中华五千年

纪事本末

宁可 主编

主　　编　宁　可

常务编委　蒋福亚

编　　委（以姓氏笔画为序）

宁　可　刘振岚　杨生民　邱远猷　邱树森　陈绍畴
张海瀛　林健柏　顾全芳　翁俊雄　蒋福亚

主要撰稿人（以姓氏笔画为序）

王　才　王佩琏　史金波　宁　欣　刘　庆　刘振岚
杨生民　邱远猷　邱树森　宋　杰　陈永禄　陈绍畴
陈隆涛　张正明　张桂萍　张海瀛　林健柏　周　昕
周兴旺　孟繁清　施　红　顾全芳　秦秀芳　翁俊雄
殷常符　高春平　高凯军　董增刚　蒋福亚　滕文藻
戴　冠

序

“史，记事者也。”《说文解字》对史的解释，说出了史学的基本对象与某些基本功能。

“事”，不仅包括历史上的事件，也应当包括历史上人们的活动及其心态、思想，还应当包括历史现象、关系、制度、结构、运动、过程等等。也就是说，人们历史活动的全部。

但是，对“事”一般都作狭义的理解，即专指历史事件，也就是历史上发生的明显可见的大事。相对于那些深层的、长时期的、细微的、缓慢进行着的、分散的、不断重复的、几乎是默默无闻的历史活动，例如人们的生产，历史事件呈现出表层的、短期的、巨大的、激烈的、集中的、一发不再现的、鲜明的特色。因此，人们的诸多历史活动中，历史事件最为瞩目。

历史活动是在时间的长流中进行的，而历史时间进程的节奏似乎并非匀速。历史事件，尤其是那些重大的历史事件，往往使那些在长时期里仿佛停滞甚至静止的历史进程突然加速或者倒退，或者发生重大的曲折，也使那看似平淡不显眼的历史进程陡然发生急剧的变化，发出耀眼的闪光。它们往往是历史诸多方面运动的综合集中的反映，是历史深层变化的界标与契机。不仅如此，历史事件又是历史偶然性和个别人物发挥作用的最佳场所，常常充分显示了历史的复杂、丰富、多变，甚至难于测度。

历史事件有不同的类型，有的是那种激起全体人民、整个民族、各个阶级的重大活动，有的则仅限于统治阶级或其上层。这些事件的作用范围与深度各不相同，影响的时段也各不一样，有的只对它所在的那个时代，有全局或局部的影响，有的则影响长远，对历史进程的某些方面乃至全局打上印记，甚至今天还能觉到。

这些明显的、短期的、凸现的历史事件，多属政治（包括军事）方面。这也正是过去的历史著述为何以事件记述，特别是以政治军事事件的记述为其主要内容的原因。

因此，人们对历史的认识首先就瞩目于历史事件及在其中活动的历史人物，这是很自然的，也正因为如此，传统的史学也往往以表述历史事件及在其中活动的人物为主。像中国各种史书体裁中主要的纪传体和编年体，就是如此，至于“纪事本末”这一体裁，就更是专以事件为主体的了。

中国传统史学认为史学的功能在于通过历史事件的记述以“垂戒立训”，即一方面提供历史活动成败得失的经验教训，作为后来者从事现实活动时的参考、借鉴，乃至指导。即所谓“以史为鉴”。另一方面，则是在于通过大量历史事例提供人们的行为准则，实现历史的教育作用，

即所谓“寓褒贬,别善恶”。历史事件往往首尾毕具,情节分明,人物言行凸现,是提供经验和进行教育的最好材料。这也是中国传统史学重视事件的一个原因。诚然,中国传统史学所企图提供的经验教训,主要是统治者统治的经验教训,其所提供的行为准则,也主要是统治者所需要的特别是儒家所宣扬的道德伦理。这是它的时代与阶级的局限。但史学功能确乎具有总结历史经验教训与进行教育的内容,并不因过去的统治阶级利用它来为自己的利益服务而有所削弱或淡化。而最好的材料也仍然是历史事件和事件中活动着的历史人物。

今天我们对历史的认识已不仅限于历史事件,而是扩展到了人类历史活动的各个方面、各个层次、各个时段,我们对史学功能的认识也不仅仅简单地限于“垂戒立训”,而主要是经过对历史的认识,了解历史的趋势、历史的规律,以便更自觉地、更科学地来认识世界、改造世界。这并不意味着对历史事件的认识在全部历史认识中的地位有所降低,相反,由于我们对历史认识的扩展与深化,而会更加体味到历史事件在人们全部历史活动中所起的作用,也使我们对历史事件的所由形成、演变和结局有了更深入的认识。

正因为这样,今天人们对认识历史事件的需要与兴味,迄未少减。目前历史著述的体裁常是整合论述历史活动诸多方面的章节式,或分别论述历史事件各个方面的分类式,或者是二者的结合,但专述某类历史事件或撰写人物的著述也不在少。

有鉴于此,我们采取传统的纪事本末体形式,编纂了这部带有工具书性质的《中华五千年纪事本末》,选择从远古到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期间的历史事件1216件,分别作出比较详细的记述。所选择的,不是也不可能是所有的历史事件,更不可能是五千年中国历史的全貌,而主要是我们所认为的在中国历史上是重大的而且对当时与后世有影响的那些事件。根据历史事件本身所具有的特点,一如传统的纪事本末体,所选择的事件更多的是在政治与军事方面。人物的活动则结合在事件记述之中。至于属于制度、现象、关系、结构等方面,由于不是事件或难于成为事件,则不列入。这样,从反映五千年历史的全貌来看,它自然有很大限制,但也许正因为如此,就它所涉及的范围而言,也许更能给人一个清晰的印象。

就每一历史事件而言,主要记述事件本身,做到首尾毕具,过程清晰完整,尽量详明。对事不加论议,当然也会从叙事中见到作者的观点。叙事力求具有科学性、准确性和稳定性,以期提供可靠的、详细的知识和材料,使读者对这些历史事件有一个准确的了解。即使对专门的研究者来说,也希望它可以作为了解这些事件的基本材料。

编撰者都是对所撰写的那个时期的历史学有专攻。有些条目就是自己的研究成果,其它条目也大都吸取了已有的研究成果。我们希望这部带有工具书性质的书,不仅具有知识性、科学性,而且具有学术性。

自然,一部涉及五千年中国历史的书,无论在体例上、取材上、叙事的详细上、叙述内容的完整准确上,乃至作者的观点上,不可能没有问题或缺失,我们期待专家和读者的批评。

宁　可

1995年3月

编 辑 说 明

一、《中华五千年纪事本末》是以时间为序，立条列述中国历史上重大且对后世有影响的事件的一部工具书。起自传说中的炎黄，迄止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全书共收1216条，按时间顺序排列。

二、每一事件主要叙述事件本身，必要时兼及其渊源与此后的发展。

三、叙事力求科学性、学术性、准确性和稳定性。极少数条目采诸说并列的方式。

四、本书采取编委负责制，编委均系主要撰稿人，具体分工如下：

杨生民　传说时代、夏、商、西周、春秋、战国、秦、两汉
蒋福亚　三国、两晋十六国、南北朝
翁俊雄　隋、唐、五代十国
顾全芳　宋、辽、金
邱树森　元
张海瀛　明、清(鸦片战争前)
刘振岚　清(鸦片战争后)、中华民国(五四运动前)
林健柏　陈绍畴　中华民国(五四运动后)

五、为方便读者，本书附有历史人物索引，按姓氏笔画排列。

六、本书撰写过程中，参阅了已出版的诸多论著，恕不一一注明。

七、本书不足或错误之处在所难免，敬请学者、专家和广大读者提出批评。

1995年3月

目　　录

传说时代

夏、商、西周

春　　秋

战　　国

秦

两　汉

三　国

两晋十六国

南北朝

隋

唐

五代十国

宋、辽、金

元

明

清

民 国

附录：历史人物索引

传 说 时 代

涿鹿之战

传说中炎帝、黄帝与蚩尤之间发生的一次战争。

炎帝，号神农氏，姜姓，生于姜水（又称岐水，在今陕西岐山东）。神话传说中炎帝牛头蛇身，可能是以牛为图腾的氏族。从活动地区看，炎帝可能是古代羌族的一支。号神农氏，说明主要是从事农业的部落。炎帝族的一支烈山氏（厉山氏），活动在今湖北随州市一带，烈山氏是烧山种田之意，会种谷物、蔬菜，夏以前就被奉为稷神。黄帝，少典之子，姓公孙，名轩辕（天鼋），号有熊氏，可能是以熊为图腾的氏族，又号缙云氏、帝鸿氏。黄帝住在涿鹿地方的山湾里，过着迁徙不定的游牧生活。蚩尤，传说是九黎族的首领，有的学者认为九黎就是九夷，所以蚩尤是东夷族的首领。蚩尤兄弟81人，应是81个氏族的酋长。九黎有九个部落，每个部落又有九个氏族，是一支很大的势力。传说九黎族兽身人言，铜头铁额，头上有角，是很强悍的部落。九黎族活动的地区在今黄河下游的山东与河南东部地区。

在涿鹿之战前，蚩尤与炎帝族发生冲突。关于这一冲突有两种传说：一说蚩尤逐8世炎帝（榆罔）或曰逐后世炎帝（参卢）自立。促使炎、黄联合，对付蚩尤。一说炎帝族的一支共工氏，向东发展，活动于今河北南部与河南北部，与向西发展的九黎族首领蚩尤发生冲突，大战于太行山东侧，共工氏九个氏族居住的九块地方被攻占。在危急情况下，共工氏“乃说于黄帝”即向黄帝求援，双方结成联盟，共同抗击蚩尤。涿鹿，一说在河北省怀来县，一说在河北省涿鹿县。涿鹿之战时，黄帝族联合神皇（神农）余部、力牧（西羌首领），调动各胞族中以熊、罴、貔、貅、貙、虎为图腾的各氏族为先锋。传说蚩尤以“金”（铜）做兵器，武器好，黄帝族处于守势。黄帝“使应龙蓄水”抵抗蚩尤。蚩尤则请来风伯雨师，使“天大晦冥”，雷电交作，冲破了应龙水阵。危急时，黄帝又请来旱神女魃，天气放晴，终于战败蚩尤。蚩尤战败南逃，被黄帝擒杀于冀州之野。黄帝族的前锋追到今山东一些地方，所以有黄帝“封泰山”的传说。打败蚩尤之后，传说黄帝让少昊（少皞）统领夷人各部。

蚩尤战败后，九黎族一部分退回东南地区，一部分留在北方建立了黎国（山西长治西南），后为周文王所灭，一部分做了炎、黄族的俘虏。 （杨生民）

阪泉之战

传说中炎帝族与黄帝族之间进行的一次战争，黄帝族获胜后势力向黄河流域和江、淮流域发展。

黄、炎联合打败蚩尤之后，联盟破裂。这时“炎帝欲侵凌诸侯”，而“诸侯咸归轩辕”黄帝。于是黄、炎二族，发生了激烈冲突，双方大战于“阪泉之野”。阪泉在今河北省怀来县境。经过三次战争，黄帝取得了胜利。这次战争后，黄帝族向南发展，进入黄河中游，并向汉水、长江流域发展。在向南发展过程中，黄帝族打了很多仗，传说“五十二战而天下咸服”。此后，黄、炎二族联合了，传说中黄、炎是兄弟。黄、炎被认为各族共同的始族。

传说中炎帝族及其后裔有四支：一支是烈山氏，活动在今湖北随州地区；一支是共工氏，活动在今河北南部和河南北部；一支称四岳，活动在河南西部和陕西东部，尧舜时还有很大势力；一支在山西汾水流

域，这支据说有沈、姒、蓐、黄四部，奉汾水之神台骀为始祖。传说炎帝神农氏，木制耒耜，教民农耕。神农尝百草的传说至今脍炙人口。炎帝族在我国古代农业发展中曾做出过杰出贡献。

传说黄帝有子25人，得姓者14人，因各有两人同姓，所以得12姓。所谓得姓，可能是繁衍子孙多，建立了新的氏族。12姓为：姬、酉、祁、己、滕、箴、任、荀、僖、姞、儇、依。尧以前黄帝族的著名首领有颛顼、帝喾，少昊。颛顼，高阳氏，黄帝之孙，黄帝次子昌意之子，居帝丘(河南濮阳西南)。舜、禹和南方楚国的王族都是颛顼高阳氏的后裔。帝喾，高辛氏，黄帝之孙，黄帝长子玄嚣之子。传说少昊与尧、商族的始祖契、周族的始祖弃都是帝喾之子。少昊，名挚，是黄帝族向东发展的一支，嬴姓，居曲阜，与夷族杂居，接受了夷族文化。周族始祖弃，姬姓，相传为帝喾元妃所生，是黄帝族的嫡系，活动在今陕西南部和山西南部地区，到周代这一支发展到极盛时期。一些戎、狄部落，如骊戎、狐戎也是姬姓；白狄中的鲜虞，后来建立了中山国也是姬姓。传说中的夏后氏，姒姓，戎人，也是黄帝的后裔，有的记载称大禹为“戎禹”。据说夏后氏原在今河套地区，其中一支南下到河南西部。留在原地的匈奴，也是夏后氏的苗裔。黄帝族有很多发明创造，如仓颉造字，黄帝妻子嫘祖养蚕，共鼓与货狄做船，大挠作干支，隶首作算数等等。

炎帝族、黄帝族(包括一部分戎、狄)与黎、夷、苗的一部分融合形成为后来的华夏族，在此基础上又发展为汉族。（杨生民）

尧舜禅让

传说尧选拔舜做继任人，是通过选贤任能的原则选拔的。

尧，号陶唐氏，帝喾之子，黄帝后裔，建唐国，都平阳(山西临汾)，尧当部落联盟首领时称“帝尧”。据说尧16岁即位，在位70年，有心让四岳替代自己，对四岳说：你能顺应天命用事，可入处我位。四岳认为自己不够条件，如替代尧，有辱帝位。于是尧在所有贵戚、疏远、隐匿者中间选拔继任人。大家说民间有个光棍叫虞舜的人可以。四岳介绍了舜能以孝道处理父母兄弟之间的关系等等情况，尧表示可以试试看。在以后的三年中，尧经种种试验，认为舜确实好，让他摄行政事。这时，舜把“四凶族”首领的罪行报告给尧，在尧同意下，把他们流放到边远地区，以惩戒做坏事的人。从此，天下人都服了。尧知道自己的儿子丹朱不成材，所以就把天下授给舜去治理。尧死后，舜为让位于尧子丹朱，自己迁居到都城南边。然而，诸侯不朝拜丹朱而朝拜舜，打官司的不找丹朱而找舜，人们不讴歌丹朱而讴歌舜。在此情况下，舜接替了尧的职位，称“帝舜”。舜，号有虞氏，黄帝之孙颛顼的后裔，出身于低微的庶人。舜继尧位后，通过部落联盟议事会，进行了改革。他任用高阳氏才子“八恺”管教化、高辛氏“八元”管土地、商朝始祖契管人民、皋陶作刑、禹治洪水等等，使部落联盟出现了新气象。舜61岁代尧，在位39年。舜的儿子商均也不成材，所以在征询部落酋长们的意见后，让禹摄行政事。舜死后，禹也让位于舜子商均，然而诸侯都归服于禹，这样禹就继承了舜的“帝位”。

尧、舜禅让，古代有不同的传说。有的传说讲“舜囚尧”，不让尧与其子丹朱见面。有的又说，舜凭借实力“南面而立，尧率诸侯北面而朝”，尧向舜屈服，舜夺得了“帝位”。而禹替代舜则是“禹逼舜”的产物等等。

尧舜禅让的传说，反映了部落联盟首领还没有国王的权威，所以在选择继任人时，要征询部落酋长意见，按才干、贡献和各部落实力大小等等因素来选拔。（杨生民）

大禹治水

传说中禹组织领导民众与洪水斗争的事迹。

相传尧做部落联盟首领时，发生过一次特别大的洪水，洪水滔滔，漫山遍野，下民忧苦。尧征求治水人选时，部落氏族的酋长们都推荐鲧。尧认为鲧会违负教命、毁败善类，不主张用鲧。主管四方部落氏族事务的酋长四岳说：没有比鲧更合适的人选了，就让鲧试试吧！尧听从了大家的意见，让鲧负责治理洪水。鲧采用“堕高堙庳”的办法治水，也就是把高的地方铲低、把低的地方填高，用堵水的办法来治理洪水。结果，鲧用了9年时间，以失败而告终。这时尧因年老，让舜摄行政事。舜在巡察中看到鲧“治水无状”，违负教命，毁败善类，就把鲧流放到羽山(江苏赣榆县西南)，后来又诛杀了鲧。天下人都认为舜这样处理鲧是正确的。

尧死后，舜正式做了部落联盟首领，征求治水人选，四岳回答说：伯禹担任司空(即司工，管理工程的官)，治水定能成功。舜在感叹之余，就任命禹负责治理洪水。

禹是夏部落的首领，所以称夏禹，又名文命，姒姓。禹之父名鲧，鲧之父是黄帝之孙颛顼的后裔。禹幼年时随父鲧迁居于今河南登封县的嵩山(当时叫

崇)下,尧时封夏伯,所以又称禹为伯禹。禹负责治水后,在舜同意下,请契、后稷、皋陶三位酋长协助治水,后来又请益(伯益)参加治水。这几位都是部落联盟领导机构中的成员。契(商族始祖)在部落联盟机构中担任掌管教化的司徒。后稷(周族祖先)担任农官。皋陶(少昊后代)担任狱官。益(秦国祖先)担任掌管山林鸟兽的虞官。禹亲自到各地实地勘察,“定高山大川”,竖立标记。然后,制定了“疏川导滞”的治水方针。所谓“疏川导滞”就是通过疏通河道使积滞的洪水畅通无阻地流入大河、大海,按疏导的办法治水。禹带领民众,艰苦奋斗了 13 年,终于取得了成功。治水时,禹开挖田间的沟洫,既能通水灌溉,又能排除积水。治水时,禹让益给民众稻种,让种在低湿的地方。后稷又给民众难得的食物,并调余粮给缺粮地方的民众。此外,禹还察看各地土壤和山川特点,让按其相应的物产缴纳贡赋,这也方便了民众。禹治水成功后,出现了“万民乃定”的安居乐业的局面,出现了凤凰来朝、百兽起舞的盛世。

在治水过程中,禹手执耒锸,参加劳动,率先为民众做出榜样。十多年治水的艰苦生活,大禹人瘦了,小腿上的汗毛磨光了。大禹一心治水,三次路过家门都没有回去看一看。传说禹治理了“名川三百,支川三千,小者无数”。为表彰禹治水的功绩,舜给禹颁赐了“玄圭”。“玄圭”是一种用黑色玉石琢磨成的礼器。

禹是中国历史传说中治山河、平水土、定九州的英雄人物,几千年来一直为人们所称颂。孔子说:禹啊!我简直找不出他一点可以非议的地方。他住的宫室那样简陋,但却把力量用于治洪水、修沟渠、发展农业。东周人刘定公在河南洛水旁说:如果没有禹治理洪水,我们这些地方只有鱼,哪里还有人呢?

(杨生民)

禹伐三苗

传说中禹做华夏族部落联盟首领时与南方苗蛮部落进行的一次战争。

三苗是南方苗蛮族组成的部落联盟,活动在江、淮、荆州等地区。据说当时三苗作五刑、用刑罚,已开始发生阶级分化,是比较先进的部落。传说尧时三苗的一部分已越过长江到达今河南南部和湖北西北部一带活动。尧曾和三苗在丹水(从河南流入湖北注入汉水的丹江)进行过战争,三苗被尧打败,表面归顺。舜摄行政事时经尧同意把部分三苗作为“四凶族”之一迁于三危(甘肃敦煌东南,一说甘肃陇西县西北)。舜做部落联盟首领时,一方面把一部分三苗迁于北方,同时试图通过与南方三苗交往,改变其习性。但这些措施收效甚微,三苗在江汉流域的势力仍然很大。禹治理洪水时,三苗也参加了。治水成功后,参加治水的各氏族、各部落都受了封赏,唯独没有给三苗封赏。三苗不服又叛,禹想讨伐,舜不同意,主张以德教化。舜用了三年时间,以德感化三苗,同时加紧练兵,操练武舞。武舞即干戚舞。古代练兵,士卒一手执盾牌,盾牌叫干,一手拿一种上面插着羽毛的斧形兵器,操练时奏乐,动作整齐有节奏,叫执干戚舞,又叫武舞。三苗见舜、禹做了文、武两手准备,无隙可乘,只好归服。

禹任部落联盟首领以后,三苗反叛,向禹发动进攻。传说当时三苗内部非常混乱:小人当权,天变灾异,妖魔四起,血雨下了三天,祖庙里出现了青龙,地裂开涌出了泉水,五谷发生了变化,民众震惊异常等等。禹决心讨伐三苗,出兵前在“玄宫”(祖庙)举行了隆重祭祀,祈求上天和祖先神灵保佑战胜三苗。祭祀之后,又举行了誓师大会。禹在会上说:你们大家听我讲话,不是我喜欢打仗,而是苗人前来攻掠,老天爷要惩罚苗人。我现在就率领你们众邦君长,去征伐他们。这次战争延续了一段时间,禹率大军打到江、淮流域。在一次战斗中,禹军射死了三苗的首领,苗师大败而逃,以后三苗就逐渐衰亡了。这次战争之后,南方苗蛮部落在很长时间内构不成对北方的威胁。

(杨生民)

夏、商、西周

夏朝建立

禹子启建立夏朝的事迹。

禹战胜三苗后，"四方归之"，北方和东方的许多氏族、部落都归服了。为巩固统一，禹到东南的夷族聚居区去巡视，在涂山（安徽蚌埠市西）大会诸侯。四方来朝会的氏族、部落酋长多至"万国"，并带来了朝见的礼物玉、帛。大会后，禹把各地进贡的金（铜）铸了九个鼎，象征着统一了九州万国。过了几年，禹再次巡视东南，又在苗山（今浙江境）大会诸侯。在这次会上，禹诛杀了迟到的防风氏。诸侯震慑于禹的威德，都说杀得对。这时的禹已具有了国王的权威，部落联盟机构已逐渐向国家机构转化。虽然如此，按"禅让"的传统，禹仍举荐皋陶做继任人。皋陶死后，又举荐伯益做继任人。益虽掌握了国家政事，但由于辅佐禹时间短，资历不深，所以禹死后，发生了诸侯不朝拜益而去朝拜禹子启，不拥戴益而拥戴启。益感到自己不孚众望，就在禹的三年丧礼完毕之后，让位于启。有的传说说，禹死后启与同党用武力攻打益，夺取了王位，最后导致了"益干启位，启杀之"。古代的"禅让"制度遭到了破坏，父子、兄弟相传的王位世袭制度确立了。禹传子，家天下。这是古代中国历史上的一个重大变革。

启夺得王位后，同姓有扈氏（今陕西户县）不服，发兵攻启。两军在甘（陕西户县境，一说河南郑州西的甘水旁）大战。战前启声讨有扈氏的罪行说：有扈氏违侮天命，怠弃政事，上天要灭绝他，大家要齐心协力执行天的惩罚，去消灭他。誓师后，启率军与有扈氏大战，有扈氏战败而逃。夏军追到扈地，诛杀了有扈氏的首领，罚整个氏族为牧奴。

启打败有扈氏后，召集各地的部落酋长在钧台大会，表示正式继位，各地诸侯纷纷前去朝贺。启怕夷族反对，就把国都从阳翟（河南禹县）迁到安邑（山西夏县西）。这时禹的幼子武观不服，启把他流放到西河（河南滑县、浚县一带）。武观到西河后，蓄积力量，3年后发动叛乱。启就令彭国（江苏徐州市）的方伯名寿的率兵讨伐。彭伯寿据说是尧时封在彭的彭祖之后，当时是一个部落大酋长。武观领兵抵抗，不敌，最后投降。彭伯寿把武观带回交给启，启诛杀了武观。

经过这些斗争，启终于巩固了统治，当了夏国的国王，成了统一天下的天子。夏王朝是我国历史上第一个王朝，据记载自启至桀，共传13世，16王，历172年或132年，约在公元前21世纪至前16世纪。周人确认夏和商都是"受天命"的正统王朝。夏朝建立说明我国已正式进入阶级社会。相传禹曾设官制、制定刑法、建立军队。夏朝分给每户农民50亩土地，农民把收入的十分之一作为贡赋上缴给国家。归服夏王朝的氏族、部落，也要按自己的出产缴纳贡赋。传说禹曾把全国九州的土地分为三级九等，规定了每等缴纳贡赋的标准。这些都是国家产生的重要标志。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考古发现了一种二里头类型文化。这种文化遗存遍及河南西部和山西西南部，是介于龙山文化和商前期文化之间的一种文化，同传说中夏代活动的中心区正相符合。在这种文化的遗址中，发现了石镰、石刀等农业生产工具和骨蚌器，还发现有爵、刀、镞、铃之类的小型青铜器和铸铜手工业作坊遗址。遗址中出现了明显的阶级分化和

屠杀俘虏、奴隶的证据。据推断这种文化就是夏朝文化的遗存。　（杨生民）

太康失国与少康中兴

启子太康失国，太康孙少康又恢复了夏王朝，故称少康中兴。

启死后，子太康继位。太康不理国事，不关心民众的生产、生活，只知打猎玩乐。他去洛水南打猎，一百多天不归。夷族方伯后羿乘其未归，拥兵占据夏都，拒绝太康返国。后羿是有穷国的国君，传说是尧时以善射著名的羿的后代。羿在禹时被封于鉏（河南濮阳西南）。后羿得祖传，射箭百发百中。太康在洛水南岸打猎返回时，无法进国都，诸侯也不救援，只得向东流亡，最后到现在河南太康县住下，病死于此。后羿逼走太康后，把有穷国的国都自鉏迁至穷石（河南巩县），并利用夏民对太康的不满情绪夺取了夏政权。后羿也不关心民众的疾苦，只知凭自己善射的本领，打猎游玩。后羿有个叫寒浞的臣下，不务正业，只知吹拍献媚，深得后羿宠信，掌握了有穷国的大权。寒浞收买了后羿的亲信随从，在后羿打猎出游时杀死后羿，夺取了政权，霸占了后羿的妻妾和财产，并生了两个儿子，大的名浇，小的叫豷。为巩固统治，又把浇封在过（山东掖县北），把豷封在戈（河南杞县和太康地区）。传说寒浞极残忍，杀后羿后，把肉煮了，强迫其子吃，不吃，就杀其子。

相传斟灌氏和斟鄩氏是夏王朝封的两个姒姓诸侯国。斟灌氏封在今山东寿光县，斟鄩氏封在今河南巩县。后羿代夏后，斟鄩氏被迫迁至今山东潍县与斟灌氏为邻。后羿驱逐了太康之后，其弟仲康就在一部分贵族、臣下保护下，逃到斟鄩，建立了一个夏族小朝廷。仲康死后，在斟鄩的夏族小朝廷就立仲康子相继任为王。这就是夏后相。夏后相在后羿武力威逼下又迁到帝丘（河南濮阳）。在这里，相得到斟鄩氏和斟灌氏的帮助，势力又开始发展。寒浞见相势力发展，就让他的大儿子浇率师灭斟灌，次年又灭斟鄩，并直捣帝丘，杀相。相被杀时，相的妃子后缗怀孕在身，从城墙的一个洞中逃出。后缗逃出后直奔娘家有仍氏（在今山东济宁），不久生了个儿子，就是少康。有仍氏原是夏朝的诸侯国，对少康特别爱护。少康长大后，当了有仍氏的牧正（主管畜牧的官）。没多久，被浇知道，就派人去捉少康。少康就从有仍氏逃到有虞氏（在今河南虞城）。有虞氏是舜的后裔，当时的当政者叫虞思。虞思对夏后氏亲善，对少康热情接待，让少康做庖正（管理膳食的官），并把两个女儿嫁给少康，又给了10里见方的土地和500人做部众。少康就在此广布恩德，团结民众，收集夏王朝的臣民，准备复国。少康还派了一个叫女艾的人到城中探听寒浞方面的情况，派自己的儿子季杼到戈城去诱惑豷。

寒浞杀羿时，夏王朝的一个叫伯靡的臣下趁机逃走，逃到有鬲（山东德州北）。伯靡在有鬲氏帮助下，准备灭寒浞。当浇灭了斟鄩氏、斟灌氏时，伯靡就招集这两国的士卒。这两国的人与寒浞有仇，同仇敌忾。这使伯靡很快便训练出一支有战斗力的队伍。伯靡又以恢复夏王朝相号召，得到了部众拥护。伯靡率领这支队伍一下子打进有穷国的国都穷石，杀了寒浞，并从有虞氏接少康回到夏邑。少康又命伯靡到过城杀了浇，又命儿子季杼杀了豷。在这种情况下，伯靡和夏朝贵族就拥少康为王，“复禹之迹，祀夏配天，不失旧物”。少康成了夏朝的中兴名王。

夏朝自太康失国到少康中兴，经三代人约40年的斗争，对全国的统治才算巩固。　（杨生民）

商 汤 灭 夏

商汤率兵灭夏建立商朝的事迹。

夏王朝传到孔甲时，逐渐衰落，诸侯叛夏。孔甲下传三世至履癸，又名桀，就是夏朝最后一个国王，我国历史上有名的暴君。桀，不理政事，好色，嗜酒。有施氏（山东滕县）在桀以前就反叛不服，怕桀讨伐，就把叫妹喜的美女进献给夏桀。桀在今河南洛阳大修宫殿、瑶台。为此，征调民夫、奴隶，大兴土木。建成后，桀与妹喜在此日夜淫乐。夏桀把自己比作太阳，平民、奴隶却说：你这个太阳什么时候灭亡啊！愿与你同归于尽。为显示天子的权威，桀在有仍（山东济宁）大会诸侯。有缗国（山东金乡）的首领不等散会就回国去了。桀大为恼怒，率领参加朝会的诸侯、方伯征伐有缗。灭有缗后，把有缗的美女、财物、人口，尽数掠回夏都。诸侯们见桀如此，叛夏的更多了。相传夏桀有个管记事、天文、历法的太史叫终古，多次进谏，桀不听，终古最后逃走，投奔了商汤。夏桀有个大夫叫关龙逄也多次进谏，劝桀效法大禹爱惜民众等等。桀听不进去，反而杀了关龙逄。从此，言路闭塞，桀愈骄横，终为商汤所灭。

商人，子姓。传说商的始祖叫契，契母简狄吞燕（玄鸟）卵而生契。从契到汤传十四世。契在尧舜时做司徒，佐禹治水有功，尧舜封契于商（今河南商丘县南）。夏朝建立后，封契子昭明为商侯。昭明的儿子“相土作乘马”，发明用马驮东西、拉车。相土的孙子冥在少康时做夏朝的水正（管治水的官），治水时被

水淹死，是位治水英雄，死后被奉为水神，称“玄冥”。冥的儿子“王亥作服牛”，用牛拉车、驮东西。王亥曾赶着牛羊到有易氏（河北易县一带）部落经商，被有易氏杀害。王亥儿子上甲微继任商侯，替父报仇，灭了有易氏。此后，国势日渐强大。传到汤时，商已是夏王朝东边诸侯国中的一个强国。汤见夏桀残害民众，侵暴诸侯，所以在表面上臣服于夏，同时又积极做灭夏的准备。

汤在灭夏的过程中，伊尹和仲虺起了重要作用。汤任用仲虺、伊尹为左、右相。伊尹原是有莘氏（河南开封附近）的奴隶，汤娶有莘氏之女为妻，伊尹作为陪嫁奴隶来到商。汤发现伊尹是个人才，就让他当了右相。仲虺祖先叫奚仲，禹时曾任车正（管造车的官），后来世代在夏做官，负责监造车子。桀时诸侯、臣下叛夏，仲虺就在这时投奔汤，汤任用他为左相。

汤为削弱夏的势力，先灭邻国葛。汤都亳（河南商丘北），邻近的葛（河南宁陵北）是夏的属国。古代祭祀是个大事，葛伯很长时间不祭祀。汤以助祭为名，送牲畜牛羊给葛伯，又派人帮助种田。葛伯派人杀死为助耕人送饭的孩子，抢走酒饭。汤以此为借口，出兵攻灭葛国。葛国民众早就怨恨葛伯，归顺了商。汤灭葛后，桀召汤入朝，并把汤禁在夏台（夏朝监狱，在钧台）。伊尹、仲虺就搜集珍宝、美女献给夏桀。桀收到礼物后，释放了汤。汤回来后，归顺汤的诸侯、方伯越来越多。汤进一步又率兵攻灭了韦（河南滑县东）、顾（山东鄄城东北）、昆吾（河南濮阳境）。据说汤“十一征而天下无敌”。这三个夏属国的灭亡，就为灭夏准备了条件。尤其是昆吾，是个较大的方国，与夏的关系很亲近。汤灭了昆吾，使夏失去了东方的屏障和依靠力量。

汤在取得这些胜利之后，按伊尹的谋划，停止了对夏朝的贡纳，以观察形势。桀为此大怒，令“九夷”起兵攻汤。汤因此又恢复了对夏朝的贡纳。次年又停止了对夏朝的贡纳。桀又令“九夷”起兵伐商，“九夷”不听指挥。汤和伊尹看到“九夷之师不起”，桀陷于孤立，立即起兵伐桀。两军在鸣条（河南封丘东或山西安邑境）大战，桀军大败。桀领败兵逃到三㚇（山东定陶北）。汤率军东进讨伐三㚇，杀三㚇伯。桀又逃到南巢（安徽寿县东南），后来就死在那里。

汤灭夏后建立了商朝。商朝的奴隶制得到了进一步发展，疆域也比夏代大，文化发展程度也远远高于夏代。商朝从汤到纣，共传 17 代，31 王，历时六百余年，约当于公元前 16 世纪至前 11 世纪。

（杨生民）

盘庚迁殷

商朝国王盘庚把国都从奄（山东曲阜）迁至殷（河南安阳西北）的事迹。

盘庚是商朝第十代、第二十位国王。汤灭夏至盘庚，国都曾五次迁徙，中丁由亳迁至嚣（即隞，今河南荥阳东北），河亶甲迁至相（河南内黄东南），祖乙迁至邢（即耿，今河南温县东），南庚迁至奄，盘庚又迁至殷。此后，至纣亡国，历 273 年，再未迁都。

盘庚继位时，商朝日渐衰弱。衰弱的一个重要原因是争夺王位的内部斗争所造成的。商朝建立后，嫡长子的王位继承制还未确立。商王死后，王位一般由弟继承，没有弟弟才传儿子。商王又实行多妻制，一个商王生许多儿子。这样兄弟多，为继承王位，争夺不休。自中丁至阳甲九个商王，为争王位，造成九世混乱，使诸侯不来朝贡。盘庚继位后，离商都奄较近的彭、韦二国，与商关系一直不错，已都不来朝贡，更不用说远在西北地区已经强大起来的各个方国了。如果让这种情况发展下去，商朝有灭亡的危险。另外，商都奄偏东，不利于控制四方诸侯，尤其是不利于控制西北方国。因此，盘庚为“去奢从俭”，缓和内部矛盾，使商朝强大，决心迁都。

经过精心挑选，盘庚决定把国都迁至殷。然而，迁都却遭到一部分贵族和受他们煽惑的平民的强烈反对。盘庚就把他们召到王廷，进行训话。盘庚利用商人敬畏祖先、迷信鬼神的思想习俗，处处以先王、上帝进行威吓。盘庚向他们说：反对迁都违背了先王和上帝的意旨，必然要受到先王和上帝的严厉惩罚。如果谁不与我一同迁都，我就要杀戮他，灭绝他，不让孽种流传。在盘庚的恫吓下，这些贵族和平民就渡过黄河，迁到了殷地。迁到新都后，一些诸侯、方伯前来朝贺。这时盘庚发现一些贵族、大臣又散布流言蜚语，发泄不满。为制服他们，盘庚隆重地对祖先、上帝进行了一次祭祀，并用龟甲进行了占卜。祭祀过后，盘庚召集他们训话说：你们问我，为何震动万民迁都。迁都！这是上帝要恢复我们祖先的美绩到我们这一代。我急于敬奉上帝的旨意来拯救民众，所以迁于新都。我不是不知道人们有意见，是因为上帝要赐惠给我们，我不敢违反占卜，所以只能这样做。你们要服从这神龟的灵验占卜，……不论同意与否，你们都必须服从。后来，盘庚发现还有人造谣惑众，反对迁都。盘庚又第三次对这些人进行训话说：如果再擅自用谣言煽惑人心，恐吓民众，企图闹事，我有力量加以扑灭，这是你们自己惹出的祸患，不要怪我错待了

你们。盘庚通过这些斗争，稳定了人心，团结了内部，使迁都得到成功。

盘庚迁殷是商代历史上的大事。迁都后共经13王，历273年。《史记》上说盘庚迁殷后：行汤之政，然后百姓安宁，殷道复兴，诸侯来朝。迁殷，使商朝得到复兴，使我国奴隶社会发展到了一个新的阶段。同时，也为我国以后历史的发展奠定了一个坚实的基础。（杨生民）

武丁盛世

商王武丁统治时期，商朝出现了昌盛的局面，故称武丁盛世。

武丁是盘庚迁殷后的第四任国王，盘庚的侄儿。盘庚死后，由弟小辛继位，小辛之后由弟小乙继位，小乙之后由其子武丁继位。武丁青年时曾生活于民间，与"小人"一起参加农业生产，"知稼穑之艰难"。武丁在位五十余年，励精图治，开创了商朝历史上新的强盛时期。

甘盘和傅说（音悦）是辅佐武丁的名臣。甘盘是位隐居在虞（山西平陆一带）的有学问的人。武丁在民间时去拜访，发现甘盘学识渊博，历史知识丰富，就拜甘盘为师。后武丁为国王，就请甘盘当大臣。傅说是奴隶，武丁想重用他，自称梦见圣人叫说，画出相貌，令百官到处找寻，果然在罪徒中找到了。商人迷信鬼神，武丁让傅说做相，贵族们不敢反对。武丁得到傅说，"举以为相，殷国大治"。

武丁对农、牧业生产十分关心。武丁时期天旱祈雨，占卜求雨的卜辞很多，"求年"、"受年"的卜辞也不少。这是通过占卜祈求神灵和祖先保佑年成好，农牧业丰收。武丁时期的卜辞中有"王大令众人曰：劦田，其受年"，说明他关心、重视农业生产。在武丁关心、重视下，农牧业生产得到了进一步发展。

武丁曾与在商朝西北的𢀛方、土方、鬼方发生过战争。𢀛方、土方居住于今山西、陕西北部和内蒙古自治区的南部。他们不仅常常侵犯商的属国，而且还不时侵入王畿进行劫掠。武丁征伐𢀛方、土方，每次用兵3000至5000人，战争规模大。有时是武丁亲自领兵，有时则派大将领兵。武丁与𢀛方之间的战争，前后进行了十几年，最后可能是把𢀛方赶跑了。在与𢀛方战争中间，也对土方进行了讨伐，大约经过几年时间，把土方灭了。土方的国土成了商的"北土"。土方灭亡后，武丁还去巡视，卜辞中称为"王省土方"。土方的民众，一部分被俘当了奴隶，一部分归服。武丁以后，再未见到商朝征伐𢀛方、土方。

鬼方是强大的游牧部落，大约活动在今陕北、内蒙古及以北地区。武丁调动西部属国的兵力，用了三年时间，终于取得了胜利。羌方也是商朝西北方的敌人，善于养马。武丁为掠夺奴隶，对羌方大举用兵，征调兵力，有一次竟达13000人。

武丁对南方也进行过激烈的战争。《诗经》中说武丁"奋伐荆楚，深入其阻"，这是武丁在江、汉流域打了胜仗的证据。

武丁征伐过的方国和部落很多，如缶、蜀、湔方、基方和淮河流域夷人方国虎方等等。武丁平定了从商朝西北方到南方的广大地区。《诗经》中说武丁时期的商王国是"邦畿千里，维民所止，肇域彼四海"。

武丁时期，商朝统治的中心地区仍是黄河中下游地区，但其势力东到辽东和山东半岛，西至陕西和甘肃西南部，北抵内蒙古南部和山西、河北北部，南达长江流域。商朝及其属国，开垦土地，发展农牧业，促进了社会经济发展。这使商朝出现了空前强盛的局面。所谓"武丁朝诸侯，王天下，犹运之掌上"正说明了这点。（杨生民）

武王伐纣

周武王率兵伐纣灭商的事迹。

武丁死后由儿子祖庚继位，祖庚死后由其弟祖甲继位。祖甲在民间生活过，知民众疾苦，在位较贤明，商朝相对稳定。祖甲以后的商王都贪图安逸享受。最后一个商王称帝辛，名受，古代受、纣同音，所以称纣王或商纣王、殷纣王，是中国历史上有名的暴君。据说纣聪明多才，身材高大，勇力过人，能赤手与猛兽格斗。纣贪图享受，在商都以南的朝歌（河南淇县）建别都，修离宫别馆，建鹿台，里面存满了钱，又修造了叫巨桥的大仓库储满了粮食。纣又在商都以北的邯郸（河北邯郸市）、沙丘（河北平乡东北）修建离宫别馆、林苑亭台。纣又率大军讨伐东夷，俘虏了大量夷人。这都耗费了大量人力、物力，激化了阶级矛盾。

纣王好声色，嗜酒。他宠爱美女妲己，唯妲己之言是从，又彻夜饮酒。纣常用残酷的刑罚惩治臣下和诸侯。有叫梅伯的诸侯多次劝谏纣不要对臣民用酷刑，纣因此杀了他，剁成肉酱分赏给诸侯吃。九侯（封地在今河北临漳）也被剁成肉酱分给诸侯吃。鄂侯（封地在今河南沁阳西北）为九侯辩护，也被杀死制成干尸示众。西伯灭黎国（山西长治西南）后，朝野震动，祖伊想让纣改弦更张，对他说：现在很不安定，民众都想让朝廷早日灭亡，请大王想想该如何办？纣回

答说：我生来的命不是由天管吗？你说这些有什么用呢？微子是纣的同父异母兄长，因母亲不是王后没有继承王位。他深感商朝危在旦夕，几次进谏，纣置之不理。微子无可奈何，只好逃走。箕子是纣的叔父，多次劝谏纣，纣不听，就装疯混在奴隶群中，后被纣囚禁。纣的另一位叔父比干，以死相谏，纣恼羞成怒，杀了比干，还挖了心。在此情况下，商朝的一些大臣如管祭祀的太师庇和少师疆投奔了周。一些诸侯、方伯也纷纷叛商归周。

周族，姬姓，始祖弃，传说为帝喾元妃所生，善于农耕，尧时举为农师，舜时做农官，号后稷。弃的三世孙公刘，定居于豳（今陕西旬邑）。公刘传九世，至古公亶父，受戎狄逼迫，迁居于周原（陕西岐山南）。这时周人营城郭、建室屋、设官吏，开始进入阶级社会，并日渐强大。周人尊古公亶父为太王，奉他为周王朝的奠基人。古公亶父臣属于商，共同讨伐戎狄。古公亶父死后，子季历继位。季历与戎狄部落作战取得很大胜利，周日益强大。商王文丁封季历为商朝“牧师”（管畜牧的官）。为遏制周族势力，文丁杀季历。季历子昌继位，就是后来的周文王。姬昌虽臣属于商，但积极扩大自己的势力。姬昌曾被纣囚在羑里（河南汤阴北），其下属以美女、奇物、好马献纣，才被赦免。纣赐给姬昌弓矢斧钺，有权征伐诸侯，为西伯。以后，西伯昌不断发动战争，首先讨伐犬戎、密须（甘肃灵台西），又渡黄河攻灭黎国，不久又灭邘（河南沁阳西北），深入到商朝的中心地区。最后又灭崇国（陕西长安县）。灭崇后迁都于丰（陕西长安县），成为商西方的一个最强大的国家。商朝属国中有40国叛商归周。

文王死后，太子发（武王）继位，迁都于镐（陕西长安县境），积极准备灭商。武王继位的第二年至孟津（河南孟县）大会诸侯，检阅军队，做了一次伐商的军事大演习。武王即位的第四年（前1027），见纣杀比干、囚箕子，非常孤立，遂发动了伐纣战争。在这次战争中，武王率兵车300乘，虎贲（近卫军）3000人，甲士45000人，又联合了庸、蜀、羌、髳、微、卢、彭、濮等方国部落的军队，向东进发，渡过孟津，抵达牧野（河南汲县北），距纣的住地朝歌只有70里。武王在牧野誓师指斥纣的罪恶是：只听信妇言，不祭祀祖宗，不信任亲族，招集四方的罪人和逃亡奴隶。周军到了牧野，纣才发兵匆忙应战。商军的一部分精锐还在东方征讨夷人。所以纣临时把奴隶和贫穷自由民都编制起来连同军队一齐开往前线。这些人无法忍受纣的暴虐统治，反把周军视为救星。因此，商军阵前起义，掉转矛头，配合周军，进攻纣王。纣见大势已去，登鹿台自焚而亡。武王率军攻占商都，宣告了商朝灭亡和周朝建立。　　（杨生民）

周公东征

周公东征，讨伐纣子武庚和管叔、蔡叔发动的叛乱，巩固了周朝的统治。

周公，名旦，武王弟，因封邑在周，故称周公。武王灭商后，采纳周公的意见，对商遗民笼络分化又加以武力监视。于是封纣子武庚于商都，利用他统治商遗民。又把商朝王畿分为三个封区：封弟弟姬鲜（即管叔）于管（河南郑州）；封姬度（即蔡叔）于蔡（河南上蔡西南）；封姬处（即霍叔）于霍（山西霍县西南）。他们称为三监，负责监视武庚。

武王灭商后两年病死，子成王诵继位。由于成王年幼，周公旦摄政。管叔、蔡叔对此不满，就造谣说周公要谋害成王，篡夺王位。这引起了周朝内部矛盾。武庚见有机可乘，便勾结管、蔡，发动徐、奄、蒲姑、熊、盈等方国部落，进行大规模武装叛乱，企图推翻周朝，恢复商的统治。这次叛乱，声势浩大，使周朝“西土”也出现了骚动和不安。周公立即解决了内部分歧，出兵东征。经过三年战斗，周公平定了叛乱，取得胜利，杀武庚、管叔，流放了蔡叔、霍叔。这次战争胜利，巩固了周朝统治，并进一步把势力扩展到黄河下游和淮河流域。

在周公东征的过程中，俘虏了大批商遗民，其中不少是大、小奴隶主，周人称他们为“献民”，又因他们顽强反抗周朝统治所以叫“殷顽民”。要让他们服从统治，困难很大。灭纣后，武王曾考虑过，在伊水、洛水流域建立一座新的都城，以就近进行统治。周公鉴于武庚和三叔叛乱的教训，决定兴建洛邑。周统治者先把参加武庚叛乱的殷顽民，强制迁徙到洛水北岸，命令他们在那里兴建了一座新城，叫成周（洛阳东30里）。周统治者又训练编成了一支军队，驻守成周，这就是铜器铭文中常见的“成周八师”。周统治者利用这支军队镇压殷顽民的反抗，也利用他们进攻东夷和淮夷。成周是周朝统治整个东方地区的政治、军事中心。从此，周朝有了两座都城，西部的镐京叫宗周，东部的洛邑叫成周。

周统治者又把一部分商遗民迁到成周附近定居下来，告诫他们说：不杀你们，给你们房子和田地，你们要老老实实种田，臣服周朝，求得上天的宽恕！如果你们不顺应天命，就要执行天罚，灭绝你们。你们当中有好人，也会得到提拔和使用。在这种情况下，

这部分殷顽民逐渐服从了周朝的统治。此外，周统治者又把微子封于宋，都商丘(今河南商丘)，把一部分殷顽民交给他去治理。微子是归顺周朝的商贵族，实际上等于借微子来统治、安抚殷顽民。

周公东征是武王伐纣的继续。通过东征，周朝摧毁了商朝残余势力的顽强反抗，真正在东部地区确立了周朝的统治，对周朝的巩固、强大、延续都有重大意义。　(杨生民)

周初大分封

周初为巩固统治在全国分封诸侯。

周初为巩固统治，在全国大规模分封诸侯，即所谓"封邦建国"。据记载，武王、周公、成王曾先后封建71国。其中，武王、周公的兄弟15人，同姓40人。周王子弟一般都得到了封地，成了大小诸侯。异姓诸侯中以姜姓贵族居多，也有归附周朝的传统贵族如神农、黄帝、尧、舜、禹的后裔。分封的目的是"封建亲戚，以蕃屏周"。每个诸侯国既是统治各地的据点，又起着拱卫周王的作用。

在当时的封国中，重要的有卫、鲁、齐、宋、晋、燕等国。

卫国是武王弟康叔的封国，都朝歌(河南淇县)。周朝统治者把殷民七族：陶氏、施氏、繁氏、锜氏、樊氏、饥氏、终葵氏分赐康叔做种族奴隶。卫国统治着原商朝的中心地区。康叔兼周王朝的司寇，操生杀大权。周公对康叔说，如殷民反抗，要严厉镇压。卫国墓地出土过有"康侯"铭文的青铜器。在一件簋的铭文里记载了康叔封卫的事迹。

鲁国是周公长子伯禽的封国，都奄(山东曲阜)。奄国曾随武庚叛周，所以周朝统治者让伯禽去统治商奄之民。并分给他殷民六族：徐氏、条氏、萧氏、索氏、长勺氏、尾勺氏，做种族奴隶。伯禽到封地后，继续对徐夷、淮夷用兵，巩固了周在东方的统治。

齐国是太公吕望的封国，都营丘(山东临淄北)。太公望，姜姓，所以称姜尚，据说夏时被封于吕(河南南阳附近)，因此被称为吕尚、吕望。在武王伐纣和周公东征中立有大功。平定武庚叛乱时，灭蒲姑，封为齐侯，统治蒲姑氏的土地和人民。周统治者授权于齐国，可以征讨有罪的诸侯国。齐国先后灭了不少东夷小国，是周朝在东方的诸侯大国。

宋国是商贵族微子启的封国，都商丘(河南商丘)，统治商早期活动的地区。武王伐纣时，微子自缚归降于周，后来也未参加武庚的叛乱活动。武庚被杀后，微子作为商朝的后裔受封于宋国。宋国周围还封了杞、陈、蔡等小国。这些国家都靠近徐夷、淮夷，是周朝东南的屏障。

晋国是成王弟叔虞的封国，都唐(山西翼城西)。叔虞子燮改国号为晋。分给他怀姓九宗和职官五正。怀姓九宗成了晋国的种族奴隶。山西西南部原是夏之故墟，并有戎狄杂处。所以周统治者告诉叔虞，施政要顺应夏人的习俗，疆理土地要适应戎人的成法。晋国附近有许多戎狄部落，先后被晋并灭。所以，后来晋国成了大国。

燕国是周贵族召公奭长子的封国，都蓟(北京市)。北京近年来不断发现带有燕侯字样的青铜器，在辽宁也发现了周初燕侯的青铜器。有一件周初的青铜鼎，铭文中反映了召公开发燕国的事迹。燕国是周朝控制北方的据点，是周朝北方的屏障。

周王室与卫、鲁、齐、晋、燕等诸侯大国互相犄角、遥相呼应，在大国之间还分封了许多小的诸侯国。这样，由点到线再连接为面就构成了一个控制全国的网络。

分封诸侯，要举行一种隆重的仪式。在仪式上，受封诸侯从周天子接受册命，称为册封。册封的主要内容是授民、授疆土，也就是将某一地区的土地和一定数目的民众封赐给诸侯，让他们建立诸侯国。周公封康叔为卫侯，司空聃季授土，司徒陶叔授民。授土的仪式是：天子建一大社，封诸侯时从大社中取一块社土，放在白茅上，赐给受封诸侯。授民是指分封时把一定数目和身分的民众赐给诸侯，如给鲁国殷民六族和商奄之民。又如赐臣、仆若干家，庶人或庶民若干夫等等。诸侯接受分封后，对周王室要承担缴纳贡物、朝觐等义务，还要接受周天子的调遣，率领武士、军队参加战争。

在诸侯国内，诸侯有权把土地和民众封赐给卿大夫，卿大夫对诸侯也要承担相应的义务。

分封制是周代的重要制度。在当时条件下，这一制度对巩固周朝对全国各地的统治，对各地经济、文化的发展都起了积极作用。战国以后，分封制逐渐被郡县制取代。　(杨生民)

西周的土地国有制与井田制

西周土地所有制的形式。

西周的土地所有制是奴隶主阶级的土地国有制。周天子是全国土地和臣民的最高所有者，所以说："溥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王畿内的土地是周天子直接管理的土地，王畿之外的土地则分封给诸侯。周天子和诸侯可以把土地分赐

给臣下世代享用，也可以收回。但是，诸侯和臣下不能买卖、授受和转让土地。

周天子王畿内的土地一部分是王室的藉田，由司徒管理。每年春耕，周天子率领大臣举行一次亲耕藉田的典礼。周王室的“藉田”在《诗经》中被称为“甫田”、“大田”，规模很大，有时有成千上万的劳动者在耕作，收获的谷物堆积得如山丘。王畿内的山林川泽，天子派遣虞人、麓人、川衡等官吏管理。王畿内的土地，天子可赐给臣下。赐给臣下时，有时以“邑”计，如铜器铭文载周王赐给一个臣下“五邑”。有时则以“田”计，如铜器铭文载周王赐给一个臣下“于敓（地名）五十田，于早（地名）五十田”。有时赏赐的土地则以“里”计，如铜器铭文载，周王赏赐一个臣下“方五十里”土地。赏赐土地时常常是连同民众一起赏赐的。各诸侯国在国内管理土地的方式与此相似。

井田制是土地国有制的骨干。井田制形式上是指耕田被灌溉的沟渠和道路区划为方块田。周制宽一步、长百步为亩。一夫百亩（约合今28市亩），称为一田，是井田的基本单位。由于全国各地区情况不同，井田的规划不完全一致。有的地区采十进制，即十夫为井，以“十夫”、“百夫”、“千夫”、“万夫”构成井田制的体系。有的地区则以九夫为井，一井方一里；方十里为“成”，即百井；方百里为“同”，就是一万井。井田中间的灌溉渠道称作遂、沟、洫、浍、川；与此相应的道路称为径、畛、涂、道、路。

井田分为归各级奴隶主直接经营管理的公田和归奴隶耕种的私田（份地）。

耕种井田的主要是“庶人”或“庶民”。统治者把井田的一部分作为份地分配给庶人耕种。分配的方法是按男劳动力计算，二十岁受田，六十岁归田。受田数量是上田（好地）一夫百亩，中田二百亩，下田三百亩。由于耕地好坏不同，农业生产水平低，耕地要轮休，所以规定：三年一换土易居，使财均力平。份地上的收入归庶人自己享用。耕种份地的庶人要无偿耕种公田，公田上的收入全部归奴隶主。据说耕种公田的收入为庶人耕田总收入的十分之一。此外，庶人要承担各种徭役，贡纳各种实物。如到了冬季，要为主人修理房屋、凿冰、割草等等。他们要用自己的纺织物“为公子裳”，要用猎到的狐狸“为公子裘”等等。庶人劳苦一年，最后还是不能不发出“无衣无褐，何以卒岁”的感叹！这种庶人与农奴很难区分，但他们人身为主人所有，奴隶主阶级及其国家对他们握有生杀予夺之权，从这种阶级地位来看，他们是奴隶。

奴隶主阶级直接管理的公田，即大田、甫田等等，除由庶人提供的无偿劳动耕种外，还有臣、妾等奴隶从事耕作。奴隶在公田上劳动时，奴隶主贵族派“田畯”等官吏进行指挥、监督。

总之，周代的土地所有制是国有制，国有制的主体部分是以井田制形式组织管理的耕地。井田制反映了人与人之间的阶级关系和剥削被剥削的关系。周天子把井田分赐给诸侯和百官，是用作计算俸禄和身分等级的单位。各级奴隶主把井田中的公田让奴隶耕种，则作为课验奴隶勤惰的单位，以便直接榨取奴隶的剩余劳动。各级奴隶主把井田的一部分作为份地交给庶人耕种是为了养活供他们盘剥的奴隶。（杨生民）

昭王南征

昭王南征楚国在汉水淹死的事件。

楚国的远祖是颛顼高阳氏。商末楚国祖先鬻熊，投奔西伯姬昌为谋臣。西伯被纣王囚于羑里，鬻熊和闳夭、散宜生等人曾设法营救。他的事迹和文章被后人编为《鬻子》一书。鬻熊的曾孙熊绎在周成王时被封为子爵，姓芈，国都在丹阳（河南淅川县），统治着今湖北北部和河南西南部的一些地区。周成王在岐阳（陕西岐山县东北）会盟诸侯时，楚国君熊绎虽被应邀到会，但未坐到席位上，正式盟会时，却被分去看守殿前庭院中燃烧的火炬，仅被封为子爵。这说明楚国君在当时的地位是很低的。这是后来楚与周王室发生矛盾的一个原因。

昭王，名瑕，康王子，西周第四位国王。昭王南征楚国，决非偶然。早在成、康之时，周与楚的矛盾就比较尖锐。楚国盛产铜锡，却不满足周朝的需求，所以周朝就通过战争掠夺铜锡。西周前期的铭文中，就有周王臣下讨伐荆楚掠夺铜锡铸造青铜器的记载。后来，楚国日益强大，不听王命，所以昭王决定南征楚国。昭王南征时，周军被楚军打败，丧失了六师兵力，昭王回来时淹死在汉水之中。有的记载说，昭王坐了胶粘的船，船在水中解体，昭王因而淹死。有的记载则说，昭王返回途中过汉水时，因桥梁败坏，昭王落水淹死。

昭王南征失败，王道衰微。楚国势力得到进一步发展。周夷王时，楚国君熊渠向外扩张，首先进攻庸国（湖北竹山县西南）取得胜利，又攻扬粤（又名豫章、越章，今江西湖口一带）又取得胜利，后又攻灭鄂国（湖北鄂城），占领了鄂地。鄂地土地肥沃，大冶铜矿资源丰富，使楚国势力更加发展。熊渠不满意周天子封楚君为子爵，更不满意视楚国为蛮夷，所以宣

称：楚是蛮夷之邦，可不遵中原名号，因此封三个儿子为王，长子熊康为句亶王，次子熊红为鄂王，三子熊执疵为越章王。周厉王时为避免周朝讨伐，熊渠才取消了三个儿子的王号，并向周进献了鱼贝，表示愿意尊周，矛盾才得暂时缓和。（杨生民）

穆王作赎刑

穆王制定罪人按犯罪轻重向官府缴纳一定量的铜可赎罪免刑。

穆王，名满，昭王子。西周成、康时期，国力强盛，天下安定，称成康之治。其后，昭王南征不返，穆王时西北的戎狄部落不来朝贡，王道衰微，国内社会矛盾激化。为了加强对国内的控制，增加国家的财政收入，穆王制定了赎刑。

作赎刑时，穆王对周朝传统的五刑进行了改革。周朝原有的五刑各五百条，共两千五百条，穆王改为三千条。同时把刖刑（割掉脚）改为膑刑（去掉膝盖骨）。改动后的刑法为：墨刑（在犯人脸上刺字涂墨）一千条，劓刑（割鼻子）一千条，膑刑五百条，宫刑（男割睾丸，女子幽闭）三百条，大辟（死刑）二百条，共三千条。在此基础上，穆王增加了赎刑，让有钱人出钱赎罪，并制定了赎罪条例。按照规定：墨刑，罚黄铜百锾（一锾六两）；劓刑，罚二百锾；膑刑，罚五百锾；宫刑，罚六百锾；大辟，罚一千锾。

按周礼规定"刑不上大夫"，所以穆王改定刑法主要是为加强对平民和奴隶的统治。穆王作赎刑，说明随着社会经济发展出现了富有的平民和工商业者，作赎刑就是为搜刮和榨取他们的财富。

（杨生民）

国人暴动

周厉王时，国人暴动，厉王逃出国都。

西周时有国、野之分。国指国都，野指广大农村。贵族和享有政治权利的平民住在国中及其近郊称国人。在广大农村居住的被统治阶级庶人称野人。

周厉王是西周第十位国王，名胡，夷王之子。厉王在位30年，不断对楚和西北戎狄部落用兵，开支浩大，再加统治者腐化奢侈，国家财用不足。厉王好利，任用贵族荣夷公为卿士执掌国政。荣夷公专利，决定山林川泽之利归王室垄断。山林川泽原归各级贵族和平民共同享有，厉王收归王室背离旧有的典章制度，引起了各阶层的不满。于是，人们纷纷议论朝政，大发怨言。为压制舆论，厉王使卫巫监视，如有人议论，对厉王不满，一经告发，立即处死。在此情况下，国人都不敢说话了，在道路上只能以目示意。厉王高兴地告诉召公说：我禁止了诽谤，人们都不敢讲话了。召公规谏厉王说：防民之口，甚于防川，水壅而溃，伤人必多，民亦如之。厉王不听，矛盾日益尖锐。公元前841年国人终于暴动。参加暴动的，除国人之外，还有被称为"正人"、"师氏人"等的低级贵族与武人参加。这些人围住王宫，袭击厉王，厉王逃奔于彘（山西霍县）。厉王的太子静也逃进召公家躲藏了起来。国人知道后，围住召公家，要杀太子静。召公无奈，只得把自己的儿子送出代替太子，太子静才得以逃脱。厉王逃走后，召公、周公共同执政，史称"共和行政"。从共和元年（前841）开始，我国历史才有了不间断的正式纪年。

共和行政维持了14年，厉王死于彘。召公、周公立太子静为王，是为宣王。

国人暴动是西周历史的一个转折点。从此，西周逐渐走向衰亡。（杨生民）

宣王中兴

宣王革新内政、外攘夷狄使周朝一度复兴的事迹。

宣王（前827—前782），名静，厉王子。宣王即位，任用召公、周公辅政，接受厉王被推翻的教训，革新内政。他首先整顿吏治，告诫臣下，不要过重盘剥民众、中饱私囊、鱼肉鳏寡、沉湎于酒。革新内政的另一新措施是"不籍千亩"，即天子不再举行亲耕籍田的仪式。国人暴动后，使用庶人无偿的徭役劳动耕种大田、甫田等公田的制度已难于维持，因此周天子亲耕籍田的仪式已无必要举行，所以采取了这一措施。这一措施有利于减轻庶人的徭役负担，提高庶人生产劳动的积极性。宣王还令召伯清查申伯土田，按土地数量征收实物税。在宣王治理下，周朝一度出现"德行国富，人民殷众"的局面。

宣王曾对猃狁用兵，并取得胜利。猃狁是对西北一些戎狄部落的称呼。宣王之前，猃狁有时深入到宗周腹地侵扰、掠夺。宣王派南仲驻兵朔方加强防守，又派尹吉甫率军攻打猃狁，一直打到太原（宁夏固原县北），取得了很大胜利。诗歌中称颂南仲说"赫赫南仲，猃狁于夷（平定）"，称颂尹吉甫说"文武吉甫，万邦为宪（法）"。《虢季子白盘》铭文记载参加这次战争的子白，与敌交锋，斩杀五百，立了大功。猃狁受打击向北逃走，受其控制的戎狄部落又重新臣服西周。

宣王还对东南方的淮夷、徐国和南方荆楚用兵。宣王五年（前823），派反击猃狁获胜归来的尹吉甫

向淮夷征收布匹、冠服、奴隶等贡物，并说如不听从，就出兵讨伐，淮夷表示臣服。宣王令方叔南征荆楚，在战争中"获丑"即抓到了战俘，取得胜利。宣王亲自率兵征伐东南的徐国，战争中"仍执丑虏"抓到了战俘。徐国战败，臣服朝贡。

宣王在南征胜利后，效法武王、周公封建国家。宣王封其舅申伯于谢（河南南阳），封庶弟友于棫林称郑国（陕西华县）。《史记》说宣王：效法文、武、成、康之遗风，使诸侯又臣服于周。故称宣王中兴。然而，宣王频繁用兵消耗了国力。宣王晚年，伐太原之戎、条戎、奔戎的战争都失败了。尤其是宣王 39 年（前 789），伐姜氏之戎，败于千亩（山西介休南），从南方征调的"南国之师"丧失殆尽。接着，宣王又到太原调査民数，反映了兵源枯竭，国力虚弱。所以，宣王中兴，在历史上仅是短暂的一瞬。（杨生民）

幽王亡国

幽王时，犬戎攻陷镐京，杀幽王于骊山，西周灭亡。

周幽王（前 781—前 771），名宫涅，宣王子，是个昏庸无能的君主。他当国王后任用"善谀好利"的虢石父为卿士执政，排斥正直大臣。幽王即位的第二年（前 780 年），镐京发生了一次大地震。这次地震发生的情景是：河水沸腾，山峰崩塌，渭、泾、洛三条河流枯竭，遭大旱。当时的诗歌中说，"无草不死，无木不萎"，旱情异常严重。人民饥饿流离，田地荒芜。这一年幽王命伯士攻六济之戎，大败，伯士被戎人杀死。幽王五年（前 777）秦庄公收复的犬丘被戎人包围，并抓走秦襄公叫世父的长兄。周王朝的疆土处于"国蹙（收缩）日百里"的状况。周朝处于风雨飘摇之中，统治阶级内部也有人预感到周朝将要灭亡。

周幽王宠幸褒姒，迷恋酒色。这一点恰成为西周灭亡的导火线。《史记》记载，周宣王时流传一首民谣：桑木做的弓，箕木制的箭袋，周朝就要亡在这上面。这本来是民众对宣王不断用兵的不满，宣王听到后就严厉禁止这两件东西。恰巧有一对夫妻卖这两件东西，宣王下令捉拿处死。这对夫妻仓皇出逃，在路上拾到个被遗弃的女婴，流亡褒国。后来褒国就把这个女孩献给周王。由于褒国姓姒，所以称这个女子为褒姒。幽王三年（前 789），幽王在后宫见褒姒美貌非凡，对她分外宠爱。褒姒还给幽王生了个儿子叫伯服。褒姒平时不笑，幽王想逗她笑，各种办法都无用，就想出了举烽火引褒姒一笑。烽火是周朝的一种报警设施。周都镐京地近戎狄，为防止戎狄进攻，在镐京附近的骊山上筑有烽火台。点燃烽火，白天可看见浓烟，晚上可看见火光。诸侯看见烽火，就可率兵救助。幽王令点燃烽火，各路诸侯都发兵前来救助，褒姒看见被逗笑，幽王算是达到了自己的目的。然而，诸侯们却虚惊一场，往返徒劳。一连数次，诸侯屡受欺骗，再点烽火也不来了。

幽王的王后是被宣王封在河南南阳的申侯的女儿，称申后。申后生子名宜臼，已被立为太子。幽王宠爱褒姒，所以废申后改立褒姒为王后，废太子宜臼改立褒姒生子伯服为太子，申侯对此极为不服。幽王 11 年（前 771），申侯联合缯国和犬戎一齐攻打幽王，发兵直抵镐京。幽王点燃烽火，诸侯救兵不至。犬戎攻破镐京，在骊山杀死幽王，虏走褒姒，并把镐京的财富、珍宝洗劫一空，西周亡。自武王灭商至幽王亡国，共 257 年。平王即位后，东迁洛邑，历史上称此后的周朝为东周。（杨生民）

春　秋

平王东迁

公元前770年，周平王东迁洛邑，建立东周。

周平王前770至前720年当政，名宜臼，幽王子。幽王死后，申侯、鲁侯和许文公立原来的太子宜臼为王，是为周平王。这时周朝已无力在镐京立足，于是平王在郑、卫、秦、晋等国的支持下，前770年迁都洛邑，建立东周。同时，虢公翰也拥立王子余臣于携称携王，出现了两王并立的局面。十余年后，晋文侯攻杀携王，两王并立的局面才告结束。东周建立，标志着西周灭亡。东周建立后，王室进一步衰微，天子成了名义上的共主，出现了诸侯混战、大国争霸，历史进入了春秋时期。

春秋时期一些诸侯国的势力发展很快，为诸侯混战、大国争霸提供了条件。

郑国最早的国君是郑桓公。他是厉王的幼子，宣王的庶弟，名友。宣王封他于郑(陕西华县东)，是为郑桓公。幽王时，郑桓公做周王室的司徒。幽王九年，诸侯多叛周，郑桓公见形势不好，向太史伯求安全之计，太史伯告诉他，地处河南中部的虢、郐两国间，有河、洛、济、颍四水之便，是很安全的。郑桓公就把部族、财产迁到那里，为以后在这里建国奠定了基础。西周灭亡时，郑桓公保护周幽王，被犬戎杀死。他的儿子郑武公，保护周平王东迁。前769年，郑武公灭郐(河南新郑西北)，郑国东迁，都河南新郑。前767年，郑又灭东虢(河南荥阳东北汜水县)。郑国新迁到这里时，一片荒凉，多蓬蒿藜藿。为发展农业，郑国开荒辟土。郑国还与随其东迁的商人订立盟约：商人不背叛统治者，统治者也不刁难商人。春秋初，郑国很快发展成一个新兴的诸侯强国。

秦国先人非子因替周孝王养马有功，被封在今甘肃天水附近的秦地，嬴姓，故称秦嬴。周宣王命非子之孙秦仲为大夫讨伐犬戎。秦仲被犬戎杀死后，宣王又命他的儿子秦庄公继续与戎人作战，阻止戎人东进。秦庄公之子秦襄公时，幽王被犬戎杀死，襄公出兵救周，并护送平王东迁。因此，平王封秦襄公为诸侯，并把岐山以西的土地赐给秦，准许秦与诸侯"通聘享之礼"。秦从此由大夫上升为正式的诸侯国。前762年，秦襄公的儿子秦文公，迁于汧水、渭水的会合处(陕西眉县附近)筑城邑。周平王21年(前750)，秦文公打败戎兵，拓地至岐山下，得周之余民。从此，秦迅速发展为一个新兴的诸侯强国。

平王东迁时，晋文侯护送平王东迁，后又杀了与平王并立的携王有功，平王赐给晋文侯秬鬯(酒)和武器等器物。平王因无力驱逐犬戎，又把黄河西岸一片土地赐给晋文侯。今河南三门峡一带，是周文王同母弟所建的虢国。虢有东虢、西虢、北虢。东虢在前767年为郑所灭。西虢在今陕西宝鸡附近，平王东迁后被犬戎所灭。这里说的虢是北虢，北虢是东周西边的屏障，与王室关系密切，平王之子周桓王曾让虢公做王室卿士。前655年，虢国被晋献公灭掉，晋国占有了殽函天险，使秦无法东进。此后，晋国发展成了一个重要的诸侯强国。

卫国在东周王室的东北，据有今河南北部和河北南部。卫国是周武王弟弟康叔之后。卫武公曾派大兵保护平王东迁，受平王特别奖赏。

上述四国之外，东方的齐国，南方的楚国，东南的吴国、越国都发展很快，相继强大。所以，春秋时期

出现了大国争霸。

与诸侯国的日益强大相反，东周王室却日益衰微。平王迁都洛邑后，关中故土丧失，后为秦有。东周王朝只有今河南西北部约方六百里的土地。这些土地还不断赐给诸侯。如前673年赐郑国虎牢（河南荥阳境），赐晋文公温（河南温县）、原（河南济源县）等四邑。前638年秦晋两国迁陆浑之戎于伊川（河南嵩县）等等。这使周王室东不到虎牢，西不到潼关，南仅达伊、汝二水之间，北到黄河，方不过一二百里。西周后期，西周对诸侯还是有权威的。如周夷王朝会诸侯，曾烹死齐哀公。周宣王时，鲁懿公被兄子伯御所杀，宣王讨伐杀死伯御。平王东迁后，周天子对诸侯的僭越行为根本无力制止。如鲁桓公谋杀其兄鲁隐公，直到鲁桓公死后，他的儿子鲁庄公才派人去向天子请命，周天子只得派人到鲁国册命桓公为合法的鲁国国君。不仅如此，周天子已由至尊变为大国的工具。如晋文公在城濮之战打败楚国后，要周襄王到郑国践土会盟诸侯，周襄王也只好前去。东周王室在经济上也很困难，如周襄王时乘坐的车发生困难，就派人到鲁国去要。周顷王即位，财政困难，又派人到鲁国要钱花。虽然东周王室非常贫弱，但名义上仍是天下共主，为华夏各国所尊奉。大国争霸时，大国也打着周天子的旗号，号令诸侯。

从前770年至前476年是中国历史上的春秋时期。这个时期的特点是王室衰微，大国争霸。各国之间互相兼并，春秋初有一百四五十国，到战国初年见于记载的只剩下十几个国家。在这一过程中，出现了齐、晋、楚、秦、吴、越等影响较大的国家。

（杨生民）

郑祝聃射王中肩

周桓王十三年（前707），周、郑交战，郑国将领祝聃射周桓王中肩，周军战败。

周郑之战发生于郑庄公时。周平王27年（前744），曾保护平王东迁的郑国国君郑武公死，子寤生继位，是为郑庄公。此后，郑国迅速发展为一个新兴的诸侯强国。这是主客观条件所造成的。客观上当时齐、晋、楚、秦等大国还未兴起，郑国周围都是些小国，这对郑国兴起十分有利。主观上，郑庄公做东周王室卿士，掌握王室大权，可代周王讲话，借天子号令诸侯。郑庄公及时平定了其弟共叔段为夺取君位发动的叛乱，稳定了内部。再加上郑国农业、工商业都较发达，这就使郑国能迅速兴起。周桓王六年（前714），宋国不向周王朝贡，郑庄公以王室卿士身分奉王命伐宋，齐、鲁两国派军相助，次年攻打宋军获胜，并把占领宋国的两个邑赠鲁。接着，郑军又包围歼灭了宋、卫、蔡三国联军。前712年，郑庄公又联合齐、鲁两国灭了许国（河南许昌东）。在与戎人的斗争中，郑庄公也取得了胜利。前714年，郑、宋交战时，北戎南下伐郑。郑庄公用公子突之计，针对戎军作战特点，引诱戎军深入埋伏区，三处伏兵齐发，戎师大败。在郑国国力蒸蒸日上之时，郑庄公与周王室矛盾逐渐尖锐，最后发展为一场战争。

郑庄公的祖父郑桓公为保护幽王在骊山被犬戎杀死，父亲郑武公又保护平王东迁。郑庄公继郑武公在周王室任卿士，倚仗祖、父两代功劳，办事专横。加上郑国内部事务多，庄公不能常在王室处理政事。周平王就想让虢公与庄公同为左、右卿士，共掌王室大权。郑庄公知此事后，就去责问平王，平王怕得罪庄公，断然否认。为让庄公放心，就提出互相交换人质。于是平王子王子狐到郑做人质，郑庄公的儿子公子忽到周王室做人质。这个事情被称为“周郑交质”。“周郑交质”说明平王与庄公之间的君臣关系实际上变成了平列的国家间的关系，说明周王室地位下降。这在周朝历史上是破天荒的一次。周平王51年（前720），平王死，其孙林继位，是为周桓王。周桓王对庄公的专横极为不满，一上台就让虢公当卿士主持朝政。庄公知道后，就派大夫祭足带领人马把周王室温地（河南温县）的麦子割掉，秋天又派祭足带人割走成周（河南洛阳东）的禾。郑庄公这样做本想给周桓王点厉害看看，没料到桓王毫不退让。周王室虽然衰微，周天子毕竟是一个可以用来号令天下的牌子。如果失掉王室卿士的职务对郑国是极不利的。于是，庄公就改变策略，前717年亲自到王都朝见桓王，桓王拿着天子的架子，不加礼遇。前715年，周桓王任命虢公忌父为王室右卿士，庄公为左卿士。郑庄公为了表示对这一任命的服从，就带着齐僖公去朝见桓王。按说周郑的矛盾至此可以了结。然而，周桓王却做得太过分了。前712年，周桓王把封给苏忿生的12个邑给郑，换郑四个邑归周。苏忿生的12个邑本来已不归王室所有，把它换给郑国等于说了一句空话，为此郑国白白丢了四个邑的土地和民众。从此，周郑又一次失和。又过了五年，周桓王干脆罢免了郑庄公王室左卿士的职位。郑庄公因此不去朝见周王。至此，周郑关系极为紧张，一触即发。

周桓王十三年（前707），桓王亲率王师和他能指挥的陈、蔡、卫等小国军队伐郑。王师进入郑国的繻葛（河南长葛县东北）。郑庄公率兵抗击。双方在此

交战，这就是周郑繻葛之战。周桓王率领的军队分为左中右三军。桓王率领主力为中军，虢公林父率领右军，周公黑肩率领左军。蔡卫两国军队随虢公林父，陈国军队随周公黑肩。军队排成人字形发动进攻。郑国的子元根据周军的情况提出设左右两个方阵(名左右拒)，主帅所在的中军放在左右两个方阵的中间靠后。左右两个方阵像捕鱼的网一样，张开口袋捕捉敌军主力。子元并对庄公说：陈国发生内乱，士无斗志，若先击陈军，必然奔逃。王师看到，必然混乱。蔡、卫两国军也必然奔逃，而后便可取胜。庄公依计而行。战斗开始，庄公令两个方阵挥动旗帜，战鼓齐鸣，蔡、卫、陈三国军队不战而逃，郑军全力进攻，王师大乱。郑国将领祝聃一箭射中王肩，并请庄公下令追击。庄公说：怎么敢欺凌天子呢？下令收军。晚上，郑庄公派祭足到周军问候周桓王和左右将领，表示自己只不过不得已应战，并不敢反对天子。

繻葛之战，王师大败，使周天子威风扫地，说明周天子已无力征伐违命诸侯，宣告了“礼乐征伐自天子出”的时代已经结束。　　(杨生民)

齐鲁长勺之战

周庄王十三年(前 684)，齐鲁两国于鲁长勺(山东莱芜东北)交战，在曹刿谋划下鲁国以弱胜强。

齐鲁长勺之战，是由于鲁庄公干预齐国君位继承和齐桓公图霸所引起的。春秋初年，齐国大而不强。齐僖公死后，由嫡长子齐襄公继位。齐襄公是个很昏乱的人，在诸侯国之间跟着郑庄公跑，在国内诛杀无度，兄弟和大臣纷纷逃往国外。襄公庶弟公子小白就是后来的齐桓公在鲍叔牙的卫护下逃到莒国。另一庶弟公子纠在管仲等人卫护下逃往鲁国。前 686 年，齐襄公被他的叔伯兄弟公子无知杀死，公子无知又被大夫雍廪杀掉。齐国无君，于是发生了争夺君位的斗争。齐国大夫高傒与公子小白关系好，趁机派人迎接小白做国君。鲁国得知后立即派军队护送公子纠回国做国君，并派管仲带领军队阻止小白从莒国回齐。管仲在半道上遇见小白，向小白射了一箭，以为小白已死，就立即派人向公子纠报告。公子纠到达国都临淄，方知小白已当上了国君。原来管仲的箭恰好射在小白腰间用铜做的带钩上，小白装死，而后迅速回到国都，当了国君，这就是齐桓公。护送公子纠回国的鲁庄公不肯甘休，就让军队驻扎在临淄以东的乾时，向齐进攻，结果被齐军打得大败，鲁庄公仓皇逃回鲁国。其后，鲍叔牙带军队逼鲁国杀死公子纠，又逼鲁国囚了管仲交给齐国。回齐后，管仲在鲍叔牙的保荐下，受到齐桓公的重用。齐桓公对鲁国仍不肯就此罢休，于是在即位的第二年派大军攻鲁。

前 684 年，齐桓公发军侵鲁。齐军进至鲁国长勺。鲁庄公率军前去迎敌。这时有个叫做曹刿的人求见他，问凭借什么去同敌人打仗？庄公说：衣食不敢独自享用，常常分一部分给别人，这些人会出力打仗。曹刿说：这些小恩小惠全国人不会普遍得到，民众不会为你出力。庄公说：祭祀祖先神灵用的牛羊玉帛，都按规定奉献，很守信用。曹刿说：这些小小的信用，神灵不会保祐你必胜。庄公又说：国内的大小狱讼案件，虽然不能每件都亲自调查，但都能按实情判决。曹刿说：这是忠于国家民众的事情，定会得到民众的支持，可以与齐国一战，战争时我跟你一同去。鲁庄公同他上了战场。齐军仗着人多势众，首先击鼓发起冲锋。鲁庄公也想击鼓反击，曹刿说：不可。等到齐军第三次击鼓冲锋后，曹刿说，可以击鼓冲锋了。结果，一个反击，打败了齐军。齐军向后败退时，鲁庄公要下令追击，曹刿又加以制止，他下车看了齐军败逃时的车轨印迹，又上车观望敌军的旗帜，说可以追击，结果一举把齐军逐出国境。战争结束后，庄公问曹刿其中的道理。曹刿回答说：打仗，靠的是勇气，一鼓作气，第二次就衰了，第三次就竭尽了。在这种情况下，我军发起反击，所以打胜了。由于对方是大国，怕有埋伏，所以我看敌人车轨印乱了，旗帜东倒西歪，知道敌人是真败，所以才加以追击。这就是历史上著名的以弱胜强的长勺之战。　　(杨生民)

管 仲 相 齐

管仲为齐相，改革内政，齐国由此富强。

管仲，名夷吾，字仲，又称敬仲。青年时曾和好友鲍叔牙共同经商，还做过小官吏。公元前 685 至前 645 年为齐相。齐桓公争夺君位时，鲍叔牙出力最大，所以桓公要任用鲍叔牙为相。然而，鲍叔牙却竭力推荐管仲。鲍叔牙对齐桓公说：如果仅仅只是治理齐国，有高傒和我就可以了。如果想成就霸业，非管仲不可。鲍叔牙还说管仲在理民、治国、团结人、外交、军事诸方面都比自己强。至于管仲射桓公一箭，只是各为其主，如果他做了您的臣下，也会同样忠心。齐桓公是个想称霸诸侯干一番大事业的人，所以就听了鲍叔牙的意见，任用管仲为相。

管仲为齐相后，在齐桓公支持下推行了改革内政的方略和措施：一、实行按土地好坏分等级征收实物税的制度。这是根据当时齐国的实际情况实行的

一项重大改革。按西周井田制的传统,庶人要首先耕种公田,在公田上奴隶主直接榨取庶人的剩余劳动。另外,庶人耕种的份地各家又要轮换耕种,"三年一换土易居"。这都阻碍了生产力的发展。齐襄公时这种制度已无法维持,当时齐国的公田到处无人耕种,草长得非常茂盛。为此,管仲把井田大体平均分配到户,各家之间不再轮换耕种,而是按分到土地的好坏分等级缴纳实物税。二、设置铁官,组织工匠,开采铁矿。同时也鼓励民间开采铁矿,并按赢利多少,向国家纳税。铁主要用于制造农具和手工业生产工具,促进了农业、手工业的发展,也有利于商业发展和增加国家税收。三、对原有的行政组织加以整顿。当时国都及其郊区称国。管仲把国中分为二十一乡,工、商各三乡,士十五个乡。士、工、商各自居住在一起,不能杂居和迁徙,以五家为一个单位编起来。农村当时叫做鄙。鄙划分为五属:三十家为一邑,十邑为一卒,十卒为一乡,三乡为一县,十县为一属,每属有九万家。各级分设行政长官管理,每年对行政长官考察一次,三次考核成绩不佳就要受处罚。这便加强了对国内的控制。四、士乡实行兵民合一。国中十五个士乡中,以五家为轨,十轨为里,四里为连,十连为乡。这是行政组织。军事编制一家出一兵,一轨五家出五人为"伍",由轨长率领。十轨五十家,出五十人组成一"小戎",由里有司率领。四里二百家出二百人为"卒",由连长率领。十连两千家出两千人组成"旅",由乡良人率领。五乡出一万人,组成一军。十五个乡,出三万人,组成三军。由齐桓公和国氏、高氏两卿各领一军。使军事编制与士乡中的行政组织合为一体,士兵从小生活在一起,互相了解,共患难,利于加强军队的战斗力。五、规定罪犯按轻重不同可以甲、戟、箭、铜、铁等赎罪,犯死罪的可用一付上等犀甲和二支戟赎免,轻一些的可用一付皮甲和二支戟赎罪,小罪可用一定数量的铜或铁赎罪,诬告别人罚交十二支箭。管仲还有其他的改革,如齐国滨海,有鱼盐之利,大力发展商业,增加了政府财政收入等等。

管仲的改革在当时促进了生产力和社会经济的发展,增加了国家的财政收入,使齐国富强,为齐桓公称霸诸侯奠定了基础。　(杨生民)

齐桓公称霸

齐桓公会盟诸侯,征伐不服从的诸侯国,北击戎狄、南拒楚国的事迹。

齐桓公(? —前 643),姜姓,名小白,齐僖公之子,公元前 685 至前 643 年为齐国国君,春秋时期的第一位霸主。齐桓公称霸有其条件。齐国是东方大国,管仲改革后,内部稳定,国力强盛,这是基本条件。另外,当时各国不断发生内乱,齐桓公则借周天子名义号令诸侯,平定各国内乱,讨伐不服从的诸侯国,名正言顺,使其目的易于实现。同时,当时北边戎狄不断南侵,被中原各国视为蛮族的楚国北犯,中原各国有联合抗御的要求,齐桓公尊王攘夷,联合各国,实现了这一要求。在这种条件下,齐桓公成就了霸业。

齐桓公时,中原的鲁国、郑国、宋国都是有影响的诸侯国,只有得到这三国的确认,才能确立其霸主地位。周庄王 15 年(前 682),宋国内乱,大夫南宫万杀了宋闵公和大夫仇牧、太宰华督。宋国平定了内乱,立闵公弟公子御说为新君,是为宋桓公。然而,新君并未得到周天子的册立。齐桓公与管仲抓住时机,派使臣朝见周王,请周王确定宋国君位。周庄王死后刚继位的周僖王见齐国这样尊自己,就让齐桓公去办理此事。齐桓公就借周天子之名约宋、鲁、陈、蔡、卫、郑、曹、邾等国于前 681 年 3 月到齐国北杏(山东东阿县附近)开会,到会的只有齐、宋、陈、蔡、邾五国,其他国家未去。北杏盟会还未结束,刚定位的宋桓公不愿接受领导,便偷偷回国去了。为树立自己的权威,齐桓公决定讨伐不参加盟会的诸侯。这年夏天,齐桓公首先灭了不参加盟会的纪国(山东肥城南)。纪国在齐、鲁两国之间,灭纪是给鲁国看的。接着,齐桓公又统大军讨伐鲁国。鲁庄公在威胁下,要求齐国退兵而后会盟,表示鲁国屈服。这年冬天,齐国退兵后,两国在齐地柯(山东东阿县西南)会盟。会盟时,鲁将曹沫一手拿匕首、一手拉着齐桓公说:齐强鲁弱,如真心订立盟约,就应把过去侵占的鲁地还鲁。齐桓公在曹沫的劫持下,只好答应,两国就这样订立了盟约。事后,桓公后悔,想杀死曹沫,不与鲁地。管仲则说:如果背信杀了曹沫,会失信于诸侯,不如把土地归还鲁国。齐桓公接受了管仲的意见,就把过去侵占的鲁国汶阳之田还给鲁国,并好好招待了鲁庄公。这个消息一传出,诸侯都称赞齐桓公,未参加北杏会盟的卫、曹两国也派人来要求订立盟约。接着,于前 680 年齐桓公又联合诸侯讨伐在北杏会盟时偷跑的宋国,并请周天子相助。周僖王派大夫单伯到齐军表示支持,齐桓公又取得了以天子之命伐宋的名义。在政治、军事的压力下,宋国求和,派人向齐桓公认错,并送来一份礼物。齐桓公把礼物奉送周天子的使臣,答应接受宋国加盟。前 679 年春,齐、鲁、宋、卫、曹、邾、陈、蔡八国在卫国鄄(山东鄄城北)会

盟，齐桓公主盟为诸侯长，称霸从此开始。郑国不仅不参加北杏会盟，而且宋、郑两国是世仇，宋国与齐国结盟，郑国就攻击宋国。所以，前678年齐桓公联合宋、卫伐郑。恰巧这年楚国北上打到郑国栎地（河南禹县）。为阻止楚国北进，这年冬郑厉公在宋国幽地与齐、鲁、宋、陈、许、滑、滕诸国结盟。这样，中原的重要诸侯国鲁、宋、郑、卫都承认了齐桓公的盟主地位。前667年，齐、鲁、宋、陈、郑等国再次在宋国幽地结盟。周惠王派召伯廖到齐，正式赐命齐桓公为诸侯之长，齐桓公的霸主地位才算完全确立。这次，周惠王还请齐桓公讨伐帮助王子颓争夺王位进行叛乱的卫国。次年春，桓公打起尊王的旗号，率军伐卫，大败卫军，声讨卫君帮助王子颓的反叛罪行。卫国向桓公送了厚礼，此事才算了结。

春秋初期北方的戎、狄对中原各国威胁很大，常常南侵劫掠。周惠王15年（前663），山戎大举伐燕，燕向齐国告急。齐与鲁商议救燕。鲁开始同意派军前往，后惧怕路远不去。齐桓公率军北伐山戎，至孤竹国（河北卢龙），大败山戎而还。据说途中，军队迷路，管仲让老马带路，终于走出迷谷。燕庄公对齐十分感激，所以桓公回师时，送了一程又一程，齐桓公觉察时，已进入齐国几十里。按西周诸侯相送不出境的规定，齐桓公把齐国境内这几十里的地方划给了燕国。齐桓公又让燕君向周王室纳贡，尽臣下的义务。诸侯知道后，都信服齐桓公，愿意听从他。

前661年，狄人攻邢国（河北邢台县境），齐桓公刚从燕国回来不久想休整一下，就问管仲该怎么办？管仲说：戎狄似豺狼，贪得无厌；诸侯各国是亲戚，不可不救。安逸像毒药一样，不可留恋。诸侯之间也有相互救援的盟书，请救邢国，按盟书上的规定办吧！齐桓公就起兵救了邢国。前659年，狄人又向邢大举进攻。齐桓公又联合宋、曹等国赶走狄人。然而，邢国的都城却被狄人彻底破坏了。齐桓公就组织各国的力量在夷仪（河北邢台西）给邢国修筑了一座新的都城，邢人迁去后就像回到家里一样。卫国与邢国邻近，也常遭狄人的侵犯。前660年狄人大举进攻卫国。卫国原是西周初年分封的一个重要国家，但春秋初年以来卫国内政腐败，内乱不断，国势衰弱。这时当政的卫懿公爱养鹤，让鹤住好的住宅，吃好的食品，乘坐大夫乘坐的轩车，而一般民众的生活却十分困苦。这次狄人来犯，民众就说：让鹤去打仗吧！卫懿公只得自己领兵上阵，结果被狄人杀死，卫国就这样被狄人灭了。狄人大肆杀戮。从卫国国都逃出活下来的只有730人，连同共邑（河南辉县）和滕邑的人集中起来总数也只有5000人。齐桓公使公子无诡率兵车300乘、甲士3000人帮卫国防守。次年，齐、宋、曹三国又帮卫国在楚丘（河南滑县东）建造了一座新城作国都，卫国的民众和贵族高兴地迁到新都。通过存邢救卫，齐桓公在中原诸侯国中的地位更高了。

不久，齐桓公又和楚国在召陵（河南偃城县东）订盟，阻止楚国势力北进。楚国从西周开始势力逐渐发展，是南方大国。楚国国君有时自称王，不尊周天子。齐桓公时，楚国君楚成王北上争霸，先后灭掉在今河南南部、西部的申、息、邓等国，又伐黄服蔡，进而北伐郑国，郑已准备依附楚国。然而，在中原各国看来楚是个蛮族国家。所以，各国有联合阻止楚国北进的要求。前659年，楚攻郑，齐、鲁、宋、郑、曹、邾在宋地荦（河南淮阳附近）会盟，商议救郑。前658年，楚国又攻郑。这一年江（河南罗山西北）、黄（河南潢川西）亲齐。第二年齐、宋、江、黄四国会盟于阳谷（山东阳谷县北），谋攻楚。这一年楚国又进攻郑国。郑国向齐国求救。当时齐桓公的一个夫人蔡姬，因得罪了桓公被送回娘家蔡国，夫人的哥哥蔡国国君就把蔡姬改嫁给楚成王，齐桓公为此生气，决定伐蔡，伐蔡楚必来救，郑国威胁就会随着解除。前656年，齐桓公率齐、宋、鲁、陈、卫、郑、曹、许八国军伐蔡，蔡向楚求救，八国军击败蔡，又进攻楚。楚大军驻屯边境，双方对峙。楚国派了一名使者到齐军会见了管仲，责问说：你们在北海，我们在南海，彼此之间风马牛不相及，不知道你们带着大军来我们这里为了何事？管仲回答说：昔日召公、康叔奉周天子命，对齐国祖先太公说，不遵从王命的诸侯齐国都可以征伐。你们楚国不向周王进贡祭祀用的包茅，昭王南征没有返回，我们来这里就是责问这两件事！楚国使者回答说：不贡包茅这是我们的过失，至于昭王南征不归，你就去问水吧！由于楚使者态度强硬，桓公就进兵陉地（河南偃城县南）。双方从春天相持到夏天，都不敢贸然进攻。这年夏天楚成王派屈完到诸侯军中讲和，诸侯军退到召陵（河南偃城县东）。齐桓公把八国大军整齐地排列起来，然后与屈完一道登车观看，对屈完说：以这样强大的军队去打仗，谁能抵抗？以这样强大的军队去攻城，什么样的城攻不破！屈完回答说：您如果用德安抚诸侯，谁敢不服？您若用武力威胁，楚国就可以把方城山（楚国北部的山脉）作为城，把汉水作为护城河，您的军队再多，有什么用呢？屈完的回答有理有节，不亢不卑。齐桓公也感到不能单凭武力屈楚，于是与楚在召陵结盟修好。楚国解除了对郑国的威胁，楚成王派屈完带了包茅朝见周惠王，表示尊崇周王。

齐国为首的中原各国也解除了对蔡国的包围。

齐桓公在召陵与楚结盟之后，前 655 年 5 月联合八国诸侯在首止（河南睢县东南）会盟，目的是安定王室。当时，周王室内部发生了王位之争。起因是周惠王晚年宠幸惠后，于是想废掉太子郑，立惠后生的儿子王子带为太子。齐桓公为保全太子的地位，以诸侯要拜见太子为借口，联合八国诸侯在首止会盟，太子在首止与诸侯见了面，一住就是几个月。周惠王无力与齐桓公抗争，就唆使郑国不要参加结盟，并让郑国去联楚，由他自己联晋，结成一个与齐桓公抗衡的联盟，以达另立太子的目的。郑国听了周王的话，就离开了首止，剩下的七国诸侯缔结了共辅太子的盟约，表示支持太子。前 654—前 653 年齐桓公连续兴兵伐郑，郑国也倒向齐国，参加了共辅太子的盟约。不久，周惠王死，太子郑怕王子带争位，封锁消息，向齐桓公求援。前 652 年，齐桓公在洮（山东鄄城县西）召开诸侯会议，拥太子郑为周天子。这就是周襄王。襄王即位后公布了惠王的死讯，并发丧。周襄王对齐桓公特别感激，为此特派使臣送去礼物。前 651 年齐桓公又在葵丘（河南兰考、民权县境）大会诸侯，接待周天子的使者。天子的使臣宰孔送去了祭肉、珍贵的弓箭和车子，以表示对齐桓公的特别尊敬。齐桓公要举行跪拜礼接受礼物，宰孔又传襄王的话说：伯舅年纪大了，加升一级，不必举行大礼。齐桓公表示他不敢不下拜，于是下堂进行跪拜，又登堂接受了礼物。这次盟会上宣布了周襄王的禁令：不要堵塞河水，不要禁籴粮食，不要废嫡立庶，不要以妾为妻，不要让妇人参与国事。这次诸侯会盟的盟约上规定"凡我同盟之人，既盟之后，言归于好"。这就是历史上有名的葵丘之会。

葵丘之会后，齐桓公曾帮助杞国（河南杞县）和鄫国（山东苍山县西北）与淮夷进行过斗争，帮助这两国修建过都城。为安定周王室，齐桓公曾派诸侯军队戍守王都防止戎人进攻，帮助周王室修复了被戎人破坏的城墙。

齐桓公晚年骄傲了，生活上也比过去奢侈腐化，对齐国的内政也不注意治理。前 645 年管仲病死，死前曾劝齐桓公要疏远竖刁、易牙、开方这些小人、奸臣，齐桓公对他们却更加信任。前 643 年桓公病死，竖刁、易牙发动政变，杀了一批大臣，立他们喜欢的公子无诡为国君，接着桓公的五个儿子为争夺君位发生内乱。齐国从此中衰，失去了霸主地位。

总之，齐桓公在齐国当政的四十余年中，适应当时形势，在尊王旗帜下，促使各国结盟修好，减少相互间的战争，一些国家争夺君位的斗争在他干预下较快平息。他还联合黄河中下游诸侯国家制止落后的戎狄族的侵扰，对中原先进经济文化的发展起了积极作用。齐桓公称霸，对春秋时期的历史发展起了进步作用。 （杨生民）

假虞灭虢

周惠王二十二年（前 655）晋献公向虞国借道灭虢国，又在回军路上灭虞。假，借也。

晋国是周初分封时成王弟唐叔虞建立的国家。前 770 年晋文侯曾护卫平王东迁。文侯子昭侯即位后封他的叔父成师于曲沃（山西闻喜东北），称曲沃桓叔。曲沃曾是晋国都城，后都城迁至绛（山西翼城县东），昭侯子孝侯时又把都城绛改名为翼。桓叔迁至曲沃后势力迅速壮大，桓叔及其子孙与晋侯经常斗争。周僖王三年（前 679），桓叔的孙子曲沃武公攻杀晋侯缗，尽有晋地。次年武公把灭晋侯所得宝器献给周僖王，僖王封武公为晋侯，并准许晋国可有一军的兵力。从此，曲沃桓叔一支终于由小宗取代大宗列为诸侯。武公灭翼后两年死去，子献公立。献公，名诡诸。参加过其父攻灭大宗的斗争，深怕支庶宗族再起来夺权，所以即位后采用大夫士芍的计谋把群公子全部杀死，结束了内患，使大权集中于国君。献公加强权力后，在国内作二军，灭了耿、霍、魏三国，又派太子申生讨伐狄族东山皋落氏。假虞灭虢就是这时发生的著名历史事件。

虢国在今河南陕县黄河三门峡地区，姬姓，文王弟虢叔之后。虢国北面是虞国（山西平陆县），虞是古公亶父之子虞仲的后裔。晋要攻虢国必须经过虞国。前 658 年晋献公令里克、荀息率军进攻虢国。为向虞假（借）道，献公用荀息之计，给虞君送去好马和玉璧。虞君贪财，见了这两样稀世珍宝，就同意借路，并答应愿与晋国共同攻击虢国。两国军队很快就攻克虢国重镇下阳（山西平陆县东北）。前 655 年，晋国再次向虞国借道攻虢。虞国大夫宫之奇谏虞君说：不能借道给晋国，虞、虢两国就像牙齿和嘴唇的关系一样，唇亡齿寒，虢国灭亡了，虞国还能存在吗？但虞国国君说：晋国与我是同宗，怎么能加害于我？宫之奇说：虢叔是王季的儿子，文王的兄弟，为文王卿士，现在晋要灭虢，怎么能爱虞国呢？虞君不听，借道让晋军通过。晋军攻下了虢都上阳城（河南陕县南），灭了虢国。在回师的路上，顺便灭了毫无防备的虞国，虞君与大夫百里奚都做了晋国的俘虏。荀息把过去给虞国的好马、玉璧又拿来献给晋献公。晋献公说：宝

器还是我的宝器，就是马的牙齿多长了几颗。

（杨生民）

秦晋韩原之战

周襄王七年（前 645），秦晋在韩原（山西稷山县西）交战，晋惠公战败被俘。

晋献公晚年，晋国发生内乱。晋献公夫人齐姜生一男一女，男是太子申生，女嫁秦穆公称穆姬。献公又娶狄人狐家两姐妹，姐姐生子叫重耳（后来的晋文公），妹妹生子叫夷吾（后来的晋惠公）。献公伐骊戎，又纳骊君之女称骊姬，生子叫奚齐。随骊姬陪嫁的妹妹生子叫卓子。献公宠爱骊姬，唯骊姬之言是从。骊姬为让奚齐当太子，设计陷害太子申生，诬申生要毒死晋献公。为此，献公逼死申生，并派人捉拿重耳和夷吾。为避祸，重耳逃到齐国。夷吾逃到梁国。这样，奚齐被立为太子。前 651 年，献公死，荀息拥立奚齐为君，里克等人杀奚齐，想让重耳回国为君。荀息又立卓子为君，里克又杀卓子，荀息也自杀。前 650 年，周襄王、齐桓公、秦穆公立逃到梁国的夷吾为君，就是晋惠公。

夷吾能回国为君，主要靠里克和秦穆公的支持。夷吾对里克表示，他为君后给里克土地百万亩。又向秦穆公表示，为君后以黄河外五城作酬谢，其中包括秦通中原的崤函险关。于是，秦穆公就与周襄王、齐桓公联合派兵送夷吾回国为君。当国君后，晋惠公就把许下的诺言全部赖掉。他囚禁了里克，对他说：你这个做臣子的连杀两位国君，当你的国君不是太难了吗？里克回答说：不杀前两君，你怎能有今天？欲加之罪，何患无辞！你的意思我知道了。说完，就用剑自杀。晋惠公不兑现给秦五城的诺言，秦穆公未因此发兵攻晋。过了四年，即前 647 年，晋国遇天灾，发生饥荒，请秦卖给粮食，秦穆公不计较惠公的失信，同意晋的请求。秦把粮食装船从渭水东下到黄河，又从黄河沿汾水运到晋都绛。次年，秦发生饥荒，向晋求援，惠公不许卖粮给秦。秦穆公大怒，周襄王七年（前 645），发兵攻晋。秦国士卒被晋惠公的无礼和背信弃义所激怒，个个斗志倍增，英勇作战，三战三捷。晋军退过黄河，秦军追过黄河，两军在韩原大战，晋惠公驾车的马陷入泥潭，被秦人活捉，并押入囚车送往秦国。晋国有几个大夫，低着头，跟在囚车后走，样子很凄苦。秦穆公就派人来说：你们几个人为何这样悲苦呢？我只是想同你们的国君到西边走走，岂能害他。这几个大夫听到后叩头三谢才辞别而去。晋惠公的姐姐是秦穆公的夫人，听到晋惠公被俘将被押来，就带着已被立为太子的儿子和女儿登上堆着柴草的高台，穿着丧服对秦穆公说：上天降灾使两国君主不能友好相处而以兵戎相见。如果你早上把晋君押回，我母子当晚烧死，你晚上把晋君押回，我第二天早上就烧死，你看着办吧！在这种情况下，秦穆公就决定与晋国讲和，把惠公放回。

惠公知秦穆公要放他回去，就派郤乞先回晋国告诉吕甥准备接他。郤乞回去后召集国人而以惠公的名义赏赐，又代惠公说：我虽然返回，实在对不起国家和民众，请立太子为君吧。国人听了后，感动得哭了起来。晋国在这种情况下宣布“作爰田”，改革了土地制度。晋国原来实行的是西周的井田制，各家之间土地要定期轮换耕种，一般是三年轮换一次，“作爰田”就是把土地的使用权长期固定于每家每户，所谓“爰”（换）就是“自爰其处”，即各家在自己占有的土地上轮换休耕使地力得到恢复。这一改革使耕种者成了国有土地的长期占有者、使用者，所以说是国君赏田给民众。“作爰田”满足了民众对土地的要求，因而得到民众的欢迎。在这个基础上晋国又“作州兵”，进行兵制改革。所谓“作州兵”，就是以州为单位，使州长各自整治甲兵，扩大了兵员和兵器的供给。“作爰田”和“作州兵”这两项改革措施，适应了生产力的发展和富国强兵的需要，为以后晋国的发展和成就霸业奠定了基础。这一年秦国以公子圉为人质放回了晋惠公。

（杨生民）

宋襄公争霸

周襄王十四年（前 638）宋襄公不自量力与强楚争霸失败的事迹。

宋襄公（？—前 637），名兹父，宋桓公之子。前 651 年宋桓公死，兹父继位为宋襄公。宋襄公即位七年后齐桓公死了。宋国周围的陈、蔡、卫和夷族小国力量比宋弱。鲁国在鲁庄公死后，发生内乱。郑国早已中衰。宋襄公想继承齐桓公称霸诸侯。

齐桓公在世时，有过三个正夫人，都未生子。齐桓公有不少妾，其中受宠幸的有六个。这六个妾都生有儿子。齐桓公生前，这几个儿子都想争当国君。齐桓公曾经与管仲商量立公子昭为太子，并托孤给宋襄公，请宋襄公日后帮公子昭做国君。后来，在易牙等人的鼓动下，齐桓公又答应立公子无诡为太子。桓公死后，易牙等人立公子无诡为国君，公子昭逃奔宋国请求帮助。宋襄公想图霸，公子昭来投奔恰好给了他一个机会。前 642 年宋襄公联合卫、曹、邾等国送公子昭回国，齐大臣杀公子无诡愿立公子昭为君。但

其他四位公子不服，就率领他们的徒众与宋襄公在甗地（山东济南市历城境）打仗。齐军大败，宋襄公立公子昭为君，就是齐孝公。这一胜利冲昏了宋襄公的头脑，更激发了他当霸主的欲望。为在诸侯中树立自己的权威，他就邀滕、曹、邾、鄫等国开会。前641年春，宋襄公抓了滕君婴齐给不服从的诸侯看，接着邀曹、邾、鄫等国在曹地开会，鄫国国君迟到，就叫邾国把他抓起来杀死做牺牲去祭祀社神。这种残忍而愚蠢的行为，本来起了反作用，宋襄公却自以为了不起。前641年冬在陈国倡议下，鲁、陈、蔡、楚、郑、齐等国在齐国开会，表示怀念齐桓公的恩德，实际上就是对宋襄公欺压弱小诸侯国行为的否定。

宋襄公见诸侯不服，就想借齐、楚两国之力压服中原各国。前639年，宋国与齐、楚在鹿上开会订盟。这次会议，宋国当主人，决定以三国名义这年秋天在宋国盂地（河南睢县）召集诸侯开会。齐孝公是宋襄公送回国立为国君的，自然答应。楚成王在此情况下也只好应允。宋襄公到盂地开会之前，公子目夷对他说：楚是蛮夷之国，强而不讲信义，应带着兵车前去开会。宋襄公则说：不可，已与楚约好不带兵车，怎能不遵守呢？楚成王却在会上埋伏了兵车。这次会盛大，宋、楚、郑、陈、蔡、曹、许等国都去了。会上，正当宋襄公争当盟主之时，楚成王的军队突然拥出活捉了宋襄公。楚军乘势攻宋。幸好，公子目夷从会上逃回，团结宋国军民坚决抵抗。楚成王攻不破宋国都城，留着宋襄公也无用，鲁僖公又出面说情，于是就释放了宋襄公。

宋襄公受了侮辱，决心报仇。郑国不是亲楚吗？他就联卫、许、滕这些小国伐郑，给楚国一个难堪！郑向楚求救，楚迅速发兵攻宋。宋襄公立即回兵准备与楚大战。大司马公孙固谏曰：上天抛弃商族已经很久了，你要光复祖业是不可能的，不如与楚讲和。宋襄公哪里听得进去。他要用他的仁义之师打败楚国的武力。前638年冬宋、楚两国战于泓水（河南柘城西北）。宋军列好阵势，楚军正在渡河。公子目夷对他说：敌众我寡，趁其渡河时发动攻击，可以获胜。宋襄公不同意。楚军渡河后还未排好阵势，公子目夷又让他乘敌军混乱时发动进攻，宋襄公又不听。楚军排好阵后，宋襄公命令宋军击鼓攻击，结果被楚军打得大败，身边的随从被全部杀死，自己也受了重伤。宋军打了败仗，宋国人都埋怨宋襄公，宋襄公却振振有词地说：君子在战场上不伤害已受伤的对手，不擒拿头上长白头发的敌人，古代的军队不靠险阻的地势打败敌人。我虽然是已经亡国的商朝的后人，也决不攻击没列好阵势的敌人。公子目夷批评他说：你还不懂打仗的道理，强敌在前，我有天险而敌人又未列阵，这是天赐良机，此时发动攻击，有什么不可以？就是这样还是担心不能取胜。况且敌军中的人都是我们的敌人，凡能抓住的就抓过来，管他头上有没有白头发。打仗就要杀敌，若爱受伤的敌人，那何必要伤他？若爱有白发的敌人，干脆去投降吧！

宋国在这次战争中损失惨重，齐孝公又乘人之危，借口宋国没有参加陈人发起的颂扬齐桓公的盟会而兴师讨宋，围困了宋的缗邑（山东金乡县境）。不久，宋襄公因伤重死去。他的争霸与仁义之师成了历史上的千古笑柄！　（杨生民）

晋文公称霸

晋文公修明政治、选贤任能，周襄王二十年（前632）在城濮之战中战胜楚军，称霸诸侯。

晋文公（？—前628），名重耳，晋献公之子。公元前636至前628年为晋国国君。晋献公时，重耳被派去守蒲（山西隰县西北）。骊姬诬太子申生，说重耳也参与了太子毒死献公的活动，献公派人到蒲捉重耳，重耳逃奔狄，跟随他的有狐偃、赵衰、颠颉、魏犨等一批人才。重耳在狄住了12年，夷吾回国当晋惠公后，又派人到狄刺杀重耳，重耳计划逃往齐国。经卫国时，卫文公不接待。在卫国五鹿（河南濮阳东北），没粮吃，向农民讨饭，农民送他一块土，重耳很生气，狐偃说：土是国家的象征，这是天赐国家的吉兆。重耳以为真如此，向农民鞠了一躬。到齐国，齐桓公送他80匹马，又把公室女嫁给他。重耳这时已近60，生活安定，不愿离齐再走。随行的狐偃等人把重耳灌醉用车拉出齐国。离齐后至曹国，曹共公不加礼遇，反而伺机看他的生理畸形"骈胁"（肋骨紧紧相连），使他十分生气。只有曹大夫僖负羁送他一盘饭，饭中放一块璧玉，重耳吃了饭送还璧玉。到了宋国，宋襄公刚被楚打败，对他很友好，送他80匹马。又到郑国，郑文公此时已倒向楚，对他不礼遇。到楚国，楚成王隆重接待，问他：假使归国，您怎么报答我呢？重耳回答：楚国物产这么丰富，晋比不上楚，我真不知用什么报答您！楚成王又说：虽然如此，您总应报答呀！重耳回答：托您的福，如我回到晋国，晋楚两国军队在中原相遇，我一定退避三舍（90里）。楚大将子玉听到后认为重耳未当国君就想与楚打仗，不如杀了他。楚成王还是好好招待他，并把他送到秦国。这时晋国国君晋惠公已死，留在秦国做人质的公子圉不辞而别，逃回晋国继位，称晋怀公。秦穆公对公子

围不辞而别的无礼行为极为不满，所以隆重接待重耳，又把嫁给公子圉的女儿怀嬴，改嫁给重耳。这时晋怀公为巩固统治在晋国乱杀大臣，国内不稳。大夫栾枝、郤谷等人听说重耳在秦，就派人劝重耳回国，并说愿为内应者很多。

周襄王十六年（前636），秦穆公派军送重耳回国，秦军占晋的令狐（山西临猗县西），此时一支晋军转向重耳，重耳用这支军队攻下曲沃，派人杀晋怀公，为晋君，是为晋文公。晋文公即位后，在秦穆公支持下，迅速平灭了与惠公、怀公关系密切的吕甥、郤芮等人策划的叛乱。接着，他修明政治、施惠百姓、严明赏罚、任用贤才，得到了朝野广泛支持。对与他一起共渡患难的功臣，大者封邑、小者尊爵，不忘其功。对跟随惠公、怀公的人也争取、使用，使晋国政局迅速稳定。

前636年冬，周王室发生内乱，王子带联合狄人，进攻周襄王，攻进京城洛邑。襄王逃到郑国汜地（河南襄城县境），派人向秦晋求援。晋文公辞秦师，率军打败狄人，一军包围王子带所在的温地（河南温县），一军迎周襄王回洛邑。晋文公活捉王子带交襄王处置，襄王杀王子带。晋文公安定了王室，周襄王设宴招待时，文公向襄王请隧（天子死后下葬用的墓道），周襄王婉词加以拒绝，而赐他阳樊（河南济源东南）、温（河南温县）、原（河南济源北）、攒矛四个邑的土地。晋遂有太行山南黄河北岸的土地。

这时楚国集中力量北上。前638年楚打败宋襄公后，汉水流域的姬姓小国已经被楚全部灭掉。前634年齐国侵犯鲁国北部，鲁求救于楚。这年冬，楚、鲁联合攻齐，夺取了齐国的谷邑（山东东阿县），让齐桓公的儿子公子雍住在那里。楚又派申公、叔侯带兵戍守。齐桓公的儿子有几个在楚做大夫。这构成了对齐国的威胁。这一年，楚又发兵攻宋，围缗邑。楚成王又先后派大将子文和子玉在睽和蔿两个地方训练军队、集结兵力，准备向北发展。

前633年，楚与陈、蔡、郑、许围宋，宋派大司马公孙固到晋告急求援。先轸对文公说：报答宋国的恩惠，建立晋国的霸业，时机就在现在。狐偃也说：楚国刚得到曹国的归服，又和卫国通婚，如讨伐曹、卫，楚国必然来救，宋围就可解除。晋文公赞成先轸、狐偃的意见，为制止楚国北上，把原来的两军扩大为上、中、下三军。本着选贤任能的原则，任命了三军统帅。赵衰推荐郤谷为中军统帅；文公任命狐偃为上军统帅，狐偃让给了狐毛；赵衰本可做下军统帅，但他让给了栾枝，又使先轸为副。前632年，晋文公率军攻曹。曹在卫东，攻曹必经卫，向卫借道，卫不许。晋军于是过黄河经卫攻曹，下军副帅先轸很快攻破卫国的五鹿。这时中军元帅郤谷病死，晋文公就破格任用先轸为中军元帅，另任胥臣为下军副帅。接着晋、齐两国在卫国敛盂（河南濮阳东南）会盟，壮大了晋军的声势。卫成公请求与晋盟会，被晋文公拒绝，又转而向楚求援，国人不愿与晋打仗，把卫成公轰出国都。接着，晋军攻破曹都陶丘（山东定陶西北），俘虏了曹国国君曹共公。这时楚继续围宋，宋又向晋告急。晋文公担心齐、秦两国态度不明，就采用先轸出的主意，让宋给齐、秦送厚礼，请两国调解，要楚解宋围。楚不解宋围，调解失败，齐、秦两国就站在了晋国一边。此时，楚国君臣发生分歧，楚成王认为晋文公经验丰富、人为所用，不主张与晋打仗，让楚将子玉退兵。子玉主战，成王又不多给军队。子玉无可奈何，派使者宛春与晋谈判，提出晋恢复卫侯君位和曹国，楚解除对宋国的围攻。晋文公按先轸的策划，就向曹、卫许诺恢复两国，以离间两国与楚关系。这两国本是楚国盟国，感到依靠楚国反而对自己不利，就派使者到子玉营中要求与楚绝交。这使楚国更加孤立，而且晋国又拘留了楚国使者宛春。为此，子玉十分气愤，立即率军北上与晋作战。两军逼近时，晋文公下令晋军退避三舍（后撤90里），以兑现昔日诺言。晋军后退90里，驻扎于卫国城濮（山东范县境）。这时，楚国一些将领主张就此收兵，子玉坚不同意，率军追至城濮。这年夏天，宋国、齐国、秦国的军队也来到城濮。两军对垒，晋文公仍然犹豫不决。狐偃对他说：打吧！打胜了，各国诸侯必然信服。如果打不胜，外有黄河、内有太行群山之险，必无大患。晋文公又问：楚成王对我们有恩，怎么能对得起他呢？栾枝对他说：汉水流域的姬姓诸国，全是被楚国灭掉的，我们怎能老是惦记着楚的小恩小惠而忘掉这样的奇耻大辱，下决心打吧！这时子玉派楚大夫斗勃前来挑战，对晋文公说：楚军请求与您的士兵游戏一番，您可站在车上靠着前面的横木，与得臣（子玉名）共同观看。晋文公使栾枝回答说：你们的挑战我们国君已经知道了。楚成王过去的恩惠，我们不敢忘记，所以才退守在这里。你们既然如此，那就明天早晨在战场上见吧！春秋时期最大的一次会战就这样爆发了。

城濮之战双方的兵力和部署是：晋国兵车七百乘，士兵三万几千人。分三军：中军先轸为元帅，指挥全军，郤溱为副。上军以狐毛为主将，狐偃为副。下军以栾枝为主将，胥臣为副。另外，尚有宋、齐、秦三国援军。楚国方面：中军由子玉指挥，统领西广、东宫与

若敖六卒等楚国主力部队。右军由子上指挥，统陈、蔡两国部队。左军由子西指挥，统申、息两县的地方部队。兵车和士兵总数比晋军多。战前，晋文公站在高丘上检阅晋军说：我军上下和睦团结，纪律严明，是可以打胜的。子玉也对部下说：今日晋国一定会全军覆没。战斗开始，晋国的下军副将胥臣在驾车的马身上蒙虎皮向楚国右军陈、蔡两国军队突然攻击，陈、蔡两国军队战斗力不强，大败溃逃，蔡国公子印被杀，楚右军大败。晋国上军主将狐毛竖起两面大旗，伪装败退，下军主将栾枝让兵车曳着树枝，扬起尘土，伪装逃遁。子西率领楚左军申、息两县的军队率先急驰紧追，这时先轸、郤溱率领晋中军主力拦腰截击，狐毛、狐偃的上军也反杀回来，前后夹攻，楚左军大部被歼。子玉见子西率领的左军失利，急忙收兵，中军才得保全。城濮之战后，晋文公下令军队休整三天，班师回国。文公军纪严明，令行禁止。在攻曹国国都时，曾跟文公流亡各国的颠颉，因违反军纪被处死。在城濮之战中，祁瞒因掌管的中军大旗丢失，依法处决。在返国途中，文公车上武士舟之侨渡黄河，驾车先自行回国，违反军纪，被处死。文公依法治军，虽然惩办了违纪将士，民众却心悦诚服。

城濮之战后，晋国国威大大提高，以前与楚结盟的国家转向与晋结盟。郑国原与楚国结盟，城濮之战刚结束，就主动与晋结盟。这次战争使楚国的北进方针受到了严重打击。战后，晋文公带着宋、齐、鲁、郑、陈、蔡、邾、莒诸国诸侯在郑国践土（河南郑州市北）会盟。会上，晋文公向周天子献上俘虏一千名，兵车一百乘。周襄王命王子虎和别的大臣册命晋文公为侯伯（诸侯之长），并赠送了礼物。各国诸侯共奉晋文公为盟主，订立了共尊王室、互不侵害的盟约。其后，文公恢复了曹、卫两国。这年冬文公率领诸侯在晋国河阳（河南孟县西）朝见了周襄王，晋文公的威望更高了。　　（杨生民）

秦晋崤之战

周襄王二十五年（前627）秦越晋境偷袭郑国，回军途中经崤山被晋伏兵围歼，全军覆没。

城濮之战后，秦晋关系逐渐恶化。前630年，秦晋两国以郑国亲楚为借口出兵攻郑。郑派大夫烛之武夜至秦营会见秦穆公说：秦晋联合攻郑，灭亡郑后，得到好处的是晋，而非秦。郑离晋近，离秦远。秦助晋灭郑是帮助晋国强大。晋强大，对秦是很大威胁。晋今天图郑，明天就会攻秦等等。这一番话打动了秦穆公。烛之武还答应郑愿做秦人员往来的接待站，这对秦有利无害。秦穆公听了，下令单独撤军，与郑结盟，并派秦国的三个将领杞子、逢孙、杨孙留下，帮助郑国守城。晋文公见秦兵撤走，也随之撤兵而去。

前628年，晋文公病逝。恰在此时，秦穆公得到郑国守北门的人送来的情报，说如秦军袭郑，他们开门接应，郑国拱手可得。秦穆公为利所动，就同大臣蹇叔商量出兵，不料遭反对。蹇叔认为：出动大军偷袭远方国家，没听说过。军队长途跋涉，会因劳累丧失战斗力，行军千里难保密，郑国会有准备，所以偷袭不可取。秦穆公听不进反对意见，就任命孟明视、西乞术、白乙丙三人为将，带兵车三百乘偷袭郑国。大军出发时，蹇叔哭着说：我能见你们出去，看不到你们回来。穆公派人对他说：你知道什么，你要是早死了，你坟墓上的树木已经成材了。蹇叔又对孟明视说：晋人必在崤山设兵攻击你们，……我将去那里收拾你们的尸骨。秦军急驰东进，经周都洛邑北门时，武士跳下车，摘掉头盔，表示向周天子致敬，不等车停下，又跃上战车而去。王孙满见此情景对周襄王说：秦军轻浮无礼，必然失败。秦军途经滑国时，遇见了郑国商人弦高。弦高得知秦国要偷袭郑，就冒充郑国的使臣，对秦军将领说：听说贵国来讨伐郑国，郑国国君已做好防御的准备，特派我献上12条牛犒赏贵军的将士。同时，弦高又派人报告郑国国君，让做好准备。秦国将领感到郑国已有准备，去也无济于事，就灭掉滑国回军西归。

晋文公刚逝世，秦军袭郑灭滑，来回通过晋境也不借道，十分无礼。晋国君臣都很气愤，决心给秦一个打击。晋文公还未安葬，其子晋襄公身穿黑色丧服亲临战场，联合姜戎在崤山设伏。周襄王二十五年（前627）四月，秦军灭滑后经崤山回秦，晋和姜戎联军向秦军发起攻击，全歼秦军，活捉孟明视等三位将领。三位将领押回后，晋襄公嫡母文嬴（即穆公女怀嬴）称穆公对此三人恨之入骨，放回秦国，让穆公处死他们。晋襄公听文嬴之言，放三将回秦。中军元帅先轸听此消息，气冲冲地对襄公说：这是葬送胜利果实而助长敌人，看来晋国离灭亡不远了，并激动得不顾君臣关系而吐唾沫。襄公立即醒悟，马上派阳处父追回三人，追至黄河岸边，三人已经下船而去。阳处父把自己驾车的一匹马解下，声称奉晋襄公之命向孟明视赠马，以引诱他们上岸。孟明视在船上行礼回答：贵国国君不以我们的血去涂战鼓，让回去请死，如果回去被杀，死后也当感激贵君，如果因贵君之恩惠得免于死，三年后当来拜谢贵君。秦穆公听说三将

回来了，身穿素服亲自到郊外迎接，并说：都是我不听蹇叔的忠告，使你们蒙受了耻辱。并恢复三人地位，以图报复。过了三年，前625年，孟明视果然率军伐晋，这时先轸之子先且居为晋国的中军元帅，晋襄公也亲自率军迎战。两军在彭衙（陕西白水县境）相战。晋国军队士气高昂，战斗紧张时，晋将狼瞫率军冲进秦阵，大军随后掩杀，秦军又一次大败。第二次战争失败后，秦穆公仍然重用孟明视，整顿内政，施惠于民，训练军队。赵衰说：秦军再来，我们应当回避，秦虽两次失败却更加发愤图强，这是不可阻挡的。第二年夏天，孟明视又率军攻晋，秦军渡过黄河后，下令烧掉所有战船，以激励将士报仇雪耻。秦军一举攻克王官（山西闻喜县西）和郊（山西运城县）两个地方。晋军坚守不出，避其锋锐。秦穆公下令军队从茅津渡（山西平陵县西南）过黄河，掩埋崤山谷中秦军的尸骨，全军哭祭三天，然后班师回国。秦晋崤之战至此方告结束。　（杨生民）

秦穆公霸西戎

秦穆公灭西戎十余国，辟地千里，成为西方霸主。

周平王东迁时，封秦襄公为诸侯，赐岐以西地，并表示戎人把周朝岐山和丰邑（陕西西安沣水西）的土地都侵占了，如秦赶走戎人，那里的土地归秦。秦襄公后，经几代国君的努力，至秦武公，秦已地跨今陕、甘两省，拥有了周朝王畿内的土地，包括关中平原，这为秦的发展提供了条件。然而，秦国仍需扫灭境内外的戎狄势力和其他割据势力，这个历史任务是秦穆公完成的。

秦穆公（？一前621），名任好，公元前659至前621年为秦国国君。为使秦强大，渴求治国人才。前656年，秦穆公娶晋献公女儿穆姬为夫人。这次联姻使秦穆公得到两位治国人才。这两人是百里奚、蹇叔。百里奚原为虞国大夫，晋灭虞时做了俘虏，被献公作为女儿陪嫁奴隶送给秦国。百里奚在送往秦国途中逃跑，后又成了楚国的奴隶。穆公知百里奚有才干，就以五张羊皮从楚国赎回。百里奚这时已七十余岁，被拜为大夫。百里奚又推荐蹇叔，秦穆公派人以厚礼请来，拜上大夫。秦穆公晚年又任用长期流落于戎地的晋人由余，依靠他的谋划伐戎取得成功。

秦穆公热心图霸，兴修的宫殿称“霸城宫”，他把关中的兹水改名霸水，对霸业孜孜以求。由于晋国强大，他称霸中原的图谋无法实现，但称霸西方的宏图却变成了现实。前659年，秦穆公即位第一年，就向茅津之戎进攻。茅津之戎地处今山西平陆附近晋、陕交界处，阻挡着秦向东发展的通路。这次进攻很快取胜。前640年，秦灭梁国（陕西韩城南），次年又灭芮国（陕西朝邑东南）。前638年，秦穆公又用武力把陆浑之戎赶走。陆浑之戎又称允姓之戎或姜戎，原住在今陕西武功县。秦占其原地后，晋国又把他们安置在伊川（河南伊川县）。此后，秦穆公逐渐把注意力转向征伐西戎。西戎，泛指秦西方广大地区的戎、狄。其中有四个主要的戎国：绵诸（甘肃天水附近）、绲戎（陕西凤翔一带）、翟（甘肃临洮县）、貆（甘肃陇西县北）。由于西戎势力日渐发展，所以戎王派使者由余到秦国观察国情。秦穆公通过与由余谈话，发现由余是个人才。认为由余这样的“贤人”为戎王所用，是秦国的祸患，所以用内史廖的离间计，使戎王怀疑、不满由余，最后迫使由余降秦。由于由余长期生活在戎人当中，很了解戎人，所以秦穆公“用由余谋”，于周襄王二十九年（前623）向西戎发动进攻，逐渐灭戎人建立的12个国家（一说20国），辟地千余里。这就是秦穆公称霸西戎。为此，周天子特赐给金鼓以示祝贺。

（杨生民）

楚庄王称霸

周定王十年（前597），楚庄王在邲（河南郑州北）大败晋军，威服中原，称霸诸侯。

春秋时，楚国势力迅速发展。周桓王十三年（前707），楚国君熊通伐随国（湖北随县），让随国君替楚向周天子求封号。被周拒绝。熊通说：楚国祖先鬻熊，是周文王的老师，因死得早，周成王封我们祖先时才封了个子爵，令居楚地。现在楚国强大，南方蛮夷归服，然而周王却不加封号。既然如此，我就自加封号吧！于是自称楚武王。这年夏，楚武王在楚地沈鹿会盟诸侯，申、江、庸、巴、濮、邓、绞、罗、陨、贰、轸诸国都应召赴会。只有黄、随两国未到。楚遣使责黄，三次出兵伐随。这时，楚武王占有了江汉以南百濮地区大片土地，又灭权国（湖北荆门东南），形成楚国独霸南方江、汉地区。楚武王病死后，楚文王继位。文王把国都从丹阳迁到郢（湖北江陵县北），又灭了申（河南南阳北）、息（河南息县），设申、息两县。申、息地理位置重要，成了后来楚国北上争霸中原的基地。前677年楚文王死，长子熊囏立，前672年其弟熊恽杀熊囏自立，是为成王。楚成王在位46年，曾以齐桓公、晋文公为对手争霸中原。继位的楚穆王又灭江（河南正阳县西南）、六（安徽庐江县西）、蓼（河南固始县北）、宗（安徽庐江县西）等国，势力进一步发展。及到楚庄

王，终于称霸中原。

楚庄王（? 一前 591），名侣，楚穆王子，前 614 年穆王死，庄王继位，在位 23 年。庄王当国君后，日夜作乐，三年不理国政。而且下令：敢来进谏，处死，不赦。大臣们十分着急，伍举冒死入谏庄王，庄王正在作乐。他小心地说：为给大王助兴，特来进一谜语，请大王猜一猜。接着说：高山上一只鸟，三年不飞又不鸣，是何鸟呢？庄王回答说：三年不飞，一飞冲天；三年不鸣，一鸣惊人。过了几个月，庄王依旧不理朝政。大夫苏从又去进谏，一见面庄王就问：没听到禁止进谏的命令吗？苏从回答说：臣不怕死，只要大王清醒过来，治理国家，使楚国强大，我死也甘心。从此，庄王励精图治，专心治国，诛灭了几百个作恶多端的坏人，提拔了几百名有才德的人，任伍举、苏从辅佐政事，楚国人都很高兴。前 611 年，楚遇大灾荒，周边一些国家、部落乘机进攻。戎族攻楚国西南的阜山（湖北房县西南），又攻其东南訾枝（湖北枝江）。庸国（湖北竹山县西南）也率群蛮攻楚。麇国也联合百濮准备攻楚。形势严重，申、息两县的城门都不敢打开，大臣们议论迁都，大夫艻贾反对迁都，主张起兵攻击主要的敌人庸国。庄王听取了他的意见，这年秋起兵伐庸。麇和百濮见楚国还有力量赶快退回。楚军派大夫戢黎带一部分军队攻庸，进至方城（湖北竹山县东），庸军夜间偷袭获胜。戢黎失败之后与部将商量，决定用骄兵之计战胜庸国。其后，七战七败，庸人认为楚军不堪一击，不再设防。这期间，楚国联络秦国与巴国出兵助战。楚庄王急率大军与前线部队会合，从今湖北均县兵分两路，夹攻庸国。秦、巴两国军队也进行合击。庸国由于毫无准备，让楚军攻进国都上庸，从此亡国，周围蛮族也归服了楚国。

灭庸后，楚国地盘扩大到湖北西北部，与秦接壤，又向北发展。这样，陈、宋两国首当其冲。前 608 年，庄王带兵攻陈、宋。晋赵盾率兵相救，并问郑亲楚之罪。楚派艻贾率楚军救郑，两军在北林（河南郑州西南）交战，楚军胜，晋大夫解扬被活捉，晋退兵。前 607 年夏天，晋联合宋、卫、陈三国攻郑，楚国把军队开到郑国国都等待，赵盾率四国军退回。这两次楚国都占了上风，庄王胆子越来越大。前 606 年，他率军到今河南伊河、洛河流域去进攻陆浑之戎，军队开进周王室国土。周定王派大夫王孙满去慰劳楚军，楚庄王问九鼎的大小轻重。九鼎是天子权力的象征，王孙满觉察到楚庄王有觊觎周天子权力取周而代之的意思，便回答他，周天子的权力在德不在鼎，没有德迁鼎也无济于事，况且天命在周，因此鼎之轻重，不能过问。楚庄王本是试探，听了王孙满的话，就带兵回国去了。楚庄王回国后，平定了内部叛乱，令孙叔敖为令尹，整顿了内政、军事，又北上争霸。前 598 年，楚庄王以陈国大夫夏征舒杀死国君为借口出兵攻陈，车裂夏征舒，陈国从此完全归服楚国。陈国西边的郑国，南临楚，北靠晋，西面是周王室，为晋楚必争之地。前 608 年到前 596 年的 11 年中，楚七次攻郑，晋五次伐郑，郑国疲于应付。为生存下去，郑国统治者就顺风倒，谁来了就归顺谁。但是，楚国不许郑国如此，这就导致了晋楚两国的又一次大战。

前 597 年，郑从晋，楚军包围郑都新郑。郑襄公一面派人向晋求救，一面加强防守。楚军一连攻了三个多月，终于攻破。郑襄公肉袒牵羊谢罪，送弟子良到楚做人质，楚郑讲和。晋国荀林父率三军救郑，当晋军走到黄河边，方知楚、郑已经讲和。荀林父认为应回师，不与楚军正面冲突，上军主将士会等将领赞同。中军副帅先谷却坚决不同意，并说不与楚战，晋会失去霸主地位，还不如死去。晋军将领还未商量出最后结果，先谷就擅自带领下属军队过了黄河。先谷还得到赵括、赵同的支持。先谷是文公时的功臣先轸之子。赵括、赵同则是功臣赵衰之子，其母是文公之女。这几位不听指挥。晋军执法司马韩厥对荀林父说：先谷的军队如果失败，您是元帅罪责就大了，不如全军渡河，失败了，大家分担责任。于是荀林父率全军渡河。

楚庄王攻克郑都新郑后，原想率军饮马黄河尔后回师，后知晋军已渡过黄河，便打算班师还楚，令尹孙叔敖掉转车头准备回楚。伍参想与晋军决战，孙叔敖说：往年攻陈，今年攻郑，事情够多了。如打不胜晋国，伍参的肉够吃吗？伍参回答说：如果打胜，是孙叔敖无谋。如果打不胜，伍参的肉将在晋军那里，楚军怎么吃得上呢？伍参对庄王说：荀林父新任元帅，副帅先谷不听指挥。部下无所适从。这样的军队必然失败。庄公犹豫不定，让孙叔敖把战车掉过头，军队驻扎于管（河南郑州市）等待。晋军驻扎在敖、鄗两山之间（河南荥阳县北）。这时楚庄王派使臣到晋营议和，荀林父派士会接待。谈判中双方都表示派军队来是针对郑国，不是针对对方，都表现了议和的诚意。楚使走后，先谷派赵括追上楚使说：刚才我们的使者说错了话，我们的国君让我们来就是要把大国的足迹迁出郑国，要求我们不要避开敌人，我们群臣怎敢不执行国君的命令呢？这就是表示要与楚军决战。楚庄王没有听赵括的话，又派使臣议和，已约定了讲和的日期。其后，楚派单车向晋军挑战，被晋军逐回。晋

将魏锜要求当晋公族大夫未达到目的，心怀不满，有意让晋军吃败仗，请求向楚军挑战未准，又请求去议和得到允许，去后竟违抗军令向楚军挑战，被逐回。其后赵旃与魏锜二人又一次违背去楚营议和的军令，擅自挑战。楚庄王令亲兵的 30 辆战车分左右严阵以待，又率亲兵追出，赵旃狼狈而逃，所乘战车和身上的盔甲也被楚军抢去。荀林父担心赵、魏去向楚军挑战受损失，就派一部分兵车去接应。楚将潘党见晋战车走动扬起的尘土，急向主将孙叔敖报告晋军逼近，楚军怕庄王追赵旃被晋军围攻，纷纷出阵。孙叔敖率兵急驰猛进，突然向晋军发动攻击。荀林父不知所措，慌忙下令：先渡过黄河者有赏。这道命令一下，中军和下军奔向河边，争夺渡船逃命，先上船的就用大刀砍断后爬船者的手指，晋军大败，溃不成军。只有士会、郤克率领的上军先设了埋伏，阻止了楚军进攻，未受损失。赵婴齐所属人马因事先准备好渡船，抢先渡过了黄河，其他部队损失惨重。晋在这次战争中以失败而告终。

晋军失败，荀林父作为元帅自然应负主要责任，他主动请死。晋景公吸取了城濮之战后楚杀子玉晋文公认为这是为晋除了后患的教训，没有杀他，还恢复了他的职务。先谷在这次战争中不听指挥分裂晋军责任重大，战后的第二年即前 596 年，又勾结北方赤狄攻击晋国，晋景公诛杀了他，并灭其全族。楚国在邲战中打败晋国，终于达到了威服中原，称霸诸侯的目的。　　　　　　　　　　　　　　（杨生民）

齐晋鞍之战

周定王十八年（前 589），齐晋两国在鞍（山东济南）大战，齐军大败。

春秋中期，各国矛盾错综复杂。晋、楚争霸，齐、鲁两国一般是站在晋国一边。但是，齐国较强大，又常与晋国对立，侵欺比较弱小的鲁国。鲁国则靠晋国支持对付齐国。前 589 年春，齐国攻打鲁国龙邑（山东泰安西南），宠臣卢蒲在攻城时被鲁擒杀。为此，齐顷公亲自率军进攻龙城，经三天激战，终于攻破，又进军攻打巢丘（山东泰安境）。在此同时，齐军又进攻卫国，大败卫军，卫国领兵将领孙桓子几乎被俘。孙桓子丧师辱国，没回国都，就到晋国去求救兵。这时，鲁国也派臧宣叔到晋国求救兵。两人都找到晋国的执政者郤克。郤克三年前即前 592 年曾出使齐国，因自己是跛子，受了侮辱，早想统兵伐齐雪耻。现在鲁、卫两国派人来求救兵，晋景公不能允许齐国肆无忌惮地进攻自己的盟国，于是派郤克为中军元帅，带兵车八百乘，会同鲁、卫两国军队攻齐。

晋军分上、中、下三军，韩厥为司马，出兵救鲁、卫。鲁国派臧宣叔做晋军的向导，又令季文子率鲁军与晋军会合。军队行至卫地，韩厥要斩杀违反军纪的人，这次用刑有些不当，郤克急忙赶来阻止，来到时，人已被斩。郤克没有责难韩厥，而是与他一起分担了责任，维护了晋军的内部团结，顾全了大局。齐军战胜卫军后，返齐，晋军跟踪而来。前 589 年 6 月，晋与鲁、卫军到达靡笄（山东济南市千佛山）。齐君向晋军约战说：你们率军光临敝邑，我军虽不强，也请明早一见高下。晋军接待的官员回答说：晋与鲁、卫是姬姓的兄弟之邦，贵国常进攻他们的城邑，我们国君不忍见此，所以派我们来。我们受命而来，只能进，不能退，既然约明日一战，我们不能让您的愿望落空。在约定时间，双方大军列阵于鞍，齐顷公战前夸口说：我要先消灭了晋军再吃早饭。战争开始，晋军元帅郤克被箭射中，血流到脚上，仍击鼓向前。他对驾车的张侯说：我病了，不能再坚持了。张侯说：战争一开始，我的手和肘都被箭射中，我把箭折断继续驾车，左边的车轮都被血染红了，怎么敢说病呢？你还是忍着吧。卫士郑丘缓说：交战开始，有危险的路，我都下去推车，你知道吗？张侯又说：军队的耳目，就是我们的旗帜和鼓声，进攻和退却都靠它指挥，怎么能以病败坏国家的大事呢？穿上甲胄，拿起武器，就得准备死，受伤而没有死，你就得勉励自己坚持到底。听了这些话，郤克精神振奋，张侯左手驾车，右手拿起鼓槌帮助击鼓，晋军跟着冲锋。齐军大败，晋军紧追，绕着华不注山跑了三圈。韩厥尾随齐顷公车紧追，齐君车的卫士逢丑父与他交换了位置，车子被树木挂住不能向前，被韩厥赶上。伪装成齐君的卫士逢丑父让齐君下车取泉水，齐君才趁机逃脱。晋军追赶齐军，一直追到丘舆（山东益都）。

齐君被迫求和，给晋送去灭纪国时所得的铜甗、玉磬和土地。晋不同意，提出要把曾侮辱嘲笑郤克的齐顷公母萧夫人做人质和把齐国的田垄改为东西向作为讲和的条件。田垄东西向是为方便晋兵车伐齐。齐对晋条件一一反驳，表示如晋坚持这些条件，齐只好决一死战。鲁、卫两国也从中说和，晋方才同意放弃苛刻条件讲和。齐归还侵占的鲁、卫两国的土地，晋则得到齐国送的大量财物。

鞍战胜利，晋景公很高兴。晋军回国后，晋景公见了郤克说：这次战争能得胜，是你出力的结果啊！郤克回答说：这是执行国君的命令，三军将士出力的结果，我有什么力量？晋景公见到上军、下军将领，也

说了同样的话，他们也都回答是上级指挥正确和部下用命的结果。晋军内部团结是晋在这次战争中胜利的重要原因。

这次战争使齐国的地位大为削弱，使晋国重新增强了在诸侯国中间的霸主地位。 （杨生民）

晋楚鄢陵之战

周简王十一年(前575)，晋国在鄢陵（河南鄢陵西北）战败楚国，在晋楚争霸中又占上风。

齐晋鞍之战后，中原形势依然是晋楚争霸。晋、楚两国不断用兵中原，不仅使两国负担沉重，也使中原诸侯国吃尽苦头。在此情况下，双方交换战俘，晋释放邲战中俘虏的楚公子谷臣，楚则放晋大夫智罃。双方都派使臣向对方表示议和愿望，再加上宋执政者华元从中调解，前579年夏天晋、楚两国使臣在宋国都议和，这就是春秋时期的第一次弭(息)兵会议。盟约中说以后两国不以武力相加，友好相处，共辅王室。仅过三年，楚国就违背盟约，于前576年进攻卫、郑。晋则约诸侯与吴使臣相会准备对付楚国。前575年春，楚以汝阴（河南郑县与叶县间）之地给郑，郑因此叛晋附楚。晋厉公为此兴兵伐郑，郑向楚求救，楚共王率军援郑。这年夏天，晋、楚两军在鄢陵相遇。

楚军的统帅是楚共王，司马子反统中军。楚军路过申县时，子反向申叔时探询对这次战争的看法。申叔时说：楚国对内抛弃了民众，对外背弃盟约说话不算数，现在正值农忙去打仗也不是时候，在这种情况下，人们都为自己的命运担心，谁会不怕牺牲地去奋勇作战呢？子反对这些逆耳忠言听不进去。

晋军的主帅是晋厉公，栾书统中军。战争一开始，楚军先发制人，逼近晋军，列好阵势。晋厉公在大夫苗贲皇的陪同下观看了楚军。苗贲皇是楚令尹斗越椒的儿子，前605年斗越椒叛乱被楚庄王杀死，苗贲皇逃到晋国。苗贲皇对楚军的情况很熟悉，他对晋厉公说：楚军精锐集中在中军，我们如先用精兵击败它的左右军，然后再集中兵力攻击它的中军，一定能打胜。晋军的将领在是否与楚决战上本来意见分歧，晋厉公也犹豫不决，听了苗贲皇的意见，晋厉公才下定决心。双方都下达了进攻的命令。战争一开始，晋厉公的乘车陷进泥沼，栾书正要救晋厉公，他的儿子栾鍼说，你是主帅快去指挥战事，我来救国君。他将晋厉公拉出泥沼。这时，晋将魏锜一箭射中楚共王的眼睛，共王令神箭手养由基给自己报仇，养由基射死了魏锜。晋军个个奋战，楚军被逼退到了险阻的地段。晋军攻击楚的中军，养由基连射晋军，箭无虚发。力士叔山冉捉了一名晋军，趁势掷出，正中一辆战车，折断了车上的横木，晋军停止了追击。在另外的阵地上，晋军俘虏了楚将公子伐、栾鍼夺取了令尹子重的旗帜。战斗从早晨打到黑夜，双方只好收兵。

楚司马子反派军吏视察伤病，补充军卒，修理盔甲武装，准备战车马匹，令明早鸡叫吃饭，准备再战。晋军虽然白天作战占了上风，但明天战局如何发展，难以预料，所以很担心。苗贲皇通告全军：检阅战车，补充士卒，喂好战马，磨快兵器，加固阵列，饱餐一顿，明天再战，并把俘虏的楚军放回去报信。楚共王听到此消息，叫子反来商议对策。但子反却因喝了侍卫谷阳竖献的酒，酩酊大醉，不省人事。共王说：这是天意要使楚国失败，我不能再等待了。所以便趁黑夜，带着楚军退走。第二天晋军进了楚营，楚军留下的粮食，晋军吃了三天。

楚军回到瑕邑，楚共王派人对子反说：过去打败仗，君主不在战场，所以主将负责。这次不是你的过错，而是我的罪过。子反认为他率领的士兵不战而逃，是自己的罪责。令尹子重与子反有矛盾，责备子反。子反认为自己罪责当死，就自杀了。当楚共王派使阻止时，已来不及了。

鄢陵之战后，晋国在晋楚争霸中又占了上风，但楚国的实力并未有多大损失，所以中原的形势依然是晋楚争霸。前573年，晋厉公死，继位的晋悼公，虽只有14岁，但却有魄力有才干。他选贤任能，整顿内政，接受魏绛的建议，采取和戎政策，改善与戎的关系。晋悼公把晋国军队分为三部分轮流出兵对付楚国，使楚军疲于奔命。晋悼公九次会盟诸侯，郑、宋、陈等国背楚向晋，史称晋悼公复霸。 （杨生民）

晋吴联合制楚

春秋中期后，晋国联合吴国牵制、打击楚国。

吴国是周族建立的国家，称句吴，姬姓。吴国始祖是周文王的两个伯父。相传周太王古公亶父生了太伯、仲雍、季历三个儿子。季历生子姬昌（后来的文王）。古公亶父特别喜欢季历及其子姬昌，想传位给季历。太伯、仲雍知此意图，就逃到“荆蛮之地”，与当地土著居民结合，被举为君长，号句吴，初住在今江苏无锡，有千余家。太伯死，无子，仲雍立，号吴仲，下传四世，周武王灭商，封吴为诸侯国。吴传至太伯的19代孙寿梦时，自称王，开始强大。寿梦是前585年即位的。前584年晋景公派巫臣使吴，开始联吴反楚。巫臣在楚庄王时是楚国申县县尹，所以称申公巫臣，屈姓，名巫臣。楚共王时，派他出使齐国，他趁机

逃亡到晋国,晋国封他为邢邑大夫。这时,与巫臣有矛盾的楚国令尹子重和大夫子反,便趁机诛灭他的家族,瓜分了他的家产。巫臣对此极为气愤,写信给子重、子反说:你们多杀无辜,我一定要使你们死在疲于奔命。于是,他向晋景公要求出使吴国执行联吴攻楚的使命。晋景公同意了这一要求。巫臣使吴时带了 30 辆战车,教吴人使用战车、行军布阵、指挥作战、训练士卒。返晋时,留下 15 辆战车给吴国,还留下了几名射手。他还把儿子狐庸留下当吴国的外交官。他极力怂恿吴王寿梦进攻楚国。巫臣这些做法当时正适合吴晋两国的需要。吴国是楚国的近邻,为使自己发展需要联晋制楚。而处在晋、楚争霸中的晋国,也需要吴国在东南牵制、打击楚国。巫臣使吴的当年即前 584 年,吴国就发动了对楚国的进攻,攻楚的边邑驾(安徽无为)、棘(河南永城县境),又进攻吴、楚之间的两个小国巢(安徽巢县境)、徐(安徽泗县西北)。同年 8 月又攻楚邑州来(安徽凤台)。楚国正率军攻郑的令尹子重,不得不奉命驰援。在这年中,子重和子反先后七次奉命往返奔驰御吴。吴国在这一年中夺去了原属于楚国的巢、徐一带的一些蛮夷部落。这说明巫臣的计谋是成功的。从此,联晋制楚就成了吴国的国策。

吴国原来被视为蛮夷之邦,和中原诸国缺乏联系,从巫臣使吴开始,渐渐打通了与中原各国的联系。前 576 年,晋大夫士燮率鲁、齐、宋、卫、郑、邾诸国大夫与吴会于钟离(安徽凤阳东),提高了吴在诸侯国中的地位。前 573 年,楚、郑攻宋,占彭城(江苏徐州市)等地。楚留 300 辆兵车协助戍守。彭城是晋、吴之间的交通要道。楚占彭城是为切断晋、吴之间的通路。不久,晋助宋收回彭城。前 563 年,晋悼公召集宋、鲁、卫、曹、莒、邾、滕、薛、杞、小邾、齐等国与吴国君寿梦相会,并攻灭偪阳国(江苏邳县西北)。偪阳处于晋、吴之间第二条交通要道上。晋灭偪阳,把它给宋,使晋、吴之间得到另一条交通要道。前 561 年,吴王寿梦死,子诸樊立,诸樊把国都迁到吴(江苏苏州)。前 559 年,晋国又召集鲁、齐、宋、卫、郑、曹、莒、邾、小邾、滕、薛、杞等国与吴相会于向(安徽怀远西)。盟会的目的是帮助吴国策划进攻楚国的方略。这几次盟会,说明晋、吴反楚联盟已经形成。前 548 年,诸樊在楚巢(安徽安庆市北)之战中中箭死,诸樊二弟馀祭立,在位 17 年死。前 530 年三弟夷眛立,在位 4 年,曾大败楚军,攻占楚地州来。前 526 年,夷眛死,应传位给四弟季扎,季扎三次让国,所以夷眛子州于继位,是为吴王僚。吴王僚当政时,前 519 年在鸡父(河南固始县南)之战中,大败楚军。次年,吴又吞并了居巢(安徽寿县东南)、钟离两小国。这时,诸樊之子公子光认为既然叔父季扎让国,就应由他继位,所以在楚国亡臣伍子胥帮助下刺杀吴王僚自立,是为吴王阖闾。此后,吴迅速向外扩展,攻占楚国城邑,使吴、楚关系进入了新时期。

从寿梦开始,晋联吴制楚,吴、楚两国不断攻战,互有胜负,吴国愈战愈强。这是晋吴联合制楚方针的胜利。　(杨生民)

向戎弭(息)兵

周灵王二十六年(前 546),在宋国执政向戎倡议下,晋楚等 13 国在宋会盟,达成弭兵协议。

春秋中期,晋、楚势均力敌,不断争霸,中小国家深受其苦。楚庄王时围宋都城达九个多月,宋人易子而食。中小国家渴望制止战争,过安定生活。晋国也与秦、齐进行战争,前 562 年晋秦栎之战与前 559 年晋秦迁延之战,前 555 年晋齐平阴之战等等,晋国有胜有败,国力大为损耗。尤其是晋公室与卿、大夫矛盾尖锐,大权渐为韩、赵、魏、范、中行、智六家所操纵,晋国君被架空,这使晋无力争霸。楚国王权也日渐衰微,同时在吴国兴起之后,吴、楚之间不断发生战争,也使楚国无力北上争霸。

在上述情况下,宋国执政向戎,倡议弭兵。向戎与晋国执政赵武和楚国的令尹子木私人关系都很好。他先去晋国找中军元帅赵武说明来意,赵武与众大夫商量,韩起(韩宣子)说:战争残害民众,消耗财物,对小国是大灾难。消除战争虽然办不到,但一定要答应,才能得人心。不然楚国先答应了,利用它号召诸侯,我们就会丧失霸主地位。晋国的大臣们感到韩起讲的有道理,晋国就接受了向戎的倡议。向戎又去楚国,楚国也表示同意,齐、秦和其他一些中小国家也同意。前 546 年,晋、楚、郑、鲁、齐、陈、卫、邾、滕、蔡、许、宋、曹 13 国代表在宋国召开了春秋时期的第二次弭兵大会。秦国同意弭兵,但没有出席大会。会上,楚国提出,原先分别从属晋、楚的中、小国家,以后同时向晋、楚两国朝贡,等于给这些国家增加了一倍的贡纳财物的负担。原来从属于晋国的侯国多,从属于楚国的少,楚国从中占了便宜。赵武说:晋、楚、齐、秦四国地位相等,晋国不能指挥齐国,正像楚国不能指挥秦国一样。最后商定,除齐、秦两国之外,原先分属于晋、楚的属国现在变为双方的附属国,对两国尽同样的义务。邾、滕两国是齐、宋两国的属国,没有参加盟约。宋、鲁、郑、卫、曹、许、陈、蔡答

应了向双方朝贡的条件。在这一点上，晋国作了一定让步。会上，晋、楚两国争当盟主。晋人认为：晋国本来就是诸侯的盟主，从来没有人能在晋国之前歃血的。楚人反驳说：你们也认为晋、楚地位平等，如果晋国永远在前，不等于说楚是弱国吗？而且，晋、楚两国主持诸侯盟会时间已很久了，岂能专由晋国主持。叔向见争执不下，劝赵武以德服人，不要争谁首先歃血为盟，晋国作了让步，由楚首先歃血。在会盟过程中，发现楚人外衣里面穿着甲，赵武有些担心。楚人也劝子木不要对诸侯失信，子木却说：晋、楚两国从来不讲信义，只要对自己有利能达到目的就行。叔向对赵武说：如果一个会合诸侯的卿不讲信用，谁愿意归属他？他也一定不会成功。如果出了事，与宋一起拼杀，也没有什么可怕的。晋国没有军事准备，就以坚守信用争取诸侯。楚国也怕因失信用而使诸侯倒向晋国，同时晋也让楚在会上当了盟主，所以这次会议终于以成功而告结束。

这次会议召开之后，与会各国之间停止了十几年的战争，晋、楚两国间在四十余年内没有发生军事冲突。晋、楚两国平分霸权，互相勾结，共同奴役各国。这次会议表明晋、楚两国争霸基本结束。从此，中原地区的晋、楚争霸为长江流域的吴、楚争霸所取代。而晋、齐、鲁各国内却开展了卿、大夫的新兴势力与以国君为代表的旧势力的斗争。因此，这次弭兵会议，成了春秋时期历史的一个转折点，从此历史进入了春秋后期。（杨生民）

子产相郑

周景王二年（前 543），子产相郑，改革内政，在与晋、楚交往中维护了郑国的利益与尊严。

子产（？—前 522），名侨，字子产，郑穆公之孙，子国之子，前 543 至前 522 年在郑国执政，是春秋后期著名政治活动家。这时，郑国外受大国威逼，国内贵族势力很大，困难重重。子产小时就有卓越的政治见解。前 565 年，郑国执政子国、子耳率兵攻蔡，俘蔡司马公子燮，郑人很高兴，唯子产持不同意见，说：小国有武功无文德是祸患，打败楚盟国蔡国，楚来讨伐能不顺从吗？顺从了，晋国必然来攻。晋、楚都来伐郑，今后几年，郑国怎能安宁？子国说：国家大事有正卿处理，小孩多嘴，是要受处罚的。这年冬天，楚国果然因郑国打败蔡国而来伐郑。前 563 年，晋国和诸侯军攻郑，在抵抗晋军时执政子驷与贵族尉止矛盾激化。过去子驷"为田洫"，整顿田界，贵族司氏、堵氏、侯氏、子师氏都丧失了土地。尉止这时便聚合这五族和不满的人发动叛乱，进攻执政所在地西宫，杀死当国（代国君执政者）子驷、司马子国、司空子耳。子驷的儿子子西闻讯，在家没有布置警戒就去追赶反叛者，反叛者已进入国君宫殿北宫，子西又返回家内武装族人，这时他家的奴隶（臣妾）多数逃跑了，财物多数也丢失了。子产听到消息后却处置有方，他派人把守门户、关闭仓库，加强守备，而后带着编好队列的十七乘兵车去北宫攻击反叛者。这时子蟜也率国人助战，尉止等人被杀，有的则逃亡到宋国，叛乱被平息。在这次平定叛乱的过程中，子产显示了政治才干。前 543 年郑国又发生了大夫伯有之乱，伯有之乱平定后，子皮执政。子皮看出子产很能干，让子产执政，并大力支持子产。子产在郑国执政 21 年，对郑国内政进行了改革，主要有：一、田有封洫，庐井有伍：这项改革是子产执政第一年推行的。所谓"田有封洫"就是划定田界，清理田亩。"封"是指田间的道路、土垄，也就是田界。"洫"是指田间的水沟。当时一夫耕田百亩，中间的小水渠叫"沟"；百人耕种的田间的水渠叫"洫"；千人耕种的田间水渠叫"浍"；一万人耕种的田间水渠叫"川"。"田有封洫"就是把田地中的道路、土垄和沟、洫等水渠区划清楚，以达划定田界、清理田亩的目的，并把侵占他人的田地归还回去。同时，又按农民居住的地区（庐井）把农民按什伍组织加以编制，叫做"庐井有伍"。这实际等于承认个体农民的合法性。子产推行这一改革时，曾遭贵族反对，他们咒骂子产说：取我的衣冠而贮之，取走我的田地进行征税，谁杀子产，我一定同去。然而过了三年，他们又说：我有子弟，子产教诲；我有田地，子产使它得到垦殖。子产如果死了，谁来继承他呢？二、作丘赋：划定田界后的五年，即前 538 年，子产又"作丘赋"，对野鄙中的奴隶按土地面积征收军赋，当兵打仗。改变了过去奴隶不纳军赋也不当兵打仗的规定。这就改变了奴隶的身分地位。由于这一措施打破庶人、国人的界限，受到统治族即国人的反对。他们骂子产说：他父亲死在路上，变成了蝎子尾巴，他在国家这样发号施令，国家会变成什么样子。有人把这话告诉子产，子产说：骂我有什么关系，只要于国有利，我愿以身殉职。子产坚持了这项改革。三、铸刑书：前 536 年子产在郑国铸刑书，把法律条文铸造在鼎上，公布于民众。这样，民众知道了用刑的准则，有利于约束自己，也利于限制贵族的不法行为。然而，这一改革遭受旧派的反对，晋国叔向写信对子产说：让民众知道法律条文，对上无所顾忌，以法律条文作根据，人人相争，国家就无法治理了。子产回答叔向说，他这

样做只为"救世"。此外，子产注意听取不同意见，他认为：让大家都不敢说话是很危险的，如同把河水堵住，河水决堤，危害大而无法救。不如让它细水长流，有意见让讲出来，变成医治自己病的药。因此，子产让人们在乡的学校里，议论国家政事、得失。有合理意见，就加以采纳。在用人方面，子产注意做到知人善任，用其所长。如善于出主意的就让他出点子，善于决断的就让他做最后决断，善于辞令和外交的就让他办外交。因此，子产执政时，郑国政治比较清明，外交上也很少失误。

在外交上子产注意维护郑国的安全、利益和尊严。前541年楚令尹公子围(后来的楚灵王)要娶郑大夫公孙段的女儿为夫人，要求住进郑国都城内的国都宾馆，子产不同意，让住在城外。下聘礼时，楚人又要求多带士兵为仪仗队进城，子产为防止意外，又不同意。经过交涉，楚方提出请求解除武装入城，郑国方才同意。前524年郑国发生大火灾，子产令国人武装起来，登上城墙，加强戒备。有人担心，这样做晋国会问罪。子产回答说：有火灾，如有人趁火打劫，国家很危险。为防止别人趁机攻击，就得有准备。不久，果然晋国官吏责备郑国，说郑国有火，晋君也很担心，然而你们派兵登城防守，真不知你们要干什么？子产回答说：贵国既然对郑国很关心，就会想到，如果不加强防守，出了危亡问题，你们担心也无用了。我们一心侍奉晋国，不会有二心。晋国官吏无言以对，也只好作罢。在对外交往中，子产为减少郑国对大国的纳贡，也多次进行斗争。如前529年各国诸侯在平丘开会议定各国对晋纳贡数量，子产极力争取郑国按较低的爵位交纳贡品。他说：过去天子规定贡品有轻重，地位高的贡重，地位低的贡纳少。……郑国是属于男一级的，要缴纳公侯一级贡品，承担不起，我要事先说明。结果，就贡品多少，从中午争到傍晚，晋国被迫答应了他的要求。会盟完了，子大叔对子产说：这样争，晋国会联合诸侯来治罪，能忽视吗？子产却认为：晋国的政策由很多大夫决定，彼此有分歧，他们也在苟安中混日子，没有力量治我们的罪。不力争，国家受欺侮，还算什么国家。子产了解晋国的情况，所以争取减轻纳贡取得了成功。子产在外交上维护了郑国的安全、独立、利益和尊严，其影响远远超出郑国。

子产的改革对民众有利，对贵族虽限制了一些他们的越轨行为，但也照顾了他们的利益。如子产执政之初，贵族丰卷要用新鲜野物祭祀祖先，这是君主才能享受的特权，所以子产不许这种行为。为此，丰卷要攻杀子产，在子皮支持下丰卷被逐出国。但子产却向君主请求保留他的土地、财产。三年过后，丰卷回来，把土地及其收入一并给了他。在这种情况下，子产的改革得到了多数人的支持。子产死后，郑人都哭泣，悲伤得如死了亲人一样。　　　　(杨生民)

春秋时的"民溃"与"多盗"

春秋时，庶民以溃逃和当盗贼的形式对统治者进行反抗，史书称之为"民溃"、"多盗"。

春秋时作为被统治族劳动者的庶民，地位低下，未完全从奴隶状态下解放出来。奴隶主贵族对庶民的剥削压迫非常残酷，迫使他们进行反抗。"民溃"就是庶民反抗的一种形式。前644年冬，齐桓公以霸主身分会合诸侯于淮水旁，为击退淮夷，保护鄫国，让齐、鲁、宋、陈、卫、郑等十国征发的庶人修筑鄫城。冬天的苦役，使很多人病倒。他们十分怨恨，有天夜里有人登丘高喊：齐有内乱。服役庶人骚动，一哄而起，溃逃。齐桓公筑城计划被迫停止，征伐淮夷的打算只好作罢。前641年，梁国(陕西韩城南)国君修筑城墙壕沟，强迫庶民服苦役。庶人疲惫不堪，不愿服役，国君以敌寇侵犯为借口强迫他们挖宫殿四周的壕沟。役人无法忍受，一齐溃逃，秦国趁机吞并了梁国。这种"民溃"事件在其他国家也先后发生。前624年春，鲁国会合一些诸侯国兴兵伐沈，沈国的民众怨恨本国的统治者，就乘机溃散。前660年，狄人攻邢，邢人溃逃。前657年，齐桓公率各国诸侯军攻蔡，"蔡溃"。前583年，楚伐莒，"莒溃"。前549年，楚令尹子木围舒鸠，"舒鸠溃"。有的国家甚而发生庶民起义。前550年陈国国君与贵族庆氏发生矛盾。庆氏为抵抗国君讨伐，征发属下庶民筑城。筑城时夯土打实需用夹板，因夹板脱落，庆氏以杀人惩罚。这使庶人无比愤怒，他们杀死监工的大小头目，庆虎、庆寅也被杀死。这是陈国爆发的一次庶民起义。面对庶人起义的强大力量，一些贵族发出了"惟命不于常"的感叹，感到难以统治下去了。

春秋时，庶民逃亡的现象各国都普遍存在，这些逃亡的民众一部分就转为"盗贼"。所以各国又普遍存在盗贼。鲁国季孙曾因"鲁多盗"责备司寇(管治安的官)臧武仲无能。季康子因为"患盗"向孔子请教治理的办法。郑国子大叔执政时，因为"郑国多盗"，曾派徒兵前去镇压。前506年，吴国攻入楚国的都城郢，楚昭王逃入云梦泽，盗贼攻击，曾"以戈击王"。晋国盗贼尤其多，甚而国都也是"盗贼充斥"，"盗贼公行"。

“民溃”与“多盗”是春秋时期阶级矛盾激化的反映，说明奴隶主贵族已无法照旧统治下去了。

（杨生民）

吴阖闾攻破楚郢都

周敬王十四年（前 506），吴王阖闾大败楚军，攻破楚郢都。

吴王阖闾，名光，前 515 年派专诸刺杀吴王僚即位，重用伍子胥。伍子胥，名员，父伍奢，兄伍尚，原为楚平王臣下。楚平王是个昏君，宠信佞臣费无极。在费无极唆使下，平王把为太子从秦国娶的妻子据为己有。费无极又诬太子谋反，伍奢因是太子的师傅被牵连，为斩草除根，处死了伍奢、伍尚，追捕伍子胥。伍子胥历尽艰险逃到吴国，决心报仇。阖闾即位后，伍子胥替他出谋划策，又推荐大军事家孙武为将军，推荐从楚国逃到吴国的伯嚭当了大夫。吴王阖闾即位后整顿朝政，安抚百姓，决心打败楚国谋求霸业。阖闾即位的第四年，伍子胥建议把吴国的军队分成三支独立作战的部队，用一支军队经常出击楚国，遇楚军抗击则立即撤回，待楚军撤回又立即出击，使楚军疲于奔命。同时，吴军选择有利时机，集中主力，歼灭楚军。从此，吴军年年进攻楚国，楚军疲惫不堪，连续失败。前 512 年，吴攻克舒地，杀了投降楚国的吴公子掩余，这年冬灭徐国。第二年吴军攻楚夷、潜、六等地。前 508 年，楚令尹囊瓦率军攻吴，在豫章（淮南地区）被吴军击败，吴军又攻占巢邑，大败楚军，俘楚公子繁。楚国在军事上处境日益恶化。

楚国令尹囊瓦贪得无厌，蔡国国君蔡昭侯和唐国国君唐成公去楚国朝贡，囊瓦向蔡昭侯无礼索要玉佩和皮衣，向唐成公索要马匹，被拒绝，就拘留了两国国君。被逼无奈，两国把东西献给了囊瓦后，国君才被释放。为此，两国对楚极为不满。伍子胥利用此事，出使两国，结成反楚联盟。前 506 年冬，吴、蔡、唐攻楚，吴王阖闾亲统大军，伍子胥、孙武、伯嚭等参加指挥。吴军沿淮水西渡，后舍舟登陆，越大别山，与囊瓦统帅的楚军在柏举（湖北麻城）相遇，两军交战，楚军大败，吴军追击，一连五次大胜楚军，乘胜攻破郢都。楚国建都近 200 年的郢都落入吴国手中。囊瓦在兵败之后逃到了郑国。楚昭王在郢都被攻破后，逃进云梦泽，被“盗”袭击，后又逃奔到随国（湖北随州市南）。吴军追至随国要求交出楚昭王，被随君婉言谢绝。

吴军进入郢都后，伍子胥掘开楚平王的坟墓，鞭尸三百，以报杀父之仇。吴国君臣按等级住进楚国的宫殿，他们还要强占楚国君臣的妻妾。

伍子胥当年逃离楚国时曾遇到楚大夫申包胥，二人关系很好。伍子胥表示一定要灭楚国，申包胥回答说：如果你要灭楚国，我就一定要复兴楚国。楚军攻占郢都后，申包胥就到秦去乞求救兵。秦哀公表示要等商议后再定，让他先在宾馆住下。他表示：楚国国君还逃难在荒野之中，我怎么敢安歇！于是，他靠在秦廷门外哭了七天七夜，感动了秦国君臣。楚、秦两国过去联合反晋，楚如果亡国，对秦也不利。在这种形势下，秦哀公决定出兵救楚。这已是第二年的年初了。在申包胥带领下，秦国发五百辆兵车救楚。秦、楚联军在沂地（湖北鄂城东）打败阖闾弟夫概率领的吴军。楚军又在军祥（湖北随县）打败吴军。这年 9 月夫概回吴国想乘机夺取王位，被阖闾打败后，逃至楚，楚封于堂溪（河南西平境）。这年越国也抄吴国后路向吴进攻。吴军在楚，军纪不好。吴军又在公壻之溪（湖北襄樊市东）和麇（湖北与陕西交界）连吃败仗。吴军消耗大，无力坚持，只好撤军。吴军撤退后，楚昭王回到郢都。历时达十个多月的这次战争方告结束。

前 504 年，吴舟师大破楚军舟师，俘楚两个水军将领和七个大夫，又在繁阳（河南新蔡北）打败了楚国陆军。楚国人心惶惶，于是一度把国都迁至都（湖北宜城东南）。这次战争后，楚国衰落。从此，南方吴、楚争霸让位于吴、越争霸。　（杨生民）

春秋时期的国人暴动

春秋时期，国人不断暴动，而且常常成为决定政权更替的重要因素。

国人是指住在国都及其近郊的居民，包括贵族、平民、工商业者。其中平民人数最多，是国人的主体。平民原是本部落、氏族的成员，与贵族处于平等地位，后来由于阶级分化，氏族贵族转变为奴隶主贵族，大多数氏族成员却沦为被压迫、被剥削的平民。随着奴隶社会的发展，奴隶主贵族与平民的矛盾越来越尖锐，斗争越来越激烈。所以，国人暴动，从性质上来说，是平民反对奴隶主贵族的斗争。西周末期周厉王时，曾发生过大规模的国人暴动。春秋时期的国人暴动就更多了。

春秋时期卫国国君卫懿公昏庸无道，非常荒诞，对国人的困苦不闻不问，但爱养鹤，给鹤住豪华的住宅，吃上等食品，坐大夫一级官员才能坐的轩车。前 660 年，狄人攻卫，卫懿公让国人去抵抗，国人说：鹤的待遇与大夫一样，让鹤去打仗吧！结果，卫懿公只

得带领亲兵与狄人交锋，全军覆没，自己也被杀死。前633年，晋、楚城濮之战前夕，卫国国君想背晋从楚，国人反对，国人就把国君赶走了。前555年，郑国执政者子孔因专制残暴激起国人不满，贵族子展、子西率领国人杀子孔，并瓜分了他家的财产。前542年，莒国黎比公暴虐，被国人杀死。前520年，莒国国君铸成剑后杀活人来试验，国人起而对他进行围攻，莒国君被迫逃亡。前485年陈国的司徒辕颇以国君嫁女为名，向封田征收赋税，并用这笔钱为自己铸造鼎等大型器物，结果激起国人暴动，辕颇被赶走，逃往郑国。

春秋时期，出现了人身较自由的工商业者，春秋初郑国国君与商人订立了商人不背叛国家及国家不干涉商业事务的盟约。这时，工商业者也进行反对奴隶主贵族的斗争。前478年，卫国工匠暴动，包围王宫，卫庄公在宫门内向起义者求饶，不成，就带着太子疾、公子青从北墙跳墙逃跑，摔断了腿。卫都附近的戎州人乘机攻打庄公，杀死了太子疾、公子青。庄公逃到戎人己氏那里，企图逃命，但己氏与他有仇，杀死了他。前469年，卫国又发生了工匠暴动，原因也是"公使匠久"。工匠们有的拿着兵器，没有兵器的就拿着斧子，进攻卫侯辄，卫侯辄只得狼狈逃跑。

春秋时期，国人暴动和工商业者的反抗，说明奴隶主贵族在国都中的统治也是不稳的。有时国人、工商业者的反抗斗争常常和统治阶级内部斗争结合在一起。尤其是国人，作用重大。齐国的田氏、鲁国的季氏在斗争中取胜的重要原因，就是因为国人支持。所以，国人的向背常常决定着政权的更替。

（杨生民）

越勾践卧薪尝胆

越王勾践被吴王夫差打败亡国，后卧薪尝胆发愤图强，周元王四年（前473）终于灭吴复兴越国。

越国传说是夏朝国王少康庶子无余封于会稽而建立的国家。无余传20余世至允常，允常的儿子就是越王勾践。前601年，楚庄王灭舒和蓼，与吴、越会盟。这是越国在春秋时活动的最早记载。前537年，楚灵王伐吴，越大夫常寿曾带一支兵马与楚会合，这次楚兵败于鹊岸（安徽铜陵一带）。前518年，楚平王出动水军窥吴境时，越大夫胥犴曾在豫章之滨犒劳吴军。前510年，越王允常在位，吴王阖闾攻越，失败。前505年，越趁吴兵攻入楚郢都，曾出兵攻吴，成为迫使吴王阖闾从楚撤军的一个原因。从此吴、越结怨，彼此攻战。

前496年，越王允常死，勾践即位。吴国乘机伐越，越兵抵御，双方在槜李（浙江嘉兴）大战，吴军大败，吴王阖闾一个脚趾被砍去，伤势沉重，死于回师途中。儿子夫差继位，决心报仇。让一个臣下站在宫门，他出入时就喊：你忘了杀父之仇吗？他就回答：不敢忘，三年一定报仇。刚到三年，双方又发生大战。前494年，吴、越在夫椒（太湖椒山）大战，吴军大败越军，攻进越境。勾践只剩5000人，退守会稽，为免亡国，接受了文种向吴求和的建议。勾践派使到吴军中请罪求和，表示愿为吴王臣仆，夫人愿为奴妾。夫差打算答应。伍子胥对吴王说：这是天以越赐吴的良机，不能答应。这时，文种又建议勾践以美女、宝器献给吴太宰伯嚭。伯嚭受贿后引文种朝见吴王，文种要求吴王夫差赦免勾践的罪过，接受越国的宝器。同时又说：如得不到吴王的赦免，勾践将杀死妻子，毁掉宝器，以剩下的5000士卒与吴国拚个死活，对吴也不利。伯嚭也从旁说：越王愿意臣服，如果赦免，对吴国有利。伍子胥则认为：现在不灭亡越国，必会后悔莫及。勾践贤能，文种、范蠡都是贤臣，如果归国，后将为乱。吴王不听伍子胥的忠言，赦免了越王，收兵回国。议和达成后，越国成了吴的属国，勾践夫妻及臣吏300人入吴为吴王服役。勾践小心翼翼地服侍吴王，3年后，吴王放勾践回越。

勾践被困在会稽时曾叹息说：我的一生在这里就完结了吗？文种劝他说：商汤被囚禁在夏台，周文王被拘禁在羑里，晋重耳逃奔狄国，齐桓公逃奔莒国，最后不是称王就是称霸，从这里可以看到，祸安知不会转变为福呢？勾践回越后，时时不忘复兴越国。他不吃肉，穿粗布衣服，亲自耕作，夫人织布，住在旧房子里，睡在铺着席草的木板上，在自己坐和睡的地方挂了一个苦胆，坐着、睡觉时、吃饭时、抬起头来尝尝苦胆，自言自语地问自己：你忘了在会稽被围困的耻辱吗？勾践又任用贤能。范蠡对他说：带兵打仗，文种不如我。安抚国家，亲附百姓，我不如文种。勾践就把国家的政事委托给文种，把带兵打仗的事委托给范蠡。勾践在国内，提倡垦辟田地，减轻赋税，做到使民"有三年之食"。又奖励生育，规定男子到二十岁，女子十七岁，不结婚成亲，父母有罪受处罚。生儿女时，公家派医护理。生男，奖二壶酒一犬；生女，奖二壶酒一豚。生两个，国家养活一个。生三个，国家养活两个。此外，还发展冶铸手工业，铸炼宝剑的技术很出名。同时，加强军事训练，按闾里行政组织征兵，以重赏严刑教育士卒服从命令，乐于立功。

在外交上，勾践对吴国实行以退为进的策略。经

常送吴国玉帛珍玩，以讨欢心。选送美女西施、郑旦，助长夫差的骄奢淫逸。伐取大木为吴修姑苏台，使吴劳民伤财。假装饥荒，向吴借粮，使吴库藏空虚。又偿还煮熟的粮食让吴做种籽，使其当年颗粒无收。又制定了“结齐、亲楚、附晋”的方针，尤其是与楚国关系密切。楚惠王是越的外甥，文种、范蠡都是楚国宛郡人，申包胥曾使越为越谋划攻吴，形成楚、越联合制吴的形势。当吴国北上伐齐时，勾践君臣前去朝贺，怂恿夫差北上争霸，以消耗吴国国力。

正当越王勾践励精图治，千方百计要灭吴雪耻时，吴王夫差却日益腐败，好大喜功。前489年吴再次伐陈，前488年向鲁征取百牢（牺牲）的献礼，前487年又助邾伐鲁。前486年，在邗（江苏扬州市境）筑城，开凿长江、淮河间的运河邗沟，准备北进。前485年联合鲁、邾、郯伐齐，这次吴军被齐打败。前484年吴、鲁联合与齐战于艾陵（山东莱芜县东北），齐国大败，吴俘虏了齐国中军将领国书等五大夫，获革车八百乘，甲首三千。这年伐齐时，越国君臣朝贺伐齐，满朝欢喜，独伍子胥谏吴王说：越是吴国的心腹大患，齐与吴是疥癣之疾，愿大王放过齐国先伐越国。吴王不听。越国向吴借贷粮食，伍子胥谏不给，吴王却让给。伍子胥感叹地说：吴王不听谏言，三年后，吴国怕要被越国踏成废墟啊！太宰伯嚭对吴王说：伍子胥表面上很忠心，实际是个很残忍的人。他连自己的父兄都不顾，怎么会顾及大王呢？大王不防备他，以后他必然会作乱。伍子胥见吴王宠信奸佞，趁使齐之机，把儿子寄托在齐国鲍氏家，吴王得知大怒，认为伍子胥有反心，随赐剑逼其自杀。

前482年，吴国农业歉收，夫差发兵北上争霸，从水路邗沟出发会晋定公于黄池（河南封丘南）争中原霸主。出师前，太子友讲了一个螳螂捕蝉、黄雀在后捕螳螂的故事，说如果吴国倾全国兵力到千里之外攻战，身后越国攻吴这是很危险的事情。夫差听不进去，依然北上。这时，勾践与范蠡经过商议，抓住时机，率精兵4万，近卫军6千，分3路，一路由海路入淮，切断吴军的归路，一路直逼姑苏。双方在泓水（苏州近郊）激战，吴军全线大败，太子友等三将被俘，越军焚烧了姑苏，夺取了船只。夫差在黄池争当霸主后，急忙领兵返回，双方议和，从此越国加紧准备灭吴。前478年，越国得知吴国发生大饥荒，勾践又率大军伐吴，两军在今苏州南大战，吴军大败，越军三战三捷，直捣姑苏城下。前475年越军再次进攻姑苏，因城池坚固一时无法攻克，采取长期围困的办法，前473年越军终于攻克姑苏。夫差率众逃至姑苏台上，派使者袒衣膝行至勾践面前表示愿惟命是从，当越王臣虏。勾践想接受，范蠡对他说：君王忍辱受苦二十余年为了什么？又对夫差使者说：昔日上天把越国赐给吴国，你们不接受；现在上天以吴赐越，我们不敢违背天命。范蠡毅然击鼓进兵。勾践又派人对吴王说，我给你甬东（舟山群岛）之地，以三百家供你衣食。夫差回答说：我已年老，不能侍候您了。而后自杀身亡。勾践认为吴太宰伯嚭是奸臣，所以杀了他。

灭吴后，勾践率兵北渡江淮，与齐、宋、晋、鲁等国诸侯在徐州（山东薛县）会盟，并向周朝贡。周元王派人赐勾践祭肉，命为伯，当了霸主。从此，越兵横行江淮，号称霸王。范蠡认为，与勾践可以共患难，不可共安乐。所以，范蠡离开勾践而去。文种留在越国。有人在勾践面前诬告文种要谋反，勾践赐给文种一把剑，逼他自杀。

赵王勾践是春秋时期的最后一个霸主，灭吴以后，占有了整个吴国，国土扩大了一倍。战国时，勾践六世孙王无疆为越王时，曾北伐齐，西伐楚。后被楚威王打败，王无疆被杀，原吴国的土地被楚占有。后来，越国王族诸子争立，国家分裂，诸子或称王，或称君，朝服楚国。（杨生民）

鲁国三分公室

春秋中期以后，季孙氏、叔孙氏、孟孙氏三家瓜分鲁国的事迹。

季孙氏、叔孙氏、孟孙氏均系鲁桓公的子孙，所以称三桓。鲁桓公有四个儿子，一个是太子同即后来的鲁庄公，另外三个是庆父、叔牙、季友。前662年，鲁庄公病危，庆父勾结叔牙图谋君位。叔牙探问庄公病情，庄公自感病重不久于人世，就向叔牙征询自己死后君位的继承问题，叔牙回答说：父死子继，兄终弟及，都是鲁国的习惯，庆父是您的弟弟，可以继位。庄公赶快召另一弟弟季友商议，季友回答说：国君应由您的儿子公子般继承，我誓死立公子般为国君。庄公知季友忠良，就把大权交给他。季友采取果断措施，逼叔牙饮鸩自杀，但未追查庆父。庄公死后，季友立公子般为国君。不到两月，庆父指使公子般的马夫邓扈荦刺死公子般，而后又以追查凶手为名杀邓扈荦。季友被迫出奔陈国。庆父本与庄公夫人哀姜私通，刺死公子般后，二人合谋立庄公另一儿子公子开为国君，是为鲁闵公。前660年，庆父又与哀姜合谋杀鲁闵公自立。不到两年，庆父杀了两个国君，激起了鲁人公愤。庆父怕被诛，逃到了莒国。这时，季友奉庄公幼子公子申从陈国入鲁，立公子申为国君，是为

鲁僖公。季友重赂莒国，要求交出庆父治罪，庆父向季友求情，请求免死奔他国，被拒绝，最后自杀。季友平定内乱后，鲁僖公封给他一座城，季友回答说：我与庆父、叔牙都是先君桓公之子，请封他们二人的后代，使鲁人知道主公不忘祖宗。这样，鲁僖公封公孙敖继承庆父的地位，称孟孙氏；封公孙兹继承叔牙地位，称叔孙氏；季友一支，则称季孙氏。

季孙、叔孙、孟孙这三家大夫，有封邑，为壮大各自势力，采取了种种办法。季氏的妻妾不穿丝织品，收罗人才，争取民众。及至春秋后期，季氏有大量私田和依附民众，还有私家武装2000人，力量超过鲁国国君。由于私田越来越多，公田无人耕种，公室的收入越来越少，所以鲁宣公十五年(前594)鲁国实行"初税亩"，不分公、私田，一律按亩收税。这一改革虽使公室收入增加，但也使国君与卿大夫的矛盾进一步激化。鲁国原来有三军，后衰弱，只有上、下两军。鲁襄公十一年(前562)春，季武子把两军改为上、中、下三军，与孟叔、叔孙三家各分一军，军赋由三家征收。这就是"三分公室"。三家在各自占有的土地上采用不同的剥削方法，季孙氏采用征税制，叔孙氏采用奴隶制，孟孙氏采用新旧各半的方法。季孙氏的办法收效显著，势力更加发展。鲁昭公五年(前537)，三家废掉三军，恢复两军，又把两军分为四份，季孙氏独得两份，叔孙氏、孟孙氏各得一份。三家都采用征税制，并各以其收入的一部分贡献给鲁君。这样，三家瓜分了鲁国，鲁君成了徒有虚名的共主。

然而，以国君为代表的公室势力不甘心自己的失败。季孙氏封邑在费(山东费县北)。鲁昭公十二年(前530)，季孙氏家臣费宰南蒯与鲁昭公串通发动叛乱，声言要把季孙氏的土地财产收归公室。但费邑民众支持季孙氏，鲁昭公十四年(前528)费邑民众赶走南蒯，南蒯逃到了齐国，投靠了齐景公。鲁昭公二十五年(前517)季孙氏家族内部矛盾尖锐，季孙氏与郈氏、臧氏的矛盾也很尖锐。鲁昭公企图利用这一时机消灭季孙氏，于是率兵进攻季孙氏，杀季平子弟弟，攻进季平子住宅。季平子提出请求，要求把自己迁到沂水等待处理，或把他囚禁在费邑，或给他五辆车子逃亡国外，都未得到允许。鲁昭公想联合叔孙氏、孟孙氏两家共同诛灭季孙氏。叔孙氏族人、家众都认为没有季孙氏就没有叔孙氏。于是叔孙氏派武装援救季孙氏，公室武装被包围。孟孙氏这时又杀郈氏。在三桓势力的联合反攻下，鲁昭公被赶出鲁国，逃到齐国。鲁昭公先后曾企图利用齐国、晋国的力量返国，但都未得逞，最后死在晋国乾侯。鲁昭公死后，晋国史官评论说：鲁君失政，季孙氏勤政，人民忘了国君，他死在国外，有谁怜恤呢？鲁哀公统治时期(前494—前467)，公室想借越国力量诛灭三桓，但在三桓联合进攻下，鲁哀公也不得不逃亡国外。经过一系列的斗争，代表新兴封建势力的三桓，在鲁国取得了胜利。　　　　　　　　　　　　　　　　(杨生民)

孔子创立儒家学派

在奴隶制逐渐崩溃、封建制开始走向胜利的春秋末期，孔子通过自己的活动创立了对后世影响深远的儒家学派。

孔子名丘，字仲尼。前551年生，前479年卒，终年73岁，鲁国陬邑(山东曲阜)人。孔子出身于没落的奴隶主贵族家庭，远祖弗父何系宋闵公嫡子，让位于弟宋厉公。春秋初期，弗父何的四世孙孔父嘉任宋国大司马，在争夺君位的斗争中，被权臣华督杀死，家人逃到鲁国陬邑。传至孔子父亲叔梁纥时已是春秋后期。叔梁纥是有名的大力士，任鲁国陬邑大夫。前551年，叔梁纥续娶的妻子颜征在生孔子。孔子出生不久，父亲就去世了。他少年时家庭不富裕，青年时给贵族家当管理财务和畜牧的小官。据说他帐目清楚，牛羊养得肥壮。他说："吾少也贱，故多能鄙事。"这说明他青少年时并不是四体不勤的人。另外，鲁国是个以笃守周礼保存西周典籍文物而闻名的国家。在环境影响下，孔子幼年游戏时就喜欢陈设礼器，模仿礼仪活动。孔子青年时学习勤奋，他自己说他15岁时立志学习，学习了礼、乐、射、御、书、数等传统的科目，向郯子学习过历史上的典章制度，曾向老子问礼，曾向其他有专长的人学习过乐、琴等等。三十多岁时在鲁国贵族社会中已以博学而闻名，孟僖子死时曾嘱他的两个儿子拜孔子为师。

春秋时期传统的天命思想已经动摇。孔子说：天说了什么呢？四季照样运行，百物照样生长，天说了什么呢？从这句话中可以看出，孔子心目中的天不是有意志的人格神、造物主。孔子所说的天命包含有不可抗拒的自然必然性或自然法则的意思。这和西周时把天视为有意志的人格神，把天命视为不可抗拒的上帝的意志是不同的。孔子"不语怪力乱神"，认为"未知生，焉知死"，"不能事人，焉能事鬼"。所以，孔子虽未断然否定鬼神，但也不怎么相信。孔子极力提倡"仁"，"仁"的含义就是"爱人"，而"爱人"就要求"使民以时"，不要过分地役使民众。这无疑是要求改善劳动者的地位的一种反映。"仁"的极致是"博施于民而能济众"，能做到这一点便可称之为"圣"。孔子

还特别强调"礼"，特别崇拜制礼作乐的周公，在春秋时代竭力恢复西周的礼制。这反映孔子思想中保守的一面。孔子还竭力提倡"中庸之道"，要求人们认识和处理事物要恰如其分，要把握好度量界限，过分了和达不到一定界限都不好。

孔子理想的政治是西周的盛世，理想中的圣人是周公。他主张维护"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的社会秩序，对当时卿大夫专权、政权下移、礼乐崩坏的现实不满。前516年，孔子35岁曾到过齐国，见过齐景公，刚开始与齐景公谈的很投机，后来没有用他，他返回鲁国。从此，一方面聚徒讲学，一方面从事政治活动。五十多岁时担任过鲁国的中都宰，后又任司空，由司空又任司寇，并摄行相事。任司寇时，做了两件事：一件事是前500年，齐景公与鲁定公会盟。齐君在会盟时企图用莱人武装劫持鲁君；孔子立即让鲁定公退下，自己挺身而出，对齐人说，两国和好不应以武力威逼，又以"夷不乱华"为理由，义正辞严，指出用莱兵的不当，齐景公无理，只好斥退莱兵。会盟时齐国提出齐军出境征伐，鲁国要派300乘兵车随从。孔子也立即提出，齐国如不归还占领的鲁国汶阳的一片土地，鲁国无法听从。这年，齐国归还了以前侵占的鲁国的土地。这次会盟，孔子维护了鲁国的尊严，引起了齐人的注意。第二件事是前498年，孔子在鲁定公同意下发动的"堕三都"。三都原是三桓季孙氏、叔孙氏、孟孙氏的都邑，是他们专权的根据地，后来因他们的家臣反叛，又成了三家的对立物，所以三家也同意推毁这些都邑。孔子先撤除了叔孙氏的郈邑，接着撤除了季孙氏的费邑。撤除孟孙氏的郕邑时，孟孙氏不同意，鲁国国君的军队包围了郕邑，但攻不下来，结果没有成功。孔子在鲁国执政，治理有方，引起了齐国的惊恐，怕鲁国强大，于齐不利。于是齐国选了80名美女、30乘车的马匹给鲁君。鲁君与季桓子等人一连几天观赏齐国送来的女乐，不理政事，祭祀也不按常规送祭肉给大夫。在这种情况下，孔子为实现自己的政治抱负就离开鲁国去周游列国。这年，孔子55岁，离开鲁国时，曾任季氏宰的子路、武城宰的冉求等学生都相随侍奉，先后14年，到过卫、宋、陈、蔡、楚诸国，一路备尝艰辛，受了许多讥讽谩骂。前484年孔子68岁时回到了鲁国。从此致力于教学和整理古代典籍。

孔子是我国历史上的大教育家，对教育事业的发展有重大贡献。西周时期，学在官府，统治阶级子弟才能进学校。孔子是私人办学，打破了官府对教育的垄断。孔子提出"有教无类"，出身微贱的人也可以入学。这些做法对文化教育下到民间，起了促进作用。孔子在教学态度上，主张虚心向别人学习，"学而不厌"，"三人行必有我师"，对学生是"诲人不倦"。孔子在教学方法上不机械，提倡"因材施教"，"举一反三"。他提倡"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的实事求是的学风。在思想方法上提出"毋意，毋必，毋固，毋我"，即不要臆测，不要绝对化，不要固执偏见，不要只看到自己。孔子的教育思想是有局限性的，如贱视生产劳动，认为这是"小人"干的事情，主张"君子劳心，小人劳力"等等。

孔子通过自己的教育活动创立了儒家学派，这对中国后世的影响是深远的。相传孔子有弟子三千多人，其中有72位有才干有成就的人，如颜渊、闵子骞、冉伯牛、宰我、子贡、冉有、子路、子夏等等。孔子传授给学生的科目主要是传统的六艺：书、数、射、御、礼、乐。书是认字写字，数是数学运算，射是射箭一类武艺，御是驾车的有关本领，礼是历史上形成的反映人与人之间关系的有关礼节、仪式，乐是音乐、舞蹈。孔子及其后儒家用作教材的有《易》、《诗》、《书》、《礼》、《乐》、《春秋》等六经。这些经典是儒家的经典，也是指导后来中国封建时代政治生活和精神生活的经典。这些经典有的是孔子编订的，有的则是后人编订和补充的。《易》又称《周易》，后世称《易经》，是一部古代占卜用书，具有朴素唯物论和辩证法思想，孔子晚年喜欢读《易》，对《易》有钻研和解释，并用于教授门人。《诗》又称《诗经》，据说原有三千多篇，经孔子删削，后剩305篇。《书》后称《尚书》、《书经》，是一部古代历史文献汇编，上起《尧典》，下迄《秦誓》，共29篇，有很高的史料价值。《礼》是指周代宗法、政治典章制度及有关的各种仪式，流传下来的有《周礼》、《仪礼》、《礼记》。《乐》已失传。《春秋》原是鲁国的编年体史书，经孔子删修编成，孔子这样做的目的是为"寓褒贬，别善恶"，使乱臣贼子惧。后来解释《春秋》的书有《左传》、《公羊》、《谷梁》三传。这六经之外，孔子的弟子辑录的《论语》一书，记录了孔子的言行。这些典籍对我国古代文化和历史典籍的保存、流传也做出了宝贵贡献。

孔子所创立的儒家学派，传授了古代统治阶级管理国家和社会所需要的各种知识、技能，保存了我国古代的文化典籍。这不仅对我国历史和文化的发展有深远的影响，对亚洲一些国家历史和文化的发展也有深远的影响。　　（杨生民）

战　国

三家分晋

春秋末晋国政权为六卿把持，六卿互相兼并，导致了周威烈王二十三年（前403）韩、赵、魏三家分晋，形成三个国家。

春秋初期，晋公族嫡系与旁系斗争尖锐。晋献公诛灭旁系公族，使嫡系继承君位得到保证。献公死后，他的几个儿子又为争夺君位斗争，晋文公即位，这一斗争才告结束。为防止公族内部争夺君位的斗争，晋国规定不分封国君家族子弟，但并未废除传统的分封制和世卿世禄制，只是限定可以分封异姓卿、大夫，异姓卿、大夫的封邑、职位都可世袭，并在封邑中掌握着军事、行政、司法、财政大权。卿同时又是晋国的军事将领。晋国又让卿大夫的家族代替公族。所以，卿大夫势力越来越大。国君为保卫自己的权力不断与卿大夫进行斗争，如晋景公差一点把赵氏子孙杀绝，晋厉公诛灭了有“三卿五大夫”的郤氏家族。卿大夫之间也不断斗争，在斗争中晋国大族栾氏、祁氏、羊舌氏又先后被灭。这样，晋国就形成了韩、赵、魏、范、中行、智六卿专权的局面。

春秋末六卿之间斗争激烈，在灭掉祁氏、羊舌氏17年之后，前497年晋国发生了赵鞅等与范氏、中行氏的斗争。不仅晋国各卿参加，齐、鲁、宋、卫、郑诸国也因支持范氏、中行氏而参与其中，斗争持续7年之久。这次事件是以赵氏家族内部矛盾为导火线而激发的。晋国执政赵鞅曾攻卫国，卫国进贡给他500家人。这些人放在邯郸，赵鞅打算移至晋阳（山西太原）。他的族人赵午治理邯郸，反对把这500家迁至晋阳。赵鞅下令把赵午囚于晋阳，随从人员不许带剑。赵午的随从违令带剑，赵鞅处死了赵午。赵午儿子赵稷等人乃据邯郸反叛，赵鞅派兵包围邯郸。由于赵午是中行氏荀寅的外甥，荀寅又和范氏范吉射有姻亲关系。所以，中行氏、范氏联合进攻赵鞅，赵鞅逃回晋阳，被包围。智氏荀跞对晋定公说：按晋国法律，首先挑起内争的要处死刑，现在三大臣发动内乱，单单处罚赵鞅，用刑不公，应把三人全部赶走。晋定公同意，令智、韩、魏三家讨伐范、中行两家，未打胜。范、中行就向定公发动进攻，国人都纷纷起来帮助君主，范、中行被打败，逃往朝歌。按晋国法律首先挑起内争者处死，赵鞅杀赵午是挑起内争的祸首之一，应处死。但韩、魏两家在晋定公面前替赵鞅求情，赵鞅的谋臣董安于又承担“始祸”的责任而自杀，这样赵鞅便回到国都恢复了原来的地位。范氏、中行氏逃到朝歌后，晋军包围了朝歌。这时，齐景公分别与鲁、卫国君和宋景公相会，商议援救范氏、中行氏。前496年，晋军败范氏、中行氏于潞（山西潞城东北），郑出兵助范氏，也败。前493年，赵鞅率军与支援范氏、中行氏的郑军在戚地相遇。赵鞅在前线誓师说：对打败敌人的人，上大夫赏赐给县，下大夫赏赐给郡，士卒赏田十万（十田），庶人工商可以仕进，奴隶可以被释放。誓词激励战士勇敢作战，终于大获全胜，郑军大败，晋军虏获了齐国送给范氏、中行氏的粮食一千车。第二年赵鞅率晋军围攻朝歌，范氏、中行氏逃奔邯郸。赵鞅率军围邯郸，邯郸投降。范氏、中行氏又投奔鲜虞（中山国），齐和鲜虞又把二人送回晋地柏人（河北隆尧西南）。晋军又包围柏人，范氏、中行氏最后逃到了齐国。

前458年，智、韩、赵、魏四家联合分占了范氏、

中行氏的地方，晋出公不答应，四家联合起来赶走了晋出公，晋出公在逃奔齐国的路上死去。智氏立晋哀公(懿公)，控制了朝政。智氏在四家中势力最强。智伯荀瑶想独吞晋国，为削弱韩、赵、魏三家，以晋侯之命，要恢复晋国的霸主地位，让每家拿出100里的土地和户口归“公家”。韩康子虎、魏桓子驹如数交出。赵襄子无邮却说：土地是祖先留下的产物，哪能随便送人呢？于是，智伯联合韩、魏两家出兵攻打赵家，答应灭赵家后三家平分赵家的土地、户口。前455年，智伯率三家军攻赵氏。赵襄子退守晋阳，被智伯所率三家军队围困，双方相持近二年。前453年，智伯用水淹晋阳城。赵襄子派谋士张孟谈出晋阳城对韩康子、魏桓子说，唇亡齿寒，赵亡以后，就轮到你们两家了。韩、魏两家并非自愿，又见智伯非常专横，怕智伯得势，于己不利，决定倒向赵家。韩、赵、魏三家反过来用水淹了智伯的军营，智伯驾小船准备逃命，被抓住杀掉，智氏一族被灭，三家平分了智家的土地和户口。前438年，晋哀公死，晋幽公即位，韩康子、赵襄子、魏桓子商定把晋国的绛州、曲沃两座城留给晋国国君，其他地方三家瓜分。此后，三家各自独立，被称为三晋。前403年，经过周威烈王的册命，韩、赵、魏三家正式成为诸侯国。这就是历史上所说的三家分晋。 (杨生民)

田氏代齐

齐国是西周分封的姜姓诸侯国，春秋中期以后齐国的田氏(陈氏)争取民众发展势力，经长期斗争于周安王十六年(前386)取代了姜齐。

春秋初，前672年陈国发生内乱，公子完逃到齐国，齐桓公任命他为工正(管理工匠的官)，公子完就是齐国田氏(陈氏)的始祖。田氏在迁齐以后，与齐公室关系密切，得宠于齐。齐景公当政时(前547—前490)，齐国国君对民众的盘剥苛重，达到民众收入的三分之二。而且刑法苛暴，受刖足(砍掉脚)的人很多。田氏却减轻对民众的剥削，争取民众，具体做法是向民众收税时用小斗收，减轻盘剥；民众借贷粮食时，用大斗贷出，解决民众的生活困难。原来齐国的量具是升、豆、区、釜、钟五种，从升到釜是四进位制，从釜到钟是十进制。田氏另外制作了一套家量，从升到釜是五进位制，从釜到钟仍为十进位制。这样，田氏家量就比齐国的公量大得多。田氏用小斗向农民收税(实物租)，用大斗贷出，这对民众是有利的。因此，民众纷纷逃到田氏那里，“归之如流水”。田氏控制的劳动力越来越多，势力越来越大。这样，以田氏为代表的新兴势力与以齐公室为代表的旧势力矛盾尖锐，频频发生斗争，主要有以下三次：

第一次是前532年夏天田氏联合鲍氏与旧贵族栾氏、高氏的斗争。当时有人告诉田、鲍说栾氏、高氏要攻打田、鲍，又告诉栾、高两家说田、鲍要消灭你们。田、鲍两家做好战争准备时，栾施和高强却正喝酒并无打仗的样子。田、鲍两家乘其不备发动进攻。栾、高两家想把国君控制在手里，派兵攻打国君住的宫门。双方军队在稷门外大战，栾、高战败。国人乘胜追赶栾、高，在鹿门又打败他们。栾施、高强逃往鲁国。这次斗争后，田桓子对国中贫困孤寡者发给粮食，势力更加强大。

第二次斗争发生于前489年，是在田桓子的儿子田乞与鲍氏联合大夫们同贵族高张、国夏之间进行的。齐景公临死时立不得人心的公子荼为太子，托孤给高张、国夏，驱逐群公子。田乞伪装着对高张、国夏很恭顺，与他们同车上朝，好像是他们的卫士。背后却告诉大夫们说高、国根本不听诸位的意见。诸大夫就议论要赶走高、国。田乞又对他们说要早点想办法，犹豫不决是下策。当着高、国的面又说诸大夫的坏话：他们像虎狼，我在你们身边，随时想杀我。田乞把双方都鼓动起来了。前489年田乞等人带领甲士攻入君主宫内，高张、国夏赶快带着军队往救，双方军队在街道上打了一仗，高、国战败，国人乘胜追击，国夏逃奔莒国，高张等人逃往鲁国。田乞派人到鲁国接回公子阳生，立他为国君，就是齐悼公。此后，田乞为相，掌握了齐国的实权。

第三次斗争发生于前481年，是田乞的儿子田常(即田恒，田成子)与监止的斗争。齐悼公即位四年，鲍氏杀悼公，立悼公子壬为齐君，是为齐简公。齐简公信任监止，让他执掌齐国政权。齐大夫御鞅对简公说：田常、监止不能并立，君主应选择一个。齐简公没有听御鞅的话。田氏的一个族人田豹当了监止的家臣，监止对他很信任，对他说：我把田氏全部赶走，你来替他们，如何？田豹回答说：我虽也姓田，但和他们很疏远，他们中不听话的才几个，何必全部赶走呢？田豹在暗地里却把这一消息告知了田氏。田氏知道这一消息后，以田常为首的兄弟八人分乘四辆战车去宫中劫持简公。监止见田氏劫持了国君，率领徒属进攻宫中的大门、小门，未攻进。监止失去了国君的支持，国内的人又都支持田氏，只得出走，途中又迷失道路，进入田氏的封地丰丘。被丰丘人捉住，后被杀死。打败监止后，田常又逮捕了简公，齐简公这时才后悔没有听御鞅的话。过了两个月，田常在舒州

(江苏徐州)杀死简公,立简公弟骜为齐君,是为平公。田常为相,掌握齐国的大权。为巩固统治,田常又采取了一些有力的措施:一、消灭齐国的旧势力,把鲍氏、晏氏、监止及有势力的公族全部杀掉,安排田氏兄弟和同族人做都邑大夫,从上到下完全控制了齐国的政权。二、扩大封地,把安平(山东临淄东)以东至琅邪(山东诸城南)的地区划为自己的封地,其面积超过齐国国君所占的土地。三、同晋国韩、赵、魏三家结约,互相支持。齐国原来占据的鲁、卫两国的土地,归还原主。田常死后,他的儿子襄子(田盘)又进一步扩大势力。田常的曾孙田和托三晋向周天子请求封田氏为诸侯,前387年经周安王认可,田氏正式列为诸侯,姜姓的齐国为田氏的齐国所取代。

(杨生民)

魏文侯改革图强

战国初魏文侯任用李悝、吴起等人改革图强的事迹。

魏国的远祖系周文王的庶子毕公高,武王伐纣后封于毕。春秋初,魏国祖先毕万曾侍奉晋献公。晋悼公时,魏绛和戎有功。魏绛的孙子魏献子在晋顷公时曾执掌晋国国政,为六卿之一。魏献子的三世孙魏桓子与韩、赵共灭智氏,形成了三家分晋的局面。魏文侯就是魏桓子的孙子。

魏文侯前445年前396年在魏执政,名斯,前445年继位,前403年与韩、赵一同被周天子册封为诸侯,是战国时魏国的第一代国君。文侯当政后决心励精图治。他礼贤下士,招纳人才。他以孔门弟子卜子夏和社会名流田子方、段干木为师,先后任用魏成子、翟璜、李悝为相,又重用吴起、西门豹、乐羊等人,使魏国富强。

李悝,又叫李克,是卜子夏的学生,战国前期法家的代表人物,关于他的生平事迹,留下的记载很少。他的著作,有《李子》32篇和《法经》6篇,也都失传。在魏文侯的支持下,李悝在相魏的10年中进行了一系列的改革,主要有:一、在经济方面实行"尽地力之教"和"平籴法"。所谓"尽地力之教"就是让农民努力耕作增加粮食产量的一种措施。李悝认为:百里见方的地方,有田九万顷,除去山林、河泽、城邑、乡居外,实际可耕种的田地为六百万亩。如果农民勤谨耕作,每亩可增产三斗,六百万亩耕地可增产粮食一百八十万石。如果农民不勤谨耕作则每亩可减产三斗,六百万亩土地可减产一百八十万石。因此,李悝根据土地好坏分给每个劳动力百亩或二百亩土地,保护农民的生产积极性,发挥土地的潜力,增加粮食产量。"平籴法"是指在年成好时,政府以平价购进余粮做储备,荒年时再以平价出售,防止粮价暴涨暴跌,防止"谷贱伤农"以稳定小农经济。二、废除西周时的官爵世袭制度,按"食有劳而禄有功"的原则,选拔有功劳、有能力的人当官,吸收了很多人才加入封建官僚集团。三、以法治国。李悝收集整理了春秋末期以来各国的法律条文,"集诸国刑典"之大成,编成了我国历史上第一个封建法典——《法经》。《法经》虽已失传,据有关记载大致有《盗法》、《贼法》、《囚法》、《捕法》、《杂法》、《具法》6篇。前四篇主要讲对盗、贼进行关押、拘捕的办法。《杂法》主要规定了惩办盗窃官府印信、议论政府法令、淫乱、赌博、贪污贿赂等罪行的办法。《具法》则是讲根据具体情况加重或减轻刑罚的法律。《法经》的许多内容为以后封建统治者所沿用,影响深远。

魏文侯还任用吴起改革军事制度。吴起是杰出的军事家,对军队训练严格,在魏国实行"武卒制",被选中当武卒的,国家奖给好的田宅。吴起关心士卒,与士卒同甘苦,"常与士卒最下者同衣食"。吴起训练的军队,纪律严明,战斗力强。公元前408年,魏文侯令吴起伐秦,吴起率军一举攻下秦的五座城池,魏国在这里设了西河郡,吴起任西河守。吴起治西河二十余年,"亲万民,实府库",使"秦兵不敢东向"。此外,魏文侯还任用西门豹革除邺县的陋俗,兴修水利,发展农业生产。又任用乐羊攻灭中山国。魏国成为战国初期一个强盛的封建国家。　(杨生民)

西门豹治邺

西门豹为邺县县令时,革除陋俗,兴修水利,发展农业生产。

魏国的邺县在今河南省安阳县和河北省临漳县一带,地处魏、赵两国交界处,战略地位较重要,而流经邺地的漳河水又泛滥成灾,使田地荒芜、民不聊生。在这种情况下,魏文侯就派西门豹为邺县县令。西门豹到邺后,问民间疾苦。父老说:苦就苦在为河伯娶妇这件事上,使大家民穷财尽。原来漳河因得不到治理,夏秋两季河水泛滥成灾。地方官三老、廷掾和以服事鬼神为职业的巫祝结合起来,说漳河水灾是"河伯显圣"。只要挑选美女送给"河伯"为妻,就可使水患平息,百姓安宁。这样,他们便借替"河伯"娶妻为名,每年搜刮民财数百万钱,除用二三十万为"河伯"娶妻外,余下的都装进了自己腰包。每逢"河伯"娶妇时,巫婆到处巡视,看见谁家女儿好看,就强

行聘娶作河伯妻子，而后梳洗打扮，选定日子，把少女放在一张床上，推到河里，任其漂浮，沉没河底就是被河伯娶走。许多民众怕自己的女儿被选中，就背井离乡，逃亡外地。西门豹了解了此情况，决心革除陋习，表面上却装得不露声色地说：下次给河伯娶妇，请告诉我，我也去为新妇送行。

到了为河伯娶妇的那一天，西门豹也到河边相会。三老、属官、里父老都去参加，民众前往观看的有二三千人。老巫婆年七十多，身后站着十多个小巫女。仪式即将开始，西门豹下令说：把河伯妇带上来，看长相是否好看。西门豹看后说：长得不好，烦劳巫婆去报告河伯，等选到漂亮的，改日送去。巫婆未及开口，兵丁就把她抬起投入河中。过了会，西门豹又说：这么久了，巫婆还不回来，再派她的徒弟去打听一下。兵丁又把一个小巫婆投进河里。一连把巫婆和她的三个徒弟投入河中，不见回来。西门豹又说：巫婆和她的弟子是女流，说不清楚，劳驾三老(乡官)亲自去一趟吧！又下令把三老投入河中。又等了很长时间，还是不见回来，西门豹又说：巫婆和三老办不了事，请县吏和豪绅派个人去催问一下。这些人大惊失色，叩头求饶，把头都碰破了，血流满地，面如死灰。为河伯娶妇的真相暴露无遗。又等了会儿，西门豹说：起来罢！河伯留客太久，我们回去罢！这件事使邺县地区的吏民非常震动。从此，再无人敢提为河伯娶妇的事了。

为根治邺地水患，西门豹又发动民众开凿了12条水渠，引漳河水灌溉农田。刚开始时，有人认为工程浩大、劳民伤财，不同意动工。西门豹说：现在兴修水利虽给民众增加了负担，百年之后，他们的子孙会感谢给他们带来的好处。一直到汉代，西门豹主持修建的水利工程还发挥着作用，使民众世世代代得到了好处。 (杨生民)

乐羊灭中山国

周威烈王十八年(前408)魏文侯派大将乐羊攻灭中山国的事迹。

中山国在春秋时称“鲜虞”，白狄族的一支。白狄族原居住在陕西和山西北部。大约在春秋初期，白狄族进入太行山以东地区。中山的名称最早见于鲁昭公十二年(前530)。中山国的中心区域大致在太行山东麓保定、石家庄以西的丘陵地区。春秋时期，据记载楚昭王时曾攻灭中山国。不久，中山国又复国。国都在顾(河北定县)。

战国初年，魏文侯改革图强。前408年，魏文侯令吴起攻秦，攻克五城，任吴起为西河守。就在这一年，魏文侯以乐羊为将，使太子伐中山。中山国与魏国之间隔着赵国，所以魏国进攻中山，必须途经赵国。魏向赵国借道，赵计划不许。赵利对赵侯说：魏如果攻下中山，必不能越过赵国而占有中山。所以，用兵是魏国，得到土地的将会是赵国。因此，君王应答应借道给魏国。这次战争从开始到结束，中间经过三年。乐羊的儿子被中山俘虏入城，乐羊围城急，中山国把其子绑在城上示众。乐羊认为：君臣大义，不能因自己的儿子而徇私，所以令士卒攻城更急。中山国烹了乐羊儿子，把汤和首送给乐羊。乐羊哭泣着饮了三杯汤，继续率兵攻城。中山国的使者回城向国王报告了这些情况，国王下令开门投降。

魏国征服中山后，曾派太子击于中山，太子击归国后，又以其弟挚为中山君。乐羊因灭中山国有功，被魏文侯封在灵寿(河北平山县境内)。中山国后来又一次复国，最后于公元前296年为赵国所灭。中山国是战国时少数民族建立的一个“千乘之国”。从1974年以后河北平山县三汲村中山国遗址中发掘出土的铁制生产工具和礼器、生活用具看，其经济发展水平和文化发展水平与华夏诸国相似，尤其与魏、赵两国近似。 (杨生民)

楚国吴起变法

楚悼王时，吴起在楚国变法的事迹。

吴起，卫国(河南濮阳一带)人，约生于前440年，卒于前381年，出身于“家累千金”的富有家庭。青年时，为在政治上求发展，四处奔走，挥霍了家产，未取得一官半职，为人所讥笑，气愤之下，杀30余人，从卫国逃亡。临行时，对母亲说：不当卿相，决不回卫。吴起从卫国至鲁国，拜在孔门弟子曾参之子曾申门下求学，因母去世未归，曾申认为他不孝，与他断绝师生关系。从此，吴起改学兵法。前410年，齐国进攻鲁国，鲁穆公用他为将，虽打败齐军，显示了军事才干，但因鲁穆公听信谗言，最后还是谢辞了他。吴起又到魏国，被魏国大夫翟璜推荐给魏文侯。文侯用吴起为将攻秦，连克五城，夺取了河西之地(陕西大荔以东地区)。魏文侯认为吴起善于用兵，廉洁公平，深得民心，在前406年，任命他为西河守。吴起在西河做地方行政长官二十余年，实行了一系列改革，使“秦兵不敢东向，韩、赵宾从”。魏文侯死后，魏武侯继位。武侯在游西河时，认为凭着这里的“河山之险”，可使边防永固，侍臣王错极力附和，并说过去晋国所以能成就霸业的原因就在于此。吴起力陈国家

能否强盛的决定因素在政治好坏而非地形，即所谓“在德不在险”。并举例说，三苗、夏桀、殷纣所处地形都很险要，为什么灭亡呢？关键是政治不好。魏武侯称赞他的话是“圣人”之言。虽然如此，但因魏武侯的一些近臣忌恨吴起，武侯对他也不信任，吴起辞去。

吴起离魏往楚。这时楚国政治腐败，前407年当政的楚声王残暴，激起人民强烈不满，前402年声王被民众杀死，儿子熊疑继位，是为楚悼王。在此前后，楚国一直受三晋威胁。前404年和前391年，三晋两次进攻楚国，楚国都被打败，第二次因楚向秦送了厚礼，秦从中调解双方才算讲和。此时，楚国内旧贵族专横腐败，“上逼主”、“下虐民”。韩非认为楚国的问题在于“大臣太重，封君太众”。楚悼王即位力图变法图强。这时吴起到了楚国。楚悼王听说吴起贤能，先任命他为苑地（河南南阳地区）守，后又任命为楚令尹。在楚悼王支持下，吴起实行变法，主要内容有：

一、限制压抑旧贵族，集权国君：凡是封君（世袭贵族）已经传了三代的，都取消爵禄，子孙不再继承。公族（王室宗族成员）出五辈的，取消特权、俸禄，迁到边远地区“实广虚之地”。他们原有的封土，由国家收回。这就打击了旧贵族，加强了王权。

二、整顿政治机构：凡是无能、无用和不必要的官员一律裁减，即所谓“罢无能，废无用，损不急之官”。

三、节省费用，整顿财政，奖励军功：吴起把裁减旧贵族的爵禄节省下来的钱，用来抚养战士。吴起提出“厉甲兵以时争于天下”，就是要建立一支强大的军队，由国君指挥，以与各国争雄。

四、建设国都，加强国都防卫：吴起把楚国国都城墙由简陋的两板加高到四板（约今二丈二尺），以增强国都的防卫能力。

吴起的改革使楚国出现了新气象。公元前381年，赵国遭魏国进攻而求救于楚，楚派兵攻魏，打败魏军，一直打到黄河，使各诸侯国震惊。楚国还北并陈蔡，南平百越，西伐秦，成了南方的强国。前381年，楚悼王病死，旧贵族趁机作乱，围攻吴起，吴起跑进灵堂伏在王尸上，进攻吴起的人因射、刺吴起而伤害王尸。太子楚肃王即位。按楚国法律，伤了王尸，要“尽加重罪，逮三族”，70余家旧贵族因此灭族。有的旧贵族则逃亡出国。吴起的新法也被废除。

吴起是战国初期杰出的军事家、政治家。作为军事家，吴起与孙武齐名。吴起作的兵法，也与《孔子兵法》齐各。作为政治家，吴起在战国初魏国的改革与楚国的变法中，都做出了杰出的贡献。（杨生民）

威王治齐

战国中期，齐威王励精图治，整顿吏治，虚心纳谏，使齐国强盛。

齐威王（？—前343），名因齐，田和之孙，田齐桓公午之子，前378年即位为齐侯，后称齐王。威王即位，九年不理国事，政事由卿大夫处理。在这九年中，韩、赵、魏、鲁、卫各国不断攻齐，齐国被打败，土地被割去，呈现“诸侯并伐，国人不治”的局面。威王对此置之不问，大臣都很着急。齐威王爱听音乐，邹忌就通过鼓琴进谏。邹忌见了威王，借弹琴比喻治国，使威王十分感动，三月后任邹忌为相，下决心励精图治。齐威王时铸造过一个铜器，上有79个字的铭文，铭文说的意思是：他要继承、发扬他父亲桓公午的业绩，学习远祖黄帝，继承齐桓公、晋文公的霸业，号令诸侯。在邹忌的辅佐下，他主要进行了以下几方面的改革：

一、明法申令、整顿吏治：齐威王任邹忌为相后，采取的一个重要措施是明法申令、整顿吏治，提“谨修法而督奸吏”，赏罚分明，任用贤才。威王对两个典型，进行了认真处理。一个是即墨（山东平度东南）大夫，及时处理政务，使荒地垦辟，赋税增加，因为人正直，不送礼行贿结交威王近臣，而被诋毁。另一个是阿（山东阳谷东北）大夫，治理地区田地荒芜，仓库空虚，防务废弛，因经常给威王近臣送礼行贿，而被称颂。威王了解真情后，便把两人召回，当众宣布即墨大夫功绩，赏给一万户的租税作俸禄。又指出阿大夫玩忽职守等罪行，下令把阿大夫和受他贿赂的几个官吏烹杀。上下为之震动，齐国大治。齐威王注意发现和任用人才。有次，齐威王与魏惠王会见，魏惠王说：魏国虽小，但有十几枚光照几十丈的寸珠，齐国这样的万乘之国怎么无宝呢?齐威王回答说，他以人才为宝，派檀子守南城，楚国不敢侵扰。他派肦子守高唐，赵国不敢东进。他派黔夫守徐州，燕、赵都感到害怕，七千多家来归附齐国。他令种首治理盗贼，使道不拾遗。这些贤臣可以光照千里，十枚寸珠怎能与之相比呢？魏惠王听后，十分惭愧。

二、广开言路，善于纳谏：邹忌规劝齐威王要善于听取不同意见。他以自己为例讲了一个故事。邹忌一表人材，是个美男子。他先后问妻、妾和朋友，他与徐公谁长得美，都说他长得美。徐公来后，他仔细打量，感到自己远不如徐公美。那么，为什么妻、妾、朋友都说自己美呢？他领悟到：妻子说他美是偏向他，妾说他美是惧怕他，朋友说他美是有求于他。由此他

说：大王做一国之君，宫中妇人没有不偏爱大王的，臣下没有不怕大王的，四境之内没有不有求于大王的，所以大王就听不到自己的过失了。威王表示赞同，下令说：臣下吏民当面指出我的过失的给上等奖，用书面进言的给中等奖，能在众人面前讲我的过失的给下等奖。命令下达后，前来进言的，门庭若市。几个月后，还常有人提建议。一年之后，虽还有人想提建议，但已无什么可说。齐国因此政治清明。燕、赵、韩、魏知道后，都向齐国朝贺。

齐威王在邹忌辅佐之下，使齐国大治，不仅打退了赵、卫的侵袭，还迫使赵国归还了从齐国夺走的侵地长城。三晋中最强大的魏国，也多次被齐国打败。有次把魏惠王围在浊泽，魏惠王只好献观地求和。尤其值得注意的是，齐威王任用田忌和孙膑训练出一支强大的军队，在有名的桂陵之战和马陵之战中两次大败魏军，使齐国成了当时诸侯国中最强大的国家。（杨生民）

齐魏桂陵之战

周显王十六年（前353）齐军采用孙膑“围魏救赵”的战法，在桂陵（今河南长垣西南）大败魏军。

战国初，魏国强盛，独霸中原。魏文侯改革后，魏国西攻秦、南伐楚、东伐齐，都取得了胜利。前356年，齐威王在齐实行改革后，齐国强大，成为魏国的有力竞争者。桂陵之战就是在这种背景下发生的。桂陵之战一般认为发生于齐威王四年（前353年），战争爆发原因是赵国向卫国进攻，迫卫从属于赵。然而，卫国原从属于魏，魏国不允。于是，魏国起兵伐赵，包围赵国国都邯郸（河北邯郸西南）。赵国君赵成侯派使者求救于齐。齐威王召集群臣商议对策，邹忌主张不出兵救赵，军事将领段干朋认为不救会失信于赵，对齐也不利，并提出先联合宋、卫等国围攻魏国的襄陵（河南睢县西），牵制魏军，等魏赵两国精疲力竭时，再出动大军救赵。齐威王采纳了这一意见，让宋、卫攻襄陵，楚国也出兵攻魏。第二年魏攻破赵都邯郸。这时，威王认为时机成熟，打算派孙膑为主将，率兵救赵。孙膑认为自己是受过刑的残废人，不可为主将。齐威王就让田忌为主将，孙膑为军师，兴兵救赵。

孙膑，大军事家孙武后裔，青年时曾和庞涓同师学习兵法。后庞涓为魏惠王将军，自知才干不如孙膑，派人请孙膑至魏，出于嫉妒，用刑割断孙膑两膝并在脸上刺字（黥刑），企图让孙膑永远无法出头。不久，齐使至魏都大梁（河南开封），孙膑暗中会见齐使。齐使发现他是个人才，暗里把他载回齐国。齐将田忌赏识孙膑，以客礼相待。田忌常跟齐威王及诸公子赛马，下大赌注。孙膑观察到马分上、中、下三等，便对田忌说：赌注再下大些，有办法取胜。于是田忌下了“千金”的赌注。临比赛时，孙膑说：用你的下等马与他们的上等马比赛，用上等马与中等马、中等马与下等马比赛。赛三场，田忌输一场，胜两场，赢了齐威王千金。其后，田忌把孙膑介绍给威王。威王以孙膑为师，常常向他请教兵法。

这次齐军救赵，率士卒8万。田忌打算直趋邯郸进攻魏军。孙膑却说：要解乱丝，不能强拉硬扯；要调解别人打架，不能参加去打。这次救赵也应如此，避实击虚，敌人有后顾之忧，自己会解围而去。现在魏攻赵，精兵必然在外，留在国内的是老弱残兵，将军如能统大军向魏都大梁进攻，魏军必然回军自救，我军一举解了赵围，又使魏军疲于奔命。田忌依计而行，率军攻大梁，魏军果然从邯郸回救，进至桂陵（河南长垣西南）时与早已等候的齐军相遇。齐军以逸待劳，大破魏军，同时由于西方秦军也在攻魏，魏国只得放弃邯郸。孙膑在这次战争中使用的“围魏救赵”的战法为后世兵家所研究和运用。这就是有名的桂陵之战。（杨生民）

商鞅变法

秦孝公时，商鞅在秦变法，秦国由此富强。

商鞅（约前390—前338），卫国人，破落贵族出身，姓公孙，名鞅，祖上姬姓。因佐秦孝公变法有功，被封于商，所以称商鞅，也称商君。商鞅从小爱好“刑名之学”，曾在魏惠王相国公叔痤门下做中庶子。公叔痤知卫鞅有才干，临死前，把他推荐给魏惠王，要惠王用之为相，委以国政。公叔痤死后，魏惠王未重用卫鞅。卫鞅听说秦孝公求贤，就到了秦国。

战国中期以前的秦国，发展迟缓，旧贵族势力强大，国家贫弱。诸侯侵欺秦国，魏文侯占领秦河西大片地方，楚国攻占秦汉中之地。前384年，秦献公即位，进行了一些改革，废除了殉葬制度，制定了五家为伍的户籍制度，建立了直属中央的四个县，前378年又“初行为市”促进商品交换发展。秦献公还把国都从雍（陕西凤翔）迁至栎阳（陕西临潼），以便向东发展。前361年，秦献公死，其子渠梁即位，就是秦孝公。秦孝公深感“诸侯卑秦，丑莫大焉”，决心变法图强。他下的《求贤令》说：谁能出奇计，使秦国强大，就给他高官做，分封给土地。卫鞅就在这时到了秦国。

卫鞅到秦国，住在孝公宠臣景监家里，通过景监

与秦孝公三次相见。前两次卫鞅劝孝公效法尧舜禹汤，行帝王之道，孝公听的直打瞌睡。事后孝公对景监说：你介绍来的客人太迂腐，我无法用他。景监告诉卫鞅，孝公对他不满意。卫鞅要求再次与孝公谈话。这次卫鞅向孝公大讲法家富国强兵之术，孝公越听越爱听，一连谈了好几天。最后，孝公决定重用商鞅，实行变法。然而，遭到一些大臣坚决反对。有次孝公征询大臣对变法的意见，辩论激烈。会上，卫鞅说："苟可以强国，不法其故；苟可以利民，不循其礼"，并说"疑事无功"，请孝公早下决心变法。甘龙反驳说：圣人不易民而教，智者不变法而治。杜挚也反驳说：利益不到百倍，不能变法；功效不超过十倍，不改换器用。效法古代，没有过失；因循旧礼，不会出偏差。卫鞅反驳二人说：前世不同教，何古之法？帝王不相复，何礼之循？商汤王、周武王没有循古制而称王，殷纣王、夏桀王没有改变旧法而亡国。秦孝公称赞卫鞅讲得好，任他为左庶长，实行变法。为取信于民，在法令公布前，搞了一次"南门徙木"。商鞅派人在栎阳城南门放了一根三丈长的木杆，申令谁能把木杆徙至北门，赏十金，人们疑惑不敢徙，又改为赏五十金。一人徙了木杆，立即如数给赏，以示法令如山，说一不二。

前356年，第一次下变法令，主要有以下几点：一、编定户籍，实行连坐：把居民按五家为伍、十家为什编为户籍。各民户之间互相监督，一家犯法，别家不告发，则十家同罪连坐，不告发的人腰斩，告发的人同前线斩敌者一样受赏。藏匿坏人的与在前线降敌者一样受罚。二、奖励军功、严禁私斗：为国家立有军功的，按功劳大小授予爵位和田宅。私斗者按情节轻重服不同刑罚。三、打击旧贵族、废除世卿世禄制：新法规定，宗室（国君的同宗）没有军功，不能列入宗世属籍，不能享受宗世特权。只能根据对国家功劳大小，确定爵位、田宅、奴婢和器用，不许逾制。这就严重打击了旧贵族。四、鼓励个体小农经济，发展农业生产：一家有两个以上成年男劳力必须分家，各立户头，否则加倍出赋役。努力从事农业，生产粮食和布帛多的免除劳役和赋税；经营工商业和因懒惰而贫困的，罚全家为官奴婢。新法公布后，秦国的民众到国都议论新法差错的有上千人，而且太子带头犯法。商鞅认为：新法所以贯彻困难，主要是因为上层大贵族不遵守。于是，决定依法处理太子，但太子是国君的继承者，不能施刑。于是"刑其傅公子虔，黥（脸上刺字）其师公子贾"。此后，没人敢不遵守新法。新法推行了10年，秦国的民众十分高兴，出现了道不拾遗、山无盗贼、家给人足的新气象。老百姓个个都"勇于公战，怯于私斗"，城乡都得到了治理。商鞅变法有功，爵位从左庶长升为大良造。

前350年，秦国又把都城迁到咸阳，同时第二次下达变法法令，主要内容有以下几点：一、在全国建立县制：合并原来的小乡邑，全国统一划为31县。县设令、丞，由国君任免。二、开阡陌封疆、废井田、民得买卖：这是把井田制的纵、横疆界打破，鼓励开垦荒地，土地可以买卖，按耕地多少征收赋税。这就以法律形式废除了旧的土地制度，承认了土地私有制。三、平斗桶、权衡、丈尺，统一度量衡：这方便了税收和交换。商鞅时的度量衡，保存到现在的有"商鞅尺"、"商鞅量"。1966年，上海博物馆还征集到一件商鞅方升。这些文物，是商鞅为统一度量衡做的标准量器。这些法令推行了四年，公子虔又犯法，被割鼻。

商鞅变法后，秦国开始富强。对外方面，首先向邻近的魏国开始进攻。前354年，夺取了魏的少梁（陕西韩城）。前352年，商鞅率兵围安邑（山西夏县）。又过了两年，商鞅俘虏了魏将公子卬，战胜了魏军。因为商鞅变法功劳大，封于商，给十五邑，号称商君，也称商鞅。但商鞅变法打击了旧贵族，这些人对商鞅十分痛恨。前338年秦孝公死，太子即位，他们诬告商鞅谋反，商鞅想逃往他国，半途被抓回，被车裂而死。虽然如此，因新法已在秦国推行无法废止，所以说变法取得了成功。商鞅变法使秦国从落后国家变为强国，为以后秦国的发展和统一全国奠定了基础。所以说，商鞅是战国时新兴地主阶级的杰出政治家。　　（杨生民）

齐魏马陵之战

周显王二十八年（前341），齐军在马陵（河北大名东南）大破魏军，迫使魏主将庞涓自杀。

前342年，魏国联赵攻韩。韩国危急，向齐求救。前341年，齐宣王派田忌为大将，田婴为副将，孙膑为军师，率兵5万救韩。这次，齐军又采用"围魏救赵"的战法，向魏国国都大梁进军。魏惠王原来派太子申和庞涓为将，带10万大军攻韩，闻齐军攻入魏国，立即回师迎击齐军。在军力对比上，魏军比齐军多一倍。知魏军前来迎击，齐军向齐国境内撤退，魏军从后追击。孙膑对田忌说：三晋军队向来强悍勇敢而轻视齐国，齐国被视为胆怯，善用兵者就要利用这种情况，诱敌中计。兵法上说：追击敌百里以上急于争利会使上将受挫；五十里以上也只有一半军队能够赶上。我军已入魏境，可用减灶之计迷惑敌人。田

忌采用了孙膑的意见。庞涓率齐军从后追击，第一天追到齐军扎营的地方发现齐军做饭的灶够10万军队吃饭之用，第二天的灶够5万人吃饭之用，第三天的灶只够3万人吃饭之用。庞涓高兴地说：我早知齐军胆怯，进入魏国境内三天，士卒逃亡已经过半。于是，丢下步兵，率领部分精锐，一天走两天路程，一直追到马陵。马陵地势险要，道路狭窄，两旁是山。孙膑计算庞涓行程，傍晚可以到达马陵。于是让善射军卒埋伏在马陵道两旁，砍掉一棵大树，上写：庞涓死于此树之下。并告诉军卒：晚上树下有人以举火为号，万箭齐发。庞涓果然中计，傍晚来到大树下，举火观看时，齐军万箭俱发，魏军溃散。庞涓自知兵败，拔剑自杀，临死时说：想不到让孙膑这小子成了名！齐军乘胜歼灭了魏军，俘虏了魏太子申。此后，孙膑名满天下。

马陵之战，魏军惨败。从此魏国衰落，丧失了魏文侯以来的霸主地位。齐国代替魏国成了当时最强大的国家。（杨生民）

申不害“修术行道”

韩昭侯任用申不害“修术行道”，使韩一度兴盛。

韩国远祖，姬姓，后裔服侍晋国，封于韩原（今陕西韩城南），以封地为姓，故姓韩。晋景公时，韩厥为晋六卿之一，称韩献子。前403年，韩、赵、魏被周天子列为诸侯，当时韩国国君韩景侯叫韩虔。韩景侯的六世孙就是韩昭侯。

韩昭侯前358至前333年执政。前359年韩懿侯死，子昭侯立。前358年为昭侯元年，其时韩国衰弱。韩国地处晋国南部，西与秦为邻，北和东北与魏接壤，南与楚交界，恰好夹在大国中间。前391年，秦攻韩宜阳，夺取六座城池。魏国也不断向韩进攻。另外，韩国存在着“晋之故法未息，而韩之新法又生；先君之令未收，而后君之令又下”的混乱现象。为改变这种内忧外患的局面，韩昭侯八年（前351），任用申不害为相。申不害郑国京（河南荥阳）人，出身较低下，为相14年后，于前337年卒。申不害主张法、术结合。所谓法就是法治，术则是贯彻法的手段或方式。他“本于黄老而主刑名”，但又侧重于术。申不害在韩国的改革主要有以下几点：一、建立“循功劳、视次第”的按功行赏制度。二、国君平时无为，使臣下揣摩不到自己的意图，决策时则要“独断”，让臣下只能按国君决定行事，君主则“静观”考察臣下。这叫“无为”之术。三、任用官吏要称职，不许越职办事，要经常监督、考核。四、用出其不意的办法慑服臣下。有次韩昭侯听使者说南门外有小黄牛吃禾苗，立即下令官员检查牛马践踏禾苗的情况，否则要治重罪。官员们上报后，没有上面使者谈到的那件事。韩昭侯说，没把情况全报上来，重新调查后，才发现使者说的那一情况。臣下以为韩昭侯能明察一切，就都小心谨慎不敢怠慢。五、国君操生杀大权。在申不害为相的14年间，韩国加强了中央集权，政局比较稳定，国力一度强盛，出现了“国治兵强，无侵韩者”的局面。但由于韩国没有统一法律，韩昭侯、申不害的改革也未抓住主要问题，所以韩昭侯一死，韩国又陷入混乱。

（杨生民）

燕王哙禅让

周慎靓王元年（前316），燕王哙为改革把君位禅让给相国子之的事迹。

燕国，原是西周召公奭的封国。战国时，各国变法图强，燕国迟迟不改革。燕弱，招致邻国进攻。前333年，燕文公死，其子易王即位，齐国趁机攻燕，占十城。易王之子燕王哙当政时（前320—前316），力图改革图强，对相国子之很器重。这时，苏代为齐使燕国。燕王哙问苏代，齐宣王怎么样？苏代回答说：称不了霸。燕王哙又问：为什么？苏代回答：对大臣不信任。苏代和子之是好朋友，这样回答是想让燕王哙更加重用子之。燕王哙果然对子之更加信任。子之为报答苏代，送给他百金。这时有人对燕王哙说：不如把王位让给子之。人们称颂尧贤德，就是因为他把天下让给了别人。现在大王能把国家政权让给子之，不就与尧同名了吗？燕王哙听了他的话，就把王位让给了子之。又有人对燕王哙说：禹虽推举益接他的位，但官吏都是他儿子启的人。禹年老后虽认为启不能管天下，传位给益。启和他的党徒攻益，却夺走了王位。今天大王虽让位给子之，但国家官吏都是太子的人。名义上是让位给子之，实际上仍是太子专权。燕王听后果然收俸禄三百石以上官吏的印给了子之。子之做了真正的国王，燕王哙因年老不管政事，甘愿为臣，国家大事都决定于子之。

3年后，国家大乱，人心惶惶。将军市被和太子平谋划进攻子之。齐国的大臣劝齐宣王说，如趁机攻燕，必会获胜。齐王因此派人对燕太子平说：我听说太子要整顿朝政，摆正君臣、父子的位置，齐国虽小，愿听从太子的命令。太子没有听齐国的话，齐王想借太子平进攻燕国的打算落空。太子平聚集自己的党羽，命将军市被攻子之，不克。将军市被及百姓又反过来攻太子平，市被被杀，燕国大乱，12个月中死了

几万人。这时，孟轲对齐宣王说：现在伐燕，是成就周文王、周武王事业的好时机，不可坐失良机。前314年，齐王令章子率临淄等五都的兵力和齐国北部的壮丁攻打燕国。燕国处在混乱之中，齐军未遇到什么抵抗，就攻进燕国国都，占领了燕国大片土地，杀了燕王哙，捉住子之后剁成肉酱，齐军大胜。齐军占领燕国的第三年即前312年，在燕国民众的群起反抗下，齐军被迫撤出燕国。这一年，燕人立太子平为王，是为燕昭王。燕昭王即位后决心复兴燕国，报仇雪恨，于是整顿内政，招贤纳士，与百姓共甘苦，后来就任命乐毅为大将，与秦、楚、三晋合谋伐齐。

（杨生民）

诸侯国先后称王

战国中期，魏、齐、韩、赵、燕、中山、秦等国先后称王。

平王东迁，周朝衰微。春秋初期，楚国首先称王。战国中期后，其他诸侯国也相继称王。战国时，最早称王的是魏国。魏惠王时，魏仍是各国中最强大的国家，一度攻陷赵都邯郸，要伐秦。商鞅对秦孝公说让他去见魏王，他有计败魏。商鞅见到魏王说，图王业不能只让宋、卫、邹、鲁这些小国听从，要伐齐、楚、燕、赵。劝魏王行王服，伐齐、楚。听了商鞅的话，魏惠王就建王宫、造王车、穿王衣，称夏王。前344年，魏率领12个诸侯国朝见周天子，发起、主持了在逢泽（河南开封东南）的诸侯盟会，秦派公子少官参加。在这次盟会上，魏国称王，引起各国反对。齐、楚两国为此十分愤怒，诸侯都附和齐、楚两国。魏毕竟是强国，虽遭各国反对，仍称王，各国也无可奈何。商鞅怂恿魏称王就是要把各国攻击目标引向魏国，解除魏国对秦的威胁。魏国果然中计。

经桂陵之战、马陵之战，魏大为削弱。魏王要报仇，想和齐国决战。惠施对他说：如今国家弱，没有力量，不能决战。不如变服（不穿王服）表示屈节朝见齐君，让齐称王，楚王必然会迁怒齐君，魏王感到这个办法好。前334年，魏王约请齐王在齐国徐州（山东滕县东南）相会，这是有名的魏齐“会徐州相王”，即魏王和齐王互相承认为王。魏已称王，实际上是魏国承认齐国为王。魏王变服折节，对齐委曲求全，说明当时齐国力量的强大。惠施用称王作诱饵，让别国反对齐国称王。果然，齐国称王引起了楚国的反对。前333年，楚威王亲自统兵攻徐州，打败了齐将申缚。

魏齐徐州相王后的第九年，前325年，秦、韩两国也相继称王。除楚国外，魏、齐、秦几个力量强大的国家都已称王。韩国因经过韩昭侯、申不害治理，国力比赵、燕强，所以比燕、赵先称王。又过了两年，前323年，秦国派张仪和齐、楚两国大臣在啮桑（江苏沛县西南）相会。魏国公孙衍为对抗秦、齐、楚的联合，发起“五国相王”。五国是韩、赵、魏、燕、中山。“五国相王”就是参加的五国互相承认称王。这样，赵、燕、中山从这年起也称了王。魏国发起“五国相王”，是为用这种办法组织联合阵线。燕国虽大，但力量小，中山是小国别国看不起，这时也利用“五国相王”的机会称了王。当时称王，要有实力做后盾。实力不够，要靠大国扶植，不然无法称王。齐反对中山称王，齐国说：同中山并称王，是莫大的侮辱，愿和大国一起伐中山，不许它称王。中山王害怕，与大臣张登商量了一个办法，让张登带重金拜见齐国权臣田婴，田婴答应让中山称王。张登又对赵、魏说，齐国本来反对中山称王，现在又许中山称王，是因齐国想用中山的军队攻魏的河东。这样，赵、魏对齐愈加反感，就更加支持中山称王。齐国还对中山“闭关不通”，说中山是小国，不配称王。齐国还打算割平邑地方给燕、赵，联合燕、赵，攻中山。燕、赵则认为，这是齐国离间燕、赵与中山关系，把中山纳入自己的势力范围，于是燕、赵坚决支持中山称王。中山国在魏、赵、燕的支持下，经过和齐国的斗争，终于称王。前322年，战国时的七个大国，除了楚国春秋时已称王外，其余六国也都称王。前318年，宋国也自立为王。这就是说除七个强国称王外，中山、宋这样的小国也称了王。

称王是战国时期的重要事件，以前是周天子才能称王，现在诸侯争着称王，说明他们眼中没有周天子，同时称王也表示要高于而决不低于别的诸侯国。魏、齐“会徐州相王”后，这两大国就以两大霸主自居。现在，各大国都称了王，随之而来的是更加激烈的兼并战争。　（杨生民）

秦并巴、蜀

秦灭巴、蜀两国，使国力大为增强。

巴、蜀是今四川境内的古代的两个国家。巴国约在四川东部长江南北两岸，北到剑阁，西边沿嘉陵江流域阆中、南充等地与蜀交界，东边与楚接壤。蜀国在今四川中部岷江、沱江、涪江流域，西、南与巴国交界，北到今甘肃文县一带与秦接壤。巴、蜀地区气候温暖，矿、畜、农产品丰富。巴、蜀两国原是周朝属国。周朝衰落后，蜀国称王，传12世，前316年，被秦灭。战国时，巴国也称王，曾在江州（重庆）、平都（丰都）、阆中定过都。前316年，为秦所灭。

春秋战国，巴与楚关系密切，是楚的附属国，曾与楚联姻，楚曾出兵帮助巴平定内乱。蜀在春秋时曾攻秦，“至雍”(陕西凤翔县)。有时巴奉秦为盟主，向秦纳贡。蜀与巴两国关系不好。蜀王封其弟于汉中，称苴侯。苴侯与巴国国王关系好，蜀王为此发兵攻苴侯，苴侯逃到巴，并向秦求援。秦惠文王想趁机伐蜀，恰巧这时韩国攻秦。秦王对是伐蜀，还是伐韩，犹豫不决，于是召群臣商议。会上，张仪主张伐韩，说：进兵韩国三川郡，攻新城(河南密县)、宜阳(河南宜阳)，兵临东、西周，可造成挟天子以令天下的形势，诸侯谁敢不听，这是帝王之业。不争此，而争偏远的巴蜀戎狄，离帝王之业就远了。司马错反驳张仪说：今秦地狭民贫，蜀是西边戎狄首领，现有内乱，秦趁机出兵，容易征服。得到巴蜀地方，秦土地扩大；得到巴蜀财富，秦军民富裕。攻取巴蜀，天下并不认为秦国贪暴。现在攻韩，劫周天子，则有不义之名。两国联合，向齐赵楚魏求援，秦无法阻止。因此，伐周、韩，对秦有危险，不如伐蜀有利。前316年，秦王派司马错领兵伐蜀，在葭萌(四川剑阁东北)打败蜀军，蜀王败走武阳，为秦军所杀。司马错又率军攻占了巴国，并在同年设郡。前314年，秦王封儿子通国为蜀侯，以陈壮为相。前311年，秦置蜀郡。后陈壮反秦，杀蜀侯通国，秦派甘茂等入蜀杀陈壮，稳定了秦对巴蜀的统治。

秦攻占巴蜀，增强了秦国的实力，而占据长江上游后，对付处于下游的楚国，在军事上又极为有利。所以，秦占领巴蜀对以后的发展和强大都起了重要作用。　　（杨生民）

赵武灵王胡服骑射

战国中后期，赵武灵王在赵国进行的军事改革。

赵国的远祖与秦同。春秋时，赵国先人赵衰辅佐晋文公成就霸业，此后世代执掌着晋国国政。春秋末年，赵氏在封邑中曾实行田制和军事方面的改革。前403年周天子册封韩、赵、魏三家为诸侯。赵国的第一个国君是赵列侯赵籍。他曾改革吏治，实行“任官使能”，又改革财政“节财俭用”。赵武灵王是赵国的第六位国君。他在位时实行的“胡服骑射”是战国时一次著名的军事改革。

赵国东北与东胡和燕国为邻，东与中山、齐接壤，北面与林胡、楼烦两部落相连，南和西方与魏、韩、秦交界。赵国当时是个二、三流国家，常受强国欺凌。魏、齐、秦国都打败过赵国。秦国还占领了赵国几座城池。北方和东方的胡人部落也常对赵国进行小规模的掠夺战争。胡人作战时，身穿短衣，骑马射箭，战斗力很强。而赵国军队，主要是步兵、车兵，穿宽大的服装、笨重的盔甲，行动很不方便。赵武灵王即位后，为使赵国强大起来，决心进行军事改革，实行“胡服骑射”。赵武灵王想把赵人穿的宽大的服装改为胡人穿的小袖的短褂，腰里系根皮带，脚上穿双皮靴，这就是胡服。他还想建立一支强大的骑兵，在马上骑马射箭，这就是骑射。前307年赵武灵王找大臣楼缓商议说：先祖的功业还未完成。现在中山在我腹心，北有燕，西有林胡、楼烦、秦、韩，没有强兵，就不能生存。我想改穿胡服，建立一支强大的骑兵。楼缓说：这是个好办法，就是许多大臣都想不通。他又找大臣肥义说：我想让百姓胡服骑射，而这将会受到世俗的非议，你看怎么办好。肥义回答说：我听说疑事无功，疑行无名。如果要改变旧制，就不能顾虑旧习惯势力的非议。自古风俗习惯就是可以改变的。从前舜曾向苗部落学习跳舞，禹也向倮部落学习过舞蹈。所以，大王不要有什么疑虑。这一席话更加坚定了赵武灵王改革的决心，于是自己首先胡服。

这一改革在贵族中阻力很大。赵武灵王决定胡服后，派人告诉他的叔父公子成，请他胡服。公子成说，中原自古以来的礼、教、习俗不好改变，并以自己有病为名拒绝胡服。赵武灵王到公子成家说：服装为便用，礼义为便事，不是一成不变。所以，地方不同，服装不同；事情不同，礼就变易。因此，只要对国有利，圣人就用不同的礼。我们国家，东有河而无舟船，西北边境没有善骑射的军队防守。因此，要建造舟船，要变服骑射，建立强大的军队。从前中山国凭借齐国的力量，侵占我国的地方，欺凌我国民众，先王感到耻辱，至今也没能报仇雪耻。现在胡服骑射，就是为了使国家强大，叔父顺从原有的习俗，但却违背先君简子、襄子的意愿，也辜负了我对叔父的期望。公子成听赵王讲的有理，心悦诚服，表示愿意胡服，第二天就穿胡服上朝。此后，正式在全国下达胡服的命令。王族公子赵文、赵俊和大臣周绍等人也反对胡服，并谏止赵王不要胡服。赵武灵王反驳他们说：古代的习俗不同，有什么古法可依？古代帝王的礼都在变化，有什么古礼可循？夏、商、周三代都依据时代不同而制法，按照不同的事而制礼。礼制、法令都因时而异，衣服器械各便其用。圣贤的君主，不因袭前代能成就王业。昏庸的君主，不变易先王的礼也难免灭亡。赵文等人无理反对，也同意胡服。王族的赵燕迟迟不胡服，赵王命令他说：我已胡服，你不胡服，有意违抗。你犯了大罪，小心我严惩你，以示天下执法之

严。赵燕非常害怕，一再谢罪，表示第二天胡服。由于王族、大臣们穿起了胡服，老百姓也很快胡服。

同时，赵武灵王训练士卒，教士兵骑马射箭，组成了一支强大的骑兵队伍。这使赵国军事上很快强大。前306年赵国攻取胡地至榆中（内蒙古鄂尔多斯黄河北岸），“辟地千里”，林胡王献马于赵。这一年，赵国还攻略中山的土地。前305年，赵武灵王亲统三路大军攻中山，攻取丹丘、华阳、鸱、鄗、石邑、封龙等地，中山献四邑求和。前300年，又攻中山，扩地北至燕、代，西至云中、九原。前296年，赵国灭中山，迁中山王到肤施（陕西绥德县东南）。这使赵国国力大大增强。齐国衰落后，能与秦抗衡的就是赵国了。早于前299年，赵武灵王立幼子何为王，是为赵惠文王。肥义为相国，灵王自称主父。他想让儿子治国，自己带兵攻略胡地，后再从云中、九原南下攻秦。他曾化装为使者入秦，见秦昭王。主父入秦，是为察看秦国的地形和了解秦国的情况。前295年，赵国发生了争夺王位的斗争，主父的大儿子公子章对其弟公子何当赵王不满，发动政变，失败。在这次事变中，主父也被围困沙丘宫，三个多月未吃饭，饿死。

赵武灵王是战国中后期的杰出军事家、政治家。他的改革使赵国迅速强大。他学习游牧民族建立骑兵在中国历史上是首创。后来汉朝在与匈奴战争中骑兵起了很大作用。这说明赵武灵王改革对后世有积极的影响。　（杨生民）

秦蚕食三晋称西帝

战国中期以后，秦通过蚕食三晋国力进一步强大，一度称西帝。

战国中期以后魏国衰落，秦在商鞅变法后国力强大，像蚕食桑叶一样蚕食三晋。商鞅曾对秦孝公说：魏据黄河天险，独揽山东之利，又占安邑一带山岭险峻之地，有利可图时西攻秦，攻秦无利则向东发展，这对秦很不利。因此，秦应乘魏败于齐之机，伐魏，向东制服诸侯，可成帝王之业。秦孝公赞成他的主张，派他伐魏。前340年，商鞅率兵伐魏，捎信给领兵抵抗他的魏将公子卬，要求会盟罢兵。公子卬信以为真，去会盟，被伏兵生擒。然后，商鞅派军进攻，大破魏军。秦惠文王八年（前330），秦派大良造公孙衍（犀首）在雕阴（陕西甘泉南），又大败魏军，俘魏将龙贾，迫使魏把西河之地献秦。前329年，秦又攻魏，取河东汾阴（山西万荣西南）、皮氏（山西河津西）、曲沃（山西曲沃）等地。次年，秦又攻占魏的蒲阳（山西隰县），迫魏献上郡15县（陕西东北部）给秦。至此，黄河西部和东岸的重要地区为秦有，对秦攻取三晋黄河以东地区极为有利，秦国威震山东各国。前314年，秦又趁齐攻燕之机，攻取魏的焦（河南三门峡市西）、曲沃（这两地曾被秦攻占，后还魏），又攻韩之岸门（河南许昌西北），大破韩军，迫使韩派太子仓做人质求和。前313年，魏按秦的要求立公子政为太子。这年，秦又攻占赵的蔺（山西离石西），俘赵将赵庄。

秦在取得一系列胜利之后，以主力出函谷关攻韩。秦武王说，秦要“进窥周室”。韩国重镇宜阳（河南宜阳）是秦灭周的必经之地，储备物资多，战略地位重要，韩国10万精兵在此守卫。前308年，秦派甘茂攻宜阳，五月不克。冯章对秦武王说：不攻克宜阳，韩、楚乘我疲惫，国家危险。秦武王为此很着急，因秦军死伤很重，甘茂又想撤退。有人对他说：国内樗里疾、公孙衍反对你，国外也有人反对你，今天如果失败，你也危险了，如攻克宜阳，你的功就大了。甘茂表示：他要决一死战，准备死在宜阳，宜阳就是他的坟墓。他请求增兵，秦又派大军来，甘茂拿出私蓄奖励将士，前307年终于攻下宜阳。占领宜阳，秦国打通了通向中原的门户。秦昭王十三年（前294），秦又向韩进攻，攻占武始（河北武安县南）、新城（河南密县东南）。前293年，秦将白起与韩、魏联军在伊阙（河南洛阳南）大战，秦军大胜，歼韩、魏联军24万多人。这是战国中期死伤人数最多的一次战争。这次战争白起率领的秦军人数不到韩、魏联军的一半。白起分析胜利的原因时说：韩、魏都想自己退到后面，把别人推到前面，互相推诿。秦军利用对方这一弱点，设疑兵麻痹韩军，出其不意以精兵攻魏军，魏军败，韩军自溃。这次战争后，秦继续攻占三晋地方。前292年，秦攻占魏的垣（山西垣曲县）。次年，白起又攻占韩的宛（河南南阳），司马错攻取魏的轵（河南济源东南），又取韩的邓（河南孟县西）。宛、邓是韩国冶铁手工业中心，秦取得后又增强了实力。秦昭王17年（前290），魏被迫以河东地400里给秦，韩割武遂200里（山西垣曲一带）给秦。前289年，秦派白起等攻魏，取61城。前288年，秦又攻赵取梗阳（山西清徐县）。前287年，秦又攻取魏新垣、曲阳，次年魏献安邑和河内给秦。

战国中期以后，秦不断攻伐三晋，三晋土地不断落入秦手。秦国当时已攻占了三晋一半的土地，主要是韩、魏两国的土地。韩、魏被极大削弱，秦国更加强大起来。在此情况下，秦昭王十九年（前288），穰侯魏冉想让秦称帝，怕齐国不答应，于是约齐一同称帝，在齐同意下，秦昭王称西帝，齐湣王称东帝。不

久，齐、秦又取消帝号。 （杨生民）

齐称东帝

齐威王改革后，齐国强大，齐滑王时一度称东帝。

齐国在威王改革后，经桂陵、马陵之战打败了魏国，成为东方强国，前334年齐、魏两国“会徐州相王”，说明魏国承认齐国称王，承认了齐国的强国地位。齐威王三十二年（前325），齐攻赵，在平邑（河南南乐东北）大败赵军，俘赵将韩举。前314年，齐宣王乘燕国内乱，占领燕国达3年之久。前301年，齐宣王又联合魏、韩攻楚，在垂沙（河南唐河境）大破楚军，杀楚将唐眛。楚被迫派太子横为人质，向齐求和。秦国看见齐国强大，也派泾阳君去齐国做人质，与齐国修好。前298年，齐国又发动齐、韩、魏三国攻秦，三国联军到达函谷关，威胁咸阳。秦昭王说：宁可割让三城事后后悔，也不能让威胁咸阳。于是秦割武遂（山西临汾境内）给韩，割封陵给魏，割齐城给齐，与三国讲和。前288年秦昭王想称帝，怕齐国不答应，约齐滑王一同称帝。在齐同意下，秦昭王称西帝，齐滑王称东帝。这实际上反映了两国力量对比的状况。称帝不久，苏秦认为齐称东帝，实际是尊秦，劝齐王合纵反秦，滑王去帝号，诸侯背秦从齐，迫使秦国也去帝号。从称帝到去帝号，前后仅3个月。很快，齐组织五国攻秦。五国合纵攻秦虽无成就，但齐国于前286年却灭了宋国。灭宋后两年，各国组织了六国攻齐，在这次战争打击下，齐国衰落了。 （杨生民）

乐毅伐齐

周赧王三十一年（前284），燕昭王派乐毅率兵伐齐，数年中攻陷齐国70余城，齐国几乎亡国。

燕国在燕王哙时把王位禅让给子之，引起内乱。齐宣王乘机派大兵攻燕，占领燕都蓟（北京市）。前311年燕昭王即位后，励精图治，决心报仇。为此，招贤纳士，在易山（河北易县）建了一座高台，内放黄金，叫黄金台，以恭敬的态度、隆重的礼物求贤。他去见贤士郭隗，郭隗对他说：有贤臣辅佐，可以为王，可以称霸。如大王真想振兴，隗请为天下贤士开路。从此，昭王对郭隗很尊敬，为他修建了好的住房，让他坐上座。其他国家贤士也前来投奔，邹衍从齐国来，昭王亲自扫地迎接，并拜邹衍为师，为他筑碣石宫。乐毅从魏国来，剧辛从赵国来，屈庸从卫国来。燕昭王还让苏秦去齐进行反间活动，以削弱齐国。燕国君臣奋发图强，经过二十多年的治理，使燕国殷富。

乐毅，燕将，魏国名将乐羊的后代，战国后期杰出的军事家。乐毅到燕国受到重用，给燕国训练了一支战斗力很强的军队，使士卒“轻佚乐战”。前286年齐国灭宋后，激起各国对齐的强烈不满。燕国利用这一机会积极活动组织各国合纵攻齐。前284年，燕、秦、楚、魏、赵、韩六国合纵攻齐。燕派乐毅领兵，乐毅还接受了赵国的相印。乐毅总领赵、楚、韩、魏、燕五国军队伐齐。齐派触子为将率大军迎战，战于济西，齐军大败。各国军队罢归。乐毅率燕国军队追击，齐又派达子为将，齐、燕军大战，齐军又败，达子战死。乐毅率燕军长驱直入，攻占了齐国都城临淄。乐毅取齐国的财宝重器，尽数运回燕国，燕昭王大喜，亲自去劳军，犒赏将士，封乐毅为昌国君，并让乐毅继续领兵攻取齐国的城池。乐毅在齐国五年，攻下齐国70余城，只有莒（山东莒县）和即墨（山东平度县）两座城没有攻下。齐滑王逃到莒，被原是楚国大将后来又做了齐相的淖齿杀死。齐国眼看就要灭亡了，这时燕国和齐国的情况却发生了变化。

前279年燕昭王死，其子惠王继位。惠王过去和乐毅不和，二人有矛盾。齐国在齐滑王死后，太子化装成平民逃到太史家里做佣人。这位太子就是后来的齐襄王，齐襄王依靠田单终于恢复了齐国。田单是齐国王族的远房亲属，齐滑王时在国都临淄做小官，燕国攻占临淄，他和家人逃到即墨。乐毅带领大军包围即墨，即墨守城官员与燕军交战而死。大家都认为田单有军事才能，推举他指挥战争。田单得知燕惠王与乐毅有矛盾，就派间谍到燕国造谣说：乐毅所以迟迟攻不下齐国的两座城，是因乐毅与燕新君不和，想联合齐军，在齐称王。齐国人最害怕燕国派别的大将来，要那样齐国就完了。燕惠王信以为真，就派骑劫代替乐毅。乐毅被革职后，怕被治罪，投奔赵国，将士们都气愤不平。骑劫是个庸才，代乐毅为大将后，一再上当，遂把燕军置于失败之地。田单宣扬说：最怕燕军割掉齐国俘虏的鼻子，把他们置于军前，与我们作战，这样即墨就守不住了。愚蠢的骑劫听到后果然割掉俘虏的鼻子，结果激怒了即墨人民，使他们同仇敌忾，坚守即墨。田单又派人到燕军煽动说：我们最怕的是燕军挖城外的祖坟，侮辱祖先，这样人们就太伤心而不愿死守。骑劫听到后又下令燕军挖齐人的祖坟，烧齐人祖先的尸骨，即墨人在城上看到这种情景十分悲愤，纷纷要求出城与燕军作战，斗志顿增十倍。田单又把守城精壮士卒隐藏起来，让老弱女子登城麻痹燕军，又派使去燕营谈判投降日期。燕军高兴得欢呼万岁！田单又收民间黄金，令即墨富人送给燕

将说，即墨就要投降贵军，请大军进城后不要虏掠财产妻妾，让我们家中平安。燕将答应这些富人的要求，以为即墨很快就要投降。燕军更加懈怠。田单这时却经过精心准备，把集中起来的千余头牛，穿上衣服，衣服上画着五彩龙纹，在牛角上缚上尖刀，牛尾巴上缚上用油脂浸泡的草苇用火点燃，夜晚把火牛从城洞中赶出，牛后面跟着5000精壮士卒。火牛直冲燕军营地，燕军大惊溃乱，死伤甚众，5000壮士又随后奋力杀来，城中鼓噪助威，声震天地。燕军败走，主将骑劫在混乱中被齐军杀死。燕军溃不成军，齐军乘胜追击，一直把燕军赶出国境。田单等人从莒迎接齐襄王入临淄主持国政。齐虽复国，但在这次战争中元气大伤，失去了东方强国的地位。燕国在这次战争中也因最后的惨败而国势衰弱。这都为以后秦统一中国创造了条件。（杨生民）

楚怀王受骗

楚怀王一再受秦欺骗，导致了丧师、失地、自己被扣押致死。

秦惠文王时，齐、楚两国关系好，共同对付秦国。秦国害怕齐、楚联盟，派张仪到楚，试图拆散齐、楚联盟。前313年，张仪至楚，楚怀王对张仪说：楚国是个偏僻的国家，先生有什么好的治国方略吗？张仪说：大王如能闭关绝齐，我请秦献商於（河南淅川内乡一带）之地六百里给楚，使秦女为大王的婢妾，秦、楚为兄弟之国。这样，能够北弱齐，西与秦好。这是最好的计策，大王何不行之。楚怀王很高兴地答应了，群臣都纷纷称贺，唯陈轸独吊。楚怀王问其原因。陈轸回答说：秦国所以看重楚国，是因为齐楚联盟。如今闭关绝齐，楚国孤立。秦国怎么会给孤立无援的楚国六百里地？北绝齐交，西方会有秦患，两国的兵都会攻来。楚国何不表面与齐绝交，暗里与齐联合，派使者随张仪去秦，如秦给土地，与齐绝交不晚，如不给，就与齐联合对付秦国。楚怀王要陈轸闭口。他派使者随张仪入秦要地，张仪假装坠车受伤，3个月不上朝。楚怀王以为张仪嫌楚不与齐绝交，于是派了位勇士去齐大骂齐王。齐王被迫与楚绝交，与秦和好。张仪达到目的后上朝，对楚使者说：我有六里的俸邑，愿献大王。使者回去告诉怀王，怀王大怒，要兴兵伐秦。陈轸一再劝告，怀王不听，与秦绝交，派屈匄率兵攻秦。前312年，楚秦在丹阳（河南丹水北）大战，楚败，秦俘虏楚将屈匄等将领70余人，斩首8万，并取楚丹阳、汉中郡。消息传来，楚怀王恼羞成怒，又发大兵攻秦。楚军进至蓝田（湖北钟祥西北），秦军反击，楚军大败，韩、魏两国也趁机攻楚，于是楚又割两城与秦讲和。

前311年，秦惠文王愿分汉中之地一半给楚，与楚结盟修好。楚王表示：愿得张仪，不愿得地。张仪知道后，主动请求去楚，并对秦王说：秦强楚弱，我奉秦王命出使楚国，楚怎敢杀我。再说，我与楚大臣靳尚关系好，靳尚又为楚王宠姬郑袖所信赖，郑袖的话楚王没有不听的。在秦王同意下，张仪至楚，被楚王关押，并要处死。这时靳尚对郑袖说：秦王特别喜欢张仪，楚王要杀他。秦王想用上庸（湖北房县一带）六县和美女换回张仪。秦女来必然贵宠，夫人就会失宠而沦为贱妾。夫人何不让大王放走张仪呢？于是郑袖就在楚王面前日夜哭泣着说：人臣都各为其主，秦王让张仪来，是尊重大王。大王如杀张仪，秦王必会大怒而攻楚。请求大王让我们母子都迁居江南，免受秦国蹂躏。楚怀王果听郑袖之言，放张仪，厚加礼遇，让归秦。时屈原出使秦国回来，劝楚王杀张仪，楚王赶快派人去追，但已追之不及。这一年秦惠文王死。

前299年，秦昭王写信给楚怀王说：秦楚接界，互相通婚，相亲久矣。秦楚不和，无法号令诸侯。所以，愿与大王会武关，友好结盟。楚怀王接信左右为难，去，怕受骗，不去，又怕得罪秦国。大臣昭睢说：大王不要去，应发兵自守。秦是虎狼之国，有吞并诸侯之心，不可相信。楚王庶子子兰主张去，说不去会绝了秦国的欢心。怀王听他的话，去秦。秦王派一将军埋伏在武关，假称秦王。楚王到武关，被劫持送去咸阳。秦王以接待藩臣之礼接见楚王，并要楚割巫、黔中郡给秦。楚王不答应，被秦扣押。对此，楚国极为不满，于是派昭睢至齐，对齐诈称楚王去世，接在齐的楚太子回国即王位，是为楚顷襄王。秦昭王知楚新君即位，发兵出武关攻楚，斩首5万，取15城。前297年，楚怀王企图逃回楚国，被发现，秦军严加防守去楚道路，怀王从便道逃往赵国，这时适逢赵武灵王退位为主父在代，子惠文王初立不敢接纳楚王，楚王又去魏，路上被秦兵追上带回秦国。楚怀王忧愤成疾，前296年死于秦国。

楚怀王昏聩无能，不采纳陈轸、昭睢、屈原等人联齐抗秦意见，而听信靳尚、郑袖、子兰的谗言，一再受骗，给楚国造成极大危害。屈原愤怒地谴责楚国一些人，贪求私利，而把国家置于极为危险的境地。

（杨生民）

合纵与连横

合纵与连横是战国时各国间彼此斗争的策略与

实践。

战国中期后，秦国通过商鞅变法迅速强大，对山东诸国形成威胁。齐国在桂陵、马陵之战以后，迅速崛起，成了东方强国。这样就形成了东、西两大强国对峙的局面。在上述形势下，就出现了“合纵”与“连横”的策略与实践。所谓合纵，就是“合众弱以攻一强也”。合纵，可以对秦，也可以对齐。从地域上讲，当时的弱国以三晋(韩、赵、魏)为主，北连燕，南连楚称为纵，彼此联合对付秦或齐。所谓连横，就是“事一强以攻众弱也”，从地域上讲，就是弱国东连齐或西连秦，服从强国去兼并弱国。所以连横是一种强国吞并弱国的策略。各国之间互相结约，联盟不断变化，没有固定的朋友，也没有固定的仇敌，形成了复杂多变的“合纵”与“连横”的格局。在这种形势下，各国国君把对外政策看得十分重要，一部分士人研究形势，讲究权变，为各国国君出谋划策，这样便出现了历史上的纵横家。张仪、公孙衍、苏秦等人就是著名的纵横家。

张仪(？—前310)，魏国贵族后裔，主张连横，为秦奔走。张仪青年时求见过魏惠王，魏惠王没有用他。他又带着妻子去楚国投在令尹(相国)昭阳门下做宾客。有次昭阳大会宾客，让人传看楚国宝“和氏璧”，不料丢失，怀疑张仪偷了，于是痛打张仪。前329年，张仪入秦投奔秦惠文王，前328年任秦相，爵位为大良造。他极力怂恿秦攻魏。这一年秦攻取了魏的汾阴(山西万荣西南)、皮氏(河津西)、焦(三门峡市西南)，对山东各国形成了很大威胁。这样便出现了公孙衍创导的合纵。公孙衍，又名犀首，魏人，做过秦的大良造，与张仪不和，张仪入秦的同年，他由秦入魏。前323年，公孙衍倡议魏、赵、韩、燕、中山五国相王。前319年，公孙衍做魏相，次年他针对张仪的连横活动，组织发动了一次五国合纵攻秦。五国是：魏、赵、韩、楚、燕，并推楚怀王为纵长。由于楚、燕两国对合纵不热心，没有出兵。所以前317年韩、赵、魏出兵在修鱼(河南原阳西南)与秦军大战，三国军败，8万多军队被歼灭。这次五国合纵抗秦以失败告终。此后，秦国不断向三晋进攻，韩国屈服，把太子仓送去秦国做抵押求和，魏国的内政也受秦国干涉，秦国越来越强大了。

秦国的强大，给东方各国威胁很大，于是齐、楚结盟，互相支援。为破坏齐、楚联盟，前313年秦派张仪去楚。张仪在楚首先收买了贵族靳尚等人，然后见楚怀王说：大王如果和齐国断交，秦王愿献出商於一带六百里的地方给楚国。楚怀王受了骗，还没有得到土地就和齐国绝交。齐王因此大怒，转过来与秦联合对付楚国。当楚国派人去向秦国要土地，张仪却说：臣有六里俸邑，愿献大王左右。为此楚怀王非常愤怒。前312年，楚出兵攻秦。楚军在丹阳(河南丹水北岸)被秦军打败，损失了8万多人，主将屈匄等70多人被俘，秦军进而占领楚汉中郡。这年，楚怀王又调集大军向秦进攻，在蓝田(湖北钟祥西北)被秦军打败。张仪这次连横活动削弱了楚国，对秦的强大和以后统一中国起了积极作用。

楚被削弱后，齐、秦两强对峙，这时继公孙衍之后苏秦登上了合纵的政治舞台。苏秦(？——前284)，东周洛阳人，自称鄙人，可能出身于农民家庭。前311年，燕昭王即位，广招贤才，苏秦就在这时到了燕国，受到燕昭王的重用。前300年左右，苏秦从燕至齐，在齐五年使齐没有“谋燕”。前288年，秦昭王派魏冉至齐，约齐与秦同时称东、西帝，齐、秦联合，对燕不利。这年，燕昭王第二次派苏秦去齐为燕国利益而活动。苏秦到齐劝齐湣王放弃帝号，孤立秦国，合纵反秦，趁机灭宋。其目的是让齐无力攻伐北面的燕国。齐湣王听了苏秦的话，废帝号，让苏秦为齐国使者联合韩、赵、魏、燕五国伐秦。赵相李兑怕秦攻赵，为阻止秦东进，也积极组织五国攻秦。另外，当时任魏相的孟尝君也支持五国攻秦。韩国怕秦进攻，也愿参加五国攻秦。楚国虽未参加此次合纵，但派使者去齐表示支持。这样，苏秦组织了五国攻秦。除齐出兵外，赵国派了驻上党的全部军队，燕派两万人。五国联军驻在韩国荥阳(河南荥阳东北)、成皋(河南成皋西北)之间。军队停留时间不短，一直未发动大进攻，结果“无功而还”。其原因是各国在反秦幌子下各有打算。齐想利用反秦达灭宋目的。赵相李兑想利用这一反秦机会，与齐争宋国的陶邑做自己的封地。魏相孟尝君与齐争宋国的平陵做自己的封邑。所以，五国攻秦没有什么结果是很自然的。不过在上述形势的压力下，秦国也去掉帝号，并把部分侵地归给赵、魏。这次齐、秦称帝发生于前288年10月到12月，时间虽短，影响却很大。

前286年，由于宋国内乱，齐国趁机灭宋，宋康王逃到魏国，死于温(河南温县西)。齐国灭宋引起了各国的强烈不满。过了两年，前284年就发生了六国合纵攻齐的重大事件。在这次事件中，秦国起了发动和组织作用。前285年，秦王与楚王在宛相会，与赵王在中阳相会。秦派兵向齐的河东进攻，占领九座城。次年，秦王又分别与魏王、韩王相会。前284年，秦、燕、韩、赵、魏、楚六国联合攻齐，在济西大败齐军。燕昭王见报仇时机已到，让乐毅统兵追击，几乎

灭齐。苏秦为燕谋齐的计谋取得成功。齐湣王最后识破了苏秦在齐为燕的反间计谋，车裂苏秦。六国战胜齐国后，秦占齐所得的宋地陶邑，封给穰侯魏冉，魏占了大部分宋地，赵占了济西部分地区，楚、鲁也攻占了齐与原宋国的一些地区。东方强国齐国从此一蹶不振，齐、秦两强对峙的形势结束。　（杨生民）

秦破楚郢都

周赧王三十七年（前 278），秦将白起攻占楚都城郢（湖北江陵北），楚国进一步衰落。

春秋以后，楚国是兼并中小国家最多的大国。前 306 年，楚国趁越内乱灭越。这时的楚国西北部与秦交界，东在今山东南部与齐交界，中部在河南南部与韩、魏交界。楚国几乎占了整个南部中国，是七国中土地最大、人口最多的国家。但是，楚国在吴起改革失败后，一直国力不振。楚怀王昏庸无能，一再受骗，导致丧师失地，使楚国遭受重大打击。前 280 年，楚顷襄王十九年，秦将司马错攻楚，占楚黔中郡（湘西及黔东北），楚国割上庸（湖北房县、均县等地）和汉水北岸地给秦。前 279 年，秦将白起攻占楚国的鄢（湖北宜城东南）、邓（河南邓县）、西陵。前 278 年，秦将白起攻破楚国都城郢（湖北江陵北），并南进至洞庭湖一带，秦军还焚烧楚先王陵墓所在地夷陵（湖北宜昌），楚被迫迁都于陈（河南淮阳）。这一年，伟大诗人屈原投汨罗江自杀。前 277 年，秦又攻占楚黔中郡。这几年中，秦国攻占了楚国大片领土，特别楚国国都的陷落，引起了极大震动，楚国从此进一步衰落。

秦国攻占楚国都郢以后，想联韩、魏继续攻楚。楚国春申君黄歇怕秦“举兵而灭楚”，就给秦昭王写了一封长信，信中极力离间秦与韩、魏的关系。春申君在信中劝秦王做事不能太过头，以免物极必反。他以吴国北上争霸被越国最后灭掉和智氏攻赵最后被韩、赵、魏三家所灭的事实，告诫秦王不要只顾伐楚，对韩、魏丧失警惕。春申君指出：韩、魏对秦有多世的怨仇，韩、魏父子兄弟死于秦军将近有 10 世了。秦如果还是联韩、魏攻楚，岂不大错。秦楚相争，魏国就会趁机去占领过去宋国的领土，齐国必然占领楚国淮北的徐泗一带。齐、魏、韩强大起来，秦国想称帝也不行了。为大王考虑，最好的办法是与楚友好。秦楚联合攻韩，韩就会屈服。秦以 10 万精兵戍守在原郑国的地区，魏也会屈服。韩、魏屈服了，齐国也就容易攻取了。秦王看了春申君的信后撤销了联韩魏攻楚的计划，并派使者与楚修好。这使楚国免除了一次危机。　（杨生民）

屈原投江

屈原在黑暗势力打击下，政治主张无法实现，楚都郢被秦军攻陷后，投江身亡。

屈原（？一前 278），名平，熊姓，楚武王子瑕的后裔。由于瑕的封邑在屈，以封地为姓氏，所以姓屈。屈原约生于前 340 年前后，卒于前 278 年。从小受到好的教育，青年时从事政治活动，善写文章又长于外交辞令，深得楚怀王赏识。青年时，曾任左徒，地位仅次于令尹，常常参与机要，起草政令。还当过三闾大夫，管理楚国王族屈、景、昭三姓子弟。屈原生活于战国后期，正是诸侯互相称雄兼并时期。当时楚、秦、齐是大国。屈原热爱祖国、人民，一心想使楚国富强起来。主张任用贤能、厉行法制、限制贵族特权，外交上则主张联齐抗秦。按照当时的形势，如果以秦为首的连横政策取得胜利，天下就会统一于秦。如果以楚为首的合纵取得胜利，天下也可能统一于楚。屈原所主张的是努力实现以楚为首联合抗秦。然而，屈原的正确主张，却因楚国黑暗势力的反对而无法实现。

屈原为左徒时，经常与楚怀王议论国事，深受信任。因此，为上官大夫靳尚所嫉恨。怀王让屈原起草宪令，写出草案，还未定稿，上官大夫靳尚看到后想夺为己有。屈原不给，上官大夫就在怀王面前进谗言说：大王让屈原起草宪令，众人莫不知晓，每出一令，屈原都夸耀自己的功劳，以为非他莫能为也。怀王因此大怒，疏远贬黜了屈原。张仪离间齐、楚关系，欺骗楚怀王，使楚丧师、失地。他第二次来楚时，屈原从齐出使归来力谏杀死张仪。秦昭王致函楚怀王，要求会盟通婚，在武关相会。屈原说：秦国是虎狼之国，不可相信，不如不去。怀王听郑袖、子兰的话前去相会，被秦扣押而死。屈原对楚怀王非常怀念，看到自己的国家日渐衰亡，悲痛欲绝。楚怀王死后，长子继位为楚顷襄王，其弟子兰为令尹。子兰又让上官大夫靳尚在顷襄王面前诋毁屈原，顷襄王大怒，迁屈原于江南（湖北南部、湖南北部长江以南地区）。前 278 年，秦将白起率军攻陷楚都郢，楚国面临亡国危运，屈原无限悲愤，投汨罗江而死。据传后世五月初五端阳节吃粽子、划龙舟都是为了纪念屈原。

在黑暗势力摧残下，屈原的政治主张无法实现。但是，屈原对中国古代诗歌的发展却做出了卓越的贡献。屈原是楚辞的创始人、奠基人。他的诗思想性、艺术性高度统一，《离骚》等一系列诗篇抒发了对祖国、人民的无限热爱，和对黑暗势力的无比憎恶。屈

原的诗是中国文化史上的瑰宝。伟大的爱国诗人——屈原，永垂不朽！ （杨生民）

将 相 和

赵相蔺相如与大将廉颇，二人以国家利益为重，妥善处理彼此矛盾，和衷共济。

赵惠文王时，赵国大将廉颇，声震诸侯。蔺相如原是赵国宦者令（宦官头目）缪贤家舍人，出身低微。前 283 年，秦昭王知楚国国宝“和氏璧”在赵，派人带着国书见赵惠文王，表示愿以 15 城换和氏璧。为此，赵王与廉颇等大臣商议：答应秦要求，怕秦不给 15 城，受欺骗；不答应，又怕秦兵来攻，拿不定主意。同时，也挑选不出一个出使秦国的合适人选。这时，缪贤推荐蔺相如当使者。赵王接见蔺相如时，问他这件事怎样处理好？蔺相如回答说：秦强赵弱，不能不答应。不答应，赵国理亏。答应，秦不给赵 15 城，是秦理亏。应采取后一办法。我奉玉璧使秦，秦把城给赵，玉璧留在秦国；秦不给赵城，我完璧归赵。赵王感到他考虑周全，就让他带着玉璧出使秦国。蔺相如到秦，受秦王接见时，奉上玉璧，秦王很高兴，令传示左右，但却无意给赵 15 城。蔺相如上前说：璧有瑕（小毛病），请指给大王看。接过玉璧，蔺相如后退几步，怒发冲冠，对秦王说，赵国把璧送来，是相信秦国、尊重秦国，为了两国的和好。大王得璧后，却无意给赵国城邑，所以我取回玉璧。如果大王硬逼，我愿把璧和自己的头在柱了上碰碎。蔺相如做出要以璧击柱的样子，秦王怕碰碎璧，忙向他道歉，并让人拿过地图说从此的 15 城给赵。蔺相如又对秦王说：和氏璧是天下之宝，赵王曾斋戒五日，举行隆重仪式，才把璧送来。现在大王也应斋戒五日、举行隆重仪式，我才能献给大王。秦王感到不能强夺，只好应允。回到馆舍，蔺相如料定秦王决不会给赵国城邑，就派人从便道把璧送回赵国。蔺相如使秦归来后，赵王认为他贤能，拜为上大夫。

前 279 年，秦昭王约赵惠文王相会于渑池（河南渑池县）。会上，秦王饮酒高兴，要赵王鼓瑟，赵王只得照办。秦史官当即记载：某年月日，秦王与赵王会饮，令赵王鼓瑟。蔺相如立即上前对秦王说：赵王听说秦王会奏秦声，请秦王用瓦缻（瓦质打击乐器）演奏，以相娱乐。秦王怒，不许。相如向前献上缻，跪请秦王击奏，秦王不肯。相如说：五步之内，相如请把颈中的鲜血溅在大王身上。秦王左右的人想杀死相如，相如瞪着大眼喝叱，吓得他们往后退。秦王无法，只得击一下瓦缻。相如让赵国史官记载：某年月日，秦王为赵王击缻。秦群臣说：请以赵 15 城为秦王祝寿。蔺相如也说：请以秦的咸阳为赵王祝寿。一直到饮酒完毕，秦在宴会上不能取胜。另外，赵国也集结了大量军队准备对付秦军进攻，因无隙可乘，秦不敢轻动。

渑池之会后，赵王为表彰蔺相如的功劳，拜他为上卿，地位在廉颇之上。为此，廉颇很不服气，他说：我为赵将，有攻城野战之功，而蔺相如以口舌为劳，位居我上，况且相如原是地位卑贱的人，我羞居其下。并扬言如碰见蔺相如，一定要羞辱他。蔺相如听到后，避免与廉颇会面，上朝也以有病为名推辞为去，避免与廉颇争位次排列。有时出门，望见廉颇，就引车逃匿。蔺相如的家人说：我们远离亲戚来侍奉您，是因仰慕您的为人。现在您与廉颇同为大臣，见了他就远远避匿，如此害怕，平常人也感羞耻，何况将相乎？我们受不了，请让我们辞职他去。蔺相如挽留他们说：你们看廉将军与秦王比谁可怕？众人说：廉将军不如秦王。相如说：以秦王的威严，我敢在朝廷上斥责，辱其群臣，我虽才能低下，难道会单单怕廉将军吗？我考虑到，强秦不敢加兵于赵，就是因为我们两人在。两虎相斗，必有一伤，只能对秦有利。我所以这样做，正是以国家安危为重而不计个人私怨。廉颇听说后，十分感动，负荆请罪，到蔺相如家说：鄙贱之人，不知将军如此宽宏大量。两人谈得都很高兴，结为生死之交。由于二人和衷共济，共辅赵王，赵国这时曾打败齐、魏，在阏与之战中又打败秦国，成为东方六国中的强国。将相和，成为广泛流传的千古佳话。 （杨生民）

秦赵阏与之战

周赧王四十六年（前 269），赵奢率赵军在阏与（山西和顺县）大破秦军。

赵奢，号马服君。赵奢曾做赵国田部吏，因平原君家不纳租税，杀平原君家用事者 9 人。为此，平原君要杀赵奢，赵奢说：您是赵国的贵公子，您家不奉公守法，法就削弱，法削弱国家就弱，国弱诸侯就会来攻打，赵国贫弱，您还有什么富贵？以您的尊贵，奉公守法则上下平和，上下平和则国强，赵国强大了，您是贵戚，在天下岂能没有地位。听了赵奢的话，平原君认为他贤能，把他推荐给赵王。赵王用他治理国家赋税，治理得很好，使民富而府库充实。

秦昭王三十七年（前 270），秦军为伐韩，要占领赵国阏与（山西和顺县）。赵惠文王问廉颇：可以救吗？廉颇回答说：道路远、险、狭，难救。赵王又问乐

乘，乐乘回答与廉颇相同。赵王又问赵奢，赵奢回答说：道路远、险、狭，好像两只老鼠在洞穴里相斗，将领勇敢就能取胜。赵王赞赏他的回答，就派他带兵去救阏与。军队在离邯郸 30 里的地方驻下，目的是让秦军知道：赵军只在此坚守，无意去救阏与。同时在军中下令：有以军事谏言者，立即处死。秦军驻扎在武安西边，鼓噪练兵，武安房上的瓦都震动了。赵军中有一人要急救武安，赵奢立即处死。赵军在此坚守 28 天，又增加防守的堡垒。秦军派奸细来，赵奢让他们吃好，而后遣送回去。奸细回去把这些情况报告秦将，秦将高兴地说：赵军离国都 30 里就不前进了，还增设防御工事，阏与不会属赵国了。赵奢遣送了秦军奸细后，下令全军轻装前进，两天一夜就走到离阏与 50 里的地方驻扎，并修筑了工事。秦军这时也向阏与前进。许历说：秦军想不到赵军会来到这里，秦军气势汹汹，赵军一定要严阵以待，不然会失败。另外，要抢先占领北山，谁能先占领北山谁就可以胜利。赵奢同意这个意见，立即让万人急驰抢占北山。秦军后至，争夺山头上不去。赵奢令全军奋勇进击，大破秦军，秦军败走，赵军解了阏与之围。这次战争胜利后，赵王封赵奢为马服君，与廉颇、蔺相如禄位相等。阏与之战，是赵国给秦国的一次打击，使秦的东进政策暂时受挫。　（杨生民）

长平之战

周赧王五十五年（前 260），秦军在长平之战中，坑杀赵卒 40 余万，使赵国一蹶不振。

前 269 年秦赵阏与之战以后，两国内部都发生了一些变化。秦国方面，前 266 年任用范雎为相，封应侯。秦昭王采纳了范雎提出的“远交近攻”策略，集中兵力进攻三晋。赵国方面，前 266 年，赵惠文王死，其子孝成王立，任用平原君为相。长平之战前，赵奢病死，蔺相如病重。这些变化对长平之战的胜败有直接影响。前 262 年，秦将白起攻韩，取野王（河南沁阳县），完全切断了韩上党郡与本国的联系。韩上党郡守冯亭不愿降秦，降赵，赵王接受了他的投降，同时派廉颇率军进驻长平，与上党成犄角之势，抵抗秦军。前 260 年，秦将王龁攻上党，上党军民退到赵国。秦军攻长平（山西高平县），虽有几次小胜，但由于廉颇坚壁固守，秦军挑战，赵军不出，两军相持，赵军挡住了秦军攻势。这时，秦相范雎派间谍以千金贿赂赵王左右，散布流言说：秦怕赵派马服君之子赵括为将，廉颇容易对付。赵王对廉颇以前的几次小败不满，又认为坚壁不出是不敢与秦兵作战，就让赵括代替廉颇为将。

赵括自幼学兵法，言兵事，自以为天下第一。他常和其父赵奢谈兵事，赵奢谈不过他，然而却从不称赞他。他母亲问其中的原因，赵奢回答说：用兵，关系着生死存亡，赵括常常轻率地谈论，今后赵国不用他则已，如用他，让赵军大败的就是他。听说任用赵括为将，蔺相如对赵王说，赵括虽读其兵书，不知合变，如同胶棍鼓瑟，不能用。赵王不听。赵括母亲也上书赵王说：赵奢为将时，亲自奉献饮食给自己尊敬的人以十计算，和他友好的人以百计算，赵王赏赐的钱财东西都分给了部下，接受命令就不顾家里的事。现在赵括当了将领，十分傲慢，趾高气扬，部下都不敢抬头看他。大王赏他的金银财宝，都收藏到家里，看到好的田宅可买的就去买。他和他的父亲相比怎么样？二人思想、品德全然不同。因此，请大王不要派他为将，以免危害国家。赵王表示，他已决定，做母亲的就不必管了。赵括母亲又说：大王最后还是要派遣他，如不称职，请不要牵连于我。赵王答应了这一要求。

秦国听说赵已派赵括为将，就暗里派武安君白起为主将，以王龁为副将，又下令军中泄漏此事者，立斩。赵括上任，改变廉颇原来约束，更换军官，率兵攻秦军，秦军佯败，赵军从后追赶。这时，白起派两支奇兵分割包抄赵军，一军 25000 人截断赵军后路、粮道；另一支 5000 人从中间插入把赵军分割为二。秦军又派轻骑攻击赵军，赵军筑垒坚守，以待救兵。赵国向齐求救，请求齐支援粮食，齐不给。秦昭王知秦军包围赵军，亲自到河内（河南沁阳县）征发 15 岁以上男子，开往长平。赵军断粮 40 余天，饥饿的士兵互相残杀，以人肉充饥。赵军为摆脱困境，几次突围，无法突破包围圈。赵括亲率精兵突围，结果赵括被秦军射死，40 余万赵军降秦。白起怕降卒反叛，除放 240 个小孩回赵外，其余全部坑杀（活埋）。这次战争，赵前后丧失 45 万人，秦军亦“死者过半”。长平之战是战国时期一次规模最大的战争，赵国损失惨重，从此一蹶不振。　（杨生民）

秦赵邯郸之战

周赧王五十八年（前 257），秦军围攻赵国都邯郸的一次战争。

长平之战后，白起分兵两支，攻取了赵的太原郡和韩的上党郡。韩、赵派苏代赴秦离间范雎与白起关系。范雎嫉妒白起功高，建议昭王罢兵言和，昭王采纳了这个意见。过了几个月，秦又派王陵攻赵，围赵都邯郸，赵国军民顽强抗击，秦军不断失利。秦昭王

想起用白起为主将，白起托病不出，于是改派王龁为主将。前258年，秦军攻至邯郸城下，形势危急，赵孝成王派平原君到楚求救。平原君，名胜，赵国公子，家有门客数千人。这次使楚，计划在门客中选20位文武兼备的人同去，但只选出19人，差一人怎么也选不出来。门客中有个叫毛遂的，对平原君说：还少一人，就请带我一同去吧！平原君问他到门下几年了，回答说三年了。平原君说：有才干者处世，好像锥处囊中，锥尖很快就会显露出来，先生在这里三年了，没听到有人称赞你，也没听说你有什么本领，还是不要去，留下吧。毛遂说：今天就是请你把我放在囊中，要是早把我放在囊中，整个锥子都会露出来，岂止露一点尖呢？平原君带他一同去，其他19个门客都嘲笑他。到楚国后，平原君与楚考烈王商谈合纵抗秦。由于楚王害怕秦国，从早上谈到中午，谈不出个结果。大家都很着急。这时毛遂按剑走上宫廷说：联合抗秦有利，不联有害，两句话就可以说清楚，现在从早上谈到中午还决定不了，这是为什么？楚王厉声呵斥说：还不快下去，我与你主人谈话，你插进来干什么！毛遂毫无畏惧，按着剑，走到楚王面前说：大王这样怒斥我，是凭借楚国的人多势大，现在我与大王在十步之内，兵多帮不了大王的忙，大王的命就握在我手里。楚王不知所措。毛遂继续说："在我主人面前，你这样怒斥我，太无礼了。我听说成汤只有七十里的地方后来在天下称王，文王只有百里的土地使天下臣服。这难道是因为军队众多吗？这是由于他们能把握形势，发挥自己的威力。现在楚国有地方五千里，有军队百万之众，凭这些可做天下的霸主。然而，秦将白起只率领数万军队，兴师伐楚，一仗攻取了鄢、郢，二仗烧毁了楚国祖先的坟墓所在地夷陵，第三仗又烧毁了楚国祖先的宗庙。这是楚国的耻辱、百世的怨仇，赵国都为此感到羞辱，难道大王你就没有这种感觉吗？因此，楚赵联合抗秦，这是为了楚国，不单是为了赵国。"毛遂这一席话击中了楚王思想上的要害，促使楚王醒悟，同意联合抗秦。在这种情况下，楚、赵签订了合纵抗秦的盟约，楚王派春申君黄歇率兵解邯郸之围。

秦军围邯郸时，赵国曾多次向魏国求救。秦昭王五十年（前257），魏安釐王派晋鄙率10万大军救赵。为此，秦国向魏发出警告：谁救赵，秦攻下赵以后，立刻去攻打谁。魏王害怕，命令晋鄙在邺（河北临漳县）驻扎，以观变化。赵王见救兵不到，十分着急，平原君也三番五次地派人向魏求救。平原君的夫人是魏国信陵君的姐姐。信陵君，名无忌，是魏王的弟弟，因封在信陵（河南宁陵县），称信陵君。平原君写信给信陵君说：邯郸这样危急，魏国救兵不至，您无动于衷，纵然您能抛弃我，就不可怜您姐姐吗？信陵君几次请求魏王，魏王还是不发兵。在此情况下，信陵君决定带着一百多辆车骑到赵国与秦军拼命。路过东门，遇侯嬴，以实情相告，没想到侯嬴回答说：公子自勉吧！老臣不能相从。信陵君向前走了几里，不高兴，心想：我待侯生好，天下没有不知道的，现在我就要死了，侯生无一言送我，是不是我有什么过失。因此，公子又坐车返回，问侯生，侯生笑着说："臣知公子会返回来"，并说信陵君如果这样去是以肉投喂饿虎。并悄悄说："我听说调动晋鄙大军的兵符在魏王的卧室内。魏王最宠爱如姬，如姬可以出入卧室，能窃出兵符。我听说如姬父亲被人杀死，想报仇，用了3年时间也报不了。如姬在公子面前哭泣，请公子为父报仇，公子就使客斩仇人头敬献如姬。如姬为此愿为公子死，只是没有恰当的时机。如果公子开口请如姬办这件事，她必然会许诺，这样就会得到虎符而夺晋鄙的兵权。"信陵君照此办法，如姬果然窃出兵符给他。信陵君又按侯生出的主意到邺，要晋鄙交出兵权。晋鄙合了符，但有怀疑，不交兵权。这时，随从的大力士朱亥用铁椎打死晋鄙，信陵君夺取了兵权。信陵君整顿军队，下令：父子都在军中的，父亲回去；兄弟在军中的，哥哥回去；独生子当兵的回家侍奉父母。经过整顿，得精兵8万，军队士气旺盛。信陵君率领军队连夜去解救邯郸。

魏国信陵君和楚国春申君率领的救邯郸的军队会合之后，向秦军发动进攻，平原君也率敢死队3000人杀出城来。在内外夹攻下，秦军大败，秦将王龁率败兵逃到汾城（山西襄汾县境），秦将郑安平所率两万秦军被包围后全部投降。被秦军包围一年多的邯郸至此解围。这次战争中，秦国还失去占领的赵国的太原郡和魏国的河东郡。

在这次战争中，由于秦国统治集团内部矛盾的发展，秦昭王逼白起自杀。秦昭王想用白起为主将代替王陵。白起认为赵国誓死保卫国家，诸侯再派兵援救，秦军受夹攻，会遭失败，于是托病不愿带兵。让王龁代王陵为主将后，仍攻不下邯郸。秦昭王依然要白起去领兵，白起仍托病不去，昭王因此免了白起的官爵。后秦军失败，昭王便把白起逐出咸阳。白起出城10里，昭王派人给白起送了一把剑，白起收到剑就自杀了。白起是战国后期秦国的杰出军事家，指挥军队"出奇无穷"，他指挥的一些著名战役都取得了胜利。白起的死，是秦国的一大损失。 （杨生民）

李冰修都江堰

秦昭王时，李冰主持修建了技术水平高、效益好的大型水利灌溉工程都江堰。

都江堰是春秋战国时修建的有代表性的大型水利灌溉工程，位于四川成都平原。原来，这一地区经常发生旱、涝灾害，主要是因岷江得不到治理造成的。岷江上游江水从地势陡峻的岷山崇岭穿过，水流湍急，进入成都平原流速突减，从上游夹带的泥沙石子沉积淤塞了河道。这样，雨季洪水泛滥，造成水灾，雨季过后又缺水出现旱灾。因此，治理水旱灾害就成了成都平原人民的迫切要求和生产能否发展的关键。

前 306 至前 251 年秦昭王执政末期，李冰任蜀郡守，决心治理岷江。他同儿子二郎一道察看地形，听取民众意见，吸收前人经验，动工兴建了都江堰水利工程。工程主要分分水堰、宝瓶口、飞砂堰三部分。一、分水堰：分水堰是在岷江中的天然滩脊上，修建一个形似鱼嘴的卵石沉积建筑物做堰。为避免卵石被水冲走，堰被冲垮，筑堰时用当地产的竹子编成大竹笼，把鹅卵石放进竹笼，再把竹笼连接起来，然后一层一层在河中堆起来，两侧再用大卵石垒起两道护堤。这样，分水堰就筑成了。分水堰前端尖，从远处看像个大鱼嘴，所以又叫“分水鱼嘴”或“都江鱼嘴”。分水堰的作用是把岷江水一分为二：东边的水流称内江（也称郫江）；西边的水流称外江（也称检江），外江沿岷江故道流入长江。分水堰在三国以后属都安县，所以人们称之为“都安堰”，后又称“都江堰”。二、宝瓶口：内江流一段，为原有玉垒山的一块大岩石堵住水的去路，李冰在大岩石上开凿了一个人工道口，叫宝瓶口。内江水通过宝瓶口后分为走马河、柏条河、蒲阳河等支流灌溉着农田。被凿开的岩石孤立于内、外江之间的称“离堆”。三、飞砂堰：从分水鱼嘴到“离堆”又用竹笼装石筑堤修成溢洪道，叫飞砂堰。飞砂堰比较低，功能是如果洪水太大内江水就可溢出飞砂堰流到外江，再沿岷江故道流出。这个办法既保证内江灌溉区有水，又不会因水太大泛滥成灾。

为解除岷江水患，必须解决河床淤塞问题。为此，李冰定下每年要进行一次淘江整修。淘江时，采用杩槎（音马查）挡水断水。杩槎是用三根 6 至 8 米长的大木扎成三脚架，三脚架下面用装有石头的竹笼卡稳，把多个三脚架连在一起，在迎水面上绑上竹席，糊上粘土，就成了一道临时挡水堰，使水断流。淘江时，于每年霜降（10 月下旬）先用这种三脚架在外江口截断水流，让水全部流入内江，把外江淤积的沙石挖去后，到次年立春前后（2 月上旬），又把三脚架移至内江口截断江水，整修内江河道堤坝。内江整修好后，再根据情况逐渐拆除三脚架，放水入江，灌溉农田。这样又解决了河道阻塞的问题。

都江堰建成，使成都平原 300 多万亩的土地得到灌溉，变成了良田，使“蜀沃野千里，……天下谓之天府”。

都江堰不仅有高度科学性，效益好，而且在施工时经济合理，重要建筑材料都取之于当地，如竹、木、鹅卵石当地都应有尽有。

都江堰是我国古代著名的水利工程，至今仍在不断修理、增建下，发挥着巨大的作用。都江堰的建成，充分反映了我国古代人民的勤劳和智慧。都江堰不仅是中国也是世界上著名的古代水利工程。

古代四川人民为纪念李冰和他的儿子二郎领导人民修建都江堰的功绩，在都江堰建造了一座“二王庙”，庙里有李冰父子的塑像，每年按时祭祀，表现了劳动人民对他们的高度敬仰。（杨生民）

秦灭二周

秦灭亡东周土地上出现的西周、东周两个小国。

历史上称平王东迁后的周朝为东周。战国时，东周只占有洛阳附近相当于今十多个县的一片土地，实际只是一个小国。但是，周王室名义上是天子，各诸侯国君位由周天子册封，各国也应朝拜周天子。各国需要时表面上也遵守这些礼制，不需要时就把周天子踢开。前 403 年周威烈王封韩、赵、魏三家为诸侯，前 386 年周封田氏为齐侯，已经是一种形式。战国中期以后，不仅大国称王，连一些二等国家也称王，诸侯国根本不把周天子放在眼里，周天子对此只好听之任之。

战国时，东周土地上又分出了西周、东周两个小国。这两个小国是这样出现的：前 440 年，周考王即位，封其弟揭于河南（洛阳西），说是要继周公的官职，是为周桓公。周桓公传到第四世周惠公时，他的长子称西周公，惠公又封他的小儿子于洛阳东一个叫巩的地方称东周惠公。这样原来周桓公的封邑中出了西周、东周两个小国。这两个小国渐渐占有了东周王室的土地，到周赧王时无容身之地，时而寄居西周，时而寄居东周。秦昭王五十一年（前 256），秦灭西周，这一年周赧王死，周朝结束。秦庄襄王元年（前 249），秦灭东周，东周当时只有七个邑。

东周（前 770—前 256），共 514 年。相传夏代传

下来象征王权的九鼎就收藏在周王室的宗庙里。秦灭周后，九鼎迁秦，象征秦取代了周的地位。

（杨生民）

信陵君合纵攻秦

秦庄襄王三年（前 247），信陵君为魏上将军率五国军合纵攻秦，打败秦军。

前 257 年，信陵君大破秦军解邯郸之围后，留居赵国，整整 10 年。信陵君喜养士，礼贤下士。赵国有两位隐士毛公、薛公，毛公混在赌博的人中间，薛公藏在卖浆者家中。信陵君主动与两个交游，来往密切。平原君门下宾客见信陵君如此礼贤下士，有一半多都投奔了信陵君。信陵君在赵期间，秦常出兵伐魏。为抗秦国，魏王派人请信陵君回国。信陵君怕回国被治罪，不敢回去，并对门下人说：有敢为魏王使者通报的，处死。门下宾客没人敢再劝信陵君归魏。这时，毛公、薛公对信陵君说：公子所以为赵看重，名扬诸侯，是因有魏，今魏危急而公子无动于衷，如秦攻破魏国国都大梁，毁先王宗庙，公子有何面目立于天下呢？话还未讲完，信陵君脸上颜色都变了，决定立即回魏。回魏后，魏王授信陵君上将军印，统领魏军。魏安釐王三十年（前 247），秦派蒙骜攻魏，信陵君向各国求援，各国听说信陵君统魏军，纷纷派兵救魏。信陵君率五国军合纵击秦，败蒙骜所率秦军于河外，乘胜追击秦军至函谷关，秦兵不敢迎战。此时，信陵君名震天下。

秦军退回函谷关后，就派人带万金到魏国进行反间，中伤信陵君，对魏王说：公子在外 10 年，今为魏将统领魏军，各国将领都听他指挥，诸侯只知有信陵君，不知有魏王；信陵君想自立为王，诸侯也想共立他为王。秦王故意派使者伪贺信陵君立为魏王。在此情况下，魏王中计，派人代替信陵君为将。信陵君自后谢病不朝，与宾客为长夜饮，多近女色，4 年后而亡，同年魏安釐王亦亡。秦听说信陵君去世，派蒙骜攻魏，占 20 余城，设东郡。

信陵君率五国军合纵攻秦之后，前 241 年赵国庞煖还发动了一次五国攻秦，以后东方六国再未发动合纵攻秦，而秦对东方六国则各个击破、吞并。

（杨生民）

甘 罗 使 赵

秦王政时，甘罗 12 岁使赵，利用燕赵矛盾成功地进行了外交活动。

甘罗，秦武王时左丞相甘茂之孙。甘茂死后，12 岁的甘罗在秦相文信侯吕不韦门下做少庶子。吕不韦企图联燕攻赵扩大秦国占领的河间地区（河北河间县一带），让蔡泽使燕 3 年和燕太子丹在秦做人质，加强两国联系。接着，吕不韦又想让秦人张唐做燕相，以便与燕出兵伐赵。没想到张唐对吕不韦说：我曾领兵攻打赵国，赵国怨恨我，悬重赏捉拿我，去燕必然经过赵国，我怎么能去燕国呢？吕不韦为此很不高兴。甘罗问吕不韦：君侯为什么这样不高兴呢？回答说：今天我亲自请张唐去燕为相，张不去。甘罗说：请让我去对他说吧！吕不韦呵斥甘罗说：我亲自去请他不肯，你怎么能行？甘罗回答说：项橐 7 岁可以为孔子师，我已经 12 岁了，您可以试用，何必呵斥于我？得到吕的允许后，甘罗见张唐，问他：您与武安君白起相比，谁的功劳大？张唐说：武安君南败强楚，北面威震燕、赵，攻取城邑不计其数，我怎么敢与武安君相比呢？甘罗又问张唐：应侯范雎与文信侯比谁更受国王的信任呢？张唐回答：应侯当然比不上文信侯。甘罗说：你明知如此，就没想到应侯想攻赵国邯郸，武安君白起违抗，死在离咸阳七里的杜邮。现在文信侯亲自请你相燕，你不去，我不知在什么地方您会被处死？张唐感到甘罗讲的有理，立即表示愿去燕，并打点行装，准备出发。张唐出发的日子定下后，甘罗对吕不韦说：请借我五乘车，把张唐去燕的事先通知赵国。为此，秦王政召见了甘罗，同意派他出使赵国。听说秦使前来，赵襄王到郊外迎接。见面后，甘罗对赵王说：大王知道燕已派太子丹去秦做人质了吗？听说秦让张唐相燕了吗？赵王说：听说了。甘罗接着说：这两件事是燕、秦两国互相信任的表现。秦、燕和好是想攻赵，以扩大河间的地盘，大王不如给我五城，以扩大河间地盘，并请求秦国送回燕太子丹。然后，秦、赵联合攻燕。赵王认为甘罗说的有道理，立即割五城给秦，秦答应送回燕太子丹。在此情况下，赵攻燕，夺上谷郡 30 城，又拿 11 座城给秦。甘罗回国后向秦王政汇报了出使情况，秦王封甘罗为上卿，并把甘茂过去因从秦出逃被没收的田、宅，赐给了甘罗。

（杨生民）

秦王政诛吕、嫪

秦王政诛灭吕不韦、嫪毐两大势力，加强王权。

秦王政，姓嬴，名政，秦庄襄王之子，前 246 年继位为秦王，因即位时年仅 13 岁，相国吕不韦当政。

吕不韦（？—前 237），韩国阳翟（河南禹县）富商，家累千金。前 265 年左右，吕不韦在赵都邯郸经商，遇秦公子异人（子楚），异人是秦昭王之孙，安国

君(即后来孝文王)之子。异人有兄弟二十几人,自己不是长子,生母夏姬不受宠爱,所以被送至赵国为人质。吕不韦看出异人是"奇货",决定在他身上做一笔一本万利的生意。吕不韦对异人分析秦王室内的形势,表示愿帮助他做秦王位继承人,异人感激涕零,许诺若为秦王,"请得分秦国与君共之"。吕不韦先送异人 500 金,让他广为结交,又以 500 金买奇物珍玩,自己带到秦国去进行活动。到秦,吕不韦找到太子安国君夫人华阳夫人的弟弟阳泉君 ,对他说:异人在赵为人质,"贤"并且极想归秦,愿为华阳夫人之子。华阳夫人无子,如认他为子,立为嗣,由他继承王位。异人无国而有国,华阳夫人无子而有子,对华阳夫人来说可永保权势。吕不韦的话打动了阳泉君,阳泉君劝华阳夫人,认异人为子,华阳夫人又劝安国君立异人为嗣。这样,秦昭王死后,安国君继位是为孝文王,孝文王即位三天就离开人世,由太子异人继位,是为秦庄襄王。庄襄王即位,任吕不韦为相国,掌朝政。庄襄王即位三年而死,太子嬴政 13 岁即位为王,年幼,相国吕不韦当政,号称仲父。秦王政的母亲(太后),原是吕不韦在赵国经商时的宠姬,后送异人为妻,庄襄王死,吕不韦又与太后私通。这样,吕不韦便成了秦国的太上皇。从秦王政即位到成年后亲政的八年间,吕不韦在发展秦国势力方面是有贡献的。如在军事上,继续向韩、赵、魏进攻取得了一系列胜利,前 241 年粉碎了赵将庞煖率领的韩、赵、魏、楚、燕五国合纵攻秦,在文化上让门客编写《吕氏春秋》一书。然而,随着秦王政即将亲政,吕不韦权势太重,难免与王权发生矛盾,而吕不韦与太后私通又怕被秦王发现而治罪。所以,在秦王政亲政前,吕不韦就设法解脱自己。吕不韦把他的舍人嫪毐推荐给太后代替自己。太后与嫪毐私通,"绝爱之"。太后给了他很多赏赐,很多国家大事也由他决定。嫪毐的权势发展到与吕不韦不相上下,以至嫪、吕并提。吕不韦封文信侯,家僮万人,食河南洛阳 10 万户。嫪毐封长信侯,以太原郡为封地,改称"毐国",家有门客千余人,僮数千人。前 238 年,秦王政亲政,举行加冕礼时,嫪毐公然发动叛乱,秦王政果断地镇压了这次叛乱,严厉惩处了嫪毐及其一伙。在处理嫪毐案件的过程中,发现这一案件与吕不韦有牵连。次年,秦王政免去吕不韦的相国职务,并令吕不韦迁蜀。吕不韦见大势不好,自杀身亡。秦王政诛灭吕、嫪两大势力,加强王权,使秦王"独治其民",为以后统一全国创造了重要的内部条件。　　(杨生民)

荆轲刺秦

秦王政二十年(前 227),燕太子丹派荆轲刺秦王政。

荆轲,原名庆轲,卫国人,祖先是从齐迁卫的庆氏。卫国灭亡后,他到赵国,后又到燕国,改名荆轲。在燕,荆轲与长于击筑(古乐器)的高渐离和勇士田光为友。燕太子丹曾在秦当人质,秦王政待他不好,回燕后时时想报仇。当秦灭韩灭赵时,燕国危急,太子丹找勇士田光商量对策,田光年老就推荐荆轲。太子丹与荆轲一见如故,希望荆轲使秦,劫持秦王,让秦归还侵占的诸侯土地,如不答应就刺死他,而后联诸侯合纵抗秦。荆轲允诺,太子丹拜他为上卿,并给以最优厚的待遇。

王翦灭赵,秦军逼近燕境,荆轲还无动身之意。太子丹督促荆轲动身,荆轲对他说:如果不能接近秦王,到秦也无用。秦用千金、邑万户的重赏捉拿逃将樊于期,如带樊将军人头和燕督亢(河北涿县、新城、固安一带)的地图做礼物,献给秦王,秦王定会接见,这样便可见机行事。太子丹赞成荆轲的计划,但又感到樊于期投燕,杀他不合适。于是荆轲便私下见樊于期,讲了自己刺秦王的计划,并说这不仅是为燕,也是为樊将军报仇。樊于期听后说,这是我日夜在想的事情,现在才得到您的指教,说完自刎而死。太子丹听到后,痛苦致哀,命人把樊于期的头放在匣子里封好,又用高价买了把锋利的匕首,用毒药浸泡,刺人见血中毒即死,并把两件东西和督亢地图交给荆轲。太子丹又在燕找到了一个 13 岁的勇士秦舞阳,做荆轲的助手,让荆轲动身。荆轲本来约了一位朋友一同去,因路远未赶到。太子丹一再催促,荆轲对他说:太子遣我们去秦,去不能归问题可能就出在秦舞阳身上。提一匕首到强秦随时可能出问题。我之所以不急于出发,是想等朋友来一同去。太子丹认为这样太迟缓,现在就请前往。荆轲出发时,太子丹及其门客穿着白衣白帽送行,一直送到易水边,高渐离击筑,荆轲唱道:风萧萧兮易水寒,壮士一去兮不复还!声调悲壮激昂,唱罢,带着秦舞阳登车而去。

荆轲到咸阳后,先用重金买通了秦王宠臣中庶子蒙嘉,请求他转告秦王:燕王愿向大王称臣,并派人送来樊于期人头和督亢地图做进见礼物。秦王十分高兴,用隆重礼仪,在咸阳接见燕使。荆轲在前手捧装有樊于期人头的匣子,秦舞阳在后捧着装着督亢地图的匣子。走到宫殿台阶,秦舞阳突然吓得变了脸色,身子发抖,秦国官员都感到奇怪。荆轲上前对

秦王说：北方蛮夷荒僻之人，没见过天子威严，所以害怕，请大王原谅。秦王让荆轲取秦舞阳所拿地图，荆轲送上。秦王打开地图，快翻完时，发现了藏在图中的匕首。图穷匕首见，荆轲拿起匕首向秦王刺去，秦王从座位上跳起绕着宫中柱子躲避，荆轲在后追逐。秦王的佩剑剑身太长，只有把剑推上背，从背后拔，方能拔出。秦王急中疏忽，拔剑拔不出来。按秦律，群臣在殿上不许携带武器，有人就徒手与荆轲搏斗，侍医夏无且拿起药袋向荆轲打去。正在千钧一发之际，有人提醒秦王：背后拔。秦王听到，拔剑砍断荆轲左腿。荆轲将匕首向秦王投去，未中，击在铜柱上。秦王用剑砍荆轲，荆轲受伤倚柱而笑说：事情所以未成功，是因想活捉你，让你订下契约，以报答太子丹。秦王左右拥上，杀荆轲。秦王政由此深恨燕太子丹，立即下令秦军攻燕。前 226 年，秦军攻下燕都城蓟（北京市），迫使燕王杀太子丹，燕王喜迁都辽东。燕太子丹策划荆轲刺秦未能挽救燕灭亡，反而加速了这一过程。 （杨生民）

百 家 争 鸣

战国时，各学派聚徒讲学，阐发各自的学术观点、政治主张，有的还为实现主张积极奔走、游说，这种状况被称为百家争鸣。

战国时期的著名学派有儒家、墨家、道家、法家、兵家、名家、阴阳五行家、杂家等等。

一、墨家：墨家的创始人是墨子。墨子，名翟，鲁国人（一说宋国人），约生于前 468 年，卒于前 376 年。战国时，儒、墨并称显学。墨子门徒所编的《墨子》一书，是墨家思想的代表作。墨子主张“非命”，认为“命”是“暴王作之，穷人述之”。这也就是说“命”是统治者编造出来愚弄劳动人民的。墨子不相信命运，认为富贵、贫贱不是命中注定，强调人的力量可以起决定作用。所以，他说：“强必富，不强必贫”，“强必贵，不强必贱”，“强必饱，不强必饥”，又说“赖其力者生，不赖其力则不生”。这一思想反对了统治者宣扬的宿命说，让人民通过自己的努力改变自己的政治、经济地位。这在当时有一定积极意义。墨子主张“尚贤”是要求按照“官无常贵，民无终贱”的原则选贤任能，出身低贱的人只要有才能也可以当官，反对贵族的世官制度。墨子主张“节用”是要“去无用之费”，反对统治者腐化、奢侈的生活。墨子主张“节葬”、“非乐”是反对统治者厚葬和对钟鼓之乐的沉湎。墨子主张“兼爱”是要求人们之间要互爱互利，要求国君兼爱一国，天子兼爱天下。这是一种超阶级、超等级的爱，是一种空想，在当时无法实现。墨子主张“非攻”是反对强国侵凌弱国的战争，反映人民要求过安定和平生活的情绪，这在当时也无法实现。墨子讲“天志”，把天当作有意志的人格神，把天比作“匠人之矩”，是人间是非的标准。在“明鬼”中，又认为鬼神能够赏贤罚恶。这些都是宗教迷信思想。墨子主张“尚同”，认为天子“上同于天”，“上之所是必皆是之，上之所非必皆非之”，最后归结为一切以“天志”和统治者的意志为转移。这些则是欺骗、麻醉人民的毒素。墨子做过工匠，自称“贱人”，门徒多来自社会下层。墨家组成的团体，生活刻苦，服从教义，服从首领指挥。墨子以后的首领称“巨子”，代代相传。墨家后来分为三派。墨家的思想反映了当时下层劳动人民的思想要求。

二、道家：道家的代表人物是老子和庄子。一般认为老子是春秋后期楚国人，做过东周王室的守藏史，姓李，名耳，字聃，是个知识渊博的学者。成书于战国时期的《老子》即《道德经》一书反映了老子的思想。老子认为宇宙万物的本体称“道”，又叫“大”。“道”可以理解为是宇宙万事万物发生、发展、变化法则的总称谓，这样便对“道”作了唯物主义的理解。“道”也可以理解为主宰和决定万事万物的精神本体，这样“道”就成了客观唯心主义的精神本体。老子学说中含有朴素辩证法思想。认为事物中存在大小、有无、长短、强弱、祸福、生死两个方面。二者互有联系，互相转化，弱可变强，无可变有，小可变大。“祸兮福之所倚，福兮祸之所伏。”在社会政治思想方面，老子主张无为而治，统治者要清静不干涉人民的生活。在实践中这种统治方法有时能收到好的效果。老子主张返回到“小国寡民”的“绝圣弃智”的原始社会去，则是一种倒退的、落后的思想。

庄子，名周，宋国人，战国中期人，约与孟子同时，曾做过漆园吏。庄子是道家的重要代表人物，所著《庄子》一书对后世有很大影响。庄子哲学的一个特点是相对主义，把世界一切事物都看作是相对的。他认为：彼也是此，此也是彼，是也是非，非也是是。他说儒墨两家各以对方所是为非，所非为是，最后是争辩不出结果的。在庄子看来，大小之间也无区别，从大小不同角度看，你看着是大，就都是大，你看着是小，就都是小。庄子也认为道是天地万物的本源，自然界万物和鬼神、上帝、天都是由“道”生出来的。庄子所说的“道”与老子所说的“道”不同。老子说的“道”是客观存在，庄子说的“道”则是主观精神。他说：“天地与我同生，而万物与我为一。”这就是说天

地万物与我是合为一体的。天就是我，我就是天，“道”就是我，我就是“道”，世界成了我主观精神的产物。这种哲学是主观唯心主义。在社会政治方面，庄子从他的相对主义出发，认为判断社会政治是非的标准是没有的，讨论尧和桀的是非没有意义。庄子提倡一切顺从命运、安于现状。他说：“安时而处顺”，“知其不可奈何而安之若命，德之至也。”庄子的思想代表了社会大变革时没落旧贵族无可奈何的思想情绪。

三、儒家：战国儒家代表人物是孟子、荀子。孟子，名轲，邹（山东邹县）人，约生于前390年，卒于前305年。孟子曾受业于孔子孙子思的门下，是儒家学派大师。孟子原是鲁国贵族孟孙氏的后代。他曾带着弟子们游说诸侯，力图推行其政治主张，但不为诸侯所用，晚年回邹国，著有《孟子》一书。孟子主张人性善，认为人的本性是善的，仁、义、礼、智四种品德是先天固有的，如能存心养性、扩而充之，则“人皆可以为尧舜”。不过，他认为只有君子才能做到这一点，一般的劳动民众做不到。在政治思想上，孟子在人性善的基础上，提出了“仁政”和“王道”的学说。所谓“仁政”，就是要求统治者减轻对劳动人民的徭役、赋税盘剥，改善劳动者的生活条件，最要紧的是让劳动者不失去土地，“有恒产者有恒心”。这样农民不会反抗，封建统治才能巩固。孟子还认为把“仁政”推广开来，就可以实现“王道”政治，即所谓“以德行仁者王”。王者实行仁政，人民就会“心悦而诚服”地服从他的统治。如果能做到“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就可以“治天下若运之掌上”，实现封建统一。孟子的思想中有民本思想，他提出“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的思想，国君、社稷可以变置，唯独民的地位最为根本，没有他们生产，国家就不可能存在。他说尧、舜得天下，就是因为得民心，桀、纣失天下，就是因失了民心。对桀、纣这样的暴君，臣下杀死他，是合理的，不是弑君。

荀子，名况，字卿，赵国人，曾游学于齐，取得了稷下先生首领“祭酒”的地位。荀子是战国末年最有影响的儒家大师。他批判地吸收了各家之长，也批判地吸收了儒家各派之长，著有《荀子》一书。荀子主张人性恶，这与孟子人性善是对立的。荀子认为人的本性“好利而恶害”，“目好色，耳好声，口好味，心好利”，所以人性恶是先天就有的。他和孟子一样对人性所作的解释都属于唯心主义先验论。荀子认为天是自然现象，日月星辰、四时代谢、阴阳变化、风雨施降都是自然现象。所以天不是神，没有意志，因此反对迷信、巫祝、祈祷。这完全是唯物主义观点。荀子宣扬“明于天人之分”的观点，批判了“天人合一”的唯心主义思想。荀子强调人的力量，提出了人定胜天的思想。他说：加强农业而又节约用费，天怎么能使你贫困呢？又提出“制天命而用之”即掌握自然变化法则而利用它，和“官天地而役万物”的人定胜天思想。在治理国家方面，荀子主张礼、法并重。他说礼是“道德之极”。礼的基本要求是维护“上下有序，贵贱有等”的封建秩序，即维护君臣父子、兄弟、夫妇之间的封建伦理纲常。但荀子对法也很重视，他说“法者，治之端也”，可见他把法也视为治国之本。他是儒法杂糅的人物。荀子能认识人民力量的强大，把君主和人民比为舟和水的关系，并以“水则载舟，水则覆舟”的道理告诫当时的封建君主。

四、法家：战国时的法家有李悝、吴起、商鞅、申不害等人。然而，法家学说的集大成者却是战国末年的韩非。韩非，约生于前280年，死于前233年，韩国公子，与李斯同是荀子的学生。后到秦国，被李斯等人陷害，著有《韩非子》一书。韩非的历史观认为历史在不断前进、发展，不会停滞、倒退。他把历史分为“上古”、“中古”、“近古”、“当今”四个时期，并认为一个时期比一个时期进步。所以，他说“圣人不期修（循）古，不法常可”，就是不依照古法死抱一种东西不放。他认为“世异则事异”，“事异则备变”，即时代变了事物也随着改变，事物改变了做法也要改变。一个时代与一个时代斗争的方式也不同，他说：“上古竟于道德，中世逐于智谋，当今争于气力。”战国后期兼并战争激烈进行，就是要有力量。所以，韩非说：“力多则人朝，力寡则朝于人，故明君务力。”为了有力，就要富国强兵，而要富国强兵，就要推行法治。韩非的政治思想突出的是法治。他主张以法为本的法治，克服了各家的片面与不足，继承了商鞅的“法”，申不害的“术”，慎到的“势”，提出完整的法治理论。他认为君主制订了法律后，还要有权势，否则法令无法贯彻。另外，国君还要有一套控制臣下的权术，不然地位不会巩固。这种法、术、势三者结合，就成为后来推行封建专制主义的准则。韩非对法和刑的关系也有论述：他认为法是治国的规矩准绳，制订了法，就要执行，任何人也不能例外，“法不阿贵”，“刑过不避大臣”，实际主要统治对象还是人民。为执行法就要用刑。韩非主张用重刑，他说：“上设重刑而奸尽止。”所以，韩非主张的封建专制主义是和严刑峻法结合在一起的。韩非主张把封建专制主义扩大到思想领域，他说：“明主之国，无书简之文，以法为教，无

先王之语，以吏为师。”这就是要把法以外的各个学派统统加以禁止。韩非的思想为以后秦朝的统治提供了理论基础。

战国社会大变动中，兵家起了重要的作用。《孙子兵法》是春秋末杰出军事家孙武的著作，经后人改删，战国以后才广为流传。《孙子兵法》根据战争的客观规律，制定了系统的战略战术原则。它提出了在战争中要重视政治、外交斗争，经过充分准备，最好做到“不战而屈人之兵”。它提出了“知己知彼，百战不殆”，“攻其无备，出其不意”，“善战者先为不可胜以待敌之可胜”等一系列原则。它提出了使用兵力要“十则围之，五则攻之，倍则分之”等等。《孙子兵法》是一部卓越的军事著作，不仅在我国军事史上有重要地位，在世界军事史上也享有极高的声誉。孙武以后，在战国时期著名的兵家有吴起、司马穰苴、孙膑、信陵君魏无忌等人，据记载他们都著有兵法，多失传，唯《孙膑兵法》1972 年 4 月在山东临沂银雀山汉墓出土，又重新发现。

战国末以齐国人邹衍为代表的阴阳五行学派对后世思想的影响也不可忽视。邹衍把具有朴素唯物思想的阴阳说与五行说结合起来，把阴阳消长与五行相胜配合，提出五德始终说，认为土、木、金、火、水五行就是五德，历史上每个朝代代表一德，按五行相胜次序互相更替，周而复始。而主宰历史循环的则是人格神天。这一循环论的唯心主义历史观为后来两汉谶纬神学的发展提供了一个思想基础。

战国时代还有名家。名家的出现是由于社会制度发生了大变革，旧的称谓与新的内容不适应，新的称谓又没有得到公认，因而有正名的要求，这样就产生了名家。先秦的名家被称为“辩者”、“察士”。名家的代表人物有原属于道家学派的惠施和公孙龙。

战国末年，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和统一局面的来临，又出现了杂家。秦相吕不韦在秦王政八年令门人辑成《吕氏春秋》一书，公布于众。这部书力图综合先秦诸子，被称为杂家，对各家兼收并蓄，主要是对儒家、道家采取尽量吸收的态度。这部书有重要的政治意义和文化价值，对后世的影响不可忽视。

战国时期的百家争鸣，对我国后世思想文化的发展，有重大而深远的影响。　　（杨生民）

秦王政统一全国

秦王政从前 230 年到前 221 年，并灭东方六国，统一全国。

前 238 年，秦王政亲政，不到两年消灭了国内吕不韦、嫪毒两大势力，为统一全国创造了一个重要条件。秦王政重用李斯、尉缭，这两人在统一全国中起了重要作用。李斯，楚上蔡（河南上蔡县）人，荀子学生，韩非同学，年轻时曾为郡小吏，掌乡文书。李斯想做一番事业，看到东方六国衰落，就西入秦，为吕不韦舍人，不久任郎（王的侍卫），有机会接近秦王。李斯上书秦王说：秦国强大，诸侯认可，诸侯实际上已降为秦的郡县。凭秦的强大和大王贤明，灭诸侯，成帝业，如同扫除灶上灰尘一样容易，所以现在是统一天下的绝好时机。现在不抓紧时机，待诸侯复强，合纵抗秦，虽有黄帝之贤，也无法兼并了。秦王赏识他的意见，拜他为长史。李斯又劝秦王派人带重金去各国行反间，离间其君臣关系，秦王采纳了他的意见，又拜他为客卿。尉缭，名缭，尉是官名，魏国大梁人。他是个“为商鞅学”的法家，到秦后向秦王献计说，要继承范睢的远交近攻，对诸侯国各个击破，又建议秦不要爱惜财物，要出重金贿赂各国豪臣，阻止六国合纵，这样不过花 30 万金，就可收到兼并各国的效果。秦王采纳了他的建议，封尉缭为国尉，统率全国军队。

秦国自秦孝公以来，六世攻伐山东诸侯，节节胜利，在东方设置了一些重要的郡，主要有：三川郡（河南西部洛阳、荥阳、宜阳等地）、东郡（河南东北部濮阳等地）、南阳郡（河南南部南阳等地）、上党郡（山西东南长治等地）、太原郡（山西太原等地）。此外，秦还攻占楚都郢（鄢）、以其地置南郡，并夺取楚的巫郡、黔中郡，又置陇西郡、北地郡。从秦孝公至秦王政这 120 余年中，秦消灭东方六国 150 多万军队。秦国据有了天下三分之一的土地，十分之六的财富。秦国统一全国的条件成熟了。

在秦王政的组织、领导下，一场空前的统一战争开始了。秦王政采纳李斯、尉缭的建议，集中力量、选择弱点、各个击破；先灭韩，再及两翼，最后灭齐，完成统一。

战国末，韩国所辖地区在今河南中部，韩国又是六国中一个比较弱小的国家。先灭韩，实现中间突破，有利于并灭六国。前 230 年，秦王政派内史腾率兵进攻韩国，虏韩王安，韩亡，并在所得韩地置颍川郡（郡治在今河南禹县）。前 229 年，秦又利用赵国前两年发生大地震、大灾荒之机，派王翦等人率兵攻赵。赵派李牧、司马尚领兵抵抗。李牧是抗击匈奴的名将，所领军队战斗力很强。李牧的军队曾几次打败秦军，秦军一个叫桓齮的将领也被赵军杀死。秦将王翦用重金收买了赵王宠臣郭开，郭开散布流言说李

牧、司马尚谋反。赵王很昏庸，轻信流言，改以赵葱、颜聚二人统率赵军，李牧不受命，被杀。王翦乘机大举进攻。前 228 年，秦军入邯郸，俘赵王迁，赵亡。太子嘉带着一些人马逃到代郡（河北蔚县东北），称代王。

前 227 年，秦攻燕。燕太子丹的师傅鞠武主张联合诸侯共同抗秦。太子丹认为这是远水救不了近火，所以派荆轲去刺杀秦王，想以此挽救自己的灭亡，没想到荆轲没有成功，反而激怒了秦国，加速对燕进攻。燕联合代王赵太子嘉，共同抗秦。王翦在易水西击败燕、代联军。前 226 年，秦军攻入燕都蓟（北京市），燕杀太子丹谢罪。燕王喜迁都辽东。

前 225 年，秦派王翦的儿子王贲率 10 万大军攻打魏国，秦军围攻魏都大梁（河南开封西北），秦引黄河、鸿沟的水灌进大梁城内，三个月后秦攻破大梁城，魏王投降，秦杀魏王假，魏亡。

同年，秦攻楚。攻楚前，秦王问青年将领李信灭楚要用多少人马，李信说需要 20 万。秦王又问老将王翦需要多少人马？王翦说需要 60 万。秦王认为王翦老了，李信壮勇，于是派李信、蒙恬率 20 万人伐楚。秦王未用王翦，王翦告老还乡。李信开始打了几次胜仗，至城父（安徽亳县东南），被楚将项燕打败。李信回秦被革职。秦王亲自请王翦，王翦说非 60 万人不可，秦王答应。王翦总结李信轻敌冒进的教训，采取屯兵练武、坚壁不战、以逸待劳的策略。过了一年多，楚军因粮草不足、斗志松懈，开始向北撤退时，王翦趁机追击。前 224 年，在平舆（河南平舆北），大破楚军，至蕲（安徽宿县东南），杀楚将项燕。前 223 年，秦攻占楚都寿春，虏楚王负刍，楚亡。秦又平定了楚属百越地方，统一了南方。

前 222 年，秦王派王翦的儿子王贲率兵攻辽东，俘燕王喜，燕亡。接着，又回军攻代，俘代王嘉，代亡。秦统一了北方。

前 221 年，王贲又率秦军从燕南下攻齐，几乎没有遇到什么抵抗，就攻进了齐都城临淄，齐王建投降，齐国灭亡。齐相后胜，接受了秦国大量贿赂，劝齐王和秦国修好，不做抗秦准备，说明秦国收买山东豪臣的办法起了作用。灭齐后，秦统一了中国。

从前 230 年灭韩开始，到前 221 年灭齐，前后 10 年，秦王政完成了统一全国的大业，在中国历史上，建立了第一个统一的多民族的中央集权的封建国家。从此，中国的历史揭开了新的一页。

（杨生民）

秦

建立封建专制集权的中央国家机构

秦王政二十六年(前 221)统一六国后,为适应新的形势,建立了封建专制集权的中央国家机构。

秦统一前最高统治者称王,秦王政感到称王不能显示其尊贵,统一后的当年就对臣下说:"今名号不更,无以称成功,传后世。"于是令臣下议帝号。丞相王绾、御史大夫冯劫、廷尉李斯等说,陛下功德上古以来未尝有,五帝所不及。古有天皇、地皇、泰皇,泰皇最为尊贵,臣等冒死上尊号王为泰皇。秦王政说,去泰留皇,采上古帝位号,号曰:"皇帝"。从此,皇帝成为最高统治者的称号。皇帝二字在古代是神圣的,皇是"天人之总称",而"得天之道者为帝"。同时还规定,皇帝下的命令称为制和诏,皇帝自称"朕"。由于秦王政第一个称皇帝,所以自称始皇帝,后世以数计,称二世、三世,以至万世,传之无穷。秦始皇取消谥法,不许下一代皇帝为上一代皇帝起"谥号"。

皇帝之下,设丞相、太尉、御史大夫,合称三公。秦国原有相、相国,统一后称丞相,"金印紫绶(丝带)",辅佐天子,"助理万机",为文官之长。秦原有尉、国尉,统一后称太尉,"金印紫绶",掌武事,为武官之长。御史大夫,"银印青绶,掌副丞相",地位仅次于丞相。

三公之下,设九卿,实际比九多,多为秦原有,少数为统一后增设,九卿分掌具体政务,主要有:一、郎中令:掌宫殿正门、偏门,负责保卫皇帝和传达,下属有大夫、郎中、谒者。二、卫尉:掌皇宫警卫屯兵,下属有丞。三、中尉:负责京畿保卫,下属两丞。四、奉常:掌宗庙礼仪,下有丞。五、太仆:掌皇室车马。六、廷尉:全国最高司法官,掌刑罚,下有正、右监。七、治粟内史:掌谷货,下有两丞。八、少府:掌供应皇室的山海地泽之税和官府手工业制造,下有两丞。九、宗正:掌皇室宗亲属籍。十、典客:掌国内民族事务与外事。十一、主爵中尉:掌列侯。三公与诸卿议论政务,最后由皇帝裁决。

秦始皇建立的封建专制集权中央国家机构的特点是皇帝一人独揽大权。三公分掌政、军、监察,互不统属。丞相总领朝廷集议、上奏、上计,协助皇帝处理政务。御史大夫则有权监察百官,复查上奏、上计,随时可向皇帝进谏,这就形成了对相权的牵制。太尉虽为武官之长,实际只有带兵权,而发兵、调兵权又完全操在皇帝之手。发兵时,皇帝可临时派大将统兵。在上述情况下,最后决断大权只能归于皇帝。

(杨生民　施　红)

废分封、立郡县

秦始皇二十六年(前 221)统一六国后,废除分封制,在全国推行郡县制的地方行政机构。

经春秋、战国时期的发展,战国后期出现了郡县两级制的地方行政组织。然而,由于古代传统的分封制度影响深远,秦统一后,丞相王绾主张实行分封制,理由是:诸侯灭亡不久,燕、齐、楚地区遥远,不分封诸侯,难以统治。所以,请分封诸子。群臣支持这一意见。廷尉李斯反对,认为:周文王、武王分封同姓子弟很多,后来亲属疏远,互相攻杀,如同仇敌,诸侯互相攻伐,周天子无力禁止。今海内统一,全国已置郡县。诸子及功臣可赐给公赋和重赏,这样便于控制。这是使天下安宁的办法,分封诸侯不利。秦始皇认

为：天下所以苦战不休，就是因为有诸侯王。今天下初定，又分封立国，是树敌，要天下安宁息事，岂不困难！于是采纳李斯意见，废分封，在全国推行郡县制。秦始皇统一六国后，在全国置36郡，后随疆域扩大，增至40多郡。郡设守、尉、监御史，守掌政事，尉掌军事，监御史为统一后增设，掌监察。郡下设县，置令或长（万户以上设令，以下设长），掌政务；尉，掌军事；丞，为令（长）助理，并管司法。郡、县主要官吏都由中央任免、调动，彼此有分工、牵制，利于中央控制。县下设乡，乡设三老掌教化，啬夫掌司法和税收，游徼掌治安。乡下有亭、里，亭有亭长，里有里正，负责最基层的有关事项。

废除分封制，在全国推行郡县两级地方行政管理机构，对巩固统一和中央集权有重大作用，对我国以后历史发展有着深远的影响。

（杨生民 王勇华）

统一文字、货币、度量衡等制度

统一六国后，秦始皇在全国统一了文字、货币、度量衡等制度。

秦统一前，各国的文字、货币、度量衡、车轨和道路宽狭都不统一，不利于各地的来往交流，阻碍了社会发展。秦统一后，秦始皇以秦国原来的制度为基础，统一了文化、经济等各方面的制度。

一、统一文字：秦统一前，各国"文字异形"。周朝的文字笔画繁琐，称大篆或籀文。战国时，齐鲁等地通行一种比较简便的文字，称古文、蝌蚪文。秦统一后，李斯订定文字，据秦原有文字，参考大篆、古文，笔画力求简单划一，制定秦篆，或称小篆。这种文字与大篆相比，偏旁形体统一固定和笔数、笔顺基本固定，简便、易认、易写。李斯作苍颉篇、赵高作爰历篇、胡母正作博学篇，用小篆写成，在全国推行，作为标准文字。同时，又以狱吏程邈制作的更为简便易写的称为隶书的文字作为日用文字。这样，小篆和隶书就成了全国通用的文字。

二、统一货币：秦统一前，各国货币的形状、大小、轻重不同，有流通于韩、赵、魏地区的布钱，有流通于齐、燕、赵等国的刀货，有流通于秦、二周和赵、魏沿黄河地区的圜钱，有流通于淮河流域以南和长江中下游楚国地区的郢爰和蚁鼻钱。计算重量的单位有的用斤（16两），有的用镒（20两）。秦统一后，废止战国时各国的货币，规定货币为两种：黄金为上币，以镒（20两）为单位。圆形方孔的铜钱为下币，以半两为单位。

三、统一度量衡：秦统一前，各国的度量衡制度混乱。统一后，秦始皇按秦原有制度统一全国度量衡。前221年，颁统一度量衡的诏书，诏书共40字，制造度量衡器都得刻上这一诏书，作为标准器推广使用。统一后度制单位为寸、尺、丈、引，采十进位制；量制单位为桶（斛）、斗、升、合、龠，二龠为一合，其它为十进位；衡制单位为铢、两、斤、钧、石，24铢为一两，16两为一斤，30斤为一钧，四钧为一石。据测定数据，秦一尺约合今0.23公尺，秦一升约合今0.2公升。战国时田亩大小不同，秦规定六尺为步，240方步为亩。

四、车同轨、修道路、去险阻：秦统一前各国道路、车辆宽窄不一，各国之间修筑了不少要塞、城郭、壕沟。秦统一后，令车同轨，车宽六尺。秦始皇二十七年，下令修驰道，以首都咸阳为中心，一条东通燕、齐地区，一条南通吴、楚地区。道宽50步，道旁每隔三丈植青松一株。秦始皇二十八年，又令蒙恬修"直道"，由咸阳经云阳至九原郡，全长1800余里（合今1400里）。又在云贵地区"通五尺道"，修筑攀越五岭通百越的"新道"，开凿沟通湘江与珠江的灵渠。秦统一后，又去险阻，对国内原各国间长城、壕沟、要塞统统平毁。

秦统一后，秦始皇根据秦法，统一全国的法律制度，把严峻的秦法推行到全国。秦始皇三十一年，秦始皇又颁布"令黔首（民）自实田"的法令，在全国以法律形式确定封建地主土地占有制度。

秦始皇这一系列的措施，有利于加强全国统一，有利于经济、文化的发展，同时也有利于加强其封建专制统治，对我国后世都有深远影响。

（杨生民 施 红）

南平百越

秦始皇二十六年（前221）至三十三年间，为平定南方越人而采取的重大措施。

中国古代的越人分于越、东越、闽越、南越、西瓯诸支。于越以今浙江绍兴为中心，春秋时曾建立越国，后为楚所灭。秦王政二十四年，王翦灭楚后率秦军南进，占领于越地区，置会稽郡（郡治今江苏苏州）。今浙江南部瓯江流域温州一带的越人称东越或瓯越。今福建福州一带的越人称闽越。南越在今广东，西瓯在今广东西南部、广西南部一带和云南东部。百越是越人的总称。秦始皇统一六国时，越人一般处于原始社会阶段，从事渔猎、农业，各部落、氏族分散于广大地区，互不统属。

秦始皇二十六年统一六国后，令尉屠睢发卒50万，分五路向上述越人地区进攻。一路由今江西南康县境一带向东攻取东越、闽越，当年平定，置闽中郡(郡治今福建福州)。有两路取南越，一路由南昌经大庾岭入广东北部，一路由长沙经骑田岭抵番禺。这两路都未经多大挫折取胜。其余两路进攻西瓯，一路由萌渚岭进入广西贺县，一路经越城岭取广西桂林及其以南地区。这两路军队遇到了大的困难、挫折。这主要是由于：河道纵横、运粮困难。为解决这一问题，令监禄开凿灵渠，沟通了长江、珠江两大水系的交通，解决了运送军粮的困难。另外，西瓯人顽强抵抗，秦军统帅尉屠睢战死。大约经过三年，到秦始皇二十八年西瓯平定，北响户以北地区成为秦朝疆域，后来这一地区可能又进行反抗。所以，秦始皇三十三年，又征发“亡人、赘婿、贾人略取陆梁地”。“陆梁地”即今广东、广西及其以南地区，并取得胜利，置桂林、象郡、南海三郡，并令50万人戍守。秦始皇南平百越奠定了以后中国东南和南方疆域的基础，对当地的开发和经济、文化的发展以及中原文化的传播都起了积极作用。　(杨生民　王勇华)

开　灵　渠

秦始皇统一六国后，为开拓岭南，运输军粮，开凿的一条沟通湘、漓二水的运河。

灵渠，又称零渠或澪渠，因漓江又称灵河，故灵渠便由此得名。另外，因灵渠在今广西兴安县境，所以也称兴安运河。秦始皇统一六国后，派尉屠睢率秦军开拓岭南，为运输军粮，沟通湘、漓二水，联系长江、珠江两大水系，令监禄督率士卒在今广西兴安县境开凿的运河。灵渠的主要工程有以下三项：一、铧嘴：铧嘴是分水坝，建在湘水支流海洋河中，形似犁铧，用石筑成，尖端与河水流向相对，使海洋河水一分为二，分别流入南渠、北渠。二、大小天平：大小天平是拦河坝，位于铧嘴尾端，用石筑成的“人”字形堤坝，高度低于河水堤岸。与北渠口相接、同河水东岸相近的一段称大天平，与南渠口相接、同河水西岸相近的一段称小天平。天平的作用是拦河蓄水，提高湘江水位，枯水期，则大小天平拦截河水入渠，以便水运。大水季节，洪水可漫过天平坝顶，流入海洋河故道，减缓水势。经过这种调节，可使渠水涨而不溢，枯而不竭，经常保持一定的安全流量，以便水运。这是灵渠治水的巧妙之处。三、渠道：渠道分南渠、北渠。南渠全长约30多公里，其中有4.5公里为人工开凿，以下则利用原有河道南进。南渠与漓江上游的大溶江连接，沟通了漓江。北渠长约4公里，通入湘江。这样，灵渠便连接沟通了湘江、漓江，成为连接中原与岭南地区的水路通道，除水运之外，还可用于灌溉。

汉代以后对这条运河常有改建疏浚。如陡门为唐代宝历(825—826)年间李渤主持修渠时所创建，经陡门的拦阻，水位提高，流势平畅，便利了航运。陡门多建于水流湍急、渠道浅狭之处，其作用如同后世的船闸。

灵渠的开通，使北方物资可运至南方，为秦始皇开拓岭南的成功起了积极作用。灵渠的开通，对以后两千多年中原与岭南地区的联系，促进岭南地区经济、文化的发展，均有深远的意义。不仅如此，灵渠在中国和世界古代的水利工程史上也占有重要地位。

(杨生民　王勇华)

北　击　匈　奴

秦始皇三十二年(前215)至三十六年为解除匈奴的威胁而采取的军事行动。

匈奴，胡人的一支，主要分布在蒙古高原，南至阴山，北至贝加尔湖附近，东邻东胡，西界大月氏。主要从事游牧业，逐水草而居。远古时，匈奴就与中原地区有密切的经济、文化交往，战国以后逐渐由原始社会向奴隶制过渡，经常骚扰中原，劫掠财物、人口。战国末，与匈奴为邻的燕、赵、秦三国对匈奴取守势。秦统一前夕，头曼统一了匈奴各部，对中原威胁更甚。秦始皇三十二年，燕人卢生受命入海寻求仙人，回来上谶纬图书，内云：“亡秦者，胡也。”秦始皇于是令蒙恬率30万大军北击匈奴，一举攻占河南地(河套地区)。秦始皇三十三年，秦军又渡黄河攻占高阙、陶山、北假等地，并在榆中以东、黄河以北到阴山的地区内设置了34县，把有罪的官吏和内地民人迁去进行开垦。同时又把从前秦、赵、燕三国北方长城连起来，筑成长达五千余里的长城。秦始皇三十六年，又迁内地居民3万户到北河、榆中屯垦。上述措施，对防御匈奴侵扰、开发边地和中原文化的传播，都起了积极作用。　(施　红)

修　长　城

秦始皇三十三年(前214)，为防御匈奴，令蒙恬修筑万里长城。

城墙是古代防御性建筑。战国时，为防止北方游牧民族东胡、匈奴的掠夺骚扰，燕国、赵国、秦国都曾在北方边境修筑长城。燕将秦开破东胡，拓地千余里

后，燕筑北长城，西起造阳（河北省怀来县一带），东至襄平（辽宁省东部辽阳市境）。赵国在赵武灵王时，北破林胡、楼烦后，筑长城。长城自代（河北省蔚县东北），向西沿阴山山脉至高阙（内蒙古杭锦后旗东北）。秦国于秦昭王时在陇西、北地、上郡筑长城，长城西起临洮（甘肃岷县），向东而北至今陕西安塞县境分为两支：一支至秦上郡治所肤施附近（陕西榆林东南），一支抵达今内蒙古鄂尔多斯准格尔旗十二连城附近的黄河岸旁。

秦统一六国后，秦始皇三十二年，派蒙恬率30万大军北击匈奴，攻占河南地（河套地区），次年渡黄河攻占高阙、陶山等地，大规模修筑长城，把从前秦、赵、燕三国的北方长城连接起来，筑成了一条西起临洮，向东北经河套地区过黄河沿阴山、燕山直达辽东的长城。长城蜿蜒五千余里，世称万里长城。从现存秦长城的遗迹看，长城多夯土筑成或石砌，墙身平均高7.8米，墙基宽6.5米，顶部宽5.8米。万里长城是古代世界上最伟大的建筑工程之一，是中国古代劳动人民勤劳与智慧的结晶，对保卫长城内农业地区各族人民的生产、生活起了积极作用。

（杨生民　施　红）

焚书坑儒

秦始皇三十四（前213）及三十五年为维护统治在思想文化领域内采取的两项措施。

焚书是由应不应实行分封制的争论为导火线而引起的。秦始皇建立了封建专制主义中央集权的国家机构。为巩固统一、反对分裂割据，废除分封制，在全国推行郡县制。然而传统的分封制影响深远。一些人认为不实行分封制，统治不能长久。实行分封制，不仅旧的六国贵族残余势力支持，一些有可能被分封的秦国王族子弟、功臣也支持。另外，战国时学术上百家争鸣，儒生与各学派士人游说诸侯猎取功名利禄，秦始皇实行封建专制集权影响他们的仕途，所以一些儒生、游士也主张实行分封制。秦始皇二十六年（前221）丞相王绾、群臣主张在边远地区实行分封制，被秦始皇否定。秦始皇三十四年，博士齐人淳于越上言说，商周统治长久，就是因为分封子弟功臣为枝辅，“事不师古而能长久者，非所闻也”。丞相李斯为杜绝“诸生不师今而学古，以非当世，惑乱黔首”，“人善其所私学，以非上之所建立”，建议焚书，得到秦始皇的同意后执行。当时规定所焚之书为：各国史记、百姓私藏的诗、书、百家语，至于秦国史书、博士官收藏的图书和医药、卜筮、种树之书不在此列。所焚书籍必须在命令下达后30日内上交地方官府焚毁。为执行焚书令还规定：有敢偶语诗书者弃市，以古非今者族。吏见知不举者与同罪，令下30日不烧黥为城旦（四岁刑）。不难看出，秦始皇贯彻焚书令是坚决的。焚书是对古代文化典籍的一次大毁坏，造成的后果无法弥补。

秦始皇三十五年，又发生了坑儒（活埋儒生）。坑儒是因方士侯生、卢生欺骗、诽谤秦始皇而后逃亡为导火线而引发的。秦始皇晚年求长生不老，侯生、卢生为其求长生仙药而受宠幸。然而这种欺骗行为不能长久，为此二人慌恐，于是以秦始皇贪于权势，未可为求仙药为借口逃亡而去。秦始皇闻讯大怒，认为侯生、卢生诽谤他，进而又认为：诸生在咸阳者以妖言惑乱黔首，于是使御史案问诸生，诸生互相揭发告引，牵连460余人，全部被活埋在咸阳。这就是著名的坑儒。在这一事件处理过程中，秦始皇的长子扶苏也认为太残暴，说：天下初定，百姓未安，诸生皆诵法孔子，现都以重法惩处，恐天下不安。秦始皇不听，反加贬斥，令他到上郡监蒙恬军。坑儒激起儒生的不满，陈胜、吴广起义后，孔子后裔孔鲋等儒生投奔义军就是明证。

秦始皇是中国历史上的杰出人物。为维护统治，在废分封、立郡县等问题上力图消除反对意见是正常的，诛杀一些坚决的反对者也是可以理解的，但焚书坑儒则是愚蠢、野蛮和残暴的行为，结果走向了反面。后世也把焚书坑儒视为秦始皇残暴行为的象征。

（杨生民　王勇华）

修阿房宫、骊山墓

秦始皇修建的宏伟奢华的宫殿与陵墓。

秦始皇生活上穷奢极欲，大量修筑奢华宫殿。秦都咸阳和故都雍本已有不少宏丽宫殿，秦始皇仍继续修建，在对六国战争中，每灭一国就仿照该国的宫殿在咸阳盖同样的宫殿。秦始皇时，关中有宫殿300座，关外有400余座，咸阳附近200里内有宫观270座。秦始皇三十五年（前212）以咸阳人多、先王宫廷小为由，乃营作朝宫于渭南上林苑中，先作前殿阿房，阿，近也，以其距咸阳近而名，后这座宫殿被称为阿房宫。阿房宫前殿东西500步，南北50丈，殿上可坐万人，下可处五丈旗，四周有阁道通行，从殿下直抵南山，以南山之殿为门阙。修复道（架空的道或上下道）从阿房宫过渭水，直达咸阳。阿房宫建筑群与天上的北极星、飞渡银河的阁道星等星空格局吻合。建材来自全国各地，有北山的石料，荆楚、蜀山的木

材。宫的栋、梁都是用梓木、檀香木,宫门用磁石做成,以防刺客带兵器潜入。宫内装饰华丽,饰有夜光璧,陈犀象珍玩。挂的青玉五枝灯,高七尺五寸,雕刻的蟠龙,以口衔灯,灯点燃后,龙鳞甲晃动,栩栩如生。宫中还陈设有12个铜人,手中各执琴、筑、笙、竽等乐器,据说能演奏出音乐。传说有面方镜能照见人五脏,另有一个不用钩而自卷的帘。秦始皇为了尽情享受,把俘获的诸侯妃嫔美人都充入自己的众多宫殿中,命令她们穿华衣艳服,唱歌跳舞,供自己作乐。

1974至1975年,考古工作者在咸阳附近的牛羊村发掘出一号宫殿,从遗址可看出这组宫殿建筑宏伟,分布对称,各殿之间有飞阁复道相连。主体宫室建于高台之上,四周环绕着层层叠叠的宫室。在八室西邻的九室还发现壁画的残痕。宫殿的建筑结构精美。考古发现说明,秦始皇所修阿房宫规模之大,构筑之华丽,绝非后人虚构。

骊山墓是坐落在骊山北麓的秦始皇墓。秦始皇刚即王位就开始为自己修墓,直到死时还未完工,历时38年。大规模的修建据推测始自秦王政十七年,三十五年又征发70万刑徒分作骊山墓、阿房宫。陵墓地势辽阔,南靠骊山,树林葱郁,层峦叠嶂;北临渭河,河水逶迤,风景极佳。陵园平面呈南北长、东西窄的长方形。有内外两城。外城四道门,内城六道门,都建有门阙。内城分南北两部分,北半部又分东西两区,是寝殿、便殿及后宫女嫔陪葬墓。南半部是秦始皇的墓,土基近似方形。据记载,墓高50余丈,周围长五里多。墓穴地宫深达三层泉水之下,用铜汁浇铸,涂上丹漆才放置棺椁。为充分表现皇帝的尊严,墓中构造、陈设与生前宫殿一样:亭台楼阁环绕,珠宝珍玩堆积;雕塑了文武百官依次排列;墓室穹顶绘天文星宿图像,镶嵌明珠以作日月星辰。下边摹拟九州五岳的地理形势,以水银为百川江河大海,沙棠、沉檀造的船浮游其中,金银做的雁、凫,琉璃做的龟、鱼嬉戏其间,用玉石制的松柏点缀陆地。据说人鱼油脂做的蜡烛能燃很长时间。为了防止后人盗墓,在入口处设有自动发射的机弩。秦二世甚至在骊山墓完工之后,下令把数千名营造陵墓的能工巧匠关闭墓中,以防泄密。把1万名宫女也埋进墓里。

现已查明,秦始皇陵外城南北长2156米,东西宽940米,周长6210米,面积2035100平方米。陵园内发现大型建筑遗址多处,有大量的青石、砖瓦。已出土的巨型夔纹半圆形瓦当,直径61厘米,高48厘米,比一般瓦当高4倍。1961年和1982年科学工作者用化学探矿法对陵墓封土进行含汞测量。在12000平方米的面积内,发现强烈的汞反应,证实了《史记》中始皇陵"以水银为百川江河"的记载。举世闻名的秦始皇陵兵马俑坑在陵园正门的外边。它是始皇陵的三个从葬坑,规模相当宏伟,采用的是多兵种的混合编队,象征御林军。1号坑呈长方形,有兵马俑6000;2号坑战车89乘,车兵261,陶马356,骑兵俑116,鞍马116,步兵俑600余;3号坑为军阵的指挥部,有战车一组及64名执殳武士俑,充分反映了秦军的强大。

从文献记载和考古发现都可以看出,秦始皇修筑的宫殿、陵墓规模宏伟、布局严整、构思奇特、陈设精美。它反映了秦始皇穷奢极欲的生活享受,对劳动人民的残酷剥削压迫,也反映了中国古代劳动者的高度智慧和建筑工艺水平。它是古代人类文化发展史上的奇观!　(施　红)

泰山封禅

秦始皇二十八年(前219),去泰山祭祀天地表示自己受天命的一种隆重典礼。

封禅起源于春秋、战国齐、鲁儒生适应趋于统一而提出的祭祀,是一种表示帝王受天命有天下的大礼。齐、鲁儒生认为泰山是天下最高的山,人间最高的帝王应到这里去祭祀至高无上的上帝。由于是望山川而祭所以称为望祭。封是祭天,禅是祭地,所以名为封禅。封禅之礼,最早见之于《管子·封禅篇》,此篇虽佚,《史记·封禅书》却保存了先秦封禅的传说与记载。但是否先秦真有帝王进行过封禅还有待证明。第一个举行封禅大典的是秦始皇。秦始皇二十八年,即统一六国后的第三年,东巡郡县,清除车道,从泰山南道登上顶峰,立石,按原来秦国祭祀雍上帝的典礼举行了封礼。后世注家说,举行封礼时,要积土于泰山上,为坛而祭,意思是增天之高,归功于天。举行封礼后,从泰山北道下来,又到梁父山(山东新泰县西)举行了禅礼。后世注家说,禅礼,系开广土地之意,举行禅礼时刻石颂功,内云:"祗颂功德,诸产得宜,皆有法式"云云。举行封礼后,从泰山北道下山时,遇暴风雨,秦始皇在一棵树下休息,因此封此树为五大夫。封禅以后,秦始皇了结了一件大事,继续向东方巡视,在琅邪又刻石颂功,内云:"六合之内,皇帝之土,西涉流沙,南尽北户,东有东海,北过大夏,人迹所至,无不臣者"等等,反映秦始皇踌躇满志的心情。此举对后世影响甚大,以后各朝好大喜功的君王,当其功成名就之时,往往召集臣僚议论或进行过封禅。　(杨生民　施　红)

沙丘之变

秦始皇三十七年(前 210)在沙丘病死后,赵高主谋与胡亥、李斯改遗诏,立胡亥为太子。

秦始皇三十七年第五次巡行郡县,随行的有左丞相李斯、少子胡亥、宦官赵高等人,从咸阳出武关过会稽(江苏苏州),又北上至琅邪、芝罘,而后西还,在沙丘(河北广宗西北)病死。死前曾令赵高为书赐公子扶苏曰:"与丧,会咸阳而葬",意思是等他死后,在咸阳安葬他。秦始皇有二十几个儿子,扶苏是长子,皇位当然应由扶苏继承。诏书封好,未交使者送出,秦始皇就病死了。李斯考虑到皇帝死在外地,未正式立太子,恐天下有变,秘不发丧,棺材放在辒凉车中,派亲幸的宦官陪乘,照常奉上食物,百官奏事如故,宦官即从车中准其所奏,只有胡亥、赵高、李斯及亲幸的宦官五、六人知皇帝死。

赵高,赵国国君疏远的亲属,兄弟数人,皆生隐宫,因其母受刑,出身卑贱。赵高因通狱法,被提为中车府令兼行符玺令事,私事公子胡亥,教其决狱。赵高与蒙恬弟蒙毅有很深的积怨。蒙恬祖父蒙骜、父亲蒙武都是秦国名将,战功卓著,秦始皇令蒙恬统 30 万大军威震匈奴,蒙毅也位至上卿,以忠信,深得秦始皇的信任。赵高有大罪,秦王政交蒙毅法治,蒙毅依法判处赵高死刑,除其宦籍。秦始皇以赵高敏于办事,赦免,复其官爵。秦始皇死后,赵高深怕扶苏继位,信任蒙恬兄弟于己不利,欲立胡亥为太子。为此,施展阴谋,对胡亥、李斯多方劝诱。胡亥、李斯为自身的权位、安危,赞同了赵高。于是三人合谋,诈称丞相李斯在沙丘受秦始皇遗诏,立胡亥为太子。又以秦始皇之名赐扶苏、蒙恬书,指斥二人率师数十万屯边,十有余年,士卒多耗,无尺寸之功;说扶苏数次上书直言诽谤我所为等等是不孝,赐剑令自裁;说蒙恬为人臣不忠,赐死。扶苏在上郡接书自杀,蒙恬不肯死,被囚楚。

赵高、胡亥等人急从沙丘抵井陉、九原,时逢暑天,辒凉车上尸体发臭,令载鲍鱼一石,以乱其味。路途得使者还报知扶苏已死,胡亥、李斯、赵高大喜,至咸阳,发丧,胡亥继位为二世皇帝。　(施　红)

陈胜起义

秦二世元年(前 209)爆发的中国历史上第一次大规模的农民起义。

秦始皇统一中国后,实行了一系列符合社会发展的措施。这些措施如北击匈奴、南平百越、修长城、筑灵渠等都是建筑在残酷剥削压迫劳动人民的基础上而进行的。秦始皇为满足自己穷奢极欲的生活享受,又修骊山墓、阿房宫等,更加重了人民的负担。史书上说秦代"力役 30 倍于古,田租口赋盐铁之利 20 倍于古",对人民的剥削常超过收入的三分之二。农民处于"男子力耕不足粮饟,女子纺织不足衣服"的境地。再加上刑罚苛暴,造成了"赭衣塞路,囹圄成市"的状况。秦二世时,更加残暴,出现了"刑者相伴于道,而死人日成积于市"。人民在死亡线上挣扎,再也无法忍受,于是爆发了陈胜领导的农民大起义。

陈胜,字涉,出身雇农,阳城(河南登封县东南)人。吴广,阳夏(河南太康县)人,出身贫苦农民。他们都是戍卒的屯长,在秦二世元年七月,与一批贫民一起被征发到渔阳(北京市密云县西南)屯戍。这一批 900 戍卒走到蕲县大泽乡(安徽宿县西南)时,因遇大雨,不能按期到达渔阳,按秦法当斩。陈胜、吴广商议说:现在逃亡是死,起事也是死,同样是死,不如为国而死。于是二人决定发动起义,以已被赐死的公子扶苏和楚将项燕的名义,发动农民反秦。为提高陈胜的威望,他们在帛上写了"陈胜王"三字,放于鱼腹中,戍卒买鱼得书,传为怪异。又在住地旁的从祠篝火狐鸣,呼曰:大楚兴,陈胜王。接着,陈胜、吴广率戍卒杀死押送他们的将尉,举行了起义。附近农民斩木为兵、揭竿为旗,加入义军。义军攻下大泽乡,又攻下蕲县,令葛婴率部分义军东进,主力则向西北进攻,攻下铚(安徽宿县西南)、酂(河南永城西南)、苦(河南鹿邑县东)、柘(河南柘城县)、谯(安徽亳县)、豫北、皖东等地。当义军攻占陈县(河南淮阳)时,已发展成有兵车六七百乘、骑兵千余、步兵数万人的军队。攻占陈县后,陈胜自立为王,号张楚,即张大楚国之意。又以吴广为假王,监诸将西击荥阳(河南荥阳),令武臣、张耳率军攻赵地,邓宗攻九江郡,周市进攻魏地。陈胜又令周文统率 10 万大军进攻关中,直指咸阳。沿途大量农民参加义军,军队至函谷关时,已有兵车千乘,卒几十万人。大军进至距咸阳百里的戏(陕西临潼县境)。在这一过程中,各郡县的农民纷起杀死秦朝地方官吏,响应义军。原来六国的贵族、官僚也纷纷参加反秦斗争,如武臣、张耳、陈余等等。有的儒生也投奔义军举起反秦旗帜,如孔子八世孙孔鲋等。

义军至戏,使秦君臣震恐,急令少府章邯把修骊山墓的刑徒、奴产子编成军队击周文军,周文兵败,退出函谷关。武臣取赵地后,在张耳、陈余等人怂恿下自立为赵王。陈胜为了大局予以承认,并令武臣率

兵西上营救周文，武臣拒不服从。武臣令韩广取燕地，韩在燕旧贵族怂恿下，自立为燕王。周市率军至魏南部和齐境内，齐贵族田儋自立为齐王，并攻击周市军。周市退回魏地立魏贵族魏咎为魏王，并派人从陈胜那里迎回魏咎，周市又自为魏丞相。这些旧贵族只顾窃据地盘，发展自己的势力。这就使陈胜领导的农民起义军处于正面受秦军攻击又有后顾之忧的困难处境。

秦二世二年，章邯在渑池大破周文军，周文兵败自杀。接着，章邯率军向东逼近荥阳。吴广率军围荥阳，李斯子三川郡守李由守荥阳，吴广久攻不下，屯军城下。这时，吴广与其部将田臧意见不合，田臧假借陈胜令杀吴广，留李归等围荥阳，自己领兵迎击章邯所统秦军，二军战于敖仓，田臧兵败被杀。章邯又乘胜进击围困荥阳的李归义军，李归兵败而死。章邯又乘胜进攻起义军的中心地陈县，陈胜兵败退至下城父(安徽蒙城西北)，陈县失守，陈胜被叛徒庄贾杀害。陈胜的部将吕臣率领苍头军，反击秦军，收复陈县，处死庄贾。陈胜领导的起义军只有半年就失败了。虽然如此，杰出的农民领袖陈胜领导的义军所掀起的反秦浪潮，却汹涌澎湃，倾覆了秦朝的暴虐统治。　(杨生民　施　红)

赵高专权

秦二世庸碌无能，一切大事听任赵高决断。

秦二世继位后，赵高为郎中令，掌宫殿门户，受重用。赵高阴险狠毒，与秦二世深怕沙丘之谋一旦泄漏，引起群臣与诸公子不服，所以诬陷杀害蒙恬、蒙毅兄弟等功臣，又诛杀诸公子、公主，连坐者不可胜数，宗室、黔首(百姓)震恐，大吏持禄取容。二世残暴，葬秦始皇时，后宫女子无子者，皆令从死，死者甚众。又把工匠尽埋在骊山墓中，无复出者。秦始皇死后，阿房宫停建。二世元年(前 209)四月复作阿房宫，修治驰道，徭役、赋敛愈重，又征调 5 万卫卒屯卫咸阳，粮食不足，令郡县转运粮食等物资的人自带食物，用法刻深，人人自危，欲叛者众。二世元年(前 209)七月爆发了陈胜、吴广起义。赵高为郎中令，为报私怨杀人甚众，怕大臣在二世面前揭露，就对二世说，陛下初即位，与公卿决事，如有误，会让群臣知道自己的短处。天子称朕，只闻其声，不见其面。陛下宜深居禁中，与臣及习法者决事，天下就会称为圣主。二世采赵高之言，不坐朝廷见大臣，深居禁中，事皆决于赵高。由于关东农民起义和反秦势力壮大，右丞相冯去疾、左丞相李斯、将军冯劫入宫见二世，要求停止阿房宫工程，减少征戍转运，以缓和形势。二世为此指斥三人不忠，下吏治罪。冯去疾、冯劫为此自杀。李斯交郎中令赵高囚禁治罪。赵高诬李斯等谋反，次年被处死灭族。二世三年(前 207)冬，赵高为丞相。秦将章邯率军围巨鹿，项羽统义军往救。章邯战不利，派长史司马欣向朝廷报告军情和请示事情，赵高拒不接见，司马欣恐惧逃走，赵高派人追捕，司马欣逃回军中见到章邯说：赵高用事，将军有功亦诛，无功亦诛。这时项羽急击秦军，章邯兵败降项羽。赵高欲为乱，恐群臣不听，为试验群臣敢不敢反对自己，就献鹿于二世，说是马，二世笑曰：丞相有误，谓鹿为马。问左右，群臣有的沉默，有的阿谀顺从赵高说是马，有的说是鹿。赵高暗中处置了说是鹿的人，群臣更加惧怕赵高。秦末农民起义爆发后，赵高几次对二世说：关东盗贼不会有什么作为。巨鹿之战章邯降项羽，关东叛秦，沛公刘邦率军入武关，赵高恐二世诛及己身，称病不朝。二世使使者责赵高，赵高与其婿咸阳令阎乐、弟赵成策划，诈称有大贼入宫，而后阎乐发吏卒千余人入宫逼二世自杀，立二世兄子公子婴为秦王。子婴设计诛杀赵高，为秦王 46 日，沛公率起义军至霸上，子婴奉天子玺符降，秦亡。赵高专权加速了秦王朝的灭亡。　(杨生民　施　红)

巨鹿之战

秦二世二年(前 208)项羽率义军消灭秦军主力的著名战役。

项羽(前 233—前 202)，名籍，字羽，下相(江苏宿迁西南)人，楚名将项燕之孙。叔父项梁。秦灭楚后，项梁因杀人与项羽避吴中。项羽力能扛鼎，少时曾学书写、剑术、兵法，有大志。秦始皇东巡会稽时，在路旁观看的项羽曾说："彼可取而代也。"秦二世元年七月，陈胜、吴广在大泽乡起义，九月项梁、项羽杀会稽郡守，举兵反秦，得精兵八千人。陈胜牺牲后，部将召平诈奉陈王命拜项梁为楚王上柱国，急引兵西击秦。项梁渡江后，有陈婴领导的二万起义军前来会合；渡淮后，又有英布、蒲将军所率义军前来会合。总兵力发展到六、七万人，成为当时反秦斗争的主力。次年六月，项梁召集义军将领，立楚怀王孙心，仍称楚怀王。项梁号武信君，率义军先后破秦军于东阿、定陶。项羽、刘邦也攻克城阳(山东范县)，接着又攻雍丘(河南杞县)，破秦军，斩秦将三川守李由。这时，章邯率秦军，乘项梁骄傲防备松弛之时，夜袭定陶，大破项梁军，并杀项梁。

章邯破项梁军后，以为南方义军无足轻重，移师

北击赵。这时代蒙恬戍守北方边塞的王离也率军东向，包围了张耳、赵王歇所住的巨鹿城（河北平乡境）。当时赵国刚发生了一次动乱，赵王武臣的部将李良在秦将的离间下杀死武臣，张耳、陈余立原赵国王族赵歇为赵王。巨鹿城中食尽兵少，陈余住在巨鹿北有兵数万不敢出战。巨鹿危急，燕、齐皆派兵来救，震慑于秦军的强大，也不敢出战。项梁军失败后，楚怀王以宋义为上将军，项羽为次将，范增为末将，率军救赵。宋义率兵至安阳（山东曹县东），留40余日不进，计划坐观秦赵军决一胜负，而后伺机进兵。项羽为此愤慨，杀宋义。楚怀王又以项羽为上将军，令率师援赵。项羽令英布、蒲将军为先遣队，渡河救巨鹿，继统大军渡漳河，渡河前下令破釜沉舟、带三日口粮，以示决心。渡河后，项羽军围王离军，与秦军九战，又断绝秦军运粮甬道，大破秦军，杀秦将苏角，虏王离，秦将涉间因不愿降自焚而死，起义军取得空前胜利。其后，蒲将军又破秦军于漳南，项羽又大破秦军于汙水。秦将章邯在走投无路的情况下，率二十多万秦军投降项羽。后项羽怕降卒不服，在新安城南把降卒全部坑杀。

巨鹿之战中，楚军作战英勇无比，以一当十，喊声震天，作壁上观的诸侯军将领人人惴恐。破秦军后，项羽召见诸侯军将领，都膝行而前，莫敢仰视。项羽由是为诸侯上将军，各路诸侯军都听从项羽的指挥。

巨鹿之战消灭了秦军主力，为推翻秦朝统治奠定了基础，同时也奠定了项羽在各路反秦军中的地位。　　　　（杨生民　施　红）

约法三章

汉王元年（前206），刘邦为废除秦朝苛法争取关中民心所采取的措施。

刘邦（前256—前195），字季，秦泗水郡沛县（江苏沛县）人，出身农民家庭，不事生产，豁达大度，青年时当过亭长。秦二世元年（前209）七月陈胜起义反秦，九月刘邦在沛县聚众响应，称沛公，不久投项梁。章邯围攻巨鹿，赵向楚怀王求救兵，怀王以宋义为上将军、项羽为次将北救赵，又令沛公向西略地入关，并与诸将相约，先入定关中者王之。由于秦破项梁军，项羽愤慨，愿与沛公西入关中，怀王左右诸老将都说，项羽在战争中屠杀甚众，所过无不残灭，无法争取民心；应遣长者以仁义之师而西，毋侵暴，宜可胜。他们还认为，独有沛公是宽厚长者，可派遣前往。最后怀王不派项羽，而遣沛公西向略地。刘邦率军西伐秦，注意不杀掠民众，收揽人心，争取秦臣民归降。如攻宛城（河南南阳）时，封宛城守令为殷侯、其舍人陈恢食封千户，宛城归降。此后所过之处，无不下者。攻武关前，刘邦采张良计，先派郦生、陆贾对秦将晓以利害，而后袭破武关。入关后，刘邦军队所过不虏掠，秦民喜欢，秦军瓦解，因此才得以在蓝田大破秦军，后又在蓝田北破秦军。汉王元年十月，刘邦率军进至霸上，秦王子婴投降，秦朝灭亡。刘邦想到秦宫休息，后听樊哙、张良谏言，封秦重宝财物府库，还军霸上，并召诸县父老豪杰说：父老苦于秦的苛法很久了，诽谤朝廷的灭族，人们相聚说话犯弃市死罪。我与诸侯有约，先入关的为关中王，我当为关中王。我与父老约法三章：杀人者，死；伤人和盗，抵罪。其余秦法完全废除。官吏依原位，不动。我所以来这里，就是为父老除害，不是来侵暴大家，大家不要害怕。我所以回军霸上，是为等待诸侯军来，共同制定约束，以安定百姓。刘邦又使人和秦朝官吏巡行各县乡邑，把约法三章的事告诉民众。秦人大喜，争着拿牛羊酒食，献给沛公的士卒，沛公又谦让不受，说：我军中仓库粮食很多，不缺乏，不劳大家破费。秦人听后更加高兴，唯恐沛公不做秦王。约法三章解除了秦朝苛法对民众的压迫，解除了关中民众对刘邦军队的恐惧，赢得了他们的信任和拥护。这为以后刘邦夺取关中并以此为根据地战胜项羽奠定了基础。

（杨生民　施　红）

鸿　门　宴

汉王元年（前206），项羽与刘邦两大集团发生尖锐矛盾斗争的一次宴会。宴会地点在鸿门，故曰鸿门宴。

项羽、刘邦为争夺关中地区发生了尖锐矛盾。刘邦约法三章后，有人对他说：秦地很高，地势险要。听说章邯归降项羽，项羽封他为雍王，要在关中称王。现在要来关中，沛公你就不能为关中王了。为今之计，应急派兵守函谷关，不让诸侯军入关。沛公认为此计好，依计而行。这年十一月，项羽率兵西进，要入关，关门闭。听说沛公已平定关中，项羽大怒，派英布等人率兵攻破函谷关，十二月到离咸阳百里的戏。沛公左司马曹无伤使人对项羽说：沛公要当关中王，令子婴为相，珍宝尽有之。曹无伤这样做，是想求得项羽的封赏。亚父范增劝项羽袭击沛公，当时让将士饱餐，准备次日合击。这时项羽率兵四十万，沛公有兵十万，双方力量相差悬殊。项羽的叔父项伯杀人犯罪，张良对他有救命之恩。项伯知项羽要进攻沛公

后，想救出张良，于是当夜去见张良，告此事，想让张良离去。张良说：我是韩王送来辅佐沛公的，现在沛公有急事，逃离是不讲信义，不能不对他说。良入见沛公，告此事，沛公大惊，问张良如何是好？张良说，请向项伯说明，沛公不敢背叛项王。沛公询问了张良与项伯的关系和项伯的年龄后，决定以兄长待项伯，请项伯入见，沛公奉酒为项伯祝寿，并约定儿女婚姻，而后说：我入关以后，秋毫无犯，吏民册籍妥为保存，府库加封，等待项将军前来接收。所以遣将守关是为防备其他盗贼，或有什么非常变故。我日夜盼望项将军到来，怎敢反叛呢？请伯兄千万向项将军说明。项伯应允，并嘱咐沛公：明早不可不早来向项王谢罪！沛公同意。项伯又连夜返回项羽军中，把沛公的话都告诉了项王，并说：如果不是沛公先破关中，你怎能一直入关呢？人有大功而攻击人家，是不义行为，不如善待沛公。项王允诺。

次日早晨，沛公带骑士百余人来见项王，到鸿门，向项羽谢罪说：我与将军合力攻秦，将军战河北，我战河南，自己也没想到能先入关破秦，而和将军在这里相见。现在有小人进言，令将军与我有隙。项羽说：这是沛公左司马曹无伤说的，不然，我何至如此。当日项王设宴留沛公饮酒，项羽、项伯东向而坐，亚父范增南向坐，沛公向北，张良西向坐侍位。范增几次以眼色示意，又三次举所佩玉玦示意项羽杀沛公，项羽默然不应。范增起出召项庄，让其在宴会舞剑，借机杀沛公。项伯也拔剑起舞，常以身掩护沛公，使项庄无法击沛公。张良至门外，见樊哙，说：甚急，项庄拔剑舞，意在沛公也。樊哙带剑持盾闯入宴会厅，向西而立，怒瞪着项羽。项羽跪起大声问：来客是什么人？张良说：这是沛公的护卫樊哙。项羽赐给樊哙一斗酒、一生猪肩。项羽又问樊哙还能复饮吗？樊哙说：臣连死都不逃避，喝酒还推辞吗？秦有虎狼之心，杀人甚众，刑罚严酷，天下叛之。怀王与诸将约：先破秦入咸阳者王之。今沛公先破秦入咸阳……，未有封侯之赏，大王听小人之言，欲诛有功之人。这样做正是暴秦的继续，大王实不该如此。对樊哙的话，项王没有回答，只说让他坐。樊哙同张良坐在一起，过一会沛公起身去厕所，招樊哙出去，张良也顺便出来。沛公出去后，项王招沛公回去。沛公说：现在出来，未告辞，如何是好？樊哙说：做大事不必太顾虑小节，行大礼不必拘泥于细小的谦让，如今人为刀和俎，我为鱼和肉，还讲什么辞别。于是沛公决定脱身回去，留张良向项羽辞谢。临走时，沛公给张良留下白璧一双，让献给项王，玉斗一双，让献给亚父范增，并对张良说估计我回至军中，你才进去献上礼物。当时项羽所在的鸿门距沛公军所在的霸上相距40里，沛公抄小道回军不过20里。张良估计沛公已到军中，就进去献上礼物。亚父范增接过玉斗后，置之地，拔剑击碎，而后说：唉！这些年轻无识之辈，不足与谋大事。夺项王天下者，必定是沛公，我们这些人会成为刘邦的俘虏！沛公回到军中后，立即诛杀了曹无伤。过了几天，项羽引兵西进，屠杀咸阳的居民，杀秦王子婴，烧秦宫室，大火三月不灭，收取了秦宫的财宝、妇女，后都带回关东。 （杨生民 施 红）

楚霸王分封

汉王元年（前206），义军灭秦后，项羽称西楚霸王，实行分封制，在全国封了十八个王。

秦统一后，在全国实行郡县制，然而传统的分封制影响很深，不能一下退出历史舞台。陈胜起义后，张耳、陈余就建议陈胜“立六国后”，使“诸侯亡而得立”，实行分封制。陈胜虽不主张实行分封制，但在当时形势下，不能不承认六国旧势力拥立武臣、韩广、魏咎等人为王。陈胜失败后，项羽所率义军消灭了秦军主力，实力最强，诸侯听命，能左右形势，所以灭秦后，就按自己的好恶分封诸侯。有人建议项羽定都关中、称霸全国，因关中秦宫室被烧残破和项羽想富贵还故乡，所以自立为西楚霸王，王九郡，都彭城（江苏徐州）。项羽破坏了怀王与诸将“先入定关中者王之”的约定，封刘邦为汉王，王巴、蜀、汉中，都南郑（陕西汉中境）。又把关中分给秦的三降将：章邯为雍王，辖咸阳以西地，都废丘（陕西兴平东南）；司马欣为塞王，辖咸阳以东至渭河，都栎阳（陕西临潼北）；董翳为翟王，辖上郡，都高奴（陕西延安东北）。此外，徙魏王豹为西魏王，辖河东，都平阳；瑕丘申阳为河南王，都雒阳；韩王成为韩王，都阳翟；司马卬为殷王，都朝歌；赵王歇为代王；张耳为常山王；英布为九江王；吴芮为衡山王；共敖为临江王；燕王韩广为辽东王；臧荼为燕王；齐王田市为胶东王；田都为齐王；田安为济北王。还封陈余三县等等。

怀王因要兑现“先入定关中者王之”的约定，激起项羽的不满。于是项羽佯尊怀王为义帝，让其迁江南，都郴（湖南郴县），暗中指使人击杀义帝于江中。

分封制不利于全国的统一、安定，再加上项羽按个人好恶、需要分封激化了各种势力之间的矛盾，所以分封之后很快就爆发了战争。

（杨生民 施 红）

楚汉战争

汉王元年(前206)至五年项羽与刘邦为争夺封建统治权而进行的战争。

项羽分封以后,汉王元年(前206)四月,诸侯各就国。汉王刘邦经栈道往南郑时,烧绝栈道,其目的是为防备诸侯盗贼袭击,同时也是为了向项羽表示他无意向东发展。刘邦至南郑后,以汉中为基地,安定巴蜀,准备收复关中,东向争天下。三个月后,因齐地田荣起兵反楚,就为汉王提供了机会。

项羽分封诸侯后,就国归彭城。齐国田荣因与项梁不和,又不率兵随项羽击秦,未封。田荣对项羽封齐王田市为胶东王、齐将田都为齐王非常恼怒,因此攻杀田市、逐走田都、自立为齐王,又击杀济北王田安。秦末在今山东西南曹县起义的彭越有众万余人,项羽未封。田荣封彭越为将军,共同反楚。陈余怨项羽未封自己为王,于是向田荣借兵,击破常山王张耳,张耳逃亡归汉。陈余又从代迎回赵王歇为赵王,赵王歇又立陈余为代王。项羽为此大怒,率兵北击齐。这年八月,汉王用韩信计,趁机败章邯,得雍王地,司马欣、董翳降,关中归汉王。战争一开始项羽就陷于两线作战的不利境地。汉使张良致项羽书说:“汉王失职,欲得关中,如约即止,不敢东。”又以齐、梁反书遗项羽说:“齐欲与赵并灭楚。”于是项羽无西向意,而专注于北击齐。项羽在齐虽击杀田荣,立田假为齐王,但因在齐焚烧城郭室屋,虏掠老弱妇女,坑杀田荣降卒,激起齐民反抗。于是田荣弟田横收集逃卒得数万人,反城阳,后立田荣子田广为齐王。战事一时无法结束,项羽率楚军主力滞留齐地。汉王刘邦得关中后,乘机东进,河南王申阳降。汉王二年三月,魏王豹降,破河内俘殷王司马卬。汉王入洛阳后知项羽使九江王英布在郴县击杀义帝,为义帝发丧,遣使告诸侯,要求“击楚之杀义帝者”。接着汉王率诸侯兵共56万人大举东进,四月入彭城,收其宝货、美人,连日置酒高会。项羽闻讯,急率3万精兵回救彭城,大破汉军,汉军士卒死伤过半,刘邦仅与数十骑突围,楚军至沛虏取刘邦父母妻子为人质,诸侯见楚强,皆背汉向楚。

彭城之战后,楚汉战争进入相持阶段。这一阶段从汉王二年四月退守荥阳到汉王四年八月楚汉达成以鸿沟为界中分天下的和议为止。彭城大败后,刘邦退守荥阳,靠及时征发关中老弱未成年者补充兵力才得以复振。楚、汉双方相持在荥阳、成皋一线,双方互有胜负。项羽移主力于西线同刘邦作战,虽曾先后攻占荥阳、成皋,但始终无法继续西进。这一方面是因刘邦深沟高垒坚守阻止了项羽的进攻,另一方面项羽无法摆脱两线作战的困境,无力西进。对刘邦来说,在这一相持时期却取得了积极的成果。表现在:一、巩固了已占领地区。如汉王二年六月汉军灌章邯困守的废丘,废丘降,章邯自杀,拔除了项羽在关中的据点。二、争取到英布、彭越的支持,从侧翼威胁项羽。汉王二年五、六月刘邦使随何往说九江王英布背楚从汉,楚使龙且击布,布不胜,与随何归汉。汉王三年五月,刘邦令彭越率兵渡睢水,杀楚将薛公。这年八月,刘邦令刘贾等人率兵2万,入楚地,支援彭越。彭越在汉军协助下,攻占梁地,连克睢阳、外黄等17城,断楚军粮道,烧楚军积聚。这迫使项羽于九月令大司马曹咎守成皋,亲自率师东击彭越,夺回睢阳、外黄十余城。而刘邦则趁机于汉王四年十月,大破楚曹咎军,收复成皋。项羽闻讯又率军西来,与刘邦军在广武相持数月。这种状况,使项羽军疲于奔命,难于兼顾。三、完成了对项羽的战略大包围。汉王二年八月至汉王三年九月,刘邦派大将韩信平定魏、赵、代、燕,矛头指向齐地。汉王四年十月,韩信破齐军,进据临淄,项羽遣龙且救齐。十一月,韩信以囊沙堵潍水,楚军渡河时决水淹之,大破号称20万的楚军,杀龙且,追擒齐王田广,尽定齐地。项羽闻讯,惊恐,派武涉说韩信背叛汉王,三分天下,韩信不听。这样,刘邦便完成了对项羽的战略大包围。此时,彭越居梁地,又断绝楚军粮道。项羽四面受敌,与汉议和。汉王四年八月,双方约定,中分天下,以鸿沟为界,以西归汉,以东归楚,项王放汉王父母妻子归汉。议和达成后,项羽引兵东归,刘邦也想率兵西归。张良、陈平说为免养虎遗患,应趁机灭楚。刘邦遂率兵东击楚。

过了几个月,汉王五年十二月,刘邦会合韩信、彭越等各路军,围楚军于垓下(安徽灵璧东南),项羽自杀,刘邦尽并楚地。楚汉战争前后持续了四年多至此结束。　(杨生民　施　红)

垓下大战

汉王五年(前202)楚汉战争的最后一次战役,项羽在这次战役中兵败自杀。

汉王四年八月,项羽、刘邦达成以鸿沟为界中分天下的和议后,项羽率兵东归彭城,刘邦也想西归。张良、陈平对刘邦说:汉已有天下三分之二,诸侯归附。楚却兵疲粮绝,这是天亡楚的时机,不如趁机攻取,如果放过这个机会不加攻击,就是所谓养虎遗患了。汉王采纳了这一意见,于汉王五年率兵追项羽于

阳夏(河南太康县)南,驻屯,约期与韩信、彭越军会合,共同袭击楚军。汉王兵至固陵,韩信、彭越的兵却未来会合,楚军大破汉军,汉王又坚守壁垒,挖深沟自守。刘邦对张良说:诸侯不如期从约相会,如何是好?张良回答说:楚兵将破,韩信、彭越没有分到土地,不来是合理的。君王能与他们共分天下,让二人来会合,可以立即做到。如果不能合兵攻楚,事情的发展是无法预料的。君王如果把自陈以东至大海的土地尽给韩信,把睢阳以北至谷城的土地给彭越,使他们各自来会并力攻楚,则楚兵容易打败。汉王回答说:好。于是派使者告韩信、彭越破楚后给与二人的封地。二人听后都请求进兵。汉王五年十二月,刘邦与韩信、彭越等路军会攻项羽于垓下(安徽灵璧东南),韩信率兵20万,项羽有兵10万,汉军和诸侯兵围楚军数重,夜间汉军在四面唱的都是楚国的歌声,项羽以为汉尽得楚地,大败而走,退至乌江(安徽和县境)自杀。项羽死后,楚地都降了汉王。因为楚怀王曾封项羽为鲁公,鲁人为守节义不降,汉知此原因拿项羽头给鲁父老看,他们知项羽死,降服于汉。

(杨生民　施　红)

两　汉

汉朝建立

汉王五年(前202)刘邦称帝建立汉朝及其后为稳定封建秩序所采取的一系列重要措施。

汉王五年项羽兵败自刎。同年二月,刘邦在群臣的拥戴下即皇帝位于定陶(山东定陶),重建了统一的专制主义中央集权的封建王朝,即西汉政权。

由于秦朝的残暴统治及秦末与楚汉之际的长期战乱,到西汉初期,农业生产受到了严重破坏,经济衰败,人民大量死亡流散,不少农民为生活所迫,卖妻鬻子,甚至自卖为奴。大城市里的人口剧减,各地市场混乱,商人屯积居奇,操纵物价,至米一石值万钱,马一匹价百金。刚刚建立起来的西汉政府,国库空虚,又面临着残破的社会局面,以至天子都找不到四匹毛色相同的马来驾车,将相大臣出门有时只好乘坐牛车。

在百废待兴的形势下,汉初的统治集团不得不把发展农业经济、恢复稳定封建秩序作为自己的首要任务。高祖刘邦在即位的当年先后颁布诏令,采取了一些重要措施来巩固汉王朝的经济、政治基础。其主要内容有:

一、组织军队将士复员,“兵皆罢归家”。根据复员官兵的功绩大小,按照所获爵位的高低来分别颁赐不同数量的田地与宅室。跟随汉军灭秦平楚的关东诸侯之子,愿意留居关中者,免徭役12年,回关东者免役6年。大批士兵回到农村,在和平安定的环境下得到一份土地,提高了他们生产的积极性,使之成为汉初恢复农村经济的一支重要力量。

二、招抚流亡,恢复故爵、田宅。命令在战乱中聚保山泽的人各归本土,政府承认他们原来拥有的爵位和田地房屋。这对于安定人民生活、促进生产的发展也起到一定的积极作用,并使西汉王朝获得了部分过去秦朝地主、自耕农的支持。

三、释放奴婢,宣布因为饥饿而自卖为奴婢者,一律免为庶人。

四、赐军吏卒爵位。凡是军吏卒爵在大夫(第五级爵)以下或无爵者,皆赐爵为大夫。在大夫以上者,晋爵一级。爵在七大夫以上者,免除全家徭赋,分给食邑,并优先颁给田宅。这是从政治、经济上扶助新形成的军功地主阶层,使他们成为西汉王朝的主要支持者。

此外,刘邦还下令抑制商人势力,禁止他们穿着丝帛、携带兵器、乘车骑马,也不许他们做官,加倍征收他们的人头税——算赋,以限制商人对农民的兼并。减轻田租,规定“十五税一”。又认为临时颁行的“约法三章”(杀人者死、伤人及盗抵罪)过于简略,不足以“御奸”,使丞相萧何将秦法之宜于时者加以增益,制定了《九章律》,作为保护封建政权的重要工具。

汉高祖刘邦推行的以上措施,是地主阶级为了适应农民战争之后阶级关系发生剧烈变化而采取的对策,它一方面保护和扶植了秦朝的旧地主与汉初新生的军功地主,扩大了封建国家的统治基础;另一方面也在一定程度上承认了农民战争的胜利成果,使大量脱离生产的农民回到土地上,为他们提供了各种必要的劳动条件,稳定了社会秩序,致使农业生产逐步恢复起来　　　　(宋　杰)

消灭异姓王

西汉初年，高祖刘邦铲除地方割据势力、诛杀废黜异姓诸侯王的措施。

秦统一天下之后，在全国推行中央集权的郡县制度，以郡统县，直属中央，不再分封宗室子弟与功臣为诸侯。秦朝被农民起义推翻后，项羽依靠他军事上的优势地位，据梁楚之地九郡，自立为西楚霸王，都彭城（江苏徐州），尊楚怀王为义帝，并恢复了秦代废除的分封制度，将其余郡县封给六国旧贵族、秦朝降将和有功将领十八人，建立王国，受制于项羽。

在楚汉战争当中，刘邦为了取得对项羽作战的胜利，也采取分封王国的措施来拉拢诸侯，赏赐功臣。到汉王五年（前 202），西汉王朝正式建立时，刘邦先后共分封了异姓功臣八人为王。其中包括韩王信，汉王二年十一月立，都阳翟，辖故秦颍川郡。赵王张耳，汉王四年十一月立，都襄国，辖邯郸、巨鹿、常山三郡。楚王韩信，汉王四年二月立为齐王，五年正月徙为楚王，都下邳，辖东海、薛郡、会稽、泗水、陈郡五郡。淮南王英布，汉王四年七月立，辖九江、衡山、庐江、豫章四郡。梁王彭越，汉王五年正月立，都定陶，辖砀郡。燕王臧荼，原受项羽分封，后降汉仍保持旧位，都蓟，辖广阳、上谷、渔阳、右北平、辽西、辽东六郡。后臧荼造反被诛，汉王五年九月改封卢绾为燕王。长沙王吴芮，汉王五年二月立，都临湘，辖长沙、武陵二郡。

刘邦分封异姓诸侯王是为当时的形势所迫，故战胜项羽、正式称帝之后，感到受其威胁，便采取了逐步翦除的措施。高祖六年（前 201），有人上告楚王韩信谋反，刘邦又听说原项羽部将钟离眜躲藏在楚，便采用了陈平的计策，伪装去云梦泽巡游，令韩信迎接。韩信不知其计，到陈（河南淮阳）谒见时，当即被擒，后贬为淮阴侯。高祖十年（前 197），赵相国陈豨举兵反汉，自称代王，与韩信勾结。刘邦率师出征时，韩信称病不从，和家臣谋划在夜间诈作诏书赦免长安的刑徒、官奴，带领他们袭击留守京师的吕后、太子刘盈。次年正月，其舍人乐说之弟上告韩信谋反，吕后与相国萧何商议，派人伪装使者报告刘邦击杀陈豨，列侯、群臣皆入宫祝贺。韩信进见而被擒，被杀于长乐宫钟室，诛灭三族。

高祖六年，韩王信被徙至太原郡，都晋阳（山西太原），以防备匈奴入侵。同年九月，韩王信反汉，投降匈奴。次年刘邦自将兵击信。韩王信军败逃入匈奴，至高祖十一年（前 196），被汉将柴武击败斩杀。

高祖七年（前 200），刘邦经过邯郸时，对赵王张敖谩骂无礼，引起赵相贯高、赵午等人的愤怒。次年冬，刘邦再次过赵时，贯高等在柏人（河北隆尧西）驿馆设伏，准备在夜间暗杀他；因刘邦未留宿而失败。次年，此事被人告发，刘邦逮捕张敖，念他不知情而释放，但取消了王位，改封宣平侯。

高祖十年（前 197）陈豨反汉时，刘邦曾向梁王彭越征兵平叛。彭越因患病未曾随军，仅派部将领兵前往，受到刘邦的责备。后梁国太傅得罪彭越，恐怕被杀，便逃亡至汉，诬告彭越谋反。刘邦逮捕彭越后，取消了他的王位，贬为庶人，迁徙到蜀郡青衣（四川名山北）。彭越途中遇到吕后，向她泣诉无罪，请求回故乡昌邑居住。吕后佯允后，与其同返洛阳，策动刘邦斩草除根，杀死彭越，夷灭其三族。

高祖十一年（前 196），淮南国中大夫贲赫至长安，诬告其王英布谋反。刘邦遣使者前去案验，英布恐不自安，遂起兵反汉。次年英布军败，逃亡番阳（今江西波阳东），被长沙王吴成使人诱杀。

燕王卢绾在陈豨反汉时曾派使者与之联络，又勾结匈奴，欲令战事持久不决。后陈豨裨将降汉，告发卢绾通敌之事。刘邦召见卢绾，他却称病不至。汉朝官员前往燕国验问，归报其谋反，刘邦遂在高祖十二年（前 195）派樊哙领兵击燕，卢绾弃国率宫人家属逃入匈奴。

这样，到刘邦去世前，原来受封的异姓诸侯王大多因谋反的罪名被诛死、废黜或逐走，其封国、爵位被取消。仅有长沙王吴芮因为势弱无罪而得以自保，传国到文帝后元七年（前 157），由于无嗣而国绝。刘邦先后用了七年的时间，基本上消除了异姓诸侯王的地方割据势力，维护了西汉王朝的统一局面。但是他在消灭异姓王之后又大封刘氏宗室子弟为同姓诸侯王，仍然留下了叛乱和分裂的隐患。（宋　杰）

汉初分封同姓王

西汉初年，汉高祖分封同姓王国的政治措施。

刘邦在消灭异姓诸侯王、维护汉初统一的局面时，又错误地认为，秦祚短促的重要原因之一在于没有分封同姓子弟为诸侯，做中央的屏藩，乃大封同姓为诸侯王。到他去世前，共封宗室九人为王：楚王刘交，汉六年正月封，都彭城，辖彭城、东海、薛郡。齐王刘肥，汉六年正月封，都临淄，辖临淄、胶东、胶西、济北、博阳、城阳、琅邪。赵王刘如意，汉九年正月封，都邯郸，辖邯郸、魏郡、常山、中山、巨鹿、河间、清河。代王刘恒，汉十一年正月封，都晋阳，辖太原、雁门、定

襄、代郡。梁王刘恢，汉十一年三月封，都定陶，辖砀郡、东郡。淮阳王刘友，汉十一年三月封，都陈，辖陈郡、汝南、颍川。淮南王刘长，汉十一年七月封，都寿春，辖九江、衡山、庐江、豫章。吴王刘濞，汉十二年十月封，都广陵，辖东阳、吴郡、鄣郡。燕王刘建，汉十二年二月封，都蓟，辖广阳、上谷、渔阳、右北平、辽西、辽东。又与群臣立下誓言："非刘氏而王，天下共击之。"诸侯王国虽然受朝廷节制，但又相对独立，权力相当大，可以自行任命国内御史大夫群卿以下的众官，直接向封国的臣民收取赋税、征发徭役。当时全国有 54 个郡，其中 39 个封给了诸侯王国，齐燕吴三国几乎"分天下半"，中央直属的郡只有 15 个。这些王国疆域辽阔，人口众多，实力雄厚，实际上成为能与朝廷分庭抗礼的割据力量，为统一的中央集权政体带来了不稳定的因素，留下叛乱和分裂的隐患。

（宋　杰）

白登之围

汉高祖七年(前 200)，刘邦率众反击匈奴，被围困在白登山(山西大同东北)的历史事件。

匈奴是我国古代聚居在阴山南北草原上的一个游牧民族，秦始皇时被蒙恬率军击败，退往漠北。秦末汉初，匈奴首领冒顿单于乘刘邦、项羽争夺天下之机，东灭东胡，占有今大兴安岭、辽河上游地区；北败丁零、屈射、薪犁等部落，控制了今贝加尔湖一带；西驱月氏，并征服乌孙等部族，据有今祁连山、阿尔泰山地区；南并楼烦、白羊，重新占领了河南地(内蒙古河套地区)，成为横跨蒙古高原的一大强国。

汉朝建立以后，北部边郡经常遭到匈奴骑兵的袭扰。高祖六年，异姓诸侯王韩王信起兵反汉；次年，刘邦亲率大军平叛，击败韩王信，信亡入匈奴。曼丘臣、王黄等拥立赵国旧贵族赵利为王，收集韩王信败散人马，与信及匈奴勾结，图谋反攻汉朝。匈奴派左、右贤王将万余骑南下至晋阳(山西太原)，与王黄等合兵，被汉军击退。刘邦领兵 32 万北进，欲出征匈奴，先后派使者十余人前往窥探虚实。冒顿单于匿其壮士、肥牛马，使者但见老弱及羸畜，归报皆言匈奴势弱可击。只有谋士刘(娄)敬出使还报，认为冒顿是采用骄敌之计以引诱汉军前来，定有奇兵埋伏，不可轻举妄动。刘邦不信其言，以沮败军心的罪名逮捕刘敬。

刘邦率先出征，到达平城(山西大同)。汉军还没有全部聚齐，冒顿单于纵精兵 30 余万骑，包围刘邦君臣于白登山，断绝其粮饷、救兵，围困七日七夜。刘邦无奈，用谋臣陈平的计策，派使者向阏氏(匈奴单于之妻的称号)送去厚礼行贿，并携带去美女图像，对阏氏展示，声称："汉有美女如此，今皇帝困急，欲献之。"阏氏惟恐失宠，劝说冒顿放刘邦出围。当时匈奴与韩王信、赵利等约期会师，而信等兵久不来，所以冒顿怀疑他们与汉军有勾结，害怕中计，又听了阏氏的劝告，便解围一角，纵刘邦君臣逃出，与大军会合。刘邦还师后释放了刘敬，处死前出使匈奴言其羸弱者。

由于秦汉之际的长期战乱，中原地区的社会经济遭到严重破坏，因此刘邦感到无力再与匈奴交战，接受了刘敬的建议，实行"和亲"，将他人女伪称公主嫁给单于，陪嫁黄金千斤，另外每年奉送给匈奴大量缯絮、酒、米等财物，以缓和双方的关系，求得边境上暂时的和平。此后，惠帝、文帝、景帝时继续采取和亲，将宗室女下嫁单于，岁岁奉献物品。汉朝和匈奴之间避免了大规模的战争，但匈奴军队对汉边郡的侵扰仍未停止。

（宋　杰）

徙豪关中

西汉政府削弱地方割据势力，陆续将关东各地的豪强大族迁徙到关中地区的措施。

秦始皇在兼并六国的战争中，经常采取强制的手段，频频迁徙被征服的关东各国旧贵族及豪富到关中、蜀地等秦国故土，置于秦政府军事力量的严密监视之下，以加强控制，切断他们与故乡、族众的联系；没收其财产，削弱他们的经济、政治力量，防止这些人起来兴风作浪、从事复兴故国的斗争。秦统一全国之后，又徙天下豪富 12 万户到首都咸阳居住。

西汉王朝建立后，定都长安。由于经历了秦汉之际的多年战乱，关中地区人口锐减，经济残破；汉朝政权又面临着北方游牧民族匈奴的侵扰与关东六国强族的潜在威胁。高祖九年(前 198)十一月，刘邦采纳了谋士刘敬的建议，继续实行迁豪政策，将齐、楚大族田氏、怀氏、昭氏、屈氏、景氏五姓十余万口徙至关中地区居住。这项措施具有"强本弱末"的双重意义，既打击了地方豪强势力，起到防范六国旧贵族反叛的作用，也充实了首都长安附近地区的人口。大量富豪携带财富聚居关中，也促进了当地经济的恢复与繁荣。

由于六国强族多参加了反秦起义，与汉朝并非处于公开对立的关系，政府在一定程度上还要依靠他们的力量，作为自己的统治基础。像刘敬所建议的那样，豪杰名家迁到关中，"无事，可以备胡，诸侯有

变，亦足率以东伐”。所以汉初迁徙豪强的措施与秦代有很大不同，朝廷不再把他们视为战俘、贱民，掠夺其财物，而是对他们“与利田宅”，在经济上给予一定的优恤与扶植。此后，自惠、文、景、武、昭、宣、成帝七代，各代皇帝即位后，都在长安附近设置陵县，迁徙豪富到那里定居，其对象有三种：一、豪强兼并之家。各地旧有或新兴的豪强地主，他们宗族强大，武断乡曲，既欺凌农民，也破坏法度。二、吏二千石家属，是中央政府任命到地方担任郡太守、国相的行政长官之家眷。朝廷担心他们在当地专擅军政，起兵造反，所以把家属迁往首都周围加以控制，实际上是作为变相的人质。三、高赀富人，包括大地主、富商以及高利贷者，按照规定的财产标准来确定是否迁徙。像武帝元朔二年（前127）徙豪资300万钱以上者于茂陵；宣帝本始元年（前73）、元康元年（前65）资百万钱以上者徙平陵、杜陵；成帝鸿嘉二年（前19）徙豪资500万钱以上者5000户于昌陵。对待迁徙的吏民，政府亦赏赐田宅，还有铜钱，每户或10万，或20万，将强迫迁徙逐渐改为自愿应募。

西汉后期，随着封建经济的发展，豪强地主的势力日益膨胀，政府的迁徙政策要使他们失去故乡的土地和劳动人手；虽然封建国家给予了一些照顾，也难以补偿损失，因此对徙豪的措施愈发不满，反对的呼声日益强烈，迫使西汉王朝改变了这一传统政策。汉元帝在永光元年（前43）十一月乙丑日下诏宣布不再迁豪充实诸陵。成帝时又恢复旧制，徙民昌陵，致使怨声载道，海内不安。哀帝即位后，在建平二年（前5）重申废除迁徙豪强的做法，以后终西汉、东汉之世，再未出现过同类措施。　　（宋　杰）

汉高祖立嗣

西汉初年，高祖刘邦与吕后在废立太子问题上的斗争。

汉朝建立后，刘邦宠幸定陶戚姬，生子刘如意，封为赵王，但因受宠爱未到封国居住，常留在京师。刘邦前往关东各地巡视、作战，往往携带戚姬出行。而吕后由于年长色衰而渐被疏远，总是留守长安。刘邦认为吕后所生太子刘盈过于懦弱，不像自己，而赵王如意在性格、气质上和自己很相似，几次打算废掉刘盈，改立如意为太子。戚姬又在他身边日夜啼泣，策动其早下决断。大臣周昌等人闻讯后坚决表示反对，使刘邦犹豫不决。

吕后为此事恐惧忧虑，不知所为。有人对吕后建议，说留侯张良善于策划，常常得到皇帝的信任和采用，何不请他想想办法。吕后便指使其兄建成侯吕泽劫持张良，强迫他为自己谋划，保住太子的地位。张良认为此事难以用言语争辩，当今天下有四位贤人，即东园公、角里先生、绮里季、夏黄公，皆年事已高；因为刘邦对属下轻侮谩骂，故逃匿山中，不愿做汉朝的臣子，然而刘邦对他们很尊敬。如果吕氏送去金玉璧帛等厚礼，令太子亲写书信，用卑辞安车，再派善辩之士请他们出山，在太子门下为客，时时随从他入朝。刘邦看见他们，必然感到奇怪而询问，若是知道这四位自己请迎不到的贤士在辅助太子，就可能会打消废嗣改立的想法。吕泽依照张良的办法，请来了四人，住在自己府中。

高祖十一年（前196），淮南王英布造反。刘邦正在患病，想命太子统率军队，出征平叛。东园公等四人闻讯后往见吕泽，说英布是天下闻名的猛将，善于用兵。现在汉朝诸将都是与皇帝共定天下的枭雄，过去和刘邦同为编户农民，地位相等；让太子去统率他们，无异于使羊将狼，不会为他尽力，必然无功。那样，太子的地位就会被如意所取代。东园公等为吕后出谋，让她向刘邦哭泣进言，说明太子没有领兵作战的能力，请求刘邦带病出征，亲自统率军队，诸将就不敢不尽力了。刘邦听后，见自己的想法被吕后说破，只好同意自己领兵东征，命太子为将军，留守关中。

次年，刘邦平定英布叛乱，回到长安后，愈发想要废黜太子，群臣进谏也不为所动。在一次酒宴上，他发现跟随太子的四位老人皆八十余岁，须眉皓白，衣冠甚伟，感到奇怪，问知姓名后大惊说：“吾求公数岁，公避逃我，今公何自从吾儿游乎？”四人都说：陛下轻视士人，经常辱骂，臣等义不受辱，因此逃亡隐匿。窃闻太子为人仁孝，恭敬爱士，故来跟随他。刘邦听后认为太子羽翼已成，难以动摇，便消除改立赵王如意的企图。刘邦死后，太子刘盈即位，是为惠帝，朝政被吕后所把持。她为了报复前怨，先后将戚姬与赵王刘如意谋害致死。　　（宋　杰）

吕后当政

西汉初期，高祖刘邦去世后吕后独揽大权、把持朝政达15年的历史事件。

吕后名雉，秦朝单父（山东单县）人，早年嫁与刘邦。汉王五年（前202），刘邦称帝，立吕雉为后。吕后为人残忍而有谋略，曾助刘邦翦除韩信、彭越等异姓诸侯王。吕后生惠帝刘盈，而刘邦嫌刘盈柔弱，曾打算另立宠姬戚夫人之子赵王如意为太子。由于大臣

反对，吕后又多方设法为刘盈培植党羽，使改立太子之事未成。刘邦死后，她认为惠帝年少，恐众功臣不服，密谋尽杀诸将，后接受郦商劝告，考虑到陈平、周勃、灌婴等大臣拥兵在外，恐怕激起变乱而未敢动手。

惠帝即位后，朝政由吕后独擅，相国曹参迫于她的专横，不敢理政，终日饭酒而已。吕后为报复前怨，毒死赵王如意，砍断戚夫人手足，挖眼熏耳，以药使之变哑，置于厕中，名为"人彘"。惠帝目睹其暴行，忧愤患病而死。吕后遂两次立他人少子为帝，而自己临朝称制，封吕氏宗族兄弟子侄多人为王侯，拔擢亲信辟阳侯审食其为左丞相。刘邦临终时嘱托的诸位功臣则遭到她的排斥和打击，如免去丞相王陵的职位，夺去太尉周勃的兵权，命其侄吕产、吕禄控制京师南北军。并对刘氏诸王多加残害，如鸩杀赵王如意，令淮阳王刘友为赵王，又幽杀赵王刘友，后又以梁王刘恢为赵王，又逼死刘恢。暗杀燕王刘建之子，使其无嗣继位，以致国绝；而改立诸吕为赵、梁、燕王，以巩固吕氏权力。但是她在临朝称制的八年当中，继续奉行高祖刘邦以来"与民休息"的政策，奖励农耕，对地方官推举的孝悌力田之人免除徭役；在法律上废除秦代苛法，如除掉禁止批评指责朝政得失的"妖言令"、株连亲属的"夷三族罪"、以及对私藏儒家经典者进行灭族的"挟书律"。对北方游牧民族匈奴采取安抚"和亲"的政策，尽量不发动战争；因此人民生活比较安定，社会经济得以恢复和发展。

公元前180年，吕后病危。她知道刘氏宗室与功臣元老对吕氏专权深怀怨愤，便告诫诸吕部署应变，严密控制京师长安的驻军与皇宫警卫，在自己死后不要外出送丧，恐怕为人所制。诸吕在吕后死后阴谋发动政变，废掉汉室，自立为帝；被太尉周勃、丞相陈平以及朱虚侯刘章等迅速平定，全部消灭。

（宋　杰）

周勃安刘

西汉初期，大臣周勃等人诛灭外戚吕氏、迎立文帝的历史事件。

周勃（？—前169），沛（江苏沛县）人，汉初开国功臣，曾跟随高祖刘邦起义，在反秦战争、楚汉战争和汉初平定异姓诸侯王韩王信、陈豨、卢绾叛乱的作战中功勋卓著，受封为绛侯，历任太尉、相国。他为人厚重少文，刘邦认为可以嘱托大事，曾称："安刘氏天下者必勃也。"

刘邦死后，吕后独揽朝政，排挤迫害刘姓宗室和功臣，大肆分封诸吕子侄为王侯，执掌兵权。公元前180年，吕后病故。她死前担心会爆发政变，命赵王吕禄为上将军，掌京师北军；相国吕产居南军；告诫诸吕严密控制守卫京师地区和皇宫的军队，不要外出送丧，为人所制。并遗诏任命吕产为相国，吕禄女为帝后，又以亲信左丞相审食其任太傅。诸吕秉权后擅自尊官，聚兵严威，矫制以令天下。齐王刘襄不服，起兵西征，声讨诸吕。吕产等闻讯后，遣功臣灌婴带兵御敌。军至荥阳后，灌婴留屯不进，派使者与齐王及诸侯相约联合，等待朝中诸吕发动政变后共同将其诛灭。

吕禄、吕产企图在关中作乱，自立为帝，但是内惮周勃、刘章等大臣、宗室，外畏齐、楚等诸侯之兵，又恐怕灌婴反叛，故犹豫未决。周勃与丞相陈平、朱虚侯刘章等合谋，劫持吕氏亲信曲周侯郦商，迫使其子郦寄劝说吕禄、吕产交出上将军印，与大臣们结盟，回到封国居住，以平息事态。吕禄听信其言，将北军兵权交付周勃。周勃掌握北军后，急令卫尉禁止吕产等进殿门，遣刘章率士卒千余入未央宫，经过战斗杀死了控制南军、企图入宫作乱的吕产；又斩长乐宫卫尉吕更始。战乱平定后，周勃遂派人分别逮捕诸吕男女，无少长皆斩首，以谋反的罪名将赵王吕禄、燕王吕通处死，笞杀吕后妹吕媭，废掉其外孙鲁王张偃，并与朝中大臣、宗室商议，迎接代王刘恒进京，即皇帝位，是为文帝。

周勃等人平定了诸吕之乱，对于汉初的政治安定起到了重要的保障作用，使西汉前期得以出现"文景之治"的繁荣局面。（宋　杰）

文景之治

西汉文帝、景帝奉行"轻徭薄赋"、"与民休息"的政策，使社会政治安定，经济得以恢复发展，史称"文景之治"。

西汉王朝建立之初，由于秦末及楚汉之际的长期战乱，农业生产受到严重破坏，经济衰败，人民大量死亡流散。面对残破的社会局面，汉高祖刘邦总结秦朝灭亡的教训，认识到在当时的条件下，只有实行黄老之学"清静无为"的政治理论，减轻赋役剥削，约法省禁，才能缓和农民和地主政权的矛盾，巩固自己的统治；从而推行了复员军队、招还流亡、减轻田租、抑制商人等措施，稳定了社会秩序，使经济得以逐步恢复。

文帝、景帝在位期间（前179—前141），继续执行和调整汉初以来安定社会、发展经济的各项政策，

具体措施有：

一、入粟拜爵。由于当时粮价很低，农民的收入有限，社会上大小商人乘机囤积居奇，操纵物价，放高利贷，造成了许多农民的破产流亡。文帝在十二年（前168）听从了大臣晁错的建议，号召全国百姓向官府交纳粮食，换取爵位。二十等爵当中，上造（二级爵）价六百石，五大夫（九级爵）价四千石，大庶长（十八级）价一万二千石；五大夫以上，可以免除家中一人的徭役。为了防备北方匈奴的入侵，命令入粟者把粮食运到长城沿线，边郡储存的粮食足够五年食用以后，再运到内地郡县收藏。这项法令实行后，许多商人纷纷购买粮食上交买爵，国家的存粮大大增加，粮价因此得到提高，使农民的生活得到了一定改善，也促进了农业生产的发展。

二、轻徭薄赋。在实行"入粟拜爵"的同年，减田租由"十五税一"至"三十税一"，第二年全免天下田租，历时十一年，到汉景帝元年（前156）才又恢复征收田租，仍为三十税一；此后直到西汉末年，这个税率再未改变。成年男女交纳的"算赋"（人头税），由每人每年120钱减成40钱。在徭役方面，原来15—56岁的男女每年为官府服役一次，历时一月，现在改成三年服役一次，时间仍为一月。景帝二年（前155），又把秦代规定的15岁"傅籍"服兵役的年龄界限推迟到20岁；并停止郡国地方政府向朝廷进献贡品。

三、开关梁，弛山泽之禁。文帝时又改变了汉初的"抑商"政策，下令取消了在关卡、渡口、桥梁等交通要道检查、盘索来往行旅的制度，也废除了不许在山林川泽砍柴、采集、开矿、渔猎的禁令，商人们可以自由地贩运，开矿冶炼，砍伐木材，出现了"富商大贾周流天下，交易之物莫不通，得其所欲"的局面；劳动人民也可以到山泽从事耕种和副业生产、渔猎采伐，用来改善生活，增加收入。汉景帝时又恢复了关卡和检查制度，但主要是为了治安的需要，有官府证明的商人仍然能够到处通行。

四、弛刑法。汉初萧何主持制订的《九章律》，还保留了不少秦朝的苛酷刑法，人民对此很反感。文帝在位时取消了秦代的"收孥相坐律令"，不再实行一人犯罪，妻子儿女要连坐、罚为官府奴婢的法律；还废除了残害犯人肢体的几种肉刑，如黥刑、劓刑，减轻了笞刑，官吏审案一般也从轻发落。法律改革的结果是社会更加安定，人民犯罪的现象大大减少，甚至全国一年之中只审理了400多起刑事案件。

五、崇节俭。汉文帝提倡节俭，他在位期间紧缩国家的财政开支，皇帝的宫室、苑囿、车骑、服御都没有增加多少，连妃子的衣襟太长，文帝也下令将它裁短。历史记载他想造一座露台，工匠说要花费百金，文帝觉得太浪费，便改变主意不再修建，说，一百斤黄金相当于中等人家十户的资产，我住在先帝的宫殿里，常常觉得很惭愧，何必还要再修筑露台呢！皇帝崇尚节俭，对于社会上的侈靡之风，会起到一定的制约作用。

通过这些措施的实行，文帝、景帝统治时期逐渐出现了天下安定、经济繁荣，至武帝即位之初，达到了我国封建社会前期的鼎盛阶段。史学家司马迁称当时，"非遇水旱之灾，民则人给家足，都鄙廪庾皆满，而府库余货财。京师之钱累巨万，贯朽而不可校。太仓之粟陈陈相因，充溢露积于外，至腐败不可食。众庶街巷有马，阡陌之间成群。"虽然不无溢美之辞，但也反映了当时太平盛世的情况。不过，文景时期外有匈奴游牧民族的侵扰，国内发生过淮南王刘长、济北王刘兴居和吴楚等七国发动的叛乱，实际上在政治领域还有许多不稳定的因素。　（宋　杰）

吴楚七国之乱

景帝三年（前154），以吴王刘濞为首的七位同姓诸侯王发动的叛乱。

汉初刘邦在翦除异姓王时，又分封自己的兄弟子侄九人为王，他们是齐王刘肥、楚王刘交、吴王刘濞、代王刘恒、淮南王刘长、梁王刘恢、赵王刘如意、淮阳王刘友、燕王刘建。企图以宗族血缘关系来维持朝廷的最高统治地位。汉初同姓诸侯王国的封地共有39郡，幅员辽阔，人口众多，占汉朝整个疆土的大半，皇帝直辖的政区不过15郡。由于同姓诸王与高祖血缘亲近，效忠汉室，起着拱卫中央的作用，所以干弱枝强的问题当时并不突出。另一方面，刘邦为了防止诸侯王形成尾大不掉之势，规定王国的相、太傅等重臣须由皇帝任命，法令须由朝廷统一制订，军队必须接到皇帝的命令及凭证"虎符"，才得以调遣，借此来限制诸侯王的权力。不过，诸侯王掌握着封国内的征收赋税、任免官吏、铸造货币等经济、政治大权，其国土跨州兼郡，连城数十，客观上形成对中央政府的潜在威胁。

汉文帝（前179—前157在位）统治期间，诸侯王国随着经济的恢复和发展，财富日增，势力愈强，逐渐形成了割据状态。文帝三年（前177），济北王刘兴居乘文帝赴太原征匈奴之机，发动叛乱，开同姓王国武装反抗朝廷的先河。此役被朝廷出兵平息后，又出现了淮南王刘长谋反的事件，中央政府与地方割

据势力之间的矛盾日益尖锐。许多忠于汉室的官吏，都感到事态的严重，应该及早解决。太中大夫贾谊向文帝献《治安策》，认为“欲天下之治安，莫若众建诸侯而少其力”，即在各王国的封地内再分封几个小侯国，以削弱其势力。此后，太子家令晁错又建议“削藩”，把王国的一部分封地收归朝廷直辖。文帝在一定程度上采纳了贾谊的建议，于十六年(前 164)分代国为二，分齐国为六，分淮南国为三，还把自己的儿子刘武封为梁王(封地在今河南东部)，控制中原要地，屏障朝廷。但是碍于形势，没有实行削藩，剖分诸侯王国领土的措施也没有普遍推行。

景帝即位后，诸侯王国的势力发展到同朝廷分庭抗礼的地步，严重地影响着西汉王朝政权的统一。特别是吴王刘濞，其国土广大，辖有豫章(江西地区)、会稽(苏南、浙江地区)等郡，有铜矿铸钱，用海水煮盐，财力丰足。他利用这些优越的经济条件来扩张势力，招诱天下豪杰、亡命罪人，蓄谋起兵，夺取帝位。在这种情况下，御史大夫晁错又献“削藩”之策，认为“今削之亦反，不削亦反。削之，其反亟，祸小；不削之，其反迟，祸大。”景帝实行了晁错的主张，先后下诏削夺了赵王刘遂的常山郡、胶西王刘卬的六合县、楚王刘戊的东海郡、吴王刘濞的会稽等郡。削藩之举引起了诸侯王的强烈反对，吴王乘机纠集各王国以武力反叛汉朝。他首先与胶西王刘卬联络，约定反汉事成后，吴与胶西平分天下。胶西王刘卬又与他的兄弟、齐国旧地其他诸王相约反叛。吴王遣使者游说楚、赵、淮南等国，得到应允。景帝三年正月，削藩诏传到吴国后，吴王立即杀死吴国境内朝廷任命的官吏，与楚王戊、赵王遂、胶西王卬、济南王辟光、菑川王贤、胶东王雄渠等分别起兵。原来参与策划反叛的诸侯王中，齐王将闾临时背约，济北王志和淮南王安都被国内亲汉官员所阻止，未能参加。刘濞年六十二，是宗室元老，他致书诸侯王，声称起兵的目的是诛杀晁错、恢复王国故地、安定刘氏社稷；在他的影响与策划下，这次叛乱遍及整个关东地区，震动天下。

吴国在出兵之前，大将军田禄伯提出，现在大军只一路西进，没有其它方向的策应，难以取胜。他表示愿意率领 5 万人，沿着长江、淮河西上，收取淮南、长沙两国，由武关进军关中，与吴王会师，算是一支奇兵。而吴王对田禄伯存有戒心，不敢授予他兵权，遂未采纳其分兵迂回入关的建议。

吴国青年将领桓将军也向吴王建议，“吴多步兵，步兵利险；汉多车骑，车骑利平地。”吴军应该挥师急速西进，沿途不攻城夺地，以迅速的行动抢占洛阳的武库(军械库)与荥阳敖仓的屯粮，凭借当地的山河之险，以会合诸侯；这样即使不能西取长安，也占据了夺取天下的有利地位。如果进展缓慢，沿途攻城略地，一旦汉军率先进占梁楚一带，势必招致失败。但桓将军这一扬长避短、速据战略要地的建议，也被吴王拒绝了。

吴王亲率 20 万大军从广陵(江苏扬州北)出发，北渡淮河，会合楚军，向西进攻梁国，企图打开通往关中的大门。他又派出间谍和游军深入到殽(河南崤山)、渑(河南渑池)之间活动，侦察关中汉军情况。胶西等国叛军共同进攻齐王将闾据守的国都临淄。

吴楚七国之乱爆发后，景帝派太尉周亚夫率 36 将军前往迎击，派郦寄率兵击赵，栾布领兵击胶西、胶东等齐地叛国，并以大将军窦婴驻屯荥阳，监齐、赵两地兵事。曾任吴国相的大臣袁盎，为泄私愤，建议景帝杀死晁错，恢复王国故地，请求七国罢兵。景帝因变起仓猝，又对晁错请他率军亲征平叛不满，便接受建议，处死晁错，向吴王求和。而吴王认为自己居于优势，已经取得了“东帝”的地位，拒不受诏，战事继续进行。

周亚夫出征前，向景帝提出：吴楚军队剽悍轻捷，汉兵难与争锋，要暂时放弃梁国的部分领土，引诱并牵制敌军，使其力量削弱、疲劳，同时派兵断其粮道，便可取胜。景帝同意了他的计划。周亚夫率军由长安出发，行经霸上(陕西西安东)时，部下赵涉建议说，吴王富有资财，多养敢死之士，知道将军的动向，定会在崤山、渑池之间设置间谍，骚扰破坏行军；用兵贵在神速秘密，将军何不经蓝田出武关，只不过多用一二天的时间，便能出敌不意，安抵洛阳，控制武库。周亚夫表示赞同，立即改变了行军路线，迅速由蓝田出武关，经南阳到达洛阳，并派兵抢先占领了荥阳要地，控制了武库和敖仓。为了保障潼关、洛阳间的交通补给线和后方的安全，又派兵清除了崤、渑间的吴楚伏兵。

吴楚联军在棘壁(河南永城西北)之战中，歼灭梁军数万人，乘胜西进，进攻梁国。梁军退保睢阳(河南商丘南)，被吴楚军队围攻。周亚夫接受了老将邓都尉的计策，把主力部队屯驻昌邑(山东金乡西北)，筑垒固守。吴楚联军全力进攻睢阳，梁王数次派人求救，周亚夫为了消耗敌人兵力，保持力量以待决战，不予增援。梁王上诉于景帝，景帝下诏命令周亚夫救梁，亚夫仍不肯直接出兵与敌军主力交战，只派轻骑出淮泗口，迂回到吴楚联军的背后，绝其粮道；直到

敌军力量疲惫之后，才将主力推进至下邑（安徽砀山）。

吴楚久攻睢阳不下，屡受损失，西进关中的计划无法实现，退路又受到威胁，便调转兵力进攻下邑，寻求与汉军主力决战。周亚夫深沟高垒，坚壁不出。吴楚联军求战不得，派部分兵力佯攻汉军营垒的东南角，转移其注意力，再以主力强攻西北角。这一企图被周亚夫及时识破，加强了营垒西北角的防御，粉碎了敌军的偷袭阴谋。

吴楚联军西进无望，求战不能，又被汉兵断绝粮道，给养不至。在粮尽兵疲、士卒大量叛逃的情况下，只得引兵退走。周亚夫乘势追击，大破敌军，楚王刘戊自杀，吴王刘濞丢掉大军，仅率数千人退保江南丹徒（江苏镇江），还想依托东越作最后挣扎；而东越王在汉军的威慑和重金利诱下，杀死了刘濞。吴楚起兵，历时三月，至此完全失败。

在齐地，胶西、胶东、菑川、济南四王的军队围攻齐都临淄，三月不下。汉将栾布率军救援来到，叛军兵疲意沮，全被击败，胶西王卬自杀，其余各王也被杀。赵王刘遂起兵后，集结力量，暗中联络匈奴，拟待吴、楚破梁以后，再西攻长安，坐享其成。当郦寄领兵向赵国进攻时，赵军立刻退保邯郸，坚守达七月之久。匈奴单于听说吴楚已败，不肯发兵救赵；致使栾布在平定齐地之后，得以从容回师，与郦寄合力攻赵，引水灌坏邯郸城，赵王遂于城破后自杀。至此，吴楚七国之乱结束。

吴楚七国之乱的平定，使地方割据势力受到了沉重的打击，在很大程度上解决了汉高祖分封同姓诸侯王所引起的政治矛盾。景帝乘势“抑损诸侯，减黜其国”，改王国丞相为相，废除其御史大夫、廷尉、宗正等官，对大夫以下的其它官吏也予以裁减，把王国的行政权和官吏的任免权全部收归中央，命令诸侯王不得处理政务，使他们的权力被大大削弱，为后来汉武帝颁行“推恩令”，彻底结束汉初以来诸侯割据的状态创造了必要的条件。　（宋　杰）

张骞通西域

西汉武帝时派张骞两次出使西域、建立友好往来的历史事件。

汉朝以来，玉门关、阳关以西即今新疆乃至中亚、印度、伊朗高原、阿位伯半岛及小亚细亚等地，被称为“西域”。而狭义的“西域”，则是指葱岭（帕米尔高原）以东，甘肃敦煌以西，今新疆天山南北地区。西汉时代，西域共有36国，绝大多数分布在天山以南塔里木盆地南北边缘的绿洲上，称为“南道诸国”和“北道诸国”。这些国家多以城郭为中心，兼营农牧业，有些还能自铸兵器、农具；少数国家则以游牧为生，逐水草而居。天山以北的准噶尔盆地气候湿润，水草肥美，宜于农牧业，也分成若干小国，统称为“山后诸国”。西域各国语言不一，互不统属；由于自然条件的限制，每国的人口一般只有几千到几万人，最大的国家是山后的乌孙，有12万户，60余万人。

西汉初年，我国北方的游牧民族匈奴强大起来，向西扩展，征服了西域诸国。匈奴右部的日逐王在北道的焉耆、危须、尉犁之间设置了“僮仆都尉”，率领数千骑兵往来巡视，向诸国强征贡赋，掠夺人口，在经济上获得资助。汉武帝即位后，出于反击匈奴侵扰的需要，企图联合被匈奴逐出河西、迁至西域的大月氏人，共同夹击匈奴。建元三年（前138），武帝招募愿赴大月氏的使者，汉中成固（陕西城固）人张骞以郎应募，率众100余人首次出使西域。他们进入匈奴控制的河西地区时被俘获，押送到单于的王庭（约在今内蒙古呼和浩特一带）。匈奴诱迫张骞投降，而他保持汉节，严辞拒绝，被拘留了10年左右。后趁匈奴看守不严而逃脱，西行数十日，翻过葱岭，到达大宛。大宛国王旧闻汉朝富饶，想和汉朝通好，便派人向导，将张骞一行送往康居，转程到大月氏。当时大月氏已从伊犁河流域西迁，占据大夏故地。他们认为新居之地肥饶安宁，而汉朝距离太远，不愿与汉结盟，向匈奴报仇，归还故地。张骞在当地居留了一年，不得要领，无奈只得回国。途中他们又被匈奴截获，扣留了岁余。元朔三年（前126），匈奴首领军臣单于病死，国内贵族争位，发生战乱，张骞与他的胡妻及随从堂邑父乘机逃走，返回长安，因功受封为博望侯，官居太中大夫；堂邑父封为奉使君。张骞首次出使西域，前后历时13年，历尽艰险，百余人的使团仅有二人生还。根据张骞的报告，武帝了解到西域各国的情况，决心加强双方的联系。元狩二年（前121），汉军击败匈奴，夺取了河西走廊。从此，自盐泽以东，空无匈奴，汉朝与西域之间开辟了一条安全的通道。

元狩四年（前119），张骞以中郎将奉命再次出使西域，目的是联络大国乌孙，请其返回故地河西，共同打击匈奴；并招引西域各国臣属于汉。汉朝的使团有300余人，每人马各二匹，并携带牛羊万头，价值亿万的金帛，顺利到达乌孙。乌孙国王猎骄靡年老，不能做主；大臣们都惧怕匈奴，认为汉朝太远，不愿迁回故地；但答应派使者数十人随张骞入朝，献良马数十匹答谢。张骞又派遣副使分赴大宛、康居、大

月氏、安息、身毒、于阗及诸旁国,进行外交活动。元鼎二年(前 115)夏,张骞同乌孙使者回国,其副使也带了西域各国的使者陆续还朝。从此,汉朝与西域葱岭内外诸国首次建立了外交关系,相互间的交往日益频繁起来,而乌孙后来也和汉朝通婚和好,共同击破匈奴。汉朝交通西域,由张骞建立首功,因为他在当地甚有威信,后来汉朝遣往西域的使者仍然使用博望侯的称号,以取信于诸国。古代中国通往西方的经济、文化交流干线——“丝绸之路”得以开辟,张骞对此做出了卓越的贡献。　(宋　杰)

罢黜百家,独尊儒术

建元六年(前 135),汉武帝尊崇儒术、将黄老刑名百家之言排斥于官学以外的措施。

西汉初年,汉高祖刘邦仍然奉行秦代的“挟书律”,禁止私人收藏《诗》、《书》、《百家语》等,违者处以族刑,并蔑视儒学和儒生。在此情况下,儒家的学术活动几乎断绝。惠帝四年(前 191),宣布废除“挟书律”,诸子百家学说开始复苏,民间比较活跃的有阴阳、儒、墨、名、法、道六家,其中儒、道两家影响较大。博士制度在汉初依然存在,高祖曾以叔孙通为博士,文帝曾以申公、韩婴、公孙臣等人为博士,但是人数不多,不过具官备员、待问而已,不受封建统治集团的重视,在传授文化方面起到的作用并不大。

由于社会经济遭到长期战乱的严重破坏,汉初的统治阶级所面临的紧迫任务是恢复、发展生产,稳定封建统治秩序,所以在政治上主张“无为而治”,提倡统治者用少有作为的办法,来缓和与农民的阶级矛盾、与匈奴、南越的民族矛盾以及统治集团内部的矛盾斗争。这样,在思想上,主张清虚自守、卑弱自持的道家黄老学说受到重视,在意识形态领域占据了支配地位。

武帝即位时,社会生产经过几十年的休养生息,得到了很大程度的发展;地主阶级和封建国家积累了巨量的财富,其力量已很强大;对农民的压迫、剥削也逐渐加重,促使阶级矛盾日益激化;地方上诸侯王等割据势力恃怙权势,企图与中央分庭抗礼;豪强、商人日甚一日地兼并农民;匈奴时汉朝的侵扰欺侮肆无止境。因此,从政治和经济上进一步强化专制主义中央集权制度已经成为封建统治者的迫切需要。在这种情况下,主张清静无为的黄老道家思想已不能满足地主国家的现实要求了,而儒家的春秋大一统思想、神化皇权的君臣伦理观念以及仁义学说却和当时封建统治集团所面临的形势与任务比较适应,儒家思想开始取代了道家黄老之言在思想领域中的支配地位。

汉武帝建元六年,董仲舒在举贤良对策中提出,现在官学和民间流行的诸子百家学说遵循的理论不同,以致影响到国家不能保持一贯的政策,法令制度常常改变,下边的民众不知所守,这种情况不利于封建专制政治,建议官府只任用讲儒学的人,“诸不在六艺之科、孔子之术者,皆绝其道,勿使并进”。得到汉武帝的赞许,并同意丞相卫绾的奏言,罢黜各地荐举的治申(不害)、商(鞅)、韩非、苏秦、张仪之言的贤良之士。武帝后又起用好儒的窦婴、田蚡为丞相、太尉,任儒生赵绾为御史大夫、王臧为郎中令,以此褒扬儒学,贬斥道家。赵绾等鼓动武帝改革政治,不向暗中执政的窦太后请奏,引起太后的不满。她借故将赵绾、王臧逮捕入狱,二人自杀;又逼迫武帝将窦婴、田蚡免职,儒家势力再次受到打击。

建元六年,窦太后去世,武帝拜田蚡为丞相,将官府里不治儒学五经的太常博士一律罢免,黄老、刑名等诸子百家之言都被排斥在官学之外,并且优礼延揽儒生数百人,在官办的太学和郡县学校里任职,只教授儒家的《诗》、《书》、《礼》、《易》、《春秋》五种经典,这就是著名的“罢黜百家,独尊儒术”。自此以后,官吏主要出于儒生,儒学逐步发展,成为二千年来地主阶级统治人民的封建正统思想。

此时的儒学,已和先秦时以孔孟为代表的儒学思想有所不同,它在原来“仁义”、“教化”等学说的基础上,又吸收了阴阳五行家神化皇权的思想,极力鼓吹封禅和改制;又接受了法家尊君抑臣、增设刑法、任用酷吏的学说,使儒学更为完备,形成了以霸道(法家理论)、王道(儒家理论)杂而用之的统治手法,对后代的影响颇为深远。　(宋　杰)

马邑之谋

元光二年(前 133),汉武帝反击匈奴侵扰的军事行动。

秦汉之际,北方游牧民族的首领冒顿单于率领部众东取东胡,北服丁零,西逐大月氏,其统治区域横跨蒙古高原,国势强盛。自汉朝建立以来,匈奴经常南下袭扰汉北部边郡,杀戮吏民,掠夺人畜财物,构成对西汉政权的严重威胁,也给北方各族人民带来沉重的灾难。

汉初,中原经济残破,因此,从汉高祖到文帝、景帝时期,无力反击匈奴的南侵,被迫采取“和亲”政策,把汉室公主嫁给单于,每年送去大批的丝绸、粮

食、酒等财物，与匈奴首领约为兄弟，以缓和其侵扰。但是匈奴贵族既不放弃和亲的利益，又不肯停止武力掠夺的行动，西汉王朝虽然进行了先后八次和亲，而每次只能维持短暂的和平。

汉武帝时，国家经过文景时期几十年的休养生息，经济、军事实力空前雄厚，又平息了诸侯王发动的吴楚七国之乱，已无内顾之忧，反击匈奴的条件完全成熟了。元光二年，雁门郡马邑（山西朔县）豪强聂壹通过大行王恢上书献计，请求反击匈奴；提出匈奴刚与汉朝和亲，对汉不加戒备，可诱之以利，设伏袭击，定能获胜。武帝本来就对屈辱的和亲措施感到不满，便召集公卿大臣商议此计是否可行。御史大夫韩安国力主和亲，认为汉高祖、文帝向匈奴用兵，都无功而还。采取和亲政策已然延续五世，有利于天下；如果开战，卷甲轻举、深入长驱，给养运输和联络都很困难，是难以成功的。王恢坚决主战，指出战国初期代国虽小，匈奴还不敢轻易进犯它。现在天下统一，反而边境数惊，士卒伤死，棺木相望，这是国家的耻辱。况且反击匈奴，并非一定要深入其地，可以诱敌入边，设奇兵伏击，这样，“单于可擒，百全必取”。武帝采纳了王恢的建议，批准执行聂壹的计策，决心放弃和亲，与匈奴开战。

同年六月，聂壹佯作内奸，逃出边塞，引诱匈奴军臣单于说，他能斩马邑县令和县丞，以全城投降，财物可尽归匈奴。军臣单于信以为真，亲率10万骑兵按期进至武州塞（山西左云县）。汉武帝发兵30万，以韩安国为护军将军，卫尉李广为骠骑将军，太仆公孙贺为轻车将军，率领主力预先埋伏在马邑附近的山谷里。王恢为将屯将军、太中大夫李息为材官将军，另率军一部出代郡（治今河北蔚县东北）西部，准备从侧后袭击匈奴军队的辎重，企图一举歼灭匈奴精锐。到了约定的日期，聂壹斩下死罪囚犯的首级，冒充县吏的人头，挂在马邑城下，欺骗匈奴使者，谎称已杀死令丞，占据该县。又在城北百余里外放牧畜群，制造假象。单于得信后领兵入塞，见畜群布野，无人放牧，甚为怀疑；又在进军途中俘获了巡防的汉朝雁门尉史，尉史供出汉军计划，单于大惊，急忙退兵。汉军闻讯后追至边塞，而匈奴已经远去，追赶不及。汉朝首次兴师动众，计划遭到失败。王恢负责攻击匈奴辎重，因为部下仅有3万人，不敢出塞追击；还军后，武帝怒而将他逮捕，送交廷尉审判，定为斩罪。王恢以千金行贿丞相田蚡，而田蚡胆怯，不敢向武帝求情，便请太后对武帝说：“王恢首为马邑事，今不成而诛恢，是为匈奴报仇也。”武帝回答说，首先倡议马邑之谋的就是王恢，朝廷听从他的话，征发了天下几十万大军。计划泄露后纵使不能擒获单于，王恢所部若是进击匈奴的辎重，也还能取得战果，宽慰士大夫们的心情。现在不杀王恢，无法向天下人谢罪。王恢闻讯后，即在狱中自杀。

马邑之谋使汉朝与匈奴的关系正式破裂，和亲断绝，揭开了双方长期战争的序幕。 （宋 杰）

卫青、霍去病反击匈奴

西汉武帝时将军卫青、霍去病领兵数次反击匈奴侵扰、获得胜利的军事行动。

元光二年（前133），马邑（山西朔县）之谋揭开了对匈奴大规模作战的序幕。在此之后，匈奴频频大举进攻汉朝北方边郡，汉军也屡屡发动反击，其中影响较大、带有决定性的是汉朝将军卫青、霍去病领兵攻击匈奴的三次战役。

一、河南之战。元朔二年（前127）春，匈奴军队袭扰上谷、渔阳，杀掠吏民数千人。当时匈奴右贤王及白羊王、楼烦王占据河南地（即阴山、河套地区），并以此作为袭扰关中的出发基地，对汉京师长安构成很大的威胁。武帝不受匈奴军队袭扰上谷、渔阳的牵制，决定收复河南地，以彻底解除匈奴威胁长安的隐患。于是采取胡骑东进、汉军西击的作战方针，派车骑将军卫青、将军李息率兵出云中（内蒙古自治区托克托旗），沿黄河北岸西进，用避实击虚的战略，迂回到陇西，对河套及其以南的匈奴军队进行大包围，发动突然袭击，歼敌数千人，获牛羊百余万头，匈奴白羊王领残部逃走，西汉完全收复了秦末以来被匈奴占领的河套地区。武帝采纳了谋臣主父偃的建议，在当地设置了朔方郡（治今内蒙古自治区杭锦旗北）和五原郡（治今内蒙古自治区包头市西），又派苏建督率十余万人兴建了朔方城，重修秦代所筑的旧长城，从内地移民10万在朔方定居，充实边防力量，建立了反击匈奴的前沿基地，消除了首都长安所受的威胁。汉得河南地后，匈奴贵族不甘心失败，连年入侵上谷、代郡、雁门、定襄、云中、上郡、朔方，企图夺回失地。汉军在卫青指挥下数度出击，在漠南多次战败匈奴，确保了朔方地区的巩固，使匈奴主力退往漠北。

二、河西之战。河西郡在今甘肃的武威、张掖、酒泉等地，因位于黄河之西，自古称为河西，是内地至西域的通道。匈奴驱逐大月氏占领河西之后，将酒泉地区封给浑邪王，武威地区封给休屠王，借以西控西域各国，南与羌族联合，袭扰汉朝的西部地区。为了

打开通往西域的道路，保卫西部边境的安全，汉朝在元狩二年（前121）三月，命将军霍去病率骑兵万人出征，发动了河西战役。

霍去病领兵出陇西，经金城（甘肃兰州西北）、令居（甘肃永登西），越乌鞘岭，穿过匈奴所属的五个王国，连战连捷，然后越过焉支山，涉千余里，和匈奴军队短兵相搏，大获全胜，杀其卢胡王、折兰王，俘虏浑邪王子及相国、都尉等，歼敌8960余人，缴获休屠王的祭天金人。匈奴浑邪王、休屠王等率败军逃走，汉兵在作战中亦伤亡7000余人。

同年夏天，霍去病再次西征，与合骑侯公孙敖领数万骑兵，从北地（治今甘肃庆阳西北）出发，越贺兰山，绕居延泽，在祁连山与合黎山之间的黑河（今弱水上游）流域大破匈奴浑邪王、休屠王的军队，俘虏其五王及王母、单于阏氏、王子59人，相国、将军、当户、都尉等63人，匈奴单桓王、酋涂王及相国、都尉等2500人投降，共斩敌3万余人。这次战役沉重地打击了匈奴右部，单于对接连失败的浑邪王、休屠王十分恼恨，要严加惩处，引起内讧。同年秋天，浑邪王杀休屠王，率众4万余人投降汉朝，武帝将他们安置在陇西、北地、上郡、朔方、云中五郡黄河以南的故塞之外，为五属国；又在河西陆续设置酒泉、武威、张掖、敦煌四郡，组织移民到那里定居。这次战役的胜利，不仅隔绝了匈奴与羌人的联系，而且沟通了内地与西域的直接交往，加强了中国与西方各国的经济、文化交流。匈奴失去了水草丰美的河西地区，经济上亦受到很大损失，以致作歌道："失我祁连山，使我六畜不蕃息；失我焉支山，使我嫁妇无颜色。"

三、漠北之战。匈奴贵族在屡次失败之后，改变了作战的策略，其首领伊稚斜单于接受了汉朝降将赵信的建议，认为"汉兵不能度幕（沙漠）轻留"，所以把军队主力和人畜转移到蒙古大沙漠以北，仅派遣少数部队袭扰汉朝边境。元狩三年，匈奴骑兵数万人攻入右北平、定襄，杀掠吏民数千人。为了彻底战胜匈奴，汉武帝召集诸将商议，决定利用赵信等人的错误判断，因势利导，乘其不备，集中骑兵10万人深入漠北，寻歼匈奴主力。

元狩四年，大将军卫青率前将军李广、左将军公孙贺、右将军赵食其、后将军曹襄等，领骑兵5万出定襄；骠骑将军霍去病率从票侯赵破奴、昌武侯安稽、北地都尉卫山、校尉李敢及匈奴降将复陆支、伊即靬等，领骑兵5万东出代郡。赵信听说汉军北进的消息，又向单于献计说，汉兵如果越过沙漠，兵马定会疲惫，匈奴可以以逸待劳，坐待虏获汉军人马。伊稚斜单于遂将全部家小、牲畜、辎重更向北方转移，自领精兵待于漠北。

卫青出塞后，捕获俘虏，得知单于驻地，便率主力北进千余里，越过大漠，发现单于军队后，便下令用兵车环绕为营，以防突袭；又派出5000骑兵与敌人交战。至黄昏时，大风忽起，沙砾扑面，卫青乘机派部队从两侧迂回，包围了单于的营阵，激战至深夜，单于见汉军势众，自料不能取胜，率精骑数百突围，余众溃散。汉军歼敌19000人，获胜后遣轻骑追赶单于至天明，到寘颜山（蒙古杭爱山南端）赵信城，缴获匈奴大批屯粮，补充军需，尽焚其城与余粮而还。

霍去病率军出代郡，北进二千余里，渡过大漠，同匈奴左贤王军队交战，大获全胜，俘屯头王、韩王以下70400余人。左贤王及部将弃军逃走，汉军追至狼居胥山（蒙古乌兰巴托东），凯旋而归。

漠北之战是汉匈战争中规模最大的一役，汉军损失数万人、马11万匹，而匈奴军队的损失更为惨重，两路被歼达9万余人，其力量大为削弱，一时无力南渡大漠侵扰，造成了"是后匈奴远遁，而幕（漠）南无王庭"的局面。此后直到武帝去世（前87），汉匈之间虽然不断有零星的交战，互有胜负，但匈奴总的趋势是日渐衰落，再也不能对汉朝构成严重的威胁了。卫青、霍去病在以上数次战役中，表现了出色的指挥才能，他们充分发挥了骑兵作战的机动性，大胆深入，猛打猛追，成功地完成了各项作战任务。卫青、霍去病反击匈奴战争的胜利，制止了匈奴贵族的残暴杀掠，保护了汉朝北方边境人民生命、财产的安全，使当地获得进一步的开发，汉朝与西域的交往也得到保障，其历史影响是深远和重大的。　（宋　杰）

淮南王安、衡山王赐谋反

西汉武帝时地方诸侯王阴谋反叛、被朝廷发觉处置的历史事件。

刘安（约前179—前122）系西汉淮南王刘长之子，刘长于文帝时谋反被捕，废去王位后迁徙蜀郡严道（四川荥经），于途中自杀。文帝八年（前172），刘安受封为阜陵侯，后晋封淮南王。他因其父被朝廷治罪而死，时时怨恨不已，意欲谋叛；经常施行小惠于百姓，收买民心，以至天下流誉。吴楚七国发动叛乱时，曾派遣使者到淮南联络，刘安准备起兵响应，但由于国相掌握兵权，反对叛乱，而未能得逞。武帝即位后，他又勾结当时任太尉的田蚡，欲立为帝，聚积金钱赂遗郡国诸侯守相与朝中大臣，招致宾客方术之士数千人，整治攻战器械，意图起兵反汉。王后荼

与太子刘迁也专擅国权，侵夺百姓田宅，滥捕无辜，多做不法之事。元朔五年(前124)，刘安因阻拦郎中雷被从军击匈奴，被人告发后罚削二县。其后益怒，日夜与谋士伍被、左吴等策划叛乱，私做皇帝玺和丞相、御史、大将军及邻近郡太守、都尉印与汉使节法冠。并派遣间谍西入长安，投在大将军卫青、丞相公孙弘等门下，企图在起兵时刺杀朝中大臣。又恐怕在叛乱时受到国相、二千石长吏的阻挠，准备伪作宫中失火，骗相、二千石进宫救火再将其杀害，然后派人诈称南越兵入界，以此为由发兵造反。元狩元年(前122)，淮南王孙刘建怨其父不害不得封侯，使人告发刘安谋反，武帝交丞相、廷尉审理；谋士伍被亦诣官自首，朝廷派遣官吏至淮南逮捕王后、太子及诸宾客，搜出各种谋反器具。刘安畏罪自杀，王后荼、太子迁被判处斩首，与其策划谋反者皆受族诛。和此案有牵连而被处死的列侯、二千石长吏、京师郡国豪杰等有数千人，其中有利侯刘钉、安平侯鄂但因与刘安私通，在书信中称臣而论以弃市；岸头侯张次公接受刘安财赂，并和其女陵通奸，被免去爵邑。侍中严助素与刘安结交，私下议论，并受其贿赂，案发后武帝本不愿判他死刑，但遭到廷尉张汤的反对，认为严助出入宫禁，是天子心腹之臣，而外与诸侯交利如此，不诛，无可惩治后人；终于将严助处死。淮南王国被废，其地改为九江郡。

刘赐(?—前122)系刘安之弟，文帝八年(前172)封为阳周侯，16岁立为庐江王。景帝四年(前153)，因数次与越人私相交通，徙为衡山王。武帝初，其国内史上奏刘赐诬陷谒者卫庆犯有死罪，并拷打强迫他承认，又多次侵夺人田、坏人冢墓以为田。有司请求逮捕刘赐，加以审理。武帝不许，但剥夺了他任命秩二百石以上官吏的权力。刘赐因此心怀怨恨，与淮南王刘安私约谋反，谢病不朝，在境内交结宾客壮士，寻求通习兵法占星望气者，并制造战车弓箭，刻天子玺、将相军吏印，策划起兵。元狩元年，刘赐次子孝之门客陈喜因参与淮南王安谋反事被捕，刘孝恐被告发，闻律文有“先自告，除其罪”的规定，便自己出首，告发他与父及宾客救赫、陈喜等图谋反叛。廷尉审讯后，公卿大臣请求逮捕刘赐，遭到武帝拒绝，派遣中尉司马安、大行李息前往衡山国讯问刘赐，刘赐俱以实情相告。司马安等回报后，朝廷准备派遣宗正、大行与沛郡官吏共同审理此案，刘赐闻讯后畏罪自杀。刘孝由于先前自首，免除其罪；但因为他与父王婢女通奸，被处以死刑。王后徐来因蛊杀前王后乘舒，太子刘爽因曾被其父控告不孝，均斩首弃市；与衡山王赐策划谋反者都受到族诛的严惩。衡山国废除，改为衡山郡。（宋　杰）

推恩酎金

西汉武帝为了削弱、打击诸侯割据势力而采取的两项政治措施。

早在汉文帝时，面对诸侯王势力日益膨胀、强大，威胁中央的形势，大臣贾谊为了加强中央集权，削弱地方割据势力，向文帝上《治安策》，根据历史经验得出了“大抵强者先反”的结论，提出“欲天下之治安，莫若众建诸侯而少其力”。其具体解决办法就是规定将诸侯王国再分为若干小国，依次封给诸侯王的子孙，地尽而止。封土广大而子孙少者，也要虚建国号，待其子孙出生以后再行分封。这样一代代地分割下去，诸侯王国的领土自然是越来越小，而诸侯王的子孙们知道按规定他们一定会受封，不再担心失封，也就不会有反叛之心。文帝在一定程度上采纳了贾谊的建议，把淮南、齐等诸侯大国分析为几个小国，但是没有完全解决问题。汉景帝时平息了诸侯王们掀起的“吴楚七国之乱”，并采取了一系列相应的措施，限制和削弱了地方割据集团的力量。

到汉武帝在位时，经济繁荣，国力强盛，有条件进一步实行巩固中央集权、打击王国、侯国势力的措施。元朔二年(前127)，中大夫主父偃(?—前126)继承了贾谊分析王国的政治思想，在给武帝的上疏中提出：当今诸侯王连城数十，地方千里，缓则骄奢而易为淫乱，急则合纵以反抗朝廷，对加强中央政令的推行不利。因此建议，令诸侯王得推恩分封子弟为侯。原来诸侯王的爵位是由嫡子继承，庶出的子孙没有继嗣的资格。主父偃认为，诸侯骨肉子弟无尺地之封，仁孝之道就得不到宣扬；所以主张除了其嫡长子继承王位之外，其他诸子都在王国范围内分割封地，建立侯国，把大的王国剖分为一个较小的王国与若干个小侯国。这样，诸侯子弟人人喜得所愿，名义上是施行德惠，实际通过分割封国削弱了诸侯的势力。这个主张适应汉武帝巩固封建专制集权制度的需要，又避免了引起诸侯王叛乱的可能，所以被武帝立即接受。同年春正月，武帝制诏御史，颁行“推恩令”，宣布：“诸侯王或欲推私恩分子弟邑者，令各条上，朕且临定其号名。”这项法令实行以后，诸侯王的支庶子弟多得以受封为列侯。《汉书·王子侯表》中记载的侯爵名号，大部分是在武帝元朔年间受封的。结果，诸侯王国都分为几个或十几个侯国。依照汉朝的制度，侯国隶属于郡，地位与县相当，这样就导致了

王国领土缩小与朝廷直辖政区的扩大。此后，大国不过十余城，小侯仅有数十里封地，势力大为削弱。汉武帝又作"左官律"，规定凡在诸侯王国任官者，地位、秩禄低于中央任职的同级官吏，并不得再到朝廷为官；以此限制诸侯王网罗人才。还设"附益之法"，严禁封国的官吏、士人与诸侯王串通往来、结党营私，以达到孤立他们的目的。

酎金夺爵事件发生在武帝元鼎五年(前112)，当时汉朝发兵数十万征讨南越，列侯几百人都没有响应朝廷号召，未请求从军出征，引起武帝的不满。同年九月在长安祭祀高祖宗庙时，诸侯王和列侯要按规定随同酎酒(一种自一月至八月分三次追加原料反复酿成的优质酒)献金助祭，称为"酎金"，依照其封国的人数，每千口献金四两，余数超过五百口的也要献金四两，由少府验收。武帝借口列侯贡金有重量或成色不足者，对他们劾以不敬的罪名，取消其爵位，剥夺其爵号、封国者多达106人。丞相赵周因为知酎金轻恶而不纠举，被追究罪责，逮捕入狱，后自杀身死。至此，诸侯王、列侯不仅辖地缩小，数量也大为减少，仅能衣食租税，不得参与政事。这样，汉初以来，地方诸侯王对于专制主义中央集权政府的威胁便完全解除了，结束了统一局面下实际存在的割据局面。　(宋　杰)

设十三州刺史

元封五年(前106)汉武帝时在全国设地方监察机构，加强中央集权的措施。

秦朝统一六国后，分天下为三十六郡，曾在各郡设监郡御史，隶属于御史大夫，对郡县官吏进行监察，以加强中央政府对地方的控制。汉朝建立后，减省了御史监郡的制度；至汉惠帝三年(前192)，相国曹参因为京师长安附近的三辅地区多发生违法事件，奏请在当地恢复旧制，派遣御史监察词讼、盗贼、铸伪钱、狱不直，徭赋不平、吏不廉、吏苛刻、逾侈及作非所当服等九事。以后朝廷又先后向郡国普遍派遣监察御史，又遣丞相史分刺各地，考察地方官，并督察监察御史，时置时省。

汉武帝即位后，中央统辖郡国数达百余，比汉初大为增加，原来负责监察地方的御史、丞相史职事重叠，各自为政，又没有固定的监察地区，已不能适应中央集权政治的需要。随着封建制度的发展，当时社会上出现了许多骄纵不法的豪强地主；他们宗强族盛，武断乡曲，兼并农民土地，破坏国家的法度；而郡县长吏或与之勾结，狼狈为奸，多有徇私舞弊、鱼肉百姓者。为了强化中央对地方的督察和控制，汉武帝在元封五年实行了新的监察制度，把全国政区除了三辅(京兆、冯翊、扶风)、三河(河南、河内、河东)与弘农之外分为13个监察区域，即冀州、兖州、青州、徐州、扬州、荆州、豫州、益州、凉州、幽州、并州、交趾、朔方13部，每个州部设刺史一人，分管几个郡国的监察事务。

刺史秩六百石，位下大夫，上受中央御史中丞直接管辖，主要职责是代表朝廷督察诸侯王、列侯、郡守相和地方豪强的违法行为。刺史在辖境内有固定的治所，每年八月巡视所部的郡国，考察吏治，惩奖官员，断治冤狱。规定以六条问事，其具体内容为：一、强宗豪右田宅逾制，以强凌弱，以众暴寡。二、郡国长吏不奉行诏书遵承典制，背公向私，侵渔百姓，聚敛为奸。三、郡国长吏不恤疑狱，风厉杀人，怒则任刑，喜则淫赏，烦扰苛暴，剥截黎民，为百姓所疾。山崩石裂，妖祥讹言。四、郡国长吏选署不平，苟阿所爱，蔽贤宠顽。五、二千石子弟恃怙荣势，请托所监。六、郡国长吏违公下比，阿附豪强，通行货赂，割损正令。刺史所举劾者，由丞相遣史案验，但是只能监察郡国二千石长吏施政是否得当，不得干预地方行政事务。征和四年(前89)，武帝又置司隶校尉，督察三辅、三河与弘农七郡，职权同州部刺史相等。刺史和司隶校尉的设立，对于整肃吏治、维持封建统治秩序起到了促进的作用，将全国各地的监察权集中到中央，便于皇帝掌握。西汉后期，刺史的权力日益增大，可以任命地方官吏和决断刑狱，造成对郡国守相职权的侵越。为了使刺史的权位与品秩相称，成帝时改刺史为州牧，秩禄提高到二千石。哀帝时一度复刺史旧制，后又改变为牧，实行到西汉灭亡。(宋　杰)

汉武帝筦盐铁

汉武帝元狩五年(前118)，封建国家对盐、铁等重要物资实行官营专卖的措施。

盐是人民生活基本的消费品，铁器则是封建时代主要生产工具，盐、铁在古代社会具有广泛的市场，利润丰厚，生产规模又比较大，是个体劳动所无法进行的。西汉初年，盐、铁的生产和贸易由私人经营，政府仅设官收税而已；特别是在文帝统治时期，对盐铁经营采取放任的态度，以致富商大贾、豪强地主们往往专擅山海之饶，采矿冶铁煮盐，一家使用的劳力或至千余名。他们聚集亡命，役利细民，垄断了对国计民生有重要影响的盐铁行业，不仅影响了中央的财政收入，而且助长了地方的分裂割据势力，如

景帝时发动“吴楚七国之乱”的吴王刘濞，就依靠煮海为盐获得巨额财富，以供叛乱资用。

汉武帝在位时，连续发动了多次对边疆各族的战争，耗费巨量的人力、财力，文帝、景帝时期遗留下来的府库积蓄用度殆尽，出现了财政危机。武帝为了增加收入，采取了许多措施，如募民入奴婢、入羊、入钱、入粟以拜官或赎罪，设武功爵十七级出卖，但是搜集的财富远远不够需要。于是在元狩年间，武帝正式打破不准商人充当官吏的禁令，起用齐地(今山东)大盐商东郭咸阳、南阳大冶铁商孔仅为盐铁丞，领盐铁事；洛阳贾人子桑弘羊为侍中，会计用事，筹备经济、财政上的改革措施。元狩五年，大农令郑当时(名庄)提出建议，请求在全国实行盐铁官营，称为“筦(管)盐铁”，具体办法是：国家在产盐区设立盐官，提供煮盐的生产工具“牢盆”和伙食，招募百姓充当盐工，费用自负，产品全部由官府收购，然后出卖。另外在产铁区设立铁官，政府组织犯人、服徭役的农民、士兵进行采矿、冶炼和铸造。这是因为开矿、冶铁通常在深山之中，劳动条件和生活待遇比较恶劣，实行招募恐怕没有人愿意去，所以不得不采取强制的办法。不出铁的郡在属县设置小铁官，各地的官营盐铁机构全部直属于中央的大农令，地方郡国无权管理。盐铁官吏多任命过去的盐铁商人来担任，严禁私人铸造铁器和煮盐贩盐，违令者处以“钛左趾”的刑罚，并没收其器物。武帝同意，随即派孔仅、东郭咸阳乘传车驰往全国各地，取缔私人盐铁业，逐一建立盐铁官，这个过程直到元封元年(前110)，桑弘羊任大农令，代孔仅管天下盐铁事时才告完成。据《汉书·地理志》记载，西汉国内共设盐官37处，分布在27个郡国；铁官遍及39郡国的48县。

盐铁官营的施行给了豪强富贾以沉重的打击，为汉朝政府增加了大量财政收入，但是其经营管理不善，成本高而生产效率低，产品的质量很差而价格昂贵，如制造的铁器，“民用钝弊，割草不痛，是以农夫作剧，得获者少，百姓苦之矣”。政府甚至在民众不欢迎的情况下强迫他们购买使用，因此盐铁官营的政策遭到豪强商贾和百姓的强烈反对。昭帝始元六年(前81)，郡国所举的贤良文学与丞相田千秋、御史大夫桑弘羊共商国是，论民间疾苦。贤良文学对盐铁专营进行了尖锐的批评，桑弘羊则代表官方，为盐铁专营辩护。双方各执一词，言语激烈，会议的结果是朝廷作出部分让步，取消了关内铁官和酒类的专卖。国家垄断盐铁生产销售的制度直到东汉和帝永元三年(88)才正式宣告废除，准许私人经营。

(宋 杰)

均输平准

元鼎二年(前115)，西汉政府开始直接经营全国贡物赋税的运输管理和控制京师市场贸易的重要措施。

汉朝初年，郡国向朝廷贡献土特产品，各自运输到京师长安，往来烦难，费用很多，而且物品多有损坏，质量难以保证，有时贡物的价值还抵不上运费。武帝元鼎二年，商人出身的理财家桑弘羊擢迁大农丞(大农令属官)，掌管诸会计事，针对上述弊病，建议在国内试行“均输法”，至元封元年(前110)，桑弘羊任搜粟都尉，遂在全国大力推行。“均输”就是调剂运输，由中央的大农派出部丞数十人，分部主管各地的运输贡品事务，在郡国设立均输官，将各地应上缴的贡物、特产转运到价格较高的地方出售，再在价格较低的地方收买京师所需的物品，运送过去；有时将所得现钱又转买当地土特产品易地再贩，借以周转运销，增加官府收入，消除了贡品运输制度中的不合理环节。同时，桑弘羊又创立了“平准”制度。“平准”即平衡物价，其内容是由大农在京师长安设立专门机构，置平准令一人，接受和贮存各地均输官运来的货物，按照长安市场价格的涨落情况，贵卖贱买，以此来平抑、稳定物价，调剂市场的供求关系。

均输平准政策实行之后，国家从中获取巨利、大农收入的钱帛充足，武帝巡幸朔方、封禅泰山的用度赏赐花费绢帛百余万匹，金钱以巨万计，大部分都是依靠均输平准的收入。但是也带来了一些弊病。在昭帝始元六年(前81)盐铁会议上，郡国所举的贤良文学指出：由于官吏行奸猥发，强卖滥收，迫使百姓贱卖自己生产的货物，再用高价买进官府所有的东西来缴纳贡赋，超过了原来规定的份额，使农民双重受苦，女工加倍纳税，“未见输之均也”。官吏勾结奸商，合门擅市，把万物搜买一空，囤积居奇，待机高价卖出，使物价飞涨，“未见准之平也！”贤良文学们主张官府不能与民争利，应该废除这项制度。当时虽未罢废，但均输平准到西汉末年已逐渐废弛，至东汉初年不再实行。

(宋 杰)

汉武帝禁私铸钱

元鼎四年(前113)，封建国家垄断钱币的铸造权、统一货币的措施。

汉朝初年，由于长期战乱的破坏，生产衰败，经

济萧条；因为政府无力发行货币，高祖刘邦听任百姓自行铸钱。市场上流通的"荚钱"质量低劣，币面文字为"半两（十二铢）"，实际不到三铢，薄如榆荚，故以得名。不轨逐利之徒囤积物资，引起物价飞涨，结果"马一匹百金，米石万钱"，造成了商业领域的混乱。惠帝三年（前192）不得不下令禁止私人铸钱。汉文帝即位后，又对货币制度做了一些改革，官府发行"四铢钱"，文曰半两，实重四铢；并允许私人按照国家法定的重量、成色标准铸造钱币。贾谊指出，纵民私铸铜钱有四害，一、必定会有人掺用铅铁，铸造不合规格的奸钱以求利。二、奸钱日多，合乎标准的"法钱"减少，二者并用，会使市场混乱。三、农民弃农采铜铸钱的人日益增多，造成五谷不足。四、盗铸如云，犯死罪的人不断增多，官吏到处追捕罪犯，"榜笞奔走者甚众"，引起社会动荡不安。实际远不止此，一些贵族官僚、富商大贾操纵造币之权，牟取暴利。像吴王刘濞因此富埒天子，依靠财富招聚豪杰、亡命，图谋叛乱，使地方割据势力得以膨胀，威胁朝廷的统治。政府见私人铸钱对社会的危害甚大，故在景帝中元六年（前144）颁布了"铸钱伪黄金弃市律"，用死刑来禁止盗铸铜钱和做伪黄金，只许中央政府和郡国地方政权机构铸造钱币，企图收回货币的发行权。可是直到汉武帝即位时，货币领域的混乱状态依然如故，通货膨胀的现象仍很严重："钱益多而轻，物益少而贵"。为了整顿市场秩序，武帝在建元元年（前140）和建元五年（前136）先后发行了"三铢钱"（文字、重量都是三铢）与"半两钱"（文曰半两，实重四铢，外沿有轮廓），民间私铸新钱者不可胜数。无狩年间，汉朝与匈奴的大规模交战连年进行，耗费了巨量人力、财力，国家府库空虚，亟待开辟财源。经济领域的危机迫使武帝改变过去的货币政策，厉行由国家统一发行货币，垄断钱币的铸造。

元狩五年（前118），汉朝政府发行了新的铜钱"五铢钱"，其文字和重量都是五铢，改变了西汉前期"半两钱"名实不符、重量减少的弊病，同时又把铜钱的内外边铸成凸起的轮廓，防止盗铸者把钱币的边剪磨下来，熔化后另铸新钱，在形制上也做了改进。但是由于郡国地方政府铸造的五铢钱质量较为粗劣，规格不一，所以还是给盗铸者留下了仿造的可能。元鼎二年（前115），中央政府在京师长安又发行了一种叫"赤仄钱"的五铢钱，其外廓经过锉磨加工，比较精致。政府规定一枚赤仄钱可以兑换五枚郡国五铢钱，交赋税时只能用赤仄钱。后来因为民间伪造的赤仄钱太多，不易分辨，又被废止了。

几次发行新币失败的挫折，给武帝统治集团提供了经验教训，促使朝廷采取断然措施，垄断铸钱的铜料，把铸币权收归中央，这才从根本上制止了盗铸铜钱的发生。元鼎四年（前113），汉武帝取消了郡国铸钱的权力，专令上林苑水衡都尉所属的钟官、辨铜、技巧（或曰均输）三个机构负责铸造新的五铢钱，名为"三官钱"。他还责成各郡国把以前所铸的钱币一律销毁，所得铜料输往三官，不是三官钱不准流通使用。这次禁令很严格，三官钱的质量又高，成色好，制造精致，一般人很难伪造；政府发行的钱币数量又多，盗铸无利可图；朝廷对私铸钱币者的查禁惩办非常严厉，几年内犯盗铸钱罪被处死刑者多达数十万人，此外还有经过大赦释放的百余万人，所以彻底根除了汉初以来的私铸铜钱现象。五铢钱的行用获得了长期的稳定，一直沿续到隋代，历时700余年。汉武帝依靠封建政权的强大力量统一了货币，禁绝了私铸，而它的结果是加强了国家的财力，使专制主义中央集权政体的经济基础得到了巩固。（宋　杰）

杨可告缗

西汉武帝时，封建国家鼓励人们告发富户隐瞒财产、逃避税收的历史事件。

汉初征收过财产税，称为"訾算"，家产总值每万钱每年纳税一"算"（一百二十钱左右），税率为1.2%。至武帝时，由于连年对少数民族进行战争，又内兴功利，国家财政发生危机，商人势力乘机以高利贷盘剥贫民，囤积居奇，投机倒把，积累巨额财富，既不佐助国家之急需，又严重损害平民百姓的利益，促使社会矛盾激化。元光六年（前129）冬，开始向商人征收车船税以及算缗钱（对积聚铜钱的课税，每千钱一岁征收二十钱），以此增加国家收入，后一度暂停。

元狩四年（前119），汉朝发骑兵10万、步兵辎重数十万人北征匈奴。国力严重消耗。公卿大臣们为了广开财源，奏请重新施行算缗钱和税商贾车船，并提出扩大课税对象、提高税率的新征收办法，获得武帝批准，命令各类商人，手工业者申报财产数目，按照比例纳税。商人每二千钱一岁交纳一"算"（一百二十钱），手工业者的税额为商人的一半。百姓凡身分不是吏、三老、北边骑士者，所有的轺车每辆每岁收税一算，商人的轺车每辆二算。船身长五丈以上，每船一算。凡隐瞒不报财产数目、或者呈报不全不实，罚戍边一岁，没收全部财产。揭发他人隐瞒财产者，奖给没收财产的一半。有市籍的商人及其家属不准附着农业户籍以名占田，若违令占田，没收其土地财

产与奴婢。

这项法令颁布以后,许多商民争匿财物,不肯如实申报纳税。于是武帝决心对他们实行惩罚,发动"告缗",即告发隐匿缗钱逃税之罪。元狩六年冬,杨可受朝廷暗中指使,第一个出来揭发,著名酷吏杜周被任命负责审理此类案件,很少从轻发落。至元鼎三年(前 114)十一月,武帝重申"告缗"之法,依令奖励杨可等告发人;于是"告缗"风行天下,商贾中家以上几乎都被告发。朝廷派遣御史和廷尉正监等分批前往各郡国清理处置告缗所没收的资产,得民财物以亿计,奴婢以千万数,田地大县达到数百顷,小县也有百余顷,商贾中家以上大部分因此而破产。政府将没收的缗钱分配给各个部门,在水衡、少府、太仆、大农等机构设置农官,分别经营没收的郡县土地,没收的奴婢则主要用于饲养苑囿中的狗马禽兽和在官府里充当杂役。告缗扰乱了百姓的正常生活秩序,引起民怨沸腾。到元封元年(前 110)夏,桑弘羊管天下盐铁,另辟财源,又请令民得入粟补吏赎罪,国家的财政状况有了明显的好转,才宣布"不复告缗",结束了此项制度的实行。 (宋 杰)

李广利伐大宛

太初元年(前 104)及四年,汉武帝时派将军李广利领兵远征西域大宛国的战争。

大宛是西域古国,位于帕米尔高原西麓,锡尔河上、中游,前苏联费尔干纳盆地一带。西汉时其国大小属邑有七十多个,人口数十万,产稻、麦、葡萄、苜蓿,尤其以出汗血马著称。大宛西北邻康居国,西南邻大月氏、大夏,东北临乌孙,东行经葱岭(帕米尔高原)的特洛克(Terek)山口可达疏勒,是古代东西方交通线"丝绸之路"上的要道。

西汉武帝时派遣张骞通使西域,此后,大宛与汉朝建立了外交、贸易上的联系。但是大宛距离汉朝较远,长期处于匈奴的控制之下,所以对汉使不甚恭敬;匈奴使者持单于一信到国,各处饮食招待,不敢怠慢;而汉使来临后,"非出币物不得食,不市畜不得骑",汉朝政府对此久有不满。

太初元年,武帝因渴慕大宛贰师城出产的汗血马,派遣壮士车令等人携带千金及金马前往换取。大宛国王毋寡与贵人商议,认为汗血马是大宛的国宝,不能交换。汉朝离大宛很远,途中经过荒无人烟的沙漠、戈壁,走北道有匈奴为敌,出南路则城邑稀少,粮饷水草乏绝,大军难至,不用担心会因此受到报复。便予以拒绝。汉使怒而出言相骂,并椎破金马而去。大宛指使东邻的郁成国王截杀汉使,劫夺了财物。武帝闻讯后大为震怒,任命宠姬李夫人之兄李广利为"贰师将军",表示对汗血马志在必得;赵始成为军正,王恢为导军,李哆为校尉,制军事;征发属国骑兵6000 及郡国恶少年数万人,于同年八月出征。

李广利率领的远征军越过盐泽,出西域北道,沿途的各个小国闭城坚守,拒不供应给养。汉军攻下城池,才得补充粮饷,如攻之不能下,则数日后继续西行。到达郁成国时,汉军只剩下几千人,而且均饥疲不堪,结果被郁成军队击败,死伤甚众。李广利不得已,引残兵退至敦煌,往返经历两年,军队的人数只剩下十之一二。他派使者到长安上书,请求罢兵,待发大军,然后出征。武帝闻报后怒甚,命使者赶到玉门关下令,"有敢入玉门关者斩"。让残余军队驻在关外待命。

当时因浞野侯赵破奴北伐匈奴失败,二万余人全军覆没;朝中公卿大臣们都建议停止西征而专力与匈奴作战。而武帝认为如果连大宛这样的小国都攻不下来,西域大夏等国便会轻视汉朝,乌孙、轮台等国也会对汉使不加礼遇,良马从此休想得到,汉朝就要彻底丧失在西域的威望。于是他把坚持休战的官员邓光等下狱治罪,赦免天下的囚徒,征发了郡国青壮年兵丁及边郡骑兵六万多人,牛十万,马三万多匹,驴骡骆驼以万数,还有大批的粮食武器,以致"天下骚动,转相奉伐宛"。在太初四年再次由李广利统率出征,并谪发国内有罪的官吏、流亡他乡者、赘婿、贾人、父母及祖父母或本人过去曾有市籍者为远征军运输给养。

汉军声势浩大,沿途的西域小国莫不畏惧相迎,争先奉送酒食,仅有仑头(轮台)不服,即被攻破屠灭。以后行军顺利,到达大宛城下有三万人。大宛军迎战失利后退保其城,李广利断绝了贵山城的水源,围攻 40 余日,克其外城,俘虏敌方勇将煎靡。大宛贵人见形势危急,便商议定策,共杀其王毋寡,遣使者携王头至汉营求和,请汉军停战,答应送出善马,供应酒食。否则便尽杀善马,与汉死战。李广利与诸将、军吏商量,认为大宛城内存粮尚多,又穿井得水,难以速克;康居国又发兵来救,恐怕战事持久不利,于是许和。汉军取其善马数十匹,中马以下牝牡 3000余匹,立大宛贵人亲汉者昧蔡为王,与其结盟而还。李广利另派搜粟都尉上官桀领兵攻破郁成国,郁成王逃至康居,康居王闻大宛降汉,不肯收留他,将其送交汉军后斩首。

李广利领军还朝后,以功封为海西侯,斩郁成王

首者赵第封新畤侯，赵始成为光禄大夫，上官桀为少府，李哆为上党太守，军吏为九卿者三人，任诸侯相、郡守、二千石者百余人，秩千石以下者千余人。士卒接受赏赐的财物价值四万斤黄金。后来，大宛贵人们杀死汉朝所立国王昧蔡，立前王毋寡兄弟蝉封为王，但仍遣子入质于汉，约定每年献两匹汗血马，表示臣服。武帝为了确保通西域商路的安全，把长城的西端延长，派使者前往大宛赏赐并镇抚该国，控制了这一地区。

西征大宛之役的胜利，使汉朝国威大张，西域各个小国纷纷脱离匈奴的掌握，派遣子弟跟随汉军前往长安，呈献贡物，朝见武帝，并留在汉朝作为人质。从此，汉朝在西域取代了匈奴的统治地位和影响，建立了起自敦煌至盐泽的交通干线，沿途设置亭燧等防御设施，派遣军队在轮台、渠犁屯田积谷，设立了“使者校尉”在当地领护，加强了与西方各国的通使、贸易交流。另一方面，远征大宛的战争也明显地造成一些消极作用，这两次军事行动历时四年，汉朝军队遭到了惨重的损失。第二次出征，军入玉门关者仅剩下万余人，马千余匹；实际上在战斗中死亡的人不多，粮饷供应也很充足，主要是因为将吏贪财，不爱恤士卒，多有迫害所致。国内耗费的人力、物力更是难以估算，以致“黎人困苦，奸伪萌生，盗贼并起”，引发了社会危机，也给大宛和西域沿途各个小国带来了人民生命、财产的严重破坏。　（宋　杰）

和亲乌孙

西汉武帝时先后遣细君、解忧公主嫁与西域乌孙国王和亲通好的历史事件。

乌孙是我国古代西域的一个游牧民族，居住在天山北麓、巴尔喀什湖以东以南、伊犁河流域的广大地区。当地水草丰美，物产丰富。乌孙有户12万，人口63万，胜兵（壮丁）188000人，是西域诸国中最强大的国家。其地理位置也十分重要，它东界匈奴，西邻康居、大宛，南接塔里木盆地北道诸国，在西汉与北方强邻匈奴的交战中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如果乌孙与汉结盟，既可以对匈奴形成东西夹攻之势，还能使汉朝通过它来加强与西域诸国的联系。乌孙原来居住在祁连、敦煌一带，依附于匈奴，后来双方发生矛盾，乌孙西迁至伊犁河流域，“不肯复朝事匈奴”。为了争取乌孙，实现联合西域各国、“断匈奴右臂”的战略计划，汉武帝在元狩四年（前119）派遣张骞为使者，抵乌孙国都赤谷城，赂以重礼，请求乌孙重返河西故地，与汉朝通好。然而乌孙诸大臣不愿东迁，其昆莫（王，或称“昆弥”）猎骄靡又年老不能自主，仅遣使者数十人随张骞入汉，赠良马多匹答谢，从此双方建立了经常性联系。

匈奴闻知乌孙通汉后，便欲兴师问罪。乌孙为了对付匈奴，再次遣使到汉朝献马，并且主动提出愿意迎娶汉公主为夫人，与之和亲。元封六年（前105），武帝把江都王刘建的女儿细君作为公主嫁与乌孙昆莫猎骄靡，馈赠甚丰。匈奴闻讯后，亦遣女嫁乌孙，企图以此抵销汉朝的影响。猎骄靡以细君为右夫人，匈奴女为左夫人。细君至乌孙后，即开展外交活动，设宴招待、广送币帛给乌孙贵人；但因语言不通，且别居一室，不常与昆莫相会，细君时常忧伤思乡。猎骄靡死前，欲令公主改嫁继承人军须靡，公主不肯，向朝廷请示。武帝为了同乌孙共灭匈奴，令公主从其国俗。细君遂与军须靡成婚，生一女后病死。太初四年（前101），武帝又以楚王刘戊孙女解忧作为公主续嫁给军须靡。

解忧公主下嫁后不久，军须靡病死，其叔父之子翁归靡继位，号为肥王，按照乌孙的婚姻习俗，继娶解忧公主为妻，生三男二女，长男名元贵靡。乌孙与汉结好，引起匈奴的恐惧和仇视。昭帝末年，匈奴与车师联合，接连侵扰乌孙，强占土地，杀掠人民，并一再派使者胁迫乌孙交出汉公主，与汉朝断交。解忧公主与翁归靡两次上书，请求汉朝发兵相救，主动建议与汉联合出征，尽力抗击匈奴。汉朝政府采纳了他们的建议，于宣帝本始二年（前72）遣五将军领兵16万出塞，另派校尉常惠为使节，护乌孙发兵。翁归靡亲率5万余骑，与汉军东西夹击，大获全胜。匈奴死伤惨重，乌孙俘匈奴单于叔父、嫂、公主及名王以下39000人，获马牛驴骡骆驼5万余匹，羊60余万头。数年内乌孙与丁零、乌桓等族进攻匈奴多次获胜，汉兵亦出塞攻下车师，留卒屯田，保障天山北麓往乌孙的道路畅通，汉朝和乌孙的联系进一步加强了。宣帝元康二年（前64），翁归靡病死，前王军须靡匈奴夫人所生之子泥靡即位，号为“狂王”，复娶解忧公主为妻。狂王为人暴恶，失去乌孙人心，并与公主不和。解忧与汉使魏和意、任昌合谋，于酒宴中刺杀狂王，因剑刺斜，狂王负伤而逃，其子细沈瘦起兵包围公主与汉使于赤谷城；他们坚守城池数月，后西域都护郑吉率西域诸国兵马前来支援，打败了细沈瘦。这时，翁归靡匈奴妻所生之子乌就屠依靠母党的支持，袭杀狂王，自立为昆弥，乌孙一时出现倾向匈奴的局面。西汉政府一面派破羌将军辛武贤领兵15000人至敦煌，准备以武力征讨；另一方面由解忧公主的侍女冯

嫽进行斡旋调停。冯嫽“能史书、司事”，颇有政治素养和外交才干，其丈夫为乌孙右大将，与乌就屠关系密切。冯嫽利用这种关系对乌就屠分析形势，晓以利害，终于使他答应让出王位，奉解忧公主之子元贵靡为大昆弥，自己为小昆弥，分别地界，各领户60000余、40000余，各自为政，平息了这场动乱。汉朝政府对两人皆赐予印绶，并派长罗侯常惠将三校尉兵马屯赤谷城，进行监护。甘露三年(前51)，元贵靡与其弟鸱靡皆病死，解忧公主已年近七旬，上书请求回归汉地，得到宣帝准许，携三个孙儿、孙女回到长安。汉朝对乌孙的和亲政策，建立了双方的友好关系，扩大了汉政权在西域各地的影响，促进了它对匈奴作战的胜利，并对多民族统一国家的发展做出了重要的贡献。 (宋 杰)

通西南夷

西汉武帝时开拓边境，将西南夷地区纳入中原王朝版图的历史事件。

我国古代的西南地区，即今云南、贵州和四川西南部一带，分布着许多语言、习俗不同的民族，当时统称为西南夷。其中在今贵州境内的有夜郎、且兰，在今云南境内的诸多部落有滇(滇池地区)、嶲、昆明(洱海地区)，自滇以北、今四川西昌附近有邛都，雅安附近有徙、筰都，茂汶附近有冉駹，位于今甘肃南部的部分氐族如白马氐也列入西南夷中。这些少数民族的社会发展很不平衡，或定居从事农耕，或过着游牧生活，有些还处在原始社会末期，有些则进入阶级社会阶段，如夜郎、滇等，他们和巴蜀地区的居民很早就有频繁的交往。

战国时，楚国遣将庄蹻率兵至西南略地，经夜郎至滇。后黔中地区被秦国占领，庄蹻无法返回楚国，于是留驻滇地称王，全军改变服饰，遵从滇俗。秦朝统一六国后，曾派常頞主持修筑通往西南地区的“五尺道”，在夜郎、滇和邛都的一些区域里设置郡县，派遣官吏进行管理。此后，内地与西南少数民族地区的经济文化联系更为密切，巴蜀商人常去那里从事贸易，贩回当地出产的筰马、牦牛、僰僮、帛叠，运去枸酱等各种货物，像蜀布甚至经过滇西销往身毒(印度)。

西汉武帝即位之后，国内政治稳定，经济繁荣，进入了封建社会的鼎盛阶段。凭借雄厚的实力，汉朝进一步向四周开疆拓土，展开了北却匈奴、西通西域、南伐南越的活动；同时也积极地加强了对“西南夷”各民族的联系交往。

建元六年(前135)，武帝派唐蒙出使南越，谕令其归附汉朝。唐蒙发现了自蜀郡经夜郎的牂牁江水路，可以通往南越都城番禺(今广州)城下；于是向武帝建议，招降夜郎，利用夜郎之兵，乘船自牂牁江南下以击南越。同年，武帝任命唐蒙为中郎将，率千人，携带绢帛、货币前往，招降了夜郎及附近的许多城邑，在当地设置了犍为郡(治今四川宜宾)。不久，又派司马相如以同样的方式，招引邛都、筰都等“西夷”归附，在那里设置都尉，建立十余县，属蜀郡管辖。为了对西南地区进行有效的控制，武帝征发巴、蜀、广汉等郡士卒数万人修筑从僰道(四川宜宾)指向牂牁江流域的道路，派司马相如主持修筑了自蜀郡(治今四川成都)西达邛、筰的道路。这两条道路的工程耗费了大量的人力、物力，附近的夷人部落又时常反抗和袭击汉人，为了集中力量对付北方的劲敌匈奴，汉朝只好在元朔三年(前126)暂停经营“西南夷”之事，命令犍为郡的官吏修筑城垒，注意防御，再待机扩张势力。

张骞出使西域归来后，报告说在大夏(今阿富汗)境内见到过蜀布、邛竹杖，是蜀郡商人经过西南夷地区运往身毒(今印度)，又转销到大夏的。武帝想打开由西南地区通往身毒的道路，前后派出使者十余起，西行至滇，皆被昆明夷所阻拦。汉使归朝后都盛赞滇国的富饶，引起武帝的注意。元鼎五年(前112)，西汉王朝发兵征伐南越，犍为郡的且兰君长不愿远行，率族众造反，杀汉使者及犍为太守；后被汉军击败，在当地设牂牁郡，反抗汉朝的且兰君、邛君、筰侯先后失败被杀。冉駹等部族震恐，纷纷入朝或称臣，或请求设置官吏。武帝乃封夜郎侯为王，以邛都为越嶲郡(治今四川西昌东南)、筰都为沈黎郡(治今四川雅安南)、冉駹为汶山郡(治今四川茂汶县北)、白马氐为武都郡(治今甘肃成县)。

滇因国势较强，又有同姓劳深、靡莫等部族相扶助，拒不向汉称臣入朝。元封二年(前109)，武帝发巴蜀士卒击灭劳深、靡莫，兵临滇境，其王降服。汉朝在当地设置了益州郡，赐滇王王印，仍然让他统治当地的居民。此后，西南夷居住的地区大部都归入西汉王朝的直接管辖之下，只有滇西昆明夷的一部分(即哀牢夷的部分人口)及其东南部、南部、西南的僚、闽濮等族居住的区域，西汉王朝的统治范围尚未达到。

(宋 杰)

平定南越

元鼎五年(前112)，汉武帝时派兵平定南越国

叛乱、统一岭南的历史事件。

秦始皇统一天下后，曾派遣大军征服岭南的越人，在当地设置郡县，加强了华夏族与越族的政治、经济与文化联系。秦末农民战争爆发之后，原来南海郡将赵佗乘机割据南海、桂林、象郡，自立为南越武王。而西汉王朝建立后，高祖刘邦曾派陆贾为使者，说降赵佗，封其为王。吕后七年(前181)，汉朝曾禁止中原与南越的铁器贸易，引起赵佗的不满，断绝了与西汉的臣属关系，自尊为南越武帝，发兵攻打长沙国边邑。吕后遣将军周灶等率军讨伐，遇天气暑湿，发生瘟疫，不能越过五岭，只得罢兵。赵佗得以扬威南陲。他交结闽越、西瓯等族，其势力扩展到东南万余里，用天子礼仪，乘黄屋左纛，称制，与汉朝对峙。文帝即位后，再对南越实行安抚政策，为赵佗在真定的祖坟置守邑，岁时祭祀，征召他的宗亲昆弟，给以尊官厚赐，又派陆贾出使南越，劝赵佗放弃帝号。赵佗遂去制称臣，遣使朝请，如同汉朝的诸侯国。

武帝即位之初，南越王赵胡谨奉藩职，并遣太子婴齐到长安为天子宿卫。婴齐娶汉女邯郸樛氏，生子赵兴。后婴齐回国继承王位，但仍想保持南越对汉朝的独立性。武帝屡次遣使要他入朝，婴齐均称病不往，只派其子赵次公入侍。婴齐死后，赵兴即位，樛氏为太后。元鼎四年(前113)，武帝遣使者安国少季宣谕赵兴与太后入朝，同内地诸侯王一样；同时令卫尉路博德率兵屯驻桂阳(广东连县)，接应使者，以示威慑。太后劝赵兴举国内属，赵兴年少，听从其意见，于是通过使者上书，愿列位同内诸侯，三年一朝，废除汉与南越边境上的关口。武帝闻报大悦，赐南越丞相银印及内史、中尉、太傅印，其余官吏由南越自置；并在当地推行汉法，改其旧制，废除黥、劓等肉刑，令使者留镇南越。赵兴与太后整理行装，准备入朝，但此举遭到丞相吕嘉的反对。吕嘉在南越任三朝丞相，其宗族任长吏者有70余人，势力很大；其男皆娶王室女子，其女全嫁与王室男子。吕嘉恐怕归附汉朝以后，自己的权势地位会受到削弱，便多次谏止其王内属，未获成功后便图谋叛乱。王和太后恐为吕嘉所制，亦与汉使谋议在酒宴上诛杀吕嘉，因使者临事怯懦而失败，双方关系紧张。武帝闻知后未引起重视，仅派韩千秋与太后弟樛乐将2000人入越援助。元鼎五年四月，吕嘉通令国中公开反叛，与其弟率军攻进宫中，杀死赵兴、太后及汉使者，遣人告知苍梧越族秦王及其所属郡县，立明王长男越妻所生子赵建德为王。又下令边邑开道给食，诱汉军深入，将韩千秋所部全歼，发兵守住边塞要地。

武帝闻报后抚恤韩千秋、樛乐家属，封其子韩延年为成安侯，樛广德为龚侯；并下诏赦免罪人为士卒及征发江淮以南水师10万征讨南越。同年秋，汉朝遣四路大军会攻南越首府番禺(广州)。次年冬十月，楼船将军杨仆率军数万先破番禺城北要塞石门，与伏波将军路博德会师后，分别从东南、西北两面，攻破番禺。吕嘉与南越王建德乘夜率数百人入海，路博德领军追赶，将其擒获。闻汉兵到，苍梧王赵光、越揭阳令史定自动归降；越桂林监居翁亦晓谕瓯骆王率10余万口降汉，他们都被封为列侯。其余二路兵马未到，南越全境已被征服。自秦末赵佗在此割据称王，凡传五世九十三年，为汉朝所统一，将其地分置南海(治番禺，辖今广东省大部地区)、郁林(治今广西桂平县西)、苍梧(治今广西梧州市)，合浦(治今广东合浦北)、珠崖(治今广东琼山东南)、儋耳(治今海南省儋耳西北)、交趾(今越南北部)、日南(今越南中部北起横山、南抵大岭地区)、九真(今越南中部清化、河静两省及义安省东部)等郡。　(宋　杰)

司马迁著《史记》

西汉太史令司马迁历经艰辛，撰写历史巨著《史记》的事迹。

汉武帝在位期间，国内经济繁荣，政治稳定，出现了封建社会的盛世，文化学术事业也获得了空前的发展，在史学领域也取得了卓越的成就，出现了著名的史学家司马迁和他的不朽著作《史记》。

司马迁，字子长，夏阳(陕西韩城)龙门人，生卒年不详。其父司马谈是汉朝专管文史星历的太史令，熟悉历史，通晓先秦诸子学术，曾次第旧闻，裁剪论著，撰写一部记述先秦至汉事迹的著作，但是没有完成。司马迁韶继家学，曾师从经学大师孔安国、董仲舒。20岁旅游全国，足迹遍及中原及长江中下游各地；不久又以"郎中"身分奉使巴、蜀、邛、筰、昆明一带，还随同汉武帝到各处巡幸，游览名山大川、考察风俗，访问古迹，采集传说，为将来著述史书打下基础。司马谈去世后，他在元封三年(前108)继承了太史令的职务。在此期间，饱览皇室的藏书和档案，收集了大量的历史资料，于太初元年(前104)正式开始撰修《史记》。天汉二年(前99)，将军李陵败降匈奴，武帝闻报盛怒，群臣皆罪责李陵，司马迁独为其辩解，称李陵事亲孝顺，与士人结交守信，常奋不顾身以徇国家之急；此战率步卒五千与匈奴数万骑兵交战，因寡不敌众而失败，不应受到谴责；他之所以没有战死而降敌，是为了将来有机会立功赎罪，报效

汉朝。武帝被其言触怒，将司马迁逮捕入狱，处以腐刑。司马迁家贫，财产不足以赎罪，亲友又不为上言相救；本欲自杀，但为了《史记》一书的撰写，忍辱受刑，在狱中发愤继续著书。太始元年(前96)，他遇赦出狱，任中书令，先后用了20余年时间，倾注全部心血，终于完成了这部闻名于世的史学巨著；人称其书为《太史公书》，后称为《史记》。

《史记》是我国第一部内容完整、结构严密的通史著作，记事始于传说中的黄帝，止于西汉武帝太初年间，包括上下三千年的历史，尤详于战国、秦汉。全书分为十二本纪、十表、八书、三十世家、七十列传，共一百三十篇、五十二万六千五百字。"本纪"是全书纲领，按年月记述帝王言行政绩，兼录各方面重大事件；其中先秦诸篇按朝代成篇，秦汉诸纪则按帝王成篇。"表"采用表格形式简列世系、人物和史事，以清脉络；其中包括世表、月表和各种年表。"书"叙述各种制度沿革，内容涉及礼乐制度、天文兵律、社会经济、河渠地理等。"列传"主要是社会各阶层代表人物的传记，少数篇章为中国少数民族以及与中国互相往来的一些国家和地区的历史记录。总的来说，是以各种人物传记为主，以表、书为辅，合编年、记事等体例之长，创造了历史书籍的纪传体的新体裁，成为以后二千年中编写王朝历史的规范。

《史记》的取材相当丰富。司马迁具有广博的学识，又能利用职务之便，博览皇室藏书和朝廷的律令典籍，从古书、档案中多所采摘，并增添了自己亲身采访、实地调查的材料。对于这些内容繁多的史料，他谨慎地进行选择和考察，淘汰无稽之谈，显示出严谨的科学态度。在对历史事件和人物的叙述、介绍中，力求实事求是，后人称赞《史记》"其文直，其事核，不虚美，不隐恶"；敢于揭露汉代统治阶级的暴虐、奢侈、愚昧，并给予陈胜、吴广领导的农民起义很高的评价，是非分明，爱憎强烈，表现出来的进步观点是难能可贵的。

《史记》在文学方面也具有很高的艺术性，它的叙事简明扼要，文字生动精练，写人叙事形象鲜明，曾被鲁迅先生誉为"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

汉代以前，曾出现过多种体裁的历史著作，但就记事的久远、内容的广泛、史事的详实、材料的系统、组织的完备来看，都不如《史记》。二千年来，《史记》对后世史学和文学的影响是巨大、深远的。此后我国历代的史学家和文学家几乎无不从其中吸取丰富的营养。这部书是司马迁为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做出的伟大贡献。（宋　杰）

巫蛊之祸

西汉武帝末年封建统治集团的内部斗争。

巫蛊是一种巫术，汉代迷信，认为使巫师祭祀诅咒或埋木偶人于地下，可以给被诅咒者带来灾祸。汉武帝晚年宠爱赵婕妤及其皇子刘弗陵，皇后卫氏与太子刘据失宠。武帝又笃信方术，因年老多病，怀疑系左右人巫蛊所致，对此类案件惩治严厉。征和元年(前92)，丞相公孙贺之子太仆公孙敬声因私用北军钱千九百万下狱，公孙贺请求追捕朝廷缉拿的要犯阳陵大侠朱安世，以此为儿子赎罪，得到武帝准许。后来捕获，而朱安世在狱中上告公孙敬声与阳石公主私通，还派人在甘泉驰道上埋设偶人，以恶言诅咒武帝。武帝使有司穷究，公孙贺父子在狱中被拷打致死，贺妻卫君孺(卫皇后之姊)及家人受族诛。卫皇后所生女诸邑、阳石公主及皇后弟子长平侯卫伉均遭牵连被杀。近臣江充等原与太子、卫后家族结恶，恐怕在武帝死后被太子所杀，即利用巫蛊事迫害太子、卫后，上奏称武帝病因在于巫蛊。帝以江充为使者，审查此事。征和二年，江充带领胡巫到处掘地求偶人，逮捕夜间祭祀者，或以酒洒地后诬告他人祝诅，烧铁钳灼烫，逼其招供，劾以大逆不道罪。自京师、三辅连及郡国，受连坐而死者前后达数万人。江充又言宫中有蛊气，武帝命按道侯韩说、御史章赣、黄门苏文等相助搜索。江充等先查后宫不得宠的夫人，然后到太子宫中，指使胡巫做桐木偶人、帛书埋地下，发掘出后奏报太子为巫蛊不道，欲兴动大狱，将其治罪。当时武帝在甘泉宫养病，被江充等隔绝消息，皇后与太子多次派属吏去甘泉请问，都没有回报。这引起太子刘据的惊惧，恐怕遭到江充的陷害，便听从少傅石德的劝告，于七月壬午日遣客伪装使者，收捕江充等人。韩说怀疑有诈，不肯奉诏，被当场杀死，章赣负伤后逃归甘泉宫。太子亲自监斩江充，又将胡巫在上林苑中烧死，然后派舍人无且持节夜入未央宫通知皇后，集合长乐宫卫士，发放武库的兵器，通告百官说江充谋反，引起长安城内的动乱。

苏文等逃回甘泉，上报太子造反。武帝命使者前往，召见太子，而使者不敢入长安，中途返回说太子已反，欲杀死他，只好逃回报告。武帝闻讯大怒，自甘泉至建章宫，下诏征发三辅近县兵马，由丞相刘屈氂率领进攻长安。太子命石德及宾客张光分别为将领军，使囚犯如侯持节征发长水，宣曲校尉属下的胡人骑兵，并驱使市民与丞相兵合战五日，死者数万，血流入沟。百姓传言"太子反"，不肯附助，结果太子势

弱兵败。石德、张光及如侯等均被擒杀，太子南奔，被司直田仁私放出长安城。武帝事后腰斩田仁及受太子节的北军使者任安，太子宾客凡是曾经出入宫门者，悉被处死；并下诏废黜卫皇后，收缴其玺绶，卫后自杀，其家族尽遭诛灭。随同太子参加兵变者，一律以谋反罪受族诛。官吏士卒在战乱中劫掠财物者，判处迁刑，徙至敦煌郡。太子逃至湖县泉鸠里卖屦者家，后被官府发觉，遭吏卒围捕而自尽，皇孙二人亦当场被杀，这场动乱使卫氏外戚集团被彻底清除。

事后，壶关三老令狐茂、长陵高庙卫寝郎官田千秋先后上书为太子讼冤，巫蛊之事又多不信，武帝发觉自己受骗，因而诛灭江充三族，将苏文焚毙，并把在湖县围捕太子而受封赏者处以族刑；又作思子宫，于太子被害处作“归来望思之台”，以志哀思。

巫蛊之狱连岁不决，直到后元二年（前 87）二月，还余波未息。当时武帝病重，因听信望气的方士之言，以为长安狱中有天子气，就派遣专使疏录京师各官府狱中囚犯，不论轻重，一律斩首。太子刘据之孙刘病已，时才数岁，亦受巫蛊案件牵连入郡邸狱，内谒者令郭穰奉诏提取刘病已处死，而治狱官员廷尉监丙吉闭门不纳，说：“他人无辜而死犹不可，况亲曾孙乎！”拒守到天明，郭穰归报，武帝因此感悟，于是大赦天下，巫蛊之祸遂告结束。　（宋　杰）

罢轮台屯田诏

征和四年（前 89），汉武帝否决在西域轮台屯田的计划并罪己自责的诏书。

汉武帝在位时，由于长期兴师暴众，征伐四夷，开疆拓土，加重了对人民的赋税、徭役剥削，结果国内经济凋敝，民怨沸腾，引起社会矛盾的激化。至武帝末年，南阳、楚、齐、燕、赵之间，农民起义接连发生，义军建立名号，攻打城邑，劫夺库兵，释放囚犯，诛杀官吏，据险反抗朝廷军队的镇压，散而复聚，不屈不挠。朝中佞臣江充又借穷究宫内巫蛊的名义迫害太子刘据，激起太子在长安的兵变，导致江充被杀，太子亦兵败自缢而死。汉朝对匈奴的作战又遭受了惨重失败，大将李广利降敌，十余万军队全部覆没。在一系列危机、挫折的打击下，汉武帝认识到先前推行的“内兴功利，外攘四夷”的政策劳民扰众，应该改弦更张。征和四年（前 89）三月，武帝在钜定（山东广饶东北）亲耕，祀于明堂，向群臣公开检讨，“朕即位以来，所为狂悖，使天下愁苦，不可追悔。自今事有伤害百姓，糜费天下者，悉罢之！”又斥退寻仙求神的方士。事后，搜粟都尉桑弘羊与丞相田千秋、御史大夫商丘成联名上奏，建议在西域轮台以东捷技、渠犁等地兴建屯田，派遣吏卒前往耕种；待一岁后有所蓄积，再招募百姓壮丁及家属到那里居住劳动，以轮台为基地，逐渐向周围扩张，沿途修筑列亭，以此支持汉朝的盟国乌孙，并向西域各国扬威。汉武帝否决了桑弘羊等人的建议，在六月下了追悔自非的诏书，史称“轮台诏”或“罢轮台屯田诏”，其内容如下：

诏书首先深切地检讨了征和年间西征的失误，说：以前有司奏请增加民众的算赋每口三十钱以佐助边境作战的费用，这是加重老弱孤独的困苦。现在又请求派吏卒屯田轮台，是扰劳天下，并非优惠百姓，表示不愿听到这样的建议。大鸿胪等请求招募囚徒派往匈奴充当刺客，用封侯的重赏激励他们刺杀单于以报忿。武帝认为这种事五霸尚且耻而不为，自己更不能做。何况匈奴得到投降的汉人，都要严加搜查盘问，很可能会暴露出意图。当今汉朝的边防松弛，听任亡命者逃出关塞、障候的长吏又多遣戍卒猎捕野兽，以皮肉为利，致使士卒不堪其苦而逃亡，烽火缺乏。这些情况都没有上报，自己还是从俘虏那里得知的。最后，武帝在诏书里宣布，当今的要务在于严禁苛暴，制止擅征赋税，努力发展农业和繁殖马匹，不要缺乏武备就行了。郡国二千石长吏各上进畜马方略，补边状，与上计者同来赴对。此后，武帝便不再兴发军旅、对外大规模用兵作战了。（宋　杰）

赵过推行代田法

西汉武帝时由赵过在北方干旱地区推行新型耕作方法的历史事件。

战国后期，我国农学家总结了长期耕作的生产经验，在《吕氏春秋》一书中提出了“上田弃亩”、“下田弃甽”的原则，即在高田旱地放弃垄台不种而种垄沟，这样有利于保墒防旱；在低田湿地放弃垄沟不种而种垄台，有利于排水防涝。西汉武帝晚年，为了发展农业，实行“富民”政策，任命赵过为搜粟都尉，由他主持试验和推广新型的耕种技术。赵过在“上田弃亩”方法的基础上，增添了“垄沟互换、轮番利用”的新内容，即把耕地分成“甽”（同畎，田间小沟）和垄，甽垄相间：一亩宽六尺（一步），划为三垄三甽；每条甽宽一尺，深一尺，下谷播种甽中，挖出的土堆置甽旁成垄，亦宽一尺。种子播在甽底不受风吹，可以保墒；幼苗长在甽中，也能得到和保持较多的水分，生长健壮。随着甽中苗长，耨草时拨垄土培植苗根。到了盛暑，垄上的土削平，甽垄相齐，这就使作物的根能扎得深，能够抗风耐旱，防止倒伏。隔年替换垄甽

的位置，把原来的垄为甽，原来的甽为垄，交替轮耕，使土地得到保养地力的机会。因为甽垄每年代换，所以称为“代田法”。

同时，赵过还创制了新式农具耧车和耦犁等。耧车即三脚耧，是一种轻便的下种器，用一牛牵引，一人操纵，可以同时播种三行，每日能种地一顷。耦犁是用两条牛合犋的耕犁，用二人在前边牵牛，一人扶犁在后边施耕。由于畜力缺乏，平都县令光又教赵过用人力挽犁，赵过奏举光为他的副职，教民相互换工挽犁耕种，人力多的犁一日能种30亩，人力少的也能耕13亩。赵过首先率领士卒在三辅离宫壖地等公田上试验代田法，取得成功，每亩岁收比普通民田多一斛以上，好的要多出一倍。武帝即让大司农组织工巧奴等大量制造新式农具，又令关中地区的郡守督所属县令、长、三老、力田和里父老中熟悉农业技术的人学习新农具的使用方法以及代田法的耕种养苗技术。随着国家的倡导，代田法不仅行于关中地区，在河东、西北边郡乃至居延等地也得到了普遍的推广。这种新型农业技术方法受到北方各地百姓的欢迎，它“用力少而得谷多”，结果收到了提高劳动生产率和增加亩收的成效，促进了农业的发展与繁荣。

（宋　杰）

盐铁会议

始元六年（前81），汉昭帝令丞相田千秋等召开的辩论盐铁官营等政策利弊得失的会议。

西汉武帝时由于长期对外用兵、开拓边境，耗费了大量的财物，致使府库空虚，用度不足。为了解决财政危机、增加政府的收入、以及打击地方上的豪强地主势力，武帝在元狩年间令桑弘羊等理财家制订并推行了一系列新的经济政策，如盐铁和酒类官营、统一币制、均输、平准、增收“算缗”、鼓励“告缗”等，结果大见成效，充实了国家的财政，为其文治武功奠定了基础。但是这些措施也存在着不少弊病，如铁器制造粗劣，价格过高，主管官吏废公谋私，强征农民服役煮盐冶铁等等。武帝晚年，社会的经济、政治局势恶化，“海内虚耗，户口减半”，阶级矛盾尖锐，小规模的农民起义、暴动在中原各地频繁发生，彼伏此起；而汉朝北方的劲敌匈奴因为连年作战，力量也大为削弱，不再成为边境的巨患；这些客观情况，促使武帝改变了“内兴功利、外攘四夷”的政策，在征和四年（前89）下诏自责，宣布今后要禁绝苛暴，不得擅兴赋役，大力发展农业生产。结果缓和了阶级矛盾，封建统治得到了稳定。

昭帝即位后，大将军霍光辅政，继续奉行武帝晚年“与民休息”的政策。始元六年（前81）二月，霍光采纳了谏大夫杜延年的建议，请昭帝令丞相田千秋、御史大夫桑弘羊召集郡国所举的贤良文学60余人至京师长安，询问民间疾苦、以及施政教化的要务。会上，贤良文学与桑弘羊意见不一，他们就汉王朝的内外政策进行了辩论，这就是著名的“盐铁会议”。会议的中心论题是盐铁、榷酒、均输平准等政策的利弊得失。贤良文学们认为这些政策是与民争利，执行时官吏又胡作非为，坑害百姓，是民间痛苦的根源，应予废除。桑弘羊坚决反对，强调盐铁榷酒等扩大了国家的财源，保证了抗击匈奴、消除边患的经费需要；另外，这些政策的施行削弱了豪强地主势力，使农民少受豪家的兼并役使，有益于社会的稳定，所以主张坚持推行盐铁官营政策。贤良文学们又认为对匈奴的战争劳师苦众，消耗了巨量的人力、财力，而收效甚微，应该奉行汉朝初年的“和亲”政策，偃兵休士，赠以厚礼，借此来感化匈奴，维持双方的和平。桑弘羊则批驳说，匈奴反复无常，蚕食内侵，只有通过战争才能阻止其侵扰，保证汉朝的安全；不讲武备，侈谈对敌施行“仁义”、“德教”是危亡之道。抗击匈奴虽然给当时的人民带来沉重负担，但这是为了后代子孙的长远利益。在施政方针与治国的指导思想上，贤良文学们主张行“德政”、“仁政”，一再引证历史教训，把严刑峻法看作是秦王朝灭亡的主要原因；指责任用酷吏、厉行法治是亡国之道。桑弘羊则依据法家学说反对德治，主张法治，认为律令严厉百姓就会小心谨慎，法禁完备奸邪自然止息，为了长治久安，以重刑除害去恶，惩治不轨是必要的。此外，会上还辩论了有关农业的基本政策，对社会现状的估计，对伦理道德观念的理解，如何看待古和今的关系等问题。会议的结果是桑弘羊在政治上受到一定的挫折，尽管没有废除盐铁官营和均输平准，但是根据贤良文学的意见取消了榷酒（酒类官府专卖）与关内铁官。“与民休息”的政策在会后得到了进一步的肯定，对昭帝、宣帝时期社会经济的恢复发展产生了积极的影响。次年，桑弘羊因为与霍光政见不和，参与了燕王刘旦、左将军上官桀父子及盖长公主等人的谋反活动，被朝廷发觉后处死。宣帝时，庐江太守丞桓宽根据盐铁会议的资料，结合汝南人朱子伯的追述，编撰成《盐铁论》一书，详细记载了当时的讨论情况。

（宋　杰）

苏武牧羊

天汉元年(前 100),苏武出使匈奴被扣押达 19 年、秉节不降的历史事迹。

苏武(? 一前 60),京兆杜陵(陕西西安东南)人,字子卿,西汉平陵侯、将军苏建之子。少时以父任为郎官,后迁至移中监厩。武帝天汉元年(前 100),匈奴勾黎湖单于去世,其弟且鞮侯即位,因初立根基未稳,恐怕汉朝发兵袭击,乃与汉交好,遣回在战争期间扣押的汉朝使者路充国等十余人。武帝为了表示嘉奖,派遣苏武以中郎将持节出使匈奴,亦送回匈奴使者扣押在汉者,答其善意。苏武与副中郎将张胜及假吏常惠、随从百余人俱往,到达匈奴完成使命后,准备起程回国。原汉朝降将卫律被匈奴封为丁零王,其部下虞常等人及匈奴缑王与汉副使张胜私下商议,阴谋伏弩射杀卫律,劫持单于母阏氏归汉。事机败露后,缑王等被杀,单于大怒,下令拘禁汉朝全部使者。苏武认为自己受到牵连,有辱使命,便引刀自刺,重伤未绝。单于派卫律劝降,又斩虞常以相威胁;苏武不为所动,严词斥责卫律。匈奴幽禁苏武于大窖中,断绝饮食;苏武咽雪及旃毛,数日不死,遂被徙至北海(今贝加尔湖)荒无人烟处,使之放牧公羊,声称待公羊产羔才得放他回国。

苏武至北海后,持汉节牧羊,因无炊粮,常掘野鼠、采草实而食之,自制弓弩以射猎。其牲畜多被丁零族盗走,生活穷困。单于又派汉朝降将李陵劝他归顺匈奴,遭拒绝。

汉昭帝即位后,匈奴发生内乱,部族分裂,新单于因势孤力弱,不敢对抗汉朝,遂遣使者入汉,请求和亲。昭帝亦派使者还报匈奴,要求放还苏武。单于不肯,谎称苏武已死。原苏武部下常惠买通看守,夜见汉使,说明情况,进献迫使单于放还苏武的计策。次日汉使又见单于,称昭帝在上林苑射下飞雁,足上有苏武所写帛书,写明他居住在某某泽中。单于闻言大惊,只好承认苏武尚在,向汉使赔罪,并召集苏武部属,除去投降与死亡者,仅存九人。

始元六年(前 81),被匈奴扣押了 19 年的苏武须发尽白,手持汉节,领余众回国。昭帝为了表彰他坚贞不屈的爱国精神,拜苏武为典属国,秩中二千石,赐钱二百万,公田二顷,宅一区。随从常惠、徐圣、赵终根拜为中郎,赐帛二百匹。其余六人年老归乡,赐钱每人十万,终身免除徭役。　　(宋　杰)

燕王旦、上官桀等谋反案

西汉昭帝时,燕王刘旦与左将军上官桀等人图谋反叛的历史事件。

西汉武帝去世前,曾立幼子刘弗陵为嗣,遗诏大将军霍光等辅政。刘弗陵继位后(昭帝),其异母兄长燕王刘旦自以为年长当即帝位,便于始元元年(前 86)与宗室齐孝王孙刘泽、中山哀王子刘长等伪造文书,称刘弗陵非武帝亲生之子,系霍光等朝内大臣私自伪立的皇帝,应该受到天下吏民的诛伐;并派人将文书传送到各郡国,煽动百姓起来叛乱。刘旦还招诱各地豪杰,在封国内征收铜铁制造甲胄兵器,数次检阅操练军队,借围猎之名征发国内民众,准备起事。刘泽等回到各地策划发兵,与刘旦共同造反,欲先杀青州刺史隽不疑。缾侯刘成闻知其谋后,向地方官府告发,隽不疑立即逮捕刘泽,上报朝廷。霍光遣大鸿胪前往审问,词引燕王刘旦,霍光等考虑到燕王是昭帝亲兄,没有将他治罪,仅判处刘泽等人死刑。

事后刘旦仍常怀怨望,而朝内大臣左将军上官桀、车骑将军上官安父子不满霍光专断朝政,欲与之争权;御史大夫桑弘羊先前曾兴办均输平准、榷酒、官营盐铁,为国兴利,矜恃其功,为子弟求官,遭到霍光拒绝,亦深为怨恨;昭帝之姊盖长公主曾托上官桀向霍光请求将她的情夫丁外人封为列侯、任光禄大夫,也没有得到允许,故心生忌愤。元凤元年(前 80),上官桀父子、桑弘羊与盖长公主密谋,欲令公主请霍光饮酒,在第内埋伏兵丁将其杀害,然后废掉昭帝,迎立燕王刘旦为天子。刘旦得讯大喜,与上官桀等通过驿传文书往来相报,答应事成后封上官桀为王,并联络郡国各地豪杰数千人,准备响应。而上官安等又策划在政变成功后诱刘旦至长安,将他谋杀,再立上官桀为帝。尚未发难时,其谋被盖长公主舍人父稻田使者燕仓得知,报告大司农杨敞;杨敞畏惧不敢言,诈称有病归家休养,将此事转告谏大夫杜延年,延年上报。九月,昭帝下令逮捕上官桀、上官安父子、桑弘羊及丁外人等,均处以死刑,诛灭亲族;盖长公主与燕王刘旦自杀。昭帝皇后是上官安之女,又是霍光的外孙女,因年少未参与谋反所以未被废黜。十月,昭帝颁诏赦除燕王太子刘建、盖长公主之子文信以及宗室因此案受连坐者,皆免罪黜为庶人。官吏被上官桀等欺骗而参预谋反活动者及未发现有罪仍在任者,一律除罪。　　(宋　杰)

傅介子刺楼兰王

西汉元凤四年(前 77),昭帝派遣傅介子等出使西域、刺杀楼兰国王的历史事件。

楼兰是西域东部的小国。国都在楼兰城(遗址在今新疆罗布泊西北),正当古代东西方交通线"丝绸之路"的要冲。东近白龙堆,入玉门关可通往敦煌。西北抵焉耆,西南通且末、精绝、拘弥、于阗,北通车师,是汉朝使节商旅前往西域的首站。因其地与汉境接近,常发人充当向导、负水担粮以迎汉使;又数为汉朝边塞吏卒所寇扰,故心怀怨憎。匈奴乘机策动楼兰劫杀汉使,并从此地刺探汉朝军情。武帝元封三年(前 108),汉朝遣从票侯赵破奴率属国骑及郡兵数万征讨楼兰,俘获其王。楼兰降汉后,又屡受匈奴的攻击,于是向汉朝和匈奴分遣侍子,称臣于两国。后来匈奴侍子安归回国,立为楼兰王,与匈奴亲近,拒绝向汉遣送质子,又先后截杀汉朝使者卫司马安乐、光禄大夫忠、期门郎遂成,以及安息、大宛使者等,盗取使节、印章与贡献的物品。王弟尉屠耆降汉后报告了情况。

汉昭帝元凤四年(前 77),曾派骏马监傅介子(? 一前 65)出使大宛,途经楼兰、龟兹时责备其王对汉无礼,两王均表示谢罪。傅介子还朝后,向执政的大将军霍光进言,认为楼兰、龟兹反复无常,如果不加诛灭则无所惩治。龟兹王为人轻慢易近,请求前往行刺,以此向西域诸国示威。霍光觉得龟兹道远,主张刺杀楼兰王;即奏请昭帝批准,遣傅介子率勇士携带金币出使西域,扬言奉命赏赐各国财物。至楼兰后,楼兰王不愿接见汉使。傅介子佯作离境,到西界,让译者对楼兰王说:"汉使者持黄金锦绣行赐诸国,王不来受,我去之西国矣。"楼兰王安归贪图财物,来见汉使。双方在帐外饮酒至醉,傅介子出金币示之,谎称天子让他有秘事相告,诱安归入帐,屏去随从,使壮士二人从背后将其刺死;并告谕楼兰贵人、左右说:安归有罪,我奉天子之命将他杀死。汉朝大军马上就要到来,若反抗即有灭国之祸。遂斩安归首级还朝。昭帝论功封傅介子为义阳侯,食邑七百户;刺死楼兰王者皆补侍郎。又下诏封尉屠耆为王,遣送归国。改国名为鄯善,迁都扜泥城(新疆若羌附近)。此后,汉朝遣吏卒在楼兰伊循城屯田积谷,镇抚该国。自玉门关至楼兰,沿途设置烽燧亭障,控制了这个重要地区。　　　　(宋　杰)

霍光废帝

元平元年(前 74),辅政大臣霍光迎立昌邑王刘贺为帝,后又将其废黜并改立宣帝刘询的历史事件。

霍光(? 一前 68),字子孟,西汉河东郡平阳(山西临汾西南)人,名将霍去病异母弟,任官后出入宫禁二十余年,小心谨慎,未尝有过,深得武帝亲信。武帝临终时,任霍光为大司马大将军,与金日䃅、上官桀、桑弘羊等大臣辅佐昭帝。后来上官桀、桑弘羊等人与霍光争权,勾结燕王刘旦谋反,被杀,霍光遂专擅朝政。元平元年(前 74),昭帝病死,无嗣,霍光等迎立武帝孙昌邑王刘贺继承帝位。刘贺即位后荒淫无道,终日饮酒作乐,滥行赏罚,并将原昌邑国官属皆征召至京,越级拜官。霍光见状忧烦,与其亲信大司农田延年商议,延年劝他向上官太后建议,废掉刘贺,另立贤君;并举出商代伊尹废太甲的事例。霍光遂与车骑将军张安世、丞相杨敞等图计,得到他们的支持,便召集公卿、将军、列侯、中二千石、大夫、博士官等在未央宫举行会议。霍光在会上提出刘贺行为昏乱,恐怕要危害社稷,问群臣应如何处置。群臣皆惊愕失色,莫敢发言。田延年起身按剑,声称先帝亲托霍光以天下重任,是因为他忠心、贤能,可以安定刘氏的天下,现在群下鼎沸,社稷将倾,希望大将军(霍光)主持议事,早下决断。群臣如有后应者,请允许他用剑斩之!霍光谢罪说,对他的责备是正确的,天下汹汹不安,责任在自己身上。与会大臣们皆叩头,表示愿意服从霍光的决定。

霍光领群臣入见上官太后,陈述了刘贺不可担任皇帝的理由,得到赞同。太后遂驾幸未央宫承明殿,使霍光用太后诏书召见刘贺,禁止原昌邑国群臣入宫。刘贺上殿后,霍光与群臣联名上奏,列举了他即位后胡作非为的种种罪行,称他"荒淫迷惑,失帝王礼谊,乱汉制度"。请求废黜其帝位。太后立即下诏批准,使刘贺跪拜接受诏书,并解下了他的皇帝玺绶。刘贺只做了二十七日皇帝,就被遣归故国昌邑(治今山东金乡附近)居住,食邑二千户,受到朝廷的严密监视。车骑将军张安世率羽林骑收缚原昌邑群臣二百余人,关入廷尉诏狱,坐以在封国时不举奏刘贺罪过,使朝廷不闻知;又不能对刘贺以正道辅导,使其陷于罪恶;皆被论处死刑。赴刑场时,昌邑群臣悔不早杀霍光,号呼市中曰:"当断不断,反受其乱!"

刘贺黜位后,霍光与群臣商议,另立武帝曾孙、卫太子刘据之孙刘病已(后改名刘询)继承帝位,即宣帝,稳定了国内的政治形势,保障了社会经济的继

续发展，出现了“吏称其职，民安其业”的中兴局面。

（宋　杰）

赵充国屯田湟中

神爵元年（前 61），将军赵充国领兵平息湟水流域羌人叛乱的历史事件。

赵充国（前 137—前 52），字翁孙，西汉陇西上邽（甘肃天水西南）人，武帝时为骑士，善骑射，以六郡良家子补羽林郎。为人坚毅、勇武而有谋略，熟悉羌胡少数民族事务。后任假司马，从贰师将军李广利击匈奴，奋战突围立功，身遭创伤二十余处，受到武帝嘉奖，拜中郎将，迁车骑将军长史。昭帝时，曾领兵平息武都氐人反叛，在反击匈奴的战斗里擒获敌西祁王，因功擢为后将军，威震北边。宣帝即位后，分布在西海（今青海一带）的羌人与汉朝不和，渡过湟水，与汉人争夺牧地；某些部落首领与匈奴勾结，企图攻击鄯善、敦煌，断绝汉朝通往西域的道路。宣帝遣光禄大夫义渠安国巡视诸羌，调查各部落对汉朝的态度。而安国不分善恶，诱杀先零羌豪三十余人，并纵兵袭击其部民，斩首千余级，激起羌人的愤怒，遂起兵反汉，攻城邑，杀长吏，包围了金城（甘肃兰州西北）。义渠安国兵败，退保令居塞（甘肃永登县境内），上报朝廷求援。神爵元年（前 61）春，年已 70 余岁的赵充国闻讯后向宣帝自荐，请兵平息羌乱，得到批准。他来到金城郡观察敌情，待军队集结到万骑后才向敌营进攻。赵充国用兵持重，不轻易与羌人交战；常派遣斥候远探敌情，行军必为战备，止宿必坚营壁；爱恤士卒，往往是计划周密以后才进行战斗。每日犒饮士卒，军队的士气很高。当时宣帝求胜心切，准备与羌人大战，赦三辅、太常的刑徒充军，又征发了各郡的步卒、骑士，共计六万人。赵充国听说后两次上书分析敌情，认为数万汉军携带大量辎重、粮草，难以追逐敌人；一旦粮道被断，就要陷入绝境；提出必须首先分化羌人中各部落的关系，孤立叛乱的先零部，然后进军，才能获胜。宣帝与大臣商议后同意了他的意见。赵充国释放了罕羌在汉营拘押的人质，命令军队不许纵火焚烧羌民的住所、牧草、庄稼，使罕羌大为感动，首领靡忘不战而降。汉军至先零羌所在地后，敌军因久屯不战，士气松懈，望见汉军后抛弃辎重，败渡湟水，溺死者数百，投降及战死者五百余人。汉军俘获马牛羊十余万头，获得全胜。

入秋后，赵充国因鞍马劳顿而病倒。宣帝急于求成，遣破羌将军辛武贤为赵充国副手，命令要在十二月内击破先零羌。赵充国见羌人陆续投降者已有万余，预料其不久即将溃散，便上书请求不要进军交战，罢骑兵，留下步卒在湟中（青海省湟水两岸）屯田，又奏《不出兵留田便宜十二事》，逐条分析了留兵屯田、耕战两利的优点，例如吏士留屯，既可以解决粮草，又可兼为战备；就地屯田，羌人不敢来放牧，必造成其经济困难，不战自败；当地汉民可以就地耕作，不失农业；军马一月之食，可供田卒一岁用度，罢骑兵可省去巨大开支。士兵闲时可缮治邮亭，军屯留守，敌人无隙可乘，可能安定亲附汉朝的开羌诸部，不致生变；能够影响西域，决胜千里之外，节省国家财物，以备不虞之费；奏明“屯田内有无事之利，外有守御之备”的好处，说服了宣帝和朝内大臣，采纳了屯田计划。结果赵充国屯田守边的策略获得成功，反叛的羌人迫于屯兵的威慑，纷纷归顺汉朝。至次年五月，赵充国上奏说，造反的先零羌本有 5 万人，至今累计斩首 7600 级，投降 31200 人，溺黄河、湟水及饥饿而死者五六千人，现存的反叛逃亡者不过 4000 人，亲汉的羌族首领靡忘保证可以由他的部属加以消灭，留驻当地屯田已无必要，请求罢兵还朝。朝廷准奏。屯田部队撤除后，至秋，叛羌酋豪犹非、杨玉因内讧被杀，靡忘等收其余众降汉，果如赵充国所奏。汉朝西部的边患得到了平息。　（宋　杰）

西域都护的设立

西汉宣帝神爵二年（前 60），中原王朝在西域地区设立行政管辖机构的历史事件。

自张骞通西域后，西域各国与中原王朝保持着友好的往来。汉昭帝时，在轮台、渠犁等地留驻吏卒屯田积谷，置使者校尉领护，以保护往来的使者和商旅，这是西汉王朝在西域设置军政机构的开始。但匈奴在西域的势力依然不可忽视。宣帝在位时期，匈奴因与汉朝长期交战失败，国力渐衰，境内又发生了饥荒，人民、牲畜死者十之六七，经济陷于崩溃；原来受它役属的诸部族也纷纷起来反抗。神爵二年（前 60），匈奴虚闾权渠单于去世，日逐王先贤掸与新单于不睦，见汉朝势强，欲率众归降，遣使报与西汉护使者都尉郑吉。郑吉征发渠犁、龟兹诸国兵 5 万人，前往迎接。日逐王领部众 12000 人、小王将 12 人入降，后入京师长安朝见，宣帝封日逐王为归德侯，郑吉为安远侯。此后，匈奴设在西域的僮仆都尉撤销，其势力退出。西汉政府在西域设置都护，首任都护为郑吉，治所在乌垒城（今新疆轮台以东），以统治西域诸国。西域都护的辖区北抵今新疆准噶尔盆地及苏联巴尔喀什湖，南达阿尔金山和昆仑山，西起今帕米

尔高原及苏联费尔干纳州，东至今甘肃、青海省界。都护下属官员有副校尉，秩比二千石；丞一人，司马、候、千人各二人。西域诸国与汉朝的臣属关系，至此完全确定。元帝初元元年(前48)，汉朝又在车师地区(今新疆吐鲁番东南)设立戊己校尉，专管屯田和防务。西域都护府的设立，标志着天山南北地区首次与内地联为一体，加强了中原与西域各地的经济、政治、文化联系，对于统一的多民族国家的巩固发展，具有重要而深远的意义。　　(宋　杰)

呼韩邪单于归汉

甘露三年(前51)，匈奴南部单于呼韩邪率众归附汉朝的历史事件。

匈奴在与汉朝的多年交战中，大量人口和牲畜死亡、被俘；因为战败又退出了许多适于放牧的地区，影响了其主要经济部门——畜牧业的生产。原来被匈奴征服的许多部族如乌孙、乌桓、丁零等又乘机反抗，摆脱其控制。匈奴势力遭到严重的削弱。汉宣帝在位期间，匈奴又发生了大饥荒，人民、牲畜死者十之六七，经济陷于崩溃。自神爵二年(前60)起，因为虚闾权渠单于死后的继位问题，统治集团分裂，形成"五单于争立"的局面。混战的结果是由虚闾权渠单于之子稽侯珊即位，号为呼韩邪单于，但其部众仅剩下数万人，牲畜损耗十之八九；人民饥饿，甚至互相燔烧而食。呼韩邪正着手恢复变乱后的残局，不料休旬王在西边自立为闰振单于；呼韩邪之兄左贤王呼屠吾斯又在东边自立为郅支骨都侯单于。不久郅支杀闰振，击败呼韩邪，占据了单于庭。呼韩邪率众出走，想以附汉为条件，借助汉朝恢复统治，战胜郅支，重新统一匈奴各部。经过匈奴大臣会议的讨论，呼韩邪在左伊秩訾等人的支持下，率领部众南下靠近汉朝的边塞，于甘露元年先后派遣其子右贤王铢娄渠堂及其弟左贤王入汉，窥探汉朝的态度。汉朝表示欢迎，呼韩邪便于甘露三年正月亲自入塞朝觐。

汉朝自武帝以来对匈奴的作战虽然多次获胜，但是也付出了巨大代价，结果还不能使之臣服；现在呼韩邪自动奉藩称臣，自属大喜过望。为了表示欢迎和加强戒备，宣帝派遣车骑都尉韩昌为专使，先至五原郡(治今内蒙古自治区包头市)迎接，并在五原至长安的沿途发兵陈列道上，以示宠信。呼韩邪至长安后，汉朝待以客礼，宣布单于位在诸侯王之上，拜见皇帝时只称"臣"而不必唱名，颁给金玺，承认他是匈奴的最高首领，表示汉天子对臣下的册封，确立了双方的君臣关系、以及呼韩邪所部隶属于汉朝的藩属地位。此外，又赠给呼韩邪大量珍贵礼物，如冠带、衣裳、武器、车辆、金钱、锦绣等。临别北归时，呼韩邪考虑到自今势力薄弱，恐怕受到郅支的袭击，请求留居光禄塞(内蒙古自治区包头市西南)下，如有紧急情况，则入保汉受降城(内蒙古自治区乌拉特后旗北)。汉朝为了便于约束，接受了他的请求，派高昌侯董忠和车骑都尉韩昌领骑兵16000及边郡骑士数千人护送呼韩邪出塞，并留驻塞外，保卫单于；同时调拨边郡米精34000斛，救济匈奴饥民。次年呼韩邪再次入朝，又受到汉朝优礼，进一步巩固和加强了双方的友好关系。自呼韩邪归汉后，匈奴分裂成南北两部，呼韩邪所领的南部亲附汉朝，郅支单于统率的北部见汉朝出兵援助呼韩邪，自度其势不敌，便率部西迁康居，后被汉将甘延寿、陈汤所击杀。匈奴南部势力逐渐恢复壮大，呼韩邪在元帝初元元年(前48)经过汉朝准许，北归单于庭，又娶汉朝宫女王嫱(字昭君)为妻，号为宁胡阏氏。此后汉与匈奴相安数十年，直到西汉之末没有发生战争。呼韩邪单于归汉，结束了汉匈两族百多年来的敌对状态，使我国北方边境得以安宁，开创了民族团结合作的新局面，加强了塞北、中原两地人民经济、文化的交流，对于多民族统一国家的巩固、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　　(宋　杰)

陈汤矫诏击斩单于

西汉元帝建昭三年(前36)时，西域副校尉陈汤诈称奉诏发兵，消灭北匈奴郅支单于的历史事件。

南匈奴呼韩邪单于归降汉朝后，北匈奴郅支单于恐怕呼韩邪联合汉军与其作战，自己力不能敌，便专意向西域发展，想利用匈奴右部为根据地，扩张势力，接连攻破乌揭、坚昆、丁零三国，立都于坚昆，并杀害汉朝使者谷吉等人。当时西域大国康居与乌孙发生冲突，康居数败，遣使坚昆向郅支单于求助。郅支乘机转移康居，娶康居王女，与康居合兵进攻乌孙，杀掠人民，驱赶牲畜，乌孙数败，不敢与之交战，西部千里之地空无人居。郅支单于乘胜骄慢，杀康居王女及诸贵人，统治了康居国，强迫当地人民为他修筑城堡，并向阖苏、大宛诸国责取贡赋。此举严重威胁着汉朝对西域的统治。元帝建昭三年，西域都护甘延寿与副校尉陈汤奉命出塞赴任。陈汤为人沉勇有大虑，多策谋，喜奇功，看到当时的形势，认为如果郅支单于降服了乌孙、大宛二国，实力壮大，便可以北击伊列，西取安息，南排大月氏、山离乌弋，数年之间，天山以南诸国就会遇到危险。汉朝如不及时采取军事行动，就会丧失在西域的统治权，而西部边防和

中西商路也无法保障。他向甘延寿建议，乘郅支单于立足未稳，没有巩固的城防，尽快征发屯田吏士和乌孙等西域诸国兵马进击，敌人逃亡则无处容身（匈奴故地已被呼韩邪占据），据守则兵力不足以自保，千载之功可一朝而成。甘延寿同意他的见解，但主张将计划上报朝廷批准。陈汤认为皇帝与公卿大臣议事，不了解边疆的形势，如果否决计划，就会坐失良机。甘延寿听后犹豫不决，陈汤乘他患病时，自己矫制（伪称奉诏）征发西域城郭诸国兵马以及汉朝在车师屯田吏士共4万人，分两路伐郅支单于，南路出葱岭（帕米尔高原）经大宛至康居南部，北路经温宿越天山过乌孙境至康居东部。甘延寿闻讯大惊，只好听从陈汤的主张。

北路汉胡联军进入乌孙境内，正遇到康居副王抱阗率数千骑在当地杀掠，陈汤纵兵截击，夺回被俘的人民、牲畜，交还乌孙。军队入康居界内，陈汤又下令不许抄掠，得到民众的欢迎。康居贵人痛恨郅支单于的残暴，与汉军结盟，充当向导并通报了郅支的内部情况，使汉军得以顺利到达郅支城下。匈奴守军仅有数千，因为得不到康居百姓的支持，势力孤单。汉军及西域诸国兵四面围攻，并放火将木筑的外城烧毁。郅支单于企图突围，但怀疑康居怨恨自己，充当汉军内应，又听说西域诸国都出动兵马来助敌，自己无处投奔，便决定坚守，退入土城。汉军连夜激战，攻破土城，全歼敌人，军候假丞杜勋斩郅支单于首，共斩阏氏（单于妻）、太子、名王以下1518级，俘获145人，投降者千余人。郅支单于首级随捷报送至汉朝京师长安，悬挂在槀街蛮夷邸（外国使节客馆）。甘延寿因功封义成侯，拜为长水校尉；陈汤赐爵关内侯，为射声校尉。至此，敌对汉朝的匈奴势力全部消灭，解除了中国北部、西北的边患，西域人民的生活也获得了安定，中西交通畅通无阻，直到西汉末年。

（宋　杰）

昭君出塞

竟宁元年（前33），汉匈和亲，宫女王昭君出嫁呼韩邪单于的历史事件。

王嫱，字昭君，西汉南郡秭归（今属湖北）人，元帝时以良家女子选入宫中。建昭三年（前36），敌对汉朝的匈奴郅支单于被汉西域都护甘延寿、副校尉陈汤发兵剿灭，而与汉朝亲附的匈奴呼韩邪单于闻讯惊喜且惧，上书请求入塞朝见，得到元帝准许。竟宁元年（前33）正月，呼韩邪至长安朝见元帝，汉朝对他厚礼相待，加赐衣服、绵、帛、絮，倍于前例。为了加强汉匈两族的友好关系，呼韩邪主动提出“和亲”、愿意做汉家女婿。王嫱入宫数年，不得见御，积怀悲怨，听说此事后便挺身应召，向掖庭令申请愿行。元帝随即同意，将昭君赐予单于为妻。在临别大会上，昭君容貌丰美，服饰华丽，使汉宫增辉生色；顾影徘徊，令左右肃然起敬。呼韩邪大喜，称昭君为“宁胡阏氏”，意即胡人得昭君为阏氏（王后），国以安宁。并上书愿为汉朝守卫自上谷（河北怀来）以西至敦煌一带地方，请求撤去边备及塞卒，以便天子、人民休息；得到汉朝皇帝的嘉奖和婉辞谢绝。昭君在匈奴生一男二女，男名伊屠智牙师，为右日逐王；二女俱嫁匈奴贵人。

建始二年（前31），呼韩邪单于病死，其前妻长子雕陶莫皋即位，为复株累单于，准备依照匈奴“父死妻其后母”的风俗，再与昭君成婚。昭君上书朝廷，请求回国。汉成帝下敕要她珍惜汉匈关系的友谊，尊重匈奴的习惯；于是昭君又嫁给复株累单于，仍为阏氏。

昭君出塞对汉与匈奴的通好起到积极的促进作用，巩固和加强了两族的友谊与团结，在历史上具有重要的影响，这一事件并成为后代诗词、小说、戏曲、说唱的流行题材。

（宋　杰）

限田限奴令

绥和二年（前7），汉哀帝颁布限制贵族官僚豪富占有田地、奴婢数量的诏令。

西汉后期，由于封建经济的发展，官僚贵族、豪强地主和大商人相互勾结，兼并农民的土地，破产的农民或沦为佣工、佃客，或卖身为奴婢，或失业流亡他乡，引起阶级矛盾的激化。成帝在位期间，各地小规模的暴动接连发生，起义者诛杀官吏，夺取库兵，威胁着西汉王朝的统治；而私人土地的高度集中与蓄养奴婢成风又使封建国家的赋役征课对象编户农民大量减少，影响了政府的财政收入。哀帝即位以后，社会危机更加严重。绥和二年（前7），左将军师丹向朝廷建议：当今豪富吏民的资产数达巨万（亿），而贫弱百姓生活愈发困难，请对私人占有田地、奴婢的数量加以限制。哀帝接受建议并颁布诏书，让朝内大臣们制订一项关于限田限奴婢的法令。丞相孔光、大司空何武等人拟出条款，规定诸侯王、列侯可以在自己的封国内占有田地，列侯还可以在京师长安占田，公主则可以在其食封的县、道占田，关内侯、吏民拥有田地都不得超过30顷。诸侯王拥有的奴婢不得超过200人，列侯、公主可蓄养奴婢百人，关内侯、吏

民则为30人。奴婢年60以上，或10岁以下，不在规定的数额之内。商人不得拥有田地和充当官吏，犯者依律论罪。凡是拥有田地、蓄养奴婢超过规定限额者，都要被政府没收。这项法令传出之后，在社会上起到了一定影响，使市场上田地、房宅和奴婢的价格出现下跌。但是由于宠臣董贤、外戚丁明与傅喜等当权人物的反对，哀帝没有将这项法令批准执行，只是下诏"且须后"，把它搁置起来。后来哀帝又一次赐给董贤公田2000顷，限田限奴令实际上废置，社会矛盾仍未能够解决。（宋　杰）

哀帝更受命

建平二年(前5)，汉哀帝为了缓和社会矛盾，听从方士夏贺良的建议，改元换号，表示重新接受天命的历史事件。

西汉后期，外戚王氏专权，政治黑暗，赋役沉重，土地兼并激烈，阶级矛盾尖锐，各地接连爆发了农民、刑徒的起义。汉成帝时，齐(今山东)人甘忠可伪造《天官历》、《包元太平经》十二卷，自称"汉家逢天地之大终，当更受命于天，天帝使真人赤精子下教我此道"。以其书传授重平(河北吴桥东)人夏贺良等。后被中垒校尉刘向举奏犯有假托鬼神、罔上惑众罪，逮捕入狱。经过审讯，甘忠可承认了上述罪行，未经判决即在狱内病死。

哀帝即位后，社会危机愈发严重。建平二年，夏贺良受司隶校尉解光、骑都尉李寻举荐，待诏黄门，数次得到哀帝召见。夏贺良说汉家气运已衰，应当改元换号，表示重新接受天命，这样皇帝就可以延年益寿，生育皇子，平息灾异。哀帝听从了他的建议，下诏大赦天下，以建平二年为太初元将元年，自号为"陈圣刘太平皇帝"，借此欺骗人民，企图挽救西汉王朝的垂危统治。经过月余，哀帝的疾病仍未好转，社会矛盾也不见缓和。夏贺良等又建议改变政事，遭到大臣们的反对，夏贺良即奏言大臣皆不知天命，请求将丞相朱博、御史大夫赵玄免职，以解光、李寻辅政。哀帝认为他的话没有灵验，下令废除日前颁发的改元诏书，把夏贺良逮捕入狱，深究其罪。经光禄勋平当、光禄大夫毛莫如与御史中丞、廷尉共同审理，定夏贺良等以执左道、乱朝政、倾覆国家、诬罔主上不道罪，将夏贺良判处死刑，解光和李寻减死一等，被流放到敦煌郡。（宋　杰）

王莽改制

王莽建立新朝后，为了解决社会危机而在土地、奴婢、货币、工商财政诸方面颁行的新制度。

王莽代汉，登上皇帝宝座之后，看到社会危机的严重性，陆续颁布了许多法令，企图依照《周礼》来改革旧制，实行新政。其主要内容有：

一、"王田"、"私属"政策。因为土地集中和蓄奴、买卖奴婢问题是当时阶级矛盾尖锐的根源，王莽在始建国元年(公元9)宣布天下土地都称为"王田"，奴婢叫做"私属"，禁止买卖。按周代"井田制"的规定，每个男子只许占田百亩，超过的部分分给亲族邻里乡党。没有田地的人，官府按照上述规定分配给土地。反对及违令者处以流放边裔的刑罚。此令颁布后，贵族、官僚、豪强地主群起反对，各级官吏拒不执行，农民并未从中得到好处；大量奴婢既没有获得释放，也没能改善生活、劳动条件。违法买卖田地、奴婢的人数众多，"自诸大夫至于庶民，抵罪者不可胜数"。仅仅过了三年，王莽迫于各界的压力，只得宣布停止执行这项法令。

二、五均六管。始建国二年(10)，王莽采纳国师公刘歆的建议，在长安、洛阳、邯郸、临淄、宛和成都等大城市设立管理市场的官员，名为"五均司市师"，负责管理本地市场，在每季的中月评定物价，称为"市平"。物价高过市平，司市师照市平出售；低于市平，则听民买卖。五谷布帛丝绵等生活必需品滞销时，由官府按其成本价格收买。百姓因为祭祀或丧葬需要用钱，可以向官府借贷，不取利息。从事小手工业的人和小贩缺少本钱，也可以向官府低息借贷，每个月收3%的利息。这些措施统称为"五均(赊贷)"。"六管"是由国家垄断盐、铁、酒、铸钱及五均赊贷事业，不许私人经营，同时控制山泽，向人民征收渔猎樵采之税，小手工业者、巫、卜、医师要交纳赢利的十分之一。这些制度多数在汉武帝时期实行过，王莽原想以此来制止商人对农民的盘剥，打击高利贷者的猖獗活动，达到增加国库收入的目的。但是他用来推行五均六管制度的多是过去的富商大贾，他们和地方官吏互相勾结，制造假帐，损公肥私，百姓和国家都没有从中获得多少利益。

三、币制改革。居摄二年(7)，王莽下令在流通的五铢钱之外，增加发行大泉(值五十)、契刀(值五百)、金错刀(值五千)三种贬值的高额钱币；同时宣布黄金国有，列侯以下的吏民不许拥有黄金。可是官府征收百姓的黄金始终没有支付价钱。始建国元年(9)，王莽废金错刀、契刀与五铢钱，另做"小泉"与大泉并行，并且颁令禁民私藏铜炭，不许私人铸钱。次年，王莽又改行"宝货制"，用"五物"(金、银、龟、贝、

铜)充当货币材料,取"六名"(金货、银货、龟货、贝货、泉货、布货),共分"二十八品",即二十八种面值,种类繁琐,其价值名实不符,受到人民的抵制。王莽迫于民愤,废除金、银、龟、贝等物,只用大泉、小泉。地皇元年(20),王莽又废大、小泉,改行货泉(值一)、货布(值二十五)两种。频繁而又不合理的币制改革,每次都是变相的通货膨胀,引起了经济混乱,加速了人民的破产和国家财政的崩溃。为了惩治私铸铜钱的百姓,王莽推行五家连坐的酷刑,将犯法者全家及邻伍没为官奴婢,传诣长安钟官,以十万数。这项法令加剧了汉末以来奴婢问题引起的社会矛盾,使百姓深为愤恨。

四、更改官制和郡县名称。王莽在天凤元年(14)之后数次下令重划行政区域,更改官吏名称以表示改朝换代。有些郡县改名达五次之多,以致官吏和百姓都难以记住。王莽按照《周礼》改行另一套官僚制度,并将官吏的选任恢复成周代的世袭,增加了许多官位,加重了劳动人民的负担,使当时的政治更加腐败与混乱。

五、改变少数民族的族名和首领的封号。王莽即帝位后,命令少数民族首领只能称"侯",不能称"王",贬低了他们的封号,以表示自己的尊贵。同时将"高句骊"族名改为"下句骊",把匈奴单于改称"降奴服于",激起各少数民族的愤怒。匈奴、西域和西南夷地区的各族首领纷纷宣布脱离与新朝的藩属关系,并挑起边境冲突。此后,新朝与周边民族的关系始终很紧张,经常交战,曾征发了几十万人北征匈奴,给国内人民带来新的灾难和痛苦。

王莽推行的各项新政,不仅没有缓和西汉后期以来的阶级矛盾与社会问题,反而使它们进一步激化了。劳动人民身受沉重的赋役剥削、战争骚扰,还有残酷的刑罚,生路断绝,终于爆发了震撼全国、推翻新莽王朝的绿林、赤眉农民大起义。(宋　杰)

绿林起义

新莽天凤四年(17)荆州地区(今湖北北部、河南南部一带)农民发动的武装起义。

西汉后期,土地兼并激烈,阶级矛盾激化。王莽代汉后的托古改制等措施,更促成了社会危机的爆发。天凤年间,江汉流域的荆州地区连岁饥荒,农民相率掘荸荠等为食,新市(湖北京山境内)人王匡、王凤经常为饥民排解纠纷,深得爱戴,被推举为首领。天凤四年,王匡、王凤等率众数百起义,马武、王常、成丹等也带领流民前来归附,义军人数越聚越多,不时攻击附近的乡聚。他们以绿林山(湖北当阳东北)为根据地,几个月内发展到七八千人,以山名号为绿林军。

地皇二年(21),荆州牧调发2万官兵进犯绿林山,王匡等率义军迎击,在云杜(湖北沔阳西北)大破敌军,杀数千人,尽获辎重,乘胜攻拔竟陵(湖北天门县),转战近县,部众增至五万余人,还入绿林山中。次年,当地疾疫流行,绿林军死亡过半,被迫离开绿林山,分散活动。一支由王常、成丹等率领,西入南郡(湖北江陵),称下江兵;另一支由王匡、王凤、马武等率领,北上南阳,称新市兵;首领皆自称将军。新市兵攻打随县时,平林人陈牧、廖湛率千余人起义响应,号为平林兵,西汉宗室刘玄亦加入平林兵中。

绿林军的迅速扩大,引起了王莽的恐慌。他派遣司命孔仁把守豫州,阻止义军北上;又派纳言将军严尤、秩宗将军陈茂到南郡,集结兵力,打败了下江兵。王常、成丹率数千人北撤,声势复盛。同年冬,舂陵(湖北枣阳南)的西汉宗室刘縯、刘秀兄弟,见王莽统治行将覆灭,便以"复高祖之业"相号召,联络附近各县地主豪强,聚集其子弟、宾客七八千人起义,号为"舂陵兵"。后与新市、平林兵合师,进击长聚(河南唐县境内),杀新野县尉;再破唐子乡,斩湖阳县尉,接连获胜。同年十一月,绿林军准备进攻重镇宛城(河南南阳市),刘縯率舂陵兵至小长安(河南南阳市南),与莽军甄阜、梁丘赐所部遭遇,大败,退保棘阳。甄阜、梁丘赐等急于全歼义军,将辎重留在蓝乡,领精兵10万跟踪而来,南渡潢淳水,前临泌水,阻两川为营,向义军挑战,并断绝渡桥,以示决心。此时,王常等所率下江兵适时来到,义军实力转盛。绿林军休整三日后,在除夕之夜潜袭蓝乡,尽获莽军辎重。次日黎明又转向正面,猛攻敌军。舂陵兵自西南攻甄阜部,下江兵自东南攻梁丘赐部。梁丘赐部兵败溃散,阵势大乱,甄阜所部亦退却逃窜。因渡桥已断,莽军被斩杀和溺死者达两万余人,甄阜、梁丘赐阵亡。绿林军大胜后不顾疲劳,焚烧积聚,破碎甑釜,迅速赶往淯阳(河南南阳西),截住严尤、陈茂所率的莽军,一战即胜,杀敌三千余人,严尤等率残部逃往颍川。绿林军缴获大批辎重装备与俘虏,部队扩充到十余万人。为了扩大声势,地皇四年(23)正月,绿林军将领们在宛城南边的淯水上拥立刘玄做皇帝,恢复汉朝的国号,改元更始,正式建立了政权。(宋　杰)

赤眉起义

新莽天凤五年(18)山东地区的农民起义。

绿林起义爆发后，天凤五年，琅邪（治今山东诸城）人樊崇在莒县（山东莒县）聚众百余起义，转入泰山，自号三老。当年青州、徐州境内大饥，起义接连爆发。因樊崇作战勇猛，各地义军领袖逄安、徐宣、谢禄、杨音等都率部归附，义军兵力增至数万。次年，义军进攻莒县不利，转战姑幕，大破莽军田况部，歼敌万余人。参加这支义军的都是饥寒所迫的农民，起初只是为了求生，并无攻城夺地的打算。势力壮大以后，他们把各级首领分别称为"三老"、"从事"、"卒史"等汉朝乡官小吏的称号，彼此以"巨人"相称。队伍之中没有文书、旌旗、部曲、号令，仅以言语相约："杀人者死，伤人者偿创。"为了在作战中与敌军相区别，他们把眉毛染红，故此获得"赤眉军"的称号。地皇二年（21），王莽派遣景尚、王党率兵镇压赤眉军，被义军击败。次年四月，王莽复遣太师大匡、更始将军廉丹领兵十余万进攻赤眉军。王匡、廉丹的军队沿途恣意烧杀劫掠，激起民愤，百姓作歌曰："宁逢赤眉，不逢太师；太师尚可，更始杀我。"同年冬，无盐（山东东平东）人索卢恢据城起义，响应赤眉军，被王匡、廉丹镇压，屠杀万余人。莽军乘胜进攻赤眉军，双方在成昌（山东东平西）一带交战，赤眉军获得大胜，歼敌万余人；继而又在无盐再败莽军，杀死廉丹等敌将二十余人，这一胜仗结束了王莽在山东的统治。赤眉军还攻莒县，转战于东海、楚、沛、汝南、颍川、陈留各郡，攻拔鲁城，进驻濮阳。

更始元年（23），绿林军推举刘玄称帝建国，大破莽军，迁都洛阳之后，曾遣使者招抚赤眉军。樊崇率领诸将二十余人赴洛表示归附，受封为列侯；但其部众未得到妥善安置，发生溃散。樊崇等为团聚部下自洛阳回归军中，与更始政权分裂。樊崇等领兵攻拔宛城（河南南阳市）、阳翟（河南禹城）等地，见部下多思归山东故乡，惟恐军队离散，又看到更始政权日益腐败，内部出现争斗，便决心西进长安，推翻刘玄。

更始二年冬，樊崇、逄安领兵进武关，徐宣、杨音等率众自陆浑关（河南嵩县东北）入关中，次年正月在弘农两军会师，一路连战连胜，并整顿队伍，分万人为一营，营设三老、从事各一人，共30营。六月，进至华阴后，赤眉军立西汉宗室刘盆子为帝，任命徐宣为丞相、樊崇为御史大夫、逄安为左大司马、谢禄为右大司马。此时，更始政权发生内乱，刘玄先后杀申屠建、成丹、陈牧等农民将领，王匡、张卬等与刘玄作战失利，归降赤眉。九月，赤眉军攻入长安，消灭了更始政权，后又处死刘玄。赤眉军将领骤胜而骄，盲目自满，以为功成业就，相互争功论赏，吵闹不休。而长安附近豪强地主武装纷纷拥兵自保，坚壁清野，隐匿粮食，致使赤眉军在关中无法立足。次年春，长安粮尽，赤眉军焚毁宫室，引兵而西，自南山转攻各城邑，至安定、北地；但是遭到陇西割据势力隗嚣的阻挡和暴风雪的袭击，死伤甚众，不得不折回长安。东汉建武二年（26），关中大饥，赤眉军余部二十余万人向关东撤退，而归途被刘秀军队切断。次年初，赤眉军在崤山（河南渑池西）中了刘秀部将冯异的埋伏，失利后折向宜阳。刘秀闻讯后，亲率大军埋伏在熊耳山下，进行截击。赤眉军粮尽力拙，被迫放下武器投降。同年夏，樊崇、逄安等合谋再度造反，被刘秀发觉后处死。　（宋　杰）

铜马起义

新莽末年在河北地区爆发的大规模农民起义。

王莽新朝末年，黄河以北地区的农民不堪忍受其暴政的压迫，纷纷举行起义，义军名号有铜马、大彤、高湖、重连、铁胫、大枪、尤来、上江、青犊、五校、檀乡、五幡、五楼、富平、获索等数十种，他们各领部曲，互不统属，或以山川土地为名，或以军容强盛为号，总数达到数百万，其中铜马军最强大，首领是东山荒秃、上淮况等。河北义军的著名领袖还有城头子路，其人姓爰，名曾，字子路，为东平人，与肥城刘诩起兵于卢城头，故号为"城头子路"。他自称"都从事"，刘诩称"校三老"，转战黄河、济水之间，众至二十余万。力（或作"刁"）子都，东海（治今山东郯城北）人，起兵乡里，游击徐州、兖州界内，众有六七万。更始政权建立后，爰曾、力子都皆遣使归附，分别受官为东莱郡太守、徐州牧，后均被部下所杀。力子都余部与其他义军会合于檀乡，因以为号；其主帅董次仲率众人魏郡、清河，与"五校"合兵，众十余万。

河北地区的农民起义军虽然人数众多，但是力量分散，没有形成统一领导。后来刘秀到达河北，曾利用城头子路、力子都等义军名号，扩大自己的声势；待打开局面后，便采取分化瓦解、各个击破的策略来消灭义军。更始二年（24）秋，刘秀在鄡（河北束鹿东）与铜马军交战，实行闭营坚守、派兵断绝粮道的战术，获得成功。铜马军相持月余，因食尽退兵。刘秀率众追至馆陶，将其击败；受降未尽，而高湖、重连等义军从东方来，与铜马余众会合，在蒲阳与刘秀再度交战失利，全部投降。刘秀为了拉拢收买义军首领，将其将帅悉封为列侯，各自统率原来的部属，分别由刘秀手下诸将领导；共收编了数十万兵众，势力骤然壮大，关中因此称刘秀为"铜马帝"。东汉建武二

年(26),铜马、青犊、尤来等义军余众在上郡(治今陕西榆林东南)拥立孙登为天子。同年十一月,孙登部将乐玄将其杀死,率领部众五万余人投降刘秀。河北义军与东汉军队作战,一直坚持到建武五年(29),才最终失败。（宋　杰）

昆阳之战

地皇四年(23)绿林军战胜新朝的决定性战役。

地皇四年二月绿林军建立更始政权后,即以主力围攻宛城,企图得手后西出武关,进取关中。另派数万人由成国上公王凤及王常、刘秀等率领,北上进占昆阳(河南叶县境)、定陵(河南舞阳)、郾(河南郾城)诸县,切断了宛城与中原重镇洛阳的联系。当年三月,王莽派大司空王邑赶到洛阳,会同司徒王寻征发各郡兵42万,号称百万,南下镇压。莽军向洛阳集中时,旌旗辎重,千里不绝,并征用了明兵法六十三术者数百人,各持图书,受器械,充当军吏;以及一位身高一丈、名叫巨毋霸的巨人,带领大批虎豹犀象,以助军威。五月,王邑、王寻指挥大军从洛阳出发,在颍川又同纳言将军严尤、秩宗将军陈茂所部会合,进逼昆阳,企图开向宛城。其军容之威,自秦汉以来出师所未见。六月,莽军前锋十余万人抵昆阳城下,绿林诸将多认为敌众我寡,城中仅有八九千人,无法守城,想化整为零,散归各地。刘秀力主坚守昆阳,待机破敌,指出如今敌众我寡,只有全力抗敌,方可成功;如若分散,势无俱全。何况宛城未拔,不能相救。昆阳一旦被攻破,诸部亦将被消灭。此策获得诸将同意,决定由主帅王凤与王常领兵守城,刘秀与李轶、宗佻等13骑乘夜突围出城,到郾县、定陵一带调集兵马,准备破敌。

莽军包围昆阳后,严尤向王邑建议,昆阳城池虽小,却很坚固;现在敌军首领、主力在宛城,应该急进大兵,敌人必然溃散,击败宛城之敌后,昆阳自然会降服。王邑不以为然,认为“百万之师,所过当灭”。决定先破昆阳,再攻宛城。于是使用全部兵力列营百余座,包围昆阳数十层,造云车高十余丈,俯瞰城中。其军旗帜蔽野,埃尘连天,钲鼓之声闻数百里。莽军采取了掘地道、冲车撞城门等战术,弓弩乱发,矢下如雨,城中义军汲水时都要背负门扇以防护。绿林军顽强坚守,多次击退莽军进攻。严尤又向王邑建议,撤开包围一角,放城中守军逃走,可以使宛城的绿林军感到惊怖。王邑等自恃兵多将广,仍一味强攻,不见成效。

刘秀等从定陵、郾县调集兵马一万余人,支援昆阳。刘秀率领精锐骑兵千余人为先锋,与小股敌军接连交战,皆获胜利,使将士胆气益壮。这时,绿林军主力已攻克宛城三日,消息尚未传到昆阳。刘秀为了鼓舞士气,动摇敌人军心,便伪造了攻克宛城的捷报,用箭射入城内,又故意将战报遗失,让莽军拾到。消息传布后,城内义军斗志愈发高涨,而莽军久攻不下,闻讯后更为沮丧,形势开始转为对义军有利。刘秀与敢死勇士3000人,迂回到城西渡河,直冲敌军大营中坚。王邑、王寻见绿林军人数不多,盲目轻敌,自率万余人迎战,命令各军不准擅自行动。义军猛烈冲杀,莽军阵势大乱,王寻被杀。诸营因有令在先,不敢擅自相救。城内义军乘势鼓噪而出,内外夹攻,呼声震天。王邑逃走,莽军全部崩溃,互相践踏,积尸遍野。恰值大风飞瓦、暴雨如注,滍水暴涨,莽军士兵争渡,溺死者以万数,乃至水为不流。仅有王邑、严尤、陈茂等少数人狼狈逃回洛阳。绿林军缴获的粮食辎重、车甲珍宝不可胜数,连月搬运不尽。

昆阳之战是我国历史上著名的以少胜多的战例。战后,莽军主力大部被歼。起义风暴很快席卷全国,海内豪杰闻风响应,起兵诛杀牧守,自称将军,用汉年号,以待更始诏命。这次战役对于后来的绿林军入关和新莽王朝的覆灭,起了决定性的作用。

（宋　杰）

更始政权败亡

更始三年(25),赤眉军利用更始政权内乱,击灭更始政权的历史事件。

昆阳之战后,刘玄忌恨刘縯声威日增,借故将其诛杀;复遣王匡北上攻取洛阳,申屠建、李松领兵西进武关,攻入关中;各地豪杰纷纷响应起义,皆杀官吏,用汉年号,以待更始帝(刘玄)诏命。同年九月,长安人民暴动,攻进未央宫,杀死王莽,迎接义军。次年二月,刘玄迁都进驻长安。绿林军纪律严明,长安城内除了未央宫焚毁之外,其余府库宫室一无所动,市里不改于旧。刘玄分封汉宗室及诸功臣为王,并遣军队消灭了三辅地区的一些豪强地主割据武装,稳定了当地的政治局面。

起义胜利之后,刘玄很快沉醉在腐化的宫廷生活中,终日与妇人饮酒作乐,不理政事,由其岳丈赵萌专权,内部开始出现分裂。领兵在外的朱鲔、李轶擅命一方,王匡、张卬等“横暴三辅”。更始三年春,赤眉军入关后战败阻击的更始军队李松所部。驻守河东的王匡、张卬也被刘秀部将邓禹所破,逃归长安。张卬与绿林诸将商议,劝刘玄撤离长安,回到宛

城，遭到刘玄拒绝。张卬与廖湛、申屠建等将领企图劫持刘玄，迫使他同意。刘玄侦知此事，先发制人，杀申屠建。张卬等人勒兵掠长安东西市，攻入宫中。刘玄兵败，带领妻子车辆百余，逃到新丰赵萌营中；他怀疑其他将领也参与政变，又杀害了陈牧和成丹，王匡等人恐惧，领所部人马入长安，与张卬合兵。赵萌、李松等则率军还攻长安，连战月余，王匡、张卬等兵败，撤出长安，至高陵投降赤眉军。九月，赤眉军兵进长安，刘玄单骑从北城中门逃走，投靠右辅都尉严本，严本却以保护为名将他软禁起来。十月，刘玄见众叛亲离，走投无路，只得归降赤眉军，受封为长沙王，更始政权至此灭亡。刘玄后被赤眉军将领谢禄派人暗杀。　（宋　杰）

刘秀建立东汉

建武元年(25)，刘秀称帝，随即镇压、收编农民起义军，削平分裂割据势力，统一了全国。

刘秀(前6—公元57)，字文叔，南阳蔡阳(湖北枣阳县西南)人，皇族。新地皇三年(22)，与其兄刘縯起兵，与新市、平林兵会合，成为绿林兵的一部分。次年，新市、平林诸将立汉宗室刘玄为帝，恢复汉国号，年号更始。这年，在昆阳之战中，刘秀等以少胜多，大破王莽军，受更始帝刘玄之封，行大司马事；十月，又持节巡行河北，发展势力。这时，黄河以北有铜马、大彤、重连、铁胫、大枪、青犊、五校等部农民军，各领部曲，众上百万。此外，豪强地主武装也不少。豪强地主在邯郸拥立诈称成帝之子的卜者王郎为帝，声势浩大。刘秀依靠信都太守任光、和成卒正(太守)邳彤和刘植、耿纯等地主武装的支持，取得一些郡县，众至数万人。又得到上谷太守耿况、渔阳太守的援助，与更始帝所派尚书仆射谢躬等共击王郎，更始二年(24)五月，攻破邯郸，诛王郎。更始帝封刘秀为萧王，令其罢兵，带有功将领回长安接受封赏。刘秀借口河北尚未平定，拒回长安，继续发展自己的势力。接着，刘秀大破铜马于鄡，再破之于馆陶，又大破铜马余众和高湖、重连部于蒲阳，收编降众，众至数十万人。刘秀被称为“铜马帝”。在此基础上，刘秀率兵南下，击破赤眉别部和青犊、上江、铁胫、五幡等十多万人，杀死更始帝派到河北的大将谢躬，招降了马武。

更始三年六月，当赤眉军迫近长安，更始政权将要灭亡时，刘秀在鄗县(河北高邑东)即帝位(光武帝)，沿用汉国号，建元建武。九月，赤眉军入长安，更始帝刘玄投降后被暗害。十月，刘秀定都洛阳，史称东汉。赤眉军在长安缺乏粮食，又遇豪强地主的武装抵抗，企图向长安以西发展，受到隗嚣的阻挡和风雪袭击。次年十二月，关中大饥，赤眉军无粮，在长安无法立足，引军东归，随行随散。这时，刘秀军已扼守了洛阳以西赤眉军东归道路。建武三年正月，邓禹、冯异等将领阻击赤眉军，在回溪(河南渑池南)被赤眉军打败。闰正月，冯异在崤山(河南渑池西)大破赤眉军。赤眉军余部南向宜阳，光武帝驾临宜阳亲征，亲统六军，严阵以待，赤眉军君臣刘盆子与诸将遣使请降。其后，樊崇、逢安合谋起兵反抗被杀。接着，刘秀又削平了割据势力。建武五年，统一了北方主要地区。建武九年，割据陇西的隗嚣死，众将拥立其子隗纯为王，光武帝派来歙等将领往击。次年，来歙连战皆捷，隗纯降，后逃亡被捕杀，陇右平。建武十二年平定了割据巴蜀称皇帝的公孙述。建武十六年割据安定(治今甘肃固原)称“汉帝”的卢芳请降，全国重新统一。东汉建立后，光武帝刘秀及其后继者采取措施进一步集权君主。

东汉初，光武帝采取措施不让功臣、外戚、贵戚把持军政大权。东汉初，功臣众多，封侯者百余人，在生活上给以优厚待遇，让他们安享荣华富贵。列侯封地大者四县，超过了汉高祖对功臣的封赏。在政治上，光武帝改变汉高祖任功臣为丞相等要职的做法，不给功臣实权实职，不让他们掌握军政大权。刘秀的妹夫李通和邓禹、贾复都表示远离权势，无心争夺，被允许参议大政。光武帝以王莽代汉为鉴，不让外戚干预政事，不给他们以尊贵地位，如马援有大功，因是外戚，不能列入功臣云台28将之中。汉明帝令外戚阴、邓等家互相纠察，使外戚不敢犯法。梁松、窦穆虽娶公主为妻，但由于请托郡县、干乱政事而被诛灭。对刘姓宗室诸王，光武帝重申“阿附蕃王之法”，以防止他们蓄养羽翼，发展势力。建武二十八年(52)，光武帝令郡县逮捕诸王宾客，牵连而死的以千计。永平十四年(71)，明帝兄弟楚王因被告结交方士，图谋不轨，明帝下令穷治楚王之狱，被株连而死、徙的外戚、诸侯、豪强、官吏以千计，系狱的达数千人。

鉴于西汉晚期大臣权势过重、皇帝丧失权柄的教训，光武帝从制度上加以改革，严加防范。在中央政府中，号称三公的太尉、司徒、司空在名义上是首脑，实际权力却在中朝的尚书台。尚书台分六曹(曹相当于部)。尚书台设千石的尚书令和副官六百石的尚书仆射，以下有六曹尚书，分掌政事，每曹下又有丞、郎若干人。尚书台的尚书令、尚书仆射与六曹尚书称为“八座”。他们“出纳王命，赋政四海，权尊势

重”。但他们品级很低，尚书令为千石仅相当于大县县令，尚书仆射和六曹尚书只相当于中小县的县长。此外，皇帝又挑选亲信三公“录尚书事”，实际上等于皇帝直接指挥尚书台，所以尚书台的专权，实际就是专制皇权的加强。另外，西汉时宫内许多官员由士人充任或参用士人，东汉时多改为专由宦官充任，这也有利于皇帝直接掌握。东汉时期，皇权大大加强，但到后期却导致了外戚、宦官挟主专权，这是统治者所始料不及的。

在地方行政制度上，东汉特别加强了刺史的职权。全国分为 13 个监察区即 13 州，首都由司隶校尉兼管，此外每州设刺史一人，长驻地方。从前刺史检举地方长官违法行为，要先报告三公，由三公派人复查核实再行惩办。东汉时，刘秀规定直接向皇帝报告情况，不再通过三公，这便把管理地方长官的大权直接收归皇帝掌握，也削弱了三公的权力。此后，刺史权威日渐增大。东汉末刺史改为州牧，品级也从六百石提高为二千石，并派有名望的九卿出任州牧，逐渐形成了州、郡、县三级地方行政机构，对后世有深远影响。地方政权又一重要改革，是废除内郡的地方兵，裁撤郡都尉，并其职于太守，取消郡内每年征兵操练的都试。废除地方兵后，国家军队的指挥权完全集中在中央和皇帝之手，便于对地方进行控制。然而，东汉的地方兵并未完全废除，有事时仍征发内郡地方兵，由太守或刺史统领。由于这些内郡地方兵没有都试缺乏训练，所以战斗力差。而东汉时出现的刺史兼有一州军政大权的现象，也有利于东汉末刺史割据的发生。这同东汉统治者加强集权的愿望也是相反的。

另外，东汉一建立，光武帝就着手建立太学，设置博士，从儒生中选拔官吏。光武帝对于隐居山林不仕王莽的人，重礼征聘，表示对封建名节的表彰。他以特礼相待严子陵就是一个著名的例证。这对维护东汉王朝的统治加强皇权都是有利的。（杨生民）

释奴令与度田令

东汉初光武帝为解决奴婢问题和土地问题而颁布的法令。

西汉末年，在王莽改制和继之而来的农民大起义过程中，一些民人沦为奴婢，成了当时的社会问题。东汉初年，光武帝为解决这一问题，下了九次诏令：建武二年(26)五月，下诏：民间有“嫁妻卖子”想回父母家的，都听任他们回去。如果不让回去，要按法律惩处。建武六年十一月诏：王莽当政时吏人(民)被没入为奴婢不合旧法律的，都免为庶人。建武七年诏：吏人(民)由于遭饥饿和战乱以及被青、徐贼所略(强取)当了奴婢下妻的人，想去想留，听其自由。如果敢拘留不还，按卖人法惩处。建武十一年一连下三次诏书，内容是：一、奴婢主杀奴婢不得减罪；二、奴婢主炙灼奴婢，依法治罪，免被炙灼者为庶民；三、废除奴婢射伤人处死的法律。建武十二年三月下诏：陇、蜀民被略(强取)为奴婢自己提出诉讼和狱官还未上报的人，都免为庶人。建武十三年十二月诏：益州民自建武八年以来被强取为奴婢者，免为庶人。如敢拘留不放，按略人法治罪。建武十四年十二月诏：益、凉二州奴婢，自建武八年以来在官府提出诉讼的，都免为庶人。出卖了的奴婢不向主人还钱。这几次诏令从内容看，一是要释放一部分沦为奴婢的人为庶人，一是要提高奴婢法律地位不许任意杀死奴婢和不许炙灼奴婢等等。这些法令在当时是有进步意义的。

东汉初年，由于豪强地主的发展，大量隐占土地和人口，影响了东汉政权的财政收入和统治的巩固。针对这种情况，建武十五年光武帝颁布度田令，让州郡查实垦田顷亩和户口、年纪。度田的目的，是为了掌握垦田数与户口名籍以增加赋税收入，同时也是为了控制、削弱豪强。由于州郡官吏阿附豪强推行度田不力，建武十六年，光武帝以度田不实为罪名，处死曾任汝南太守的大司徒欧阳歙、河南尹张伋及其他郡守十余人。结果引起了豪强地主的激烈反抗，“郡国大姓及兵长群盗处处并起，攻劫在所，害杀长吏”，郡县发兵追讨时“到则解散，去复屯结”。光武帝一方面发兵追捕，让其互相纠杀，一方面又把捕获的大姓兵长、魁帅迁至他郡，赋田授廪，使其安于生产。经过这次斗争，豪强势力受到一定的抑制，形势缓和，度田与清查户口也在形式上成为东汉的定制。

（杨生民）

东汉初任循吏发展经济

东汉初任用遵理守法而有治绩的人为地方官称循吏，他们为安定社会秩序和恢复发展社会经济做出了一定贡献。

《后汉书·循吏列传》载卫飒、任延、王景等 12 人为循吏。卫飒在建武年间为桂阳太守。桂阳郡管辖下的一些地方离郡城远者千里，官吏来往，发民服役，每一官吏往来，要数家服役，百姓困苦不堪。卫飒凿山开道 500 余里，设置驿传，省劳息役，杜绝奸吏。另外，桂阳郡所属耒阳县出铁矿石，私人为开矿冶

铸，招收亡命，多生奸盗。卫飒罢斥私铸，每年政府增加收入500余万，社会秩序也大为好转。卫飒治理桂阳10年，郡内清理得井井有条，受到了光武帝的赞赏。任延在建武初为九真郡（今越南清化）太守，九真俗以射猎为业，不知牛耕，任延令"铸作田器，教之垦辟，田畴岁岁开广，百姓充给"。任延后转任武威太守后，组织当地武装，有效地制止了匈奴、羌人的侵犯，同时又设置水官"修理沟渠"，使百姓"皆蒙其利"。王景在明帝永平十二年(69)曾被任命与王吴一道治理黄河、汴渠，后任庐江郡（安徽庐江南）太守。由于这一地区"百姓不知牛耕"，导致了"地力有余而食常不足"。当地有春秋时楚相孙叔敖所修的芍陂稻田，王景率吏民，修芜废，"教用犁耕，由是垦辟倍多，境内丰给"。又令百姓"蚕织"。

此外，建武七年(31)杜诗任南阳太守时，总结劳动人民的生产经验，"造作水排"，发明了用水力鼓风冶铸铁器，"用力少，见功多"，为大量铸作优质的廉价农具创造了便利条件。水力鼓风欧洲在12世纪才开始应用，杜诗在公元1世纪发明使用这项技术，在世界冶铁技术史上是一项重大改革。杜诗在南阳还"修治陂池，广拓土田"，使郡内"比室殷足"。东汉初年，汝南郡太守邓晨用都水掾许扬修治汝南原有的鸿隙陂，经几年时间，修建了许多陂塘，使几千顷农田得以灌溉，累年丰收。其后，太守鲍昱又继续修治，用石头建造水门，灌溉农田更多。后何敞为汝南太守，又修鲖阳旧渠，灌田至三万余顷。东汉初年，渔阳太守张堪在狐奴（北京市顺义县境）引水灌田，开辟稻田八千多顷。

东汉初年任用这些被称为循吏的好的地方官，为社会安定和经济发展做出了贡献。　（杨生民）

王景修汴渠、黄河

东汉明帝时任用王景修治汴渠、黄河取得成功，使以后900多年黄河没有改道。

王景是东汉时著名水利专家，乐浪郡诩邯县（今朝鲜平壤北）人。王景少年学易，博览群书，爱好天文数学，又多技艺。明帝时，王景与将作谒者王吴用堰流法修治浚仪渠获得成功，使水不再为害。这是王景修汴渠、黄河的前奏。

王莽当政时，公元11年，黄河在魏郡决口，河道南徙，改从千乘（山东利津县）入海。河水侵入汴渠。汴渠是东汉漕运要道，汴渠原设水门的地方已处于黄河之中。这使漕运发生了困难。尤为严重的是，黄河决口导致了兖、豫两州连年遭水灾，河水泛滥数十县。东汉初，国家无力修治，而河北的官僚地主为了自身的利益，也乐于以邻为壑，又阻止修治汴渠。所以，河水泛滥近60年。明帝永平十二年(69)，朝廷议修治汴渠，明帝召见了王景，问了有关问题，王景对答自如。又因王景修浚仪渠功业有成，遂决定修治。这年夏天，发卒数十万，派遣王景与王吴修渠筑堤。王景、王吴在从荥阳至千乘（山东利津县）海口的地段内，测量地势，开凿山阜，疏决壅积；又在汴渠堤上，每10里立一水门，控制水流。他们用这种方法，终于使河汴分流，消除了黄河水患，使黄河两岸广大地区能重新耕种，同时也使汴渠漕运畅通。第二年夏天，大功告成，明帝亲自沿河巡行，诏沿河郡国设置管理河堤的官吏。王景在治河过程中简省役费。明帝还下诏令把"滨渠下田赋与贫人，无令豪右得固其利"。这次修治黄河的工程质量好，黄河受南北两堤的约束，水势足以冲击沙土流入海中，对消除黄河水患起了积极作用。　（杨生民）

汉明帝推行区田法

东汉明帝时下诏推行旱田园艺化的耕作方法区田法，以增加土地的垦殖和农业产量。

东汉明帝时因牛疫、天旱、垦田减少，下诏推行区田法。区田法是在代田法基础上发展起来的适用于北方旱作地区的一种园田化的耕作方法。最早载于汉成帝时成书的《氾胜之书》。其耕作要点如下：一、深挖作区（音欧）。区田法有两种，即开沟点播和坑穴点播，沟和坑就称为区。深挖点播的作用是有利于防风防旱、保墒保肥和作物根系的发育。二、密植。如种粟，开沟点播每沟内种粟二行，行距五寸，每汉亩合15000余株，折合市亩为23000余株。坑穴点播种粟各小区（坑）下种20粒，一亩3700区，合74000株，折合市亩约106000余株。三、浸种。即以肥料和可以防虫的物质浸泡种子。四、施用重肥，如种粟、麦、大豆等每小区（坑）要施美粪一升，瓜每小区要用粪一石。区田法还注重中耕除草、保墒和灌溉。区田法不仅可以在平地和熟田推行，也可以推行于坡地和荒地，有利于扩大土地的利用和垦殖，也可大大提高粮食的亩产量。区田法还可以大大节约畜力。所以每当缺乏畜力、天旱之时，如东汉明帝和晋朝时都要求推行区田法。但又因区田法要耗费大量人力、物力，技术要求高，所以只作为小面积的试验而存在，并没有在长时间内大面积推广。区田法作为一种新的耕作方法的出现，要求在小面积的土地上精耕细作少种多收，使农业走园田化的道路，这为我国农业

精耕细作提高单产奠定了一个初步基础。从这方面来说，区田法的出现有着重要意义。　（杨生民）

汉明帝提倡佛教

佛教自西汉末传入中国后，东汉明帝提倡佛教，此后佛教在统治阶级倡导下流传了起来。

西汉时，今新疆一些地区已信奉佛教。据记载汉哀帝元寿元年（前2），西域佛教国大月氏使臣伊存来朝，博士弟子景卢从伊存口授浮屠经。大月氏是中亚佛教盛行之地，口授佛经又是当时佛经传授的通行办法。所以，汉哀帝元寿元年佛教传入中国的这一记载是可信的。佛教传入中国后，先在统治阶级中流传，最早的信徒多是帝王贵族。汉明帝永平八年（65），光武帝的儿子楚王刘英"为浮屠（佛）斋戒祭祀"。汉明帝给刘英的诏书里褒奖他"尚浮屠之仁祠"。汉明帝并将诏书宣示各王。这说明汉明帝是提倡佛教的。此后，佛教在统治阶级信奉、倡导下流传了起来。桓帝曾在宫中"立黄老浮屠之祠"。桓、灵之世，安息僧人安世高、大月氏僧支谶等相继来中国，在洛阳翻译佛经，汉人严浮调从安世高学习佛学，并参预翻译佛经。从此以后，佛教在中国有了教义可循。

汉代虽然佛教已传入中国，但当时的人把佛教教义理解为清虚无为，与黄老学说相似。因此，浮屠与老子常常并祭。汉桓帝时襄楷上书桓帝书里说"老子入夷狄为浮屠"。这里说老子西行教化胡人为浮屠之说，说明当时人对佛教还缺乏认识。东汉末年，佛教徒牟融作理惑论仍然用老庄无为思想阐发佛教教义。汉献帝初平四年（193），丹阳人笮融为徐州牧陶谦督广陵等郡漕运，他起浮屠祠，造浮屠铜像，用复免徭役的办法招信徒，"远近前后至者五千余人户……民人来观及就食且万人，费以巨亿计"，这是我国佛教大规模招致信徒的最早的记载。

佛教的内容和形式，在当时中国是一种新奇事物，开始流行的佛教主要是小乘教。它的教义主要有以下几点：一是神不灭论，宣扬人身体死亡而精神不死。这比秦汉方士宣扬的人可以长生不死的骗术要高超，人不易识破。二是因果报应说，认为现世的生死祸福，是前世的因果报应。前世善人，死后神归天堂；前世为恶，死后神归地狱。这比儒家宣扬的"死生有命，富贵在天"的说教更富于欺骗性。三是布施，宣扬布施是为本人造功德，于是布施便盛行了起来。东汉末笮融就以造佛寺、养僧徒、免徭役、舍酒饭等办法大行布施。这些内容正是统治阶级愿意接受的新工具。统治阶级可以利用它麻醉人民。所以，佛教传入中国后，就在统治阶级倡导、信奉下，发展了起来，并长期盛行。　（杨生民）

匈奴分裂与北匈奴西迁

建武二十四年（48），匈奴分裂为南北两部。此后，南匈奴向东汉王朝称臣，北匈奴在东汉王朝和南匈奴的打击下连连战败最后西迁。

汉宣帝时匈奴呼韩邪单于向汉称臣，王莽改制破坏了汉与匈奴的友好关系。更始政权建立后，曾派使者送去汉王朝旧制规定的玺绶，要求恢复传统友好关系。然而，匈奴单于舆却不答应。他认为：匈奴与汉本是兄弟。后来匈奴内乱，汉宣帝扶持呼朝邪单于，所以尊汉称臣。西汉末王莽篡汉，匈奴出兵攻王莽，使王莽失败汉朝复兴，是匈奴有功于汉，因此汉应尊匈奴。建武六年汉光武帝令中郎将韩统使匈奴，"赂遗金币，以通旧好"，而单于傲慢，出言不逊。虽然，汉与匈奴常有使节往来，但匈奴与叛降匈奴的卢芳勾结不断侵扰边郡。建武九年，光武帝派大司马吴汉等反击匈奴，经年无功而匈奴转盛，侵扰更甚。卢芳降汉后，匈奴进一步大举南侵，兵锋抵达今山西东南的上党、陕西西部的扶风、甘肃东部的天水、河北中部的中山国等地，杀掠严重。建武二十二年匈奴内部在单于继承问题上发生矛盾，导致了分裂。原来，向西汉称臣的呼韩邪单于死后，单于位由诸子以次第继立，乌珠留单于、单于舆均为呼韩邪单于之子。单于舆在位时立乌珠留单于之子比为日逐王，负责统领匈奴南方诸部及乌桓。单于舆之后，应由呼韩邪单于与王昭君生的儿子知牙师继位，但知牙师被杀。单于舆死后，其子乌达立为单于。乌达单于死后，其弟蒲奴立为单于。日逐王比对此十分不满，他认为，如果是兄弟相继，则知牙师应立为单于；如果是父子相继，他是前单于乌珠留的长子就应立他为单于。恰巧这时，匈奴地区连年遭旱灾、蝗灾，赤地数千里，人畜死耗大半。蒲奴单于惧汉乘机攻伐匈奴，于是遣使求汉和亲。这时，日逐王比也在建武二十三年派人带匈奴地图至西河郡（治今山西离石）太守处请求归附。建武二十四年，日逐王率领匈奴南边八部共四五万人降汉，八部大人共议立日逐王比为单于，并沿用呼韩邪名号，表示愿意继续西汉后期的汉、匈关系。光武帝采纳耿国意见，承认日逐王比为南匈奴呼韩邪单于，自此匈奴分裂为南、北两部。

匈奴在分裂过程中存在着尖锐斗争。建武二十三年，日逐王比求内附被人密报单于并建议为防"乱

国"应诛杀日逐王比，蒲奴单于曾遣万骑袭击日逐王比所率部众，因日逐王比有准备而未得逞。比立为南匈奴呼韩邪单于后，建武二十五年春派其弟左贤王莫率兵万余击北匈奴左贤王，并擒获之，又破北单于帐下，共得其众万余人，马七千匹，牛羊万头。南单于遣使使汉，奉藩称臣，修旧约。建武二十六年，汉派使者使南单于，立其庭于五原(内蒙古包头西)西部。汉王朝赏赐单于及官员冠带、衣裳、玺绶、车马、缯絮、器用、武器及粮食、牛羊等物品，花费一万万以上，并听任南匈奴入居云中。不久，因南匈奴与北匈奴交战失利，又把南单于庭迁到西河美稷(内蒙古准格尔旗北)，并令使匈奴中郎将等官员统兵卫护单于，南单于也分部众分屯北地、朔方、五原、云中、定襄、雁门、代郡，侦察北匈奴行动，并协助守边。

北匈奴控制着西域，离汉较远，常常侵扰北方和西方郡县。东汉王朝答应与北匈奴"合市"，但引起了一些南匈奴贵族的疑忌。另外，北匈奴也常常引诱南匈奴部众。为此，明帝永平八年(65)，设置度辽营，屯兵于五原曼柏(内蒙古伊克昭盟东北部)，以隔绝南、北匈奴交通。章帝时，北匈奴驱牛马万余头，到武威与汉人"合市"，曾受到郡县的款待和东汉王朝的馈赠。

北匈奴势力薄弱，经常受到南匈奴和东方鲜卑的攻击，北方的丁零和西方的西域诸国也乘机攻击北匈奴。东汉王朝为消除北匈奴对西北边郡的侵扰和恢复与西域关系，也发动了对北匈奴的进攻。明帝永平十六年(73)，汉军四路出击，窦固、耿秉出酒泉塞，追击北匈奴至天山，夺得伊吾庐(新疆哈密)，留吏士屯田。次年冬窦固、耿秉等人率军在蒲类海(新疆巴里坤湖)破敌军，取车师(新疆奇台、吐鲁番等地)，复置西域都护及戊、己校尉。明帝永平十八年，北匈奴单于派骑兵2万进攻戊校尉耿恭、己校尉关宠，焉耆、龟兹等又攻杀西域都护陈睦。

章帝章和二年(88)，北匈奴内乱，又遭蝗灾饥荒，南下归降者不断。这年章帝死，和帝继位年幼，窦太后执政。南匈奴屯屠何单于上书说：北单于兄弟争立，部众离散，很多人想归汉，应趁此机征服北匈奴，永远解除北部边患。并表示：臣等生长汉地，开口仰食……惭无报效之地。愿发国中精兵，一举平定，唯陛下省察等等。窦太后征询耿秉的意见，耿秉认为：北虏分争，以夷伐夷，国家之利，宜可听许。并自告奋勇出征。窦太后采纳了耿秉的意见，大举北伐。和帝永元元年(89)，窦宪、耿秉等率骑兵8000与南匈奴右谷蠡王所部万骑，邓鸿率度辽营及沿边羌胡骑兵8000与南匈奴左贤王所部万骑，及屯屠何单于亲自率领的骑兵一万多分三路出击，与北单于大战于稽落山(今蒙古人民共和国达兰扎达加德西北)，北单于败逃，汉军追击，俘获牲畜百余万头，前后归降的共八十一部，二十余万人。窦宪大军达燕然山，刻石纪功而还。次年，南匈奴左谷蠡王等率骑兵八千多与汉王朝军官远征北匈奴，北单于受伤逃跑，其夫人及家属五人被俘。永元三年，窦宪令耿夔、任尚出居延塞，至金微山(今阿尔泰山)，大破北匈奴。北单于逃走，自此逐渐西迁，其弟於除鞬自立为单于，部众仅数千人，请降汉。这时，兴起于东北的鲜卑乘虚转徙逐渐占据了北匈奴广大漠北地区，北匈奴散居于各地遗民也就归降鲜卑，互相融合，从此鲜卑渐渐强大起来。

南匈奴归附汉朝后，逐渐内徙，至汉和帝时发展到34000多户，近24万人，有战士5万多。北匈奴西迁后，南匈奴没有北返，仍留居边塞，与汉族友好相处，逐步转向从事农业活动。上层贵族子弟学习汉族传统典籍，思想和习俗上逐渐汉化。这样，南匈奴逐渐地与汉族融合。

秦汉时期与中原王朝斗争了几百年的匈奴终于在斗争中失败了。汉和帝时期攻打北匈奴的主力是南匈奴，看来匈奴自身的分裂是其衰败的重要因素。在中原王朝与匈奴斗争过程中，中原王朝在经济上、文化上都是先进的，同时汉王朝也奉行了比较恰当的民族政策即"怀远以德"，也就是用尊重友好的态度对待兄弟民族。这些都是长远的起了重大作用的因素。不过，匈奴的衰败并不意味着中原王朝北部边患的解除，在北方逐渐强大的鲜卑族取代匈奴又成了中原王朝的北方强敌。 (杨生民)

班超、班勇通西域

东汉时班超及其子班勇通西域，恢复了汉朝对西域各国的管辖，打通了中西交通。

自张骞通西域后，汉王朝对西域各国，逐步行施了有效的统辖、管理。王莽改制后，中原大乱，匈奴又乘机征服西域。由于匈奴的残酷剥削压迫，西域有的国家坚决不肯归属匈奴。天凤五年(18)莎车王延去世，子康即位，反抗匈奴，保护了西域都护李崇的部属及家眷千余人，表示了对汉朝的思慕。建武五年(29)，占据河西的窦融以东汉王朝名义任命莎车王康为"西域大都尉"，统管西域诸国。莎车王康去世，弟贤继位。建武十四年，莎车王贤、鄯善王安派使者到洛阳朝贡，表示西域受匈奴重敛，无法忍受，请汉

派西域都护。光武帝以中原初定力量不足为理由，不许。建武二十一年，车师前王、鄯善、焉耆等18国遣王子入侍，再次请汉派西域都护，光武帝仍不答应。鄯善告诫东汉王朝，如果再不派都护，只有臣属于匈奴了。光武帝回答说：汉王朝无力派军队和都护去西域。如各国力不从心，只有任你们选择。在这种情况下，车师、鄯善、龟兹等国先后归降匈奴。此后于阗一度强大，但最后也不能不归降匈奴。这样，西域50余国都成了匈奴的属国。匈奴利用西域的人力、物力攻击河西地区，使边郡白天都得关上城门守备。汉明帝觉察出不能一味退让挨打，应以攻为守。永平十六年(73)，派窦固、耿秉等分兵四路北击匈奴，打开了经营西域的道路。班超这时从军西征，遂脱颖而出。

班超(32—102)，著名史学家班彪之子，班固之弟。年轻时在洛阳生活，勤奋好学，胸怀大志。他曾感叹地说：大丈夫应像张骞立功异域，争取封侯。永平十六年，窦固等北击匈奴，班超以当"假司马"的小官从军出征，因立功，深受窦固赏识。窦固派班超、郭恂带随从36人，出使西域南道诸国，争取他们断绝与匈奴关系。班超等人先到鄯善，鄯善王热情有礼，突然又怠慢起来。班超认为肯定是匈奴使者来临，他们拿不定主意。后从鄯善侍者处得知，匈奴使者已来三天，住在离此30里处。超以"不入虎穴，焉得虎子"的精神，火烧匈奴使者营地，歼灭匈奴使者及随从。鄯善举国震动，从此决计归附汉朝。窦固把这一情况上报朝廷，并请派高级官员进一步通使西域诸国。明帝下诏说，班超就是最恰当的使臣。于是就派他出使于阗。窦固计划给班超多派些士兵，班超认为增加几百士卒也强不了多少，于是仍领原来36人。当时于阗新破莎车，威服附近十余小国，北匈奴又派使臣监护。班超到于阗后受冷遇，当地有威信的巫师反对亲汉，并说汉使有匹黄马，要来供祭祀用吧！于阗王广德派人向班超要马，班超应允，要巫师亲自去取马。巫师来后，班超杀巫师，并严厉斥责于阗王。于阗王醒悟，立即攻杀驻此监护的匈奴使者，归附汉朝。龟兹王是匈奴拥立的，凭借匈奴势力横行霸道，攻破疏勒，杀疏勒王，派龟兹官员兜题当疏勒王。永平十七年，班超到疏勒，在距兜题所住盘橐城90里处暂住，派从官田虑招降兜题。班超告诉田虑，兜题不是疏勒人，得不到支持，如果他不归降，可抓起来。田虑到后，兜题不降。田虑乘其不备，突然把他捆绑起来，兜题左右惊恐逃散。班超立即前去，向疏勒官员宣布龟兹的罪行，并立原疏勒王侄子忠为疏勒王，疏勒官民都很支持。在窦固、班超等人初步成功的基础上，这一年汉重新设立西域都护和戊、己校尉，以陈睦、耿恭、关宠分任其职。

永平十八年，北匈奴在西域反攻。焉耆、龟兹攻杀西域都护陈睦。北匈奴围攻己校尉关宠，后关宠被杀。北匈奴与车师又围攻戊校尉耿恭。章帝建初元年(76)，耿秉才率援军击败匈奴，打败车师，救出耿恭和残存吏士30余人。这年，章帝撤除西域都护和戊、己校尉，并诏班超回朝。南道诸国怕匈奴报复，都挽留班超。疏勒一位官员因挽留不住班超自杀，于阗国王和官员也坚决挽留班超，甚至抱住马腿不让走。班超感到民心可用，又返回疏勒。建初三年，班超率疏勒、于阗等国士兵1万人进攻姑墨(新疆温宿西)获得胜利。其后，班超上书章帝说，西域诸国多数倾向汉朝，如能集中兵力攻破龟兹，护送亲汉的龟兹侍子白霸回国即位，便可稳定西域。章帝认为此议可行。后班超用汉朝两次援兵各约千人及于阗等国兵，迫使匈奴南道属国莎车归降，又击败龟兹援莎车军队，西域南道从此平定。

和帝永元二年(90)，大月氏贵霜王朝发兵7万，越葱岭东来，企图统治西域。班超认为，大月氏兵虽多，却远途跋涉，后勤供应困难，只要有粮、坚守，敌人会因饥饿困乏投降，过不了几十天就能解决问题。大月氏兵攻城不克，粮食将尽，班超估计他们必往龟兹求援，便派兵等候，果然全歼大月氏派往龟兹的使者及随从。大月氏领兵统帅副王谢派人向班超请罪，恳求放他们生还。班超给他们以生路，大月氏从此向汉朝纳贡。这时，窦宪等人已大败北匈奴，并重新派兵占领伊吾，形势发生了重大变化。永元三年，北道龟兹、温宿、姑墨等国降于班超。汉朝任命班超为西域都护，驻守龟兹，并复置戊、己校尉。汉朝又送回龟兹侍子白霸为龟兹王，废旧王尤利多。这时，只有焉耆、危须(新疆和硕西)、尉犁(新疆库尔勒西)三国因杀害前都护陈睦，不肯归降。永元六年，班超发龟兹、鄯善等国兵7万余人讨伐焉耆，擒焉耆王广、尉犁王汎送至陈睦被害处处死，焉耆等国归降，西域北道完全打通，西域50余国全部归属。永元七年，汉和帝在诏书中称赞班超在西域22年，改立国王，安抚臣民，不用内地兵马财物，而得西域诸国士民拥戴，为国报仇雪耻，封班超为定远侯。永元九年班超派甘英出使大秦(罗马帝国)到达条支(今伊拉克)的海边，因当地的阻挠未继续前进。但这件事在中西交往史上无法忽视。永元十四年，年已过70的班超在朝廷允许后回到洛阳，一个多月后因病去逝。

班超东归后，继任的西域都护任尚措置失宜，受

诸国攻击。汉朝调回任尚，新都护段禧苦战数月，仅保住龟兹。安帝永初元年(107)，汉撤销都护，发兵迎回段禧和伊吾、柳中屯田吏士还内地。这年，陇西羌人与东汉发生战争，陇道断绝。北匈奴又占伊吾，寇掠河西地区。安帝元初七年，鄯善向敦煌太守曹宗求援，曹宗请朝廷派兵经营西域，朝中公卿多主张放弃西域，唯班勇指出：经营西域是“夺匈奴府藏，断其右臂”，弃西域则匈奴威胁河西，使“中国之费，不止千亿”。又指出：西域一些国家，如鄯善、车师等国不堪匈奴侵扰，“思乐事汉”。西域一些国家发生变乱，大多是官吏处置不当引起的。并建议在敦煌复置护西域副校尉加强敦煌边兵，恢复鄯善屯田。延光二年(123)，安帝派班勇为西域长史，率兵500屯田柳中(鄯善西)。次年，班勇到鄯善，招降龟兹、姑墨、温宿等国，又征调诸国兵万余人攻车师前部、击走北匈奴伊蠡王，招车师前部遗民5000人重新立国。延光四年(125)，班勇征调河西及鄯善、疏勒、车师前部兵攻车师后部，斩8000余人，斩车师后部王及北匈奴使臣。次年，班勇征调诸国兵进攻北匈奴呼衍王，呼衍王逃走，其部众2万多人降。北匈奴单于率万骑进入车师后部，被班勇派兵击退，追杀其贵人骨都侯。班勇又改立车师后王，从此匈奴不再进攻车师，西域诸国安定。唯焉耆不附汉。顺帝永建二年(127)，班勇奏请攻焉耆，获准。班勇与敦煌太守张朗约期会合进攻，张朗提早进攻，焉耆王元孟降。班勇反而以后期未赶到参战的罪名免官下狱。班勇虽受诬陷，但功不可没，他的活动使西域各国重新归属汉朝，直到汉灵帝时黄巾起义爆发，东汉与西域交通才又告断绝。班勇随父班超在西域长大，了解西域，曾编著《西域记》一书，为后人了解西域提供了珍贵资料。

班超、班勇父子在西域奋斗了几十年，帮助西域人民解除了北匈奴的压迫，使西域与内地重新联系在一起，这在客观上有利于各族人民，有利于中西交通的畅通和经济发展。　(杨生民)

东汉与羌人的战争

东汉中期后，东汉王朝与不堪忍受压迫的羌人多次进行的战争。

羌是一个古老的民族，春秋时称西戎。战国初秦厉公(前476—前443)从西羌俘虏了一个叫爰剑的人当奴隶，爰剑从秦人学到一些生产知识，逃回后教羌人畜牧种植。羌人敬重爰剑的功绩，让其子孙世代做酋长，汉代羌人酋长都说是爰剑的后人。羌人以游牧业为主，活动地区以西海郡(青海)为中心，南到蜀、广汉郡，西北到西域鄯善、车师，大约有150个部落。西汉初，羌人被匈奴贵族所役属。汉武帝设立河西四郡后，羌人的一支在河西地区与汉人杂居。东汉初，羌人曾进攻金城、陇西一带。汉政权打败羌人后，把他们安置在天水、陇西、扶风三郡。羌人与汉人杂处对其经济、文化发展有利，但羌人无法忍受地方官吏与豪强地主的奴役，于是便爆发了东汉王朝与羌人的战争。

安帝永初元年(107)，汉王朝派骑都尉王弘强迫征发金城、陇西、汉阳(甘肃甘谷东南)三郡羌人去西域接迎屯田吏士还内地，羌人到酒泉纷纷逃散。郡县地方官吏发兵追捕，捣毁羌人村落庐舍，引起羌人反抗。羌人没武器，或持竹竿木棍当矛，或负木板食案作盾，或执铜镜在日光下摇动当作舞刀。邓太后想让其兄邓骘立功，令他率5万人出征。邓骘先在汉阳被钟羌打败死亡千余，接着又在平襄(甘肃通渭西)被滇零羌打败，死余八千余人。滇零在北地郡(治今宁夏吴忠)自称天子，武都、上郡、西河等地的羌人群起响应。羌人势盛，东犯赵、魏，南侵益州，杀汉中太守董炳，朝廷不能制。汉朝廷只得把邓骘撤回。边郡地方官纷纷要求迁郡县到内地以避战祸，邓骘也主张放弃凉州。永初五年，汉朝廷下令把陇西、安定、北地、上郡太守治所迁至内地，居民也被强令西迁，这便造成了弃老弱、道途死亡或沦为奴婢等惨状发生，逼使汉族人民也起来反抗东汉王朝。这年秋，汉阳人杜琦、杜季贡、王信起义，占领上邽(甘肃天水)，与羌人相呼应。汉军屡战屡败，最后收买叛徒、刺客暗杀了杜琦、杜季贡等人。这次反抗斗争坚持了12年，到安帝元初五年(118)才被压服下去。在这次战争中，东汉政府用军费240多亿，给战区人民造成极大灾难。

顺帝元和四年(139)，由于地方官吏骚扰，羌人又起来反抗。次年，羌人攻金城、三辅、武都，杀贪官污吏。顺帝命马贤为征西将军，率10万军队驻汉阳。马贤每天饮酒作乐，军中带着婢妾，结果被羌人打败，马贤及其子均被羌人杀死。这次战争经10年，冲帝永嘉元年(145)，才算平息。这次军费用80多亿。军官只顾贿赂皇帝左右以便升官发财，又克扣军费，使许多士兵饥死道路。

桓帝延熹二年(159)，羌人又一次大规模反抗。四年，公卿举皇甫规为中郎将，督诸军进攻。皇甫规击破羌兵，羌人十余万自动归附。皇甫规严惩贪官，逐诛大官五六人，小官百余人，羌人闻讯又有十余万人归附。皇甫规逐诛贪官，然而贪官有大官、宦官做

后台，他们勾结起来，反诬皇甫规用钱收买羌人诈降，皇甫规反被投入狱中。后经一些官员和太学生张凤等300余人辩护，才被释回家。由于羌人不断反抗，皇甫规又被任命为度辽将军。皇甫规到职后推荐张奂做元帅，自己做他的副手。延熹六年，朝廷命张奂为度辽将军、皇甫规为使匈奴中郎将、段颎为护羌校尉。张奂曾任安定附国都尉(陕西榆林北)，相当太守，管内附各族，为官清正。先零羌送他马20匹，金器八件，他拒不受，发誓说：即使马像羊那样贱，不让马入我厩；金像米那样多，不让金入我怀。羌人敬佩他的廉洁，从此遵从他的教命。张奂、皇甫规主张招抚，在他们任职内，地方上较平静。但因东汉王朝政治上腐败，羌人反抗仍是此起彼伏。段颎主张对羌人进行屠杀，汉桓帝居然同意。建宁二年(169)段颎进攻羌人于射虎谷(甘肃天水西)，杀19000人，在与羌人作战中他共杀38000余人，用费44亿，算是把羌人压服了。但这只是暂时的，十余年后黄巾农民起义时，羌人起而响应，与汉族人民一起，摧毁了腐败的东汉王朝。

东汉中期后，东汉王朝与羌人战争持续60余年，耗军费400亿，使东汉王朝的危机进一步加深，日益走向崩溃。　　　　(杨生民)

白虎观会议

建初四年(79)，章帝召开的讨论儒家经学的会议，使儒家经学进一步神学化。

从汉武帝时董仲舒宣扬天人感应推崇阴阳灾异说之后，儒家今文经学发展的一个显著特点是经学与谶纬相结合，逐渐神学化。谶是伪托神灵的预言，常附有图，称图谶。纬是假托神意解经的书。谶、纬的内容绝大部分是荒诞的迷信。王莽、刘秀称帝都利用谶纬制造舆论。由于今文经学(用汉代通行隶书写成)与古文经学(用篆文即战国文字和秦小篆)对儒家经学解释不同，今文经学内部各家师承不同解释也不同。为此，光武帝中元元年(56)“宣布图谶于天下”，把谶纬之学正式立为官方的统治思想。为使儒学与谶纬结合，使儒学进一步神学化，并巩固其统治地位，章帝建初四年，仿西汉宣帝时石渠阁会议的办法，召集著名儒生于洛阳白虎观，讨论五经异同。这就是历史上著名的白虎观会议。

白虎观会议由汉章帝亲自主持，参加会议的有魏应、淳于恭、丁鸿、楼望、贾逵、班固、杨终等人。会上，由五官中郎将魏应秉承章帝意旨发问，侍中淳于恭代表诸儒回答，章帝亲自裁决。这样详考异同，最后由班固把讨论的结果辑成《白虎通德论》，又称《白虎通义》或《白虎通》，作为钦定的经典公布于世。这次会议把流行的谶纬迷信与儒家经典合为一体，使儒学进一步神学化了，把封建伦理纲常神学化了。如白虎观会议肯定了“君为臣纲”是三纲之首，而在讲五行时又把五行之一的土解释为五行之首，寓意是土为君，“土居中央”，“木非土不生，火非土不荣，金非土不成，水非土不高”。所以土在五行之中是起决定作用的，是五行之君。这一解释的目的是为说明君的地位和中央政权至高无上是起决定作用的，是天意，是神授。再如《白虎通》里把“日行迟，月行速”这一自然现象比为“君舒臣劳”，即君应安舒、臣应操劳，并把这说成是天的意志和安排。白虎观会议是把谶纬迷信抬高到和经学同等的神圣地位，以神学化的儒学为封建统治秩序服务。　　　　(杨生民)

三张传道

东汉中期以后，道教产生，在张道陵、张鲁和张角的传播下迅速发展。

东汉时，民间流行的巫术和黄老学说的某些成分融合，逐渐形成道教。据记载道教产生于东汉中期以后的顺帝时。顺帝时，宫崇来到洛阳，把从老师于吉那里得到的《太平清领书》170卷献给皇帝，书的内容主要是阴阳五行家思想和巫术杂语。当时有的部门认为此书“妖妄不经”，没有采用。现存的道教主要经典《太平经》残本，就是从《太平清领书》演化而来的。《太平经》推崇图谶、用阴阳五行之说解释治国之道，充斥着迷信及对人民的欺骗。但《太平经》中有“救穷周急”的思想，如说：“积财亿万，不肯救穷周急，使人饥寒而死，罪不除也。”又说，皇帝的仓库“少内”之钱财是万民交纳，不是“独以给一人”，“有不足者，悉当从其取也”。这些思想反映了贫困农民的愿望与要求。

道教出现后，主要分“五斗米道”和“太平道”两派。“五斗米道”是道教各派中创立最早的一派。顺帝汉安元年(142)，张陵即张道陵在四川鹄鸣山(今四川崇庆境)传道，入道者须出五斗米，因此称五斗米道。又因教徒称张陵为天师，所以又称之为天师道。“五斗米道”主要在农民中传播。初入道的人称“鬼卒”，道徒中的骨干称“祭酒”。又以“治”为单位传道，发展很快，汉安二年发展到24治。张陵死后，传子衡，衡死后，传子鲁。东汉末，张鲁据汉中，为益州牧刘焉督义司马，自称师君，不设官吏，让“大祭酒”、“祭酒”治民。祭酒在道途作“义舍”，置义米肉，行人

可量腹取足。民犯法，原谅三次而后行刑。张鲁在汉中曾建立政权，统治20余年，人民生活比较安定。建安二十年(215)曹操灭张鲁。其后，五斗米道继续传播。西晋陈瑞在益州起义和东晋的孙恩、鲁循起义都曾利用五斗米道。

"太平道"的首领是张角。张角，巨鹿(今河北平乡)人，自称"大贤良师"，信奉《太平清领书》，灵帝时在冀州借治病传教。他以画符祈祷替人治病，办法是让病人跪拜自首其过，喝经过画符念咒的水，病治愈便说他信道，医治有效。病治不好，便说他不信道，所以医治无效。总之，符水总是灵验的，只要信教虔诚，病便会治好。张角又使弟子"使于四方，以善道教化天下"，徒众发展很快，十余年间，达数十万人，遍及青、徐、幽、冀、荆、扬、兖、豫八州，为黄巾农民大起义做了组织准备。　　(杨生民)

外戚、宦官专权

东汉中期后，外戚、宦官轮流专权。政治黑暗、腐败。

东汉从和帝开始，皇帝都年幼继位，无法管理政事，所以由母后临朝，母后又依靠自己的父兄(外戚)掌握朝政，形成外戚专权。小皇帝长大，又依靠宦官消灭专权的外戚，其后又形成宦官专权，或宦官、外戚共同专权。在上述情况下，政治黑暗、腐败，东汉统治集团一天天走向衰亡。

东汉第一位专权的外戚是窦宪。窦宪(？—92)，扶风平陵(陕西咸阳西北)人，字伯度，其妹为章帝皇后。章和二年(88)章帝死，其子和帝10岁即位，窦太后临朝，其兄窦宪为侍中，掌握朝政，后任车骑将军，永元元年(89)率军击败北匈奴。后为大将军，刺史守令多出其门，其家人及奴客横暴不法。永元四年，和帝在宦官郑众等人谋划下，乘大将军窦宪出征得胜归来，调兵遣将控制京城，一举收捕窦宪，逼其自杀，夺回政权。郑众也因此封侯，宦官把持政权局面由此开始。

东汉第二位专权的外戚是邓骘。邓骘(？—121)，南阳新野(河南新野南)人，字昭伯，其妹为和帝皇后。永元十七年(105)，27岁的和帝去世，其子殇帝才出生一百余天即位，邓太后临朝听政，骘先后任虎贲中郎将、车骑将军，数月后殇帝死，邓太后、邓骘立和帝13岁的侄儿为安帝。安帝永初二年(108)，邓骘曾率兵镇压羌人，败，后升大将军。邓氏以窦宪为鉴，并用外戚、宦官，又起用名士杨震等人，以图取得广泛支持。邓太后死后，安帝与宦官李闰等人合谋，消灭邓氏势力，邓骘兄弟子侄七人被迫自杀。安帝母家耿氏、妻家阎氏的兄弟阎显等人也上台执政，形成宦官李闰与阎显等联合专权。阎皇后向安帝进谗言废太子为济阴王，安帝死后，阎皇后与阎显迎立幼小的北乡侯为少帝，数月少帝病死。延光四年(125)十一月，宦官孙程、王康等19人，发动宫廷政变，拥立11岁的济阴王为顺帝，杀阎显及其同党。宦官孙程等19人因功封侯，有人甚而把他们比为两汉开国功臣韩信、吴汉。宦官势力大盛，他们收养的儿子可以世袭爵位也被定为法令。顺帝也扶植外戚势力，相继任用皇后父梁商和商子冀为大将军。

梁冀(？—159)，安定乌氏(甘肃平凉西北)人，字伯卓。妹为顺帝皇后，其父梁商死后，冀继为大将军。三年后，汉安三年(144)八月顺帝死，太子炳二岁即位，为冲帝。次年冲帝死，梁太后与梁冀立年仅八岁的质帝。梁冀执政，专横跋扈，引起质帝不满，称梁冀是"跋扈将军"，梁冀为此指使人在食物中放毒，毒死九岁的质帝。其后，梁太后、梁冀在宦官曹腾等人支持下，否定公卿大臣主张迎立年长贤明的清河王为帝的意见，拥立年幼的蠡吾侯，是为桓帝。桓帝又娶梁冀另一妹妹为皇后，梁氏家族地位更加显赫。梁冀更是权倾中外，一手遮天，不少宦官是其亲信，朝廷百官的升迁都得先到梁家谢恩，实权都被梁氏党徒把持。太尉李固和杜乔因不肯附和梁冀被诬陷致死。宛县县令吴树，诛杀在本地残害百姓的梁府宾客，升任荆州刺史后到梁府谢恩，梁以毒酒款待，让他出门死在车上。梁冀向财主士孙奋借5000万，给了3000万，梁冀诬告士孙奋母亲原是梁府婢女，偷了"白珠十斛，紫金千斤"逃亡，官吏抓士孙奋拷问，人死狱中，其家产1亿7000万全被没收。为搜刮财富，梁冀派人出塞，交通外国，搜求异物。他们的私苑，绵延近千里。又在洛阳附近，设兔苑，周围数十里，立禁令不许动苑中一草一木，苑兔被杀，牵连处死至十余人。梁冀公然不顾禁令，掠取良民为奴婢，多至数千，名为"自卖人"。梁冀把持朝政二十多年，作恶多端。延熹二年(159)，桓帝的梁皇后死，桓帝与宦官单超、徐璜等五人合谋消灭梁氏。他们趁梁冀派亲信宦官监视之机，说这些人私进宫廷图谋不轨，派武装包围梁府，收梁冀大将军印，逼其自杀，又收捕梁氏宗族亲戚处死，其他公卿将校处死数十人，免官300人，朝廷大官几乎全被罢黜。没收梁冀家产，拍卖得钱三十多亿，用这笔钱减收当年天下租税之半，以收买人心。

梁冀死后，宦官单超等五人因诛梁冀有功受到

称赞，甚而说他们有张良、陈平的计谋，霍光之功。五人同日封侯，称为“五侯”。单超封新丰侯，食邑2万户，徐璜等四个各食邑万户。此外，宦官侯览、赵忠等八人也被封为乡侯。宦官专权达于顶点，政治日甚一日地黑暗、腐败。宦官的宗族、亲戚被派到地方任刺史、太守，贪赃枉法，榨取民财，与盗贼无异。宦官侯览前后夺宅舍381所，夺人田地达118顷。梁冀专权被宦官“五侯”专权所代替，完全是以暴易暴，民间咒骂说“一将军死，五将军出”。人民无法忍受纷纷反抗，“起为盗贼”。

延熹八年(165)，桓帝立贵人窦氏为皇后。过两年，桓帝死，无子，立12岁的解渎亭侯，是为灵帝，窦太后临朝听政，其父窦武为大将军执政。窦武与太傅陈蕃谋诛宦官，并做了一系列布置，如任命尹勋为尚书令、冯述为屯骑校尉、窦武侄儿窦绍为步兵校尉等，控制了政府中枢与部分近卫军。窦武建议太后：宦官不能干政，不能让其亲属任职，对掌握大权的宦官应撤职惩处。窦太后则认为用宦官是传统，不能尽废，但同意惩办罪恶严重的。窦武打算逐步铲除，先杀宦官管霸、苏康等人。结果，打草惊蛇，宦官曹节、王甫等先发制人，劫持灵帝和太后，假传圣旨捕拿窦武等人。窦武拒不受诏，与侄儿窦绍召集近卫军数千人准备抵抗。宦官王甫迅速率宫廷警卫千余人捕窦武，又假传圣旨令不明真相刚从边郡凯旋的张奂统兵攻窦武。双方都指斥对方谋反。由于宦官挟皇帝而令臣民，窦武部众逐渐走散归降，窦武被困自杀，陈蕃遇害。此后，灵帝完全被宦官控制。宦官“父兄子弟皆为公卿列校牧守令长，布满天下”。这些人贪残异常，如宦官王甫的义子王吉出任沛国相(相当于郡守)，任职五年，总计杀了一万多人，处死人后，还要陈尸车上，到所属各县示众，夏天尸体腐烂，还要用绳子串连尸骨去各县巡行，人民经常生活在恐怖之中。光和四年(181)，宦官曹节死，宦官赵忠、张让等12人都任宦官最高品级的中常侍，贵宠封侯，被称为“十常侍”，灵帝甚而说：“张常侍是我父，赵常侍是我母。”十常侍专权，宦官更加肆无忌惮。东汉的政治黑暗到了极点。过了三年，就爆发了黄巾农民大起义。 (杨生民)

杨震自尽

延光三年(124)，为官清正的太尉杨震，因不与宦官、外戚同流合污而被逼自尽。

杨震(？—124)，字伯起，弘农华阴(陕西华阴县)人，少年好学，从太常桓郁受欧阳《尚书》，被儒生称为“关西孔子”。年50时受大将军邓骘征辟而为官，后又举茂才，经四次升迁做了荆州刺史、东莱太守。在去东莱郡途经昌邑县时，县令是他在荆州刺史任上举荐的茂才王密，王拜见他时送给他10斤金子，杨震拒不收受。永宁元年(120)，杨震为司徒，安帝乳母王圣之女伯荣，出入宫室，传通奸赂。杨震上书皇帝，要求妇人不应干政，应让乳母居于宫外，断绝与乳母往来。为此开罪了安帝的近幸。其后，伯荣丈夫刘瑰非法袭爵为侯，又位至侍中，在皇帝左右，地位贵重。杨震认为不当，又一次上书进谏。延光二年(123)，杨震为太尉，外戚帝舅耿宝和皇后兄阎显、中常侍李闰推荐私人给杨震，请他任用提拔。他拒不任用，进一步得罪了外戚、宦官。这年，安帝乳母王圣被封为野王君，大修第室，攻山采石，雕修善饰，其费巨亿。中常侍樊丰、侍中谢恽等人又从中渔利煽动，朝廷震动。杨震又上书谏止，皇帝不从。这时，中常侍樊丰、侍中谢恽等人见杨震连谏不从，遂无所顾忌，伪作诏书，调拨大司农钱谷和将作大匠处的刑徒、林木，各起家舍、园池、庐观，役费无数。次年春，安帝东巡泰山，樊丰等人趁皇帝在外之机，竞修第宅。杨震的属吏高舒从将作大匠令史处得到了樊丰等人诈作的伪诏书，准备等皇帝回来后上奏。樊丰等人知道后，极为惊怖，就共同上书皇帝，说杨震是被诛外戚邓骘的故吏，对朝廷怨恨。皇帝准奏，收杨震太尉印。樊丰等人又让外戚大将军耿宝上书奏杨震不服罪，心怀怨望云云。皇帝下诏把杨震遣送归本郡。杨震接到诏书后对他的儿子和门人说：奸臣狡猾而不能诛灭，嬖女倾乱而不能禁止，有什么面目再见天日呢？因此，饮鸩而死。死时，年七十有余。一年多以后，安帝死，顺帝即位，中常侍樊丰等人被诛，朝廷认为杨震忠贞正直，才平反昭雪，下诏令其二子为郎，赠钱百万，以礼改葬。杨震自尽的事件，说明士族官僚与外戚、宦官的矛盾斗争，从东汉中叶已经出现。

(杨生民)

党锢之祸

桓、灵二帝时，统治集团的内部权势之争。其时官僚士大夫因反对宦官受到惩罚，本人及亲属、门生、故吏终身不得做官。反对宦官的官僚士大夫被称为党人，锢是终身不得做官。

东汉从和帝后，外戚、宦官专权。外戚、宦官之外，官僚士大夫也是一支重要的政治力量。官僚士大夫指以儒学起家的官僚和习儒学的太学生组成的集团。这个集团是逐渐出现和形成的。西汉从汉武帝

“独尊儒术”后，汉政权大量选拔儒生做官。东汉初，光武帝进一步尊儒，从儒生选用官吏和习儒学的各类学校进一步发展。安、顺二帝时，扩充太学，太学生数量日增，顺帝时达到3万多人。东汉末，官僚士大夫集团集中反对宦官是当时形势决定的。延熹二年(159)，桓帝与宦官单超等诛灭梁冀后，宦官长期专权。灵帝时，外戚窦武等人为从宦官手里夺权自然要联合官僚士大夫。另外，宦官专权破坏了封建统治的正常秩序，引起了官僚士大夫的不满与忧虑。宦官任人唯亲，贿赂公行，也堵塞了士大夫的仕途。宦官是卑贱的“刑余之人”，为官僚士大夫所不齿。基于上述种种原因，官僚士大夫集团在东汉末把反对的主要目标对准宦官。

桓帝时，官僚士大夫中盛行着一种褒贬品评人物、左右社会舆论的风气，称为清议。这种风气传到太学，太学生推崇太尉陈蕃、司隶校尉李膺、王畅等人。太学生中流传着：“天下楷模李元礼(膺)，不畏强御陈仲举(蕃)，天下俊秀王叔茂(畅)。”三人中，由于李膺与宦官斗争最坚决，名望最高。如桓帝初，李膺出任司隶校尉，宦官张让的弟弟在其属下为县令，贪残不法，犯法逃至张让家躲藏，李膺率吏卒追至张让家将其弟逮捕法办。李膺因此受到赞誉，声望高，人们受到他的接待被称为“登龙门”。清议有时直接抨击宦官，如延熹五年(162)，名将皇甫规被宦官徐璜等陷害，有功反被判刑服苦役。太学生张凤等300人为他辩护，适遇大赦，皇甫规才被释放回家。官僚士大夫抨击说“国命委于阉寺”是腐败的主要根源。于是，清议对把持朝政的宦官形成了严重威胁。党锢就是在这种背景下发生的。

延熹九年，方士张成交结宦官、教子杀人。李膺捕杀张成之子。宦官侯览等唆使张成弟子牢修诬告李膺养太学游士，交结诸郡生徒，共为部党，诽谤朝廷，扰乱社会风俗。桓帝下令郡国逮捕党人，李膺和太仆杜密、陈寔、范滂等200余人均被逮捕，太尉陈蕃也被免官。次年，桓帝又下诏，把党人赦归田里，禁锢终身，不得做官。这就是著名的第一次党锢事件。这次事件发生后，官僚士大夫极为愤慨，称赞不畏宦官权势的正直士大夫。如称陈蕃、窦武等三人为“三君”，君指当时受人崇敬的人；称李膺、王畅等八人为“八俊”，俊即人中英雄；称郭泰、范滂等八人为“八顾”，顾即品德高尚值得人们效法；称张俭、刘表等八人为“八及”，及指能引导人；称度尚，张邈等八人为“八厨”，厨指能以财物救助人。这使官僚士大夫与宦官集团之间的斗争更为激烈。

延熹十年，桓帝死，灵帝幼年即位，窦太后临朝，大将军窦武与太傅陈蕃执政，起用李膺等被禁锢的党人，谋诛宦官，失败，窦武、陈蕃均死，窦武、陈蕃及李膺所举荐的官员和门生、故吏皆免官禁锢。建宁二年(169)，张俭揭发宦官侯览的家属及爪牙横行乡里、残害百姓，侯览指使人反诬张俭与同乡24人“共为部党，图危社稷”。宦官曹节乘机把李膺等上次禁锢过的人也牵连进去，在灵帝同意下，李膺、范滂等百余人被捕，死在狱中。此外，地方官吏牵连滥捕，使死、徙、废、禁者又有六七百人。熹平元年(172)，宦官又指使司隶校尉段颎滥捕太学生千余人，进行清查。熹平五年，又诏州郡，凡党人门生、故吏、父子兄弟和五服内亲属，皆免官禁锢。这是第二次党锢事件。这次事件前后延续了十几年，直到中平元年(184)，黄巾农民起义爆发后，灵帝才下诏赦免党人，党锢才告结束。 (杨生民)

四 世 三 公

东汉中期以后，地主阶级中出现了累世通经致显的士族门阀阶层，这个阶层中最显赫的家族四世(四代)都有人做三公。士族指累世传授儒家经学的地主家庭。门阀指他们累世为官有特殊的身分地位。

从汉武帝“独尊儒术”之后，儒学宗师的门生日渐增多，西汉末有的“众至数千人”。东汉以后，有的多达数千上万。如安、顺二帝时的蔡玄，学通五经，门徒常数千人，著录姓名拜在门下的达万六千人。东汉时，士人通过察举、征辟做官。被举、被辟的人就成了举主、辟主的故吏。故吏为利禄、前程就以父子、君臣之礼对待举主、辟主。如举主、辟主死后，故吏要服丧三年。这样，儒学宗师而又身为大官僚的人就有大量的门生、故吏。他们彼此结成集团，形成了不可忽视的政治、社会势力。

东汉末，地方上的士族门阀具有垄断性。太守莅任，常常征辟他们为掾属，委政于他们。如南阳人宗资为汝南太守，让本郡人范滂主持政务。弘农人成谮为南阳太守，让本郡人岑晊主持政务。当时的歌谣说：“汝南‘太守’范孟博(滂)，南阳宗资主画诺；南阳‘太守’岑公孝(晊)，弘农成谮但坐啸。”本地的士族门阀，实际上统治了本地。

东汉中期以后的士族门阀中，出现了累世专攻一经而又四世三公的显贵家族。如弘农杨氏其家世代传授欧阳《尚书》之学，汝南袁氏其家世代传授孟氏《易》学。他们世代通经致仕，成了累世公卿的官僚世家。弘农杨氏，自杨震以后，四世皆为三公。汝南袁

氏，自袁安以后，四世中有五人居三公位。他们又都是全国最大的大地主。由于他们世代是儒学宗师，又是大官僚、大地主，门生、故吏遍于天下，有很大的政治、社会势力和影响。所以，他们就成了士族门阀中最负盛名的代表人物。当政的外戚要与他们联系争取他们支持，宦官也要与他们周旋。

这种四世三公类型的士族门阀，是长期历史发展形成的。东汉中期以后"选士而论族姓阀阅"，士族门阀子弟在察举、征辟中可得到优先照顾，就是这种士族门阀出现和形成的一个重要条件。这种士族门阀的出现，对以后历史发展有重大影响。

（杨生民）

灵帝卖官

灵帝即位后在西邸标价买卖官爵，使东汉统治更加黑暗、腐败。

东汉末桓、灵二帝统治时期，政治黑暗腐败，水旱蝗雹等灾害连年不断，地震时有发生，牛疫流行，农民流亡。桓帝永兴元年(153)，流民达数十万户。人民饥饿无以为生，出现了"田野空、朝廷空、仓库空"的三空景象。然而，桓帝却淫奢无度，后宫宫女五六千人，穷天下美色；衣食华丽精致，尽天下佳品。灵帝即位淫侈超过桓帝，政治上重用宦官侯览、曹节，黑暗、腐败至极。灵帝的乳母赵娆的资财可比皇家的府库，她死后的坟墓超过了帝后的陵园，她的兄弟都出任为郡守。灵帝的生母董太后积累的金钱装满宫室。当时民谣说："河间妖女工数钱，以钱为室金为堂。"董太后是河间人，这一民谣就是讲她的。

桓、灵时宦官专权，为彻底排斥官僚士大夫就废弃汉代察举、征辟的选官制度，实行卖官。另外，桓、灵时统治者奢侈腐化，为此就要搜刮钱财，卖官就是搜刮钱财的一种方式。灵帝光和元年(178)，公开标价张榜出卖官爵，开西邸卖官，自关内侯、虎贲、羽林分等级买卖。郡守级的二千石官员卖价二千万，县长级的四百石官员四百万，按资历应当升迁的出半价或三分之一。有的还可向皇帝上书要求出任某地官长，随该地收入多少而定价。一时交不起的允许赊欠，到任后加倍交纳。国家的高级官员三公九卿，则通过左右亲信私下交易，公千万钱，卿五百万钱。这些官员品级高价格反而低，可能是考虑到中央官员搜刮民财门路较少。不过也不一定，常常是因人而异。如曹操的父亲曹嵩，买太尉花费1亿钱，比定价高出了10倍。而出身官僚世家的廷尉崔烈，曾任郡守九卿，名气也大，通过灵帝傅母程夫人交纳五百万钱就买到一个司徒。同是三公，二者价格相差20倍。有的买到地方官后，怕损失本钱，又想获利，一到任就要本利兼收，搜刮民财，刻不容缓。为多卖钱，加快周转，一个官上任不久，另派一个新官又去上任，州郡地方官一月内替换好几次，每个官到任都要搜刮一番。逼得人民"寒不敢衣，饥不敢食"，以便省出钱交给新上任的官，以免性命难保。买卖官爵后来发展到所有官员升迁调动，都得先到西邸讲好价钱，大郡要先交二三千万才能去上任。有的人不愿贪赃枉法要求不去做官，但被强迫派去。如新任巨鹿(河北柏乡东)太守司马直是个清官，减价收他300万。司马直接到诏书后认为：当官应是为民父母，现在反而要割剥百姓，满足上司要求。不愿干，请病假，但上司不批准，只好赴任。走到半路，上书皇帝批评政治上的错误，述古今兴亡教训，而后服毒自杀。所以，想当清官也不可能。灵帝卖官是对全国人民的一次变相搜刮，进一步把全国人民推向灾难的深渊，同时也使东汉统治更加黑暗、腐败。（杨生民）

黄巾起义

东汉中平元年(184)爆发的一次有组织的全国性农民起义，因起义军以头戴黄巾为标志，故称黄巾起义。

东汉末，政治黑暗腐败，土地兼并严重，东汉政权与羌人战争耗费巨大，灾害频繁，农民大量流亡，京师洛阳也是死尸相枕于路。广大农民被迫奋起反抗，从安帝到灵帝八十余年间，史籍记载的大小农民起义近百次。大的如顺帝时张婴领导的起义军一百多人，在徐州、扬州一带活动达十余年。桓帝时公孙举领导的起义军在青、兖、徐三州转战，给东汉政权以沉重打击。有的农民起义领袖自称"皇帝"、"黑帝"、"无上将军"、"真人"等等，有的还建年号，置百官。当时流行的一首民谣说："小民发如韭，剪复生；头如鸡，割复鸣。吏不必可畏，民不必可轻。"

黄巾起义的领袖张角是冀州巨鹿(河北平乡西南)人，太平道首领，自号"大贤良师"。太平道系道教一支，以黄帝、老子为始祖，所以也称黄老道。张角以治病为名，宣传教义，组织群众，得到民众信任，形成"天下襁负(背着小孩)归之"。张角的活动引起东汉政权的注意。灵帝熹平六年(177)，司徒杨赐指出：令地方官把流民遣还原籍，分散削弱其势力，然后诛灭首领，可不劳而定。这个建议未引起灵帝重视，作罢。张角加紧传道，派弟子八人，使于四方，道徒迅速发展到几十万人，遍布青、徐、冀、荆、扬、兖、豫七州。张

角把道徒分为36方，"方"相当于一支军队的称号，大方万余人，小方六七千人，每方设"渠帅"领导。灵帝光和六年(183)，张角等传言"苍天(汉朝)已死，黄天(张角自称)当立，岁在甲子，天下大吉"，约定于次年(甲子年)三月五日起义。道徒在民间散布"黄天泰平"的口号，并在各地府门上用白土写"甲子"字样。中平元年初，大方渠帅马元义等人先调荆州、扬州信徒数万到邺(河北磁县南)集中，又与首都洛阳信徒约定，三月五日同时起义。由于起义计划被叛徒告密泄露，东汉政权在洛阳逮捕并车裂了马元义，又诛杀信道的"宫省直卫"和百姓千余人，并令冀州追捕张角等人。张角知计划泄露，当机立断，通知36方提前起义。二月，七州28郡同时举行起义。由于起义军以头戴黄巾为标志，所以称"黄巾军"。起义军人数众多，被统治者诬为"蚁贼"。中国历史上空前的一次组织、准备严密的农民起义就这样爆发了。

黄巾农民起义军主要有以下几支：张角、张宝、张梁兄弟领导的巨鹿义军；波才领导的颍川义军；张曼成、赵弘等领导的南阳义军；彭脱等领导的汝南、陈国义军。此外还有卜己领导的东郡义军、戴风等领导的扬州义军和今北京地区的广阳黄巾等等。黄巾起义后，张角称"天公将军"、张宝称"地公将军"、张梁称"人公将军"，巨鹿的这支黄巾军俘获了安平(河北冀县)王刘续和甘陵(山东临清)王刘忠。广阳(今北京)黄巾攻杀幽州刺史郭勋和广阳太守刘卫，占据幽州。黄巾军"所在燔烧官府，劫略聚邑，州郡失据……，天下响应，京师震动"。这年七月又有"五斗米道"首领张修在巴郡(四川重庆地区)发动起义，被称为"米贼"。这年冬天，胡人北宫伯王等领导羌、胡、汉各族在金城郡起义，攻杀金城太守等等。

黄巾起义后，东汉王朝首先加强京师洛阳的防守，任命外戚何进为大将军，率兵屯洛阳，在洛阳附近增设八关校尉。同时，诏令州郡修理器械，加固城防，并征调军队对各部黄巾发动进攻。为防止一些士大夫与黄巾军合作，宣布赦免党人，解除党锢。黄巾农民军虽然起义之初取得了很大胜利，但由于缺乏政治军事斗争经验，不能集中力量控制全局，变成了分散活动的若干支孤军，缺乏互相联系和配合，便于东汉王朝各个击破。同时，各地豪强地主也组织武装与黄巾军为敌，也增加了义军的困难。东汉政权为确保京师洛阳安全，首先令皇甫嵩、朱儁，率军4万，进攻波才领导的颍川义军。波才打败了朱儁，又在长社(河南长葛东)围住了皇甫嵩，官军少，恐慌。然而，由于波才缺乏军事经验，依草扎营，皇甫嵩趁机纵火烧营，波才失利。接着，皇甫嵩、朱儁与曹操援军联合，大破黄巾军，杀数万人，又追击波才战阳翟(河南禹县)获胜。这使黄巾军丧失了进攻洛阳的有利态势。汉军又东进，打败汝南、陈国黄巾。东汉政权又派皇甫嵩进攻卜己领导的东郡黄巾，卜己军牺牲七千多人，卜己被俘。而后，皇甫嵩又被派去进攻巨鹿张角领导的黄巾主力军。

黄巾起义后，东汉政权在这年三月派卢植北攻张角，张角初战失利，退保广宗(河北威县)，卢植围攻数月不下被撤职，改派董卓率精兵进攻又被张宝打败。八月，又派皇甫嵩进攻张角。这时，张角病死，部众由张梁统率。十月，两军在广宗大战，黄巾军精勇，皇甫嵩不能取胜。皇甫嵩闭营休战，待黄巾军懈怠时，发动突袭，打败黄巾军，张梁牺牲，黄巾军被杀三万多，投河自杀五万多。11月，汉军又在下曲阳围攻张宝，义军败，张宝牺牲。汉军在下曲阳大量屠杀义军，积尸封土，残暴异常。

南阳的黄巾军在张曼成领导下，三月击杀太守褚贡。六月，张曼成战死，赵弘继任领导，攻占宛县，队伍发展到十余万人。汉朝派朱儁去进攻，汉军围宛县三个多月不下，战斗激烈，赵弘战死，另一首领韩忠继任统帅战败投降被杀。黄巾军又推孙夏继任统帅，十一月朱儁攻占宛县，孙夏被杀。这支黄巾也告失败。

中平二年，黄巾农民军主力虽已失败，但散聚各地的义军仍很多，如博陵(河北蠡县南)张牛角、常山褚飞燕和黄龙、左校等等不可胜数，大者二三万，小者六七千人，在河北地区转战。张牛角、褚习燕合军，张牛角死后，褚飞燕统其众，号百万，改名张燕，时称"黑山贼"。这支军队"渐寇河内，逼近京师"，一度威胁洛阳，经历二十余年，先后被朱儁、袁绍、曹操击败，后张燕归降曹操。中平五年黄巾余部郭大等在西河白波谷(山西襄汾县西)起义，攻太原、河东(山西中南部)。这年四月，汝南葛陂(河南平舆东)黄巾军攻占郡县。六月，益州马相、赵祇在绵竹(四川绵阳县)起义，聚合数千人，攻杀县令，自号黄巾，曾发展到十余万人，马相自称天子，后失败。这年十月，青州、徐州黄巾又起。献帝初平三年(192)，青州黄巾攻兖州(山东金乡)，刺史刘岱败死，曹操统兵破黄巾，得降兵三十余万，男女百余万口，选精锐编为"青州兵"。建安12年(207)黄巾军杀死济南国国王刘赟。这些散聚在各地的黄巾余部在黄巾主力失败后还延续了二十余年，给东汉政权以沉重打击。

黄巾起义虽然失败，但瓦解了东汉王朝的统治，

外戚、宦官的黑暗统治不久也因此从历史上消失。

（杨生民）

何进谋诛宦官

光熹元年(189)，大将军何进谋诛宦官，反被宦官杀害，何进部下袁绍等人诛杀所有宦官。

何进(? —189)，字遂高，南阳宛(河南南阳)人。其异母妹入宫，在宠于灵帝，先后为贵人、皇后。何进因此先后拜郎中、虎贲中郎将、颍川太守。黄巾起义爆发后，进又为大将军。这时正是宦官十常侍专权之时。

光和四年(181)，宦官大长秋曹节死，赵忠代领大长秋。时张让、赵忠、夏恽、郭胜、孙璋、毕岚、栗嵩、段珪、高望、张恭、韩悝、宋典12人皆为中常侍，被称为“十常侍”。这些宦官父兄子弟布列州郡，所在贪残，为害百姓。黄巾起义爆发后，郎中张钧上书指出：张角所以能兴兵作乱，万人乐附，都是由于十常侍的父兄、子弟、婚亲、宾客典据州郡、搜刮钱财，侵渔百姓等等造成的，所以应斩十常侍，以谢百姓，若能如此，可大寇自消。后张让指使御使诬张钧通黄巾，收至狱中，拷掠而死。黄巾主力被镇压下去后，东汉统治集团又变本加厉搜刮人民。中平二年(185)，皇宫火灾，烧坏部分宫殿，张让、赵忠建议灵帝加征田税亩十钱，作为修复皇宫费用。又责令太原、河东(山西中南部)等地交纳石料木材，甚而官僚升迁也要交纳“修宫钱”。宦官以修宫为名借机勒索，大发横财。这年谏大夫刘陶上言说天下大乱，皆由宦官，被诬蔑为“与贼通”，下狱，自杀。黄巾农民起义失败后，灵帝让宦官赵忠主持封赏有功将领，张让等12人无功封侯，皇甫嵩等有功将领反被贬官。中平五年，置西园八校尉，扩建八支近卫军，袁绍、曹操等七人任校尉，各统一军，以宦官小黄门蹇硕为上军校尉兼元帅总领各军，连大将军何进也得归其管辖。中平六年灵帝死，蹇硕计划杀死何进，立王贵人子刘协。何进发现后，逃往军营，拥兵自重，蹇硕不敢轻动，何皇后子刘辩才得以继位。何太后临朝，何进辅政，与下属袁绍等人谋划铲除宦官。蹇硕也向赵忠建议杀何进。结果，赵忠等宦官与何进处死蹇硕。从此，何进接管了蹇硕统领的近卫军，独掌了军权。接着，何进向太后建议尽罢掌政事的宦官，何太后则认为汉朝历来用宦官，怎可全废；太后母亲及弟弟经常接受宦官贿赂，也反对尽诛宦官。在这种情况下，何进接受袁绍建议，传召前将军董卓、东郡太守桥瑁等带兵进屯洛阳附近。同时，又任命袁绍为司隶校尉，王允为河南尹，控制首都及附近地区。何太后在压力下被迫罢免了张让等当权宦官，何进劝宦官回封国去，宦官则秘密策划反击。

宦官与皇帝及其周围的人有千丝万缕的联系，张让的儿媳是何太后的妹妹，张让通过儿媳及其母亲的关系又悄悄回宫廷当差。这年八月，何进入宫见何太后要求杀张让等大宦官，反被张让、段珪等人捉拿。张让责问何进：天下如此，也不能全怪我们。你们说宦官秽浊，公卿大臣谁又是公忠清廉的呢?于是杀何进，又擅自下诏任命前太尉樊陵为司隶校尉、少府许相为河南尹。尚书接诏有疑说：请大将军何进出来商议。宦官掷出何进人头给尚书，并说何进谋反已被诛杀。何进部将吴匡等人听说何进被害，想率兵入宫，宫门紧闭。袁术与吴匡共攻宫门，并烧南宫门及东西宫。袁绍与叔父太傅袁隗假托诏书召樊陵、许相斩之。袁绍等人又尽杀宦官赵忠等两千余人。张让、段珪挟持皇帝及其弟陈留王刘协等数十人逃出城外，河南尹王允派人追上，斩杀数人，宦官张让等投河自杀。通过这次事件，外戚、宦官专权现象消失，继之而来的是军阀混战，东汉政权也随之瓦解。

（杨生民）

董卓之乱

光熹元年(189)，董卓拥兵擅权、专横跋扈任意废立皇帝，又与其部下相继焚毁洛阳、长安。

董卓(? —192)，字仲颖，陇西临洮(甘肃岷县)人，粗猛有谋。少年与羌中豪帅相交结，以健侠知名。桓帝末，以六郡良家子为羽林郎，从中郎将张奂为军司马，后拜郎中、迁西域戊己校尉、并州刺史、河东太守。中平元年(184)，黄巾起义爆发，拜卓中郎将，代卢植击张角于下曲阳，战败。这年冬天，北地先零羌、湟中义从胡和金城人边章、韩遂起兵响应黄巾起义，董卓又以中郎将、破虏将军、前将军身分前往镇压，有败有胜，但保存了实力。中平六年，征卓为少府，拒不任职。灵帝病危时，拜卓为并州牧，驻兵河东，以观时变。灵帝死后，刘辩继位，是为少帝，更年号为光熹。大将军何进执权，与司隶校尉袁绍谋诛宦官，不顾朝臣反对，私自召董卓带兵入屯洛阳附近，胁迫何太后诛灭宦官。卓接召后，立即带兵前往，未至，而何进已被宦官杀害。袁绍、袁术诛宦官，宦官张让、段珪劫持少帝与陈留王外逃。董卓远望火起，领兵急进，至京城收编何进兄弟所领部曲，又让吕布杀执金吾丁原，而并其众，从此势盛。接着，董卓谏朝廷免司空刘弘而自代之，拥兵专权，废少帝，立陈留王为献帝，

害死何太后。董卓又迁任太尉，领前将军事，封郿侯。为收买人心，与司徒黄琬、司空杨彪上书为陈蕃、窦武和党人平反。后卓又晋位相国。当时洛阳城中贵戚室第相连，积存大量金帛财产。董卓放纵士兵大肆虏掠财物、淫掠妇女，称为“搜牢”。又奸乱公主，妻略宫人，虐刑滥罚，睚眦必死，以致人心惶惶，内外官僚朝夕不保。董卓素知天下人痛恨宦官诛杀忠良，所以进一步为党人恢复名誉，起用士大夫，企图巩固自己的统治。初平元年(190)，冀州刺史刘馥与袁绍、曹操、孙坚等人起义兵讨伐董卓。关东地区军阀混战由此展开。这时灵帝末年起于西河白波谷的黄巾余部郭大，又破河东(山西西南部)，众至十余万。在上述情况下，董卓挟持献帝迁都长安，并尽烧洛阳宫庙、官府、居家，强迫周围数百万人迁长安，致使洛阳周围200里内无复人烟。在迁徙途中，饥饿寇掠，积尸盈路。董卓又令吕布发诸帝陵和公卿家冢墓，收其珍宝。次年，卓又授意朝廷，拜他为太师，位在诸王之上，车服仪饰近似天子。其弟董旻为左将军，封鄠侯。宗族内外，并居高位。子孙虽年幼，也是男皆封侯，女为邑君。董卓又筑坞于郿(陕西眉县东)，高、厚各七丈，号“万岁坞”，积谷可供30年用。他说：事成，可雄据天下，不成守此也足以养老。后司徒王允与吕布(董卓义子)等人密谋诛卓。初平三年四月，献帝会群臣于未央殿，董卓入朝时被李肃、吕布所杀。消息传开，士卒皆称万岁，百姓歌舞于道。其后，诛灭董卓全族。董卓在坞中珍藏有金二三万斤，银八九万斤，锦绮奇玩积如丘山。董卓死后，其部下李傕、郭汜等人继续作乱，使长安和关中地区又遭浩劫。

(杨生民)

三　国

袁绍据冀青并幽

东汉末年，袁绍夺取冀青并幽四州，一度成为据地最广、拥兵最多的军阀。

袁绍（？—202），字本初，汝南汝阳（河南商水西南）人。汝南袁氏是东汉后期第一流名门望族。这个家族在四代中都有人位登三公高官，被时人称为"四世三公"，门生故吏遍天下，在士大夫中有相当大的号召力。袁绍颇具才华，又是名门公子，青少年时好游侠，结交了张邈、许攸、伍琼、曹操等一批志同道合者，以"济同类"、"救时难"自诩，名动天下；在中平五年（188）出任中军校尉，成为外戚、大将军何进诛戮宦官的谋主。董卓之乱时，袁绍凭恃父祖余荫及个人名声，被推为关东联军的盟主，讨伐董卓。董卓西撤，关东联军瓦解，互相攻伐，割地称雄，大河南北密布了大大小小的军阀。其中势力较大的有南阳的袁术，徐州的陶谦，兖州的刘岱，幽州的刘虞和公孙瓒，司隶的董卓及冀州的韩馥等。袁绍名为盟主，实际仅有勃海（郡治今河北南皮东北）一郡，没有大块地盘，实难在军阀混战中立足。此时河南已遭战火破坏，只有河北因山川之险尚属完好。冀州位处河北之中，社会经济发达，人户众多，号称"带甲百万，谷支十年"，对袁绍有巨大的吸引力。在上述军阀中，韩馥既是袁氏故吏，又最无能，冀州成了袁绍首先攫取的目标。初平二年（191），韩馥与部将麴义互相攻杀。袁绍招纳麴义，由延津（河北延津北）东向，开始了夺取冀州的活动，苦于兵力不足，谋士逢纪献策：韩馥是个庸才，只要致书公孙瓒，邀其兵临冀州。将军再派遣舌辩之士去冀州动以利害，必可令韩馥让出冀州。果然，韩馥得知公孙瓒和袁绍两路来攻，惶迫无计，在袁绍说客荀谌和高干的威逼利诱下，拒绝部下的劝阻，拱手让出了冀州。

袁绍的意图是利用和控制曹操夺取兖、徐、豫等地，自己占有河北，凭恃山川之险，驱策智能之士，利用燕代一带少数民族兵力，南向争夺天下。随着形势的变化，特别是和曹操关系的日渐破裂，尽据河北成为袁绍能否得志天下的关键，公孙瓒也就成为其非除不可的对象。

公孙瓒，辽西令支（河北迁安西）人。是东汉末年崛起于幽州的一个军阀。能征惯战，在击败辽西等地乌丸后，搜罗乌丸及鲜卑等少数民族中的丁壮，组建了一支剽悍的骑兵，号称"白马义从"，横行燕代一带。公孙瓒所以见袁绍书信后立刻南下，目的也在于夺取冀州。当时袁绍在冀州的统治尚未稳定，公孙瓒则刚刚击败号称百万的青州黄巾军，声势正盛。冀州郡县闻公孙瓒掉兵南来，纷纷闻风归降。公孙瓒任命严纲为冀州刺史、田楷为青州刺史、单经为兖州刺史。袁绍尽众拒战，双方激战于界桥（河北威县东北）南20里处，严纲被杀，公孙瓒兵败后撤。年末再战龙凑（山东平原境内），公孙瓒损失惨重，退回幽州。袁绍进逼青州，鏖战两年，逐走了田楷。

在袁绍与田楷相持之时，河北地区的黑山军壮大起来，总数超过百万，进逼冀州政治中心邺城（河北临漳西南）。魏郡（治邺城）守军起而响应。初平四年，黑山起义军攻克邺城。袁绍被迫回师。在逐次镇压和击败各支黑山军后，袁绍在冀州的统治才初步稳定下来。接着，袁绍乘并州小股军阀各不相让、群龙无首之机，据有并州。

公孙瓒在争夺冀州的战争中所以接连失败，被迫在初平四年借口朝廷调停，与袁绍罢战言和，原因在于没有自己的地盘，必须仰仗幽州牧刘虞的接济。刘虞主张西迎献帝。公孙瓒联合袁术破坏。刘虞认为对乌丸及鲜卑等少数民族以安抚为好，公孙瓒力主讨伐。政见不同，双方失和。刘虞经常克扣公孙瓒的马匹粮草，阻止公孙瓒和袁绍战争。双方终成仇寇。初平四年，双方兵戎相见。刘虞并不知兵，兴平二年(195)被公孙瓒俘杀。公孙瓒尽有幽州，踌躇满志，虽然开置屯田，积谷储粮，但心胸狭窄，睚眦必报，轻忽和凌辱智能之士，为政苛暴，不顾百姓死活。又苛待部下，听凭部下被袁绍各个击破而不救助，造成部下背离。刘虞旧部鲜于辅和阎柔等乘机发动胡、汉数万，夺取了渔阳，南联袁绍。袁绍抓住时机，和鲜于辅等合兵10万，击斩公孙瓒部20000余人。代郡、广阳、上谷、右北平等地群起响应。公孙瓒屡战屡败，被迫移镇易县(河北雄县西北)，修筑围堑十重，各重围堑内堆土成“京”，京高五六丈，京上密布坞堡，正中之京高十丈，上建高楼。公孙瓒和姬妾等深居楼中，严禁7岁以上男子入内。凡文簿书记均用绳索吊上，供其审阅，又选取大嗓门的妇女站在楼上高声宣传其教令，不和将领谋士等接触，妄图凭恃这个坞堡群和300万斛积谷，坐观天下兴亡，迫使袁绍知难而退。袁绍频频来攻，逐一拔除易京外围。建安三年(198)，袁绍倾巢而来，包围了易京。公孙瓒估计难守，命其子公孙续突围，向黑山军呼救。次年春，黑山军张燕部10万之众分三道来援。公孙瓒又遣使告知其子，约定举火为号，内外夹击袁绍。使者被袁军俘虏，袁绍如期举火，设伏引公孙瓒出击，重创公孙瓒军。随即又挖地道，直通京下，逐次推进，直至公孙瓒所居楼下。公孙瓒计穷力尽，缢杀其妻子和姐妹后，举火自焚。至此，袁绍终于据有冀青并幽四州(今河北、山西及山东东部)，成为当时拥有逢纪、田丰、沮授、审配、文丑、颜良等谋士猛将、占地最广、拥兵最多、实力最强的军阀。　(蒋福亚)

曹操据兖豫

东汉末年，曹操据有兖豫二州，取得了逐鹿中原的地盘。

曹操(155—220)，字孟德，沛国谯县(安徽亳县)人。父曹嵩，汉末居官太尉，是当时宦官集团中坚分子曹腾的养子。因此日后曹操被政敌骂为“赘阉遗丑”，也即宦官养子留下的孽种。曹操文武并茂，狡诈多智，少好游侠，因交结桥玄、许劭、袁绍等社会贤达而声名鹊起，得到了“命世之才”和“清平之奸贼，乱世之英雄”等评语。曹操反对宦官专权，参加过外戚、大将军何进诛戮宦官的密谋。后来起兵陈留，参加了讨伐董卓的关东联军。兵败后募兵扬州，赶到河内，董卓已经西撤，关东联军瓦解，纷纷混战割据。时曹操名位低下，没有地盘，只好依附袁绍，在河南坐观形势。恰值黑山起义军崛起，企图进击邺城(河北临漳西南)，号称百万的青州黄巾军又想与黑山军会合。此时袁绍新得冀州，局面尚未稳定下来，又面临公孙瓒的威胁，想利用曹操牵制和阻遏这两支起义军。初平二年(191)，当曹操小挫黑山军后，袁绍便以盟主名义发布曹操为东郡(郡治今河南濮阳西南)太守。曹操有了一小块地盘。次年，青州黄巾军转入兖州，斩杀兖州刺史刘岱。曹操部将陈宫乘机游说济北相鲍信和兖州治中万潜等推曹操为兖州牧。曹操移师寿张(山东东平)，青州军败退济北(国治今山东长清南)。年底，青州军被击溃，30余万人投降，百多万男女老幼被俘虏。曹操立刻整编，选取精壮，组建了“青州兵”，自此曹操有了一支精锐的武装。时隔不久，盘踞南阳的袁术前来夺取兖豫，双方相持于陈留(河南开封东南)。曹操利用袁绍，拉拢荆州牧刘表，由刘表袭取了南阳。袁术失去依托，狼狈逃向淮南。初平四年和兴平元年(194)，曹操两次攻打徐州，血腥屠杀，泗水为之不流。当曹操和徐州牧陶谦相持于下邳(江苏睢宁西北)时，东郡守将陈宫和陈留太守张邈却联合吕布，突然袭击了兖州。

陈宫足智多谋，早就追随曹操，见曹操多疑，惟恐曹操猜忌。张邈是曹操的密友，和袁绍失和，见曹操依附袁绍，深恐曹操为讨好袁绍而取自己性命。吕布逃离关中后，投奔过袁术和袁绍，均难得志，为寻找立足点路过陈留。张、陈认为凭恃吕布骁勇善战，乘曹操领兵在外，袭取兖州，坐观形势，必可纵横天下。三人信誓旦旦，共推吕布为兖州牧。张、陈在兖州有相当大的号召力，一时间，兖州郡县大都附从。只有荀彧(163—212)和夏侯惇苦苦支撑，才为曹操保住了兖州政治中心鄄城(今属山东)和东郡的两个属县。曹操匆忙回师，在濮阳和吕布激战了百余天，胜负难分。这年蝗灾严重，双方粮尽，各自收兵。次年再战，曹操终于获胜。吕布和张邈逃奔徐州。不久，张邈为部下所杀；吕布则逐走了继陶谦据有徐州的刘备，占有徐州。曹操在兖州的统治渐趋稳定，接受谋士荀彧和毛玠的建议，着力经营，有了一块可靠的立足地。建安元年(196)，曹操血腥镇压汝南和颍川一带的黄巾军，势力扩大到许县(河南许昌)。二年，曹操

兵进淯水(白河),迫降了依附荆州牧刘表、屯扎宛城(河南南阳)的西北军阀张绣。曹操好色,娶张绣叔母为妾,企图暗杀张绣,激起张绣哗变。曹操长子曹昂被杀,自己身受重创,幸赖亲信力战,才逃脱性命。该年冬,曹操再次进军宛城,张绣兵败,退屯穰县(河南邓县)。直到官渡之战前夜,张绣才投降。至此,曹操在兖豫(今河南省及山东省的西部)二州的统治终于稳定下来,有了逐鹿中原的地盘。　(蒋福亚)

李傕、郭汜之乱

东汉末年,以李傕和郭汜为首的凉州军阀在关中掀起的一场战乱。

李傕,北地(郡治今宁夏青铜峡南)人;郭汜,张掖(郡治今甘肃张掖)人。都是董卓部将。初平三年(192)王允联合吕布袭击董卓时,宣布只杀董卓,余皆不问。事成后,王允居功自傲,自食其言,置善后于不顾,进而挟私报复,借口大名士、学者蔡邕同情董卓,杀了蔡邕。西北军人在董卓死后,归无所依,一再乞求收编和赦免。王允害怕失去以袁绍为首的关东联军的支持,声称一年不能两次大赦而拒绝,勒令西北军人解除武装,自动回乡。一时间,内外盛传将尽诛凉州军人。凉州军人也以蔡邕被杀自相煽惑,人人自危,纷纷拥兵自卫。武威(郡治今甘肃武威)人贾诩据此唆使李傕、郭汜起兵,倡言为董卓报仇,号召董卓旧部。李、郭二人本是快意随心的武夫,两人商议,既然朝廷不赦免,就只有拼死一搏。如果能夺取长安,便可坐制天下,实在不成,也可抄略关中妇女财物,返回家乡。该年五月,两人结盟,集众数千,从陈留、颍川西进。沿途吸收樊稠及李蒙等所统董卓旧部,众过10万,包围了长安。六月,长安城破,吕布兵败,统数百骑投奔了盘踞南阳的袁术。李、郭放兵虏掠,长安惨遭洗劫。两人挟持汉献帝后,杀了王允等人,李傕自为车骑将军,郭汜为后将军,随意封拜,关中为其所有。此时,陇右军阀韩遂和马腾亦想染指关中,双方几经激战,韩、马兵败后撤。临行前,韩遂以乡里之谊,在疆场上与樊稠叙话良久。凉州军人是在权势财物关系下集结起来的一群乌合之众,彼此间矛盾重重。李傕本来就猜忌樊稠,担心樊稠联合陇右军阀前来争权,乃于兴平二年(195)二月的一次军事会议上袭杀樊稠。此举导致其内部战乱爆发。三月,李傕抢先劫持献帝,将宫室、府库、民宅洗劫一空后,放火把长安烧成废墟。郭汜勒兵来攻,双方激战。献帝遣公卿大臣赴郭汜营和解,反被郭汜扣留。结果李傕以献帝为人质,郭汜以公卿大臣为人质,互相攻杀了一个多月,死伤超过数万。双方各自引诱羌族和匈奴族的豪酋参加混战,直到彼此元气大损才言和。其后,凉州军阀为争夺献帝和地盘时和时战,又延续了两三年。建安二年(197),郭汜为部将伍习所杀。次年,李傕兵败,被曹操部将击杀。至此关中军阀混战方暂告一个段落。

这次战乱非但使名都长安化为废墟,关中也遭到惨绝人寰的破坏。董卓死时,关中尚有数十万户,经过军阀们的烧杀抢掠,肆意破坏,人民无以为生,强者四散逃亡,弱者坐而待毙,吃死人肉度日。乃至白骨蔽野,数年中关中"无复人迹"。　(蒋福亚)

孙策据江东

东汉末年,孙策据有江东,为日后东吴的建国奠定了基业。

孙策(175—200),字伯符,吴郡富春(浙江富阳)人。父孙坚,原为普通农民,有急智武略,初任县吏,擅长交结,招揽和收养无赖子弟,成为乡里一霸。因镇压农民起义积官为长沙太守。关东联军讨伐董卓时,孙坚拥众数万受袁术节制,任破虏将军。阳人(河南临汝西)一战,阵斩董卓骁将华雄。在关东联军中,敢与董卓部队交战的仅曹操和孙坚二人,曹操败了,孙坚胜了。军阀混战初期,孙坚仍隶袁术。初平三年(192)受命进攻荆州牧刘表,兵围襄阳,恃勇轻敌,为黄祖部下射杀。部属由其兄子孙贲统领,依附袁术。孙策颇类其父,应同年龄的庐江舒县(安徽庐江西南)世族大地主周瑜(175—210)之请,居于舒县,结成莫逆。孙策十来岁时便知交结社会名流,勤奋好学,名闻江淮,被江东父老称为"孙郎"。徐州牧陶谦已隐隐感受其威胁。袁术钦羡万分,常对人说:"有子如孙郎,死复何恨!"孙坚死后,孙策移居江都(江苏扬州),一再向才识之士张纮求教怎样才能报仇雪恨?张纮建议孙策投奔其舅父丹阳太守吴景,收兵江东,占据荆、扬二州,划江而守,匡复汉室。这实际上是日后孙氏兄弟建国的基本方略。孙策在丹阳募兵数百,拟取江东,遭土豪祖郎伏击,损失惨重,乃投袁术,求其支持。当时江东土豪林立,山越势盛,军阀们各不相属。其中势力较大的有扬州刺史刘繇据曲阿(江苏丹阳),会稽太守王朗据会稽(浙江绍兴)等。袁术败退江淮后,西受荆州牧刘表的威胁,东北有徐州牧陶谦的障碍,难以伸展,想利用孙策父子昔日在江东的基础,打击刘繇和王朗等,待其两败俱伤,然后坐收渔利。故将孙坚旧部归还孙策。兴平二年(195),孙策领兵千余进抵历阳(安徽和县),兵力增至五六

千。周瑜闻讯赶来，成为孙策得力的助手。在周瑜粮草的接济下，孙策逐走刘繇部将樊能和张英，渡江而前。江东百姓初闻孙郎兵来，惊惶不定，窜伏山野。殊料孙策善战，严于治军。所过秋毫无犯，百姓转而积极支持。孙策相继击破依附刘繇的孙礼和笮融等后，兵击曲阿。刘繇不知用兵，只会以门第取人，舍弃猛将太史慈不用，为孙策击败，奔逸豫章（郡治今江西南昌）。太史慈后为孙策所得，为其招诱刘繇旧部。孙策礼贤下士，招兵买马，颁令：刘繇、笮融旧部凡来降者，一概不问；百姓家有一人从军，全家免除租税徭役。其兵力迅速扩大至20000余，张昭、张纮等纷纷来投，声震江东。建安元年（196），孙策兵进会稽，王朗兵败而降。该年，袁术称帝，众叛亲离，孙策乘机摆脱了袁术。三年，曹操以献帝名义发布孙策为讨逆将军，封吴侯。孙策开始有了正式的名号。四年，袁术死，余部欲投孙策，被庐江太守刘勋截留。刘勋兵马骤增，粮草短缺。孙策抓住时机，卑辞厚礼麻痹刘勋，遣使劝说刘勋袭击上缭（江西建昌）等地山越，夺取山越的粮食，并表示愿意领兵声援。刘勋立刻出动，兵至海昏（江西永修），山越逃逸，一无所得。孙策却乘虚偷袭了刘勋的基地皖城（安徽潜山），俘获其部曲30000余。刘勋失去根基，北投曹操。孙策乘胜移兵豫章。时刘繇已死，华歆为太守。华歆是个文人，以德行闻名海内，毫不知兵，在孙策功曹虞翻的劝说下，主动让出豫章后北归。至此，约相当于今天的苏南、浙江、江西、福建及安徽的一部分均为孙策所有。孙策攻克皖城，善待袁术妻小；进入豫章，礼敬华歆，特意为刘繇发丧。此类举措，情义俱著，得到了士大夫们的赞扬。以朱陆顾张为首的吴郡四姓和孔贺虞魏为首的会稽四姓相继为其所用。孙策又用联姻的方式牢牢拉住江东名门豪族，使其在江东的统治渐趋巩固。

孙策数战数胜，年少气盛，疏于防范，建安五年打猎时，遭仇家、原吴郡太守许贡（为孙策所杀）奴客的袭击，重创而死。其军政活动为其弟孙权的建国奠定了基础。　　　　（蒋福亚）

曹操迎献帝都许

东汉建安元年（196），曹操在军阀混战中争夺政治优势的一项策略。

汉献帝从永汉元年（189）当皇帝的第一天起，就是一个傀儡，先后为董卓、王允、李傕和郭汜等挟持。但献帝毕竟是名义上的共主，凉州军阀虽无政治头脑，还是知道挟持献帝，利用其名义。因此，兴平二年（195）李傕和郭汜内讧、杨奉、董承等劫持献帝东逃时，李、郭又联合起来紧紧追夺。十二月，献帝在杨奉等拥持下到达陕县（今属河南），在河东军阀韩暹等接应下连夜渡过黄河，驻跸大阳（山西平陆东北）。这时公卿大臣已大都死亡流散，跟随而来的仅数十人。献帝居住无门的棘篱民屋中，公卿朝会，士兵们伏在篱笆上嬉笑打闹。将领们专横跋扈，随意鞭打或杀戮尚书，往往自带酒菜，找献帝嬉乐。皇帝尊严扫地以尽。该年蝗虫大起，加上大旱，颗粒无收。迫于饥荒，这批人不得不渡河南下，赖屯驻野王（河南沁阳）的另一军阀张杨接济了一些粮食，才于建安元年回到了洛阳。此时的洛阳，已是一片焦土，宫室烧尽，荆棘满道，官员们只能在断垣残壁间搭起帐篷办公。饥饿如影随形，始终紧紧追逼着他们。尚书郎以下的官员都得自出采挖野菜草根充饥，有的饿死于颓垣断壁之侧。

两汉以来，忠君思想已经形成，士大夫中有不少人为献帝的处境痛心疾首，盼献帝东归。早在曹操初得兖州时，谋士毛玠就建议“奉天子以令不臣”。曹操并无忠于汉室之心，但深知个中利弊，因为力量薄弱，兖州长安，关山遥遥，所以只是派遣使者虚致殷勤而已。献帝回转洛阳途中，荀彧立刻建议迎献帝都许（河南许昌）。告诫曹操，若不及早下手，他人捷足先登，就悔之晚矣。荀彧并非虚声恫吓，当献帝还在关中时，幽州牧刘虞就想派兵迎接。由于公孙瓒和袁术的破坏，没有成功。献帝辗转河东，田丰和沮授相继劝告袁绍把献帝接到邺城来，这样可以“挟天子以令诸侯”。但袁绍过去反对过册立献帝，企图拥立刘虞，更顾忌献帝来后，碍于君臣名义，就得事事奏请，处处受制；许多谋士武将也竭力反对，没有接受。曹操属下也颇多争议，武将们反对尤烈。荀彧指出，奉迎献帝至少有三大好处：一、可以顺应民心。二、可以招致大批人才。三、可以名正言顺地发号施令，讨伐异己。程昱也竭力赞成。曹操乃于建安元年遣曹洪西迎，遭董承和袁术部将苌奴的阻击，未成。七月，献帝到洛阳，曹操亲自出动。议郎董昭利用韩暹、杨奉、董承和张杨间的矛盾，假借曹操名义，致书兵力最强的杨奉，诱以接济粮草、生死与共的好处，劝杨奉不要阻挠。杨奉上当，曹操顺利进入洛阳，借口洛阳残破，立刻把献帝接到了许昌。自此，献帝成了曹操的傀儡，曹操取得了挟天子以令诸侯的强大政治优势。曹操之能统一北方，与此有很大关系。　　（蒋福亚）

屯田许下

东汉末年，曹操安集流民，恢复生产，保障国用的措施。

东汉末年军阀混战，人民死亡流离极多，人口锐减。昔日经济发达、人口众多的地方，多是军阀们争夺的所在，受到的破坏更大。富饶的中原到处尸骨累累，名城空无居民，百里不见人烟。众多的大小军阀们大都无长远图谋，饥则抢掠，饱则弃余。没有武装的保卫，人民根本无法生产。饥荒到处蔓延，军阀们连抢粮的地方都没有。袁绍在河北，军队有时以桑椹为粮。袁术在淮南，军队以蒲螺充饥。曹操曾以死人肉晒成干，权充数日军粮。刘备更惨，在广陵(江苏扬州)时，"吏士大小自相啖食"。许多军阀并非被对手打败，而是因饥饿溃散的。也有个别军阀注意到了生产问题，如陶谦在徐州，公孙瓒在幽州，相继屯田解决粮饷。尤其是陶谦，成效更大，徐州一时成为流民所归之地。事实表明，这个时候，谁能安集流民，组织生产，谁就得民心，能在军阀混战中站住脚。

曹操初得兖州，谋士毛玠就指出百姓饥饿流亡、政府无一年储粮的危险性，强调只有"修耕植，畜军资"才能成霸王之业。曹操曾两次兵临徐州，当然会深受影响。在枣祗的建议下，曹操利用镇压黄巾起义军掠来的耕牛、农具和劳动力，借鉴秦汉边防屯田的经验，采用军事组织形式，依据屯田客租用政府耕牛(官牛)的数量征收相应租额的办法，试行屯田。建安元年(196)，经过一场争论，曹操采纳枣祗和韩浩的建议，在许下(河南许昌周围)大规模募民屯田，改用分成制剥削方式：用官牛的，收获为官六民四，用私牛的，对半分。此举甚为有效，这一年收获百余万斛，随即全面推广。屯田终于成为一种制度，有自成系统的管理机构。中央由大司农统筹全国民屯事务，郡级设典农中郎将，县级设典农都尉，基层叫"屯"，由屯司马管辖，每屯50人。直接劳动者叫"屯田客"或"典农部民"，受军事编制的束缚。

屯田大都在土地肥沃、水利方便之区进行，产量颇高。其后，在民屯的基础上又出现了军屯和士家屯田等多种形式。军屯主要在魏吴、魏蜀边境及军事要冲地区，由驻军轮番垦耕，收入全部充作军饷。士家屯田是把士兵的家属集中起来，在内地选择宜于垦耕的地方进行，他们既是曹魏控制士兵的人质，不断提供兵源，又是剥削对象，剥削量和民屯一样。

屯田对安集流民、缓和阶级矛盾、恢复经济起了积极的作用，为曹操统一北方奠定了相应的物质基础。吴、蜀两国相继仿效，东吴屯田规模仅次于曹魏，亦有民屯和军屯等形式。蜀汉规模最小，仅在渭水南岸实施过军屯。曹操在内地屯田的措施对后世，特别是魏晋南北朝时期的影响甚大。魏晋南北朝时期，许多政权都实施过屯田。北魏推行均田制后，还抽取十分之一的民户进行屯田，以解决国用。（蒋福亚）

官渡之战

东汉建安五年(200)曹操和袁绍在官渡的一场激战，是曹操统一北方的关键性战役。

东汉末年军阀混战初期，曹操依附袁绍，势力初成，双方关系日渐恶化。建安元年，曹操迎献帝都许(河南许昌)，自为大将军，以袁绍为太尉，并以献帝名义谴责袁绍据地自雄，擅自讨伐，不忠汉室。袁绍方悔失策，上书自辩，指令曹操送献帝至鄄城(河北临漳西南)。曹操让出大将军的名号，拒绝送献帝。袁绍大怒，声言曹操这是找死！在诸多军阀中，袁绍势力最大，据有冀、青、并三州，经济未受多大破坏，仅冀州一地便可征发胜兵30万，手下谋士猛将如云。曹操兖、豫二州经济残破，人口死亡流散严重，实力远不如袁绍，何况东有吕布据徐州为患，南有张绣据南阳作祟，西受韩遂和马腾据关中的威胁。这些势力如若联合起来，曹操必将四面受敌，难以自存。因此消息传来，曹操十分恐慌，心绪不宁，动作失常。所幸此时袁绍与公孙瓒正鏖战甚急，使曹操及其谋士们取得了从长计议，预作布置的时间。谋士郭嘉和荀彧指出，袁绍有外宽内忌、用人唯亲、谋而不断、赏罚不明、文过饰非、属下争权、疏于治军、不识兵机、好妇人之仁而不识大体等弱点，曹操则恰恰相反，还有奉天子以讨逆臣的政治优势。郭、荀断言，两虎相争，曹操必胜。进而分析形势：张绣依附荆州牧刘表，袁绍竭力唆使刘表夹击曹操，但刘表志在保安，难为所动。这样张绣亦不敢轻举。关陇军阀各不相上下，韩、马虽是其中之强，因互相牵制，决无胆略妄动。钟繇和韩、马私交甚好，可全权委托钟繇处理关中。徐、兖二州在地理形势上互为表里，吕布逐走刘备(陶谦死后将徐州交给了刘备)后，招兵买马，南结袁绍，野心甚大，且骁勇善战。当前的关键是消灭吕布，夺取徐州，解除腹背受敌的威胁。大势已明，方略已定，曹操的情绪稳定下来，建安三年，亲率兵马讨伐徐州。鏖战几及两年，精疲力竭，本拟退兵。在郭嘉的坚持下，曹操鼓起余勇，终于克敌，俘杀吕布和陈宫。在此期间，曹操又接连击败了袁术和张绣，迫使袁术退据淮南，张绣龟缩穰县(河南邓县)。钟繇也相当成功，韩、

马在战前还送来马匹2000。曹操取得了全力对付袁绍的有利条件。

建安四年，袁绍几经苦战，消灭了公孙瓒，占有幽州。该年中，袁绍发兵10万，战马万匹，进逼兖、豫。八月，曹操屯兵黎阳（河南浚县东北）；九月，分兵官渡（河南中牟境内），占据有利地形，预作守备。此时，张绣在谋士贾诩的劝说下投降了曹操。曹操后顾之忧全消。曹操企图利用刘备在徐州的威信稳定徐州（刘备被吕布打败后投奔曹操），发布刘备为徐州刺史。刘备一到徐州便独树一帜。变出肘腋，不得不除。建安五年正月，曹操亲提兵马，逐走刘备，回师官渡。

袁绍在河北放纵亲信和豪强凌辱百姓，肆意兼并，民不堪命，境内阶级矛盾十分尖锐；和公孙瓒相持经年，府库已空；获胜后兵横将骄，自己也不可一世。沮授和田丰看到了这些现象，建议袁绍招揽人才，外交英雄，内修农战，分遣小股精兵袭扰河南，使曹操疲于奔命，二三年后可坐取天下。袁绍拒绝了这个万全之策。为阻止袁绍立刻出兵，沮授指出这次师出无名，希望袁绍暂缓行动，寻找借口，伺机再出。审配、郭图乘机谗毁，沮授被剥夺了部分兵权。曹操追击刘备时，田丰力促袁绍袭击其后方。袁绍借口儿子有病拒绝。田丰愤怒已极，哀叹大势去矣！过后又苦苦哀求袁绍接受其早先提出的方略，落了个“阻众”的罪名，锒铛入狱。曹操得知，欣喜过望，断言袁绍必败。日后回忆，仍然心有余悸，说袁绍若用田丰之计，鹿死谁手，尚未可知。

建安五年二月，袁绍推进黎阳，扎营黄河北岸，分兵颜良包围白马（河南滑县东）。荀攸建议佯攻延津，突袭白马。曹操采纳，迫使袁绍分兵西应，突然回师，击斩颜良，救出白马兵民，沿河而西。袁绍部将文丑受命统骑兵5000来追。曹操佯装无备，放兵散马诱敌。当袁军争抢马匹辎重时，曹操纵兵突击，斩杀文丑。河北名将相继丧生，袁军为之夺气。八月，袁军推进官渡，双方以官渡河为界相持。迫于袁绍声势，许、蔡以南郡县纷纷归降，许都中许多官吏致书袁绍，表示愿为内应。许攸建议袁绍乘曹操后方空虚混乱，偷袭许都，拔其根本；沮授劝袁绍不要躁动，利用自己的优势拖垮曹操。袁绍均不理会，只想在官渡与曹操决战。在郭图和审配的挑唆下，剥夺了沮授 的全部兵权。

曹操兵力不足，装备又差，粮草尤缺，遣使郡县催逼租赋。违期者严惩不贷。赵俨报告荀彧，如此作为，只能激变民心投奔袁绍，无疑是为渊驱鱼。荀彧当机立断，征得曹操同意，租调停征，已征来的绵绢退还百姓，郡县不得擅自加征。民心稳定下来了。九月，曹操粮草将尽，士卒疲惫，信心渐失，准备退守许都。荀彧得知，飞书曹操，劝曹操吸取楚汉成皋之战先退者势屈的教训，告诫说如若一退，后果不堪设想。又指出昔日以一当十，画地而守，半年之中迫使袁军难越雷池一步，说明其气势已衰。当前正是用奇取胜的大好时机，万不可失。曹操接受，勉力支撑。荀攸建议偷袭袁绍粮道，瓦解其军心。徐晃受命，一举烧毁袁绍即将运达官渡的几千车粮食。十月，曹操粮食已不足供军一个月，恰值许攸因贪欲难足，背袁绍来奔，具告袁军虚实，建议偷袭其屯粮要地乌巢（河南延津东南）。曹操立刻精选步骑5000，打起袁军旗号，连夜奔袭乌巢。乌巢守将淳于琼固守待援。袁绍拒绝沮授增援乌巢的建议，在郭图的谋划下全力进攻曹操官渡大营，企图一举倾覆其老巢。淳于琼被击杀，万车粮草为曹操烧为灰烬。曹操割取淳于琼部下的鼻子及牛马的唇舌，驰回官渡，展示阵前。袁军军心瓦解，四散逃命。郭图又委过前敌大将张郃和高览，逼得二人临阵降敌。曹操全线出击，袁绍狼奔豕突，只剩800余骑逃回河北。这就是官渡之战。这次战役为曹操统一北方奠定了基础，也是我国历史上著名的以少胜多的战例。　（蒋福亚）

袁氏败亡

官渡之战后，曹操利用袁谭、袁尚兄弟内争，进军河北，基本上统一了北方。

官渡惨败，袁绍气急攻心，在建安七年(202)吐血而死。袁绍有三子一婿，酷爱少子袁尚。战前，袁绍借口考察和锻炼诸子能力，出长子袁谭镇青州，次子袁熙镇幽州，婿高干镇并州，留袁尚在身边，实际是想以袁尚为继承人。沮授认为如此安排有悖于宗法制，将埋下祸乱的根苗。不出其所料，为了争权，袁谭以辛毗、郭图为羽翼，袁尚以审配、逢纪为帮手，展开了明争暗斗。袁绍一死，袁谭借奔丧为名前来争权，审配等抢先一步，拥袁尚为冀州牧。袁谭激愤而去，自称车骑将军，屯驻黎阳（河南浚县东北）。兄弟阋墙之势已成。

官渡之战，曹操虽胜，也元气大伤，考虑刘表懦弱，想进击荆州。荀彧反对，指出如若袁氏死灰复燃，乘虚而入，则大势去矣。曹操方以河北为务。建安七年兵进黎阳。大敌压境，袁氏兄弟捐弃前嫌，携手抗曹。鏖战数月，谭、尚兵败。次年，退保邺城（河北临漳西南）。曹操急切难以攻克，郭嘉献策：袁氏兄弟急则

相保，缓则相争，不如后撤，静观其变，各个击破。果然，曹军一退，兄弟俩便激战起来，并以妇女、财物引诱乌丸、鲜卑、匈奴等豪酋助战。属下王脩、审配及荆州牧刘表等相继致书，告诫骨肉相残，亲痛仇快，授敌以可乘之机，劝兄弟俩握手言和，共报父仇。但谁也听不进去。为增强实力，各自肆意征发，百姓不堪其役，被迫自残肢体。河北地区经此浩劫，到处尸骨累累，饿殍载道。在袁尚的追逼下，袁谭败退平原（山东平原西南），遣辛毗向仇敌曹操呼救。此时曹操仍想先取荆州，荀攸指出，刘表志在保安，无四方之志，不足为虑。袁氏据冀青并幽四州之地，带甲10万，地形险要，兄弟中一人得逞，便成劲敌。乘其内乱，取而有之，天下大局可定。如今正是难得的良机。是否支持袁谭，曹操仍然犹豫不决。辛毗求援心切，竟至完全重复荀攸的理由，进而指出，何必考虑袁谭日后的变化，关键是看准形势。取乱侮亡，古来使然。如今河北旱蝗并作，民无所食，上下离心，兄弟相争，明公若和袁谭联手，攻拔邺城，犹如秋风之扫落叶。袁氏乃当今之大敌，袁尚一定，天下不足为虑。若待来年，年谷丰登，袁尚又改恶从善的话，就再也没有今天这种大好时机了。曹操为说词所动，决定支持袁谭，并许嫁女袁谭，以坚其心。为确保运粮，特意在浚县淇水入黄河口处开凿一条河道，南至内黄（今属河南），沟通淇水和洹水，名曰白沟（今称卫河），在建安九年兵围邺城。邺城墙高城坚，曹操土山地道并用，亦难奏效。竟然引漳水灌邺，造成城中死亡过半。袁尚被迫放弃进攻袁谭，回援邺城，遭曹操阻击，旋被包围，势屈求降。曹操拒绝。袁尚溃围，北走中山（国治今河北定县），投幽州袁熙而去。邺城外援无望，内讧又起，该年八月，为曹操所得。接着，曹操借口袁谭背盟，在次年兵进平原，击斩袁谭于南皮（河北南皮东北）。袁熙部将焦触和张南见袁氏大势已去，举兵降曹，袁尚、袁熙逃奔辽西乌丸。建安十一年春，曹操进军并州，高干兵败，南投刘表，被刘表部下杀死。曹操夺取了昔日袁绍所占的四州之地。

袁尚、袁熙所以裹胁河北10余万户百姓投奔乌丸，是想借助乌丸之力卷土重来。乌丸，东胡族的一支，原为活跃于大漠草原南部老哈河流域的游牧部族。汉魏之际主要分布在上谷（郡治今河北怀来东南）、辽西（郡治今辽宁义县西）、辽东（郡治今辽宁朝阳北）和右北平（郡治今河北丰润东）一带，约计16000余落，20余万人左右。以游牧为主，已知农耕，能开采铜铁，铸锻兵器，织造粗糙的毛织物及酿酒等。正处在原始社会末期、军事民主制阶段。妇女在社会生活中地位较高，血亲复仇大都由伤害妇女引起。有"蒸母"（父死以后母为妻）"报嫂"（兄死以嫂为妻）的习俗。私有财产已出现，犯罪者可以自己的牛羊赎罪。没有法律。部落酋长称大人，有十夫长、百夫长之类的名号。成年男子都是战士，好勇斗狠，掠夺异族和异部落被视作光荣行为。大人有命，部众不敢违。东汉末，辽西乌丸大人蹋顿势力强大，总摄辽西、辽东、右北平三郡乌丸，建庭柳城（辽宁朝阳南）。乌丸既受军阀欺凌，又受其引诱而内逼。河北军阀往往借助乌丸的力量争雄，或随意征讨，虏掠乌丸丁壮。袁绍割据河北，册封三郡乌丸大人为单于，和蹋顿和亲，勾引其参加内战，河北一带深受其殃。此时，乌丸已经成为曹操在河北的统治能否巩固的一大障碍。但大部分谋臣武将都主张打荆州，只有郭嘉一人力主打乌丸。指出河北新得，民心不服；袁氏影响还在，大军一去，袁氏兄弟凭借乌丸之力乘虚而入，民夷骚动，冀、青一带就将不保。进而建议曹操乘其无备，轻装奔袭。建安十二年，曹操遣使徐无山（河北遵化境内），召请田畴为向导，亲统兵马出击。曹军在田畴的带领下，翻越500余里荒无人烟的山岭，由无终（河北蓟县东）经徐无山，穿越卢龙（河北喜峰口），直扑柳城。距柳城不足200里，乌丸才发觉。蹋顿及袁氏兄弟匆忙统众逆击，被曹操打败。曹操攻占柳城，斩杀蹋顿及乌丸大人多人，俘虏乌丸及汉人20余万。袁氏兄弟投奔割据辽东的公孙康，被公孙康杀死，送首曹操。曹操北边威胁解除，在河北的统治终于巩固下来。曹操凯旋时，驱逼万余落乌丸内徙冀州，其后又不断逼迁，选取其丁壮组建骑兵，南征北战，乌丸成为天下名骑。乌丸内徙，对河北经济的恢复起有积极作用。

曹操占有河北后，建霸府于邺城，指挥全局，极少到许都和洛阳去。因邺城地处魏郡，所以日后曹操晋爵为魏公、魏王。为确保其霸府经济及军事上的优势，曹操大量移民冀州，相继开凿了利漕、平虏、泉州等运渠。这些措施对河北经济的恢复，特别是东部平原的开发，起有奠基作用。（蒋福亚）

隆中对

刘备在荆州时三顾茅庐，在建安十二年（207）见到诸葛亮，求得了平定天下的方针大计。

刘备（161—223），字玄德，涿郡涿县（今属河北）人。汉景帝子中山靖王刘胜的后裔。不过这一支早在汉武帝时就没落了。刘备垂手过膝，耳朵大于常人，故日后被政敌骂为"大耳贼"。青少年时穷困潦倒，母

子二人以织席贩履为生。刘备好游侠，结交无赖，靠镇压黄巾起义起家。军阀混战初期，刘备以匡复汉室相号召，被徐州牧陶谦表为豫州牧，徒有虚名，并无实地。刘备极善控制自己，喜怒不形于色，较能平等待人。起兵后善待部下，与其同席而坐，同桌共餐，不加选择。东汉后期，社会上以门第相尚，封建隶属关系急剧发展，上下级之间已形同君臣，下层人民投奔，身分地位与奴婢相差无几。刘备是帝室苗裔，此类举措，无疑是屈尊降贵，对下属的极大抬举，无怪乎出身下层的关羽、张飞、赵云等要感激涕零，矢志追随了。就是刺客也深受感动，不忍下手，具告虚实而去。正由于此，刘备才败而复起，散而复聚，声名鹊起，被曹操、袁绍、郭嘉、孔融等目为英雄。日后，刘备把这一套归结为"宽"、"仁"、"忠"三个字，声言将以此与曹操的"急"、"暴"、"谲"三个特点对着干，争夺天下。但刘备毕竟势单力薄，名位低微，号召力较小。更重要的是其手下人才匮乏。关、张、赵等，确是勇敌万人的名将，可惜武勇有余，识见不足，可供驱使，难商远谋；简雍、孙乾等文人，守成尚可，创业乏才。所以刘备在长时期中战略方针不明确，栖身无所，落得个东奔西窜，寄人篱下，先后投靠过陶谦、吕布、曹操和袁绍等。官渡之战后期，刘备见袁绍时运不济，又改投了荆州牧刘表。刘备在荆州七八年中，致力于遍访英豪，招揽人才，其中最大的收获是请出了诸葛亮。

诸葛亮(181—234)，字孔明，琅邪阳都(山东沂南南)人。汉末战乱，隐居襄阳城西20里的隆中，躬耕垄亩，心存汉室，留意世事，务在实学。利用襄阳是南北交通枢纽、北方士人流寓之地的优势，交结英豪，不断搜集和分析当时形势，人号"卧龙"。自比管仲、乐毅，高吟待时，欲择明主，一展抱负。刘备向号称水镜先生(察人如清水明镜)的司马德操询问英杰。德操说"卧龙"诸葛亮、"凤雏"庞统都是识时务的俊杰。深得刘备器重的徐庶又竭力推荐，告诫刘备，此人只能亲自造访，不可邀见。刘备去了三次，建安十二年终于面识。两人初见，刘备开宗明义，说自己志在匡复，但智短术浅，雄心难酬，先生计将安出？诸葛亮侃侃而谈，指出自董卓之乱以来，豪杰并起，跨州连郡者不可胜计。曹操和袁绍相比，名位低微，力量薄弱，但能力克袁绍，化弱为强，固然与天时有关，主要却是依靠了人谋。现在曹操拥众百万，又有挟天子以令诸侯的政治优势，以将军之力，当前实在难以和曹操争锋。诸葛亮预见到曹操必将兴兵南下。在长江流域有孙权、刘表和刘璋三股势力。其中孙权据有江东，已历三世，地形险要，民心稳定，贤能为其所用，局面已经巩固。荆州北据汉、沔，利尽交、广，东连长江下游，南接巴、蜀，是个用武之地，但刘表志在保安，没有远谋。益州是四塞之地，沃野千里，天府之国，汉高祖据此而成帝业，但刘璋懦弱无能，北受张鲁据汉中的威胁，又不知体恤百姓，内部矛盾重重，智能之士欲得明主而事之。根据这一形势，诸葛亮为刘备画策：第一步，先夺取荆州，利用孙权难以独力北抗曹操的弱点，与之结好，抢得先机。第二步，规图刘璋，夺取巴、蜀，总揽英雄，刷新政治，西和诸戎，南抚夷越，继续结好孙权，稳定形势。第三步，静观形势，一旦天下有变，即由荆州兵进宛(河南南阳)、洛(阳)，由益州进击秦川，两路钳击，如此，则"霸业可成，汉室可兴矣"！其中夺取荆、益和结好孙权是关键的两条。两汉辟举用人，有对策的惯例，日后刘备为帝，诸葛亮位居丞相，所以后人把这一席对话叫作"隆中对策"或"草庐对策"，简称"隆中对"或"草庐对"。当时诸葛亮仅27岁。"隆中对"提出的方略，是这个时候刘备唯一可行策略。对刘备来说无疑是醍醐灌顶、顿开茅塞的一剂良方。无怪乎刘备要坚请诸葛亮出山辅佐，而说自己之有诸葛亮，"犹鱼之有水"了。

隆中对既有诸葛亮对当时形势的分析判断，亦有百余年前公孙述据益州兵出荆州的历史借鉴。尽管在历史上益州几乎是与外界隔绝的独守之地，因为交通阻塞，在经济上难以和荆州联成一体，跨据荆益，以荆制益极难实行，而且其中孕育着孙、刘之间有关荆州之争的难以避免的矛盾，导致后来荆州之失，吴、蜀一度交恶的后果，为诸葛亮所始料而不及。至于"天下有变"，诸葛亮在世之时也基本上没有出现。因此历史的进展只是基本上实现了隆中对中提出的近期方略，远期方略此时诸葛亮既不明确，又随着形势的变幻而化为乌有。但人们仍不免承认诸葛亮见解之高，分析之精辟，隆中对也始终被后人看作以数言定天下大计的典型事例。　　(蒋福亚)

赤壁之战

东汉建安十三年(208)，曹操和孙、刘联军在赤壁进行的、导致三国鼎立的关键性战役。

刘备投奔荆州后，先驻新野(今属河南)，后屯樊城(湖北襄樊北)。刘表外示亲热，内存戒心，防范甚严。刘备有意夺取荆州，"隆中对"后，更是如此。但刘备是惊弓之鸟，寄寓羁旅，想凭数千之众吞荆州而无灼手之虞，实在是心有余而力不足，只有按诸葛亮之

计，请准刘表，清查荆州游户，扩张兵力，笼络英豪。就在刘备羽翼渐丰之际，曹操的目光转向了荆州。

曹操早就有意于荆州，碍于袁氏势力的挤迫，迟迟不能行动。当其基本统一北方，平定乌丸后，在建安十三年，便挟得胜之余威，马不停行，亲统十五六万人马，进夺荆州，企图包罗长江，上伐益州，下讨扬州，一举统一全国。

刘表有琦、琮二子，偏爱少子刘琮。刘琮为刘表继室蔡氏所生。蔡氏是荆州名门，有强大的潜在势力，又得荆州另一大族张氏的支持。故刘琦被迫出屯江夏（郡治今湖北云梦）。八月，刘表死，刘琮继嗣，顾忌刘琦联合刘备前来争权，在蔡瑁和张允的主持下，投降了曹操，想借曹操之力，巩固其统治。曹操兵不血刃，据有荆州（州治今湖北襄樊），支开刘琮，吞并了荆州水师。

刘琮投降，刘备毫无所知。曹操到达宛城（河南南阳），刘备才得知，慌忙统部撤向荆州粮秣重地江陵。沿途有男女老少10余万人同行，行军速度奇慢。曹操挑选精骑5000，以日夜300里的速度追击，在当阳长坂（湖北当阳东北）冲垮了刘备。刘备妻小并失，赖赵云力战，救回其子刘禅，率数十骑斜趋汉津，得关羽接济，渡过沔水，会合了夏口（湖北汉口）的刘琦。

孙权有竟长江全境之志，时刻窥图荆州。刘表一死，在鲁肃（172—219）的建议下，遣鲁肃为使，借吊丧到荆州刺探虚实，寻找时机下手。时曹操已得荆州，鲁肃当机立断，追至当阳，劝刘备联孙抗曹，移屯樊口（湖北鄂城西），和孙权成犄角之势。这是隆中对理中提出的基本方略之一，也是此时刘备最　想的方案，诸葛亮竭力赞成。到夏口后，诸葛亮便随鲁肃去柴桑（江西九江西南），向孙权呼救，共商抗曹大计。行前，告诫刘备，切勿过江会见周瑜等。

曹操占有荆州后，谋士贾诩和程昱相继建议适可而止，安抚百姓，稳定统治，养精蓄锐，再图后举，特别要严防孙、刘联手。曹操骤胜而骄，还想不战而有扬州，致书孙权，扬言将统步骑80万和孙权“会猎于吴”，把孙权逼上了不得不联刘的道路。

江东上下得知曹操不日将移师扬州，大惊失色，谋士张昭等主降，鲁肃主战，争论不休。鲁肃用投降后孙权难以南面为尊打动孙权之心，但缺少具体的方略。孙权担心刘备新败，无力再战，对诸葛亮虚与委蛇。诸葛亮估计孙权难以言动，决定智激。一见面就大谈刘备是汉室之胄，宁为玉碎，不作瓦全，劝孙权应有自知之明，不要犹豫不决，明知不是曹操对手，趁早投降为好，轻蔑之心溢于言表。孙权被激怒，托出真心。诸葛亮方始具体分析形势：刘备尚有精兵20000，足堪一战；曹操有远来疲惫、北兵不习水战、荆州民心不服等弱点。声言孙、刘同心合力，必破曹操，成三足鼎立之势。孙权仍然犹豫。周瑜两次进言：曹操后有韩遂、马超作祟；北兵长于步战，南兵长于水战，曹操到此，被迫舍长用短；时及隆冬，北兵不习水土，已经患病；曹军号称80万，实际仅有23万上下，其中北兵十五六万，荆州水师七八万；北兵长途奔袭，士卒疲病，荆州水师心怀狐疑，以疲病之卒统狐疑之众，不堪一击。何况曹操尚有补给线过长、粮草不足等弊端。周瑜豪气干云，声言凭借江东地方千里、兵精粮足、将士用命的优势，足可横行天下，为汉家除残去秽。这次若有精兵50000，必可手操胜券！孙权终于下定决心，联刘抗曹，拔刀而起，砍断案角，断然宣布：诸将敢复言迎曹操者，与此案同！命周瑜为都督，程普为副，鲁肃为赞军校尉，统兵30000，迎击曹操。亲统兵马，为周瑜后援。周瑜心胸宽宏，很会团结人。程普年长，轻视周瑜，屡次当众凌辱。周瑜却倍加尊重。程普心折，说与周公谨（周瑜字公谨）交，若饮美酒，不觉自醉。将帅同心同德，确保了此战的胜利。

刘备在樊口早已望眼欲穿，见周瑜兵到，喜不自禁，过江劳军。周瑜功曹庞统（战后归刘备）得知，建议周瑜扣留刘备，逼迫关、张归顺。周瑜考虑大敌当前，小不忍则乱大谋，没有接受。

曹军推进赤壁（湖北蒲圻，在长江南岸），已染上瘟疫。一个接触，曹操小挫，退屯乌林（湖北洪湖境内，在长江北岸）。为克服不习水战的弱点，命令将战舰连在一起。周瑜部将黄盖建议火攻和诈降。十二月一天，东南风大起，黄盖选取十数艘蒙冲斗舰，内装浇上油脂的干芦枯柴，顺风而来。曹军出营观看，准备受降。黄盖纵火，直冲曹营。火借风威，风助火势，延及岸上营寨，烟焰张天。孙刘联军乘机猛攻。曹军不支，为防辎重落入敌手，曹操下令放火，烧尽辎重，经华容道退到江陵，这就是赤壁之战。

赤壁之战是我国历史上著名的以少胜多的战例。战后，曹操保有荆州八郡中的南阳、襄阳二郡，无力南下，乃致力经营北方。孙权夺取了南郡和江夏二郡。刘备得利最大，获有武陵、长沙、零陵和桂阳四郡，约当今湖南及贵州的一部分，虽然是荆州中较贫瘠的地区，毕竟有了立足点。三国鼎立的雏形已约略可见。　（蒋福亚）

韩、马之叛

东汉建安十六年(211),韩遂、马超等军阀阻止曹操兵进关陇的战乱。

东汉末年,关陇军阀不下十余支,其中以韩遂和马腾的势力最强。韩遂,金城(郡治今甘肃永靖西北)人;马腾,扶风茂陵(陕西兴平东北)人。都是靠镇压或利用当地人民反抗斗争起家的军阀。他们遥受汉室官号,韩遂为镇西将军,马腾为征西将军。其余军阀也都有正式名号,实际是一股股割据势力。这些军阀与当地少数民族关系密切,马腾即为羌女所生。彼此间又矛盾重重,勾心斗角。为争城夺地,韩、马二人一度结为异姓兄弟,互相利用,企图染指关中。直到李傕、郭汜败后,二人才称雄雍、凉,成为曹操腹背之患。官渡之战及赤壁之战时,都能见到这两股势力的阴影。赤壁之战后,曹操无力南下,致力经营北方,荡平关陇势在必行。

建安十六年,曹操扬言进击汉中(陕西省秦岭以南地区)的张鲁,借道关陇,命夏侯渊会合钟繇,兵进河东。诸将颇惧关陇军阀兵强马壮,骁勇善战,劲骑长矛,锋不可挡,建议精选前锋或坚壁不战。曹操成算在胸,自统主力直叩关中东门潼关。假道灭虢,历来为兵家常用之计。关陇军阀侯选、程银、杨秋、成宜等,以韩遂和马超(时马腾已死,其子超掌军)为首,布防潼关,进行阻击。双方夹潼关而阵。其余关陇军阀纷纷前来,韩、马兵力增至10万有余,曹操见此,喜不自禁,说这下可以一劳永逸,省去了逐个讨灭的麻烦。马超建议屯兵渭北,截断曹军粮道,迫使曹操无粮而退。曹操得知,甚为担忧,说:马儿不死,我无葬身之地。但韩遂企图乘曹军半渡,纵骑歼敌,拒不接受。曹操抓住时机,分兵徐晃和朱灵,由蒲坂(山西永济西蒲州镇)渡河,扎营黄河以西,用战车和树木筑起一条直达渭水北岸的甬道,确保河东粮草源源不断运至前线,抢得了先手。然后引军渡河,亲统百余虎士断后。马超率万骑猛攻,矢如雨下,在许褚的护卫下,曹操侥幸脱逃。但小挫无碍大局,曹军渡渭,筑垒渭南,完全掌握了主动权。韩、马形势尽失,求战不应,欲退不成,被迫割地纳质求和。曹操用贾诩的离间计,佯装允和,惺惺送别,在疆场上拉韩遂叙旧,时而大笑,时而低语,良久不绝。异日,又故意点窜和涂改给韩遂的书信。马超等疑心大起,与韩遂反目成仇。曹操先以轻兵缠住对方主力,突然发劲骑夹击,阵斩成宜等。韩、马失利,败退凉州。关中为曹操所有。夏侯渊受命逐次扫平陇右。十八年,马超集结羌、胡等少数民族一度卷土重来,席卷陇右。在杨阜和姜叙的偷袭下,妻、子并死,退无所据,南投汉中的张鲁。十九年,马超在张鲁、特别是氐族豪酋的支持下再出,又被张郃和姜叙击败。后来投靠了刘备。韩遂则在二十年被部下所杀。至此,关陇为曹操所有。此役,关陇惨遭再次浩劫,关中百姓逃奔汉中者就达“数万家”。

(蒋福亚)

刘备入蜀

东汉建安十六年(211),刘备应刘璋之邀入蜀,历时三年,夺得益州,三国鼎立局面告成。

东汉末年,汉宗室后裔、江夏竟陵(湖北潜江西北)人刘焉、刘璋父子据有益州(今四川、云、贵等地)。刘焉入蜀时,带去南阳及三辅一带流民数万家,其中上层分子成为父子俩统治益州的核心,史称东州地主集团。益州土著地主具有强烈的排外性,先后爆发三次起兵,失败后,想利用外力驱逐刘璋;时,据有汉中的张鲁又对刘璋构成了一定的威胁。内外煎迫,使刘璋亦想借助外力巩固统治。刘璋看中了曹操,遣益州地主集团代表人物张松使出北方。其时曹操已据有荆州,忙于筹措兵下江东,无暇他顾;又认为取有江东后,益州唾手可得,坐失了良机。张松身材短小,其貌不扬,为人放荡倨傲,不得曹操欢心。主簿杨修建议礼待和辟用,亦遭曹操拒绝。张松满腹怨愤,回程中途经刘备驻地。刘备和诸葛亮曲意厚待,殷勤备至。张松乃倾其所知,详告益州虚实,敦请刘备入蜀。回到益州,又劝刘璋与曹操绝交,联络刘备。建安十六年,曹操兵进关陇,瞩目汉中,刘璋惶迫。张松抓住时机力促刘璋命法正为使,邀请刘备,剪除张鲁,北抗曹操。刘璋本无定见,当即接受。法正受命统兵4000,携带大量物资,赴荆州礼请刘备。法正宦途失意,正想改投新主,一见刘备,便力呈益州可取。攫取益州,是“隆中对”中最重要的一环,但溯江而上,水流湍急,艰险之极。见有如此良机,刘备立即命诸葛亮统关羽等留守荆州,亲统步卒数万,任庞统为军师,逆江而西。

邀刘备入蜀,刘璋部下大都反对,王商倒悬城门谏阻,巴西太守严颜哀叹这是“独坐穷山,放虎自卫”。刘璋一概不听,下令沿途隆重接待,亲率步骑30000余至涪县(四川绵阳)迎接。两人相见,互相推奉,刘璋举刘备为大司马、领司隶校尉,刘备举刘璋为镇西将军、益州牧。庞统、张松及法正建议席间发难,刘备老谋深算,唯恐人心不服,反对仓猝行事。两人欢宴百余日。刘璋给兵给粮,赠马千匹,车千乘,请

刘备去打张鲁。刘备装备已足，总兵30000余，欣然上路。兵至葭萌关（四川广元西南），便驻兵不前。庞统献计：乘刘璋无备，突袭成都，是为上策；扬言回荆州，宴请白水关（四川广元东北）守将杨怀和高沛，席间发难，兵击成都，是为中策；回荆州去，徐图时机，是为下策。刘备认为上策太急，下策太慢，取其中策，在葭萌关一年多中，千方百计收买人心。次年，曹操征讨孙权，分兵荆州。刘备借口荆州告急，必须回援，请刘璋资助。时刘璋疑虑已起，为避免彻底破裂，只给兵4000，粮草减半。刘备乘机发作，袭杀杨怀、高沛。刘璋醒悟，杀死张松，但为时已晚。双方在雒城（四川广汉）相持一年有余，庞统为流矢射杀。诸葛亮奉命将荆州移交关羽，统张飞、赵云等入蜀增援。双方会师成都郊外，刘备军威更盛。刘璋向张鲁求救。张鲁命马超统军支援。马超投奔张鲁后，难以得志，乃私通刘备，助刘备攻打成都北门。时成都尚有精兵30000，粮草足支一年。但刘璋见人心尽失，援军又成了仇敌，父子二人在益州20余年，无所建树，不忍百姓再受兵燹之灾，举城投降。刘备送刘璋到南郡，以免留在成都引起是非。后刘璋死于东吴。

刘备夺取成都，得意忘形，放兵抄略，成都府库为之一空。又想没收成都房屋田园分给有功将士。赵云（？—229）谏阻：只有让百姓安居乐业，赋役才有保证，人心才能安定。刘备接受了，成都百姓免去了一场浩劫。至此，天下三分的格局终于形成。

（周　昕）

曹刘争汉中

东汉建安二十年（215）至二十四年，曹操和刘备争夺战略要地汉中的战争。

东汉末年，张鲁以五斗米道组织民众，据有汉中（陕西省秦岭以南地区）近30年，仓廪充实，士民富庶，汉中一度成为雍凉流民所归之地。建安十六年，曹操夺取关陇，本应直插汉中，因内有农民起义及拥汉势力的未遂政变，外受孙权耀武淮南的威胁，没有成行。建安十九年，刘备据有益州，若继续推进，占有汉中，关中便将裸露敌前。此时曹操内乱已平，孙权也在其统兵40万扬威江淮的震慑下龟缩，终于腾出手来，在次年抢先进击汉中了。阳平关（陕西勉县西北）一战，张鲁弟张卫败北，张鲁闻风逃窜，在曹操的招诱下投降，被送往邺城。司马懿及刘晔等建议乘胜席卷巴蜀，曹操考虑蜀道艰险，刘备和诸葛亮亦非易与之辈，悬军深入，难免不测，没有接受。但因宕渠（四川渠县东北）等地板楯蛮豪酋朴胡、杜濩的归降，其势力推进到嘉陵江及渠江上游一线，巴郡、巴东和巴西三郡（益州东部）均受威胁。为防曹军深入，刘备调度诸将，督黄权等击破朴胡、杜濩等，稳定了三郡形势。曹操即令张郃领兵争夺宕渠。刘备则命名将张飞领兵10000拒敌。双方激战50余天，张郃失利，退守汉中政治中心南郑（陕西南郑东）。此时刘备在益州的统治尚有待巩固，难以全力争夺汉中，张郃一退，刘备也回了成都。强敌已去，曹操布置大将夏侯渊督张郃、徐晃等镇守汉中后，亦在次年春统主力返回邺城。

汉中既是益州的北大门，又是出兵雍凉、进击中原的必由之道。曹操夺得汉中，蜀中一日数惊。失去汉中，非但钳击中原的设想落空，刘备也难关门自守。对于刘备而言，汉中势在必争。曹操一走，法正立刻对刘备指出：曹操得汉中而不图巴蜀，仓猝回师，必然内有忧患，当前正是夺取汉中的大好时机。果然，曹操正在为立谁作世子闹得不可开交。刘备抓住时机，在建安二十二年冬命张飞、马超、吴兰、雷铜等推进下辨（甘肃成县西北）。遭曹洪和夏侯渊的阻击，吴、雷全军覆没，张、马败而回缩。该年夏，刘备亲至阳平关督战。九月，曹操也赶到长安压阵。双方胶着于阳平关一年有余。刘备飞书诸葛亮发兵运粮。诸葛亮颇为犹豫，杨洪进言：汉中，益州之咽喉，若无汉中，益州难保。当此时刻，举国征发，男子力战，妇女运输，亦应在所不惜，有何可疑！诸葛亮乃全力筹措。建安二十四年，刘备得到接济后，兵势大盛，推进定军山（陕西勉县东南），夏侯渊恃勇轻敌，为蜀将黄忠击杀。曹操被迫亲临前线，意欲速决。刘备据险不出，利用曹操补给线过长的弱点，想拖垮曹操。曹操无奈，急运粮草接济。黄忠企图偷袭粮道，被曹军包围，赖赵云救援，方溃围而出。曹军大至，赵云且战且走，退回营寨，偃旗息鼓，大开寨门。曹军疑有伏兵，进退犹豫。赵云突然擂鼓震天，万箭齐发。曹军惊恐，自相践踏，跌落汉水而死者不可胜计，为之夺气。次日，刘备巡视战场，夸赞赵云一身是胆。

曹刘相持汉中时，孙权曾兵围合肥，关羽在襄樊又配合刘备行动。对于曹操来说，汉中得失和防守关陇并无多大关系，因而一得汉中，便大肆杀戮反抗者，掠徙夷汉各族人民于内地，并无非占不可的意图。既然当时不具备进兵巴蜀的条件，补给又如此困难，因此曹操把汉中比为弃之可惜、食之无味的鸡肋。权衡轻重，觉得重兵陷入汉中，实在利少弊多。所以当双方相持一个多月后，便在建安二十四年五月拔营起寨，再次驱逼各族人民退守长安、陈仓（陕西

宝鸡东）一线。汉中为刘备所得，魏、蜀间的疆界基本上稳定下来了。这次曹、刘汉中之争，都掠徙当地各族人民，仅被曹操虏往关中和河北的就不下十余万。汉中遭战火浩劫，疮痍满目，残破不堪。（蒋福亚）

曹丕曹植争世子

曹操晚年，其子曹丕、曹植争夺王位继承权的一场斗争。

曹操长子昂，死于建安二年(197)张绣哗变。继室卞后生丕、植、彰、熊四子。丕(187—226)字子桓，植字子建。建安二十一年春，曹操晋爵魏王，时已年过60，选择世子已经迫不可缓。曹丕居长，在此以前已被任命为五官中郎将，位居丞相之副，按宗法制惯例，是理所当然的继承人。但曹植的资质、才华、词令等均稍胜曹丕一筹，更讨曹操欢心。曹操认为曹植和自己相差无几，意欲以才择嗣，属意于曹植。

舍嫡长而立次，历来是封建社会中权势分配的大忌，稍一不慎，便会引起大乱。曹操迟疑不决。曹丕、曹植各怀野心，拉帮结伙，争宠邀势，各不相让。群臣对此深有所知。王位继承人的争执，通常都是各权势集团权力再分配的关键时刻，争宠邀势的最佳时机，风险极大。败则身首异处，家破人亡；成则佐命有功，公侯卿相，封妻荫子，光宗耀祖有望。名缰利绳，将官僚们纷纷卷入了这场角逐。杨修 、丁仪、丁廙等党于曹植，吴质、贾诩及一批老于世故的官僚党于曹丕。其中，吴质是曹丕的心腹谋士。曹植深自结托的杨修，是东汉后期社会上第一流名门望族，号称“四世五公”的弘农杨氏之后，这个家族具有强大的潜在势力。杨修才思敏捷，办事干练，官居丞相府主簿，典掌丞相府事，参与机要，深得曹操赏识。丁仪和丁廙是兄弟，其父是曹操故交，两家交往极深。丁仪居官西曹掾，丁廙居官黄门侍郎，均可参商机密。两人的文才与名声，仅次于“建安七子”。曹操欲嫁爱女与丁仪，被曹丕以其眼睛一大一小为理由破坏，由此对曹丕恨之入骨。一度，曹操对丁仪也是言听计从。这三人一再建议册立曹植，急得曹丕惶惶不可终日，向太中大夫贾诩问计。贾诩说，只有毫无野心，勤于攻读，礼贤下士，用孝道来感动汝父。曹操私下征询亲信大臣的意见，崔琰、毛玠、邢颙、贾诩等官僚均不正面回答，有的大谈立嫡立长的大道理，有的王顾左右而言他，列举袁绍嫡庶不分，造成兄弟阋墙，刘表舍长立次，结果荆州不保的往事，其实倾向都十分明确，迫使曹操欲行又止，犹豫迟疑，不断反复。这场斗争也更趋激烈。

曹丕用废筐偷运吴质入宫，密商对策。杨修发觉，密报曹操。消息泄漏，吴质将计就计，要曹丕依然故我。曹操密遣亲信拦截检查，结果满筐都是绢帛，疑心杨修挑拨其父子兄弟间的关系。曹操想考察兄弟二人的决断能力，命令二人各出邺城（曹操霸府所在地，今河北临漳西南）一门，又布置门吏不准放行。曹植按杨修之计，声言奉王命外出公干，拦者立斩，扬长而去。曹丕则沮丧而归。曹操以军国大事探测二人才识。杨修揣度曹操心意，密拟几种条呈告知曹植。曹操策问才出，曹植的对策应时而至，相当完美。曹操以知人善任名垂史册，对二子才情亦有所了解，疑心大起。几经推问，真相大白，杨修以交关诸侯、泄露机密罪问斩。每逢曹操领兵外出，曹植总是歌功颂德，激昂慷慨，铿锵有致，文采飞扬，闻者色动。曹丕用贾诩之计，竭力结好朝臣，强压各种奢侈淫逸的欲望，装出依依不舍的模样。吴质说必须掉泪。自此每逢别离，曹丕总是泪流满面，俯伏不起，悲不自胜。旁人均认为这是父子情深，曹操亦深受感动。杨修 一死，曹植失去智囊，灰心丧气，使酒任性。曹丕矫情有加，竭力讨好和收买曹操身边的妃子宫女，“仁孝”之名传闻内外。

曹操晚年，格于形势，不得不以文王自居，实质上代汉之心已决。曹植对此犹豫不决，曹丕则早已急不可捺。权衡再三，建安二十二年，曹操终于决心册立曹丕为太子。曹丕目的已达，喜不自禁，出门搂住议郎辛毗的脖子说：辛君，知我今日大喜否?！曹植未始毫无希望，因为直到曹操临死前仍在犹豫之中。建安二十四年，关羽兵围襄阳，曹操命曹植为南中郎将，统兵救援。殊料曹植屡遭挫折，意志消沉，甘愿认输，放荡不羁，借酒浇愁，成天烂醉如泥，难以受命。最后的机会也白白丢失。鉴于上述缘由，曹丕登基后，蓄意报复，敕令曹植七步内吟诗一首，且诸多限制，若不称旨，杀无赦。这就是流传古今、脍炙人口的《七步诗》：“煮豆燃豆萁，豆在釜中泣。本是同根生，相煎何太急！”　（蒋福亚）

东吴夺荆州

东汉建安二十四年(219)，孙权将领吕蒙和陆逊偷袭关羽，夺取荆州的战争。

两汉以来，南方经济的发展和长江交通，使荆、扬两地的联系日益紧密。扬州，尤其是三吴（今江、浙一带）地区，是正在崛起的新的财赋之区；荆州位处长江中游，是北图宛洛、东屏三吴的战略要地。因而汉末有识之士在分析形势，指点江山时，大都荆、扬

并举。荆不离扬，扬不离荆，渐成智能之士的共识。囊括荆、扬，划江而守，伺机进取，是孙策进兵江东时定下的方略。鲁肃之为孙权所重，关键也在其甫见孙权时就建议包罗长江全境，实在办不到，也得占有荆州，成三足鼎立之势。刘表一死，孙权即命鲁肃借吊丧为名，到荆州刺探虚实，准备行动。无奈曹操南下，迫使孙权不得不联刘抗曹。赤壁之战后，为紧密孙、刘联盟，孙权嫁妹于刘备。周瑜和吕范等苦苦建议孙权，乘机软困刘备，盛筑宫室，多给美女玩好，消磨其斗志，挟持其部下。孙权何尝不想如此，无奈内有山越作祟，外受曹操的威胁，近侧再树强敌，势非良策；同时也顾忌如此一来，会使天下英雄寒心，难以招揽人才，故只得放还刘备。建安十五年，为进一步孤立曹操，在鲁肃的建议下，孙权又将南郡和江夏郡的一部分借给了刘备。此举对曹操打击甚重。时曹操正在写信，闻讯后笔落于地，始悟东南暂不可图，决心夺取关陇，经营北方。日后随着形势的变化，孙权移镇秣陵（后改称建业，今江苏南京），特别是刘备取有益州后，对江东已构成威胁，取有荆州，更见重要。荆州不得，孙权寝食难安。联盟的裂痕渐渐扩大，双方终于成为仇敌。不过孙权还是先礼后兵，命诸葛瑾入蜀索取荆州，遭到拒绝，方于建安二十年命吕蒙统兵20000掠取长沙、零陵和桂阳三郡。刘备亲临公安（荆州牧驻地，今湖北公安油江口），指挥关羽争夺。孙权闻讯，赶到陆口（湖北嘉鱼西南），调度诸将，准备一战。时周瑜已死，鲁肃接掌南郡，节制诸路兵马。为维持联盟计，鲁肃邀关羽协商，双方都单刀赴会，据理力争，唇枪舌剑，各不相让，不欢而散。在双方势将一拼之际，曹操夺取了汉中，蜀中一日数惊。刘备后方不稳，被迫求和。双方商定以湘江为界，长沙、江夏、桂阳归孙权，南郡、零陵、武陵属刘备。暂时相安无事。建安二十二年，鲁肃死，孙权授命吕蒙规图荆州。

吕蒙（178—219），汝南富陂（安徽阜南东南）人，出身贫贱，立志以军功求取富贵，身经百战，功成名就后又笃志于学，成为孙权麾下智勇兼备的猛将。接任后，以夺取荆州为己任，无奈其对手关羽亦是强者，防范极严，急切难以得逞，只有徐图良机。关羽（？—219），河东解县（山西临猗）人，追随刘备，战功卓著，获有“万人之敌，世之虎臣”的美誉。曾被汉献帝封为汉寿亭侯。刘备入蜀后，关羽坐镇荆州，肩负维系孙、刘联盟及北图宛洛的两大重任。建安二十三年，曹操在汉中失利，洛阳爆发了韦晃和耿纪等人的未遂政变，南阳又发生了侯音领导的起义。后者和关羽遥相呼应。这正是刘备和诸葛亮企求的“中原有变”的信号，乃命关羽出击宛、洛。关羽命糜芳守江陵，傅士仁驻公安，沿江设置斥候，严防吕蒙乘虚而入，然后才于次年领兵北上。樊城（湖北襄樊北）以北一战，关羽水淹七军，曹魏骁将庞德被阵斩，名将于禁被俘，统帅曹仁龟缩襄阳、樊城一线。关羽乘胜推进，曹方荆州郡县闻风归降，华夏震动，曹操欲迁都以避其锋。司马懿等建议：利用孙、刘的矛盾，解除襄、樊之敌。

关羽军动，吕蒙立刻扬言病重，奔赴建业。陆逊闻讯，疾追吕蒙于芜湖，当即劝告：关羽兵胜而骄，荆州空虚，正是偷袭的大好时机，岂能轻易离开讯地。吕蒙此行，目的有二：一为向孙权呈报偷袭荆州的方略，二为物色能担此任，又不使关羽起疑的人选。陆逊的建议恰与其不谋而合。吕蒙确认陆逊堪当此任，向孙权力荐。孙权大肆张扬，发布陆逊接代吕蒙的命令。陆逊年少，声名未显，一到任所，接连致书关羽，竭力颂扬关羽的武功和威德，声称自己系一介书生，受命西来，力所不胜，字里行间不断流露出请关羽多加照拂之意。吕蒙一去，关羽心头已经一松，今见陆逊如此，戒虑之念全消，不断抽兵北上，荆州为之一空。孙权得陆逊飞报，命吕蒙统军出动，并称臣曹操，求其默许，切勿乘机南下或泄漏机密。曹操盼的就是这一天，为使关羽早日撤兵，挑起孙、刘之争，坐收渔利，故意泄密。关羽却以为这是曹操的调虎离山计，不予理会。

吕蒙伏精兵于船中，扮成商贩模样，昼夜兼程，沿途搜捕关羽所设斥候。关羽耳目全失，对江东动静一无所知。关羽能善待士卒，却轻忽甚至凌辱僚属。糜芳和傅士仁怀恨在心，吕蒙兵到，相继献城。吕蒙军纪严明，秋毫无犯，优抚关羽士卒的家小，嘘寒问暖，送药给粮，解其急困，无微不至。消息传到前线，关羽军心瓦解，士卒纷纷逃散。关羽统余部南撤，退到麦城（湖北当阳东），被吴将潘璋擒杀。孙权终于夺得了荆州，君臣欢会，乐不可支。　（蒋福亚）

曹丕代汉

黄初元年（220），曹丕废汉献帝自立，建立曹魏王朝的历史事件。

曹操挟持汉献帝后，对献帝防范极严，身居邺城（河北临漳西南），指挥全局，极少朝觐。曹操戎马一生，力克群雄，统一北方，整顿吏治，恢复经济，到晚年，以功业论，称帝的条件已经具备。当其由魏公晋爵魏王，受封十郡，位在诸侯王之上，出警入跸，享有

天子全部仪仗后，实质上已类同皇帝，劝进者更多。建安二十四年(219)，孙权又上表劝进，曹操拿着劝进表对群臣说：这小子是想把寡人放在炉火上烤死！声明将以文王自居。也即说代汉之举，将由其儿子完成。所以如此，关键是正统思想在文人朝士中还有相当的市场，士族中反对者尚多。献帝蠢蠢欲动，几经较量，只有认输。一些拥汉势力和野心家却还想借献帝之名集结力量，密谋政变。对于政敌及障碍自己权势地位上升的人，不管其名位多高，功劳多大，曹操绝不留情，大都以族灭处置。一连串的杀戮吓得献帝胆战心惊，乞求曹操高抬贵手，饶其一命。建安二十四年，魏讽政变未遂，株连而死的达一千余家。荀彧是曹操第一号谋士，功劳谋略，旁人莫比，因对曹操谋取魏公、受九锡殊礼心有迟疑，最后也被逼自杀。尽管如此，面对正统思想及士族的强劲压力，曹操不得不有所退让。曹操何尝不知这个天下迟早是曹家的，为了留给属下拥戴其子称帝的机会，更好地忠于其后裔，何况利用献帝，尚可挟持刘备和孙权，有利无弊，才没有废汉自立。建安二十五年，曹操死，享年66岁。

曹操晚年，在曹丕、曹植二人中，立谁为嗣，一直犹豫。后来虽册立曹丕，却仍偏爱曹植，直到死前。就其本意而言，无非想选择一个理想的嗣子，殊不料此类犹豫却使"天下将乱"的谣传不翼而飞。死讯传出，军队骚动，青州兵和以臧质为首的徐州兵竟擅自击鼓而去。曹操是死在洛阳的，诸子均不在身边，临终前曾急召三子曹彰入见。曹彰是曹操诸子中唯一手握重兵、颇有将帅之才的一个，此时坐镇长安，平素心向曹植，认为曹操所以急召，为的是废曹丕，立曹植。所以一到洛阳，便追问先王玺绶，就使形势更趋复杂。曹丕党羽贾逵等以太子已立为由拒绝，保护曹操灵柩到达邺城。曹彰又找曹植：先王召我，欲立汝也。此时满朝均为曹丕党羽，曹植以袁谭、袁尚兄弟阋墙的理由说服了曹彰，曹彰才没有进一步行动。为防夜长梦多，曹丕草草安葬曹操，不待报请献帝，用卞后的名义，在一天之中匆忙办完嗣位仪式。名分一定，立即杀戮曹植党羽，剥夺曹彰兵权，勒令其兄弟归国，解除潜在威胁，安抚臧质及青州兵等，并以心腹曹真、曹仁、吴质等出任重要方镇，控制地方。

曹丕早有代汉之心，局面一稳定，便下令大赦，减轻关津税，抚恤阵亡将士，邀买民心。为求取士族的支持，代汉前后除重赏各级官吏外，先后颁布了金策令、九品中正制及严禁外戚干政的诏令。金策令规定此后宦官做官不得过署令，杜绝了宦官干政的途径。九品中正制是吏部尚书陈群所建议。曹操当政时，正值乱世之秋，士人流迁严重，两汉以来的乡举里选已难推行，在军中把士人按才能分为九等，以便使用。陈群在此基础上，建议选拔公正贤明而又善于鉴别人才的中央官员，兼任本州本郡的中正官，根据德、才两个方面，评品本土士人，分上上、上中、上下、中上、中中、中下、下上、下中、下下九品，供吏部铨选任职。中正有权进退士人的等第。由于上上品以孔子为标准，所以形同虚设，上中品成为最高品级，被称为"灼然二品"。此制又称"九品官人法"。禁止外戚干政的诏令规定群臣不得奏事太后，后族之家不得辅政或横受爵土，"若有背违，天下共诛之"。这三者互为表里，以九品中正制为核心。东汉以来，外戚宦官轮流专权，垄断仕途，政治腐败，毒遍海内，人神共愤。严禁外戚宦官干政吸取了这个教训，有其积极意义，同时为士人的仕途生涯扫除了障碍。九品中正制是官吏选拔制度的一个变革，有重大的历史影响。过去士夫名流只是以"清议"臧否人物，影响官吏铨选，现今手操评品之权，无疑是直接控制了官吏铨选的部分权力。这是曹丕对士族的让步。自东汉中后期起，士族权势的扩张已成不可逆转之势。中正均由士族充任，在评品时当然会更多地考虑本阶层、本集团的利益，久而久之，门第成为评品的唯一标准，上品无寒门、下品无势族的格局出现了。门第高华者垄断了高官显职。该制演化成士族攫取政治特权及建立门阀统治的工具。在这些措施下，士族们支持曹丕代汉了，劝进表纷纷而来。延康元年(220)十月，曹丕废汉献帝为山阳公，在禅让的名义下登上了皇帝宝座，定国号为魏，奠都洛阳，建元黄初，正式建立了曹魏王朝，史称魏或曹魏。 （蒋福亚）

夷陵之战

蜀汉章武二年(222)，吴蜀双方为争夺荆州，在夷陵爆发的一场大战。又称猇亭之战。

失去荆州，隆中对中提出的方略便告流产，刘备怒不可遏。章武元年四月，刘备称帝，七月，提兵40000，御驾亲征，企图夺回荆州。此举朝内争议极大，赵云竭力反对，诸葛亮没有明确表态，可能处在模棱两可之间。为稳妥起见，黄权建议由其先行，刘备殿后，也遭拒绝。刘备一意孤行，留赵云守江州(四川重庆)，诸葛亮镇成都，黄权被支往江北防御曹魏，把个别反对者投进了监狱。

刘备先发制人，盛怒而来，深入吴境数百里，声势甚壮。武陵、零陵、桂阳等地少数民族，苦于东吴压

榨和奴役,奋起响应。马良受命前往联络组织。形势对刘备甚为有利。

孙权命陆逊为大都督,统兵50000抵御。又命步骘从交州统武吏万余,屯驻益阳(今属湖南),镇压各地少数民族,截断少数民族和刘备的联系。

陆逊屯兵夷陵(湖北宜昌东),统主力扼守西陵峡口,分兵孙桓坚守夷道(湖北宜都西北),阻止刘备深入武陵、零陵和桂阳一带。此着相当有效,参与夷陵之战的少数民族极少。次年,刘备进抵夷陵,百般挑战,陆逊坚守不出。刘备计穷,转攻夷道,屯兵猇亭(湖北宜都北,长江北岸之古老背)。孙桓情急,频频呼救。

在陆逊的部署中,夷道只是吸引和牵制刘备,以便争取时间从容部署的偏师,何况夷道城坚粮足,孙桓又颇善用兵,因而不予理睬。夷陵过不去,夷道久攻不下,刘备的攻势被挡住了。这里水流湍急,险滩密布,江道狭窄,船舰只能鱼次而过。顺流而下,势如奔马,溯江而上,难如登天。冒险而进,有归路遭截、全军覆没之危。刘备无此胆略,身边亦缺智勇双全、可以胜任此危的谋臣猛将,被迫舍舟登陆。可是两岸山高林密,陡峭险峻,缺少集中屯兵的所在,只有在巫峡至夷陵700里间,扎营50有余,兵力分散了。蜀军久驻坚城之下,师老兵疲,士气日渐低落。该年六月,陆逊先攻刘备一营,试探军情,随即命令士兵各持茅柴一把,全线出击,火烧蜀军,阵斩蜀将冯习、张南等,连破刘备40余营,包围刘备于马鞍山(湖北宜昌东北)。刘备拚力自保,乘夜突围,退据白帝城(四川奉节东)。黄权归路被阻,投降了曹魏。东吴将领要求乘胜追击,直捣白帝,推进西川。陆逊顾忌曹魏坐收渔利,请准孙权,下令退兵。果然,曹魏三路大军直扑江陵,见陆逊回师,只好鸣金收兵。

夷陵惨败,蜀汉精兵损失大半,水陆军资、船舰器械,丧失殆尽,自此被封闭在夔门之内,吴、蜀间的疆界大体固定下来。刘备无颜再见西川父老,次年病死于白帝城,托孤诸葛亮,命其辅佐后主刘禅。

(蒋福亚)

孙权建国

黄武元年(222),孙权在建业称王,七年称帝,建立吴国的历史事件。

孙策有权、翊、匡三个弟弟,二弟孙翊在武勇上与其相似。但孙策考虑,乱世之秋,只有具备选贤任能、保境安民的才干,方能保住基业,这恰是其大弟孙权的长处。为此,他在建安五年(200)临终前,把江东交给了孙权。

孙权(182—252),字仲谋,胸襟开阔,多谋善断,礼贤下士,勇武好侠,声名同于父兄。随兄孙策起兵,参谋帷幄,锻炼了军政才能。接掌江东后,在创业过程中,果然不负乃兄所托,以张昭、周瑜为左膀右臂,网罗了鲁肃、诸葛瑾、步骘等北来英豪,用联姻及升堂礼拜顾雍之母的手段,紧紧拉住了以顾陆朱张为首的吴郡士族,与这些人交同布衣,“义虽君臣,恩犹骨肉”,深相寄托。周瑜人才两美,赤壁之战后,曹操遣以舌辩独步于江淮的蒋干过江,用同学的关系游说周瑜。周瑜的回答十分干脆:我与孙将军外托君臣之义,内结骨肉之恩,言听计从,祸福与共,岂能为说词所动!孙权不因诸葛瑾是诸葛亮之兄而横加猜疑,当有人企图离间时,孙权毫不犹豫地回答:孤与子瑜(诸葛瑾字)是生死不易之交。孙权知人善任,赤壁之战,全权委托周瑜。张昭认为鲁肃粗疏,孙权却看到其长处,周瑜一死,便令鲁肃继任,至死方休。张昭刚直,自奉颇高,不易团结人;顾雍谦和,才识优秀,为政务实,孙权礼敬张昭,却以顾雍为相,一任就是19年。孙权不因陆逊年少而轻忽,委以荆州及夷陵之战的重任。吕蒙、潘璋,出身贫贱,甘宁本是剧盗,孙权均予重用,成为一代名将。为求取将领们的死力,在调处部下的矛盾上,孙权煞费苦心。甘宁射杀凌统之父,凌统矢志报仇。孙权始则把二人分开,继则借合肥之役两人并肩战斗、互相救护之机,说合了双方的关系。孙权并非一意笼络,对于心怀异端者,绝不留情。吴郡沈友,以才辩、文章、刀法闻名于世,号称“三绝”;对当时形势的分析,亦令孙权心折。因心向许都,被孙权所杀。恩威并济,收到“贤能为之用”的实效。更重要的是孙权在创业过程中采取了世袭领兵制、复客赐客制、奉邑制、殊其门户等措施,厚待功臣将相,求取其竭心效力。世袭领兵制实质上是一种人口分割制度。江东政权在内外战争中,凡有俘虏,都与有功将领共同分割,将领们世代拥有分割到的人马,父死子继,兄终弟及,故称世袭领兵。由于士族大都身兼军职,因而绝大部分享有此一特权。后来,江东名宗大族所统人马之多,连魏国都不敢轻视。江东军队也用于屯田,士兵的身分也为世袭,在世袭领兵制下,士兵极易转化为依附农民。“复客”就是免除贵族官僚依附农民的赋税徭役,承认官僚贵族独占其依附农民剩余劳动的特权。“赐客”即将封建政府控制的人户赏赐给达官贵人为依附农民。数量都相当大。按照体制,孙权未称王前,不能推行封爵制,为此把部分地区赏赐给有功将相,叫做奉邑。受赐者可衣

食奉邑内部分租税。奉邑制与封爵制的区别在于封爵是世袭的，奉邑则身死地夺。殊其门户则是对于死于王事的中下级官员的特殊褒赏，封建政府用强权确保其后代对土地和依附农民的占有。这些措施对江东士族的长足发展，有巨大的影响。

北来士族客寓江东，急于寻找立功立业的机会，以便扎下根基。江东士族大体上形成于东汉中后期，但彼此间不相上下，其地位、名望、实力均难望北方士族之项背，不具备割地自雄的条件。孙氏兄弟以武力征服江东，对南北士族优礼有加，政治上予以重用，经济上赋予特权，士族们当然全力支持了。此外，孙权又内平山越，兴置屯田，外交上则竭尽纵横捭阖之能事，并屡获成功。赤壁之战时，孙权联刘抗曹，据有荆州的南郡和江夏。战后，向交广伸展，建安十五年，自东汉末年以来就据有交州的士燮归降，交广归孙权所有。继而又联曹拒刘，夺取了荆州，并在夷陵之战中重创刘备。过后不久，孙权又和蜀汉重申旧好，合力抗曹，推行其划江自守的策略。比较曹操以一统天下为己任，刘备和诸葛亮以王业不偏安相号召，孙权似乎略见逊色。其实这恰恰是江东君臣的高明处。在北方残破的情况下，江东财赋可以支持一个割据政权，逐鹿中原则力所不胜。划江自守，可以集中经营内部。江东政权对南方的开发是有贡献的。黄武元年，孙权称吴王，都建业（江苏南京）。黄龙元年（229）称帝，国号吴，史称孙吴或东吴。（蒋福亚）

诸葛亮南征

蜀汉建兴三年（225），诸葛亮镇压南中叛乱，征发当地军国物资的战争。其《前出师表》中“五月渡泸，深入不毛”即指此而言。

南中，约当今四川南部及云、贵一带。此时南中散居着为数众多、各不相属的少数民族，总称西南夷。西南夷的社会发展阶段及经济生活差异甚大，有的以农耕为生，有的以渔猎或放牧为业，后者所居之地，时人称为“不毛”。由于两汉曾在南中移民屯垦，故有不少汉人杂处其间，其中的豪强，往往被称为“大姓”。这是一个不稳定的地区。夷陵惨败，蜀汉腹心动摇，南中豪酋及大姓乘机掀起了一场大规模的叛乱。越巂（郡治今四川西昌东南）叟帅高定元举兵称王；牂柯（郡治今贵州凯里西北）太守朱褒据郡不听调遣；益州（郡治今云南晋宁东）大姓雍闿杀太守，俘执继任的张裔送交东吴；少数民族豪酋孟获谎称蜀汉勒索当地生产不出的土产宝物煽惑民心。东吴竭力推波助澜，发布雍闿为永昌太守，任命刘璋之子刘阐为益州刺史，屯驻交、益二州交界处，遥相呼应。只有吕凯和王伉坚守永昌（郡治今云南保山东北），为蜀汉保住了滇南。巴蜀虽富，若无南中的军国物资，势难支撑。时刘备新死，刘禅少不更事，诸葛亮辅政，真乃“受任于败军之际，奉命于危难之间”。诸葛亮致力于稳定蜀汉内部，命邓芝两次使出东吴。在此期间，曹魏三次兵压吴境，没有蜀汉的牵制，孙权也难独守，被迫和蜀汉重申旧好。吴蜀联盟恢复后，诸葛亮拒绝丞相长史王连的谏阻，根据当时金沙江畔瘴气侵人，三、四月间过者必受其害，只有五月才略见缓和的特点，在建兴三年春兵分三路，讨伐南中。

这次用兵，诸葛亮虽然以攻心为上、攻城为下、心战为上、兵战为下为其基本策略，事实上，不经血战，叛乱难平。东路马忠直捣牂柯，朱褒被歼。中路李恢包抄雍闿和孟获的后方。诸葛亮亲提主力，直逼声势最大、盘据越巂的高定元，伺机决战。雍闿、孟获失利，向高定元靠拢。高定元部下袭杀雍闿，孟获代闿为主。诸葛亮乘其内讧，发动攻击，两战皆捷，攻克越巂，斩杀高定元。孟获统部节节顽抗。诸葛亮步步进逼，在该年五月，渡过泸水（金沙江），几经鏖战，孟获兵败投降（传说七擒七纵，不可信）。南中叛乱终于平息。诸葛亮派遣汉族官员坐镇南中各郡，大力培植大姓的势力，发展封建隶属关系，传播先进生产技术。利用南中少数民族好“巫鬼”（迷信）和“诅盟”（盟誓）的风俗，赏赐少数民族豪酋天地、日月、君长、神龙等图谱，予以安抚；赠送瑞锦、铁券等，与其结盟；吸收其上层分子如孟获者流到蜀汉中央做官，加强和南中的联系。又在南中推行封建赋役剥削制度，征发南中耕牛、战马、金银、犀革、丹漆等军国物资，选取其丁壮当兵。在该年十二月回到了成都。其后南中虽仍有动荡，但已无碍大局。

这次南征，加强了西南夷和内地的联系，有利于该地经济及封建关系的发展，为云贵等地成为我国神圣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作出了贡献。蜀汉也收到军用充足、“国以富饶”的实效，为诸葛亮的北伐创造了条件。（周　昕）

六出祁山

蜀汉建兴六年（228）至十二年间，诸葛亮在关陇一隅与曹魏的六次战争。其间五次主动出击，一次防御，只有两次道出祁山（甘肃礼县西北）。但历来民间盛传“六出祁山”，故此处从俗。

诸葛亮恢复吴蜀联盟、平定南中、取得南中的军国物资及丁壮后，国用富饶，兵甲充足，兴复汉室、北

伐中原被提上日程。时荆州已失,汉水中上游军事重镇上庸(湖北竹山)等又被曹魏占有,隆中对中提出的两路钳击中原的设想已经流产,乃以兵出陇右、发动西戎、占有关中、再取中原为战略方针。诸葛亮吸取东吴背盟的教训,分兵永安(四川奉节),特命副手李严驻节江州(四川重庆),以防万一。令蒋琬主持后方,保证前线足食足兵,然后亲提10万兵马,在建兴五年移节汉中,整军讲武。该年,曹丕死,魏明帝曹叡继位,主少国疑,东吴两次袭扰曹魏边境;年底,屯驻新城(湖北房县)的魏将孟达暗通诸葛亮,约定举城响应。诸葛亮抓住时机,在次年春命赵云和邓芝统偏师,扬言将沿褒斜道直扑长安,亲统主力北出祁山。时大将魏延建议,利用曹魏关中主将夏侯楙懦弱无能,不知兵机,由子午道直袭长安。此策有其合理部分,但蜀汉国小力薄,以一州之众当八州之师,难免有失。诸葛亮用兵,唯求谨慎,不善用奇,没有采纳。尽管司马懿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制住了孟达,使曹魏可以集中兵力对付诸葛亮,毕竟因蜀汉多年无闻,疏于防范,所以诸葛亮一出,便横扫南安、天水、安定等郡,陇右纷纷归降,曹魏举朝震动。曹魏关中都督曹真统主力控扼斜谷口(陕西眉县西南),分兵坚守陇西(郡治今甘肃陇西东南)及上邽(郡治今甘肃天水)一带,据险不出,避免决战。明帝亲至长安,调度诸将。督宿将张郃统兵50000伺机争逐战略要点。形势对蜀汉颇为有利。可惜诸葛亮用人不当,以只会纸上谈兵的马谡为先锋。马谡违背节度,街亭(甘肃秦安东北)一战,被张郃击败,要地丢失。赵云在箕谷(陕西太白境内)又被曹真打败。形势已失,诸葛亮无力再战,只好退兵。曹真次第收复失地,估计诸葛亮再出,必由陈仓(陕西宝鸡东),乃大治陈仓城。诸葛亮回到汉中后指出,这次敌少我众,仍然失利,责在统帅。只要牢记教训,群策群力,属下勤攻其过失,兵少亦能取胜,功业可翘足以待。否则兵多也是无用。为此主动贬官三级,布告天下。该年八月,东吴陆逊在淮南击败曹休,魏兵东调,关中空虚。诸葛亮为不误战机,仓猝兵出大散关(陕西宝鸡西南),围攻陈仓20余天。张郃统援军而来,蜀军粮尽,诸葛亮主动后撤,击斩魏追将王双。次年春,诸葛亮整军再出,命陈式攻拔武都、阴平二郡,小胜而还。建兴八年七月,曹真为遏诸葛亮之势,主动出击,数道并进,取会汉中。诸葛亮命魏延在下辨(甘肃成县西北)附近的羌中阻击郭淮军,亲屯成固(今属陕西),挡其主力。时气候反常,大雨30余天,曹真一无所得,被迫奉诏回师。建兴九年春,诸葛亮再出祁山,造木牛流马两种小车运送军粮。时曹真病重,司马懿代曹真为帅。诸葛亮小挫郭淮、费曜等军后,与司马懿相持于上邽,抢收当地麦子,移军卤城(甘肃天水与甘谷间),一个小接触,司马懿损兵3000,据险不出。六月,诸葛亮粮尽兵退。张郃奉司马懿之命衔尾追击,在木门谷(甘肃天水西南)中伏,被乱箭射杀。诸葛亮吸取每次均因粮运不继被迫退兵的教训,在郿县(今属陕西)的渭水南岸分兵20000屯田,作长久之计。历经三年,在建兴十二年约会东吴后,亲统10万大军由斜谷推进渭水南岸。司马懿先期渡渭,凭水筑垒,据垒坚守,明帝亲至东线阻击孙权,命令司马懿以守却敌,不准出战。魏吴交兵,孙权小挫,立刻后撤,东线无事,只剩下诸葛亮在西线孤军奋战。双方相持达六个月之久。时诸葛亮已疾病缠身,为求一战,送司马懿一套妇人服饰,企图激出司马懿。司马懿不为所动,只是反复向来使询问诸葛亮的饮食起居。魏将不堪其辱,纷纷求战。司马懿佯装发怒,上表明帝请战。明帝命辛毗为军师,严令坚守,持节镇压诸将。该年八月,诸葛亮终因积劳成疾,久病不治,死于五丈原(陕西眉县西南30里),享年54岁。蜀军整肃而退,司马懿引军追击,姜维回旗鸣鼓,推出诸葛亮的木雕像。司马懿吓得回头就走。当地百姓盛传"死诸葛走生仲达(司马懿字仲达)"。司马懿以"吾能料生,不能料死故也"解嘲。

蜀弱魏强,魏方战略得当,而东吴对诸葛亮夹击的要求又虚与委蛇,这些决定了诸葛亮北伐难成的结局。诸葛亮北伐,既有兴复汉室的理想,也有报刘备知遇之恩、不可为而为之的成分。连年兴师动众,给蜀汉带来了很大的负担。北伐虽无所成,但诸葛亮严于律己,治军有方,军队训练有素,军纪严明,秋毫无犯。蜀军静如处子,动若脱兔,进退有序,凛然不可犯。魏兵数倍于蜀师,仍然技差一筹,处处被动。所以司马懿也不得不感叹诸葛亮为"天下奇才"。

(周　昕)

吴平山越

东吴建国前后,不断掠夺南方少数民族山越的战争。

汉魏之际,在长江以南,约当今江苏、浙江、福建、安徽、江西的山岭地区,散居着为数众多的古代越人的后裔,时称山越。其中,皖南、浙东、福建的建阳地区、江西的九江及上饶地区是当时山越较集中的所在,两广也有少量的分布。两汉以来,山越深受汉族的影响,基本上以农垦为生。汉末战乱,许多汉

族人民逃入山林地区，促进了山越的发展。山越已知冶铜炼铁，制造兵器铠甲，内部贫富分化和阶级对立已相当明显。虏掠已成为山越生活的有机组成部分，好勇斗狠。山越长年生活在深山老林，不服"王化"，又时出抄掠，乃被统治阶级诬称为"山贼"、"山寇"。山越保留较多的氏族组织残余，又和结寨自保、聚族而居的汉族豪强有密切的关系，所以又被叫作"宗部"、"宗伍"、"宗贼"等。汉末战乱，南方豪强往往借助山越，据地自雄，与孙氏兄弟作对。曹魏也经常招诱著名的山越首领，骚扰江东腹心。孙氏兄弟据有江东后，较长时间不遑外顾，与山越声势颇盛关系甚大。建安五年(200)孙策死后，山越大动，孙权被迫分兵讨伐，直到建安八年，程普、吕范、太史慈、吕蒙等主要将领分任山越较多的诸县，才把局面控制下来。

东汉以来，江东地区虽有开发，但地广人稀的面貌并无改变。为了巩固统治，掠夺劳动人手和补充兵源，驱逼和虏掠山越出山，成为江东政权创业过程中的基本措施。孙权接掌江东后，几乎年年用兵山越。由于讨伐山越，俘掠人口后，将领们可以分得一部分，因而都把讨伐山越视为美差。其中规模最大的有建安二十二年及嘉禾六年(237)两次。建安二十二年，孙权在陆逊的建议下，借口土豪费栈接受曹魏官号，煽动山越，命陆逊为帐下右都督，统兵讨伐。击破费栈后，乘势驱掠丹阳(郡治今安徽宣城)、新都(郡治今浙江淳安)、会稽(郡治今浙江绍兴)三郡的山越，抽取数万丁壮为兵，弱者用于屯田。嘉禾六年，孙权命诸葛恪为抚越将军，讨伐丹阳郡深山中的山越。诸葛恪移檄吴郡(郡治江苏苏州)、会稽、新都和鄱阳(郡治今江西波阳)四郡地方长官，严密封锁通向山林的通道，自保疆界，防止山越出入或逃窜，凡有投顺，随时收编并移居平川。待至秋收时节，采用拉网战术，步步为营，搜山荡谷，又尽力避免与山越交战，只是抢收山越的稻谷，抢掠粮食，颗粒不剩。山越饿极无奈，被迫出山。诸葛恪下令，凡出山投顺，一律安抚，移居他县，违令者严惩。臼阳(今地名无考)长胡伉因山越周遗屡屡犯案，乘其出山，即予拘押。事发，诸葛恪斩胡伉以徇。此举极见成效，山越纷纷归顺，收得精兵40000余。

东吴征讨山越的基本政策是选拔其丁壮为兵，羸弱者用于屯田。吴国有兵20余万，半数以上由山越丁壮组成。吴国民屯劳动者，绝大部分是山越人民。山越出山，对东吴开疆拓土，北抗曹魏，特别是对太湖平原和宁绍平原的开发立有殊勋。后来，出山的山越和汉族融合，留居深山的，在隋唐时期亦和汉族融合。

(蒋福亚)

魏吴争淮南

三国鼎立时期，魏、吴两国为争夺淮南而进行的一系列战争。

赤壁之战后，曹操暂时无力南下，改攻为守，转而致力北方，但并未忘情江东。为屏障许、洛，曹操着力经营淮南政治、经济、军事中心寿春(安徽寿县)，在此设立扬州，选派名将张辽、李典镇守巢湖北岸号称淮右咽喉、江南唇齿的战略要地合肥(今属安徽)。其后继者亦复如此。利用当地水丰土沃的优良条件，修筑陂堰，开渠引水，抽调驻军，在淮河南北大规模军屯，保证足食足兵。太和六年(232)又在合肥西北修筑合肥新城，加强合肥一线攻防体系。孙权虽以划江自守为基本国策，但为巩固江防，确保京师建业(江苏南京)，对淮南亦是一日不可或忘，若有机会，总想据为己有。孙权以庐江(郡治今安徽潜山)为基地，也大规模实施军屯，确保前沿军需，屯兵号称北控巢湖、南扼长江的战略要地东兴(安徽巢县东南)。建安十七年(212)采纳吕蒙的建议，在濡须水口修筑了濡须坞(安徽巢县东南)。太和四年因濡须坞久废不治，又修筑了东兴堤，夹水立两城，加强对巢湖的控扼。曹魏视濡须坞及东兴堤为眼中钉，东吴视合肥新城为肉中刺，数十年中，双方为争夺淮南，战争几乎无年不有，这两地成为彼此角逐的主战场，计其大者有建安二十年、黄初三年(222)、太和二年、太和四年、青龙二年(234)、嘉平四年(252)和嘉平五年等次。

建安二十年，曹操西征张鲁，孙权乘虚而动，兴兵10万，包围合肥。曹将张辽、李典等仅有守兵7000，按曹操预先的布置，张、李二人夜募敢死之士800余人，杀牛犒劳，乘天色微明，张辽一马当先，高喝自己名号，破寨斩将，直冲孙权大帐。孙权不支，走登高冢，以长戟自卫，吴兵大至，张辽溃围而出。为救出部众，张辽连连冲杀，几进几出，如入无人之境。吴军挡者披靡，为之夺气。孙权围攻合肥10余天，一无所获，士卒疲惫，挥军后撤，退至合肥东面的逍遥津北。张辽突然统部掩袭，包围孙权，吴兵尽死。甘宁、吕蒙、凌统等拼死力战，方保护孙权溃围而出。这便是有名的逍遥津之战。

黄初三年，吴、蜀爆发夷陵之战，魏文帝乘机兵分三路袭击江东，其中淮南是重点。曹仁扬言东攻羡溪(濡须坞东)，诱逼吴将朱桓分兵救应，突然亲统主力数万直袭濡须。时朱桓仅有兵5000，惶迫中追回

东调之军，偃旗息鼓，外示虚弱。曹仁命其子曹泰猛攻濡须，分遣常雕、王双偷袭吴兵家属所在地中洲，亲自挥动主力支援曹泰攻坚。朱桓别遣将领拦阻常雕和王双，身挡曹泰，凭险力战。曹泰失利，烧营而走。朱桓移师，斩杀常雕，生擒王双。

太和二年，诸葛亮首出祁山，约会孙权配合。孙权利用曹魏企图煽动山越豪帅在东吴制造混乱的心态，命鄱阳（治今江西波阳）太守周鲂假借名闻北方的山越豪酋之名，致意曹魏扬州牧曹休，将袭取鄱阳献降，呼吁接应。曹休立刻领兵10万直趋皖城。魏明帝命司马懿兵发江陵，贾逵推进东兴，以为声援。孙权坐镇皖城，以陆逊为大都督，朱桓、全琮为左、右督，各统步骑30000合击曹休。石亭（安徽潜山）一战，曹休败北。退至夹石（安徽桐城及舒县间），损军万余，军资器械尽失，被吴军包围。幸好贾逵识机，当他兵进东兴，不见吴兵阻击时，便断定吴军集中皖城，袭击曹休。乃立刻引军西向，水陆并进，急行200余里，多设疑兵，突然出现阵前。吴军惊散，曹休脱险而出。

青龙二年，为配合诸葛亮最后一次北伐，孙权众号10万，意欲攻拔合肥新城。又令陆逊和诸葛瑾等各统万人进击江夏等地，虚张声势，迫使曹魏数处应敌。魏扬州都督满宠准备救援新城，田豫反对，指出这样恰中孙权之计，不如听其攻城，乘其师老兵疲时突然袭击，必可获胜。满宠召集屯田士兵，表请救兵，准备放弃合肥新城。魏明帝采刘劭建议，精选步骑8000，扬声西进，一到合肥便多设疑兵，佯断其归路，袭击其粮道。并诏令满宠不准放弃新城。指出合肥、襄阳、陈仓三地是曹操在世时对付吴、蜀的三个战略要点，务必坚守。随即统大军御驾亲征。孙权得悉魏明帝亲至，小失后立刻退军。

嘉平四年，孙权死，孙亮继位，诸葛恪辅政。魏将诸葛诞、王昶、胡遵、毌丘俭等纷纷表请乘其主少国疑大举伐吴。司马师乃决定三道并进，以诸葛诞和胡遵一路为主，总兵70000攻东兴。诸葛恪统丁奉、吕据等40000人马驰救。胡遵等指挥魏军搭浮桥渡过濡须水，阵军东兴堤上，分兵攻打两边城堡。吴军坚守，魏军一无所得。诸葛恪统军一到，前锋丁奉即统3000人马进据东兴堤旁的徐圹。时天寒地冻，胡遵方置酒高会，疏于防范。丁奉见其前沿兵少，激励士卒，脱去铠甲，头戴兜鍪，手执盾牌和短兵器，裸身攀堤而上。魏兵轻敌，竟以此为笑乐。吴军登堤，呐喊猛攻。吕据等继至，吴兵大盛。魏军惊扰，自相践踏，落水而死者甚众。前锋将领韩综、乐安等相继被吴军击杀，损军数万，牛驴马骡及辎重均为吴军虏获。此役使诸葛恪轻敌之心陡增，置国疲民困、士兵厌战于不顾，力排众议，倾国而动，发兵20万，打入魏境，意欲夺取合肥新城后，一举包罗淮南。蜀汉方面亦与配合，姜维统兵西出，曹魏陷入东西对敌的窘境。司马师采纳虞松的建议，西线防御，集中全力对付东线，司马孚受命统军20万增援淮南。姜维粮尽兵败，曹魏取得从容对付诸葛恪的有利条件。吴军围攻合肥新城三月有余，曹将张特统兵3000死守，伤亡过半，两处城墙已经残破，势将不守。张特设计，把印信投给吴军，声明：按魏国军法，守城百日，援军不至而降者，家属可免连坐。现已守城90余天，请吴军缓慢进攻，待满百日，将献城投降。吴军中计，张特连夜拆屋修补城墙，天明后大声宣告决意死守。吴军再攻，依然难拔。时酷暑炎热，吴军伤亡日多，病者大半，怨愤之声四起。诸葛恪迁怒诸将，都尉蔡林降魏，具告虚实。司马孚挥军而来，诸葛恪失利而退。是役，诸葛恪损失甚重，声望一落千丈，吴宗室孙峻乘机发动政变，袭杀诸葛恪。至此，东吴再也无力争夺淮南了。

（蒋福亚）

司马懿平辽东

曹魏景初二年（238），司马懿击灭割据辽东的公孙渊的战争。

公孙渊，辽东襄平（辽宁辽阳北）人，公孙度之孙。董卓之乱时，任公孙度为辽东（郡治襄平）太守。公孙度杀戮郡中大姓，署置亲信，借军阀混战之机，据有辽东。当时中原人民苦于战乱，纷纷来投，达数万家之多，使这块处女地得到了初步的开发，封建生产关系也由此植根。公孙度凭恃这些东伐高句丽，西讨乌丸。因辽东地处边缘，曹操及其后继者鞭长莫及，对公孙氏采取安抚政策，加官晋爵。公孙氏对曹魏则虚与委蛇，时降时叛，保持着半独立的地位。太和二年（228），公孙渊夺得统治权，加强和东吴的联系，对曹魏更加不逊。景初元年，魏明帝命毌丘俭讨伐，为公孙渊所败。公孙渊乃自称燕王，建元绍汉，封拜鲜卑豪酋，勾引鲜卑不断袭扰，成为北边一患。次年，明帝命司马懿统军40000讨伐。行前，明帝问此行的方略及所需时间。司马懿早已成算在胸，禀报说：如果公孙渊弃城而走，是为上策。据辽水抗拒，是为中策。坐守襄平，送死而已。此行去百天，还百天，攻战百天，休整60天，一年足矣。战争进程果不出司马懿所料。魏军进入辽东，公孙渊即命大将卑衍和杨祚统步骑数万屯于辽隧（辽宁海城西，辽水东岸），坚

壁阻击。诸将求战，司马懿拒绝，指出对方坚壁，目的在于使我军久驻坚城之下，师老兵疲。如今进攻，正中其计。乘其重兵在此，巢穴空虚，直指襄平，必可破贼。司马懿佯装南进，迫使卑衍分兵堵截。待其军动，司马懿突然北行，强渡辽水，直插襄平。卑衍大惊，统师舍壁，在首山（襄平北）堵截，三战皆北，退守襄平。时值大雨连月，辽水暴涨，平地水深数尺，魏军急切难于合围。公孙渊利用水势樵采、放牧，毫无走意。魏将意欲断其樵牧，司马懿不听，指出这次讨伐，不忧贼攻，只愁贼走，我粮草丰足，贼粮草将尽，断其樵牧，恰好惊其远遁，利用其凭赖水雨坚守的心理，方可一举全歼。不久雨停水退，魏军合围襄平，土山地道，楼橹冲车，矢如雨下，昼夜猛攻。襄平城中粮尽，饿死者甚多，纷纷逾城出降。公孙渊无奈，遣使送质求降，司马懿断然拒绝。公孙渊计穷，统数百骑溃围逃窜，为魏军追斩。至此，北方最后一股割据势力也被曹魏击灭。（蒋福亚）

高平陵之变

曹魏正始十年（249），司马懿乘曹爽等随魏帝曹芳出祭明帝高平陵之机，发动的一场政变。

司马懿（179—251），字仲达，河内温县（河南温县西）人。家世二千石高官，是东汉后期河内名门望族。兄弟八人，都有声望，号称“八达”。其中司马懿独居榜首，与其夫人、两个儿子都是深藏不露，极工心计，善于窥度形势而又果于决断的人物。司马懿自恃门第，鄙薄曹操出身，装疯卖傻，屡拒曹操辟召。据说其脖子能作一百八十度的转动，像狼一样地看到自己的后背，所以时人说司马懿有“狼顾相”。建安十六年（211）出仕后，兢兢业业，小心谨慎，渐渐积官为丞相主簿。由于上述原因，曹操对司马懿始终深具戒心，特意告诫文帝曹丕：司马懿野心极大，决非人臣。司马懿自有其妙计，联姻曹丕心腹谋士吴质，深自结托曹丕左膀右臂朱铄和陈群，被时人称为“四友”。果然，曹丕登基后，司马懿得到重用，官居抚军大将军、录尚书事。每遇文帝外出，司马懿留守京师，综理政务。文帝临终，任司马懿为辅政大臣。明帝统治期间，司马懿开始进入军事领域，始则协助曹真对付蜀汉，继则代曹真成为对蜀作战的统帅，成功地阻遏了诸葛亮的攻势。由于吴国以守为主，蜀汉成为曹魏军事活动的主要对象，取得对蜀作战的指挥权，无疑就成了曹魏军事领域中的首要人物。景初二年（238），司马懿又讨灭了割据辽东数十年的公孙氏，军政声望成为曹魏朝臣之首。其时，朝廷中拉帮结伙，党同伐异之风又起，以曹真之子曹爽为首的曹氏集团和以司马懿为首的司马氏集团初步形成，彼此明争暗斗，势同水火。明帝诏令禁止，亦无补于事。司马懿经常和其长子司马师策划于密室，积极罗致党羽。明帝心腹、典掌机要的中书监刘放、中书令孙资均为其笼络。司马师妻子夏侯徽是曹氏外甥女，聪明机灵，察知情况有异，是否告发，犹豫不决，司马师抢先下毒，杀人灭口。

明帝酒色过度，身体虚弱，景初二年一病不起。其子曹芳年仅七岁，选择何人辅政，煞费苦心。明帝颇知人，对司马懿疑虑甚重，瞩目于燕王曹宇。刘放和孙资同曹宇嫌隙极深，，借单独召见之机，抬出文帝严禁藩王辅政的诏令，排斥曹宇，力荐懦弱无能的曹爽和司马懿。亲王既不能辅政，曹氏宗室又无杰出人才，明帝无奈，任曹爽为大将军、假节钺、都督中外诸军事、录尚书事。顾忌曹爽懦弱，特意任命以办事干练著称的孙礼为曹爽的助手，但对司马懿依然迟疑不决。此时，司马懿已从辽东回到汲县（今属河南），得讯后乘追锋车，以一夜400里的速度赶回洛阳，闯入宫中，对明帝力表忠心，终于夺得了和曹爽共同辅政的权力。

正始元年，明帝死，葬高平陵（洛阳城南90余里）。曹芳继位。曹爽布置兄弟及亲信何晏、邓飏、丁谧、毕轨、李胜等掌握禁军、机要、官吏任免、治安等要害部门，尊司马懿为太傅。但这些人大都是贵介子弟，纨袴公子，醉心权势财货而无应变之能，热衷吹枯嘘生的玄学或高谈阔论而无治政之才，彼此间也不断勾心斗角。有的被时人呼做狗，有的被看做行尸走肉之徒。这帮人连两个普通藩王争夺封地的一般案件也处理不了，一拖就是八年。孙礼认为查一下初封时的地图便可迎刃而解，得罪了曹爽，判刑五年，保释在外。孙礼怨愤难平，找司马懿诉苦，被司马懿笼络。正始五年，曹爽为提高声望，兴师10万伐蜀，兵败而归，改用合并郡县，裁撤官吏的办法立威，侵犯了官吏的权益，使之大都倒向司马懿一边。

司马懿外示退让，暗中着着布置，标榜名教，积蓄力量。司马师豢养3000余敢死之士，散于民间，严防曹氏集团察觉。正始八年，司马懿故伎重演，声称旧病复发，卧床不起，拒绝过问朝政。次年，李胜外任荆州刺史，借辞行之名前往刺探虚实。司马懿佯装神智昏迷，气若游丝，水浆难进。李胜回报，司马懿将不久人世。曹爽等戒虑全消，肆情纵欲，为所欲为。正始十年正月，曹爽带领全部亲信拥簇曹芳到高平陵祭祀明帝。司马懿立刻借曹芳生母郭太后之名发动兵

变，占据武器库，关闭洛阳城门。司马师陈兵阙下，切断宫室与外界的联系。司马懿亲屯洛水浮桥，堵住曹爽归路。随后又强令郭太后罢免曹爽，同时上章曹芳，列数曹爽罪状。大司农桓范夺门而出，建议曹爽挟持曹芳，退屯许昌，讨伐司马懿。曹爽拒绝。司马懿遣曹爽亲信尹大目游说曹爽：只要交出权力，身家性命概不过问。又拉出素以刚正见称的大臣蒋济等做担保人，以洛水为誓，确保曹爽身家性命的安全。桓范力阻，告诫曹爽，以将军今日之地位，想做普通百姓都不可能，谈何身家性命。曹爽相信司马懿的誓言，甘做富家翁，拱手交出权力。司马懿大权在握，软禁曹爽，严密监视其一举一动。不久，借口曹爽阴谋反逆，族灭曹爽及其党羽。高平陵之变使司马懿掌握了曹魏中央大权，为日后司马氏代魏奠定了基础。

（蒋福亚）

淮南三叛

曹魏后期，先后出任扬州都督的王凌、毌丘俭、诸葛诞所掀起的三次叛乱。

高平陵之变后，司马氏攫取了曹魏中央大权，但从中央到地方，曹氏还有相当的实力。为逐步取魏而代之，司马氏大张杀伐，激起亲曹势力的反抗，一些野心家亦想借此扩张权势。首先发难的是扬州都督（镇寿春，今安徽寿县）王凌。

王凌，太原祁（山西祁县东南）人，魏帝曹芳初年任扬州都督。其甥令狐愚时任兖州（治今山东鄄城东北）刺史。两人各拥重兵，合谋拥曹操之子楚王曹彪为帝，与司马氏一争高下。曹魏对都督控制极严，不得诏命，都督不得擅自兴兵。在等待时机中，令狐愚病死，计划被迫中断。嘉平三年（251），孙权兵进北方，王凌借机请求发兵。时司马懿疑心已起，断然压制。王凌见形迹已露，怕日久生变，决定孤注一掷，邀新任兖州刺史黄华一同起事。黄华告密，司马懿立刻亲提兵马潜进，兵临城下，王凌才发觉，束手就擒，服毒自杀。党羽全遭族灭。为防同类事件发生，司马懿把曹魏亲王全数拘集邺城（河北临漳西南），严密监管。该年，司马懿死，长子司马师总揽大权，大力削减方镇兵力，增强中央军队，署置亲信，屠戮政敌。嘉平六年，曹芳年满20，不满司马师专权，与李丰等密谋翦除司马师兄弟，由夏侯玄辅政。机密泄露，司马师用刀环敲死李丰，参与及受牵连者全遭族灭。不久，又重兵包围皇宫，逼令曹芳生母郭太后废曹芳为齐王，立文帝孙高贵乡公曹髦为帝。时隔四月，淮南又爆发了毌丘俭的叛乱。

毌丘俭，河东闻喜（今属山西）人。屡有战功。嘉平五年代诸葛诞为扬州都督，和李丰、夏侯玄是知交，二人受戮，毌丘俭心中颤栗，兔死狐悲。恰值扬州刺史文钦是曹爽同乡，经常冒功请赏，贪欲难足，心怀怨望。毌丘俭投其所好，两人合伙，在正元二年（255）正月假借郭太后之名，发布檄文，指责司马师为臣不忠，为子不孝，起兵讨伐。遣使邀豫州都督诸葛诞及兖州刺史邓艾连兵。又频频向东吴呼救。邓艾出身贫寒，唯思立功立业，毫无异心，闻讯立刻移师堵截。诸葛诞是琅邪阳都（山东沂南南）人，诸葛亮之堂弟，仕魏历官扬州刺史等，和夏侯玄、邓飏等是莫逆之交，此时坐镇曹魏三大兵站和粮站之一的许昌。豫、扬地片相连，若两人联手，可直接威胁洛阳。但诸葛诞自具野心，与毌丘俭矛盾极深，明知必遭司马氏猜疑，却不甘心屈处附从地位，没有响应。叛乱发生后，毌、文兵渡淮河，占领项城（河南沈丘）。毌丘俭留守，文钦领兵游弋项城附近。司马师阴谋有术，缺乏实战经验，借口新动目瘤手术，欲以其叔司马孚领兵镇压。曹魏后期，手握重兵的都督有六个，扬州是其一，何况此举必得东吴支持，所以王肃、傅嘏、钟会等力主司马师亲征，指出淮南兵训练有素，毌、文久经战阵，诸将万一失利，形势一变，则大势去矣。司马师惕然而起，部署如下：一、命令各地坚壁高垒，堵截东吴援军。二、邓艾统本州兵抵挡文钦。三、以亲信王基代诸葛诞为豫州都督，统许昌军，抢占陈县（河南淮阳）和许昌间的战略要地南顿（河南项城西北）。四、诸葛诞统部进击寿春。五、亲统中军出动，约会诸路，会师于陈、许间。当司马师进达南顿以北40里的乐嘉城时，与文钦狭路相逢。文钦子文鸯勇猛善战，欲乘司马师立足未稳，诸路兵马未集之机，打司马师一个下马威。乃与文钦兵分两路，连夜偷袭。文鸯一路先至，所部大都是敢死之士，呐喊猛攻，破营而入。魏军震骇，溃乱不堪。司马师惊恐已极，才动过手术的一只眼珠吓得被挤出，死死咬住被角才没有喊出声来，侥幸逃命。双方混战到天明，魏军大至。文钦因迷路失期，文鸯孤掌难鸣，被迫且战且退。由于：1.淮南军民对汉末战乱记忆犹新，极其厌恶毌、文叛乱。2.自实行士家屯田后，边防各主要军镇驻兵的家属均被作为人质，拘集异地屯田，叛乱一起，司马师采纳王肃建议，全数扣押淮南士兵家属，进行要挟。因此，司马师兵马未动，淮南军心已被瓦解，毌丘俭如坐针毡，当得知文钦失利后，立刻挥军后撤，军队顷刻溃散。毌丘俭弃军而逃，被人捕杀。寿春军民惧怕司马师用“从逆”的罪名屠城，斩草除根，10余万人全数

奔窜吴国，寿春城空，被诸葛诞顺顺当当地占领。文钦退无所据，投降了东吴。司马师明知诸葛诞心怀异端，苦于借口不足，加之叛乱初平，不宜莽撞，被迫发布诸葛诞为扬州都督。叛乱被镇压了，司马师也吓得丧魂落魄，病死于回师途中，其弟司马昭继掌大权。

诸葛诞一到任上，立刻开仓济民，邀结人心；豢养勇力死士数千人，以防万一。随即借口东吴袭扰，请兵10万，加强实力。时司马昭掌权不久，内部急待处理，不得不虚与应付。甘露三年(258)，司马昭内部已稳，命亲信贾充借劳军之名到寿春探看诸葛诞的态度。贾充开门见山，询问诸葛诞对禅代的意见。诸葛诞声色俱厉，声言：洛阳有难，吾必以死报之！贾充回报：诸葛诞在扬州甚得民心，迟早必反。乘其羽翼未丰，及早下手，较易解决。五月，司马昭发布诸葛诞为司空，征调入京。这是明升实降，褫夺兵权。诸葛诞于心何甘，乃先发制人，袭杀扬州刺史乐琳，兼并其四五万人马，召集淮南屯田士兵10余万，拘押将士子弟为人质，屯聚一年多粮草，准备据地自守。又以少子为人质，遣使东吴呼救。东吴命大将全怿统文钦等30000余众先行，朱异统30000余为后继。六月，司马昭亲统26万兵马讨伐，为防离京后变出意外，又挟持郭太后和魏帝曹髦同行，驻跸项城，推进丘头(河南沈丘)。随即命王基、陈骞等重兵包围寿春，石苞、州泰统部分精兵为游军，堵截东吴援军。全怿、文钦部在魏军未合围前突入寿春，朱异部在石苞等阻击下兵败而回。寿春成了一座孤城。尽管其间蜀汉将领姜维兵进雍、凉，袭扰曹魏后方，但不久便被关中都督司马望和邓艾等击退。司马昭取得了倾全国之力镇压一州之众的绝对优势，采取围而不战，静观其变的方略。

诸葛诞自恃粮草丰足，不以为意，听凭诸军任意取用。未及数月，粮草告紧，部将焦彝、蒋班等提议伺机决战，攻其一面，打破包围圈。文钦力主死守待援。双方争执不下，矛盾激化。为稳住文钦，诸葛诞拟杀焦、蒋二人，导致二人逾城而降。其时吴国因孙琳专权，内部矛盾加剧，全怿的兄弟又投奔了司马昭。司马昭采纳钟会的建议，命令全怿之弟致书全怿，谎称吴国因其救寿春无功，将尽诛其所统诸将，劝全怿及早归顺。年底，全怿统数千人开门投降。待援无望，文钦乃力主溃围。在师出无功后，又建议诸葛诞把北方人全部驱逐出城，以便节约粮食。诸葛诞当然不能接受，双方矛盾激化。次年初，诸葛诞袭杀文钦，文鸯率兄弟文虎逾城而降。司马昭当即封侯拜将，命文鸯沿城招降。罪不容诛的叛臣尚然受此优待，他人更有何惧，寿春城中斗志全消。司马昭亲临城下巡察，守城将士都引弓不发。时机完全成熟，魏军的总攻开始，一举成功。平定诸葛诞叛乱后，司马昭调整了方镇人选。至此，代魏条件基本成熟。　(蒋福亚)

曹魏灭蜀

曹魏景元四年(263)，司马昭命钟会等三路兵马击灭蜀汉的战争。

诸葛亮死后，蒋琬、费祎先后为相，蜀汉吏治尚可。费祎一死，姜维成了举足轻重的人物。姜维曾九次北伐曹魏，前三次在蒋琬、费祎的抑制下，用兵不过万人。费祎一死，姜维专任，用兵较多，虽无大成，因颇得诸葛亮几分真传，对曹魏也有一些威胁。但戎车屡动，蜀汉人民负担太重。后主刘禅(小名阿斗)是个庸人，贪图享乐，不知政治为何物。费祎死后，后主在宦官黄皓的引诱下纵情肆欲，不理朝政。黄皓乘机为非作歹，排斥正直之士，吏治一落千丈。姜维屡受猜忌，最后连成都也不敢去，躲在沓中(甘肃舟曲以西，岷县以南)屯田练兵。蜀汉仅28万户，却养兵10万2千，吏4万余，平均二户养一兵或一吏，租役之重可想而知。东吴使臣薛珝返国后，谈其出使后的观感说：主上昏庸不知弊端之所在，群臣尸位素餐只知保官；入其朝廷不闻正直之语，经其原野百姓饿得面如菜色。

司马昭平定淮南叛乱后，经过六年左右的整治，急欲通过灭蜀抬高声望，取魏而代之。吴、蜀比较，当然以灭蜀为先。但文恬武嬉，没有一个大臣甘充其任，只有野心家钟会锐于其事。景元四年(蜀景耀六年)，钟会受命总兵18万三道伐蜀。邓艾统偏师30000余推进沓中，牵制姜维；诸葛绪统偏师30000余直趋武街(甘肃成县)，断姜维之后路；钟会主力10余万分道斜谷、骆谷及子午谷直扑汉中。蜀兵屡败，姜维退守剑阁，想凭赖天险阻遏魏军。不料邓艾由阴平(甘肃文县西北)翻越马阁山，凿山开路，造桥修道，穿过700余里荒无人烟的地区，连克江油(今属四川)、涪城(四川绵阳东)，在绵竹(四川绵竹东南)击斩诸葛亮之子诸葛瞻，直逼成都。后主召集群臣会议，或说东投吴国，或说南逃南中(四川南部及云贵等地)，益州人士则高唱降魏。后主六神无主，最后采谯周之议，开城投降邓艾。蜀汉亡，历二主，立国凡43年。钟会意欲割据巴蜀，诬陷邓艾，联合姜维，图谋不轨。司马昭料事在先，姜维虽想借钟会之手拥后主复辟，但亡国之众难以言勇，迅速失败。后主被徙洛阳，受封为安乐县公。司马昭屡次试探刘禅有无

野心，刘禅竟懵然不知所云。司马昭直截了当问刘禅想念巴蜀否？刘禅居然回答："此间乐，不思蜀。"由于既无野心，又无心机，倒太太平平地度过了余年，死于西晋泰始七年(271)。灭蜀提高了司马氏的声望，代魏条件成熟了。　（周　昕）

两晋十六国

司马炎代魏

泰始元年(265),司马炎废黜魏帝曹奂,建立西晋的历史事件。

司马炎(236—290),字安世,司马昭长子。高平陵之变后,司马氏标榜名教,大张杀伐,随意废立,顺我者昌,逆我者亡。及至平定淮南三叛后,全朝上下已都是司马氏的党羽了。甘露五年(260),魏帝曹髦年届20,在外无强援、内无谋主的情况下,想凭其皇帝的名义作孤注一掷。五月,曹髦对其师傅王经、王沈、王业说:"司马昭之心,路人所知也。"命令这三人随驾去杀司马昭。三人闻言大惊。王经逃回家中,闭门不出,王沈、王业慌忙奔告了司马昭。曹髦无奈,搜罗宫中奴仆数百人,亲自仗剑,鼓躁而出。此时司马昭的亲信贾充早已统领禁卫军严阵以待。和皇帝性命相搏,禁卫军难免胆怯。太子舍人成济急问怎么办?贾充说司马公豢养尔等,为的就是今天,有何可问!成济操矛直刺,曹髦当场毙命。司马昭随即逼令郭太后诏责曹髦,归罪成济,族灭王经,立年仅15岁的曹操之孙曹奂为帝。

东汉中叶以来,士族社会地位及权势的膨胀,渐成不可逆转之势,社会风气以门第相尚。曹氏出身宦官,后族大都来自社会底层。曹操卞后,出自倡家。文帝甄后,原是袁熙之妻。郭后被时人称为出身低微。明帝毛后,来自手工工匠家庭。比照历代封建王朝,后族门第如此,实属罕见。封建时代王公权贵的婚姻,历来都是政治行为。此等状况,使曹氏集团处于十分不利的地位。司马氏门第高于曹氏,姻戚大都是名门望族,在权势之争中又竭力维护士族的利益,放纵达官贵人召募佃客。景元五年(264),司马昭又颁行五等爵制,600余官僚贵族获得世代享有封国食邑的特权,士族们更愿附从司马氏了。

在权势之争中,司马氏心地险恶,行径卑劣,但并非毫无建树。曹魏中后期两淮及关陇大规模军屯,基本上是在司马懿的倡导和主持下发展起来的,对抵挡吴、蜀的进攻及日后全国的统一有所贡献。高平陵之变后,司马氏重视用人及行政,废除了魏明帝时的一些苛政,减免了一些杂徭杂赋。所以吴国的大臣张悌也说司马氏用政平惠,民心所归,淮南虽有三次叛乱,民间却没有什么骚动。在司马氏的各项措施中,影响最大的是废除民屯。屯田制实施初期,对社会经济的恢复起有积极作用,屯田客除了接受分成制剥削外,没有其它负担,尚可维持简单的再生产。后来,对屯田客的剥削日益加重,用官牛者,官收其八,民得其二;用私牛者,官七民三,此外还有各种徭役、调绢等重负。屯田客对生产已毫无兴趣,乃至收获低于投入的种子,屯田已成为生产的桎梏。屯田客的单独管理也有碍政令的统一。早在司马昭为洛阳典农中郎将时,免除屯田客的一些杂役便被认为是一大惠政。咸熙元年(264)为统一政令和赋役负担,司马昭下令废除民屯,屯田客成为国家编户,屯田官吏转化为地方行政官吏。此举有利于促发屯田客的生产兴趣,对经济的恢复客观上有促进作用。在这以前,司马昭又击灭了蜀国,代魏的条件完全成熟了。该年春,灭蜀大军凯旋,司马昭晋爵晋王,享有天子仪仗。但司马昭没有来得及登基便死了。其子司马炎嗣王位。咸熙二年底,司马炎废曹奂为陈留王,登基称帝,建国号为晋,建元泰始,都洛阳。史称西晋。司

马炎即晋武帝。（蒋福亚）

西晋灭吴

咸宁五年(279)，晋武帝六道灭吴，在次年统一全国的战争。

蜀汉灭亡，东吴形影相吊，危机四伏。孙权后期，东吴的统治已是江河日下，内部矛盾重重。孙权一死，统治集团内部权势之争爆发，宗室孙峻乘诸葛恪淮南兵败发动政变，夺取了大权。孙峻死后，其弟孙𬘭专权，主相矛盾激化。太平二年(258)，孙𬘭引兵入宫，废吴主孙亮，立孙权第六子孙休为帝。孙休一登位，就设计杀了孙𬘭。孙休在位六年便死了，元兴元年(264)，丞相濮阳兴及左将军张布认为国有大难，宜立长君，拥故太子孙登之子孙皓继位。孙皓一登位，又杀了濮阳兴和张布。经过一系列的变乱和杀戮，吴国统治集团分崩离析了。

孙皓是三国时期的著名暴君。登位不久便大兴宫室，采择无已，后宫过万，豪华奢侈，肆意挥霍，国库为空。孙皓猜忌大臣，贬逐忠良及正直之士，任用奸佞之徒，除个别人外，凡谏诤者必死无疑。剥皮凿眼，各种刑罚无不用其极，甚至亲自下毒，残害其厌恶的大臣。孙皓嗜酒如命，每宴必作终日饮，与宴群臣，每人至少喝七升，酒量小者由侍者灌，拒绝者必遭严惩。群臣醉后，又诏令互相揭发阴私以为笑乐，特设黄门侍郎十人作记录，作为贬杀大臣的罪证。因而将相大臣都有朝不保夕之感，人人自危，多次发生背吴北投事件。在三国中，东吴的赋役一向最重，有人建议减轻，都被孙权以军国事繁为理由拒绝，此时更是有增无减。政治极端腐败，贪污成风，风俗奢靡，挥霍无度。各级官吏欲壑难填，唯以克剥百姓为务。人民生活极端困苦，家家饥寒，人人菜色，生子不养的现象相当普遍。有识之士惊呼朝内朋党倾轧，地方官为政苛急，国无一年之储，民户流离不归，凡此种种，必将酿成大祸。孙皓不以为意，依然故我。甘露二年(266)，孙皓迁都武昌，逼令扬州溯流供给，军民苦不堪言，愤怒地传唱童谣："宁饮建业(江苏南京)水，不食武昌鱼；宁还建业死，不止武昌居。"阶级矛盾极端尖锐，小规模农民起义不断爆发。

晋武帝登基后便有意兴兵灭吴。泰始五年(269)任命羊祜为荆州大都督，筹措伐吴事宜。羊祜一到任，兴置屯田，积谷储粮，力图用"德"、"信"瓦解吴方士气。凡兴兵必告知对方，不搞偷袭之举；军出吴境，割取对方稻谷为粮，必计价还绢；围猎时野兽逸入吴境，为吴兵所伤，捕获后必送交吴方。吴方主帅陆抗有病，羊祜送药医治。使得吴军心悦诚服，对羊祜的人品深信不疑。羊祜又力荐志在立功立业的王濬为益州刺史，监梁、益二州军事。王濬在任大布恩信，训练士卒，秘密督造船舰，演练水师，以便有朝一日顺流而下。咸宁二年(276)，羊祜上灭吴之策，建议巴蜀、荆襄、徐淮三处并举，兴兵伐吴。晋武帝同意。但司马氏集团是在权势利害下集结起来的，彼此矛盾重重，派系林立。西晋的天下并非晋武帝打下的，晋武帝只是坐享其成者，在功臣将相中并无绝对权威。以贾充为首的中枢功臣集团力阻伐吴，这就使灭吴之举年复一年拖延下来。咸宁四年，羊祜病危，力荐志同道合的杜预自代，嘱托中书令张华务必转告晋武帝：孙皓暴虐已甚，今日之东吴可不战而克。如若孙皓一死，吴国换个聪明有为之主，凭恃长江天险，纵有雄兵百万，也将无能为力。晋武帝深表同意。时陆抗已死，张政主持吴方防务。此人颇有军政才干。杜预大施离间计，促使孙皓调离张政，起用无能的留宪为帅。咸宁五年，杜预和王濬接连上表请求伐吴，深受晋武帝信任的张华又竭力赞成，晋武帝终于下定决心，驳斥贾充等人，命张华主持后勤。十一月，晋武帝发兵20万，诏令六道并进：镇军将军司马伷出涂中(安徽滁县)，安东将军王浑出横江(安徽和县)，建威将军王戎出武昌，平南将军胡奋出夏口(即汉口)，镇南大将军杜预出江陵，龙骧将军王濬由巴蜀顺流而下。却又任命反对伐吴最烈的贾充为统帅，协调诸路兵马。次年初，诸路齐发。吴军毫无斗志，晋军进军十分顺利，犹如秋风之扫落叶。吴主孙皓命丞相张悌统30000精兵渡江逆击。军至牛渚(安徽马鞍山市采石矶)，将领们主张据险死守，张悌认为吴之将亡，天下贤愚共知，如若晋军由巴蜀顺流而下，局面更难设想。不如渡江决战，侥幸取胜，尚可一为。否则宁死社稷。张悌挥军而进，被王浑全歼。但王浑对此役能否成功亦无信心，大胜后竟逗留不进。王濬一路顺江而下，势如破竹，攻克武昌，征得杜预同意，继续推进。就在此时，统帅贾充还上章武帝，力呈吴不可伐的理由，要求晋武帝杀张华以谢天下。为晋武帝拒绝。三月，王濬直逼建业，吴方水师统帅张象投降，孙皓走投无路，开城投降。王濬入城，王浑跟踪而至，大掠财物，火烧吴宫。五月，孙皓被押送洛阳，降封为归命侯。吴亡，历四主，立国凡五十九年。为志庆贺，晋武帝特意改元为太康(280)。在封赏功臣时，仍以贾充功居第一。王濬和王浑争功，晋武帝偏袒王浑，这场官司打了好久。尽管晋武帝封赏失宜，但自董卓之乱以来将及百年的分裂割据终于结束，全国的统一，

对经济文化的发展有着积极的作用。 (蒋福亚)

八王之乱

西晋后期,从永平元年(291)起至光熙元年(306)止,统治集团为争夺权势而进行的长达16年的战乱。

太熙元年(290),晋武帝死,白痴司马衷继位,是为惠帝。白痴当皇帝为亲贵权臣们的争权夺利提供了大好的时机。晋武帝原遗诏外戚杨骏和汝南王司马亮(司马懿第四子)共同辅政,杨骏却勾结杨太后篡改诏书,排斥了司马亮。当时就有人建议司马亮起兵声讨。司马亮胆小怕事,逃回封国。杨骏独掌大权,大开封赏网罗党羽。杨骏最怕惠帝皇后贾南风争权,为此严密控制宫禁,切断其和外界的联系。贾后是个私生活淫荡、妒忌成性、阴险狡诈、权势欲极旺的女人,永平元年终于买通禁军官吏孟观和李肇,密召司马亮入京翦除杨骏。司马亮不敢,李肇转往荆州找荆州都督楚王司马玮(武帝第五子)。司马玮垂涎中枢,见召立刻入京,声言杨骏谋反,奉诏讨贼。发兵隔断宫禁与外界联系,包围杨骏府第。杨太后闻讯,飞书宫外,许诺凡救得杨骏者,必予重赏。贾后截获此书,如获至宝,立刻扬言太后与杨骏同谋,翦除了杨氏,幽禁杨太后于金墉城(洛阳西北角小城),活活饿死。政变成功,朝议推司马亮及元老卫瓘共同辅政。司马亮虽不敢为祸首,权势欲却很大。为消除隐患,独掌大权,下令诸侯王一律归国,封侯1081人网罗党羽。司马玮空忙一场,目的未达,怨愤难平;贾后也决不甘心为他人作嫁,何况过去卫瓘曾反对过武帝立司马衷为太子,更是非除不可。该年六月,司马玮诬告司马亮和卫瓘欲谋废立,贾后即唆使惠帝发手诏密令司马玮深夜发动,一举翦除司马亮和卫瓘。如何处置贾后,司马玮犹豫不决。贾后却按张华之计先发制人,天刚放明,便用惠帝名义宣称司马玮矫诏,擅杀辅政,按律论斩。贾后攫取大权后,起用王戎、张华、裴颁、裴楷等与其娘家子侄姻亲分掌朝政。这四人是官场老手,在朝臣中有一定威望,处事圆滑,维持了七八年的相对稳定。

惠帝只有一子,名叫司马遹,是谢才人所生,被册立为太子。贾后深恐太子长大后对己不利,千方百计引诱太子热衷犬马声色,养成骄奢暴戾的性格,使其声誉日毁。贾后宠爱内侄贾谧,贾谧依仗贾后,屡屡与太子作对,双方冤仇越结越深。元康九年(299),贾后拟好谋杀惠帝和自己的书稿,设计灌醉太子,诱骗太子抄写,然后偷出呈报惠帝。经过朝议,太子被废。储位无人,启动了近支亲王争夺帝位的野心。

太子被废,东宫官属的前程蒙受威胁,密谋扶太子复位,苦于声望太低,难以号召,找到典掌禁军的赵王司马伦(司马懿第九子)。司马伦才智低劣,野心奇大,曾历任邺城和关中都督,靠奉迎贾后才进入中枢,得知东宫官属密谋后便蠢蠢欲动。其心腹孙秀指出:满朝大臣都知道明公党于贾后,若扶太子复位,太子也不会倚重明公。不如放出东宫人士欲废贾后的风声,假手贾后,除掉太子。然后倡言为太子报仇,翦除贾后,届时便可大权独揽。司马伦如计行事。永康元年(300),贾后果然毒杀太子。一时间朝野汹汹,司马伦乘机联合齐王司马冏(司马师之孙)和梁王司马肜(司马懿第八子),矫诏发兵,劫持惠帝,废贾后为庶人,关入金墉城后毒死。随即一一族灭贾后党羽。政变成功,司马伦自为相国,封侯数千邀结人心,走马灯似地更换朝臣。一切就绪,乃在永宁元年(301)自立为帝,奉惠帝为太上皇,幽禁金墉城。为志庆贺,大开封赏,郡守县令一律封侯,亲信奴仆亦予封爵,铸印来不及,以白板封拜,府库被赏赐一空。

司马伦是个庸人,一切全凭孙秀摆布。孙秀热衷财色权势,毫无经国才用,大量引进小人,排斥异己,迫令齐王司马冏归国,并在拥有重兵的亲王身旁安置爪牙,监督诸王,激起近支亲王的强烈不满。司马冏野心勃勃,一回封国便密谋起兵,司马伦称帝,恰好授以口实,立刻带领豫州刺史何勖、龙骧将军董艾等传檄州镇,声讨司马伦。河北都督(镇邺城,今河北临漳西南)成都王司马颖(武帝第十六子)在谋士卢志的唆动下,命兖州刺史王彦、冀州刺史李毅等统26万人马响应。因罪降爵、依附于司马颖的常山王司马乂(晋武帝之弟)起本国兵跟进。关中都督(镇长安)河间王司马颙本来心怀二端,见司马冏和司马颖兵盛,也遣大将张方统兵助阵。其它方镇暂作壁上观,准备随时投机。三王联兵,京师震动,中枢官僚暗通三王,准备迎降。司马伦内部失和,节节失利,心腹大将王舆倒戈,迎惠帝复位,立司马遹之子司马尚为皇太孙(皇位继承人)。这次战乱为时二个多月,以司马伦被杀而暂时中止。双方死伤超过十余万,并各自引诱少数民族豪酋参战,内徙各族也被卷进祸乱漩涡。

三王入京后,司马冏被推为辅政,常山王司马乂恢复原封长沙王,司马颖及司马颙权位大大提高。实际上三王势均力敌,难分上下。由于大乱后必有大封赏,因此一些野心家又鼓动司马冏翦除司马颖等。卢志是个人物,看到形势不妙,建议司马颖归功司马

冏，撤回邺城，收葬阵亡将士，救济受害灾民，收买人心。一时间司马颖誉满天下。

司马冏大权在握，志得意满，纵情声色，翦除异己，政局更加混乱。太安元年(302)，太孙司马尚死，惠帝孙子至此全部死绝，近支亲王都有继承皇位的权力，其中司马颖的地位及声望最高，似乎非其莫属。司马乂也想染指。但司马冏却立年仅八岁的司马覃(武帝弟清河王司马遐嗣子)为太子，导致司马颖及司马乂的极端不满。河间王司马颙是司马懿弟弟司马孚之孙，就皇统而论，疏而又疏，无继位的可能，只想借大乱入为宰辅，为此传檄司马颖及司马乂，请这二王与其联兵讨伐司马冏。司马颙本想假手司马冏杀掉司马乂，减少一个竞争对手，然后凭恃邺城、长安两镇兵力除掉司马冏，拥司马颖为皇太弟(皇位继承人)，这样宰辅之任就非其莫属。殊料司马乂竟一举成功，诛戮了司马冏及其党羽数千人。迫于形势，司马颖及司马颙只有推司马乂为辅政。

司马乂过去是在司马颖的卵翼下活动的，一切唯司马颖马首是瞻。司马颖满以为司马乂辅政后，必会拥自己为皇太弟。岂知司马乂大权在握后，自有打算。司马颖恼怒了。司马颙因不能成为宰辅也极端不满。太安二年八月，二人总兵27万再次举兵。司马乂挟持惠帝分兵迎战，均告失利。司马颙部将张方拥军进入洛阳，大肆杀掠。司马乂组织反击，先败司马颖部统帅陆机，又败张方，两战皆胜。司马颖及司马颙重新部署，包围洛阳。司马乂外无援兵，粮食日益紧缺。次年正月，内部矛盾爆发，其党羽东海王司马越(司马懿弟司马馗之孙)突然发难，抓住司马乂送交张方，活活烤死。司马颖入京，废太子司马覃，自为皇太弟，以司马颙为太宰、大都督，司马越为司空、守尚书令，分掌朝权。

司马颖达到目的后，退据邺城。邺城一度成为当时全国的政治中心。司马颖形美神昏，所以成功，全凭卢志的谋划。得志后竟排斥卢志，任用小人孟玖等，大失人心。司马越也是个野心勃勃的人物，乘机在永兴元年(304)自为大都督，传檄四方，挟持惠帝，声讨司马颖。各地方镇大多响应，一时集兵10余万，进逼邺城。邺城震恐，人心离散。司马越得知后，认为邺城指日可下，掉以轻心，荡阴(河南汤阴西南)一战，为司马颖部将石超击败，逃回封国，大肆募兵，准备伺机再起。惠帝落入司马颖之手，洛阳则为张方控制。就在司马颖志得意满之际，司马越党羽幽州刺史王浚和并州刺史司马腾却勾引鲜卑、乌丸之众扑向了邺城。

三王讨伐齐王司马冏时，王浚首鼠两端，成了司马颖的眼中钉。王浚惧怕司马颖兴师问罪，竭力结好司马越之弟司马腾及鲜卑和乌丸，迫使司马颖不敢贸然下手。司马越兵进邺城，王浚许诺鲜卑、乌丸酋帅，攻破邺城，听凭抢掠，和司马腾联兵而来。司马越败退，这二人却击败了石超，进攻邺城。邺城士兵溃散，司马颖和惠帝仅在数十骑护卫下逃奔洛阳。王浚占有邺城后，放纵部下及鲜卑、乌丸烧杀抢掠，自曹操开始苦心经营起来的河北名城毁于战火。

司马颖逃到洛阳，落入张方之手。张方所部纪律荡然，洗劫洛阳后，放火烧掉宫室府库，挟持惠帝和司马颖西撤长安。曹丕登基后竭力营建的洛阳惨遭破坏，魏晋以来的积蓄扫地以尽。惠帝等一到长安，河间王司马颙便废司马颖，立司马炽(晋武帝第二十五子)为皇太弟，自为太宰，控制全权。司马颙想拉司马越为羽翼，司马越则想独擅大权。永兴元年，司马越拉笼了王浚、东平王司马楙、青州都督司马略、冀州都督司马模、范阳王司马虓等，以讨伐张方、迎惠帝还都为名，兵进关陇。为利用司马颖在河北的残余势力牵制司马越，司马颙发布司马颖为邺城都督。司马颖在返邺途中，被人擒杀。

司马越的进兵并不顺利，在河南遭到豫州刺史刘乔的阻击。张方受司马颙之命，统兵10万支援刘乔。但张方过于残暴，激起部将刘弘倒戈，投奔了司马越。张方被迫后撤。刘乔又被王浚和司马虓击败。司马颙见形势逆转，在光熙元年杀张方，向司马越求和。司马越不肯罢手，长驱长安。司马颙奔窜长安附近的南山。司马越进入长安后，纵兵杀掠，长安为之一空。该年六月，司马越挟持惠帝还都洛阳。十一月，毒杀惠帝，拥皇太弟司马炽继位。不久，又征司马颙入京，布置亲信在途中袭杀司马颙。至此，大权为司马越掌握，皇室中的祸乱方告结束。

造成这场战乱的主要原因是：一、西晋时期，士族势力进一步膨胀。为确保司马氏在统治集团中的优越地位，吸取曹魏诸侯王权力过小，中央有变，没有外援而亡国的教训，晋武帝大封同姓王，提高其地位，任命近支亲王兼任各大方镇都督及中央要职。近支亲王往往节制二三州兵马，手操地方军、政、财大权，有权辟置僚佐，发展成一股股强大的势力。二、司马氏集团是在权势利害关系下组成的。内部派系林立，党同伐异，互相攻讦。武帝有意利用派系，耍弄权术，以便从容操纵。终西晋之世，派系之争愈演愈烈。三、全国统一后，奢侈糜烂之风席卷整个统治集团。晋武帝醉心珍宝财货，公开卖官鬻爵，肆意挥霍。大

臣刘毅当面指责武帝不如东汉的亡国之君桓、灵二帝。其生活骄奢淫逸，后宫过万，嬖宠之多，连晚上宴寝何处也拿不定主意。又暗中支持宠臣们斗宝赛富。奢侈之风越发不可收拾。有识之士惊呼奢糜之害，甚于天灾。当时政以贿成，官以贿选，有的官吏公然白昼抢劫。荆州刺史石崇就靠抢劫长江中过往商旅贩客，成了中国历史上著名的巨富。这个地主集团抛弃了地主阶级鼓吹的最起码的道德标准，把各种无耻行径发挥得淋漓尽致。士人们张口虚无，寡廉鲜耻，以纵情肆欲为高雅；官吏们玩忽职守，以贪污克剥为通达。勤政务实者被斥为俗不可耐。上上下下都是一群逐利奔竞之徒。这是一个黑白混淆、是非颠倒的时代，吏治坏到极点，社会风气坏到极点。奢侈糜烂的生活刺激着无限的贪欲，无限的贪欲促使当路权贵力图攫取更多的权势。手握重兵的近支亲王人人都想当皇帝，盘踞要津的当路权贵个个都想因缘附会。大乱已无法避免，大乱也无法遏止。先后参加这场战乱的主要有楚王司马玮、汝南王司马亮、赵王司马伦、齐王司马冏、长沙王司马乂、成都王司马颖、河间王司马颙和东海王司马越八个，故史称八王之乱。在长达16年的战乱中，势力较大的宗室亲王火拼殆尽，西晋陷入极端虚弱的窘境。战火连接，生灵涂炭，人民被推进血泊深渊。流民问题极端严重，阶级矛盾空前激烈，流民起义相继爆发。战乱非但毁坏了洛阳、邺城、长安等名都，更重要的是各大权势集团都引诱少数民族豪酋参战，少数民族势力进一步内逼，民族矛盾随之激化。匈奴贵族乘机而起，在并州建立汉国，少数民族的反晋斗争激烈展开。腐朽的西晋王朝已病入膏肓，无可救药，终于在各地流民起义和少数民族的反晋浪潮中走向了灭亡。

（蒋福亚、周 昕）

西晋末年流民起义

西晋末年，长江流域流民进行的多次反晋起义。

西晋建立后，士族势力急剧膨胀。占田令又确保了其经济特权，大士族们往往占地上百千顷，佃客奴仆成群。西晋赋役苛重，正常征收量亦将近曹魏的一倍，统治腐朽已极。晋武帝骄奢淫逸，不理政事，公开卖官鬻爵，聚敛财物；因人设官，视分官命职若儿戏。凉州刺史出缺，朝议推荐唐彬和杨宗供武帝选择。武帝问这两人如何？大臣文立回答：唐彬贪财，杨宗贪酒。武帝选中了唐彬。理由是“财欲可足，酒嗜难改”。言外之意是无官不贪，只要不妨碍统治，其它均可不问。因此官以贿选，政以贿成，贪污勒索弥漫官场。杜预是武帝姨丈，皇亲国戚，官居镇南大将军、荆州都督，也得靠不断贿赂中枢权贵维持地位。各级官吏唯聚敛财物为务，敲剥黎民，无所不用其极，直至公开白昼抢劫。南阳人鲁褒著《钱神论》讥评时政：家兄名曰“孔方（钱）”，有排金门入紫闼的神通，王公权贵均视家兄如命，家兄一到，危可使安，死可使生，贵可使贱，生可使杀；为了钱，当路权贵什么坏事丑事都能干出来。黑暗腐朽的统治，促使土地兼并、隐匿人户、官吏横行不法更趋激烈。百姓啼饥号寒，纷纷破产。八王之乱更加深了百姓的苦难，被迫嫁妻卖子。统治集团不思改弦更张，唯一的“惠政”是诏令卖至亲骨肉为奴婢者无罪。为了求生，百姓们背井离乡，四出流浪。秦、雍等地饥民流向梁、益、荆、湘，并州饥民流入冀、豫二州，冀州饥民流向兖州，益州饥民又流向荆、湘等地。约略统计，流民达30万户左右，占全国总户数的八分之一强，为上述数州的二分之一。流民到达新的地区后，生活仍无着落，各级官吏敲剥勒索，横加迫害，乃被逼铤而走险，揭竿而起。规模较大的有李特、张昌、王如、杜弢等领导的起义。永宁元年（301）李特领导的流民起义详见“李雄建成汉”条，这里叙述其余各次。

张昌，义阳（河南新野）蛮族人。孔武有力，颇知兵法。原为平氏（河南桐柏）小吏。因不堪奴役和压榨，太安二年（303）亡命安陆（今属湖北）以南80里的石岩山，组织群众，准备起义。当李特领导的起义在益州蓬勃发展时，晋廷抽调荆州军队入蜀镇压，又征发武勇增援。荆州百姓不愿，纷纷走避。恰值江夏郡（治安陆）丰收，成了逃避征役者的集中地。晋廷严令地方官吏督迫武勇上路，郡县官吏亲自出动，驱迫避役丁壮，荆州骚动。张昌乘机而起，流民相继投奔，屡败官军，声势大震。义军头裹绛色巾，上插羽毛，奋勇杀敌，击败江夏太守弓钦及荆州大将靳满，攻克安陆。张昌拥立山都（湖北谷城东南）县吏丘沈为天子，更其名曰刘尼，自己更名李辰，为相国，建元神凤，署置官吏。荆州都督司马歆向晋廷呼救，晋廷命豫州刺史刘乔、荆州刺史刘弘配合，又令河间王司马颙部雍州刺史刘沈统兵万余增援。时长沙王司马乂掌权，和成都王司马颖、河间王司马颙的内战已成一触即发之势，故司马颙拒不发兵。因为司马歆党于成都王，长沙王又下令司马歆不得擅自行动。统治集团的内部矛盾使义军获得进一步发展的有利条件，樊城（湖北襄樊北）一战，斩杀荆州都督司马歆。在宛城（河南南阳）又大败前将军赵骧，击杀平南将军羊伊。新任荆州都督刘弘屡屡败北，退屯梁城（河南临汝）。义军

所向披靡，晋军闻风丧胆。张昌分兵石冰，东下扬州，封云在徐州聚众响应。起义席卷荆、江、徐、扬、豫五州。晋廷恐慌，调集重兵，围攻江夏，安陆失陷，义军牺牲万余，张昌他走。次年在下儁山（湖北通城县境内）被俘牺牲。永兴元年（304），石冰在扬州士族的镇压下也告失败。

王如，京兆新丰（陕西临潼）人。原为州武吏。八王之乱时，关中频年水旱，百姓饥困流离。永嘉元年（307），南阳王司马模出镇雍州，为政苛暴，迫使百姓逃亡。王如统领一支流民进入宛城（河南南阳）。地方官吏逼令流民回归故乡，征西将军山简、南中郎将杜蕤特意派兵押送，激起流民强烈不满。永嘉四年，王如潜结血性男儿发动起义，连败山简和杜蕤，北破襄城（今属河南）。时冯翊郡（治今陕西大荔）的严嶷、南安郡（治今甘肃陇西东南）的庞寔、京兆郡（治今陕西西安西北）的侯脱等亦各统一支流民活动在南阳一带，闻讯起而响应，攻打郡县，义军达四五万人。王如自称大将军、领司、雍二州牧，南逼襄阳。恰值汉国石勒领兵南下，王如惧怕石勒，与之结为兄弟，称藩汉国。此举既失去了民心，又导致义军内部的分裂，王如和侯脱、严嶷等反目成仇。侯脱为石勒攻杀，严嶷被俘，王如连连败北。永嘉六年，王如再次变节，投降晋将王敦，后为王敦所杀。余部战斗到建兴元年（313）。

杜弢，蜀郡成都（今属四川）人。以才学名闻蜀郡，州举秀才。李特起义爆发后，杜弢避居南平郡（治今湖北公安），被南平太守应詹辟为醴陵令。永嘉五年参与血腥镇压李骧领导的巴蜀流民在荆州的起义。李骧兵败乞降，荆州刺史王澄假允，袭杀李骧，沉杀8000流民于长江。骇人听闻的惨案激起巴蜀流民的同仇敌忾，在杜畴的领导下，在湘州再次举义。湘州刺史荀眺为除后患，欲尽诛巴蜀流民，迫使四五万流民同时俱起。时杜弢恰好寄寓湘州，比较同情流民境遇，又是益州名流，乃被起义流民推为梁、益二州牧。义军攻克湘州州治长沙，生俘荀眺，南破零陵，东攻武昌，横扫长沙、宜都、邵陵、衡阳等地。荆州刺史王澄落荒而逃。义军纵横荆、湘两州。晋安东将军、琅邪王司马睿命王敦为征讨都督，坐镇豫章（江西南昌），节制周颢、陶侃、周访、甘卓等诸路兵马，合力围攻。杜弢频战不利，主要将领丧亡殆尽，在建兴三年投降王敦，任巴东监军。但晋室官吏不断借故袭击其部，邀功请赏。杜弢被迫再次起义，破庐陵、南康等郡，终因寡不敌众，弃军而逃，不知所终。起义失败。

西晋末年流民起义沉重地打击了腐朽的西晋王朝，为推翻西晋作出了贡献；教训了东晋的统治者，迫使其考虑如何对待流民，侨州郡及优复流民的措施由此出现，对南方经济的发展起有积极作用。

（蒋福亚、周　昕）

张氏霸凉州

永宁元年（301），晋廷发布张轨为凉州刺史，自此张氏霸有河西走廊达七十余年。

西晋末年，官居散骑常侍的安定乌氏（甘肃平凉）人张轨（255—314）看到中原板荡，国无宁日，大乱将至，意欲保据河西走廊，偏霸一方。经多方活动，永宁元年，被晋廷发布为凉州刺史。乱世之秋，凉州也极不安宁。这里历来是胡汉交错之地，此时鲜卑势盛，以若罗拔能部最强大。张轨到任后，引当地名流宋配、阴充、汜援和阴澹等为僚佐，兴建学校，倡导封建教化，大力修筑州治姑臧（甘肃武威），并在永兴年间（304—306）击斩了若罗拔能，俘获其10余万口，妥为安置，使凉州局面渐趋稳定。永嘉之乱，洛阳危急，张轨遣兵勤王，曾小挫过王弥和刘聪，故京师盛传“凉州大马，横行天下”的民谣。在西晋末年的方镇中，张轨是对晋室略存忠心的一个。其后直到永和十年（354）张祚称凉王时止，张氏一直奉行西晋的正朔。西晋灭亡前夕，凉州大族张镇、张越兄弟联合曹祛、麴佩等起兵，企图驱逐张轨。张轨在其他大族的支持下镇压了这次叛乱，在凉州的霸权终于确立起来。

张轨死后，其子张寔、张茂和孙张骏先后继任。太宁元年（323），前赵主刘曜尽有关陇后，亲统28万大军，列阵河上，金鼓之声惊天动地，扬言要百道俱进，荡平凉州。临河诸戍闻风崩溃，凉州大震。参军陈珍进言：刘曜兵虽多，但大都是氐、羌乌合之众，何况其东受石勒威胁，决不会舍弃腹心之患，旷日持久，与我争河西之地。若彼军二旬不退，我请以敝卒2000，为明公击擒之。张茂才下定决心防御。此言料中刘曜用心，所以当张茂遣使称藩，贡献大量牛羊珍宝后，刘曜也就退兵了。

张氏霸据凉州，虽然奉行西晋正朔，实质上是一个独立的政权，故史称前凉。前凉在张骏时达于全盛，统治区南逾河湟，西包葱岭，东至秦陇，北暨居延，约当今甘肃西北部、新疆南部和宁夏西部。张氏霸据凉州之时，正值中原战乱频仍，河西走廊相对安定之日，故中原人民流徙而来者甚多。张氏设置了武兴郡等侨郡予以安置。张氏祖孙比较重视刑政和水利，仅在敦煌就开凿了阳开渠、北府渠、阴安渠等，其

中北府渠直到盛唐时仍然效益显著。张氏重视文教，凉州经学一度居全国之冠，直至唐代还对中原有所影响。河西走廊是丝绸之路的必由之地，张氏利用地理优势，加强西域长史(驻海头，今新疆罗布泊西)的兵力，改戊己校尉为高昌郡(新疆吐鲁番高昌故城)，强化治理。咸康元年(335)，张骏又遣杨宣领兵讨伐称雄西域的龟兹和鄯善，确保了丝绸之路的畅通。西域诸国纷纷遣使前凉。同时，张骏结好后赵和成汉，使西域珍宝能假道后赵和成汉，顺利进入南方，中国丝绸等物品可以汇集前凉，输往西方，姑臧一度成为中外经济文化交流的中心。前凉从中西贸易中获取厚利，收到了“刑清国富”的实效。前凉统治时期，是河西走廊继汉武帝以后的第二个开发期，对维系中外经济文化交流亦有贡献。前凉历九主，立国凡 76 年，在太元元年(376)被前秦击灭。（蒋福亚）

李雄建成汉

建兴元年(304)，李雄在秦、雍流民起义的基础上，在益州建立成汉政权的历史事件。

李雄(274—334)，字仲儁，巴氐族人。巴氐亦称“賨”，其先祖居于巴西宕渠(四川渠县东北)一带，曹操征服张鲁，巴氐人被逼迁略阳临渭(甘肃秦安东南)一带，遂著籍临渭。巴氐是一个少数民族，笃信五斗米道，此时已基本上和汉族融合，两族间很难区别。李氏是巴氐中的大姓，李雄父李特胸襟宽广，雄武善骑射，深沉有谋略，是西晋末年流民起义的领袖。李雄颇具父风，见义勇为，名闻乡里。

从惠帝永熙元年(290)起，秦、雍一带连年大旱，瘟疫猖獗，饥荒严重，米石万钱。人民在死亡线上挣扎，镇守关中的赵王司马伦又极端残暴，终于逼出了元康六年(296)以氐豪齐万年为首的各族人民起义。这一带因战祸连接，更加疮痍满目。略阳(郡治临渭)、天水(郡治今甘肃甘谷东)、扶风(郡治今陕西眉县东)、始平(郡治今陕西兴平南)、武都(郡治今甘肃成县西北)和阴平(郡治今甘肃文县西)六郡数万户、10 余万汉、巴氐、氐、羌、叟等各族人民在大姓李、任、阎、赵、何、杨、上官、费氏的率领下流向益州乞食。流徙途中，李特、李庠和李流兄弟关心流民疾苦，扶危济贫，深受流民爱戴，被推为首领。流民进入巴蜀时，赵王司马伦发动政变，杀死贾后，窃夺了大权。益州刺史赵钦是贾后党羽，怕受株连，企图利用流民力量割据巴蜀，乃命李庠为部曲督，组织了万余流民武装，袭杀前来接任的耿滕，翦除不愿奉命的地方官吏。又因李庠善用兵，深得流民之心，怕其势力壮大对己不利，在永宁元年(301)乘其谒见之机，突然袭杀李庠及流民将领多人。李特、李流被迫组织流民自卫，赵钦战败，逃亡途中被部下杀死。

李特等本无反意，事成后上报晋廷，申述理由。晋廷发布罗尚为益州刺史，带广汉太守辛冉等 7000 余人入蜀。罗尚贪残好杀，秉承朝廷意旨，勒令流民在七月上道，回归秦、雍，沿途又设关卡，搜刮流民财物，动辄杀戮，矛盾迅速激化。当时，更多的流民散处各地佣耕为生，请求秋收后上路，否则囊无行资，难以到达故土。李特也代表流民一再请求放宽遣返期限，并在绵阳设立大营，收容流民。罗尚假意允应，暗中调集 30000 人马，准备一举歼灭流民。李特等察知情况有异，一再警告罗尚不要轻举妄动。罗尚置之不理。流民被迫铤而走险，揭竿而起，推李特为大都督、镇北大将军。为争取益州人民的支持，李特宣布约法三章，救济灾民，选拔贤能。“李特尚可，罗尚杀我”的民谣迅速在益州流传。

流民起义爆发后，益州地主有的外逃荆、湘，有的结壁自保。后者不敢公开与义军为敌，表面上维持中立。太安元年(302)，李特击败梁州及南夷校尉派来的援军，称大都督、大将军，建元建初，着手建立政权，攻占成都小城。罗尚龟缩成都大城，频频向晋廷呼救。荆州刺史宗岱、建平太守孙阜奉命统军 30000 支援。义军粮食匮乏，李特分散军队就食各坞堡。李流警告：应保持警惕，索取坞堡主们的人质以防万一。李特为暂时的优势迷惑，没有采纳。次年，荆州援军到达，罗尚势力转盛。益州地主立刻配合罗尚袭击义军，李特及许多义军将领牺牲。余众在李雄的领导下退守赤祖(四川绵竹东)，推李流为大都督、大将军。义军频战失利，被晋军包围，形势险恶，河间王司马颙的长史李含又频频诱降。李流动摇，李雄等数谏无效，乃抢回送交晋军的人质，胁迫李流抗击，并宣传流民：如果投降，必然任人宰割，只有奋起抗击，打败孙阜，才有生路。流民群起响应，猛攻孙阜。李雄身先士卒，冲锋陷阵，突破包围。宗岱病死后，荆州军连遭重创，被迫撤走。义军转危为安。李流见到李雄才干，交出了军事大权。李雄稍加整顿后便展开了全面反击，攻占郫城(四川郫县)，逼近成都。此时义军粮草仍然十分困难。恰值罗尚部内讧，其参军徐轝投奔了义军，出面游说青城山(四川灌县境内)大地主范长生。范长生拥有部曲数千，粮草山积，是五斗米道首领。当地是五斗米道的根据地，范长生的家世、源渊又和巴氐族的关系极密。由于宗教信仰、族属等关系，也为日后的利益，范长生支持李雄。义军有了粮

草，斗志更坚，逐次推进，再度包围成都。该年九月，李流病死，李雄成了义军领袖。年底，李雄用诈降计攻克成都，罗尚逃跑，益州终于为义军夺取。永兴元年（304），李雄称成都王，建元建兴，都成都，废除了西晋的律令。永兴三年，建国号大成，改元晏平。东晋咸康四年（338），李寿在位时，改国号为汉，故史称这个政权为成汉。

成汉是十六国之一，全盛时，其统治区相当于今天的四川及云、贵的一部分。这个政权是在流民起义中建立的，统治初期，君臣上下间没有严格的区分，关系相当融洽，对民间的疾苦也有深切的了解，刑法简单宽松，人民负担较轻，男子每年纳谷三斛，女子则缴一半，户调绢仅数丈，绵数两，事少役稀，人民得到了休养生息的时机。一时间盗贼止息，夜不闭户。当时天下大乱，益州成为流民向往的乐土。自魏晋以来，这是十分罕见的现象。　（蒋福亚）

刘渊起兵

晋惠帝永兴元年（304），匈奴贵族刘渊起兵离石，建立汉国，揭开了十六国时期的历史序幕。

刘渊（？—310），字元海，南匈奴呼厨泉单于之孙。东汉初年，匈奴分裂，北匈奴西迁，南匈奴内附。魏晋之际，南匈奴徙入并州，左部居兹氏（山西临汾南），右部居祁县（山西祁县东南），南部居蒲子（山西隰县），北部居新兴（山西忻县），中部居大陵（山西文水东北），总计30000余落。魏晋统治者对匈奴采取分而治之的办法，选择匈奴贵族为各部帅，后又改帅为都尉，大权则操在都尉的僚佐、由汉人充任的司马之手，严禁各部往来，各部帅均须送“任子”到洛阳，作为人质。

南匈奴内迁后，深受汉族影响，绝大部分已过渡到农业定居或半农半牧。匈奴贵族都有一定的汉文化素养，有的精通经史。一般平民生活困苦，沦落为部曲佃客，太原等地达官贵人拥有的匈奴佃客，往往数以千计。有的则被掠卖为奴婢。匈奴深受阶级及民族的双重压迫，极端仇视西晋的腐朽统治，甚至其贵族也认为“晋为无道，奴隶御我”。

刘渊青少年时代作为任子在洛阳多年，结交了一批豪贵，野心勃勃，勤奋好学，熟悉经史，博览诸子，尤喜兵法，自诩文武全才。晋武帝的心腹重臣认为刘渊的才识当今无匹，匈奴贵族则把复国的希望寄托其身，密推刘渊为大单于。武帝末年，刘渊继其父刘豹为匈奴左部都尉。八王之乱时，刘渊投靠成都王司马颖。永兴元年，王浚挟鲜卑、乌丸之众与司马颖对垒，刘渊抓住机会，对司马颖大表忠心，愿统匈奴五部之众支持司马颖。司马颖立刻以皇太弟的名义发布刘渊为北单于，参丞相军事。刘渊终于突破了魏晋以来禁令，取得号召和统领匈奴五部的权力。刘渊一到离石（今属山西），匈奴贵族闻风而来，奉上大单于尊号，20来天，便集众50000有余，建庭左国城（山西离石北）。刘渊意欲参加西晋内战，借助皇太弟的名义扩张势力，夺取天下。不料司马颖溃败，逃窜洛阳。刘渊拟命左独鹿王刘延年统精骑20000讨伐鲜卑，声援司马颖，左贤王刘宣坚决反对，指出司马氏骨肉相残，四海鼎沸，正是兴邦复业的大好时机。鲜卑、乌丸的处境和匈奴一样，是可以利用的力量，决不能化友为敌。建议直接打出匈奴单于的旗帜，与晋争夺天下。刘渊考虑，条件确已成熟，乘时而起，打倒西晋，犹如摧枯拉朽，成则可以一统天下，至少也能像曹操那样据有半壁江山。不过顾忌匈奴力量太小，若不利用汉族的反晋斗争，难成大事。直接打出匈奴单于的旗号，必然会遭到汉族人民的反抗，主张用“汉”的名义相号召，指出“汉有天下世长，恩德结于人心”，所以刘备以一州之地，可与天下抗衡。匈奴是汉的外甥，曾经约为兄弟，兄终弟及，顺理成章。刘渊乃自称汉王，建元元熙，都离石，以刘宣为丞相，追尊蜀汉后主刘禅为孝怀皇帝，网罗了一些汉族士族，虚给名号，不予实权，正式起兵了。一时间各族人民纷纷而来，势力大张，攻占了上党、西河及太原三郡的部分地区。并州一片混乱，各级机构瘫痪，毁坏无存，荆棘成林，豺狼满道，僵尸遍地。晋并州刺史司马腾屡战屡败，频频向晋廷呼救。时八王之乱正进入后期阶段，南方流民起义又风起云涌，西晋统治集团无暇他顾，司马腾只有带领20000余户汉族人民逃亡山东。刘渊攻占了河东（郡治今山西夏县西北）、平阳（郡治今山西临汾西北）等地，迁都蒲子。河北汲桑、王弥、石勒，陕北鲜卑豪酋陆逐延及氐酋单征等纷纷表示归附，刘渊成了北方各族反晋势力的共主。

刘渊起兵，有其反抗西晋腐朽统治及民族压迫的一面。但匈奴贵族在征战进军中，肆行杀掠，驱赶各族人民到其统治较为稳定的腹心地区，导致民族矛盾的迅速上升。永嘉元年（307），在八王之乱中最终夺得实权的东海王司马越发布刘琨为并州刺史，汉族人民由分散的斗争逐步围集到刘琨周围，与匈奴贵族浴血战斗。

刘琨，字越石，中山魏昌（河北无极）人，和祖逖情同莫逆，均以雄豪著名当世。两人胸怀大志，民族意识强烈，看到世将大乱，每天都闻鸡起舞，互相激

励,磨练意志,决心轰轰烈烈干一番事业。刘琨受命后,只身走马上任,在上党(郡治今山西黎城西南)募兵千人,边战边进,到达晋阳(山西太原南),收葬枯骨,招抚流亡,亦兵亦农,恢复生产,组织抗战。苦于匈奴贵族掠夺的汉族人民纷纷投奔而来,晋阳成为抗击刘渊汉国的根据地。刘琨又结好鲜卑段部和拓跋部,利用他们和汉国的矛盾,牵制刘渊。汉国几次进攻均告失利。在刘琨的阻击下,刘渊的势力一时难以越出并州。但刘琨嗜好声色,生活奢豪,形势危急时尚有收敛,局面一稳定便故态复萌,越演越烈。慕名投奔的汉族人民虽然很多,失望而去的也日以千计,两者数目大体相当,其力量极难发展壮大,充其量只是楔入汉国腹心的一颗钉子。西晋统治集团内部的斗争在八王之乱后仍无止境地进行着,活跃在河北、河南的石勒和王弥利用这个空隙日益壮大。在这种形势下,刘渊以共主的身分对西晋发动了全面进攻,陷西晋于灭顶之灾的"永嘉之乱"开始了。这次起兵成为覆灭西晋、导致十六国分裂割据和南北长期对峙的前奏。 (蒋福亚)

三 定 江 南

西晋末年,以周玘、顾荣等为首的吴姓士族先后镇压石冰领导的农民军、陈敏、钱玹的叛乱,稳定江南局势的历史事件。

太安二年(303),张昌领导汉、沔间流民起义,攻克江夏(郡治今湖北安陆),屡败晋军后,命石冰统偏师一支,进击长江下游。苦于西晋腐朽统治的人民从者如云,石冰势如破竹,连下江州(州治今江西南昌)、扬州(州治今江苏南京)。临淮(郡治今江苏盱眙东北)人封云起兵响应,攻克徐州(州治今江苏徐州)。时成都王司马颖、河间王司马颙和长沙王司马乂的内战正酣,无暇东顾,义军横扫江、扬、徐三州,西晋在这一带的统治岌岌可危。此时,义兴(江苏宜兴)大地主周玘联络吴姓士族,推吴郡(郡治今江苏苏州)四姓之首、时任吴兴(郡治今浙江吴兴南)太守的顾秘为扬州九郡都督,组织地主武装进行镇压,会稽(郡治今浙江绍兴)四姓之首贺循闻讯,也组织地主武装协助杀戮农民军的地方官吏。石冰派大将羌毒领兵数万抗击,被周玘击杀。石冰失利,由临淮退向寿春(安徽寿县)。时广陵(江苏扬州)度支陈敏据寿春,猖狂进逼,双方激战数十次,石冰败退建业(江苏南京)。在陈敏和周玘等合击下,永兴元年(304),石冰北投封云。不料封云部将张统叛变投敌,石冰和封云牺牲,起义失败。此为一定江南。

在镇压石冰起义中,庐江(郡治今安徽庐江西南)人陈敏以功迁右将军,驻节广陵。时天下大乱,成汉据有巴蜀,刘渊起兵并州,汲桑和石勒横行河北,西晋统治集团的内乱无休无止,河间王司马颙挟持惠帝,与东海王司马越势将一拼。永兴二年,陈敏乘机东归,收兵历阳(安徽和县),攻占扬、江二州,成为带甲数万、舳舻千艘的一大势力,想凭恃丰富的仓储割据江东,乃自称都督江东诸军事、大司马、楚公,积极拉拢吴姓士族。东吴灭亡后,吴姓士族政治地位一落千丈,西晋不重视吴姓士族,吴姓士族对西晋亦殊无好感。晋末战乱,正想待时而起,恢复昔日威势,因而大都为陈敏网罗。但陈敏出身低微,难孚众望,更重要的是才识低劣,朝令夕改,兄弟子侄并据要津,没有笼络吴姓士族的具体措施。吴姓士族顾荣、周玘等见陈敏难成气候,密谋起兵,说动控制陈敏精兵的甘卓,配合政府军一时俱起,朱雀桥(江苏南京秦淮河上)一战,陈敏大败,单骑奔窜,被追杀。此为二定江南。

吴姓士族起兵讨伐陈敏时,吴兴士族钱玹参与是役,以功迁建武将军。永嘉四年(310),钱玹受司马越之命,统部驰援洛阳。当其兵达广陵时,听说匈奴汉国的刘聪已兵进洛阳,乃自称平西大将军、八州都督,拥孙皓子孙充为吴王。意欲袭杀王敦,割据江东。王敦逃奔建业。钱玹焚烧粮仓,杀死度支校尉陈丰,兵进阳羡(江苏宜兴)。晋琅邪王司马睿命将军郭逸领兵镇压。郭逸懦怯,逗留不进。此地是周玘老巢,周玘又聚集武装,和郭逸合力,斩杀钱玹。此为三定江南。

三定江南稳定了江东的局势,为司马睿在江东建立东晋创造了条件。 (周 昕)

永 嘉 之 乱

以匈奴汉国为共主的北方反晋势力攻陷洛阳和长安,俘虏晋怀帝和晋愍帝,击灭西晋的战乱。永嘉,晋怀帝年号,自公元307年到313年。西晋灭亡的全过程应上溯惠帝永兴元年(304)匈奴贵族刘渊起兵,下延建兴四年(316)长安陷落,愍帝被俘。因永嘉年间西晋的灭亡已成定局,愍帝的长安政权充其量只是尾声,所以稍后不久,人们便把西晋灭亡的主要过程叫作"永嘉之乱"。

八王之乱后期,朝权为东海王司马越夺取。永嘉元年,东海王毒杀惠帝,立怀帝司马炽。此时,益州的成汉政权已趋巩固;长江中下游的流民起义一浪紧接一浪;匈奴贵族的汉国崛起于并州,成为北方反晋

势力的共主；各地方镇矛盾重重，随时准备互相厮杀。东海王赢得了疮痍满目的河山，也面临着难以收拾的危局。混战使西晋的实力极度削弱，司马氏的近支亲王大都火并殆尽，皇族已失去了昔日的优势。东海王在皇族中的地位及威望本不算高，何况皇族极端衰弱，已难凌驾士族，为此不得不拉拢和依靠士族首领、以清谈名闻天下的琅邪临沂（今属山东）人王衍共同支撑危局。

怀帝23岁继位，按体制，东海王必须归政。东海王部署兄弟亲信盘据要津和控制重要方镇后，退据许昌，遥控朝政。怀帝颇有武帝之风，为夺回实权，布恩朝士，网罗亲信，经常与中书监缪播、缪胤兄弟、尚书令何绥、太史令高堂冲等密商机要，和东海王的矛盾日益激烈。永嘉三年三月，东海王突然引兵京师，收斩缪播等，控制宫禁，严密监视怀帝。在这场内乱中，左积弩将军朱诞叛逃汉国，具告洛都虚实，敦促刘渊对西晋发动总攻。

西晋内争不休，各地方镇又大都是无能之辈，致使刘渊、石勒和王弥等势力坐大。永嘉二年七月，刘渊攻占平阳（山西临汾西北）。十月称帝，迁都平阳。就力量对比而言，西晋仍然较强。为此刘渊计划先取关中，蚕食河北、河南，再对洛阳发动致命一击。在朱诞的建议下，转变战略，决心利用西晋主相矛盾，发起总攻，兵进洛阳，乃命石勒兵掠河北，刘景推进河南。石勒一路势如破竹，连下魏郡、汲郡、顿丘、巨鹿、常山等地，兵力扩大到10万有余。刘景一路抢占了军事要冲黎阳（河南浚县东北），军临黄河渡口延津（今属河南），威逼洛阳。刘景杀掠过甚，激起人民反抗，一时寸步难进。此时，据有晋阳（山西太原南）的晋并州刺史刘琨为牵制刘渊，夺取上党（郡治今山西黎城西南），切断了平阳和河北的联系，威胁平阳。刘渊被迫收兵，集中全力对付刘琨。刘渊收复上党后，在这年八月以第四子刘聪为统帅，对洛阳发动了第二次攻势。兵达宜阳（今属河南），中了晋弘农太守桓诞的诈降计，大败而回。十月，刘渊集中精兵50000，以刘聪、刘曜、王弥和刘景为将，乘晋军胜后无备，发动了第三次攻击，兵渡洛水，直逼洛阳城下。洛阳军民据城死守，奋起抗战，连毙其大将呼延颢、呼延朗、刘厉等。汉国统治者惊呼“晋气犹盛”，加上粮运不继，被迫撤退。王弥受命兵掠兖、豫，削弱西晋，扫清洛阳外围。

西晋全盛时，并州仅40000余户。刘渊起兵后，20000余户随前并州刺史司马腾东逃，余下大都围集刘琨周围。但自刘渊起兵到愍帝建兴二年（314），平阳周围的人口竟激增到360万左右，相当于西晋全盛时总人口的四分之一强。其中汉族43万户左右，少数民族20万落左右，绝无疑问，大部分是匈奴贵族在东征西讨过程中从各地驱掠来的。野蛮的掠夺，势必激起人民的拼死战斗，“晋气犹盛”正是在这种情况下出现的。它表明，随着汉国势力的扩张，民族矛盾已上升为社会主要矛盾。此时，民族矛盾极端尖锐和复杂，由于匈奴贵族的掠夺不仅对于汉族，对其他各族也一样，因此，除汉、匈间的矛盾外，匈奴和其他各族的矛盾也在急剧上升。这样，固然有一些少数民族豪酋追随刘渊，亦有一些豪酋自谋独立，或与西晋联手。汉族人民仇恨西晋的腐朽统治，在民族矛盾激化之际，还是愿意支持西晋与匈奴贵族作殊死斗的。刘渊进攻洛阳几次失利，正是人民奋起抗战的结果。与此同时，刘渊的方针策略也出现了相应的变化。永嘉四年，刘渊在平阳设置单于台，以刘聪为大单于，统领各少数民族，公开利用民族矛盾和西晋争夺。该年，刘渊死，刘聪通过政变继位后，完善刘渊的措施，在平阳设左右司隶，下设内史，统治汉族人民，每一内史领民万户；在单于台下设单于左右辅，下设都尉，每一都尉统少数民族万落，采取军事编制，成为其主要军事力量，凌驾于汉族之上。这就是胡汉分治政策。此一措施在十六国时期影响深远，几乎为各少数民族政权所采纳。

在民族矛盾上升为社会主要矛盾之际，汉族地主阶级也出现了分化。有的筑壁自保，乃至北方坞堡林立，在西晋及汉国势力难达或互相争夺的地区，基本上是坞堡主的天下。有的举族南迁，东晋南朝时期在政治舞台上十分活跃的百多家侨姓士族，就是这个时候南渡的。有的投靠了少数民族统治者。石勒兵进河北时，投顺者极多，士人张宾就成了石勒的谋主。至于西晋上层统治集团，却仍陷入权势之争难于自拔。汉国一再进攻洛阳，京师万分危急，晋怀帝遣使四出呼救，叮嘱使者务必告知各地方镇：今日来，尚可救，“后则无逮矣！”各地方镇为保存实力，大都置若罔闻。掌握实权的东海王司马越面对危如累卵的局面，不思利用民气进行抗战，继续翦除异己，中央精兵给养全数据为己有，紧锣密鼓进行狡兔三窟的安排。永嘉四年十月，刘聪对洛阳的包围行将就绪，东海王突然戎服入宫，告知怀帝，将领兵出讨石勒。怀帝苦苦哀求共保京师，东海王不理而去。东海王传檄各地方镇勤王，自己却统领洛阳全部精锐直奔项城（河南沈丘），留下老弱病残，命龙骧将军李恽守卫洛阳。镇守青、徐的镇军大将军苟晞虽无勤王之

心，却有争权之意，立刻上书指责东海王，怀帝手诏苟晞讨伐东海王。东海王寸步不让，命兖州刺史杨瑁和徐州刺史裴盾进攻苟晞，内战又起。

东海王会合许昌驻军，拥众10万，退到项城，在永嘉五年三月病死。受其嘱托，王衍统军撤向东海王封国。石勒追踪而至，在苦县宁平城（河南郸城东北）包围晋军，纵骑猛攻，10余万人马、随军的公卿大臣及18个宗室亲王全被坑杀。王衍被俘，声称自己不豫世事，晋室之政与己无关，苦苦哀求活命，愿以其头号士族的名望，号召天下，协助石勒称帝。石勒怒斥王衍：汝名盖四海，身居重任，少壮登朝，直至白首。岂能说不豫世事。破坏天下，正是汝罪！命令士兵，排墙压死王衍。后人将王衍协助东海王执政以来的行径归结为四个字：清谈误国！

精兵一撤，洛阳成为不设防城市，宫禁无人守卫，各级衙门被迫挖堑自防，盗贼横行，警号不绝。东海王死讯传来，李恽带领老弱残兵逃之夭夭，东海王妃裴氏也被人掠卖。怀帝向苟晞呼救，苟晞派来士兵500，船只数十艘，请怀帝迁都其控制的仓垣（河南开封北）。残留的王公贵族因车船不够分配，搬不走聚敛来的财物，迟迟不肯上路。汉军紧缩对洛阳的包围，粮食告罄，乃至人相食，官吏逃散了十分之八九。怀帝在数十个朝士的护卫下徒步逃出西掖门，被盗贼所阻，又返回皇宫。六月，刘曜、王弥、石勒轻易攻下了洛阳，肆行杀掠，挖了司马氏的祖坟，夷洛阳为平地，俘押怀帝至平阳。怀帝饱受凌辱后，被杀于永嘉七年。

刘曜攻下洛阳后，马不停行，又攻占了长安。时关中大旱，人民饥饿流离，刘曜在此亦难久留，乃驱逼80000余人民后撤。长安再遭战火毁坏。

怀帝被俘，西晋在北方的残余势力仍然不少，却均不思恢复，反而利用这个机会争夺最高统治权，纷纷自建行台，擅自封拜。当时被推为皇太子的便有司马端（怀帝子）、司马邺（武帝曾孙）等三个。行台更多，各不相让，有的方镇则自己想当皇帝。刘曜撤离长安后，豫州刺史阎鼎和雍州刺史贾疋拥司马邺进据长安。怀帝死讯传出，阎鼎等抢先一步，扶司马邺即位，改元建兴，是为愍帝。愍帝封琅邪王司马睿为左丞相，陕以东大都督，命其集兵30万收复洛阳；封南阳王司马保为右丞相，陕以西大都督，命其集兵30万入卫长安，又令幽州刺史王浚和并州刺史刘琨集兵30万夹攻平阳。这无疑是痴人说梦。司马睿抢据建康（江苏南京），积极筹建小朝廷；司马保盘踞秦州（治今甘肃甘谷南），也自有图谋；王浚和刘琨矛盾重重，互相火并。刘琨失利，汉国乘机猛攻。刘琨逃离晋阳，被鲜卑段部杀死，不久王浚又被石勒计杀。长安也不平静，贾疋被关中少数民族豪酋彭天护攻杀，始平（郡治今陕西兴平南）太守麹允立刻自封为雍州刺史。阎鼎则攻杀了京兆太守（治长安）梁综，挟持了愍帝。麹允又领兵进攻阎鼎。阎鼎兵败逃窜，为氐族豪酋杀死。小朝廷内部厮杀正酣，汉国对长安的进攻也已大体就绪。汉军主帅一改前三次沿渭水而进的方略，在渭北逐次拔除长安外围。愍帝命麹允为大都督，领兵30000驰救北地（郡治今陕西耀县）。麹允懦怯不进，刘曜故意举火佯攻，麹允望火退窜灵武（陕西咸阳东），渭北城镇俱溃，汉军直抵长安城下。愍帝向司马保呼救。司马保的谋士们却说毒蛇咬手，壮士断腕，当今之计是截断秦、雍二州间的通道，静观其变。司马保不表态，也不出兵，实质是采纳。刘曜包围长安，城中斗米价值二两黄金。愍帝靠糠皮度日，死者大半，士卒逃散殆尽，只有凉州来的千余人战斗不休，至死不变。建兴四年，愍帝出降，被押送平阳，备受辛酸和凌辱后被杀，时年18岁。

西晋灭亡了，西晋的灭亡毫不足惜，却给人民带来了罄竹难书的灾难。自此，西晋残余势力在南方建立东晋，北方的民族斗争则一浪紧接一浪，在120余年时间里，先后出现了20来个政权，史称十六国时期。这是我国封建社会史上罕见的、灾难深重的漫长岁月，是刀光剑影、血流漂杵、尸骨满野的黑暗年代。数以百万计的人民在战乱中丧生，数以百万计的人民背井离乡，出现了我国历史上的空前大流徙。幸存者随时都要拿起刀枪，凭借村寨城堡、密林草丛去争取生存的权利。各族人民付出极其高昂的代价，进一步交错杂居，艰苦挣扎，生生不息，在经济生活和社会发展阶段上逐渐与汉族一致，进而并肩战斗，终于迎来了民族融合的曙光，为隋唐盛世奠定了基础。

（蒋福亚、周　昕）

晋室南渡

建武元年（317），琅邪王司马睿在建康称帝，建立东晋的历史事件。

司马睿（276—322），字景文，司马懿曾孙，琅邪王司马伷之孙，太熙元年（290）嗣其父司马觐爵为琅邪王。此人颇工心计，锋芒内敛，善于韬晦。在西晋宗室中，司马睿离皇统疏而又疏，地位不高，名声不大，仅是一个普通亲王，因此嗣爵后一段时间内，达官贵人还不知其为何许人。不过琅邪（国治今山东临沂北）和东海（国治今山东郯城）相邻，司马睿和东海王

司马越关系极密，依恃司马越的卵翼逐步发展。永兴二年(305)，司马越被成都王司马颖部将石超打败，募兵封国，北上争权，以司空名义发布司马睿为平东将军、监徐州军事，留镇下邳(江苏睢宁西北)，把后方交给了司马睿，并命其妻兄裴盾为徐州刺史，大力协助。司马睿又奏请司空府参军王导为司马，执掌军事。自此，司马睿在王导的辅佐下终于蔚成大势。

王导(276—339)，字茂弘，琅邪临沂(今属山东)人。政治嗅觉灵敏，善观形势，官场经验丰富，少有令名，被时人看作将相之器。琅邪王氏是西晋头等高门大族，父祖兄弟，自魏晋以来，历据要津，在士族中有相当大的号召力。西晋时期，皇族凌驾士族，亦得拉拢士族装饰门面。士族为了自身的利益，竭力结好诸侯王，以求仕途通泰。王导家园在司马睿封国之内，当然愿与司马睿搞好关系。两人都倾心结交，互相推奉，遂成莫逆。八王之乱中，在洛阳的西晋宗室少有全者，王导建议司马睿逃回封国，免遭枉祸。司马睿听从，保全了性命。八王之乱后，司马越引大名士、清谈魁首、王导从兄王衍为司空、司徒，共掌朝权，王衍成为仅次于司马越的权臣。当时天下大乱之势已成定局，中央只有凭赖方镇才能维持一统，为此王衍建议司马越部署亲信盘据各地，自己则作狡兔三窟的安排，出其弟王澄为荆州刺史，族弟王敦为青州刺史。王导参与此项密谋，看中了江东。江东是东汉后期以来新出现的财赋之区，又有长江天险作屏障，昔日东吴曾据此立国近60年，为此王导建议司马睿抢占这块形胜之地。经过多方斡旋，永嘉元年(307)，司马越发布司马睿为安东大将军，移镇建业(江苏南京，为避愍帝讳，更名建康)，其后又加扬、江、湘、交、广五州都督，成为东南地区名义上的军政首脑。永嘉三年，司马越又转王敦为扬州刺史，加强对江东的控制。

西晋末年，江东也是烽火连天。张昌起义军的将领石冰曾经席卷过江东，之后又相继出现陈敏和钱璯企图割据的叛乱，均被吴姓士族的地主武装所镇压。因而时人称吴姓士族有“三定江南”之功。不过吴国灭亡后，吴姓士族的政治地位远不如昔日。西晋没有重用吴姓士族，吴姓士族对司马氏也殊无好感。晋末战乱，吴姓士族蠢蠢欲动，只是缺乏政治首脑，难以形成统一的力量。司马睿东渡建业，吴姓士族的态度十分冷漠，居然没有一人主动拜谒这位东南地区最高军政长官。司马睿移镇时，无兵无粮，徒具虚名，能否争得具有“三定江南”实力的吴姓士族的支持，成为能否立足江东的关键。为笼络吴姓士族，王导用司马睿的名义，主动拜会吴姓士族之首顾荣、贺循、纪瞻等人。在其建议下，司马睿发布贺循为吴国内史，顾荣为安东大将军府司马，纪瞻为军祭酒，周玘为仓曹掾。不久，吴郡大族尚书郎顾球死，司马睿亲自为顾球举哀，这又是突破礼制的殊荣。一系列的举动表明司马睿有倚重吴姓士族之意。吴姓士族也就由冷漠转向支持了。

永嘉之乱，中原板荡，民族矛盾激化，中原士族十分之六七南渡，有百家之多，称作侨姓士族。侨姓士族羁旅寄寓，大都有风景虽好，只是江山有异的感触，相当颓丧。王导极力倡导“戮力王室，克复神州”，激励侨姓士族奋发起来，支持司马睿。这些人过去和司马越都有这样那样的关系，在司马睿和王导的悉意拉拢下，成为司马睿建立东晋的有力支持者。在权势分配上，司马睿和王导又有意偏袒侨姓士族。久而久之，终于反客为主，侨姓士族的权势压倒了吴姓士族。

司马睿并非万事顺遂。在东南，扬州都督周馥和江州(州治今江西南昌)刺史华轶是司马越的政敌。周馥不满司马越翦除异己，专擅自恣，永嘉四年，联合祖纳、裴宪等30人奏请怀帝徙都寿春(安徽寿县)。司马越命司马睿征讨，逐走周馥。永嘉五年，怀帝被俘，司马睿建立行台，华轶不承认，定要司马睿拿出诏书证明其合法性。为防他人效尤，王敦集中兵力，猛攻豫章(江西南昌)，杀了华轶及其五子，才防止了事态的扩大。同年，又爆发了杜弢领导的流民起义，纵横荆、湘，打得荆州刺史王澄落荒而逃。直到建兴三年(315)才被王敦血腥镇压。在统治集团内部，权势之争一如既往。王澄、王敦，名为兄弟，实质势同水火。王澄为杜弢所败，永嘉六年奉司马睿之征前往建业，路过豫章，王敦席间发难，拉杀王澄，夺取了荆州，成为江东军事首脑。吴姓士族不甘心政治上的屈从地位，在“三定江南”中立有殊勋的义兴(江苏宜兴)周氏更是耿耿于怀。建兴元年，周玘就想起兵争权，机密泄漏，忧愤而死，遗言其子周勰定要为其报仇，杀尽诸“伧”(吴姓士族对侨姓士族的鄙称)。建兴三年，周勰纠集了一批吴姓士族声讨王导，江东响应者甚多，只是其叔周札犹豫不决才迅速失败。司马睿和王导惧怕追治会激起吴姓士族更大的反抗，不了了之。东晋尚未建立，统治集团内部勾心斗角、尔虞我诈就已激烈展开。为了稳定政局，王导为司马睿制定了“清静为政，抚绥新旧”的方针，也即最大限度地满足士族地主在政治和经济上的欲望，以维护司马氏和士族、各大士族间的权势平衡为基本国策，放纵

南北士族兼并土地，占有部曲佃客，隐匿人户，鱼肉人民。乃至曲法申恩，宽纵到网漏吞舟的地步。难以遮掩，也力求大事化小，小事化了，最多惩处几个小吏掩人耳目。

建兴四年，长安陷落，愍帝被俘。次年从长安逃出来的平东将军宋哲带来了愍帝命司马睿“摄万机”的诏令，司马睿乃称晋王，建元建武(317)。又次年，在群臣的劝进下称帝，改元太兴，都建康，史称东晋。司马睿即晋元帝，建武元年是东晋始年。

从南渡到登极，司马睿内赖王导，外仗王敦，才成大势。王导居机枢重地，出谋划策，纵横捭阖，联合南北士族支持司马睿。王敦手掌重兵，专任征伐，坐镇荆州，威制扬州。正是王氏兄弟的军政活动，才奠定了司马睿的江东基业。琅邪王氏，权倾内外。因此司马睿登极那天，一再拉王导同登御床，共受群臣朝贺。被王导以太阳岂能与万物同辉为理由拒绝。历元、明、成三朝，王导的地位一直十分尊崇，世罕其匹。元帝称王导为“仲父”，成帝给王导的手诏总用“惶恐言”、“顿首言”、“敬白”等词汇，还亲至王导府，礼敬王导之妻。此种现象，在我国历史上可谓空前绝后。所以时人说这一时期是“王与马，共天下”。和西晋相比，无疑是一大激变。东晋一代，王权衰落了，王权与士族几成并驾齐驱之势，有时王权还得屈从士族。真正的门阀统治时期开始了。

魏晋以来，士族势力之膨胀，已难逆转。八王之乱，西晋宗室丧亡殆尽，王室极端衰微。永嘉之乱，王室更受打击，南渡者仅琅邪王司马睿、西阳王司马羕、彭城王司马康、汝南王司马祐和南顿王司马宗五个。元帝虽和晋武帝、惠帝的血统疏而又疏，毕竟捷足先登，在王室极端式微的前提下，只有仰赖以琅邪王氏为首的南北士族，否则将一事无成，因而只有承认共天下的格局，这正是其精明处。永嘉之乱，民族矛盾成为社会主要矛盾，晋室成了民族和国家的象征，舍弃晋室，另立新朝，既会遭到全国军民的反对，士族集团内部也将爆发难以遏止的祸乱，元帝既承认共天下，那么拥有晋室名号，奉行晋室正朔，就成了士族们保全身家性命及自身门户的最佳选择。所以，东晋的建立和共天下格局的出现，正是八王之乱和永嘉之乱的结果。事实上，共天下及各大士族间权势的平衡极难维持，因而东晋一代的内乱可谓无休无止。东晋政权所以能维持百年之久，与民族矛盾尖锐、南北人民的共同支持密不可分。 (蒋福亚)

祖逖北伐

东晋初年祖逖收复河南的北伐。

祖逖(266—321)，字士稚，范阳遒县(河北涞水北)士族。家世二千石高官。自小尚武好侠，慷慨有志。长大后博览群书，名闻乡里。和刘琨同为司州主簿，情同手足，共被同寝。时中原板荡，两人均有忧国忧民之志，互相探讨古今兴亡，慨然以中原自许。每逢中夜鸡叫，两人即起而练武。“闻鸡起舞”成为传诵古今的历史佳话。洛阳陷落，祖逖率亲党数百家南徙。途中，自己步行，车马让给老弱病残，药物衣粮，也和同行者共享，深受流民爱戴，被推为“行主”。时司马睿移镇建业(江苏南京)不久，正在大力网罗南徙士族。祖逖有雄豪之名，曾被东海王司马越辟为典兵参军，所以成为司马睿急于笼络的对象。一到泗口(江苏清江北)，即被司马睿发布为徐州刺史，不久，征为军咨祭酒，徙居京口(江苏镇江)。祖逖志在恢复，求请北伐。司马睿对北伐虽无兴趣，却也不便丢掉这面足以号召人心的旗帜，建兴元年(313)，任祖逖为奋威将军、豫州刺史，给与千人口粮和3000匹布，赋予自行召募的权力，命其北伐。祖逖率领随其南渡的百余家部曲渡江，船至江心，慷慨激昂，击楫发誓：“祖逖不能清中原而复济者，有如大江！”进入淮阴后，祖逖立冶铸造兵器，召募2000余人，向雍丘(河南杞县)推进。此时，汉国频频进攻关中，愍帝的长安政权岌岌可危；石勒占有冀州，还向河南扩张，成了祖逖北伐的主要敌手。洛阳陷落后，中原群龙无首，晋室官吏、地方豪强和流民等组成一个个武装集团，修筑坞垒堡壁，割地自雄，互相吞并，形势十分复杂。中原是坞堡主们的天下，其中势力较大的有郭默、赵固、李矩、上官巳、张平、樊雅、陈川等。郭、赵、李、上官四人活跃于宜阳(今属河南)和新城间(今属河南)，民族意识强烈，但彼此矛盾重重，互相攻伐。祖逖晓以大义，力陈利害，使彼等捐弃前嫌，携手抗敌。樊雅和张平纵横谯城(安徽亳县)一带，张平自称豫州刺史，樊雅自称谯郡太守，虽有民族意识，却均桀骜不驯，与祖逖为敌，对峙一年有余。建武元年(317)祖逖计除张平，重创樊雅，攻克谯城。樊雅兵败，本拟他走。祖逖及时遣桓宣为使，说明其目的只在于击灭刘聪和石勒，决无它意，愿和樊雅合作共抗强敌，同保富贵。终于说服了樊雅。蓬陂(河南开封境内)坞主陈川本来支持祖逖，但心胸狭窄，因祖逖威名日增，仁义俱著，得到陈川部下爱戴，陈川乃杀戮心向祖逖的部属，抄略豫州诸郡。祖逖无奈，被迫进

讨。陈川兵败，据浚仪（河南开封）投降了石勒。石勒命骁将石虎统兵50000救陈川，为祖逖设计击败。石虎徙陈川于襄国（河北邢台），沿途抄略豫州，留桃豹守陈川故城，成为楔进河南的一颗钉子。祖逖挥师猛攻，只打下一半。双方对峙40余天，粮草均将告罄。为求全功，祖逖命千余人用米袋装土运入城内，又令数人挑米，伪装疲极息肩于道，见到桃豹的兵士就弃担而逃。桃豹认为祖逖粮草丰足，怯意顿生。祖逖又遣军截获了石勒运给桃豹的粮食。桃豹斗志全消，连夜统部逃遁。祖逖大获全胜，终于在太兴三年（320）进屯雍丘。

祖逖深知维系民心是北伐成败的关键，为此军纪严明，决不私掠，关心民间疾苦。其部所在屯田，解决粮饷；所经收葬枯骨，抚恤贫困百姓，劝课农桑。又不问贵贱，都恩礼相待。豫州父老感动得痛哭流涕，称祖逖为"慈父"。祖逖严于律己，治军有方，身先士卒，生活简朴，不蓄私产，和部下一同耕田樵采，其子弟都得勤于耕作，勇于战阵。祖逖爱护部下，信赏必罚，即使只有微功，亦力求赏不隔夜。名将好马，祖逖亦不例外。有次缴获一匹名驹，祖逖喜不自胜。友军将领李头见马羡慕已极，祖逖立刻命人将马送交李头。赏功不惜割爱，非但得到了部属的死力，连友军李头等也由衷地感叹："若得此人为主，吾死何恨！"经过八年的努力，祖逖终于在河南打开了局面，河南坞堡纷纷归附，尽为晋土。对于边界地带的坞堡，祖逖听其两属，不断遣小部队佯攻，杜绝石勒对这些坞堡的猜疑。祖逖极得人心，石勒凡有举动，百姓均赶来密报，故战则有胜，迫使石勒不敢窥兵河南。石勒对祖逖满怀敬意，修葺祖逖祖坟，致书要求互市。祖逖默认，收利十倍，士马日强。祖逖壮大起来了，进军河北的格局即将形成，晋元帝和权臣王敦的矛盾却表面化了。元帝命亲信戴渊为兖豫等六州都督，坐镇合肥（今属安徽），节制祖逖，用来牵制王敦。王敦则诱逼祖逖和其联手，与元帝相抗。祖逖北伐不成，眼看内乱将起，愤激发病，太兴四年死于雍丘，享年56岁。祖逖一死，东晋内乱爆发，其北伐成果尽数化为乌有，淮河、汉水以北之地全被石勒攻占。

（蒋福亚）

刘曜建前赵

东晋太兴元年（318），刘曜称帝长安，建立前赵，开十六国历史之端。

刘曜（？—329），字永明，匈奴族人。刘渊族子。刘曜深受汉文化影响，博览群书，尤好兵策，雄武善射，时号"神射"。永嘉五年（311）为汉国统帅，攻克洛阳，俘晋怀帝，杀西晋王公以下30000余人。建兴四年（316），攻克长安，俘晋愍帝，击灭西晋。因功封中山王，居官相国，都督中外诸军事，坐镇长安。太兴元年，汉国主刘聪病死，子刘粲继位。刘聪在世时，统治极端残暴，民不聊生，统治集团内部矛盾已难遏止。刘粲更是沉湎酒色，征发百姓作兼昼夜，结果饥饿穷叛，死亡相继。外戚靳准乘机执杀刘粲，自号汉天王，尽诛平阳（山西临汾西）刘姓匈奴权贵，平阳大乱。刘曜和石勒闻变，各自领兵前来，讨灭靳氏。刘曜迁都长安，自立为帝，建元光初，改国号为赵，史称前赵。

刘曜称帝后，击灭陇右西晋残余势力南阳王司马保，征服关陇地区氐羌等各少数民族，尽有关陇。全盛时其统治区东达太行，南界嵩洛，西至陇坻，北至汾晋。相当于今河北、山西、河南、陕西及甘肃的各一部分，拥兵28万多人，推行胡汉分治政策，模仿汉族封建统治，设立太学、小学培养统治人才，但在恢复生产、安定民生方面缺乏具体和有效的措施，对各族人民的压榨和奴役过于峻急，激起关陇氐、羌、巴、羯等30余万人的大暴动，长安城门为之昼闭。事平后仍无改进。刘曜擅长用兵，却治军无方，军队经常无故自惊；又刚愎自用，嗜酒如命，拒绝各种合理的建议，臣僚劝其节饮也往往被杀。时石勒据河北建立后赵，双方鏖战连年。太宁二年（324），石勒命石生兵掠河南，占据洛阳。刘曜命刘岳统军15000反击，连克孟津（河南孟津东北）、石梁（河南洛阳东，洛水北岸）二戍，歼敌5000，包围石生于洛阳西北角的金墉城。石勒命石虎驰救。洛西一战，刘岳败退石梁戍。刘曜被迫亲提兵马增援，击杀石虎将领石聪，推进洛阳西北的金谷。入夜，军队无故自惊，刘曜溃退渑池（河南渑池西）。刘岳全军覆没，前赵退缩新安、渑池以西。咸和三年（328），石虎统兵40000掠取河东，推进蒲阪（山西永济蒲州镇）。刘曜再度亲提精锐反击，高侯原（山西闻喜北）一战，石虎大败，枕尸200余里，损失军资以亿计。石虎退屯朝歌（河南淇县）。刘曜兵进大阳关（山西平陆茅津渡），包围石生于金墉城，后赵河南郡县闻风归降，襄国（后赵都城，今河北邢台）震动。石勒亲统步骑87000潜进洛阳。行前估计刘曜作战方略：1.耀兵成皋（河南荥阳西北上街镇），严阵以待，是为上策。2.据洛水阻击，是为中策。3.坐守洛阳，必败无疑。刘曜恰取下策，10万大军集结洛西，扎营十余里，在军事要冲成皋不设一兵一卒。石勒轻易通过成皋，额手庆贺，喜极高呼："天也！"一切就绪，石虎受命引兵30000，由洛阳城北往西打，石堪

等统骑兵16000余由西往北冲，石勒亲统主力伺机歼敌。刘曜大胜而骄，成天烂醉如泥，对石勒动态毫无所知。双方交战，捕获后赵士兵，方知石勒亲临，为之色变。临战前，饮酒数斗壮胆，昏醉马上，难以指挥。在石勒严密部署和猛烈进攻下，前赵全线崩溃，刘曜马倒被俘，全军覆没。次年，后赵翦除前赵余部，据有关陇。前赵亡，立国仅11年。 （蒋福亚）

石勒建后赵

东晋太兴二年（319），石勒在襄国称赵王，建立前赵，曾一度统一了黄河流域。

石勒（274—332），字世龙，上党武乡（山西榆社北）羯族人，世为部落小帅。羯族是匈奴别部，有高鼻、深目、多须的特征。随匈奴内徙，魏晋之际主要分布于并州上党一带，大都已向农业定居过渡。石勒幼年贫困，以行贩或佣耕为生。20余岁时被并州刺史司马腾掠卖给茌平（山东茌平西）大地主师懽为奴，后放免为佃客。八王之乱时，汲桑领导河北官牧场中的牧人起义，石勒成为其主要将领之一。汲桑失败，石勒投奔刘渊，兼并乐平（山西昔阳西南）乌丸张伏利度部，兵伐魏郡、顿丘等地，攻陷坞堡后，任坞堡主为将军、都尉，征发其丁壮为兵，兵力扩大到50000，他无所犯。在汉国各支队伍中，石勒军纪最严，军无私掠，因而往往得到百姓的怀念。攻陷冀州后，石勒拥众10余万，河北坞堡大都送质请降。石勒以张宾为谋主，在军中设立"君子营"，安置汉族士大夫，为其出谋划策，成为河北地区最大的军事力量。永嘉五年（311），石勒在苦县宁平城（河南郸城东北）全歼王衍所统西晋主力，会合刘曜、王弥攻陷洛阳，俘晋怀帝。当时汉国内部有刘曜、王弥和石勒三大势力。刘曜是刘渊族子，汉国的嫡系势力。王弥是东莱（山东掖县）士族，西晋末年随刘伯根起义。刘伯根失败，王弥聚众再起，横行青州，一度攻克许昌，兵逼洛阳，失败后投奔刘渊，势力又发展起来。永嘉五年，王弥首先攻入洛阳，大肆杀掠，引起刘曜忌恨。双方兵戎相见，死伤千余。王弥建议汉国迁都洛阳，刘曜拒绝，纵火把洛阳烧为废墟。王弥怒骂：屠各子（刘氏为匈奴屠各种），如此作为，岂有帝王之意乎？汝将奈天下何！和盘托出了霸有中原的野心，双方成了仇敌。在王弥心目中，能与其逐鹿中原的仅石勒一人。为此命其左长史曹嶷领兵5000，携带虏掠来的财物回转青州，招兵买马，扩张实力。同时卑辞厚礼麻痹石勒，伺隙兼并。汉国攻陷洛阳后，石勒虽归功刘曜和王弥，退屯许昌，却早有自立之心，严密注意王弥的动态。该年九月，石勒截获王弥约曹嶷合兵聚歼其部的密函，决心翦除王弥。恰值王弥和西晋残余势力刘瑞相持不下，向石勒呼救。当时石勒正与陈午等汉族流民集团恶战于浚仪（河南开封），得讯后立刻放弃击灭陈午的良机，引师击斩刘瑞，解了王弥之危。然后宴请王弥。王弥疑虑全消，在十月欣然赴宴，席间被杀，部众被石勒兼并。

永嘉六年，石勒兵下江汉，碰上三个多月大雨，野无所掠，士卒饥疫，死者大半；晋军又云集而至，陷于进退两难的境地。张宾建议，迅速后退，夺取邺城（河北临漳西南），凭恃其四塞山河的地理形势，夺取黄河以北，巩固统治，再取天下。当时西晋在河北的残余势力有刘演、王浚、刘琨三股。刘演据邺，王浚据幽州，刘琨据晋阳（山西太原南）。其中以王浚势力最大。王浚是个野心家，自恃太原名门，在洛阳陷落后自置行台，拥立一个史不见名的司马氏宗室为皇太子，封拜官员，实质是自己想当皇帝。和刘琨你争我夺，双方虎视眈眈。

石勒兵进邺城，久攻不下，退据襄国（河北邢台），筹粮积谷后再次兴兵，终于夺取了邺城，巩固了在冀州的统治。石勒势力壮大，王浚深感不安，勾引辽西鲜卑段部猛攻襄国。段部曾数败石勒，但襄国城下一战，石勒生擒段部强酋段末柸，待以恩礼，结为盟友，终于离间了段部和王浚的关系。王浚统治残暴，赋役苛重，下不堪命。其将领大都贪得无厌，广占山泽，欺凌百姓，百姓纷纷投奔鲜卑段部和慕容部。王浚迁怒段部，重礼引诱鲜卑拓跋部进攻段部，反而被段部击败。王浚与段部的关系更加恶化。石勒抓住王浚内外交困却又想当皇帝的心态，遣使劝进，贡献大量珍宝，一再表示自己甘当前驱。王浚信以为真，双方使者往来不绝。石勒外示恭敬，北面拜接王浚的书信，甚至朝夕跪拜王浚所赠的麈尾（魏晋玄学盛行，名流皆执麈尾谈玄）。并告知王浚，将在建兴三年（315）三月亲自到蓟城（幽州州治，今北京）奉上尊号。二月，石勒引兵将发，却又担心刘琨乘虚而入，袭击其根本。张宾指出：王浚和刘琨虽然名为晋室之臣，实质互为仇敌。如果遣使修笺刘琨，送质求和，刘琨必喜，决不会为救王浚而对我偷袭。果然，刘琨得知石勒的意图后欣喜过望，按兵不动。三月，石勒兵达易水，幽州将领要求阻击，王浚大怒，斥责将领们说：石勒为奉戴我而来，敢有言击者斩！下令大开城门，设宴等待。石勒兵不血刃，拥军入城，俘执王浚，怒斥其位居上公，手握强兵，坐观京师倾覆，不救天子，而欲自己称尊；信用奸恶，杀害忠良；积谷百余万

斛，却听凭百姓饥饿而死等罪名后，押送襄国斩首。

石勒据有冀、幽等州后，招抚流亡，劝课农桑，整顿户籍，仿照魏晋推行租调制，每户年纳赀调二匹，租二石，比西晋少了一半。当时汉国的统治已十分腐朽，建兴四年，河东、平阳(山西临汾)等地大蝗，饿殍载道，石勒特遣石越领兵20000屯驻并、冀二州交界处，招纳流民，平阳周围20余万户流民投奔而来，石勒势力进一步壮大。同年，击败刘琨。太兴元年(318)，汉国内乱，石勒乘机统精兵50000到达平阳，驱掠单于台下10余万落少数民族至其统治腹心地区，据平阳至洛阳以东为己有。刘曜称帝时，封石勒为赵王。石勒大怒，声称赵王、赵帝孤自取之，名号大小，岂能受刘曜节制。太兴二年，石勒自称大单于、赵王，都襄国。史称后赵。

后赵建立后，石勒加强了政权建设，着手恢复经济：一、令贯志等人采集历代律令之要，撰成辛亥制度，颁行国内。二、经常遣使巡行郡国，劝课农桑，考核各级地方官吏。三、准对战祸频仍，百姓失业，资储未丰，下令严禁酿酒，雷厉风行。行之数年，卓有成效。四、仿照汉族，初步改变羯族落后旧习，禁止“报嫂”(兄亡以嫂为妻)和在丧事期内婚娶。这些措施有利于河北经济的恢复，封建政府“租入殷广”。落后风习的改变，促使羯族和汉族在风俗习惯上有所接近。石勒是内徙少数民族统治者中倡导汉化的先行者。后赵同样实行胡汉分治，在其扩张过程中，被驱掠至其腹心地区的各族人民有数百万之多。石勒规定称羯人为“国人”，蓄意抬高羯人的地位，严惩称羯人为胡者。但石勒又很知道必须拉拢汉族士族，特意在襄国设立“崇仁里”安置士族，严禁羯人欺侮士族。后来又恢复了九品中正制，恢复了士族做官和免役的一些特权。在此种措置下，胡汉贵族开始了初步的勾结。正由于此，在前、后赵的争战中，后赵始终掌有主动权。咸和四年(329)，石勒击灭前赵，并有关陇，一度统一了黄河流域。次年，石勒称帝。后赵全盛时，其统治区南逾淮汉，东滨于海，西至河西，北尽燕代，声震西域，约相当于今天的河北、山西、河南、山东、陕西诸省及江苏、安徽、甘肃、湖北和辽宁的各一部分。后赵历七主，立国凡33年，永和六年(350)被冉闵击灭。　(蒋福亚)

王敦之乱

东晋永昌元年(322)，晋元帝为加强王权，打破王与马共天下的格局而引起的一场内乱。

东晋以荆扬两州为根本重地。扬州是中枢所在，财赋所出，号称“内户”。荆州甲兵所聚，有相应的财力，屏障扬州，号称“外阃”。控制荆、扬两州，便可左右东晋大局。东晋初年，王导执权中枢，王敦坐镇荆州，兄弟子侄并踞要津，琅邪王氏权倾天下，时人为之语曰“王与马共天下”。实质是指以琅邪王氏为首的士族和司马氏共有天下。迫于形势，元帝不得不承认这个格局(参见“晋室南渡”)。名器不可假人，是封建帝王的信条。元帝承认这个格局，于心何甘！为此屡屡插手荆州。王氏兄弟拥戴元帝，同样是格于形势，不得不尔。为维持共天下，牢抓荆州不放，严禁他人染指。其中以王敦尤为露骨。王敦(266—324)，字仲处，琅邪临沂(今属山东)人。刚狠残毒，尚晋武帝女襄城公主，野心勃勃。元帝登极以前，王敦就顾忌元帝精明，拟另立新主。东晋局面稍稳，王敦专擅之迹日露，问鼎之心渐萌。双方矛盾日益加剧。为重振帝王雄风，元帝故意冷淡王氏兄弟，重用亲信刘隗、刁协和戴渊。这三人秉风承旨，借助刑名，不遗余力弹纠达官贵人，建议按户籍征发“免奴客”(奴婢放免为佃客后的专有名称)为兵，加强扬州兵力，与荆州抗衡。南北权豪的利益受到侵犯，一时怨声蜂起。不久，元帝以戴渊为征西将军，节制祖逖等坐镇合肥(今属安徽)；以刘隗为镇北将军，镇淮阴(今属江苏)。名为北伐，实质是对付王敦。又出谯王司马丞为湘州(州治今湖南长沙)刺史，预作守备，牵制王敦。由于周访、陶侃和祖逖等中兴名将尚在，王敦暂时隐忍。随着周访、祖逖相继死亡，王敦顾忌全消，借口戮力王室，共靖海内，致书刘隗，要其收敛，严厉警告：若如既往，天下将永无宁日！刘隗反唇相讥，报书誓以“忠贞”自效。永昌元年，王敦遣使梁州(镇襄阳)刺史甘卓，获得甘卓默许后，即疏奏刘、刁、戴三人罪状，在清君侧的名义下，由武昌起兵东下，分兵20000进袭湘州。吴兴(今属浙江)大豪族沈充闻风而动，起兵响应，被王敦任为大都督。司马丞遣使甘卓，请其共讨王敦。甘卓又约会广州刺史陶侃，邀陶侃共攻武昌，实质上举棋不定。元帝急召刘隗、戴渊入卫，以周札为征虏将军，屯驻石头(建康西面军事要塞)。

王敦起兵，王导暗喜，却又不形于色，诚惶诚恐地率领群从子弟待罪台省。时胜负未分，为孤立王敦，元帝发布王导为大都督，节制诸军。王敦顺流而下，直扑建康(江苏南京)，绕过刘隗精兵，攻打石头城，周札不战而降，建康门户洞开。王敦占据有利地形，大败刘隗、刁协、戴渊等数道兵马。刘隗逃奔石勒，刁协和戴渊在不久后被杀。王敦拥兵不朝，放兵

劫掠，官省逃散。元帝无奈，遣使王敦：公若不忘本朝，请就此息兵，则天下尚可“共安”。如其不然，朕当逊位，退归琅邪，以避贤路。又命百官到石头谒见王敦。王敦大权在握，遣兵执杀司马丞，袭杀甘卓，稳定了自己的后方。年底，元帝郁愤而死，子司马绍继位，是为明帝。王敦意在篡立，逼明帝征己入朝，享受殊礼，拜扬州牧，移镇姑孰（安徽当涂），屯兵于湖（姑孰北）。荆、扬两州全为其控制。

在王、马之争中，南北权豪大都抱隔岸观火的态度。但王敦生杀由己，树置亲信，四方贡献尽入其府，将相方镇皆出其门，左迁官员数以百计。引钱凤、沈充为谋主，放纵部属肆意侵凌，夺人田宅，剽掠市道。南北权豪的利益都受侵犯，不满之心日增。其中杀戮周顗及周札引起的反响更大。周顗，字伯仁，官居尚书仆射，盛名海内，在士族中很有威望。王导待罪台省时，屡请周顗在元帝面前为其说项。周顗表面上不理会，实质力主共天下的格局，因此表请面奏，处处为王导辩白。王敦组建朝班时，一再征询王导，如何处理周顗？王导衔恨在心，默不作答，结果周顗被杀。此举表明王敦不愿遵从共天下的格局。周札是吴郡士族，义兴（江苏宜兴）周氏在三定江南中立有殊勋，所以不战而降，无非是想借助变乱，扩张势力。殊料王敦顾忌吴姓士族势力过大，利用义兴周氏和吴兴沈氏这江东势力最盛的两个大族间的矛盾，听凭沈充灭了周氏一族。此举表明王敦也不愿维持各大士族集团间势力平衡的局面。既然元帝已表明愿意“共安”，两相权衡，维护司马氏的正统地位，显然对各大士族，包括王导在内的自身门户权益更为有利。一场倒王活动在暗中展开了。不过建康达官贵人手中无兵，只有注目于拥有流民数万、屯驻合肥、在流民帅中享有威望的郗鉴，企图利用流民帅的力量制服王敦。吴郡士望，因病暂归林泉的纪瞻成了个中牵线人，竭力向明帝推荐郗鉴。明帝颇有文武才略，知道利害，乃任郗鉴为兖州刺史，都督扬州以西诸军事。王敦亦想拉拢郗鉴，表荐郗鉴为尚书令，征其入朝。东晋一向对流民帅抱有戒心，轻易不予重用。郗鉴深知，只有立功立业才能在朝中占有一席之地，进入权力中枢，所以一到建康，便积极参与击灭王敦的密谋。善观风色的王导迅速加入，致书从兄王含：宁为忠臣而死，不为无赖而生。王敦逐渐变成了孤家寡人。王敦未始没有察觉，其亲信沈充、钱凤又力促再次起兵，代晋自立。但此时王敦年老体衰，疾病沉重，深知没有南北士族的支持，势难遂心，因而认为起兵只是下策，在起兵、退据武昌和释兵散众、保全门户三者间犹豫不决。为稳妥起见，遣温峤入朝侦察动静，以定行止。温峤本是明帝亲信，早想摆脱王敦，一见明帝便具告虚实。建康方面早就急待一举，太宁二年（324），明帝以王导为大都督，应詹为秦淮河以北都督，亲统郗鉴等讨伐王敦，征流民帅临淮太守苏峻、豫州刺史祖约、广陵太守陶瞻等入卫京师，散布王敦已死的谣言。王导假戏真做，率领群从子弟为王敦发丧，果然把士气鼓动起来了。三吴士族也纷纷起兵，讨伐沈充。王敦病重难起，以其兄王含为帅，统军50000，借口诛除温峤，兵逼建康。无奈士气已衰，兵败后退，王敦气急而死。不久，王敦党羽被全数歼灭，一场祸乱宣告结束。司马氏和士族共天下及维护各大士族间权势平衡的格局经此变乱，终于稳定下来。

（蒋福亚）

苏峻之乱

东晋咸和二年（327），历阳内史苏峻和豫州刺史祖约兵下建康的一次叛乱。

王敦失败，琅邪王氏的势力受到打击，明帝企图依靠外戚和宗室加强王权，重用皇后兄颍川（河南鄢陵西北）庾氏的庾亮（289—340）、西阳王司马羕、南顿王司马宗。两王则笼络流民帅历阳（安徽和县）内史苏峻等竭力排斥庾亮和王导。太宁三年（325），明帝死，年仅四岁的成帝司马衍继位，庾亮先发制人，杀司马宗，贬司马羕，借口庾太后临朝，手操大权。庾亮企图取代琅邪王氏，与司马氏共天下，首务之急是要解决手操重兵的陶侃、苏峻和祖约三人。陶侃（259—334），寻阳（江西九江）人，门第寒微，行伍出身，王敦之乱后官居征西大将军、荆湘雍凉四州都督，镇武昌。此人聪明机警，精于打算，自制力颇强，居然把荆州治理得路不拾遗，士女们额手相庆。但在门阀统治下屡受排挤，心怀怨望。苏峻（？—328），长广掖县（今属山东）人，少为书生，颇有才学。永嘉之乱时聚众数千家结壁自保，在汉国青州刺史曹嶷的打击下泛海南渡，王敦之乱中因功进冠军将军、历阳内史，成为淮南地区一大军事力量。祖约（？—330），祖逖之弟，祖逖死后，领祖逖旧部。王敦之乱时，统部入卫京师，后驻寿阳（安徽寿县），是淮南又一军事力量。此三人都想插手中枢，猜疑由于庾亮作梗，才没有成为辅政大臣。怨愤之心，溢于言表。其中陶侃兵力最大，却较稳妥；苏峻最跋扈，招纳亡命，拥有精兵万余，无视朝廷，勒索粮草，稍不遂心，便破口忿言。东晋边防，以荆州和淮南为重，精兵猛将，大都集中在这两地。现今三人态度如此，庾亮无疑是针芒在

背，寝食难安，为此加强石头防御，出温峤为江州（州治江西九江），防备陶侃，征苏峻入朝为大司农，企图褫夺其兵权。王导、温峤等力阻无效。苏峻洞悉庾亮用心，断然拒绝。声言：台省说我欲反，岂有我的活路。我宁愿在山头望廷尉（司法机构），决不在廷尉望山头。只有拼死来报答造谋者了。乃遣使祖约，共约起兵讨伐庾亮。祖约久有此心，即以其兄祖沛之子祖涣和女婿许柳会合苏峻，兵向建康。温峤及三吴士族要求入卫京师，被庾亮拒绝。孔坦、陶回等建议坚守江防，决战江北，庾亮也不采纳。咸和二年十二月，苏峻攻陷江防重地姑孰（安徽当涂），夺取了屯积于此的大量盐、米。庾亮方悔失策。急令赵胤及司马流扼守慈阳（当涂北六十里），弟庾翼驻守石头城（建康军事要塞）。赵胤及司马流都是胆小如鼠的庸人，听说苏峻分兵来攻，司马流吓得举着筷子找不到嘴，兵败而死，赵胤则奔窜而退。次年正月，苏峻由横江（安徽和县）渡江，兵达陵口（江苏丹阳），避开石头城，绕道秣陵（秦淮河南岸），击杀晋军东路统帅卞壶等，攻打台城（建康内城）。庾亮统兵抵御，未及列阵，士卒逃散。庾亮等逃奔寻阳（江西九江）。苏峻进入建康，纵火焚烧台省府库，建康积储，悉数据为己有。又肆行杀掠，凡身披戎装者一个不留。昔日高门大族均被驱使服役；裸剥士女，哀号之声，震动内外。其部下突入后宫，肆意欲为。庾太后不堪其辱，死于三月。苏峻控制了大权后，以祖约为侍中、尚书令。接着分兵三吴，掠取了吴县、海盐、嘉兴、余杭和宣城等地，声势日盛。

庾亮逃到寻阳，虽然得到温峤的全力支持，却仅有兵7000，难和苏峻抗衡，被迫向陶侃呼救。陶侃怀恨在心，宣称疆场外将，不敢越局。在庾亮和温峤的一再请求下，陶侃方命龚登统兵支援。兵马才动，陶侃反悔，追回龚登。温峤再次致书，企图以陶侃子陶瞻为苏峻所杀，说动陶侃。陶侃仍然犹豫。信使王愆期指出：苏峻豺狼成性，如若得志，岂有明公立足之地！陶侃醒悟，惕然而起，戎服登舟，昼夜兼程，赶到寻阳，被推为盟主，和庾、温合兵40000，东下建康。荆、江联合，声势大振，郗鉴、魏该、桓彝等纷纷起兵配合。双方相持于石头。

东晋内乱，石勒乘虚而动，兵占寿阳。祖约大败，退到历阳。后赵将寿阳洗劫一空，驱掠20000余户而还。

祖约虽然失利，但苏峻却狡黠多计，部下大多是亡命之徒，犹堪一战。荆、江联军久久不能得手。军粮行将告罄，向陶侃借贷。陶侃却声言西还，徐图良谋再来。联军面临解体之危。温峤用官渡之战的例子，恳请陶侃坚持，许以"臣主共祚"，也即共天下的好处后，陶侃才分米50000石助温峤。将领毛宝自告奋勇，袭击句容（今属江苏）和湖孰（江苏江宁东南），烧毁苏峻积储，才促使陶侃定下攻打石头城的决心。苏峻领兵8000迎战，庾亮和温峤再次失利，但总的形势已对苏峻不利。为鼓励士气，苏峻醉后劳军，自恃骁勇，统数骑突阵，马失前蹄，为陶侃部将彭世、李千所杀。其弟苏逸继领其众，闭城自守。凶酋毙命，联军士气激增。咸和四年正月，攻克历阳。祖约逃奔石勒，后为石勒所杀。二月，晋军攻破石头，收复建康，苏峻余部被次第翦除，叛乱终于平息。陶侃以功迁太尉、侍中，加督交广宁三州，尽有长江中游及岭南。至其死后，庾氏的势力才伸向荆州，取代琅邪王氏，与司马氏共有天下。　（蒋福亚）

慕容氏建前燕

东晋咸康三年（337），慕容皝在龙城称燕王，其子慕容儁时称帝中原，前燕进入全盛。

慕容皝（297—348），字元真，昌黎棘城（辽宁义县西北）人，鲜卑族。父慕容廆，鲜卑慕容部酋长。鲜卑是东胡族的一支，源于今内蒙古科尔沁旗西哈古勒河附近的"鲜卑山"，以游牧狩猎为生。其语言、习惯等与乌丸大体相同。部落酋帅称"大人"。因乌丸阻隔，和中原王朝绝少往来。乌丸南徙老哈河流域，鲜卑方推进西喇木伦河流域，在东汉初年出现于我国历史舞台。自北匈奴西迁，南匈奴保塞后，乌丸占有漠南，鲜卑占有漠北，并雄于大漠草原。乌丸内徙，鲜卑继续推进，融合残留在草原上的匈奴和乌丸等部，成了大漠草原的主人。与东汉互市，从内地输入精金良铁及生产技能，人口有所增加，势力渐大。战争成为部落的正常职能，加强了部落权贵的权力，私有财产及奴隶相继出现。在东起辽水流域，西达河西走廊一线不断向内地进逼。东汉中后期，形成了以檀石槐为首的部落联盟，控弦之士十余万，成为中原王朝北方的劲敌。部落权贵的世袭制在此期间确立起来。檀石槐死后，联盟中衰。残留西喇木伦河的鲜卑在酋长轲比能的统领下南进，在汉族先进经济文化影响下，势力渐增，逐步联合鲜卑各部，重建了部落联盟。这个联盟虽然没有包罗昔日鲜卑各部，但其文明程度，却比檀石槐时有所发 展，成了曹魏北边大敌。曹魏数战不利，乃在青龙三年（235）采用卑劣手段，暗杀了轲比能。轲比能一死，部落联盟瓦解，互相攻伐，弱者归附曹魏，强者远遁。其中，宇文、段部、慕容、素利

等部散处河北塞外及辽河流域，拓跋部游牧于燕代一带，乞伏部及慕容部的分支吐谷浑部进入青海草原，拓跋部分支秃发部则进入河西走廊。

慕容部迁徙辽西时，虽然仍以游牧为生，其私有制及酋长的世袭制却已确立起来。元康四年(294)，慕容廆统该部徙居大棘城(辽宁锦州附近)，转向农业定居，模仿西晋，建立了一些较为原始的制度。当时慕容部势小力薄，处境艰难，除素连和木津等部与其争夺辽西外，其东有强敌高句丽，西有世仇段部和宇文部，并把慕容部和中原的联系隔绝。宇文和段部的实力均大于慕容部，经常兵戎相加，迫使慕容廆卑辞厚礼，屈膝求和。慕容廆企图依靠西晋自存，遭到拒绝，一怒之下，与晋为敌，自称大单于。晋东夷校尉崔毖曾联合高句丽、宇文部和段部夹击慕容廆，想瓜分其地。慕容廆勉力支撑，才粉碎了这次进攻。为摆脱这危如累卵的局面，慕容廆先后采取了如下措施：一、利用民族矛盾，以"勤王"名义保存自己，扩张实力。永嘉之乱，民族矛盾上升为社会主要矛盾，其子慕容翰建议称臣晋室，打出勤王的旗号，招揽民心，扩张实力。慕容廆采纳。自此直到进据中原，慕容氏始终以晋室忠臣面目出现。慕容廆曾遣使建康，向司马睿进呈劝进表，其位号也力求取得东晋的认可。此举对吸引汉族人民相当有效。二、制定优惠政策，招徕流民。永嘉之乱，中原板荡，汉族人民四散流徙，寻求较为安定的地区。其中有不少流向幽州。但西晋残余势力幽州刺史王浚为政苛暴，下不堪命，被迫流向处于王浚和慕容部之间的宇文部和段部。这两部偏重武勇，又不礼敬士大夫，流民难以安生，继续流徙，进入慕容部。慕容廆抓住时机，制定来去自由、劝课农桑的政策，招徕流民。凡愿留者，安置于侨郡县，贷给种子耕牛，酌量减免赋役。凡想去者，给予资助。结果，这里成为冀州、豫州、并州和青州等地流民会集之所。慕容廆特设冀阳(冀州)、成周(豫州)、唐国(并州)、营丘(青州)等侨郡安置上述数州流民，兴修水利，并从东晋引进桑种和蚕种，发展生产。三、起用士族，草创制度。尊重有真才实学者，凡来投奔，均量才录用，利用士族制定和改革各种制度，赋予士族军政方面的实权。士族阳耽之母李氏博学多才，人品又好，慕容廆经常升堂礼敬。为培养统治人才，特意设置学校，慕容廆经常前去听讲。在十六国前期，选用汉族士人之广泛，双方关系之融洽，应首推慕容氏。所以前燕亡国后，许多旧臣甘愿为其复国而奔走呼号。

咸和八年(333)，慕容廆死，子慕容皝继统其部。咸康三年，慕容皝称燕王。史称前燕。慕容皝继位后，继续推行慕容廆的措施，投奔前来的汉族人民更多，竟至超过土著10倍有余。为安置流民，慕容皝开放苑囿牧场，模仿魏晋，实施屯田，剥削量和曹魏相同。慕容皝比慕容廆更热衷于提倡汉文化，亲自编写汉文课本《太上章》，代替汉元帝以来的课本《急就篇》；又著《典诫》15篇作为贵族子弟的政治课本；不断登坛讲学，学校生徒达千余人。慕容氏对辽东处女地的开发、促进汉族和鲜卑慕容部的融合是有贡献的。

在上述措施下，慕容部逐渐发展壮大起来，吞并了素连和木津部，顶住了宇文、段部和高句丽的频频进攻。为彻底解除周边的威胁，慕容皝采取远交近攻的策略，利用后赵与段部的矛盾，称藩后赵，约期咸康四年合攻段部。后赵主石虎亲统步骑17万击灭段部，慕容皝乘机兵略令支(段部政治中心，今河北迁安西)以北诸城。不料石虎得陇望蜀，击灭段部后，指责慕容皝略地自肥，兵犯前燕，连夺36城。慕容皝势屈，退据棘城。时人心惶恐，计无所出，准备弃城而逃。在慕舆根的竭力谏阻下，慕容皝才决定坚守待变。部将刘佩又恳请精选数百敢死骑士，伺隙袭击赵军。赵军难当其锋，燕军士气被鼓动起来了。石虎猛攻棘城十余日，一无所得，被迫引退。慕容恪受命统骑兵2000跟踪追击，斩获30000余人而回。后赵大败，前燕转危为安。年底，后赵征东将军麻秋统军30000再犯前燕。慕容恪埋伏精骑7000于密云山(北京密云境内)，三藏口一战，麻秋大败，损兵十分之六七，麻秋步走得免。自此后赵再也不敢大举来犯，双方基本上处于僵持状态。咸康七年，慕容皝定都龙城(辽宁朝阳)，命慕容翰和慕容垂引兵东向，一举攻克高句丽政治中心丸都(吉林集安西北)，俘获高句丽王高钊的母妻及男女50000余口，迫使高钊俯首称臣。不久，其兵锋转向西北，与宇文部展开了角逐。建元二年(344)，慕容皝亲自领兵攻打紫蒙川(辽宁营口西北)一带，斩杀宇文部骁将宇文涉奕于，宇文部酋长宇文归远窜漠北，部众为慕容皝所有。宇文部灭亡，慕容皝终于尽有辽河流域。

永和三年(347)，慕容皝死，子慕容儁继位。此时，前燕已成拥有胜兵20余万的强国了。永和五年，后赵主石虎死，中原大乱。永和六年，慕容儁兵发三路，迅速据有幽州，继而经营冀州。时冉闵和后赵残余势力连年鏖战，精疲力竭。永和八年，魏昌廉台(河北无极境内)一战，慕容恪生擒冉闵，前燕终于成为中原的一大势力。慕容氏"勤王"的目的是为了"得志于诸侯"，至此，晋室的名号对其已全无用处，所以慕

容儁坦率地对东晋的使者说：回去告诉你家天子，中原无主，我已被推为皇帝了！慕容儁初都蓟城(北京)，升平元年(357)又迁都邺城(河北临漳西南)。前燕全盛时，统治区南至汝颍，东尽青齐，西抵崤渑，北守云中，约当今河北、山东、山西、河南数省及辽宁、安徽、江苏的一部分。前燕历三主，立国凡34年，在太和五年(370)为前秦击灭。一说应自太康六年(285)慕容廆称公算起，则历四主，立国86年，是十六国时期统治时间最长的一个政权。　(蒋福亚)

桓温灭成汉

东晋永和二年(346)，荆州都督桓温兵进巴蜀，击灭成汉的战争。

东晋成、康二帝(335—344)时，颍川庾氏势力达于极盛。穆帝永和元年(345)，庾氏中最后一个执权者庾翼死，为防庾氏坐制荆州，卷土重来，当路权贵几经协商，任桓温为荆州刺史，都督荆、梁等四州军事，荆州落入桓温之手。桓温(312—373)，字子元，谯国龙亢(安徽怀县西北龙亢集)人。颇具才识，时人称为英略过人。桓温也以此自豪，自比司马懿和刘琨。当路权贵所以看中桓温，一是谯国桓氏门第不高，较易控制。二是桓温之父桓彝在苏峻之乱中死于王事，桓温尚明帝女南康公主，过去又为庾翼器重，是帝室和庾氏较易接受的一个人物。三是桓温的才具在时辈中确属屈指可数，可以遏制庾氏。殊料桓温据有荆州，权势日大后，自恃才智，野心勃勃，以司马师和司马昭自况，扬言不能流芳百世，不惜遗臭万年。也即说桓温为取晋而代之，甘愿在所不惜。不过桓温行事谨慎，往往欲取先予，在威望不足时，力图通过立功立业为代晋铺平道路。当时，后赵据有黄河流域，前燕据有辽河流域，前凉据有河西走廊，成汉据有巴蜀。四者中，后赵势力正盛；前燕、前凉称臣于晋，奉行晋室正朔，是东晋的与国，实力仅足自保；成汉依违于晋、赵之间，经常联合后赵，威胁东晋。权衡利弊，桓温立功立业，只有从成汉始。成汉从李雄死后，内乱不已。李寿登位后，初期尚可，晚年盛筑宫室，徭役无度，惟以刑杀立威，百姓思乱者十室而九。其子李势继位后，有过之而无不及，贪恋财色，杀戮忠良，信用小人，内部厮杀不已。形势对桓温相当有利，不过溯江而上，素称艰险，桓温部下大都胆怯，又顾忌后赵乘势来攻。只有江夏相袁乔赞同，分析说：成汉依恃山川之险，不修战备已久，乘其不意，以精兵10000轻装捷进，待其发觉，我已扼其险要，可一战而擒。后赵听说我万里征伐，必然以为我有所准备，不敢轻动。即便渡江来犯，沿边诸军足可守境，无庸忧患。益州天府之国，取而有之，实为国家大利。桓温决心一定，便在永和二年十一月拜表朝廷。为防止当路权贵阻拦，不待朝命，表才发出，兵已出动。朝廷果然大哗，但兵已离境，只有忧心忡忡地默认。

桓温兵达青衣(四川名山北)，李势方命李福、李权和昝坚领兵设伏青衣山南之合水(四川乐山境内，青衣水之入江口)。三人意见不合，昝坚从江北渡，引军向犍为(四川彭山东)。桓温夺取彭模(四川彭山)后，留孙盛、周楚等统羸兵守辎重，只带三天干粮，倍道急进，三战三捷，击败李权，在犍为东面的沙头津北渡。待至昝坚发觉岔道，桓温已推进到成都近郊的十里陌。昝坚军不战自溃。李势倾巢出动，与桓温战于成都东面的笮桥。晋军前锋失利，参军龚护战死，乱箭直达桓温马首，晋军怯意渐生，桓温下令撤军，岂料鼓吏在慌乱中竟击鼓催战，先锋袁乔只好仗剑督战，逼迫士兵冲锋，居然反败为胜。李势力屈，弃城而逃，到达葭萌(四川广元南)，自缚请降。成汉亡，历六主，传国46年。至此，东晋才包有长江全境。

(蒋福亚)

冉闵滥杀胡羯

东晋永和五年(349)，后赵野心家冉闵为夺取统治权，利用和挑唆民族矛盾，蓄意制造的一场大规模民族仇杀。

咸康元年(335)，石虎杀后赵主石弘，夺取了皇位，由襄国(河北邢台)迁都邺城(河北临漳西南)。石虎(295—349)，石勒之侄(一说堂弟)，是十六国时期的著名暴君。早年随石勒征战，攻城略地，大都屠灭殆尽。登位后大兴土木，在襄国、邺城、洛阳、长安等地盛筑宫室，无不穷极奢华。石虎穷兵黩武，无年不战，动辄下令全国五丁取三、三丁取二为兵，仅咸康八年，为南征西讨，便征发工匠50万造甲仗兵器，船夫17万运输。结果船夫中三分之一淹死或为野兽所食。不久，进攻东晋，下令士卒每五人备车1乘、牛2头、米各50斛、绢各10匹，不备者斩。百姓被迫嫁妻卖子，自经道路者相继。石虎酷爱围猎，特意制造猎车千乘，规定自灵昌津(河南汲县东)起，南至荥阳(今属河南)，东及阳都(山东鄄城境内)为猎场，设御史监察，敢有犯其中禽兽者斩。石虎荒淫好色，“夺人妻女，十万盈宫”。残暴的统治导致人无宁志，流叛略尽，阶级矛盾和民族矛盾空前激化。为巩固统治，石虎又用“苦役晋人”办法压迫汉人，征发大量伕役在灵昌津投石架桥，饥疲而死者不可胜计。又征发26

万人修筑洛阳宫，16万男女修筑华林苑和邺北长城。昼夜施工，风雨无阻，死者数万。为震慑各族人民，特命其子石宣建天子旌旗，统军18万狩猎，下令所过之处，四面均以百里为度，为其驱赶野兽，贡奉衣食。若野兽奔逸，当之者鞭刑处置。士卒冻饿而死者数万，所过三州十五郡资财扫地无遗。接着，石宣弟石韬又照样办理，出并州，游秦晋，肆意祸害。石虎诸子均野心勃勃，残暴已极，为争夺帝位而自相暗杀，或谋刺石虎。石虎迁怒东宫卫士，十余万人被发配凉州。其中一万余人在永和五年(349)到达雍城(陕西凤翔)后，在梁犊领导下揭竿而起。义军破关斩将，逼长安，出潼关，鼓行而东。在各族人民支持下发展到10余万，屡败后赵军队。石虎无奈，被迫重用羌酋姚弋仲和氐酋苻洪血腥镇压。起义失败，暴君石虎也在惊怖中死去。诸子争夺帝位，大权落入冉闵之手。

冉闵(？—352)，内黄(河南内黄西北)汉族人。其父冉瞻在12岁时被石勒俘虏，石虎收为养子。因此冉闵是石虎的养孙，改姓石。石虎死后，石世和石遵争立，冉闵纵横捭阖于石虎诸子间，居官都督中外诸军事，掌握了军事大权，发动兵变，废石遵，立石鉴。不久又密谋杀石鉴。事泄后双方引兵攻杀，邺城内横尸相枕，血流成河。石鉴兵败被囚，冉闵下令，邺城内外六夷(匈奴、鲜卑、羯、氐、羌等内徙少数民族的总称)敢有执兵仗者斩。少数民族人民纷纷夺关或逾城而走。冉闵又下令，自今以后与官同心者留，不同心者随其所之，城门守卒不得留难。邺城周围百余里内汉族人民纷纷入城，少数民族人民去者填门。冉闵见少数民族人民不为其用，乃丧心病狂地下令：杀一羯人送首凤阳门者，文官晋位三等，武职悉拜牙门。一日之中，羯人被杀数万。冉闵犹感不足，亲自率领汉人杀戮羯人，不问贵贱和男女老幼，被杀者20余万。各地接到冉闵文书，竞起效尤，凡高鼻、深目、多须者均遭屠戮，羯族几乎灭种。永和六年正月，冉闵杀石鉴，自立为帝，建国号为魏。次年，攻杀在襄国称帝的石祗，后赵亡。

冉闵挑起的民族仇杀造成了极恶劣的后果，中原地区一时四分五裂，无月不战，遭到惨重的破坏。被后赵驱掠到河北的数百万各族人民成群结伙向故乡逃窜，狭路相逢，便是一场血腥攻杀，能回去的仅有十分之二三。中原田野荒芜，旱蝗遍地，尸骨成堆，饥荒严重，乃至人食人。在此期间，氐酋苻健乘机打回关中，建立后秦；前燕则推进河北。永和八年，魏昌廉台(河北无极境内)一战，冉闵兵败，为前燕统帅慕容恪生擒，送龙城(辽宁朝阳)斩首。　　(蒋福亚)

苻健入关

东晋永和六年(350)末，氐酋苻健打入关中，次年称王，建立前秦的历史事件。

苻健(317—355)，略阳临渭(甘肃秦安东南)人，氐族。父苻洪，部落小帅，家富千金。氐族是西戎的一支，自称盘古之后，两汉时大都分布在西汉水、白龙江、涪江上游及其支流的河谷地带，酒泉(甘肃酒泉)等地也有少量氐族活动。自汉武帝开通西南夷以来，氐族成了封建政府的编户，和汉族交错杂居，受汉族影响较深，大都会汉语，姓氏和汉族大体相同，有独自的语言，妇女皆编发。氐人以农耕为生，男耕女织是其经济生活的主体。农作物丰富多采，产量较高，麻织品颇有名，会染色，崇尚白、青、绛三种颜色。家庭饲养业较发达，所产马匹很有名。能冶铜铸铁及制作各种器具，善经商。贫富分化及阶级对立已十分明显。汉魏之际，曹操兵进关陇及汉中，为削弱蜀汉，增加关中劳动人手，六、七万余落氐族被掠徙关中，主要分布在扶风(治陕西兴平东南)、始平(治陕西咸阳西北)、京兆(治陕西西安西北)三郡。青龙四年(236)，又有6000余氐人被掠徙略阳，其中就有苻氏。永嘉之乱，豪杰并起，苻洪散家财广泛结交，图谋起事，被宗人苻光、苻突等推为盟主。但氐族历来分散，没有形成统一的力量，因此当刘曜占有关陇时，苻洪只有投靠刘曜。前赵灭亡，苻洪又投靠了后赵，因建议逼迁氐、羌到关中，大受石虎宠信，拜流人都督，统氐、羌、汉等20000余户徙居枋头(河南浚县西南)。屡有战功，又积极参与镇压梁犊起义，势力进一步壮大，拥众十余万。因和冉闵冲突矛盾，在永和五年称臣于晋，实质自立。在击败党于后赵残余势力的羌酋姚弋仲后，便想逐鹿中原。遭降将麻秋暗算，临终前遗言苻健从速入关，抢占形胜之地。当时关中群雄割据，京兆(治今陕西西安西北)杜洪势力最大，据有长安。为麻痹杜洪，减少来自后赵残余势力的挤压，苻健伪受后赵最后一个统治主石祗的官爵，在枋头修造宫室，督令部下屯垦，种植小麦，违令者斩。永和六年八月，一切准备就绪，苻健兵分两路，尽众西进。兄子苻菁统偏师从黄河以北进逼轵关(河南济源西北)，亲统主力，以其弟苻雄为先锋，自黄河以南推进潼关。行前，苻健激励苻菁：如若不胜，汝死河北，我死河南，不及黄泉，无相见也！潼关一战，苻健击败杜洪大将张先所统13000兵马，进逼长安。杜洪尽众而出，声势甚壮。苻健占卜，大吉，士气被鼓动起来，

一战而胜。杜洪退保长安。苻健分兵略定三辅，长安成了孤城，杜洪逃窜司竹（陕西周至东南）。十一月，苻健取有长安。十二月，苻健兵出上邽（治今甘肃天水），击斩后赵残余势力凉州刺史石宁，尽有秦、雍二州。次年，苻健称天王，建国号为秦，建元皇始（351），都长安，史称前秦。随即先后击溃东晋和前凉的来犯，又在永和八年采用坚壁清野战术，大败东晋的桓温。

苻健建国后，与关中百姓约法三章，留心政事，崇尚儒学，招揽人才，提倡节俭，轻徭薄赋，劝课农桑，不搞大规模的宫殿建筑；灾荒年景，又减免赋役。在丰阳（陕西山阳）设置荆州，利用该地是交通枢纽的优势，招诱南北商贾，开放关禁，发展过境贸易，解决国用。关中出现了初步复苏的现象，前秦的统治逐步稳定下来。（蒋福亚）

殷浩北伐

东晋中期，以司马昱和殷浩为首的当路权贵与桓温的一场权势之争。

永和五年（349），后赵主石虎死，北方大乱，北伐声浪日高。但东晋一代，当路权贵大多视北伐为畏途，并力阻他人北伐，以免功高难制。某些力倡北伐者又往往心怀叵测，桓温即其典型。自击灭成汉后，桓温声望陡增，当然不会白白放过这大好机遇，屡屡表请北伐。辅政司马昱等故意冷落，对其请求置之不理，同时拉出号称识度清远的殷浩参综朝政，与桓温抗衡。

殷浩（？—356），字深源，陈郡长平（河南西华东北）人。以擅长清谈美名天下，一再拒绝征辟，以至士林中盛传“深源不出，当如苍生何”！名望之高，当世莫及。参政后，专与桓温作对。桓温屡请无效，在永和七年重演兵进巴蜀的故技，拜表辄行，胁迫中枢表态。朝廷惶恐，由司马昱致书桓温，苦苦恳求，要桓温还镇，先宁国而后图外。桓温无奈，被迫接受。不过此举终于逼迫中枢在次年发布殷浩总掌北伐事宜。此时黄河中下游一片混乱，前燕乘势推进中原，苻健入关建立了前秦，以少量兵力游弋河南。殷浩并无政治才干，只是一个沽名钓誉、吹枯嘘生的玄学名士，毫无实战经验。这年六月，殷浩以谢尚和姚襄为前锋，推进河南。许昌附近诫桥一战，为前秦大将张遇击败，损兵15000。谢尚弃军而逃，许洛间50000民户被前秦掠徙关中。殷浩退回寿春（安徽寿县），并不吸取教训，企图通过收买前秦大臣雷弱儿等来个里应外合，颠覆前秦。前秦将计就计，引诱殷浩出击。永和九年十月，殷浩以姚襄为先锋，推进许、洛。

姚襄是羌族豪酋，在逐鹿中原失败后投奔东晋，驻屯淮南，不过是为了取得喘息的时机，积蓄力量，伺机打回关中。殷浩对此有所了解，根本不信任姚襄，但又不通过正当途径解决，而是扣押姚襄诸弟为人质，不断遣刺客暗杀姚襄。偏偏刺客都为姚襄收伏，具告实情。出军前，双方因为地盘和兵力已有一次正面冲突，姚襄遣使指责殷浩用心险恶。殷浩竟以何至如此推诿应付。此次行动，正是姚襄报复的大好时机。姚襄引兵北进，估计殷浩将到，突然诈令所部夜遁，设伏山桑（安徽蒙城东北）。殷浩统部来追，为姚襄大败，损折万余。奔窜谯城（安徽亳县）。北伐失败，桓温立刻上章弹劾。晋廷无奈，废殷浩为庶人，桓温加督司州，终于夺到了北伐大权。殷浩自以为算无遗策，至死都没有想明白为何会身败名裂，经常书写“咄咄怪事”四字聊以自慰。（蒋福亚）

桓温北伐

东晋中期，权臣桓温为取晋而代之，进行的三次北伐。

后赵灭亡后，前燕推进河北，自立为帝，声势颇盛。永和八年（352），苻健据有关中，建立前秦，但立国伊始，内部矛盾重重。次年七月，长安周围爆发了孔特、刘珍、夏侯显、乔秉等起兵，众过数万，频频向殷浩和桓温呼救。孔特等相继失败，胡阳赤和呼延毒仍据有霸城。桓温抓住时机，在永和十年二月令梁州刺史司马勋统本部沿子午道进逼前秦西境，自统步骑40000兵发江陵，取道襄阳，在南乡郡（郡治今河南淅川）舍舟登陆，直叩武关（陕西丹凤东南）。桓温分兵上洛（陕西商县），擒前秦荆州刺史郭敬，在青泥（陕西蓝田）大败秦兵，进逼长安。晋军入境，苻健倾国而动，令太子苻苌、弟苻雄领兵50000军于峣柳（蓝田东南）。一场鏖战，苻苌身受重创，大败而退。白鹿原（峣柳附近）再战，苻雄又败。秦军退守长安。桓温声震关中，三辅郡县纷纷归降，百姓大都持牛酒犒军，父老痛哭流涕地说：“不图今日复见官军。”但桓温此行目的在于提高威望，没有灭国的决心，所以进到灞上（陕西西安东）后，就驻兵不动。关中父老心意渐冷，由支持转向观望。苻雄乘势逐走司马勋，解除了西边的威胁。桓温进兵时所带粮草不多，本拟进入关中后就地筹粮。岂知苻健老谋深算，晋军来犯，便下令深沟高垒，芟苗清野。时至五月，桓温野无所掠，粮草匮乏，只有退兵。秦军衔尾追击，在白鹿原歼灭晋军10000余。六月，桓温还镇，此行只掠徙关中

3000余户而归。

永和十一年，桓温整军再出，目标是中州。此时河南一片混乱，势力较大者仅周成和羌酋姚襄。周成是冉闵余部，惊弓之鸟，据有洛阳。姚襄袭败殷浩后，屯驻盱眙(今属江苏)，招掠流民，众至70000，自置守宰。永和十一年在部下的劝说下自称大单于、大将军，倾巢北进。在外黄(河南民权西北)为晋将击败，转而夺取了许昌(今属河南)，进攻洛阳，与周成激战一个多月，相持不下。桓温乘势领兵而来。面临腹背受敌的窘境，姚襄退据伊水北岸，设伏以待。遣使桓温，声言投降。桓温对姚襄有所估计，回报说我自开复中原，敬礼陵寝，与君无关。要降可亲自前来，用不着派遣使者。乃亲披甲胄督战，姚襄大败西走。周成开城出降。桓温收复了洛阳。出师前，桓温连上十余道奏章，吁请还都，建议把永嘉之乱以来南渡的百姓全部遣返北方。攻占洛阳后，桓温再次上章还都。南渡士族在数十年中，早已在南方广占田园，如今要他们“舍安乐之国，适习乱之乡”，当然不愿。何况真的还都，必将落入桓温股掌，故当朝权贵一致反对。桓温此议，不过是欲擒故纵。果然，在其逼迫下，晋廷任桓温为侍中、大司马，都督中外诸军事，赋予假黄钺殊礼。

桓温回师后，经过一系列的角逐，在兴宁二年(364)晋录尚书事，遥领扬州牧。至此，荆、扬两地全入其手，东晋大局由其操纵；兄弟子侄，布列方镇，桓氏势倾天下。桓温决心借北伐而代晋。无奈晋室多故，哀帝司马丕去世，其弟琅邪王司马奕继位。值此重大变故，桓温当然难离汛地，免得大权旁落。太和四年(369)，桓温终于筹措北上。在此期间，前燕已占据洛阳，尽有河南，扩张到了淮北。不过此时的前燕已是外强中干，国库空虚，民户隐匿和逃亡现象严重，阶级矛盾尖锐。前燕主慕容暐唯奢玩是务，深为桓温忌惮的辅政慕容恪已死，继为辅政的慕容评猜忌成性，贪得无厌，政治大坏。统治集团内部权势之争愈演愈烈。形势对桓温相当有利。太和四年四月，桓温领兵50000由姑孰(安徽当涂)出发，进入金乡(今属山东)。其亲信郗超提出两个方案：一是驻兵河、济间，积储粮草，明年进兵。一是出其不意，直逼前燕国都邺城(河北临漳西南)。桓温认为前者太缓，后者过急，亲统水师在七月抢占了枋头(河南浚县西南)。枋头距邺城仅200余里，前燕举朝惊骇，拟逃回故都龙城(辽宁朝阳)。谋士申胤指出：以今日桓温之声势，似有所为。其实必无成功之理。晋室衰弱，朝臣对桓温专制心怀不满，必将从中作梗，以败其事。桓温恃众而骄，不善应变，举众深入，值此可乘之机，却逍遥中流，守驻枋头，欲待持久坐收全胜。如若粮草不继，声势将竭，必然不战自败。这里所说粮草，确是桓温的致命伤。有鉴于此，桓温特命冠军将军毛宝生开通泗水和巨野泽(山东巨野北)之间的运道，名曰桓公渎，确保粮运。可北方秋冬雨水少，桓公渎开通了，水源却严重不足，为此桓温又命豫州刺史袁真进占谯郡(郡治安徽亳县)和梁国(国治河南商丘西南)，企图打开荥阳(今属河南)石门(即汴口)，引黄入汴，沟通淮泗。桓温见识不谓不高，但被慕容恪称为天资英杰、智略超世的前燕吴王慕容垂同样考虑到了。当其在前燕在一片慌乱中主动请缨，获得南讨大都督名号，也即阻击桓温的全权后，立刻命慕容德统兵10000、刘当统骑5000，死死守住石门，又令豫州刺史李邽统州兵断了桓温的粮道。时至九月，河道干涸，船只全部搁浅。桓温被迫舍舟登陆，自东芜(河南延津东北)经仓垣(河南开封东北)撤向襄邑(河南睢县西)。慕容垂紧紧跟随。700余里的撤退，晋军斗志全消。慕容德早就设伏以待，与慕容垂一个夹击，桓温损军30000。退到谯城，应前燕之请，前来支援的前秦大将苟池早已在此以逸待劳。桓温又丧师万余，狼狈退奔山阳(江苏淮安)。桓温迁怒袁真。袁真为了身家性命，据寿春投降了前燕，才收复的淮北丧失殆尽，淮南也裸露敌前。经此惨败，桓温威名大损，转而采用废司马奕为海西公、立司马昱为简文帝等活动立威，继续为代晋而奋斗。但桓温毕竟年事已高，疾病缠身，当路权要谢安、王彪之和王坦之等百般拖延阻挠。桓温目的难达，死于宁康元年(373)。

(蒋福亚)

王猛佐苻坚治秦

东晋升平元年(357)，前秦主苻坚任用汉人王猛励精图治，为统一北方奠定了基础。

永和十一年(355)，前秦主苻健死，子苻生继位。升平元年，苻坚发动政变，夺取了君位。苻坚(338—385)，字永固，苻洪之孙，苻雄之子。深受汉文化影响，少怀大志，以经邦济世、一统天下自许。夺取君位后，即任用汉人王猛励精图治。

王猛(325—375)，字景略，北海剧县(山东寿光东南)人。出身贫贱，流落华阴(陕西华阴东南)，以贩畚为生。博学多才，尤好兵策，反对浮华，务在实学，声名早著。因吕婆楼的推荐结识苻坚。两人一见，款若生平，谈及兴废大事，更为投机。苻坚赞扬王猛为“一时奇士”，称结织王猛“若玄德之遇孔明也”。因

此，政变一成功，即任王猛为始平（陕西咸阳西北）令，整治在前秦开国过程中建有大功的枋头旧部。一年之中，王猛连升五次，位至尚书令，权倾内外。王猛联合氐族中志同道合的权贵右仆射梁平老、左仆射李威、领军将军强汪、司隶校尉吕婆楼和汉人御史中丞邓羌等，以强化专制主义中央集权为核心，打击不法氐族豪贵为突破口，进行改革，整顿纲纪和吏治。强太后之弟强德，平素以豪横著称，公开抢掠他人财货子女。王猛一掌权，立刻收斩。苻坚得知，驰诏赦免，也没有来得及。几十天中，被王猛诛杀和刑免的贵戚权豪达20余人。统治民族中的不法权要亦遭严惩，其它各族的权豪只能忍气吞声，善自收敛了。在此基础上，王猛协助苻坚制定了一系列的法规和制度。为时不久，苻坚由衷地赞叹：吾今始知天下之有法也，天子之为尊也。王猛掌权期间，整军讲武，大力选拔人才，整顿吏治，贬逐尸位素餐者，崇兴儒学，倡导封建伦理道德，力求无罪不刑，无才不任。前秦的行政效率相当高，社会风气也有转变，成为十六国时期最有气度和规模的一个政权："百僚震肃，豪右屏气，路不拾遗，风化大行。"

氐族权贵强烈反对王猛掌权，在前秦建国过程中立有大功的权豪樊世当众指责王猛：君无汗马之劳，何敢专管大任？岂不是我耕种而君不劳而食吗！扬言必杀王猛，否则就不活在世上了。苻坚借口杀了樊世，当众谩骂或鞭笞许多反对王猛的氐族豪贵，保证了王猛各项措施的推行。苻坚精通经史，凡有举动，经常以历史上的明君圣主为效法的榜样，君臣间的对话充满了历史典故。在其统治前期，善于纳谏，对倡导儒学尤为醉心，遣使收罗和整理儒家经典，兴建学校，规定中外四禁、二卫、四军（前秦各支军队的名称）长上将士都得入学就读，甚至在后宫也设置学校，选择有文化的宦官宫女为博士，教授嫔妃宫女。自诩在振兴儒学上要和汉武帝、汉光武帝比美。初期每月三临太学，考试诸生，后来一月一临。此举有利于培养人才和促进民族融合。

在王猛的建议下，苻坚前期以偃甲息兵、休养生息为基本国策；大力提倡节俭，禁止后宫穿锦着绸，不准衣着曳地；不搞大规模的宫殿建设；灾荒年景，一再减免租赋；经常遣使巡行州郡，检查吏治，劝课农桑，兴修水利。苻坚曾征发王公以下富豪的奴仆30000余人，开凿泾水上游，引渠灌溉。又针对关中干旱严重，大力推广两汉以来先进的耕作技术区种法。关中经济一度欣欣向荣，从长安到诸州，20里一亭，40里一驿，沿路都有工商贩贸，行旅商贩均可取给于途。"关陇清晏，百姓丰乐"，"兵强国富"。在尸骨累累，生灵涂炭，疮痍满目的十六国时期，实属罕见。如此政治和经济，为其统一北方奠定了基础。

（蒋福亚）

庚戌土断

东晋兴宁二年（364）三月初一，桓温为统一地方行政、整理户籍、增加赋役收入所采取的措施。

永嘉之乱，民族矛盾上升为社会主要矛盾。其后120余年间，北方除前秦统治时出现过短暂的统一外，始终处于分裂割据状态，战乱不已，生灵涂炭。中原人民不堪少数民族统治者的残酷掠夺和屠杀，为逃避战乱，纷纷向较为安定的辽东、河西及长江流域一带流徙，其中以流向长江流域一带的为多。每逢少数民族政权风雨飘摇，统治绽露缺口，就会掀起一股股徙民浪潮。据近人统计，自永嘉之乱至刘宋末年，徙至长江中下游及淮南的人口达90余万，相当于西晋全盛时中原人口的八分之一，东晋南朝人口的六分之一。徙民较集中于相当今天的江苏、安徽、四川、陕南、湖北一带，江西、湖南等地亦有少量分布。仅江苏一地，侨寓人口多达26万，超过土著20000余。以上统计仅是封建政府控制的人口。中原人民背井离乡南下，到达新的地方后，无依无靠，南北权豪乘机兼并隐匿，沦落为依附农民，不登版籍的状况相当严重；还有为数不少者甚至被迫卖身为奴。奴婢律同畜产，不入户籍。若把后两种情况考虑进去，实际南下人口，将远远超过上述统计数字。中原人民南下，初步改变了长江中下游、特别是太湖平原地广人稀的面貌，也带来了先进的生产技能和工具，有力地促进了南方的开发。东晋南朝，太湖平原飞速发展，成为我国新的财赋之区，与此密不可分。对于如浪潮一般南徙的人民，东晋的措置是开放山林川泽，设置侨州郡（流亡政府）予以安置。在侨州郡注籍的民户享有"优复"，也即免除赋役的优待。侨州郡的设置有利于南徙人口在新的地区求生，也吸引着北方人民不断南徙。当时在南徙人口较密集的地区，侨郡县之多，简直数不胜数。仅晋陵（郡治今江苏常州）一地，就设置了十五六个郡级政府和60余个县级政府。久而久之，它给封建政府的统治及管理带来了极大的紊乱；封建政府也决不愿侨寓人口长期享有优复权益，"土断"应运而生。所谓"土断"，便是合并或裁撤一些侨州郡县，使其由流亡政府成为具有相应辖地的地方政府。新设的地方政府，或用原名，或用侨州郡县之名，并不强求一律。侨寓人口一律就地落籍，承担各

种赋役。因而土断的要旨是统一地方行政，整顿户籍，增加赋役对象。随着北方人民继续南下，东晋南朝仍不断设置侨州郡，同时又不断进行土断。侨州郡和土断在东晋南朝可说是并行不悖的两项措施。东晋土断始于成帝咸和年间(326—334)，至桓温这次已是第三次了。这次土断雷厉风行，较为彻底，东晋宗室彭城王司马玄因藏匿五户，被收付廷尉。仅会稽(郡治今浙江绍兴)一地，便有30000余口回归版籍。桓温的目的在于保障国用和征发京口(江苏镇江)一带侨户丁壮为兵，筹措北伐。后者虽未实现，这次土断在东晋南朝历史上却相当著名，收到了“财阜国丰”的实效。古人有以甲子记日的习惯，兴宁二年三月初一是庚戌日，故史称其为“庚戌土断”。

(蒋福亚)

苻坚统一北方

东晋太和五年(370)至太元元年(376)间，前秦主苻坚四出用兵，先后击灭前燕、前凉和代国等，实现了北方的短暂统一。

苻坚任用王猛励精图治时，中国的形势是这样：东晋据有长江全境及交广一带；前燕据有河北及河南大部分地区；前凉据有河西走廊；鲜卑拓跋部正崛兴于燕代一带，号称代国。此外，在仇池(甘肃成县)有氐族杨氏建立的地方性割据政权，名曰前仇池国，立国已达70余年之久；鲜卑乞伏部活跃于陇西，势力不断壮大；吐谷浑游牧于今青海西南部、四川西北部，逐步向阶级社会迈进。前秦在北方最强大的对手是前燕。双方虎视眈眈，都想伺机吞灭对方。

前燕推进中原时，统治集团已日趋腐朽。慕容暐在位期间(360—370)，更是江河日下。慕容暐长于深宫，锦衣玉食，不经世事，秉性懦弱 。登位后不理政事，奢玩是务，盛兴宫室，后宫4000有余，供奔走服役者十倍于此，日费万金，府库为空。赖辅政太原王慕容恪富有统治才能，才维持着政局的稳定。慕容恪一死，权势欲极旺、猜忌成性、贪得无厌的上庸王慕容评辅政，结果政以贿成，官以贿选，各级官吏无不敲诈勒索。百姓穷敝，农桑俱废，民不聊生，四散流亡。权豪们肆意鲸吞，私家控制的人口超过了封建政府，财政危机更加严重。为增加赋役，悦绾建议括户，整顿户籍。没有多久，便括出20余万户，100余万人。括户本待大举，但此举侵犯了权豪的利益，悦绾被暗杀(一说悦绾病死)，括户被迫中止。统治集团内部矛盾更加激烈，稍有才干者大都被排挤，宗室吴王慕容垂也投奔了苻坚。前燕版图大于前秦，人口是前秦和东晋的总和，在如此统治下，军队虽多，却是武备不修，逃亡相继。

苻坚早有伐燕之意，在陕东一带屯积粮草。慕容垂来奔，苻坚感到灭燕条件已经成熟，遣郭辩为使，前往燕都邺城(河北临漳西南)探察虚实。郭辩回报：前燕朝廷毫无纲纪，王公大臣都是庸才，只有皇甫真一人头脑清醒，却起不了任何作用。太和五年，苻坚命王猛统邓羌、张蚝、杨安等，率步骑60000，开始了灭燕之役。

王猛破关斩将，攻克壶关(山西长治东南)和晋阳(山西太原南)，洞开了通向邺城的大门。慕容暐倾国而动，命慕容评统军40万阻击。两军相遇于潞川(今浊漳水)。慕容评驻军不动，力图利用王猛孤军深入的弱点拖垮秦军。这一带水源不足，饮水奇缺，慕容评霸占山、泉，军民用水一律缴绢，绢一匹，水二石；樵采柴草，亦得缴钱。慕容评钱绢山积，前燕士气被瓦解殆尽。王猛遣郭庆领骑兵5000，乘夜绕道燕军后方，袭击慕容评辎重，烧个罄尽，火光冲天，映照邺城。慕容暐焦急恐惧，遣使怒斥慕容评：王，高祖之子，应以宗庙社稷之忧为忧，为何不恤战士和勋劳，专以聚敛为务！府库及内藏珍宝财货，朕愿与王共有，岂能独爱。若贼军冒进，国破家亡，王所有钱帛将安置何处？皮之不存，毛将焉附！快将钱帛散给三军，以克敌制胜为当务之急，并敕令慕容评立刻出战。慕容评被逼向王猛挑战。王猛慷慨誓师：今与诸君深入贼地，当竭力死战，有进无退，共立大功，以报国家。受爵明君之朝，庆觞父母之室，此其时也！秦军士气昂扬，破釜弃粮，呐喊冲锋。一比七，前燕在人数上占有绝对优势。王猛对手握精兵强将的邓羌寄予厚望：成败在此一举，非将军不足以破劲敌。邓羌乘机要挟：如果任我为司隶校尉，公勿以此战为忧。王猛直言相告：此非吾所能决。邓羌不悦而退。秦燕鏖战甚急，邓羌高卧不动。形势危急，王猛被迫从权从宜，答应邓羌。邓羌挥部往返冲杀，燕军受挫败退。是战歼敌50000。秦军乘胜追击，又俘斩10万。王猛东逼邺城，号令严明，军无私犯，法简政宽，很快安定了邺城周围的民心。秦军攻城，邺城兵变，开城投降。慕容暐统十余骑出逃，被秦军追获，前燕亡。

东晋咸安元年(371)，苻坚命苻雅领兵70000击灭了割据仇池弹丸之地的前仇池国。迫于前秦声威，吐谷浑部归降。同年，苻坚命王统兵进陇西，征服了鲜卑乞伏部；朱彤和毛当统兵50000袭取了东晋的梁、益二州。

前凉自张骏死后，很快就走完了它全盛的历程，

日趋衰败，内部政变不断，10 年之中，四易其主。隆和二年(363)，张天锡夺取了君位。张天锡是个贪暴昏庸的统治者，不理政事，成天沉湎于酒色，纵欲享乐。前凉境内贪官污吏横行，百姓生活极端困苦。太元元年，苻坚命苟苌等统兵 13 万，在秦州、河州等地驻军的配合下，发动了灭凉之役。前凉毫无抵抗能力，前秦大军压境，凉军非降即逃。仅仅一个月时间，前凉就被击灭。

当时拓跋什翼犍统治代国。代国名虽为国，实质上正处在原始社会末期，什翼犍也只是部落联盟的最高军事首脑而已。联盟成员之一铁弗部酋长刘卫辰为争夺这个位置经常与拓跋部兵戎相见，失败后投靠了前秦。太元元年，苻坚在击灭前凉后，即命苻洛统兵 30 万，以刘卫辰为向导，分兵数道，袭击什翼犍政治中心盛乐(内蒙古呼和浩特西南)，一举成功，统一了北方。

太元三年，苻坚命其庶长子苻丕统军 17 万，兵发四路，攻取东晋的襄阳。鏖战一年，生俘襄阳守将朱序。太元七年，又命吕光领兵 70000 西征，征服了西域。至此，前秦进入极盛，其版图东极沧海，西并龟兹，南包襄阳，北尽大漠，只有东晋偏居江东南一隅与其相抗了。　(蒋福亚)

吕 光 西 征

东晋太元八年(383)，前秦主苻坚命吕光统军 70000 西征，是两汉以来中原王朝经营西域用兵最多的一次。

丝绸之路是海运开通以前中外经济文化交流的主要通道。自东汉中后期至三国，丝绸之路由南北两道发展成南、中、新三道。由玉门关(甘肃敦煌西北)西出，经婼羌(新疆婼羌附近，十六国时期西域鄯善国王廷)，越葱岭，入大月氏(今阿富汗及巴基斯坦)为南道；由玉门关西出，经都护井、居庐仓、沙西井，越白龙堆(均在罗布泊东)，到古楼兰(在鄯善国境内)，西诣龟兹(王廷延城，今新疆库车)，至葱岭，为中道；由玉门关西北出，避开白龙堆，经戊己校尉(新疆吐鲁番高昌遗址，当时称高昌郡)，经车师前王国(新疆吐鲁番交河城遗址)，取道焉耆(今属新疆)，达龟兹，西行，为新道。十六国初期，鄯善和龟兹称雄西域，被前凉征服。前秦时，鄯善、车师等与前秦交好；龟兹和焉耆称雄西域，与前秦交恶。焉耆位于高昌与龟兹间，四周有大山，道路险要，控制周围尉犁(新疆库尔勒东北)、危须(焉耆东)及山王国(焉耆东南)等小的城邦国家。龟兹在焉耆西，塔里木河流经境内，既利农耕，又宜放牧，物产丰富，冶铁业发达，以冶铁控制周围 36 个城邦小国。龟兹王廷延城内外三重，占地与长安大体相同，十分坚固，其影响远远超过焉耆。前秦崛起后，西域各国纷纷遣使，丝绸之路上商贩日增，长安一度成为中西交流的中心。太元五年，到长安通使贸易的就有西域及海东等 62 国。因焉耆及龟兹作梗，中道和新道受阻，西域诸国亟盼前秦兵发西域，维护丝路畅通。其中尤以鄯善及车师前部王最热心。

是否发兵西域，前秦争议极大，朝中反对者居多，以苻坚弟苻融最烈。理由是连年战争，国敝民穷，士兵厌战情绪严重。但一连串的胜利引发了苻坚的骄侈心，加上热衷西域的名马珍宝，想网罗西域佛教首领鸠摩罗什，借助佛教进一步巩固统治；并企图在倾国而动、兵出东晋的前夕，征服西域，解除后顾之忧。因此苻坚力排众议，在太元八年正月命吕光统步骑 70000，以鄯善王休密驮和车师前部王弥寘为向导，发动了西征。

吕光(338—399)，字世明，略阳(甘肃庄浪西南)氐族人，号称智勇双全，屡有战功。此次西征，进展顺利，焉耆不战而降。十二月，秦军进达延城城下。龟兹王帛纯不服，据城抵抗。吕光频频进攻，均难得逞，被迫在延城南五里扎营，深沟高垒，作持久之计。双方相持到次年五月。帛纯尽散财宝，招诱温宿、尉头(均在龟兹以西)等 30 余国兵马，总计 70 余万人马与吕光决战。西域诸国都是互不统属的城邦小国，大军云集后也是各自为战，何况他们对中原王朝素有好感，即便龟兹内部，意见也极不一致。帛纯之弟曾到过长安，表达了归顺的意向。精神领袖鸠摩罗什则反对与中原王朝为敌。因此七月城西一战，吕光歼敌万余后，30 余国全部归顺。帛纯收拾珍宝出逃，延城为秦军攻占。击败龟兹，前秦威震西域。西域诸国不远万里前来奉献两汉时所赐节传，希望得到前秦的重新认可。太元十年三月，吕光凯旋，西域使臣商贩组成了 20000 余头的庞大的骆驼队，携带稀世珍宝、奇伎异戏、殊禽怪兽，随大军东来，是丝绸之路上的空前壮举。由于苻坚在淝水惨败，这支蔚为壮观的队伍没有进入中原，成为吕光割据河西、建立后凉的基础。尽管如此，此行在我国文化史上有相当重要的地位，如这支队伍中的龟兹乐，对日后河西走廊及中原音乐的发展，具有不小的影响；而随军东来的鸠摩罗什，则对我国佛教的发展，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蒋福亚)

淝水之战

太元八年(383),东晋在淝水击败前秦,是导致南北长期对峙的关键性战役。

太元七年十月,前秦主苻坚召集群臣,提出了独自酝酿已久的设想:倾国而动,击灭东晋,一统中国。遭到以其弟阳平公苻融为首的绝大部分大臣的激烈反对,理由是:一、东晋虽然局居一隅,但如今君臣和睦,将相得人,没有衰败迹象。谢安和桓冲均堪称时杰。二、晋中宗(元帝)是在夷夏共同拥戴下称帝的,如今"遗爱犹在于人"。也即说如今仍然是人心思晋的局面。三、长江自古号称天堑,难以逾越。四、连年不断的战争造成"兵疲将倦",厌战情绪严重。只有羌族豪贵姚苌及慕容鲜卑豪贵慕容垂竭力赞成,认为此战是小不敌大,弱不胜强,东晋必败。苻坚欣喜,对此二人宠信有加。其实此时前秦境况已大非昔比:一、苻坚的民族政策虽比汉、赵等国好,但每逢战争,同样大量掠徙人口,民族矛盾为此激化。此时民族融合、包括胡汉贵族的勾结尚处在初步阶段。苻坚虽重用王猛,却仍有戒心,对非关中或枋头旧部的汉族地主更是疑虑重重,少数民族豪贵在前秦军政领域中的地位比汉族地主高。二、苻坚后期,一改过去节俭之风,追求宫室器玩,奢侈豪华之风日盛。连绵不断的征战造成道殣相望,兵疲于外,民困于内,阶级矛盾激化,结果是关中骚动,"盗贼"并起。三、在阶级矛盾和民族矛盾的激荡下,统治集团内部矛盾加剧。太元五年爆发了苻洛的叛乱,不久又发生了苻阳的未遂政变。苻坚镇压苻洛叛乱后,分遣氐户坐镇各方,赋予氐族豪贵世代据有其封地的特权,定名为"新券主",借以巩固统治。氐户上路时悲号哀恸,酸感行人。氐族内部矛盾亦表面化。但为胜利冲昏头脑的苻坚,此时骄侈心已难遏止,拒绝苻融等进谏,断然下令征用全国公私马匹,平民每十丁抽一为兵;富家子弟年20以下应募,有才用者皆拜御林郎。富家子弟希冀功名利禄,应募者达30000余人。大征发造成全国人心惶惶,连长安也鸡犬不宁,每夜群犬大吠,众鸡夜鸣,厩马惊逸。反对派们动员出深得苻坚宠信、言听计从的佛教领袖道安婉言谏阻,亦遭苻坚拒绝。争论如此激烈,后宫也卷了进来。苻坚宠妃张氏规劝苻坚听听群臣的意见,幼子苻铣坚决反对伐晋,均遭严厉斥责。苻融一再谏诤,告诫苻坚:自古以来,穷兵黩武,没有不亡国的。甚至泪流满面托出郁积心头已久而又难以出口的话:国家,戎族也,正朔不属我所有。东晋是中华正统,天意决不会使彼绝灭。提醒苻坚,王猛临终前曾遗言千万不要伐晋,应逐渐翦除羌族和鲜卑的势力。指出如今鲜卑、羌、羯布满畿甸,执权履职,势倾劳旧。若倾国而去,留弱卒数万守京师,决非万全之策。如有风尘之变,宗庙可危!强调鲜卑和羌族是氐族的仇敌,正想伺机复国,决不能轻信其言。富家子弟无军旅之能,只会阿谀奉承,求取功名利禄。因此,如果信而用之,轻举大事,只怕非但难以成功,还将后患无穷,届时将懊悔莫及!苻坚勃然大怒,指责苻融不达变通之意,声言我劲卒百万,文武如林,资仗山积,足以投鞭断流。鼓行而摧遗晋,犹如秋风之扫落叶,安有不克!苻坚自认此战必胜,命令在长安城中起造安置东晋君臣的邸宅。在太元八年任苻融为前锋都督,统步骑25万先行,亲统主力殿后。此役,总计步兵60余万,骑兵27万余。各路大军相继开进,逶迤千里,旌旗蔽日,前后相望。苻融会合徐、淮驻兵,合计30余万推进淮南。这时苻坚才到达项城(河南沈丘),幽冀之兵则开达彭城(江苏徐州),凉州之众方到咸阳(陕西咸阳东北)。

秦军甫出,东晋即命谢安统筹全局,谢石为征讨大都督,谢玄为前锋都督,与将军谢琰、桓伊、刘牢之等统北府兵80000抵抗。谢安(320—385),字安石,陈郡阳夏(河南太康)人,出身高门大族,在桓温死后执掌东晋大权。此时前秦已蒸蒸日上,屡次兴兵南下,梁、益二州和襄阳重镇相继失守。谢安估计秦晋间迟早必有一战,为此预先作了一些准备:一、修造宫室,抬高皇室地位;妥然安置桓氏势力,起用失势的士族,缓和统治集团的内部矛盾。二、减免一些赋役和商税;蠲除太元三年以来百姓所欠租税;规定非军国所需的劳役一律暂停;裁减烦费冗员,节省开支;废除度田收租制,规定王公以下一律按口纳米,年三斛;免除士兵家属全部赋役。缓和阶级矛盾。三、以三吴为重点,整顿户籍,增加政府收入。四、整编京口(江苏镇江)和淮南一带流民武装,组成一支有较强战斗力的军队,改变了东晋建国以来荆州以甲兵之重威制扬州的态势。这支军队在对北方少数民族政权的战争中屡屡获胜,获有"北府兵"的美称。这些措施收到了君臣相安、上下一致对敌的效果,面对前秦大军压境,谢安从容调度,镇之以静,稳定了人心。

十月,秦军前锋攻克寿阳(安徽寿县),晋将胡彬退守硖石(寿县西北淮河两岸山峡中的军事据点)。苻融命梁成统军50000推进洛涧(安徽淮南市东洛河),竖栅截流,隔断淮河,堵住了胡彬的退路。谢玄统晋军主力西上,进达距洛涧25里处,畏惧梁成兵威,停驻不动。胡彬粮草将尽,遣使报告谢玄:贼军势

盛，我已粮尽，矢志尽节，恐再也难见大军。信使被秦军截获，本来力主稳妥的苻融见此后一反常态，认为一击可胜，驰报苻坚：贼少易俘，惟恐其逃逸，当今之宜，应命诸军快速推进，一战而擒贼帅。苻坚欣喜过望，留大军于项城，选取轻骑8000，昼夜兼程，驰赴寿阳。严令诸军：敢有言朕之寿春者，拔舌！又命东晋降将朱序赴晋营敦劝谢石归降。朱序不忘故国，悉告秦军虚实，建议晋军先敌而动。告诫说，如果苻坚百万大军齐集，就难以为敌了。现今乘其未集，发动攻击，必可得志。谢石犹豫不决，谢玄力主进击。十一月，谢玄命刘牢之统5000精锐进击洛涧。梁成沿涧严阵以待。晋军慷慨赴敌，高呼竞渡，以一当十，猛扑敌阵，斩杀梁成及其弟梁云等。秦军大乱，争渡淮河。刘牢之纵兵追击，秦军损失惨重，50000大军土崩瓦解。晋军水陆并进，隔淝水与秦军对峙。

初战大捷，晋军士气昂扬。秦军损兵折将，惊悸不已，畏敌之心陡增，士气一落千丈。苻坚登上寿阳城头，见晋军布阵严整，旌旗招展，心意紊乱，误认八公山（寿阳城东北五里）上的草木为晋军，回顾苻融说：此亦勍敌，何谓弱也！谢玄遣使苻坚，请秦军稍退，让晋军渡河决战。前秦诸将大都反对，苻坚和苻融想乘晋军半渡时突然袭击，一举而收全功，乃挥军后撤。秦军一动，晋军竞渡猛攻，锐不可挡。秦军士气已竭，一退不可复止，队不成列。苻融驰骑掠阵，企图稳定军心，战马被乱军冲倒，为晋军所杀。主帅一死，秦军更为惶恐，朱序乘乱在阵后大呼：秦军败矣，秦军败矣！秦军土崩瓦解，自相践踏或落水而死者不可胜计，淝水为之不流。晋军乘胜追击，杀到寿阳城西北30余里的青冈山才收兵。苻坚身中流矢，单骑逃到淮北。余部弃甲宵遁，听到风声鹤唳，也以为晋军追来，昼夜不敢停留，草行露宿，饥疲冻饿而死者十有七八。这就是淝水之战。其后苻坚虽然收集余众回到长安，但慕容垂和姚苌等相继起兵自立，貌似强大的前秦顷刻间四分五裂。太元十年，苻坚被后秦主姚苌擒杀。太元十九年，后秦击灭前秦。前秦历五主，立国凡44年。

淝水之战后，北方又陷入战乱之中，再也无力南下，南北对峙的局面由此得以延续。

（蒋福亚、周　昕）

慕容垂建后燕

东晋太元九年（384），慕容垂在荥阳称燕王，两年后在中山称帝，实现了慕容鲜卑复国的愿望。

前燕灭亡后，慕容权贵矢志复国，昔日为前燕所用的关东士族亦不断为此奔走呼号，把希望寄托于慕容垂。慕容垂（326—396），字道明，慕容皝之子，有军政才能。太和四年（369）在襄邑（河南睢县西）大败桓温，因功遭忌，被迫投奔了苻坚，受苻坚信用。支持苻坚发动灭晋之役，实质是想伺机复国。淝水之战时隶属苻融，受命兵进郧城（湖北安陆），牵制东晋荆州军队。前秦惨败，诸军溃散，唯其军独全。苻坚狼狈来奔，慕容垂的子侄都主张乘机杀苻坚，取而代之。慕容垂说君子不怙乱，不为祸先，且要报苻坚知遇之恩，以便日后可“以义取天下”。把军队交给了苻坚。其实慕容垂深知江汉一带决非其立足之地，关中又急切难图，只有回到关东，利用前燕昔日余烬，才有复国的可能。同时也有必要再观察一下形势，以求万全。不久，丁零族豪酋翟斌在新安（今属河南）起兵反秦，关东骚动。机会到来，慕容垂借口祭扫先人坟墓，请准苻坚，东返邺城（河北临漳西南），暗中与前燕旧臣密商复国大计。时苻坚庶长子苻丕镇邺，对慕容垂东来惊疑不定，没有把柄，不便问罪，只好严密监视。但苻坚却想利用慕容垂在关东的威望，镇压翟斌，乃诏令慕容垂为帅。苻丕无奈，给慕容垂羸兵2000，又命苻飞龙统氐骑1000为副，严加防范，伺机翦除。苻飞龙少不更事，泄露机密。军达汤池（河南安阳附近），慕容垂召集部众，和盘托出苻丕密谋，激起众怒。又至河内募兵8000，突然袭击苻飞龙，将氐骑歼灭殆尽。其子慕容农等闻讯，在列人（河北肥乡东北）召集鲜卑、乌丸、匈奴等数万起而响应。在前燕旧臣的劝说下，翟斌归降慕容垂。慕容垂声势大张，乃于太元九年正月在荥阳（河南荥阳东北）称燕王，改元燕元年，率众20万进攻邺城。

南有慕容垂，北有慕容农，苻丕权衡轻重，决定命石越统精兵万余，先歼灭声势较小的慕容农，再对付慕容垂。慕容农装备极差，但志在复国，部下又都是不甘心前秦统治之徒，列人城西一战，个个奋勇，结果石越授首，全军覆没。慕容农立刻移师，与慕容垂会合，同攻邺城。石越是前秦名将，一战毙命，关东震动，所在蜂起，前秦在河北只剩下了邺城一地。邺有三台之固，墙高城坚，资储甚丰。慕容垂云梯地道，诸路并攻，均难得手，乃在肥乡（今属河北）筑新兴城安顿老小，对邺城采取长期包围的策略。苻丕四出呼救，但此时关东已乱，关中岌岌可危，各地方镇或则自保不暇，或则图谋自立，所以苻丕只有孤军死守。双方相持一年有余。慕容垂引漳水灌邺，邺城变成一片废墟。在万分危急时，苻丕曾联合东晋夹攻慕容垂，把邺城让给了东晋的军队。为时不久，慕容垂击

败晋军，晋军后撤，苻丕又回到邺城。太元十年七月，苻丕再难坚持，统余众撤向并州。河北为慕容垂占有。

在慕容垂和苻丕争战的破坏下，河北地区农桑俱废，饥荒严重，只剩下中山（河北定县）一地经济尚可。次年，慕容垂乃决定奠都中山。由燕王改称皇帝。史称后燕。太元十七年，后燕攻占滑台（河南滑县东），击灭了丁零族翟氏建立的魏国。十八年攻占长子（山西长治西），击灭了占有今山西部分地区的西燕。后燕是十六国后期在北方占地最大的一个割据政权，全盛时南至琅邪，东迄于海，西届汾河，北暨燕代，约当今河北、山东、山西诸省及河南、辽宁的一部分。后燕历六主，立国凡 26 年，在义熙五年(409)政变中亡国。（蒋福亚）

慕容氏建西燕

东晋太元九年(384)，慕容泓和慕容冲扰乱关中，先后称燕王和皇帝，建立了西燕。

慕容垂起兵关东，亡国失土的慕容权贵欣喜若狂。慕容泓和慕容冲也即刻起兵。慕容泓是前燕亡国之主慕容暐之弟。前燕亡国后，任前秦北地（陕西耀县）长史，听说慕容垂兵围邺城（河北临漳西南），乃亡命关东，收集鲜卑数千，进屯华阴（陕西华阴东南）。击败前秦将领强永后，自称燕王（该年即为西燕始年）。祸乱由关东发展到了关中。慕容冲亦是慕容暐之弟，前燕时封中山王，前秦时任平阳（山西临汾西南）太守，此时亦集兵 20000，进逼河东重镇蒲坂（山西永济县蒲州镇）。

面对烽烟四起，苻坚决定力保关陇，然后徐图良机，乃任命苻叡为帅，统窦冲和姚苌等步骑 50000 镇压这两地。慕容冲被窦冲击败，投奔了慕容泓。华泽（华阴境内）一战，苻叡骄傲轻敌，被击杀。慕容泓声势大张，拥众十余万进逼长安，并遣使苻坚，提出：放还慕容暐及前燕宗室，自己便统军东出，与秦以武牢（河南荥阳汜水镇）为界，永为邻好，不复为敌。其目的是想拥慕容暐回到关东，和慕容垂争夺燕国的最高统治权。对于苻坚而言，这本是大可利用的机会，借以挑起慕容氏的内战。但苻坚却以为扣住慕容暐，即可胁迫慕容垂和慕容泓就范，不予理睬。慕容泓挥军推进。慕容泓德望不如慕容冲，且持法苛严，该年六月，在内讧中被杀，慕容冲继统其众。苻坚集兵 50000，以苻晖为帅，前往镇压。两军相遇于郑西（陕西华县境内）。慕容冲诡计多端，事先命妇女各缝一布囊，装满尘土，各骑牛马，身穿斑斓彩衣，揭竿为旗，名曰“斑队”，藏匿阵后。凌晨薄雾，慕容冲挥军攻击，双方兵马方接触，慕容冲高喝：“斑队何在？”妇女们蜂拥而进，摇旗扬尘，灰雾满天。秦军不知虚实，惊慌失措，大败而退。灞上（陕西西安东）一战，慕容冲又击败苻琳所统 30000 秦军，占有阿房城（阿房宫遗址），逼近长安。其声势之壮，苻坚亦为之触目惊心。此时苻坚已经六神无主，妄图依靠佛、道迷信来挽回颓势。慕容暐又组织长安城中鲜卑准备秘密举事，机密泄漏，苻坚恼羞成怒，下令尽诛长安城中鲜卑。慕容冲得知慕容暐被杀，乃于太元十年正月在阿房称帝，然后以杀报杀，关中惨遭破坏，人皆流散，道路断绝，千里无烟。双方相持九个多月，数度激战长安城下。苻坚顶盔贯甲，亲登城楼督战。慕容冲屡次统众，亲自攀城攻打。长安四周血流成河，积尸满地。城中粮尽，苻坚已难坚守，恰在一本名叫《古符传贾录》的谶书中找到“帝出五将久长得”这句话，便认为是苍天的启示，在该年五月把长安交给太子苻宏后，领数百骑出奔五将山（陕西岐山县北，一说醴泉县北），企图凭借“五将”二字恢复前秦昔日天下（不久便被后秦主姚苌擒杀）。六月，苻宏弃长安西逃，慕容冲夺取了长安，肆意烧杀，长安成为废墟。

西燕部众大都想打回关东去，慕容冲则留恋关中，内讧再起，慕容冲被杀。30 余万鲜卑男女自动撤离长安东出。途中杀戮迭起，五易其主，最终立慕容永为主。进至襄陵（山西临汾东南），和西归的前秦残余势力苻丕狭路相逢，一场激战，苻丕大败南窜，被东晋将领冯该击杀。太元十一年，慕容永称帝于长子（山西长治西），西燕政局渐趋稳定。西燕全盛时，其统治区南达轵关（河南济源西北），北抵新兴（山西忻县），东靠太行山，西临黄河。西燕和后燕互争正统，争战迭起。太元十八年冬台壁（山西黎城西南）一战，西燕主力被歼，次年国亡。西燕立国，首尾仅十年。（蒋福亚）

姚苌建后秦

东晋太元九年(384)，姚苌在渭北自称万年秦王，二年后称帝长安，建立后秦。

姚苌(330—393)，字景茂，南安赤亭（甘肃陇西西）人，羌族。父姚弋仲，羌族豪酋。羌族原游牧于青海草原，东汉时被迫内徙，散居三辅一带。晋末，内徙羌族主要散居在冯翊（郡治陕西大荔）、北地（郡治陕西耀县东）、新平（郡治陕西铜川西南）和安定（郡治甘肃镇原南）等郡，已逐渐过渡到农耕定居。十六国初期，姚弋仲被石虎徙置滠头（河北枣强东北），官拜

西羌大都督。冉闵之乱时，姚弋仲被苻洪打败，其众在其子姚襄统领下南投东晋。姚襄在淮南积聚力量后，率众北返，力图夺取关中。永和十二年(356)三原(陕西三原东北)一战，姚襄身死，全军覆没，其弟姚苌投降了前秦。姚苌颇有军事才能，屡立战功，深受前秦主苻坚宠爱，官拜龙骧将军。淝水之战后，慕容泓扰乱关中，姚苌受命辅佐苻叡镇压。时关中鲜卑急欲东归，斗志不高，姚苌建议苻叡佯攻，在鲜卑东撤时衔尾鸣鼓，将鲜卑逐出关中，切勿迎头阻击，断其归路，导致狗急反噬。不料苻叡骄傲轻敌，有勇无谋，求功心切，驱逼士兵绝断慕容泓东归之路，企图聚而歼之。慕容泓见归路被截，被迫回军拼命，华泽(陕西华县境内)一战，秦军大败，苻叡被杀。苻坚得讯，暴跳如雷，杀死姚苌的报讯使者。姚苌本有自立之心，处此情况，便带领亲兵逃奔渭北马牧(陕西兴平东南20里之马牧泽)，准备纠集羌族豪贵，独树一帜。这一带羌族潜在影响甚大，昔日西州豪族曾支持过姚襄，受到苻坚严惩，仕宦极不得意，早就想兴风作浪。听说姚苌潜奔马牧，以天水(郡治今属甘肃)尹纬为首的西州豪族们即刻纠集汉羌等50000余户推姚苌为盟主。姚苌乃自称万年秦王，建元白雀，是为后秦始年。姚苌结好慕容泓，进逼北地，顿成前秦心腹大患。苻坚被迫亲统兵马20000进剿。姚苌兵败，为前秦军包围。苻坚切断姚苌水源，后秦士卒干渴而死者相继，眼看就将全军覆没，突然喜雨天降，后秦营中水深三尺，营外只是细雨霏霏。此时，天命思想居统治地位，所以双方都认为姚苌确系天命所归。后秦将士士气大振，前秦士气一落千丈。姚苌一举击败苻坚，俘获前秦高级将领数十人。将士们一致要求乘胜追击，直捣长安。姚苌老谋深算，知道前秦尚堪一战，不愿过多消耗实力，晓谕将士：燕国士兵均怀东归之心，决不会久据秦川，吾今移兵岭北(陕西礼泉县九嵕山以北一带)，广收资实，待秦败燕去，然后回师，可兵不血刃，坐定天下。果然，苻坚在西燕攻击下，于太元十年出奔五将山。姚苌立刻分兵追击，擒获苻坚，缢杀于新平(陕西彬县)佛寺之中。不久，西燕撤离关中，姚苌轻易取有长安。次年，姚苌称帝，都长安，国号大秦，建元建初。

苻坚死后，其庶长子苻丕称帝晋阳(山西太原南)。苻丕死，苻坚族孙苻登称帝南安(郡治甘肃陇西渭水东岸)，拥众10余万，与姚苌激烈争夺关陇。苻登勇悍善战，军中供奉苻坚神主，每战必召集三军祈祷，痛哭流涕，哀感三军。其将士都在头盔铠甲上刻书“死”、“休”二字，以示必死的决心，所以每战必胜，一直推进到胡空堡(陕西彬县西南)。双方相持于新平、安定(陕西镇原东南)间一年有余。姚苌频战不利，关西群豪渐渐倾向苻登。为激励士气，姚苌在军中亦设苻坚神主，祈求苻坚勿计其过，给予庇护，结果适得其反。安丘(甘肃泾川北)一战，损兵20000有余。此败终于使姚苌醒悟过来，决心凭才智及安定民生的措施和苻登作长期拼搏。苻登虽长于战阵，却没有任何积极的政治措施，且屡胜而骄，对其辎重等疏于防范。太元十四年八月，姚苌突然偷袭大界(新平与安定间)，俘获苻登全部辎重及50000余人马，扭转了战场态势。太元十九年，姚苌死，子姚兴继位，废桥(陕西兴平西北)一战，全歼苻登余众。苻登单骑逃窜，被捕获，前秦亡。后秦的统治终于稳定下来。姚兴重视文教、农桑和刑政，曾下令放免奴婢为平民，大力提倡佛教，境内信佛者十室而九。在十六国后期，后秦是政治、经济状况较好的一个政权，对民族融合起有积极的作用。全盛时，其版图南至汉川，东逾汝颍，西控西河，北守上郡，约当今陕西及河南、甘肃、宁夏、山西的各一部分。后秦曾一度击灭过西秦，受降后凉，据有姑臧，其声威迫使南凉和北凉称藩、称臣。义熙十三年(417)被东晋击灭，历三主，立国凡33年。

(蒋福亚)

乞伏氏建西秦

东晋太元十年(385)，鲜卑乞伏部酋长乞伏国仁在勇士川称大单于，建立西秦。

乞伏部为西部鲜卑的一支，汉魏之际自漠北南出阴山，进入陇西。又经迁徙，方游牧于苑川水(甘肃榆中东北)一带。十六国初期，乞伏部发展到50000余落，已进入原始社会末期。咸安元年(371)，前秦击灭仇池国后，命益州刺史王统移师陇西，讨伐乞伏部。乞伏部酋长乞伏司繁尽锐而出，据守苑川。不料王统潜师袭击乞伏部腹心重地度坚山(甘肃靖远境内)，一举俘获司繁整个部落。司繁见根本已失，被迫投降，作为人质留居长安。不久，司繁受命统本部镇勇士川(甘肃榆中东北)，死后乞伏国仁(？—388)继统其部。淝水之战前夕，乞伏国仁看到苻坚在其统治区内大征发所引起的危机，对部属说：苻氏穷兵黩武，虚广声势，勤心远略，骚动苍生，疲敝中国，天怒人怨，怎么会成功呢！俗话说物极必亏，祸盈则覆，天理自然。以我估计，苻坚此次大举，难免失败。我当与诸君共成一方之业。苻坚淝水惨败信息传来，乞伏国仁立刻召集部众，讨伐不服者，拥众10余万，成为一方势力。苻坚一死，乞伏国仁便在太元十年自称大单

于、大将军，领秦、河二州牧。该年即西秦始年。国仁击败其周围的羌族和其他鲜卑部落后，结好前秦主苻登，太元十二年被苻登封为苑川王。次年，国仁死，其弟乞伏乾归继位，迁都金城（甘肃兰州西北），被苻登封为金城王。苻登败死，乾归尽有陇西，在太元十九年自称秦王，仿照魏晋建立官僚制度，又推行胡汉分治政策。

乞伏乾归曾一度称藩于后凉，后反悔。隆安元年（397），后凉数道来伐，攻陷金城、临洮、武始、河关等地。在形势极端不利之际，乞伏乾归大施反间计，利用后凉军队包围圈尚未合拢之机，扬言自己已逃奔成纪，引诱统率后凉精锐的吕延贪功冒进，一举击溃吕延，转危为安。隆安四年，后秦大将姚硕德又领兵来犯，双方相持于陇西（甘肃陇西南）。乞伏乾归截断姚硕德樵采之路，迫使后秦主姚兴亲自领兵驰援。乾归分军堵截，自统轻骑数千企图偷袭姚兴。恰值狂风大作，尘沙飞扬，昏雾满天，乾归迷路，与中军失去联络，为后秦军追及，大败而逃，部众纷纷投降后秦。乾归计穷，先投南凉，后降后秦。后秦乃以乾归子乞伏炽磐镇苑川。

姚兴统治后期，后秦内乱迭起，又受大夏赫连勃勃的侵逼，飘摇欲坠，乞伏乾归乘机逃回苑川，在义熙五年（409）又自称秦王。此时姚兴再也无力经营陇西，乃于义熙七年封乾归为河南王，借助乾归牵制大夏等。次年乾归死，子乞伏炽磐继位。炽磐颇会用人，西秦逐渐强盛。义熙九年大败其西邻吐谷浑。次年又乘南凉内外交困，上下饥敝的有利时机，攻占乐都（今属青海），击灭南凉。其后又屡次大败吐谷浑，俘掠牛羊50余万头和大量人口，西秦进入全盛。其版图西逾浩亹（青海乐都），东极陇山，北距黄河，南略吐谷浑，约当今甘肃的西南部。南朝宋元嘉八年（431），西秦被大夏击灭，历四主，立国凡47年。

（蒋福亚）

拓跋珪复国

登国元年（386），鲜卑拓跋部酋长拓跋珪在牛川登代王位，旋改称魏王，是为北魏历史的开端。

拓跋部是西部鲜卑的一支，发祥于今内蒙古呼伦贝尔盟鄂伦春旗阿里河镇嘎仙洞周围，在大兴安岭北部东麓以狩猎为生。东汉初年，北匈奴西迁，南匈奴内附，大漠草原出现势力真空，拓跋部乃南迁呼伦贝尔草原。在此生息七代后继续南迁，据有匈奴故地，融合匈奴余部及其他部落，发展成控弦之士20余万的游牧部落，酋长世袭制也逐步确立起来。曹魏甘露三年（258），拓跋力微统部进入盛乐（内蒙古和林格尔北）一带。自此，拓跋部方有确切纪年。西晋末年，拓跋猗卢为酋长，控弦之士40余万，支持晋并州刺史刘琨与匈奴汉国为敌。永嘉四年（310），刘琨奏请晋廷，封猗卢为代公。建兴二年（314），晋爵代王，并割陉岭以北（山西代县西勾注山以北）的马邑、阴馆、楼烦、崞和繁峙五县为其封地。尽管此时拓跋部还处在原始社会末期，旧史中却已称其为代国了。此时，苦于战乱的汉族人民纷纷拥入拓跋部居地，促进了拓跋部的发展，私有制出现了，贫富分化日益明显。猗卢以"军令"统率诸部，在汉族士人卫操、莫含、姬澹等人辅佐下，模仿魏晋，治国御众，导致内部新旧势力的严重冲突。建兴四年，内乱爆发，猗卢被杀，部落离散，拓跋部之建国首次受挫。经过22年的争夺，东晋咸康四年（338），拓跋什翼犍登代王位，逐步统一诸部，建立常备军，仿照魏晋设置近侍官职，创制了保护私有财产和加强联盟酋长权力的原始律令，修建盛乐宫（盛乐故城南），使其成为政治中心，朝 建立国家跨进了一大步。此时，农业生产在拓跋部经济生活中的比重也逐步上升。但一再与拓跋部争夺部落联盟领导权的铁弗部酋长刘卫辰在兵败后投靠了前秦。太元元年（376），30万前秦大军在刘卫辰的向导下灭掉了代国，拓跋部之建国再次受挫。

前秦灭代后，将代国一分为二。黄河以东归独孤部酋长刘库仁，以西归刘卫辰。命令解散部落，设置尉和监行事等官职，推行中原的赋役制度，客观上有利于拓跋部向阶级社会的过渡。独孤是屠各的异译，本来是铁弗的一支，因此代国灭亡后，实质上是铁弗控制了这个部落联盟。不过库仁和卫辰素有矛盾，彼此经常兵戎相见，库仁稍占优势。

代国灭亡后，什翼犍之孙拓跋珪（371—409）先居贺兰部，后投独孤部。淝水之战后，拓跋部的复国活动悄悄展开，内部动乱进一步加剧。太元十年，刘库仁之子刘显袭杀继库仁为酋长的刘头眷，掌有独孤部，图谋杀害拓跋珪。赖汉族商人王霸救助，拓跋珪幸免于难，在长孙建和元他等人护卫下，逃奔其舅氏贺兰部。时诸部大人纷纷劝贺兰部酋长贺讷推拓跋珪为主。十一年正月，诸部大会牛川（内蒙古锡拉木林河），拓跋珪被推为代王。四月，改称魏王，建元登国，揭开了北魏的历史。皇始元年（396），拓跋珪建天子旌旗；天兴元年（398），正式定国号为"魏"，史称北魏。拓跋珪即北魏开国之主道武帝。

拓跋珪复国后，除按传统分设南北部大人统领部众外，采取了两项重要措施。一是组建由其直接统

领的常备军。一是继承前秦对拓跋部的措置，下令离散诸部，分土定居，不准迁徙，君长大人皆同于编户。后一措施是拓跋部社会生活的一大激变，自此，拓跋部的部落组织开始了向地域组织的转化。不过这一措施直到推进中原后，方大体完成。

初建的北魏，具有严重的部落联盟的遗痕，各部叛降无常，但对拓跋珪威胁最大的还是宿敌刘显和刘卫辰。拓跋珪离开独孤部后，独孤部便出现了内乱，庾和辰和奴真等先后统部分部众投奔了拓跋珪，刘显南走马邑（山西朔县）。登国元年八月，刘显支持窟咄南犯，前来争夺王位。窟咄是什翼犍少子，前秦灭代后，被逼迁长安，后为西燕所得，随西燕东返。刘显利用窟咄，且有西燕的支持，来势汹汹。一时间北魏人心惊骇，诸部骚动，谋为内应者甚多。拓跋珪被追北逾阴山，投贺兰部凭山固守。时南有窟咄进逼，北有贺兰部内敌对势力贺染干的骚扰，内部又发生了北部大人叔孙普洛和臣伏的乌丸诸部投奔刘卫辰的叛乱，形势万分危急，拓跋珪频频向后燕呼救。后燕和西燕是宿敌，窟咄得逞，对后燕显然不利，何况拓跋珪又是后燕主慕容垂的外甥，故慕容垂命慕容麟统军救援。高柳（山西阳高西北）一战，窟咄败奔刘卫辰，为卫辰所杀。次年，刘显部内乱，拓跋珪又在后燕的帮助下一举尽俘其部，刘显败奔西燕，拓跋珪去了一个大敌。自此直至登国六年，拓跋珪先后讨平各部，相继征服了库莫奚、高车等游牧部族，虏掠了大量部众和牲口，势力进一步壮大，具备了和刘卫辰决战的条件。

刘卫辰在拓跋珪复国前后一直横行于朔方（治内蒙古杭锦旗北）一带，先后称臣于西燕和后秦，凭借其支持屡与拓跋珪为敌。这一年，卫辰命其子直力鞮统八九万之众来攻，铁岐山（地点无考）南一战，直力鞮大败，单骑逃窜。拓跋珪乘胜追击，渡河而西，袭破悦跋城（内蒙古杭锦旗东）。卫辰父子弃城而走，在木根山（内蒙古乌审旗西）被部下杀死。拓跋珪诛戮卫辰宗党5000余人。至此，北魏终于成为塞外唯一强国。（蒋福亚）

吕光建后凉

东晋太元十一年（386），吕光据凉州，称酒泉公，二十一年称天王，建立后凉。

前秦击灭前凉后，苻坚即任命梁熙出任凉州牧。梁熙宣威西域，支持吕光西征，对维护丝绸之路的畅通有一定贡献。前秦淝水惨败后，关东和关中相继陷入战乱，梁熙遂欲割据凉州，所以当有人建议迎立颇有才具、被苻坚放逐到西海郡（内蒙古额济纳旗东南、居延海北岸）的苻洛来主持危局时，便立刻派人杀了苻洛。梁熙真正畏惧的是从西域拥众东归的吕光。吕光也是一个颇具雄心的人物，在其征服龟兹后，想乘前秦大乱之机称雄西域，只是西域诸国关系过于复杂，难以久安，只好在太元十年领军东归。高昌太守杨翰揣摩梁熙心意，提出两种方案供梁熙选择：一、派兵扼守高梧谷口（新疆吐鲁番高昌遗址西），截断水源，渴死吕光大军。二、陈兵伊吾关（新疆哈密西北），凭恃有利地形，阻止吕光入境。但梁熙是个文人，不识机变和军事，竟然拒绝。杨翰见其计难售，梁熙势将失败，乃举郡（新疆吐鲁番高昌遗址）归顺了吕光。吕光轻易越过险阻，在九月进达宜禾（甘肃安西北）。梁熙命其子梁胤统兵50000扼守玉门关（甘肃敦煌西北），传檄指责吕光不遵王命，擅自班师。此时吕光已进入河西走廊，有恃无恐，同样传檄责备梁熙无赴难之诚，有阻击归师之罪，催军进击，生擒梁胤。武威太守彭熙见大势已去，执梁熙请降。吕光据有姑臧（甘肃武威），自称凉州刺史，分兵攻克酒泉及西郡等地，凉州郡县大都归顺。

苻坚发动淝水之战时，逼令前凉亡国之主张天锡随军。淝水惨败，张天锡南投东晋，其子张大豫却想利用前凉在河西走廊的影响恢复昔日统治，在王穆等人的庇护下潜至武威，得到张济、焦松、刘肃等人支持，集兵数千，在太元十一年攻占昌松（甘肃武威南），击败吕光部将杜进，自称凉州牧，进逼姑臧。建康（甘肃酒泉东南）太守李隰及敦煌豪族郭瑀、索嘏等起而响应。李隰起兵30000进攻姑臧之西，郭瑀、索嘏等则占有敦煌（今属甘肃），运粮30000石支援张大豫。吕光采用擒贼先擒王的方略，集中力量打击张大豫，俘斩20000有余。张大豫退奔临洮（甘肃岷县）。局面稍有改观，吕光便自称酒泉公，该年即为后凉始年。随即追击张大豫，在十二年七月俘而杀之。张大豫虽死，王穆仍据有酒泉（今属甘肃），自称凉州牧，与吕光争夺河西走廊的统治权。该年，凉州大灾，饥荒严重，百姓死者大半，群情骚动，西平（青海西宁）太守康宁乘机起兵割据，自称匈奴王。吕光大将、扼守张掖（今属甘肃）的彭晃起而响应，西联王穆。吕光在河西走廊的统治岌岌可危，被迫亲统步骑30000讨伐康宁和彭晃，一举奏效。王穆震动，内讧爆发，与索嘏互相攻杀，吕光乘乱平定了王穆。至此，吕光在陇右河西的统治暂时稳定下来。十四年，吕光称三河王；二十一年改称天王，国号大凉，都姑臧。史称后凉。后凉全盛时南逾河湟，东至秦陇，西包葱岭，

北暨居延，版图与前凉相同，并和西域等地保持着友好的交往。

河西走廊一带民族关系极端复杂，氐族在这一带影响甚小，力量薄弱，吕光又无安定民生的措施，只是凭借70000余兵力东征西伐，因而内乱迭起。在隆安元年(397)至五年间，先后分裂出秃发乌孤的南凉和沮渠蒙逊的北凉。后凉在后秦、西秦、南凉和北凉的不断进逼下疆土日蹙，最后只剩有姑臧及仓松(姑臧南)、番禾(姑臧西)二郡，实际仅有今甘肃武威一地。在北凉长期包围下，姑臧斗米5000钱，饿死10余万口，百姓逾城乞为奴婢者日有数百。元兴二年(403)，后凉主吕隆眼看再也无法支撑，向后秦呼救。后秦40000大军一到，吕隆便拱手让出了姑臧，后凉亡，历四主，立国仅15年。　　(蒋福亚)

魏道武帝推进河北

登国十年(395)至天兴元年(398)间，北魏和后燕数度鏖战，尽占今山西、河北等地。

魏道武帝拓跋珪复国初期，是在后燕的卵翼下逐步平定内难，统一诸部的，为此付出了沉重的代价。后燕始终以宗主国自居，每次助战，除分割大量战利品外，还不断勒索和虏掠，有时甚至将人畜席卷而去。随着拓跋珪实力的壮大，双方关系日益恶化。后燕蓄意挑起北魏内乱，以便控制。登国六年，后燕封贺讷为归善王，挑起贺兰部内贺讷和贺染干两大势力的战争，乘机兴兵，把贺兰部席卷而去。拓跋珪数度交涉，后燕归还贺讷所统。拓跋珪之弟拓跋觚奉命献物致谢，被后燕扣押。后燕借机命拓跋珪用大批战马赎取。双方关系彻底破裂。登国十年五月，后燕主命太子慕容宝统慕容农及慕容麟等步骑80000，又慕容德统18000精兵为后继，企图一举击灭北魏。散骑常侍高湖竭力反对，指出燕、魏结好已久，今因求马不得，扣留拓跋觚，“理曲在我”。何况拓跋珪沉勇有谋，幼经艰辛，兵精马壮，决不可轻视。而太子年少气盛，轻敌好胜，难以独当一面。如若失败，太子声望将一落千丈。言词激切，触怒了慕容垂，被免官。

燕军压境，谋臣张衮献计：利用慕容宝骄傲轻敌，先以羸师迎敌，待其骄纵，然后反击。拓跋珪接受，统部西渡黄河，远遁千里，退守黄河以南。燕军进至五原，击降30000余落，收穄田(俗称糜子)百余万斛，临河赶造船只，准备追击。拓跋珪在向后秦呼救的同时，召集诸部，在九月移师黄河，命拓跋虔统骑5万屯河东，拓跋仪统骑10万屯河北，拓跋遵统骑7万堵截燕军后路，遣游骑散布五原至中山的各要道口，专门截获燕军信使。燕军出动时，慕容垂已病重。慕容宝数月不得其父信息，心急如焚。拓跋珪逼令被俘虏的后燕信使隔河大声宣称慕容垂已死，敦促慕容宝赶快回师。燕军士气大受影响。时至十月，塞外寒冬已临，慕容宝仍难渡河与魏师决战。慕容麟的部将慕舆嵩等误信谣传，谋立慕容麟为主。机密泄漏，慕舆嵩被处死。慕容宝与慕容麟之间猜忌加剧。慕容宝已难坚持下去，下令退兵。

燕军后撤时，黄河并未封冻，慕容宝以为烧掉船只，便可从容回师。殊料风暴突然而至，黄河冰封，拓跋珪抓住时机，精选骑兵20000，轻装昼夜追蹑。十一月初，燕军退到参合陂(内蒙古凉城石匣子沟)，扎营陂东。风暴又起，沙门支昙猛建议设防。慕容宝不以为意。支昙猛一再坚持，慕容宝令慕容麟统骑30000以备非常。慕容麟拒不受命，纵骑游猎，慕容宝布置侦骑游弋，探察魏军行止。侦骑前行十余里后解鞍而寝。入夜，魏军追至陂西，拓跋珪命令诸军连夜衔枚潜进，登上陂顶。凌晨，燕军正拟东行，魏军由陂顶冲下，锐不可挡。燕军队不成列，士卒惶怖，人马惊散，落水和自相践踏而死者万数，逃命者仅数千人。慕容宝单骑逃归，随军王公贵族大都被俘。在中部大人王建的建议下，拓跋珪坑杀四五万降卒。这就是著名的参合陂之役。是役，后燕精锐损失大半，元气大伤，拓跋珪终于扭转了燕强魏弱的态势。

慕容宝不甘心参合陂之败，屡屡请求再次兴兵。慕容德等竭力赞成。为免贻患子孙，慕容垂从龙城(辽宁朝阳)调来仅存的精锐，在皇始元年(396)三月御驾亲征。燕军秘密出动，越青岭(河北易县西南)，凿山开道，达于猎岭(山西代县东北)，出魏不意，直插云中。拓跋珪退守善无(山西左云西北)。燕军袭击平城(山西大同东北)，魏陈留公拓跋虔出战，败死。燕军俘虏其部落30000余家，平城失陷。为保存实力，拓跋珪故伎重演，远遁阴山，避免决战。燕军经过参合陂时，见去年交战处尸骨如山，失声痛哭，声震山谷。时慕容垂年已71，本来有病，受此刺激，病情恶化，被迫匆忙回师。四月，慕容垂病死于沮阳(河北怀来南)。慕容宝秘不发丧，回到中山(河北定县)后，继登大位。

同前燕后期一样，后燕的统治相当腐朽。人户隐漏严重，财政十分困难。慕容垂时便想整顿户籍，清查户口，废除荫户。慕容宝继位后即付之实施。此举触犯了胡汉豪贵的利益，统治集团内部矛盾加剧。由于封建政府的赋役远比私家苛重，因而被清查出的人户也极端不满，百姓思乱者十室而九，阶级矛盾随

之激化。在慕容垂诸子中，慕容宝才德俱差，是曲意讨好慕容垂左右才被立为太子的，连其生母段氏也说“太子不才，天下所知”，“必丧社稷”。宗室亲王各有徒党，都想乘机取代。其中以慕容会和慕容麟最露骨。当时，后燕除中山外，大军云集的重镇尚有龙城、晋阳（山西太原南）、蓟城（北京）和邺城（河北临漳西南）四个。分别由慕容会、慕容农、慕容兰和慕容德镇守。慕容农统治的并州本来乏食，该年旱霜为害，饥荒更加严重，慕容农的统治又相当残酷，并州百姓怨愤难平，潜奔北魏，求其发兵。拓跋珪久有伐燕之心，遇此良机，便在八月亲统步骑40余万，以左将军李栗为前锋，长驱晋阳，又遣将军封真统偏师攻打蓟城。九月，晋阳城下一战，慕容农大败，全军覆没，仅余三骑奔窜中山。晋阳为魏所有。

魏军深入，后燕举朝恐慌，如何对敌，众说纷纭。或说据险坚守，或说深沟高垒，坚壁清野，或说凭关抗击。慕容宝采慕容麟之说，修缮中山城墙，积粟为持久之计，等待魏军师老兵疲时反击。

十月，拓跋珪自井陉（河北井陉东北）向中山推进，攻拔常山（郡治今河北正定南）。常山以东守令或走或降，郡县都投降了北魏，后燕只剩下了中山、邺城和信都（河北冀县）三地。拓跋珪命东平公拓跋仪统骑50000攻邺，冠军将军王建和左将军李栗攻信都，亲统主力攻中山。此时后燕犹堪一战，魏军在三地均遭小挫。拓跋珪调整部署，加强攻邺兵力，亲自移师信都，计划攻取信都和邺城后，再夺中山。攻邺一路因统帅争功而告失利，信都一时成了主战场。慕容宝尽散珍宝募兵，出屯深泽（河北深泽东南），为信都声援。魏燕激战信都城下60余天，后燕伤亡惨重。皇始二年正月，燕宜都王慕容农弃城而逃，信都为魏所有。

燕魏激战信都时，贺兰部、纥突邻、纥奚部等酋帅据阴馆（山西代县西北）作乱（不久被平定）。内乱爆发，拓跋珪本拟退兵，在这年二月遣使向慕容宝求和。慕容宝认为机会难得，拼凑步骑16万左右，开进曲阳的柏肆坞（河北藁城北），屯滹沱河北，欲与魏军一决雌雄。当拓跋珪扎营滹沱河南，立足未稳时，慕容宝精选敢死之士万余乘夜偷渡，亲统募兵殿后，突然袭击拓跋珪寝帐。燕军因风纵火，魏军大乱，拓跋珪赤脚弃营而走。不料燕军无故自惊，自相砍杀。拓跋珪乘机击鼓召集兵马，布置大量火炬为疑兵，纵骑猛冲。燕军败退滹沱河北，为之夺气。慕容宝战心尽失，向中山撤退。魏军跟踪追击。燕军屡败，慕容宝统骑兵20000逃窜。恰值寒流袭来，暴风大雪，燕军冻死者无数。慕容宝唯恐被魏军俘虏，命令丢弃辎重、武器逃命。魏军包围了中山。此时慕容宝已无力再战，遣使向拓跋珪求和，答应割地。拓跋珪接受。兵马才撤，慕容宝反悔，魏军再次包围中山。

魏军包围中山时，后燕将士一再求战，慕容麟意欲政变，屡次破坏。当其机密泄露后，夜奔西山（河北曲阳境内）。因为魏军东下时，慕容会声言赴难，在这年三月统龙城兵到达蓟城。慕容宝害怕慕容麟劫持慕容会军后，夺取龙城，登极称帝，乃统领王公亲贵及残余部队冲出重围，会合蓟城兵马，撤向龙城。后经数度火并，慕容宝终于暂时在龙城站住了脚。

慕容宝逃离，中山无主，东门洞开。拓跋珪本可从容入城。但王建志在虏掠，建议明晨开进。殊料中山百姓害怕拓跋珪重演参合陂坑降杀俘的惨剧，关闭城门，拥没有来得及逃走的开封公慕容详为主，人自为战，据城死守。拓跋珪百般劝降，城中就是不应。尽管残留的慕容权贵为争权而火并，但百姓却矢志抗击。魏军伤亡累累，亦难得手。直至十月城中粮尽，才开城出降。中山百姓的斗争深刻教训了北魏统治者，日后攻城略地，坑降杀俘之事大为减少。

中山一失，邺城势难独守，慕容德弃城渡河，逃向滑台（河南滑县东），后来占据青兖，建立了南燕。天兴元年正月，魏军占有邺城。后燕是十六国后期最强大的一个割据政权，在拓跋珪的打击下，失去了大片领地，而且被分割为两小块，苟延残喘了一段时间。北魏则尽占并冀等州，势力伸向了内地。战后，拓跋珪迁山东胡汉36万及百工伎巧10余万于平城，势力进一步壮大起来。　　　　（蒋福亚）

王恭、殷仲堪之乱

东晋后期，北府统帅王恭和荆州刺史殷仲堪发动的两次叛乱。

晋孝武帝统治后期，大权落入会稽王司马道子之手。道子唯酒色财物是务，信用小人，卖官鬻爵，聚敛财物，信佛佞佛，肆意鲸吞。连其宠爱的僧尼也乘机窃弄权柄。当时，官以贿选，刑政谬乱，政治坏到了极点。孝武帝资质愚钝，却不甘心当傀儡，起用皇后兄晋阳（山西太原西南）人王恭镇京口（江苏镇江），掌握北府兵；陈郡（郡治今河南睢阳）人殷仲堪掌荆州，分道子兵权。又引王恂、王雅参与机要，分道子决策权。王雅认为王恭和殷仲堪二人才干平平，心胸狭窄，升平之世，尚可自安，一旦有变，必为祸首。孝武帝置之不理。道子寸步不让，以王国宝、王绪、茹千秋等为心腹，拉手握重兵、坐镇历阳（安徽和县）的庾楷

为外援。主相之间，各有朋党。太元二十一年(396)九月，孝武帝酒后为张贵人害死，其子白痴司马德宗继位，是为安帝。道子贪于权势，对孝武帝之死不闻不问，乘机抢到了摄政的权位，在王国宝的唆使下，削夺王恭和殷仲堪的兵权。王恭早想插手中枢，闻讯遣使殷仲堪，借口声讨王国宝，约期举兵。隆安元年(397)四月，王恭首先发难。战乱一起，道子不知所措，杀王国宝和王绪等，祈请二镇息兵。二人已除，王恭师出无名，只好接受，一场祸乱暂告平息。此举更使道子感到非削夺方镇兵权不可，乃引谯王司马尚之及司马休之兄弟为腹心，出王愉为江州刺史，都督江、豫二州，割庾楷四郡归王愉节制。庾楷党于道子，绝未想到道子竟会先对自己下手，一时怨愤难平，遣使游说王恭和殷仲堪再次起兵。王恭目的未达，当然于心不甘。前次所以罢兵，一是殷仲堪误期，造成他孤军难支的局面。二是惧怕庾楷兵力强盛。如今庾楷亦有此心，岂非求之不得。立刻遣使殷仲堪，自为盟主，约期会攻建康(江苏南京)。隆安二年七月，战祸又起。殷仲堪记取前次没有如期发兵的教训，先期以杨佺期为先锋顺江而下，自己和桓玄领兵20000跟进，攻占江州(州治今江西九江)。三州联兵，声势更壮，道子计无所出。其子司马元显颇机警，自荐为征讨都督，令王恂和谢琰讨伐王恭，司马尚之讨伐庾楷，亲屯石头，对付荆州军，想集中力量稳定扬州后，再解决殷仲堪。

王恭并不知兵，所以骄横跋扈，关键是手握北府兵。但平素自恃门第，视北府名将刘牢之等如走狗爪牙，北府将领早就怀恨在心。值此兵马将动之际，王恭把精兵甲仗全部交给刘牢之，拜刘牢之为兄，想以此博取刘牢之的拼死效力。刘牢之是个权势利欲熏心的人物，岂能为此所动。司马元显抓住这个特征，派高素为说客，劝刘牢之倒戈，许其事成后即为北府统帅。刘牢之联合北府将领，突然袭击王恭。王恭单骑逃命，途中被擒，送建康斩首。司马尚之一路亦颇顺利，庾楷兵败，窜逃荆州。

殷仲堪来势虽猛，兵临石头，此时却成了孤军，慑于刘牢之和北府兵的威名，不敢轻进。桓修献计道子：用重利收买杨佺期和桓玄，促使其倒戈，击败殷仲堪。道子立即发布桓玄为江州刺史，杨佺期为雍州刺史，桓修为荆州刺史，贬殷仲堪为广州刺史。命殷仲堪之叔殷茂前往宣读诏令。

桓玄是桓温之子，袭爵南郡公，弃官在家，没有实地，只是凭借桓氏在荆州的潜势力胁迫殷仲堪就范，处心积虑想夺回荆州。杨佺期是东汉时社会上第一流高门大族弘农杨氏之后，因渡江较晚而不受重用，心中怏怏，暂时依附殷仲堪，力谋乘乱扩张，扬眉吐气。朝命恰投二人所好，殷仲堪内部分裂了。殷仲堪虽不知兵，在军事上需依赖杨佺期和桓玄，却相当狡猾凶狠。当桓玄和杨佺期拒绝接受其命令时，立刻退据寻阳(江西九江)，传谕桓、杨二部将士：汝等若不各自归散，我到江陵，将尽诛汝等家属。桓、杨二部闻讯骚动，有的将领统部自回。桓、杨无奈，只有继续和殷仲堪联合。三人互换人质，推桓玄为盟主，联名抗表晋廷，为殷仲堪辩护。道子被迫同意殷仲堪留任。这场祸乱虽暂时平息了，但石头城以南为殷、桓、杨三人控制，以西为豫州刺史司马尚之据有，京口及江北则成了刘牢之和高雅之的天下，朝令所至，仅三吴(太湖平原及浙东)一地。东晋事实上已四分五裂。

(蒋福亚)

秃发氏建南凉

东晋隆安元年(397)，鲜卑秃发部酋长秃发乌孤在廉川堡称大单于、西平王，建立南凉。

秃发部是鲜卑拓跋部的分支，秃发即拓跋的异译。北边称鲜卑父、胡母的后裔为拓跋，因此秃发部是以鲜卑为主体，混合匈奴等其他少数民族而形成的一个新的部落。曹魏中后期，秃发部屡经迁徙，进入今甘肃兰州黄河以西、湟水流域一带，长期生息该地，故又得“河西鲜卑”之名。河西既利农耕，又宜放牧，优越的自然条件及当地先进生产方式的影响，促使秃发部开始了由游牧向农耕的转化。西晋初年，秃发酋长树机能曾领导过为时十年的抗晋斗争，失败后，部落分散。秃发乌孤(？—399)时，部众稍盛，农桑亦有发展，成为一方势力。太元十九年(394)，后凉主吕光封乌孤为冠军大将军、河西鲜卑大都统。乌孤兼并河西地区乙弗、折掘等小股鲜卑，修筑廉川堡(青海乐都东北)，秃发部始有自己的政治中心。

河西走廊一带，氐族势力较弱，吕光晚年刑政失措，三子凶暴，内乱不已，其东南又有西秦为敌，形势动荡不定。乌孤抓住后凉内外交困的时机，在隆安元年自称大单于、西平王，奠都廉川堡，正式自立，史称南凉。随即又攻占金城(甘肃兰州西北)、乐都(今属青海)等地，改称武威王。隆安三年，迁都乐都，起用汉族士人，招诱其他少数民族豪酋，任命子弟、族人分镇各地，南凉政权渐趋完善和巩固。时后凉内乱又起，国势进一步衰落，乌孤决定乘势进占姑臧(甘肃武威)，击灭后凉。不幸，兵马未动，乌孤却因酒醉坠马，重伤而死。其弟秃发利鹿孤继位，在迁都西平(青

海西宁）后，于隆安五年改称西河王。元兴元年（402），利鹿孤死，弟秃发傉檀（365—415）继位，又迁回乐都，改称凉王。

南凉初年，务求攻城掠户，不知抚恤百姓，加上迁徙频繁，百姓逃亡现象严重，因而虽然利用后凉的衰落数战有胜，实力并未壮大起来。秃发傉檀时，后秦已据有关陇，向河西扩展，并一度击灭西秦，兵发河西走廊。此时，后凉在西秦和南凉的进逼下已经走投无路，元兴二年，干脆投降了后秦，姑臧落入后秦手中。在西北地区，后秦虽属首强，但仅凭其关陇之力来经营河西走廊，却相当困难。此时的姑臧西受北凉的威胁，东受鲜卑乞伏部的骚扰，仅是后秦悬处河西的一座孤城。为维护对姑臧的占领，后秦必须经常动用四五万兵力，无疑是一大包袱。直接兵掠姑臧，傉檀无此实力，但看准了后秦这个弱点，在称臣后秦后，干脆取消了年号，北掠北凉，将大部分战利品奉献后秦，终于博得后秦主姚兴的欢心和信任。义熙二年（406），姚兴任命傉檀为凉州刺史，镇姑臧。傉檀一进入姑臧，立刻兵占姑臧附近五郡之地，势力略有壮大，便在次年和后秦决裂，恢复了凉王的名号，其版图东自金城，西至青海，南有河、湟，北据广武（甘肃永登东南），约当今甘肃西部和青海部分。傉檀不改掠夺本性，四出用兵，招来后秦、大夏、北凉的反击。义熙三年底，大夏主赫连勃勃亲统 20000 人马虏掠南凉北边，得 27000 余人，牛马羊数十万头而去。傉檀领兵追截，结果大败，名臣勇将死亡者十有七八，勃勃积南凉阵亡将士骷髅为高台，名曰“髑髅台”。此战，南凉元气大伤。次年，后秦兵马又至，失败后退缩陇右。臣伏后秦的乞伏乾归乘机复国，南凉东部又出现了强敌西秦。义熙六年，傉檀兴兵 50000 攻掠北凉，结果单骑逃归。北凉乘胜步步进逼，傉檀被迫放弃姑臧，退归乐都。北凉紧追不舍，三次兵临乐都。至此傉檀仍然好战不休，在义熙九年又兴兵西掠，西秦乘虚而入，攻破乐都，傉檀退无所据，只有投降。南凉亡。历三主，立国凡 19 年。　（蒋福亚）

孙恩起义

东晋隆安三年（399），三吴地区爆发的以孙恩为首的农民起义。

王恭、殷仲堪叛乱失败后，司马元显自以为算无遗策，天下无敌，野心急剧膨胀，乘其父司马道子长醉不醒之机，自为录尚书事、扬州牧。时称道子为“东录”，元显为“西录”。东录门可罗雀，西录门庭若市。元显骄横不可一世，贪得无厌，富过帝室，仍然聚敛不已，东晋吏治更坏。时刘牢之镇京口（江苏镇江），殷仲堪、杨佺期、桓玄据上流，元显的号令只能行于三吴地区（太湖流域及浙东一带）。为肆意遂心，隆安三年，元显下令征发三吴诸郡免奴客（奴婢免为佃客后的专有名称）为兵，号称“乐属”。三吴是南北士族的集中地，在东晋的庇护下，士族地主肆意兼并，隐匿人户，乃至名山大川亦为其圈占封锢。百姓樵采捕鱼，都无措手之地。京口地区的刁氏竟至占地万顷以上，拥有奴客数千。三吴又是东晋建国以来军国开支源泉。赋税之重，相当惊人。太元二年（377），东晋按口征租，每口三斛，至八年激增为每口税米五石。户调则每户岁输布四匹左右。此外还有禄绢、禄米、禄棉、扩丁税等杂税，其它临时性的摊派数不胜数。徭役之重，更加触目惊心。东晋成丁年龄仿照西晋，16 为全丁，13 至 15 为半丁，全丁服全役，半丁服半役，此外还有各种杂役。庾和为丹阳尹时，一次奏除的杂役就达 60 余种。如此沉重的剥削和奴役，逼得百姓残形剪发，生儿不养，鳏寡不敢嫁娶，破产流亡日多，东土为之凋敝。被封建政府控制的依附民如兵户、吏户之类，命运更悲惨，七八岁就得从役，至 80 尚难幸免。稍有良知的官僚也惊呼赋役之重，已达伤天害理的地步。即便如此，依然是国库空虚，国用匮乏。统治阶级欲壑难填，人民流亡相属，小规模起义不断爆发。早在东晋中期，大士族王羲之就发出了“深可忧，深可忧”的惊呼。司马元显的举措，无疑是给尖锐的阶级矛盾火上浇油，终于激出了孙恩领导的起义。

孙恩，琅邪（郡治山东临沂北）人，士族出身，世奉五斗米道。其叔孙泰是五斗米道首领。当时东土信奉五斗米道者甚多，许多士族也成为道徒，但更多的是贫困无依的农民。当路权贵怕孙泰惑众作乱，曾将孙泰流放广州。王恭之乱时，司马道子诛除孙泰及其六子。孙恩逃奔海岛翁州（浙江舟山群岛），聚集徒众百余，意在复仇。隆安三年十月，东土骚动，孙恩率徒众登陆，攻占上虞（今属浙江），推进山阴（浙江绍兴），发展到数万，执杀会稽内史王凝之。三吴八郡群起响应，建康周围也处处蜂起，旬日之中，众达数十万。孙恩自为征东将军，以山阴为起义中心，称部下为“长生人”。东晋朝廷震惊，以元显领中军将军，命徐州刺史谢琰统军镇压。北府名将刘牢之主动请战，领兵出征。孙恩骤胜而骄，为谢、刘击败，退屯海岛。谢琰出任会稽内史，主持剿除事项。次年，孙恩两次登陆，第二次在邢浦（浙江绍兴北）小胜后直逼山阴。谢琰自诩在淝水之战中曾击败苻坚雄师百万，视孙恩为“小贼”，不以为虑。临战前又不准士兵吃饭，扬

言“先灭此贼而后食”，被义军击杀。东晋命刘牢之主持镇压。北府兵久经战阵，义军频战不利，孙恩又退据海岛。隆安五年，孙恩由浃口（浙江镇海东南）再出，攻句章（浙江宁波）、海盐（今属浙江）等地，在刘牢之的骁将刘裕的阻击下，于五月转攻沪渎（上海青浦），杀吴国内史袁山松。六月，孙恩统楼船千艘、10万之众浮海疾进丹徒（今属江苏），进扑京口。东晋宣布内外戒严，征各路兵马入卫。孙恩见京师有备，乃分兵卢循，攻破广陵（江苏扬州），自统水师，浮海至郁州（江苏连云港）。刘裕尾随而至，孙恩三战三败，损失较重，再度退据海岛。东晋加强沿海防务，义军给养困难，瘟疫流行，死者大半。为求出路，元兴元年（402），孙恩登陆进攻临海（浙江临海东南），兵败后投海自杀。余众由卢循和徐道覆统领，退据番禺（广东广州），接受招安，任广州刺史。义熙六年（410），卢循、徐道覆领兵再起，一度威逼建康。在刘裕的部署和镇压下，徐道覆牺牲，卢循中箭后投水自杀。起义失败。这次起义主要战斗在三吴一带，给腐朽的东晋和南北士族沉重的打击，对南方经济的发展有所贡献。 （蒋福亚、周 昕）

慕容德建南燕

东晋隆安四年（400），后燕残余势力慕容德据有青、兖，称帝广固，建立南燕。

慕容德（336—405），字玄明，前燕主慕容皝之少子。前燕亡后降前秦，淝水之战后协助慕容垂复国。后燕建立，封范阳王。太元二十一年（396），北魏道武帝拓跋珪亲统40余万大军推进河北，分兵50000，由拓跋仪及贺赖卢进攻邺城（河北临漳西南）。时慕容德守邺，小挫魏军，在别驾韩绰的建议下深沟高垒，向后秦呼救。次年春，利用拓跋仪和贺赖卢间的矛盾，大破魏军，暂时稳定了邺城的形势。北魏偏师虽败，主力却势如破竹，歼灭后燕精锐，后燕主慕容宝奔窜辽西，燕都中山（河北定县）为魏所得，邺城顿时告急。慕容德之侄慕容麟建议：北魏既得中山，必然乘胜来攻，邺城城大难守，人心骚动，不足一战。不如乘魏军未集，拥众南渡，据有滑台（河南滑县东），聚兵屯粮，伺机而动，收复失地。隆安二年正月，慕容德乃率民户40000，车27000乘南撤。在黎阳津（河南浚县东南）骤遇大风，船只漂没殆尽。魏军闻风追击，距离已近，人情遑迫。幸好黄河结冰，慕容德冒险连夜南进。次日，魏军追临河边，冰凌已动，只有望河兴叹。慕容德一到滑台，即自称燕王，承制封拜。隆安三年，降归慕容德的前秦残余势力苻广自称秦王，据乞活堡叛乱，慕容德被迫亲征，其部属李辩乘机袭杀留守慕容和，举滑台降魏。在退无所据时，尚书潘聪建议：青州沃野二千里，精兵10余万，左有负海之饶，右有山河之固，广固（山东益都西北）城高墙坚，地形险阻，可为帝王之都。三齐英杰欲得明主以立尺寸之功，刺史辟闾浑又是燕之旧臣，今可遣使陈述利害，促其归顺。若彼不允，则临之以兵，亦取之如拾芥。慕容德欣然接受，引众南进。青、兖等地，慕容氏影响甚大。慕容德一到，兖州北部闻风而降。由于军纪严明，军无私掠，迅速打开了局面。辟闾浑据地不降，慕容德被迫进兵，攻占琅邪等地，移檄青州，徐、青、兖等地降者相继。辟闾浑势孤，退居广固后亦难自保，乃北奔北魏。慕容德据有广固后，在隆安四年自称皇帝，建元建平，史称南燕。南燕全盛时版图东至海，南滨泗上，西带巨野，北薄于河，约相当于今山东大部及河南东部一角。

南燕继承了后燕优遇豪强大族的传统，青、兖等地历来又是地主经济较发达的地区，鲜卑贵族和汉族地主肆意鲸吞，兼并土地，隐匿人户，乃至“百室合户，千丁共籍”。南燕历二主，立国凡11年，在义熙六年（410）被东晋刘裕击灭。 （蒋福亚）

李暠建西凉

东晋隆安四年（400），李暠在敦煌自称大将军、凉公，建立西凉。

李暠（351—417），字玄盛，陇西狄道（甘肃临洮）人。世为陇西大姓。隆安元年，后凉建康（甘肃高台南）太守段业乘后凉衰落之机自立，称凉州牧，署孟敏为沙州（甘肃敦煌）刺史，李暠为效谷（敦煌西）令。不久，孟敏死，李暠被敦煌护军敦歉和沙州治中索仙等推为敦煌太守。

前秦击灭前凉后，为经营西域，曾掠徙江汉一带万余户汉人于敦煌，后又迁中原7000余户来此。后凉内乱时，武威、张掖等地又有数千户汉人避难敦煌。敦煌一带，汉族占有明显的优势，成为李暠自立的有力支柱。敦煌南有祁连山，北有大漠，西为西域，东面的段业正面临沮渠蒙逊夺权的威胁，无力西顾。因此李暠虽然臣属段业，实质是个割据政权。隆安三年，段业称凉王，命索嗣统500骑接管敦煌。李暠本拟拱手让位，其亲信张邈及宋繇等坚决反对，指出后凉已衰，段业昏庸懦弱，当今正是英雄奋发有为之日，奈何束手于人。大丈夫既已为世所推，怎能授首于索嗣，岂不为天下所笑？建议乘索嗣骄傲轻敌，尚未入郡之机，突然袭击，割地自雄。李暠如计而行，据

有敦煌和酒泉一带。次年自立，称大将军、凉公，兵掠玉门关（敦煌西北）和阳关（敦煌西南）以西之地，大田积谷，准备东进。义熙元年（405），李暠迁都酒泉（今属甘肃），妥善安置汉族民户，以江汉一带迁来的5000余户置会稽郡（治甘肃安西西南），中原迁来的5000余户置广夏郡（治安西南），其余13000余户置武威、武兴、张掖（均在敦煌南）三郡。同时命沙门法泉奉表建康（江苏南京），称臣于东晋。借助晋室名义，进一步获取汉族民户的支持。西凉政权渐趋巩固。

西凉是十六国时期占地最小的一个政权，仅有今甘肃酒泉、玉门、安西及敦煌之地。李暠勤心吏治，劝课农桑，提倡文教，故西凉一度"年谷丰登，百姓乐业"。义熙十三年，李暠死，子李歆继位。李歆盛兴宫室，繁刑峻法，人力凋残，百姓愁怨；又屡动干戈，国势日衰。其东面强敌北凉在沮渠蒙逊的统治下却日益强大，永初元年（420），沮渠蒙逊利用李歆企图夺取张掖的心态，扬言将亲统主力东伐西秦，引诱李歆出击。李歆中计，统兵30000东进，中伏大败，仍不退兵。蓼泉（甘肃高台西）一战，全军覆没。李歆身死，西凉亡。西凉历二主，立国凡21年。 （蒋福亚）

沮渠蒙逊建北凉

东晋隆安五年（401），卢水胡沮渠部酋长沮渠蒙逊在张掖称公，建立北凉。

十六国后期，河西走廊一带的民族成分相当复杂，势力较大的有鲜卑乞伏部、秃发部及卢水胡沮渠部等。吕光据有河西走廊等地，建立后凉后，并无积极措施稳定统治，只是凭恃武力东征西伐，因而内部叛乱屡有发生。吕光晚年刑政失措，诸子凶暴，社会矛盾进一步激化。隆安元年，继秃发乌孤称王，建立南凉后，又发生了卢水胡沮渠部酋帅沮渠蒙逊和沮渠男成逼迫建康（甘肃高台南）太守段业的叛乱，后凉国势更趋衰弱。

卢水胡是匈奴的一支，因世代游牧卢水（甘肃黑河）流域而得名。主要集中在今甘肃张掖一带，受汉族影响较深，会汉语，汉化程度高于鲜卑乞伏部和秃发部，上层酋帅大都通晓经史。蒙逊祖先曾任匈奴左沮渠的官职，因以为姓。蒙逊博通经史，有勇略，多计谋，常怀"安时之志"，实质是时刻企图割据一方。父子兄弟均居官后凉。隆安元年，吕光听信谗言，杀了蒙逊两个叔父，各部姻亲前来会葬者万人，蒙逊乘机煽动，倡言为其叔报仇，在诸部的支持下攻占临松，屯居金山（甘肃山丹西南）。其兄沮渠男成时任后凉将军，闻讯合兵数千，攻杀酒泉太守，逼京兆（陕西西安北）人、建康太守段业称凉州牧、建康公，与后凉决裂。攻占张掖（今属甘肃）后，在隆安三年又拥段业为凉王，男成掌军国重任，蒙逊为张掖太守。为削除蒙逊兄弟的权力，段业有意疏远蒙逊兄弟，并在隆安五年任马权为张掖太守。马权隽爽有豪气，武略过人，成为蒙逊扩张权势的一大障碍。蒙逊乃利用段业心胸狭窄、猜忌心极重的特点，中伤马权，促使段业杀了马权。马权一死，蒙逊便鼓动男成取段业而代之，被男成拒绝，男成由此成了蒙逊爬上权力顶峰的障碍。蒙逊再次利用段业的猜忌心，求出为安西（甘肃张掖和民乐间）太守，约男成在其行前同祭马兰山（甘肃山丹西南）。在得到男成首肯后，立刻诬告男成想联合自己兴兵作乱，证据是男成即将告假三日，求祭马兰山，该日正是男成谋反之时。段业收捕男成。男成揭露这是蒙逊制造的阴谋，警告段业：臣若朝死，蒙逊必夕发！建议段业诈言处死自己，届时蒙逊必兴兵造反，己再领兵讨伐，必可获胜。段业不听，处死了男成。蒙逊乘机发作，哭告众人，声言要为男成报仇。男成在段业部属中素有威望，无辜被杀，激起诸部怨恨。蒙逊奸计得逞，集众万余，在周围羌胡的支持下，于该年五月攻克张掖，俘杀段业，自称凉州牧、张掖公。史称北凉。后凉灭亡后，蒙逊先后称臣于南凉和后秦，缓和来自东、南两面的挤压，省徭薄赋，致力农耕，务尽地利，颁布科条，稳定统治，使境内得以休养生息。义熙六年（410），蒙逊大败南凉主秃发傉檀，乘胜围攻姑臧（甘肃武威）。傉檀逃遁，姑臧为蒙逊所得。义熙八年，蒙逊迁都姑臧，称河西王。其后又数败西秦，并在永初元年（420）击灭了西凉，据有昔日前凉全境。在十六国后期，北凉是河西走廊割据政权中政治和经济状况最好的一个，和西域保持着较为频繁的友好往来。北凉历二主，立国凡39年，在北魏太延五年（439）被北魏击灭，余部奔窜西域。北凉的灭亡，标志十六国时期的告终。 （蒋福亚）

桓 玄 之 乱

元兴元年（402），桓玄兵下建康，于次年称帝而掀起的一场战乱。

隆安三年（399），荆州大水，平地三丈。刺史殷仲堪开仓救济，府库为空。江州刺史桓玄乘机扬言北伐，要借道荆州。殷仲堪洞悉桓玄意图，向雍州刺史杨佺期呼救。杨佺期也有意于荆州，只怕兵出无粮，殷仲堪声言决无问题。实际是荆、雍合兵后，粮草毫无着落，士气急剧跌落。结果杨佺期被桓玄俘杀，殷

仲堪奔窜。桓玄尽有长江中流，东晋地盘三分之二为其占据。桓玄招兵买马，署置亲信，将势力伸向淮南，不断令人向自己进献符瑞，致书司马道子，指摘时政，意欲取晋而代之。又借口讨伐孙恩，准备兴兵东下，遭拒绝后乃封锁长江，利用三吴残破，饥荒严重，严禁上流物资运向三吴，逼迫朝廷就范。元兴元年，录尚书事司马元显自为征讨大都督，以刘牢之为前锋都督，诏讨桓玄；发布桓谦为荆益梁宁四州都督、荆州刺史，想造成桓氏内讧。桓玄抗表朝廷，发布檄文，历数元显罪状，兵发江陵，顺江而下。其实此举纯属虚声恫吓，故作姿态。当听到元显西讨后，便忧心忡忡，时刻准备回撤。殊料兵至寻阳(江西九江)，看到元显在如此重要的军事重镇也不设防务，大喜过望，立刻气势汹汹地推进建康。不久，桓玄据有姑孰(安徽当涂)，分兵击败豫州刺史司马尚之，攻占了历阳(安徽和县)等重镇。

元显诏讨桓玄，同样是虚声恫吓。发诏后成天昏醉如泥。刘牢之亲诣军门也难一见，只是在御前偶尔和元显相会。刘牢之对元显素无好感，又怕功高遭忌，不为元显所容；自恃手控北府兵，想借手桓玄，翦除元显，然后视隙而动，攫取大权，因而拥兵观望。牢之族舅何穆之充当桓玄说客，历数历史上飞鸟尽，良弓藏，狡兔死，走狗烹的事例，劝其和桓玄联手，长保富贵。牢之便遣子刘敬宣诣桓玄请降。桓玄顺利进入建康，杀元显及司马尚之等，贬司马道子，自为总百揆，把当时代表人臣拥有最高权力的名号全数戴到自己头上；接着自兼徐州刺史，任桓修为徐、兖二州刺史，转刘牢之为会稽内史，实则是把刘牢之的地盘和兵权剥夺一空。刘牢之于心不甘，召集北府将领谋据江北讨伐桓玄。北府将领对刘牢之为一己之利反复无常早就心怀不满，谋议未完，各自四散而走。刘牢之成了孤家寡人，上吊自杀。桓玄乘势将北府高级将领诛戮殆尽。至此东晋再无一个权势集团或军事力量可与桓玄抗衡了。

东晋中后期几个皇帝的才干全都低于常人。简文帝司马昱(371—372年在位)登位前居官宰辅，见皇室多故，稍有才干的宗室迭遭权臣杀戮，为了保命，醉心于玄学清谈，在军政上从不提出自己的主见，也没有任何主见，全凭权臣和心腹左右。视入继大位为"傥(无意中)来之运"，临终前想禅位桓温。所以谢安说简文帝和白痴惠帝相差无几。孝武帝司马曜(字昌明，373—398年在位)10岁继位，资质愚钝，长大后权势欲甚旺，却又成天沉迷酒色，长醉不醒，被宠妃张贵人闷死。继谢安辅政的会稽王司马道子和乃兄孝武帝秉性一样，贪婪、好色、嗜酒，只要能为其聚敛财物，便视为心腹，听凭其为所欲为。道子置孝武帝暴死于不问，拥寒暑不分的白痴安帝司马德宗入继大位，乘机抢得摄政高位，然后便终日酣饮。其子司马元显乘道子醉酒，攫取了大权。道子无奈，更于醉中求生。元显秉性更胜于乃父，骄横不可一世，面对烽火连天，民不聊生，四分五裂的局面，还自诩一时英杰，风流名士，算无遗策，天下无敌。年方17，便以德高望重自居，讽喻百官展拜礼敬，威福过于帝王。皇室如此昏聩糜烂，导致人心尽失。简文帝时，民间就传言"晋祚尽昌明"。此时，"晋祚将终"已成时人之共识。孙恩起义时，三吴士族从之者甚多，也即说连一些士族也不愿和司马氏共天下了。

晋室南渡时，一些颇有作为的高级士族，此时也腐朽已极。以王、谢为首的高级士族们鄙薄戎马生涯，不屑日常政务，生活放荡，聚敛无已，一味追求骄奢淫逸。琅邪王氏自王导死后，在军政方面极少有成才者；陈郡谢氏崛起于东晋中叶，淝水之战中名噪一时，不久便尸位素餐。有的已愚蠢到了极点。孙恩兵进山阴(浙江绍兴)，会稽内史王凝之力阻将士们防卫，声称已在密室中求得鬼神的庇护，孙恩将不战自败。直到城破被杀，还不知道为何鬼神突然失灵。谢琰在淝水之战中立有大功，号称名将，临战前居然不准士兵吃饭，乃至全军覆没，身为刀下之鬼。有的士族身居高位，连官场术语也一窍不通。东晋士族本来就对晋室盛衰视若无谓，一切均以身家门户利益为重，所以后人评说晋室无忠臣。值此晋室人心尽失之际，更把桓玄视作救星，力图通过改朝换代确保权位。谢安的孙子谢澹和谢裕早就投靠了桓玄，成为其心腹。在东晋中后期活跃于军政领域的太原王氏的王愉父子则迫不及待，一再向桓玄上劝进表。王导的孙子王谧更是不甘人后，捧着玺绶送给了桓玄。士族之首尚且如此，其他士族岂有不亦步亦趋的。在高级士族的一片颂扬声中，元兴二年九月，桓玄称楚王，十一月称帝，建国号为楚，建元永始，贬安帝为平固王，放逐寻阳。

桓玄充其量是个政治上的赌徒加流氓。称帝前桓玄声言奉诏北伐，全部准备工作是命人把珍宝器玩装入轻舟快艇。旁人不明所以，桓玄若无其事地说：兵凶战危，难免不测，如此可以轻而易运。暗中又令人上章不宜北伐。桓玄贪得无厌，尤爱珍宝，珠玉从不离手；人有名贵书画、宝物和好的田宅庭院，桓玄都欲据为己有。明抢不成，逼人陪赌，输光为止。桓玄一心想当皇帝，逼安帝亲书禅位手诏，抢夺玺绶，

一切到手，却又假意谦让，逼迫朝臣一再磕头坚请。桓玄根本不知道什么叫经世治国，但偏偏以明君圣主自居，无事找事，朝令夕改，吹毛求疵，各部门无所适从，奏章文牍山积。称帝后穷奢极欲，大兴土木，游猎无度，自其掌权到称帝，繁华的三吴地区人户丧失过半，临海（郡治浙江临海东南）和永嘉（郡治浙江温州）等郡竟至死亡流离殆尽。如此统治，岂能不天怒人怨！

桓玄诛除北府高级将领时，中下级军官人人自危，只有刘裕镇定若恒，估计桓玄不会对彼等下手，还得利用彼等控制北府兵。果然，当桓修出任京口（江苏镇江），控制北府时，任刘裕为参军。桓玄称帝前，探询北府中下级将领的态度。刘裕佯装赞成，进一步博得桓氏欢心，暗中则和刘毅、诸葛长民、何无忌等商定：桓玄甘守臣节，我等只有服从。不然，则起而图之。也即说，他们名位较低，没有号召力，难以起事。桓玄一旦称帝，就落了个篡逆之罪，他们便可乘机而起，争夺天下了。桓玄称帝，恰恰授刘裕等口实，决定在京口、历阳、广陵（江苏扬州）和建康四地同时发动。元兴三年二月，刘裕纠合徒众百余，乘凌晨薄雾之时，伪称朝廷信使，突入刺史府，斩杀桓修。随即矫命安帝复位，奉诏讨贼。桓修党羽四散而走。刘裕夺得京口。除建康外，历阳、广陵也相继得手，刘裕等合兵，进逼建康。

听说刘裕起兵，桓玄六神无主，部署逃命，只是在桓谦等一再请求下，才发兵20000，布防覆舟山（建康东南）。其实此时刘裕仅有徒众1700人，但桓军毫无战心，江乘（江苏句容）及罗落桥（句容南）两战，荆州骁将吴甫之及皇甫敷相继丧生，覆舟山之众一触即溃。桓玄闻讯，扬言拒贼，浮江南逃。刘裕进入建康，被推为扬徐兖豫等八州都督，成为最高军事统帅。高级士族们又拥簇于刘裕门下。桓玄逃到寻阳，挟持安帝退向江陵，一路亲自撰写起居注，夸耀自己经略指授，算无遗策，只是诸将违背节度，才使贼势猖獗。反复构思诵读后，颁示远近。借此为自己流芳百世制造舆论，在军事上实质毫无主见。在江陵，桓玄拼凑起20000军队，峥嵘洲（湖北鄂城）一战，又为刘毅等不足万人的军队打败。何处安全，是汉中还是巴蜀，桓玄犹豫不定，东藏西窜，不知所止，好不容易逃到枚回洲（江陵南），便被人击杀。刘裕等扶安帝复位，自此东晋大权落入刘裕之手。

（蒋福亚、周　昕）

赫连勃勃建大夏

东晋义熙三年（407），匈奴豪酋赫连勃勃在高平川称天王，建立大夏。

赫连勃勃，南匈奴北部帅刘猛的后裔，刘卫辰之子。该部原先迁居并州新兴（山西忻县）一带。西晋泰始七年（271），刘猛叛出塞外，兵败身死，余部加入鲜卑拓跋部的部落联盟，与拓跋部世通婚姻。北人称胡父鲜卑母为"铁弗"，该部自此便以铁弗为号。实际上是匈奴和鲜卑混合而成的一个新的部落。势力壮大后，为与拓跋部争夺联盟的领导权，刘卫辰叛奔前秦主苻坚。前秦击灭代国，将代国一分为二，黄河以东归刘库仁，以西归刘卫辰。拓跋珪复国后，在登国六年（391）击灭刘卫辰，赫连勃勃辗转逃到了高平川（宁夏南部清水河），投奔了臣属于后秦的鲜卑酋帅没奕于，被没奕于招为女婿。后秦主姚兴看重勃勃才用，任为安远将军，统刘卫辰余部及其他少数民族30000余落。助没奕于镇高平（宁夏固原）。不久，迁安北将军，镇朔方（内蒙古杭锦旗北），统三交（陕西榆林西）一带五部鲜卑20000余落。时后秦与北魏通使交好，勃勃乃怒而叛秦，在义熙三年袭杀没奕于，兼并其众，自称大夏天王、大单于，建元龙升，是为大夏始年。有人建议勃勃奠都地形险固、山川沃饶的高平，南取长安，经营宇内。勃勃拒绝，指出草创伊始，兵力不足，如若固守一地，必然招来后秦全力进攻，亡可立待。何况姚兴也是一位英雄，关中决非轻易可取。决定凭借机动力极高的骑兵，采用游动战术，逐步蚕食岭北（陕西礼泉县九嵕山以北）及河东等地，待姚兴死后，再徐图长安。勃勃本拟通过和亲西结南凉，集中力量南图。遭南凉主秃发傉檀拒绝。勃勃怒而西进，驱掠南凉27000余口，马牛羊数十万头而归。傉檀尽锐来追，为勃勃大败。经此一役，南凉势衰，勃勃方集中力量蚕食后秦。义熙四年，勃勃俘斩后秦左仆射齐难20000余众，岭北一带纷纷归降。五年，姚兴御驾亲征，大败而回。勃勃掠徙7000余户而归。六年，勃勃兵出平凉（甘肃平凉西北）、定阳（陕西宜川西北）等地，坑杀后秦将士4000余，掠徙民户近20000。七年，勃勃攻杏城（陕西黄陵西南）、安定（甘肃泾川北），俘获45000余众；攻东乡，掠户3000余。九年，勃勃征发伕役兴筑都城，取一统天下、君临万邦之义，定名为统万（今陕西靖边白城子）。为求坚固，蒸土筑城，锥刺入一寸，杀筑城者，毁去重筑。统万城高10仞，基宽30步，上广10步，城墙之坚硬，可以磨刀。勃勃征召工匠精造兵器，射箭入甲，杀铠

匠，不入，杀弓匠。大夏所锻百炼钢刀锋利无比，铭曰“大夏龙雀”，为当时罕见之珍品。该年，大夏再克杏城，坑杀后秦将士20000余人。十二年攻上邽（甘肃天水），杀后秦5000兵马。当时姚兴已死，后秦内乱频作，根本无力抗御，岭北一带尽为勃勃占有。刘裕击灭后秦后，急于回建康（江苏南京）争权，统师南还。勃勃乘机大举打入关中，十四年大败晋军，攻占长安，大夏进入全盛，其有效统治区南阻秦岭，东戍蒲津，西收秦陇，北薄于河，约当今陕西北部及内蒙古河套一带。大夏历三主，立国凡26年，在北魏神䴥四年（431）被吐谷浑击灭。　（蒋福亚）

冯跋建北燕

东晋义熙五年（409），后燕权臣冯跋自称天王，建立北燕。

冯跋（？—430），字文起，长乐信都（河北冀县）人。其父冯安时徙居和龙（辽宁朝阳），深受鲜卑影响。冯跋是个鲜卑化了的汉人，任后燕中卫将军。太元二十一年（396），北魏道武帝拓跋珪兴兵40万推进中原，后燕主慕容宝统骑万余，突出重围，奔窜龙城（辽宁朝阳），收拾残余，偏居辽西。经此惨败，后燕统治集团内部权势之争空前激烈，政变迭起，自隆安二年（398）至四年间，三易其主。最后慕容宝之小弟慕容熙被拥为主。慕容熙好大喜功，骄奢淫逸，酷爱游猎，统治更加黑暗昏暴。登位后盛兴宫室园囿，连房数百，观阁相交，特意为其宠妃苻氏开凿曲光海、清凉池和兴建承华殿等，逼令百姓士卒盛暑施工，不准休息，死者太半。苻氏病重，慕容熙倾国征发，为苻氏赶造陵寝。同时又兴兵攻打高句丽，士卒大都冻饿而死。辽西民户本来不多，如此滥用民力，搞得人不聊生，民怨沸腾。统治集团内部权势之争再度爆发。义熙三年，因坐事亡命的冯跋和左卫将军张兴联合20余人，推慕容宝养子高句丽人慕容云（原姓高）为盟主，乘慕容熙出城为苻氏送葬之机，发动尚方徒役5000，据龙城政变。慕容熙兵败潜逃，被执杀。慕容云被推为主，恢复原姓高，以冯跋掌军政大权。高云无功而居大位，心常不安。为防政变再次发生，蓄养大批壮士，赏赐动至数千万，命心腹离班和桃仁统领。离、桃二人贪得无厌，欲壑难满，在义熙五年又发动政变，杀高云。冯跋领兵镇压这次政变后，被推为主，称燕天王，改元太平。史称北燕。

冯跋称天王后力革后燕弊政，轻徭薄赋，劝课农桑，勤心政治，通好东晋，和亲柔然，与库莫奚等发展互市。辽西地区经济渐有恢复。北燕全盛时据有今河北东北部和辽宁西南部，在北魏太延二年（436）被北魏击灭。计历二主，立国凡24年。　（蒋福亚）

刘裕北伐

东晋后期，权臣刘裕在义熙六年（410）和十三年两次北伐，取得击灭南燕和后秦的重大战果。

刘裕（363—422），字德舆，小名寄奴，中下级士族。原籍徐州彭城（江苏徐州），曾祖刘混时南渡，土断后落籍京口（江苏镇江）。刘裕幼年贫困，樵渔为生，后加入北府兵，在镇压孙恩起义中崭露头角。平定桓玄之乱后，刘裕扶晋安帝复位，执掌东晋大权。刘裕并无忠于晋室之心，意欲乘运禅代。东晋一代，门第观念极盛，刘裕门第低微，无所依恃，力图走立功立业的道路。当时，北魏崛起于燕、代，兵进河北；南燕盘踞青、兖；后秦据有关、洛。其中南燕地小力薄，吏治败坏，人户隐匿严重，乃至“百室合户，千丁共籍”，阶级矛盾尖锐。义熙元年，南燕主慕容德死，兄子慕容超继位。慕容超杀戮宗室，贬逐忠良，信用小人公孙五楼等，不恤政事，游猎是好，猜忌群臣，赋重役勤，人不堪命，又欲严刑峻法强化统治，被大臣封孚比作桀、纣之主。晋室内乱时，慕容德不断兴兵南犯，虏掠人口作奴婢，称作“吴口”，分赠后秦等国。义熙五年二月，南燕攻拔宿豫（江苏宿迁），大掠而去。又寇济南（今属山东），俘掠男女千余人，迫使彭城（江苏徐州）以南百姓结寨自保。为此，刘裕不得不兴兵讨伐了。但是朝中反对者多，赞同者少。一怕南燕据大岘（山东沂水北穆陵关）之险；二怕其坚壁清野，造成晋军孤军深入，全军覆没。刘裕成算在胸，指出慕容超贪婪，没有远图，进利虏获，退惜禾苗，估计我悬军深入，不能持久，无非是进据临朐（山东莒县境内），退保广固（山东益都西北）而已，决不会守险和坚壁清野。毅然在这年四月率舟师由淮入泗，在下邳（江苏睢宁西北）舍舟陆行，留下辎重，沿途筑城留兵，轻装捷进。果不出其所料，慕容超非但不守险和芟苗清野，还把力主此议的慕容镇投入了监狱。刘裕兵过大岘，喜形于色，以手指天说：兵已过险，士有必死之志，余粮栖亩，人无匮乏之忧，虏已入我掌中矣。慕容超亲统步骑40000拒战。刘裕以兵车4000辆屏障两翼，逐次推进，激战临朐之南。双方胜负难分，刘裕采纳参军胡藩的建议，分兵檀韶和向弥，潜出燕军腹背，扬言援军自海道而来。慕容超大惊，单骑奔至城南，投其部将段晖。刘裕乘机奋击，大败燕兵，斩其上将10余人。慕容超退据广固。刘裕乘胜逐北，攻克广固大城，作长围三重，包围了小城，青、兖人民荷戈

负粮，前来投军和支援者日以千数。在慕容超的呼救下，后秦虚声恫吓刘裕：已遣铁骑10万屯洛阳，若晋军不退，当长驱而进。刘裕警告来使：回去告诉汝家姚兴，我克燕之后，息兵三年，当取关、洛。现在若能自送，便可速来！次年二月，在刘裕猛攻下，慕容超统数十骑突围而走，被追获，送建康斩首。南燕亡。

义熙十二年，后秦主姚兴死，子姚泓继位，懦弱多病，难服众心。姚兴晚年，争位之事已起，此时争夺更甚。又东受北魏威胁，北受大夏进逼，后秦已岌岌可危。该年八月，刘裕抓住时机，兵发四路，北伐后秦：王镇恶、檀道济统步兵沿淮泗攻许、洛；朱超石、胡藩、沈田子和傅弘之趋武关（陕西丹凤东南）；沈林子、刘遵考统水军出石门（河南荥阳汴水入河口），自汴水入黄河，配合王镇恶；王仲德统水军自淮入泗，自泗入清、济，由济入河。刘裕进驻彭城，节制诸军，计划会齐洛阳，再入关。王镇恶、檀道济一路顺利，后秦诸城望风而降，晋军占成皋（河南荥阳上街镇）。前秦洛阳守将姚洸在城郊一战失利，开城出降。王镇恶等贪功，向潼关推进。时北魏已据有并、冀等州，设防黄河南岸的滑台（河南滑县东南），挡住王仲德入河后的通路。北魏滑台守将尉建怯懦，弃城而逃。魏明元帝拓跋嗣大怒，命于栗磾凭河筑垒，加强守备；叔孙建、公孙表引兵渡河，斩尉建，预防晋军。又遣使责问晋军无端侵境。刘裕谦词解释，声明只是借道，非敢对魏不利。北魏不信，添兵点将，准备助秦一战。

东晋大军压境，后秦统治集团内部矛盾加剧，相继爆发了蒲阪（山西永济蒲州镇）姚懿和安定（甘肃泾川北）姚恢的叛乱。姚泓忙于应付，直至次年二月才命姚鸾统步骑50000守潼关，别将姚驴救蒲阪。在秦军阻击下，王镇恶的攻势被挡住，粮草告罄，遣使向刘裕呼救，亲至弘农（郡治河南灵宝北）请百姓捐助粮草。百姓竞相赠送义租，王镇恶转危为安。刘裕也统援军沿王仲德的路线驰援。北魏集结10万大军与晋军夹河并行，以数千骑伺机骚扰。晋军在南岸牵船而进，风急浪高，逆流艰难，船只一有闪失，漂流北岸，就被魏军杀掠殆尽。刘裕命人攻击，军才登岸，魏军已退，稍一松懈，魏军又来。刘裕无奈，特命亲军卫队携战车百辆，上置彭排（挡御兵刃矢石的武器），在北岸结成两端抱河的却月阵，又令勇将朱超石统劲勇2000，携大弩百张及大锤、长矟等守阵。魏军围而攻之，魏将长孙嵩又统骑兵30000助战。魏军肉搏攻阵，蜂拥而上，晋军弓箭失效。朱超石断矟为三四尺，命令劲勇用重锤猛击其后部，一矟往往洞贯三四敌。魏军气馁，奔溃后退。刘裕终于打开通道，进入洛阳；七月，移节陕城（河南陕县），调整部署：沈田子等统疑兵千余由武关北进，屯据青泥峣柳城（陕西蓝田境内）；王镇恶统水军由潼关溯渭水西上，进逼长安。青泥距长安甚近，姚泓怕青泥有失，长安裸露敌前，拟聚歼青泥之敌后再倾国东出，乃亲统步骑数万合围沈田子。敌众我寡之下，晋军人人奋勇。姚泓损兵万余，败奔灞上（陕西西安东）。这时王镇恶在阳陵（陕西高陵西南）境内击杀秦将姚强，溯渭水而上，至渭桥（陕西西安东北），命将士饱餐后舍舟登岸。时渭水汹涌流急，船舰瞬息随流而去，将士们被迫背水一战。王镇恶身先士卒，大破秦将姚丕。姚泓引兵驰救，被败兵冲散，不战自溃，单骑逃回长安。晋军攻破长安北门，姚泓势穷力尽，被迫诣王镇恶军门求降，押送到建康后斩首。后秦亡。大夏主赫连勃勃乘机兵进安定，占有秦岭以北，时刻窥伺关中。

晋室南渡后虽然屡次北伐，从未取得灭国的成就。刘裕两战两胜，先后击灭南燕及后秦，东晋疆域扩大至河南、关中等地，版图之大，为东晋南朝历史之仅有。至此，刘裕终于为代晋铺平了道路。

（蒋福亚、周　昕）

南 北 朝

刘裕代晋

南朝宋永初元年(420),刘裕代晋称帝,开南朝历史之端。

平定桓玄之乱后,北府中下级军官全都成了东晋的显要。刘裕想乘运禅代,与其同时起兵、声名威望相差无几的刘毅和诸葛长民等亦有此心。刘毅,彭城沛县(今属江苏)人,官居豫州刺史、都督淮南等五郡军事。诸葛长民,琅邪阳都(山东沂南南)人,义熙初为青州刺史、都督青、扬二州军事。刘裕蓄意控制中枢和扬州,刘毅竭力反对,因此两人在义熙四年(408)就已失和。义熙六年,刘毅又力阻刘裕北伐南燕。数次较量,刘毅均告失败。镇压卢循起兵时,刘毅乘机攫取了荆州刺史、都督荆宁秦雍交广六州军事,既居上流分陕之重,又勾结尚书左仆射谢混,擅自割取江州万余人马自用。在荆州署置亲信,图谋不轨。义熙八年,刘毅奏请以其从弟刘藩为己副,加强对上流的控制。刘裕佯许,借刘藩入朝陛辞之机,诛杀刘藩及谢混,亲自领兵讨伐刘毅。刘毅兵败,自缢而死。刘裕兵伐荆州,一向贪纵横法的诸葛长民认为时机已到,致书冀州刺史刘敬宣,相约共同起事。敬宣告密。次年,刘裕东还,诱杀诸葛长民。至此,朝中已无可与其抗衡者了。

刘裕执掌大权后,采取一些措施缓和阶级矛盾。一、东晋一代,纲纪废弛,刘裕以身作则,威禁内外,迫使各级部门肃然奉职,吏治有所转变。二、京口(江苏镇江)大地主刁逵,占地万顷,拥有奴婢数千,放纵奴客横行不法,时称"京口之蠹"。刘裕族灭刁氏,将其财产分给贫民;又奏请安帝把王皇后的脂泽田分给百姓。三、消灭刘毅后,下令江荆二州租调以现有户口为准,不得横加征发;荆雍等地官吏私占的屯田池塞一律归公,或还之于民。四、东晋以来,豪贵占山锢泽,名山大川,亦被封锢,百姓樵采捕鱼无所。刘裕下令严加禁断,开放给百姓。五、义熙八年,刘裕主持东晋第四次土断,雷厉风行,会稽大名士虞亮藏匿亡命千余人,被处死刑。在东晋的历史上,高级士族因此而处死刑,实为首次,因此豪右肃然。土断比较彻底,封建政府的赋税有了保证。此外,刘裕还减免了百姓拖欠的一些租赋宿债和老幼的徭役。

刘裕击灭南燕和后秦,镇压卢循后,无论军功政绩,都已无人可与伦比,元熙元年(419)晋封宋王,移镇寿阳(安徽寿县)。刘裕心何止此。直接要求禅代,难以出口,乃在次年正月宴请宋国群臣,酒至半酣,扬言物满遭忌,难以久安,如今自己年届衰暮,应该归老京师,颐养天年了。谁知至晚宴竟,与宴群臣竟无一人猜透其心意,一味歌功颂德。还是其心腹傅亮乖觉,宴散后在路上悟出了刘裕语之所指,赶回叩门求见,请求暂还京师。刘裕心照不宣,问需要多少人护送?傅亮说几十人已足够,连夜赶到建康。在元熙元年才登基的晋恭帝司马德文早知必有这一天,因此十分干脆,说桓玄之时,司马氏已无天下,赖刘公才又延续了20年。今日之事,心甘情愿。四月,刘裕入建康辅政。六月,晋恭帝亲书手诏禅位。刘裕称帝,建国号宋,建元永初,都建康。刘裕即宋武帝。南朝的历史开始了。东晋自晋元帝起,至此凡历12帝,立国102年。

(蒋福亚)

魏太武帝北击柔然

自始光元年(424)至太平真君十年(449),魏太武帝缓解边患的战争。

魏太武帝拓跋焘(408—452),又名佛狸。明元帝拓跋嗣之子,是个奋发有为、谋而能断、知人善任、擅长用兵的皇帝。泰常七年(422)被册封为太子、监国(总摄国政)。始光元年继位。

柔然,亦称蠕蠕、芮芮或茹茹,东胡族的一支,与拓跋鲜卑关系甚密。原先依附于拓跋部。西晋末年,郁久闾木骨闾纠集部众,摆脱拓跋部自立。此人即柔然可汗的始祖。至其子郁久闾车鹿会时,势力渐张,始有柔然之名,活跃于大漠南部。十六国后期,酋长郁久闾社仑在位,势力推向漠北,先后征服游牧于鄂尔浑河和土拉河流域的高车,以及鄂尔浑河西北的匈奴余部,自号豆伐(意为驾驭开张)可汗,建庭鹿浑海(蒙古人民共和国哈尔和林西北),创制了一些律令:勇敢杀敌者分享俘获,怯懦畏缩者用石块击杀,或临时鞭挞;以十进位制组建军队,千人为军,设将军一人,百人为幢,设幢帅一人。柔然迅速强大,东起大兴安岭,西达阿尔泰山,南自大戈壁,北至贝加尔湖均为其势力范围。柔然无文字,以羊屎记兵数,刻木记事,逐水草为生。冬居漠南,夏徙漠北。北魏前期,牟汗纥升盖(意为制胜)可汗郁久闾大檀时,柔然达于极盛,威震西域。

柔然是一个较原始的奴隶制国家,掠夺是其奴隶及财富的主要来源。初建的北魏深受其害。为防柔然入侵,北魏在西起今内蒙古河套西北,东达河北张北一线,设置六个军镇,屯驻重兵,精选镇将,拱卫京师平城(山西大同东北)。北魏也经常兵伐柔然,缓解来自北方的威胁。始光元年,明元帝死,太武帝继位。大檀乘北魏国有大丧,主少国疑之机,统骑60000南下,进击云中,攻拔昔日代国政治中心盛乐宫(内蒙古和林格尔北),平城告急。太武帝亲统轻骑反击,急奔三天两夜,激战云中。大檀包围太武帝50余重,柔然骑兵直逼太武帝马首,将士失色。太武帝镇定自若,挥众奋击,众心乃安。是役,击杀柔然大将於陟斤,大檀兵屈后撤。该年十二月,太武帝命长孙翰和尉眷为将,兵分两路北伐,亲屯平城西部的柞山节度。柔然闻风北遁。魏军小有俘获而还。次年十月,北魏再次大举,五道并进:长孙翰和长孙道生分统东路两军,娥清和奚斤分统西路两军,太武帝自出中路,节制诸军。魏军进至漠南,舍弃辎重,只带15天粮草,轻骑奔袭柔然庭。大檀统部北走。魏军扑空。

神䴥二年(429)五月,太武帝亲出东路,长孙翰出西路,第三次北击柔然。时值宋文帝叫嚣北伐,故朝廷中反对者居多,认为北伐柔然,得不偿失。左仆射安原、太史令张渊等更断言:此行必败!警告太武帝:即便侥幸取胜,也将不利于皇帝。只有崔浩力主此行,指出漠北是天然牧场,击败柔然,人为我使,畜为我有,实为国家大利。何况柔然年年内侵,国家岁岁告警,不败此敌,国家难以安卧,更谈不上防御南贼。就形势而论,此征势在必行。建议乘其无备,轻骑奔袭,乘胜深入,毕其功于一役。崔浩断言;此行必克无疑!告诫太武帝,应防备诸将瞻前顾后,凶酋逃逸,留有后患。不出崔浩所料,魏军取会栗水(今翁金河)时,大檀惊慌失措,焚烧庐舍,只带族党数百人避入山南。其部众惊怖四散,窜伏山谷,牲畜布野,无人收视。太武帝分军搜讨,东至瀚海,西达张掖水,北度燕然山,横行于东西5000余里,南北3000余里间,柔然、高车等30余万落投降了北魏。魏军俘获战马百余万匹,其它畜产弥漫山泽。太武帝由栗水西进,度菟园水(今推河),一直追到涿邪山(阿尔泰山东麓)。将领们恐怕继续深入遭到伏击,力劝太武帝收兵。大檀终于侥幸逃命。八月,太武帝回师漠南,得知东部高车屯集巳尼陂(贝加尔湖),又令安原统万骑前往招降,高车慑于北魏军威,投降者数十万落。魏军得牛马千百余万。此役,魏军大胜,太武帝逼迁柔然和高车于漠南,安置在东起濡源(河北沽源东南滦河)、西达阴山一带,命其放牧,收其贡赋。自此,北魏"马力有余",畜产富饶,马牛羊及毡皮等为之价贱,并取得了放手统一北方的外部条件。

高车降魏,柔然骤衰,大檀郁愤而死,子郁久闾吴提继位,因国势不振,与魏和亲。待其实力稍复,又与魏成为敌国,北边战火再起。太延五年(439),吴提乘太武帝灭凉之机,兴兵犯塞,前锋直达七介山(山西平鲁西北),平城大惊。在魏军阻击下,吴提损折万余,统部北遁。太平真君四年,太武帝四道出兵,直达鹿浑海,吴提仓皇北走。太平真君十年,太武帝乘吴提死,子郁久闾吐贺真新立之机,分三道讨伐,大败柔然,收其人户畜产百余万而归。此役后,柔然再也不敢轻易犯边,北边的威胁终于得到缓解。太武帝将其兵锋转向了刘宋。　　(蒋福亚)

宋文帝翦除景明逆党

元嘉三年(426),宋文帝翦除权臣,巩固权位的措施。

永初三年(422)五月,宋武帝刘裕病死,年仅17

的太子刘义符继位，中书监傅亮、司徒徐羡之、领军将军谢晦和镇北将军檀道济同受顾命之托，次年改元景明(423)。刘裕代晋后，接受东晋主弱臣强、士族权势过大的教训，重用庶姓寒人，顾命大臣中，除谢晦外，大都起自布衣。少帝继位后，并无多大过恶，徐、傅、谢三人贪恋权势，害怕少帝年长亲政，便生废立之意。按体制，若废少帝，应拥立刘裕第二子庐陵王刘义真。但义真行事较果断，与徐、傅等结怨甚深，和谢灵运、颜延之、慧琳道人过从颇密。曾扬言，异日得志，当以谢、颜二人为相，慧琳道人为西豫州都督。为此，徐、傅等利用少帝和刘义真的矛盾，奏废义真为庶人，联合檀道济及士族首领、琅邪王氏的王弘，商定事成之后，谢晦坐镇荆州(治今湖北江陵)，檀道济坐镇广陵(江苏扬州)，徐、傅执权中枢，拥强兵挟持朝廷，内外呼应，互相扶持。景明二年五月，谢晦戒备，檀道济先行，徐羡之等继进，突入宫禁，矫太后之命，宣布少帝亲近小人，多所失德，废为营阳王。随后又杀少帝及刘义真，发布谢晦为行荆州刺史、都督荆湘等七州军事，精兵旧将，悉数归其节制。然后，由傅亮到荆州，迎刘裕第三子、荆州刺史、宜都王刘义隆入继大位。谋议废立的主谋徐、傅、谢日后便被叫作景明逆党。

刘义隆(407—453)闻变，召心腹王华、王昙首、到彦之等密议。心腹们断定先帝(刘裕)有大功于天下，人望未变，徐、傅等布衣寒士，不致有篡代之心。彼此间权势相等，决不肯相让，即便其中有人怀有野心，亦难实行。徐、傅此举，无非是握权自固，立少主为傀儡罢了。万一有所意外，荆、雍的兵力也足可控制局面。谋议一定，刘义隆命王华留守，到彦之赴襄阳控制雍州兵马。在行前才接见傅亮，追问刘义符和刘义真被废杀的始末，悲哭呜咽，近侍等竟难以仰视。傅亮也感气氛严重，汗流浃背，不能对话。途中，荆州文武严兵自卫，傅亮所率迎驾人马均不得靠近，荆州中兵参军朱容子抱刀守在刘义隆坐船的舱外，衣不解带十余日。故到达建康，徐羡之对傅亮说帝必能明我等赤心时，傅亮断然回答：不见得。八月，刘义隆入继大位，是为宋文帝。文帝深沉有谋，即位之初，超迁并推权徐、傅，正式发布谢晦为荆州刺史，参与景明废立者均蒙加官进爵之荣。谢晦离开建康，遥望石头城，喜不自禁地说：吾得脱矣！同时，文帝又以心腹王华和王昙首为侍中，掌机要，二王又和朱容子共掌宿卫禁军。不久，征到彦之为中领军，控制宿卫京师的兵马。到彦之内调时，特意绕道江陵，拜会谢晦，赠送名马、名刀和利剑。谢晦由此心安了。元嘉二年，文帝年满18，徐、傅等被迫归政。王华等急于掌权，日夜唆动文帝翦除景明逆党。文帝深知，若让徐、傅等继续执掌大权，后果可虞。乃利用王昙首和王弘是兄弟的关系，将未参与废立密谋、也决不愿借此受赏的王弘拉了过来。又利用檀道济推崇王弘，两人关系极密这一层，笼络了智勇双全的檀道济。徐、傅、谢的联盟被攻破了。随即扬声北伐，实质是集中兵力准备讨伐谢晦。元嘉三年正月，一切部署完毕，乃发诏暴露徐、傅等罪状，下令收捕。徐羡之逃到建康城外，在陶灶中自尽而死。傅亮逃到建康北门，被捕伏诛。建康一定，到彦之便统军20000先行，檀道济统军30000继发，雍州刺史刘粹统本部袭击江陵。谢晦闻讯，募集精兵30000，命周超统10000留守，亲统20000东下，抗表朝廷，声言清君侧。彭城洲(湖南岳阳东北)一战，到彦之败退隐圻(湖南临湘东北)，会合檀道济后西进。参谋帷幄，谢晦智机迭出，堪称良才；临阵决战，则非其所长，檀道济远胜之。原来估计宋文帝必杀檀道济，故谢晦对荆州军宣布檀道济已死。殊不料檀道济竟领军而来，舰只首尾相连而进。谢晦怯意顿萌，荆州军毫无斗志，一时溃散。谢晦逃回江陵，周超却已赴到彦之营投降。退路被断，谢晦仅余7骑北奔北魏，在安陆(今属湖北)被俘，送建康斩首。宋文帝终于一举全歼了景明逆党。

文帝亲政后，吸取徐、傅等人擅权的教训，采取措施强化王权：一、继承刘裕的措施，以宗室至亲坐镇重要方镇，但调动颇频繁，既使其起有辅弼王室的作用，又避免其拥兵坐大。二、任命宗室至亲及高级士族控制台省，既以宗室至亲为主，又使他们彼此间互相牵制，避免权力过于集中。三、翦除异姓强臣。文帝精通权术，驾驭有方，在上述措施下，收到了政局稳定的实效。但文帝度量狭窄，猜疑心强，在翦除异姓强臣时往往不分青红皂白，其中翦除檀道济所引起的后果尤坏。檀道济是被时人比作关羽、张飞之流的猛将，其左右心腹皆身经百战，诸子都有才略，深为北魏忌惮，时人许之为国之干城。元嘉十三年，文帝病重，唯恐身后无人可制檀道济，乃无端收捕，悉数诛戮。檀道济被捕时愤怒莫名，目光如电，脱帻掷地，怒喝：此乃坏汝万里长城！北魏闻讯，甚喜，互相传告：道济死，吴子辈不复足惮。由此南下之意转盛，不过未敢轻举妄动。

由于政局稳定，慎于用兵，加上文帝重视农桑，鼓励垦荒和增殖人口，厘定户籍，防止豪强把赋役转嫁到一般农民头上；减轻甚至豁免农民的逋租宿债，贷给种粮，倡导发展旱地作物和越冬作物；整顿吏

治，打击贪污，使南方人民得到了近30年的休养生息时间。文帝统治时，是东晋南朝南方经济恢复发展最好的时期，史称“元嘉之治”。　（蒋福亚）

北魏统一北方

始光三年（426）至太延五年（439），魏太武帝拓跋焘先后击灭大夏、北燕和北凉，实现了北方的统一。

北魏开国后，道武帝拓跋珪在政治上、经济上进行了多项改革：一、模仿中原王朝，强化皇权，初步确立了专制主义中央集权政体。二、离散诸部，分土定居，劝课农桑，促成拓跋部由部落组织向地域组织的转化，及由游牧经济向农业定居的转化。三、大力发展农业生产，在五原（内蒙古包头西北及乌拉特前旗东）至稒阳塞（内蒙古包头东）一带实施大规模屯田。在平城（山西大同东北）周围对“新人”和“新民”（被逼迁的各族人民）实行“计口授田”，开发雁、代地区。四、以宗主督护制为地方基层组织，由坞堡主们充任，承认其奴役依附农民的特权，由此减少了进击中原的阻力。五、拉拢和大量使用汉族士人，一些汉族士人进入了权力中枢，尚书郎以下文职官员均由汉族士人充任。等等。明元帝及太武帝时继承并发展了这些措施。明元帝还在崔浩的建议下创设了太子监国制，赋予太子部分最高统治主的权力，使嫡长继承制逐步确立起来，基本上杜绝了因皇位继承问题所引起的内乱。在军事行动中，北魏前期的几个统治主都坚持了先南后北的战略方针，竭力保持和发挥其以骑兵为主的战术优势，以推进中原为其战略目标。由此，北魏日益壮大，为统一中原奠定了基础。

北魏兴起之日，正是东晋内难频作、刘裕代晋之时。刘裕及其后继者为稳定内部，巩固统治，无遑北顾。而北方的几个割据政权在互相火并下也日益衰落，至太武帝继位时，北方只剩下了西秦、大夏、北燕、北凉，实力均小于北魏，且已腐朽。形势对北魏相当有利。

赫连勃勃建立大夏后，一度攻占长安，进入全盛。勃勃凶勇好杀，统治极端残暴，盛兴宫室，穷极侈丽，“视民如草芥”。对汉族地主阶级疑虑极深，胡汉贵族间矛盾重重。结果是“夷夏嚣然，人无生赖”。勃勃晚年，诸子火并，最后其三子赫连昌被册封为太子。始光二年，勃勃死，赫连昌继位，统治一如乃父。太武帝久有灭夏之心，次年九月得知勃勃死讯后，立刻分兵两路，命司空奚斤统军50000攻打蒲阪（山西永济县蒲州镇）、陕城（河南三门峡）和长安等地；亲提轻骑18000渡过君子津（内蒙古托克托南黄河渡口），奔袭夏都统万（陕西靖边白城子）。冬至那天，魏军进抵距统万30里的黑水（无定河北岸支流淖泥河）。赫连昌仓促阻击，败退统万。太武帝分兵抄掠，俘获民户万余，牛马10余万而还。夏蒲阪及长安等地守将得知统万失利，相继弃城而走。奚斤攻占了长安等地。赫连昌于心不甘，在始光四年命其弟赫连定统军20000夺取长安，与奚斤相持不下。太武帝抓住统万空虚的战机，步骑并出，携带攻城器械，总兵近10万再次伐夏。魏军有虏掠各地物资维持后勤的传统，而统万城高墙坚，为避免顿兵坚城之下，后勤不继，难以持久的弊病，太武帝采用置之死地而后生的战术，留辎重及步兵于黑水东北的拔邻山，背靠大河，命轻骑30000倍道急行，埋伏深谷，用羸师诱赫连昌出击，企图战而擒之，再起用步兵攻城。不料赫连昌因兵力单薄，坚守不出。太武帝无奈，挥军后撤。事有凑巧，魏军中有一士兵因罪逃奔大夏，具告虚实：魏军乏食，以菜充饥，现今难以支撑；其辎重在后，步兵未至，太武帝兵单力薄。机不可失，时不我待，赫连昌立刻整军30000，倾巢追截，想一战而擒太武帝。太武帝欣喜过望，佯装逃遁，引夏军远追。夏军分两翼呐喊包抄，步步追逼。眼看赫连昌即将中计，突然狂风大作，灰沙漫天，暴雨继至，由东南方袭来。夏军位处上风，声势更盛。魏军饥渴疲乏，逆风阻击，口眼难张，斗志渐失，形势危急。在崔浩建议下，魏军分骑兵为左右两队，拼死阻击。太武帝坐骑蹶顿，坠下马来，几为夏军俘虏。赖大将拓跋齐力战，幸免于难。太武帝换马再战，身中流矢，依然身先士卒，士气被鼓动起来，终于扭转了态势。夏军大败。魏军乘胜追逐，抢先进入统万城。赫连昌败奔上邽（甘肃天水）。统万城破，赫连定无意再攻长安，也撤元年（428）二月，太武帝命平北将军尉眷会合奚斤和娥清等攻打上邽。魏军先败后胜，俘虏赫连昌。赫连定统余部退到平凉（甘肃平凉西北）后称帝。三月，奚斤命丘堆屯安定（甘肃泾川北），守护辎重，自带三天粮草轻骑追击，想一劳永逸。魏军进至平凉西北的马髦岭后，路径难觅，缺食乏水，在赫连定夹击下，全军覆没，奚斤、娥清等被俘。丘堆闻讯，弃城奔长安，再奔蒲阪，长安等地又为大夏所占。

北魏败退蒲阪，柔然大举犯边，刘宋也乘机扬声北伐。三面受敌，如何对待，朝廷争议甚烈。太武帝采崔浩之议，在神䴥二年亲征柔然。北边的威胁虽然解除，宋文帝的北伐却开始了。神䴥三年，宋军相继攻克洛阳、虎牢（河南荥阳汜水镇）、滑台（河南滑县东）

等地，据有河南大部分地区。赫连定也乘机出动，攻占了鄜城(陕西黄陵北)，并遣使刘宋，双方约定：合力灭魏，中分河北，恒山以东归宋，以西属夏。在腹背受敌的困境中，北魏朝议纷纷，莫衷一是。太武帝和崔浩力排众议，以偏师逼退宋军后，亲统主力伐夏。该年，西秦大饥，难以自存。西秦主乞伏暮末统余部15000余户，想借道上邽，投奔北魏，行至南安(郡治今甘肃陇西东南)的高田谷时，遭赫连定阻击，退保南安。次年在夏军围攻下投降，西秦亡。赫连定虽然灭了西秦，毕竟难挡北魏兵锋，平凉及关中等地相继失陷。神䴥四年，赫连定统领余众西窜，想攻取北凉。渡河时被吐谷浑王慕容瓌俘送北魏，大夏亡。

北燕在冯跋统治时，政治及经济都较好。神䴥二年，冯跋死，其弟冯弘杀冯跋诸子，自称天王。为防北魏进攻，冯弘南结刘宋，被刘宋称为"黄龙国"。太武帝在击灭大夏的第二年，即延和元年(432)，亲提兵马进攻北燕。是役，俘掠民户30000余家而还。自此至太延二年(436)，魏军数次围攻燕都龙城(辽宁朝阳)。在北魏频频进攻下，北燕迅速衰落。太延二年五月，冯弘焚烧宫室，统余部奔窜高句丽。魏军占有龙城，北燕亡。太延四年，冯弘为高句丽王所杀。至此，北方仅有北凉居河西走廊一隅了。

北凉尽有河西走廊后，虽然注意政治和经济，毕竟难抗北魏重压。因此，自沮渠蒙逊起，就向北魏称藩，年年纳贡。北魏封蒙逊为凉州牧、凉王。沮渠牧犍继为凉王后，又受封为凉州刺史、河西王。双方使臣往来频繁。其时，关陇未得，北燕未灭，太武帝虽有意于河西走廊，却是鞭长莫及。牧犍也深知个中关窍，每逢北魏太常李顺使出北凉时(李顺曾12次使出北凉)，总是贿赂大量金宝，求李顺在魏廷为其美言。同时又结好柔然，牵制北魏。随着大夏和北燕的相继灭亡，用兵河西走廊提上了日程。太武帝召集公卿商讨征伐。奚斤等30余人均表反对，理由是新征柔然，士卒疲惫，难以大举。凉州土地贫瘠，缺乏水草，北凉若婴城固守，大军野无所掠，此行难免覆败。李顺反对更烈，描绘亦更具体：自温圉水以西至凉都姑臧(甘肃武威)，是一片戈壁，绝无水草；只是春夏时节，天梯山(祁连山)冰雪融化，居民才能引渠灌溉。如闻大军压境，北凉决渠断水，环城百余里内就将寸草不生。其时人马饥渴，势难久持。太武帝为此犹豫再三。崔浩和李顺虽是姻亲，彼此却结怨甚深。为报私仇，揭露李顺收受贿赂的隐私，依据《汉书·地理志》"凉州之畜为天下饶"的记载，以及汉人决不会在荒无水草之地筑城的常识，推断姑臧周围水草必然丰美，指责李顺谎言惑众。太武帝终于下定决心，在太延五年大举伐凉。魏军节节推进，直逼姑臧城下。九月，牧犍兄子沮渠万年统部降魏。牧犍计穷，开城出降，北凉亡。至此，自西晋灭亡以来，北方分裂混战的局面终告结束，为期一个世纪的南北朝对峙的历史开始了。

(蒋福亚)

元嘉北伐

宋文帝在元嘉七年(430)及二十七年两次北进的战争。

宋文帝刘义隆和魏太武帝拓跋焘同年登基，两人都是有为之主，一个不忘北进，一个时图南下。其时北魏尚未统一北方，北受柔然的威胁，就整体力量而论，宋强魏弱，形势对刘宋颇有利。元嘉七年(魏神䴥三年)，文帝遣使北魏，声言河南是宋土，理当收复，与河北无关。太武帝怒斥：我出世头发未干，就知河南是我之地，若必来夺，我可暂让，待隆冬河冰坚合，即便收回。文帝任人唯亲，不用智勇双全的檀道济，任无统帅之才的到彦之为帅，想凭北伐的功业给其加官晋爵。该年三月，到彦之统王仲德、竺灵秀、段宏等步骑近60000分道北上，豫州刺史刘德武统兵10000继进，长沙王刘义欣统军30000坐镇彭城(江苏徐州)，为监军。北伐大军自淮入泗，日行10里，在七月方达须昌(山东东平西北)。魏军相继弃碻磝(山东茌平西南古黄河南岸)、滑台(河南滑县东)、洛阳、虎牢(河南荥阳汜水镇)诸戍而去。到彦之分兵把守，回驻须昌。冬十月，魏将安颉攻拔洛阳。十一月，叔孙建、长孙道生统魏骑大举反击。到彦之拒绝将领们增兵滑台、北上拒敌的建议，退至历城(今属山东)，弃甲焚舟，南走彭城。竺灵秀也弃须昌南奔。魏军攻济南，济南太守萧承之虽然只有守军数百，但胆气弥壮，下令偃兵开城。魏军长于野战，不善攻坚，见此疑有伏兵，舍之而去。魏将安颉统司马楚之等合力攻滑台，宋将朱修之死守不屈。文帝被迫收到彦之下狱(不久又起用)，在次年初命檀道济统军救滑台。檀道济急进，20余天中，大小30余战，战则有胜，进入历城。但其粮草为叔孙建焚毁，难以再进。三月，滑台因粮尽失陷，骁将朱修之被俘(后逃归)。檀道济只有后撤。恰有士兵奔降魏军，具告宋军已无粮食。魏军衔尾追击。宋军饥疲，斗志消沉，有崩溃瓦解之势。檀道济在夜中唱筹量沙，上面覆盖少许米粒，稳定军心。天明，魏军见后，以为其资粮有余，斩杀降者。檀道济抓住时机，命士兵披甲，自己白服乘舆，引兵徐出。魏军疑有伏兵，不敢进逼。是役，宋军损兵折将，资杖尽

失，“凡百荡尽，府藏为空”。只有檀道济全军而退。刘宋一时无力北上，太武帝则忙于统一北方及征伐柔然，彼此一度相安无事二十余年。在此期间，刘宋并非绝无机会，其中尤以元嘉二十二年（魏太平真君六年）盖吴起义时为佳，盖吴众达10余万，河东响应，魏廷震动，太武帝被迫御驾亲征。盖吴曾数次表奏文帝发兵，文帝却仅给予安西将军的空名，按兵不动，坐失了良机。

元嘉二十六年，彭城太守王玄谟揣透文帝意图，表奏北伐。文帝阅后，醺醺然有封狼居须之意（汉武帝时霍去病击败匈奴，曾封狼居须）。此时，太武帝已统一北方，重创柔然，游刃有余，正想扬威南方。次年初，太武帝亲统步骑10万南下，南顿太守及颍川太守均弃城而走。悬瓠（河南汝阳）被围，军民苦战42天，伤亡过半，杀敌万余。魏军退走。文帝北伐之意转炽。朝议中只有王玄谟及少数文臣如江湛及徐湛之等赞成，反对者居多，其中以大将沈庆之反对尤烈。指出治国如同治家，耕当问奴，织当问婢。今伐人之国，只与白面书生谋议，岂能成功。为筹措北伐，诏令：一、青、冀、徐、豫、兖、南兖六州五个丁男中抽三人为兵，十天之中沿江五郡集结广陵（江苏扬州），沿淮三郡集结盱眙（江苏盱眙东北）。二、凡有马步武艺及勇力者应募，皆给重赏。三、扬、南徐、兖、江四州富民，家赀满50万，僧尼家赀满20万者，均借四分之一，以充军用，事毕即还。七月，宋军水陆数路出动。东路是主力，在萧斌节制下，以王玄谟为主，沈庆之等配合，进攻滑台。西路是偏师，在刘诞节制下，以柳元景（后为帅）为主，尹显祖等配合，出卢氏（今属河南）。柳元景颇有智勇，在河南百姓的支持下，连克弘农、陕县，进军潼关，势如破竹，关中群起响应。王玄谟好大言而无实才，贪得无厌，刻薄寡恩，凶残好杀，却又相当怯懦。将士们大都离心离德，心怀怨望。包围滑台初期，将领们建议用火箭射入城内，焚烧城中茅屋，乘势攻拔。王玄谟却说这是我的财产岂能烧掉。滑台军民闻讯，拆除茅屋穴居，使此计难售。当时，河、洛百姓竞献租谷，接济宋军。丁壮们自动集结前来投奔，日以千数。王玄谟排斥其首领，悉数配属其亲信。又每家发布一匹，责令缴出大梨800，以牟取暴利。由此民心尽失。

宋军甫出，魏沿边诸戍吁请救援，增拨粮草。太武帝认为天时尚热，马匹饥瘦，动必无功，若难支撑，可以后退。待秋高马肥，再行出击。冬十月，太武帝亲统大军渡河反击，众号百万，鞞鼓之声，惊天动地。王玄谟闻风丧胆，仓皇奔退，死者万余，部属散亡殆尽。器械军资，委弃如山。东路溃败，文帝诏令西路后撤。太武帝乘胜追击，分兵攻掠寿阳（安徽寿县）、马头（安徽怀远东）、钟离（安徽凤阳东北）、下邳（江苏睢宁西北）等地，连克悬瓠、项城（河南沈丘）等地。亲统主力攻彭城，不克，引众南下。文帝急令臧质统兵万余，助太守沈璞守盱眙。太武帝直插瓜步（江苏六合东南），拆毁百姓房屋，砍伐树木芦苇，扬言要结筏渡江，进攻建康（江苏南京）。宋廷大惊，内外戒严，大肆征发，在采石（安徽当涂）至暨阳（江苏江阴）六七百里间严密布防。太武帝统军后撤，围攻盱眙，致书守将臧质：如今我所遣攻城士兵，均非我国人（指拓跋部成员）。城东北是丁零及胡人，南是氐、羌，如果你杀死丁零，可减我常山（治今河北元氏西北）之贼，杀胡，可减我并州（治今山西太原西南）之贼，杀氐羌，可减我关中之贼。你杀得越多越好，对我无所不利。盱眙早有准备，城高墙坚，众志成城，魏军使用钩车和冲车猛攻，30来天，伤亡万计，尸与城平，也难得逞。时魏军不服水土，疾疫流行，不克而去。

魏军出动，历来不带粮饷，只靠抢掠。此行，所经杀掠无算。后撤时变本加厉，遇有丁壮格杀勿论，婴儿贯于枪槊戏耍，幸存者奔窜山湖或被驱掠北方。自江、淮至于青、济间，户口数十万，经此浩劫，“百不存一”，村井空荒，“赤地无余”，乃至暮春飞燕归来，连筑巢的房檐也找不到。破坏之惨酷，前所未见。文帝登基后，曾力倡节俭，励精图治，南方及江淮间一度得以休养生息，经济有所恢复和发展，史称“元嘉之治”。至此，元嘉之治宣告结束，国力大为削弱。防线渐渐收缩到淮北。统治集团的内部矛盾随之爆发，元嘉三十年，宋文帝为儿子刘劭弑杀。北魏此行也是伤亡惨重，太武帝在文帝死前一年为宦官宗爱弑杀。

宋文帝北伐之所以失败，除了用人不当外，指授方略错误也是原因之一。文帝并不知兵，出军命将，却好遥授方略，攻战之日，将领都得秉其成命，犯了兵家大忌。太武帝身经百战，娴熟军旅，能战则战，不能战则走，最大限度地发挥骑兵优势。南下时又吸取苻坚淝水惨败的教训，往往舍坚城而不攻，力求野战。宋军以步兵据优势，擅长偷营砍寨，太武帝有鉴于此，指挥骑兵朝东暮西，飘忽不定，使宋军难逞其能，处处被动挨打。（蒋福亚）

魏太武帝灭佛

太平真君七年（446），魏太武帝镇压叛乱和农民起义、巩固统治的措施。

汉魏之际，佛教开始在民间流传。晋末以后，战

乱频仍，统治残暴，民不聊生，佛教获得滋生的土壤。统治者，特别是在中原建立政权的少数民族统治主，面对华夏正统思想，大都有一种怯懦的心理，更想借助佛教巩固统治。在统治者的大力提倡下，佛教日益盛行。诸如后秦，信佛者十室而九。北魏前期，皇亲国戚、达官贵人、信佛佞佛者甚多。太武帝对僧侣亦执礼甚敬，数次遣使北凉，索要当时的著名僧侣昙无谶。

佛教传入之初，仰仗道教及迷信方术流传，在理论上则大多与玄学相附会。乱世之秋，谶纬之说流行，上自君主，下至民庶，大都笃信不疑。佛教徒、道教徒、方士儒生等更借此故弄玄虚，欺世惑众，邀宠争权。太平真君四年九月，太武帝兴兵四道北伐柔然。行前，尚书令刘洁激烈反对。刘洁是个野心家，求得图谶中有"刘氏应王"等语后，便联合太武帝弟乐平王拓跋丕等，力图造成北伐失败、太武帝匹马难返的结局，然后拥乐平王为帝，再伺机篡夺。为此大军出动后，刘洁矫诏更改日期，破坏了四路合击的计划。太武帝追击柔然不及，野无虏掠，士卒死亡甚多，被迫退兵。刘洁乘机委过崔浩。崔浩揭露刘洁矫诏。十二月，太武帝回到平城（山西大同东北），收系刘洁，抄没刘洁及其亲信之家，搜得谶书。次年正月，即颁诏严禁挟藏谶记、阴阳、图纬、方伎等书，指责佛教徒妄生妖孽，有害教化及风俗，规定凡收养沙门（僧侣）及师巫者，必须在二月十五以前一律送官，过期不出，沙门、师巫身死，主人门诛。此诏透露太武帝已有灭佛的意图。

太平真君六年，杏城爆发卢水胡盖吴领导的各族人民起义，击杀长安副将拓跋纥，新平（郡治今陕西彬县）、安定（郡治甘肃泾川北）等地群起响应，义军发展到10余万，屡败魏军。河东（郡治今山西永济县蒲州镇）薛永宗也聚众而起，与盖吴遥相呼应。盖吴又南联刘宋，声势更壮，兵进长安。北魏前期，民族矛盾尖锐，恰值此时又盛传"灭魏者吴"的谶言，因此非但关中震动，且有波及中原之势。鉴此，太武帝被迫征集骁骑60000，分头镇压，亲自驾临关中。次年二月，驻跸长安，进一佛寺，发现寺中藏有大量兵器，便认为僧侣与盖吴通谋，下令抄没，进而发现该寺违背佛教戒律：寺内有酿酒用具；藏有州郡牧守及富豪寄藏的大量财物；建有地下窟室，藏有妇女供僧侣淫乐，等等。在太武帝东征西讨、统一北方中屡献奇谋、深受太武帝宠信的崔浩笃信道教，早怀排佛意图，见此机会，不管道教首领寇谦之的反对，力劝太武帝灭佛。太武帝乃尽诛长安僧侣，捣毁佛像，焚烧佛经。继则诏令全国仿照长安行事，荡除佛教，灭其踪迹。规定今后敢有事佛及塑造佛像者门诛，各地佛像、佛经一律击破焚毁，僧侣不问老幼，全部坑杀。此为我国历史上的第一次灭佛事件。以后尚有周武帝及唐武宗的灭佛，虽然起因各异，但均使佛教遭到重大打击。故在我国佛教史上有"三武之厄"的说法。由于太子拓跋晃及许多达官贵人信佛佞佛，千方百计延缓诏令下达之日，许多僧侣得以事先逃匿，寺院塔庙则被破坏殆尽。此举也是导致崔浩与拓跋晃之间矛盾激化的因素之一。拓跋晃伺机报复，后终于借"国史之狱"族灭崔浩。

统治阶级离不开精神鸦片，更欲仗此巩固统治。因此太武帝晚年，禁令便见松弛。承平元年（452），太武帝死，其孙文成帝拓跋濬继位，立刻诏令恢复佛教。佛教又广为流传。（蒋福亚）

宋孝武帝杀叔翦弟

南朝刘宋中期王室之间的战乱。

宋文帝19子，元嘉六年（429）立长子刘劭为太子。由于武帝接受东晋主弱臣强、王室无力匡弼的教训，遗诏非宗室亲王不得坐镇京口（江苏镇口）及荆州（治今湖北江陵），重要方镇也尽量起用宗室成员，因此诸王大都坐镇地方，手握强兵。文帝猜忌成性，害怕诸王难制，竭力加大太子兵力，东宫甲士过万，与羽林宿卫相当。太子与文帝第二子刘濬狼狈为奸，胡作非为，急欲入继大位，亲近女巫严道育，用玉雕成文帝像，埋于含章殿前，诅咒文帝早死。事发，文帝乃有废立之意，将此事告知了刘濬养母潘淑妃，但迟疑不决，与宰相江湛、徐湛之、王僧绰等商议不休。潘淑妃泄露此事，刘劭便在元嘉三十年二月统兵入宫，弑文帝，杀死江湛、徐湛之，收斩王僧绰等，自立为帝。又密令沈庆之收斩刘骏。自此，刘宋骨肉至亲间的杀戮就连绵不绝，直至其灭亡。

刘骏（430—464），文帝第三子，爵封武陵王，官居江州刺史（治寻阳，今江西九江），当时正统江、豫、荆、雍四州军队攻打大别山以南的少数民族五水蛮。闻变后惊慌失措，准备就死，不敢见沈庆之。沈庆之抢入，敦促刘骏起兵。刘骏委沈庆之全权处分。旬日之内，沈庆之部署完毕，即命柳元景等先行，传檄四方，共讨刘劭。荆州刺史刘义宣、司州刺史鲁爽、雍州刺史臧质、会稽太守刘诞及其它方镇一时俱起。刘劭立刻陷入四面楚歌的境地。柳元景由陆路倍道兼行，迅速推进到新亭（江苏南京南），依山筑垒。刘劭纠集精兵万余，亲登朱雀门督战，二战皆北，退据台城（皇

宫所在地)，大肆杀戮。四月，刘骏在江夏王义恭等劝进下登位，是为孝武帝。五月，攻破台城，刘劭、刘濬伏诛，亲友全被收斩。人民极端厌恶此类自相残杀，一首歌谣盛传民间："遥望建康城(江苏南京)，小江逆流萦，前见子杀父，后见弟杀兄。"

孝武帝是权必揽，刻薄寡恩，猜忌之心远远超过乃父。尤其猜忌其叔南郡王刘义宣(武帝第六子)。刘劭弑文帝后，臧质、鲁爽等急趋荆州，拥刘义宣与刘骏同时起兵，实质另有企图。孝武帝捷足先登，臧质等已是于心不甘。事成后孝武帝赏赐不公，刘义宣及臧质等更是心怀不满。刘义宣手拥强兵，久镇荆州，对孝武帝而言，又是针芒在背，乃借调整方镇之便，征刘义宣为丞相、扬州刺史。刘义宣拒绝，孝武帝收回成命，双方矛盾公开化。孝武帝闺房无礼，淫义宣诸女，双方势同水火。江州刺史臧质抓住时机，唆动刘义宣联合南豫州(治寿阳，今安徽寿县)刺史鲁爽及刘义宣旧部兖州(治今山东济宁东北)刺史徐遗宝起兵夺权。孝建元年(454)二月，也即孝武帝登基不到一年，四州俱起，鲁爽兵进历阳(安徽和县)，刘义宣则赶至寻阳，会合臧质顺流而下，声势甚壮。孝武帝极度惊慌，想让位，扬州刺史刘诞坚决反对，乃命沈庆之督薛安都、宗越等讨鲁爽及徐遗宝；柳元景、王玄谟等布防采石(安徽马鞍山西南)及梁山(安徽当涂西南)，同时在北线采取攻势。小岘(安徽合肥东)一战，薛安都枪挑鲁爽，徐遗宝奔逃东海(治山东苍山南)被杀。鲁爽是当时号称万人敌的骁将，一战授首，叛军胆栗。北面威胁解除，宋军全力对付刘义宣等。梁山鏖战，叛军全线崩溃。刘义宣窜回江陵。时朱修之已奉命袭取了江陵，义宣及其16子全被收斩。臧质逃无所归，窜入南湖(武昌东)被杀。叛乱平息。

在讨伐刘劭及刘义宣的过程中，孝武帝弟竟陵王刘诞(文帝第六子)均有大功，且宽而有礼，威望日高，引来孝武帝的疑忌。大明元年(457)，孝武帝出刘诞镇广陵(江苏扬州)，命亲信刘延孙镇京口，严加防范。刘诞也预为准备。大明三年四月，道路传言刘诞谋反，孝武帝即命沈庆之统军围攻。刘诞抗表自辩，历数孝武帝过恶。孝武帝大怒，收斩建康城中刘诞的亲友及昔日部属数以千计。七月，广陵城破，刘诞自杀。孝武帝诏令屠城。结果五尺以上男子全遭杀戮，妇女分赐给屠城有功将士作奴婢。统治集团的权势之争，使人民横遭惨祸。 (蒋福亚)

刘宋昭穆之战

泰始元年(465)至二年间，南朝刘宋王室之间的一场战乱。

宋孝武帝的统治极端残暴，民不聊生。一次旱灾，三吴地区饿死者十居六七。阶级矛盾尖锐，统治集团间的争夺日趋激烈。孝武帝迁怒群臣，将相大臣动辄得咎，身首异处。大明八年(464)闰五月，孝武帝死，年仅16的长子刘子业继位，是为前废帝，其叔祖江夏王刘义恭、尚书令柳元景及司空沈庆之等受遗诏辅政。刘子业荒淫无耻，暴虐成性。即位不久，生母王太后病重，呼其探视。刘子业却说病人间鬼太多，可怕，岂能前往。太后气急，对侍者说，拿刀来，剖开我的肚子，怎么生了这样的好儿子！其姐山阴公主淫荡，刘子业特意设置面首(男宠)30人，供其姐淫乐。

刘宋一代，重用寒人典掌机要。宋孝武帝后期，中书通事舍人戴法兴、巢尚之等权倾天下，威行远近，敲诈勒索，胡作非为。刘义恭等皆仰其鼻息。刘子业即位后，戴法兴专擅朝政，诏敕尽出其手，威福自行，故道路盛传戴法兴是真天子，刘子业为赝天子。永光元年(465)，刘子业杀戴法兴，废巢尚之，夺回权力。刘义恭、柳元景等害怕失去权势，密谋废立，却又排斥沈庆之。沈庆之怀恨告密。刘子业统羽林军杀刘义恭及其四子，肢解刘义恭，挖出眼珠，用蜜蜜之，叫作"鬼目粽"。同时收诛柳元景、颜师伯等。为志庆贺，改元景和(465)。自此杀戮连绵。首遭其难的是其弟新安王刘子鸾。原因是昔日为孝武帝所宠爱。年仅10岁的刘子鸾临死前，悲呼愿来世不再出身于王家。接着赐死其弟南海王刘子师。大臣何迈、王藻、孔灵符等或因权重，或因有些政绩，均遭屠戮。沈庆之认为杀戮太过，也被杀死。一时间举朝惶惶，人人危怖。刘子业还计划杀掉其六个叔父，为此全数拘押殿中，将湘东王刘彧、晋平王刘休祐、始安王刘休仁等裸体关进竹笼，喂以猪食。这三人体格肥壮，刘子业分别给其起了名号，叫刘彧为"猪王"，刘休仁为"杀王"，刘休祐为"贼王"；另一叔刘祎资质愚钝，便叫"驴王"；带在身边，随时准备屠戮。刘彧颇机警诙谐，靠阿谀奉承和调笑躲过了好多次杀身之祸。宿卫将士们也朝不保夕，为此人怀异志。景和元年十一月，刘子业屏绝亲信爪牙，带领宫女及女巫数百到竹林堂射鬼。刘彧的心腹爪牙阮佃夫、李道儿等联合宿卫寿寂之等十余人冲进竹林堂，杀死刘子业，释放刘彧。刘休仁等即拥刘彧登极，是为宋明帝。是年，改元泰始(465)。

刘子业死前，曾命朱景云送毒药至江州（治寻阳，今江西九江），赐死其弟刘子勋。时刘子勋年方10岁，实权操在长史邓琬之手。邓琬抗不受命，拥刘子勋起兵自卫。明帝登位，邓琬也拥刘子勋在寻阳称帝，改元义嘉，署置封拜，自为尚书右仆射。并传檄四方。荆州（治今湖北江陵）刺史临海王刘子顼、郢州刺史（治今湖北武汉武昌）安陆王刘子绥、会稽（治今浙江绍兴）太守寻阳王刘子房等响应。刘子房部进攻义兴（江苏宜兴）和晋陵（江苏常州）一带，邓琬则纠集10万之众顺江而下。明帝命巴陵王刘休若督王玄谟、萧道成、吴喜等对付东线；建安王刘休仁督沈攸之、江方兴等对付西线。西线是主战场。形成了以明帝为首的文帝系诸王（按封建宗法制，文帝在宗庙中排在左面，叫作“昭”）和以刘子勋为首的孝武帝系诸王（孝武帝在宗庙中排在右面，叫作“穆”）之间争夺皇位的大内战。所以当时人萧惠开就说这是一场无是非可言的昭穆之战。内战爆发后，雍州、梁州、益州、广州、徐州、冀州、湘州、青州、豫州等方镇或太守相继支持刘子勋，一时间“四方贡计，皆归寻阳”。明帝只剩下了丹阳和淮南数郡，其间还有些县令支持刘子勋。值此普天同反、人怀异志之际，明帝采纳蔡兴宗的建议：镇之以静，至信待人。先则诏赦从叛者在建康城中的亲友，继则下令父子兄弟罪不相及，唯本人行为是问。人心稳定下来了。接着募集兵众，在东线展开了进攻。在义兴、晋陵等地打退了刘子房部。泰始二年二月，进袭会稽，生俘刘子房。从叛主凶除17人阵斩外，余皆放免。这对瓦解西线起有作用。邓琬是个贪得无厌的屑小之辈，父子兄弟擅作威福，公然命奴仆到市场上去卖官鬻爵，成日酣歌妙舞和赌博，内部事务交付小人褚灵嗣等处置。闹得人心尽失，大好形势化为乌有。双方相持于鹊洲（安徽繁昌东北长江中的岛屿）一带达数月之久。这年八月，明帝将领张世兴攻击贵口（安徽贵池西五里）成功，一举虏获邓琬运往前线的30万斛军粮和数十船的钱帛。10万余叛军一时溃散，寻阳内乱爆发，邓琬被杀，刘子勋被送建康斩首。九月，刘子绥、刘子顼等相继败亡。过去支持刘子勋的幽州刺史刘休宾、兖州刺史毕众敬、徐州刺史薛安都、冀州刺史崔道固、青州刺史沈文秀等相继举地投降了北魏，淮北地区丧失殆尽，刘宋的防线收缩到了淮南。这次战乱几乎波及到刘宋的整个统治区，人民赋役奇重，横遭战火浩劫，乃至“民荒财单”。南强北弱的局面改变了。

（蒋福亚）

太和改制

北魏太和年间（477—499），魏孝文帝和文明太后在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等方面所推行的一系列改革措施。

北魏前期，奴隶制残余颇浓，各种社会矛盾尖锐，各族人民起义连绵不断，汉族地主阶级的骚乱也时有发生。随着北方的统一，拓跋部封建化的加深，北魏统治集团只得进行改革，适应新的形势，以维护统治。因此，孝文帝之父献文帝拓跋弘在位时（465—471），改革已经开始。不过最主要的改革却是在孝文帝太和年间（477—499）进行的，故史称“太和改制”或“孝文改制”。

文明太后（442—490），长乐信都（河北冀县）人，汉族。北燕主冯跋后裔。因其父冯朗犯罪而被配没入宫，在其姑、太武帝拓跋焘的左昭仪抚育下成长，深受汉文化的影响，颇知书计，后为文成帝拓跋濬皇后。冯后聪明机智，很有政治头脑，善于用人及当机立断。和平六年（465），文成帝死，年仅13岁的献文帝继位，丞相乙浑控制大权，大肆诛杀，复谋篡立。冯后诛除乙浑，临朝称制。天安二年（467），文成帝生子拓跋宏（467—499，即元宏），冯后亲自抚育，以利自己日后继续控制朝政。该年，冯后归政献文帝，两人在政见上虽无不同，权势之争却相当激烈。凡冯后宠信者，献文帝必设法诛除或排挤，厌恶者则往往重用。双方角逐的结果是皇兴五年（471）献文帝被迫禅位，年仅5岁的孝文帝拓跋宏（467—499）登基，冯后再度临朝听政。承明元年（476），冯后毒死献文帝，执掌大权，直到死时。

冯后执权期间，主要改革有：一、禁止鲜卑同姓通婚，局部改革了鲜卑落后旧习。二、仿照汉制，实行官吏俸禄制，严惩贪污，整顿吏治。三、改革律令，减轻刑罚。四、兴置学校，诏定礼乐，崇尚孔子，禁止图谶。五、释放部分奴婢和改变政府垄断手工业的状况，允许工商杂伎农耕和民间经营手工业。六、颁行均田制度（详见专条）。孝文帝长成亲政后，参与了其中许多改革和决策。太和十四年，冯后死，孝文帝大权独揽，在上述基础上加深改革，在太和十八年迁都洛阳（详见专条）后，又大力推行各项汉化政策：一、禁鲜卑语。过去军中一律用鲜卑语，朝廷内则鲜卑、汉语杂用。太和十九年诏定汉语为“正音”，禁止朝廷及官场使用鲜卑语，30岁以上官员暂不勉强，30岁以下官员违令者降职或免官。二、禁胡服。胡服是昔日吉庆大典的礼服，特征为左衽，妇女一般穿夹领小

袖短袄。太和十九年，孝文帝赐百官汉族冠服，诏禁胡服，密切关注此令执行。次年当其由前线返京，见妇女犹穿胡服，严斥留守官员贯彻不力。太和二十三年见此风犹存后，又怒斥尚书任城王元澄。胡服有便于生活等优点，故在孝文帝各项措施中，只有此项很难推行。直到隋唐，胡服仍颇为盛行。三、改鲜卑姓，鲜卑为多音节复姓，为泯灭胡汉之间的差别，太和二十年仿照汉族诏改鲜卑姓。取拓跋氏为黄帝之后，"万物之元"的含义，改皇族为元氏，故孝文帝又名元宏。它如改跋跋氏为长孙氏、达奚氏为奚氏、乙旃氏为叔孙氏等。规定迁洛鲜卑的籍贯一律改为河南洛阳，死后葬洛阳，不得还葬平城。四、定族姓。魏晋以来，族姓是区别士、庶的标志，山东及关陇的冠冕望族过去叫作"郡姓"，为密切胡汉权豪的关系，改鲜卑姓后，诏定皇族为诸姓之首外，鲜卑的穆、陆、贺、刘、楼、于、嵇、尉八姓和山东诸姓之首崔、卢、李、郑、王等地位相同，又据各大士族父祖的官职，分郡姓为甲乙丙丁四等。孝文帝自娶范阳卢氏、清河崔氏、荥阳郑氏和太原王氏之女为嫔妃，为其诸弟聘中原著名士族之女为王妃，下嫁公主给著名士族，提倡和鼓励胡汉权贵通婚。用联姻的手段进一步密切和泯灭彼此的界限。五、改官制。北魏前期，胡汉官号杂用。孝文帝重用南来士族王肃，以王肃为首，使用大量士人，仿照魏、晋官制，厘定官号体制，把鲜卑成分洗涮殆尽。又在定族姓的基础上，命令吏部严格按照门第高下选拔官员，定名为"方司格"，确立起"以贵承贵，以贱袭贱"的选官原则。六、改定宗庙及郊祀礼仪。天地神祇是封建正统的标志之一。改制前，北魏一直保持着原始的祀天仪式。太和十八年改用汉族帝王祀天仪制，圆丘祭天，方泽祭地，并以祖宗配天。昔日，北魏奉拓跋郁律为太祖，历经朝议，钦定第一个君临中原的道武帝拓跋珪为太祖。天地神祇及太祖是封建礼仪制度的核心，此制一定，孝文帝便可以封建正统自居了。七、改定律令。太和年间，北魏曾三次改定律令，文明太后在世时改了两次，太和十六年颁行了新的《魏律》。和昔日相比，《魏律》的刑罚又见省轻，废除了夷五族、三族之类的酷刑，对日后的《隋律》、《唐律》影响甚大。此外，孝文帝还改革了鲜卑袒裸之类的落后旧习，等等。

太和改制是魏、晋以来民族融合的产物和总结，目的虽然在于泯灭胡、汉界限，密切胡、汉贵族的关系，客观上却顺应了落后民族征服先进民族之后，最终将为先进民族的经济文化所征服，甚至不得不采用征服民族的语言的历史进程。改制中，有些措施消极作用较大，如定族姓及选官原则；有些并不能通行，如禁胡服。但其积极作用是主要的。改制后三四十年，北方民族关系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当南朝的陈庆之来到洛阳，返回建康（江苏南京）后，便认为衣冠士族、文物礼仪全在中原，洛阳才是名副其实的京师，钦羡不已。其服饰羽仪全部模仿北魏，一度风靡建康。西晋灭亡后，南方统治者自诩是封建正统和礼仪的所在，视北方为戎狄世界。这个观念是南方统治者赖以建立政权的精神支柱，是驱使南方人民支持其腐朽统治的有力武器。如今动摇了。这既说明太和改制后民族融合取得了巨大成果，也预示着南北长期分裂对峙的局面即将结束，全国统一已经为时不远了。　　　　（蒋福亚）

萧道成代宋

建元元年（479），萧道成代宋称帝，建立南齐的历史事件。

萧道成（427—482），字绍伯，小字斗将，原籍兰陵郡兰陵（山东枣庄峄城镇）人。其高祖在东晋初年南渡，侨居晋陵的南兰陵（江苏常州西北），土断后落籍南兰陵。是刘宋宗室的外戚疏属。在宋明帝时的内乱中积军功为南东海太守，后持节镇淮阴，培植个人势力。数受明帝猜疑，在泰始七年（471）被征入朝任散骑常侍、太子左卫率。因与辅政褚渊交好，在褚渊的援引下，元徽初任右卫将军，得参机密。萧道成能代宋称帝，是利用了刘宋王室的自相杀戮。

宋明帝的猜忌残忍，远过于宋孝武帝，为防近支亲王夺位，把宋孝武帝的儿子杀了个一干二净，其中年龄最大的不过10岁。明帝有五个兄弟，四个被杀。滥杀使王室急剧地衰落了。明帝奢侈淫逸，挥霍无度，迷信鬼神，忌讳极多，犯者必死。各种酷刑，无不俱备。其信用的阮佃夫、杨运长等，都是贪得无厌、请谒无穷、骄奢淫逸之徒。结果府藏空竭，民不堪命，天下骚动。"宋氏将亡"成了时人的共识。泰豫元年（472），明帝死，遗诏袁粲、刘勔、褚渊、沈攸之等辅政，年仅10岁的长子刘昱继位，史称后废帝。刘昱颇有勇力，人极聪明，制作金银器、裁衣制帽，一学就会，相当精美。只是极端顽劣，冷酷残忍，生性好杀。一天不杀，便怏怏不乐。成日出宫游耍，或晨去暮返，或早出晚归，从者手执戈矛，路遇行人及犬马牛驴，必杀无疑。害得民间白天不敢开门，路上行人绝迹，朝廷内外，人不自保，上上下下，惊恐不安。元徽二年（474）五月，明帝唯一活着的弟弟江州（治今江西九江）刺史桂阳王刘休范乘机起兵，图谋夺位。兵达新

亭(江苏南京郊外)时,朝廷才得知。顿时慌作一团,权贵们集结中书省商议对策,计无所出。萧道成指出:刘休范千里孤军,后援不继,求战不得,必然溃散,只要布防新亭、白下(江苏江宁西北),坚守宫城、东府(建康东城)及石头(建康西城),必可获胜。建议征北将军张永守白下,领军将军刘勔屯宣阳门节制诸军,自己趋新亭亲挡刘休范之锋。权贵们如计而行。萧道成直趋新亭,施诈降计袭杀刘休范。但刘休范部将丁文豪、杜黑蠡等并不知刘休范已死,依然猛攻建康。丁文豪击败台军,推进朱雀桥南,会合杜黑蠡后,又败羽林军,刘勔败死。叛军渡过秦淮河,破东府,进逼南掖门,中外大震,盛传台城已陷落,白下、石头诸戍一时溃散,形势万分危急。萧道成急令陈显达、张敬儿等统军入卫,阵斩丁文豪、杜黑蠡,平定了叛乱。是役,萧道成独居全功,一跃而控制权力中心,与袁粲、褚渊、刘秉合称"四贵"。永徽四年六月,南徐州刺史建平王刘景素在心腹将佐的唆动下,据京口(江苏镇江)反,兵进建康。萧道成出屯玄武湖,部署诸军,平定了刘景素,权威进一步上升。刘昱对其猜忌转剧,屡欲杀害。萧道成乃与褚渊、袁粲等密谋废立。命亲信王敬则随时侦察刘昱动静,邀结刘昱左右杨玉夫、杨万年等伺机下手。永徽五年七月初,刘昱命杨玉夫守夜,若见织女星渡河,立刻禀报;若见不到,将杀头取肝肺。杨玉夫待刘昱熟睡,割取其首级,送交王敬则。王敬则夜驰萧道成府,大声唱名叩门。萧道成唯恐刘昱设计,不敢开。王敬则将首级扔入墙内,萧道成用水洗净,验明无误后,立刻戎服入宫,以太后名义召袁粲等入议。王敬则手执白刃,怒喝敢有违萧公意者,血染敬则刀。在萧道成的主意下,年仅9岁的明帝第三子安成王刘准被立为帝,史称顺帝。大权全落萧道成之手。此时,堪与其一争高下的仅沈攸之一人了。

沈攸之,吴兴武康(浙江永康西)人。前废帝心腹爪牙,在刘宋王室不断战乱中扶摇直上,官至征西将军、荆州刺史,都督荆湘梁雍益等八州军事,是明帝死时外藩中唯一受顾命之托的重臣。既拥上流之兵,在州又招兵买马,造舟治械,拥有战士10万,铁马2000。见萧道成禅代之意已明,乃在升明元年(477)举兵东下。袁粲、刘秉乘机联合将帅黄回、任侯伯等,密谋诛除萧道成。萧道成只有拉住褚渊共谋对策,勒兵攻杀袁粲等,部署讨伐沈攸之。沈攸之起兵之初,威势甚盛,进达郢州州治夏口(湖北武汉武昌)后,拒绝属下绕过坚城直逼建康的建议,尽锐攻 城,错过了时机。沈攸之为政苛暴,人心早失。此时顿兵坚城之下,30余天毫无进展,士卒渐有散离之心。一人逃亡,沈攸之命十人追捉,结果是尽去不返,谁也不敢告发。次年正月,部将投降朝廷军,士众乘机离散,沈攸之只好返回江陵,江陵却已被张敬儿奉萧道成之命袭取。退无所据,只好自经而死。萧道成终于由齐公而齐王,在褚渊等劝进下,在升明三年四月,废顺帝登极,是为齐高帝。改国号曰齐,改元建元,都建康,史称南齐或萧齐。宋亡,历八帝,立国凡59年。五月,萧道成杀死刘准,刘宋王侯无少长全部被幽禁死,只有宋文帝第九子晋熙王刘昶在前废帝时逃奔了北魏,才留有后人。 (蒋福亚)

北魏行均田

太和九年(485),文明太后和魏孝文帝为发展生产,确保赋役对象,解决国用而采取的措施。

魏道武帝拓跋珪复国时,农业生产在拓跋部经济生活中已占一定比重,其后更有发展。随着封建化的加深,拓跋部内贫富分化加剧,阶级对立更趋明朗,土地私有的观念逐步确立,拓跋权贵的土地占有欲与日俱增。大贵族和跋在临刑前念念不忘告诫其弟:在瀔水南岸占据肥饶之地,广为产业。太武帝拓跋焘时,就连贵为太子的拓跋晃也要大量圈占土地,谋取私利了。

十六国以来,北方坞堡林立,成为一个个地主的势力范围。内迁中原的各少数民族统治主在其建立政权、割地称雄过程中,无力消灭各地坞堡,便大都转向笼络,如石勒进军河北时,署坞堡主为将军都尉,利用其征收赋役,巩固统治。北魏前期的宗主督护制,实质也是如此。所以,北魏统一北方过程中,中原地主的利益并未受到多大的损害。宗主督护制既是北魏前期统治地方的基层组织,又是隐匿人户的渊薮。

上述情况导致两种现象:一、胡汉地主竞相兼并土地,富强者占地连片,并兼山泽,土地有余,弃而不用。贫弱者房无一间,地无一垄,被迫成为游民。此外,随着战乱平息,原先逃亡在外的百姓回归故里,其土地已为他人所占,彼此间为产权争讼不已。结果是"良畴委而不开,柔桑枯而不采",农业及家庭手工业都遭破坏,社会经济萎缩,游食之民激增。平城地区尤为严重,游食者占居民的三分之二左右。二、人户隐匿严重,30、50家方为一户,个别地区甚至"百室合户,千丁共籍"。封建政府赋役收入减少,国库空虚。北魏初年,并无固定的赋役制度,军国开支主要靠战争的掠夺和临时性的摊派;征收品种不固定,随

时所需，或征谷帛，或征牛马不等。官吏也无俸禄，仰仗皇帝的“班赐”及随意榨取。北方统一后，战争掠夺来源骤减，才在宗主督护制的基础上，建立起“九品混通”租税制。此制规定，民户按赀产及丁壮的多寡，被划分为三级九等，富者多缴赋役，贫者少缴，各户每年平均租税额为帛二匹、絮二斤、丝一斤、粟二十石。此外再加调外费帛一匹二丈。实际征收时，地主和官吏上下其手，大都转嫁到贫弱者头上。如此征收，亦难满足军国所需，临时性摊派层出无穷，数额之巨，令人咋舌，往往是 30 石或 50 石粟，有时一年摊派数次。仅延兴三年(473)，河南各州每户租调总额竟高达帛四匹二丈、绵三斤、丝一斤、粟一百石，此外还有各种徭役。结局是个体农民难以幸存，隐匿现象更趋严重，阶级矛盾激化，农民起义不断爆发。再不改弦易辙，北魏统治岌岌可危。鉴此，文明太后和孝文帝在太和九年前后，相继颁行了包括均田、赋役和三长这三项内容的均田制度。

均田令规定：一、男子年 15 以上，到达缴纳赋役的年龄时，受露田 40 亩；已婚女子 20 亩；奴从耕、婢从织者受田同良人；丁牛受田 30 亩，限止四条牛。适应轮休耕作制的需要，露田加倍授受，或加两倍，称作“倍田”。露田不准种植桑榆枣果等树木，种者以违令论。年老免课或身死，露田归还封建政府，用于还授；奴婢和牛随有无还授。二、蚕桑之区，男子成丁可给桑田 20 亩，限三年内种桑 50 株、榆 3 株，枣 5 株，否则将追夺其未种桑榆枣之桑田。桑田内多种桑榆枣果者不禁。奴隶依良人授桑田。桑田可作为“世业”留传子孙。授田时，无桑田者，依制授足；不足者，依制补足；多余者，算作倍田，但不在还授之列。桑田可以买卖，买卖均以男子各有桑田 20 亩为限，只准卖多余的部分，不准买过不足的部分。麻田之区，男子给麻田 10 亩，女子给 5 亩，奴婢同良人。麻田同露田一样还授。三、土地的还授均以“及课”，即以承担赋役为前提。及课则授，免课则还。四、无正常劳动力的老、小、癃、残户，年过 11 可授丁男一半之田，年过 70 不还所授之田。寡妇守志，虽免课也授妇田。五、地广人稀处，可随劳动力多寡多垦耕土地，不受限制。地少人多处，凡进丁受田不足者，可迁往地广人稀处受田，但不准逃避及规免赋役。不愿迁徙者则以其桑田充露田之数，又不足，不给倍田，再不足，则分别减少户内人的露田。地广人稀处不得无故迁徙。六、有徙新居者，三口给园宅地一亩，奴婢五口给一亩，种植菜二分，种植规定的榆及枣。七、犯罪流配或人口死绝之户，其田产尽为公田，用于还授。授受时其近亲有优先权，未授受前亦可由其近亲租种。八、地方官吏在其任所给公田，刺史 15 顷，太守 10 顷，治中、别驾各 8 顷，县令及郡丞各 6 顷，离任时移交下任，不得买卖。九、每年正月核实人户，进行还授工作。授田时尽可能考虑正田和正田相连，倍田和倍田相连，并距其住宅较近。若同时有多人受田，则以先贫后富为原则。

废除宗主督护制，仿照秦汉以来的乡里组织，规定五家为邻，五邻为里，五里为党，邻里党各设“长”一人，合称三长。三长享有免除若干人赋役的特权，邻长免一人，里长免二人，党长免三人。职责是检查户口，辅助均田，维持地方治安，督促均田农民生产和确保封建政府赋役收入。克尽职守者，三年中可逐级提升。

与此同时，建立了新的租调额度，一夫一妇年纳户调帛一匹，租粟二石。民年 15 以上未娶者四人纳一夫一妇之调，从事耕作的奴婢 8 口，或耕牛 20 头纳一夫一妇之调。麻布之乡户调改为纳布一匹。

史籍记载，均田令是孝文帝采纳李安世的奏议后制定的。该奏议的核心是确定有争议的土地的业主，采取措施阻遏土地兼并，限定土地的占有额，使其与劳动力大体吻合，达到田不荒芜，民无游力，实现家丰岁储，人给资用的目的。三长及新的租调征收额则是在李冲的建议下，由文明太后决定推行的。由于清查荫冒必然会触及胡汉地主的利益，为此朝议中争论颇烈。中书令郑羲及秘书令高祐等竭力反对，认为三长制度似是而非，实际难以推行；宗主督护制推行已久，一旦废除，可能引起骚乱。文明太后认为实行三长制后，可以确定划一的赋役制度，清查隐匿人户，应该推行。朝议一定，孝文帝即颁诏实施。

均田制具有土地、劳动力和赋役三者紧密结合的特点。其中均田是基础，赋役是目的，三长是行政保障，三者缺一不可。其能顺利推行，与当时大量无主荒地的存在、以及北魏专制主义中央集权相对强大密不可分。秦汉以来，封建政府推行或议论过名田制度、限田制度、屯田制度及占田制度，北魏前期又采取过离散诸部、分土定居及计口授田的措施。凡此，都是均田制度的渊源。均田制度名曰“均”，实际一开始就不均，胡汉地主从一开始便享有极大的优惠，可以通过奴婢、牛及合法依附民的占有攫取大量土地；地少人多之处普通均田农民决不能按制受足土地。不过由于赋役减轻，均田农民在正常情况下可以维持简单的再生产，故为时不久，便出现了“百姓殷阜，年登俗乐”的景象。均田制对北方经济的恢复

和发展起有积极的作用。废除宗主督护制后，30、50家为一户的现象大体被个体均田农民取代，大量游食人口回归版籍，缴纳租调者激增，北魏总收入随之改善，国库日趋富裕。均田制度实行后，内迁中原的各少数民族人民大体都成了均田农民，同样的经济生活和阶级地位，促进了各民族间的融合。

均田制度是中原王朝实行时间最长的土地制度，直至唐建中元年(780)颁布两税法时才废止。在此期间，由于人口增多，无主荒地日减，特别是土地兼并盛行，均田制屡遭破坏。后继封建王朝在北魏均田制的基础上，针对当时的条件，修改其中个别条令后，又予推行。主要变化有：一、改露田名为口分田，桑田为永业田，麻布之区亦给永业田。二、出现了官吏职分田、永业田、勋田及公廨田等名目及规定。三、由不限制奴婢、依附农民授田到限制，隋炀帝大业元年(605)时，废止奴婢、牛、妇人及依附民的授田，只有丁男才授田。同时，只有丁男才承担课役。四、逐步缩小丁男的年限，减少授田人数，最终规定25—55岁间为丁男。五、繁杂授田手续，宽、狭乡实际授田数各不相同，等等。 （蒋福亚）

魏孝文帝迁都

北魏太和十八年(494)，孝文帝为巩固统治、推行改革，实现其一统华夏理想而采取的决策和行动。

北魏崛起于雁代一带，建国伊始，奠都平城(山西大同东北)，不失为高明之举。但到孝文帝时，平城作为国都，已难适应新的形势。一、随着北魏统一北方，其统治重心逐渐转向中原。中原是周秦以来经济文化最发达的地区，平城却偏处塞上，交通闭塞，即便以暴力相威胁，中原士人也不大愿意来平城做官。政治中心远离经济文化中心，显然不利于统治。因此早在明元帝时，就有人倡议迁都，碍于当时政治军事形势，难以实行。随着北魏封建化的加深，均田制的实行，此类矛盾更显突出。二、平城作为国都，人口密集，粮食需求量大。北魏前期的几个皇帝在征服战争中，虽然逼迁各族人民到平城周围，计口授田，劝课农桑，发展农业生产，促进了雁北地区的开发，但雁北地处高寒，无霜期短，六月飞雪，风沙常起，当时人王肃作《悲平城》诗曰："阴山常晦雪，荒松无罢风。"农业生产在此等自然条件下极难发展，平时就难满足平城的需求。一遇灾害，封建政府就得组织平城百姓"就食"山东。粮食问题极难解决，危及北魏的统治。三、北魏初期，设置六镇，防御柔然，捍卫平城。太武帝拓跋焘时，又屡次兴兵北伐，打击柔然。但柔然势力稍一恢复，又频频南下，平城始终蒙受其威胁。四、孝文帝时，模仿汉族习俗及封建统治改革鲜卑落后旧习，已是势在必行。平城闭塞，文化不发达，又是鲜卑豪贵的集中地，保守势力强大，改革相当困难。总之，此时的形势及条件，已将迁都中原提上了日程。但迁于何处，是邺城(河北临漳西南)还是洛阳，颇费斟酌。邺城是河北的政治中心，河北又是北魏前期经营有素、经济较为发达的所在；洛阳则历经战乱，荒败不堪。但自西晋灭亡以来，胡汉统治者之间常有封建正统之争，洛阳是中原故都，历史上的经济文化中心，正统的标志之一；且交通方便，便于南进。孝文帝是一个醉心于汉文化、有一统华夏理想、力图以封建正统自居的皇帝。两相比较，迁都洛阳，既能获取政治上的优势，又能满足自己及汉族士大夫热衷的"中夏正音"的心态，密切胡汉贵族之间的关系，进一步巩固统治，孝文帝终于决定舍邺城而都洛阳。

孝文帝深知，朝议迁都，必会遭到鲜卑权贵的强烈反对，乃设下圈套，在太和十七年五月力排众议，决定大举南讨。暗中告知任城王元澄将迁都洛阳及此举将碰到的困难。元澄坚决支持，指出既是非常之事，决非常人所能了解，决之圣断即可。八月，孝文帝统领步骑30余万南下，命令王公大臣大都随驾出动。九月，到达洛阳，时值雨霖不止，道路泥泞，行军极端艰难困苦。霏霏霪雨之中，孝文帝身披戎装，执鞭乘马，断然下令冒雨前进。平素锦衣文绣、玉堂金马的达官贵人岂堪其苦，纷纷跪于泥地哀求班师。宠臣李冲表示敢以死请。孝文帝勃然大怒，申斥李冲，声言再敢劝阻，必受斧钺之惩！安定王元休及南安王元桢等亲贵元老跪地不起，哭求停止南征。孝文帝见时机成熟，当众宣布：如今劳师动众，无功而返，朕有何颜见人，又岂能名垂千载。若不南伐，当迁都洛阳。尔等不准犹豫，应当机立断。同意迁都者站于左边，不同意者站右边。结果站于右边者仍然居多。为打破僵局，元桢表示，只有非常之人才能建非常之业，"迁都洛邑，此臣等之愿"。群臣无奈，不再言声。迁都的决策勉强定了下来。李冲建议孝文帝暂回平城，待洛阳建成后再移驾，也被孝文帝拒绝。元澄奉命回平城宣谕迁都决策，处置善后。虽经百般劝喻，平城权贵们愤怒之情依然难平。孝文帝被迫在次年三月返回平城，进行安抚。反对者认为：一、四方未定，征战事繁，没有马匹不行，中原不产马。二、黄帝起于涿鹿(河北涿鹿)，圣王不一定居于中原。三、北人无须知书。四、安土重迁，人之常情，舍弃家园，人情不乐。有的干脆要求求神问卜。孝文帝据理驳斥：一、朕之远

祖，世居北荒，历经迁徙。昭成皇帝(什翼犍)营都盛乐(内蒙古和林格尔北)，道武皇帝迁都平城。为何唯独朕不能迁都?!二、迁洛之后，恒代仍为国家所有，何患无马?三、天下一定，黄帝即迁居河南。代(雁北地区)在恒山之北，九州之外，不可为帝王之都。四、王者以四海为家，或南或北，没有常居。迁都实为卿等子孙博见多知着想，否则卿等子孙难免面墙之虞。五、求神问卜，为的是解决疑惑。迁都既无疑惑，为何要如此。同时许诺，凡迁洛之民，定予优待，不令窘迫匮乏。群臣至此才不敢多言。孝文帝暂居邺西行宫。这年十月，新洛阳大体落成，才正式迁都。新建的洛阳东西 20 里，南北 15 里，城西北是宫城，宫城外有 322 个街坊，220 个里弄，可容 10 万 9 千余户居民；西阳门外有周围八里的大市，汇集各地土产珍宝，琳琅满目，百工伎巧及各种娱乐场所杂处其间。一度成为中外经济文化交流的中心，全盛时达 40 余万户，是当时世界最大的都会之一。

拓跋权贵大都反对迁都，于烈对孝文帝说赞成及反对者各居其半，无非是为了宽慰孝文帝。对此，孝文帝是有估计的，所以特别赞赏于烈保持中立，没有公开唱反调的态度。迁都以后，保守派仍不甘心。太和十九年，文明太后之弟冯熙死，元老元丕和陆睿利用孝文帝偏爱冯氏一族的心理，请孝文帝还代临丧，意欲乘机劫持，迫使孝文帝还都平城。孝文帝断然拒绝：开天辟地以来，哪有天子为国舅奔丧的道理。但还是派太子元恂作代表去吊唁。元丕等企图扣留元恂，举兵陉岭以北，逼迫孝文帝就范。孝文帝略有所闻后，给了元丕和陆睿应有的惩处。太和二十年八月，孝文帝巡视嵩山，保守派们利用太子年幼无知，害怕河洛暑热，贪图代北凉快的心理，引诱太子带领亲信奔代，意欲跨据河朔，公开与孝文帝对峙。北魏过去有太子监国的制度，此举显然危及北魏的统治。为绝后患，孝文帝废太子为庶人。不久又毒死了太子。保守派们计划落空，决定孤注一掷。该年冬，穆泰和陆睿等公开举兵，企图另立朝廷，雁代地区大多响应。孝文帝事先得到密报，果断部署，命元澄统兵镇压。由于保守派们思想及行动并不完全一致，叛乱被迅速扫平。不过孝文帝还是作了些让步。一、放慢拓跋成员迁洛的速度。二、允许迁洛贵族冬居洛阳，夏还代北。

迁洛导致了拓跋部的分裂，迁洛平民受到的损害尤大，拓跋部内部阶级对立及矛盾更趋尖锐。洛阳的重建及随之而来的南北战争的频繁和扩大，又使百姓的兵役和徭役剧增。但迁洛确保了孝文帝一系列汉化政策的推行，客观上有利于民族融合。故此举利大于弊，得多于失。　　(蒋福亚)

魏齐、魏梁交兵

魏孝文帝迁都洛阳后，北魏与南朝的齐、梁之间争城夺地的一系列战争。

魏孝文帝在位时，经过一系列改革，国力增强。孝文帝有一统中华的理想，特别是迁都洛阳后，为屏障京师，巩固洛阳外围防线，南下之念转盛。南朝的君主为提高威望，屏障建康，或在阶级矛盾尖锐之时转移视线，也往往锐意北上。于是，从太和十八年(494，南朝齐建武元年)起，至宣武帝延昌四年(515，南朝梁天监十四年)20 余年间，在西起宛(河南南阳)、邓(湖北襄樊北)，中在义阳(郡治今河南信阳)，东达淮上数百里交界线上，战争频仍，无年不有。计其大者有太和十八年、太和二十一年(497，南朝齐建武四年)、正始二年(505，南朝梁天监四年)等多次。

太和十八年，齐明帝废萧昭文自立，命雍州刺史曹虎诈降，以遏魏师。十二月，孝文帝借机分兵四路，大举南下：薛度真向襄阳，刘昶和王肃向义阳，元衍向钟离(安徽凤阳东北)，刘藻向南郑(陕西汉中)，亲统大军驻跸悬瓠(河南汝阳)。明帝命王广之、萧坦之、沈文秀等诸路阻击。次年二月，孝文帝渡过淮河，兵逼寿阳(安徽寿县)，众号 30 万，铁骑满野，扬言将饮马长江。不久，循淮而东，围攻钟离。此役，义阳及钟离是主战场。其中，刘昶及王肃一路也号称 20 万。孝文帝兴兵虽多，但由于：一、才迁都洛阳不久，内部矛盾甚大，士兵厌战情绪严重，急待安抚及处理。二、进达寿阳后，军队不服水土，染上疾疫。三、此时拓跋贵族往日马背上的进取精神已基本丧失，孝文帝用兵主要依靠南朝北奔的刘昶和王肃。刘昶性情偏激暴躁，难服众心，且御下苛刻；王肃精于典章制度，疏于战阵，稍有战绩，便自我吹嘘。所以义阳和钟离相继失利，伤亡甚多。只有南郑方面的偏师小挫齐军。三月，孝文帝被迫回师。

太和二十一年六月，孝文帝发冀定相瀛济五州兵 20 余万，号称百万，再次大举南下。王肃攻义阳，孝文帝亲向襄阳。孝文帝进军较速，留兵围赭阳(河南叶县西南)和南阳，直趋新野(今属河南)，筑长围四面进攻，断南阳之路。此行，孝文帝誓雪昔日兵败南阳之仇，南齐则因明帝的猜忌杀伐而矛盾重重，所以魏军节节胜利，斩获甚多。次年正月，破新野，齐湖阳(河南泌阳)、赭阳等戍弃城而走。二月，夺取了南阳。三月，邓城一战，大败齐崔慧景及萧衍所统援军。

崔慧景逃遁，士卒死亡相枕。孝文帝耀武襄阳而返。王肃攻义阳却不顺利。齐将裴叔业统军50000，采围魏救赵之策，围攻魏涡阳城（安徽蒙城），又分兵袭击龙亢（安徽怀远西北龙亢镇），大败魏广陵王元羽所统援军。涡阳粮尽，频频告急。孝文帝敕令王肃罢义阳之围，统军10万驰救。裴叔业见魏军势盛，弃军而遁，士卒溃散，伤亡不可胜数。四月，孝文帝又令各州征发20余万兵马，期于八月集中悬瓠，大举南下。七月，齐明帝死。九月，孝文帝病重，借口礼不伐丧回师。魏军甫退，齐将认为有机可乘，宿将陈显达在太和二十三年初督崔慧景等40000人马企图收复雍州郡县，大败魏中山王元英，围攻马圈（河南邓县东北）40余天，拔之。孝文帝抱病回师，大败陈显达，杀敌30000余，收其军资以亿计，一直追到汉水边。不过该年四月，孝文帝也病死于回师途中。景明元年（501，齐永元二年），齐东昏侯诛戮大臣，裴叔业举寿阳降魏。北魏终于利用南朝统治集团的内部倾轧，取得了这个淮南重镇，置兵40000戍卫。

景明三年，梁武帝代齐，建元天监，杀戮南齐王室，齐鄱阳王萧宝寅奔窜北魏，请兵报仇，伏诉阙下，虽大风暴雨，也不懈怠，感动魏廷群臣。景明四年六月，魏宣武帝乃命萧宝寅统军10000先行，决定秋冬大举。八月，元英受命攻义阳。十月，任城王元澄督诸军分道而进。主战场仍在义阳及钟离一带。正始元年，魏军深入淮南，因淮水暴涨而暂退。八月，攻拔义阳。寿阳和义阳历来是南朝防御北魏的重镇，相继失陷，淮河上下同时告急，梁武帝寝食难安，乃在正始二年大举北上，企图收复失地。梁军器械之精良，军容之盛，北魏认为是百数十年来所未见。魏命中山王元英统军10万阻击。梁军初出，兵势甚锐，张惠绍克宿豫（江苏宿迁东南），昌义之克梁城（安徽凤阳西南），韦睿克合肥（今属安徽），裴邃克霍丘（今属安徽），桓和克朐山（江苏东海南）等地。魏又增兵10万阻击。此战，梁武帝舍名将韦睿不用，任临川王萧宏为统帅。萧宏是个贪得无厌，只知聚敛，毫无才识，而又胆小如鼠之辈，进驻洛口（安徽怀远西南洛河镇，洛涧入淮之口）后，观望不前。得知魏军大集，便召集将领商议班师。诸将求战心切，萧宏众议难违，不敢回师，却又下令：人马有前行者斩！众将怨愤难平，上下离心离德。魏军知其怯懦，送了一套妇人服饰，称萧宏为"萧娘"老妪，作歌嘲讽："不畏萧娘与吕姥（指支持萧宏班师的吕僧珍），但畏合肥有韦虎（韦睿）。"一日深夜，风雨大作，萧宏误认为魏军杀来，弃军窜回建康。诸军寻觅主帅不得，纷纷散归，弃甲投戈，填满了水陆道路，伤亡近50000。魏军数十万乘机围攻钟离，采车轮战术，昼夜猛攻，伤亡万计，尸与城平。梁将昌义之督3000余众死守五个多月。元英在邵阳洲（安徽凤阳北）筑城竖栅，作长围之计。梁武帝命大将曹景宗督军20万驰救。曹景宗想一举成功，拟据邵阳洲，打败魏军主力后再进，恰值风雨，士卒漂溺，曹景宗便驻军不前。梁武帝又命韦睿统军配合，告诫曹景宗，一定要尊重韦睿。两军会合，逼魏城而阵。魏军知韦睿军临，为之夺气。梁军一战打败魏悍将杨大眼，声势更壮。正始四年三月，淮水暴涨，梁军乘船舰攻击。元英弃城而走，诸垒相继崩溃，投水死者十余万。沿淮百余里间，尸体相望。梁军俘虏50000余，缴获资粮、器械山积，牛马驴骡不可胜计。这次征战，双方损失均极惨重。

梁武帝兵战无能，企图利用淮河水淹寿阳，阻止魏军南下。天监十三年（魏延昌三年），接受降将王足的建议，征发伕役20余万，在浮山（安徽嘉山县北）筑堰截流，叫作浮山堰，又叫淮堰。自冬及夏，方将合龙，水势暴涨，顷刻冲毁。开工前，科学家、材官将军祖暅和水工陈承伯勘察后指出，此地系沙土层，漂轻不坚实，难以成功。梁武帝一意孤行，又征役再筑，收集东西二冶数千万斤铁器，沉于堰底，伐木发屋，大小木料及石块搜罗殆尽，不分酷暑严寒施工，役死民伕十之七八，终于在天监十五年四月筑成。堰长9里，下宽140丈，上宽45丈，高20丈，军垒列其上，开洞使淮水东注。魏将萧宝寅则凿山深5丈，开洞使淮水北注。淮水日夜分流，东窜北夺，水势仍然不断上涨。九月，浮山堰筑成才四个月左右，淮水暴涨，浮山堰崩塌，声震300余里。洪水横溢，沿淮城镇村庄及十余万兵民都被漂卷入海。以后，梁朝日趋腐朽，北魏也内乱频作，双方都没有力量大举，南北交界处的战争方告沉寂。

淮南是生产较发达的所在，社会经济比较繁荣，号称"天府"，是南朝的一个财赋区。历经20余年的战乱，遭到了严重的破坏。浮山堰的崩塌，更使人民遭受空前浩劫。南朝进一步衰落下去了。连年不断的劳师动众，也使北魏不堪重负，赋役奇重，农田荒废，百姓逃窜流亡相继，阶级矛盾激化，成为北魏末年各族人民起义的一大原因。　（蒋福亚、戴　冠）

萧鸾夺位

建武元年（494），南齐宗室萧鸾夺取皇位的政变。

南齐初年，齐高帝萧道成、齐武帝萧赜吸取刘宋

骨肉自相屠戮，异姓得志的教训，致力于稳定王室，加上二人都有一定的统治权术，故王室间一度相安无事，政局相对稳定。永明十一年(493)七月，武帝死，太孙萧昭业继位。遗诏萧子良辅政，事无大小，均和萧鸾参决。自此，南齐内乱开始。

萧子良，武帝次子，爵封竟陵王；萧鸾，高帝侄，爵封西昌侯。二人都历官州郡，取得一些统治经验。萧鸾以严能称，萧子良则开西邸，广揽文学之士，府中人才济济，声望远高于萧鸾。武帝和萧子良本来是兄弟，情好甚笃，萧子良往往参决大谋。文惠太子萧长懋死后，舆论倾向萧子良，武帝却立嫡孙萧昭业为太孙。永明十一年，武帝病重昏厥，中书郎王融矫诏册立萧子良。萧子良犹豫。俄顷，武帝复苏，召太孙，不见，情知有异，始命萧鸾参决政事。武帝死，王融拒太孙于宫外，仍欲拥立萧子良。萧鸾得知，排闼而入，拥萧昭业继位，掌握了大权。不久，诛王融，排斥萧子良。萧子良郁郁而死。萧昭业长于深宫，不经世事，矫情奸诈，所交所厚都是无赖小人。临丧时哀感左右，一回宫寝便声乐大作。平素好游市井，即位后斗鸡走狗，多行无道。武帝时克剥聚敛，积钱八亿万，金银布帛不可胜计，萧昭业继位不到一年，便挥霍赏赐得干干净净，府库为空。萧鸾因屡谏阻，遭疑忌，乃先发制人，在隆昌元年(494)七月拥兵入宫，杀萧昭业，借太后之名贬萧昭业为郁林王，立昭业弟昭文为帝。萧昭文在位，事无大小，全由萧鸾作主，有次想吃蒸鱼，御膳房因无萧鸾之命，也不敢做。延兴元年(494)十月，萧鸾干脆废萧昭文为海陵王，自立为帝，改元建武，是为明帝。不久，又杀了海陵王。

南朝时，士族更加腐朽，凭恃门第，安流平进，养尊处优，尸位素餐，只考虑身家门户的利益，视王朝的更替为把一家物给另一家，有的则迫不及待地充当劝进和禅代的急先锋，攫取佐命元勋的高位。平日鄙薄戎事，不屑理政。因此齐武帝对高级士族有个评价：学士辈不堪经国，只能读读书而已。实际上这还是比较好的。更多的是不读书，也不会读，只知敷粉熏香假风流。因此自刘宋起，将帅都出身寒门；行政决策，也只有仰仗寒士。萧齐继之，中央由寒人掌机要，又吸收刘宋诸王叛乱的教训，起用寒人为典签，控制诸王。萧齐一代，典签权势尤重。虽然仅是五品的僚属，但方镇向朝廷呈报军政，都得由典签副署。典签每年回京向皇帝报告方镇行径，供皇帝黜陟参考。有的一年回京几次。因此典签威行州郡，权重藩君，形成长王临藩，素族出镇的局面。方镇纷纷巴结典签，称典签为签帅。坐镇地方的诸王处处受典签的钳制，甚至取一段藕，喝一杯浆，也得典签批准。南海王萧子罕出镇琅邪，想游东堂，典签不许，只有作罢。回京后哭告其母说，儿想移五步都不能得，和囚犯有什么区别！明帝以帝室疏属窃取大权，登极为帝，只怕诸王反逆。大权在握，便开始了杀戮，登基后变本加厉，高帝19子，武帝23子，除早丧者外，差不多全都杀光，只有高帝次子萧嶷一人留有后人。明帝屠戮诸王，都是命典签下手，居然没有一人敢于反抗。明帝的杀戮，不仅是诸王，重要方镇也难幸免，方镇叛乱也就连绵不绝。萧齐王朝也就在这种滥杀和内乱中衰落下去了。 (蒋福亚)

萧衍代齐

天监元年(502)，萧衍利用南齐内乱，建立梁朝的历史事件。

萧衍(464—549)，字叔达，南兰陵(江苏常州西北)人。齐高帝萧道成的族弟。其父萧顺之是萧道成代宋的佐命功臣之一。因此，萧衍兄弟10人都是南齐权势集团中人。萧衍之能代齐建梁，完全是利用了南齐王室、方镇间的杀戮和倾轧。永泰元年(498)七月，齐明帝死，太子萧宝卷继位，遗诏始安王萧遥光、尚书令徐孝嗣、尚书仆射江祏、右将军萧坦之、侍中江祀、卫尉刘暄辅政，时称“六贵”。明帝临死前，遗言萧宝卷：“作事不可在人后。”也即凡事都以先下手为强。萧宝卷幼而无赖，长大后更甚，得此遗言，自恃勇力，照办不误。信用小人茹法珍、梅虫儿，豢养勇力之人三四十人，凡有杀戮，即命这些人捉刀前往，叫作“刀敕”，一个劲地滥杀。明帝的猜忌和杀戮，已使统治集团内部矛盾重重。萧宝卷继位不久，江祏兄弟便密谋废立，想拥萧遥光为帝。明帝刘后之弟刘暄参与此谋，怕萧遥光登极，自己做不成外戚，不同意，所以谋而不决。萧遥光便命心腹黄昙庆暗杀刘暄，未成。刘暄告密，江祏兄弟被杀。萧遥光即据东府(建康东城，宰相府第)叛乱。事变爆发，徐孝嗣入卫宫城，萧坦之统台军(宿卫)镇压。台军屡败。但萧遥光生性残暴，难服众心，其骁将垣历生临阵投降。台军攻破东府，杀萧遥光。二十余天后，萧宝卷又接连杀了萧坦之、刘暄和徐孝嗣。“六贵”尽除。如此滥杀，使将相大臣人人自危。高帝时江州(治寻阳，今江西九江)刺史、宿将陈显达本来就内怀忧惧，听到道路传言朝廷将兵讨江州，乃于该年十一月起兵寻阳，扬言将拥立建安王萧子真为帝。十二月采石(安徽马鞍山西南)一战，陈显达大破台军，兵入建康，包围台城(宫城)。不过陈显达年老气衰，不堪久战，临阵被杀，这次叛

乱终于被镇压。

陈显达兵围宫城时，豫州刺史裴叔业曾遣兵入卫，实质是拥兵观望。陈显达兵败，裴叔业心不自安，在年底举寿阳（安徽寿县）降魏，淮南重镇落入北魏之手。裴叔业死后，其兄子裴植主寿阳事。次年三月，萧宝卷命平西将军崔慧景讨伐寿阳。崔慧景也早怀异心，突然回师，夺取广陵（江苏扬州），收众渡江，在南徐州（治今江苏镇江）刺史萧宝玄内应下，进逼建康。白下（江苏江宁西北）、新亭（江苏南京南郊）、石头城（建康城西）、东府（建康城东）诸戍皆溃。崔慧景包围了宫城。屯驻小岘（安徽合肥东）的萧懿闻变，即统数千人自采石渡江，急趋建康。崔恭祖建议分兵堵击，崔慧景认为宫城指日可下，无须如此。萧懿抢得先机，进据秦淮河南。崔慧景打进建康后，论功不明，是否拥萧宝玄为帝，又犹豫不决，终于导致内乱，崔慧景单骑逃遁，被渔民杀死；萧宝玄被捕伏诛。萧懿以功居官尚书令。当时，劝萧懿速行废立的人甚多，萧宝卷也猜忌萧懿。永元二年十一月，萧宝卷又先发制人，杀死萧懿。进而想杀萧懿弟萧衍，乃命巴西、梓橦二郡太守刘山阳引兵3000东下，会合荆州刺史南康王萧宝融，进击襄阳，诛除萧衍。引发了萧衍和萧颖胄的联合起兵。

萧衍早蓄野心，建武五年出刺雍州（治襄阳，今湖北襄樊）后，便偷造器械，伐木砍竹，沉入檀溪，待时而动。曾力劝其兄萧懿夺权。裴叔业起事，也曾和萧衍通过声气。萧懿被杀，萧衍即召集心腹，决定起兵，旬日之间，集甲士万人，马千余匹，船3000艘，准备东下。萧衍深知，仅靠如此力量，难以成功，若能和荆州联手，便可挟上流之重威逼建康。当时年仅14的萧宝融只是名义上坐镇荆州，实权操在长史萧颖胄之手。萧衍致书萧颖胄，劝其共同举兵。萧颖胄犹豫不决。萧衍立刻致书各州府，到处扬言刘山阳此来，是想一举袭取荆、雍二州。刘山阳得知，百口难辩，不敢轻进江陵。萧衍又命其参军王天虎面呈萧颖胄兄弟书信各一封。萧颖胄打开一看，仅“天虎口具”四字。问王天虎。王天虎不知所云。实质萧衍什么都没有告诉过王天虎。王天虎本是萧颖胄心腹人物之一，至此萧颖胄疑心大起，认为王天虎勾结刘山阳。集众商议，又众口一词主张和萧衍联合。萧颖胄乃杀王天虎，送首刘山阳，诱刘山阳入城，突然诛杀。永元三年三月，两人拥萧宝融在江陵称帝，是为齐和帝，改元中兴，萧颖胄留守，萧衍统军东下。萧宝卷命吴子阳统13军讨伐。双方相持于郢州州治夏口（湖北武汉的武昌）达数月之久。加湖（湖北黄陂东南）一战，吴子阳大败。萧衍推进，江州刺史陈伯之迎降。萧衍连克姑孰（安徽当涂）、新亭等地，在建康的朱雀航南又大败台军30000。萧宝卷统甲士70000死守宫城。萧衍作长围之计。十二月，宫城兵变，萧宝卷被杀，和帝借太后之名，废萧宝卷为东昏侯。时萧颖胄已死，萧衍弟萧憺接任荆州，荆、扬两地全为萧衍控制。萧衍乃由梁公而梁王，在中兴二年四月，正式登上了帝位，建国号为梁，建元天监，都建康。齐亡，历七帝，首尾24年。萧衍即梁武帝。

梁朝首尾55年，梁武帝独占了48年。其时，文物礼仪虽然号称东晋南朝之冠，统治却极端昏庸腐朽。梁武帝崇尚士族，实际施政又依靠寒门地主，为使地主阶级中两大阶层都有官可做，有攫取克剥人民的机会，尽力扩大官吏队伍。官吏犯法，只要不是谋反和大逆之类，无不曲法申恩；视百姓如草芥，稍有越“轨”，定然严惩不贷，监狱由此人满为患。其六弟临川王萧宏勒索聚敛，无所不用其极，积钱三亿余万，布帛丝绵等堆满库房，难以计数。有人告发，库房中藏的是武器，所以不准旁人看。萧衍心情紧张，认为萧宏要谋反，亲自一间间开视后，大为高兴，夸奖萧宏真会过日子。就私生活而言，萧衍似乎无可非议。平日手不释卷，孜孜于学，精通经学，诗作甚佳；冬天四更起身批阅奏章公文，手冻裂了也乐此不疲；生活简朴，节衣缩食，粗茶淡饭。但非常贪财。地方官吏任满还朝，必须贡纳，多的升官，少的罢黜。因此无官不贪，到任后恣意搜刮。有的公然宣称，做地方官一定要做到四尽：水中鱼鳖尽，山中麋鹿尽，田中米谷尽，村里民庶尽。有的公然杀人越货。吏治坏到极点，达官贵人奢侈糜烂，妓妾盈房，仆从千数。为了麻醉人民，又大力提倡佛教，宣布佛教为国教。梁武帝信佛佞佛，多次舍身同泰寺，迫使臣僚凑足亿万钱为其赎身。朴素唯物主义者范缜反佛，主张神灭论，梁武帝亲自率领群臣和僧尼进行文化围攻。高级僧尼乘机为非作歹，祸害人民。腐朽的统治造成农桑俱废，“人人厌苦，家家思乱”。农民起义西起益州，南达交广，遍布南北各地。梁武帝想借北伐转移视线，粉饰升平，可总是以祸国殃民告终，并由此招来了侯景之乱。

（蒋福亚）

北魏末年各族人民起义

自正光五年（524）至普泰元年（531），北魏境内爆发的各族人民大起义。

随着北方的统一，北魏统治集团昔日马背上的进取精神日渐丧失。孝文帝改革后，胡汉权贵获得了

累世公卿的特权，北魏腐朽的速度加快了。地方官吏不亲民事，中央部门职责混乱，互相推诿。吏部公开卖官鬻爵，被时人称为"市曹"。王公贵族及各级官吏不遗余力地搜刮民脂民膏，土地兼并日甚一日，均田制遭到了破坏。咸阳王元禧的田产和牧场遍布远近，还让奴仆们经营盐铁，谋取暴利。章武王元融、高阳王元雍、北海王元详等无不如此。李崇等大官僚均号称富甲天下。皇亲国戚和达官贵人们兼并土地，垄断商业，占山锢泽，聚敛了大量的财富，生活穷奢极欲。元融公开宣称：不恨我不见石崇，恨石崇不见我！奢侈之风及挥霍浪费超过了西晋末年。迁都洛阳后，北魏频频用兵两淮，伤亡甚众，昔日南北鏖战之处及通衢大道到处尸骨累累，无暇掩埋。淮南告急，建康（江苏南京）便裸露敌前，南朝势在必争。为屏障京师，巩固河南防线，北魏对于淮南又势在必夺。战争无止境地延续，兵役和徭役剧增。大河南北家家从军，丁丁转运，大量土地荒芜，各户都有伤亡之痛。庞大的军国开支，最高统治主奢侈的生活和毫无节制的赏赐，官僚贵族的挥霍浪费，造成国库空虚，财政危机愈益严重。解决的办法是敲骨吸髓地榨取百姓，仅长尺、重秤和大斗，就使百姓的租调负担凭空增加了一倍多。均田农民被迫背井离乡，逃亡他地。有的成了依附农民，有的亡命山泽。由于僧尼可以免除赋役，因此往往是合户出家，僧尼数激增达 200 余万，占总人口的十五分之一左右。阶级矛盾日趋尖锐，农民起义不断爆发。宣武帝元恪在位 16 年（500—515）间，见于正史记载的起义便达 10 次之多，规模最大的有 10 万之众。其中有许多次是僧侣起义。延昌四年，宣武帝死，年仅 7 岁的孝明帝元诩继位，生母胡太后临朝听政。这是一个权势欲极旺、信佛佞佛、昏庸淫乱的女人。北魏统治更加腐败，政变屡有发生。腐朽的统治终于导致了六镇起义的爆发。

北魏初年，为抵御柔然，捍卫京师平城（山西大同东北），在今内蒙古河套至河北张北一线设置了沃野（内蒙古乌拉特前旗东南）、怀朔（内蒙古固阳西南）、武川（内蒙古武川西）、抚冥（内蒙古四子王旗东南）、柔玄（河北尚义西）、怀荒（河北张北北）等六个军镇。镇将大都在皇室的亲信中选拔，镇兵（或称镇民）则由拓跋部成员或中原强宗子弟充任，被视作国之肺腑，寄以爪牙重任，享有一定的政治、经济特权。迁洛以后，六镇军事作用急剧跌落，镇将人选已不受重视，镇兵往往由罪犯递补，身分地位一落千丈，低于平民，被叫作"府户"、"镇户"或"军户"等。随着北魏统治的腐败，镇将大都贪得无厌，肥田沃地悉数占为己有，瘠土荒丘分给镇兵耕种。镇兵生活极端穷困，还得承受镇将的役使。抚今追昔，怨愤之情郁积，对孝文帝的迁都和改革怀有刻骨之恨。六镇成为北魏末年各种矛盾的焦点。

正光四年，塞北大旱，赤地千里，柔然主阿那瑰统领饥饿兵民 30 余万入塞抢掠，兵锋直达平城，柔玄、怀荒等镇惨遭洗劫。嗷嗷待哺的镇民家徒四壁，吁请镇将开仓赈济，被拒绝。镇民愤而聚集，攻杀镇将。次年春，饥荒更加猖獗，沃野镇高阙戍（内蒙古浦格旗南）镇兵匈奴人破六韩拔陵被迫聚众起义，推破六韩孔雀为南平王，攻占沃野，得到镇民响应，义军声势大张。高平镇（宁夏固原）镇兵赫连恩等推高车酋长胡琛为高平王，与六镇起义遥相呼应。破六韩拔陵兵分两路，相继攻克武川、怀朔，又在五原白道（内蒙古呼和浩特西北）两次大败魏军，打得魏军只轮不返，诸军解体。义军基本上控制了六镇，魏廷被迫三易统帅，向世仇柔然呼救。阿那瑰闻讯即动，统兵 10 万进拔武川，西向沃野。魏广阳王元渊亦纠集重兵由平城向沃野移动。在敌军的夹击下，义军频战不利。元渊乘机诱降，参加起义的西部高车酋长乜列河和斛律金等相继降魏，破六韩拔陵被迫统 20 余万镇民渡河南移。五原（内蒙古包头西）一战，义军在元渊、阿那瑰等三面夹击下溃散，破六韩拔陵下落不明，20 余万镇民相继降魏。六镇地区经兵燹之灾和柔然的杀掠，荡然无遗，魏廷乃逼迁六镇降户于河北的定（州治今河北定县）、冀（州治今河北冀县）、瀛（州治今河北河间）等州。其后六镇仍有零星起义爆发，并且攻克过平城，终因大多数镇民被逼迁，队伍难以壮大。起义重心转向了河北。

河北地区频年水旱，百姓饥饿逃亡，六镇降民来到河北，生活毫无着落。孝昌元年（525）八月，柔玄镇民杜洛周被迫在燕州（州治今河北涿鹿）上谷（郡治今北京延庆）再举义旗，兵围州治。魏廷以常景为行台，布防卢龙塞（河北宽城喜峰口）至军都关（北京昌平北）一线。义军西上恒州（州治今山西大同东北），扩大队伍后突然南向，攻拔蓟城（北京），挥军再进，围攻范阳（河北涿县）。十一月，范阳在久困之下爆发起义，常景被俘。其后，义军又攻克了定、冀二州，声势大振。

杜洛周起义后四个月，怀朔镇兵丁零人鲜于修礼及葛荣等在定州左人城（河北蠡县）也发动了起义。定州长史甄楷害怕城内六镇降民响应，收斩其中粗豪者。此举激起六镇降民的愤怒，纷纷投奔义军，义军迅速扩大到 10 余万。孝昌二年四月，滹沱河北

一战，魏北讨大都督长孙稚大败，河间王元琛部溃散。魏廷改令元渊为北讨大都督，统章武王元融等镇压。在元融诱降下，义军渐有分裂之势。葛荣本是魏怀朔镇镇将，野心勃勃，为形势裹胁而参加起义，值此时机，便想窃夺义军的领导权，先后袭杀了义军偏师将领毛普贤和主帅鲜于修礼，控制了这支义军。博野白牛逻（河北蠡县境内）一役，葛荣阵斩元融，元渊统余部逃窜。义军衔尾追击，在定州附近俘杀元渊，至此，河北魏军主力大部被歼。葛荣乃自称天子，建国号为齐，分兵略地。孝昌三年，葛荣又相继攻克殷州（州治今河北隆尧东）及冀州等地，与杜洛周部联成一片。武泰元年（528）正月，葛荣火并杜洛周，尽有河北，队伍发展到数十万，号称百万，计划兵进洛阳。

胡琛领导高平镇起义后两个月，上邽（甘肃天水）又爆发了羌人莫折太提领导的起义，关陇起义由此如火如荼地展开。莫折太提病死后，其子莫折念生继统其军，称天子，建国号秦，署置百官。魏廷任元修义为西道行台，统元志等前往镇压。八月，莫折念生在陇东大败元志，进逼岐州（陕西凤翔）。魏廷被迫临阵易帅，任齐王萧宝寅为西道行台。十一月，义军攻克岐州，俘杀元志，随即分兵攻打雍州（治今陕西西安）及泾州（治今甘肃泾川北）等地。在此期间，南秦州（治今甘肃西和西）和凉州（治今甘肃武威）等地也相继爆发了起义，响应莫折念生父子，这些起义虽然为时不久就失败了，但念生部却日益壮大。孝昌元年正月黑水（陕西兴平西）一战，义军大败，10余万人被俘杀。念生被迫统部退回陇西。此时，氐酋吕伯度背叛念生，先投胡琛，后投北魏，勾结魏军进攻念生。次年九月，念生在魏军和吕伯度的夹击下，为保存实力，采用诈降计。这支义军暂时进入了低潮。

当念生所统义军被迫诈降时，胡琛部却日渐壮大。孝昌元年四月，其大将宿勤明达和万俟丑奴进逼泾州，大败魏军。萧宝寅被迫倾巢而出，集中甲士12万，铁骑8000余移师安定（甘肃泾川北）。万俟丑奴命轻骑挑战，不断佯败，引诱萧宝寅追击。继而诈降，抓住萧宝寅麻痹大意的机会，与宿勤明达合击魏西道行台悍将崔延伯，杀敌近20000。崔延伯负气再战，被义军击杀。魏军闻风丧胆，关陇起义进入了转折点。孝昌二年九月，莫折念生统部再起，与胡琛互通声气，合击魏军。不久，胡琛死，万俟丑奴继统其军；念生死后，其军也归属了万俟丑奴，关陇起义有了统一的领导。孝昌三年正月，泾州一战，义军又大败萧宝寅，基本上歼灭了西道行台主力。萧宝寅统残兵万余龟缩长安。义军乘胜略地，攻克了潼关。萧宝寅兵败，受到魏廷猜疑，乃于该年十月据长安称齐帝。武泰元年（528）为魏西道行台长孙稚击败后，投降了万俟丑奴。关陇起义进入全盛，万俟丑奴称天子，署置百官。

在河北义军和关陇义军的沉重打击下，北魏统治集团的内部矛盾日益加剧。时孝明帝已年满19，力图夺回大权，密诏契胡族酋帅尔朱荣入京。胡太后先发制人，立年仅3岁的堂侄元钊为帝，改元建义（528）。尔朱荣抗表讨伐，在河阳（河南孟县西）拥献文帝之孙元子攸为帝（史称孝庄帝）。兵进洛阳，废胡太后，控制了北魏军政大权，随即集兵36万镇压葛荣。当时葛荣正兵围邺城（河北临漳西南），众号百万，前锋已过汲郡（治今河南新乡）。尔朱荣亲统精骑70000，一兵配两马，倍道堵截。两军相遇于滏口（河北磁县石鼓山，太行八径之一）。葛荣自恃兵广将多，屡战屡胜，威行河北，骄傲轻敌，不作准备，只命士兵各带长绳一根，届时缚敌。尔朱荣则精心部署，伏兵山谷，命令魏军各备木棒一根，遇敌即抡棒击杀，不准下马割取首级记功。临战，葛荣自邺北摆开了延绵数十里的长蛇阵，箕张而进。尔朱荣则命督将以上三人为一处，各统数百骑，扬尘鼓噪，迷惑义军，亲统精骑突袭义军腹背。是役，葛荣兵败，被俘牺牲。数十万大军一朝散尽，河北起义失败。尔朱荣押送六镇兵民于河北各地，其中流入今山西的有20余万，先后起义26次，半数以上牺牲。

杜洛周和葛荣都没有处理好民族关系，特别是葛荣，攻克信都（河北冀县）后，尽逐城中居民，造成冻死者十分之六七的悲剧。攻取沧州（治今河北盐山西南）后，当地居民又大受其害，死者十分之七八。为此河北地区20余万汉族人民被迫流徙青州（治今山东益都）。永安元年（528），在邢杲的领导下举行了起义，众过10万。邢杲自称汉王，曾一度攻占过光州（治今山东掖县）。但这次起义前后只有10个月，在次年为元天穆血腥镇压。

河北和山东起义相继失败后，永安三年，尔朱荣命其从子尔朱天光统贺拔岳及侯莫陈悦等镇压关陇起义。在地方豪强武装和魏军的进击下，义军失利，退守安定。尔朱天光扬言天气炎热，需秋凉后再战。万俟丑奴上当，分散部队开荒种地，解决粮饷，只留5000余人马据险立栅，在大栅附近又设立了一些小栅，每栅千人，兵力分散了。尔朱天光抓住时机，夜间偷袭，突破大栅。丑奴被迫西走。魏军追击。平凉（甘肃华亭西）长平坑一战，丑奴兵败被俘，壮烈牺牲。余部由万俟道洛和宿勤明达统领，继续战斗。该年七

月，水洛城（甘肃庄浪）一战，万俟道洛兵败被俘。普泰元年四月，尔朱天光兵进夏州（治今陕西靖边白城子），宿勤明达也兵败被俘。关陇起义战斗了六年零十个月，亦告失败。

北魏末年各族人民起义前后延续了七年有余，横扫今内蒙古、河北、山东、甘肃、宁夏、陕西等省，沉重地打击了北魏的腐朽统治。起义虽然失败，北魏也名存实亡了，不久便分裂为东、西魏。参加起义的群众有鲜卑、汉、匈奴、氐、羌、高车等族，尽管起义领袖没有处理好民族关系，但义军的战士却是由各族人民组成的，生死与共的并肩战斗，必然会增进相互的了解，有力地推进了各民族的融合。　（蒋福亚）

河阴之变

北魏武泰元年（528），军阀尔朱荣发动的一次政变。

尔朱荣（493—530），字天宝，契胡族秀容部酋帅。劲悍善战，长于行军布阵，因世居尔朱川（亦名秀容川，今山西西北部之朱家川）而得姓。其高祖尔朱羽健追随道武帝拓跋珪兵击后燕，以功拜领民酋长，受封秀容州一带300余里。其子孙世有其地，成为拥有部落8000余家、牛羊驼马色别为群、弥漫山谷、不可胜数的一方豪霸。每有战争，尔朱氏均进献马匹、粮草，组织武士参战，由此倍得魏廷宠信。北魏末年各族人民起义爆发后，尔朱荣广散私财，招募勇悍，组成一支豪强武装，先后血腥镇压南秀容及并州等地小股农民起义，进号平北将军，拜北道都督。孝昌二年（526）八月，尔朱荣袭破肆州（治今山西忻县北），私署其叔尔朱羽生为刺史，结好并州刺史元天穆，进一步扩大势力。其时，魏廷正忙于应付河北和关陇起义，只有听之任之。尔朱荣终于发展成盘据一方的军阀。但其野心甚大，一心一意要插手权力中枢，因此当杜洛周和葛荣义军横扫河北时，一再毛遂自荐，祈请兵出河北。不过胡太后对其疑虑甚深，没有同意，还以封官许愿离间其部属，削弱其势力。尔朱荣对胡太后恨之入骨。

武泰元年，孝明帝年已19，不甘心屈从傀儡地位，屡欲亲政。但其生母胡太后权势欲极旺，迷恋临朝听政，任用嬖幸，千方百计排除孝明帝的亲信。孝明帝乃密诏尔朱荣带兵入京。尔朱荣闻诏即动，兵达上党（郡治今山西潞城西）。孝明帝反悔，又诏令尔朱荣止兵。此举为胡太后嬖宠郑俨和徐纥侦知，在二人计谋下，胡太后毒杀孝明帝，立一女婴为帝。数天后，人心稍定，胡太后便宣称魏帝为女婴，复立年仅3岁的堂侄元钊为帝。尔朱荣得知，认为过问朝政、夺取大权的时机已到，决定兵进洛阳。此时，北魏的主力基本上已被农民起义军歼灭，再无强悍的部队可供调遣，朝廷恐慌已极。在徐纥的建议下，胡太后诏令李神轨布防太行山一线，郑先护屯守河桥（河南孟县西南），费穆屯驻小平津（河南孟县东北），想把住黄河渡口，屏障洛阳，阻止尔朱荣渡河。四月，尔朱荣兵达河阳（河南孟县西），即拥立献文帝拓跋弘之孙元子攸为孝庄帝，改元建义，声讨胡太后等。郑先护与元子攸交好，闻讯后联合郑季明引尔朱荣渡河，开城迎降。徐纥东奔兖州，郑俨逃归故乡开封。胡太后计穷，被迫落发为尼。尔朱荣入京后，遣骑兵执获胡太后及元钊，送之河阴（河南洛阳东北），沉杀于黄河。随后又借口祭天，召集百官奉孝庄帝至陶渚（河阴西北三里处）行宫，铁骑包围，杀戮殆尽。自此，北魏军政大权为尔朱荣掌握。孝文帝苦心经营起来的门阀士族集团遭到了沉重的打击，山东士族也为之一蹶不振。　（蒋福亚）

元颢入洛

北魏永安二年（529，梁中大通元年），北海王元颢在梁武帝卵翼下掀起的一场内乱。

元颢，魏孝文帝弟北海王元详之子，其父因罪死后，于永平二年（509）受封北海王。北魏末年，任西道行台，镇压关陇起义。兵败后转相州（治今河北临漳西南）刺史，阻击河北葛荣起义军。行至汲郡（治今河南汲县西），尔朱荣拥立孝庄帝发动河阴之变，诛戮王公大臣。元颢即转其舅范遵为相州刺史，图谋争权。行迹败露，相州行台甄密废黜范遵，发兵迎接元颢，实际是想强行控制。建义元年（528）五月，元颢投奔了梁朝。

梁武帝本想乘北魏动乱之机兵进北方，乃于该年（梁中大通元年）十月封元颢为魏主，命飚勇将军陈庆之领兵7000，护送元颢北上。进据铚城，等待形势。恰值邢杲领导山东人民起义，横扫青齐。北魏集中兵力由元天穆统领镇压。永安二年四月，陈庆之乘虚而入，进拔堂城（河南宁陵北），在梁国（国治今河南商丘南）击败魏将丘大千7万之众。连拔三垒，迫降丘大千。元颢乃在睢阳（河南商丘南）称帝，改元孝基。考城（山东曹县与河南民权间）一战，陈庆之生俘统带20000羽林军的魏济阴王元晖业，虏获粮车七八千辆，乘胜而西。魏廷命东南道大都督杨昱领兵7万镇荥阳（今属河南），尚书仆射尔朱世隆布防虎牢关（河南荥阳汜水镇）等地，内外戒严。又调遣镇压邢

杲起义的元天穆和尔朱吐没儿部增援荥阳。总兵力达30余万。敌我兵力悬殊，梁军恐慌万分。陈庆之解鞍秣马，晓谕将士：此行攻城略地，所在屠掠无算，元天穆等都是仇敌，今日之计，只有死战方可求生。乘其众未集，当急攻其城，否则必遭屠灭。求生的欲望驱使将士们一鼓作气，攻拔荥阳，生俘了杨昱。接着又以3000之众凭城力战，大破元天穆军，乘胜推进虎牢，尔朱世隆弃城而走。孝庄帝闻讯失色，弃城而北，夜奔河内（郡治今河南沁阳）。元颢进入洛阳。此行历时140天，大小47战，攻拔32城，所向披靡。陈庆之部全着白袍，威震河洛，洛阳童谣曰："名师大将莫自牢，千兵万马避白袍。"

元颢入洛后，改元建武，任陈庆之为车骑大将军、徐州刺史。河南州郡大多闻风归附，顷刻间，北魏一分为二。元颢骤胜而骄，荒于酒色，日夜宴乐，不再视政，放纵昔日亲信好友擅权干政，横征暴敛。梁军士兵居功自傲，所在陵暴。结果人心尽失，民怨沸腾。但元颢却自认天命所归，力图摆脱梁朝自立。只担心陈庆之会从中作梗。陈庆之估计，若尔朱荣全力进攻，梁军必然难以抵敌，建议元颢奏请梁武帝增兵。元颢非但拒绝，在表疏中吹嘘将不日克定尔朱荣，特意申明无须援兵。梁武帝信以为真。梁军副帅马佛念建议陈庆之杀元颢据洛。陈庆之无此胆略，力请赴徐州任所，保全实力。又遭元颢拒绝。双方同床异梦，猜忌日深。尔朱荣抓住时机，命尔朱天光坐镇晋阳（山西太原西南），稳定后方，纠集鲜卑、柔然兵力，众号百万，亲自指挥尔朱世隆、元天穆和尔朱吐没儿等发起了攻击。陈庆之渡河阻击，三天中激战11次。尔朱荣失利，因无船只渡河，拟退兵后再图良谋。爪牙杨侃及高道穆等竭力反对，建议征发民间木材，结扎木筏，夜渡黄河。尔朱荣如计而行，击获元颢子元冠受，余军闻风溃散。元颢仓皇南走，被擒获，传首洛阳。其据有洛阳仅65天。陈庆之收步骑数千结阵东逃，士卒死散略尽，最后削发为僧，逃归建康。（蒋福亚）

高欢据关东

北魏普泰元年（531），高欢起兵信都，翦除尔朱氏势力，控制朝权，据有关东，为东魏北齐奠定了基业。

高欢（494—547），字贺六浑，鲜卑人（一说汉人）。其祖因罪配谪，世居怀朔镇（内蒙古固原西南）。发迹后，为抬高出身门第，乃认河北高氏为同宗，自称勃海蓨县（河北景县）人。其幼年贫困，寄养姐夫尉景家。及长，外貌俊美，深沉机变，含而不露。娶富家女匹娄氏为妻，才有马一匹，被镇将提拔为"队主"，转"函使"（信使），经常往来于怀朔及洛阳之间，目睹朝政腐败，纲纪不立，民不聊生，天下将乱，阴怀"澄清天下之志"，散家财广结豪杰。先后参加过破六韩拔陵、杜洛周及葛荣等起义军，联合尉景、段荣等辈，背叛葛荣，投奔了尔朱荣。建议尔朱荣借清君侧之名，翦除胡太后及其亲信，控制朝权，建霸王之业。博得尔朱荣欢心，任亲信都督（卫队长），参与机密。因血腥镇压河北及山东等地起义军，累官晋州（治今山西临汾）刺史。不断贿赂尔朱荣左右及其亲信，巩固权位。河阴之变后，尔朱荣嫁女为帝后，事事掣肘孝庄帝，身居晋阳（山西太原西南），遥控朝政，生杀予夺，随心所欲。孝庄帝不甘心作傀儡，永安三年（530），借尔朱荣朝觐之机，伏兵殿中，袭杀尔朱荣。尔朱荣从弟尔朱彦伯、尔朱世隆及侄尔朱兆等纠集兵马，拥长广王元晔为帝，兵进洛阳，执杀孝庄帝。尔朱彦伯兄弟坐镇洛阳，控制朝权，兄弟子侄，大都封王，各据一方。其中以据有并州和汾州（均在今山西省）的尔朱兆势力最大。尔朱氏是一群权势欲极旺、快意随心、贪虐无比、根本不知政治为何物的武夫。所在割剥，无所不用其极，被百姓怒斥为"豺狼"。当时，被尔朱氏逼迁到并州和肆州（治今山西忻县）一带的20余万六镇兵民，因生活毫无着落，先后起义26次，虽遭血腥屠杀，犹有复燃之势，成为尔朱兆心腹大患。如何处置？尔朱兆征询高欢。高欢早就想摆脱尔朱氏，图谋自立，苦于没有自己的军队，借机建议尔朱兆选取亲信统领六镇余众，若再闹事，唯此人是问。讨论人选时，贺拔允推荐高欢。高欢佯怒，挥拳猛击，打落贺拔允门齿，声言平生只配充当鹰犬，今日商讨如何安置天下，一切唯王（尔朱兆）之命是听。他人岂能置喙。贺拔允诬下罔上，该杀！骗得尔朱兆欢心，充任六镇余众首领。为防尔朱兆酒醒生变，高欢立刻命令六镇余众集结汾河东，略加整编，屯驻壶关（山西黎城东北）之大王山。不久，借口并、肆一带连年干旱，六镇兵民饥饿难耐，面无人色，请求移置山东就食，待其温饱后再作处分。尔朱兆拒绝其长史慕容绍宗的规劝，准其所请。高欢统六镇兵民出滏口（河北磁县石鼓山），渡漳水，进入河北。沿途约束六镇兵民，秋毫无犯，邀结民心，并竭力拉拢高乾、封隆之、李元忠等豪强大族。这些人平素横行乡里，欺压良善，早在北魏末年各族人民大起义时就组织豪强武装，参与血腥镇压，也不满尔朱氏的作为，正在物色政治首领。听说高欢统部而来，高乾便袭取冀州州府信都（河北冀县），亲往迎接。高欢势力有所壮大。

为笼络计，魏廷封高欢为渤海王。

普泰元年二月，尔朱世隆等废元晔，立元恭为节闵帝。尔朱兆因没有与闻，大为不满，准备起兵讨伐。尔朱氏内部权势之争公开化。幽州（治今北京）刺史刘灵助乘机起兵，自称燕王，倡言为孝庄帝报仇。顷刻间，河北大乱。该年六月，高欢见自立时机已到，乃诈称奉尔朱兆兵符，征发六镇余众配契胡（尔朱氏是契胡族）酋帅为部曲。假戏真做，选拣万余人，立刻出发。其亲信尉景、孙腾等则出面代表受命的万余人请求暂留五日，与家人告别。实质是为了煽风点火。六镇余众惶迫无计，人怀恐惧，哭声震天动地。期限已到，高欢亲往送行，就势煽动：吾与汝等同是背井离乡，客居异地之人，义同一家。不料上司征发，分离在即。汝等西去并州，是死路；误了军期，按律当死；配国人（契胡族的称谓），也当死。怎么办？对尔朱氏怀有刻骨仇恨的六镇余众异口同声：只有造反耳！共推高欢为主。高欢随即宣布：汝等同是乡里，互不服从。不见葛荣拥众百万，刑法不立，终于灰飞烟灭。今以吾为主，当与昔日有所不同。不得欺侮汉儿，不得违吾军令，生死由吾处置。否则必败，将取笑于天下。众人磕头表示：生死唯命！自此，除随贺拔岳入关的武川镇兵民外，六镇余众全都成了高欢的部属，为其奠定东魏北齐基业血战疆场。其后，为迎合六镇鲜卑对魏孝文帝改革的逆反心理，高欢及其后继者一直以鲜卑语号令军队，但又劝喻六镇鲜卑：汉人是汝等奴仆，男为汝耕，女为汝织，输送谷帛，令汝温饱，汝等为何还要欺凌彼等？又欺骗汉族人民：鲜卑是汝等之客，得汝一斛粟，一匹绢，为汝击贼，保汝安宁，汝等为何要痛恨彼等？借以缓和民族矛盾。高欢在骗得六镇余众死力后，密令李元忠夺取殷州（治今河北隆尧东），又派高乾伪装救助殷州刺史尔朱羽生，夺取了殷州。至此，高欢与尔朱氏决裂的条件终于成熟，乃抗表魏廷，讨伐尔朱氏。采纳孙腾的建议，拥元朗为帝，改年号为中兴，自为大将军、丞相、大行台。

高欢自立朝廷，尔朱氏岂能甘休。十月，尔朱仲远（尔朱世隆兄弟）、尔朱度律等统军阵于阳平（郡治河北馆陶），尔朱兆军于广阿（河北隆尧东），形成西、南合击之势。高欢利用尔朱氏之间的矛盾，大施离间计。尔朱世隆兄弟想谋杀尔朱兆、尔朱兆与高欢同谋想杀尔朱仲远等谣传不翼而飞。尔朱仲远和尔朱兆信以为真，互相猜忌，徘徊不进。尔朱仲远命骠骑大将军斛斯椿和车骑大将军贺拔胜屡请尔朱兆共商军计。尔朱兆来了，却手挥马鞭，长啸凝望，怀疑尔朱仲远另有异谋，没有进营，即驰马而去。斛斯椿及贺拔胜奉命再赴尔朱兆营劝喻，反被扣押，经日才放还。尔朱仲远闻讯大惊，引兵南遁。高欢抓住时机，兵进广阿，大败尔朱兆，俘获甲士5000余。普泰二年正月，高欢乘胜攻拔邺城（河北临漳西南），据有河北政治中心，声威大振。尔朱氏暂时捐弃嫌隙，携手共同征讨。三月，尔朱天光自关中、尔朱兆自并州、尔朱仲远自东郡、尔朱度律自洛阳各统其部而来，众号20万，会攻邺城。高欢命封隆之守邺城，亲统主力屯驻紫陌。时，其战马不满2000，步兵不满30000，虽然众寡之势悬殊，却胆气弥壮，凭借邺城西南的韩陵山（河南安阳东北70里）结成圆阵，用绳索把牛驴连系一处，截断归路，采置之死地而后生的战术，逼迫将士作殊死斗。高欢亲统中军，高昂统左军，高岳统右军，全线阻击。尔朱兆以铁骑陷阵，高欢失利，赖左、右军合击，挽回了颓势。尔朱度律恐尔朱兆得胜对己不利，按兵不动，坐观成败。尔朱兆数战无功，士气衰竭，大败西奔。尔朱度律大将贺拔胜见尔朱氏彼此如此猜忌，难成气候，临阵投降。其余诸军各自逃散。这就是著名的韩陵之战。

韩陵惨败导致尔朱氏的分崩离析。该年四月，斛斯椿联合贾显度等在洛阳发动兵变，杀死尔朱彦伯及尔朱世隆，尽屠其党，俘执尔朱度律和尔朱天光，送交高欢。尔朱仲远南投梁朝。高欢顺利进入洛阳，随即废元朗及节闵帝元恭，立孝文帝之孙元修为孝武帝，改易百官，署置亲信，控制了大权。洛阳政局甫定，便在七月兴兵10万，自出滏口，大都督库狄干出井陉（河北井陉西），两路直捣晋阳。尔朱兆已是惊弓之鸟，大肆虏掠晋阳后北窜秀容（山西神池、五寨县一带），次年正月，兵败自杀。尔朱氏势力被歼灭殆尽后，高欢控制了北魏全境。但为时不久，宇文泰崛起于关陇，高欢号令所及，仅止关东而已。（蒋福亚）

宇文泰据关陇

永熙三年（534），宇文泰兼并侯莫陈悦，尽有关陇，为西魏北周奠定了基业。

宇文泰（507—556），字黑獭，武川镇（内蒙古武川西南）人。其先为南匈奴的一支，后与鲜卑融合，徙居辽西。晋末被慕容部征服。北魏初年，道武帝推进河北，宇文泰先祖被俘，逼迁代北，世居武川。北魏末年，其全家参加了六镇起义，后又参加了鲜于修礼及葛荣义军。葛荣兵败，宇文泰为尔朱荣部将贺拔岳收编。多年的行伍生涯和曲折多变的历程，锻炼了宇文泰的军政才能。宇文和贺拔两家本是通家之好，在贺拔岳的栽培下，宇文泰成为以武川镇户为骨干的贺

拔岳兵团的核心人物之一。永安三年(530),尔朱荣命其子尔朱天光统贺拔岳及侯莫陈悦两支兵马入关,镇压关陇起义。几经血战,关陇义军领袖万俟丑奴及宿勤明达相继牺牲。尔朱天光尽有关陇之地。在此期间,高欢崛起于关东,尔朱天光留其弟尔朱显寿镇守长安,统军东下,会同尔朱氏其他势力合攻高欢。尔朱天光一走,宇文泰便建议贺拔岳联合侯莫陈悦袭杀了尔朱显寿。为笼络这两人,节闵帝封贺拔岳为关西大行台,侯莫陈悦为陇右行台。两人分据关陇。宇文泰任关西行台左丞,领府司马,参决贺拔岳军机。孝武帝虽为高欢所拥立,却不甘心为高欢挟持,潜结贺拔岳,密图高欢。宇文泰建议贺拔岳移军陇右,收服费也头及河西流民纥豆陵伊利等部,西和氐、羌,北抚沙塞,壮大实力。贺拔岳则请准孝武帝,任宇文泰为夏州(治今陕西靖边白城子)刺史,镇守北鄙重地。然后统军西出平凉(甘肃鹑阴)。此行相当顺利,秦、南秦、河、渭四州刺史奉命而来,表示愿受节度。只有灵州刺史曹泥心向高欢,拒不受命。永熙三年,贺拔岳阵军高平(宁夏固原),召侯莫陈悦商订共征曹泥。侯莫陈悦贪而无信,早被高欢暗中收买,借宴请之机,席中发难,杀死贺拔岳。贺拔岳一死,武川军人大都希望侯莫陈悦收编,求得一线生机。但侯莫陈悦目光短浅,对武川军人的期待置之不理,统本部退回陇右。武川军人一时群龙无首,散归平凉,投止无所,人心惶恐。为谋出路,一批年轻军官推资格最老的寇洛为首,意欲自立。寇洛颇有自知之明,承认自己没有雄才大略,难在乱世之秋闯出天下。只同意暂任,希望能另推贤者。大都督赵贵倡言:宇文泰的才干超世出俗,远近归心,法令齐肃,赏罚严明。今若遣人前去告丧,彼必来赴难,乘势推其为帅,定可成就大事。青年军官群起响应,赫连达受众人之托驰赴夏州。宇文泰闻讯,唯恐日久生变,立刻轻装就道。途中斥退奉高欢之命赶往平凉收编贺拔岳军队的侯景,抢先一步,收编了这支军队。此时,孝武帝和高欢的矛盾已表面化,命元毗持诏召宇文泰和侯莫陈悦入卫洛阳。宇文泰志在据有关陇,以所部大多为关西人,贪恋本土为理由,请求暂缓东出的期限,同时又与元毗歃血盟誓,力表同奖王室的忠心,骗取孝武帝的信任。进而要求讨伐侯莫陈悦,为贺拔岳报仇。其时,孝武帝势单力薄,虽对宇文泰疑虑重重,但为了争取这支部队,准其所请,并授予大都督名号。宇文泰立刻兵进原州(宁夏固原),突袭侯莫陈悦。所过军纪严明,秋毫无犯,获得了百姓的支持。侯莫陈悦兵力大于宇文泰,但素性怯懦,又无谋略,不敢拼杀,只想凭险固守。宇文泰一鼓作气,挥军猛攻。侯莫陈悦一退再退,导致军心涣散,纷纷投降宇文泰,最后连侯莫陈悦的姐夫李弼也统部归降。侯莫陈悦成为孤家寡人,被宇文泰追杀。关陇终于落入宇文泰之手。

(蒋福亚)

北魏分裂

永熙三年(534),魏孝武帝和高欢兵戎相见,兵败后奔窜关西,北魏分裂为东、西魏。

高欢歼灭尔朱氏后,因六镇兵民大都散居并州一带,晋阳(山西太原西南)是并州的政治中心,山河四塞,形势险要,乃大营晋阳,遥控朝政。时贺拔胜据荆州(治今河南鲁山),贺拔岳和侯莫陈悦据关陇(不久关陇为宇文泰所有),与高欢不和,彼此虎视眈眈。其余州镇心存观望,准备随时投机。北魏名为统一,实际上已四分五裂。孝武帝权势欲炽烈,不甘寂寞,以斛斯椿和王思政等为心腹,图谋夺回大权。采斛斯椿的建议,挑选勇悍轻剽之士,组建军队,时加训练。又企图分化高欢部属,笼络高欢亲信高乾。高乾不为所动,密告高欢,劝高欢取魏而代之。自知在洛阳已难存身,求出为徐州刺史。事发,被孝武帝杀死。高乾弟高昂逃奔晋阳。孝武帝和高欢的矛盾终于公开化。永熙三年五月,孝武帝征兵河南诸州,集众 10 万有余,意在奔袭晋阳。为迷惑高欢,却扬言声讨梁朝。同时利用高欢和贺拔胜、宇文泰之间的矛盾,用密诏的形式告知高欢,宇文泰和贺拔胜将有异谋,命高欢早作准备。实际是想借此分散高欢的兵力。高欢不为所算,佯称受旨,总兵 24 万有余,自统精兵 30000 渡河,命库狄干领步骑 40000 出来违渡(山西大同西),娄昭统步骑 50000 讨伐荆州,尉景统步骑 12 万配合孝武帝讨伐梁朝。其中除库狄干一路意在阻遏宇文泰外,其余三路 20 万人马却是指向洛阳。孝武帝无奈,被迫在诏书中和盘托出真相,命令高欢退兵。声言,高欢若能奉诏,今后彼此可相安无事。若继续举兵南向,纵然只有匹马只轮,亦将奋空拳与高欢一搏。哪怕身为齑粉,亦决无遗恨!高欢对此置之不理,却要求孝武帝迁都邺城(河北临漳西南)。遭拒绝后,即分兵扼守建兴(山西晋城、高平间)、河东和济州(治今山东茌平西南)等地,堵住了洛阳至诸州的通道;和籴诸州粮食,全部运入邺城,力图以饥饿迫使孝武帝就范。孝武帝形势尽失,被迫敕谕高欢,求高欢罢以上诸地之兵,送邺城之粟,今后自己将垂拱洛阳。否则,为了宗庙社稷,必将万死不辞。高欢则极言宇文泰及斛斯椿的罪恶,要孝武帝采取措施。实质是

寸步不让。至此，双方一战已势难避免。以实力论，高欢占有绝对优势。孝武帝明知不敌，急召贺拔胜入卫，并初步商议了兵败后退据何处：荆州无险可守，又弥近梁朝，决非理想之地；宇文泰野心勃勃，早已不听调遣，退据关西亦非善局。但就地理形势论，关西优于荆州，万般无奈，只有这一条路，然后再图良谋。为此封宇文泰为尚书仆射、关西大行台，许尚冯翊公主，并命其遣骑迎接。七月，孝武帝亲统兵马出屯河桥（河南孟县西南，洛阳外围戍守要地），凭河而守。又命斛斯椿和长孙稚守虎牢关（河南荥阳汜水镇），长孙子彦守陕城（河南三门峡），贾显智和斛斯长寿守滑台（河南滑县东）。孝武帝若能入关，宇文泰将获得巨大的政治优势，且此战孝武帝必败无疑。故宇文泰得诏后，立刻命赵贵自蒲阪（山西永济蒲州镇）渡河，挺进并州，牵制高欢；李贤统精骑 1000，驰赴洛阳，迎接孝武帝。高欢驱军急进，窦泰奉命猛攻滑台。贾显智投降。高欢顺利渡过了黄河。守已不能，战又无力，是投奔梁朝，还是南依贺拔胜或西投关中，孝武帝仍然举棋不定。恰值元斌之和斛斯椿争权火并，元斌之扬言高欢已进到洛阳，丧魂失魄的孝武帝狼狈就道，西奔崤中（河南新安东），与李贤部相遇，只有随李贤入关了。洛阳一失，长孙子彦弃陕城而逃。不久，贺拔胜兵败，投降了梁朝，后来又归顺了宇文泰。

孝武帝西逃后，建朝廷于长安，封宇文泰为大丞相。不久，主相矛盾激化，宇文泰毒杀孝武帝，立孝文帝之孙元宝炬为帝，是为西魏文帝。高欢屡请孝武帝东还无效后，乃于该年十月拥年仅 11 岁的元善见（孝文帝后裔）为帝，是为东魏孝静帝。随即驱逼洛阳 40 余万户迁都邺城。至此，北魏分裂为东魏和西魏。

（蒋福亚）

东、西魏之争

西魏大统二年（536，东魏天平三年）至十五年（东魏武定七年）间，与东魏频繁的战争。

东、西魏对峙后，高欢及其后继者力图击灭西魏，一统北方，战争连绵不绝。计其大者有小关之战、沙苑之战、河桥之战、邙山之战、玉壁之战、长社之战等。双方互有胜负。其中以沙苑之战及邙山之战的影响为大。

大统三年，关中继连年干旱之后，又遇大灾，百姓饿死者十有七八。为解燃眉之急，宇文泰结好柔然，求柔然配合，在八月统李弼等 12 将、万余人马，突袭恒农（河南三门峡），擒获东魏陕州刺史李徽等 8000 余人马，随即分兵四出抢掠，就食 50 余天后急退关中。迫于两面受敌，高欢亲提军马，在九月击退柔然后，方命高昂统兵 30000 驰夺恒农。自为后继，统 10 万大军在蒲津（山西永济蒲州镇）渡河，又渡洛水，阵于洛水南岸的许原。东魏攻势极猛，不给宇文泰喘息的时机，企图一举歼灭宇文泰。宇文泰已无可能召集兵马，被迫带领就食人马及三天干粮返身阻击，扎营沙苑（陕西大荔渭水北岸），防备高欢深入。双方相距仅 60 余里。李弼分析：敌众我寡，决不可在平原列阵。建议东移 10 里，利用渭曲芦苇丛生、河道弯曲的有利地形，设伏待敌。宇文泰接受，在渭曲背水而阵，东、西两面各埋伏一个方阵，以小股队伍诱敌。高欢得知西魏军东移，挥军推进。

高欢兵临蒲津时，其长史薛琡反对渡河，指出高昂已兵围恒农，截断了粮食入关之路。只要沿边勤加防御，使宇文泰野无所掠，来年麦收前，西魏军必然饿死或饿散。届时关中唾手可得。渡河以后，大都督斛律羌举建议，用部分兵力在渭曲一带牵制宇文泰，密遣精锐直捣长安，拔其根本。若如此，可不战而擒宇文泰。临战前，侯景建议分军为前后队，互相呼应，以防万一。以上建议均有合理成分，但去年小关之战，东魏损失颇重，大将窦泰被逼自杀。高欢此行，可谓含忿而来，又知宇文泰兵少，必欲手刃仇敌，以报昔日之仇，故概不接受。东魏将士则认为以百击一，必操胜券，个个骄横万分。悍将彭乐居然在临战前喝得酩酊大醉。时及黄昏，东魏军扑入渭曲，见西魏军兵微将寡，人人争功，抢夺俘获，阵列大乱。宇文泰抓住战机，亲自擂鼓督战。于谨统西魏左翼死死缠住东魏将士，就在胜负难分之际，右翼李弼统铁骑突然杀出，左冲右突，把东魏军截为二段。西魏将士个个奋勇，宇文泰的卫队长李檦藏身甲胄，跃马冲杀，来去如风，挡者辟易。直到战争结束，东魏将士竟都没有看清李檦长相如何。大都督耿令贵杀敌尤多，乃至甲裳尽赤。高欢部属是久经战阵的“百保鲜卑”，作战极其凶猛。彭乐肚子被刺穿，肠子外流，竟然割掉塞不进去的部分，跃马再战。毕竟由于队不成列，混乱不堪，难以发挥整体力量。高欢命人历营点兵，企图整队再战。岂料营中竟无一人。大势已去，被迫骑上橐驼，逃到黄河边，抢得船只，渡河东去。这就是沙苑之战。是战，宇文泰杀敌无数，俘虏 80000 余人，收编精锐 20000，余皆放回。高欢损失惨重，此后不敢再轻易犯险渡河。但就双方实力而论，东魏北齐在较长时间内一直据有优势，因此每逢冬季冰雪封河，西魏北周均沿河推冰，防备高氏突然兵渡黄河。

东魏御史中丞高慎原娶崔暹之妹，后离异，两人由此结仇。时高欢世子高澄用事，宠信崔暹。高慎深恐崔暹陷害，疑虑重重。大统九年（东魏武定元年），高澄又欺凌高慎后妻，双方结怨更深。为防意外，高欢出高慎为北豫州刺史。魏晋以来，刺史权重，大臣出镇，统军治民，已成惯例。但高欢却令奚寿兴典军，只给高慎治民之权。高慎于心难平，乃据虎牢（河南荥阳汜水镇）叛降西魏，吁请宇文泰接应。虎牢、长安，相距甚远，且高欢已兵屯河阳（河南孟县西南），防备西魏异举。是否接应，宇文泰迟疑不决。骠骑大将军李远指出：按常理而论，实难救援，但兵贵神速，不入虎穴，焉得虎子。若以奇兵出其意表，或许可以成功。即便有失，胜败也是兵家常事。如若总是顾望不前，天下将永无克定之日。宇文泰乃命李远为前锋，亲统大军为后继，兵围河桥南城（河南孟县西南，防卫洛阳外围的三个军事要塞之一）。

宇文泰甫出，高欢便统兵10万，移军黄河北岸，准备渡河。为阻遏高欢，宇文泰从上游放火船而下，想烧毁河桥（河桥是用船只连接成的浮桥），东魏军以小船百余结成长锁拦截，火船一到，即用钉钉牢，拉向岸边，保全了河桥。高欢顺利渡河，据邙山（河南洛阳北）列阵，诱宇文泰进攻。宇文泰留辎重于瀍曲，统军夜登邙山。高欢严阵以待，欲等西魏军干渴而后战。黎明，两军相会，彭乐统数千骑冲入宇文泰北翼，俘西魏大都督临洮王元柬等督将48人。西魏军大败。高欢命彭乐统军再战，追擒宇文泰。宇文泰窘极无奈，对彭乐说：痴男子！今日无我，明日岂有汝邪！何不赶快还营收取金宝。贪财好宝的彭乐果然返身抢入宇文泰大帐，抢夺金宝而去。宇文泰侥幸逃脱。该日，高欢大胜，俘斩西魏30000余人（一说60000）。次日，两军再战。宇文泰自统中军，赵贵统左军，若于惠统右军。中、右两军合击，大破东魏军，高欢身旁仅剩侍卫7人，赖卫队长尉兴庆拼死力战，堵住追兵，才得脱身。两军混战正酣之际，宇文泰发现高欢旗鼓，急命太师贺拔胜挑选3000勇士，都用短兵器，以肉搏战冲入敌阵，终于找到了高欢。贺拔胜领13骑，手执槊矟，紧紧盯住高欢。高欢落荒而逃。数里之中，贺拔胜的槊矟几次劈向高欢，均被闪过。贺拔胜高声大喝：贺六浑（高欢字），贺拔破胡（胜字破胡）必杀汝也！高欢慌极，几乎气绝。幸赖东魏河州刺史刘洪徽和武卫将军段韶尾追而至，刘洪徽射死追骑二人，段韶射倒贺拔胜坐骑，高欢才侥幸逃逸。贺拔胜懊恼万分：今日之事，吾不执弓矢者，天也！

西魏中、右两军虽胜，赵贵所统左军却数战不利。高欢整军再来，队伍云集，战场态势骤变。宇文泰亲统军马增援左军，亦被打败。傍晚，西魏军终于不支，宇文泰率残兵败卒逃遁，降者甚众。东魏军紧追不舍。西魏大将于谨统部伪降，待追骑一过，突然鸣鼓呐喊，奋击东魏队尾。东魏军骚乱，宇文泰安全脱身。这就是邙山之战。此战，宇文泰损失惨重，其所仰仗的武川军人伤亡尤多，不得不大量募取关陇豪右入伍，汉人逐渐成为其所建府兵的主力。

大统十五年长社之战后，发生了侯景乱梁事件，南朝极度衰弱，东、西魏都掉转兵锋南向争城略地。彼此间的战争才暂告平息。　　　　（蒋福亚）

宇文泰建府兵制

西魏权相宇文泰进行的兵制改革。

东、西魏对峙时，东魏占有的关东地盘大，人口多，历来是我国经济较发达的地区。西魏占有的关陇人口近千万，将及东魏的一半，经济实力不如关东。但在大统二年（536）至十五年间，宇文泰不仅顶住了高欢的频频进攻，而且往往有胜，有时还主动出击。究其原因，固然与关陇地形险要，易守难攻有关，关键还在于宇文泰采纳了苏绰的建议，以“爱民如慈父，训民如严师”为治国思想，颁行了六条诏书，在政治、经济领域中进行了一系列的改革。政治上整顿吏治，裁减官吏，严惩贪污，慎于刑政，突破魏晋以来凭门第取人的藩篱，唯才是用。经济上整顿户籍，清查隐漏，认真推行均田制度，并建立预计收入而确定军国开支的计帐制。此外，在军事领域中，宇文泰也进行了改革，这就是建立了府兵制。

府兵制肇始于大统八年的设置六军，至大统十六年设置8个柱国大将军及12个大将军后，才初具规模。其建制大体如下：宇文泰和西魏宗室广阳王元欣以柱国大将军名义分别为府兵的统帅和副帅，后者徒具虚名，实权操在宇文泰之手。赵贵、于谨、李虎、李弼、独孤信和侯莫陈崇六个柱国大将军各治一军，称“六家”，分别辖两个大将军；大将军各辖两个骠骑大将军，骠骑大将军各领开府一个，简称开府将军或开府。开府领一军，故府兵又有24军之称。开府下辖两团，团设车骑大将军，简称仪同将军或仪同。仪同所统叫团，团下又设团，设大都督，其下为旅，置帅都督。旅下设队，置都督。每个开府统兵约千人左右。府兵初建，总兵力大体近50000。初建的府兵，以六镇兵民为主体，每月15天戍卫，15天训练；每年一次演习，有时两次。连绵不绝的战争，兵员损丧极大，尤其是大统九年的邙山之战，宇文泰损军30000

有余，精锐被歼大半，不得不召募汉人入伍，其后，关陇豪右逐步成为府兵主体。征召汉人入伍，必须是六等户以上，有勇力才用的丁壮方可。府兵自备弓刀一具，其它由六家及封建政府筹措。

府兵制建立时，将领一律保持或赐给鲜卑姓，士兵则用将领之姓，取其同一部落，"有如子弟"之意。军中号令一律用鲜卑语。八柱国的设置也有模仿北魏初年八部大人的含义。表面看来，初建的府兵与北魏初年的部落兵制颇相类似。但府兵有严格的管理系统，户籍不隶郡县，集中居住城坊之中，享有免除赋役的特权，身分世袭，是一个特殊的社会集团。和世兵制不同，世兵的身分地位类同奴仆，生活困苦。府兵是将领的"子弟"，社会地位甚高，经济生活有保障，西魏政府又确保其仕途通泰。因此，府兵制度只是借用了部落兵制的躯壳，吸收了魏晋以来世兵制度的部分内容而形成的一种新的兵制。由于身分地位的提高和经济条件的改善，加上训练有素，府兵的战斗力大为提高。

府兵制是我国封建社会中重要的军事制度之一。自西魏创建，直到唐代均田制度瓦解前夕，才被募兵制取代，前后推行计有200年左右。其间的演变主要有：一、淡化兵将间的关系，直接由皇帝统领，逐步确立起兵将分离，命将出征，战罢兵归府、将归朝的原则。二、洗涤部落兵制及世兵制的残余，逐步与均田制相结合。上述变化大体完成于周、隋之际。隋、唐武功之盛，虽不尽由府兵制，但却与此有极大的关系。　（蒋福亚）

侯景之乱

太清二年(548)至天正二年(552)间，东魏降将侯景在梁朝掀起的一场战乱。

侯景，鲜卑化了的羯族人，世居怀朔镇（内蒙古固原西北），高欢少年时密友，奸诈多谋略，经历大体与高欢相仿，参加过六镇及河北起义，后背叛义军，投奔尔朱荣，因生擒葛荣而特蒙宠信。高欢崛起后，侯景投靠高欢，成为高欢的得力帮凶。任河南大行台，统兵10万，专制河南13州达14年之久。与高欢约定：为防他人离间，凡高欢书信，均在书背加微点。侯景素来轻视高澄，曾对人说：高王（指高欢）在，吾不敢有异志；王没，吾不能与鲜卑小儿（指高澄）共事。故高欢父子深以侯景为忧。高欢病重，高澄假借高欢之名征侯景入朝。侯景见书背无点，心知有变，立刻拥兵自固。高欢死讯传出，侯景便遣使建康和长安，献地请降。宇文泰对侯景了如指掌，采取受降如临敌的方针，分遣军队乘机接收了河南7州13镇，并要侯景入朝。侯景考虑入关难有善局，决心向梁武帝求援。梁武帝认为这是兵进北方、一统华夏的天赐良机，封侯景为大将军、河南王、都督河南诸军事、大行台，命其侄贞阳侯萧渊明统精兵50000进取彭城（江苏徐州）接应。高澄起用宿将慕容绍宗对敌。梁军纪律败坏，所过劫掠居民，萧渊明又怯懦无能，寒山堰（江苏铜山东南）一战，东魏军水淹彭城，生俘萧渊明，梁军几乎全军覆没。再战涡阳（安徽蒙城），侯景败北，统残余800骑奔窜寿阳（安徽寿县）。梁武帝发布侯景为南豫州刺史。

东魏大胜后，复施离间计，遣使和致书并下，要求议和。佞臣朱异竭力赞成。侯景得知，一再反对。梁武帝一方面对侯景信誓旦旦，宣称自己贵为万乘之主，决不会成则相纳，败则相弃，失信于人。不断赏赐和安抚，侯景凡有所求，必然满足。一方面又不断遣使东魏。侯景伪造东魏信件，提出议和条件：用侯景交换萧渊明及寒山战俘。梁武帝立刻表示：贞阳旦至，侯景夕返。朝臣指出不妥，梁武帝却同意朱异的看法：败军之将难以言勇，派遣一介使节便可捉拿侯景。不作任何军事准备。侯景见此，反意转炽，竭力召募南豫州居民为兵，停征市税和田租收买民心，将百姓子女全数配给将士鼓励士气。随即遣使邀约驻兵淮上的轻车将军羊鸦仁同反，羊鸦仁拒绝，将侯景使节押送建康，朱异抑而不报，不久又放回侯景使节。侯景进而要求杀羊鸦仁。梁武帝反而道歉，厚加赏赐。侯景断定梁朝腐败无能，乃在太清二年八月借诛"三蠹"（佞臣朱异、徐麟、陆验三人）为名，起兵叛乱。此时，梁武帝还断言侯景决无能为，继续掉以轻心，不过总算命邵陵王萧纶统四路兵马，摆出了讨伐侯景的架势。九月，侯景扬言兵进合肥（今属安徽），突然偷袭谯州（治今安徽含山西南）。谯州百姓在刺史萧泰的残酷统治下早已人心思乱。侯景兵到，守将董绍先便执萧泰开城迎降。接着，历阳（安徽和县）庄铁又投降，并劝侯景从速渡江，抢占江防要地采石（安徽马鞍山西南，长江南岸），直捣建康。侯景兵趋横江（长江北岸，面对采石，今安徽和县东南）。名将羊侃建议赶快遣兵二千扼守采石，命萧纶袭取寿阳，使侯景进退失据，束手就擒。梁武帝自恃长江天险，拒不采纳，同意朱异的意见：侯景决不会渡江。只是命临贺王萧正德负责京师防务。羊侃哀叹：如今必败无疑。

萧正德，萧宏之子，过继梁武帝为嗣。梁武帝在长子萧统（昭明太子）出生后，又将萧正德退还给萧

宏。萧正德本以为自己是皇位的继承人，对此处置极端不满，阴养死士，伺机篡夺，只盼大乱早日爆发。侯景抓住这点，起兵前致书萧正德，将拥其为帝。萧正德欣喜万分，回报说：仆有此心，为日久矣。敦促侯景及早发动，免得错过时机。此刻负责防务，即派大船数十艘，诈称运载苇荻，在十月下旬将侯景叛军偷运过江。侯景占有采石，攻取姑孰（安徽当涂），建康才得到信息，慌作一团。太子萧纲（萧统死后被立）戎服入见，求取方略。85岁高龄的梁武帝束手无策，将军国大事推给了萧纲。萧纲和羊侃部署防务，命萧正德驻屯朱雀门。此时，侯景已越过板桥（江苏南京西南板桥镇），推进秦淮河南。萧正德引侯景渡过秦淮河，直抵台城（宫城），西陷石头城（建康西城）后，对台城作长围之计，昼夜猛攻。十一月，侯景立萧正德为帝，自为丞相。侯景渡江时，仅有马百匹，兵八千余人。进入建康后，下令放免奴婢，愿从军者重赏，奴隶投奔者日有千数，居然拥众十万，势力大张。

台城被围，萧纶日夜兼程，入卫京师。玄武湖畔一战，萧纶败北，退避京口（江苏镇江）。时东扬州、南兖州、司州、西豫州、衡州、高州、荆州等地勤王军纷纷赶到建康周围，总兵力达二三十万，但以谁为帅争执不下。推定柳仲礼为大都督后，只有袁粲一人战死，其余各部均观望不前，乘机四出抢掠。柳仲礼成天拥妓妾饮酒作乐，拒绝诸将请战。有人求萧纶进攻，萧纶也不同意。柳仲礼的父亲柳津站在台城城头责以君父大义，柳仲礼置之不理。台城被围之初，有男女十余万，甲士二万余，米40万斛。被围日久，粮食告罄，战死、饿死者十有七八，横尸满路，城破时只剩下了二三千人。侯景初进建康，尚注意军纪。台城久攻不下，侯景本相暴露，放纵士兵抢杀，驱迫居民担土起土山攻城，病弱者杀死填山。建康饥荒蔓延，饿死者十之六七。自东吴以来，建康历数百年的经营，成为拥有28万户的一大都会，遭此洗劫，破坏无遗，数月中道路断绝，幸存者“百无一二”。值此存亡定于俄顷之际，扼守太阳门的萧坚（梁武帝之孙）仍然只是酣饮聚赌，苛待部下。太清三年二月中旬，台城兵变，被侯景夺取，迫令梁武帝及萧纲发诏令勤王军听自己指挥。诸军或降或归，陆续散去。

侯景控制大权后，废萧正德（不久缢杀），幽禁梁武帝等。五月，梁武帝老病饿死，侯景立萧纲为帝（简文帝），自为相国、宇宙大将军、都督六合诸军事，分兵攻掠三吴（苏南浙东）等地。命令：若攻破城邑，全部杀掉，使天下人知道我侯景的威名。三吴是东晋南朝最富庶的地区，经此惨祸，加上天灾，竟然“千里绝烟，人迹罕见”。侯景灭绝人性，企图用杀戮及令人发指的酷刑，如杀人时从脚到头一寸一寸地割取来压服南方人民，南方人民至死不屈，反抗日趋强烈。

台城虽然陷落，梁朝还有一定的力量。但梁武帝的子孙们为了夺取皇位，内乱不已，延缓了侯景灭亡的时间。大宝二年（551），侯景西上，先后攻陷江州（治今江西九江）及郢州（治今湖北武汉的武昌），乘胜进逼江陵。时梁武帝第七子荆州刺史湘东王萧绎已基本上消灭了争夺皇位的对手，命大将王僧辩争夺江郢两州。五月，巴陵（湖南岳阳）一战，侯景败北。双方相持。荆州军乏食。恰值崛起于岭南的陈霸先攻克了湓城（江西九江），推进巴丘（湖南岳阳），支援了30万石粮食，王僧辩得以乘胜推进。侯景退回建康，八月，废简文帝，立萧统的儿子萧栋为帝，改元天正；十月，侯景用土袋压死简文帝；十一月，废萧栋，自己登上帝位，改国号为汉。次年二月，王僧辩和陈霸先会师后东下，三月，姑孰一战，王僧辩大胜，直抵建康。侯景东逃，四月，在胡豆洲（江苏镇江北）被杀。荆州军攻拔建康后，又惨无人道地进行杀掠，以致当时人说，王师之暴，远远超过了侯景。

祸乱平息了，这场祸乱不但将建康及三吴一带破坏得“人迹罕见”、“极目无烟”，东魏又乘乱攻取了江北诸郡，西魏则将梁、益二州纳入了版图，雍州（治今襄樊）也成了其附庸。南朝极度地削弱了。

（蒋福亚 戴 冠）

梁宗室夺位之乱

太清三年（549）至承圣三年（554）间，梁武帝的子孙借侯景之乱争夺皇位的战乱。

武帝八子，长子昭明太子萧统、四子南康王萧绩及五子庐陵王萧续早死，次子豫章王萧综叛降北魏，乃册立三子萧纲为太子。其六子邵陵王萧纶、七子湘东王萧绎、八子武陵王萧纪都心怀不满，梁武帝处诸子于重要方镇，任萧纶为南徐州刺史、萧绎为荆州刺史、萧纪为益州刺史，加大其权力，局部满足其贪欲，诸子都权侔人主。按父死子继的传统，萧统死后，其子河东王萧誉或岳阳王萧詧应为太孙，将来继承皇位，故也心中不服。梁武帝又任这二人为富庶之区的太守，后也各为方镇，权势仅次于诸叔。这些人到镇后都积蓄力量，豢养勇力死士，网罗亲信爪牙，盼梁武帝早死，可以伺机夺位。为此都把侯景之乱看成入继皇位的大好时机，掀起了一场场内战。

太清二年八月，侯景之乱爆发。萧纶奉命为北讨大都督征讨。台城被围，萧纶入卫，兵败后退据京口

(江苏镇江)。台城陷落,萧纶先窜会稽(浙江绍兴),受排挤,再逃郢州(治今湖北武汉武昌),被推为都督中外诸军事,成了中流盟主,虽然缺兵短粮,但不承认简文帝,名自己的听事厅为正阳殿,居处衙门也都冠以宫殿名称,署置官吏,俨然摆出了皇帝的架势。此时,力量最大、兵赋全资的是拥有都督荆雍湘司等八州诸军事、荆州(治今湖北江陵)刺史头衔的萧绎。萧绎也早有夺位的欲望,当侯景兵围台城时见死不救,只派万人勤王,后来在舆论的压力下,才又命大将王僧辩统舟师万人东下。台城陷落后,也不承认简文帝,一直使用太清年号。现见萧纶如此,当然于心不甘。不过其间还隔着一个湘州(治今湖南长沙)刺史萧誉,只有翦除萧誉,才能加兵郢州。为此,太清三年四月,萧绎借口讨伐侯景,以八州都督身分,命令萧誉发兵送粮。萧誉明确表示不受管束。萧绎立刻命世子萧方等统精兵20000讨伐。麻溪(湖南长沙北)一战,萧方等败死。萧绎又命鲍泉督师围攻长沙。久攻不下,临阵移帅,命王僧辩督师。萧誉向萧纶及萧詧呼救。萧纶明知湘州一失,自身难保,只因兵粮不足,爱莫能助,借口共讨侯景,呼吁萧绎罢兵。萧绎的回答十分干脆:我白天平定湘州,晚上便发兵讨伐你。萧詧则自恃兵精将勇,亲统精卒20000,铁骑2000直扑江陵。恰值大雨滂沱,平地水深四尺,士气沮丧,内部又爆发萧绎旧友新兴太守杜岸偷袭雍州州治襄阳(湖北襄樊)的变乱。萧詧狼狈回师,平定变乱后,估计难抗萧绎,在大宝元年(550)四月自称梁王,称臣西魏呼救。西魏宰相宇文泰正欲南下攻城略地,立刻命大将杨忠统军把汉水以东据为己有,摆出进攻萧绎的态势。萧绎效法萧詧,同样称臣西魏,与杨忠议定:魏以石城(湖北潜江)为界,梁以安陆(今属湖北)为界,出让大片土地求取西魏罢兵,以便集中全力去消灭萧纶。六月,王僧辩攻拔长沙,移师郢州。九月,萧纶弃城而走,称臣北齐,在北齐的支持下称梁王。大宝二年二月,被西魏俘杀。至此,只要除掉简文帝,按兄弟行次,萧绎也可名正言顺地即位了。但要除掉简文帝,必须兵下建康,讨伐侯景。因此,这年四月,萧绎命王僧辩为大都督统军东下。萧绎之猜忌残忍,人所共知,王僧辩更是深有体察。昔日进攻萧誉时,王僧辩因水师未集,请示暂缓一时,即被认为是抗命,心向萧誉,当场被萧绎打得晕死过去,关进监狱,几乎被杀。故此次东下,特意请示:讨平侯景,若嗣君(简文帝)平安无事,应待以怎样的礼节?萧绎回答干脆利落:攻克台城,"自极兵威",也即放手杀戮。所以天正二年(552)三月王僧辩攻下建康后,就毫不犹豫地杀死了萧栋(时简文帝已死,萧栋曾被侯景立为皇帝)及其兄弟。这年十一月,萧绎也就在江陵即位了(梁元帝)。由于建康及三吴(苏南浙东一带)已为侯景及萧绎的队伍破坏无遗,短时期内极难恢复,萧绎乃决定迁都江陵。

萧绎得势,萧纪不服。萧纪坐镇成都已有16个年头。为了日后争帝,一到成都,便内修农桑盐铁,外通商贾,积蓄财力物力,居然"器甲殷积",拥有精兵40000,铁骑8000。台城被围,萧纪毫无勤王之意,不发一兵一卒,此刻却抢先一步,在这年四月称帝成都,随即挥师东下,借口讨伐侯景,意欲夺取江陵,翦除萧绎。进到西陵峡(湖北宜昌东),被萧绎军挡住。萧绎一面遣使萧纪,告知侯景已平,汝已师出无名,借以瓦解其军心。一面又请求西魏袭取梁益二州。宇文泰坐收渔利,何乐而不为,立刻命大将尉迟迥统军夺取梁州,兵围成都。萧纪东下时,制成金饼10000个、银饼50000个,各重一斤,每战悬示将士,声明将赏赐有功者,实际毫无兑现之意。将士怨恨,又都是益州人,西归心切,人心思变。其时萧纪已欲进不能,欲退不成,只好向萧绎求和。萧绎拒绝,并于承圣二年七月反击,一举阵斩萧纪。萧纪死了,梁益二州也为西魏攻占。

萧詧依附西魏后,并不死心,屡次入朝长安,请求西魏发兵夺取江陵,助自己争夺帝位。萧绎过去一再称臣西魏,借手西魏翦除异己,称帝后却结好北齐,牵制西魏,要求西魏退还梁益二州及襄阳等地,双方破裂。承圣三年十月,宇文泰命大将于谨总兵50000,会合萧詧,在萧詧的向导下,直指江陵。行前,于谨分析,此时萧绎有三条路好走:耀兵汉沔,席卷渡江,退据建康,是为上策。移江陵周围百姓入子城,屏障江陵,坚守待援,是为中策。死守江陵,是为下策。又根据萧绎多疑、无谋、少断的特点,断定其必采下策。不出其所料,萧绎果采下策。十一月,江陵城破,萧绎被俘杀。西魏驱掠城中10万男女到关中,赏给有功将士为奴婢,把一座空城留给了萧詧。次年初,西魏册立萧詧为傀儡皇帝,划定方三百里为其统治区,史称后梁。此时萧詧已后悔莫及,郁郁而死。梁武帝子孙夺位的战乱也于此告终。

梁武帝的腐朽统治造成的侯景之乱及其子孙的夺位之乱,固然使南朝奄奄待毙,更使南方惨遭破坏,人民屡遭涂炭之苦。 (**戴 珽**)

高氏建北齐

天保元年(550),高欢子高洋废东魏孝静帝元善

见，建立北齐的历史事件。

北魏分裂，高欢威望颇受损害，关西大敌尚在，战争又颇不顺利，虽然大权在握，生杀予夺可随心所欲，急切间却难行禅代之事。高欢15子，高澄、高洋、高演和高湛均系嫡出，都有才勇，兄弟间勾心斗角，权势之争相当激烈。高澄居长，才华外露，中兴元年(531)被立为世子。天平三年(536)，17岁的高澄便成了高欢的副手，入朝辅政，执权用事。高澄颇明吏事，执权后改革官吏铨选制度，选用了一些文人，以崔暹、宋游道、崔季舒、卢斐、毕云义等为腹心。其中御史中丞崔暹、中尉宋游道能不避权贵，弹纠贪官污吏，得到高欢的支持和赞赏。无官不贪、敲骨吸髓地榨取民脂民膏的现象稍有收敛，吏治略有起色。武定五年(547)，高欢死，高澄继为渤海王，独掌大权，本拟禅代，因河南爆发了侯景的叛乱，只得放慢步伐，特命崔季舒严密监视孝静帝，一举一动都不得轻易放过。有次宴饮，高澄逼孝静帝饮一大觞。孝静帝酒力不胜，忿怒难当，说：自古没有不亡之国，朕何必如此活着。高澄破脸怒骂：朕、朕、狗脚朕！命崔季舒猛击孝静帝三拳，奋衣而去。在荀济、元瑾等人策划下，孝静帝诈称在宫中造一假山，实质是开挖地道，想从北门逃出。挖到千秋门，被卫士发觉。高澄立刻勒兵入宫，责问孝静帝为何造反?此时孝静帝已知难以逃逸，乃反唇相讥：自古以来，只听说臣反君，没有听说过君反臣。高澄语塞。为防同类事件发生，将孝静帝幽禁在含章殿。侯景兵败南窜，被西魏夺取的河南州郡也在武定七年六月前后相继收复，禅代步伐随之加快。七月，高澄、高洋等赴邺城，部署禅代事项。八月，当高澄与心腹商议于密室时，负责膳食的奴隶蘭京怀刃而入，刺杀了高澄。高洋乘机攫取了大权。

高洋平素锋芒内敛，城府极深，为防高澄猜忌，伪装木讷，一切唯高澄之命是听，那怕面对娇妻，亦能整日不语，因此素为勋贵们轻视。高澄被杀，内外震惊，高洋镇定自若，部署分明，秘不发丧，留高岳、封隆之等在邺城，带领甲士8000陛辞，实质是耀武扬威。孝静帝本来幻想高澄死后，将权归朝廷，此时大惊失色，哀叹：朕不知死在何日。高洋赶回晋阳，抓住兵权，召集旧臣宿将商议禅代。个别大臣怕西魏抓住口实，兴兵东向。光禄大夫徐子才指出：西魏宇文泰早想如此行事，无非是随我称帝而已。计议一决，次年初，孝静帝便被迫签署了禅位诏书。高洋登基，改国号为齐，都邺，建元天保，史称北齐。高洋即齐文宣帝。

高洋登位之初，留心政事，整顿吏治，以法驭下，不避勋贵，政治颇有起色。又修缮甲兵，简练士卒，用兵打仗，颇有法度。每战必亲当矢石，临危不惧，唯恐前敌不多，曾先后击败北边的库莫奚和突厥等，威震华夏。但六七年后本性大变，喜怒无常，荒淫暴虐，近若疯狂，且嗜酒成疾，内外皆知其"颠颠痴痴"。不过却能委政颇有政治头脑的杨愔，时人评述是"主昏于上，政清于下"。天保十年，高洋病死，年仅15的儿子高殷继位，遗诏常山王高演、杨愔等辅政。高洋晚年，其生母娄太后便欲立高演为帝。所以高洋估计高演必将夺位，临终前对高演说：夺则任汝，慎勿杀也。果然，高殷继位不及一年，高演便在娄太后和六镇鲜卑勋贵的支持下杀死杨愔等人，废杀了高殷，夺取了帝位，是为齐孝昭帝。高演聪明有识度，精于吏术，谋而能断，登位之初，颇似有为之君。但在位不及二年便死了，其弟长广王高湛夺取了帝位，是为北齐武成帝。

东魏北齐统治期间，有三大问题始终相当突出。一是胡汉矛盾。自高欢起，主要仰仗六镇鲜卑勋贵，轻视汉族豪贵，更视汉族人民如草芥，汉族地主想求官，非学鲜卑语不可。胡汉贵族间的权势之争相当激烈。娄太后之支持高演夺位，相当重要的一条原因是高殷生母系赵郡李氏，是汉人。二是刑政苛暴，无官不贪，贪污勒索，弥漫整个官场，吏治腐败已极。高澄、高洋的整顿，无非是使此风稍有收敛而已。三是地方豪霸横行，土地兼并激烈，加上赋役苛重，百姓难以为生。因此东魏北齐虽都实行均田制，但都难以贯彻。高湛在位时，这三个问题越发不可收拾，统治集团的内部矛盾也更趋剧烈，杀戮迭起，北齐江河日下，亡国之期已屈指可数了。　　(蒋福亚)

宇文护专权

西魏恭帝三年(556)十二月，宇文护逼恭帝禅代，次年正月，拥宇文觉登基，建立北周，前后控制朝权达16年之久。

宇文泰11子，长子宇文毓是庶出，娶柱国大将军独孤信之女为妻。西魏恭帝三年，宇文泰召集亲信，商议立嗣。独孤信倾向宇文毓，宇文泰志在立嫡。彼此意见不合，直至另一柱国大将军李远抽刀逼迫，独孤信始同意立年方15的宇文觉为嗣子。该年十月，宇文泰北巡，突然病发，来势凶猛，死于云阳宫(陕西淳化西北)。临终前遗命其长兄之子宇文护辅佐宇文觉治理国政。时，辈行、功业及名位与宇文泰相差无几者大有人在，其中有些人想夺取丞相权位。宇文护名位素低，难服众望，一时间人心骚动。宇文

护深知名位不定，众心难安，只有乘勋贵们尚未集结起来以前，利用宇文泰的余威，改朝换代，才能以宗室重臣之名秉理国政。为此，宇文护依靠于谨等人，草草了结宇文泰丧事，在十二月便逼迫恭帝禅代。次年正月，宇文觉登天王位，史称孝闵帝。封宇文护为大冢宰(丞相)。北周王朝正式建立。但是不到两个月，就发生了柱国大将军赵贵和独孤信密谋的政变。此事才解决，孝闵帝又在执掌财权的李直和执掌机要的孙恒等人的支持下，召集武士练习擒拿格斗，意在夺回大权。宇文护先发制人，出李直为梁州刺史，孙恒为潼州刺史，严厉警告了孝闵帝。孝闵帝仍不罢休，想借宴会之名擒杀宇文护。事泄，宇文护废孝闵帝，立宇文毓为天王。两年后，即公元559年，宇文毓改称皇帝，史称周明帝，才正式建年号为武成。宇文护名义上归政明帝，实际是牢抓大权不放。明帝聪明好学，博览群书，注意笼络宗室及勋贵。宇文护隐隐感到了威胁，在武成二年毒死了明帝。明帝临终前，考虑诸弟中只有三弟宇文邕深沉机谋，能决大事，乃遗诏宇文邕继位。这就是历史上著名的周武帝。不过武帝初年，大权仍为宇文护操纵。

宇文护虽然心狠手毒，迷恋权势，却颇有政治眼光，精于权术，稳定了北周初年的政局。执政期间，减轻赋役，擢升大批有功将领为柱国大将军，笼络了大批军将。由于柱国大将军及大将军的骤然增多，官号和实际领兵权渐趋分离，有利于中央集权，客观上为周武帝的改革奠定了一些基础。

周武帝精明干练，岂容大权旁落。不过其城府极深，锋芒内敛，纹丝不露。平素十分尊敬宇文护，军政之事，不分巨细，任由宇文护裁决。在宇文护及其母亲面前，总是执家人礼，丝毫没有皇帝的架子。逢年过节，必然率领群臣至丞相府祝贺宇文护及其母亲健康长寿。在太后面前，宇文护可以坐而论事，周武帝则侧立侍候，毫无倦意。这一切都是为了寻找最佳时机，给宇文护以致命的一击。

当时，突厥已崛兴于北边，成为北周和北齐都欲力争的与国。保定四年(564)，突厥遣使，邀北周合击北齐。宇文护短于军阵，本心不愿出兵，又怕北齐乘机联合突厥共攻北周，被迫兴兵20万包围洛阳。结果损兵折将，威望大受影响。宇文护吸取了教训，此后决不轻易发动战争，而且牢抓军权不放，军队调动，非其手书不可，平日警卫也远多于宫室。因此，周武帝一时间竟无隙可乘。但宇文护凭恃大权在握，广营宅第，好酒嗜声妓，排斥异己。其几个儿子又狐假虎威，专权弄势，引进小人，蠹政害民，贪污勒索，直闹得户口日减，道路以目，众叛亲离。天和七年(572)三月，周武帝借口太后好酒，自己屡谏无效，挑出《尚书》中的《酒诰》，请宇文护朗读给太后听，进一步规谏。宇文护信以为真，就在其朗朗诵读之际，周武帝突然在背后用重物猛击其头部，埋伏下的卫士乘机冲出，斩杀了宇文护。随即宣示群臣，尽诛其党羽。由于这是瓜熟蒂落，因此朝野晏然。周武帝终于在30岁时夺回了大权。　　(蒋福亚)

陈霸先建陈

永定元年(557)，陈霸先在建康称帝，建立陈朝的历史事件。

陈霸先(503—559)，字兴国，原籍颍川，其先祖在永嘉之乱时南渡，土断后著籍吴兴长城(浙江吴兴)。陈霸先出身寒微，富谋略，曾数为小吏，后随梁新喻侯萧映至广州，因镇压交州农民起义有功，积官西江督护、高要(今属广东)太守。侯景之乱时，陈霸先乘时而起，攻杀勾结侯景的广州刺史元景仲，厚结始兴(郡治今广东韶关)豪右侯安都，遣使江陵请命，被湘东王萧绎拜为明威将军，起兵讨伐侯景。陈霸先出大庾岭，沿赣江而下，得到沿途人民的支持，发展成拥有甲士30000，强弩5000张、舟舰2000艘，军粮50万石的一大势力。恰值王僧辩奉命统军东下，与侯景叛军相持于巴丘(湖南岳阳)，粮草匮乏。陈霸先支援王僧辩军粮30万石。王僧辩军大振，击败叛军。两人会合后，连师而进，克建康，灭侯景，陈霸先均屡立大功。故梁元帝即位后，拜陈霸先司空、扬州刺史，镇京口(江苏镇江)。承圣三年(554)末，西魏攻破江陵，俘杀梁元帝，王僧辩和陈霸先在建康拥立元帝第九子、年仅13岁的晋安王萧方智为梁王。此时，梁朝衰弱已极，西起江陵以下(其间湘、郢等地又被王琳占有)，北以长江为界，岭南又为萧勃割据，统治地盘不过千里，著籍人户不过30000。北齐虽然无力荡平梁朝，却想乘机染指南方，乃立寒山之战中的战俘萧渊明(梁武帝之侄)为梁王，胁迫王僧辩接受，否则将诸道渡江。王僧辩迫于压力，在承圣四年五月立萧渊明为帝，以萧方智为太子。陈霸先屡屡反对，毫无作用，才密谋起兵，翦除王僧辩。九月，陈霸先命其侄陈蒨回长城，立栅防备王僧辩的女婿吴兴(治今浙江吴兴)太守杜龛，亲统侯安都、周文育等潜进建康。王僧辩自和陈霸先会师后，对其十分倚重信赖，双方情笃，结为姻亲，故对陈霸先略无猜疑，丝毫未加防范。及至侯安都翻墙而入，冲进其卧室，方始发觉，力屈被杀。十月，陈霸先立萧方智为帝(梁敬帝)，改元绍

泰，独揽大权。

王僧辩虽死，其残余势力却甚大。杜龛首先在吴兴起兵，攻打长城，被陈蒨挡住。接着王僧辩之弟王僧智起兵吴郡(治今江苏苏州)，兵败后逃窜杜龛处。谯(州治今安徽滁县)、秦(州治今江苏六合)二州刺史徐嗣徽(其从弟徐嗣先为王僧辩外甥)又举州投降北齐，乞求援助，并联合南豫州刺史任约，借陈霸先东讨杜龛之机，合兵5000进袭建康，攻占了石头城(建康西城)。北齐援兵及粮草源源而来，建康告急。陈霸先被迫留周文育协助陈蒨讨伐杜龛，亲统主力回师建康。在韦载的建议下，陈霸先分兵截断北齐粮道，扼守建康险要，一举打败徐嗣徽等。绍泰二年正月，陈蒨和周文育讨平杜龛，王僧智奔齐。陈蒨兵进岭南。

北齐目的未达，于心不甘。这年三月，命大将萧轨会合徐嗣徽及任约，总兵10万，渡江而进。一路攻城略地，在六月屯驻玄武湖西北，威逼台城(宫城)。陈霸先驻军北郊坛，与萧轨对垒，形势万分危急。时值连日大雨，平地水深丈余，齐军昼夜坐立泥水中，足趾皆烂，悬鬲而炊，苦不堪言，士气低沉。梁军地势稍高，易于排水，可以轮番休息，却因四方阻隔，粮运不济，士卒饥疲，也无力进攻。建康经侯景之乱，破坏无遗，百姓大都无隔夜之储，虽然竭尽全力支持梁军，士卒们也不过是以麦屑煮汤喝。就在双方对峙不下之时，陈蒨送来了3000斛米，千头鸭，军民为之一振。陈霸先抓住时机，命令连夜炊米煮鸭。家家以荷叶包饭，中夹鸭肉劳军。士卒们薄晨饱餐，天明奋勇攻击，一举俘斩徐嗣徽等。乘胜追击，又俘虏萧轨等北齐将帅46人，齐军大溃。是役，王僧辩残余势力全部被歼，北齐兵士窜回江北者仅十之二三，缴获军资器械不可胜计。陈霸先将战俘赏赐给有功将士为奴，一时间，奴婢价格暴跌。军士以战俘换酒喝，一个战俘才换得一顿醉饱。在此之前，周文育也讨平了萧勃。至此，无论功业和威望，朝中已无一人可与陈霸先抗衡，陈霸先乃由陈公而陈王，在这年十月代梁为帝，改国号曰陈，都建康，建元永定。陈霸先即陈武帝。梁亡，历四帝，首尾55年。　（戴　冠）

陈初平难

陈朝初年翦除敌对和割据势力的战争。

永定三年(559)，陈武帝死。武帝本有一子，叫陈昌，江陵陷落时，被西魏虏往长安，故遗诏其兄子始兴王陈道谭之子陈蒨(530—566)继位，是为陈文帝。文帝少经艰难，颇知民间疾苦，参与陈霸先的创业活动，显示了军政才能。即位后勤于治政，倡导节俭，明于断事，获有“下不容奸，人知自励”的美誉。是一个企图有所作为的皇帝。他即位之初，面临的形势十分严峻：一、臣属北齐的王琳据有长江中游，兴兵南下，威胁建康。二、地方割据势力时刻作祟。故其号令所及，不过千里，加上社会经济残破，可谓举步维艰。

王琳，会稽山阴(浙江绍兴)人，出身卑微，因其姐妹是湘东王萧绎的嬖宠，才得为将帅。不过此人好武有勇力，富于心计，善抚士卒，谨慎刑罚，倾身下士，平素又不贪财，所得赏赐全数分给属下，所以极得士卒之心。在平定侯景之乱中屡立大功，官至湘州(治今湖南长沙)刺史。其部万人，大都是江、淮间亡命之徒，凶暴异常，所过军纪荡然，但对王琳却忠心不二，甘效死命。梁元帝怕其桀骜难驯，曾一度囚禁，剥夺其兵权。其部抗命不从，王僧辩统军讨伐，一时也难翦除。加上萧纪兵进江陵，梁元帝为免两面用兵，又放回了王琳。承圣三年(554)初，梁元帝还是借故转王琳为广州刺史。为时不久，西魏兵围江陵，梁元帝只好又召王琳入卫。王琳兵次长沙，梁元帝已被西魏俘杀，于是停驻湘州，被推为上流盟主，既称梁臣，又先后奉表北齐和西魏，甘当藩臣，大治舟舰、图谋和陈霸先争权。太平二年(557)初，陈霸先征其入朝为司空，遭拒绝，即命侯安都和周文育统舟师20000讨伐。不久，陈霸先代梁称帝，上流一些持观望态度的势力倒向王琳。加上侯、周二人互不统属，部下争功，矛盾重重。沌口(湖北汉阳东南，沌水入江口)一战，侯周二人及其主要将领均为王琳俘获(后逃归)，几乎全军覆没。王琳乘胜占有郢州(治今湖北武汉武昌)，扩地江州(治今江西九江)。其时，王琳虽然号称带甲10万，但因据有北江州(治今安徽繁昌西北)的鲁悉达对其颇具威胁，一时不敢大举东下。次年三月，王琳送其兄子王叔宝及所部十州刺史子弟为北齐人质，按北齐要求，册立年仅7岁的萧庄(北齐俘虏，梁元帝之孙)为帝，终于求得北齐援兵，打败了鲁悉达，大举东下，兵次濡须口(安徽和县裕溪口)。不久，武帝死，文帝继位。王琳乘机挥军推进。北齐大将慕容俨也统兵临江，威逼建康，为王琳声援。文帝命侯慎统侯安都等阻击，与王琳相持于大雷(安徽望江)百余日。天嘉元年(560)二月虎槛(安徽芜湖西南)一战，王琳稍挫，退保西岸。当夜，风暴大起，王琳舟舰大都损坏，被迫采取守势。王琳倾巢出动前，曾称藩于北周傀儡后梁，求取后梁主的支持。此时后梁却突然变卦，联合北周兵围郢州。王琳后方受制，军心大乱，侯慎乘机进攻，终于获胜。王琳

兵败后窜逃北齐。陈军进攻上流，截断北周粮道，周军狼狈后撤。陈军次第收复了江、郢等地。大体恢复了梁元帝时的疆域。

南朝后期，士族地主日趋衰落，地方豪强乘机崛起。侯景之乱，梁朝的统治分崩离析，各地豪强凭借坞堡及徒众，恣意劫掠，鱼肉良善，壮大实力。陈初，为了对付北齐、北周和王琳，对这些势力无暇过问，只是千方百计笼络，给予高官厚禄。这些地方豪强，有的成了陈朝的开国功臣，有的虽然受命为刺史太守，实质是拥兵自重，桀骜不驯，成为半独立的割据势力，在几种大势力中投机取巧。宜新、豫章二郡太守、豫章南昌(今属江西)人熊昙朗，江州刺史、临川南城(江西南城西南)人周迪，缙州刺史兼领东阳太守、东阳长山(浙江金华)人留异，闽州刺史、晋安侯官(福建福州)人陈宝应等，就属后一种类型。永定三年，周文育奉命统周迪、吴明彻等讨伐王琳部盘据湓城(江西九江)的余孝励等。周迪失利，周文育退据金口(江西建新西南)，拟拨熊昙朗支援周迪。熊昙朗伪许，乘机袭杀周文育，兼并其部，兵进临川(治今江西南城西南)。幸赖太守周敷早已严阵以待，纵兵迎击，昙朗兵败，退据新淦(江西清江东北)。在王琳兵败逃逸后，熊昙朗因士卒离散，只身奔窜，为村民所杀。周迪乘机收编，扩张实力。

解决王琳和熊昙朗后，翦除周迪、留异、陈宝应等也就提上了日程。在这三人中，留异最嚣张，曾潜结王琳，始终脚踩两只船，公然袭败代其为缙州刺史的左卫将军沈恪，当然就成了首当其冲的人物。留异也深知文帝必会对其动手，特意嫁女给陈宝应为妻，联合周迪，与朝廷对抗。天嘉二年十二月，文帝命侯安都讨伐留异；不久又征周迪、陈宝应等入朝，进行分化瓦解。周、陈二人拒绝，文帝又命吴明彻讨伐周迪。次年三月，留异兵败，统余部投奔了陈宝应。天嘉四年初，周迪兵败，也投奔了陈宝应。这样，解决陈宝应就成为消灭江南豪霸的关键。经多年征战，天嘉五年末，陈军终于次第攻破建安(福建建瓯东南)、晋安(福建泉州西北)等地，留异、陈宝应伏诛。周迪漏网，在次年七月被诱杀。至此，陈朝的统治终于稳定下来了。

(戴 冠)

陈 顼 夺 位

太建元年(569)，陈顼夺取帝位的政变。

陈顼，陈文帝之弟。西魏攻陷江陵，被俘虏至长安。周、陈通好后，在天嘉三年(562)才回到建康，封安成王，任扬州刺史，迁司空、尚书令等，权位日重。天康元年(566)，文帝病危，因其子陈伯宗懦弱无能，担忧陈顼在其死后夺位，突然对陈顼说：朕将命汝入继大位。陈顼明白文帝此语是刺探其心迹，急忙跪拜，涕泣坚辞。入侍医药的五兵尚书孔奂又力白陈顼决无此意。文帝这才放心，遗诏陈顼、到仲举、刘师知等辅佐陈伯宗继位。文帝一死，陈顼便入居尚书省，控制了大权。刘师知等不满，在光大元年(567)联合尚书左丞王暹等，由东宫通事舍人殷不佞出面，矫诏命陈顼还居东府(建康东城的丞相府)，管理州务(扬州)。实质是要将陈顼逐出权力中心。记室毛喜立即对陈顼指出，一旦外出，将受制于人，届时必然和曹爽一样，想做富家翁也不可能。领军将军吴明彻则断言，此决非当今皇帝的主意，应该拒绝。陈顼乃遣毛喜入宫告知太后，太后说：伯宗幼弱，政事并委二郎。此诏并非我意。陈伯宗也说：此诏系刘师知等所为，朕毫不知情。陈顼乃杀刘师知、王暹，免殷不佞官，贬到仲举。到仲举于心不甘，和右卫将军韩子高等密议举事。谋泄，均被杀。湘州(治今湖南长沙)刺史华皎与韩子高交好，闻讯后寝食难安，用求转广州刺史来探察朝廷心意。陈顼伪许。华皎乃缮甲集兵，在这年五月叛乱，并遣使北周呼救。北周即命宇文直统兵30000，会合后梁兵马20000驰救。陈顼命吴明彻统舟师20000先行，淳于量统舟师50000继发，又调集江州、郢州等地兵马，由徐度统一节度，进行镇压。沌口(湖北汉阳东南，沌水入江口)一战，陈军大胜，宇文直等退避江陵，华皎单舸逃逸，不久被捕获，与其党徒40余人一并伏诛。陈顼进位太傅，加殊礼。借口陈伯宗之弟始兴王陈伯茂与刘师知、华皎通谋而剥夺其权力。二年十一月，陈顼又逼令太后废陈伯宗为临海王；贼杀陈伯茂。次年正月，陈顼即位，改元太建。陈顼即陈宣帝。

宣帝是陈朝在位最久的皇帝(自569年至582年)。太建五年曾命大将吴明彻北伐，其时北齐已十分腐朽衰败，故一举攻克淮南。但太建九年，北周兴兵南下，吴明彻几乎全军覆没，淮南为北周夺取。宣帝的才智既远不如武帝陈霸先，治政才能又差于其兄陈文帝，殆至晚年，陈朝已奄奄待毙了。

(戴 冠)

周武帝改革

天和七年(572)周武帝亲政后富国强兵的措施。

周武帝宇文邕(543—578)，字祢罗突，是个有作为的皇帝。亲政后励精图治，为实现其击灭北齐、一统全国的理想，由富国强兵入手，进行了一系列的改

革：一、建德三年(574)诏改府兵名称为“侍官”，意为侍卫天子的武士，实质是由皇帝直接控制军队。在此基础上，逐步确立兵将分离、命将配兵的原则，强化皇权。同时又大量征召六等户以上均田农民入伍，加强训练，提高作战能力。二、数次下诏选拔人才，不惜屈尊降贵，登门拜访，尤其重视将领的选拔，擢用了一批优秀后进。三、轻徭薄赋，强调为政之要在于安民息役；诏令各地除正常赋役外，不得妄加征发；多次蠲免逋租宿债。同时，兴修水利，责令刺史牧守都得亲自劝课农桑。四、鼓励婚配，增殖人口。规定全国军民，在生育年龄内都得婚配，鳏夫寡妇，亦无例外。五、五次下诏放免奴婢。其中以建德六年十一月那次规模最大，诏令规定自北魏分裂以来，直至去年十月以前，凡境内抄略为奴婢者，一律放免为民，若主人仍有需要，可放免为部曲客女。此令洗涤了奴隶制残余，有利于封建隶属关系的发展。该年，又下诏放免杂户，废除因犯罪配没为杂户的律令。六、倡导节俭。周武帝以身作则，穿布衣，盖布被，宫殿陈设相当朴素，凡华丽无实用者一律撤除，禁止衣锦文绣，雕梁画栋。其后宫嫔御也不过十余人。在周武帝的改革中，影响最大的是废除佛教。

魏太武帝死后，封建政府又大力提倡佛教。北魏后期，僧尼数急增到200余万。周、齐对峙时，高达300余万，占北方总人口的十分之一左右。寺院占有大量土地，拥有许多名为佛图户、僧祇户和寺户等的依附农民及奴婢。寺院地主成为地主阶级的重要组成部分。寺院不仅享有免除赋役的特权，内部还形成了等级森严的教阶体系及戒律，僧尼除杀人才受国法惩处外，其余一切均由寺院自行了断。这非但危及封建政府的财政收入，亦是淆乱政令、促使阶级矛盾激化的渊薮。宇文泰和宇文护都信佛佞佛。在父兄的影响下，周武帝也信佛。但面临周、齐、陈三国对峙、兵源紧缺、财政拮据、阶级矛盾激化的严峻形势，周武帝不得不采取措施，先后四次召集百官及僧道议论此事。在宇文护的阻挠下，毫无成果。建德二年，周武帝召集了第五次会议，讨论儒佛道三教的地位，确定儒学居首，道教为二，佛教殿后。次序的排定压抑了佛教的气焰，为废除佛教奠定了基础。建德三年，为了“求兵于僧众之间，取地于塔庙之下”，周武帝颁诏废佛，没收寺院财产，焚烧佛道经典，僧尼一律还俗。当时有位僧侣用阿鼻地狱威胁周武帝。周武帝决绝地回答：“但令百姓得乐，朕亦不辞地狱之苦！”废佛后，铜佛像熔铸为钱，以充国用，寺院田地分给僧侣或均田农民耕种，房舍充作官用，或安置无家可归的还俗僧尼。由于经济原因是这次废佛的主要因素，因此没有从肉体上去消灭僧侣，对于佛教思想，周武帝也没有断然禁绝。僧尼还俗后仍迷恋佛教，只要不触犯宪律，并不深究。许多僧侣中的才识之士，还被起用为官。较为缓和的措施和对还俗僧尼的安排，保障了诏令的贯彻。

周武帝的上述措施不仅为统一北方创造了条件，也为日后隋文帝的统一中国奠定了一些基础。

（蒋福亚）

北周统一北方

建德六年(577)，周武帝击灭北齐、统一北方的战争。

自东魏起，各级官吏就贪污成风，北齐时更不堪收拾，公开卖官鬻爵，牧守令长可卖，主簿、功曹等僚属也可卖。买官者大都是富商大贾，一到任所，便变本加厉搜刮，逼得民不聊生。东魏北齐都实行过均田制，但在繁重的赋税徭役的剥削和腐朽的统治下，地主豪强和达官贵人乘机兼并，结果是富有连畛亘陌，贫无立锥之地，户口租调，十亡六七，一遇灾害，便僵尸满道，农民起义此起彼伏。高欢及其后继者都没有处理好胡汉间的关系，胡汉贵族数度激烈斗争，杀戮甚多。统治集团间的矛盾愈演愈烈，政变迭有发生。天统元年(565，北周保定五年)，齐后主高纬继位。这是一个性格内向，懦弱无能，荒淫残暴，成天迷恋犬马声色、斗鸡走狗的无道昏君。平日怕见大臣，不愿商谈军国大事，却自以为算无遗策。作无愁之曲，手抱琵琶自弹自唱，称作“无愁天子”。遇有天灾，饿殍载道，唯一的措置是让僧侣设斋念佛。齐后主盛兴宫室寺院，穷极工巧，督迫夫役昼夜施工，不论寒暑。死者不可胜数。宠信佞人乱政害人，结果是官以财进，狱以贿成。封赏之滥，史所罕见，异姓王以百计，甚至平日喜爱的犬马鹰鸡都有郡君、开府、仪同之类的官爵，廪食府库。生活极尽奢侈靡丽，宝衣玉食的宫女多达五百余人，一条裙子价值万匹绢，一面镜子价值千金，互相攀比，朝置夕毁。

和北齐相反，周武帝励精图治，北周蒸蒸日上。周武帝早想用兵北齐，远交近攻，结好陈朝和突厥，唆使陈朝兵进淮南，刺探北齐实力。北齐一败涂地。由此断定北齐可灭。为收突然之效，建德四年（齐武平六年）三月，又遣使北齐，重币甘言求和，麻痹北齐君臣。该年六月，却集兵18万，五道并进，御驾亲征，攻克河阴（河南孟津东），围攻洛阳。河洛一带是东西魏对峙以来双方经常鏖战之地，北齐在此重兵云集，

防守甚严。双方相持20余天，周军无所收获，又值武帝有病，只有撤兵。谋士宇文弢、赵煚和鲍宏等人建议出其不意，兵进汾曲（山西临汾东），攻占平阳（山西临汾南）、上党，直扑晋阳（山西太原西南），拔其根本，再进围邺城（河北临漳西南）。武帝接受，在建德五年亲统步骑14万5千直插汾曲，分兵一半控扼平阳四周险要之处，截断增援平阳的通路，亲自指挥一半兵力猛攻平阳。鏖战数日，攻下了这座襟带河汾、翼蔽关洛的晋南重镇，俘获齐平阳守将及甲士8000余人，洞开了通向晋阳的大门。

周军出动时，齐后主正带着宠幸冯淑妃在天池（山西宁武西南管涔山）围猎。平阳告急文书一日三至，均被佞臣高阿那肱扣留。围猎尽兴，后主准备赶回晋阳，召集兵马。冯淑妃却又要求再杀一围。待到冯淑妃意兴阑珊，后主方回晋祠（山西太原南）征集10万精锐向平阳进发。在鸡栖原（山西霍县北）与周军前锋相遇。由于平阳攻坚战过于激烈，周军疲惫不堪，双方一个小接触后，武帝便统军退回长安休整，命梁士彦坚守平阳。齐军昼夜猛攻，城头楼堞皆被夷平。周军人人奋勇，士气越战越旺。齐军改变战术，挖掘地道，宽达十余步的城墙倒塌。齐军即将冲入城内，后主突然下令停止攻击，要冯淑妃来看看其攻拔坚城的丰功伟绩。冯淑妃着意妆扮后来到城下，周军已抓住转瞬即逝的时机堵住了缺口。据传，平阳西城石头上有圣人遗迹，冯淑妃要一饱眼福，后主立刻抽取全部攻城器械，搭起天桥一座，摆出全副仪仗，带领大批随从，和冯淑妃登桥遥望。桥被压塌，攻城器具毁损殆尽。鏖战一月有余，平阳屹立如故，齐军伤亡三分之一，士气一落千丈。此时武帝已统80000人马赶来，逼城而阵。齐师被迫深挖长壕自守。双方隔壕对峙。武帝选择决战城南，临战前夕，巡视诸营。其记忆力过人，见人一面，永志不忘，直呼将士姓名，谆谆慰劳鼓励。见士卒光脚，立即脱下靴子赐给。将士们感奋莫名，士气高昂已极。如何越过长壕，武帝百思不得其策。自晨及傍晚，周军峙立壕边，渐见懈怠。后主怯意渐萌，准备后退。佞臣们却鼓动说：彼亦是天子，我亦是天子，彼尚能远来，我为何守堑自弱！后主兴起，下令填平壕沟，挥军进攻。武帝抓住战机，立刻迎战。齐军东翼稍许后却，冯淑妃便惊呼败了。佞臣穆提婆拉着后主就逃。大将奚长及张常山力呈战场进退乃兵家常事，决非战败，提醒后主，此时一退，后果不堪设想。穆提婆指责奚长等欺君，唆使后主先退高梁桥（山西临汾东北）。皇帝旌旗一动，齐师军心瓦解，全线溃不成军，损折万余人马。军资甲仗，损失殆尽，委积如山。经此一战，北齐精锐成了惊弓之鸟。

齐后主逃到晋阳，觉得不安全，计划逃往突厥。晋阳留守安德王高延宗乞求后主留在晋阳共破周军，后主竟在夜间斩关夺门，逃奔邺城而去，随从官员大都逃散，穆提婆投降了周军。晋阳将士气愤已极，共推高延宗为帝。此时，周军已兵临城下。周武帝连夜挥军攻城，身先士卒，冲进城内。由于路径不熟，被齐军分割围歼，周武帝单骑逃归。城中谣传武帝已死。高延宗设宴庆贺，人人酩酊大醉。凌晨，武帝整军再来，晋阳将士还在醉乡，全都成了俘虏。后主逃到邺城，诏令重赏募兵，却又分文不给。大将斛律孝卿请后主劳军，教一套言词，求其按照哀兵必胜的道理，务必哀感众军。岂料军队集结方毕，后主早将刚学会的言词忘得干干净净，只会仰天大笑。将士们愤慨已极，纷纷指责：皇帝尚且如此，我辈为何要着急！次年正月初，周武帝轻易越过太行天险，兵临邺城。后主已先一日逃向陈朝，途中被周军追获。北齐亡，历七主，首尾28年。

北齐灭亡，陈宣帝企图坐收渔利，命司空吴明彻督诸军北上，意欲掠取徐、兖等州。吴明彻筑堰清水（即泗水），引清水至徐州（今属江苏），环列舟舰，昼夜猛攻。周徐州总管梁士彦兵败后婴城死守。建德七年十一月，周武帝命大将王轨督诸军救徐州。王轨轻装捷进，在次年二月兵占清口（又名淮口，清水入淮处，今江苏淮阴西），以铁锁贯车轮，沉入水中，竖大木立栅，横截水流，断陈军船路，并欲水淹陈军。萧摩诃建议吴明彻乘其未成，分兵争夺，保住后路。吴明彻犹豫，迁延旬余，坐失良机。水路一断，吴明彻情知不妙，挥军后撤，企图借周军决水，洪水横溢之机退入淮河。军到清口，水势已衰，舟舰被木栅及车轮挡住，王轨乘势猛攻，30000余陈军几乎全军覆没，吴明彻被俘，仅萧摩诃统2000余部逃逸。这便是清口之战。周军乘胜推进，尽取淮南。陈朝已日暮途穷，奄奄待毙了。也就在这一年六月，周武帝病重而死，终年36岁。但其军政活动却为日后北方统一南方奠定了较为坚实的基础。　（蒋福亚）

隋

杨坚篡周建隋

北周大象二年(580)五月,周宣帝死,贵戚杨坚于次年(581)迫使新即位的周静帝退位,自立为帝,改国号为隋,是为隋文帝。

杨坚(541—604),弘农郡华阴(陕西华阴)人。父杨忠,贵族,于西魏恭帝初年,赐姓"普六如",因功赐爵随国公,晋位柱国大将军。周武帝保定二年(562)官至大司空。杨坚(普六如坚)于武帝即位不久,任官随州刺史,晋位大将军。武帝天和三年(568)七月,杨忠死,袭爵随国公。武帝建德六年(577)北周灭北齐,因战功晋位柱国,为柱国大将军。其妻独孤氏是鲜卑贵族八柱国之一独孤信的女儿,独孤信的另一女儿是北周明帝宇文毓的皇后。杨坚长女杨丽华,为太子宇文赟妃。宣政元年(578)闰六月,武帝死,宇文赟即皇帝位,是为周宣帝,立杨丽华为皇后。七月,杨坚以皇后之父征拜上柱国、大司马。宣帝巡幸各地,委任杨坚居守长安,杨坚威望日隆。

宣帝素好酒色。为太子时,武帝宇文邕担心其不堪继承皇位,对其管教甚严,竟无效果。即位后,大逞其欲,常于后宫酗酒,公卿奏事,只能通过宦官进奏。宣帝好谀忌谏,诛杀王轨、宇文神举、宇文孝伯等忠贞之臣。臣下偶有小过,即加笞捶。北周政权日坏,杨坚开始萌发篡周之志。他私下对宇文庆(神举之弟)说:"天元(指宣帝)实无积德","视其相貌,寿亦不长"。而观其派出镇守地方之诸王,都很幼弱,可知他"无深根固本之计"。杨坚与"司兵事,多计略"的高颎,以及名望素重的李德林、苏威(534—621)等人关系密切,凡事都与他们商议然后实行。

大象二年(580)五月十一日,宣帝突得重病,而且失掉语言能力。平日围绕在宣帝周围的刘昉、郑译等,矫诏杨坚"居中侍疾"。当日,宣帝死,年仅22岁。刘、郑等人秘不发丧,矫诏杨坚"受顾命辅少主,总知内外兵马事"。守卫皇宫及京城的左右宫伯、左右羽林诸卫,并受其节度。

郑译、刘昉私议,欲授杨坚"冢宰",郑译任"大司马",刘昉任"小冢宰",三人共掌朝政。杨坚私问李德林:这样的安排如何?李答:"即宜做大丞相,假黄钺,都督内外诸军事。不尔,无以压众心。"杨坚采纳,任命郑译为丞相府长史;任刘昉为丞相府司马。自己总揽大权,随即逼迫彦之仪交出天子六玺和兵符。为防止在各地的诸王发动兵变,以赵王宇文招欲嫁女于突厥为词,征赵、陈、越、代、滕五王入朝。在做了各方面的部署后,于二十三日发丧。

早在大成元年(579)二月二十五日,周宣帝即传皇帝位于太子衍(后改名阐),改元大象,自称天元皇帝,所居称"天台"。宇文衍即位时年仅7岁,是为静帝,居处称正阳宫。发丧后,静帝从正阳宫入居天台,而正阳宫即为杨坚的丞相府。

杨坚因相州总管尉迟迥位望素重,恐其生变,矫诏进京会葬。同时任韦孝宽代其为相州总管。六月,尉迟迥于相州邺城(河南安阳)举兵反。不久,郧州(湖北安陆)总管司马消难、益州(四川成都)总管王谦率部响应。杨坚任韦孝宽为行军元帅,率关中兵讨伐尉迟迥。尉迟迥兵败自杀。在此前后,司马消难投降陈朝。王谦被斩。三方之乱平定后,杨坚加快了篡周的步伐。大象二年十二月五日,以周静帝名义下诏:"诸改姓者,宜悉复旧。"早在西魏恭帝元年

(554)，宇文泰将汉族军将一律改为鲜卑姓。如李弼为徒河弼；刘亮为侯莫陈亮，杨忠为普六如忠等，凡改99姓。这些军将所部士卒，也改从其姓。至此所有汉族将士一律恢复原姓。普六如坚，复姓名为杨坚。次年二月，在刘昉、郑译、高颎、苏威、韦孝宽等人策划下，杨坚迫使周静帝退位，自立为帝，改国号为隋，年号开皇，建都长安，是为中国历史上有名的隋文帝。杨坚袭爵"随国公"，其国号应为"随"。鉴于北周、北齐国祚短促，而"随"字中有"辶"部，认为很不吉利，因而将国号定为"隋"。

隋朝国祚虽仅有37年，然而隋朝结束了东汉末年以来近400年的分裂割据局面，实现了全国的统一。隋朝的各项典章制度，被唐朝继承和发展。隋朝在中国历史上有重要地位。　　（翁俊雄）

尉迟迥相州举兵

北周相州总管尉迟迥，为反对杨坚篡周于大象元年(579)六月在相州举兵反。举兵68天失败。

尉迟迥(？—579)，鲜卑族。其父俟兜娶周文帝宇文泰姊昌乐大长公主。尉迟迥娶宇文泰女金明公主，拜驸马都尉。北周闵帝元年(557)，尉迟迥因功进位柱国大将军。又因平蜀有功，晋位蜀国公。宣帝即位，以尉迟迥为大前疑，任相州(治邺城，今河南安阳)总管。

宣帝死，杨坚辅政。因尉迟迥为杨坚的父辈，位望素重，恐其生变，以静帝名义召之会葬。同时任韦孝宽代为相州总管。尉迟迥见杨坚篡周意图暴露，于大象元年六月，在邺城城楼之上向文武士庶宣言：杨坚篡权的野心已经暴露无遗，而先帝任命我为相州总管就是为了今天。因而举兵反抗。当时尉迟迥管辖相、卫、黎、洺、贝、赵、冀、瀛、沧等11州。而迥侄尉迟勤时任青州(治今山东益都)总管，辖青、胶、光、莒等州，起兵响应。尉迟迥拥"众数十万"。此后，荥州刺史宇文胄、申州刺史李惠、东楚州刺史费也利进、东潼州刺史曹孝达，也各以其州响应。一时之间，潼关以东北齐旧境今河北、山东、淮北广大地区在尉迟迥号令之下，纷纷叛乱，造成对杨坚的严重威胁。接着郧州(湖北安陆)总管司马消难也以其所辖郧、随、温、应、土、顺、沔、儇、岳等九州及鲁山等八镇，响应尉迟迥。而益州(四川成都)总管王谦也举兵于巴、蜀。

大象二年六月十日，杨坚发关中兵，以韦孝宽为行军元帅，梁士彦、元谐、宇文忻、宇文述、崔弘度、杨素、李询等为行军总管，讨伐尉迟迥。同时派杨尚希率3000士卒镇守潼关。七月三十日，韦孝宽军至永桥城，诸将建议攻城。孝宽认为，城虽小但防守却坚固，如攻不破有损我军兵威，应着眼于"破其大军"。于是引军于河内郡武陟(河南武陟)。尉迟迥遣子尉迟惇率10万士卒据武德(河南沁阳)，陈军沁水东岸。韦孝宽所率诸军，在沁水西岸，由于敌军甚盛，而且沁水无桥，不可渡，因而隔水相持。杨坚又遣高颎驰驿前往督战。高颎至，下令在沁水上架桥。敌军从上游纵火栰烧桥。高颎预先在沁水中积土，"前锐后广，前高后卑"，形状如"坐狗"，因名"土狗"，以阻挡火栰，使其不能流至桥边。尉迟惇在河岸布阵20余里，为了在韦军过桥时进行袭击，故意令兵阵稍往后移。韦孝宽却乘机鸣鼓，士卒急速过桥。士卒过桥后，高颎命焚桥，"以绝士卒反顾之心"。尉迟惇兵败，本人单骑逃走，孝宽乘胜追击至邺城城下的"西门豹祠"南。

尉迟迥与子惇及惇弟祐，率士卒13万于城南布阵。迥另率万人，全着锦袄、戴绿巾，号"黄龙兵"，作为中坚。迥弟尉迟勤率5万士卒自青州赴援，以3000骑先至。迥虽年迈，却富于战争经验，仍被甲临阵。所部关中兵，皆勇于作战。韦孝宽所率诸军，接战不利，稍退却。邺城士民观战者数万人。韦军行军总管宇文忻认为形势危急，"当以诡道破之"。乃先射观战者，观战者立即逃散，互相践踏，哭喊声有如雷霆。宇文忻命麾下大呼："贼败矣！"韦军士气大振，乘势追杀，迥军大败，迥逃进邺城。韦孝宽纵兵包围邺城，李询、贺娄子干率所部登城，邺城随即攻下。尉迟迥在城楼自杀身亡。尉迟迥举兵68天而败亡。

杨坚令韦孝宽焚烧邺城，将城内居民南迁45里至安阳城，以安阳城为安阳县，为相州之新理所。

郧州总管司马消难，在尉迟迥失败前夕，以郧、随等九州、八镇投降陈朝。

大象二年十月，杨坚派遣梁睿率步骑20万讨王谦。梁睿率大军自剑阁入蜀，王谦令达奚惎、乙弗虔守成都，自率精兵5万于城下迎敌。两军相接，睿军奋击，谦战败，将入城，惎、虔以城降。王谦不得进，率麾下30骑逃向蜀郡新都县。县令王宝将王谦拿获。十月二十六日梁睿斩王谦，剑南平。　　（翁俊雄）

隋文帝营建大兴城

隋朝建立后，隋文帝嫌长安狭小，而且地下水"皆咸卤"，决定于汉长安旧城东南20里龙首川处创建新都，名曰大兴城，即唐代京师长安。

北周以汉长安城为都城，杨坚建隋之初仍都长安。隋文帝嫌长安城"制度狭小"，而且从西汉末年

起，长安几经战乱，"凋残日久"，加以汉高祖建都长安以来业经800年，长安城地下水"皆咸卤"。西汉所建长安城作为国都已不适宜。隋文帝与苏威、高颎商议，决定迁都。开皇二年(582)六月二十四日诏左仆射高颎、将作大匠刘龙等于长安旧城东南20里龙首川处创建新都。太子左庶子宇文恺"有巧思"为"营新都副监"。十二月七日，隋文帝命名新都为大兴城。经过九个月大规模的营建，新都大兴城于开皇三年(583)三月建成。

大兴城分为三个部分：宫城居北，皇城居其南。宫城、皇城的东、西、南为外郭城。宫城为宫殿所在处，皇城为中央机构所在处，外郭城为百姓之居处。皇城东西五里余，南北三里余。城内南北七街，东西五街。南面三门，东西各二门。外郭城东西18里余，南北15里余，周围67里。皇城正南门为"朱雀门"。从朱雀门直至外郭城的南门(明德门)之间为朱雀大街。朱雀大街宽百步。宫城、皇城之东尽东郭，宫城、皇城之西尽西郭，各为三纵列，每列南北皆13坊(居民点)。皇城东、西两侧的坊列中分别置一市，东为东市，西为西市，市各占两坊之地。上述六纵列共有74坊和二市。皇城之南分四纵列，每纵列皆九坊，共36坊。坊的规模分两类。在宫城、皇城两侧者，广650步，纵400至450步。每坊皆开四门，中有十字街。皇城之南，纵各350步，广350步或450步。每坊只开东西二门，坊中有横街。横街两侧有曲巷。大兴城的规模在当时居世界之首位。 （翁俊雄）

隋代均田制度的实行

隋朝于开皇二年(582)颁布《田令》，继续实行北魏以来在中原地区实行的均田制度。不过，隋朝开皇二年所颁《田令》的内容，除了有一部分是继承前代的以外，还作了一些新的规定。《田令》规定：丁男受露田80亩，又每丁给桑田20亩为永业。老小、癃残当户者受丁男之半。妇人受露田40亩。奴婢依良人受田。这些条文均为继承北齐以及以前的规定。《田令》还规定："自诸王已下，至于都督，皆给永业田，各有差。""京官又给职分田，一品者给田五顷。每品以50亩为差。……至九品为一顷。外官亦各有职分田。"官员的永业田和职分田，则是前代所无。隋炀帝即位，废除了妇人及奴婢受田的规定，从此妇人及奴婢不再受田。隋朝实行均田制度有个过程。开皇二年至五年间，隋王朝主要是授给官员以永业田(开皇五年前王谊曰"百官者，历世勋贤，方蒙爵土"说明了这一点。而官员职分田实行情况，未见记载)。开皇五年(585)隋王朝主要解决了游民和浮客的土地问题。开皇五年高颎(？—607)建议实行"输籍之法"，即用征收轻税的政策，招诱"依强豪作佃家"的浮客，使之成为国家的编户。输籍之法实行的结果："浮客悉自归于编户，隋代之盛，实由于斯。"(唐德宗宰相杜佑语)如果隋王朝不能解决他们的土地问题，他们就不能摆脱豪强地主的控制。开皇十年(590)隋王朝主要解决了府兵卫士的土地问题。开皇九年春，隋朝以50万大军一举攻灭陈朝，实现了全国的统一。开皇十年隋文帝下诏："凡是军人，可悉属州县，垦田籍帐，一与民同"，实行寓兵于农、兵农合一的兵制。这期间，隋王朝主要解决了50万府兵卫士的"垦田"问题。开皇十二年(592)隋王朝主要是授给百姓土地。其年冬，隋文帝发使四出，均天下之田。在广大宽乡，百姓受田较多，而狭乡，"每丁才至20亩，老、小(当户者)又少焉"。虽然如此，如果考虑到这一时期，隋王朝民户总数已达六七百万户，接近隋唐时期全国民户的最高峰，那么，隋王朝实行均田制的效果就不能低估。 （翁俊雄）

突厥朝隋

蒙古草原上突厥族建立的突厥汗国臣服隋朝。

突厥统治者姓阿史那，起初居于辅水、剑水(原苏联叶尼塞河上游两支流)，过游牧狩猎生活，后迁居于金山(阿尔泰山)南麓。西魏废帝元年(552)阿史那土门建立突厥汗国，称伊利可汗。领地"东自辽海以西至西海(里海)万里，南自沙漠以北至北海(贝加尔湖)"。

隋开皇元年(581)十二月，佗钵大可汗死，摄图继为大可汗，称沙钵略可汗，居于都斤山(今蒙古人民共和国哈尔和林)。以其子庵罗为第二可汗，居独洛水(今土拉河)。以沙钵略可汗之从父玷厥为达头可汗，居草原西部原乌孙故地。以其弟处罗睺为莫何干可汗，居草原东部。以木杆可汗子大逻便为阿波可汗，居都斤山西北(西突厥)。

北周平齐时，因木杆可汗(佗钵可汗之兄)出兵支援，遂将宗室女千金公主嫁给他。隋代周，公主要求沙钵略为其报仇，沙钵略遂与原北齐营州(辽宁朝阳)刺史高宝宁合兵犯隋，隋文帝于边境修建长城以防范。命阴寿镇幽州(北京)、虞庆则镇并州(太原)，屯兵数万以防备。周平齐后，长孙晟曾送千金公主入突厥。由于他善射，木杆可汗为了子弟与贵族学习其射艺，留他在突厥一年有余。长孙晟乘机与他们游猎，以观察其山川形势及部众强弱。突厥进犯，长孙

晟对文帝说：沙钵略弟处罗睺（莫何干可汗）居草原东部，因得众心，为沙钵略忌恨，因而心中不安。而阿波可汗畏惧沙钵略，心也不安。对突厥应采取远交近攻，离强而合弱的战略。一方面要促使达头与阿波可汗联合，沙钵略必将兵集中在草原西部。另一方面促使处罗睺与草原东部的奚、霫、契丹等民族部落联合，沙钵略还需分兵于草原东部。这样，就造成“首尾猜疑，腹心离阻”的局面。十数年后，乘弱讨之，必可降伏他们。隋文帝采纳了这一主张，立即派人至草原西部会见达头可汗，赐给他“狼头纛”一面；在突厥使臣来隋时，故意将达头可汗使者排列在沙钵略可汗使者之上。并派长孙晟携带大量金宝，至草原东部奚、霫、契丹等部落，让他们带引至处罗睺牙帐，劝其附隋。

开皇二年五月，高宝宁与沙钵略合兵进犯，攻陷临渝镇（河北卢龙）。突厥发兵40万众入长城。文帝命上柱国李崇屯兵涿郡、兰州总管叱李长叉守临洮，皆为突厥所败。于是，突厥纵兵自木硖、石门两道进犯，大掠武威（甘肃武威）、天水（甘肃天水）、安定（甘肃泾川）、金城（甘肃兰州）、上郡（陕西黄陵）、弘化（陕西雷龙湾）、延安（陕西延安）各郡，将牲畜全部掠走。沙钵略可汗欲继续南下，达头可汗反对，自领兵而返。沙钵略可汗风闻铁勒等强部落欲反，只好领兵出塞。

突厥大举来犯，使隋文帝下了抗击决心。开皇三年四月下诏：过去，节省下财物，赐给突厥，以求边防平静。现在看来，不如将财物赐给战士，使民安于耕织。决心“清边制胜”。任命将领，分八路出兵长城。五月，秦州（甘肃天水）总管窦荣定率九总管、步骑3万人出凉州（甘肃武威），与阿波可汗相持于高越原。两军约定，双方只各派一壮士交战，以此决定胜负。隋军以史万岁出战，立斩突厥来将之首，突厥诸将大为吃惊，不敢出战。时长孙晟在窦荣定军中任偏将，派人对阿波可汗说：沙钵略可汗每次来战全获胜。阿波可汗刚出师，即失败，这是突厥的耻辱。沙钵略必借此事，来实现他对你的宿愿。建议他不如依附隋，并与达头联盟，这才是万全之计。阿波可汗即派使者随长孙晟入隋。沙钵略得知后，遂率兵破阿波之牙帐，并杀死阿波之母。阿波可汗回军，已无牙帐，辖地也被沙钵略占据，遂西奔达头可汗。在达头可汗的支援下，阿波屡败沙钵略，又收回其领地。开皇四年二月，达头可汗也依附于隋。此后，沙钵略可汗由于多次被隋军打败，乃请和。千金公主自请改姓杨，愿为隋文帝之女。隋文帝遣使封她为大义公主。沙钵略可汗致书隋文帝：大隋皇帝是我妇之父，也即我父。我为女婿，如同儿辈。自今以后，子子孙孙，乃至万世，双方亲好不绝。上天为证，终不违负。

开皇五年，突厥汗国分裂为东西两部。阿波可汗势力发展迅速，其领地，东起都斤山，西越金山（阿尔泰山），龟兹、铁勒、伊吾及西域诸国，全归附于他，号西突厥。七月，东突厥沙钵略可汗因经常遭达头可汗骚扰，又担心契丹来犯，向隋告急。请求准其率部至漠南，寄居隋之白道川（内蒙古呼和浩特以北），获隋文帝准许。隋文帝派晋王杨广以兵支援他袭击西突厥。沙钵略大喜，并遣其子库合真至隋，从此，朝贡不绝。开皇六年隋颁日历于突厥，东突厥奉隋正朔。

开皇七年，沙钵略可汗死，弟处罗睺继为莫何干可汗。在隋军支持下，莫何干可汗击败西突厥阿波可汗之众，生擒阿波。隋文帝免其死。八年十二月，莫何干可汗死，国人立雍虞闾号都蓝可汗。隋平陈后将陈后主屏风赐都蓝可汗，大义公主因北周被隋灭，复见陈国也被隋灭，心中感慨，因赋诗于屏风上。隋文帝得知后，嫌恶公主，派长孙晟至突厥，废大义公主。时公主与胡人安遂迦有私，事被发觉，都蓝可汗杀死大义公主。大义公主死后，都蓝与莫何干可汗子突利可汗，俱向隋请婚。开皇十七年隋文帝将宗室女安义公主嫁突利可汗。都蓝可汗不服，说：我是大可汗，反不如突利！于是不再向隋朝贡。十九年都蓝与达头可汗结盟，合兵掩袭突利，大战于长城之下，突利大败，都蓝杀尽突利之兄弟、子侄。此时长孙晟在突利牙帐，遂带领突利可汗入朝。隋文帝大喜。十九年十月，隋文帝封突利可汗为意利珍豆启民可汗（其意：意、智、健）。突厥男女万余口归附启民可汗，隋文帝命长孙晟于朔州（山西朔县）筑大利城，安置他们。时安义公主死，隋文帝派长孙晟送宗室女义成公主嫁给启民可汗。由于考虑都蓝可汗经常抄掠不能安居，长孙晟建议在夏、胜二州（内蒙古与陕北之间的“毛乌素沙漠”一带）之间，掘南北相距400里、东西至黄河的“横堑”（即东西向之长壕沟），使居住在其间的启民可汗所领部落，可以任意畜牧。十二月都蓝可汗被部下杀死，达头自以为步迦可汗，其国大乱。二十年四月，步迦可汗进犯长城。隋文帝命晋王杨广、杨素出灵武道（宁夏陶乐南）；汉王杨谅、史万岁出马邑道（山西朔县）迎击。长孙晟为秦州总管，投毒药于饮泉，突厥人畜饮之多死，遂逃走，长孙晟率士卒追击，斩首千余级。史万岁出长城至大斤山（内蒙古境内大青山），与步迦可汗相遇，步迦可汗素畏史万岁，率兵逃走，史万岁追出数百里，斩首数千级，引兵还长安。

步迦可汗又派弟子俟利伐东攻启民可汗，隋文帝又出兵协助防守要路，俟利伐只好退走沙碛。启民可汗上表隋文帝，表示感激之情。文帝派赵仲卿为启民可汗筑金城、定襄（内蒙古和林格尔）使居之。仁寿元年（601）、二年，步迦可汗屡被隋军击败。三年，步迦可汗投降启民可汗，启民可汗据有其部众。

炀帝大业三年（607）五月，炀帝征发河北十余郡丁男凿太行山至并州驰道。六月十一日炀帝至榆林郡（内蒙古托克托），以耀武扬威。计划从榆林郡、经定襄至涿郡（北京）。启民可汗奉诏召所部诸国奚、霫、室韦等酋长数十人至其牙帐。同时征发各族人，修了一条自榆林郡北、经其牙帐，东达涿郡的长3000里、宽百步的御道。启民可汗与义成公主来朝榆林行宫。七月炀帝命宇文恺在城东设可容数千人的大帐。炀帝于大帐宴启民可汗及其部落，并演出“散乐”。诸胡又惊又喜，争献牛羊驼马数千、万头。炀帝赐启民可汗帛20万匹。启民以下，都得到赏赐。又赐启民辂车、乘马、乐器、旗帜。宣布启民地位在诸侯王之上。炀帝又下诏，征发丁男百余万筑长城，西起榆林，东至紫河（山西朔县境内）。工程二旬而毕。八月炀帝出榆林，经云中（山西大同）继续向东。隋炀帝出行，有甲士50余万，马10万匹，旌旗辎重，千里不绝。炀帝令宇文恺等造“观风行殿”，可容数百人。行殿既可“离合为之上下”，由于“施轮轴”，还可“倏忽推移”。又作“行城”，周长2000步，用木板为干，以彩布为墙。胡人望见御营，十里之外即屈膝顿首。启民可汗在前面置庐帐，等候炀帝一行。炀帝至其庐帐，启民可汗跪在炀帝面前上酒祝寿。诸国酋长，莫敢仰视。炀帝心中大喜，赋诗曰：“呼韩顿颡至，屠耆接踵来。何如汉天子，空上单于台。”皇后也至义成公主帐。炀帝赐启民可汗、义成公主金瓮各一个，以及衣服、被褥、锦彩等。各国酋长以下，都得到赏赐。启民可汗送炀帝入城后归国，炀帝入楼烦关，经太原，还东都。

大业五年启民可汗死，子咄吉为始毕可汗。十一年八月炀帝北巡长城。由于始毕的宠臣史蜀胡悉被隋诱杀，始毕可汗从此不朝隋。十二日，炀帝入雁门（山西代县），十三日突厥围雁门。炀帝诏天下募兵，各地发兵前来解围。炀帝派间谍至突厥向义成公主求救。义成公主派人诈告始毕“北边有急”，九月十五日始毕才解围撤兵。十八日炀帝至太原，十月初三炀帝还东都。　　（翁俊雄）

“输籍之法”的实行

“输籍之法”是隋王朝在开皇五年（585）实行的与豪强地主争夺民户的重大措施。

从东汉末年起，军阀混战，继之各少数民族贵族进入中原，建立一个个割据政权，彼此攻战。为避乱防暴，黄河以北出现了大规模的人口流徙。一些豪强地主利用宗族关系，率族人至“深险平敞地居之”。在那里建“壁坞”，作为防御工事，在附近平敞土地上开垦荒地进行农业生产。贫穷的族人一面耕种，一面作战，成为豪强地主的佃客、部曲。他们没有独立的户籍，只附属在豪强地主的“家籍”之上，形成“百室合户，千丁共籍”的现象。因而，封建国家的户籍上的民户数量大为减少，影响国家的财政收入。与此同时，汉代的乡、亭、里的地方组织系统，也就被“宗主督护”系统所取代。北魏政权于太和十年（486）实行“三长制”（即五家为邻、五邻为里、五里为党，皆置“长”一人），主要目的是使被豪强地主荫庇的“浮客”成为国家的编民。然而，“三长制”虽然取得一些效果，但远未达到目的，豪强地主荫庇民户的现象仍较普遍。此外，社会上还存在许多隐漏户口的民户和人口，以及为逃避赋役而诈老、诈小的丁男。

隋开皇五年隋王朝在黄河以北进行“大索貌阅”，即将没有户籍的隐漏户口检括出来，登记在国家的户籍簿上。对诈老、诈小以逃避赋役的丁男，则通过“貌阅”检括出来。结果，检括出漏口164万余；检括出诈老、诈小的丁男44万余。然而，在“大索貌阅”中，原先规定“堂兄弟以下分居单独立户”的目标却未达到。因此，高颎（？—607，渤海蓨县（今河北景县）人）建议实行“输籍之法”。主要是公布“输籍定样”，即每个民户的成员限制为直系亲属，堂兄弟以下旁系亲属不得入籍。同时，将民户依劳动力、财产分为上、中、下三等。对人口少、财产少的民户征收轻税。每年正月五日，县令组织进行这一工作，将民户“三党、五党”（即三、五百家）组成一团，作为一个单位，“依样定户上下”。这种做法的目的是使百姓知道，作为户等低的国家编民所缴的赋税比作为佃客、部曲向豪强地主缴的收获一半以上的“地租”要轻得多，“输籍之法”效果显著。唐德宗的宰相杜佑曾说：“高颎的轻税之法，使得浮客成为国家编户。隋朝之繁盛，全在此举。”这句话虽然有些夸张，但是，“输籍之法”的实行，对隋朝户数增多、财政收入增加、国力强盛有重大意义。浮客最集中的北齐旧境，隋朝初年编民只有300余万户，经过“大索貌阅”和“输籍之

法”,到大业年间增至500万户左右。隋朝大业五年(609年)全国民户达到890余万户,接近东汉末年的数字。这是中国历史上经历了四个世纪编户大幅度下降之后的一次回升,是中国历史步入新的发展时期的一个显著的标志。　(翁俊雄)

隋灭陈统一全国

开皇九年(589)正月,隋军攻下建康,俘陈后主,灭陈,结束了东汉末年以来近400年的分裂状态,实现了全国的大统一,中国历史进入了新的阶段。

开皇元年九月,隋文帝第一次下令伐陈,命长孙览为东南道行军元帅,统率八总管出寿春(安徽寿县),水陆二路进军。又以元景山为行军元帅,率总管韩延、吕哲出汉口。此时正值陈宣帝死讯传来,隋监军高颎以“礼不伐丧”奏准,于开皇二年二月十五日班师。实际是因灭陈的时机尚不成熟。此后,隋文帝采取了一系列措施,为伐陈准备条件。在北齐旧境实行“大索貌阅”和“输籍之法”,使国家编户增至六七百万户。开皇七年派兵至江陵灭后梁(在侯景之乱中,南梁雍州刺史萧詧攻陷江陵,自立为帝,建立后梁)。开皇五年结好突厥沙钵略可汗,使其“贡献不绝”。

经过数年准备,伐陈条件成熟,文帝遂与臣下策划平陈之策。高颎建议经常派人入陈境纵火,焚烧其粮仓,不数年,其财力俱尽。崔仲方建议:在长江上游赶造战船,大造声势,造成自上游进攻的印象;而在下游,即自武昌以下至广陵(江苏扬州)布置精兵秘密做渡江攻陈的准备。于此同时,杨素在永安(四川奉节)造名为“五牙”的大型战舰数艘,每艘可容战士800人。另造可容战士百人的“黄龙”战舰、“舴舰”等无数。

开皇八年三月九日,隋文帝下诏揭露陈后主(叔宝)罪恶12条,声言讨伐。十月二十八日,设置淮南行台省于寿春(安徽寿县),以晋王杨广为行台尚书令,总掌灭陈事宜。命左仆射高颎为晋王元帅府长史。右仆射王韶为司马。军中事由二人裁决。命晋王杨广、秦王杨俊、清河公杨素(?—606,弘农华阴(今属陕西省)人)并为行军元帅。隋文帝对伐陈做了周密的部署:命杨广屯兵六合(江苏六合)。命杨俊出襄阳(湖北襄樊),向汉口进军。命杨素出永安,下三峡。命刘仁恩出江陵(湖北江陵),与杨素会合下三峡。命王世积出蕲春(湖北蕲春),自蕲口临江津。命韩擒虎(538—592,河南东垣(今河南新安东)人)出庐江(安徽庐江),自“横江渡”攻姑孰。命贺若弼(544—607,河南洛阳人)出广陵(江苏扬州境内),自瓜洲渡江攻京口。命燕荣出东海(江苏连云港),以青州之师出朐山渡海攻南沙。隋文帝这一周密部署是经过多年策划的产物。当时部署的兵力合计为90总管,将士51.8万人。战线从西起巴蜀、东至沧海,船舰绵亘数千里。

十二月,秦王杨俊率军屯驻汉口,为上流诸军节度。陈后主命周罗睺为都督巴峡诸军事,率军以拒秦王杨俊军。当月,开始了军事行动。杨素率水军出永安,下三峡,军至“流头滩”。由戚昕率领的陈军乘“青龙”船百余艘守“狼尾滩”(流头、狼尾滩,均在今湖北省宜昌附近)。狼尾滩地势险峭,不易攻取。杨素考虑如果白昼进兵易于暴露虚实,因而在夜间率“黄龙”战船数千艘偃旗而攻。同时派遣王长袭率步卒自南岸袭击戚昕别栅,又派自江陵赴援的刘仁恩率骑兵自北岸进兵“白沙”。天将明,双方激战,戚昕败逃,所部全部被俘。杨素随即将他们遣散。隋军大胜后,杨素率水军沿江东下,旌甲蔽天,杨素坐在“平乘”大船之上,容貌雄伟,陈人望见,赞叹道:“清河公即江神也!”

开皇九年正月初一,贺若弼自广陵引兵在下游渡江。此前,贺若弼购买许多陈民间船只,并且隐蔽起来。同时购买五六十只破船停靠岸边,造成隋军无船的假象。又令士卒换防之日必须在广陵集中,并大列旗帜,造成隋军集结的印象。待到陈军集兵防备,隋军即散。如此反复多次,习以为常,陈军不再防备。因此,这次渡江陈军竟未发觉。当日入夜,韩擒虎率500士卒,自横江渡采石。由于当日为正月初一,采石戍守兵皆醉,因而得以轻易渡江。

正月初六,贺若弼攻占京口。初七,韩擒虎按部署攻下姑孰,陈守将皋文奏逃回建康。于是,贺若弼自北道、韩擒虎自南道(京口在建康之北;姑孰在建康之南)向陈朝都城建康进发。当日,贺若弼进据钟山(又名蒋山),屯兵白土冈之东。此时已在瓜步山的晋王杨广派遣总管杜彦与韩擒虎合军,共有步、骑兵2万人屯于新林(距建康城只有20里)。此时王世积也按部署在蕲口大破陈军。

在大军压境之下,陈后主命萧摩诃为主帅,任忠、樊毅、孔范诸将率军依次进发迎战贺若弼。在蒋山白土冈屯兵的贺若弼望见源源开来的陈军,立即组织甲士8000人,严阵以待。陈军主帅萧摩诃因妻与陈后主私通而无战意,影响了陈军士气。只有鲁广达率军力战,迫使贺若弼几次败退,士卒战死273人。陈兵得人头,即去求赏,贺若弼知陈军骄惰,于是

重振士气，改变战略，集中兵力袭击孔范所率军。孔范军初交战，即败退。陈诸军见此情形，慌乱起来，人马交踏，不可复止，死者5000人。陈军主帅萧摩诃被擒，其余诸将逃回建康。

在贺若弼于蒋山与陈军激战时，韩擒虎自新林向建康进军。陈将任忠率数骑兵迎降于石子冈，引韩擒虎军直入建康之朱雀门。守兵准备抵抗，任忠说：连我都降了，你们何必如此！守兵散去。城内文武官员相继逃散，只有尚书仆射袁宪在殿中、尚书令江总几个人还在尚书省。陈后主对袁宪说：我平日对待你并没有超过别人，今日只有惭愧。事到如今，不仅说明我无德，也是江东衣冠道尽。后主想躲藏起来，袁宪劝他不要如此，应"正衣冠，御正殿"堂堂正正地投降。后主不听，跟从十余宫人出景阳殿，与张（丽华）贵妃、孔贵嫔相继下到院中的土井中。为时不久，被韩擒虎士卒发现，用绳索将三人曳出。贺若弼乘胜至乐游苑，又遇鲁广达军的抵抗，至夜，将鲁擒获，于是自北掖门入建康。贺若弼听到韩擒虎已得陈叔宝，随即将其呼至，叔宝见贺若弼，异常恐惧，向若弼再拜。贺若弼将叔宝置于德教殿，派兵守卫。

高颎入建康。晋王杨广派高颎子德弘向高颎索取陈叔宝宠妃张丽华。高颎回答：以前姜太公杀妲己，今日怎能留张丽华！随即将张丽华斩首。德弘回报杨广，杨广十分恼怒，却无可奈何。二十二日，晋王杨广入建康，令高颎与裴矩收图籍、封府库，资财一无所取。因此事，杨广赢得贤名。贺若弼因韩擒虎得陈叔宝，自己功劳在韩擒虎之后，耿耿于怀。杨广因贺若弼在蒋山之役中违反原定与韩擒虎两军同时进攻的计划，提前出战，从而违反了军令，撤销了他的军职，使其更加不满。隋文帝得知后，立即召回贺若弼，在给杨广的诏书中指出：平定江表，是贺若弼与韩擒虎二人的功劳。另分别赐二人诏，赞美他们的功劳。

此时平陈战役并未结束。早在开皇八年十二月，秦王杨俊率30总管水陆10余万人屯驻汉口，与陈水军都督周罗睺隔江相持月余，不能前进。陈荆州刺史陈慧纪派吕忠肃屯兵西陵峡口之岐亭，控制巫峡。忠肃在江上横缀铁锁三条，以拦截隋船。在取得"狼尾滩"战役胜利、沿江而下的杨素与刘仁恩军，随即投入岐亭之战。经过40余战，死5000余人，才将吕忠肃击败。忠肃退守荆门之延洲。杨素命人除去铁锁，并组织当地习水性的巴蜑人千余，乘四艘"五牙"战舰，用舰上的拍竿粉碎陈舰十余艘，大败陈军，俘甲士2000余人。吕忠肃只身逃窜。从此，巴陵（湖南岳阳）以东，再没有人为陈守城了。陈慧纪率将士3万人、楼船千余艘，沿江而下，被秦王杨俊水军遏阻，无法撤回建康，阻于江上。此时隋军已攻占建康，晋王杨广命叔宝手书招上江诸将向隋军投降。得到陈后主手书后，与秦王杨俊相持的周罗睺，把士卒遣散后向杨俊投降；被杨俊遏阻江上的陈慧纪军也向杨俊投降。于是上江皆平。而赢得岐亭之役的杨素率水军沿江而下至汉口，与杨俊会合。在蕲口的隋将王世积，得知陈国灭亡，将此事告谕陈江南诸郡，于是九江郡（江西九江）司马弃城逃走。豫章（江西南昌）等诸郡太守皆向王世积投降。

隋伐陈时，岭南数郡地方长吏共举高凉郡（广东阳江）太夫人洗氏为主，保境拒守。晋王杨广令陈叔宝给洗夫人去书，告其陈国已亡，劝其归隋。洗夫人集首领数千人，宣明此意，并派人迎接隋安抚岭南使臣韦洸进入广州。至此，陈国境内皆平定，隋得州30，郡100，县400户，50万。

开皇九年三月初六，晋王杨广班师。同时，陈叔宝与其王公百官也从建康向长安进发。队伍绵延500里。隋文帝下令腾出一部分长安士民住宅，并加修整，以安置陈人。四月十七日，诸军在鼓乐声中进入长安，献俘于太庙。在铁骑的包围中，陈叔宝及其王侯将相；以及天文图籍，鱼贯而列。晋王杨广、秦王杨俊率队走在前面。隋文帝拜杨广为太尉，赐辂车、乘马、衮冕之服、玄圭、白璧等。二十五日，隋文帝在广阳门"观阙"，有人引导陈叔宝及其太子、诸王28人，"司空"司马消难（北周大象元年司马消难响应尉迟迥举兵，其年八月降陈）以下至尚书郎凡200余人排列在下。隋文帝责其君臣不能相辅乃至亡国。陈叔宝及群臣战战兢兢，伏首于地，无言以答。

隋平陈，结束了自东汉末年以来近400年的分裂局面，实现了全国的大统一，中国历史进入了新的阶段。　　（翁俊雄）

科举制的创立

科举制是封建政府以不同科目对学有专长的读书人进行考试的制度。经考试合格者，就取得做官的资格。高官子弟可以通过"门荫"做官，而非高官子弟取得做官资格后，仍须再通过吏部考试，合格者方得任官。科举制是隋朝创立的，至清朝末年才废除。

以前读书人要想做官，首先需经过评议。曹魏创立"九品中正制"，即由"贤有识鉴"的官员任各郡的"中正"，负责评审本郡读书人的才能、德行，将他们分为九品（等级），评议的结论是任官的依据。九品中

正制实行日久，流弊百出。隋文帝于开皇中废除九品中正制，改变选拔人才的办法。

隋朝的科举制，主要是分科。隋文帝开皇十八年(598)七月，设立"志行修谨(有德行)"、"清平干济(有才能)"二科。隋文帝令京官五品以上和地方官总管、刺史以上述二科"举人"(推荐人才)。这被看做是科举制的开始。以后科举名目繁多。隋文帝仁寿三年(603)下诏，以明知古今、通识治乱、究政教之本、达礼乐之源等四科选举人才。隋炀帝大业三年(607)下诏以孝悌有闻、德行敦厚、节义可称、操履清洁、强毅正直、执宪不挠、学业优敏、文才秀美、才堪将略、膂力骁壮等10科"举人"。这些举科，均属临时规定的特科，选拔德、才、体各方面表现突出的人。这些人虽然仍是由"权威人士"推选出来，但是，由于科目较具体，标准较明确，比原先的"九品"评定，易于将真正学有专长的人选拔出来。

在上述一些临时性的特科之外，隋朝还设立了比较固定的举科，如秀才、明经、进士三科，为后世所沿用。尤其值得注意的是，这三个较为固定的举科，都必须经过考试，而不是由权威评论。例如，杜正伦与兄正元、正藏三人，在隋文帝仁寿年间，"俱以秀才擢第"。又如孔颖达，在"隋大业初，举明经高第"。而侯君集、孙伏伽"皆隋之进士也"。"擢第"即"及第"，考中之意。"高第"，分明是名列榜首之意。

隋朝所设秀才、明经、进士三科，以秀才为尊。隋有天下近40年，而所取秀才总共不过十余名。正因如此，《旧唐书・杜正伦传》："隋代举秀才止十余人，正伦一家有三秀才，甚为当时称美。"杜正伦考秀才时，主考官杨素命题为《拟司马相如〈上林赋〉》、《拟张载〈剑阁铭〉》。秀才科考文辞秀美。明经科考儒家经典。进士科，在唐代考文辞和策问，隋代大概也是如此。

科举及第，只获得明经、进士"出身"，即取得了当官的资格。获得明经、进士出身之后，还要赴吏部，通过"身、言、书、判"的考试内容，合格者，依据当年各个部门、各个州县缺官的情况，任命为官员。不过，最初只能做县尉、功曹等九品小官。

科举制自隋朝创立，唐朝盛行，经宋、元、明，至清朝末年才被废除。　　　　(翁俊雄)

隋初江南地区的叛乱

开皇十年(590)江南地区世族地主发动的大规模反隋的叛乱。

开皇十年十一月，在原陈朝境内爆发了一场大规模的反隋叛乱。蒋山(江苏江宁)李棱，吴郡(苏州)沈玄侩，东阳郡(浙江金华)汪文进，会稽郡(浙江绍兴)高智慧，永嘉郡(浙江温州)沈孝澈，余杭郡(杭州市)杨宝英，鄱阳郡(江西波阳)吴世华，建安郡(福州市)王国庆，交趾郡(越南境内)李春，或自称天子，或自称都督、刺史，其兵力，多者数万，少者数千，先后举兵反隋。

在平陈后的一年多时间内，隋王朝将在北方实行的一系列政治改革措施推行于江南。首先是改地方州、郡、县三级制为州、县两级制。相继撤销了丹阳、晋陵、吴、会稽、钱塘、金华、永嘉、临海等郡。同时，还并省了许多县。其结果，势必罢免了大批出身于世族地主的地方官员的职务，触犯了他们的利益，为他们所不满。此外，隋王朝又任命了大批北方隋官为江南地区的地方长吏。如皇甫绩拜苏州(陈之吴郡)刺史，王世积任荆州总管，杨异任吴州总管，李园通任饶州(陈之鄱阳郡)刺史等。大批北方隋官任江南地区地方官也为江南世族所不满。更为重要的，是隋文帝派遣苏威至江南"依内州责户籍"，即将开皇五年在北方实行的"输籍之法"向江南推行，使江南世族地主荫庇的部曲、佃客，成为国家编户，从而大大削弱了世族地主的经济实力，更是他们难以接受的。隋初江南地区大规模的反隋叛乱，实际上是江南世族地主发动的。

开皇十年十一月，隋文帝任命杨素为行军总管，平定江南叛乱。杨素率水军自扬子津渡江，击败在京口(江苏镇江)自称南徐州刺史的朱莫问所领之兵，攻占京口。晋陵郡(江苏常州)顾世兴自称太守，遣其将鲍迁迎战，被杨素击败，并俘获鲍迁以下3000余人。接着，杨素乘胜讨平无锡之叛军叶略所率之军。吴郡沈玄侩、沈杰等率叛军包围苏州，隋苏州刺史皇甫绩接战不利，杨素率军赴援，玄侩走投南沙叛将陆孟孙。杨素在松江(上海市松江)击败孟孙，生擒孟孙、玄侩，攻占松江。会稽郡高智慧，自号东扬州刺史，有船舰千艘，兵甚盛。杨素率军几经苦战，才将其击败，高智慧逃入海。杨素率军紧随其后，从余姚入海，至永嘉郡，攻占永嘉郡，高智慧逃向泉州。在追击高智慧的过程中，杨素又平定东阳郡的汪文进和蔡道人所率叛军。

隋文帝因杨素多次攻城占地，异常辛劳，令其入朝，加以慰问。并加其子杨玄感官至上开府，厚赏杨素本人。杨素在稍事歇息之后，因高智慧仍在泉州，叛乱尚未最后平息，又请求出征。杨素至会稽郡。此前，泉州(福州市)豪强王国庆杀泉州刺史刘弘，据州

叛乱。不久，高智慧从永嘉逃来，与国庆会合。王国庆认为北方人缺乏泛海经验，没有在海岸设防。杨素率水军从会稽入海南行，从海上进攻泉州，王国庆与高智慧在慌乱中弃州逃走。杨素秘密派人告知王国庆："你的罪行严重，只有交出高智慧才可得到宽宥。"于是，王国庆将高智慧交给杨素，杨素立即将其斩首。至此，江南的大规模叛乱才告平息。

江南地区叛乱的同时，南海郡夷人王仲宣也举兵反隋。岭南各地首领纷纷响应，引兵围广州，隋广州道行军事韦洸中箭身亡。隋文帝任命韦洸副将慕容三藏代理其职。又派裴矩巡抚岭南。裴矩至南康郡(江西赣州)，得兵数千人。王仲宣派遣别将周师举分兵围东衡州(广东韶关)，裴矩与大将军鹿愿击败周师举，将其斩首，随即向南海郡(广州市)进军。高凉郡(广东阳江)冼夫人遣其孙冯暄领兵支援隋军，冯暄因与敌将陈佛智笃好，逗留不进，冼夫人大怒，遣使将其投入州狱。另遣孙冯盎领兵进兵广州，与隋军会合，共同讨伐王仲宣。王仲宣兵败，士卒逃散，王仲宣攻占广州的企图没有得逞，广州终于获全。冼夫人亲自随从裴矩巡抚岭南二十余州。苍梧郡(广东封开)首领陈坦等皆来谒见。裴矩以隋王朝名义，分别任命他们为刺史、县令，让他们回去统领其部落。岭南遂平定。 （翁俊雄）

隋文帝废秦、蜀二王

隋文帝第三子秦王杨俊奢侈腐化，第四子蜀王杨秀有胆气、好武艺受到隋文帝的猜忌，或被免官爵，或废为庶人，而隋文帝长子皇太子杨勇也被废黜，这使杨广(文帝次子)帝位继承人的地位得以巩固。

秦王杨俊，隋文帝第三子，开皇元年(581)立为秦王。开皇二年，拜上柱国，任河南道行台尚书令、洛州刺史。时年12。加任右武卫大将军，领关东兵。开皇三年，改任秦州总管，管辖陇右(甘肃省)诸州。杨俊性仁恕，以慈爱为怀，信仰佛教，曾要求出家为僧，隋文帝不许。开皇六年，调任山南道行台尚书令。开皇八年，隋平陈，任山南道行军元帅，督三十总管，水陆10余万大军，屯驻汉口，为上流节度。陈将周罗睺、荀法尚等，以劲兵数万屯鹦鹉洲。山南道行军总管崔弘度请求出兵进攻，杨俊不愿杀伤，不许。后来，周罗睺等相继投降。陈平后，任扬州总管四十四州诸军事，镇广陵(扬州市)。开皇十年调任并州(太原市)总管二十四州诸军事。

杨俊自任并州总管以后，渐好奢侈。大放高利贷，收取利息。大兴土木，建造很多华丽的宫室。还建造"水殿"，用香料涂墙壁，玉砌金阶。栋梁之间，镶嵌明镜，悬挂宝珠，穷极侈丽。常与宾客、妓女一起，弦歌于其上。杨俊妃嫔很多，王妃崔氏性妒，心甚不平，在瓜中放毒，杨俊中毒，不能视事，隋文帝召其还京师。隋文帝因杨俊奢侈放纵，免其官爵，只保留其王位。后来杨俊卧病不起，隋文帝派人责备他说："我兢兢业业，创立大业，给你们树立榜样，你作为我的儿子，竟要败坏它，我不知应该怎样责备你！"杨俊又惭愧，又恐惧，病情恶化，于开皇二十年六月病死。妃崔氏因毒害杨俊，赐死于其家。

蜀王杨秀，隋文帝第四子。开皇元年，立为越王。二年，徙封蜀王，拜柱国，任益州(成都市)总管二十四州诸军事、益州刺史。杨秀有胆气，容貌瓌伟，好武艺，朝臣都畏惧他。隋文帝曾对独孤后说："秀必以恶终。我在世可无虑，我一死，他必反。"杨秀渐奢侈，车马、服饰，违反制度，超越等级，与帝王相似。开皇二十年，太子杨勇废，立杨广为皇太子，杨秀愤愤不平。太子杨广为防患于未然，秘密使杨素在文帝面前进谗言。仁寿二年(602)隋文帝召杨秀至长安。杨秀欲称病不行。益州司马总管源师说：圣上有旨召王，如迁延不去，引起猜疑，无法澄清。杨秀只好上路。杨秀至京师，见文帝，文帝不答话。次日，文帝派人责问他。杨秀说："臣负国恩，出镇一方不能奉法，罪当万死。"太子杨广及诸王替他谢罪。隋文帝说："以前秦王糜费财物，我以父亲身分训导他。今天秀蠹害生民，我应以国君身分法办他。"于是将其送交司法部门。十二月二十日，废蜀王秀为庶人，并将其囚禁于内侍省。还下诏数其罪，列举其不满杨广为太子，咒父兄早死，心怀篡位之心，多杀无辜，剥削民庶等十条罪状。禁止他与妻子相见。在杨秀一再要求之下，才准其与瓜子(杨俊之子)同住。从此，一直过着囚徒的生活，直到被宇文化及杀死。 （翁俊雄）

隋朝储位之争

隋文帝次子杨广阴谋争得皇太子位。

隋文帝杨坚早年与独孤皇后约定不要异母所生之子，因而他的五子，长子勇，次子广(569—618)，三子俊，四子秀，五子谅，均为独孤氏所生。北周静帝大定元年(581)二月十四日，杨坚篡周，即皇帝位，即以杨勇为皇太子。封广为晋王，俊为秦王，秀为越王，谅为汉王。

太子杨勇，为人宽厚，性情耿直，言行无所顾忌。对军国政事常提建议，往往为文帝采纳。隋文帝崇尚

节俭，相州刺史豆卢通贡绫文布，由于过于精致，为文帝所不喜，命人焚之于朝堂。杨勇有一次穿蜀郡（成都市。蜀郡手工业精巧）制作的铠甲，而且又添加装饰，隋文帝看见，很不满意，对他说：自古帝王没有好奢侈而能长久的。你是储君，应崇尚节俭，才能为人主。我给你两件东西，一是我过去所携带的刀一口和我过去经常食用的酱菜一盒。希望你不要忘记过去的日子。有一年冬至，京城百官和各地方官至朝后，又全都到东宫拜贺。杨勇命乐队奏乐。隋文帝得知后对臣下说：太子受贺，只能三四十人，随情各去。哪能去那么多人，很像是都接到了通知。再说，也不应该设乐队奏乐。他下诏：今后官员朝贺时，不应另至东宫拜贺，因为这不符合礼制。隋文帝的不满，埋下了父子猜疑的种子。独孤皇后也不满意太子杨勇。皇后为杨勇选嫡妃元氏，杨勇对她并无情感，予以冷落，而宠爱妃云氏。嫡妃元氏因心痛突然死去，外内议论纷纷。皇后也疑是杨勇毒死的。

文帝次子杨广，相貌堂堂，能文能武，敏慧异常，素为父母喜爱。曾统大军北逐突厥，南灭陈朝，为隋王朝立下功勋。在平陈时，封府库，资财一无所取，赢得贤王之名。杨广察觉父母对杨勇的态度有了变化，就有意做出各种姿态，以赢得他们的欢心。杨广减少与其他妃嫔往来，独与萧妃住在一起。将美貌姬妾另匿别室，只留老丑者在身边。所用屏帐，全部更换为色泽暗淡、做工粗糙的。将乐弦弄断，上面的尘土也不挥去。给人以不好声色的印象。隋文帝与独孤后派人至杨广居所，无论贵贱，杨广与萧妃必亲自在门外迎接，并设美馔招待。因此，赢得帝后婢仆们的好感，无不称其仁孝。隋平陈后，于开皇十年（590）杨广任扬州总管。有一次，在入朝后将回扬州之际，在向皇后拜别时，杨广对独孤皇后说：我一向敬爱兄弟，但不知如何得罪了太子。他恼怒我，恨不得杀死我。独孤皇后说：我们现在还活着，他竟敢如此。我常想，如果你父千秋之后，你们得向阿云（即太子妃云氏）再拜问讯，这是多么痛苦之事！从此，独孤皇后下了废杨勇、立杨广为太子的决心。

杨广见时机成熟，返回扬州后，立即进行谋夺皇储的活动。杨广与其部下扬州总管司马张衡过从甚密。同时将其另一亲信宇文述由安州（湖北安陆）刺史任上调任寿州（治今江苏扬州市）刺史。这样，他经常与张衡、宇文述一起谋划。宇文述认为：现在能左右主上的，只有杨素（？—606）。而杨素对其弟杨约又是言听计从。杨广即派宇文述至京城进行活动。时杨约任大理少卿，杨素的举措往往先与杨约商议。宇文述设法与杨约接近，经常与他赌博，故意将金宝输给他。有一次，杨约为赢了大量金宝而感谢宇文述。宇文述乘机对他说：这些都是晋王赐给你的。杨约大惊，才得知事情的原委，并转达给了杨素，又对杨素说：要抓紧时机进行，这样可长保富贵。如果错过时机，将来太子理事，大祸就要临头。数日后，杨素在宫廷宴会上，对独孤皇后说：晋王孝悌恭俭，类似至尊。以此进行试探。皇后说：你说得很对。阿麽（杨广之小名）很孝顺。我们派人去，他必然在门外迎接。他每辞别，都伤心以至落泪。不像睍地伐（杨勇之小名），亲近小人，猜疑骨肉。我担心他会谋害阿麽。杨素乘机指摘太子的种种不是。皇后赐给杨素金帛，让他支持废立太子之事。

宇文述在京师的活动逐渐奏效。由于独孤氏经常叨念杨勇的种种不是，隋文帝猜忌杨勇益甚。竟至布置耳目，对东宫的任何动静，让他们随时奏闻。又抽调东宫宿卫官兵中的勇健者，特别是将最有才能的苏孝慈调出任淅州刺史。曾明确反对废太子的高颎，也反对削弱东宫宿卫的做法。独孤皇后将高颎视为废太子一事的绊脚石，设法除去。使人密告高颎子表仁曾劝高颎实行当年司马懿所做之事，以得天下。隋文帝因此下诏，罢免高颎一切官职、爵位，降为庶民。对削弱东宫宿卫的做法，杨勇极为愤怒，他对人说：看来没等我即位，即被诛杀。作为太子，我竟然不如其他兄弟，没有一件事让我遂心。杨素将太子的牢骚话密告隋文帝。文帝说：此儿早就不堪继承皇位，皇后常劝我废掉他。我考虑他是我“布衣时所生”，又是老大，总盼着他改悔，以至拖延至今。他曾指皇后的侍儿说：这些人都是我的。元妃刚死时，我怀疑是他毒死的，责问他，他竟然说：有机会一定要杀死元孝矩（元妃父）！他的长子长宁初生，我与皇后领来抱养，他竟然把他抱走。我时时担心他谋害我，我对他如防大敌。我不能将天下交给这个不肖子。我要废掉他，以安天下。

开皇二十年十月九日，隋文帝派人召杨勇。杨勇见使者大吃一惊，说：是不是要杀我？隋文帝穿着戎装，排列军阵，坐在武德殿中。百官立在东面，宗室立在西面。有人带引杨勇及其诸子列于殿庭，命内史侍郎薛道衡宣诏：废杨勇及其男女为王、为公主者。杨勇再拜说：臣当伏尸都市，以我为将来鉴戒。幸蒙哀怜，得全性命。说毕，泪如雨下。在场的人心情十分沉重。十一月三日，立晋王杨广为皇太子。隋文帝囚禁杨勇于东宫，让太子杨广掌管。杨勇多次要求见其父申冤，都被杨广遏阻。杨勇只得爬到树上大声喊叫，

以使其父听见。杨素对隋文帝说：杨勇已经神经错乱。文帝以为然，终未召见。　（翁俊雄）

杨广阴谋夺帝位

仁寿四年(604)正月，隋文帝病情恶化，皇太子杨广急于夺权，加以调戏文帝宠妃，隋文帝决意召回已废太子杨勇，杨广抢先一步，夺得了帝位。

仁寿四年正月，隋文帝病情恶化，尚书左仆射杨素、兵部侍郎柳述、黄门侍郎元岩，入阁侍疾。召皇太子杨广(569—618)入居大宝殿。杨广预计其父不久于世，要有所准备，因此，写手书给杨素，讯问如何处理后事？杨素的回书被宫人误送至隋文帝。文帝看后，大怒。此时文帝的宠妃陈夫人侍疾，因外出更衣，与杨广相遇，杨广欲行无礼，被陈夫人严厉拒绝。隋文帝见陈夫人神色慌张，在追问之下，陈夫人说：太子无礼！隋文帝气急败坏地说：畜生怎能承担大事，都是独孤氏害我如此！即唤柳述、元岩，对他们说：快把勇召来！柳述、元岩出阁写敕书召杨勇。杨素得知后，立即报告太子杨广。杨广即以隋文帝名义下诏逮捕柳述、元岩，投入监狱。同时，调东宫宿卫接管皇宫宿卫。封锁宫门，交由宇文述、郭衍掌管。将隋文帝身边宫人全部调出。并令其亲信右庶子张衡入阁。不久，隋文帝死。当时宫廷内外，就有种种猜测。陈夫人听到消息，心情异常紧张。不久，就有人送来太子杨广送的小金盒。陈夫人以为必是毒药，迟迟不敢打开。在来人的催促之下，打开一看，原来盒中有"同心结"数枚。杨广当晚遂逞其欲。十八日发丧。太子杨广即皇帝位，这就是历史上有恶名的隋炀帝。炀帝即以文帝遗诏的形式，赐前太子杨勇死。杨勇当即被绳索勒死。杨勇的十个儿子，也被杨广一一杀害。

（翁俊雄）

杨谅起兵反隋炀帝

仁寿四年(604)正月，镇守并州的汉王杨谅在并州起兵反对隋炀帝的叛乱。

汉王杨谅，隋文帝第五子，受到文帝的宠爱。开皇元年(581)立为汉王。十七年，代秦王杨俊为并州(太原市)总管。自太行山以东，至于东海、黄河以北五十二州全归其管辖。并准其在必要时不受律、令约束，可便宜从事。开皇二十年杨勇被废，杨广立为皇太子，杨谅甚感不安。为防患于未然，着手扩充军队，缮治军械，加以防备。其部下王頍，原梁朝王僧辩之子，有计谋；原陈朝旧将萧摩诃英勇善战。杨谅与王、萧二人过从甚密，心照不宣。仁寿四年正月隋文帝死，杨广以文帝玺书征召杨谅入京。以前隋文帝曾与杨谅密约：如果玺书召你，在"敕"字旁加一点，你才能来。杨谅见玺书中没有加点，知道有变。于是，杨谅以"诛杨素"为名，起兵反。响应杨谅叛乱的有十九州。王頍对杨谅说：王所率将吏，家属全在关西(蒲津关以西)，如果依靠他们，就应发兵直捣京师。如果割据太行山以东，则应任用山东之人为将吏。杨谅犹豫不决，兼用关西、山东之人。并州总管府兵曹裴文安说：井陉(河北省井陉)以西，在王掌握之中。山东士马，也由王掌握。应率精锐，入蒲津关(陕西朝邑北)，屯兵灞上，京师就会为之震动。旬日之间，大局可定。杨谅大喜，分派兵力出兵。大将军余公理出兵太谷(山西太谷)取河阳(河南巩县)。大将军綦良出滏口(河北邯郸西)取黎阳(河南浚县)。大将军刘建出井陉，进兵燕(河北北部)、赵(河北中部)。柱国乔钟葵率兵出雁门(山西代县)。杨谅率裴文安、纥单贵、王聃、茹茹天宝、侯莫陈惠诸将从并州出兵，经蒲津关，指向长安。

隋炀帝命右武将军丘和为河东郡郡守，守蒲津关。杨谅选数百骑兵着妇女装束，诈称杨谅宫人回长安，路过此城。河东县守城人开门放入。丘和发觉有变，跳城逃向长安。蒲州长史、司马以下全成俘虏。杨谅遂占领蒲州治所河东县。此时，裴文安领兵进攻蒲津关，杨谅忽然改变主意，令纥单贵断河桥，守蒲州，将向蒲津关进军的裴文安召回。裴文安见到杨谅说：兵贵神速，应出其不意，现在王既不乘胜进兵，又将文安召回，大势去矣。

隋炀帝任杨素为并州道行军总管、河北道安抚大使，率士卒数万讨伐杨谅。杨谅胆怯，放弃蒲州，领兵北返介州(山西介休)。杨素率大军追击，沿路攻占绛、吕州。杨谅命赵子开率士卒十余万屯据高壁(山西灵石南)。杨素火烧其营，大败赵子开。杨谅自率士卒十万在蒿泽(山西祁县与介休间)拒守。时天下大雨，杨谅欲领军回并州。王頍说：杨素之军已疲惫，王如亲率军进击，必能取胜。现在见敌而退，士气必然涣散。杨谅不听，领兵退至清源县(山西清徐)，杨素进击杨谅，拿获其大将萧摩诃。杨谅退守并州晋阳县(太原市)，杨素以兵包围，杨谅投降。隋炀帝削杨谅一切官爵，降之为民，将其囚禁至死。杨谅部将綦良、余公理等所率叛军在此前先后被隋军击溃。

（翁俊雄）

隋炀帝营建东都洛阳

隋炀帝于仁寿四年(604)即位，当年十一月二十

一日下诏于洛阳旧城西 18 里营建东京(北周、北齐以洛阳为东京)洛阳。

洛阳是东周、东汉、曹魏、西晋和北魏后期的都城。东汉末年和以后历经战乱,洛阳成为废墟。北魏太和十八年(494)孝文帝将都城从平城迁至洛阳。迁徙之初,洛阳居民不多,到处皆是空地。不过,曹魏明帝时所造的洛阳宫殿故基仍在。北魏迁都时,就是在这个故基上营建起来的。北魏末年战乱,洛阳又遭破坏,以至"城阙为墟"。大象元年(579)二月二日,北周宣帝下诏营建洛阳宫。从此,每月役使 4 万人,直到翌年五月,周宣帝死,静帝下令"停洛阳宫作",营建了一年以后停工。隋炀帝营建东京洛阳,是北周未完工程的继续。

隋炀帝营建洛阳是在完成一项历史使命。炀帝在仁寿四年十一月二十一日诏中说:汉高祖曾说过:"我到过很多地方,只有洛阳最好。"自古帝王无不留意于洛阳,所以未能建都洛阳,不是因为没有统一,就是因为财力不足。我隋朝一建立,就曾想这样做,但由于种种原因,拖延至今。此诏说明营建洛阳是隋朝统治集团的既定国策。

营建洛阳是经济、政治和军事的需要。洛阳地处全国的中心。北周宣帝的营建洛阳宫诏中指出:洛阳位于全国的中央,各地向中央上缴贡赋时所经路途距离均等。隋炀帝的诏书也说:洛阳四面有天险可作屏障,有水陆交通线通向四方,各地上缴贡赋的路途相等。诏书还指出:黄河以北和江淮广大地区一旦发生叛乱,长安处于潼关、黄河以西("关、河悬远"),采取的军事行动可能迟误("兵不赴急"),而洛阳作为都城,更为适宜。

大业元年(605)三月十七日,炀帝任命尚书令杨素(? —606,弘农华阴(今属陕西)人)为营建东京大监,纳言杨达、将作大匠宇文恺为副监,每月役使工匠 200 万人,开展了大规模的营建工程。经过十个月,于大业二年正月六日建成。洛阳城分为宫城、皇城和外郭城三部分。宫城是宫殿所在处,皇城是中央政权机构所在处,外郭城(或称罗城)是官员住宅和百姓居住之处。外郭城内在洛水以南有 96 坊(居民区);以北有 36 坊。此外,在居民区开设东、南、北三市(即贸易市场)。

大业元年三月,又于河南郡寿安县营建显仁宫。五月,又筑西苑,苑周围 200 里。苑内开凿周围十余里的湖泊,象征东海。湖中积土为蓬莱、方丈、瀛洲三山,象征东海之三神山。三山高出水面十余丈,山中营建台、观、殿、阁,状极辉煌。

为了充实东京洛阳,在营建东京的同时,将豫州(即洛州,大业元年改为豫州)各县城郭的居民和全国诸州的富商巨贾数万户迁入洛阳。炀帝又命江南诸州的 6000 余家上等民户"分房"入居东京,称之为"部京户"。此外,又命河北诸郡送"工艺户"3000 余家,入居东京,并划东京建阳门东道北十二坊作为他们的居住区。

大业五年正月八日改东京为东都。此后隋炀帝经常来往于京师长安与东都洛阳之间。洛阳在唐代仍为东都(亦称东京),与京师长安(亦称西京)并称"两京"。　(翁俊雄)

隋炀帝开运河

隋炀帝在位时凿通了北起涿郡(北京)南至余杭郡(杭州)沟通南北的大运河。我国的江河均为东西走向,大运河的开通,对南北之间的交通与经济交流有重大意义。

大运河分为通济渠、邗沟、江南河和永济渠四段。

通济渠　大业元年(605)三月,隋炀帝命尚书左丞皇甫议征发河南、淮北各郡民百余万开通济渠。通济渠的渠首是在汜水县(今汜水镇)东北 35 里的板渚(黄河南岸),这样,黄河遂成为通济渠的水源。从板渚至浚仪(开封市)之间,则利用两汉时开的汴渠(又称蒗荡渠)。自浚仪起,通济渠就与一直东去与泗水会合的汴渠分离,而折向东南方向。此后,通济渠经陈留(陈留镇)、雍丘(杞县)、襄邑(睢县)、宁陵、宋城(商丘)、谷熟(商丘东南)、永城、临涣(永城东南)、埇桥(宿州)、虹县(泗县)至泗州(盱眙北洪泽湖中)而注入淮河。通济渠连接了黄河与淮河,是南北大运河的关键一段。

然而,通济渠只是沟通黄、淮的最佳水路路线。当时沟通这两条河流的还有两条水路。其一是:黄河(自板渚)——济水(或称白沟)——菏水——泗水——淮水。济水的西端经荥泽县入黄河,其东端在菏泽与菏水相连。菏水的东端与泗水相接,沿泗水东下,绕彭城(徐州)至淮阴入淮水。隋炀帝在大业六年第二次乘龙舟幸江都(扬州),路经东平郡(山东郓城),而东平郡地处菏泽以北,有水路可通。这说明当时这条水路可以通航。其二是:汴渠——泗水——淮水。两汉时汴渠的西端为板渚,东端在下邳附近与泗水连接。泗水向东南行走与淮水相通。白居易在《长相思》一诗中对汴水、泗水及邗沟航运通行的情况描述道:"汴水流,泗水流,流到瓜洲古渡头。"说明至唐

代，这条水路仍然通行。然而，这两条水路都有很大的缺陷，前者向北绕了个大弯子，后者“迂曲”不顺畅、不安全。隋炀帝下诏在汴、泗水之南开凿通济渠，是沟通黄、淮的最佳水路路线。

邗沟 隋炀帝下诏开凿通济渠的同时，又征发淮南民十余万开邗沟。邗沟是沟通淮河与长江的唯一水路通道，也是中国最早的运河。公元前484年吴国筑邗城（扬州西北）时，同时修凿，故名邗沟。邗沟是从邗城西南角起，屈曲至今湾头折向北流，经武广湖、陆阳湖（在高邮南。前者在西，后者在东）二湖之间，北入樊梁湖（界首湖），再折向东北，穿过博支湖、射阳湖（宝应、淮安两县东），西北至末口（淮安北五里）入淮。这可称为“东线”。汉顺帝永和年间，陈敏穿樊梁湖北口，下注津湖（淮安西南），再北达末口，使邗沟成为南北端直的状态，可称之为“西线”。

早在开皇七年（587）隋文帝曾下令修邗沟，经宜陵樊汊、湾头与“东线”相接。也就是说，只有博支湖与湾头之间是另辟新道，其他均依邗沟东线。所以重开东线，显然是迁就东线湖泊广阔、水源丰富，利于大型战舰通过。但东线迂远，也不利于通航。隋炀帝大业元年又下令疏凿邗沟西线，引江入淮，南起扬子（仪征东南），北达山阳（淮安）。

江南河 大业六年隋炀帝下诏开凿江南河。自京口（镇江）至余杭全长800余里。要求河面“广十余丈”，“使可通龙舟”。这次开凿江南运河，是对六朝以来原有江南运河的一次加宽、疏浚。

永济渠 大业四年正月，炀帝下诏征发河北各郡民百余万开永济渠：“引沁水南达于河，北通涿郡。”永济渠的起点是沁水在黄河北岸的入河处（河南武陟西北）。永济渠从这里向东北行进，会清（卫河）、淇二水，直达涿郡（北京）。隋代引沁水入永济渠，除沁水水源丰富外，还因沁水入黄河处距离板渚最近，舟船容易渡过黄河。

大业七年二月，隋炀帝自江都乘龙舟，经邗沟、通济渠、永济渠，至四月抵达涿郡之临朔宫。这无异于隋炀帝对南北大运河工程进行的总验收。从大业元年三月炀帝下诏开通济渠，至大业七年二月，大运河南北通航，只用了六年的时间就完成了历史上的伟大工程。这是当时黄河、淮河、长江南北数百万劳动人民创造的奇迹！南北大运河的开凿，加强了南北经济、政治的联系。（翁俊雄）

隋炀帝幸江都

隋炀帝自仁寿四年（604）即位，在位期间三次“巡幸”江都（江苏扬州）。这三次巡幸，历史背景不尽相同，政治目的也不相同，但都对当时的历史发展产生重大的影响。

炀帝第一次巡幸江都，自大业元年（605）八月至二年三月，历时七个月。这次巡幸是在开皇九年（589）平陈、开皇十年平定江南地区叛乱之后，又是在隋王朝经济发展、政治稳定的背景下，新即位的隋炀帝为加强对江南的控制而采取的一项重大举措。

炀帝即位不久，于大业元年三月，下令开凿通济渠，以沟通黄河、淮河。同时又开邗沟，以沟通淮河与长江的水路。通济渠与邗沟的疏通，对隋王朝加强控制江淮，加强南北之间的政治、经济、军事的联系有重大意义。隋炀帝第一次巡幸江都，与开凿南北大运河一样，都是旨在加强对江淮地区的联系和控制。这一次巡幸，其仪仗空前盛大。史载：“舳舻相接二百余里，照耀川陆，骑兵翊岸而行，旌旗蔽野。”挽船夫8万余人，全着锦彩袍，号为“殿脚”。炀帝所乘龙舟，高45尺，长200丈，上下四层，只中间两层，就“有百二十房”。伴随龙舟的有朱鸟、苍螭、白虎、玄武等船舰数千艘，由后宫、诸王、公主、百官、僧尼、道士、蕃客乘之；另有平乘、青龙、艨艟等船舰数千艘，由十二卫之士兵乘之。如此盛大的巡幸场面，目的是对平定不久的江南地区宣扬中原王朝的“皇威”！这与秦始皇统一全国之后东巡山东的政治意图是一脉相承的。

炀帝第二次巡幸江都，自大业六年三月，至七年二月，历时十一个月。这次巡幸是在加强了对边疆的控制并大大开拓了国土的背景下，为准备征伐高丽而采取的重大步骤。炀帝于大业六年三月初二至江都后，四月十六日“宴江淮已南父老，颁赐各有差”。六月二十四日提高江都郡的地位，使与长安、洛阳等同，使江都郡太守的级别与“京兆尹”相等。炀帝还将水军将领、江都人来护儿带在身边，并“令上先人冢，宴父老”使之“州县荣之”。炀帝的这些举措都是要取得江淮对即将进行的征高丽战争的广泛支持。此外，还下诏开凿自京口（江苏镇江）至余杭（浙江杭州）的“江南河”。这样，就将沟通南北的大运河大大向南延伸，以利于对江南人力、物力的调发。大业七年二月，炀帝在完成对南方的军事动员和物质准备之后，即下诏讨伐高丽：“高丽高元，亏失藩礼，将欲问罪辽左，恢宣胜略。”同时炀帝立即自江都乘龙舟，沿新竣工的大运河（邗沟、通济渠、永济渠）至对高丽作战的前线涿郡（北京市）。四月十五日，炀帝至涿郡的“行在”临朔宫，立即加紧了征伐高丽的准备。其中，调发江淮的人力、物力，占有重要地位。三、四月间征发江

淮以南水手1万人、弩手3万人、岭南排镩手3万人。五月，敕河南、淮南、江南造戎车5万乘送高阳（河北高阳）。七月，发江、淮以南民夫及船，运黎阳及洛口诸仓米至涿郡。这都显现了隋炀帝第二次巡幸江都的政治目的。

炀帝第三次巡幸江都，自大业十二年七月至十三年三月，历时八个月。这次出巡与前不同，是在北方各地农民起义风起云涌，而炀帝欲"袭永嘉之旧迹"，即逃至江淮，做残守半壁江山之幻梦。然而，江都兵变粉碎了他的梦幻，结束了他的一生，隋王朝也随之灭亡。　（翁俊雄）

隋通流求

隋朝时大陆与台湾的联系。

台湾自古以来就是中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同大陆联系密切。隋代台湾称为流求，土地肥沃，适宜种植稻、粱、黍、麻、豆等。树木有枫、栝、樟、松、楠、梓、竹、藤等，风土气候与广东相同。当地高山族仍处于刀耕火种时代。没有文字，"无君臣上下之节、拜伏之礼"。大业三年（607）炀帝令羽骑尉朱宽"入海求访异俗"，朱宽与"海师"何蛮一起到达流求。翌年炀帝又命朱宽招抚当地土著民族，不从。大业六年，炀帝派虎贲郎将陈棱和朝请大夫张镇周，率东阳郡（治今浙江金华）兵万余人，从义安（广东潮州）出海，经高华屿、鼊鼊屿（均属澎湖列岛）到达流求，"流求人初见船舰，以为商旅，往往诣军中贸易"。从此，台湾和大陆的联系更加密切，大陆人民迁往台湾定居者不断增多。唐朝时期，台湾划归岭南节度使管辖，同大陆保持密切关系。　（翁俊雄）

隋炀帝通西域

隋炀帝为加强中原与西域的联系所做出的重大贡献。

隋朝初年西域地区存在着很多少数民族政权，如高昌、焉耆、龟兹、疏勒、于阗（均在新疆境内）、康国、安国、石国、米国、史国、曹国、何国、钹汗、挹怛等"昭武九姓"国（今阿姆河、锡尔河流域一带）。这些地方政权的人民，接受汉文化极深，有的就是汉族人建立的政权，例如高昌就是汉族敦煌人张孟明所建，以后的麹氏也是汉族金城（甘肃兰州）人。炀帝在位，西域胡人多至张掖（甘肃张掖）与汉人进行贸易。炀帝派裴矩至张掖，掌管互市。裴矩通过胡商，了解西域44国的山川地理、风俗、服饰，撰写《西域图记》一书，并绘制了地图多幅，面奏炀帝。书、图显示，当时从敦煌向西至"西海"（地中海东岸），有三条通道：北道经伊吾（新疆哈密）；中道经高昌（新疆吐鲁番）；南道经鄯善（新疆若羌）。这就是隋唐时代的丝绸之路。裴矩对炀帝说：西域诸国，"引领翘首"愿意臣服隋朝。然而，它们由于分别受突厥、吐谷浑的控制，交通受阻，致使"朝贡不通"。隋炀帝遂下决心打通通往西域的道路。

欲打通通向西域之路，必须削弱西突厥和吐谷浑对西域的控制。早在隋文帝开皇五年（585）突厥分裂为东、西二部。西突厥首领阿波可汗在位，其地域东起都斤山，西越金山（阿尔泰山），控有伊吾、铁勒、龟兹等西域诸国。开皇七年，阿波可汗被东突厥莫何干可汗擒获，泥利可汗继立。不久，泥利可汗被铁勒诸部击败而死，处罗可汗继立。处罗可汗为替父报仇，于大业元年（605）引兵平定了铁勒诸部。由于处罗可汗搜刮无度，又引起铁勒诸部的起义。同时铁勒又常侵犯隋朝边境，隋朝在大业三年对铁勒用兵，铁勒失败后"遣使谢罪，请降"。在隋朝控制铁勒诸部后，大业四年，炀帝派"司朝谒者"崔君肃见西突厥处罗可汗。当时，东突厥莫何干可汗已死，继立的突利可汗被隋炀帝封为启民可汗。崔君肃对处罗可汗指出：启民可汗降隋的目的在于借隋大军以消灭西突厥。今天隋天子派使臣来此，就在于怜悯你。处罗可汗"流涕再拜，跪受诏书"，并遣使者随崔君肃入朝，进贡"汗血马"。

在解决了西突厥的问题后，隋炀帝即着手解决吐谷浑问题。吐谷浑是鲜卑族慕容部的一支，原居于徒河之青山（辽宁义县境内）。西晋末年迁至青海地区。隋朝初年，吐谷浑时常进扰隋边境，隋文帝几度派兵击败吐谷浑。开皇十一年吐谷浑酋长夸吕（或作吕夸）可汗死，子世伏可汗继立。隋文帝以宗女光化公主嫁给他。开皇十七年，世伏被部下杀死，弟伏允可汗继立，仍以光化公主为妻。"自是朝贡不绝"。为开通西域，大业四年七月，裴矩说服已臣伏之铁勒，使之攻击吐谷浑。吐谷浑可汗伏允大败，向东逃入西平郡（青海西宁）境内。伏允遣使向隋朝求救。然而，在隋炀帝派杨雄和宇文述率军至西平郡入援时，伏允可汗见隋军过盛，担心有诈，遂率军又向西逃遁。宇文述率军追击，攻占曼头（青海塘格林）、赤水（青海兴海以南）二城。隋军斩首3000余级，俘获其王公以下200人，虏其男女4000口而还。伏允可汗本人率数骑兵逃奔雪山。吐谷浑之"先头王"率男女十余万口降隋。隋朝在吐谷浑故地设置鄯善（新疆若羌）、且末（新疆且末）、西海（新疆柴达木盆地）、河源（青

海西海)四郡。炀帝调发罪人为戍卒,大开屯田,以捍卫通往西域的通道。河西四郡的设置和西突厥的归附,打开了西域诸国与中原的商路。大业五年炀帝西巡时,就有西域27国的使者来朝见。大业年间,相率来朝者有40余国,因此,大业年间设"西戎校尉",专门接待西域诸国的使者。及至隋朝末年社会动乱,伏允乘机东山再起,恢复故地。不过,自大业年间以来,不少吐谷浑人民和汉族人民杂居,两族人民之间的联系日益密切,并渐趋融合。　(翁俊雄)

隋炀帝征高丽

隋炀帝于大业八年(612)、九年和十年发动的三次征伐高丽的战争。

西汉时,燕人卫满东渡浿水(今朝鲜境内的大同江),在朝鲜半岛北部称王。元封三年(前108),汉武帝派兵平定,在其地置玄菟、乐浪、临屯、真番四郡。汉元帝建昭二年(前37),高句骊(汉玄菟郡所辖之县名)人朱蒙始建国。北魏始光四年(427年。高句骊长寿王十五年)迁都平壤。北齐时,高句骊改称高丽。隋朝初年,高丽除占有朝鲜半岛北部外,还占有辽水以北部分地区。而朝鲜半岛西南部有百济,东南部有新罗,与高丽成三国鼎立状态。三国中以高丽最为强大。

由于汉朝在半岛设立过四郡,以后历代或在其地设郡,或封其王,因此,隋朝统一全国以后,统治者认为应该着手恢复旧日的疆土。开皇十八年(598)高丽王高元又自辽东(辽宁辽阳)进攻辽西(辽宁锦州东),虽然这次进攻被隋营州总管韦冲所击退,却促使隋文帝下了进攻高丽的决心。隋文帝于当年二月命汉王杨谅为元帅、高颎为元帅长史,率水陆大军30万,大举进攻高丽。但是,水军遇风,漂没很多船舰;陆军遇到霖潦,饷运不继,加以疾疫流行,遂失败而归。高元也乘机遣使请和,文帝借此罢兵。

大业三年隋炀帝巡幸到突厥启民可汗牙帐时,高丽王所派使者也在牙帐,启民可汗不敢隐瞒,遂引使者谒见炀帝。隋朝君臣因而议论进攻高丽一事。裴矩说:高丽之地,汉代在那里设郡;西晋也统辖过那里。现在高丽王竟不臣服,先帝早欲征伐。但汉王杨谅不肖,出师无功。今陛下在位,怎能不过问此事?在裴矩的建议下,炀帝要高丽王高元来朝。高元不予理会,炀帝以此为借口,连续发动三次进攻高丽的战争。

第一次征伐高丽,炀帝做了许多准备。在涿郡(北京)建临朔宫,作为出兵的根据地。在太行山以东增置军府,令养战马以供军。开凿永济渠(河南武陟县西北沁水河口至涿郡),以运输军粮及军械。大业七年二月,炀帝下诏征伐高丽。征发全国水陆军分别集中于东莱(山东掖县)和涿郡,又调江淮以南水手、弩手及排镩手7万余人北上。命河南、淮南和江南地区造戎车5万辆送至高阳(河北白洋淀)。又令元弘嗣于东莱海口督造战船。此外,又征挽车驾船民伕230余万人,日夜不停地运送武器粮秣等军需物资,积于泸河、怀远镇(沈阳与辽阳之间)。

大业八年正月,第一次征伐高丽战争开始。这次征调水陆大军共1133800人。水军由右翊卫大将军来护儿率领,从东莱海口出发,浮海先行;陆军由炀帝亲自统率,兵分左、右十二军。每军置大将、亚将各一人。骑兵40队,10队为团。步兵80队,分为四团。团各有偏将1人,受降使1人。各团将士的铠胄、缨拂、旗幡之颜色各异。每日有一军出发,各军相距40里,用了40天各军才出发完毕。这一支队伍,浩浩荡荡,鼓角相闻,旌旗绵亘960里。真所谓"近古出师之盛,未之有也"。

三月十四日,隋军马至辽水西岸布阵,高丽兵在东岸拒守,隋军无法渡水。炀帝命工部尚书宇文恺造浮桥于辽水西岸。造好后发现桥身短少一丈余,够不到东岸。这时东岸高丽兵骤然增加,隋军骁勇者争先跳入水中接战。高丽兵在东岸狙击,隋兵死伤甚众。左屯卫大将军麦铁杖、武贲郎将钱士雄、孟金叉等战死。炀帝又命少府监何稠接桥,二日而成。隋军陆续从桥上通过,在东岸大败高丽军,高丽兵死伤万计。隋军乘胜进围辽东城(辽阳市)。

五月,隋军进攻辽东城,高丽军固守。此前,炀帝曾告诫各军将领:凡进军,应兵分三路,如进击,必须相互配合,不得孤军独进。凡军事进止,必须奏闻,在得到命令前,诸将不得专擅。在隋军猛攻、高丽军不能支持之时,由于先有上述"不得专擅"的命令,诸将不敢乘势攻入城内,只好用快马驰奏。待进占命令到达后,城中又加强了防御。这种情形反复出现,因而,辽东城久攻不下。六月十一日,炀帝至辽东城南观察城池形势,很不满意,威胁诸将说:你们怕死,不肯尽力。不要以为你们官高、家世显赫,我就无可奈何你们!说完,炀帝就到辽东城西数里的六合城中去。

隋军围攻辽东城的同时,右翊卫大将军来护儿率江淮水军数万乘楼船从东莱海口出发,渡海,沿朝鲜半岛的浿水进军,在距平壤60里处打败高丽军。来护儿欲乘胜取平壤,副总管周法尚提醒他:不可孤军独进。来护儿不听,率精兵4万,直抵平壤城下。此

时高丽在罗城中埋伏下很多伏兵。而在城外只用少数士兵迎战，佯败，诱使隋军入城。隋军入城后，来护儿纵军大肆掠夺，不成队伍。此时，高丽伏兵齐发，隋军大败。来护儿只率数千人逃至海浦。后来得知宇文述等诸军溃败，只好班师。

炀帝见久围辽东城不下，遂命左翊卫大将军宇文述、右翊卫大将军于仲文等率领九路人马，共305000人绕道至鸭绿水岸会合，以攻取平壤。大军出发前，炀帝对宇文述说：按古礼，年逾七十，率军出征，允许其妇女随军。公宜以家累自随。虽然也有“妇人不入军”之说，那是指临战时而言。如果不是临战，妇女在营垒之间并无妨碍。项羽、虞姬的故事，就说明了这一点。与此同时，炀帝因于仲文有计谋，乃令其节度诸军。

在大军出发前，人马皆给百日粮，又给排甲、枪矟、衣资、戎具、火幕，这些合起来，每人要负重三石以上！虽有“遗弃米粟者斩！”的军令，军士仍将大部粮食、军械掘坑掩埋。因此，九路人马至鸭绿水岸时，军粮已经不多。

高丽王派大臣乙支文德至隋军营寨诈降，以观虚实。于仲文在此前曾奉炀帝密旨：若遇高元及文德来时，必擒之。于仲文准备行动，却被当时担任炀帝与于仲文之间联络的“慰抚使”刘士龙制止。于仲文只好听任文德返还。既而又后悔，立即派人想把他骗回，文德不顾，渡鸭绿水而去。于仲文、宇文述因失文德而深为不安。宇文述又考虑军粮已尽，主张班师。于仲文则主张立即派兵追拿文德，宇文述反对。于仲文怒曰：将军仗十万之众，不能破小贼，何颜以见帝！且仲文此行，固知无功。何则？古之良将能成功者，军中之事，决在一人。今人各有心，何以胜敌！宇文述见他如此，不得已而服从他，与诸将渡鸭绿水追拿文德。文德见隋军有饥色，意欲使其疲劳，因而，每与隋军接战，即走。宇文述一日之中，七战皆捷。于是，又渡萨水，在距平壤30里处扎下营寨。文德又遣使诈降，向宇文述说：如果隋军撤走，当使高元至行在所（指炀帝的临时住所）。宇文述明知其诈，由于缺粮，加以平壤防守坚固，也就顺水推舟，答应撤军。宇文述等所率诸军，结成方阵而行，高丽四面抄击。秋七月二十四日至萨水，隋军半渡，高丽击其后军，右屯卫将军辛世雄战死。于是，诸军俱溃，将士奔还，一日一夜至鸭绿水，行450里。当初九军渡辽水时，共305000人，及至撤回辽东时，只剩2700人。至于资储器械亡失殆尽，第一次征伐高丽的战争以失败而告终。这一次战争，只是在辽水西攻拔高丽在辽水西所置“武厉逻”（“逻”即巡逻据点），在此地设置辽东郡及通定镇。二十五日，炀帝自辽东还东都。

大业九年第二次征高丽。四月二十九日炀帝命宇文述与上大将军杨义臣渡鸭绿水取平壤。命右骁卫大将军来护儿率舟师自东莱攻平壤。炀帝亲率左光禄大夫王仁恭等攻辽东。辽东城久攻不下，炀帝命造布囊百余万口，满贮土，积为“鱼梁”大道，阔三十步，高与城齐，使战士登而攻之。又做八轮楼车，高出于城，夹鱼梁道，欲俯射城内，指期将攻，即将攻下。这时，杨玄感起兵，危及隋朝统治，炀帝下令班师。宇文述、杨义臣率军自鸭绿水班师，来护儿自东莱班师。两军奉命追击杨玄感。攻辽东城之军，炀帝“密召诸将，使引军还”。军资、器械、攻具，积如丘山，皆弃之而去。隋军人心惶惶，溃不成军，高丽军随而抄击，直过辽水。第二次征高丽战争又告失败。

第三次征伐高丽战争。大业十年二月炀帝下诏征天下兵征高丽。这时各地农民起义相继爆发，所征之兵多不至。炀帝在怀远镇（沈阳、辽阳之间）坐镇。仍命来护儿率水军从东莱海口出发进攻平壤。来护儿先至卑奢城（旅大市），击败高丽守军，将乘胜取平壤。此时高丽亦困敝，高丽王元遣使请降，并将因与杨玄感关系密切而逃亡高丽的前兵部尚书斛斯政囚送隋军。炀帝大悦，遣使持节召还来护儿。来护儿虽然认识到这次攻辽，仍是“劳而无功”，但不敢违抗诏书，只好奉诏班师。八月初四，炀帝自怀远镇班师。十月初三至东都，二十五日，还西京。以高丽使者及斛斯政告太庙。仍征高丽王元入朝，元竟不至。炀帝虽然下敕书声称“更图后举”，但并未实行。

（翁俊雄）

隋末农民大起义

大业七年（611）爆发的隋末农民大起义席卷全国，最终推翻了隋王朝的统治，为唐朝的建立扫清了道路。

隋文帝平定陈朝、统一全国，并且进行了一系列的政治改革，出现了“户口滋盛，中外仓库无不盈积”的局面。炀帝即位后，形势逐渐逆转。他凭借雄厚的人力、财力，建东都，修西苑，筑长城，开运河，幸江都，每年都要征调大量劳动力，动辄一二百万。在各项工程的营建过程中，“僵仆而毙者，十四五焉”。尤其是进攻高丽的战争，征调的民夫与士卒达三四百万人，在征战过程中死伤尤多。大业七年，由于山东、河南发大水，这年因水灾和征高丽，“死者数十万”。由于丁壮被征发，剩下老弱、妇女进行生产，以至“耕

稼失时，田畴多荒”。如此滥用民力，将农民逼迫至死亡的边缘，农民忍无可忍，一场波澜壮阔的农民大起义爆发了。

大业七年二月隋炀帝第一次颁布征高丽的诏书，随即在全国征发士卒和民夫，天下骚动。不久，在山东章丘的长白山一带聚集了一支农民起义的队伍。领导者邹平民王薄，自称“知世郎”，作《无向辽东浪死歌》：

“长白山前知世郎，纯着红罗绵背裆。长矟侵天半，轮刀耀日光。上山吃獐鹿，下山吃牛羊。忽闻官军至，提刀向前荡。譬如辽东死，斩头何所伤！”以反对隋炀帝发动的进攻高丽的战争为号召，附近“避征役者多往归之”，揭开了隋末农民战争的序幕。

隋末农民大起义经历了三个阶段。从大业七年王薄起义至大业九年杨玄感（？—613，弘农华阴（今属陕西）人）起兵为第一阶段。这中间隋炀帝先后发动了两次进攻高丽的战争。农民起义主要是反对进攻高丽的战争。起义军主要集中在山东、河北交界地区。起义队伍除王薄领导的长白山起义军之外，比较著名的有：刘霸道据豆子䴚（山东惠民）、孙安祖据高鸡泊（山东恩县）、鄃县（山东夏津）人张金称据河曲、蓨县（河北景县）人高士达在清河（今属河北）境内起义。这一阶段的起义军，多是由躲避兵役、徭役的农民组成。孙安祖最为典型。为进攻高丽而征调士卒时，孙安祖因骁勇被选为“征士”。安祖因故请求免征，县令怒，笞之。安祖刺杀县令，藏匿于同县窦建德（573—621，清河漳南（今河北故城东北）人）家中。建德也以勇敢被选为征辽“二百人长”。建德对安祖说：文皇帝在位时，天下殷盛，发百万之众伐高丽，尚为所败。今水潦为灾，百姓困穷，加以往岁西征（吐谷浑），行者不归，疮痍未复，主上不恤，今又发兵，亲击高丽，天下必大乱。大丈夫不死，当立大功，岂可但为亡虏邪！于是，召集数百少年，交孙安祖率领，以高鸡泊为活动中心，举行起义。地方官得知窦建德支持起义军，下令逮捕，捕获不着，将其家属杀死。于是，窦建德率麾下200人投奔在清河一带活动的高士达。不久，孙安祖死，其众归建德。窦建德有兵渐至万人。在这一阶段中，由于起义的地区有限，起义队伍又很分散，因而，对隋王朝还没有构成严重威胁，因此，隋炀帝除下令地方官对起义军进行镇压之外，仍集中全力进行第一次和第二次对高丽的战争。大业九年第二次征高丽不久，杨玄感在黎阳起兵，围攻东都，隋炀帝才从高丽撤军镇压杨玄感，随后加强了对农民起义进行镇压。

自大业九年杨玄感起兵至大业十二年七月炀帝第三次巡幸江都为第二阶段。其特点是农民起义从黄河流域向长江流域发展，形成全国性的农民大起义，隋王朝趋于土崩瓦解。这一阶段农民起义受到第二次征高丽和杨玄感起兵的极大影响。大业九年七月，余杭（杭州）民刘元进起义，响应杨玄感起兵。三吴地区农民议论：前些年天下全盛，我们父兄征高丽犹大半未归，而今与前大不相同，还要征高丽，我们还能活下去吗！他们纷纷参加刘元进领导的起义军，旬日间众至数万。此后，吴郡（苏州）朱燮起义，“民苦役者赴之如归”；晋陵（常州）管崇起义，“众益盛，至十万”。杨玄感起兵失败后，朱燮、管崇推刘元进为主，迎元进据吴郡，称天子；朱燮、管崇俱为尚书仆射，置百官。毗陵（常州、无锡）、东阳（浙江金华）、会稽（绍兴、宁波）、建安（福建福州）等郡都“执长吏”，纷纷起义。隋炀帝派江都（扬州）丞王世充发淮南兵数万人镇压，刘元进、朱燮、管崇先后战死，然而，“余党复相聚为盗，官军不能讨，以至隋亡”。大业十年炀帝发动第三次征伐高丽战争，激起更广泛的农民起义。炀帝感到他的统治基础已经动摇，仍妄图割据江淮，残守半壁江山，遂于大业十二年七月第三次巡幸江都。炀帝从中原地区逃至江淮，表明隋王朝已经土崩瓦解，这也是农民起义进入第三阶段的标志。

从大业十二年七月炀帝第三次巡幸江都至唐武德元年（618）三月炀帝被杀，为隋末农民起义的第三阶段。在这一阶段中，由于第三次征高丽的战争已经以最后失败而结束，农民起义的矛头已由反对战争本身转变为反对战争的后果上。隋炀帝滥用民力与发动征高丽战争的社会后果日益严重。在这一阶段中，徐世勣曾对李密说：“天下大乱，本为饥馑”，李密也对翟让说：“今百姓饥馑”，就充分说明了这一点。在这一阶段中遍布全国的农民起义逐渐会合为三支强大的武装力量，成为摧毁隋王朝的基本力量。

翟让（？—617，东郡韦城（今滑县东南）人）、李密（582—618，京兆长安（今属陕西）人）领导的瓦岗军，是三支农民起义军中最强大的一支，也是推翻隋王朝的主力军。瓦岗，在今河南滑县附近，是个不大的山岗。瓦岗之西的白马津，自古为兵家必争之地。瓦岗位于黄河、济水之间，河汊很多。韦城县人翟让领导万余人在瓦岗起义，其中，“齐、济间渔猎之手”是基本群众。大业末年，徐世勣参加了瓦岗军，建议邀截来往于通济渠上的公私船只，解决起义军的给养。翟让采纳，于是兵众大振。瓦岗军自李密参加后，

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杨玄感起兵失败后，李密逃入京兆府冯翊县从叔李询家，后被邻人告发，被捕。不久，在押解途中逃遁，于大业十二年参加瓦岗军。李密指出了随着起义队伍扩大粮草匮乏的严重性，建议直取荥阳，休兵馆谷，待士马肥足，然后与人争利。翟让同意，领兵破金堤关，攻下荥阳郡(河南郑州一带)的许多县城。荥阳太守郇王杨庆不能讨，炀帝命张须陀为荥阳通守征讨起义军。十月，须陀领兵袭击翟让。由于以前须陀打败过翟让，因而翟让闻其来，大惧，将避之。李密说："须陀勇而无谋，可一战而擒也。公但列阵以待，密保为公破之。"乃分兵千余人埋伏于大海寺北林间。翟让接战不利，须陀追击十余里，李密发伏兵掩袭，须陀兵败。李密与翟让、徐世勣等合军围攻张须陀，须陀战死，"河南郡县为之丧气"。翟让因此一战，令李密建牙，别统所部，号"蒲山公营"。翟让对李密说："今资粮粗足，意欲还向瓦岗，公若不往，听公所适，让从此别矣！"翟让领兵东向。李密领兵西向，至康城县，说下数城，大获资储。翟让后悔，复领兵从李密。大业十三年二月，李密劝翟让进攻洛口仓，然后发粟赈济穷乏百姓，号召民众，发展实力。翟让同意，两人率精兵7000人出阳城北，逾方山(陆浑县境内)，自罗口(巩县境内之长罗川口)攻破了巩县境内的兴洛仓(即洛口仓)，开仓让百姓任意取粮，老弱襁负，道路相属。由于李密建议夺取洛口仓，翟让推举李密为主，尊李密为魏公，建行军元帅府，置元帅府长史以下官属。李密拜翟让为上柱国、司徒、东郡公，亦置长史以下官属，减元帅府之半。此时李密众至数十万。李密扩建洛口仓城，方40里。并派兵东略地，取安陆(今属湖北)、汝南(今属河南)、淮安(湖北泌阳)郡，河南郡县多降于密。三月，巩县县令柴孝和投降起义军；李密又派裴仁基等率2万余人夺取洛阳北之回洛仓，声势大振。隋炀帝命监门将军庞玉、虎贲郎将霍世举率关中兵支援东都。柴孝和建议李密用翟让守洛口仓，裴仁基守回洛仓，亲自领精兵袭取长安，据有关中，传檄天下，成就王业。由于李密部下均为太行山以东人，李密担心他们不愿随他进军关中，没有采纳。五、六月间，李密与东都将领段达、关中将领庞玉为争夺回洛仓反复争战，最后仍由起义军控制。此时，李渊自晋阳进军关中，为稳住李密，以书遗李密。李密自恃兵强，欲为盟主。在复书中说："自唯虚薄，为四海英雄共推盟主。"李渊得书笑曰："吾方有事关中，不如卑辞推奖以骄其志。俟关中平定，据险养威，徐观鹬蚌相争，以收渔人之利。"在瓦岗军的掩护之下，李渊顺利进军关中。徐世勣对李密说："天下大乱，本为饥馑，如果再得黎阳仓，大事济矣。"李密遣徐世勣率麾下5000人自原武渡黄河，袭破黎阳仓，开仓让百姓就食，旬日间得胜兵20余万。起义军占领了淮南许多郡县。此时，泰山道士徐洪客献书于李密，以为："大众久聚，恐米尽人散，师老厌战，难以成功。"建议："乘进取之机，因士马之锐，沿流东指，直向江都，执取独夫，号令天下。"李密虽壮其言，竟未采纳。

正值瓦岗军据有洛口、回洛和黎阳仓，控制了河南、淮南很多郡县，起义军人数已达百万，同时全国形势也日趋复杂之际，起义军内部发生了裂痕。翟让司马王儒信劝让自为"大冢宰"，以夺李密之权。翟让不听。而翟让兄翟弘从旁附和：天子应当自己做，怎么能让给别人？你如不做，由我来做。李密得知后，非常厌恶。在翟让身边出现的现象，在李密身边也出现了。有一次，翟让对房彦藻说：你前时破汝南，得到的宝货，都给了魏公，却不给我。李密乃我所立，将来如何还未可知！房彦藻与左司马郑颋对李密说：翟让贪愎不仁，不把你放在眼里，应该早日解决！李密说：今日大局未定，先相互诛杀，这很不好。郑颋说：毒蛇螫手，壮士断腕，为的是保全性命、从大处着眼。如果让他先下手，那就悔之莫及了。于是，李密设宴，在席间将翟让杀害。这一严重错误影响深远，"密之将始有自疑之心"。

正在此时，李渊已进入长安，遥尊炀帝为太上皇，立代王杨侑为帝，自为唐王、大丞相，为建立唐朝做准备。李密在杀害翟让后，尽量弥补内部的裂痕，同时倾全力在洛阳、巩县之间大败王世充，世充被迫龟缩在东都外郭城内之含嘉仓城。而李密乘胜进据距东都不远的金墉城，以30万兵陈于北邙山，军势甚盛。于是，偃师、柏谷及河阳都尉独孤武都、检校河南郡丞柳燮、职方郎柳续等隋朝官吏各举所部降于李密。而窦建德、孟海公、徐园朗等农民起义首领更纷纷遣使奉表劝李密即皇帝位。

窦建德领导的起义军，在河北有了很大发展。大业十二年十二月，炀帝派涿郡通守郭绚率兵万余人讨高士达。高士达自以才略不及建德，乃晋建德为军司马，悉以兵授之。建德自率精兵7000人迎敌，伪称与高士达不和，遣使请降。郭绚信以为真，遂引兵随建德攻击高士达。行至长河(河北故城)，建德乘郭绚不备，率兵袭击，郭绚全军覆没。此时太仆卿杨义臣率兵万余人在镇压了张金称所率起义军之后，乘胜欲袭击高士达。建德对士达说："杨义臣新破金称，远来袭我，其锋不可当。"建议："请引兵避之，令其欲战

不得，空延岁月，将士疲倦，乘便袭击，可有大功。"士达不从，令建德守壁，自率精兵迎敌。五日后，杨义臣大破士达，并将其斩首。此时隋炀帝担心杨义臣功大难制，将杨义臣调回，并放散其兵。窦建德乘机收集张金称及高士达余部，军复大振。此后"隋郡长吏稍以城降之；军容益盛，胜兵十余万人"。大业十三年正月，窦建德在河间乐寿（河北献县），自称长乐王，署置官属。七月，炀帝派涿郡留守薛世雄率精兵 3 万人南下讨李密，命王世充等皆受其节度。薛军行至河间城南，营于七里井。建德选精兵数千人，埋伏于河间南界泽中。同时悉拔诸城伪遁，声称："亡入豆子航中"。薛世雄不设备。建德自率敢死士 1000 人袭击薛世雄。当时云雾很大，两军不辨，隋军大溃，自相踏藉，死者万余，世雄以数百骑逃回涿郡，余军悉降。这次大战，起义军消灭了河北地区隋军主力，起义军控制了河北地区，并且有力地支援了瓦岗军。

大业十二年杜伏威(? —624，齐州章丘(今属山东)人)领导的江淮起义军也有很大的发展。杜伏威是齐州章丘人，大业九年，率众参加长白山起义。杨玄感起兵失败后，一部分隋军主力从河南调至山东，围剿长白山一带的农民起义军。由于隋军的强大压力，杜伏威率领农民军转战淮南，合并了下邳（江苏邳县）苗海潮和海陵（江苏泰州）赵破阵领导的小股起义军，壮大了队伍。七月，杜伏威占领具有战略意义的六合（今属江苏）。大业十三年隋炀帝派大将陈棱率军镇压。陈棱采取"闭壁不战"的战略。杜伏威送他一身妇人衣服，称之为"陈姥"以激怒他。陈棱中计，被杜伏威打败。起义军乘胜进攻高邮，占领历阳（安徽和县），杜伏威自称总管，以辅公祏为长史，分兵攻城略地，江淮间许多农民起义军都来归附。

在河南、河北和江淮农民起义军的沉重打击之下，隋王朝面临末日。唐武德元年三月，隋将司马德勘和宇文化及，乘隋末农民大起义造成的天翻地覆的形势，在江都发动兵变，绞死隋炀帝，结束了隋王朝 37 年的统治，中国历史又翻开了新的篇章。

（翁俊雄）

杨玄感起兵

大业九年(613)隋炀帝第二次征高丽时，礼部尚书杨玄感于黎阳（河南浚县）起兵推翻隋炀帝的统治，标志着隋统治集团的分裂。

隋炀帝滥用民力征伐高丽，引起农民和统治集团一部分人的反对。早在大业七年炀帝下诏征高丽、进行战争的准备时，邹平县农民王薄就在章丘县长白山聚众起义，反对隋王朝的统治。王薄作《无向辽东浪死歌》，"避役者多往归之"。从此，各地农民纷纷起义。大业九年炀帝发动第二次征高丽战争，礼部尚书杨玄感在黎阳起兵，反对隋炀帝发动的征伐高丽的战争，并且要推翻隋炀帝的统治。

杨玄感(? —613，弘农华阴(今属陕西)人)是司徒、楚国公杨素之子。杨素屡建大功，位极人臣，为炀帝所猜忌。大业二年杨素死。年余，玄感袭爵楚国公，勋至上柱国，升任礼部尚书。玄感鉴于满朝文武多是其父生前将吏，又见炀帝朝纲日紊，对其猜忌日甚，于是与其弟玄纵、玄挺、玄奖、积善等策划废炀帝，立秦王杨浩为帝。杨玄感利用其父之影响，广交海内知名之士，为废立做准备。

炀帝在第二次征高丽之前，派遣杨玄感至黎阳（有大粮仓）督运军粮。玄感与虎贲郎将王仲伯、汲郡"赞治"（郡太守之辅佐官员）赵怀义等密谋，故意逗留漕运，以使渡辽之军乏食。玄感之弟玄纵随炀帝至辽东，玄感秘密派人召还。六月，玄感在黎阳挑选运夫 5000 余人及丹阳、宣城水手 3000 余人，杀牲誓众，宣称：主上无道，不以百姓为念，天下骚扰，战死辽东者以万计！今天起兵，以解除百姓之苦难！于是大家都高呼万岁！

在起兵前，玄感秘密派遣家人至长安，召其弟玄挺及李密来黎阳。李密是李宽之子。李宽，自周至隋，为名将，官至柱国，爵为蒲山郡公。李密，多筹算，才兼文武，开皇中，袭父爵，广交结，与玄感为刎颈之交。玄感起兵，正值李密从长安来，玄感大喜，以为谋主。李密向玄感提出上、中、下三策：乘炀帝在辽东之机，率军入蓟州，占据临渝关（山海关），扼其咽喉，绝其归路。而高丽闻之，必蹑其后，不过旬日，资粮皆尽，其众不降则溃，可不战而擒。这是上策。进军关中，直取长安，收其豪杰，抚其士民，据险而守。主上虽还，失其根本，不久也可擒获。这是中策。挑选精兵，昼夜兼行，袭取东都，以号令四方。然而，必速战速决，切不可拖延时日，如百日不克，天下援兵四面而至，结果则难以预料。此为下策。玄感则说：现百官家口均在东都，若先攻下，必动其心。而且我军经城不拔，何以示威！公之下策，乃上策也。于是，由他本人及弟玄挺、积善分别率三路人马进军洛阳。玄感屯兵东都上春门，对众宣誓：我身为上柱国，家累巨万金，至于富贵，无所求也。今不顾灭族起兵，只为天下解倒悬之急！父老争献牛酒，子弟来军门效力者，日以千数。此时，留守东都的是越王杨侗和民部尚书樊子盖。杨玄感致书樊子盖，数炀帝罪恶，要求他响应

其"废昏立明"之举。此时樊子盖由于接战不利而将其副手"赞治"裴弘策斩首，这使本来应募从军以平玄感的达官子弟不敢进入东都，相反，观王杨雄子恭道、虞世基子柔、来护儿子渊、裴蕴子爽、大理卿郑善果子俨、周罗睺子仲等四十余人皆降于玄感。

正在围攻辽东城的隋炀帝，得知杨玄感起兵，而达官子弟皆降于玄感，倍感忧虑。数日，玄纵逃走事发。兵部侍郎斛斯政与玄感通谋，玄纵逃走是他秘密遣送的。由于担心追究，斛斯政亡奔高丽。炀帝愈益感到事态严重，立即撤军，停止征高丽。同时，派遣虎贲郎将陈棱率军进攻黎阳；派左翊卫大将军宇文述、右候卫将军屈突通发兵讨伐杨玄感；令来护儿从东莱回军救东都。留守长安的代王杨侑派遣刑部尚书卫文升率4万人救东都。

卫文升经过华阴(今属陕西)掘杨素墓，表示与杨玄感势不两立。卫文升率军出潼关，经函谷关，过河阳，直趋东都城北，屯军金谷。卫文升亲率步骑2万渡瀍水，与玄感战。此时杨玄感有兵10万，卫文升寡不敌众，死伤大半。于是，屯兵北芒，与杨玄感决战，一日十余回合。由于杨玄挺中流矢死，玄感军乃稍却。此前，右武侯大将军李子雄因事免官，在来护儿军中效力。玄感起兵，炀帝怀疑他，下诏将他押回。中途，子雄杀使者，逃奔杨玄感。子雄劝玄感立即加尊号、称帝，玄感以此事问李密。李密说：东都防守尚强，天下援兵愈来愈多，公当挺身立战，早定关中为是。玄感也以为然。屈突通率军至河阳屯守，宇文述接其踵而至。玄感问计于李子雄，子雄说：屈突通精晓兵事，他如果渡过黄河，则胜负难决，不如以兵拒之，使其不能过河。这就避免了他与东都的樊子盖、邙山以北的卫文升会合。玄感接受其意见。然而，此时樊子盖出兵袭击玄感军，而屈突通乘机渡过黄河，屯兵破陵(河阳之南岸)，迫使玄感西抗卫文升，东拒屈突通，而樊子盖又自南面加强了攻势。在态势紧急之时，李子雄建议：东都援军愈益增多，而我军屡败，此地不可久留。不如直入关中，开永丰仓以赈贫乏，三辅可指麾而定，然后南面而争天下，亦霸王之业也。于是，七月二十日玄感解东都之围，引兵西取潼关。

杨玄感率军西行，宇文述等诸军追击于后。玄感军行至弘农郡(河南灵宝)，郡太守蔡王杨智积，谓其属下曰：玄感欲入潼关，如得逞，则难克也。应加以阻挠，使不得进，不出十日，可以成擒。于是，登城谩骂玄感。玄感怒，准备攻城。李密说：军贵神速，而且后有追兵，不能滞留！如不能据有潼关，退无所守，大众一散，何以自全！玄感不从，遂攻其城。三日不拔，只得引兵向西，至潼关以西之阌乡。此时宇文述、卫文升、来护儿、屈突通等各军已追至阌乡西之皇天原。杨玄感登槃豆(阌乡西)，布阵五十里，且战且行，一日三败。八月初一，玄感阵于董杜原，宇文述等军击之，玄感大败，独与十余骑奔上洛(陕西商县)，至葭芦戍，对其弟积善说：我不能受人戮辱，你可杀我！积善抽刀斫杀之，并自刺，不死，为追兵所获。至此，杨玄感起兵，完全失败。　　(翁俊雄)

江都兵变与隋炀帝之死

武德元年(618)三月，虎贲郎将司马德勘与屯卫将军宇文化及在江都(江苏扬州)宫发动兵变，缢死隋炀帝，结束了隋朝37年的统治。

大业十二年(616)隋炀帝第三次巡游江都，见到江淮以北已经失去控制，于是无心北归，在江都宫过着醉生梦死的生活。江都宫有百余房，装饰华丽，美人充实其间，每日令一房为主人，轮流前往享乐。江都郡丞赵元楷掌供酒馔，炀帝、萧后及幸姬每日宴饮，酒卮不离口，从姬千余人亦常醉。炀帝以此掩盖内心的苦闷与恐惧。他虽然知道江山难保，却幻想自己不失为陈叔宝，萧后不失为沈后(陈后主皇后)。一日，他对镜自照，对萧后说：好头颈，谁当斫之！经常备毒药以自随。他还经常自我安慰，曾对萧后说：人生有贵有贱，贵贱轮番，有何关系？对其结局虽然心中有数，但是，仍怀着割据江南、残守半壁江山的愿望。因此，他欲以丹阳(江苏南京)为都城，命群臣廷议之。内史侍郎虞世基等竭力反对，主张回长安。门下录事李桐客说：江东土地卑湿，物产不丰，现供应皇帝与三军，负担太重，百姓不堪忍受，终会出乱子。话一出口，立即以谤毁朝政的罪名，受到御史的弹劾。于是公卿立即改口，顺从炀帝的心愿说：江东之民早就盼望陛下过江。陛下过江，就如同当年大禹过江一样！炀帝遂命建丹阳宫，准备迁都。

随从炀帝第三次巡游江都的骁果多为关中人，他们没有料到炀帝从此不归。一年后，江都骁果多逃回关中。炀帝问其故，裴矩说：军士在这里没有家室，难以长此下去。请准军士在这里娶妻。炀帝同意。九月，召江都境内寡妇及处女集宫下，让将士挑选，即予匹配。二年后，江都粮尽，骁果不得饱食。虽然炀帝征调上江(夏口以上为上江)米船至江都，又从东吴调运粮食，然而，一时之间尚未运到，加以久客思乡，骁果多谋叛归。郎将窦贤遂率所部西走，炀帝派骑兵追斩之，而逃亡者还不能止。

骁果人人欲逃还关中，使武将处境为难。虎贲郎将司马德勘奉命领骁果屯东城，他对好友虎贲郎将元礼、"直阁"裴虔通说：今骁果人人都要逃跑，我要报告，恐怕会杀我；不说，以后事发，亦不免灭族。怎么办？又听说华阴县令以永丰仓叛归李渊，主上就将他的两个弟弟囚禁起来，打算处死。我们家属全在长安，能不考虑吗？二人皆惧怕。德勘说：骁果若逃亡，不如与他们一起走。二人皆欢喜。因而转相招引，先后串通内史舍人元敏、虎牙将赵行枢、鹰扬郎将孟秉、符玺郎李覆、牛方裕、直长许弘仁、薛世良、城门郎唐奉义、医正张恺、勋侍杨士览等。他们日夜商议叛亡之计，无所畏避。有宫人对萧后说："外间人人欲反。"萧后说：去奏明主上。宫人于是对炀帝说了，炀帝大怒，认为这话"非所宜言"，遂将宫人斩首。其后有宫人再向萧后提到此事，萧后则说："天下事一朝至此，无可救者，何用言之，徒令常忧耳。"自是不再有人提此事。赵行枢与将作少监宇文智及亲厚，杨士览是智及的外甥，赵、杨二人以密谋告智及，智及大喜。司马德勘等准备于武德元年(618)三月十五日前后结伙西逃。智及说：主上虽然无道，但他手中仍握大权，你等逃亡，是自取灭亡。今天，隋的天命已尽，英雄并起，不如干脆一不做二不休，此帝王之业也。德勘等甚以为然。赵行枢、薛世良请以智及兄右屯卫将军、许国公化及为主。结约既定，乃告化及。化及性驽怯，初闻之，变色流汗，既而从之。

十日，司马德勘悉召骁果军吏，将其谋告诉他们。军吏都说："唯将军命！"是夜，元礼、裴虔通直阁下，专主殿内；唐奉义主闭城门，与虔通相知，诸门皆不下键。至三更，德勘于东城集兵得数万人，德勘使人于城内举火与城外相应。炀帝望见火，问何事？虔通回答："草坊失火，外人共救之耳。"十一日，天未明，德勘调拨士卒给虔通，以代诸门卫士。以前，炀帝选强健官奴数百人置玄武门，谓之"给使"，以备非常。司宫魏氏为炀帝所宠信，化及等结之为内应。是日，魏氏矫诏悉听给使出外。此时竟无一人当值。司马德勘引兵自玄武门入，炀帝闻乱，易服逃入西阁。虔通与元礼率兵敲左阁，魏氏开启，遂入永巷，问："陛下安在？"有美人出，指之。校尉令狐行达拔刀直进，炀帝从窗内对行达说："你要杀我吗？"行达说："臣不敢，只是想奉陛下还长安。"因扶炀帝下阁。裴虔通曾是炀帝为晋王时的亲信，炀帝见之，对他说："卿非我故人乎！何恨而反？"回答："臣不敢反，但将士思归，欲奉陛下还京师耳。"炀帝说："朕方欲归，正为上江(夏口以上为上江)米船未至。今与汝归耳。"天明，孟秉以甲骑迎宇文化及，化及战栗不能言。化及至城门，司马德勘等引至炀帝寝殿。稍后，炀帝被引入寝殿，虔通、德勘等拔白刃侍立。炀帝叹曰："我何罪至此？"马文举说："陛下不在京师守宗庙，到处巡游不止。对外征战不已，在内穷奢极欲。百姓不能安生，盗贼蜂起。重用佞谀之人，饰非拒谏。怎么说没有罪！"炀帝说："我实在对不起百姓，至于你们，荣禄兼极，怎么会这样！今日之事，谁为首领？"司马德勘说："溥天同怨，何止一人！"化及又使封德彝数炀帝罪，炀帝说：你是个读书人，怎么也会这样？德彝赧然而退。炀帝爱子赵王杨杲年十二，在帝侧，号哭不已，虔通斩之，血溅御服。虔通等欲杀炀帝，炀帝说："天子死自有法，何得加以锋刃？取鸩酒来！"马文举等不许，使令狐行达按炀帝令其坐，炀帝自解练巾授行达，行达缢杀之。炀帝时年五十。起初，炀帝自知必及于难，常以罂贮毒药自随，对幸姬说："若贼至，汝曹当先饮之，然后我饮。"及乱，顾索药，左右皆逃散，竟不能得。萧后与宫人撤漆床板为小棺，与赵王杲同殡于西院流珠堂。炀帝每巡幸，常以蜀王秀自随，囚于骁果营。炀帝死，化及欲奉秀立之，众议不可，乃杀秀及其七男。又杀齐王暕及其二子，并燕王倓，隋氏家室、外戚，无少长皆死。齐王暕素失爱于炀帝，互相猜忌。炀帝闻乱，对萧后说："得非阿孩(暕小字阿孩)邪？"化及使人就第杀暕，暕以为是炀帝所使。父子死不相明。唯秦王杨浩素与宇文智及往来，暂时得以保全，武德元年九月，被宇文化及缢死。　（翁俊雄）

唐

李渊晋阳起兵

大业十三年(617)七月太原郡留守李渊在晋阳起兵,为唐朝建立奠定了基础。

李渊(566—635),祖籍陇西狄道(甘肃临洮),十六国时凉武昭王李暠的后代。祖李虎,西魏柱国大将军,赐姓大野氏,死后追封为唐国公。父李昞为北周安州总管、柱国大将军,袭爵唐国公。李渊7岁时,袭爵唐国公。北周末年杨坚秉政时,复还本姓。李渊历任刺史、郡太守、卫尉少卿等职,隋大业十二年任太原郡留守。李渊是隋文帝独孤皇后的姨侄。李渊的祖先三代以来,是西魏、北周、隋的大贵族。

大业十一年四月,李渊自卫尉少卿迁任山西、河东抚慰大使,其职责之一是:"发河东兵讨捕群盗"。翌年任太原郡留守。王威、高君雅为副留守。此时,山西农民纷纷起义,李渊上任不久,先后镇压了历山飞、毋端儿等领导的农民起义军。在镇压农民起义过程中,李渊看到隋朝已土崩瓦解,就乘机发展势力,命长子李建成(589—626)"于河东(山西永济)潜结英俊";次子世民(599—649)"于晋阳(太原郡郡城内)密招豪友"。晋阳县令刘文静与李密是儿女亲家,因而被囚于太原郡狱。大业十三年李世民就狱中探视,文静对他说:今主上南巡江都,李密围逼东都,当此之时,取天下如同反掌。令尊有兵数万,不过半年,帝业可成!世民说:君言正合吾意。晋阳宫(隋炀帝新建之离宫,在太原郡郡城内)"宫监"裴寂,原与李渊有旧,经常往来。刘文静为使李世民与之结交,让世民出钱百万,由龙山县令高斌廉出面,以赌博的形式,将钱奉送与他。裴寂遂与世民亲密,"世民乃以其谋告之,寂许诺"。

突厥进犯马邑(山西朔县),李渊派副留守高君雅会同马邑太守王仁恭拒之,战不利,李渊畏惧,担心得罪。李世民乘机进言:"今盗贼日繁,遍于天下,大人受诏讨贼,贼可尽乎!终不免罪。不如顺民心,举义兵,转祸为福,此天授之时也。"李渊乍听,胆战心惊,但一转念,乃叹曰:"今日破家亡躯亦由汝;化家为国亦由汝!"李渊虽已下了举兵的决心,但由于长子建成、四子元吉(三子元霸早夭)尚在河东,故迁延未发。不久,马邑校尉刘武周据"汾阳宫",举兵反。世民对李渊说:"大人为留守,而盗贼据离宫,不早建大计,祸即至矣!"李渊于是召集将佐,对他们说:"刘武周据汾阳宫,吾辈不能制,罪当灭族,如之何?"副留守王威等请李渊出计,李渊故作为难:如集兵,先须朝廷允准,然而,江都在三千里外,势必迁延时日,错过战机。王威等说:"要在平贼,专之可也。"李渊假作不得已的样子,说:这么说来,首先要集中兵力。于是命李世民与刘文静等各募兵,远近赴集,旬日间近万人。同时,密遣使至河东召建成、元吉;至大兴城(长安),召婿柴绍。王威、高君雅见李渊大集兵,怀疑他有异志,因此设计,让李渊至晋祠祈雨,乘其不备,将其杀死。晋阳乡长刘世龙将这一阴谋向李渊泄露。李渊先下手,五月十五日,召王、高二人议事,渊使刘政会当场告王威等勾结突厥进犯晋阳,于是立即将二人拿下斩首。六月,李建成、李元吉和柴绍等至晋阳。

在起兵的准备过程中,北方的突厥是个极为重要的问题。刘文静劝李渊与突厥结好,向始毕可汗称臣。因为这样不仅可以稳住突厥,而且可以"资其士马以益兵势"。于是李渊"自为手启,卑辞厚礼"云:

"若能与我俱南,愿勿侵暴百姓;若但和亲坐受宝货,亦唯可汗所择。"始毕可汗得启,立即复书,表示将"以兵马助之"。李渊的军队,从此改易旗帜。隋朝旗帜为赤色,李渊改为"杂用绛白","以示突厥"。李渊就此一事曾表示:"逼于时事,不得不尔。"

太原郡南界西河郡(山西临汾),不服从李渊之命令。李渊派建成、世民攻西河。建成、世民与士卒同甘苦,遇事身先士卒。路旁菜、果,非买不食。军士有私取者,令其赔偿,并不责罚,因此,军士及民皆感悦。至西河城下,民有欲入城者,皆听其入。郡丞高德儒闭城拒守,初十,攻拔之,只斩其一人,其余不问。社会秩序迅速恢复。远近闻之大悦。建成等率兵还晋阳,往返只有九日。李渊高兴地说:"以此行兵,虽横行天下,可也。"遂定入关之计。十四日,建大将军府,并置三军,分为左、右:以建成为陇西公、左领军大都督,统领左三统军;世民为敦煌公、右领军大都督,统领右三统军。裴寂为大将军府长史,刘文静为司马。长孙顺德、刘弘基、窦琮等分为左、右统军。

七月初四,李渊以四子元吉为太原郡守,留守晋阳宫。翌日,李渊率甲士3万从晋阳出发,西入潼关。出发前,李渊立军门誓众,表示此行"废昏立明"之意,即废炀帝,立代王杨侑为帝。初八,李渊至西河郡,一方面赈济贫民;一方面笼络当地"豪俊"。李渊"口询功能,手注官秩",一日之内,任命官员千余人。十四日,大军在距霍邑(山西霍县)50余里的贾胡堡(今张家庄)驻扎。隋代王杨侑派宋老生率精兵2万屯霍邑;屈突通率骁果数万屯河东,以阻遏李渊的军队。霍邑东面是霍山,西面是汾水,地势险要,易守难攻。李渊主力在此被阻,加以秋雨连绵、道路泥泞,而军粮又供应不上,遂派人还太原郡运一月军粮。

十八日,突厥遣其大臣级失、特勤等至李渊军。早在大军出发前,李渊即派刘文静为使,至突厥请兵。刘文静至突厥,见始毕可汗,与之相约:"若入长安,民众土地入唐公,金玉缯帛归突厥。"始毕大喜,遣其使先至,告以兵已上道。

李渊为了在入关时,由李密替他"拒东都之兵,守成皋之厄",于二十一日,以书遗李密,推李密为盟主。李渊对建成、世民说:"桀贼南柔,强胡北附,所忧此辈,今并归心。"李渊在稳住南、北两股势力之后,才能专力西入潼关。

然而,雨久不止,军中乏粮,始毕可汗使者虽至,而刘文静却未还,军中又谣传:突厥与刘武周乘虚袭取太原,李渊遂召集将佐商议北还。裴寂等认为:"宋老生、屈突通连兵据险,未易猝下。李密虽云连和,奸谋难测。突厥贪而无信,唯利是视。武周,事胡者也。太原,一方都会,且义兵家属在焉。不如还救根本,更图后举。"虽经世民、建成的反对,李渊不听,下令大军北撤。入夜,李渊已于军帐中入寝,世民不得入,号哭于外,声闻帐中,李渊召问之。世民说:"今兵以义动,进战则克,退还则散;众散于前,敌乘于后,死亡无日,何得不悲!"李渊乃大悟,说:"军已发,奈何?"世民说:"右军严而未发;左军离去,计亦未远,请自追之。"于是,李世民与李建成夜追左军而还。二十八日,太原运粮至。八月初一,雨止。李渊军迅速攻下霍邑,斩宋老生。李渊进入霍邑,劳赏民吏,选丁壮从军,扩大队伍。此后,沿汾水而下,初八,李渊入临汾郡(山西临汾),劳赏一如霍邑。十五日,李渊至龙门(山西河津)。刘文静与突厥大臣康鞘利所率突厥兵500人、马2000匹来助战。至此,李渊终于解除了后顾之忧。在龙门,面临如何进入潼关问题。有人主张先攻河东,再渡黄河,入潼关。薛大鼎、任瓌则主张:不攻河东,自梁山渡黄河,直指韩城,进逼郃阳,然后进据永丰仓(在华阴县),虽未得长安,关中固已定矣。李渊大喜。二十一日,李渊进军壶口,河滨之民纷纷进献船只,日以百数,以此置水军。当时关中农民起义军中以孙华领导的起义队伍最为强大。李渊早在汾阴时就以书招之。二十四日,孙华自郃阳来见李渊。李渊以孙华为冯翊太守,命其先渡黄河。接着,李渊令左、右统军王长谐、刘弘基、史大奈等率步骑6000自梁山渡黄河,在河西屯军,以待大军。又以任瓌为招慰大使,瓌说服韩城守将投降。九月初七,李渊所遣军队先后攻下龙泉郡(山西隰县)、文成郡(山西吉县)。初十,李渊亲率诸军围攻河东郡。李渊登城东原上西望城内情状,发现"城高甚峻,不易可攻",于是对部众说:"今且示威而已,未是攻城之时。"当日准备率十数万人西入潼关。初八,冯翊太守萧造率官属降,华阴县令李孝常据永丰仓来降。此外,京兆万年、礼泉等县也遣使洽降。此时李渊对部下说:"吾未济河者,正须此耳。今既事办,可以济矣!"十二日,李渊率诸军渡黄河。十六日,舍于朝邑县之长春宫。关中之民,归之者如市。十八日,李渊派李建成率司马刘文静、统军王长谐、姜宝谊等诸军数万人屯永丰仓,并防守潼关;派李世民率统军刘弘基、长孙顺德等诸军数万人往高陵道,先后平定泾阳、云阳、武功、周至、户等县。事实上,在柴绍自长安(即大兴城)赴太原以后,李渊女柴氏归户县庄所,散家资,聚徒众,举兵于周至县之司竹园,平定了周至、武功、始平等县,队伍发展至7万人。而李渊之从父弟李神通亦举

兵于户县。李渊入关后，神通、柴氏各遣使迎渊。因此，李世民进军颇为顺利。二十四日，李渊自长春宫进屯冯翊郡，命建成自永丰仓沿新丰道趋故长乐宫（大兴城西北）；令世民率军自户县道北上屯长安故城（大兴城西）。二十八日李渊亲率大军西向，经下邽，过栎阳，十月初四至灞上（大兴城东南），停于大兴城春明门之西北，与建成、世民所率诸军20余万众会合。大兴城内代王杨侑与留守卫文升、阴世师等闭门拒守。李渊遣使至城下对卫文升表示尊隋之意。卫文升因老、病不视事，而阴世师不予理会。相持十日。十七日，李渊乃下令攻城。十一月初九，军头雷永吉率先登城而入，守城人见势立即逃散。李渊令建成、世民率所统兵，封府库、收图籍。令军民勿杂，勿抢掠，勿惊百姓，使吏民安堵，一如汉初故事。代王杨侑居东宫，乃奉迎居于大兴后殿。此时卫文升已死。十一日，收斩阴世师以下十余人，余无所问。十五日，李渊率百官迎代王杨侑即位于大兴殿，时年仅13岁，是为隋恭帝。遥尊炀帝为太上皇。改大业十三年为义宁元年。十七日李渊自长乐宫入长安。杨侑以李渊为假黄钺、使持节、大都督内外诸军事、尚书令、大丞相，晋封唐王。以武德殿为丞相府，改教称令，日于虔化门视事。十九日诏军国机务，事无大小，文武设官，位无贵贱，宪章赏罚，咸归相府。　（翁俊雄）

唐朝的建立和统一全国

唐王李渊于大业十四年(618)四月即皇帝位于长安，建立唐朝，改年号为武德。自武德元年至贞观二年(628)完成了全国统一。

大业十四年四月，隋炀帝的死讯传到长安，唐王李渊率文武群臣从隋恭帝举哀于大兴后殿。五月，恭帝禅位于李渊。二十日，唐王李渊即皇帝位于太极殿。改元武德，国号唐。二十八日，命裴寂、刘文静等修订律、令。六月初一，以李世民为尚书令，裴寂为右仆射、知政事。刘文静为纳言；窦威、萧瑀为内史令。同时任命六部尚书、侍郎。

唐朝建立前后，全国各地存在着许多称霸一方的军事集团，形势复杂。

北、西北　大业十三年二月，鹰扬府校尉刘武周（？—622，河间景城（今河北交河东北）人）斩太守王仁恭于马邑郡（山西朔县）起兵，依附于突厥，突厥立武周为“定扬可汗”，因而称帝。有兵数万。同月，鹰扬郎将梁师都杀郡丞于朔方郡（内蒙古白城子）起兵，北联突厥，遣兵掠雕阴、弘化、延安等郡，遂即帝位，国号梁。四月，校尉薛举于金城郡（甘肃兰州）起兵，攻占陇西、天水诸郡，自称秦帝，建都上邽（甘肃天水），拥兵13万。武德元年(618)夏，鹰扬府司马李轨于武威郡（甘肃武威）即帝位。不久攻占张掖、敦煌、西平、枹罕诸郡，尽有河西五郡之地。有精兵万余。

河南、河北　武德元年正月，李密率领的瓦岗军攻占偃师（河南偃师），修金墉城以居之，有众30余万，进逼东都。兵威所及，东至海岱，南至江淮。在这期间，窦建德、孟海公、徐园朗等农民起义领袖纷纷通表于密，劝其即帝位。李密说：“东都未平，不可议此。”炀帝死讯传至东都，武德元年五月，太府卿元文都等奉越王杨桐即皇帝位，改元皇泰，是为皇泰帝，全力抵抗瓦岗军。十一月，窦建德于河间郡乐寿（河北献县）称帝，建夏国，后迁都洺州（河北永年东）。先后并吞魏刀儿、徐园朗、孟海公领导的农民起义军，势力从河北发展到河南北部齐、济、兖、曹等州，有众30万。

江淮以南，隋炀帝死后，宇文化及立秦王浩为帝，令其画敕书而已。化及自称大丞相、总百揆，拥兵10余万。武德元年三月，宇文化及率众北上，声言西还长安。以陈棱为江都太守。宇文化及出发前，以据历阳（安徽和县）的杜伏威为历阳太守。伏威不受，乃上表于皇泰帝，皇泰帝拜杜伏威为东道大总管，封楚王。武德元年三月，吴郡太守沈法兴以讨宇文化及为名起兵于吴郡（江苏苏州），连下余杭、毗陵、丹阳诸郡，据江表十余郡，自称江南道大总管，置百官。大业十三年十月，罗川令萧铣于巴陵郡起兵，翌年四月即帝位，置百官，“准梁室故事”。不久，吞并鄱阳湖一带林士弘的队伍，并遣其将杨道生攻陷南郡，遂徙都江陵（湖北江陵）。有胜兵40余万。“东自九江，西抵三峡，南尽交趾，北距‘汉川’（汉水以南），铣皆有之。”

唐朝为解除后顾之忧，首先用兵西北和北方。首战薛举。李渊入长安不久，薛举子仁杲曾领兵进围扶风（陕西凤翔），被李世民击退。武德元年六月，薛举来夺泾州（甘肃泾川），李渊命李世民率军出战，两军战于高墌（陕西武功北），唐军战败。九月，薛举死，子仁杲嗣立。仁杲诸将不和，实力减弱。不久，两军复对垒高墌，李世民按兵不动，相持60余日，待薛军粮尽，大举进攻，十一月初八，薛仁杲降唐，被斩首。唐尽收其地，改隋天水、金城、西平等五郡为秦、兰、鄯、原、泾等五州。接着，唐用反间计俘获李轨。唐派安兴贵前往武威活动，兴贵劝李轨降唐，未果。于是兴贵与其弟安修仁（李轨部将）于武德二年五月发动兵变，俘获李轨，唐不战而得河西。唐改隋武威、枹罕、张掖三郡为凉、甘、河三州，并分张掖郡置肃州；于隋

会宁镇置西会州(后改称会州)。攻刘武周。割据于马邑的刘武周，勾结突厥，对唐朝的发祥地晋阳及河东发动攻势。武德二年九月，攻克晋阳，守将李元吉逃回长安。晋州(山西临汾)以北的城镇，除浩州(山西汾阳)外，全被刘武周控制。十一月，李世民率军乘坚冰过黄河，驻扎柏壁(山西新绛西南)与刘武周对垒。李世民仍采坚壁不战的策略，与刘军相持五个多月。武德三年春，在李世民统一指挥下，浩州唐军突然抢渡汾水，占领介休、平遥一带，斩断刘军汾水东侧运粮要道。刘武周部将宋金刚北撤，李世民率军追击，日夜奋战200余里，于吕州(山西霍县)雀鼠谷(介休西南)一带进行多次战斗，刘武周兵败，逃入突厥。其后又从突厥外逃，被突厥追杀。唐军尽占刘武周之地。武德四年唐改隋马邑郡为朔州。同时，于马邑郡之云内县恒安镇置云州；于楼烦郡之岚城县置东会州(后改称岚州)；于雁门郡之灵丘县置蔚州。

李密降唐。　武德元年三月，宇文化及率众自江都北上，"取彭城(徐州)水路西归"。至彭城，水路不通，改行陆路。路上，宇文化及缢死司马德勘。李密据巩洛以拒化及，化及不能西进，遂引兵向东郡，东郡通守王轨降化及。东都闻化及北来，上下震惧。元文都为使李密击化及，遂与李密和解，拜李密为太尉、尚书令等官。七月，李密与化及战于同山(汲郡卫县境内)下，东郡王轨降密，而化及将陈智略率岭南骁果万余人亦降密。宇文化及率余众2万人北走魏县。此时，东都王世充畏李密强盛遂杀元文都，复拒李密。李密闻变，遂还偃师金墉城。李密虽击败宇文化及，但劲卒、良马多死，元气大伤。王世充乘机攻李密，攻破偃师。而守洛口仓的李密部将邴元真以仓城降王世充。李密尚有黎阳仓，由徐世勣留守，但由于在杀翟让时徐世勣曾受牵连，此时李密不敢入黎阳。在走投无路之时，李密于十一月率瓦岗军余众2万人西入长安，投降唐朝。不久，由于未受重用，李密又从长安出逃，被唐军拿获斩首。

决战中原。　武德三年七月，李世民受命统帅大军进攻东都。王世充征兵洛阳，率步骑3万抵御唐军。又分遣子侄分镇洛阳外围汜水县(河南荥阳汜水镇，即虎牢关)、河内、襄城郡。李世民在拔掉洛阳以西据点慈涧(河南新安东)后，军屯北邙山(洛阳北)；遣史万宝自宜阳下龙门(河南洛阳南)；刘德威沿太行山东下河内；王君廓攻占洛口，以断王世充粮道。东都缺粮，"民食草根木叶皆尽"。至武德四年二月，洛阳外围据点多被唐军控制，河南州县大部降唐。李世民看到时机成熟，下令向洛阳发动攻击。王世充向窦建德求援。窦建德在武德二年二月打败宇文化及并将其斩首，此后窦建德的势力又有很大发展。窦建德的中书侍郎刘彬认为：唐、郑、夏三国共成鼎足之势，郑亡，夏亦难存，主张出援。窦建德率孟海公等将领以10万大军水陆并进，连克管城、荥阳、阳翟等县，屯军于虎牢之东原，筑"行宫"于板渚(河南荥阳汜水镇东侧)。李世民围困东都的同时，精选精兵3500人，抢先占领虎牢，遏住窦军的西进。两军相持月余。窦军预料唐军刍秣将尽，必将牧马于黄河北岸，届时乘机袭取虎牢。李世民将计就计，北济河，留马千余匹，牧于河渚以诱之。五月初二，窦建德率全军而至。窦军自板渚结阵西向汜水而来，其阵"北距大河……南属鹊山(一名方山)"，南北绵亘20里，鼓行而进。建德先遣300骑涉汜水，距屯驻汜水以西的唐营尚有一里之处停住，遣使对李世民说："请选锐士数百与之'剧'(意为演习)。"世民遣王君廓率"长槊"200以应之。相与交战，乍进乍退，两无胜负，各引还。窦建德在汜水东岸所列10万众、绵亘20里的军阵，自辰至午，士卒饥倦，皆坐列，又争饮水。李世民看时机已到，亲率轻骑先进，大军继之，东涉汜水，直薄其阵。窦军猝不及防，大溃，唐军追奔30里，俘获5万余人。窦建德被俘。虎牢之战，是唐朝统一全国的关键一仗，它决定了中原的形势。王世充得知窦建德被俘后，遂向唐军投降。李世民进入洛阳，中原决战结束。窦建德被斩首；王世充被"仇人"杀死。唐朝尽收窦建德河北郡县，将隋上谷、河间等10郡改为瀛、易、定、冀、德、贝、卫、洺、邢、恒等10州。此外，于武阳郡之贵乡县、聊城县分别置魏、博州；于河间郡之饶阳县置深州。唐平王世充，将隋河南、襄城等九郡改为洛、汝、许、豫、亳、颍、宋、徐、安州。此外，于荥阳郡之浚仪县置汴州。

江南归附。　武德二年沈法兴既克毗陵(江苏常州)，自称梁王，建都毗陵，置百官。其时，杜伏威据历阳；陈棱据江都(江苏扬州)。原起义于长白山后渡淮据海陵(江苏泰州)的李子通先打败陈棱，占领江都；后又给杜伏威以重创，致使伏威于武德三年被迫降唐，唐授伏威为淮南安抚大使、和州总管。李子通则即位于江都，国号吴。不久，李子通渡长江攻沈法兴，取其京口，于是，丹阳、毗陵等郡皆降于李子通，沈法兴被迫南下。稍后，杜伏威卷土重来，打败李子通，迫其放弃江都、保京口。于是子通江西之地尽入于伏威，伏威入居丹阳。在杜伏威步步进逼之下，李子通则尾随沈法兴之后节节追击。李子通大败沈法兴于吴郡，法兴被迫自杀。李子通占领北自太湖，南至会

稽,尽取法兴之地,以余杭(杭州)为都城。武德四年十一月,杜伏威遣其将王雄诞攻李子通于杭州,大败之,并将其俘送至长安。至此,江淮地区皆为唐有。武德三年杜伏威降唐,唐改隋江都、历阳等八郡为扬、和、宣、濠、庐、光、寿、常等八州。此外,于江都郡之丹徒、清流二县分别置润、滁州。武德四年唐平李子通,改吴、余杭等五郡为苏、杭、越、婺、括等五州。此外,于吴郡之乌程县置湖州;于永嘉郡之临海县置海州;于信安县置衢州。

平定萧铣。　武德四年九月遣李孝恭和李靖(571—649,京兆三原(今陕西三原东北)人)等率军进攻据江陵的萧铣。李孝恭率战船2000余艘,自夔州顺流东下,先后攻占荆门、宜都二镇,进至夷陵,进而追击萧军于百里洲。萧铣江州总管盖彦举以五州来降。萧铣的军队正投入农业生产,只留宿卫数千人。唐军忽至,无法迎战,萧铣于十月二十一日下令开门出降。李孝恭送萧铣于长安,被斩于都市。李靖度岭,遣使分道招抚诸州,所至皆下。以李靖为岭南抚慰大使、检校桂州总管,“引兵下九十六(?)州,得户六十万”。唐平萧铣,改隋南、夷陵等12郡为荆、硖、袁、鄂、岳、潭、衡、澧、朗、永、郴、连等12州。此外,于长沙郡之邵阳县置邵州;于沅陵县置辰州;于零陵郡之永阳县置道州。李靖度岭,改南海、龙川等八郡为广、恩、贵、藤、桂、梧、钦、崖等八州。此外,还从南海、始安等郡分置25州,计有:韶、昭、富、蒙、象、柳、融、康、封、泷、春、窦、勤、禺、雷、峰、邕、贺、新、澄、容、横、潘、白、绣州。计33州。武德五年正月,岭南俚帅杨世略以循、潮二州来降;唐使者王义童领兵下岭南泉(后改称福州)、建(后改称泉州)二州。此外,武德四年平汪华,改遂安郡为睦州;改新安郡为歙州;改鄱阳郡为饶州。武德五年,萧铣败后余众归林士弘,不久,唐打败林士弘,改九江郡为江州;改豫章郡为洪州;改庐陵郡为吉州;改南康郡为虔州;改临川郡为抚州。

全国统一的最后实现　武德四年夏,窦建德部将刘黑闼收集残部,起兵漳南(山东恩县西),“设法行政,皆师建德”。不到半年时间,便恢复了窦建德故地,在洺州(河北永年)建立政权。武德六年正月,刘黑闼被部将诸葛德威杀死。唐朝在河北的统治得以稳定。贞观二年,盘据在夏州的梁师都也被唐军平定,全国统一。　（翁俊雄）

唐代租庸调制的实行

在唐前期实行均田制时,与均田制相适应的赋役制度。

武德二年(619)二月,唐王朝规定:丁男,每年缴租粟二石、绢二丈、绵三两。武德七年三月,颁布《田令》,实行均田制度。与此同时,颁布《赋役令》,规定:丁男,岁入粟二石,谓之租,随乡土所出,桑蚕产地,缴绢(或绫、絁)二丈、绵三两;麻产地,缴麻布二丈五尺、麻三斤,谓之调。丁男每年服徭役二十日;若不出役,则每日缴绢三尺,布则三尺七寸五分,谓之庸。总括谓之租庸调制。唐玄宗天宝年间,“以庸代役”普遍实行(唐王朝以庸资雇人夫充役)。这样,每个丁男,每年除缴租粟二石外,其调、庸合计,每年缴绢二匹(调二丈,庸六丈,共八丈。唐制四丈为匹,计二匹)。唐代的租庸调制是承袭隋代而来,不过有些变动。唐代租庸调的征收只以成年男子为对象,妇女、老小、残疾并不征收。贵族和九品以上官员有免课役的特权。唐前期除租庸调以外,还有户税和地税两种税收。户税是根据财产多少而确定的户等进行征收。唐初民户按资产分为三等,不久又改为九等,户等高则多征,低则少征。王公、百官之家都要征收。唐玄宗开元年间,户税征收进入了主要阶段,当时规定:“凡天下诸州税钱,各有准常。三年一大税,其率150万贯;每年一小税,其率40万贯,以供军国、传驿及邮递之用。每年又别税80万贯,以供外官月料及公廨之用。”这说明至开元年间,户税已制度化,而户税又区分为大税、小税和别税。各类户税都有特殊的用途,例如供传驿和地方官府的办公费,以及地方官员伙食费等。在唐前期,户、地二税逐渐增加,以至相当于租庸调收入的二分之一弱。由于唐初百姓授田较多,所承担的赋役尚能承受,加之“以庸代役”普遍实行,农民有较多的时间进行生产,因而有利于唐初农业的恢复和发展。　（翁俊雄）

唐代均田制度的实行

在隋末、唐初人口大为减少、无主荒地较多的条件下,唐朝实行将无主荒地授给百姓的土地收授制度,对恢复和发展社会经济起了积极作用。

唐朝建立后继续实行北魏以来所实行的均田制度。唐朝于武德七年(624)、开元七年(719)和开元二十五年三次颁布均田令。田令规定:凡年满18岁以上的男子授田100亩,其中80亩为口分田(至年老,部分还公;死则全部还公);20亩为永业田(专种桑、榆等树,本人老、死不退,由家人继承)。工商业者,永业、口分均减半授给。病重、残疾人只授口分田40亩。寡妇授田30亩(如为户主者,则授口分田20亩、

永业田 20 亩)。道士、僧侣授田 30 亩;女冠、尼授田 20 亩。寡妇以外的妇女和奴婢不授田。贵族、官员按官品授官员永业田,自 1 万亩至 60 亩。田令还规定:田多可以足其人者为宽乡,少者为狭乡。狭乡授田,减宽乡之半。

唐朝均田制的实行情况因时间、地域之不同而有很大差别。这是由于各个时期、各个地区的具体情况不同决定的。隋朝实行过均田制,然而,经过隋末的战乱,百姓或死、或逃,人口大量减少,人口分布因而也发生巨大的变化。从人口数量看,隋大业五年(609),全国民户超过 900 万。经过战乱和灾荒,至唐贞观十三年(639),民户只有 300 万,减少了三分之二。从唐武德三年至贞观十九年,唐朝曾三次下诏:"收瘗隋末丧乱骸骨",经过 20 余年,隋末骸骨还未埋完。从贞观元年至载初元年(689)唐朝多次颁布鼓励百姓结婚、生育的诏令,责令地方官吏使男女"嫁娶以时",并给予物质上的支持。这证明隋末、唐初人口的大量减少。从人口分布上看,在隋大业年间,民户有 53%集中在河南、河北。由于隋末这一地区是战争频繁、灾荒集中的地区,人口或逃或死,至唐朝初年,"十才一在"。从洛阳至东海的广大地区"萑莽巨泽,茫茫千里,人烟断绝,鸡犬不闻"。河南、河北人口大幅度减少,成为地多人少的宽乡。而以长安为中心的京畿地区"地狭人稠";以益州为中心的成都平原,都属人多地少的狭乡。随着唐朝统一战争的结束,社会逐渐安定,如何使人口分布较为均匀,使宽乡的大量荒芜土地重新开垦出来,成为唐朝封建统治集团优先考虑的问题。唐初的均田制度,就是适应这时期的经济形势制定的。均田制度并非废除土地私有权,将地主土地没收加以重新分配,而是将无主荒田,依据《田令》规定的授田标准,在官府的监督下,任百姓自占,开垦为耕地。在唐初社会上存在大量荒田的情况下,特别是河南、河北这类宽乡,均田制实行得较好,百姓受田一般能按规定的数额受足。不仅如此,《唐律疏议》中规定:在宽乡,如果"仍有剩田,务从垦辟,庶尽地利,故所占虽多,律不与罪"。宽乡百姓可以在定额之外多占耕地。史载,洛州的豪富不仅凭着权势占有了更多的土地,而且为了逃避地税,往往"籍外占田",即将多占的土地不在户籍上登记。从洛州豪富"籍外占田"一事可看出在宽乡,如果如实申报,是可以多占土地的。即使是狭乡,在唐初也实行了均田制。贞观十八年唐太宗在雍州临潼县零口镇发现这里的丁壮受田只有 30 亩。即使按《田令》"狭乡授田,减宽乡之半"的规定,也不足数。高宗太子李弘指出:"关辅之地,萌庶孔殷,丁壮受田,罕能充足。"这都说明,以长安为中心的一带,由于地少人多,丁壮受田多不足数。

唐初,狭乡百姓受田不足,而河南、河北等宽乡又有大量无主荒田,因而,狭乡民户纷纷向宽乡迁徙。《田令》有鼓励百姓从狭乡迁徙宽乡的条文。但同时,在《户令》中又禁止"自畿内徙畿外,自京县徙余县"。而京畿地区正是地少人多的地区,这就迫使京畿地区百姓背着官府逃至宽乡。在高宗时就不断出现关辅地区的百姓逃往宽乡的现象。天授二年(691),武则天下诏,允许雍、同、华、鸿、宜、稷、鼎等州"百姓无田业者"可以携带家口,由官府派"清强官押领",并提供交通工具,送至洛州,由洛州地方官受领、安置。这次将"关内户数十万"移至河南。在唐初河南存在大量荒田,这数十万"百姓无田业者"在河南得到安置,受了土地。

随着时间的推移,人口逐渐繁殖,民户也随之增多。从贞观十三年全国民户只有 300 万,到天宝十三年(754),发展为 900 万户,在 115 年中,全国民户增加了两倍,而耕地的开发有限。至开元、天宝年间,已是"高山绝壑,耒耜亦满",宽乡已不多见。这就是说,宽乡的人口逐渐增多,宽乡逐渐狭乡化。这一过程,从目前保存着的敦煌"户籍残卷"中透露出来。《唐天宝六载敦煌郡敦煌县龙勒乡都乡里户籍残卷》载:程大忠,51 岁,程大庆,47 岁,其父程义已死。大忠、大庆兄弟二人分别立户,成为户主。大忠已受田:20 亩永业、61 亩口分。大庆已受田:20 亩永业、47 亩口分。这是天宝六载的户籍登录。如果从此上溯 46 年,即武则天大足元年(701),那时,程义为户主,大庆 1 岁,大忠 5 岁,而该户有耕地 150 亩(按规定程义只能受田百亩,由于敦煌县为宽乡,占田可以逾限)。从程义一户变为两户、一份土地分成两份来看,如果以民户为单位来说,受田就由足额变为不足;如果以乡、里为单位来说,就由宽乡变为狭乡。

总之,唐朝初年,由于民户少、荒地多,均田制实行得好,特别是在宽乡更是如此。随着时间的推移,人口的繁衍,民户的增多,均田制也就逐渐有名无实了。唐前期实行的均田制度,对恢复和发展社会经济起了重大作用。在开元、天宝之际,随着土地兼并的发展,均田农民破产,均田制也就逐渐瓦解,安史之乱爆发,大量民户离乡背井,逃往他乡,意味着均田制彻底瓦解。唐德宗建中元年(780)两税法的实行,则是唐代均田制彻底瓦解的标志。　(翁俊雄)

科举制的完备

科举制度为隋朝所创立，唐朝完备化。

武德四年(621)唐高祖下敕：各州欲参加秀才、明经、俊士考试的人，先经本县考试，后由本州复试，取其合格者，于每年十月，随贡物入贡。这是唐朝科举制的开始。投考者，一为京城以及各州县学馆的生徒；一为私塾肄业或自学成才、自行至州县报考者。唐代所有应试的人均称为举人，与明、清时专指乡试合格者不同。举人在州县考试合格后，由州郡于每年十月随贡物一起送至尚书都省，接受吏部考试。唐朝取士之科，较隋朝为多，有秀才、明经、俊士、进士、明法、明字、明算、一史、三史、开元礼、道举、童子等科。众科有目，如明经科分为五经、三经、二经等目。考试的内容因科目不同而各异。秀才科试“方略策”五道；明经科，先帖经文，然后口试(答“时务策”三道)；进士科，试“时务策”五道，帖一大经。考试内容先后多有变动，例如，进士科，于永隆二年(681)加试诗、赋。此后进士科主要试诗赋，大和八年(834)进士科专试诗、赋。进士科主要试诗赋，对唐代诗歌的发达有深刻的影响。开元二十四年(736)科举考试原由吏部主持改为由礼部主持。每年参加考试的人众多，而考中的人很少。唐代秀才每年只取一人，多时也只取二人。自高祖至高宗30余年间，所取秀才只有29人。秀才名额甚少，因此，唐代士人多趋向明经、进士二科。明经，每年取百名左右，而进士每年只取30名左右。因此，相比之下，进士更难考中，当时有“三十老明经，五十少进士”的谚语。也正因此，时人更看重进士出身。举人经礼部考取后，只是取得了做官的资格而已。还必须通过吏部的考试，即所谓的“省试”，才可授予官职。所授之官品，一般为县丞、县尉等八、九品官。如果省试不中第，则不能任官。韩愈考中进士后，三次省试均不中第，十年中无官可做。后来宣武节度使董晋引他做僚属，此后才得到唐王朝正式任命的官职。唐朝的科举制度中，还有所谓“制举”，即由皇帝临时规定的一些科目、由皇帝亲自主持的考试。唐代的制举的名目，有“贤良方正”、“直言极谏”、“博通坟典达于教化”、“军谋宏远堪任将率”、“详明政术可以理人”等。此外，自武则天长安二年(702)始置武举，科目有马射、步射、马枪、负重等。州县考中后送兵部。　　(翁俊雄)

唐朝府兵制的建立

唐朝继承和发展了西魏以来的府兵制度，这是唐朝前期主要的兵制。

西魏时以鲜卑拓跋族的部落兵为基础，扩大征收汉民入伍，建立了府兵制。府兵原是与农分离的职业兵。北周、隋继承了这一兵制。隋开皇十年(590)，改为寓兵于农，即：府兵卫士一方面有军籍，由军府统领；另一方面，与百姓一样在州县申报户口、领受土地。实现了兵农合一。在府兵的统领方面，实行西魏以来的由十二大将军分统十二卫(下设若干军府)、总隶于皇帝的军事系统。

唐朝沿袭了隋朝的府兵制度。然而，却有些变动。在府兵的编制上，中央设十二卫(左右卫、左右骁卫、左右武卫、左右威卫、左右领军卫、左右金吾卫)，每卫设大将军一人、将军二人。每卫统兵府(即“折冲府”)，多者60府，少者50府、40府。全国共置634府。“折冲府”是府兵制的基层单位，分上、中、下三等。上府1200人，中府1000人，下府800人。共有卫士60余万人。折冲府置折冲都尉一人、左右果毅都尉各一人。府兵卫士以300人为团，团有校尉；以100人为旅，旅有旅帅；50人为队，队有队正；10人为火，火有火长。

府兵的主要任务是宿卫京师，因而士卒称之为卫士。每年十一月各卫、府以卫士数目上报兵部，而兵部按折冲府与京师的距离布置宿卫任务。规定：距500里者，每5个月宿卫一个月。至远距2000里者，每10个月宿卫一个月。事实上距京师较近的关内道、河东道范围内的折冲府主要承担了京师的宿卫任务。其余各地的折冲府则承担其他巡防任务。

唐代的府兵继承隋朝的寓兵于农制度。从现存唐代户籍残卷中可以看出，有很多府兵卫士与白丁同样受田，因而同样是“课口(即有缴纳赋税义务者)”，只是卫士在服兵役期间，有权“不输”。唐代《田令》对战伤、战死卫士的土地有优惠的规定。这说明唐代的府兵卫士也是“垦田籍帐，一与民同”。

唐代府兵是义务兵。府兵卫士的来源是从百姓中征点。征点的原则是：“财均者取强；力均者取富。财、力又均，先取多丁。”征点府兵还有年龄的规定。起初是20岁入军，60岁老免。后改为25岁入军，50岁老免。在年限范围内，每年“三时务农，一时讲武”，并轮番宿卫京师。府兵制建立在均田制的基础上。由于府兵卫士在唐初受田较足，因此，卫士入伍时不仅要自备路途的口粮，而且要自备武器(刀、弓、矢)、衣装(毡装、毡帽)。尽管卫士受田较足，生活较富裕，这些仍是沉重的负担。

府兵除宿卫京师以外，如有战事，朝廷临时任命

将帅率兵出征。事后，"兵散于府，将归于朝"。不过，由于边境战争日频，高宗以后，往往在边境置军。调露二年(680)在朔州置"大同军"，唐玄宗开元五年(717)于并州置"天平军"。"唐初，兵之戍边者，大曰军，小曰捉守、曰城、曰镇，而总之曰道。"大同、天平二军就是府兵戍边的长驻据点。

在唐前期府兵制度实行时期，遇到大规模的军事行动往往临时招募百姓入军。唐太宗征高丽时，即临时招募了10万士卒。事后，唐太宗自诩："朕今征高丽，皆取愿行者。募十得百，募百得千。其不得从军者，皆愤叹郁悒。"唐玄宗开元十年宰相张说建议招募"长从宿卫"标志着府兵制的瓦解，募兵制逐渐代替了府兵制。　　(翁俊雄)

唐代的道教

道教，以老子为教祖。以老子《道德经》为主要经典，宣扬清静无为思想；以善养生、能驱邪为号召。以合灵药、炼金丹为手段，以求长生不老；也有以画符箓为手段，让人佩戴、张贴，用以驱鬼、避邪，以求安生。因而，被人们信奉。隋炀帝就曾命嵩山道士潘诞，合灵药、炼金丹。

由于唐高祖李渊家族与拓跋族有血缘关系，为标榜其华夏正宗，遂附会老子为其始祖(因老子姓李)。武德三年(620)，晋州人吉善对李渊说，他在羊角山下见一老者，令他传话。老者对他说："替我转达唐天子，我是他的祖先。……李家的子孙可以有国一千年。"从此，唐朝就崇尚道教。贞观十一年(637)，唐太宗下诏："道士、女冠(女道士)宜在僧、尼之前。"道教的地位居佛教之上。武则天永昌年间(689)称老子为老君。乾封元年(666)唐高宗尊老子为"太上玄元皇帝"，将各地的"老君庙"改名为"玄元皇帝庙"。后又改长安的"玄元庙"为"太清宫"；洛阳为"太微宫"；各州为"紫极宫"。以后，改道"庙"为"观"，仅长安城内，见于记载的就有龙兴观、金仙观、玉真观等20余观。有道士叶法善者，"抄传符箓，尤能厌劾(驱赶)鬼神"。高宗闻其名，征诣京师，留在宫廷内"道场"。高宗还广寻各地道术之士"合炼黄、白"(炼金丹)。

唐玄宗开元、天宝年间，推崇道教。有张果者，"时人传其有长年秘术。自云年数百岁矣。"玄宗爱好神仙及方药之事，夸奖张果"真奇士也"，甚至欲将一公主嫁给他。玄宗亲自为《道德经》作《注、疏》，颁行天下。在长安、洛阳各设"崇元学"，各设博士、助教一人，招收生徒百人。在道学中，开设《道德经》、《南华经》、《通元经》、《冲虚经》、《洞灵真经》等课程。生徒考试合格后，在各个祭祀祠堂中任"斋郎"。

唐武宗"(立)志学神仙"。会昌二年(842)任命道士赵归真为"教授博士"。赵归真在武宗面前诽毁佛教，说佛教"非中国之教，宜尽去之"。唐武宗灭佛，赵归真起了很大作用。

唐宪宗相信道教的长生术，服方士柳泌炼制的"金丹药"。起居舍人裴潾上表切谏："金石含酷烈之性，加烧炼则火毒难制。若金丹已成，且令方士自服一年，观其效用，则进御可也。"宪宗听不入耳，大怒。不久，宪宗"以饵金丹小不豫"，数日后，暴死。死时年仅43岁。长庆四年(824)唐穆宗"饵金石之药"，数日后死，年仅30岁。

唐前期的统治者主要是推崇老子的"清静无为"思想，以巩固政权。魏征曾对唐太宗说："无为而治，德之上也。"房玄龄对唐太宗说："愿陛下遵皇祖老子'止足'之诫，以保万代巍巍之名。"而唐后期的统治者则耽于道教的长生不老之术。唐宪宗、唐穆宗妄想长生，反而早死。不过，道士炼丹合药，在客观上对化学、药物学的发展，起过一些积极作用。炼丹所用原料，主要是丹汞、硫磺等物，对于这些物质的化合和分解，在烧炼过程中，摸索到一些技术方法和知识，成为近代化学的先驱。采制灵药，往往积累了草药的知识，对中草药和祖国医学的发展，也起过积极作用。　　(秦秀芳)

玄武门之变

武德九年(626)六月初四，唐高祖李渊之次子秦王李世民伏兵玄武门，诛杀其兄太子建成、弟齐王元吉。李世民遂即皇帝位，是为唐太宗，尊李渊为太上皇。

李渊原配窦后生四子，长子建成，次子世民，三子元霸(早夭)，四子元吉。晋阳起兵主要是世民之谋，当时李渊曾对世民许诺：事成之后，由世民为皇太子。李渊即皇帝位，仍遵封建法统，以长子建成为皇太子。唐朝建立后，世民先后平定王世充、窦建德，为全国统一奠定基础，从而功名日盛，李渊心中已有实现当初诺言之意。建成的地位受到威胁，遂与四弟齐王元吉密谋倾覆世民。

在建成、元吉和世民周围各形成一个政治集团。在宰相中，裴寂、封德彝支持建成；萧瑀、陈叔达则倾向世民。在文臣、武将中，如长孙无忌、房玄龄、杜如晦、温大雅、尉迟敬德、秦叔宝等人都拥戴世民。两个集团都拥有武装，太子有东宫兵，秦、齐二王各有王府兵。除了这些合法武装力量，各自还招募私人拥有

的卫士、勇士数百以至上千人。

为了倾覆世民，建成、元吉着意接近李渊的嫔妃们，尤其是李渊宠爱的张婕妤、尹德妃。效果逐渐显露出来。李世民曾写手谕（诸王的手谕称为"教"）给淮安王李神通数十顷良田。而张婕妤请求李渊把那块良田赐给其父，李渊手敕赐之。张父向李神通索取土地，被拒绝。李渊发怒责备世民："我手敕不如汝教邪！"并对宰相裴寂说："此儿典兵在外，为书生所教，非昔日子也。"还有一次，秦王府僚属杜如晦经过尹德妃父尹阿鼠宅门未下马。尹家家僮曳杜如晦下马，并殴打他，说："汝何人！敢过我门而不下马！"尹阿鼠担心杜如晦申诉，先使尹德妃对李渊说："秦王左右暴妾家。"李渊又责备世民："我妃嫔家犹为汝左右所凌，况小民乎！"诸嫔妃对李渊说："陛下万岁后妾母子必不为秦王所容，无孑遗矣。皇太子仁孝，陛下以妾母子属之，必能保全。"于是，李渊放弃了变更太子的打算。

武德七年七月，李渊校猎长安城南，三子皆从。建成有胡马肥壮，但喜蹶，赠世民。世民乘以逐鹿，马蹶，世民跳马于数步之外，如是者反复三次。世民对宇文士及说："彼欲以此见杀。死生有命，庸何伤乎！"建成闻之，因令嫔妃对李渊说："秦王自言：我有天命，方为天下主。"李渊大怒，召世民，责之曰："天子自有天命，非智力可求。汝求之何急邪！"正在此时有人入奏："突厥入寇。"李渊改容，即与世民商议讨伐事。李渊每遇寇盗，即命世民征讨，讨平之后，猜忌益甚。

李世民感到形势逼人，选择洛阳作为自保之地，派温大雅镇洛阳，派张亮率王府兵千余人至洛阳。并使人结纳山东豪杰，多出金宝，恣其所用。武德九年六月初一，李建成夜召世民至东宫饮酒，于酒中放入毒药。世民肚痛，吐血数升。淮安王李神通扶之还西宫。李渊来探视，对世民说："观汝兄弟似不相容，同处京邑，必有纷竞，当遣汝居洛阳。自陕州以东，皆由汝主之。"建成、元吉密谋曰："秦王若至洛阳，有土地、甲兵，不可复制。不如留之长安，则一匹夫耳，取之易矣。"乃密令数人上封言："秦王左右闻往洛阳，无不喜跃。观其志趣，恐不复来。"李渊听信谗言，事复中止。

秦王府僚属房玄龄（579—648，齐州淄博（山东淄博东）人）对长孙无忌说：现在矛盾已经极为尖锐，一旦爆发，不仅是秦王府的危机，也是整个朝廷的危机。不如劝秦王立即效仿周公当年所行之事。长孙无忌、房玄龄、杜如晦共劝世民除掉建成。

建成、元吉因秦王府多骁将，欲收买之。密以金、银器一车赠尉迟敬德，遭拒绝。敬德将此事告知世民。建成又以谗言说动李渊，将秦王府房玄龄和杜如晦调出秦王府。李世民身边只剩长孙无忌、高士廉、侯君集、尉迟敬德和秦叔宝等人。当时正值突厥郁射设率万骑入塞，围乌城。建成荐元吉代替世民督诸军北征。元吉乘机请求将秦王府尉迟敬德、程知节及秦叔宝等与之偕行。这样，几乎将秦王府官将抽空。正在此时，元吉之僚属王晊密告世民说："太子语齐王：吾与秦王饯汝于昆明池，汝使壮士拉杀之于幕下。……敬德等既入汝手，宜悉坑之。"李世民就与长孙无忌、尉迟敬德、房玄龄等密谋：先发制人，伏杀建成。

六月初四，常何当值玄武门。此前一日，李世民曾密告李渊，指控建成、元吉淫乱后宫。李渊决定次日召见、鞫问。李建成以为常何是自己人，控制了玄武门，所以这天早晨放心入朝。而李世民已在常何的协助下，伏兵玄武门。李建成、李元吉入宫行至临湖殿觉变，便拨马归东宫，李世民大呼追赶，射死建成，李元吉张弓射李世民不中，这时尉迟敬德率70骑助战，李元吉兵力不支，结果被杀。史称"玄武门之变"。

李世民杀死李建成、李元吉后，李渊迫于形势，退出皇位。同年八月，李世民即皇帝位，改年号为贞观，是为历史上著名的唐太宗。 （翁俊雄）

唐太宗"贞观之治"

李世民即位后，次年（627）改年号为贞观。在其在位的23年（627—649）中，总结历代王朝兴衰的经验教训，虚心听取臣下意见，减轻赋税和徭役，减轻刑罚，使百姓在战乱后能够休养生息，从而使社会经济得以恢复和发展，为唐朝的繁荣昌盛奠定了基础。人们对唐太宗在位的斐然治绩，誉之为"贞观之治"。

唐太宗即位的形势严峻。由于隋末、唐初的战乱，人口大量减少、经济残破。隋朝最为富庶的河南、河北破坏最重，百姓逃至外地找饭吃。而北方的突厥侵扰边境州县。唐太宗即位后，着重考虑在这种严峻的形势下如何才能使新建立的唐朝巩固下来？他对臣下说：治国就如同治病。病虽痊愈，还要加强护理，如果不加注意，病复发，就不可救了。

唐太宗在贞观十六年总结了即位以来在政治上做了三件事：第一件，是总结历代王朝成功与失败的经验教训作为借鉴。他认识到，要巩固政权首先要使百姓安居乐业。早在贞观元年，就建立五品以上京官轮流在中书省值班的制度，以便及时了解民间的疾

苦。在贞观初年为减轻百姓负担,实行轻徭薄赋政策。至贞观八年,唐太宗总结几年来实行这一政策的结果是:对百姓没有过重的科差,人人皆得营生。贞观二十二年,女官徐氏指出:贞观以来,二十余年,风调雨顺,年谷丰登,人无水旱之灾,国无饥馑之患。

唐太宗还认识到,要使百姓安居、政权巩固,必须避免决策上的失误。他对臣下说:作为一国之主,决定事务,要尽可能避免失误。一天决断十件事,即使得失相半,乖谬已经太多,下诓上蔽,不亡何待!为了避免失误,首先必须全面而深入地了解实际情况。魏征对太宗说:偏信则暗,兼听则明。只有听取各种意见,不偏听偏信,则下情才能上达,上面才不至于被蒙蔽。太宗对臣下说,我每当闲居静坐,就想正直的大臣他们所提的各种意见,为的是使自己耳目外通。在了解情况的基础上,还必须做出正确的决定。唐太宗要求臣下:即使发下的诏书、敕旨,如果其中有问题,你们要立即提出来,不得违心地服从。魏征就按照这一要求行事。贞观初年征点府兵。按唐令规定:年满21岁以上的丁壮为征点的对象。由于唐初民户较少,兵源不足,因而宰相封德彝建议,从18岁起征点。唐朝皇帝下的诏敕,宰相得副署。宰相魏征(580—643,馆陶(今属河北)人)多次提出反对意见。封德彝解释说:这次征点的是18岁以上身材壮大者。太宗又发诏敕:16岁以上,只要身形壮大,也可征点。魏征仍不签署。唐太宗召集宰相们,批评魏征:你这么固执,我不懂这是因为什么?魏征庄重地回答:作为国君要以诚信对人,这样不按制度办事,还怎么能让百姓信任?最后,唐太宗作了自我批评:我原来还以为你太固执,不讲变通。现在才知道这实际是个信用问题,如果不讲信用,国家怎么能治理好!于是,决定停点21岁以下的男子入军。并赐魏征金瓮一口。魏征以敢于犯颜直谏而名垂青史,这与唐太宗虚心纳谏有密切关系。唐太宗有时也感觉臣下犯颜直谏有损威颜、难以忍受。贞观六年三月某日,太宗下朝回后宫,生气地说:有机会就杀死这个乡巴佬!长孙皇后问这是指何人?太宗说:魏征经常在朝廷上污辱我!皇后立即换上盛装,立在庭院中向太宗拜贺。太宗惊问这是为何?皇后回答:我听说"主明臣直"。今魏征直,说明陛下明。我怎能不贺!唐太宗才转怒为喜。总的看来,贞观之世,唐太宗努力了解各方面的实际情况,鼓励提出不同意见,因而很少失误。第二件事,是重用心地善良、一身正气的人。唐太宗最恨口是心非、阿谀奉承的"佞人"。他所用宰相,多成为历史上的名相。房玄龄(579—648),齐州临淄(山东临淄东北)人。"闻人有善,若己有之"。他尽心竭力,尽量不出现失误。他审定的法令,去掉繁苛,意在宽平。因此,唐朝人都把他称为良相。杜如晦(589—630),京兆杜陵(陕西西安东南)人,善于处理军国大事,为同辈人所折服。他与房玄龄共掌朝政。当时的中央政府机构和典章制度,全是他二人所定。他们在当时就获好评,人们称之为"房、杜"。魏征,担任宰相,刚直不阿,敢于犯颜直谏。王珪,为人正直,主持公道,"嫉恶好善",发扬正气。唐太宗不仅自己"进用善人",而且要求宰相"广求贤人"。贞观初,他对房玄龄、杜如晦说:"公为仆射,当广求贤人,随才授任,此宰相之职也。"唐太宗注重官员的质量,他说:"官在得人,不在员多。"因而命房玄龄精简机构,在中央机构中"留文武总六百四十三员",在拥有300万户、1200万人口的国家,中央政府官员只有643人,是十分精简的。唐太宗尤重地方官的任用。他对臣下说:"为朕养民者,唯在都督、刺史。朕常疏其名于屏风,坐卧观之,得其善恶之迹,皆注于名下,以备黜陟。"贞观八年还派遣大臣为"黜陟大使"分巡十道,检查地方行政,依地方官的善恶、行能,或罢免、或提升,罪恶大的,予以法办。第三件事,是"斥弃群小,不听谗言"。这是他即位后的教训。贞观初年,治书侍御史权万纪、侍御史李仁发,捕风捉影,以没有核实的材料弹劾官员。如指弹房玄龄在考课官员时不公平,以致一度被"以谴归第",后来得以澄清。再如诬蔑相州刺史张亮谋反,以致被处死,事后才得以平反。后来,唐太宗免二人官,遣其归家。唐太宗从沉重的教训中认识到"谗佞之徒,皆国之蟊贼也"。他对宰相说:"从今以后,再有上书揭发别人的小错的,当以诽谤之罪处罚。"

唐太宗还宽刑罚。他对臣下说:"死者不可再生,用法务在宽简。"贞观五年太宗下诏:近来司法机关断狱,多据《律》文,虽然从情理上说,可以减缓的,也不敢放宽。这种"守文定罪"而不考虑情理,"或恐有冤"。今后遇此情形,"宜录状奏闻"。贞观四年处死刑的,天下二十九人,"几致刑措"。

在文化方面,唐太宗提倡儒学和文化。太宗即位不久,于宫城西建"文学馆"。以房玄龄、杜如晦、孔颖达、姚思廉、虞世南等18人以本官兼文学馆学士。为了表示对学士的推崇,命人将18学士的像貌一一画出,写明其籍贯和官爵,并命褚亮撰写"像赞",号《十八学士写真图》藏于书府。18学士分为三班,轮流值班。太宗每退朝,即召见,与他们讨论学术、综论古今。秘书监魏征,建议在全国收购图书,令学士进行

校定。因而，“群书大备”，分辑为经、史、子、集四部。命工书者缮写成正、副两本，藏于“集贤书院”。唐太宗还多次至全国最高学府国子监观看举行的仪式和听讲。征召天下名儒为学官，进行讲论。扩建学舍1200间，扩大生员名额至2260员。于是，四方学者云集京师，以至高丽、百济、新罗、高昌、吐蕃酋长，皆遣子弟请入学。

在军事上，贞观十年唐太宗整顿和加强了府兵制度，在全国十道，置折冲府634，约60余万府兵卫士，大大提高了军队的作战能力。早在贞观四年，兵部尚书李靖和并州都督李勣，大败东突厥，生擒颉利可汗。东突厥灭亡，漠南广大地区尽为唐有，原突厥故地部民奉唐太宗为“天可汗”。贞观十五年击败薛延陀，迫其降唐。贞观十四年平高昌。贞观二十二年唐军攻破龟兹。唐太宗以安西都护郭孝恪兼统龟兹、于阗、疏勒、碎叶等“安西四镇”。巩固了唐朝西北边防。　　（翁俊雄）

玄奘“西天取经”

唐太宗贞观年间，玄奘法师只身出玉门关西行，历尽艰辛、行程万里，至印度取经，架起中印友谊的桥梁，在世界文化史上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玄奘原名陈祎，法号玄奘。隋开皇十六年(596)生于河南偃师。其父陈惠，曾任江陵县令，后解职归乡里。隋代崇尚佛教，陈惠是一个虔诚的佛教信徒。玄奘之兄长捷在洛阳净土寺为僧。隋大业十年(614)，陈祎也在净土寺剃度为僧。因隋末战乱，河南百姓大批流入长安，唐王朝建立前后，又将流民转移入蜀。玄奘与其兄先随流民至长安，居长安庄严寺，后又随流民入四川，于武德元年(618)冬抵成都。玄奘与兄在定慧寺研读佛经。玄奘研读佛经五年，于武德七、八年(624—625)两年间，离开成都，至荆州天皇寺与僧众研讨佛经，半年后又北上河南、河北、山东等地，访问各地著名高僧，钻研各派学说。武德九年(626)玄奘返回长安。在多年研读佛经的过程中，他发现国内佛经不仅译本缺乏，而各译本舛错很多。为了解经典真义、寻求佛教的究竟，他决心到佛教圣地求法。唐太宗即位后，宰相萧瑀曾奏请太宗令玄奘住庄严寺，被玄奘拒绝。玄奘上表太宗，要求出国取经，“有诏不许”。其年秋季，关中发生灾荒，唐王朝允许“道俗(可)随丰四出”至各地就食。玄奘于贞观三年(629)乘机出国求法。他途经秦州、兰州，到达凉州(今甘肃武威)，准备从这里出发，通过西域出国。在威远法师的协助下，出了凉州，风餐露宿，到了瓜州(今安西)。

我国与西方各国的交通，出玉门关，横过沙漠以后有两条路：一条是北路，沿天山南麓向西过葱岭；另一条是南路，沿昆仑山北麓向西过葱岭，进入中亚地区。隋末战乱，南路废弃，玄奘大体走的是北路，即从瓜州到伊吾(今新疆哈密)一线。玄奘在瓜州结识了西域人石槃陀，并请他做向导，又得到瓜州老人送给他的一匹瘦马，马虽瘦，但是它曾经往返瓜州、伊吾十余次。玄奘从瓜州出发走了50多里，绕过玉门关，再向西北，进入莫贺延碛(安西至哈密间的沙漠)，此时向导已跑掉。玄奘在800里的沙漠里走了两天，迷了路，找不到野马泉，他在慌乱中竟将仅有的一皮囊饮水失手倒在沙漠里，他打算折回取水，走了十几里，想到自己所立“不到目的地，决不东归一步”的誓言，便掉转马头，继续西进。走到第五天傍晚，终因连日滴水未沾，昏倒在沙漠中。幸而离绿洲不远，清风吹过，人有了精神，马也站立起来，老马识途，奔向水源，才摆脱困境。两天后到达伊吾国境。玄奘在伊吾国停留10余日后抵达高昌(新疆吐鲁番以南)。高昌国王麹文泰亲自出迎，并请玄奘讲经。玄奘在高昌停留两个月。离开时，高昌王送给他黄金百两、银3万两、绢500匹、马30匹、和尚4名、人夫25名。并书写25封介绍信，请沿途国王关照。玄奘非常感激。玄奘一行从高昌出发，经阿耆尼国(新疆焉耆)、屈支国(新疆库车)，抵达碎叶城(原苏联吉尔吉斯共和国托克马克)，在这里谒见了西突厥肆叶护可汗(统叶护可汗之子。统叶护可汗已于贞观元年死)。由于肆叶护可汗给诸国国王写信，要他们保护玄奘，因此，玄奘顺利地通过吐火罗(今阿富汗境内)等国，进入南亚次大陆。玄奘于贞观元年(627)八月离开长安，翌年夏季抵南亚次大陆长途跋涉近一年之久。

玄奘经阿富汗东北部、巴基斯坦白沙瓦和拉瓦尔品第地区至迦湿弥罗国(今克什米尔)的阇耶因陀罗寺，与名僧研讨佛学。贞观三年(629)秋抵达磔迦国(今巴基斯坦旁遮普地方)从一老婆罗门学习经典。一月后，至那仆底国(今印度北境的罗兹普尔地方)的乐寿寺学习经典。贞观四、五年(630—631)间玄奘在印度北部游学，行踪所至，巡礼佛教遗迹，学习佛经。贞观五年(631)十月初，至佛教最高学府那烂陀寺(印度北部比哈尔邦巴特那以东55英里的巴腊贡)留学，师事戒贤法师。戒贤是著名的佛学家，年老久不讲学，为了玄奘，破例连续讲了15个月。玄奘在这里学习5年，成为第一流佛教学者。贞观十年(636)春玄奘辞别戒贤，周游五印度(当时印度分为

东、西、南、北、中五部分)。

贞观十一年(637)玄奘经孟加拉国的西南部至三摩怛吒国(今恒河口支流胡格里河与鲁甫拉纳河汇合处西岸的塔姆努地区),沿印度半岛东岸至印度南部克里希纳河口处。在这里遇苏部底、苏利耶二法师,遂向二师学习佛法。以后继续南下,至马德拉斯以南地区,这是玄奘游五印度之极南之地。原准备从这里出海去师子国(今斯里兰卡),闻其国内乱,遂放弃前往,改为取道西印度,再返回中印度。于是北上,渡克里希纳河、纳巴达河,至巴基斯坦的卡拉奇。这是玄奘所至极西之地。后经巴基斯坦海德拉巴德、克什米尔西南查谟地区,从此向东南行,返回那烂陀寺。

贞观十四年(640)戒贤命玄奘为该寺僧众开讲《摄大乘论》、《唯识抉择论》。其时正值小乘佛教大师师子光在该寺开讲《中论》、《百论》,反对大乘佛教唯识之说。玄奘著《会宗论》、《制恶见论》,进行驳难。这时戒日王(当时称霸五印度的是普西亚布蒂王朝的戒日王,其直接统治的是羯若鞠阇国,都城曲女城,在今恒河西岸的卡脑季)遣使至那烂陀寺,嘱戒贤法师派寺中高僧和小乘佛教大师般若鞠著《破大乘论》,展开学术辩论。当年秋,玄奘沿恒河至羯朱温罗国(今恒河以北的拉杰马哈尔地方)会晤当时在该国的戒日王。戒日王对玄奘备极尊敬。玄奘颂扬唐朝功业,戒日王即遣使至长安,为我国与南亚次大陆国家正式建立邦交之始。戒日王对玄奘所著《制恶见论》极为赞赏。乃决定在曲女城举行辩论大会,通知五印度各国不同宗教、不同学派的僧徒齐来集会。玄奘"自冬初,共(戒日)王逆(恒)河而进,腊月方至会场"。会前,计到印度18国国王,佛教大、小乘派教徒3000余人,婆罗门教及"尼乾外道"2000余人,那烂陀寺也有千余人参加,加上观礼者,"尔时四方翕集乃有万数"。贞观十五年(641)初春,学术辩论大会开幕。仪式极为隆重,戒日王恭请玄奘为论主。玄奘以《制恶见论》为主要论题,讲论完毕,由"那烂陀寺明贤法师读示大众,并别令写一本题会场外,示一切人:'若其间有一字无理、能破者,请斩首相谢!'"辩论结束,戒日王与18国国王纷赠财宝珍物,玄奘一概辞谢。按照印度传统,举行辩论胜利仪式,请玄奘乘坐庄严大象,由大臣护卫,巡行宣唱:"支那国法师立大乘义,破诸异见,自18国来无敢论者,普宣知之!"于是万众腾欢。玄奘从此名声震撼五印度。戒日王又请玄奘参加其所举行的第六次75天的"无遮大会"。会后,玄奘向戒日王辞行,踏上归国之路。

贞观十六年(642),玄奘携带大量佛经从那烂陀寺向西北行进,过印度北部、巴基斯坦西北部,进入阿富汗加兹尼北40英里的喀布尔河流域,折向西北,从原苏联塔吉克共和国南部瓦汗地区,进入我国新疆喀什专区的塔什库尔干县。接着北行,至英吉沙、疏勒、喀什,折向西南,至于阗国(今新疆和田)。玄奘在于阗国,遣人随商队往长安上表朝廷,报告私往印度求法,历览周游17载,还达于阗的经过,听候发落。8个月后,奉唐太宗敕令,即辞别于阗王回归。玄奘本欲经高昌国返回,因闻高昌王麹文泰已死,遂中止高昌之行,改从天山南路回国。玄奘从和田、经且末、楼兰,辗转抵达沙州(甘肃敦煌)。唐太宗此时在东都洛阳,敕西京留守、宰相房玄龄使有司迎待。玄奘接近长安已近年终。贞观十九年(645)正月二十四日行抵长安西郊漕上,房玄龄遣右武侯大将军侯莫陈实、雍州司马李叔眘、长安县令李乾祐前往迎接。二十五日入长安。玄奘于二月初一在洛阳谒见唐太宗。太宗广询在外情状,并力劝玄奘还俗辅政,玄奘固辞乃止。玄奘请求敕许在嵩岳少林寺从事佛经翻译,太宗不许入山,乃令在长安弘福寺禅院译经,一切由宰相房玄龄安排。三月初一,玄奘返回长安,入居弘福寺,筹备译场,五月准备就绪,即开始译经。

玄奘从贞观十九年(645)五月开始,整整19年一直全神贯注地坚持译经。他每天早晨都规定好进度,白天没有译完,夜里一定补上。在19年中,平均每年译经70卷,而最后4年,提高到年译170卷之多。在他逝世的前一年冬,完成了我国佛教经典中卷帙最大的《大般若经》,600卷。在19年中,玄奘共译经论74部,1365卷。

玄奘的另一伟大贡献是著《大唐西域记》12卷,10余万字。这是应唐太宗的嘱托,由他弟子辩机执笔,但其内容则是玄奘在17年游行中有意识随时采访搜集而来的。这本书对于中亚印度各国的山川、气候、物产、人情、风俗以及古迹传说等,做了忠实的记录。《大唐西域记》不仅是古典的游记,而且是一部记述中亚印度古代历史地理的重要著作,所以英、法、德、日等国,都出版了这部书的译本。

玄奘晚年体弱多病,上表高宗请准在距京师较近的玉华寺译经。高宗麟德元年(664)二月初五夜半,玄奘在玉华寺与世长辞,终年65岁。玄奘逝世的消息传至长安,文武百官以及僧俗人等莫不悲悼。高宗为之罢朝数日。三月十五日高宗下敕:"玄奘法师葬日宜听京城僧尼造幢盖送至墓所。"玄奘遗柩还京,"安置慈恩寺(原弘福寺)翻经堂内,京城道俗奔

赴哭泣者日数百千"。四月十四日，遵照玄奘遗嘱，葬于浐水之滨白鹿原。总章二年(669)高宗下敕：徙葬玄奘于樊川北原，营建塔宇。　　(翁俊雄)

唐灭东突厥

突厥是我国北方的一个古老民族。隋文帝开皇三年(583)突厥分裂为以沙钵略、突利可汗为首的东突厥和以达头、阿波为首的西突厥集团。唐太宗贞观三、四年(629—630)唐朝征服东突厥，巩固了北方边疆。

隋末、唐初，东突厥强盛。隋末、唐初割据之群雄薛举、窦建德、王世充、刘武周、梁师都、高开道，无不北面称臣于突厥。事实上，唐高祖李渊也派遣刘文静出使东突厥，并向其称臣。后来，唐太宗李世民提到过这事，说太上皇称臣于突厥，"朕未尝不痛心疾首"。

武德初年，突厥处罗可汗曾率军至太原，掠走很多美妇人。处罗死，其弟即位，为颉利可汗。颉利可汗又立侄什钵苾为突利可汗，使其统辖草原东部。此后，突厥不断骚扰唐境。在武德五、六年(622—623)间，颉利可汗亲率大军15万，在并、汾、潞诸州，虏去男女5000余口。武德九年(626)八月，唐太宗即位。此时，颉利、突利二可汗率兵10余万进扰武功县(今属陕西省)，唐朝京城受到威胁，京师戒严。二十八日，颉利可汗进军至渭水便桥之北。太宗即率高士廉、房玄龄等共六骑到渭水岸边亲自与颉利对话。此时唐军陆续开来，旌甲蔽野。颉利惟恐悬军深入，与太宗约盟而退。太宗决心制服北方大患突厥，一面利用突厥内部矛盾，结好突利可汗；一面亲自引数百人于显德殿前习射，训练军队，积极备战。

东突厥是靠军事力量建立起来的汗国，包含着许多部落民族，本来就不统一，加以突厥可汗无休止的榨取，因而纷纷谋叛。突利可汗辖区奚、霫等数十部多叛突厥降唐。颉利可汗因突利用兵不利，将其"拘之十余日而挞之"，迫使突利谋叛，上表唐太宗，要求入朝。不久，草原东部契丹酋长率所部降唐。贞观二年(628)八月被突厥控制的薛延陀毗伽可汗遣其弟特勒入贡。东突厥已陷于分崩离析状态。

贞观三年(629)十一月，唐朝经过充分准备，开始讨伐东突厥。太宗命并州都督李勣为通漠道行军总管、兵部尚书李靖为定襄道行军总管、华州刺史柴绍为金河道行军总管、灵州大都督薛万彻为畅武道行军总管，合众10余万，皆受李靖节度，从山西、陕西、甘肃分道进攻突厥。在唐军强大压力下，十二月，突利可汗降唐入朝。贞观四年(631)正月，李靖率3000精骑自马邑进屯恶阳岭(定襄城南)。颉利可汗见唐军来势凶猛，异常震惊，以为唐已倾全国之兵来攻，遂不战由定襄(内蒙古清水河县境)撤军北逃，徙其牙帐于碛口。李靖遂一举攻克定襄。李勣率军出云中(大同东)在白道(内蒙古呼和浩特西)一战，大败突厥。颉利损失惨重，被迫从碛口继续北逃，逃至阴山。二月，李靖又在阴山打败颉利，迫其继续北逃至铁山(呼和浩特北)建牙帐。此时颉利尚有数万人。李靖率军于前，李勣率军继之，穷追不舍。李靖派大将苏定方率200骑为前锋，乘雾而行，直到距颉利牙帐七里，方被发觉。颉利可汗先逃，李靖率军至其牙帐，俘男女10余万。颉利率万余人欲南度碛口，碛口已被李勣军控制，颉利不得渡，遂西逃，奔吐谷浑。颉利所部大酋长以下皆率众降，李勣俘获5万余口而还。大同道行军副总管张宝相在灵州西北生俘颉利可汗，送京师。东突厥灭亡，自阴山北至大漠的广大地区尽为唐有。原属东突厥故地的四夷君长至长安奉唐太宗为天可汗，此后唐太宗以玺书赐西北君长，皆自称天可汗。

东突厥颉利可汗至长安。四月，唐太宗至顺天楼，大陈文物，引见颉利，面数其罪，颉利哭谢而退。太宗诏太仆寺，善为安顿，"厚廪食之"。太上皇李渊听说生俘颉利，叹曰："汉高祖困白登，不能报；今我子能灭突厥，吾托付得人，复何忧哉！"李渊召太宗及贵臣10余人及诸王、妃、公主置酒凌烟阁。酒酣，李渊自弹琵琶，太宗起舞，公卿迭起祝贺，彻夜而罢。

东突厥灭亡后，唐朝将突厥人安置于塞内，东起幽州，西至灵州，置顺、佑、化、长四州，各设都督府进行管理。在颉利可汗故地，则设定襄、云中两都督府进行管理。高宗初年，又置单于、安北二大都护府。

(翁俊雄)

日本遣唐使来唐

为了学习中国的优秀文化，在唐代，日本先后派遣19次遣唐使来唐，随行有大批留学僧、留学生，为中日友好和日本文化的发展做出重大贡献。

中日交往，源远流长。东汉光武帝中元二年(公元57年)倭奴国(约在隋大业年间更号日本)曾遣使入贡。然而，隋朝建立后，日本国先后三次派遣隋使，才具有政治和文化交流的意义。隋炀帝大业四年(608)九月，日本皇廷派遣以小野妹子为大使的第三次遣隋使，其使者说："闻海西菩萨天子重兴佛法，故遣朝拜，兼有沙门数十人来学佛法。"而日皇在接见

隋朝使者裴世清时说："今故清道饰馆以待大使，冀闻大国维新之化。"学佛法和学习优秀的中国文化是日本派遣隋使的目的。随从遣隋使来隋的留学生高向玄理和留学僧旻分别在中国留学33年和25年，他们在中国经历了隋末、唐初的巨大变化。他们归国后，日本孝德天皇任命他们做顾问——国博士，依照唐朝的律令制度，初步建立中央集权的封建国家。这就是公元645年(唐太宗贞观十九年)的"大化革新("大化"是孝德天皇的年号)"。从此以后，日本吸收唐文化的热忱更加高了。

唐建立后，自公元630年(唐贞观四年)至894年(唐昭宗乾宁元年)的264年间，日皇廷派遣"遣唐使"，任命了19次，因故中止者3次。另有一次仅抵百济；另有二次为"送唐客大使"；还有一次因入唐日使久客未归，特派使团前往迎接的"迎入唐大使"。这样，名副其实的遣唐使只有12次。而这12次中，有10次集中在唐前期(公元755年"安史之乱"以前)。这12次中，人数少者百余人，最多为500余人，一般分乘二至四艘大船。其中最为重要的是按任命大使序列排列的第9次。这次一行557人，分乘4舶，于717年(唐玄宗开元五年)抵达唐朝。大使阿倍安麿，副使藤原马养。而藤原马养，度量恢宏，尤富文藻，是此次使团中出色人物。而留学生吉备真备、阿倍仲麻吕，在中日友好文化交流中做出了重大贡献。

日本遣唐使团，设大使、副使，均由贵族并文化素养高的人担任。下设判官、录事数名。除译语、医师、船匠、水手等大批人员之外，每次都有留学生一二十名，留学僧数十名。在出发前，天皇照例给大使、副使"赐饯"，宴酣之际，天皇即席赋御诗，以示优宠，并照例颁赐砂金(自100两至200两)、御服、御被。贵族之间也举办送别宴会，赠以和歌。出发前夕，日皇廷又奉币于神社，祈求海上平安。自大使以至水手，还各按身分赐绵、布、絁、彩，各有差。

遣唐使团一旦平安抵唐土，便通报当州都督府，州都督府按照先例，安排住宿，妥善接待，并立即上报唐廷。待得到指示后即安排他们沿大运河上长安。不过每次只限五六十名赴京师。唐廷除免费提供官船外，另给大使绢270匹，判官以下，水手以上，每人5匹，作为旅费。对留候原泊口岸的判官以下、水手以上人员也各给5匹，作为驻留费。遣唐使抵长安郊外长乐驿时，内使即引马(与人数相等的匹数)出迎，奉酒脯慰劳。随后他们骑马由内使导入长安城内，进"四方馆"，由唐朝廷特设的监使负责接待，频加优遇。接着，遣唐使把携来的贡物托监使进呈唐天子。唐天子随即下敕语嘉奖贡使。随后遣唐使先在宣化殿举行遥拜天子仪式，谓之礼见，接着在麟德殿谒见天子。谒见时，凡有所求，照例面许。然后唐天子在内殿赐宴，并对使节们分别授赏、授爵。之后又在中使的使院再度举行宴会，并赏赐有加。使节留驻期间，如逢正月元旦，也可与百官、诸藩在蓬莱宫含元殿共同参列朝贺。事毕归国时，由监使宣读诏敕，赠予答信物，并举行拜辞、回赐、送别仪式和宴会。最后使节一行率领学成的留学生等由内使监送而就归国之途。内使有的送至中途，有的随使团同行赴日答访。

随遣唐使来唐的还有很多留学僧和留学生，他们对移植唐文化于日本起了巨大的作用。唐初，佛教的三论、法相宗两宗派盛行。三论，由高丽僧慧灌于625年(唐高祖武德八年)传入日本，而法相宗，自贞观十九年(645)由玄奘从印度传入，一时风行。而日本留学僧入唐的非三论即法相宗，必学一宗而归。尔后，律宗、华严宗盛行于唐，也经留学僧传入日本，成为影响力最大的教派。唐中叶，天台、密宗在唐盛行，日本亦从奈良时代中期开始受其影响，这与留学僧的努力也分不开。例如，随17次遣唐史来唐的空海法师，携带很多经论章疏等回日，开真言宗，遂使密宗在日本实现组织化。

与留学僧相比，留学生数量较少。这与唐对留学生十分优待，在学期间，食宿、衣被均予免费，唐朝廷支出颇巨，故对名额加以限制有关。留学生对中日友好，对移植唐文化于日本有重大贡献。随第9次遣唐使来唐的留学生吉备真备，从开元五年(717)来唐，于开元二十二年(734)归国，在唐17年。他在长安国子监精修三史、五经、名刑、算术、汉音、书法等。回国后向学生400人教授五经、三史、明法、算术、音韵、籀道等六道。特别是他以三史(《史记》、《汉书》、《后汉书》)为课程内容，导致了后来《大宝令》有关学制方面的改革。他从唐携归的《唐礼》有助于政府礼典的修订。他还与入唐进修刑名的大和长冈共同删定律、令24条。他又以唐之《大衍历经》为据，于763年废止了日本的仪凤历，并使日本改行大衍历。留学生长期生活于唐土，唐代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对他们都有强烈的影响，他们努力效仿，积极移植于日本。如大化革新后在文武天皇时所建的平安京(京都)就是模仿唐朝的长安城建成的。当时颁行的班田制、租庸调制以及大化革新后颁行的《大宝律令》都受到唐朝直接而巨大的影响。日本的官制，从中央到地方有完整的系统，中央设有神祇官和太政二官，以及中务、式部、治部、民部、兵部、刑部、大藏、宫内等八省，

大体也仿照唐制。此外，唐朝的衣着、居住、风俗也移植于日本。五月五日的菖蒲酒、七月十五日的盂兰盆、九月九日的菊酒、除夕的追傩等中国一年间定例的节日或活动，亦逐步深入日本朝野上下以及社会各阶层。中国的打球、蹴鞠、双陆、围棋也盛行于日本。留学生和留学僧回国时，带回了大量的中国典籍，《史记》、《汉书》、《后汉书》、《三国志》、《晋书》、《文选》以及诸子、文集等，大量传入日本。《孙子兵法》也在唐中叶时，约公元760年（唐肃宗上元元年）传入日本。有不少书籍在中国失传了，以后在日本发现后再传回中国，如唐人张行成所著《游仙窟》就是如此。空海回国后，仿汉字草书制定平假名，吉备真备取汉字楷书偏旁、部首制定片假名，从此，日本才有了自己的文字。

在留学生中还有久客不归、老死于唐土的。随第9次遣唐使来唐的留学生阿倍仲麻吕（698—770）与吉备真备同来唐朝，时开元8年（717），其年他19岁。他被分配到长安城内"太学"学习。这里的学生都是五品以上官员子弟。太学的教师主要是各种经典的博士，是全国知名的学者。阿倍仲麻吕经过9年的勤奋学习，不仅精通几种经典，而且善作诗赋。这期间由于热爱中国，故改姓名为晁衡。开元十六年（728），他担任了左右春坊司经局的校书郎（从九品），专门校理图书。他从此正式为唐朝官员，达40年之久。翌年，转任"补阙"（从七品），属于门下省。补阙是皇帝的侍从，对中央政府工作的问题有权提出批评、建议。四年以后，担任仪王"友"。仪王是唐玄宗第11子李璲。"友"是官职，其职务是伴读。其时，李白来长安，担任"翰林供奉"，是皇帝文学词章顾问侍从。李白结识了阿倍仲麻吕，两人经常在一起痛饮酣歌，高谈阔论。阿倍仲麻吕在担任唐政府官职以及和中国文人交游的过程中，逐渐成为中日两国友谊的桥梁。他虽然是唐朝官员，实际执行日本大使的任务。每当日本遣唐使到达长安，他都主动协助使团，与唐政府接洽有关事务。例如：天宝十一载（752）日本第11次遣唐使到达长安后，阿倍仲麻吕即引领日本使团谒见唐玄宗。由于阿倍仲麻吕的疏通，唐玄宗授予日本大使藤原清河以"特进"（正二品散官），授副使大伴古麻吕以银青光禄大夫卫尉卿（从三品），从而加深了中日两国的友好关系。天宝十一载，阿倍仲麻吕已留唐35年，见日本来使，不禁涌起回国的念头，于是上书唐玄宗并获准以唐王朝使臣的身分与日使同行返日。翌年十月，阿倍仲麻吕随日使藤原清河等离长安返日。唐朝廷及阿倍仲麻吕好友们热情欢送。唐玄宗并赋御诗惜别，题曰《送日本使》，诗云："日下非殊俗，天中嘉会朝。念余怀义远，矜尔畏途遥。涨海宽秋月，归帆驶夕飙。因惊彼君子，王化远昭昭。"诗人王维亦赋五言长律赠予阿倍仲麻吕，题为《送秘书晁监还日本》。天宝十二载十月十五日晚，在船上，阿倍仲麻吕作诗《望月望乡》："翘首望东天，神驰奈良边。三笠山顶上，想又皎月圆。"不料，所乘第一船航行中遇风漂流到安南驩州。全船180人绝大部分遇难，只有阿倍仲麻吕和大使藤原清河等少数人幸免，从陆路辗转返回长安。此时李白在江南听说阿倍仲麻吕乘船遇风无消息，误以为遇难，写了一首七绝《哭晁衡》，沉痛悼念这位日本友人，诗云："日本晁卿辞帝都，征帆一片绕蓬壶。明月不归沉碧海，白云愁色满苍梧。"这首诗无疑是象征着中日两国人民长期往来的深厚情谊，传诵当时而永垂千古的绝唱。阿倍仲麻吕于唐代宗大历五年（770）在中国与世长辞，终年72岁。（翁俊雄）

西方宗教的传入

唐代是中国历史上的鼎盛时期，经济繁荣、文化发达、国力强盛，在当时世界上居于前列，有很大的影响。唐朝与西方国家也有广泛的联系。波斯（伊朗）、大食（阿拉伯）、拂林（拜占廷）的使臣、商人、宗教信徒纷至沓来。随着他们的足迹，拜占廷的景教（基督教的一支），波斯的摩尼教、袄教，大食的伊斯兰教也于此时传入唐朝。

唐朝建立即与西方的一些国家建立联系。唐太宗贞观九年（635）拂林即派使者来唐；十七年（643）拂林国王波多力又遣使者来献赤玻璃等物。高宗永徽二年（651）大食"始遣使朝贡"。龙朔元年（661）波斯国王卑路斯奏言："频被大食侵扰，请求救援。"唐高宗派陇州南由县令王名远充使西域，在其地"疾陵城"置波斯都督府，以卑路斯为都督。唐朝与西方各国的交通，除有著名的"丝绸之路"陆路可通外，自南海西向，也有海上交通线。唐人杜环，随镇西节度使高仙芝西征。唐军在怛逻斯城（前苏联哈萨克东南的江布尔城）被大食军大败。在大食所俘的唐朝士兵中，多有造纸工匠。从此，中国的造纸术辗转传入西方。而杜环也被俘。杜环于天宝十载（751）至西海。唐代宗宝历元年（762），搭乘商贾船归国，自广州登岸回长安。杜环就是从陆路至西方，又从海路归国。西方的一些宗教信徒，就伴随着使臣、商贾一起来唐。

景教（基督教的一个教派，后来又称也里可温教）。拂林的使臣于贞观九年（635）来唐。这时从波

斯来唐的以波斯人阿罗本为首的一行景教教士谒见了唐太宗。唐太宗听了他们陈述的景教教义，并令将基督教圣经经文译为汉文供他参考。贞观十二年(638)唐太宗宣布他对这新宗教完全满意，可以在唐境宣讲。并令在长安义宁坊"建寺一所，度僧廿一人"。由于拂林的景教通过波斯人阿罗本传来，因而最初称其寺为"波斯寺"。唐玄宗天宝四载(745)始命长安、洛阳的景教寺，一律改称"大秦寺"。两京和诸郡有不少景教教堂，可见信者不乏其人。唐德宗建中二年(781)长安的景教徒宁恕等最早的一批中国信徒，立了一块石碑《大秦景教流行中国碑》，记述了景教在唐朝流行的情况："高宗纂祖，更筑精宇，和宫敞朗，遍满中土。"(此碑后埋没土中，至明朝才被发掘出土。)唐武宗灭佛时，景教也受牵连。

摩尼教。　波斯人摩尼所创。武则天延载元年(694)传入中国。唐德宗曾令摩尼师祈雨。长安、洛阳、太原都有摩尼寺。《太平广记・吴可久》载：吴可久，越州人，唐宪宗元和十五年居长安，奉摩尼教，妻王氏，亦从之。唐武宗灭佛，摩尼教受到牵连，天下摩尼寺尽废，京城女摩尼 72 人皆死。不过，摩尼教的教义为光明与黑暗斗争，光明最后胜利。并提倡互助。因而易被人们接受。后转入地下，信徒不少。北宋的方腊起义，就是利用民间秘密存在的摩尼教来组织发动群众的。

伊斯兰教。　阿拉伯人穆罕默德所创。唐高宗永徽二年(651)大食使者来唐。唐玄宗开元年间，大食又派使臣来唐。安史之乱时，唐朝"亦用其国兵，以收两都"。这些大食士兵，有不少在中国落籍。大食商人不少从海上而来，唐朝的沿海城市如广州、泉州、扬州等有很多大食商人居住。他们都是伊斯兰教徒。著名的伊斯兰教徒瓦哈伯，即曾在广州传教。

(秦秀芳)

唐灭高昌国

贞观十四年(640)唐太宗派侯君集率军灭高昌国(新疆吐鲁番)，在其地设置西昌州(不久改为西州)，实施有效的行政管理。

公元 460 年，我国北方游牧民族柔然的势力达到这里，立汉人阚伯周为高昌王，其后几经变乱，公元 499 年，金城郡榆中县(甘肃兰州西)汉族人麹嘉被拥立为高昌王。高昌麹氏王朝是以汉族为中心的封建割据政权，其经济、政治制度、风俗、文化，以及文字都与中原地区基本一致。高昌地处内地与西域之间，是中西交通的重要枢纽。西域自西汉以来已经成为中国的领土的一部分。自西汉至隋朝，由内地通往西域的交通线，分南、中、北三道。从敦煌出发，南道经过鄯善；中道经过高昌；北道经过伊吾(新疆哈密)，也可以通过高昌至波斯达于欧洲。高昌地当要津，与鄯善、伊吾同被称为"西域之门户"。隋末战乱，经鄯善一线的南道因故废弃。从内地通往西域只有中道、北道可通，而北道的"门户"伊吾原先臣属西突厥，贞观四年内附唐朝，成为唐朝的伊州。但由于后来受到高昌王麹文泰和西突厥乙毗咄陆可汗的遏制，其作用远比不上高昌。高昌国东北迫伊吾，西南控焉耆，雄居其中，成为扼守西域的咽喉之地。

隋朝时，高昌国与隋朝保持着友好的关系。唐高祖武德初年，高昌国王麹伯雅死，子文泰立，曾遣使入贡。贞观元年，麹文泰从道经高昌的玄奘那里，得知唐朝的伟业，遂遣使向唐太宗贡"玄狐裘、玉盘"，并且"西域诸国所有动静辄以奏闻"。贞观四年十二月，又亲自入朝，受到唐太宗的款待。然而，高昌王麹文泰从贞观六年起开始反抗唐朝，这与西突厥的分裂有关。唐武德年间，西突厥统叶护可汗多次遣使入贡，与唐朝保持友好。唐太宗即位，贞观元年又遣使贡"万钉宝钿金带、马 5000 匹"。贞观二年，统叶护可汗因内乱被杀，西突厥分裂。继立的乙毗咥利失可汗，逐渐不能维持西突厥的统一，居伊犁河以东；居伊犁河以西的乙毗咄陆可汗，大体活动在高昌国西北，今准噶尔盆地一带，对抗咥利失可汗和唐朝。在其影响下，高昌王麹文泰也于贞观六年开始与唐朝对抗。此年焉耆王突骑支遣使入贡，请求恢复由焉耆通往内地的碛路，以便往来，得到唐太宗的允许。这条碛路亦为中西交通中道的支线。麹文泰因此怀恨，遣兵袭焉耆，大掠而去。伊吾附唐后，麹文泰与西突厥乙毗咄陆可汗发兵共击之。此外。麹文泰又"遏绝西域朝贡"，拘留西域各国派遣入唐的使者，以至出现"伊吾之右，波斯以东，职贡不绝，商旅相继，(而)琛赉(即所贡之珍宝)遭其寇攘，道路由其拥塞"的状况。很明显，唐太宗如果要统一西域，打击西突厥乙毗咄陆可汗，必须首先打击高昌麹氏王朝。

唐朝初年，唐太宗把主要精力放在平定割据势力，平定东突厥、吐谷浑上，无暇顾及西北地区。贞观年间，在上述目标实现以后，统一高昌，进而统一西域的时机已经成熟。贞观十三年唐太宗下诏征麹文泰入朝，麹文泰称疾不至，表示要与唐朝对抗到底。同年十二月，唐太宗命吏部尚书侯君集(？—643，豳州三水(今陕西旬邑)人)为交河道行军大总管，征调"山东(指太行山以东地区)善为攻城器械者，悉遣从

军”,率领大军挥戈西北,平定高昌。唐军很快到达高昌国境,麹文泰忧惧无策,发疾而死。其子麹智盛试图抵抗,终于投降。西突厥乙毗咄陆可汗仓皇西逃千里之外,不敢来救。贞观十四年八月,高昌麹氏王朝被唐朝灭亡。高昌国原有“三郡、五县、二十二城”,“其界东西800里、南北500里”。唐朝在那里设置高昌州,旋即改为西州,下置高昌、柳中、交河、蒲昌、天山五县。不久,又于西州置安西都护府,治所在交河城。“岁调千兵,谪罪人以戍”。唐平高昌时,有户8000,口3万。唐太宗下诏:“彼州所有官田并给旧官人、首望及百姓等。”在这里与内地一样实行了均田制度。　（翁俊雄）

文成公主入藏

唐太宗贞观十五年(641),宗室女文成公主(? —680)赴吐蕃与吐蕃赞普松赞干布和亲,揭开了汉藏两族友好关系的序幕,具有重大的历史意义。

吐蕃,藏族的祖先。活动于今西藏和四川西部。公元7世纪初,吐蕃人在杰出赞普(即“王”)松赞干布(? —649或650)的领导下,陆续兼并了羊同、苏毗等邻部,统一了西藏,迁都拉萨(古称逻些),建立了吐蕃王国。松赞干布性骁武,多英略,因仰慕大唐风貌,再加上吐蕃与臣服诸部,吐蕃与唐朝、吐谷浑之间错综复杂的关系,促使他力求与强盛的唐朝保持和平亲睦的关系。

贞观八年,松赞干布遣使到长安,太宗派冯德遐入藏答礼。松赞干布听说突厥、吐谷浑等皆与唐联姻,尚唐公主,于是派使者随冯德遐再度入唐,携带大量贵重礼物,正式向唐请婚。未得太宗允准。松赞干布认为是吐谷浑离间所致,遂提兵20万攻吐谷浑。吐谷浑当时归附于唐,唐派侯君集率军迎击,大败吐蕃军。松赞干布退兵,遣使谢罪,复请和亲。

贞观十四年,松赞干布命大相禄东赞为正使,率随从百名,携聘礼黄金5000两,珍玩数百件,赴长安求婚。太宗许以宗室女文成公主为妻。青藏高原广泛流传着唐“五难婚使”的传说,歌颂了藏族人民的智慧和才干及两族人民的亲密关系。

文成公主自幼由长孙皇后和太宗收养。贞观十五年初,太宗命江夏王李道宗为送亲使者,护送文成公主入藏,随带了丰厚的妆奁,包括珍宝、金玉饰物、金玉书橱、绫罗彩缎,大量书籍、食物、饮料、谷种、衣物,药材、日用品,还有一尊释迦铜像,随行者有25名侍女、乐队和众多的工匠。松赞干布亲自率兵到吐谷浑与吐蕃交界的黄河源附近的柏海迎亲,见到江夏王李道宗,十分恭谨地执子婿之礼,道宗随后返回长安。

文成公主一行自长安启程至拉萨,全程共5800余里,史称“入蕃大道”,沿途都有当地官兵迎送。尤其进入吐蕃境内后,迎送更加热情和周到。松赞干布与文成公主于同年藏历四月十五日到达拉萨,这一天成为藏族人民的传统节日。沿入蕃大道,留下了许多与公主入藏有关的优美动人的传说与史迹。

到拉萨后,受到全城居民的盛情欢迎,松赞干布特地为文成公主建造了一座华丽的宫室。现在的布达拉宫内,还保存着他们结婚时的洞房遗址和两人的塑像。

文成公主入藏,首先是发展了汉藏两民族的友好关系,为中华民族大家庭的团结统一做出了卓越的贡献。两族长期保持着“和同一家”的甥舅关系,友好往来成为历史的主流。自贞观八年到会昌六年(846)双方遣使往来近200次。松赞干布去世时,唐高宗特别派使臣前往吊唁。唐穆宗长庆元年(821)双方共立的《唐蕃会盟碑》中,还追溯和回顾了文成公主和亲开创的两族关系史上的良好开端。

其次,还促进了吐蕃农业和手工业的发展。除文成公主带入吐蕃的许多谷物、种子、工匠、技艺外,唐朝又应松赞干布及文成公主之请,送去蚕种及造酒、碾硙、纸、墨等工匠。藏民在汉族工匠的帮助下,逐渐掌握了农具制造、纺织、缫丝、建筑、酿酒、造纸、制墨、制陶、冶金、碾磨等生产技术,至今藏民还相传牛犁法与纺织技术是文成公主传授的。吐蕃人过去较原始和落后的生活习俗,主要是衣、食、住等方面,也随着先进技术及华美纺织品的传入而逐渐改观。

再次,文成公主入藏对吐蕃的文学艺术和宗教也产生了很大影响。公主入藏及诗书史籍的传入,使松赞干布更加仰慕华风,专门派贵族子弟到长安国学求学,学习诗书,又聘请唐朝文士为他撰写表疏。不少吐蕃人成为精通汉诗、熟知唐朝典章的才学之士。唐代诗人陈陶作诗称颂道:“自从公主和亲后,一半胡风似汉家。”文成公主还推动松赞干布创制文字与藏历,对吐蕃文化经济的发展意义深远。随公主入藏的乐队及乐器丰富了藏族音乐。乐队所留下来的50多件弹拨乐器一直被珍藏在拉萨大昭寺内。

文成公主笃信佛教,随身携带的释迦铜像至今保存在大昭寺内。她到拉萨后,亲自顾问大昭寺的修造,大昭寺飞檐重阁,受唐风影响颇深。她还在寺前手植柳树数株,人称“唐柳”或“公主柳”。佛教在吐蕃的传播和发展与文成公主的努力分不开。喇嘛教尊

奉她为绿度母(藏传佛教传说中观音的化身)的化身。

藏族的赭面、女子椎髻及打马球等习俗游艺,传到了中原,也丰富了汉族人民的文化生活。

文成公主在吐蕃生活了近40年。由于她对汉藏两族人民之间经济、文化交流、推动吐蕃社会的进步与发展做出了卓越贡献,受到汉藏人民的深深崇敬。至今汉藏两族人民仍以壁画、诗歌、舞蹈、戏剧、传说、节日等各种形式歌颂和纪念文成公主入藏和亲的历史佳话。（宁　欣）

雕版印刷术的发明

隋唐之际,我国发明了雕版印刷术。以后传到日本、埃及和其他国家,对世界文化的发展做出巨大的贡献。

隋唐之际,我国发明了雕版印刷术。雕版印刷源于“石刻拓印”,即涂墨于石刻之上,将湿润的白纸贴在石刻上,用刷子轻轻一刷,揭下白纸,就呈现黑白分明的字迹。在这基础上再前进一步,就出现了雕版印刷术。唐太宗贞观年间(627—649)曾令“梓行”(即印行)长孙皇后的《女则》,这是雕版印刷的最早文字记载。玄奘法师曾让人大量雕印佛像散发。元稹(779—831)说:“扬、越间,多作书模勒乐天及予杂诗,卖于市肆之中。”模勒即雕刻。这说明唐宪宗元和、唐穆宗长庆年间,江苏扬州至浙江绍兴之间各地的书店陈列着雕版印刷的白乐天(即白居易)、元稹的《诗集》出售。唐文宗大和年间,剑南两川及淮南道,皆以“版印《历日》鬻于市”,由于颁行日历应由“司天台”奏颁,因此,大和九年(835)唐文宗下诏:“诸道府不得私置《历日》版。”这说明全国各地都有雕版印刷的《历书》。现存的雕版印刷的实物是唐懿宗咸通九年(868)“王玠为二亲(父、母)敬造、普施(散发)”的《金刚经》。这是用7张纸装成的卷本。第一张雕印佛经故事图;其余6张均为《金刚经》正文。这是现存雕版印刷的最古刊本,现在收藏在英国伦敦博物院。晚唐诗人司空图,应洛阳敬爱寺“讲《律》僧”确化莫(人名)的要求,为其“雕刻《律疏》(即对《律》的解释)”作《序》。司空图写道:“印本渐虞散失,欲更雕锼”,在标题下自注:“印本共八百纸。”这说明:《律疏》是雕刻印刷而成,每本800张纸,今欲重刻,需雕刻800个木版。唐僖宗因黄巢起义入蜀,他在成都市肆中看到有雕印的“字书、小学”等学生课本,还有一些“占梦”、“相宅”(看“风水”)等杂书。从中可知唐朝末年雕版印刷业已经面向民间。

雕版印刷术发明以后,逐步传至国外,这是我国对世界文化发展的巨大贡献。朝鲜和日本来唐的留学生,学到许多工艺技术,其中包括雕版印刷术。日本至今留存有雕印本、日本印的《陀罗尼经》,据说印于公元770年(唐代宗大历五年,日本宝龟元年)。日本学者指出,这本经书的印刷技术是中国传去的。12世纪,我国的雕版印刷术传到埃及。欧洲至14世纪末,才开始有雕版印刷品。其印刷的方法、程序和我国相同,说明欧洲的印刷术也是从我国辗转传去的。（秦秀芳）

唐“安西四镇”的设置

唐朝初年打败西突厥和吐蕃,在西北焉耆(新疆焉耆)、龟兹(新疆库车)、疏勒(新疆喀什)、碎叶(托克马克)设置四个军事重镇,巩固了唐朝西北的边防。

巴尔喀什湖以东、以南,里海以东的广大地区,自古以来就同中原地区有密切关系。今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境内的高昌(新疆吐鲁番)、焉耆、龟兹、疏勒、于阗(新疆和田)等,长期接受汉族的政治、经济、文化的影响,社会发达,如高昌,“其刑法、风俗、婚姻、丧葬,与华夏大同”。然而,隋末唐初,这一带被西突厥统治者控制。唐贞观二年(628)西突厥统叶护可汗死,咥利失可汗继位,分其国为十部,在碎叶以东,为五“咄陆”(部落名称),碎叶以西,为五“弩失毕”(部落名称)。此后西部首领乙毗咄陆可汗打败东部首领乙毗咥利失可汗,并吞并其部分领土,自伊利河(今伊犁河)以西属乙毗咄陆可汗;以东属乙毗咥利失可汗。唐为恢复巴尔喀什湖以东、以南各地和内地的关系,首先要打通河西走廊。吐谷浑居于青海东部,经常北犯甘肃河西走廊。吐谷浑是唐朝向西域发展的主要障碍。贞观九年春,唐太宗以李靖为西南道行军大总管向西挺进。三月,唐军于库山击溃吐谷浑的主力,其王伏允被迫向砂碛中撤退。唐军兵分两路追击。伏允计穷,自缢而死。唐军会于星宿川柏海(青海罗布诺尔湖畔),伏允子慕容顺率众投降。唐降服吐谷浑,通往西域的孔道已经疏通。早在贞观四年,临近中原的伊吾(新疆哈密)城主附唐,以其地置伊州。从此,唐朝势力越过玉门关。接着,唐军的矛头指向高昌、焉耆、龟兹。高昌是西域古老的王国,早在北魏时期,敦煌人张孟明始为高昌王,其后为麹氏家族夺得王位,也是汉人。有城二十二,人口3万,军队万人。唐太宗贞观元年,高昌王麹文泰曾资助西行取经的玄奘。贞观四年,高昌王麹文泰曾入朝,受到唐太

宗的礼遇。贞观十三年高昌王麴文泰受西突厥控制，一方面"遏绝西域朝贡"；另一方面，与西突厥联兵共击唐之伊州和焉耆国。当年十二月唐太宗以侯君集为交河行军大总管领兵数万进攻高昌。此年，西突厥咥利失可汗死，其侄立，是为沙钵罗叶护可汗，建庭于虽合水北，谓之"南庭"。龟兹、焉耆、鄯善、吐火罗等国皆附之。咄陆可汗建牙于"镞曷山"西，谓之"北庭"。贞观十四年八月，高昌王麴文泰死，子麴智盛继立。西突厥乙毗咄陆可汗遣其部将屯兵"可汗浮图城"，声援高昌。及至侯君集率大军至，可汗西逃，守将以城降。麴智盛开城门出降。唐以高昌国为西州，其治所为高昌县。以"可汗浮图城"为庭州，其治所为金满县。并置安西都护府于交河城。贞观十五年西突厥咄陆可汗杀沙钵罗叶护可汗并其众，自此"自恃强大，遂骄倨，拘留唐使者，侵暴西域"。然而，咄陆可汗对内跋扈，被其部将胡禄屋赶走，迫其奔吐火罗国。西突厥诸部派使者至唐廷，请废咄陆，更立可汗。唐太宗遣使立莫贺咄可汗(统叶护可汗之伯父)之子为射匮可汗。唐初，焉耆王突骑支曾遣使入贡，并请求唐廷"复开碛路以便往来"。唐灭高昌后，焉耆的态度骤变，依附西突厥，绝朝贡。贞观十八年唐太宗以郭孝恪为西州道行军总管，率步骑3000以击之，克其城并俘其王突骑支。贞观二十年西突厥射匮可汗遣使入贡，且请婚。唐太宗允许，不过，要他割龟兹、于阗、疏勒、朱俱波、葱岭五国为聘礼。被拒绝，双方不睦。贞观二十一年龟兹王伐叠死，其弟诃黎布失毕继立。"浸失臣礼，侵渔邻国"。唐太宗命左骁卫大将军阿史那社尔、安西都护郭孝恪等将兵进讨。贞观二十二年唐军擒龟兹王布失毕，攻破龟兹。"西域震骇，西突厥、于阗、安国争馈驼马、军粮"。唐廷将安西都护府从交河城移于西州高昌城。"以郭孝恪为都护，兼统于阗、疏勒、碎叶，谓之'四镇'。"

原先，西突厥咄陆可汗曾以阿史那贺鲁为叶护(西突厥可汗之下的小可汗)，使居多逻斯水，统处月、处密、始苏、歌逻禄、失毕五姓之众。咄陆可汗奔吐火罗之后，于贞观二十二年射匮可汗遣兵追击，贺鲁无法，率其众数千帐附唐。唐太宗诏处之于庭州莫贺城。贞观二十三年，唐在贺鲁原地设瑶池都督府，隶安西都护。阿史那贺鲁闻唐太宗死，谋袭取西、庭二州。后因其阴谋暴露，遂率众西走，击败射匮可汗，并其众，建牙双河及千泉，自号沙钵罗可汗，咄陆、弩失毕各部皆归之，胜兵数十万。并与逃入吐火罗的咄陆可汗联兵，进攻唐庭州，攻陷金岭城及蒲类县。显庆二年(657)以左屯卫将军苏定方为伊丽道行军总管，并发回纥兵，自北道讨西突厥沙钵罗可汗，生俘之。苏定方令西突厥各部归所居所，通道路，置邮驿，问疾苦，划疆埸，复生业。分西突厥地置濛池、昆陵二都护府。以阿史那弥射为昆陵都护、兴昔亡可汗押五咄陆部落。以阿史那步真为濛池都护、继往绝可汗押五弩失毕部落。显庆三年五月，将安西都护府从西州高昌城移之于龟兹。而原安西都护府改为西州都督府。沙钵罗可汗所役属诸国皆置州府，西尽波斯，并隶安西都护府。龙朔元年(661)以吐火罗、波斯、哌哒、罽宾等16国，置都督府8，州76，县110，军府126，并隶安西都护府。咸亨元年(670)吐蕃陷西域18州，又与于阗联兵袭龟兹之拨换城。唐高宗放弃安西四镇，移安西都护府于西州。武则天垂拱元年(685)因西突厥兴昔亡、继往绝可汗先后死，十姓无主，武则天乃擢阿史那弥射之子元庆为昆陵都护，押五咄陆部落。翌年，以阿史那步真之子斛瑟罗为濛池都护，押五弩失毕部落。长寿元年(692)西州都督请求复取龟兹、于阗、疏勒、碎叶四镇。武则天敕以王孝杰为武威军总管，率兵击吐蕃。其年十月，王孝杰、阿史那忠节大破吐蕃军，克复龟兹、于阗等四镇，自此，复于龟兹置安西都护府，用汉兵3万以镇之。久视元年(700)以斛瑟罗为平西军大总管镇碎叶。"其安西都护，(武)则天时有田扬名，中宗时有郭元振，开元初则有张孝嵩、杜暹，皆有政绩，为夷人所服。"

(翁俊雄)

《唐律》的颁行

唐高宗永徽二年(651)颁布的《律》，是唐朝的法律条文。它是我国历史上保存下来的最早又完整的法律文献，对后代的法律有极大的影响。

唐代的法典分为律、令、格、式四类。"令"是国家制度的单行条例，如《户令》规定了户籍制度；《田令》规定了土地制度。"格"，是以皇帝诏书、敕文的形式对令文的补充。"式"，是国家机构的办事细则。"律"，是"正刑定罪"的条文，主要是为刑事犯罪制定的法律条文，其中也有涉及民事和诉讼法的条文。令、格、式是从积极方面规定的规章制度，而律则是从消极方面规定了违反前者时所应受到的刑罚。

唐代多次进行法典的纂修。现存《唐律》是永徽二年颁布的。此后，唐高宗命宰相长孙无忌等对律文逐条进行疏证(解释)，于永徽四年颁行。当时《律》与《疏》统称《永徽律疏》。后世称之为《唐律疏议》。

《唐律》连同《疏议》共30卷，分为12篇，律文共有500条。刑，分为五种：笞、杖、徒、流、死。笞，最轻，

即用荆条打击罪犯的臀、腿。杖，用竹杖打击臀、腿。徒，在一定期限（最多不超过3年）内，强迫罪犯带枷（或钳）劳作。流，将罪犯遣送边远地区服役（最远为3000里）。死，分为绞与斩两种。

维护封建专制政体和以父权、夫权为中心的封建伦理关系是《唐律》的基本精神。为此，特别规定了"十恶"罪行：谋反（谋危社稷）、谋大逆（谋毁宗庙、宫殿、皇帝祖坟）、谋叛（叛国）、恶逆（殴打乃至谋杀祖父母、父母等）、不道、大不敬（指斥皇帝）、不孝、不睦、不义（杀地方官及老师）、内乱（奸父祖之妾等）。凡属十恶之罪，"罪在不赦"，在任何情况下，都不得减免刑罚。

为维护封建等级制度，禁止不同等级人之间的婚姻，规定奴娶良人为妻者，徒一年半。"以妻为妾，以婢为妻者，徒二年"。为维护均田制度，凡是盗种、盗卖、妄认公、私田者；凡是占田过限、卖口分田者，按情节轻重，分别处以笞十至徒二年的刑罚。为了维护户籍制度和赋役制度，规定凡是漏报户口者，处以一年至三年的徒刑。

为使文武官吏守法、尽职和提高行政效率，对违法、失职和稽延公务的官吏，唐律中的《职制篇》作了许多规定。如对"受人财而为人请求者以坐赃论加二等"。《疏》对这一律文解释为：凡是公事不按正理办，受人托，为之说情，以"贪赃"论处。由于受人财物而为之说情，在原贪赃罪上加二等。依据受财多少定罪自笞四十至流2500里。在尽职方面，如唐《令》规定："内外官应轮番直宿"。而《唐律·职制篇》规定：无故不直宿者，"一日笞二十"。在行政效率方面，如唐《令》规定：官员处理公文"小事五日程"、"大事二十日程"，即小事必须在5日内办完，大事必须在20日内办完。而《唐律·职制篇》规定："文书稽程者"即没有按期办完，"一日笞十"，三日罪加一等，最多杖八十。

贵族、官员、富人受法律的庇护。凡是犯了五刑的，除十恶不赦外，其余可通过各种途径予以减免。贵族，由于他们是皇帝的亲戚而"议亲"；五品以上官员，由于官爵高贵，而"议贵"；有战功的武将而"议功"。共有八种类似情况，有"八议"。贵族、官员可以通过"八议"而减免刑罚。富人可以用铜赎罪。如犯笞刑十，可用铜一斤赎罪。用铜120斤可以赎死罪。官员还可用官、爵抵罪。

《唐律》在诉讼程序上作了明确的规定。一般诉讼程序是自下而上，即自县而州（府）、而中央的大理寺。审决权限：笞、杖刑，由县级判决和执行。徒刑，由州（府）判决和执行。徒刑以上，则由州（府）呈报，大理寺判决、执行。如事关重大或冤情严重者，则由刑部侍郎、御史大夫、大理寺卿三司会审，所谓"三司推事"。三司集议后，由秘书省奏报皇帝，由皇帝裁决。而死刑还需经过三次奏报皇帝，"三复奏讫，然后始下决"。除了上述一般诉讼程序外，由殿中侍御史负责京畿一带的巡回审理案件。京畿以外各地，则由监察御史进行巡回审理。凡案情重、冤抑无处申诉者，允许向皇帝申诉，方式有二：在皇帝出巡时，在路旁迎驾申诉，名为"邀车驾"。在东（洛阳）、西（长安）两京城门外置有大鼓，申诉者还可敲挝大鼓，名为"挝登闻鼓"。　（翁俊雄）

安东都护府的设置

唐高宗总章元年（668）唐朝在辽河以东、朝鲜半岛大同江以北建立的地方行政机构。

唐朝初年，朝鲜半岛仍然是高丽、百济、新罗三国鼎立，高丽居半岛北部，势力达到辽河以东地区。高丽和半岛西南部的百济联合，常攻半岛东南部的新罗。不过，三国在唐朝建立后，都遣使入贡，并受封爵，与唐朝关系密切。武德年间，唐朝封高丽人高建武为辽东郡王、高丽王；封百济人扶余璋为带方郡王、百济王；封新罗人金真平为乐浪郡王、新罗王。这时唐朝正在巩固内部，无暇及外。唐太宗即位后，社会经济逐渐恢复，政权也已稳定，对外活动也就积极起来。贞观五年（631）唐朝派人前往收瘗隋时战亡骸骨。高丽王建武惧唐来攻，于是筑长城，东北自扶余城，西南至海，千余里，以为防御。此时唐朝对外的主要目标是对付西突厥，以恢复对西域的统治。及至东突厥灭亡，吐谷浑、高昌、焉耆等先后内属，西突厥在西域的势力已经大为衰落，西北边疆已渐稳定，唐太宗转而东向进攻高丽了。

贞观十六年高丽西部大人泉（姓）盖苏文（名）杀其王高建武，自为莫离支（相当于中国兵部尚书兼中书令），操纵大权。莫离支盖苏文联络百济进攻新罗，新罗向唐求救。唐太宗对臣下说："出师吊伐，须有其名，因其弑君虐下，败之甚易也。"于是大量建造战船，大量招募战士，太宗以"募十得百，募百得千"自诩。准备就绪后，于贞观十九年，命刑部尚书张亮为平壤道行军大总管，领将军常何等，率江、淮、岭、硖劲卒4万、战船500艘，自莱州泛海攻平壤。以英国公李勣（594—669，本姓徐，名世勣，字懋公，曹州离狐（山东东明南）人）行军大总管，礼部尚书、江夏王李道宗，领将军张士贵等率步骑6万攻辽东。唐太宗

亲率六军至前线督战。四月，李勣渡辽水，攻下盖牟城，以其城置盖州；五月，攻下沙卑城；接着，攻下辽东城（辽宁辽阳）。六月，攻下白崖城，以其城置岩州。八月，围攻安市城，受到高丽军民的顽强抵抗，多日不下。“太宗以辽东仓储无几，士卒寒冻，乃诏班师”。第一次征高丽以失败而还。贞观二十二年唐太宗又命江南造大船，召募战士，并在莱州储军粮、器械，还命右武卫将军薛万彻做试探性进攻，欲再次大举进攻高丽，却先已病死。

高宗即位后，继续用兵高丽。高宗吸取太宗的教训，认识到必须在朝鲜半岛建立根据地。当时岛上三国，以新罗与唐关系最密切，然而，受到高丽和百济的包围，与唐朝的通路时断时续；而百济在半岛西南，与唐境距离也近。有鉴于此，高宗对刘仁轨说：“欲吞并高丽，先诛百济，留兵镇守，制其心腹。”显庆五年（660）唐派大将苏定方（592—667，冀州武邑（今属河北）人）率水陆大军10万，灭百济，分其地置五都督府。于是唐在百济“渐营屯田，积粮抚士，以经略高丽”。乾封元年（666）高丽莫离支泉盖苏文死，其子泉男生继为莫离支，与其弟泉男产、泉男建争权相攻，男生不胜，遣子献诚向唐求援。这给唐朝进攻以好机会。唐朝派大将契苾何力接应泉男生投奔唐朝。乾封二年派李勣为辽东道行军大总管，率郭待封、薛仁贵（614—683，绛州龙门（山西河津）人）等部众2万攻入高丽。总章元年攻下平壤。高丽旧分五部，有城176，户697,000。唐分其地设九都督府、42州、100县，擢拔诸部酋长有功者为都督、刺史、县令，与华人共同治理百姓，而总隶于安东都护府，以薛仁贵为安东都护，总领之，镇守平壤。以后，由于新罗反抗唐朝，迫使唐将安东都护府内迁于辽东城，再迁于新城（抚顺市附近）。不久，改称为都督府，中宗时复称安东都护府。高丽人或归于新罗，或投奔靺鞨、突厥，高氏旧族亡散。朝鲜半岛被新罗统一，高丽、百济旧地，归于新罗。（翁俊雄）

唐高宗、武则天时期对河陇地区的治理

高宗、武则天在位，先后以黑齿常之、娄师德、郭元振为陇右节度、营田大使，经过四五十年的经营，将陇右、河西地区变为富庶的地区。

今甘肃省在唐太宗贞观元年（627）将全国划为十道时划为“陇右道”。唐睿宗景云二年（711）又划陇右道之西部为“河西道”。两道统称“河陇”，是唐朝通向西域的交通要道。唐朝初年，北方的突厥和西部的吐蕃时常进犯这一地区。自唐初起，就在这一地区配置重兵防守。为了解决军需，高宗、武则天时期在这一地区开屯田，养战马，发展畜牧，使这一地区逐渐富庶起来。隋末、唐初，时人指出：“秦陇之西，人户渐少，凉州以北，沙碛悠然。”此后这一地区的经济面貌逐渐改变。

陇右（因在陇山之西而得名）：高宗仪凤年间（677—679），吐蕃犯边，黑齿常之（？—689，百济人）任河源军（唐朝派驻鄯州的军队名称）副使，“开营田5000余顷，岁收百余万石”。武则天十分重视陇右的屯田，着意大大扩充陇右屯田的规模。长寿元年（692）任命长期充“河源军司马并知营田事”的娄师德（630—699，郑州原武（今河南原阳）人）为河源军、积石军（驻廓州）、怀远军及河、兰、鄯、廓等州营田大使。娄师德赴任前，武则天对他说：“王师外镇，必借边境营田，卿须不惮劬劳，更充使检校。”娄师德经营屯田的情况可从其部下河州诸军事知营田使冉寔在河州屯田的情况了解其一斑。冉寔入朝时，武则天对他备加称赞：“河州，军镇要冲，屯田最多。卿以足食为心，朕无西顾之忧矣！”娄师德在河陇前后40年，恭勤不怠，夷夏安之。陇右还是唐军战马的供应地。唐朝建立后收括战马3000匹，在京师东赤岸泽放牧。唐太宗贞观年间，自赤岸泽移牧马于会州之南、秦渭二州之北、兰州狄道县之西。至高宗麟德年间（664—665）战马繁衍至706,000匹，放牧地区扩展至秦、渭、兰（以上三州属陇右道）、原（与上述三州接壤，属关内道）四州。幅员千里，分设48“监”进行管理。此后一度衰落，至唐玄宗开元初年，又恢复到24万匹。至开元十三年（725）又发展为43万匹，此外，还畜养牛5万头，羊28万口。由于黑齿常之、娄师德在陇右河、兰、鄯、廓等州广大地区开拓屯田，粮食丰盈；而秦、渭、兰（以及原州）州大片地区牧放战马，并畜养了大量牛、羊，为陇右的经济打下雄厚的基础。至唐玄宗开元年间，陇右已跃居全国最富庶的地区之一。

河西（因在黄河以西而得名）：武则天圣历元年（698），甘州已有屯田40余处，而此时凉州屯田较少。凉州在唐高宗总章元年（669）升为大都督府，督凉、甘、肃、伊、瓜、沙等州。然而，凉州的地界南北不过400余里。北方突厥、西部吐蕃时常至凉州城下骚扰。为加强凉州的防御力量，武则天于大足元年（701）任命郭元振为凉州都督、陇右诸军州大使。郭元振到任，在凉州以南之硖口，建筑和戎城；在凉州以北的沙碛中配置白亭军。由于控制了南北要路，乃

拓州境1500余里。从此，突厥、吐蕃不再出现于凉州城下。郭元振又令所部甘州刺史李汉通于凉州开拓屯田面积，充分发挥凉州1500余里的“水陆之利”，因而粮食丰盈。此前，凉州的粟、麦，价高时竟达数千钱一斛，自李汉通广开屯田，“数年丰稔，乃至一匹绢粜数十斛。积军粮，可支数十年(之用)”。史载：郭元振“在凉州5年，夷夏畏慕，令行禁止，牛羊被野，路不拾遗”。郭元振在凉州奠定的雄厚基础，保持了数十年。唐玄宗开元十二至十五年(724—727)任河西节度使的王君㚟，在任期间，“大田多稼，而屯廩百亿”。而开元十八至二十四年任河西节度使的牛仙客，在任期间，“所积仓库盈满”。

陇右、河西，一向民户少、沙碛多，民生困苦。然而，唐高宗、武则天在位，在陇右、河西大力开拓屯田、发展畜牧，经过四五十年的经营，到唐玄宗开元中期，一跃而成为可与河南、河北相提并论的重要经济区域。唐人在谈论开元年间国家的财政收入时，往往将陇右、河西与河南、河北相比拟。唐人说：“昔在开元，最为治平。当时西有甘、凉六府之饶；东有两河(指河南、河北)之赋。……四十年间，富庶滂洋之若是。”还说：“开元中(西)入河湟(指黄河、湟水，即指河陇)之赋，满右藏(唐朝之仓库分左、右)；东纳河北诸道租庸，充左藏”。史称：天宝中“天下称富庶者，无如陇右”。总之，唐高宗、武则天时期对河陇地区的治理，不仅使这一经济落后地区一跃而为经济富庶地区，并且，也为以后“开天盛世”的出现，奠定了部分的经济基础。 (翁俊雄)

武则天改唐为周

武则天是中国历史上唯一的女皇帝，封建时代杰出的女政治家。她以皇后的身分多年辅佐唐高宗之后，于天授元年(690)即皇帝位，改国号为周。武则天于长安四年(704)退位。她在中国封建社会历史上有重要地位。

武则天(624—705)，山西文水人。父武士彟，原为木材商人。隋大业十三年(617)，任太原留守行军司铠。入唐后，历任利州(治今四川广元)都督、荆州(治今湖北江陵)都督等。武则天随母杨氏居于长安。贞观十一年(637)唐太宗听说武则天“美容止”，召入宫，立为才人(女官名)。年仅14岁的武则天进入皇宫，太宗赐其号为“武媚”。太子李治在宫中见了武则天而“悦之”。贞观二十二年唐太宗卧病，李治与她有较多的接触机会。翌年，太宗死，宫中嫔御皆为比丘尼，武则天也进了感业寺削发为尼。高宗李治继位后，王皇后与萧淑妃争宠，让武则天蓄发。翌年，武则天已28岁，王皇后将其引入后宫，“以挠妃宠”。武则天入宫后，起初对皇后极为顺从，因而晋封昭仪。皇后无子，而武则天于永徽三～四年(652—653)间，生下长子李弘。唐高宗共有12个子女，而后面的6个，都是武则天所生，可见她独占房帷之宠。这使武则天萌发了当皇后的野心。永徽五年初，武则天生下第二个孩子，是女儿。王皇后“就顾弄，去，昭仪潜毙儿衾下，伺帝至，阳为欢言，发衾视儿，死矣”。高宗问左、右，都说：皇后刚才来过。高宗甚怒，始有废皇后之意。永徽六年九月，高宗退朝，召见长孙无忌、李勣(原名徐世勣，因功赐姓李，后因避唐太宗名讳改名勣。)、于志宁(588—665，京兆高陵(今属陕西)人)、褚遂良(596—658，钱塘(今杭州)人)等元老重臣，对他们说：皇后无子，武昭仪有子，今欲立昭仪为后，何如?褚遂良回答：皇后名门出身，是先帝为陛下所娶。无过，岂可轻废！翌日，高宗又召见他们，褚遂良说：陛下必欲易皇后，伏请妙择天下令族，何必武氏？武氏曾经奉侍先帝，众所俱知，天下耳目，安可蔽也！万代之后，谓陛下为如何！说罢即将笏置于殿阶，解巾叩头流血，说还陛下笏，乞放归田里。高宗大怒，令人引出。武则天在帘后大声说：“何不扑杀此獠！”于志宁不敢说话。此后，韩瑗、来济等重臣上表切谏。高宗正在一筹莫展之际，李勣入见，高宗问他：朕欲立武昭仪为后，遂良固执以为不可。此事就中止了不成？李勣回答：此陛下家事，何必更问外人。高宗得到李勣的支持，“上意遂决”。为了清除障碍，唐高宗贬褚遂良为潭州(治今湖南长沙)都督。永徽六年十月，高宗诏废王皇后、萧淑妃为庶人，立武昭仪为皇后。

武则天当了皇后，反对她的元老重臣大部还在朝廷。显庆二年(657)，武则天指使许敬宗、李义府诬奏韩瑗、来济与褚遂良图谋不轨。将褚遂良再贬为桂州(治今广西桂林)都督、再贬为爱州(今越南清化)刺史，翌年，死于任所。韩瑗贬为振州(海南崖县西)刺史、来济贬为台州(浙江临海)刺史。反对武则天为皇后的在朝廷中只剩下高宗李治的母舅长孙无忌了。显庆四年，许敬宗在武则天指使下诬告褚遂良、柳奭(王皇后之母舅)和长孙无忌谋逆。长孙无忌被流放至黔州(四川彭水)，不久，被逼自缢。这时褚遂良已死，追削其官爵。柳奭除名，后被杀于象州。此时韩瑗已死，来济远贬庭州(新疆吉木萨尔)。至此，反对武则天的元老重臣势力彻底摧毁。然而，在迫害元老重臣的过程中，武后威福自专，牵制高宗，高宗颇感不快。恰值宦官王伏胜揭发武后常引方士郭士真

入禁中蛊祝，祈求非分之福。高宗大怒，将废武后为庶人。宰相上官仪乘机劝高宗废除武后，以顺人心。高宗命他起草废皇后诏书。武则天闻讯赶至，一番申诉，使高宗"羞缩不忍"。在慌乱中，高宗说：我初无此心，皆上官仪教我。对武后"待之如初"。武则天为彻底巩固地位，指使许敬宗诬陷上官仪谋大逆。上官仪与其子庭芝下狱而死，家口籍没为奴婢。至此，武则天的皇后地位终于稳固下来。

自上官仪死后，武则天的地位日益加强。高宗每视朝，天后（上元元年，高宗号"天皇"，皇后亦号"天后"。）垂帘于御座后，政事大小，皆预闻之，内外称为"二圣"。事实上，这与高宗的健康状况有关。自显庆五年起，高宗的慢性疾病时好时坏，严重时风眩头重，目不能视。百官奏事，往往由武后裁决。武后性明敏，涉猎文史，处事得宜，实际已手操人主之权。上元二年(675)四月，年仅24岁的皇太子李弘病死，武则天所生次子李贤继为皇太子。高宗此时心情沮丧，病情加重。上元三年，高宗欲将帝位传给武则天。为此事，与宰相议论。宰相郝处俊说：以前，魏文帝命令：自己身死后不许皇后临朝主持国政。今天陛下怎能亲自传位给天后？再说，天下，本是高祖、太宗之天下，不是陛下之天下。陛下应守宗庙、传位子孙，不可将社稷给别人。高宗才放弃了这一打算。这件事，对武则天觊觎帝位不无影响。

高宗一度想传位于皇后的念头被打消后，就一心培养太子李贤，屡次命他监国，"太子处事明审，时论称之"。武则天既觊觎帝位，而面临高宗死后帝位落入李贤手里的危险，母子之间的矛盾日益尖锐。明崇俨死，使矛盾表面化。明崇俨是正谏大夫，特令入阁供奉。他私奏李贤不堪承继大位。太子李贤得知后，每日忧心忡忡，知难保全。仪凤四年(679)五月一日，明崇俨遇刺身死。武则天怀疑是李贤派刺客刺死，使人告发太子颇好声色，与户奴赵道生等狎昵。高宗下诏审理此案，搜查东宫。于东宫马坊查获皂甲数百领，认为是造反所用。赵道生承认明崇俨是他受太子指使杀害的。高宗想宽宥李贤。武则天却说：为人子，怀逆谋，天地所不容；大义灭亲，何可赦也！调露二年(680)八月，太子李贤废为庶人，遭幽禁。以后，被流放巴州。高宗死后，武则天又派人将其杀害。李贤被废次日，武则天所生第三子李显被立为皇太子。

弘道元年(683)十二月，高宗病死。太子李显继位，即唐中宗，尊武则天为皇太后。武则天觊觎帝位的野心空前膨胀。唐中宗年轻气盛，想让其岳父韦玄贞当宰相，遭到中书令裴炎的反对，中宗顶撞说：我以天下与韦玄贞何不可！此话被武则天得知，大怒，下令废中宗为庐陵王，幽于别所。中宗问武则天：我何罪？武则天回答：汝欲以天下与韦玄贞，何得无罪！嗣圣元年(684)二月，武则天立李旦（武则天所生第四子）为皇帝，是为唐睿宗。武则天虽立李旦为帝，但令其居于别殿，不许其参与政事，理由是："皇帝谅暗不言，眇身且代亲政。"从此一切大政由她以太后身分裁决。

武则天废中宗、禁睿宗，自己临朝称制，独断专行，使"宗室人人自危，众人愤惋"。率先起来反叛武则天的是李敬业（？—648），即徐敬业，曹州离狐（山东东明东南）人。他是元老重臣唯一支持武则天为皇后的李勣之孙。各地一起策划反叛的骨干分子是一伙心怀不满的中小官僚。李敬业原任眉州刺史，后因故贬为柳州司马。其弟周至县令敬猷，因故免官。给事中唐之奇贬为括苍县令。长安县主簿骆宾王贬为临海县丞。"各以失职怨望，乃谋作乱，以匡复庐陵王为辞"。光宅元年(684)九月，他们在扬州起兵，有众10万人。武则天迅速调集30万大军，派李孝逸统率，仅用44天，就压平了叛乱，李敬业、李敬猷、骆宾王等被部下杀死，余党皆平。早在平定扬州起兵的紧张时刻，宰相裴炎对武则天说：皇帝年纪已经不小，不让他掌政，会给人以口实。如果将政权还给皇帝，叛军不攻自破。监察御史崔詧上言：裴炎身为宰相，揽大权，不征讨叛乱，却请太后归政，这是别有用心。于是裴炎下狱，不久被斩于洛阳都亭驿。扬州起兵失败后，垂拱四年(688)唐宗室又起兵反对武则天。首谋起兵的是唐高祖第11子韩王李元嘉。武则天临朝摄政，拜他为太尉、任绛州刺史。官位虽高，在朝中并无实权。他以"迎还中宗"为号召，串通霍王李元轨、鲁王李灵夔、越王李贞等起兵，相互呼应。武则天派丘神勣、麹崇裕等率两路兵马，迅速将各地宗室起兵压平。武则天在压平扬州、宗室起兵后，利用周兴、来俊臣等一大批酷吏，盛开告密之门，为政敌罗织罪名，击溃了所有与她抗衡的力量，为她登基扫清了道路。

载初元年(690)九月九日，67岁的武则天正式登基，成为"圣神皇帝"，建立大周朝，改元天授。降皇帝为皇嗣、皇太子为皇孙。武则天尊周文王姬发为始祖文皇帝，以迁都洛邑的平王少子姬武为睿祖康皇帝。传说姬武生时手上有"武"字，武则天遂援引姬武为祖先，以周为国号，以光大其祖先与社稷。武则天在辅佐高宗的30年和做大周皇帝的14年中，上承

贞观，下启开元，是前者向后者转变的过渡时期。这一时期，无论政治、经济、军事上都呈现欣欣向荣的景象。这是在隋末动乱之后、贞观年间各方面初步恢复的基础上，进一步恢复和初步发展，为开元盛世的出现打下牢固基础的时期。在社会经济上，调整人口布局、推行均田制度。由于隋末战乱，唐初人口分布极不平衡。隋朝人口密集的河南、河北，唐初人口“十裁一在”，出现了大量宽乡。而关中地区人口过密，是狭乡。为了恢复和发展中原地区的农业生产，武则天于天授二年将关中百姓数十万户“无田业者”迁徙至河南、河北，在此期间有力地推行了均田制度，促进了社会经济的发展。在政治上，拔擢人才。武则天发展了科举制度，每年科举取士的平均数超过唐太宗时的一倍。武则天大量拔擢人才。唐人李绛说：“天后朝命官猥多，当时有车载斗量之语。及开元中，致朝廷赫赫有名望、事绩者，多是天后所进之人。”在武则天在位期间，庶族地主在政治上的地位日益显著。在军事上，长寿元年(692)派王孝杰收复安西四镇，巩固了西北边防。在她退位时，全国民户已从永徽三年的380万户增至615万户，反映了当时社会经济的显著发展。

神龙元年(705)正月二十二日，张柬之(625—706，襄州襄阳(今属湖北)人)、敬晖、桓彦范等人发动了政变，迫使武则天退位，拥戴唐中宗复辟。正月二十五日，武则天徙居洛阳宫城西南的上阳宫。翌日，唐中宗亲率百官至上阳宫问安，为其母帝上尊号“则天大圣皇帝”。当年十一月初二，即705年12月11日，虚岁82的武则天死于上阳宫的仙居殿。神龙二年正月，武则天的灵柩在唐中宗亲自护送下回长安，隆重地举行安葬仪式，与唐高宗合葬在乾陵，并在陵前高高地竖起一座无字碑，让后人去评说这位女皇帝一生的功过与是非。　　(翁俊雄)

武则天时期狭乡民户徙就宽乡

武则天天授二年(691)唐廷将以雍州(都城长安所在地)为中心的关中南部地区的数十万民户迁徙至“地广人稀”的河南、河北，授给他们土地，为这一广大地区的社会经济的恢复和发展创造了条件。

隋末战乱使人口大为减少。隋大业五年(609)全国民户8,907,536；人口46,019,956。至唐贞观十三年(639)，全国民户只有3,003,202，人口12,311,698。为原来的33%。而人口分布也失于常态。隋代民户集中在黄河流域，占当时全国户数的76%。其中河南、河北的民户占全国户数的54%。然而，由于隋末战乱主要集中在河南、河北，这里的人口大幅度减少。隋代的河南地区民户居全国各地区之首，为290万户，而唐贞观十三年只有30万户，因此唐初有人指出：“比于隋时，十裁一在。”贞观年间魏征指出：“今自伊(水)、洛(水)之东，暨乎海、岱(即泰山)，萑莽巨泽，茫茫千里，人烟断绝，鸡犬不闻。”唐高宗在显庆二年(657)巡幸许、汝二州，指出：“此间田地极宽，百姓太少。”这就是说，自隋末至唐高宗显庆年间这四五十年中，这一地区从人口最密集的地区，变为“地广人稀”的宽乡。此外，河北、江淮、陇右等地，都属宽乡。与上述地区相反，关中南部地区，主要是以都城长安所在地的雍州及其邻近华、同、邠、宁、岐等州，即“京畿”地区，人口密集、土地狭小。当时有人指出：“今畿内数州，实惟邦本，地狭人稠，耕植不博。”当时人将“地狭人稠”地区称之为“狭乡”。唐初实行均田制度，而地少人多的狭乡，民户土地给授不能足数。贞观十八年唐太宗巡幸京畿地区的零口村，询问民户授田情况，得知丁壮受田不足，下诏：“录尤少田者，……移之于宽乡。”将狭乡民户迁徙至宽乡，不仅能使民户受田得以足数，而且对人口分布的合理化、对社会经济的恢复和发展都有利。不过，当时担心关中地区丁壮流失，并未实施。随着社会经济的日益恢复，狭乡民户愿意迁至宽乡，以改善生产与生活状况。但是，当时存在着禁止京畿地区民户迁至宽乡的制度，因而，百姓多采取背着官府全家出逃的形式徙乡。从高宗永淳(682—683)至武则天长寿元年(692)这十余年中，大批京畿百姓逃往洛阳、怀、郑、汴、汝等河南州县。尽管如此，人口分布极不平衡问题并未解决。

天授二年七月武则天颁布《置鸿、宜、鼎、稷等州制》，指出：京畿地区“土狭人稠，营种辛苦”。为了解决百姓的土地不足问题，这一地区的“百姓无田业者”可以携带家口，由官府派“清强官押领”，提供水陆交通工具，送到洛州，由洛州地方官受领、安置，然后将办理结果上奏。这一《制书》冲破了原先禁止京畿百姓外徙的规定，这是武则天凭借皇帝地位才能做到的。这次由政府组织的徙民活动，收到了极大的效果。史载：天授二年“徙关内户数十万以实洛阳”。实际上，当时不仅洛阳，就是洛州也只有十数万户，无论如何也容纳不下数十万户。事实是，这数十万户经由洛州地方官将之安置在洛阳、怀、郑、汴、许、汝等河南州县。不仅如此，这一《制》书还准许此前十数年私自逃往河南州县的民户，可以在当地登记户籍，承认他们迁徙为合法。这不仅使唐初人口不合理

的布局得到调整,也使唐初的均田制得以切实地实行。在天授二年以前从京畿逃来河南、河北等地的百姓,一部分可能成为当地土户的佃农,但也有一部分在这里私自开垦荒地(这一地区在隋代为全国最发达的经济区,因战乱而抛荒的多是熟荒地)。由于他们的“逃户”身分,决定了他们占有的土地为非法。但是,天授二年的《制书》承认了他们的合法身分,从而也承认了他们所占有的土地为合法。而天授二年京畿地区数十万户“百姓无田业者”至河南州县“安置”,如果不能解决他们的土地问题,也就谈不上安置了。武则天的这一重大举措,对唐初社会经济的恢复与发展起了极大的促进作用。　(翁俊雄)

神龙至先天的政局变动

自神龙元年(705)唐中宗即位至先天二年(713)唐玄宗初即位的八年中,更替了四个皇帝,政局紊乱,是从武则天退位至唐玄宗“开元之治”的过渡阶段。

唐中宗名显(656—710),是武则天第三子,性懦弱。弘道元年(683)十二月高宗死,李显即位,嗣圣元年(684)二月即被武则天废黜,并与皇后韦氏一起软禁于房陵(湖北竹山)。李显每次听说武则天的使者来“辄惶恐欲自杀”。韦氏却有胆识,对李显说:祸福无常,宁失一死,何至如此!李显对韦氏说:如果将来能重见天日,你可以做一切你愿意做的事,我不干涉你。长安四年(704)武则天被迫退位,李显重新即位,韦氏再为皇后,干预朝政,如同武则天为皇后时的作为。中宗每次临朝,韦后都垂帘听政。桓彦范上表劝阻,被中宗拒绝。韦后为扩大权势,以她为首形成了一个韦武集团。韦武集团的骨干分子是上官婉儿和武三思(?—707)并州文水(今山西文水东)人,武则天侄。上官婉儿是上官仪孙女,上官仪及其子上官庭芝被武则天处死后,婉儿随其母没入宫廷为奴婢。婉儿聪明伶俐,能说会写,熟悉吏事,因此得到武则天的赏识,百官表奏,多让她处理。中宗复位后,晋封昭容(女官名),叫她负责起草诏书,参预朝政。武三思,武则天之侄,被拔擢为春官尚书。其子武崇训,娶中宗女安乐公主。武三思先后与上官婉儿和韦后私通。韦武集团是由武氏集团和韦后的亲属、亲信构成。他们掌握大权,中宗被韦武集团包围。韦武集团将发动政变逼迫武则天退位的张柬之、敬晖、桓彦范等人视为仇敌。神龙元年(705),武三思与韦后反复对中宗说:张柬之、敬晖等五人恃功专权,将不利于社稷。不若封晖等为王,罢其政事,外不失尊宠功臣,内实夺其权。中宗听信谗言,以敬晖为平阳王,桓彦范为扶阳王,张柬之为汉阳王,袁恕己为南阳王,崔玄暐为博陵王。翌年五月,又将五人的王位削除,分别贬为崖州司马、泷州司马、新州司马、窦州司马、白州司马。当年八月,又削除五人之官位,分别流放至琼州、瀼州、泷州、环州、古州。五人之子弟凡年16岁以上,皆流岭外。接着武三思又派人至贬所杀害他们。其时,张柬之、崔玄暐已死,其他三人惨遭折磨致死。武三思在迫害“五王”之后扬言:我不知道世间什么人是善人,什么人是恶人。凡是对我好的就是善人,对我恶的就是恶人。安乐公主为中宗、韦后所宠爱,她凭借这点卖官鬻狱,无所不为。为了卖官和为罪犯开脱,甚至自己写好皇帝的诏旨,将文字掩盖,让中宗在上签署,中宗“笑而从之,竟不视也”。皇太子李重俊,中宗第三子,是后宫宫人所生,韦后恶之。安乐公主与武崇训常凌辱太子,或呼为奴。他们还要求中宗废黜太子。景龙元年(707)七月太子李重俊与左羽林大将军李多祚和将军李思冲、李承况、独孤祎之、沙吒忠义等,冒皇帝命发羽林军骑兵300余人,杀死武三思、武崇训及其党羽十余人。接着,攻入太极宫,中宗、韦后、安乐公主、上官婉儿登上玄武门楼,令右羽林大将军刘景仁率飞骑百余人屯于楼下护卫。中宗在门楼上对李多祚所率羽林军说:汝辈皆朕宿卫之士,何为从多祚反,若能斩反者,勿患不富贵。于是,李多祚的部下斩李多祚、李承况、独孤祎之、沙吒忠义等。太子李重俊逃往终南山,至户县西,被其左右杀死。景龙四年六月,散骑常侍马秦客以医术高明、光禄少卿杨均以善于烹调,经常出入宫廷,与韦后私通。他们怕事情败露,而安乐公主想让韦后临朝摄政,自己做皇太女,以后好当皇帝,遂合谋毒死中宗。中宗死后,韦后封锁消息,总管朝政;调集各地士兵5万人守卫京城,命令自己的亲属韦捷、韦灌、韦璿、韦锜、韦播等分别统领;任命亲信张嘉福、岑羲、崔湜任宰相。太平公主(?—713,唐高宗女)和上官婉儿起草遗诏,立中宗第四子李重茂为皇太子,韦后临朝称制。韦武集团重要成员宗楚客、武延秀(安乐公主于武崇训死后再嫁武延秀)、赵履温、叶静能及韦后亲属共同劝韦后效法武则天,以革唐命。为此想谋害太子李重茂,将中宗弟相王李旦、妹太平公主除掉。韦武集团的阴谋被李旦第三子隆基得知。李隆基于景龙二年任潞州别驾,但常居京师。他认为粉碎韦武集团,必须掌握军队。唐太宗早年曾选一些骁勇者“着虎文衣,跨豹文鞯”,跟随他游猎,于马前射禽兽,谓之“百骑”。武则天时扩大编制为“千骑”,隶属于

左、右羽林军。中宗时又扩编，谓“万骑”。这是一支勇敢善战的军队。李隆基经常与他们往来，厚结其豪杰。兵部侍郎崔日用得知韦武集团上述阴谋，通报李隆基，劝其先发制人。李隆基乃与太平公主商议，太平公主赞成，并让其子薛崇暕参与其事。李隆基还与苑总监钟绍京、尚衣奉御王崇晔、前朝邑尉刘幽求、利仁府折冲麻嗣宗商定：及早动手。正在此时，韦武集团成员韦播、高嵩数次逞威体罚万骑卫士，引起万骑的反感。其果毅（武官名称）葛福顺、陈玄礼见李隆基，诉之，李隆基就将除掉诸韦的计划告知他们，“皆踊跃请以死自效”。万骑果毅李仙凫也参与。景云元年（710）六月二十日，李隆基与刘幽求便装入禁苑之中。时羽林将士皆屯玄武门。入夜，葛福顺、李仙凫皆至李隆基所在处，问何时发动？时正二鼓，天星散落如雪，刘幽求说：天意如此，时不可失！福顺拔剑直入羽林营，斩韦璿、高嵩，对众宣言：韦后鸩杀先帝，谋危社稷，今夕当共诛诸韦，（身长）马鞭以上皆斩之。立相王以安天下，敢有怀两端助逆党者，罪及三族！羽林卫士皆欣然听命。葛福顺率左万骑攻玄德门，李仙凫率右万骑攻白兽门，相约两军于凌烟阁前会合，即高声呐喊。葛福顺等杀守门将，斩关而入。李隆基勒兵于玄武门外，二鼓，闻噪声，率羽林军而入。韦后慌乱走入飞骑营，被飞骑士兵斩首。安乐公主正在照镜画眉，被军士斩首。斩武延秀于肃章门外。李隆基入宫，下令将上官婉儿斩于旗下。韦武集团成员宗楚客、赵履温、马秦客、杨均、叶静能等，先后被诛。京城城南，韦、杜二族居之，谓之“韦曲”、“杜曲”。崔日用将兵诛诸韦于韦曲；而诸韦门宗强盛，有的侵杜曲而居之，崔日用将兵又至杜曲追杀，“襁褓儿无免者”，而“诸杜滥死非一”。张嘉福在怀州被斩首。二十三日，太平公主传少帝李重茂之命，让帝位于相王李旦。相王固辞。刘幽求要李隆基出面要求相王即帝位，相王终于答应。二十四日，少帝在太极殿东隅西向，相王立于梓宫旁。太平公主对重茂说：皇帝欲从此位让于叔父，可乎？少帝犹在御座，太平公主进曰：天下之心已归相王，此非儿座！遂提下之。唐睿宗（662—716）即位，以重茂为温王。

睿宗即位后，首先遇到立谁为太子的问题。宋王李成器是睿宗长子，按封建宗法制度应为太子；平王李隆基有大功；睿宗犹豫不能决。成器主动表示不做太子，说：国家安定时应立长子，国家危难时则立有功者。如果不这样做，就会使天下人失望。刘幽求说：平王拯救社稷和陛下之难，论功最大，论德最高，毫无疑问应该立为太子。最后，睿宗只好立李隆基为太子。睿宗先后任命姚崇（650—721，陕州硖石（今河南三门峡南）人）做宰相兼兵部尚书，宋璟（663—737，邢州南和（今属河北）人）做宰相兼吏部尚书。睿宗即位之初，宋璟与姚崇协力革中宗执政时的弊政，进忠良，退不肖，赏罚分明，请托不行，当时人“翕然以为复有贞观、永徽之风”。然而，好景不长，睿宗即位的第二年，形势急剧变化。这与太平公主有很大关系。太平公主是武则天所生，睿宗之妹。她聪明，多权略，武则天认为她很像自己，特别钟爱她。武则天在世，她不敢弄权势。在中宗复位的过程中，她参与其事，有功。在诛诸韦、睿宗复位时，又立大功。因此，睿宗常与她议论大政，有时睿宗还遣宰相到她家征求意见。宰相奏事，睿宗常问：尝与太平议否？又问：与三郎（李隆基）议否？然后做决定。太平公主的主张，睿宗全部采纳，自宰相以下官员的任免、升降，“系其一言”。她权倾人主，趋附其门者如市。太平公主将太子李隆基看做她长久握权的最大威胁。在她看来，李隆基年少英武，有威望，日后对己必不利，希望立暗弱者为太子。因此，使人散布流言：太子非长，不当立。她还在太子周围布置耳目，大小事都会立即得知，而将她不以为然的事通报睿宗。这使太子李隆基深感不安。太平公主为颠覆太子，与益州长史窦怀贞等结为朋党。景云二年正月，太平公主曾乘辇邀宰相们于光范门内，向他们透露更换皇太子的主张，宰相们大为吃惊，宋璟当即驳斥：太子有大功于天下，真宗庙社稷之主，公主奈何忽有此议！宋璟、姚崇将太平公主的阴谋奏报睿宗，建议睿宗将朝廷日常事务交给太子处置（“太子监国”）；使太平公主远离长安。睿宗采纳了他们的意见，二月，下诏太平公主于蒲州（山西永济）安置；命太子监国，六品以下除官及徒罪以下，并取太子处分。太平公主得知这是宋璟、姚崇之谋，大怒，当面责备太子。李隆基受到姑母的指斥，心中恐惧，竟然上奏：姚崇、宋璟离间骨肉。在这种情况下，睿宗只好下诏贬姚崇为申州刺史、宋璟为楚州刺史。太子还请让位于宋王成器，睿宗不许；又请召太平公主还京师，许之。姚崇、宋璟被贬，睿宗以韦安石、李日知代姚、宋为宰相，“自是纲纪紊乱，复如（中宗）景龙之世矣”。太平公主回京师后，将其亲信窦怀贞擢为宰相。怀贞每退朝，必诣太平公主第。还将崔湜、岑羲引以为宰相。延和元年（712）有术士对睿宗说：帝座及“心前”星，皆有变。皇太子当为天子。睿宗说：传德避灾，吾志决矣。七月二十五日，睿宗传位于太子。太平公主劝睿宗传位后继续自总大政。故睿宗对太子李隆基说：朕虽传位，岂忘家国！其军国大事，

当兼省之。八月初三，太子即位，是为玄宗，尊睿宗为太上皇。三品以上除授及大刑政，决于上皇，余皆决于皇帝。当时有七名宰相，只有郭元振、魏知古、陆象先与太平公主无关；其余窦怀贞、萧至忠、岑羲、崔湜四名都是太平公主的人。他们四人又与左羽林大将军常元楷、知右羽林将军事李慈等策划废黜皇帝的阴谋，甚至使宫人元氏密谋毒死李隆基。与此同时，新任宰相刘幽求与右羽林将军张暐策划诛杀窦怀贞、崔湜等人。而左丞张说自东都遣人送给玄宗一把佩刀，用意为"快刀斩乱麻"。荆州长史崔日用入奏玄宗：太平谋逆有日，陛下往在东宫，犹为臣子，若欲讨之，须用谋力。今既光临大宝，但下一制书，谁敢不从？万一奸宄得志，悔之何及！玄宗下了决心。开元元年(713)七月，宰相魏知古得知太平公主欲于四日作乱，令左羽林大将军常元楷等率羽林兵突入武德殿，窦怀贞、萧至忠、岑羲等于南牙举兵响应，立即报告玄宗。唐玄宗遂与岐王李范、薛王李业、宰相郭元振及龙武将军王毛仲等定计，立即行动。初三，唐玄宗令王毛仲带闲厩马及兵 300 余人，自武德殿入虔化门，召常元楷、李慈，先斩之。执萧至忠、岑羲于朝堂，皆斩之。窦怀贞自缢而死。初四，太上皇下《诰》：自今军国政刑，一皆取皇帝处分。朕方无为养志，以遂素心。太平公主逃入山寺，三日乃出，赐死于家。当年十月，改年号为"开元"，从此，唐朝进入鼎盛时期。

（翁俊雄）

唐蕃会盟

自文成公主、金城公主嫁给吐蕃赞普后，唐蕃结为舅甥之国。双方战时少、和时多，多次结盟，"社稷如一统"。

自文成公主下嫁吐蕃松赞干布后，唐、蕃关系日益密切，但由于双方统治者的利害冲突，曾发生过一些战争。如唐高宗时发生了大非川之役、青海之役，唐将薛仁贵被吐蕃打败，吐蕃益强，进占安西四镇。武则天在位时，派王孝杰打败吐蕃，收复安西四镇。唐玄宗时，双方又发生小勃律之役和石堡城之役。不过，双方和时多，多次结盟，"同为一家"，才是双方关系的主流。

唐蕃第一次会盟是在唐中宗神龙二年(706)。武则天时收复安西四镇，遏制了吐蕃对河陇地区的攻势。此后，吐蕃内部纷争，国势稍衰，派使者向唐求盟。神龙二年，唐中宗命仆射豆卢钦望、魏元忠，中书令李峤，侍中纪处纳、萧至忠等 11 人与吐蕃宰相坌达延"同盟誓讫"。誓盟的主要内容是划定双方边界。吐蕃请婚，景云元年(710)，唐中宗以金城公主下嫁吐蕃赞普尺带珠丹。

唐玄宗开元二年(714)唐蕃发生了多次冲突。不过，双方的友好趋势也在发展，尤其是金城公主一直努力促进唐蕃和盟。开元四年八月，吐蕃遣使请和。唐玄宗表示同意，并赏赐金城公主及赞普锦帛、器物等。金城公主上书请"还依旧日，重为和好"。从此，吐蕃每年朝贡，不犯边。开元十八年唐玄宗命皇甫惟明入使吐蕃，见赞普与金城公主。赞普将自唐太宗贞观年以来所得敕书，拿出展示。随即派遣大臣论名悉猎随皇甫惟明入贡。同时上表："甥世尚公主，义同一家"，"深识尊卑，安敢失礼！""今蒙降使臣来视公主，甥不胜喜荷！倘使修旧好，死无所恨。"盟约的内容为划定边界、双方修好。事后，唐使臣张守珪、李行玮与吐蕃使臣莽布支在赤岭立碑，将盟约的内容刻于石碑之上。

安史之乱爆发，唐廷将西北镇兵大部内调，守边镇兵不足。此时，吐蕃赞普赤祖德赞死，赤松德赞继位，年仅 13。而吐蕃内部又发生权力之争。吐蕃攻占鄯、廓等州，继而完全控制了河西、陇右地区，隔陇山与唐为界。唐代宗广德元年(763)吐蕃引兵深入至奉天、武功，一度攻占长安，立傀儡皇帝；剽掠府库、市里，欲掠城中士女、百工，整众而归。在郭子仪组织兵力反击之下，撤出长安，居于原、会、成、渭等州。此后，吐蕃多次请盟。宝应元年(762)，唐代宗派宰相郭子仪、萧华等于鸿胪寺结盟。永泰元年(765)，又命宰相元载、杜鸿渐与吐蕃会盟于兴唐寺。为时不久，朔方节度使仆固怀恩叛唐，引回纥、吐蕃进围泾阳。不久，仆固怀恩病死，郭子仪入回纥营，说服回纥倒戈，吐蕃引兵遁去。此后，代宗大历二年(767)、德宗建中四年(783)、贞元三年(787)三次会盟。其中建中四年会盟，唐廷承认了吐蕃占领河陇地区的既成事实。

唐德宗贞元四年，剑南节度使韦皋招抚南诏。翌年，南诏弃蕃归唐。贞元十年唐与南诏会盟点苍山。随后与南诏联兵大破吐蕃，唐蕃力量的对比发生了根本变化。吐蕃内部又发生内乱。赤松德赞死后，幼子赤德松赞继位，为了稳定局势，采取与唐息兵的政策，派使者入唐请盟。唐穆宗长庆元年(821)十月，唐、蕃互派使者议和。唐尚书右仆射韩皋、御史中丞牛僧孺以及吏、户、礼、兵各部尚书等 17 人与吐蕃论讷罗盟于城西；遣刘元鼎与论讷罗入吐蕃，亦与其宰相以下盟。这年分别在长安和逻些举行的和盟，即著名的长庆会盟。今天拉萨大昭寺前还竖立着那时的《长庆会盟碑》。碑文上刻：自今以后，消除旧日的嫌

怨，不再以兵戎相见，恢复舅甥之间的情好，患难与共（大意）。碑之背面有文字：过去虽然有过兵争，但是，问聘之礼，从未间断。如此近厚姻亲，现在再结盟誓。“乐于和叶社稷如一统”。这些文字，可以说是对整个唐、蕃和盟关系的最好总结。　　（翁俊雄）

金城公主入藏

唐中宗时，金城公主继文成公主之后，第二个肩负唐蕃和亲使命入藏，这是汉藏两族人民源远流长的友好关系史上的又一个重大事件。

唐蕃之间自文成公主入藏到高宗初年，一直保持着密切的联系和友好关系。永徽元年（650），松赞干布死后，新立赞普幼弱，政事皆决于国相禄东赞。禄东赞明达干练，三个儿子又都有才略，父子先后执掌朝政达 50 年之久，国力达到全盛时期，不断北进与东侵，成为高宗到武则天初期最严重的边患。吐蕃在这期间曾多次请求和亲，但未能如愿。7 世纪末，吐蕃由于内部矛盾国势稍衰，唐复夺回一度被吐蕃控制的安西四镇。万岁通天元年（696）、长安二年（702），吐蕃两次遣使请婚，武则天因在与吐蕃争夺西域中已取得主动权，西北边防得到巩固，遂同意和亲。

中宗景龙元年（707），吐蕃赞普之祖母派大臣悉熏热入贡，并为其孙尺带珠丹请婚，中宗践母后（则天）之约，同意以雍王李守礼之女金城公主（？—740）和亲。金城公主从小由中宗、韦后养居宫中。景云元年（710），吐蕃派遣大臣尚赞吐等千余人迎娶公主。中宗则委派左骁卫大将军杨矩为送亲使。

景云元年（710）正月，中宗亲临始平县（今陕西咸阳市西南）为公主送行，设宴款待王公宰相及吐蕃迎亲使，悲伤良久，依依惜别，改始平县为金城县，并将饯别之地改为凤池乡怆别里。一方面表达了中宗惜别之情，一方面也反映出唐朝对这次和亲的重视。念及公主年幼，中宗赐予公主绣花锦缎数万匹、大量工艺技术书籍和各类器物，还有工匠、杂技、音乐等专门技艺人才。金城公主经青海，沿 69 年前文成公主走过的入蕃大道进入西藏，送亲行列之壮观仅次于文成公主。吐蕃特地为她修筑宫城居住。

金城公主入藏后，唐蕃双方由于政治、军事上的利害冲突，仍和战无常，但和亲结下的甥舅亲情，双方都没有忘怀。金城公主曾随赞普向唐奉送珍玩的同时，别进金器若干。还向唐请《毛诗》、《礼记》、《左传》、《文选》各一部，推动中原文明向西藏地区更广泛的传播。当开元十七年（729）玄宗派使往吐蕃宣达永息边境战火、通和友好之意时，赞普尽出贞观以来前后敕书以示使者，表示唐蕃甥舅亲情，同为一家，以先代文成公主、今金城公主之故，不敢对唐失礼。在金城公主的推动下，双方于开元二十二年于赤岭（青海日月山）各竖界碑，相约互不侵犯。

金城公主入藏对继续和加强汉藏两族人民之间的团结友好关系，促进两族经济文化交流，进一步推动吐蕃社会的发展起到积极作用。以她为题材的壁画、传说等亦广为流传。　　（宁　欣）

张仁愿筑三受降城

为加强西北边防，唐中宗景龙二年（708）唐廷于黄河河套以北，筑中、东、西三城，名为“三受降城”。

贞观四年（630）东突厥颉利可汗被俘，唐灭东突厥，太宗将其余众徙于黄河以南，而留在河北北部的东突厥别部车鼻可汗又与唐廷对抗，唐太宗于贞观二十二年派兵袭击，兵入其境，诸部落相继来降。自此 30 年间，北边无事。高宗永隆元年（680）颉利可汗侄阿史那伏念自为可汗叛唐，被唐军追杀。永淳二年（683）颉利可汗之疏属骨咄禄自立为可汗，纠集亡散，有众 5000 余人，入总材山建牙。接连攻掠蔚、朔、代等州，后被唐军追击，逃入漠北。武则天天授年间（690—691）骨咄禄病死，其弟默啜自立为可汗。长寿二年（693）默啜可汗率众袭击灵州。万岁通天元年（696），契丹首领李尽忠、孙万荣叛唐，攻陷营州，默啜可汗率众与唐军合攻契丹，从此默啜兵众日盛。默啜可汗请求唐廷将咸亨年间降唐而被安置在丰、胜、灵、夏、朔、代等“六州降户”归其统领，势力更为强大。圣历元年（698）默啜可汗以辅立李显（唐中宗）、李旦（唐睿宗）复帝位为借口，发兵进攻妫、檀、蔚、定、赵等州，尽掠定、赵二州男女八九万人北走，所过残杀，不可胜纪。久视元年（700）又掠陇右诸马监万匹而去。唐廷多次发兵，无功而还。中宗即位，曾命内外官各进破突厥之策。其时，朔方军（驻灵州）总管沙吒忠义被默啜可汗击败，中宗命张仁愿（？—714，原名亶，以字行。华州下邽（今陕西大荔西）人）为朔方道大总管，代沙吒忠义统军。张仁愿建议在黄河河套以北筑三城，以加强西北防务。唐廷在灵州设朔方军，辖灵、丰、胜等州，即今河套以南广大地区。河套以北为默啜可汗活动地区。而河套北有“拂云神祠”。突厥欲进扰河套以南地区，必先至神祠求福而后渡河。当时默啜可汗正率众向西攻击别部，张仁愿建议乘其虚夺取河套以北之地，并于河套以北筑三城，使之首尾相应，以遏绝其南下之路。太子少师唐休璟以

为两汉以来，皆北守黄河，今于河北筑城，恐劳而无功。张仁愿坚持自己的主张，唐中宗采纳了张仁愿的建议。张仁愿留年满该轮换的镇兵，以实现其主张。当时咸阳兵200余人逃走，张仁愿下令擒斩之，镇兵皆畏惧。役者尽力，六旬而将三城修筑完毕。以拂云祠所在地为“中受降城”；以其东、西400里，分筑东、西受降城。三城遥遥相呼应。北拓地300余里，并于牛头朝那山以北，置烽候1700所。自是突厥不能度山放牧，朔方不再受其骚扰，减镇兵数万人。三受降城戍兵数量有限。黄河北岸的中受降城，戍兵6000人，战马2000匹。胜州东北200里的东受降城，戍兵7000人，战马1700匹。西受降城在丰州北、黄河外80里，戍兵7000人，马1700匹。其作用甚大。

（翁俊雄）

大祚荣建渤海国

唐前期东北地区靺鞨族粟末部人大祚荣建立的国家，臣属于唐朝。

唐时东北地区有契丹、奚、室韦和靺鞨等各族。靺鞨族是满族的祖先，古称肃慎，汉魏南北朝以来称挹娄、勿吉，主要活动于白山（长白山）、黑水（黑龙江）一带。隋、唐时改称靺鞨，其地西接契丹，北至室韦，东达日本海，南邻高丽，包括今吉林、黑龙江大部，辽宁一部，朝鲜北部，以及黑龙江以北、乌苏里江以东大部地区。靺鞨又分黑水、粟末等诸部，以此二部最大。黑水靺鞨居北；粟末靺鞨居南。其俗贵壮贱老，屋宇皆依山水，掘地为穴，架木于上，再用土覆盖。养猪很多，富者有数百头，食其肉，而衣其皮。唐初武德年间，靺鞨遣使来唐，唐于其地置燕州，任命突地稽为燕州总管，后突地稽来唐朝做官，为右卫将军，赐姓李氏。开元十一年（722），唐朝任命黑龙江下游两岸的黑水靺鞨首领为勃利（即伯力，今哈巴罗夫斯克）州刺史。开元十三年，唐朝于黑水靺鞨属地置黑水军，翌年又以其最大部落为黑水都督府，其余各部为都督下属的州，任命其首领为都督、刺史，而由中央派遣官吏为长史，监领其地。开元十六年，唐玄宗又赐其首领姓名为李献诚，晋封云麾将军，与唐朝保持密切联系。

靺鞨诸部中以粟末部势力最强。圣历元年（698）粟末人大祚荣自号为震国王。其地在营州（辽宁锦州北）之东2000里，南至朝鲜北部龙兴江以北，东至日本海，西连契丹，北至黑龙江，与黑水靺鞨相接。“地方5000里，户10余万，胜兵数万”。“筑城郭以居”、“颇知书契”，模仿唐朝文物与典章制度。先天二年（713），唐封大祚荣为渤海郡王，以其所部为忽汗州，任大祚荣为都督，由是才将族名、国名都改为渤海。唐朝于开元十四年正式名之渤海国，晋封郡王为渤海国王。这个地方王国政权存在达229年，直到公元926年为契丹所灭。渤海国历代新王继立都要报聘唐朝中央请封，始终同唐朝保持臣属关系。

（翁俊雄）

唐玄宗“开元之治”

唐玄宗开元、天宝年间（714—755）是中国封建社会的鼎盛时期，史称“开天盛世”。唐玄宗即位的最初一些年，励精图治，兢兢业业，在政治、经济、文化、军事等各方面，治绩斐然，史家誉为“开元之治”。

延和元年（712），李隆基即位，改元先天，是为唐玄宗。次年，诛杀太平公主及其党羽改元开元（713—741）。唐玄宗即位后，即将贬为同州刺史的姚崇调至京师，拜为宰相。玄宗励精图治，遇事多与姚崇面议，姚崇献策：抑制权势、虚心纳谏、严格选官、不受贡献之物。玄宗又任卢怀慎为宰相。卢怀慎与姚崇配合默契，严惩侵暴百姓的贵戚，由是贵戚束手。反对和拒绝达官贵人的请托，由是请谒不行。开元四年代替姚崇为相的宋璟，随材授任，使百官各称其职、刑赏无私、敢犯颜直谏。宋璟从广州都督调回京师，广州吏民为宋璟立“遗爱碑”，颂其功德。宋璟认为这是谄谀，此风不可助长，请玄宗下敕禁止。于是，他州皆不敢立。姚崇、宋璟为相，政绩辉煌，成为中国历史上的“名相”。史称：“姚、宋相继为相，……协心辅佐，使赋役宽平、刑罚清省，百姓富庶。”

开元年间，唐玄宗提倡节俭。要求从皇帝服饰、车辇上的金银器玩起，宫廷所有金银器玩一律销毁。化后的金银供军国之用。而宫廷中的珠玉、锦绣一律焚毁。同时关闭两京的“织锦坊”。开元初宰相都很清廉。姚崇为相，在京城无住宅，寓居大宁坊中的罔极寺。宰相卢怀慎不置产业，所得俸赐，散给亲旧，妻子不免饥寒，所居不蔽风雨。张嘉贞不营产业，有人劝其购买田宅时，他说：吾贵为将相，何忧寒馁！若其获罪，虽有田宅，亦无所用。比见朝士广占良田，身没之日，适足为无赖子弟酒色之资，吾不取也。宰相李元纮以清俭著称。清俭成为玄宗选任宰相的重要条件之一。

开元年间，唐玄宗重视州县的治理。即位不久，引见京畿县令，“诫以岁饥惠养黎民之意”。经常调中央官员至州府任地方官。开元十二年由于河南、河北旱灾，抽调中央机构的名臣崔沔等五人至灾区任刺

史。

开元年间,"刑罚清省",开元十八年判处死罪的仅 24 人。

开元年间,唐玄宗重视文化教育。开元十一年设"丽正书院",聚文学之士。由宰相张说总其事。文学之士徐坚、贺知章、赵冬曦等,或修书,或侍讲。由于供给优厚,有人以糜费为由主张撤销。张说认为:自古帝王于国家无事之时,莫不崇宫室,广声色,今天子独延礼文儒,发挥典籍,所益者大,所损者微。坚持办下去。开元二十六年,令天下州、县、里别置学,即除中央有国子、四门等最高学府外,在各州、县,甚至县以下乡、里也开办学校。

开元年间唐玄宗还在经济上采取一系列措施。从唐朝建立至开元的百余年间,社会经济发生了很大变化。随着民户的成倍增长,民户的耕地日益缩小。唐初的租庸调是在民户授田较足的情况下制定的,开元以前又增收户税、地税,百姓的收入较少,而赋役负担加重。在地少而人众的狭乡更不堪忍受,因而出现民户出逃的现象。这极大地影响了政府的财政收入。开元九年至开元十一年唐玄宗任宇文融为劝农使,搜括逃户。结果括得隐漏户 80 万,使全国户籍上的民户从 615 万上升为 706 万。增加了财政收入。此后还有大量民户逃往宽乡,开垦土地,以致"高山绝壑,耒耜亦满";还有大量农民逃至正在迅速发展起来的田庄,成为地主的佃农。由于此时地主田庄更适合当时的形势,田庄生产了比前更多的粮食。史载:开元十一年至二十年"屡获丰年"。而各地的粮食,尤其是江淮地区的粮食当时难以运至关中。开元二十二年唐玄宗以裴耀卿(681—743,绛州稷山人)为江淮、河南转运使,改进江淮至关中的水上运输线,从而使江淮的粮食大量北运。正因如此,杜甫《忆昔诗》:"忆昔开元全盛日,小邑犹藏万家室。稻米流脂粟米白,公私仓廪皆丰实。"说的就是当年的实际情况。史载:开元二十八年"西京、东都米斛直钱不满二百(钱),绢匹亦如之。海内富安,行者虽万里,不持寸兵。"

从高宗、武则天以来,东北契丹、奚,北方突厥,西部吐蕃,时常侵犯唐朝边境。至开元年间,尤以西北边界最为吃紧。为加强防御,开元年间在北、东北、西北、西南分设九节度使,统领辖区内各州县的驻守镇兵。数十万镇兵需大批战马和大量军粮。开元初年派王毛仲为内外闲厩使,加强在陇右所置马监的管理,牧马从 24 万匹增至 43 万匹。解决了镇兵所需之战马。在边境开拓屯田并在关中实行"和籴法",即以略高于时价购买农民粮食,以补充屯田之不足,解决了镇兵的军粮。由于加强了防御的能力,开元年间以至天宝中期,对少数民族的用兵往往取胜。如开元十七年朔方军节度使李祎攻陷吐蕃的石堡城,遂改其城为"振武军"(天宝八载改为神武军)。唐廷在河陇"拓境千余里"。天宝四载(745)朔方军节度使王忠嗣,兼领河东节度使,"自朔方至云中边陲数千里,要害之地,悉列置城堡,斥地各数百里"。天宝十二载陇右节度使哥舒翰,击败吐蕃,"拔洪济桥、大漠门城,悉收'九曲部落'"。史载:"是时,中国强盛,自安远门(长安西门)西尽唐境,万二千里,闾阎相望,桑麻翳野。"

唐玄宗晚年,渐肆奢欲,视金帛如粪壤。上行下效,贪污受贿,奢靡成风。与此同时,玄宗又怠于政事,罢免了遇事力争的张九龄(678—740,韶州曲江(今属广东)人)之宰相职位,专任"口有蜜,腹有剑"的李林甫(?—752,宗室)为相,他为大权独揽,遮蔽玄宗视听,公然召集谏官,对他们说:今明主在上,群臣将顺之不暇,乌用多言!君不见立仗马乎?食三品料,一鸣辄斥去,悔之何及!"自是谏诤路绝矣"。终于酿成"安史之乱"。　　　　（翁俊雄）

营州都督府的复置

营州都督府是唐朝东北的军事重镇。武则天在位时,其治所柳城被契丹攻陷,开元五年(717)复置。

营州(辽宁西南部)治所柳城(辽宁朝阳)为汉县,隋于其地置柳城郡。武德元年(618),隋襄平太守邓暠以柳城、北平二郡降唐。唐高祖于柳城置总管府,以邓暠为营州总管。营州之北为契丹族居住地;营州西北为奚族居住地。贞观二十二年(648)契丹首领窟哥、奚族首领可度者附唐。唐廷以契丹部为松漠都督府,赐窟哥姓李氏,任松漠都督;以奚部为饶乐都督府,赐可度者姓李氏,任饶乐都督。另,契丹别部酋帅孙敖曹,早在武德四年附唐,唐高祖令其于营州旁安置。至其曾孙孙万荣被册封为归诚州(其居地为归诚州)刺史。武则天万岁通天元年(696)松漠都督李尽忠(窟哥之后胤)与孙万荣杀营州都督赵翙,据营州作乱。武则天先后派遣大将张玄遇、王孝杰等讨伐,不克。其后李尽忠、孙万荣死,契丹余众遂降突厥。神龙元年(705)唐廷移营州都督府于幽州界内,领渔阳、玉田二县。开元三年契丹首领李失活(李尽忠堂弟)率部附唐。于是唐玄宗复置松漠都督府,封失活为松漠郡王。以奚族首领李大酺为饶乐郡王。开元五年李失活、李大酺咸请于柳城依旧置营州都督

府。唐玄宗就此事与臣下讨论。宰相宋璟以为不可，独大理评事宋庆礼认为甚为有利。唐玄宗下《制》书：复置营州都督府于柳城，营州都督兼平卢军使；管内州县、镇戍皆如旧制。令宋庆礼及太子詹事姜师度、左骁卫将军邵宏等充使，更于柳城筑营州城。姜师度负责建城工作，役使8000余人，三旬而功毕。玄宗任姜师度为营州都督。他于营州开屯田80余所。并征调幽州渔阳、淄青等民户充实营州，招集商胡，为他们营建店肆。数年间，营州仓廪丰实，居民渐多，市井繁荣。（翁俊雄）

宇文融括户

自唐中宗即位，百姓逃亡现象又日益普遍，影响了唐朝的财政收入。唐玄宗开元九年(721)监察御史宇文融献策检括逃户，收到巨大成效，增加了唐朝的财政收入。

高宗、武则天时狭乡民户逃往宽乡的活动，至长安三年(703)"今始安辑"，告一段落。为时不久，逃户问题再度出现。唐朝建立后，随着经济的恢复与发展，民户也日益增多。贞观十三年(639)全国民户为300万户，到开元十四年增至706万户。在近百年中，民户增长了1.35倍，而开垦耕地却受到自然条件的限制，民户土地势必日益缩小。唐初规定的租庸调征收数额以唐初均田农民授田较足为基础，此后相继增加了地税、户税，而徭役、兵役也日益繁重，因而均田农民生计日艰。唐中宗即位，政治腐败，差科繁剧，致使诸州百姓多有逃亡。民户逃走后，州县责令其邻居代出赋役，迫使留居者又复出逃。逃走民户原有的土地，往往被人兼并。地主为逃避赋税，兼并的土地往往不向官府申报，成为籍外占田。此外，还有不少略有财势者与里胥串通，或假冒战功，非法获得免出徭役的特权；或以充当各种色役(如充当门夫、看水闸、为官员个人服劳役等)为名，免除每年20日的繁重正役。此类现象，从唐中宗至唐玄宗开元初年，日益普遍，极大地影响了政府的财政收入和徭役的征调。

开元九年正月，监察御史宇文融(？—约730，京兆府万年(今西安)人)献策：搜括逃户、籍外占田和色役伪滥者。唐人指出：有田则有租，有家则有调，有身则有庸(其意为有身就要服徭役。庸，是指所出之代役钱)。可知，宇文融的建议，实际就是整顿租、庸、调制，将偷、漏的租庸调搜括出来。唐玄宗任宇文融为勾当租庸地税(贞观年间于租庸调外又增征地税)兼覆田使(后又称劝农使)。同时由宇文融提名任命京畿、都畿、太原府一些州县的干吏29人为勾当租庸地税兼覆田判官，分巡天下，在全国各州县进行整顿。整顿的重点在于搜括逃户。当年二月，唐玄宗在《制》书中规定：州县逃亡户口听百日自首，或于所在附籍；或牒归故乡，各从所欲。过期不首，即加检括，谪徙边州。逃户在逃所申报户口，则免除其六年的租庸调，每丁每年只缴纳1500钱的轻税。六年以后，则按常例出租庸调。这些对逃户优惠的政策，有力地促使其自首。史载：判官至州县"招集老幼宣上恩命"，"百姓感其心，至有流泪称父母者"。判官在州县，检括户口，核实丁壮，括量耕地，检括籍外田，最后与吏民议赋役。当地有闲田的，准许逃户耕垦。自开元九年至开元十二年前后进行了三年。括出客户(逃户至某地，于当地称为客户)80余万，和大量籍外田，并检查出众多"色役伪滥"(即以服轻役的办法代替服较重的正役)者。得客户所缴税钱数百万贯。开元十三年唐玄宗在《制》书中决定，"以所得客户税钱，均充所在常平仓本"，即将税钱作为资金，购买粮食，充实各州县的官仓，国家粮储大为丰盈。开元十四年全国民户从神龙元年(705)的615万户增至706万户。增加的90万户中，有80万户是这次大规模括户检括而来。六年后，客户依常例出租庸调，势必大大增加国家的财政收入。

然而，宇文融括户不久，即出现了更多的逃户。这与宇文融括户时实行的政策有关。宇文融括户时，仍然实行逃户的赋役由邻、保代出的老办法。而同时又规定客户于新附地只出1500钱的轻税。这样，在"邻保代出"的严重地区，民户宁愿选择客户的轻税负担。在民户耕地日益缩小的情况下，这不失为一种摆脱困境的出路，因而纷纷出逃。唐廷很快认识到对客户实行轻税的副作用，开元十五年唐玄宗在《制》书中规定："诸州逃户先经劝农使括定按比后，复有逃来者，随到准白丁例输当年租庸。有征役，先差！"甚至以"散配诸军，以充镇兵"相威胁。至天宝八载(720)，"浮食未还，其数非广"，才遏止住出逃浪潮。这一时期的逃户逃往宽乡和未开垦的山坳，从而在那里开发出大片土地。唐人指出：开元、天宝之中"高山绝壑，耒耜亦满"。还有大批逃户，逃至正在发展起来的地主田庄，成为庄客。他们虽然要向地主交纳收获物的半数作为地租，但是，却不再向官府出赋役，因而，他们的生活较前会好些。（翁俊雄）

"犷骑"的招募

开元十年(722)宰相张说建议招募"长从宿卫"

(后改称彍骑),标志着义务兵性质的府兵制度的瓦解。

唐初建立的府兵制度,经过百余年,至唐玄宗开元年间开始瓦解。府兵制建立在均田制的基础上,经过数十年,民户平均占有的耕地随着民户逐渐增多而日益缩小。同时,百姓的课役负担日益加重,就连不输课役的府兵卫士之家,都“不免杂徭”。在这种情况下,逃避兵役的现象日益普遍化。由于兵源枯竭,开元十年,唐玄宗采纳宰相张说召募壮士充宿卫的建议,用募兵代替义务兵。翌年,唐廷在京兆府、同、华、岐、蒲等临近长安的各州府,选现任府兵卫士及白丁12万人担任宿卫京师的任务,谓之“长从宿卫”。这12万人,分两番宿卫京师,每番半年。命州县对他们“不得杂役使”。开元十三年唐廷将长从宿卫改称为“彍骑”。分隶原府兵的最高机构十二卫。此外,又将其每年宿卫京师的时间由两番改为六番,即由半年改为两个月。开元十六年又改彍骑为左右羽林军“飞骑”,并规定他们每年有两个月回家休息。

开元初年在东北、西北边境地区设节度使,统领驻屯边境各州的镇兵。开元二十五年唐玄宗命宰相与诸道节度使将边境各地的镇兵加以定编,并从各种劳役征发对象和无户籍的居民中招募士卒以充边军。这样,边境的镇兵也就改为募兵制。至天宝元年(742)有镇兵49万人。镇兵是雇佣兵,除“增给田宅”外,政府供给他们衣粮。天宝以后,募兵日多,每岁用衣千二十万匹;粮百九十万斛,军费日益浩繁。皇帝还要不时颁给他们以“给赐”。　(翁俊雄)

节度使的设置

唐朝为加强边境的防御,自武则天长安二年(702)至唐玄宗开元十一年(723)在北方、东北、西北、西南先后设置九节度使,统领辖区之屯驻军队。

自唐高宗永徽年间至唐开元年间,东北的契丹、奚,北方的东突厥别部,西北的西突厥,西部的吐蕃等少数民族与唐廷时和时战,唐朝的边境经常受到骚扰。为加强防御,唐朝先后设置九节度使。东北:开元二年始置幽州节度、经略、镇守大使(后改称范阳节度使),治幽州(北京西南),辖幽、易、平、檀、妫、燕等六州;统领经略、渔阳、清夷、威武、高阳等军。开元七年置平卢军节度使,治营州(辽宁朝阳),辖营、平二州,统领卢龙、平卢二军。北方:开元十一年置河东以北诸军节度使(后改称河东节度使),治太原府(今属山西),辖太原府、石、岚、汾、辽、忻、代、朔、蔚、云等州;统领大同、横野、天兵等军。西北:武则天长安二年置北庭都护(开元十年改称北庭节度使)。治庭州(新疆吉木萨尔北破城子),统领瀚海军。唐睿宗景云元年(710)置河西节度使,治凉州(甘肃武威),辖凉、甘、肃、伊、瓜、河、西等州,统领赤水、大斗、建康、玉门、豆卢等军。开元二年置陇右节度大使,治鄯州(青海乐都),辖鄯、秦、河、渭、兰、临、武、洮、岷、郭、叠等州;统领临洮、河源、白水、安人、积石、莫门、振武、威戎、镇西等军。开元六年置四镇经略使(后改称安西四镇节度使),治龟兹(新疆库车)。辖龟兹、焉耆、于阗、疏勒四镇。开元九年置朔方节度使,治灵州(宁夏灵武西南),辖丰、胜、灵、夏、盐、银等州及单于都护府、东西中三受降城。统领经略、丰安、定远军。西南:开元七年置剑南节度使,治益州(四川成都),统领松、维、蓬、恭、雅、黎、姚、悉等州;统领天保、洪源等军。开元初年所置边境九节度使所辖地区及所统军队,后来都有很大的变动,特别是,至唐肃宗至德二年(757)增设岭南节度使,共十节度使,即史籍所谓“置十节度、经略使以备边”。十节度使的大部分为开元初年设置,当时起了很大的作用。东北与契丹、奚族相安无事,开元十年唐册封契丹首领李郁于为松漠郡王;册封奚族首领李鲁苏为饶乐郡王。北方的东突厥别部毗伽可汗于开元九年遣使求和。翌年,唐廷讨平“六胡州”胡人康待宾发动的叛乱,将其众5万人徙之于许、汝、唐、邓等州。西北:开元七年唐册封西突厥突骑施苏禄为忠顺可汗。开元十年,因吐蕃侵犯小勃律,北庭节度使张嵩派兵大破之,自是累岁吐蕃不敢犯边。正因如此,宰相张说在开元十年指出:这一时期边境“无强寇”。这时期边境安宁与节度使的设置有密切关系。不仅如此,张说还建议唐玄宗,将边境60万防兵罢20余万还农,从而大幅度地削减了军费开支。然而,天宝以后,边将不断要求扩大军队的编制,致使军费开支日益增多。开元以前每年供给边兵衣粮的费用不过200万;而天宝以后,每年边兵军衣所用1020万匹;军粮所需190万石,以致公私劳费,民众困苦。安史乱后,由于中原用兵,州刺史往往兼领军队,因而州刺史往往身兼防御使、团练使,而要冲大郡,则身兼节度使。　(翁俊雄)

采访处置使的设立

唐玄宗开元二十一年(733),分全国为15道,各道设采访处置使,后改为观察处置使,成为州以上的一级常设机构。

唐朝在全国300余州、1500余县,设置州刺史、县令,进行行政管理。自唐朝初年起,对地方官的治

理十分重视。贞观二年(628)唐太宗对臣下说:"为朕养民者,唯都督(州一级的军事长官)、刺史,朕常疏其名于屏风,坐卧观之,得其在官善恶之迹,皆注于名下,以备黜陟。"唐朝政府设立了对各级官吏进行考核的专门机构,即吏部所属的以考功郎中、考功员外郎为长官的考司。每年,尚书省各司将各州县的户口、赋役、治安、灾情等状况申报考司,作为对州县官员考核的依据。此外,每年年终,各州刺史都要到朝廷报告各地情状及所属官员的善恶政绩。然而要核实各地的情状,以及了解州刺史本人的善恶政绩,仍需采取其他途径。贞观元年,将全国分为关内、河南、河东、河北、山南、陇右、淮南、江南、剑南、岭南"十道"。贞观八年正月唐太宗派遣朝廷重臣萧瑀、李靖、王珪、窦静等16人为观风俗、黜陟大使。其任务是"观风俗之得失"、"察政刑之苛弊",作为黜陟官员的依据。贞观二十年正月派遣大理卿孙伏伽等22人,分行四方。他们将对州县官员善恶情状"具状以闻"。唐太宗亲自裁决,自州刺史以下,晋级提升的20人;处死刑的7人;判处流刑、徒刑的数百人。此后历朝都以各种名称派遣大使巡察四方。不过这种临时派遣的做法存在很多问题,主要是时间短、任务重。武则天万岁通天元年(696)凤阁舍人李峤指出,在垂拱二年(687)派遣诸道巡察使时,检查的科目有44条之多,此外还有"别作格敕令访察者"30余条。而巡察使于当年三月出发,十一月归朝,时限迫促。而每道需考察的文武官员多至2,000余人,少者也有1,000人左右。对每个人都需品量才行、褒贬得失,工作任务太重,难免不够精当。至唐玄宗开元二十一年做了重大改进。首先,分天下为15道,即在贞观元年十道的基础上,从关内道分出京畿道;从河南道分出都畿道;分山南道为山南东、西二道;分江南道为江南东道、江南西道和黔中道。15道各置采访处置使。其次,采访处置使置印章,并设置副手"判官",实际成为常设机构,而采访使与判官任期"并须首末经三年"。其任务是考课官人善积,三年一奏。安史乱后,唐肃宗乾元元年(758),改名为观察处置使,权力日重。　　(翁俊雄)

裴耀卿改进漕运

唐玄宗开元(713—741)年间,在宰相兼转运使裴耀卿的主持下,对漕运进行了改进,卓有成效地缓解了长安粮食和国用的危机,为以后的继续改进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唐朝以关中立国,但关中地狭,所产粮食不足以供政府机构、皇族、官僚、兵士及仆役等人所需。高祖、太宗时,每年便需要从江淮地区漕运20万石粮食供长安。漕运依靠隋代开凿的南北大运河,尤以连接长安、洛阳与江淮地区间的漕渠,汴河和江南河最为重要。高宗以后,李唐宗室枝叶繁衍,官吏队伍膨胀、士庶人口增长,加上边战频仍及募兵制的推广,国用渐广,漕运任务日趋繁重。开元初,漕运数量虽数倍于前,但仍"支犹不给"。自高宗起,武则天、中宗,都用就食东都的方式以缓解关中缺粮的矛盾。玄宗也曾数次东行,但粮食匮乏的压力有增无减。当时由于西北边境不断受到吐蕃、突厥的骚扰,西北防务成为需要认真对待的重大问题。皇帝率领庞大的官廷官僚队频繁奔波于两都之间,不仅对解决西北边防事务弊大于利,也使沿途州县劳于供顿。玄宗本人年过半百,长途跋涉,鞍马之劳也愈来愈难于适应。在政治中心仍在关中的历史条件下,扩大漕运成为解决问题的关键所在。

提出全面、系统地改进漕运方案的当首推裴耀卿(681—743,绛州稷川(今属山西)人)。他幼年应童子举,聪慧,有文才,曾任秘书省正字,相王府典签、国子主簿,长安令,济、宣、冀等州刺史,"皆有善政"。后入为户部侍郎。开元十八年裴耀卿朝集京师,借玄宗向朝集使征询利害之便,上疏提出了分段转运法。开元二十一年,京师因雨灾而谷价腾贵,玄宗在赴洛阳就食前夕,独召当时已任京兆尹的裴耀卿询问对策。裴耀卿认为,圣驾率百官就食东都及派重臣往各道发放赈济,都只是救灾的应急措施,并不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他分析长安缺粮原因,一是受地理条件及自然气候的限制,关中地狭,收粟不多,一遇水旱,即显匮乏;二是受社会经济因素的制约,升平日久,国用渐广,原有的漕运量与漕运管理体系已无法满足需要。在开元十八年方案的基础上,他又提出了更完善的改进漕运的方案。玄宗很赞赏,很快提升他为黄门侍郎,同中书门下平章事,充转运使,以郑州刺史崔希逸和河南少尹萧炅为副使,开始改革漕运。主要措施为:施行节级转运法。原来江南漕船直抵洛阳,航途远,航期长,由长江入淮河,由淮河入汴河,各段水势涨落不一,水情多变,往往停滞日多,行船日少。二月启程,冬季才到,不仅运费昂贵,损耗也很严重。裴耀卿根据不同的河道、水势,沿岸置仓,分段运贮,水通则随近运转,不通则就近入仓。第一节于汴水与黄河交汇处的河口置仓,江南漕船不须入黄河,纳粮入仓便可返回。第二节从河口入黄河和洛水西运时,由政府出资雇船转运。第三节从河口至陕州

(河南陕县)300余里"北运"线,实行水陆联运。第四节,汴河入渭,直抵京师。这样可大大缩短运输周期,提高运输效率,节省人力、物力、财力。改进"北运"。汴河、黄河转漕长安一向颇为艰难,关键在于北运的运输能力得不到有效的改善。北运如水运则须走黄河,黄河水险流急,三门砥柱的险滩,"破害舟船,自古为害"。高宗显庆(656—661)年间,曾开凿山路,开凿栈道,试图改进运输条件,都没有成功。只好全部改为陆运,大约运两斛粮,脚价千钱。开元二年,河南尹李杰任陆运使,创陕洛间递场运输法,分段陆运,虽然提高了运输能力,但并没有降低运费。裴耀卿将北运改为水陆联运,利用新置仓及原沿河旧仓,逐级转运溯汴水而来的江南漕船,在河、汴交汇处纳入河阴仓,河运者运至三门砥柱东面新置的集津仓。三门以北开山路18里,将集津仓贮纳之粮陆运,绕过三门险滩,纳于三门以西新置的盐仓,然后顺黄河运至太原仓(陕州),再由黄河入渭,供京师所需。凡三年,运漕粮700万石,省陆运脚费30万缗。调整转运仓布局。旧制,江淮漕船直抵洛阳,输纳含嘉仓(洛阳),河阳、柏崖二仓拱抱东都,分别贮纳河北、河东的租粟,再转输关中,形成以东都为中心的转运布局。裴耀卿重新调整了转运仓布局。以河阴、太原、永丰(陕西华县)三仓为枢纽,再加上原有沿途旧仓及新设仓,形成河渭并重的转运仓系统,重点在提高向关中转输的能力。

裴耀卿的漕运改革适应了唐政治中心与经济重心日渐分离的历史趋势,将长安与经济发达的江南更加紧密地联系起来,基本解决了长安缺粮的问题,为以后漕运体制及方式的进一步改善提供了可能。在某种意义上讲,也推动了唐后期赋税制度及国家财政体制的改革。 (宁 欣)

唐与南诏的关系

自开元二十六年(738)唐玄宗册封南诏首领皮逻阁为云南王,南诏与唐关系日益密切。

在今云南省地区,原分布着六个蛮族部落:蒙舍、邆赕、蒙嶲、越析、浪穹、施浪。当地部落称其首领为"诏",于是也就称六部落为六诏。蒙舍诏处于五诏之南,因名南诏。唐高宗时,南诏首领遣使者入朝。武后时,南诏首领盛炎亲自入朝,受到款待。至南诏首领皮逻阁时,南诏势力强大,而其余五诏力量微弱。皮逻阁通过剑南节度使王昱,求合并六诏,唐玄宗允准。不久,南诏吞并了五诏,以南诏名之。开元二十六年(738)唐玄宗派使臣前往南诏,册封皮逻阁为云南王。皮逻阁从吐蕃手里夺取大和城,遂徙都城于大和城。天宝初年皮逻阁遣其孙凤迦异入唐,充天子宿卫,官拜鸿胪少卿。天宝七载(748)皮逻阁死,子阁罗凤立,袭爵云南王。

当时云南郡(云南姚安)太守为张虔陀。南诏首领经常携妻至成都谒见剑南节度使。天宝九载阁罗凤携妻去成都,路过云南郡,郡太守张虔陀"私其妻",又多所征求,阁罗凤怒,发兵反,攻陷云南郡,杀张虔陀,占32夷州。天宝十载四月,剑南节度使鲜于仲通率兵讨南诏。南诏王阁罗凤遣使向剑南节度使谢罪,并请放还俘虏,声言吐蕃大兵压境,若不许,当归命吐蕃,云南之地,非唐所有也。鲜于仲通不许,囚其使,进兵大和城,被南诏打得大败。从此阁罗凤臣服吐蕃。阁罗凤刻碑于国门,声称自己不得已叛唐,"我世世事唐,受其封爵,后世容复归唐,当指碑以示唐使者,知我之叛,非本心也。"唐肃宗至德元年(756),乘安史之乱,南诏与吐蕃攻占越嶲郡(嶲州),南诏据清溪关。

唐代宗大历十四年(779),阁罗凤死,子凤迦异先于阁罗凤死,遂立凤迦异子异牟寻为首领。异牟寻不堪忍受吐蕃日益加重的征敛,对吐蕃极为不满。有郑回者,本相州(河南安阳)人,天宝中明经及第,授嶲州西泸县令,嶲州失陷,被南诏俘虏。时阁罗凤以郑回有儒学,命教凤迦异。及异牟寻立,又命教其子寻梦凑。南诏置清平官(宰相)六人,郑回是六名清平官中威望最高者,其余五清平官在郑回面前极为"卑谨"。郑回对异牟寻说:"中国尚礼义,以惠养为务,无所求取。今弃蕃归国,无远戍之劳、重税之困,利莫大焉。"异牟寻遂决心弃蕃归唐。唐德宗贞元九年(793)四月,异牟寻与诸酋长谋划遣使入唐的办法,以免吐蕃作梗。由于从阳苴咩城(异牟寻继位,迁都城于大和城南十余里。今云南大理。)入唐之路被吐蕃控制,因而使臣须避开北路;为防止使臣被吐蕃截获,因而分三路前往。这样,三路使臣一出戎州,一出黔州,一出安南(越南北部),即从东北、南两个方向迂回前进。三路使臣在成都会齐,再北上长安。各路使者除带上德宗之《表》和给当时任剑南西川节度使韦皋之书信以外,各带生金、丹砂。韦皋遣人送其使赴长安。在长安,使者奉《表》,表示弃蕃归唐的决心。使者对德宗说:"牟寻请归大国,永为藩国。所献生金,以喻北向之意如金也;丹砂,示其赤心耳。"唐德宗"嘉之",乃赐异牟寻诏书。西川节度使韦皋派巡官崔佐时至阳苴咩城,贞元十年正月,异牟寻使其子寻梦凑及清平官与崔佐时盟于点苍山神祠。盟书共四份,一

藏于神室，一沉于西洱河，一置祖庙，一进唐天子。清平官郑回见崔佐时，多所指导，故崔佐时深得其情。崔佐时与盟毕，留26日而归。贞元十年六月，异牟寻遣其弟凑罗楝至长安，献地图、土贡。德宗派祠部郎中袁滋为册南诏使。袁滋至大和城（此时南诏又徙都至此城）册封异牟寻为南诏王，并赐其金印，文曰："贞元册南诏印"。册封仪式后，异牟寻拿出"银平脱马头盘"二个，对袁滋说："此天宝时先君以鸿胪少卿宿卫，皇帝所赐也。"有笛工、歌女二人，皆白发，异牟寻说：先君归国时，皇帝赐胡部、龟兹二乐队，今丧亡略尽，唯此二人在。唐宪宗元和三年（808）十二月异牟寻死。四年正月，唐廷以太常少卿武少仪充吊祭使，册封异牟寻子寻梦凑（又名阁劝）为南诏王，赐其印，文曰："元和册南诏印"。

唐文宗大和三年（829）南诏内乱。"弄栋节度王"嵯颠弑其君，专南诏之政。而时任西川节度使杜元颖，不懂军事，削减士卒衣粮。西南戍边士卒衣食不足，往往入南诏境内钞盗以自给，而蛮人反以衣食资之。这样，蜀中虚实动静，蛮皆知之。嵯颠乘机谋大举入侵。边州屡次报告，杜元颖皆不信。嵯颠率兵至边城，这里不仅毫无防备，而且蜀兵还当向导，南诏从而攻陷邛州。接着引兵至成都，攻下成都外城。杜元颖率兵保内城。此时朝廷以东川节度使郭钊为西川节度使；征发东川、荆南、鄂岳等各路军入西川。西川节度使郭钊以书责嵯颠，嵯颠复书曰："杜元颖侵扰我，故兴兵报之耳。"与郭钊修好而退兵。嵯颠在成都外城停留10日，起初"市肆安堵"，临撤退，"乃大掠子女、百工数万人及珍货而去"。由于大批工匠被掠至南诏，从此"南诏工巧埒（相等）于蜀中"。嵯颠遣使上表辩解说：由于杜元颖不体恤军士，军士要求我诛杀虐帅，为我做向导。现虐帅未诛，无以慰军士之心，愿陛下诛之。唐文宗遂贬杜元颖为循州司马；下令各路官军撤回。西川节度使郭钊至成都与南诏立约：互不侵扰。文宗以国信赐嵯颠。太和四年（830）十月以李德裕代郭钊为西川节度使。李德裕至镇，建"筹边楼"，向老于军旅、习边事者了解情况。绘制南入南诏、西达吐蕃的西川地图。修固清溪关，以断南诏入侵之路。整顿、扩充军队，精加训练。大和五年五月，李德裕遣使至南诏，索回被掠百姓、工匠、僧道4000余人还成都。从此，南诏每年遣使入贡。

（翁俊雄）

高仙芝败于怛逻斯城

天宝九载（750），唐与大食（阿拉伯人所建）争夺中亚的一场战争，以唐军失败告终。

从7世纪后半期起，唐、吐蕃、突骑施以及不断向东方扩张的大食帝国为了控制西域屡屡发生冲突。开元时（713—741），唐玄宗凭借雄厚的国力，对西北边疆的经营颇有成效，遏制了吐蕃东进的势头，推进到石堡城（青海西宁西南）一线。吐蕃东进受阻，转而西出，侵入小勃律王国（今克什米尔吉尔吉特雅辛河流域一带），企图从西线攻侵唐的安西四镇，并以女妻小勃律王，使其叛唐，邻近20余国也不再向唐朝贡而归附吐蕃。天宝六载，唐派大将高仙芝（？—755，高丽人）率万骑远征小勃律。高仙芝本高丽人，骁勇、善骑射。当年八月，平小勃律，虏小勃律王及吐蕃公主而还，威震西域诸国。高仙芝因深入万里建立奇功被擢为安西四镇节度使。

玄宗素怀"吞四夷之志"，对西域的开拓与经营极为重视，大食国亦发展至极盛，西域是它向东扩张的必争之地。因此，唐与大食在西域、中亚的正面冲突只是迟早之事。高仙芝在西域战场频频得手，擒突骑施可汗、吐蕃酋长、竭师国王。但高仙芝本性贪残，天宝九载伪与石国（今乌兹别克塔什干一带）约和，引兵偷袭，虏其国王，悉杀其老弱，掠取大量珍宝黄金，引起西域诸国的愤怒，于是密谋与大食勾结，攻侵安西四镇。高仙芝得知后，率蕃汉3万兵进攻大食，深入700里，越过碎叶水，与大食军在怛逻斯（今哈萨克江布尔城附近）相遇，双方相持5日。高仙芝所统的葛逻禄部临阵倒戈，与大食夹攻唐军，唐军大败，被俘2万余人，仙芝侥幸逃脱。

怛逻斯战役后，唐对西域的控制力削弱，大食也未继续东进。值得一提的是，这次战役中大食掳走了手工匠出身的唐朝士兵。其中有造纸匠、织匠、金银匠、画匠。当时从军被俘的杜环也被掳到大食，并写了《经行记》一书。原书虽已散佚，但杜佑所撰《通典》引用了一些片断，其中记载他亲眼看见居住在大食国的各类工匠。10世纪阿拉伯的著名学者比鲁尼（Al—Biruni，973—1048）也提到"初次造纸是在中国"，"中国的战俘把造纸法输入撒马尔罕"。此后，阿拉伯境内各地先后开始造纸生产。造纸术的西传，在中外文化交流史上产生了极深远的影响。

（宁　欣）

鉴真东渡日本

唐朝著名的高僧鉴真天宝十二年（753）东渡日本，将中国的建筑、雕塑、医药学知识介绍到日本。在中、日文化交流史上，有重要地位。

鉴真(688—763),俗姓淳于,扬州人,14岁出家为僧,法号鉴真。早年在长安、洛阳等地游历,后定居扬州大明寺。对佛经深有研究,尤精戒律。天宝元年,在唐朝完成学业的日本学问僧荣睿和普照邀鉴真去日本传播佛教。翌年十二月,鉴真率领弟子10多人,画师、工匠100多人启程。途中,船被巨浪打坏,第一次东渡失败。以后三次东渡都未成功。天宝七年,鉴真第五次东渡,遇大风,在海上漂流14天,最后抵达海南岛南部。在五次东渡中,荣睿、普照和鉴真得意弟子祥彦一直陪伴鉴真,历尽艰辛,祥彦不幸于端州(广东肇庆)病逝。鉴真也双目失明。天宝十二年,65岁的鉴真率领20多人,乘一艘返国的日本木船,第六次东渡,终于成功地到达萨摩国秋妻屋浦(现日本国鹿儿岛县、川边郡、坊津町、秋目),后入大宰府(古制的官厅,设置于九州,任当地国防、外交事务)。翌年,鉴真一行入平城京。鉴真于东大寺佛殿前给圣武上皇、孝谦天皇等传授戒律。唐至德三年(758)鉴真受赐"大和上"法号。唐乾元二年(759),鉴真受赐新田部亲王家旧宅地,就在此地私营"唐律招提"(按唐制:私人于乡村营建佛寺曰"招提";"唐律"当为此招提名称),创建了"唐招提寺"。翌年,平城宫"东朝集殿"捐入唐招提寺。唐招提寺金堂的建筑,采用了鸱尾、三层斗拱等形制,气势雄伟,反映了唐朝建筑的最新成就。鉴真又传授干漆夹纻法,塑造佛像,还凭嗅觉鉴定药物,治疗疑难病症,介绍了中国医药知识。唐宝应二年(763)鉴真在奈良圆寂,享年76岁。为了纪念鉴真,当时有名叫淡海三船的日本学者撰写《唐大和尚东征传》,介绍他的事迹。日本僧忍基等塑造的干漆夹纻鉴真坐像,一直安放在"唐招提寺",以至于今。 (秦秀芳)

安史之乱

唐玄宗天宝十四载(755)兼领范阳、平卢、河东三镇节度使的胡人安禄山,与其部将史思明发动叛乱,一度攻陷洛阳、长安。这次动乱,史称"安史之乱"。经过七年,叛乱才被平息。安史之乱标志着唐朝在政治、军事上由盛转衰。

在唐玄宗开元年间和天宝初年呈现出繁盛景象。天宝八载(749)各地的"逃户"基本上已于所在地定居。全国在籍民户已近900万,是贞观年间的三倍。在以课丁为主要征收对象的租庸调制下,政府的财政收入也相应增加。天宝八载,"是时,州县殷富,仓库积粟帛,动以万计",各地的粟、帛源源运入京师,"帑藏充牣,古今罕俦"。唐玄宗也引以为荣,常率群臣参观。这种繁荣景象冲昏了唐玄宗的头脑。他不再提倡节俭,竭尽奢靡之能事,公主、贵戚经常比赛着向他"进食",他不仅不加制止,反而命宦官充当"检校进食使",对所进之食物加以"检校"。一次进食比赛,往往"水陆珍羞数千盘",而一盘之费,竟是"中人十家之产"!他不再过问民间疾苦,而"视金帛如粪壤,赏赐贵宠之家,无有限极"。贵戚、官员莫不以奢靡为荣,互相攀比。长安宝寿寺的大钟铸成,高力士作斋庆贺,"举朝毕集"。规定:击钟一杵,施钱百贯。朝臣比富,少者10杵,多者20杵。韩国夫人、虢国夫人、秦国夫人(均为杨贵妃之姊),大建住宅,极其壮丽。建成后发现别人建的更为豪华,立即拆毁,重新改建。奢侈成风,腐败接踵而来。贵戚、官员贪污、受贿、请托,无所不为。剑南节度使章仇兼琼为巩固职位,以价值万贯的精美"蜀货",请人至长安送与杨贵妃之家,以为"内援"。

唐玄宗晚年深居禁中,专以声色自娱,厌听谏诤,怠于政事。开元二十四年(736)唐玄宗罢免遇事"皆力争"的张九龄宰相职位,"悉以政事委林甫"。自张九龄罢相,朝臣皆固身保位,不再直言。李林甫为遮蔽玄宗视听,自专大权,公然召见谏官,对他们说:"今明主在上,群臣顺从惟恐不暇,何用多言!诸君不见立仗之马,吃三品料,嘶叫一声,就被斥去。后悔不及!"从此"谏诤路绝矣"。从此,李林甫大权在握,结党营私、排斥异己。户部尚书裴宽,一向被玄宗重视,李林甫恐其被提拔为宰相,遂唆使刑部尚书裴敦复揭裴宽之短,致使裴宽一贬再贬,外任安陆郡之别驾。史称:李林甫为宰相,凡是才高望重、受玄宗重视、有可能升任宰相的人,"必百计去之"。而他在表面上与其亲善,"啗以甘言,而阴陷之"。因此,时人说李林甫"口有蜜,腹有剑"。李林甫任宰相19年,于天宝十一载(752)死,杨贵妃堂兄杨国忠继之为相。他效法李林甫,飞扬跋扈,"台省官有才行、时名,不为己用者,皆出之"。混乱的朝政,势必酿成巨大的灾祸。

朝政的混乱与对边镇的失控正相表里。随着府兵制的瓦解、募兵制的确立,军队的分布也发生了重大变化。府兵制时,全国有折冲府634个,而京师所在地关内道就有军府270个。目的是加强保卫唐朝的统治中心关中地区。即所谓"内重外轻"。改行募兵制以后,开元二十五年(737)由中书、门下省与诸道节度使一起确定边防镇兵的编制数额。"天宝之后,边将奏益兵浸多"。边境镇兵达49万人。相反,担任宿卫京师的"长从宿卫"(彍骑)不到20万人。这样,

就形成了“外重内轻”的局面。开元以前，边境节度使皆用文臣，不久任，不兼领，战功显赫，即入朝任宰相。由少数民族人为边将时，必须由有名望之臣遥领节度使，以节制武将。自开元中期以后，一反过去的做法，往往任善战的少数民族人为节度使，权限大、任期长，往往还兼领数镇节度使。在军队分布“外重内轻”的局面下，边将权限过大，所包藏的危险是一目了然的。在危机四伏的天宝十三年(754)唐玄宗对宦官高力士(684—742，高州良德(今广东广州东北)人)说：“朕今老矣(按：其年玄宗69岁)，朝事付之宰相；边事付之诸将，夫复何忧！”高力士回答：“边将拥兵太盛，陛下得何以制之？臣恐一旦祸发，不可复救，何得谓无忧也！”高力士所谓“一旦祸发”是指安禄山已有叛乱的迹象而言。其实，当时朝廷有很多人已经看出，并且已经对玄宗提出。玄宗并未采取对策，或者是心存侥幸，或者是大势已成，无可奈何。翌年，天宝十四载(755)“安史之乱”爆发。

安禄山(？—757)，营州杂种“胡人”，曾任边境的“互市牙郎”。投唐军后，被幽州节度使张守珪收为养子，并提拔为平卢军使。天宝元年(742)于营州置平卢节度使，唐玄宗以安禄山为平卢节度使。天宝三载(744)安禄山又兼领范阳节度使。天宝十载(751)又兼领河东节度使。安禄山兼领三镇节度使，强兵在握，日益骄恣。见唐玄宗年老，中原无武备，有轻唐廷之心。在汉人谋士严庄、高尚的策划之下，阴谋叛乱。安禄山收养奚、契丹等降者8000余人，谓之“曳落何”(意为壮士)，拥有蕃、汉步骑15万人、战马数万匹。部将史思明、安忠志、田承嗣、张孝忠等十数人为其爪牙。安禄山日益坐大，反象已明，朝臣对唐玄宗指出“安禄山必反”，玄宗不听。天宝十三载(754)安禄山要求兼领“群牧总监”，掌管陇右数十万匹战马。安禄山又要求唐玄宗给他空白“告身”(任命状)，由他提名授予部下500名将领。翌年，又要求“以蕃将32人代汉将”。唐玄宗一一满足其要求。朝臣指出：“其反明矣！”玄宗却回答：“禄山，朕推心待之，必无异志。东北二虏(指奚、契丹)，借其镇遏。朕自保之，卿等勿忧也。”天宝十四载(755)十一月，安禄山发所部奚、契丹、同罗、室韦等蕃汉兵15万，以讨杨国忠为名，在范阳郡(治所蓟县)发动叛乱。

唐玄宗得知安禄山叛乱，即命毕思琛至东京(洛阳)、程千里至河东各招募数万人防守。安西节度使封常清入朝，玄宗任命他为范阳、平卢节度使。立即至东京募兵，得6万人。封常清切断洛阳东北的河阳桥，屯兵武牢(即汜水县)防止叛军渡黄河。安禄山所部叛军，经博陵郡南至常山郡南部的藁城。常山郡太守(天宝元年改刺史为太守)颜杲卿，不能抗，为安禄山守常山郡。安禄山派其部将率数千人守井陉口(在今河北井陉，为河东入河北的要道)，防止河东方面的进攻。叛军从常山郡南下，自灵昌郡(今河南滑县一带)渡黄河，攻占灵昌郡、荥阳郡。安禄山以其部将田承嗣、安忠志等为前锋，攻武牢。在此屯守的6万兵，是封常清仓促招募、未及训练的乌合之众，因而溃败。叛军随即攻陷东京，纵兵杀掠。封常清率残部西退至陕郡(今河南陕县)。此前，玄宗出内库钱帛，于京师招募士卒11万，号“天武军”，由荣王李琬为元帅、高仙芝为副元帅，率领东征，至陕郡。封、高二军相遇。封常清建议高仙芝所部退守潼关。高仙芝军队的“监军使”宦官边令诚，因高仙芝不听他话，边令诚遂自潼关入奏：封常清动摇军心，高仙芝自动放弃陕州数百里，又盗减军士粮赐。玄宗大怒，即派边令诚至军中将二人斩首。唐军无主将，遂起用在长安养病的河西、陇右节度使哥舒翰，拜为兵马副元帅，领兵8万以讨叛军。哥舒翰至潼关，合并高仙芝旧兵，共20万，在潼关驻守。

在洛阳准备称帝的安禄山自率叛军自东京向潼关进发，至新安县，听说河北有变，遂还军东京。在河北，平原郡(今河北德州)太守颜真卿(709—785，京兆万年(今陕西西安)人)在饶阳县举兵讨伐叛军。博平郡(博州)、河间郡也举兵响应。常山郡前太守颜杲卿杀安禄山部将，响应颜真卿。一时间，河北郡县大部分归唐廷。为了造声势、稳定阵脚，至德元年(756)正月，安禄山在洛阳即帝位，自称大燕皇帝。随即派史思明(？—761，突厥族人)、蔡希德攻占常山郡，杀死颜杲卿。颜杲卿起兵八日失败，河北大部郡县又被叛军控制。

正月，玄宗任命朔方节度使郭子仪(697—781，华州郑县(今陕西华县)人)发朔方军攻东京；命其选良将一人分兵先出井陉，定河北。郭子仪推荐李光弼(708—764，契丹族人)。玄宗任为河东节度使，分朔方军1万人给他。李光弼率蕃、汉兵万余人出井陉。二月攻下常山郡的大部属县，只有九门、藁城二县未下。李光弼在常山与叛将史思明相持40余日。史思明绝李军粮道，危急，李光弼使人告急于郭子仪。郭子仪引兵出井陉，四月至常山，与李光弼合蕃汉兵10余万大败史思明，迫其奔博陵郡。此时唐军大振，河北十余郡皆杀叛将而归朝廷。安禄山异常恐惧，甚至准备放弃洛阳，逃归范阳。

然而，形势突然逆转。驻守潼关的哥舒翰面临是

守是攻的问题。哥舒翰认为：叛军远来，利于速战，官军不可轻出。郭子仪、李光弼则建议：宜引兵北取范阳；而潼关宜于固守，不可轻出。宰相杨国忠则主张从潼关出军攻占洛阳。在攻、守的关键问题上，唐玄宗采纳了杨国忠的意见，命哥舒翰引兵出击。在陕郡灵宝县(今属河南)与叛将崔乾祐所率叛军遭遇，官军大败。哥舒翰所领20万人，只有8000人逃还潼关。哥舒翰在兵败之后，被部下火拔归仁控制押解至洛阳，投降安禄山。六月，叛将崔乾祐率所部攻占潼关。潼关失守，临近的河东、华阴、冯翊、上洛防御使皆弃郡走，所在守兵皆散，长安士民惊扰奔走，不知所往。初九，入夜，"平安火"(烽火)不至，唐玄宗恐惧。初十，玄宗召宰相商议去就，有人建议入蜀避难。十二日，百官至朝者十无一、二。玄宗登勤政楼，假意宣言亲征，人们都不相信。傍晚，玄宗命龙武大将军陈玄礼整比六军，厚赐钱帛，选"闲厩"马900余匹。十三日，黎明，唐玄宗与杨贵妃姊妹、皇子、皇妃、皇孙及杨国忠、韦见素、魏方进、陈玄礼等出"延秋门"向西逃跑。唐玄宗一行于二十日至马嵬驿(今陕西兴平县)，护卫六军军士哗变，杀死杨国忠，并迫使玄宗下令缢死杨贵妃，继续西行。七月二十三日，玄宗率从官、皇子皇孙及六军卫士1300人至成都。此前不久，安禄山入长安。

在马嵬驿，宦官李辅国向太子李亨献计请分玄宗麾下兵北趋朔方，以图复兴。宦官李辅国(704—762)挟太子李亨北走平凉县(今甘肃平凉县)。朔方留后杜鸿渐自迎太子于平凉，对他说：朔方，天下劲兵处也。四方郡县，大抵坚守抵抗叛军，以待复兴。如殿下在灵武治兵，叛军不足平也。七月初九太子李亨于灵武(今属宁夏)即位，是为唐肃宗。任颜真卿为河北招讨采访处置使。颜真卿将诏书颁诸州，于是河北、河南、江淮诸道皆知肃宗在灵武即位。李光弼追围史思明于博陵郡，得知潼关失守，遂解围，与郭子仪引兵赴灵武，灵武军威始盛，人有复兴之望。肃宗以郭子仪为兵部尚书、灵武长史；李光弼为户部尚书、太原尹、北京(今太原)留守。又遣使者告知唐玄宗。李光弼率兵5000赴太原。肃宗主要依靠朔方军以及陇右、河西、安西诸镇兵收复两京，但是"欲借兵于外夷以张军势"。谋士李泌建议，灵武距长安较远，可先至彭原(甘肃宁县西北)，再至扶风(治今陕西凤翔)，以扶风作为反攻基地。至德元年(756)十月，肃宗至彭原。第五琦朝见，建议将江淮的租庸粟米于当地换成布帛，逆长江、汉水运至洋川郡(治今陕西西乡)。令洋川郡守、汉中王李瑀负责陆运至扶风郡，解决军费。军费来源有了着落，肃宗命敦煌王李承寀、仆固怀恩至回纥可汗牙帐求援。并通过回纥可汗转告西域诸国入援。回纥可汗遣贵臣随李承寀至彭原。

安禄山在长安大索三日，恣意抢掠，遭到百姓的普遍反抗。其控制地区，南不出武关，北不过云阳，西不过武功。至德二载正月，其子安庆绪杀死安禄山自为大燕皇帝。

早在至德元年九月，史思明便攻占了赵郡、常山郡、博陵郡等地。次年正月，又率部将蔡希德等进兵太原。李光弼拒守月余。时安禄山已死，史思明受安庆绪之命，留蔡希德围太原，归范阳阻击回纥骑兵。李光弼乘机袭破蔡希德，斩首7万级。蔡希德逃遁。史思明归范阳，回纥兵已撤走。安禄山陷两京时，常以骆驼运御府珍宝于范阳。史思明拥强兵，据富资，益骄横，不听安庆绪之命。

三月，肃宗至凤翔(今属陕西)。这时，入援的陇右、河西、安西、西域之兵皆至，而江淮之租庸布帛亦至洋川、汉中。四月，以郭子仪为天下兵马副元帅，率军至凤翔。九月，郭子仪建议请回纥增加援兵。怀仁可汗遣其子叶护及将军帝德率精兵4000余人来凤翔。十二日，元帅广平王李俶率朔方等军及回纥、西域之兵15万，号20万，从凤翔进发。二十七日，唐军至长安西，陈兵香积寺北、沣水之东。李嗣业为前军、郭子仪为中军、王思礼为后军。叛军10万陈于其北。李嗣业率前军各执长刀，如墙而进，身先士卒，所向披靡。朔方左厢兵马使仆固怀恩发觉叛军伏精兵于阵东，欲袭官军背后，遂引回纥兵袭击之，翦灭殆尽。前军李嗣业又与回纥兵出战阵后，与大军夹击叛军，自午及酉，斩首六万级。至夜，叛军余部逃遁。二十八日，唐军入西京。肃宗曾与回纥可汗约定：克城之日，土地、士庶归唐；金帛、子女归回纥。叶护欲践约。广平王对叶护说：这样，东京人皆为叛军固守，愿至东京乃践约。郭子仪引蕃、汉兵追叛军至潼关，克华阴、弘农、陕三郡。十月十六日，安庆绪连夜逃出洛阳，北走河北。十八日，广平王李俶入东京。回纥在东京欲践约，父老搜罗锦万匹送给回纥，回纥乃止。二十三日，肃宗入长安。不久，唐玄宗也返回西京。

安庆绪入邺城(河南安阳)，叛将蔡希德、田承嗣等率部来会，有兵共6万。乾元元年(758)八月，回纥可汗遣骨啜特勒及帝德率骁骑3000助唐讨安庆绪，肃宗命已晋升为朔方左武锋使的仆固怀恩率领。九月，肃宗命朔方郭子仪、淮西鲁炅、兴平李奂、滑濮许叔冀、镇西北庭李嗣业、郑蔡季广琛、河南崔光远七节度使及平卢兵马使董秦率步骑20万讨安庆绪；又

命河东李光弼、关内泽潞王思礼二节度使率所部助攻。以宦官鱼朝恩为观军容宣慰处置使，负责指挥。十月，郭子仪击败安庆绪，占卫州，兵围邺城。安庆绪求援于史思明，史思明率兵13万自范阳分三路来援，攻陷唐军占领的魏州。郭子仪等九节度使围邺城，自十月至翌年二月，竟未攻克。史思明从魏州出军，在距邺城50里处安营，日夜派兵骚扰，断其粮道。唐军乏食，军心动摇。三月初六，官军步骑60万阵于安阳河北，史思明自率精兵5万抵抗。两军交锋，杀伤相半，忽起大风，飞沙走石，天地黑暗，咫尺不相辨。两军大惊，官军溃而南，叛军溃而北。弃甲仗辎重于路。郭子仪以朔方军断河阳桥保东京。战马万匹，只存3000；甲仗10万，遗弃殆尽。东京士民散奔山谷。东京留守崔圆、河南尹苏震等官吏南奔襄、邓。各节度使溃归本镇，只有李光弼、王思礼全军而归。史思明自沙河还屯邺城南。安庆绪入史思明军营，被杀。事后，史思明留其子史朝义守相州，自引兵还范阳。

九节度使围邺失败后，肃宗召郭子仪还京师，以李光弼代其为朔方节度使、兵马元帅。为收复河北，不久，任李光弼为幽州长史、河北节度使。史思明还范阳后，自称大燕皇帝。九月，史思明分四路南下，会于汴州，连下汴、郑二州。李光弼主动放弃洛阳，北守河阳，以便与泽潞节度使王思礼表里相应。史思明入洛阳，城空，无所得，担心李光弼袭其后，在河阳以南列阵。双方激战。李光弼攻怀州百日，占怀州。上元二年(761)二月，观军容使鱼朝恩建言肃宗攻占洛阳。肃宗令李光弼攻东京。李光弼不得已，使郑陈节度使李抱玉守河阳，组织兵力进攻洛阳。二十三日，唐军在邙山布阵。李光弼主张依险而阵，而部将仆固怀恩坚持布阵平原。结果大败。河阳、怀州皆被叛军控制。朝廷大惧，增兵屯陕州，防止叛军西进。史思明乘胜取陕州，遇官军狙击，退守永宁县境内之鹿桥驿。屯军于柳泉驿的史朝义派人至鹿桥驿杀死其父史思明，随即至洛阳即皇帝位。宝应元年(762)十月，肃宗以雍王李适为天下兵马元帅，以朔方节度使仆固怀恩为副，分三路进攻洛阳：仆固怀恩与回纥"左杀"为前锋，自渑池入；潞泽节度使李抱玉自河阳入；河南道副元帅李光弼自陈留入。三军全力进攻，斩首6万级，俘虏2万人。仆固怀恩进克东京及河阳城，派遣其子仆固玚及朔方兵马使高辅成率步骑万余追捕史朝义。史朝义逃至范阳，叛将李怀仙拒其入城。史朝义欲北入奚、契丹，至平州界内温泉栅，走投无路，缢死于林中。回纥入东京，肆行杀掠，死者万计，火累旬不灭。朔方、神策军亦以东京、郑、汴、汝州皆叛军控制之地，所过虏掠，三月乃已。叛将薛嵩以相、卫、洺、邢四州，张忠志以赵、恒、深、定、易五州降唐。历时七年之久的"安史之乱"，终于平息。

（翁俊雄）

马嵬驿之变

唐天宝十五载(756)，玄宗逃往成都的途中，在马嵬驿(今陕西兴平)发生的一次带有预谋性质的兵变。

安史之乱爆发后，河北州县望风瓦解，洛阳很快失陷，潼关相继失守、京师震骇。玄宗由于没有及时获得确切消息，几天之内还不知道形势已如此严峻(潼关距长安仅300里)，朝廷重臣亦无人提出应变之策。天宝十五载正月十一日，前线不利的消息不胫而走，士庶恐骇，惊扰奔走。十二日，上朝大臣十无一二。玄宗虽故作姿态下诏亲征，但已做好了随时撤离京师的准备，逃往土富人繁、内外险固、杨国忠又遣人经营多年的剑南(四川)。十三日凌晨，细雨濛濛，玄宗仓皇从大明宫出逃，随行的只有杨贵妃姊妹、太子、皇子、皇孙、公主及杨国忠、韦见素、魏方进等朝臣，再加上龙武大将军陈玄礼及所统率的禁军、亲随宦官。一行人平明时分过西渭桥后，杨国忠便令人将桥焚毁，恐叛军追踪而来。到达咸阳望贤宫时，宫中已无一人。午夜到达金城(陕西兴平)。这时，哥舒翰部下王思礼带来了潼关失守、哥舒翰被俘的消息(王思礼在潼关曾劝哥舒翰奏请玄宗杀掉杨国忠(？—756，蒲州永乐(今山西永济)人，杨贵妃堂兄，时任宰相)。又曾建议派30骑将杨国忠劫持到潼关杀掉。将士们早就因杨国忠恃宠弄权、穷极奢侈、陷害将帅、积怨促叛等行为不满，得知哥舒翰出兵被俘始末，更是人心骚动。

十四日一早继续行路，至马嵬驿，军士们饥疲交加，群情激愤。陈玄礼恐军士猝然发难，遂通过东宫心腹宦官李辅国，向太子李亨请示解决办法。李亨未置可否。陈玄礼于是对军士说，今天这种局面，都是杨国忠克剥百姓、积怨朝野所致，如果不杀他以谢天下，就无法平息天下人的怨愤。军士受其鼓动，无不表示早就有此念了。当众人看到吐蕃使者20余人拦住杨国忠在驿门交谈时，立即大呼：杨国忠与蕃人谋叛。遂冲上前去围追而杀之。杨国忠子杨暄、杨氏姊妹韩国夫人、秦国夫人及御史大夫魏方进同时被杀。宰相韦见素亦遭误伤，幸亏被人认出才免于一死。禁军士兵将玄宗围在驿中不肯散去。玄宗闻驿外喧哗，

不知何故，左右回答杨国忠谋反。玄宗走出驿门，慰谕军士，令他们归队。军士不应。玄宗使高力士问军士还有什么要求？陈玄礼回答：国忠谋反，贵妃不宜供奉，愿陛下割恩正法。玄宗说：由我自己来处理吧。返身入驿门，拄着拐杖久久呆立，京兆司录韦谔（见素之子）上前劝道：今众怒难犯，安危在晷刻，望陛下速决。叩头流血。玄宗说：贵妃常居深宫，安知国忠反谋？高力士接道：贵妃固然无罪，但将士们已杀国忠，而贵妃在陛下左右，他们怎能自安？愿陛下审思之，将士安则陛下安。玄宗权衡安危利弊后，只得命高力士将杨贵妃缢杀，一场哗变暂被平息。

翌日，玄宗准备继续西行，争论又起。将士们表示，杨国忠谋反，其党羽皆在蜀，不肯入蜀。当地父老也反对玄宗入蜀。玄宗去意已定，遂令太子宣慰父老。当玄宗被迫留下太子后，才得继续西行，然后南下入蜀。

马嵬驿之变似系偶然，但却是多年来唐宫廷内部、皇帝与太子、太子与权相、权相与宦官等统治阶级内部矛盾尖锐化的具体反映。　（宁　欣）

唐肃宗即位灵武

安史之乱爆发，唐玄宗入蜀途中，在父老要求下，宦官李辅国等挟太子李亨至灵武，在至德元年（756）即皇帝位，是为唐肃宗。唐肃宗依靠朔方军平定安史之乱。

天宝十四载（755）十月，安史之乱爆发，至德元年六月十四日，准备逃入蜀郡（治今四川成都）的唐玄宗一行，至马嵬驿（陕西兴平西），军士哗变，杀死宰相杨国忠，迫使玄宗下令缢杀杨贵妃。事后，六军将士反对玄宗入蜀，有人建议不如且至扶风，徐图去就。这时父老遮道请玄宗留下，玄宗不肯，父老说：如不能留下，我们愿率子弟跟太子破贼，收复长安。时间不长，众至数千人。这时建宁王李倓（太子李亨之子）与宦官李辅国握住太子的马缰绳对李亨说：如果殿下随皇帝入蜀，若贼兵烧绝栈道，切断交通，中原之地则拱手授贼。不如依靠西北边兵，召郭子仪、李光弼从河北回来，讨逆贼、复两京。唐玄宗得知后，对将士说：太子仁孝，可奉宗庙，可善辅之。对太子说：西北诸胡，吾抚之素厚，汝必得其用。于是分后军2000人及良马跟从太子。太子李亨一行自奉天县北上，经新平县、安定县至平凉（甘肃平凉西北）。平凉有监牧马，得数万匹，军势稍振。这时朔方留后杜鸿渐等人认为平凉非屯兵之所，不如灵武郡（治今宁夏灵武）“兵、食完富”。因而至平凉迎接李亨。七月初九，李亨至灵武。十二日太子李亨即位于灵武城南楼，是为唐肃宗，尊玄宗为上皇天帝，改元至德。平原郡太守颜真卿上表灵武，肃宗任其为河北招讨采访处置使。颜真卿将诏书颁诸州，于是，河北、河南、江淮各地皆知肃宗在灵武即位。不久，奉玄宗之命出井陉、进军河北的朔方军节度使郭子仪、河东节度使李光弼率兵赴灵武，灵武军威始盛，人有复兴之望矣。

（翁俊雄）

张巡、许远守睢阳

唐至德二载（756）二月至次年十月，张巡和许远等率领当地军民苦守睢阳等城达一年多，为唐军赢得了宝贵的时间，遏阻了安史叛军继续南下，保障了漕运线的畅通及江南物资对唐廷的源源补给。

张巡（708—757）邓州南阳（今属河南）人，安史之乱时以真源（河南鹿邑）令召募义军，率吏民拒敌。当雍丘（河南杞县）令令狐潮出城欲以城降敌时，张巡会合其他义军，入据雍丘，杀令狐潮妻子，环城固守，以千余人拒数万之敌，固守达10个月之久，常出奇兵，屡败叛军。至德元载十二月，雍丘以北几个城池相继失陷，叛军2万人欲袭击宁陵（河南宁陵东南），断张巡后路。张巡孤立无援，储备殆尽，被迫放弃雍丘，东守宁陵。叛军来攻，张巡一昼夜数十战，杀敌万余，敌收兵夜遁。张巡因功拜河南节度副使。

许远（708—757），杭州盐官（今浙江海宁西南）人，安史之乱猝发，朝廷不次拔擢将帅，许远拜睢阳太守。他临危受命，与许叔冀、薛愿等各守灵昌（河南汲县东）、颍川（河南许昌）、睢阳（河南商丘南）等城，成犄角之势，阻挡了叛军南下兵锋。但皆孤城无援，颍川、灵昌先后陷落。

安庆绪杀父即位后，视河南固守孤城为心腹之患，为实现他扫平江南、掠夺财富及切断唐廷运输线，困阻唐军，征服两河，再西向扑灭唐廷的战略方针，必须首先拔掉仍在固守的几座孤城。至德元载十月，史思明部下尹子奇曾率5000骑兵渡黄河，攻略北海（山东潍坊），欲乘势南取江淮，因回纥助唐援军已至范阳（北京）城下，只好急速引兵北归。

至德二载正月，尹子奇率蕃、汉兵13万攻睢阳。许远告急于张巡。张巡率兵自宁陵入睢阳，二人合兵后共6800人。与城父（安徽亳县东南）令姚訚等共守睢阳。叛军悉众攻城，张巡督励将士，苦战16个日夜，擒敌将60余，杀敌2万余，守军士气倍增，敌军夜遁。许远以张巡智勇双全，军事才能远在己之上，遂推张巡主持守城军务，自己承担调集军粮、修缮战

具、居中接应事宜，二人配合默契。

当时，两京均已沦陷，河北几乎全部、河南大部、河东、山东部分地尽入叛军之手，主持河南战事的唐宗室嗣虢王李巨为避兵锋，从战略要地彭城（江苏徐州）南撤到淮河北岸的临淮（江苏盱眙北）。南阳（河南邓县）鲁炅固守孤城一年，力战不能支，遂率众数千突围奔襄阳，继续苦守襄阳，使叛军无法侵掠江、汉。

尹子奇屡屡率大军攻打睢阳，急欲拔之，张巡、许远则激励将士，与将士同甘共苦，屡摧敌锋。张巡打仗不依古法，能临机应猝，号令明，赏罚信，推诚待人，故将士们个个舍生忘死。守城前期，张巡经常主动出击，屡战屡捷。但叛军攻围不休，至七月时，睢阳储粮已尽，死亡惨重，只剩 1600 名士兵，且不堪饥病，几乎无法作战了。张巡被迫坚守，以变制变。叛军先后用大云梯、钩车、木驴等攻城，均告无效。叛军无可奈何，在城外挖壕筑栅围守，张巡也挖壕拒之。

八月，睢阳守卒仅存 600，有人建议弃城东走，张巡、许远认为睢阳是江淮屏障，如果弃城而去，叛军必乘胜长驱江淮。且我方饥羸交加，走不了多远，不如坚守待援。粮食尽了，先以树皮、茶纸、战马果腹，继则捕雀挖鼠充饥。雀鼠又尽，张巡杀爱妾以饷军士，许远杀家奴充军食，后又搜罗城中妇女、老弱男子为食。当时，许叔冀在谯郡（安徽亳县）、尚衡在彭城、贺兰进明在临淮，皆拥兵不救。张巡令南霁云率 30 骑突围奔临淮告急求援。贺兰进明认为救援存亡不知的孤城，纯属徒劳，加上与其他将领有矛盾，不敢分兵，南霁云痛心疾首而去，过午陵时，集合了 3000 义军冲过重围，突入睢阳城，守城将士见援军无望，无不失声痛哭，抱定了必死的决心。

十月，叛军登城，守城将士仅剩 400 人，病弱不堪已失去战斗力，张巡许远等均被俘。张巡就义时，视死如归，大义凛然，与部将南霁云等 36 人同时壮烈牺牲，许远被押往洛阳后遇害。

睢阳城虽然失陷，但唐军主力已开始了大举反攻，至德二载九月，收复长安，挥兵西向，很快又收复了洛阳，从被动转为主动。张巡、许远以其艰苦卓绝的功业，催人泪下的气节名垂青史。　（宁欣）

永王李璘叛乱

安史之乱爆发后，永王李璘欲乘机割据江南，于至德元载（756）在江陵叛乱，不久被镇压。

开元十五年（727），唐玄宗命其第十六子永王璘遥领荆州大都督，并不赴任。安史之乱爆发后，至德元载六月，唐玄宗在入蜀途中，于汉中郡下诏任永王璘为江陵郡大都督及山南东路、岭南、黔中、江南西路四道节度采访等使，镇江陵。谏议大夫高适对玄宗任命诸王分镇天下的做法提出异议，玄宗不听。永王璘于九月至江陵。江陵是江淮租赋的转运站，“时江淮租赋山积于江陵”。永王璘召募士卒数万人。永王璘之子襄城王李玚有勇力、好武。永王璘的谋士薛镠、李台卿、蔡垧认为：今天下大乱，惟南方完富。而永王握四道兵，封疆数千里，宜据金陵（江苏南京），割据江南，如同东晋。唐肃宗得到消息，令李璘入蜀，李璘不听。肃宗知道高适曾反对玄宗对李璘的任命，于是，召高适赴彭原行在，听取其意见。高适分析江南形势，认为李璘必败。至德元载十二月，置淮南节度使，领江陵等 12 郡，以高适为扬州大都督长史、淮南节度使。并置淮南西道节度使，领汝南等五郡，以来瑱充使。肃宗并命高适、来瑱及江东节度使韦陟共同商讨平叛之计。二十五日，永王璘率军东巡，乘战船沿江而下，军容甚盛。吴郡（治今江苏苏州）太守兼江南东路采访使李希言，追问其东下之意。李璘大怒，分遣其将浑惟明袭击吴郡、季广琛袭击广陵（江苏扬州）。李璘进军至当涂（今属安徽），吴郡太守遣部将元景曜及丹徒太守阎敬之率兵拒之。淮南采访使李成式亦遣部将李承庆拒之。永王璘击斩阎敬之，元景曜、李承庆皆降于永王璘，进据丹阳城，江淮大震。高适、来瑱、韦陟会于安陆（今属湖北），结盟誓众讨伐李璘。

至德二载二月，李成式与河北招讨判官李铣合兵讨伐李璘。李铣率兵数千，列阵于扬子县；李成式使判官裴茂领兵 3000，列阵于瓜步山（江苏六合境内），广张旗帜，列于江津。李璘与其子李玚在丹阳城上望之，始有惧色。永王璘之将季广琛召诸将说：看来事情不会成功，不如在开战之前，各奔前程。于是，季广琛率兵奔广陵；浑惟明奔江宁。李璘弃丹阳，携家属与余部乘船沿江而东下。李成式部将赵侃等追至新丰陵，双方交战，李璘子李玚肩部被射中，李璘兵溃，率残部南逃，至鄱阳郡，收库物甲兵，企图南奔岭南。江西采访使皇甫侁追擒，杀之于传舍。李玚亦死于乱兵。高适、来瑱、韦陟未及渡江，叛乱已平息。

永王璘初任江陵郡大都督及四道采访使时，曾巡视宣州，李白谒见，被任命为从事。叛乱失败，李白受牵连，被流放夜郎，中途遇赦得还。　（翁俊雄）

第五琦筹军费、改盐法

“安史之乱”爆发不久，第五琦为筹措军费，设法

将江、淮租庸调绕路运至唐廷，为收复两京创造条件。乾元元年(758)第五琦改变盐法，从征盐税改为食盐统购统销，为唐廷增加了财政收入。

唐玄宗天宝十四载(755)十一月，安史之乱爆发，叛军攻陷洛阳、长安，玄宗入蜀，太子李亨于灵武即位，是为唐肃宗。至德元年(756)十月，肃宗一行自灵武至彭原县(甘肃镇原以东)，后又至扶风郡(陕西凤翔)，以扶风为反攻基地。

安史叛军虽占领洛阳、长安，但河北、河南大部分州郡地方官聚兵自保，以抗叛军。平原郡(治今山东陵县)太守颜真卿、北海郡(山东益都)太守贺兰进明等为取得与朝廷的联系，先后遣使入奏。至德元年(756)八月，贺兰进明派遣录事参军第五琦入蜀奏事。第五琦(729—799)，京兆长安(陕西西安)人，有吏才，以富国强兵之术自任，对唐玄宗说：方今用兵，财赋为急，财赋所产，江、淮居多，乞假臣一职，可使军用无乏。玄宗即任其为江淮租庸使，负责征收江淮的租庸调。十月，肃宗即位灵武，不久移至彭原县。第五琦又至彭原谒见肃宗，提出将江淮租庸调运至朝廷的具体办法。由于叛军控制了大运河中段(汴河)，切断了南粮北运的主要通道，因而第五琦建议：逆长江、经汉水，至洋州(陕西西乡)，再陆运至朝廷。由于这条路线行程过长，且多不便，因而第五琦又建议：将征收江淮的粮食、布帛全部作价出售，转换成铜钱，以利运输。对这些建议，肃宗完全采纳。于是，第五琦加任山南等五道(即山南东、西道，剑南东、西道和黔中道)度支使。负责整个长江流域的赋税征收、运输事宜。第五琦将征收的粮食、布帛换成铜钱，由江陵、襄阳、上津路转至凤翔。乾元二年八月，襄州(湖北襄阳)裨将康楚元、张嘉延叛乱，攻占江陵(湖北江陵)，控制了转输的江淮租庸。十一月，被荆襄等道租庸使韦伦击败，得其所掠租庸200万缗，这条运路复通畅。

唐肃宗主要依靠朔方军，以及陇右、河西、安西镇兵收复两京，同时“欲借兵于外夷以张军势”。肃宗派李承寀、仆固怀恩至回纥牙帐请求援军，并通过回纥请求西域诸国派兵入援。肃宗于至德二年(757)二月至凤翔。十日后，陇右、河西、安西和西域之兵皆来会合。此时，江、淮庸调亦至洋川、汉中。各路兵马在较为充足的财力支持下，于至德二年九月收复长安，不久，又收复洛阳。

唐肃宗乾元元年十月，第五琦升任户部侍郎、判度支、勾当转运租庸、盐铁、铸钱等使，即除了总掌全国财政收支负责征收、转运赋税之外，又兼领盐铁、铸钱等事宜。唐朝初年“弛山泽之禁”，盐池、盐井产盐皆不收税。自开元元年(713)十月起对食盐生产者征收“盐课”。安史之乱爆发，平原太守颜真卿聚兵自保，为了筹措军费，创立了新的盐法。邻郡为景城郡(治今河北沧州)，临渤海，出海盐。颜真卿与清河郡(治今河北清河)“行人”李华，商讨了一个筹措军费的办法：收购沧州所产之海盐，沿永济渠设“场”。沧州盐以船沿渠而下，在各个“场”点卸货，以运路远近，“略定一价”，就场出售。从食盐的倒卖中获利，用作军费。当时任北海郡录事参军的第五琦随太守贺兰进明讨伐叛军，见其事，从中得到启发。第五琦自乾元元年十月，实行“榷盐法”(食盐专卖制度)。具体的做法是：在全国各地，“就山、海、井、灶”，设置“监院”。由监院派吏收购所有出产的食盐，然后由吏出售。凡是背着官府生产、销售食盐者，以违法论处。原有的盐户，以及自愿从业者为“亭户”，一律由监院管理。他们可以免除其他徭役。由于食盐专卖制度的实行，“(每)斗加时价百钱而出之，为钱一百一十”“用以饶”，扩大了国家的财政来源，增加了财政收入。从此，盐利成为唐朝财政收入的重要组成部分。

第五琦自乾元元年十月起，还兼“判度支使”，掌管全国财政的收支事宜。唐玄宗以前，全国的财政收入(金、帛)全部贮藏于左藏库。唐玄宗开元年间另置大盈内库，又称百宝大盈库，所贮金帛专供皇帝个人使用，由宦官掌管。第五琦判度支后，发现京师多豪将，求取无节。他也制止不了。于是他奏请将天下金帛贮纳大盈内库。这虽是权宜之计，在当时情况下，避免了京师武将的滥用。至唐德宗即位(779)复旧：“凡财赋皆归左藏”。

第五琦在此期间还兼铸钱使。以国用未足，奏请铸乾元重宝钱，以一枚乾元重宝当十枚通行的开元通宝钱行用。不久，又奏请铸“重轮”乾元钱，一当五十开元通宝行用。引起“民争盗铸”、铜钱贬值、粮价上涨的恶果。因此，第五琦于乾元二年十一月被贬为忠州(四川忠县)司马。 (翁俊雄)

九节度围邺

唐肃宗乾元元年(758)九月为围歼据邺固守的安史之乱元凶安禄山之子安庆绪的一次大规模的联合军事行动。以唐军失败告终。

唐肃宗在灵武即位后，由于河北、河南人民及一些地方官吏的坚决抗击，消耗了安史叛军的力量，遏制了叛军南下的企图，为唐廷赢得了调配、集结兵力的宝贵时间。郭子仪、李光弼奉命率朔方军步骑5万

自河北至灵武，与河西、北庭及安西节度使的军队会合，再加上回纥、于阗及西域诸族派兵入援，形势逐渐向利于唐军的方向发展。安史叛军内部则因相互残杀及争权夺利而发生分裂。至德二载（757）正月，安禄山被其子安庆绪杀死。唐军相继收复两京。安庆绪被迫从洛阳逃往邺郡（河南安阳）。

安庆绪初至邺时，从骑不过300，步卒不过千人，后陆续有逃散将领率兵归之，他又从河北诸郡召募壮勇，众至6万，军声复振。但据保范阳的史思明不愿受安庆绪节制，遂以所据13郡及8万兵降唐。庆绪不亲政事，专事游宴，愎戾好杀，部下凡有降唐或欲降者，皆族诛，部属连坐。将士怨愤，有的散逃他处。但史思明发觉朝廷并不信任他，派乌重恩为副使并授权伺机杀他，于是杀乌重恩后再叛，与安庆绪遥相为援。

乾元元年九月，唐朝命朔方郭子仪、淮南鲁炅、兴平李奂、滑濮许叔冀、镇西北庭李嗣业、郑蔡季广琛、河南崔光远等七节度使及平卢兵马使率兵20万讨安庆绪。又命河东李光弼、关内泽潞王思礼二节度使将所部兵协同征讨，力图一举歼灭安庆绪。兵力后增至60万。肃宗因子仪、光弼皆为元勋，难相统属，故不置元帅，以宦官鱼朝恩为观军容使、宣慰、处置使。鱼朝恩早已对勋业克隆的郭、李二人心怀芥蒂，又不谙军事，为以后的失败埋下了前因。

战役初期，郭子仪率军渡黄河，东至获嘉（河南获嘉北），大破安太清，斩首4000，俘获5万，进而围攻逃至卫州（河南汲县）的安太清，季广琛、崔光远分别从东西两侧过黄河，与李嗣业一起在卫州城下与郭子仪会师。安庆绪深知卫州城的得失对整个战局将产生重大影响，于是倾邺城之兵，亲赴救援。郭子仪以诈兵之计，大败叛军，拔取卫州，然后追击逃往邺城的安庆绪，其他各节度也引兵继至。安庆绪收拾残众与唐军战于邺城西愁思岗，又败，前后死3万人，被俘千人，只好退居邺城固守。九节度于是连营围城。安庆绪以禅让为条件向史思明求救。史思明立即自范阳发兵13万救邺，见郭子仪等围邺甚固，不敢贸然轻进，先遣部将李归仁率步骑1万往滏阳（邺城北60里），遥为安军声援。史思明很快夺取了魏州，自称大圣燕王。李光弼认为，史思明得魏州后按兵不动，是欲使我军懈惰，再以精锐乘我不备时发动袭击，勤王军应进逼魏州，史思明必不敢轻出，旷日持久，邺城无援，必可攻破。安庆绪如死，史思明也就失去了发兵的借口。但负责居中协调的鱼朝恩却否定了这一方案，使唐军丧失了主动权。

九节度围邺，人数虽众，但军无统帅，进退不一，自冬到春，竟不能破城，只是重重筑垒穿堑，又引漳水灌邺城。城中井泉溢满，人只能构栈而居、城中食尽，一鼠值钱4000，斗米钱7万，甚至易子而食，人皆以为城破在即。但勤王诸军上无统帅，号令不一；城中有欲降者，因水深又出不来，安庆绪仍坚守待援。因此，久围无功，引起上下解体，军心涣散。

史思明据魏州厉兵秣马，伺机而动。见唐军懈惰，亲自率兵奔邺城，令诸将各离城50里安营，每营击鼓300面，连相威胁。每营又选500精骑，到城下抄掠，日夜袭扰。还派人扮成唐军到漕运线上骚扰、杀戮，或纵火焚烧运粮舟车，聚散无定，造成九节度军粮不继，严重扰乱了军心。史思明见唐军已“人思自溃”，遂率大军直抵城下，与唐军约定决战日期。

乾元二年三月，唐九节度率步骑60万列阵于安阳河（安阳东）北岸，史思明率精兵50000迎战。唐军恃兵多，有轻敌之心，见数万敌军前来，以为只是小股部队，颇不以为意。史思明突然奋力攻击，双方死伤相当。郭子仪率军绕到史思明军背后准备前后夹击，未及布好阵势，突然大风骤起，一时间吹沙拔木，天地昼晦，咫尺不相辨。两军将士皆惊慌失措，唐军南逃，史军北溃，甲仗、辎重委弃于道。唐军溃退而不可收拾，战马万匹仅存3000，甲仗10万遗弃殆尽，狂奔数百里，退到东都，士民闻风丧胆，纷纷四散逃往山谷，东都留守、河南尹等地方官员南逃至襄（湖北襄阳）邓（河南邓县），各节度使纷纷溃归本镇。军队所过之处，竞相剽掠，地方官吏无法禁止。十多日才安定。只有李光弼、王思礼尚能整勒部伍，全军归镇。郭子仪退至洛阳时，率朔方军断河阳桥（洛阳西北）遏制叛军，以保东都。史思明借唐军溃败之机，入邺城杀安庆绪，令其子史朝义留守相州，自己回师北上，重新聚集力量，与唐廷一决雌雄。九节度围邺的大规模军事行动以唐军的溃败而告结束。

（宁　欣）

朔方军始末

唐玄宗开元九年（721）于灵州（天宝元年改为灵武郡）置朔方节度使。安史之乱爆发后，在灵武即位的唐肃宗，依靠朔方节度使所统领的各军（统称为“朔方军”），平定叛乱。

隋代在今宁夏的银川、灵武、永宁、青铜峡一带设灵武郡，治所在回乐县（吴忠）。唐初以其地置灵州总管，后改称为“朔方行军大总管”，治所在灵武县（永宁、灵武间）。唐玄宗开元九年二月，扩大朔方军

大总管的管辖范围使领单于都护府(内蒙古和林格尔)、三受降城(河套以北)、丰、胜、夏、银等六州及定远军(灵武东北)、丰安军(灵武西)。改朔方军大总管为朔方节度使。开元末至天宝初年,又于灵州城内置经略军、于单于都护府城内置振武军。天宝初年,朔方军节度使共领兵129,400人、有战马17,600匹。天宝四载(745),唐玄宗命朔方节度使王忠嗣兼领河东节度使。王忠嗣身兼两道节度使,很有作为,自朔方至云中,边陲数千里,要害之地,悉列城堡,斥地各数百里。朔方为国之北门,地位极为重要。

天宝十四载安禄山叛乱,南下时,派叛将高秀岩、薛忠义进攻振武军及王忠嗣所筑之静边军(在振武军之北),朔方节度使郭子仪(697—781,华州郑县(陕西华县)人)率部将李光弼(708—764,契丹族人)仆固怀恩等大破之,坑其骑兵7000,进围叛军占据之云中郡。至德元年(756)正月,唐玄宗命郭子仪解云中之围,还朔方,增兵进取东京(洛阳),并要郭子仪选良将一人分兵出井陉(山西通往河北之要路),定河北。郭子仪推荐李光弼。玄宗以李光弼为河东节度使,分领朔方军万人。二月,以李光弼为魏郡太守、河北道采访使。李光弼率蕃、汉步骑万余人、太原弩手3000人出井陉,占领常山郡。常山九县,有七县附唐,只有藁城、九门二县为叛军所据。叛将闻常山失守,领兵来战。李光弼与史思明相持40余日。史思明切断唐军粮道,军中乏食,形势紧急。李光弼遣使告郭子仪,郭子仪引兵出井陉,四月初三至常山,与光弼会合。郭、李所率蕃、汉步骑10余万。史思明不敌,逃遁。唐军攻占赵郡,并于恒阳县大破史思明军,斩首4万级,进围博陵郡治所。唐军声势大振,河北10余郡皆杀贼守将归降。在洛阳的安禄山大为恐惧,甚至想放弃洛阳,回范阳。

然而,形势突然逆转。唐玄宗听信宰相杨国忠之言,在违背潼关守将哥舒翰意愿之下,命哥舒翰率军出潼关,东取洛阳,结果大败。叛军在崔乾祐率领之下入潼关、入长安;玄宗逃往成都。在河北的李光弼围博陵不下,听说潼关失守,解围而南,与郭子仪入井陉,常山陷于叛军。太子李亨在灵武即帝位,郭子仪率5万士卒自河北至灵武,灵武军威始盛,人有复兴之望。李光弼将一部分精兵交还郭子仪,自率5000士兵返回太原。新即位的唐肃宗主要依靠朔方军平息叛乱。不过,虽用朔方之众,却欲借兵于外夷以张军势。因此,派敦煌王李承寀和郭子仪部将仆固怀恩出使回纥,请援军,并遣使至西域、吐蕃请援军。肃宗谋臣李泌劝肃宗离开灵武,经彭原,至扶风郡,以便在那里迎接入援夷兵。唐肃宗离开灵武,十月至彭原。至德二年(757)正月,安禄山被其子安庆绪杀死,安庆绪在长安即大燕皇帝位,命史思明归范阳。朔方节度使郭子仪认为河东郡处于长安、洛阳两京之间,得河东则两京可图。二月,郭子仪自洛交郡率朔方军,打败守城的叛将崔乾祐,收复河东。唐肃宗此时已到凤翔。入援的陇右、河西、安西、西域之兵亦至凤翔,江淮之庸调亦至洋川、汉中。四月,肃宗以郭子仪为天下兵马副元帅,使其率兵赴凤翔。郭子仪率兵与叛军战于长安之西,被打败。九月,郭子仪建议肃宗请回纥增兵。回纥怀仁可汗遣其子叶护及将军帝德率精兵4000至凤翔。十二日,元帅广平王李俶率朔方军及回纥、西域之兵15万,号称20万,从凤翔出军。二十七日,唐军至长安西,陈兵于香积寺北、沣水之东。唐军李嗣业为前军、郭子仪为中军、王思礼为后军。叛军10万阵于其北。李嗣业率前军进攻,所向披靡。朔方左厢兵马使仆固怀恩发觉叛军伏精兵于阵东,欲袭官军背后,遂引回纥兵袭击之,翦灭殆尽。前军李嗣业又与回纥兵出战阵后,与大军夹击叛军,斩首6万级。至夜,叛军余部逃窜。二十八日,唐军入长安。郭子仪引蕃、汉兵追击叛军于潼关,克华阴、弘农、陕三郡。十月十八日广平王李俶入东京。二十三日,肃宗入长安。不久,唐玄宗也返回长安。

安庆绪入邺城,叛将蔡希德、田承嗣等率兵会于邺城,有兵共6万。乾元元年(758)八月,回纥可汗遣骨啜特勒及帝德率骁骑3000助唐讨安庆绪。肃宗命朔方左武锋仆固怀恩统领。九月,肃宗命朔方节度使郭子仪及淮西节度使鲁炅等九节度使攻邺城。由于九节度使互不统属,没有统一指挥。自十月至翌年二月,竟未攻克。最后,被从范阳南下的叛将史思明打败。各节度使归本镇。史思明杀死安庆绪,留其子史朝义守相州,自引兵还范阳。

九节度围邺失败后,七月,肃宗召郭子仪还长安,以李光弼代其为朔方节度使、兵马元帅。为收复河北,不久,任李光弼为幽州长史、河北节度使。史思明在范阳自称大燕皇帝。九月,史思明率大军南下,攻占汴、郑二州。李光弼主动放弃洛阳,北守河阳。在河阳,双方激战,李光弼占怀州。上元二年(761),李光弼在进攻洛阳的途中,在邙山被叛军击败,河阳、怀州被叛军控制。朝廷闻之,大惧,增兵屯陕州,防止叛军西进。在陕州永宁县,史朝义杀死其父史思明。事后,史朝义在洛阳即皇帝位。宝应元年(762)十月,代宗以雍王李适为天下兵马元帅,以朔方节度使仆固怀恩为副,进讨史朝义。二十三日,唐军分三路进

攻洛阳。以仆固怀恩与回纥“左杀”为前锋，自渑池入；以潞泽节度使李抱玉自河阳入；以河南道副元帅李光弼自陈留入。三军全力进攻，斩首6万级，俘虏2万人。仆固怀恩率前锋进克河阳城及东京洛阳。不久，史朝义自缢而死。朔方军在收复两京中起了重大作用。

唐代宗广德元年(763)，吐蕃占泾州，进犯长安附近的奉天、武功县，京师震骇。唐代宗急忙起用已经解除兵权闲居长安的郭子仪为副元帅，讨伐吐蕃。郭子仪匆忙召募骑兵20人至咸阳。不久，代宗逃往陕州，吐蕃攻占长安。郭子仪听说六军将士溃散在商州。于是，至商州收散兵与武关防兵4000人。在郭子仪与左羽林大将军长孙全绪所率骑兵的围追下，吐蕃从长安撤走，居于原、会、成、渭等州。郭子仪入长安，京畿遂安。十二月，代宗从陕州回长安。由于朔方节度使仆固怀恩与唐代宗互相猜疑，拒绝与吐蕃作战，因而，唐代宗于广德二年(764)二月复任郭子仪为朔方节度大使。

仆固怀恩得知河东节度使辛云京进谗言致使代宗猜疑自己，因而领兵围太原、榆次，不克。后归灵武，引回纥、吐蕃10万众南下，京师震动。朔方节度使郭子仪驻屯河中，奉命入朝。九月，代宗以郭子仪充北道井宁、泾原、河西以来通和吐蕃使。十月，仆固怀恩引回纥、吐蕃至邠州，进逼奉天县。不久，解围而退。永泰元年(765)仆固怀恩又引回纥、吐蕃10万众南下，至奉天县，围泾阳县，距京师只有数十里，形势危急。此时仆固怀恩已经病死。回纥与吐蕃因争利而矛盾爆发，分营而居。郭子仪只带数骑至回纥营，见其大帅合胡禄都督药葛罗，对他说：回纥有大功于唐，唐之报亦不薄，奈何负约，深入吾地，侵逼畿县，弃前功，结怨仇，背恩德而助叛臣，何其愚也！并揭露仆固怀恩叛君弃母、吐蕃不顾舅甥之亲(吐蕃娶唐公主，为舅甥之国)。建议回纥破敌以取富。药葛罗与郭子仪以酒为誓。吐蕃得知后，在夜间引兵遁去。回纥遣其酋长石野那等六人入见唐代宗。朔方军在解除两次京师危机中起了巨大作用。

大历三年(768)十一月，宰相元载认为，郭子仪以朔方军镇守河中，是以重兵深居无事之地。遂与郭子仪商议，使郭子仪以朔方兵镇守邠州，因为这一带已经成为吐蕃经常骚扰的地区。大历四年六月，郭子仪自河中迁于邠州，其精兵自随，余兵交部将统领，分守河中、灵州。吐蕃每年秋高马肥，时常进犯京畿地区进行骚扰。唐廷每年秋季征调关东(潼关以东)之兵，屯京西防守，谓之“防秋”。大历六年淮西节度使李忠臣率兵2000屯奉天县防秋。大历九年二月，郭子仪入朝，对代宗说：朔方，国之北门。中间战士耗散，十才有一。今吐蕃兼河陇之地，杂羌、浑(党项、吐谷浑)，势强十倍。愿更于诸道各发精兵，成四五万人，则制胜之道必矣。此时，朔方军大为衰弱。大历十四年五月，代宗死，德宗即位，改元建中。德宗即位的当月，就解除了郭子仪的兵权。此时郭子仪头衔过高，权太重：司徒、中书令领河中尹、灵州大都督、单于·镇北大都护、关内·河东副元帅、朔方节度、关内支度、盐池·六城(朔方塞下有六城)水运大使、押蕃部并营田及河阳道观察等使。唐代宗欲分其权，久不决。数日后，德宗下诏，尊郭子仪为“尚父”，加太尉兼中书令，增实封满2000户(按：即将2000民户的租调作为其俸禄的一部分)，月给千五百人粮、二百匹马之马料，子弟、诸婿升官者十余人。所领副元帅、诸使所有头衔全部解除。将其权柄分给其部下任领：其部将李怀光为河中尹、邠·宁·庆·晋·绛·慈·隰节度使；常谦光为灵州大都督、西受降城·定远·天德·盐·夏·丰等军州节度使；浑瑊为单于大都护、东·中二受降城·振武·镇北·绥银·麟胜等军州节度使。从此，在唐后期历史上起着举足轻重作用的朔方军已不复存在。 (翁俊雄)

刘展之叛

唐肃宗上元元年(760)十一月，正当河北节度使李光弼与叛将史思明争战洛阳以北地区时，淮西节度副使、宋州刺史刘展叛乱，占领广陵，给江淮造成巨大损失。翌年正月叛乱平息。

淮西节度使王仲升有两名副使，一为李铣，一为刘展。李铣贪暴不法，被王仲升奏而处死。上元元年十月，王仲升使监军使邢延恩入奏：刘展倔强不受命，有野心，请除掉他。由于刘展掌握强兵，应以计谋去之。邢延恩建议：先任命刘展为都统淮南东、江南西、浙西三道节度使，在他解除兵权赴任时，在路途中，将他擒拿。肃宗采纳了建议。邢延恩将任命的《制》书给刘展时，刘展怀疑，他说：吾自陈留参军，数年间官至刺史，可谓暴贵。江淮，是国家赋税的主要来源地，吾既无大功勋，又非亲贤，今天突然这样重用，莫非有诈？邢延恩十分紧张，赶忙说：公素有才望，主上以江淮为忧，所以特别重用公，为何疑心？刘展说：如果无欺，可否先将都统的印章和节杖给吾？邢延恩说可以。于是赶忙至广陵郡(治今江苏扬州)与都统淮南东、江南西、浙西三道节度使李峘策划，并将李峘的都统印、节授给刘展。刘展既得印、节，立

即以牒通知江淮亲旧,以取得他们的支持。三道官属纷纷遣使迎贺。刘展带领所属兵1000赴广陵上任。

邢延恩知道刘展已有戒备,奔还广陵,与都统李峘、淮南东道节度使邓景山发兵拒刘展之兵,并向州县散发檄文,声言刘展反叛。刘展也散发檄文,言李峘反。州县莫知所以。李峘引兵渡江,屯兵京口(江苏镇江)。邓景山率万人屯徐城(安徽泗洪之南),分别控制渡江、渡淮的要冲。刘展率兵倍道而行,至徐城,使人质问邓景山:吾奉诏书赴镇,为何陈兵以待?邓景山不答,刘展使人于阵前大呼:汝等皆为吾民,莫干扰吾之旗鼓!然后,发兵进击,邓景山兵溃,与邢延恩逃向寿州(安徽寿县)。刘展引兵入广陵,分兵巡守淮河上、下游地区。

李峘在京口的北固山布兵防刘展渡江,在江口遍插木桩。刘展布疑阵于瓜洲(北固山对面),造成在瓜洲渡江的印象,而集中兵力在瓜洲西面的白沙。相持数日,刘展自白沙渡江,袭击下蜀戍(句容县北)。李峘军听到消息,不战而溃。李峘南奔宣城(今属安徽)。十一月初八,刘展攻占润州。接着,连下升、宣、常、苏、湖、濠、楚等江淮各州,聚兵万人、骑兵3000,横行江淮之间。

邓景山与邢延恩从寿州北上至任城,请求平卢军马使田神功率所部精兵5000救淮南。答应田神功在进入淮南后,淮南的金帛、子女归他所有。田神功即率所部南下至彭城(江苏徐州)。此时,唐肃宗命田神功讨伐刘展的诏书亦至,遂倍道而南。刘展闻讯,自广陵亲率所部8000兵拒之,并遣2000兵渡淮,袭击田神功于都梁山(江苏盱眙境内)。结果,刘展被田神功打得大败,率残部逃至天长(属扬州),又败,刘展与一随从逃过长江。田神功入楚州,占广陵。在广陵平卢军"大掠,杀商胡以千数",为了发掘财宝,"城中地穿掘略遍"。上元二年正月,田神功遣部将范知新率4000人自白沙渡江,西取下蜀戍,邓景山率千人自海陵渡江,东取常州。田神功与邢延恩率3000人于瓜洲渡江。刘展率步骑万余陈兵于蒜山(镇江西)。刘展集中兵力拒田神功,使其无法从瓜洲渡江,然而,范知新等兵已至下蜀戍。刘展招架不住,刘展弟刘殷劝展引兵逃入海,刘展说:若事不济,何必多杀人,早死晚死没有区别。在激烈的战斗中,刘展被箭射中,仆地,被斩首。刘展部将在与唐军战斗中,先后入据苏、湖、杭州。刘展死,余部或死或降,余党悉平。平卢军收复杭州时,大掠十余日。史称:"安史之乱,乱兵不及江淮,至是,其民始罹荼毒矣。"不过,刘展叛乱为期仅4个月,破坏的范围、程度有限。租庸使元载在宝应元年(762)认为:"江淮虽经兵荒,其民比诸道犹有资产。"就说明了这一点。 (翁俊雄)

吐蕃攻陷长安

唐代宗广德元年(763),吐蕃攻占长安,代宗逃至陕州。在郭子仪组织兵力反击之下,吐蕃撤至京师西北,十二月,代宗返回长安。

唐玄宗开元年间,为防御吐蕃、突厥,置朔方、陇右、河西、安西、北庭各节度使,分统镇兵防守边境。安史之乱爆发,唐廷依靠朔方军收复两京,同时,陇右、河西、安西等镇兵亦内调入援,称为"行营"。而留在各镇的兵力过少,吐蕃攻陷定戎军、天成军等,势力发展起来。此后不仅占领河西、陇右之地,还逐渐深入至凤翔(今属陕西)以西、邠州以北的广大地区,逼近长安。广德元年十月,吐蕃占领泾州,刺史高晖投降,作为向导,引吐蕃进犯奉天、武功县,京师震骇。唐代宗以雍王李适为关内元帅、郭子仪为副元帅,出咸阳县迎敌。此前,郭子仪被解除兵权闲居京师,部下早已离散。此时受命,匆忙召募了骑兵20人,至咸阳。吐蕃20余万兵众,弥漫数十里,自司竹园渡渭水,循山而东。渭北行营兵马使吕月将率2000骑兵迎敌,兵败,被俘。初七,代宗一行向东逃往陕州。初九,吐蕃入长安。高晖与吐蕃大将马重英立已故邠王李守礼之孙李承宏为傀儡皇帝。吐蕃剽掠府库、市里,焚烧闾舍,长安肃然一空。而唐朝六军散卒,也趁机打劫。士民避乱山谷。此时,郭子仪自御宿川循山而东,对随从说:六军将士逃溃者,多在商州,今速往收之。并发武关防兵,数日间,北出蓝田以向长安,吐蕃必遁。过蓝田,又得兵千人。数日后,郭子仪至商州收六军散兵与武关防兵共4000人,军势稍振。郭子仪请第五琦为粮料使,以筹措军粮。渭北、鄜坊节度使白孝德自其治所坊州领兵南取京畿州县。与蒲、陕、商、华各州之兵合势进击吐蕃。而长安城中的吐蕃,欲掠城中士女、百工撤走。郭子仪使左羽林大将军长孙全绪率200骑兵出蓝田观察形势。长孙全绪至韩公堆,昼夜击鼓,大张旗帜,大造声势。光禄卿殷仲卿聚众千人,保蓝田,与长孙全绪相配合,率200骑直渡浐水。长安百姓间传言:郭子仪自商州率大军不知其数向长安开来!入夜,长安百余少年击鼓大呼于朱雀街。吐蕃大为恐惧,全部逃遁,居于长安西北的原、会、成、渭等州。高晖率300骑兵向东逃走,至潼关,被守将擒而杀之。十一月,白孝德与邠宁节度使张蕴琦率兵屯畿县,郭子仪入长安后,京畿遂安。十二月十九日,唐代宗从陕州回长安。郭子

仪率城中百官及诸军迎于浐水之东。代宗对郭子仪说：不早用卿，故及于此。广德二年正月，代宗任郭子仪为朔方节度大使。　（翁俊雄）

刘晏疏汴河、改盐法

安史之乱后，各地民户流亡，经济残破，朝廷财政极为困难。刘晏于广德二年（764）疏浚汴河，使江淮租庸调沿运河顺利运至长安。又改进第五琦的盐法，使盐利"十倍其初"，结果朝廷摆脱了财政困境。

安史乱前，江淮的租庸调是通过运河输至京师的。运河的中段汴河（自河南汜水县，引黄河水，至泗州虹县，注入洪泽湖，再注入淮河。）的水源来自黄河，而黄河"号为一石水而六斗泥（沙）"。自汴河开凿后，每年正月征发附近县丁男淘挖泥沙，至桃花清明之后，"远水自然安流"。安史之乱爆发，河南地区是战场，8年多没有淘挖，汴河被泥沙堙废，无法行船。战乱时期，在第五琦建议下，江淮租调改走长江、汉水北上，"迂险劳费"，不是长久之计。安史乱后，朝廷议论此事，决定任用刘晏（715—780，曹州南华（今山东东明）人）主持此事。广德二年三月，以太子宾客刘晏为河南、江淮以来转运使，议开汴水。早在上元元年（760）唐肃宗就任命刘晏为户部侍郎，充度支、盐铁、铸钱等使主管财政。然而，在此后四年中，刘晏两度被贬、两度复官，因而不可能真正有所作为。他在理财上大显身手是从其任转运使开始的。

当时所以议论疏通汴河，是因战乱之后，朝廷缺乏粮食。长安米每斗竟达千文，"官厨无兼时之积"，"禁军乏食"。河南、河北虽是盛产粮食地区，但是，河北三镇贡赋不入；河南诸镇的租赋全用以养兵。而江淮地区基本上没经战乱，又在朝廷的控制下，因而贡赋所入，江淮居多。战乱期间，江淮租庸改走长江、汉水，再经陆路（上津路）运至朝廷，十分不便、不畅。为了解决朝廷急需，疏通汴河遂提上日程。

刘晏为疏通汴河，进行了实地考察。他发现，从熊耳山至虎牢关（今河南汜水县境内）的500里内，只有百姓千余家，"今于无人之境，兴此劳人之运，固难就矣"。此外，汴河沿线地阔人稀，多有盗贼。而东自淮阴（江苏淮安，汴河入淮处），西至蒲坂（山西省永济境内，黄河与渭水汇合处）的3000里内，武将跋扈，每以军需不足为由，"挽漕所至，船到便留"。刘晏将这些困难报告宰相元载。代宗遂命与河南副元帅王缙研究开汴河。王缙除解决了疏汴河的役力和武将截留漕运两个问题外，还于夹河两岸设置驿站，每两驿置"防援"300人，分界捉拿盗贼。刘晏提出的三个困难皆得到解决。汴河疏浚的障碍既已扫清，很快就畅通无阻了。

刘晏认识到长江、淮河、汴河、黄河、渭水水力不同，因而在造船时就考虑到这些情况，以适应各个水段的需要。为了使船坚牢，刘晏提供丰厚的造船经费。以前漕运过程中所需之力役，皆以附近州县征发丁男充。刘晏以盐利的一部分雇工，凡运输10万斛粮食，给7000缗钱。时人称这种做法为"不发丁身，不劳郡县，盖自古未之有也"。刘晏还加强了运输过程的管理。每船载粮1000斛，10船编成一纲，由军将押运。军将任务艰巨，据说，凡是押运几次后，没有不满头白发的。刘晏继承裴耀卿的分段运输法。长江之船达扬州，淮水船达河阴县（今河南汜水），黄河船达渭河口（今陕西华阴东），渭水船达太仓。沿水路置粮仓，在扬州、河阴、渭口等地设置大量粮仓，转相给、受，据说，没有一斗、一升粮食被水吞没。

刘晏疏汴河、改进漕运取得了巨大成就。自此，每年运米数十万石（斛）以充实关中。大历八年（773），由于关中地区丰收，朝廷减漕10万石，减少了江淮运米任务，说明刘晏疏汴河、改进漕运满足了朝廷的需求。

永泰二年（766），刘晏为东都畿内、河南、淮南、江南东西、湖南、荆南、山南东道转运租庸、盐铁、铸钱等使；第五琦为关内、河东、剑南、山南西道转运、常平、盐铁、铸钱等使。二人分理财政。第五琦管区皆食池盐；而刘晏管区多食海盐。刘晏在管区内改进盐法。在安史乱中，第五琦首创食盐由官府统购、统销之榷盐法。这种做法虽起过很大作用，然而也有缺陷。首先，盐官甚多，"官多则民扰"。其次，官吏只在盐产区附近销售，而距盐产区较远的乡村、山区却买不到盐。这都影响盐利的收入。刘晏在第五琦改变盐法的基础上加以改进：减少官吏数量，只在盐产地置盐官，由官府收购盐户所产的全部食盐，转售给商人，听任商人至各地销售。为了使商人畅行无阻，撤销交通线上一切以抽过境税为目的的关卡。在买盐困难的偏远地区，则运官盐以平价出售。这样，既方便了百姓，又扩大了销售网。

刘晏为保证充足的货源，还鼓励、指导亭户发展食盐生产。在淮河以北，设置巡院11所：郑滑、汴州、宋州、陈许、兖郓、甬桥、淮西、泗州、扬州、白沙、庐寿等。在江南设场4所：涟水、湖州、杭州、越州；设监10所：嘉兴、海陵、盐城、新亭、临平、华亭、永嘉、大昌、侯官、富都；设巡院2所：浙西、岭南。这些监院多设在水路要冲，如华亭监，在苏州华亭县。《太平广记

·守船者》载：县有"陆四官庙"，"元和初(年)，有盐船数十只于庙前"。

刘晏改进盐法，收到巨大成就。盐利由永泰年间每年不过40万缗，至大历末年，"十倍其初"，增至每年600余万缗。在全国财政总收入中，"盐利居半"。

刘晏为平衡全国粮食价格，于诸道设知院官，与各地的巡院保持信息的联系。知院官的主要职责是，每旬、每月将所属州县的雨雪、丰歉情况申报中央。而各巡院以高价雇"疾足"传递信息。各地物价之高下，虽然很远之处，不四、五日而尽知。诸道巡院广积粮食。当地丰收，即以高于市场价格购进；当地歉收，即以平价抛出。用以平衡物价。此外，知院官发现某地有灾情迹象，及时申报中央，提出蠲免赋税、发放救济粮的建议。及至征收赋税时节，刘晏不待州县申报，即在其困敝、流亡、饿殍等现象出现之前，就奏行赈济。此举使"百姓得安居乐业，户口蕃息"。刘晏任转运使的15年(764—779)中，全国财政收入从每年不过400万缗，增至1200余万缗。

刘晏以干练称著，讲究工作效率，事无大小，"必于一日中决之"，不使过夜。他的属吏，多是新手而且是"有干能者"。刘晏严格要求属吏，他们虽"居数千里之外，奉教如在目前"。除严格执行其指令以外，必须忠诚，即使在非正式场合，也不准说谎。刘晏培养了一大批理财能手，他死后20余年，唐廷掌管财政的韩洄、元琇、裴腆、包佶、卢征、李衡等，"皆(刘)晏故吏"。

(翁俊雄、孙焕丽)

回纥的兴起

回纥是北方的游牧民族，是维吾尔族之祖先。回纥帮助唐朝平定安史之乱，立下不小的战功。

回纥(唐德宗贞元四年(788年)改称为回鹘)，北魏时称为敕勒，或铁勒。其部落有袁纥、仆骨、同罗、拔野古等，散居碛北。突厥兴起后，臣服于突厥。隋炀帝大业年间，突厥处罗可汗掠夺铁勒各部，韦纥(袁纥改称)部乃与仆骨、同罗、拔野古诸部叛去，首领自称俟斤，铁勒诸部称为回纥。隋末、唐初，回纥居于薛延陀之北娑陵水(蒙古色楞格河)，有众10万。有"时健"俟斤，众始推为君长。其子名菩萨，与薛延陀共攻突厥北边。东突厥颉利可汗遣其子欲谷设率10万骑讨伐。菩萨率骑兵5000，破之于马鬣山，北追至天山，大俘其部人，声震北方，建牙帐于独洛水(土拉河)上。回纥打败东突厥，对唐太宗灭东突厥起了积极作用。东突厥灭亡后，北方草原以薛延陀、回纥最为强大。

早在贞观三年(629)，回纥"始来朝，献方物"，开始建立友好关系。贞观二十年(646)回纥首领吐迷度战败薛延陀，与唐朝联合灭掉薛延陀。于是，回纥越过贺兰山，进入黄河流域，并遣使归附。唐太宗特至灵武(宁夏永宁与灵武间)接见。此时回纥有十一部落，其首领对唐太宗说：薛延陀不事大国，自取灭亡。其众散亡，不知去向。吾等今各有分地，愿归命天子，请封唐官。唐太宗封其大小首领凡数千人。翌年，其十一部落首领入朝，乃以回纥部为瀚海，多览葛部为燕然，仆骨部为金微，拔野古部为幽陵，同罗部为龟林，思结部为卢山都督府，共六都督府。以浑、斛薛等七部置皋兰、高阙等七州。皆以其酋领为都督、刺史、长史、司马。置燕然都护府，六府七州皆隶属。以唐官李素立为燕然都护。回纥酋领共请于回纥、突厥各部修大道，号"参天至尊(臣下对皇帝的尊称曰'至尊')道"，世为唐臣。唐太宗下诏于碛南鹈鹕泉之阳，置过邮68所。过邮所备驿马、膳食。每年回纥以貂皮为贡赋。高宗永徽年间，回纥先后出兵助唐收复北庭、讨高丽。唐玄宗开元年间，回纥杀凉州都督王君㚟，断安西诸国入长安路，玄宗命郭知运等讨逐，迫使其退保乌德健山。天宝初年，其酋长叶护(官名)颉利吐发入朝，受封为奉义王。不久，自称骨咄禄毗伽阙可汗，遣使入朝，玄宗册封为怀仁可汗。

安史乱后，唐肃宗于灵武即位，遣敦煌王李承寀出使回纥，求援军。至德二载(757)九月，怀仁可汗遣其太子叶护领其将帝德等兵马4000余众，助讨安庆绪，配合朔方军收复长安。十月，副元帅郭子仪领回纥兵马与叛军战于陕州之西，收复东京洛阳。回纥军在东京大掠三日。肃宗命每年送回纥绢2万匹，至朔方军受领。肃宗将幼女封为宁国公主，嫁给毗伽阙可汗。这是唐朝以"天子真女"和亲之始。乾元元年(758)九月，回纥王子骨啜特勒率兵从郭子仪九节度使围邺，不利，翌年三月，回纥王子及帝德等15人自相州奔于长安。四月，回纥毗伽阙可汗死，其少子继立，为登里可汗。宝应元年(762)十月，代宗以雍王适为天下兵马元帅，以朔方节度使仆固怀恩为副元帅，会诸道节度使及回纥于陕州，进讨史朝义。二十三日，唐军三路进攻洛阳。仆固怀恩与回纥"左杀"(回纥官名)为前锋，收复洛阳。史朝义北逃，仆固怀恩子仆固玚与回纥兵追蹑2000余里，至平州石城县，割史朝义头而回。回纥至东京大掠坊市及汝、郑等州。仆固怀恩得知河东节度使辛云京进谗言致使代宗怀疑自己，于广德二年(764)秋，引回纥、吐蕃之众至奉天县，被朔方节度使郭子仪击退。永泰元年(765)秋，

仆固怀恩又诱回纥、吐蕃之众20余万，进犯奉天、礼泉，郭子仪率朔方军屯泾阳。此时，仆固怀恩病死。回纥与吐蕃争地位高下，矛盾很大，以至两支军队的兵营都分开。郭子仪得到消息，仅带数骑至回纥营，见其大帅合胡禄都督药罗葛，对他说：回纥有大功，朝廷对你也不薄，为何负约，深入唐境，骚扰京畿诸县，结果搞得前功尽弃，结下怨仇，还帮助叛臣，多么愚蠢！药罗葛说：怀恩对可汗谎说唐国天子今已向江淮，而(郭)令公亦不主兵，我才敢来。今知天可汗仍在上都；令公为将；怀恩，天又杀之。今请追杀吐蕃，收其羊马，以报国恩。郭子仪先执酒杯，发誓：大唐天子万万岁，回纥可汗亦万岁！两国将相亦万岁！若起负心违背盟约者，身死阵前，家口屠戮！合胡禄都督亦举杯曰：如令公盟约！五日后，朔方先锋兵马使白元光与回纥兵马合于泾州灵台县西50里赤山岭，共破吐蕃等10余万众，斩首50000余级，生擒10000余人，驼马牛羊凡百里相继，不可胜纪。

自肃宗幼女宁国公主下嫁毗伽阙可汗后，德宗以女咸安公主下嫁合骨咄禄可汗；穆宗封第十妹太和公主下嫁登逻骨没密施合毗伽可汗。自肃宗乾元年间之后，回纥屡遣使以回纥马和市唐缯帛，每年来市，以马一匹易绢40匹，动至数万匹马。见于记载较多者为贞元六年(790)，德宗赐马价绢30万匹；文宗大和元年(827)，以绢20万匹赐回纥充马价。大和三年，以绢2万匹赐回纥充马价。宣宗大中年，回纥衰落，依附于室韦。以后，黠戛斯从室韦部取回纥，收归碛北。其后，回纥居甘州，“无复昔时之盛”。

(翁俊雄)

河朔三镇的割据

安史之乱平定之后，唐朝任命安史降将为河朔三镇(幽州·卢龙、成德、魏博)节度使。三镇节度使父死子继，不服从皇帝命令，自己任命属官，赋税不上缴朝廷，形成割据状态。

河朔(唐朝的“河北道”，大体相当今天的河北省)地区，自秦汉以来，就是全国农业生产最发达的地区之一。唐玄宗天宝年间，河北道所有24州，148万户，1023万人。占全国人口的四分之一以上。河北道储存的“义仓”粮在全国15道中列居首位。河北道又是盛产绢帛等丝织品的地区，与河南道并列为全国之冠。安禄山在范阳起兵叛乱，就是以河北地区为基地。

唐肃宗宝应元年(762)十月，雍王李适为天下兵马元帅、朔方节度使仆固怀恩为副元帅，收复东京，史朝义从洛阳逃向北方。仆固怀恩使其子仆固玚追击史朝义至莫州。史朝义部将田承嗣(704—778，平州卢龙(今属河北)人)让史朝义亲往范阳(幽州)发兵救莫州。史朝义去后，田承嗣以莫州降唐。此时在相州的史朝义部将薛嵩，以相、卫、洺、邢四州降唐。在定州的张忠志，以赵、恒、深、定、易五州降唐。唐副元帅仆固怀恩此时已萌发叛唐之心，欲以安史降将为援，因而令薛嵩、张忠志继续管辖各州，而唐肃宗也苦于长年战乱，希望早日安定，因而承认了既成事实。遂于宝应元年至广德元年(763)之间，先后任张忠志为成德节度使，统恒、赵、深、定、易五州，并赐姓李，名宝臣。任薛嵩为昭义节度使，统相、卫、邢、洺、贝、磁六州。任田承嗣为魏、博、德、沧、瀛五州都防御使(后改为节度使)。史朝义逃至范阳，其部将李怀仙事前已降唐，拒其入城，并派兵追击。史朝义走投无路，缢死树林中，李怀仙取其首献唐朝。肃宗任李怀仙为幽州、卢龙节度使，领幽州、卢龙(河北卢龙)。

此后，幽州卢龙镇内部发生了部将驱逐主将事和魏博吞并昭义镇事。大历三年(768)幽州兵马使朱希彩杀死节度使李怀仙，自称留后，唐代宗任其为节度使。大历七年朱希彩又被部下杀死，拥立朱泚(742—784，平州卢龙(今属河北)人)，朱泚权知留后，唐肃宗复任之为幽州·卢龙节度使。大历十年朱泚请留在长安，以弟朱滔为节度使。大历八年，昭义节度使薛嵩死，子幼，让其叔父薛崿知留后。大历九年魏博节度使田承嗣诱昭义镇将吏作乱，于翌年，吞并其相、卫、邢、贝四州。

大历十年魏博节度使田承嗣杀死成德节度使李宝臣之弟李宝正，两镇交恶。李宝臣与淄青节度使李正己上表唐代宗，请下诏讨伐田承嗣。代宗也想借部分藩镇之力削弱部分藩镇，因而下令各道发兵共攻魏博镇。卢龙·幽州节度使朱滔(746—785，幽州昌平(今属北京市)人)与成德节度使李宝臣，攻魏博镇北部沧、冀、瀛等州，在冀州打败田承嗣。平卢·淄青节度使李正己与淮西节度使李忠臣攻魏博镇之南部德、卫等州。田承嗣无法对付四面夹击的形势，八月，一面遣使奉表，俯首待罪，请束身归朝；另一面设谋分化诸道联军。田承嗣将所统各州的户口、甲兵以及谷、帛之数的簿册呈献李正己，表示归附于他。李正己中计，遂按兵不动，而南线各军也不敢进攻。田承嗣既无南顾之忧，遂专意北方。田承嗣与成德节度使李宝臣皆范阳人，并知其久有吞幽州之心，因此，设计离间李宝臣与幽州节度使朱滔的关系。田承嗣使人刻石一方，文曰：“二帝同功势万全，将田为侣入幽

燕。"埋藏于李宝臣境内，并使人掘而得之。又派说客对李宝臣说：如公得沧州，土地归国有，非公所有。公能舍田承嗣之罪，田承嗣将其沧州归国；并愿从公取范阳。李宝臣大喜，且与石刻符谶相合。于是李宝臣率骑60000，乘夜袭朱滔军于瓦桥，朱滔不备，狼狈逃走。而李宝臣待田承嗣军一起进攻范阳，此时，田承嗣使人对李宝臣说：河内有警，不暇从公。石上谶文，吾戏为之耳。李宝臣既愤且愧，无可奈何！

在以计瓦解各道联军之后，十二月，田承嗣请入朝。淄青节度使李正己也屡为之上表，乞许其自新。大历十一年二月，代宗下诏赦免田承嗣罪，恢复其官爵，其所部一切不予追究。

大历十一年八月，汴宋节度留后李灵曜作乱，至十月即平定。汴宋节度使统汴、宋、曹、濮、兖、郓、徐、泗八州。由于各道受诏共同出兵攻伐，在作战中所得之地，各为己有。加上此前各节度使所统之州多所变动，因此，至大历十二年河北三镇所统之州与前有所不同：魏博节度使田承嗣据魏、博、相、卫、洺、贝、澶七州；成德节度使李宝臣据恒、易、赵、定、深、冀、沧七州；幽州·卢龙节度使朱滔据幽、蓟、营、涿、平、檀、瀛、莫、妫九州。

河朔三镇节度使的职位，父、兄死子、弟继立，或由部下废立，朝廷不得已被迫加以承认而已。节度使所统各州，也因各自的实力互相兼并，朝廷也只好加以承认。节度使之间互相"以力相并"，同时又"连结姻娅，互为表里"。在他们与朝廷发生利害冲突时，就联合起来"连衡以叛上"。在节镇内部，"郡邑官吏，皆自署置"；"户版不籍于天府，税赋不入于朝廷"。

在河朔三镇中，以魏博最为强大。田承嗣"修缮兵甲，计户口之众寡，而老弱事耕稼，丁壮从征役，故数年之间，其众(兵)10万。仍选其魁伟强力者万人以自卫，谓之衙兵(亲兵)。"成德镇"军用殷积，招集亡命之徒，缮阅兵仗"，有兵5万。幽州·卢龙镇，"治兵缮邑，部下各数万精兵"。朱滔拥兵5万、战马2万匹。河朔三镇共拥兵20余万，占全国兵力三分之一左右。河朔三镇依靠雄厚的财力和兵力，长期割据。虽然名曰"藩臣"(护卫中央之臣)，实为独立王国。不过，由于他们的力量毕竟有限，并不能完全独立：节度使的更替，毕竟要由朝廷任命；境内开河渠、州县变动以及税制改革都要申报和贯彻。此外，各个节度使之间，以及不同的时期他们与中央的关系也不完全相同。唐后期在很多地区都设节度使，他们与中央的关系区别更大。　(翁俊雄)

两税法的实行

安史之乱爆发后，民户大量逃亡，土地兼并加剧，导致均田制彻底瓦解，租庸调制也难以维持。建中元年(780)，唐德宗采纳了杨炎的建议，实行两税法。两税法的"户无土客，以见居为簿；人无丁中，以贫富为差"的税收原则，不仅适应了安史之乱后的社会变化，也适应了唐代以后的情况，因而被唐以后各朝所沿用。明代的一条鞭法、清代的摊丁入亩，都是唐代两税法的继续和发展。

唐玄宗天宝十四载(755)全国有编民890余万户，为唐朝国家掌握的编民数字最高纪录。当年十一月，安史之乱爆发，各地出现了大规模民户逃亡现象："乡居地著者，百不四五(十)。如是者，怠三十年。"在二三十年中，有半数以上民户流徙，这是中国历史上仅见的。

战乱集中在以长安为中心的京畿地区、以洛阳为中心的都畿地区、河南道的绝大部分地区，以及淮南道一带。因此，这些地区的百姓流失最为严重。京畿地区的士人、百姓多逃往山南、剑南道，与蜀人杂居。河南道的士人、百姓大量逃往襄、汉。元结就自汝州率领邻里千余家南投襄、汉。有更多的关中、河南的士人、百姓逃至江南，如苏州的居民中有三分之一是南逃的北方人。安史之乱平息的后一段时期中，百姓仍继续逃亡。唐代宗大历四年(769)李翰指出：战乱至今已有14年，"编版之户，三耗其二"。这类现象势必导致土地所有权的急剧转换。张谓在《代北州老翁答》一诗中写道："尽将田宅借邻伍，且复伶俜去乡土"，描绘了安史之乱中均田农民抛弃田宅逃亡的情景。这种情况很普遍，以致唐代宗宝应元年(762)在赦文中对"百姓竞田"纠纷做了关于产权方面的规定。与此同时，官员与殷富之家则乘机大肆兼并土地，社会上大土地所有者空前增多。流亡百姓"大抵只与兼并豪家力田耳"。大量民户出逃，意味着唐代均田制的彻底瓦解。

安史之乱平息后，百姓逃亡在继续，而各地的地方官着力于招诱流民、辟荒田、导水渠等恢复经济的工作。这一时期不少州县出现"流庸毕复"、"户口增加"的情况。逃户在各州、县或暂时落脚，或停居下来。他们在这些州县，被看作是"浮户"、"客户"。宝应二年九月，唐代宗下令：客户若住一年以上，无论其耕地是自己购买，或是贴赁来、无论其住房是自己建造的，或是租借来的，一律编为百姓。不过，在缴赋税、出徭役上，比当地原有居民(土户)减少一半。既

然他们的赋役负担比土户减少一半，也就是仍然承认他们的客户身分。而对于居住一年以下或是充当地主雇农的浮户，即“与兼并豪家力田”者，并没有作任何规定。正因如此，安史之乱平息后，一方面各地出现“流庸毕复”，另一方面，国家正式编户不仅没有增多，反而进一步减少。乾元三年(760)全国编户只有190余万户，大历年间(767—779)更下降为120万户。民户逃亡的结果使大量土户变为客户、浮户。大历五年任舒州刺史的独孤及到任后指出：该州百姓并浮寄户共有33000，应差科者3500。其余29500户，蚕而衣，耕而食，不持一钱以助王赋。正因浮寄户、客户大量增多，致使“正赋所入无几”。充分说明，唐朝初年以来，以“丁身”为税收对象的租庸调制已经过时，必须实行税制改革。

广德二年(764)三月，唐代宗命刘晏为河南、江淮以来转运使，议开汴河。数日后，又命刘晏对税制进行改革。这是一个极为复杂而艰巨的任务，不能一蹴而就。战乱期间，一方面“正赋所入无几”；另一方面军费开支过大。因而临时征派甚多，“科敛之名，凡数百”。广德二年七月，由于官员俸禄无着，遂征发天下青苗钱以给百官俸禄，从此，青苗钱作为地税的附加税而制度化。永泰元年(765)五月，京兆尹第五琦，由于“畿内麦稔”，就奏请“税百姓田，十亩收其一”。翌年，即大历元年十月就停止征收什一之税。这说明战乱期间租庸调已经无法实行，在税收上出现了混乱局面。“什一之税”废止后，朝廷如何收税?看来，从大历元年十一月起，就改征夏、秋两税。大历元年十一月诏：“京兆府奏今年秋税……”大历三年六月诏：“京兆府于今年所率夏麦，……”就透露了这一情况。所谓夏麦、秋税，是指于夏收小麦、秋收谷(粟)时，分别征收的田亩之税。然而夏、秋两次征收的田亩之税的征收数额屡经变动，至大历五年三月最后固定下来：夏税上田，亩税六升；下田，亩税四升。秋税上田，亩税五升；下田，亩税三升。荒田开佃者，亩税二升。

在地税之外，还有户税。大历四年正月规定：天下百姓及王公百官每年税钱分为九等。一等户(及一品官)每年缴4000文。每降一等(官亦如是)，减少500文。但至八等户(及八品官)每年缴700文。九等户(及九品官)每年缴500文。户税，亦分夏、秋两次缴纳。

大历年间的税制改革，首先将过去租庸调时每年一次纳税改为两季纳税，反映了这时期农业的二茬种植(即秋季播种越冬小麦；春种秋收的谷(粟))已普遍化。而过去主要是春种秋收的谷(粟)种植，因而相应地规定了每年每丁缴粟二石。其次，这次税制改革，废除了租庸调时期官员免税的特权，所有官员都不免税。这一规定适应了唐中叶以来，特别是安史乱后土地兼并加剧的形势。再次，这次税制改革，按耕地质量收税，比较合理，也反映了这一时期出现了大量高产田。最后，地税按亩征收，户税按资产(资产多者户等高，缴税多，反之也是一样)征收，比较合理，也适应了唐中叶以来，特别是安史乱后贫富分化剧烈的形势。大历年间的税制改革，看来就是刘晏与诸道节度使“均节赋役”的结果。

大历税制改革收到成效。从广德二年赋入不过400万缗(或贯，均为1000文)(其中包括盐利40万缗)，至大历末年增至1200万缗(其中包括盐利600万缗)。单从两税来看，则从300余万缗增至600万缗。不过，由于对各州县大量存在的客户、浮户没有切实的解决办法，因而，朝廷的财政收入并没有很大的改善。

大历十四年五月，唐代宗死，德宗即位。不久，以杨炎(727—781，凤翔天兴(今陕西凤翔)人)为宰相，罢免刘晏的转运、租庸、青苗、盐铁等使。建中元年，唐德宗始用杨炎建议实行两税法。两税法的主要内容：(1)“户无土客，以见居为簿。”这是针对各州县大量存在的客户而制定的税收原则。即只要现在居住在某地，不论是原有的土户，还是外来的客户，一律以现在居处进行户口登记，一律编为民户，加以征税。(2)“人无丁中，以贫富为差。”这是两税法征税的主要原则。即废除租庸调时着重税“丁身”的人头税，改为以耕地、资产为主要征收对象的资产税。这是将大历年间税制改革的原则加以明确化。(3)在所州县向“行商”征税三十分之一。坐商历来按百姓例收税。这是为行商制定的税收。这反映了这一时期，有大量民户弃地逃亡，成为小商、小贩。这一规定，是这一时期商品交流发展的反映。(4)“居人之税，秋、夏两征之。”大历年间税制改革中首创秋、夏两征。两税法加以确认，并具体规定：征夏税无过六月，秋税无过十一月。(5)各州县据每岁所应费用及上供之数而确定税额，这便是“量出以制入”。当时“量出以制入”难以做到，在实行过程中只是每州各取大历年间征收钱谷最多一年的数额为两税定额。而田亩数以大历十四年垦田数为准。

当年二月，命黜陟使11人分巡天下至各道与各道观察使、各州刺史，制定各州两税定额，以及各州县应留与上供数额。两税法实行当年就收到巨大成效。杜祐指出：“建中初，命黜陟使往诸道按比户口，

都得土户百八十余万，客户百三十余万”，合计310余万户。《唐会要·户口数》：“建中元年十二月，定天下两税户凡三百八十万五千七十六。”两个记载虽有出入，但可以肯定，两税法实行当年就将数以百万计的客户列为两税户。而财政收入也大为增加。每岁天下共敛3000余万贯（其2050余万贯以供外费；950余万贯，供京师。）税米、麦共千六百余万石（其二百余万石供京师；千四百万石给充外费）。不过，如果以天宝年间有编民890余万户来看，建中元年的两税户仍然相差悬殊。这除了因地方官不如实申报之外，更主要的是大量没有耕地、为兼并之家“力田”的浮户不包括在内的缘故。 （翁俊雄）

五镇连兵

唐德宗初年，为抗拒中央裁抑藩镇的行动，成德、魏博、淄青、山南东道及淮西等割据性较强的五节度使相继连兵叛乱，史称“五镇连兵”。

安史之乱平定后，形成藩镇林立的局面，割据性较强的有安史余孽任节度使的河朔三镇，魏博田承嗣（辖魏、博等六州，今河北南部和河南北部的一小部）、成德李宝臣（辖恒、冀等州，今河北中部）、卢龙李怀仙（辖幽、蓟等州，今河北东北部），此外还有淄青李正己（辖淄、青等州，今山东）、淮西李希烈（辖蔡、申等州，今鄂豫皖交界处）、山南东道梁崇义（辖襄、邓等州，今湖北西北部）、相卫薛嵩（辖相、卫等州。今河北西南部，及山西、河南各一部，死后辖地被其他强藩兼并）。他们各拥强兵，官吏自署，租赋自擅，节帅自立，辅牙相倚，“喜则连衡而叛上，怒则以力而相并”。代宗由于外患（西御吐蕃）内忧（京畿叛乱及宦官之祸）对割据藩镇无可奈何。

德宗即位（780）后，实施两税法增加了财政收入，边疆形势亦得到缓和。鉴于代宗一朝姑息养奸，形成藩镇势力恶性膨胀尾大不掉而中央集权式微的教训，力图重振朝纲，裁抑藩镇。裁抑之初较有成效，如收夺郭子仪兵权，征据蜀十余年的西川节度使崔宁入朝，镇压了据泾州（甘肃泾川北）而叛的刘文喜之乱，坚定了德宗抑藩的决心。几个强藩因此而惶惶不安。但德宗自视过高，急于求成，低估了割据藩镇的实力与抗命的程度。

建中二年（781）正月，李宝臣死，其子李惟岳匿不发丧，自为留后，并使将佐共为己奏求旌节。李宝臣在世时，与李正己、田承嗣、梁崇义相互约定以土地传之子孙。田承嗣死后，李宝臣曾竭力为其子田悦奏请，田悦得以继袭。因此，此次田悦亦屡屡为惟岳奏请。但德宗认为，逆藩皆借唐室土地与爵命为聚众作乱的资本，李惟岳作乱只在迟早，任命与不任命结果都一样，于是坚持不允。田悦对朝廷本是阳奉阴违，李正己亦是反复无常，二人遂与李惟岳勾通，密谋联兵拒命。正当他们内不自安，蠢蠢欲动时，有传闻德宗欲东封泰山，而此时滑亳节度使李勉又在汴州（河南开封）修广城池，于是四镇如惊弓之鸟，连兵反唐（成德、魏博、淄青、山南东道），遥相呼应，“河南士民骚然惊骇”。德宗遂下令讨伐叛逆。

梁崇义挟众而得节钺，所据襄汉等七州之地，跨东南要冲，带甲2万，连结根固，未尝朝觐。建中元年，淮西节度使李希烈（？—786，燕州辽西（今北京顺义）人）就数请兴师讨之，梁遂加紧战备。德宗先是征梁崇义入朝，见他拒不受诏，于是征召四方之兵，由李希烈统一指挥讨伐梁崇义。宰相杨炎认为李希烈为人狠戾无亲，无功尚且倔强不法，如居平梁之功，更无法控制，但德宗仍坚持己见。

当时，内自关中，西暨蜀汉，南尽江淮、闽越、北至太原，各道方镇均奉召出兵讨叛。建中二年八月，梁崇义发兵攻江陵（湖北江陵），欲打通往黔中、岭南之路，摆脱被围困的不利局面。但屡屡被李希烈军打败。李希烈招降梁崇义部将瞿晖、杜少诚，遂进攻襄阳（湖北襄樊）。梁崇义闭城拒守，但守城将士却打开城门争相出城。梁崇义一看大势已去，与其妻一起投井自杀。李希烈早就觊觎梁崇义地盘，讨平梁崇义后，旋据襄阳为己有，对德宗新派来赴任的山南东道节度使李承百般威胁，但终不能遂愿，于是索性将襄阳一带掠夺殆尽，并留牙将于襄州看守所掠财物，才引兵而去，实际上加入反唐行列。

河北战场，田悦、李惟岳、李纳（李正己死，其子纳擅领军务，奏请袭职，德宗不允，遂反）与唐军交锋屡战屡败。建中三年初，李惟岳被部将王武俊（735—801，契丹族人）杀死，王武俊降唐。李纳被河南诸军围于濮州（山东鄄城北），势已日穷。田悦困守魏州（河北大名东北）。天下皆谓叛逆不日可平。但由于讨叛主帅之间的矛盾，以及降将王武俊等认为勋赏不公，再加上早有异志的幽州（北京）留后朱滔心怀怨望，不仅兵祸未解，反倒酿成更大的战乱，遂发展为“二帝四王”之乱。

建中三年十一月，朱滔自称冀王，田悦称魏王，王武俊称赵王，李纳称齐王。田悦等共推朱滔为盟主。十二月，李希烈自称天下都元帅、太尉、建兴王。建中四年正月，朱滔、王武俊、田悦、李纳又各遣使至淮西，上表称臣，共劝李希烈为帝。

建中四年在“泾师之变”中，唐德宗出逃。叛乱的士卒在长安拥立朱泚，朱泚自称大秦皇帝。兴元元年正月，德宗为集中力量打击朱泚以及其弟朱滔，下诏赦免王武俊、李纳、田悦、李希烈罪，王武俊、李纳、田悦皆去王号，依旧为节度使。而李希烈凭借强兵财富，不仅不去王号，进而于兴元元年(784)正月即皇帝位，国号大楚。当年六月，河北行营节度使李晟收复长安，朱泚从长安逃至泾州，被部将杀死。贞元二年(786)李希烈死，吴少诚为留后。而淮西之乱则在唐宪宗元和年间才被平息。 (宁 欣)

泾师之变

建中四年(783)十月，唐德宗发泾原等诸道兵救襄城(许州)，以击退淮宁节度使李希烈来犯之兵。泾原节度使(统领泾、原、渭、武四州)姚令言率兵5000赴援，路过长安。士卒哗变，德宗出逃奉天(长安西北)，士卒拥立闲居长安的朱泚(范阳节度使朱滔之兄)，朱泚在长安自称大秦皇帝。德宗兴元元年(784)六月，唐军收复长安，朱泚被杀，兵变平息。

“四镇之乱”起，唐德宗命淮宁节度使(即淮西节度使，治蔡州)李希烈兼领淄青节度使，征讨李纳。此时朱滔、王武俊、田悦、李纳皆称王，李希烈密使人与四王联结。建中四年正月，李希烈遣兵攻下汝州，三月进攻许州，至襄城(许州西部)。唐德宗任左龙武大将军哥舒曜讨李希烈，二月，收复汝州。三月，与李希烈所部对峙于襄城，李希烈引兵还蔡州。八月，李希烈又率兵3万围哥舒曜于襄城，襄城危机。十月，唐德宗发泾原诸道兵救襄城。泾原节度使(驻泾州)姚令言率兵5000赴襄城，途经长安。士卒冒雨而来，天气寒冷。士卒还带子弟一起来，希望得些赏赐，好让子弟带回家。然而至京师，一无所赐。初二，士卒从长安出发，东至浐水，德宗命京兆尹王翃犒劳士兵，只有粗粮淡菜，士卒大怒，踢翻饭菜，扬言：吾辈拼死阵前，竟食不得饱。听说琼林、大盈二库，金帛盈溢，不如大家一起取之。于是士卒张旗鼓噪还京城。此时姚令言正向德宗辞行，急忙赶来，在长乐阪相遇。姚令言对士卒说：东征立功，不愁富贵，为何要犯灭族之大罪！士卒不听，拥姚令言回京。唐德宗此时才命赐士卒绢帛，每人2匹，这更使士卒愤怒。士卒入城，喧声浩浩，不复可遏。百姓围观者以万计。德宗急命禁军抵御，竟无一人至者。这时，德宗慌忙与王贵妃、韦淑妃、太子、诸王、唐安公主自苑北门出，逃往奉天县。后宫诸王、公主不及从者，十之七八。叛乱士卒入宫，登含元殿，大呼：“天子已出，人宜自求富。”争相入府库，运金帛，小民亦入库盗物，通宵不息。姚令言对乱兵说：“今众无主，不能持久。朱(泚)太尉闲居私第，请奉之。”于是派遣数百骑兵，迎朱泚于晋昌里私宅。夜半，朱泚居含元殿。数日，朱泚入宣政殿，自称大秦皇帝，改元应天。命姚令言为侍中及以下官员。

接着，朱泚率叛军进逼奉天，军势甚盛。然而，此时唐朝的各路兵马开赴奉天，共同讨伐朱泚。奉命北伐、进围定州的河北行营节度使李晟，带万人自蒲津桥(蒲州境内)开来；神策兵马使尚可孤率兵3000自襄阳入武关来援，陈兵七盘。奉命讨伐魏博镇田悦的朔方节度使李怀光自蒲津渡河取泾阳(属京兆府)，进而在礼泉县打败朱泚，朱泚引兵躲回长安。德宗为集中打击朱泚以及其弟朱滔，于兴元元年(784)正月下诏“罪己”：小子(德宗自称)无德，不能继承祖先之业绩。自小长于深宫之中，不懂管理国家之务，不知稼穑之艰难，不恤征戍之劳苦，这些年士兵连年不解甲胄；百姓转死沟壑，离去乡里；城乡一片丘墟，人烟断绝。上累于祖宗，下负于百姓。罪实在予，永言愧悼，若坠泉谷。自今中外所上书奏，不得再言“圣神文武”之号(建中元年，群臣为德宗上尊号圣神文武皇帝)。李希烈、田悦、王武俊、李纳等产生疑惧，全是由于“上失其道而下罹其灾”！“朕实不君，人则何罪！”王武俊、田悦、李纳见赦令，皆去王号，依旧为节度使，上表谢罪。而李希烈自恃兵强财富，不仅不去王号，反而在汴州即皇帝位，国号大楚，改元武成；设置百官。兴元元年(784)六月，河北行营节度使李晟收复长安，朱泚从长安逃至泾州之驿马关，被部将杀死。泾师之变才告平息。而李希烈之乱在唐宪宗元和年间才被平息。 (翁俊雄)

李怀光之叛

唐德宗兴元元年(784)二月，朔方节度使李怀光叛，进占河中府。贞元元年(785)八月，被平息。

建中四年(783)十月，发生“泾师之变”，朱泚在长安称帝，唐德宗逃至奉天(陕西乾县)。此时正奉命北伐魏博镇的朔方节度使李怀光(728—785，靺鞨族人)又奉命从魏州撤军以讨朱泚。李怀光率朔方军经蒲津桥渡河屯军泾阳(长安城以北)。当时朱泚正从长安出兵向奉天进发，行至礼泉(陕西礼泉)，被率军赶来的李怀光军打败。当时人认为，如果李怀光迟至三日，奉天就会失守。李怀光有保社稷之功。朱泚军败，被迫返回长安。

此前数月，户部侍郎赵赞奏请行“税间架”(房产税)、“除陌钱”(交易税)，引起百姓和商人的不满。在

“泾师之变”时，哗变士兵进入长安就大呼：你们不要害怕，从此不再征收间架、除陌钱矣。李怀光性梗直，对人说：天下之乱，皆宰相卢杞、户部侍郎赵赞等人造成的。我见陛下，当请诛之。他对时政的抨击被卢杞、赵赞得知。他们担心李怀光见德宗对他们不利。因此对德宗说：现在最好不要接见李怀光。如果李怀光能乘胜进攻长安，就会使朱泚措手不及。如果李怀光入朝，必当赐宴，留连累日，使朱泚从容戒备，就难以速胜。德宗不察，诏李怀光引军屯长安附近的便桥，与从河北撤回的、河北行营节度使李晟等所率官军共取长安。李怀光自以数千里竭诚赴难，打败朱泚，解奉天之围，而咫尺不得见天子，非常愤恨，说：吾今已为奸臣所排，事可知矣。于是引兵去，在距长安仅 40 里的咸阳(陕西咸阳)屯军。在咸阳，李怀光数上表指斥卢杞、赵赞等罪恶。十二月，德宗不得已贬卢杞、赵赞等官。李晟此时率军屯渭水之北。唐德宗兴元元年二月，李怀光奏请调李晟军至咸阳，以与其军会合。此外，鄜坊节度使李建徽、神策军使杨惠元也率军来咸阳联营。李怀光对朝廷有戒心，进而猜疑，密与朱泚通谋，阴谋为乱，因而屯军咸阳两个多月，不肯进攻朱泚盘踞的长安。李晟发现李怀光与朱泚勾结，表请将自己所率之军从咸阳撤至东渭桥。德宗批准，遂移军。李怀光宣言：吾与朱泚联合，车驾(指唐德宗)当行引避。唐德宗匆忙率部分官员和扈从离奉天逃往梁州(陕西汉中)。三月，李怀光吞并了李建徽、杨惠元二军，李建徽逃走，杨惠元被杀害。李怀光从咸阳移军好畤(陕西麟游南)。在好畤停留二旬，掠夺泾阳、三原、富平三县，然后经同州至河中府(山西永济)。五月，京畿、渭北、鄜、坊、商、华副元帅李晟收复长安，朱泚逃出长安，在彭原县被部将杀死。七月，德宗返回长安。朱泚既死，李怀光遣其子至梁州谢罪，请束身归朝。十八日，德宗派给事中孔巢父至河中，李怀光素服待罪。李怀光左右皆胡人，不熟悉礼仪，误以为穿素服即所有官职皆被罢免，皆叹曰：太尉(兴元元年二月德宗加李怀光太尉官)无官矣。孔巢父说：军中谁可代太尉领军者？引起李怀光部众愤怒，众当即杀死孔巢父。李怀光不予制止。朝廷派遣朔方行营元帅浑瑊、晋慈隰节度使马燧讨李怀光。贞元元年八月，马燧、浑瑊进军河中。初二，马燧率军至河西县，河中军士惊恐，自相惊扰。军士将书写“太平”二字的旗帜挂起，李怀光见大势已去，遂自缢而死。朔方将牛名俊断李怀光首出降。时在河中的朔方军有 16,000 人。马燧入河中，斩李怀光部将 7 人，其余皆不问。这是因为朔方军在平定安史之乱时功勋卓著。唐德宗说：朔方军，累代忠义，今为李怀光所制耳，将士何罪！马燧平河中，首尾仅用 27 日。初五，唐德宗下诏：李怀光曾有功，赦免其一子，使续其后，赐之田宅；归其首及其尸，加以安葬。对李怀光死后的宽大处置，除因其有保卫社稷之功以外，还与整个事情的起因只不过是与他抨击了时政有关。

（翁俊雄）

“二王、八司马”事件

贞元二十一年(805)正月，唐顺宗即位后，提升韦执谊等任宰相及以下官员，朝廷大权由王伾、王叔文掌握，为唐德宗旧臣所不容，他们迫使顺宗退位，王伾、王叔文被贬斥，死于贬所；韦执谊等八人被贬于远州，任州司马。即“二王八司马”事件。

贞元二十一年正月，唐德宗死，顺宗即位。王叔文(753—806，越州山阴(今浙江绍兴)人)，善棋，以棋艺为待诏；王伾，杭州人，为翰林待诏。顺宗为太子时，德宗命二人在东宫值班，为太子侍读，从而受太子宠信。侍读是不准与太子谈论外事的。然而，王叔文经常在太子面前提出某可为相，某可为将，幸异日用之。王叔文推荐的都是当代知名之士，而且又都是希望迅速升迁的中下级官员。他们是：韦执谊、韩泰、韩晔、柳宗元、刘禹锡、陈谏、凌准、程异等。

顺宗即位，提拔吏部郎中韦执谊为尚书左丞、同平章事(宰相)。提拔原任殿中丞、翰林待诏的王伾为左散骑常侍、翰林待诏如故；王叔文、凌准为翰林学士；原任监察御史的柳宗元为礼部员外郎；原任监察御史的刘禹锡为屯田员外郎、判度支、盐铁案。唐顺宗于贞元二十年九月得风疾，不能言。即位后，于宫中垂帘帷，只有昭容(女官)牛氏和宦官李忠言在左右。百官奏事，自帷中可其奏。这样，在宫廷中形成了一个信息传递系统：从昭容牛氏至李忠言，从李忠言至王伾，从王伾至王叔文。事至翰林院，由王叔文定可否，再宣于中书省(宰相的办事机构)，韦执谊(宰相)承而行之。韩泰、柳宗元、刘禹锡、陈谏、凌准、韩晔主听外事，“谋议唱和”。朝政被王伾、王叔文把持。

顺宗为太子时，王叔文曾向太子议论长安城内的“宫市”(即宫中宦官常以宫中所需为由，低价强买甚至掠夺民间物品)和地方官“进奉”(即地方官员在赋税之外另行上贡钱物)之弊。顺宗即位后，明令取消“宫市”和“进奉”。这些扰民弊端的罢除，王叔文起过积极的作用。然而，王伾、王叔文把持了大权，目空一切，办事惟其所欲，不按规则行事。他们滥用职权，扬言某可为某官。不过一、二日，某人即被任官。他们

以纳贿为事，家门昼夜车马如市。有人为了等待王伾、王叔文接见，甚至在前一日就住在附近坊中的饼肆、酒店之中。如是行止，为德宗时的内外旧臣所不能容忍。御史中丞武元衡极为不满，故意对他们"莽卤"。侍御史窦群，奏刘禹锡挟邪乱政，不宜在朝。贾耽对他们很反感，称疾不出。种种情况，使王叔文"自知为内外所憎疾"。双方矛盾，日益激化。

永贞元年(805)四月，宰相韦执谊自以专权，恐太子不悦，因而，以陆质为太子侍读，希望他利用与太子接近的机会，了解太子的态度。及陆质发言，太子怒曰：陛下令先生为寡人讲经义耳，何为预他事！五月，宦官俱文珍恶王叔文专权，让顺宗削去王叔文的翰林学士头衔，改任户部侍郎，这使王叔文失去"定可否"的权力。王叔文感到事情的严重。这两件事对王伾、王叔文集团极为不利。而在这一集团内部也出现矛盾。王叔文与韦执谊之间出现芥蒂。汀州宁化县尉羊士谔因公事至长安，曾与人议论王叔文之非，被王叔文得知。王叔文欲通过皇帝诏书的形式将其斩首。韦执谊不同意；又想杖杀之，执谊又以为不可。因此，王叔文对韦执谊极为不满。在内外交困、岌岌可危的形势下，为巩固自己的地位，王叔文派韩泰和朝廷大将范希朝至奉天县，接管在那里驻扎的、原由宦官掌握的神策军军权。掌权的宦官发觉，嘱神策军诸将："无以兵属人。"范希朝至奉天县，神策军将领竟无一人至者。王叔文得知后，连呼："奈何！奈何！"六月，在走投无路的情况下，王叔文以母病为由辞位。临行盛俱酒馔，邀诸学士及宦官李忠言、俱文珍等饮于翰林院。王叔文说："比竭心力，不避危难，……一旦去归，百谤交至，谁肯见察以一言相助乎？"自王叔文去位，王伾势孤，见事不济，声言"中风"，归家养病。这期间剑南西川节度使韦皋，因王叔文拒绝其兼领东川、山南西道节度使的要求，乘机上表顺宗，指斥王叔文、王伾"隳纪紊纲"；请求顺宗专事养病，令皇太子"亲临庶政"。而宦官俱文珍等也屡请令太子监国。八月，唐顺宗令太子李纯即皇帝位。顺宗为太上皇。改年号为永贞。太子李纯即皇帝位，是为唐宪宗(改年号为元和)。数日后，贬王伾开州司马；贬王叔文渝州司户(不久，王伾病死贬所。翌年，赐王叔文死)。十一月，贬韦执谊为崖州司马，韩泰为虔州司马，韩晔为饶州司马，柳宗元为永州司马，刘禹锡为朗州司马，陈谏为台州司马，凌准为连州司马，程异为郴州司马。

(翁俊雄)

牛李党争

从唐宪宗元和三年(808)到唐宣宗大中初年，以牛僧孺、李宗闵为代表的官僚集团与李德裕为代表的官僚集团之间展开了尖锐的斗争，史称"牛李党争"。牛李党争是唐朝后期政治生活中的重大事件。唐文宗曾感叹地说："去河北贼(指河朔三镇)非难，去此朋党实难！"

牛李党争的源起是由于唐宪宗元和三年策试贤良方正科(这是对在职低级官员进行的考试。成绩优异，即被提升。)时，伊阙县县尉牛僧孺(779—847，安定鹑觚(今甘肃灵台)人)、陆浑县县尉皇甫湜、华州参军李宗闵(？—846)在时事对策的考试中指陈时政之失，无所避讳。主考官杨於陵、韦贯之、李益，复试官翰林学士裴垍、王涯对三人的对策极为赞赏，韦贯之将三人的成绩署为上第，奏报。唐宪宗亦欣赏，下诏优与处分。宰相李吉甫认为牛僧孺等的对策是攻击自己，因而向宪宗哭诉说：皇甫湜是王涯的外甥，考官对皇甫湜等的评价，都是王涯的意愿。宪宗不得已，免去裴垍、王涯的翰林学士职位；贬王涯、韦贯之、杨於陵至外州。考生牛僧孺等三人亦不予升迁。

13年后，即唐穆宗长庆元年(821)，右补阙杨汝士与礼部侍郎钱徽主持进士录取事。当时科举考试，考生往往请托权势出面疏通，谓之"关节"。"每岁策名，无不先定"。西川节度使段文昌因得了刑部侍郎杨凭的书画，受托将杨凭之子杨浑之推荐于钱徽。翰林学士李绅也将考生周汉宾托付于钱徽。及榜出，段、李二人所托之考生没有录取；在录取的14名进士中，却有主考官杨汝士之弟杨殷士和中书舍人李宗闵之婿苏巢。这引起段文昌的极大不满，遂对穆宗说：今岁礼部殊不公，所取进士皆公卿子弟，都无艺能，以关节得之。穆宗问翰林学士李德裕、元稹、李绅。这三名翰林学士都说：诚如文昌言。他们所以这么说，都另有缘故。李绅是因请托的考生落选；元稹与李宗闵"争进取有隙"；而李德裕乃李吉甫之子，深恨李宗闵过去在对策时讥讽其父。穆宗命中书舍人王起、主客郎中知制诰白居易复试，结果，仅以孔温业、赵存约、窦洵、裴谟四人进士及第，十人并落下。穆宗贬主考官钱徽为江州刺史、杨汝士为开江县令。贬李宗闵为剑州刺史。而钱徽手里有段文昌、李绅为请托写给钱徽的书信，有人劝他奏报穆宗，钱徽说：只要心中无愧，奈何奏人私书，岂君子所为邪！即将书信付之一炬。自此，德裕、宗闵各分朋党，更相倾

轧，将达40年。

牛、李二党的形成，与科举制度有关。考生录取为进士后，主考官与考生、考生之间就形成了“座主”（主考官）、“门生”（录取的进士对主考官的自称）、“同年”（考生之间的称谓）的社会关系。而两党的上层人物的“故吏”亦在其中。牛党的主要成员有：牛僧孺、李宗闵、李逢吉、杨虞卿、杨汝士、李仲言、杨嗣复、李固言、杜综、李珏等；李党的主要成员有：李德裕（787—850，赵郡（今河北赵县）人）、郑覃、李绅、陈夷行、元稹、薛元赏、薛元龟等。

牛、李党争在唐文宗大和年间最为尖锐。党争集中在地位和权力上。唐朝的皇帝有至高无上的权力，然而宰相是皇帝之下地位最高、权力最大的人，因此，两党竭力争夺宰相职位。唐文宗大和六年(832)，西川节度使李德裕奉调至朝廷，文宗准备用为宰相。当时任宰相的李宗闵百般阻挠，没有奏效。京兆尹杜综（牛党成员）向李宗闵献计，他说：李德裕做官不是经过科举考试，而是经“门荫”做官，他为此深为遗憾。如果让他当进士的主考官，他一定很愿意。李宗闵不同意。杜综说：“不则用为御史大夫。”李宗闵同意。因为这样李德裕就当不成宰相。后来事与愿违，李宗闵被调出任江南西道节度使，而由李德裕任宰相。这件事说明控制中枢权力是牛、李党争的一个主要内容。

唐朝后期翰林学士的地位日益重要。任翰林学士者，不仅接近皇帝的机会多，而且对朝廷的决策起着重要作用。因此，牛、李两党都力争己党成员进入翰林院，而力排异党进入。大和八年八月，文宗欲以李仲言为谏官，置之翰林。李仲言是牛党成员，过去因犯错误受过贬官的处罚，后离任。宰相李德裕对文宗说：李仲言过去所为，陛下必尽知之。岂宜置之近侍？文宗说：然，岂不容其改过？李德裕说：仲言之恶，著于心本，怎么能改？文宗又说：李逢吉荐之，朕不欲食言。由于李逢吉也是牛党成员，所以李德裕说：逢吉身为宰相，乃荐奸邪以误国，亦罪人也！文宗提出能否另任一官？李德裕回答：不可！由于李德裕过于意气用事，使文宗大为不快。九月，下诏将李德裕与山南西道节度使李宗闵对调，李宗闵回京任宰相。这说明皇帝的“近侍”翰林学士的职位也是两党争夺的焦点。

李德裕不愿外任，请求留在京师。文宗改任李德裕为兵部尚书。宰相李宗闵认为皇帝既下诏调李德裕外任，李德裕不应再提出请求。文宗只得下诏，以李德裕为镇海节度使。史称：“时德裕、宗闵各有朋党，互相（排）挤、（支）援，上患之。每叹曰：‘去河北贼易，去此朋党实难！’”

唐武宗在位(841—846)，将宰相李珏、宰相杨嗣复（二人皆属牛党）罢免，将时任淮南节度使的李德裕调回京师任宰相。不久，牛僧孺一贬再贬为循州（广东惠州）司马；李宗闵一贬再贬以至流放封州（广东梧州之东）。唐宣宗在位(847—859)，由于“素恶李德裕之专”，遂罢免李德裕宰相职位。同时贬工部尚书薛元赏、京兆尹薛元龟为远州刺史，因二人“皆德裕之党也”。任命“与李德裕不协”的崔铉为宰相。宰相白敏中，虽早年由李德裕推荐，在这种形势下，也见风使舵，“使其党李咸讼李德裕罪”。不久，将任过宰相的五个牛党成员从远州北迁。以循州司马牛僧孺为衡州（湖南衡阳）长史、封州流人李宗闵为郴州（湖南郴州）刺史。此外，崔珙、杨嗣复、李珏等远州刺史都分别北迁。不过，李宗闵于唐武宗会昌六年(846)八月受诏，未离封州即死。牛僧孺在大中初年卒。大中三年(849)李德裕死于崖州。

牛、李两党的政见有些不同。唐文宗大和七年(833)七月，当时李德裕执政，主张进士科考试内容应为儒家经典的“经义”和时务对策，反对考诗赋。唐文宗同意。不过，为时不长，至翌年十月李宗闵为宰相，李德裕外贬，“贡院奏：进士复试诗赋。”直到唐末，并未改变。这说明李党的这一主张已经过时。太和五年九月，吐蕃维州副使悉怛谋以维州降。时任西川节度使的李德裕主张受降。宰相牛僧孺担心开罪吐蕃赞普从而引起唐蕃不和，反对受降。唐文宗先同意牛僧孺意见决定不受降，后来又后悔。这件事牛僧孺判断失误，唐文宗也有责任。在对待河朔三镇问题上，牛李二党的主张无大区别。大和五年幽州军乱，副兵马使杨志诚驱逐其帅李载义作乱。文宗问宰相牛僧孺。牛僧孺说：范阳自安、史以来，非国所有。今日志诚得之，犹前日载义得之。因而抚之，使捍北狄，不必计其逆顺。唐武宗会昌三年(843)泽潞镇不听朝命，唐武宗以此事问宰相李德裕。李德裕主张对泽潞用兵，他说：“泽潞事体与河朔三镇不同。河朔习乱已久，人心难化，是故累朝以来，置之度外。”由于河朔三镇割据，由来已久，情况很难改变，因而牛、李二党都主张姑息。而在对泽潞用兵一事，牛党也不反对。由此可见，牛李党争与其说是政见之争，不如说是权力之争。

（翁俊雄）

唐宪宗平淮西

唐宪宗元和九年(814)冬到十二年十月对割据

已达数十年之久的强藩淮西合围进剿，终于削平淮西，为“元和中兴”局面的形成奠定了基础。

淮西自李希烈领使后，便成为割据性较强的藩镇之一。“五镇连兵”、“四王二帝之乱”淮西均列其中。淮西地处今河南省东南与安徽、湖北两省交界地区，治蔡州（河南汝南），领有申（河南信阳）、光（河南潢川）、蔡三州。西北出可逼东都洛阳，东北出汴州，扼汉水及运河交通线，截断长江中下游通往中原的主要孔道。“中天下而持南北之吭（咽喉）”，是十分重要的战略要地。

安史之乱后，李希烈及其继任者吴少诚、吴少阳，长期割据，袭扰四邻，对抗官军，并经常威胁和骚扰江淮漕运线，成为朝廷的心腹之患。

自代宗以来，朝廷便力图扭转藩镇跋扈连横的局面，德宗由于急于求成，反导致凶虐更肆，几乎倾覆王室。元和元年（806），28岁的宪宗即位，当时两税法颁行20余年，国家已积聚了较雄厚的物质力量，平定“二帝四王之乱”后，国内局势相对平静，中央所掌握的兵力已达到一定规模，加上杜黄裳（738—808，京兆万年（今西安）人）、李吉甫（758—814，赵郡（今河北赵县）人）、武元衡、裴度（765—839，河东闻喜（今属山西）人）等著名政治家相继出任宰相，都力主抑藩。因此，促使宪宗下决心采取以武力削藩的强硬方针。

元和之初，削藩初行，便很快平息了西川刘辟、夏绥杨惠琳和浙西李琦等几起叛乱。随即又对河北成德王承宗用兵，虽然师出无功，却在一定程度上表明了朝廷的决心，促成了割据势力的分化。元和五年，张茂昭以易、定二州归顺中央；元和七年，魏博节度使田兴（后赐名弘正）宣布效忠朝廷。

元和九年，淮西节度使吴少阳死，其子吴元济匿不发丧，伪称少阳患病，请以元济为留后。宪宗坚执不允。元济于是四出纵兵焚掠千余里。宪宗与宰臣武元衡等共议对策，认为淮西为朝廷心腹之患，又为害最烈，而且，河北、山东诸强藩皆以中央对淮西的态度窥测中央对藩镇的动向，所以志在必除。此外，淮西地处中原腹地，与河北、山东诸镇并不接壤，魏博归顺后，改善了朝廷的战略地位，河北三镇已无连兵之恃。淮西所辖地狭，兵马不众，正是叛镇中的薄弱环节。如宰相李吉甫所说：“失今不取，后难图矣！”宪宗遂于元和十年正月，下诏讨伐淮西，令宣武等16道联兵围剿。

与淮西存着唇亡齿寒、辅牙相倚关系的河北成德王承宗、淄青李师道不惜用一切手段破坏和阻挠平淮战役。他们先是暗中与吴元济通谋，出面为之请赦，遭到拒绝后，李师道又派人先后烧掉河阴转运院（河南荥阳东北）和柏崖仓（洛阳北）储积的大批物资和粮草，引起京师和平淮前线军民的慌恐，又遣刺客暗杀了主持讨淮军政事务的宰相武元衡，刺伤裴度，策划东都暴乱。宪宗不为威胁所动，以裴度为宰相，宣称：我用度一人，足破三贼！这时的讨淮前线，由于各道分别出兵，将帅心志不一，仍循旧例不设统帅，由宦官监军，所以虽有9万之众，迁延不进，合围二年久而无功。军民因久战无功，斗志疲懈，内外恐慌。群臣或以数战不利，或以馈饷烦匮争请罢兵，但宪宗坚执不从，十一年末，撤换了不敢进取的彰义节度使袁滋，以李愬（773—821，洮州临潭（今属甘肃）人）代之。李愬是德宗时收复京城的名将李晟之子，沉勇有谋。他先后俘获、招降敌将丁士良、吴秀琳、李祐、李忠义等，推诚以待，尽知吴元济虚实。元和十二年停止讨伐王承宗（十一年下诏讨伐王），专讨吴元济。裴度自请督战。十二年夏，裴度亲赴前线督战，先慰劳诸军，奏请罢撤监军，使将得专制，号令统一，又调整了漕运线路，保证了前线的资粮供应，鼓舞了士气。淮西地区因连年交战，粮食匮乏，人心浮动，再加上数败唐军，有轻敌之心。李愬决定利用淮西大将董重质率精兵主力在洄曲（河南汝南北、郾城东）与北面的唐军对峙之机，出其不意，突袭空虚的蔡州城，直捣吴元济的大本营。

元和十二年十月初十，李愬率9000士卒进发，途中阴晦雨雪，大风裂旗，人马冻栗，死者相望，道路险恶，但李愬促令进军。连夜行军130里，四更时分直抵蔡州城下。蔡州自吴少诚抗命以来，官军不至城下30余年，城上守备熟睡而毫无察觉。李祐、李忠义奋勇登城，杀死警卫，留下更夫继续打更，冲进里城如法炮制，城中仍毫无知觉。鸡鸣雪止，李愬率军已到吴元济外宅。吴元济听到报警后，仍认为大概是驻守洄曲的士兵来取寒衣而已。李愬知道吴元济依恃董重质所率万余精兵的救援，于是厚抚被吴元济留在城中做人质的董重质家属，遣其子持书劝降，重质遂单骑赴李愬军投降。李愬攻破蔡州城，生擒吴元济。当天，申、光二州及淮西诸镇2万余士兵相继投降。吴元济被槛送长安后斩首。历时三年的平淮西战役至此结束。

平淮西的胜利，使全国政局发生了急剧的变化，卢龙、成德两镇被迫主动归顺，元和十四年，淄青李师道的势力被消灭，一些拥兵自重或首鼠两端的中小割据者也相继有归顺的行动或表示，使安史之乱

以来历时半个世纪的分裂局面基本告一段落。

（宁 欣）

河朔复叛

唐宪宗在位，河朔三镇相继归顺朝廷。唐穆宗长庆元年(821)七月至翌年二月，卢龙、成德、魏博三镇再叛朝廷，河朔三镇又恢复割据状态，直到唐朝灭亡。

唐宪宗元和七年(812)，魏博节度使田季安死，部将立季安子田怀谏为知军务，年仅11岁。士卒数千人大噪，拥立田季安部将田弘正(764—821，平州卢龙(今属河北)人)。田弘正提出条件：守朝廷法令，申版籍，请朝廷委派官吏，然后可。士卒同意。魏博镇归顺了朝廷。元和十三年，由于朝廷新近平定淮西，节度使吴元济就擒，成德节度使王承宗，求田弘正出面请求朝廷停止用兵，愿意献德、棣二州、输租税并请朝廷委派官吏。唐宪宗允准，成德镇归顺。卢龙节度使刘总由于在元和五年杀父刘济和兄刘绲夺取节度使职务，因而心常自疑，惊悸不寐；见河南、北皆归附朝廷，遂于唐穆宗长庆元年正月乞弃官为僧。卢龙镇也归顺朝廷。

好景不长。元和十五年正月，唐宪宗死，穆宗即位。唐穆宗追求享乐，不留意天下之务，形势很快逆转。卢龙镇首先发生叛乱。刘总在弃官为僧之前，建议朝廷，将卢龙道分为三道并推荐三道节度使人选：以幽、涿、营州为一道，以河东节度使张弘靖为节度使；以平、蓟、妫、檀州为一道，以平卢节度使薛平为节度使；以瀛、莫州为一道，以京兆尹卢士玫为观察使。唐穆宗并未认真考虑，即任命张弘靖为卢龙节度使，统幽、涿、营、平、蓟、妫、檀七州；任卢士玫为瀛、莫观察使。而对"知河朔风俗，尽诚于国"的薛平却不予考虑。张弘靖原为河东节度使，以宽简得众，刘总因而推荐之。然而，张弘靖不了解河朔风俗，举措失当，引起卢龙军士不满。长庆元年七月，士卒作乱，迎卢龙旧将朱洄为留后。朱洄因老、病不能胜任，推荐子朱克融为留后。唐穆宗无力扭转局势，只得任朱克融为节度使。不久，朱克融进占瀛、莫二州。

卢龙镇复叛之后，成德、魏博二镇又叛。长庆元年成德节度使王承宗死，其弟王承元秘密上表穆宗，请朝廷任命节度使。穆宗调魏博节度使田弘正为成德节度使，以李愬为魏博节度使。由于过去魏博镇与成德镇曾发生过战争，因此，田弘正从魏博带来士卒2000人充卫兵。但是户部侍郎崔俊拒绝发给这2000人的军粮，这些人只好归魏博。魏博兵刚走，成德都知兵马使王庭凑集结牙兵噪于府署，杀死田弘正及其僚佐、将吏、家属300余人。王庭凑自为留后。长庆二年二月，朝廷不得已，以王庭凑为成德节度使。这样，成德镇复叛。

魏博节度使李愬知道田弘正遇害，决定发兵讨王庭凑。未发，李愬病，朝廷命泾原节度使田布为魏博节度使。十月，田布发魏博士卒30000讨王庭凑。长庆二年正月，田布率士兵至南宫(今河北南部)，因为大雪，朝廷调发的军粮不继。田布决定调发魏博六州租赋以供军，引起魏博士卒不满，他们说：按照制度，大军出境，皆仰给朝廷。今尚书(田布)刮六州肌肉以奉军，虽尚书瘠己肥国，六州之人何罪乎！在争夺深州的战役中，田布所率之士卒，大部归附田布的牙将史宪诚。田布只带8000人返回魏州。田布召诸将议出兵，诸将说：尚书能行河朔旧事，则死生以之；若使复战，则不能也！田布无可奈何，遂抽刀自杀。牙将史宪诚"乃谕其众，遵河北故事"，士兵拥史宪诚为留后。唐穆宗不得已，任命史宪诚为魏博节度使。宪诚虽喜得旄钺，外奉朝廷，然内实与卢龙、成德连结。河朔三镇复叛，又恢复为割据状态。直到唐亡。

（翁俊雄）

"甘露之变"

唐文宗大和九年(835)十一月，宰相李训伙同金吾卫大将军韩约、京兆少尹罗立言、河东节度使王璠和邠宁节度使郭行余等谋诛宦官，诈称"左金吾厅事后石榴夜有甘露"，以待宦官、右神策军中尉仇士良等进入左仗院时围杀之。不料事败露，宦官急拥文宗入内殿，随即派禁兵出宫，大杀朝官吏卒，死者数百人，是为"甘露之变"。

唐朝初年，宦官在皇宫内负责看门、洒扫及生活服务性事务，不得过问政事。唐太宗规定宦官的官阶不得超过四品，以防患于未然。唐玄宗时，长安、洛阳两京宦官已有三四千人，地位开始上升，衣朱紫者千余人。安史之乱爆发，宦官李辅国有"定策功"，被唐肃宗任为判元帅府行军司马，四方奏事、御前符印、军号一以委之。从此，宦官开始掌握军权。唐代宗在位，天下兵马副元帅郭子仪北伐安庆绪于相州，宦官鱼朝恩为观军容宣慰处置使，有监督官军的权力。代宗时，鱼朝恩专典禁兵(即"神策军"，护卫皇帝之兵)。代宗尊其为"尚父"，政无大小，全让他参与。鱼朝恩甚至对代宗说：大家(宦官对皇帝的称谓)但内里坐，外事听老奴(宦官本是皇帝的家奴)处置。李辅国、鱼朝恩虽然很有权势，但是，此时宦官掌握兵权

还未制度化，他们的权力并不巩固，因而他们较容易地被诛死。

建中四年(783)，“泾师之变”爆发，德宗从长安出逃，神策军使白志贞所统帅的神策军，竟无一人赶来扈从。加以德宗认为武将皆不可信赖，不欲武臣典重兵。因而，在兴元元年(784)以宦官窦文场为监神策军左厢兵马使，以宦官王希迁为监右厢兵马使。唐代宗在诛鱼朝恩后，本想不再使宦官典兵，“泾师之变”后，一改初衷，从此宦官掌握神策军就成了不可改变的事实。不久，将神策军两厢改为左、右神策军；左、右神策军分别置护军中尉，以窦文场、霍仙鸣分别为左、右神策军中尉。从此，神策军就由宦官任中尉，掌实权。

宦官掌握禁兵，权力日盛。自德宗贞元(785—805)年间之后，朝廷大臣、藩镇戎帅，欲升迁、固位，必须攀援宦官、贿赂宦官，才能如愿。更有甚者，顺宗、宪宗、敬宗先后被宦官暗害而死。宦官可以依据自己的意愿在皇帝诸子中择立皇帝。穆宗、敬宗、文宗皆为宦官所立。唐文宗虽是宦官所立，然而他知道曾祖(顺宗)、祖(宪宗)、兄(敬宗)皆死于宦者之手；而父(穆宗)、兄(敬宗)以及自己都是宦官所立，因而对宦官专横异常痛恨；对自己“受制于家奴”感到耻辱，决心铲除宦官势力。

大和四年六月，文宗与翰林学士宋申锡流露出对宦官、神策军中尉王守澄等“威权逼上者”的不满，宋申锡心领神会。七月，文宗任宋申锡为宰相。宋申锡为了策划诛杀宦官，提升吏部侍郎王璠为京兆尹，并将文宗的密旨透露给他。而王璠将消息泄露出去。王守澄使人诬告宋申锡谋立文宗之弟漳王李凑为皇帝。由于李凑“贤，有人望”，素为文宗所忌，文宗信以为真，甚怒。王守澄遣200骑屠宋申锡之家。宋申锡则被贬为开州司马，不久死于贬所。唐文宗辜负了宋申锡，宋申锡含冤而死。这次诛宦官之谋终于流产。五年后，发生了“甘露之变”。

李训(？—835，陇西成纪(今甘肃秦安)人)是宰相李逢吉的从子，与郑注(？—835，绛州翼城(今山西翼城东)人)关系密切。而郑注依附于王守澄，李训经王守澄推荐充翰林侍讲学士。不久，郑注也充翰林学士。李训、郑注虽然都与王守澄有密切关系，但是，李训揣知文宗之意，在文宗面前表示对宦官不满。文宗虽然知道李、郑二人与王守澄的关系，想利用这一点使宦官对他们不存戒心，就将消灭宦官的意图告诉他们，想通过他们诛杀宦官。李训、郑注也以诛宦官为己任。由于大宦官仇士良(781—843，循州兴宁(今广东兴宁东北)人)与王守澄有隙，李、郑二人为文宗献策，提升仇士良为左神策军中尉，以分王守澄之权。不久，又以右神策军中尉王守澄为左右神策军观军容使，虚尊其名，实则夺取了他的军权。大和九年九月，文宗任李训为宰相。十月，李训、郑注建议立即除掉王守澄。初九，唐文宗遣宦官李好古就王守澄宅第，“赐鸩”，用毒酒将其毒死。

在毒死王守澄之后，李训欲将有兵权的宦官仇士良等一网打尽。事前有所布置。九月，李训以郑注为凤翔节度使。十一月初五，李训以大理卿郭行余为邠宁节度使；以户部尚书王璠为河东节度使；以京兆少尹罗立言为权知大尹事；太府卿韩约为金吾街使(统帅长安“警察”)。这些人都是李训之亲信。李训将亲信从中央调至长安附近的军镇统率士兵，目的是让郭行余、王璠多募士卒；让韩约率长安金吾吏卒，诛杀宦官。

二十一日，唐文宗在紫宸殿上朝，百官排班站定。照例由金吾将军先报平安。金吾将军韩约不报平安，却奏：“左金吾厅事(大厅)后石榴夜有甘露！”树上樱桃、石榴出现“甘露”、空中有紫云等现象，当时被认为是“祥瑞”，值得大为庆贺。因而，宰相李训率百官称贺。李训建议文宗亲自前往观看。文宗乘软舆由紫宸殿至含元殿时，命李训等先往观。李训回奏说：“臣与众人验之，殆非真甘露。”文宗又命左、右神策军中尉仇士良、鱼志弘率宦官们前往视之。仇士良等至左金吾厅，有阵风吹动帷幕，发现幕后埋伏很多执武器的士卒，惊骇万分，急忙外走。守门人欲闭门，被仇士良喝叱，门关不上，致使仇士良等逃出。宦官连忙扶文宗上软舆，北出，进宣武门。仇士良察觉文宗参与其事，口出不逊，文宗惭惧不复言。仇士良等率左、右神策军500人，逢人便杀，杀死中书、门下省官吏及金吾吏卒600余人。诸司印章、图籍、器皿俱尽。又遣兵在长安城中追捕，捕杀李训、王璠、罗立言、郭行余等。宰相王涯、贾𫗧并未参与其事，也被捕杀。郑注按计划率凤翔亲兵500人赴京城，行至扶风县，闻李训败，复还凤翔，被凤翔监军张仲清杀害。

“甘露之变”以后，宦官掌禁兵，依然如故。唐文宗以后至唐朝灭亡，共有武宗、宣宗、懿宗、僖宗、昭宗、哀帝六个皇帝，其中除哀帝以外，皆为宦官所立。宦官专权的局面延续至唐朝灭亡。　（翁俊雄）

唐武宗灭佛

会昌年间(841—846)，唐武宗下诏禁断佛教，大刀阔斧地在全国拆毁寺庙，下令大多数僧尼还俗，这

就是历史上著名的“武宗灭佛”。

佛教自东汉传入我国，经过数百年，至唐代进入了全盛时期。佛教对我国的思想、文化、社会生活产生了很大影响。佛教又从我国传入日本和亚洲其他邻国。唐朝中后期，佛教信徒日益增多。由于寺庙有免缴赋税、僧尼有免出赋役的特权，以致寺庙的耕地愈益扩大、僧尼的数量日益增多，极大地影响国家赋税的收入。唐代出家为僧尼需官府发给“度牒”(凭证)才属合法。有的地方官利用颁发的职权大发横财。唐敬宗在位(825—827)，徐州节度使王智兴以庆祝皇帝诞辰为辞，在泗州(江苏盱眙)置僧尼戒坛，凡百姓每人缴纳2000钱者，“给牒即回，别无法事”。这样，一些意在规避王徭、影庇资产的人，就纷纷来此缴钱领牒，也就获得免出赋役的特权。因此，不仅泗州，而且江、淮以南的人也渡淮至泗州。淮南节度使李德裕为实际了解这一情形，在蒜山渡口进行察看。一日中有百余人为此目的经过渡口，其中有14人过去曾当过僧尼，其余皆苏、常二州百姓。据李德裕估计，从去年冬至敬宗诞辰，“江淮以南，失却六十万丁壮”。而徐州节度使从中可获120万贯钱。而这只是国家因佛教而损失的一小部分。因此，唐武宗“恶僧尼耗蠹天下，欲去之”。唐代，道教与佛教的争斗由来已久。道士赵归真等人在唐武宗决心灭佛中也起过很大的作用。

唐武宗灭佛分为三个阶段。会昌二年(842)十月下敕：过去有犯罪记录的僧人、为逃避兵役而入佛门者、不修戒行者，并勒令还俗。没收所有僧尼的一切财产(田地、庄园、粮食、钱物)。如情愿还俗者则免于没收，立即充入两税徭役。于是，有很多僧尼纷纷还俗，编为两税户(即为民户。时百姓每年于夏、秋缴纳赋税)。这是第一阶段。

会昌三年二月下敕：拆毁天下所有山野招提、兰若、佛堂。唐代规模大、官赐匾额者为“寺”。私人于山野修建的称为“招提”、“兰若”。“兰若”比“招提”离乡村更远些。私人在城中的居民区(坊)中修建的，称为“佛堂”。长安城里各坊内就有佛堂300余所。会昌三年二月《敕》还令全国各地的招提、兰若、佛堂中的僧尼“尽勒还俗”充两税户。这样，散布在全国各个乡村、山野中和城里居民点中的私人小寺庙一律拆毁，其中的僧尼全部还俗。这是第二阶段。

会昌五年三月敕：长安、洛阳两都两街各留二寺。即长安左街留慈恩、荐福二寺；右街留西明、庄严二寺。长安所留寺庙各留僧30人，洛阳每寺减少至20人。天下各节度、观察使治所及同、华、商、汝四州，各留一寺。寺分三等，上等留20人(不久减10人)；中等留10人(不久减至7人)；下等5人(不久改为一个不留)。其余限期拆毁，没收所有庙产。拆下的建筑材料用作官舍的修缮；铜像、钟磬熔化铸钱。除应留的以外其余僧尼全部还俗。长安城里的僧尼还俗分为三批。从会昌五年四月初一起，凡40岁以下者先还俗，递归本贯。每日300人，十五日方尽。从十六日起，50岁以下还俗，直到五月十日方尽。五月十一日起，50岁以上无祠部(主管僧尼事务的政府机构)牒者，还俗。外国僧侣无祠部牒者亦令还俗。有祠部牒者准许保留。

长安严令僧尼还俗，全国各地以至偏远地区也无不如此。日本和尚园仁入唐求法，正赶上灭佛，他因无祠部牒被迫蓄发还俗，遂决定回国。园仁和尚于会昌五年六月底至扬州，见城里僧尼正裹头，递还本贯。拟拆寺舍；钱物、庄园、钟等，官家收检。八月十六日至登州，登州虽是边地，但他见到僧尼还俗，毁拆寺舍，焚经毁像，收检寺物，与京城无异。

唐代寺庙蓄养大量奴婢。会昌五年三月《敕》中，就明令勘检天下寺舍中有多少奴婢、钱物、粮食、绢帛，一一具实奏闻。长安城里的寺庙由神策军两中尉负责勘检。诸州府寺舍，由中书、门下二省勘检。长安城里寺庙奴婢分为三等，有艺业者没入军中役使；无技能少壮者出售；货卖奴婢所得钱，官收。老弱者没为官奴婢。

经过会昌二年、三年、五年三个阶段，至会昌五年八月灭佛结束。唐武宗下诏宣示中外：天下毁寺4,600余所，归俗僧尼260,500人。拆毁天下招提、兰若40,000余所。合计毁寺、招提、兰若44,600所；还俗僧尼约30余万人。此外，在灭佛中，还没收寺产“良田数千万顷、奴婢十五万人”。

在唐武宗大刀阔斧地灭佛时，河朔三镇，即卢龙、成德、魏博三节度使，仍尚佛法，不奉诏敕，不拆寺庙，不令僧尼还俗。他们对中使说：天子自来毁拆、焚烧，即可然矣。臣等不能做此事也。五台山僧多逃亡幽州。宰相李德裕对卢龙镇进奏官说：回去对本使说，如果任五台僧做将军，不如幽州之将；如果让他们当兵，不如幽州兵。为何虚取容纳之名，给人以口实！卢龙(幽州)节度使张仲武乃封二口刀给居庸关守将，命令他：有游僧入境则斩之！从此五台山僧不复入幽州。

会昌六年四月，唐武宗死，唐宣宗即位，当日罢李德裕宰相职位，一反“会昌之政”。当月杖杀道士赵归真等数人。五月，放宽佛禁。诏长安两街在先留两

寺以外，各增八寺。这样两街共20所寺庙。左街先留慈恩寺、荐福寺；今增置八寺，实际增置兴唐、保寿二寺；恢复(并改名)六寺：宝应寺改为资圣寺，青龙寺改为护国寺，菩提寺改为保唐寺，清禅寺改为安国寺，法云寺(尼寺)改名为唐安寺，崇敬寺(尼寺)改名为唐昌寺。右街先留西明寺改名为福寿寺，庄严寺改名为崇圣寺。增置僧寺一所名为千福寺、尼寺一所名为兴圣寺。恢复(并改名)六寺：化度寺改为崇福寺，永泰寺改为万寿寺，清国寺改为崇圣寺，经行寺改为龙兴寺，奉恩寺改为兴福寺，万寿寺(尼寺)改名为延唐寺。唐宣宗大中元年(847)闰二月敕：会昌年间所废之寺、招提、兰若、佛堂，又重新加以修缮，僧尼愿意重入佛门者听便。佛教又重新兴盛起来。

(翁俊雄)

"泽、潞"之叛

唐武宗会昌三年(843)四月，泽潞镇刘从谏、刘稹父子效法河朔三镇，节度使父死子继。朝廷为防止他镇效法，决心讨伐。翌年八月，刘稹被诛，泽潞之叛终被平息。

唐宪宗元和十五年(820)起，昭义节度使领泽、潞(属河东道)、邢、洺、磁(属河北道)五州，时人简称为"泽潞镇"。唐敬宗宝历二年(826)刘从谏为昭义节度使。唐文宗大和九年(835)"甘露之变"中，宰相王涯无辜被诛，刘从谏甚为不平，三次上书指斥宦官仇士良，为王涯申冤。甘露之变以后，仇士良等更为跋扈。刘从谏对仇士良的指斥，迫使宦官稍加收敛，故纪纲粗立，因而得罪了仇士良等宦官势力。会昌三年四月刘从谏病危，担心宦官报复，死前对其妻裴氏说：我以忠直事朝廷，而朝廷不明我志。各道节度使，也不同情我。我死后，朝廷派别人主此军镇，则吾家无炊火矣。因而他与部下策划仿效河朔三镇父死子继的做法，以从子刘稹为留后，待朝廷任命为节度使。唐武宗以泽潞之事谋于宰相。宰相李德裕认为：泽潞之事与河朔三镇不同。河朔习乱已久，人心难化，是故累朝以来，置之度外。泽潞近处心腹，如果效法河朔，也父死子继，四方诸镇起而效之，则天子威令不行矣！遂决心兴师讨伐。为孤立泽潞镇，武宗下诏给成德节度使王元逵、魏博节度使何弘敬："泽潞一镇，与你们情形不同，不要为子孙的利益，相互串通。只要为朝廷建功，自然福及后代。"王元逵、何弘敬得诏书，"悚息听命"。六月十九日，唐武宗下诏王元逵、何弘敬、武宁节度使李彦佐、河东节度使刘沔、忠武节度使王茂元于七月中旬五道齐进，进攻泽潞。出兵前，宰相李德裕指出：过去出征，监军以自己的意见指挥官军，而将帅却不能决定进退，因而往往失败。这次出兵应约敕监军不得干预军政，武宗同意。会昌四年八月十一日，成德、魏博节度使奏：邢、洺、磁三州降。李德裕认为："昭义的根本在邢、洺、磁三州。今天三州降，则昭义镇很快有变化。"果然不久，刘稹被其部将杀死。刘从谏、刘稹父子亲厚者12人及其家属也被杀死。"泽潞"之叛终于平息。朝廷任命廉洁奉公的山南东道节度使卢钧兼领昭义节度使。

(翁俊雄)

张义潮归唐

唐宣宗大中五年(851)沙州汉族首领张义潮以沙、甘、肃等11州归唐。被吐蕃占据近百年的河西、陇右地区，重新划入唐朝版图。

安史乱后，吐蕃占据了河西、陇右(今甘肃)广大地区。自唐代宗宝应元年(762)至唐穆宗长庆元年(821)，唐蕃多次会盟。唐敬宗至唐武宗，双方使者往来频繁。唐宣宗大中二年吐蕃赞普死，内乱。别将尚恐热自号宰相，兵袭吐蕃鄯州节度尚婢婢。在进军中，大掠鄯、廓、瓜、肃、伊、西等州，过甚的杀掠引起麾下内怨。为稳定内部，尚恐热扬言：将请唐兵50万共定内乱，求册为赞普，奉表归唐。尚恐热为取得唐廷的支持，以秦、原、安乐三州和石门、木峡、六盘、制胜、驿藏、石峡、木靖等七关归唐。泾原节度使康季荣奏报朝廷。大中三年三月，宣宗以太仆卿陆耽为宣谕使，诏泾原、灵武、凤翔、邠宁等节度使出兵接应。六、七月间，泾原节度使康季荣取原州(宁夏固原)和石门、驿藏、木峡、制胜、石峡、六盘等六关。灵武节度使朱叔明取安乐州(宁夏同心东北)、邠宁节度使张君绪取萧关(今宁夏同心南)。凤翔节度使李玭取秦州(甘肃秦安北)。八月，河西、陇右老少千余人至长安，宣宗登延喜门楼接见。河陇老少欢呼舞跃，观者皆呼万岁！大中四年八月，尚恐热袭击尚婢婢于鄯州，尚婢婢留拓跋怀光守鄯州，自率军向西逃往瓜州。尚恐热大掠鄯、廓等州。

沙州(甘肃敦煌)汉族首领张义潮(？—872，沙州敦煌人)乘吐蕃内乱，于大中五年正月，在沙州率众起义，吐蕃守将惊走，遂代理州事，奉表归唐。朝廷任命张义潮为沙州防御使。由于河西、陇右各州屡遭尚恐热的杀掠，群情激愤。十月，张义潮发兵接管瓜、伊、西、甘、肃、兰、鄯、河、岷、廓十州。遣其兄张义泽奉11州地图、户籍入朝。于是，河西、陇右广大地区，重新划入唐朝版图。十一月，唐置归义军于沙州。以

张义潮为归义军节度使、十一州观察使。又以张义潮的判官曹义金为归义军长史。

大中十一年十月，吐蕃酋长尚延心，以河、渭二州部落降唐。唐廷以尚延心为河、渭都游弈使，使统其众。

唐懿宗咸通十三年(872)八月，归义军节度使张义潮死，沙州长史曹义金为归义节度使。此后，中原多故，朝令所不及。回鹘攻陷甘州，其余归义军节度使所辖各州，多为羌、胡所据。 (翁俊雄)

黄巢领导的农民战争

唐僖宗乾符二年(875)二月，濮州人王仙芝，于濮阳起义，冤句人黄巢聚众数千人响应。王仙芝死后，黄巢领导的农民起义军转战南北，经江淮、浙闽至广州；然后经两湖北上，起义队伍发展至60万，攻占洛阳、长安。在长安建立农民政权，长达两年之久，最后失败。

唐懿宗统治期间(860—874)，长期积累的社会矛盾逐渐表面化。唐朝的统治集团已经腐化。唐懿宗信佛佞佛，怠于政事，经常口诵佛号，手抄佛经，对佛寺施舍无度。同时又游宴无节，宫廷每月宴会十余次，为此而设的殿前乐队达500人。还经常至曲江池、昆明池、南宫、北苑等风景区游览，扈从者多达10余万人，所费不可胜纪。唐僖宗即位时年仅12岁，政权由宦官神策军中尉操纵。皇帝怠于政事、政权由宦官操纵。唐懿宗咸通元年(860)唐宣宗死，而南诏王丰祐亦死。丰祐子酋龙继立。酋龙不满唐廷没有按惯例册封，遂自称皇帝，自号“大礼国”，年号“建极”。唐懿宗因其年号与唐玄宗之名“隆基”音近，认为这是犯讳，是对唐廷的不敬，因而拒绝接受南诏的朝贡。于是，南诏经常骚扰邕管(广西南宁)、西川(四川成都)、黔中(贵州)，天下骚动达15年。连年战争，耗尽国库。唐宣宗大中末年“内库资积如山”；十数年后“中藏空虚”。战争使赋役加重，加以河南、河北连年出现水旱灾害，农民难以存活，被迫起义。

唐宣宗末年，政治局势已经恶化。大中十三年(859)十二月，浙东爆发了裘甫领导的农民起义。起义军很快占领象山(浙江象山)，进逼剡县(浙江嵊县)。唐懿宗咸通元年(860)三月，起义军北走上虞、余姚；东下慈溪、奉化、宁海(均属今浙江)又分兵攻下衢州、婺州，进逼越州，声震中原。至七月，裘甫被俘牺牲，起义失败。

为抗击南诏进扰西川、邕管、黔中，咸通三年，唐廷调发河南、山南、江南各地镇兵到岭南戍守。其中，唐廷命徐州节度使孟球，召募兵士2000人，分800人戍防桂林，约定三年轮换。至咸通九年已戍守六年，戍兵屡次请求代还，时任徐州节度使的崔彦曾因库藏空虚，要桂林戍兵继续戍守一年。戍卒大怒，杀都头王仲甫，立粮料判官庞勋为都将，掠湘潭、衡山两县，一直打回徐州老家。徐州附近、今山东、河南一带农民也纷纷参加起义队伍。起义军发展至20万人，以徐州为中心，占领了今山东南部、江苏、安徽北部广大地区。咸通十年唐军攻占徐州，至十月，起义军失败。裘甫、庞勋起义，给唐朝以沉重打击，使其实力大为削弱，为更大规模的黄巢起义铺平了道路。

王仙芝、黄巢(？—884，曹州冤句(今山东菏泽)人)都是私盐贩出身。唐僖宗乾符二年五月，濮州人王仙芝于濮阳(河南濮阳南)起义。六月，王仙芝及其部将尚君长攻占濮、曹二州，有众数万。曹州冤句(山东菏泽)人黄巢聚数千人响应，数月之间，众至数万。十二月，王仙芝率起义大军袭沂州。乾符三年七月平卢节度使宋威在沂州城下大败起义军。起义军向西南转移。九月，攻陷汝州，执刺史王镣。十月，出河南，进入山南东道，进攻唐、邓二州。十一月攻占郢、复二州。十二月，进入淮南道，进攻申、光、庐、寿、舒等州。此时，尚君长弟尚让(？—884)占据查牙山。王仙芝领导起义军攻蕲州(湖北蕲春)。前此被起义军俘虏的汝州刺史王镣出面，在蕲州刺史裴偓与王仙芝之间进行调解，双方“敛兵不战”。裴偓开城请王仙芝及黄巢等30余人入城，排酒宴。裴偓代王仙芝向朝廷求官。唐廷以王仙芝为左神策军押牙兼监察御史，并派人送“告身”来蕲州。王仙芝甚喜。黄巢怒责王仙芝背众求官：“让这5000人怎么办？”殴打王仙芝，伤其首。其众宣噪不已。王仙芝畏众怒，遂不受命。起义军分裂，3000余人由王仙芝、尚君长率领，在江南流动，2000余人由黄巢统率往黄河以南进军。

乾符四年正月，王仙芝攻下鄂州(湖北武昌)，八月攻占安州、随州。乾符五年正月，攻下江陵(湖北江陵)外城，被山南东道节度使李福打败，遂焚掠江陵而去。二月，唐招讨使曾元裕在蕲州黄梅县大败王仙芝，杀起义军50000余人，王仙芝被害，起义军余部散去。

黄巢领导起义军2000余人于乾符三年年底，从蕲州出发，渡淮，入河南道。乾符四年正月陷郓州，杀节度使薛崇。三月，攻占沂州。四月，到查牙山与尚让合军。六月，黄巢与尚让攻宋州，不克，解围而去。十一月，攻占滑州匡城、濮州，围攻亳州。尚让推黄巢为主，号冲天将军，改年号为元霸，置官属，初建农民政

权。黄巢再攻占沂、濮二州，此时屡为官军所败。为缓解官军进逼，黄巢给天平节度使张杨去书，表示归顺朝廷。朝廷任黄巢为右卫将军，令至郓州解除武装。黄巢不理，三月，自滑州南向汴、宋二州，引兵渡淮河、长江，入江南西道，攻占虔、吉、饶、信等州。八月，攻宣州(安徽宣城)不克，引兵攻浙东、入福建。因无水路，开山道700里，打通了仙霞岭大道，攻克福州。乾符六年五月，黄巢与浙东观察使崔璆、岭南东道节度使李迢书，求为天平节度使。朝廷不许，改求广州节度使，又不许，仅任黄巢为“率府率”。黄巢大怒，在九月急攻广州，很快占领。起义军在岭南因瘴疫而死者很多，士卒请求北还以图大事，黄巢同意。起义军自桂州(广西桂林)编大筏数十，乘暴水，沿湘江而下，经衡、永二州，抵潭州(湖南湘潭)城下。尚让乘胜率一部义军进逼江陵，号众50万。黄巢率义军攻襄阳，被唐军打败。黄巢与尚让率义军渡江东走，攻克鄂州外城，转掠饶、信、池、宣、歙、杭等15州，起义军尚有20万人。唐僖宗广明元年(880)七月，黄巢率义军自采石戍(安徽当涂西北)渡江，围天长、六合，兵势甚盛。淮南节度使高骈不敢抗其锋，自保而已。九月，起义军占申州，遂入河南道，攻入颍、宋、徐、兖各州境内，队伍不断扩大，十一月攻入汝州境内。此时，黄巢自称天补大将军，散牒诸节度使：各宜守垒，勿犯吾锋！吾将入东都，即至京邑，自欲问罪，无预众人。

此时长安城中十分紧张。调派潼关以内诸镇及神策军守潼关。僖宗惶迫无计，对着宰相哭泣，在宰相豆卢瑑的建议下，任命神策军中尉田令孜为左右神策军、内外八镇及诸道兵马都指挥制置招讨等使。十七日，起义军占领东都洛阳。东都留守刘允章率百官迎谒。起义军入城，“闾里晏然”，秋毫无犯。二十二日，唐僖宗又任田令孜为汝、洛、晋、绛、同、华都统，率神策军东讨。十二月初一，黄巢前锋军抵潼关，白旗满野，不见其际。不久，黄巢至，举军大呼，声震河、华(华山临黄河)。潼关左有谷，平日禁行人通行，谓之“禁坑”。官军忘记派人扼守，起义军一部分从禁坑入，两面夹击，唐军大溃。起义军占领潼关，向长安进军。初五，起义军破潼关的消息传到长安。宰相卢携服毒自杀。田令孜率神策军500人拥僖宗自金光门出逃，只有福、穆、泽、寿四王及妃嫔数人从行，百官皆莫知之。军士及坊市民竞入府库取金帛。金吾大将军张直方率文武官员数十人迎黄巢于灞上。黄巢金装肩舆，甲骑如流，辎重塞路，千里络绎不绝。民夹道聚观。尚让一路多次宣告：“黄王起兵，本为百姓，非如李氏不爱汝曹(你们)，汝曹但安居无恐。”起义军“见贫者，往往施与之”。起义军杀唐宗室在京者无遗类。十三日，黄巢即皇帝位于含元殿，国号大齐，改年号为金统。唐官三品以上悉停任，四品以下位如故。以尚让、赵璋(义军将领)、崔璆(浙东观察使，曾为黄巢求官于唐)等为宰相。还任命大批起义军首领为官员。地主、官僚嘲讽他们：“还将短发戴华簪，不脱朝衣缠绣被；翻持象笏作三公，倒佩金鱼为两史。”反映了大齐政权掌握在劳动群众手中。王仙芝曾自号天补平均大将军、黄巢自号天补将军，表达了起义农民反对财富不均、平均财富的主张。大齐政权建立后曾在一定程度上加以贯彻，所以在金统二年(881。唐中和二年)三月尚书省门前有这样一首反对农民起义的招贴诗：“自从大驾去奔西，贵落深坑贱出泥。邑号尽封元谅田，郡君变作士和妻。扶犁黑手翻持笏，食肉朱唇却吃齑。唯有一般平不得，南山依旧与天齐。”

唐僖宗于中和元年正月逃至成都。在这期间，诏诸道各出全军收复京师。二月，代北监军陈景思率沙陀族酋长李友金、绛州刺史瞿稹(沙陀族)在代北募兵，得30000余北方胡人，屯于代州崞县之西。由于胡兵犷悍暴横，不能制，李友余、陈景思奏请由前大同防御使李克用为帅。唐僖宗任李克用为大同防御使兼代州刺史、雁门以北行营兵马节度使，以讨黄巢。又任郑畋为京城四面诸军行营都统。四月，朔方节度使唐弘夫屯渭北，河中节度使王重荣屯沙苑，义武军节度使王处存屯渭桥，朔方大将拓跋思恭屯武功，郑畋屯周至。初五，黄巢为诱敌深入，主动撤出长安，屯驻灞上。王处存率5000兵入城。长安部分百姓欢迎官军。入城官军毫无纪律，分占第宅，俘虏妓妾。初十，起义军自灞上分军从各门攻入，王处存所率官军仓皇溃乱，逃出长安。黄巢怒百姓迎官军，开杀戒，坊市为之流血。

诸道都统高骈讨伐起义军不利，中和二年正月，以宰相王铎(？—884，太原(今属山西)人)充诸道行营都统，崔安潜为副都统。以周岌、王重荣为都统左、右司马。王铎更换诸道将领，以王处存、李孝昌、拓跋思恭为京城东、北、西面都统，以杨复光为南面行营都监使。加紧对起义军的进攻。

二月，黄巢部将朱温攻占同州。朱温率义军攻河中府，被王重荣击败。五月，黄巢攻兴平，兴平诸军退屯奉天。七月，尚让攻宜君寨。起义军无大进展。朱温屡请增兵，未果。朱温见黄巢兵势日衰，知其将亡，于九月，以州降河中节度使王重荣。起义军形势逆转。十二月，此前引军退回代州的李克用，奉敕率蕃、

汉兵4万余人自岚、石州赴河中。又引兵自河西县夏阳渡黄河，屯军同州。此时同州集结了数万官军。中和三年正月，李克用在沙苑打败黄巢之弟黄揆。唐僖宗任李克用为东北面行营都统；以宦官杨复光为东面都统监军使、陈景思为北面都统监军使。王铎被罢兵权。二月，李克用进军乾坑（同州澄城县内），与王重荣等军在梁田陂大败尚让等率领的起义军。黄揆率义军占据华州，李克用进围华州，并分兵屯渭北。三月，黄巢遣尚让率兵救华州。李克用、王重荣引兵逆战于零口镇，破之。李克用进军渭桥，而骑兵在渭北。二十七日，李克用等攻占华州，黄揆率义军弃城走。四月，李克用等官军与黄巢战于渭南县，起义军失败。初八，李克用等自光泰门入长安，黄巢率起义军撤出长安，经蓝田县入商山。官军入长安，"暴掠"，"长安室屋及民所存无几"！

黄巢派部将孟楷率万人为前锋，进击蔡州。节度使秦宗权兵败，向起义军投降，与孟楷连兵。孟楷率义军攻陈州，兵败，被陈州刺史赵犨擒斩。孟楷是黄巢爱将，深惜之。六月，黄巢怒，与秦宗权合兵攻陈州。黄巢营于州北，立宫室百司，为持久之计。纵兵四处掠夺，以给军用。此前李克用自长安引兵还雁门，七月，朝廷任其为河东节度使。中和四年二月，陈州刺史赵犨、宣武节度使朱全忠等共同求救于河东节度使李克用，李克用遂率蕃、汉兵50000自陕州、河中府渡黄河向东。李克用会许、汴、徐、兖之军于陈州。此时，黄巢围陈州已近300日，官军反复进攻，黄巢被迫解陈州之围。

宣武军节度使（治汴州）朱全忠于中和三年七月被任命为东北面招讨使，参与陈州的会战。陈州解围后，中和四年四月，朱全忠率汴军还镇。黄巢解围陈州后，即进军汴州。五月，朱全忠向李克用求救，李克用经许州，追击黄巢于中牟县（属郑州）北"王满渡"。起义军正在渡汴河，被李克用杀伤万余人。尚让、葛存周、李谠、霍存等义军将领降唐，起义军溃散。黄巢率一小部分起义军渡汴河向北，在封丘县（属汴州）又遭李克用袭击。黄巢经胙城、匡城（均在滑州界内），收余众千人东奔兖州。初十，李克用班师过汴州，营于城外，朱全忠请他入城，在上源驿设宴款待，朱全忠有意将李克用灌醉，以兵围驿，纵火焚驿，以消灭这强有力的政敌。正巧，雷雨顿作，李克用逾城墙而逃。当即自陕济河还晋阳。六月初十，感化军节度使时溥遣部将李师悦万人追黄巢于兖州，在瑕丘，打败黄巢，起义军所剩无几。十四日，黄巢及弟黄揆、黄秉等一行，走至狼虎谷（山东莱芜县内），黄巢对其外甥林言说：我本想铲除奸臣，洗刷朝廷，今事不成，没有办法。如果把我的头砍下献给天子，你可得享富贵。林言不忍心。黄巢遂自刎，没死，林言斩之，并斩黄巢兄黄存、弟黄邺、揆等及他们的妻子。林言将至时溥处，路遇沙陀博野军，将林言杀死。起义虽然失败，腐朽的唐王朝也名存实亡了。22年后，唐灭亡。历史进入了五代十国的新阶段。 （翁俊雄）

唐末藩镇割据

自唐僖宗中和四年（884）六月，黄巢起义失败起，至后梁开平元年（907）正月的22年中，唐朝名存实亡，境内四分五裂，都被藩镇割据。

唐朝自安史乱后，河朔三镇形成半独立状态，内地节度使亦多仿效。宪宗时一度打败方镇的反抗，但并没有真正统一。穆宗时卢龙镇朱克融之乱，河朔三镇故态复萌。黄巢起义后，唐廷为了镇压起义，利用各地方镇的兵力，各地藩镇的力量日益加强。黄巢起义虽然被镇压下去，唐朝的力量大为削弱。旧方镇未去，在镇压黄巢起义过程中壮大起来的武将，又成为新方镇。这些新方镇分布在南北各地：李昌符据凤翔府（陕西凤翔）；李茂贞据兴元府（陕西汉中）；李克用据太原府（山西太原）、上党；王重荣据蒲州（山西永济）、陕州；孟方立据邢州（河北邢台）、洺州；诸葛爽据河阳（河南孟县）、洛阳；朱温据汴州（河南开封）、滑州；秦宗权据许州（河南许昌）、蔡州；朱瑄据郓州（山东郓城）、曹州、濮州、齐州；王敬武据淄州（山东淄博）、青州；杨行密据庐州（安徽合肥）；秦彦据宣州（安徽宣城）、歙州；时溥据徐州（江苏徐州）、泗州；高骈据淮南（江苏扬州）；刘汉宏、钱镠先后据浙东（浙江绍兴）。这些新方镇加上旧方镇，唐朝境内，已经四分五裂。新、老方镇不仅自擅一方，职贡不入，赏罚由己，而且迭相吞噬，朝廷不能制。在四分五裂的局面下，唐王朝王室日卑，号令不出国门。唐朝小朝廷只能收取京畿、同、华、凤翔府等数州租税。

这些新、老藩镇都怀有更大的野心。如老藩镇魏博节度使韩简军势方盛，自有图王之志。新方镇淮南节度使高骈大阅军师，欲兼并（东、西）两浙，为孙策三分天下之计。凤翔节度使李茂贞距长安最近，甲兵雄盛，凌弱王室，颇有问鼎之志。在这种情况下，方镇间混战不已，互相吞噬，形成若干特别强大的方镇。这些方镇，从北至南，分别为：卢龙镇（河北蓟县），刘仁恭所据。镇冀镇（河北正定），王镕所据。魏博镇（河北大名以北），罗绍威所据。宣武镇（河南开封），朱全忠所据。河东镇（山西太原），李克用所据。凤翔镇（陕

西凤翔），李茂贞所据。西川镇（四川成都），王建所据。淮南镇（江苏扬州），杨行密所据。湖南武安军（湖南长沙），马殷所据。镇海、镇东镇（浙江绍兴），钱镠所据。福建威武军（福建福州），王审知所据。岭南镇（广东广州），刘隐所据。及至朱全忠建立后梁，这些方镇节度使，也纷纷称王称帝，形成了五代十国分裂的局面。这种分裂局面的形成，实即唐末藩镇割据的继续和进一步的发展。　（翁俊雄）

五 代 十 国

杨行密建吴国

吴国，为杨行密所建。自唐天复二年(902)杨行密为吴王，建立吴国(地方割据政权，国都在扬州)。至后晋天福二年(937)吴国灭亡，历时35年。领有江淮28州，即今安徽、江苏大部和江西地区。

杨行密(852—905)，庐州合肥(今属安徽)人，世为农家。唐末参加农民起义，起义失败后，应募为州兵。唐中和三年(883)三月，淮南节度使(治所在扬州)高骈任之为“押牙，知庐州事”，不久，唐廷任之为庐州刺史。

唐光启三年(887)四月，淮南“左厢都知兵马使”毕师铎囚禁高骈，并遣使至宣州，请求宣歙观察使秦彦增援。五月，杨行密发庐州兵，讨伐毕师铎。当月二十三日，秦彦率军至扬州，自称“知淮南节度使事”，以毕师铎为行军司马。二十五日，杨行密率士卒17000人至扬州界，屯兵蜀冈，包围扬州。九月初四，秦彦杀死高骈。杨行密包围扬州数月，城内无食，秦彦、毕师铎自开化门出奔东塘，杨行密率军入扬州，自称淮南留后。

唐文德元年(888)四月，前蔡州节度使秦宗权部将孙儒攻占扬州，自称淮南节度使。杨行密奔还庐州。唐龙纪元年(889)六月，杨行密攻占宣州，唐廷以杨行密为宣歙观察使。此后，杨行密与孙儒反复争夺常、润二州，唐景福元年(892)二月，杨行密部将复占常、润二州。六月，杨行密部将田頵擒斩孙儒，孙儒余部多降于杨行密。二十五日，杨行密率军归扬州。

七月十四日，杨行密至扬州。以田頵守宣州，以安仁义守润州。杨行密自己着意治理扬州。此前，扬州“富庶甲天下”，时人称“扬一益二”(时人以为就富庶而论，扬州居第一，益州居第二)。然而，经过秦彦、毕师铎、孙儒、杨行密兵火之后，“江淮间，东西千里扫地尽矣”。杨行密遂于此后数年着意治理扬州：“能以俭足用，非公宴，未尝举乐。招抚流散，轻徭薄赋。未及数年，公私富庶，几复承平之旧。”

唐景福元年(892)八月，唐昭宗任杨行密为淮南节度使、同平章事(宰相衔)；以田頵为“知宣州留后”；以安仁义为润州刺史。

景福二年(893)八月，杨行密占歙州，十月，又得舒州。唐乾宁元年(894)至三年，杨行密先后占领黄、濠、寿、蕲、光州，据有淮南大部地区。

乾宁三年(896)七月，凤翔节度使李茂贞逼京师。此时，杨行密上表昭宗，请迁都江淮。而朱温则请昭宗迁都洛阳；王建请迁都成都。史称三人“皆欲迎天子，挟之，以令诸侯”。由此可知，此时杨行密已与朱温、王建分庭抗礼。

乾宁四年九月，朱温大举进攻杨行密。朱温遣部将庞师古率7万兵屯清口(楚州)，以攻取扬州；葛从周屯安丰县(在寿春东南60里)，以攻取寿州(治寿春)；朱温自率兵屯宿州(符离)。淮南震恐。杨行密与部将朱瑾率兵3万至楚州。十一月初二，朱瑾与侯瓒率5000骑渡淮水，从清口之北向南攻；杨行密亲率大军从清口之南向北攻。在淮南军南北夹击之下，大败朱温军，斩其大将庞师古及将士万余人，余众皆溃。葛从周闻庞师古败，遂逃奔淮北。杨行密击退朱温的大举进攻，“由是，遂保据江、淮之间，(朱温)不

能与之争"。唐天复二年(902)三月,唐昭宗拜杨行密为吴王,杨行密建立吴政权,国都为扬州。

唐天复三年(903)八月,杨行密部将田頵在宣州叛变;而杨行密部将、润州团练使安仁义也在润州举兵反杨行密。杨行密于当年十一月收复宣州,斩田頵。唐天祐二年(905)正月,杨行密收复润州,斩安仁义。吴国复有宣、润二州。当年二月,吴攻占鄂州。十一月,杨行密病死,庙号太祖。

杨行密死后,长子杨渥即位。后梁开平二年(908)渥死,其弟隆演立。后梁贞明五年(919)四月,杨隆演即吴王位,"建宗庙、社稷,设百官如天子之制",改年号为武义元年。六年,隆演死,其弟杨溥即吴国王位。后晋天福二年(937)九月,吴国灭亡。

杨行密死后,吴国又占领江、饶、洪、信、虔诸州,"于是,(吴)始尽有江西之地"。吴领有江淮28州,北起淮河,南至江西赣州以南;西自武汉、萍乡一线,东至无锡、歙县、上饶、长汀一线。　　(翁俊雄)

钱镠建吴越国

唐天复二年(902),钱镠建立吴越地方政权,都城在杭州,控制了太湖和浙江地区。北宋太平兴国三年(978)灭亡,存在76年。在吴越时期,太湖和浙江地区社会经济有显著的发展。

钱镠(852—932),杭州临安县(今属浙江)人,年轻时以贩卖私盐为生。唐乾符二年(876)石镜镇(杭州境内)镇将董昌招募乡兵,钱镠应募为乡兵,董昌拔钱镠为偏将。唐广明元年(880)周宝任镇海军节度使(兼任浙西观察处置使,领润、苏、常、杭、湖、睦六州。治所在润州)。周宝于杭州置8"都"统领乡兵,"临安都"由董昌主之,而钱镠为副。唐中和元年(881)董昌升为杭州刺史;钱镠为"都知兵马使",统领8都兵。

中和二年,浙东观察使刘汉宏率兵进攻杭州属县,屡被钱镠击败。唐光启二年(886)正月,钱镠攻拔越州,斩刘汉宏。镇海军节度使周宝,以钱镠"权知杭州军州事,兼杭州管内都指挥使";董昌权知越州。三年正月,唐僖宗任钱镠为"杭越管内都指挥使",充杭州刺史;董昌为越州观察使。唐龙纪元年(889)三月,钱镠占领苏州。唐景福二年(893)闰五月,唐昭宗任钱镠为"苏杭等处观察处置使"。

七月,钱镠使都兵及工徒20余万人筑杭州罗城,"自秦望山由夹城东亘江干,薄钱塘、霍山、范浦七十里"。

唐景福二年,越州董昌叛唐,自称皇帝,国号"大越罗平"。唐昭宗命钱镠讨伐董昌。唐乾宁三年(896)五月,钱镠攻占越州,斩董昌。十月,唐昭宗授钱镠领镇海、镇东等军节度使。唐原置镇海军于润州。然而,杨行密部将安仁义自景福元年(892)至天祐二年(905)任润州刺史。而唐廷于光化二年(898)二月应钱镠之请,徙镇海军于杭州。看来,此时已将镇海军徙于杭州。钱镠此时已据有杭、苏、越三州。

此后,钱镠先后攻占湖、明、睦、婺、衢、处、温、台等州,据有太湖和浙江地区。唐昭宗于天复二年(902)、天复三年(903)先后封钱镠为"越王"、"吴王"。天祐四年(907)五月,后梁太祖朱温晋封钱镠为"吴越王"。此后广陵(扬州)杨氏、西川王氏,南海刘氏皆"设百官如天子之制",他们亦劝钱镠称帝。钱镠笑曰:"此儿辈皆自坐炉炭之中,又踞吾于上邪!"却之不纳。诸国主亦无不以父兄事之。后梁龙德三年(923)后梁册封钱镠为"吴越国王",钱镠始建国。"仪卫名称多如天子之制"。后唐长兴三年(932)三月,钱镠病死,终年81岁。此后,其子元瓘、弘佐、弘倧、弘俶先后在位。后梁开运三年(946),钱弘佐发兵攻占福州。宋太宗太平兴国三年(978)五月,钱弘俶被迫向宋太宗"纳土",弘俶以下包括宗室、官员,"悉归京师",吴越亡。

吴越国,主要是钱镠在位期间,太湖、浙江地区社会经济有显著发展。

兴修水利　后梁开平四年(910)八月,于杭州城外濒浙江筑捍海石塘。上起六和塔,下抵艮山门外。塘外植"滉柱"(即在水坝外栽植数尺高的方形石柱)十余行,用以缓和海浪对堤坝的冲击。

同年,又于吴越北部置龙山、浙江两闸。浙江"江源自歙州界东北流经界石山,又东北经州治(钱塘县)北,又东北流入于海。江涛每日昼、夜再上,……小则水渐涨不过数尺;大则涛涌高至数丈"。筑两闸,用以控制江潮入海。

后梁乾化五年(915),在苏州设置"都台营使"主管水利。招募士卒曰"撩清军",在太湖旁设"撩清军"四部,共七八千人,治河筑堤,疏通太湖至海的水路。一路自太湖东经吴淞江入海;一路自太湖北向"急水港",下"淀山湖"入海。旱则引水种田;涝则引水出田。又在越州会稽县疏浚鉴湖(南湖)。

开垦荒田　后汉乾祐二年(949),钱弘俶在位,募民能垦荒者,听其垦荒,免其赋税,"由是,境内无弃田"。又置营田卒数千人,在淞江"辟地而耕"。

扩建杭州城　继唐景福二年筑杭州罗城之后,又于后梁开平四年(910),扩建杭州城,"大修台馆";

又筑子城，开二门，南曰“通越门”；北曰“只门”。史称，在杭州的水利工程和扩建城市之后，“钱塘富庶由是盛于东南”。

物产丰富　由于吴越的北面与西面邻吴，南面邻闽，三面受敌，因而钱镠一直向中原王朝称臣纳贡。钱镠临终嘱咐其子元瓘：“子孙善事中国（指中原王朝），勿以易姓，废事大之礼。”因而，吴越国始终向中原王朝称臣纳贡。从吴越向中原王朝缴纳的贡品中可知吴越经济繁荣、物产丰富。

后唐同光二年（924），钱镠向后唐进贡：金银器、秘色瓷器、吴绫、越绫、盘龙凤锦、白龙瑙红地锦被、银装花榈木橱、红藤龙凤箱等。后唐明宗天成三年（928），钱镠又向后唐进贡：白金 5,000 两、茶 27,000 斤。

后晋天福三年（938），钱元瓘向后晋进贡：金器 500 两、白金 10,000 两，吴越异纹绫 8,000 匹、金条纱 3,000 匹、绢 20,000 段、绵 90,000 两、大茶、脑源茶 24,000 斤。

后晋天福七年（942），钱弘佐向后晋进贡：银铤 5,000 两、绢 5,000 匹、丝 10,000 两。此外又贡：细纸、秘色瓷器、细甲弓弩箭、扇子、茶 25,000 斤、干姜 30,000 斤。

后周显德五年（958），钱弘俶分别于四、七、八月先后三次向后周进贡总计为：白金 20,000 两、绫绢 50,000 匹、细衣段 2,000 匹、龙舟、天禄舟各一艘，“皆饰以白金”。

北宋开宝九年（976），钱弘俶向北宋进贡白金 100,000 两、绢 50,000 匹。北宋太平兴国三年（978），又贡：金银器物 6,000 两、绫锦 10,000 疋、龙凤香等二万件。

从后唐至北宋开宝年的 50 余年中，吴越国向中原王朝进贡的物品，除了茶和干姜以外，均属手工业产品。其中以各种精美丝织品尤为突出。秘色瓷器，是当时重要的新产品。细纸、精制木橱、藤箱也反映了吴越地区手工业生产水平的提高。吴越地区贡品数量之大是隋唐五代史书中仅见的。尤其值得注意的是，愈到后来数量愈大。以金银而论，后唐同光年间贡白金 5,000 两，而至北宋开宝年间贡白金 10 万两；后晋天福年间贡金器 500 两，至北宋开宝年间则贡金银器物 6,000 两。天福以前贡绫绢数千匹，而至后周、北宋初年，动辄数万匹。这都说明：吴越国在其存在的 70 余年中，太湖、浙江地区的社会经济，特别是手工业有了长足的发展。　　（翁俊雄）

高季兴割据荆南

唐昭宗天佑三年（906）十月，高季兴为荆南节度使（治江陵）留后。后唐同光二年（924），后唐庄宗封高季兴为南平王，从此，高季兴遂割据荆南。高季兴据有荆（江陵）、归、峡三州。乾德元年（963）二月，北宋吞并荆南。

高季兴（858—928）（原名季昌，后为避后唐祖讳，乃更名。），陕州峡石县（今河南三门峡南）人。少为汴州富人朱友让家僮。朱温为宣武节度使（治汴州）时，高季兴经朱友让推荐，被任命为毅勇指挥使。天复三年（903）因军功，唐昭宗命高季兴为宋州团练使。不久改为颍州防御使。天佑三年（906）十月，梁王朱温以高季兴代“荆南节度观察留后”贺瓌，从此，高季兴据有荆南。开平元年（907）四月，朱温即皇帝位，建后梁。五月，梁太祖朱温任高季兴为荆南节度使。荆南节度使原统领江陵府、澧、朗、峡、夔、忠、万、施、归等 8 府州。自唐僖宗、昭宗以来，为诸道蚕食，高季兴为荆南节度使时，只有江陵一城而已。由于兵火之后，井邑凋零，高季兴至任，“招辑抚绥，民皆复业”。

后梁乾化二年（912），高季兴“有据荆南之志”。扩建江陵外城，在西北面，复建“雄楚楼”（杜甫有“西北楼成雄‘楚’都”之句，因以为楼名。）和“望江楼”。“执畚锸者十数万人，将校、宾友皆负土相助”，可见其规模。高季兴造战舰 500 艘，赶造兵器、扩建军队。翌年八月，后梁封高季兴为渤海王。

由于原隶属于荆南节度使统辖的夔、万、忠、涪四州，被前蜀攻占，高季兴遂于乾化四年（914）正月，兴兵攻蜀，但被蜀兵击退。

同光二年（924）三月，后唐庄宗封高季兴为南平王。翌年九月，后唐伐蜀，后唐庄宗命高季兴为“西川东南面行营招讨使”，以配合伐蜀，并允许在其攻占夔、忠、万、归、峡五州后，将此五州隶属于荆南。然而，由于高季兴不敢出军，因而，此五州仍由后唐占领。十一月，后唐灭前蜀。同光四年（926），高季兴上表庄宗，求领夔、忠等五州，后唐庄宗不得已而许之。后唐明宗天成二年（927）二月，高季兴进一步向明宗要求：后唐朝廷不要任命此五州刺史，而由高季兴子弟充任，遭到拒绝。在这情况下，高季兴遣兵突入夔州州城，杀戍兵而强行占领。此时，适值后唐运蜀珍宝金帛 40 万，浮江而下，往京师。高季兴发兵在峡口拦截，杀押运者 10 余人，尽掠其珍宝金帛。后唐明宗大怒，发兵数万，从三面进攻江陵。后唐军队虽未攻下江陵，但却收取夔、忠、万三州。高季兴只有荆州

(江陵府)、归州、峡州之地。

由于与后唐关系破裂,高季兴遂于天成三年(928)六月,以荆、归、峡三州之地,向吴国王杨溥称臣。吴国王封高季兴为秦王。十二月,高季兴死,子高从诲即位。吴国王改任高从诲为荆南节度使。高从诲惧后唐再次进攻,遂于天成四年七月,请求楚王马殷为其向后唐明宗疏通,后唐明宗应允,遂任命高从诲为荆南节度使。长兴三年(932)二月,后唐明宗赐高季兴爵为渤海王。应顺元年(934)后唐闵帝改封高从诲为南平王。

后晋天福六年(941),高从诲向后晋进贡金器、绫绢;天福十二年(947),高从诲向后汉进贡金银器、锦罗。

这时,荆南地狭兵弱,夹在吴、楚之间。南汉、闽皆臣服中原王朝,每年向中原王朝进贡物品,多路经荆南。自高季兴,至高从诲,经常邀留其贡使,乘机掠取其贡物。如遇南汉、闽为此而兴兵,即将贡物退还,"而无惭色"。其后,南汉与闽先后称帝,只有荆南高氏,"所向称臣",从而能获得赐物。"故诸国贱之,皆目为'高赖子',又曰'高无赖'。"

后汉乾佑元年(948)十一月,高从诲死,子高保融即位。十二月,后汉授高保融"荆南节度、荆归峡观察使"。

广顺元年(951)正月,后周太祖郭威即帝位,建后周。高保融贡白金、法锦。周太祖封高保融为渤海郡王。

建隆元年(960)正月,宋太祖赵匡胤称帝,建宋朝。高保融惧,"一岁三入贡于宋"。八月,高保融死,弟高保勖即位。建隆三年十一月,高保勖死,高保融长子高继冲即位。宋太祖授高继冲荆南节度使。乾德元年(963)二月,宋太祖派遣枢密副使李处耘平荆南。李处耘率轻骑数千至江陵,高继冲降于宋朝。北宋平荆南,得3州府(江陵府、归、峡二州)、17县、143,300户。　(翁俊雄)

朱温建后梁

唐僖宗中和二年(882)九月,黄巢任命的同州防御使朱温,背叛农民起义军,投降唐朝。此后,朱温在唐末藩镇相互攻战中,先后占领河南、河北诸州郡,成为当时兵力最强大的藩镇。天祐四年(907),朱温利用南衙(以宰相为首的朝臣)、北司(掌握禁军的宦官)的矛盾,劫持唐昭宗入洛阳。数月后,杀死昭宗,废年幼的昭宣帝(哀帝),自立为皇帝,改国号为大梁。从此,中国历史进入"五代十国"时期。后梁于同光元年(923)为后唐所灭,存在了16年。

朱温(赐名全忠,即帝位前自更名晃)(852－912)砀山县(今属安徽)人。父早死,随母寄住萧县刘崇家。参加黄巢起义,是农民军的重要将领之一。黄巢建立农民政权,任朱温为同州防御使。唐河中节度使王重荣多次进攻同州,朱温兵力不支,屡上表请求黄巢增援,不得。遂叛变起义军,投降王重荣。朝廷任朱温为同华节度使。十月,朝廷以朱温为右金吾卫大将军、河中行营招讨副使,赐名全忠,令其征讨起义军。中和三年(883)二月,朝廷以朱温为宣武军节度使。不久,黄巢被迫撤出长安,与秦宗权(唐蔡州节度使,投降黄巢)连兵进围陈州。七月朱温至汴州。唐僖宗又命朱温为东北面招讨使。四年春,朱温与农民军"大小凡四十战",迫使黄巢、秦宗权解陈州之围,朱温遂入陈州。不久,朱温率军归汴州。

河东节度使李克用奉唐僖宗诏配合诸军围剿黄巢起义军,五月遂与朱温合军,在中牟县(属郑州)北王满渡大败起义军,迫使起义军残部向东撤走。李克用班师过汴州,朱温在汴州的上源驿,设宴款待李克用,李克用大醉。入夜,朱温命甲士围而攻之。当夜大雨,雷电交加,李克用在电光中逾城墙逃回晋阳(太原)。其部下300余人皆被朱温杀害。从此朱、李二人,有如水火。

六月中,黄巢在狼虎谷(山东莱芜境内)死,起义军失败。秦宗权自解陈州围后,率众归蔡州。秦宗权有众数万,不断派将出兵,攻陷邻近州郡,于唐僖宗光启二年(886),接连攻占汝、洛、许、郑、孟等河南州郡。河南道只有宋、亳、滑、颍四州仅能闭垒防守而已。秦宗权的军事行动,对汴州的朱温构成重大威胁,于是朱温也加紧了军事活动。十一月,朱温乘滑州内乱占领了滑州。光启三年二月,又先后占领淄、棣二州。四月,朱温粉碎了秦宗权部将张晊以数万兵力对汴州的大举进攻,从而声威大振。而秦宗权在大败之后,被迫放弃郑州,而其控制的汝、洛、许、孟等州的部将大为"恐惧,咸弃之而遁"。唐僖宗文德元年(888)二月,朝廷又任朱温为蔡州四面行营都统,"由是,诸镇之师,皆受其节度"。三月,唐僖宗死,昭宗即位。龙纪元年(889)二月,秦宗权被部下囚禁,并被缚送给朱温。朱温派人将秦宗权押解至长安,被斩于独柳树下。昭宗为奖赏朱温平蔡之功,加朱温"检校太尉、兼中书令,晋封东平王"。

大顺元年(890)六月,昭宗又命朱温为宣义军节度使、充河东东面行营招讨使,令其配合朝廷讨伐晋阳李克用。十月,朱温在滑州,遣使至魏州,请求魏博

节度使罗弘信准其率军通过魏境以攻晋阳。魏博节度使罗弘信以为朱温别有用心，遂加以拒绝，并与李克用通好。大顺二年正月，朱温率军打败罗弘信，迫其请和。从此，朱温集中兵力攻占河南、河北州郡。从大顺二年八月至乾宁四年(897)正月，先后攻占宿、曹、濮、徐、郓、兖、海、沂、密等河南诸州。光化元年(898)，昭宗以朱温兼领天平军节度使。此后，朱温接连占领洺、邢、磁、德、瀛、莫等河北中部、南部之大部州郡。“由是，河朔知惧，皆弭服焉”。朱温势力的发展，为其染指长安奠定了基础。

此时唐廷内部南衙(唐朝的政权机构在长安的皇城内，而宫城在其北面。朝臣在皇城办公，因而以“南衙”喻朝臣。宦官在宫城活动，因而以“北司”喻宦官。)、北司的矛盾日益尖锐起来。宦官掌握禁军(左、右神策军)的指挥权，因而十分跋扈。唐昭宗深恶宦官跋扈，常与宰相崔胤、王抟等密谋铲除宦官。朝臣、宦官各自的力量都较单薄，各自连结藩镇以为后盾。宰相崔胤与朱温串通；左军中尉宦官刘季述等则勾结长安附近的凤翔节度使李茂贞、同华节度使韩建等。双方争夺的目标集中在唐昭宗身上。

光化三年(900)十月，左军中尉刘季述、右军中尉王仲先、枢密使王彦范、薛齐偓等密谋：主上轻佻多变诈，很难侍奉他。他专听南衙的官员，我们终不免受祸。不如立太子为帝，尊主上为太上皇，引岐州李茂贞、华州韩建，有他们的兵援，谁能够害我们！十一月，昭宗夜间酒醉，手杀宦官、侍女数人。翌日天明，宫门不开。刘季述对崔胤说：“主上所为如是，岂可理天下！废昏立明，自古有之。为社稷大计，非不顺也。”崔胤怕死，不敢违。刘季述矫诏令太子李裕嗣位，更名缜，以昭宗为太上皇。数日后，崔胤秘密致书朱温，使其举兵图谋昭宗反正。十二月，刘季述由于畏惧朱温，遂遣养子刘希度见朱全忠，许以唐社稷给朱全忠。朱温犹疑不定，其部下李振认为，如果与宦官串通，会被人看轻，今后“无以令诸侯”。朱温遂决定使昭宗反正，并秘密派人与崔胤联系。天复元年(901)正月，崔胤令侍卫将军孙德昭等诛杀刘季述、王仲先、王彦范、薛齐偓等20余人，并使昭宗反正。昭宗封朱温为东平王，后改为梁王，“酬反正之功也”。不久，凤翔节度使李茂贞来朝，将凤翔监军、宦官韩全海、张彦弘举荐给昭宗，昭宗任二人为左、右军中尉。李茂贞将亲信宦官安排好后，归凤翔。朱全忠于此后占领河东道之绛州、晋州、河中府、沁州、泽州。五月，昭宗以朱温为宣武、宣义、天平、护国四镇节度使。六月，朱温入河中府。当时李茂贞、朱温各有挟天子以令诸侯之意，李茂贞欲昭宗至凤翔；朱温则欲昭宗至洛阳。宰相崔胤欲尽诛宦官，事泄，情况紧急，遂致书朱温，声称奉密诏令朱温以兵来迎驾。事实上，昭宗的态度并非如此。九月昭宗对宰相韩偓说：朱全忠来清君侧，是大忠。但是应让他与李茂贞共同立功。你传我的话给崔胤，赶快飞书两镇，让他们共同策划才好。事实是昭宗担心被朱温一手控制。十月，朱温大举兵，从汴州出发。十一月，朱温率四镇兵七万，占领同州，逼进长安。此时，韩全海劫持昭宗奔凤翔(今属陕西)。而同华节度使韩建降朱温，朱温占领华州。数日后，朱温入长安。接着，朱温率军至凤翔，屯军于城东。李茂贞登城对朱温说：天子避难，并非我对主上无礼。不要听谗言。朱温说：韩全海劫持天子，今来问罪，迎驾还宫。你如果未参与其事，为何由你出来说话！昭宗屡诏朱温还镇，朱温才撤军。朱温乘势占领邠州。攻占周至县。天复二年(902)二月，朱温率军归河中府。五月，朱温在崔胤的请求下，率精兵五万从河中府出发。六月，在虢县大败李茂贞，死者万余人。接着朱温进军至凤翔城下，以兵包围凤翔城。朱温分兵占领坊、鄜二州，关中诸州镇皆归朱温，李茂贞坐守岐州孤城。李茂贞“乃密谋诛宦官以自赎”。李茂贞致书朱温：祸乱之出，全由韩全海造成。我迎驾至此，以防其他别有用心的人。你既然志在匡复社稷，就请你迎驾还宫。我愿以兵力为你效劳。朱温回书：我举兵至此，正是为了护驾还宫，你能协助，正是我所希望的。三年正月李茂贞谒见昭宗，请诛韩全海等，与朱全忠和解，奉驾还京城。昭宗命凤翔兵收韩全海等二十余人，斩之。昭宗出凤翔城，至朱温营。朱温见昭宗，顿首流涕，昭宗命宰相韩偓扶起。昭宗对朱温说：“宗庙社稷，赖卿再安，朕与宗族，赖卿再生。”于是，昭宗返回长安。朱温至长安，立即将宦官第五可范等数百人尽杀死，只留幼小者30人以备洒扫。唐后期猖獗百余年的宦官势力，从此退出历史舞台。

天复三年(903)二月，昭宗赐朱温号“回天再造竭忠守正功臣”。崔胤依仗朱温之势，专权自恣，昭宗动静皆禀告朱温。朱温以部将为左军宿卫都指挥使、宫苑使、皇城使、街使，“于是，全忠之党布列遍于禁卫及京辅”。之后，朱温归汴州。朱温自六月至九月，先后攻占青、登、莱、密等河南州郡，“由是，东渐至海，皆为梁土(朱温治所汴州，亦名‘大梁’)”。朱温早已萌发篡夺之心，此时时机已经成熟，欲将昭宗从长安迁至洛阳。为防止宰相等作梗，遂命令护驾都指挥使朱友谅，矫昭宗命，将宰相崔胤、京兆尹郑元规诛

杀。另派人至长安迎昭宗，昭宗不得已而从之。天祐元年(904)正月，昭宗至陕州，朱温自河中来，何皇后泣曰："自今大家(指昭宗)夫妇委身全忠矣！"朱温辞昭宗归镇后，昭宗以绢诏告急于李克用、王建、杨行密诸节度使，令他们合力以图匡复，曰："朕至洛阳，则为所幽闭，诏敕皆出其手，朕意不复得通矣！"并有意不行。四月，朱温使牙将"即日促官家(指昭宗)发来！"路上，昭宗的侍从"击球供奉"、"内园小儿"等200余人，皆被朱温使人杀死，另选200余人大小相类者替代。"自是上之左右职掌使令，皆全忠之人矣。"闰四月，昭宗入洛阳。八月，朱温令枢密使蒋玄晖、龙武牙官史太等杀死昭宗。蒋玄晖矫诏立辉王李祚为皇太子，更名柷。又矫诏皇太后令：太子于柩前即位，是为昭宣帝(谥号哀帝)，时年13岁。天祐二、三年(905、906)朱温与淮南、河北等诸镇征战不已，最后"河北诸镇皆服"，因而，于907年二月，迫使唐昭宣帝逊位。"于是，朝臣、藩镇乃至湖南、岭南上笺劝进者相继"。三月九日朱温更名晃，表示放弃唐朝皇帝所赐"全忠"之名，从而与唐朝彻底绝裂。十一日，朱温在汴州大梁(开封)即皇帝位。十五日，大赦，改元开平，国号大梁，以汴州大梁(河南开封)为都城。朱晃即后梁太祖。后梁疆域：西自陕西西安，东至于海；北自晋南、邢台、德州一线，南至长江中游及淮河一线。　(翁俊雄)

王建建前蜀国

前蜀国为王建所建。王建在据有西川、东川、山南西道，即今四川广大地区以后，于后梁开平元年(907)即皇帝位，建立蜀国，即中国历史上的"前蜀"地方政权。后唐同光三年(923)灭于后唐。

王建(847—918)，许州舞阳县(今属河南)人，少时以贩私盐为生，后为"忠武军"士卒。忠武军节度使(治所在许州)杜审权提拔王建为小校。黄巢入长安，唐僖宗逃向成都。监军使杨复光在河中府(山西永济)以鹿晏宏所率忠武军8,000人编成8"都"。每都设一都头，领4人。王建与鹿晏宏皆为都头。杨复光在河中死，鹿晏宏率八都兵入蜀。西行至兴元府(陕西南郑)，逐节度使牛勖，自称"留后"。中和四年(884)王建与晋晖、韩建、张造、李师泰各率一都至成都，僖宗大喜，将之隶属于观军容使田令孜。田令孜以王建为假子，光启元年(885)，僖宗返长安，以王建、晋晖等隶神策军，充宿卫。

由于河中节度使王重荣与观军容使田令孜争盐池之利(田令孜主张以河中盐池收入充中央军饷，因而触犯了河中地方的利益)，因而有隙。王重荣遂勾结河东节度使李克用，使李克用率河东兵犯京师，唐僖宗出奔兴元府。王建"负玉玺以从行"。及至兴元，僖宗命王建遥领壁州刺史。不久，王建出为利州刺史。光启三年(887)，王建召募无业游民及彝族部落为兵，有众至8,000人。遂沿嘉陵江南下，攻占阆州(以上梁、壁、利、阆州皆属山南西道)，逐其刺史，自称防御使。王建在阆、利二州"养士爱民，以观天下之变"。

在唐廷的观军容使田令孜，因与河中节度使王重荣有隙，必须离开长安，以缓和矛盾。田令孜的同母弟陈敬瑄时任西川节度使(治成都)，因而求为西川监军使。田令孜遂离开长安至成都。陈敬瑄与东川节度使顾彦朗有隙，担心王建与陈敬瑄关系过密，遂与田令孜谋。田令孜是王建的假父，因而主张召王建至西川，以疏远其与顾彦朗的关系。王建得书简，即选精兵二千及从子宗鐬、假子宗傜、宗弼、宗侃、宗弁等驰往成都。此时，西川参谋李乂对陈敬瑄说："王建，虎也，奈何延之入室？"陈敬瑄大悟，急遣人阻止王建来成都。王建时已至鹿头关(四川绵竹南)，闻讯大怒，破鹿头关而进，攻占德阳、雒县(汉州之治所)。文德元年(888)三月，昭宗即位。东川节度使顾彦朗与西川节度使陈敬瑄有隙、与王建通好，因而上表昭宗：请赦王建罪，移陈敬瑄于他镇，"以靖两川"。六月，昭宗罢陈敬瑄西川节度使，以韦昭度充西川节度使，兼"两川招抚制置使"，来蜀替代陈敬瑄。其时，王建已进占益州新都县，并收编当地土豪私人武装，扩大了队伍。七月，韦昭度至成都城下，陈敬瑄不受代。十二月，昭宗以韦昭度为行营招讨使，以顾彦朗为行军司马。割邛、蜀、黎、雅四州置永平军，以王建为永平军节度使(治邛州)，以王建充行营诸军都指挥使，以讨伐陈敬瑄。龙纪元年(889)十二月至大顺元年(890)十月，眉、简、资、嘉、戎、雅、邛、蜀等州，皆降于王建，王建"持永平旌节入邛州"。大顺二年八月，田令孜以西川节度使印牌授王建，陈敬瑄开城迎降王建。王建入成都，自称西川留后。王建据有西川。十月，唐廷废永平军，以王建为西川节度使。

大顺二年(891)九月，东川节度使顾彦朗死，弟顾彦晖知留后。十二月，唐廷以顾彦晖为东川节度使(治今四川三台)。凤翔节度使李茂贞部将阆州刺使杨守亮攻梓州，顾彦晖求救于王建。王建欲乘机杀彦晖以夺取东川，遂遣兵至梓州。王建兵虽击退杨守亮，但他欲杀彦晖的密谋泄露，因而与顾彦晖结怨，从此王建屡兴兵攻东川。从乾宁元年(894)十二月起

至三年正月,王建先后占领阆、蓬、渠、果、通等山南西道之各州,从而使东川节度使治所梓州处于东、西两面受敌之势。乾宁四年(897)九月,王建进围梓州。十月,顾彦晖自杀,王建入梓州,遂据有东川。光化三年(901)唐昭宗赐王建为琅邪王,翌年,晋封为西平王。

天复二年(902)二月,王建又得利州。八月攻占兴元府(梁州,今陕西南郑,为山南西道节度使治所),山南西道节度使李继密投降。由于此前王建已占领山南西道大部州,此后,又占领渝、洋、兴等州,因而,王建继占领东川之后,又占领山南西道。

天复三年十月,王建又占领夔、忠、万、施四州,"于是,并有三峡之地"。天祐二年(905)王建又占山南东道之金、均二州。

后梁开平元年(907)四月,朱温建后梁。九月,王建在成都即皇帝位,国号大蜀,即历史上的前蜀地方政权。

后梁贞明元年(915)十一月,蜀兵北伐陇右,先后占领阶、成二州。秦州节度使李继崇请降。不久,蜀兵攻占凤州。贞明四年(918)六月,蜀高祖王建死。

史称:"是时,唐衣冠之族多避乱在蜀,帝礼而用焉,使修举政事,故典章、文物有唐之遗风。"

王建死,子王衍即帝位。同光三年(923)九月,后唐庄宗李存勗遣魏王李继岌、大将郭崇韬率六万大军攻蜀,迅速占领凤、兴、文、扶四州。十月,东川剑、绵、梓,山南西道洋、壁、蓬、通、渠,荆南夔、万忠等州望风而降。十一月,李继岌至成都,王衍"白衣、衔璧、牵羊、草绳系首"降后唐。后唐出师以至克蜀仅用70日。后唐得蜀节度使10,州64,县249。

（翁俊雄）

王审知建闽国

闽国,为王潮、王审知所建。开平三年(909)四月,后梁太祖朱温封王审知为闽王。闽国有福、建、泉、漳、汀五州。开运二年(945),闽国为南唐所灭。

王潮(?—898)光州固始县(今属河南)人。其父王恁是大地主。在唐末农民大起义中,江淮地区也纷纷起义。寿春(安徽寿县)屠者王绪,聚众数万,占寿、光二州。当时,王潮为县小吏,与其弟王审知皆投王绪。王绪任王潮为军正,掌粮仓。蔡州节度使秦宗权势力膨胀,王绪以寿、光二州附秦宗权,秦宗权任其为光州刺史。秦宗权一度投降黄巢,并与黄巢联合反唐,后又背叛。秦宗权命王绪会兵袭击黄巢起义军,王绪迟留不进,秦宗权遂发兵攻王绪。王绪率众南奔,过长江,经浔阳(江西九江),沿赣江,进入福建汀(长汀)、漳(漳浦)、泉(泉州)三州境内。行至泉州南安县,王潮发动兵变,迫王绪自尽,自为帅。光启二年(887)八月,王潮占领泉州。福建观察使郑镒上表唐廷,以王潮为泉州刺史。景福二年(893),王潮占领福州,自称留后。不久,又占领建、漳、汀三州,王潮乃尽有福建五州之地。九月,唐昭宗以王潮为福建观察使。乾宁三年(896)九月,唐廷升福建为威武军,以王潮为威武军节度使(治福州)。乾宁四年十二月,王潮死,弟王审知(862—925)自称留后。

史称:王潮在福建"创四门义学;还流亡;定租税;遣吏巡州县,劝课农桑;交好邻道,保境息民。人皆安焉"。

光化元年(899)十月,唐昭宗以王审知为威武军节度使。天复二年(902),王审知筑福州外罗城40里。天祐二年(905),又筑福州内城,周26里。

有人劝王审知称帝,他说:"我宁为开门节度使,不做闭门天子也。"然而,开平三年(909)四月,后梁太祖朱温封王审知为闽王,王审知只好接受。王审知虽为国王,据有一方,但生活却极朴素。所居"府舍卑陋,未常葺居";他的衣衫破败,"乃取酒库酢袋而补之";他的足下"恒常蹑麻履"。史称在他治理下,"宽刑薄赋,公私富实,境内以安"。开平四年,王审知"大浚侯官县西湖,广至四十里,灌溉民田无算"。发展对外贸易,"招来海中蛮裔商贾,资用以饶"。闽国冶炼也很发达,"泥金银万余两,作金、银字《四藏经》各五千四十八卷"。王审知"好礼下士,唐公卿子弟多依以仕宦"。又扩充四门学"以教闽中秀士"。

后唐同光三年(925)十二月,闽王王审知死,庙号太祖。其长子王延翰即王位。天成元年(926)十月,王延翰自称大闽国王,立宫殿,置百官,"威仪、文物皆拟天子制"。王延翰骄淫奢侈。当年十二月,王审知养子、建州刺史王延禀、王审知次子、泉州刺史王延钧合兵攻福州,执王延翰而杀之。王延钧为威武军留后。

天成二年(927),后唐明宗以王延钧为威武军节度使,封琅邪王。翌年七月,后唐晋封王延钧为闽王。后唐长兴四年(933)王延钧即皇帝位,国号大闽。后唐清泰二年(935)王延钧死,子王昶即位。

后晋天福四年(939)闰七月,"控鹤军使"连重遇与王审知第28子王延羲发动兵变,杀死王昶,王延羲即位,自称威武军节度使、闽国王。天福五年十一月,后晋朝廷以王延羲为威武军节度使,晋封闽国王。天福六年七月,王延羲自称大闽皇。

开运元年(944)三月,“拱宸都指挥使”朱文进、“阁门使”连重遇,合谋杀死闽皇王延羲。王延羲之弟王延政,时任建州节度使,原与其兄王延羲结仇,遂于天福八年(943)于建州称帝,建国,国号大殷,与闽对峙。由于朱、连二人杀其兄,朱文进称帝于福州,王延政遂派兵进攻福州。开运元年(944)十二月,闽之故臣在福州发动兵变,杀死连重遇、朱文进,遣使至建州迎殷国主王延政。王延政因南唐入侵,暂缓迁都福州。

南唐国主李璟,欲乘机灭闽,遂于开运二年(945)发兵攻占建州,闽帝王延政降南唐。汀、泉、漳州相继降南唐。闽国灭亡。

闽国亡后,开运三年南唐主以李弘义为威武军节度使(治福州),以王崇文为永安军节度使(治建州),以董思安为漳州刺史,以王继勋为泉州刺史。不久,泉州都指挥使留从效废王继勋,南唐以留从效为泉州刺史。由于威武军节度使李弘义对南唐有戒心,拒绝应召入朝,南唐主李璟遂发兵攻福州,命泉州刺史留从效会兵助攻福州。

李弘义遣使至杭州,请吴越王钱弘佐派兵支援,吴越国发兵三万救福州。吴越军击败南唐军,占领福州。留从效对南唐也有戒心,遂撤军归泉州,并将南唐兵遣回杭州。留从效从此割据泉、漳二州。

(翁俊雄)

刘隐、刘陟建南汉国

南汉国为刘隐、刘陟兄弟所建。后梁贞明二年(916),刘陟于番禺(广东佛山)即皇帝位,国号大越。翌年十一月,改国号为“汉”,是为南汉。南汉据有岭南(今广东、广西省)之地。开宝四年(971)被北宋灭亡。

刘隐(874—911)上蔡(今属河南)人。父刘谦为广州牙将。唐乾符五年(878),黄巢起义军攻破广州,旋即北上湘湖之间。岭南节度使(治所在广州)郑续上表朝廷,任刘谦为封州刺史、贺江镇遏使。刘谦有兵万人、战舰百艘。乾宁元年(894)刘谦死,时任岭南节度使(此后又称清海军节度使)刘崇龟,以刘谦长子刘隐为“右都押牙”兼“贺江镇遏使”。未几,升任其为封州刺史。光化三年(900),时任清海军节度使徐彦若表刘隐为清海军节度副使,掌岭南军政。天复元年(901)冬,徐彦若死,刘隐为清海军节度使“留后”。

天复二年,唐虔州刺史卢光稠攻岭南,占韶州,以其子卢延昌为韶州刺史。开平二年(908)八月,楚王马殷遣步军都指挥使吕师周率兵攻岭南,占领昭、贺、梧、蒙、龚、富6州。

十月,后梁太祖朱温以刘隐为清海军节度使。唐僖宗乾符年间,在容州置宁远军节度使,以庞巨昭为节度使;在高州置高州防御使,以刘昌鲁为防御使。刘隐为清海军节度使,高、容二州不服从,转而投附楚王马殷。楚国遂发兵攻占高、容二州。

后梁开平四年(910),梁太祖朱温封刘隐为南海王。后梁乾化元年(911)三月,刘隐死,弟刘陟(889—942,初名岩,后改名龚,又改名䶮)即位。

史称:当时天下已乱,中原王朝士人,多往岭南避乱,而唐朝在近300年中,往往将获罪名臣贬斥岭南,他们的子孙都留在岭南。刘隐“皆招礼之”。后梁使者赵光裔、李殷衡,刘隐也“留而不遣”,加以重用,“后卒用此数人致治”。

乾化元年四月,后梁太祖朱温以刘陟为清海军节度使。十二月,刘陟出兵收复在天复二年失去的韶州;又收复于开平二年失去的高州、容州。

后梁在邕州置建武军,贞明元年(915)后梁以刘陟为清海(治广州)、建武(治邕州,今广西南宁)军节度使,刘陟身兼二镇。

刘陟因后梁封钱镠为吴越国王,因而请求后梁朝廷封己为南越王,被朝廷拒绝。于是,在后梁贞明二年即皇帝位于番禺(广东佛山),国号大越。翌年十一月,改国号为“汉”,是为南汉。刘陟庙号高祖。

史称:刘陟在位“始立学校,置选部”,开科举,每年录取进士、明经十余人。

后晋天福七年(942)三月,刘陟死,第三子刘弘度即帝位。刘弘度“骄奢,不亲政事”,被其弟刘弘熙使力士杀死。翌年二月,刘弘熙即帝位。

南汉乾祐元年(948)南汉国发兵攻楚国,收复被其占据的贺、昭二州。后周广顺元年(951)十月,南汉国乘南唐攻灭楚国之机,发兵攻占其桂、连、宜、梧、严、富、柳、龚、象等州。至此,“南汉始尽有岭南之地”。

后周显德五年(958),刘弘熙死,长子刘钻即位。开宝四年(971),南汉国被宋朝灭亡。宋朝凡得60州,240县,170,263户。　(翁俊雄)

李存勖建后唐

沙陀人李克用之子李存勖于同光元年(923)四月,在魏州即皇帝位,国号大唐,年号同光,是为后唐。十月,后唐灭后梁,迁都于洛阳。李存勖即后唐庄宗。后唐至清泰三年(936)为后晋所灭,存在13年。

李克用(856—908),沙陀部人(本为唐初薛延陀

族，后迁徙于北庭。北庭有沙碛名"沙陀"，时人将迁至此者称为沙陀人。后来，沙陀人入居代州以北），姓朱邪氏。其父名赤心，被朝廷任命为朔州刺史。唐懿宗咸通年间，赤心因讨庞勋有功，晋升为金吾上将军，并赐姓李，名国昌。庞勋被平定后，李国昌任振武节度使，其子李克用（856—908）任云中牙将。唐僖宗乾符三年（876）云州士卒哗变，赶走云中节度使段文楚，拥李克用为帅。李克用请求朝廷授云中防御使官爵，遭拒绝。朝廷为此事，征诸道兵讨伐他。

僖宗广明元年（880）十月，黄巢起义军攻潼关，僖宗令河东监军使陈景思为"代北起军使"。至云、蔚等州招募士卒以平定起义军。十二月，黄巢入长安，僖宗逃入蜀，陈景思至雁门县，命李友金（李克用之族父）发沙陀诸部5000骑南下。中和元年（881）二月，李友金率军至绛州。绛州刺史瞿正对陈景思说："巢贼方盛，不如且还代北，徐图利害。"四月，李友金率军回雁门县，瞿正亦至代州。半月之间，募兵3万，屯驻于代州崞县之西。其军皆沙陀众，不娴军法，瞿正、李友金不能控制。李友金对陈景思说："今军虽数万，苟无善帅，进亦无功。"建议奏请任李国昌、李克用父子为帅。僖宗以李克用为雁门节度使，使统沙陀众。

中和二年（882）十月，李克用率代、蔚、朔、忻之军35000骑南下。十二月，至河中府（山西永济）。中和三年二月，自夏阳（今山西、陕西、河南交界处）渡黄河，屯军于乾坑店（陕西大荔西）。黄巢部将尚让、林言等引军15万屯于梁田陂。翌日，两军大战，农民起义军大败。当夜，起义军退守郑县（华州治所）。数日后，李克用于昭应县零口镇又打败尚让，迫使起义军放弃华州，李克用进军渭桥。四月，黄巢被迫撤出长安东走。李克用率军入长安。七月，朝廷授李克用河东节度使。不久，李克用率军至河东节度使治所晋阳县。"李克用自此以晋阳为争天下根本"。

十二月，宣武节度使朱温、陈州刺史赵犨等因黄巢与秦宗权合军，军势甚盛，请李克用出兵协力征讨。中和四年（884）春，李克用率蕃、汉之军5万南下，于河中府渡黄河，至汝、洛二州界。四月，李克用与宣武节度使朱温、感化军节度使时溥合军在太康县打败尚让，斩获万计。五月，李克用与朱温在中牟县王满渡又大败起义军，迫使黄巢率残部东走。

是月，李克用班师过汴州，朱温迎劳于封禅寺，请李克用休憩于府第，而以其从官300余人及监军使陈思景安顿于上源驿。入夜，朱温设宴于上源驿，将李克用及从官灌醉，以兵围攻传舍。是时，大雨雷电交加，李克用在电光之中，登尉氏门，缒城而出，得还本营。监军使陈景思等300余人皆被杀害。李克用收兵归晋阳。李克用多次上表僖宗，请削夺朱温官爵，并准许自以本军讨伐。僖宗令李克用"且全大体"，不准兴师讨伐。

邠宁节度使朱玫、凤翔节度使李昌符进攻河中府。光启元年（885）十月，河中节度使王重荣遣使请李克用出兵助战。李克用上表僖宗："李昌符、朱玫挟邪忌正、党庇朱温。臣已点检蕃、汉军15万，取来年渡河，先斩朱玫、李昌符，然后平荡朱温。"十二月，李克用引军渡黄河，大败朱玫于沙苑（陕西大荔北），朱玫逃入长安。时京师大骇，僖宗为避李克用兵锋，逃至凤翔。李克用退入河中府。光启二年（886）正月，僖宗驻跸宝鸡，李克用自河中遣使上表称：大军只诛凶党，请僖宗还京师。宦官田令孜请僖宗迁至兴元府，李克用遂挥师返晋阳。光启三年六月，河中节度使王重荣被部将杀害，李克用上表请以王重荣兄王重盈为河中节度使。文德元年（888）二月，僖宗自兴元府还长安。三月，僖宗死，昭宗即位。

李克用以河东晋阳为根本，又控制了河中府，进一步向河北发展。李克用在昭宗龙纪元年（889）六月至大顺元年（890）正月间，占领河北道之磁、洺、邢三州。朝廷于五月，削夺李克用官爵，以宰相张浚为招讨使，各镇配合征讨李克用。李克用控制的潞州发生内乱，被朱温夺走。九月，李克用派兵收复潞州、晋州和绛州，唐军大败。大顺二年（891）正月，李克用遣使上表："臣今身无官爵，名是罪人，不敢归陛下藩方，且欲于河中寄寓，进退行止，伏俟指麾。"昭宗无奈，复其河东节度使等官爵，使其归晋阳。昭宗乾宁元年（894）十二月，李克用为报复卢龙节度使节匡筹数次进犯河东，进军幽州，其大将请降，李克用占领幽州，"幽州军民数万以麾盖歌鼓迎李克用入府舍"。李克用命李存审、刘仁恭将兵略定幽州镇所属幽、涿、瀛、莫、妫、檀、蓟、顺、营、平、新、武等州。乾宁二年二月，李克用上表朝廷，以刘仁恭为卢龙留后，留兵戍之，李克用还晋阳。

六月，李克用率蕃、汉兵自晋阳赴长安，讨伐凤翔节度使李茂贞、邠宁节度使王行瑜、同华节度使韩建之乱。这是由于河中节度使王重盈死，其子王珂是李克用之婿，在李克用的支持下继为节度使，并得到昭宗的准许。而王之兄王瑶、王珙与之争位，取得凤翔、邠宁、同华三镇的支持，三节度使率兵入长安，请昭宗任王瑶为河中节度使，而降王珂为同州节度使，昭宗被迫答应。而李克用为支持王珂，从而保住河中

府的控制权，遂兴师问罪。李克用大军将至，李茂贞假子、右军指挥使李继鹏欲劫昭宗至凤翔；而邠宁节度使王行瑜之弟、左军指挥使王行实欲劫昭宗至邠州。两军相攻，纵火烧内宫门，烟火蔽天。王行瑜、李茂贞各声言迎驾，带兵前来长安。昭宗惧，逃入终南山，驻跸莎城。李克用率蕃汉兵攻同州，昭宗遣使赐其诏书，令李克用与王珂共同讨伐王行瑜、李茂贞。昭宗在密旨中说：我担心他俩勾结在一起。现暂时姑息李茂贞，令他与你修好。等除掉王行瑜，然后再商议下一步。于是，李克用在打败王行瑜（寻被其部下杀死）后，遂班师。昭宗封李克用为晋王。不久，昭宗返长安。乾元三年（896）六月，李茂贞又举兵进犯长安。七月，昭宗逃至华州。光化元年（900）正月，李茂贞、韩建致书于李克用，表示结好，共拥王室，李克用同意。

当月，朱温派兵占领李克用的泽州。四月，朱温部将葛从周，占领李克用控制的邢、洺、磁三州。八月，昭宗自华州还长安。此后，朱温又占领河北道德、瀛、莫等州。天复元年（901）正月，朱温协助宰相崔胤使昭宗反正，因而被昭宗封为东平王，后改为梁王。此后，朱温接连夺取李克用的晋、绛二州和河中府，李克用之婿、河中节度使王珂被朱温徙于汴州，史称：李克用“霸业由是中否”。而朱温势力膨胀，在迁昭宗于洛阳后，又将其杀害。立昭宣帝，又于907年二月逼昭宣帝逊位，自己于开封即皇帝位，建立后梁，年号开平。开平二年（908）正月，李克用病死于晋阳，其子李存勗（885—926）即晋王位。

三月，后梁太祖亲率军至泽州（唐昭宗光化元年正月朱温占领泽州），欲攻占潞州，得知李克用死，留兵在泽州，自归洛阳。四月，晋王李存勗对部将说：汴人知我有丧，以为我不会兴师；又以我年少，不习戎事，必有骄怠之心，如乘机击骄惰之师，必收摧枯拉朽之效。解围定霸，在此一役。于是，进军至潞州北黄碾村下营。五月，大败梁军，梁招讨使康怀英率百余骑，出天井关而遁。梁太祖闻败，叹曰：“生子如是，李氏不亡矣。吾家诸子乃豚犬尔。”接着，李存勗命周德威乘胜收复泽州。

柏乡之役　开平四年（910）十一月，梁太祖欲兼并镇、定二州。成德节度使王镕领镇、定、易、赵、深五州，治所在赵州。王镕遂遣使请求晋王李存勗援救。李存勗乃遣周德威率军进屯赵州。梁太祖命王景仁为北面行营招讨使。王景仁进军屯于柏乡县（属赵州）。晋王李存勗亲率大军与周德威合军于柏乡县城下，有精兵7万人。乾化元年（911）正月，双方大战，梁军失败，李存勗入柏乡，占领赵州。这一战役，晋人获战马3000匹、铠甲兵仗7万、辎重锅幕不可胜计，擒梁将陈思权以下285人。梁人弃深、冀二州而逃。二月，李存勗归晋阳，留周德威戍赵州。后来李存勗将女嫁王镕幼子王昭诲，“由是晋、赵之交遂固”。

平定幽州　八月，幽州节度使刘守光叛晋，自称大燕皇帝。十二月，李存勗遣周德威、李嗣源率蕃、汉大军进攻幽州。乾化二年二月，梁太祖派兵支援刘守光。六月，梁太祖朱温被其子朱友珪杀死，朱友珪于洛阳即帝位。乾化三年二月，朱友珪被部将袁象先杀死，均王朱友贞在开封即位。十一月李存勗亲率大军占领幽州，刘守光逃遁，后被李存勗杀死。十二月，李存勗以周德威为卢龙节度使，悉有河北。后梁均王贞明元年（915），晋王李存勗因魏博镇内乱出兵占领魏州。六月，占领德州。贞明二年三月，卫州刺史米昭以城降李存勗。四至九月，李存勗收复磁、洺、邢三州（光化元年四月被朱温部将占领），并占领相、沧、贝等州，自是“河朔悉为帝（李存勗）所有”。

灭后梁　贞明四年（918）八月，晋王李存勗为灭后梁，在魏州举行大规模阅军仪式。周德威率幽州步、骑3万，李存审率沧景步、骑万人，李嗣源率邢洺步、骑万人，王处直率易定步、骑万人；麟、胜、云、蔚、新、武等州士卒；奚、契丹、室韦、吐谷浑诸部落兵；以及河东、魏博之兵皆来会师。十余万众，接受检阅。“部阵严肃，旌甲照耀，师旅之盛，近代为最”。贞明五年（919）晋王李存勗拔濮阳（今属河南）。贞明六年四月，河中节度使朱友谦与后梁均王有隙，与晋王李存勗通好。龙德元年（921）二月，成德节度使王镕被部将杀死，九月，李存勗攻占镇州。翌年，晋王李存勗兼领成德节度使。至此，存在160余年的幽州、魏博、成德的“河朔三镇”全部被李存勗吞并。公元923年四月，晋王李存勗在魏州牙城之南升坛，即皇帝位。国号大唐，是为后唐。改元同光。李存勗即后唐庄宗。后唐有13节度、50州。疆域：西起宁夏银川，东至海；北起河北张家口，南至湖北武汉、沙市以至淮河以北。

后唐同光元年（923）十月，后唐庄宗攻占开封，后梁末帝朱锽死。十二月，庄宗至洛阳，以洛阳为国都。同光三年，灭前蜀，据有今四川地区。

（翁俊雄）

马殷建楚国

楚国为马殷所建。天成二年（927）六月，后唐明宗封马殷为楚国王。楚国据有湖南以及广西、广东部

分地区。广顺元年(951)元月,被南唐灭亡。

马殷(852—930),许州鄢陵县(今属河南)人。唐僖宗中和年间为忠武军(忠武军节度使为秦宗权,治所在蔡州)士卒。马殷在忠武军指挥使孙儒、刘建锋麾下以勇敢闻名。孙儒战死淮南,刘建锋、马殷等乃收余众7,000人加以整编,以刘建锋为帅、马殷为先锋指挥使。此后转战江西道之豫章(南昌)、虔、吉等州,队伍不断壮大,有众至10万人。唐昭宗乾宁元年(894),进军湖南,攻占潭州(长沙),刘建锋自为"留后"。刘建锋乃庸人,"不能帅其下",军士杀建锋拥马殷为帅。乾宁三年九月,唐廷授马殷潭州刺史、判湖南军府事。唐光化元年(898)唐昭宗任马殷为武安军节度使(治所在长沙)。

是时,湖南管内有7州,除潭州以外,"皆以州人聚兵据都"。杨思远据衡州,唐世旻据永州,蔡结据道州,陈彦谦据郴州,鲁景仁据连州。马殷虽为"判湖南军府事",只据有潭州(湖南长沙)、邵州(湖南邵阳)二州而已。自光化三年(899)五月至二年十一月,马殷先后攻占衡、永、郴、连、道等5州,洞庭湖"湖南悉平"。

同年十月马殷派遣部将李琼、秦彦晖率兵攻占桂、宜、岩、柳、象(皆属广西)5州。

开平元年(907)四月,后梁太祖朱温封马殷为楚王。六月,楚王马殷派遣部将秦彦晖攻占岳州。二年五月,秦彦晖又攻占朗州。澧州刺史来降。至此,洞庭湖以东、以西地区亦归马殷占有。

九月,楚王马殷遣步军都指挥使吕师周伐岭南,与清海节度使刘隐多次激战,取其昭、贺、梧、蒙、龚、富(皆属广东)6州。楚王马殷"土地既广,息民礼士,湖南遂安"。

湖南在马殷治理之下,手工业、商业和经济作物有很大发展。开运元年六月,湖南判官高郁,请准民自采茶卖于北客。楚王马殷从之。七月,马殷向后梁朝廷进奏:于汴、荆、襄、唐、郢、复各州置"回图务"。运茶于河南、河北卖之,以易缯、纩和战马而归。"湖南由是富赡"。楚王马殷每年向后梁贡茶25万斤。后唐同光年间,楚王马殷"免关市之税",因而,"四方商旅闻风辐凑",都来湖南贸易。又铸铅钱、铁钱在境内流通,由于湖南以外皆用铜钱,商人得铅、铁钱无用处,迫使他们"辄易他货而去。故能以本土所余之物,易天下百货,国以富饶"。湖南原只产麻,"不事桑蚕"。楚王马殷"令输税者,以帛代钱",于是,境内桑蚕发展起来,"由是机杼大盛"。

天成二年(927)六月,后唐明宗封马殷为楚国王。八月,马殷建楚国,在长沙"立宫殿,置百官,皆如天子制"。

后唐长兴元年(930)十一月,马殷死,次子马希声袭位,"去建国之制,复藩镇之旧"。至长兴三年七月,马希声死,马殷第四子马希范袭位,后唐任马希范为"武安军节度使"。后唐应顺元年(934)后唐闵帝复封马希范为楚王。后晋十二年(947)五月,马希范死,马殷第35子马希广继王位。

当年十二月,楚王马希广之兄马希萼自镇所朗州来奔丧。马希广对马希萼存戒心,命希萼的"将士释甲而后入",后又不允希萼入见,希萼愤然而去。从此,兄弟相争,兵戎相见。

后汉乾祐元年(950)十二月,南汉攻占楚国贺、昭二州。翌年八月,马希萼悉调朗州丁壮为兵,号"静江军",造战舰700艘,进攻潭州,但被楚军击败。

乾祐三年九月,马希萼请求后汉朝廷许其别置"进奏务"于京师,意欲从楚国独立出去,后汉不许。马希萼认为后汉朝廷偏袒马希广,大怒,遣使至杭州,向南唐李璟称臣,并请派军支援。十月,楚王马希广派遣刘彦瑫为朗州行营都统,率兵入朗州境。但被马希萼击败。十一月,马希萼攻占长沙,赐马希广死。马希萼自称楚王。后周广顺元年(951)三月,南唐封马希萼为楚王。

六月,马希萼部将朗州静江指挥使王逵叛,从长沙逃归朗州,向后唐求旌节,后唐不许,遂向后周称藩。

九月,楚王马希萼被部将徐威囚禁。徐威立马希崇为"武安军留后"。南唐国主李璟命大将边镐率兵万人自袁州攻占长沙,楚国灭亡。 (翁俊雄)

孟知祥建后蜀国

孟知祥于后唐清泰元年(934)正月于成都即皇帝位,国号蜀,即后蜀地方政权。后蜀据有西川、东川及山南西道(时称"三川")前蜀之全境,即今四川广大地区。至开宝四年(971)正月,灭于北宋。

孟知祥(874—934),邢州龙冈(河北邢台西南)人。其父孟道是晋王李克用部将,孟知祥任"亲卫军使"。李克用以弟李克让女下嫁孟知祥。李克用死后,李存勖即皇帝位,建立后唐。李存勖庙号庄宗。庄宗以太原府(晋阳)为北京,以孟知祥为太原尹、北京留守。

任西川节度副使 后唐魏王李继岌奉诏伐前蜀,以郭崇韬为招讨使。郭崇韬临行对庄宗说:"即臣等平蜀,陛下择帅以守西川,无如孟知祥者。"不久,

唐兵破蜀，以孟知祥为剑南西川节度副大使。

阴有王蜀之志　后唐天成元年(926)四月，庄宗死，明宗立。孟知祥训练甲兵，阴有王蜀之志。七月，开府库，得铠甲20万具。于是，除原有军队之外，扩编义胜、定远诸军，凡16营，共16,000人，屯驻成都牙城内外。增置左、右冲山等6营，凡6,000人，屯驻于成都罗城内外。又置义宁等20营，凡16,000人，分屯成都附近各州县。又置左、右牢城4营，凡4,000人，分戍成都境内。又置左、右飞棹兵6营，凡6,000人，分戍滨江各州，习水战，以加强对水路的控制。

后唐太仆卿赵季良奉命将蜀府库贮存之200万缗输之洛阳，并征西川赋税入京师。孟知祥大怒，说："府库，他人所聚，输之可也。州县租税，以赡镇兵十万，决不可得(输)。"赵季良只好发蜀府库之金帛入洛，不敢调发蜀之赋税。孟知祥割据之志日益显露。

合纵反唐　魏王李继岌还洛阳后，后唐宰相安重诲认为西川节度使孟知祥、东川节度使董璋，据险拥兵，久将难制。于是，派遣李严为西川监军使、朱宏昭为东川节度副使，以钳制他们。孟知祥怒李严之来，李严甫至成都，即被孟知祥斩首。朱宏昭闻讯，借故也溜回洛阳。一计不成，又生一计。安重诲于天成三年(928)九十月间，派遣夏鲁奇为武信军节度使(治遂州，属东川)；以武虔裕为绵州刺史(属东川)；又割阆、果二州(属山南西道)置保宁军，以李仁矩为节度使。这样，就对东川节度使(治今四川三台)形成了三面的包围。当时又盛传唐廷不久又要割绵、龙二州为节镇。这使董璋极为不安。董璋本来与孟知祥不协，然而，在大敌当前之下，只好与西川通好，合纵以拒唐。长兴元年(930)二月，孟知祥与董璋联名上表明宗："闻朝廷于阆中建节，绵、遂益兵，无不忧恐，请罢还所遣节度、刺史。"

七月，董璋使人对后唐朝廷表示："朝廷更发一骑入斜谷，吾必反！"不久，朝廷又遣荀咸乂率兵戍阆州，董璋遂反唐。九月，西川进奏官苏愿从洛阳回成都，对孟知祥透露："朝廷将发兵讨两川。"孟知祥遂与董璋共同举兵反后唐。

九十月之间，董璋先后攻占阆、利、合、巴、蓬、果等州(皆属山南西道)。自长兴元年十一月至长兴二年二月，孟知祥遣兵攻占泸、渝、涪、黔、忠、万、夔州(除泸州属东川以外，均属山南西道)，并控制了三峡。在长兴二年正月，孟知祥遣部将李仁罕攻占遂州(属东川)。

占据东川、山南西道　四月，唐明宗杀宰相安重诲，将兴兵两川之责归罪于他。孟知祥想乘机罢兵，欲与董璋联名上表谢罪。董璋怀疑孟知祥出卖自己，不允，并有"窥西川之志"。五月，董璋发兵攻陷西川之汉州，得而复失。孟知祥在收复汉州之后，命大将赵廷隐进攻东川。不久，董璋被部将杀死，赵廷隐遂占领梓州(东川节度使治所)。"是役也，凡得(董)璋梓、绵、龙、剑、普、果、阆、蓬、渠九城(州)。"至此，孟知祥除西川以外，又得东川(梓、绵、龙、剑、普州)、山南西道(阆、蓬、渠、果州)以及三峡(夔、忠、万州)地区。

长兴四年(933)后唐明宗以孟知祥为剑南东、西两川节度使，晋封蜀王。

建立后蜀　长兴四年十一月，唐明宗死。后唐清泰元年(934)正月，孟知祥于成都即皇帝位，国号蜀，即后蜀地方政权。七月，蜀高祖孟知祥死，子孟昶即帝位。

后汉乾祐元年(948)四月，后晋秦、凤、阶、成四州(皆属陇右道)刺史相继降蜀。后蜀"悉复前蜀王氏疆土"。

自孟知祥为蜀王以后，二三十年没有大的战事，后蜀经济繁盛。乾祐三年，蜀帝孟昶游浣花溪，御龙舟，观水嬉。史称："时百姓富饶，夹江皆创亭榭，都人士女倾城游玩，珠翠罗绮，名花异卉，馥郁十里，望者有若神仙之境。"孟昶对左右说："(长安)'曲江金殿锁千门'，殆未及此。"兵部尚书王廷珪赋诗曰："十字水中分岛屿，数重花外见楼台。"

后周广顺二年(952)十月，蜀帝下诏：刻《经》于石。秘书郎张绍文写《毛诗》、《礼记》、《仪礼》，秘书省校书郎孙朋古写《周礼》，国子博士孙逢吉写《周易》，校书郎周德政写《尚书》，简州平泉县令张德昭写《尔雅》，"字皆精谨"。石经的刻成，是后蜀在文化上的重大建树。

后周广顺三年(953)五月，后蜀宰相毋昭裔出私财百万，营建学馆。且请刻板印《九经》，以颁州县，"由是蜀中文学复盛"。

后蜀灭亡　宋乾德四年(966)，后蜀秦、凤、阶、成四州被北宋占领。开宝四年(971)正月，宋军大军压境，蜀后主孟昶投降宋朝。北宋自兴师至灭蜀，凡66日，得后蜀州45，府1，县198，户534,039。

(翁俊雄)

石敬瑭建后晋

沙陀人石敬瑭于后唐长兴七年(936)，以割地、纳贡、称臣为条件，被契丹主耶律德光册封为大晋皇

帝。石敬瑭即后晋高祖。后迁都于汴州大梁城(河南开封)。后晋至开运四年(947)被契丹灭。仅存在9年。

石敬瑭(892—942),沙陀部人。其父臬捩鸡曾为李国昌、李克用父子部将。后又因随后唐明宗(李嗣源)征战有功,而屡任大镇节帅。后唐长兴四年(933)十一月,明宗死,子李从厚即位。清泰元年(934)四月,明宗养子王从珂夺取帝位。石敬瑭复任太原节度使(治所于晋阳县)。从此,石敬瑭以太原为根据地,谋夺中原。石敬瑭"尽收其货在洛阳及诸道者归晋阳,托言以助军费。人皆知其有异志"。后晋天福元年(936)五月,石敬瑭在晋阳反,上表称:"帝(指王从珂)为养子,不应承祀,请传位许王(许王李从益为明宗李嗣源子)。"后唐朝廷削夺石敬瑭官爵,发兵讨伐之。

六月,石敬瑭遣使向契丹主耶律德光请求救兵,令桑维翰草表称臣于契丹主,且请以父礼待耶律德光,约事捷之日,割卢龙一道及雁门关以北诸州给契丹。刘知远谏曰:"称臣是可以的,自贬为儿太过分了。给他们金帛可以,不必给他们土地。这会成为中国的大患,后悔不及。"石敬瑭不听。九月,耶律德光率5万骑,号30万,自扬武谷(山西代县附近)而南,旌旗不绝50里。耶律率军至晋阳,陈兵于汾水北虎北口。石敬瑭出晋阳城北门,与耶律德光相见。数日后,石敬瑭与耶律德光会兵,将后唐张敬达军5万人包围在晋安寨(太原西南"晋祠"之南),包围圈长百余里、厚50里,多设铃索、吠犬,使人寸步难逾。不久,卢龙节度使赵德钧率幽州兵出现于契丹军背后,而耀州防御使潘环纠合西路戍兵,一出晋、绛二州;一出慈、隰二州,共救晋安寨。耶律德光移帐于柳林(晋安寨之南)。

在柳林,耶律德光对石敬瑭说:"看你外貌和胆识,真似中原之主。我要立你为天子。"契丹主遂作册书,命石敬瑭为大晋皇帝。筑坛于柳林。于是,石敬瑭即皇帝位,改后唐长兴七年为天福元年(936),建立了后晋政权。石敬瑭以前约,割幽、蓟、瀛、莫、涿、檀、顺、新、妫、儒、武、云、应、寰、朔、蔚16州即山西北部和包括今北京市在内的河北北部地区给契丹。并许每年输帛30万匹给契丹。

卢龙节度使赵德钧,虽扬言率军以解晋安寨之围,但却欲乘乱夺取中原,并想"倚契丹取中国",因而,距晋安寨百里时,即按兵不战。派其子赵延寿至契丹营帐,对耶律德光说:若立吾为帝,吾即引兵南平洛阳,而石敬瑭可常镇河东。耶律德光欲许赵德钧之请。石敬瑭得讯,竟跪于帐前,"自旦至暮,涕泣争之",迫使耶律德光拒绝赵德钧之请。

晋安寨被围数月,"刍粮俱竭",难以支撑。张敬达部将杨光远杀害张敬达,率晋安寨诸将降于契丹。

晋安寨投降后,石敬瑭与耶律德光将引兵南下。南下前,耶律德光命石敬瑭任桑维翰为宰相、以晋安寨降将杨光远为侍卫马步军都指挥使。并命石敬瑭任石敬瑭养子石重贵为河东节度使,留守晋阳。

耶律德光以其部将高谟翰为前锋,率契丹兵及后唐晋安寨降兵在团柏(山西长治以北),与后唐军大战,唐将赵德钧、赵延寿父子先逃遁,后唐"士卒大溃,相腾践死者万计"。洛阳闻团柏兵败,居民四出,逃窜山谷。赵德钧、赵延寿南奔潞州。石敬瑭与耶律德光至潞州,赵德钧、赵延寿父子出降。在潞州(山西长治)石敬瑭将率军南攻洛阳,耶律德光对石敬瑭说:我暂时留在此,等你的消息,有紧急情况就下山(指太行山)救你。你如果占领洛阳,我就北返。数日后,石敬瑭率军入洛阳,"唐兵皆解甲待罪"。后唐末帝王从珂此前已于玄武楼自焚而死。

天福三年(938)七月,石敬瑭以冯道为太后册礼使;刘煦为契丹主册礼使至契丹。石敬瑭(时年45岁)奉表称臣,称契丹主耶律德光(时年35岁)为"父皇帝"。耶律德光骄倨,小不如意,辄遣使来指斥,石敬瑭"常卑辞谢之"。然而,原许每年输帛30万匹,"往往托以民困,不能满数"。其后,耶律德光屡止石敬瑭上表称臣,但令自称"儿皇帝"。此时,耶律德光遂改国号为大辽,时天福三年(938)。

十月,石敬瑭因汴州大梁舟车所会便于漕运,遂以大梁城(开封)为东京(即国都)。以洛阳为西京,以长安为"晋昌军"。

后晋疆域:北自银川、雁门关、海河一线,与辽国接壤,南至长江中游、淮河一线;西起银川、天水一线,东至于海。　　(翁俊雄)

徐知诰建南唐

南唐是徐温的养子徐知诰建立的。后晋天福二年(937)十月,徐知诰篡夺吴国政权,于金陵(今南京市)即皇帝位,改国号为唐,即南唐。北宋开宝九年(976)正月,南唐为宋所灭。

徐知诰原名李昪(888—943),徐州彭城(今江苏徐州)人,世微贱。唐乾宁二年(895),被杨行密收为养子,但为杨行密诸子所不容,杨行密遂使大将徐温收养,冒姓徐,名知诰。

后梁开平二年(908),杨渥死,杨隆演继为吴王,

大将徐温专政。徐温自镇广陵(扬州);以徐知诰为升州(治今南京)防遏使。不久,徐知诰任升州刺史,治理金陵。修建金陵"治城市府舍甚盛"。

后梁贞明三年(917)五月,徐温至金陵,见城市府舍甚盛,爱其繁富,遂留金陵,迁徐知诰为润州团练使。贞明四年六月,徐温子徐知训,在扬州被平卢节度使朱瑾杀死。朱瑾怒知训暴虐,故杀死他。而吴王杨隆演因畏惧徐温,故拒绝承担责任,迫使朱瑾自杀。徐知诰闻扬州乱,从润州引兵渡长江至扬州。徐温"乃以知诰代知训执吴政",徐温自己"总吴朝大纲"而已。

后梁贞明五年(919)四月,在徐温劝进之下,杨隆演即吴国王位,"建宗庙、社稷,置百官,宫殿、文物皆用天子礼"。加徐温"大丞相、都督中外诸军事"等官爵。八月,徐温以吴国王隆演名义遣使与吴越王钱镠通好,"自是,吴国休兵息民,三十余州民乐业者二十余年。"贞明六年五月,杨隆演死,其弟杨溥即吴国王位。后唐天成二年(927)徐温死。徐知诰将徐温另一子徐知询从金陵召入扬州,并将金陵兵征调扬州,徐知诰"自是始专吴政"。

后唐长兴三年(932),徐知诰扩建金陵城,扩建后的金陵城周围20里。又以其子景通镇守金陵。后唐清泰元年(934),徐知诰又在金陵大建私人住宅,并从扬州移居金陵私宅。徐知诰的这些举措,皆为其篡夺政权、迁都做准备。迫于形势,吴国王杨溥于后晋天福二年(937)二月,遣使至金陵,册封徐知诰为齐王。徐知诰更名"诰",去"知"字,以示不与徐氏兄弟排名。九月,吴国王杨溥命江夏王杨璘奉玺绶至金陵(不久,杨溥被迁至润州丹阳宫)。十月初五,齐王徐诰即皇帝位于金陵,改元"升元",改国号为唐,复姓李氏。史称:徐知诰"自为吴相,兴利除害,变更旧法甚多",实行轻徭薄赋,减轻百姓负担,"由是江、淮间,旷土尽辟,桑柘满野,国以富强"。

后晋天福八年(943)二月,李诰病死,长子李璟即位。李璟在位期间,先后派兵攻打湖南和福建(闽国),并将闽国灭亡。但,得而复失。后周广顺二年(952),李璟因多年出师无功,乃议休兵息民。有人对他说:"愿陛下数十年不用兵,可小康矣。"李璟说:"将终身不用,何数十年之有!"后周广顺元年(951)南唐乘楚国内乱之机,灭了楚国。

后周显德三年(956),周世宗亲征淮南。此后至显德五年,后周夺得南唐江北10州。当年三月,李璟遣使献江北尚未被后周占领的4州。至此,南唐淮南、江北所有14州土地皆入于后周。五月,李璟去帝号,改称"国主","凡天子仪制皆从降损"。

北宋建隆元年(960)三月,南唐国主李璟遣使向宋朝进贡绢2万匹、银万两,贺宋太祖赵匡胤即皇帝位。建隆二年二月,宋太祖迁李璟于洪州(南昌),以李璟子李从嘉为太子,留金陵监国。六月,李璟死,李从嘉继为国主,更名为"煜"。开宝八年(975)三月,吴越攻占常州。六月,宋师及吴越兵联军围润州,南唐守将刘澄以城降。十一月,宋师及吴越军攻陷金陵。开宝九年正月,南唐后主李煜至宋朝汴京(开封)。宋太祖御明德楼,李煜以下"白衣纱帽至楼下待罪",南唐灭亡。太平兴国三年(978)七月,李煜死。

(翁俊雄)

刘知远建后汉

刘知远于天福十二年(947)二月在晋阳即皇帝位。六月入大梁城(开封),改国号为汉,仍用后晋天福年号。以汴州(治所大梁城)为东京(即国都)。史称"后汉"。后汉广顺元年(951)正月为后周所灭,仅存在4年。

刘知远(895—984)(后改名曰暠),沙陀部人。其先世居沙陀,后移居太原。刘知远与石敬瑭均为李存勖之偏将。李存勖建后唐,石敬瑭为太原节度使(治所在晋阳),刘知远为其部将。石敬瑭建后晋,刘知远任陕州节度使。天福六年(941)刘知远改任北京(太原)留守、河东节度使。七年六月,石敬瑭死,其子石重贵即位,是为晋出帝。晋出帝加刘知远"检校太师",寻又晋其位中书令。

后晋开运元年(944)正月,契丹耶律德光攻后晋。天福十二年(947),耶律德光攻入后晋都城大梁,迁晋出帝至黄龙府。二月,耶律德光御崇元殿受朝,改晋国为大辽国。刘知远自晋阳遣牙将王峻奉表于耶律德光。耶律德光赐诏褒美,呼刘知远为儿,又赐木拐(契丹贵臣方得此物)。及王峻归晋阳,刘知远得知契丹政乱,而中原无主,乃议建国。十五日,刘知远于太原宫(晋阳)即皇帝位,即后汉高祖。

三月,耶律德光以萧翰为宣武军节度使,留守大梁,自率军北还。耶律德光在北归路上,病死于栾城。耶律德光侄兀欲即位,是为辽世宗。

五月,刘知远以舅刘崇为北京留守,自率军从太原南下,辽宣武节度使萧翰弃城北归。六月,刘知远至大梁城,后晋文武百寮相次奉迎。十五日,后汉高祖下诏:"凡契丹所除节度使,下至将吏,各安职任,不复变更。"改国号曰汉。仍用后晋天福年号。以汴州(治所大梁城)为东京(即国都)。乾祐元年(948)正

月，刘知远自更名曰暠。27日刘知远病死，庙号高祖。二月，子刘承祐即帝位，即后汉隐帝，时年18。三年十一月，后汉隐帝在镇压郭威叛乱中为乱兵所杀。后周广顺元年(951)正月，后晋被后周灭亡。后汉仅存在4年。（翁俊雄）

郭威建后周

后汉乾祐三年(950)十一月，后汉隐帝被乱兵杀死。广顺元年(951)正月，郭威率兵入大梁城(开封)即皇帝位，建国后周。

郭威(904—954)，邢州尧山(今河北隆尧)人。三岁时，家徙太原。后唐庄宗李存勗灭后梁，郭威时为军中马夫。天福元年(936)石敬瑭在晋阳起兵反唐，建后晋。郭威任侍卫马步都虞候，跟随石敬瑭左右。天福十二年(947)正月，契丹耶律德光攻占大梁城，灭后晋。郭威劝刘知远称帝。二月，刘知远在晋阳即皇帝位，建后汉。任郭威为“枢密副使、检校司徒”。乾祐元年(948)正月，后汉高祖刘知远病死，子刘承祐即帝位，是为隐帝。郭威受命辅佐隐帝。时郭威为枢密使，加检校太尉。

三月，河中节度使李守贞与永兴节度使赵思绾、凤翔节度使王景崇同反。二年七月，郭威攻下河中(今山西永济)，平定三镇叛乱。三年三月，郭威任邺都(今河南安阳)留守，河北诸州事，皆由郭威节度。

十一月，后汉隐帝忌杀功臣杨邠、史宏肇，又密令邺都“行营马军都指挥使”郭崇威等杀郭威及监军使王峻。迫使郭威起兵南下以灭后汉。20日，隐帝率军陈于刘子陂(今河南封丘县之南)。两军交战，后汉军败，隐帝败归大梁城。城门守将刘铢拒开城门，隐帝不得已向西北方向逃遁，在赵村，被乱兵杀死，后汉亡。27日郭威率大军至大梁城外皋门村。

广顺元年(951)正月，郭威入大梁，御崇元殿，即皇帝位，以周为国号。郭威即后周太祖。

（翁俊雄）

刘崇建北汉

乾祐三年(950)十一月，后汉隐帝被杀，郭威建立后周王朝，刘崇也于晋阳即帝位，建立后汉割据政权。北宋太平兴国四年(979)为北宋所灭，存在28年。

刘崇，称帝后更名旻(895—954)，沙陀部人，是后汉高祖刘知远之舅。天福十二年(947)正月，刘知远在晋阳称帝，建后汉，任刘崇为太原尹。乾祐元年(948)正月，刘知远死，隐帝即位，刘崇升任河东节度使。乾祐三年十一月，隐帝被杀，刘崇谋举兵。乾祐四年正月，郭威于大梁城即皇帝位，建立后周王朝。刘崇于晋阳称帝，仍用乾祐年号，建北汉政权。后汉割据政权控制河东道并、汾、忻、代、岚、宪、隆、沁、辽、麟、石诸州，即今山西省大部地区。刘崇致书辽世宗兀欲，表示“愿循晋室故事，求援北朝”。辽世宗与刘崇“约为父子之国”，刘崇致书辽世宗，自称“侄皇帝”。

九月，辽国内乱，辽世宗被杀，耶律德光子述律即位，刘崇遣使贺即位。“复以叔父事之”，并请辽国出兵击后周之晋州。”是时，(后汉)内供军国，外奉契丹，赋役繁重，民不聊生，逃入周境者甚众。”

显德元年(954)后周太祖郭威死，养子柴荣即帝位，即周世宗。刘崇闻郭威死，遣使于辽，谋大举伐周。辽大将杨衮率“铁马”万骑及奚诸部兵五、六万人至晋阳。刘崇自率兵三万与辽合军出团柏(山西长治以北)。三月，进逼潞州。后在泽州高平，被周军击败，刘崇与杨衮率残部北归。

四月，后汉太原府(治晋阳)周围的沁、汾、宪、岚、忻、辽等州守将相继降后周。周兵又占石州。五月，周世宗至太原，以兵包围晋阳。然而，周师“百计攻之不能克”，加以连日大雨，士卒多病，只得班师。十一月，刘崇病死，次子刘承钧即位。

显德七年(960)北宋灭后周。北宋太平兴国四年(979)五月，北汉被宋朝灭亡。（翁俊雄）

周世宗的改革

周世宗于显德元年(954)即位后，击退北汉与契丹的联合进攻。此后进行了政治、经济和军事上的改革，加强了国力，收复了契丹在后晋时占领的部分州县，因病未能收复所失全部州县。

周世宗柴荣(921—959)，邢州龙冈(河北邢台西南)人，为郭威养子。乾祐二年(949)郭威镇邺都，柴荣为天雄军牙内都指挥使。三年冬，郭威率军南下攻后汉，留柴荣守邺都。广顺元年(951)正月，郭威在大梁即帝位，建后周。三年正月，柴荣至大梁。三月，柴荣官授开封尹，晋爵晋王。显德元年(954)正月，后周太祖郭威病故，柴荣即帝位，是为周世宗。

前此在晋阳称帝的北汉主刘崇，闻郭威死，欲乘机灭后周，遂遣使至辽，请求辽派兵支援。二月，刘崇自率兵3万与辽大将杨衮所率五六万援兵，经团柏南攻潞州。三月，北汉、辽联军进逼潞州。周世宗从大梁出兵北上向泽州。刘崇陈兵高平县(山西长治北部)南之高原。18日，周军至泽州。周世宗观兵于晋

城(泽州治所)之东北郊,距州城 15 里。19 日,周世宗得知刘崇自率骑兵 3 万,辽大将杨衮率万余骑东西陈列,以待周军,遂令白重赞、李重进所部为左翼,居阵之西厢;樊爱能、何徽所部为右翼,居阵之东厢。向训、史彦超以精骑居中。周世宗亲自临阵督战。两军交锋不久,樊爱能、何徽弃阵逃遁,东厢骑军乱、步军解甲降敌。周世宗乃自率亲骑驰于阵前,先犯其锋,战士皆奋命争先,北汉军大败。阵前斩北汉大将张晖等。诸将分兵追袭,尸体、弃甲填满山谷。北汉主刘崇、辽大将杨衮逃归晋阳。入夜,周军至高平县,所获辎重、兵器、驼马等不可胜纪。高平大捷后,周世宗斩樊爱能、何徽等临阵脱逃之将校 70 余人。"由是,骄将堕兵,无不知惧"。周世宗率师至潞州。四月,周世宗亲征北汉。五月至晋阳城下。由于晋阳防守严密,久攻不下。六月,周世宗挥师归大梁。

周世宗在击退北汉和辽的联合进攻、取得高平之战胜利之后,为巩固政权、收复幽云 16 州,进行了一系列改革。

经济改革。由于战乱,百姓逃亡,人口流动很大,因而各地出现了很多无主土地。显德二年(955)正月,周世宗下诏:准许百姓承佃逃户庄田,使荒田得以耕种。显德五年七月,周世宗下诏均定天下赋税。周世宗入夜读书,见唐同州刺史元稹所撰《长庆集》中有其所上《均田表》,慨然叹曰:"此致治之本也,王者之政自此始!"于是下诏,将元稹《均田表》,"制素成图,直书其事"。颁其图法,"使吏民先习知之。期以一岁大均天下之田"。元稹于唐穆宗长庆 2—3 年为同州刺史。他在上穆宗《均田表》中,详述当州赋税不均,集中于极少数土户身上,而大量外来客户和隐户没有任何负担。因而改变赋税征收办法,将赋税合理分摊在所有民户身上。看来,周世宗所谓在一年内大均天下之田,实际是均天下赋税。当年十月,周世宗"遣左散骑常侍艾颖等均定河南六十州税赋"。

兴修水利。显德六年(959)二月,征发河南各州丁夫疏浚汴河,使汴州至淮河的水路得以畅通;疏浚五丈河,并使之"东流于定陶,入于济水",沟通汴州至青州间的水路;又疏导蔡河,使汴州至颍州水路畅通。这样,就使以汴州为中心向东、向东北、向东南三个方向的水路畅通无阻。

政治改革。周世宗"留心政事,朝夕不倦"。为了探讨"治平"之道,显德二年,周世宗提出《为君难为臣不易论》、《平边策》两个题目,命翰林学士徐台符以下 20 余人每人各撰论策一篇,提出"君臣治平"和"混一天下"的见解。周世宗"及览其策,欣然听纳",坚定了统一全国的意志。显德四年十月,周世宗整顿科举制度,并恢复了久已停废的"制科"考试,确定了"贤良方正能直言极谏"、"经学优深可为师法"、"详娴吏理达于教化"三科。规定:无论有无官职,无论资历深浅,虽"黄衣草泽,并许应诏"参加考试,以网络人才。

整顿军队。长期以来藩镇牙兵跋扈,而且老弱者多,每遇大敌,不走即降。然而,由于他们已成势力,累朝相承,因而镇帅务求姑息,不欲裁减,恐伤人情。周世宗"因高平之战,始知其弊"。高平战役后,周世宗除严肃军纪,军法处斩临战脱逃将校 70 余人外,决心整顿禁兵(过去的牙兵,近来成为禁兵)。"乃命大简诸军,精锐者升之上军,羸弱者斥去之"。又命招募天下壮士,选其尤壮者,"为殿前诸班";"其步骑诸军,各命将帅选之"。这样,不仅普遍提高了军队的战斗力,而且产生了一支勇猛强壮的禁军。史称:"由是士卒精强,近代无比,征伐四方,所向皆捷,选练之力也。"

访求图书。显德三年(956)十二月,周世宗下诏:"史馆所少书籍,宜令本馆诸处求访补填。"并抽调朝官 30 人,据现有书籍,务求真本,进行校勘。校勘后,署校官姓名。并逐月将工作进度申报中书、门下省。周世宗自己常夜间读书,均天下赋税的决定,就是在阅读元稹《长庆集》中得到启发的。显德二年二月,后周兵部尚书张昭呈上《制旨兵法》一书,分为 10 卷,42 门。这是周世宗下诏兵部撰集而成,因而名之曰《制旨兵法》。周世宗下诏撰兵法一书,表明他对军事理论的重视,为"混一天下"做准备。

周世宗的一系列改革措施是与统一全国的举措同时进行的。

西取秦、成四州。后汉天福十二年(947),契丹耶律德光灭后汉,雄武节度使何重建,以其秦、阶、成三州降蜀。此后,蜀又取凤州。显德二年(955)三月,秦、凤州民户"怨蜀之苛政,相次诣阙,乞举兵收复旧地"。五月,周世宗出兵讨伐,至八月,收复秦(甘肃天水)、阶(甘肃成县)、成州(甘肃徽县)、凤(陕西凤县)四州。

攻占淮南州县。周世宗于显德二年十一月,命将出师,进攻南唐。周世宗三次亲征。到显德五年(958)春,后周尽得南唐江北、淮南土地,计有光(河南潢川)、黄(湖北黄冈)、蕲(湖北蕲春)、舒(安徽舒城)、寿(安徽寿县)、庐(安徽合肥)、滁(安徽滁县)、和(安徽和县)、濠(安徽凤阳)、泗(江苏盱眙)、楚(江苏淮安)、海(江苏连云港)、泰(江苏泰州)、扬(江苏

扬州)等 14 州,60 县,226,574 户。淮河以南、长江以北地区,尽入后周。

北收三州三关。在取得淮南 14 州、解除了后顾之忧的翌年,即显德六年(959)二月,周世宗下诏北征,以收复石敬瑭割给契丹的幽、云 16 州。

天福十二年(947)三月,耶律德光死于栾城,耶律德光侄兀欲立,是为辽世宗。乾祐元年(948),辽世宗在内乱中被杀,耶律德光子齐王述律即位。述律"好饮酒,不恤国事,每酣饮,自夜至旦,昼则常睡,国人谓之'睡王'"。辽政治腐败,为周世宗收复幽、云 16 州提供了好机会。

显德六年三月,周世宗亲率大军北上。四月,周世宗至沧州,进军宁州(河北青县),辽宁州刺史王洪以城降。二十五日,周世宗至益津关(河北霸县境),辽守将终廷辉以城降。二十七日周世宗至瓦桥关(河北雄县境),辽守将姚内斌举城降。二十八日,辽莫州(河北白洋淀)刺史刘楚言举城降。四月二十三日,辽瀛州(河北河间)刺史高彦晖举城降。又取淤口关。在短短三个月内,后周得 3 关(益津、淤口、瓦桥三关)及瓦桥关以南 3 州(宁、莫、瀛)17 县,18360 户。"是役也,王师数万,不亡一失,边界城邑皆望风而下"。

二十六日,周世宗与诸将议攻幽州(北京市),诸将皆以为不可,周世宗坚持,但至夜,周世宗患病,乃止。二十九日,定州节度使孙行友奏,攻下易州(河北易县),斩其刺史李在钦。三十日,以瓦桥关为雄州并命陈思让为"都部署"率兵戍守;以益津关为霸州,并命韩令坤为"霸州都部署",率所部戍守。当日,先锋都指挥使张藏英攻占固安县。

五月初八,周世宗从雄州出发还京。三十日,周世宗至大梁城。六月,周师攻占辽州。六月初九,周世宗病故,年仅 39 岁,庙号世宗。周世宗子柴宗训即皇帝位,年仅 7 岁,即周恭帝。翌年,即公元 960 年(北宋建隆元年),禁军统帅赵匡胤发动陈桥兵变,夺得后周政权,建立宋朝。后周传三帝,两姓,存在 9 年。

后周疆域:北:自银川、太原以南、保定以北一线;南:自汉中、长江中游、下游一线。西:银川、天水一线。东至海。　(翁俊雄)

宋、辽、金

耶律阿保机建国

契丹神册元年(916),耶律阿保机建国、称帝的历史事件。

契丹是我国古老的民族之一,是由匈奴族演变发展而来的。居于我国东北辽河上游潢水流域。唐贞观年间(627—649),唐太宗在契丹居地设松漠都督府和七个州,以其各部落首领为都督和刺史。武则天在位时,契丹逐渐强大,经常侵扰唐河北道北部地区。

契丹原有八个部落,每三年依次以一酋长为契丹部落联盟首领。唐末,卢龙节度使(治今北京)刘仁恭于每年秋季出兵摘星岭,烧契丹野草,影响其放牧,迫使契丹通过贿赂马匹换取牧地。此时耶律阿保机被推为夷离堇(部落联盟首领)。后梁开平元年(907)四月,刘仁恭子刘守光杀父自立,统治暴虐,幽、涿二州汉人多逃入契丹,阿保机乘机招抚,修筑城郭,用他们从事农业及手工业生产,并乘机入塞,俘掠汉人。依唐制置州县统治,名曰"汉城"。在汉人谋士的策划下,阿保机决心推翻三年一换部落联盟首领的旧制,拒绝让位,仿照中原帝王实行世袭,建立起亲兵卫队"腹心部",三次镇压来自内部守旧势力的反抗,伏兵击杀契丹其他部落首领,其地位日趋巩固。

后梁贞明二年(916),阿保机在龙化州(内蒙古昭乌达盟八仙筒一带)以东的金铃冈筑坛,自立为帝,建国号大契丹,建元神册,立长子为皇太子。不久,他建都临潢府(内蒙古昭乌达盟巴林左旗南波罗城),创制契丹太学,公布"决狱法",其统治机构渐具规模。

(翁俊雄、刘　庆)

头下军州建立

"头下军州"是辽代对俘掠来的汉人和渤海等人户所采取的一种特殊的统治形式。它最早出现在遥辇氏时,于越释鲁俘掠党项、吐谷浑之民,建于越王城,以之放牧。辽朝建立以后,不仅阿保机、述律太后将俘掠来的汉族居民仿唐朝州县置城以居之,作为自己的私人奴隶,也允许宗室、外戚等各自占有奴隶,建立这样的据点,称"头下军州"或"投下州"。每个被允许建头下军州的契丹贵族所拥有的州县额,由朝廷颁赐。其官吏,除节度使因有管辖军政权,由朝廷任命外,其他都由建军州的贵族以部曲充当。州内井市赋皆归头下主,只有酒税由上京盐铁司收缴,归于朝廷。头下州的建置,按规模大小,依次为州、军、县、城、堡,分布于辽朝境内各地,是契丹奴隶主奴役俘掠奴隶的重要形式。辽圣宗以后,对外战争日益减少,俘掠奴隶的来源枯竭,契丹社会也日趋封建化,这种对汉和渤海民族来说属历史倒退的社会产物失去生存基础,逐渐减少最后走向消亡。

(刘　庆)

辽灭渤海

辽天赞五年(926),辽击灭渤海国的战争。

渤海是唐代靺鞨人粟末部建立起来的一个地方政权,都于忽汗城(黑龙江宁安东京城),有五京、十五府、六十二州。契丹领袖耶律阿保机创建辽朝政权时,渤海势力已经衰落下来,但并没有像吐谷浑、党项、阻卜诸族一样,臣服于辽,对日夜思念争夺中原

的契丹贵族仍具有一定的威胁。

辽天赞四年(925)冬,耶律阿保机为解除后顾之忧,避免将来南下时陷入两线作战的危险境地,以"渤海世仇未雪"为借口,亲率诸军及皇后、皇太子及汉族谋士韩知古等人征讨渤海。十二月,包围渤海西疆重镇扶余府(吉林农安)。次年正月攻克其城,杀渤海守将。紧接着,又派萧阿古只将万骑为先锋,长驱直入。途中与諲譔老相所率渤海主力相遇。渤海军衰弱已极,远不是契丹军对手,大败。耶律阿保机旋以皇太子等领军包围忽汗城。渤海国王大諲譔自知不敌,素服率僚属300人出降,渤海遂灭。

阿保机征服该国后,改名为东丹国(即东契丹),改忽汗城为天福城,册皇太子为东丹王主事。同时仍保留渤海原政府体制和规模,以渤海人服习的"汉法"来统治。在任官命职上,杂契丹和渤海旧官任用执政,采取利用和监督政策,以保障对这一经济、文化发展程度较高地区的顺利统治。　　(刘　庆)

耶律德光称帝

契丹族耶律阿保机之次子耶律德光于辽会同十年(947)二月于大梁城(河南开封)即皇帝位,国号大辽。耶律德光即辽太宗。

契丹建国后,不断向外扩张。阿保机亲征突厥、吐谷浑、党项。又南下,进入中原地区,连克蔚、新、武、妫、儒等州。同光二年(924),耶律阿保机遣使后唐,向庄宗索取幽州,不果,遂遣兵侵扰后唐之幽、涿等州。后唐天成元年(926)七月,契丹攻灭渤海国。数日后,耶律阿保机死于扶余城,其次子耀屈之(后改名德光)即位。

后晋天福元年(936)五月,后晋河东节度使石敬瑭于晋阳叛乱。七月,石敬瑭遣使至契丹,向耶律德光请求援军。石敬瑭令桑维翰起草表章,主动提出:向耶律德光称臣;将耶律德光视为父,自己"以父礼事之";"事捷之日,割卢龙一道及雁门关以北诸州与之"。其部将刘知远反对割地、称儿皇帝,石敬瑭不听。九月,耶律德光率5万骑兵,号30万,自扬武谷(山西代县境)而南,至晋阳城外。当晚,石敬瑭出晋阳城北门,见耶律德光。数日后,石敬瑭与耶律德光会师围"晋安寨"(在晋祠之南)。十一月,耶律德光对石敬瑭说:看你的相貌与胆识,真似中原之主,我要立你为天子。契丹主作册书,命敬瑭为大晋皇帝。筑坛于柳林(晋安寨之南),石敬瑭即皇帝位。改年号为天福。石敬瑭割幽、蓟、瀛、莫、涿、檀、顺、新、妫、儒、武、云、应、寰、朔、蔚16州(即包括今北京市在内的河北北部和山西北部地区)与契丹;并许每年给契丹帛30万匹。不久,晋安寨守将降契丹。石敬瑭为灭后唐率军从潞州上党县出发南下。临别,耶律德光对石敬瑭说:我暂且留在这里,等你的消息。有紧急情况,我就下山(指太行山)救你。你若占领洛阳,我即北返。当月,石敬瑭入洛阳,灭后唐。后晋天福二年(937)二月,耶律德光自潞州上党县出发,过云、新二州北还。四月,石敬瑭以汴州大梁城(河南开封)为都城。

天福七年(942)石敬瑭死,子石重贵即位,是为"出帝"。耶律德光怒其不奉表,自后晋开运元年(944)起,屡次发兵攻后晋。开运三年十二月,晋出帝投降契丹。天福十二年(947)正月,耶律德光入大梁城,迁晋出帝于黄龙府。二月,耶律德光"冠通天冠,服绛纱袍,执大珪以视朝,大赦"。"改晋国为大辽国,(改)开运四年为会同十年"。耶律德光即辽太宗。

辽太宗灭后晋,派遣其部落豪酋为诸州、镇刺史、节度使。为了契丹兵马粮草的需要,常遣数千骑分出四野,劫掠百姓,号为"打谷草",东西二、三千里,民被其毒,远近怨嗟,纷纷起而反抗。刘知远在太原起兵,契丹州镇多杀契丹守将归刘知远。耶律德光大惧,遂命契丹贵族萧翰为宣武节度使,留守大梁,自率契丹兵北归。行至栾城(河北赵州)得病,死于杀胡林。耶律德光侄兀欲即位。　　(翁俊雄)

辽南北面官制的创建

南北面官制是辽太宗耶律德光时期创建的一种对所辖各民族实行"因俗而治"的政治制度。

辽朝是一个多民族的王朝,辽太宗时期统治区域空前扩大,辖境西至流沙,东到黑龙江流域及原属渤海国的地区,北达胪朐河(克鲁伦河),南部吞并了幽云地区。在这一广大区域内,民族成分众多,有契丹、汉、渤海以及其他少数民族;经济成分也因各地各族而异。以上京(辽宁巴林左旗南)为中心的契丹故地和西北部地区的契丹等少数民族从事以奴隶制为主的游牧经济;新并入的渤海国故地及民族因长期受唐朝影响,已步入以农为主的封建社会;南部幽云地区则是历史悠久的汉族以农耕为主的封建社会。辽太宗为适应这种状况,巩固辽朝的统治,根据辽朝北部以奴隶制为主的游牧经济和南部以封建制为主的封建经济的大体区别采取了"因俗而治"的方针,所设统治机构"兼制中国(中原),官分南北,以国制治契丹,以汉制待汉人"。

北面官制系契丹的传统制度,仍保持着契丹氏

族部落制的一些遗俗，官员职号多源于突厥、回纥，也采用汉官制的某些职名。北面官“治宫帐、部族、属国之政”，官吏一律用契丹人，在执法上依契丹之旧。南面官的设置是顺应南部封建农耕经济状况的结果，在渤海地区和汉族地区推行奴隶制和游牧经济，曾遭到当地人民的强烈反抗，无法保证这里的赋税来源，于是设南面官掌“治汉人州县、租赋、军马之事”，其制大抵因袭唐制，后来又兼采宋制而略有变通，中央设有枢密院和三省、六部、台、院、寺、监等机构，地方也设节度、观察、防御、团练、招讨诸使及刺史、县令等官。官员多用汉人，也兼用契丹。在法律上，对汉人、渤海遗民均采用汉法。

辽朝“因俗而治”的南、北面官制是十六国时期“胡汉分治”政策的继承和发展，是一种比较成功的民族政策，曾对巩固和稳定辽朝的统治起了重大作用，对以后的金、元、清各朝的统治都有深远影响，是辽朝留下的重要历史遗产。　（高凯军）

陈桥兵变

赵匡胤于后周显德七年(960)在陈桥黄袍加身，自立代周，建立宋朝。

赵匡胤(927—976)，祖籍涿州(河北涿州市)，生于河南洛阳。体态丰伟。后汉乾祐元年(948)，后汉枢密使郭威以西面军前招慰安抚使西征李守贞。郭威广罗人才，21岁的赵匡胤投奔郭威，成为郭的部属。广顺元年(951)，掌握后汉军权的郭威，谎称辽军南犯后汉，率军北上抗辽。军至澶州(河南濮阳)，将士将黄袍披在郭威身上，拥立郭威为帝。郭威率军回后汉京师汴京(河南开封)，即皇帝位，国号周(后周)。后周显德三年，赵匡胤因功升任为殿前都指挥使(五代及后周军制，掌握中央军权为殿前都检点，其下有殿前副都检点、殿前都指挥使等)。后周显德六年，后周世宗柴荣病死前，为防止兵变，升任赵匡胤为殿前都检点。赵匡胤掌握了后周军权。

周世宗于显德六年病逝后，其子柴宗训继位，年仅7岁。宰相范质、王溥不为军界所服，后周局势不稳。赵匡胤始有效法郭威，以拥有军权而自立之意。他与弟赵匡义，亲信、掌书记赵普密谋策划兵变。赵普(922—992)，幽州蓟县(北京市)人，后迁常山(河北曲阳)，又迁河南洛阳。原为后周军事判官，与赵匡胤过从甚密。赵匡胤等一面做军事准备，一面指使人在开封传播“点检为天子”，即赵匡胤应当皇帝的谣传。一时间京城恐慌混乱，但宫廷内却一无所知。

后周显德七年正月初一(960年1月31日)，赵匡胤指使人谎报军情，说是契丹与北汉联合入侵后周。契丹出兵镇(河北正定)、定(河北定州)二州，北汉兵自土门(河北获鹿西南井陉口)东下。宰相范质、王溥真假不辨，慌忙遣赵匡胤出兵御敌。正月初二，殿前副都检点慕容延钊领先头部队离开京城。正月初三，赵匡胤率大军出爱景门，向东北方向进发。当天，到达离开封约20公里的陈桥驿(开封市郊陈桥镇)，停止前进。当晚酒后，赵匡胤假装酒醉卧床睡觉。赵匡义、赵普与将领们商议兵变。将领们赞同“立检点为天子”。赵普以“长保富贵”为由，要将领们听从指挥，并派人驰告殿前都指挥使石守信、殿前都虞候王审琦等。正月初四清晨，赵普、赵匡义率诸将至赵匡胤卧室，将赵匡胤扶出，并将黄袍披在赵匡胤身上，拥立赵匡胤为天子，叩拜呼万岁。赵匡胤假意推拒后，宣布若要我当皇帝，必须“能从我命”，并不得“纵兵大掠”，对原周帝及皇族加以保护等。众将表示愿“唯命是听”后，赵匡胤带领禁军回开封，从仁和门进入都城。石守信等在城内接应赵匡胤。入城后，未遇到后周文武臣僚抵抗，仅武将韩通抗拒兵变，为王彦升所杀。赵匡胤派潘美去通知范质、王溥。范、王得知兵变后，后悔莫及，被迫承认赵匡胤代周自立。当日，赵匡胤登位于崇元殿，受臣僚拜贺。后周恭帝降为郑王，迁居西京(河南洛阳)。正月初五，宋太祖赵匡胤颁定国号为宋，改周显德七年为宋建隆元年。宋朝正式建立。赵匡胤即宋太祖。

宋朝建国伊始，秉承后周军政体制，宰相仍由范质、王溥担任，殿前都检点由慕容延钊充任。原后周各地掌地方军权的节度使，得知赵匡胤代周自立，并不想归顺宋朝。四月，原后周昭义节度使李筠，在北汉的支持下，准备在潞州(山西长治)起兵反宋。宋太祖派石守信、高怀德、慕容延钊、王全斌率重兵分路进讨。石守信等与李筠首战于长平(山西高平)，李筠失利。五月，赵匡胤亲自出征，在泽州(山西晋城)大败李筠。李筠自焚而死，消除了宋初黄河以北的一大威胁。七月，原后周节度使李重进也不服赵宋，在扬州(今属江苏)起兵反宋。十月，宋太祖亲征李重进，扬州城破，李重进自杀。至此，原后周疆域尽归宋所有，使宋成为北至燕山，南达淮河，东临大海，西过黄河的大国。

此后数年，宋又先后统一了南方的荆南、楚、后蜀、南汉、南唐、吴越等地方割据政权，结束了历史上第二次分裂割据的局面，进入了我国中原及南方基本统一，经济、文化较快发展的时期。　（顾全芳）

杯酒释兵权

宋初宋太祖为集中军权采取的措施。

赵匡胤自己以陈桥兵变而代周自立，深知掌握军权之重要。他认识到五代王朝频繁更替，主要是由于“方镇太重，君弱臣强”。为了使赵宋天下稳定长久，避免出现又一次陈桥兵变，宋太祖下决心亲自掌握军权，将军队归皇帝直接领导指挥。

北宋建隆二年(961)闰三月，宋太祖首先废除了掌管精锐部队禁军的殿前都点检这一要害军职，将殿前都点检慕容延钊改任为节度使，迈开了皇帝掌握禁军的第一步。不久，宋太祖又采纳赵普对禁军重要将领“收其精兵”的建议，解除石守信等禁军军职。宋太祖解除石守信等人的军职，没有采取以武对武、兵戎相见的政策，而是采取喝酒谈心的方式实现的，因而史称“杯酒释兵权”。

建隆二年七月初七日晚，宋太祖留石守信、王审琦等禁军武将晚宴。饮酒至酣，宋太祖以秘密亲切的语气，对石守信等低声说：我能当上天子，全靠你们出了大力，我非常感谢。然而你们哪里知道，当皇帝也难得很，弄得我天天睡不着。石守信等不知是计，急忙问宋太祖还有什么难处。宋太祖说：这有什么不好理解，谁不想当皇帝？你们说，我的皇位能坐稳吗？石守信等听话听音，吓出了一身冷汗，赶紧向宋太祖发誓表忠心：陛下当上皇帝，是天命，我们决不会有异心。宋太祖接着说：你们确实不会有异心。但是，你们想，谁能保证你们的部属，不会为了贪图富贵，将黄袍加在你身上，拥立你当皇帝？石守信等一听，十分害怕，流着泪对宋太祖说：我们可没想到这一层，还望陛下给我们指一条出路。宋太祖这才说出了早就想好的解除他们禁军职务的办法：人生在世，无非是贪图荣华富贵，为子孙造福；我为你们考虑，最好的办法是放弃军权，离开京城，到外地去当个闲官，享清福，买田买屋，留给子孙。这样，你们可以永保富贵，饮酒作乐，以终天年；如此，我同你们之间，也就用不着互相猜疑提防，可以上下相安。石守信等听了宋太祖这番话，知道自己再也不能掌军权，当面向宋太祖称谢指点迷津之恩。第二天，武将们都称病，请求免去禁军重职。宋太祖立即批准了他们的请求，罢去了原职，改命石守信、高怀德、王审琦、张令铎、赵彦徽等为节度使，并对他们加以重赏。从此，中央禁军的兵权，收归宋太祖直接掌管。

中央禁军的兵权问题解决后，宋太祖又着手解决地方军队的兵权问题。他采取相同的办法，召王彦超等掌军权的藩镇入朝宴会。席间，宋太祖对他们说，你们都是功臣宿将，长期在地方忙于公务，很辛苦劳累，我对你们照顾关心不周，今后我要让你们少管事，多享福。王彦超等心领神会，依照石守信等的做法，对宋太祖说，我们本来没有什么大功劳，全靠陛下提拔重用，如今老了，实在想告老归乡。有的地方武将还在宋太祖面前陈说自己过去的战功，宋太祖不耐烦地说，那是前朝的事，有什么可说的。第二天，各重要藩镇的将领，也多被解职。之后，主管地方军队的官职，也多由文官来充任。

宋太祖杯酒释兵权，将中央及地方的军权收归皇帝直接掌管，避免了自唐后期至五代军人权重，藩镇割据，军阀混战，甚而拥兵自立的弊端，保证了宋朝三百多年的内部统一和安定。自宋以后，历史上再难出现拥军割据混战的现象。但自杯酒释兵权后，出现了重文轻武，对武将极度不信任，重内轻外的怪现象。岳飞等名将之被害，根源即在于对武将的猜忌。宋朝对辽、夏、金等屡战屡败，根源也在于这种对武将的不重用和猜忌。历史上称为“弱宋”的“弱”，并非是宋朝经济文化不发达，而是因为这种轻武国策，使军队难以在对辽、夏、金的战争中发挥作用，最终偏隅江南而至覆灭。　　（顾全芳）

宋初的统一战争

宋朝初期宋太祖统一南方各国的战争。

后周在柴荣统治期间，曾在军事、经济等方面进行整顿和改革，使其国力增强。周世宗柴荣有统一中国的雄心壮志。曾就如何统一问题征求大臣们的意见。王朴提出了先易后难、先南后北的战略方针，即先统一南方诸弱国，再回过头来对付北方强大的契丹族建立的辽国，以及辽国的附庸山西北汉政权。周世宗接受了先南后北的方针，先后攻取了后蜀的秦州(甘肃天水)、凤州(陕西凤县)、成州(甘肃成县)和阶州(甘肃武都)，打败了南唐，取得了今江苏和安徽北部及湖北东部地区。这就为后来的宋朝统一南方各国，打下了基础。柴荣还曾于后周显德六年(959)三月北攻辽国，占领了辽国统治的瀛州(河北河间)和莫州(河北任丘)。可惜柴荣病死，先南后北、统一中国的壮志未酬。

赵匡胤在柴荣病死后不久即代周自立，要不要继承周世宗的遗志，如何统一中国，宋初曾有过争议。宋太祖认为北方的辽国强大，与其先攻强敌，不如“先取西川，次及荆、广、江南，则国用富饶”，然后再北攻辽国。这一战略构想与柴荣的方针基本相同。

宋太祖统一战争的目标，首先对准了地理位置十分重要、却是力量最弱的荆南（南平）和湖南。荆南仅有荆州（湖北江陵）、归州（湖北秭归）、峡州（湖北宜昌）三州之地，由高继冲掌权，湖南则属周保权的势力范围。北宋乾德元年(963)正月，宋太祖令慕容延钊率军出兵荆、湖。出兵的理由是讨伐占据潭州（湖南长沙）的张文表。张文表不服周保权统治，周保权曾派人求援于宋，宋则借机出兵，并扬言是路过荆南。待到宋军到达荆南，占领荆州后，便逼迫高继冲投降。高继冲方知上当受骗，却无反抗之力，只得将三州之地献给宋朝，荆南首先被北宋统一。三月，慕容延钊进占潭州。当时，张文表早被周保权杀死。周保权看到张文表已死而宋军仍来湖南，知道宋是项庄舞剑，便率军抵抗，结果周保权被俘，湖南相继为宋所有。宋占有荆、湖地区后，取得了统一战争的主动权，从此，不但割断了南方各国之间的联系，而且西可以攻后蜀，南可以攻南汉，东可以顺长江而下攻南唐。

乾德二年十二月，宋太祖向后蜀进军。后蜀主孟昶在得知宋攻取荆、湖后，预料到宋将攻四川，曾做了一些抗宋准备，并曾约太原北汉联合攻宋。宋太祖便以此为借口，出动6万宋军，分两路向四川进发。北路军由王全斌等率领，从凤州出发，沿嘉陵江上游南下，攻占了兴州（陕西略阳）而进入四川。战斗力不强而又轻敌的蜀军被宋军打败，王全斌占领了天险剑阁。南路军由曹彬等率领，从新占领的归州沿长江西进入川，夺取夔州（四川奉节）、万州（四川万县）、开州（四川开县）、施州（四川恩施）、忠州（四川忠县）等川东地区。乾德三年正月初七，走投无路的后蜀主孟昶决定向宋军投降。正月十三日，王全斌在魏城（四川绵阳东）接受了蜀使送来的降书。宋军开进了成都，亡国之主孟昶在王全斌面前俯首称臣。宋军占领四川后，曾“纵部下掠子女，夺财物，蜀人苦之”，将四川的财富抢劫一空，大部分运到宋京师汴京（河南开封），从而引起了降宋蜀兵的大规模叛变，“两川之民争应之”。

打下四川后，宋太祖感到太原北汉是个威胁，曾一度偏离先南后北的战略方针，先后于开宝元年(968)八月及第二年三月两次攻打北方的北汉，第二次宋太祖还曾亲征太原，由于太原城坚难破，以及辽国救援，北汉未能被灭。宋太祖难以打败辽国及消灭北汉，才又回到先南后北的方针。开宝三年九月，宋太祖令潘美率军向广东的南汉进军。潘美军占贺州（广西贺县），南汉派兵10万，以象为阵与宋军对抗。潘美令宋军用强力弓箭射象，象群中箭后向后奔逃，反踏汉军，汉军大败，潘美进占韶州（广东韶关）。开宝四年二月，宋军到达英州（广东英德），逼近广州（今属广东）。刘𬬮派人来求和，请求宋军停止前进。潘美不允，直指广州。南汉军据水立寨，负隅顽抗，宋军用火攻，烧掉了竹木栅寨，南汉军大败，广州被包围。刘𬬮山穷水尽，投降了潘美。

南汉被宋统一后，东南的南唐感到紧张，派人到宋入贡，改唐国为江南国，以求宋不进攻南唐。南唐国主李煜“聪悟好学，善属文，工书画，明音律”，词写得十分好，但治国打仗却不在行。开宝七年九月，宋太祖决心消灭南唐。为寻借口，宋太祖派使至南唐，要李煜到宋朝京师来朝拜。李煜不来，宋太祖便派兵10万，由曹彬、潘美率领，下江南攻唐。宋军从荆南以数千战船顺长江东下，很快占领了池州（安徽贵池）、铜陵（今属安徽），在采石矶（安徽当涂北）与唐军接战后，宋军登陆江南。开宝八年二月，宋军已到南唐都城金陵（江苏南京）城下。李煜无奈，派文臣徐铉到宋京城见宋太祖。徐铉对宋太祖说，李煜是个才子，又没有得罪宋朝，为什么要兵围金陵？你这是出师无名，还望撤军。徐铉两次见宋太祖，能言善辩，宋太祖火了，手按宝剑，对徐铉怒吼：不要多说了，江南是无罪，“但天下一家，卧榻之侧，岂容他人鼾睡！”吓得徐铉急忙返回南唐。李煜得知宋太祖必夺南唐，毫无撤军之意，只得自救。南唐仅剩大军由朱令赟率领，欲回金陵解围，在皖口（安徽安庆西）被宋军击溃。曹彬派人对李煜说，城破之日，一城老小性命难保；如能降宋，乃是上策。李煜不肯投降。开宝八年正月十七日，潘美、曹彬向金陵城发起总攻，在秦淮河一带与南唐军决战。宋军以舰船装满芦苇，点火烧着，向南唐水寨火攻。潘美则率军渡过秦淮，打败南唐陆军。然而，金陵城易守难攻，六月，宋军夺得南唐战船无数，仍不能使南唐归宋。宋军一直包围金陵至十一月，金陵城内饥寒交迫，李煜才于十一月底向宋军投降。

南唐被灭，地处浙江的吴越国主钱俶更加不安。事实上，吴越早就向宋进贡，打南唐时，吴越还曾受命配合宋军，打下了常州（今属江苏）等地。开宝九年二月，钱俶到宋京都，住了两个月。直到太平兴国三年(978)三月，吴越才正式归宋。四月，地处福建的陈洪进也向宋纳土称臣。至此，南方被宋统一。太平兴国四年五月，宋太宗消灭北汉，山西中南部归宋，北宋的疆域由此大体确定，它包辖北起河北、山西中部，西至陕西、甘肃一部，西南占有四川、贵州，南迄广东，东至沿海。宋初统一五代诸国，结束了分裂割

据局面，但其所占地域，远不及汉、唐。宋时云南有大理，青海、西藏有吐蕃，宁夏有党项，北方有强大的辽。史称宋时期为中国历史上的第二个南北朝时期，当有一面之理。

宋太祖执行先南后北方针，在南方取得了基本胜利后，曾想转向北方，并于开宝九年八月再次进攻北汉。太原未曾打下，宋太祖却在京突然去世。后来，宋太宗才将北汉打下。

由于宋太祖忙于统一南方，因而对北方的辽国，只能暂时采取以和为主的策略，以免辽国乘机犯宋，使宋南北受敌。尽管宋辽双方因辽援北汉而时有摩擦，甚而在宋辽边境发生军事冲突，但总的说来两国处于和平共处状态。开宝八年，辽国曾派人到宋"请通好"，宋与辽达成了和好协议。辽国还曾通知北汉说，已与宋和好，要北汉不再与宋为敌。宋太祖则暂时不想伐辽，而是主张对辽占燕云地区，采取赎买政策，准备以 500 万缗赎回燕云，并为此而特设左藏库，储备钱物。宋太祖并非不想以武力攻取辽国，统一北方，实在是因国力有限，攻辽怕是凶多吉少。宋初兵力不足 20 万，且多是步兵，骑兵很少。即使倾全国之力长途北上，既难敌辽之 10 万骑兵，后勤供应更成问题。就算是攻占了燕云，打败了辽国，日后的守卫也是大问题。宋太祖曾拿出取幽图给赵普看，要赵普发表看法。赵普看后说：取幽容易守幽难，实质上是不同意攻辽。宋太祖心里也清楚，攻辽确非易事。因而直到去世，宋太祖未曾发动对辽战争。宋太宗即位后，出于国内原因，曾两次大规模攻辽，两次败北。从此，宋辽南北对峙，谁也消灭不了对方。所以，宋初的先南后北统一方针，"先南"得以实现，"后北"却成就不大。不过，宋太祖统一南方各国，结束了南方长期分裂的局面，无论对社会还是对历史，都有十分鲜明的积极作用和进步意义。（顾全芳）

斧声烛影之谜

开宝九年(976)宋太祖突然死亡事件。

自陈桥兵变赵匡胤当皇帝至开宝九年，宋太祖已在位 16 年。这位开国皇帝治国有方，却身体时有不适。据历史记载，宋太祖有病时，曾叫一个叫张守真的人，在建隆观设坛祭神。张守真装神弄鬼之后，说是神已发话："天上宫阙已成。"意即宋太祖即将升天。又说"晋王有仁心"，意即晋王赵光义当即皇帝位。宋太祖听说张守真的神话后，很恼火，要杀张守真，由于宋太祖当即突然死亡，来不及杀死张守真。另据野史记载，宋太祖陈桥兵变前，曾结识一位道士，他非常相信这位道士的话，曾多次下令寻访道士。开宝九年，这位道士突然出现，宋太祖很高兴，立即请道士"抵掌浩饮"。饮酒之中，宋太祖说，我一直在找你，现在请你为我算一算，我还有多少阳寿，即还能活多久。道士回答：如果今年十月二十日夜晚是晴天，还有"一纪"即十二年寿命；如果不是晴天，你必须立即安排后事。宋太祖听信这位道士之言，到十月二十日那天，便至太清阁察看天气。夜晚，满天星斗，是个晴天，宋太祖满心欢喜。然而天有不测风云，不久即乌云密布，雪雹交加。宋太祖大惊失色，急忙回到寝宫，立即差人叫来弟弟赵光义。赵光义当年 37 岁，在宋朝立国及其后统一南方等方面，起过很大作用，被封为晋王。赵光义来后，宋太祖令宫妾宦官等周围的人都暂避，只留弟弟与自己对酌。饮酒之中，有人在屋外看见屋内的烛影下，赵光义"时或离席，若有逊避之状"，意即宋太祖要赵光义弟即兄位，弟弟避辞。时至三更，宋太祖送弟出寝宫。宫门口积雪已有数寸。宋太祖站在寝宫外，用柱斧(上朝用仪仗)戳着雪地对赵光义说：好自为之。之后便回寝内睡觉。夜深人静，只有大胖子宋太祖的"鼻息如雷霆"之声。时至五更，侍卫听到宋太祖的"鼻息声异"，便进入寝室探视，宋太祖已停止呼吸死亡了。

年仅 49 岁的宋太祖突然死亡，使人无所适从，乱作一团。年仅 27 岁的宋皇后做不了主，赶紧派内侍王继恩去叫宋太祖的大儿子赵德芳来商量后事。王继恩是赵光义的亲信，他没有去叫赵德芳，却直奔晋王府去叫赵光义。在晋王府门口，碰上精通医道的御医程德玄。程德玄是来晋王府查看赵光义是否有病。王继恩告诉程德玄，宋太祖突然死去，他是来找赵光义看怎么办的。于是二人一起进府找到赵光义。赵光义听到这个突如其来的吓人消息后，便与王、程一道，赶往寝宫。王继恩去见宋皇后，宋皇后问赵德芳来了没有？王继恩回答赵德芳没有来，晋王来了。宋皇后听到晋王来了，知道大事不妙，皇位可能被赵光义抢去。为避免流血被害，宋皇后恳求赵光义："吾母子之命，皆托于官家。"官家即赵光义。赵光义当场向宋皇后保证："共保富贵，勿忧也。"天亮之后，大臣们被通知到寝宫"以瞻圣体"，即瞻仰宋太祖遗体。大臣们但见宋太祖"如出汤沐"，遗体气色正常，没有被杀或被毒死的任何迹象。当时，赵光义在万岁殿即皇帝位，是为宋太宗。

野史笔记对宋太祖之死的记载，大体如上述。由于《正史》、《国史》、《实录》等可靠史书，对宋太祖之死因，皆无明确详细记载，因而宋太祖究竟是如何死

的，成为千古之谜。直至目前，学家尚在探讨研究之中。一说是赵光义为抢夺皇位，谋杀了宋太祖；另一说则认为，宋太祖属暴病而亡，并非由赵光义谋杀。持谋杀论者认为，野史笔记对宋太祖之死的记载，虽有讹传，但仍不失为可寻其蛛丝马迹。如赵光义二入寝宫，尤其是第二次入宫，显然是早就料定宋太祖将死。又如王继恩不找赵德芳而找晋王，显然是预谋，况且王继恩曾对赵光义说，去迟了，皇帝可就由别人当了之类的话。再如，宋太祖遗体气色正常，可能是赵光义在谋害宋太祖后做了手脚，以掩人耳目等等。有的学者认为赵光义伪造了宋太祖传位于他的遗嘱，证明他是名正言顺继位而不是夺位。更有学者认为宋太宗先后逼死宋太祖的几个儿子，是其夺权后消除皇位继承问题上的威胁。总之，这些学者认定斧声烛影之谜的谜底，是赵光义杀兄篡位，宋太祖为其弟谋害而死。至于谋害手段，学者推断可能是在兄弟俩饮酒时，弟在兄的酒中暗下了毒药。另有学者完全否定上述论断，认为宋太祖属正常病死，与赵光义毫无关涉。他们甚至从遗传学、病理学的角度，来论证宋太祖可能死于心脏病或脑溢血。尽管斧声烛影这一千古之谜尚未真正解开，但有一点可以肯定，赵光义弟继兄位，是乘机夺权。 （顾全芳）

宋太宗平北汉

太平兴国四年(979)宋太宗率军消灭河东北汉政权。

宋太祖先后统一大江南北，却未曾消灭盘据太原(今属山西)的北汉政权。宋太祖曾三次攻打太原，终未打下。开宝元年(968)八月，宋军进兵太原城，由于辽军增援北汉，宋军无功而返。第二年，宋太祖亲征北汉，曾引汾水、晋水灌城，由于宋军不适应气候，多病而失战斗力，加上辽军再次援汉，宋太祖被迫撤军，反而丢失粮、茶、绢无数。开宝九年八月，宋太祖第三次派兵分路大举攻北汉，再次兵围太原城，由于宋太祖突然去世，加上辽军又来援汉，宋太宗下令撤军，太原依然未被攻破。

为什么仅有山西弹丸之地的小国北汉，能够不被宋所消灭，而苟延了近 20 年之久，成为五代诸国中最后被北宋统一的国家？究其原因有三。首先，宋太祖代周建宋后，采取了先南后北的战略方针，即先统一江南诸国，然后再回过头来对付契丹族建立的辽国以及北汉，这就使北汉得到多年的时间，为抗宋战争做好准备。其次，北汉是沙陀人刘崇建立的国家，以沙陀人为核心的武装，具有较强的战斗力，加上河东人在五代战乱中，锻炼了自己，以及太原城易守难攻等，因而北汉能长期生存。第三也是最重要的，北汉政权实际上是辽国的附庸，既向辽国称臣称侄，又向辽国朝贡。辽国则将具有重要战略地位的山西，作为向中原进军的跳板，又作为抵挡宋军北进攻辽的桥头堡。辽国深知唇亡齿寒，因而宋军攻北汉，辽军必援汉。宋军既要对付北汉军，又要对付辽军，往往顾此失彼，功亏一篑。

宋太宗于开宝九年十月即皇帝位后，下决心要消灭北汉，作为消灭辽国、统一天下的先决条件。这位弟继兄位的第二代皇帝，既有斧声烛影、杀兄谋位之嫌，又有威望不高、文武离心之苦。宋太宗为提高自身威望，转移臣民视线，巩固其帝王地位，从当皇帝后不久，就在准备与北汉较量。从兵员、粮草、宣传等准备了两年多后，到太平兴国四年正月初，宋太宗决定出兵河东，消灭北汉。他召集文武大臣集议进兵之计，文武大臣都认为时机已经成熟，关键是如何对付辽国的支援。为了避免辽军援汉，宋太宗曾对辽国使者说，讨伐北汉，势在必行；如果贵国不再援汉，宋辽可以和平相处，如果你们还要出兵，那只能战场上见高低。辽国经过反复衡量利弊，终究还是在后来派兵救援北汉。

正月十二日，宋太宗任命潘美为北路都招讨制置使，进兵太原，崔彦进攻城东，李汉琼攻城南，曹翰攻城西，刘遇攻城北；郭进为石岭关(山西忻州南)都部署，在此狙击援汉辽兵。同时，命令陕西等地方军分兵攻占北汉的岚州(山西岚县)等地，以形成孤立太原之势。二月二日，宋太宗下诏亲征，三月一日到真定(河北正定)，四月二十二日到达太原城下。北汉皇帝眼见宋大兵压境，急忙派其儿子刘让赴辽做人质，以求辽救北汉。二月十八日，辽国派能征惯战的耶律沙、耶律斜轸等率骑兵驰援北汉。三月十日，辽又增派后续部队南下。辽军果然路经兵家必争之地石岭关，进入郭进统领的宋军阵地。郭进，河北博野(蠡县)人，宋初即任西山巡检，以备北汉犯宋。曾三次与北汉军作战，屡立战功，对北汉的地理、兵力，以及辽军的进军路线等，都十分熟知。三月十六日，辽数万骑兵至石岭关之涧边时，郭进伏兵四出，与辽骑短兵相接。经过激烈战斗，辽难以发挥骑兵优势，被宋军打得大败。辽军五员将领被杀，耶律沙急忙收拾残兵北逃。宋军随后紧追。幸有耶律斜轸后军赶到，辽军才免于被歼。耶律沙在损失万余官兵后，再也不敢南下救援太原。太原北汉处于孤立无援的境地。

太原城被包围，宋太宗到达城下后，曾于四月二

十三日写书给北汉皇帝刘继元，劝其“审定良机”，投降宋朝。书信未至刘继元处。四月二十四日，宋太宗下令宋军对太原四面总攻，亲自督战。太原城城坚难摧，北汉军顽强抵抗。荆嗣曾首先登城，北汉军以箭、炮还击，荆嗣受伤而下。南城的李汉琼也曾登上城头，被乱箭射中而退。名将呼延赞曾登城4次，都被打下。韩起受伤13处，身中8箭。北汉的刘继业(即杨业)在降宋前，曾“拒城苦战”。可见北汉反抗宋军之齐心与激烈程度。五月初，被包围的太原城几近粮绝，北汉大将范超、郭万超相继出城投降宋军，北汉军心动摇。五月四日，宋太宗再次致书刘继元，劝其“但速归降”。五月端午，宋太宗督战，务要当日破城灭汉。宋“士卒奋怒乘城，矢石交发，梯冲并进”，太原城危在旦夕。北汉重臣马峰劝刘继元降宋。刘继元看到外无援兵，内无粮草，人心惶恐，才决定降宋。端午晚，刘继元派客省使李勋送投降书。宋太宗接降书后，立即复书表示欢迎。六日晨，宋太宗在太原城北连城台上，接受刘继元投降。刘继元派人告诉尚在苦战的刘继业投降。至此，北汉终于被灭。北汉的10州，11县，3万5千余户，3万军队，全部归宋。

宋太宗消灭北汉，不仅最后统一了大半个中国，增强了国力，而且对日后的抗辽防辽，具有重要意义。 (顾全芳)

高梁河之战

宋辽于太平兴国四年(979)在幽州高梁河一带大规模的首次战争。

宋朝立国之后，南有南唐、后蜀、南汉等诸国，北有契丹族建立的强大的辽国。为求得生存与发展，宋必须面对群雄割据的现实，制定相应的策略。宋太祖审时度势，提出了先南后北的战略方针。即先对付南方诸国，再回过头来对付北汉和辽国。因此，在统一南方诸国的数年中，宋朝对辽采取和平相处的政策，双方既曾互派使节，又曾和平谈判。即使在南方基本统一后，宋太祖也不想对辽国诉诸武力，而是主张赎回被石敬瑭割让于辽的燕云地区(共16州，其中莫、瀛2州早在周世宗时已用武力取回)。为了赎买燕云，宋太祖专门建造封椿库，以储备财物。宋太祖曾3次北伐太原北汉，因辽军援汉而宋辽发生冲突，但从未酿成大战。

宋太宗以弟即兄位，本不符合父传子的纲常，又有斧声烛影之嫌。为提高威望，宋太宗改变对辽方针，主张以武力相向，企图打败辽国，一统天下。宋太宗曾视察封椿库，见财货堆积如山，欣喜异常，对臣僚说，先皇常常为经费发愁，是多余的；现在货充粮足，对辽战争定能取胜。他决心与辽国一决雌雄。

太平兴国四年五月端午，太原北汉刘继元降宋，北汉被灭；支援北汉的辽国骑兵，也在太原北郊的石岭关被打败。宋太宗胜利冲昏头脑，认为打败辽国易如反掌，决定一鼓作气，乘胜北上，收回燕幽。实际上，宋军“围攻太原累月，馈饷且尽，军士罢乏”，根本不具备攻辽的条件，因而“诸将皆不愿行”，呼延赞等甚至警告宋太宗“此饼难翻”，即打败辽国不可能。然而宋太宗一意孤行，根本不听别人的劝告，终于从太原起兵北征辽国。六月初，宋军到达镇州(河北正定)、定州(今属河北)，进入辽统治区。宋军过岐沟关，抵达涿州(今属河北)。一路上未遇大的抵抗，宋军便直驱幽州(辽南京，今北京市)。六月中，宋太宗率军抵幽州城外，驻跸宝光寺。辽在南京的守军仅万余，且不是精兵，在城北被宋军打败。宋军包围幽州城，宋太宗督战，从四面攻城，由于城坚难破，宋太宗令造炮攻城。辽军坚守不出，以待援兵。宋军攻城多日，宋太宗多次临城督战，皆无功徒劳。

辽得报宋军围攻南京，急派耶律休哥、耶律斜轸率辽军主力，星夜奔驰，救援南京。七月初六，宋辽两军会战于南京城北之高梁河。辽将耶律沙首先迎战宋军，被打败。入暮，耶律休哥迎战宋军，“人持两炬，宋师不测多寡，有惧色”；耶律斜轸亦赶到。辽军以精锐左右夹击。城内辽兵闻援军已到，正在与宋军激战，便“开门列阵，四面鸣鼓，居民大呼，声震天地”。宋军胆战心惊，被辽军大败，死伤万余。宋太宗在混战中失去指挥，自己也急忙败退南逃，据说还曾身中两箭。宋太宗乘驴车狼狈逃遁，耶律休哥紧追不舍，一直追到涿州(今属河北)。辽缴获宋“兵仗、符印、粮馈、货币不可胜计”。

高梁河之战，是宋辽首次大规模战争，结果以宋方彻底败北而告终。由宋太宗挑起的这次战争，不但劳民伤财，而且破坏了宋辽基本和平相处的局势。自高梁河之战后，宋朝上下谈辽色变，产生恐辽心理。自此，燕幽地区再也无法赎回。这些，都影响到宋后来的内外政策。被后人称为“弱宋”由此而始。

(顾全芳)

辽圣宗时期的封建化改革

辽圣宗统治期间，承天皇后及辽圣宗先后采取的封建化措施。

辽圣宗耶律隆绪(971—1031)，字文殊奴，辽景宗长子，在位49年(982—1031)。辽圣宗在位期间，

契丹社会进行了一系列封建化改革。辽圣宗即位时，年仅12岁，其母承天皇后摄政。承天皇后系北府宰相萧思温之女，有汉化倾向。她摄政后，主张革新，大胆任用汉官，开始实施封建化改革。统和二十七年(1009)承天皇后死，圣宗亲政。这时，辽、宋南北对峙局面已经形成，彼此都处于相对安定时期，使辽圣宗得以在其母改革的基础上完成了封建化改革。辽圣宗时期的封建化改革主要有如下几个方面：

一、整顿吏治和推行科举制度。承天皇后和圣宗为了巩固统治，在内政方面的改革主要是整顿吏治并按汉人取士办法推行科举制度。圣宗即位之初，承天皇后任用汉官韩德让，开始吏治整顿，诏谕三京大小官员必须秉公办事，不得阿谀曲徇。并实行了一些罢免徇私舞弊贪暴残民官吏、荐拔"能清勤自持"官吏的措施。还规定"内族受贿，事发，与常人所犯同科"。吏治整顿，大大改变了以往在用人问题上的"蠹弊"。为了扩充统治人才，从圣宗统和六年正式实行贡举取士制度。初行时，每一年或二年举行一次，录取进士2至3名。从统和二十年起取士名额逐渐增加，当年有6人及第；统和二十四年增至23人；开泰(1012—1020)和太平(1021—1030)年间，每年及第者增至40至70人不等。科举制的推行和取士规模的逐渐扩大，使越来越多的汉族地主阶级知识分子被吸收到辽朝统治机构中来，丰富了契丹贵族的统治经验，加快了辽朝的封建化过程。

二、引进汉律，修订辽朝法律。辽太祖阿保机时，曾规定契丹及其他少数民族犯法按"契丹及诸夷之法"论处，汉人犯法则"断以律令"。这种法律旨在维护契丹等奴隶贵族的利益，在民族待遇上十分不平等。契丹人和汉人相殴致死，判罪轻重不均。契丹人"殴死汉人，偿之以牛马；汉人则斩之，仍以亲属为奴婢"，以致汉族百姓"有冤者无所诉"。辽圣宗即位后，在承天皇后主持下，改为同等科罚，一律以汉律论处。太平六年(1026)又改变了过去"凡狱讼惟夷离毕主之"的旧制，由北、南枢密使审理狱讼事宜，进一步削弱了契丹贵族对汉人及其他部民"同罪异论"的特权。这些措施在一定程度上改善了辽朝内部的民族关系，起到了稳定辽朝统治的作用。此外，这一时期的法律改革，在主、奴关系上也有所松动。统和二十年规定"若奴婢犯罪致死，听送有司，其主不得擅杀"。改订后的这条法律，虽未改变奴隶的地位，但毕竟从法律上规定了奴隶主不能擅自杀害奴隶了，这反映了当时主奴关系的新变化。

三、改编部族，削弱了奴隶制因素。为了适应契丹社会封建化因素的增长和社会经济发展的需求，圣宗时期，把原来属于宫帐的俘户奴隶改编为部族。据《辽史·营卫志》记载，这一时期新增置的34部如撒里葛部、窈爪部、耨盌爪部、讹仆括部等等，都是取诸宫帐及横帐大族所有的奴隶改置的。同时还将原处于奴隶地位的异族旧部如乙典女真部、鲶突盆乌古部、北敌烈部、迭鲁敌烈部、室韦部、术哲达鲁虢部、梅古悉部、颉丽部、匿讫唐古部、南唐古部、北唐古部、鹤剌唐古部等改置为平民部族。上述处于奴隶地位的部族被改编后，设置节度使管理，其身分成为部民，不再是奴隶了。此外，对新征服的各族人户也不再编为官户奴隶，如圣宗时期，征服回鹘后，以其民户置薛特部；剖阿里国、盆奴里国、奥里米国、越里笃国、都里吉国等来附，设五国部，均设节度使领之，而不再分给诸宫帐为奴隶。这些措施无疑起到了解放生产力、推动社会经济发展的作用。

四、推广封建的赋税制度。自辽太祖开始掠夺大批中原汉族农民到契丹地区以后，契丹人已逐渐受到汉族封建经济的影响，特别是当契丹占领渤海故地和幽、云地区之后，使辽朝的封建经济因素迅猛增长，契丹贵族也从中知道了课税对国家的重要意义。辽景宗时期为了恢复社会经济，对诸州逃户庄田，曾允许蕃汉承佃，国家收取租税。辽圣宗时期，不仅在汉族聚居的农耕地区因袭了唐代的两税法，而且还将封建的赋税制度推广到头下州县。在由俘获奴隶设置的头下州县，分赋税为二等，工商税中，市井之赋归头下，酒税缴纳给朝廷，使头下俘奴演变为输租于官、纳课于主的"二税户"。统和十三年又诏令诸道民户，自穆宗以来被掠夺为"部曲"(奴隶)者，"仍籍州县"，使之不再是奴隶主完全占有的奴隶，而成为向朝廷纳税的编民。统和七年令"山前后未纳税户，并于密云、燕乐两县，占田置业入税"，所占之田叫做私田；统和十五年又"募民耕滦河旷地，十年始租"，称为"在闲官田"。无论是耕种"私田"还是"在闲官田"，都要"计亩出粟，以赋公上"。封建赋税制度的推广，解放了契丹奴隶制下的生产力，使辽朝增加了赋税收入，增强了国家的经济实力。

辽圣宗时期由承天皇后和圣宗主持的封建化改革，使契丹族的历史进入了一个新的历史时期，奴隶制残余逐渐削弱，封建制逐步确立起来，辽朝的政治、经济和军事实力由此空前增强，迫使北宋与之达成了澶渊和议；西夏随之背宋附辽；北方的鞑靼也望风归顺；同时辽朝借助强盛的国威，向西同大食建立了联系，在东方发动了对高丽的侵略战争，使辽朝的

声威远播，将辽朝的历史推向了鼎盛时代。

（高凯军）

雍熙北伐

北宋于雍熙三年(986)大规模北征辽国。

宋太宗自太平兴国四年(979)高梁河之败后，不但没有提高威望，反而引起朝野不满。为挽回面子，平息宋朝内部的怨恨情绪，宋太宗念念不忘再次北伐辽国。太平兴国五年十月，辽将耶律休哥包围宋辽边境要地瓦桥关(河北雄县境)，兵败宋军，一直打到莫州(河北任丘)。十一月，宋太宗又要大规模亲征辽国，已经行至大名(今属河北)，由于辽军北还，以及李昉等劝阻，宋太宗才乘机下了台阶，南还京城。然而，这位急于保住皇位的第二代皇帝，仍不时扬言要以武力夺取幽云，打败辽国，统一中国。太平兴国六年七月，宋太宗再次准备北伐，并且派使者到渤海国及高丽国，要求他们配合宋伐辽。由于这两个国家都清楚辽国强大，不敢冒犯，因而对宋太宗的要求不予理睬，宋太宗只得作罢。此后数年，宋辽双方各镇边境相安无事。宋太宗终不甘心，他在做再次北伐的准备工作。

经过四、五年的准备，宋太宗认为时机成熟，又扬言要北伐辽国，收复幽云。贺令图投其所好，建议宋太宗乘"契丹主年幼"、辽国政治混乱之机，北上灭辽。宋太宗决定于雍熙三年初北伐。其实，辽国皇帝年幼、国内混乱等，不过是借口，而且不符合辽国实际。辽景宗病死于云州(山西大同)焦山，12岁的圣宗即位，萧太后专政，是辽乾亨四年(982)、宋太平兴国七年的事，已离雍熙三年北伐时有近4年时间。雍熙北伐时，辽国内局势已趋于稳定。

雍熙三年初，宋太宗根本不同宰相等文官商量、通气，擅自决定倾全国之力，兵分三路北伐辽国。主力曹彬为一路，从涿州(今属河北)北上直抵幽州(辽南京，今北京市)；米信、田重进为一路，出雄州(河北雄县)和飞狐(河北涞源)北上。潘美、杨业为一路，出雁门关(山西代县境)北上，攻云州等地。宋太宗企图三路兵马最后会师幽州，与辽军决战，不但收回幽云等石敬瑭让辽的地区，而且消灭辽。宋太宗的这一决策，雄心可谓大矣，但在战略战术上犯了以下错误：一是分散了兵力。宋军三路出击，战线千里，很难集中兵力打歼灭战，反而被辽集中力量各个击破。二是不顾地理条件。河北为开阔平原，利于辽国骑兵纵横驰骋，不利于宋军步兵行动，将主力放在河北，只会被动挨打。三是不能适应战场实际的变化。宋太宗在京城遥控指挥作战，将领只能执行宋太宗的命令，甚至执行宋太宗早先画好的阵图。这种命令和阵图，往往是马后炮或纸上谈兵。所以战后有人总结战败的原因是由于"失地利，分兵力，将从中御，士不用命"。

雍熙三年三月初，曹彬奉命集结宋军主力，越过宋辽边界，先锋李继隆占领新城、固安，向涿州进军。三月十一日，辽军以数千人救援涿州，被宋军打败，占领涿州。时，萧太后得知宋军来犯，急令辽军全力南下抵抗。耶律休哥率骑兵精锐急趋涿州。两军在涿州对阵。耶律休哥是辽智勇战将。他不急于攻涿州城，而是派兵至宋之后方，断绝宋军粮道。曹彬在涿州十多天，士兵的吃饭成了问题。无奈，只能退还雄州(河北雄县)宋境，以就粮食。宋军兵屯拒马河一线。曹彬军听说另两路军进战顺利，要求继续北上。曹彬决定带50天的粮食，再次北攻涿州。在去涿州的路上，辽以少量骑兵抵抗、干扰宋军。宋军且战且进，从雄州到涿州不到一百公里，宋军走了20天。萧太后得知宋军又占涿州，亲临前线，命令辽军包围涿州城。耶律休哥则再次深入宋军后方，截劫宋军粮食。宋军在涿州被围，再次断粮，士卒病疾交加。五月一日，曹彬第二次被迫突围，退出涿州南下返回宋境。这一次，耶律休哥不再放过曹彬。他命令辽骑兵冲击突围南退的宋军。宋军被骑兵冲击后阵势大乱，狼狈南逃，一直逃到拒马河北的岐沟关(河北新城西北)。五月二日，两军在岐沟关北摆开阵势决战，宋军一触即溃，又南退到拒马河边。辽军紧追不舍，宋军一片混乱，夜渡拒马河，被淹死、踩死的宋军，在拒马河里躺成一片。曹彬收拾过河败军落荒南逃，逃到沙河，被辽军乘胜追杀，宋军再次惨败，士兵死伤无数，尸体堆积，使"沙河为之不流，弃戈甲如丘山"。至此，雍熙北伐宋军主力全军覆没。这就是有名的岐沟关之战，成为中国历史上著名的以众败于寡的战例。

消灭宋军主力后，辽军迅速西调，对付另两路宋军。田重进原来战况不坏，曾大败辽军，活捉辽将大鹏翼，占领了飞狐、灵丘(今属山西)等地。曹彬兵败岐沟，田重进只得退还定州(今属河北)，辽耶律斜轸等重新占领了飞狐及山西西北部地区。潘美、杨业原来更为顺利，一直打到云州，占领了山西北部。曹彬军败，潘、杨奉命退兵，在雁门关外被辽集中兵力所败，名将杨业殉国。至此，三路北伐宋军全部败退，雍熙北伐以宋彻底败北而偃旗息鼓。

雍熙北伐是宋辽双方战争史上最大规模的战役，双方几乎投入了全部的兵力、财力、物力。这次由宋太宗挑起的战争，给宋造成了灾难。宋朝除损失数

以十万计的兵力外，山西、河北等战区生产遭到破坏，民众受到浩劫，大批居民被俘掠、逃亡。辽国占领的幽云等地，同样遭到战争破坏。宋朝自雍熙北伐，"岐沟之蹶，终宋不振"，朝廷文武得了恐辽病。从此"弱宋"更弱，此后三百年，宋朝在对辽、夏、金战争中屡战屡败。　（顾全芳）

杨业之死

抗辽名将杨业在雍熙三年(986)重伤被俘，绝食殉国。

雍熙三年春，宋太宗经过多年备战，错误估计了敌我形势，决定倾全国之力，北伐辽国，以攻占幽云，打败辽国，统一中国，并报高梁河战败之仇。宋太宗以曹彬军为主力，从雄州(河北雄县)北上，直指幽州(辽南京，今北京市)；田重进等出飞狐(河北涞源境)，从中路策应。潘美、杨业为西路军，出雁门(山西代县境)，攻山西北部地区云州(山西大同)等地。宋太宗意图三路宋军在幽州会师，最后与辽军决战。

杨业，本名重贵，麟州(陕西神木)人。其父杨信，是以武力占据麟州的地方豪强。少年时代，杨业即喜爱弄武，并有志向。太原刘崇到麟州时，杨信将其不满 20 岁的儿子杨业交给刘崇，带回太原。刘崇建北汉当皇帝后，杨业仍在刘崇部下。刘崇将其改姓名为刘继业。北汉与后周、宋多次战争，杨业为北汉立下不少战功，成为名将。太平兴国四年(979)宋太宗攻太原，灭北汉，杨业曾顽强抗宋。北汉刘继元降宋时，杨业仍在与宋军战，奉刘继元之召，才来见宋太宗。宋太宗素闻其名，封杨业为右领军卫大将军，同时将其姓名刘继业改为杨业。杨业归宋后不久，便被派往代州(山西代县)宋辽边境，负责抗辽防辽，并曾于太平兴国五年及七年，两次以少胜多，击败辽军，屡建战功。雍熙三年北伐时，杨业为副都部署，地位仅在潘美之后。

潘美、杨业率宋军出雁门关，很快占领了辽的寰州(山西朔州境)、应州(山西应县)、朔州和云州。潘、杨打下山西北部，完成了宋太宗预定的任务，军事态势对西路军十分有利。可惜宋军主力曹彬在岐沟关惨败，使北伐失败。辽军在打败曹彬后，急速西调，直扑西路军。宋太宗眼看北伐无望，命令潘、杨西路军退还宋境。

西路军退还到代州时，辽耶律斜轸等已攻占代州西北的寰州，大有包围代州，消灭宋军之势，是走是战，必须迅即决策。潘美在代州召集高级军事会议，讨论御敌之策。参加会议者有潘美、杨业、王侁和刘文裕。王侁和刘文裕是西路军监军，负责监督西路军的军事行动。宋朝为防止军队重演陈桥兵变，威胁皇权，给予监军很大权力，加上王、刘又是宋太宗的亲信和亲戚，因而在军中飞扬跋扈，不可一世。杨业虽在代州为宋守边七年，对地理形势、辽军内情了如指掌，但因是北汉降将，自然低人一等。会上，杨业首先提出了经过仔细考虑的进退方案：不能与辽军正面硬拼，硬拼必然失败；只能佯攻代州北面的应州(山西应县)，调动辽军去救援应州，然后乘机掩护尚在朔州等地的大批军民，迅速撤退到雁门关内，完成宋太宗交给的安全撤退任务。杨业强调，只有这样，才是万全之策。岂料好大喜功的王侁，立即起来反对杨业的作战方案，主张同辽军正面决战。杨业重申，到寰州去同辽军硬拼，必败无疑。王侁拿出架势，威胁杨业：你号称无敌，如今不敢同敌人作战，是不是想投降？杨业最忌恨人说他不忠，因而被逼发誓：我不怕死，更不想降敌，实在是因为硬拼白白送掉战士性命。你说我怕死不忠，我可以身先士卒，死在战场上，以表忠心。会上，刘文裕支持王侁，潘美明知硬拼凶多吉少，但又惹不起王侁和刘文裕，因而没有明确表示态度。会议不欢而散。

散会后，杨业立即带领人马向寰州进发。临行，哭着对潘美说：我是降将，当今皇上不歧视我，反而重用我带兵抗辽，我一定要以死报国。我死不足惜，但其他将士的性命重要，希望你们在陈家谷口埋伏，作为后援，待我转战到此，共同夹击敌人。潘美、王侁同意了杨业的请求。杨业向寰州进军时，遇到耶律斜轸派出的骑兵，杨业领军奋勇冲杀，辽军且战且退，一直退到朔州南的狼牙村附近。杨业领军追到狼牙村，进入了辽军设的伏击圈。杨业方知中计，只得左冲右突，血战半天，才突出重围，于日落前退回到陈家谷口。杨业多么希望此时潘美在此地接应自己，共同杀敌。谁料到王侁以为杨业战胜了辽军，为了抢功，竟领部分宋军离开陈家谷前进。潘美无法阻止王侁违约离谷，自己怕被辽军消灭，也领军离开了陈家谷。潘美离谷走了 20 多里，听说杨业战败退到陈家谷，既不返回陈家谷，更不与杨业联系，而是临阵逃遁。

杨业领数百宋军到陈家谷，眼看四周无人接应，知道自己身处绝境，为国捐躯的时刻来临了。他对士兵们说：你们都有父母妻儿，用不着在这里同我一起战死，还是各自逃生吧。士兵们都哭着喊，愿与杨将军一起战死沙场。杨业无奈，"拊膺大恸，再率帐下士卒力战，身被数十创，士卒殆尽，(杨)业犹手刃数十

百人，马重伤不能进，遂为敌所擒。"在陈家谷战死的，除所有士兵外，还有老将王贵，以及杨业的儿子杨延玉。杨业重伤被俘后，辽劝他投降。杨业坚贞不屈，誓不降辽，绝食三日而死。时为七月中旬，地点约在杨业从朔州解往辽南京的途中。

杨业之死，引起宋朝野震惊，纷纷要求追查杨业之死因。经过调查，宋太宗将王侁、刘文裕削职为民，潘美降级降职。同时，赠杨业为太尉、大同军节度使。

（顾全芳）

王小波、李顺起义

淳化四年(993)王小波领导的四川农民起义。

宋朝于乾德三年(965)消灭四川后蜀政权。宋军在四川"掠子女，夺财物，蜀人苦之"。后来，宋又设置"日进"纲，将富庶的四川的金银财货，全部用船运到京城，时历十年。又设"博买务"，强迫民众"不得私市布帛"，而由官府垄断布帛交易。官吏在收购布帛时常常压价敲诈，使大批农民破产。还有，宋政府严禁部分茶农私卖茶叶，使大批茶农难以为生，茶贩陷于失业，加上天旱饥荒，农民走投无路，只得揭竿而起。

淳化四年二月，王小波首先领导百余人，点燃了农民起义的烈火。王小波，又称王小皤、王小博，茶贩，青城县(四川灌县南)人。王小波率领茶农揭竿而起后，提出了"均贫富"的纲领，附近农民纷纷响应，起义军很快发展到上万人，蜂拥到青城县城，攻占了该城。之后，起义军又占领了彭山县，活捉大肆搜括民财的贪官、县令齐元振。农民军怒不可遏，将齐元振"剖其腹，实之以钱，以其平日爱钱故也"。攻占彭山后，起义军声势大振，震动了四川。同年十二月，王小波率领农民军北上，打下了成都以西重镇江原(崇庆)。都巡检张玘率军顽抗。两军激战于江原。王小波指挥起义军作战，被宋军射中。王小波也发箭射死了张玘。不久，王小波箭伤发作，"亦病创死"。

王小波牺牲后，起义军推举李顺为首领。李顺是王小波妻弟，有威信，有领导才能。李顺率起义军横扫蜀州、邛州和永康军(灌县)，处决了一批贪官污吏。起义军没有因王小波牺牲而挫折，反而更加壮大。淳化五年(994)正月，李顺率领数万起义军，浩浩荡荡向成都进发。农民军火烧成都西郭门，城坚难破。李顺放弃攻城，挥师汉州(广汉)、彭州，然后又迅速回师，直指成都。这一次，成都被顺利攻占，起义达到高峰。起义军扩大战果，派兵四出，形成了以成都为中心，北抵剑关，东至巫峡的广大地区。起义军壮大为"众至数十万"。

在成都，农民军建立了政权机构，号"大蜀"，李顺为大蜀王，建号"应运"，战士称"应运雄军"。政府设宰相、刺史、知州等，统管占领区一切事务。发行了铜钱"应运元宝"和铁钱"应运通宝"。大蜀政权沿用起义初的办法，对富豪实行财产没收。富豪大姓必须自报家产钱粮，除留给生活必需外，其余全部归起义军所有。隐瞒不报者，则由起义军没收。没收来的富豪家产钱财，绝大多数用来救济贫民。这是深受广大农民欢迎的、也是大蜀政权的主要措施。王小波、李顺起义的"均贫富"，就是这种形式。大蜀政权没有、也不可能提出平分土地的设想或方案。

王小波、李顺起义"存抚善良，号令严明，所至一无所犯"，震动了东京。宋太宗决定以武力镇压起义，派遣宦官王继恩为西川招安使，带兵入川。淳化五年(994)二月初，宋太宗得到起义军占领成都的消息，惊恐万状，增派雷有终、裴庄、刘锡、周谓、王果等前往增援，还下令必须"旦夕讨平"起义军，对起义军"尽加杀戮"。起义军没有把兵力集中剑门，而是去打梓州(三台)。这就使宋军从必经之路剑门顺利通过，抵剑州(剑阁)。然后不到梓州而去绵州(绵阳市)。在绵州，起义军被宋军"杀戮及溺水者不可胜计"。起义军防御上的失误，使宋军迅速从绵州包围成都。成都被围后，李顺率数十万农民军英勇抵抗。五月七日，成都城被攻破，3万多战士阵亡，十多位将领及官员被俘杀害。李顺牺牲(一说李顺"得脱"，三十多年后在广州被俘杀，"年已七十余")。王继恩占领成都后，"恣横剽掠"，无恶不作。

成都被攻陷后，起义军在张余等领导下，继续斗争，攻占了嘉州(四川乐山)、戎州(四川宜宾)、泸州、渝州、涪州(四川涪陵)、忠州(四川忠县)和万州(四川万县)等广大地区，起义军发展到十余万，有战船千艘。八月，张余率农民军在转战川东后，回到嘉州。宋政府加紧镇压起义，四川地主武装也猖狂配合宋军。十一月，张余率农民军参加眉州会战后，又退回嘉州。十二月，起义军任命的嘉州知州在宋军猛攻嘉州时，临阵投降叛变，嘉州陷落。张余在战斗中被捕英勇就义。另一支由吴蕴领导的起义军，在眉州一带抵抗宋军，战败牺牲。其他起义军则分散各地，坚持了多年。

（顾全芳）

党项羌割据

宋咸平五年(1002)，党项羌首领李继迁依附于辽，攻占灵州，为西夏建国奠定基础。

党项羌在南北朝时期活动在黄河河曲古称析支

的地方（青海东南部）。后逐渐强大，其居地东至松州（四川松潘北），西接叶护（新疆境内），南杂春桑、迷桑（青海南部）等羌，北连吐谷浑（青海北部），从事游牧，有八个部落，以拓跋氏为最强。隋朝统一中国后，时叛时服，后归附隋朝，不时朝贡。

唐初，党项各部落先后降附唐朝，唐在其地设置羁縻州，擢党项首领拓跋赤辞为西戎州都督，并赐予李姓，以松州为都督府。因青藏高原的吐蕃日渐强盛，打败并占领了北部的吐谷浑，使党项羌受到吐蕃的威胁和挤迫，有的被吐蕃征服。拓跋部首领遂向唐朝请求内徙，唐玄宗下诏于庆州（甘肃庆阳）置静边州安置，党项族开始了大规模的内迁。唐代宗时期散居在灵州（宁夏灵武县境）、盐州（宁夏盐池县）和庆州一带的党项部落，又迁到银州（陕西米脂）以北，夏州（陕西靖边境）以东地区，还有的东迁到绥州（陕西绥德）、延州（陕西延安）一带。居住在夏州的称平夏部，居住在庆州的称东山部，居平夏部以南横山地区的称南山部。党项羌内迁后与中原地区更加接近，与汉族及其他民族交往增多，得到了迅速发展。留居松州的党项部落，为吐蕃所并，称为弥药。

唐末，党项平夏部首领、宥州刺史拓跋思恭因协助唐朝镇压黄巢农民起义军，参与收复长安战斗有功，于唐僖宗中和元年（881）升任定难军节度使，三年，进爵夏国公，复赐李姓。乾宁二年（895）思恭卒，弟思谏袭节度使，从此李氏世袭此职。夏州党项从此跻身于唐朝北部的重要藩镇之中。定难军统辖夏（陕西靖边）、银（陕西米脂）、绥（陕西绥德）、宥（宁夏灵武）、静（宁夏灵武）五州之地。

唐末、五代时期，夏州党项政权利用中原王朝和附近各藩镇之间的矛盾，纵横捭阖，不断增强实力。夏州党项政权先后臣服梁、唐、晋、汉、周及北汉。党项羌与汉族及其他民族交往增多，活动范围扩大，实力增强。一些党项部落入居汉族地区，相互杂居，渐习农业，被称为熟户；仍有一部分游牧于山间、草原，而被称为生户。

宋朝取代后周以后，夏州党项政权归属宋朝，其首领拓跋氏又被赐以赵姓。宋太宗太平兴国七年（982）党项首领、定难军节度使赵保忠（李继捧）因本族内一部分势力极想内附宋朝，不得已将所辖夏、银、绥、宥、静五州地献给宋朝。宋太宗进而强使继捧亲族都离开原驻地到宋京师。这种类似扣押人质的民族压迫政策，引起了部分党项族的不满和反抗。李继捧的族弟、定难军都知藩落使李继迁（赵保吉）设计谋率众逃入地斤泽（内蒙古伊克昭盟境内），号召人众，组织武装，抗宋自立。为求取外援，依附辽朝。辽则将其视为与宋和战的筹码，予以援助和利用，并以宗室女封义成公主下嫁。不久，继迁被辽封为夏国王。经十一年与宋反复角逐，终于宋至道三年（997）迫使宋朝封他为定难军节度使，仍管领党项原所辖五州之地。李继迁并不满足先世统辖范围，仍不断进攻宋朝疆土，最后于宋真宗咸平五年（1002）攻占灵州（宁夏灵武）。次年，改灵州为西平府，这里便成了党项族政权新的统治中心。李继迁注意发展生产，在大旱之年令蕃汉人民引河水灌田。

宋真宗咸平六年（1003）李继迁与吐蕃作战时受伤死去。其子李德明继王位。宋真宗景德三年（1006）李德明被封为西平王。他在位的 20 多年中，虽与回鹘、吐蕃发生过战争，但与宋朝大体上保持了友好往来。宋朝不仅每年赐给德明大量茶、绢、银，而且还在保安军（陕西志丹）开设榷场。李德明也注意发展生产，使西夏的封建经济有了进一步发展。宋天禧四年（1020）德明据新的形势，将其统治中心移往贺兰山麓的怀远镇，改称兴州（宁夏银川），势力更加壮大。宋仁宗天圣六年（1028）德明派其子元昊向西攻占甘州（甘肃张掖）、凉州（甘肃武威）。此后瓜州（甘肃安西）、沙州（甘肃敦煌）回鹘也来降服。至此大体上奠定了建立西夏王朝的版图基础。（史金波）

灵州之战

宋咸平五年（1002），党项羌首领李继迁攻取宋灵州的战役。

李继迁抗宋自立以后，臣事辽国，攻宋州城，并其族兄李继捧所统之众。宋太宗淳化五年（994）宋将所俘获继迁母罔氏羁于延州（陕西延安），以招诱继迁。至道元年（995）继迁遣左都押牙张浦至宋入贡，被宋留京师不遣。后又削赐继迁姓名（赵保吉）。宋以灵州（宁夏灵武）为防御继迁的军事重镇，粮秣需从关中与环州（甘肃环县）和庆州（甘肃庆阳）等地调运，十分不便。二年，继迁于灵武西南的洛浦河（宁夏吴忠南苦水河）夺取宋运往灵州粮 40 万石，后又集数万人围灵州，索要使人张浦。宋太宗命以五路出兵进援灵武。继迁恐平夏有失，遂解灵州围，回师援平夏，与宋战于乌白池（宁夏盐池），大败。三年以宋投降军校郑美为前导攻灵州，复大败。十二月宋授继迁夏州刺史、定难军节度使，复赐姓名赵保吉，送回使者张浦。咸平元年（998）、二年继迁先后攻宋麟州（陕西神木）、府州（陕西府谷）、延州、镇戎军（宁夏固原）。三年先屯兵萧关（宁夏同心），后复夺运往灵州

的粮运，宋转运使陈纬和知灵州李守恩拒战，死。辽授继迁子德明为朔方节度使，促继迁攻取灵州。次年，继迁以5万骑围灵州，宋军兵少，拒不出战。继迁令兵卒屯垦，作长围之计。宋大臣多人主张弃守灵州，真宗不听。继迁又率兵相继取灵州河外五城，使灵州孤立绝援。咸平五年三月，继迁集蕃部并力攻城，宋知州裴济奋力守御，饷援并绝，城陷被杀。继迁改灵州为西平府，后为都城。　　（史金波）

澶渊之盟

宋朝于真宗景德元年(1005)同辽国在澶州签订的屈辱性盟约。

自从宋太宗雍熙北伐彻底败北后，朝廷内外谈辽色变，加上四川爆发了较大规模的王小波、李顺农民起义，宋政府再也不敢对辽作战，而是采取妥协退让政策，把重心转移到对付“内患”上。宋太宗曾大讲“外忧不过边事”，内患才是对朝廷的真正威胁。至道三年(997)三月宋太宗病死，宋真宗即位，继续执行守内虚外政策，对辽更是以和为贵。咸平二年(999)，辽国向宋挑衅窥探，深入河北宋境，只是由于杨业之子杨延朗等以及群众的奋力抗辽，辽军才退走。辽见宋软弱可欺，便时常以攻为守，南下犯宋。

景德元年(1004)闰九月，辽国认为大举犯宋时机成熟，圣宗皇帝及萧太后亲率号称20万骑兵，大规模南下，于当月二十二日到达河北唐河，围攻定州。定州未破，辽军绕道而行，经祁州(河北安国)、深州、冀州、大名等地，深入到澶州(河南濮阳)，大有向宋朝京师东京(河南开封)进军之势。大敌当前，宋廷一片惊恐，宋真宗日夜焦虑。王钦若建议迁都金陵(江苏南京)，陈尧叟建议逃往四川。宰相寇准、毕士安力阻妥协逃跑，坚决主张抗战。寇准(961—1023)，字平仲，华州下邽(陕西渭南)人。19岁考中进士，先后任知县、三司度支推官、同知枢密院事、参知政事(副宰相)等职，为人刚正不阿，办事机敏果断。经毕士安推荐，寇准受命于危难之时，毅然于景德元年八月担任宰相。寇准任相后，立即着手准备抗辽，整顿朝纲，训练士卒，充实边防。面对辽军南犯和朝廷的退让政策，寇准力挽狂澜，怒斥妥协逃跑者“该杀”。他力促“圣驾暂幸澶渊”，亲征辽军，而且应当“进发不可缓”。在寇准的督促下，宋真宗被迫于十一月二十日从京城起驾，北上抗辽。到达澶州前，宋真宗实在怕死，又要返回京城。寇准力陈“陛下唯可进尺，不可退寸”，这位胆小如鼠的天子才被迫向前，于当月月底到达黄河北岸(后黄河改道)的澶州城北。封建社会皇帝代表国家。黄河两岸军民得知皇帝来到抗辽前线，一片欢腾，“踊跃呼万岁”，抗辽热情高涨，辽国方面也感到这次南下恐怕凶多吉少。

宋军20万与辽军在澶州城外摆开战场，准备决战。辽军统帅萧挞览为迎战宋军，在视察地形时，被宋有名的“床子弩”射中身亡。辽军见统帅未战而死，锐气大减。同时，河北各地军民听说宋辽在澶州对阵，加紧袭击辽军后方，准备断绝辽军退路。如果宋军此时一鼓作气，与辽军决战，则胜券在握。可惜宋真宗只想求和，根本想不到能打败辽军。他曾派人去探听寇准的态度。寇准看到军民同仇敌忾，知道这场战争能打胜，因而镇定自若，饮酒酣睡。当探听者向日夜惶恐的宋真宗报告说，寇相正在安睡，还打呼噜呢，宋真宗这才稍为安心。辽国方面见萧挞览已死，宋千军万马又如此斗志昂扬，后方又不稳，因而准备从澶州退军。此时，辽朝方面提出和谈，宋方便顺水推舟，同意停战谈判。

早在辽国围攻定州时，辽就曾派原宋朝降将王继忠及李兴，到宋境莫州(河北任丘)会见宋将石普，表示辽国愿意议和。和谈是假，想从和谈中得到战场上相同的好处是真。石普将这一信息飞告朝廷。宋真宗听到辽国愿和，当然十分赞同，他立即召辽使王继忠说：如果辽国准许通和，我国将立即派遣使者到辽方去谈判。十月，宋朝派遣曹利用到辽军商谈和议。萧太后提出，欲罢兵和谈，必须割让大片土地。宋朝认为土地是祖宗传下来的，不能动，谈判破裂。宋真宗到达澶州后，又想起了曹利用，看能否再同辽方和谈，于是令曹利用从天雄(河北魏县)秘密到辽军中。这时辽萧挞览已身亡，萧太后、韩德让正进退两难，赶忙接见曹利用，但这次接见谈判，收效甚微。辽国便派韩杞同曹利用一道，到宋方来谈判。宋真宗接见韩杞时，辽方坚持宋方必须割地才能求和，谈判再次破裂。宋真宗命曹利用陪同韩杞到辽营，又一轮和谈。曹奉命坚持不能割地，只允赔款，“许遗绢二十万匹，银一十万两”。辽国意欲讨价还价，改派姚柬之陪曹利用回宋，进行新一轮和谈。急于停战求和的宋真宗，向曹利用说，赔款“必不得已，虽百万亦可”，并又一次派曹去辽求和。寇准原来反对媾和，但见宋真宗刻意讲和，不能明确反对，只得将曹利用找来，对曹利用说：虽然圣上说了，可以给辽百万，但你与辽谈判时，许辽银绢决不能超过30万；超过30万，我杀你的头。曹利用至辽后，最后果然以每年送辽银绢30万达成协议。经过双方签约互换文书，协议正式生效。协议规定，宋方每年向辽纳银10万两，绢20

万匹，总计30万；宋辽双方互称“兄弟”，结成所谓兄弟之国；辽军退还至辽国境内。由于澶州郡名澶渊，史称在澶州宋辽签订的和约为澶渊之盟。具体签订时日为景德元年十二月初四，即公元1005年1月16日。

宋朝在军事态势有利的情况下，反而与辽签订了赔款媾和的屈辱性条约。这是宋对辽妥协退让的必然结果，也是“弱宋”的具体体现。尽管宋方坚持而未曾割地，但开了赔款之先例。此门一开，辽国动辄以武力相威胁，要求增加赔款额，成为宋财政的重负，民众的重压。更有甚者，后来的西夏与金，效法辽国，常以武力胁迫宋割地，目的是为得赔款，宋政府则为求得暂时安宁，有求必应。这就后患无穷。不过，从历史角度考察，澶渊之盟尚有可取之处。盟约签订后，“中外略安”，宋辽两国大体上保持了上百年的和平局面，这对双方尤其是宋辽边境地区人民的生产和生活，以及两国经济文化的发展，都起着积极作用。（顾全芳）

西夏文的创制和推行

西夏立国前创制党项羌民族文字，并推行使用的历史事实。

宋初，党项羌政权政治、经济、文化的发展，各民族间交往的增多，为西夏文字的创造提出了客观的需要。党项首领、夏国王元昊继位后积极做正式立国的种种准备，他把创制本民族文字作为立国的一个基本条件。元昊在建国前提倡并下令创制记录本民族语言的文字，而由元昊的谋主、大臣野利仁荣具体主持制定，累年方成，字形体方整类八分体。大庆元年（1036，宋景祐三年）颁行国内，尊为国字，大力推行，凡国中艺文诰牒尽易蕃书。所创蕃书又称蕃文，即后世所谓的西夏文。系借鉴汉字的形体和笔划制成，外形接近汉字。共6000余字，大多在10画以上，6画以下和20画以上的字较少。与汉字相比斜笔较多，一般四角饱满，字形匀称。其文字构成有单纯字和合成字，合成字占绝大多数。合成字中的会意合成字（约相当于汉字的会意字）、音意合成字（约相当于汉字的形声字）约占合成字的80%。音兼意合成字、反切上下字合成字、互换字和对称字等都表现了西夏文字的特点。西夏还设立蕃字院和汉字院。蕃字院掌管吐蕃、回鹘等王朝的往来文书，用西夏文书字，附以相应的民族文字。汉字院掌管与宋朝的往来表奏，中间写汉字，旁边写西夏文。西夏还在天授礼法延祚二年（1039）建立蕃学，由创制西夏文字的大师野利仁荣主持，教授西夏文，培养官吏。还把汉文典籍《孝经》、《尔雅》、《四言杂字》译成西夏文。从元昊时起，先后把大量汉文佛经翻译成西夏文，计有3700余卷，称为番大藏经，使西夏文的应用更加广泛。已经发现的大量西夏文献表明：西夏文应用范围广，使用地区包括西夏全境；延续时间长，西夏灭亡后，元、明时期仍继续使用，从创制文字时起，至少有460多年的历史；西夏文与汉文并用；编印有多种不同类型的西夏文字典、词书。西夏设刻字司，专主刻印事业。西夏文文献的大量印刷，推动了西夏文的使用和流传。传世的很多西夏文著作、字典、汉籍译本和佛经都是当时的刻本。西夏灭亡后，西夏文仍在部分党项羌聚居地流行。元朝还在杭州用活字版大量印刷西夏文佛经。目前见到最晚的西夏文文献为明朝中叶的保定西夏文石经幢。（史金波）

西夏立国

党项羌首领元昊在西北地区建立以党项羌为统治民族的西夏国的事件。

宋明道元年（1032）党项羌首领、夏国王李德明死，长子元昊嗣位。元昊对其父臣事宋朝早有不满，并与其父争论。执政后采取一系列重大措施，为正式立国做准备。首先取消唐、宋所赐李、赵姓，更号嵬名氏，号称“兀卒”。“兀卒”，党项语意为皇帝。发布秃发令。将宋明道年号改为显道。升兴州为兴庆府，扩建宫城，立官制，其官分文武班，有中书、枢密分掌其职，下又有三司、御史台、开封府、翊卫司、官计司、受纳司、农田司、群牧司、飞龙院、磨勘司、文思院、蕃学、汉学等。后又设总理庶务的中书令，增各司为十六司。又下令区别文武、官庶服饰。宋景祐元年（1034）改为开运元年，旋改为广运。二年（1035）定兵制，将全境分为左右厢，立十二监军司，各有军名。西夏大庆元年（1036）颁行新创制的民族文字，称为蕃文或蕃书，即后世所谓的西夏文。接连对宋、吐蕃和回鹘用兵。攻宋府州（陕西府谷），在环州（甘肃环县）、庆州（甘肃庆阳）击败宋军。次年攻打湟水流域的吐蕃首领唃斯啰，取得胜利。又发兵镇压肃州（甘肃酒泉）、瓜州（甘肃安西）、沙州（甘肃敦煌）的回鹘反抗势力，并回师取兰州，截断与吐蕃的联系。宋宝元元年（1038）元昊筑台受册，正式即皇帝位，建立大夏国，改元天授礼法延祚，封大臣野利仁荣等为中书、枢密等官职，开创了西夏十代帝王、共190年的基业。此时西夏的领土东尽黄河，西尽玉门关，南迄萧关，北抵大漠，包括了今宁夏、甘肃的大部、陕西省

的北部、内蒙古的西部、青海省的东北部地区。内有兴庆府、西平府、夏、银、绥、宥、静、盐、会、胜、甘、凉、瓜、沙、肃、洪、定、威、怀等州。西夏立国使宋、夏关系顿趋紧张，经长时间反复较量，后双方妥协议和，西夏名义上向宋称臣，宋朝承认西夏的实际地位，并每年给予大量岁赐，元昊自帝国中的局面就这样延续下来。（史金波）

西夏佛教的流传

西夏统治者大力提倡佛教，使佛教在西夏广泛流传和发展的历史事实。

佛教在党项族后来移驻的河西地区早已流行了六、七百年，这对迁到此地的党项族，不仅有潜移默化的影响，也有直接继承的关系。西夏立国前在党项族政权周围的汉族、回鹘、吐蕃、契丹都早已信仰佛教，对西夏佛教的信仰也有相当的影响。西夏历朝统治者都崇信并大力发展佛教，使佛教在西夏境内日益发展。宋景德四年（1007）党项首领、西平王李德明母死，下葬时，德明要求到宋朝北部佛教中心五台山修供十寺，可知当时佛教已成为党项王室的重要信仰。宋天圣八年（1030）德明向宋求赐佛经一藏。景宗元昊通晓佛学，继位后又向宋求取大藏经。西夏创制文字后，于立国当年（1038）即开始组织将汉文佛经翻译为西夏文佛经，使佛教在西夏进一步发展。自景宗至崇宗历经 4 朝 53 年中共译佛经 3700 余卷，称为番大藏经，即后世所谓的西夏文大藏经。元昊还搜集佛舍利，造金棺银椁，建高塔贮葬。他还以四孟朔（每季第一月的初一）为圣节，令官民礼佛，使佛教在西夏成为全民信仰，有了更高的地位。天授礼法延祚十年（1047）元昊建立规模宏大的高台寺，贮宋朝所赐大藏经，延请回鹘僧人演绎经文，易为蕃字。毅宗谅祚幼年继位。母没藏氏曾出家为尼，她十分好佛，继续推动佛教发展，于天佑垂圣元年（1050）役兵民数万人，在兴庆府建承天寺，延请回鹘僧登座演经。没藏氏与毅宗时临听讲。后毅宗和惠宗两朝又四次向宋朝求取大藏经。西夏时期妆銮敦煌莫高窟、安西榆林窟 80 余座，目前窟中遗留西夏时期的西夏文、汉文题记中以惠宗时期为最早。天佑民安四年（1093）崇宗与母梁太后发愿，动用大量人力、物力，重修凉州护国寺感通塔及寺庙。后又在甘州（甘肃张掖）修建规模宏大、佛身伟岸的卧佛寺。仁宗时印施佛经很多，并多次作大法会，延高僧讲经，布施、度僧，大量散施佛经。还系统地校勘、重印佛经，使佛教在西夏得到高度发展。

西夏中、后期，随着西夏与吐蕃关系的改善，藏传佛教有了很大发展，其势力主要在与吐蕃接壤的河西走廊一带，并将一部分藏文佛经译为西夏文。西夏在后期还封设帝师，开中国帝师制度之先河。藏传佛教在西夏的发展对以后藏传佛教的东传起了重要作用。西夏晚期，西夏统治者仍笃信佛教。仁宗死后，其皇后罔氏又大量刊印、缮写大藏经。光定四年（1214）神宗做御制发愿文发愿书写泥金字《金光明最胜王经》。西夏还在其佛教圣地贺兰山佛祖院刊印汉文大藏经，称为《西夏藏》，是当时中国为数不多的几部刻本汉文大藏经中的一种。西夏时期还辑录佛经。天庆七年（1200）西夏僧人编辑《密咒圆因往生集》，后收入汉文《大藏经》，还编辑《大方广佛华严经海印道场十重行愿常编礼忏仪》、《涤罪礼忏要文》、《魔断要语》、《四分律行事集要显用记》等。西夏佛教的发展对中国中古时期西北地区的佛教流传起到重要作用。（史金波）

西夏皇族与后族之争

西夏早、中期统治集团内部不断发生的皇族与后族的斗争，以及随之而产生的提倡蕃礼和汉礼之争。

西夏景宗元昊在立国前后，一方面效法中原王朝的政治制度，提高君权，一方面又蓄意保存并强调民族特点。集中君权与贵族势力产生矛盾。一些有势力的贵族多是与皇族世通婚姻的后族。景宗先后对卫慕氏、野利氏后族进行打击。夏开运元年（1034）景宗母卫慕氏族人卫慕山喜作乱欲谋杀景宗，事觉，景宗杀山喜鸩弑母卫慕氏，后又杀妃卫慕氏。景宗妻野利氏为皇后，生子宁令哥，后景宗复妻没藏氏，废野利后。天授礼法延祚十年（1047）没藏氏之兄、国相没藏讹庞唆使宁令哥刺杀元昊，后又借机斩杀宁令哥及其母野利氏。景宗幼子谅祚被立为帝，是为毅宗，太后没藏氏和兄讹庞总揽朝政。奲都五年（1061）讹庞父子欲谋杀毅宗，讹庞子妇梁氏告知毅宗，毅宗在大将漫咩支持下擒杀讹庞父子，废没藏后，召梁氏入宫为后，以梁氏弟梁乙埋为国相。毅宗下令停止使用蕃礼，改用汉礼，并向宋请求书籍及宋廷的朝贺仪式。拱化元年（1063）恢复唐所赐李姓。乾道元年（1068）毅宗死，子惠宗秉常 8 岁继位。母梁太后摄政，梁乙埋任国相，姊弟专权，一改毅宗所为，废止汉礼，恢复蕃礼，并大举攻宋。大安二年（1075）惠宗亲政，又下令以汉礼代替蕃礼，遭到后党的强烈反对，惠宗图依宋朝削弱后族势力。七年（1080）梁太后囚

禁惠宗。支持惠宗的将领拥兵自重，不听梁氏号令。宋朝乘机五路攻夏。九年(1082)梁氏又让惠宗复位。十一年(1084)乙埋死，其子梁乙逋继为国相。后梁氏、惠宗先后死去。天仪治平元年(1086)惠宗3岁子崇宗乾顺即位，母梁氏(前梁太后侄女)垂帘听政，与其兄梁乙逋共专国政，乙逋骄横恣虐，对内迫害老臣，对外加紧用兵，甚至图谋篡位。天祐民安四年(1094)，皇族嵬名阿吴、大将仁多保忠在梁氏支持下，杀梁乙逋。梁氏仍主国政，不准已成年的乾顺主国事。永安二年(1099)崇宗在辽国的支持下，鸩杀梁氏，亲掌国政，结束了第二次梁氏专权，并大力提倡汉学。仁宗继位后尊母任氏与曹氏为太后，任氏之父任得敬权势渐大，后入朝专国政，反对发展汉学，欲谋篡国。乾祐元年(1170)胁迫仁宗分国之半与之，各自立国，在金国的干预下未能得逞，旋被仁宗诛杀。

(史金波)

狄青西征

北宋名将狄青在陕西与西夏多年作战。

我国西部地区的党项族，自北宋宝元元年(1038)元昊称帝立国后，不断向宋扩张，宋夏战争连年不断。在长达四年的宋夏战争中，宋军屡战屡败，唯有名将狄青连连获胜，成为传奇式的人物而家喻户晓。

狄青(1008—1057)，字汉臣，河东汾州(山西汾阳)人，出身于贫困农家，以种田为生，终生不忘本而带有浓重的泥土气息。成名之后，有人逢迎拍马，说狄青是唐朝名相狄仁杰的后代，狄青公开声明，我从小务农，那里会是狄仁杰后代。16岁时，狄青之兄狄素在田旁与人打架，将人打落河中。地保赶到，要逮狄素去坐牢。狄青急忙对地保说，是我推打了人家，不是我哥。狄青便进入了牢房。宋朝有时可以在罪犯中挑选当兵的，由于狄青"风骨奇伟，善骑射"，便被选中，走出牢房，到京都禁军中当马夫。宋朝士兵的社会地位很低，有"好男不当兵"之俗。凡当兵的，脸上还要刺字，以防其逃跑。狄青后来当了大将，有人劝他去掉脸上刺的字。狄青不干，还说："某虽贵不忘本也。"

元昊称帝后，向宋境侵犯，有无视宋朝之势。宋仁宗考虑再三，决定不承认西夏，并派中央禁军前往抗夏。狄青便随军前往西北前线。这时，狄青已经30岁，并且当上了低级武官散直。出征前，狄青又被任命为延州指挥使。指挥使统兵500名。狄青就以这500名士兵起家，在战场上冲杀。狄青参加的第一仗，是攻打金汤城(陕西志丹东)，旗开得胜。第二仗是攻打宥州(内蒙古鄂托克旗南)，又捷。宝元二年(1039)十一月，夏军又犯保安军(陕西志丹)，卢守勤派狄青赶往保安军，与夏军激战，敌人又被打败。从此，狄青名扬天下，成为战无不胜的骁将，晋升为殿直。之后，狄青越战越勇，"与西贼大小二十五战，每战带铜面具，被(披)发出入行阵间，凡中八箭，累官至泾原路招讨副使"。头戴面具，披头散发，在敌阵中左冲右杀，身上8处中箭的狄青，靠自己的战功，在四年的戎马生涯中，博得了高级将领的职位。狄青打仗，常常组织人数不多的敢死队，自己则冲锋在前，使敌人闻风丧胆，自己则每战必胜。狄青不仅是一介武夫，而且足智多谋。在一次战前，他将宋军中强弱两队的队旗互相更换，夏军看见虎翼旗，以为仍是弱兵，便想先消灭弱队，岂料碰上的是精兵，结果全军覆没。

狄青战功赫赫，成为唯一能打胜仗的名将。仁宗皇帝也知道了狄青大名，说狄青是我的关公关云长。文臣范仲淹在陕西统兵，他听说部队里竟然出了个百战百胜的英雄，就把狄青找来。范仲淹对狄青极为赏识，说狄青是良将之才，并且指点狄青说，"将不知古今，匹夫之勇"，要狄青多读书，通晓历史、兵法，还送给狄青《春秋》、《汉书》。狄青非常感谢范仲淹的指点知遇之恩，从此"博览书史，通究古今"。欧阳修也很关心狄青。有人诬告狄青侵吞公用钱，欧阳修在仁宗皇帝面前，为狄青辩护说，狄青不会有这种事；即使有，也是不懂得公用钱的用法，用错了。尹洙也为狄青洗冤说，狄青"于公用钱物，无毫分私用"。庆历二年(1042)，长达四年的宋夏战争结束，双方议和。狄青被任命为秦州刺史、泾原路兵马副都部署，负责甘肃、宁夏宋夏边防的抗夏防夏。狄青指挥修筑城堡，加强战备，使"敌不敢犯寨"。宋朝重文轻武，严防武将拥兵专权，因而规定了将帅必须经常调动，使兵不识将，将不识兵，将帅很难有自己的亲信可靠而得力的军队。狄青终于调离宋夏前线，后来又离开军队，到朝廷当枢密副使。在远征广西侬智高后，回朝升任为枢密使。枢密使权力不大，仅掌管军事训练之类，地位却很高，相当于宰相。由出身低微的武将担任枢密使，在宋朝历史上是首次。尽管掌管军队、军事的枢密使，理应由武官担任，但宋朝深怕武将造反，因而历来由不懂军事的文官担任。狄青以自己的战功，理所当然应得此位。但自狄青当上枢密使后，朝廷的文官群起而攻之，认为不合祖宗规矩，甚至说谁敢保证狄青不会带兵推翻朝廷。狄青只有招架之

功，毫无还手之力，终于被罢免职务，不久便在陈州(河南淮阳)忧病而死，年仅50周岁。　(顾全芳)

三川口之战

西夏天授礼法延祚三年(1040，宋宝元三年)，西夏与北宋在延州外围的一次重要战役。

夏景宗元昊称帝后，宋仁宗削其赐姓、官爵，并募人拟捕杀元昊。天授礼法延祚二年景宗以锦袍、玉带诱鄜延都监李士彬，士彬斩使人。景宗又遣使入鄜延(陕西富县、延安)请和，辞甚悖慢，宋不从。景宗以宋不许和激励众人与宋作战。三年元昊用计伪装怯战，以骄宋守将李士彬，后破宋金明寨，俘李士彬父子。景宗欲攻延州，先使人至州，言欲改过归命。宋知州范雍大喜，防备松弛。景宗遂以数万军围攻延州。宋守军势孤，范雍急调驻兵庆州(甘肃庆阳)的鄜延环庆副总管刘平、副都部署石元孙督精兵兼程赴援，至三川口(陕西志丹西)与夏兵遇，宋军仓促应战，鄜延都监黄德和先溃走。裨将郭遵奋力抵抗，景宗使人集中射死其马，而后杀之，刘平率众退保西南山头。景宗麾骑出截宋军为二，大败之，刘平与石元孙被俘。时逢大雨，宋军来援。景宗又闻宋鄜州都教练使折继闵、柔远寨主张岊袭破浪黄、党儿二族，军主敖保被杀，宋并代钤辖王仲宝又以兵入贺兰谷，蕃将罗遁败于长鸡岭，于是夏军引退，延州解围。

(史金波)

好水川之战

西夏天授礼法延祚四年(1041，宋康定二年)，西夏与宋朝的一次重要战役。

宋、夏三川口战役后，夏景宗元昊围宋镇戎军(宁夏固原)，宋陕西经略安抚副使韩琦使环庆副总管任福率兵声言巡边，夜抵白豹城(陕西吴旗西南白豹镇)，平明攻取，袭破夏41族。宋军又攻夏铁冶务(夏州东)，争青涧城(陕西青涧)，侵陇干城(甘肃静宁)。天授礼法延祚四年，景宗又伪使人至泾原(甘肃泾川县)请和，韩琦认为西夏无故请和，定是欺诈。景宗派兵攻宋渭州(甘肃平凉)，进逼怀远城(甘肃平凉北)，韩琦急趋镇戎军，尽发其兵，又募勇士18000人，命行营总管任福率领，并授任福方略，申令持重。当晚，夏兵趋怀远东南，且日与任福部下战于张家堡，尽弃牛、羊、马、驼，佯败走。任福引轻骑数千追赶，晚屯兵好水川(宁夏隆德东甜水河)。时景宗自将兵10万营于川口，先以银泥盒密封鸽百余置道旁。任福率军循川西行，得盒发之，鸽自中起，盘飞军上，夏军铁骑四合，自晨至午相持不决，西夏伏兵又起，景宗复分兵断任福归路，任福力战，身受伤多处，仍奋力决斗而死。宋大将多人及士兵万余人战死，仅有千余人冲出重围。　(史金波)

定川寨之战

宋庆历二年(1042，西夏天授礼法延祚五年)，北宋与西夏在定川寨的一场大战。

好水川之战后，西夏因胜而日益骄横，不断兵犯宋境，兵锋直至黄河西岸的麟州(陕西神木)和丰州(陕西府谷)。北宋无奈，任命韩琦知秦州(甘肃天水)、王沿知渭州(甘肃平凉)、范仲淹知庆州(甘肃庆阳)，分兵把口，负责对夏防务。同时，宋增拨粮草，征召士卒，增派军队，加强防御。由于北宋对西夏的防线延绵约2000余里，易受夏的攻击。西夏则往往采"以十战一"，各个击破的战术，使宋防不胜防，被迫改为重点防御，强调各军之间要互相配合，共同作战。宋军在各点的总兵力达20万，严阵以待。

庆历二年闰九月，夏景宗元昊遣教练使李文贵至宋界请和，实际却积极准备大举犯宋。宋将庞籍疑李文贵请和是诈，留之不遣。夏中书令张元认为，宋精兵并聚诸边，关中少备，可用重兵威胁宋边城，使其不得出战；同时乘间深入，东阻潼关，隔绝西川贡赋，则长安在掌中。元昊采纳，在天都山点集左右厢兵10万，分东西两路合攻镇戎军(宁夏固原)。宋知渭州王沿首当其冲，命泾原路副总管葛怀敏统军救援镇戎军，其它各地宋军也向镇戎军集结增援。王沿先曾赠书告诫葛怀敏：勿深入，背城为营，诱敌至，发伏兵攻击，即可胜利。葛怀敏不听，进至镇戎军南数十公里的瓦亭寨后，便兵分左右两翼推进，又命其它宋军兵分四路，向镇戎军西北20公里左右的定川寨(甘肃平凉北)进发，占领了定川寨。此时，夏军蜂拥而至，包围了定川寨，毁板桥断了宋军归路，后又绝定川水上流，饥渴宋军。怀敏部署抵抗。夏骑兵冲乱宋阵，怀敏被迫退入瓮城。入夜，夏军燃火攻城，城中一片慌乱。怀敏召集诸将商议结阵撤退。但夏已完成四壁重围，结果宋全军覆灭，怀敏等将校40余人战死，近万士兵被俘。元昊乘胜大掠渭州，关辅居民震恐，纷纷逃往山间。元昊令张元作露布，声言朕将"亲临渭水，直据长安"。夏军自渭州东进，在潘原被宋军所败。宋仁宗又命范仲淹统军增援渭州。至此，元昊才挥军撤退。　(史金波、顾全芳)

王伦起义

北宋中期王伦领导的士兵起义。

宋朝立国后，采取募兵政策，招募大量贫困农民当兵。到北宋中期，宋朝的士兵超过一百万。宋朝兵制，将士兵分为禁军、厢兵、乡兵、番兵四种，禁兵多在京城，身体强壮，训练较好，待遇也较好。厢兵则多在地方州县，兵员亦多在本地招募，平时很少训练，战斗力不强，待遇低而吃苦多，实际上是服各种劳役、干苦活的特殊士兵。乡兵则是亦兵亦农的民兵。番兵是少数民族组成的兵种。宋代重文轻武，士兵尤其是厢兵社会地位十分低下，以致有“好男不当兵”的习俗，“都下鄙俗，目军人为赤老”，将军人骂为赤老。厢兵苦役多而军饷很少，还常被克扣或停发，因而难以养家糊口，常常被迫逃跑或干脆暴动。厢兵来自农民、贫民甚至罪犯，农民的境遇好坏，直接影响到士兵的情绪、立场；农民举行起义，士兵则同情甚至响应。这些，促使宋朝士兵暴动、起义此起彼伏。宋真宗统治时期，四川王均兵变，宜州（广西宜山）陈进士兵暴动等，已使统治者坐立不安。到庆历年间，农民起义和士兵暴动接连不断，“杀官吏，据州城，尽取官私财物，召募徒众”，有的甚至“称王称朕，与朝廷抗礼”。庆历三年的王伦士兵起义，就是在这种形势下发生的。

王伦原为沂州（山东临沂东南）虎翼军士卒。京东安抚使陈执中在山东大量搜刮民财，鱼肉百姓，并且强迫农民修建青州城（山东益都），引起农民的强烈不满。王伦于庆历三年五月，串通近50名士兵，杀死巡检使朱进，举起了义旗。宋廷得知山东王伦起义，决定派李沔等前往镇压。欧阳修曾上奏皇帝，说假定王伦从山东打到全国，“杀官吏，据城邑，谁为捍御者?”他主张对镇压王伦等起义不力者，必须罢官惩办。王伦举起义旗后，立即从临沂北上青州，陈执中派巡检使傅永吉与王伦战。王伦不能入青州城，只得游击流动。先打到密州（山东诸城），之后又打回沂州。又从沂州出发，打到海州（江苏连云港）。再从海州转战泗州（江苏盱眙）、楚州（江苏淮安）。不久，又打到高邮军（江苏高邮）。在高邮，王伦义军扩充为二三百人，“皆是平民”，脸上都刺“天都圣捷指挥”等字。王伦又从高邮军出发，进军江苏之泰州和扬州。王伦以少数起义军转战千里，“连骑扬旗，如履无人之境”。各地官吏见王伦兵来，不是逃避便是迎送酒茶，州县的“衣甲器械”，多为王伦所取。“所向莫敢当”的王伦，在扬州山光寺南与官军激战，败退到和州（安徽和县），傅永吉又尾追而来，王伦寡不敌众，在历阳（安徽和县）被杀牺牲，王伦士兵起义失败。

（顾全芳）

瑶汉人民起义

湖南瑶汉人民联合于庆历三年(1043)举行的大规模起义。

我国岭南一带的桂阳、彬州、连州、韶州等地山区，很早就有“居山谷间”、“环行千余里”的少数民族瑶族。这些分散于山谷间的瑶族，虽然“不事赋役”，却既不被宋政府重视，又要受地方官吏的欺诈。宋初，由于北边有契丹、西边有党项族的威胁，因而对边境及少数民族的政策，“重西北而轻西南”，对西南地区采取听之任之的态度。这就使派往少数民族地区的政府官吏，可以玩忽职守，甚至胡作非为，而朝廷鞭长莫及，难以纠察整治。西南少数民族与地方政府之间的矛盾，渐趋激化。少数民族忍无可忍，便起义以求改善自己的地位。

湖南瑶汉人民起义的导火线，是食盐问题。湖南山区食盐奇缺，而宋政府却在这里也实行榷盐即食盐专卖制度，只能由官方买卖，不许私人贩运。这就给深居山区的瑶族人民带来不便和灾难。他们强烈要求改变食盐专卖政策，时有小规模的反抗举动。瑶汉人民起义的直接起因，是统治湖南的转运使王逵在那里鱼肉百姓，大量搜刮。除常税外，王逵强迫民众上贡钱物，而且数量很大。居住这里的汉民不堪重负，纷纷逃往山区，与瑶族人民生活在一起。

庆历三年八月，经常出入瑶区的黄捉鬼兄弟数人“皆习蛮法”，带领瑶民数百人贩卖食盐，杀死官吏后逃至深山，起义爆发。宋政府为镇压起义，放火烧掉住在瑶区汉民的房屋，不准汉民在瑶区种田居住，强迫汉人迁走。于是，瑶汉民众联合起来，聚集5000人，举行更大规模的起义。起义军凭借山区易守难攻的优势，神出鬼没，使宋官军防不胜防。九月，起义军从蓝山县扩展到其它地区，打死了巡检李延祚、潭州都监张克明。宋廷得知湖南起义，手忙脚乱，急忙派杨畋前往镇压。杨畋系文官，但却凶残，他通告“杀一人头，赏钱十千”，官军为求得赏钱，滥杀起义军，连普通百姓也不放过。这就更激起瑶汉民众的愤慨。十二月，杨畋入山区围剿义军，在孤浆峒惨遭失败。杨畋躲在草丛中仅免于死。杨畋逃回后恼羞成怒，又深入宁远南九嶷山区屠杀起义军，义军稍有挫折，但仍势盛。庆历四年春，宋廷加派刘沆等人前往桂阳监，同杨畋通力攻打起义军，仍难取胜，反而损兵折将。

宋政府又采纳欧阳修、余靖等“分行招诱”的建议，诏令湖南转运使郭辅之等招安起义军，并对瑶、汉两族采取分化挑拨之策。然而起义军不为所动，继续抵抗官军的围剿。宋政府再派王丝、徐的及刘沆领宋军增援。起义军中有千人以上投降，邓文志等三头领受招安。但从庆历四年到五年内，官军和起义军多次作战，互有胜负。庆历六年四月，刘沆、杨畋等兵分八路，对起义军征剿，桃油平、能家源等瑶据点被攻破，义军首领唐和尚又败于银江源。但该年冬，唐和尚在华阴峒隘口大败宋军，杀死宋臣胡元。刘沆、杨畋因此而被宋廷撤职，加派黄士元发大兵征讨，起义军被迫转战英州、彬州和韶州，“依山自保”。庆历七年，义军与官军激战，但负多胜少。五月，义军首领唐和尚、盘知谅等受挫后接受招安。坚持了四年之久的瑶汉人民起义，归于失败。　（顾全芳）

张海起义

庆历三年(1043)张海等领导的陕西农民起义。

庆历初，全国连年干旱，庆历三年春夏，更遇大旱，宋国内尤其是北方地区，广大农民家无隔日粮，而国家税收却照旧征收，逼得农民无以为生，纷纷逃荒。宋西北边境，由于宋、夏连年战争，老百姓负担更重。庆历三年，全国各地农民起义此起彼伏。南方有瑶汉人民大起义，北方有王伦起义。此外，小股农民暴动遍及池州(安徽贵池)、邓州(河南邓县)、解州(山西解县)、南京(河南商丘)等地。面对“盗贼渐多”即农民起义风起云涌的局面，宋统治集团内部，有的主张招安即收买起义军，使起义者投降归顺；有的则主张以武力镇压，平息暴动。宋对农民起义，大体采用招安与征剿并用或交替使用之策。

庆历三年，京西、陕西两路的伏牛山、熊耳山、终南山、武当山之间的商洛地区，更是遭到百年不遇的大旱，大批饥民不得不逃荒求生，迁走他乡。在此之前，商洛贫困山区已连年干旱，早就有农民起义军活动，其中有张海、郭邈山(一作郭邈三)、党君子、范三等小股农民军。张海原属李宗领导的农民军。到庆历三年，张海等召集饥民，并且“以小合大”，联合起来举行大规模起义，起义军有千人以上。张海、郭邈山等联合组成的起义大军，于庆历三年夏在河南卢氏县以东、洛阳以西一带劫富济贫，打击官吏豪强，声势浩大，“州县不能制”。八月末，宋命令曹元喆、张宏、黎遂等率中央禁军前往镇压。九月初，宋又派监察御使蔡禀为京西安抚使，加强对起义军的围剿。宋仁宗还专门下了诏令，全国文武官员中有能镇压起义者，可以自报，如果镇压有方，可以嘉奖及越级提拔。然而，起义军不但没有缩小，反而更为强大，并且南下攻占了黄河以南的汝州(今属河南)、唐州(河南唐河)、邓州、均州(湖北郧县)、房州(湖北房县)、金州(陕西安康)等州县，“如入无人之境”，转战千里之外，一直打到汉水流域的襄州(湖北襄樊)、郢州(湖北钟祥)及安州(湖北安陆)。起义军所到之处，处决贪官污吏，没收豪强财产，打开官仓府库，分粮给当地贫苦百姓。老百姓欢欣鼓舞，纷纷加入义军行列。特别是起义军打到湖北时，光化军(湖北均县东南)驻地的300多名宋官军在邵兴领导下响应起义，活捉其指挥使李美，知光化军韩纲等官僚落荒而逃。

邵兴官军造反占领光化军后，率军取蜀道北上，打回商州(陕西商县)，又打进兴州(陕西略阳)和洋州(陕西洋县)，并在蓝田(今属陕西)打败官军，杀死与起义军为敌的官军官员上官珙。在兴元府(陕西汉中)的饶风岭，再次打败官军，兴元府军校赵明投降了起义军。十一月，邵兴被陈曙所率官军追击，在壻水(陕西洋县境)战败被俘，宋廷下令就地将邵兴斩首，其部下多被俘杀。

张海、郭邈山等打到湖北后，又返回商州一带。宋以韩琦为宣抚使，指挥官军围击起义军。是年底，张海、郭邈山等率军与官军大战于商山，义军兵败，张、郭等英勇牺牲，起义军被全部消灭。张海起义在不到一年的时间内，转战于陕西、河北、湖北等广大地区，所向无敌，使宋朝野震惊，“不寒而战”，给封建统治者以沉重打击。张海、王伦、瑶汉人民差不多同时起义，在全国燃起的反宋统治烽火，使范仲淹、韩琦、富弼等认识到，农民们起来造反，原因不在其它，而是在于宋政策有误，“徭役日繁，率敛日重”，农民们被逼上揭竿而起之路；为使国内安定，必须“减徭役”、“厚农桑”。这就使庆历三年的农民起义，推动了正在进行的、范仲淹领导的庆历新政。（顾全芳）

庆历新政

范仲淹等领导的政治社会经济改革。

宋朝建国之后，改革了五代的武人专权而横行不法等种种社会弊端，基本统一了全国，以文治国，走上了稳定发展的轨道。然而，一些积弊仍沿续下来，而宋初的一些政策，又矫枉过正，从而使宋朝出现了不少新的弊病。这些弊病，到宋朝立国八十年后的庆历年间，发展成严重的社会经济危机。这些弊病主要表现在冗官成灾而因循守旧，冗兵日多而战斗力不强，冗费日增而财力空虚。庆历年间，农民和士

兵起义此起彼伏，日甚一日。庆历三年(1043)一年之内，就爆发了王伦、张海以及湖南瑶汉人民起义。党项族建立的西夏，与宋朝接连四年兵戎相见，以宋朝屡战屡败而告终。北方的辽国则乘宋之危，要求宋朝增加对辽输送澶渊之盟时规定的岁币。面对如此严峻的时局，内外交困的处境，国家社会"纲纪制度，日削月侵，官壅于下，民困于外"等严重不景气，范仲淹等忧国忧民有识之士，大声疾呼革除积弊，振兴宋朝。宋仁宗焦头烂额，走投无路，急于消除内忧外患，以延续赵宋统治，起用范仲淹、富弼、韩琦、欧阳修等力主革新图强的士大夫，主持朝政。范仲淹等义不容辞地对朝政的各方面，进行大规模的改革。由于改革出现在庆历三年至五年，历史上称之为庆历新政。

范仲淹(989—1052)字希文，苏州吴县人，家境贫苦而好学上进。27岁考中进士，历任州县及中央右司谏等官职，曾受排挤。庆历新政前，范仲淹多次上书，要求改革，提出"固邦本，厚民力，重名器，备戎狄，杜奸雄，明国听"等改革设想。庆历三年八月，范仲淹被任命为参知政事(副宰相)，着手改革。富弼(1004—1083)，字彦国，河南洛阳人。26岁科举入仕，历任官职至知谏院。庆历三年升任枢密副使。韩琦(1008—1075)，字稚圭，河南安阳人。也是科举入官的有为之士，曾同范仲淹至陕西抗夏，时称范、韩。这三人志同道合，时人比之为三人同推一辆车，通力合作，共同推行新政。欧阳修(1007—1072)，字永叔，吉州庐陵(江西吉安)人。幼贫而苦学，23岁考取进士而入官，力主革新图强，曾因替范仲淹申辩而遭贬。庆历三年知谏院，利用其谏官地位，积极支持范仲淹等的新政。

庆历三年九月，在宋仁宗急于消除内忧外患的逼促下，范仲淹、富弼向宋仁宗《上十事疏》，庆历新政正式开始。《上十事疏》是范仲淹等的改革纲领和方案。新政的实施，依《上十事疏》为蓝图。《上十事疏》及新政改革的主要内容有：

一、"明黜陟"、"抑侥幸"、"精贡举"、"择长官"。这是庆历新政的重点，也是新政推行的政治体制改革。目的在于整顿和精简官僚机构，精减官吏，革除冗官成灾的积弊；改革官吏任免制度，提高官僚素质，改变因循苟且、无所作为的恶劣风气，使国家机器能够正常运转，生气勃勃。新政前的旧制规定，不管官僚的政绩如何，照常是三年一迁，五年一升。这种摧残人才、鼓励当一天和尚撞一天钟的规定，造成"人人因循"而死气沉沉。范仲淹提出改革方案，核心是考核升降官僚，主要应看政绩，看其成效。如果官吏无所事事，一事无成，不但不应升官，而且应当罢职。他坚决主张并且在新政中部分地执行了对"年老、病患、赃污、不材四色之人"，"并行澄汰"，即坚决不能让年老不能办事者，有病在家休养者，贪官污吏以及毫无才能者，在官僚队伍中滥竽充数。在审查任免地方官吏时，范仲淹"视不才者一笔勾之"。富弼说，你一笔勾掉了人家的官职，很容易，却不想一想，这些官僚的一家人都要哭啊。范仲淹说，不让这班囊才做官，仅仅是一家人哭。如果让他们去当官，则一路(相当于一省)人都要哭。与其让一路人哭，不如让一家人哭。

恩荫制度是造成宋代冗官泛滥，官僚素质下降的重要原因。所谓恩荫，就是贵族官僚的子弟，可以通过其父兄的特殊地位，得以当官。范仲淹主张限制这种赐官制度，以免"权势子弟，长期占据"京官等官职混日子。范仲淹还提出，在考试取士时，重点应考考生的实际能力，考经世治国的才能，而不应把重点放在诗赋上。只有这样，方能考出实际水平，以"求有才有识者"，充实到官僚队伍中去。宋仁宗很快地批准了上述改革方案，并迅速诏令天下，组织实施。庆历三年十月颁布了新的考课法，十一月颁布了新的恩荫制，第二年三月，公布了新科举制。新制颁布后，收到了一定成效。有作为的官僚得到重用，无所作为的官僚被罢黜；既煞住了无限扩张的"任子之恩"，又选拔了经世之才充实官吏队伍。

二、"均公田"、"厚农桑"、"减徭役"。这实际上是经济方面的改革。公田(职田)是贵族官僚的一项特权，其剥削所得，无偿地作为俸禄的一部分。公田既强迫农人耕种，控制和分配权又掌握在大官僚手中，出现了严重的分配不公。范仲淹提出限制公田数额，明确规定各级官吏的公田多少。做到"人有定制，士有定限"。北宋的农民，赋税负担越来越重，使农业生产难以为继。范仲淹提出解决"贫弱之民，困于赋敛"的办法，以及兴修水利，"养民""务农"等措施，以振兴农业。北宋的徭役(劳役)繁重，使地主和农民深受其害。范仲淹主张减轻地主和农民的劳役负担，提出合并州县，撤销部分县、镇级建制，使裁减下来的役人"各放归农"，回到农业生产上去，做到"但少徭役，人自耕种"。这三方面的改革措施，也被宋仁宗接受，于庆历三年十一月及明年五月颁布实施。

三、"修武备"。这是加强战备主要是加强京师防备的建议。范仲淹提出先在京师招募50000士兵，"使三时务农，大省给赡之费；一时教战，自可防御外患"，既省养兵之费，又使百姓能成为战士。范仲淹建

议在京师示范后，再推广到全国。这一主张，显然带有寓兵于农、兵农合一的倾向。

四、"覃恩信"、"重命令"。这是为了纠正有令不行，有禁不止的坏作风。范仲淹强调，以前国家的政策法令，尤其是"宽赋敛、减徭役"等有利于百姓的法令，各级官吏实际上并没有执行。今后，如果州县官吏阳奉阴违，不执行国家的政策法令，"尽成空言"，必须追究责任，直到罢官判刑。如果官吏无视法律，执法犯法或"受财枉法"，必须从严处分。

韩琦也提出了改革设想和方案，并与范、富的方案大同小异。属于边防与军事方面的有"清政本，念边计，擢贤才，备河北，固河东，收民心，营洛邑"等。属于政治和经济方面的有"明按察，丰财利，遏侥幸，进能吏，退不才，谨入官，去冗食"等。欧阳修、蔡襄、余靖等谏官，极力支持新政。欧阳修甚至向宋仁宗发出警告：革新朝政，不能有任何动摇，必须全力依靠和支持范仲淹、富弼，倘若轻信由于新政而使"小人怨怒"的话，"则事不成矣"。后来的事实证明，欧阳修的警告，成了准确的预言。

由于庆历新政触动了权贵们的既得利益，因循守旧之辈对新政不遗余力地加以反对和破坏。章得象、吕夷简等顽固之士，以莫须有的"朋党"等种种罪名，强加在范仲淹等身上。宋仁宗本来就不想改革，而是迫于内外交困的时势。时势有所松动和好转，便放弃原来急切地"必以太平责之"的主张，对范仲淹等"任之而不能终"。庆历四年六月，范仲淹被任命为陕西、河东宣抚使，离京赴陕西。八月，富弼被任命为河北宣抚使，也离开朝廷。之后，欧阳修、韩琦相继离京。庆历五年正月，范仲淹被罢参知政事，富弼被罢枢密副使。范仲淹等力主革新者被"一网打尽"。二月，新法多被废止。庆历新政夭折。　（顾全芳）

宋夏和议

宋仁宗时因西夏立国而引起宋夏之间的战争，最后双方议和的事件。

西夏立国前，党项羌政权为宋藩属。宋宝元元年(1038)西夏景宗元昊宣布裂土称帝，正式立国。宋仁宗大怒，立即削其赐姓、官爵，断绝互市贸易，并募人悬赏捕杀元昊。同时筹备边务，以图对西夏惩罚。元昊亦向宋用兵。宋康定元年(1040)、庆历元年(1041)、二年宋夏接连发生了三川口、好水川、定川寨三次大的战役。皆以宋失败结束，至使关陇大震。宋因军费开支浩大，国库空虚，人民负担加重，起义不时发生，又恐辽夏联手来攻，所以希望结束战争冲突。西夏虽在军事上取得了一时胜利，但亦因连年用兵，军马损失甚重，人民苦于征战，社会很不稳定。又因宋夏停止榷场贸易，宋不准西夏所产青白盐入境，西夏仰赖宋朝的粮食、绢帛、茶叶等日用必需品奇缺，境内各族人民不满。西夏已为长期战争付出了很高代价，很难再负担新的战争，元昊也有意向宋求和。宋庆历三年(1043)元昊遣使赴宋都议和，要求岁赐、割地、不称臣、驰盐禁、至京师市易、自立年号、改称吾祖等十一件事。宋臣议论纷纷，韩琦、范仲淹、余靖、欧阳修等主张征讨，多数大臣认为应当议和。仁宗对向西夏用兵亦感烦恼，愿与西夏和议。双方经过一年多的谈判，于四年(1044)宋夏双方达成和议，宋册元昊为夏国主，西夏向宋称臣，每年赐西夏绢13万匹，银5万两，茶2万斤，其他岁时赏赐计银2万两，银器2千两，绢2万匹，细衣着1千匹，杂帛2千匹，茶1万斤，共计25万5千两、匹、斤。于保安军和镇戎军高平寨开设榷场，双方恢复互市。此后西夏名义上向宋称臣，但元昊自帝国中的局面便延续下去。

（史金波）

贺兰山之战

西夏初期在贺兰山一带与辽军的两次重要战役。

西夏建国前后，一直臣于辽国，依赖辽国支持与宋对立，但双方也有矛盾。天授礼法延祚六年(1043)景宗元昊侵契丹境内党项，辽遣使诘责景宗，不听。继潜诱辽境内南山党项诸部及呆儿族800户叛契丹而附西夏。后契丹征讨党项，景宗发兵助战杀契丹将。契丹主怒，征诸道兵讨西夏。宋夏议和后，辽夏矛盾加深。七年(1044，辽重熙十三年)辽兴宗将兵10万，弟天齐王耶律重元将骑兵7千、北院枢密使韩国王萧惠将兵6万，分三路大军渡河攻夏，长驱400里无人迹。景宗以左厢兵屯贺兰山北，萧惠遣将萧迭里得等冲击夏军中坚，夏军大溃而退。景宗率残众守贺兰山，见契丹兵势众请降。萧惠建议辽兴宗灭夏，兴宗犹豫未决。景宗退军百里赭其地。辽马无食而许和。景宗又迁延数日，待辽军马困乏进攻，先败，后乘风沙大起，纵军急攻，萧惠军溃退，死者甚众，辽兴宗亦败走，驸马萧胡覩及近臣数十人被俘。后元昊遣使请和，归所俘获。

景宗死后，子毅宗谅祚年幼继位，母没藏氏与舅没藏讹庞主国政。延嗣宁国元年(1049)夏两次遣使向辽进贡，皆被扣留。七月，辽兴宗亲征，以天齐王耶律重元、北院大王耶律仁先为前锋，韩国王萧惠为河

南行军都统率大军渡河攻入夏境。萧惠轻敌，不立营栅。讹庞派夏兵突袭，辽军大败，死伤万计。辽兴宗又派行军都统耶律敌鲁古率阻卜军由北路至贺兰山攻夏。没藏讹庞以3000骑扼险拒战，敌鲁古大呼奋击，夏兵大败。毅宗母没哆氏及官属被俘。次年，辽兵围夏都兴庆府(宁夏银川)，纵兵四面大掠，没藏氏令诸城坚壁拒战，后通使与辽修好。（史金波）

贝州士兵暴动

庆历七年(1047)王则领导的贝州士兵起义。

庆历年间，黄河以北地区连年遭灾，农民对宋政府日益反感。地位低下的各地厢兵，受农民情绪的影响，反抗宋政权的行动一触即发。贝州(河北清河)的宋士兵在小校王则的领导下，终于举起了反宋旗帜，推翻了贝州地方政府，建立了新的政权机构，成为典型的宋代士兵起义。

王则，河北涿州人，家境贫困，又遇荒年，逃荒到宋统治区贝州。逃荒前，其母在王则背上身刺一“福”字，以作标记。王则逃到贝州后，初为人放羊为生，后当兵吃粮，以谋生路。在宋军中，王则被提拔为低级武官小校。河北盛行弥勒教，王则及其它士兵多信奉该教，读过《五龙滴泪》等经书。王则信教后，利用弥勒教宣传反宋。社会上流传“释迦佛衰谢，弥勒佛当持世”，影射宋朝即将灭亡，背上有“福”字的王则当起。庆历七年秋，王则见时机已到，与另两位贝州小校张峦、卜吉秘密策划，商定在庆历八年正月初一起义，计划切断澶州(河南濮阳)黄河浮桥，以阻止宋军进入河北，联络山东德州、齐州(济南)以及深州(河北深县)等地的信教士兵，同时举行声势浩大的暴动，夺取各地地方政权。

在与各地联络之时，起义计划被叛徒潘方净出卖。北京留守贾昌朝得知黄河以北即将发生士兵暴动后，派大名府钤辖郝质带兵赶到贝州，以防叛乱。王则眼见计划被泄，有灭顶之灾，便决定提前于庆历七年十一月二十八日冬至那天，在贝州及各地起义。冬至那天，王则如期举事，首先派人去控制武器库。这天，贝州知州张得一、通判董元亨等州官，恰在天庆观拜谒。董元亨在天庆观得知士兵造反，立即返回。起义士兵十余人闯进董元亨公堂，举起刀刃，逼迫董元亨交出武器库钥匙，董元亨拒交，被随后赶到的起义士兵头目郝用杀死，搜出了钥匙，打开了武器库，为占领贝州城取得了武器。同时，王则派人打开了贝州监狱，放出了犯人。起义士兵活捉了张得一，处决了贝州文武官员王奖、李浩、齐开、王洙，占领了贝州城。

占领贝州后，王则自称东平王(一作东平郡王)，建国号安阳，改年号为“得至”(又作“得胜”、“德至”)。并任命张峦为宰相，卜吉为枢密使。王则还将贝州城内的楼当作州，写上州名，封其部下为知州，并设总管。这样，上有王、将、相，下有各州知州、总管，在形式上具有了政权机构的权力与职能。为了表示反宋决心，起义士兵一律在脸上刺“义军破赵得胜”6字，赵是指赵宋政权。因战士都信教，在起义旗帜上有一“佛”字。

由于起义仓促，德、齐、深等州士兵难以同时响应贝州起义，未能实现黄河以北同时起义的宏大计划，并使宋得以集中兵力对付贝州起义。十二月初，贾昌朝向宋廷报告了贝州暴动，宋中央立即命令澶州、定州、真定府各地加强防范控制，以防起义蔓延。同时通知辽国来宋使者，不走起义地区，改道到宋京都，以防不测。宋政府还派明镐、麦元言、王凯等，抽调宋军精锐禁兵，赶往贝州镇压起义。宋官军包围了贝州城，宣布凡是能引官军破城者，“授诸卫上将军”，“赐钱二千贯”。在官位、金钱利诱下，城内义军汪文庆叛变，用箭射一书至城外，告诉官军，他愿做内应。汪文庆终于将数百官军引进城里。王则率军与官军在城内展开肉搏战。官军难敌义军，用吊绳返出城墙，狼狈逃出。宋廷得知贝州起义仍未扑灭，加派大臣文彦博为河北宣抚使，统一指挥各官军攻打贝州城。明镐则在贝州城南挖掘地道，通往城内。黑夜，200官军从地道偷入城内，义军难察。入城官军乘黑登城，接应大批官军越墙入城。起义军与官军在城内再度巷战。终因官军人多势众，义军渐难支持，被迫从东门退出城外。在撤退中，王则被王信俘获，其他士兵多逃往他乡。王则被解押到东京(河南开封)，不屈就义。至此，前后坚持了65天的贝州士兵暴动，归于失败。（顾全芳）

侬智高反宋

侬智高领导的广西壮族反宋战争。

我国广西历来聚居着少数民族壮族。唐朝壮族有韦氏、黄氏、周氏和侬氏四大部族。侬氏世居广源州(今越南广渊)。宋代中期，侬氏首领侬全福被交趾国(今越南)俘杀，其妻改嫁，生侬智高。侬智高长大后，又被交趾所俘，放回后统治广源州及附近地区。侬智高仇视交趾而自立，称南天国，年号景瑞，扩充实力和地盘，以武力占领了安德州(广西靖西西北)。北宋皇祐二年(1050)交趾北伐侬智高，被侬智高击

败。侬智高见交趾以武力相逼，要求归属宋朝，曾"奉表请岁贡方物"，希望得到宋朝的承认和支持。宋朝政府竟不答应侬智高的请求。侬智高"又以驯象、金银来献"，宋朝政府"以其役属交趾，拒之"。侬智高再次"贡金函书以请"，仍遭冷遇。侬智高三次请求归顺宋朝，都被拒之门外，只得招兵买马，以求发展，并对宋朝产生仇视情绪。在广州进士黄玮、黄师宓的参谋下，侬智高以占据邕州（广西南宁）和广州为目标，力求独立为王，割据称雄。

皇祐四年（1052）四月，侬智高正式起兵反宋，率领5000之众沿江东下，攻破横山寨，杀死寨主张日新、邕州都巡检高士安及巡检吴香等。五月初一，侬智高攻破邕州，知州陈珙、通判王乾祐、广西都监张立、节度推官陈辅尧、观察推官唐鉴、司户参军孔宗旦等文武官吏，都被侬智高俘杀。占领邕州后，侬智高改称大南国，自封仁惠皇帝，年号启历。黄师宓等以中国宋朝官名封任。

取得广西重镇邕州后，侬智高没有多停留，而是顺水东下，连占横州（广西横县）、贵州（贵县）、藤州（藤县）、梧州、封州（广东封开）、康州（德庆）和端州（肇庆）。两广这些州县官吏，见侬智高至，多闻风而逃。有的州县稍有抵抗，被侬智高败杀。五月末，侬智高兵临广州城下，以实现盘踞邕州、广州大片土地割据的计划。不到一个月，侬智高便从广西打到广东，广州知州仲简不相信侬智高如此神速，以为是有人造谣惑众，竟然下令："有言贼（诬称侬智高）至者斩。"侬智高在广州城外与宋军交锋，获胜；用数百战船攻南城，却被宋军焚毁。侬智高看到广州城坚难破，宋援军又至，在围城57日后，撤出广州，从广东清远到达贺州（广西贺县）。在贺州，侬智高军与宋援军激战，败杀宋军将官蒋偕等后率军西还，打下昭州（平乐）。十月初，侬智高到宾州（宾阳），十一月返至邕州。

在半年之内，侬智高从广西打到广东，又从广东打回广西，转了一大圈，如入无人之境。信息传到宋朝京都，朝廷上下震惊。宋仁宗先派杨畋等前往征剿，劳而无功。不得已，便派能征惯战的狄青前往。狄青率陕西1万精锐骑兵，于十月赶往广西。交趾得知宋朝派兵征讨侬智高，表示愿出兵联合围剿侬智高。狄青反对，认为："假兵于外以除内寇，非我利也。"十二月初，广西钤辖陈曙首战侬智高，兵败金城驿（广西邕宁北）。狄青于皇祐五年正月初率宋军至宾州，陈曙又私率8千兵与侬智高战，在昆仑关（宾阳西南）被击败。狄青严申军纪，将陈曙等32人斩首示众，吓得将领们发抖。狄青在宾州按兵不动，以迷惑侬智高。之后突然进军兵家必争之地昆仑关。狄青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偷渡昆仑关，在关外与侬智高决战。侬智高率全军"执大盾，标枪，衣绛衣，望之如火"，与狄青对阵。侬智高势盛，宋前军败退，右将孙节战死。宋军有兵败如山倒的危险。狄青赶到，举旗领骑兵前后左右攻击侬智高，侬智高被骑兵冲击得昏头转向，大败而逃往邕州。狄青紧追不舍，一路上被宋骑兵捕杀近3千人，黄师宓等将官57人被杀死。侬智高率残兵逃入邕州城，连夜将城烧毁后逃到合江（四川），后又逃往大理国（今云南省一带），并死在那里。宋朝历史上大规模的壮族侬智高反宋战争，在不到一年的时间里，以失败而告终。（顾全芳）

辽夏和议

西夏前期与辽争战后达成和议的事件。

西夏立国前党项政权首领李继迁、李德明父子皆向辽称臣，接受辽封爵，与辽保持依恃与和好的关系。辽太平十一年（1031）辽接受德明请求，将宗室女封兴平公主嫁太子元昊，封元昊夏国公、驸马都尉，加强了双方政治上的联系。次年，辽册元昊夏国主。重熙五年（1036）辽境内的党项部落经常逃到西夏境内，元昊为壮大势力往往给予接纳，引起辽国不满，辽禁止西夏私市金铁，禁止西夏到吐谷浑、党项住地购买马匹。七年（1038）兴平公主死，辽遣使责问。元昊时与宋关系紧张，为避免同时南北受敌，向辽表示顺服，并献宋俘于辽。宋夏和议后，加剧了西夏与辽的矛盾。辽重熙十三年（1044）辽夹山部落呆儿族800户投归元昊，辽兴宗责令还给，元昊不遣。兴宗率大军入夏境，西夏抗辽获胜，后元昊主动向辽请和朝贡。十七年（1048）元昊死。次年，夏毅宗谅祚遣使至辽，辽因旧怨不册封而扣押其使臣。兴宗亲率军分三路伐夏，战于贺兰山，获元昊妻及官僚家属。西夏先败后胜。十九年（1050）西夏停止对辽朝贡，遣使责问。西夏遣大将洼普围辽金肃城（今内蒙古准格尔旗西北）。又遣讹都嗨袭威塞堡，均为辽所败。五月，辽乘胜攻西夏首府兴庆（宁夏银川），夏大将洼普投降，皇后没藏氏闭城坚守。辽又破贺兰山西北之摊粮城。西夏只能与辽求和。二十二年（1053）辽接受西夏誓表，恢复和好。（史金波）

王安石变法

宋神宗统治年间，王安石在神宗支持下主持的大规模改革。

庆历新政夭折后，北宋中期的社会政治弊端依然存在，阶级矛盾并未缓和，民族矛盾并未解决，国家财政经济状况一天不如一天，直到出现了前所未有的财政赤字。面对如此积贫积弱的危难局面，忧国忧民的官僚士大夫，越来越强烈地呼吁振兴当朝，改革时政。李觏疾呼国家"弱甚矣，忧至矣，非立大奇，不足以救。"司马光、韩琦等提出改革役法。继宋仁宗登位的宋英宗，也认为"积弊甚众"而应"裁救"。在"世之名士，常患法之不变"的声浪中，宋英宗的变革愿望未能实现，于治平三年十二月(1067)病逝。赵顼即位．这位年仅 19 岁的年轻宋神宗，看到改革势在必行，"思除历世之弊，务振非常之功"，以富国强兵为己任，力主革新图强。熙宁二年(1069)二月初三任命王安石为参知政事(副宰相)，正式开始变法。史称王安石变法。新法贯穿于熙宁、元丰的十五年间，亦称熙丰变法。

宋神宗(1048—1085)即位不久，便对旧制进行局部改革。为变法做了准备。王安石(1021—1086)，字介甫，江西临川人。21 岁考中进士，历任鄞县知县、舒州通判、群牧判官、知常州等官职。嘉祐三年(1058)入京任三司度支判官，曾写上仁宗皇帝长达万言的《言事书》，主张改革更张，提出培养教育人才，"因天下之力以生天下之财"等设想。熙宁元年为翰林学士，在士大夫中有威望，被宋神宗看中，熙宁三年升为宰相。熙宁七年四月罢相，次年二月复相。熙宁九年十月再次罢相。从此退居金陵(江苏南京)钟山，直到去世。

由宋神宗、王安石主持的熙丰变法，分经济、军事、教育、政治诸方面。现按新法颁布时间，分类概述如下。

经济方面的改革是王安石变法的核心和重点。主要新法有：

一、均输法。熙宁二年七月十七日颁布。在此之前，京都大量的物资供应，全靠江南东西、浙江、荆湖南北、淮南六路(相当于省)由汴河运进。京都的需求与运进的物资常常脱节，造成供不应求或严重积压，出现富商乘机牟利、农民苦于交纳的弊端。均输法规定，由发运使统一掌管六路的财赋，以及茶、盐、酒等税收。宋神宗拨出钱 500 万贯和上供米 300 万石，作为本钱，征购所需物资。发运司既要掌握京师所需物资的品种和数量，以便采购供应，又要了解物品的产地和价格，以便"徙贵就贱，用近易远"，以便宜的价格，就近征购。均输法还规定，如果遇到荒年，歉收地区可以以钱代物，征钱不征物，再以歉收地区的钱购买丰收地区的物资。具体执行均输法的薛向，还由官办运输物资，改为官商兼办运输。均输法执行的结果，改善了京都的物资供应状况，限制了富商对京都市场的操纵及影响。

二、青苗法。熙宁二年九月初四颁布。在此之前有常平仓。所谓常平仓，即丰收年景，政府以高于市场的价格，大量收购农民的余粮，以免商人屯积居奇，压低粮价，造成谷贱伤农。灾荒岁月，粮价飞涨，政府便以低于市场的价格，大量出售粮食给第四等以下人户(农民及贫民)，以免谷贵伤民。这种起经济杠杆作用、稳定农民粮食生产的常平仓，汉代以来就曾实行并保持下来，宋朝沿用，但有时断时续等弊端。青苗法废止常平仓，将常平仓原有的 1500 万贯石的钱米作为本钱，以钱贷款给地主和农民，政府收取 40%的年息。青苗法出台时规定：1.先在河北、京东、淮南三路推行，其后即推行全国。2.强迫地主和农民每年向政府两次借贷青苗钱，一次在每年的正月三十日以前，另一次在五月三十日以前。借贷数量，第一等户不超过 15 贯，第二等户不超过 10 贯，三等户不超过 6 贯(宋代户分五等，前三等为大地主或地主)，第四等户不超过 3 贯，五等户和客户不超过 1 贯半(四等户多为自耕农，五等户及客户为贫苦农民和佃农)。出台后反应强烈，旋即改为"不得抑配"即不许强迫借贷，应以自愿借贷为原则。但事实上州县官吏为图升官发财，并未完全执行自愿原则，"抑配"之风盛行。3.借贷之后，政府每年两次向借主收回本息。第一次在五月前交纳本息，第二次在十月前交纳本息。如果到期不交或交不出，则强迫交纳，甚至要受皮肉之苦。4.青苗利息为三分或二分，即年息 60%或 40%。后来的补充规定年息不得超过二分，即不超过 40%。也就是说，农民借一贯钱，不到半年时间，必须归还本息一贯二百文(一千文为一贯)。青苗法出台后，在全国城乡引起了轩然大波，拥护和反对之声不绝于耳。苏辙、韩琦、司马光、欧阳修等大批人纷纷表示反对。他们的反对理由有四条，一是主张恢复整顿常平仓，认为常平仓比青苗法有益于农民和农业生产；二是反对抑配即强迫借贷；三是反对以粮折钱坑害农民；四是反对收如此高的利息。欧阳修甚至责骂青苗法是公家明目张胆的"放债取利"。青苗法的实施，极有限度地限制了私人高利贷，政府却从青苗利息中得到了大量财政收入。王安石说过，青苗利息所得，一年在 300 万贯左右。王安石第二次罢相后，青苗法作了一些修正和更改，青苗钱的发放、催交和利息，都比熙宁青苗法有所宽松。

三、农田水利法。又称农田利害条约。熙宁二年十一月十三日颁布。主要内容是：官民都可提出对水利工程的设想和方案，政府认为切实可行的，待工程完工后给以奖励。州县的水利工程，调查落实后呈报修建。修建农田水利工程的具体办法为，由农户分等出工出料；如经济困难，可贷款，年息10%。该法颁布后，掀起农田水利建设热潮，至熙宁九年(1076)，全国共修水利10793处，农田受益面积37万余顷。此外，还开垦了不少荒田(包括淤田)，扩大了耕地。农田水利法的实施，促进了农业生产的发展。

四、免役法。又称募役法、雇役法。熙宁四年(1071)十月初一正式颁布推行。具体办法是：以前应出差役的民户，可以不再出差役，而是按户等出钱雇役，所出之钱叫免役钱。原来不出差役的坊郭户(城镇民户)、官户、女户、单丁户，以及僧尼道士等，应出免役钱的半数，称助役钱。州县政府收到钱后，不再摊派役人，而是用收来的钱募人、雇人，充当差役。在收钱时，除了收应雇役人所付出的钱数外，另加20%的钱，叫免役宽剩钱。由差役改为雇役，是我国役法史上的划时代改革。它有利于解放生产力。免役法的缺陷，在于原来不服役的贫困农民等社会底层百姓，也要出助役钱、免役宽剩钱甚至免役钱，加重了他们的负担，成为变相税收。此外，政府所收之钱，用于雇人服役等开支后，尚有大量结余。熙宁九年一年，就结余近300万贯，从而成为国家的一项重要财政收入。同青苗法利息结余相同，这些钱的来源，不是由于生产发展而税收增加，而是对百姓尤其是农民的变相加赋和掠夺。免役法之遭到原来倡导改差役为募役的司马光等人反对，主要原因就在于此。

五、市易法。熙宁五年三月二十六日在京都设市易务机构，开始推行市易法。此后，在边境及城市遍设市易务，市易法推行全国城乡。市易法较为繁杂，简单地说，原先商人自由卖买货物，改为政府机构控制商品买卖。凡是运到京都或全国城镇的重要货物，均由官方机构市易务定价收购，再由市易务出卖或赊给商人出卖。这种事实上由国家垄断商业贸易的市易法，给大商人以一定程度的打击，也给小商小贩带来不便，无助于商品流通。

六、方田均税法。熙宁五年八月颁布实施。在此之前，宋政府曾多次方田均税。此法与以前的方田均税大同小异。该法实际上是两项，一是丈量清查田地，二是将清查丈量出的土地，分成等级好坏，按等交税，税额不超过原税额总数。这对隐瞒田地而偷漏税的地主豪强是不利的。该法并未在全国推行，仅限于北方五路。由于封建政权及乡村权力实际上掌握在地主豪强手里，方田均税法很难不走样地贯彻执行。

上述经济方面的改革，目的在于富国。军事方面的改革，是为了强兵。措施主要有：

一、保甲法。熙宁三年十二月初九发布，先在开封府实施，后推广全国各地。该法规定，乡村人户以10户为一保，50户为一大保，500户为一都保，后人户缩小一半。分设保长、大保长和都保正、副保正。每户两丁抽一，选充保丁。保丁需自置弓箭等，进行军训。任务是镇压农民的反抗行动，王安石称其为“寇乱息而威势强”。保甲法还有兵民合一的意图，与正规军互相配合，以加强军事力量。无论是压镇农民反抗，还是兵农合一，保甲法都不是历史的进步，而是历史的反动。

二、保马法。熙宁五年五月，宋神宗下令开封府试行，次年八月二十七日颁布，在京东、京西、河北、河东、陕西五路推行。每户养军马一匹，多至两匹。养官马户者，免少许税收。若马匹死亡，应赔偿。实行该法的目的，是为了节省军费，减少军马死亡。

三、将兵法。熙宁六年在河北等地试行，第二年推行全国。具体做法是把军队中的正规军禁军，以及蕃兵、弓箭手等地方军，进行改编。改编后的军队，以“将”为最大建制，辖几千至上万官兵。将下设部，部下设队。队为基层编制，有50人。将负责训练兵。推行将兵法，是为了提高军队的战斗力，加强军事训练，巩固全国尤其是边防统治。

此外，变法期间还曾整编军队，压缩和淘汰老弱士卒，节省了军费。又曾专设军器监，在京师集中制造武器装备，使武器的质和量都有所提高增加。上述这些有关军事方面的改革，有的如保甲法不合时宜，有的如将兵法，并未触及北宋军事体制的基本弊端，因而改革后的军事和国防力量并未显著提高，“弱宋”面貌并未显著改善。

整顿学校教育和改革科举制度，是王安石变法的内容之一。通过“三舍法”对太学的整顿、学校教材的统一(《三经新义》为必读)，王安石企图全国上下“一道德”，即统制全国的思想和舆论，培养和选拔他所要求的人才。

王安石变法的薄弱之处，在于几乎未在政治体制方面作重大改革，仅仅是撤销一些州县建制等。元丰官制改革，重点不在精简机构，澄汰冗官，而是使官、职相符。这与庆历新政有很大不同。熙丰变法没有改变官僚机构重叠、冗官如毛、国家机器难以运转

等积弊，使经济、军事等改革难以持久与贯彻。宋神宗于元丰八年(1085)三月初五病逝，即位的宋哲宗年幼，由太皇太后高氏垂帘听政，司马光等为宰相。由于熙丰变法本身以及执行过程中的弊端，宋神宗死后，新法难以推行。司马光等“元祐更化”，废除了尚在实行的新法。王安石变法自此结束。

(顾全芳)

河湟之役

宋熙宁年间王韶攻占西北河湟地区的战争。

宋自与西夏于庆历四年(1044)签订和约后，宋夏边境虽时有磨擦，但规模不大。宋神宗即位后，立志富国强兵，完成祖宗未竟之业，打败西夏与辽国，统一天下。熙宁元年(1068)，建昌军司理参军王韶献《平戎策》，正合宋神宗消灭西夏的意图。王韶(1030—1081)，字子纯，江西德安人，进士出身。王韶在《平戎策》中提出“欲制西夏，当复河湟”的战略构想。河、湟地区指我国西北甘肃兰州以东、青海西宁以西的大部地区，当时既不属西夏，亦不属北宋，而是吐蕃部族的领地。王韶在《平戎策》中说，要打败西夏，必须先占领河、湟，使西夏背腹受敌，等于断西夏右臂。王韶献上平戎三策后，宋神宗召见了王韶，详细询问对夏方略，并且派王韶为秦凤路经略，主管机宜文字。王安石也很赏识王韶。熙宁三年，王安石让王韶负责秦州西路“招纳蕃部”诸事。王韶曾请求兴建渭州(甘肃陇西)、泾州(甘肃泾川)城堡，以招抚吐蕃诸部，遭到秦凤路经略使李师中反对，李师中为此而被宋神宗贬职。王韶又建议在宋边境地区建市易司，由官方垄断边境外贸，也得到宋神宗、王安石的支持，令王韶在边境主持建设市易司。

熙宁四年，宋在西部边境特设洮河安抚司，由王韶主持洮州(甘肃临潭)、河州(甘肃临夏)、湟州(青海乐都)收复事宜。王韶到达秦州(甘肃天水)后，了解到吐蕃诸部中，以青唐(青海西宁)俞龙珂部落最大，西夏极想拉拢俞龙珂以联合对付宋朝。王韶决定首先争取俞龙珂。王韶反对用武力征讨，而是带领极少人马，直抵青唐会见俞龙珂，对俞陈说利害得失，劝其归附宋朝。经过一天一夜的会谈，终于说服俞龙珂。第二天，俞龙珂即同意所属部落12万人归附宋朝。俞龙珂则起程到宋京都，受宋神宗接见。俞龙珂见宋神宗时，提出一个要求，请宋神宗赐姓为包，因为俞钦慕包拯(即包公)的忠直。宋神宗同意了俞的请求，赐俞改姓名为包顺。俞龙珂的内附，影响、带动了其它小的吐蕃部落纷纷归宋。这些部落的20多万人口也归附宋朝。从此，宋朝在西部的控制地区，扩展了千余里。

熙宁五年五月，宋神宗将古渭寨改为通远军(甘肃陇西)，任命王韶知军事，意在向陇右进展。八月，身为沿边安抚使的王韶，决心以武力西征。他带兵先打败了一些小的部落，直趋武胜(甘肃临洮)，在武胜南的抹邦山，宋军与吐蕃部落军对阵，王韶下令，宋军有“敢言退者斩”。部落军乘高而下，宋军难敌而退。王韶身穿甲胄，领兵反击，终于将其击溃。王韶烧毁敌帐后返回。敌木征来增援，王韶密令部分宋军在竹牛岭虚张声势，以牵制敌兵，而自己则带领主力北上至武胜。经过战斗，武胜被占，北宋从此在这里建镇洮军，不久改设为熙州。十月，宋又设熙河路，以王韶为熙河路经略安抚使，兼知熙州。

熙宁六年二月，王韶率军继续西征，到达河州，但因木征反抗，王韶只得南下洮州。木征率军尾随宋军，两军在洮州激战，木征战败，放弃河州。王韶回军占领了河州。打败木征，占领河州后，其它部落多不战而降，王韶很快占有了岷州(甘肃岷县)、洮州、宕州(甘肃宕昌)及叠州(甘肃迭部)。至此，王韶在西北纵横二千余里，“招抚大小蕃族三十余万帐”，使我国西北的甘肃、青海部分地区，划入宋朝版图。河湟之役不仅扩展了北宋疆域，而且使西夏处于被动地理位置，有利于宋对西夏的防御。　(顾全芳)

交趾之战

宋朝与交趾在熙宁年间发生的大规模战争。

历史上的交趾，地处今越南北部，与我国南方相邻。唐朝曾在交趾设安南节度使。五代后晋天福四年(939)，交趾吴权称王独立，建立政权。宋初，宋朝与交趾友好相处，宋太祖和宋太宗都曾封其首领为交趾郡王。太平兴国五年(980)秋和第二年春，宋太宗曾派兵自邕州(广西南宁)和广东广州水陆并举，进攻交趾，以失败而告终。此后，交趾成立李氏政权，称李朝。李朝经常越过边境，蚕食宋朝土地，劫掠财物，成为宋朝边境之患。熙宁八年(1075)秋，李朝倾全国之力，率数万之众，毫无理由地从水陆两地，大规模进攻宋朝。水路登陆入宋境后，于十一月下旬侵占了钦州(广西灵山)和廉州(广西合浦)。陆路深入宋地，攻占万古寨(广西扶绥)，直逼西南重镇邕州。熙宁九年正月，交趾军包围邕州，邕州城被攻破。交趾军在邕州大屠杀，知州苏缄及5.8万宋朝军民被杀害。宋朝中央得知交趾大举侵宋，深入宋境，决定派郭逵等人率领5万大军，从中原长途南下，抗敌救国。宋军

到达前线后，很快打败交趾军，收复了邕州、廉州和钦州等全部失地，将敌军赶入交趾。年底，郭逵率宋军反击至交趾境内，双方兵阵决里隘。交趾军乘大象来战。宋军用强弓和大刀砍杀象鼻，战胜，攻占决里隘，直抵富良江（红河）北岸，距交趾京都交州（河内）仅 90 里。交趾又乘船来援，被宋军大败。交趾主李乾德眼看大势已去，面临生死存亡，被迫"奉表诣军门乞降"。宋军也由于深入异地，不适应气候，粮草难以为继，便同意停战撤军。从此，交趾长期不敢犯宋，而是睦邻相处。（顾全芳）

乌台诗案

历史上罕见的文字狱之一。

元丰二年（1079）八月十八日，宋中央监察机构御史台，派皇甫朝光到浙江湖州，逮捕了知州苏轼，押至东京（河南开封），投入御史监狱，造成了震惊海内的冤案。御史台别称乌台，苏轼冤案被称为乌台诗案。

苏轼，字子瞻，景祐三年十二月十九日（1037）生于四川眉山县城内。21 岁考中进士，25 岁参加制举。与父苏洵、弟苏辙"名动京师"，后被称为唐宋八大家中之三家。历任凤翔签判、判登闻鼓院、直史馆等职。王安石变法前，苏轼力主革新朝政，提出除"三患"即冗官、冗兵及冗费等改革建议。熙宁二年（1069）王安石变法后，苏轼对青苗、均输等新法提出不同看法，并认为变法"求治太急"、"听言太广"、"进人太锐"，为王安石所恶，被王安石之婿谢景温诬陷私贩苏木、私盐。苏轼被迫于熙宁四年四月离京任杭州通判。熙宁七年调任密州（山东诸城），熙宁十年任徐州太守，元丰二年三月任湖州知州，不久被捕入狱。

苏轼被捕，起因于著名科学家沈括。苏轼与沈括原是同事兼朋友。熙宁六年六月，宋神宗派沈括到两浙考察新法执行情况，时任杭州通判的苏轼热情接待沈括。毫无防人之心的苏轼，向沈括反映了新法的真实情况，并应沈括之求，手书诗一首，赠给沈括。不料沈括回京后，向朝廷告密，说苏轼对新法不满，并拿出苏轼赠给他的诗为证。原来就对苏轼不满的御史中丞李定等人，如获至宝，决定对苏轼下毒手。李定等到处搜集苏轼的诗词，以便给苏轼定死罪。直到元丰二年，李定等认为苏轼已构成死罪，便将苏轼的所谓反诗呈送宋神宗审批，罪名是苏轼反对新法，诽谤宋神宗。宋神宗批准将苏轼逮捕，关押审查。

苏轼被捕前，写过大量诗词，其中极少部分诗，主要是在杭州时写的，确实含蓄地反映出对青苗法等的不满情绪。如"赢得儿童语音好，一年强半在城中"，讽刺青苗、免役法使农民往返城市，影响务农。李定等给苏轼定罪的 20 多首诗，大体类似。且不说这些诗夸张地反映了当时的实际情况，就对新法不满而言，在宋朝也构不成逮捕判刑之罪。当时反对王安石变法的人很多，言辞比苏轼诗激烈者比比皆是，宋神宗并没有逮捕任何人。宋朝立国之初，就重用文士，士大夫相对来说比较受宽容和优待，即使是批评朝政甚而批评皇帝，也不为过，更不用担心坐牢杀头。李定等人了解这一点，深知仅凭对新法的不满，难以置苏轼于死地。于是，李定拿出最恶毒的一招：诬告苏轼攻击诽谤宋神宗。宋朝虽对士大夫宽容，但谋反罪和叛国罪，属十恶不赦，非处死不可。李定正是想伪造苏轼攻击宋神宗之罪，处死苏轼。李定、舒亶给苏轼定死罪的唯一依据，是苏轼写的一首《双桧》七律，其中后两句是"根到九泉无曲处，岁寒惟有蛰龙知"。这本来是一首咏桧诗，与反宋反皇帝风马牛不相及。但李定、舒亶一口咬定，诗中的龙是指宋神宗。对于这样肆无忌惮的欲加之罪，苏轼当然不能承认。据说问到苏轼诗中的龙是否指皇帝时，苏轼自卫反击："王安石诗：'天下苍生待霖雨，不知龙向此中蟠。'此龙是也。"苏轼只承认他诗中的龙，与王安石诗中的龙，是同一条龙。这就难住了李定等。李定可以任意地把苏轼的龙上升到宋神宗的吓人高度，却不敢把王安石的龙也说成是宋神宗。

苏轼入狱后，御史台对苏轼进行连续的审讯，逼其交待写诗的动机，核对材料。在"诟辱通宵不忍闻"的气忿之中，苏轼承认了自己反对新法。同时，御史台派人调查取证，凡与苏轼有过诗文往还的人，都被波及。经过三个多月的审讯逼供，调查取证，御史台最后做成专案，结论是苏轼应处死刑。苏轼被捕并可能被处死的消息，很快传遍全国，"天下之士痛之，环视而莫敢救"。但张方平、王安礼、吴充等人还是站出来仗义执言，营救苏轼。吴充对宋神宗说，曹操能容得下祢衡，陛下为什么容不得苏轼。王安石之弟王安礼更对宋神宗说："自古大度之君，不以语言谪人"，陛下若处死苏轼，后世会骂你不能容才。太皇太后曹氏得到苏轼被捕的消息后，把宋神宗叫去，对他说，仁宗皇帝在位时，曾说过，苏轼、苏辙兄弟是做宰相的材料，留给后世用吧。如今你却要处分苏轼，"冤滥甚矣"。在舆论及曹太后的压力下，宋神宗这才决定从宽处分苏轼。专案材料报到宋神宗手里后，宋神宗召集宰相王珪、御史中丞李定、舒亶、何正臣等廷议。王珪说苏轼诗中的龙，是影射皇帝。宋神宗表态："彼

自咏桧，何预朕事？"不同意龙就是指自己。李定还不甘心，一再说苏轼"肆意纵言，讥讽时政"，"所著文字讪上惑众"。最后决定撤销苏轼官职，受刑两年。由于正值曹太后死而大赦天下，苏轼被赦为黄州团练副使，本州安置，不得签书公事，派人押往黄州。该年年底，除夕之夜，苏轼被押出狱，元丰三年正月初一，在炮竹声中，苏轼被押往黄州而去。经过长途跋涉，顶风冒雪，于二月初一日到达黄州(湖北黄冈)。从此，苏轼开始了半软禁、半自由，艰辛的人生之途。由于乌台诗案而受牵连的，有苏辙、王诜、李清臣、司马光、张方平、范镇、陈襄、孙觉、李常、刘攽、刘挚、王巩、钱藻、曾巩、黄庭坚等一大批人，他们都受到不同程度的处分或处罚。其中不少是当朝名士。轰动一时的乌台诗案，成为我国历史上著名的文字狱。

(顾全芳)

元丰官制改革

元丰三年(1080)宋神宗主持的官职制度改革。

宋初实行养官政策，到北宋中期，中央机构重叠，三省六部等形同虚设，造成冗官成灾，成为宋朝的三大公害(冗官、冗兵、冗费)之一。冗官成灾又使官员无所事事，互相制约、扯皮、内耗，办事效率低下，国家机器运转失灵。

宋代官员的来源，除宋初接收原五代各国文武官僚外，主要有恩荫、科举、推荐三大途径，其中尤以恩荫即王公大臣的官位继承、子孙可以合法做官危害最大。通过科举即考试进入官场的人数，也越来越多。北宋中期的官员，将近5万人，超过东汉官员数10倍；用于官员的俸禄、恩赐(赠与)的支出，北宋后期超过宋初几十倍。恩荫之滥，一次可达数百人，一人当官，其子孙亲属有多达20人当官者。宋初通过科举入官者，一次不过十多人，到北宋中期，竟一次就超过千人。多如牛毛而又大多无事可干的庞大官僚队伍，使北宋的有识之士不断呼吁整顿、精简，以"澄汰冗官"。由于制度、体制的原因，北宋虽曾多次着手解决冗官问题，包括范仲淹的庆历新政，但精简过后，官员反而增多，形成了恶性循环。

为了安置如此庞大的官僚队伍，宋朝不得不增设机构，并将官僚分官、职、差遣三类。宋朝机构林立，但大多没有多少实际工作可做。宋亦有三省六部，但权力集中于宰相，其他不过是摆样子。连统管全国财政经济的三司使，也没有实权，仅做一些统计之类的事。至于宋朝的"官"，其实不是实际职务，而是定级领俸禄的标准，因而同一个"官位"，可以有几人甚至几十人。宋朝的大部分"官"都没有具体职务，而是闲散在家，或在京城等待分配具体工作。很多人，尤其是受到"恩荫"的官僚，一辈子也没有职务，而是在家只领薪水不做事。"职"是荣誉性的虚职，如学士、待制、太师等等，往往是一种"荣誉证书"。只有"差遣"才算是实职，掌握着中央及路、州、县的实权，如中央的宰相，地方的知州、知县。这种官、职、权的分离，直到元丰三年(1080)八月中秋，宋神宗才下诏决心加以改革。宋神宗专门设立了"详定官制局"，负责制定官制改革方案，史称元丰改制。

元丰改制最主要的内容是撤销中央政府机构中的挂名机构和官职，代之以有职就有权的机构和官员，使官位与职权相统一。宋神宗效法唐朝的三省六部制，使三省六部不再是虚设机构，而是中央政府的实权部门。三省分中书省、门下省和尚书省。中书省受命制定政策法令和法规，门下省负责复审中书省的法令法规，尚书省权力最大，负责全面行政工作，贯彻法令。所以尚书省的左右仆射，是名实相符的宰相。尚书省分吏、户、礼、兵、刑、工等六部，分工负责全国各方面的行政工作，掌有实权。只有兵部权小，军权不在兵部而在枢密院和皇帝。这是因为宋神宗坚持兵权不能归行政系统管辖。为了监察行政机关及官僚执行法令等情况，宋神宗扩大御史台的权力，使其负责监察六部及地方官吏的所作所为。这样，元丰改制以立法、行政和监察三方面的形式，明确了政府职权和职能范围，纠正了过去庞杂混乱的政府机构和职能不相符的局面。

元丰官制改革从元丰三年试改，到元丰五年正式颁布改革方案，共用两年多时间。改制的结果，不但明确了政府职能，使官僚在其位就有其权，"知所责任"，再也不能混日子，而且完善了对官僚的监察考核制度，有利于提高官僚素质和办事效率。由于自宋初以来官僚体制弊端已病入膏肓，仅靠中央机构的体制改革，难以显著改变北宋日益腐朽的国家机器，更没有解决冗官成灾的老大难问题。宋朝的机构设置及政府职能，自元丰改制后，大体上继续保持下来，此后的元祐更化等政治变动，并未废止元丰官制改革。

(顾全芳)

永乐城之战

元丰五年(1082)宋、夏在永乐城的关键性战役。

宋神宗于治平四年(1067)即帝位后，就想与西夏争个高低，甚而想消灭西夏。当年冬，种谔与西夏发生战事，收复了绥州(陕西绥德)。熙宁三年(1070)

八月，西夏进犯环州（甘肃环县）、庆州（甘肃庆阳），宋派韩绛为陕西宣抚使，西出防御。韩绛派种谔与西夏战，大败。熙宁五年，宋神宗命王韶用兵吐蕃，断了西夏的右臂。从此，宋神宗处心积虑想与西夏决一雌雄。

元丰四年（1081）六月，西夏国主秉常被其母梁氏囚禁，内政不稳，宋神宗有意乘机用兵。知庆州俞充建议对西夏兴师问罪，并说这是千载一时的良机。七月，宋神宗以西夏国主被囚为借口，派兵分五路攻伐西夏，揭开了宋夏全面战争的序幕。出兵之初，宋军声势逼人，进展顺利。宦官李宪在甘肃新城（榆中）打败西夏军，占领了兰州。九月，种谔从绥德攻占了米脂（今属陕西）。十月，高遵裕从庆州北上，攻占了通远军（甘肃环县）；王中正从麟州（陕西神木）沿无定河西进，打到夏州（内蒙古乌审旗南）及宥州（内蒙古托克旗南）；刘昌祚兵出泾原，到达灵州（宁夏青铜峡西）。

宋五路兵马从各地进围西夏，西夏面临生死存亡关头。梁氏采纳对宋"坚壁清野，纵其深入"，断其粮草的战略战术，并用黄河水灌宋军驻地。结果宋军在灵州城下冻溺而死者无数，夏军乘机出击，刘昌祚的 5 万宋军几乎覆没。种谔占领米脂后，又率军前进，结果遇大雪，粮草又断，死伤甚重。王中正自宥州行至奈王井，粮断，饿死者 2 万人。至此，熙宁四年五路宋军伐夏以损失惨重而告终。宋军多集结在灵州，以待下一步行动。宋神宗得知宋军多败，将高遵裕、种谔、王中正、刘昌祚等贬职、降官。唯李宪改任为泾原路经略安抚制置使，知兰州。

元丰五年四月，李宪请求再次攻夏。有人提出上次出征攻夏至今才几个月，恐怕没有做好准备。宋神宗回答说，李宪报告说已经做好了准备；一个宦官尚且如此爱国，你们怎么如此畏难。宋神宗决定再与西夏决战。六月，宋军曾与夏军接触，宋小胜。八月，沈括建议从横山（今属陕西）进攻西夏，种谔建议从银州（横山东）攻入西夏。宋神宗赞成他们的建议，派徐禧在银州东南 25 里处的宋夏边境，修筑永乐城，以永乐城为基地，向银州西夏境挺进。九月，永乐城建成。西夏得知宋军企图大举进犯，出动大军 30 万，誓与宋决一死战。西夏声东击西，仅以千骑攻新城，徐禧赶往救援，留沈括守永乐西南的米脂。夏军主力屯于泾原（甘肃泾川）。徐禧麻痹大意高枕无忧。忽报夏军从泾原捷至，已至永乐城外。徐禧惊骇，执刀上阵，与夏军战。宋军将士见夏军蜂拥而至，自知凶多吉少，劝徐禧退兵永乐城内，固守待机。徐禧不听，说，哪有遇敌先退的道理。徐禧在城下陈兵 7 万。夏军铁骑渡过无定河。曲珍向徐禧说，夏来的是铁鹞子军，一定要在渡河时袭击；如果让骑兵渡过河，登上陆地，则势不可挡。徐禧又不听。夏铁骑渡河后，左冲右杀，宋军根本不是对手，曲珍战败退入永乐城中。夏军将永乐城团团包围，包围圈"厚数里，且据其水寨"。曲珍领宋军在城头与夏军昼夜血战，终因城内缺水，战士绞马粪汁取水而饮，渴死者大半。沈括、李宪赶来救援，多被夏军狙击。夏军乘夜半大雨，急攻永乐城，城被攻破。宋"将校死者数百人，丧失士卒役夫二十万"。徐禧等将领在混乱中丧生。西夏在永乐城得胜后，到米脂宣耀军威后返回。灵州之战与永乐城之战，使宋军"死者 60 万人，钱谷银绢不可胜计"。宋神宗自此"无意于西夏"，由主战转为主守，消灭西夏的美梦破灭。永乐城之败，标志着熙丰变法"强兵"的破产。西夏经永乐城之战，亦"困敝"而待休整，宋夏之间一度无大规模战争。　　（顾全芳）

元祐更化

宋元祐初（1086）废止熙丰新法之举。

元丰八年（1085）三月初五，37 岁的宋神宗病死，年仅 9 岁的赵煦（宋哲宗）即位，国事由宋神宗之母高太皇太后垂帘听政。高太后（1032—1093），亳州蒙城（安徽蒙城）人，节度使高继勋孙女，4 岁时被宋仁宗之曹皇后接入宫中，17 岁时与赵曙（宋英宗）结婚，宋英宗即位后，被册封为皇后。宋英宗不久病逝，宋神宗即位，被尊为皇太后。高太后在熙丰年间，对熙丰变法持消极甚而反对态度，因无权，不问国事。高太后听政后，成为太皇太后，又因立哲宗有功，权力在手。她掌权后，崇尚节俭，"散遣修京城役夫，止造军器及禁廷工技，出近侍尤无状者"。接着，于五月二十三日将司马光召回京城，任门下侍郎（副宰相），之后又将司马光提升为宰相。同时，熙丰年间反对过变法的吕公著、吕大防、刘挚、范纯仁、李常、苏轼等许多人，陆续调到京城任职。原变法派掌权人物蔡確、章惇、吕惠卿、吕嘉问等，则先后被罢官贬职，逐出京城。

司马光回到京城，高太后问及政治，司马光回答，首先应当"广开言路"。高太后于是下诏，让"百官言朝政阙（缺）失"，结果上书谈政者近千。按当时风尚，宋神宗刚死，三年内不宜改变先皇之政。司马光力排众议，说王安石、吕惠卿的新政，不但可以改，而且"改之当如救焚拯溺"那样迅速果断。在高太后的支持下，司马光与吕公著等"同心辅政"，将熙丰新法

逐一废除，仍行宋仁宗时的旧法。史称"元祐更化"。

首先废止的是保甲法。元丰八年七月以宋哲宗的名义，下诏书停止推行保甲法。保甲法在黄河流域推行后，共抽壮丁 69 万多人，虽省去国家不少募兵钱，却使农民负担加重。司马光认为这种"两丁抽一"的保甲制，有百害而无一利。事实上，推行保甲法之初衷，就有防止农民暴动之意，而推行保甲法的结果，反而引起农民不满。元丰末年，北方各地被抽壮丁，曾先后多次举行暴动或起义。

其次废除的是方田法。方田均税法有阻止地主豪强瞒田漏税的进步作用，但在熙丰年间已半途而废，名存实亡。尽管如此，元丰八年十月明令废罢方田法，表明了司马光等对地主豪强的让步与照顾。

再次废止的是市易法。元祐元年(1086)闰二月，市易法被明令终止实行。原先推行市易法的结果，在全国形成了官营商业网，垄断了商业贸易，实际上无助于商品流通，阻碍了商品经济的发展。国家在打击大商人操纵贸易中所得的商业利润，由于"上下相蒙，亏折日多"而所剩无几。在废罢市易法的同时，将原主持市易法的吕嘉问贬职后逐出京城。

元祐元年三月，免役法被废除。免役法是否应废，在朝中引起轩然大波，激烈争论。司马光在熙丰之前，曾早先提出要改革差役法，推行募役。但在熙宁年间实行免役法时，由于新法不合司马光意，曾反对实行免役法。至此，司马光又提出免役法有五害：上户不得休息，下户要出役钱，所雇役人"奸欺"，农民为出役钱而"卖庄田、牛具"，多收役钱"以为功"等。原来推行免役法的章惇，首先起来驳斥司马光的五害论。接着，原先倾向改革，但反对王安石新法的苏轼，也反对司马光的看法。苏轼对他一向尊重的司马光说，差役法和免役法各有利弊得失，其利弊大约各半；差役法之弊，在于农民因服役而不能专心务农，免役法之弊在于征收过多的役钱。司马光问苏轼应当怎么办？苏轼回答："法相因则事易成，事有渐则民不惊"，凡事应当慢慢来，才不致引起民众的惊疑混乱。苏轼实际上主张继续推行免役法，只要不过多地收取民间役钱就行。然而司马光一意孤行，听不进苏轼的忠告。范仲淹的儿子范纯仁也对司马光说，如今废除新法，废除危害大的可以，但免役法是否应废除，要听听公论，否则，遗患无穷；如果一定要废除，是否可以先在一路(宋建制，相当于后来的省)试行废除，看看效果再说。司马光也不听，反而"持之益坚"。善于看风扬帆、后来擅权误国的蔡京，投司马光之所好，在开封畿县五天内就废除了免役法，司马光不察，还表扬蔡京。司马光废除被刘挚称之为"矫枉过正"的免役法，实属倒行逆施。

八月，青苗法被废罢。青苗法实际上是官放高利贷，宋政府由此而获得大量青苗利息。继续行青苗法，最先由范纯仁提出，司马光考虑青苗法废除后，国家将损失大量经费，因而迟迟不愿罢废。苏轼等许多人一再向司马光建议废除青苗法，迫使司马光在病逝前一个月，终于同意"青苗钱更不支俵"，终止了青苗法的执行。此外，元祐初还禁止使用王安石的《三经新义》等。

元祐更化有其积极的一面，更有消极的一面。尽管元祐更化谈不上是所谓复辟，倒退，但总的来说，其消极作用大于积极作用。　　（顾全芳）

元祐党争

北宋元祐年间朔、洛、蜀三党的派系斗争。

元丰八年(1085)三月，宋神宗病死后，不满十岁的宋哲宗为帝，由高太皇太后垂帘听政。高太后一向反对王安石变法，陆续将因反对变法而遭贬逐的司马光、苏轼、程颢、程颐、吕公著、刘挚等大批所谓旧党人物，调回京城，任以要职。旧党人物激烈反对参与王安石变法的所谓新党人物继续掌权，迫使蔡確、章惇、吕惠卿等下野离京。这新旧党之争，已经带有朋党之祸色彩。

新党被逐，司马光于元祐元年(1086)九月逝世，旧党人物失去了能够控制局面的核心人物，因而很快分裂为朔、洛、蜀三党。朔党以刘挚、刘安世、王岩叟、梁涛等河北人为主，洛党以程颐、朱光庭、贾易等洛阳人为主，蜀党以苏轼、吕陶、孔文仲等四川人为主。三党之间除个别政治、学说之分歧争论外，多为争权夺利的你争我斗。仅有吕大防、范祖禹、司马康等，未参与三党之争。

司马光逝世前，翰林学士苏轼就对崇政殿说书程颐"多用古礼"表示不满，称其谓"不近人情"。司马光逝世后，在如何悼念司马光问题上，苏轼与程颐的矛盾表面化。洛党中的右司谏贾易、朱光庭自以为人多势众，借故弹劾苏轼"讥讽"先皇，使蜀、洛党争激化。不敬先皇，属杀头之罪，苏轼由此而依例待罪。蜀党起而应战，为苏轼辩护，并反击贾易等弹劾苏轼是"假借事权以报私隙"，企图挑起朋党之祸。孔文仲更把程颐说成是"五鬼之魁"。五鬼是指程颐、欧阳棐、毕仲游、杨国宝和孙朴。孔文仲还要求罢免程颐。程颐的所作所为，引起元祐大臣的反感。朔党、尚书右丞刘挚也起而攻击程颐"慕古变常"。程颐在蜀、朔党

人的围攻下，于元祐二年八月被罢去崇政殿说书，离开京城；贾易被罢去右司谏。这对洛党是个沉重打击。由于贾易与吕陶互相攻讦，吕陶也被罢去左司谏之职，出为京西转运副使。尽管高太后宣布今后大臣要“一心为国，勿为朋比”，但党争之祸难以消禁，朔、蜀之争仍在延续。朔党刘安世等公开诋毁胡宗愈“自为御史中丞，论事建言，多出私意，与苏轼、孔文仲各以亲旧相朋比”。高太后欲偏护蜀党，范纯仁极论先父范仲淹及韩琦、富弼等被指控为朋党之害，并呈送欧阳修的《朋党论》，意在不以朋党论人。元祐四年三月，胡宗愈在刘安世的多次弹劾下罢职离京。同月，苏轼也在赵挺之等“攻之尤甚”下，被罢知杭州。此后，蜀、洛党争仍陆续难绝。被称为元祐党争的朔、蜀、洛三党之争，既摧残了人才，更无益于治国。其影响所及，直到北宋末、南宋，实为宋朝一大公害。

（顾全芳）

绍圣改制

宋哲宗于绍圣元年(1094)重新推行宋神宗的新法。

元祐八年(1093)九月，垂帘听政、掌握了北宋9年政权的高太皇太后逝世，17岁的宋哲宗亲政。亲政前，这位少年皇帝实际上一直是傀儡，受到元祐大臣的冷落。亲政后，宋哲宗决心对元祐大臣清洗报复，改变元祐时期的政策。翰林学士范祖禹预感到这点，因而在宋哲宗执政之初，就上疏说，熙宁期间王安石、吕惠卿“造立新法，悉变祖宗之政，多引小人以误国，勋旧之臣屏弃不用，忠正之士相继远引”，忠告宋哲宗不要听元祐时被贬逐的人的“奸言”，不要改变元祐时的法度，不要恢复熙宁时的新法，不要打击元祐时的大臣，不要用熙丰时的变法人物。宋哲宗不听，并于亲政后的第二年四月十一日，废元祐年号，改元“绍圣”，以“绍复熙丰之志”，继承先帝宋神宗的遗志相标榜。史称绍圣初年这种政治、经济政策的改变为“绍圣绍述”或“绍圣改制”。

绍圣改制的首要举动，是清洗、打击元祐大臣。宋哲宗亲政后仅三个月，苏轼看出了“国事将变”，上疏宋哲宗，劝告皇上不要听“急进好利之臣”的话，改变政策，并要求辞职离京。接着，吕大防被罢职、刘安世被贬逐。绍圣元年(1094)四月，宋哲宗欲用章惇为宰相，范祖禹力陈不当用章惇，范祖禹被免职离京。同年七月，章惇将司马光、吕公著等73人打成元祐党人，其中已死的司马光、吕公著等被追贬毁碑，差一点被掘棺暴尸。活着的吕大防、刘挚、苏辙等许多人被贬官，并且以诏令的形式，公布于朝野。元祐四年二月，司马光等再次遭到追贬，吕大防、范纯仁、苏辙等所谓元祐党人，被贬逐流放到岭南，韩维等30人被贬官，连已退休的文彦博亦难以躲过。在元祐大臣遭到清洗、打击之时，熙丰时期的改革大臣，很快回到朝廷。绍圣元年四月，章惇担任宰相，曾布、蔡卞、张商英以及投机政客蔡京等，先后担任要职，掌握了权力。可见所谓绍圣改制，首先成了党派之争，权力之争，实为历史上的一幕闹剧。

绍圣初熙丰旧臣以继承宋神宗遗志、恢复熙丰新法，作为打击元祐大臣的借口，争夺权力的旗号，因而章惇等不得不在形式上恢复熙宁新法。章惇刚当上宰相，就主张恢复熙丰年间推行的免役法。原来曾主张免役、司马光执政时首起废除免役法的投机家蔡京，这时又对章惇说，免役法同差役法的好坏对比，用不着讨论，就按熙宁成法施行就是。章惇同意，并且在当年闰四月派陆师闵等为各路(行政建制，相当于省)的提举常平官，推行免役法。八月，宋哲宗下令“罢广惠仓，复免行钱”。绍圣二年九月，又下令“府界诸路常平敛散等事”，“并依元丰七年见行条例”。绍圣三年二月，再下令“三路保甲依义勇法教试”。这样，元祐初年被废止的免役法、青苗法、市易法和保甲法，渐次恢复。绍圣改制虽然在条文上恢复了熙宁、元丰时代的法令，但执政者既不想认真执行熙丰新法，更不想由此而富国强兵。绍圣改制的结果，更加深了宋朝的政治危机，更加重了下层民众的负担和苦难。元符三年(1100)正月，24岁的宋哲宗病死，绍圣改制闹剧随之收场。（顾全芳）

平夏之战

西夏永安元年(1098，宋绍圣五年)，西夏与北宋的一次重要战争。

崇宗继位时年幼，母梁太后专权。梁氏多次攻宋。天祐民安七年(1096)梁氏将兵寇鄜延(陕西富县、延安)，攻陷金明寨(陕西安塞东南)。八年(1097)梁氏遣兵6万攻宋麟州(陕西神木)，大败。宋知保安军李沂以兵围洪州(属陕西靖边)，夏监军嵬名济乃来援，不胜，洪州失守。梁氏复取宥州(陕西靖边)。宋鄜延经略使吕惠卿命诸路兵讨击。宋筑平夏城(宁夏同心南)，令总管王文振统熙河、秦凤、环庆诸路兵，以折可适为其副，暗带版筑筑城，以逼夏国，沿边诸路亦相继筑城堡，深入西夏属地。梁氏遣使以宋于要地筑城告于辽，望辽说服宋朝尽还所得疆土、城寨，尽毁所修城堡。永安元年(1098)大将数人先后降宋；

梁氏乞兵于辽，辽集兵于境上，不出。梁氏决意举国相争，与崇宗计议，认为宋所建诸城中平夏最大，若得平夏，其余自破。于是亲率军40万急趋平夏，连营百里，造攻城高车"对垒"，载数百人填堑而进，飞石激火，昼夜不息。宋守将郭成拒守有方。夏兵死者数千，经30日，军粮不继，大风震折攻城器具，大败。梁氏恸哭，以刀划面而逃。后请辽斡旋与宋讲和。

（史金波）

西夏儒学的发展

儒学在西夏大力发展并成为西夏统治思想的历史事实。

西夏所辖河西之地，早有深厚的汉文化基础，儒学对迁居这里的党项族逐渐产生影响。党项首领李继迁占领夏州（陕西靖边）时，就"修复寝庙"。夏景宗元昊建立西夏王朝，基本上借用了中原王朝的一整套政治制度。起初他想以"胡礼蕃书"以别于中原文化，特建"蕃学"，由创制西夏文字的大臣野利仁荣主持，将《孝经》、《尔雅》、《四言杂字》译为蕃书。可见在其强调本民族文化时，就已经在吸收儒学了。景宗注意网罗儒学人才。宋朝有两个不被朝廷重用的文人张元、吴昊同时投靠元昊，受到重视，后成为元昊的重要谋臣。毅宗谅祚执政后大力推行汉学，䄻都六年（1062）向宋朝献马50匹，求赐《九经》、《唐书》、《册府元龟》。宋仁宗赐予《九经》。这些重要儒学经典中除上述《孝经》外，《论语》、《孟子》也被译成西夏文，广为流传。儒学在西夏有了更大的影响。西夏前期毅宗、惠宗、崇宗几朝皇帝年幼时母后专权，往往提倡蕃礼，皇帝长大亲政后，又大力提倡汉学。崇宗亲政后于贞观元年（1101，宋建中靖国元年）御史中丞薛元礼建议设立"国学"，以教授儒学。他认为重视儒学是经邦治国的需要，只有提倡儒学才能改变风气，储备人才，有利于统治。这一建议被崇宗采纳，在蕃学外，特建国学，聘请教授，选弟子300人入学，并专设"养贤务"，负责国学的廪食。仁宗仁孝把儒学推上更高的地位。他本人酷爱汉文化，其皇后罔氏亦聪慧知书，爱行汉礼。人庆元年（1144）仁宗下令州、县各立学校，全国增至弟子员3千人。同年，仁宗又在皇宫内建小学，凡宗室子孙7岁至15岁都可以入学，请教授讲课，仁宗和罔氏也常调教训导。人庆二年（1145）西夏又建立大汉太学。仁宗亲临太学祭奠先圣先师孔子。次年，仁宗又尊孔子为文宣帝，下令各州郡都立庙祭祀。其时崇儒之风，实不亚于中原。一年以后，仁宗进一步接受中原的科举制度，主要是设进士科，策试举人，立唱名法。又开设童子科。儒学在西夏空前发展。人庆五年（1148）仁宗又建内学，亲选名儒主其事。天盛六年（1154）仁宗派使臣到金国，求购儒学和佛经。

西夏儒学的发展，在仁宗时曾遭到外戚权臣任得敬的反对。他于天盛十一年（1159）上表仁宗，要求废除学校，认为多养儒士白白浪费很多俸禄，说中原制度难以在西夏实行。这些主张未能得到仁宗同意。第二年，仁宗又设立翰林学士院，以著名文人王金、焦景颜等为学士，进一步确立了儒学在国家政治生活中的重要地位。西夏由于儒学的发展，文人学士辈出。西夏的儒学在抑制武将权臣谋乱、反对宗王腐败、巩固西夏统治方面，起到一定作用。但因过多强调文教，使军力、国力减弱。

（史金波）

蔡京擅权

北宋末蔡京长期当宰相而害民误国。

元符三年（1100）正月，宋哲宗病死，赵佶即位，是为宋徽宗。宋徽宗（1082—1135），宋神宗第十一子，宋哲宗之弟。哲宗无子，遂由18岁的赵佶即位。徽宗曾自称"教主道君皇帝"。宣和七年（1125）退位，自为太上皇。靖康二年（1127）为金人所虏，后死于金五国城（黑龙江依兰）。徽宗荒淫，但能书画诗词，尤以书法擅长。

宋徽宗即位后，曾由宋神宗皇后向氏以皇太后身分"权同处分军国事"，掌权半年。向氏倾向元祐更化，将元祐旧臣范纯仁等"复官"，为文彦博、司马光、吕公著、吕大防、刘挚等33人平反。蔡卞被罢相。九月，章惇罢相；十月，蔡京罢官，曾布、韩忠彦（韩琦之子）为宰相。宋徽宗掌权后，对元祐和绍圣之政都不认同，改元为建中靖国（1101），以求调和元祐、绍圣大臣之间的矛盾。朋党之争无法调和，宋徽宗又改元为崇宁（1102），打出"上述父（宋神宗）兄（宋哲宗）之志"旗号，表示继续推行熙宁新法。崇宁元年五月及闰六月，罢去韩忠彦和曾布宰相之职。七月初五任命蔡京为宰相。从此跨入蔡京擅权的腐朽统治。

蔡京（1047—1126），字元长，福建仙游人，进士出身，曾倾向王安石变法。司马光元祐更化，恢复差役法时，蔡京在五天内实施，得司马光赏识。绍圣绍述时，又帮助章惇推翻元祐之政，推行新法。这个反复无常的投机政客，在宋徽宗即位之初被罢官后，继续钻营，在杭州结识童贯，童贯还朝后推荐蔡京。蔡京给宋徽宗上疏，主张重行熙宁之政，遂被任命为宰相。蔡京上台后，立即"禁元祐法"，并将司马光等

120人列为奸党，刻碑立于京都及各地官厅。崇宁三年，又扩大到309人，包括曾布、章惇在内，再次刻石立碑于京都及州县。今广西桂林龙隐岩留有唯一留存的"元祐党籍碑"。列为元祐奸党者，本人及子孙都受到追贬及迫害。蔡京装模作样地"用熙宁条例司故事"，于崇宁元年七月即成立类似条例司机构，"自为提举"，掌握大权以"钳制天子"。同月，在杭州、明州(浙江宁波)设市舶司。八月，"复绍圣役法"。崇宁三年七月，"复行方田法"。四年九月，诏"京畿三路保甲，并于农隙时教阅"。宋徽宗和蔡京所颁行的熙宁新法，失去了熙宁变法中发展生产、抑制豪强兼并的一面，成为增加百姓负担、赤裸裸地剥削农工商的手段。

蔡京一伙在残酷剥削劳动者的同时，把北宋推向政治上腐败、生活上腐化的顶端。宋徽宗和蔡京迷信道教，装神弄鬼自欺欺人，使朝政腐朽，国运衰亡。蔡京故意制造皇帝"应当丰亨豫大"的舆论，搜罗天下珍宝，制造精美工艺品，大搞"花石纲"，建造楼堂宫观，为皇帝及蔡京一伙统治者极尽享受玩乐之能事。蔡京、童贯、梁师成、王黼、朱勔及李彦，被人称之为"六贼"。尽管蔡京曾三起三落，但直到宣和七年(1125)四月，才最后退出相位。蔡京做相擅权达20余年。这20余年，是北宋历史上最黑暗的时代。蔡京辞相的第二年，北宋便灭亡了 （顾全芳）

花石纲之害

北宋末年祸国殃民之举。

宋徽宗是吃喝玩乐、穷极侈靡的花花皇帝。为一己之玩乐，于崇宁元年(1102)三月，命宦官童贯在两浙的杭州、苏州设造作局，征役工匠几千人，制造"牙、角、犀、玉、金"等皇家奢侈品。所需材料等，强行在百姓中摊派。使两浙"民力重困"，深受其害。宋徽宗还有爱玩花石的癖好。蔡京投其所好，纵容、支持苏州大商人朱勔于崇宁四年十二月在苏州设应奉局，专门搜括两浙的奇花异石。朱勔仗势欺人，凡民间有"一石一木稍堪玩者"，便命官府军卒"直入其家"，没收交公。稍有异议，便按对皇帝"大不恭之罪"论处。

搜括来的太湖等地的异石，两浙的奇花珍竹，全部装上船，通过内河及海上运往首都开封，称为"花石纲"(成批运送货物的组织称"纲")。在运送途中，官吏们狐假虎威，拆屋破堰，甚至"毁桥梁、凿城廓"，以使花石通行。花石纲的大小船只，在河上接连不断、日夜不停地航行。

奇花异石运到京都后，宋徽宗便以此建造各式宫楼假山。政和四年(1114)八月新造的延福宫，"嘉花名木类聚区别；怪石岩壑，幽胜宛若天成"。从政和七年十二月到宣和四年(1122)十二月，历经五年建成的万岁山(艮岳)，更是宏奇无比，"山周十余里"，"分东南二岭，直接南山"。山上除全国各地的奇花异石外，还养有数以十万计的珍鸟异兽。宋徽宗到万岁山游乐，养鸟人薛翁献媚说："万岁山瑞禽迎驾。"宋徽宗欣奋之余，给薛翁封官赐钱。

花石纲的搜括和运输，耗尽了东南地区的人力物力。朱勔等乘花石纲之机而勒索百姓，大发横财。朱勔被人称为"东南小朝廷"。东南地区无法忍受花石纲之害，爆发了方腊等农民起义，喊出了打倒朱勔、童贯、蔡京的口号。在方腊起义的打击下，宣和三年正月，花石纲被迫废止，朱勔被罢职。方腊起义失败，花石纲又于当年闰五月恢复。直到宣和七年金兵南下，花石纲才最终废罢，前后历时20年。

（顾全芳）

阿骨打统一女真

辽末，生女真完颜部酋帅阿骨打在先辈的基础上统一女真的历史过程。

阿骨打(1068—1123)，即金太祖完颜旻。生女真完颜部酋帅乌古乃之孙，劾里钵之次子。女真，也叫女直，我国古代少数民族之一。生息在我国东北白山黑水之间，以渔猎为生，辽初分布在黑龙江、松花江流域，被辽征服，臣属于辽，其中生息在今辽宁、吉林南部的女真人，因编入契丹户籍，叫作熟女真，生活在松花江、长白山一带的叫生女真。生女真的人数远多于熟女真，有几十个部落，完颜部最强大。辽中期，生女真开始向半渔猎半农耕过渡。在与辽及高丽的交往中，吸收先进文明，学会烧炭炼铁，制作兵甲，渐趋强盛。至酋帅乌古迺(乃)时，接受辽节度使称号，以完颜部为核心，东征西讨，逐步建立起强大的部落联盟。历经劾里钵及其弟盈歌的经营，女真部渐趋统一。其中阿骨打起了较大的作用。他为盈歌及乌雅束(阿骨打兄)出谋划策，进而身体力行，采取了三项有效的统一措施：一是取消军事部落联盟内原各小部落联盟长的称号，诸部不得擅置信牌驿讯，理清了内部的政治关系。二是对愿意归属的邻近部落实行怀柔政策，以保留原来部落统属关系和部落显贵特权为条件予以招抚。三是对顽抗不顺从的部落，打着为辽平叛的幌子，进行武力兼并，并将所俘获部落酋长献给辽朝。遵循这些原则，阿骨打辅佐叔叔盈歌、兄

长乌雅束攻打纥石烈部，逐走阿疏，讨伐留可，尽服47部之众。所辖疆域空前扩大，东南到图们江流域，东北至松花江下游，西至辽边。辽天庆三年(1113)，阿骨打继兄乌雅束为都勃烈极，成为女真部落联盟大酋长。辽金战争爆发后，阿骨打又先后派人抚定辽北、东京州县及南路系辽籍女真，就连与女真习俗语言相近的达鲁古、兀惹、铁骊诸部也陆续降附。

阿骨打统一女真诸部，不仅为反抗契丹贵族的政治压迫和残酷剥削，发动辽金战争奠定了雄厚的人力、物力基础，经营了一块退可以守，进可以攻的战略基地，也为女真民族共同体的最终形成做出重要贡献。（刘　庆）

猛安谋克的建立

猛安谋克系金代女真族在原始部落组织基础上建立和发展起来的一种军、政合一的社会组织形式。金朝建国前夕，女真社会尚处于原始社会末期阶段，各部落族众平时组织在一起从事渔猎、采集生产，战时则自备马匹器械从部落酋长出征。部落酋长通称孛堇，战时则以统众多少称猛安(千夫长)、谋克(百夫长)。金太祖在金朝建立前一年(1114)正式规定女真人户以三百户为谋克，十谋克为猛安，建立起较规范的兵民合一、军政合一的社会组织。金初，女真统治者曾一度把归降的契丹、渤海和汉人也编为猛安谋克。天会二年(1124)以后，相继改汉人、渤海人的猛安谋克为汉制，置长吏，从汉官之号；废除了契丹猛安谋克而将契丹人编入女真猛安谋克。此后，猛安谋克主要由女真族组成。猛安谋克户享有占有土地、役使一定数量劳动力的特权。据大定二十三年(1183)统计，当时共有202个猛安，1878个谋克，人口(包括正口和奴婢口)6158636口，占地1690380余顷。

猛安谋克组织在灭辽侵宋的战争中曾起了重要作用。后来，金朝统治者为了加强对中原地区的统治，自天会十一年(1116)起，曾陆续三次大规模地将猛安谋克户迁往中原各地和东蒙地区。分散在中原各地的猛安谋克户在封建经济的影响下，往往出卖奴婢，将所授之官田租于汉人耕作，收取地租，与此相应，猛安谋克制日趋衰落。（高凯军）

宁江州大捷

辽天庆四年(1114)，阿骨打攻克宁江州，拉开了女真灭辽的序幕。

辽朝末年，契丹贵族穷奢极欲，对居住在辽朝东北边疆的女真人欺侮更甚。在边境贸易中仗势强取，并不时派人前去需索北珠和名鹰海东青。使者所到之处，肆意骚扰，每晚必得由女真美女侍寝，引起女真人的强烈不满，民族矛盾日益激化。其时，女真完颜部首领不断征服辽朝势力所不及的边远女真部落，逐渐建立起一个强大的军事部落联盟。完颜阿骨打袭兄职任生女真部族节度使以后，募军购甲，编组女真武装力量，极力缓和女真社会内部的矛盾，促使其东南边境上的高丽国保持中立，从而为正式树立反辽战争的大旗奠定了基础。辽天庆四年(1114)，辽朝统治者觉察到阿骨打有“异志”，遣使前去责问威吓，又下令在边防重镇宁江州(吉林扶余)集结兵力。尽管如此，辽朝上下并不相信女真人真敢造反。九月，阿骨打多次派人侦察，了解到辽军在宁江州仅有兵力800人，毅然决定在秋马正肥、粮草成熟的季节，乘冰河未曾封冻，辽兵未能集结之际，尽快发起攻击，夺取宁江州，拉开反辽战争的序幕。他派人至女真各部征调士卒2500人，聚集于涞流水(今拉林河)西岸，举行誓师典礼。阿骨打申告天地，宣布辽朝罪状，订立军规军纪，命部将立誓严格遵守。二十三日，女真将领宗干领兵填塞辽朝边界界壕，与驻守在宁江州城外阵地上的辽军遭遇。女真以中军和左右翼三路相迎。辽军兵甚锐，击退女真左翼七谋克。阿骨打驱中军与之混战，射毙辽将耶律谢十。辽军大溃，自蹂践，十死七八。女真乘胜进攻宁江州，填壕攻城，辽军力守不及。十月初一城陷，女真擒获辽防御使大药奴。辽宁江州总帅、东北路副都统萧兀纳领兵300人退出州城，渡过混同江(今松花江)退走。此役，扩大了女真的政治影响，沉重打击了辽朝在脆弱的种族统治体系中的权威地位，正式拉开了女真灭辽战争的序幕。（刘　庆）

阿骨打建国

收国元年(1115)，阿骨打建立金朝，开启了金朝的历史。

辽天庆三年(1113)，阿骨打兄乌雅束(康宗)死，阿骨打嗣位为都勃极烈。此时女真军事部落联盟已经发展到了它的尽头，诸部落间法令统一，官制一律，基本具备了国家建立的条件。阿骨打起兵后，在宁江州城外射死辽将耶律谢十，初战获胜。国相撒改遂派人向阿骨打建言立国称帝。阿骨打弟吴乞买等人也率官属进言。辽天庆五年(1115)正月元旦，阿骨打即帝位，国号大金，建元收国，以会宁府(黑龙江阿城)为都城。建国后，阿骨打在其原有的奴隶制度上

实行社会改革，主要措施有：一、把原来不系统的都孛堇、国相、孛堇官职改造成中央统治的最高权力机构——勃极烈制。有谙版勃极烈、国论勃极烈、阿买勃极烈、国论昃勃极烈、国论乙室勃极烈、迭勃极烈等名号，实行完颜氏宗亲新贵的共同统治。二、把原来单一的行猎组织猛安谋克发展成为军政生产多种职能合一的地域组织。300户为一谋克，10谋克为一猛安。三、确定新的法制，分轻重，别贵贱，建监狱，严刑法。四、严禁同姓为婚。这既是女真人观念进步、人伦发展的结果，客观上也能打击残存的血缘氏族集团的势力。五、创造女真文字。金王朝的建立，标志着女真奴隶制开始取代氏族制，并随着战争的发展进一步扩大和巩固。也标志着女真民族共同体的正式形成。（刘　庆）

高永昌起义

辽天庆六年(1116，金收国二年)，高永昌领导的反辽抗金斗争。

天庆六年春，随着阿骨打所领导的女真抗辽斗争节节胜利，辽朝固有的统治体系趋于瓦解，渤海与契丹的民族矛盾更加尖锐，各地相继爆发了大大小小的民族起义。当时，渤海贵族后裔高永昌乃是辽廷派驻东京辽阳府(辽宁辽阳)的偏裨将校，于前一年奉命统渤海兵2000人屯扎辽阳城外白草谷，备御女真。收国二年正月初一夜，10余名渤海人持刀潜入东京留守府，刺死留守官萧保先。次日辽将逮捕数十名嫌疑人犯，杀头示众，引起群情激忿。高永昌利用这一良机，初五夜，乘城中火起，内应开门，顺利进占辽阳城。

高永昌旋自称大渤海王，国号隆基，短时间内在百姓的拥护下，占据辽东50余州，声势煊赫。为了防御辽朝的镇压，他沿辽河、太子河设下两道防线。同年三月，辽朝派张琳召募"转户军"2万，准备攻击高永昌渤海军。五月，双方交战30余次，辽军突破辽河防线，进而打算渡太子河攻取辽阳城。高永昌趁辽军半渡之际，以5000铁骑突袭辽军翼侧，将其杀得大败，并乘胜反攻，穷追至沈阳城下。

但高永昌渤海政权的建立，不符合阿骨打兼并辽朝故土的设想。他有意助长反辽烈火的蔓延，一度派人虚与委蛇，与高永昌谈判合力攻辽问题。一旦金军作战准备完成后，便中止谈判，扣留渤海谈判代表，向高永昌部大举进攻。高永昌被迫应战，在辽中免儿陀、首山连战连败，退据辽阳城，并派人向金军提出取消名号、称藩的请求。金军将领表面答应，暗地里招诱降人开启城门，轻易收降了东京诸州县的大片土地。高永昌仓促间与部下2000人退守盖平长松岛。六月，处于金军包围之中的高永昌，粮乏草缺，遭叛将捕捉献于金军，旋在辽阳被杀。其余部则在海上坚持反金斗争达一年之久。（刘　庆）

宋江起义

宣和初年黄淮地区的农民起义。

宋徽宗对民众的加剧搜括及残酷统治，使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进一步激化，各地出现了不同规模的农民起义。宋江领导的山东、河北、江苏北部的农民起义，仅是当时农民起义中规模不大的一支队伍。

宣和元年(1119)十一月，宋江在东平府(山东东平)梁山一带，以36人为大小首领，领导了农民起义。宋江起义的信息传到京都，宋徽宗一面下令消灭起义军，一面又下诏可以"招抚"。宋江起义后，并未建立根据地，而是"横行齐魏"，转战于青州(山东青州)、济州(山东巨野)、单州(山东单县)、濮州(山东鄄城)和沂州(山东临沂)等地。当地的官军，对宋江起义军"无敢抗者"。之后，宋江又率军南下，到达沭阳(江苏沭阳)、楚州(江苏淮安)，"转掠十郡"，最后至海州(江苏连云港)。在海州，宋江等乘船到了海口。海州知州张叔夜得知宋江在船上，在陆上设下1000人的埋伏圈，引诱宋江军登陆。宋江中计，离船上岸，张叔夜随即派人烧毁起义军大船。起义军见船被焚，方知中计，"皆无斗志"。宋江军在与官军交战中，副手被俘，宋江等人只得"相与出降"，投降了张叔夜，接受了宋朝的招安。李若水曾写下《捕盗偶成》一诗。诗中有"去年宋江起山东，白昼横戈犯城郭"；"大书黄纸飞敕来，三十六人同拜爵"，证明了宋江等36人确实接受了招安，投降了宋朝。时间是在宣和二年十二月(一说三年二月)。宋江起义以宋江的叛变投降而告终。

宋江降宋后，起义军被收编为官军，其大小头领成为官军头领。他们与其它官军一道，被派往浙江镇压方腊农民起义。宋江曾攻陷了方腊起义军的上苑洞。之后，宋江等回到京都，俨然以官军得胜回朝的姿态，昂首阔步于开封大街。

由于史料记载缺乏和相互矛盾，宋江起义的时间、地点、活动范围，是否到过梁山泊，以及是否降而复叛等等，至今尚无定论。南宋时，宋江起义已在"街谈巷语"中流传，流传中夹进了不少传奇虚构。龚开曾作《宋江三十六人赞》，其中有宋江、吴学究、卢俊义、关胜等36人，与后来的《宣和遗事》、元杂剧有关

剧目，以及广为流传的《水浒传》中的人物姓名相同。但是，这36人的传说及其在《水浒传》等艺术作品中的故事，都难以作为历史事实看待。宋江起义之所以妇孺皆知，主要是由于这些传说和小说的影响。

（顾全芳）

方腊起义

北宋末年（宣和二年，1120）方腊领导的东南地区大规模农民起义。

北宋末年，政治日益腐败，苛捐杂税日增。元符三年（1100）初，宋哲宗病死，“轻佻不可以君天下”的赵佶即位。宋徽宗当皇帝后，打着“崇宁”即崇尚熙宁变法的旗号，以蔡京为宰相。宋徽宗、蔡京统治集团名义上要恢复熙宁新政，实质上却打着变法的招牌，疯狂侵吞、掠夺财富，过着荒淫无耻的生活，成为宋朝历史上最腐朽、黑暗的时期。受害最深的，是东南地区的两浙路（今浙江、江苏及上海地区）。两浙路原是最富庶的地区，盛产稻、茶、盐、丝，也是宋朝的主要征税地区。尤其是朱勔在苏州设苏杭应奉局后，两浙路更受花石纲之害。广大贫苦民众实在不堪忍受宋政府如此欺压，反抗斗争不断，终于汇集成宣和二年（1120）方腊领导的农民大起义。

方腊，又名方十三，世居清溪县（浙江淳安）堨村（一说安徽歙县人）。家有漆园（一说是漆园雇工）。残酷的压榨，使方腊无以为生，他秘密联络农民方肥、方七佛等，以杀死朱勔、废除花石纲相号召，准备举行反宋暴动。同时，又“托左道以惑众”，利用摩尼教来宣传并组织民众。摩尼教由明教演变而来。明教早由波斯传入中国，其教义中有“黑暗”、“光明”之说，意为黑暗终将过去。传入浙江城乡后，参加该教的贫困教徒，“率财以助”起义者，“协力同心，以拒官吏”。方腊在准备起义时，被人告密，不得不提前于宣和二年（1120）十月九日举起义旗。在帮源洞宣布起义的会上，方腊疾呼“东南之民，苦于剥削久矣；近岁花石之扰，尤所勿堪”。他号召贫苦农民们鼓足勇气，占领两浙及江南地区，然后“划江而守，轻徭薄赋，以宽民力”；十年之内，统一中国。

方腊在家乡起义后，几天之内就“有众十万”。方腊率领起义军建立政权机构。“自号圣公，建元永乐，置官吏、将帅”。十一月二十九日，方腊打败两浙都监蔡遵的5000官军，攻占青溪，挥师东下睦州（浙江建德梅城镇），败杀官军千余后占领该城。接着，起义军又于十二月十三日攻下歙州（安徽歙县）。方腊马不停蹄，按计划沿浙江（富春江）北上，经桐庐、富阳，于十二月二十九日占领杭州。占领杭州后，方腊不是率主力继续北进，直抵长江，而是兵分两路，一路回师南下，攻占了婺州（金华）和衢州，宣和三年二月抵达处州（丽水）。另一路由方七佛率军6万继续北上，攻打秀州（嘉兴）。至此，起义军共打下6州52县，声势浩大，东南各地农民纷纷揭竿而起，响应方腊，义军发展到百万之众。各地农民“结集徒众，窥视州县”，地主豪强闻风而逃，州县官吏“弃城而遁者不可胜计”。

方腊起义的消息传到东京，宋徽宗惊恐万状，一面将千夫所指的朱勔罢官，一面派童贯为宣抚使，调动包括准备北伐辽国的“汉、蕃精兵”数十万，紧急南下镇压方腊起义。宣和三年正月中旬，童贯率军渡过长江。方七佛率领起义军攻秀州，正月二十四日到达秀州城外，遇到当地官军王子武的顽强抵抗。这时，南下的官军赶到秀州。起义军在官军夹击下战败退还杭州。方腊原先分兵两路而造成兵力分散，秀州之败决定了起义由进攻转入防守。官军追到杭州，从二月七日起，起义军在杭州城北清河堰与官军激战了6天，义军损失惨重。二月十九日杭州城被攻破，起义军败退。官军又沿浙江南下，经富阳、桐庐到达睦州。起义军在睦州与官军决战，又败。同时，官军相继攻陷衢州和婺州。形势急转直下，20万起义军被迫撤退回青溪县，四月十九日再退到起义出发地帮源洞。官军包围帮源洞，起义军英勇迎敌，血战三昼夜，死伤过半。四月二十六日，方腊等在石洞中被韩世忠查获。方腊被押到东京，八月二十四日献身。方腊起义失败。

（顾全芳）

海上之盟

宣和二年（1120）宋、金订立共同打败辽国的密约。

北宋政和五年初（1115），东北地区日益强盛的女真族建立金朝。金朝建立前后，与北方地区的辽国时战时和，关系紧张。早在政和元年（1111）九月，童贯出使辽国，路过卢沟时，遇辽大族马植。马植在辽无法立足，见童贯，自言有灭辽之策。童贯将马植带回京城，受宋徽宗召见。马植对宋徽宗说，女真与辽国仇大恨深，而辽国皇帝荒淫失道。如果朝廷派人自登州（山东蓬莱）和莱州（今属山东）入海，到达女真，与女真相约攻辽，则辽国必亡，燕云地区便可收复；一旦女真先下手为强，灭掉辽国，则燕云收不回了。宋徽宗也想借以收复燕云地区来巩固自己的统治，对马植的建议很赞赏，并赐马植姓赵（马植从此改姓

名为赵良嗣)。

重和元年(1118)二月,宋徽宗派马政以买马为名,从登州入海,出使金国。马政至金后,对金主说,听说贵朝攻破契丹(辽国)50余城,我朝想与贵朝联合讨伐契丹。如果同意,可以互派使节谈判。金国主经过商议后,同意与宋谈判,便于宣和元年(1119)正月,派李善庆等跟随马政到宋京都。宋徽宗指示蔡京同李善庆会谈。蔡京遵命同李谈宋、金夹攻辽国问题。李善庆不表示明确态度。十余天后,宋又派马政到金谈判。马政随李善庆到登州,准备渡海使金时,宋朝的间谍探知辽国已经封金主为帝,宋徽宗明白约金攻辽暂时无望,即令马政暂勿使金。

宣和二年二月,宋又派赵良嗣仍以买马为名,秘密使金。授权赵良嗣对金主说,如果攻辽成功,长城以南地区归宋,以北归金。金主同意,但必须由宋付给金岁币,并说攻辽时,金可以从古北口(北京市北郊)南下,宋军从白沟(河北新城)北上。赵良嗣回宋后,将金文书交宋徽宗,奏报了会谈情况。宋徽宗同意金的条件。九月,金使到宋京,得宋致金的国书。在此之前,金坚持必须以国书的形式,订定盟约,否则无从谈起。宋致金以国书,等于承认金为与宋平等的国家。国书上称"大宋皇帝致书于大金皇帝"。国书上还规定,宋金两国"夹攻"辽国的条件是:金进攻中京大定府(内蒙古宁城),占领长城以北地区;宋攻燕京(北京市),占领燕云;两国军队互不得越过长城;打败或消灭辽国后,长城以南燕云地区归宋;宋将原来付给辽国的岁币,如数改付给金;两国从此以后不得单方面与辽国讲和及签订和约。金使回国后,经过商议,金方大体上同意上述宋的盟约内容,并于当年十一月,派人向宋朝也递交了国书。从此,两国密约正式生效,可以付诸行动。由于宋金两国使者往来须渡海,因而史称此密约为"海上之盟"。

订立海上之盟后,金于宋宣和三年二月即曾派使者至宋,约宋攻辽。由于原来准备攻辽的宋军,已由童贯带到南方去镇压方腊起义,难以如约北上攻辽。方腊起义被镇压后,童贯于宣和四年三月被任命为河北、河东路宣抚使。五月,童贯领兵北上,自高阳关(河北高阳东)取白沟,在白沟被辽军打败,退还雄州(河北雄县),辽军追至雄州城下。宋徽宗得知兵败,下令撤军。辽国派使臣对童贯破口大骂:你们图一时之利,破坏百年之好,与豺狼(金)共谋,像话吗?童贯无言以对。十月,童贯在金的催促下,又以兵10万出雄州,渡白沟,再败,退还雄州。宋军屡战屡败,金军则屡战屡胜,很快到长城以北。童贯不能如约破燕京,怕得罪,密派人至金,私请金军越过长城,攻破燕京。金攻占燕京后,根本不想将燕京及其占领区划归宋朝。双方经过多次讨价还价,结果宋不仅每年要向金交40万,而且要增加"代税钱"100万缗,金军才能退出燕京。宋同意了以钱买回燕京。金军撤出燕京时,"职官、富民、金帛、子女皆为金人尽掠而去,惟存空城而已"。燕京及所属6州24县,总算为宋所有。宣和七年(1125)底,金兵分路大举南下攻宋,宋金海上之盟成为一张废纸。　　　　(顾全芳)

金夏和议

金在灭辽战争中,与西夏先交战后议和的事件。

金在攻辽时,曾遣使至西夏,以宋地为诱饵,联合西夏共同进攻宋麟州(陕西神木),以牵制河东局势。辽为西夏宗主国,辽又于夏贞观五年(1103)封宗室女为成安公主嫁于夏崇宗乾顺,当金攻辽时,西夏给予援助。金天辅六年(1122),破辽西京(山西大同)时,追辽主于乙室部,不获,夏崇宗遣兵5000赴援,出境后闻金已破西京,遂还。五月,辽天祚帝被金打败,逃往阴山时,西夏派大将李良辅率军3万救援,至天德(内蒙古乌拉特前旗)境首挫金兵,六月,进军宜水,金军二路合击,良辅大败,死数千人。次年,夏复发兵救辽,为金兵所阻,不得进。辽天祚帝于阴山被金所袭,西走云内(内蒙古土默特旗),夏崇宗遣使往迎,请临其国。金借强大军势诱降西夏,提出若西夏以臣事辽国之礼臣事金朝,辽主至夏国执送金国,则金当割地酬劳。此时辽主遣使册崇宗为夏国皇帝,令再发兵救援,崇宗慑金势力未应。天会二年(1124)夏遣使至金,向金称臣,金以下寨以北、阴山以南、乙室耶刺部吐禄泺西之地与西夏。西夏上誓表于金,金使来赐誓诏,册夏崇宗为夏国主,和议成功。后西夏仁宗、桓宗、襄宗、神宗皆被金封为夏国主。

(史金波)

辽朝灭亡

辽天祚帝保大五年(1125,金天会年),立国210年的辽朝为金朝击灭。

金收国元年(1115,辽天庆五年)正月,阿骨打称帝后,便不断进攻辽国。该年九月,阿骨打攻陷辽东京道军事重镇黄龙府(吉林农安附近),声势益盛。其时,辽天祚帝耶律延禧(1075—1128)在位。他荒淫无道,穷奢极侈,酷好酒色游畋,排斥忠良,信用萧奉先、李处温和萧嗒喇台等奸佞之徒。在他统治期间,纲纪废弛,有功不录,有罪不罚,贪官污吏横行无忌,

朝内朋党倾轧，内乱不断。人民生活极端困苦，女真人、渤海人和汉人的起义连绵不绝。腐朽的统治导致辽兵士气极度低落，金辽之间的战争，辽军几乎每战必败，甚至双方尚未交战，辽方已溃不成军。不过金国初起之时，天祚帝仍自恃强大，在该年十一月御驾亲征，企图以倾国之力一举击灭金国。阿骨打深沟高垒，准备率众抵御。辽军行军途中，天祚帝惊闻知咸州路兵马事耶律张家奴在上京（内蒙古巴林左旗南波罗城）起兵，谋立辽兴宗之孙耶律淳为帝，被迫仓促回师。金太祖阿骨打侦知，立刻选精骑追击。护步答冈一战，辽军大败，天祚帝一日夜狂奔500里，退保长春城（嫩江与洮儿河交汇处）。是战，辽军枕尸百余里，军资器械与牛马损失无数。至次年五月，东京辽阳府（辽宁辽阳）及其周围地区均为金国占有。

天祚帝大败而归后，虽在天庆七年置怨军28000人，屯于卫州蒺藜山（辽宁兴城境内），却一时难以大举。金在大胜之后，进取心也略减，故此双方曾一度进行和议。此时，北宋见有机可乘，屡屡遣使金国，在金天辅四年（1120，宋宣和二年，辽天庆十年），宋金达成“海上之盟”，辽金和议也随之破裂。该年五月，阿骨打亲自领兵攻克辽上京。辽保大元年（1121），辽统治集团内部激斗再起，东路都统耶律余睹统军降金，尽告辽之虚实，并于次年正月引金军攻占辽中京（内蒙古宁城西大明城）。时天祚帝正在鸳鸯泺（河北赤城西北）打猎，闻讯后向西京（山西大同）奔窜。金将完颜宗翰统军追击，在三月攻破西京。天祚帝统余部5000窜逃夹山（内蒙古呼和浩特西北），诏令耶律淳留守燕京（又称南京，今北京）。三月，南京奚王回离保及林牙耶律大石拥耶律淳为帝，建元建福，辽国一分为二。但耶律淳为帝仅三个月多一点便病死。

金军本可乘胜攻取燕京，但按海上之盟，南京应由宋军攻打。岂料宋军腐败不堪，虽曾攻进燕京，却在辽军的一个反击下便损兵折将，无力再进。这年十二月，金兵开进居庸关，辽军不战而降，金轻而易举地攻占了燕京。至此，辽的五京均为金占有。金天辅七年，阿骨打死，其弟吴乞买继位，是为金太宗。天会三年二月，天祚帝向西夏逃窜，在应州（山西应县）东被金将完颜罗索擒获。辽亡，历9帝210年。

（蒋福亚）

太原保卫战

宋宣和七年（1125）山西军民抗击金兵、保卫太原城之战。

宋宣和七年二月，辽国的天祚帝为金所俘，辽国灭亡。契丹族除西迁新疆等地的势力外，在我国北方已不复存在。十月，金以宋招纳辽旧臣张觉为借口，决定兵分两路，大举犯宋，以期会师开封，打败宋朝。十二月，东路斡离不率军6万，由河北进逼开封。西路粘罕（宗翰）率兵6万，从山西大同向太原进发。西路军很快打下朔州、代州、忻州等地，于十二月十八日兵临太原城下。童贯得知金兵南下，吓得从太原逃回开封。太原城于宋初新建，易守难攻。金兵包围太原后，宋将王禀说服太原知府张孝纯坚守太原。靖康元年（1126）五月，宋将种师中及姚古率军救援太原，打到靠近太原的寿阳、榆次。由于宋军各自为战，被金兵各个击破。种师中“力疾斗死”，以身殉国。八月，宋将李纲派解潜、刘韐、折可求、张思正等三路兵马，向太原进发，以解太原之围。又因为三路宋军不能协力同心，被金兵分别打败。太原周围百姓“皆渡河南奔”，太原成为孤立无援的孤城。

王禀、张孝纯死守太原，组织城中军民顽强抵抗金兵一次又一次攻城。直到靖康元年九月初三，太原才被金兵攻陷，共坚守250多天。太原城破后，张孝纯被俘，王禀与金兵肉搏巷战后跳汾河自殉，通判王逸焚火自杀。在八个多月的坚守太原中，太原军民表现出非凡的勇气，令人敬佩的牺牲。他们拒绝朝廷放弃太原的诏令，固守太原城。他们将房屋拆通，以利攻防战斗。他们拿出家里的粮食，分给缺粮军民。“百姓自十五以上六十以下，皆籍为兵”，万众一心，众志成城地抗击金兵。粮食吃光了，军民便以草根、树皮甚至牛皮充饥。直到大部分军民都已饿死，所剩军民也已不能动弹作战，才被金兵以云梯登上城墙，进入城中。即使如此，太原军民也不曾投降而遭金兵屠杀洗劫。

气壮山河的太原保卫战，是爱国主义的凯歌，它延缓了金军消灭北宋的时间。太原失守，宋朝失去了保卫京都的屏障，使西路军长驱南下，直抵开封，北宋被金所灭遂成定局。

（顾全芳）

陈东上书

宣和七年末（1125）至靖康二年间，以太学生陈东为首，为挽救宋朝国家民族危亡的上书、请愿活动。

宣和七年（1125，金天会三年）十二月，金兵分西路南下，大举犯宋，逼近京都开封。宋徽宗退位逃跑，宋面临生死存亡的危急关头。最高学府太学生陈东，会同太学诸生，于十二月二十七日首次上书宋钦宗，

要求挽救宋朝，处死祸国殃民的蔡京、王黼、童贯、梁师成、李彦、朱勔等六贼，"传首四方，以谢天下"。陈东，字少阳，江苏丹阳人。靖康元年(1126)正月初六，金兵兵临开封城下。陈东再次上书，要求捉拿逃出开封的蔡京、童贯、朱勔父子还京，"悉正典刑"，以平民愤。正月三十日，陈东又一次上书，要求严惩梁师成等六贼。宋钦宗迫于陈东等时论，将梁师成贬杀，其他五贼也先后被贬、死。

金兵包围开封后，李纲领导京都军民英勇抗敌，保卫京都。宋钦宗、李邦彦等却与金和谈，答应割地纳岁币，并于二月初一日将李纲罢职以媚金。宋钦宗、李邦彦等投降求和之举，激起京都军民的强烈不满。二月五日，陈东等太学生又一次到宣德门上书，怒斥不当重用李邦彦、张邦昌等割地纳币，坚决要求恢复李纲、种师道的职务，继续抗金。京都军民听说陈东等数百名太学生到宣德门上书，"不约而会者几数十万人"，形成声势浩大的自发请愿活动。李邦彦入朝路过，军民同声怒骂李是"国贼"、"浪子"。许多人"拾瓦砾击之。邦彦跃马奔入朝堂，乃免。"朝廷派人驱赶、镇压学生和军民，陈东"挺身斧锧之间"，数万群"众莫肯去"，转移到东华门。军民"填塞驰道，呼声震地"，要求严惩国贼，共同抗金。宋钦宗害怕军民难以控制，被迫同意恢复李纲、种师道职务，以平民愤。李纲出现在东华门至右掖门的军民之中，"安抚军民"，表示共同抗金之决心，数万军民才放心解散。这是我国封建社会罕见的挽救民族危亡的群众请愿。

靖康二年(1127)四月初一，金朝将宋徽宗和钦宗作为俘虏押走，北宋灭亡。五月初一，赵构(宋高宗)在应天府(河南商丘)登位。八月十八日，李纲罢相。陈东最后一次上书，反对罢李纲，宋高宗、黄潜善将陈东斩首于市，时年41。陈东死时，"识者哀其忠义，且知丧乱未已也"。 (顾全芳)

开封保卫战

靖康元年(1126)李纲抗击金兵保卫首都之战。

宣和七年(1125)十月，金朝决定大举南犯以消灭宋朝，并为此做秘密战备。十一月下旬，金派斡离不(宗望)从平州(河北卢龙)起兵西进，进犯宋境。金兵陷蓟州(天津蓟县)，破檀州(北京密云)，于十二月上旬抵达三河，进逼燕山(北京市)。燕山府守将郭药师在城郊白河投降金军。金军占领燕山府后，兵分两路，斡离不的6万东路军以郭药师为向导，长驱南下。靖康元年(1126)正月初三，金兵渡过黄河天险，初六即抵北宋京都开封郊外。

金兵攻占燕山及南下的消息传到京都，宋廷内外乱作一团。宋徽宗急忙罢花石纲、下罪己诏，于宣和七年十二月二十三日让位给长子赵桓(宋钦宗)，自为太上皇。靖康元年正月初三深夜，金兵还在远离开封的黄河北岸，宋徽宗就悄悄逃出开封。一直逃到京口(江苏镇江)。同时，蔡京等"百官多潜逃"。宋朝由宋钦宗当皇帝管天下事。

25岁的宋钦宗与宋徽宗一样，是位昏庸之君。他在金兵兵临城下之际，忽而主战，忽而主和，甚至想效法父亲逃出开封。迫于内外压力，靖康元年正月初五，任命李纲为尚书右丞、东京留守，委以全权指挥军队保卫京都之重任。李纲(1083—1140)，福建邵武人，进士出身，是始终主张抗金的主战派，曾上血书要求宋徽宗退位。李纲受命于危难之时，立即宣布京师戒严，誓死保卫开封，坚决反对并阻止宋钦宗迁都逃跑，"敢有异议者斩"。他迅即组织5万余宋军，"以百步法分兵备御"开封四周。同时紧急调用、安排各种"防御之具"，严阵以待金兵。

金兵抵达开封城郊后，听从郭药师的建议，首先在初七袭击城西北牟驼冈的天驷监，获宋战马2万匹和堆积如山的粮食、饲料。当夜，金兵又乘船沿汴河而下，攻开封城水西门。李纲早有准备，在汴河河中设置木障，又从蔡京家中运来假山石，堵塞河道，使金船难以近城。李纲派2000名宋军敢死队，在城上"矢石俱发"，打砸敌船。金兵无奈，损失百余人后撤退。初八日晨，金兵又攻陈桥、封丘、卫州及酸枣门，尤以攻酸枣门为烈。李纲急忙带领禁卫兵千人，疾驰20里，赶到酸枣门。金兵正在渡过城濠，驾云梯爬城。李纲迅速登上城楼，指挥宋兵射箭、发炮还击，杀伤金兵。同时，宋军以绳索下城墙，到金兵中烧毁云梯，与金兵肉搏。金兵损兵数千，开封各城门均未攻破。

斡离不眼看攻城受阻，便应宋钦宗之约，与宋朝议和谈判。金方提出了极为苛刻的撤军议和条件：割让山西太原、河北中山及河间三镇；赔偿军费金500万两，银5000万两，绢彩200万匹，牛马等1万匹；以亲王、宰相各一名为人质。宋钦宗及李邦彦等大臣准备接受这些条件，遭到李纲的坚决反对。李纲说，割地纳币"何以立国"？然而一心求和的宋钦宗不听。正当宋金谈判之际，种师道等各路勤王之师，先后到达京都，约20万左右，壮大了保卫开封的军事力量。二月初一，姚平仲率宋军偷袭金营，反为金兵所败。宋钦宗乘机将李纲做替罪羊，解除其军职"以谢金

人"，派使到金营，答应金方的全部议和条件。宋钦宗、李邦彦等的投降求和之举，激起开封军民的强烈不满。宋钦宗被迫恢复李纲职务。李纲复职后，继续领导开封军民的抗金。斡离不看到开封兵多民心齐，一时难以攻破，久待城外于己不利，于二月中旬暂时向北撤退。开封在李纲领导的军民齐心奋战下，终于得救。　（顾全芳）

红巾军抗金

北宋亡时河东民众的抗金斗争。

宋宣和七年(1125)十二月，金兵分两路南犯宋朝。西路粘罕(宗翰)率军6万，从大同出发，打下朔州、代州(代县)、忻州等地后包围太原。靖康元年(1126)九月初三，太原城被金攻破。金兵越过灵石险隘阳凉关，攻占平阳(临汾)、隆德(长治)、泽州(晋城)后南下北宋京都开封。至此，河东路(山西中南部)为金所有。在金攻占河东的几年中，素有结社习武之风的河东人民，不满于金的侵占统治，纷纷拿起武器，抗击金兵。从太行山下到黄河沿岸，到处是民间抗金烽火。五台山和尚真宝"与其徒习武于山中"，金兵来犯，真宝率和尚们"尽夜拒之"。金军势盛，真宝将"寺舍尽焚"后败退。金兵追击，真宝被俘，拒不降金，"怡然受戮"。太原南的保正石竧"起寨于西山"，领导周围村民起来袭击金兵，多次打败金兵的围剿。粘罕曾派重兵前往镇压。石竧战败被俘后被"钉之于车"，粘罕劝他降金，石竧大呼"爷是汉人，甘死不降"，英勇就义。繁峙县2万多民众在杨可发率领下，与金兵大战。杨可发转战至五台后兵败自殉。安邑人邵兴在金军进占运城时，领导民众"屡与金人大战"。金兵逮捕其兄弟作为人质，要邵兴投降。邵兴不顾兄弟安危，仍与金兵死战。在朱家山，邵兴率众与金兵苦战三天，杀死金兵一千余人。近年，灵石县绵山上曾发现当年抗金义士埋藏的五件文书，其中一件称，抗金义军要"斩尽杀绝"投降金人的"国贼"。

河东民间抗金，影响最大者当属红巾军。红巾军以红巾作标志，建立山寨，抗击金兵。红巾军分成数股，"每党不啻数千人"。这几千人战旗林立，战鼓震耳，很有气势。其中以活跃于泽州、隆德一带晋东南的红巾军最有作战能力。他们神出鬼没，袭击金兵。有一次较大规模的袭击，差一点将在金营中的统帅粘罕活捉。粘罕恼羞成怒，下令务将红巾军消灭。金兵无法抓到真正的红巾军，就杀害老百姓，结果使更多老百姓参加红巾军，"而红巾愈炽"。红巾军及河东民间的抗金斗争，具有自发组织的色彩，他们希望得到宋官军的领导与支持，也希望配合官军行动。邵兴就曾配合宗泽，打败金军，与李彦仙会师陕州(河南陕县)。宗泽也曾联络河东义军。

金兵占领北宋京都，北宋灭亡后，红巾军虽受残酷镇压，有的红巾军首领如齐实、武渊、贾敢等还叛变投敌，但抗金斗争并未终止，红巾军反而发展到太行山以东，使"河北红巾甚众"。这些来自普通百姓的自发抗金活动，打击了金人的气焰，延缓了金兵的向南进攻。尤其是长年活跃在金后方，使金有后顾之忧。南宋之难被消灭，民间自发抗金起了重要作用。

（顾全芳）

靖康之难

宋靖康元年(1126)末至次年初，金攻陷宋京都开封，俘废徽钦二帝，北宋灭亡。

宣和七年(1125)十一月，金朝以10余万兵力，分东西两路大举南犯，以图会师开封，打败宋朝。由于粘罕所率西路军久攻太原不下，斡离不所率东路军孤军深入开封城外，遭开封军民顽强抵抗而暂时撤离。东路军北渡黄河后，一面攻占黄河以北州县，一面准备再次南下。靖康元年八月，金朝以未得太原、中山、河间三镇为借口，决定再次进军开封，打垮宋朝。东路军从保州(河北保定)进兵，十月二日攻陷河北定州。西路军也于九月三日攻陷太原。斡离不与粘罕会见于山西平定，商定了两路金军进军开封事项。东路军由河北平原长驱南下，直抵魏县，在李固镇渡过黄河，直指开封。西路军由太原南下，越过险隘阳凉南、北关(山西灵石境)，攻陷平阳(山西临汾)、隆德(山西长治)、泽州(山西晋城)，直抵怀州(河南沁阳)，从河阳(河南孟县)渡过黄河，经西京(河南洛阳)、郑州，直逼开封。十一月三十日，东西两路金军约10万之众，会师于开封城下。

自从靖康元年二月金兵暂撤开封后，宋钦宗以为天下太平，金军不可能再次南下。他将主战的李纲撤职，遣返了各路勤王兵马。他不做任何战争准备，一心想以割地纳币、求和投降换取金人好感，保住自己帝位。四月，宋徽宗也返回京城，照样荒淫享乐。两路金兵包围开封后，宋钦宗仍然幻想割地求和。金一面派人同宋朝谈判议和，一面却加紧向开封各城门连续进攻。只是由于守城军民竭力防御，才未被攻破。宋钦宗既不听宋军出城与金兵在城外决战之计，更不依靠7万宋军及全体百姓守城抗金，而是迷信无赖郭京组织的"六甲正兵"。靖康元年闰十一月二十五日，金兵攻宣化门。宣化门告急。郭京率7000余

名“鬼颜异服”的所谓“神兵”，打开宣化门，出城与金兵战。这班“神兵”只会装神弄鬼，根本不会用武，结果很快被金骑兵冲杀溃散，郭京率残余神兵出城南逃。金兵在宣化门乘机攻破城门，攻上城墙。金兵攻上城墙的消息很快传开，开封城内军民群情激忿，杀死了和议金使，数以十万计的民众要求领取武器，与金兵巷战。金兵看到“其来如云”的无数民众斗志昂扬，不敢贸然攻入城内，而是攻占城头四壁及京城16门，在城墙修筑工事，以防百姓攻上城墙。

金兵攻占城墙后，更向宋施加压力。畏懦昏庸的宋钦宗唯金命是听，一味退让求和。金提出应撤走宋各路勤王宋军，宋钦宗便让宋军停止向开封前进。宗泽等少数宋军违命与金兵战，虽有小胜，但已无补大局。金兵索要大量金、银、帛、少女、骡马，宋政府便在开封大肆搜括，直到“搜掘戚里、宗室、内侍、僧道、伎术、倡优之家”。至于普通百姓，早就被搜括一空。更有甚者，宋钦宗不准军民私造武器以抗金，甚至将抗金百姓斩首示众。

宋钦宗的求和投降，并未满足金的欲望。靖康元年十一月三十日，宋钦宗被迫前往青城金营投降求和。十二月二日，宋钦宗向金递交降表。金扣押宋钦宗于青城。靖康二年二月六日，金宣布废掉宋徽宗和宋钦宗。二月七日，宋徽宗及皇族被扣押至青城金营。二月十一日，金立张邦昌为帝；三月七日，张邦昌伪楚建立。四月一日，金兵将宋徽宗、宋钦宗及宗族、大臣等3000余人，以及无数金银珍宝，运离开封，开封被洗劫一空。北宋灭亡，史称靖康之难。

（顾全芳）

建炎中兴

建炎元年(1127)宋高宗在应天府即帝位建南宋。

宣和七年(1125)十一月，金兵分两路南下攻宋。西路由粘罕率领，从云中府(山西大同)至太原，在太原受挫。东路由斡离不率领，攻取燕山(北京市)，郭药师降金后，金兵从河北直达开封。宋徽宗闻风而逃，传位给儿子赵桓(宋钦宗)。钦宗即位后改元为靖康。宋钦宗与金讲和，答应割让太原、中山(河北定州)、河间(今属河北)三镇及大量赔款。斡离不等不到在太原城外的粘罕军，于靖康元年(1126)二月撤退。宋徽宗又回开封当太上皇帝。靖康元年十月，粘罕在攻下太原城后，率军南下，抵开封城外。斡离不也率金军再次南下攻宋。北宋京都开封再度紧张。宋钦宗再次向斡离不求和。金提出要讲和必须派赵构来。赵构(1107—1187)，宋徽宗第9子，宋钦宗弟，宣和三年被封为康王。靖康元年初金首次兵临开封，宋钦宗求和时，就曾以赵构作为人质，被扣押在金营近月。宋钦宗答应由赵构去金营求和。当时，康王赵构不在开封，而在滑州(河南滑县)。宋钦宗便派冯澥、王云作为赵构的副手，到滑县去请康王到金营去谈判。康王赵构奉命从滑州出发，于十月二十日到达磁州(河北磁县)。磁州在滑州北。赵构不西入开封，而是北上磁州，是因为当时斡离不军不在开封，而在磁州北，正向磁州南下。在磁州迎接赵构的，是抗金名将宗泽。宗泽向来反对宋向金求和投降。宗泽对赵构说，你千万不能到金营去，去了就回不来了；金诡计多端，是以谈判为名，将你骗去。老百姓也聚集在一起，劝赵构不去金营，并且将原先到金营、回宋说金要赵构去的王云当场杀死。金兵前锋已快到磁州，并且正在寻找赵构下落。在相州(河南安阳)任知州的汪伯彦得知赵构在磁州，立即派兵马到磁州，要赵构到相州去。赵构看到王云的下场，知道众怒难犯，又看到金兵将临，自己凶吉未卜，因而同意前往相州。相州在磁州南。赵构不再北上去金营而是南下相州，表示赵构不想去金营求和。

靖康元年闰十一月，在臣僚的劝说下，宋钦宗同意赵构不去谈判，而是封他为兵马大元帅，陈遘为元帅，汪伯彦、宗泽为副元帅，要他迅速召集河北兵马，回开封救急。当时开封已被粘罕军包围。宋招募了不怕死的秦仔等4人，出开封府到相州，从头顶上的头发中取出宋钦宗给赵构的诏令。十二月初一，得到密令的赵构在相州开设大元帅府，有兵1万，分前、后、左、中、右五军。赵构与宋徽宗、宋钦宗一样，是不想与金对抗的贪生怕死之辈。成立大元帅府后，赵构实在怕金将目标集中到他身上，将他消灭。他和汪伯彦知道在相州不安全，便密谋逃往大名府(河北大名)。十二月十四日，赵构在相州建大元帅府不到半月，便以回开封求援为名，瞒过众军士，从相州逃出，经过临漳(今属河北)逃往大名府。大名府在相州东。赵构离开封反而越来越远。赵构逃离相州后11天，金兵便包围了相州。赵构到达大名后，宗泽等宋军纷纷赶来大名，要求抗金救援京师开封。汪伯彦却只想当高官，不想上前线卖命。宗泽和汪伯彦就西援开封与否曾激烈辩论。最后汪伯彦同赵构又一次密谋，由宗泽领兵10000去抗金。赵构及汪伯彦等再一次逃跑，先东逃到东平(今属山东)，还觉得不安全，又南逃到济州(山东巨野)。

靖康元年十二月下旬，老将宗泽带领10000宋

军，从大名出发，向开封方向前进，到达开德府（河南濮阳），与金兵大小 13 战，每战皆胜。宗泽认为金兵不难打败，便写信给赵构，希望他汇集宋军，到京城与金决战。然而康王哪里会听。宗泽在黄河南北与金孤军奋战，已无补于腐败无能的北宋王朝之大局。靖康二年四月，金将宋徽宗、钦宗父子俘虏北去，宋朝名义上已经灭亡。金立张邦昌为大楚皇帝。张邦昌（1081—1127）河北东光人，字子能。宋钦宗即位后任太宰兼门下侍郎，曾以宰相身分，与赵构一同到金营作为人质。张邦昌为伪楚帝后，遭广大军民的唾弃与反对，他自知好梦不长，被迫退位，由孟太后垂帘听政，并派人把御玺送到济州，让唯一在外的赵氏皇族赵构当皇帝。伪楚仅存在 32 天。四月二十一日，赵构在大批宋军的护送下，从济州出发，五月初一到达应天府（河南商丘），在应天府即帝位，改元建炎，是为宋高宗。旧史称宋高宗在应天府重建宋朝政权为建炎中兴。

宋高宗于建炎元年（1127）五月即帝位后，迫于形势与众望，任用李纲为宰相。李纲于六月赶到应天府上任后，立即着手整顿政治军事，做抗金准备，任命主战派张所为河北宣抚使，傅亮为河东经制副使，以期收复河北、河东（山西）失地，并鼓励民间结社抗金。宗泽知开封府，修复开封防御体系，组建抗金义军。一时间确有“中兴”之势。然而好景不长，黄潜善、汪伯彦极力反对李纲的抗金措施，甚至主张宋高宗逃跑东南。宋高宗不听忠言听谗言，将当了两个多月宰相的李纲罢免，“中兴”半途而废。之后，宋高宗对金消极抵抗，一退再退，一直退到临安（浙江杭州），史称南宋。　　（顾全芳）

八字军抗金

南宋初年太行山民众的抗金斗争。

金军南下烧抢虏掠，中原人民深受其害。金兵“杀人如割麻”，引起黄河北岸的百姓极度不满，纷纷拿起武器，奔向抗金战场。王彦领导的八字军，就是南宋初年最强大的太行山抗金义军。

王彦（1090—1139），字子才，隆德府上党（山西长治）人。原是北宋军校，曾两次随种师道出战西夏。建炎元年（1127），金兵南下，王彦只身离家，到京都东京（河南开封），主动要求抗金。河北招抚使张所为其所动，任命为都统制，率领岳飞等 11 位将校，以及 7 千宋军，渡过黄河，抗击金兵。王彦率军渡河后，前后两次打败金兵，于九月二十一日收复卫州新乡县（河南新乡）。金调集重兵数万，包围宋军，进行反扑。王彦寡不敌众，激战后于十月二十九日突围。突围后且战且退，退至卫州共城（河南辉县）西山。时，宋军仅余 700 余。金人悬赏捉拿王彦。王彦为免暗算，“夜寝屡迁”。700 余士卒得知后，一致表示，愿随王彦抗金到底，决无二心。为表抗金决心，每人脸上刺“赤心报国，誓杀金贼”八字。王彦深受感动，决定与士卒共赴国难，抗金杀贼。民间抗金组织八字军成立。

王彦在西山树起抗金义旗后，太行山区的民众纷纷响应。傅选、孟德、刘泽、焦文通等率各地义军，与王彦联络，表示愿受王彦领导指挥。八字军威声大振，众至 10 余万，势力扩展到山西地区，“绵亘数百里，金鼓之声相闻”，成为北方民众抗金的主力。八字军以太行山为根据地，经常袭击金兵，救回被金兵虏掠的百姓，深受民众爱戴。金兵决心消灭严重威胁自己后方的八字军，于十一月九日大举进犯西山，王彦率众与金兵苦战。金兵断八字军粮道，将西山包围。王彦派人求援于各路义军。义军闻讯后赶来解围，击退金兵。击退金兵后，王彦在西山加强训练，准备与金兵血战。之后，八字军曾与金兵大战于太行山，“夜破金人赵固寨（河南辉县西南）”，八字军声威益增，迅速壮大。

建炎二年春，声势浩大的八字军计划西攻太原和大同，力图将金兵赶出河东（今山西省）。王彦派人到东京留守宗泽处，将计划告诉宗泽，希望得到配合。抗金名将宗泽认为八字军虽人多势众，但孤军深入河东，非为上策。宗泽希望王彦亲来东京，共商抗金大计。王彦得知后，率八字军万余人，浩浩荡荡向东京进发。金军尾随其后，却不敢与八字军战。五月二十日，王彦与宗泽相见于开封府。宗泽十分高兴，握着王彦的手，称道王彦八字军“力战河朔”，“忠勇无双”。宗泽希望王彦及万余八字军留在东京，共同抗金。宗泽主张王彦亲自到扬州（江苏扬州），劝告逃到那里的宋高宗北上抗金，恢复中原。王彦带少数亲兵，于九月一日赶到扬州。时，宋高宗已派人向金兵议和，不接见王彦。王彦向黄潜善、汪伯彦力陈河北、河南义军声势，希望宋高宗回首大举北伐，恢复宋业。宰相黄、汪根本不主张抗金，对“言辞愤激”的王彦建议置之不理。王彦无奈，称病于真州（江苏仪征）。从此，留在开封的八字军改作南宋官军，继续与金兵转战。太行山的八字军，则仍抗金到底。王彦后以南宋将领之职，与金抗战多年，直到 49 岁时去世。

（顾全芳）

五马山义兵

建炎二年(1128),马扩领导两河义民的抗金斗争。

北宋灭亡以后,宋朝统治者逃到南方,不思收复故土。但广大北方人民不堪忍受金人的掠夺和压迫,纷纷组织起抗金队伍,利用山区有利地形结寨屯聚,坚持斗争,成为当时抗金的主要力量。活跃在今河北赞皇县境内的五马山忠义民兵便是其中较大的一支。

五马山义兵首领为原宋保州路廉访使马扩(? —1152,甘肃临洮人)。他是宋朝早期派往金朝的使节马政的儿子,曾随父一同赴金,因精于射箭,为金军大将宗翰所钦佩。金军侵宋战争开始后,他到真定(河北正定)一带招募士兵,与地方官产生矛盾,被囚禁起来。真定失守,他趁机从监狱中跑出来,上山组织百姓抗战,后来战败被俘。金军大将宗望劝他说:"你又不是南朝宰相或大将,何苦这样?我国家内除两府外,你可以自己拣个好官做。"马扩严词拒绝,说:"我宁死,不受好官。"宗望想软化他,准许他开酒店过活。马扩借此机会结交过往豪杰,暗地里与五马山首领赵邦杰通消息。宋建炎二年(1128)初,终于上山,被推举为首领。此时传说宋高宗赵构的弟弟信王赵榛流落在民间,隐名埋姓靠为人点茶为生。马扩为了扩大影响和号召力,将他迎上山来,请他总制诸山寨。两河义民闻讯,欢喜异常,愿意听从他指挥抗金的有十余万人。

不久,马扩带着赵榛的书信南下,到扬州去见宋高宗,请求给予河东河北兵马元帅印信,以便进一步发动敌后抗金斗争。但南宋朝廷非常仇视义军,更惧怕赵榛团结北方抗金武装,与宋高宗分庭抗礼。所以只是口头上封为河外兵马都元帅,答应发援兵,给兵器。暗地里却派人监视马扩的一举一动。马扩北上后,朝廷竟自食其言,将原来的许诺完全取消。是年五月,风传赵榛将渡河到故宋东京主持抗金活动,南宋朝廷极为慌恐,下令严禁赵榛部下渡河。就在宋高宗千方百计破坏抗金斗争的时候,金人却很害怕马扩引援兵北上,与五马山义兵会合,遂派大兵围攻五马山山寨。秋天,山寨守兵因水源被切断,支撑不住而失败,赵榛下落不明。不久,马扩亦因势孤力单,兵败南退了。　　(刘　庆)

宗泽之死

靖康元年(1126)冬,金兵大举南犯,宋京都东京(河南开封)危急。宋钦宗派康王赵构到金营求和,十一月二十日到达磁州(河北磁县)。磁州知州宗泽反对割地求和,劝阻赵构前往金营。在此之前,宗泽已在磁州"治器械,募义勇",做好抗金准备。金兵攻磁州城时,宗泽登城指挥射杀金兵,"开门纵击,斩首数百级",成为抗金勇将。宗泽(1060—1128),字汝霖,浙江义乌人;进士出身,历任县令、通判等职。宗泽劝阻赵构向金求和后,赵构于十二月初奉旨在相州(河南安阳)成立元帅府,准备起兵勤王。宗泽被任命为副元帅。宗泽带兵从磁州赶到相州,建议康王赵构迅即出兵解京城之围。贪生怕死的赵构却向东逃跑,先到大名府(河北大名),又逃到东平府(山东东平)。宗泽率2000宋军抢占黄河渡口李固镇,打败金兵,破金30多寨,渡河赶到大名,力劝赵构向开封进发。赵构让宗泽带兵万人,分前后左中右五军救援首都。十二月下旬,宗泽进军开德府(河南濮阳),与金兵连续作战13次,每战皆捷。岳飞在宗泽军中显露头角,屡建战功。在开德,宗泽曾联络各地宋将,共同进军东京,未得结果。宗泽孤军向卫南(河南滑县东)挺进,被金优势兵力所围。宗泽下令"死中求生",决一死战,结果以少胜多,又追奔袭击,杀敌数千。

靖康二年(1127)四月初,金兵俘获宋徽宗、宋钦宗离东京北撤。宗泽救援东京未成,便回军大名,准备狙击金军归路,救出徽、钦二帝,终因势单力薄而未成。五月初,赵构从济州(山东巨野)回应天府(河南商丘)即帝位(宋高宗)。宗泽赴应天府,与李纲一起见高宗,表示要抗金到底。李纲赏识宗泽,不顾黄潜善等人的刁难排挤,推荐宗泽任东京留守。

建炎元年(1127)六月,宗泽到达东京。昔日繁华热闹的京都,战乱后是一片破败景象,"盗贼纵横,人情恟惧"。到开封后,宗泽整顿秩序,重修防御并"募义士守京城"。九月,宗泽从游家渡渡过黄河,到河北各地巡视抗金情势,"约诸将共议事宜",协调战备。山西、河北各地的抗金力量,都与宗泽有联系。此后,王善、杨进、王再兴、李贵等领导的近百万义军,都接受宗泽领导指挥。宗泽实际上成为南宋初年全国抗金的核心人物。从河北返回开封后,宗泽又上书宋高宗,反对迁都逃跑,要求宋高宗到东京抗金。宋高宗不听,南逃扬州(江苏扬州)。

建炎元年十一月中旬,金兵兵分三路,从山东、山西、陕西、河北大举南下,先后攻陷各地州县。宗泽坐镇开封,沉着指挥全国的抗金战争。他派岳飞到孟州(河南孟县)汜水关,胜利地狙击了金兵。金兵在建炎二年正、二月两次攻打开封,李纲指挥宋军与金兵

展开激战。四月,金兵在李纲指挥的各地军民打击下,先后撤退。宗泽又与义军王彦等制定了大规模的北伐计划,并正在付诸实施。然而,宋高宗与黄潜善等决不允许宗泽北伐。宗泽忧愤交加,"疽发于背",一病不起。在病中,宗泽喊出了杜甫的诗句:"出师未捷身先死,长使英雄泪满襟!"

建炎二年七月一日,口中喃喃"过河,过河"的宗泽与世长辞,享年69岁。 (顾全芳)

苗刘兵变

建炎三年(1129)兵逼宋高宗退位事件。

建炎三年正月,金军攻占东平、济南、徐州后,直指扬州,企图消灭宋朝。二月初三,宋高宗仓皇逃离扬州,经镇江、常州、吴江、秀州(浙江嘉兴),于二月十三日抵达杭州。宋王朝不战而逃,引起公愤。宋高宗迫于舆论,于二月二十日在杭州罢去逃跑求和的宰相黄潜善、汪伯彦之职。三月初一、初二,接连任命王渊主管军事,朱胜非为宰相。王渊系高宗亲信,在这次大逃退中负有重要罪责。王渊有责反而高升,军民不满。在杭州的扈从统制苗傅,串通御营右军副都统制刘正彦,利用军民对宋高宗、王渊的不满情绪兵变。

三月初五,苗、刘率领各自掌握的精兵数千人,设伏擒杀了王渊,包围了行宫,胁迫宋高宗退位,要求传位给皇子赵旉,由隆祐太后垂帘听政。宋高宗无奈,只得当众宣布"禅位于皇子,请太后同听政",自己同时退位。宣布后,苗、刘兵撤行宫。隆祐太后听政,改建炎三年为明受元年。史称苗刘之变或明受之变。

宋高宗退位,隆祐太后听政后,实权掌于苗傅、刘正彦之手。苗、刘同样不主张抗金,失去军民拥护。在杭州外地的文臣吕颐浩、张浚、武将韩世忠、刘光世、张俊等秘密串联,决定以武力兵围杭州,杀死苗、刘,恢复宋高宗帝位。首由张俊领兵8000,到平江(江苏苏州)会见张浚,密议举兵。张浚随即联络吕颐浩、刘光世。吕颐浩率兵万人,自江宁至丹阳(江苏丹阳)与刘光世兵会合后起兵勤王。韩世忠则自盐城(江苏盐城)至平江,与张浚会合,领兵向杭州进发。苗傅、刘正彦眼看兵临城下,被迫同意复宋高宗帝位。四月初一,宋高宗正式复位,隆祐太后撤帘,复用建炎年号。从退位到复位,前后仅25天。韩世忠领兵到杭州后,领兵追捕苗、刘。刘正彦在福建浦城、苗傅在浦城之南的建阳被活捉。当年六月初六,苗、刘在建康(江苏南京)被处以极刑。苗刘兵变彻底破产。

(顾全芳)

钟相、杨幺起义

南宋初年洞庭湖地区大规模的农民起义。

南宋初,民族矛盾与阶级矛盾尖锐激烈。金兵所到之处,烧杀抢掠,南方人民灾难深重,两湖地区也遭金兵屠杀抢劫。南宋政权则以对金战争为由,扩大对民众的剥削,湖南、湖北民众负担各种苛捐杂税,迫使农民卖儿卖女,仍不得温饱。两湖地区民众还受宋官军及土匪的抢掠,更使百姓处于水深火热之中。广大农民忍无可忍,终于在建炎四年(1130)春爆发了钟相领导的大规模农民起义。

钟相,鼎州武陵(湖南常德)人。北宋末年,钟相就以民间结社的形式,进行长期的组织宣传活动。他提出了"法分贵贱贫富,非善法也。我行法,当等贵贱,均贫富"的口号和思想。这就不但对封建法律秩序提出疑问,而且发展了宋初王小波起义时提出的"均贫富"口号。

钟相的组织宣传活动,得到洞庭湖地区贫苦民众的热烈响应,使钟相组织了庞大的农民队伍,储备了不少钱物,为武装起义做好了准备。建炎四年二月,土匪孔彦周的部伍到澧州(湖南澧县)杀人放火,与此同时,金兵已经占领潭州(湖南长沙),威胁鼎州。钟相审时度势,认识到宋官军既无力剿匪,更不去抗金,只有举行农民起义,才能救民众于危难之中。二月十七日,钟相以抵御土匪相号召,在家乡唐丰乡水连村举起了义旗。洞庭湖周围的数十万农民闻风而动,响应起义。二月二十一日,钟相建立农民政权,国号楚,改元天载,自为楚王。二月二十六日,起义军攻下桃源,二十八日打下澧州。农民军实际上控制了武陵、桃源、龙阳、澧阳、安乡、石门、慈利、枝江、松滋、公安、石首、益阳、宁乡、湘阴、安化、宜都、华容等十九个县的广大地区。

声势浩大的钟相农民起义,引起宋政府注意。南宋派官兵前往镇压,并任命孔彦周为湖北捉杀使,去与农民军为敌。起义军在澧州药山平重创孔彦周土匪。三月一日,孔彦周逃到鼎州。起义军包围鼎州,孔彦周黔驴技穷,一面以奸细打入起义军,一面放风说准备逃出鼎州。钟相受骗,以为孔彦周别无他图。岂料孔彦周突然从鼎州偷袭钟相水连村大本营。钟相突围水连村后被俘,在湖南攸县被害。同时遭害的,有钟相妻儿及其他起义军将领。

钟相牺牲,起义军受到挫折,却没有被彻底打

败。洞庭西南的龙阳县，成为新的农民起义中心。原来就参加起义的杨幺（原名杨太），继续高举钟相起义大旗，立钟相幼子钟子义为"太子"。杨幺农民军占领了鼎州，打败了宋鼎澧镇抚使兼鼎州知州程昌寓，程昌寓逃脱。起义军与宋官军及地主武装势不两立，形成对峙。杨幺利用洞庭湖湖港交错的条件，建立了许多水寨，成为农民军的根据地。同时，起义军又建造了不少战船，在湖中成立了水军。杨幺农民军在洞庭湖周围"占据"田主的土地，或者"虽不占据，而令田主出纳租课"。同时，农民军无视宋官方的政策法令，根本不向官方交税。杨幺自称"大圣天王"，连南宋皇帝也不放在眼里。他们决心要与宋军抗衡，推翻南宋腐朽统治。

绍兴元年(1131)，程昌寓建造了两艘车船，其速度很快，但吃水浅，易搁浅。程昌寓以为可以凭借车船，打败农民军，立即将两艘车船开往夏诚的水寨。不料车船在芷江搁浅，成为起义军的战利品。杨幺起义军不断扩大，形成几万人的浩荡大军。程昌寓无计可施。绍兴三年六月，南宋政府认为不镇压掉杨幺起义，则"无以立国"，任命王𤫉为制置使，统一指挥5万余官军，围剿起义军。王军在荆湖烧抢剽掠，使民众对王极为反感，加上程昌寓不同王合作，使王在鼎口水战中受伤战败，又在阳武口使万余名官军全军覆没。

绍兴五年三月，岳飞奉命前往镇压杨幺起义。岳飞改变以强攻为主的策略，采取长期围困，断其粮草，诱降义军，使起义军自相残杀的方针。这种方针，比强攻更恶毒。义军黄佐首降岳飞，岳飞派其反攻义军水寨，义军损失惨重。五月，官军进攻永安寨，起义军又受损失，杨幺居住、指挥的大寨被官军逼近。六月初，起义军勇将杨钦率万余人投降了岳飞，使义军处于危急之中。杨钦又向岳飞献计说，用青草撒于湖面，起义军车船便难以行驶。岳飞照计行事，并派人挑战。杨幺、钟子义等率军与战，果然中计，战船无法进退。杨幺跳水后被捉，不屈献身。钟相、杨幺起义失败。 （顾全芳）

黄天荡之战

建炎四年(1129)，韩世忠在长江中打败金兀术的重要战役。

建炎三年正月，金兵由山东长驱南下，占领扬州。宋高宗从扬州逃到杭州。十一月二十一日，金将兀术由归德（河南商丘）率金兵至建康（江苏南京），在马家渡渡过长江天险，直指杭州，企图消灭宋朝，统一江南。金军由建康经溧水南下，十二月初七占领广德军（安徽广德），十二月十日打到杭州。宋高宗听说金军渡过长江直指杭州，便于十一月二十五日逃离杭州，经越州（浙江绍兴）、明州（宁波），于十二月十九日逃到定海（浙江镇海）。兀术占领杭州后，得知宋高宗已逃跑，便派兵追捕。金兵追到明州，发现宋高宗已从定海渡海逃到昌国（浙江舟山岛定海），赶紧乘船追到昌国，差一天活捉宋高宗。宋高宗于一天前由昌国乘船沿海南逃，一直逃到温州。金军在昌国海域遇到大风雨，又遭宋船阻击，只得退还明州，向兀术报告金军"搜山检海已毕"。

金军占领两浙杭州等地后，已成强弩之末，疲惫不堪，加上在江、浙的宋军并未被消灭，反而有积极活动、包抄其后路的态势。金兵将面临陷入前后夹击的绝境之危，便决定离杭北归。建炎四年二月十三日，兀术在劫掠大批金银财宝、焚烧杭州后，撤军沿运河北上。二月十八日到秀州（浙江嘉兴），二十五日到平江（江苏苏州），三月十日到常州，很快到达长江南岸的镇江，企图立即渡江北撤。

早在金军在马家渡渡过长江向杭州进军之时，浙西制置使韩世忠在镇江将所有军需物资装船运到江阴，并且日夜修造战船，布于长江之中。韩世忠还将所率8千余宋军，部署江防。建炎四年正月初，韩世忠就着手"往镇江邀敌归师，尽死一战"。三月中旬，金军果然乘船到了镇江，落入韩世忠的防区，韩世忠立即布置截击。韩世忠一方面在镇江金山寺设伏兵，一方面在附近长江中排船。宋金两军在水陆两地激战。韩世忠夫人梁红玉亲自击鼓助战。韩世忠则指挥战船夹袭金船。金军在迎战数十回合后败北，兀术几乎被活捉。兀术见金军被阻于镇江，被迫向韩世忠求和，派人向韩世忠说，只要放金军渡过长江，兀术愿意留下劫掠来的所有金银财宝，外加人口马匹。韩世忠回答说：想过长江不难，只需归还被你们占领的全部领土，放回被你们俘去的两位皇帝。兀术无奈，只得向驻淮东的金军求援。

10万金军被8000韩世忠军截困于镇江长江之中，不能渡江，使兀术焦虑无状。兀术不得不沿长江南岸，向西游动，企图到建康登岸北上。韩世忠见金船在江中向西开去，便将战船列于长江北岸，与金船相对而驶，以防金船靠近长江北岸登陆而去。两军在长江中相持并行至建康东北数十里的黄天荡。金船开入黄天荡内。黄天荡虽属长江，但进入荡内后，无路进退。韩世忠见金船驶进黄天荡，用船队堵住出口处。金船在黄天荡内多次突围，均被宋军打败。金军

被围40多天。最后，兀术只得挖河开渠，偷逃出荡。第二天，韩世忠得知金军逃离黄天荡，向建康驶去，赶紧开船追击。追到建康，几经交战，金军仍难靠近北岸。兀术悬赏求破宋船之术。有人献计，在金船中载土以使船平稳，并改桨以加快船速，待到风平浪静之日，再与宋军交战。四月二十五日，金驶小船，用火箭向宋船火攻。宋船大，无风难驶，被焚烧者不少，被迫退兵。五月十一日，金兵"焚掠建康"后"渡江而去"。

黄天荡之战是宋金战争史上的重要战役，宋军以少胜多，鼓舞了宋军士气，迫使金军退出江南，为南宋求得暂时的安宁。　（顾全芳）

范汝为起义

建炎、绍兴年间东南地区范汝为领导的农民起义。

南宋朝廷偏隅江南后，对外消极抗金，对江南农民却加紧搜括剥削。附加税、新增赋税及各种名目的苛捐杂税，加上各种劳役，都压在百姓头上，使农民负担比北宋时更为沉重。土地兼并及地主豪强对农民的压榨，使广大农民过着"半偿私债半官租"的生活。贪官污吏的鱼肉百姓造成了官逼民反的局面，东南各地农民起义"几半天下"。自钟相、杨幺建炎四年(1130)在湖南举起起义大旗后，虔州(江西赣州)群众因不满宋官军的烧抢虏掠，也在建炎四年爆发了数万人的武装起义。在吉州(江西吉安)，农民起义的规模更大，占领了不少县城。江西地区的农民起义此起彼伏，延续了多年。

与江西相邻的福建，也是农民起义的多发地带。除了南宋对农民的欺压外，福建百姓还深受战乱之苦。南宋的军队在福建相互火并，烧房屋，抢粮食，逼得农民只得逃亡或起而反抗。其中较大规模的农民起义，是范汝为领导的建阳(今属福建)起义。范汝为，建州(福建建瓯)人。粗有文化。其父原为有数百人的武装走私贩盐集团首领，后被官方逮捕死于狱中。范汝为继承父业，成为新首领。建炎四年七月，范汝为率领盐贩，举起了反抗官府的旗帜。范汝为在建阳(今属福建)起义后，几万饥民、贩盐的贫困农民立即响应。韩珉曾派州兵与起义军对抗，很快被起义军打败。十一月，声势浩大的起义军在打败官军后，占领了建州。宋朝廷对范汝为起义采用了两手策略："招抚"和"以大兵临之"。十二月，辛企宗领军到邵武军(福建邵武)，派官军前往镇压起义，被起义军打败。辛企宗等先派一位教书先生去说服范汝为投降，结果反被范汝为说服。后又再次派人去招安，并且提出了优厚的条件：范汝为等首领可以当宋朝官，可以保存其部队，还可以继续留在本地。这一次，范汝为在威胁利诱下，接受了招安。范汝为之所以投降，是他"慕得官，且惧大军至"，也就是既要当官，又怕被官军消灭。接受招安后，范汝为被授予武翼郎阁门祗候、民兵都统领，其部下叶铁被授以忠翊郎。范汝为保持了对原起义部队的领导。绍兴元年(1131)正月，宋枢密院向宋高宗上奏说，范汝为应当归辛企宗领导。宋高宗认为"福建僻陋，盗贼(农民起义)踵起"，是因为当地官吏不知民间疾苦，不同意枢密院的建议。

绍兴元年十月十九日，范汝为在建安(福建建瓯东)"制黄红伞"后，再度叛宋起义，宋州县官吏闻风而逃，起义军很快占领建州。月底，农民军攻进邵武军，起义进入高潮，农民军有十多万人，超过了当地官军。福建北部的剑州(南平)、汀州(长汀)等广大地区的贫民闻风而动，响应范汝为起义。农民们烧毁地主住宅，夺回田地，甚至要地主向农民军交钱纳粮。宋高宗深怕范汝为攻进福州，"则全闽皆贼(农民起义)有"，因而改变态度，主张镇压，反对招安，明令凡捉拿到范汝为者，有重赏。宋高宗派参政知事孟庚、抗金名将韩世忠带官军去镇压起义。十一月二十五日，韩世忠带兵从福州出发，向建州进军。范汝为在建州听到消息，知道自己降而复叛，除了抵抗，别无他路。他不想再受招安，而是在建州百里之外"伐木埋竹"，"布铁蒺藜，开陷马井，以扼诸要路"，阻止宋官军前来建州。韩世忠抗金很坚决，镇压农民起义也不含糊，他巧妙地不走起义军有防范的要道，而是悄悄地从小路走凤凰山，于十二月底到达建州城外，包围了建州城。韩世忠用火炮等先进武器攻城，起义军坚守了六天六夜，牺牲1万多人，城才被攻破。范汝为从城中逃出后自杀身亡，时为绍兴二年正月。范汝为起义失败。　（顾全芳）

伪齐的建立

宋建炎四年(1130，金天会八年)金立刘豫为帝，国号齐，史称伪齐。

南宋建炎年间，金虽占领中原及西北地区，但河东(山西)、河北、山东、河南、陕西各地人民的抗金斗争却此起彼伏，给金在中原的统治以很大威胁。金军虽曾打过长江，宋高宗曾逃到海上，但终未能消灭南宋，金军在北撤时，屡遭宋军袭击。金挞懒等统治者为巩固在中原地区的统治，遂改变对中原地区的策

略，提出了"以僭逆诱叛党"的政策，也就是扶植汉人建立傀儡政权，以汉人统治汉人，以汉人打汉人的恶毒用心和政策。经过多方物色，金最后选中了刘豫作为其傀儡。

刘豫(1073—1146)，字彦游，河北阜城人。原为宋河北提刑。金兵南下，曾弃官私逃至仪真(今属江苏)。建炎二年，隐瞒了这段历史的刘豫，经人推荐，到济南府(今属山东)任知府。当年年末，金人打下东平府(今属山东)后攻济南府。刘豫派其子刘麟出战，结果陷入重围。金派人至刘豫处，以威胁利诱的手段，说服了软骨头刘豫。刘豫设法杀害了济南骁将关胜后，率领百姓投降金兵。老百姓不愿投降，刘豫便从济南城墙上顺索而下，逃到金营。建炎三年三月，金打下山东各地后，让刘豫为金东平府知府，其子刘麟知济南府，实行傀儡统治。金兀术同时还命刘豫为金京东、京西及淮南等路的安抚使，意在让刘豫组织汉人军队，进攻南宋。

建炎四年夏，金太宗倾向挞懒的立汉人伪政权的主张，对粘罕说，打败宋以后，可以立像张邦昌那样的人作傀儡皇帝。刘豫得知这个消息后，用重金贿赂挞懒，要求挞懒帮助立自己为帝。挞懒答应，并与粘罕商量，粘罕当面表示反对，背地里却抢先立刘豫。一切准备工作就绪后，于七月二十七日演出了金立刘豫为"大齐皇帝"的闹剧，国号齐，定都大名(今属河北)，改元为阜昌，以在太原被俘的张纯孝为丞相，其弟刘益为北京留守，子刘麟为提领诸路兵马兼济南知府，其母翟氏为皇太后，妾钱氏为皇后。刘豫被金册封为帝后，死心塌地为金效忠。有人曾劝刘豫叛金归宋，刘豫将他囚禁。伪齐建立后，管辖京东、京西等黄河以南地区，不久，金将陕西也交伪齐统治。之后，刘豫又迁到开封(今属河南)定"都"。伪齐的建立，尤其是搜罗了数以十万计的士兵，成立伪军，对宋造成很大威胁，并使金兵可以更有力地控制黄河流域，镇压反金斗争。伪齐政权在统治区对百姓实行残暴统治，严刑酷罚，横征暴敛，使中原民众雪上加霜，苦不堪言。

南宋对伪齐的建立，忧心忡忡，不得已只得采取对抗态度。绍兴二年春，宋令翟兴等进攻伪齐，以图收复失地。翟兴进据伊阳山寨(河南嵩县西南)，成为伪齐的最大威胁。刘豫收买了翟兴部下杨伟，将翟兴暗杀。杨伟将翟兴首级献刘豫以求荣。翟兴之子翟琮继承父业，誓与伪齐不两立，联合李横等再次进攻伪齐，伪齐的牛皋(后为岳飞部将)等纷纷叛齐起义。绍兴三年初，李横、牛皋等收复了伪齐统治的汝州(河南临汝)、颍昌府(河南许昌)、信阳军(河南信阳)、唐州(河南唐河)等地；翟琮攻下洛阳(今属河南)等地。李横、翟琮分路向开封进逼，以图消灭伪齐。刘豫自身难保，求救于其主子金廷，金派兀术来援。金兵加上李成的2万伪齐军，在开封西北的牟驼冈与宋军会战。宋军被金骑兵所败。从此，宋军接连败退，不但原来收复的地区又被伪齐所占，而且伪齐攻占了要地襄阳(湖北襄樊)、郢州(湖北钟祥)等地，深入湖北，宋长江防线紧张。

绍兴四年五月，岳飞率岳家军第一次北伐伪齐，势如破竹，攻下伪齐占领的郢州、襄阳、信阳军、邓州(今属河南)及唐州。九月，伪齐与金兵联合，避开岳家军驻防的湖北地区，从东南向宋进攻，企图直逼临安(浙江杭州)，消灭南宋。刘豫之子刘麟倾伪齐之兵，渡过淮河，直逼长江。刘麟在庐州(安徽合肥)被牛皋等驰援而来的岳家军打败，其它金兵亦为韩世忠所挫，狼狈北逃。

绍兴六年正月，宋朝决定岳飞、韩世忠等再次北伐伪齐。韩世忠在淮阳军(江苏邳县南)受挫，岳飞却第二次、第三次北伐襄汉大获全胜。刘豫孤注一掷，于九月发伪齐兵20万，再次进攻淮西地区，结果多被宋军打败。金见刘豫作战不力，加上刘豫的直接后台粘罕已死，挞懒和兀术等对伪齐失去兴趣，决心搞掉刘豫。绍兴七年(1137)十一月十八日，挞懒与兀术奉命至开封，伪称要与刘豫商讨共同伐宋，派人将刘麟叫到开封城外。刘麟带200骑兵赶来，被兀术的骑兵活捉。兀术进城找到刘豫，将其囚禁于城内金明池，宣布废除伪齐及刘豫。刘豫还在向挞懒、兀术乞求。挞懒说："今汝废，无一人怜者，汝何不自责也。"这个摇尾乞怜的丧家犬，被遣送到临潢(内蒙古巴林左旗)，仅有七年半的伪齐傀儡政权不复存在。

(顾全芳)

富平会战

宋金于建炎四年(1130，金天会八年)在陕西富平大规模会战。

宋金长期争夺的地区之一，是四川、陕西，尤其是陕西具有重要的战略地位。宋控制陕西，可以确保四川及西北的安全。金得陕西，可直入四川和中原。建炎三年五月，金在东南战场受挫后北撤。七月，金立刘豫为伪齐傀儡皇帝，黄淮地区战事稍缓。金为扩大在西北地区的控制权，想把战场移向西北。宋为减轻金对东南的压力，也想在西北增加兵力甚至发动攻势。建炎三年五月，宋高宗曾问张浚如何抗金中

兴，张浚回答说：中兴应当从关中、陕西着手。如果金先占陕入蜀，“则东南不可保”。张浚表示愿到陕西去。宋高宗赞成张浚的看法，任命张浚为川陕宣抚处置使，并且可以“便宜黜陟”，有权决定将士的升降处理。张浚受命后，于十月兵屯兴元（陕西汉中）。张浚上奏宋高宗说，这里（汉中）是战略要地，既可指挥西北各地的宋军，又可以向四川、陕西、荆襄（湖北）筹粮买马，更可以进退中原。他在兴元筹粮备战，以图与金争战西北。

建炎三年十二月，娄室率金兵攻陕州（河南陕县），张浚令李彦仙死守。陕州城军民坚守，前后数百战，妇女亦上房顶用瓦块杀敌，李彦仙重伤殉国。建炎四年正月，金军陷陕州后，进军潼关（今属陕西）。张浚新任命的曲端、吴玠奉命去守潼关。四月，吴玠在潼关勇挫金兵，由于曲端违约不援吴玠，宋军被打败。金兵由潼关进入邠州（陕西彬县），火烧邠州城后退还河东。时，金兵多在东南，张浚令各地宋军收复失地。八月，吴玠收复长安（陕西西安），赵哲收复鄜、延诸州县（陕西富县、延安一带），“其余州县多迎降”，陕西各地复为南宋所有。

金兀术在六合（今属江苏）听到南宋调集军队在陕西收复各地，立即将在黄淮地区的金兵紧急西调。娄室也从河东复往陕西。宋、金在陕西大战无可避免。张浚得知兀术精兵向陕西奔来，决定集中熙河、秦凤、泾原、环庆四路（行政建制，相当于省）驻扎的宋军，加上吴玠人马，共步兵 12 万，骑兵 6 万，向富平（今属陕西）调动，以期在此与金会战。吴玠等认为金兵势盛，宜各守要害，待金兵松懈，寻机与战。张浚不听。他派刘锡到富平前线指挥，自己则坐镇邠州。战前，宋将士请求偷袭金兵，轻敌自负的张浚也不听。待到宋、金两军在富平对峙，宋多次向金下战书“约日会战”，金统帅讹里朵与兀术不予理睬，以待娄室军至。宋军误认为金兵害怕出战，出榜公布说，谁能活捉娄室，官封节度使，赐金银上万，以激将法诱使金兵出战。娄室自绥德赶到富平后，金才决定与宋会战。金也出榜公布说：谁能活捉张浚，“赐驴一头，布一匹”，以示对其侮辱。张浚不知是计，反而更为轻敌，又约金决战。金同意。但到会战之时，金又故意兵不出营，张浚更误认为是金胆小怕战。直到九月二十三日，金兵侦察清楚宋军虚实，准备工作完成，才与宋军决战。当时，双方十多万兵马在富平布阵血战。大战半天，胜负难分。宋将刘锜曾率军冲进敌阵，包围了兀术，射中其大将韩常眼睛。兀术经过搏斗冲杀，才突围逃脱。可惜宋将赵哲之军遭娄室军铁骑冲击，其他宋军难以支援，赵哲临阵逃跑，其军溃散。其它宋军知赵哲军散，也兵败如山倒。富平会战以宋军大溃退而结束。十一月，金兵入德顺军（陕西隆德），张浚则带领千名亲兵，从邠州退守兴州（陕西略阳）。第二年，金兵迫近兴州，张浚一退再退。金兵重新占领了关陕各地。

富平会战系宋对金集中兵力大规模作战，迫使金兵从东南调往西北，减轻了对南宋朝廷的压力。但会战失败，西北各地沦陷，使南宋在西北、四川长期处于劣势、守势，对南宋的抗金极为不利。

（顾全芳）

吴玠抗金

绍兴年间宋名将吴玠的抗金业绩。

建炎四年（1130）九月，宋金富平之战以宋败北而告终，西北地区几乎全为金所占领，并有进犯四川之势。宋西北战场敌强我弱，苦撑西北战场、阻挡金兵入川的主要将领，是吴玠。

吴玠（1093—1139），字晋卿，宋顺德军陇干（甘肃宁静）人。少年从军，喜读史书，通晓兵法。曾参加抗夏守边，屡立战功。富平之战前，在彭原（甘肃镇原东）打败金兵，升为秦凤副总管。富平之战后，吴玠退守和尚原（陕西宝鸡南）。和尚原之大散关，为入川必经之地。吴玠在大散关整军蓄粮，修关立栅，以防金兵入川。

绍兴元年（1131）五月十三日，金两路兵马进犯和尚原，吴玠指挥宋军分头迎战，两路金军都被打败逃退。自此，金以吴玠为眼中钉，必欲拔之。十月二十日，金兀术率重兵数万，自宝鸡集结，往攻和尚原。吴玠令宋军坚守，以强弓利箭，轮番射敌。箭如雨注，金兵稍退。吴玠乘胜出奇兵旁击，断金兵粮道，设伏兵于金退路。金兵至，吴玠“纵兵夜击”。金多骑兵，不善肉搏近战。激战三日，金兵损失上万。兀术也身中二箭，狼狈逃脱。和尚原之战，是宋金战争中少见的宋军大捷，吴玠被擢封为镇西节度使。其弟吴璘因作战有功，升任泾原路副总管。

绍兴三年正月，金军攻陷金州（陕西安康），饶风关（陕西石泉西）告急。吴玠率军自河池（甘肃徽县）一天一夜驰骋 300 里，赶到饶风关。金兵大惊，与吴玠在山上激战。金兵攻山，宋军弓箭乱石齐下。六天六夜，金尸堆积而不退。最后，吴玠退守仙人关（甘肃徽县南）。

仙人关也是入川必经之路。吴玠在仙人关附近设垒曰“杀金坪”，严防金兵。绍兴四年（1134）二月初

七，兀术指挥金及伪齐军约10万人，向仙人关进攻。吴玠以所率万人迎敌。吴璘率宋军由七方关（甘肃康县北）来援。吴璘与金兵转战七天，才到达仙人关与吴玠会合。金分东西两阵攻击，吴玠、吴璘兄弟以死抵抗，激战多时，金攻占仙人关第一隘。宋军退守新修建的第二隘。吴玠下令死守。金兵鱼贯而进，志在必夺。宋军箭如雨发，金兵尸陈于道，仍踏尸而上。第二天，金转攻仙人关西北楼。吴玠命宋军“持长刀大斧，击其左右。夜布火四山，大震鼓随之”。宋军一鼓作气，冲入金营，金兵溃乱，韩常被宋军射中左眼。吴玠又断金退路，金损兵折将。三月初，金残兵退还凤翔，吴玠则乘胜收复秦州（甘肃天水）等地。

吴玠在西北抗击金兵四年余，与金主力多次激战，常常以少胜多，有效地阻止了金军入川，功垂青史。（顾全芳）

耶律大石创建西辽

耶律大石（1087—1143），字重德，契丹族，辽太祖耶律亿（阿保机）的八代孙，西辽王朝的创建者，死后谥德宗。大石“通辽、汉字，善骑射”，辽天祚帝耶律延禧初年考中进士，擢翰林应奉，不久又迁升为翰林承旨。契丹语称翰林为“林牙”，所以大石也被称为“大石林牙”。此后历任泰州和祥州刺史、辽兴军节度使。耶律大石步入仕途之际正值辽末的多事之秋。保大二年（1122，金天辅五年）金军大举进攻辽朝，取中京，下泽州，天祚帝自驾銮泺败走夹山（内蒙古萨拉齐西北大青山）。其子耶律淳留守南京（北京）。耶律大石与宰相李处温和都统奚王萧干（回离保）在南京拥立耶律淳为帝，号天锡皇帝，改元建福，史称北辽。耶律淳称帝三个月后病死，其妻萧德妃立为太后，临朝称制，改元德兴，军政大权实际落入四军（契丹、渤海、奚、汉）大王萧干和太师耶律大石手中。

保大三年，金、宋夹击攻陷南京，北辽发生内部分裂。萧干率奚军退往奚王府（后于保大五年正月建大奚国，自称神圣皇帝，五月为部下所杀）；耶律大石挟萧妃，率契丹军投归天祚帝。天祚帝杀萧妃，赦大石擅立之罪，任其为都统。该年四月，大石率军袭击奉圣州（河北涿鹿）金军时被俘，是年九月率7千人逃回天祚帝行营。天祚帝得到耶律大石带回的军队，后又得到阴山室韦谟葛失的军队，自认为是“天助”，保大四年又谋划出兵收复失地。耶律大石根据当时形势竭力谏阻，主张“养兵待时而动”，遭到天祚帝的拒绝。

天祚帝一意孤行，耶律大石丧失了追随的信心。他杀掉天祚帝的亲信萧乙薛和坡里括，率200骑夜间离开了天祚帝行营，自立为王，设置南、北面官属，决心到西北腹地另建根据地，聚集力量，待机复兴大辽。他们自夹山出发，北行三日过黑水（爱毕哈河，亦称艾卜盖河），得到白达达部详稳床古儿的资助，由此西北行，到达可敦城（辽朝西北招讨司所在地镇州，今蒙古鄂尔浑河上游，哈达桑东北古回鹘城）。在这里召集威武、崇德、会蕃、新、大林、紫河、驼等七个头下军州长官和大黄室韦、敌剌、王纪剌、茶赤剌、也喜、鼻古德、尼剌、达剌乖、达密里、密儿纪、合主、乌古里、阻卜、普速完、唐古、忽母思、奚的、纠尔毕十八部首领大会，号召他们参加复兴大辽的战争，“遂得精兵万余”，战马“数十万匹”，设置官吏，建立起新政权。金天会八年（1130）二月，耶律大石率新集结的军队向西扩张势力，在叶密立（新疆自治区额敏县）修筑城堡，建立根据地，招抚当地突厥语各族，所辖户数达四万户，疆域东起土兀剌河（今土拉河），西至也米里河。金天会十年（1132）二月，耶律大石于此登基称帝，根据当地习惯，号称菊儿汗（亦汉译为葛儿汗），意为“大汗”或“汗中之汗”，群臣又上汉尊号“天祐皇帝”，建元“延庆”，创建起西辽王朝，阿拉伯史家称之为“哈剌契丹”。此后的十年间，耶律大石继续率军东征西讨，先后归并了高昌回鹘王国、东、西喀喇汗国和花剌子模国以及康里部，并移都巴拉沙衮（亦称虎思斡鲁朵，在今中亚托克马克以东），将西辽王朝扩展为东起土拉河，西至咸海，南达阿姆河，北抵叶尼塞河上游的强大帝国。

西辽王朝的建立和发展对中亚乃至世界历史产生了深远的影响。首先，它结束了中亚各国、各民族长期分裂屡起战端的局面。耶律大石及其后继者以儒家思想为指导，对当地人民“轻徭薄赋”；对属国属部“柔远怀来”，“羁縻”，“安抚”；对不同的宗教信仰“循俗”，“宽容”，缓和了当地原来比较紧张的阶级关系、民族关系和宗教关系，建立起稳定的社会秩序。耶律大石也因此受到当地人民的爱戴。穆斯林史家朱兹贾尼称他为“公正的君主”；蒙古国大臣耶律楚材说他“颇尚文教，西域至今思之”。其次，它促进了中亚地区社会经济的发展。耶律大石的西征队伍（包括大批的汉人）把中原地区先进的科学技术带到了中亚，当地人民赞叹“桃花石诸事皆巧”，“桃花石”意指汉人。再次，它广泛地在中亚地区推广了中原文化。耶律大石及其后继者以辽朝的正统自居，以复兴大辽为己任，所以西辽除了在典章制度方面作了些必要的变通外，其文化传统一仍前朝，始终未接受伊

斯兰教，顽强地保持着其固有的汉文化特色。苏联50年代出版的《吉尔吉斯史》曾指出："吉尔吉斯斯坦出现的高度发展的汉文化的新高潮，归功于哈喇契丹。"西辽王朝的建立和发展使作为中国和汉人别名的契丹通过中亚这块中西文化荟萃之地更加广泛地传向了世界。

延庆十二年(1143)耶律大石逝世，其事业由他的子孙继承。至金大安三年(1211)，菊儿汗直鲁古的西辽政权被乃蛮部首领屈出律篡夺。金兴定二年(1218)被屈出律攫取的西辽政权又为成吉思汗的蒙古军所灭。至此由耶律大石创建的威震中亚达90年之久的西辽王朝退出了历史舞台。　(高凯军)

襄阳之战

岳飞于绍兴四年(1134)首次北伐，展开了襄阳之战。

绍兴三年(1133)十月，金兀术会同投降伪齐的李成，攻占了长江以北的襄阳府(湖北襄樊)和郢州(湖北钟祥)。伪齐刘豫企图由此而大举南下，突破宋长江防线，消灭南宋。岳飞得知襄阳沦陷，多次上奏，要求进兵襄阳，粉碎伪齐南下计划。岳飞(1103—1142)，字鹏举，河南相州(安阳)汤阴县永和乡孝悌里人。出身农家，喜武术，通文墨。少时为北宋名臣韩琦后代佃客。20岁参军。靖康元年(1126)参加平定军(山西平定)抗金守卫战，次年随抗金将领转战河南、山东。建炎元年(1127)十二月与金战于汜水关(河南汜水镇西)，获胜。次年，在开封保卫战中"每出必捷"。三年，在江南抗击金兵。四年五月，在建康(江苏南京)与金军激战半月，交锋数十次，杀敌数千，收复建康。

岳飞上奏后，南宋朝廷经过争议，决定出征襄阳。绍兴四年三月十三日，岳飞被任命为湖北路统帅，出兵收复襄阳，阻止刘豫南下。四月十九日岳飞率3万之众，由江州(江西九江)向鄂州(湖北武昌)进发，又从鄂州登岸北上。在长江江中，岳飞壮怀激烈，发誓"不擒贼帅，复旧境，不涉此江"。岳飞进军的第一个目标是郢州(湖北钟祥)。郢州是伪齐侵占的最南端的重镇，由伪齐勇将荆超领兵万员在此驻防。五月五日，岳飞军抵郢州城下。岳飞侦察后，对攻下郢州满怀信心地说，明天上午就可破城。五月六日晨，岳飞指挥攻城，将士踏肩登城，争先而上，经激烈冲杀，城中伪齐7000人被杀，荆超自尽，郢州首战告捷。

郢州打下后，岳飞亲率主力乘胜北上，直指襄阳。李成在襄阳闻岳家军来临，自知凶多吉少，弃城而逃。岳飞不战而得襄阳城。同时，张宪率军从郢州进军随州(今属湖北)，与牛皋联合攻下随州城。在攻城中，16岁的少年岳云首登城头，冲锋在前。岳家军于五月中旬攻占随州，兵屯襄阳，使伪齐坐立不安，急忙调兵遣将，将兵马集结于新野(今属河南)、枣阳(今属湖北)、唐州(河南唐河)及邓州(今属河南)，并求金兵支援，李成也回军。六月上旬，岳飞两败李成，李成退到邓州。邓州还有金、伪齐军数万人。岳飞决定兵分两路，由王贵及张宪分别带兵挺进邓州。王、张在邓州郊外与敌激战，大胜，敌退守邓州城。七月十七日，岳家军攻破邓州。岳云又一次首先登城。七月二十三日，宋军收复唐州及信阳军(河南信阳)。

岳飞出兵收复襄汉地区六州之地，是岳家军首次北伐大捷，也是南宋首次收复大片失地。岳飞被升为节度使。时年仅31周岁。收复襄汉后，飞留下少数兵马，自己则率大军返回鄂州。留在襄汉的岳家军及官员，奉岳飞之命，修葺城池，加强防御，帮助恢复生产，以巩固襄汉统治。岳飞自己则一面要求增加兵员，一面上奏宋高宗，请求"以精兵二十万直捣中原"。他曾登高远眺，万里长江滔滔。他心潮起伏，创作了有名的《满江红》。他豪情满怀，决心"待从头收拾旧山河"。　(顾全芳)

金熙宗改革

金熙宗执政时期的封建化改革。

金熙宗(1119—1149)，金朝第三代皇帝完颜亶，女真族，原名合剌，金太祖嫡长孙。天会十年(1132)，在完颜宗干、宗翰、宗辅、希尹等宗室勋贵的支持下，受任谙版勃极烈，成为皇位继承人。天会十三年，金太宗死，即皇帝位。

完颜亶自幼随汉人文士韩昉学习汉文经典，深受汉文化薰陶。他即位时，金已吞并北宋，经济、文化发达的中原已成为金朝的主要统治地区，金朝统治者要巩固统治，就必须适应新的情况，在统治方式上改弦更张；此时，金、宋间大规模的战争已暂时停止，南北对峙的局面也初步形成，给金熙宗进行内部整顿和改革提供了一个相对稳定的环境。他即位以后，顺应历史发展的新情况，对女真族传统的政治、经济制度，主张"可则循，否则革"，进行了若干有利于金朝巩固统治的封建化改革。

政治和法律制度改革。金熙宗即位之后，为了加强皇权，同守旧势力的"旧历大臣"诸如宗翰、宗磐、宗隽、挞懒、希尹等展开了激烈的斗争。斗争的结果

是废除了女真族传统的勃极烈制度，加强了皇帝的中央集权。在皇帝之下，改用辽、宋官制，兼采唐制，设三师（太师、太傅、太保）和三省（尚书、中书、门下）。地方官制仍辽、宋旧制，设路、府、州、县。天会十五年废伪齐，又在汴京设行台尚书省；天眷元年（1138）改燕京枢密院为行台尚书省。行台尚书省系隶属中央尚书省的地方行政机构，可保持一定的地方特殊性。同年又颁行新官制及换官格（即将原女真、辽、宋的官职依照新制统一换授）。新官制中增设了平章政事和参知政事官职，并在中央设置了监察机构：御史台。与此同时还规定了百官仪制与服色。皇统年间（1141—1148），诏诸臣以本朝旧制兼采隋、唐之制，参辽、宋之法，制定《皇统新律》一千余条，建立起金朝统一的封建化的法制。

社会经济改革。金朝统治者为了加强对中原地区的统治，自金太宗天会十一年起，将原居东北的猛安谋克屯田军迁往中原地区，特别是金熙宗皇统元年（1141）南宋将淮水以北割金后，猛安谋克又大批南迁。猛安谋克户本来以"牛头地"制为其经济基础，即根据所占有的牛具、奴婢数目向国家领取"牛头地"，实行家族奴隶制经营。进入中原地区的猛安谋克户由于受到封建经济的影响，往往出卖奴婢，将获得的牛头地租与汉人耕作，收取地租，使牛头地制渐遭破坏。随着封建经济的发展，猛安谋克内部贫富分化加剧，很多猛安谋克户丧失了"牛头地"和奴隶，走向贫困化，失去了作战能力。金熙宗根据这种情况，放弃了以往牛具税地（猛安谋克制下女真户的赋税制度，亦称牛具税）的经营办法，开始在这些猛安谋克户中实行"计其户口，给以官田"。这种计口授田的土地分配制度是女真猛安谋克内部土地所有制和经营方式的一个重大变化，也是由原来的大家族管理的牛头地制向封建个体经营的过渡形态，标志着猛安谋克内部的土地关系顺应中原地区封建经济状况开始有了新的变化。与此同时，金熙宗为了缓和女真奴隶制与中原封建经济的矛盾，也采取了一些放奴为良、减免赋税等有利于社会经济发展的措施。他针对宗翰、挞懒、刘豫等在中原地区大肆掠夺和残暴统治的教训，废除了刘豫伪齐政权，建立行台省，将过去苛重的赋税减免三分之一，同时还下诏："陕西、蒲、解、汝、蔡等处，因岁饥流民典雇为奴者，官给绢赎为良，放还乡。"为了扩大耕地面积，解决农民无地的问题，还把"禁苑隙地"、"西京鹿囿"等分给无地农民耕种。

史载，熙宗时"内外皆得人，风雨时，年谷丰，盗贼息，百姓安"，这当然属溢美之辞，但也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熙宗改革是有成效的，它对缓和女真族同汉族的矛盾、女真奴隶制同中原封建经济的矛盾，恢复北方社会经济，巩固金朝在北方地区的统治，加速女真族的封建化和汉化具有积极的促进作用。

（高凯军）

岳飞北伐

绍兴六年（1136）岳飞两次北伐金及伪齐，收复襄汉及中原。

岳飞自绍兴四年（1134）首次北伐，收复襄汉地区六州之地后，又于第二年镇压了杨幺起义，升为荆湖南、北，襄阳府招讨使，岳家军也扩充到10万以上。岳飞回军鄂州（湖北武汉），训练士卒，准备再次北伐。绍兴六年秋，岳飞率岳家军从襄阳府（湖北襄樊）和邓州（今属河南）北进，拉开岳家军二次北伐的战幕。先锋牛皋神勇，以摧枯拉朽之势，横扫伪齐军，占领了颍昌府（河南许昌）及蔡州（河南汝南）。岳飞则自率主力挥师西北，直逼离黄河不远的虢州（河南灵宝）。八月初，王贵等一举攻克卢氏县（今属河南）、朱阳（河南朱阳镇）、栾川（今属河南）及虢略（河南灵宝）。王贵乘胜西进，横扫商州，攻克商洛（陕西商县）、洛南、丰阳（陕西山阳）、上津（湖北郧西）等地。岳家军收复商州和虢州，在战略上有重要意义，既可北扼黄河，又可东入洛阳，还可西攻关中。伪齐惊恐，以攻为守，劫略岳家军后方。岳家军义无返顾，又回师东进，杨再兴在多次激战后，占领了顺州（河南嵩县）、永宁（河南洛宁）和福昌（洛宁东北），逼近洛阳。绍兴六年岳飞的第二次北伐，攻占了湖北、河南、陕西大片地区，形势对宋十分有利。可惜千里转战，战线太长，后勤粮食供应困难。所占地区，由于战争以及伪齐的横征暴敛，地广人稀，不但难以在当地筹粮，而且还需救济当地饥民。由于粮食紧张，已有士兵因饥饿而开小差。岳飞无奈，只得收兵南返，回师鄂州。南撤中，当地百姓纷纷跟随岳家军南下，岳飞安排了他们的生活和生产。岳家军主力回师后，金及伪齐联合出兵，重占商、虢、邓、唐等州。

岳飞得知第二次北伐之地得而复失，不顾眼睛病痛，"深惟国事之重"，于绍兴六年十一月十五日第三次北伐。岳家军从鄂州渡江北上。张宪率军1万，在邓州内乡（河南西峡）与伪齐军数度对阵。张宪用计，以宋军佯败，伪齐军追击，入岳家军圈套。岳家军前后夹击，俘敌千余。伪齐军逃回洛阳。牛皋则率军8千，至唐州方城县（今属河南）猛击伪齐军，追至和

尚寨，杀死敌将，降敌上千，获马300。王贵在战败十倍于已的伪齐军后，进军蔡州。岳飞指挥王贵、牛皋等2万岳家军，午夜进逼蔡州城。岳飞临城侦察，但见城、濠皆备，唯不见敌兵。岳飞令军佯攻，敌即上城守御。岳飞知敌有戒备，遂下令暂撤，以防中计。果然，伪齐李成等已将蔡州城当作陷阱，伏兵已布四周。岳飞撤退时，李成军尾后追击。王贵以骑兵迎敌，追杀数里。李成增兵再袭岳家军，岳家军董先伏兵树林，自己则立于桥头，等李成追来。李成至桥，董先拿出绳索，挥舞着说：李成你别跑，我今天一定要捉住你。李成见仅有董先一人，笑笑说：我肯定不跑，就怕你要跑。李成便派兵去捉董先。董先举旗击鼓，树林中即冲出岳家军，伪齐军退，岳家军便返回树林。相持多时，岳飞亲自率大军赶来。李成见岳家军铺天盖地冲来，赶紧拨马逃跑。李军败退数十里，刚要休息吃饭，岳家军又从四面蜂拥而至，伪齐军横尸遍野，被俘者数千。岳飞给俘虏发了路费，让他们回家，被俘者高兴而散。年底，岳家军返回鄂州。第三次北伐又以杀敌立功而胜利结束。　（顾全芳）

秦 桧 卖 国

奸相秦桧卖国乞和、陷害忠良。

靖康二年（1127）三月，金之张邦昌为伪楚傀儡皇帝。时为宋御史中丞的建康（江苏南京）人秦桧（1090—1155），反对割地及立张邦昌为帝，遂为金所俘。从此，秦桧变节降金，为金挞懒所信用。建炎四年（1130）十月二十八日，秦桧由江苏涟水归宋，自称杀死金兵夺船而回，实为挞懒故意放归，充当奸细。宋高宗不顾群臣的怀疑与反对，宣称秦桧“朴忠过人”，于绍兴元年（1131）八月二十三日任秦桧为宰相。秦桧任相后，再次提出“如欲天下无事，南自南，北自北”的卖国投降之策，实际上是以北方割让金朝，乞求议和。秦桧的卖国投降言论，遭朝野强烈反对。宋高宗迫于舆论，又因向金乞和未成，遂于绍兴二年八月二十七日将秦桧罢相。秦桧仅相一年。宋高宗表示永不复用秦桧。

绍兴八年（1138）初，金主和派挞懒欲与宋议和。宋高宗在各地抗金有利之际，坚持先安内后攘外，再次向金乞和。宰相张浚迫使赵鼎辞相，给秦桧有可乘之机。宋高宗为讨好于金，自食其言，于三月初七再次任“以诚待敌”的秦桧为宰相兼枢密使。秦桧任相后，积极推行卖国投降政策。他向宋高宗说，要与金议和，必须由他一人独断专行，“勿许群臣预”。宋高宗乞和心切，委秦桧专门负责向金乞和，赞同秦桧的求和卖国方案。秦桧的卖国罪行，又一次遭国人强烈反对。临安（浙江杭州）贴出“秦相公是细作（奸细）”的大标语。胡铨上奏力主“斩秦桧与王伦以谢天下”。韩世忠、岳飞等将领表示坚决抗金，反对议和。宋高宗一意孤行，支持秦桧与金订立了“屈已议和”的卖国和约。

和约签订后，秦桧进一步阴谋“撤武备，尽夺诸将兵权”，以使金顺利消灭南宋。由于抗金派反对，阴谋暂未得逞。绍兴九年夏，金兀术杀害挞懒，准备南侵。绍兴十年五月，金撕毁和约，分兵四路大规模攻宋。宋抗金呼声高涨，秦桧处境不利，即见风扬帆，假意表示愿“谕诸帅同力招讨”金兵，以保住相位。七月，岳飞率10万大军大败兀术，抵近开封，金有被岳飞直捣黄龙之危。秦桧急忙奏请宋高宗，要岳飞“且令班师”，终使岳飞的抗金“十年之力，废于一旦”。兀术死里逃生，卷土重来。

为扫除抗金力量，秦桧再次阴谋削夺抗金将领兵权。他向宋高宗挑拨说，现在各地的宋军，只知道将军，不知道皇帝，“跋扈有萌，不可不虑”。宋高宗也怕将领不忠，遂与秦桧密谋，于绍兴十一年（1141）四月二十四日罢夺抗金将领韩世忠、岳飞兵权。不久，又以“莫须有”之名，将岳飞杀害。同时，秦桧第二次与金签订了卖国和约。从此，秦桧更为跋扈，将“忠臣良将，诛锄略尽”，干了金朝想干的事。绍兴二十五年（1155）十月二十二日，当了19年宰相、作恶多端的内奸秦桧，终于一命呜乎，遗臭万年。　（顾全芳）

金 筑 界 壕

所谓“界壕”系金朝为对付北方蒙古诸游牧民族进攻而修建的一道防御工程。

金灭北宋割据北方以后，蒙古草原的诸游牧民族“皆臣属于金”，归金依辽旧制所设的东北、西北和西南三路招讨司管辖。但金朝统治者一方面以天朝大国自居，一方面又缺乏容纳异族的博大胸怀。大约在金太宗时期，蒙古合不勒汗应召入朝，金太宗仅因合不勒汗在宴会上即兴起舞，抓了一下他的胡子这样一点小事，就听信臣僚的话，在放归合不勒汗后，又出尔反尔派使臣追杀之，合不勒汗不得已杀了金朝使臣。从此，蒙古对金的臣属关系出现裂痕。金朝统治者为了压服蒙古各部，或者唆使属部塔塔儿攻击蒙古，或者直接出兵进剿，对俘获的蒙古部落首领则以惩治叛部法钉死在木驴上。如合不勒汗的亲族俺巴孩汗、合不勒汗之子斡勤巴尔合黑等就是被金朝用这种酷刑杀害的。残酷的民族压迫政策使蒙古

诸部对金朝统治者"怨入骨髓"，于是"连岁扰边"，成了金朝北方的"边梗之患"。金在熙宗、世宗时期曾屡次出兵镇压，但终无济于事。于是金朝统治者只好对蒙古采取消极防御的办法，从熙宗天眷（1138—1140）年间到章宗承安（1197—1200）年间，历时 60 年之久，有时"止役戍军"，有时"军民并役"，挖壕筑垒，修建一条长达三千余里的界壕，这条界壕沿大兴安岭、阴山，从嫩江左岸的布西城（今莫力达瓦），经庆州（今林西县西北）直到河套西曲之北。从现存边堡界壕的遗迹来看，是由内、外壕墙、戍堡和障、寨所组成，在古代防御工程中，其浩繁程度仅次于长城。金朝统治者修建这条界壕，主观上是为了阻止蒙古的进攻，客观上也起到了阻隔民族间经济、文化交流的消极作用，因此，这条界壕是金朝统治者民族政策拙劣的产物。蒙古族统一全国以后，这条界壕便废弃了。　（高凯军）

绍兴和议

绍兴年间宋向金两次订立屈辱性和约。

绍兴七年（1137），金朝主和派挞懒掌权，傀儡政权伪齐刘豫被废，黄河南北抗金斗争高涨，金难以控制河南、陕西等占领区。挞懒为实现"以和议佐攻战"，诱使南宋兵力部署于黄河平原，便于金骑兵消灭宋军，表示愿与宋议和，归还黄河以南地区。当年十一月，挞懒对宋使臣王伦表示，金愿归还梓宫（宋徽宗棺材）、韦太后（宋高宗生母）以及河南地区，与宋议和。绍兴八年初，王伦回宋。宋高宗得知金愿和议，立即响应。宋高宗置朝野强烈反对于不顾，三月七日任"以诚待敌"的内奸秦桧为相，独力主持与金和议事宜。五、六月间，两国使者往返谈判。十一月，金派张通古身带金诏书至宋。诏书不称宋而称"江南"，又要宋高宗"奉表称臣"、"行屈己之礼"，更遭宋文武大臣坚决反对。宋高宗、秦桧一意孤行。十二月底，秦桧代宋高宗屈膝跪倒"见金国使臣于其馆，受国书以归"，订定了和约。和约规定，宋必须对金称臣纳贡，每年输银、绢各 25 万两、匹于金。金则以黄河为界，归还原伪齐占河南、陕西等地；归还梓宫及韦太后。是为宋对金第一次屈辱性的绍兴和议。

绍兴九年夏，金兀术杀害挞懒，主战派掌权，准备毁约南侵。绍兴十年（1140）五月，兀术撕毁和约，兵分四路，渡过黄河，大举犯宋，侵占已归还宋的河南、陕西等地。宋有被灭之危。宋高宗为保住皇位，统治半壁江山，下诏抗金。岳飞、刘锜、韩世忠等全力以赴，分别率军北上迎敌。宋军连获顺昌、郾城、颍昌大捷，金兀术屡战屡败，态势对宋十分有利。宋高宗、秦桧害怕岳飞等大将打败金朝，拥兵自重，威胁赵宋统治，又怕宋钦宗由此而回宋当皇帝，急忙下令诸路宋军班师南撤，使抗金之功废于一旦。绍兴十一年四月，宋高宗、秦桧为向金乞和，罢去岳飞、韩世忠兵权，之后又将岳飞杀害。金因战场上难以打败宋朝，同意和议。九月，两国使臣开始往返递书，商议和议。十一月七日，金第三次派人带金书至宋，提出议和条件。宋高宗、秦桧卖国求和心切，又一次不顾朝野反对，全部答应金方要求，立即派何铸等人出使于金。十二月末，和约最后议定。

这次和约，宋仍向金称臣，纳贡银、绢数量不变，但在两国划界上，却不再以黄河为界，而是东以淮河、西自大散关（陕西宝鸡）为界，并向金割让唐（河南唐河）、邓（河南邓州）、商（陕西商州）、虢（河南灵宝）、泗（江苏盱眙）等州，以及陕西和尚原、方山原等要地。宋由此丢失了大片领土。这是第二次绍兴和议。由于划界、割地、韦太后返宋等事项，都在绍兴十二年（1142，壬戌年）才执行完成，故第二次绍兴和议又称"壬戌之盟"。　（顾全芳）

顺昌保卫战

南宋刘锜于绍兴十年（1140，金天眷三年）在顺昌以少胜多，大败金军。

绍兴十年五月十一日，金兀术背信弃义，撕毁绍兴八年宋金签订的和约，兵分四路南下，大规模进犯南宋。金骑兵横冲直撞，防备力量极薄弱的陕西、河南各地，很快被金占领。兀术亲率金主力进驻开封（今属河南）。金南下前，出使金的王伦，得知兀术将毁约犯宋，立即回国报告了宋高宗，并建议派张俊、韩世忠、岳飞分别驻守开封、商丘、洛阳和西安，以防不测。宋高宗及秦桧不加理睬。之后，金又提出宋须用金年号，以作借口犯宋，宋高宗仍无抗金打算。韩世忠曾建议先发制人，袭击金兵，宋高宗再次拒绝安排抗金。金四路南下后，宋高宗迫于形势，才下诏令韩世忠、张俊、岳飞为招讨使，悬赏捉拿金兀术；韩世忠攻守江淮，吴璘攻守陕西，岳飞、张俊、刘锜出兵中原，与金兀术对阵。刘锜（1098—1162），字信叔，德顺军（甘肃静宁）人。曾参加抗夏防夏，后随张浚在陕西抗金。出兵中原前，新任东京副留守。

刘锜率宋军 18000，五月自临安（浙江杭州）行军至顺昌府（安徽阜阳）前，得知金兵已陷开封，离顺昌仅数百里，决定连夜赶到顺昌城，准备金兵来战。顺昌知府陈规告诉刘锜，顺昌城中粮米充足，刘锜知

道无缺粮之忧，便向将士宣布留守顺昌城，“敢言去者斩”，并且听从部将许清的建议，将运来兵马物资及随军家属的船只统统沉没，“示无去意”。刘锜所领宋军，大多是当年的八字军，因而战斗力强而士气高。这班八字军勇士，听说准备迎战金兵，“男子备战守，妇人砺刀剑”，个个磨拳擦掌，高呼“平时人欺我八字军，今日当为国家破贼立功”。刘锜又组织人修建城防工事，将车轮埋于城上，把老百姓的门板放置城周，命令城外数千户百姓焚屋坚壁清野。准备了6天，金兀术的先头部队已兵临城下。

五月二十六日，金兵包围顺昌城。“以死报国家”的宋军虽不满2万，但斗志高昂。金有3万余众，亦为其精锐主力。两军相遇，恶斗难免。刘锜旗开得胜，首先以伏兵活捉敌将2人。被俘的金将交待说，离城30里的白沙涡有不少金兵。刘锜连夜派1000宋军奇袭，又胜。围城的金兵用箭射城，但刘锜早有准备，敌箭根本射不进城头。相反，宋军以强弓自城上往下射箭，金兵却中箭死伤不少。金兵只得稍退以避箭。刘锜又以步兵出城狙击，金兵掉进河里的很多。围城第四天，刘锜乘黑夜雷电交加之际，偷袭敌营。宋兵在电光闪处，凡是看见留辫发者（金习俗，男子亦须留辫，与清朝略同）就砍杀。金兵败退15里，又被追杀。宋军以吹竹声为联络，金兵闻声而惧，大败退到老婆湾。

金兀术在开封听到金兵败于顺昌的消息后，怒从心中升，亲自率领10万骑兵，于六月初七赶到顺昌。兀术扬言，攻破顺昌城太容易了，靴尖就可以踢倒。六月初九，兀术包围顺昌城。刘锜与将领们商量对策，有人主张见好就收，乘连连得胜的机会，返回临安，朝廷也不会怪罪。刘锜不同意，说，国家养兵15年，就是为了用兵一时。如果撤军，兀术尾后追击，则前功尽弃，兀术可以长驱江淮，反有误国之罪。刘锜招募到曹成等2人，作为宋军间谍。曹成等故意为金所俘。兀术问宋军情况，曹成说，宋朝说，朝廷主张与贵国讲和，根本不准备与贵国作战。兀术十分高兴，连攻城的炮车都不用，还责骂将官竟然败在宋军手下。将官们说，“南朝（宋）用兵，非昔之比，元帅临城自见”。兀术依然轻敌麻痹。

第二天，刘锜派人到金营下战书约日会战，并对兀术说，我们刘太尉（锜）说了，太子（兀术）既不敢会战，更不敢过河（阜阳北泉河）；如果你敢过河，太尉愿意献上五座浮桥，帮助你们将士过河。兀术听了，十分生气，说他刘锜竟敢向我挑战，同意明日会战。早晨，兀术看见果然有五座浮桥在河上，兀术以长胜军严阵以待。刘锜决定擒贼擒王，首先进攻兀术所在军营。正值天热，金人、马都到河中饮水、吃草，孰不知刘锜早在水中、草上下了毒，金人马吃喝后纷纷生病。等到金人困马乏时，刘锜下令开西城门和南城门，以数百、数千宋军出战，直冲敌阵，专门用刀斧砍杀，敌阵大乱。金兀术见势不妙，身穿白袍，以3000亲兵亲自督阵出战，金兵多身穿重铠甲，称“铁浮图”，三人一组，并肩前进，后面还有骑兵紧跟，许进不许退。宋军奋勇挡杀，铁浮图死伤无数。兀术又用“拐子马”，即以精良骑兵从左右包抄围攻宋军，刘锜也战而胜之。金兵稍退，宋军则坐下休息吃饭。金兵见宋军竟敢坐下休息，又想回过头来冲击，但听城上鼓声震天，路上又有拒马木拦阻，才不敢冲过来。吃罢饭，休息好，宋军又齐声喊起，撤掉拒马木，深入金阵，乱砍乱杀，兀术又大败。六月十一日，兀术10余万精锐被战败，死伤近2万，战马数千匹，“弃尸、毙马血肉枕藉，车旗、器甲积如山阜”。兀术领残军狼狈逃走，从陈州（河南淮阳）退到开封。顺昌之战，“金人震恐丧魄”，据说准备一直退到燕山以北，放弃山西、河北、陕西等地。顺昌大捷使宋由防御转入反攻阶段。可惜宋朝廷坐失良机，总是以求和为主，以至功亏一篑。 （顾全芳）

岳飞朱仙镇班师

绍兴十年（1140）岳飞奉诏在胜利中撤军。

自从绍兴六年（1136）两次北伐后，岳飞一直在思考如何才能彻底打垮金朝，收复中原。他接受北伐时粮食供应困难的教训，在襄汉地区召募百姓，开荒种地，岳家军也参加生产，甚至做生意。这样做的结果，使岳家军的军粮和军需，可以保证北伐之需。岳飞的战袍上绣上了“誓作中兴臣，必殄金贼主”十个大字，以示决心消灭“北虏”。他戒掉了酒，以免酒醉误事。他时刻向往着能直捣黄龙府。他结识、联络河东、河北的抗金人士和组织，准备再次北伐之时，可以南呼北应。

绍兴十年（1140）五月，金撕毁宋金和约，兵分四路南侵。兀术亲率主力进驻开封，河南各地为金所占。面对金的野心，宋高宗和秦桧本欲求和投降，但迫于抗金情势，勉强下了抗金诏书。岳飞得知金兵南下，立即通知各地宋军准备对金作战。自己则率岳家军主力北上，开始了第四次北伐。

岳飞的10万大军，从鄂州（湖北武汉）渡江北上。六月初，张宪率前军抵达光州（河南潢川），夺取蔡州（河南汝南）。闰六月十九日，张宪在颍昌府（河

南许昌）郊外与金军激战，杀败金兵后占领颍昌。同月二十四日，张宪与牛皋联合东进淮宁府（河南淮阳），攻占府城。同时，王贵等岳家军攻克郑州（今属河南）、洛阳（今属河南）。岳家军兵临黄河，直逼开封。

七月初，金兀术知岳家军有直捣开封之势，亲率10余万大军迎战。金军进兵郾城（今属河南）。岳飞在郾城兵少，但仍派兵出城迎战。临行，岳飞对其子岳云说：这次战斗，只许取胜；如果作战不力，我先斩了你。七月八日，岳云拍马舞枪，领兵直冲敌阵。双方骑兵你来我往，在城郊原野上斗杀。金兵越战越多，喊杀声惊天动地。岳飞见军情危急，不顾有人阻拦，亲率40名骑兵冲至阵前，用箭射敌。杨再兴更是性起，单枪匹马冲进敌阵，杀金军将士近百，自身亦中数十枪。金军善用左右翼骑兵“拐子马”，岳飞则调动宋军，巧妙对付。十数回合，金骑无法取胜。兀术将身穿重铠的“铁浮图”军来对付岳飞，以三匹马为一组，用索相连，齐头并进，冲击宋军。岳飞派步兵上前，手持长刀，砍敌马足。一匹马倒在地，其余两匹亦难动弹，“铁浮图”大乱。从中午杀到天黑，金军众不敌寡，败逃而去。兀术率军北上临颍（今属河南）。岳飞迅速调动兵力，令张宪等直扑临颍，以与兀术决战。

七月十三日，杨再兴领300骑兵先行，突遇兀术，杨再兴被包围，300骑兵在血战后全部殉国，杨再兴也阵亡，金兵亦有2000多人被杀。兀术见岳家军张宪等来，向颍昌逃跑。兀术至颍昌，集结兵力10余万，摆阵10余里，要与岳家军见个高低。岳云率骑兵800，拍马先出，步兵随后，专杀拐子马。两军血战数十回合，胜负难分。岳云等受伤百处，直战得“人为血人，马为血马”。中午，董先等领兵出颍昌城，支援前线，才将兀术打败。颍昌之战，岳家军杀敌5000，俘人2000，马3000，军用品不计其数；兀术女婿阵亡，副统帅受重伤死去。郾城、颍昌大战，岳家军以少胜多，使兀术感到“撼山易，撼岳家军难”。

岳家军的节节胜利，鼓舞了河北、山东、山西的金后方军民。岳飞派往后方的奇兵，与当地军民配合，打击金敌。后方军民盼望岳家军渡过黄河。岳飞充满信心，发誓“直捣黄龙府，当与诸君痛饮”。七月十八日，岳飞命令向开封府进军。张宪等从临颍出发，向东北挺进。兀术负隅顽抗，在开封西南的朱仙镇集结兵力10万。岳家军前锋抵朱仙镇，金士气低落，一战即溃。正当岳飞准备进军开封之时，宋高宗深怕岳飞消灭金军后居功自傲，威胁自己的皇位。这是北宋以来重文轻武，对武将极度不信任的集中体现。宋高宗连下多道金字牌，命令岳飞停止北进，回师南下，岳飞本人则去临安（浙江杭州）面见皇帝。岳飞在一天之内连接十二道金字牌后，不听张宪的劝告，更不愿将在外君命有所不受，而是决定遵旨班师。愚忠误了大好时机。愚忠使岳飞投入罗网。岳飞只能悲泣“十年之力，废于一旦”。班师南回之时，沿途百姓苦苦挽留，岳飞悲愤交加，出示班师诏示众。百姓痛哭失声。金兀术得知岳飞撤军，喜出望外，重占河南各地。第四次也是岳飞最后一次北伐，以胜利始，以撤离终。从此，正如岳飞所说，南宋“难以中兴，乾坤世界，无由再复”。（顾全芳）

岳飞被害

绍兴十一年底（1142），宋高宗、秦桧为卖国求和而枉杀岳飞。

绍兴十年七月，岳飞率10万岳家军长驱北伐，连败金兀术军，收复大片失地，有打败金朝之势。金惊恐失措。宋高宗为向金乞和，竟然连下十数道金字牌，命令岳飞从开封前线班师回朝。

绍兴十一年四月下旬，岳飞奉诏到杭州。宋高宗和秦桧为防岳飞“跋扈”，进一步向金献媚，密谋先削夺岳飞兵权，再将岳飞杀害。秦桧必欲害死岳飞，一是由于兀术写信给秦桧，明确提出“必杀岳飞，始可和”作为条件；奸细秦桧心领神会。二是因为岳飞始终反对秦桧的求和投降，“数言和议非计，（秦）桧大恶之”；岳飞在兵权被罢后，还曾最后一次对宋高宗明确表示反对与金和谈，以免受骗。

四月二十二日，岳飞幕僚朱芾、李若虚被调离岳飞身边，开始了削夺岳飞兵权的第一步。四月二十四日，岳飞被升任为枢密副使。这是明升暗降，枢密副使难以直接统兵。岳飞心里清楚，但还是甘愿交出了兵权。

秦桧一面与金议和，一面指使万俟卨、何铸、罗汝楫搜集岳飞的所谓罪状后，弹劾岳飞“不忠”、“妄自尊大，略无忌惮”，以及“不肯出师”等等，显然要将岳飞置于死地。宋高宗也公开表示，说岳飞主张放弃楚州，“朕何赖焉”。八月九日，岳飞被解除枢密副使之职，成为无职无任何权力的万寿观使。这就为谋害岳飞做好了组织权力上的准备。

宋高宗和秦桧深知岳飞是抗金最坚决、战绩最大的名将，深得民心，要杀害岳飞，仅凭以上捕风捉影的弹劾，就将岳飞处死，会激起天怒人怨。要遮天下人耳目，必须进一步搜罗“罪状”，拿出更有力的“证据”。秦桧再施诡计，指使枢密使张俊罗织岳飞

"罪状"。张俊早年曾抗金,"晚年主和议,与秦桧意合",却与岳飞不和。张俊接到秦桧的旨意,威胁岳飞部将王贵,收买了张宪部属王俊,策划了一个阴谋。王俊造谣说,他听张宪说,岳飞在最近曾让张宪以兵谋反,要挟朝廷,将兵权交还岳飞。王俊写成诬告状,于九月八日交给王贵。王贵又将此状上呈,最后到张俊手里。这拙劣的伎俩,漏洞百出。张俊接到状纸后,立即在江苏镇江将张宪逮捕,企图让张宪屈打成招,作为陷害岳飞的主要证据。宋朝法律规定,谋反罪属十恶不赦,必须处以极刑。张宪宁死不屈,被打得体无完肤,仍不枉招这无中生有的"谋反"罪。然而,丧尽天良的张俊,再次捏造罪证,向宋高宗上奏说:"张宪通供,为收岳飞处文字后谋反。"秦桧立即建议宋高宗审讯张宪、岳云和岳飞。宋高宗下令逮捕张宪、岳云,押送大理寺"根勘"即追查审讯,岳飞则必须到大理寺一同受审。大理寺是专门审理官吏、将校罪犯的机构。

岳飞在家听到了王俊诬告事后,已经明白秦桧必然要害死自己。十月十三日,秦桧派杨沂中拘捕了岳飞押往大理寺。在大理寺,岳飞见到儿子岳云、爱将张宪被拷打得"浑身尽是血染",悲愤欲绝。岳飞受审时,据理申冤,力陈自己"无所负国家",并袒露背刺"精忠报国"四个大字,以表心迹。然而,秦桧同党们全然不顾岳飞的忠心,硬逼岳飞承认谋反罪。岳飞见他们毫不讲理,"长吁一声"说:"吾方知既落秦桧国贼之手,使吾为国忠心,一旦都休。"任凭卑鄙小人御史中丞万俟卨如何"拷掠",岳飞合上双眼,不再说话。

岳飞被投入狱中。在狱中,岳飞绝食,写了"天日昭昭,天日昭昭"八个大字。

岳飞被捕,朝野震动,有识之士纷纷出面为岳飞叫屈,声援营救岳飞。韩世忠身处逆境,还挺身而出,质问秦桧为何将岳飞逮捕。秦桧回答:岳"飞子(岳)云与张宪书虽不明,其事体莫须有"。韩世忠勃然大怒:"'莫须有'(意为'也许有')三字,何以服天下!"

绍兴十一年十二月二十九日(1142 年 1 月 27 日),内奸秦桧向宋高宗报告,将岳飞、张宪处死,岳云判刑免死。宋高宗当即批示:"岳飞特赐死。张宪、岳云并依军法施行,令杨沂中监斩。"当日,岳飞被冤杀狱中。岳云、张宪刑场斩首。岳飞时年 38 周岁,岳云年仅 22 周岁。是为中国历史上罕见的千古奇冤。

(顾全芳)

蕃部起义

西夏大庆四年(1143)发生的一次党项人民起义。

夏仁宗大庆三年西夏闹大饥荒,民间每升米达百钱。四年三月,国都兴庆府(宁夏银川)地震,有声如雷,逾月不止,破坏官私庐舍城堡,人畜死亡数万。四月夏州(陕西靖边)地裂泉涌,出黑沙,林木皆没,民居数千塌陷。仁宗为缓和矛盾,下令遭地震陷死者二人免租税三年,死一人免租税二年,伤者免租税一年,令有司修复塌陷庐舍城堡。境内大饥,定州(宁夏平罗)筅浪、富儿等族,与威州(宁夏同心北)大斌族,静州(宁夏灵武北)埋庆族分头起义,多者万人,少者五、六千人,进攻附近州城。守城将官出兵镇压,多被打败,郡县告急。仁宗用枢密承旨苏执礼谋,实行赈济法,命诸州按视灾情轻重,分别给以赈恤,同时派西平都统任得敬领兵镇压。数月后起义军渐被瓦解。定州起义军首领哆讹率筅浪、富儿二族恃险拒守,遭任得敬发兵夜袭,攻克堡寨,被擒杀,起义失败。

(史金波)

海陵王迁都燕京

金天德三年(1151),海陵王将金的都城由会宁府迁往燕京的措施。

12 世纪初,女真人从比较落后的社会形态中崛起,相继灭掉辽朝与北宋,建立起奴隶制国家,号大金,都会宁府(黑龙江省阿城县白城)。其时处于草创阶段,规制简陋,都城仅以土围墙围裹,宫殿建筑也不雄伟。但其后数十年与故辽、宋地区发达的封建经济及文物制度的广泛接触下,女真贵族自己也迅速汉化,社会制度由奴隶制向封建制过渡。金熙宗在位时,钦慕汉俗,有意识地进行了一系列政治改革,加强中央集权的皇权统治。同时也感到都城僻处东北一隅,不利于统治广大经济发达的中原地区。朝野上下,迁都的呼声日益强烈。

金皇统九年(1149),女真族封建改革家宗干的儿子、时任右丞相兼都元帅的完颜亮发动政变,杀熙宗自立,是为海陵王。他登基以后,采取了更为激烈的封建化改革措施,进一步加强中央集权,屠杀宗室亲贵。为了彻底摆脱都城敌对势力的包围,同时也想武力统一南北,成为华夏的正统之君,海陵王加快了迁都的步伐。金天德三年四月,他下诏迁都燕京(北京),先以谙熟汉文化的渤海人张浩主持扩建燕京城。其城全仿北宋都城汴京(河南开封)规制,役民

80万，兵夫40万，经营数年始成。城有皇城、宫城、外郭与子城之设，环境优美，街市繁华。东、南、西、北城门各有施仁、彰义、端礼、崇智之名，反映了崇尚汉族仁、义、礼、智观念的状况。金天德五年，金朝统治机构正式迁至燕京，改其名为中都。他还在中都西南的大房山建行宫，又营建"山陵"，把金太祖、太宗的棺木迁到这里重新安葬。设太庙，四时祭祀。同时，又把女真民户大量南迁，安插在河北、山东等地。他还采取无情手段，下令毁去上京会宁府的旧宫殿、诸大族第宅，平夷其址栽种庄稼。对原贵族王爵一律削封，借以打击女真旧贵族势力。

海陵王将金朝政治中心迁至中原汉人居住地区，便于女真贵族与汉族地主阶级相结合，以加强对中原人民的直接统治，客观上促进了女真人汉化和封建改革，也使北京从此成为中国封建王朝的统治中心。 （刘 庆）

撒八、移剌窝斡起义

金朝海陵王正隆年间爆发的契丹族大起义。

海陵王在政治、经济和军事条件均不成熟的情况下，凭其好大喜功的主观意志，盲目发动统一南宋的战争。正隆五年(1160)，海陵王为扩兵南侵，派牌印燥合等人强行征发西北路契丹20岁以上50岁以下全部丁壮充军，遭到契丹人民的强烈反抗。契丹译使撒八、孛特补等率众杀燥合及招讨使完颜沃侧，并夺取招讨司兵甲举行起义，得到西北路及东北各地契丹人民响应。还有很多女真"富家奴隶"参加，声势日益浩大。海陵王先后派枢密使仆忽土和西京留守萧怀忠以及枢密副使白彦恭等前往镇压。撒八因实力不足，率众西投耶律大石。这时，参加起义的多数契丹人不愿舍弃故土，起义军发生分裂。起义将领移剌窝斡与陈家等于大定元年(1161)杀撒八，窝斡自为都统帅，以陈家为都监，率众东还，围攻临潢府(今内蒙古巴林左旗)，擒总管移室懑，起义队伍扩大至5万人。十二月，移剌窝斡称帝，建年号天正。次年撤临潢围，东攻泰(今吉林省白城市东南)、济(今吉林省农安县)、懿(今辽宁省彰武县西)等州，不利。率众西走花道(今内蒙古赤峰东南)与金军遭遇，在转移至陷泉(今内蒙古巴林左旗境内)时被金军击败。移剌窝斡率残众逃入奚族居地，又欲西奔夏国，但因金军追击乃北入沙漠。大定二年后，移剌窝斡为部下稍合柱和神独斡所擒获，至金军请降，被金军押送中都(今北京)处死。起义军余部仍继续战斗。第二年括里札八率部南下降宋。契丹人民的大起义沉重打击了金朝统治者，牵制了海陵王南侵的力量，也迫使金世宗即位后采取了一些解放契丹奴隶的措施，推动了历史的进步。 （高凯军）

牛头地制的瓦解

牛头地制也称为牛具税地制，是金初对女真族猛安谋克施行的一种奴隶制土地分配和地税征收制度。当时土地最高所有权掌握在国家手中，不得买卖，女真贵族和一般家族根据所占有的牛具、奴婢数目可分得一定数目土地的占有和使用权，并向国家缴纳一定的地税。其具体办法是：每25口人拥有一耒具(1耒、3头牛)，分给4顷4亩多土地，采取家内奴隶制经营方式；向国家缴纳固定的实物赋税，天会三年(1125)规定每耒赋粟1石，天会五年改为5斗，大定二十年(1180)又改为3斗。

后来，随着女真社会生产力的发展，特别是猛安谋克户大批迁往中原地区受到汉族封建经济的影响，牛头地制逐渐瓦解，被封建土地制度和赋税制度所取代。金初，女真奴隶主贵族在伐辽侵宋的战争中，将大量汉人、契丹人掠往"内地"即东北地区，刺激了女真社会生产力的发展。首先是适应军事和农业生产的需要，使东北地区的冶铁业迅速发展起来。在黑龙江阿城市等地都发现不少冶铁遗址，从中可知当时女真人已学会了铸铁和脱碳钢的制法。冶铁业的发展使当时的生产工具得到了改进，各地出土的铁制生产工具有：犁铧、蹚头、手锄、镐、锹、铲、镢以及各种形式的镰，还有双股垛叉、鱼形铡刀等。其中铁犁的制作技术远比辽时进步，大体接近北宋的水平并有新的改进。女真社会生产力的发展为封建个体经济的发展以及由奴隶制向封建制的转变奠定了基础。与此同时，随着灭辽侵宋战争的胜利，猛安谋克户大举南迁，原有的家族奴隶制经济受到中原封建经济的强烈冲击。有的猛安谋克户模仿汉族地主经营方式将分到的牛头地出租给汉人耕种，坐收地租；有的则为生计所迫出卖土地和奴婢，走向贫困化；少部分女真贵族则仗势侵夺民田、冒占官田，采取租佃经营方式，变成大奴隶主兼大地主。由此，牛头地制渐遭破坏。金熙宗时期就已针对这种情况，对丧失土地和奴婢的猛安谋克户采取过"计口授田"的措施，以挽救牛头地制。到金世宗时期，原定的牛具、户口和土地间的比例关系进一步陷入混乱，土地和奴隶占有不均的现象已十分普遍，猛安谋克户中出现了许多"贫难无地者"，严重危及了猛安谋克的战斗力，于是金世宗只好进一步扩大"计口授田"的范

围，对丧失土地的猛安谋克户每丁授田三、五十亩不等，并拨给一定数目的"官奴婢"和"官牛"，试图维持猛安谋克家族奴隶制的土地经营方式。但与此同时也给封建租佃制的发展打开了缺口，即允许猛安谋克户把靠家内奴隶经营不过来的土地租给佃农耕种。到金章宗统治时期，由于女真社会封建经济的进一步发展，只好制定了"屯田户自耕及租佃法"，在一定程度和范围内承认了土地私有和租佃关系的合法性，同时也采取了一些放奴为良等废除奴隶制的措施。这时牛头地制已基本崩溃，牛头税只存旧税名而"多有名无实"了，在这种情况下改行了封建的赋税制度。牛头地制的瓦解是女真社会生产力发展和受汉族封建经济影响的必然结果，它标志着女真族封建化的最终完成。　　（高凯军）

采石之战

宋金绍兴三十一年(1161)，宋金双方在采石的攻防之战。

绍兴和议(1141)后，宋金保持近20年的相对和平。绍兴二十八年(1158)，金主完颜亮扬言"举兵灭宋，远不过二、三年"，积极准备南侵犯宋。绍兴三十一年五月十九日，金使到临安(浙江杭州)，无理要求宋割让淮南地区。六月四日，金迁都汴京(河南开封)，随即撕毁绍兴和约，兵分四路，由海上、淮南、唐(河南唐河)、邓(河南邓州)、秦(甘肃天水)、凤(陕西凤翔)全面推进，企图一举消灭南宋。宋朝得知金毁约犯宋，以吴璘守陕南及四川，成闵守武昌等长江中游，刘锜守淮南及长江下游。年老病弱的刘锜自江苏扬州起兵北上抗敌，十月初一至盱眙，初八至淮阴(江苏淮阴)淮河南岸。当时，金兵已至淮阴淮河北岸。两军在淮河南北对峙。由于淮西金兵已渡过淮河，宋将王权不战而逃，金兵于十月二十日侵占滁州(安徽滁州)，二十二日占领和州(安徽和县)，兵临长江。刘锜在淮阴与敌接战后，奉命退还扬州，防守长江天险。

宋高宗得知金兵兵临长江，欲故伎重演，逃跑海上。由于朝野反对逃跑，宋高宗才表示"亲征"，任命虞允文等前往长江前线抗金。十一月七日，中书舍人虞允文以"参议军事"的身分，赶往与和州隔江相对的采石(安徽当涂北)，抗击金兵渡江。采石宋军因王权不战而逃，一无将帅，二无士气。虞允文毅然挑起重任，立即组织人马，"勾集战舰，拣选水军"，部署江防。同时鼓舞士气，"死战以报国"。

虞允文赶到采石的当天，金数十万主力早已陈兵江北，"二三十里不绝，鼓声震地"，势不可挡。完颜亮临江筑台，身披金甲，杀马祭天以求风顺；誓师"明日渡江"。十一月八日，完颜亮以木船载兵渡江。虞允文见事态危急，亲到江边前线指挥，调遣战船在江中与金兵激战，附近民兵也赶来，在战船上与宋军"并杀金人"。金木船敌不过宋车船。车船速度快，往来如飞，转弯自如。宋军又用强弓和霹雳炮杀敌。霹雳炮震声如雷，施放烟雾石灰，使金兵人马迷目。金兵不习水战，又因船速慢，被宋军射杀无数。金船难登南岸，残兵退还江北。虞允文又指挥宋军堵住金船，迫使完颜亮放弃渡江，沿长江北岸东行。十一月二十七日，始终无法渡江的完颜亮，在扬州被金完颜元宜所杀，金兵北退。虞允文在采石之战后，曾到镇江(江苏镇江)慰问病危中的刘锜，刘锜握着虞允文的手，赞扬虞虽为儒臣，却"成大功勋"。采石之战是宋金战争史上的重要战役，宋军有效地防止了金兵渡江，打掉了金的嚣张气焰，促使金内部分裂和完颜亮被杀，终使金消灭南宋成为泡影。　　（顾全芳）

通检推排

"通检推排"是金代世宗完颜雍和章宗完颜璟统治时期对州县民户和猛安谋克户分别实行的清查户口、财产，据以征收财产税(物力钱)和征发差役的重大措施。

金世宗大定四年(1164)为了平均赋税，保证朝廷的赋税来源，首先在州县民户中实行通检推排，分遣泰宁军节度张弘信等分路通检户口推排物力。推排物力的范围主要是：田园、屋舍、车马、牛羊、树艺等。但由于标准不一，出现了诸路不均，百姓负担不等的弊端，又于次年颁布了"通检地土等地税法"，使诸路赋税不均的现象有所缓解。大定十五年又令济南尹梁肃等人分路推排。大定二十年底，由于猛安谋克户迁居中原地区深受汉族封建经济的影响，贫富分化加剧，猛安谋克首领在侵占民田的同时也霸占一般猛安谋克的土地，致使他们"贫困不能自存"，无法承担军役和其他差役。为了解决"猛安谋克户贫富差发不均"的问题，以保证金军的战斗力，开始在猛安谋克户中实行通检推排，标准与州县民户的有所不同，主要办法是，"集耆老推贫富，验土地、牛具、奴婢之数，分为上中下三等"，然后按户等摊派军役及其杂役。金世宗时期在州县民户和猛安谋克户分别实施的通检推排，确实在一定程度上达到了均平赋役、缓合阶级矛盾和民族矛盾、稳定社会秩序的目的，起到了富国强兵的作用，将金朝的经济、政治推

向了发展的高峰。

金章宗即位以后，又在州县民户中施行了两次通检推排，初次也收到了一定效果，但到章宗晚期这次，金朝实已内外交困，“通检推排”无法继续实施而宣告破产。（高凯军）

隆兴和议

绍兴三十一年(1161)冬，金完颜亮大规模攻宋，在采石(安徽当涂北)兵败被杀，金世宗即位，金军北撤。宋各地抗金活跃，形势对宋有利。宋高宗仍力主屈膝求和。绍兴三十二年六月初，宋高宗传位于太子赵玮，自称太上皇帝。赵玮即宋孝宗。宋孝宗即位后，为岳飞平反昭雪，任命张浚等主战派宣抚江淮，指挥抗金，决心励精图治，有一番作为。隆兴元年(1163)五月，张浚渡江北伐，以图恢复中原。此前，金曾派人索要四州之地及贡币，遭张浚坚决拒绝。张浚指挥的宋军攻克宿州(安徽宿州)，但得而复失，宋军溃逃至符离(宿州北郊)，被金大败，损失将士数以万计，“军资殆尽”。八月，金向宋提出宋金议和的四个条件：索取海(江苏连云港)、泗(江苏盱眙)、唐(河南唐河)、邓(河南邓州)四州归金；宋对金称臣；纳贡如前；遣返归附宋的北人。如不答应，金将再次攻宋。宋廷对是战是和，长时间争议不休。张浚、虞允文等极力反对向金屈辱求和，步秦桧后尘的宰相汤思退等一心要向金投降主和，宋孝宗介于两者之间，左右为难，虽心向主战，但力不从心，又有太上皇的影响。直到隆兴二年四月，宋孝宗终于倾向主和。将主战派首领张浚罢职。八月，张浚病逝。张浚被罢去世后，汤思退等主和派得势，宋孝宗最后决定向金求和，派魏杞身带国书去金和议。宋孝宗规定向金和议的条件是：“一正名，二退师，三减岁币，四不发归附人。”十月，金再次南侵，兵临长江。在金武力威胁下，宋孝宗于十一月再次派人使金求和，降低了条件。经过讨价还价，达成如下和议：宋不再向金称臣，而是称侄；改“岁贡”为“岁币”，宋向金银、绢比前各少纳5万；宋割商(陕西商州)、秦(甘肃天水)地区，宋、金划界与绍兴和议相同；宋遣返战俘，但归附者不遣。乾道元年(1165)正月初，宋又遣魏杞等带国书至金，完成了和约一切手续。这便是宋金隆兴和议。由于最后完成和约手续在乾道元年，宋人又称之为“乾道之盟”。隆兴和议后，宋、金双方都无暇发动大规模战争，从此又进入30年相对和平阶段。（顾全芳）

任得敬分国

夏仁宗乾祐元年(1170)时外戚任得敬专权图谋分国的事件。

任得敬(？—1170)，原为宋西安州(宁夏海原西)通判。夏大德三年(1137)崇宗乾顺攻西安州时出降，受命权知州事，献女予崇宗为妃，被擢为静州防御使。次年，其女被立为皇后，又升静州都统军。仁宗继位后，大庆元年(1140)夏州统军萧合达据城叛，围西平府(即灵州，今属宁夏灵武)，攻陷盐州(陕西定边)。任得敬请兵讨伐，袭取夏州(陕西靖边)，进攻盐州，平灭萧合达。旋授翔庆军都统军，封西平公。大庆四年因灾荒无食，威州(宁夏同心)、静州(宁夏灵武)、定州(宁夏平罗)等地党项族人民举行起义，郡县告急。仁宗派任得敬率兵镇压，杀起义首领哆讹。大庆四年(1147)任得敬上表请求入朝，因御史大夫热辣公济等恐其干预国政，提出反对，未得仁宗允准。天盛元年(1149)以金珠贿晋王察哥，使进言于仁宗，终被召入朝，任尚书令。任得敬渐尊宠用事，次年为中书令。八年察哥死，得敬晋为国相，权势更重，以弟任得聪为殿前太尉，任得恭为兴庆府尹，兄弟把持朝政，凌虐异己。十二年晋爵为楚王，出入仪从几与皇帝同。后又晋为太师、上公、总领军国重事、秦晋国王，集军政大权于一身。任得敬见仁宗尊崇儒学，而儒学、儒士是其篡权的障碍，因借口儒学不适于西夏，上言请废学校。十七年任得敬欲使仁宗处瓜(甘肃安西)、沙(甘肃敦煌)，自己据灵、夏，于是役民夫10万，大筑灵州城，营造西平府，以翔庆军司所为宫殿。任得敬又密通南宋，约四川出兵夹攻西蕃，宋四川宣抚使虞允文派使者回报，得敬再派使人，其书信被夏逻者所获。仁宗疑其有异，密献于金。其女皇太后任氏对其恃权不法，屡次劝诫，不听。任太后于乾祐元年四月忧虑而死。五月，任得敬胁迫仁宗分国之半归其统治。仁宗无能为力，欲分西南路及灵州、啰庞岭(在甘肃凉州境内)归任得敬，并违心地上表于金，为任得敬请求册封。金世宗知此必权臣逼夺，非夏主本意，退还礼物，拒绝册封，而使任得敬分国阴谋未遂。任得敬求封不得，始有惧心，与弟南院宣徽使任得仁、殿前太尉任得聪等谋变。八月，仁宗在金国支持下，先捕杀任得仁、任得聪，旋又诛杀任得敬及其党羽，粉碎了篡权分国的阴谋。仁宗改元乾祐，任命蕃汉教授斡道冲为中书令，后升为国相，政局逐步稳定。（史金波）

卢沟桥的建造

金世宗和金章宗时期在永定河上所建的卢沟桥，在我国桥梁建筑史上占有重要地位。

据《金史・河渠志》记载："大定二十七年(1187)，以卢沟桥为往来津要，令建石桥。明昌三年(1192)桥成。"卢沟桥在北京西南郊，是出入京师南北大道的必经之地。世宗和章宗时所新建石桥为连拱式，长 212.2 米，加上两端桥堍共长 265 米，宽 8 米，计 11 个孔洞，在各孔关系上采用"连续桥"的结构方式，相邻的两孔都有一个共拱脚，使各拱结成整体。桥上每孔的承载，都有全桥各孔的支援，参与共同的支撑作用。在桥墩工程上，墩体前部采用"尖嘴"形，夏杀怒水，春击流凌，在我国桥梁史上是一种因地制宜的创造。桥石栏柱上，装有近五百个精雕细刻的石狮，形态雄健逼真。马可・波罗在其游记中曾称这座桥是"一座极美丽的石头桥"，"是世界上最好的独一无二的桥"。这座桥造型美观，坚实稳固，沿用至今。震惊中外的"卢沟桥事变"就是在这里发生的。

（高凯军）

庆元党禁

南宋绍熙五年(1194)六月，67 岁的太上皇宋孝宗去世，患有精神病的宋光宗拒不执丧。七月初，枢密使赵汝愚联络知阁门事韩侂胄等，乘机逼宫，迫使宋光宗退位，立光宗子嘉王赵扩为帝。是谓"绍熙内禅"。

宋宁宗赵扩(1168—1224)即位后，赵汝愚升迁右丞相，韩侂胄仅迁宜州观察使。韩侂胄(1152—1207)，字节夫，河南安阳人，北宋名相韩琦曾孙，宋宁宗韩皇后叔祖，遂为外戚。韩侂胄自谓立赵扩为帝有功，对现职位不满，力争权位，渐与赵汝愚不和，阴谋斥逐赵汝愚。韩侂胄拢络对赵汝愚不满的京镗等人，控制言路，并使宋宁宗对其"托以腑肺，信而不疑"。十一月末，韩侂胄升为都承旨，权位日高。不久，韩侂胄指使李沐弹奏赵汝愚，以赵汝愚与赵宋皇帝同姓而居相位，对社稷不利为由，要求罢去赵汝愚。对赵汝愚日益不满的宋宁宗，遂将赵汝愚罢相。赵汝愚被罢后，韩侂胄权势更盛。

韩侂胄的所作所为，遭到朱熹、彭龟年等许多朝野人士的反对，韩侂胄逐一打击所有反对人士，渐成党祸。首遭迫害的是朱熹。朱熹(1130—1200)，字元晦、仲晦，号晦庵、晦翁，江西婺源人。绍兴十八年进士，集理学(亦称道学)之大成，创程朱学派，为宋以来最有影响的大思想家。十月，韩侂胄指使伶人扮演儒生，在宋宁宗面前欺辱朱熹。韩侂胄则对宋宁宗说朱熹"迂阔不可用"。宋宁宗即罢去朱熹待制兼侍讲之要位。不久，年近 70 的朱熹被贬而弃政讲学。庆元六年(1200)年病死。死后，无人敢为朱熹写行状。其次受打击的是吏部侍郎兼侍讲彭龟年。彭龟年弹劾韩侂胄"假托声势"，"窃弄威福"，被韩侂胄贬逐出京。接着，陈傅良、刘光祖等被罢官。

庆元元年(1195)二月赵汝愚被罢相后，凡认为不当罢赵汝愚相位者，都被贬逐。四月，太学生杨宏中等六人联名上书宋宁宗，力陈罢赵汝愚相是"小人中伤君子"，杨宏中等被押送 500 里外编管，时称"六君子"。六月，韩侂胄宣布理学为"伪学"，凡是理学家以及与理学无关、但同情或支持过赵汝愚的人，都被称为"逆党"。韩侂胄列出"伪学"、"逆党"名单，一一贬逐。庆元三年(1197)冬，又将"伪学逆党"刊布于世，共 59 人。这 59 人皆遭打击迫害。其中有赵汝愚、留正、周必大等正副宰相 4 人，朱熹、彭龟年等大臣 13 人，吕祖俭、叶适等文官 31 人，蔡元定等文士 8 人，武臣 3 人。更有甚者，凡是与这 59 人有牵连者，一律不许做官，不准应举入仕。史称庆元党禁。

尽管庆元党禁压迫极严，但难以清除赵汝愚、朱熹的政治思想影响。直到嘉泰二年(1202)，韩侂胄为巩固其权力，发动对金战争，才将庆元党禁取消弛禁。党中人已死者追复官职，生还者相继复官。是可谓平反昭雪。

（顾全芳）

开禧北伐

宋韩侂胄于开禧二年(1206，金泰和六年)发动的大规模北伐金朝。

南宋自韩侂胄为相后，对金采取较为强硬的态度，宋宁宗也不满于金的飞扬跋扈，支持韩侂胄对金采取行动。南宋辛弃疾、叶适等，支持朝廷北伐金朝。辛弃疾(1140—1207)，历城(山东济南)人，字幼安，号稼轩居士，一生以抗金恢复山河为志，著名词人，其词悲壮。曾于嘉泰四年(1204)见宋宁宗，将他了解的金国情况奏上，并认为"金国必亡"，应当乘机北伐，得宋宁宗、韩侂胄赏识，任辛弃疾为镇江知府。开禧元年(1205)七月，韩侂胄任平章军国事，总揽军政大权，"三省印并纳其第"。韩早就相信派到金朝的邓友龙的话，也认为"金国内弱，王师若来，势如拉朽"。为北伐金朝，韩侂胄在做种种准备，包括将秦桧"改谥缪丑"，贬低秦桧，以示自己主战。

金探知宋准备北伐，也加强了战备，派丞相仆散

揆将金兵结集于开封。开禧元年末，宋宁宗故意改期接见金使者，两国关系紧张表面化，金更加提高警惕。开禧二年四月，韩侂胄不宣而战，令宋军越过边界，打下了安徽北部及淮河流域的泗州（江苏盱眙）、新息（河南息县）、褒信（河南新蔡南）及虹县（安徽泗县）。宋军的胜利，冲昏了宋宁宗和韩侂胄的头脑。于五月公开下诏伐金。诏书中声称"匹夫无不报之仇"，"当念祖宗之忿"。下诏书后，等于向金公开宣战，因而又下令山东、京东招抚使郭倪，京西北路招抚使赵淳，陕西、河东招抚使吴曦，分路全面出击，进攻宿州（今属安徽）、寿州（安徽凤台）、唐州（河南唐河）、蔡州（河南汝南）等金占之地。早有准备的金兵，在宿州、寿州、蔡州、唐州等地，轻而易举地击败或击溃了宋军的进攻。宋军败后，宋把苏师旦等做替罪羊，非杀即贬。十月，金展开全面反击，10多万金兵分9路南下攻宋。当月，金兵渡过淮河，包围楚州（江苏淮阴）。十一月，金军进围和州（安徽和县），兵至长江北岸，同时，金攻破河南信阳、湖北随州等地。十二月，金攻陷六合（今属江苏）、真州（江苏仪征）和滁州（今属安徽）等地，长江北岸的士民"奔逃渡江者十余万"。至此，开禧北伐宋军全线溃败，金兵临长江中下游，"广为渡江之势"，以渡过长江来威胁宋朝，要宋"奉表称臣"，屈膝求和。

这次开禧北伐，由于宋宁宗及韩侂胄在战争中不够坚决，多数将领出汗不出血，应付观望，加上"聚财募卒"时间仓促，因而多为金所败，只有毕再遇率领的一支宋军，能以少胜多，连连获胜。毕再遇，字德卿，岳飞部将毕进之子，山东兖州人。宋军攻打泗州时，毕再遇尚是低级军官。他组织敢死队守城。在灵璧（今属安徽），毕再遇手舞双刀杀入敌阵，直杀得自己的战袍被敌人的血染成红色。金将挥舞双铁锏来战，毕再遇"以左刀格其锏，右刀砍其胁，金将随马死"。毕再遇不但作战勇敢，而且很有谋略。他曾扎了几千个稻草人，穿宋军衣服，手持戈矛，与真人一般，列阵鸣鼓。金人赶快放水以淹宋军，却不知全是假的。毕再遇乘机带领真的宋军向金兵冲杀，金兵面对从天而降的突然袭击，晕头转向，大败而退。还有一次，毕再遇与金人战，佯败而退，如此者多次，天近黄昏，毕再遇把香料煮过的豆撒在路上，再战后又佯败退。金兵追到，其战马奔驰了一天，已饿极，闻到香味，都低头只顾吃豆，打也打不走。毕再遇又乘机反戈一击，结果将金大批人马杀死。更有一次，金人多马众，毕再遇难以取胜，只得转移。转移时，宋兵尽走，却在营中留下旗帜等，并将不少羊捆住，让羊的两只前脚放在战鼓上击鼓。金兵远望，只见宋旗仍在，且闻有击鼓之声，不敢贸然进攻。待到金侦察清楚是空营，金兵赶快追击，毕再遇军早已不知去向。智勇双全的毕再遇，还曾巧计守六合（今属江苏），解楚州之围，成为南宋名将。开禧北伐后，别的将领多受处分，唯毕再遇越级升任为镇江都统制兼权山东、京东招抚司事。

正是由于毕再遇等的顽强抵抗，又因为金军主帅因病、死等原因而三易其人，金兵始终未能越长江，只是以过江相威胁。开禧三年十一月，韩侂胄被杀，宋向金签订了屈辱性的嘉定和议，开禧北伐以大规模伐金始，以向金乞和终。（顾全芳）

吴曦叛立

南宋吴曦于开禧三年（1207，金泰和七年）初叛宋降金，自立蜀王。

南宋开禧二年三月，韩侂胄分路大规模北伐金朝，任命吴曦为四川宣抚副使兼陕西、河东招抚使，负责指挥陕西方面的对金进攻。吴曦（1162—1207），顺德军陇干（甘肃静宁）人，抗金名将吴璘之孙。吴家"世袭兵柄"，号称吴家军，长期在四川、陕西西南部地区，是地方军阀实力派。南宋朝廷认为"吴氏世掌西兵，非国家之利"，想将吴氏军权夺归宋中央掌握。绍熙四年五月，吴曦之父、利州安抚使吴挺去世，宋朝乘机派人代替吴挺，将吴曦调离四川，任命吴曦为殿前副都指挥使。吴曦在临安（浙江杭州）闲住，"郁郁不得志"，实在想返回四川，掌握吴家军军权。他用贿赂的手段，买通了掌握宋廷实权的陈自强等人，让陈自强去求告韩侂胄，说吴曦可以返回四川。韩侂胄任命吴曦为兴州都统制，吴曦终于在嘉泰元年回到兴州（陕西略阳）。到兴州后，吴曦又用秘密告状的手段，将副都统制王大节排挤出兴州，掌握了兴州军政大权。

开禧二年吴曦为四川宣抚副使后，受命进驻河池（陕西凤县西南），带兵6万，还可以继续管理地方财赋，使吴曦军力、财力大增，根本不把四川宣抚使程松放在眼里。有人曾告诉程松说，吴曦"必误国"，但程松置之不闻。吴曦到河池后不久，就与其党徒秘密商量谋反事宜，派幕僚姚淮源到金秘密联系，表示愿以阶州（甘肃武都）、成州（甘肃成县）、西河州（甘肃西河）以及凤州（陕西凤县）共四州大片相连的土地，献给金朝，以求金承认并支持吴曦割据四川，封为蜀王。金当然十分愿意吴曦叛宋投金，所以很快责成完颜纲办理吴曦叛宋自立事宜。完颜纲为策应吴

曦，进兵到水洛（甘肃庄浪），任命吴曦族人吴端为水洛城巡检使，通过吴端送给吴曦金的诏书。金在诏书中说，吴曦"专制蜀汉，积有岁年"，但宋政府对你很不信任，使你"进退维谷"。你要想一想岳飞的下场：岳飞战功最大，还不是被冤杀？你能"因机而决"，叛宋自立，是"智者顺时而动"。只要你能按兵不动，"使我师东下，无西顾忧"，那么，不但四川归你所有，而且我朝对你"当加册封"，封你为蜀王。如果你能配合我们顺长江东下，攻打宋朝，那么你所攻下的地方，归你所有。吴曦得到金的保证后，求封心切，完全按金的要求办，在河池按兵不动。韩侂胄已在江淮向金发动进攻，迫切希望西线吴曦立即进兵，接连派人催促。吴曦为遮人耳目，假装派兵前进，韩侂胄、程松等蒙在鼓里。

开禧二年九月，金在得吴曦答应配合金兵行动后，进攻和尚原（陕西宝鸡南），吴曦的部将王喜等不知道吴已与金勾结，正在卖命苦战，吴曦赶紧命令王喜等撤退，结果宋军溃败，金从西河州进入成州。吴曦一把火烧掉河池城后，退到青野原（陕西略阳北）。金进兵沔州（陕西略阳），吴曦命宋军撤退。在沔州，金派人私会吴曦，将金的册封诏书、金印等交给吴曦，立为蜀王。吴曦则"献蜀地图及吴氏谱牒于金"，并商定吴曦出兵10万东下，配合金攻襄阳（湖南襄樊）。开禧三年正月，吴曦引金兵入凤州，四州之地尽为金所占有。正月十二日，吴曦以兴州城为行宫，公开正式称蜀王，"改元，置百官"，向金称臣。并派人到成都修筑宫殿，准备迁居。吴曦叛立，吓跑了程松。二月，宋派杨辅为四川制置使，意欲处置吴曦。杨辅也是个胆小鬼，他弃官从成都逃跑。但吴曦之叛，不得人心，军民纷纷反对。杨巨源首先起来谋讨吴曦，他秘密联络吴曦部将张林等人，准备举事。同时，李好义等数十将士也在谋划杀死吴曦。杨巨源与李好义、李贵等共同商定了推翻吴曦的办法。

开禧三年二月二十九日深夜，李好义率领74名士兵，闯进吴曦的"宫廷"，大声宣布说：奉朝廷圣旨，我来杀吴曦，有敢反抗者，格杀勿论。吴曦的卫兵听到是宋朝皇帝的圣旨，不敢违抗而鸟兽散。杨巨源则自称是宋使者，找到吴曦。吴曦知大事不妙，欲开门逃跑，李贵拦住去路，将吴曦活捉，命人用斧砍头而死。吴曦叛立称蜀王仅41天。之后，吴曦让于金的四州之地，亦为李好义等收复还宋。　（顾全芳）

嘉定和议

嘉定元年（1208，金泰和八年）宋金最后一次签订和约。

开禧二年（1206），宋北伐金朝败多胜少，金兵临长江。年末，金仆散揆曾派人至宋，透露愿与宋"通和罢兵"之意。发动北伐的韩侂胄在战场上失败，当然愿意与金罢兵讲和，便派人至金兵营，表示愿"讲和息兵"。仆散揆接见来使，提出讲和的三项条件：称臣、割地、要韩侂胄的脑袋。韩侂胄得知金竟然要以处死自己作为讲和的条件，自然火冒三丈。这位时和时战的宰相，于开禧三年二月任命叶适为江淮制置使，意在加强抗金领导，向金表示决不让步。叶适（1150—1223），浙江温州人，字正则，世称水心先生，进士出身，哲学家，永嘉学派台柱；力主抗金，开禧北伐时，曾因战胜而有功；任江淮制置使后，在江淮地区练兵、屯田、修筑工事，防备金再犯。无巧不成书，同年二月，仆散揆病死于金营中。韩侂胄以为从此可以保住脑袋，便于四月派方信孺到金营讲和。方信孺到达濠州（安徽凤阳），被金关进监牢，以死相逼，要方信孺同意金提出的讲和条件。这次的条件，不但保留上次的割地、称臣、要韩侂胄首级三条，反而增加了遣返金俘、增加赔款两条，变成五条。方信孺倒挺硬气，他置生死于度外，对金说：遣返金人，可以；赔款，也可以；但要送韩侂胄脑袋给你们，从古到今没有这种先例。称臣、割地，我不敢答应。金方火了，威胁方信孺：你不想活着回去了吧？方信孺回答：我奉命踏出国门，就不想活着回去了。方信孺被解送到开封去见宗浩。宗浩坚持讲和五条件，方信孺也寸步不让。金方无奈，只得放还方信孺，并且对方信孺说，战与和，你回去等决定后，可以再来谈判。方信孺回国后，又立即奉命到开封再谈。宗浩一听方信孺说宋仍难同意割头、割地，就火了，说你回国后为什么不把金方的条件讲清楚，讲出理由，我这次一定不会放过你。方信孺面不改色地说：我这次来实在是不想活了，你杀了我吧；你们"得此求彼"，没完没了地增加和谈条件，我只能一死了之。金方又无奈，只好将方信孺放还宋朝。一回宋，韩侂胄就问方信孺谈判得如何？方信孺回答说，金要求有五项，"一割两淮，二增岁币，三索归正人，四犒师银"，至于第五项，我不敢说。韩侂胄再三追问第五项是什么，方信孺一字一句地说：要你的头！韩侂胄大怒，将方信孺降官。其实，方信孺三次使金，临危不惧，不辱使命，倒值得称道嘉奖。

韩侂胄与金和战相替，使宋朝内部求和投降派势力抬头。宋宁宗皇后杨氏，因遭韩侂胄反对立为皇后，欲报此仇，与其兄杨次山密谋搞掉韩侂胄。杨氏

兄妹串通礼部侍郎史弥远等，先后向宋宁宗上告造舆论，说韩侂胄对金用兵"不利于社稷"，"中外忧惧"，要宋宁宗诛杀韩侂胄。宋宁宗初不同意，后又默许。史弥远得知宋宁宗态度后，立即组织实施暗杀韩侂胄。开禧三年十一月初三，韩侂胄早朝，坐轿至杭州城内六部桥，被夏震所率伏兵劫持至龙山之北玉津园夹墙内，当即杀害。韩侂胄被害后，其他文武大臣多被贬逐。

嘉定元年(1208)三月，史弥远等为向金乞和，打开韩侂胄棺盖，取其首级，同李师旦首级一并送给金廷。金得首级后，悬挂示众，随即撤兵。宋金又一次议和。这次嘉定和约，比前几次和约对宋更为不利，更加屈辱。和约规定除将韩侂胄首级送金外，宋与金由侄叔之称改为侄伯之称。向金纳贡增至每年币、绢各30万两、匹，并须一次性赔款(犒军钱)300万两。嘉定和议后，史弥远把持南宋大权达26年，南宋内政外交每况愈下。 (顾全芳)

金宣宗南渡

金贞祐二年(1214)，金宣宗完颜珣迁都之举。

13世纪初，崛起于北方草原的蒙古部落在成吉思汗的率领下频频向金朝发动进攻。他们先长驱直入中兴府，迫使西夏降服，消除了自己战略上的翼侧威胁，金大安三年(1211)二月便直接进攻金边防要地乌沙堡。时金朝最高统治者为庸懦无能的卫绍王，他被奸佞群小挟持，幻想以40万大军一战而灭蒙古。结果野狐岭一战，能征惯战的蒙古骑兵歼灭金军主力，乘胜攻克北疆诸州县，十月更包围金中都(北京)。此后，金人虽能固守中都，但蒙古军频频南下牧马，蹂躏黄河以北的广大地区，中都城濠之外时时可以看见敌军出没。

金至宁元年(1213)八月，中都城中发生争夺皇权的政变，卫绍王被杀，世宗孙完颜珣被迎入继位称帝，是为金宣宗。宣宗继位后，立即向蒙古求和，献纳童男童女、绣衣御马和金银珠宝等，并许把岐国公主献给成吉思汗。当时成吉思汗热衷于掠夺人民、财货，尚无意在中原建立统治，欣然允诺退兵。但中都以北皆处在蒙古军占领之下，金朝政权仍有随时被消灭的危险。

宣宗不思振作，也没有信心围绕着中都建立起一道坚固防线，遂以中都乏粮，而南京(开封)有黄河、潼关之险为由，积极主张南迁。统治集团内部的一些有识之士不赞成此举。他们认为宗庙、社稷皆在中都，且有居庸险关可依，固守京师乃是上策。河南地狭土薄，又受宋、西夏威胁，并不可去。更重要的是，中都乃天下民心所系，车驾一动，北路就都要失守。所以，百官士庶都不同意在大敌当前时，采取这种瓦解军心民心的措施。太学生赵昉等400人联名上书，陈述利害，宣宗一概不听。

金贞祐二年(1214)五月，判南京留守事仆散端等连上三表，请迁南京，宣宗之意乃决。十一日，他任完颜承晖为尚书右丞相兼都元帅、抹燃尽忠为左副元帅，与太子完颜守忠驻中都，旋自领文武百官，捆载内府珠宝、宫廷文书匆匆南去。七月，闻蒙古军南下，又把驻中都的太子召到南京，显露出他已经彻底放弃中都的态度。

宣宗南迁后，官兵齐集地域狭小的河南，进一步激化了社会矛盾，山东、河北一带广大农民纷纷起来反抗其腐朽统治。蒙古铁骑相继践踏中都和辽东地区。金朝灭亡之期已不远了。 (刘 庆)

红袄军起义

金末山东、河北等地反金抗蒙的农民大起义。因起义军以身穿红袄为标志而得名。

自1115年阿骨打率女真族众在反抗辽朝民族压迫的斗争中建立女真奴隶制国家以后，其势力日益发展，灭辽之后，又进一步扩大战火侵占了原北宋王朝所辖的中原地区。在侵占中原地区的过程中，烧杀抢掠自不待言，女真奴隶主贵族为了加强对中原地区的统治，自金熙宗时起曾三次大规模地将女真族猛安谋克屯田军南迁，主要分布在山东、河北等地，把战俘分给各猛安谋克户当奴隶，将战乱中出现的荒地和掠夺当地农民的土地分给猛安谋克户进行奴隶制经营。金熙宗、海陵王和金世宗统治时期虽然也进行了一些封建化改革，但掠夺土地、俘人为奴的现象始终存在，直到金章宗、宣宗时期，统治集团为了维护猛安谋克屯田军的经济基础，还在顽固地推行"括地之议"，掠夺广大农民的土地归猛安谋克户所有。因此，整个金代民族矛盾、奴隶主和奴隶的矛盾以及地主和农民的矛盾交织在一起，呈现出异常尖锐复杂的特点。中原地区的广大农民反抗民族压迫、反抗奴隶制、反抗地主阶级残暴统治的斗争一直也没有停止。

金宣宗贞祐二年(1214)，蒙古军进攻中都(北京)，金朝统治集团退往南京(河南开封)。此时，深受女真奴隶主贵族"括地"之害而失去土地的农民，特别是山东、河北地区的农民乘机奋起反抗，很多沦为女真奴隶主的"驱奴"的农民也纷纷参加起义。其中

规模最大、时间最长、影响最深的是山东、河北以及淮河地区以杨安儿为首的红袄忠义军的反金抗蒙起义。这一起义军主要由四支力量组成：一是在鲁东青、潍、莒、密诸州一带的起义军，由杨安儿领导；一是在鲁南沂蒙山区一带的起义军，由刘二祖领导；一是在山东中部安丘、临朐一带的起义军，由李全领导；一是在河北深、祁一带的起义军，由周元儿领导。他们虽活动于不同地区，但共同目标都是反抗金朝统治，以后蒙古兵侵入河北、山东时，也进行了抗蒙斗争。这几支起义军为了便于识别和联系，都穿红色衲袄，因此称为红袄忠义军。各路起义军转战山东、河北以及河南、江苏等地，所到之处沉重打击了猛安谋克村寨和金朝的官府，受到各地广大农民的拥护。

杨安儿部所向披靡，先后攻占了山东莱州、登州、邹县、宁海、潍州、密州、沂海等地，并建立起反金政权，设置官吏，建元天顺。金朝调集陕西等地的猛安谋克军和残暴的“花帽军”前往镇压。杨安儿在敌我悬殊的情况下，乘船向即墨转移，途中在岠嵎山遭受金朝贿买的奸细舟人曲成暗算，坠水牺牲。所部由其四妹杨妙真率领转战莒县磨旗山（山东莒县东南马鬐山）与李全军会师，杨妙真与李全结为夫妇，两军合并。后又转战到江淮地区，拒绝金朝诱降，决心“宁为江淮鬼，不为金国臣”，继续同金军作战。兴定三年（1219）金军副元帅仆散安贞率金军南侵时，李全率所部在涡口（安徽怀远北）等地大败金军，使之“不敢窥淮东”。这次胜利后，李全、杨妙真投南宋，接受了南宋的封号和任命。此后，李全占据益都，发展个人势力，加害于一些义军首领，削弱了起义军的力量。宋绍定二年（1226）9月，蒙古军围益都，李全在城破后投降，后奉蒙古统治者指使率部抵扬州，进攻南宋。绍定四年正月，李全与宋将赵范、赵葵战于扬州城下，兵败被杀。杨妙真不知所终。31年之后，杨妙真之子李檀又在山东、河北一带组织抗蒙队伍，控制了北到无棣、滨州，南至涟水的广大地区。后来，李檀在济南受蒙军围困，城破战死。

刘二祖率所部于贞祐三年（1215）与金军战于沂蒙山区大沫涸（山东费县西南），被俘牺牲。所部由彭义斌率领转战山东、河北，起义军发展到几十万人，成为金军和蒙古军的劲敌。正大二年（1225）彭义斌在五马山（河北赞皇）与蒙古军交战时，兵败牺牲。其余各部红袄军仍分散在各地活动，在金军和蒙古军的打击之下，相继失败。

红袄军的反金抗蒙起义历时50多年，起义范围自山东益都、青、莱一带发展到冀豫以及江淮地区，沉重打击了金朝女真统治集团在北方地区的残酷统治，加快了金朝的灭亡；在反抗蒙古军入侵中原的斗争中也表现了英勇不屈的气概。　（高凯军）

枣阳之战

宋金于嘉定十二年（1219，金兴定三年）在枣阳最后一次大规模战争。

宋金自宋嘉定元年订立和约后，有多年的和平局面。嘉定七年，金在蒙古的逼迫下，迁都开封（今属河南）。宋眼看金国势渐弱，于嘉定七年罢去给金的岁币，金曾派人至宋催要。金所占黄河以北地区被蒙古占领后，感到难以生存发展，金宣宗认为只有向软弱可欺的南宋进军，“以扩疆土”，才是上策。嘉定十年四月，金以宋不交岁币为由，分路南进犯宋。五月，金兵中路犯枣阳（今属湖北）、襄阳（湖北襄樊）。宋京湖制置使兼知襄阳府赵方主张坚决抵抗。赵方，潭州衡山（今属湖南）人，进士，文官。在京西路（今湖北北部、河南南部）抗金守边十年，有功。名将扈再兴、孟宗政等，多为其提拔。赵方一面向宋廷上抗金疏，一面组织兵马抗金。赵方亲至襄阳，通知扈再兴、孟宗政等加强防御。金兵至襄阳城外，宋军以扈再兴、孟宗政、陈祥各领一军布阵，设下埋伏。金兵至，扈再兴接战，佯败，金兵紧追，进入宋伏击圈，孟宗政、陈祥军从左右包围金兵，扈再兴返回迎战。金三面受敌，大败，“血肉枕藉山谷间”。金兵败退后，孟宗政立即支援被金包围的枣阳城。孟宗政率领宋军以“驰突如神”的速度，赶到枣阳，金兵惊骇，以为是神兵天降，不战而逃。不久，在光山（今属河南）、随州（今属湖北）的金兵也被击退。六月，宋宁宗听从赵方的建议，下诏全国讨伐金朝。诏书中有“狐兔失其故穴，人竞逐之”之句，意为金被蒙古打得失掉老窠，应当乘机消灭它。

嘉定十一年二月，金完颜赛不又犯随州、枣阳。自去年解枣阳之围后，孟宗政被赵方任命为知枣阳军，领导枣阳军民抗金。孟在枣阳修堤筑城，整训军士。金兵围困枣阳时，孟宗政同扈再兴两军合作抗敌。经过大小70多次战斗，孟宗政身先士卒，最后出城将金兵击溃。西路金军在西北战场却胜多败少。金乘西北战场胜利之机，想与宋停战讲和，以图生存。宋拒绝接见金使者，无意和谈。金宣宗没有想到宋朝竟会一反常态，对金取强硬立场。在北有蒙古、南有南宋的夹缝中，金还是选择了弱者作为攻击目标。嘉定十一年末，金宣宗决心孤注一掷，倾全国之力，分兵三路，以仆散安贞为统帅，再度南下。西路军进占

凤州(陕西凤县)、兴元府(陕西汉中)等地后败退;东路军长驱至杨林渡(安徽和县)兵临长江后败退。中路军仍进军枣阳,并在枣阳激战。

进犯枣阳的金中路军,由完颜讹可率领,于嘉定十二年二月包围枣阳城,并在城外筑土墙,以断绝城内外联系。赵方看到金重兵包围枣阳,金后方一定空虚,便来了个围魏救赵的战术。赵不急于救枣阳之危,而是派许国及扈再兴领兵3万,分两路攻打枣阳以北金后方的唐州(河南唐河)和邓州(今属河南),焚金粮食,断金退路。在枣阳城内的孟宗政已有备无患,他用沙袋护城,并积水以防火攻,在城上架起了火炮,一炮可以杀伤金数人。金以骑兵攻城,架云梯,搭天桥,带弓箭爬上城头。宋军勇士则以长枪强弓对付,金军难以进城。金军开始挖地道,企图从地道内入城。宋军则"挖深坑防地道",挖到地道后,便向地道内放毒烟,金兵仍不得入。城楼被金兵攻陷,孟宗政干脆下令将城楼烧掉,外加木柴,形成火墙。金兵仍不退,穿上湿衣扑火攻城。宋军在城上顽强抵抗,在城下与金兵肉搏,上下夹击,终于击退金的轮番进攻。金兵多被摔死、烧死。金兵进攻枣阳近三个月,终难得手,又听说后方邓州、唐州吃紧,士气不振。赵方估计消灭金兵时机已到,便调许国、扈再兴两军兵还枣阳。宋生力军赶到,两次击败金兵。孟宗政知扈再兴率军来援,打开城门,领兵出击。内外宋军与金军在城外大战,从黄昏一直杀到三更,金军抵抗不住,大败,死伤3万余,损失器甲无数。完颜讹可只身骑马落荒而逃,幸免于死。宋军追击,一直追到邓州而还。时为七月炎夏。十月,赵方令扈再兴、许国、孟宗政率军三路北上伐金,但战果不著。枣阳之战系宋金最后一次大规模战争。自枣阳战败后,金更伤元气,再也不敢进犯襄阳、枣阳,也难于组织大规模攻宋,实际上由进攻转入防守,"更不南侵"。15年后,蒙宋联合消灭了金。　　(顾全芳)

九公封建

金朝末年,崛起于漠北草原的蒙古骑兵频频南下,攻略金国疆土。金军腐败不堪一战,朝廷倚之守卫中都(北京)的乣军又投降蒙古,造成中都失守、统治中心被迫南迁的危急局面。但是,蒙古贵族挥师南下,残暴屠杀和掠夺当地人民,也极大地激化了民族矛盾,一些义军首领纷纷聚众把守堡寨,反抗蒙古统治,给善于野战奔袭,攻坚能力却不很强的蒙古军队以牵制。此时,金朝统治者自知再也无力与蒙古军野战阵斗、以会战决定胜负,转而打算靠长期据守城池堡寨消耗对方。为达到这个目的,一些臣僚纷纷上书,建议在河朔诸州推举其长,保聚险阻,招纳北方地主阶级抗蒙势力,保护金朝统治的中心区域。

金兴定四年(1220)二月,宣宗封沧州经略使王福为沧海公、河间路招抚使移剌众家奴为河间公、中都西路经略使靖安民为易水公、辽州从宜郭文振为晋阳公、真定经略使武仙为恒山公、中都东路经略使张甫为高阳公、平阳招抚使胡天作为平阳公、昭义军节度使完颜开为上党公、山东安抚副使燕宁为东莒公。诸公拥有统辖本路兵马,委派官吏,征敛赋税,赏罚号令之权,若能收复非自己所管邻近州县,亦听其治理,俨然是称霸一方的地方割据政权。

"九公封建"在当时确实起到了一定的稳定战局的作用,对金朝廷保住自己摇摇欲坠的统治有利。但也由此造成中央权力被分割,破坏了抗蒙斗争的统一性。九公相互争夺,甚至有人降蒙充当攻金的先锋部队,这也是金宣宗及其臣僚始料所不及的。

(刘　庆)

蒙古灭夏

13世纪初,蒙古军经多次征伐,最终在1227年灭亡西夏的事件。

西夏晚期,统治者越加腐败,提倡儒学,崇信佛教,武力削弱,皇室废立频繁,国力衰微。蒙古于1206年由首领成吉思汗统一各部,势力渐强。西夏是蒙古攻击金、宋,进据中原的必经之地,成吉思汗多次兴兵伐夏。

早在夏天庆十二年(1205)蒙古军首次侵夏,破力吉里寨,蹂躏瓜(甘肃安西)、沙(甘肃敦煌)等州,掠落思城。应天二年(1207),蒙古闻西夏襄宗安全废主自立,派兵来征,取兀剌海城(内蒙古乌拉特中后旗),襄宗集右厢诸路兵抗拒,成吉思汗见夏国兵盛,粮匮而还。四年,蒙古欲伐金,恐夏为金后援,先举兵出黑水城(内蒙古额济纳旗)北,入河西。襄宗遣世子承祯为主将,以大都督府令公高逸为副元帅督兵5万抗御,大败,高逸被俘,不屈而死。蒙军又围兀剌海城,守将出降,夏太傅西壁氏巷战被俘。七月,攻夏中兴府(宁夏银川)外卫克夷门,襄宗遣嵬名令公率兵5万守拒,始击败蒙军,后相持两月,夏军守备渐弛,蒙古主设伏兵诱夏军,破克夷门,进围中兴府。襄宗亲督将士守御,蒙军不能破。时大雨,河水暴涨,成吉思汗令以水灌城,居民溺死无算。襄宗向金求援,不应。后河水入蒙军营,遂解围,襄宗纳女请和。皇建元年(1210),襄宗因金不发兵救援,遣兵攻金。神宗遵

项即位后也多次攻金。光定六年(1216)神宗联蒙古兵攻金延安府(陕西延安)及代州(山西代县),遂破潼关。蒙古对夏征发日多,夏不堪奔命,渐有不满,成吉思汗怒,渡河来攻,包围中兴府。神宗命太子德任居守,自己出走西凉(甘肃武威),后遣使请降,蒙古兵退走,神宗还都。随即又与金交兵多年,并联宋攻金。十一年蒙古将木华黎率军入西夏,河西诸堡悉降,神宗惧,使5万兵属之,后又遣兵将与蒙军攻金绥德州(陕西绥德)。十二年夏河西将野蒲井卜叛降蒙古。十三年神宗遣将率师10万从蒙古将木华黎围金凤翔(陕西凤翔),知不能克,不告而先引退。蒙古恶西夏无礼,遣将攻夏积石州(青海循化),后退兵。夏神宗复集兵欲攻金巩州(甘肃陇西),御史中丞梁德懿上言,指出西夏用兵十余年,田野荒芜,民生涂炭,国势濒危,望神宗抚恤黎庶,修睦邻邦。神宗不听,罢其官。不久,惧蒙古势传位于次子献宗德旺。乾定元年(1224)献宗结漠北诸部兵以拒蒙古。五月,蒙古兵围沙州,夏将籍辣思义坚守,后蒙军破夏银州(陕西米脂),夏献宗用右丞相高良惠谋遣使与金修好,又闻银州失守、漠北诸部散去,遣使至蒙古军前请降,使沙州解围,并许以质子为信,后又不遣质子。二年夏收纳蒙古仇乃蛮部赤腊喝翔昆,成吉思汗怒,三年亲将兵10万来攻破夏黑水城,死者数万。五月,又攻肃州(甘肃酒泉),守将坚守,蒙古谕降,不听。肃州大户举立沙举城出降,城破屠城军民。六月,蒙古攻甘州(甘肃张掖),成吉思汗遣使谕降,守将曲也怯律欲降,副将阿绰等36人合谋杀使者及曲也怯律,拚力抵抗,城破皆死。七月,蒙古破西凉府,献宗忧悸而死,南平王睍即位。八月,成吉思汗率兵至黄河九渡,攻破应里(宁夏中卫)等县。十月,蒙古兵破夏州(陕西靖边)。十一月,蒙古攻灵州(宁夏灵武),夏主遣大将嵬名令公以10万众救援,蒙古军渡河邀击,遂取灵州。宝义元年(1227)三月,蒙古破沙州。五月,蒙古遣使谕降。六月,夏主睍率文武臣僚奉图籍出降,蒙古军执归,至萨理川因成吉思汗卒,蒙军诸将恐为变,杀夏主睍。西夏自景宗立国共历10主,经190年,最后终为蒙古所灭。　　(史金波)

端 平 入 洛

宋蒙于端平元年(1234)在河南洛阳首次大战。

宋绍定五年(1232),蒙古派人到宋,建议蒙宋联合攻金。宋朝廷上下多认为灭金报仇时机已到,赞成联合攻金。只有赵范认为这是宋金海上之盟那样引狼入室。宋派史嵩之入蒙,同意联合攻金;灭金后,河南之地归还南宋。绍定六年四月,宋金战争爆发,年底,宋蒙联合攻金于蔡州(河南汝阳)。端平元年(1234)正月,蔡州被攻破,金哀宗自杀,金亡。

宋蒙联合灭金后,两国立即出现了裂痕。蒙古不想归还已占的河南之地,仅以陈州(河南淮阳)、蔡州以南之地属宋所有。当时,宋慑于蒙古军威,只能忍气吞声。蒙古军开始从河南北撤。南宋的赵范、赵葵等异想天开,竟主张乘蒙古军北撤之际,出兵收复河南三京(开封、洛阳、商丘),从而"抚定中原"。宋理宗在没有任何军事准备的情况下,草率下诏北进,燃起了宋蒙之间的首次战火。

端平元年六月十二日,宋将全子才奉命率淮西之兵万余,从庐州(安徽合肥)北上开封,二十四日进据亳州(今属安徽),七月初五进兵开封。蒙古守军李伯渊杀死崔立,献开封城降宋。赵葵也率淮西兵5万,从滁州(今属安徽)出发,占领泗州(江苏盱眙)后于七月二十日到达开封,与全子才军会合。赵葵对全子才说:你在开封已经半个月,为什么不去打洛阳、潼关(今属陕西)?全子才说,因为粮草没有集齐,不能去。赵葵催促尽快动身。七月二十八日,宋军26000余进占空城洛阳。蒙军听说宋军已占领洛阳,便不再北撤,立即从陕州(河南陕县)东返洛阳,与宋军争夺洛阳等地。在洛阳东30里处,有宋军杨谊领万人,正要坐下吃饭,忽然见几里外有红黄凉伞立在那里,方知有蒙军,宋军惊骇,又忽然从草蒿中冒出蒙古伏兵,对未立阵的杨谊军冲击,杨谊军大乱而被击溃,逼进洛水而死者无数,杨谊只身脱险。当夜,宋逃卒入洛阳城,到处说杨谊军已被蒙古军打散,蒙古军已到洛水北岸。宋军听说后士气低落。

八月一日,蒙古军抵达洛阳城外安营扎寨。宋军徐敏子袭击蒙古军东西两寨,双方混战,互有胜负。由于后援不继,洛阳城内粮食奇缺,宋军先是吃野草,后来杀战马充饥。连日饥饿,宋军已丧失战斗力。蒙古军又以河水灌宋军,宋军被淹死者众。宋军无奈,只得放弃洛阳城,向东南方向撤退。蒙古军则乘机"纵兵尾击",将宋军打得落花流水,万余宋军所剩无几,监军徐敏子也中箭。在开封的宋军听说洛阳军败,不去救援,反而弃城南逃,攻占河南终成泡影。由于是在端平元年宋军入洛阳与蒙军战,所以史称端平入洛。

洛阳之战失败后,赵葵、全子才、徐敏子、杨谊等多被削职。蒙古方面对于端平入洛,则十分恼火,十二月,蒙古派人至宋,责问为什么要攻占开封、洛阳。宋无言以对,只得派人去道歉。蒙古军则以此为借

口，于宋端平二年夏分三路南下。七月，蒙中路军占领唐州（河南唐河），十月攻下枣阳（今属湖北），第二年三月占领湖北重镇襄阳。东路蒙军则一直打到光州（河南光山），向合肥、滁州进军。西路蒙军从凤州（陕西凤县）直入四川。此后蒙宋争战连年。端平入洛，宋不但未占到便宜，反而丧失大量人力、物力，蒙古军一直打到长江北岸，占领南宋之地。

（顾全芳）

余玠守蜀

南宋名将余玠淳祐三年（1243）治蜀抗蒙。

南宋自端平元年兵败洛阳后，蒙古军反守为攻，兵分三路犯宋。西路蒙军于端平二年（1235）入蜀，年底，蒙古军攻下沔州（陕西略阳），次年九月入兴元府（陕西汉中）后长驱进入四川，四川大部为蒙古军所占，后因蒙军主将阔出死于军中，入川蒙军才退出成都等地。宋嘉熙三年（1239），蒙军再次入蜀占领成都等地，遭孟珙所率宋军抗击后败退。淳祐元年（1241）十一月，蒙古军第三次入蜀攻占成都等地，次年又占领泸州、遂宁等地区。宋理宗感到四川连年为蒙古所犯，应以“救蜀为急”。

淳祐二年初，淮东安抚制置副使余玠知四川危急，便自告奋勇，请求入蜀抗蒙。二月，宋理宗任命余玠为四川安抚制置使兼知重庆府，全权负责四川的军政事务，并答应余玠可以“先行后奏”。余玠，字义夫，湖北蕲春（一说江西修水）人，家贫，少读史书，后投赵葵从戎。赵葵赏识余玠，余玠亦屡有战功。到四川前，余玠曾见宋理宗，对这位主战的皇帝说，现在还是重文轻武，对武人看不起，这怎么能使武人打仗救国？应当“视文、武之士为一”，文武并重，才能振兴国家。宋理宗认为余玠“人物议论，皆不寻常，可独当一面”，于是任命他去四川全权处理一切。余玠于淳祐三年初到达重庆，立即着手治理整顿，“大更弊政”，务使“拿全蜀还本朝”。在此之前，“蜀地破残，所存州县无几”，而且“荡无纪纲”，民不聊生。余玠仿诸葛亮治蜀之策，在重庆设招贤馆，招贤纳士，采治蜀良方。原来隐居播州（贵州遵义）的冉璞兄弟俩，文武俱备，听说余玠招贤，便来投奔。余玠热情接待。然而兄弟俩一住数月，一言不发，只是每日对坐，在地上画山川地形。之后去见余玠，对余玠说，要保卫四川，必须在合州钓鱼山上建城，在那里存粮派人防守，“胜于十万师”。余玠觉得这个建议好，便报请宋廷，让兄弟俩专门去钓鱼山负责建造城堡、工事。同时，余玠在青居山等山上修建了类似钓鱼山这样的城堡十多座。这些城堡建成后，对四川抗蒙起了重要作用。余玠还在成都等地屯田以利农，整顿军纪以利民。嘉定（乐山）都统王夔凭借军权，在该地无恶不作，鱼肉百姓。余玠亲到嘉定，将其诱杀，老百姓拍手称快。此外，余玠还在四川办教育，修学校，对老百姓轻徭薄赋，对商人少收商税。经过几年的政治、军事、教育、农业、商业等诸多方面的治理整顿，原来百业凋零的四川，成为有名的“富实”之地。

治蜀之余，余玠不忘抗蒙。淳祐十年（1250），余玠曾远征兴元。淳祐十二年冬，蒙古军打到成都、嘉定，余玠率领蜀军与蒙军苦战，蒙军才退走。余玠治蜀、守蜀 10 年，与蒙古军大小 36 战，有效地抗击了敌人的进攻。余玠治蜀有功，却遭小人暗算，朝廷猜疑。宝祐元年（1253），戎州（宜宾）驻军头目离职前，向余玠推荐姚世安代替自己。余玠向来讨厌军队中这种举代之风，他派兵马到戎州，要将姚世安换下来。姚世安抗拒余玠军来戎州，也不想由人代己，对余玠不满。恰好姚世安认识当朝丞相谢方叔的亲属，便通过关系，在谢方叔面前诬告余玠。谢方叔便在皇帝面前说余玠的坏话，说余玠在四川靠不住。对武将猜忌，是宋朝的顽疾。宋理宗不听忠言听奸言，不信忠臣信佞臣，终于在五月下圣旨，要将余玠调离四川，调京任有名无实的资政殿学士。六月，圣旨到达四川。余玠心里清楚，召他回京大概凶多吉少，前有岳飞之鉴，因而闷闷不乐，不得安宁，突然死去。余玠究竟因何病而“暴卒”，史无明文。不过有记载说，当时人多认为余玠是服毒自杀。宋朝 300 年的历史，始终重文轻武，深怕武将起来推翻龙廷。这种对武将的猜忌、防范、调动甚至杀害，冤屈了无数忠臣良将，余玠仅是其中之一。余玠死后，四川军民莫不悲愤难忍。

（顾全芳）

合州之战

宋开庆元年（1259）蒙宋在四川钓鱼城的关键战役。

蒙宋自宋端平入洛后，两国关系虽然紧张，时有战争，但在战争中互有胜负。蒙古贵族认识到，要消灭南宋，并非轻而易举，既必须增强国力，又必须控制吐蕃、大理等西南地区，以包围南宋。首先归顺蒙古并为其管辖的，是吐蕃。吐蕃归附蒙古后，蒙古于宪宗三年（1253）进攻大理。从此，我国的云南、康藏地区，归附蒙古。这就为蒙古大举攻宋，创造了条件。

宋宝祐六年（1258）四月，蒙古分兵大举攻宋。忽必烈率军攻鄂州（湖北武汉），兀良从云南回攻潭州

(湖南长沙),李璮攻江淮。蒙哥则率4万蒙军,分三路入蜀:蒙哥从陇州(陕西千阳)经大散关(陕西宝鸡南)进入四川;莫哥从洋州(陕西洋县)经米仓关(陕西南郑南)入蜀;孛里叉自潼关(属陕西)经沔州(陕西略阳)向四川进发。三路蒙军入川后,未遇大的抵抗,就占领了成都等川西北地区。蒙古可汗蒙哥亲率主力入川占领利州(四川广元)后渡过嘉陵江,到达要隘剑门(剑阁东北)。开庆元年二月,蒙哥军到达合州(合川)钓鱼城外。钓鱼城系淳祐三年(1243)余玠治蜀时新建,位于钓鱼山上。建城时就充分考虑到日后蒙军可能入蜀,因而城坚难攻。驻守钓鱼城的,是兴元都统制兼知合州王坚。王坚,原为孟珙部将,在邓州(今属河南)战蒙军有功,入蜀后又收复兴元(陕西汉中),守合州,多有业绩,因而很快成为独当一面的战将。蒙哥军到达钓鱼城外前,曾派投降蒙古的晋国宝去劝王坚投降,王坚坚定地拒绝招降,并将劝降使晋国宝"杀于阅武场",以示抗蒙决心。蒙哥见王坚守城不降,便切断所有宋救援合州的通道,并调集进入四川的4万蒙军包围钓鱼城,蒙哥亲自指挥攻城。从二月到七月的半年之内,钓鱼城始终未被蒙军攻破。六月中,蒙将汪德臣曾乘黑夜攻上钓鱼城外城,王坚率军与汪德臣恶战。汪德臣在天亮前大喊:"王坚,我来活捉汝一城军民,宜早降。"话音未落,宋军发炮,击中汪德臣,汪德臣狼狈而逃,不久病死。正好天又下起大雨,蒙军攻城的云梯折断,蒙军后援不继,只得从外城退走。经过无数次攻防之战,蒙哥于七月病死于钓鱼城外军营(一说为宋炮石所伤而致死)。蒙哥一死,局势起了变化,蒙军无首,只得退出钓鱼城外。蒙古大臣用驴车拉着蒙古可汗蒙哥的遗体,向北撤军,合州之围被解。

合州之战使蒙军损兵折将,蒙古之主蒙哥身死合州。忽必烈为争夺汗位,也从鄂州等地北撤。南宋则因合州之战取得胜利,解除了蒙古消灭南宋的危机,使南宋得以继续存在近20年。　　(顾全芳)

襄樊争夺战

宋蒙争夺战略要地的长期战争。

宋端平二年(1235)正月,宋将孟珙在湖北加强战备,将精锐之师镇北军15000人分驻樊城(湖北襄樊;樊城与襄阳隔汉水相望)等地,以襄阳(湖北襄樊)都统制防备蒙古南侵。襄、樊为战略要地,南下长江,必经襄樊。孟珙(1196—1246),字璞玉,河东绛州(山西新绛)人,父为宋将孟宗政。嘉定十年(1217)曾随父大败金兵于枣阳(湖北枣阳)。父死,孟珙继领其师忠顺军。曾与蒙军联合攻金,破蔡州(河南汝南)。

端平二年六月,蒙古兵分三路,南下犯宋。西路入四川,东路入江淮。中路由蒙将阔出率领,进攻湖北。七月,中路蒙军攻入唐州(河南唐河),宋将全子才不战而逃。十月,蒙军攻下枣阳,接着攻郢州(湖北钟祥)。郢州城西临汉水,宋多有战舰。蒙军以木筏、骑兵水陆两攻,宋军坚守,城未被破。蒙军在郢州受阻,不得南下,遂"掳掠而还"。

端平三年正月,蒙军增援中路,继续南犯。二月下旬,蒙军直至江汉重镇襄阳。宋赵范等在襄阳府"朝夕酣狎",不理军政。蒙军一到,王旻、李伯渊等叛宋降蒙,襄阳弃守。宋将李虎乘乱纵掠焚火,襄阳城一片废墟。蒙军在襄阳获粮食、物资无数。百年前岳飞收复的襄阳,至此落入敌手。十一月底,蒙军长驱南下,破荆门(湖北荆门)后进军长江北岸之江陵(湖北江陵)。宋长江中游情势危急,派孟珙救援江陵。孟珙率军渡过长江指挥宋军抗蒙。宋军"变易旗旗服色,循环往来;夜则烈炬照江,数十里相接",以壮威势,迷惑敌人。接着,孟珙与蒙军交锋,宋军获胜,破敌24寨,夺回被蒙所俘两万人,阻止了蒙古军渡江东侵,但襄樊仍在敌手。

嘉熙二年(1238)十月,孟珙被任命为京西、湖北路制置使,受命收复襄阳等地,以保南宋安全。孟珙先取郢州、荆门,以开粮道。次年三月始,孟珙与蒙军大战三次,三战皆捷,一举收复信阳(河南信阳)、光化(湖北丹江口)。随之收复襄樊。襄樊失而复得,对延续南宋统治起了重要的作用。孟珙在襄汉地区屯兵兴农修水利,积极备战,扭转了敌我形势,使襄汉获30年休养生息。

咸淳三年(1267)十一月,降蒙宋将刘整向元主忽必烈建议"攻蜀不若攻襄"。刘整深知蒙古得襄樊后,即可至长江东渡,"江南唾手可得",南宋即会灭亡。忽必烈接受刘整之策,逐渐调动集中兵力,攻取襄阳,消灭南宋。第二年九月,蒙将阿珠及刘整率军数万包围襄阳。此后几年,蒙军在襄阳外围修建城堡水寨,从白河口、鹿门山、万山、汉水等处水陆,严密封锁襄、樊城,以断绝两城粮食等物资供应及宋援军。同时,蒙军建造战舰5000艘,加紧训练水军,以与宋军在汉水作战。

襄樊被围,事关南宋存亡。宋先后数年派兵救援。从咸淳五年秋开始,宋将李庭芝、夏贵、范文虎等多次增援,多被狙败于襄阳南之龙尾洲、灌子滩、鹿门等地,难以解围入城,张顺、张贵等众多将士为此而英勇献身。咸淳八年(1272)三月,被围四年、援兵

难至、孤军独撑、军民齐心抗敌的樊城外城被元军（蒙古自1271年建国号大元）攻破。元军集中兵力破樊城内城，并切断了襄阳与樊城的水上联系。第二年正月十一日，坚守五年的樊城终被攻陷。城陷时，宋将牛富率军与元军巷战，受重伤后投火殉国。二月，被誉为“铁脊梁”的襄阳城，终于在守御五年后无回天之力，吕文焕向元军投降献城，襄、樊落入元手。这次宋元争夺攻守襄樊，历时五年，双方动用兵力均在10万以上，财力物力无算。结果，由于南宋贾似道等腐败不援，终于败北。元军攻取襄樊后，不久即至长江东下。南宋自食苦果，危在旦夕。（顾全芳）

南宋降元

德祐二年（1276），南宋向元投降，宋朝灭亡。

宋咸淳九年（1273，元至元十年）二月，湖北襄樊被元军攻占，南宋危在旦夕。元得襄樊后，于第二年十二月抵鄂州（湖北武昌），沿长江东下，直指临安（浙江杭州）。南宋朝野震惊。有识之士纷纷上书，救亡图强，都被宰相贾似道拒绝。贾似道（1213—1275），字师宪，台州（浙江临海）人。少为“不事操行”之无赖。因其姐为宋理宗得宠贵妃，因而青云直上。开庆元年（1259）曾至湖北汉阳，支援鄂州抗蒙，暗中向忽必烈称臣纳币以乞和。蒙军退走，贾似道谎称鄂州大捷，回朝为右丞相。自此“权倾中外”，把持朝政。推行“公田法”，用低价强行购买民田；又行“推排法”，使尺寸之地都有重税；还滥发会子等肆无忌惮地横征暴敛。荒淫无耻的贾似道，喜欢玩蟋蟀，“尝与群妾踞地斗蟋蟀”，被称为“蟋蟀宰相”。

咸淳十年（1274）七月，宋度宗病死，贾似道立仅3周岁的赵㬎为皇帝（宋恭帝），由谢太皇太后垂帘听政。谢太皇太后，原名谢道清（1210—1283），台州临海人，祖父谢深甫，曾当过宰相。少女时，由杨太后做主，谢道清入宫，20岁时为宋理宗皇后。宋理宗去世，宋度宗即位，谢为皇太后。谢为皇后时，曾劝阻宋理宗不要迁都逃跑。

宋德祐元年（1275）正月，元军从鄂州东下，势如破竹，占领黄州（湖北黄冈）、蕲州（湖北蕲春）、江州（江西九江）、安庆（安徽安庆）。贾似道迫于舆论，“上表出师”，倾全国之力，到达芜湖（安徽芜湖）。一到芜湖，贾似道又派人向元称臣纳币以乞和，遭元拒绝。二月，元军占领池州（安徽贵池）。贾似道自驻鲁港，以孙虎臣领军7万至池州下流之丁家洲，以夏贵率战船2150艘横于长江，企图阻止元军东下。元军与宋军接战，孙虎臣、夏贵水陆两军即望风而逃。贾似道慌令收军，狼狈逃往扬州（江苏扬州）。池州一战，南宋主力覆没，灭亡无可避免。在举国的压力下，谢太皇太后罢免和贬逐了贾似道，下诏各地勤王，处置“避难偷生”者，并紧缩开支，减少冗官，以助经费。贾似道在贬窜途中，行至漳州木绵庵时，被监押者郑虎臣以“为天下”之名将其拉杀。

元军乘胜东进，于三月占领江苏之南京、镇江、无锡、常州等地，临安指日可下。在扬州，元军遇到激烈抵抗。宋淮东制置使李庭芝及部将姜才死守扬州，打败元军多次进攻。元军无奈，只得筑长围包围扬州。姜才多次出击，难胜元军。七月，张世杰在焦山长江中与元军大战，亦败。直到元军进入临安，李庭芝与姜才仍拒降力战。在常州，元军遇到更激烈的抵抗。五月，刘师勇收复常州，常州新任知州姚訔、通判陈炤、都统王安节，在常州坚守。元军包围常州，久攻难下。十月，元丞相伯颜率主力攻常。宋派张全率军2000，文天祥派部将3000救援。宋元两军在常州外围激战，互有胜负。十一月，元军强迫城外居民“运土为垒，土至，并人以筑之”。元军日夜攻城，常州军民誓死不降。连攻两日，孤城难守，城被攻破，姚訔、陈炤、王安节犹率军巷战。姚、陈战死。王安节不屈被元军所杀。刘师勇仅以八人突围，常州军民尽被屠杀。

常州失守后，宋军退守平江（江苏苏州）。元军已兵分三路，向临安包抄。平江、广德军（安徽广德）、建昌（江西永修）、嘉兴（浙江嘉兴）相继为元所占。德祐二年（1276）正月，元军拒绝宋多次求和，兵临临安。文天祥、张世杰“请移三宫入海”，向海上转移逃跑，他俩率城中宋军“背城一战”。宰相陈宜中反对。正月十八日，在谢太皇太后的同意下，宋派监察御史杨应奎向元军呈递投降书，表示向元投降。至此宋朝事实上已经灭亡。二月初，元军开进临安，接收了南宋的一切。三月，宋恭帝等被元押送至大都（北京市）。谢太皇太后因病暂留杭州。八月，元军将谢太皇太后抬出杭州，一直抬到大都。文天祥、张世杰、陆秀夫等则继续抗元。（顾全芳）

陆秀夫跳海

元至元十六年（1279），南宋残部覆灭，丞相陆秀夫背负宋帝赵昺投海殉国。

宋德祐二年（1276）正月，南宋向元请降，宋亡。二月，元军进入临安（浙江杭州），宋恭帝之兄赵昰、弟赵昺被驸马都尉杨镇护逃出临安。元军追杀，杨等从婺州（浙江金华）逃到温州（今属浙江）。陆秀夫等赶往温州。五月，陆秀夫、张世杰等拥立年仅七岁的

赵昰为帝，改元景炎。

陆秀夫(1238—1279)，字君实，楚州(江苏盐城)人。幼居镇江。喜读书，文思敏捷。19岁考中进士，为李庭芝幕僚。德祐元年时，元军攻宋，陆秀夫与李庭芝患难与共，李将其推荐为京官，至礼部侍郎。陆秀夫拥立端宗后，与张世杰等重振旗鼓，努力恢复宋朝。张世杰，范阳(河北涿州)人。累有战功。德祐元年率军至浙江定海，坚不降元。陆秀夫为签书枢密院事，张世杰为枢密副使，负抗元及保护宋端宗之重任。

德祐二年十一月，元军进攻福州。张世杰率17万官军及30万民兵，护送端宗至福建泉州、潮州，十二月逃到惠州(今属广东)。

元至元十四年(1277)九月，张世杰保护宋端宗至浅湾(广东饶平南岛)，元军水陆齐进，务要灭宋之遗君、遗臣。张世杰与陆秀夫在作战失利后逃至井澳(广东珠江口外岛屿)。年末，大风袭击井澳，船翻人溺，士卒死亡过半。元军追至，于次年三月逃到冈州(广东雷州湾外海中岛屿)。四月端宗病死，陆秀夫在“群臣皆欲散去”的逆境中，立赵昺为帝，自任左丞相，与张世杰同执政，欲想以10万兵民，复兴宋朝。六月，陆秀夫将小皇帝等移到厓山(广东新会南)。在厓山，陆秀夫建屋修造，准备抗元。厓山虽在海中，但舟行艰难，易守难攻。

元至元十六年(1279)初，忽必烈得知广东尚存亡宋之残余后，令张弘范为元帅至广东清剿。张弘范率水陆精兵两万，水陆并进，经漳州、惠州，至广州，进攻厓山。元军塞海口，断绝张世杰、陆秀夫军与陆上联系。厓山危在旦夕，张世杰拒绝突围登陆的建议，誓与元死战，令烧毁房屋，全体登舟，以千艘战船相连。张弘范曾以火攻战船，张世杰早将战船涂上湿泥，战船无恙。张弘范将海口围困，张世杰等官兵断水缺粮，坚持十余日后病倒无数。二月初六日晨，天气阴暗，张弘范兵分四路，强攻舟船，张世杰率军抵敌，双方肉搏多时，胜负难分。中午潮涨，战船东移，元军两面向船冲杀，张世杰背腹受敌，因士卒困顿，不敌元军，“尸浮海上者十余万人”。张世杰派人向陆秀夫告急，请陆保护赵昺脱险。陆秀夫恐无法突围，反遭被俘，拒绝转移。陆知难以生还，决心以身殉难。陆手执宝剑，先将其妻推入海中。之后，陆对赵昺说：如今一败涂地，应为国捐驱，不应被敌所俘。说罢，背起年仅9岁的赵昺，用白绸将赵昺与自身捆紧，步向船舷，纵身跳入大海。时为二月六日晚。后，张世杰亦跳海殉难。至此，宋朝彻底覆灭。　(顾全芳)

文天祥殉难

宋丞相文天祥在被俘后屡拒劝降，在元至元十九年末(1283)从容就义。

宋开庆元年(1259)八月，蒙古军渡过淮河，九月进围鄂州(湖北武昌)。宋“朝野震恐”，宦官董宋臣主张迁都四明(浙江宁波)，逃跑避难。时为海宁节度使的文天祥在京(临安，浙江杭州)，反对迁都，上奏“乞斩董宋臣，以一人心，以安社稷”。

文天祥(1236—1283)，字宋瑞、履善，号文山；吉州庐陵(江西吉安)人。“体貌丰伟，美皙如玉”。出身书香门第，自幼攻读，有大志。20岁考中进士第一，始登仕途，受人注目。景定四年(1263)任端州(广东肇庆)知州，次年任江西提刑。咸淳五年(1269)四月知宁国府(安徽宣城)，次年回京，因得罪宰相贾似道，被免职，回老家闲居。咸淳九年任湖南提刑，十年三月至赣州(今属江西)任知州。德祐元年(1275，元至元十二年)正月，元军沿长江长驱东下至安徽，宋召诸路勤王。文天祥奉召，立即招募万人以上，准备起兵赴京。因祖母病故，七月七日才兵发吉州(江西吉安)，八月至临安西湖驻兵。时，元军已包围常州(今属江苏)，文天祥被任命为浙西江东置制使，知平江府(江苏苏州)。十月十五日，文天祥带兵至平江，立即派3000士兵救援常州，因孤军作战，将士多壮烈殉国。文天祥奉命回临安守独松关。时独松关已破，文天祥回城。元军包围临安，南宋朝廷处于混乱之中。垂帘听政的谢太皇太后于德祐二年正月十九日任命文天祥为右丞相兼枢密使，令文天祥至临安城外军中求和请降。文天祥受命于危难之时，至元营，不言投降，惟言讲和。元见文天祥不屈不降，将其扣留。南宋朝廷降元后，文天祥被押往江苏镇江、扬州。三月初三夜半，文天祥从扬州西门逃脱，“伏城西荒山空屋中”，又“卧败墙粪秽中”。初七逃到高邮，十一日逃到泰州，之后由通州(江苏南通)乘船由长江入海，沿海逃到温州(今属浙江)。在温州，实际已亡的南宋遗臣陆秀夫等立吉王赵昰为帝(宋端宗)，改元景炎，文天祥为右丞相，后任主掌兵事的枢密使。七月四日，文天祥离开温州，到江西募兵抗元。十一月又到汀州(福建长汀)。在汀州，文天祥曾派兵攻取江西宁都、永丰等地，多因寡不敌众而未成。

元至元十四年(1277)正月，元军攻汀州，文天祥退至漳州(今属福建)。六月二日，文天祥转战至兴国县(今属江西)。江西反元义军纷纷响应文天祥，先后收复江西及周围不少地区，文天祥还吉州(江西吉

安)各地。元得知江西、湖南抗元势盛,派精兵至江西,江西各地抗元军难敌蒙军精锐,文天祥被迫从兴国撤退。元兵追至方石岭(兴国东北),文天祥之妻欧阳夫人及1子2女被元军所俘。文之部将赵时赏在回答元军身分时,有意回答"我姓文",元军认为抓住了文天祥,文天祥得以脱险。赵时赏被杀。

文天祥脱险后,收拾散兵,准备东山再起,于十月到汀州,十一月到循州(广东龙川)。为寻找小皇帝所在,文天祥于元至元十五年二月进兵广东海丰;十一月,文天祥进驻潮阳。时,元水陆两路逼来,文天祥向海丰方向撤退。十一月二十日,元军追到山区五坡岭。文天祥"军溃被执"。被俘后,文天祥曾自杀,未得愿。元军将文天祥置于船中,由海路过零丁洋,到达广州。在零丁洋,南宋遗臣张世杰尚有战船千艘。元想叫文天祥劝降张世杰。文天祥拒绝,写下了著名的《过零丁洋》七律,内有"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之句。文天祥拒降,忽必烈下令将文天祥押解至大都。

元至元十六年十月一日,文天祥被押至大都(北京市)。在大都,原南宋降臣、甚至原小皇帝恭帝,都受元指使,劝降文天祥。文天祥不为所动。元丞相等也曾多次前来劝降,文天祥但求早死,决不偷生降元。至元十九年(1282),忽必烈亲自劝文天祥降元,降元后可以当元宰相。文天祥死不降元。当年十二月(1283)初九,文天祥被押往柴市刑场。文天祥向南面跪后从容就义,年仅47周岁。文天祥的夫人欧阳氏为文天祥的遗体收葬。"时穷节乃见,一一垂丹青"(《正气歌》)的文天祥,成为坚贞不屈的中华民族精神的典型。

(顾全芳)

元

成吉思汗统一漠北

蒙古族杰出领袖成吉思汗在金泰和四年(1024)实现了蒙古高原的统一。

成吉思汗原名铁木真(1162—1227),出生于蒙古孛儿只斤氏一个强有力的贵族之家。曾祖葛不律汗及其弟咸不海汗、伯祖父忽都剌汗,都曾为蒙古部首领。父也速该,号拔阿秃儿,意为勇士。成吉思汗诞生时,适逢也速该与塔塔儿人作战获胜,俘其首领铁木真兀格。为纪念这次胜利,遂以铁木真为新生之子命名。铁木真9岁时,也速该带他到弘吉剌部求亲,并依习惯将他留在岳父德薛禅家。也速该返回途中,食用塔塔儿人投过毒的食物,不久死去。铁木真返回本部。但也速该死后,原领部众纷纷离散,铁木真兄弟随其母诃额伦在斡难河上游不儿罕山一带颠沛流离,艰难度日。铁木真又一度为泰赤乌氏贵族抓获,幸得他人救助,才得以逃归。为恢复自己家族昔日显赫的地位,铁木真开始了艰苦卓绝的斗争。

12世纪后期,蒙古高原分布着大大小小近百个氏族部落。蒙古部内即有乞颜氏与泰赤乌氏两个强大的氏族。铁木真出生的孛儿只斤部属乞颜氏。蒙古部之外,漠北高原比较强大的部落群体还有塔塔儿、克烈、乃蛮、篾儿乞、汪古等。塔塔儿又译作鞑靼、达怛、阻卜、阻轐等,据有呼伦贝尔一带的广大草原,是一个力量强大、声名显赫的部落联盟。克烈部游牧在土拉河与鄂尔浑河流域,和蒙古孛儿只斤部是近邻,也是一个拥有六个部落的部落联盟。乃蛮部在克烈部以西直至阿尔泰山一带,和其他部族相比,文化最为发达。蒙古部以北,从鄂尔浑河到色楞河流域,居住着篾儿乞人。此外,在库苏古尔湖以西和以北,还有斡亦剌人。汪古部在阴山以北,经济文化水平也比较高。蒙古部正是在这些部落群体的包围之中,艰难地发展着。

铁木真长大之后,首先要对付的是泰赤乌氏贵族的压迫。他需要一个强大势力的庇护,于是便投靠克烈部首领王罕,尊其为父。在王罕的帮助下,积聚力量。但不久便遭到三姓篾儿乞人的袭击,妻子家人都被俘去。他求援于王罕和札答阑部首领札木合,联合出兵,击败篾儿乞,夺回妻子家人。铁木真力量壮大之后,便摆脱了对札木合的依附,建立了自己的斡耳朵(营帐),把许多蒙古部众吸引到自己周围,并建立起一支以那可儿为核心的精悍的队伍。12世纪80年代,铁木真被推举为可汗。为继续寻求王罕的支持,他遣使向王罕通报此事,获得王罕准允。

札木合不能容忍铁木真势力的壮大,便联合泰赤乌等十三部共3万人进攻铁木真。铁木真闻讯,也将自己的3万部众分为十三翼迎敌。其中铁木真之母诃额伦所统亲族、属民与奴婢等为第一翼,铁木真所统诸子、那可儿、护卫等为第二翼,其余各翼大都由乞颜氏各贵族率领。归附铁木真的尼鲁温氏族也参加了战斗。双方交战于答阑版朱思(鄂嫩河附近,一说克鲁伦河畔),铁木真战败。但札木合残杀战俘,引起部众不满,以致纷纷离去。铁木真则尽力笼络归附部众,力量并未削弱。此即著名的十三翼之战。

金承安元年(1196),金朝丞相完颜襄统兵征讨塔塔儿部。铁木真以为父祖复仇为名,请求王罕出兵助金。铁木真率本部人马与王罕会合,从斡难河上游东进至斡里札河一带,攻破塔塔儿营寨,捕杀其首领

篾兀真笑里徒，给塔塔儿部以沉重打击。铁木真因功被金授予札兀惕忽里之职，其声望地位显著提高。回师后，铁木真乘新胜之威，又讨伐主儿乞氏，并其部属，力量进一步壮大。金承安五年（1200）铁木真又与王罕联合，共同进攻泰赤乌部，泰赤乌则拉篾儿乞贵族相助。双方激战于斡难河。泰赤乌部兵败，首领塔儿忽台等被杀。之后，依附泰赤乌部的合答斤与散只兀部，也被铁木真击败吞并。

金泰和元年（1201），札木合收集败散的塔塔儿、弘吉剌、合答斤、散只兀、泰赤乌、朵儿边、豁罗剌思等部众，组成一个与铁木真相对抗的联盟，但很快就在海拉尔河的支流帖尼火罗罕之地为铁木真击败。次年秋，乃蛮部的不欲鲁汗联合篾儿乞部的脱脱和斡亦剌部的忽都合别乞，以及札木合所统泰赤乌、朵儿边、合答斤、散只兀、塔塔儿等残部东击王罕和铁木真。双方大战于阙亦坛之野（哈拉哈河上游）。王罕、铁木真占据有利地形，击败不欲鲁汗与札木合联军。

王罕见铁木真力量不断壮大，担心于己不利，于泰和三年向铁木真发动突然袭击。铁木真仓促迎敌，终因众寡不敌，败退至哈拉哈河之北，在那里休整并集结部众。不久，铁木真偷袭王罕，双方激战三天三夜。王罕败逃至乃蛮边界，为乃蛮守将所杀。克烈部灭亡。

乃蛮部首领太阳罕知克烈部败亡，极为震惊，于是联合篾儿乞、斡亦剌及札木合残部，一起进攻铁木真。铁木真在哈拉哈河附近整顿部众，建立起强大的护卫军，然后逆克鲁伦河西行，泰和四年与太阳罕激战于纳忽昆山。乃蛮部军心涣散，太阳罕又骄傲轻敌，终为铁木真所败。太阳罕受伤被擒，不久死去。铁木真进军至阿尔泰山前，乃蛮部被彻底征服。至此，塔塔儿、篾儿乞、克烈、斡亦剌、乃蛮诸部均相继败亡，铁木真统一了漠北高原。

泰和六年春，铁木真在斡难河源召集各部贵族、那颜举行忽里台大会，被推举为蒙古国大汗，号成吉思汗。漠北高原的统一，为蒙古族的进一步发展创造了有利条件。　　　　　（孟繁清）

大蒙古国的建立

12世纪末至13世纪初，铁木真统一蒙古高原后，在元太祖元年（金泰和六年，1206年）春，在斡难河源召集贵族、那颜举行忽里台大会，树九游白旗，即大汗位，号成吉思汗，蒙古国宣告成立。

蒙古国成立前后，成吉思汗在军政方面采取了一系列措施，巩固统治，扩大疆域。他在境内实行千户制，将所辖民户划为95千户，分别授予追随自己的贵族、功臣统领。千户之下，又设百户、十户。千户作为军事和地方行政单位，取代了原来的氏族部落体制。国家按千户征派赋役和签发军队。15岁至70岁的男子都有服兵役的义务。千户之上，又有万户。成吉思汗任命木华黎为左手万户，管理东部直到大兴安岭一带诸千户；博尔术为右手万户，管辖西部直到阿尔泰山一带诸千户。纳牙阿被任命为中军万户。此外，豁儿赤、忽难等，也被委任管领若干千户。蒙古国初期，万户仅是军事统帅，并非行政长官。所有万户、千户那颜都必须效忠于成吉思汗。成吉思汗又将所辖百姓分封给诸子、诸弟，使他们共同藩卫以大汗为首的“黄金家族”。

成吉思汗将原来的护卫军扩大，建立起一支1万人组成的怯薛军。怯薛为突厥—蒙古语，意为轮番护卫。其职责主要是保卫大汗宫帐，并分管汗廷各种事务。其成员均为万户、千户、百户与十户那颜及白身人之子有技能且身体健壮者。成吉思汗的亲信功臣博尔忽、博尔术、木华黎、赤老温被任命为世袭四大怯薛长。怯薛为大汗侍卫近臣，有很高的政治地位，是蒙元时代高级官吏的主要来源。怯薛成为大汗对内巩固统治、对外进行扩张的有力工具。

成吉思汗建国前，蒙古族没有文字。成吉思汗攻灭乃蛮时，俘获了太阳罕掌印官畏兀人塔塔统阿，命他以畏兀字拼写蒙古语，教授蒙古贵族子弟，从此产生了畏兀体蒙古文，后经不断改革完善，一直沿用至今。成吉思汗还制定了“大札撒”（意为法规），内容包括蒙古习惯法，以及成吉思汗的训言、敕令等，要臣民遵守。成吉思汗任命其养弟失吉忽秃忽为也可札鲁忽赤，即大断事官，掌民户分配及司法刑狱，为当时蒙古国最高行政长官，类似中原王朝的丞相。

蒙古国建立后，成吉思汗不断向外进行军事扩张。在金泰和五年至元太祖四年（1209）之间，多次进攻西夏，迫使西夏纳女请和。元太祖六年攻金，前锋突入居庸关，威逼金之都城中都（北京）。元太祖九年（1214）金宣宗被迫迁都南京（河南开封）。次年蒙古军攻占中都，逐步控制华北地区。之后，成吉思汗将进攻矛头指向中亚。元太祖十三年（1218）攻灭西辽。第二年，成吉思汗率20万大军西征花剌子模，攻占中亚广大地区。部分蒙古军攻入斡罗斯南部，沿黑海北岸进入克里米亚半岛。蒙古军西征给中亚和欧洲人民带来极大灾难。直至1224年，成吉思汗才率军回国。

成吉思汗将新占领的地区作为“兀鲁思”分封给他的儿子。花剌子模及康里国故地、咸海以西、里海以北地区，分封给长子术赤(1177—1225)。术赤死后归其子拔都。后来，拔都以此为基础，建立起钦察汗国。阿尔泰山以西至阿姆河一带，原西辽及畏兀故地，分封给次子察合台(？—1242)，后来形成察合台汗国。今鄂毕河上游以西至巴尔喀什湖以东，原乃蛮故地，封给窝阔台(1186—1241)，后来形成窝阔台汗国。斡难河及克鲁伦河流域蒙古本土，则分封给幼子拖雷。

元太祖二十一年(1226)成吉思汗再次出兵攻夏。第二年，西夏败亡。同年夏历七月十二日，成吉思汗病逝六盘山，享年66岁。窝阔台即位大汗，并于金天兴三年(1234)灭金。元太宗八年(1236)至元太宗十三年(1241)间命拔都率军再次西征。元太宗十三年窝阔台病逝，脱列哥那皇后摄政达5年之久。元定宗元年(1246)年窝阔台长子贵由即位。贵由称汗不足三年即去世，后继者为拖雷之子蒙哥。元宪宗二年(1252)蒙哥又命六弟旭烈兀进行第三次西征。蒙古军攻占波斯广大地区，前锋攻入叙利亚。旭烈兀在西征的基础上又建伊利汗国。

由四大汗国与蒙古本土组成的庞大的蒙古帝国，其内部缺乏必要的强有力的经济联系，汗位的争夺也不断加剧汗国间的矛盾，大蒙古国这个复杂的政治混合体逐渐解体。钦察汗国与伊利汗国各自走上了独立发展的道路。窝阔台及其子贵由因先后即位大汗，窝阔台汗国便成为大汗直接统领的地区。察合台汗国和蒙古本土相连，因而常常受到中央王朝的左右和控制。1260年忽必烈即大汗位，年号中统。至元八年(1271)改国号为元。至元十三年元军陷临安(浙江杭州)，灭亡南宋。蒙古贵族在蒙古国的基础上建立起统一的元朝政权。 (孟繁清)

成吉思汗西征

元太祖十三年(1218)，成吉思汗西征花剌子模等地的战争。

成吉思汗统一漠北各部并建立大蒙古国，随后不断向外扩张。是时花剌子模沙摩诃末也妄图建立世界帝国。元太祖十三年，成吉思汗命诸王、大臣各派一二人，携带钱币到花剌子模采购珍宝、织物和奢侈品，遂组成450名穆斯林商人的商队去花剌子模贸易。商队行至花剌子模边境城市讹答剌城(哈萨克斯坦齐穆耳)时，该城守将亦难出(海儿汗)，自恃为摩诃末母亲的亲属，企图吞没钱财，将商队扣留，摩诃末也下令杀害全部商人，没收钱货。有一名骆驼夫侥幸逃回蒙古，告知成吉思汗。成吉思汗派出3名使臣赴花剌子模交涉，摩诃末竟杀蒙古正使，2名副使剃去胡须逐出境外。成吉思汗大为震惊，决定发动战争。该年，成吉思汗命大将哲别灭亡西辽，追杀攫取西辽汗位的乃蛮王子屈出律，扫清西征道路。十四年春，成吉思汗亲率诸子、诸将出兵。是年秋，兵抵讹答剌，分兵四路：一路由察合台、窝阔台指挥进攻讹答剌；一路由术赤进攻毡的(哈萨克斯坦克齐尔—奥尔达东南)；一路由阿剌黑南下取别纳客忒(乌兹别克斯坦塔什干南)、忽毡(塔吉克斯坦列宁纳巴德)等地；成吉思汗与拖雷率中军直趋不花剌(乌兹别克斯坦布哈拉)。察合台、窝阔台一军围攻讹答剌达5个月之久，城破，俘杀亦难出。术赤一军连克昔格纳黑(哈萨克斯坦契伊利东南)、八儿真(在昔格纳黑西北)、毡的，尽占锡尔河下游诸城镇。阿剌黑一军攻取别纳客忒等城后，在忽毡受阻，成吉思汗派军增援，遂破忽毡，进破费尔干纳地区。成吉思汗自率大军于十五年三月围不花剌城，守将夜遁，蒙古军追至阿姆河畔尽杀之，城内一部分伊玛目和名绅迎接成吉思汗进城，首先闯入大礼拜寺，用战马践踏《古兰经》，把装《古兰经》的书柜做槽子喂马，命当地德高望重的长老、学者、医生们干杂活，自称是“上帝之鞭”来惩罚穆斯林。然后用火攻破内城，抵抗者3万余人全部惨遭屠杀。成吉思汗命居民出城，纵火焚烧城内建筑。当月，成吉思汗进围花剌子模新都撒马耳干(乌兹别克斯坦撒马尔罕)，摩诃末仓皇出逃，城内数万军队不敢出战，蒙古军诱使敌人进入埋伏圈歼灭之，城中守军分裂，康里军携眷属出降。城中居民委托首席法官出城向蒙古投降，成吉思汗命全城居民出城，然后由蒙古士兵拆毁全部堡垒，抢掠财物，搜杀躲藏的居民，纵火烧死进行抵抗的花剌子模士兵，但献城居民代表和法官、掌教可保护其属民5万人免受侵害；投降的3万康里士兵被驱赶至城外旷野，入夜尽被杀害。成吉思汗又从居民中签括工匠3万人，分赐给诸子、亲属，另选3万丁壮随军作战。是时，成吉思汗又命大将哲别、速不台等追击摩诃末，摩诃末逃至你沙不儿(阿富汗内沙布尔)，再奔哥疾宁(伊朗加兹尼)，哲别率军追至哈马丹(今属伊朗)，摩诃末逃至宽田吉思海(里海)中一岛上，年底病卒，子札兰丁继位。摩诃末之母秃儿罕可敦逃离旧都玉龙杰赤(土库曼库尼亚乌尔根奇)，札兰丁葬父后来玉龙杰赤守城，由于城中康里将领准备政变，札兰丁被迫出走，于是康里将乌马儿自称为汗。十六年春，察合台、窝

阔台、术赤各率军队先后抵达玉龙杰赤城下，进攻数月不下。成吉思汗命窝阔台统一指挥，遂克之。蒙古军队将全城居民赶至郊外，将数十万工匠押送蒙古，年轻妇女和儿童为奴婢，余者杀之。又决阿姆河水灌城，玉龙杰赤成为泽国，躲藏于城内的居民全部淹死。五月，成吉思汗率中军过铁门关(乌兹别克斯坦沙赫尔夏勃兹南布兹加勒山口)，命拖雷破呼罗珊诸城，自率军破阿姆河北岸诸城，所过皆残破；拖雷破马鲁(土库曼马里)后屠城，死者达70万(一说130万)；成吉思汗、拖雷率军破塔里寒(阿富汗木尔加布河上游北)。札兰丁出走后重新整顿军队，进屯八鲁湾(阿富汗查里卡东北)，大败成吉思汗弟失吉忽秃忽所率3万军。札兰丁进驻哥疾宁，成吉思汗率各路军来攻。十一月，札兰丁欲渡申河(印度河)南逃，被蒙古军队阻截，部众死伤逃散，仅余4,000余人渡河入印度。次年，蒙古军追击至印度，入暑后蒙古军被迫退军。九月，成吉思汗命牙老瓦赤、麻速忽父子治理西域各地。十八年，率军东归。追击摩诃末的哲别、速不台军，于十五年秋进入阿哲儿拜占，十六年初掠谷儿只(吉尔吉斯)；秋，破哈马丹(今属伊朗)，再破桃里寺(伊朗大不里士)。十六年春，进兵干札(阿塞拜疆基洛瓦巴德东)，进入谷儿只境，取首府沙马哈、打耳班(俄罗斯捷尔本特)，再逾太和岭(高加索山)，进入阿速、钦察境，阿速人与钦察人联军抵抗，哲别、速不台离间后各个击破。钦察首领忽滩汗逃入斡罗思(俄罗斯)。斡罗思诸公国互不团结，伽里赤王密赤思老等部分王公结盟，与钦察人联合抗蒙。十八年五月，双方战于阿里吉河(乌克兰北卡里奇克河)，斡罗思、钦察联军大败，密赤思老乞降后被杀。蒙古军长驱直入，进入克里米亚等地，陷城杀掠。十八年底，哲别、速不台东返，与成吉思汗大军会合。二十年春，成吉思汗率西征军返抵蒙古本土。 (邱树森)

耶律楚材辅政

成吉思汗与窝阔台汗在位期间，谋臣耶律楚材积极参与朝政，为推进蒙古族的封建化，稳定蒙古贵族在中原地区的统治，作出了重要贡献。

耶律楚材(1190—1244)字晋卿，号湛然居士，出生于契丹贵族之家。父耶律履，仕金，官至尚书右丞。楚材3岁而孤，母杨氏育其成人，博览群书，通天文、地理、律历、术数及释、老、医、卜之说。初仕金为开州(河南濮阳)同知，后升左右司员外郎。元太祖成吉思汗十年(1215)蒙古军攻占中都(北京)，遂归降蒙古。元太祖十四年随成吉思汗西征，常为成吉思汗观天文星相，占卜吉凶，并常以占卜之名，劝阻成吉思汗滥杀，受到成吉思汗信用。成吉思汗曾对其子窝阔台说，耶律楚材乃上天所赐，尔后军国庶政，可全部托付给他。窝阔台即汗位后，任耶律楚材为掌汉文字的必阇，汉人称其为中书令。在耶律楚材的建议和推动下，窝阔台实行了若干新的政策措施，以加强对中原汉地的统治。如检括户籍，建立特定的赋税机构和比较稳定的赋税制度；将蒙古贵族与汉族地主武装私占的驱口变为国家编户；反对屠城滥杀，反对任意搜刮，反对回回商人提出的扑买赋税制度，反对高利贷盘剥。他曾向窝阔台提出时务十策，即信赏罚，给俸禄，官功臣，考殿最，均科差，选工匠，务农桑，定土贡，制漕运。这些建议，曾部分地被采纳。耶律楚材主张加强中央集权，反对蒙古诸王贵族“裂土分民”；主张军民分治，反对汉人军阀垄断地方军、政、司法及经济大权。他积极建议任用汉人儒士，并于燕京(北京)设编修所，于平阳(山西临汾)设经籍所，整理编印儒家典籍。元太宗窝阔台十年(1238)通过考试，选用儒士4,030人。元太宗十三年(1241)窝阔台暴死，乃马真皇后脱列哥那称制，信用回回商人奥都剌合蛮，耶律楚材渐被疏远。他著有《湛然居士集》、《西游录》等。 (孟繁清)

绰儿马罕西征

元太宗元年(1229)，窝阔台命绰儿马罕率军发动征伐波斯等地的战争。

成吉思汗西征结束后，札兰丁从印度返回波斯，图谋复国。元太祖十九年(1224)、花剌子模统治者札兰丁先后占领起儿漫(伊朗克尔曼)、法儿思(波斯湾东北岸一带)两州及亦思法杭(伊朗伊斯法罕)、伊利克阿只迷(札格罗斯山脉以东地区)等地。二十年，札兰丁进取桃里寺(伊朗大不里士)，进而占领阿哲儿拜占(阿塞拜疆)全境。二十一年三月占领谷儿只(格鲁吉亚)之梯弗利里(第比利斯)。札兰丁完成花剌子模之重建，但内部矛盾却十分尖锐。元太宗元年，窝阔台命绰儿马罕率3万士兵出征花剌子模。二年冬，蒙古军队越过呼罗珊、木剌夷(里海南岸)，进入阿哲儿拜占，击败札兰丁军，札兰丁逃至木干草原，蒙古军追至迪牙别乞儿(土耳其东部)山中。三年八月，札兰丁被当地库尔德族农夫杀死。绰马儿罕驻营木干草原和阿兰(阿塞拜疆西南部)一带，遣兵攻掠阿哲儿拜占、迪牙别乞儿、额儿比勒(伊拉克北部)、谷儿只等地。五年，进兵桃里寺，守城长官、士绅降。八年，攻入谷儿只，梯弗利思地区诸侯降。十年，攻入大阿

美尼亚地区，屠其故都阿尼城，阿美尼亚王曾去蒙古朝见窝阔台汗，故窝阔台下旨令阿美尼亚王仍领有其地。十二年绰儿马罕死，拜住继领其军。十三年，拜住军侵入鲁迷(小亚细亚)，占领额儿哲鲁木城(位于幼发拉底河上游二源之间)，进占西瓦思(土耳其锡瓦思)。同年，另一支蒙古军侵入叙利亚。乃马真后二年(1244)小阿美尼亚(西里西亚)王海屯一世归附蒙古。乃马真后三年，毛夕里王、大马士革王均向蒙古纳贡，谷儿只王降于拔都。至此，蒙古又重新占有波斯等地，先后命真帖木儿、阔里吉思、阿儿浑等置官府加以管辖。1251年宪宗蒙哥即位后，设阿姆河等处行尚书省，仍命阿儿浑为长官，治所设于呼罗珊之徒思城(伊朗马什哈德西北)。　(邱树森)

长子西征

元太宗窝阔台七年(1235)，由宗室长子组成的西征军对钦察、斡罗思等地的征服战争。

这一征服战争，是元太宗七年太宗窝阔台召开忽里台(诸王大聚会)决定的。并即命各宗室均以长子统率出征军，万户以下各级那颜(贵族)亦遣长子从征。参加出征者有术赤子拔都、斡鲁答、别儿哥、昔班；察合台子拜答儿，孙不理；窝阔台子贵由、合丹，孙海都；拖雷子蒙哥、拨绰；成吉思汗庶子阔列坚等。以拔都为统帅，故又称“拔都西征”。总兵力约15万。七年春，西征军出发。秋，先锋速不台抵不里阿耳境，不久破不里阿耳城(俄罗斯不里阿耳—乌斯平斯科依村旁)，屠城后焚之。冬，蒙哥率军逼近亦的勒河(伏尔加河)下游的钦察部，钦察首领八赤蛮起兵袭击蒙古军。八年春，蒙哥、速不台击败八赤蛮，八赤蛮退入宽田吉思海岛中，旋被擒杀。蒙哥率部征讨阿速部。秋，拔都召开忽里台，决定进讨斡罗思。冬，蒙古军破莫尔多瓦、也烈赞(俄罗斯梁赞附近)。九年初，蒙古军连破科罗木纳、莫斯科、罗思托夫、速兹答勒等十余城，纵兵大掠弗拉基米尔城，又南掠斯摩棱斯克、契尔尼果夫城，血洗科泽里思哥城。进而略取钦察草原西部，钦察首领忽滩率余部退入马札儿(匈牙利)境。十年，蒙哥、贵由率兵再侵阿速，阿速主杭忽思降。十一年春，蒙哥、贵由军略太和岭(高加索山)以北地区，次年秋东归。拔都则率军深入斡罗思境，十一年冬破乞瓦(乌克兰基辅)，破伽里赤公国。十二年春，蒙古军队兵分两路：一路由拜答儿、兀良合台率领侵入孛烈儿(波兰)，一路由拔都、速不台等侵入马扎儿。进入孛烈儿的蒙古军大败孛烈儿军、日耳曼十字军与条顿骑士团联军，南下与拔都军会合。拔都军则大败马札儿军，攻占其都佩斯城。是年七月，一支蒙古军曾到达维也纳附近的诺伊施达，因奥地利公有备，未战即退回。十三年，窝阔台死讯传来，拔都遂率军东归。乃马真后二年初返回亦的勒河下游的拔都营地。拔都以其所占领地建立钦察汗国，辖地东起也儿的石河(今额尔齐斯河)，西至斡罗思，南达巴尔喀什湖、里海、黑海一线，建都城萨莱城(今俄罗斯阿斯特拉罕附近)。　(邱树森)

贵由征拔都

窝阔台汗死后蒙古王室内部的一场派系斗争。

元太宗窝阔台十三年(1241)窝阔台汗病死，皇后脱列哥那摄政。脱列哥那主张传位于长子贵由(1206—1248)，但遭到术赤之子拔都(1209—1256)的抵制。拔都曾总领西征军事，在同辈诸王中威望很高，实力也很强，因而对贵由构成一定威胁。元定宗元年(1246)，贵由被推举为汗。次年，即命野里知吉带为征西军统帅，进军波斯，同时迫近拔都势力范围，企图抑制拔都势力的扩张。元定宗三年初，贵由以和林(蒙古人民共和国哈尔和林)气候于他病体不宜为由，带兵前往叶密立(新疆额敏河附近)封地。拖雷之妻唆鲁禾帖尼派遣使臣密告拔都注意防备，拔都遂整军以待。同年三月，贵由行至横相乙儿(新疆青河东南)之地突然病死，西征拔都的计划未能实现。　(孟繁清)

旭烈兀西征

元宪宗元年(1251)至十年，旭烈兀对里海南岸及报达城等地的征服战争。

宪宗蒙哥元年，决定派其弟旭烈兀征木剌夷国和报达(伊拉克巴格达)。命诸王各从所属军队中每10人签调2人，由子弟率领从征；又从汉地签发炮手、火箭手千人；波斯等地驻军听从旭烈兀调遣；军需由阿姆河等处行尚书省负责。次年七月，旭烈兀遣其先锋怯的不花先行。又次年十月，旭烈兀率大军启程。宪宗九年九月抵撒麻耳干(乌兹别克斯坦撒马尔罕)。宪宗十年初渡阿姆河，驻军速不儿罕(阿富汗马扎里沙里夫西)。六月，旭烈兀抵达你沙不儿(阿富汗内沙不尔)，准备向木剌夷发起进攻。

木剌夷国位于里海南岸一带。木剌夷是阿拉伯语 Mulahid 的音译，意为迷途者。本为伊斯兰什叶派的一支宗教派别，源于阿里后裔、第五代教主亦思马因，故称亦思马因派。其教主广蓄敢死之士，灌输迷信盲从思想，训练成刺客，赴各地进行暗杀活动。12

世纪中叶，教主哈散宣称伊斯兰教再兴之日来临，解除若干戒条，允许在斋月中饮宴娱乐，故被穆斯林视为异端，称之为“迷途者”。早在11世纪末，该教派由传道士哈散・萨马据里海南岸的阿剌模忒、兰巴撒耳、麦门底司、吉儿都怯等堡，招收信徒，据险设寨，势力渐盛，形成独立宗教国，所属城堡达360座。曾抵御住成吉思汗西征。旭烈兀西征后，遣先锋怯的不花围攻吉儿都怯堡，两年不下。宪宗十年六月旭烈兀大军压境，木剌夷国主鲁克奴丁忽儿沙遣使请降，并下令吉儿都怯堡投降。旭烈兀因鲁克奴丁不愿亲降，命令进攻其所居城堡。十一月，鲁克奴丁降，旭烈兀命他遣使谕降诸城堡，并尽毁之，又派兵送鲁克奴丁去和林朝见蒙哥汗。蒙哥拒绝接见，返回时途中被杀。

宪宗七年春，旭烈兀驻军哈马丹（今属伊朗），准备进兵报达。报达系黑衣大食（阿巴斯王朝）都城，当时由第36代哈里发谟斯哈辛统治。谟斯哈辛傲慢无能，专事游乐，朝廷大臣、将相之间互相倾轧。九月，旭烈兀致书哈里发，命其投降，哈里发不予理睬，蒙古使臣又遭侮辱，旭烈兀决定进攻。十一月，蒙古军队兵分三路：右翼军拜住、左翼军怯的不花、中路军旭烈兀进围报达。宪宗八年一月发起猛烈进攻。二月，哈里发率其子及教长、法官、贵人出降，旭烈兀命哈里发派人宣谕城中军民出城可以免死，军民们蜂拥而出，尽被蒙古军杀戮，蒙古军又入城大肆杀掠，并纵火毁城，居民死者达80万人，哈里发及其长子亦被处死，至此阿巴斯王朝灭亡。

宪宗八年八月，旭烈兀返回桃里寺（伊朗大不里士），准备进攻叙利亚。时叙利亚为艾育伯朝统治，算端纳昔儿遣其子及宰相向蒙古求降，旭烈兀因不满算端所提条件，于九年九月三路进兵叙利亚，取美索不达米亚北部之迪牙别克儿地区诸城，再克鲁哈等城，渡幼发拉底河，向阿勒波进发。算端怯懦畏敌，将妻、子、宝藏送往埃及。十年一月，旭烈兀破阿勒波，其余各城不战而降。算端弃都城大马士革逃奔埃及，后被蒙古军队俘获。三月，蒙古军队进驻大马士革。时蒙哥汗在四川钓鱼城去世的消息传来，旭烈兀决定先归，命怯的不花攻略叙利亚、巴勒斯坦诸地，并遣使至埃及开罗谕降算端忽秃思，忽秃思拒降，决定发兵抵抗。七月，杀蒙古使臣，进兵巴勒斯坦。九月，与蒙古军队会战于哲连附近之阿音、札鲁特，蒙古军全军覆没，埃及军队乘胜占领大马士革、阿勒波等地，势力扩展至幼发拉底河。

旭烈兀返抵波斯后，闻忽必烈已即大汗位，遣使表示拥戴忽必烈。忽必烈传旨，将阿姆河以西直到埃及占领的叙利亚地边境的大片土地划归旭烈兀统治，旭烈兀在其领地内建立了伊利汗国，其领土东起阿姆河和印度河，西有小亚细亚大部分地区，南抵波斯湾，北至高加索山。　（邱树森）

忽必烈与阿里不哥之争

蒙哥汗去世后忽必烈与幼弟阿里不哥之间的一场斗争。

忽必烈（1215—1294）系拖雷之子，蒙哥汗之弟，唆鲁禾帖尼所生。少年时受到祖父成吉思汗宠爱，成年后热心汉族文化，思大有为于天下。1251年蒙哥即大汗位，是为元宪宗。时忽必烈受命总理漠南军国庶事，开府于金莲川（内蒙古正蓝旗境内）。宪宗三年（1253）统兵征云南，平大理。四年兴建开平府（内蒙古正蓝旗东）。八年南下攻宋。九年蒙哥死于合州（四川合川）伐宋前线，汗位归属遂成为蒙古宗室矛盾斗争的中心。蒙哥生前没有像成吉思汗和窝阔台汗那样对嗣位问题作出安排，因而在蒙古王室内部对汗位归属并没有一个预定的、明确的意见。当时，蒙古王室并无固定的汗位继承制度。忽必烈固然有资格即位，但幼弟阿里不哥（？—1266）以及蒙哥诸子也都有资格即位，这就必然引起诸王间的汗位之争。

蒙哥南征时，阿里不哥奉命留守和林（蒙古人民共和国哈尔和林），主持大兀鲁思（蒙语，意为人众、国家），管理留守军队及诸斡儿朵，在政治上处于很优越的地位。根据蒙古幼子守产的习惯，阿里不哥确有夺位的潜力。蒙哥死后，皇后忽都台以及蒙哥诸子阿速歹、玉龙答失、昔里吉等，都拥护阿里不哥，这就更增加了阿里不哥在政治上的声势。在军事上，阿里不哥亦有相当的力量。他控制着留守和林的军队，随从蒙哥南征的军队也有一部分归附了他。浑都海居六盘，拥兵2万，且“士马精强，咸思北归”。他与东川乞带不花、西川密里火者以及京兆刘太平、霍鲁怀等阴相勾结，以策应阿里不哥。整个秦、蜀、陇地区的形势非常动荡。不仅如此，阿里不哥还派阿蓝答儿发兵于漠北诸部，遣脱里赤括兵于漠南诸州。阿蓝答儿乘传调兵，距开平仅百余里。开平一带是忽必烈经营多年的根据地，阿里不哥的军事行动给忽必烈造成很大威胁。

当时忽必烈正率师南伐，他在接到蒙哥去世的消息时不愿“无功遽还”。为进一步扩大自己的势力，提高自己的声望，他继续南下，包围了鄂州（湖北武昌）。部下纷纷劝忽必烈班师北还，郝经在“班师议”

中对当时动荡的形势以及阿里不哥的军事威胁作了深入分析，提高了忽必烈的警觉。所以，忽必烈一接到关于阿里不哥调兵遣将、拘收钱谷、图有异谋的确实消息，便果断地与南宋议和，从鄂州紧急回师。1260年夏历三月，忽必烈在开平即汗位，建元中统。不久，阿里不哥也在和林自称奉遗诏称汗（一说阿里不哥称汗在忽必烈之前）。双方汗位之争公开爆发。

斗争初期，双方争夺的中心区域，一是开平至燕京（北京）一带，二是秦、蜀、陇地区。阿里不哥在漠南征集军队，横敛财物，企图抢先控制开平至燕京一带，以断绝忽必烈归路。忽必烈回师燕地，察其祸心，解散了脱里赤征集的军队，解除了阿里不哥对开平的威胁。秦、蜀、陇地区情况则比较复杂。散处秦、蜀的征南诸军，有的支持忽必烈，有的支持阿里不哥，有的依违于两者之间，取观望态度。在这一地区，阿里不哥虽有较强的军事力量，但却没有明确的军事行动计划。为夺取这一地区，忽必烈采纳廉希宪建议，在鄂州回师的同时，即派赵良弼前往关右了解情况，接着又任命廉希宪为陕西四川等路宣抚使，经略这一地区。廉希宪至京兆（陕西西安），相机行事。他依靠刘黑马、汪惟正、汪惟良、八春等人的军事力量，迅速捕绞刘太平、霍鲁怀，诛杀密里火者与乞带不花，同时命汪惟良等率秦、巩（巩昌，今甘肃陇西）诸军进军六盘，防浑都海东来。忽必烈逐步加强了在秦、蜀、陇地区对付阿里不哥的力量。

该年五、六月间，忽必烈连续调兵遣将，筹集粮草，加紧备战。七月，准备大体就绪，忽必烈便亲征阿里不哥。九月，阿蓝答儿率军自和林南下，与浑都海军会合。忽必烈方面，诸王合丹与八春、汪良臣等分三路拒敌。双方在山丹（今属甘肃）附近之耀碑谷激战，结果阿蓝答儿、浑都海被杀，忽必烈军大获全胜。

是年秋冬，忽必烈亲征和林。阿里不哥因缺乏粮草，自知不敌，遂放弃和林，逃往吉利吉思（叶尼塞河、阿巴根河流域）。他一方面派阿鲁忽去主持察合台汗国事，筹集兵械粮草，一面与忽必烈假意议和，以待时机。忽必烈则派宗王移相哥留守边境，而自返开平。中统二年（1261）秋，阿里不哥伪装率众归降，对移相哥发动突然袭击。移相哥丧失警惕，军队溃败。阿里不哥挥师南下，矛头直指忽必烈漠南驻地。消息传来，忽必烈连忙率军迎敌。十一月，双方大战于昔木土脑儿。忽必烈部诸王合丹等杀阿里不哥将领合丹火儿赤及其兵士3,000人，诸王塔察儿与合必赤等分兵合击阿里不哥，阿里不哥兵败北逃，其部将阿脱等归降。阿里不哥因粮草与兵械不足而陷入困境。开始，他曾寄希望于阿鲁忽。但阿鲁忽在征集了大量牲畜、兵械、财货之后，却背叛了他，把财富据为己有。阿里不哥盛怒之下又发动了对阿鲁忽的战争，大肆屠戮阿鲁忽管下无辜兵民，致使他的许多将领为之寒心而纷纷叛去。诸王昔里吉、玉龙答失等也相继与之脱离关系。当地人民对他的暴行更为切齿。阿里不哥在众叛亲离的情况下不得已于中统五年七月归降忽必烈，这场汗位之争以阿里不哥的失败而告结束。

（孟繁清）

"斡脱"之盛行

蒙元统治者高利盘剥各族人民的一种措施。

斡脱钱是蒙元时期由回回商人经手发放的官债。"斡脱"是突厥语 ortaq 的音译，原意为同僚、同伴。西域商人从事长途贩运贸易，奔走于草原与城区之间，组成商帮，结队而行，故自称"斡脱"。西域商人投靠蒙古后，蒙古大汗、诸王、公主、后妃等将掠夺来的钱财交西域商人放高利贷或经商，收取利息。蒙古国时期，斡脱钱十分盛行，高利贷年息达百分之百，次年转息为本，又复生息，1锭银10年后本利达1,024锭，这种高利贷又称"羊羔儿息"，因从事"斡脱"的多为回回人，故又称"回回债"。由于斡脱钱造成大批借债者破产，社会矛盾日益尖锐，太宗窝阔台时耶律楚材曾建议：钱债"子母相侔，更不生息"，全部利息最终不得超过本银的百分之百，对此有所限制。但不久又依然盛行。入元后，斡脱不断发展，逐渐成为官营高利贷。元世祖忽必烈时曾设诸位斡脱总管府、斡脱所、斡脱总管府等机构，掌管斡脱事务；政府还规定，凡持有圣旨、令旨的斡脱商人称为斡脱户，他们可以使用驿站铺马，官给饮食，货物可减免课税，行船鸣锣击鼓，可不依河道开闸时间强行通过，甚至携带军器，或有军人护卫。斡脱发放对象除民间百姓外，还有地方官府等。斡脱商人除向朝廷、官府、皇室、贵族提供巨额利息外，还利用自己享有的特权，夹带私人资金，牟取暴利。斡脱商人除发放高利贷外，还经营金银珠宝、名贵皮毛、金锦罗缎等供王公贵族享用的奢侈品。

（邱树森）

钞法之行

元代实行以纸币（又称钞）为主的货币制度。

中统元年（1260）十月，元政府发行中统元宝交钞（简称中统宝钞或中统钞），这是我国古代在全国范围内发行纸币的开始。先是，纸币曾在部分地区流行，如宋朝的会子、交子，金朝的交钞、宝泉等。元太

宗八年(1236),窝阔台曾下令发行交钞,但发行额很少。此外,一些地方政府,为方便贸易和筹集经费,也曾各自发行纸币,在本辖区流通使用,如博州(山东聊城)所印以丝为本的会子,真定路(河北正定)所印以银为本的银钞。元宪宗三年(1253),忽必烈也曾在京兆(陕西西安)分地立交钞提举司,发行纸钞。中统元年发行的中统钞,是作为主货币在忽必烈辖区统一发行的,并随着元的统一而发行到全国。其面值分十文、二十文、三十文、五十文、一百文、二百文、三百文、五百文、一贯文省、二贯文省10等。习惯上称钞一贯为一两,五十贯为一锭,百文为一钱,十文为一分。以银为本,与银并用。中统钞二贯(两)同白银一两。中统钞发行的同时,又以文绫织为中统银货,分一两、二两、三两、五两、十两五等,每一两同白银一两,但未及实行。为了便于民间零星交易,至元十二年(1275),又印行小额厘钞,面值有二文、三文、五文三等。后因中统钞贬值,厘钞工本费大于面值,至元十五年便停止印行。

中统钞发行之初,中央曾采取了一系列措施,以保持币值的稳定。如,中央政府垄断货币发行权。货币用材、货币形态、货币印造、货币投放、货币管理以及各项钞法的制定,都控制在中央政府手里。中书省户部设有诸路宝钞都提举司、宝钞总库、印造宝钞库、烧钞东西二库等,具体掌管钞币的印造、存储、发放以及昏钞倒换、焚毁等事宜。中央保持一定数量的准备金,规定没有准备金不准发行钞币。在各路设立平准库,民众可以持钞币兑换金银,只需交纳百分之二至百分之三的手续费。控制钞币发行量。中统元年至中统五年年间,每年发行额不超过九万锭。到至元十年,每年发行额没有突破十二万锭。由于采取了上述措施,中统钞在最初发行的十几年间,币值相对稳定。当时有人将中统钞的优越性概括为七点:一是难得,二是经费省,三是银本常足不动,四是伪造者少,五是把钞看得重于金银,六是币实不虚,钞不贬值,七是物价平稳。这是符合当时的实际情况的。

但币值稳定的局面没有维持多久,钞币便迅速贬值。究其原因,一是准备金得不到保证,原有准备金大都移作他用;二是货币投放量严重失控。至元二十四年,元政府又变更钞法,改行至元通行宝钞(简称至元钞),停印中统钞,但中统旧钞仍许行用。至元钞币值自二贯文至五文,分11等。中统钞五贯当至元钞一贯,十贯当白银一两。

武宗至大二年(1309),又改印至大银钞,其币值自二两至二厘,凡13等,与中统钞、至元钞并行,一贯当至元钞五贯,当中统钞二十五贯。与此同时,又铸至大通宝与大元通宝两种铜钱,与钞及前代铜钱并用。至大四年,仁宗即位之后,以“倍数太多,轻重失宜”为由,宣布废罢至大银钞,仍以中统钞与至元钞相权并行。

至正十年(1350),钞法再变,顺帝又印行新的中统元宝交钞,每贯当至元钞二贯,当铜钱一千文。同时铸造“至正通宝”铜钱,与历代铜钱并用。元末,政府为解决财政困难,滥发纸币,钞多至“舟车装运,舳舻相接”,人视之如废纸。民间交易,唯用银、钱,甚或以物易物,公私钞币均难以行用。 (孟繁清)

阿合马、桑哥等理财

元初,忽必烈起用阿合马、桑哥等聚敛财物,改善财政的措施。

元世祖忽必烈即位后,面临百废待兴局面,迫切需要大量军饷去对付诸王反叛和灭宋战争,又需要大量投资去兴修水利,恢复农业生产。回回人阿合马初隶蒙古弘吉剌部按陈那颜,以世祖察必哈屯(顺圣皇后)媵臣服务于忽必烈潜邸。忽必烈即位后以才能进。中统三年(1262),领中书左右部,兼诸路都转运使,专掌全国财赋。阿合马从以下四方面加以“敛财”:一、增加税课。税粮,蒙古原以成丁科粟1石,至元五年(1268)规定地多者缴地税,十七年规定每丁粟增至2石。榷盐,自至元十三年每引0.43贯增至十七年的2.45贯。其余商税、酒醋课、杂税等均有增加。二、官营牟利。中统四年起,专以河南钧州、徐州铁冶之利,又以礼部尚书马月合乃兴煽铁冶,岁输铁103.7万斤,铸农器20万件,易粟输官4万石。至元十二年,立转运司9,鼓铸铁器,官为专卖。又采银矿、专卖药材,设和买、平准、常平等机构控制市价。三、实行钞法。中统元年起,政府即实行钞法。阿合马主财赋后,扩大“中统宝钞”发行量,并开始挪用钞本,变相废除银钞相权大法。四、钩考钱财。对地方官吏大加钩考,如理算江淮行省平章阿里伯、右丞燕帖木儿立行省以来一切钱谷,查出擅支粮47万石,征钞1.2万锭,两人被处死。阿合马理财使国库逐渐充盈,收入大幅度上升,至元七年时北方诸路课税年额只银5万锭,合钞10万锭,到至元十八年,仅京兆等路每年课钞即达5.4万锭,相当于至元七年北方地区总额一半以上。由于阿合马敛财颇有成绩,忽必烈愈加信任,且言无不从,地位不断上升,自至元元年起任中书平章政事,执朝政几达20年之久。他打击异己,排斥老臣,结党营私,贪赃不法,专权横暴,使

人民负担加重，统治集团内部矛盾激化，人民强烈不满。至元十九年，益都千户王著与高和尚等利用忽必烈及太子真金赴上都之际，潜入大都中书省，假称真金回宫，召阿合马来见，击杀之。王著、高和尚旋被捕杀。事后忽必烈下令追查阿合马罪行，戮其尸，阿合马诸子亦被处死。

阿合马死，朝廷之臣皆讳言财利事。吐蕃人、总制院使桑哥荐卢世荣有才术，能救钞法，增课额。卢世荣，大名人，阿合马专政时曾任江西榷茶运使，后罢职。至元二十一年十一月，忽必烈命卢世荣为中书右丞。卢世荣上台后，采取各项理财措施：一、整治钞法。括铜铸至元钱，制绫券，与钞并行；各路立平准周急库，轻其月息，以贷贫民，使民不致失本，物价平稳，钞法坚挺。二、发展商业。于泉、杭二州立市舶司，造船给本，令人商贩，官有其利七，商有其三；禁私泛海；禁权势所擅产铁之所，官立炉鼓铸器鬻之，获利籴粟积于常平仓；于各都立市易司，由牙侩人计商人物货，四十分取一，其利四给牙侩，六为官吏增俸之用。三、发展畜牧业。于上都、隆兴等路选蒙古人牧羊马，官取八牧者得二。四、加强税收管理。立提奉司以领天下之课，立真定、济南、江淮等处宣慰司兼都转运使司以治课税，增酒课 20 倍，减民间仓银地税等。然世荣之理财措施多难以推行，数月后监察御史陈天祥即上章劾之，丞相安童亦上奏世祖，指责卢世荣“钱谷出者多于所入，引用俭人，紊乱选法”等，二十二年十一月，世荣被杀。世荣执政不足一年，就成了统治阶级内部倾轧的牺牲品。

卢世荣死后不久，世祖忽必烈起用桑哥理财。桑哥，吐蕃人，至元中任总制院使，能通诸国言语。至元二十四年二月，忽必烈复置尚书省，以桑哥为平章政事。三月，桑哥主持更改钞法，颁行至元宝钞，中统钞仍通行。接着对中书省进行全面检核，凡仓库诸司，无不钩考，以致入仓库者，无不破产。十月，桑哥晋为尚书右丞相。随后又遣人理算江淮、江西、福建、四川、甘肃、安西等六省，大批省部官、台臣、地方官被处死或罢官。钩考天下钱谷后，又大幅度增加盐、茶、酒、醋税课和协济户改为全赋，因而天下骚动，人民群众不堪忍受沉重负担，而桑哥自恃权势，一意孤行。一些阿谀逢迎之徒，竟为其树立德政碑。朝臣群起反对，纷纷上奏弹劾，忽必烈深感社会动荡不安，遂于二十八年将桑哥处死。桑哥家中抄出金银珍宝足有宫殿所藏之半数。　（邱树森）

四等人制的推行

元代推行的民族压迫政策。

蒙古统治者在征服全国过程中，不断把各族人民置于自己统治之下。蒙古贵族为了保持自己的特权地位和维持对人口远远超过本族的汉族和其他民族的统治，把全国各族人民分成蒙古、色目、汉人、南人四等。第一等为蒙古人。元人称之“国族”，指蒙古高原各蒙古氏族。据陶宗仪《南村辍耕录》载，蒙古氏族有 72 种，其中多有重复、误入者，漏载的也有不少。主要民族有札剌儿、瓮吉剌、怯烈、塔塔儿、灭里吉、忙兀等。第二等为色目人。“色目”一词初见于《唐律疏议》，初为“各色名目”之意。蒙元时期因疆域辽阔，西域以至欧洲各国来华人种繁多，遂含有各种类之人和稀僻不常见之人之意。《南村辍耕录》列出 31 种，亦有重见、错漏。色目人主要有：哈剌鲁、钦察、唐兀、阿速、康里、畏兀儿、回回、乃蛮、汪古、阿儿浑、吐蕃、怯失迷儿、斡罗思等。第三等为汉人，又称汉儿。指淮河以北原金朝境内的汉族和契丹、女真、高丽等族，以及先为蒙古征服的云南、四川两地的各族人。第四等为南人，又称蛮子、囊加歹、新附人。指原南宋统治下的汉族和其他族人。四等人在政治上、法律上是极不平等的。一、担任官职之不平等。元代各级长官，皆专于蒙古人，其次为色目人，而汉人、南人不可与。中书省为最高行政机构，中书令一职由皇太子虚领其衔，实权归于右左二丞相，世祖忽必烈即位之初曾以汉人史天泽、契丹人耶律铸为丞相，李璮叛乱平定后，对汉人防范益严，四等人制逐渐形成，从此即规定“不以汉人为相”，右丞相均由蒙古贵族担任，左丞相曾起用少数色目人担任过；枢密院掌兵柄，其长官枢密院使亦由皇太子领其虚衔，实权由知枢密院事、同知枢密院事和枢密院副使掌握。元制规定汉人不得阅军数，故终元之世，无一汉人担任知院一职，色目人亦仅有 4 人；至于掌黜陟之权的御史台，其长官御史大夫“非国姓不以授”。元制，行省以下各级地方政府皆置达鲁花赤（蒙古语镇守者之意，实为各所在官衙的监治长官）一职，至元二年（1265）规定：“以蒙古人充各路达鲁花赤，汉人充总管，回回人充同知，永为定制”，只有当缺员时才选用色目贵族充任，通过冒名改姓、蒙蔽上司而担任达鲁花赤的汉人、南人，一经查出，即予革罢。某些南方边远地区因蒙古、色目人不愿赴任时才允许汉人、南人担任此职。元代承荫制度也按等级有差，蒙古、色目人比汉人特优一级。其他如怯薛（宿卫）、各道廉访使等对汉人、南人

也加以严格限制。二、科举的不平等。元代直到仁宗延祐元年(1314)才开始实行科举取士，其考试科目，蒙古、色目人考二场，汉人、南人考三场，内容前者容易，后者艰难，乡试、会试亦同；殿试虽同试策一道，而命题难易不同，字数亦有多寡，殿试第一人必属蒙古人；还规定蒙古、色目人愿试汉人、南人科目中选者，加一等注授。其出榜，蒙古、色目人为右榜，汉人、南人为左榜；名额规定，乡试四等人各取 75 名，会试各取 25 名，这种名义上的平均分配，实际上因人口相差极大而是极不平等的。凡两举不第者，有恩授教授和学正、山长之例，蒙古、色目人限年 30 以上，汉人、南人则需 50 以上。三、法律上之不平等。元制，蒙古人犯重刑归大宗正府处断，至致和元年(1328)又补充规定："以上都、大都所属蒙古人并怯薛、军站、色目与汉人相犯者，归宗正府处断，其余路、府、州、县，汉人、蒙古、色目词讼，悉归有司刑部掌管。"但"诸蒙古人居官犯法，论罪既定，必择蒙古官断之，行杖亦如之。"色目人犯罪也另设官署掌其词讼事务。在具体量刑方面，规定蒙古、色目人因争执殴打汉人，汉人不得还手，只许向官府申诉，违者治罪；诸蒙古人因争及乘醉殴死汉人者，除征烧埋银外，止断罚出征，而汉人殴伤蒙古人甚至可处死；四等人同样犯盗窃罪，汉人、南人初犯刺左臂，再犯刺右臂，三犯刺项，而蒙古人不在刺字之条，色目人亦免刺。四、对汉人、南人的防范。元朝统治者对汉人、南人采取种种措施以防范汉人、南人造反，尤以武器限制最严。中统三年(1262)李璮反叛后，政府即下令严禁民间私藏军器。至元十三年灭宋后，下令括江南已附州郡军器，法律明确规定："诸汉人持兵器者禁之，汉人为军者不禁。"但对汉军限制甚严：除武卫军外，汉军出军时才可持军器，无军事行动则将军器置于军库之中；汉人、南人为急递铺兵和宿卫者，亦禁有武器。至元二十二年，令将汉地、江南拘收的弓箭、兵器分为三等，下等销毁，中等赐给近居蒙古人，上等存库，由所在行省、行院、行台掌管；无省、台、院官署的，由达鲁花赤或畏兀、回回人任职者掌管。汉人之打捕户禁止执弓箭，亦不许用军器、弓箭供神；汉人不得持铁尺、手挝及杖之藏刃，不得持弹弓射鸟雀；汉人围猎，不得超过 20 人，超过百人者处死；汉人弄枪棒者禁，习武艺者禁，聚众祈神者禁，划龙船者禁，演唱戏文、评话者禁，立集买卖者禁。政府也严禁汉人拥有马匹，至元二十三年下令"括诸路马，凡色目人有马者，三取其二，汉民悉入官"；甚至规定汉军亦不得有马，所括之马则全部充实蒙古军或蒙古流民、贫民。元朝政府甚至禁汉人、南人畜鹰、犬为猎，违者没入家资。后至元二年(1336)，丞相伯颜擅权，为防止南人造反，下令禁止南人农家使用铁禾叉。元朝统治者推行四等人制是为了保持蒙古和色目贵族的既得利益，维护其政权。但广大蒙古、色目劳动人民并没有从中得到什么利益。元朝统治下的许多蒙古、色目劳动人民因不堪忍受繁重的赋役，造成破产乃至卖子鬻妻者有之，饥饿死亡者有之。四等人制只能进一步加深民族矛盾和阶级矛盾，加速元朝的灭亡。 (邱树森)

李璮之乱

中统三年(1262)汉人军阀李璮发动的武装叛乱。

李璮(? —1262)，字松寿，潍州(山东潍坊)人，金末红袄军领袖李全之子(一说为养子)。金宣宗兴定二年(1218)李全降宋，后又叛降蒙古。李全死，李璮袭职治益都行省。忽必烈即位，加封其为江淮大都督。忽必烈与阿里不哥争战之际，李璮借口防御南宋，拒不出兵，并大修益都城堑，骗取赐银、军饷、军械。其岳父王文统为中书平章政事，与之内外勾结，伺机叛乱。中统三年二月，李璮乘忽必烈与阿里不哥争战之机，起兵反叛，并将涟(江苏涟水)、海(江苏连云港)等州献给南宋，且还军益都，占据济南。南宋封其为齐郡王。忽必烈闻讯，立即杀王文统，命诸王合必赤总督各路军马围攻李璮。三月，史枢、韩世安、阿术等败李璮于高苑(山东高青东南高苑镇)老僧口，李璮退守济南。四月，忽必烈又命右丞相史天泽专征。史天泽与合必赤筑环城围济南达四个月之久。城中粮尽，李璮自知无路可走，遂投大明湖中。然水浅不得死，遂被俘，为史天泽斩杀。此次叛乱即告平息。

(孟繁清)

兴建大都

元世祖忽必烈即位后对都城大都(北京)的兴建。

从成吉思汗至蒙哥汗，蒙古国都于和林(蒙古人民共和国哈尔和林)。蒙哥汗在位期间，忽必烈总理漠南军国庶事，曾命刘秉忠在桓州(内蒙古正蓝旗境内)东、滦水北岸的龙冈兴建新城，即开平府。中统元年(1260)忽必烈在此即帝位。中统四年开平被定为都城，称上都。次年，又将燕京(北京)改名中都。于是形成两都制。两都之中，中都为正都，上都为陪都。至元四年(1267)，忽必烈命刘秉忠等主持，在中都旧城东北设计兴建新城。至元九年，中都改称大都。至元

十三年大都城建成，但直至至元二十年城内修建才基本完成。

大都作为元朝的首都，是全国政治、经济、文化中心。新建的大都城规模宏伟，布局严整。城周28,600米，共有十一门。东面三座门，即光熙门（和平里东）、崇仁门（东直门）、齐化门（朝阳门）。南面三座门，即文明门（东单南，又称哈达门）、丽正门（天安门南）、顺承门（西单南）。西面三座门，即平则门（阜成门）、和义门（西直门）、肃清门（学院南路西端）。北面两座门，即建德门（德胜门外小关）、安贞门（安定门外小关）。据记载，大都所以开十一门，是为了象征附会神话中的哪吒。哪吒三头六臂两足，南面三门象征三头，东西六门象征六臂，北面两门象征两足。

大都皇城在城南部的中央地区。皇城南墙正中是灵星门，其位置大致在今午门附近。它的南面是大都城的丽正门。丽正门与灵星门之间，是宫廷广场，左右两侧，有长达700步的千步廊。皇城之内，以太液池为中心，围绕着三组大的建筑群，即宫城、隆福宫和兴圣宫。宫城在皇城东部，成长方形。宫城内建筑分南北两大部分，南面以大明殿为中心，北面以延春阁为中心。大明殿是朝廷举行重大仪式的地方，东西长200尺，深120尺，高90尺，规模雄伟壮观。大明殿后面的一座大的楼阁，下面称延春堂，上面称延春阁，是朝廷做佛事和举行宴会的地方。宫城以北是御苑，种有花草树木。宫城之西是太液池，包括现在的北海和中海。太液池中有两个小岛，南面的小岛，称为瀛州，即今团城所在地；北面的小岛，面积较大，即著名的琼华岛。至元八年改称万寿山（又称万岁山），山顶是著名的广寒殿。太液池以西有两大建筑群。南面为隆福宫，原称东宫或皇太子宫，是皇太子的住所，后改名隆福宫，成为皇太后的居所。北面为兴圣宫，是武宗在位期间修建的。专门收藏文物图书的奎章阁就在兴圣宫内。奎章阁后改名宣文阁，元顺帝时又改为端本堂，成为皇太子读书的地方。

大都城的中心筑有中心台，中心台东侧是中心阁，西侧则有鼓楼，钟楼建在鼓楼北面。中心阁、鼓楼、钟楼，构成元大都的中心区域，也是城内最繁华的区域。大都城内街道规划整齐，相对城门之间，都有宽广平直的大道。全城住着约四五十万人口，中部与南部人口较密集，北部则比较稀疏。

大都的兴建，工程浩大。木材、石料以及各种建筑材料的采集、运输，都需要投入数以万计的劳动力。大都城正是劳动人民血汗与智慧的结晶。

（孟繁清）

驿站之兴

元初有关驿站的制度及驿站的兴盛。

元代驿站的设置，始于成吉思汗时期。元太祖十四年（1219），成吉思汗遣刘仲禄赴山东邀长春真人丘处机，曾利用驿骑。丘处机往中亚及返燕京（北京）途中，亦曾得到驿站帮助。太宗窝阔台时驿站规模进一步扩大，从蒙古本土，经察合台汗国，到欧洲的钦察汗国，已有驿路可通。窝阔台本人也把建立站赤（即驿站）作为自己的一项功绩。忽必烈建元后，建立起了以大都（北京）为中心的四通八达的驿站网，东北至黑龙江口的奴儿干，北通叶尼塞河上游的吉利吉思，西通伊利汗国和钦察汗国，西南抵云南、西藏。据《经世大典》、《元史》记载，全国各类驿站有1500余处，服役站户约在二三十万户以上。

元代驿站又分陆站、水站。陆站交通工具主要是马，也有的地方用牛、车、桥等，水站则用船。东北辽东还有狗站，用狗拉雪橇，在冰雪之上运送使者、货物。至元二十六年（1289），为运送外国使臣所贡珍奇货物，特设从泉州到杭州的海站，至元二十八年罢。中央管理驿站的机构初为诸站都统领使司，后改名通政院。至大四年（1311）又以汉地驿站归中书兵部，通政院只辖蒙古驿站。延祐七年（1320）仍命通政院统掌全国驿站。地方管理体制亦屡有变化，多数情况下是由路、府长官提调，不另设专门机构。驿站依其大小设驿令或提领。交通枢纽之处往往置脱脱禾孙，即检查官，专门检查乘驿人员是否遵守乘驿制度。

乘驿凭证有圆牌、铺马圣旨和札子。圆牌又称圆符，专为军情急事差遣使用。朝廷所遣使者佩金字圆牌乘驿，诸王公主和地方官府所遣使者则佩银字圆牌。佩戴圆牌使者可择骑良马，兼程驰驿，马乏时亦可夺骑官民马匹。普通公事差遣人员，给铺马圣旨乘驿。铺马圣旨又称御宝圣旨，上面用蒙古文字标明启用马匹数目。元初，中书省、枢密院、御史台及行省、行台等官府有公事差遣，均可出铺马札子给驿。至元十九年后一律用铺马圣旨乘驿，诸官府不得自出札子。只有水站，可不用圣旨，而由中书省出给船札。此外，诸王也可自发铺马令旨给驿。

站户由民间签发而来，通常都是中等或中等以上民户。站户要负责管理驿站交通工具，喂养马、牛，如有死亡、损坏，必须赔偿。驿站马、牛、车、船等交通工具，有国家购置的，也有站户提供的。站户要按规定标准向过往使臣提供饮食。元政府规定，正使住宿驿站，每日供米一升，面一斤，酒一升，肉一斤，油盐

杂钞三十文，随从只给米面；过路者减半。冬天每日给炭五斤。此外，站户还要轮流充当驭手或水手。国家设有专门的站户户籍，世代相传，不得改易。

驿站是当时最便利的交通体系。元政府曾严格控制给驿范围。但王公贵族、官僚及上层僧侣等都千方百计以各种名目谋取乘驿特权。有的甚至搬取家属、迁葬送灵、娶妻嫁女等都利用驿站，极大地增加了站户负担。许多站户因此而破产逃亡。元朝后期，驿站制度逐渐废弛。　　　　　　（孟繁清）

海都之乱

元世祖忽必烈与元成宗铁穆耳统治时期蒙古诸王海都发动的武装叛乱。

海都（约1235—1301），窝阔台之孙，合失之子。蒙哥即大汗位后，镇压了窝阔台后王的反抗，海都心怀不满。蒙哥死，海都支持阿里不哥，对抗忽必烈。阿里不哥败降，海都以大汗之位当属窝阔台后裔为由，积极图谋自立。至元五年（1268），他与术赤后王相勾结，发动叛乱，以叶密立（新疆额敏东南）为中心，建窝阔台汗国。为牵制海都，忽必烈曾册封察合台曾孙八剌为察合台汗国之汗。但八剌败于海都之后，又与之结盟，海都势力更加扩大。至元七年，八剌死。至元九年海都又立八剌之子笃哇为汗。二者互相勾结，在西北地区不断骚扰。至元十二年，忽必烈命右丞相安童辅佐皇子那木罕镇守西北，蒙哥子昔里吉、诸王脱脱木等随行。至元十三年夏，昔里吉与阿里不哥之子药木忽儿等发动叛乱，拘系那木罕与安童等，并东犯和林（蒙古人民共和国哈尔和林）。忽必烈急令南下攻宋的元帅伯颜北征，击败昔里吉，收复和林。诸叛王或兵败被俘，或被迫归降。至元二十一年那木罕、安童获释回朝。至元二十四年，乃颜之乱发生，海都连连窜扰，与之配合。至元二十六年，海都军进逼和林，围攻皇孙铁穆耳。同年七月，忽必烈率军亲征。海都自知不敌，慌忙逃遁。忽必烈回大都（北京）后，命伯颜、玉昔帖木儿等先后主持西北军事，海都势力被逐出金山（即阿尔泰山）之外。成宗即位后，海都、笃哇虽几度企图卷土重来，但终为政府军所败。大德五年（1301），海都败死。大德七年，笃哇投降。大德十年，海都之子察八儿被迫归附。这场叛乱终被平息。

（孟繁清）

赛典赤治滇

赛典赤巩固西南边陲，发展经济文化的措施。

赛典赤·赡思丁（1211—1279），回族人，出身于不花剌（乌兹别克斯坦布哈拉）。元太祖十五年（1220），成吉思汗西征时，赛典赤·赡思丁的祖父率其家族投降蒙古人，赛典赤·赡思丁随蒙古军队征伐，并入宿卫，西征结束后随蒙古军队入华。成吉思汗呼为“赛典赤”而不名。“赛典赤”是阿拉伯语Saiyid Ajall二词的连读，Saiyid是首领之意，为先知穆罕默德之婿阿里后裔的尊称，穆罕默德无子，阿里的后裔就是圣裔；Ajall是至尊荣的意思。“赛典赤”就是尊贵的圣裔之意。

赛典赤在元太宗窝阔台时曾为燕京断事官。宪宗蒙哥时，迁燕京路总管，擢为采访使，专事筹措军饷物资。其后，皇弟忽必烈奉令进攻云南，率师抵六盘山，赛典赤将军饷物资运送至军前，大受忽必烈赞赏及保举，从此两人建立了特殊关系。后来忽必烈总管漠南汉地，在金莲川（滦河上游）建立藩府，招揽谋士，有志于在中原建立霸业，时赛典赤主管燕京行省财赋，常常暗地资助忽必烈。中统元年（1260）忽必烈夺取汗位，命赛典赤为燕京路宣抚使，进为中书平章政事，成为中书省中第一个被重用的回回人。其后又出任陕西五路西蜀四川行中书省第一任平章政事。任内，皆有政声，

至元十一年（1274），忽必烈命赛典赤为第一任云南行省平章政事。云南地处西南边陲，自忽必烈平定大理后，兀良合台主政，由于“委任非人，政令屡变”，政局极不稳定，宗王、行政长官、军事统帅之间互相争权夺利，至元八年曾发生云南王忽赤哥被都元帅宝合丁、六部尚书阔阔带等合伙毒死事件。为稳定云南大局，忽必烈决定选用办事干练、谨慎宽厚的赛典赤担负治理云南的重任。

至元十一年七月，赛典赤抵达云南后即开始全面治滇。其主要措施有：一、创建云南行省各级机构。赛典赤一到任即遍访当地父老乡亲，了解民情。知云南政出多门、主多役繁是造成人民痛苦的主要原因，深知迅速完善行省机构、统一政令为当务之急。时大理国王之弟段实（信苴日）握有实权，赛典赤命之为大理总督，以收回段氏统辖万户以下官吏的权力，使之权力范围仅限于大理地区，官吏任免之权悉归行省，行省治所设于昆明；云南王脱忽鲁对赛典赤来滇颇为疑忌，赛典赤授其亲信撒满、位哈乃为行省断事官，参预行省事务，但宗王权力只限于对行省事务监督、建议之权，并重大军事指挥权，使政令一归于行省；而宣慰司兼行元帅府事，亦听行省节制，行省则成为全省最高军政机关。与此同时，赛典赤对全省地方政权进行重大改革，改万户、千户、百户为路、府、

州、县，分别设总管、知府、知州、县尹，使云南全省37路、2府、3属府、54州、47县，与全国地方行政建置统一，改变了南诏、大理500余年来的割据状态。二、正确处理与当地少数民族和邻邦的关系。云南地方众多少数民族历来叛服不常，历代统治者并未真正对他们实施有效统治。赛典赤采取"力攻不如德降"的办法，逐步平定云南各地少数民族的反抗。罗槃甸位于今红河一带，以元江为中心的阿僰诸部蛮一直反抗蒙古和段氏统治，至元七年又筑城反抗。十三年，赛典赤率军亲征，严禁诸将擅攻，罗甸酋长闻之曰："平章宽仁如此，吾拒命不祥。"遂举部出降，由是西南诸部闻风款附，计有：广南溪洞侬士贵及左江李维屏、右江岑从威等2000余人；临安、白衣、和泥分地城寨109所；威楚、金齿、落落分地城寨军民32200余人；秃志寨蛮、高州、筠连州等城寨19所；今贵州境内的八番、罗氏鬼国等地洞寨1626所，101168人。赛典赤注意团结、使用少数民族上层人物，段氏子孙世袭大理总管，迄至明初共11代。各路、府、州、县，基本上因袭大理国的各土酋统治范围，各级官吏大部分由本地土官、土司充任，成为土司制度的滥觞。赛典赤还十分妥善地处理了与邻邦的关系。他遣使与交趾(越南北方)王约为兄弟，交趾王亲至云南，赛典赤亲至昆明城郊迎之，待为上宾。及至赛典赤于至元十六年去世时，交趾王遣使者12人来吊丧，祭文中有"生我育我，慈父慈母"等语，使者号泣震野，情感之深可见。但对于屡犯我领土的不友好行为则坚决回击。至元十四年，缅国蒲甘遣将释多罗伯剽掠金齿(云南德宏一带)，赛典赤命万户忽都、总管段实击退之，自此蒲甘不敢犯金齿。三、恢复和发展云南地区社会生产。云南建立行省前，社会生产力十分低下，生产技术落后，水利设施落后。赛典赤采取四项主要措施：其一，大规模开展屯田。至元十一年，下令查阅户籍，得隐户万余，其中四千户就地屯田。十二年至十八年，于威楚、大理、金齿、永昌、鹤庆、中庆、曲靖、澂江、仁德、临安、建昌、会川、德昌等地开展民屯，所屯土地有已业田和官给无主荒田，民屯户分漏籍户和编民两种，政府贷给种子和耕牛，所收租赋为五分之一左右，较领主为轻，租赋可用金银、马牛折算。赛典赤病卒后，云南屯田继续发展，并开展了军屯。其二，治理滇池。滇池位于昆明南郊，周围500余里，受灌溉面积达数十万亩，大理国后期因年久失修，经常泛滥。赛典赤经调查后，亲自主持治理工程。他采取疏六河(上游六条水源)、扩海口(下游泄水口)的办法，历时三年完工，为滇池地区农业发展创造了条件。其三，推广内地先进生产技术。南诏、大理国时，在曲靖以南、滇池以西地区，已有水田，种植单季稻，也有小麦、大麦、麻、豆、黍等作物，但生产技术落后，不得其法，赛典赤派遣官吏深入各地指导农业生产，如大理等处劝农使张立道等教寸、僰诸部人植桑养蚕方法，使之收利十倍于旧。又遣人教民播种之法，各地设义仓以贷种子，于是农业生产得到发展，云南人民日益富庶。手工业、采矿业也有较大发展。其四，遍设驿站，发展商业。为改变云南与外界封闭的状况，赛典赤于至元十三年命爱鲁打通乌蒙到四川的唐代石门旧道，水陆均置驿站。十六年，赛典赤子纳速剌丁于金齿、蒲骠处立站。到天历三年(1330)时，云南已普设驿站78处。交通的改善对商业的发展具有促进作用，许多内地商人入滇贸易，赛典赤又采取薄征税、逐步推行交钞、鼓励开办街子(集市贸易)等措施，使商业逐渐繁荣。著名意大利旅行家马可·波罗曾在至元中后期到过云南，他说昆明地方有许多商人，他们获得很多利润，物产丰富，大理也有许多商人和工匠。四、传播先进文化。南诏、大理统治时云南虽受中原汉文化影响较深，但仍很落后。赛典赤初到时，"云南俗无礼仪，男女往往自相配偶，亲死则火之，不为丧祭。无秔稻桑麻，子弟不知读书"。赛典赤采取两大措施：其一，兴办庙学，传播封建儒学。他于昆明、大理置儒学提举，修建孔庙，创办庙学，并为之拨学田，使之有永久的开支；又从内地购经书，以传播封建文化。其二，改变云南地方的落后风俗习惯，推广内地通行的习俗。如教当地人民行跪拜之礼，婚姻行媒，死者为之棺椁奠祭，通过学校讲述三纲五常。以上措施的推行，有助于云南地区的文化习俗与内地渐趋一致。赛典赤在云南任职6年，至元十六年卒于任。死讯传出，百姓巷哭，远近如丧考妣。忽必烈下诏："云南省臣尽守赛典赤成规，不得辄改。"成宗大德元年(1297)赠号咸阳王。云南人民于昆明建咸阳王庙，每年春、秋祭祀。

(邱树森)

三 征 日 本

至元十一年(1274)至至元二十三年元朝对日本的三次侵略战争。

元初，忽必烈多次遣使日本，谕其来朝。日本镰仓幕府拒不答复。至元十一年三月，忽必烈命凤州(治今陕西凤县凤州镇)经略使忻都、高丽(今朝鲜)军民总管洪茶丘率军15000人，乘船900艘，征日本。元军由高丽合浦出发，攻取对马、一岐诸岛。日军

坚持抵抗。元军受阻,不敢久留,匆忙撤回高丽。至元十八年,忽必烈又以日本杀元朝国使杜世忠等为由,命征东行省右丞相阿剌罕(后阿剌罕因病未行,由阿塔海代总军事)、右丞范文虎及忻都、洪茶丘等率10万人再征日本。忻都、洪茶丘等率军从高丽渡海,阿塔海、范文虎、李庭等率新附军自庆元(浙江宁波)、定海(浙江镇海)出发。忻都、洪茶丘部在志贺岛等处受到日军阻击,不能取胜。两军会合后,七月至平户岛,又移至五龙山。八月一日,飓风大作,元军船只多撞击沉没,军士落水溺死者无数。范文虎等择坚好船只逃走,士卒逃还者仅十之二三。其余元军遭日军袭击,大部死亡,少数被俘为奴。此次出征以惨败告终。至元二十年,忽必烈又命阿塔海为征东行省丞相,募兵造船,欲三征日本。由于地方官府酷刑催逼,造船工匠冻死、病死者不计其数,致使江南民变迭起。御史中丞崔彧建议暂停日本之役。忽必烈不从,又授刘国杰为征东行省左丞,练兵于扬州。此时,福建黄华起义,声势浩大,刘国杰奉命前往镇压,征日之事,遂暂搁置。黄华起义失败后,忽必烈仍想举兵征日,但由于安南战事失利,国内人民起义不断,征日之役很难继续举行。至元二十三年正月,忽必烈只好下诏罢征日本。 (孟繁清)

马可·波罗来华

元初中西交往史上的一桩盛事。

由于欧亚交通的开通,元朝时到中国的欧洲人数量很多。早在乃马真后四年(1245)初,教皇英诺森四世在法国里昂召集的宗教大会上,决定派教士普兰诺·卡尔平尼等出使蒙古,劝告蒙古人停止杀戮基督教徒和侵犯基督教国家,并改信基督正教。卡尔平尼使团中有俄、波、奥等国商人同行。元定宗贵由汗元年(1246)四月,他们在亦的勒河(伏尔加河)的营帐中觐见拔都,呈上教皇致蒙古大汗的信件,拔都命译成蒙文、波斯文和俄文,一并由使团送到和林(蒙古乌兰巴托西南哈尔和林)贵由汗处。卡尔平尼等参加了贵由汗的登基大典,并受到贵由汗的接见。次年秋,卡尔平尼回到里昂,向英诺森四世递交贵由汗的复信,信中拒绝教皇对蒙古人的指责,要求教皇率基督教国家的国王来朝觐等。定宗三年,法王路易九世派教士安德烈出使蒙古,当时贵由汗已卒,摄政的斡兀立海迷失后在叶密立接见了安德烈。元宪宗蒙哥汗三年(1253),路易九世再遣鲁布鲁克去东方传教。他在萨莱见到了钦察汗拔都,又去蒙古朝见蒙哥汗,对蒙古国的政治、军事、宗教活动进行全面考察,并带回蒙哥汗致法王的信。

元代欧洲旅行家来华最负盛名的是马可·波罗。中统元年(1260),威尼斯商人尼科罗·波罗、马菲奥兄弟从君士坦丁堡到黑海沿岸经商,又到达钦察汗国都城萨莱。中统三年东行至不花剌(乌兹别克斯坦布哈拉)留居3年。后随伊利汗国使臣于至元二年(1265)到达上都(内蒙古正蓝旗东),受到元世祖忽必烈接见。忽必烈询问了欧洲各国情况,决定派使臣出使罗马教廷,命尼科罗兄弟充副使随行。途中,元朝使臣因病未行,以国书交尼科罗兄弟。至元六年他们到达阿克拉,向教廷呈送元世祖国书。至元八年,尼科罗兄弟携尼古拉之子马可·波罗(Marco Polo,1254—1324)谒见新教皇格里戈里十世,要求依元朝国书派教士去中国,教皇遂命两名传教士随尼古拉等3人出使中国。两教士畏路途艰难,不久返回。尼科罗等3人从地中海东岸阿迦城出发,穿越叙利亚和两河流域,经波斯,越过中亚大沙漠,翻过帕米尔高原,到达可失哈耳(新疆喀什),由南疆东行至鸦儿看(叶城)、忽炭(和田)、阇鄽(且末)、罗不(若羌),进入河西走廊,经沙州(敦煌)、肃州(玉门)、甘州(张掖)、额里折兀(武威)到额里哈牙(银川)、天德军(呼和浩特东)、宣德州(宣化)、察罕脑儿行宫(河北沽源县北),于至元十二年到达上都。他们受到忽必烈的接见,以后在中国整整17年。

马可·波罗在上都期间学会了蒙古语和骑射,由于聪明谨慎、善于言辞,受到忽必烈的信任。他多次奉命出使各地,到过今内蒙古、山西、陕西、四川、云南、河北、山东、江苏、浙江、江西、福建等省区,出使安南、爪哇、苏门答腊、印度、僧伽剌等国,自称在扬州任过3年行政长官。马可·波罗及其父、叔在中国久居后怀念故土,要求回国。至元二十六年伊利汗阿鲁浑因妻伯岳吾氏去世,派使者兀鲁斛、阿必失呵、火者3人来元朝,请求续娶其亡妻本部的女子为妻,忽必烈命3使者护送伯岳吾氏贵族之女阔阔真远嫁伊利汗。马可·波罗等获准随行。约于至元二十八年春,使团从泉州出发,在海上航行2年有余,始达忽里模子(伊朗霍尔木兹)。时阿鲁浑已卒,其弟乞合都在位。至元三十年夏,阔阔真与阿鲁浑子合赞成婚。1295年马可·波罗一行返抵威尼斯。元成宗贞元二年(1296),马可·波罗参加威尼斯舰队与热那亚作战被俘,他在狱中把自己在亚洲的丰富见闻口授给作家鲁思蒂谦听,鲁思蒂谦把它记录下来,这就是闻名世界的《东方闻见录》(俗称《马可·波罗行纪》)。大德二年(1298)马可·波罗获释回家。

《东方闻见录》被誉为世界一大奇书。书中记载了马可·波罗在东方的所见所闻，其中对大都、上都、京兆、成都、昆明、大理、济南、扬州、苏州、杭州、福州、泉州、襄阳等城市的记载，对元朝重大政治事件（如海都乃颜之乱、阿合马被杀等）、典章制度（如两都制度、钞法、宫廷宴飨等）及风土人情、物产、建筑等多与汉文史料吻合，但也有夸大失实和文字雷同之处。书中关于他离开中国，与伊利汗国使者兀鲁䚟、阿卜失哈、火者护送阔阔真到伊利汗国的记载与《经世大典·站赤》所记至元二十七年出使诸王阿鲁浑处三使者的名字与《行纪》所载完全符合，无可辩驳地证明了马可·波罗中国之行是真实的。

继马可·波罗之后到中国来的传教士、商人仍络绎不绝。自至元二十四年大都基督教聂思脱里派修士列班扫马奉伊利汗阿鲁浑出使欧洲后，教皇尼古拉四世又派遣教士孟特戈维诺携带致伊利汗阿鲁浑、元朝大汗忽必烈、诸王海都的信往东方传教。至元二十六年抵伊利汗首都桃里寺（伊朗大不里士）。二十八年与商人彼得改道印度。三十年从马八儿乘船到中国，次年抵大都，向成宗铁穆耳呈交教皇的信件，获准在大都传教，彼得也留在中国经商。孟特戈维诺在大都建立4所教堂，受洗礼的教徒达6000人之多，他还收养40名中国儿童，教他们学习希腊文、拉丁文，培养成为教士。他还将《新约全书》译成蒙文，在蒙古人中传播。大德十一年，教皇任命孟特戈维诺为大都及东方总主教。又遣主教热拉德、帕烈格利诺、安德鲁等到中国协助传教，他们主要活动于泉州地区。延祐三年（1316），意大利教士鄂多立克奉命往东方诸国传教，约于至治元年（1321）经锡兰、苏门答腊、爪哇、占城至广州，再由广州至泉州、福州、杭州、建康、扬州，沿运河至大都，在大都居留3年，又往中国西部，直到吐蕃地区。后经陆路返回家乡波登隆埃（今属斯洛文尼亚）。他留下了名著《鄂多立克行纪》。后至元元年（1336），元顺帝妥懽帖睦尔派欧洲传教士安德鲁·威廉、阿速人脱孩为使，出访罗马教廷，要求派主教来华，并购买良马、珍宝。使者于后至元四年抵法国阿维尼翁觐见教皇本笃十二世，教皇派佛罗伦斯人马黎诺里为使，率庞大使团来华。1342年始抵上都，赠送给元顺帝白蹄黑身欧洲良马一匹，称为“天马”，轰动朝野。至正六年（1346）马黎诺里离大都回国南行，至正十三年返抵阿维尼翁，著有《马黎诺里奉使东方录》一书。　　（邱树森）

开凿京杭大运河

元代对南北大运河的重新修凿与疏浚。

元平江南之初，北运粮食物资需水陆兼运，自浙西，抵长江，辗转入淮，然后由黄河逆水至中滦旱站（河南封丘西南、黄河北岸），陆运至淇门（河南浚县西南），入御河（卫河），以达大都（北京）。这条运河旧道，年久失修，很不通畅。元政府为适应南北漕运的需要，先后开凿和修治了济州河、会通河、通惠河、通州运粮河、扬州运河与镇江运河，贯通了南北漕运。

济州河的开凿始于至元十三年（1276），由阿八赤主持。至元十八年至二十年又由奥鲁赤主持在原来的基础上重新浚修。该河从济州（山东济宁）向西北至须城安山（山东东平西南），全长150余里。济州河开通之后，漕路便由淮河入泗水（今中运河），经济州河北达安山，出大清河，经东阿（山东东阿南）、利津入海，然后由海运至直沽（天津大沽口），抵大都。后会通河开通，济州河也通称会通河。

会通河是至元二十六年开凿的。这年，元政府采纳寿张县（山东梁山西北）县尹韩仲晖、太史院令史边源建议，遣都漕运副使马之贞与边源等勘测地势，命断事官忙速儿、礼部尚书张孔孙、兵部尚书李处巽等主持修浚工程。该河自须城安山，经寿张西北至东昌（山东聊城），再向西北至临清，接御河，全长250里，中间建闸31座，历时六个月完成。

通惠河是至元二十九年由都水监郭守敬主持开凿的。上自大都西北昌平白浮村，引神山泉水，西折南转，经双塔、榆河，引一亩、玉泉诸水（北京昌平境内），经大都西门入城，环汇于积水潭，然后出文明门（崇文门），向东至通州（北京通县）高丽庄入白河。全长164里，修坝闸10处，共20座。至元三十年，河成，忽必烈由上都（内蒙古正蓝旗东）返大都，过积水潭，见舳舻蔽水，大喜，赐名通惠河。该河开凿，大大方便了由通州至大都的粮运。

通州运粮河上接通惠河，下入大沽河，西接御河，但水源不足，河道不畅。至元三十年，忽必烈采纳漕运使司建议，另引小渠水入榆河，以增加运粮河水源，方便了粮船航运。

仁宗延祐四年（1317）和英宗至治年间（1321—1323），元政府又分别对扬州运河（即旧邗沟）和镇江运河（原属江南运河）进行了浚修，疏通了大运河的南段。

经过多次分段浚修，大运河北起大都，南至杭州，沟通了海河、黄河、淮河、长江、钱塘江五大水系，

成为南北交通的大动脉。　（孟繁清）

侵缅战争

元朝对缅甸的侵略战争。至元八年(1271)、十年，元朝两次遣使诏缅国蒲甘王朝那罗梯诃波王归附纳贡，均未达目的。至元十四年，缅王以干额（云南盈江）总管阿禾内附，举兵进犯干额、金齿（云南德宏傣族景颇族自治区等地区），阿禾向元告急求援。大理路（治今云南大理）蒙古千户忽都、总管信苴日出兵增援阿禾，缅军战败溃逃。同年十月，云南行省遣云南诸路宣慰使都元帅纳速剌丁率军3800余人征缅，至江头城（缅甸伊洛瓦底江与瑞丽江汇流处以北杰沙），招降300余寨，后因天热还师。至元二十年，忽必烈命宗王相吾答儿、右丞太卜、参知政事也罕的斤征缅。元军分路进军，破江头城，杀万余人。至元二十二年十一月，缅王遣使求和，为孟乃甸（缅甸蒙米特东北，瑞丽江南岸）白衣头目解塞所阻。至元二十四年，缅王为其庶子不速速古里囚系，云南王所命官阿难答等被杀。忽必烈遂以秃满带为都元帅，张万为副都元帅，将6000人征缅。元军进讨至蒲甘（缅甸蒲甘），缅军诱敌深入，元军失利，丧师数千。缅国遣使求和，岁纳贡物。之后，缅国分裂，蒲甘王朝亡。成宗大德三年(1299)，缅王为权臣阿散哥也所杀，缅国王子至元京师求援。元朝命诸王阔阔、云南行省平章薛超兀而等率军2000出征，进围木连城（缅甸曼德勒以南）达两月之久。后，元军将领受缅军重贿，遂以炎暑瘴疫为由撤兵。阿散哥也遣使来朝，承认杀主之罪。中缅又恢复友好往来。　（孟繁清）

元初农民起义

自至元十五年(1278)到至元二十六年间，因元朝的残酷压迫，在闽、浙、赣等地，先后爆发了黄华、陈吊眼、杜可用、钟明亮、杨镇龙等领导的农民起义。

黄华，建宁政和（福建政和）人。至元十五年组织盐夫，并联络建宁（福建建瓯）、括苍（浙江丽水）民众及畲族女首领许夫人举义。邵武人高日新、高从周等聚众响应。至元十七年，黄华降元，起义受挫。同年，在南康都昌（江西都昌）爆发了杜可用领导的起义，福建漳州（今属福建）则有畲族首领陈吊眼及其叔陈桂龙领导的起义，其中以陈吊眼的规模为大。陈吊眼又名陈大举、陈钓眼。南宋末年曾领导汉、畲人民起义，归顺过宋将张世杰。宋亡后坚持抗元。至元十七年其叔陈桂龙起义后，两人占有山洞山寨80余所，建号昌泰，凭险固守。元政府以完者都为福建等处征蛮都元帅，高兴为右副都元帅、黄华为征蛮副元帅，统军讨伐。义军失利，损失2万余。至元十八年，陈吊眼统10万余义军坚守50余寨抵抗，又损失15寨。至元十九年，陈吊眼退守千壁岭。高兴以谈判为诱，陈吊眼中计，在半山腰被俘，牺牲于漳州。其父陈文桂、叔陈桂龙等降。余众坚持战斗不久，即告失败。至元二十一年，黄华拥众10万，剪发纹身，号头陀军，沿用宋末帝赵昺年号，再度起兵反元，进攻崇安、浦城等地，并包围建宁。元政府急令征东行省左丞刘国杰领准备出征日本的军队，会合浙西宣慰使高兴、江淮参政伯颜等联兵镇压。黄华屡战屡败，退至江山洞，守赤岩寨。寨破，黄华自焚死，起义失败。

至元二十四年，福建汀州（福建长汀）人（一说广东循州人）钟明亮率汀州畲民起义。这里山深林密，广东、江西失去土地的农民，往往千百成群移居于此，开荒种地。义军发展至10万左右。广东董贤举，江西丘元、谢主簿、刘六十、卢大老，福建泉州陈七师，兴化朱三十五等纷起响应。至元二十六年，钟明亮攻赣州，袭宁都，据秀岭，声势大张。元政府急令佥江西行枢密院事月的迷失、江西行省左丞管如德等发兵进讨。起义军转战福建、江西、广东边界地区，利用密林有利条件，“东击则西走，西击则东逸”，有力地回击元军。其间，钟明亮曾降敌两次，但一旦时机有利，便举旗再起。至元二十七年，钟明亮病死，余众仍打起他的旗号战斗达数年之久。

至元二十六年，浙江宁海人杨镇龙以玉山县（江西玉山）龙兴山为根据地，聚众起义，自称大兴国皇帝，建元安定。义军额刺“大兴国军”，众号12万，活动于义乌、东阳、永康、天台、新昌、嵊县一带。元遣宗王瓮吉得、浙江行省左丞相忙兀台等镇压。义军频战失利，龙兴山被攻破，起义失败，杨镇龙牺牲。

（孟繁清）

开辟海道

元初发展海运的措施及海运的兴盛。

秦汉以降，我国近海航运曾多次进行，但航程较短，运量较少。至元代，海运事业才兴盛发达起来。至元十三年(1276)，元军攻占临安（浙江杭州），大将伯颜命朱清、张瑄将南宋府藏图籍自崇明州（上海崇明）海运至京师，此即元代海运之始。元统一之初，江南税粮北运，主要依靠运河漕运。但当时运河尚未全线贯通，水陆间转，劳民伤财。至元十九年，忽必烈采纳伯颜建议，试办海运。总管罗璧、朱清、张瑄等奉命造平底船60艘，运粮40000余石，由海道至京师。这

次首航，因信风失时，中途停于山东刘家岛（山东蓬莱境内），明年始达直沽（天津），海上运粮首告成功。至元二十年，元政府立万户府二，以朱清为中万户，张瑄为千户，忙兀䚟为万户府达鲁花赤。至元二十四年，设行泉府司，专掌海运。又增置万户府二。次年设漕运司二，一在直沽河西务，接运南来粮物；一为京畿都漕运司，负责将直沽的粮食运往大都。至元二十八年，又应朱清、张瑄之请，并四府为都漕运万户府二，由朱清、张瑄专掌。海运粮自至元二十年后逐年增加，最多时年运粮达 350 多万石，对保证大都的用粮发挥了关键作用。

海运路线先后开辟过三条。前两条均为朱清、张瑄所辟。至元三十年海运千户殷明略又辟第三条航线：自刘家港（江苏太仓浏河）入海，至崇明三沙放洋东行，入黑水洋，至成山（山东荣成县成山角），然后西行，经刘家岛、登州（山东蓬莱）沙门岛，于莱州大洋入界河（海河）。航行这条路线，如风信有时，全程只需 10 天左右。

随着海运的发展，沿海港口逐渐兴起。太仓刘家港是海运起点，可容万斛之舟。山东密州（山东诸城）、登州成为定期的寄泊海港。上海也成为长江口的主要港口。直沽为海运终点，海运、河运的物资都在这里汇集，然后再运往京师。这里成为北方最大的港口。海运的兴起，不仅保证了元政府的粮食供应，而且促进了南北物资交流，加强了南北间的经济联系。成千上万的船工水手在与惊涛骇浪的斗争中，积累了丰富的航海经验，推进了我国航海技术的发展。

（孟繁清）

用兵安南

元朝初年对安南（越南北部）的侵略战争。

蒙哥汗七年（1257），蒙古大将兀良合台遣使入安南谕降，使者被扣。兀良合台遂分道进兵，破安南都城。后因气候炎热，驻兵九日即班师。忽必烈即位后，安南国王被迫称臣入贡，接受元朝册封。至元十九年（1282），元朝遣大将唆都率战船千艘，由广州出海，伐占城（越南中部）。占城王兵败，退据山林，双方相持年余。至元二十年，忽必烈责安南助元军兵粮以攻占城，为安南国王陈日烜拒绝。次年，忽必烈命镇南王脱欢、大将李恒假道安南以攻占城，并责陈日烜输粮助军。日烜从兄兴道王陈峻提兵边境，拒不从命。元军分六路进攻，陈峻败逃。日烜调圣翊等军，船千余艘，助陈峻。元军缚筏为桥，渡富良江。日烜退守天长（越南南定北即墨社）、长安（越南宁平附近）。此时，唐兀䚟与唆都率军由占城北返，与脱欢兵合，元军力量大增。日烜屡战屡败，弃舟楫甲仗，匿山林，走清化府（越南清化省清化）。元军虽连连取胜，但转战日久，疲于奔波，加以炎暑疾疫，亦死伤甚重。安南兵虽数败散，但散而复集，坚持抵抗。脱欢决意撤兵，命唆都等还乌里。安南军乘机追袭，唆都兵败战死，元军死伤惨重。至元二十四年，忽必烈再次命脱欢总兵征安南。元军渡富良江，迫安南都城。次年正月，日烜及其子复逃入海。然而天气转热，粮饷不继，元军难以持久，只好回师。安南军多处邀击，元军遭重大损失，脱欢亦受伤。至元三十年，忽必烈欲再次出兵安南，但不久病逝。成宗即位后即告作罢。

（孟繁清）

乃颜之乱

元世祖忽必烈统治时期蒙古诸王乃颜发动的武装叛乱。

乃颜（？—1287），成吉思汗幼弟铁木哥斡赤斤后裔，塔察儿国王之孙。其分地以哈剌哈河（即哈尔哈河）流域为中心，据有辽东大部。乃颜自恃地广人众，图谋起兵反叛。至元二十三年（1286），忽必烈置辽东行省于辽阳，借以镇慑诸王，控制辽东，乃颜等东路诸王多不自安。至元二十四年，乃颜联合哈撒儿后王势都儿，合赤温后王胜纳哈儿、哈丹等，举兵反叛，企图与海都相配合，对忽必烈东西夹击。海都则答应率 10 万大军前来会合。乃颜军南逼潢河（辽河上游西拉木伦河）流域，迫使元军退至豪州（治今辽宁彰武）、懿州（治今辽宁阜新东北）以西。忽必烈闻讯，一方面命伯颜进据和林（蒙古人民共和国哈尔和林），以防海都东来，一面亲统蒙汉两路大军，由上都（内蒙古正蓝旗东）北进，讨伐叛军。六月，乃颜退至呼伦贝尔高原的不里古都伯塔哈（在哈尔哈河与诺木尔金河交汇处的三角地带），企图集结兵力，与元军决战，结果被元军击败。乃颜出逃，后被追获处死。其余党势都儿兵败投降。哈丹窜逃高丽（朝鲜），最后兵败自杀。乃颜之乱平定后，忽必烈进一步加强了对东北地区的控制。（孟繁清）

出兵爪哇

至元二十九年（1292）元朝对爪哇（印度尼西亚爪哇岛）的入侵。

至元二十九年二月，忽必烈借口爪哇黥元使者孟琪，遂以史弼、亦黑迷失、高兴并为福建行省平章，率福建、江西、湖广三行省兵 2 万，战船千艘，备一年

用粮及钞4万锭，出征爪哇。十二月，元军从泉州出发。次年二月，抵爪哇。当时，爪哇国王哈只葛达那加剌为其邻国葛郎(位于今印度尼西亚爪哇岛)国王哈只葛当所杀，其婿土罕必阇耶攻哈只葛当，不胜。闻元军至，遂遣使以其国山川、户口及葛郎国地图迎降，求元军救助。元军击败葛郎兵，哈只葛当降。土罕必阇耶声称备降表及珍宝贡品，请求离元军回国。元军万户捏只不丁、甘州不花率兵200护送。土罕必阇耶中途杀元军2万户，起兵反元。元军且战且退，海行68日回泉州，损失3000余人。史弼、亦黑迷失等因出征失利而受杖责，其家产被籍没三分之一。

（孟繁清）

赛梁秉政

元世祖晚年及成宗统治时，起用赛典赤及梁德珪解决财政困难的事件。

元世祖忽必烈即位后，因理财心切，先后起用阿合马、卢世荣、桑哥等人理财，但三人先后被杀，国家财政状况日益恶化。至元三十年(1293)十一月，任命回回人、赛典赤·赡思丁之孙阿不一别克儿为中书平章政事，位在众平章之上，并赐以伯颜平章之号，呼之为赛典赤；同时命汉人梁德珪(即梁暗都剌)为中书左丞(后升为中书平章)。赛、梁秉政后主要着手理财。次年，忽必烈去世。在成宗元贞、大德年间继续秉政。其主要措施有：一、起用阿合马余党阿里等人参与理财；二、清理江南诸寺佃户，厘正原籍编民，整治江南影占税民地土；三、增加岁课，充实国库，以摆脱财政困难。大德七年(1303)三月，御史台臣奏劾赛、梁受朱清、张瑄贿赂，皆被罢黜。八年九月，成宗下令两人复职，但不久梁德珪病死，伯颜与其原来班底虽仍掌握朝政，已无多大作为。大德十一年正月，成宗病死，伯颜与左丞相阿忽台支持安西王阿难答夺位失败，均遭杀害。赛梁秉政是忽必烈晚年和成宗铁穆耳时期以色目人为主的理财活动，其过程长达10余年之久。这一理财活动对挽救世祖后期严重财政危机、维持成宗朝财政收支大体平衡起了很大作用。但整个赛梁秉政时期，御史台臣不断弹劾，统治集团内部矛盾也随之不断加深。（邱树森）

阿难答皈依伊斯兰教

元贵族阿难答信奉伊斯兰教的事件。

阿难答是元世祖忽必烈的孙子。其父忙哥剌于至元九年(1272)封安西王，出镇长安，次年加封秦王，又于开城(宁夏固原开城乡)建府。十七年，忙哥剌卒，阿难答袭封安西王，同时掌秦王印。阿难答有弟按擅不花，于二十四年袭封秦王，但他犹称"秦王阿难答"。

忙哥剌子女多早卒，因担心阿难答难于长成，遂将他托给突厥伊斯兰教徒蔑黑贴儿·哈散·阿黑塔赤抚养，由其妻祖来哈奶大。阿难答自幼从其奶妈背诵《古兰经》，学会阿拉伯文，履行戒律和祈祷，成为虔诚的伊斯兰教徒。待他袭封安西王后，拥有在河西(原西夏辖地)关陇地区的封地，15万蒙古军队，享有酿酒等特权。他礼拜甚勤，经常在礼拜寺中祈祷和念诵《古兰经》，给大多数蒙古儿童施行割礼，大部分蒙古军队也皈依了伊斯兰教，还广建礼拜寺，实施回回历。有一个反对伊斯兰教的贵族撒儿塔黑向成宗铁穆耳告发了阿难答的活动，成宗大为恼怒，派鹰夫长只儿哈朗和赤儿塔合兄弟俩去阻止阿难答履行礼祷和戒律，下令禁止阿难答派穆斯林进京见皇帝，要他改信佛教，到寺庙中去向偶像磕头烧香。阿难答予以拒绝，并说："偶像是人造的，我们为什么要向它下拜？我连伟大上帝的造物，有形世界的生命之源，禽兽草木的生活和发展之因，太阳，也不认为能够崇拜，我怎能崇拜人造的物象，把它看作我和合罕(大汗)的创造者呢？"成宗大怒，下令将阿难答监禁起来，阿难答对伊斯兰教信仰依然坚定不移。成宗慑于其军队的威力，不得不作出让步，被迫释放他回归他的封地，并加以抚慰，待之以礼。后来阿难答以参加忽里台(大聚会)的名义到京，向成宗表示爱戴和尊敬，并表示自己坚信伊斯兰教信仰，追随伊利汗国合赞汗，成宗不得不表示赞许："阿难答在伊斯兰教信仰方面成了合赞汗的追随者，让他如其心愿，也信仰伊斯兰教吧，我已仔细想过了，并已看出伊斯兰教是好的道路和信仰。"那个告发阿难答的撒儿塔黑后来也成了穆斯林。从此，阿难答在其辖区放手推广伊斯兰教。尽管大德十一年(1307)成宗去世后，皇后卜鲁罕与大臣阿忽台、八都马辛、伯颜等拥立阿难答为帝失败，阿难答也因此遭杀身之祸，但伊斯兰教在今甘肃、宁夏一带扎下了根。《明史·西域传》称："元时回回遍天下，居甘肃者尚多。"这与阿难答皈依伊斯兰教不无关系。阿难答死后，辖境内皈依伊斯兰教的蒙古军队及其家属逐渐融入回族、东乡族、保安族中去。（邱树森）

武仁授受

元朝武宗、仁宗时的皇位之争。

元世祖忽必烈立其子真金为皇太子，但真金先

死。真金生三子：长子甘麻剌、次子答剌麻八剌、三子铁穆耳。至元三十年(1293)世祖立铁穆耳为皇太孙，第二年即位，是为成宗。成宗嗜酒多病。大德九年(1305)立其独子德寿为皇太子，但半年后德寿先死。十一年，成宗亦病亡。于是宫廷内部又一次爆发皇位继承危机。安西王阿难答、左丞相阿忽台等力图以成宗晚年即"居中用事"的卜鲁罕皇后垂帘听政，进而推阿难答即帝位，并定于当年三月三日发难。右丞相哈剌哈孙则拥立镇守漠北、握有重兵的怀宁王海山(答剌麻八剌长子)。双方剑拔弩张，形势十分危急。哈剌哈孙一面北迎海山，南迎海山弟、居怀州(河南沁阳)的爱育黎拔力八达；一面悉收京师百司符印、封府库，称病以阻止卜鲁罕皇后发号施令。海山在漠北道远，爱育黎拔力八达先到大都，遂与哈剌哈孙密谋先发制人，于是比阿难答等抢先一天发动政变，爱育黎拔力八达亲率卫士执左丞相阿忽台及安西王阿难答等，责以乱祖宗家法，杀之。诸王阔阔出、牙忽都等力劝爱育黎拔力八达即帝位，他以长兄在不宜造次为由，先以监国名义执政，遣使北迎海山。海山早已关注大都局势，使者往来不绝，并做好南还夺位准备，待爱育黎拔力八达政变成功后，即率三路精兵南下，于是年五月抵达上都，爱育黎拔力八达与其母答己亦至上都，母子三人相会后，大会诸王，海山正式即位，是为武宗。废成宗后卜鲁罕，命其出居东安州，赐死；执阿难答同伙诸王明里铁木儿，亦赐死。同年六月，武宗封其弟爱育黎拔力八达为皇太子，相约兄终弟及，叔侄相承。武宗在位时大肆挥霍浪费，赏赐亲王大臣，以致财政枯竭、政制混乱。至大四年(1311)正月，武宗卒，爱育黎拔力八达即位，是为仁宗。仁宗即位后不久，即背弃成约，将武宗长子和世㻋封为周王，令其出镇云南，和世㻋心怀不满，行至陕西延安附近，与武宗旧臣们相商，决定抗命走北边金山。仁宗乘机立已子硕德八剌为皇太子，正式背弃"兄终弟及，叔侄相承"的成约。　　(邱树森)

铁木迭儿之奸

元朝中期统治集团内部的权势之争。

铁木迭儿(？—1322)，蒙古速客讷氏。祖卜邻吉带为宪宗蒙哥时元帅；父木儿火赤，怯薛官。成宗大德年间，铁木迭儿为同知宣徽院事，兼通政院使。武宗即位，为宣徽使。至大元年(1308)，由江西行省平章政事，拜云南行省左丞相，后因擅离职赴京师，被尚书省奏劾，因皇太后答己包庇，得戴罪还职。武宗卒，仁宗即位前起用完泽、李孟为中书平章政事，而皇太后答己召铁木迭儿为中书右丞相，仁宗即位后，仍为右丞相。

铁木迭儿之所以受皇太后恩宠，与其供职宣徽院有关。宣徽院掌玉食及燕享宗戚宾客之事，由后妃直接掌管，故与皇太后结成特殊关系，形成与朝廷官僚对峙之内侍集团。倚恃皇太后权势，为所欲为。

皇庆二年(1313)二月，铁木迭儿因病免职。延祐元年(1314)九月，复为中书右丞相。采取加强市舶管理，增加海外贸易税收，预买山东、河间运使明年盐引及各冶铁货以供财政开支，经理江南田粮等措施，导致江西蔡五九起义。铁木迭儿恃势贪虐，凶秽滋甚，中外切齿。三年，中书平章政事劾铁木迭儿不可使为太师，遭皇太后责杖，被罢职。四年，平章政事萧拜住、御史中丞杨朵儿只等揭露铁木迭儿"桀黠奸贪，阴贼险狠，蒙上罔下，蠹政害民，布置爪牙，威詟朝野，凡可以诬陷善人、要功利己者，靡所不至"。他侵吞晋王田千余亩、兴教寺后壖园地30亩、卫兵牧地20余亩，窃食郊庙供祀马，受诸王合儿班答等人钞14万贯、珠玉等10余万贯，受杭州永兴寺僧章自福贿赂金150两，取杀人犯张弼贿赂钞5万贯。他们奏请仁宗予以斩首，以抚人心。仁宗下诏逮问，铁木迭儿逃匿太后宫中，仁宗不忍伤太后意，仅罢其相位，而杨朵儿只反遭太后责斥，迁为集贤学士。六年四月，铁木迭儿复起为太子太师。御史中丞赵世延论其不法十数事，内外台劾其不可辅导东宫者又有40余人，仁宗以太后故，皆不听。

延祐七年正月，仁宗卒。太后以铁木迭儿为中书右丞相。铁木迭儿上台伊始，即大肆杀戮曾揭露其罪行者。二月，以皇太后旨召平章萧拜住、御史中丞杨朵儿只至徽政院，未几被杀。三月，英宗硕德八剌即位，铁木迭儿进开府仪同三司、上柱国、太师。平章政事李孟素不愿依附铁木迭儿，铁木迭儿故意将李孟迁为集贤侍讲学士，并以为李孟不愿担任此职，然后加以中伤，不料李孟识破其险恶用心欣然从命，铁木迭儿无奈。参议中书省事韩若愚亦不附铁木迭儿，铁木迭儿诬告并欲杀之，英宗不从，铁木迭儿夺其官，除名归乡里。五月，杀上都留守贺伯颜。贺氏曾揭露铁木迭儿受杀人犯张弼之贿，至是以贺便服迎诏为不敬之罪名杀之，籍没其家。八月，下四川平章政事赵世延狱。世延曾劾铁木迭儿奸状，故逮捕加以诬告，奏请极刑，英宗知其忠良，予以驳回，世延得免于死。

铁木迭儿自恃有太后为后盾，无视英宗。英宗察觉被其谮毁者皆先帝旧人，对其倒行逆施深感不安。

为巩固自己地位，牵制铁木迭儿，遂命功臣木华黎后裔、深谙儒道的拜住为中书左丞相，并委以心腹。当时，以太后答己、右丞相铁木迭儿为一方的势力很强大，拜住千方百计遏制他们的势力。答己原以为年仅17岁的英宗便于控制，至是懊悔不已；而英宗虽无力铲除铁木迭儿，但对其疏远而亲近拜住，使铁木迭儿颇感冷落。至治二年(1322)八、九月，铁木迭儿、答己相继病卒，为英宗与拜住推行新政提供了机会和条件。但铁木迭儿余党仍布列朝中，矛盾依然潜伏着。三年五月，英宗下令拆毁所立碑，追夺其官爵及封赠制书，籍没其家。　　（邱树森）

延祐经理

元仁宗延祐年间(1314—1320)，政府在江浙、江西、河南等地对田亩的查核以及对租税钱粮的理算。当时，各地地主豪强、寺观僧道与蒙古贵族，采取种种手段，大量隐瞒田产，逃避赋税，严重影响国家财政收入。为此，延祐元年(1314)，仁宗遣平章政事章闾、尚书你咱马丁、左丞陈士英等，分赴江浙、江西、河南等省经理田粮，同时命行御史台分台镇遏，枢密院以军防护。其经理办法是：先期布告民众，限40日内，向政府自报本户田产。凡以熟为荒，以田为荡，或隐占逃亡之产，或盗官田为民田，指民田为官田，及僧道以田作弊者，并许人告发。10亩以下，其田主及管干佃户皆杖77。20亩以下，加一等。100亩以下，杖107；以上，流窜北边，所隐田籍没入官。郡县官吏不认真查核，致有脱漏者，依情节治罪，重者除名。这次经理触犯了部分地主豪强的利益。但由于各地地主豪强与贪官污吏互相勾结，狼狈为奸，往往以无为有，陷害民众，因而激起各地民众纷纷反抗。延祐二年四月，宁都州民蔡五九聚众起义，七月间两度包围州城，后又移兵攻打汀州路宁化县(治今福建宁化东黄连镇)，福建为之震动。同年，仁宗被迫下诏，宣布新括田土免税三年。延祐五年，又下令河南新括田土，只科半税。至泰定、天历之初，虚增田亩之数又宣布全部革除。延祐经理并未达到预期目的。

（孟繁清）

延祐开科

延祐二年(1315)元仁宗开科取士的措施。

元仁宗即位后，采纳平章政事李孟建议，于皇庆二年(1313)十一月颁布《行科举诏》，决定恢复科举考试。因首次科举考试在延祐二年进行，故史文常以“延祐科举”称。

先是，窝阔台九年(1237)八月，在耶律楚材建议下，曾诏令以论、经义、词赋三科选试诸路儒生。考试于次年举行，共选得儒士4030人。该年为戊戌年，史称“戊戌选试”。

忽必烈即位后，曾就科举一事多次讨论。至元初，史天泽曾议行科举，但未果实行。至元四年(1267)九月，翰林学士王鹗等，又列举历代选举之法，请复行科举。忽必烈亦表示，“此良法也”，要求中书左三部议立程式。至元十一年十一月，中书省臣曾将翰林老臣所议程式呈报热心汉化政策的太子真金。但终忽必烈一朝，科举始终未能实行。成宗、武宗时，虽也一再议及贡举法度，但仍无结果。及至仁宗即位，方有是举。

元代科举分乡试、会试、殿试三道，每三年举行一次。

乡试于八月举行。参试者须由本贯官司于路、府、州、县学及诸色户内推举，年及25以上，乡党称其孝悌，朋友服其信义，并由经明行修之士，结罪保举。考试程式规定：蒙古、色目人试二场。第一场经问五条，于《大学》、《论语》、《孟子》、《中庸》内设问。义理精明、文辞典雅者为中选。第二场试策一道，以时务出题，限500字以上成。顺帝至正时，改经问五条为三条，另增经义一道，要求在《诗经》、《尚书》、《周易》、《春秋》、《礼记》内明一经，难度较前增大。汉人、南人试三场。第一场明经、经疑二问，于四书内出题。第二场于古赋、诏诰、章表内科一道，至正时改为古赋外于诏诰、章表内另科一道。第三场策问一道，限千字以上成。应试时，四书、《诗经》采朱注，《周易》采程、朱之说，《尚书》采朱熹门人蔡沈之说，《春秋》用程颐私淑门人胡安国传，亦可用左氏、公羊、谷梁三传，《礼记》用古注疏。策问不尚浮藻，惟务直述。蒙古、色目愿试汉人、南人科目，中选者加一等注授。

乡试科场共17处，分设于河南、陕西、辽阳、四川、甘肃、云南、岭北、征东、江浙、江西、湖广十一行省，河东、山东二宣慰司，真定(河北正定)、东平(今属山东)、大都(北京)、上都(内蒙古正蓝旗东)四处直隶省部路分。乡试结束，从应试者中选中试者300名(其中蒙古、色目、汉人、南人各75名)。其名额分配，各处多少不等。名额较多者，如江浙行省为43名(其中蒙古5、色目10、南人28)，大都35名(其中蒙古15、色目10、汉人10)；名额较少者，如云南行省5名(其中蒙古1，色目、汉人各2)，征东行省3名(蒙古、色目、汉人各1)。

会试定于乡试次年二月举行。科目与乡试相同。

会试共录取100名(其中蒙古、色目、汉人、南人各25名),然后参加殿试。殿试于当年三月举行,其内容为试策一道。汉人、南人限千字以上成,蒙古、色目人限500字以上成。殿试诸生不再黜落,仅以策论定其高下顺序。然后以蒙古人、色目人为右榜,汉人、南人为左榜,唱名公布。两榜各分三甲,第一甲各1人,赐进士及第,秩从六品;第二甲赐进士出身,秩正七品;第三甲同进士出身,秩正八品。顺帝元统元年(1333)改殿试第一甲各3人,皆赐进士及第。

元代科举考试,从延祐首科至元末,共举行九次,取士1200余人(包括国子监生员会试中选者),仅为唐与北宋的十分之一强。元代官员,以怯薛与吏员出身者居绝大多数,科举出身者为数寥寥。而科举出身入相者,有元一代不过九人,官至省、部宰臣(包括侍郎)、行省宰相及诸路总管者,不过六七十人。其他多为基层官吏。由此可见,元代科举对元代政治所发挥的作用并不大。但元代科举首先将程朱理学作为科举考试的依据,这对明清科举考试却有很大影响。理学在思想界的统治地位,通过科举得到了巩固。　(孟繁清)

蔡五九起义

延祐二年(1316)蔡五九领导的江西农民起义。

蔡五九,江西赣州人。延祐元年,元仁宗采纳中书右丞相铁木迭儿之议,在江浙、江西、河南等处经理田粮。政府官吏乘机虚张顷亩,冒括田租,敲诈百姓。仅江西信丰一县即拆毁民宅900处,且夷墓扬骨,民众极为痛恨。第二年四月,蔡五九等在赣州起义。义军相聚于兔子寮五王庙,杀猪置酒,俱执锡楞刀枪。蔡五九自号洞主。六月,起义军攻宁都,杀赵同知。八月,进攻汀州宁化县(治今福建宁化东黄连镇),蔡五九自称蔡王,义军声势浩大,福建为之震动。元政府遣元帅乞住与江西行省平章政事李世安、江浙行省平章政事章闾等联兵进讨,残酷镇压。九月,蔡五九在木麻坑被俘牺牲,余部3000余人在上虎嶂遭围歼,起义失败。　(孟繁清)

南坡之变

至治三年(1323),为反对英宗改革所发动的政变。

延祐七年(1320)正月,仁宗病死,子硕德八剌即位,是为英宗。英宗自幼长于怀州(河南沁阳)旧府,素受儒家教育,通汉族封建文化。当时控制朝政的太后答己之所以同意立硕德八剌为帝,主要觉得他柔儒易于控制。为进一步控制朝政,仁宗死后仅4天,答己起用被仁宗斥罢的铁木迭儿为中书右丞相,铁木迭儿乘英宗尚未登位之机,杀其政敌中书平章萧拜住、御史中丞杨朵儿只、上都留守贺伯颜等,排斥中书平章李孟等,并网罗黑驴、赵世荣、木八剌等,结成私党。对此,硕德八剌大为不满,在其即帝位之时,太后答己来贺,英宗毅然见于色,答己退而悔曰:"我不拟养此儿耶!"遂饮恨成疾。英宗上台后对答己、铁木迭儿一党进行清洗,岭北行省平章政事阿散、中书平章黑驴、御史大夫脱忒哈、徽政院使失列门等皆以"谋废立"罪诛戮。因碍于答己权势,英宗尚不能罢黜铁木迭儿,乃任拜住为中书左丞相,委以心腹。拜住为开国功臣木华黎之后、世祖时名相安童之孙,有"蒙古儒者"之称。他竭力扶持英宗,抵制铁木迭儿奸谋,使中书省逐渐摆脱铁木迭儿控制。至治二年(1322)八、九月,答己、铁木迭儿相继去世。十月,英宗任命拜住为中书右丞相,且不设左丞相,以免掣肘。此后,君臣即放手实行新政:(一)铲除铁木迭儿余党。铁木迭儿死后,英宗责其贪蠹无厌,下令籍没其家,追夺官爵,毁所立碑。至治二年十二月,铁木迭儿子、宣政院使八思吉思坐刘夔冒献田地伏诛;次年二月,杀刘夔及参与此案的同佥宣政院事囊加台。但铁木迭儿义子、御史大夫铁失被特赦。(二)起用汉族地主官僚及儒臣。拜住荐张珪、吴元珪、王约、韩从益、赵居信、吴澄、王结等人入中书省任职或为集贤院、翰林院官。英宗要求大臣们尽心求访山林遗逸之士,引入朝廷。(三)罢汰冗员。从至治二年十一月起,罢世祖以后冗置官,其中有崇祥院、福寿院下属十三署、徽政院断事官、江淮财赋之属六十余署。(四)行助役法。为减轻农民劳役负担,英宗于至治三年四月下诏行助役法:凡民田百亩,令以三亩入官,收其岁入为助役费,补贴给受役者,官不得与。同时下令岁减江南海运粮22万石。(五)颁行《大元通制》。早在仁宗在位时即命中书省官员选编元朝开国以来政制法程可著为令者,供有司遵行,但始终未能公布。至治二年正月,英宗命继续编纂,重新审定。书成,定名《大元通制》,凡2539条,内断例717条,条格1151条、诏赦94条,令类577条,全书共88卷,于至治三年正式颁布。这些改革措施引起铁木迭儿余党惊恐万状。尤其是英宗表示将继续追查铁木迭儿余党贪赃枉法罪行时,以铁失为首的一伙加紧密谋发动政变。至治三年八月二日,铁失等遣使至和林(蒙古乌兰巴托西南)向晋王也孙帖木耳报告政变之谋,并称事成之后将拥戴也孙帖木耳为帝。五日,英宗、拜住

等自上都(内蒙古正蓝旗东)返回大都,途径南离上都30里的南坡驻跸时,铁失与知枢密院事也先帖木儿、大司农失秃儿、前平章政事赤斤铁木儿、前云南行省平章政事完者、铁木迭儿子前治书侍御史锁南、按梯不花等蒙古诸王,共16人,以铁失所辖阿速卫军为外应,手持凶器,先后杀死拜住、英宗于卧所。九月四日,晋王也孙帖木耳在漠北龙居河(怯绿连河)即帝位,是为泰定帝。为稳定局面,泰定帝命也先帖木儿为中书右丞相、铁失为知枢密院事。十月至十二月,对南坡之变的元凶铁失、也先帖木儿等全部杀戮,籍没家产,按梯不花等诸王被流放。泰定帝既轻而易举地登上了皇帝宝座,又维护了臣仆不得杀主的蒙古大扎撒的尊严。 (邱树森)

两都之战

致和元年(1328),元文宗图帖睦尔与元幼主阿速吉八争夺帝位之战。

致和元年(1328)七月,泰定帝在上都(内蒙古正蓝旗东)病卒。武宗旧臣、留守大都(北京)的金书枢密院事燕铁木儿与西安王阿剌忒纳失里等密谋,以其掌握枢密符印的有利条件,发动政变,拥立武宗子为帝。八月初四黎明,令百官集兴圣宫,燕铁木儿率阿速铁木儿、孛伦赤等17人及武装卫士,声称"武宗皇帝有圣子二人,孝友仁人,天下正统当归之",欲立武宗子为帝,有不顺者斩。中书平章政事乌伯都剌、伯颜察儿等不从,当即被缚,中书左丞朵朵,参知政事王士熙,参议中书省事脱脱、吴秉道,侍御史铁木哥、丘世杰,治书侍御史脱欢,太子詹事丞王桓等亦被拘留。燕铁木儿与西安王阿剌忒纳失里共守内廷,分遣心腹掌管官库、符印,召百官入内廷听命;因周王遥远,乃遣前河南行省参知政事明里董阿、前宣政院使答里麻失里,急驰江陵(今属湖北),迎武宗次子、周王和世㻋异母弟怀王图帖睦尔至京师。为预防不测,燕铁木儿又密告河南行省平章政事伯颜,领兵扈从怀王来京。伯颜亦为武宗旧臣,早年侍武宗于藩邸,仁宗时曾为周王和世㻋常侍府常侍。伯颜立即清点仓廪、府库、谷粟、金帛之数,准备车舆、士马、饮膳、犒劳等,并征发民丁、招募勇士、修葺城池,增置武器,加强巡逻,做好战备。俟怀王途经河南时,伯颜全副武装护送北行。是月,怀王抵达大都。时上都以中书左丞相倒剌沙为首的朝臣已闻大都发生政变,立即派兵南下,内战爆发。

九月八日,燕铁木儿率诸王、大臣,伏阙请怀王早正大位,以安天下。怀王以兄在朔方为由固辞,燕铁木儿曰:"人心向背之机,间不容发,噬脐无及!"十三日,图帖睦尔即位,诏书中称:"宗戚、将相、百僚、耆老,以为神器不可以久虚,天下不可以无主,周王辽隔朔漠,民庶遑遑,已及三月,诚恳迫切。朕姑从其请,谨俟大兄之至,以遂朕固让之心。"是为文宗。文宗登基前夕,乌伯都剌等被杀,伯颜察儿、朵朵等流放远州,籍没家产。是月,上都倒剌沙等立皇太子阿剌吉八为帝,改元天顺。

文宗、天顺帝分别在大都、上都即位前,双方已经剑拔弩张,进行交锋。燕铁木儿发动大都政变后不久,即命其弟撒敦、子唐其势分兵驻守居庸关、古北口,河南行省也派前万户孛罗守潼关。上都方面,留辽王脱脱、诸王孛罗帖木儿、太师朵带、左丞相倒剌沙、知枢密院事铁木儿脱居守,梁王王禅、右丞相塔失铁木儿、太尉不花、平章政事买闾、御史大夫纽泽等率大军至榆林。至九月初一,双方在榆林激战,上都军兵败退至怀来而还;大都方面的隆镇卫指挥使斡都蛮又袭击上都诸王灭里铁木儿、脱木赤军于陀罗台,执诸王而归。但上都得到陕西、四川两行省的支持。初三,陕西兵渡河入河中府(今山西永济西),劫夺库银万八千锭,杀掠官员,大都方面不得不分兵抵御。而上都军又卷土重来,分兵攻碑楼口、蓟州沙流河两家店等地。十三日,文宗即位后,立即加封燕铁木儿为太平王、开府仪同三司、上柱国、录军国重事、中书右丞相,并急命率军抵御上都军。十六日,梁王王禅袭破居庸关,大都守军大溃,燕铁木儿军至三河,次日王禅兵至大口。之后,双方激战于榆河、白浮一带,王禅终因兵力不济,单骑败亡,此役上都损失精兵数千。是月底,上都不甘失败,遣其知枢密院事竹温台突破古北口,以兵掠石槽,与燕铁木儿、撒敦等转战40余里,直至牛头山,其驸马孛罗帖木儿、平章蒙古塔失、雅失帖木儿皆被俘杀,损失精兵万余人。而支持上都的辽东军由蓟州抵达京师之郊,燕铁木儿急引兵拒守;上都诸王忽剌台入紫荆关;陕西行台御史大夫也先帖木儿从大庆关(陕西大荔东)渡河,大肆擒杀河中府官员。至十月初,燕铁木儿调各地军至,分援紫荆关、潼关,自率主力军击辽东军于通州,旋击溃辽东军于潞水。转而与上都方面的阳翟王太平、国王朵罗台战于蓟州之檀子山,太平被杀,敌军死伤无算;而阿速卫指挥使脱脱木儿等大败上都诸王忽剌台于良乡、卢沟桥。至此,上都方面败局已定。虽然陕西、四川方面仍支持上都,上都也曾遣军掠山西等地,但终究是强弩之末。十三日,齐王月鲁帖木儿、东路蒙古元帅不花帖木儿等率大都军围

上都，倒剌沙等奉皇帝宝玺出降，梁王王禅逃遁，辽王脱脱被杀。不久，王禅等亦被擒。十一月，倒剌沙、王禅及其党羽均被处死。陕西、四川方面军均先后被瓦解。两都之战以上都的彻底失败而告终。

（邱树森）

燕铁木儿专权

元文宗在位时（1328—1332），大臣燕铁木儿专权的事件。

燕铁木儿，钦察人，功臣土土哈之孙。初从怀宁王海山镇守称海（蒙古国科布多以东），备宿卫十余年。海山即位，是为武宗，封燕铁木儿同知宣徽院事。泰定帝致和元年（1328），任佥书枢密院事，掌宿卫。同年七月，泰定帝卒于上都（内蒙古正蓝旗东）。时燕铁木儿留大都，自以身受武宗宠拔之恩，其子宜登大位，遂与公主察吉儿、族党阿剌帖木儿等密谋，于是年八月发动政变，捕泰定帝在大都（北京）的支持者，夺中书省、枢密院权，遣人至江陵迎武宗次子怀王图帖睦尔至京。九月，图帖睦尔即位，是为文宗；而上都的中书左丞相倒剌沙、梁王王禅等立泰定帝子阿剌吉八为帝，并爆发两都之战。文宗即位后，封燕铁木儿为太平王，加开府仪同三司、上柱国、录军国重事、中书右丞相、监修国史、知枢密院事，率军大破上都兵。十月，倒剌沙奉皇帝玺降，两都之战结束，文宗加燕铁木儿答剌罕之号。自泰定帝病卒后，迎文宗即位，两都之战得胜，在这场皇位继承的争战中，燕铁木儿起了决定作用。

接着，燕铁木儿在明、文二帝交替即位中又成了主角。文宗在大都即位之时，曾在即位诏中申明："朕姑从其请，谨俟大兄之至，以遂朕固让之心。"现在天下既定，文宗不得不遣使迎其兄周王和世㻋来入继大位。但文宗与燕铁木儿自然不甘心把来之不易的果实双手拱让给别人，于是演出了一幕假让位、真谋杀的戏来。至治二年（1329）八月，文宗与燕铁木儿在王忽察都（河北张北北）毒死明宗。燕铁木儿根据早已谋划的部署，以皇后的名义将皇帝玺宝授给文宗，立即从王忽察都拥文宗西北走，昼则率宿卫士以扈从，夜则躬擐甲胄绕幄殿巡护，文宗终于在上都复位。文宗对燕铁木儿的感激之情只有通过不断增加荣誉、地位和赏赐来表达。例如封赠其三代，命礼部尚书马祖常制文立石表彰其大勋，下诏命燕铁木儿独为丞相以尊异之，规定凡号令、刑名、选法、钱粮、造作，一切中书政务，悉听总裁，任何人不得隔越闻奏，赐平江、松江、江阴等地田产。甚至文宗以次子古纳答剌养于燕铁木儿家中（其长子、三子皆卒），改名为燕帖古思；而燕铁木儿之子塔剌海则养于宫中，作为文宗的养子。燕铁木儿的官名不断增加，达到53字之多：开府仪同三司、上柱国、太师、太平王、答剌罕、中书右丞相、录军国重事、监修国史、提调燕王宫相府事、大都督、领龙翔亲军都指挥使司事。

燕铁木儿自独秉大权以来，挟震主之威，肆意无忌。知枢密院事阔彻伯、脱脱木儿等10人恶其权势之重，欲谋害之，事发，皆被诛杀。至顺三年（1332）八月，文宗病危，遗诏立明兄之子继位。在此之前，燕铁木儿多次劝文宗立燕帖古思为皇太子，文宗因有愧于兄，执意不肯。文宗卒，燕铁木儿封锁遗诏，拖延时日，最后决定立明宗次子7岁的懿璘质班登位，不发诏，不改元，是为宁宗。宁宗在位53天病死，燕铁木儿再次请立燕帖古思，卜答失里皇后慑于文宗和宁宗之死，又自惭于谗害明宗八不沙皇后，执意立明宗长子妥懽帖睦尔为帝。燕铁木儿策动司天监太史上书，言帝不可立，立则天下乱，千方百计阻挠妥懽帖睦尔登位。直至燕铁木儿病死前，妥懽帖睦尔一直未能登基。

燕铁木儿以自己的权势视天下为其私有，搜括财富，恣意挥霍，生活极端荒淫。一宴或宰13马，娶泰定帝后为妻，前后娶宗室女达40人，终因荒淫日甚，体羸溺血而死。妥懽帖睦尔即位后，燕铁木儿家族余威尚在，其弟撒敦为左丞相，子唐其势为御史大夫，女伯牙吾氏为皇后。唐其势因不满伯颜位居其上，遂发动反伯颜政变。事败，燕铁木儿家族彻底覆灭。

（邱树森）

明宗暴死

元后期的帝位之争。

明宗和世㻋系武宗海山长子。武宗死后，由弟爱育黎拔力八达即位，是为仁宗。仁宗背弃"兄终弟及，叔侄相承"定约，用丞相铁木迭儿计，谋立己子硕德八剌为皇太子。为此，先封和世㻋为周王，远徙云南。和世㻋得知仁宗谋立己子为皇太子，颇为怨恨，遂与属臣秃忽鲁、尚家奴、教化、孛罗及武宗旧臣厘日、沙不丁、哈八儿秃等相会于延安，商量对策，由翰林侍讲学士教化去长安，与陕西行省丞相阿思罕谋划出兵事。议定后，阿思罕与行省平章塔察儿等分道自潼关、河中府（山西永济西）进驻行省。不料塔察儿已密报仁宗，奉旨伺机杀害和世㻋。诸军行至河中，塔察儿等袭杀阿思罕、教化等，和世㻋仓促西奔金山（阿尔泰山），察合台后王等率众来会。自此以后，和世㻋

与朝廷断绝往来，朝廷亦视周王为敌。

致和元年(1328)七月，泰定帝病卒，燕铁木儿在大都发动政变，随后和世㻋异母弟图帖睦尔即位，爆发两都之战。十一月，两都之战以上都彻底失败告终。文宗图帖睦尔为实践即位诏中的诺言，遣使哈散、撒迪至西北周王所在，奉迎皇兄。朔漠诸王也劝周王南还京师即位。周王遂决定南下，西北诸王察阿台、沿边元帅朵烈捏、万户买驴等率军扈从，武宗旧臣孛罗、尚家奴、哈八儿秃等亦随行。行至金山，又有岭北行省平章政事泼皮、武宁王彻彻秃、佥书枢密院事帖木儿不花继至，真所谓"诸王、旧臣争先迎谒，所至成聚"。

正当周王和世㻋陶醉不已之时，文宗、燕铁木儿已策划好谋害周王的阴谋。是时文宗已即位三个月，燕铁木儿作为翊戴第一号功臣已权倾天下，他们自然不会把手中的权力轻易拱手让给别人。天历二年(1329)正月，文宗再遣中书右丞跃里帖木儿前来迎接，跃里帖木儿、撒迪等以文宗之命劝进。二十八日，周王即位于和林之北，是为明宗。三月初四日，文宗遣中书右丞相燕铁木儿奉皇帝宝玺北上，御史中丞八即剌、知枢密院事秃儿哈帖木儿等，各率其属官随从。四月初七日，燕铁木儿到达明宗驻地，率百官上皇帝宝玺，明宗表彰其功勋，拜太师，仍命为中书右丞相，开府仪同三司、上柱国、录军国重事、监修国史、答剌罕、太平王一切照旧。但明宗又同时把自己的亲信安插进中书省、枢密院、御史台三个要害部门：旧臣哈八儿秃为中书平章政事、前中书平章政事伯帖木儿为知枢密院事、常侍孛罗为御史大夫。其后，明宗又任命一批中央及行省长官，周王府旧臣及扈从士受制命者达 85 人，六品以下 26 人。在短短的时间内，明宗已完成了政权交替工作。明宗又命武宁王彻彻秃、中书平章哈八儿秃至京师，立弟图帖睦尔为皇太子。

明宗咄咄逼人的攻势，迫使图帖睦尔、燕帖木儿必须尽早施行既定的毒计。八月初一日，明宗到达王忽察都(河北张北北)之地，离大都已近在咫尺了。初二日，图帖睦尔入见明宗。是日，明宗大会皇太子、诸王和大臣们。至初六日，年方 30 的明宗突然中毒暴死。燕铁木儿立即以皇后命奉皇帝宝玺授文宗。初九日，燕铁木儿拥文宗抵上都。十五日，文宗正式复位。

明宗死后，文宗等加紧对明宗妻、子进行迫害。八不沙皇后与妥懽帖睦尔、懿璘质班二子住进宁徽寺。至顺元年(1330)，八不沙皇后被杀。妥懽帖睦尔送至高丽大青岛贬所。至顺三年，文宗病卒。临终前召集卜答失里皇后、燕帖古思太子、权臣燕铁木儿曰："昔者晃忽义(即王忽察都)之事，为朕平生大错。朕尝中夜思之，悔之无及。燕帖古思虽为朕子，朕固爱之，然今日大位，乃明宗之大位也，汝辈如爱朕，愿召明宗子妥懽帖睦尔来，使登大位。如是，朕虽见明宗于地下，亦可以有所措词而塞责耳。"妥懽帖睦尔于至顺四年六月即位，至元六年(1340)四月权臣伯颜被逐后，顺帝妥懽帖睦尔正式下诏揭示文宗等谋杀明宗之事于天下。　　(邱树森)

棒胡、朱光卿起义

元末后至元年间爆发的农民起义。

元顺帝妥懽帖睦尔即位后，权臣伯颜倒行逆施，吏治败坏，贪污成风，加之土地兼并，赋役不均，灾荒频仍，社会矛盾极其尖锐，导致后至元年间(1335—1340)农民起义特别频繁，其中尤以至元三年(1337)爆发的棒胡、朱光卿起义规模和影响最大。

是年正月，广州增城县民朱光卿发动起义，石昆山、钟大明率众响应。他们很快建立政权，国号大金，建元赤符。元廷命指挥狗札里、江西行省左丞沙的出兵镇压。四月，惠州归善县民聂秀卿、谭景山等造军器，拜戴甲为定光佛，与增城朱光卿相结合，起义势力大增，曾出兵进攻博罗等县。由于元军的残酷镇压，聂秀卿等先被捕获。七月，狗札里、沙的擒朱光卿，石昆山、钟大明等逃遁，旋亦被擒，起义失败。但三年后，朱光卿余部再次起义，攻增城县，射伤元广东肃政廉访使颜浩。

同年二月，河南汝宁信阳州爆发棒胡起义。棒胡，陈州人，名闰儿，好使棒，棒长六七尺，进退击技如神，故称"棒胡"。其徒弟有百余人，著名者如胡山花、辘轴李、棒张等。棒胡以白莲教号召群众，起义后响应者甚众，其徒亦在各地起兵。起义军破归德府鹿邑，焚陈州，屯军于杏冈。元廷命河南行省左丞庆童领兵讨之。时广东有朱光卿起义；四川合州大足县有韩法师起义，自称南朝赵王；西番有起义民众东镇西王子党兀班，各地起义对元廷威胁甚大。元廷迫于形势，下诏称："汝宁棒胡、广东朱光卿、聂秀卿皆系汉人，汉人有官于省台院及翰林集贤者可讲求诛捕之法以闻。"可见，各地起义对元廷震动很大。棒胡起义军一直与元军周旋，直至次年四月，元军才将棒胡俘获，送往京师杀害。

棒胡、朱光卿起义是至正十一年(1351)开始的元末农民大起义的预兆，也是后至元年间社会矛盾的反映。当时擅权的右丞相伯颜，曾疯狂地提出杀

张、王、刘、李、赵五姓汉人的荒唐主张，元顺帝虽然没有执行，但阶级矛盾和民族矛盾的尖锐化已经进一步加深。　（邱树森）

驱逐伯颜

元末统治集团内部的权势之争。

伯颜，蒙古篾儿乞部人。年15岁时为怀宁王海山侍从，从海山北征海都有功，赐号"拔都儿"（勇士）。海山即位（武宗），伯颜拜吏部尚书，累官尚书平章政事，领右卫阿速亲军都指挥使司达鲁花赤。仁宗爱育黎拔力八达即位后，伯颜改为周王和世㻋常侍府常侍，改河南行省平章政事。致和元年（1328），泰定帝卒，燕铁木儿在大都发动政变，迎怀王图帖睦尔至大都即帝位，伯颜参预其谋，扩军备战，迎怀王北上。故文宗即位后，他以翊戴之功，拜御史大夫、中政院使，历中书左丞相加储政院使，改知枢密院事，晋封浚宁王，拜太傅，加徽政使。他是文宗夺位的第二号大功臣，地位仅次于燕铁木儿。

顺帝妥懽帖睦尔即位时，燕铁木儿已病死，伯颜进拜中书右丞相，封秦王。燕铁木儿子唐其势等不满伯颜位在己上，于至元元年（1335）六月发动兵变，被伯颜诛杀。从此，伯颜独秉国钧，专权自恣，其官衔相加达到246字，比之燕铁木儿53字又多了193字，拥有皇帝赐给的田地达1万多顷，权倾天下，顺帝只是敢怒不敢言。于是，他更加肆无忌惮，推行了一系列"变乱祖宗成宪"的政策。

伯颜专权时，社会矛盾已十分尖锐。他出于维护蒙古统治集团的利益，特别是他个人的特殊地位，不惜一切手段排斥汉人、南人，甚至打击蒙古统治集团内部的异己者。他把中书省中的汉人、南人长官，绝大部分排斥出去；禁止汉人、南人习蒙古、色目文字；废除科举，以防止汉人、南人入仕；禁止汉人、南人持兵器、畜马匹；当棒胡、朱光卿起义后，他竟提出杀张、王、刘、李、赵五姓汉人。伯颜出身篾儿乞部，篾儿乞人因反抗铁木真，被铁木真击败，部众大部分被俘为奴，伯颜幼时曾为郯王家奴。郯王彻彻秃是宪宗蒙哥第三子玉龙答失之孙，立有军功。郯王每见伯颜习惯地呼为"使长"。伯颜于是诬告郯王谋为不轨，矫旨将其杀死。他还将世祖忽必烈的孙子宣让王帖木儿不花、威顺王宽彻普化贬走。伯颜还穷凶极恶地搜括钱财，时人说"天下贡赋多入伯颜家"。他出入宫禁，公然与文宗后卜答失里私通，甚至在太后宫里，通宵不出。京师民间嘲笑他"上把君欺，下把民虐，倚恃着太皇太后"。

正当伯颜专权日恣、势焰熏天之时，他的侄儿脱脱深感事态严重，万一伯颜有杀身之祸也会殃及自己。脱脱虽自幼养于伯颜家，且依仗伯父权势，官拜御史大夫，但他还是决心要把伯颜铲除掉。当他与生父马札儿台、老师吴直方商议后，决心益坚，又大胆地向顺帝吐露心意，顺帝对他反复测试，终于排除疑虑，一场紧张的朝廷政变正在酝酿着。伯颜也渐感有疑，对脱脱百般防范；脱脱也曾几度准备下手，终因胆怯或准备不足而未遂。

后至元六年（1340）二月，伯颜约顺帝同去柳林打猎，顺帝托疾不往。伯颜固请燕帖古思太子（文宗子）同往。脱脱密告顺帝："伯父久有异志，兹行率诸卫军马以行，往必不利社稷。"并立即与亲信世杰班、阿鲁商议，先收京师城门钥，各门均由亲信率士兵及宿卫士把守。当夜，顺帝在玉德殿召集近臣汪家奴、沙剌班及省院大臣先后入见，告之将拒伯颜入京；中夜二鼓，命太子怯薛月可察儿率30骑抵柳林太子营将太子接回京城；立即起草诏书，列数伯颜罪状，诏成，命中书平章政事只儿瓦歹奉诏连夜前往柳林，出伯颜为河南行省左丞相。天明，大都城门紧闭，脱脱据坐城门等候。伯颜遣人来问故，脱脱传圣旨曰："诸道随从伯颜者并无罪，可即时解散，各还本卫，所罪者惟伯颜一人而已。"诸军见伯颜失势，纷纷散去。伯颜怨恨不已，大骂"皆脱脱贼子之所为也！"但为时已晚，只得南下。是年三月，顺帝下诏命伯颜徙南恩州阳春县（今属广东）安置，途经龙兴路（江西南昌）驿舍，得病而死。驱逐伯颜受到了朝野称赞，士大夫称此举为"拔去大憝，如剔朽蠹！"有人讽刺道："百千万锭犹嫌少，垛积金银北斗边，可惜太师无运智，不将些子到黄泉。"　（邱树森）

脱脱更化

元末丞相脱脱挽救垂亡的措施。

元末，统治腐朽，统治集团内部倾轧激烈。顺帝和脱脱逐走伯颜后，脱脱之父马札儿台出任中书右丞相，脱脱出任知枢密院事，脱脱弟也先帖木儿为御史大夫。但马札儿台一心于经营榻坊、酒馆，贩运长芦淮南盐，不理朝政，脱脱让参政佛嘉向上奏弹劾，迫使马札儿台辞职。至元六年（1340）十一月，脱脱出任中书右丞相。当时，顺帝有志于励精图治，对脱脱十分信任，脱脱也执意废除伯颜旧政，推行新政，使元朝出现中兴局面，因而在顺帝支持下推出一系列更化措施：

一、恢复科举取士制。脱脱上台伊始，立即于当

年十二月恢复科举。规定国子监生员，三年一次，依科举例入会试，中者取18名。又大兴国子监，使蒙古、回回、汉人三监生员达到3000余。这一措施对于笼络汉族士大夫、消除由于伯颜推行排儒政策带来的民族隔阂心理具有一定作用。

二、置宣文阁，开经筵，遴选儒臣以选讲。文宗于天历二年(1329)创建奎章阁，一时精英荟萃。文宗卒后，伯颜弄权，奎章阁凋敝，文士四散。脱脱上台后，改奎章阁为宣文阁，由书法家巎巎董阁事，开展宫廷教育、修撰三史、翻译古籍、编撰史书等活动。为使皇帝和太子等接受传统经史教育，脱脱选儒臣欧阳玄、李好文、董缙、许有壬四人，每五日一进讲，读四书五经，练大字，操琴弹古调。

三、恢复太庙四时祭祀。至正三年(1343)十月，顺帝曾至太室拜享于诸列祖，并向宁宗位拜；又亲祀南郊。

四、为受伯颜迫害诸王昭雪、平反。郯王彻彻秃、高昌王帖木儿不花等皆以无罪被伯颜杀，顺帝为之昭雪；宣让王帖木儿不花、威顺王宽彻普化被伯颜矫旨贬走，顺帝下诏使返回原有领地；功臣博尔术四世孙阿鲁图正广平王之位。这些措施有利于蒙古统治集团内部团结。

五、开马禁，减盐额，蠲负逋，减轻人民负担。脱脱下令开马禁；下令自至正二年起减河间盐场额盐3万引、自至正三年起减两浙盐场11万引、自至正三年起减福建盐场3万引；至正三年十月顺帝南郊礼毕，大赦天下，蠲民租五分。

六、对地方官升降、选用采取六条标准。元制，凡选举守令，以户口增、田野辟、词讼简、盗贼息、赋役均五事备者为上选，升一等；四事备者减一资；三事有成者为中选，依常例迁转；四事不备者，添一资；五事俱不举者，黜降一等。至正三年，诏天下立常平仓，以常平仓得法为六事，六事备者升一等，四事备者减一资，三事备者平迁，六事俱不备者降一等。

七、皇帝带头关心国事、厉行节俭。自脱脱在顺帝支持下推行新政以来，顺帝一改过去不问政事、深居宫中的状况，用功攻读圣贤之书，留心国事，除非有朝会、祠享、时巡之事，几无一日而不御宣文阁，与宰相、儒生商议国事。顺帝亦颇为节俭，下令裁减宫女和宦官，皇帝御膳也从日用羊5头减为1头，御靴刺花过去用黄金，现改为用铜，他甚至走出厚载门亲自耕种田地。

自至元六年十一月脱脱上台以来，到至正四年(1344)五月脱脱辞位，其间共三年半时间，由于采取了一系列更化政策，腐朽不堪的元朝政治为之一新，一些得到重用的汉儒，知无不言，言无顾忌，顺帝也有励精图治之意，统治集团矛盾较少；社会上出现了少有的安定，水旱灾荒得到及时赈济蠲免，农民起义虽常有发生，但规模不大。脱脱因此颇得好评，中外翕然称为贤相。　　(邱树森)

伊本·白图泰的中国之行

元末中西交往纪事。

伊本·白图泰(1304—1377)是摩洛哥丹吉尔人。全名穆罕默德·伊本·阿布杜拉·伊本·穆罕默德·伊本·伊布拉欣·赖瓦蒂·团哲，以伊本·白图泰之名著称于世。他一生中曾三次外出旅行。泰定元年(1325)，当他21岁时为了进行朝觐，开始第一次旅行，从摩洛哥出发，经阿尔及利亚、突尼斯、西的黎波里、埃及、巴勒斯坦、黎巴嫩、叙利亚，到希贾兹，然后作初次朝觐。接着从麦加出发，抵伊拉克、波斯、小亚细亚，又回到麦加作第二次朝觐。此后，留居麦加两年之久。后又离开麦加赴也门，渡海至东非，返抵阿拉伯半岛南部至波斯湾，游历阿曼、巴林、哈萨，再至麦加作第三次朝觐。旋又离麦加去印度，经花剌子模、霍腊散、土耳其斯坦、阿富汗、信都。在德里时，曾被素丹穆罕默德·沙委任为德里的马利克教派法官，受素丹的派遣，往马尔代夫、锡兰、孟加拉、东印度群岛、苏门答腊、爪哇，到达中国。他到达中国的时间是元顺帝至正六年(1346)，由刺桐(泉州)上岸，再去脩尼克兰(广州)、建昌或干江(江山)、拜旺·古图鲁(鄱阳)、汗沙(杭州)、汗八里(大都)，然后回国。归途时经印度西海岸，过波斯湾，到达阿拉伯各国，再至麦加作第四次朝觐。直到至政九年才回到摩洛哥非斯，结束第一次旅行。不久又开始第二次旅行，由丹吉尔、直布罗陀抵格拉纳达，返回非斯。第三次旅行起自赛哲罗马赛，继至台阿杂、曼里、杂额雷、卡斯胡、台卜克图、台堪达、汗卜尔，对中非地区进行了广泛的游历。他是中世纪四大旅行家之一。

伊本·白图泰回到非斯后在此定居。他成为买勒族素丹阿布·安纳尼的幕僚。至正十六年，素丹命其秘书伊布·朱赞将伊本·白图泰口述的一切记录成书，定名《异域奇游胜览》，俗称《伊本·白图泰游记》。《游记》记载的范围相当广泛，为人们提供了那个时代阿拉伯各国、中亚、印度、中国及非洲的珍贵资料。其中有关中国的记载虽然篇幅不多，内容却相当丰富。根据《游记》所载，至正二年左右，元顺帝遣使臣图西尔至印度，要求素丹允许在赛姆海里建造

佛庙，那里原来的佛庙被穆斯林破坏并抢掠一空。元朝皇帝送给素丹男女奴隶100名，花缎500匹，其中百匹系在刺桐织造，百匹系在汗沙(大都)织造，麝香5曼尼(印度衡名)，镶宝锦衣5件，绣金箭袋5个，宝剑5把。素丹命白图泰率使团回聘，所赠礼品有骏马100匹，男奴100人，女婢100人，贝赖米亚棉布100匹，五彩丝绸衣料100件，衣服104套，毛绒布衣500件，麻布衣料100段，细毡100卷，彩篷1座，拱形帐幕6座，金质烛台4座，银质镶法蓝烛台6座，金质浴盆并壶1套，银盆6件，绣金素丹锦袍10件，绣金箭袋10件，宝剑10把，镶宝手套1副。但素丹以穆斯林地区只许缴纳人丁税的人修建教堂为理由，拒绝了元朝皇帝建佛庙的要求。据记载，当时中印之间交通皆由中国海舶承担，而且中国海域只能由中国船只航行。中国海船分为三等：大者称艟克，中者称艚，小者称舸舸姆。最大的船有3至12帆，皆以竹制成，织如席状，每艘载人达千名，其中海员600名，士兵400名，每艘大船有小船3艘随行。这类巨舶是刺桐和广州制造的。他说，中国幅员辽阔，物产丰富，水果、五谷、家禽，都是世界上最好的，瓷器质优价廉，人民生活富裕，多用煤做燃料，交易时通用纸币。中国每至一地都有穆斯林，尤以泉州、广州、杭州为多，每一城市中都有穆斯林居住区，内有清真大寺和道堂，并设有法官和谢赫(教长)，中国穆斯林享有宗教信仰自由，宗教活动正常，其习俗、文化生活严格遵循《古兰经》和圣训中的规定，他们有的仍使用阿拉伯语和波斯语。他还见到中国有苏非派修道士和黑人穆斯林。穆斯林商人在中国很活跃，其中有的成为巨商，对商旅来说，中国是最美好最安全的地方。《伊本·白图泰游记》中关于中国的记载具有很重要的史料价值。《游记》受到世界各国的重视，并给予很高的评价。　(邱树森)

至正变钞

至正十年(1350)，元政府变更钞法的措施。

至正四年五月，脱脱辞去中书右丞相职。以后阿鲁图、别儿怯不花、朵儿只相继出任中书右丞相。至正九年闰七月，脱脱复相。其间共五年多，元朝政治腐败已不可挽救，加之天灾频仍，农民起义和少数民族起义加剧，社会矛盾进一步激化。

脱脱复相后，意欲扭转逆转局面，重新整顿朝政。变更钞法是其措施之一。

实行变钞的主要原因，一是国库空虚，入不敷出。世祖至元后期以来，纸币发行量猛增，纸币不断贬值。成宗大德以来，开始大量动用纸币准备金；武宗至大时，钞本已经空虚，不得不发行至大银钞，使之5倍于至元钞，又恢复铜钱使用；仁宗即位，整顿钞法，遂罢至大银钞与铜钱，但仍大量印钞，皇庆年间发行额多达232万锭以上，延祐年间略有减少，而官定钞银比值只及中统初的二十分之一。由于日积月累印钞，到至正年间纸币已形同废纸。二是伪钞横行。元代钞法虽规定造伪钞者不分首从、堪用不堪用，一律处死，但造伪钞者仍屡见不鲜，几乎遍及全国。大德元年至四年(1297—1300)，仅杭州路一地，查处伪钞案多达88起，274人之多。伪钞充斥市面，对钞法构成极大破坏。

至正十年四月，左司都事武琪向脱脱建议变更钞法。他说：钞法自世祖时已行之后，除拨支料本、倒易昏钞以布天下，有合支名目，于宝钞总库料钞转拨，所以钞法疏通，民受其利。比年以来，失祖宗原行钞法本意，不与转拨，故民间流转者少，致伪钞滋多。吏部尚书偰哲笃支持这一建议，并提出以楮币一贯文省权铜钱一千文为母，而钱为子的方案。脱脱为慎重起见，会集中书省、枢密院、御史台及集贤、翰林两院官进一步商议，会上展开了激烈的争论。以集贤大学士兼国子祭酒吕思诚为代表的官员竭力反对变钞，他反对的主要理由是："钱钞用法，见为一致，以虚换实也。今历代钱、至正钱、中统钞、至元钞、交钞分为五项，虑下民知之，藏其实而弃其虚，恐不利于国家也。"但御史大夫也先帖木儿命监察御史劾吕思诚狂妄，夺其诰命并所赐玉带，迁为湖广行省左丞。这一事关国计民生的重大决策，竟用压制的办法，仓促而定。顺帝下诏批准了中书省的变钞方案。具体办法是：一是印造"至正交钞"(实际上是用旧的中统交钞加盖"至正交钞"字样，故又称"至正中统交钞")，新钞一贯含铜钱一千文，或至元宝钞两贯，两种钞并行通用。二是发行"至正通宝"钱，共分三类：地支纪年钱(分代表铸造年代的寅、卯、辰、巳、午五种，每一种有小钱、折二钱、折三钱三等)、纪值钱(折二钱、折三钱、当五钱、当十钱)、权钞钱(五分、一钱、一钱五分、二钱五分、五钱)。所谓"权钞"就是以有价值的金属货币代替无价值的纸币。就变钞的初衷来看，执政者企图以钱来实钞，殊不知由于纸钞根本没有银子作准备金，早就成了虚文，人民群众对之毫无信任，因而一俟钱钞并用，民必"藏其实而弃其虚"。至正十一年，朝廷专置宝泉提举司，印制交钞和铸造铜钱，但物价飞涨，"京师料钞十锭(每锭50贯)易斗粟不可得"，纸币成了废纸。到十五年时，纸币几乎绝用；

到十六年，纸币绝用，民间交易只用铜钱。变钞最终结局，竟被吕思诚言中了。而变钞的失败，加剧了元末社会的动荡不安，成为激起农民起义的重要原因。

（邱树森）

贾鲁治河

元末贾鲁治理黄河的工程。

至正四年（1344）夏五月，大雨二十余日，黄河暴溢，水平地深二丈许，北决白茅堤（河南兰考东北）。六月，又北决金堤。沿河郡邑，如济宁路（治今山东巨野）的单州（山东单县）、虞城（河南虞城北）、砀山（今属安徽）、金乡（今属山东）、鱼台（山东鱼台西）、丰（江苏丰县）、沛（江苏沛县）、任城（山东济宁）、嘉祥（今属山东），曹州（治今山东菏泽）的定陶（今属山东）、楚丘（山东曹县东南）、成武（今属山东），大名路（治今河北大名南）的东明（山东东明东南），东平路（治今山东东平）的汶上（今属山东）等州县皆遭水患。这次河决严重破坏了黄河下游广大地区的农业生产，给数以千万计的劳动人民带来巨大灾难，民之死亡者不可胜数，出现人相食的悲惨情景。河患之后，灾区的饥民、流民为生存计，不得不拿起武器四处劫掠，阶级矛盾进一步加剧。河决后，由于元朝统治者没有采取有效措施，水势北侵安山（山东东平西），沿入会通河，延袤济南、河间，严重危及山东、河间两漕司盐场和南北运河的漕运，元朝的财政收入将面临危机。元朝政府虽先后设置过河南山东都水监和山东等处行都水监，专治河患，并曾修治过金堤和白茅堤，终因只是小修小补，河患愈益严重。

至正八年（1348）二月，元廷于济宁郓城立行都水监，专治河患，命河东高平（属山西）人贾鲁主其事。贾鲁上任后，即巡行河道，考察地形，往返数千里，查清河患要害，为图上进二策：其一，修筑北堤，以制横溢溃，则用工省；其一，疏塞并举，挽河东行，使复故道，其功数倍。但他的方案未被采纳。至正九年闰七月，脱脱再度出任中书右丞相，并主持召开治河讨论会，贾鲁以都漕运使身分在会上再次提出治河二策，并坚定地主张应采取其第二策："必疏南河，塞北河，使复故道。役不大兴，害不能已。"脱脱不顾廷臣反对，当机立断地采取了贾鲁"疏南河，塞北河"的主张。

贾鲁"疏塞并举，挽河东行，使复故道"的治河方略是当时历史条件和科学水平下最有效的方案。因为黄河自南宋建炎二年（1128）杜充决堤，河水由泗入淮，到至正十一年223年来，河水北流的局面已经结束，由于以往千百年来的泥淤和黄河南流后北河水量的锐减，北河的排洪能力大大降低，黄河南流由淮入海，其泄洪能力要强得多。元代黄河多次大决，多在汴梁至邳州段，主流在此南北摆动，如能在这一范围内疏通加深河床，引水东流，则既能将山东积水放归黄河，又能确保运河、盐场安全。贾鲁的方案，指导思想即是如此。

至正十一年四月，元廷命贾鲁为工部尚书兼总治河防使，发汴梁、大名等13路民工15万人，庐州（治今安徽合肥）等地戍军18翼2万人供役。四月二十二日开工，七月完成疏凿工程，八月二十九日放水入故道，九月舟楫通行，并开始堵口工程，十一月十一日，木土工毕，诸埽堤建成。整个工期计190天，经历三大工程。

第一大工程为疏浚故河。即疏浚从黄陵岗到哈只口的黄河故道和凹里村到杨青村的减水河。施工从白茅口南二里的黄陵岗向东开始，开新河10里，到达南白茅，又开河10里至刘庄村，接入黄河故道，从刘庄至专固浚故道102里280步，从专固至黄固，开新河8里，从黄固至哈只口浚故道51里80步。这段干流工程共长182里。为防止以后堵口合龙后水势的狂怒，特浚凹里村减水河：从凹里村向西开生地3里40步，分别不同情况拓宽旧河身82里54步至张赞店，从张赞店到杨青村垦生地13里60步，接入故道。这段减水河共长98里54步。两者全长280里54步强。

第二大工程是堵塞黄河故道下游上段诸缺口、豁口，修筑北岸堤防。至正四年河决后，黄河故道两岸已是千疮百孔，为使回河故道后不致出现决溢险情，贾鲁在疏浚了故道和开凿减水河的同时或以后，先后筑塞了专固缺口和凹里减水河豁口4处，从哈只口至徐州300余里，修缺口107处。同时又兴两岸埽堤工程，北岸因地势低洼，修筑护岸堤防，高广不等，通长254里71步，其中白茅河口至曹州板城补筑旧堤，长25里285步，板村至英贤村等处，长133里200步，稍冈至砀山县，长85里20步，亦思剌店缕水月堤，长6里30步，哈只口至徐州缺口107处，积长3里256步。

第三大工程是堵塞白茅缺口，使黄河勒回故道。这项工程是决定治河成败的关键一役。八月二十九日开始向疏浚完毕的故道放水。贾鲁考虑到决河势大，又正值秋涨汛期，故在口门西侧的北岸筑刺水堤二道，总长26里200步，用作挑溜减弱口门溜势。又筑截河大堤19里177步：其中在黄陵岗北岸者总长

10里41步，在口门西侧岸上筑土堤伸入水中，修叠埽台，系龙尾埽，直抵龙口；黄陵岗南岸总长9里160步。但刺水堤及截河大堤筑得较短，控制能力不足，决河势大，南北广400余步，中流深3丈余，一俟放水，难以下埽，如冲入故道，将会前功尽弃。在此关键时刻，贾鲁决定采用船堤障水法，即逆流排大船27艘，前后连以大桅或长桩，用大麻索、竹绠绞缚，缀为方舟；又用大麻索、竹絙周船身上下绕紧，使之牢不可破，用铁锚硾于上流水中，使之固定。船腹中铺散草，满贮小石，以合子板钉合，再以埽密布合子板上，达二、三重，以大麻索缚紧，又缚横木三道于头桅，用竹编笆，夹以草石，立之桅前，约长丈余，名为“束水帘桅”。然后选动作便捷的水工，每船各二人，立于船首尾，岸上击鼓为号，船工同时凿船，使水入船，船沉后，水溢入故河道，在船堤上填三道草埽。这一工程极为惊险、壮观，10余万人扎帮、运埽、叠埽，终于在十一月十一日使龙口堵合，使北河绝流，故道复通。

据统计，整个治河工程耗费木桩大者27000根，榆柳杂梢666000根，藁秸蒲苇杂草7335000余束，竹竿625000根，碎石2000船，绳索57000根，所沉大船120艘，其余苇席、竹篾、铁缆、铁锚、大钉等物资不计其数。总计用去中统钞1845636锭。工程之浩大，在中国古代治河史上是空前的。

贾鲁成功地完成了治河工程，但仍然挽救不了岌岌可危的元朝黑暗统治。韩山童等农民起义领袖利用开河之机，埋独眼石人于黄陵岗，传播“石人一只眼，挑动黄河天下反”的民谣，一俟独眼石人挖出，即发动武装起义。农民起义利用了贾鲁开河，却不是贾鲁开河导致了农民起义。宋濂在《元史·河渠志》中指出：“议者往往以谓天下之乱，皆由贾鲁治河之役，劳民动众之所致。殊不知元之所以亡者，实基于上下因循，狃于宴安之习，纪纲废弛，风俗偷薄，其致乱之阶，非一朝一夕之故，所由来久矣。不此之察，乃独归咎于是役，是徒以成败论事，非通论也。设使贾鲁不兴是役，天下之乱，讵无从而起乎？”此见解颇为公允。

（邱树森）

天完政权的建立

元至正十一年(1351)九月，彭莹玉、徐寿辉在蕲水建立的农民政权。

彭莹玉(？—1353)，江西袁州(江西宜春)人，自幼出家到南泉山慈化寺为僧，从其寺僧之姓，故人称彭和尚。当时，其家乡一带百姓多患疾疫，他以清泉水为人治病，患者多愈，以致袁州民翕然事之如神。在群众中享有很高的威信。至元四年，彭莹玉和他的徒弟周子旺率众5000余人起义。起义者胸前背后都写一“佛”字。不久，起义失败，彭莹玉逃往淮西，淮民闻其义行，争相庇护，虽然官府严令抓捕，终难得逞。至正十一年八月，彭莹玉在刘福通领导的汝、颍红巾起义军的影响下，又与徐寿辉、邹普胜在蕲州(湖北蕲春蕲州镇)起义。徐寿辉(？—1360)，又名徐贞一，蕲州罗田县人，布贩。邹普胜，黄州(湖北黄冈)麻城人，铁匠，自彭莹玉在袁州起义失败后，他继续宣传“弥勒佛下生，当为世主”，鼓动起义。至此，他们共推徐寿辉为主，聚众起义，也以红巾为号。起义后的第二月(九月)，就攻占了蕲水县及黄州路。这年十月，徐寿辉以蕲水为都称帝，国号天完，建元治平，以邹普胜为太师。这是元末农民起义军中最早建立政权的一支红巾军。沔阳渔家子陈友谅(1320—1363)也随徐寿辉一同起义。当时南方人民在元朝黑暗统治和地主阶级压迫剥削下，相率造反。所以徐寿辉起义军所到之处，得到人民的广泛拥护，发展迅猛。天完政权建立不到半年，即至正十二年正月，起义军就攻占了湖广行省的首府武昌，接着兵分数路，向今江西、安徽、浙江、湖南、湖北挺进，先后攻下了江州、南康、袁州、饶州、徽州、吉安、杭州、常德、澧州、宝庆、沔阳、中兴、荆门、襄阳等数十个州县。起义军所到之处，元朝官军多狼狈溃逃，广大贫苦农民则纷纷参加起义军。如至正十二年三月，项普略率起义军到达江西饶州时，短短几天内就有数万人参加。他们皆短衣草鞋，削竹为枪，截帛为巾，乃至声势壮观，弥野皆赤。义军阵容严整，纪律严明，至正十二年七月，攻下繁华的杭州城时，照样不杀不淫，也不强迫人民去当兵，只是把元朝政府搜刮得来的府库财物，加以没收，深受杭州人民的赞颂。蕲、黄红巾军还提出了“摧富益贫”的口号，在许多地方推行剥夺富家救济贫民的政策，没收地主阶级的财物救济贫民。受到广大贫苦人民的热烈拥护，同时遭到各地地主武装的对抗，他们凶狠地袭击农民军。如至正十二年闰三月，陈普文统义军攻占了吉安路，赶跑了元军，而地主武装罗明远又攻陷了吉安。湖广地区的地主武装更加猖獗，至正十二年八月，义军将领俞君正攻下了荆门州，杀元知州聂炳。九月又打败元朝的四川行省咬住的军队，攻下了中兴路(湖北江陵)，逼使咬住逃奔松滋。可是不久，俞君正却被中兴地主范忠组织的反动武装所打败，中兴路再次陷入敌人之手。元朝政府认识到地主武装可以利用，竭力扩充所谓的“民兵”或“义

兵"。所以，在至正十二年后，徐寿辉领导的红巾军就与地主武装和元朝军队组成的反动联合武装展开剧烈的争夺战。在湖广、江西、江浙诸省的许多战略要地，如武昌、岳州、汉阳、江州、饶州、杭州以及徽州等地，都进行了反复的争夺，战斗打得十分激烈，不少地区多次呈胶着状态，出现一系列拉锯战。起义军重要首领彭莹玉和项普略相继在战斗中英勇牺牲。至正十三年五月，元军由信州和徽州两路进军，攻陷江西重镇饶州，步步推进，向天完政权的根据地蕲水逼近。六月，元将答失八都鲁攻陷了蕲水西北方向的安陆。七月，元湖广行省参知政事阿鲁辉攻陷了武昌及汉阳。十一月，元江西左丞火尔赤攻陷了蕲水正南方向的瑞州，形成对蕲水的包围。同年十二月，元朝政府会合五支劲旅从四面向农民军进逼，蕲水终于失陷。起义军遭到重大损失，余部退到沔阳湖和蕲春山中，继续坚持艰苦的抗元斗争。正在这时，占据高邮的张士诚，于至正十四年正月自称诚王，国号大周。而汝颍红巾军也在同年五月进围庐州。这两支起义部队的举动有力地支援了蕲黄红巾军，使元朝政府不得不把注意力转向两淮地区。因而元军对蕲黄红巾军的围剿，到至正十三年十二月攻陷蕲水后，再没能组织大规模的军事力量来消灭他们。至正十四年二月，元政府命湖广行省平章政事苟儿为淮南行省平章政事，率兵攻高邮。又把答失八都鲁、阿儿灰等部军队调来汝宁和庐州。至正十四年底，张士诚在高邮城下大败元军。徐寿辉领导的蕲黄红巾军利用这一有利时机，再度兴起，大举出击。至正十五年正月，徐寿辉部将倪文俊又攻下沔阳，三月攻下湖北重镇襄阳，五月复下中兴路，七月再下武昌、汉阳。十六年(1350)正月，倪文俊建都于汉阳，迎徐寿辉据之。此后又接连攻取澧州、衡州、岳州等地。到至正十七年，又进而攻下了峡州及巴蜀诸郡，占有了湖广、江西以及四川等广大地区。天完政权重新壮大起来，在中央设有丞相、平章等官，以倪文俊为丞相，并设有中书省及六部。另设统军元帅府管理军队。在地方则设立行省。(高春平)

张士诚建立大周政权

至正十四年(1354)正月，张士诚在高邮建立的农民政权。

张士诚(1321—1367)，小字九四，江苏泰州(江苏泰州)白驹场亭人。有弟三人，皆以操舟贩运盐为生。在元代，盐户的地位十分低下，他们贩盐卖给富室，常常遭到百般侮辱，甚至有时富室买了盐却不付钱。张士诚对此十分愤恨。至正十三年正月，他与其弟士义、士德、士信以及李伯升等18人起事，结众杀所仇弓兵，灭诸富豪，纵火焚其居，并到附近的盐场招人起兵。遇到当地地主武装刘子仁的袭击，大弟士义中箭死。此时，盐丁在官府的盘剥欺压下，苦不堪言，纷纷参加起义。张士诚有众万余，被推为主。打败了刘子仁的地主武装，起义队伍迅速壮大。同年二月攻下了泰州，元朝淮南行省派遣军队去镇压，被起义军打败，又派高邮知府李齐去招降，张士诚杀了李齐和参知政事赵琏，拒绝受降。接着又攻取兴化。五月占领了运河要冲高邮，切断了元朝政府的运粮道，将兴化、德胜湖、宝应连成一片。至正十四年正月，张士诚在高邮建立政权，自称诚王，国号大周，建元天祐。这样，不仅使元政府依赖的江南财赋供应线南北运道梗塞，而且从政治上对元朝的统治施以一定的压力。元朝统治者十分恐慌，至正十四年二月，急命湖广行省平章政事苟儿为淮南行省平章政事率兵攻高邮。又把答失八都鲁，阿儿灰等部军队调来汝宁和庐州增援。但均被张士诚打败。六月，张士诚率兵攻取江北重镇扬州，大败达识帖睦尔的元军。

至正十四年九月，元中书右丞相脱脱总制各路军马前来镇压，甚至连西域、西番皆发兵来助。元军倾巢而动，旌旗千里，金鼓震野。南方地主武装也积极地参加了这次围剿，配合元军行动。浙东地主戴国彬亲自率领子弟及乡兵，携带大批船只，为进攻高邮的脱脱军转运粮草。大敌当前，张士诚部起义军毫不畏惧，英勇抗击，固守高邮城，使得大批元军屯兵坚城之下，一筹莫展，进退两难。为了敷衍元顺帝，脱脱接受了部将董抟霄"先易后难"的提议，分兵攻陷天长、六合，但高邮城在广大义军的坚守下仍岿然不动。此时，元朝统治集团内发生了内讧，脱脱的政敌哈麻，正与顺帝的母舅老的沙、顺帝之弟巴郎太子以及哈麻的妹婿秃鲁帖木儿等相勾结，用导其淫乐的方式向顺帝献媚取宠，博得了顺帝的欢心，又在顺帝面前不断攻击脱脱。至正十四年十二月，元顺帝便以劳师费财，时逾三月，坐视寇盗，恬不知罪的罪名，削夺了脱脱的官爵和兵权。哈麻怕脱脱拥军生变，不奉行诏旨，因此他在发出诏旨之前，就要朝中诸大臣领军从征者还家，私下派人先来军中，告诉他们说："诏书且至，不即散者当族诛。"所以诏书一到军中，百万大军，一时四散，其中散无所附者，多从红巾军。张士诚的起义军乘势奋起还击，大败元军，取得了高邮保卫战的胜利。这次战役在元末农民战争史上有重大意义。它消灭了元朝的有生力量，从此以后，元兵不

能复振。并把农民起义推向一个高潮。在北方，刘福通领导的红巾军拥立韩林儿为帝，分兵三路，大举北伐。在南方，徐寿辉领导的蕲黄红巾军在这一胜利形势的鼓舞下，立即组织反攻，很快重新占有了湖广、江西、四川等大部地区。到至正十六年，朱元璋和张士诚先后渡江占领了浙东、浙西的大片土地。张士诚攻下了平江（江苏苏州），建为国都，占有了盛产鱼盐、蚕桑的江南富庶地区。整个农民起义的形势十分喜人，元朝的灭亡已成定局。　（高春平）

刘福通建立龙凤政权

元至正十五年（1355），刘福通拥立韩林儿建立农民革命政权。

元顺帝至正十一年，黄河在河南归德府（治今河南商丘南）白茅决口，日徙而北，失其故道。时中书省丞相脱脱因变更钞法失败，物价飞涨，想借治河来挽回声誉，因而极力赞成治河，对元顺帝说：皇帝方忧下民，为大臣者正当分忧。且事有难为，如病有难治，自古河患即难治之疾，今我必欲去之。于是他派工部尚书成遵前去勘察，成遵回报：工不可兴，浩大难成。且现在南阳、安丰一带盗贼成群，万一与挑河民夫相聚而起，便成大乱之契机，非等闲小事也。其它许多官员也纷纷反对。脱脱固执己见，贬成遵为长芦盐运使，擢升贾鲁为工部尚书兼河防使，总理治河。遂于这年四月，调发汴梁、大名等十三路民工 15 万前去服役。为了防备挑河夫的动乱，特地调派了庐州诸地 2 万军队去监视。计划挖掘从黄陵岗南达白茅西至杨青村的河道，使黄河东流复入故道。正在江、淮一带利用白莲教筹划起义的韩山童等人听到这个消息，十分高兴。因为以往元政府怕人民聚众闹事，三令五申严禁集会，现在元朝政府主动把一二十万人民集结在挑河工地上，这正是宣传发动起义的大好时机。当时，在黄河南北一直传说着“石人一只眼，挑动黄河天下反”的民谣。于是韩山童等人就因势利导，凿了个独眼石人，并把那首民谣稍加改动，刻在石人的背上：“莫道石人一只眼，此物一出天下反。”预先埋到黄陵岗要挖的河道里。此时，元朝政治黑暗，治河官吏贪残无度，不管河工死活，任意克扣工钱和饭食，致使河夫多怨。正在这时，河工们在黄陵岗上挖出了一只眼的石人，看到在它背上刻着的两句话和社会上流传着的民谣十分相符，群情激奋，十分惊讶，纷纷计谋造反。韩山童见时机成熟，便和颍州（安徽阜阳）人刘福通（？—1352）及杜遵道、罗文素等聚集了 3000 人在颍州颍上县白鹿庄密谋起义。为了广泛动员群众参加，他们宣称：韩山童是宋徽宗八世孙，当主中国。并说刘福通是宋朝大将刘光世的后代，辅佐旧主恢复大业。大家共同推戴韩山童为明王，杀白马黑牛祭告天地，密谋起兵，以红巾为号。不慎，走露了消息，韩山童被元政府捕杀，其妻杨氏带着儿子韩林儿（？—1366）逃跑到武安山中。刘福通逃到颍州，和杜遵道等重新组织力量，举行起义。并出敌不意，于这年五月迅速攻占了颍州及元朝屯粮地点朱皋（河南固始），获得了大批粮食，散发给贫苦人民，壮大了起义队伍。义军头裹红巾，以红巾为标记，所以称为“红巾军”，简称“红军”，又因他们烧香礼拜弥勒佛，所以也称“香军”。当时有人写诗嘲讽元朝政府：“丞相造假钞，舍人做强盗，贾鲁要开河，搅得天下闹。”生动地刻画了元朝统治的腐朽及广大劳动人民的怨恨情绪，揭示了红巾大起义爆发的根源。

红巾军起义爆发后，元朝立即派枢密院同知赫斯秃赤领阿速军 6000 会合汉军去镇压。阿速军由色目人组成，素号精悍，善骑射。赫斯与河南行省左丞一起进兵，但这两个带兵将领整日以酒色为务，军士也只知剽掠，根本不做战斗准备。当赫斯看见红巾军阵容严整时扬起马鞭连呼“阿卜（走）！阿卜！”所部不战皆走。元政府另派巩卜班平章为将，领侍卫汉军会同爱马鞑靼军数万人，进抵汝宁（治今河南汝南），屯军沙河岸边。巩卜班和赫斯一样日夜沉溺酒色，醉卧不醒。起义军夜袭其营，元军顿时乱作一团，主将也不知所终。事后清扫战场时，才找到巩卜班的尸体。元政府两遭惨败后，又命御史大夫也先帖木儿为总兵，率精兵 30 余万，车载军需物资数千辆。但此人外表气势汹汹，实质相当怯懦，当接近红巾军时，就停驻汝宁沙河岸，两月不敢出战。某夜，军中夜惊，自相扰乱，也先以为红巾军袭入营寨，尽弃军资粮械，只带散兵万人，一直逃到开封城下。刘福通乘势攻占了亳州（安徽亳县）、罗山、真阳（河南正阳），九月，又占汝宁，克息州、光州（河南潢川）等地，义军发展到数十万之众。至正十五年二月，刘福通在砀山夹河找到了韩林儿，迎来亳州，立为皇帝，号小明王，国号大宋，建元龙凤。以林儿母杨氏为皇太后，杜遵道、盛文郁为丞相，刘福通、罗文素为平章政事，刘福通的弟弟刘六知枢密院事，建立了农民革命政权。

龙凤政权建立后，分散在中原各地的红巾军大都接受其领导，势力大增。刘福通决定向元朝统治的心脏地区进军。至正十五年六月，刘福通率军大败河南行省平章答失八都鲁的部队。第二年九月，义军攻占了军事重镇潼关，杀死元参知政事述律杰。至正十

七年六月，刘福通自率大军进攻汴梁(河南开封)，并分军三路北伐：中路由关先生、破头潘、冯长舅、沙刘二以及王士诚等率领攻向晋、冀；西路由白不信、大刀敖和李喜喜率领攻向关中；东路由毛贵向北进攻，直指大都。他们在军旗上写着："虎贲三千，直抵幽燕之地；龙飞九五，重开大宋之天。"表达了广大农民起义军气吞山河，誓必推翻元朝黑暗统治的决心。至正十八年五月，刘福通攻下汴梁，迎来韩林儿，以此为都。当时，义军在汴梁造宫阙，易正朔。巴蜀、荆楚、江淮、齐鲁、辽海，西至甘肃，所在兵起，势相联结，形成了北方红巾军的全盛时期。

由毛贵率领的东路军在至正十八年攻克济南，占领山东大部分地区，并在那里立宾兴院，选用故官姬宗周等分守诸路，又于莱州立360屯田，每屯相距30里，造挽运大车百辆，凡官民田十收二分，还释放无辜被掠人员，从而使山东成为义军巩固的根据地，随后毛贵又挥师进入河北，同年三月克蓟州，前锋到达离大都不过百多里的枣林(北京通县西南)和柳林等地。在大都的蒙古贵族十分惊骇，纷纷建议北逃。但由于义军长途奔袭，孤军深入，在元朝精锐部队的阻击下，不得不撤回济南。关先生、破头潘率领的中路红巾军，进展也很迅速。他们在攻占怀庆后，派偏师出击绛州牵制元军，主力部队则直指潞州。至正十八年四月攻下辽州(山西省昔阳县)，接着又攻下冀宁路。九月攻保定，为元军所阻，遂转而攻下大同，兴和等地。到十二月，攻取元上都，焚宫阙，略辽阳，入高丽，沉重打击了蒙古贵族的腐朽统治。西路军在陕西一度受阻，至正十八年进入四川，余部又攻占了甘肃、宁夏等地。但由于义军各自为政，流动性大，孤军远征，相互间派系斗争激烈，终于被元军各个击破。在北伐各路军败退的同时，元朝地主武装察罕帖木儿部攻下了汴梁，韩林儿、刘福通撤退到安丰。至正二十三年张士诚派大将吕珍乘机围安丰，刘福通派人向朱元璋求援。援军还未到，刘福通已被吕珍杀害。朱元璋解安丰围后，迎小明王韩林儿到滁州居住。至正二十六年十二月，朱元璋派大将廖永忠迎接韩林儿到应天，在瓜步(江苏六合东南)渡江时沉船，韩林儿淹死江中，以龙凤纪年的大宋政权至此结束了。

刘福通、韩林儿领导的红巾军及其所建龙凤政权虽然失败了，但在反元斗争中，前后13年，大小数百战，给予元统治者以致命的打击，而且牵制了元军对江南的镇压力量，从根本上动摇了元朝的统治，为朱元璋北伐灭元扫清了障碍，历史功绩是巨大的。

(高春平)

朱元璋建立江南政权

元朝末年，朱元璋参加农民起义，并在南京建立独立政权的事件。

朱元璋(1328—1398)，幼名兴宗，字国瑞，濠州钟离(安徽凤阳东)人，出身佃农家庭，小时曾进私塾念书数月，因家贫卒读，给地主家放牛牧羊。由于元末政治腐败，社会黑暗，阶级矛盾和民族矛盾极度尖锐，民间流传着这样的歌谣：堂堂大元，奸佞当权，开河变钞祸根源，惹红巾万千。官法滥、刑法重、黎民怨……。元顺帝至正三年(1343)，黄河在河南归德府(治今河南商丘南)白茅口决口泛滥，沿河百姓苦不堪言。次年，淮北旱蝗交加，瘟疫流行，朱元璋的父母和大哥相继染疾病亡，因家贫无地安葬，幸得乡人刘继祖与地相助才草草入葬。年仅17岁的朱元璋在天灾人祸的双重逼迫下孤苦无依，托身附近的皇觉寺苟且度日。然而灾荒很快也殃及佛门。他入寺为僧刚两月，寺里便因年荒无粮，将僧徒遣散。他无处栖身，只好做个游方僧，四处化缘乞食。这期间，朱元璋南到庐州(安徽合肥)，西抵固始、信阳，北迄汝宁(河南汝南)、陈州(河南淮阳)，东经鹿邑、亳州(安徽亳县)，到颍州(安徽阜阳县)，几乎走遍了淮西、豫南。在外流浪三年后，又于至正八年回到皇觉寺。此时各地农民的反元斗争风起云涌。至正十一年五月，白莲教首领韩山童、刘福通利用元政府征集大批民工堵修黄河决口的时机，率先发动数万河工在淮水流域举起反元起义大旗。义军头系红巾，故称为"红巾军"。同年八月，彭莹玉、徐寿辉在湖北蕲水，李二、赵均用、彭大在江苏徐州相继起义。第二年春，定远人郭子兴与孙德崖也在濠州(安徽凤阳)起义。至正十三年，张士诚又在泰州起义。在各地反元武装斗争浪潮的影响下，广大农民纷起响应。朱元璋于至正十二年闰三月到濠州城参加了郭子兴领导的红巾军。这是他一生中的重要转折点。

朱元璋参加起义军后，作战英勇机智，深得郭子兴赏识，很快被提升为亲兵九夫长。郭子兴见其才能出众，年轻有为，又把养女马氏嫁给他。朱元璋做了元帅的女婿后，在军中的地位日益提高。不久，元将贾鲁攻围濠州，朱元璋受命拼力拒敌。至正十三年五月，贾鲁死，元兵解围去。但濠州城内郭子兴、孙德崖、彭大、赵均用、张天佑五位正副元帅互不团结，而且郭子兴割据思想浓重，只想占据滁阳称王，并无远

图。朱元璋觉得难与共图大业，必须发展自己的势力。于是他回到家乡去募兵，得徐达、周德兴等700余人，郭子兴大喜，提升他为镇抚。至正十四年六月，朱元璋挑选徐达、汤和、吴祯、花云、费聚、耿再成、唐胜宗、陆仲亨、郭英、周德兴等24员贴己将士南略定远。在攻打定远中，他又用计降服张家堡驴牌寨民兵3000人，并在横涧山夜袭元将张知院，收编缪大亨的义兵2万余人，势力大增。

攻克定远后，当地儒士冯国用、冯国胜兄弟带着乡兵前来投附，并向朱元璋献进取天下之计。冯国用认为金陵（江苏南京）龙蟠虎踞，是帝王建都立业之地。建议朱元璋先攻取金陵作为根据地，然后四出征伐，倡仁义，收人心，勿贪子女玉帛，天下不难平定。朱元璋听后大喜，当即把兄弟俩留在军中，参议军机大事。继而又在进军滁州（安徽滁县）途中遇儒士李善长，李善长建议他仿效汉高祖刘邦灭秦之法，朱元璋听毕连声称善，又任李善长作幕府掌书记，协助他出谋划策，协调诸将。在这些儒士的谋划下，朱元璋逐渐注意整饬军纪，严明赏罚，为统一天下打基础。随着队伍的扩大，其成分也越来越庞杂，部卒中既有投诚的元朝官兵，又有收编的各种地主武装，因而不少士兵沾染了抢掠奸淫的恶习。至正十五年春正月，郭子兴用朱元璋计，派大将张天佑攻取和州（安徽和县）传檄朱元璋统领诸将。朱元璋看到将士掠人妻女，下令把军中所掠妇女全部放回，百姓大悦。元兵10万反攻和州，朱元璋坚守三月，城中一度缺粮，遂严禁军士饮酒，大将胡大海的儿子触犯禁酒令，准备依法处置，有人提醒说胡大海正在浙江前线统兵作战，杀子恐怕不妥，朱元璋却斩钉截铁地说：宁可使胡大海叛我，也不可坏我军法！说完亲手将其杀掉。由于执法严明，注意安抚百姓，因此很快就打破元军的重围，逼使元兵渡江逃窜。至正十五年三月，郭子兴病死，朱元璋事实上已成为这支起义军的统帅。其时刘福通已把韩林儿迎到亳州（安徽亳县）立为皇帝，国号称宋，年号为龙凤，并任命郭子兴子郭天叙为都元帅，朱元璋为左副元帅，张天佑为右副元帅。朱元璋愤然说道："大丈夫宁能受制于人耶！"意不欲受封。但他的部下将领和谋士提醒说，韩林儿势力尚可借为声援，于是朱元璋才接受了任命，军中纪年文告仍称龙凤，遇事则皆不受龙凤政权节制。同年五月，朱元璋收附了巢湖水师廖永安、俞通海的战船千艘。不久，猛将常遇春、邓愈也归附了朱元璋。于是舟楫具备，军威大振。朱元璋遂召集徐达、冯国用、汤和、李善长、常遇春、廖永安诸文臣武将，决议渡江作战攻取集庆（江苏南京）。诸将请求直攻集庆，朱元璋认为取集庆必自采石始，采石为江防重镇，防守完备，而牛渚前临大江，敌难防备，可先克之。各部按照朱元璋的指挥于六月初一乘风扬帆强渡长江，部将常遇春率先突破牛渚，采石守敌亦溃。诸将见江东富庶，粮畜充足，各欲资取而归和州。朱元璋见此对徐达等说：今举军渡江，幸而克捷，即当乘胜径取太平，若听诸军取财物以归，再举必难，江东非我有，大势去矣。遂下令把全部船缆砍掉，将船推入江心，顺流冲走，断了士兵返回北岸和州的念头。又令诸军一鼓作气攻占安徽重镇太平，俘获元万户纳哈出，太平路总管靳义跳水自杀。并令李善长立即将入城禁约张贴于通衢。有一士兵违令进入民家，立即斩首，城中肃然。儒士李习、陶安等率众出城迎接。六月三日，朱元璋任陶安参幕府事，以李习为知府，改太平路为太平府（治今安徽当涂）。置太平兴国翼元帅府，大家公推朱元璋为大元帅，朱元璋又命李善长为帅府令史，诸将分守各门，修城浚濠，以固守御。又籍乡兵，徙居民入城，文移仍用宋龙凤年号，旗帜战衣皆红色。朱元璋的江南政权已初具规模。

其时，太平虽下，可周围都是元军，并向立足未稳的红巾军反扑过来。元右丞阿鲁灰、中丞蛮子海牙以巨舟截采石，闭姑孰口，截断红巾军的退路。而义兵元帅陈埜先与大将康茂才分水陆两路直扑太平城。朱元璋亲自督战，命徐达、邓愈、汤和率一路迎战正面之敌，别将率军绕到元兵的背后，前后夹击，元军大败，生擒陈埜先，部属皆降，康茂才脱逃。七月，朱元璋命张天佑率军连同陈埜先的降军去攻打集庆，被元将福寿打败。八月，朱元璋令徐达攻取了溧水、溧阳、句容、芜湖等外围阵地。九月，朱元璋复命郭天叙、张天佑以及陈埜先合军再攻集庆，四面包围集庆城长达七日。战斗正紧张进行的时候，陈埜先竟与城里的元将密约内外夹击红巾军，郭天叙、张天佑皆战死，二次进攻集庆失败。郭、张二帅死后，朱元璋独管元帅府事，郭子兴所部全都归属于己。至正十六年二月，朱元璋命常遇春率军进攻元将蛮子海牙设在采石江上的水军，逼迫蛮子海牙逃回集庆城里，打通南北道路。三月初一，朱元璋决定亲率大军，第三次进攻集庆。义军自太平水陆并进。初三日在江宁镇，破陈兆先的营寨，活捉陈兆先，降其众36000人。初十日，一举攻破集庆，元守将行台御史大夫福寿战死，蛮子海牙走投张士诚，水军元帅康茂才等率众降，共得军民50余万。朱元璋进入集庆当即宣谕：元失其政，干戈蜂起，生民涂炭，尔等处危城之中，朝夕

不能自保。我率众至此，为民除乱。大家各安其业，毋怀疑惧，贤人君子有能相从立功业者，我礼而用之。居官者谨慎从政，不许暴横殃害我子民，旧政有不便者，我为你们废除之。第二日，朱元璋登上城楼环视集庆城后志得意满地对身边的徐达诸将说：金陵险固，古所谓长江天堑，真形胜地也。仓廪实，人民足，吾今有之。诸公又能同心协力以相左右，何功不成。遂于当天改集庆路为应天府，置天兴建康翼统军大元帅府。任命廖永安为统军元帅，赵忠为兴国翼元帅据守太平。儒士夏煜、孙炎、杨宪等10余人都安排了官职。这时，应天周围的局势仍较紧张，元将定定扼守着镇江，别不花、杨仲英屯兵宁国，青衣军张明鉴占据扬州，八思尔不花驻军徽州，石抹宜孙守护处州，宋伯颜不花守衢州，而池州已为徐寿辉将所据，东南方向的张士诚势力已自淮东陷平江，并从平江伸展到浙西、常州一带。再从战略地位来看，镇江是应天的东大门，如若张士诚占领了镇江，则东边就处于门户洞开的不利境地，张士诚随时都能进攻应天。宁国和广德则是应天的南大门，这两处如果长期为元军占有，或者被徐寿辉攻取，那末对方就可以随时进窥应天，搅得朱元璋不得安枕。要确保应天的安全，首先必须尽快占领上述要害地方。鉴于此情，朱元璋在占领集庆的当月，便派遣大将徐达攻取镇江，消灭元将定定及镇江守兵。同年六月，又派邓愈攻下了广德。从而解除了朱元璋的顾虑，保证了应天的安全。到七月，诸将推朱元璋为吴国公，置江南行中书省，朱元璋兼总省事，置僚佐参议、左右司郎中、都事。并设行枢密院、理问所、提刑按察司、营田司等机构，分别掌管军政、刑狱、司法、监察、屯田、水利等事宜。朱元璋在应天很快组建起一整套军事、政治、经济机构，显然标志着江南政权已正式建立。

为了巩固和发展江南政权，朱元璋在占领了应天的东南门户镇江、宁国、广德诸地后，进一步向浙东发展。至正十八年十二月，朱元璋亲率10万大军攻下了婺州（浙江金华），还把它改为宁越府，后又改金华府，并于其地置浙东行省。于省门竖两大黄旗，上书："山河奄有中华地，日月重开大宋天。"旗旁各立一碑，上写："九天日月开黄道，宋国江山复宝图。"至正十九年胡大海克诸暨。九月，常遇春克衢州，擒宋伯颜不花。十一月，胡大海又克处州，石抹宜孙败逃。其时元守兵单弱，且闻中原已乱，人心离散，以故江左、浙右诸郡，朱元璋兵至皆下。仅两年左右时间的征战，江浙行省西部的元朝统治区，大都已被朱元璋占有。朱元璋江南政权的辖区不断扩大，而且日益巩固和发展壮大。富庶的江浙一带成为朱元璋补充兵源和军需物资的基地。与此同时，朱元璋重视对地主阶级知识分子的使用。尤其是渡江以后，随着统治地域的拓展，一大批文人前来归附。朱元璋也到处搜罗地主文人学士为己所用。当浙东地主文人刘基、宋濂、章溢、叶琛被聘召到应天时，朱元璋还特地为他们盖了一所礼贤馆。这批人的确是具有治国安邦才能的杰出人才，他们对于帮助朱元璋选择根据地，提供策略，整顿军纪，安抚百姓乃至削平群雄，统一天下均发挥了不小的作用。　（高春平）

扩廓与孛罗之争

元末统治集团内部的权势之争。

元末军阀争权夺利始自察罕帖木儿和答失八都鲁。察罕帖木儿，字廷瑞，畏兀儿人，先世随蒙古军队收河南，遂为颍州沈丘（安徽临泉西）人。至正十一年（1351），北方红巾军兵起，占领江淮诸郡，元廷征讨无功，察罕帖木儿纠集地主武装义兵，与罗山（今属河南）人李思齐合兵，袭破罗山，朝廷授为汝宁府达鲁花赤。之后，自成一军，屡败红巾军，战功显赫，但官位仍在答失八都鲁之下，并受答失八都鲁节制。答失八都鲁，蒙古珊竹带氏，出身功臣世家，世袭万户。至正十一年，以四川行省参知政事率本部探马赤军镇压荆襄红巾军，招募义丁，扩充军队。十五年，拜河南行省平章政事。十六年，以知行枢密院事节制河南军，调察罕帖木儿、李思齐军攻陕州（河南三门峡西），拔崤陵，援陕西，自与刘福通红巾军战，升河南行省左丞相，但战绩不佳。十七年底，为刘福通军所败，忧愤而死，子孛罗帖木儿为河南行省平章政事，总领其父原有诸军。

察罕帖木儿在陕西击败刘福通部西路军后，回师山西，守御关陕、晋、冀之地；孛罗帖木儿驻大同，与察罕帖木儿争夺晋、冀之地。至正二十年九月，双方战于冀宁（山西太原）。朝廷以冀宁交孛罗帖木儿，察罕帖木儿不从，遣部将白锁住来争，朝廷遣使调解，命各自罢兵还镇。

至正二十二年六月，察罕帖木儿在山东被原红巾军将领田丰、王士诚刺杀，其养子扩廓帖木儿袭总其父兵权。扩廓帖木儿原名王保保，本为其外甥，后为养子。从此与孛罗帖木儿相争进一步升级。是时孛罗戍兵大同，与陕西军阀张思道（又名良弼）相联结。张思道与李思齐在关陕争夺地盘，互相攻伐，思道在孛罗支持下，设伏兵于武功（陕西武功西），大败思齐。二十三年六月，孛罗乘扩廓与山东红巾军战后驻

兵汴、洛之机，南据扩廓守地，遣将竹贞袭据陕西。时陕西行省右丞答失铁木儿与行台有隙，恐陕西为扩廓所有，遂与孛罗相勾结，引竹贞入奉元（西安），拘留西台御史大夫完者帖木儿，夺其官印。扩廓遣部将貊高合李思齐兵攻之，竹贞战败投降。

与此同时，宫廷内部的斗争也白热化。御史大夫老的沙为顺帝母舅，与知枢密院事秃坚帖木儿得罪皇太子爱猷识理达腊，皇太子欲诛之，两人逃奔大同孛罗帖木儿军中。与皇太子结成一党的右丞相搠思坚、宦官资政院使朴不花，倚靠扩廓帖木儿为外援，屡次索要老的沙等，孛罗不遣。二十四年三月，搠思监、朴不花诬称孛罗与老的沙图谋不轨，顺帝下诏削孛罗官职、夺其兵权。孛罗拒不奉诏。朝廷命扩廓出兵讨伐孛罗。宗王不颜帖木儿等上书替孛罗辩解，且与孛罗会师。顺帝见事态扩大，急降诏书，贬斥搠思监、朴不花，孛罗官复原职。四月，孛罗以搠思监、朴不花仍留居京师为由，率军进军大都。秃坚帖木儿兵入居庸关，知院也先、詹事不兰奚率军迎战，败归。皇太子见孛罗势大，率侍卫军出光熙门，东走古北口，趋兴（河北承德西）、松（辽宁赤峰西）。秃坚兵至清河，京师大震。顺帝命达达国师、蛮子院使去秃坚军营问其究竟，秃坚声称必得搠思坚、朴不花。顺帝被迫交出二人，均被孛罗杀死。秃坚帖木儿率军自建德门进入京师，顺帝于延春阁接见，秃坚恸哭请罪，顺帝赐宴慰勉，以孛罗帖木儿为太保、中书平章政事兼知枢密院事，守御大同；命秃坚帖木儿为中书平章政事，退出京师。五月，皇太子出奔至路儿岭，知孛罗、秃坚复职，忿怒不已，命扩廓帖木儿调军队分道进攻孛罗。扩廓乃命白锁住领兵3万守御京师，以貊高、竹贞为中道领兵4万，以关保为西道领兵5万，合击孛罗于大同。扩廓驻太原，调督诸军。七月，孛罗、秃坚、老的沙等以“清君侧”名义再次进攻京师。前锋入居庸关，皇太子统军迎于清河，丞相也速、詹事不兰奚屯军昌平，白锁住亦抵京师，但也速军士无斗志，白锁住部将、青军杨同佥在居庸关被杀，不兰奚战败逃遁。皇太子奔京师，胁迫东宫官僚出走，直奔太原。孛罗等率军进入京师，顺帝命孛罗为太保、中书左丞相，未几进为右丞相，节制天下军马；老的沙为平章政事；秃坚帖木儿为御史大夫。八月，加封孛罗为开府仪同三司、上柱国、录军国重事、太保、中书右丞相，节制天下军马。孛罗主政后，杀与顺帝一起淫乱的“倚纳”秃鲁帖木儿、波迪儿祃等，罢三宫不急造作，沙汰宦官，减省钱粮，禁西蕃僧人佛事，并多次请皇太子还朝，使者至太原，均为拘留。

至正二十五年三月，皇太子在扩廓军中下令，调遣岭北、甘肃、辽阳、陕西各地军队，共讨孛罗帖木儿。孛罗遣秃坚进攻上都（内蒙古正蓝旗东）附皇太子者，调也先南御扩廓。也先驻兵永平，举师倒戈，遣人西连扩廓，东结辽阳，军声大振。孛罗遣其骁将姚伯颜不花出战，在通州虹桥遭也先袭击丧身。孛罗大怒，自领大军出通州，因大雨3日而还。顺帝见孛罗大势已去，密令威顺王宽彻普化之子和尚寻找机会刺杀孛罗。七月二十九日，秃坚派人来报告上都之捷，孛罗闻捷后即与老的沙一起进宫入奏，行至延春阁李树下，被和尚所募杀手杀死，老的沙急忙逃奔孛罗家中，携孛罗之母、妻及子天宝奴北遁至孛罗军中，拔军与秃坚会合。顺帝下令尽杀孛罗余党，并遣使将孛罗首级函送太原，命皇太子还朝。秃坚与老的沙商议至赵王府（内蒙古达茂联合旗阿伦斯木）谋起兵，被赵王缚送朝廷处死。

孛罗被杀后，扩廓乘机攻取大同。既入京，顺帝命为中书左丞相。闰十月，晋封河南王，总天下兵。扩廓因不支持皇太子夺位，皇太子怨恨在心。扩廓自请南还视师，关中军阀李思齐、脱列伯、孔兴、张思道不服调遣，共推李思齐为盟主以抗扩廓，双方相持一年，前后百战，胜负未决。二十七年八月，顺帝命皇太子亲自总天下兵马，扩廓等拒不服从调遣。皇太子乃立抚军院，专防扩廓。十月，顺帝下诏免扩廓职，扩廓退军屯泽州（山西晋城）。二十八年，扩廓攻占太原，尽杀朝廷命官。顺帝命削扩廓爵邑，诸军共讨之。这时明军北伐，到达河南。顺帝又命罢大抚军院，下诏复扩廓原职。自扩廓、孛罗构兵以来，元廷内耗达8年之久，朱元璋从容备战，次第削平群雄。八月初二，明军破大都，顺帝北遁，元亡。　　（邱树森）

朱元璋削平群雄

元至正二十至二十七年（1360—1367）间，朱元璋先后消灭割据势力陈友谅、张士诚和方国珍的战争。

至正十六年（1356）三月，朱元璋攻取集庆（江苏南京），占有两浙，建立并巩固了以应天（南京）为根据地的江南政权后，兵精粮足，人才济济，实力大增，和其它割据政权的矛盾日益尖锐。此时，其东北有张士诚，西面有陈友谅，东南有方国珍、陈友定。很显然如不尽快消除这些敌对势力，就无法继续发展进而统一全国。在众多割据势力中，张士诚最富，陈友谅最强。但张士诚狡而懦，陈友谅剽而轻。因此，许多将领都建议先除掉懦弱的张士诚再攻打陈友谅，唯独

刘基主张先消灭陈友谅，认为攻陈则张必不敢动，而先攻张则陈必乘机来犯，致我于两面与敌交战的不利境地。最后，朱元璋依据刘基的分析力排众议，确定了先陈后张的战略方针。

陈友谅出身于沔阳渔民家庭，本姓谢，因其祖赘于陈氏，故从陈姓，元末在县里当帖书，后参加了徐寿辉领导的蕲黄红巾军。他最初充当天完政权的丞相倪文俊的簿掾，不久因战功升为领兵元帅驻黄州。至正十七年八月，倪文俊想于汉阳谋杀徐寿辉未成，便率部分军队到了黄州，结果反被陈友谅所杀。至此，天完政权的大权转到陈友谅手中。至正二十年，陈友谅挟徐寿辉东下，向朱元璋的统治区进攻。同年五月，攻占太平，接着驻兵采石矶。陈友谅满以为应天指日可下，一心想当皇帝，于是派人击杀徐寿辉，自称皇帝，国号汉，改元大义。但他杀徐自立的行径不得人心，造成众叛亲离，外强内弱的结果。陈友谅称帝后即遣使约张士诚一道来攻，准备顺流而下，东西夹击南京。朱元璋和刘基分析了形势，决定先集中兵力打垮陈友谅，并利用康茂才与陈友谅曾是老朋友的关系，设计诈降，把陈友谅诱至龙湾伏击，一举将他打败，俘获所部2万多人及巨舰百余艘，乘胜收复太平，攻克安庆、信州(江西上饶)、袁州(江西宜春)等地。张士诚果如刘基所料，始终未敢出兵助战。第二年，陈友谅进行反扑，派兵攻夺信州、安庆，朱元璋亲率舟师溯江西上，直捣陈友谅的老巢江州，陈又惨败，逃奔武昌。其部将及江西郡县也相继降附。

正当朱元璋和陈友谅在江南争战不休之际，江北的局势陡变。刘福通派出的三路北伐军相继失败，元军反攻山东、河南，小明王韩林儿退保安丰。至正二十三年二月，张士诚派大将吕珍攻打安丰。刘福通不断派人向朱元璋求援，应天的文官武将多反对派兵增援，认为大兵一去，陈友谅若乘虚来攻，便进退无路。但朱元璋认为安丰是应天的屏障，救安丰便是保应天。因此亲自带兵救援安丰，东退吕珍，将小明王迎至滁州。四月，陈友谅果然乘救援安丰之机，大举出兵围攻洪都(江西南昌)。七月，朱元璋回兵救洪都，双方在鄱阳湖恶战36天之久，战斗十分激烈，最后陈军几乎全部覆没，陈友谅也在混战中因流矢贯睛及颅而丧命。其将张定边乘夜以小舟载友谅尸及其子陈理奔还武昌，立陈理为帝，改元德寿。朱元璋虽大获全胜，伤亡也很大，将领宋贵、张志雄、韩成、陈兆先、丁普郎等皆战死。至正二十四年正月，朱元璋于应天即吴王位，建百司官属，置中书省左右相国。二月，朱元璋因常遇春久围武昌未下，亲往督战，陈理遂率其太尉张定边等请降，汉亡。陈友谅势力彻底灭亡，朱元璋将其地设湖广行中书省进行管辖。

朱元璋消灭了陈氏父子后，回师东进，决定一举扑灭张士诚。张士诚建立大周政权，打败来攻元军，奠都隆平府(江苏苏州)后，便与朱元璋邻接，双方为争夺势力范围不断发生战争。不久，朱元璋攻占长兴、江阴等地，堵住了张士诚西进之路。南面又有苗军元帅杨完者驻守，无法南进。至正十七年八月，张士诚投降元朝，被封为太尉，每年自海道往大都输粮11万石。张士诚名义上接受了元朝政府的官爵，但实际上专擅甲兵土地如故。至正二十一年七月，张士诚乘元江浙左丞相达识帖睦尔与杨完者的矛盾，派兵袭取杭州，进一步扩张势力。至正二十三年，社会上流传着“但看羊儿年(1367)，便是吴家国。”的民谣，张士诚遂自立为吴王。第二年正月，朱元璋为迎合民谣，也称吴王。因此，当时人们便以金陵(朱元璋)为西吴，平江(张士诚)为东吴。东吴盛产粮米鱼盐，兼有蚕桑之利，物产丰富。张士诚全盛时期，势力南抵绍兴，北逾徐州，达于济宁之金沟，西距汝、颍、濠、泗，东临海，地跨2000余里，有带甲数十万。但张氏政权外强中干，张士诚的三弟张士信及参谋黄敬夫、蔡彦文和叶德新诸人朋比为奸，贪污无能，所以朱元璋在剪除陈友谅后很快将兵锋指向东吴。朱元璋对东吴的进攻分三个步骤：首先是扫除张士诚在淮水流域的据点。至正二十五年十月起，徐达相继攻取了通州、兴化、盐城、高邮、淮安、徐州、宿州、邳州、安丰等苏北和淮河下游地区。接着于至正二十六年五月，传檄声讨张士诚的八条罪状。十一月，大将军徐达、副将军常遇春、率师20万攻占了湖州、嘉兴、杭州、绍兴等外围之地，对苏州形成钳形包围。张士诚几次想突围逃走，均被朱元璋的军队堵回。第三步于至正二十七年九月南北夹击，一举将平江攻克。徐达破葑门，常遇春破阊门，张士诚仓皇归府第，自缢未成被俘，解至金陵死。东吴灭亡。朱元璋得城中兵民20余万，改平江路为苏州府，命何质任知府。

消灭了陈友谅、张士诚，朱元璋就摆脱了东西两侧受敌夹攻的困境，可以放心地收拾盘踞在浙东的方国珍了。早在至正十八年，朱元璋攻占婺州与方国珍接壤后，就曾派使去诏谕方国珍。方国珍看到朱兵势强盛，难与为敌，便向其奉送金银绸缎，表示愿合力攻士诚，又讲明俟朱元璋攻下杭州，就献出温州、台州、庆元。但当朱元璋攻取杭州后，方国珍怕被并吞，就暗地里北通扩廓帖木儿，南交陈友定，图谋顽抗。并连夜运珍宝，治船具，准备万一抵挡不住时就

潜逃海上。至正二十七年九、十月间，朱元璋调兵遣将，分三路进攻方国珍。一路由征南将军汤和、副将军吴祯攻庆元（浙江宁波），一路由参政朱亮祖率军攻台州，另一路由水师将领廖永忠从海道进袭，截断方国珍窜逃海上的退路。同年十一月，汤和进占庆元，方国珍逃入海岛，又被廖永忠的舟师击败。方国珍计穷势屈，只好投降。　（高春平）

鄱阳湖决战

至正二十三年（1363），朱元璋和陈友谅在江西鄱阳湖展开的一场决定胜负存亡的大战役，史称“鄱阳湖决战”。

至正二十三年，张士诚派其部将吕珍攻安丰，刘福通派人向朱元璋告急求援，朱元璋亲自率兵去解安丰之围。同年四月，陈友谅乘机倾国而动，带着家属和文武百官乘巨舰，气势汹汹，号称60万，大举进攻洪都（江西南昌）。舰高数丈，外饰丹漆，上下三级，每级置走马棚，下设板房为蔽，置橹数十，橹皆裹以铁。四月二十三日，陈友谅军直扑洪都城下，拉开了鄱阳湖决战的序幕。此时据守洪都城的是朱元璋的亲侄都督朱文正和参政邓愈。守城部署是：邓愈守抚州门；佥院赵德胜守宫步、土步、桥布三门；指挥薛显守章江、新城二门；元帅牛海龙、赵国旺、许珪、朱潜、程国胜守琉璃、澹台二门；朱文正居中节制，亲率精锐2000往来接应。四月二十七日，友谅军攻抚州门，士兵多载竹盾如箕状以挡矢石，猛扑城墙，城毁20余丈。邓愈以火铳击退敌兵，随即竖立木栅，友谅军来争栅，朱文正督诸将死战，且战且筑，昼夜不停地将所毁城修复。激战中，总管李继先、元帅牛海龙、赵国旺，万户程国胜等先后战死。五月初，陈友谅分兵攻陷吉安及无为等地。五月初八，友谅复攻新城门。指挥薛显率精锐开城突击，斩杀陈友谅的平章刘进昭等，敌兵方退。六月十四日，陈友谅赶造攻城器具，想破木栅，自水关攻入。朱文正令将士以长槊从栅内刺之，敌夺槊而进。文正又命炼铁戟、铁钩穿栅刺敌，敌来夺手皆烧烂。陈友谅用尽各种办法攻击，城中也千方百计地守御，双方互有伤亡。友谅军又攻宫步、土步二门，赵德胜巡城至宫步门楼指挥，腰中流矢而死。至此洪都被围两月余，陈友谅久攻不下，朱文正见情势危急，派千户张子明告急于应天。张子明潜出南昌，夜行昼止，半月始达。朱元璋问陈友谅兵势，张子明说：“兵虽众，死者亦不少，今江水日涸，敌巨舰将不利，又师久粮乏，援兵至，必可破。”朱元璋命子明回报令文正坚守一月待援。张子明还至湖口，被陈友谅兵俘获，逼令他至城下诱降，张子明表面答应之。至城下却大呼：请诸公坚守，大军且至矣！友谅怒，杀张子明。

至正二十三年六月底，朱元璋派使者至庐州令徐达回师解围。七月六日，朱元璋亲自率领徐达、常遇春、廖永忠、俞通海、冯国胜诸大将及文臣刘基、陶安等水陆大军20万前往增援。十六日，大军抵湖口，朱元璋派指挥戴德率一军屯于泾江口（安徽宿松西南百里临江处），另以一军扎南湖口（九江东40里彭蠡湖口），以堵陈友谅的退路。同时调信州兵守武阳渡口，防陈友谅逃跑。十九日，陈友谅知道朱元璋亲统大军来救援，于是解洪都之围东出鄱阳湖迎战。朱元璋的军队也由松门（都昌县南20里）进入鄱阳湖。七月二十日，两军相遇于康郎山（鄱阳湖南涯），鄱阳湖决战正式开始。陈友谅列巨舰于前，朱元璋对诸将说：彼大舰首尾连接不利进退，可破也。命舟师列为十一队，火器弓弩依次鳞列，下令诸将靠近敌船时先发火器，后射箭。临近敌人则以短兵器格斗搏击。第二天，徐达、常遇春、廖永忠进兵激战，徐达身先士卒，败陈友谅前军，杀敌1500人，获一巨舰。俞通海又乘风发火炮，焚敌船20余艘，溺水死者不计其数。朱元璋乘势挥军继进，双方展开一场大恶战。混战中，陈友谅骁将张定边直冲朱元璋的坐船而来，坐船急避之，不幸又搁胶浅，敌船齐趋，围之三重，情势异常危急。朱元璋的军士拼命阻击，张定边不得接近。但朱元璋的部队伤亡很大，将领韩成、宋贵、陈兆先、程国胜等相继战死。在这千钧一发的关键时刻，常遇春情急生智，操弓射中张定边，俞通海、廖永忠也飞船来助，张定边军始退。朱元璋才得以脱险。此时，太阳已西斜，战斗进行了一整天，朱元璋召集诸将，喻以生死利害，鼓励大家继续顽强战斗，直到取得最后胜利。同时，考虑到张士诚已破安丰，为防张士诚乘虚偷袭，命徐达回守应天。二十二日晨，朱元璋鸣号角集合诸军，亲自布阵再与陈友谅交战。陈友谅把巨船连锁为阵，旌旗楼橹望之如山，朱元璋的船小，仰攻屡受挫，连战三天皆失利，将领张志雄、丁普胜、徐公辅等又战死。于是朱元璋亲自督战，手斩临阵畏缩队长10余人，仍无效。部将郭兴说：不是将士不拼命，实在是船小不敌大，非用火攻不可。朱元璋深以为然，遂命七只船载火药，束草为人饰以甲胄，各持军器作斗敌状，令敢死士操之，另备船在后接应。当日晡时，乘东北风起，迫近敌船，乘风纵火，风急火烈，顷刻之间，陈友谅水寨数百艘战船全被烧坏，烟焰冲天，湖水映红，朱元璋军乘势猛攻，友谅军死伤

甚多，陈友谅弟友仁、友贵及其平章陈普略等皆被烧死。第二天，朱元璋进一步鼓励诸将：陈友谅兵败气沮，亡在旦夕，今当全力灭之。诸将感奋，勇气倍增。朱元璋坐船色白，陈友谅察觉，计划并力来攻。朱元璋得知，夜令各船把樯橹涂成白色，友谅军不能辨。七月二十四日，朱元璋军列队来攻，陈军船大笨重，运转困难，被灵活四转的小船打得首尾难顾，战斗自辰至午延续四个小时，陈友谅军大败，所弃旗鼓器仗浮满湖面。陈友谅见屡战屡败，想退保大孤山，但被对方阻拒，只好防守不敢出战，两军相持数日。陈友谅左右二金吾将军率部投朱元璋，陈军兵力益减。朱元璋以书信激陈友谅出战，友谅怒留来使，传令凡获朱元璋部无论将士皆杀。朱元璋闻讯反其道而行之，实施攻心战术瓦解对方，命将所俘友谅军全部放还，伤病者医治之，并下令获敌将士一律不杀。友谅军军心动摇，粮草匮乏，局势越来越严重。八月二十六日，陈友谅势穷力蹙进退不得，想奔还武昌，于是率军乘百余艘战船驶向南湖嘴，但被朱元璋事先埋伏在此的部队挡住。陈友谅冒死突出湖口，欲绕江下游，由泾江遁去。朱元璋挥师邀击，追奔数十里，陈友谅军复败，他本人也在混战时中流矢贯睛及颅而死。其将张定边乘夜以小船载友谅尸及其子陈理逃还武昌。朱元璋的军队闻讯大喜，欢呼雀跃，奋勇出击，擒其太子陈善儿、平章姚天祥等。次日，其平章陈荣等率所余舟师5万余人来降。张定边奔还武昌，立陈理为帝，改元德寿。至此，历时36天的鄱阳湖水上之决战以朱元璋大获全胜而告终。这一战役打得十分激烈，陈友谅所部几乎全军覆没，而朱元璋方面也付出伤亡很大的代价。它基本奠定了朱元璋翦灭群雄的基础。鄱阳湖之战结束后，朱元璋曾喜滋滋地对诸将说："此贼亡，天下不足定矣！"之后，命常遇春去攻武昌，自己班师还应天。至正二十四年二月，朱元璋以武昌久围不下，亲往督战，陈理遂率其太尉张定边等投降，汉亡。 （高春平）

陈友定割据福建

元末地主武装头目陈友定割据福建事件。

友定，一名有定，字安国，福州福清（今属福建）人，徙居汀州之清流清溪寨（今属福建）。出身农家，家境贫寒，佣于富室罗氏，后为罗氏之婿。罗氏使其经商，因折本而改充明溪驿卒。至正十二年(1352)，南方红巾军天完政权遣兵进入福建，宁化红巾军将领曹柳顺占领曹坊，拥众数万，派兵80余人来明溪索马，友定用计尽杀红巾军。曹柳顺大怒，亲率步骑千余人攻明溪，友定将当地老弱登寨，率驿卒500人袭击柳顺兵营，红巾军大败，追杀至曹坊，擒柳顺。元汀州府判蔡公安召见，授友定为明溪寨巡检。自此，陈友定随从元军，以镇压进入福建之红巾军为己任。

是时，南方红巾军势力极盛，不断遣兵进入福建，福建各地农民起兵响应。陈友定从元福建佥都元帅吴按摊不花进讨汀州、邵武、延平、建宁等地红巾军，以功授清流县主簿，旋升县尹。南方红巾军天完政权受到各地元军的镇压，被迫进入低潮。

至正十五年，南方红巾军再起。十八年十一月，天完统军元帅陈友谅、邓克明陷汀州，进围清流，友定驻兵平安寨，夜袭红巾军，复清流，追至宁化。十九年，陈友谅再遣其将康泰取邵武，邓克明攻汀州，转略延平、将乐等地，元福建行省授友定汀州路总管，率军击退红巾军。二十一年，邓克明再入福建等地，攻永丰、宁都、石城、宁化等县，克宁昌，破杉关，掠光泽，攻建宁，陈友定率军与红巾军激战于建宁，红巾军败退。元廷安抚使李国凤上其功第一，遂升友定为福建行省参知政事。二十二年，友定再复汀州。此时，红巾军势力已基本上退出福建，友定以战功握有重兵，遂萌生割据福建之志。

福建地处东南沿海，陆上与元都交通阻塞。自元末兵起后，福建各地为地主武装或当地元军分割统治。陈友定自占领建宁、汀州、延平、邵武等地后，已成为福建势力最强的军阀。他首先废除原先分割的建宁分省，进而吞并泉州、漳州两分省。早在至正十七年春，义兵万户赛甫丁、阿速里丁率亦思巴奚（波斯语 Jsbah 的音译，意为穆斯林组成的军队）占领泉州。十八年，赛甫丁等奉福建行省平章普化帖木儿命进攻福州廉访司所属元军。二十年，与兴化分省右丞苦思丁谋出兵兴化（莆田），并参与汉人割据势力互相攻伐。二十二年二月，代表蒲寿庚后裔势力的那兀纳（一译阿巫那）占领泉州，杀阿速里丁。五月，新任福建行省平章燕只不花杀赛甫丁，那兀纳乘机清除赛甫丁余党，控制泉州、兴化等地。二十六年四月，那兀纳遣其将白牌、马合谋、金阿里等进攻兴化，陈友定遣兵与兴化城守将柳伯顺合击那兀纳的亦思巴奚军，亦思巴奚军大败。五月，友定破泉州，擒那兀纳，又大肆杀戮穆斯林，发蒲氏冢，进而兼并泉州周围地区。八月，元廷命友定为福建行省平章。九月，友定发兵攻漳州，元漳州分省右丞罗良誓死以守，城破，罗良巷战死。友定兵进取潮州、循州、梅州、惠州等地。

陈友定据有福建各地后，所收郡县仓库，悉入为家资，各级官僚有不从者必行诛窜，威镇闽中。但其

对元廷却忠心耿耿。平江(江苏苏州)张士诚于至正二十三年自称吴王,停输海运粮至大都(北京),大都再次发生饥荒,友定每岁自海道输粮数十万石至京,受到元顺帝嘉奖。

至正二十四年,朱元璋灭亡汉政权后,开始与陈友定对峙。二十五年二月,友定进攻处州(浙江丽水),元璋将胡琛来援,友定遁去。四月,胡琛克建宁之松溪,获友定骁将张子玉而还。五月,元璋命胡琛、朱亮祖、王溥进攻福建,胡琛在进攻建宁时中伏被执,友定杀之。时平江张士诚、台州方国珍仍割据一方,元璋未敢派军深入平闽。吴元年(1367)十月,朱元璋平定方国珍后,即令胡廷瑞为征南将军、何文辉为副将军,率军南下征陈友定。朱军势如破竹,入杉关,克汀州,取邵武,占长阳,友定在各地的守将纷纷投降。十二月,朱元璋又令汤和、廖永忠等率舟师自庆元(浙江宁波)取福州。洪武元年(1368)正月,李文忠率明兵取建宁,进围延平,陈友定杀明军所遣劝降使者,誓众死守。未久城破,友定服毒未死,俘送至明京城应天(江苏南京),为元璋所杀。明军次第攻克其余州县,福建平。

(邱树森)

明

朱元璋选定大明国号

元末明初，明太祖朱元璋因“明教”创业建国，故洪武元年(1368)以“明”为国号。

中国历史上历朝各代的称号，有的根据初起事时的地名，如秦、汉；有的依据所封之爵邑，如隋、唐；也有的取经史书中有一定意义的字词，如蒙古人入主中原，建国号为大元，取《易经》“大哉乾元”之意。明太祖朱元璋即位伊始定国号为“大明”取义特殊，未因袭前代之法。朱元璋选定的“大明”国号，出于韩山童父子之“明王”，明王源于《大小明王出世经》。该书为明教经典，故明朝的国号实取源于明教。

明教即摩尼教(Manichaeism)，由波斯人摩尼(Mani，216—277)所创。明教的主要经典有《二宗三际经》，二宗即明与暗，明暗斗争，时有轩轾，明终克暗，至安乐处。三际者：过去、现在、未来，也称作初际、中际、后际。初际，明暗相背；中际，明暗混糅；后际，明暗划分。明为善，为理；暗则为恶，为欲。明教尊奉其神为明使，亦称明尊，即摩尼也。明教经典输入我国，始于唐朝武则天延载元年(694)，到唐肃宗宝应元年(762)，回鹘入唐，帮助唐政府击史朝义于洛阳，次年携留居洛阳之摩尼师归国，明教遂入回鹘，为其朝野所信奉。明教不奉像设，不事鬼神，斋食禁杀，但拜日月，很易于被下层民众所接受和信奉。回鹘因助唐朝平定安史之乱有功，遂要求唐朝为其建寺。于是北方的长安、洛阳、太原，南方的荆州、扬州、洪州、越州等南北通都大邑，都有了明教徒的祠宇。到唐后期会昌年间，回鹘屡入寇掠。会昌三年(843)，李德裕诏讨回鹘，大破之。同年四月，唐政府下令杀天下摩尼教徒。此后，明教遂成为秘密结社，攀附佛道，以图幸存。唐末五代时，明教已与三阶教混合，并南传至闽，再由闽入浙。到北宋末年，仅温州一地，即有明教斋堂40余处。至南宋初，已遍传于淮南、两浙、江东西、福建等东南沿海地区，名称也因地而异。两浙谓之牟尼教，江西谓之金刚禅，福建称之为明教。宋元之际，明教与白莲教开始合流，其特点为不事神佛祖先，不会宾客，死后裸葬，平时诵金刚经，拜太阳和月亮，每月的初一、十五烧香，尤其崇尚互助合作之精神和淳朴节俭的生活，因而很快深入农村的下层劳苦大众。农民入教的原因，一因素食节用而食足，一因结党互助事稍济，一向受官吏地主压迫剥削者，均可借入教而得荫庇。信仰既深，蟠结愈固，平时安居重迁，一旦官府诛求过甚，便揭竿而起，一呼百应，立成劲旅，成为农民革命的核心力量。元武宗至大元年(1308)五月，统治者便下诏禁白莲教，毁其祠宇。到元英宗至治二年(1322)又下诏禁白莲教。自此，白莲教也成秘密团体，不能公开活动。到元泰定二年(1325)，民间已流传“弥勒降生，明王出世”的歌谣。至正年间，明教头领彭莹玉在湖北起义，白莲教首领韩山童在河南、河北一带活动。元顺帝至正十一年(1351)，韩山童乘元政府调集十几万民工治河之机与刘福通聚集3000人在颍州密谋起义，不慎因泄露消息被捕杀。韩山童死后，其子韩林儿称小明王，建国号宋，建元龙凤。朱元璋后来肇于小明王的基业，承小明王之后，削平群雄，因此建国号曰“大明”。而且，朱元璋参加元末农民起义之前曾入皇觉寺为僧，是明教徒。后由一名红巾军小卒超擢为大将，封公封王，终至于谋杀小明王，代之而建新王朝。明太

祖取宋而代之，但其部曲多是红巾军，为笼络韩林儿、刘福通旧部，徐寿辉、陈友谅降将，为迎合民心，均不宜放弃“明王出世”之说。以“大明”为国号，一来表示自己承小明王而起，二则宣示“明王”已正式出世，使后来者无所借口。

朱元璋于至正十六年渡江建立江南政权的时候，张士诚也于这年二月攻下平江（江苏苏州），建为国都，并于至正二十三年自立为吴王。至正二十四年正月，朱元璋于应天即吴王位，建百司官属，置中书省左右相国。为什么张士诚已在前一年立为吴王而朱元璋还要再称吴王呢？这是因为当时社会上流传着这样一首民谣：“但看羊儿年，便是吴家国。”羊儿年是农历丁未年，即至正二十七年，为了迎合这首民谣，所以朱元璋当时也称吴王。因此，有人就把平江张士诚称东吴，金陵朱元璋称为西吴。到至正二十七年九月，朱元璋消灭张士诚，平定东吴。第二年正月，朱元璋在南平闽广和北伐中原的大军节节取胜的凯歌声中，正式建立了新王朝。因这时已不是一个割据政权，吴王的称号更不相称。而新王朝自南方建国，与历史上以北定南者不同，按阴阳五行之说，则南方为火，为祝融，北方属水，为玄冥。元朝建都于北京，起自更北之蒙古，按五行金、木、水、火、土相生相克之理，则以火克水，火明水暗，以明制暗，正是汉以来儒士所津津乐道者，因而朱元璋的开国功臣刘基、宋濂、李善长也极力赞成以明为国号，同时也得到汉族地主士大夫的赞同。这样，一方面符合明教经义，另一方面也遵从儒家经典之说，可谓两全其美，并行不悖。于是正式决定“大明”为新建明王朝的国号，年号为“洪武”，建都于南京。朱元璋做了明朝的开国皇帝，历史上称为明太祖。

可是明教中“弥勒降生，明王出世”的教义在另一方面还包含有革命意义。明暗对立，互为消长斗争，最终归于明，况且弥勒还有三十次入世之说。如此说此教仍继续流传，则后来造反者同样人人可以自命为明王，为弥勒，像朱元璋取替韩林儿那样，取明朝而代之。所以洪武元年闰七月，明太祖同意李善长的意见，下诏禁止明教传播，严禁利用宗教聚众闹事。不久颁布的《明律》明确规定：凡师巫假降邪神，书符咒水，扶鸾祷圣，自号端公、太保、师婆，及妄称弥勒佛、白莲社、明尊教、白云宗等会，一应左道乱正之术，或隐藏图像，烧香集众，夜聚晓散，详修善事，煽惑人民，为首者绞，为从者各杖一百，流三千里。然而，尽管明太祖一再标榜自己是真正的明王，现已出世，明政府也对明教百般压迫控制，但仍禁止不住明教继续在民间流传及教徒的不断起事。洪武元年，熊鼎任浙江按察司佥事，时温州仍有大明教流行，造设殿堂甚侈，民之无业者咸归之。熊鼎分巡至温州，以其惑俗炫世，且名犯国号，奏毁禁绝之，于是官府没收其赀产，而驱其众为农。永乐四年（1406）、蕲州有白莲社之狱。永乐七年七月，陕西阶州人金刚奴以佛法惑众。后又与沔县贼首邵福等作乱。其党田九成僭号称后明皇帝，改元“龙凤”。高福兴称弥勒佛，金刚奴称四天王，前后攻破屯塞，杀死官军无数，引起明廷震动，命长兴侯耿秉文率领大兵前去镇压，余党多数被剿捕围杀，有的四散奔逃，随金刚奴、仇占儿等逃聚黑山天池平。明军撤走后仍不时地出来活动。后来，金刚奴潜还阶州，被当地官府发现擒获，械送到京师处死。同年复有李法良宣传弥勒教，在湘潭聚众起事。十六年又有昌平县民刘化自称弥勒佛等。洪武永乐以后，明教余党举行暴动之事更是史不绝书。

（高春平）

明太祖南征北伐

自至正二十七年（1367）至洪武二十年（1387），明太祖朱元璋在称帝建立明朝前后，所发动的南平闽广、川滇，北伐中原、辽东的统一战争。

朱元璋在先后消灭了陈友谅、张士诚、方国珍等割据势力后，又部署北伐和南征，发动了统一全国的战争。至正二十七年十一月，明太祖命汤和、廖永忠率水师自明州（浙江宁波）由海道取福州。当时福建由陈友定占据。陈友定，又名有定，字安国，福建福清人，后徙居清流，家贫，世业农，曾佣于富室。他虽系贫民出身，但在元末农民战争中，却站在农民军的对立面，应募参与镇压义军的活动，并以平诸山寨功，升清流县尹。至正十八年，当陈友谅的农民军攻打福建汀州、邵州时，陈友定在黄土、建宁诸地与农民军激战，疯狂屠杀义军将士，为元朝统治者卖力，因功由汀州路总管升至福建行省平章，占据了福建八郡之地，成为飞扬跋扈、威震八闽的地方割据势力。至正二十七年，明太祖在命将远征的同时，派出使者到福建延平（福建南平），招谕陈友定。陈友定拒绝，置酒大会诸将及宾客，杀掉来使，洒其血酒瓮中，与众酌饮，发誓以死拒守，严兵以待。同年十一月，胡廷瑞由江西破杉关，下光泽，接连攻克邵武、建阳、建宁。同时，汤和与廖永忠所率的水师也从福建的五虎门港进兵攻占了福州。第二年正月，汤和、廖永忠攻下了延平，陈友定服药自尽未成，被械送应天处死。明军从出师南征到攻取延平，前后仅四个月，接着又攻

克了福建的其它地区，平定了福建。

平定福建，便为进军两广奠定了基础。至正二十七年十月，当胡廷瑞南进福建时，明太祖就派湖广行省平章杨璟和左丞周德兴率师由湖广取广西。第二年二月，福建平定后，明太祖又令廖永忠为闽南将军，参政朱亮祖为副将军率水师由海道取广东，另派赣州卫指挥陆仲亨由韶州（广东韶关）直捣德庆。明军分兵三路，水陆并进。三月，廖永忠舟师在潮州登陆，占据广东的元行省左丞何真以所辖郡县户口、甲兵、钱谷，奉表归附。于是广州及其附近州县皆降于明。四月，陆仲亨率兵接连攻下英德、清远、连江、连州、肇庆及德庆诸郡县，元守将弃城逃遁，广东平定。三路明军中唯杨璟一路遭到元军的不断抵抗。杨璟出兵后的第二年正月，率部进抵永州（湖南零陵）久围不下，直到四月，才攻克永州。此后，率兵进攻靖江（广西桂林）。其时朱亮祖也率师进入广西，遂与杨璟会师合围靖江，受到城内元军的顽强抵抗，相持长达两月，直到六月才攻占了靖江城。接着南宁、柳州等州县相继降明，广西平定。至此，南方除西南一隅外基本统一。洪武二年（1369），明太祖设置广西行省。

几乎与南征同时，北伐中原的号角也已吹响。当至正二十七年九月二十八日，平吴（张士诚）师还，论功行赏毕，休整未及一月，明太祖便在十月二十一日命徐达为征虏大将军，常遇春为副将军，率师25万，由淮入河北取中原。对于北伐明军的战略部署及进兵路线，明太祖作了审慎的筹划。为了集思广益，他先向将领们征求意见。当时腐朽的元政权经北方红巾军的多次打击已元气大伤，仅剩几支地主武装在支撑残局。其中主要的有守护河南的扩廓帖木儿，守护大同的孛罗帖木儿及守卫关中的李思齐、张良弼等。他们之间又派系林立，争权夺利，到处抢掠。而代表元中央政权的元顺帝则仍沉迷于声色淫佚之中，只知朝夕宴饮享乐，不顾危亡将在旦夕。鉴此，徐达和常遇春建议由江淮长驱北上，直捣元朝。认为以我百战之师，敌彼久逸之卒，挺竿而可以胜也。都城既克，有破竹之势，乘胜长驱，余可建瓴而下。但明太祖否定了这个轻敌冒进的方案，认为元朝建都百年，城守必固。若孤军深入，不能速破，屯兵于坚城之下，馈饷不至，一旦元朝援兵四集，便处于进不得战、退无所据的危险境地，于我不利。所以提出了稳扎稳打、逐步推进的战略。决定明军先取山东，撤其屏蔽。旋师河南，断其羽翼。拔潼关而守之，据其户槛。指出，这样天下形势便由我掌握，然后进兵元都，则彼势孤援绝，不战自克，既克其都，鼓行而西，则云中、九原以及关陇等地，可席卷而下。于是北伐军按照这一战略部署，以“驱逐胡虏，恢复中华，立纲陈纪，救济斯民”为口号，在大将军徐达的具体指挥下分阶段向北方地区挺进。第一阶段：主力由江淮北上攻略山东，然后回兵两河，攻占河南，之后暂不西进，据伊洛潼关而守之。从至正二十七年十月出师，到第二年二月，三个月左右的时间就平定了山东。然后由山东折而向西分水陆两路进攻河南。水路由郓城趋汴梁，以取河南。陆路由归德（河南商丘）进入河南，攻占了陈州（河南淮阳）、许州（河南许昌）等地。元汴梁守将不战而降。四月，徐达率步骑由中滦进攻洛阳，在洛水北岸大败元军，进逼洛阳城北，元河南行省平章梁王阿鲁温降。不久，征南将军邓愈率师攻占了南阳路。冯胜也攻克了陕州（河南陕县）、潼关等地，扼住了三秦门户，阻断了驻守在关陇一带的元将李思齐、张思道等与元朝的联系。元大都的屏障已撤，外援也被截断，陷入了明军的弧形包围圈中。第二阶段：明军集结运河沿线，明太祖亲自坐镇开封，指挥进攻元都的大决战。洪武元年（1368）正月，在北伐和南征胜利进军的凯歌声中，明太祖朱元璋正式称帝，国号大明，建元洪武，定都南京。同年五月，明太祖亲自来到汴梁，听取了徐达、常遇春、冯胜等主要将领关于前线作战军情的汇报，研究了下一阶段的战略步骤。决定由冯胜留守汴梁，何文辉守洛阳，康茂才镇守潼关，明军主力由河南循卫河、运河攻取元大都。闰七月，徐达大会诸将于临清，大军沿运河长驱北上，下长芦，克青州，至直沽（天津）一带，元将也都先自海口逃跑。元朝统治者慌了手脚，忙于十九日诏复扩廓官爵，并要扩廓和中书右丞相也速、陕西左丞相秃鲁以及平章政事李思齐四道进兵，协力剿捕。然而为时已晚，明军以摧枯拉朽之势直向大都逼进。二十五日进抵河西务，郭英追元军至通州城下，杀元知院卜颜帖木儿，擒元宗室梁王孛罗。二十七日夜克通州。元顺帝得知明军已至通州，惊惧万分，知败局已无法挽救，当夜集后妃太子议避兵北逃。第二日天刚亮，又召集群臣会议瑞明殿，左丞相失烈门、知枢密院事黑斯等皆劝死守京城。但元顺帝感到大势已去，担心困守孤城，不仅保不住京城，反而会落得像宋徽、钦二宗被俘那样的悲惨结局，故决计弃城北去。行前令淮王帖木儿不花监国，丞相庆童留守，自己则于二十八日夜三鼓，带着后妃太子，开建德门，由居庸关北逃上都（内蒙古多伦一带）。八月二日，徐达等至齐化门，将士填濠登城而入，执元监国淮王帖木儿不花和丞相庆童等，斩之。从此结束了元朝的统治。第三阶

段：明军主力由大都南下，挥师入晋，消灭扩廓帖木儿驻扎在太原的10万元军，平定山西。然后进军关中，攻略陕甘，消灭李思齐、张思道等元残余势力。当元顺帝北走上都时，曾命在山西的扩廓帖木儿率兵出雁门关，由保安州（河北涿鹿）经居庸关以攻北平。徐达得悉后，乘扩廓帖木儿率师远出的机会直捣太原。扩廓进军至保安州，闻知明军进攻他的老巢，被迫还军救太原，半路上遭到徐达所率明军的夜袭，扩廓大败，仅以18骑逃到大同，后转徙至甘肃。洪武二年二月，徐达派副将军常遇春、冯胜渡河攻陕西。三月，徐达亲率明军攻占奉元路，明朝改奉元为西安府。元将张思道等逃走。接着，常遇春、冯胜率兵自西安进取凤翔，李思齐率所部10余万人西奔临洮，冯胜跟踪追击，李思齐走投无路，只得投降。与此同时，徐达也率军进抵巩昌（甘肃陇西），至此，秦晋的重要地区基本平定，明廷于洪武二年四月置陕西、山西行省。第四阶段：常遇春、徐达先后北征沙漠，驱逐元顺帝，建设明朝的北部边防。山西、陕西平定后，常遇春自凤翔回北平，与李文忠率步兵8万、骑兵1万，自北平往取元上都开平（内蒙古正蓝旗东闪电河北岸）。常遇春率军经三河，过惠州，败元将江文靖于锦川。接着又在全宁败元丞相也速，在大兴州擒元丞相脱火赤，遂取开平。六月元顺帝北奔，俘其宗王庆生及平章鼎住等斩之，得将士万人，车万辆，马3千匹，牛5万头。不久，元顺帝死于应昌（辽宁达里纳尔西南），由其子爱猷识礼达腊继位，携残部退到塞外，史称北元。但是蒙元贵族不甘心自己的失败，他们留恋在大都时的豪华生活，极希望恢复其统治全国的旧业，不断地向明朝统治地区发动军事进攻。因此洪武三年正月，明太祖命徐达为征虏大将军，李文忠、邓愈为左副将军，冯胜、汤和为右副将军，统领大军，北征沙漠。明军兵分两路：西路军由徐达率领，自潼关出西安，捣定西，以取王保保。东路军由李文忠率领，出居庸，入沙漠，以追元主。四月，徐达出安定，在沈儿峪口大败王保保，擒元郯王、文济王及国公阎思孝、平章韩扎儿等官1865人，将校士卒84500余人，获马14800余匹。王保保仅与妻子从宁夏奔和林。李文忠所部东路军，出野狐岭，至开平，破应昌，获元主孙买的里八剌并后、妃、宫人、诸王、省院鞑官、士卒等。元太子爱猷识礼达腊奔和林旧都，北部边境基本稳定。

洪武四年，明政府因北边已定，抽出力量来对西南用兵。为平定川、滇，明太祖派遣南北两路大军，水陆齐进四川。南路军由汤和、周德兴、廖永忠率领，由瞿塘峡水路攻重庆。北路军由傅友德、顾时、何文辉率领，由秦陇进攻成都，意在一举消灭四川的夏政权。夏国的创立者明玉珍原是湖北随州（湖北随县）的农民，元末农民起义爆发初期，曾隶属徐寿辉的蕲黄红巾军。陈友谅杀徐自立后，他于至正二十一年三月宣布独立，建立夏政权，改元天统，自称皇帝，占据四川、贵州、陕南等地。当时明太祖正逐鹿中原，无暇西顾，对夏一直采取拉拢态度，明玉珍也以保境安民为宗旨，不参与域外之争。至正二十六年，明玉珍死，子明升即位。洪武五年，当明朝两路大军压境时，夏君臣十分惊慌。左丞戴寿主降，太尉吴友仁主战，建议明升外交好而内修备。明升听信了吴友仁的意见，增派将士扼守瞿塘峡，汤和所率南路军受阻不利，退还归州。但傅友德的北路军却进军顺利，连克阶州（甘肃武都）、文州（甘肃文县）、江油、彰明、绵州（四川绵阳）、汉州（四川广汉）。同年六月，汤和攻入夔州（四川奉节），突破瞿塘天险。明升大惧，欲奔成都。其母彭氏认为事势至此，纵往成都，不过延旦夕命，不如早降。六月二十二日，汤和至重庆，明升降。七月初十，傅友德围成都，守将戴寿也降，四川平定。

平定了四川，南方便只剩云南一省。明太祖先后派遣王祎、吴云前往劝降，都被元朝分封在云南的梁王把匝剌瓦尔密杀害。明廷在用政治方式解决失败之后，决定诉诸武力。洪武十四年，明太祖派大将傅友德、沐英、蓝玉统领30万大军攻取云南，双方在滇东展开激战，元军10余万败亡，梁王逃到晋宁自杀。次年，蓝玉、沐英攻下大理，云南平定。明政府于洪武十五年二月建立了云南都指挥使和云南布政使司，管理云南军政事务。

占据辽东的元丞相纳哈出是明太祖统一全国中的最后一个障碍。元顺帝北遁后，纳哈出盘踞在辽宁金山（辽宁开原）一带，保存实力，和元顺帝、扩廓帖木儿等形成东中西三条战线，试图向刚占领北平的明朝军队反攻，并不断引兵进犯辽阳、辽东等地。随着南方、西北、中原地区的次第平定，洪武二十年，明太祖命大将冯胜、傅友德、蓝玉率军20万东征纳哈出。六月，明军主力自金山西面深入到金山东北，包围了纳哈出。纳哈出孤军无援，势穷力蹙，只好投降明朝。从此，元朝在东北地区的残余势力被消灭，明政府初步统一了东北。至此，历时21年的统一战争方告结束。

（高春平）

粮长制的创立及衰落

洪武四年（1371）明太祖朱元璋为革除宋元以来

赋税征收过程中的弊端而创设了粮长制，此制直到明中叶才衰落。

明初田赋的征收，以米麦实物为主，分夏税、秋粮两次交纳。在征收过程中，明政府规定由州县官吏直接负责征解，纳粮人户则需亲赴所在州县及指定的边地粮仓输缴，一般穷苦百姓因惧怕吏役勒索和路途花费，往往交给揽纳户包纳代交。揽纳户多系地方无赖，不但向税户收取很重的手续费，而且贪污中饱，侵吞税粮，勾结官府胥吏盘剥人民。明初虽三令五申地禁止，仍无法杜绝宋元以来长期存在的这种揽纳现象带来的各种弊端。洪武四年九月，明太祖针对上述状况下诏创立粮长制度。由户部令各级地方官府料民土田，以纳粮万石为基数，其中田土多者充任粮长，督收本乡赋税。明太祖认为这是以良民治良民的办法，可以革除揽纳侵渔诸弊。

粮长督粮万石，只是个概率数。实际上，明初不少地区粮长督粮数额多寡不一，有多达万石以上者，也有仅数千石者。洪武六年九月，明太祖进一步健全粮长制度，又在粮长下设知数1人，斗级20人，运粮夫1000人，分别负责核计、秤量、搬运诸事，协助粮长完纳每年应交的税粮。洪武十年，户部报称南直隶苏州、松江、嘉兴、湖州及浙江、江西所属府州县粮长，所辖民粮多至万石以上，1名粮长督办不了，奏请增设副粮长1人。例如苏州府常熟县秋粮40万石，有粮长30余名，每名粮长平均督粮达13000余石。洪武三十年明太祖根据江南赋重地区的实际情况命户部行文郡县更置粮长，每区设正副粮长3名，以区内丁粮多者为之，编定次序，轮流应役，周而复始。

粮长的具体职责包括田赋的征收和解运两大任务。征解的手续和办法据洪武二十六年的规定是：每年农历七月二十以前，凡设有粮长的州县，地方官要率众粮长赴南京面听宣谕，并向户部领取一种二联单据式的“勘合”文册，然后回乡督办当年的税粮。具体程序是粮长督里长，里长督甲首，甲首督本甲人户按时交纳。最后，粮长将各里里长交纳的税粮汇集一起，将税粮中应“存留”州县部分留在本地，供地方政府支用；“起运”部分即率领里长及运粮夫车载船运到指定仓储交纳，这就是解运。明代起运部分又分“京运”和“对拨”两类。京运粮是运纳京师，供皇室、百官和军队食用消费的，必须粮长亲自押运。对拨是拨运到外地卫所的官军俸粮，只须运载到指定码头、口岸交给运军便可。各仓库收到粮长交纳的税粮后，要在粮长的勘合上填注其交足的数额，并加盖官印证明，称为“通关”。粮长取得通关后，进缴户科，并向户部注销。而户部委官向户科领出粮长上缴的通关验核，然后立案附卷存档，以凭日后稽考。

除督收与解运税粮外，每逢重造《黄册》和《鱼鳞图册》时，粮长也要参与；并负有劝导豪门大户不可勾结官吏，洒派诡寄税粮，侵损贫苦小民的任务；农闲时节还要集中乡中父老，劝导农耕，向皇帝面奏拒纳税粮的“刁顽”人户；具报灾伤及抛荒土地，请求豁免税粮四项附带职责。

明前期洪武至宣德年间(1368—1475)是粮长制的兴盛时期。特别是洪武一朝，粮长的地位十分显赫，粮长历年赴南京领取“勘合”，完纳税粮，照例受到明太祖朱元璋的亲自召见，可以面听“圣谕”，受到奖赏。粮长一旦被明太祖看中，还可以授予官职，位居公卿。乌程人严震直，洪武间任粮长，每年率先输粮万石至京师，从未逾期，便被授为布政司参议，再迁为工部侍郎。洪武二十六年六月升任工部尚书。在洪武八年，明太祖还曾谕御史台决定给予粮长法律上减罪的特权。规定自今粮长杂犯死罪及徒、流者，仅杖之，免其输作，使仍掌税粮。不久，御史台臣又建议粮长有犯，许纳铜赎罪，得到朱元璋允准。

由于粮长享有上述一系列特权，因而粮长在明初成了乡间地主乐于担任的具有殊荣的美差。明成祖迁都北京后，粮长到南京再也见不到皇帝了，勘合也只能由南京户部官员宣谕给与，身价略有下降，但社会地位及其在乡间的威风依然不减。宣德时为了加强粮长的职能，使钱粮征收具有一定的连续性，又改变洪武时的轮流制和永乐时的岁更法而实行粮长永充制。此制减免了赋税征收过程中对钱粮来龙去脉不甚了解及拖欠钱粮无人征收等弊端，一度便利了政府对田赋的征收，保证了国家的赋税收入。但又造成了大地主世代相袭，垄断粮长一职，长期为害乡里之弊。如江西吉安府泰和县富民肖襄，自祖父、父亲、本人及弟弟，从洪武至正统近百年间一直充当本地粮长，成为横行乡里的一霸。因此，这种世袭永充制，使粮长的地位和权力恶性膨胀。不少粮长世代相传，依权仗势，无恶不作，不仅侵吞税粮，勒索贫困人户，而且勾结官府胥吏，利用各种非法手段盘剥贫民，损官肥私。如粮长郏阿奶巧立名色，科扰粮户，贪污侵吞钱粮计有搬水脚米、斛面米等达13种之多，甚至逼迫粮户以房屋、牲口、衣服、农具等折纳田赋。嘉定县粮长金仲芳竟擅立名色18种欺诈贫苦小民。所以，宣德以后，抨击粮长永充制的呼声已愈来愈高。弘治七年(1494)刑部报告：苏州、松江、常州、镇

江四府钱粮浩大，洪武间设立粮长，以近就近，催收本区钱粮。宣德以来粮长替更无期，父出子入，兄亡弟继，积袭之渐致，使其威力逼于官府，小民畏惧甚于虎狼，催征则先租债而后钱粮，侵欺则收新年以补旧年。事一败露，还官给主之赃，动经千万，虽或问革佥换，夤缘不出本家，事理仍是旧人。因此，粮长在明前期固然对政府田赋剥削的兑现起了重要作用。但他们为非作歹、鱼肉百姓的行径日益引起社会上人们的憎恨，终于成为阻碍田赋征收的弊政。

降至明中叶，随着明王朝政治的日益腐败，土地兼并狂潮日趋激烈，优免人户不断增加，豪强地主欺隐田产，诡寄税粮愈演愈烈，小农失去土地，大量破产流亡，从而造成明中期田赋逋负日多，流民四起，而政府却一味责令粮长追缴赔纳，粮长与地方官吏之间在税粮侵吞和反侵吞上的矛盾日益尖锐。至此，粮长逐渐成为躲避犹恐不及的苦差，一些大地主想方设法规避担任粮长。宣德四年(1429)，明政府为了扭转输京漕粮入不敷出的局面，决定整顿漕粮运法。漕运总兵官平江伯陈瑄建议实行兑运法，令江南民粮对拨附近卫所官军，运载至京，仍令部运官会计，给与路费耗米，则官民两便。此法在宣德六年十月实行，制定了《兑运民粮加耗则例》。兑运法实施后，湖广、江西、浙江、南直隶各府州以及山东、河南诸处百姓，只要在附近水次将税粮兑与漕军，另加耗米若干后，便由漕军负责运输和缴纳进仓了。从此，粮长输运税粮的任务较前大减，各地要求取消或改革粮长制的建议日益增加。到英宗正统时，改革粮长制已是势在必行。改革的办法之一，是以里长代替粮长执行催征税粮的任务。办法之二是将以往大户独当永充制，变为中户甚至下户朋充制。正统(1436—1449)间，明政府根据监察御史柳寻的奏请，命苏州、松江、常州、嘉兴、湖州五府粮长，每年一换。景泰(1450—1456)初，曾一度废除粮长制，时隔不久又恢复。

朋充制实行后，粮长一职不能久任，加之粮长的政治地位和经济利益大不如前，虽然个别粮长大胆地冒险侵吞税粮仍可暴富，可一旦罪行败露，也难免杀身灭家之祸。另一方面中户或下户轮充粮长，其社会地位、权势远不如地方豪强，征收田赋时阻力重重。更由于流民四出，明政府为了保证赋税额，便摊纳在籍人户或令粮长包赔。这样，粮长既对豪强地主逃税无可奈何，又无法阻止失去土地的农民流亡，可是官府却直接将催征税粮责任推到他们头上。由于流民和豪强逃税日渐增多，粮长包赔税粮负担随之加重，造成恶性循环，不少粮长倾家破产，充当粮长已成为一般中下民户对封建政府提供的苦差，许多人视粮长为畏途。正统年间，江西永新县粮长王浩八，即因赔不起田赋，而官府又如狼似虎地催逼，结果走投无路，只好铤而走险，发动起义。明世宗嘉靖六年(1527)，兵部尚书李承勋在上书中说：家有千金之产，当粮长一年，有的便沦落为乞丐；家有壮丁十余，当粮长一年，有的便成为绝户，以致民避粮长之役，过于谪戍，官府无如之何！或有每岁一换之例，或为数十家朋当之条，始也但破一家，数岁则沿乡无不破家矣。甚至有的地方官借任命粮长而挟私报复。如长洲知县郭波和致仕尚书刘缨有隙，遂编刘家粮长7名，尔后又以谢罪为辞，登门拜刘缨二十余拜。出门后对随从说：我欲拜死老贼。刘缨年80余，活活被气死。他的子孙不能承役，逃走四方。一位堂堂二品大员之家，竟因当粮长而弄得家破人亡，普通人户视当粮长为畏途就不言而喻了。

粮长制的兴衰过程证明封建社会赋税征收过程中的揽纳侵吞诸弊的根源在于封建专制政体的腐朽本质，反映了明中叶后缙绅地主权力的膨胀，流民问题的严重以及农村经济的凋敝和封建政府实现赋役剥削的难度增大。 (高春平)

六科的创设

洪武六年(1373)，明太祖强化专制主义中央集权的措施之一。

六科的设置，始于明初，明太祖废中书省和丞相制之后，加重六科权力，使之成为监督六部的独立的监察机关。六科各设有给事中若干人。给事中，秦代始置，明因之。洪武六年，始分为吏、户、礼、刑、兵、工六科。各科设都给事中一人，左右给事中各一人，给事中各科多寡不等。废中书省和丞相制以后，六部直接对皇帝负责，一切政事均由皇帝亲自裁决。皇帝忙不过来，遂仿宋制，设华盖殿、武英殿、文华殿、文渊阁、东阁诸大学士，协助皇帝处理政务。由于六部权力很大，明太祖遂令六科对六部的活动进行独立的监督，即使是明廷专司监察的机关——都察院，亦不得干预六科给事中的活动，因为六科都是直接对皇帝负责的。凡六部奏请皇帝之事，均须先经给事中审查，大事复奏，小事署而颁之，有不当则驳回。凡内外所有的上章下疏，均分别抄出，参署付部，并驳正其违误。给事中的衙署设于午门外东、西朝房，所有呈报的章奏必经其手，所以给事中的权势奇重。但他们的官阶品级却很低。都给事中仅是正七品，左右给事中和给事中均为从七品。以六科来监督六部，即是以

七品小官来监督二品大官，这是创设六科给事中之后明代吏治的一大特点。

万历初，张居正当政期间，推行了一系列改革。按照张居正推行的考成法，内阁控制六科，六科控制部、院，部、院控制抚按等地方长官，指挥整个官僚机构的运转。六科的权力更大。万历十年（1582），张居正病逝后，改革废止，考成法停行，六科的权力大大削弱。清代仅设六科掌印给事中、给事中，均为满汉各一人。雍正时，给事中改属都察院，与御史同为谏官，尊称给谏。

（张海瀛）

大明律的颁行

洪武七年（1374）二月，《大明律》书成，明太祖下令颁行全国。

元末农民大起义的浪潮，冲垮了元王朝的腐朽统治，也摧毁了体现元朝统治者意志的法律。因此，当朱元璋在洪武元年（1368）建立明王朝，重新恢复代表汉族地主阶级封建统治的秩序时，就非常重视法律的制订。为了尽快把广大人民纳入封建统治秩序，限制随着新王朝建立而日益膨胀的地主阶级的贪欲，缓和阶级矛盾，明太祖吸取了元末豪强欺侮贫弱的教训，兼采传统的儒家“仁”学思想以及法家“以法治国”的主张，确立了“锄强扶弱”的立法指导思想，明确指出：礼法，国之纲纪。礼法立，则人志定，上下安。建国之初，此为当务之急。又说：纪纲法度，为治之本。元末纪纲大坏，富侮贫、众暴寡、强凌弱，致天下大乱，今立法需佑贫抑富。为此，朱元璋早在吴元年（1367）冬十一月，就命中书省定律令，以左丞相李善长为总裁官，参知政事杨宪、傅瓛，御史中丞刘基，翰林学士陶安等20人为议律官，讨论制订。李善长等认为历代之律，皆以汉萧何所订《九章》为宗，至唐始集其大成，今制宜遵唐律。朱元璋同意他们的意见，以唐律为蓝本着手制订明律。朱元璋自己也时常和他们一起讲论律义。到十二月，书成，共有令145条，律285条。又恐一般百姓不能周知，朱元璋特命大理卿周桢等取所定律令，自礼乐、制度、钱粮、选法之外，凡民间所行事宜，类聚成编，训释其义，颁之郡县，名为《律令直解》。明王朝建立后，明太祖觉得原来所订律令还不够完善，尚有轻重失宜之处，决定继续修订。洪武六年夏刊《律令宪纲》，颁之诸司，作为各级政府部门及司法官员行政和断案的准绳。同年闰十一月，明太祖又特命刑部尚书刘惟谦详定大明律，每成一篇，随即缮写奏进，命揭于两庑之壁，由他亲加裁定。洪武七年二月，《大明律》全书修成，明太祖下诏颁行天下，篇目一准于唐，共计606条，分为30卷。从吴元年起到洪武六年底，经过前后7年的反复修改讨论，基本上完成了明律的制订。此后对原来的律条又有所增损。因此，洪武二十二年刑部又奏请更订了一次，取历年所增律条，分门别类附入。经过重新整齐编订，直到洪武三十年才正式颁布。最终修定的《明律》仍为30卷，只是减少归并了一些条目，成为460条。

《明律》和《唐律》一样，是我国封建时代的两部前后辉映的著名法典。《明律》虽以《唐律》为蓝本，但就科罪的轻重程度，在典礼仪制、婚姻教化以及佃户的人身依附关系等方面，《明律》均较《唐律》为轻；而在对勋贵不法活动的禁约，官吏贪赃科敛的打击，豪强兼并的抑制，封建财政的管理，统治阶级内部异己势力的铲锄，以及对劳动人民反抗活动的镇压方面，《明律》又较《唐律》为重。它首列“十恶”，以凌迟处死等刑法镇压人民的反抗；规定人民要服从官府，奴婢、雇工要服从主人；有敢侵犯地主、政府的田土房舍者，要处各种刑罚，以保护地主阶级的私有制和政治特权。对人民的反抗，如犯了“谋反”、“谋大逆”之罪者，在量刑上，《唐律》规定为首者处斩刑，其父及年在16岁以上的儿子皆处绞刑，其余亲属则不处死刑；而《明律》则规定，不分“主犯”、“从犯”一律凌迟处死，他们的祖、父、子、孙、兄弟及同居之人，年在16岁以上的都处斩刑。可见《明律》在镇压人民反抗方面比《唐律》更为残酷。同时增加了禁止官员在现任官所置买田宅，禁止隐蔽他人户数、丁口以及不得放富差贫、挪移作弊的内容，对地主阶级的贪欲作了限制。

明太祖是有名的专制独裁君主。因此，他一面独揽任用官员的权力，一面严禁滥设官吏，玩忽职守，并在《明律》中用法律条文固定下来，使之合法化。规定凡除授官员须从朝廷选用，若大臣专擅选用者斩，大臣亲戚非奉特旨除授官职者斩；罢闲官吏干预官事，把持官府，蠹政害民者严惩；上司官员擅勾属官，拘唤吏卒，妨废公务者罪；承顺逢迎，听从差拨者罪亦如之。此外，严禁额外滥充吏典、知印、承差、祗候、禁子、弓兵人等；严责百官忠于职守、上下贯通，不得增减官文书，漏用钞印、擅用调兵印信、私借官府车船、驿马等。明太祖还要人们只对他顶礼膜拜，凡诸衙门官吏及士庶人等若有上言宰执大臣美政才德者，即是奸党，务要鞫问，究明来历，犯人处斩，妻子为奴，财产没收。如宰执大臣知情，一同治罪。这是要

树立君主的绝对权威，让所有的臣民都按照他的意志行事，无条件地效忠于皇帝。否则，就要按结党营私、目无君主受到法律的严厉制裁。

《大明律》的制定，经历了一段30多年逐渐完善的过程。朱元璋称帝前即议律令，吴元年制令、律共430条。洪武七年，详定《大明律》，修订增补为606条，30卷。九年、十六年，又予厘正增补。二十二年，更定《大明律》，以《名例律》冠首，下分吏、户、礼、兵、刑、工六律，以类附入，共460条，30卷，我国古代沿袭已久的律书体例为之一变。三十年，撮取《大诰》中重要者附载于《大明律》正文之后，称之为《大明律诰》，中叶以后，《诰》遂废而不用。可以说《明律》是明太祖朱元璋一生政治活动中劳心焦思、防微杜渐30载的经验总结，是他经过反复修改，字斟句酌，七易其稿，亲自主持制定了这部颇称完备的国法。明太祖把它视为维护朱明王朝长治久安的法宝，同时还为他的子孙后代留下了一部甚为严厉的家法——《皇明祖训》。他满以为，有了这些法典，就有了治国安天下的法宝，即使他离开了人世，朱家天下也可永保安宁。所以他在《祖训》中谆谆嘱咐：凡我子孙，钦承朕命，勿作聪明，乱我已成之法，一字不可改易。

（高春平）

明初朱学统治的确立

明朝建立后，明太祖朱元璋为了巩固新兴的朱明王朝，除了采取政治、经济和军事措施加强专制统治以外，又大力提倡程朱理学，加强思想统治。

程朱理学又称道学，是由宋代的程颢和程颐奠基，朱熹集其大成的。二程认为在物质世界和人的意识之外独立地存在着一个最高的精神实体，这就是“理”，亦称“天理”。这个“理”就是世界万事万物之本原和创造者。一切伦理道德，“三纲五常”都是“理”。朱熹进一步发展了二程的学说，称为朱学。在朱学的整个体系中，伦理思想是其核心。而在伦理思想中，“三纲五常”又为其中心内容。正如朱熹自己所说，他一生所读、所学、所循、所宣讲者，归结到一点，就是“三纲五常”，并认为这是决定国家和社会治乱的根本所在。因此，不仅要一般臣民共同遵守，而且要皇帝强制推行。他还进一步提出要把“存天理，去人欲”作为实施“三纲五常”的大纲。尽管他的这些主张适应了封建社会后期强化中央集权的需要，但南宋统治者并未认识到这一点，所以，当时仍被宣布为“伪学”，不许传播。他的学生蔡元定还被诬为妖人，流放道州，一年后就死在那里。当时凡属参加科举考试的儒生，先要声明自己并非朱学信徒，否则不准考试。朱学被禁锢的局面从朱熹晚年一直到他死后20多年。直至南宋末年，情况才稍有好转，但仍非显学，影响也不很大。到元代蒙古族入主中原，特别是元世祖忽必烈推行汉法后，理学得到采用。但真正被重视并大力推行则是从明代开始的。

明太祖开国之初，便与李善长、刘基、宋濂等一批儒臣议论礼乐之制、经邦之道。洪武初，解缙上万言书，建议以关、闽、濂、洛，上接唐、虞、夏、商、周、孔，“勒成一经”，作为“太平制作之一端”，从而便拉开了明代官修朱学的帷幕。为了在思想领域实行专制，明太祖下令设立太学，命许存仁为祭酒，一宗朱子之学。从中央国子监到各地方的书院，乃至乡村社学，都用朱学进行教育。不久，朱元璋又采纳刘基的建议，决定沿用元仁宗延祐二年(1315)推行的以朱学为主的科举考试，规定以朱熹的《四书集注》和理学家注释的《五经》命题试士。这样，朱学便成为统一全国思想的官方哲学。社会上，家庭中，朱学的影响无所不至。小说、戏曲等文艺作品中也大力渲染。明太祖曾强调说：“四书五经如五谷，家家不可缺。”从而使朱熹注释的《四书》、《五经》成为各级学校的必修课本和考试的准则。明确要求儒生非五经、孔孟之书不读，非濂、洛、关、闽之学不讲。当时北方经元末长期战乱，学校废坏较多，书籍缺乏，朱元璋为此特于洪武十四年(1381)颁发四书五经于各地学校。明成祖朱棣即位后，又命翰林学士胡广等于永乐十二年(1414)以程朱理学为标准，汇辑经传、集注，编为《四书大全》、《五经大全》、《性理大全》。书中汇录宋元各家理学之说，作为全国士子求学和当官的必读教科书。朱棣还在敕撰《四书大全》中明文规定科举考试以《四书》、《五经》为内容，以朱熹的注疏为准绳，凡不符合程朱理学的则被视为“离经叛道”之说。书修成后，成祖亲自作序，颁行天下。三部《大全》的颁行，标志着程朱理学统治地位的正式确立。明初统治者之所以如此尊崇程朱理学，其意图就是要利用它来钳制人们的思想，进而维护封建专制统治。即所谓合众途于一轨，会万理于一原，使家不异政，国不殊俗。不久，鄱阳人朱季发在他所著书中稍微阐发了一下自己的观点，明成祖看后大发雷霆说：“此儒之贼也。”派遣行人以毁宋儒而标榜自己的罪名将朱季发押赴饶州，令地方官吏严加杖责，并焚毁其书。这样，在明朝皇帝的大力推行下，程朱理学取得了完全独尊的地位。尤其是朱学被尊奉为官方统治哲学。宪宗成化(1465—1487)以后，不仅解经答题以朱子的

注疏为准，甚至连作文的格式也一律固定为呆板的“八股”文，士子们只能按僵化的八股模式作文章，不准随意发挥和变换。

由于明初统治者的极力提倡和强制推行，程朱理学在明代前期曾一度兴盛，出现了以薛瑄和吴与弼为代表的理学家。薛瑄(1389—1464)，字德温，号敬轩，山西河津人。他曾任大理寺卿，礼部侍郎，并以醇儒入预机务。天顺初年(1457)，英宗复辟后，他回家讲学。在政治上，薛瑄十分强调统治者为政要重视顺应民心，他说：“自古未有不遂民心而得天下者，”“为政临民岂可视民为愚且贱而加慢易之心哉！”在学术上，薛瑄非常尊崇朱熹，认为孔子之后有大功于圣学者，朱子也。他治学注重实用，主张向外求知，提倡笃实践履之学。薛瑄在哲学思想上很推崇张载，他接受了张载气本体论的主张，认为“天地之间只有理气而已，其可见者气也，其不可见者理也。”但在论述理气本末关系上，他还是陷入了朱熹的理本气末的唯心论，主张：“理为主，气为客。客有往来，皆主所为，而主则不与俱往。”这就是说，理是常住不变的本体，而气则是由理来主宰变动的。薛瑄的学说在当时社会上很有影响，人们称他为“薛夫子”，他本人在政治上也曾得到统治集团的赏识和尊重。黄宗羲的《明儒学案》把他列为“河东学案”。《明史》说：“英宗之世，河东薛瑄以醇儒预机政，虽弗究于学，其清修笃学，海内宗焉。”和薛瑄齐名的另一理学家是江西崇仁人吴与弼(1391—1469)，号康斋，一生只做过两个月的低级京官左春坊左谕德，其它时间一直家居讲学。他和薛瑄被称为南北两大儒。吴与弼和朱熹一样，一生鼓吹“存天理，灭人欲”，反复强调人应在贫贱患难上立得住脚，克制粗暴，使心性纯洁，上不怨天，下不尤人，物我两忘，惟知有理而已。这显然是要人们安于现状接受逆来顺受的观念。他非常崇拜朱熹，在其《日录》中竟有梦见朱熹的话语，晚年为此专程去福建谒朱子墓，可见其信奉朱学之深。不过吴与弼虽然崇奉程朱，但在他的思想中也已流露出心学思想的端倪。他在一篇《道中作》的诗中有“寸心含宇宙，不乐复如何”之句，表现出他寸心包含宇宙的心学思想。所以黄宗羲在《明儒学案》中指出吴与弼虽禀承宋人成说，但他的门徒陈献章已是地道的心学家。陈献章的心学就继承了吴与弼的心学思想并将之继续向前推进。

明初统治者一味尊崇朱学，严密控制思想的结果，造成了思想领域的日趋僵化和学术思想的因循守旧，随着时间的推移，朱学日益走向没落。到明朝中后期，随着社会矛盾日趋尖锐，意识形态领域的朱学也出现了严重的危机。官僚士大夫的思想也发生了分化，不少人对程朱理学产生了怀疑，朱学的统治地位开始动摇。有见识的政治家、思想家便另辟蹊径，探寻新的理论武器。

（高春平）

胡惟庸党狱

洪武十三年(1380)，明太祖朱元璋以“擅权植党”的罪名杀丞相胡惟庸。之后又以“通倭”、“通虏”和“谋反”的罪名株连杀戮其党羽3万余人，史称胡惟庸党狱。这次大狱的兴起是明初君权和相权矛盾斗争的集中表现。

明朝建立后，如何保住皇帝宝座，使朱家天下世代相传而不落入别人之手，成为明太祖苦心思虑的头等大事。明太祖虽然通过改革政府机构，加强中央集权，强化地方监察，将大权独揽于皇帝手中，却十分猜忌他的文臣武将。这批人因帮助他争夺天下有功，在政治、军事和经济上都有相当大的势力，一个个官封公侯，位居将相，爵显禄厚，特别是某些开国功臣的骄纵违法以及文武之间和淮西、浙东集团之间的矛盾倾轧，更使明太祖放心不下，猜疑他们会来抢夺皇帝宝座。而且至正二十二年(1362)间旧将邵荣、谢再兴的叛变事件对明太祖影响极深。为了使公侯将相尽忠于朱明王朝，明太祖早在洪武五年就作了申戒公侯的《铁榜文》。洪武八年又编了《资世通训》。洪武十三年再编《臣戒录》，辑录历代诸侯、宗戚、宦官悖逆不道者212人的行事来教育他的臣僚。可是，明太祖还不放心。于是便利用官僚集团之间的矛盾开始了对功臣的大屠杀，首先从废中书省、罢丞相制、诛胡惟庸入手。

明初，国家政体沿袭元制。中央设中书省，置左、右丞相，总理军国大政，统摄文武百官。另设大都督府管军事，御史台掌纠察。地方则设行中书省，置平章政事和左、右丞，掌管一省军政、民政、司法和监察。丞相历来是辅弼皇帝，统领百官，综理内外政务的国家重臣，位高权重。因此，君权和相权的矛盾一直存在。进入中国封建社会后期，随着君主集权的不断强化，专制皇帝逐步地分割、削弱相权。明朝初期，中书省的权力很大，首任左、右丞相是李善长和徐达。李善长运筹帷幄，徐达出将入相，二人均为开国元勋，但李善长处事谨慎，徐达常统兵在外征战，因而没有和明太祖发生大的冲突。到胡惟庸为相后，就和专制独裁的明太祖形同水火，君权和相权的矛盾

斗争很快便趋于白热化。

胡惟庸(？—1380)，安徽定远人。至正十五年朱元璋攻占和州时，参加起义队伍，授元帅府奏差。曾任宁国县主簿、知县，吉安府通判，湖广按察使司佥事。吴元年(1364)由李善长推荐，入为太常寺卿。洪武三年拜中书省参知政事。次年，李善长老疾罢相，明太祖想用杨宪为相，胡惟庸对李善长说：杨宪为相，我等淮人不得为大官矣。于是李善长乘机劾其放肆为奸事，终于使杨宪被杀，并使中书省左丞汪广洋升为右丞相，胡惟庸代汪广洋为左丞相。但汪广洋身居相位，毫无建树，洪武六年被降为广东行省参政。此后直至洪武十年，丞相只有胡惟庸一人。他长期控制中枢要职，独揽大权。明太祖起初也以胡惟庸是个干才，宠任有加。胡惟庸亦能自励，曾以曲谨一度赢得明太祖的宠信。可是胡惟庸却专权树党。在他独居相位期间，生杀黜陟，有时竟不奏径行。内外诸司上封事，必先取阅，不利于自己的奏章，就藏匿不使外闻。四方躁进之徒及功臣武夫失职者，争走其门，贿赂金帛、名马不计其数。他还排挤开国元勋徐达，陷害浙东集团官员御史中丞刘基，逐渐形成一个淮系官僚集团。这些行为自然为明太祖所不容。为了加强以皇权为中心的专制统治，明太祖决定改革行政机构。洪武九年下令废除地方行中书省，在全国设立13个承宣布政使司，置左、右布政使各一人，主管全省的民政和财政。另设都指挥使司管军政，提刑按察使司掌司法、监察，从而将行省的权力一分为三，三司互不统属，直接归中央有关部门管辖。地方凡遇重大政事，必须由都、布、按三司长官会议，上报中央的部院。布政司以下的地方政权分为二级。第一级是府，长官为知府；直隶州，长官为知州。第二级是县，长官为知县；一般州(也叫属州)，长官为知州。这一改革，把元朝的路、府、州、县减少了一级，传达和奉行政令更便捷了。更为关键的是地方行中书省改革为三司。因为地方行省是中央中书省的外延，它的裁改已预示着中书省丞相制的行将废除。

洪武十年，明太祖复拜汪广洋为右丞相，以牵制胡惟庸。可是汪广洋颇贪酒，与胡惟庸同相，浮沉守位而已。洪武十二年九月，占城(今越南)国王阿答阿者派使臣阳须文旦带着国书来进贡象、马特产，中书省没有按时奏报引见。宦官因事出宫，见其使者，遂告知明太祖。明太祖立即召见占城来使，下敕指责中书省臣：朕居中国，抚辑四夷，四夷外国有至诚来贡者，我以礼相待。今占城来贡方物，尔等宜及时奏告，礼待来使，为何竟置若罔闻，为宰相辅佐天子，出纳帝命，怀柔四夷，难道就应当这样吗？丞相胡惟庸、汪广洋等皆叩头谢罪，但却推卸责任于礼部，礼部又推诿到中书省。明太祖更火，下令把中书礼部主管官员全部囚押，一定要追究个水落石出。特意下了第二道圣旨，指出事情发生后，中书省和礼部互相推诿责任，无人承担罪责，所以尽囚诸臣，穷诘主者。胡惟庸等遂于九月二十五日下狱。同年十二月，赐汪广洋死，接着又发生汪广洋妾陈氏从死事，再下法司调查情由，知陈氏是父亲陈知县犯法后没收为官府的，并非良家女子。而且按明制，没官妇女，只许配给功臣家服役，文官无权配给。这使明太祖更为恼怒。不久，御史中丞涂节窥探见明太祖有杀胡惟庸之意，便于洪武十三年正月逢迎明太祖之意告胡惟庸欲谋反。原来在这之前，胡惟庸的儿子乘马于市，堕死车下。胡惟庸便杀了挽车者。明太祖得知后命胡惟庸抵罪，胡惟庸请求以金帛了结此案，明太祖不许。胡惟庸乃与御史大夫陈宁、中丞涂节等谋起事，阴告四方及武臣从己者。于是，明太祖大怒，命廷臣严加审讯，随即以“擅权植党”的罪名杀了胡惟庸，对其进行了抄家灭族的严厉镇压。并大治其奸党，趁机诛杀御史大夫陈宁、中丞涂节等20余名文臣。正式下令废除中书省及丞相制，分权于六部、五府、都察院、通政司、大理寺等衙门，部院长官直接对皇帝负责，国家政务全由皇帝一人裁决。至此，明太祖集皇权、相权于一身，封建专制主义中央集权发展到了顶点。

其实，明太祖废丞相诛功臣的图谋早已有之，所谓阻占城来使不过提供了除掉胡惟庸的契机口实而已。而且明太祖不肯就此罢休，继续罗织罪名，大杀胡党。洪武十八年又以太仆寺丞李存义供出胡惟庸曾劝李善长一道谋反事牵连到太师李善长。第二年复以胡惟庸曾指使明州(浙江宁波)卫指挥林贤通倭及日本派如瑶贡舶事兴林贤狱。洪武二十一年再以蓝玉征沙漠，出塞至捕鱼儿海(俄罗斯贝加尔湖)，获惟庸通元使者封绩，李善长匿不以闻，加胡惟庸“通虏”罪名。不久又有李善长家奴庐仲谦、陆仲亨家奴封帖木相继告发李善长与陆仲亨、唐胜宗、费聚、赵庸三侯和胡惟庸共谋不轨。到洪武二十三年又兴大狱，于是太师李善长、吉安侯陆仲亨、平凉侯费聚、延安侯唐胜宗及赵庸、郑遇春、黄彬、陆聚、金朝兴、叶升、毛麒、李伯、丁玉等一大批文臣武将，都以与胡惟庸交通谋反被杀。株连坐诛者数万人。明太祖还颁布《昭示奸党录》，布告天下。株连蔓引，迄数年未靖。这时李善长已77岁，被赐死，自缢，家属70余人被杀。第二年，工部郎中王国用上书为李善长辩冤。认为李

善长与明太祖同心创业，出万死以取天下，勋臣第一，生封公，死封王，男尚公主，亲戚拜官，人臣之分极矣。假令想自图不轨，尚未可知，可说他要帮助胡惟庸谋反，则荒谬十足，不合情理。假使李善长助惟庸事成，也不过勋臣第一，太师国公封王而已。况且李善长并不是不知道侥幸万一和天下难取的事理。可见，当时人们对明太祖利用胡惟庸案件强加给李善长等人的罪名就有看法，认为多数人是冤屈而死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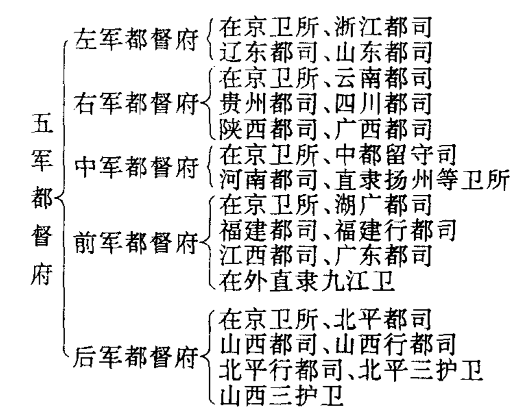
胡惟庸党狱是明初第一大狱，前后历时10余年，株连被杀者多达3万余人。一时功臣宿将诛夷殆尽。胡惟庸的被杀，不过是明太祖有目的地施行一系列大屠杀案的开端。

（高春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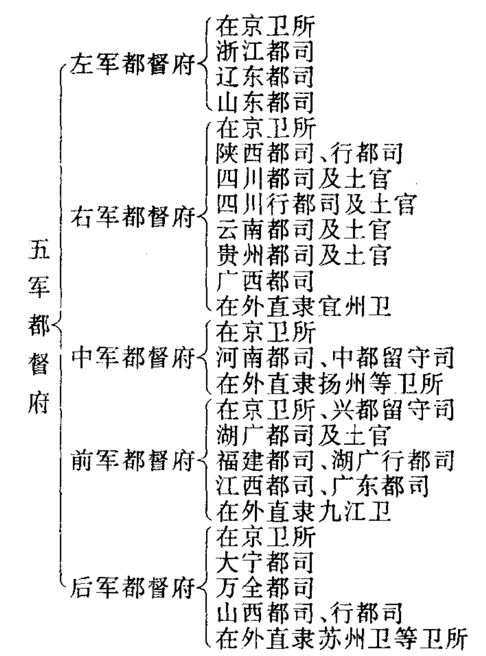
明初卫所兵制的创立

卫所兵制是明太祖和刘基总结唐代府兵制经验及龙凤年间所立部伍法基础上创立的一种兵农合一、军将分离的军事制度。

军队是国家政权的基石，明初统治者十分注意军队的管理和建制。明太祖早在渡江建立江南政权后，因军队不断扩大，编制混乱，诸将称呼不一，就于龙凤十年（1364）四月，立部伍法：稽核诸将所部，有兵5000者为指挥，满千者为千户，百人为百户，50人为总旗，10人为小旗。此制实行后，部伍严明，名实相副，众皆悦服，以为良法。明朝建立后，刘基在此基础上结合唐代府兵制的经验，奏立军卫法，自京师达于郡县，皆立卫所。卫所的设置根据各地的情况而定，在军事上重要且地跨数郡者设卫，次要系一郡者设所。大抵5600人为一卫，长官为指挥使，管辖5个千户所。每个千户所为1120人，长官为千户。千户所下辖10个百户所。每个百户所为112人，长官为百户。百户所设总旗2，每个总旗下设5个小旗，每个小旗为10人，大小联比以成军。地方上最高的军事机构是都指挥使司，负责掌管一省的军政。洪武初，全国的军队都属于中央的大都督府统领。大都督府是国家的最高军政机关，各地卫所、都指挥使司皆受其节制。明太祖任命亲侄子朱文正为大都督，统管中外诸军事。洪武十三年（1380）明太祖在改革中央政府机构的同时对军事机构也进行了调整，本着集权于上、分权于下的指导思想，在废除中书省丞相制时把大都督府一分为五，成立左、右、中、前、后五军都督府，各都督府分别掌管若干都司、卫所。为了防范统兵将领割据专权，明太祖又规定五军都督府只掌军籍，对军队无调遣权，调动军队的权力由皇帝直接掌管。兵部在军队中虽有任免、升调、训练之权，但不统兵。每逢战时，由皇帝亲自选派将领担任总兵官，统率卫所军队出征。战事结束，总兵归还将印，军队仍回各自的卫所，军权始终牢固掌握在皇帝手中。这就从军事上更加加强和巩固了皇权。洪武二十六年，明太祖进一步确定天下都司卫所及其统属。当时全国共计有17个都指挥使司和1个留守司，下辖329个卫，65个独立的守御千户所，军队总人数约190余万。精锐多驻在南北二京，其组织如下：



明成祖朱棣夺位后，根据自己的需要，又在原来的基础上稍作调整，改组后的结构如下：



和都督府相配合的军事机构是兵部，长官为兵部尚书，掌天下武卫官军选授简练之政令。下设武选、职方、车驾、武库四清吏司，各司均设有郎中1人，员外郎1人，主事2人，其结构和职责如下：

兵部
- 武选清吏司　掌卫所士官选授、升调、袭退、功赏之事。
- 职方清吏司　掌舆图、军制、城隍、镇戍、简练、征讨之事。
- 车驾清吏司　掌卤簿、仪仗、禁卫、驿传、厩牧之事。
- 武库清吏司　掌戎器、符勘、尺籍、武学之事。

都督府和兵部既互相配合又相互牵制。都督府只管军政，没有指挥和统率军队的权力。兵部虽有颁发军令、铨选军官之权，但也不能直接指挥和调动军队。卫所兵士战时随将出征，平时耕田自给，实行军屯。军屯方式又分边屯和营屯两种：边屯屯于各边镇空闲地土，驻军七分屯种，三分戍守，且耕且战；营屯屯于内地卫所附近，驻军二分戍守，八分屯种，且耕且守。明初规定，每名屯军授田50亩，耕牛、农具、种子亦由政府统一配给，收获后纳的租粮叫屯田子粒，分夏、秋两季交纳。纳税标准和数量并不统一，因时因地而异，有的地方岁征其半，余存自食，也有的除留种子外，交产量十分之二。屯军虽分散种田，但都按军事形式组织，命指挥、千户、百户为田官，都指挥为总田官，进行统一的军事管理。

卫所军士皆另立户籍，称军籍，其身分是世袭的。明代的户籍种类主要是军籍、民籍和匠籍，此外还有灶户、乐户等。军籍隶都督府，民籍属户部，匠籍归工部。明朝初期卫所军士的来源，基本可分为四种，即从征、归附、谪发、垛集。从征就是原来追随明太祖参加农民起义军的诸将及其所部兵士；归附是元朝的军队、元末各地起义部队和其它割据势力的部队失败后归降明太祖的；谪发是因犯罪被罚充军的；垛集是明政府用强制命令征调民户充军的，按每户人口多少抽丁从军，有的地方三丁抽一，有的五丁抽一，比例不一。明朝建立前，军队的主要来源为从征和归附；全国统一后，军士的来源则多为谪发与垛集。明朝建立后，山西成为北征沙漠的前线，洪武二十五年十二月，明太祖命大将冯胜等往太原、平阳等地籍民为兵，新增设了十六卫，按明制一卫5600人来测算，这次垛集到的新军就有8.9万余人。因“罪”谪发充军的军士也有一定数量，特别是在边镇地区，如辽东、陕西、甘肃卫所军士多以罪谪戍。因此，成化(1465—1487)时大学士丘濬认为明初卫所军士的构成，内地多是抽丁垛集，边防多是有罪谪戍，凡以罪谪充军者，名为恩军，地位最低下，带有惩罚性质。这也说明明代军士地位不高，普通军户受到社会的歧视，一般百姓均耻于为兵，怕受军户勾捕的牵累，很少愿与军户通婚和交往。

大约到宣德(1426—1435)年间，随着剧烈的土地兼并以及政治的日趋腐败，卫所军制赖以存在的物质基础军屯制度遭到了不断的破坏，卫所兵制亦逐渐走向衰落。　（高春平）

黄册和鱼鳞图册的编造

洪武十四年(1381)及二十年，明太祖为确保赋役收入而采取的措施。

黄册即户籍册，是明政府征派赋役的依据。黄册的编造，是有明一代的大事，始于洪武十四年。该年，明太祖下令全国各布政司、府、州、县统一编造黄册。规定：110户为一里，里中推选粮多者10人为里长，其余100户分编为十甲，每甲有甲首一人。十甲编定次序，轮流应役。甲中年满16岁的成年男子都必须服役，60岁始免役。每年由一名值年里长带领一里甲首及甲中成年男子服役。每十年轮流一次，其余九年休息。应役之年名曰“见年”，不应役之年名曰“排年”。里中110户按丁粮为序，编为一册。册中详载各户姓名、籍贯、丁口、年龄及田宅产业等。一式两份，一份留本里存底，一份上交州、县。州、县汇总各里之册，编制该州、县之总册，亦为一式两份，一份留存，一份上报到府。府再如法复制，上报户部。因呈报户部的册籍必须用黄纸做封面，故曰黄册。封建政府则依据黄册佥派各户成丁与纳粮地亩。黄册虽载明各户田宅产业，但地权有转移、分割等情况，非黄册能载明，由此便产生赋役征收的紊乱及其它弊端。为补黄册之不足，始有鱼鳞图册的编造。鱼鳞图册以土地为主，详载土地的形状、性质、等级、类别等。凡该地区内的土地，均可按图索骥，一目了然，不仅能反映地权的转移及分割，且能说明因自然灾害造成的田亩坍没淹冲等情况，对地方报灾及政府派人下乡勘灾也有重要的参考价值。即依据图册反映的受灾面积，确定减免税粮的成数。因该图系据地亩分布状况绘制，状若鱼鳞，故名鱼鳞图册。有关鱼鳞图册的最早创绘时间，目前有洪武元年、洪武二年及洪武十三年等说，但学术界普遍认为是洪武二十年推行于全国的。

按明制，黄册每十年大造一次。有明一代，大造凡27次，计有：洪武十四年、二十四年，永乐元年(1403)、十年、二十年，宣德七年(1432)，正统七年(1442)，景泰三年(1452)，天顺六年(1462)，成化八年(1472)、十八年，弘治五年(1492)、十五年，正德七年(1512)，嘉靖元年(1522)、十一年、二十一年、三十一年、四十一年，隆庆六年(1572)，万历十年(1582)、

二十年、三十年、四十年，天启二年(1622)，崇祯五年(1632)、十五年。其中，洪武十四年为黄册始造之年，是在明初清丈田亩的基础上编造的，对后世影响很大。第三次大造应在建文三年(1401)，因"靖难之役"而推迟到永乐元年。这次大造也很重要，多为其后所仿效。自永乐十年以后的大造，大都陈陈相因，更改较少。

明初吏治较清明，法制较严，对官吏舞弊和乡绅欺隐户口、田亩的惩处相当严厉。规定官吏舞弊，"一体处死"；隐瞒户口、田亩，"家长处死，人口迁发化外"。所以此时编造的册籍，与实际情况较为吻合，起到良好的作用。随着吏治的败坏，胥吏与乡绅勾结作弊的现象日趋严重，其主要手段有：里长与书算手相勾结，把乡绅人户的地亩假托在他人名下，借以逃避赋役，名曰"诡寄"；将乡绅应负担的赋役分摊到小户名下，名曰"飞洒"；为乡绅之家谎报死亡，借以隐瞒丁口，或者谎报年龄，逃避赋役，等等。这样，在很多地方就出现了占有大量土地的乡绅不纳粮税，而无立锥之地的小民却必须纳粮的奇怪现象。到万历年间，弊端之盛行，欺隐田粮之严重，正如张居正所言那样："豪强兼并，赋役不均，花分诡寄，恃顽不纳田粮，遍累小民。"已达非改不可的地步。万历十年的大造，就是在张居正改革的推动下，在清丈地亩的基础上进行的。所以这次黄册所载的丁口与地亩，比较符合实际。这是明代中叶以来最重要的一次大造。张居正改革的一项十分重要的内容是推行一条鞭法，实行摊丁于地，赋役皆由地亩起税。这样，鱼鳞图册在编定赋役中的地位就更加重要。 (张海瀛)

锦衣卫、东西厂的创立

明代统治者为维护君权、强化专制独裁统治而设立的三个特务侦缉机关。

锦衣卫本是皇帝亲军上十二卫(后增至二十六卫)之一，不隶都督府，直属皇帝。它的设置早于东西厂。其前身是仪鸾司。明太祖于开国之初设拱卫司，不久改为亲军都尉府，下隶仪鸾司。洪武十五年(1382)罢府及司，改仪鸾司为锦衣卫。锦衣卫的禄秩名号无异诸卫，统军亦与诸卫同。其与诸卫不同的是增设了北镇抚司，改原镇抚司为南镇抚司，时间在洪武十五年。于是北镇抚司专理诏狱，成为由皇帝亲自处理和管辖的重大刑狱。与此同时，北司还负责侦缉，凡缉访京城内外奸宄及缉捕京城内外盗贼，均由锦衣卫官领所属旗校专管。因锦衣卫主侦缉、典诏狱，其官多以勋戚都督领之，实际上成为皇帝的心腹，并凌驾于国家司法机构之上。

明成祖朱棣在"靖难之役"后为了镇压建文帝一派的官僚，不断派遣宦官刺探情况，但没有一个专门机构，总感到不便。永乐十八年(1420)八月，在北京东安门北设东厂，以宦官掌之，直接受皇帝指挥。其官衔的全称是"钦差总督东厂官校办事太监"，简称为"提督东厂"。并颁给关防一枚。皇帝还特颁给密封方章一枚，凡事件应封奏者，以此钤封，可不必经过任何手续，直接送到皇帝那里。厂内人员称主管东厂的太监为"督主"或"厂公"。其下设掌刑千户一、理刑百户一，亦谓之贴刑。又有掌班、领班、司房40余名及12管事。东厂的职责是"缉访谋逆妖言大奸恶等"。专门到外面去缉访的头目是役长(又叫档头)，每月初一，役长掣签庭中，率领干事的番子数人，分瞰官府。各处役长打探来事件后，先去见厂公心腹内官审阅，而后发司房删润，再送给皇帝。遇有重要事件，虽在深夜，东华门关了，也要从门缝里塞进去，里面的人接到后，立即秘密送给皇帝。所以，外边事无大小，皇帝都可以随时知道。成化十三年(1477)正月，宪宗又成立一个特务侦缉机构，以宦官汪直掌领。由于原来已有一个以"东厂"为名的宦官掌管的特务机构，因此这个新成立的机构便名为"西厂"，以与东厂相区别。西厂所领缇骑倍于东厂，势力大大超过东厂和锦衣卫。它逮捕朝廷大臣也不奏请，常有先下狱而后奏闻者，也有旋执旋释，竟不奏闻者。汪直利用西厂罗织人罪，数起大狱，搞得政治空气极为紧张，引起了一些正直大臣的反对，导致了西厂于成化十三年五月一度停罢。但到六月十五日便又恢复，汪直更加猖狂，权势登峰造极，廷臣莫敢言，甚至有人假冒其名，竟能横行各地。直到成化十八年三月，西厂最终被罢后，汪直利用西厂当权祸国的历史才告结束。可是到明武宗正德元年(1506)，又复西厂，不久，刘瑾专权，又于正德三年八月设立内行厂。万历时，又建内厂，而以初建者为外厂。厂与锦衣卫不同的是厂由皇帝最受宠的司礼太监提督，卫则由皇帝的亲信武将掌管。一般说来厂权高于卫权。他们之间职责相似，关系密切。东厂的番役都是从锦衣卫选拔来的。其任务都是伺察官民，为专制皇帝效劳，且均为皇帝直接指挥。其分工是厂主侦伺，卫典诏狱，厂卫相倚，构成了专制皇帝自己独立而又完整的又一套司法监察机构。

锦衣卫、东西厂是明代极端封建专制独裁统治的重要支柱。专制皇帝用厂卫大治"奸党"，堵塞言路，防大臣欺蔽，镇压异己，为加强皇权发挥了十分

重要的作用。但明代厂卫横行，造成了严重恶果。首先是破坏了封建社会的一般法制，形成了告密之风，造成了恐怖政治，为宦官专权、奸佞窃国创造了条件。并使广大人民备受其害。其次是搜刮、掠夺了惊人的财富，破坏了社会经济。第三，严重地桎梏了人们的思想，阻碍了科学文化的发展，最终导致了明王朝的专制统治连同厂卫一块在农民大起义的风暴中覆灭。　　（高春平）

空印案

洪武十五年(1382，一说洪武九年)，明太祖朱元璋大肆杀戮地方掌印官吏的案件，史称"空印案"。

明太祖朱元璋出身贫寒。他从青少年时代起就切身体验到元朝政治的腐败，贪官污吏的可憎，以及官逼民反的道理。明朝建立后，朱元璋明智地发现，他现在的主要任务已不是以大规模的军事行动去镇压渴望安定生活、恢复生产的农民，而是把他们重新纳入封建统治秩序；同时限制随着战争平息而日益膨胀的地主阶级的贪欲，以便缓和阶级矛盾，稳固封建统治。因此，他对勋贵豪强、文武官吏的不法行为予以严厉打击，对贪官污吏的惩治和用法严酷史所罕见。体现明太祖统治意志的《大明律》严责百官忠于职守，上下贯通，不得怠忽、壅蔽。如若官吏玩忽职守，一经发现便严惩不贷。明政府规定，每年布政司、府州县吏诣户部报核钱粮、军需诸事，经过户部的审核，遇有钱粮数额不符合的地方，就要驳回重新填造。可是地方官吏，特别是道远者为了省事，事先拿上盖有官印的空白文书，遇部驳立即改填，"习以为常"。洪武十五年，明太祖发觉了这一情况，认为军需、钱粮系关国计民生，如此敷衍，其中定有舞弊失实害民行为，下令严加惩办，凡掌印官员一律处死，佐贰以下杖一百，戍边远地方。这就是明史上有名的"空印案"。因这起案件牵连被杀的达万人之多。被杀的官吏，其中自然有不少玩忽职守的贪官污吏，但朱元璋对主印官不问青红皂白，一概诛杀，也无可否认冤枉了一些清正之官。如宁海人郑士元，刚直有才学，由进士历官湖广按察司佥事。空印案发，郑士元也被牵连下狱。当时明太祖正因此事异常恼怒，丞相、御史无人敢谏。士元弟士利认为以空印为大罪肆意诛杀有点小题大作牵涉太多，他上千言书论述此事道：陛下欲深罪空印者，恐奸吏得挟空印，为文移来虐害百姓。文移必盖印才生效。现在考查比较钱谷册书，必须符合勘合骑缝印，不是一印一纸便可捣鬼。即便得一空印文册，也不能付诸实施。钱谷数额，每府必须汇总报省，每省必汇总报户部，每省总额必须和各府汇总额相符，数字难以随意改窜，至户部才能最后敲定。可是省府距离京师户部远的六七千里，近的亦三四千里，册成而后才盖印，往返一趟差不多得用一年时间。因此先盖印而后填册，这是权宜应变之法，由来已久，何足深罪。况且国家立法，必先明示天下而后治犯法者罪，以惩其明知故犯。然而自建国至今，未曾有治空印之律条。官府因循相承，不知道这样做有罪。现在忽然一意诛杀，怎能使被杀者心服。朝廷求贤士，置百官，得之很难。位至郡守，都需几十年积功累资。通达廉明之士，并不像草菅，可割而复生。陛下为何以不足深罪之罪，而坏足用之材呢？臣窃为陛下惜之。奏上，明太祖大怒，令丞相御史拷问，究主使者。士利笑着说：看我的上书有无可取之处，我为国家言事，自知触龙颜之怒，必死无疑，谁还肯为我主谋呢？最后，士利与其兄士元被判去江浦服役输罪。平心而论，明太祖兴起空印案主观意图是为整饬吏治，防止官吏营私舞弊，以便维护朱明王朝的长治久安。因此采取了对掌印主管官员不加区分一律杀头的过激严厉措施，客观上难免冤枉错杀一部分廉洁官员。但它对明代前期相当长时间内吏治的清明起了明显的震慑作用。所以郑士利的上言除了从情理上为空印犯者开脱外，从行政法角度是难以立足的。而且他言外之意显然有指责明太祖草菅滥杀，未有治空印之律，却故陷人于罪的意思，这当然是专制独裁的明太祖所不能接受的。而且促使朱元璋在《大明律》的基础上再加重科罪，以法外重典惩办统治阶级内部的犯法行为，编成《大诰》。其中对官吏玩忽职守的惩处条目有五条，它要求官员必须"躬亲庶政"，"亲笔起稿"文案，严禁"临政之时，袖手高坐，谋由吏出"然后押字施行的官僚作风。这都反映了朱元璋励精图治、提高国家机器办事效能的强烈愿望。　　（高春平）

郭桓贪污案

洪武十八年(1385)，明太祖惩治户部侍郎郭桓贪污的案件。

明太祖朱元璋是在元末农民起义的刀光剑影中爬上皇帝宝座的。他惩元末吏治纵弛之弊，对任用的官员，详定考课之法，并用严刑酷法来惩治贪污。他规定官吏贪污钱财60两以上的，就斩首示众，还要剥皮实草。明太祖把府、州、县、卫衙门左面的土地庙，作为剥人皮的场所，称为"皮场庙"，在官府公座两旁，各悬挂一个填满草的人皮袋，使官吏触目惊

心，知所警惕。此外，还有挑筋、剁指、刖足、断手、刑膑、钩肠、去势等酷刑。洪武七年颁布的《大明律》专门辟有《受赃》篇。对于贪官污吏的科罪重，防范严，枉法受赃八十贯就要处绞刑。对于官吏贪赃、受贿、求索、借贷、嘱托、馈送、科敛、说事过钱、事后受财、奸淫的防范十分严密。然而，贪污是封建时代无法根治的痼疾。尽管明初朱元璋采取了一系列严刑高压的政策，但仍然是屡禁不止。如丹徒县丞李荣中、应天府吏任荣等卖放役夫，受刑断指后仍不知悔改，继续受财舞弊。当时，贪赃枉法的行为到处都有，掌钱谷者盗钱谷，掌刑名者出入刑名已成司空见惯之事。浙西各级官府，征收钱粮害民之狠，甚如虎狼。农民输送秋粮，每米一石，官折钞二贯，额外又要索取水脚钱等900文。洪武十八年，户部侍郎郭桓串通北平二司官吏收受浙西钱粮，190万石未上仓，受钞50万贯，与地方官吏私分。共折米算，所废者2400余万石。不久，郭桓勾结浙西地方府县官吏侵吞税粮事发，明太祖大怒，逮杀数百人，自六部左右侍郎以下有赃者皆死，追赃700万，株连直省诸官吏，下狱数万人。追赃时又波及到了全国各地，牵涉到一大批地主富户，使许多大、中地主破产。同年，明朝政府考核全国布政司及府、州、县来京朝觐官4117人，其中所谓称职的只有435人，不称职以及贪污的就有785人。而考核难免有失露虚伪之处，所以实际上贪污不法的地方官，远不止785人。

郭桓贪污案给明太祖朱元璋更大的刺激，他决心在《大明律》的基础上再加重科罪，大规模地惩治贪污兼并。洪武十八年冬十月，明太祖又颁《大诰》于天下，其中有关处置官吏犯法者达201条，而关于贪赃受贿、科敛害民者即达121条，约占56.3%。这是《大诰》中分量最重的一部分内容。具体细目有8项121条，详见“大诰的颁行”条。这些细目具体地记载了上自朝廷公卿下至地方吏卒的大量的五花八门的贪污、受贿、盗窃等不法行为以及他们对广大农民、工匠、商人、市民、渔夫、驿夫、乐户等各种民户的搜刮榨取，同时也反映出了明太祖朱元璋对吏治的重视及其对横征暴敛、贪赃枉法行为的痛恨。

（高春平）

大诰的颁行

洪武十八年(1385)，明太祖为了大规模地惩治贪污兼并，又在《大明律》的基础上加重科罪，并把这些案例编辑成《大诰》，其后又相继将《大诰续编》、《大诰三编》、《大诰武臣》，统称《大诰》，颁行全国。

《大明律》的规定尽管相当详细，且突出了惩治豪强污吏的内容，但是毕竟不可能将复杂的社会犯罪问题全部囊括无遗。它在吴元年(1365)草创，洪武七年(1374)基本形成并颁布之后，并没有像明太祖所期望的那样，而是犯者接踵。尤其是十三年的胡惟庸案，十五年的空印案，十八年的郭桓案更给了明太祖以极大的刺激，促使他决心在《大明律》的基础上以法外重典惩办统治阶级内部的犯法行为，更加严厉地打击惩治贪污兼并。洪武十八年冬，明政府汇集官民犯罪事例，编成《大诰》74条，颁行天下。次年春，又颁行《大诰续编》87条。同年冬再颁行《大诰三编》43条。二十年冬，复颁行《大诰武臣》32条。明太祖要求一切官民诸色人等，每户有此一本，臣民熟观为戒，并且规定如果家里有一本《大诰》的，犯“罪”时可减一等判刑，没有的就要加一等判刑。同时令天下府、州、县民，每里置塾，塾置师，聚生徒教诵御制《大诰》，使其从小知法守法。三年后，为师者率其徒至礼部背诵，礼部根据他们能背诵律条的多少给予不同的赏赐。洪武三十年，全国各地来京讲读《大诰》者多达19.34万余人。

《大诰》共236条，其中《大诰》、《大诰续编》、《大诰三编》共204条，可分为百姓犯法、官吏犯法、豪强犯法三部分：关于百姓犯法的条目大约20条次，约占9.3%。这些条目记录了对人民反抗活动的镇压和政治上的严密控制，规定了封建义务和尊卑名分；同时也严禁百姓投充吏卒、交结官府、隐匿财物，以便更有力地打击贪官污吏。关于官吏犯法的条目大约有156条次，约占72.6%。它们又可分为如下几类。

一、违背君臣之礼，玩忽职守11条。这11条反映了朱元璋励精图治，提高国家机器办事效能的强烈愿望。他要求官员必须躬亲庶政，亲笔起草文稿，严禁临政之时，袖手高坐，谋由吏出，或由典吏囚人起稿立意然后押字施行，将应速决之事故意拖延的官僚主义作风。

二、滥设吏卒24条，约占11%。这些条目反映了朱元璋整顿统治机构，防止吏滥超编扰害人民的明智态度。他认为吏卒以及好闲不务生重之徒，安享禄食之辈是导致官员贪赃的重要原因之一。如松江府坊厢滥充吏卒者竟达1350名，苏州坊厢1521名。他们酷虐小民，甚如虎狼。因此，明太祖一方面对在额定之外滥充者大加革除，减掉松江府吏卒900多名；另一方面对违令滥充害民者，处以族诛或枭斩的极刑。

三、贪赃受贿，科敛害民121条，约占56.3%。这是《大诰》中分量最重的一部分内容。它们又可分为若干细目：1.郭桓案，9条。2.酷敛百姓，贪污税粮，19条。3.放卖官差，私役丁夫，8条。4.妄取扰民，私吞商税，25条。5.谎报灾情，克扣赈济，6条。6.其它贪赃受贿，44条。7.民拿害民官吏，9条。8.循吏，1条。

关于豪强犯法的条目39条次，约占18%。它们又可分为粮长贪赃和豪强害民两类。

一、粮长贪赃17条。这些条目记录了粮长交结官吏，团局造册，虚出实收，就仓盗卖，巧立名色，妄起科征，飞洒粮差，接受赃私，包揽词讼，吊打细民等种种害民事理。

二、豪强害民22条。这些条目记录了豪富劣绅买嘱官吏，诡寄田地，飞洒税粮，揽纳私吞，脱免夫役，贪污赈济，说事过钱，起灭词讼等害民恶迹。

明太祖朱元璋所以花费这么大的力量来推行《明律》和《大诰》，其目的是通过律令的教育和宣传，使广大人民都能安分守纪地服从统治，让农民老老实实地从事耕作，输纳赋役；读书人规规矩矩地学习忠孝仁义，泽国安民；商人服服帖帖地贩运货物以通有无，发家致富；手工艺人一心一意地去搞技艺，应役营造。一言以蔽之，就是要全体国民奉法守分，各守其业，上下相安。这样，自然就达到朱明王朝长治久安的终极目的。　（高春平）

蓝玉党狱

洪武二十六年(1393)，明太祖以"谋反"罪名杀大将蓝玉及其党羽1.5万余人的重大案件，史称蓝玉党狱。它是明初皇帝与功臣矛盾斗争的突出反映。

明太祖在争夺天下过程中网罗了一批运筹帷幄、能征善战的文臣武将。这批人具有丰富的政治、军事斗争经验，既是新政权的核心力量，又被明太祖怀疑为争权夺位的对象。经过洪武十三年的胡惟庸案件，明太祖诛杀了3万多人。但他到晚年还是不放心，生怕和自己并肩起事的功臣宿将不受制驭，深虑身后子孙更难驾驭。所以他一面实行分封制，把自己的24个儿子和一个孙子分列在全国各地，一面继续清除异姓骄悍宿将，以保持朱明王朝的长远统治。到洪武二十六年，燕王朱棣、晋王朱棡，都已成长为镇守北国重镇的统军将帅，明太祖极为器重。于是便又兴蓝玉党狱。

蓝玉(？—1393)，安徽定远人，是开平王常遇春的内弟。长身赪面，饶勇略，有大将才。初隶常遇春帐下，作战勇猛，所向皆捷，数建奇功，遇春常称荐于明太祖，由管军镇抚积功至大都督府佥事。洪武四年，蓝玉从傅友德伐蜀。次年随大将军徐达北征沙漠。七年率兵拔兴和。十一年同西平侯沐英率兵讨西番，擒其酋。第二年封永昌侯，食禄2500石，予世券。洪武十四年，以征南右副将军从颍川侯傅友德征云南，平定云南诸土司，增禄500石，册其女为蜀王妃。洪武二十年以征虏左副将军从大将军冯胜征讨盘踞在辽东的残元势力纳哈出，尽降其众，遂拜大将军。蓝玉几乎参加了明太祖削平群雄、南征北伐的所有重要战役，故而自徐达、常遇春死后，成为洪武后期的主要将领，深得明太祖的宠眷。并曾多次带领大军出征蒙元，为明王朝立下显赫战功。洪武二十一年三月，他率军15万出塞远征，大军出大宁，至庆州，侦知元主在捕鱼儿海(俄罗斯贝加尔湖)，于是间道兼程，很快进抵敌营。蒙古人原以为明军进入沙漠地带，缺乏水草，不习水土，难以深入。又值大风飞沙，白昼如夜，明军行进时元兵毫无所觉，突至大惊失色，仓皇应战，大败。杀元太尉蛮子等，降其众。元主与太子天保奴等仅率数十骑逃走，蓝玉以精骑追之不及，俘获其次子地保奴、妃、公主以下百余人，又追获吴王朵儿只、代王达里麻及平章以下官属3000人，男女7.7万余，并宝玺、符敕、金牒、银印及马、驼、牛、羊15余万头，焚其甲仗无数。捷报传至京师，明太祖大喜，赐敕褒奖，比之汉唐名将卫青、李靖。师还，以功封凉国公。洪武二十三年，施南、忠建二宣抚司发动叛乱，明太祖命蓝玉率军讨平之。不久又平定湖广诸土司，益禄500石，诏还乡，明示以功成身退之义。但蓝玉不知功高震主，急流勇退，既有军功，复欲延长兵事，请率师征讨青海的朵甘土司和中缅交界处的麓川、平缅诸司，未获明太祖批准。而且蓝玉在屡立战功的情况下骄横起来，加之统兵作战多年，麾下勇将如雨，精兵云集，势力很大，成了一支举足轻重的武人集团。并且凭恃皇帝的宠信，骄恣不法，霸占东昌民田。御史按问，蓝玉大怒，竟逐御史。北征还，夜叩喜峰关，关吏没有来得及按时开启关门迎纳，他便纵兵毁关而入。帝闻之不乐。这一切本已引起猜忌专断的明太祖的不满，他还私纳北征所获的元主宠妃，又在军队里自专黜陟。洪武二十五年四月，明太祖的太子朱标不幸病死，按封建宗法制度，年幼的皇太孙朱允炆将是未来皇位的继承人，这就更增加了明太祖的猜忌心理。况且常遇春的女儿常氏又是皇太子的元妃，蓝玉则是常氏的亲舅，将来会不会导致外戚专权之祸的确使明太祖十分担心。第二年正月，燕王

朱棣等来朝，颇言诸公侯纵恣不法，将有尾大不掉之忧，意即指蓝玉。明太祖由此更疑忌功臣。同年二月，明太祖的特务人员锦衣卫指挥蒋瓛便告蓝玉谋反，下狱审讯，结果以蓝玉同景川侯曹震、鹤庆侯张翼、舳舻侯朱寿、东莞伯何荣、吏部尚书詹徽、户部侍郎傅友文等合谋为变的罪名，将其杀掉，并抄斩三族。除上述人外，平时和蓝玉关系较密切的武将，都被牵扯定为蓝党，均受到抄家灭族的镇压，列侯以下，坐同党族诛者不可胜数。此案前后诛杀达1.5万余人，把蓝玉军中所属的武将几乎杀了个干净。明太祖下诏布告天下，条列其罪，辑为《逆臣录》。

胡蓝党狱，前后延续达14年之久，一时元功宿将几乎被诛杀殆尽。两案株连死者共计4.5万余人。其中胡案牵连的以文臣为主，蓝案株连的则以武将为多。明太祖利用这两次大狱，诛杀了大批文武高官，甚至连开国功臣徐达、李善长、宋濂也未幸免。而且杀头与籍没相连，集权和措财并举。除此以外，洪武年间还有朱亮祖、胡美、周德兴、王弼、谢成、傅友德、冯胜等人的冤狱。如此大肆杀戮功臣在历史上实属罕见。明太祖满以为这样便可使皇权稳固且为儿孙剪除了通往皇位的荆刺，从此朱家江山可以长治久安了，但他却没想到当他死后，在朱家皇室内部便祸起萧墙，发生了叔侄争位的靖难之役。

（高春平）

田九成起义

洪武三十年(1397)沔县爆发的农民起义。

明初，陕西和四川交界地区的农民，凭借高山峻岭的复杂地形，不贡征徭，不惧法度，以弥勒教组织起来，坚持斗争。其中以田九成、金刚奴等领导的农民起义持续时间最长，规模也较大。洪武三十年，田九成、金刚奴、高福兴以弥勒教组织群众数千人在沔县(陕西勉县)起义。田九成称汉明皇帝，建元龙凤，高福兴称“弥勒佛”，金刚奴等称“四天王”。他们的称号和建元都与元末红巾军相同，他们同样宣传“弥勒降生，明王出世”的主张，表明他们是元末农民革命的继承者。他们破屯寨，杀官军，又于沔阳西北阳平关大败汉中卫明军，进而攻入略阳(今属陕西)，焚县治，杀知县，复攻入徽州(甘肃徽县)、文县。明廷大震，遂派长兴侯耿炳文、武定侯郭英统领四川和陕西都司明军数万人前去镇压。九月，起义军主力失败，高福兴被捕牺牲。余众在金刚奴与仇占儿领导下，退到沔县西部地区继续坚持斗争。永乐七年(1409)，金刚奴潜还本州，始为官军所擒，被送往京师杀害。这次起义前后持续达二三十年之久。　（张桂萍）

明初之移民

明初洪武、永乐年间，明政府大规模迁徙民户发展生产、充实京都。

经过元末战乱，明王朝建立初，北方和中原的广大地区内，到处人烟断绝，耕地荒芜。有名的大都城，到永乐初仍是商贾未集，市场萧条；北方的军事重镇大同，也是城廓空虚；位于运河沿岸向以繁华著称的扬州城，战乱后，城中居民仅剩18家；长江沿岸工商业城市芜湖，居民减至83户；著名的丝织业中心苏杭地区更是邑里萧然；凤阳府的颍州一带，居民多逃亡，城野空虚。在这种情况下，明太祖朱元璋为了巩固其统治，推行了一系列恢复与发展农业生产的措施：如鼓励屯垦，兴修水利，减轻赋役，放赎奴婢，严惩贪官，抑制豪强等。其中由政府有组织地进行的移民对社会经济的恢复和发展产生了明显的作用。明初移民主要有以下几种：

1. 迁徙豪族地主。明太祖朱元璋对旧豪族地主采取既依靠、保护又防范、限制的政策。为了防止旧的豪族地主在地方上依权仗势压榨农民，形成尾大不掉之势，他效法汉高祖徙天下富豪于关中的办法来限制他们。洪武初，朱元璋徙江南民14万户于凤阳，其中多数是地主。洪武二十四年(1391)再徙天下富户5300户于南京。三十年又徙富民1.43万余户于南京。这三次迁徙共计15.96万余户，其中又多是豪门大户。如按每户6口估算，则迁徙人口将近百万。如此大规模地迁徙富民，其目的就是迫使他们离开拥有土地的原籍，使之财势俱损，不能危害朱明王朝的长治久安。而中都凤阳和南京，又是明朝政府的核心地区，也便于对这些豪族地主进行控制。被强行迁移到凤阳等地的江南地主，十分留恋其祖宗所在地，逢年过节他们经常扮成乞丐回去扫墓探亲，沿途低声吟唱着自编的凤阳花鼓，发泄对朱元璋的不满情绪：“家住庐州并凤阳，凤阳本是好地方，自从出了朱皇帝，十年倒有九年荒。”迁徙富户主要出于政治目的，它对充实京师和维护朱明王朝的稳定起了积极的作用。

2. 移民就宽乡垦荒屯种。在元末农民起义中，为了躲避战乱和杀掠，一些地主逃亡了，另一些丧命了，土地的产权占有因之混乱，原来属地主的一些土地已被无地或少地的农民所占有，也有的土地大片荒芜。明朝政府在洪武三年下令，凡是有力量开垦荒地的，不限顷亩，并免三年租税。又规定先因兵乱遗

下田土，准人开垦成熟，即为己业。原主还乡，官府于附近荒田拨补，不许依前占护，只许尽力耕垦。这就承认了农民占有土地的既成事实。与此同时，明政府还多次大规模地组织人多地少的狭乡居民到人少地多的宽乡去垦荒屯种，以便尽快恢复和发展农业生产。洪武三年六月，徙苏州、松江、嘉兴、湖州、杭州无田农民 4000 多户到濠州种田，官府给牛具种子，三年不征其税。九年十月，徙山西及真定民无产者于凤阳屯田。二十一年八月，迁山西泽、潞二州民之无田者往彰德、真定、临清、归德、太康诸处闲旷之地，置屯耕种。二十二年四月以两浙人稠地少，务农者少而从商者多，命杭、湖、温、台、苏、松诸郡民无田者，往淮河以南滁州、和州等处耕种。山西贫民徙居大名、广平、东昌三府者，共给田 26072 顷。同年九月，山西沁州民张从整等 116 户，自愿应募到北平、山东等地去屯种。这是募民屯种的一个实例。不过，封建社会农民安土重迁的观念较重，当时老百姓主动应募到外地去屯种的仍属少数。大多是由政府有计划大规模地组织迁徙的。特别是山西省，金元之际，受战乱影响较少，故经济发达，人口激增，明初政府多次从山西移民去外地屯种。被迁移的民户成百上千地集中到洪洞县大槐树下，由明政府指定的官员登记发遣，这数以万计的山西移民大批地分赴河北、河南、山东、安徽数省的 50 多个州县开垦屯种，对恢复当地的农业生产起了积极的作用。洪武二十八年明廷官方记载称，东昌等三府屯田迁民 58124 户，租 322.59 万余石，棉花 248 万斤。同期河南彰德等四府屯田租粮 2333319 石，棉花 502.55 万余斤。上述两地的移民主要来自山西。

3. 徙罪囚屯田。洪武八年明政府规定：宥免杂犯死罪以下及官犯死罪者，谪凤阳输作屯种以赎其罪。此令发布后的第二年，官吏因罪贬谪到凤阳屯种的多达 1 万余人。

明成祖朱棣夺位后，继续推行乃父的移民政策。为了充实其藩地北平，为都城北迁做准备，明成祖于永乐二年(1404)和三年九月，两次迁徙山西太原、平阳、泽、潞、辽、沁、汾民 2 万户充实北京，永乐五年五月，复命户部迁徙山西之平阳、泽州、潞安等府民数千户隶上林苑监牧养、栽种。

总之，明初之移民无论从规模、数量、次数，还是从地域、种类、方式来说都是空前的。它对当时社会经济的发展及人口的区域平衡发挥了积极的作用，在中国移民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　（高春平）

靖难之役

建文元年(1399)至四年，明成祖朱棣为争夺帝位而发动的战争。

洪武三十一年(1398)，朱元璋病逝，皇太孙朱允炆即位，年号建文，是为建文帝。当时的诸王都是他的叔父。几位年长的亲王都是久经战阵，屡建奇功，握有重兵的武将，根本不把建文帝放在眼里，违法之事不断出现。特别是燕王朱棣，在宫中私制兵器，偷印宝钞，招兵买马，搜罗人才，对皇权形成很大威胁。建文帝遂与兵部尚书齐泰、太常寺卿黄子澄商量对策。议定先削废周、齐等王，剪除燕王的手足，然后再向燕王开刀。在不到一年的时间里，先后削除了周、湘、齐、代、岷五个藩王的爵位。除湘王合室自焚外，其他四个或是幽禁，或迁往边远地区。五个亲王被废，刺到了燕王的痛处。燕府长史葛诚不断密告朱棣的不轨行为，齐泰亦密令谢贵、张昺见机行事，逮捕燕王。燕王朱棣先发制人，遂于建文元年(1399)七月，起兵反抗朝廷。燕王起兵后，为了说明自己行动的正义性，便援朱元璋在《祖训》中说的“朝无正臣，内有奸逆，必举兵诛讨，以清君侧”的训示作为理由，指齐泰、黄子澄为奸臣，必须加以诛讨，以清君侧。这样，朱棣便使自己的举兵反抗“名正言顺”了。他把自己的举动称为“靖难”，即靖祸难的意思。

朱棣起兵后不久，就“拔居庸关，破怀来，执(都督)宋忠，取密云，克遵化，降永平”，扫平了北平的外围。建文帝起用长兴侯耿炳文为大将，率兵征讨。兵众号称 30 万，实际只调集 13 万，开到河北滹沱河地区。燕王在中秋夜乘南军不备，袭破雄县，南军的先锋部队全军覆没。继而又在滹沱河北岸大败耿炳文的主力部队。建文帝闻败，召回耿炳文，以李景隆代之。李景隆本膏粱子弟，素不知兵。燕王根本不把他放在眼里。燕王侦知李景隆军的一些措施布置后，遂决定由世子朱高炽留守北平，他自己则率军援永平去了。朱棣率军解永平围后，又直趋大宁。大宁为宁王权的封地，所属朵颜诸卫，多为蒙古骑兵，骁勇善战。朱棣起兵后，就想把它合并过来，以扩张自己的军力。建文帝也怕宁王与朱棣合兵，所以下令削除宁府的三护卫。朱棣得知这一消息后，认为这是袭取大宁的好机会，遂由刘家口直趋大宁。十月，合并了大宁宁王的部属及朵颜三卫的军队。然后又回师援救北平。十一月，朱棣军到达北平郊外，直逼李景隆军营。这时坚守北平的燕军亦开始出击，形成了内外夹攻之势。李景隆见势不妙，连夜南逃，一直败退到德

州。建文二年四月，李景隆经过数月喘息，重新集结军队60万，号称百万，在朝廷敦促下，又北上伐燕。双方主力在白沟河相遇，展开激战。双方死伤都很惨重，燕王迷失道路，几被俘虏。但最后仍大败南军。李景隆败退济南。白沟河惨败后，朝廷元气大伤。此后，再也没有那么多的兵马可以调动了。建文帝得知李景隆一败再败，遂免去他的大将军职务，以左都督盛庸来接替他。济南在盛庸和山东布政使铁铉的奋力防守下，被保住了。燕王把军队撤回北平，暂作休整。其后，南军在东昌(山东聊城)大败燕军，这是兵兴以来南军取得的第一次大胜利。建文三年二月，朱棣又率军出击，大败南军于夹河和藁城，又派轻骑袭击济宁、沛县，烧掉南军的粮草器械仓库和数万艘粮船。同年十二月，朱棣根据南京宫中宦官提供的情报，对形势做了全面分析，确定了"掠城不守，决计趋金陵"的方略。四年正月，燕军进入山东。济南由铁铉驻守，城坚难破，燕军就绕过济南，攻破东阿、汶上、邹县，占领徐州，直抵宿州，接着又在灵璧大败南军，俘虏武将37人，文臣宦官150余人，燕军士气大振。五月，朱棣率军渡过淮水，趋扬州，抵六合。这时南军已毫无抵抗能力。建文帝无可奈何，遂派燕王从姊庆成郡主赴江北朱棣军营，谈判割地议和。朱棣说："皇考所分吉地且不能保，何望割地。"六月初三，燕军自瓜州渡江。盛庸率军抵抗，被击溃。盛庸逃遁，诸将解甲投诚。燕军乘胜追击，攻克镇江，直抵金陵城下。六月十三日，守卫金川门的李景隆和谷王穗开门迎降，京城陷落。朱棣跃马入城，皇宫火焰弥天。建文帝下落不明。一说于宫中自焚而死，一说由地道出逃，隐姓埋名，做了游方僧。朱棣于南京即皇帝位，是为明成祖，年号永乐。这就是明史上的所谓"靖难之役"。

(张海瀛)

朵颜三卫的设置

永乐元年(1403)明成祖徙宁王于南昌后采取的一项措施。

明成祖以边藩篡逆得位，深恐其他藩王也学他的办法再来一次靖难，所以即位后，便推行削夺诸藩的政策。永乐元年成祖徙宁王于南昌，把原来由宁王镇守的大宁地界交给从靖难有功之朵颜、福余、泰宁三卫，以偿前劳。三卫地处兀良哈，在黑龙江南，渔阳塞北。汉朝的鲜卑、唐朝的吐谷浑、宋朝的契丹都在此地，元朝时为大宁路北境。明太祖得天下，封建诸王，固守沿边要塞。东蕃辽王、惠宁王、朵颜元帅府相率归附明朝，明政府遂在古会州地设置大宁都司营州诸卫，封第十七子朱权为宁王，"带甲八万，革车六千"，镇守此地。明成祖把大宁一带送给朵颜三卫直接毁坏了东北边防。因为大宁弃后，宣、辽隔绝，开平失援。宣德五年(1430)又弃开平，徙卫于独石。其后"三岔河弃而辽东悚，河套弃而陕右警，西河弃而甘州危"，泰宁、福余常与东合，朵颜常与西合，遂为明朝膏肓之患，追根溯源，实由成祖弃大宁开其端。

(张桂萍)

郑和下西洋

永乐三年(1405)至宣德五年(1433)年间，明政府派遣著名航海家郑和率领庞大船队七次出使西洋诸国，史称"郑和下西洋"。这是世界航海史上空前的壮举。它比哥伦布发现新大陆早87年，比迪亚士发现好望角早83年，比达·伽马发现新航路早93年，比麦哲伦到达菲律宾早116年。可以说郑和是中外历史上最早的、最伟大的航海家。

明王朝是我国历史上继汉、唐之后的第三个强盛的封建王朝。经过明太祖洪武时期30多年的恢复和发展，人口增加，耕地面积扩大，粮食、棉花、油料、茶叶的产量提高，手工业发达，商业繁荣，对国外的香料、染料、奇珍异宝消费物资的需求不断增加。与此同时，国内的丝绸、茶叶、瓷器、铁器等生活生产用品亦需要对外出口。加之宋元以来中国航海造船技术的发达，特别是元代海外贸易的兴盛，为明代发展对外关系，扩大与周边国家及地区的贸易往来提供了良好的条件。明成祖朱棣夺位后，一面继续推行乃父发展国内社会经济的措施，一面把目光投放到进一步扩大明朝的政治影响、恢复和建立中国与亚非各国的邦交之上，所以大力鼓励和发展海外贸易。由于明成祖目光远大，在内政外交诸方面都实施了开明的政策，于是出现了从明成祖永乐三年到他的孙子明宣宗宣德五年30年之间以郑和为首的商船队七次出使西洋，对亚非30多个国家和地区进行友好贸易和访问的辉煌事迹。

郑和(1371—1438)，本姓马，名和，小字三宝，回族，云南昆明(云南晋宁县昆阳镇)人。明洪武十四年(1381)，明太祖派大将傅友德、蓝玉、沐英率军平定盘踞于云南的元朝残余势力梁王把匝剌瓦尔密时，年仅10余岁的三宝，被明军俘获至南京，阉割后入皇宫当了太监。不久，又被赐给燕王朱棣。因他聪明伶俐，博得了朱棣的喜欢，成为燕王府里的一位内监。"靖难之役"中，他从燕王起兵靖难，出入战阵，勇猛有智，数建奇功，尤其是郑村坝(北京大兴县东)一

战，燕王亲自上阵，郑和拼命冲杀，大败建文帝的大将李景隆，遂被赐姓为“郑”，晋升内宫监太监，成为明成祖麾下的得力人物。又因郑和是个回教徒，他的祖父辈皆朝觐过伊斯兰教的圣地麦加，而当时南洋的许多国家也都信仰回教，因此到永乐三年明成祖便任命郑和为首次出使西洋各国的正使。

公元1405年6月15日，郑和率领62艘大船的远洋船队（其中最大的宝船长44丈，宽18丈）及水手、船师、卫士、工匠、医生、翻译等2.7万多随行人员，由苏州刘家港（江苏太仓县东浏河镇）扬帆启航，泛海至福建长乐，然后借海上信风，由闽江口五虎门港驶向浩瀚的印度洋。宝船上安有指示方向的罗盘针和航海图《针经图式》，是当时世界上最先进的航海设备。最大的宝船可容纳1000余人，普通船只每艘也可乘坐450人，是当时航行海上运载量最大的船只。船队满载中国的瓷器、茶叶、铁器、农具、丝绸、纻丝、金银等各类商品，首先抵达占城（越南南部地区），然后到爪哇的苏鲁马益（泗水），再到苏门答腊岛南部的旧港。以后又由旧港到马来亚半岛的满剌加（马六甲）。此处是南中国海进入印度洋的孔道，地理位置十分重要。郑和在这里修建仓库作为中转货物的据点，并稍事休整，然后向北到苏门答腊岛北部的苏门答腊国，又西航至锡兰山，绕印度半岛南端而北，到达葛兰（印度西南沿海阿勒皮一带）、柯枝（印度西南岸柯钦一带）、古里（印度西南沿海科泽科德一带）。郑和每到一国，就把中国出产的礼物赠送给当地国王，表示愿意建立友好邦交关系，同时与各国商民交换香料、染料、珠宝等货物，进行和平贸易。因此赢得了所到国家的欢迎，上自国王，下至人民，都愿将本地的特产换取中国的货物。如郑和到祖法儿时，开读赏赐毕，其王责头目遍谕国人，皆将乳香、血竭、芦荟、没药、安息香、苏合油、木别子之类，来换易纻丝、瓷器等物。同样，郑和到阿丹后，其国王亦谕其国人但有珍宝，许令贸易。再如锡兰人民多以宝石、珍珠易换中国麝香、纻丝、色绢、青瓷、铜钱、樟脑等物。更为可贵的是，满剌加国王还为郑和提供官仓，允许将此作为中转站，使郑和能够贮百物于此，待时结艅回还。首次远航历时三年有余，直到永乐五年九月才圆满返回。同船除带回大量奇珍异宝外，还带回琉球、别失八里、阿鲁、撒马尔罕、苏门答腊、满剌加、小葛兰诸国搭船来访入贡的外交使者若干人，极大地促进了明王朝与南洋各国的友谊。

此后在永乐年间，郑和又连续五次下西洋。时间即：第二次，永乐五年到七年；第三次，永乐七年到九年；第四次，永乐十一年到十三年；第五次，永乐十五年到十七年；第六次，永乐十九年到二十年。而最后一次下西洋则是明宣宗宣德六年到八年。船队历经占城、爪哇、旧港（今印度尼西亚苏门答腊岛巨港）、满剌加、苏门答腊、锡兰（斯里兰卡）、古里、忽鲁谟斯（波斯湾口阿巴斯港的南岛）等十七国。郑和还派遣一部分船只，入红海到伊斯兰教圣地麦加，在那里朝觐了天方，画了“天堂图”。总之，郑和在近30年间，七次远航西洋，总航程约10万余里。先后出访了占城、真腊（柬埔寨）、暹罗（泰国）、满剌加、彭亨（马来西亚）、苏门答腊、旧港、爪哇、阿鲁、南勃里（印度尼西亚）、锡兰山（斯里兰卡）、溜山（马尔代夫）、榜葛剌（孟加拉）、南巫里（印度）、忽鲁谟斯（今属伊朗）、祖法儿（佐法儿）、阿丹（红海的亚丁，今属也门民主人民共和国）、比剌（不喇哇，今属非洲东岸的索马里）、竹步（属索马里）、木骨都索（属索马里）、古里、柯枝、琐里、麻林（属怯尼亚）和天方（麦加，今属沙特阿拉伯）等37个国家和地区，大约马来半岛以东地区15国，马六甲地区3国，苏门答腊地区7国，印度地区6国，阿拉伯地区5国，非洲地区3国。最南到达印尼的爪哇，最远到达今非洲东海岸的索马里和肯尼亚。他们所到之处，受到各国人民的热诚欢迎。例如郑和到占城时，国王亲自出迎，欢迎的人们舞皮牌，捶善鼓，吹椰笛壳筒，场面十分隆重。郑和七下西洋，给亚非各国人民留下了中国人民爱好和平友谊公平交易待人的良好印象。正因为这样，直到现在尽管时间已过了五六百年，但是郑和到过的国家，很多地方都保存着纪念他的历史遗迹。如在印度尼西亚的爪哇有三宝垅、三宝洞、三宝公庙；在马来西亚的马六甲有三宝山、三宝城、三宝井；在泰国有三宝港、三宝寺；在非洲索马里的布拉瓦郊区的一个村，命名为“郑和屯”，当地人民还把发掘出土的明代瓷器作为中国与索马里两国人民传统友谊的象征。

通过郑和七次下西洋，中国和南洋的航路畅通无阻了，对外贸易迅猛发展，大批的闽广人民移居南洋。正如徐继畬在《瀛环志略》一书中所讲：南洋在明初，遣太监郑和等航海招致之，来者益众。而闽广之民，造舟涉海，趋之若鹜，或竟有买田娶妇，留下不归者。如吕宋噶罗巴诸岛，闽广流寓，殆不下数十万人。经过郑和30余年间的广泛对外接触，中国跟南洋地区的来往日益频繁。而且由于华侨的大批定居和中国先进生产工具技术的传入，极大地促进了南洋地区的开发。华侨中有的从事于农业，使大量的荒滩、荒地变成肥沃的良田；有的种植水稻、甘蔗、香蕉、胡

椒；有的从事渔业，使一些荒凉的岛屿成为渔港；有的从事工矿业生产，使不少荒山野岭成为铜、锡矿场；有的从事于日用品生产，使当地家庭日用品大多由中国工匠供给。还有一部分华侨从事于商业贸易，他们从中国大陆贩运去各种生活用品和生产资料，如瓷器、丝绸、食品、纸张和牛、马、铜、铁器等，并以薄利多销的办法，满足南洋地区居民的需要。可以说华侨对南洋各国社会经济的发展和当地人民生活的改善付出了艰辛的劳动，做出了任何人也抹煞不掉的重大贡献。

郑和在与亚非各国的友好往来和经济文化交流中，大都是和平友好的，只有个别的地方发生过武装冲突。因为当时从中国去南洋群岛的航线上海盗很多，这些人不仅抢劫中国商船，而且也抢掠别的国家的商船。郑和曾在旧港捉拿妄图剽掠宝船的海盗陈祖义；又在锡兰山打败了企图劫掠宝货的该国国王亚烈苦奈儿。这两次武装冲突都属于自卫性质，是借用必要的军事力量来保证航路的畅通。

跟随郑和下西洋的同行翻译人员费信著有《星槎胜览》、马欢著有《瀛涯胜览》、巩珍著有《西洋蕃国志》。这三部名著对郑和下西洋所到之国的位置沿革、重要都会、山川形胜、社会生产、人民生活、风俗习惯、宗教信仰以及气候、物产等，都作了详细的描述，同时也记载了中国人民不怕困难，昼夜星驰，与洪涛接天、巨浪如山的海洋搏斗的光辉业绩。这三部名著是研究中外关系史的珍贵资料。

郑和在航行中，还曾绘制了《郑和航海图》（原名《自宝船厂开船从龙江关出水直抵外国诸蕃国图》）。该图共 20 图 40 面，详细记载了起自南京下关“宝船厂”，途经今南海及印度洋诸国、终于非洲东海岸的航道、航向、航程、方位和停泊港口以及暗礁、巨石、浅滩的位置。全图所收录的亚非地区的地名达 500 个，其中本国约占 200 个，外国约占 300 个。这是 15 世纪以前，世界上最早最详细的一部亚非地区的航海图，是研究当时海洋地理的珍贵资料，反映了中国人民对世界航海事业的巨大贡献。以后许多中外商人出洋经商，便是利用《郑和航海图》而远航海外的。郑和下西洋，其时间之早，规模之大，是当时世界上任何一个国家的船队都无法比拟的。郑和第一次出使西洋率领的船队，一般都拥有宝船 60 多艘，中、小宝船 200 余艘。最大的宝船载重量达 1500—2000 吨，张 12 帆。其随行人员不下 2.8 万人。而哥伦布和达·伽马的船队只有三、四艘，最大的旗舰“圣玛利亚号”，全长也不过 30 米，仅有郑和宝船的五分之一长，张 3 帆，载重不到 250 吨。随行人员，最多没超过 160 人。这不仅说明中国的远洋航海事业，直到明代前期仍居于世界领先地位，同时也说明郑和是世界航海家中的先行者。

郑和远航亚非各国，在政治、经济和科学文化诸方面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郑和下西洋不只起到了扬国威、示富强的作用，而且极大地扩大了中国与亚非各国人民的联系和交往，推动了明朝海外贸易的兴盛和发展。郑和下西洋后，亚非许多国家都先后派遣使节来华访问。从永乐到宣德的近 30 年间，仅东南亚国家的使臣来华者就达万余人。而永乐二十一年一次就有古里等 16 国的使节和商团 1200 余人随郑和船队到达南京。除使臣外，有不少国家的元首，如满剌加、渤泥、苏禄、麻剌等国国王，皆亲率其妻子、家属及陪臣来华，他们无不受到明政府的盛情礼遇。如渤泥国王麻那惹加那亲率其家属、陪臣来华抵达福建时，明政府即遣内臣往宴劳之，并令所过诸郡设宴款待。同年，麻那惹加那病死在南京会同馆，明政府辍朝三日，祭赙甚厚，后葬于南京城南石子冈，并派人守护，为之树碑立祠，命有司春秋致祭。满剌加国王和王后来华，明成祖同样设国宴招待。所有这一切都极大地增进了中国与亚非各国之间的友好关系，促进了中外经济文化交流，推动了十五六世纪世界航海贸易事业的进步与发展。　　（高春平）

奴儿干都司的设置

永乐七年（1409）明朝政府设置的管辖黑龙江、乌苏里江流域等地最高一级的地方行政机构。

明成祖即位后，为加强对东北地区的经营和管理，于永乐元年派遣行人邢枢偕知县张斌往谕奴儿干，至吉烈迷诸部落进行招抚，成效甚大。次年，各部首领相率入京，明朝遂在东北创建了奴儿干、建州等十卫。到七年，明政府先后在乌苏里江、黑龙江流域等地设置了 132 个卫。同年，为了加强对卫所的管理，明政府在黑龙江出海口附近的特林设立奴儿干都指挥使司（简称奴儿干都司），管辖黑龙江、精奇里江（俄罗斯境内的结雅河）、乌苏里江、松花江流域和库页岛地区（俄罗斯萨哈林岛）。之后，明政府还据这一地区少数民族聚居的特点，陆续增设了任用少数族首领充当头目的卫所。到英宗正统十二年（1447）共计有 184 个卫，万历时有 384 个卫。它们的分布地域，西起斡难河（鄂嫩河），北至外兴安岭，东抵大海，东北越海而有库页岛。都司的都指挥使、同知、佥事等官均由明朝从内地派官担任，称作“流官”；下面的

卫指挥使、千户(所)等职则由当地部族酋长代代承袭,称作"土官"。此外,明朝政府还定期或不定期派遣官员巡视。自永乐七年至宣德七年(1432)间,太监亦失哈巡视该地区达10次以上。他还在特林修建永宁寺,永乐十一年刻立了《敕修永宁寺记》碑。宣德八年(1433)又刻立了《重修永宁寺记》碑。这两块碑记,记录了明朝政府管理和经营奴儿干都司的事迹。碑文用汉、蒙古、女真、西藏四种文字书写。所列官员有汉人、蒙古人、女真人等,这两块碑文所列的一百多人中,不仅有钦差大臣、封疆大吏,而且还包括了铁匠、石工匠下层人士。这两块石碑是明朝政府管理奴儿干地区的历史见证。　(张桂萍)

宗喀巴的宗教改革

永乐七年(1409)黄教领袖宗喀巴(1357—1419),开始改革西藏喇嘛教,创立新迦当教派的历史事件。

宗喀巴出生在青海西宁地区,洪武五年(1372)到西藏求佛法。在西藏,他认真钻研了各种佛教经典,在掌握各类佛教经义的基础上逐渐形成了自己的思想体系。与此同时,他还积极参与宗教活动,很快成为一个很有声望的宗教界人士。当时,西藏称作乌斯藏,藏族人民主要分布在西藏和青海南部、甘肃西部、四川甘孜及云南部分地区,过着游牧生活,信奉喇嘛教,处于封建农奴制社会。西藏喇嘛教僧侣勾结封建领主,垄断寺院,生活腐化,公开娶妻生子,酗酒耽食,贪婪成性,有的甚至淫荡纵欲,借口修行需要女人,强取民间处女,诡称法事需要,挖取活人心肝以作供品。这种极其野蛮、惨无人道的修炼方式十分不得人心,对统治阶级利用宗教控制人民的思想也极为不利。宗喀巴同情民众的处境,愤恨上层僧侣的胡作非为,决心进行宗教改革。这时,统治西藏地区的是阐化王扎巴坚参,他对宗喀巴的主张极力支持。永乐七年藏历正月初一日至十五日,在扎巴坚参的支持下,宗喀巴在拉萨大昭寺主持了盛况空前的大祈愿会,从各地赶来参加大会的僧人超过1万,观光的俗人多达数万。这次大会的召开,使宗喀巴成为西藏喇嘛教界最有地位的人。大祈愿会结束后,宗喀巴在拉萨之东50里旺古尔山旁创建甘丹寺,从此逐步创立了一个以他为中心的新教派。这个新教派即新迦当教派。它禁止僧侣娶妻生子,崇尚苦行;严禁借口法事修密抢取民女,挖人心肝;主张认真钻研佛经,建立有系统的、规模宏大的教学组织;要求僧侣身穿黄衣头戴黄帽,因此又称为黄教。宗喀巴死后,按照宗教的说法,他的两个大弟子世代转生,叫做"呼毕勒罕"(藏语意为化生),传其衣钵,这两个弟子即为后来的达赖喇嘛和班禅额尔德尼。

宗喀巴的宗教改革符合社会历史发展的要求。因此,尽管宗喀巴刚建立黄教时,在西藏的影响不是太大,但他和明朝政府建立了密切的联系,得到明朝中央政府的大力支持,所以迅速发展壮大。永乐十二年宗喀巴派他的弟子释迦也失进京朝见明成祖,明成祖当即封授他为"大国师"。永乐十四年辞归,赐佛经、佛像、法杖、僧衣、绮帛、金银器,且御制赞词赐之。宣德九年(1434)再次入朝,被明宣宗留于京师,命成国公朱勇、礼部尚书胡濙持节,册封为"大慈法王"。到明代中后期,黄教势力日益扩大,传播到蒙古地区。当时蒙古封建主仍然信奉喇嘛教,但在明穆宗隆庆(元年为1567年)以前,主要信奉的是喇嘛中的萨加教派(即红教),而当时蒙古族的广大牧民,却信奉萨满教。到万历时,蒙古族的俺答汗也崇信黄教。万历六年(1578)俺答汗邀请黄教领袖人物达赖三世锁南坚错到青海和蒙古地区传教,亲自主持有几万人参加的察卜齐勒庙大会,并尊称锁南坚错为"圣识一切瓦尔齐达赖喇嘛"。在俺答汗的大力倡导下,黄教在蒙古各部盛行起来,普及到广大牧民。与此同时,俺答汗还劝锁南坚错向明朝政府请求敕封,于是锁南坚错就写信给当时明朝政府的内阁首辅张居正,得到了明朝政府的赏赐和封赠。

明代中后期,黄教在西藏本地也受到越来越多的人的信仰。藏族人民称锁南坚错为"活佛",出现了诸番莫不从其教、大宝法王及阐化王亦皆俯首称弟子的兴盛局面。而在蒙古地区,更形成了谁能控制黄教,谁就能扩展壮大自己的势力。万历十一年,俺答汗死后,蒙古土默特部的封建主再次邀请达赖三世去传法讲经,并参加俺答汗的葬礼。万历十四年,达赖三世锁南坚错到达土默特,次年参加完俺答汗的葬礼后,又接受明朝政府的邀请前来北京。万历十六年三月,达赖三世在赴京途中,在吉尔玛台(又称卡欧吐密)地方圆寂(逝世)。锁南坚错死后,根据他的遗愿,宣布俺答汗新生的族孙为转世的"灵童"。因喇嘛教认为一个活佛圆寂后,他的灵魂不灭,还会投胎转世,继承为下一世的活佛。这就是达赖四世云丹嘉措。在历世达赖中除云丹嘉措是蒙古族人外,其他都是藏族人。黄教最高领袖竟然在蒙古俺答汗家族中投胎转世,可见当时黄教僧侣封建主和蒙古封建领主之间关系的紧密。万历三十年,在西藏哲蚌寺、色拉寺和甘丹寺三方派专使迎接和蒙古军队护送下,

达赖四世云丹嘉措进入西藏。第二年到达拉萨担任黄教的最高法王。　（高春平）

明成祖远征漠北

永乐八年(1410)至二十二年间，明成祖朱棣五次亲征漠北蒙古鞑靼、瓦剌、兀良哈三部的历史事件。

洪武元年(1368)8月，徐达率领的北伐明军攻克元大都北京，元顺帝北逃，元亡。此后一部分蒙古贵族退到蒙古草原及东北等地，继续统治当地的蒙汉等各族人民。洪武二年六月，常遇春、李文忠率军攻克元上都开平(内蒙古自治区正蓝旗东)，将元顺帝由上都赶往应昌(辽宁克什克腾旗西达来诺尔附近)。洪武三年、五年正月，明太祖又两次命徐达等北征沙漠，给蒙古贵族以沉重打击。洪武二十年九月，明太祖复命蓝玉为征虏大将军率兵肃清沙漠。第二年四月，蓝玉率军直至捕鱼儿海(俄罗斯贝加尔湖)，杀元太尉蛮子，俘获大批人马牲畜胜利而归。其时元太子爱猷识理达腊于洪武十一年死，弟脱古思帖木儿继立。脱古思帖木儿自捕鱼儿海遭蓝玉袭击后，往依丞相咬住于和林(蒙古人民共和国鄂尔浑河上游东岸)，行至土拉河，为其部将也速迭儿所杀。经过洪武时期这几次打击，蒙古内部发生混乱，到永乐初，其部帅鬼力赤杀坤帖木儿自立，称可汗，去元朝国号，遂称鞑靼。不久，蒙古便分裂为三大部，辽河、西辽河、老哈河流域为兀良哈部；鄂嫩河、克鲁伦河和贝加尔湖一带为鞑靼部；科布多河、额尔齐斯河流域及其以南的准噶尔盆地为瓦剌部。三部之间互相仇杀，并不断地进犯明朝的边境地区。明成祖朱棣为了巩固边防，一面与蒙古修好，对各部落酋长封王赐爵，用金银、布帛、粮米等物品拉拢，一面积极备御，坚决抗击其军事侵扰。并利用蒙古各部落间的矛盾，扶弱抑强，分化瓦解，以便减轻对明朝的威胁。永乐三年，鞑靼统治集团内部争权夺利，知院阿鲁台杀鬼力赤而迎元主后裔本雅失里为可汗。后被瓦剌部所败，徙居胪朐河(蒙古人民共和国境内克鲁伦河)。永乐七年六月，明政府派遣使臣郭骥去鞑靼被杀。明成祖闻讯大怒，于是在同年七月命淇国公丘福为大将军，王聪、火真为副将军，率精骑10万征鞑靼。丘福轻敌冒进，孤军深入到胪朐河，遭到鞑靼骑兵的包围袭击，随征的五位将军阵没，全军覆灭。明成祖更加恼怒，削丘福封爵，徙其全家于海南，决意亲征雪耻。

永乐八年二月，明成祖以北征诏告天下，命户部尚书夏原吉辅佐皇长孙朱瞻基留守北京。令清远侯王友督中军，宁远侯何福、武安侯郑亨督左、右哨，宁阳侯陈懋、广恩伯刘才督左、右掖，都督刘江为先锋，学士胡广、庶子杨荣、谕德金幼孜等从征。明朝50万大军于二月初十离京出发，经居庸关、宣府(河北宣化)北进，三月间抵兴和(河北张北)，五月初至胪朐河。鞑靼本雅失里可汗闻讯西逃，明军追至斡难河，本雅失里引众拒战，成祖督军奋战，一举败之。本雅失里仅率7骑狼狈逃窜。六月，明军到静虏镇，鞑靼丞相阿鲁台遣使伪降，明成祖命诸将严阵以待，阿鲁台果然率众来战，帝自将精骑迎战阿鲁台于飞云壑，大败之，追击百余里，斩其名王以下百数十人，俘获牛羊杂畜无数。七月二日回师至开平宴劳三军将士。八月论功行赏，晋封安远伯柳升为安远侯。十二月，阿鲁台遣使贡马，鞑靼臣服明朝。第一次北征大获全胜。永乐十一年，明政府封阿鲁台为和宁王。而本雅失里则于永乐十年被瓦剌部的马哈木袭杀。本雅失里死后，鞑靼部就全由阿鲁台所统率，一直接受明朝中央政府的管辖。

鞑靼部衰落后，瓦剌部逐渐强盛。永乐六年瓦剌部的马哈木向明政府贡马请封。次年明政府封瓦剌部的三个首领马哈木为顺宁王、太平为贤义王、把秃孛罗为安乐王。永乐十年瓦剌攻杀鞑靼可汗本雅失里。阿鲁台势穷内附，请求明廷攻打瓦剌。与此同时，瓦剌断绝对明廷朝贡，拥兵胪朐河，向明朝政府多所要挟，企图南下占夺明朝的宁夏、甘肃等边地。面对瓦剌部的挑衅，明成祖在永乐十二年三月，第二次亲率大军远征漠北。六月，前锋刘江遇瓦剌兵于三峡口(内蒙古多伦西北)，击败之。成祖探知马哈木在西方距此百里，于是令诸将兼程赶赴忽兰忽失温(蒙古人民共和国乌兰巴托)，马哈木率答里巴、太平、孛罗三部数万骑兵迎战。成祖令安远侯柳升攻其中，宁阳侯陈懋、成山侯王通攻其右，丰城侯李彬、都督谭清攻其左。明军火器并发，诸军齐进，成祖又亲率铁骑冲击，瓦剌大败。明军追至土拉河(蒙古人民共和国境内的图拉河)，马哈木连夜逃窜，不久死去。王子十余人、部众数千被杀，明军班师回朝。经过这一次打击，在永乐时期，瓦剌就一直接受明朝政府的管辖，马哈木顺宁王的封爵，也由其子脱懽承袭。瓦剌对北部边境的威胁暂时解除。不久，原依靠明朝打败瓦剌的鞑靼部经过数年的休养生息又强盛起来，阿鲁台因生聚蓄富遂桀骜，旋即反叛明朝，并不时地起兵骚扰明朝边塞兴和等地。永乐十九年十一月，明成祖召集文武大臣商议北征鞑靼。户部尚书夏原吉、刑部尚书吴中、兵部尚书方宾不赞同兴兵，认为连年用兵，百姓

疲累，粮储不足，宜休兵养民，饬边将备御，不宜劳师远征。成祖怒，立命夏原吉出视开平（内蒙古多伦）粮储，又令侍郎张本等分别前往山东、山西、河南及应天诸府督造粮车，调发丁夫挽运，务于永乐二十年二月前将所需军用物资集中于宣府。于是明政府饬令有关部门迅速调集骡驴34万匹，车17.75万辆，民夫235146人，运送粮草37万石。经过三个月的紧张准备，明成祖于永乐二十年三月第三次亲征漠北。正在进犯兴和的阿鲁台闻知王师出征连夜北逃。诸将请求追击，成祖令都督朱荣率5000骑先行侦探。六月，侦骑还报阿鲁台攻打万全，请分兵还击。征战多年的明成祖一眼看穿这是阿鲁台顾虑明朝大军捣其巢穴，欲以牵制明军之计。第二天明军进至阳和（山西阳高），攻万全的鞑靼兵果然北逃而去。七月，明成祖北进到克鲁伦河，阿鲁台异常恐惧，全家弃辎重趁夜色逃窜。于是成祖召前锋朱荣等还，并派兵收敌所弃牛、羊、驼、马，烧其辎重班师。回师途中成祖对诸将说：阿鲁台敢于叛明是凭恃兀良哈为其羽翼，应当移兵剪灭。当即挑选精骑2万，分兵五路进讨兀良哈。七月十五日，明军与兀良哈在屈列儿河（潢河）东展开激战，成祖麾骑夹击，自率前锋冲之，兀良哈败。明军追击30里，斩其头领数十人，尽降其众。

可是阿鲁台并不甘心前两次的失败，永乐二十一年七月，再次率众南犯。同年八月，明成祖第四次率大军北征阿鲁台，命安远侯柳升、遂安伯陈英领中军，武安侯郑亨、保定侯孟瑛领左哨，阳武侯薛禄、新宁伯谭忠领右哨，英国公张辅、安平伯李安领左掖，成山侯王通、兴安伯徐亨领右掖，宁阳侯陈懋为前锋。九月，成祖率军至西阳河，闻阿鲁台被瓦剌打败，部众溃散，遂令大军原地待命，只派前锋陈懋搜索敌方踪迹。十月，陈懋在宿嵬山遇鞑靼王子也先土干率所部来降。成祖大喜，封也先土干为忠勇王，赐姓名金忠，遂班师回京。

永乐二十二年春正月，鞑靼部阿鲁台复犯大同、开平，明成祖决定第五次亲征，诏群臣议北征，敕诸将整兵待命。正月初九，征山西、山东、河南、陕西、辽东五都司及西宁、巩昌各卫兵，令于三月分别集结于北京和宣府待命。三月二日，明成祖举行阅兵大礼，部署诸将，仍以宁阳侯陈懋为前锋，柳升、陈英领中军，张辅、朱勇领左掖，王通、徐亨领右掖，郑亨、孟瑛领左哨，薛禄、谭忠领右哨，学士杨荣、金幼孜、宦官马云、海寿等从征。四月初二，命学士杨士奇等辅佐皇太子监国。次日，大军从北京出发，二十五日至隰宁，侦知阿鲁台逃往答兰纳木儿河（蒙古人民共和国贝加尔湖一带），成祖命诸军速进。五月四日，明军进抵开平，成祖下诏切责阿鲁台叛服无常不断兴兵扰边之罪，遣使招降其所部并悼祭历年阵亡的北征将士。六月，前锋进至答兰纳木儿河，未见阿鲁台踪迹，穷搜山谷300余里仍无所获。先锋陈懋引兵至白邙山，旋因粮饷不济，遂于六月二十一日班师。七月七日，明军进抵清水源，命大学士杨荣刻石纪功。十六日至苍崖戍（内蒙古多伦西北），成祖病发，次日至榆木川（蒙古乌珠穆沁东南），遗诏传位皇太子。十八日卒，享年65岁。当时京师形势非常险恶，汉王遣子于京师探朝廷虚实，一昼夜六七行驰报。赵王亦派人潜待京师，希望有变。为消除可能爆发的皇室内乱诸王争位的危险，随军出征的宦官马云、海寿以六军在外，恐生变，遂密不发丧，与大学士杨荣、金幼孜议定暂不发丧，仿秦始皇之死，所至早晚进膳奏答如常仪，又遣杨荣、海寿驰讣皇太子，与杨士奇等留守大臣商议安排，争取了必要的时间，粉碎了诸藩王利用大丧时机叛乱的图谋。俟皇太子还自南京，始发表遗诏，立仁宗。

明成祖雄才大略，五次亲征，三犁穴庭，对漠北军事贵族进行了连续不断的军事攻击，有效地防御了明朝的北部边防，沉重打击了蒙古割据势力的嚣张气焰。并迁都北京，以攻为守，将国都置于国防前线，由皇帝亲自肩负起抵御北方游牧部族进犯中原的艰巨任务，其功绩千秋不没。　　（高春平）

唐赛儿起义

永乐十八年（1420）山东青州爆发的一次农民起义。

明朝建立后，推行了一系列恢复和发展社会经济的措施，但受益最多的首先是皇族、勋戚、官僚和地主，广大劳动人民仍然过着被压迫、被剥削的痛苦生活。所以明朝建立初期农民起义就此起彼伏，连绵不断。永乐十八年在山东青州（益都）爆发了唐赛儿领导的农民起义。唐赛儿是蒲台县农民林三的妻子，她用白莲教组织群众，徒众数千，自称佛母，活动在益都、诸州、安州、莒州、即墨、寿光等县。唐赛儿起义后，攻占了益都卸石棚寨，打死前来镇压的明青州卫指挥高凤。各地白莲教徒纷纷起而响应。董彦升、宾鸿率领的一支起义军乘胜攻占了莒县和即墨县，进而又围攻安丘。地方官惊惶失措，连忙向明廷告急。明成祖朱棣立即派安远侯柳升、都指挥刘忠率领京军赶来镇压，将卸石棚寨团团围住。唐赛儿率领起义军于夜间突围，打死都指挥刘忠，士气复振。这时，明

朝政府又调遣在山东沿海防备倭寇的卫青所率的骑兵和鳌山卫指挥王真的部队进行镇压。在力量对比较为悬殊的情况下，起义军不幸失败。起义军首领刘俊、王宣等被捕牺牲。明朝军队把俘获的4000多起义军全部杀害。唐赛儿、董彦升、宾鸿等人则在群众的掩护下逃走。明政府怀疑唐赛儿削发为尼，或混处女道士中，就下令尽逮北京、山东境内尼及道姑来京审讯，其后又尽逮出家妇女数万人，即或如此，也未能找到唐赛儿踪迹和下落。唐赛儿冲破封建礼教的束缚起而造反，表现了劳动妇女反抗压迫的大无畏精神。（张桂萍）

明成祖迁都北京

永乐十九年（1421），明成祖朱棣正式将国都由南京迁往北京，史称"迁都北京"。

朱棣（1360—1424）是明太祖第四子，貌奇伟，美髭髯，智勇有大略。洪武三年（1370），封燕王。十三年，就藩北平。妃徐氏为开国元勋徐达女，徐达数奉命备边北平，因从学兵法。徐达死后，诸大将因胡惟庸、蓝玉两次党狱诛杀殆尽，明太祖对晋、燕二王极为器重，燕王遂与秦、晋二王担当起北边御敌的重任。洪武二十三年正月与晋王率师讨伐元丞相咬住、太尉乃儿不花，征虏前将军颍国公傅友德等皆听节制。三月驻军迤都，咬住等降。获全胜而还，太祖大喜。此后屡率诸将出征，并节制沿边士马，威名大震。明太祖死后，自以为三兄都已先死，论序当立，不肯臣服惠帝。周、湘诸藩相继被削，遂决意反，阴选将校，勾军卒，收材勇异能之士，日夜铸军器。建文元年（1399）七月杀朝廷所遣北平布政使张昺、都指挥谢贵，指齐泰、黄子澄为奸臣，援引祖训，入清君侧，称其师曰靖难。

靖难之役后，朱棣以藩王夺取侄儿朱允炆的皇位，稳固已经取得的帝位成为当务之急。为此，他在即位后继续采用削藩政策，收回诸王兵权，以防其他诸王仿效自己再起靖难夺权。但为了掩人耳目，笼络人心，朱棣登位初，曾一度假意恢复了被建文帝削除的周、齐、代、岷四位亲王的封藩。可是时隔不久，他就又找个罪名，削除了代王和岷王的护卫军队。接着又于建文四年徙谷王于长沙，永乐元年（1403）又将宁王由北边徙于南昌。永乐四年削齐王护卫，废为庶人。十年，借口辽王朱植有罪，削其护卫。十五年复以谋反罪名废谷王朱穗为庶人。到永乐十八年，周王朱橚为减少明成祖的疑忌，主动献三护卫。至此，诸藩王之权尽削，护卫一再裁减，其力实不足与一镇抗衡，仅能衣租食税，凭借王号特权在地方上作威作福，根本无力对抗中央，皇权更加强化。与此同时，明成祖还采取其它措施加强中央集权。他重用在靖难之役中帮助自己夺位的宦官，授以出使、专征、监军、镇守、刺臣民隐事等特权。永乐元年遣内官监李兴出使暹罗（今泰国），马彬出使爪哇诸国。三年派太监郑和下西洋，宦官山寿率兵出云州觇敌。又因各地镇守大将多为建文帝旧臣，特派宦官出镇和监军，使之伺察。于是马靖镇甘肃，马骐镇交趾，王安之监都督谭青军。为防诸臣覆国，明成祖不仅恢复锦衣卫的典诏狱权以钳制臣民，而且又建立最高侦察机关东厂，付以宦官缉访谋逆妖言大奸恶等职权，从而使宦官有不经外廷法司便可任意逮捕官吏、平民和刑讯处死的特权。另一方面加强了对各级地方官员的监督，用重赏罚的手段强迫官吏效忠皇权。永乐元年春正月，明成祖进一步把乃父时期曾施行的遣御史分巡天下作为定制。同年六月，派一批给事中、御史分行天下，抚安军民，逮治官吏奸贪者，举荐贤能者。永乐七年六月，成祖利用北巡机会，亲自考察郡县长吏，擢山东汶上知县史诚祖治行第一，撰敕旌奖，逮贪官易州同知张腾下狱治罪。这些措施的实施，一方面加强了中央集权的统治，使国家的统一及自身的皇位更加巩固。另一方面，重用宦官为以后宦官专权埋下了祸根，造成了明代中叶后宦官势力积重难返、镇守太监凌辱有司、司礼监把持国政的恶果。而削藩的结果则是宁、谷二王内徙，诸王兵权尽释，完全改变了明太祖亲藩守边的国防策略，形成了北边空虚，蒙古骑兵随时可以南犯，边防守卫力量严重薄弱的局面。因此，明成祖决定迁都北京，君临北境，亲自肩负起抗御北方草原游牧贵族南下扰犯的历史重任。况且北京既是辽金元三朝故都，又是明太祖的龙兴发祥之地，定都北京还可以合政治与军事中心为一，以国都当敌。尤其是明朝政权取元而起，残留在漠北的蒙元军事贵族不甘心失败，时刻想南犯中原，而北京东北去辽阳需数日，去渔阳仅百里，西北去云中数日可至，去上谷亦仅200里。因此距敌近，制敌便，从当时的政治、军事形势来看，把北京作为全国的政治中心，比南京更为适宜，也便于控制全国。

然而建都北京也有缺陷。最大的问题是政治和经济中心的不一致。北京粮食不能供给庞大的皇室、官僚、军队的巨额消费，而必须仰给东南财赋之地的调济。当时海运有风涛之险，内河漕运则常因黄河决口冲塞运道受阻。为了解决这一困难，永乐初年漕运粮米采取水陆兼运，并仿元代之法参用海运，但仍无

法完满解决北方粮食供给问题。永乐九年，明成祖命工部尚书宋礼主持开浚会通河，采纳汶上老人白英的建议，引汶水和泗水入其中，在南旺湖筑堤分流，沿线建闸38座。十三年又令漕运总兵官陈瑄凿清江浦，以防淮水侵漕和运河水量分泄。经过对运河南北两段的整修，京杭大运河全线畅通，海运、陆运兼罢，南方的粮米、丝帛、茶叶等物资通过运河漕运源源不断地直达通州输往北京，这才保证了首都的物资供应。明政府还设置漕运总督和总兵专门负责往京师转运漕粮，并建立了一支由12万运军和上万只漕船组成的漕运队伍，每年定期为京城运输400万石左右的漕粮。

永乐元年，明成祖改北平为北京。为了充实北京，做好迁都前的准备，他还于永乐二、三年间，相继迁徙南直隶苏州等10郡、浙江等9省富户到北京，并三次迁徙山西太原、平阳、泽州(晋城)、潞安、辽州(左权)、沁州、汾州民共6万户充实北京。永乐四年，明成祖正式下诏于次年五月营建北京宫殿陵寝。随即派出大批官员分别前往湖广、四川、江西、浙江、山西等地采办奇木异石、砖瓦、邻甓、颜料等工程用物。与此同时把全国各地10万余名能工巧匠和百万民工征集到北京服役。永乐七年后，明成祖多次北巡驻京，留皇太子在南京监国，后来又5次亲征漠北。而且自永乐十五年北巡后，即不再南返。至此，南京在事实上已失去了政治中心的地位。

永乐十八年，经过无数工匠十多年日夜艰辛的劳作，北京的宫殿陵庙全部竣工，迁都的主客观条件完全具备。明成祖正式下诏以北京为京师，决定于永乐十九年正式迁都北京。第二年春正月，明成祖奉神主于太庙，登奉天殿受朝贺，大宴群臣，大祀天地于南郊，大赦天下以示庆贺。同时以南京为留都，仍设五府六部官，并设守备掌管一切留守防护事宜，节制南京诸卫所，以镇抚东南财赋之地。这样，南京除了没有皇帝之外，其它各种官僚机构的设置完全和北京相同。其目的自然是想依托南京这一中心来保护运河沿线漕运的畅通和加强对东南地区人民的控制。

成祖北迁以后，三面临敌，边防大重。东起鸭绿，西抵嘉峪，绵亘万里。于是在军事上初设辽东、宣府、大同、延绥四镇，继设宁夏、甘肃、蓟州三镇，又加上太原、固原，共设九大军事重镇，史称“九边”。每边各设重兵，统以大将，副以褊裨，监以宪臣，镇以开府，联以总督，无事则画地防守，战时便犄角为援。在政治制度上，明成祖进一步发展殿阁学士和四辅官的办法，形成了明代的内阁制度。登基后即命侍读解缙、胡广、编修黄淮，修撰杨荣、编修杨士奇、检讨金幼孜、胡俨入直文渊阁，参预机务。此后，阁臣的设置成为定制。阁臣与皇帝朝夕左右，机密重务悉可预闻，成为专制皇帝的得力助手，对维护以皇权为轴心的中央集权统治发挥了重要作用。

明成祖迁都北京对于巩固北部边防和加强对全国的统治，都起了积极的作用。同时为明代后世皇帝树立了“天子守边”的范例。而且有利于社会经济的发展，促进了南北物资的交流和运河沿线商品经济的繁荣。　　（高春平）

高煦之叛

洪熙元年(1425)，汉王朱高煦乘兄亡侄少之机，发动了谋夺皇位的军事叛乱，史称“高煦之叛”。

朱高煦系明成祖朱棣的次子，英勇善战，在“靖难之役”中，从其父南征北战，屡立战功。特别是在建文二年(1399)四月的白沟河会战中，高煦率精骑数千，斩南军都督瞿能父子，使得燕军反败为胜。同年九月的东昌之战，燕军轻敌冒进，被盛庸所率军队打得大败，朱棣的亲信将领张玉死于战阵，朱棣自己也被包围，赖高煦率援军击败南军，保护了他突出重围。朱棣以高煦性情类己，许以事成立为皇太子。朱棣夺取皇位后，淇国公丘福、驸马王宁拥护支持高煦，在成祖面前时称高煦功大，数次劝立他为太子。但明成祖朱棣的长子朱高炽早在洪武二十八年(1395)时就册为燕世子。所以，永乐二年(1404)议立皇太子时，朱棣在大臣们的建议下，经过一番犹豫以后，终于立朱高炽为皇太子。封高煦为汉王，国云南；三子朱高燧为赵王，国彰德。高煦大为不悦，愤而说道：我何罪，斥我万里之外。不肯到云南就藩，跟随成祖到北京巡边，极力请和其子归南京，并与弟高燧合力倾陷朱高炽。当时，明成祖数次亲率大军出征蒙古，皆留皇太子朱高炽在南京监国。永乐十年，高煦阴结明成祖左右的官员构陷朱高炽，东宫官属多得罪。大理寺丞耿通上章为朱高炽辩白，成祖认为耿通坏祖法，离间我父子，令杀之。成祖又召大学士杨士奇问太子监国状，士奇以孝敬对，而且说：太子天资高，有过必知，知必改，存心爱人，决不会辜负陛下重托。经过杨士奇的委婉解释，才消了成祖的怒气。永乐十二年闰九月，成祖北巡还，以太子遣使迎驾迟缓，下东宫官黄淮等入狱。杨士奇又解释说：太子孝敬如初，凡所稽迟，皆臣等罪。这样，在东宫官属杨士奇等的保护下，尽管高煦多次谗间，成祖也几次想更

立皇太子，但终未付诸实施。朱高炽身体肥胖、不能骑射，并有足疾，可是他的长子朱瞻基却生得英俊健壮，言语行动都很敏捷，得到成祖的钟爱。永乐九年十一月，朱瞻基立为皇太孙后经常跟随祖父巡幸征讨。明成祖甚为赞赏：此他日太平天子也！把继承他事业的希望寄托在孙子身上。朱高炽也以此巩固了他皇太子的地位。

高煦自留南京后，请得天策卫为护卫，常以唐太宗李世民自比。后来，成祖对他的跋扈行为渐感不满。永乐十三年五月，改封高煦于青州，他又不想走。成祖责备说：既受藩封，岂可常居京邸？前以云南偏远不去，分封青州，又托故欲留侍，前后殆非实意，此命决不可改。但高煦仍赖在南京不走。这时，成祖听到了高煦欲谋夺皇太子地位及其它不法行为，问蹇义，推说不知。问杨士奇，杨士奇回答说：臣与蹇义俱侍东宫，外人不敢在我两人面前言汉王之事。可是汉王两遣就藩皆不肯行，今知陛下将迁都北平，便请留守南京，其用意何在，惟陛下明察。成祖遂于永乐十五年三月徙封高煦于乐安州(山东广饶)，强令即日成行，不得违误。高煦至乐安，怨望情绪更增，处心积虑要谋夺皇帝宝座。永乐二十二年七月，明成祖病死北征途中，皇太子朱高炽即位，是为明仁宗。当时，朱高煦日遣人至京师侦探，窥伺时机。洪熙元年明仁宗朱高炽死，宣宗朱瞻基继位，高煦就乘兄亡侄少、皇位未固之机起兵叛乱。立五军：指挥王斌领前军，韦达左军，千户盛坚右军，知州朱烜后军。诸子瞻垐、瞻域、瞻埣、瞻垶各监一军。高煦自率中军，留世子瞻坦居守。部署已定，派亲信枚青潜至京师约英国公张辅里应外合。当夜，张辅就绑枚青上报宣宗。御史李浚，乐安人，因父丧家居，闻讯也赶到京师向宣宗报告高煦叛乱的情况。明宣宗计划派阳武侯薛禄率军前去征讨。大学士杨荣劝宣宗亲征，说：皇上独不见李景隆事乎？夏原吉也赞同杨荣的意见。于是宣宗决定亲征。八月初十，明宣宗亲统大营五军将士征讨高煦，少师蹇义、少傅杨士奇、少保夏原吉、太子少傅杨荣等扈驾从征。以阳武侯薛禄、清平伯吴成为先锋。八月十九，前锋兵至乐安，第二天明宣宗所率大军也到乐安城外。高煦原约山东都指挥使靳荣等于济南起兵策应，但被山东布政使与按察使阻止不得发。朱烜建议高煦率精兵乘虚袭取南京，作为根据地，但护卫军士家皆在乐安，不肯离家南下。又听说大军旦夕将至，不敢出，固守在乐安城这个弹丸之地。明宣宗为了瓦解叛军，两次致信高煦，要他出城受降，擒献倡谋者，说：朕与王免过，恩礼如初。不然，一战成擒，或者被部属居为奇货，缚以来献，到那时悔之晚矣。在强大的政治攻势和大兵压境情势的逼迫下，高煦害怕被人擒献，怀着一线活命的侥幸心理，于八月二十一日献城投降。九月，高煦父子被执至京师，禁锢于西华门内，筑室居之，曰逍遥城。到宣德四年(1429)，软禁数年的高煦父子终于被处死。因高煦的叛乱牵连被杀及充军者多达2000余人。

高煦之叛的平定，消除了统治阶级内部一场争夺最高统治权的内乱，有利于社会的安定和经济的发展，为“仁宣之治”的出现清除了障碍。

（高春平）

仁宣之治

明朝仁宗朱高炽和宣宗朱瞻基统治期间(1425—1435)，一面继续推行洪武、永乐时发展经济与民休养的政策，一面调整了洪武、永乐时的严猛措施，致使吏称其职，政得清平，纲纪修明，仓庾充实，闾阎乐业，史称“仁宣之治”。

永乐二十二年(1424)七月，明成祖朱棣在第五次北征途中病死于榆木川，由皇太子朱高炽即位，改元洪熙，是为仁宗。仁宗只当了十个月的皇帝，便于洪熙元年(1425)五月病死。他死后，其子朱瞻基继位，改元宣德，是为宣宗。仁宣时期，从政治、经济各方面谋求社会的稳定与发展。仁宗即位后，大赦天下，罢云南取宝石、交趾采金珠、撒马尔罕取马及采办、烧铸、进贡等劳民伤财役务。并将原户部尚书夏原吉、刑部尚书吴中、侍郎杨勉、右春坊大学士黄淮等出狱复职。令名臣杨士奇、杨荣、杨溥掌管内阁事务，蹇义掌吏部，夏原吉管户部。与此同时，对不称职的大臣如大学士陈山、张瑛等予以黜退。大理寺卿弋谦直陈时政，言词太激，许多阿谀之臣想讨好仁宗，一致指责弋谦沽名乱政，仁宗拟加罪弋谦，后来听了杨士奇的建言，令杨草敕引过，并升弋谦为副都御史，让他去四川严办采买木材扰害百姓的宦官。仁宗还多次蠲免灾区赋税，并发放官粟赈灾。洪熙元年四月，山东、淮安、徐州三地同时饥荒，地方官照旧催逼税粮。仁宗得知，命杨士奇草诏，蠲免夏税之半，停罢一切官买物料。为了保证吏治清明，仁宗还派遣监察御史分巡天下，考察官吏。他对贪官污吏深恶痛绝，曾对司法机构的官员说：“国家要恤民，定要从清除赃吏做起”，凡是发现官吏贪赃害民者一律严行惩办。

宣宗继位后，继续执行乃父与民休养生息的政策，重用“蹇夏”、“三杨”等一班老臣，使他们长期担

任政府要职,辅佐自己治国安邦。宣德七年(1432)四月,以山西旱,蠲逋赋240万石有奇。同年十二月又减苏州官田租72万余石。一次外出还京途中,见农夫耕作,下马询问稼穑之事,接过农夫手中的犁把推了三下,说:朕只推三下,就已觉得累了,更别说常年累月干这种活。人常说劳苦莫如农家,确是如此!他还亲自写了《织妇词》一篇赐给朝臣,让官员知道百姓的艰辛。同时他本人带头节俭,反对向百姓横征暴敛以供帝王享受和充实国库。有一个和尚要为他祝福长寿,他说:"人没有不想长寿的,古代的明君像商朝高宗、祖甲,周朝周文王等享国最久,而那时并没有僧道神仙之说!秦皇、汉武求神仙、梁武帝、宋徽宗崇僧道,效验可见。世人不悟,实在可叹!"同时,宣宗严禁地方官扰害百姓,即使皇亲国戚也严加约束。宁王朱权要求赐给他南昌的一片土地,宣宗训斥道:"你身为亲王,衣租食税,现有的俸禄就够多了。而一乡之田,百姓靠它衣食,不该夺以自富。"对于贪官污吏,宣宗严厉惩办,公卿大僚也不轻贷。都察院左都御史刘观,因贪污下狱。工部尚书吴中私自把国家的木料、砖瓦送给太监杨庆建府第,被逮捕入狱。在用人方面,宣宗亲贤臣远小人。都御史刘观罢免后,杨士奇和杨荣举荐顾佐接替。顾佐为官清廉刚直,上任后贬谪了20位不称职御史到辽东为吏,同时举荐40余员清正有为的人担任御史,致使朝纲整肃。在地方上,宣宗除派巡抚安抚军民外,还让"三杨"、蹇义、夏原吉等推荐一批廉能官员出任州府长官。这些人为百姓兴利除弊,深受当地人民的欢迎,许多人成为明史上有名的清官循吏。其中最著名的有江南巡抚周忱,苏州知府况钟等。

仁宣时期,确立了内阁制度,弥补了朱元璋罢丞相废中书后中枢权力机构出现的空隙。而且阁职渐崇,阁权已重于部权。史称仁宗之后,诸大学士历晋尚书、保、傅,品位尊崇,地居近密。而纶言批答,裁决机宜,悉由票拟。阁权之重,俨然汉唐宰辅,特不居丞相名耳。当时大学士以太子经师恩,累加至三孤,望益尊。而宣宗内柄无大小,悉下大学士杨士奇等参可否,吏部蹇义、户部夏原吉虽也时被召见,得预部事,然终不敌士奇等。自是内阁权日重,即有一二吏兵之长,与辄持是非,多以败。

仁宣时期,对科举取士法也作了改革。仁宗曾与廷臣讨论科举之弊,杨士奇建议定会试分南北卷取士,分配录取比例,从地域上平衡南北方文化水平不同之差异。如当取百人,则南六十,北四十。后复定南、北、中卷。北卷则北直隶、山东、河南、山西、陕西,中卷则四川、广西、云南、贵州及凤阳、庐州二府,徐、滁、和三州,其余皆南卷。这一改革,使得北方的儒士踏上仕途者日渐增多。进而在地域方面进一步扩大了明王朝的统治基础,南北英才,都有机会担任政府要职。

仁宣两朝对宦官的控制相对较严。仁宗即位初便全部召还宦官在外采办者,罢所市物。宣宗则于宣德元年七月谕六科给事中,凡中官传旨,必复奏始行。宣德六年,宦官唐受以公差往南京,纵恣贪酷被捕杀。其同党阮巨队、阮浩、武路、陈友、赵雄、王贵等10人皆下狱论死,并命都察院榜其罪宣示天下。经过对不法宦官的严厉惩处,使得宦官的恶行有所收敛,不敢像以往那样恣意妄为。当然,明宣宗对宦官的控制是相对的,个别宦官仍受到重用,其亲信太监金英、范弘等,竟赐予免死诏。宣德元年七月,又设立内书堂,让宦官学习文化。宦官有了文化,便为其狐假虎威、窃权弄政创造了条件。

仁宣时期,周边形势也较安定。北方蒙古族诸部经永乐帝五次亲征多已远徙漠北,加之仁宣二帝对北方少数民族实行驱之而已,戒边将毋贪功的防守政策,故北部一度相安无事。东北地区在奴儿干都司的管辖下也较宁静。西北卫所的设置,有效地担负起管理当地各族人民的使命。西南地区自永乐十一年设置贵州布政使司以后,进一步加强了对这一边陲地区的控制。

然而,在这表面繁华与平静的背后,各种社会危机也在潜滋暗长,明王朝衰落的迹象也已开始显现。由于经济的发展,社会的比较安定,封建统治集团多陶醉在升平盛世的景象中。大臣僚吏宴乐,以奢相尚,歌妓满庭,纪纲为之不振的现象日盛一日。洪武、永乐时垦荒田永不起科的规定这时已废止,垦荒田亩都要核入赋额,人民负担日益加重,流民问题日益严重起来,土地兼并的恶浪滚滚而来。屯田制、粮长制开始受到破坏。宣德三年,山西饥民流徙至南阳诸郡不下十余万口,有司军卫及巡检司各遣人捕逐,结果民愈穷困,逃亡愈多。镇守宁夏的宁阳侯陈懋私役军士种田3000余顷,夺民水利,岁收之粟,召商贾收籴中盐。明宣宗本人好斗促织,结果上行下效,每年令百姓捕捉进贡宫中。而在北部边防线上,宣德五年六月,迁开平卫于独石,自此蹙地三百里,龙冈滦河之险尽失,边地益虚。　(高春平)

土木之变

明英宗正统十四年(1449),宦官王振专权,诱惑

英宗亲征瓦剌，致使明朝国君被俘，数十万军队惨败于土木堡，史称"土木之变"。

明太祖朱元璋鉴于历代宦官擅权祸害国家的教训，曾立"内臣不得干预政事"的禁牌。明成祖朱棣在靖难之役中是在宦官帮助下夺得帝位的，为了稳固自己的专制统治，开始重用宦官，授宦官出使、专征、监军、镇守、刺臣民隐事诸特权。但明英宗以前，皇帝亲理朝政，宦官受到约束，一般不敢专横跋扈。从英宗时起，皇帝多昏庸无道，宦官乘机擅权，司礼监太监王振首开宦官专权之祸。

王振（？—1449），山西蔚州（河北蔚县）人，曾作教官，后自阉入宫，授宫人书。因具有一定的文化和权术，很快受到明宣宗的信用，被派侍奉皇太子朱祁镇读书，升任司礼监太监。宣德十年（1485），宣宗病死，年仅9岁的朱祁镇继位，是为明英宗。太皇太后张氏委朝政于内阁大学士杨荣、杨溥、杨士奇及英国公张辅和吏部尚书胡濙，告诫英宗，军国大政必须与五位辅臣商议，征得他们同意才可施行。又把王振找来说：你侍皇帝起居多不规律，今当赐汝死。经过朱祁镇和在场大臣们的请求，才宽免了王振，但规定"此后不可令干国事"。王振伪装忠诚敬畏以换取张太后和三杨的好感，暗地里却勾结内外官僚，窃取权力。英宗即位半年，张太后命王振偕文武大臣在朝阳门外阅兵，王振谎报其私党隆庆右卫指挥佥事纪广的骑射为第一，超擢为都督佥事。正统四年（1439）十月，福建按察佥事廖谟杖死驿丞。驿丞、廖谟二人分别是阁臣杨溥和杨士奇的同乡。杨溥要为驿丞报仇，主张处死廖谟，而杨士奇则以因公杀人庇护廖谟，二杨争议不决，请太后裁断。王振乘机说：二人皆挟乡故，抵命太重，因公太轻，建议对品降调，降廖谟为同知。太后采纳了这一折衷办法，还觉得他处理事情较公允，逐渐放松戒心，让他参与了朝事。王振进而利用英宗敬畏先生，自己倍受宠信的便利条件攫取权位。正统六年十月，奉天、华盖、谨身三殿工竣，英宗大宴百官。按照明朝的礼制，宦官虽宠，不得预王廷宴。英宗怕王振不高兴，派人去看，来人回报说他大发脾气，并以"周公辅成王，我独不可一坐乎！"叫骂，英宗忙让人打开东华门中门请来王振，在场的官员也忙起来迎谒。到正统七年十月，张太后病死，杨荣先卒，杨士奇则因其子杀人下狱而坚卧不出，望高权重的三杨中只剩年老势孤的杨溥。王振更无所顾忌了，他竟然摘去明太祖立在宫中不许宦官干政的禁牌，明目张胆地独揽大权，广植私党。他使其侄王山、王林分别担任锦衣卫指挥同知、佥事。兵部尚书徐晞百般巴结王振，于是五府、六部、都察院诸大臣及地方官员，纷起携金进见。王振公开收受贿赂，卖官鬻爵。福建参政宋彰因贪污被劾，献给王振白银万两，不但没受惩处，反而升任布政使。凡是不阿顺他的便横加迫害。户部尚书刘中敷、国子监祭酒李时勉因反对王振被械枷于长安门和国子监门。御史李铎见振不跪，被谪戍铁岭。巡抚山西、河南兵部侍郎于谦入京，从不携一物进献王振，结果被贬。大理寺少卿薛瑄秉公办案也被罢官。王振的生活极尽奢侈腐化，役使军民在京城内外建造了数处富丽不亚于皇宫的府第，家里则有金银60余库，玉盘100，珊瑚高六七尺者20余株，其它金银珍宝无数。王振如此专横阴险，昏庸的英宗却以奸为忠，长期执迷不悟，宠眷有加。由于王振的胡作非为，明朝的内政外交一片黑暗，边防受到严重的削弱。蒙古族瓦剌部的脱欢及其子也先乘机崛起。脱欢是永乐时被封为顺宁王的马哈木之子。宣德九年脱欢袭杀鞑靼部的阿鲁台。正统初，脱欢又杀瓦剌部的贤义、安乐二王，尽有其众。于是蒙古瓦剌、鞑靼各部皆归他统率。正统四年脱欢死，子也先嗣，称太师淮王。也先利用明朝用兵麓川之机，在西北地区拼命扩张其势力，并通过进贡向明朝政府讹诈财物。正统四年以后，瓦剌每年来京的贡使达2000余人。大同地区每年对贡使供应费高达30万两。正统十四年二月，也先遣使2000余人进马，诈称3000人，向明朝政府邀赏。瓦剌贡使冒领赏赐，原是习以为常之事，屡受也先贿赂的王振更是庇护有加。这次，王振却叫礼部按贡使实数给予赏赐，并轻易减去马价五分之四。瓦剌贡使回报也先后，也先勃然大怒，借口明朝使者去瓦剌时曾答应嫁公主给其儿子，这次贡马是聘礼，而明朝失信，答诏无许姻意，于是决定兴兵入犯。

正统十四年七月，也先统率各部从东、中、西三面分兵四路大举进犯。东路由脱脱不花与兀良哈部攻辽东；西路派别将攻甘州（甘肃张掖），中路为进攻的重点，一支由阿剌知院统领，直攻宣府镇外围赤城，另一支由也先亲率瓦剌主力猛攻大同，兵锋甚锐。七月十一日，也先军至貌儿庄（山西阳高县北），明大同参将吴浩迎战败亡，塞外城堡所至陷落。大同前线的败报雪片似的飞至北京，明英宗朱祁镇在王振的蛊惑下，准备亲征。兵部尚书邝埜和侍郎于谦力言王师不宜轻易出征，吏部尚书王直也率群臣上疏，认为秋暑未退，旱气未回，青草不丰，水泉犹塞，士马用具不充足，征战危险。但英宗不听群臣谏阻，偏信王振，贸然决定亲征。命太监金英辅佐其弟郕王朱祁

钰留守京师，兵部侍郎于谦留京代理部务。英国公张辅、兵部尚书邝埜、户部尚书王佐及内阁学士曹鼐、张益等50余位文武大臣扈驾随征。这样大规模的军事行动，朱祁镇和王振竟要在几天内仓促完成准备工作，于是急命山西、顺天、保定等七府应纳口外夏麦秋粮悉赴大同、宣府交纳。在京五军、神机、三千等营出征官军，人赐银一两，胖袄裤各一件，鞠鞋两双。行粮一月。兵器80余万件。每三人配驴一头，运载辎重。七月十五日，明大同镇总兵西宁侯宋瑛与武进伯朱冕率军与也先大战于阳和（山西阳高县），因监军太监郭敬的牵制，结果全军覆没，宋、朱二将战死，郭敬躲藏草中侥幸获生，仅都督同知石亨单骑逃脱，其余边关守将也闻风逃匿。十六日，明英宗和王振率领50余万明军从北京出发北征。大军出居庸关，经怀来、宣府（河北宣化），二十八日至阳和，见十几天前留下的伏尸遍野，众益寒心。八月初一，明军抵达大同。也先为诱明军深入，主动北撤，王振见势仍欲大军继续北进。次日，其党羽镇守太监郭敬将前线惨败的实况密告王振，并说北进正中虏计，振始惧。初三日下令班师回京，命广宁伯刘安充总兵官，都督佥事郭登为参将镇守大同。王振想让英宗退兵时驾幸其家乡蔚州夸耀显威，但兵行40里后，又怕大军踏坏他田园的庄稼，复命折而东行，迂回奔向宣府。郭登得悉，急告学士曹鼐、张益说：自此去紫荆关，已减40余里，车驾宜从紫荆关回京，可保无虞。王振不从，反而取道白登、怀安城西、阳和北河岭，直到八月初十才到宣府。这时瓦剌大队骑兵已奔袭而来，英宗先派恭顺伯吴克忠、都督吴克勤率兵断后拒敌，二人皆战死。又令成国公朱永、永顺伯薛绶带3万骑前去救援，复被瓦剌军包围，全军败亡于鹞儿岭（河北宣化县东）。十三日，英宗和王振在瓦剌军一路追袭中狼狈逃到土木堡（河北怀来东），离怀来城仅20里，随从的文武官员都主张入保怀来，王振仍一意孤行，以辎重车辆未至而不从。兵部尚书邝埜一再请求英宗急趋入居庸关，组织精锐部队断后拒敌，皆被王振阻止。鉴于事态严重，邝埜又到行殿力请，王振怒斥道："腐儒安知兵事，再妄言必死！"邝埜愤而回答说："我为社稷生灵，何得以死惧我！"王振竟喝令卫士硬把邝埜强行拉出，遂驻军土木堡。第二天朱祁镇想继续返回，可是瓦剌军已步步紧逼明军，无法移动。土木堡地高缺水，明军大批人马两日无水可饮，饥渴难忍。土木堡南部15里的一条河也被瓦剌军占据。也先从堡旁的麻谷口进攻明军，守护麻谷口的都指挥郭懋苦战一夜，瓦剌军越聚越多，不断地围攻。十五日，也先佯退，假意派使者来议和，英宗便命大学士曹鼐起草诏书，并派通事二人随来使去也先军营。王振见瓦剌军后撤，又来议和，未加深思，即轻易地下令移营就水，被饥渴困扰数日的军士纷纷跳出壕堑，行伍顿时一片混乱。明军此举正中也先诱歼诡计，兵士移行未三四里，瓦剌军就四面围杀过来，明军四散奔逃，势不能止，瓦剌骑兵横冲直撞，挥刀砍杀，大呼解甲投刀者不杀。结果明军士兵死伤相枕，蔽野塞川。英宗与亲兵乘马四处突围，不得出，只好下马盘膝面南而坐。有一个瓦剌士兵要剥取他的衣甲，看到英宗的衣着华贵，与众不同，于是推拥着他去了也先之弟赛刊王营地雷家站（河北宣化县东南）。赛刊王在盘问他时，朱祁镇并未立即做答，却反问对方：你是也先？还是伯颜帖木儿？或是赛刊王、大同王？赛刊王见他说话口气不小，立即报知也先，说部下获一奇异之人，莫非是大明天子？也先当即派尚在瓦剌军营的明朝使者去辨认，证实是明朝皇帝，于是狂喜大笑道：我常祷告苍天，求大元一统天下，今果有此胜。如何处置英宗？有人主张杀，也先和其弟伯颜帖木儿却想借此要挟明朝政府，于是就把明英宗软禁于伯颜帖木儿营。在混战中，随从英宗的英国公张辅，驸马都尉井源，兵部尚书邝埜，户部尚书王佐，内阁学士曹鼐、张益，侍郎丁铭、王永和等50余位文武大臣都战死。仅大理寺右丞萧维桢、礼部左侍郎杨善等少数人侥幸逃脱。王振则被护卫将军樊忠以棰捶死，说：我为天下诛此贼！太监喜宁投降瓦剌，把明朝内部的虚实情况全盘告诉了也先。至此，英宗所率领的50万京军精锐和50余位文武高官，几乎全被王振葬送。还有大批军械辎重丢失在战场上。仅据事后明朝宣府总兵杨洪与提督居庸关巡守都指挥同知杨俊报称，在土木堡拾得所遗军器就有：头盔9800余顶，甲5200余领，神枪11000余把，神铳22600余把，火药18桶，神箭44万枝，盾牌290余面，大炮800余门。如再加上被瓦剌军掳获的战利物资，数额会更大。可见明朝人财物损失之惨重。土木之变造成了明朝君俘臣亡的恶果，对明朝的国防实力影响极为深远，成为明王朝由前期进入中朝的转折点。

（高春平）

于谦北京保卫战

明英宗正统十四年（1449）十月，瓦剌进犯京都，民族英雄于谦领导广大军民力保北京，史称"北京保卫战"。

正统十四年（1449）八月十五日发生的土木之

变，使明朝遇到空前严重的危机。八月十六日夜三更，英宗在土木堡被俘，明军惨败的消息传递至京，明朝统治集团顿时惊慌失措。皇太后孙氏和皇后钱氏急忙搜刮皇宫里的金银财宝，装驮了八匹马，于十七日午派太监运送到居庸关外去找瓦剌军营，企图赎回英宗，结果未成功，英宗却被瓦剌骑兵带至宣府转到大同。十八日，皇太后只好命郕王朱祁钰监国，召集文武大臣商议战守之策。当时，瓦剌不仅在军事上取胜，而且挟有英宗，占有极大的政治优势，步步进逼，使明朝面临着群龙无首、兵临城下的险恶局面。群臣聚哭于朝，众怒首先齐集在王振身上，当场将其党羽指挥马顺打死。但对战守意见不一，翰林侍讲徐珵以天命惑乱人心，妄言验之星象，稽之历数，天命已去，惟南迁可以纾难，建议迁都南京。其时许多达官富户为了保全身家性命，纷纷南逃。徐珵是其中的代表，他预感到瓦剌必将入犯京畿，故先把他的眷属送回苏州老家。徐珵南迁的主张当即遭到主战派兵部侍郎于谦等人的坚决反对。他认为京师是天下根本，宗庙、社稷、陵寝、百官、万民、帑藏、仓储皆在，一动则大势去矣！宋朝南渡之事即为前车之鉴，倡议南迁者可斩！此说得到吏部尚书王直、内阁学士陈循等人的支持。在于谦、陈循、王直以及商辂、王竑诸爱国官员坚决主战意见的激励下，朱祁钰和皇后才下定抗战保京的决心，并把战守的重任托付给于谦。

于谦（？—1457），字廷益，号节庵，浙江钱塘人。青少年时期就有了救国救民的抱负，非常仰慕南宋民族英雄文天祥，曾撰写《石灰吟》诗，作为激励自己的座右铭："千锤百炼出深山，烈火焚烧若等闲。粉身碎骨全不怕，要留青白在人间。"此时，明英宗被俘，前线惨败，城防空虚，北京城内所余疲卒羸马不满10万，情况异常危急。明王朝眼看就要重蹈南宋亡国的覆辙，于是他挺身而出，毅然担负起力挽狂澜的使命。八月十八日受命后，便和主战派官员一道，采取了雷厉风行的应急备战措施：(1)诏兵入援。八月十九日于谦奏请朱祁钰檄调南北两京河南备操军，山东及南京沿海备倭军，江北及北京诸府运粮漕军，以及宁阳侯陈懋所率的浙兵急赴京师守卫。(2)运通州粮至京。通州仓存粮百万石，为防落入瓦剌手中，初议全部焚毁，后从应天巡抚周忱的建议，令京官及京军自运以充饷。遂派都御史陈镒总理其事，征调顺天府大车500辆运粮，凡运粮20石纳京仓者，官府给运费银一两。(3)诛太监王振家族及其党羽。郕王摄政，群臣当殿击毙振党太监马顺、毛贵、王长随等。并杀振侄锦衣卫指挥同知王山，王振家族不论少长皆斩，籍其家得金银60余库、玉盘百、珊瑚高六七尺者20余株，其它珍玩无数。经此番打击，王振同党的专横势力为之敛迹，主战派的正气得到伸张。(4)安抚军民，饬谕边关守将严阵以待。八月二十四日，于谦推荐右都御史陈镒安抚畿内军民。同日封宣府总兵杨洪为昌平伯，并奖谕巡抚罗亨信，以嘉二人坚守宣府孤城之功。二十五日升广东东莞县河泊所闸官罗通为兵部郎中守居庸关，派四川按察使曹泰守紫荆关。同时封石亨为武清伯总管京营兵马。石亨自阳和之败以后，被贬官。但他有军事才能，因此经于谦推荐，再度起用效力。二十八日，取来南京内库所贮军器三分之二以备作战之用。当时京军兵器装备十分短缺，有盔甲者仅十之一。另一方面，鉴于土木事变后，也先挟英宗到各边关令守将开城纳土的情况，饬谕守备居庸关都指挥孙斌及沿边诸将：如瓦剌奉大驾至，胁尔开关，切勿轻听擅出，以堕其奸计。(5)立景帝。九月初一，于谦等大臣忧国家无主，太子幼弱，合请太后立郕王为帝以安人心。这时朱祁钰虽以监国身分总理军国大政，但却不是名正言顺的国君，缺乏皇帝的权威，从明朝内部讲，推行政令总有些不便；对外部来说，明朝不另立皇帝，就便于瓦剌借英宗来不断要挟。九月六日，朱祁钰正式即位，是为代宗，又称景帝，遥尊明英宗朱祁镇为太上皇，以明年为景泰元年，大赦天下。(6)选将守关，募兵各地，赶造兵器。九月初七，于谦推荐辽东都指挥范广为副总兵，协助石亨佐理京营。十五日，于谦推荐大同副总兵都督同知郭登，佩征西前将军印为总兵官，代刘安镇守大同。土木之变后，也先挟英宗向宣府、大同守将进行敲诈。宣府总兵杨洪不为所动，将英宗来书封呈北京，景帝嘉奖之。大同副总兵郭登闭门不纳英宗，但总兵刘安携金帛出谒，并驰至北京，说英宗已晋己为侯，奉命来报敌情，受到文武大臣和六科十三道的弹劾，遂以其擅离守地之罪下于狱。二十七日，命监察御史白圭、李宾等15人，募兵畿内、山东、山西、河南各地，并召募官舍余丁、义勇、民夫更替运河沿线漕运官军，集中京师，充实和加强北京的守护力量。同时令工部迅速征集物资，使内外各厂昼夜加工打制攻战武器，以便作战之用。

经过于谦一个多月的日夜操劳筹措，明朝的内政、战备大为加强。正统十四年十月初一，瓦剌果然又大举入犯，企图长驱直入，进占明都。也先和脱脱不花拥挟着英宗先至大同城下，诡称奉还上皇。总兵郭登严兵为备，派人谢曰："赖天地宗社之灵，国有君

矣！”也先见郭登有备，不敢攻，绕过大同南进。郭登立即将瓦剌内犯情况驰报京师。十月初四，瓦剌由阳原进攻长城要隘白羊口，初八日白羊口守将谢泽战死，瓦剌军经顺圣川南下直逼紫荆关。同日，景帝命于谦提督各营军马，京师戒严，进入战备状态。初九日，也先抵紫荆关猛攻不克，后在明朝宦官喜宁引导下由间道越过山岭，腹背夹攻关城，守备都御史孙祥、都指挥韩清战死，紫荆关破。十一日，瓦剌军直扑北京城下，列阵西直门外。当瓦剌兵尚未至京时，明廷曾召集文武大臣具体商议战守策略。成山侯王通建议挑筑京外城壕以拒敌骑，总兵官石亨提议尽闭九门，坚壁清野，以守为主。兵部尚书于谦则坚决主张主动出击，到城外去大胆迎战瓦剌以压其气焰。于是分遣诸将率兵22万列阵于京师九门外：总兵官石亨、副总兵范广、武兴等率主力阵于德胜门外，以当敌冲。都督陶瑾阵于安定门，广宁伯刘安阵于东直门，武进伯朱瑛阵于朝阳门，都督刘聚阵于西直门，副总兵顾兴祖阵于阜城门，都指挥李端阵于正阳门，都督刘德新阵于崇文门，都指挥杨节阵于宣武门。各路将士皆受石亨节制。于谦亲自坐镇德胜门石亨军营，统一指挥，总揽全局，以抵御瓦剌的主攻部队。等到各路军马出城部署完毕后，于谦下令闭诸城门以示背城死战的决心。并规定临阵遇敌，将不顾军先退者，斩其将；军不顾将先退者，后队斩前队。而于谦自己也披盔挂甲，身先士卒，泣以忠义激励三军。明军将士同仇敌忾，人人感奋，勇气百倍，决定痛击瓦剌军。

十月十一日，瓦剌军进抵北京当天，明都督高礼、毛福寿大胆袭击敌于彰义门北，杀瓦剌兵数百，夺还所掠人畜千余，首战告捷。也先见明军阵容严整，士气高昂，不敢贸然进攻，便借议和之名试探明朝内部的虚实。景帝和部分廷臣有些动摇，派人去征求于谦的意见。于谦一眼看穿也先的图谋，当即斩钉截铁地回答道：“今日止知有军旅，它非所敢闻。”在于谦的坚持下，也先议和诡计没有得逞。十三日，于谦、石亨率军与瓦剌军大战于德胜门外。于谦采取诱敌深入之计，诱瓦剌万余骑兵逼近，然后令神机营的火炮、火铳齐发，同时令石亨所率伏兵突起攻击。明朝副总兵范广一马当先，飞刀陷阵，直闯敌营，士兵鼓噪继进，瓦剌军大败，也先弟当场被击毙。瓦剌军在德胜门外失利又转攻西直门，守将孙镗率军奋战，战斗进行得十分激烈。孙镗斩瓦剌军前锋数人，敌退，孙镗率军追击。瓦剌军增兵包围孙镗，孙镗尽力拼杀，但终因敌众我寡，支撑不住，退到城边。给事中程信见状忙在城上发火炮轰击瓦剌军，高礼、毛福寿率兵来助，石亨也派来援兵，瓦剌军三面被围，被迫退去。于谦根据战斗中暴露出的问题，调整了部署，加强了西直门和彰义门之间的兵力。命都督毛福寿等于京城外街巷要路，将路口堵塞，埋伏神铳短枪，以便策应。又派佥都御史王竑往毛福寿、高礼处提督军务，与孙镗屯兵一处，同时加强与彰义门的联系，遇到紧急情况，互相应援，不许自分彼此，失误军机。瓦剌军在德胜门和西直门均未得手，又在彰义门组织进攻。于谦命副总兵武兴、都督王敬、都指挥王勇率军迎战。明军以神铳列于前，弓矢短兵继于后，挫败了瓦剌军的前锋。就在这时明军方面有数百骑想要争夺首功，纷纷自阵后跃马冲出，乱了阵脚，瓦剌军乘机反扑过来，明军败退，大将武兴中流矢死。瓦剌军直追到土城，当地居民升屋号呼，投砖石击敌，喊杀声惊天动地，瓦剌军受到阻击。王竑、毛福寿等闻讯来援，瓦剌军见援军四集，不敢恋战，仓皇退走。

也先得胜于土木堡后轻敌自傲，原以为进犯京师，明军不堪一击，北京城旦夕可下。但连日来多次交战，均被于谦领导的北京军民击败，议和“迎驾”的阴谋又未成功，而且损兵折将，感到十分沮丧。瓦剌军在明军的猛烈抗击下屡战屡败，士气低落。另一路进攻居庸关的瓦剌军，因天大寒，守将罗通汲水灌城，被阻于坚冰城下，迟迟不能与也先会合，实现其南北夹击的计划。也先又听得明朝的各路勤王援军将集，深恐断其归路，遂于十月十五日夜拔营北归。也先拥挟着英宗先退，于谦侦知英宗已走远，就命石亨举火发大炮轰其营，瓦剌军死伤万余。也先率军自良乡西退，瓦剌军沿途大掠，焚烧了明陵三座和许多供器。十七日，也先由紫荆关北退。但仍有少股瓦剌军散掠各府、州、县。昌平伯杨洪率兵2万自宣府入援京师，于谦便命他和范广、孙镗追杀残敌，在霸州、固安诸地消灭了瓦剌军的许多散兵游勇。各地人民因不堪瓦剌军的扰掠，也纷纷组织起来自卫抗敌。十一月初八日，瓦剌军退出塞外，京师解围，明王朝转危为安。　（高春平）

英宗复辟

景泰八年(1457)正月，以石亨、徐有贞为首的一批军人、官僚勾结王振余党宦官曹吉祥，利用英宗和景帝兄弟间的矛盾，发动宫廷政变，迎复英宗，史称“英宗复辟”。

景帝朱祁钰由亲王成为皇帝，完全是“土木之变”后英宗被俘的偶然机遇促成的。景泰元年八月，

英宗被瓦剌放回，这时朱祁钰被推戴为皇帝才一年，内心十分不安，怕到手不久的皇帝宝座再被其兄夺回，所以在东安门礼节性地举行了授受帝位仪式之后，立即把明英宗朱祁镇送到南宫软禁起来。并派靖远伯王骥守护南宫，不许群臣去朝见，更不许英宗和朝中文武大臣来往，以防他们进行复辟活动。此外，令景帝放心不下的是太子的归属问题。当时朱祁钰虽被拥戴为帝，可是皇太子仍是英宗的长子朱见深。因此，景帝便很想“易储”，废掉原太子朱见深，另立亲子朱见济为皇太子。其亲信太监投其所好，建议景帝用加官晋爵和赏赐金银财物的办法拉拢大臣，实现“易储”的目的。朱祁钰遂于景泰三年正月，晋都御史杨善、王文为太子太保。四月，赏赐阁臣陈循、高谷银百两，江渊、王一宁、商辂等银各50两，试探这几人的态度。被晋爵和赏赐的几位大臣都接受了财物，这说明他们是同意易储的。正在这时恰好发生了广西土官都指挥使黄玹为免罪上疏建议更换太子的事件，加速了“易储”的进程。黄玹是广西思明州知府黄𤦺的庶兄。景泰三年，黄𤦺因年老致仕，由其子黄钧承袭知府。黄玹阴谋夺取知府之位，假传上令征兵思明府，令其子纠众扎营于城外30里，到深夜突袭府城，杀了黄𤦺全家。黄家仆人福童逃脱，告到广西巡抚李棠和总兵处，李棠和副总兵武毅查核后当即上报朝廷，要逮捕黄玹父子治罪。黄玹忙派心腹千户袁洪携带重财去京师贿赂权臣，并为迎合景帝的心意，奏请更换太子以固国本。景帝览奏大喜道：“万里之外，乃有此忠臣！”即令赦免黄玹父子，并令礼部集群臣商议废立太子事。参加会议的众官员虽知不妥，但都不敢直言。司礼监太监兴安乘机鼓动大家签名，于是大学士陈循、礼部尚书胡濙及都御史王文率先签名，其余官员便也联名合奏：父有天下，必传于子，陛下顺天应命，中兴邦家，今黄玹所奏，宜允所言。同年五月初二日，景帝正式立长子见济为皇太子，见济的生母杭氏为皇后，改封原太子朱见深为沂王。为了进一步稳固皇太子的地位，景帝还以大臣王直、胡濙、陈循、高谷、于谦等为东宫官，每人兼支二俸。景帝以为英宗被禁锢，皇太子也已更换，他们父子传承皇位似乎毫无问题了。然而事与愿违，朱见济立为太子仅一年多，便于景泰四年十一月病亡，而景帝又仅此一子，这样皇储问题又被提了出来。第二年五月，御史钟同和礼部郎中章纶请复朱见深为太子，景帝大怒，逮二人下锦衣卫狱拷问幕后主使及交通英宗罪，极力压制复立太子的言行。与此同时严密防范英宗在南宫的活动，始终把其兄看作威胁皇位的隐患。景泰八年正月，景帝病重，宫内和文武官员都忧心忡忡，不时地探问景帝的病情。十一日，太监兴安对大家说：公等朝廷股肱，不能为社稷计，只是每日问安有何益处？十四日，群臣会议皇太子问题，多数官员同意复立朱见深为太子，只有大学士王文、陈循等不同意，于是就以“早择元旦”奏请。但景帝坚执不允，并以朕偶有风寒，十七日当早朝为由否决了奏稿。十六日，王直、于谦会诸大臣请复立朱见深，让商辂草奏，稿成夜幕已降临，尚未来得及上奏，当天夜晚石亨、徐有贞、曹吉祥等便发动了迎复英宗的夺门之变。

早在正月十二日，景帝召石亨至病榻前嘱他代行郊祀大礼。石亨见景帝病笃难复，回来后便与其同党都督张軏、左都御史杨善、左副都御史徐有贞及太监曹吉祥等密谋英宗复辟。十三日，他们先将计划密告英宗。次日晚，石亨等聚会在徐有贞家商议具体行动方案。十六日夜，石亨、张軏等又到徐有贞家聚会，张軏急不可耐地告诉徐有贞已得英宗的回报，下一步如何行动？于是徐有贞煞有介事地观察了一会天象说：事在今晚，机不可失。适有边吏报警，徐有贞说：宜乘此机缘以备意外为名，纳兵入宫内。计谋已定，就去会合王骥、杨善、陈汝言等人分头行动。徐有贞在离家时告以“事成社稷之福，不成满门之祸。归，人；不归，鬼矣。”决心孤注一掷。当夜四更，石亨收了各城门钥匙，打开长安门放预先等待在门外的张軏所率军士千人进入皇城，守卫的士兵惊慌失措。徐有贞复将城门锁好，并把门钥投入水窦中，以防外兵进入。然后率士兵急速向南宫进发。途中石亨、张軏心中不踏实，问徐有贞，事情能成功吗？徐有贞说必成无疑。至南宫，门锢不可开。徐有贞令军士取巨木撞门，又命一些士兵爬墙进去，内外合力毁墙，墙坏门开，石亨、张軏进入南宫。英宗在灯烛下出见，石亨、徐有贞等一齐对英宗说：“请陛下登位。”呼士兵举辇，士兵惊愕不能举，徐有贞等帮着一起推挽，扶英宗登车驶向东华门。英宗问徐有贞等是谁，各人一一报称自己的职位姓名。到东华门，守门卫士喝令他们停止行进，英宗大声说：“朕太上皇帝也。”遂入。众人簇拥着英宗到奉天殿升座，随后徐有贞等立即高呼万岁，敲响钟鼓，大开诸门。其时已是正月十七日黎明，群臣正等在朝房中准备景帝早朝，忽听钟鼓呼噪声，颇感意外，正在惊疑不定之际，只见徐有贞出门大声说：“上皇帝复位矣！”催促大家前去朝贺。英宗宣谕复位。众臣见大局已定，只好就范。当日，英宗便命徐有贞以原官兼学士入内阁预机务。石亨晋封忠国公。曹吉祥提升为司礼太监，总督三大营。张軏封

为太平侯，杨善为兴济伯，其他参加夺门事件的官员一个个也都得到了封赏。第二天逮捕少保于谦、王文，学士陈循、商辂、萧镃，尚书俞士悦、江渊，都督范广，太监王诚、舒良、张玉等下狱。升徐有贞为兵部尚书。二十一日，改景泰八年为天顺元年。这就是明史上所称的“夺门之变”。也称“南宫复辟”。

英宗复辟，政局陡变。他首先废景帝仍为郕王，将其迁到西宫。景帝连病带恨，没过多久就死去了。几乎同时，拥立景帝的一些大臣相继被罢遇害。徐有贞、石亨等嗾使其党羽劾于谦、王文阴谋迎立外藩襄王朱瞻墡的儿子做皇帝。在廷审时，王文以召亲王须用金牌信符，遣人必有马牌，内府、兵部可验的道理极力为自己辩冤。于谦冷笑着说：亨等意耳，辩何益。经查对，金牌信符都在内府，但徐有贞却说：虽无显迹，意有之。主持廷审的都御史萧维桢阿附徐有贞、石亨，遂以“意欲”二字判处谋逆死罪。英宗还有点犹豫不决，说：“于谦实有功。”徐有贞却恶狠狠地说：“不杀于谦，此举为无名。”于谦和王文被害，天下为之呼冤。抄没于谦的家产时，家无余资，正室内景帝所赐蟒衣剑器紧锁在内，于谦从未动用。都督范广勇而知义，得到于谦的信任，曾弹劾过石亨的不法行为，遭到石亨的嫉恨，也被杀。徐有贞、石亨还罗织罪名，把于谦推荐选用以及不附和他们的文武官员指责为于谦党人，榜示天下，极力打击陷害。致使陈循、俞士悦充军边卫，商辂、萧镃等罢斥为民。于谦被杀的那天，行路嗟叹，国人无不怨之。有一个指挥朵儿，本系曹吉祥部属，用酒哭祭于谦。都督同知陆逵为于谦的忠义所感，冒险收遗骸葬之。后来于谦的女婿朱骥把灵柩归葬他的故乡杭州西湖边。青山埋忠骨，民族英雄于谦一直为后人凭吊和怀念。

曹吉祥、石亨、徐有贞诸人是一帮投机钻营贪得无厌的封建官僚。他们在英宗复辟后先是打击异己，培植亲信，紧接着便因争权夺利而矛盾分裂。徐有贞于夺门之变后入阁，排挤了其他阁臣独揽内阁事权。因曹吉祥、石亨招权纳贿太露骨，在英宗面前微言曹、石贪横行为。天顺元年(1457)五月，御史杨瑄、张鹏弹劾曹吉祥、石亨强夺民田，冒功滥职等罪。曹、石两人便联合起来日夜图谋构陷徐有贞，离间英宗和徐有贞，并嗾使言官弹劾徐有贞和李贤擅作威权，排斥勋旧，终于将徐有贞谪戍云南金齿卫。自此，曹、石更加肆无忌惮地专权乱政。天顺三年石亨的侄子石彪晋爵为侯，石家冒功锦衣卫者 50 余人，亲戚故旧冒名夺门功得官者 4000 余人。石亨还公开卖官鬻爵，以纳贿多少为授职美差，入之前后为得官迟早。郎中朱铨和龙文图贿赂石亨而升官，遂有朱三千、龙八百之谣。石亨的专权跋扈，使英宗感到不满，说：“此辈干政，四方奏事者先造其门，为之奈何?”吏部侍郎李贤建议英宗乾纲独断，权不下移。于是英宗逐步剥夺曹、石的权力。石亨感到英宗在疏远自己后，想学“陈桥兵变”来夺取明朝的天下，他安排石彪在大同作为叛乱的据点，对其党羽说：“大同士马甲天下，吾抚之素厚，今石彪在彼可恃也。”但英宗对石亨、石彪内外掌握兵权更不放心。天顺三年七月，召石彪还京，石彪不从。八月下彪锦衣卫狱，又罢石亨兵权。天顺四年二月，石亨死于狱中，石彪被杀。石亨、石彪的下场使曹吉祥、曹钦叔侄坐卧不安。他们认为与其坐以待毙，不如孤注一掷。为此私下招降纳叛，决定于天顺四年七月二日黎明发动政变而废英宗。后因都指挥马亮告密而败露，曹吉祥被捕，皇城及京城九门紧闭，曹钦率其党徒至东安门，门闭不得入，转至逯杲住所杀了逯杲，又在西朝房杀了都御史寇深，纵火焚烧东西长安门。这时怀宁伯孙镗召西征军 2000 人攻击曹钦，工部尚书赵荣亦率数百人来助战。待到天明，曹党渐散，城门尽闭，曹钦冲突不出，才奔归家里拒战，孙镗军攻入，曹钦投井死，曹吉祥也于三天后被凌迟处死。　(高春平)

于谦被害

天顺元年(1457)英宗复辟后陷害保卫北京的功臣于谦的事件。

于谦，字廷益，浙江钱塘(杭州)人。永乐十九年(1421)进士。宣德及正统初，任监察御史，以兵部右侍郎衔巡抚河南、山西，平反冤狱，赈济灾荒。正统十三年(1448)，任兵部左侍郎。十四年，瓦剌也先大举入犯，宦官王振挟英宗亲征，于谦极力谏止，但未被采纳，兵部尚书邝埜从征，留他理部事。“土木之变”，英宗被俘，京师震恐。文武大臣纷纷主张放弃北京，迁都南京，而于谦则反对南迁。他的主张得到郕王的赞许，郕王提升他为兵部尚书，坚守北京。当时，京师的精骑劲旅已在土木堡覆没，剩下的 10 万人多为老弱病残之辈，人心恐慌。于谦一方面部署军队，设防固守；另方面，又拥立英宗弟郕王为景帝，安定人心。于谦任兵部尚书后，号令严明，指挥得当，取得了北京保卫战的胜利。然而也得罪了一些官僚、政客。景泰八年(1457)正月，石亨、徐有贞伙同曹吉祥等，利用景帝生病之机迎英宗朱祁镇复辟，改年号为天顺，史称“南宫复辟”，亦称“夺门之变”。英宗复辟后，徐有贞、石亨以迎复功高，大受宠幸。他们联合起来打

击陷害于谦，最后以“谋逆”罪将于谦杀害。于谦的家属被发配充军，甚至连于谦举荐、重用的官员、将领亦被谪戍、罢官以致杀害。于谦被害的消息传出后，天下无不怨之，后来于谦的女婿朱骥将于谦的灵柩葬于他的故乡杭州西湖。于谦的祠墓与岳飞的祠墓同在西湖，所以后人有“赖有岳、于双少保”之称。

（张桂萍）

刘瑾专权

明武宗正德初年，宦官刘瑾专权祸国的历史事件，史称“刘瑾专权”。

刘瑾(？—1510)，直隶兴平(今属陕西)人。本姓谈，依刘姓宦官进宫，遂从其姓。孝宗时，犯法当死，被免。后侍奉太子。弘治十八年(1505)，武宗立，掌钟鼓司，与宦官马永成、高凤、罗祥、魏彬，丘聚、谷大用、张永都以旧恩得宠，结成“八党”，时称“八虎”。他们整日引诱年轻的明武宗游玩取乐，使武宗怠于朝政，沉溺于声色、狗马、歌舞之中。身为顾命大臣的大学士刘健等上疏极谏，劝武宗实行遗诏中其父生前欲兴革之事。明武宗表面以温诏答之，实际上并不付诸实施，而是变本加厉地宠用太监，致使孝宗时的善政也变易殆尽。刘健、谢迁等虽居高位，徒拥虚衔，或旨从中出，略不预闻，对军国大政的合理建议也得不到采纳。他们只好愤然要求致仕(退休)，武宗又不同意，反而与“八党”厮混一起。刘瑾利用受宠之机，开始排挤正直官员，任用亲信。于是比较正直的大臣们和“八党”展开了日趋激烈的斗争。

正德元年(1506)三月，吏部尚书马文升上疏乞休。他为改良时政尽职尽责，不惜得罪当权太监。而太监对他汰除传奉官早已不满。此时便劝武宗下旨允准，以拔除他们的眼中钉。接任马文升的吏部尚书焦芳心术不正，一心向上爬，受到正直大学士刘健、谢迁的指责，于是勾结刘瑾摧残忠良。同年五月，忘身徇国的兵部尚书刘大夏也因建议裁撤镇守太监而被迫致仕。六月，许多大臣以灾异而应诏陈言，指责明武宗频幸监局、纳内侍进献、排斥臣僚诸时弊。八月，刘健等又上言批评明武宗视朝太晚，致使四方朝见官吏、外国进贡使臣久候不见，废时误事。但武宗在八党诱导下仍耽于戏玩，执迷不悟。为了彻底解决问题，刘健等决定设法铲除“八党”。其时给事中陶谐、御史赵佑交章论劾八党，明武宗把奏章下内阁议论，刘健赞同言官的意见。紧接着户部尚书韩文合九卿诸臣在十月又上一疏。此疏由郎中李梦阳起草，韩文删定。疏文简洁明快地声讨了八党淫荡圣心，击球走马，放鹰逐犬，日游不足，夜以继之等罪恶。指出此辈惟知蛊惑君上以便私，若放纵不治，必危及社稷。最后严正地要求明武宗奋乾纲，割私爱，上告两宫，下谕百僚，明正典刑。明武宗阅后打算采纳，在一天之内曾三次派司礼太监至内阁商讨处置办法。明武宗的意见是把刘瑾诸人安置在南京，但刘健、谢迁主张根除祸患，并计划与韩文及其它部院大臣于第二天伏阙力争处死八党，可是焦芳把消息有意泄露给刘瑾。刘瑾大惊，率马永成等八人连夜进宫，围着明武宗哭泣，武宗一时心动，刘瑾乘机告黑状说：诸臣欲借此挟制皇上，故先除我等。如司礼监得人，朝臣哪敢如此狂妄欺君！昏庸的明武宗听后大怒，立即命刘瑾掌司礼监，马永成掌东厂，谷大用掌西厂。次日晨诸臣上朝准备伏阙力争时，发现局势已大变，刘健、谢迁、李东阳三位内阁大学士只好上疏乞休。明武宗批准刘健、谢迁致仕。至此，除“八党”活动彻底失败，内外大权悉归刘瑾。

刘瑾得势后，大肆培植亲信，打击异己。他特别忌恨带头上疏反对自己的山西人韩文，整天想找韩文的差错，无奈韩文清正奉职无隙可击。正德元年十一月，发现有人以伪劣银两输内库，遂以此为罪，将户部尚书韩文罢官。刘瑾仍不罢休，后又创“罚米法”，让他罚米千石输大同，使家素清贫的韩文苦不堪言。此后，刘瑾的权势不断膨胀，竟至倾动天下，威福自专。百官奏章先具红揭送刘瑾，号“红本”，然后上通政司，号“白本”。京官奉命外出还京必赴刘瑾家馈赠。批答奏章，刘瑾因没文化，便拿到家中与妹婿相商，然后交焦芳润色。正德三年六月二十六日早朝时，在丹墀发现一封反对刘瑾的匿名信，刘瑾大怒，当即下令百官跪奉天门下进行诘责。至晚上仍没结果，又将五品以下官 300 多人尽逮下狱。在刘瑾的纵容下，太监更加横暴。正德三年夏，提督西厂太监谷大用，分遣官校远出侦事。江西南康民吴登显等三家按传统习惯在五月端午节竞渡，被诬为擅造龙舟，全家遭抄斩。自此偏州小邑，见华衣怒马，操京师语音者，辄相惊告，搞得人心惶惶。为了加强特务统治，刘瑾在东、西二厂外，又立内行厂，自己亲自掌管。同时，依附刘瑾的官僚，也狐假虎威，滥施淫威。安定人张彩，靠走刘瑾的门路，一年之内自郎署当上吏部尚书，跃居六卿之首。他还强夺同乡刘介和平阳知府张恕的美妾。为能固位保宠，刘瑾千方百计地引诱明武宗寻欢作乐，并在西华门院内专门构筑了密室豹房供武宗淫乐。刘瑾专权达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当时民间流传着“一个坐皇帝，一个立皇帝，一个朱皇帝，

一个刘皇帝"的民谣,形象地道出了刘瑾专权祸国的情况。 (高春平)

朱寘鐇之乱

明武宗正德五年(1510),宁夏安化王朱寘鐇发动的一场叛乱。

朱寘鐇的曾祖父朱㮵是明太祖朱元璋的第16子,洪武二十四年(1391)封庆靖王,二十六年就藩宁夏。朱㮵的第四子朱秩炵为朱寘鐇的祖父,永乐十九年(1421)封安化王。朱寘鐇的父亲朱邃墁,封镇国将军。弘治五年(1492),朱寘鐇嗣安化王爵。他素有逆谋,与宁夏卫生员孙景文等交往甚密,招降纳叛,图谋不轨。刘瑾专权期间,政治腐败,财政日紧。正德三年十月,刘瑾克剥边兵,擅自规定罢弘治年间叶淇变开中法后实施的各边年例银两,使边兵的生活费用没有着落。正德四年八月,刘瑾奏请派御史等到各处清理屯田。各边伪增屯田数百顷,悉令出租,搞得民不聊生。派往宁夏清理屯田的大理寺少卿周东尤为苛刻,他竟以50亩为一顷,又按亩敛银贿赂刘瑾,戍将卫卒都气愤万端,矛盾激化。朱寘鐇乘机通过孙景文等拉拢一批军官和士兵起兵叛乱。

正德五年,适有边警,明廷令游击将军仇钺和副总兵杨英率兵出御,总兵官姜汉,选锐卒60人为牙兵,令指挥周昂带领。周昂是朱寘鐇的同党,受任后便与另一同党千户何锦为朱寘鐇划策,定于四月五日设宴,大会巡抚安惟学、总兵姜汉、大理寺少卿周东、镇守太监李增等。届时,安惟学、周东辞而未来。何锦、周昂率牙兵直入宴会,杀姜汉和李增等,另派同党千户丁广杀安惟学、周东于公署。遂焚烧官府,释放囚犯,并将黄河岸边的渡船撤到西岸,防止有人渡河。朱寘鐇还派人招降仇钺和杨英,仇钺伪降,自驻地玉泉营引兵而来,被叛军所败,朱寘鐇夺其军,分给其党统领;杨英所率部众溃散,本人单骑奔灵州。朱寘鐇又令孙景文作檄文,历数刘瑾诸罪,以讨伐刘瑾作为起兵借口。各边镇接到檄文后,因畏惧刘瑾,不敢报闻朝廷,只有延绥巡抚黄珂封而上之。另外,固原总兵曹雄闻变,即统兵压境上。命指挥黄正率兵3000入灵州,约邻境各镇兵克期讨叛,又私下遗书仇钺,约为内应,并派灵州守备史镛奋夺河西船,尽泊东岸。这就极大地牵制了叛军的行动。不久,仇钺装病在家,以计诱杀前来探视的周昂,并召集壮士,直奔安化王府,将朱寘鐇擒拿。然后,假传朱寘鐇之命,一面召何锦、丁广回城,同时暗地里把朱寘鐇已擒的消息传给其士兵。何、丁部众遂乱,二人单骑逃往贺兰山,皆被俘获,械送京师处死。至此,时仅19天的朱寘鐇之乱以失败告终。

朱寘鐇叛乱的消息传至京城,明武宗立即派杨一清总制军务,与总兵官神英西讨,又派太监张永为监军。讨逆大军未至,朱寘鐇已被擒,杨一清驰抵宁夏处理善后事宜。张永原是八党之一,后与刘瑾因争夺权势翻脸。于是杨一清利用刘张矛盾,鼓动张永策划除掉刘瑾的计谋。后来事态的发展,恰如杨一清所设计。时有术士俞日明,妄言刘瑾当大贵,刘瑾信之,亦谋不轨。恰好其兄都督同知刘景祥死,于是计划以正德五年八月十五日百官前来参加葬礼时起事。正在这时,张永的奏捷报告送到,恰好请以八月十五这一天献俘。刘瑾指令推迟献俘日期,想事成一并收拾张永,张永恐事出变故,遂先期入。献俘完毕,明武宗设宴慰劳张永,刘瑾作陪。至夜,刘瑾退席,张永拿出朱寘鐇的檄文让明武宗看,顺奏刘瑾不法事17件。其时武宗已喝得半醉,歪着头说:刘瑾负我!张永见机进一步说:事不可缓。于是当夜逮捕了刘瑾。第二天,明武宗把张永的奏疏交内阁,降刘瑾为奉御,谪居南京。武宗亲自籍没其家,搜得伪造玉玺、穿宫牌500及衣甲、弓弩、衮衣、玉带等违禁物。又发现刘瑾平常所持大扇内藏锋利匕首两把。武宗见状大怒道:"奴果反!"急趋至狱,下诏磔刘瑾于市,枭其头,榜狱词处决图告示天下。内阁大学士焦芳、刘宇、曹元、尚书张彩、侍郎柴升、副都御史杨纶、佥都御史萧选、巡抚刘聪、总督文贵、大理寺卿张纶、少卿董恬、大理寺丞蔡中孚,通政司通政吴钦、参议张龙、太常少卿杨廷仪、尚宝卿吴世忠、尚宝丞屈铨、府尹陈良器、府丞石禄、侍读焦黄中、给事中李宪、御史戴凤鸣等60多人,或论死,或谪戍,或闲住,或除名,都得到应有的惩处,一时朝署为清。恶贯满盈、不可一世的刘瑾彻底败灭。 (高春平)

河北刘六、刘七起义

正德六年(1511)霸州爆发的一次农民起义。

明政府在京畿地区强令民户寄养官马,按岁征驹,种马若死或孳生不足数,养马户都得赔补。其时,庄田日增,草场日削,饲料短缺,马户苦于孳养,而官吏又催督苛紧,农民困苦已极。正德六年,文安(今属河北)人刘六、刘七领导农民在霸州(河北霸县)发动起义。他们推杨虎为首领,攻打畿南州县,四方农民云集响应。京畿地区养官马很多,义军得到大量马匹,组成骑兵,一昼夜驰数百里,势如风雨。起义军旋分两路,东路由刘六、刘七率领,自河北转入山东;西

路由杨虎率领，进入山西。八月两军会师霸州，进逼京师。明朝惊恐万状，急派陆完率军镇压。起义军为了暂避敌锋，并切断明朝漕运，遂转旗南进，围攻济宁，焚毁运船1200艘。十一月，起义军又分兵作战，大体上刘六、刘七活动在山东地区，杨虎活动在河南东部及江苏、安徽北部。在夏邑(河南夏邑)小黄河渡口作战中，杨虎不幸落水牺牲。起义军共推刘惠(又名刘三)为领袖，称奉天征讨大元帅，赵鐩为副元帅，继续作战。七年，刘惠、赵鐩进军河南，明将仇钺拼凑重兵，疯狂反扑。义军进入安徽，又转战湖广，在应山县与明军激战，失利。赵鐩突围后，在江夏(武昌)被俘。刘惠突围至河南南召，不幸中箭牺牲。山东方面的刘六、刘七为了援救河南战场，率军入豫。其时刘惠、赵鐩均已失败。明军遂集中兵力围攻刘六、刘七。义军被迫弃马登舟，引兵南下湖广、江西。在湖北黄州战役中，刘六中箭受伤，投江自尽。刘七领导义军攻克江西九江，转战安徽、江苏等地，但寡不敌众，刘七亦兵败，于正德七年七月，在南通狼山自杀。河北农民起义军奋战持续三年，纵横河北、河南、山东、山西、江苏、安徽、湖北、江西八省，是明中叶规模最大的一次农民起义。 (张海瀛)

朱宸濠之乱

正德十四年(1519)六月，宁王朱宸濠在南昌发动的叛乱。

朱宸濠的高祖是明太祖的第17子宁王朱权，洪武二十四年(1391)封王，两年后就藩大宁。靖难之役中，燕王朱棣以计挟朱权迁北平，并以大宁地给从征有功的朵颜三卫。永乐元年(1403)改封南昌。正统十三年(1448)，朱权死，朱宸濠之祖朱奠培嗣位。弘治四年(1491)朱奠培死，朱宸濠之父朱觐钧嗣位。弘治十年(1497)朱觐钧死，朱宸濠嗣位。他在刘瑾专权时，就已认为有机可乘，野心勃勃，发展势力，为夺取最高权力积聚力量。时有术士李自然妄言宸濠有异表，并称南昌城东南有天子气。这更助长了朱宸濠犯上作乱的狂妄野心。他通过贿赂刘瑾，于正德二年五月恢复护卫。刘瑾败亡后，其护卫又削。正德九年，朱宸濠通过行贿，又在兵部尚书陆完、宦官钱宁诸人的帮助下再次恢复护卫。与此同时，朱宸濠也不断地向明武宗献媚邀宠，博取欢心。此后，他更加恣意妄为，尽夺诸王府民庐，责民间子钱，强夺民田宅子女，养群盗，劫钱财，官府不敢问。他与致仕都御史李士实、举人刘养正等图谋不轨。并勾结钱宁等报复压制揭发他为非作歹进行阴谋活动的人，希望自己的儿子能乘武宗无子、东宫未立的机会入继大统。后因江彬和钱宁之间的倾轧，明武宗下诏驱逐宁王派到京城的人。正德十四年，御史萧淮上疏揭发朱宸濠的罪恶行径，指出如不早制，将来后患无穷。内阁大学士杨廷和建议按宣宗处理赵府之法，派勋戚大臣宣谕警责，令其改过自新。明武宗遂派都御史颜颐寿、驸马都尉崔元、太监赖义等携带圣旨前去，收其护卫，责令宁王归还所夺官民田产。至此，朱宸濠决定孤注一掷，发动武装叛乱。

正德十四年六月十三日，朱宸濠以庆祝生日为名，设宴召请地方官。次日早，地方官前来道贺，朱宸濠令带甲持刀侍卫数百人将地方官包围，声称奉太后密旨，令起兵入朝。巡抚江西副都御史孙燧和江西按察司副使许逵不从被杀。布政使梁宸、按察使杨璋、参政王纶、佥事潘鹏等归附。朱宸濠以李士实、刘养正分任左右丞相，以王纶为兵部尚书，集兵号称10万。七月初一，朱宸濠留人坐守南昌，自率舟师蔽江而下，夺取长江重镇安庆。

汀、赣巡抚副都御史王守仁在六月十九日得知朱宸濠起兵叛乱的消息后立即飞书报警。急报至京，举朝惴惴不安，唯有兵部尚书王琼镇定自若。他连夜草疏十三道，沉着应变，周密部署，并对众官员说："诸君勿忧，吾用王伯安抚赣州，正为今日。不过旦夕，贼成擒耳。"王守仁集结兵力直攻南昌，七月二十日克南昌，擒拿宁王的留守人员宜春王朱拱樤、宦官万锐等。消息传到朱宸濠那里，他正在围攻安庆，久未得手。老巢的丢失，使他大吃一惊，只得回师图存。二十四日，叛军与王守仁所部在黄家渡发生遭遇战，败退八字脑。第二天叛军又败，退保樵舍(南昌市东北)，连舟布方阵。二十六日，明军以火相攻，朱宸濠大败，诸妃嫔皆赴水死，将士焚溺而亡者3万余人，朱宸濠及其世子、郡王、仪宾及同党李士实、刘养正、王纶等皆被擒。朱宸濠见到王守仁后，大喊："王先生，我欲尽削护卫，请降为庶民可乎?"王守仁回答说："有国法在!"他只好低头不语。朱宸濠自起兵至被擒，时仅月余。捷报到京，朝臣十分佩服王琼的预见和用人。而明武宗及其幸臣却把这一事件当作南巡寻欢的机会。他不顾群臣谏阻执意御驾南下亲征。一路上为迎刘美人、捕鱼鸟取乐花费许多时间和精力。直到正德十四年十二月底才到达南京。正德十五年七月，王守仁再次报捷，为了照顾明武宗的面子，在捷报里特意写上了"奉威武大将军方略讨平叛乱"的词句，并且写上了武宗幸臣的名字。这样，明武宗既已承认了朱宸濠被擒的奏报，"亲征"的闹剧理应

收场。但明武宗及群小仍不罢休。正德十五年闰八月，武宗又在南京搞了个滑稽的受俘仪式。为了表示是武宗亲征所取得的大捷，特地设广场、大纛，环以诸军，明武宗披剑挂甲，全副戎服武装，令放朱宸濠等逆党分子，去桎梏，伐鼓鸣金而擒之，然后置械，行献俘礼。该月十二日，明武宗自南京北返。一路上继续寻欢作乐。十月，北还至通州，十二月在通州处死朱宸濠，将其焚尸扬灰。第二年三月十四日，纵欲贪欢的明武宗终于在豹房毙命，年仅 31 岁。

（高春平）

大礼议之争

明世宗嘉靖初年，统治阶级内部围绕嘉靖帝生身父母的崇祀典礼问题展开的一场争论。

正德十六年(1521)三月十四日明武宗死后，因为无子可继皇位，皇太后张氏命太监张永、谷大用等到内阁，与大学士们议所当立。首辅杨廷和以《皇明祖训》提出兄终弟及，兴献王长子、武宗堂弟朱厚熜依序当立，大学士梁储等也赞成。于是皇太后张氏派太监谷大用、大学士梁储、定国公徐光祚、礼部尚书毛澄去湖北安陆迎接朱厚熜。四月二十二日，朱厚熜至京师，在文武百官的拥戴下登奉天殿即皇帝位，以第二年为嘉靖元年(1522)。这便是在位长达 45 年的明世宗，时年 15 岁。他是个很爱虚荣的人，由藩王而入继皇位后的第 5 天，即正德十六年四月二十七日，就下令礼官集议崇祀其父兴献王的典礼。礼部尚书毛澄向首辅杨廷和请示，杨廷和援引汉代定陶王、北宋濮王事例，主张朱厚熜继统不继嗣，以孝宗为考，兴献王及妃为皇叔父母。于是，毛澄会公卿台谏等官 60 余人将此意奏上，明世宗十分不满，当即下令另议。同年七月，吏部观政进士张璁上《大礼疏》，提出了为兴献王立庙京师，尊其生父兴献王为兴献皇帝，母兴献皇后，祖母为康寿皇太后的建议。明世宗得此奏疏，如获至宝，立即召见杨廷和、毛澄等，令他们按此为其父上尊号。可是，杨廷和等拒不从命。这年九月，明世宗的母亲兴献王妃蒋氏从安陆来到通州，得知朝中大臣打算让明世宗以孝宗为考，大怒说："安得以我子为人之子！"遂留通州，不肯来京。此事陷入僵局。杨廷和见势不得已，只好草敕礼部说："圣母慈寿皇太后懿旨，以朕缵承大统，本生父兴献王宜称兴献帝，母宜称兴献后。"明世宗批准了这个草敕，蒋氏见此才答应进京。然而事情至此并未完结。该年十二月，杨廷和授意吏部，把观政期满的张璁安排为南京刑部主事，使之远离朝廷。不久，明世宗下御札一道，令加兴献帝、后以"皇"字。杨廷和等反对，并以清宁宫后殿之灾劝阻。迷信神灵的明世宗被迫从之，称孝宗为皇考，兴献帝、后为本生父母，不加"皇"字。时隔不久，南京吏部主事桂萼经过与张璁长期讨论，联名上疏世宗，明确要求明世宗速下诏旨，循名考实，称孝宗曰皇伯考，兴献帝曰皇考。他还谈到，巡抚湖广都御史席书和吏部员外郎方献夫也均持此主张。明世宗得疏大喜，下令文武群臣集议。此时已到嘉靖三年，杨廷和因屡违旨意被罢，但吏部尚书乔宇和新任礼部尚书汪俊，率领百官仍坚持杨廷和的主张。嘉靖帝更加恼火，下令调席书、桂萼、张璁等赴京集议。张、桂二人奉召赴京行至凤阳，又上疏建议去掉"本生"。嘉靖三年六月，张璁、桂萼至京，被任命为翰林学士。七月，复奏上十三事，进一步征古援今地说明其主张，指斥礼官欺罔之罪。明世宗根据张璁、桂萼的意见，屡次派司礼监太监到内阁找大学士毛纪等，要去掉其生身父母"尊称"中的本生二字。毛纪等力言不可，明世宗大发脾气，召百官至左顺门，正式下令："本生圣母章圣皇太后，今更定尊号曰'圣母章圣皇太后'。"于是风波再起，成为议大礼中两派斗争最激烈的一幕。当时，詹事、翰林、科道及六部诸司许多大臣各具疏反对，皆留中不下。七月十五日，会朝方罢，吏部左侍郎何孟春对百官说：宪宗时，百官哭文华门，争慈懿皇太后葬礼，宪宗从之，此我朝故事也。修撰杨慎接着说："国家养士百五十年，仗节死义，正在今日。"编修王元正等当即遮留百官于金水桥南，声言今日不跪哭力争者，必共击之。于是尚书金献民、侍郎何孟春、都御史王时中、少卿徐文华、编修王相、给事中张翀、御史王时柯、郎中余宽、评事陈大纲等 200 余名朝臣一起跪在左顺门。明世宗命司礼监太监传旨劝退，众人要求必得圣旨才退。自辰至午，先后传旨两次，皆跪伏不起。明世宗恼羞成怒，派锦衣卫旗校逮捕为首者，于是张翀等 8 人逮入诏狱。杨慎、王元正撼门大哭，百官皆哭，声震内廷。明世宗更加恼火，遂命逮捕 134 人下狱，另外令何孟春等 86 人姑且待罪。两天后，锦衣卫请示处理在押百官的办法，明世宗下令严加拷讯，四品以上者夺俸，五品以下者廷杖。结果有 180 余人被杖，其中 17 人先后毙命。就在专制皇帝大施淫威的一片棒打声中，明世宗生身父亲的神主自安陆迎到北京，奉于观德殿，上尊号曰"皇考恭穆献皇帝"，去掉原有的"本生"二字。

左顺门事件是"议大礼"的高潮和转折点。此后，多数人屈服于专制淫威之下，仅个别人仍坚持己见。明世宗抬高其父的愿望终于付诸实现，而且由于一

些大臣的百般逢迎，明世宗生父的尊崇典礼一再拔高。嘉靖四年四月，光禄寺丞何渊请立世室，崇祀明世宗的生身父于太庙。按封建礼制，没当过皇帝的人不能供入太庙，入则干犯皇帝的统系。所以，席书、张璁、桂萼也不同意这样做，认为有些过分，难服天下人心。他们建议另外专建一庙，规制要超过原放的观德殿，明世宗同意这个建议。嘉靖五年，世庙建成于太庙之左。后来，明世宗仍不满足。嘉靖十五年将世庙改称"献皇帝庙"。嘉靖十七年七月，明世宗又让大臣讨论在太庙祭祀其父兴献王朱祐杬的问题。九月，尊朱祐杬为睿宗，这位生前并未做过皇帝的人终于在死后靠儿子登位后的特权挤入本不宜入的太庙。这场议礼之争前后长达一二十年，最激烈的时期竟达三四年。事情本身并不复杂也不是什么军国大政，只不过是礼文末节。但其背后夹杂着大臣们的争权夺利。杨廷和等从封建正统观念出发，反对任意抬高朱祐杬的地位。明世宗力主给予其父最高的尊崇，一方面是出于父子之情，另一方面是有意压制位居首辅、居于顾命大臣地位的杨廷和。那些投机钻营的中下级官吏便借机依附迎合世宗，力攻廷和。正是因此，随着议大礼的进行，明朝统治集团的构成在嘉靖初年便相应地发生着变化。反对抬高朱祐杬地位的一派逐渐丧失其地位和权力，赞同尊崇朱祐杬地位的一派便迅速跃居显位。嘉靖七年，明世宗为庆贺"议大礼"的成功，颁布了一部《明伦大典》，借此机会又对杨廷和等进行了一次全面清算，在宣布的处罚决定中说：大学士杨廷和谬主"濮议"。礼部尚书毛澄不能执经据典，林俊著论迎合。吏部尚书乔宇身为六卿之首，竟与九卿等官，交章妄执。汪俊继任礼部，仍主邪议。吏部郎中夏良胜，胁持众官，蛊惑闹事，以逞邪谋，何孟春以侍郎掌吏部，煽动群臣，跪伏喧呼。朕不欲过分，姑从轻处：杨廷和为罪魁祸首，特宽宥削籍为民。毛澄、林俊俱已病故，各夺其生前官职。蒋冕、毛纪、乔宇、汪俊俱已致仕，各夺职闲住。何孟春情犯特重，夏良胜酿祸独深，俱发原籍为民。反对尊崇朱祐杬一派所空出的官位，很快被顺从明世宗、力主抬高朱祐杬的一派官吏所袭替。最突出的莫过于张璁、桂萼二人。张璁在嘉靖帝即位时仅是由观政刚转为正式的一般京官，嘉靖四年冬进京任为詹事兼翰林学士，次年升任兵部右侍郎，六年十月再拜礼部尚书，兼文渊阁大学士，入参机务。从入仕到进入决策中枢内阁当大学士，时仅6年，这在明代罕见。再如桂萼，嘉靖初只是地位一般的南京吏部主事，嘉靖三年被召为翰林学士，六年三月进礼部右侍郎，九月改吏部左侍郎转礼部尚书，未满月，再迁吏部尚书，令密封言事。七年正月，加太子太保。八年二月，又以本官兼武英殿大学士，入参机务。　　（高春平）

李福达之狱

明代嘉靖初年发生的一起震动朝野的大狱。

李福达，山西代州崞县（今原平）人。弘治二年（1489），崞县民王良以弥勒佛教聚众，密谋起事。事前他派人赍表北去联络蒙古小王子，请犯边，愿为内应。但在偏关被明朝巡逻哨抓获，山西巡抚都御史翟瑄发官兵剿捕。良等知事已败露，即率众攻崞县，未下，率500人奔定襄县洪泉寨拒战失败，被押至京师处斩。李福达因参与这次谋反事，被发戍山丹卫（甘肃山丹）。不久，逃还，改名李五，清军御史勾发，再戍山海卫，又逃跑，寓居陕西洛川县，继续以弥勒佛教秘密活动。愚泉县民惠庆、邵进禄等俱往从之。福达称"我有天分，宜掌教天下"，民多信之，发展教徒至数千人。正德七年（1512）十一月，李福达准备起事前对众人说：我暂还家，尔等宜聚众待我回来举事。他走后不幸消息败露，其党邵进禄、何蛮汉等提前仓促起事，攻打洛川、鄜州（陕西富县）诸处，不久被明朝潼关卫指挥张潜和兵备使者张伦率官兵击败，何蛮汉等供出李五首谋后被官府杀害。李福达闻事败，逃亡到五台，变姓名为张寅，买通县吏将张寅及其子大仁、大义、大礼姓名编入五台县黄册。后占籍徐沟县同戈镇，贿县中张氏大姓以为同宗，编立宗谱，以遮人耳目。不久，李福达因放高利贷与同戈镇乡民薛良结仇，遂挟重赀至京，窜入匠籍，输粟得太原卫指挥使。其子大仁、大义、大礼俱补匠役。又以黄白烧炼术与武定侯郭勋结为深交。嘉靖初，李福达回同戈镇，其仇人薛良得知张寅是反贼李福达变易姓名，便将他告到山西按察使司衙门。按察使徐文华传捕，福达惧，逸入京。官司捕其二子大义按问之，福达窘，于是到狱置对。布政使李璋、按察使徐文华审问得实，复上巡按御史张英，皆如讯。唯独山西巡抚毕昭以同名、同姓面貌相似者极多，且原告薛良为被告仇人，对此案提出异议，又以居民戚广等为证，于是判以薛良挟仇诬告张寅为李福达。嘉靖五年（1526），为官清廉的河南人马録巡按山西。薛良不服所判诬告罪，诉于马録。马録决心穷究此案。他调阅了所有案卷，发现五台黄册内张寅父子姓名是临时填注，不符合本朝十年一造的定制。又走访了徐沟乡绅给事中常泰和洛川人给事中刘琦，二人均称张寅为福达无疑。为了进一步确证张寅、李五、李福达就是一人所变，马

禄檄取洛川、鄜州父老识福达者当面辨认，并调取崞县李福达同族人和邻里辨识其相貌和口音。经过多方取证反复核实，马禄确认山西按察使司审讯属实，张寅即李福达毫无疑问。正在这时，李福达贿求武定侯郭勋写信给巡按御史马禄为之嘱免。马禄十分气愤，于是拟福达谋反、妻子缘坐，并附信飞章弹劾郭勋党庇逆贼之罪。嘉靖帝将马禄奏章传下都察院复查，都察院左都御史聂贤等复核后认为马禄持正守法，办案秉公据实，李福达以妖术惑众，邵进禄等之反，实福达首谋，寘之重典，厥罪允宜。而郭勋身为勋戚世爵，竟交通逆贼，纳贿行嘱，法不可宥，请并逮治之。嘉靖帝传旨令诛福达父子，妻子为奴，财产全部籍没。因诘责郭勋，令自输罪。郭勋惧，谢罪乞恩，仍为福达辩解。同年十二月，山西巡抚都御史江潮、巡按御史马禄、兵科给事中郑自壁、御史高世魁等20余位官员各具疏劾武定侯郭勋交结李福达，明受贿赂，蔑视国法。福达既应伏诛，勋无可赦之理。给事中常泰亦上言：勋以输罪为名，实代福达求情，论以知情何辞？勋为福达居间，尽令大仁等事急亡命，论以故纵何辞？不久，给事中张逵复奏言：凡谋反大逆，宜服上刑。知情故纵，亦从重典。今郭勋移书请托，诡词称冤，党叛逆而背君父，罪不容诛，乞逮问如律。帝不从。郭勋见势不妙，一面累疏自诉，指使福达长子大仁击登闻鼓鸣父冤；一面串通张璁、桂萼在嘉靖帝面前诡称：勋因议大礼触怒众臣，现在廷臣内外交结，借此案倾陷我郭勋，意在报复议大礼中主张尊崇兴献帝的我等。昏庸的嘉靖帝深信其说，于是以李福达案事情重大，令锦衣卫逮系来京讯问。嘉靖六年正月，锦衣卫官校逮李福达等至，帝命三法司于京畿道会问。于是刑部尚书颜颐寿，侍郎刘玉、王启，左都御史聂贤，副都御史张闰、刘文庄，大理寺卿汤沐，少卿徐文华、顾佖及锦衣卫、镇抚司各官会审李福达，对簿无异辞，奏请处以磔刑。嘉靖帝不从，又令九卿大臣鞫于阙廷。九卿廷鞫时原告薛良，证人李景全、韩良相等共指福达，李福达理屈词穷。主审官再问戚广，薛良是否诬告李福达，戚广至此才吐真言说：我从未出庭作证，哪里说过薛良诬告李福达之言！刑部尚书颜颐寿以其词奏上，嘉靖帝真假不辨，对审讯结果更加怀疑，传言俟斋祀事毕，朕亲临鞫问。大学士杨一清说：庶狱何必烦圣心焦虑，请仍让诸勘官会讯。刑部主事唐枢根据确凿证词上奏，从六个方面一一为嘉靖帝辨疑，认为李福达罪状甚明，处死不枉。帝怒，黜为民。颜颐寿等惧，于是杂引前后不同供词，指为疑案。嘉靖帝指责他职司邦刑，明奸肆诬。令戴罪办案。同年四月，遣锦衣卫官刘泰等逮马禄赴京，下镇抚司狱待鞫，并传原审官李璋、李珏、章纶、马豸诣京对证。颜颐寿上言：福达反状甚明，法难轻纵。况彼以神奸妖术蛊惑人心，臣等若不能处置，一或纵舍，恐不久又有洛川之祸。臣虽伏斧钺，何抵欺罔之罪。帝怒，令出马禄与福达对质，情无反异。颐寿复以上请。嘉靖帝认为颐寿等朋比罔上。六月，都察院左都御史聂贤受到御史郑洛书弹劾，上疏乞休，许之。仍令在外听候，以大狱案未结。七月，刑部尚书颜颐寿以疾乞休，不允。嘉靖帝竟逮颜颐寿及侍郎刘玉、王启，左都御史聂贤，副都御史刘文庄，大理寺卿汤沐，少卿徐文华、顾佖于诏狱。八月初六，嘉靖帝下令改组三法司，命礼部左侍郎桂萼代理刑部尚书，兵部左侍郎张璁摄都察院，少詹事方献夫署大理寺重审此案。太仆卿汪玄锡与光禄少卿私下说：福达狱已审明，何必再审？结果被逮下诏狱。大学士贾咏与马禄是河南同乡，马禄被逮，咏写信安慰，镇抚司搜得，咏上疏引咎乞归，获准去。九月初八，张璁、桂萼、方献夫迎合帝意，审马禄于阙廷，严刑拷打，五毒备至。马禄不忍酷刑，屈打成招，被迫供认自己挟私故陷郭勋。张璁等奏闻，遂将李福达无罪释放。嘉靖帝迁怒于马禄，欲治死罪。张璁等以恐难服天下，建议遣戍广西南丹卫，缘及子孙，遇赦不宥。嘉靖帝仍不满意，对大学士杨一清说：与其祸及子孙，不如诛杀其身。一清对道：祖宗法律具有成法，马禄罪不至死而中死律。如若法外施刑，吏将缘此作奸，人将手足无措。嘉靖帝不得已，从之。以桂萼等平反有功，劳谕之文华殿，并编《钦明大狱录》颁示天下，说(张)寅非福达，本五台县人，工部漏籍匠户，侨居徐沟，曾出钱贷薛良，良素无赖，欲杀寅以逋责，即指为洛川县妖人李五，又以为崞县逆党李福达，前后情词互异，事无左验。马禄等恨郭勋，乘机中勋以危法，并附会薛良以张为李，使张寅怨家李景全、韩良相等诬成之。而给事中常泰、刘琦、员外郎刘仕三人声势相倚，挟私弹劾，佐使马禄构成冤狱。张璁、桂萼等憎恨的官员多被列上了罪名。明世宗悉从其言，结果大批无辜官员受害。其中谪戍极边、遇赦不宥者5人，谪戍边卫者7人，革职为民者11人，罢官闲住者17人，下巡按逮问革职者复5人，原告薛良依诬告罪绞，韩良相、石文举等判处死刑，张寅还职，马禄戍烟瘴地，后卒死戍所。一件本已真相大白的案件却被张璁、桂萼诸人利用议大礼事件搅得黑白颠倒面目全非。然而，历史是公正无情的。嘉靖四十五年，四川又发生蔡伯贯谋反案，不久，蔡就擒，审得他以山西李同为师。四川

抚、按移文山西，捕李同下狱。李同供认是李五孙，大礼之子，世习白莲教，假称唐裔出世，与《大狱录》姓名无异。抚、按官判李同坐斩，奉旨诛之。李福达案真相终于大白天下。 （高春平）

议复河套

嘉靖中期严嵩诬陷夏言、曾铣等人"议复河套"启动边衅，导致北方边防废弛的事件。

河套地区，三面凭河，土地肥沃，宜于农桑，而且接近明朝的榆林、宁夏、偏头关等边镇，地理位置十分重要。明朝中期，蒙古族曾入据河套不断骚扰内地。成化元年(1465)，鞑靼部孛来与小王子、毛里孩等先后进入河套，抄掠延绥、平凉、灵州、固原以及大同等地。六年，乩加思兰、孛罗忽、满都鲁等部入据河套，他们无岁不深入，杀掠人畜至数千百万。弘治(1488—1505)时，又有称为小王子的崛起，"自称大元大可汗"(即达延汗)，统一了蒙古各部，逐渐往来河套中，出没为寇。弘治十四年(1501)，小王子以 10 万骑从花马池、盐池入，散掠固原、宁夏境，三辅震动，戕杀惨酷。正德八年(1513)，又以 5 万骑攻大同，趋朔州，掠马邑。嘉靖六年(1527)，两寇宣府，明将王经、关山先后战死。达延汗统一蒙古后，还将其子孙分封在大漠南北。达延汗死后，他分封于各地的子孙，分裂成为 40 多个领地，蒙古的政治经济实权掌握在阿著之子吉囊和俺答手中，他们不断率其部众袭扰延绥诸边。河套成为蒙古族骚扰内地的一个主要基地。明朝每年用于北方的军费多达 600 万两，但依然无效。因此，有远见的大臣认为要清除蒙古部入犯的边患，就必须把蒙古族赶出河套地区。二十五年，三边总督曾铣上疏提出请复河套以绝边患的方略。内阁首辅夏言十分赞成并大力支持曾铣的主张。第二年，曾铣率兵出塞袭击，取得胜利，并再次上疏重申恢复河套的方略。但是，大学士严嵩曾受过夏言的压制，怀恨在心，又企图夺取夏言的首辅地位，便利用河套问题进行陷害。昏庸的明世宗听信严嵩的谗言，便把夏言罢官，把曾铣逮捕下狱，其他支持恢复河套的官员，或是贬谪，或是夺俸，或是廷杖。后来鞑靼可汗俺答合众入河套，谋犯延安、宁夏，严嵩又乘机激怒世宗说是曾铣开边启衅所致，于是将曾铣斩首。二十七年，俺答进扰宣府。世宗认为是因夏言、曾铣提出收复河套，俺答才报复，又杀了夏言。从此，明朝政府竟无一人议复河套，边防更加废弛。

（张海瀛）

九边的建立

明代为了防御蒙古军的进犯，在北部长城沿线相继设立了辽东、蓟州、宣府、大同、山西、延绥、固原、宁夏、甘肃九大军事重镇，史称"九边"。

明朝建立后，退居漠北的蒙元残余势力并不甘心其失败，经过一段时期的恢复，就不断南下进犯，成为明代的严重边患。明太祖朱元璋曾数次命大将徐达、常遇春、蓝玉等北征沙漠，明成祖朱棣也五次亲征，可是都未能彻底消除蒙元势力，于是明政府不得不在北部边地设立都司、行都司，实行卫所军屯及加修长城等一系列防卫措施。洪武六年(1373)先后在北部边地设置定辽都卫、燕山都卫、西安都卫、太原都卫、西安行都卫、大同都卫等。每一都卫设都卫指挥使司。都卫指挥使司等官，由朝廷选择升调，不许世袭。洪武八年十月，诏各都卫并改为都指挥使司(简称都司)和行都指挥使司(简称行都司)。北部边地共有辽东都司(定辽都卫改，治辽阳)、北平都司(燕山都卫改，治北平)、北平行都司(治大宁，后改为大宁都司)、万全都司(十年增设，治宣府)、山西都司(太原都卫改，治太原)、山西行都司(大同都卫改，治大同，洪武二十六年改)、陕西都司(西安都卫改，治西安)、陕西行都司(西安行都卫改，治甘州)八处。都司、行都司下设若干卫所。都司掌一方之军政，各率其卫所以隶于五军都督府，而听于兵部。边地都司卫所既是加强边防的军事指挥机构，同时又是边地军民屯田生产的组织机构。到洪武二十六年，定天下都司卫所，共计都司十有七。边地都司、行都司是军政合一的统治机构，集屯田练兵、慎固封守、命将专征、随宜调拨诸伍于一身。同年诏诸王分别就国，命肃王驻甘肃，辽王驻广宁，庆王驻大宁，秦王驻西安，晋王驻太原，代王驻大同，谷王驻宣府，韩王驻平凉。诸王都有权节制沿边军马，同时俱听北平燕王朱棣节制，从而使北部防线连为一体，藩王守边成为明初规制。

成祖将国都北迁后，三面临敌，边防奇重。于是在东起鸭绿江，西抵嘉峪关，绵亘万里的长城沿线设置军事重镇，分地守御。永乐初年遂设辽东、宣府、大同、延绥、宁夏诸镇。宣德四年(1429)又设山西镇，而甘肃镇则已于洪武二十七年设立。每边各设数以万计的重兵驻守，各镇统以大将，副以褊裨，监以宪臣，镇以开府，联以总督，无事则画地防守，有事便犄角为援。但明成祖朱棣之失策，在于即位后为削除藩王的力量，将宁、谷二王内徙，把大宁一带地送给从征有功的朵颜三卫，因而造成了幽燕东北之险，中国与

夷狄共之，胡马疾驰半日可抵关下的不利局势。宣德五年又弃开平，徙卫于独石，采取坐待守险的被动政策。辽东镇设镇守总兵官一人，驻广宁，隆庆元年(1567)冬移驻河东辽阳适中之地，调度防御。明朝都燕，辽东实为肘腋重地，建置雄镇，藩屏攸赖。该镇边墙修筑自永乐年间开始，其后不断增修，西自山海关，东抵开原，延袤2000余里。宣府称镇始于永乐三年，置镇守总兵官，佩镇朔将军印。该镇边墙始筑于永乐十年，其后不断修筑，东起昌平、延庆州界之火焰山，西迄大同之平远堡，延袤二三百里。镇当京师之北，居庸关为京师之门户，宣府又是居庸之藩卫。其地山川重叠，号为险塞，且分屯置军，倍于他镇。大同镇属古云中之地，川原平衍，利于铁骑进犯，故屏障京师，最为要害。该地置镇与宣府同时。后因大宁放弃，东胜、丰州不守，云川、玉林内迁，重边尽为虏窟。之后增筑镇边杀胡丫角一带，增设云岗、云阳诸堡，东西相望，声援相连，三云形势，大非昔比。该镇辖地：东起天城抵宣府镇，西界阳河界，至井坪，抵山西楼口界，边长640余里。镇内驻军雄于诸镇，加之神京外逼，虎穴其冲，时有“大同兵为天下最”之称。山西镇又称太原镇或三关镇。三关指偏头、雁门、宁武三关。永乐十年，山西沿边墩守始成。该镇东起北楼口抵大同、井坪，西至娘娘滩过河，抵延绥黄浦川，边长200余里。延绥镇明初设在绥德。正统后，蒙古古能部占据河套地区。为捍御套虏，成化八年(1472)都御史余子俊广开榆林城垣，增置36营堡。次年移镇于榆林，余子俊又于边带墩台空处，筑墙建堡，东起清水营紫城岩，西至宁夏花马池，延袤2000余里。甘肃镇相当于汉河西之金城、武威、张掖、酒泉四郡地。明初以李景隆为平羌将军镇甘肃，驻甘州城，边长1800里。

正统十四年(1449)土木之变后，明朝的北部边防局势日趋紧张。明蒙之间的战争，大不隔年，小不逾月，开平、东胜相继丢失。成化、弘治之际(1465—1505)，东边蒙古孛来、兀良哈侵扰辽东，西边鞑靼毛里孩攻打山、陕各地，占领河套，使明朝西北门户洞开。幸亏明廷相继任用余子俊、马文升、刘大夏三位名臣担任兵部尚书，整饬北边防务，才使局面一度好转。弘治十四年(1501)，明朝鉴于西北边陲局势的恶化，决定从陕西都司中再分设固原镇，这样西北地区共有延绥、固原、宁夏、甘肃四镇。固原镇下辖固、靖、甘、兰四卫，辖地包括宁夏、兰、靖以北，自蒲塘接庄浪200里。为了统一调遣，联合防守，明朝在固原镇设三边总制镇守西北边陲。但是仍无法扼制蒙古各部的入犯。此后，鞑靼小王子不时进攻宣府、大同，战争愈演愈烈。继小王子而起的俺答部盘踞宣大边外，联络蒙古诸部，拥兵数十万，向明边镇发起了强大的攻势。嘉靖二十年(1541)、二十一年，俺答两度攻入山西，大掠晋北，深入沁、汾、襄及太原附近。明边军长年东西调守，疲于奔命。明初通为一边的防御体系荡然无存，卫所屯田名存实亡。政府不断地募兵增饷，边军一面打仗，一面重新修筑边墙。在这样的情况下，明王朝只好采取“分地守御”的政策，派高级文臣武将担任各边镇的总督、巡抚。嘉靖二十七年，为了防止俺答进犯北京，加强京畿一带的安全，明廷又将蓟镇固定下来，统辖京师四周各镇，包括蓟州、昌平、永平、密云、保定、易州、井陉七处。七镇之地，东西千里，南北倍之。至此，辽东、蓟镇、宣府、大同、山西、延绥、宁夏、甘肃、固原九大边镇全部建立。而且，九边中有以镇称边，有一镇一边者，亦有数镇合为一边的情况。蓟镇作为一边，其下设七镇，明显可看出“边”是联合诸镇、分段设防的军事防区，而延绥、榆林乃一镇两地移驻。九边所辖范围基本上是明初北部边地都司、行都司所管辖的范围。它与明初边地都司、行都司所不同的是：九边设置以镇守总兵官之常设为标志。镇守总兵官由临时派遣逐渐变为常驻边地的地方武官，各自负责防区的边墙修筑、军事训练和防御抵抗，驾于都司、行都司之上，改变了明初东西连成一边，随宜调拨的防御体系。后来，又将相邻边(镇)联合设一总制或总督，以便于统一行动。如陕西四镇设三边总制，称“西三边”；山西设总督于偏头关，统驭偏头关、宁武关、雁门关，联络宣府、大同为“中三边”；“东三边”提督驻蓟镇，总督蓟、辽。每边皆设镇守总兵、副总兵、参将、游击等。总兵、副总兵，多以公、侯、伯、都督充之。总兵及所属将官的职责分工是：总兵官总镇军为正兵，副总兵分统3000为骑兵，游击分领3000往来防御为游兵，参将分守各路东西策应为援兵，营堡墩台分极冲、次冲，为设军多寡。平时走阵、哨探、守瞭、焚荒诸事，各有分工无敢惰。

明代九边的形成说明明王朝军事化统治的加强，但这并不代表边防的强固，反而意味着边防危机的加重。 （高春平）

庚戌之变

嘉靖二十九年(1550)，俺答兵犯北京，纵兵杀掠，明将冒功请赏事件。

明世宗嘉靖二十九年六月，俺答率军南下，入犯大同。宣、大总兵仇鸾，惊恐万状，束手无策。遂以重

贿收买俺答，乞求俺答不要在他的防区发动进攻。俺答接受贿赂后，便引兵东去，从古北口发起进攻，占领蓟州后，又直逼通州，致使京师告急。明世宗下诏勤王。仇鸾以重金贿求俺答不攻大同后，深知俺答必定深入内地，危及京师。为了乘机邀功，他又主动上疏请求入援。世宗很欣赏仇鸾的"忠勇"，遂命他为平虏大将军，节制诸路勤王兵马。各路勤王军马都是轻骑连夜赶来的，未带粮草。世宗下令犒赏。但户部拿不出钱粮。世宗愤怒之下，罢了户部尚书李士翱的官，令其戴罪办事。

俺答军直逼北京城下，大掠村落居民，焚烧庐舍，大火冲天。仇鸾节制的诸路勤王兵马，却不敢出战，只是坐观俺答烧杀抢掠。仇鸾的大同兵，甚至趁火打劫，比俺答兵还凶狠。兵部尚书丁汝夔惶急无策，问计于严嵩。严嵩回答说："在边塞打了败仗还可瞒住皇帝，在京郊就难以隐瞒了。俺答掳掠饱了，就会自己离去。"丁汝夔听信严嵩的话，传令诸将，不许轻易出战。兵部郎中王尚学屡次劝告丁汝夔下令出战，但丁汝夔却不敢违背严嵩旨意，只是一味等待。俺答掳掠中饱后，才引兵西去。俺答退兵后，平虏大将军仇鸾杀了数十个平民百姓的头，冒功请赏。世宗竟然加封仇鸾为太保，并赐金币。世宗感到这次俺答直逼京师对明王朝来说，是一件奇耻大辱之事，所以下令逮捕了兵部尚书丁汝夔。当朝首辅严嵩则推卸责任，杀害了执行他的旨意的丁汝夔。嘉靖二十九年按中国干支纪年，正是庚戌年。所以历史上把这次俺答入犯事件称为"庚戌之变"。 （张海瀛）

杨继盛之狱

嘉靖中期权奸严嵩陷害检举官员的事件。

从嘉靖二十一年(1542)严嵩以礼部尚书兼武英殿大学士入阁参预机务起，到四十一年被罢官为止的20年间，其中只有夏言担任过两年首辅，其余都是严嵩柄政。严嵩是以善写诗文和阿谀谄媚，取得世宗欢心而入阁的。他入阁时已年过60，老朽糊涂，但他有一个奸猾机敏的儿子严世蕃。严世蕃仗着父亲的权势，官至工部侍郎。他晓畅时务，颇通国典，见了世宗咨询的手札，往往能揣摩其意，迎合世宗的意思奏答。他又以重贿收买世宗近侍，探听世宗的言行举动。因而每当世宗要办什么事时，他都了如指掌，所以办得世宗很满意。严嵩见儿子这么机敏便偷偷让他入直代为票拟办事。诸部府有事请他裁决，严嵩总是说："等我和小儿子计议后再定。"故朝廷上下都说，皇上不能一天没有严嵩，严嵩不能一天没有儿子。严嵩父子利用明世宗的昏聩，狼狈为奸，贪贿弄权。严家富比皇帝，严世蕃曾自夸"朝廷不如我富"，"朝廷不如我乐"。严嵩父子的所作所为引起了正直官员的愤慨，纷纷上疏揭露其罪行。三十二年，杨继盛上疏曰：方今外贼惟俺答，内贼惟严嵩。陈述严嵩的十大罪状，主要是：俨然以丞相自居，坏祖宗成法；伺世宗之喜怒以恣威福，窃君上之大权；让世蕃代为票拟，纵奸子僭窃权柄；子孙无功而官，冒滥朝廷军功；纳贿营私，引用奸臣；戒守将勿击俺答，误国家军机；中伤天下善类，专黜陟之权。杨继盛说，严嵩的十大罪是依靠五奸才得逞的。其五奸大略是：贿结皇上左右，使之成为自己的间谍；控制通政司，使之成为自己的鹰犬；与厂卫官缔结姻亲，使之和自己有瓜葛；牢笼言官，使之成为自己的奴隶；网罗部臣，使之成为自己的心腹。杨继盛在奏书中写道：愿陛下听臣之言，察严嵩之奸。或召问裕、景二王，或询诸阁臣。重则置宪，轻则勒致仕。内贼既去，外贼自除。虽俺答亦必畏陛下圣断，不战而丧胆矣。奏疏递上后，严嵩唆弄世宗，把杨继盛处一百下杖刑，投入牢狱。世宗并没有杀继盛之意。在狱中关了二年后，严嵩为了不使养虎遗患，于三十四年，在一个估计皇帝必将批准处决的案件中，"附继盛名并奏"，将他杀害。杨继盛年仅40，临刑前留下这样的诗句："浩气还太虚，丹心照千古。生平未报恩，留作忠魂补。"刑部的两个官员在审理此案时，为杨继盛说了句公道话，一个被贬官，一个被下牢。总督王忬同情杨继盛之死，严嵩怀恨在心，事后找借口将王忬杀害。官员凡是反对严嵩的，没有一个不遭受陷害，轻则贬黜，重则杀头。

（张桂萍）

戚继光平倭

明世宗嘉靖年间(1522—1566)，民族英雄戚继光平定东南沿海倭寇的历史事件。

倭寇是由日本封建武士、失意政客、浪人、海盗勾结中国沿海凶徒、逸囚、罢吏、黠僧、衣冠失职、书生不得志等组成的非法武装集团。其患由来已久，早在元末明初，日本封建诸侯乘国内处于南北朝分裂混战之机，纷起网罗那些没落武士、浪人等来中国沿海进行武装掠夺。但在洪武、永乐时期，明朝国力强盛，重视海防，几次重挫来犯之倭，取得了望江靖大捷，故而倭寇之乱在明前期未酿成大患。

日本北朝统一后，大封建主足利义满鼓励海外贸易，保护大商人，并遣使入贡。明成祖遂和日本恢复"勘合"通商，规定日本十年一贡，每次船两艘，人

200。宣德时修约，日本贡船增为三艘，人员增至300。但日本很少遵约而行，进贡次数、船只及人员都超过规定，甚至携带兵器，进行武装走私。明朝则采取保护正常贸易和严饬海防两手并重的策略。正统(1436—1449)以后，宦官专权，政治腐败，海防逐渐废弛，倭寇之祸日趋严重起来。特别是嘉靖时，倭寇的侵扰愈演愈烈。当时日本已进入“战国时代”，各封建主争相与中国通商。嘉靖二年(1523)，细川氏贡使端佐、宋素卿和大内氏贡使宗设分道来宁波。大内氏贡船携正德勘合先至，细川氏贡船携弘治勘合后到。照宁波市舶司的规章，货物的运岸和点检顺序以勘合号数为准，若勘合号不同，则以船进港先后为序。但宋素卿贿通明朝市舶太监，抢先办理手续，宴会时又以端佐为上座，宗设为下。宗设大怒，施展海盗惯伎，杀端佐，追宋素卿至绍兴城，沿途大掠，杀明朝备倭都指挥刘锦、千户张镗，并夺船出海，引起浙中大震。此即“争贡事件”。

争贡事件发生后，明廷因噎废食，在一些官员“倭患起于市舶”的鼓噪下，停罢市舶司。这既不利于防倭，又打击了东南沿海工商业。倭寇遂勾结沿海大奸商汪直、徐海、李光头等更加疯狂地劫掠，焚毁浙江、福建、广东等沿海地区无数民居。嘉靖二十二年，明廷任命朱纨为浙江巡抚，提督浙闽防务。朱纨到浙后，日夜练兵禁海，搜捕奸商，擒杀李光头、许栋等90多个海盗头目，取得了明显的成效。但他的行为损害了靠通番发财的沿海大地主阶级的利益。他们指使闽籍巡按御史周亮出面联络在朝浙闽官员诬陷朱纨灭海盗时错杀了良民百姓。朱纨向皇帝申辩，并且愤慨地指出：“去外国盗易，去中国盗难；去中国濒海之盗易，去中国衣冠之盗尤难。”这样，沿海大地主集团对他更加痛恨，群起猛攻。明政府罢免了朱纨，派官查办此事。最后朱纨在“纵天子不欲死我，闽浙人必欲杀我”的情况下被迫自杀。

朱纨死了，可是倭患并未解决，反而更加猖獗。嘉靖三十年，明廷又开海禁，但因卫所军兵腐败，海防空虚，加之权奸严嵩当权，局势更为恶化。嘉靖三十一年，汪直、徐海、毛海峰导倭寇犯台州，破黄岩，大掠象山、定海，浙东大震。明廷以都御史王忬提督军务严加防御。次年三月，汪直勾引倭寇率战舰数百大举入犯，浙东西、江南北，滨海数千里，同时告警。王忬指挥参将俞大猷、汤克宽破汪直于普陀山，斩敌280余人。此后，倭寇飘忽往来于苏、浙沿海，王忬亦不能制。嘉靖三十三年五月，明朝任命南京兵部尚书张经总督江南、江北、浙江、山东、福建、湖广数省军务。张经慷慨自负，选将练兵，日夜筹划捣毁倭穴，并于次年五月指挥军民取得了王江泾大捷，斩倭1900余，溺水死者无数，残敌驾200艘船狼狈出海逃遁。但严嵩的党羽工部侍郎赵文华与浙江巡按胡宗宪在事前诬告张经糜饷殃民，事后又上疏冒功，硬说王江泾大捷是他和胡宗宪督师的结果。嘉靖帝不辨忠奸，竟将张经斩首，令赵文华督察军务，升胡宗宪为浙江巡抚。此间，胡宗宪虽也诱杀了徐海、汪直、陈东、叶麻等通倭头目，但由于赵文华恣行无忌，文武将吏争相贿赂，颠倒功罪，纪律大坏，将吏解体，虽征兵半天下，倭寇愈炽，对浙、闽沿海侵扰更甚，给东南沿海人民的生命财产带来了不可估量的损害。就在国家和民族屡遭倭祸，抗倭斗争久经波折，倭患难以彻底解除的危难关头，终于出现了一位著名的抗倭爱国将领戚继光。

戚继光(1528—1587)，字元敬，山东东牟(山东莱芜)人，出身于将门，自幼刻苦读书，好研学兵书战策。嘉靖二十三年，其父戚景通去世，他袭官登州卫指挥佥事。倭寇对山东沿海地区的不断侵扰，深深刺激着这位青年将军。他在16岁时，便写下了“封侯非我意，但愿海波平”的诗句，表达自己抗倭保国的远大抱负。嘉靖二十九年秋八月，戚继光入京参加武举会试，正值庚戌之变，蒙古俺答入寇京师，形势十分危急，明廷诏令各镇边兵驰援北京，入试武举也被选守城。戚继光当即率众参加了京师保卫战，并条陈御敌方略，受到兵部重视，于是以“国士”奏闻皇帝。此后数年间，戚继光率领军民驻守蓟门，驰骋于山东半岛沿海和蓟州边塞之间，保卫着明王朝的长城要塞和山东海防。嘉靖三十二年，戚继光以军功升任都指挥佥事，统管三营25卫15万兵士，专门负责防御山东沿海的倭寇。他整饬海防，出海备倭，严阵以待，倭不敢犯。但是其它沿海防务十分松懈，加之严嵩父子当国，兵将多以贿得，卫所兵士逃亡大半，只剩22%，且多老弱残疾，战斗力极差。由于江南倭患日趋严重，明廷于嘉靖三十四年秋，调戚继光前往浙江，次年升他为参将，率部守宁波、绍兴、台州三郡，不久又改守台州、金华、严州三郡，防御着倭寇侵扰的要害地带。

嘉靖三十六年，浙直总督胡宗宪招降巨奸汪直，汪余党卫潋等率众据岑港(浙江定海西北)死守。胡宗宪命戚继光随俞大猷领兵进剿，久围不克，戚继光等均被褫职并令戴罪办贼。岑港之役失利，戚继光深感卫所军兵多不堪用，各地调来的客兵缺乏训练，纪律败坏，甚至杀良冒功。于是他上书胡宗宪，主张在

"俗称剽悍"的义乌招募农民和矿夫,组织、训练一支新军劲旅,来保卫乡土,打击凶残的倭寇。他之所以选定义乌作招募地点,是因为嘉靖三十七年处州山区的矿夫和义乌陈、宋大族发生了规模巨大的械斗。戚继光对其自相残杀极为痛心,但也因此发现了他们剽悍勇猛的风俗,认识到如将之编成新军,导之抗倭,将发挥很大的作用。他的要求被批准。嘉靖三十八年秋九月,戚继光亲自来到义乌招募矿夫和农民。在他热爱祖国、保卫家乡的号召下,矿夫、乡团在各自的首领王如龙、陈大成率领下踊跃投军,很快组建起一支3000人的队伍。经过两个月的严格训练和教育,士兵们的思想和战术有了极大的提高。戚继光又根据江南水乡的地形特点,创立了各个兵种互相配合、长短兵器组合使用的新阵法——鸳鸯阵。这种阵法将盾牌、狼筅、长枪、叉、耙、棍、刀等长短武器配合使用,各尽所能,密切配合。打起仗来,挽牌手在前面"低头执牌前进",其余兵杖"紧随牌进","筅以救牌","长枪救筅","短兵救长枪"。倘情况有变,鸳鸯阵还可变为"三才阵"、"两仪阵",调整队形排列,灵活应敌。这支军队战斗力很强,很快便成为抗倭劲旅,被誉为使倭寇胆颤心惊的"戚家军"。

嘉靖四十年四月,倭寇数千人大举焚掠台州的桃渚、圻头。戚继光闻讯率部急趋宁海,扼住桃渚之敌,在龙山大败倭寇,追击至雁门岭。倭寇狼狈逃走,途中侦知戚家军大多开往前方,台州空虚,遂偷袭台州。戚继光回军与战,手斩其魁,将敌残余追至瓜陵江全部歼灭。进犯桃渚的倭寇刚被消灭,圻头之倭又来进犯台州。戚继光乘敌未至,率领精兵1500人迎头痛击。倭寇败退大田,坚壁不出,乘大雨逃往仙居。戚继光率军先行抵达仙居,设伏截击。倭寇大败,死伤甚众,少部分逃奔白水洋,匿百姓家。居民痛恨至极,纵火攻倭,全被歼灭。戚继光先后九战九捷,俘敌一千有奇,焚溺死者无数。此后,总兵官卢镗、参将牛天锡又在宁波、温州一带大败倭寇,浙东的倭寇遂告平定。

台州大捷后,戚继光以军功升都指挥使,肩负起更加重大的海防责任。他又增募义乌民兵2000人,使戚家军精锐部队达到6000余人。嘉靖四十一年,福建成为倭患的中心,自温州而来的倭寇,会合福宁、连江之倭,攻陷寿宁、政和、宁德;自广东南澳转来的倭寇,与福清、长乐之倭相会,攻陷玄钟所,延及龙岩、大田、古田、莆田。倭寇还在横屿岛扎下大营。福建的明军面对日益猖獗的倭寇束手无策,连连向朝廷告急。明廷决定以浙援闽,胡宗宪檄调戚继光入闽剿倭。同年七月,戚继光率所部精卒6000人由温州航行至平阳,斩荆棘,冒毒雾,陆行300里间道入闽。针对倭寇扎营于横屿、牛田、兴化三地,互为声援的特点,戚继光决定先破倭寇大本营横屿,乘胜攻牛田,最后灭兴化。横屿四面临海,离岸10里,潮来成海,潮退成泥,陆军跋涉进攻,极感困难。若调海船来攻,又时有搁浅之患。戚继光令军士负草填泥,匍匐前进。倭寇未料到戚家军涉海作战,仓促应战,一败涂地。戚家军连克要隘,捣破寇巢,斩倭2600余级,乘胜南进至福清,人民夹道欢迎。戚继光扬言我兵远来,须养锐待时而动,非朝暮可计。倭寇侦知,遂不防备。哪知戚继光当夜便亲自率军奇袭牛田倭巢,倭寇被焚杀殆尽,剩下的逃窜到兴化。戚家军稍事休整,即连夜追歼兴化的倭寇,夜四鼓抵贼栅,连克60营,斩倭1000余人,焚溺死者数千。第二天黎明,兴化人方知倭寇已被彻底消灭。居民扶老携幼,备彩帐郊迎十余里,道路充塞,杀牛载酒犒迎戚家军入城。福建倭寇基本肃清,戚继光班师回浙。但不久,又有大批新倭来到福建。嘉靖四十一年十一月,倭寇又陷兴化,占据莆田县东90里的平海卫为巢穴。明廷为了解决福建的倭患,调抗倭名将俞大猷为福建总兵官,升戚继光为副总兵,驰赴福建救援。嘉靖四十二年四月,戚继光率军赶到。福建巡抚谭纶调各路援军攻平海卫,戚继光担任中军,俞大猷任左翼,广东总兵刘显为右翼。在战斗中,戚家军奋勇冲杀,首登敌垒,阵斩倭寇2200余人,救还所掳男女3000余口。戚继光因功升都督同知,世荫千户,并代俞大猷为总兵官。平海卫既克,兴化随即收复。盘踞闽北府和寿宁诸县的倭寇,本想南下与平海卫之倭会合,至此只好逃窜。戚继光率军北上追击,在连江的马鼻、宁德的肖石岭围歼倭寇,斩杀1600余,倭寇焚溺死者万余。明廷大喜。这年冬,倭寇余党又纠合新倭1万多人围攻仙游。第二年春,戚继光率军相继败倭于仙游城下、同安王仓坪、漳浦蔡丕岭等地,斩获甚多,余倭掠渔船出海逃去。至此,福建倭寇亦被戚家军全部肃清。

福建倭寇平定后,广东东部还有2万多倭寇残害人民。明政府任命吴桂芳提督两广兼理巡抚,又命俞大猷为广东总兵,围剿倭寇。嘉靖四十三年秋,广东海寇吴平勾结倭寇侵扰闽、广沿海。第二年,闽、广会师合剿。广东总兵俞大猷统率水师,福建总兵戚继光率领步兵,合力进攻,一举克复吴平根据地南澳。戚继光追吴平至潮州,吴平又逃往雷州、廉州。戚继光返回漳州,遣部将傅应嘉会同俞大猷追吴平出广东。嘉靖四十五年,吴平率舟30余艘遁入安南,被明

军追及歼灭，倭寇余孽荡平。东南沿海倭患至此全部消除。爱国军民的抗倭斗争取得了最后胜利。

（高春平）

葡萄牙侵占澳门

嘉靖年间，葡萄牙殖民者用贿赂明朝地方官吏的卑劣手段，强行租占我国领土澳门的历史事件。

公元15、16世纪之际，随着新航路的发现，欧洲一些处在资本原始积累时期的资本主义国家，纷纷进行海外掠夺和殖民扩张。葡萄牙、西班牙、荷兰等早期殖民国家相继来到东方，抢占殖民地，并把矛头对准了中国。明武宗正德六年(1511)，葡萄牙殖民者侵入满剌加(马六甲)，逐走了国王，阻断了中国与南洋各国的交往与贸易。接着，葡萄牙殖民者以满剌加为基地，进一步侵略中国。正德十一年(1516)葡萄牙马六甲总督佐治(Jorge d'Alboquerque)派裴来斯特罗(Rafael Perestrello)来到中国。次年，葡萄牙又派皮来资(Thomas Pires)以国王名义充任大使和安特拉德(Fernao Perez d'Andrade)率舰队来中国屯门岛，想进入广东，遭到中国地方政府的拒绝。葡萄牙舰队就强行驶入内河，开向广州，沿途鸣铳放炮，声震城野，气焰十分嚣张。皮来资到达广州后，即要求到京师去见明朝皇帝。广东的地方官员，以其国素不列于《王会》，留其使报闻明廷。明政府命令广东地方官赐方物遣归。但葡萄牙殖民者却赖着不走，后来买通镇守太监，始允许进京。当皮来资及其翻译火者亚三前往北京时，留在广东的葡萄牙殖民者就开始进行抢掠活动。他们强占广东东莞县的屯门岛，所到之处剽劫行旅，掠夺子女玉帛，筑室立寨，无恶不作，完全暴露出一副海盗嘴脸。不久，满剌加的求援信送到北京，明朝政府才知道满剌加已为葡萄牙侵占，再看他们在广东的强盗行径，认为听其往来贸易，势必争斗杀伤，加剧南方之祸，决定拒绝来往。其时明武宗朱厚照已死，明世宗朱厚熜即位。明朝政府遂于嘉靖元年(1552)杀了火者亚三，并把在广东的葡萄牙殖民者驱逐出境。葡萄牙殖民者妄图用武力夺回侵略据点屯门岛，又在第二年寇掠广东新会县，结果被明朝指挥柯荣、百户王应恩打得大败，明军夺获其战船两艘及大量火炮军械，并把火炮称为佛郎机。葡萄牙殖民者在广东被爱国军民驱走后，还不甘心失败，又转向浙江、福建沿海地区。嘉靖十九年前后，他们又乘倭寇抢掠沿海之机，勾结中国海盗李光头、许栋及倭寇，在宁波的双屿建立据点，进行武装走私和抢掠活动。嘉靖二十七年，明副都御史朱纨派都指挥卢镗、副使魏一恭率兵攻打双屿，把殖民者全部驱逐出境，并烧毁他们所建的营房，用木石筑塞港口。被赶跑的葡萄牙殖民者又窜到福建泉州府的浯屿(金门岛)，会合原来在那里的倭寇，继续进行走私贸易和海盗活动，不断地骚扰漳、泉等地，给福建沿海地区人民的生命和财产带来巨大的损失。嘉靖二十八年，朱纨和福建巡海道副使柯乔合兵进攻浯屿，葡萄牙侵略者乘战船逃向诏安，朱纨和柯乔率领明军在走马溪堵截。广大爱国军民奋勇冲杀，使得葡萄牙殖民者的精良武器发挥不了作用，大铳不及点火，就或死或俘。这次战役沉重打击了外国殖民者的气焰，长期勾结葡萄牙殖民者的中国奸商、海盗头目李光头等96人，也在战斗中被擒获处死。殖民者在广东、浙江、福建沿海岛屿建立的侵略据点，先后都被拔除。但是，葡萄牙殖民者仍不罢休。他们在武装强占中国沿海领土的阴谋无法得逞的情况下，又采用卑鄙的贿赂手段来实现其侵占澳门的目的。原先，明朝政府为管理对外贸易，在广州设有市舶司，管辖东南亚地区暹罗、占城、爪哇、琉球、浡泥诸国的互市。正德时，市舶司曾移到高州的电白县。嘉靖十四年，葡萄牙侵略者买通明朝指挥黄庆，把市舶司迁移到壕镜(澳门)，乘机混入，准备阴谋占据澳门。到嘉靖三十二年，葡萄牙殖民者谎称商船遇到风暴，愿借澳门曝晒货物，并向明朝海运副使汪柏行贿，出租金，进而上岸定居。嘉靖三十六年，葡萄牙殖民者得寸进尺，竟在澳门私自扩充居地，建筑炮台，设官管理，强行租占。这样，由于明朝政府吏治腐败，个别官吏的受贿卖国行为，使中国的神圣领土澳门被葡萄牙殖民者长期租占窃据。但澳门的领土主权永远属于中国。万历时，明朝政府一直行使主权，派官吏管理澳门，每年向葡萄牙殖民者征收地租税金。到20世纪末，我国政府将在1997年收回香港之后收回澳门。

（高春平）

一条鞭法的推行

明代中叶改革赋役制度的重大措施。它是明代中叶以来赋役改革的总集成，是在张居正加强法制、打击豪强、清丈田亩的基础上在全国范围内推广开来的。

一条鞭法，又称条鞭法。它是把田赋、徭役以及各种杂差、贡纳，并为一条，折成银两征收的一种赋税制度。在不同时期和不同地区，其具体内容又各不相同。大而言之，它的共同要点包括以下四条：

第一、合并赋役，将一部分徭役摊入田地，按亩

征收。秦汉以来,赋与役是分别征派的。其时,赋役征派的对象由户、丁、田三部分构成。汉代的赋役,以丁身为本,即以户、丁为主。南北朝时期的田租、户调以及隋唐时期的租庸调,是对人(户、丁)之税与对物(田亩)之税并行的赋役制度。唐中叶以后的两税法,虽说“唯以资产为宗,不以丁身为本”,但徭役的征派不仅依然存在而且还相当繁重。宋代在推行两税法的过程中,同时还征收丁身米钱和役钱等项。到了元代,仍有科差、杂泛等征派。明初的赋役制度,依然有里甲、均徭、杂泛等对丁身之征派。从两汉到明代的发展历史表明,赋役征派由以丁身为重点到以地亩为重点,这是中国赋役制度发展的规律。一条鞭法将赋与役合并,并将一部分徭役摊入地亩征收,加重地亩之税,减轻丁身之税,这是符合中国赋役制度发展规律的。

赋役合并,包括三方面的内容:其一是役内里甲、均徭、杂泛等项的合并;其二是赋内各项诸如官民田土科则的合并以及土贡方物、杂项课税的合并征收;其三是赋与役的合并,即将一部分徭役摊入地亩征收。前两者是赋和役内部的合并,第三种是赋与役的合并,即将役的征派以一定比例摊入地亩征收。这种合并在中国赋役制度史上具有划时代的意义。将役摊入地亩征收,主要有四种形态:第一、以丁为主,以田为辅。例如某县役银总额为 1 万两,丁摊 6000,田摊 4000,即是以丁为主;第二、以田为主,以丁为辅,例如按税率摊派,每亩出役银六钱,每丁出四钱,便是以田为主;第三、丁田平均分担,各占一半;第四、徭役银全部摊入地亩征收。

此外,有的地方将土贡方物亦编入条鞭法征收。例如,湖广宝庆府的土贡方物及其解运费用,全部编入条鞭法,随粮带征,不另立项目。还有的地方,将与赋役毫无关系的杂税,亦编入条鞭法内,一并征收。例如,广东韶州府将杂税项下的门摊、商税、酒醋茶引、油榨场、坑窑冶、没官屋赁、河渡、牛租、牙行、税契等项额银,全部编入条鞭法内征收,甚至出现了“银存而名亡,至有不知其名者”的现象。其它诸如广州、南雄、惠州、潮州等府,都有类似的情形。

明初,民户食盐皆从官领,计口纳钞。至正统年间,始有商贩,官府不复颁盐,但征钞如故。实行条鞭法后,户口食盐钞的摊派亦编入条鞭法内,统一征收,成为条鞭法的一个组成部分。

第二、里甲十年一轮,改为每年佥派一次。明代的里甲制,原先是十甲轮充,每年只役一甲。这在“事简里均”的明初,尚较适宜。但到后来,“事烦费冗”兼以十年之中人户丁产消长不一,变化很大,各种不公平现象日益严重。就里甲制本身而论,亦有其内在弱点。诸如,各年的差役繁简不同,各甲的丁粮多寡不同,要使其适均实属很难。再加上各甲之内的优免赋役人户的多少不同,所以,即使每年差役总数相等,而丁粮多、优免户少之甲,每户负担必轻,丁粮少、优免户多之甲,每户负担必重。至于均徭中银差与力差的分别,原有调剂贫富负担之意。力差较重,故以粮多者编充;银差较轻,故以粮少者编充。但由于奸滑豪强勾结吏胥作弊,结果反使粮多者得轻差,粮少者得重差。此外,他们还用“花分”、“诡寄”、挪移出甲等办法,逃避赋役。例如,某官依例当免田粮千亩,而他却有田万亩,于是便将万亩之田花分于十甲之中,每年各免千亩,十年轮充一遍后,实际上是万亩之田均不纳田粮,此则为花分诡寄。又如,某势要之家与胥吏勾结,凡遇编审徭役之年,先期将田亩转移于下甲人户名下,到下甲编佥徭役时,又转到已役过之甲户名下。此即为挪移出甲。由此可见,十年一派虽有“一劳九逸”之好处,但却易为豪滑之民作弊,特别是在吏治腐败的情况下,赋役之不均更为严重。针对这种状况,有些官员就主张变十年一派为一年一派。例如,苏州知府王仪,就主张一年一派。因为一年一派可使徭役征派与人户丁粮的变动大体相符。江南一些地方在推行十段锦法过程中,就改十年一派为一年一派。一条鞭法推行后,全部统一为一年一派。

第三、赋役的征收解运,由民收民解改为官收官解,减少了层次,简化了手续。自宋元以来,两税之征收解运,均由里正、保甲负责。但因吏胥作弊,敲诈勒索,民不堪命。明初遂改为由粮长负责征收解运。粮长是由民间推选的,故称为民收民解。明代各地的税粮都分为两部分,一曰存留,即留供本地开支的部分;一曰起运,即解运中央或指定地点的仓库。距离较远、运输困难的仓口,称曰重仓口;距离较近、运输方便的仓口,称曰轻仓口。用途较急的称急项税粮,用途缓的称缓项税粮。由于吏治腐败,吏胥作弊,变轻仓口为重仓口,改缓项税粮为急项税粮,成倍加重解运负担,致使解运成为一大灾难。一条鞭法推行后,税粮的征收和解运,均由政府派官担任。这样,就把原来的民收民解改变为官收官解。

第四、在征收方面,由实物改为货币,除漕粮外,一律折收银两。自两汉以来,我国的税制,一直以征收实物为主。汉代的人丁税,虽曾以货币输纳,但其后又转化为实物诸如丝麻绢布之类。唐中叶推行两税法后,两税虽以货币计算,但征收时仍然是实物。

宋代的两税虽有折银征纳的情况，例如宋神宗熙宁十年(1077)，夏税秋粮均有折银输纳的现象，但属例外，并非定制。明初的税制，亦偏重实物。到了明英宗正统元年(1436)，才将一部分地区的税粮折为银两征收，名曰“金花银”。这是银两成为征纳正赋的开始。但“金花银”仅在局部地区推行。一条鞭法推行后，才在全国范围内，除漕粮征收实物外，其余赋役一律折收白银。这样，就在全国范围内正式确立了白银在赋役征收中的法定地位。这是一个历史性的重大变化，这个变化正是明中叶以来商品货币经济发展的产物和反映。

从上述一条鞭法的主要内容可以看出，一条鞭法的推行，乃是对明代赋役制度的重大改革。但一条鞭法的推行，却经历了一个曲折的历史发展过程。

早在明嘉靖十年(1531)三月，御史傅汉臣就上疏请行一条鞭法，但那时仅为一时一地所采用的税法，并未成为定制。到了嘉靖十六年，大学士顾鼎臣与巡抚欧阳铎、苏州知府王仪共同议定，推行旨在调剂赋役不均的“征一法”，其内容较之一条鞭法简单得多，且亦不完备。直到嘉靖四十年前后，才在南方一些省内逐步推行起来，其中比较早的是江西、浙江和南直隶，其次是两广和福建。

嘉靖三十五年，江西巡抚蔡克廉倡行一条鞭法，但由于王府、贵族、官绅的反对，遂革不行。嘉靖四十五年，巡抚周如斗又苦心筹划，准备推行，但又病逝于官，未能如愿。隆庆二年(1568)，巡抚刘光济再次上疏请行条鞭法，获得允准，才逐步推行起来。因条例颇为周详，对后世影响较大。

在浙江推行一条鞭法最有成效的是巡按御史庞尚鹏。从嘉靖四十年到隆庆元年七年间，庞尚鹏多次改革赋役制度，初行里甲均平法，后行十段锦法，最后归结为推行一条鞭法。万历元年(1573)张居正出任内阁首辅后，庞尚鹏又巡抚福建，万历四年至六年间，又在福建大力推行一条鞭法。其后又在广东、广西推广开来。

在南直隶推行一条鞭法最力的是海瑞。隆庆三至四年间，应天巡抚海瑞，摧豪强、抑兼并、丈田亩、均科则，大力推行一条鞭法，深受小民拥护。但由于侵犯了豪绅地主的利益，受到攻击，被加上“沽名乱政”的罪名，革职归田了。

嘉靖至万历初推行一条鞭法的实践表明，只有在打击不法权贵、抑制兼并、清丈田亩的基础上，一条鞭法才能真正推广开来。否则，只能时行时停，中途夭折。万历初年，随着张居正改革的全面展开，一条鞭法才真正推广开来。张居正当政的10年间，除了江西、浙江、南直隶、福建、两广继续推行一条鞭法外，其余各省诸如河南、山东、湖广等省，亦都先后推行了一条鞭法。在张居正震撼朝野的全面改革的有力推动下，在全国范围内形成了“天下不得不条鞭之势”的潮流。万历十年六月，张居正病故后，神宗皇帝虽然可以凭借至高无上的皇权，废止张居正改革，查抄张居正的家产，但却改变不了“天下不得不条鞭之势”的历史潮流。所以，万历十年以后，推行一条鞭法的地域仍在日益扩大。至万历十五年、十六年、十七年，贵州、云南、四川、山西、陕西以及甘、肃二州卫，亦都先后推行了一条鞭法。至是，全国南北直隶、十三布政司都推行了一条鞭法。张居正改革赋役制度、推行一条鞭法的宿愿，得以全面实现。万历十七年以后，史籍中虽不乏关于推行一条鞭法的记载，但一般都是关于一条鞭法的修订、完善以及在某些偏远地域的推广罢了。　　(张海瀛)

潘季驯治理黄河

明朝嘉靖(1522—1566)到万历(1573—1620)年间，著名水利专家潘季驯四次治理黄河的事迹。

潘季驯(1521—1595)，字时良，浙江乌程(浙江吴县)人，嘉靖二十九年(1550)进士，是明代杰出的治黄专家。嘉靖四十四年(1565)，潘季驯由大理寺左少卿晋右佥都御史，总理河道，开始治黄生涯。不久，他与另一位水利专家朱衡共同开挖了新河，以功晋右副都御史。第二年丁忧离职。当时治理黄河着眼在保运河。因为自明成祖朱棣迁都北京以后，明政府每年都要从江南沿运河调运400多万石漕粮到北京，供给军国之需。因此，漕运是系关国计民生的大问题。而这条贯通南北的大运河又有一段与由西向东流的黄河交汇。这样，黄河不仅逼近运河，而且从淮阴到徐州一段黄河水道也就是运河水道。黄河不断地决口泛滥，便直接冲击运道，威胁运河的安全。面对难以驯服的黄河，很多治河的人采取“以邻为壑”的办法，消极地保运河。他们在黄河北岸修筑长堤，有意拦河南行，任凭它泛滥漫流，以保护东部的运道。对淮阴以下的淮河决口也不主张堵塞，只当它是入海通道。再不行，就干脆躲开黄河，另开新运河。潘季驯坚决反对这种不顾老百姓死活的做法。他在奏疏中屡次说道：既要免除运道受阻，又要解除受害百姓的痛苦。提出了“民生运道”两便的积极治河方针，认为黄河运河相通，治黄即保运，黄河淮河相汇，治淮也就是治黄，既不能离开治黄谈保运，更不能抛开

淮河谈治黄。隆庆四年(1570),黄河又在邳州、睢宁决口,潘季驯第二次办理河务,堵塞决口。但当河防工程结束,数万艘搁浅的官民船只启碇北上的时候,突然连日大风暴雨,紧接着山洪又滚滚而来,河水漫过堤顶,新修的堤防多处决口,官吏民夫十分惊慌,纷纷准备逃散。这时,潘季驯正患背疽,他忍着疼痛赶到工地,亲自督率民工,抢堵决口。官民们很受感动,群情振奋,终于化险为夷。万历六年(1578),河决崔镇(泗阳县西北),黄河北流,清河口淤塞,淮河南徙,宿迁、沛县、清河(今淮阴)县、桃源(今泗阳)两岸多坏,淮阴县西南40里的高家堰湖堤大坏,淮阴、扬州、高邮、宝应间成了一片汪洋。大学士张居正深以为忧。在这种情况下,潘季驯被任命为右都御史兼工部右侍郎,第三次挑起了治河的重担。其时,朝廷上关于治河的方案不一致,有的主张在下游多开支河,疏浚海口,以便急流化弱,宣泄而下;有的建议塞崔镇决口,筑桃、宿长堤,修理高家堰,开复老黄河。但是以往经验证明这样做不行。河水越分疏,水流越缓,沙越易沉,淤塞越快,也越容易泛滥。潘季驯力排众议,他与督漕侍郎江一麟亲自到入海口观察水势,沿黄河淮河运河岸边调查,虚心向官吏、居民、船工、篙师请教。有一次,他乘坐小船到河中勘测,遇上了大风,小船颠簸在涡底浪尖,处境十分危急。幸亏小船被树挂住,才得脱险。经过一番认真的调查,最后他得出结论说:故道久堙,虽浚复,其深广必不能如今,应筑崔镇以塞决口,筑遥堤以防溃决,淮河水清黄河水浊,淮河水弱黄河水强,黄河水一斗,泥沙即占其六,入秋更达十分之八,水流不急,沙必停滞,应当借淮河之清水,冲刷黄河的泥沙,筑高家堰收束淮河水进入清口,以敌黄河水,使淮河、黄河二水并流,则海口自然畅通。于是,他上疏明神宗,提出了治河的六条办法:塞决口以挽正河;筑堤防以杜溃决;复闸坝以防外河;创滚水坝以固堤岸;止浚海工程以省糜费;停开老黄河之议以仍利涉。他的报告获得明廷批准,于是按照这个计划治理黄河。从万历六年夏到次年十月工程结束,共筑高家堰堤60余里,归仁集堤40余里,柳湾浦堤东西70余里,塞崔镇等决口130,筑徐、睢、邳、宿、桃、清两岸遥堤5.6万余丈,砀、丰大坝各一道,徐、沛、丰、砀缕堤140余里,建崔镇、徐升、季泰、三义减水石坝四座,迁通济闸于甘罗城南,淮、扬间堤坝无不修筑。此后数年,黄河没有发生大的水患。万历八年春,潘季驯因功加太子太保,晋工部尚书兼左副都御史,同年秋又升南京兵部尚书。万历十七年,黄河水暴涨,冲入夏镇,坏田庐,居民多溺死。年近七旬的潘季驯不顾自己年迈体弱,第四次出治黄河。为了尽快消除徐州一带的水灾,他拿着畚锸,与民工们一起,在泥泞的萧苇中指挥大家抢险。霜雪侵染着他稀疏的白发,风雨扑打着他瘦黑的面孔,他劳累咯血,还依然坚持着将决口全部堵塞。万历十九年,以功加太子太保、工部尚书兼右都御史。他把毕生心血奉献给了治黄事业,直到万历二十年告老退休的时候,这位72岁的老臣还对明神宗朱翊钧说,“去国之臣,心犹在河”。

潘季驯治理黄河的成绩是很显著的。万历初年,黄淮横流四溢,经年不治。在他治理下,一年之间,两河归道,沙刷水深,海口大辟,田庐尽复,流移归业,使黄、淮、运河保持了十多年的安定。万历十一年,张居正死后,家属被逮,子敬修自杀,他认为治居正狱太急,建议宥免年过八旬的居正老母,结果被指责党庇张居正,削职为民,黄河的事情便不再有人认真过问,河患又渐渐严重起来。万历十六、七年间,当权者不得不再次起用潘季驯治河,黄河沿岸老百姓才又得以安居乐业,数万艘运粮船也能够扬帆北上。潘季驯不仅实地领导了成绩卓著的治河工程,而且很注意对治河经验的总结,写出了《河防一览》、《宸断两河大工录》等治黄专著,提出了许多极有价值的治河方略。他根据长期的治河实践,提出了治河以束水攻沙为基本原则。这是很合乎科学道理的,因为黄河之水合则流急,急则荡涤而河深,分则流缓,缓则停滞而积沙。为了贯彻这一基本原理,潘季驯非常重视塞决口和河堤的修建。他提出和实施了完整的束水防患的堤防系统。他所筑的堤包括“束水归漕”的缕堤,离它二三里之外的遥堤,二堤之间的格堤,缕堤之内增加它的坚固性的月堤及滚水坝。缕堤是关键,遥堤是屏障,格堤是缓冲,构成洪水的三道防线。同时,堤上栽柳,植芦苇,种茭竹,以便固土固堤。这三类堤的功能是缕堤束其流,遥堤缓其势,滚水坝泄其怒。缕堤筑于接近河滨的地段,这是平时用来约束河水使之奔流于河床之中的。当山洪暴发,河水流量太大时,河床往往不能容纳过量的洪水,因而须事先离河二三里另筑遥堤一道以防洪水侵及陆地,起缓冲作用。至于滚水坝,那是选择地势低洼而又地基坚实的地段,用石头砌成,当洪水涨到一定高度时,洪水会通过减水坝宣泄一部分,贮于低洼地带,以免河床里水量过多。由于减水坝用石头筑成,因而一般不会被水冲溃造成灾害。为了使缕堤、遥堤等坚固不坏,潘季驯对于筑堤所用的泥土等也非常注意。他说,必真土而勿杂浮沙,高厚而勿惜巨费,让远而勿与争地,

则堤才能坚固。这就是说：要用富于粘性的土，不要杂以浮沙；要有足够的高度厚度，不可为节省开支不顾质量，要在远处挖土培堤，不可就近挖土，以防损及堤基，动摇根基。潘季驯总结的这些治理黄河的经验，是一份宝贵的历史遗产，对于今天治理黄河，仍有一定的参考价值。（高春平）

明代王学的崛起

明代中期，随着社会矛盾的加剧，原来在思想领域内占据统治地位的朱学已失去笼络控制人们思想的作用。于是以王守仁为代表的王学应运而生，崛起于思想界。

王守仁（1472—1528），字伯安，浙江余姚人，是明代著名的主观唯心主义哲学家。他曾在浙江绍兴的阳明洞读书讲学，所以人称阳明先生。他生活的时代，是中国封建社会日趋没落和资本主义萌芽日益滋长的历史变革之际。在此特定背景下，农民起义此起彼伏，南倭北虏交相侵逼，藩王反叛时有发生，手工业和商品经济的发展不断冲击和破坏着传统的封建秩序。加之宦官擅权，政治黑暗，使得明王朝面临着严重的政治危机。与此同时，明代前期崇奉宣扬的程朱理学也成为僵化的教条和封建士大夫猎取功名的工具，出现了许多言行不一致的假道学，失去了明初用以统治人民思想的效能。这一切引起了王守仁的忧虑和关切。他认为天下不治、时局动荡是由于世风衰薄、道德沦丧，而士风衰薄、道德沦丧则在于学术之不明，学术不明又是朱学崇尚空谈、不务实际的流弊所致。于是王守仁结合自己镇压江西、福建、广东等地农民起义和平定宁王朱宸濠叛乱的实践，从攻讦朱学入手，创立了他主观唯心主义的“心学”，力图用“心学”来取替“朱学”，作为维护封建统治的精神武器。他的“心学”从思想体系来看，比南宋陆象精致完整和广泛得多。其主要内容包括“心外无物”、“心外无理”的主观唯心主义宇宙观；“致良知”的先验唯心主义认识论；“知行合一”的封建伦理道德论。

王守仁在21岁时中了举人，开始认真地钻研朱熹“格物穷理”的义理。朱熹说一草一木都涵有“至理”，必须一件一件地格尽天下之物，才能豁然贯通，体会到完满的“天理”，成为圣贤。为此，王守仁曾对亭前一丛在萧瑟秋风里抖动的翠竹“格”了七昼夜，结果一无所得反而病倒了。格竹穷理的失败，说明竹子自身生长发育的规律与朱熹所宣扬的天理，并没有相通之处，将自然现象与社会现象相比附是毫无根据的。王守仁发现了程朱理学的这一破绽，但是，他并没有由此引出正确的认识，相反，却得出了我心中的天理产生出竹子等万事万物的荒谬结论。并说心外无物，宇宙便是吾心，吾心即是宇宙。有一次，他和朋友到南镇去游玩，朋友指着山中的花树问道：你说天下无心外之物，像这样的花树在深山丛林中自开自落，同我的心有什么关系呢？王守仁回答说：你没有看见此花时，此花与你的心同归于寂。你看见此花时，花的颜色一时明白起来，便知此花不在你的心外。这就是说，你看到它，感觉到它的存在，就有山花的显现，不去看它，心死寂时，山花也就消失了。王阳明认为人们认识事物必须通过感觉来论证事物的是否存在，这显然是错误的。从这种人的主观意志决定客观事物有无的主观唯心主义出发，王守仁给“物”所下定义是：身之主宰便是心，心之所发便是意，意之本体便是知，意之所在便是物。这样，物就成了一种意念，我想到什么，什么就是物，不去想的东西就不存在。因此，他武断地说：离却我的心，便没有天地万物，并进一步发挥了陆九渊“心即理”的论点，否认心外有理。而且，王守仁所讲的理，即仁、义、礼、智、信等封建道德。它们是存在于心的，是人头脑里固有的，发之事父便是孝，发之事君便是忠，发之交友治民便是仁，只在此心去人欲存天理上用功便是。在宣扬“心外无物”的同时，王守仁还提出“致良知”命题。“致良知”是王守仁学说的基本理论，他说：我生平讲学，只是致良知三字。王守仁认为人人都有良知，见父自然知孝，见兄自然知敬，见小孩落井自然产生怜悯之心，这就是良知。推而广之，父子有亲，君臣有义，夫妇有别，长幼有序，朋友有信的观念以及恻隐、羞恶、辞让、是非等感情，也都是与生俱来的，都叫良知。良知即是天理，从社会政治方面来说，即指封建的伦理纲常和道德观念。“致良知”的“致”，是指人们克灭私欲的认识和修养功夫。通过“致”使良知得以明白或恢复，即“存天理，去人欲”。王守仁还把程朱理学“格物致知”说纳入他的“致良知”学说体系中。他认为致知格物，不是探求客观事物的客观规律，只是把人心中固有的天理贯彻到客观事物中去。此外，在知与行的关系上，王守仁反对朱熹主张的“知先行后”说，提出“知行合一”说。他认为知行是合一的，不能把它分割为二。知而不行，只是未知。比如说：某人知孝，某人知悌，是指这个人已经实行了孝悌之道，并不是口说些孝悌的道理，而没有孝悌的行为就称赞他知孝悌。所以，知和行不能分开，知是行的主意，行是知的功夫。知是行之始，行是知之成。王守仁进一步指出：今人学问，只因知行分为两件，故有一念

发动，虽是不善，然却未曾行，便不去禁止。我今说个知行合一，正要人晓得一念发动处，便即是行了，发动处有不善，必须克服，不使这个恶念潜伏心中。王学的“知行合一”说，在强调知与行的统一、行是人们有目的的活动以及人们的认识来自实践等方面有其正确的含义。但知和行毕竟属于两个不同的范畴。王守仁把属于意识范畴的知当作了行，以知代行，又把属于实践范畴的行当作了知，以行代知，结果就混淆了知行的界限。不过，王守仁第一次提出了知行合一这个概念，在哲学史上具有重大意义。首先，它突破了人们长期以来把知和行割裂分离的形而上学观念，引导人们将知和行作统一的思考。他对行的强调，对明后期实学思潮的兴起及后世思想家也产生了积极的影响。尤其是在社会普遍崇奉程朱理学的时候，他公开举起反对朱熹的旗帜，起了打破朱学僵化的教条、活跃人们思想的作用。而他注重事功的积极进取精神和敢于创新的风格，极大地启发了后来的进步思想家。

王学自嘉靖初年形成完整体系之后，很快便进入了全盛时期，对明代中后期思想界产生了极大影响，出现了阳明学派“几遍天下”的空前盛况。王学不仅左右了整个思想界，而且在很大程度上控制了政界的强大的政治势力。当时王阳明心学已经以国学的资格取代朱学而成为全社会的统治思想。特别是它的“万物一体”论，为嘉靖初年社会阶级矛盾的缓和提供了理论指导，它以“吾心”而不以孔子和经书为衡量是非标准的思想，为李贽等人反对“圣贤”偶像、反对封建礼法的异端思想提供了思想资料；它极力宣扬精神、理性的作用，补救了朱学支离繁琐之弊，把理学推进到一个新的阶段。但是到万历中期以后，风靡一时的阳明学派跌入了衰落期。其原因在于王学并不是建立在科学的世界观基础之上的，它所固有的虚无主义倾向导致了它的衰落。他死后，王门后学的虚无主义思想和清谈学风大肆泛滥，从而更加深了心学禅宗化的程度。嘉、隆以后，参禅之风掩袭整个学界，士大夫形成了不读书，不探讨实际学问，不研究当代政治、经济、军事，只知谈心性、诵语录、参话头、背公案的空疏学风。什么国计民生，典章制度，用兵御敌，一概不学、不懂。而万历中期以后，各种社会矛盾又重新尖锐起来，导致了社会各阶级、阶层、集团、派别之间激烈的搏斗。农民起义、市民运动、奴仆叛主、矿徒暴动、士兵哗变汇合成反封建统治的滚滚洪流。同时民族矛盾也在激化。蒙古族鞑靼部的骚扰，女真族后金的反明直接威胁着明王朝的统治。这些矛盾斗争反映在统治集团内部，便形成了持久的党争。可是心学对此束手无策，一筹莫展。它不仅无力扶危定倾，恰好相反，因它自己的没落而加剧了危机深化。至此，社会意识与社会存在之间已经处于严重的对立状态。拯时救危需要的是治国经邦之术，经世致用之学。心学被晚明实学思潮所取替成了历史的必然。　（高春平）

戚继光镇守蓟州

隆庆（1567—1572）至万历初年，抗倭名将戚继光镇守北边的业绩。

隆庆初年，北方少数民族经常骚扰北部边境。张居正入阁后，调遣抗倭名将戚继光北上镇守蓟州，北部边境始得安宁。隆庆二年（1568），戚继光以都督同知总理蓟州、昌平、保定三镇练兵之事，总兵官以下悉受其节制。戚继光到任后，对士兵素质、蓟州地形、军事设施进行了调查研究，提出了一套设防固守、使兵因地而制胜的战术。他指出，蓟州内地为平原、近边半险半易、边外山谷险隘。敌犯平原宜用车战，敌入近边宜用马战，敌攻边外宜用步战，三者分用，乃可制胜。戚继光针对嘉靖以来只修边墙不建墩台的状况，提出了修建空心敌台的方略。他的这一建议，在张居正的大力支持下，很快付诸实践。再加上戚继光严格训练边卒，御敌能力大大加强。万历元年（1573）春，小王子后土蛮和朵颜董狐狸及兄子长昂合谋入犯。驰至喜峰口，被戚继光一举击溃，几乎抓获狐狸。同年夏，狐狸再次入犯又被击退。二年春，长昂见势难以再犯遂与狐狸共逼长秃入寇，结果长秃被继光抓获。长秃是狐狸之弟、长昂之叔父。长秃被继光抓获后，狐狸服素衣叩头乞赦。戚继光及总督刘应节等商议决定派副将史宸、罗端到喜峰口受其降。寇献还所掠边人，插刀盟誓。明军释放长秃，允许通贡。至此，终继光在镇，二寇不敢犯蓟门。戚继光镇守蓟州共16年，边备修饬，蓟门宴然。他因守边有功，晋左都督，加太子太保，录功加少保。以后数十年间，踵继光之成法，北边无事。　（张桂萍）

海瑞罢官

明朝隆庆四年（1570）一月，清官海瑞因抑制豪强，为民请命，反对大官僚地主夺田而被罢官的历史事件。

海瑞（1515—1587），字汝贤，号刚峰，广东琼山（今属海南省）人。性情刚直，生活朴素，为官清廉，是我国16世纪深受广大人民爱戴的著名政治家。嘉靖

年间海瑞中举，授福建南平县学教谕。他认为学校是师长教授学生的地方，教师有为师的尊严，不该向上官磕头。提学御史到学校来视察，别的人都跪，唯独他站着不跪，受到福建提学副使朱衡的器重。不久，海瑞升任浙江淳安知县。淳安山多地少，赋役不均，地主有田百亩，却没有分毫之税，贫农地少无收，却得赔纳税粮。海瑞通过清丈土地，均平赋役，解决了放富差贫的弊端，减轻了农民负担。在淳安，海瑞还办了两件传诵一时的快事。一是惩办了总督胡宗宪的公子。这位公子路经淳安时吊打驿吏，擅作威福。海瑞没收他带的大量银子，还报告胡总督说：胡公按临，向来不让所过地方铺张盛迎，今此人威行盛装，冒充总督公子，胡作非为，败坏总督名声。弄得胡宗宪哑巴吃黄连，有苦难言，这位少爷也只好自认倒霉。另一件是挡了都御史鄢懋卿的大驾。鄢懋卿是奸臣严嵩之党羽，时任都御史，以钦差大臣的身分奉命下来巡查盐政。但他十分虚伪贪婪，到处勒索，还带着小妾，坐五彩车，地方疲于供应。海瑞依其牌告上"素性俭朴，不喜逢迎"的官话，将计就计地写了一封信说：淳安地方穷小，难容都老爷大驾。听到你以前所到之地，铺张供应，并不像照牌所讲。这恐怕是地方官不知您意瞎张罗的缘故。结果把鄢懋卿顶了回去，绕道严州，没来淳安骚扰。可是因得罪了胡宗宪、鄢懋卿，虽然治理淳安的政绩很好，还是被排挤调职。嘉靖四十一年(1562)，海瑞升嘉兴通判，鄢懋卿指使党羽巡盐御史袁淳弹劾，将他降职为江西兴国知县。在兴国知县任内，海瑞清丈田亩，裁减冗官，并惩处了原兵部尚书乡官张鏊的侄儿张豺、张魁。他们二人到兴国买木材，狐假虎威，无恶不作。老百姓气愤填膺。海瑞派人传讯，二人倚仗叔父威势，拒不前来。有一天竟跑到县衙大闹公堂。海瑞大怒，拿下张豺，送押到府。张鏊出面写信求情，海瑞不理。张又四处求情，居然被判处无罪，两人大摇大摆回家去了。海瑞气极，写信向上司据理力争，终于将其治罪。两年后，海瑞的朋友吏部侍郎朱衡和文选司郎中陆光祖推荐他做了京官，担任户部云南司的主事。当时明世宗迷信道教，整日深居西苑，与道士妄求长生不老之术，20多年不理朝听政，弄得君道不正，臣职不明，吏贪将弱，暴动四起，社会矛盾异常尖锐。而督抚大吏争献符瑞，廷臣无敢直言时政者。嘉靖四十五年二月，海瑞上疏批评明世宗上述弊政，指责他自号尧舜，其实连汉文帝也不如。嘉靖帝看了，气得发昏，丢在地下，对左右近侍说：快抓起来，不要让他跑掉。宦官黄锦在一旁答道：此人素有直痴名。听说他上疏时，自知触忤帝意当死，早就备好后事，连棺材都托人买好，并已诀别妻子，待罪于朝，僮仆亦奔散无留，不会跑的。在内阁首辅徐阶的周旋下，才保了海瑞的一条命，把他关在牢里。同年十二月十四日，嘉靖帝死，二十六日，其三子朱载垕继位，大赦天下，以明年为隆庆元年(1567)，海瑞被释出狱，官复原职。不久，调任兵部，迁大理寺，历南北二京左、右通政使。

隆庆初年，由于嘉靖中期以来，政治腐败，财政困难，人民反抗斗争连续不断，统治集团内部一些有见识的人士先后进行力所能及的改革，以缓和社会矛盾。隆庆三年(1569)六月，海瑞以右佥都御史巡抚应天十府。应天十府包括今江苏安徽两省大部分地方，是江南鱼米之乡，号称全国最富庶的地方。但百姓生活很困苦，特别是苏(州)、松(江)、常(州)、嘉(兴)、杭(州)、湖(州)五府，田赋负担特别重，仅苏州一府弘治十五年(1502)土地占全国的2%，税粮却占全国的8%，平均亩税一斗三升四合，比湖广重12倍以上。而同期湖广土地占全国的35%以上，税粮只占全国的8%，平均亩税不足一升。而且，土地集中的现象特别严重。苏州大地主占有的土地成百上千顷，却很少纳税，广大人民田产无几，反而负担着沉重的赋税。另如松江，乡官田宅之多，奴仆之众，两京十二省找不出第二个。加之这一年江南遭到严重水灾，夏秋多雨，田地被淹，粮价飞涨，农民少衣没食，大批外出逃亡。海瑞一上任，告乡官占夺田产的老百姓就有几万人。海瑞决心从这里入手进行改革，其主要内容有：首先是赈救灾荒，兴修水利。他采取以工代赈，把赈济和治水结合起来的办法。经过亲自勘察，发现闹水灾的原因是水利失修，吴淞江淤塞，太湖水排不出去，一遇大雨，便泛滥成灾。隆庆四年正月初三，海瑞奏请趁冬闲开挖吴淞江，得到工部尚书朱衡的支持。开工后，他乘坐小船，亲自巡视督工。灾民因上工有饭吃，且工成可免遭水患，变害为利，所以热情很高，进度也快，不到一月就完工了。顺便把吴淞江北面常熟的白茆河也疏浚了。这两项工程对当地人民的生活、生产益处很大，仅用银10.95万多两，这些钱又都是海瑞从各处张罗来的，没有加重百姓负担。因此，民受其利，感激不已。其次，实行廉洁政治。海瑞上任伊始，属吏惮其威名，贪墨者多自动告退，豪门势家闻知海瑞来了，赶紧把朱漆大门涂成黑色。海瑞为裁减邮传冗费，又规定官员士大夫经过其境，一律不得供应。第三，摧豪强，抑兼并，限占田，行条鞭。这既是要害的问题，又是最难办的事情。海瑞极端痛恨贪官污吏和豪强兼并土地，认为这是

人民生活困苦、赋役不均的根源。他在应天巡抚任上，摧豪强，抚穷弱，贫民田入富室者，率夺还之。并推广庞尚鹏在浙江实行的一条鞭法，把复杂的赋役制度简化，改折银两交纳。依新法，徭役的编派，人丁居四分之一，田粮居四分之三，农民人多田少，大地主田多丁少，这样不仅减轻了农民的负担，而且增加了国家的财政收入。海瑞还把大地主的隐瞒田地清查了出来，并勒令他们退出占夺农民的田产。为此，他采用擒贼先擒王的办法，先从江南最大的罢相家居的乡官徐阶入手，勒令退田。徐家有田40万亩，是当地百姓所痛恨的大恶霸地主，大部分田地都是侵占老百姓的。海瑞刚到任就接到无数告徐家夺产的状子。徐阶知道海瑞不好惹，勉强退出一部分，海瑞不满意，亲自写信给徐阶，一定要退出大半，才能结案。徐阶见他强迫退田，心里十分痛恨，但因其家人作恶多端，罪证如山，怎么也无法蒙混过关。后来有人帮他出主意，定下釜底抽薪之计，派人到北京买通了当权太监，又重贿给事中嘉兴人戴凤翔，要他出面弹劾海瑞。戴家也是地主，亲戚朋友中有一些人正在被海瑞强令退田。于是，戴凤翔便站出来弹劾海瑞“包庇奸民，鱼肉缙绅，沽名乱政”，疏中竟把老百姓形容为虎狼，乡官反像鱼肉，全盘否定了海瑞的改革，硬把海瑞赶出巡抚衙门。直到万历十三年(1585)海瑞才被荐用为南京都察院右佥都御史。

海瑞从隆庆三年(1369)六月到隆庆四年一月只做了七个月应天巡抚，便被大地主阶级撵下台，罢官家居十几年。但他在巡抚应天的短短半年内，雷厉风行地实施改革，减轻了农民的负担，促进了生产的发展，因而是有进步意义的，是值得肯定的。他是当时人民心目中深受赞颂的清官，当他被罢官离去时，当地百姓号泣载道。他的一生是站在农民和市民的立场上向封建官僚、大地主斗争的一生，是历史上占有重要地位的政治家。　(高春平)

俺答封贡

隆庆四年(1570)明廷对俺答采取的安抚睦邻政策。俺答是明中叶北部边塞的劲敌。嘉靖二十九年(1550)“庚戌之役”后，明朝和俺答又发生过多次交锋，大同、宣府深受其害。张居正入阁后，任用王崇古镇守宣、大。经过几年努力，俺答犯边逐年减少。在加强防御力量的同时，张居正积极寻求改善蒙汉关系的门路。宣、大总督王崇古屡次派遣同蒙古有关系的人，深入内部发表文告，宣布：番汉军民凡由蒙古投奔汉族地区者，一律以礼相待，接纳安置。这类文告引起很大反响，投奔者日益增多。隆庆四年，俺答之孙把汉那吉亦来归附王崇古。但要不要接纳把汉那吉，在朝廷里出现了严重分歧。张居正积极主张“接纳”，认为这是一次改善蒙汉关系、发展同俺答友好往来的绝好契机。而很多大臣则反对“接纳”，御史叶梦熊认为，接纳必将招来大祸。也有人主张干脆杀掉把汉那吉，以绝后患。在“朝议纷然”的情况下，张居正将事情原委以及应采取的对策报告了穆宗。经穆宗允准，张居正才以皇帝的名义慑服了反对派，使“接纳”的主张占了上风。不久，俺答果然统军南下，要求明廷遣还把汗那吉。王崇古当即派遣鲍崇德向俺答说明事情经过，晓以大义，并劝说俺答归顺通好。当俺答得知其孙把汗那吉受到明廷“蟒衣貂帽，驰马从容”的礼遇后，内心十分高兴。王崇古还以明朝皇帝的名义表示，愿礼送把汉那吉返回蒙古。把汉那吉十分感动，走时与王崇古洒泪告别。俺答见到其孙把汉那吉在明军的护卫下安全归来后，欢喜若狂，立即决定退兵，并上表称谢，请求“封贡通市”。当王崇古正式上疏请求对俺答宜实行“封贡通市”时，在朝廷中又掀起一场轩然大波。兵部尚书郭乾以先皇圣训为依据，坚决反对。在“廷议”中，很多人认为，讲和示弱，马市启衅，封贡通市，后患无穷。张居正则认为，现在是俺答乞求“封贡通市”，这与汉代的和亲、宋代的和议完全不同。为了支持“封贡通市”，他向穆宗详细陈述了“封贡通市”的好处，并用明成祖加封蒙古顺宁、贤义、安乐三王的史实为依据，请求穆宗援例实行。在张居正的努力下，明廷与俺答终于缔结了“封贡通市”盟约，封俺答为顺义王，规定每年贡马一次，并在大同、宣府、山西、延绥、宁夏、甘肃等地选定十余处开设互市，双方各派军队驻守保护。自此，东起山海关，西抵嘉峪关的边境千里防线，“军民乐业，不用兵戈，岁省什七”。万历十年(1582)，俺答去世。但三娘子一向主张与明交好，并且为蒙汉两族人民的长期和睦相处贡献了毕生的精力，为了答谢她的友好情谊，明廷封她为“忠顺夫人”。　(张桂萍)

李成梁镇守辽东

明代中后期镇守辽东的名将李成梁的主要战绩。

李成梁(1525—1615)，字汝契，铁岭卫(辽宁铁岭)人，英毅骁健，有大将之才。辽东之军事设施少于蓟镇，而成梁之战功则较蓟州守将戚继光为多。隆庆初年，东北少数民族势力甚强，插汉部长土蛮与黑石炭、泰宁部长速把亥与炒花、朵颜部长董狐狸与长昂

不断骚扰这一带地区。张居正入阁后，严整边防，起用智勇双全的李成梁为总兵官镇守辽东。李成梁首先大整戎备，甄拔将校，收招四方健儿，军声始振。隆庆五年(1571)，成梁在卓山与犯敌土蛮相遇，成梁采取夹击之术，断其首尾，乘胜抵巢，斩首580余级。六年十月，土蛮又率600骑营抵辽阳，结果又被成梁击退。万历三年(1575)冬，炒花、黑石炭等联合聚集2万余骑从平虏堡南掠，李成梁邀战，发火器，敌大溃，弃辎重而逃，成梁追至河沟，乘胜渡河，击斩1000余人。五年初，土蛮、炒花屡犯屡败。六年十二月，速把亥、炒花会土蛮等3万余骑兵进逼辽河，攻东昌堡，深入至耀州，李成梁派遣诸将分屯要害以遏之，而他亲自率精兵出塞300余里直捣圜山，斩首840，及官长9人，获马1200匹。犯敌闻之，狼狈逃出边塞。李成梁因功封宁远伯，岁禄800石。这时，土蛮多次请求贡市，明廷关吏不许，土蛮一气之下又率4万骑兵于七年从前屯锦州营深入。李成梁命令诸将坚壁，镇守蓟州的戚继光也前来支援，敌遂退。不久，土蛮又与速把亥合逼红土城，声称要入海州。成梁率军直抵红土城，击败之，斩首470有奇。土蛮数侵边塞不得志，忿甚，征诸部兵分犯锦州、义州等地，但因城堡坚固，李成梁及蓟镇兵员密集，屡攻不克，无奈之下，又重用骑兵，同时联络其他部族，不断南下侵扰，结果还是被击退。十年三月，速把亥入犯义州，成梁设伏擒斩，为患辽左20余年的速把亥死，神宗大喜，诏赐甲第京师，世袭锦衣指挥使。十三年二月，把兔儿欲报其父速把亥之怨，联合数万骑入掠辽阳，结果又被成梁大败，斩首800有奇。截止到十九年李成梁离任前，土蛮一直是屡攻屡败。成梁镇辽22年，先后奏大捷十，其武功之盛，是200年来未曾有过的。万历十年张居正死后，成梁虽然战绩卓著，但却被视为居正之人，不受重用。十九年十一月终被解职。后任用贵族子弟镇守辽东，他们暮气十足，虚报战功，十年间更易八帅，边备遂弛。二十九年八月，神宗迫于形势，采纳大学士沈一贯的意见，再次起用李成梁镇守辽东，其时成梁已76岁。在他第二次镇守辽东的八年间，土蛮、长昂及把兔儿已死，同时明廷又准许开设开原、广宁马、木二市，所以辽左少事。成梁因功加官太傅。　　　　　　　　　　　　(张桂萍)

张居正改革

隆庆六年(1572)至万历十年(1582)间，张居正为匡正时弊，在军事、政治、经济等方面推行的一系列改革措施。

张居正(1525—1582)，字叔大，号太岳，湖广江陵人。嘉靖二十六年(1547)进士，隆庆元年(1567)入阁。隆庆六年六月，神宗即位，他出任内阁首辅，万历十年(1582)病逝。他入阁后，主要是担任首辅期间，在军事、政治、经济等方面进行了一系列的改革，使濒于崩溃的朱明王朝获得了短暂的复苏和繁荣，被封建史学家誉为“救时宰相”。

嘉靖四十一年(1562)五月，严嵩倒台，徐阶继任为内阁首辅。徐阶是居正在翰林院时的老师，对居正十分器重。四十五年世宗逝世后，徐阶和居正以世宗遗诏的名义，革除弊政，平反冤狱，颇得人心。隆庆二年(1568)八月，居正上《陈六事疏》，陈述了他的改革主张：省议论，振纲纪，重诏令，核名实，固邦本，饬武备。前四条主要是整顿吏治，加强中央集权，后两条重点是富国强兵。隆庆六年六月，他出任内阁首辅后，“慨然以天下为己任”，把他的改革主张付诸实施。

一、整饬边防，改善蒙汉关系。隆庆元年二月，居正入阁参与机务。其时徐阶大权在握，居正成为内阁中北方边务的承办者和主持者。这种有利地位，为他整饬边防创造了条件。他整饬边防，首先是重用智勇双全的将领，对他们“委任责成”，“信而用之”。他所重用的谭纶、戚继光、李成梁、王崇古、方逢时等人，都充分发挥了自己的才能和智慧。通过整饬边防，加强战守，改变了正统以来边防日益废弛的局面。在加强防御力量的同时，张居正又积极寻求改善蒙汉关系的门路。他命令沿边将帅要抓住有利时机，发展同蒙古的友好往来。宣、大总督王崇古多次派遣同蒙古有关系的人，深入蒙古内部，发表文告，宣布：番汉军民凡由蒙古投奔汉族地区者，一律以礼相待，接纳安置。这些文告在蒙古地区引起了很大反响，投奔人口越来越多，甚至连俺答的孙子把汉那吉也投奔来了。要不要接纳把汉那吉，在朝廷里出现了严重分歧。张居正积极主张接纳，认为这是改善蒙汉关系、发展同俺答友好往来的绝好契机。而很多大臣则认为接纳把汉那吉，必将招来大祸。最后，张居正以皇帝的名义，慑服了反对派，接纳了把汉那吉。接纳后，俺答果然率重兵前来索要，致使朝野震动，认为接纳把汉那吉引来了祸患。这时，张居正一面要王崇古坚持初议，勿为众言左右；一面又给王崇古出主意，要他开展攻心战，派遣使臣出使俺答军中，说明把汉那吉不是我们引诱来的，而是因为他本人仰慕中原文化，自己投奔来的。明廷待之以礼，俺答反而兴师问罪，这是恩将仇报，没有道理的。俺答获得明廷对把汉那吉

待之以礼的消息后，立即派使臣至明。王崇古让把汉那吉穿上红袍玉带与之会晤。随后，王崇古又以明朝皇帝的名义表示，愿礼送把汉那吉返回蒙古。把汉那吉十分感动，遂与王崇古洒泪而别。俺答见到其孙把汉那吉在明军的护卫下安全归来后，欣喜若狂，立即决定退兵，并表示今后永不犯边，还把叛人赵全等交给明廷处置。在改善蒙汉关系的基础上，张居正又积极主张对俺答实行"封贡通市"，即明廷封俺答以一定的官爵，定期朝贡、互市，和睦相处。在张居正的努力下，终于议定：封俺答为顺义王，规定每年贡马一次，并在大同、宣府、延绥、宁夏、甘肃等地选定十余处开设互市。明廷与俺答缔结"封贡通市"盟约后，张居正严守信义，不违约，不背盟，坚持照章办事。"封贡通市"的实行，有力地促进了蒙汉两族社会经济的交流和发展。这样，就从根本上改变了自明朝开国以来一直与蒙古所处的敌对关系和战争状态，发展了两族之间的友好往来。历史证明，张居正整饬边防、改善蒙汉关系的重大改革，是以巨大的功绩载入史册的。

二、创行考成法，加强内阁权力。张居正出任内阁首辅后，针对空议盛行、不务实事的风气，制定并颁布了对各级官吏的考成法。这是击中时弊的一大改革。这一改革虽说是在遵循"祖宗成宪"的旗帜下进行的，但它却完全冲破"祖宗成宪"的罗网，创立了一整套由内阁掌握实权的统治体系，为推行各项改革铺平了道路。考成法的内容，最主要的是两条：一条是六部和都察院把所属官员应办的事情酌量道里远近、事情缓急，规定完成期限，并分别登记在三个帐簿上，一本由部、院留做底册，一本送六科，一本呈内阁；另一条是六部和都察院按照帐簿登记，对所属官员承办的每件事情，逐月进行检查，完成一件，注销一件，如若没有按期完成，必须如实申报，否则，以违制罪论处。六科亦根据帐簿登记，稽查六部的执行情况，每半年上报一次，并对违限事例进行议处；内阁同样亦根据帐簿登记，对六科的稽查工作进行检查，并对欺隐事例进行惩处。这样，月有考，岁有稽，内阁总其成。内阁遂成为政治中枢。张居正通过推行考成法，以内阁来控制六科，又以六科来控制部、院，再以部、院来控制抚、按等地方长官，借以指挥整个官僚机构的运转。这就是张居正之所以能使朝廷诏令朝下而夕奉行的组织保证。张居正当权期间所推行的各项改革，都是通过这个组织系统稽查和贯彻的。张居正创行的考成法是对明代吏制的重大改革。因为，考成法关于由内阁稽查六科的规定，极大地改变了明代的吏制。按明制，内阁与六科并无隶属关系，是无权稽查六科的。六科是直接对皇帝负责的，就是都察院亦不得干预六科的活动。然而考成法却规定，由内阁来稽查六科，显然是对明代吏制的重大变革。不仅如此，张居正创行考成法的根本目的是要实行内阁集权。这更是对明代"祖宗旧制"的根本变革。明太祖朱元璋废中书省和丞相制后，使皇权与相权合而为一，形成了皇帝独断专制的格局。而张居正创行的考成法，使内阁首辅俨然成了事实上的当朝宰相。实际上，从万历元年至万历十年间张居正当权的历史，正是一部"内阁集权，首辅执政"的历史。

三、整顿吏治，伸张法纪。明代中叶，吏治腐败达于极点。张居正以推行考成法为中心，信赏必罚，刷新吏治，给腐朽的官场吹进了一股改革的清风。张居正依据立限考成的三本帐，严格地控制着从中央到地方的各级官员。他果断地把那些秉公办事、实心为民的官员列为上考，把那些靠花言巧语骗取信任的官员列为下考。这样便把整顿吏治和惠及生民有机地联系了起来，既稳定了社会秩序，又提高了行政效率。通过立限考成，每个官员都有明确的职守，对那些冗官，尽行裁革。他当政期间裁革的冗官约占官吏总数的十分之二三，其中南京官员裁革尤多。与此同时，又广泛搜罗人才。对那些拥护改革、政绩突出的官员，不拘出身和资历，大胆起用，委以重任。在整顿吏治过程中，张居正针对法纪废弛、君令无威的状况，又以伸张法纪为中心进行整顿。他把不法权贵看成破坏法纪、祸国殃民的大患，坚决予以打击。黔国公沐朝弼，为非作歹，多次犯法，本应依法制裁，但朝中无人敢问。张居正不畏权势，挺身而出，伸张法纪，改立朝弼的儿子袭爵，把朝弼本人捆缚到南京，幽禁至死，一时"人以为快"。最有权势的太监冯保的侄子冯邦宁，凭借其叔父的权势，横行不法，醉打衙卒，触犯刑律。张居正一面派人向冯保说明情况，一面将冯邦宁杖打四十，革职待罪。由于他雷厉风行地伸张法纪，有力地抑制了强宗豪民的违法活动。

四、清丈田亩，推行一条鞭法。明中叶以来，随着土地兼并的发展和吏治的腐败，豪强地主与衙门吏胥相勾结，大量隐瞒土地，逃避税粮。在这种情况下，清丈田亩，均平税粮，已成为理财安民的首要课题。万历六年，明政府下令清丈天下田亩。张居正责成户部尚书张学颜主持清丈。由于清丈田亩触犯了官僚贵族、豪强地主的利益，所以遭到他们的抵制和反对。张居正知难而进，他表示"苟利社稷，死生以之"。他运用考成法，严厉督责各级官员认真清丈，对阻挠

清丈的宗室、豪强，严加惩治。他告诫各级官员，“清丈之事，实为百年旷举”，必须“详审精核”，“务为一了百当”。这样，清丈工作才冲破重重阻力，在全国范围内推广开来。这次清丈达到了预期的目的。仅据北京、山东、河南统计，清出隐占田亩就达50余万顷。由于扩大了摊派税粮的负担面，收到了“粮不增加，而轻重适均”的效果。清丈田亩的成功，为全面改革赋役制度创造了条件。原先赋和役是分开的，赋是对田亩之征派，役是对人户之征派。万历九年，张居正下令，在全国推行一条鞭法。虽然早在嘉靖年间，有些地方就已实行一条鞭法了。但由于官僚、豪强的反对，“屡行屡止”。直到张居正清丈田亩竣事，才在全国推行开来。一条鞭法的主要内容是：第一、赋役合并，化繁为简。具体办法是，通计各省、府、州、县田赋和徭役的总量，以及土贡、方物等项征派，归之一总，统一征收，故曰一条鞭法；第二、差役合并，役归于地。明代的差役征派有三种：按户征派的叫里甲，按丁征派的叫均徭，临时征派叫杂泛。就征派形式而言，又分役差（直接服役）和银差（输银代役）两种。一条鞭法规定，所有的徭役包括里甲、均徭、杂泛，全部折成银两缴纳，取消了扰民极大的役差征派。还规定，将差银程度不同地摊入地亩，按亩征收。第三、田赋征银，官收官解。田赋征派，除漕粮缴纳实物外，其余部分一概征银。规定必须缴纳实物的漕粮，亦由民收民解（即押送）改为官收官解。明初实行粮长制，粮长负责田赋的催征、征收和解运，称为民收民解。其后弊端丛生，故一条鞭法改为官收官解。张居正推行一条鞭法的直接目的是为了整顿赋役、克服财政危机、稳定明朝的统治，但它的推行却又对社会经济的发展和资本主义萌芽起了积极的促进作用。一条鞭法从明中叶酝酿至万历年间通行全国，历时一个半世纪，时行时停，几经周折，最后才定为国策，这不能不归功于张居正顺应历史潮流、因势利导的努力。正当一条鞭法在各省迅速推行，改革事业大见成效之时，万历十年六月，张居正与世长辞了。时年58岁。神宗下诏，罢朝数日，表示哀悼，并赠他为上柱国，赐谥文忠。但不久，神宗的态度发生了重大变化。一些因反对张居正改革而被罢的官员，重新得到重用。万历十一年三月，神宗诏夺张居正上柱国封号和文忠赐谥。五月，又下令抄家。原来张居正重用的官员一概被罢，改革宣告废止。但张居正改革所建树的业绩，并没有因为改革的废止而消失，一条鞭法的推行也没有因为改革的废止而中断。神宗皇帝虽然可以凭借手中的皇权宣布废除张居正改革，但却改变不了“天下不得不条鞭之势”的历史潮流。

谷应泰撰写的《明史纪事本末》，称颂张居正改革使海内肃清，边境安全，说万历初年，太仓积粟可支用十年，国库的钱财多达400余万，“一时治绩炳然”。当然，张居正改革有它的历史的和阶级的局限性。张居正对于反剥削反压迫的农民起义，是坚决主张镇压的。（张海瀛）

张居正夺情

万历五年（1577），明廷中改革与反改革的一场严重斗争。按明制，父母丧，官吏应还原籍为民，守孝27个月，称曰居丧。但经皇帝特别指定，不必离职守孝者称为“夺情”。万历五年（1577）秋，张居正父亲病殁，李幼孜等倡议夺情。张居正本人也不甘心因守孝而中断谋划已久的政治改革，所以听任李幼孜上疏奏请。其时万历帝年幼，国家政务均由首辅张居正承担，因而下诏准许张居正“夺情”。张居正夺情，引起了一些反对改革的政客的攻击。吴中行、赵用贤、艾穆、沈思孝合疏言张居正忘亲贪位，要朝廷罢免其官职。张居正有宦官冯保和皇太后的支持，最后还是由万历皇帝做出裁决，斥责吴中行等是借纲常之说，肆为诬论，以达到孤立皇上、任意自恣的目的，故必罪不宥，便下令将吴中行等四人同时受杖。吴中行、赵用贤被驱出国门，艾穆、沈思孝复加镣锁，且禁狱。时言夺情者得罪，都人士皆愤怒，作谤书悬长安门，谓张居正且反。万历皇帝获悉后，宣谕于朝，谤议稍息。反对派的气焰暂时煞住了，但斗争并未止息。正像张居正对朋友们说的那样，几年来结怨于天下不少，那些奸夫恶党，有的明里排挤，有的暗中教唆，没有一天不是在打我的主意。（张桂萍）

利玛窦来华

明后期万历年间，欧洲耶稣会士利玛窦来华传教并带来一些西方先进的科技文化的历史事件。

公元16、17世纪，中国社会正处于剧烈变动的明清鼎革之际。当时，随着基督教第三次传入中国，大批耶稣会士东来，中华大地出现了继汉唐以后中西文化交流的第三个高潮。许多欧洲教士在来华传教布道的同时也带来不少西方先进的科学技术和文化，其中最著名最有代表性的是意大利人利玛窦。

利玛窦（1552—1610），本名玛泰奥·利奇（Matteo Ricci），出身于意大利贵族家庭，少年时代在家乡求学，其后进入罗马神学院，1571年加入耶稣会。明世宗嘉靖三十六年（1557）葡萄牙殖民者

强占澳门以后，澳门成为欧洲耶稣会士来华传教的一个据点。万历十年(1582)，利玛窦来到澳门。第二年，他和教士罗明坚一起到广州肇庆传教。他们征得两广总督郭应聘同意在肇庆建立了教堂，用中文撰写《天主实录》，宣传天主教教义。为了能与中国士大夫阶层广泛交处，利玛窦穿着中国服装，刻苦学习中国语言文字，在念、写、说三方面很下功夫，并且改名换姓，自称姓"利"名"玛窦"。以后，中国士大夫就称他为"利先生"或"利子"。其他来华的耶稣会士也都仿效他，纷纷改成中国姓名。万历十七年利玛窦迁居韶州，之后又到南京及南昌等地，与各地士大夫互相交往，畅谈社会政治、天文地理、中西风俗民情等。封建士大夫们仰慕其学识渊博，乐于和他交往。但利玛窦深知要使天主教真正能在中国扎根，仅有士大夫的赞同还不够，必须取得最高统治者明朝皇帝的允准和支持。他曾对同行来华的教士们说："假使我们不能在南北两京到皇宫里，对着皇上宣讲福音，设法求得他的许可，至少应许我们在中国境内自由传教。"为此，利玛窦深入研究儒家典籍，竭力把天主教义和儒家学说融合起来，以便能在中国顺利传教进而取得皇帝的允诺。万历二十一年到万历二十四年，利玛窦写成了《天主实义》一书，将天主教义和儒家主张融为一体，从而使该书在中国士大夫中产生了不小的影响。明朝的内阁大学士叶向高认为利玛窦宣传的天主教义"言慕中华风，深契吾儒理"。万历二十四年，利玛窦被任为耶稣会在华首任会长。万历二十八年五月，利玛窦和西班牙教士庞迪我启程北上。次年一月抵达北京，明神宗朱翊钧于便殿召见。利玛窦进献天主、圣母像及珍珠镶嵌十字架一座，自鸣钟两架，《万国图志》一册等，并向万历帝提出改革历法的建议。利玛窦此行得到了明朝皇帝的欢心，万历帝嘉其远来，假馆授职，给赐优厚，并准许在宣武门内居住。至此，耶稣会士达到了在北京居住传教的目的。当时与利玛窦一同来华的传教士还有葡萄牙人麦安东、孟三德、罗如望、李玛诺，意大利人熊三拔、龙华民，西班牙人庞迪我等。他们协助利玛窦在中国各地传教，教徒日益增多。万历十一年利玛窦在广东肇庆收受第一名信徒，万历十三年发展为 20 个，万历十七年增长为 80 个，万历三十一年增加到 500 个，万历三十三年扩大到 1000 多个，到万历末年激增到 1.3 万个，由此可见天主教在中国发展之迅猛。

利玛窦等在华传教期间还与明朝士大夫研讨科学，著书立说，对中国近代科学先驱徐光启、李之藻等人研究、介绍西方天文、数学、物理、地理、测量、机械等科学，起了积极的促进作用。利玛窦到北京后，和中国的天文学家徐光启、李之藻一起从事天文、历法的研究。利玛窦所著《圜容较义》一卷，是研究天体数学的著作，由利玛窦口述，李之藻达词，合译成中文。利玛窦发现中国士大夫中不少人对数学很有兴趣，便想把古希腊著名数学家欧几里得的经典著作《几何原本》翻译过来。他曾几次与中国士人合作翻译，但都失败了。利玛窦感叹地说："东西文理，又自绝殊，字义相求，仍多阙略，了然于口，尚可勉图，肆笔为文，便成艰涩矣。"利玛窦为译此书，三次与人合作，均未成功。万历三十二年，徐光启进北京翰林院，与利玛窦反复讨论后，于万历三十四年秋，开始合作翻译《几何原本》，利玛窦口述，徐光启笔录。第二年春，徐光启和利玛窦经过三易其稿，译完了前 6 卷。《几何原本》共有 15 卷，徐光启想继续译完全书，可是因利玛窦忙于传教，便中止了。译出的 6 卷先刻印出来。该书不仅把欧洲古希腊数学家欧几里得的平面几何学介绍到中国来，而且它所涉及的平面几何图形比中国传统几何学要丰富得多。从此，"几何"一词成了我国数学上的专有名词。徐光启在翻译中所使用的一套术语成为我国近代数学的科学术语，诸如点、线、面、平行线、直角、钝角、锐角、三角形、四边形等。继《几何原本》的翻译，万历四十一年李之藻又和利玛窦合译另一数学名著《同文算指》。该书依据克拉维斯《实用算术概论》和程大位的《算法统宗》编译而成，汇中西算术于一体。全书共 10 卷，分为前后两编，并附有别编。前编 2 卷，主要论整数和分数四则运算。其余 8 卷，主要为比例、比例分配、多元一次方程组、开方等。利玛窦到中国后还编制了世界地图，称为《山海舆地全图》。该图由当时任岭西按察司副使的王泮于万历十二年在广东肇庆刻印。万历二十三年至万历二十六年，应天巡抚赵可怀在苏州刻石翻印。万历二十八年南京吏部主事吴中明请利玛窦据王泮刻本加以增订，在南京刻印。万历三十年李之藻又请利玛窦据吴中明刻本加以增订，在北京刻印。这幅地图向中国介绍了地圆、地球大小、地心说、五大洲的概况，五带的划分，世界各国的国名和山川。许多国名、地名，一直沿用至今，如亚细亚、欧罗巴、亚美利加、加拿大、古巴、罗马、大西洋、地中海、北极、南极等。这些西方地理著作和地图的传入，打开了中国人的眼界，使得国人得以从文字和图幅中初步了解全球五大洲的情况。同时也把西方绘制地图的投影术传入了中国。此外，明朝后期西学传入中国后，水利科学也受到以农立国的中国士大夫的重

视。利玛窦刚到中国时，曾与徐光启谈及水利之学。万历三十四年意大利人耶稣会士熊三拔来华后，利玛窦就把熊三拔介绍给徐光启。后来，熊三拔编著了《泰西水法》6卷，论述了龙尾车、玉衡车、恒升车以及水库等的性能与作用，并附图说明。万历四十一年此书正式刊行。这是第一部系统介绍西方农田水利的专著。徐光启所著《农政全书》的水利部分，吸收了《泰西水法》的不少内容。

万历三十八年利玛窦去世。他来华的主要目的在传教，但是利玛窦所带来和介绍的西方先进的天文、历法、数学、地理学等自然科学知识，在中西文化交流史上具有划时代的重大意义。它对中国人认识和了解西方世界，促进中国近代科学技术的发展起了积极的推动作用。（高春平）

努尔哈赤起兵和统一建州女真

明朝中叶，女真族努尔哈赤起兵和统一建州女真的历史事件。

努尔哈赤(1559—1626)，姓爱新觉罗，是明初建州左卫都指挥使猛哥帖木儿的后裔，祖父觉昌安为明朝建州左卫都指挥，父亲塔克世为建州左卫指挥。努尔哈赤幼年家道中衰，流落抚顺(今属辽宁)。曾在抚顺关马市交易，一度在明朝辽东总兵官李成梁属下为侍从。他广交汉人，受到汉族文化的薰陶，比较熟悉汉族封建经济和明朝的政治动向。明朝万历十一年(1583)，建州女真苏克苏浒部图伦城主尼堪外兰联合明军攻打原建州首领王杲之子阿台，觉昌安和塔克世随明军同往，并入城劝阿台投降。不料明军在占领阿台的古埒城中，竟在混乱中误杀觉昌安和塔克世。后来，明政府为了抚慰其部族，遂授努尔哈赤为建州左卫都指挥使。努尔哈赤知无力与明朝抗争，便将其祖父、父亲被杀之愤，倾泄到尼堪外兰身上。是年五月，努尔哈赤以先父"十三副遗甲"，率兵百人向尼堪外兰驻地图伦城发动进攻，一举占领图伦，尼堪外兰逃遁。从此，努尔哈赤揭开了统一建州女真各部战争的序幕。努尔哈赤根据当时的政治、军事形势，采取了表面上对明朝称臣纳贡，互市通好，暗自独立，发展实力的策略，在统一女真各部的战争中，采取了由近及远，先弱后强，一城一族一部并取各部的方针。建州女真分布于牡丹江、绥芬河及长白山一带，有苏克苏浒部、董鄂部、浑河部、完颜部、哲陈部和长白山讷殷部、朱舍里部、鸭绿江部。努尔哈赤首先开始统一努尔哈赤宗族所在的苏克苏浒部。苏克苏浒部萨尔浒城主诺米纳，曾同努尔哈赤歃盟，但因尼堪外兰依恃明朝，势力较强，便背弃盟誓，暗助尼堪外兰，使尼堪外兰逃去。努尔哈赤对诺米纳虽怀恨在心，但他不用力攻，而用计取。时值诺米纳派人来约会攻浑河部巴尔达城。努尔哈赤佯同诺米纳约盟，合兵攻打巴尔达城。临战时，他要诺米纳先攻，诺米纳不从。这时，努尔哈赤便用预定之计，执诺米纳，杀之。除诺米纳后，努尔哈赤很快就统一了苏克苏浒部，势力日强，威信提高。万历十二年，努尔哈赤获悉董鄂部发生内讧，便乘机往攻董鄂部主阿海驻地齐吉塔城。阿海聚兵400，闭门守城。努尔哈赤统兵围城，并纵火焚毁城上悬楼。城将陷，因天降大雪，只好收兵还师。后来再次发兵征讨，终于吞并董鄂部。万历十三年，努尔哈赤伐哲陈部。哲陈部位于浑河上游流域，是苏克苏浒部的左邻。经过两年的战争，努尔哈赤终于灭掉哲陈部。万历十四年，努尔哈赤闻尼堪外兰在浑河部的鹅尔浑城。鹅尔浑城位于浑河畔，临近抚顺。努尔哈赤星夜兼驰，率兵攻陷鹅尔浑城，但未获尼堪外兰。后获知尼堪外兰被明军所保护，便派人向明军索要尼堪外兰。明军见努尔哈赤势力日渐强大，留着尼堪外兰这个傀儡已无用处，就决定抛弃他。后来，尼堪外兰被努尔哈赤派去的斋萨斩杀。尼堪外兰的被斩首，标志着努尔哈赤在统一建州女真的战争中已经取得决定性的胜利。万历十五年，努尔哈赤为兴基立业，扩展势力，在呼兰哈达山下建费阿拉城(辽宁省新宾县境内旧老城)。是年六月，努尔哈赤在费阿拉城"始立国政"，"自中称王"，建立王权。从此，费阿拉城成为当时建州女真政治、经济、军事中心。万历十六年，努尔哈赤又出兵征服完颜部。这样，努尔哈赤历时5年，先后并取苏克苏浒部、董鄂部、浑河部、哲陈部和完颜部，统一了建州女真本部。万历十七年，明朝封努尔哈赤为都督佥事，十九年又升为左都督。万历二十一年，努尔哈赤又先后夺取长白山讷殷部、朱舍里部和鸭绿江三部。至此，努尔哈赤使整个建州女真归一。明朝为了笼络努尔哈赤，又于万历二十三年，封他为龙虎将军。

（张正明）

努尔哈赤统一海西女真和并附"野人"女真

明朝中叶，建州女真努尔哈赤统一海西女真、并附"野人"女真的历史事件。

明朝万历十五年(1587)，努尔哈赤在费阿拉称王后，利用统一建州女真后的强大势力，抓住明朝辽东军力虚弱的时机，开始了统一海西女真的战争。同时，海西女真对于努尔哈赤统一建州女真的胜利，也

引起很大的不安。海西女真又称扈伦四部,包括叶赫、哈达、辉发和乌拉部,因居海西江(松花江)流域而得名。先是哈达贝勒扈尔干送女给努尔哈赤为妻,后叶赫贝勒纳林布禄也把胞妹纳喇氏送给努尔哈赤为妻,他们企图用姻盟牵制努尔哈赤,但都没有成功。于是叶赫贝勒纳林布禄试图以索要土地的政治手段,限制建州势力的膨胀,但也遭到努尔哈赤的拒绝。纳林布禄因努尔哈赤既不能用联姻手段笼络,又不能以政治讹诈压服,便开始诉诸武力。万历二十一年六月,叶赫纠合哈达、乌拉、辉发部兵马,劫建州户部察寨。哈达部与努尔哈赤之军在富尔佳齐相遇,双方发生遭遇战,结果建州兵大胜哈达兵。是年九月,叶赫部联合哈达、乌拉、辉发部,长白山朱舍里、讷殷部,蒙古科尔沁、锡伯、瓜尔佳三部,共为九部,组成3万人联军,兵分三路进攻努尔哈赤。努尔哈赤临危不惧,采取集中兵力奋勇合击战术,在古勒山大败九部联军,取得了统一女真各部关键性的胜利。努尔哈赤自此"军威大震,远迩慑服"。他利用古勒山之战后的有利形势,对海西女真各部展开攻势,先近后远,各个击破。首先是破哈达部。哈达,姓纳喇氏,居住在哈达河(今清河)流域,因地得名。它东邻辉发,西至开原,南接建州,北界叶赫。古勒山战后,叶赫部欲统一海西女真,出兵哈达,哈达被迫向建州乞师。努尔哈赤派费英东和噶盖领兵2000助哈达,驻防其地。叶赫部不愿意哈达倒向建州一边,从中离间哈达与建州的关系,约哈达部首领孟格布禄往开原密议,但机密泄漏,努尔哈赤决定发兵征哈达。万历二十七年九月,努尔哈赤兵陷哈达城。二十九年哈达部发生饥荒,努尔哈赤乘机并其部众,灭哈达部。接着,努尔哈赤把目标转向辉发部。辉发,先姓益克德里氏,后改姓纳喇氏。先世居住黑龙江流域,后迁徙至松花江支流辉发河流域,因地得名。辉发部自哈达部灭亡后,地理上夹在建州和叶赫部之间,政治上采取中立于建州与叶赫部的两面政策,结果反而得罪了两方。万历三十五年九月,努尔哈赤亲自统兵进攻辉发扈尔奇城。城陷后,建州军屠其兵,迁其民,辉发灭亡。之后,努尔哈赤又把注意力转向乌拉。乌拉,姓纳喇氏,居住在乌拉河(今松花江上游)流域,因地得名。万历三十五年正月,东海女真瓦尔喀部斐优城主穆特赫不堪海西女真乌拉部骚扰,率部归附建州女真。努尔哈赤派弟舒尔哈齐、长子褚英、次子代善、大臣费英东、侍卫扈尔汉等率兵3000迎接穆特赫,途遇乌拉部首领布占泰率1万军队拦截,双方在乌碣岩发生激战。结果建州兵大胜乌拉兵,努尔哈赤威震以东诸部。万历四十年九月,努尔哈赤自率第五子莽古尔泰、第八子皇太极,统兵征乌拉部。建州军连克河西六城,在乌拉城西扎营。布占泰被迫送人质至建州军营求和,努尔哈赤撤兵。次年正月,努尔哈赤再次发兵征讨乌拉部,攻陷乌拉城,布占泰仅以身免逃往叶赫部。努尔哈赤灭乌拉部后,又准备进攻海西女真中势力最大的一部——叶赫部。叶赫,先世姓土默特氏,后改姓纳喇氏。居住在叶赫河(今通河)流域,因地得名。它东邻辉发,南接哈达,西南临开原,西界蒙古,北与乌拉相近,郭治在叶赫城。叶赫一方面南靠明朝,西联蒙古,北结乌拉,以同建州相抗衡;另方面又与建州结姻、歃盟,以争取时间,集聚力量。万历二十一年古勒山之战叶赫部败于建州军后,又与努尔哈赤复缔前好,重以婚媾。而努尔哈赤也巧妙地以臣属明朝,结好朝鲜,姻盟叶赫,先腾出手来灭哈达,并辉发,吞乌拉。在哈达、辉发、乌拉相继灭亡后,叶赫陷于孤立,努尔哈赤开始了鲸吞叶赫,实现其统一海西女真的计划。万历四十一年乌拉部首领布占泰在乌拉亡后逃往叶赫,努尔哈赤三次遣使告叶赫缚布占泰以献,叶赫不从。是年九月,努尔哈赤统兵4万攻叶赫。建州兵降兀苏城,下呀哈城、黑儿苏城等大小19城寨,后回师。万历四十七年正月,努尔哈赤再次发兵攻打叶赫。努尔哈赤进攻叶赫,力求得到明朝的谅解或中立。发兵之前,曾请求明廷允准派其第七子阿巴泰质于明朝,又投书明朝述说其征伐叶赫的理由,以避免在进攻叶赫时,腹背受敌。努尔哈赤率军至叶赫城10里之外,俘获大量人民、畜产、粮食。叶赫向明乞师,明开原总兵马林率明军驰救。建州军为避免两面受敌,焚叶赫城外屯寨20余处,回师。是年八月,努尔哈赤命大贝勒代善、二贝勒阿敏(舒尔哈齐之子)、三贝勒莽古尔泰、四贝勒皇太极率军扬言征讨蒙古,暗中绕路潜行,攻叶赫贝勒布扬古驻地西城;命额亦都率军"扮为蒙古兵",攻叶赫贝勒金台石驻地东城;努尔哈赤亲率大军随后进围金台石驻地东城。二十二日,努尔哈赤军至叶赫城下,分别围住西城和东城。金台石在东城率叶赫军顽强坚守,努尔哈赤掘穴用炸药,城陷。金台石退守禁城八角楼,三次拒降后,举火自焚未死,被俘而缢杀。东城既陷,西城危在旦夕。布扬古孤城无援,军心涣散,其堂弟吴达哈携妻孥开门出降,四大贝勒兵由是得以长驱直入。布扬古被迫降。努尔哈赤以海西女真四部全亡,留着布扬古无用,便借布扬古跪拜礼节不恭为由,将他缢杀。叶赫东西二城降后,其所属各城俱降,叶赫亡。

努尔哈赤在统一海西女真的同时,又按照“征抚并用,以抚为主”的政策,逐步地并附“野人”女真。“野人”女真的一支是东海女真,另一支是黑龙江女真。东海女真居住在黑龙江支流松花江和乌苏里江流域及乌苏里江以东滨海地区。东海女真主要有渥集部(又称窝集部、兀吉部)、瓦尔喀部、库尔喀部三部。努尔哈赤并附“野人”女真,先从临近建州女真的东海女真瓦尔喀部开始。约在万历二十四年,努尔哈赤派费英东初征瓦尔喀,揭开了并附“野人”女真的序幕。万历二十七年正月,东海女真渥集部虎尔哈路路长王格、张格归附努尔哈赤,努尔哈赤将六位大臣之女分别嫁给他们做妻子,以联姻方式巩固建州女真与东海女真的关系。万历三十五年正月,东海女真瓦尔喀部蜚悠城部众归附努尔哈赤。是年五月,努尔哈赤派费英东等统兵1000征讨东海女真渥集部,获人畜2000而回。万历三十七年十二月努尔哈赤在臣服瓦尔喀部后,命扈尔汉统兵千人,伐取渥集部滹野路。次年,努尔哈赤命额亦都率兵千人,到图们江、绥芬河和牡丹江一带,招服渥集部的那木都鲁、绥芬、宁古塔、尼马察四路。之后,额亦都又乘胜率兵击取雅揽路(在今俄国海参崴东北雅兰河一带),“获人畜万余而回”。三十九年七月,努尔哈赤派第七子阿巴泰率兵千人,征讨渥集部之乌尔古宸、木伦二路。同年十二月,又派额亦都率兵2000,征伐东海女真虎尔哈部扎库塔城。万历四十三年十一月,努尔哈赤派兵征讨东海女真渥集部额黑库伦城。四十七年派兵收取东海女真虎尔哈部民。天启五年(1625)发兵征讨东海女真瓦尔喀等部。努尔哈赤经过30年的用兵,在东起日本海、西迄松花江、南达摩阔崴湾、濒临图们江口、北抵鄂伦河这一广大疆域内,基本上统一了东海女真诸部。努尔哈赤征讨黑龙江女真是从万历四十四年开始。黑龙江女真因居住黑龙江流域而得名。黑龙江女真包括虎尔哈部、萨哈连部、使犬部、使鹿部和索伦部。四十四年七月,努尔哈赤军征讨黑龙江女真萨哈连部。萨哈连部居住在黑龙江中游流域。努尔哈赤军夺取萨哈连部数十屯寨后,于十一月回师。同年,努尔哈赤军又征抚使犬部。使犬部居住在黑龙江下游一带,包括赫哲人、鄂伦春人、鄂温克人等。努尔哈赤军水陆并进,深入千里之外,兵锋所指,莫不折服。先后招服各路路长40人。同时,努尔哈赤又把兵锋指向使鹿部。使鹿部在使犬部之北和东,混同江下游以东滨海,包括库页岛全部。努尔哈赤曾不断向这一地区用兵。后来库页内附,每岁进貂皮,努尔哈赤设姓长、乡长、子弟以统之。至此,努尔哈赤基本上完成了统一女真各部的大业。

(张正明)

抗倭援朝战争

明万历二十至二十六年(1592—1598)间,日本丰臣秀吉两次侵略朝鲜,明朝政府出兵抗倭援朝的战争。

中朝两国是山水相连、唇齿相依、世代友好的邻邦。两国政府和人民在明朝一直保持着亲密的政治、经济、文化交流。到万历年间,日本的丰臣秀吉统一了全国。他为了满足日本封建领主和海盗商人的贪欲,积极向外侵略扩张,首先把矛头指向邻国朝鲜,妄图先灭亡朝鲜,然后以朝鲜为根据地,渡过鸭绿江,进攻中国。明朝政府事先获悉这一情报,当即转告朝鲜,但当时朝鲜国王李昖荒于酒色,对敌情杳无所闻,丝毫未做防备。万历二十年(1592)一月,丰臣秀吉派18万日军乘数百艘战船大举侵犯朝鲜。侵朝日军共分九军。第一军由小西行长率领,渡对马海峡,于四月十二日在朝鲜釜山登陆,加藤清正率领的第二军和黑田长政率领的第三军也紧随其后相继在釜山登陆。当时朝鲜承平日久,怯不知战。日军占领釜山后,分兵北边,很快占领了王京(汉城)、平壤,朝鲜王子被俘,军队望风溃退。短短三个月,日军几乎侵占了朝鲜全国。侵略军毁坟墓,劫府库,所过之处荡然一空,并有假道朝鲜渡鸭绿江侵犯中国之势。昏愦的朝鲜国王狼狈逃到义州,急忙遣使向明朝告急求援。明朝政府得到朝鲜国王的告急后,经过廷议认为朝鲜为我藩篱,有唇亡齿寒的关系,决定出兵援朝。但开始只派了游击史儒和副总兵祖承训统兵3000赴朝,结果史儒力战身亡,祖承训只身逃回。败报传来,明廷大震,即命宋应昌为经略,李如松为提督,前去支援。其时李如松尚在宁夏,遂由宋应昌去山海关集结赴朝参战军队。兵部尚书石星对援朝抗倭信心不足,竟派嘉兴人沈惟敬赴日议和。十二月,李如松奉命自宁夏来到东征军中部署战事。沈惟敬从日本归来向李如松报告说:倭酋愿封,请退平壤以西,以大同江为界。李如松怒斥沈惟敬,下令把他关在军营,决定统师抗倭。李如松原籍朝鲜,其高祖英迁居辽东,曾任铁岭卫指挥佥事。其父李成梁,镇辽20余年,屡建战功,威震边陲。明朝用他为援朝东征提督,是很合适的人选。万历二十年十二月二十五日,李如松率4.5万明军履冰过江,誓师东征。广大东征将士壮志满怀跨过鸭绿江,与朝鲜军民一起抗击日军。第二年一月初六,东征大军抵达平壤城外,

与日军展开平壤会战。

平壤是朝鲜北部的重要都市，东南临江，西枕山陡立，迤北牡丹台高耸，地形险要，易守难攻，日军在此设有炮台及鸟铳等新式火器严加防守。会战初，明军吴惟忠部 3000 人先攻牡丹台，与日军激战整天。日军在七星门近郊设计诱李如松入城未遂，便于夜间选精锐 800 人偷袭如松弟李如柏营。李如柏戒备森严，予敌以有力的反击。一月初八，李如松身先士卒指挥攻城，城上日军炮矢如雨。前锋稍有退却，李如松手斩一人，挺身直前。李如松坐骑被击毙，易马奔驰再战。李如柏被铅丸击中盔顶，毫不气馁，继续奋勇战斗。部将吴惟忠被铅丸击中，鲜血从胸前的伤口不住地流淌，犹奋呼督战。明军无不以一当百，奋勇冲杀。经过激烈战斗，明军终于从小西门、大西门突入，日军起初还负隅顽抗，可是在明军的顽强攻击下渐渐不支，终于退保风月楼，夜半渡大同江南逃。中朝军队收复平壤后，一鼓作气，乘胜追击。一月十九日，李如柏收复了开城、平安、黄海、京畿、江源。日军大部退屯王京。李如松连战皆捷，产生了轻敌思想，二十七日以轻骑趋碧蹄馆，离王京 30 里，突然遭到数倍于己的日军围攻，损失了几百名亲兵。明军遂退回开城。李如松探听到日军在龙山仓储有军粮数十万，就密令部将查大受选敢死勇士深入敌后纵火焚烧。日军屡战屡败，粮草被烧，士气大落，主将小西行长便致信给沈惟敬试探明朝的意向。这时明军又调来刘綎的川军和陈璘的水师，正宜乘胜进军荡平倭贼。遗憾的是明朝未能利用这一有利战机，经略宋应昌派游击周弘谟去和谈，以日方献王京，返王子，如约纵归。四月十八日，日军撤出王京，但仍盘踞在釜山一带。恰在此时，明朝国内的一些官僚也力主议和罢兵。昏庸的明神宗便传谕在朝明军以次撤回。经略宋应昌上疏力争要求将日军逐出釜山，免留后患。明神宗不听劝告，兵部尚书更主和意，于是只留刘綎的川兵进行防守，其余明军全部撤回国内。

丰臣秀吉施展和谈诡计，以便得到喘息重来的机会。故而日本留驻朝鲜釜山的军队始终未撤。万历二十五年正月，他以朝鲜王子不敬、谢礼又薄的借口，发动水陆大军 14 万人，二次进犯朝鲜。明朝政府闻讯，又派兵部尚书邢玠为总督，佥都御史杨镐为经略，名将麻贵为提督，第二次赴朝抗倭。明军入朝后，麻贵统率诸军驰赴王京。这时日军已入庆州，围南原。八月，全州、南原先后陷落，日军进逼王京。麻贵派副总兵解生守稷山，扼汉江，朝鲜都体察使李元翼也出忠清道袭击敌人，配合明军。解生在稷山挫败了日军，日军行长部退屯井邑，清正所部退屯庆州。同年十二月，邢玠、杨镐和麻贵议定进兵方略：决定分 4 万人为三协，副将高策率中军，李如梅将左军，李芳春、解生统右军，合攻退到蔚山的日军清正部。李如梅部将摆寨以轻骑诱败日军，清正部退保岛山，于城外复筑三寨进行防守。裨将陈寅身先士卒，冒弹矢勇呼而上，砍栅两重。杨镐妒嫉，不愿部属立大功，遂鸣金收兵。于是日军闭城不战，坚守待援。明军围十昼夜，不能克。万历二十六年正月，小西行长救兵到来，杨镐大惧，狼狈先奔，明军伤亡 2 万余人，全部撤回王京。明廷得报罢免了杨镐，以天津巡抚万世德为经略。总督邢玠接受这一战役缺乏水军的教训，专门招募江西水师，增强军事力量。二月，邢玠分兵四路，东路麻贵，中路李如梅，西路刘綎，水路陈璘，各守信地，相机进兵。其时日军分三路驻扎，东路清正部据蔚山，西路行长部据粟林，建砦数重。中路石曼子部据泗州。九月，明军分道进击三路日军，双方互有胜负。十月，福建都御史金学曾报日军主帅丰臣秀吉已于七月九日死去，日本兵士俱有归志。于是中朝联军加紧进攻。十一月十七日夜，日军清正部乘船先逃，麻贵遂入岛山、西浦，刘綎亦攻夺曳桥。明军总兵陈璘率水师 1.3 万余人，战舰数百艘，分扼忠清、全罗、庆尚诸海口。不久，刘綎进攻顺天大城，陈璘以舟师夹击，焚敌船百余。石曼子西援行长，陈璘又在海上邀击之。日军大队从海上溃逃，明朝副总兵邓子龙和朝鲜统制使李舜臣，统率水军邀击于釜山南海，大败日军。年逾 70 的老将邓子龙直前奋击，消灭许多日军。李舜臣与邓子龙密切配合，狠狠打击日军，击碎和烧毁敌船多艘。最后，他与邓子龙壮烈牺牲。这次海战，中朝联军同心协力歼敌万余，在反侵略斗争中用鲜血和生命结下牢固的战斗友谊。至此，为时数年的抗倭援朝战争以中朝两国军民的巨大胜利和日军的彻底失败而告终。　（高春平）

明代的"改土归流"

明朝政府废除西南各少数民族地区落后的土司制度，由中央政府直接委派流官进行统治的政策。

在明代，云南、贵州、两广、湖广以及四川等地，聚居着我国苗、瑶、壮、侗、彝、傣等许多少数民族。各少数民族间社会经济的发展极不平衡，生活习俗千差万别。和汉族人民相杂处或贴邻居住的少数民族，由于受汉族先进的生产技术的影响，多已进入封建社会；有的则处于奴隶制向封建地主制的过渡阶段；也有的地方还滞留在奴隶制时代；还有个别的地方

甚至仍处在刀耕火种式的原始社会时期。历代以来，他们自相君长，世袭其位，封建王朝对其实行"羁縻"政策，只让其进输贡赋，表示臣服中央政府，并不指派专门官员进行管辖。到明初逐渐改变了这种传统的羁縻笼络办法，实施"改土归流"政策，分别司郡州县，额以赋役，宠以名号。洪武(1368—1398)初，西南少数民族首领来归顺者，明太祖即用原官授之。当时西南一带的土司制度，实际分土司和土官两类：土司虽然名义上接受明朝皇帝封赐的官爵和位号，但事实上仍是割据一方的地方独立政权，权位世袭，管辖着所属的土地和人民，仅在表面上臣服于中央政府。土官是按照汉族地区的行政制度设立府、州、县，委派少数民族头领担任土知府、土知州、土知县等官。这些头人实际上仍是有土官之名而行土司之实。土司制度是西南少数民族地区经济落后，社会发展水平低下，而中央皇朝在军事征服或政治臣服之后又无法立即加以改变现状情况下的特殊制度。明代土司的官职有宣慰使、宣抚使、安抚使、招讨使等。土官袭替必奉朝命，虽在万里之外，皆赴阙受职。天顺(1457—1464)末年，允许土官缴呈勘奏。成化(1465—1487)中，令纳粟备赈，规取日陋。世宗嘉靖九年(1524)始复旧制，以府、州、县土官隶属吏部验封司，宣慰使、招讨使等官隶属兵部武选司。隶验封司者，布政司领之；隶武选司者，都指挥领之。于是文武相维，类于中原。但其间叛服无常，他们因世袭官位，割据性强，常常因争夺财产和土地互相仇杀火并，有的还起兵叛乱，反抗中央政府。明政府在平定这些战乱后，便在条件成熟的地方裁撤土司，改设可以调迁的"流官"。所以，明代的改土归流经历了一个渐进和不断反复的曲折过程。如永乐十一年(1413)思南宣慰使田宗鼎与思州宣慰使田琛因争夺土地而互相率兵攻杀，明朝政府命镇远侯顾成率兵5万平定了这次战乱，于是分其地为八府四州，设省级行政单位贵州布政使司，这种办法就是"改土归流"。又如播州(贵州遵义地区)从唐朝起就由杨氏世袭盘踞。洪武四年(1371)，明太祖派大军平定杨氏政权，播州归属明朝所统辖。明政府袭用元朝的土司制度，仍任土官杨铿为播州宣慰使，洪武七年中书省以播州土地既入版图，当收其贡赋，建议每年征粮2500石为军储。但明太祖因其地处僻远又率先来归，主张宽待，田税不必以额。洪武十五年，明政府为了加强对该地区的统治，建筑了播州城。但播州杨氏在其统辖地区不但管理民政，而且掌握兵权，有自己的军队。他们的军队由"土丁子弟"中抽调，每人手上刺字染黑，称为"涅手军"。杨氏还享有不受明朝政府约束的司法权，即所谓"人皆世禄，自用其法"。土司的意志就是法律，可以随意逮捕、审讯甚至残杀民众。

播州本属四川行省管辖，但其地紧邻贵州，两省之间便常因播州问题闹纠纷。隆庆五年(1571)杨应龙袭为播州宣慰使，管辖草塘、黄平两安抚司，真州、播州、余庆、白泥、容山、重安六个长官司，地域广袤，有田、张、袁、卢、谭、罗、吴七姓，世袭各级土官。杨应龙刚袭任宣慰使时，多次帮助明朝镇压其他少数民族人民的反抗，故而获得明廷的信任，授以都指挥使衔。可是杨应龙对播州各族人民的统治极为残酷，专以酷杀树威，致使人人惶恐不安。而且随着势力的日益增长，杨应龙日渐骄纵不法，对明廷不大服从了，甚至公开反叛明朝。万历二十一年(1593)，明廷派巡抚都御史王继光与总兵刘承嗣、参将郭成等分兵三路进剿，结果在娄山关被杨应龙打得大败而逃。万历二十二年三月，明廷以兵部侍郎邢玠总督贵州招抚杨应龙。杨应龙表面上对明朝输金"赎罪"，暗中拼命积蓄力量，一心想割据称王。万历二十五年杨应龙大掠贵州洪头、高坪。两年后又大败贵州巡抚江东之所率的明军，杀都指挥使杨国柱。明廷闻讯大惊，任都御史李化龙兼兵部侍郎节制川、湖、贵三省兵事，决意进剿。万历二十八年春，明朝各路军队陆续抵达川贵两省。明军兵分八路，从四川、贵州、湖广三面分进合击。同年五月，八路明军会攻杨应龙的老巢海龙囤。海龙囤地势险峻，直到六月五日才被攻克。杨应龙自缢，其子朝栋、弟兆龙等被俘，后解至京师处死。

明朝政府平定杨应龙的叛乱以后，就把播州地区"改土归流"，改成由明朝中央政府直接派遣的官吏即"流官"管理。播州原属四川省管辖，但明廷认为"黔瘠壤也，若乘此时，而割播地以附黔，则于蜀无损，于黔有裨"。于是将播州地区设置二府二州八县，分属川贵。遵义府属贵州，下辖真安州及遵义、桐梓、绥阳、仁怀四县。平越府属贵州，下辖黄州及余庆、瓮安、湄潭三县。从此，结束了杨氏在播州长达29世700余年的世袭统治。不过，明代改土归流政策的推行并不彻底，往往土流兼施，许多地方府以下的官员仍参用土官。因此，不少地区改土归流的过程几经反复。如弘治八年(1495)，改四川马湖府为流官知府。但后来迫于当地少数民族上层分子的不断捣乱，重又任用土官。到世宗嘉靖三年((1524)马湖府又曾两次改流，可结果仍是流官再设而土夷随叛，杀人夺地比往昔更厉害，使得明政府只好再次改任土官陇姓为知府，恢复土司制度。

在明代实施“改土归流”的过程中，最大的障碍来自少数民族上层分子的反抗。因为改土归流的实现标志着少数民族上层分子世袭权益的丧失，所以他们总是不断地起兵叛乱，力图阻挠流官的设置，维护原有的土司制度。到明末天启(1621--1627)年间，在西南地区又爆发了四川永宁宣抚司奢崇明、贵州水西宣慰司安邦彦的叛乱。永宁宣慰使由彝族奢姓世袭。他们定期向明朝政府贡马及输送税粮。万历时，永宁宣慰司奢效忠的妻妾之间发生了一场争袭土司职位的斗争。万历二十三年明政府命奢世统抚养长大的奢效忠的侄儿奢崇明袭宣抚使职。奢崇明和其子奢寅久蓄异志，不久，乘明廷征兵攻打辽东时疏请提兵赴援，得到允准，遂遣其将樊龙、樊虎带兵至重庆。天启元年(1621)九月十七日，樊龙等发动叛乱，杀四川巡抚、道府、总兵等官20员，占据重庆。奢崇明自号“大梁”，设丞相五府等官，统所部数万分道趋成都。明廷急调各处援兵进剿。天启二年正月，崇明父子败走，成都围解。与此同时，水西宣慰使安位的叔父安邦彦也反，自称罗甸王。天启二年二月，安邦彦自统10万大兵进取贵阳。崇祯元年(1628)六月，明廷任朱燮元总督贵、湖、云、川、广五省军务围攻奢崇明和安邦彦。次年八月，安邦彦和奢崇明合兵10余万迎战明军失败被杀。但安位在其部属的挟持下继续抗拒。明军对水西进行了100多天的围困，使得水西弹尽粮绝，只好在崇祯三年春投降，奢安之乱最后被平定。明朝政府把原来属永宁宣抚司的肥沃土地划归永宁卫，把其他的土地分为48屯，分给有功将士，隶于叙州府。明政府还于其地增设同知一人进行管理，又把叙州兵备道移到永宁卫，并削水西地区六目地归之朝廷。同时在沿河要害处，筑城36所，以加强这一地区的管理。总之，明代对西南地区“改土归流”政策的实施尽管尚属起步阶段，但它对西南地区经济文化的发展起了积极的推进作用，极大地促进了西南边陲与内地的联系，为清代雍正年间对西南地区大规模地实行“改土归流”奠定了基础。

(高春平)

明末“三案”

明末“三案”指“梃击案”、“红丸案”、“移宫案”，是明末党争的焦点。

“梃击案”发生在万历四十三年(1615)。五月初四傍晚，有一男子，手持木棍，闯入太子常洛居住的慈庆宫，打伤守门太监，随即被擒。浙党巡城御史刘廷元审问后奏称，犯人张差，蓟州人，语无伦次，是个疯子。后又经两个浙党官员审问，亦如初审，准备按疯颠结案。但很多人怀疑此人系郑贵妃主使，意在谋害太子。刑部主事王之寀私下探询犯人张差，得知此人系受人指使，是由太监带进宫来作案的。神宗遂令刑部会同十三司官员会审。张差供认，太监庞保、刘成二人指使他打进慈庆宫，并对他说：“打死‘小爷’，有吃有穿。”庞、刘二人都是郑贵妃的内侍。至此，真相大白。一时间，议论纷纷。神宗宠郑贵妃，恐怕追查下去涉及到郑贵妃，所以下令把张差凌迟处死，把庞保、刘成秘密处决于内廷，草草结案。此即所谓“梃击案”。

万历四十八年七月，神宗病死，太子朱常洛于八月初一嗣位，是为光宗。光宗做太子时，就已有妃子、宫女多人。其中，两个姓李的选侍最得宠，称曰东李、西李，而西李之宠更在东李之上。光宗起居无节，溺于女色，即位不久便生了病。内医太监崔文升上泻药，光宗服后，腹泻不止。鸿胪寺丞李可灼献红丸一颗，自称仙丹。光宗服后，稍觉舒服。过了半日，又献上一颗，光宗服后睡至凌晨死去。在位仅29天。是为“红丸案”。

光宗之死，内外官员都归咎于李可灼，但首辅方从哲却以光宗遗诏名义，拟赏李可灼白银50两。群情大哗，纷纷弹劾。方从哲才不得不把赏银50两改为罚俸一年。方从哲亦因此而被迫辞职。天启二年(1622)，东林党人礼部尚书孙慎行又上疏追论李可灼、崔文升等人之罪，李可灼充军，崔文升贬放南京。

选侍西李在光宗死后，仍住乾清宫不肯搬出，妄图借皇长子朱由校年少(时年16岁)，垂帘听政。但乾清宫是专供皇帝和皇后住的。御史左光斗上疏指出，西李既非嫡母，又非生母，俨然居正宫，而皇长子却居慈庆宫，是名分倒置。还说，如不采取措施，让西李借抚养之名，行专制之实，必乱朝纲。给事中杨涟也再次上疏，力促移宫。西李才不得不移居仁寿殿。此即为“移宫案”。西李移宫后，与东林党作对的官员又上疏谴责，说光宗尸骨未寒，逼西李移宫，未免过分。于是又争吵起来。后来，熹宗降旨，痛数西李罪状，并令西李搬出仁寿殿，到宫女养老的哕鸾宫去住，才算了事。

在“梃击”、“红丸”、“移宫”三案处置过程中，东林党人的主张占了上风，大体上都是按照东林党人的意见结案的。而魏忠贤得势后，对上疏弹劾他的东林党著名首领杨涟恨之入骨，为了迫害东林党人，魏忠贤则要把早已结案的“三案”全部翻过来。因此，下令纂修万历、泰昌、天启三朝要典。魏忠贤在重新审

定“三案”过程中，首先就把对犯人张差疯颠提出质疑的王之寀逮捕入狱，并置于死地。接着，又赦免了在“红丸案”中被充军的李可灼，起用了被贬放南京的崔文升，并任命崔文升为漕运总督。选侍西李竟被封为康妃。这样，王之寀、孙慎行、杨涟，遂被定为“梃击”、“红丸”、“移宫”三案之罪首。当时正修光宗实录，魏忠贤又下令，凡事关“三案”者，都必须按《三朝要典》改写。似乎《三朝要典》已是千秋铁案。但就在这时，熹宗死去，魏忠贤失去靠山。熹宗弟朱由检入继帝位，改元崇祯，是为思宗。其时，东林党人纷纷上书，弹劾魏忠贤。崇祯帝为了收揽人心，稳定统治，遂下令将魏忠贤贬谪凤阳，接着又派人逮捕治罪。魏忠贤闻讯，畏罪自杀。被魏忠贤翻了的“三案”，又都翻了过来。（张海瀛）

努尔哈赤建立后金政权

努尔哈赤在统一女真各部、征抚蒙古方面取得重大胜利的基础上，为巩固和发展其势力，建立后金政权的历史事件。

明万历十一年（1583）努尔哈赤以先父“十三副遗甲”起兵后，到万历十六年统一建州本部。接着，又经过二十多年时间的征讨，统一了海西女真，并附了“野人”女真，控制了东北的大部分地区。为了缓解右翼蒙古势力的威胁，又先后联姻漠南蒙古科尔沁部，会盟漠南喀尔喀部，进击漠南察哈尔部。对待明朝则成功地实行了两面政策，内心埋藏着仇恨明朝的怒火，准备伺机进攻明朝，表面却佯作忠诚明朝，多次向明朝朝贡人参、貂皮、蜂蜜等方物，同时接受明朝的赏赐和名号，先是受封任建州左卫都指挥使，后又任都督佥事、龙虎将军，多方麻痺明朝统治者。另外，努尔哈赤在统一女真各部中还逐渐建立了八旗军事制度。原来女真之行猎或行聚，每十人以一人为首领，称“牛录额真”。明万历二十九年在牛录基础上，正式创建旗制，开始设黄、红、蓝、白四旗，每旗壮丁300人编一牛录，首领牛录额真（佐领），五牛录一甲喇，首领甲喇额真（参领），五甲喇一固山，首领固山额真，一固山为一旗。万历四十三年，以初设四旗增镶黄、镶白、镶红、镶蓝四旗，合为八旗，每旗7500人，八旗共6万人。八旗制度既是军事制度，又是行政制度，同时还是经济制度（管理生产、分配财物等）。努尔哈赤在创建八旗制度的过程中，还主持制定了无圈点的老满文。努尔哈赤统一女真各部以前，女真人曾使用统一语言，但无通行文字。万历二十七年，努尔哈赤让额尔德尼和噶盖两人，利用蒙文字母，拼写女真语言，而成无圈点满文。由于努尔哈赤除在军事上取得了重大胜利外，在政治上、经济上、文化上，也创造了条件，便在万历十五年建立王权的基础上，于万历四十四年（1616）在赫图阿拉称汗，建元天命，正式建立后金政权。从此，揭开了努尔哈赤后金政权与明朝政权争夺全国统治权的序幕。（张正明）

努尔哈赤征抚漠南蒙古

明代后期，努尔哈赤对漠南蒙古科尔沁部联姻、喀尔喀部会盟和进击察哈尔部的历史事件。

明代后期，蒙古逐渐形成三大部，即生活在蒙古草原西部到新疆准噶尔盆地一带的漠西厄鲁特蒙古，生活在贝加尔湖以南、河套以北的漠北喀尔喀蒙古，生活在蒙古草原东部、大漠以南的漠南蒙古。漠南蒙古东与女真族活动的地区接壤，南接中原地区。努尔哈赤所以要征抚漠南蒙古，主要原因有五：一是漠南蒙古与海西女真关系密切，征抚漠南蒙古有助于女真内部的统一；二是可解除进入辽沈地区的后顾之忧；三是可以拆散漠南蒙古察哈尔部林丹汗等与明朝的联盟；四是可以打通进入长城的又一道路；五是可以扩大建州的势力。努尔哈赤征服漠南蒙古，是先从漠南蒙古的科尔沁部开始。科尔沁部驻牧在嫩江流域，它为了同漠南蒙古的察哈尔部争雄，就与势力较强的海西女真叶赫部、乌拉部结盟。明万历二十一年（1593），科尔沁部参加叶赫为首的九部联军攻打努尔哈赤统治的建州，在古勒山之役遭到失败后，又于万历二十二年遣使与建州和好。万历三十六年三月，建州兵攻乌拉部，科尔沁部初与乌拉部联合，后见建州兵力强盛，便改变初衷撤兵并与建州请盟。努尔哈赤从全局出发，不念旧恶，与科尔沁部建立姻盟关系，笼络科尔沁王公。万历四十年，努尔哈赤听说科尔沁贝勒明安之女博尔济吉特氏“颇有丰姿”，遣使欲娶之。明安贝勒遂送其女与努尔哈赤成亲。万历四十二年努尔哈赤的第八子皇太极娶科尔沁莽古思贝勒之女为妻。万历四十三年正月，努尔哈赤又娶科尔沁部孔果尔贝勒女为妻。科尔沁部通过与努尔哈赤建州部的联姻，以加强自己的势力对抗察哈尔部。而察哈尔部为了统一漠南蒙古，防止努尔哈赤势力扩张到蒙古，就出兵讨伐科尔沁部。科尔沁部粤巴台吉遣使送信给努尔哈赤，请求出兵援助。努尔哈赤派其子莽古尔泰和皇太极率兵驰援粤巴驻地格勒珠尔根城，后察哈尔部解围西走，粤巴亲自跪见努尔哈赤，努尔哈赤把舒尔哈齐第四子图伦的女儿

嫁给粤巴为妻。随后，努尔哈赤与粤巴盟誓结好。努尔哈赤还以召见、赏赉、赐宴等形式，抚绥科尔沁王公。万历四十三年努尔哈赤先后赐科尔沁贝勒明安第四子噶尔斋台吉、长子伊格都齐台吉缎、布、甲等。万历四十四年，努尔哈赤建立后金政权，改元天命。是年，明安贝勒次子哈坦巴图鲁受到努尔哈赤的赏赐。万历四十五年正月，明安贝勒到建州"朝贡"，努尔哈赤亲自郊迎百里，入城后每日小宴，越一日大宴。明安返回时又厚赠礼物。明天启二年(1622)二月，明安率所属军民归附建州，努尔哈赤将其别立蒙古一旗。漠南蒙古五鄂拓克喀尔喀部，主要游牧在辽河流域和今辽宁阜新地区。喀尔喀部分裂为五个鄂拓克，即五部。这五部之间，时而联合，时而倾轧，内讧不休。努尔哈赤利用他们之间的矛盾，进行分化瓦解，逐部争取。万历三十四年十二月，喀尔喀巴特部达尔汉贝勒子恩格德尔，率先归附建州。万历四十五年，努尔哈赤为了进一步笼络恩格德尔，将舒尔哈齐第四女嫁他为妻。明天启四年，恩格德尔到建州朝拜，努尔哈赤给予赏赐，并授予总兵官，后隶满洲正黄旗。但喀尔喀贝勒介赛却与努尔哈赤对抗，他自恃兵强马壮，有明朝支持，曾袭击建州村屯。万历四十七年，介赛配合明军同八旗军作战。努尔哈赤命众贝勒大臣率兵击败介赛军，俘获介赛。两年后，喀尔喀部以牲畜万头赎介赛。努尔哈赤与介赛盟誓，并以其所质之女与大贝勒代善为妻，结为姻盟。努尔哈赤通过对喀尔喀诸部的笼络、瓦解、战争、结姻等，终于使喀尔喀五部发生重大变化，由联明抗御努尔哈赤军，转变为联合努尔哈赤对抗明朝。此后，努尔哈赤把注意力转向漠南蒙古察哈尔部。察哈尔部即插汉、擦汉儿，其首领林丹汗驻帐广宁以北。在明朝看来，察哈尔部与努尔哈赤的后金相比较，主要威胁来自后金。明朝为了对付后金，便联合察哈尔部，共同抵御后金，并且增加对林丹汗的岁币。林丹汗"帐房千余"，部众繁衍，兵力强盛，依恃明朝，对后金态度蛮横。明万历四十八年正月，努尔哈赤遣使赍书给察哈尔部林丹汗，企图进行拉拢，但遭到林丹汗的拒绝。明天启六年起，林丹汗发兵讨伐科尔沁部。科尔沁部在后金援助下，打退了林丹汗的军事进攻。这样，努尔哈赤利用蒙古诸部的矛盾，采取不同策略，终于在征抚漠南蒙古方面，取得了重大胜利。　　(张正明)

萨尔浒之战

努尔哈赤后金政权与明朝政权的一次大规模的战争。

努尔哈赤统一女真各部和建立后金政权后，势力日炽，直接威胁到明朝政权的安危。明政府为了安定辽东，打击后金势力，决定向努尔哈赤发动一次大规模的军事进攻。明万历四十七年(1619，后金天命四年)，由兵部侍郎杨镐为辽东经略，调集10万大军，号称47万，兵分四路进攻后金。杨镐坐镇沈阳，为诸路军总指挥。左翼北路由总兵马林率领，自开原出靖安堡由北进攻；左翼中路由总兵杜松率领，出抚顺关由西进攻；右翼中路由总兵李如柏率领，从清河、鸦鹘关由南进攻；右翼南路由总兵刘綎率领，从宽甸出凉马甸由东南进攻。这四路军马中以西路杜松军为主力，浩浩荡荡，进攻后金都城赫图阿拉城。明政府对于这场战争既不知己，也不知彼，而盲目乐观，以为数路出兵，不日即可大获全胜。后金努尔哈赤对于明军这次战争的目的、兵力部署、作战计划却了如指掌，正确地分析了双方的有利条件和不利条件，提出了"凭你几路来，我只一路去"，集中优势兵力各个击破的战略方针，集中全力攻击明军主力杜松军。这一作战计划，扬长避短，抓住了明军的弱点。明军虽然有10万之众，但兵力分散，主力军西路杜松有军3万，而后金虽然总共有军6万，但集中兵力攻击杜松的3万军，已在人数上占了上风。是年三月初一，杜松率军到萨尔浒，先留2万军驻守萨尔浒，亲率1万军进攻界凡城，把已经分散的兵力再行分散。而努尔哈赤率领八旗兵赶到界凡城附近时，则迅速抓住战机，除留二个旗的兵力阻击界凡明军外，亲率大军突然袭击萨尔浒明军大营。明军溃败。紧接着，努尔哈赤又麾师夹攻在界凡遭到阻击的杜松，使明军陷入重围。被围明军终因寡不敌众，全军覆没，杜松落马而死。努尔哈赤首战告捷，随后挥戈北上，准备攻击北路明军。北路明军总兵马林听说杜松战败，急忙改攻为守，布防富勒哈山尚间崖、斐芬山、斡辉鄂模三地，形成"牛头阵"互为犄角，彼此声援。马林自以为"牛头阵"得地势之利，足可抵御后金军。但他采取消极防御策略，兵力分散，各营蚕缚，造成被动挨打局面，给努尔哈赤以可乘之机。努尔哈赤尽管有三倍于马林军的兵力，但他却未分兵围攻明军，而是针对马林的"牛头阵"，采用了集中兵力、各个击破的策略。后金军先攻斡辉鄂模的明军，次攻尚间崖明军，再攻斐芬山明军，仅用一天的时间就大败北路明军，马林仅以身免。东路刘綎明军，由于道路崎岖，大雪封山，进军缓慢。三月初四日始至浑河，杜松和马林兵败，刘綎却全然不知。而努尔哈赤在取得西路、北路战争的胜利后，立即派扈尔汉、阿敏、代善、皇太

极等先后出发，日夜兼程，赶往东线。努尔哈赤很快就集中了3万八旗兵，隐伏山谷，准备袭击明军。刘綎兵至，努尔哈赤密令燃放刚缴获的杜松军大炮。刘綎在行军途中遥闻大炮声响，以为西路杜松军已到，唯恐杜松独得头功，急令部队火速前进。早已埋伏好的后金军，见明军来到，突然发动攻击，经过一番鏖战，后金军击杀刘綎、生俘协同明军作战的朝鲜兵统帅姜弘立，大败东路明军。明辽东经略、四路军马总指挥杨镐在沈阳惊闻三路军大败，急令南路军撤退。这样，在五日内，后金军就击败了声势浩大的明军的进攻。据记载，在这次战役中，明军死亡文武将吏310余名，死亡军丁45870余人，阵失马骡驼28600余匹(头)。明军在萨尔浒战役的失败，主要是由于政治腐败、军事废弛、指挥失误所造成。后金军的胜利，是后金内部上下一致，兵马精强，努尔哈赤指挥得当，掌握了战争主动权的结果。萨尔浒之战，对于发展中的后金是一次很关键的战役。从此，后金渐趋巩固，对明朝在军事上转入了战略进攻，而明朝则在军事上逐渐转入了战略防御地位。　(张正明)

努尔哈赤进兵辽沈和宁远兵败

努尔哈赤后金政权向明朝发动辽沈之战和宁远兵败的历史事件。

后金天命六年(1621，明天启元年)春，努尔哈赤为夺取辽阳、沈阳，进入辽河流域，发动了辽沈之战。战前，努尔哈赤派人刺探情报，造军械，做了精心准备。闰二月，努尔哈赤率军攻克沈阳的前哨重地奉集堡和虎皮驿。三月十日，后金军顺浑河而下，水陆并进，向沈阳进发。三月十二日兵临沈阳城下。十三日，明朝守城总兵官贺世贤出城迎战，中矢坠马死。后金八旗兵从城东北角挖土填濠，蜂拥过濠，急攻东门。城中明军闻贺世贤兵败，纷纷溃散。后金军拥门而入，进占沈阳。时明总兵童仲揆、陈策等统兵由辽阳北上援沈，行至浑河，闻沈阳已陷，急令回师。努尔哈赤得报，急命八旗兵前去驰击。双方在桥北展开激战，明军力战而败。努尔哈赤陷沈阳，击破明朝援军后第五天，集诸贝勒大臣，决定乘势长驱，以取辽阳。辽阳是明朝辽东的首府，城坚池固。明朝经略袁应泰得到沈阳失陷之报后，急命撤各路兵守辽阳。三月十九日，后金军包围辽阳。三月二十日，努尔哈赤命后金兵分左右两翼，右翼攻打东门，左翼攻打小西门。努尔哈赤在右翼指挥，命右翼分兵堵塞城东入水口，左翼分兵挖开小西门闸口泄濠水。当入水口被堵，城濠干涸时，他又命右翼兵推盾车攻城。明军大溃，明总兵梁仲善、朱万良战死。三月二十一日，努尔哈赤督左右翼军发起总攻。袁应泰列盾大战，又败。袁应泰见城楼起火，知城陷，自缢死。明朝失陷辽、沈，举国震惊，京师戒严。明廷在不得已的情势下，决定起用已被听勘回原籍的原辽东经略熊廷弼。熊廷弼入朝，提出陆上以广宁为中心，集中兵力坚城固守，沿辽河西岸列筑堡垒，步骑防守以从正面牵制后金主力；海上置舟以从南面击其侧背的方略。明廷命熊廷弼为兵部尚书兼右副都御史，驻山海关，经略辽东军务。又命王化贞为广宁巡抚，驻广宁，受经略节制。王化贞素不习兵，好为大言，是以奥援廷臣，联络宦党得势。王对熊廷弼处处发难，造成经抚不和。努尔哈赤在夺取辽、沈后，探察明朝动静，未敢轻启干戈。后探知明朝辽东经抚不和，熊廷弼内外受困，王化贞广宁军备废弛，努尔哈赤遂决计乘机渡过辽河，兵指广宁。后金天命七年正月十八日，努尔哈赤亲率八旗军向广宁进发。二十日渡河，直逼西平堡。王化贞得到驰报，仓促布兵防守，自带重兵守广宁。二十日，后金军围西平堡，明朝副总兵罗一贵坚壁固守，后金军攻城不下，王化贞蜷缩广宁，不敢出击。熊廷弼急檄王化贞督战，王化贞不得已派兵驰援西平。努尔哈赤分兵迎击前来增援的明军，明将刘渠、祁秉忠战死。努尔哈赤击败明朝援军后，又集中兵力围攻西平。罗一贵以3000人抵御后金军9万人的围攻，最后矢尽援绝，城陷身亡。西平堡失陷后，广宁城军民一片混乱，王化贞狼狈出逃。二十三日，努尔哈赤率领八旗军向广宁进发。二十四日，广宁游击孙德功开门请降。至是，后金军全部占领广宁。广宁兵败，京师大震，明朝宦党把熊廷弼作为替罪羊。熊廷弼回籍听勘，被杀害。熊廷弼的死，使明朝失去一位优秀的军事统帅，也使后金努尔哈赤少了一个能干的对手。后金占领广宁后，连陷义州、平阳桥、西兴堡、锦州、铁场、大凌河、锦安、右屯卫、团山、镇宁、镇远、镇安、镇静、镇边、大清堡、大康、镇武堡、壮镇堡、闾阳驿、十三山驿、小凌河、松山、杏山、牵马岭、戚家堡、正安、锦昌、中安、镇彝、大静、大宁、大平、大安、大定、大茂、大胜、大镇、大福、大兴、盘山驿、鄂拓堡、白土厂、塔山堡、中安堡、双台堡等40余城堡。明朝连失沈阳、辽阳、广宁城，朝中汹汹。廷臣荐日讲官孙承宗主持辽东军事。明廷授孙承宗为兵部尚书兼东阁大学士，孙又荐广西藤县人袁崇焕佐军。崇焕，字元素，万历四十七年(1619)进士，授邵武知县。他少好谈兵，肝肠颇热。明天启二年(1622)，曾单骑出阅塞外，巡历关上形势。广宁已失，廷臣惶惶，崇焕却请守关。后明廷

授袁崇焕为兵部职方司主事，旋升为山东按察司佥事山海监军。明天启三年秋，孙承宗从袁崇焕议，营筑宁远。时宦党日嚣，魏忠贤因孙承宗功高望重，欲使其附己。承宗刚正不阿，魏由此衔恨。天启五年十月，孙承宗被罢去，明廷以兵部尚书高第代为经略。努尔哈赤获知明经略易人，便准备发兵，进攻宁远。高第素不知兵，以谄附宦党受封疆重任。后金天命十一年正月，努尔哈赤率13万大军，号称20万，往攻宁远。明经略高第闻惊丧胆，龟缩山海关，拥兵不救。袁崇焕驻守孤城宁远，城中军士不满2万人。但崇焕布设火炮，整肃军纪，坚壁清野，做好了迎战后金军的准备。是月二十三日，八旗军兵薄宁远城郊。努尔哈赤与袁崇焕展开了明朝与后金关系史上著名的宁远之战。二十四日，后金兵推盾车，运钩梯，步骑蜂拥攻城西南角，万矢齐射城上。明军用矢石、铁铳和西洋大炮下击，后金兵死伤累累。后金兵又攻南门，顶炮火，用斧凿城。明军发矢镞、掷礌石、飞火球、投药罐，用棉花火药等物烧杀挖城的后金兵，自晨至夜，尸积城下，城几被陷。二十五日，后金兵再倾力攻城，城上以红衣大炮轰击，后金军久攻不下，大挫而退。一说努尔哈赤在此役曾中炮负伤。二十七日，后金军全部回师。宁远之役是明朝对后金作战的第一次重大胜利，它打击了后金的锐气，挫败了努尔哈赤夺取全辽，直薄山海关的计划。努尔哈赤自用兵以来，自命"战无不胜，攻无不克"，不料在袁崇焕手下，竟损兵折将，大败而回。他从此闷闷不乐，这年七月背上长了毒瘤，八月十一日，在由清河返回沈阳途中，死在叆鸡堡。（张正明）

袁应泰自缢

天启元年(1621)袁应泰被后金兵击败城破身亡的事件。

万历四十六年(后金天命三年，1618)四月，努尔哈赤以"七大恨"告天，誓师伐明。次年，在萨尔浒(辽宁新宾西浑河南岸)大败明军，接着又转攻辽阳和沈阳。明廷遂命颇通边务的熊廷弼为辽东经略。熊廷弼尚未出京，开原已失守，当他到山海关时，铁岭又陷落。其时沈阳及诸城守军，多畏乱惊逃，军心涣散。熊廷弼到任后，针对双方力量对比，采取了"固守不战"的方针，双方相持一年有余。熹宗即位，魏忠贤专权，阉党交章弹劾熊廷弼不战，被罢职，任命袁应泰为辽东经略。袁应泰，字大来，凤翔(今属陕西)人。万历二十三年进士。因治河筑堤颇有成就，迁工部主事，历兵部武选郎中。辽事方棘，应泰练兵缮甲，修亭障，饬楼橹，关外所需粮食、火药呼之立应。泰昌元年(1620)十月，代熊廷弼为辽东经略。应泰受事，杀白马以祀神，并发誓以身委辽。应泰历官精敏强毅，然而用兵并非其所长。同年，蒙古诸部大饥，多入塞乞食。应泰下令招降，分处辽、沈二城，与民杂居。天启元年(1621)三月十二日，金兵攻沈阳。应泰遣总兵官贺世贤、尤世功二将出城力战，被金兵击败，这时杂居在沈阳城内的降人亦起而内应，致使沈阳失陷，二将战死。应泰遂派总兵官陈策、童仲揆等赴援，亦战败身亡。应泰乃撤奉集、威宁诸军，并力守辽阳，引水注濠，沿濠列置火器，兵环四面守。十九日，金兵临城，应泰亲自督总兵官尤世禄、李秉诚等出城五里迎战，结果失败，死伤甚多。其夕，应泰宿营中，未入城。次日，金兵掘城西闸以泄濠水，分兵塞城东水口，击败诸将兵，渡濠，大呼而进。明军大败，死者无数。应泰乃入城，与巡按御史张铨等分陴固守，这时军心已离散。二十一日，攻城急，应泰率军列盾大战，又败。薄暮，谯楼火，金兵从小西门攻入，城中大乱，许多人家点灯以待，有人说是降人引导。袁应泰登城东北镇远楼督战，见城破，知事不济，对张铨叹息道："公无守城责，宜急去，吾死于此。"遂佩剑印自缢死。于是，河东三河堡等50寨，古城、草河、新甸、盖州、复州、金州等大小50余城，都被金兵所破，辽河以东全为金兵占有，努尔哈赤迁都辽阳，五年，又把都城迁至沈阳，改名盛京。（张桂萍）

魏忠贤乱政

天启年间(1621—1627)，宦官魏忠贤专权，宦官乱政达于顶峰时期之朝政。

魏忠贤(1568—1627)，河间肃宁(今属河北)人。少无赖，赌博输钱，为债主所逼，自施宫刑，变姓为李，易名进忠。万历中，入宫为太监。其时熹宗年幼，由奶妈客氏抚养。客氏，乃定兴民侯二妻。进忠入宫后与客氏发生暧昧关系。泰昌元年(1620)，光宗死，熹宗即位，封客氏为"奉圣夫人"。同时提拔李进忠为司礼秉笔太监，并令复魏姓，赐名忠贤。魏忠贤遂与客氏并邀宠幸，专权擅政，其祸为有明一代之冠。

魏忠贤目不识丁，生性猜忌、残忍、阴险、毒辣，客氏淫而狠，他们狼狈为奸，宫中莫敢谁何。王体乾虽为司礼监掌印太监，也得听他们使唤。天启三年(1623)，魏忠贤兼掌东厂后，权势更大，横行天下。他们排斥异己，结党营私，形成了一种邪恶势力，史称"阉党"。天启四年十二月，顾秉谦出任内阁首辅，整个内阁全被阉党所控制。顾秉谦"曲奉忠贤，若奴役

然”，时人称内阁为“魏家阁老”。六部九卿以及四方督抚无一不是魏阉心腹。他们中有的自认魏忠贤为父、为祖父，自称干儿、义孙。最有名的是五虎、五彪、十狗、十孩儿。

五虎，指崔呈秀、田吉、吴淳夫、李夔龙、倪文焕，都是文臣，是魏忠贤的参谋。崔呈秀为五虎之首。曾任御史巡按淮阳，贪污纳贿，被左都御史高攀龙告发，吏部尚书赵南星议处充军。崔呈秀大窘，夜走魏忠贤所，叩头乞哀。其时，魏忠贤为廷臣交攻，方思得外廷为助。得呈秀，恨相见晚，遂为心腹。他自恃魏忠贤宠信，贪污纳贿，无所不为。倪文焕、李夔龙、吴淳夫、田吉四人，都是崔呈秀介绍给魏忠贤做义子的，都是忠实走狗。

五彪，指田尔耕、许显纯、崔应元、杨寰、孙云鹤，都是武臣，是魏忠贤捕杀异己的凶手。田尔耕于天启四年十月掌锦衣卫事。其人狡黠阴险，与魏忠贤之侄魏良卿为莫逆之交。魏忠贤逐斥东林党人，数兴大狱，田尔耕广布侦卒，大出打手。时有“大儿田尔耕”之谣。许显纯为田尔耕之部下，掌镇抚司，性残酷。杨涟、左光斗、周顺昌、黄尊素等人，皆死其手。崔应元为锦衣卫指挥，凡显纯杀人事，皆与应元共为之。杨寰亦隶锦衣卫，为东司理刑，是田尔耕的心腹。孙云鹤为东厂理刑官。他们都是些杀人不眨眼的刽子手。

十狗之首是吏部尚书周应秋。魏忠贤得势时为左都御史，其家善烹饪，每逢魏忠贤之侄魏良卿经过，就进猪蹄留饮，魏良卿大欢，时号煨蹄总宪。天启六年七月，被提拔为吏部尚书。卖官索价，每日得财万金，都门有“周日万”之称。及魏忠贤败，他哭道：“儿子如何过？”天下笑之。十孩儿中，兵部给事中李鲁生、提学御史李藩，皆为魏忠贤心腹。他们开始谄事魏广微；广微败，改事冯铨；冯铨宠衰，又改事崔呈秀。时人称两人为“四姓奴”。

魏忠贤通过其狐群狗党操纵了从内阁、六部乃至四方督抚的全部权力后，专横跋扈，无恶不作。朝廷内外，只知魏阉，不知皇帝。激起了正直官员的强烈反对。天启四年，左副都御史杨涟，上疏劾魏忠贤二十四大罪状，说他自行拟旨，擅权乱政；斥逐直臣，培植私党；引用亲属，滥加恩荫；利用东厂，陷害忠良；生活糜烂，穷奢极欲，等等。魏忠贤初闻疏上，惧甚。遂泣诉于熹宗。其党王体乾及客氏又从旁为之辩护，熹宗竟偏信不疑，下旨斥责杨涟。接着，魏大中、黄尊素、袁化中、周宗建等70多个官员再次冒死上疏，交章弹劾。但由于魏阉当国，魏忠贤毫毛无损，而杨涟、左光斗却被罢官。

魏忠贤遭到东林党人的交章弹劾后，对东林党人恨之入骨。天启五年，遂兴大狱。其时，辽东经略熊廷弼因被后金战败，押在狱中。魏忠贤指使其党羽诬陷杨涟、左光斗等人接纳熊廷弼贿赂，将东林著名首领杨涟、左光斗、袁化中、魏大中、周朝瑞、顾大章等六人逮捕下狱，交锦衣卫拷打追赃。一时侦骑四出，道路汹汹。凡是与这六人有点关系的，都被跟踪钉梢，随时都有送命的危险。锦衣卫都督田尔耕对杨涟、左光斗等六人，每五天进行一次逼供拷打。旧伤未愈，新创复加。到后来审讯时，只能戴桎梏平卧堂下。除顾大章被迫自杀外，其余五人都被折磨而死。杨涟死时，土囊压身，铁钉贯耳，惨不忍睹。天启六年，魏忠贤再兴大狱，逮捕东林首领高攀龙、周起元、周顺昌、缪昌期、周宗建、黄尊素、李应升等七人。这次侦缉更加森严。从被捕者家乡到京城内外，鹰犬密布，恐怖异常。除高攀龙投水自杀外，其余六人都被逮捕，惨死于狱中。史称这两次大狱为“前六君子”、“后七君子”。此外，当时早已病死的东林首领李三才，亦被削除官籍，追夺封诰。可见对东林党人打击迫害之疯狂与残酷！

魏忠贤为一网打尽东林党，又全翻“梃击”、“红丸”、“移宫”三案，以顾秉谦、黄立极、冯铨为总裁，纂修《三朝要典》。凡在“三案”中与邪党争论是非者，都惨遭迫害。原来，在“梃击”、“红丸”、“移宫”三案处置过程中，正直官员同情的东林党人的主张占了上风，大体上都是按照东林党人的意见结案的。而魏忠贤由于仇恨东林党人，则要把“三案”彻底翻过来。此即他纂修万历、泰昌、天启三朝要典之用意。魏忠贤在重新审定“三案”过程中，首先把对犯人张差疯颠提出质疑的王之寀逮捕入狱，并置于死地。接着又赦免了在“红丸案”中被充军的李可灼，起用了被贬放南京的崔文升，并任命崔文升为漕运总督。选侍西李竟被封为康妃。这样，王之寀、孙慎行、杨涟，遂被定为“梃击”、“红丸”、“移宫”三案之罪首。当时正修光宗实录，魏忠贤又下令，凡事关“三案”者，都必须按《三朝要典》改写。

魏忠贤在疯狂镇压东林党人过程中，横行不法，趾高气扬，阉党对他的吹捧达到登峰造极的地步。在疏奏中，凡提到魏忠贤的地方，均讳其姓名，称为“厂臣”。内阁拟旨，竟将“朕与厂臣”联名并称，俨然以皇帝自居。天启六年六月，浙江巡抚潘汝桢首倡为魏忠贤建造生祠。其后，遍布各地的狐群狗党，争先效尤，生祠几遍天下。除建生祠外，大同巡抚张翼明又奏请为魏忠贤建坊。其后，奏请为“厂臣”建坊者，不可胜

计。这些生祠和坊都是奉旨建造的。又各有赐名，诸如“广恩”、“崇仁”、“崇德”、“报功”之类。祠之建造，极为华丽。“一祠之费，多者数十万，少者数万。剥民财，侵公帑，伐树木无算”。开封建祠，毁民房2000余间。童蒙在延绥建祠，用的是琉璃瓦，犹如宫殿一般。各祠中，都供有魏忠贤像。蓟州、大同、湖广等地的生祠，供的是金像，头戴冕旒，执笏，俨如帝王。有的像系用沉香木雕而成，极为华丽。魏忠贤像入祠安放时，还要举行隆重的仪式。如天津巡抚黄运泰，亲自到郊外迎像，“五拜三叩头，乘马前导，如迎诏仪。及像至神所，安置讫，运泰列拜丹墀，率文武诸官俱五拜三叩头。运泰复至像前万福，口称‘某名某年某事，蒙九千岁扶植，叩头谢；又‘某年月，蒙九千岁升拔’又叩头谢。致辞毕，就班，仍五拜三叩头。旁观者皆汗下浃踵，运泰扬扬甚得意也”。又河间、真定等处迎魏忠贤像“行五拜礼，呼九千九百岁”。在像两旁，悬挂着颂扬魏忠贤的楹联。山东巡抚李精白亲自撰写的楹联云：“至圣至神，中乾坤而立极；乃文乃武，同日月以长明。”凡是对建祠不满或入祠不拜者，均遭迫害。工部郎中叶宪祖，对建祠流露了一点不满情绪，立即被削籍。原提学副使黄汝亨经过西湖生祠时，微发诧叹语，竟被活活打死。蓟州胡士容以不具建祠文，下狱论死。兵备副使耿如杞，因入祠不拜，下狱论死（尚未执行，魏阉垮台）。

魏忠贤生祠生像遍布各地，强令人们顶礼膜拜。魏阉党羽甚至把魏忠贤与孔子并尊。其时，孔子被尊为万世师表，至圣先师。就是当朝皇帝进入孔庙也得行礼。把魏忠贤与孔子并尊，自然又比皇帝高出一等，魏忠贤十分高兴。天启七年五月，国子监生员陆万龄奏请以魏忠贤配孔子，忠贤父配启圣公。他甚至说：“孔子作《春秋》，忠贤作《要典》；孔子诛少正卯，忠贤诛东林。宜建祠国学西，与先圣并尊。”末了，他还请求皇上制碑一通，勒名扬世。国子监司业林钎看了觉得太不像话，未敢上报，结果被削籍。另一个司业朱之俊立即奏上，马上就获允准。朱之俊贴出告示，说魏忠贤之功在“孟子之上”，要国子监生员捐款建造魏忠贤与孔子并尊祠。还有一生员进而奏请奉魏忠贤像入孔庙与孔子并坐。正当他们手舞足蹈，鼓噪一时之际，熹宗死，其弟朱由检入继帝位，改元崇祯，是为思宗。魏阉失去靠山，东林党人又站出来继续上疏，弹劾阉党，揭露魏阉专权乱政的罪恶行径。崇祯帝为稳定大局，收揽人心，遂下令将魏忠贤贬谪凤阳，接着又派人逮捕治罪。魏忠贤闻讯，畏罪自杀。魏忠贤乱政始告结束。　　　　（张海瀛）

东林党与阉党之争

明朝后期，以顾宪成、高攀龙、赵南星等为首的东林党人和以宦官魏忠贤为首的阉党之间的斗争。

万历二十一年（1593）京察，吏部尚书孙𬭎、考功郎中赵南星、考功员外郎顾宪成（1550—1612）尽黜邪恶奸佞。第二年，首辅王锡爵将谢政，廷推阁臣，顾宪成与吏部尚书陈有年、侍郎赵参鲁推举为相有名的原首辅王家屏，再次忤神宗意旨，因之被罢官还乡。家乡无锡原有东林书院，是宋朝杨时讲道之处。宪成与弟允成倡修之，常州知府欧阳东凤与无锡知县林宰为之构建。万历三十二年落成。于是，顾宪成与志同道合的原任行人高攀龙（1562—1626）、御史钱一本、太常少卿史孟麟等讲学于东林书院。他们都是因为人正直，遭当权的邪恶势力打击而被罢官的人。他们议论朝政，臧否人物，反对宦官专权和矿监、税使的掠夺，主张开放言路，改良朝政，遭到在朝权贵的嫉恨，但得到许多“抱道忤时”、“退处林野”的士大夫及社会上对现实不满的地主、官僚、知识分子、中小商人和下层市民的拥护，也得到朝中一批正直官员如吏部郎中赵南星（1550—1627）等人的遥相呼应。由此，“东林名大著”，“学舍至不能容”。反对派便把他们及其追随者攻击为东林党。朝廷上的党争，又和宫廷内的派系纠纷联结在一起。神宗皇后无子，王贵妃于万历十年生子朱常洛，郑贵妃于十四年生子朱常洵。常洛是长子，按照封建伦理“有嫡立嫡，无嫡立长”的原则，当立为太子。但神宗宠爱郑贵妃，想立常洵为太子，因而对册立太子之礼一拖再拖。于是，舆论哗然，怀疑郑贵妃从中作梗，甚至攻击首辅申时行阳奉阴违，攻击他和王锡爵依违其间，不敢秉公力争。申时行被迫辞官，同时另两位请立朱常洛的辅臣许国、王家屏也因忤神宗旨意，被斥出内阁，罢相家居。这问题前后争吵了15年，直到万历二十九年册立朱常洛为太子才告一段落。在“争国本”的过程中，浙江宁波人沈一贯善于迎合明神宗，于万历二十二年入阁预机务，万历三十年出任首辅。他纠集浙籍京官刘廷元、姚宗文，联络齐党给事中元诗教、韩俊、周永春，楚党给事中官应春、吴亮嗣及宣党汤宾尹，昆党顾天俊等专门与东林党人作对。两大派展开激烈的争夺倾轧，互不相让，形同水火。双方都利用“京察”官员的机会排挤打击对方，极力想置政敌于察典、被罢官的困境。尤其是主持京察的吏部尚书，都察院左都御史，吏部文选司郎中，吏科都给事中，河南道监察御史这几个要职更成为各党激烈争夺、角

逐的中心。万历三十三年，东林党人左都御史温纯和吏部侍郎杨时乔主持察典，浙党给事中钱梦皋、钟兆斗，御史钱一鲸等被贬谪。沈一贯大怒，搬出明神宗，深责主持察典的官员，并蛮横地扣留京察的奏疏不发，百般阻梗。浙党钱梦皋诬劾温纯党庇，东林党人职方郎中刘元珍弹劾沈一贯遍置死党，蒙上钳下，钱梦皋妄奏求容，士林不齿。双方展开唇枪舌剑般的斗争。结果沈一贯勾结近侍，施展阴谋，逼迫温纯致仕。第一回合交锋，东林党人暂败。但次年六月，东林党人吏科给事中陈良训，御史孙居相力劾沈一贯奸贪欺罔，终于将其劾去，只是孙居相被夺岁俸，陈良训降三级外调。万历三十六年，赞同东林党主张的陕西人孙丕扬出任吏部尚书，起用东林党人原吏部文选郎中顾宪成。顾宪成与大学士叶向高交情甚笃，他写信给叶向高，推荐漕运总督凤阳巡抚李三才入阁。但立即引起对立派的群起反对，他们攻击李三才"大奸似忠，大诈似直"，且曾私用皇木营建宅第，终于在万历三十九年二月，将李三才革职为民。东林党人想任用贤能澄清吏治的主张破产。同年，孙丕扬仍主持京察，东林党官员吏科都给事中曹于汴、御史汤兆京、乔允升等配合孙丕扬驱逐齐、楚、浙、宣、昆诸党不法之徒。于是将南京国子监祭酒汤宾尹、郎中张嘉言、主事徐大化、御史刘国缙、王绍徽、乔应甲、岳和声等皆处以降调处分。邪恶派官吏大为恼火，"议论汹汹"。但由于正直的大学士叶向高从中调护，这次察疏终于在五月发下，正直官吏取得了这一回合的胜利。万历四十三年至天启初年，相继发生了"梃击案"、"红丸案"和"移宫案"这明末三案。在"三案"审理过程中，各派官僚集团为在最高统治阶层寻找靠山，争取倚重和宠幸，借以获得政治资本，谋求自身权位，展开了激烈的争夺。最终东林党占了上风。天启初年，御史周宗建上言为贬斥的东林党人辩理鸣冤，遂使在野的东林党人相继起复受到重用。叶向高出任首辅，高攀龙任左都御史，赵南星为吏部尚书，王之寀升刑部右侍郎，邹元标拜大理寺卿，杨涟擢太常少卿，乔允升晋刑部尚书。反对东林党的人暂时销声匿迹。当时，内阁、都察院、吏部、礼部、兵部等要职均为东林党人所掌握。东林权势盛极一时，出现了众正盈朝，天下欣然望治的可喜局面。东林党人也曾幻想依靠皇帝和几个贤能官吏，对为非作歹的太监加以约束，以便改良政治，安定民生。但是阉党为保持其既得权势和私利，则疯狂打击和迫害东林党。反对东林党的齐、楚、浙、昆、宣诸党及其它敌对官员很快投靠恃宠发迹的魏忠贤。东林党与阉党之间的斗争在天启年间达到白热化的程度。

天启元年(1621)，大学士刘一燝当国，力遏魏忠贤、客氏。到天启二年正月，魏忠贤与客氏狼狈为奸，逼刘一燝辞相。接替刘一燝后面的三位首辅——叶向高、韩爌、朱国桢也在不到半年的时间内挨次被魏忠贤逼走。阉党魏广征控制了内阁，与魏忠贤表里为奸，迫害东林，专权祸国。天启四年四月，阉党给事中傅木魁开始向东林党人全面开刀，奏劾佥都御史左光斗、魏大中，逮捕中书汪文言。六月，左都御史杨涟上疏弹劾魏忠贤24条罪状，揭露他"亲乱贼而仇忠义"，专权乱政，斥逐直臣，操纵厂卫，重用私党，诬害忠良诸罪。最后，奏疏用简洁明快的语言，指出了魏忠贤权大震主的势焰，坚决要求严惩魏忠贤。魏忠贤不等奏上，就把他削籍为民，并唆使党羽将吏部尚书赵南星攻讦而去。接着，东林党人黄尊素、袁化中、李应升、周宗建等70余人连续上疏弹劾魏忠贤。魏忠贤勾结锦衣卫都督田尔耕，利用东厂和锦衣卫特务钳制百官，镇压异己，广布党羽。当时，内外大权一归忠贤。内竖自王体乾等外，又有李朝钦、王朝辅、孙进等30余人。外廷文臣则崔呈秀、田吉、吴淳夫、李夔龙、倪文焕主谋议，号"五虎"；武臣则田尔耕、许显纯、孙云鹤、杨寰、崔应元主杀戮，号"五彪"。又吏部尚书周应秋、太仆寺卿曹钦程等，号"十狗"。还有"十孩儿"、"四十孙"之号。自内阁、六部，至四方总督、巡抚，遍置死党。民间对魏忠贤的专横跋扈稍有不满议论，就被杀戮，甚至剥皮封舌。魏忠贤对揭露自己罪恶的东林党人恨之入骨，其爪牙王绍徽作《东林点将录》，"五虎"头目崔呈秀作《同志录》，提供了捕杀东林党人的黑名单，魏忠贤准备按名斥逐、捕杀，将东林党人一网打尽。天启五年，阉党借辽东经略熊廷弼和巡抚王化贞失陷广宁事，诬陷熊廷弼曾贿赂杨涟、左光斗等人祈求减罪。于是大兴冤狱，不仅将熊廷弼处死，而且把杨涟、左光斗杖毙狱中。接着，又罗织罪状，先后杀害东林党人高攀龙、周顺昌、周起元、缪昌期、黄尊素等。同年十二月，魏忠贤矫诏颁布了"东林党人榜"宣示天下。榜中所列共309人，其中生者削籍，死者追夺，已经削夺者禁锢。天启七年，思宗即位，逮治魏忠贤，命大学士韩爌、吏部尚书王承光、刑部尚书乔允升、左都御史曹于汴共同拟定逆案，将289名阉党分子分别治罪。东林党人所受的迫害才告终止。在这场斗争中，东林党的主张和行为是正义的。他们对阉党罪恶的揭露，代表了进步势力，有助于人民进一步认识明朝的腐败和黑暗，并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受压迫民众包括新兴市民阶层的利益和

愿望，因而得到民众的支持和同情。　（高春平）

东林党"前六君子"与"后七君子"

天启年间（1621—1627）发生的一起阉党迫害东林党人的事件。

熹宗即位初，东林党把握朝政。熹宗幼年丧母，由奶妈客氏养大，即位后封客氏为"奉圣夫人"，并提拔与客氏有暧昧关系的李进忠为司礼秉笔太监，接着又诏复魏姓，赐名忠贤。魏忠贤遂与客氏并邀宠幸，专权擅政。与东林党人作对的官员纷纷投奔魏忠贤，形成一股恶势力，史称"阉党"。从此，阉党与东林党人展开了尖锐激烈的斗争。由于客氏的不断唆弄，熹宗由重用东林党人变为宠信宦官近侍，致使阉党操纵了从内阁、六部乃至四方督抚的全部权力。阉党得势后，专横跋扈，无恶不作，激起了正直官员的强烈愤慨。东林党人为伸张正义，于天启四年（1624），由担任左副都御史要职的杨涟上疏弹劾魏忠贤，列举了 24 条大罪状，说他自行拟旨，擅权乱政；斥逐直臣，培植私党；引用亲属，滥加恩荫；利用东厂，陷害忠良；生活糜烂，穷奢极欲，等。魏初闻疏上，惧甚，遂泣诉于熹宗，其党王体乾及客氏又从旁为他辩护，熹宗竟偏信不疑，下旨斥责杨涟。朝中魏大中、黄尊素等 70 多个官员又冒死上疏，交章弹劾。因魏阉当国，魏忠贤毫毛无损，杨涟、左光斗却被罢官。由此，魏忠贤对东林党人恨之入骨，决心斩尽杀绝。魏忠贤爪牙王绍徽作《东林点将录》，崔呈秀作《同志录》，把东林党人列入残酷迫害的黑名单。第二年，魏忠贤借广宁失守事件，诬陷辽东经略熊廷弼行贿杨涟、左光斗等人，大兴冤狱。将东林著名首领杨涟、左光斗、袁化中、魏大中、周朝瑞、顾大章等六人逮捕下狱，交锦衣卫拷打追赃。锦衣卫都督田尔耕对这六人进行拷打逼供。到后来审讯时，只能戴桎梏平卧堂下，杨涟等五人被折磨而死，顾大章自杀。六年，魏忠贤再兴大狱，捕杀东林党首领高攀龙、周起元、周顺昌、缪昌期、周宗建、黄尊素、李应升等七人。史称在这两次大狱中受难的东林党人为"前六君子"、"后七君子"。

（张桂萍）

皇太极嗣位和称帝

后金皇太极争得嗣位和称帝加强皇权的历史事件。

皇太极（1592—1643），爱新觉罗氏，努尔哈赤第八子，后金四大贝勒。努尔哈赤生前一直难以确立嗣子。早年，曾让长子褚英主持政务，后以褚英存心"偏狭"，虐待兄弟和王大臣，罢革其位，监于牢中，最后处死。又让次子代善主持政务，并向诸子宣布以后由代善继位为汗。代善佐父治国，军功累累，蒙汗父重用，位居四大贝勒之首，拥有正红、镶红二旗，成为具有实力的太子。但是由于权大势强，群臣畏惧，地位高了，暮气渐生。不久，被加上与继母大福晋富察氏有暧昧关系的罪名，又与汗父争宅地，更糟糕的是受继妻迷惑硬要斩杀亲生次子硕托，失却汗父欢心，终于在后金天命五年（1620，明万历四十八年）九月被废掉太子。二大贝勒阿敏是努尔哈赤之侄，舒尔哈齐之子，自然不在继承汗位之列。三大贝勒莽古尔泰，其生母富察氏被加上与代善行为不轨罪名休离，也非入选之人。四大贝勒皇太极，聪敏机智，善于用兵，但恃才骄傲，也未被列为继嗣者。因而努尔哈赤在晚年仍不列嗣，而宣布实行八贝勒"共治国政"，企图以此形式代替汗位。后金天命十一年（明天启六年），努尔哈赤死。在嗣位问题上，各大贝勒相互妥协，在汗权受到限制的条件下，皇太极得以继位，但须与三大贝勒共理国政。皇太极在登上汗位后，便逐渐削除三大贝勒分掌政事的权力。他先把与三大贝勒俱南面座，改为唯我独座，突出了汗的地位。接着削除异己。后金天聪四年（1630，明崇祯三年），借口二大贝勒阿敏兵败永平，心怀不轨，将阿敏幽禁。不久，阿敏病死，皇太极除掉一个对手。天聪五年，三大贝勒莽古尔泰与皇太极发生口角，拔剑相向，皇太极趁机治罪莽古尔泰，革去大贝勒，降为贝勒。不久，莽古尔泰气愤而死。天聪九年，皇太极又以大贝勒代善对己不恭，列罪治罚，逼代善唯命是从。皇太极在削除三大贝勒势力的同时，亲自控制了正黄、镶黄、正蓝三旗，使其他旗主无力与他抗争，进一步加强了汗权。此后，皇太极又整顿和改革国家机构，设立内三院（内国史院、内秘书院、内弘文院）、六部（吏、户、礼、兵、刑、工）和都察院、理藩院，着意收降和笼络蒙、汉族官僚贵族，建立"蒙古八旗"、"汉军八旗"，改进满文、开科取士，招纳人才，翻译典籍，传布封建文化。天聪九年，又废除"女真"族名，改称"满洲"。随着汗权的加强，天聪十年正月，皇太极正式登极当上皇帝，改大金为大清，年号崇德。从此，中国历史上出现了清朝。

（张正明）

皇太极对朝用兵和"绥服"蒙古

后金政权进攻朝鲜和绥服蒙古的历史事件。

后金开国汗努尔哈赤于天命十一年（1626，明天启六年）逝世后，其第八子、四大贝勒皇太极凭借手

中的兵权登上了汗位。早在努尔哈赤统治时期，由于朝鲜地势重要，后金政权和明朝政府都竭力结好朝鲜。但朝鲜由于历史原因和现实条件，一直依附明朝。皇太极上台后，准备与明朝作战。为解除后顾之忧，决心先解决朝鲜问题。正好这时朝鲜发生内乱，后金便趁机对朝鲜用兵，并企图乘势消灭驻在东江的明朝毛文龙部。后金天聪元年(1627)，皇太极不宣而战，发兵3万，越过鸭绿江，攻陷义州。随后，兵分二路。一路进攻明军毛文龙部，毛文龙兵败退守皮岛。另一路南下连克朝鲜定州、宣州、郭山等地。在后金军的强大攻击下，朝鲜国王李琮逃到江华岛，被迫求和，与后金签订了“江都和约”。从此，朝鲜隔断了与明朝的关系，并派王弟李觉赴后金为人质，每年进献后金大批财物。明朝毛文龙部退守海岛后，孤立无援，粮饷无继，在后金的劝诱下，也准备投降后金。但毛文龙的行径被蓟辽总督袁崇焕发现，以通敌叛国罪处斩毛文龙。毛氏原部将孔有德、耿仲明等因涉降后金案，便率部投降后金。后金皇太极取得征服朝鲜的初步胜利后，仍不甘心，一心想把朝鲜变为由其控制之藩属。后金崇德元年(1636，明崇祯九年)，皇太极又突然发兵10万，越过鸭绿江，围攻朝鲜京城。朝鲜国王李琮被迫投降，向后金称臣，并把两个儿子送后金作为人质，同时每年向后金朝贡黄金百两、白金千两和大量绸布、大米。至此，后金政权不仅解除了来自东边的威胁，而且使朝鲜成为其藩属。对后金政权来说，蒙古部族和明朝的联合是来自西侧的威胁。明末，蒙古分为漠南、漠北和漠西三大部，各部正处于割据分裂状态。当时，漠南蒙古中势力最大的察哈尔部与明朝关系最密切。明朝政府为了拉拢察哈尔部，对该部也最支持，每年赏赐有加。双方相约，共同抵御后金。针对明朝对蒙古各部的政策，后金皇太极采取了拉拢和打击相结合的“恩威相加”策略。先加紧拉拢科尔沁、翁牛特、郭尔罗斯、杜尔伯特、扎赉特、克什克腾等蒙古部族，使其归顺后金。对察哈尔部则采取武力征服策略，以威慑蒙古各部，破坏明朝和蒙古各部的联合。后金天聪二年(1628，明崇祯元年)，后金军向察哈尔部发动进攻，占领了察哈尔部西剌木伦河流域。天聪六年，后金军再次向察哈尔部发动进攻，察哈尔部首领林丹汗败逃，后病死在青海大草滩。天聪九年，后金军进入河套地区，击溃察哈尔林丹汗残部，俘林丹汗正妃和八子额哲，得元朝传国玺，察哈尔部归顺后金。这样，漠南蒙古16部均先后归附后金。崇德元年，漠南蒙古各部尊皇太极为可汗。此后，皇太极又积极联络漠北蒙古。崇德三年，漠北蒙古三部遣使向后金朝贡。至此，皇太极征服了朝鲜，绥服了蒙古各部，消除了两侧的威胁，完成了向明朝政权正面进攻的准备工作。 (张正明)

袁崇焕之死

明崇祯二年(1629)蓟辽督师袁崇焕被崇祯帝下狱冤死的历史事件。

袁崇焕(1584—1630)，字元素，广东东莞人，万历进士，曾任邵武知县。有谋略，好研究军事，了解边塞形势。天启二年(1622)，自请赴边守卫辽东。六年，在保卫宁远城之战中，大败努尔哈赤后金军，取得了明朝对后金作战以来的第一次重大胜利。努尔哈赤兵败后，于当年八月亡。袁崇焕以功擢右佥都御史。崇祯元年(1628，后金天聪元年)，以兵部尚书兼左副都御史督师蓟辽。二年，后金皇太极向明朝发动进攻。由于袁崇焕在辽东建立了难以逾越的宁锦防线，皇太极便采取了避开袁崇焕所设防线的策略，绕道蒙古科尔沁部，自喜峰口、洪山口入长城，奇袭明朝京师。对此，袁崇焕早有预见，曾多次上疏说明后金有可能越辽而攻山海关、喜峰口诸处，请严饬蓟督峻防，但未引起明廷的足够重视。结果，后金果然兵临京师。十月二十八日，袁崇焕获知蓟惊后，即调诸辽将兵2万，两昼夜疾行300里，飞抵京师。皇太极原估计袁崇焕会驻守蓟门，便率兵盘踞于潞地(北京通州)，企图中断京师与袁崇焕救援之兵，使其首尾不相应。没想到袁崇焕反而已先后金兵三日到京师。皇太极挥师向北京进军途中，前锋遭遇袁崇焕军后，皇太极真以为袁督师之兵从天而降。十一月二十日、二十六日，袁崇焕在北京广渠门和左安门大战后金兵，两战皆捷。皇太极被迫撤围退兵，便施展反间计，图谋杀害袁崇焕。先是，皇太极在毁边入关时，曾俘获两个太监。在这次撤兵途中，便密令副将高鸿中、鲍承先故意在离两个太监不远处耳语说：这次撤军是大汗皇太极的计策，大汗曾经单骑在阵前与袁巡抚派出的人谈了很久，袁巡抚和大汗有密约，事情很快可以办成。事后，又故意让其中一个杨太监逃脱。杨太监逃回北京，把所听到的话立即报告了崇祯帝。崇祯帝生性独断多疑，恰巧又听得宦党王永光造谣说袁崇焕引敌长驱直入，是要挟皇上定城下之盟。于是，在京师解围后的第四天，崇祯帝就把袁崇焕下狱问罪。后又有礼部尚书兼东阁大学士温体仁收买袁的部将谢尚文制造伪证，诬告袁通敌，致明朝抵御后金的主将袁崇焕被崇祯帝下令凌迟处死。从此，明朝再无可御后金之将才，明朝的边防到了无可挽救的

地步。 （张正明）

李自成建立大顺政权

崇祯十七年(1644)正月初一,明末农民大起义领袖闯王李自成在西安建立"大顺"农民革命政权。

明朝末年,封建统治者无休止地加重对人民的赋役剥削,仅"三饷"加派,每年就达一千几百万两,超过正赋几倍。再加上不断发生的自然灾害,使广大劳苦大众陷入水深火热、饥寒交迫的困苦生活之中。特别是土地贫瘠的陕北,连年大旱,颗粒无收,农民吃糠草树皮都不可得,只好吃石粉,不数日便腹胀而死。当时摆在广大农民面前的道路只有两条:如不造反求生,就只有死路一条。于是,明末农民大起义的风暴首先从陕西爆发,并迅速波及全国。

李自成(1606—1645),陕西米脂人。祖名李海,父名李守忠。幼年曾为本县艾姓地主家牧羊,不久,父亡无依,充本县圁川驿卒。因无钱偿还恶霸地主艾举人的高利贷,被县官抓去严刑拷打。出狱后,杀死艾举人,于崇祯三年(1630)参加了不沾泥领导的起义军。崇祯五年四月,不沾泥被俘牺牲于绥德后,李自成率所部投奔了高迎祥。他谋略过人,英勇善战,屡建奇功,成为高迎祥麾下一员"闯将"。崇祯六年冬,农民军冲破明军包围,履冰过黄河,进入河南、湖南、四川,将革命烽火引向南方。第二年,明政府越发感到农民起义的严重威胁。又提升洪承畴为兵部尚书,统一指挥陕西、山西、河南、四川和湖广各路官军。八年一月,洪承畴出陕西,赴河南,扬言6个月内消灭农民军。为了抗击明军,起义军13家72营领导人召开荥阳大会,商讨作战方略。会上老回回马守应主张北渡黄河,转移山西。张献忠当即斥之为胆怯,双方争执不决。这时,李自成崭露头角,说:"一夫犹奋,况十万众乎!官兵无能为也。宜分兵定所向。"这一联合作战分兵迎击的战略意见,得到各部领导人的赞同。会上,决定分兵五路,迎击官军,粉碎洪承畴的围剿计划。这五路是:贺一龙、贺锦率部南挡湖广、四川方面明军;横天王、混十万、射塌天、改世王率部西拒陕西官兵;罗汝才(曹操)、过天星率部扼守黄河天险;高迎祥、张献忠、扫地王和太平王东征安徽;马守应、九条龙往来策应。荥阳大会后,高迎祥、张献忠一路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连下固始、霍丘、寿州、颍州等城邑,直捣明中都凤阳。崇祯八年正月十五,起义军乘雾攻入凤阳,毁皇陵,焚龙兴寺,烧公私邸舍22650余所,杀宦官60人,斩留守司官兵3000人,竖起了"古元真龙皇帝"旗号,给明王朝以沉重打击,引起了明思宗的极度震恐,下令逮捕凤阳抚按。经过多年较量,明政府看出起义军之中闯王高迎祥部最强,指令官军全力剿杀高迎祥。崇祯九年七月,盩厔一战,高迎祥中了陕西巡抚孙传庭的埋伏,不幸被捕牺牲。李自成接过了"闯王"的旗帜,坚持在渭南一带斗争,并攻占了川北许多州县,一度逼近成都。但却在梓潼中了洪承畴的伏击,伤亡惨重,仅剩数千人,之后长时间转战于陕川鄂交界地带。

崇祯十年三月,鉴于农民起义的烈火已燃遍大半个中国的严重事态,明廷急忙起用兵部尚书杨嗣昌。杨嗣昌制定了"四正六隅十面网"的军事围剿计划。以陕西、河南、湖广、江北起义军主要活动区为"四正",派四巡抚"分剿而专防";以延绥、山西、山东、江南、江西、四川为"六隅",派六巡抚"分防而协剿";四正六隅合成"十面网",再命总督、总理二大臣,统一指挥,随农民军所向专门征讨。杨嗣昌又荐熊文灿任兵部尚书,总理直隶、河南、山西、陕西、四川、湖广军务,并请增"剿饷"田赋银280万两。熊文灿用招抚一手配合杨嗣昌的军事围剿。面对大量的官军,部分农民军领导人屈服于明朝的反革命军事围剿,如刘国能、马士秀、罗汝才等先后受降,起义一度转入低潮。但阶级矛盾随着加派增多和灾荒严重更加尖锐。崇祯十一年,两畿、山东、山西、陕西、江西都发生饥荒,河南人相食尤为严重。次年十一月,李自成从郧阳地区出发,经陕西兴安、商洛地区进入河南,提出了"均田免粮"的口号。这个口号产生了巨大的动员作用。成千上万的饥民,纷纷奔向起义军,队伍迅速发展到数十万人。河南到处流传着这样的歌谣:"吃他娘,着他娘,吃着不尽有闯王,不当差,不纳粮。""杀牛羊,备酒浆,开了城门迎闯王,闯王来时不纳粮。"与此同时,活动在河南的李斗、一斗谷、罗汝才、贺一龙、袁时忠等部都接受了李自成指挥。李自成声势大振,拥有兵马数十万。崇祯十四年正月,起义军一举攻破洛阳,杀福王朱常洵,发藩邸和富豪巨室粮数万石、金钱数十万赈济饥民。洛阳战役,是明末农民战争史上的重大转折点。它不仅宣告明政府"剿"、"抚"策略的彻底破产,迫使杨嗣昌畏罪自杀,而且奠定了推翻明王朝统治的基础。

攻破洛阳后,李自成于同年二月率军攻打开封。开封为金海陵王完颜亮所筑,城坚墙厚,第一次攻城未克,李自成避免了顿兵于坚城之下的错误战术,而是移师过密县,陷登封,很快攻占了河南大部,消灭了大量明军。崇祯帝慌忙用原兵部尚书丁启濬督师,任原兵部尚书傅宗龙为陕西总督,调保定总督杨文

后与傅宗龙会合，又檄总兵贺人龙、李国奇率陕西兵出潼关赴河南，合力围堵李自成。九月，各路明军计十余万入河南，妄图一举扑灭李自成起义军。李自成设伏孟家庄，在新蔡重创明军，乘胜攻占项城，执杀傅宗龙，全歼所部。年底，合罗汝才部二围开封城，又不克，引兵下陈州、归德。崇祯十四年四月，起义军第三次包围开封城，巡抚高名衡凭借坚厚城墙负隅顽抗，李自成吸取前两次攻城不克的教训，采取围而不攻，使其坐守待毙。七月，在朱仙镇杀败驰援开封的丁启浚、杨文岳和左良玉、虎大威等部明军十余万。九月，在郏县打退了出潼关赴河南的孙传庭，俘斩明将官七八十人，逼孙传庭退回陕西。同年冬，李自成挺进湖广，在襄、樊人民的导引下，绕过左良玉在通往襄、樊路上埋下的地雷暗弩，夺取了湖北重镇襄阳，并进而攻占除武昌外湖北沿江州县。崇祯十六年五月，李自成改襄阳为襄京，自己从“奉天倡义文武大元帅”进称“新顺王”，创立了新顺革命政权。任命将领刘宗敏、田见秀为权将军，贺锦、刘芳亮、刘希尧、袁宗第、李过为制将军，张鼐等任威武将军，谷大成等任果毅将军，以下还有都尉、掌旅、部总、哨总等职。新顺中央设置上相、左辅、右弼等文职官员，协助李自成处理政务，下设吏、户、礼、兵、刑、工六政府，置侍郎、郎中、从事等官，基本上由地主阶级知识分子和明朝降官担任。新顺辖区还建立府、州、县各级地方政权，长官分别称府尹、州牧、县令。军事要地则设防御使。不久，李自成决计进取北京，推翻明朝。他采纳谋士顾君恩的建议，制订了先取关中作基地，然后经山西攻取北京的战略计划。八月，明兵部尚书孙传庭在明廷的催促下，勉强拥兵出关入豫，阻击李自成。九月，李自成在汝州大败官军。十月，乘胜攻破潼关，击毙刽子手孙传庭，占领了西安。崇祯十七年正月初一，李自成改西安为长安，称西安为西京，正式宣布建国，国号大顺，年号永昌，铸永昌通宝钱，造《甲申历》，并进一步完善了大顺中央政府机构，以天佑殿为最高行政机关，添置六政府尚书各一人，主管本府政事，并增添一名侍郎。至此，大顺农民革命政权正式成立。同时，开科取士，废除八股文，采用散文体的策论考选天下官吏，试题《定鼎长安赋》，以对新成立的农民政权的态度作为取士标准。大顺政权还宣布贵贱均田之制，一面免除劳动人民的赋税，发放银钱粮米赈济，招抚安置流民；一面勒令官僚富户交出钱财粮米，充作军需，并处死了作恶多端的大官僚地主南企仲、南居益等人。

二月，李自成亲率百万大军东渡黄河，攻拔太原，发布讨明檄文，揭露明朝统治的种种罪恶。接着以摧枯拉朽之势，连下大同、宣府，夺取居庸关、昌平，逼近北京城。三月十九日，大顺军攻占北京，明朝最后一个皇帝朱由检吊死煤山（景山）。统治中国276年的明王朝，终于被推翻了。　（高春平）

张献忠建立大西政权

崇祯十七年（1644）十一月，张献忠在成都建立的农民革命政权。

张献忠（1606—1646），延安府肤施县柳树涧人。与李自成同岁。幼年读过书，曾随父去四川贩枣。长大后，隶延绥镇为军，不得志。崇祯三年（1630）六月，他在米脂十八寨起义，自称八大王，从此开始了从事起义活动的革命生涯。八月，由于受到官军杜文焕部的威胁，为了保存实力，假装乞降，而杜文焕为了腾出手来先镇压其他起义军，也佯许之，以为后图。十月，张献忠与其他起义军首领率五六千人攻靖边、安定、绥德、米脂、清涧，遭到洪承畴、杜文焕的镇压，起义军牺牲千余人，其余奔走安定。次年六月，张献忠所部成了王自用所联合的36营之一。同年冬，陕西起义军由于遇到三边总督洪承畴所部官军的强大压力，纷纷由陕入晋豫。崇祯七年，李自成、张献忠带领起义军误入兴安县车箱峡，死者过半，后以重宝贿总督陈奇瑜左右伪请降始脱。为了避免束手就擒，张献忠率军以大踏步东进的方式，跳出了官军的战略包围圈，挺进湖广、河南。并于崇祯八年正月攻入朱元璋的老家凤阳，焚毁朱家祖坟。九年七月，高迎祥在盩厔（周至）黑水峪遭到陕西巡抚孙传庭的伏击，不幸被俘牺牲。高迎祥牺牲后，转战在豫、楚的张献忠实力最强。不久，张献忠利用清兵攻北京，卢象升奉召入援，豫、楚空虚的机会，联合罗汝才、马守应等20万大军，攻取襄阳。然后沿长江东下，会合江北的起义军革里眼贺一龙、左金王贺锦，破六合、仪真、扬州，进逼安庆，南京震动。崇祯十年三月，明廷急忙起用在家守丧的兵部尚书杨嗣昌。杨嗣昌制定了“四正六隅十面网”的围剿计划，紧随农民军，进行疯狂的剿杀。又荐熊文灿任兵部尚书，总理直隶、河南、山西、陕西、四川、湖广军务。为了保存革命力量，崇祯十一年四月，张献忠在谷城受抚于熊文灿。此后，主抚派对他进行敲诈勒索，主剿派更是虎视眈眈，想要吃掉他。面对这种情况，张献忠始终未敢解除武装，保持着一定的独立性，坚持奉命而不听调的原则，抓紧训练队伍，打造军器，并在谷城汉、沔交汇处设关征税，以充军用。崇祯十二年五月，经过一年休整，张

献忠再度起兵反明。七月,他联合罗汝才在房县罗睺山重创明总兵左良玉,消灭官兵万余人,使明朝招抚政策宣告失败。崇祯帝恼羞成怒,逮杀熊文灿。杨嗣昌不得已请求亲自督师出战。崇祯赐他尚方剑,并饶宴赋诗赠行,把消灭张献忠的希望完全寄托在杨身上。十月,杨嗣昌坐镇襄阳,会师10万,又檄令河南、四川、陕西、郧阳诸抚镇将领,分扼要冲,对张献忠进行围剿堵截。次年春,明军左良玉、贺人龙、李国奇诸部在玛瑙山联合夹击张献忠。起义军失利,退到陕南兴安、平利群山间。四月,左良玉尾追而至,连营百里,将义军围困山中。为了摆脱困境,张献忠偃旗息鼓,经白羊山、巫山进入四川,会合罗汝才部反攻。杨嗣昌得悉张献忠入蜀,也带兵尾随进川。张献忠采取以走制敌的运动战术,避开杨嗣昌的主力,使明军疲于奔命,然后寻找战机打击他们。短短半年内,起义军驰骋于大半个四川。他们先攻克大昌,进屯开县,败石砫女土司秦良玉;继而北攻剑州,过巴西,在涪江击败四川巡抚邵捷春所部,下绵州,越成都,克泸州,破永州,过汉川,入巴州;接着又自巴州走达州,至开县,把明军拖得精疲力竭,跟着起义军团团转。起义军曾讥讽道:"前有邵(捷春)巡抚,常来团转舞;后有廖(大亨)参军,不战随我行;好个杨(嗣昌)阁部,离我三天路!"到崇祯十四年一月,经过数月奔波,明军不仅疲乏不堪,而且军心涣散,诸将进止不一。尤其是左良玉和贺人龙两支主力,对杨嗣昌都心怀不满。贺人龙尾追张献忠到广元就屯兵不进,左良玉也故意迟缓不前。张献忠抓住这一有利战机,在开县突袭明军,杀死参将刘士杰、游击郭开及所部大半官兵。紧接着,他挥师顺江东下,以一昼夜急行军300里的速度,奔袭明军事重镇襄阳。杨嗣昌慌忙回师出川,可是已来不及了。二月,张献忠攻陷襄阳,杀襄王朱翊铭,发库银15万两赈济饥民。至此,张献忠以杰出的军事指挥才能,粉碎了杨嗣昌的军事围剿。然后,张献忠挥师破樊城,进豫南,攻克光州,横扫罗山、信阳、固始诸地。各地义军附者万计,声势大振。崇祯十五年,张献忠与贺一龙、贺锦会师攻陷舒城、六安、庐州等地;又大败明总兵黄得功、刘良佐,震动江南。第二年春,张献忠连克广济、蕲州、黄州。这时,麻城佃仆的反封建组织"里仁会"的首领汤志率众镇压地主,迎接起义军入麻城。义军将其编为"新营"。五月,张献忠攻克湖北首府武昌,杀明宗室贵族,沉楚王朱华奎于江中。献忠入驻楚王府,即"大西王"位,改武昌为天授府,设六部尚书、五军都督府、五城兵马司以及巡抚、知府、知州、知县等中央和地方机构,同时开科取士,建立起初具规模的大西农民政权。同年七月,明朝集结大军逼武昌。张献忠弃楚入湘,攻占长沙。八月,破常德,将刽子手杨嗣昌占夺的土地全部归还人民。十二月,张献忠听取谋士汪兆龄意见,弃湘入蜀,决定以四川为根据地,然后北伐,平定全国。崇祯十七年十一月,张献忠在成都即帝位,国号大西,改元大顺,称成都为西京。造《通天历》,铸"大顺通宝"。封养子孙可望平东将军,李定国安西将军,刘文秀抚南将军,艾能奇定北将军;任汪兆龄左丞相,严锡命右丞相;设六部尚书处理政事,置五军都督府为最高军事机构;以王尚礼为中军府都督,白文选为前军府都督,王自奇为后军府都督;又封马元利、刘进忠、凌三品、张能第、张化龙等为将军。军队被编成120营,各营设总兵官。大西政权建立后,在政治态度上,要求居民必须顺从革命政权,对所辖地区进行了严格的社会控制。并采取了整顿吏治,发展经济,对知识分子使用和控制相结合,注意军纪等政策。张献忠在四川为了稳固新建立的农民革命政权,确曾杀了不少反动敌对分子。但大西军纪律严明,流传至今的《大西炮骑营都督府刘禁约碑》上面明文规定:军士不准妄害良民,不准娶本地妇女为妻,不准私受民词,不准擅自招民扰害地方,违者重则斩首,轻则捆打。另如《五马先生纪年》记载,简州地区的大西军在崇祯十七年刚刚到达后的相当一段时期内军纪严明,很少扰民。　　(高春平)

杨嗣昌"四正六隅十面网"的破产

崇祯中后期,杨嗣昌制定的镇压农民起义的战略,结果为农民起义军击败。

崇祯十年(1637)三月,明朝兵部尚书杨嗣昌策划了一个"四正六隅十面网"的"围剿"农民军的战略,即以陕西、河南、湖广、江北为"四正",四巡抚以重兵防守;以延绥、山西、山东、江南、江西、四川为"六隅",六巡抚协助防守,声援"四正";又以"四正"与"六隅"组成"十面网",再以总理、总督两大臣统一指挥,团团围剿农民军。闰四月,杨嗣昌推荐熊文灿任兵部尚书,总理南京、河南、山西、陕西、四川、湖广军务,驻郧阳,执行以上"围剿"计划。七月,明将龙在田等败张献忠于郧阳山中,八月左良玉再败张献忠于南阳,十二月左良玉追张献忠于麻城,张献忠兵败负伤走谷城。十年冬至十一年间,农民军相继失利,革命处于低潮。张献忠为了保存实力,以行贿办法买通熊文灿,于十一年四月,在谷城"伪降"于明朝。经过一年的休整,次年五月,他联合罗汝才再次起兵,

七月在房县罗睺山大败左良玉，消灭万余人。张献忠谷城再起，崇祯帝恼羞成怒，逮杀熊文灿，诏令杨嗣昌立功赎罪，率师尾随张献忠。十月，杨嗣昌到达襄阳，会师十万，围剿张献忠。十三年春，张献忠失利于玛瑙山，随后采取"以走制敌"的策略，进入四川，致使明军疲于奔命。从十三年八月到第二年五月，张献忠走遍大半个四川，拖垮了尾追的明军。十四年一月，左良玉和贺人龙两支主力对杨嗣昌不满，贺人龙尾追张献忠到广元屯兵不进，左良玉亦迟缓不前。张献忠在开县突袭明军，取得胜利，顺江而下，以一昼夜百里以上的速度向襄阳挺进，杨嗣昌得知后再出川追赶已来不及了。二月，张献忠破襄阳，杀襄王朱翊铭，缴获大批军用物资和武器，同时发库银15万两赈济饥民，于是军威大振，所到之处深得民众拥护。杨嗣昌"围剿"农民军的"四正六隅十面网"的方略宣告破产，杨嗣昌畏罪自杀。农民起义再度进入高潮。　　（张桂萍）

皇太极统一黑龙江流域

后金汗皇太极继承努尔哈赤遗业，统一黑龙江流域的历史事件。

黑龙江流域是女真族活动地区，努尔哈赤兴起以后，曾先后出兵征讨和招附黑龙江女真萨哈连部、萨哈尔察部、使犬部、使鹿部，基本上控制了黑龙江下游。后金天命十一年(1626，明天启六年)，努尔哈赤去世，皇太极继位。皇太极很重视对黑龙江流域的经营，继续招抚黑龙江中上游各部。后金天聪五年(1631，明崇祯四年)，黑龙江中游虎尔哈部首领黑托等归附，献貂、狐、猞猁等皮货贡物。天聪八年索伦部头目巴尔达奇"倾心内附，岁贡方物"。在他的带动和影响下，外兴安岭以南的索伦部多数都归附后金。因巴尔达奇功劳卓著，皇太极把族女嫁给他，巴尔达奇成为后金的额驸。清崇德二年(1637，明崇祯十年)黑龙江上游索伦部乌苏鲁城首领博木博果尔贡马匹貂皮归附。于是黑龙江上游各部俱归附。清崇德四年，博木博果尔发动叛乱，并派人要巴尔达奇一起叛乱，但遭到巴尔达奇拒绝。皇太极派萨木什喀、索海率领清军来平叛，巴尔达奇积极支持和配合清军平叛。博木博果尔兵败逃窜，清军又攻克铎陈、阿萨津、多金、乌库勒、乌鲁苏等城。崇德六年，清军在齐洛台(今赤塔)，获博木博果尔等。皇太极平息了博木博果尔叛乱，控制了贝加尔湖以东地区。至此，自东北海滨(鄂霍次克海)，迄西北海滨(贝加尔湖)各部皆归附。皇太极统一黑龙江流域以后，在这一带"设姓长、乡长，分户管辖"，治理民事，征收赋税，并把该地居民编入旗籍，成为八旗的组成部分。　　（张正明）

松锦之战

入关前清军击溃明朝边军主力的重要战役。

清朝皇太极即位后，按照以明朝为主攻目标的战略部署，曾三次发兵入关。但因未能攻克锦州和山海关，均为绕道入关。由于山海关是屏蔽北京的要塞，锦州是山海关的门户，因此能否攻克锦州和山海关，对清军来说至关重要。清崇德五年(1640，明崇祯十三年)，清军攻打锦州，遭到锦州明军守将祖大寿的顽强抵抗，清军未能如愿。此后，再次发兵攻打锦州，又失利。崇德六年，皇太极决心不惜任何代价，怀着战略进攻的意图和必胜的信心，再次发动攻打锦州之战。皇太极命郑亲王济尔哈朗、武英郡王阿格济、贝勒多铎等，率领八旗精锐，并带来攻城大炮，对锦州进行猛烈围攻。锦州明军抵挡不住清军，锦州外城很快就被清军占领，内城也陷入重重包围之中。锦州守将祖大寿急忙向明廷告急，请求援助。明廷派蓟辽总督洪承畴率吴三桂等八个总兵，13万人马驰援。但是，由于明军对于"关外之存亡，神京之安危，决于一战"的严峻形势认识不足，精神上缺乏必胜的信心，物质上没有可靠的保证，主帅洪承畴又误信清军"今秋不得锦州，议撤兵回"的流言，认为清军和以往一样，久攻不克，必自撤兵。因而，明军参战是被动的，仅仅是为了解除锦州之围，缺乏战略反攻的积极意图。在上述战略思想指导下，洪承畴的援军只是步步为营，以守为战。并且轻易将粮草留在宁远、杏山和塔山外的笔架岗，只率6万军贸然前进。洪率军到达锦州城南18里的松山西北立营，却不与围困锦州的清军接战。当清郑亲王济尔哈朗的一支右翼八旗兵进攻明军遭到失败后，主帅洪承畴又未抓住有利战机，在清军援兵赶来之前，集中优势兵力速战速决，击溃围锦清军，再乘胜前进，进攻立足未稳的清军援兵。由于洪承畴缺乏勇气和计谋，以致坐失良机。结果，皇太极援军赶到，陈兵于松山、杏山之间，截断了松、杏明军的联系，横绝了洪承畴的归路，又派军击溃了塔山护粮明军，夺得明军笔架山粮草，以致明军因饷道被断，"松山之粮不足三日"，军心动摇。洪承畴企图把驻守在乳峰山的明军撤到松山，又中途遭到清军伏击。战机已失，洪承畴才决定背松山列阵，派兵冲击清营，被清军击败，只有少数人得以突围。龟缩在杏山的明军，在撤往宁远途中，又遭清军截杀，总兵吴三桂仅以身免，逃回宁远。清军大胜，

士气大振。洪承畴手下只剩下残兵败将1万余人，被清军围困在松山城内。松山城被围半年之久，洪承畴曾组织五次突围，均未成功。最后，松山城内粮尽援绝，城破，洪承畴被俘。被围困一年的锦州城早已筋疲力尽，守将祖大寿见援军失败，只好开城投降。至此，明朝在关外除宁远一孤城外，已全部被清军攻克。松锦战役，清军不仅歼灭了明朝边兵的主力，使明朝经营20多年的宁锦防线全部崩溃，而且大大加深了北京城的危机。　（张正明）

福临即位

清崇德八年（1643，明崇祯九年），清朝皇太极第九子福临嗣位称帝的历史事件。

皇太极于清崇德元年称帝建立大清朝后的第八年，突然病故。于是在清廷中展开了一场争夺帝位的激烈斗争，而这一斗争又是皇太极嗣位时争嗣斗争的继续。皇太极本是努尔哈赤汗的第八子，为四大贝勒。另三位大贝勒是：大贝勒代善为努尔哈赤次子（长子褚英已逝）；二大贝勒阿敏为努尔哈赤侄儿；三大贝勒莽古尔泰为努尔哈赤第五子。四位大贝勒原是同坐议政，颇有实权。另外，还有四小贝勒，即阿济格、多尔衮、多铎、济尔哈朗。前三位小贝勒，都是努尔哈赤晚年之宠妃纳喇氏所生。努尔哈赤去世，皇太极恐纳喇氏帮助其儿子与他争位，乃逼纳喇氏殉葬。当时，多尔衮仅15岁，多铎仅13岁，无力与皇太极抗争。最后皇太极终于登上汗位。但是崇德八年八月初九日，皇太极突然暴死。清廷中的争嗣斗争又爆发起来。彼时，主要有三股势力在觊觎皇位。一股是以努尔哈赤第14子睿亲王多尔衮及其兄弟英亲王阿济格、豫亲王多铎为首。当时，多尔衮已经32岁，阿济格、多铎屡劝多尔衮以兄终弟及即帝位。甚至在后来福临即位时，阿济格、多铎仍跪求多尔衮当即大位，期待多尔衮继承大统，抬高由他们所率两白旗的地位。另一股是以礼亲王代善、郑亲王济尔哈朗及两黄旗大臣为主，拥戴皇长子豪格为君。诸王中资历深、影响大的代善、济尔哈朗执意由豪格嗣位。皇太极属下的两黄旗大臣图尔格、索尼、图赖、锡翰、巩阿岱、鳌拜、谭泰、塔瞻等共相盟誓，效忠豪格，以捍卫皇权的正统，维护两黄旗的优势。第三股就是以孝庄文皇后牵头的博尔济吉特氏集团，欲立福临为君。原来皇太极共有15个后妃，其中科尔沁蒙古贝勒莽古思之女博尔济吉特氏为皇后，但她一直未能生育。她为了科尔沁蒙古在清朝中的利益和地位，又让自己的侄女科尔沁贝勒勒寨桑之女嫁给皇太极，此女也姓博尔济吉特氏，被封为永福宫庄妃。崇德三年正月，庄妃生子福临，后封为孝庄文皇后。皇太极宠爱的宸妃，生子早殇，与孝庄又系姊妹。博尔济吉特氏为了巩固其在朝廷的特殊利益，她们和衷共济把孝庄之子福临推上皇帝宝座。而豪格之母继妃乌喇纳喇氏在后宫中的地位是不能与博尔济吉特氏相比的。为了福临嗣位，孝庄施展灵活巧妙的政治手腕，将资历深、影响大的代善争取过来，使他拥戴福临。同时，将拥有实力、争夺皇位呼声高的多尔衮笼络住，通过与多尔衮结婚，使他放弃争位。八月十四日，多尔衮在崇政殿召集议立嗣君会议。两黄旗大臣令精锐护军，张弓挟矢，环立宫殿，决心以武力拥立皇长子豪格为君。但是遭到白旗诸王反对。双方剑拔弩张，僵持不下。在这种形势下，多尔衮提出拥立皇太极第九子6岁的福临即位，由他与郑亲王济尔哈朗辅政。这一折衷方案为众人所接受，避免了满洲贵族之间的公开分裂。这样，经过各派力量的妥协，年仅6岁的福临终于继承大统，登上了清朝皇帝的宝座，明年改元为顺治。　（张正明）

清

山海关之战

清顺治元年(1644,明崇祯十七年),吴三桂勾结清军与李自成农民军在山海关进行的战争。

清顺治元年,李自成农民军在西安建立大顺政权后,于是年三月破太原、代州,除在宁武与明将周遇吉一战外,余如宣府姜瓖、居庸关唐通均相继投降,李自成军兵不血刃于四月二十五日攻入北京。在北京军情紧急时奉诏率军入京戍卫的山海关总兵吴三桂,在途中听说京师已破,崇祯帝自缢身亡,便又率军退回山海关,以观形势。李自成顺利入京后,产生了轻敌麻痹思想,仅派降将唐通携带吴三桂父亲吴襄劝降书和犒师银两前去劝降,招吴三桂入京。狡猾的吴三桂虽接受了犒银,却屯兵九门口,留做后路,率军缓慢向京城运动。吴三桂率军走到滦州,见到京城逃出的吴宅家人,获知家产被抄,父亲被囚,爱妾被掳,勃然大怒,立即率军返回山海关。同时,派人向清朝请求援兵。多年来一直想进取中原的清政权,在听说明朝京师危在旦夕时,已决定由摄政王多尔衮率军南下。当清兵行军途中,见到吴三桂遣人所送书信后,全面了解到北京形势,对吴三桂提出的愿以"财帛"和"裂土"为代价,乞求派兵支援的请求,是"瞌睡给了枕头"。多尔衮立即回书吴三桂,表示欢迎吴三桂率众来归,将封以故土,晋为藩王。对于清政权和吴三桂的紧密勾结带来的严重局势,李自成的农民军却缺乏充分认识。等到李自成发现山海关军情紧急,不得不出兵时,时间已晚,形成了仓促上阵之局面。农民军四月十三日由京出发,二十一日到山海关。由于农民军入京后军队调动频繁,兵力分散,李自成带到山海关的军队仅6万(一说20万),而吴三桂有军约四五万,清军有10余万,农民军在兵力上已处于劣势。农民军到达山海关后,首先进行了攻打寺关城的战斗。该城南面临大海,农民军便从西、北、东三面围攻,经过昼夜激战,北翼吴三桂军已濒临危殆,难于支持。次日,清军赶到山海关。多尔衮对农民军的战斗力有着高度估计,不敢轻敌,先让吴三桂率军打头阵,清军在后面观阵。吴军与农民军战斗到过午时刻,已被农民军包围。吴军几番想冲杀出去,但围开复合,战斗十分激烈。清军从战斗开始一直作壁上观,直到双方都筋疲力尽时,发兵从阵右冲击,当时突然风势大作,对清军的进攻又起了掩护作用。李自成的农民军在清朝和吴三桂军的联合攻击下,终于兵败山海关。这一仗,使清军乘势杀入关内,而李自成农民军从此一蹶不振,得而复失了所取得的胜利成果。 (张正明)

清朝统治权在全国的建立

清兵入关,进攻农民起义军,消灭南明政权和镇压各地反清力量,建立全国统治权的历史事件。

顺治元年(1644)山海关之战后,李自成的农民军战败,于三十日退出北京城。五月二日,清朝摄政王多尔衮率清军进入北京城。清朝统治者为了夺取全国的统治权,根据中原地区矛盾复杂、社会动荡、人心不稳的状况,采取笼络汉族地主,镇压农民起义军和人民反清力量,征讨南明势力的策略。同时,废除明末三饷加派,争取民心,减少入主中原的阻力。十月初,清顺治帝福临由盛京迁都北京,把政治中心由关外迁入关内。是年秋,清廷一面遣人招抚山东、

河南、山西等地，同时调兵遣将，进攻退至西安的大顺农民军。顺治二年正月，清军在潼关败农民军。二月，李自成弃西安，退入商洛山区。五月，大顺农民军抵通山县（湖北通山），主力先行，李自成率20余骑断后，在九宫山不幸遇害，大顺军的抗清斗争暂时转入低潮。清军在进攻大顺农民军战争中取得胜利后，又抽调兵力进攻南明。先是顺治元年五月，明在南京的残余势力在北京陷落后，由原明南京兵部尚书史可法、凤阳总督马士英等在南京拥立福王朱由崧先称监国，旋即帝位，以明年为弘光元年，是为弘光政权。顺治二年三月，清豫王多铎率清军经虎牢关，抵归德，兵分两路推进，一路指向亳州；一路指向砀山、徐州。原明总兵以徐州降清，引清兵南下。四月，多铎军渡淮。接连破扬州，屠嘉定，镇压江阴人民抗清力量。五月，清兵渡江，弘光帝逃至芜湖被俘。多铎派人解往北京，杀之。清军入南京，以八旗兵为骨干，屯兵南京，以汉军为先锋，扫荡江南各地。清军深入江南后，已占领半个中国，在策略上也改变单纯军事进攻为剿抚并用。是月，清廷命降清原明朝大臣洪承畴坐镇南京，总督军务，经略江南五省。福王政权灭亡后，闰六月明唐王朱聿键在福州即帝位，改元隆武。明鲁王朱以海在绍兴监国，以明年为元年。顺治三年六月，清兵过钱塘江，直取绍兴，鲁王逃亡入海。后于顺治十年三月鲁王取消监国号，浙江政权覆亡。唐王即位当时，虽有志于天下，但扼于形势，也无力挽救南明政权彻底灭亡的命运。当浙东鲁王政权兵败，清兵向福建逼近的紧要关头，握有兵权的郑芝龙却与清朝方面勾结，尽撤仙霞岭之南明军。顺治三年八月，清兵顺利进入福州，于汀州俘隆武帝。清军在击败李自成大顺农民军和胜利进军江南之际，张献忠领导的大西农民军已成为清廷统治全国的主要障碍。对此，清政府采取剿抚手段，多次招降张献忠，遭到拒绝。顺治三年八月，大西军北上。时农民军内部出现叛徒，引清兵南下，偷袭驻在凤凰山的大西军老营，张献忠仓皇应战，不幸中箭身亡。余部在孙可望、李定国和刘文秀的率领下，由川东退入贵州，开展联明抗清斗争。顺治三年十一月十八日，湖广、四川的原明朝将领丁魁楚（两广总督）、瞿式耜（广西巡抚）、何腾蛟（湖广总督）、堵胤锡（湖广巡抚）在肇庆拥立神宗之孙桂王朱由榔为帝，年号永历。顺治八年四月，清军进占两广，桂王局促于广西南部一隅之地，为了苟全于危局，只好依靠农民军，于是出现了南明桂王政权与农民军联合抗清的局面。顺治九年，李定国率领的农民军在湖、桂取得进攻清军军事上的重大胜利，但遭到孙可望的忌恨。孙、李军发生战斗，孙兵败，最后降清。顺治十五年春，清廷出动15万大军从四川、湖南、广东分三路进攻永历政权控制的贵州。九月，陷贵州。十月，清军进攻桂王所在地云南。十六年，桂王被迫退出云南昆明，后逃至缅甸。十八年秋，吴三桂率清军从缅甸俘桂王回云南。翌年四月，桂王被杀，永历政权亡。不久，李定国染病亡，大西军余部的抗清斗争宣告结束。康熙三年（1664），大顺军余部也被清军镇压。清兵入关后，还先后镇压了顺治元年在鲁西曹州榆园起义的农民军，河北、天津民众，浙江四明山农民的抗清斗争；顺治二年爆发的山西交城山起义的农民军、太湖赤脚张三、苏北起义的农民军、安徽英霍山寨的抗清斗争；顺治五年爆发的鲁东栖霞于七，浙江衢州、泰顺农民军的抗清斗争。这样，清军自入关以来，经过十多年的征战，终于战胜了当时具有相当军事实力的大顺、大西农民军和南明政权，以及镇压了各地人民的抗清斗争。与此同时，还通过内政、司法、财政方面的调整和改革，拉拢、安抚汉族地主官吏，采用明朝中枢机构体制，一定程度地减轻对农民的剥削，实行薄赋敛，招集流亡人口开垦荒田政策，恢复社会经济，从而巩固和发展其统治地位。从此，原偏隅东北的清朝贵族统治者，终于取得了全国的统治权。 （张正明）

南明弘光朝党祸

南明弘光政权时期（1644.5—1645.5），统治集团内部矛盾斗争的事件。

福王朱由崧，是明神宗之孙，福王朱常洵之长子。崇祯十四年（1641），李自成领导的农民起义军克洛阳，杀福王朱常洵，朱由崧逃至怀庆，崇祯十六年嗣封福王。崇祯十七年，农民军攻占北京，崇祯帝丧命，他与潞王朱常淓一齐南逃至淮安。南京文武大臣商议拥立新君时，崇祯帝的三个儿子都没逃离北京，可供选择者只有散在各地的藩王。从血缘关系看，明神宗的直系子孙福王、惠王、瑞王、桂王与崇祯帝最近，但惠、桂、瑞三王远在西南，远水不解近渴，不便拥立，只有福王既有血缘资格，又有地域上的便利。可是，有一些大臣担心福王掌了权，会追究“梃击”“移宫”及“妖书”诸案宿怨，而立潞王，则无后患。所以前礼部侍郎钱谦益、兵部侍郎吕大器、右都御史张慎言、詹事姜日广等都同意拥立潞王，并移牒屯兵浦口的参赞机务兵部尚书史可法，说：福王由崧，论序当立，但有七不可：贪、淫、酗酒、不孝、虐下、不读书、干预有司。而潞王常淓，贤明当立。史可法亦深以为

然，遂由浦口还南京。可是凤阳总督马士英认为福王昏庸可利用，于是内贿操江诚意伯刘孔昭，外贿总兵刘泽清，同心推戴，必欲立福王。他写信给史可法和吕大器说：无论以序以贤，无如福王，已经传谕为三军之主，请奉为皇帝，并指责史可法等不应拥立潞王。与此同时，马士英拥福王至仪征，连营长江之北，造成一种非福王不可的架势。在马士英的压力下，史可法等南京文武大臣只好放弃原议，接受马士英的主张。五月十五日，福王朱由崧即皇帝位于南京，决定以明年为弘光元年。

弘光政权建立初，内部充满了明朝残余势力。因而几乎全部地承继了原来明统治的腐败本质，内部纷争不已，造成了阉党余孽马士英、阮大铖之流迫害以东林党人为核心的正直官僚的党祸。起初，正直大臣史可法、姜日广等为阁臣，马士英虽因拥戴功晋东阁大学士，兼兵部尚书、右都御史，而总督凤阳如故。朝中大权握于史可法手中，野心勃勃的马士英对此极为不满。他继续以江北四镇黄得功、高杰、刘泽清及刘良佐所率的四支部队为后盾，去夺取朝政的控制权。福王监国不久，他便来到南京，胁逼史可法让权。史可法无可奈何，只好于五月十二日向朱由崧疏请督师江北，五月十八日辞朝而出，前往扬州督师抵御清兵的南犯，马士英遂得独揽朝中大权。为了巩固自己的权位，他又拉与自己关系密切的阉党官僚阮大铖入朝预政。原来在万历四十四年(1616)马士英会试及第后，因居官檄取公费馈遗朝贵而被削职遣戍，流寓南京。崇祯十一年阮大铖也因“留都防乱公揭”之出而迁居南京郊外，两人同病相怜，相结甚欢，成为患难莫逆之交。崇祯十五年，由于阮大铖的活动，马士英由戍籍起任凤阳总督。到马士英掌握弘光政权后，就对阮大铖极力荐举。同年六月六日，马士英以阮大铖知兵为借口，荐之任兵部右侍郎。东林党等正直派官员不肯容许这种列名逆案的人出来参政，因之举朝大哗。但正直派官僚终究没有斗过大权在握的马士英。八月三十日，阮大铖出任兵部添注右侍郎，第二年又晋兵部尚书，兼右副都御史，巡阅江防。而马士英之子马锡又通过阮大铖的推荐，由白衣擢都督佥事，充总兵官，管理京营。马、阮任人唯亲，卖官鬻爵，致使政治更加腐败。如吏部尚书徐石麒荐前总督朱大典、王永吉，起初马士英没有收到朱、王的贿赂，当即拟旨严责王永吉身任督师，致北都沦陷；朱大典赃私狼藉，先帝严追未结，何得朦胧推举！时隔不久，朱、王送了份重礼，马士英立刻换了面孔，决定加以擢用。而身为皇帝的福王，唯知饮酒溺色，同样腐朽透顶。当时南京流传着“相公止爱钱，皇帝但吃酒”的谚语。与此同时，朝中正直的东林党官员，如礼部尚书兼东阁大学士姜日广、高弘图等先后被排挤辞职。马士英、阮大铖不仅陷害忠良、提拔阉党分子，而且为崇祯时钦定的阉党逆案翻案。在他的鼓动下，崇祯十七年十二月，福王朱由崧下令礼部访求与“钦定逆案”相对立的《三朝要典》送史馆，并下令追恤逆案诸臣，打击正直的东林党派官员。

弘光朝党祸是明后期东林党与阉党之争的余波。随着时间的推移，弘光政权中阉党势力日增，而以东林党为核心的正直派官员的力量则日削，这一政治状况注定了弘光政权的迅速覆灭。（高春平）

顾实汗入藏

清初，厄鲁特蒙古和硕特部首领顾实汗率军入藏，以武力确立喇嘛黄教在蒙藏社会独占地位，促使蒙藏民族在宗教信仰上统一的历史事件。

厄鲁特蒙古有准噶尔、和硕特、杜尔伯特、土尔扈特四部。顾实汗(1582—1654)，又作固始汗，本名图鲁拜琥，是和硕特部首领。和硕特部是元太祖成吉思汗之弟哈布图哈萨尔的后裔，顾实汗是哈布图哈萨尔的第19世孙，其祖父博贝密尔咱、父哈尼诺颜洪果尔世为卫拉特汗，顾实汗是哈尼诺颜洪果尔的第四子。17世纪二三十年代，和硕特部的游牧地区，先在喀拉库木河，后转向了额尔齐斯河托波尔河流域。这个时期，正是厄鲁特蒙古兵戈相攘的动乱年代。先是土尔扈特部部长和鄂尔勒克因受准噶尔部巴图尔珲台吉的排挤，率其部众迁到伏尔加河下游游牧。此后不久，顾实汗与巴图尔珲台吉的关系也日趋紧张，以致发生武装冲突，尽管这场冲突很快以和解告终，但长期的内乱与外患，严重地危害着厄鲁特各部牧民的和平游牧生活。作为和硕特部首领的顾实汗，为了部族的生存，摆脱战乱不息的处境，转移牧地以图发展便成为他最为理想的出路。而恰在这时，顾实汗接到了西藏黄教代表请他到青海护法的要求，正好为顾实汗率其部民迁徙提供了机会。于是，顾实汗便以黄教护法者的姿态，进入青藏高原的政治舞台。西藏的黄教，又称格鲁，原是15世纪初宗喀巴在改革西藏喇嘛教的基础上创立和发展起来的。随着黄教甘丹、哲蚌、色拉和扎什伦布等寺院的建立，黄教在西藏地区已形成庞大的寺院集团。16世纪末，蒙古土默特部俺答汗进据青海皈依黄教后，黄教在青海地区由于俺答汗的倡导和支持得到很快传播。17世纪初，厄鲁特蒙古也传入黄教。黄教势力

的膨胀与扩大，势必影响到其他喇嘛教派封建势力的利益，因而引起了其他教派对黄教的敌视与打击。当时，在后藏地区执政的藏巴汗，信奉喇嘛教噶玛噶举派，便联合西藏的反黄教势力极力打击、排斥黄教势力。青海地处蒙古西南，屏蔽西藏，是沟通蒙藏两地的桥梁。由于黄教在青海势力雄厚，对西藏的噶玛噶举派形成巨大压力。藏巴汗便联络当时统治青海的蒙古首领却图汗和统治康区的白利土司顿月多吉，作为他在青海地区反黄教的支持力量。却图汗本为喀尔喀蒙古的一个王公，因在喀尔喀蒙古发动内战，被喀尔喀蒙古人民驱逐，来到青海征服了在青海的土默特部。却图汗是噶玛噶举派，他到青海后杀死或监禁了大批青海地区的黄教僧人，企图消灭黄教在青海的势力。白利土司顿月多吉是苯教徒，他敌视佛教，尤其仇恨黄教，并摧毁了在康区的大部分格鲁派寺院。藏巴汗与却图汗、白利土司在一致反对黄教的基础上结成联盟，立誓要消灭格鲁派。面对这一严重形势，黄教决定派人到厄鲁特蒙古，请他们出兵救援。厄鲁特蒙古各部首领决定支援黄教，顾实汗则明确表示愿率部前去。鉴于顾实汗率部向青海转移，不仅可以减少厄鲁特蒙古各部争夺牧场的斗争，而且能共同向外扩张势力，所以原来与顾实汗有矛盾的准噶尔部巴图尔珲台吉成了顾实汗率部赴青海的积极支持者。由于顾实汗兵力有限，便与巴图尔珲台吉结成联盟，于明崇祯九年(1636，清崇德元年)秋冬之间从塔尔巴哈台往伊犁和塔里木盆地，于翌年到达青海境内。厄鲁特蒙古联军与却图汗军经过激战，却图汗被顾实汗之子达延台吉捕杀，厄鲁特联军大获全胜，“尽得青海诸地”。顾实汗为了酬谢进军青海的同盟者巴图尔珲台吉，把战争俘虏全归巴图尔，又贿以重金厚礼，甚至把女儿也许给巴图尔之子为妻，然后把巴图尔珲台吉及其部众送归准噶尔，而顾实汗的部众则陆续移牧于青海境内。崇祯十二年(1639)，顾实汗率军来到康区。次年，灭白利土司，释放了被白利土司囚禁的喇嘛僧人，使顾实汗得到了喇嘛各派僧人的尊敬。崇祯十四年，顾实汗采取佯归青海、使藏巴汗军队疏于戒备的策略，突然向西藏进军。次年春，在西藏黄教的支持下，顾实汗军彻底打败了后藏军队，擒杀藏巴汗丹回旺波。至此，青康西藏全部平定，顾实汗以黄教护法王成为青藏地区的最高统治者。顾实汗夺取青藏以后，采取了一系列措施，以加强其统治地位。他命其长子达延驻守西藏，令其余诸子驻牧青海，征康区赋税以养青海部众。顾实汗亲自掌握西藏地方政权高级官员的任命和蒙藏军队调动权力，以八个旗的蒙古军，经常驻扎西藏。广布格鲁派教法，确立黄教派的特殊地位，确定西藏地区赋税由达赖喇嘛支配，以为供养。提高班禅的地位，以四世班禅罗桑却吉坚赞住持扎什伦布寺，并划后藏部分地区归他管辖，以加强后藏黄教派力量。清顺治二年(1645)赠罗桑却吉坚赞“班禅博克多”称号，其死后采用转世制度。从此，达赖喇嘛和班禅成为黄教并行的两大系统。顾实汗早在清崇德元年便开始与清政权建立联系。崇德七年，又和达赖喇嘛共派使团到盛京，受到清太宗皇太极的热情款待。顺治二年，顾实汗又派其第六子多尔济达赖巴图尔珲台吉到北京，向顺治帝上书，表示对清政府的要求“无不奉命”。此后，顾实汗和达赖喇嘛几乎每年都遣使北京。顺治十年，清政府在册封达赖五世的同时，封顾实汗为“遵文行义敏慧顾实汗”。顾实汗入藏，以武力确立了黄教在西藏宗教界的最高地位，并促使蒙藏统一了宗教信仰。顾实汗在西藏建立的蒙古地方政权，使明末以来青藏地区由战乱割据状态逐步走向安定统一局面，给后来清朝政府进一步对青藏地区的统一奠定了良好的基础，并加强了蒙藏地区各族之间政治、经济、文化的联系，加强了蒙藏地区与清朝中央政府的联系，有利于国家的统一和民族的团结。

（张正明）

史可法抗清

顺治二年(1645)，南明弘光朝督师史可法抗击清军的历史事件。

史可法(1601—1645)，字宪之，号道邻，明末河南祥符(今属河南开封)人。崇祯元年(1628)进士，授西安府推官，迁户部郎中。因镇压农民起义，累迁右佥都御史，在安庆、池州、光山、蕲州、湖口诸地堵截农民军，升任南京兵部尚书。崇祯十七年三月十九日，李自成领导的大顺农民军攻占北京，结束了明朝的黑暗统治。五月初一，清军勾结原明朝山海关总兵吴三桂进入北京，夺取了农民革命的胜利果实。五月十五日，福王朱由崧在凤阳总督马士英等人的拥戴下，在南京建立了弘光朝廷。推史可法为内阁宰辅，不久被排挤出南京，令其督师扬州。七月二十七日，清摄政王多尔衮发出了“致明督师大学士史可法书”，对他进行诱降。九月十五日，史可法复信表示决不投降。他决心举起抗清斗争的旗帜。派黄得功、高杰、刘泽清、刘良佐率10余万军队分驻江北庐州、泗水、淮北、临淮四镇，以拱卫南京。可是弘光朝廷荒淫腐败，朱由崧只知整日饮醇酒，选淑女。阉党余孽马

士英、阮大铖之流操纵朝政，迫害东林，勒派军饷，加征盐税，甚至公开卖官鬻爵，政治腐败到了极点。正如当时一首民谣所讽："中书随地有，都督满街走。监纪多如羊，职方贱如狗。荫起千年尘，拔贡一呈首。扫尽江南钱，填塞马家口。"而弘光政权在军事上倚仗的江北四镇大都是骄兵悍将。刘泽清跋扈残酷，和刘良佐抱在一起，支持马士英，干预朝政；高杰的部队皆山、陕劲卒（高杰是李自成的叛将），战斗力很强，但军纪败坏，和扬州地方官民发生几次冲突；黄得功军纪严，战斗力也很强，可他和高杰有矛盾，为争防地问题，双方几乎发生大规模的火并。尽管内有昏君佞臣胡作非为，外有骄兵悍将纷争不和，但具有民族气节的史可法不顾处境之艰难，极力排除马、阮的干扰，协调江北四镇，团结各方力量抗清。他到扬州后的前几个月的时间和精力，主要用在调解军民之间、四镇之间的矛盾和冲突。凭着他的德望才能，经多方斡旋，总算使得四镇愿意听命，特别是赢得了高、黄的尊敬。但接着而来的是更严重的军饷问题。按定额每镇 3 万人，还不能定时发放，屡被克扣，更何况实际兵力远超出此数。军饷之外，其他军需物资也需地方筹办。史可法多次向朝廷呼吁，结果无效，只好派专人贩运盐豆，冀收赢利，以弥补军饷。不久，又命高杰为前锋，率兵赴镇；他本人也到清江浦视师，作进一步的具体部署。王家营（江苏清江北）北到宿迁一段，是冲要地区，由他亲自防守。十一月，清军占领宿迁，史可法命刘肇基进军收复，清将拔营逃遁，遂克宿迁。之后，清兵围邳州（州治在今江苏邳县境），又命刘肇基进军城南，相持半月，清兵退走。十二月，清兵大举分道南下，山东兵由济宁而南，从庙湾南渡进迫邳州、宿迁；河南兵从孟津东渡，进逼归德（河南商丘）、徐州。史可法一面会兵进援邳州，一面令高杰从徐州西上抵御，出兵开封、归德，以规复河南失地，北伐中原。这时发生了严重的粮饷不济困难，使高杰部行动受阻。更为严重的是弘光元年（1645）正月，睢州总兵许定国受清军利诱，竟诱杀高杰，叛降清朝，导致高杰所部大乱，军事上遭受重大挫折。史可法闻知流涕顿足叹道：中原事不可为矣！不得不把高杰旧部撤回整顿。三月，西路清兵已占领归德，继续南下，进逼长江；东路已从邳州、宿迁进逼淮南。四月十三日，清军至泗州仅 20 里，形势异常危急。在此紧急关头，弘光政权内部又发生了一场规模空前的内争。雄踞武昌、拥有数十万大军的骄将左良玉，因对马士英、阮大铖之流不满，以太子案为借口，发兵东下清君侧，进逼南京，从而使弘光政权面临的局势更加紧张。四月初，左良玉至九江病死，其子左梦庚统领其众，继续东进。面对北西交急的局面，在江北督师的史可法移军进驻泗州，主张重点对付清兵，但大权在握的马士英不同意这一方案，力主把对付左兵放在首位。马士英急调刘泽清、黄得功部去堵截左军，弘光帝也诏史可法火速回京，督诸军渡江入援。他请求留军抵御正在南下的清兵，不允，只得率军驰赴南京。于是清军乘南明内乱之机，毫不费力地攻占淮安和泗州。史可法到达南京近郊时，黄得功已在长江上游攻破左军，屯驻芜湖，命其继续追击；并命史可法回守防地，不必入朝。他登燕子矶，南面痛哭后急趋天长，会诸将救盱眙。听说盱眙守将已降清，援救泗州的侯方岩部全军覆没，泗州总兵官李遇春也已投降。四月十二日，史可法和亲信部将史德威等数骑，一日一夜冒雨奔回扬州，部署防守事宜。这时原驻扬州城内的高杰部属听到谣传，说许定国部将要到来消灭高部，连夜拉往泰州，牲畜舟楫，抢用一空。而刘泽清、刘良佐早已准备投降，故皆按兵不动。史可法呼吁各镇兵来援，无一至者，只有左都督刘肇基率所部从白洋河趋赴，副总兵庄子固也率众来救。四月十五日，清兵从盱眙、天长长驱南下，包围扬州。当时攻扬州的清兵，由豫亲王多铎统率，人马在 10 万以上，以叛徒许定国为向导，清兵部尚书汉侨为前锋，声势很猛。扬州城内守兵只有 1 万多人，其中还包括何刚部新募来的 2000 人，双方力量甚为悬殊。史可法命刘肇基守北门，施凤仪守便义门，黄位守钞关门，自己坐镇西门。多铎在攻城之前，屯驻扬州近郊的斑竹园，先进行诱降活动，派降将李遇春携带降书来到城下。史可法令史德威痛斥他辜负朝恩，叛敌失节的无耻罪行，表示自己决心坚守不屈。首次诱降未成，多铎又派乡约捧招降书来到城濠边，史可法严厉说道：我为朝廷首辅，岂肯反面事人？遂从城上放下健卒二人，把乡约和招降书一并投入河中。多铎又连发五书，史可法都不启封，将之全部投入火中。多铎多次诱降失败，恼羞成怒，下令攻城。总兵李栖凤、监军李岐凤，率所部 4000 人越城降敌，城中势力益孤，但仍顽强坚守。清兵用红夷大炮猛攻，史可法下令发炮还击，击杀清兵数千人于一二十里之外。扬州城内的老百姓也纷纷登陴抗敌。史可法督率军民在兵单力弱、又无外援的情况下顽强抗击十多天，给清兵以重大打击，连清统治者也承认清兵伤亡很大。二十五日，扬州城西北角崩塌，清兵攻入，城陷。史可法自杀未遂，部属数十人拥之下城走小东门，清兵迎来，他大呼：史可法在此！遂被俘，见多铎。多铎当面劝降，他

骂不绝口，严词拒绝：我为天朝重臣，岂肯苟且偷生，做万世罪人！又说：城存与存，城亡与亡，我头可断，而志不可屈。但扬州百万生灵既属于尔，当示以宽大，万不可杀。最后被害于扬州南城楼上，时年42岁。

史可法被杀后，他的部属仍在抗击。刘肇基率所部敢死士400人，杀敌千余，全部战死；庄子固与所部700人，以赤心报国为誓，全部格斗牺牲；副将马应魁、乙邦才、江云龙，参将陶国祚、冯国用、许瑾，游击李大忠、孙开忠等，都以巷战死；扬州知府任民育，城破后，穿官服，挂官印，端坐堂上，遂被杀，全家男女都投井死。其他文武官吏壮烈殉难的在200人以上。清军痛恨城内军民的顽强反抗，入城后对人民血腥屠杀十余日，王秀楚的《扬州十日记》对此有较详记述。清军血洗扬州后，乘势渡江。很快占领南京的门户镇江、瓜州，南明江防守将刘孔昭、杨文聪等望风逃窜。守卫南京的二、三十万明军纷纷降清。五月初八，清兵渡江，弘光小朝廷乱作一团，朱由崧、马士英慌忙出逃，弘光政权灭亡。清改南京为江宁府，命洪承畴为江南总督，镇抚东南。　（高春平）

南明鲁王监国

顺治二年(1645)闰六月，浙中义师公推张煌言等去台州迎立鲁王朱以海在绍兴就监国位。史称南明“鲁王监国”。

鲁王朱以海，是明太祖朱元璋的十世孙。父肃王朱寿镛，排行第五。崇祯十二年(1639)，朱寿镛死，长兄朱以派嗣位。崇祯十五年，清兵攻下兖州，朱以派自杀。崇祯十七年二月，朱以海得以嗣位。三月十九日，李自成攻占北京后，朱以海南逃。同年五月，福王朱由崧在南京建立弘光政权，命朱以海徙封江广，暂住台州。顺治二年五月，弘光政权灭亡。闰六月初九，明朝原九江道佥事孙嘉绩、原吏科都给事中熊汝霖，在家乡余姚起兵反清，举起了浙东抗清的第一面义旗。此后浙东地区出现多支抗清武装。闰六月十一日，诸生郑遵谦起于绍兴。第二天，董志宁为首的六个秀才推举前刑部员外郎钱肃乐为首，在宁波组织起抗清义军，并约请宁海总兵王之仁率军来宁波参加抗清斗争。他们赶跑了想开门迎降的宁波知府朱之葵，在群众大会上审判了企图杀害钱肃乐和六秀才、准备降清的劣绅谢三宾。紧接着原山西道御史沈宸荃和原江上兵备佥事冯元飏也在慈溪起兵抗清。余姚、绍兴等地起兵的消息传到台州，陈函辉即辅佐朱以海正式起兵。闰六月二十一日，浙中义师公推张煌言等人去台州迎立鲁王朱以海在绍兴就监国位。八月初三，鲁王迁驻绍兴，统一领导浙东的抗清斗争。并确定以明年为监国元年。同时，郑芝龙、黄道周拥立唐王朱聿键在福州称帝，建元隆武。

清军攻下江南后，很快进入浙江，占领了杭州、嘉兴、湖州等浙西地区。鲁王政府以张国维、孙嘉绩、熊汝霖等为阁臣，控制着绍兴、宁波、温州、台州等浙东地区。不仅有方国安、王之仁率领的官兵，而且还拥有浙中江上和各地的义师。起初经过周密筹划，颇有起色，在与清军的多次战斗中一直处于优势。在当地人民的支援下，他们依凭钱塘江天险，数次抗击和打败了清军。为了包抄以杭州为主要据点的浙西清兵，鲁王政权的武装曾一度潜至浙西，联合和发动了当地的抗清势力，从而使浙西也成为抗清的一个战场。但是，后来局势发生了变化，自顺治三年春季始，浙东政权对清斗争逐渐由优势向劣势转化，主动出击者成了清朝。战局的这种转变，除了客观上清朝方面投入兵力加大的原因之外，从鲁王政权自身来讲，主要是由于四方面的因素所致：一、辖区老百姓负担过重。为了抗清立国，鲁王政权不得不供养大量的军队，但浙东一隅地盘狭小，物力有限，老百姓无法承担沉重的人力物力负担，再加上许多部队纪律不好，自然灾害也时有发生，更使老百姓苦不堪言。二、内政腐败。鲁王于危难之际立国，本应励精图治，但却养尊处优，贪图安逸。朝中执掌大权的是他的岳父张国俊，他内结宦官，外倚悍将，卖官鬻爵，为所欲为。加之方国安、王之仁等专横跋扈，任用私人，引进奸党马士英、阮大铖、谢三宾，排挤正直人士，因而削弱了抗清力量。钱肃乐气愤地说：国有十亡而无一存，民有九死而无一生。竭小民之膏血，不足供藩镇之一吸，合藩镇之兵马，不足卫小民之一发。鲁王政权的这种腐朽情况，必然导致失败。三、对所属各支抗清武装缺乏高度统一的管理。当时浙东的抗清武装成分复杂，有当地士绅号召家乡农民、小工商业者组建起来的“义军”；有明朝原有的官军。这些官军又分两种，一种是原驻浙东的，一种是随着清军的南下而被迫由其它地区转移到此的。他们大部分归方国安、王之仁统领，称为“正兵”。而其中又分若干支。各支部队虽名义上属鲁王政权的统辖，但实际上各自为政，独立性很大，其统率者对自己掌管的军队具有很大的支配权。因此使得各支部队相互间虽有配合，但出于私利各行其是，互不声援的事情经常发生，甚至因粮饷的分配不公而矛盾重重，互相争夺厮杀。四、与唐王政权互争真伪，不能结成抗清同盟。唐王在闽称

帝后不久，曾派使节到浙东颁诏，但鲁王从个人名位出发，不肯受诏向唐王称臣，两个政权互争真伪，形同水火，不能合作一致对清。不仅没有形成闽得屏障、浙获后盾的牢固统一战线，反而交恶加兵。为了防备唐王进攻，鲁王不得不从抗清前线撤下部分军队，前往闽浙交界处防守，因而严重分散了抗清力量。到顺治三年二月，江南的抗清斗争已基本上被平息下去。清朝命多罗贝勒博洛同固山额真公图赖率师往征浙闽。五月二十日，大队清军抵达杭州。该月下旬，清军用大炮轰击浙东兵营。六月初一，清军突破钱塘江防线，渡江攻入绍兴，随即向浙东各县进攻，方国安望风而降，温州、台州、金华相继陷落。朱以海逃出绍兴，在张名振的保护下浮海南逃。其他抗清武装，或降或溃，或为清朝消灭。鲁王政权灭亡。

（高春平）

唐王称帝

顺治二年（1645）闰六月，唐王朱聿键在福州称帝，建立隆武政权的历史事件。

唐王朱聿键是明太祖朱元璋的九世孙。其先祖朱柽为朱元璋第二十三子，受封唐定王，封国南阳。朱聿键于崇祯年间袭王位，不久因清兵入犯，京师戒严，率护卫勤王，违背诸王不得擅离封地的祖制，被废为庶人，囚于中都凤阳。崇祯十七年（1644）五月十五，朱由崧在南京建立弘光政权后获赦，受命徙驻广西平乐府。次年五月，弘光政权亡，他行至杭州，被靖虏伯郑鸿逵接往福建，于闰六月初七监国于福州。本月二十七，在当地官绅郑芝龙、黄道周等拥立下正式称帝。以福建为福京、福州为天兴府，改元隆武，占据福建、两广、江西、湖广、云贵、四川等省区。原明朝地方官以及江南的抗清将领，也陆续承认了隆武政权。

在南明诸帝中，朱聿键是一个唯一有政治眼光，戒荒淫腐化，想有所作为的人物。他把中兴明朝作为自己的奋斗目标。为此，他很注意约束自己，生活节俭，日理万机，把中兴明朝的重点放在抗清之上。他命以建宁、天兴、延平、兴化为上游，漳州、泉州、邵武、汀州为下设，各设巡抚。对闽北自仙霞岭以外170处关隘险要处均设兵把守，并以10万兵防镇，10万兵讨伐。但是，隆武政权的军政实权，完全掌握在军阀郑芝龙手中。郑芝龙（？—1661），福建泉州南安县人，早年为海盗，往来日本等地，娶日本女为妻，生子郑成功。崇祯间受抚，历任游击、都督、总兵官诸职，爵封南安伯，拥兵二三十万，又把持着海上贸易，成为控制福建沿海的地头蛇。郑鸿逵是其弟。郑家是福建最大的地方实力派。他之所以拥立朱聿键，实为借此捞取政治资本，达到个人权势、财富扩张的野心。所以，他心目中根本没把中兴明朝及忠君放在第一位。因而就出现了内外大权尽归芝龙、朱聿键形同傀儡的局面。另一方面，为了抗清复明，朱聿键极力主张组建、保持一支数量庞大的军队。郑芝龙虽无意抗清，但为了巩固自己的权势，也同意豢养更多的军队。而增兵便需加饷，当时唐王政权的兵饷供应地，主要靠福建省，于是仅有八府一州的福建地区就被加上了沉重的经济负担。

尽管条件十分不利，唐王朱聿键还是不甘消沉，任人摆布。为了实现自己的抱负，他曾克服困难，两次组织出征：第一次是隆武元年（1645）七月，大学士黄道周出征江西，同年十二月因兵力不足，粮械缺乏，兵败于婺源。第二次为朱聿键亲征。原定隆武元年八月出发，由于郑芝龙的百般阻挠，拖了好久才由御营左先锋郑鸿逵和御营右先锋郑彩各率一支军队分出浙东、江西。十二月，朱聿键离开福州亲往督战，两路兵马虽然和清兵发生过战斗，但由于郑芝龙在后掣肘，出征军进展很慢，长期停顿在福建与浙江、江西的交界处。第二年，清朝探知郑芝龙是唐王政权的实力人物，便以王爵诱降，心怀投机的郑芝龙当即暗中写信与清廷串通。顺治三年（1646）六月，清兵渡过钱塘江进入浙东，郑芝龙不经朱聿键批准就把驻守闽浙交界处的军队撤走，向清兵敞开入闽大门。八月，清兵开向福建，郑芝龙为了保全个人的大笔家产，便与洪承畴暗中勾结，尽撤入闽要塞仙霞岭上的防军，使清军得以长驱直入。同年秋福州失守，唐王朱聿键逃至汀州（福建长汀），被清军俘杀。存在一年零三个月的福建隆武政权倾覆。十一月，郑芝龙不听他儿子郑成功等人的劝告，丢下聚集在安平镇（福建泉州南）的自己统领的部队，亲至福州降清。他满以为清朝可以让他继续留在东南沿海当地头蛇，没想到却被带往北京，名义上给了一个空头王爵，实则遭到软禁。但其子郑成功以厦门、金门为根据地，继续坚持抗清。后在顺治十六年（1659），郑成功乘清军全力进攻云贵，江南空虚之际，联合张煌言，率领17万水陆大军由崇明入长江，破瓜州，下镇江，围南京，引起清廷大震。

（高春平）

江阴人民的抗清斗争

清顺治二年（1645），江阴人民反对满族贵族统治者强行实施剃发令而爆发的抗清斗争事件。

顺治元年（1644）清军入关后，清朝统治者就下

令关内外兵民薙发。当时因南方未定，出于策略考虑，又暂时收回成命。允许"照旧束发，悉听自便"。到顺治二年(1645)五、六月间，形势发生了很大的变化：这时的清军不仅击败了农民军，占据了河北、山西、陕西、山东、河南等省，而且攻克南京，消灭了南明福王政权，控制了长江中下游地区。随着政治、军事有利形势的出现，清朝统治者出于民族统治的需要，于六月十五日再次下令，厉行薙发，宣布一应军民人等，"自今布告之后，京城内外限旬日，直隶各省地方自部文到日亦限旬日，尽令剃发。遵依者，为我国之民；迟疑者，同逆命之寇，必置重罪。""不随本朝制度者，杀无赦。"清军南下以来，在江南的暴行和一系列的民族高压政策，早已激起各地人民的无比愤怒，剃发令的颁布，犹如火上浇油，使反清斗争像烈火燎原，在社会各阶层中迅速蔓延，而反剃发令最激烈、斗争最坚决的是江阴人民。江阴是江南大县，明代属南直隶的常州府，是长江下游一个工商业城市，也是江防重镇，可谓"三江之雄镇，五湖之腴膏"之地。清军攻克南京后，南明江阴知县林之骥、参将张宿早就逃之夭夭。清政府派来知县方亨，到任后便清查户口、传令军民三日内一律薙发。方亨强行推行薙发令，激起了江阴城乡人民的公愤。闰六月初一日，江阴诸生百姓会集于孔庙明伦堂前，举起反清义旗，誓言"头可断，发决不可薙！"杀死方亨，共推典史陈明遇为城主，宣布抗清。商人尽献资财，附近乡民也荷戈负粮入城备战。清豫亲王多铎命七王、八王、十王率步、骑10万，分16营围城。江阴人民与清军激战三天，打死清将5人，退入城中防守。陈明遇又派人缒城请前典史阎应元入城，由阎统率城中军务。阎应元，河北通州人，武秀才出身，调任广东英德县主簿，因母病缓行。阎入城后，修缮城池，积极巡防。城乡人民响应者不下十余万人。他们在阎、陈的指挥下，团结一致，共同抗清。六月初，清军开始攻城。由于人民据城固守，阎、陈指挥有方，致清军李成栋、刘良佐部屡吃败仗。清军又由七王率部攻城，遭到江阴人民的顽强抵抗。七王也被守军刺中咽喉，坠城而亡，清军攻城失败。清军又命刘良佐跪在城外劝降，阎应元斥道："有降将军，无降典史！"命守军用箭将刘射跑。阎应元在与清军战斗中，右臂中铁丸受伤，他不顾伤痛，仍用左手持矛参战，激励守军。清军十王，在十方庵垒高台，坐镇高台指挥清军用大炮往城中射击，大炮烟雾挡住守军视线，阎应元便匍匐前进，命军士扛炮，由他亲自点燃引线，命中高台，十王、四员清将及240名清军从高空摔下而亡。清军又调来240多门大炮，由平南大将军克勒德浑指挥，用大炮猛轰江阴城东北角。八月二十日，清军由祥符寺后城攻入。阎应元率千人与清军格斗，背中三箭，对从者说："向乡亲们致言，我不能继续报国了！"言毕，拔刀刺胸投湖，未死。被俘后，不屈，被害于栖霞庵。陈明遇身负重伤，死而不仆。城破后，守城军民坚持巷战，最后全部壮烈牺牲。清军入城后，下令屠城三日，"满城杀尽，然后封刀"。计被杀者达17万人，幸存者仅几十名。江阴人民不畏强暴，不怕牺牲，前后打死清军7.5万人，毙其"三王十八将"，写下了反抗清朝统治者民族压迫强暴统治的可歌可泣的一页。

(张正明)

嘉定三屠

清初，嘉定人民对清朝统治者薙发令进行反抗斗争的历史事件。

顺治二年(1645)，继江阴人民抗清斗争之后，嘉定人民也以反对薙发令为导火线而进行了艰苦卓绝的抗清斗争。明代嘉定属苏州府。清军占领南京后，派张维熙任嘉定知县。张到任后，发布薙发令，激起嘉定人民愤怒。闰六月十九日，缙绅黄淳耀、侯峒曾等与城乡民众举起反清义旗，抗击清兵。他们做了守城防卫部署，决定东门由侯峒曾为主，邑诸生龚孙弦佐之；西门由黄淳耀为主，其弟邑诸生黄渊耀佐之；南门由孝廉张锡眉为主，前秀水县儒学教谕龚用园佐之；北门由国子生朱长祚为主，唐咨禹佐之。安排已定，各率众上城巡逻，城乡争缚裤执刀以从，人人斗志昂扬。明朝降将李成栋率部众从吴淞来攻嘉定，嘉定人民在外无援兵、内无粮饷的情况下，坚守孤城。清军汇集10多万后，开始攻城。时值阴雨，城中军民冒雨忍饥，守城三昼夜。七月初四日，清军见守城者渐弛，攻愈急，多缚软梯至城下，一清将以大桌覆其面，蹑梯而上，城上砖石如雨，悉中桌上，一跃而登，遂断东关，纵兵而入，城破。侯峒曾全家投水殉难，黄淳耀自杀身亡。李成栋率军入城，下令屠城三日，所杀不可数计，其悬梁者、投井者，骨肉狼藉，弥望皆是，投河死者也不下数千人。三日后，自西关至葛隆镇，河里浮尸多得船行无下篙处。初十日后，士民幸脱者始络绎入城。二十三日，江东朱瑛自称游击将军，率50人入县，重新起义旅抗清。二十六日，嘉定二次被清军攻破，再遭屠难。八月十六日，原明把总吴之蕃反清失败，嘉定复遭屠难。义民投河，水不为流，僵尸满路，血流漂杵，就连儿童也未能幸免。嘉定三次被屠，史称"嘉定三屠"。嘉定人民前后牺牲2

万多人，坚持了43天的艰苦卓绝斗争。他们用自己的鲜血写下了人民反抗民族压迫和强暴统治的历史。　（张正明）

永历朝抗清

顺治三年到康熙三年（1646—1664），桂王朱由榔在广东肇庆建立永历政权，并在大顺、大西农民军的支持下，坚持抗清斗争十五、六年的历史事件。

清军于顺治三年（1646）九月占领江南和东南沿海广大地区后，又把兵锋指向两广及西南腹地，企图一举消灭西南的抗清武装。同年十月十四，明湖广总督何腾蛟、两广总督丁魁楚、广西巡抚瞿式耜等拥立桂王朱由榔在广东肇庆监国，改元永历，瞿式耜做大学士，继续坚持抗清斗争。十一月初二，朱聿键之弟唐王朱聿鐭被原隆武政权的大学士苏观生等拥戴监国于广州，初五日正式即帝位，改元绍武。两个政权，唇齿相依，本应团结一致，共同抗清，但却同室操戈。朱由榔得知绍武政权建立的消息后，随即在十一月十八即帝位，以明年为永历元年（1647）。绍武政权杀了永历政权派到广州颁诏的使臣，并在三水、海口与永历政权之兵交战。正当双方相争厮杀之机，清兵在李成栋率领下自福建到广东，十二月中旬攻入广州，苏观生自杀，朱聿鐭出逃被俘，绍武政权灭亡。朱由榔庸碌无为，桂王政权内部腐败不堪，但由于先后得到了大顺、大西农民军余部强有力的支持，故而在南明政权中，它坚持抗清斗争的时间最长，力量也最强。

李自成牺牲后，大顺农民军余部40万分为两支：一支由郝摇旗、刘体纯等率领；一支由李过、高一功率领，在荆襄地区继续坚持抗清斗争。顺治二年秋，在清军步步南侵下，他们鉴于局势的变化，决定改变策略，拥明抗清。郝摇旗、刘体纯部10余万由原明湖广总督何腾蛟统一领导，李过、高一功部30余万人归南明巡抚堵胤锡直接指挥。顺治三年春，清派孔有德进攻湖广，何腾蛟与大顺军英勇抗击，大败清兵于岳州、湘阴，使清军南进受阻。第二年正月十六，清兵攻取肇庆，永历帝先期逃到梧州，丁魁楚无耻降清，桂王政权内部一片混乱。由于瞿式耜在桂林的坚守和广东抗清义军在敌后的牵制，才保住了广西一角。这时，清军在湖广也继续增兵，何腾蛟本想力守长沙，但因各镇官军畏敌不前，结果他只得率同郝摇旗退守衡阳，后又转移到桂林。李过部退守川东。湖广几乎全部失守，清军直逼广西。顺治四年三月中旬和五月下旬，瞿式耜指挥了两次漂亮的桂林保卫战，打击了清兵的气焰，使广西的局势大为改观。同年十一月，郝摇旗部在全州大败清军，明军连营300里，斩获无数清兵，清军被迫退保湘南，广西又回到永历政权手中。顺治五年，原来占据江西的降清明将金声桓和盘据广东的降清明将李成栋，由于没有达到个人目的和对清廷不满，先后反正。清廷调兵镇压，江西、广东、湖广因之动摇，抗清形势一度好转。大顺军与南明军乘势大举反攻，连克靖州、永州、宝庆、常德、衡州、益阳、湘潭、衡山等地，包围长沙，几乎收复了湖广地区的全部失地。全国各地人民纷起响应，掀起了轰轰烈烈的抗清高潮，桂王政府又迁回肇庆。但是，腐朽的桂王政权内部楚党（随李成栋反正的官僚）与吴党（随永历帝的护驾诸臣）互相倾轧，斗争不已。他们不仅不支持前方的抗战，反而排挤大顺农民军，因而严重削弱了抗清力量，使清军有机可乘。顺治六年春，清军破南昌，金声桓败死，李成栋兵溃信丰，何腾蛟也在湘潭被俘牺牲。第二年十一月，清廷集中力量进攻两广。平南王尚可喜率清兵攻克广州，广东基本上落入清兵手中。定南王孔有德攻破桂林，瞿式耜被俘拒降，从容就义，高一功战死，李过病故，大顺军力量严重受挫。清兵继续推进，顺治八年二月克梧州、柳州，九月陈邦傅以浔南之地降，清兵平定广西。永历帝经浔州、南宁，逃往贵州。这年冬，郝摇旗、刘体纯率领大顺军余部转移到巴东一带，组成夔东十三家军，继续坚持抗清斗争。正在这时，李定国率领的大西农民军又出现在抗清斗争的第一线，掀起了又一个抗清高潮。

李定国（1621—1662），字鸿远，陕西延安人（一说榆林人），与孙可望、刘文秀、艾能奇同为张献忠养子，能征善战，在建立大西政权中立下了功勋。张献忠死后，与孙可望率余部入贵州、云南，建立西南抗清基地。顺治四年，与孙可望等共同称王，尊孙可望为长。根据当时的形势，这支农民军对永历小朝廷实行"联合恢剿"、"合师北拒"的策略。走投无路的永历帝最后也决定依靠这支强大的军事力量，以保存自己。顺治九年，永历帝封李定国为西宁王、孙可望为秦王、刘文秀为南康王。次年，孙可望迎桂王朱由榔到贵州安隆。该年三月，决定分兵北伐，孙可望留守，李定国率主力8万人出湖广，刘文秀率偏师6万人攻四川。李定国进入湖广后，连克靖州、武冈、宝庆等地，打败了清将张国柱的军队。接着转攻广西，直趋全州，逼近桂林，在严关大败清兵，孔有德退保桂林。七月，李定国军攻破桂林，安抚百姓，严禁焚掠，进取粤西。清定南王孔有德兵败自杀。李定国又回师北

上，连下永州、衡州，直取长沙，达于江西吉安。大西军节节取胜，使清廷大为震惊，急令洪承畴经略湖广、云贵、两广，趋长沙；又令敬谨亲王尼堪率三贝勒、八固山，共10万精兵南下迎战。李定国避开清军锋芒，主动撤离长沙，十一月与清军在衡州城下激战四昼夜，大败清军，阵斩尼堪。这样，李定国出师九个月，纵横三千里，收复湘、桂两省，大破数十万清军，两蹶名王，天下震动，取得了辉煌的战果。与此同时，刘文秀在四川也屡败清军，迫使吴三桂退守汉中。但是，李定国在抗清斗争中的巨大战功，引起了孙可望的忌妒，加之桂王政府中的反动官僚马吉翔等从中挑拨，孙可望为了树立自己的威信，竟擅自破坏已定部署，率留守军上前线争功，并欲设计加害于李定国。他写信召李定国返武冈会议，三昼夜书七至。李定国不得已西行，到紫阳渡将见可望，刘文秀之子密遣人走告定国，说可望等他一到，即收杀之。李定国大惊，遂引兵东走，渡湘水，退回广西，转攻广东，拟与郑成功会兵收复浙、闽，进攻南京，但计划未能实现。顺治十年，李定国驻军广州，孙可望派冯双礼带兵袭击李定国，在反击孙可望的战斗中，李定国为顾全大局，下令勿杀冯双礼，被俘后又将他安全放回。孙可望的倒行逆施，引起了大西军将士们的义愤。不久，孙可望在宝庆遇清兵大败，退回贵州，竟然发动内战。顺治十四年八月，孙可望以白文选为征逆招讨大将军，以马宝为前锋，自己率军殿后，发动10万大军在交水（云南沾益）进攻李定国。但部将马惟兴等临阵纷纷倒戈，投向李定国。最后，孙可望众叛亲离，仅率数千骑狼狈逃往长沙，投降清军，成为农民军的可耻叛徒。

交水战后，李定国收抚孙可望的部属，胜利还师昆明。孙可望手下的主要将领白文选、冯双礼也被争取过来。事实表明，李定国以团结对待孙可望的分裂，是深得人心的。但由于孙可望的告密，清军摸清了大西军的底细，遂于顺治十五年四月分兵三路向云、贵发动进攻。第二年初，清军攻陷昆明，桂王逃走，李定国退至孟良，团结当地各少数民族，在艰苦条件下日夕练兵，力图恢复。不久，李定国派王国勋设伏于普朋（云南南华西北），白文选立阵于玉龙关（云南永平西南）阻击清兵失利。李定国率军渡潞江（今怒江），在潞江西岸的磨盘山设伏三道，与清军决一死战，终因寡不敌众，失败。顺治十八年九月，清军以10万之众，从大理、腾越出边，十二月抵达缅甸旧晚坡（今阿瓦城东六十里），永历皇帝被俘，清军当即离开缅境。南明的最后一个政权至此灭亡。康熙元年（1662）春，吴三桂将永历皇帝父子绞死于昆明。同年六月二十七，李定国在勐腊（西双版纳自治州勐腊）不幸病逝，年仅42岁。临终前对其子嗣兴、部将靳统武说：虽死荒徼，也决不投降！表现出一位农民革命英雄至死不屈的无畏气概。 （高春平）

郑成功抗清

清初，郑成功率军进行的抗清斗争。

郑成功（1624—1662），字明俨，号大木，原名福松，又名森，泉州南安（福建南安）人，南明隆武间，受唐王赏识，赐姓朱，改名成功，不久封忠孝伯。顺治三年（1646），清兵南下入闽，其父郑芝龙迎降，他哭谏不听，遂起兵反清。他先在广东南澳招兵买马，组织义军。顺治七年正月，引兵南下，攻克广东潮阳县。六月，攻碣石卫，不克。返师，围潮州。部将柯宸枢战死，退兵潮阳。八月，自潮阳回师厦门、金门，据二岛，威震海上。九年，大西军掀起反清高潮，郑成功率兵10万，攻进海澄、长泰、漳州、漳浦等地，遥相呼应，声势大振。次年，为迎接李定国进军广西，派水师南下至潮州，又与张名振会师北上，入长江，驻军崇明岛。十一年，与李定国约会师广东，共攻新会，因所遣部将失期，会师计划未能实现，李定国退回广西。此后，郑成功军一直在福建沿海作战，屡败清军。十二年六月，清廷严申海禁，不许片帆入海。十月，郑成功军围舟山，清守军孤城援绝，降附。二十三日，郑成功军进城，声震江南。十四年三月，清廷流徙郑芝龙于宁古塔，籍没家产。八月，郑成功军兴师北伐，舟入浙江，先夺海门，下黄岩，占台州（浙江临海），太平、天台、仙居诸县归附。九月，郑成功以闽安陷，虑失厦门、金门，回师。十五年，清军大举进攻西南地区的李定国军，郑成功为了解救西南的危急局势，举兵攻浙江沿海，克平阳，降瑞安，攻温州。八月，遇飓风，退师舟山。十六年与张煌言联合，由郑成功任招讨大元帅，张为监军，率17万大军，大举北上。成功部队在崇明登陆，七月至焦山，破瓜州，克长江重要门户镇江，围困南京。张煌言率另一路军沿江而上，克芜湖，分兵四出，收复徽州、宁国、太平、池州等30余府、州、县。郑张联军，大震东南。后由于郑骄兵轻敌，误中困守南京的清朝江南总督郎佐以投降为名，拖延时日之计，未能全力攻克南京，致清军乘时齐集，援兵大至。七月二十三日，清水师总兵梁化凤趁郑军战斗意志松弛之机，突然率军从南京城内出击，郑军不及防，郑成功的主要将领甘辉被俘牺牲，全军大乱。郑军仓促退出长江，返回厦门。张煌言军在皖南陷入孤立无

援境地，清军全力对他进攻，张军被击败四散，所得城镇又被清军占领。张煌言只身逃到浙东天台。郑军北伐江南失败，陆军损失近半，手下将领牺牲数十人。回到厦门后，进行了休整和补充。顺治十七年，清安南大将军达素等出漳州攻厦门，郑成功率军在漳州海门港大破清军，达素败逃福州后自杀。这一战，使郑军恢复了士气，振作了精神。清廷为了防范郑军再次北伐，于十八年发布"迁界令"，命令从山东到广东的沿海居民，内迁30里。渔舟、商舟禁止出海，田园荒芜不得耕种。郑成功面对新的形势，决定暂避清军的攻击，收复被荷兰殖民者侵占的台湾，据岛坚持抗清。同时，整顿法纪，安定社会，实行军屯，推广大陆先进生产技术，促进了台湾地区的经济发展。康熙元年(1662)，郑成功病逝。此后，随着形势的变化，清初的抗清斗争局面也逐渐发生了重大变化。

(张正明)

洪承畴经略江南五省

明末重臣洪承畴归顺清朝后帮助清政府经略江南五省的历史事件。

洪承畴(1593—1665)，字彦演，号亨九，福建泉州府南安县二十七都英山霞美乡(福建南安英都镇良山乡)人。明万历四十四年(1616)进士，曾任明都御史、陕西三边总督、兵部尚书兼副都御史总督蓟辽军务。崇祯十五年(1642)，在松锦战役中被清军俘获后降清。顺治元年(1644)，随清军入关，曾被任命为太子太保兵部尚书兼都察院右副都御史、秘书院大学士。顺治二年五月，清军占领南京后，强令全国人民依照满族风俗剃发易服，激起江南人民的激烈反抗。清廷为了安抚江南各地，决定起用汉族降清官吏，任命洪承畴以原官总督军务，招抚江南各省。洪承畴针对江南各地的抗清斗争，采取了以招抚为主，以剿灭为辅的方针，利用他在明朝为官时的旧关系，先后招降了原明朝兵部尚书张缙彦、明朝总兵高进忠，并受到清廷的褒奖。洪承畴又派兵镇压金声领导的徽州抗清义军，击溃浙东南明鲁王部众，劝说掌握南明隆武政权实权的郑芝龙降清，使清军得以长驱直入福建。顺治五年，洪承畴返京。七年，顺治帝亲政。此时，李自成余部与南明军联合抗清，据有云南、贵州、广西、广东、江西、湖南、四川七省；郑成功活跃于福建、浙江；张献忠余部与南明军联合，特别是李定国的桂林、衡阳之战，震动清廷。顺治帝"遍察清廷"，认为惟有洪承畴可担负"绥靖"南方之重任。顺治十年，年逾60岁之洪承畴，被清廷任命为湖南、广东、广西、云南、贵州五省经略。洪承畴对清廷之委任，十分感激。他采取军事上以守为战，政治上广示招徕，先安湖广，再定云贵的方针。经过一番苦心经营，使清军原来的被动地位有所改善。但战争仍处于胶着状态，洪承畴遭到一些京官的非议，被迫借口身体有病请求解任。顺治十四年，大西军孙可望被李定国击败降清，以西南虚实告清。洪承畴立刻题请留任，率吴三桂等进攻云贵。十六年，清军占领云南，永历帝被迫逃出边外。十八年，吴三桂率兵入缅甸，永历帝被害。是年五月，洪承畴因病休致。康熙四年(1665)，洪病死，清廷谥他文襄公。　(张正明)

陈名夏"南党"案

清顺治年间，清廷处死大臣陈名夏及清除所谓南党的历史事件。

陈名夏(1601—1654)，字伯史(百史)，江南溧阳(江苏溧阳)人。明崇祯十六年(1643)以鼎甲官翰林院编修，后任修撰兼户、兵科都给事中。崇祯十七年三月降李自成。四月，归南京福王政府。顺治元年(1644)十一月抵大名降清。不久，被清廷超擢为吏部左侍郎兼翰林院侍读学士。顺治五年，升任吏部尚书。八年，转内翰林弘文院大学士。九年，被革任一年。十年正月，复转为内翰林秘书院大学士并充纂修太宗实录总裁官，后又以大学士兼署吏部尚书。十一年三月，素与陈名夏不和之内国史院大学士宁完我以"党首怀奸，情事叵测"的密疏参劾陈名夏，疏列陈名夏的罪状有倡复冠服，涂改诏旨，护党行私，徇情内贿，纵子肆虐，其中最核心的是"留头发，复衣冠"。清廷对归顺和俘虏来的汉人实行剃发易服，早在清太祖时已实行，其目的主要是从直观上改变归顺者的民族标志，根绝他们的逃亡观念。入关后，清朝统治者继续推行剃发令，但遭到了汉族人民的强烈反抗。顺治三年十月，清廷谕令各官，凡为剃发、衣冠、圈地、投充、逃人等五事具疏者，一概治罪。剃发、衣冠便成了官员议事时的两大禁忌。宁完我以陈名夏私议"留头发、复衣冠"而给他加上"蛊惑明绅，号召南党""党首怀奸"的罪名，足以置陈名夏于死地。此外，宁完我还胪列了陈名夏"居乡暴恶"、"揽权欺诈"、"结党营私"之罪。顺治帝接疏后，即令内三院、九卿等官会同对陈名夏"逐款详问，从重议罪具奏"。陈名夏在受审中，对宁完我所劾罪状逐条反驳，"抗辩不屈"，只承认说过"留发复衣冠"这句话。最后，陈名夏被判绞刑死于宣武门内灵官庙，陈名夏之子"决杖，遣戍盛京"，各科道官也因对陈名夏"父子济恶"，

"不行参劾"，而分别受到处分。其中都察院左都御史赵开心，降三级调用，魏象枢等七人各降一级调用，其余分别罚俸、罚银有差。各科道官在顺治帝的切责下，惟恐被加上明知奸恶、庇护党类不肯纠参的罪名，纷纷为纠参南党而大动刀笔。一时间人心惶惶，未知何已。后来，顺治帝为安定人心，传谕不许再借陈名夏党案而进奏，如有违者，定行重治，才使一场清除"南党"的风暴逐渐平息下来。清廷处死陈名夏和清除"南党"，是为平息满汉官矛盾的一个手段。但是，用暴力手段只能暂时震慑住一些人，求得短时安定，却难以消除因实行民族压迫政策而引起的被压迫民族的不平情绪。　（张正明）

孙可望降清

清初，大西军余部孙可望率部降清的历史事件。

孙可望(？—1660)，原为张献忠领导的农民起义军著名将领。明崇祯十七年(1644)八月，张献忠在四川建立大西政权。清军入关后，大西军在与四川的明朝旧部作战的同时，还要与清军作战，处境日趋困难。清顺治三年(1646)，大西军在西充遭到清军的突然袭击，张献忠在这次战斗中牺牲。大西军余部由孙可望、李定国、刘文秀等率领由四川进入贵州、云南，建立起西南的抗清根据地。面对新的形势，李定国提出了主动联合坚持抗清的南明永历政权，以图"恢复中原"的方针。但孙可望对联明抗清恢复中原缺乏信心，认为只有保住"所得之土地"，实现他"称藩于滇、黔、楚、蜀之间"，才是斗争之目的。后来又想"挟天子以令诸侯"，便派人到肇庆向永历朝廷求封。开始时，永历"廷臣执不予，久之，始封可望景国公"。可望大怒，遣兵至南宁，杀严起恒等大臣，永历朝廷上下震骇，乃封可望为秦王。李定国对于孙可望争权夺利破坏联明抗清的言行十分气愤。随着形势的发展，李、孙二人之矛盾逐渐由政治思想领域扩大到军事领域。顺治九年，李定国、刘文秀、孙可望兵分三路，攻湖广、四川，由孙可望居中策应。可是，孙可望使冯双礼、马进忠二将与李定国"名曰共事，实相制"。定国激愤，流着眼泪对冯、马二将表白"志在扶明，非徒假借名义"。二将被定国的态度感动，表示愿协力从事。于是三人同心合力，大败清军。可望见定国屡败清兵，误以为清兵易胜，产生轻敌思想，结果大败于岔路口，可望兵退贵阳，不敢议北出。然而，可望未能从中吸取教训，反而密谋加害定国。定国至此知孙可望"终不可以共事"。但是为了顾全大局，定国仍然写信给可望，希望同心协力，不要自相残害。可望不听，却出兵进攻定国。清兵侦知李、孙"自相内乱"，乘机收复失地，挽回败局。李定国为避开与孙可望的冲突，决定以广西为基地，攻取东粤，与郑鸿逵等合作，自闽、浙图取南京。但因定国计划不周，终未实现。定国围攻广东新会失利后，只得退保南宁。可望进兵湖广、四川，一败再败之后，再也不敢出征，只想保住既得利益。他一面在云贵大兴土木，建宫殿，准备废永历，代明称帝；一面派兵驻守田州，以防定国入滇。李定国接到永历帝"述可望僭逼"的血诏后，决心帮助永历帝，并在白文选、刘文秀的支持下，将永历帝从贵州接到云南。正当李定国大举出兵，与郑成功、郑鸿逵"会师南都"，与李来亨、刘体纯"会师荆州"时，孙可望却率军进攻云南，挑起交水之战。可望之举不得人心，白文选与马进忠等率部叛可望归定国，全军瓦解。李定国以少胜多，孙可望狼狈返贵州。孙可望在兵败云南，众叛亲离，势穷力竭的情况下，决定归附清朝，以图借兵复仇，夺回云南。但是李定国的追兵，很快把孙可望赶出了贵州。孙可望走投无路，只得在顺治十四年孑身归清。随同孙可望降清的约有官兵、家属400余名。当时，负责经略五省的洪承畴，正因推行"以守为战"和"特恩招抚"的方针受到廷臣责难，处境困难。对孙可望的降清，洪承畴立刻将此说成是推行"以守为战"和"特恩招抚"政策之果，对孙可望等人"重加犒劳，以示鼓舞"。在洪承畴的大力活动下，孙可望很快被清廷封为"义王"。为了报答清朝统治者的恩德，孙可望向顺治帝奏言，愿意随清兵征讨滇南。但是，清廷对孙可望始终存有戒心，不愿放虎归山。同时也感到，孙可望可用之处已经用尽，所以决定大兵分三路进攻云南，不用可望再往。孙可望虽然没有直接参加对云、贵的进攻，但是他的降清对西南抗清势力造成极大危害。云、贵是永历朝廷的所在地，是全国坚持抗清斗争的堡垒。大西、大顺农民军余部与南明抗清势力联合作战，曾一度掀起全国性的抗清高潮，给清朝统治者以沉重打击。孙可望降清，严重破坏了联明抗清力量。清兵进军贵州，原计划三路兵马齐发，后来洪承畴根据孙可望提供的情报，改为两路大军同时齐发，又一路大军前后继进，如有一路先取贵州省城，则别路大军可就本省进兵道路相度贵州、云南适中扼要地方兼有买运米粮处所，或分行驻扎以示即可分进滇云之势，不致三路齐集贵州省城，以成既有分合之势，或犄角之形，又无屯聚拥挤争粮之患，且分路驻兵得以蓄锐养威，各由径路收复滇云，不致有奔疲之苦，一举而数利。在清军进攻云贵中，孙可望还派其部将充当清军的向

导。结果,清军很快攻入黔、滇。李定国大败,奔永昌。孙可望的降清,加速了李定国的失败。但是李定国的失败,又意味着孙可望利用价值的丧失殆尽。西南平安后,廷臣睨目而视,疏劾可望者不断。孙可望心中也自明,他已被清廷抛弃。为了避开廷臣的攻击,孙可望只得忍痛"疏辞封爵"。顺治十七年十一月,孙可望突然死去。 (张正明)

郑成功收复台湾

清顺治十八年(1661),郑成功率部收复被荷兰殖民者侵占的台湾。

台湾自古以来就是中国的领土。明朝天启四年(1624),荷兰殖民者侵入台湾西南的海港鹿耳门,在沙洲上建台湾城(安平)。次年,侵占新港社、蚊港等地,修建了赤嵌城(台南)。崇祯十五年(1642),又从西班牙殖民者手里夺取了台湾北部的鸡笼(基隆)、淡水。台湾各族人民不能忍受荷兰殖民者血腥的镇压和无止境的奴役,从荷兰侵入的第一天开始,就前仆后继,进行抵抗。据不完全记载,较大规模反抗不下二三十次。清顺治十六年(1659),郑成功军在南京战败,看到清朝统一全国之势已成,郑军势孤力单,难以持久,决定集中全力去收复被荷兰殖民者侵占的台湾。次年,郑成功开始调集兵力,赶修船舰,积聚粮食,准备时机一到就渡海攻台。顺治十八年正月,清帝福临死讯传到郑军,郑成功估计清王朝在"国丧"期间,不可能大举用兵,收复台湾的机会来到,决定发兵收复台湾。是年三月二十三日,郑成功亲率首批复台大军2.5万人,分乘船舰200余艘,从金门料罗湾启航,于四月初一日乘涨潮入鹿耳门。登陆后,郑军很快包围了荷军在岛内最重要的据点——台南赤嵌楼,郑军水师基本控制了赤嵌与安平之间的海面,把荷兰军围困在两个互相隔绝的据点里。水路荷军以赫克托和斯·格拉弗兰号舰为主力,辅以帆船、快艇向郑军水师反扑。郑军由宣毅前镇侍卫镇陈广和左虎卫左协陈冲率领大型帆船60艘迎战。荷舰长30丈,宽6丈,船板厚2丈余,甲板上有5个桅,帆樯可八面受风,行驶迅速,不惧逆风,每艘装有大炮20—30门。郑船高大仅为其三分之一,只装有大炮两门。但郑军士兵发扬不怕死的精神,利用荷舰在港内转侧不便和易于搁浅的特点,当赫克托号驶来,立即以几十艘帆船围住攻打,其中有的几艘装满燃烧物品,冒着炮火,冲到荷舰旁,点起火种,将赫克托号舰炸毁,其余荷舰见势不妙,急忙逃出港外。郑成功水师大胜,并控制了台湾海面,切断了荷军台湾城和赤嵌城的联络。陆路荷军由贝德尔上尉率领,进攻北线尾岛。郑军由宣毅前镇陈泽率领所部奋勇迎击,给敌人以重大杀伤。另一路郑军从后路包抄过来,使荷军腹背受敌,荷军大败,死亡118人,只有80人幸免逃回。郑军在水陆两路大获全胜后,开始包围城堡。四月初六日,郑军克赤嵌城。次日,围攻台湾城。城垣坚固,久攻不陷。成功遣通事致书劝降,荷军总督揆一翘待援军,拒绝投降。八月,郑成功军击败巴达维亚东印度公司援军。十二月初,郑成功采纳乡民建议,以城中无井,断其水源,再致书揆一劝降。十三日,揆一见被围八个月,船只遭焚,炮台被平,援绝城危,遂向郑成功投降。从此,被荷兰殖民者侵占了38年的祖国宝岛台湾,重归祖国怀抱。之后,郑成功在岛内建立政权,推行积极开发方针,颁布开垦条例,鼓励沿海人民移居台湾,使台湾的社会经济得到了恢复和发展。 (张正明)

清代文字狱

清王朝为了消灭异端,钳制思想,大兴文字狱的历史事件。

清朝的文字狱是从康熙朝开始的。康熙朝,最大的文字狱是庄廷鑨的《明史》案和戴名世的《南山集》案。《明史》案发生在康熙二年(1663)。先是明末人朱国桢,尝著《明史》刊行于世,未刊部分为列朝诸臣传。至顺治时,其家已落,子孙不能守其稿,以千金售于浙江富户庄廷鑨。庄氏聘名士茅元铭、吴炎、吴楚、吴之铭、吴之镕、张隽、唐元楼、严云起、韦全佑、蒋鳞征、潘柽章等16人对原书加以删润论断,又补写崇祯朝和南明史事,奉南明弘光、隆武、永历朝为正朔,并有指斥清朝的词句,定书名为《明史辑略》,请李令哲作序,刊成后于顺治十七年(1660)发卖。康熙二年,归安知县吴之荣罢官,谋以告讦庄氏获功,借此复官。吴之荣将庄氏事告于将军松魁,魁移巡抚朱昌祚,朱转督学胡尚衡。庄廷鑨纳重贿以免,后对书稿中斥清朝词句稍加修改,重新刊印。吴之荣特购得初刊本再告,引起清廷重视,遂酿成大狱。时庄廷鑨已死,戮其尸,所有庄氏家属16岁以上皆被杀。李令哲作序亦被诛,并及其四子。松魁及幕客程维藩械赴京师,魁以"八议"得免仅削官,程维藩被戮于市。湖州太守谭希闵与推官李焕皆以隐匿罪被绞。凡江楚诸名士列名书中者、参校、买卖书、刻字者一律处死。南浔朱佑明及其五子,与此事毫无关涉,也惨遭祸害。最后因此案被牵连而死者70余人,在全国引起极大震动。而吴之荣却因此起用,后仕至右佥郎。戴名世

的《南山集》案则发生于康熙后期。戴名世原为翰林院编修，在其所著《南山集》中曾采录了方孝标《滇黔纪闻》中议论南明史事和用南明诸帝年号。《南山集》一书，尤云锷、方正玉曾为之捐资刊印，尤云锷、方正玉及同官汪灏、朱书、刘岩、余生、王源皆有序，版则寄藏于方苞家。康熙五十年，左都御史赵申桥告讦戴名世，酿成又一文字大狱。经九卿会鞫终，戴名世大逆，法至寸磔，族皆弃市，未及冠笄者发边。朱书、王源已故，免议。尤云锷、汪灏、方正玉、刘岩、余生、方苞以谤论罪绞。时方孝标已死，以戴名世之罪罪之，子方登峄、方云旅，孙方世樵，并斩。方氏有服者皆坐死，且剉孝标尸。尚书韩炎、侍郎赵士麟、御史刘灏、淮扬道王英谟、庶吉士汪份等32人，并分别降谪。后来，康熙帝予以宽大。最后结案，除戴名世外，其他许多人予以宽释。到雍正朝，已不单纯以文字内容获罪，并且成为统治者以文字为借口，政治上打击异己的手段。雍正二年(1724)，雍正帝为了打击年羹尧的势力，借口在年羹尧手下作幕的汪景祺所著《西征随笔》中有讥讪康熙帝、雍正年号，律以汪景祺大逆不道处死，其妻子发黑龙江披甲人为奴，亲兄弟叔侄革职，发宁古塔披甲人为奴。雍正四年，江西正主考官礼部左侍郎查嗣庭，出了“维民所止”试题，雍正帝以“维”、“止”二字为“雍正”二字去头，“心怀怨望，讽刺时事”，将查处死，子坐死，家属流放，同时以查为浙人，停浙江会试。雍正六年，又发生了重大的吕留良、曾静文字狱案。吕留良(1629—1683)，一名光轮，字用晦，又字庄生，号晚村。暮年，名耐可，号何求。浙江崇德人。清初浙江著名学者，宗程朱理学，主张“华夷之别”和封建井田之制。曾静(1679—1736)，湖南永兴人，称蒲谭先生，著有《知几录》、《知新录》(均未刊)。雍正五年，命弟子张熙到浙江已故吕留良家访求书籍，吕留良子吕毅中授以其父所著诗文，“内皆愤懑激烈之词”。于是，曾静更沉溺于吕氏之说。雍正六年秋，曾静命张熙投书川陕总督岳钟琪，策动岳起兵反清。岳钟琪，四川成都人，由捐纳同知改武职，累迁至川陕总督。民间盛传钟琪为岳飞之后，曾静也深信不疑，贸然命张熙去投书策反。岳钟琪以诡诈手段，骗取张熙口供，并查出曾静、张熙反清思想是由于读了吕留良著作而产生的，便上报清廷。雍正帝立即将曾静、张熙“提解来京”，又从吕留良等家中抄出日记等“逆书”。雍正十年，清政府将已故吕留良及其长子吕葆中、弟子严鸿逵，戮尸枭示，其子吕毅中斩决，其孙辈发遣宁古塔给予披甲人为奴，为吕留良建祠、刻书者也遭到牵连。对于曾静、张熙，雍正帝因在审讯中发现皇室政敌允禩集团对他制造的“谤言”，感到可利用此案回击允禩集团，便以曾静等是被允禩集团和吕留良欺骗，最后在他的感召下豁然醒悟，将曾静、张熙无罪释放。同时，将有关曾静的上谕、审讯词和曾静、张熙的口供，曾静的“归仁说”，汇编成册，定名为《大义觉迷录》，于雍正八年颁布全国各府州县，企图通过此举，清除关于他“矫诏得位”之蜚语，通过释放曾静、张熙和镇压吕留良，打击、分化反清分子，整饬“绅衿士庶”不良之风。但是，《大义觉迷录》的颁布，并未达到预期效果，反而使“矫诏得位”说和书中引用的反清言论，纷纷扬扬，传遍全国。因此，在雍正帝去世弘历登位后，立即将曾静、张熙磔于市。到乾隆朝，清朝统治者罗列的文字狱更加繁多了。乾隆二十二年(1755)，胡中藻因诗中有“一把心肠论浊清”句，被处死。二十四年，又发生彭家屏、段昌绪之狱，即因彭家屏家中藏有明末野史《潞河纪闻》及钞本《启祯政事》等书，彭家屏及其子和段昌绪均遭杀害。三十二年，齐周华以刻吕留良书被磔。四十三年，徐述夔因诗中有“大明天子重相见，且把壶儿搁半边”，“明朝期振翮，一举去清都”等句，有兴明灭清之意，述夔及其子孙，以及校对者，俱坐死，已死者戮尸。四十七年方国泰因诗中有“征衣泪积燕之恨，林泉不共马蹄新”，“乱剩有身随俗隐，问谁壮志足澄清”及“蒹葭欲白露华清，梦里哀鸿听转明”等句，遭杖一百、徒三年酷刑。四十九年，世臣诗稿因有“露侵鬓朽叹途穷”，“秋色招人懒上朝”，“半轮明月西沉夜，夜照长安你我家”等句，被遣戍黑龙江。到乾隆晚年，由于阶级矛盾日益尖锐，各地人民纷纷起义，清朝统治者为了缓和矛盾，才放宽文字狱。

(张正明)

康熙帝亲政

康熙八年(1669)，康熙帝翦除权臣鳌拜，夺回实权的历史事件。

顺治十八年(1661)，顺治帝福临病逝，子玄烨继位，次年改元康熙。其时，康熙年仅八岁，实权为其祖母孝庄文皇后掌握。孝庄文皇后富于统治经验，为了巩固康熙的帝位，以顺治帝遗诏的名义宣布异姓大臣索尼、苏克萨哈、遏必隆和鳌拜为辅政大臣，以便控制。索尼，正黄旗人，其父硕色，叔父为大学士希福。他因屡建战功，皇太极时任吏部启心郎，授骑都尉，三等男，顺治时进一等伯、内大臣兼议政大臣。苏克萨哈，正白旗人，其父为额驸苏纳。他初授牛录额真，顺治时擢为议政大臣，晋内大臣。遏必隆，镶红旗

人，其父为开国功勋五大臣之一的额亦都。皇太极时授牛录章京世职，顺治时准袭一等公，擢议政大臣，领侍卫内大臣。鳌拜，镶黄旗人，开国功勋五大臣之一费英东之侄，骁勇善战，军功超群，皇太极时授三等梅勒章京，赐号“巴图鲁”，晋三等昂邦章京，顺治时擢议政大臣、领侍卫内大臣。四大臣中，索尼年迈，遏必隆软弱，苏克萨哈势力较小，只有鳌拜最跋扈。他广植党羽，排除异己，依仗权势，横行无忌。甚至欺康熙帝年幼，多次在皇帝面前“施威震众”，出矫旨，恣意妄为。康熙五年，鳌拜提出将原安置正白旗人的保定、河间、涿州改为安置镶黄旗人，将正白旗人迁往永平府一带，企图借此打击正白旗的势力，再次掀起圈地高潮。鳌拜的上述主张，遭到了正白旗的激烈反对。户部尚书苏纳海、直隶总督朱昌祚、巡抚王登联等先后上疏，由于旗地待换、民地待圈，致抛荒不耕，荒凉极目，旗民交困，要求停止圈换土地。但鳌拜一意孤行，并将苏纳海、朱昌祚、王登联处死，没收家产。结果，这次圈换土地使大批人民失去土地，生活无着，严重破坏了生产。康熙六年，康熙帝开始亲政。辅政大臣之一苏克萨哈有鉴于此，要求辞去辅政大臣之职，把权力归还皇帝。一贯专权擅政的鳌拜极不愿交权，非常恼恨苏克萨哈的行为，便捏造罪名，诬陷苏克萨哈“心怀异心”，并罗列了 24 条罪状，请康熙帝将苏克萨哈处死抄家。康熙帝不同意鳌拜所求，鳌拜便对康熙帝进行要挟，迫使康熙帝将苏克萨哈处以绞刑。鳌拜除掉苏克萨哈后，权势越来越大，也越加专横，已严重威胁到玄烨的皇帝地位。年轻的康熙帝不甘心当傀儡皇帝，在祖母孝庄皇太后的支持下，先是在暗中积极准备。由于鳌拜在朝中有一批亲信党羽，如果除鳌拜不成，可能引起混乱。所以康熙帝经过周密考虑和安排，先挑选了一批年轻力壮的侍卫，天天在一起练习摔跤。鳌拜以为皇帝年轻好武，并不在意。康熙八年五月，康熙帝认为除鳌拜时机已经成熟，便设下计谋，事先在宫中埋伏好青年侍卫，趁鳌拜单身入朝之际，命众青年一拥而上，突然将鳌拜捉获逮捕，接着在朝中将其党羽一网打尽。随之宣布鳌拜罪状 30 条，将他永远监禁。康熙帝除掉鳌拜后，政权得以巩固。又宣布永停圈地，平反苏克萨哈案件，推行休养生息、发展生产的政策，从而揭开了清朝政治史的新的一页。　（张正明）

平定三藩之乱

清康熙年间，清政府平定镇守云南、贵州的平西王吴三桂、镇守广东的平南王尚之信（袭其父尚可喜封爵）、镇守福建的靖南王耿精忠（袭其祖父耿仲明封爵）叛乱的历史事件。

吴三桂原为明朝山海关守将，崇祯十七年(1644)明廷封为平西伯。明末战乱之际，吴三桂有意避实就虚，保存实力。李自成农民军入京后，吴三桂决意降清，引清军入关，在山海关一片石配合清军大败李自成军，有功于清廷，受封平西王。入关后，吴三桂随清军下陕西，入湖广，追击李自成农民军。顺治八年(1651)，进军四川。顺治十四年，又受封平西大将军，自川入黔。顺治十六年进驻云南。顺治十八年，领兵进入缅甸，俘南明永历帝及其部属，回兵后奉清廷命镇守云南、贵州，再晋封为亲王。尚之信之父尚可喜，耿精忠之祖父耿仲明，原来都是明朝辽东军事将领。崇祯六年，耿仲明降后金（清）。崇祯七年，尚可喜降后金（清）。皇太极命耿、尚用白镶皂旗。崇祯九年，皇太极即皇帝位，改元崇德，封尚可喜为智顺王、耿仲明为怀顺王。清军入关后，尚、耿率部随清军征陕西。后尚可喜率部随阿济格南进湖广，耿仲明率部随多铎下江南，他们为清廷剿灭农民军和南明政权立下汗马功劳。顺治六年，清廷改封尚可喜为平南王、耿仲明为靖南王。年底，尚、耿率本部兵进广东。次年，占领广州。耿仲明因隐匿逃人而畏罪自杀，由其子耿继茂袭爵率兵。顺治十六年，清廷命尚可喜驻镇广东，耿继茂驻镇四川。次年，改靖南王耿继茂驻福建。康熙十年(1635)，耿继茂卒，子精忠嗣。三藩中吴三桂势力最大，军事上拥有旗兵 53 佐领（一佐领 200 甲，每甲 5 丁）、绿旗忠勇 5 营、义男 5 营，计 1.2 万余人。加上四镇援剿的兵力、云贵地方官所辖绿营兵，总兵力达 9 万多人。吴三桂还利用手中权力在云贵地方广征关市榷税，开山炼矿，自铸钱币，圈占民地，放高利贷，从经济上肆意盘剥，鱼肉人民。在政治上，吴三桂拥有种种特权，“所辖文武将吏，选用自擅”，“又屡引京朝官，各省将吏，用以自佐”，时称“西选”，一时“西选之官几满天下”，吴三桂因此网罗了一批党羽。吴又借口与西藏茶马互市，与西藏上层分子相联络。时贵州提督李本深、四川总兵吴之茂、陕西提督王辅臣都是他的心腹旧部，皆唯命于吴三桂。吴三桂依仗这些雄厚实力，无视朝廷，构成对清王朝的严重威胁。尚可喜、耿继茂二藩各拥旗兵 15 佐领，加上所属绿旗兵力六七千人，兵力不下数万。尚、耿最初同驻广州，他们设“总店”搜刮民财，“大自盐铁，小及鸡豚，城市乡村，列坐抽剥”，“百姓莫敢言”。后来，尚可喜在广东“私市私税，每岁所获银两不下数百万”，并操纵对外贸易，大搞走私活动。耿在福建也

同样是"横征盐课，……勒索银米"。他们还巧取豪夺，肆意霸占民田，派藩兵开山伐木，取山林之利。为了兴建富丽堂皇的藩王府，滥征民力，使粤、闽人民深受藩害之苦。三藩占据南方，拥有重兵，不仅不能成为清廷的藩篱，反而拥兵自重，侧目朝廷。而清廷每年尚需供"三藩"饷银 2000 万两之多，使得"天下财赋，半耗于三藩"，这对于清廷已是一个沉重的负担。随着三藩割据势力的膨胀，三藩已成为清廷政治集中统一的严重障碍。对此，康熙帝早就予以注意了。他说："朕自少时，以三藩势焰日炽，不可不撤。"康熙六年，玄烨亲政后，已对三藩，特别是吴三桂逐步加以限制。曾要吴三桂缴还大将军印，截止其用人题补权。康熙十二年三月，平南王尚可喜因年老多病，愿归老辽东，疏请以其子尚之信袭爵继续坐镇广东。康熙帝玄烨认为这是一个撤藩的好机会，在降旨称赞尚可喜"很知大体"的同时指出，"广东已经底定"，藩王坐镇已无必要，故不允尚可喜留子袭爵继续坐镇，而令其撤藩回辽。康熙帝的旨意，触动了吴、耿二藩镇。吴三桂自认为功高位重，为试探清廷的态度，也于是年七月假意疏请撤藩。当时清廷的大臣，惮于吴势，大多不主张撤藩。而康熙帝态度却十分明确，他认为吴三桂等蓄谋已久，不早撤之将养痈成患。"今日撤亦反，不撤亦反，不若先发。"毅然允其所请，准其撤藩。随后，耿精忠也疏请撤藩，康熙帝照样批准，同时命将三藩尽徙往山海关外。三藩俱撤，击中割据一方三藩的痛处。吴三桂于康熙十二年十一月二十一日，率先举起叛旗，杀云南巡抚朱国治，拘礼部侍郎折尔肯，自称天下都招讨兵马大元帅，国号周，以明年为周王元年，蓄发易衣冠，旗帜皆白。贵州提督李本深、云南提督张国柱等皆从叛。报闻京师，举朝震动。翌年三月，靖南王耿精忠在福建公开叛变。康熙十五年二月，平南王尚可喜之子尚之信，响应吴三桂，在广东叛变。其他一些汉籍将领，如广西将军孙延龄(孔有德之婿)、提督王雄，四川巡抚罗森、提督郑蛟麟、总兵谭弘等，也先后归附吴三桂。耿精忠则联络据守台湾的郑成功之子郑经，约为援军。郑经率军在闽、粤沿海、并伸入江西，以为策应。吴三桂叛变后，来势凶猛，清军猝不及防。吴军很快攻占了湖南的衡州、常德、岳州，前锋直达澧州。耿精忠叛变后，也很快攻入江西、浙江。叛军在一年多的时间内控制了大江以南的大部分地区，形势十分严重。面对吴三桂的叛乱，年轻的皇帝玄烨果断刚毅，首先排除朝廷部分大臣缓撤的主张，下令削夺吴三桂的王爵，处死在北京居住的吴三桂之子吴应熊、孙吴世霖，以寒吴三桂之胆，以绝群奸之望，以激励三军之心。然后，发兵讨伐吴三桂。康熙帝针对当时复杂的国内形势，制定了平定叛军的作战部署。康熙帝将清军分为两条战线，即一面调派八旗劲旅前往湖北荆州和"水陆皆与楚闽接壤"的江西，遏止叛军过江北上。另一面将山东兖州和山西太原作为后方两个支点，调重兵把守，控制南北和东西两条孔道，以策应前线。清军固守江西有着重要的战略意义，因为这样可以切断吴、耿两军的联合，把耿军限制在浙赣交叉地带，不得向长江伸展，使吴军也不能东出活动。并且可使东南财赋地区得到保障，使军需物资有了可靠的来源。与此同时，又着意稳定西线。西北将领多属汉籍，如果有变，吴三桂即可与之串通一气从侧面进攻北京。康熙帝针对这种形势，采取军事政治两结合的策略。一面派兵压制四川，一面尽力笼络陕西提督王辅臣。王辅臣一再附而又叛，甚至戕杀了经略莫容，康熙帝不仅宽容不治其罪，反而下诏自责"咎在朕躬，于尔何罪?"最后王辅臣终于在康熙十五年归附清廷。对甘肃提督张勇也加恩重用，使之忠于朝廷，以解除西北隐患，使清廷得以集中兵力对付三藩。就是对于三藩，康熙帝也采取区别对待、分化瓦解的策略。当吴三桂公开举起叛旗之后，为了孤立吴三桂，即下令停撤耿精忠、尚之信二藩。在处死吴三桂在京子孙时，对耿精忠在京诸弟仍"照旧宽容"。耿精忠叛乱之后，仍然派人传谕耿精忠，念其先辈功劳，若投诚自首，即赦免前罪，视之如初，给耿藩留下后路。康熙十五年十月四日，耿精忠在清军大兵压境，内部矛盾重重的情况下，被迫率部出降，康熙帝仍准留耿精忠靖南王爵。广东的平南王尚可喜在吴三桂叛变后，仍然表示效忠清廷，康熙帝特晋封尚可喜为平南亲王。康熙十五年初，尚可喜病，尚之信代为理事，附吴三桂作乱。十月，尚可喜病逝。不久，福建耿精忠降清，尚之信已知继续附吴已无出路。康熙十六年五月四日，清军兵抵广东韶州，尚之信率部投降，康熙帝仍令尚之信袭其父平南亲王爵。这样，三藩中的二藩反正，康熙帝翦除了吴三桂的侧翼，使吴军处于孤立无援的境地。初，吴三桂以王辅臣变，欲由秦、蜀入犯，亲至松滋。是冬王辅臣反正，清将图海、张勇四守要害。安亲王岳乐率清军复建昌、广信、饶州。康熙帝命岳乐进军长沙、简亲王喇布移军江西。是时，吴三桂以兵 7 万据岳州、澧州诸水口，以拒江北清军，以兵 7 万据长沙、萍乡、醴陵，以拒江西清军。安亲王岳乐乘吴三桂西上时，由袁州攻吴军，使奇兵由间道袭破其城，遂由醴陵破萍乡，攻长沙，湖

南震动。吴三桂既不得志于秦，闻长沙急，乃由松滋回军，自将援长沙。康熙帝以吴军合力拒守长沙，其湖口各路守备必虚，命清军渡江急进，先后在公安之虎渡口、澧州之太平街等地大败吴军。康熙十六年，康熙帝命清军专力湖南。十七年安亲王岳乐复浏阳、平江，招降伪水师将军林兴珠于湘潭。征南将军穆占也以陕西、荆州清军拔永兴、茶陵、攸县、酃县、安仁、兴宁、郴州、宜章、临武、蓝山、嘉禾、桂阳、桂东。清帝命简亲王喇布进守茶陵。时吴三桂年已 67 岁，失陕西、闽、粤三大援，至是又失江西，清兵云集湘、湖间、疆域日蹙，情竭势绌，乃思窃帝号自娱，其下亦争劝进。十七年三月，在湖南衡州即位，国号大周，建元昭武。置百官，封诸将，造新历，举云、贵、川、湖乡试。殿瓦不及易黄，以漆髹之，构芦舍万间为朝房，适大风雨，潦草成礼而罢。八月，吴三桂病死。他的孙子吴世璠（吴应熊庶子）在衡州继承帝位，改元洪化。吴三桂一死，叛军内部人心惶惶，无一定守攻之策，屡战屡败。此后，康熙帝集中了荆州、陕西、河南、安庆各地军队围攻岳州。岳州是湖南咽喉要地，十八年正月，清军复岳州。清军在湖南战场上取得了决定性的胜利，长沙等地叛军也弃城南逃云、贵。四月，在湖南悉皆平定，叛军据守滇、黔一隅的形势下，康熙帝下谕指出，“当时倡叛，罪止吴三桂一人，所属人员均系胁从，情可矜恕。”对于投诚者，皆可赦其前罪，论功叙录，加恩安插。康熙这一政策，对叛军起到了迅速瓦解的作用。年底，康熙帝命勇略将军陕西提督赵良栋、奋威将军平凉提督王进宝率领所部清军收复关中、洛阳等地后入川，十九年正月克定四川。随后，康熙帝令赵良栋兼云贵总督自四川入云、贵。另令湖广总督蔡毓荣、平南将军赉塔分别从湖南、广西进军云、贵。康熙二十年初，清军克贵州，数路清军会师昆明城外。清军围困昆明。十月，城中食尽粮绝，守城叛军线绒等策划献吴世璠降清，吴世璠闻变自杀，城破。康熙帝在把主要精力对付吴三桂的同时，并没有放松对尚之信、耿精忠二藩的防范。早在尚之信表示“归正”清廷之后，就有人密告尚之信“心怀两端”。康熙帝命尚之信率兵进取潮州、湖南，尚违命不行。此外，尚还在广东重敛横征，鱼肉人民。康熙十九年六月，康熙帝密令将尚之信逮至京师，八月处死。同时对其父尚可喜不肯叛清，大为表彰，并允准尚可喜尸骨及眷属搬往原籍奉天海州。是年，又借耿精忠自请入京晋见的机会，削其兵权，交法司勘问。二十一年以逆党罪将耿精忠处死。康熙帝为了安定南疆，防止藩王势力东山再起，又对三个藩王部属作了妥善的处理和安置，对藩属军队编制进行了整顿，对三藩属下财产籍没充公。清初藩地弊政，通过这些措施实现了撤藩基本目的。三藩之乱为害八年，殃及云南、贵州、四川、广西、广东、江西、湖南、福建、陕西、甘肃等省，破坏了国家统一。清朝平定“三藩”之乱，翦除割据势力，维护了国家的统一，顺应了我国多民族国家走向统一的历史趋势。　　（张正明）

清政府统一台湾

康熙二十二年（1683），清政府出兵台湾，使台湾统一于清朝中央政府管辖下的历史事件。

清顺治十八年（1661），郑成功从荷兰殖民者手中收复了台湾。不久。郑成功逝世，其子郑经继位。之后，郑氏集团内部矛盾加深。郑经与其叔父郑袭为争夺权力发生火并，政治上越来越走下坡路。许多将领和士兵感到没有出路，渡海归降了清朝。康熙十二年，吴三桂为首的“三藩”之乱发生。郑经出兵攻占厦门、泉州等地，与耿精忠一时勾结，一时反目相攻，军事行动失去了政治方向。康熙十九年底，清政府平定了三藩之乱。次年，郑经暴死，其长子郑克壍继位。不久，郑经部将冯锡范等杀郑克壍，年仅 12 岁的次子郑克塽继位，是为延平王，仍奉南明为正统。此时，台湾郑氏集团内部分崩离析，政治日趋腐败。加之，随着全国大陆的统一，“反清复明”的口号已经失去号召力，大陆士兵纷纷思归，郑氏集团内部人心惶惶，继续割据局面已很难维持。但清廷内部在是否武力统一台湾问题上颇有分歧：朝中一部分大臣认为天下初定，主张缓征台湾；也有的大臣认为海洋险远，风涛莫测，主张放弃武力征讨；还有的对使用郑氏集团降将施琅为攻台主帅不放心，认为“去必叛”。康熙皇帝排除了这些大臣的干扰，坚持统一台湾的主张，决定任用熟悉海上情形的施琅为福建水师提督，作为攻台主帅。施琅，字琢公，福建晋江人。原为明总兵郑芝龙部左冲锋，顺治三年随郑芝龙降清。康熙二十年，清廷命福建总督姚启圣统率福建全省兵马，同提督施琅进取澎湖、台湾。清军经过一段海上作战训练之后，于康熙二十二年由施琅率战船 300、水师 2 万，自福州出海攻取澎湖。时郑克塽将刘国轩拥兵 2 万，踞守澎湖。刘缘岸筑短墙，置腰铳，环 20 余里为壁垒。六月二十二日施琅全军发动进攻，命都督陈蟒、魏明等率船 50 艘入鸡笼屿、四角山为奇兵夹攻；命总兵官董义、康玉等率船 50 艘入牛心湾作疑兵牵制；亲率大船 56 艘分八队居中进击，直指郑军娘妈宫阵地，并留船 80 余艘为后队支援。刘国轩也亲率

大小船舰200余艘倚险列阵迎战。郑军有大炮船20余艘，每艘装有三、四千斤之红衣大炮一门、熕20余门、铳一二百门不等。开战后，双方炮火矢石交攻，有如雨点，烟焰蔽天，咫尺莫辨。后南风大作，施琅令火器船乘风纵发，以火桶火罐进发，郑军大败，船舰或被击沉，或被焚毁。刘国轩率残部退回台湾，施琅遂克澎湖。澎湖为台湾门户，一旦失守，台湾即失去了屏障。施琅派员到台湾劝降，联络刘国轩。刘见众志瓦解，大势已去，首创降议，并派兵监视郑氏统治集团，郑克塽只得上表求降。八月，清军胜利进驻台湾。至此，台湾与大陆复归统一。台湾平，自海道报捷，清廷复加施琅靖海将军，封靖海公，世袭罔替。康熙二十三年，清政府为了加强对台湾地区的行政管理，在台湾设台湾府，下设台湾、诸罗、凤山三县，隶属福建省，并派兵8000人驻防，设总兵一员、副将二员，澎湖派副将一员，统兵2000人驻防。 （张正明）

康熙帝南巡

清朝康熙皇帝玄烨从康熙二十三年(1684)到四十六年间，六次南巡，视察了河工和民情。

康熙二十三年九月第一次南巡。十月，视察黄河北岸诸险工。之后，到扬州，自仪征渡扬子江，抵镇江、苏州。十一月到江宁(南京)。北返，途中阅高家堰堤工。十二月，返京师。时黄河经河道总督靳辅督修数年，修堤束水，河防较固，运道通畅。但因筑高邮等地减水坝(滚水坝)，使洪水南溢，淹没土地，江淮间人颇有怨言。康熙二十四年以来，江南总督于成龙主张浚海口以泄高邮等地积水，靳辅则认为浚海口无益，坚持筑堤束水。康熙二十七年，御使郭琇参劾靳辅，辅革职。未几，康熙帝派人调查靳辅治理黄河后河身渐次刷深等情况，发觉系于成龙唆使人攻讦靳辅，乃命河工仍照靳辅所定章程办事。康熙二十八年正月第二次南巡。这次巡幸目的，正如康熙帝所说，上次巡幸曾允准淮扬士民所请疏浚下河，前已兴工，将亲自行阅，躬历河道，兼观览民情。二月，到苏州、杭州，直至钱塘江而返。在巡视中了解到江南淮安地方民人怀念前任河督靳辅。三月，回京。以“浚河深通，筑堤坚固”，恢复靳辅原品。康熙三十三年，康熙帝指责于成龙向日指责靳辅之处，不符实况，革于成龙职。康熙三十八年二月第三次南巡。先后阅视黄河以南高家堰、归仁堰等工，阅视黄河堤岸。谓河身渐高，河高于田，治河应以浚河身为要。三月，至苏州、杭州，折而北返。五月，还京师。谓江浙生计不及十年以前，要在吏治不良。康熙四十二年正月第四次南巡。二月，阅视河工，至苏、杭而返。康熙四十四年二月第五次南巡。三月，至扬州。谓河工已告成，善后方略更为重要，并亲临阅视天妃闸。四月，至杭州，北返，还至京师。南巡时，江督阿山欲于丁粮耗加三分，作为供张之用，江宁知府陈鹏年不服，阿山借行宫草创事激康熙帝发怒，帝欲杀陈，织造曹寅为请，始免。康熙四十六年正月第六次南巡。二月，视察河工，责河道总督张鹏翮安居衙门不常巡视河堤之习气，致古沟一带地方咸被冲决。以“江南百姓恳请渡江巡省”为借口，继续南下。谓六次南巡，详观河形一年异于一年，治河之道，当着何处关系紧要，便保守何处，不可执一。四月，至杭州而返。五月，抵京师。在巡视中了解到沿河百姓无不称颂靳辅，所修工程极其坚用，靳辅相度形势，兴建堤坝，广疏引河，排众议而不挠，竭精勤以自效，特予褒叙，着加太子太保。康熙帝巡视时，获悉有五六丁之户，仅一人缴纳钱粮，或有九丁、十丁，亦仅二三人缴纳钱粮。后于康熙五十一年定“滋生人丁永不加赋”之制。 （张正明）

中俄雅克萨之战和《尼布楚条约》

清康熙年间，清军抵抗俄军入侵进行的雅克萨之战和中俄双方签订《尼布楚条约》的历史事件。

先是俄罗斯在莫斯科公国的基础上形成统一国家后，逐步向外扩张。清顺治七年(1650)初，沙皇俄国由哈巴罗夫率领哥萨克越过外兴安岭，侵入中国国境，窜到雅克萨(今阿尔巴津)一带。住在这一带的我国达斡尔族以坚壁清野进行抵抗。次年初，哈巴罗夫再次率军窜到我国黑龙江地方，侵占了雅克萨这个战略要地。同年五月，又向黑龙江中下游窜犯，屠杀了数百名达斡尔族人。顺治十年(1653)，清政府为了打击俄国军队的侵略，保卫边境的安宁，特设宁古塔昂邦章京。顺治十五年，俄国斯捷潘诺夫带领500名哥萨克兵窜到松花江上。清宁古塔昂邦章京沙尔虎达率清军包围和歼灭了入犯者，击毙侵略军头子斯捷潘诺夫。康熙四年(1665)，俄国重新占领雅克萨，在尼布楚和雅克萨建筑塞堡，设置工事，勒索贡税，绑架人质，奴役和镇压当地的中国各族居民，并多次向黑龙江中下游进行骚扰、扩张。从康熙十五年至二十一年，俄军分路推进，到达黑龙江的各条支流上，建立塞堡，设置据点。俄军的侵略魔爪越伸越远。康熙二十年，清朝康熙帝特派大理寺卿明爱向在雅克萨的俄军交涉，要求拆除俄军所建塞堡。可是，不断的交涉、劝说，多次的警告、抗议都无济于事，俄军不但置若罔闻，而且变本加厉进行侵略活动。清政府

忍无可忍，为了保卫国家领土完整和人民生命财产的安全，不得不进行自卫反击。康熙二十一年，康熙帝亲自到吉林乌喇(今吉林市)，航行于松花江上，视察边防情况。同时，派副都统郎谈、公彭春到雅克萨附近侦察地理形势和水陆交通。从康熙二十二年始，清政府向黑龙江集结部队，在黑龙江东岸古城的废墟上建立黑龙江城，设将军驻守，萨布素任黑龙江将军。同时，在吉林设厂，大规模造船。开辟从乌喇到瑷珲新驿路，以传递公文、军情。清军进驻黑龙江，首先着手清扫俄军在黑龙江中下游的侵略据点。康熙二十四年一月，康熙帝决定春暖后发兵收复雅克萨。在清军向雅克萨进发以前，清政府又作了一次和平努力，由康熙帝致书俄国沙皇，要求俄国入侵军撤退，两国以雅库次克为界，如此则边界地方安宁，而无侵扰之患，互相贸易，和睦相处。但俄国方面置之不理，准备顽抗到底。是年四月，清军抵达雅克萨城下，派人致书城内俄军，要求撤离中国。但俄军恃城坚固，不肯迁归。二十三日，清军水陆官兵分两处列阵夹围雅克萨。二十四日，夜调大炮等攻城火器。二十五日黎明，水陆并进急攻，城中惊恐。时有一队俄军从黑龙江顺流而下，企图冲进雅克萨，被清军击溃。接着，清军用大炮向雅克萨猛烈轰击，城内到处起火，俄军伤亡严重，俄军头子托尔布津竖起降旗，清军准许其官兵及家属撤出雅克萨，清军焚城后返回瑷珲。第一次雅克萨战争以俄军战败投降，撤出雅克萨告终。俄国托尔布津率余部退到尼布楚时，由拜顿率领的600名俄国援军也赶到尼布楚。俄军力量增强了，他们又打听到清军已全部撤回瑷珲，便回军重新占领雅克萨，并全力构筑工事，妄图负隅顽抗。俄军再占雅克萨，清政府不得不再次出兵。康熙二十五年四月，康熙帝下令进攻雅克萨俄军，如不降则尽诛之。五月，清军逼近雅克萨城，命俄俘带信入城，要俄军速降，否则将沦为俘虏。时俄军据雅克萨者826人，有炮13门和较多粮食、军火，对上述警告置之不理。六月初四日清军以炮攻城，几天内击毙俄军百余人，其督军托尔布津也中炮毙命。清军和俄军在雅克萨相持，由于寒冷季节到来，清军停止了强攻，在雅克萨周围筑垒挖壕，团团围困。经过长期的战斗和包围，俄军大多战死病死，800多俄军最后只剩下66人，粮食弹药也消耗殆尽，尼布楚方面也无力派来援军，雅克萨俄军只有坐以待毙。清政府虽然在军事上取得了很大成功，但是为了求得边境上的稳定与和平，仍然努力争取和俄国政府进行谈判，建议两国休兵，解决边界冲突。俄国政府由于内部政权不稳，在西方连年作战，兵疲力尽，无力东顾，决定接受清政府的建议，举行边界谈判。康熙二十五年，沙俄政府派出以戈洛文为首的谈判代表团从莫斯科启程。这个使团拥有官吏、士兵1900余人，包括炮兵、火枪兵、龙骑兵等。沙俄政府授予了戈洛文不但可以与中国缔约谈判，也可以在认为有利的情况下，调动西伯利亚地区的军队，与中国作战的权力。这支名为使团的武装军队，沿途镇压各地人民的反抗斗争，进攻喀尔喀蒙古，到处制造事端。康熙二十七年二月，戈洛文派出的信使柯罗文到达北京，提出中俄谈判地点设在楚库柏兴(色楞格斯克)。是年五月，清政府派出了以领侍卫内大臣索额图为首、都统公国舅佟国纲为主要成员的谈判使团。索额图等走到蒙古地区，适逢准噶尔部噶尔丹叛军攻陷库伦(乌兰巴托)，喀尔喀蒙古各部南迁，使团北上道路被阻，不得不撤回北京。同时，派人通知俄方，谈判延至下一年度进行。康熙二十八年四月初，戈洛文派出的代表到达北京，经双方协商，决定当年八月在尼布楚举行谈判。清廷仍以索额图为首席代表，主要成员有佟国纲和黑龙江将军萨布素等，代表团于6月中旬先期抵达尼布楚。俄使戈洛文等迟至七月初四日才抵尼布楚。初八日双方举行第一次正式会谈。会谈伊始，戈洛文就颠倒是非，提出黑龙江流域“自古以来即为沙皇陛下所领有”的谬论，诬指中国政府“派兵侵犯沙皇陛下国界”等。索额图以确凿的事实和证据严正地驳斥了戈洛文的无稽之谈，明确指出：“黑龙江一带，沙皇陛下的人从未领有过，贝加尔海这方面的所有土地都隶属于中国皇帝方面。”而“鄂嫩、尼布楚皆为我茂明安等诸部落原来居住之地，雅克萨为我虞人(猎人)阿尔巴西等居住之地”，且系“我达斡尔总管倍勒尔故墟”。这些土地上的人民历来向中国政府纳税，他们与清朝政府有着密切的隶属关系，是沙俄侵占后，迫使他们内迁嫩江等地。索额图有力的驳斥，使戈洛文理屈词穷，窘态百出。至于边界，谈判中俄方提出以黑龙江为界，北岸归俄国，南岸归中国。中方严正指出，所有蒙古人及黑龙江两岸居民，从来就在中国皇帝管辖下。中方提出以贝加尔湖和勒拿河为界。次日，双方举行第二次谈判。戈洛文仍坚持黑龙江至海为界。中方代表索额图作出重大让步，提出以尼布楚为界。但俄方代表得寸进尺，不作让步。会谈陷于僵局，被迫中断。后经会外谈判，索额图再让以尼布楚及其以西与俄，戈洛文同意放弃对雅克萨之占领。康熙二十八年七月二十四日(1689年9月7日)，中俄双方经过半个月艰难曲折的谈判，在中国政府作出

了重大的让步之后，终于正式签订了《中俄尼布楚条约》。条约共分六款，其中中俄东段边界的划分是最主要的部分。条约明确规定，以额尔必齐河、大兴安岭(即外兴安岭)和额尔古纳河为两国的分界线。又规定外兴安岭和乌第河之间的边界划分问题，留待后议。条约明确规定了俄国在雅克萨和额尔古纳河南岸据点全部拆除、迁移。条约还严禁彼此越界入侵，双方不得收容逃亡者，以减少边境争端。又规定，中俄两国人民持有护照者，可过界往来，贸易互市。《中俄尼布楚条约》签订后的一段时间内，中俄东段边境得以稳定，边境相对比较安静，两国人民之间的和平往来和贸易也有所发展。　(张正明)

喀尔喀蒙古南迁

清朝康熙年间，漠北喀尔喀蒙古在漠西厄鲁特蒙古准噶尔部噶尔丹军的进攻下，被迫南迁入内蒙古游牧。漠北喀尔喀蒙古有四汗部，即土谢图汗部、札萨克图汗部、车臣汗部和赛音诺颜部。游牧区域：东至黑龙江呼伦贝尔，南至翰海，西至阿尔泰山与新疆伊犁东路界，北至俄罗斯界。清崇德三年(1638)，土谢图汗、札萨克图汗、车臣汗遣使至清廷，各贡白马八、白驼一，称“九白之贡”，岁以为常。顺治十二年(1655)，三汗及赛音诺颜部长各遣子弟至京师。冬，复遣使乞盟。清廷设八札萨克，仍分左右翼。后来，喀尔喀蒙古内部发生内讧。康熙二十五年(1686)，清廷曾为土谢图汗部和札萨克图汗部的纠纷进行调解，派理藩院尚书阿喇尼赴漠北，召集喀尔喀蒙古各部贵族在库伦附近的伯勒齐尔举行会盟。盟会上，土谢图汗与札萨克图汗“和好息争”，言归于好。但是从康熙十年阴谋夺取了漠西厄鲁特蒙古准噶尔部统治权的噶尔丹，却是一个穷兵黩武、怀有称霸西北野心的人。他为了利用沙俄的力量牵制清政府，以实现其政治图谋野心，便暗中勾结沙俄。而沙俄也想利用噶尔丹实现其侵略我国西北地区的野心。早在明朝万历年间，沙俄即已染指我国喀尔喀蒙古地区，但一直遭到喀尔喀蒙古人的反抗。康熙十三年，喀尔喀蒙古军进入贝加尔湖地区，并准备进攻伊尔库茨克等城堡。康熙十八年，土谢图汗召集蒙古各台吉会商攻打色楞格斯克城堡。康熙二十三年，车臣诺颜和什普塔尔巴图率万人，进攻了沙俄占领的桐金山谷。康熙二十六年，沙俄派戈洛文率领2000军到达色楞格斯克。戈洛文为了巩固沙俄占领区，竭力与噶尔丹勾结，唆使他进攻喀尔喀蒙古。是年，噶尔丹军攻占了喀尔喀蒙古札萨克图汗部。先是，札萨克图汗沙喇受噶尔丹诱骗唆使，与噶尔丹军联合进攻土谢图汗。后沙喇被土谢图汗俘获致毙，噶尔丹乘机裹胁札萨克图汗部众，鲸吞了该部阿尔泰山以南到杭爱山以北广大地域。康熙二十七年，正当喀尔喀蒙古抗击沙俄入侵时，噶尔丹军3万自杭爱山后，至忒木尔地方，土谢图汗之子噶尔旦多尔济台吉与战，失败，仅以身免。噶尔丹军乘胜由土拉河逾克鲁伦河，直抵呼伦贝尔，谋掠巴颜乌兰。其时，车臣汗伊勒登阿拉布坦卒，其子乌默客幼弱，在噶尔丹军的铁蹄和屠刀威胁下，车臣汗部为了应变，决定南迁。车臣汗部南迁后，大都游牧于内蒙古乌珠穆沁旗北部沿边一带。喀尔喀蒙古土谢图汗之子噶尔旦多尔济战败后，退守到翁吉，土谢图汗则在漠北集结蒙军，策划与噶尔丹军决战。土谢图汗之弟也从色楞格斯克抗俄前线撤退，增援土谢图汗。而噶尔丹军已风驰电掣，直掠车臣汗部东隅，进抵呼伦贝尔。清政府紧急调动科尔沁部骑兵10万，保卫呼伦贝尔和科尔沁草原。但是噶尔丹军未南下，又回师攻击土谢图汗的主力军。康熙二十七年八月，两军在鄂罗会诺尔发生战斗，鏖战三日，噶尔丹军夜袭协助土谢图汗作战的赛音诺颜部营，土谢图汗军战败，土谢图汗南下至库伦与其弟哲布尊丹巴活佛会合。至次年四月，土谢图汗部陆续集聚达2万人。时噶尔丹军锋甚锐，喀尔喀众汹惧，有议北投俄罗斯者。哲布尊丹巴指出，俄罗斯素不奉佛，不可投，宜归顺大清皇帝以投安全。因而土谢图汗部众南迁，并驰告清廷。康熙帝立即发兵保护，并划分牧地，妥为安置，允准在张家口外多伦诺尔旁之达兰淖尔游牧。同时发给救济。总之，喀尔喀蒙古在噶尔丹军的进攻下，出于对祖国的热爱、对沙俄的仇恨、对噶尔丹叛军暴虐行径的怨愤、出于对漠南蒙古在语言、宗教、心理状态等多方面相同的民族特点，并能及时得到清政府的有效保护、妥善安置，从而使喀尔喀蒙古数十万众进行了大规模的部族南迁活动。

(张正明)

乌兰布通之战

康熙二十九年(1690)，清军与厄鲁特蒙古准噶尔部噶尔丹叛军，在乌兰布通发生的战斗。

噶尔丹(1644—1697)，准噶尔部汗王巴图尔珲台吉第六子，早年投西藏喇嘛学习。顺治七年(1653)巴图尔珲台吉死，其子僧格嗣位。康熙十年，僧格在巴图尔珲台吉诸子争位中被杀，噶尔丹闻讯自西藏返部夺取了统治权。此后，他极力扩张势力，先后控制了天山南北两路，占有新疆、青海、漠北广大地区。

康熙二十九年秋，噶尔丹又率军东进，深入到漠南蒙古乌珠穆沁，兵锋直抵距京师700里之乌兰布通(内蒙古克什克腾旗南)。噶尔丹势焰嚣张，使清廷深为杞忧。康熙皇帝为了防卫和重重打击噶尔丹叛军，曾九次出巡蒙古地区，调兵遣将，严密部署。康熙二十九年正月，康熙帝命理藩院尚书阿喇尼率领鄂尔多斯、内喀尔喀右翼、归化城、四子部落兵3000名、喀尔喀兵3000名、察哈尔兵600名、汉军200名带火炮16门，驻守于洮赖河上流，负责监视和牵制噶尔丹军的行动。后又调科尔沁土谢图汗亲王沙津率科尔沁军协同迎战噶尔丹军。六月二十一日，阿喇尼军与噶尔丹军在乌尔合河地方发生战斗，结果阿喇尼军败北。七月二日，康熙帝发布命令，准备亲征。任命皇长兄裕亲王福全为抚远大将军、皇子允禔副之，出古北口，任命恭亲王常宁为安北大将军，和硕简亲王雅布、信郡王鄂扎副之，出喜峰口。康熙帝拟部置好包围圈后亲临前线，一举歼灭噶尔丹军。七月十四日，康熙帝自北京起程赴前线，出古北口后，于七月二十一日到达博洛和屯，因患重感冒不宜前进，便任命福全为各路军统帅。福全军是清军的主力，七月六日从北京出发，途经古北口，七月二十二日到达巴林境内济河，与噶尔丹军驻地和尔洪河有二日程。七月二十三日福全军与马思哈率领的炮火营会合。二十七日，至吐力埂河，北距乌兰布通峰40里。常宁部七月四日从北京起程，出喜峰口，七月二十三日，沿吐力埂河东进，与福全部会合。阿喇尼部在乌尔合河之战失利后，七月二十日，阿喇尼军驻于克什克腾旗木西峡及噶尔达苏台两河界。七月二十四、二十五日，在拜察河会合福全大军。科尔沁土谢图汗沙津率领的科尔沁军，则于八月四日到了达里诺尔，断绝噶尔丹退回漠北的归路，与福全、常宁两路大军形成战略包围圈。总计清军将士及厮役，共达10万人。噶尔丹军见清军秣马厉兵，势在决战，即“觅山林深堑，倚险结营”，布阵于山岗，以骆驼万千缚其足，使卧于地，背加箱垛，毡渍水盖其上，排列如栅以自蔽，谓之驼城。时噶尔丹军总数，约2万人。八月一日黎明，清军整列队伍，向乌兰布通峰前进。中午，双方展开了著名的乌兰布通之战。清军在炮火、鸟枪的掩护下，发动进攻。噶尔丹在乌兰布通峰顶指挥督战。清军右翼在进军中，因陷入泥泞沼泽，被迫退回原处。清军左翼在内大臣佟国纲、佟国维的率领下，沿萨里克河河畔冲锋，噶尔丹军用俄制滑膛枪打死了佟国纲，左翼军进攻受挫。前锋格斯泰一马当先，冲锋陷阵，佟国维率军由山腰绕至噶尔丹军后，步骑争先陷阵。格斯泰乘胜穷追，为河岸淖泥所阻，噶尔丹军众掩至，格斯泰战歿。清军继续强攻，炮火齐发，摧垮了“驼城”，乘势进击，大败噶尔丹军。时已夜晚，噶尔丹利用夜色掩护，乱放鸟枪，以火力迫使清军停止攻击。八月二日，清军继续剿击噶尔丹军，见噶尔丹军据险坚拒，故使军士暂休。噶尔丹为逃脱覆灭的命运，施行缓兵之计，先派人联络准备修好。初四日，噶尔丹派西藏喇嘛的特使济隆呼图克图率弟子70人来讲礼修好。称部下无知，抢掠人畜，皆大非礼。是因索其仇土谢图汗及哲布尊丹巴，致有此误。福全听信了济隆的巧言诳骗，乃许其所请，命清军暂止勿击。噶尔丹便利用清军的麻痹，在一个夜晚，自什拉穆楞河涉水，横渡大碛山，连夜遁走于刚阿脑儿。是年十一月，清政府追究福全等“不行追杀，纵敌远遁”之罪，将福全、常宁俱罢议政、罚俸三年，福全被撤去三佐领。尽管如此，乌兰布通之战，噶尔丹军还是遭受了沉重打击，实力大为削弱，并为清廷举行多伦会盟，加强对喀尔喀蒙古的管理奠定了基础。　（张正明）

多伦会盟

康熙三十年(1691)，清政府在多伦诺尔召集喀尔喀蒙古和内蒙古48旗王公举行会盟的历史事件。

康熙十年，噶尔丹夺取了厄鲁特蒙古准噶尔部统治权后，恃其强盛，四出剽掠，又勾结沙俄，发动内乱，先后占领了厄鲁特蒙古和硕特部和维吾尔族回部地区，继而向喀尔喀蒙古三部发动进攻，致喀尔喀蒙古被迫南迁进入漠南蒙古。噶尔丹又煽动漠南内蒙古王公，阴谋掀起更大规模的叛乱。康熙二十九年，清军在康熙帝的指挥下，于乌兰布通击败噶尔丹军，遏制住噶尔丹的猖狂进攻，沉重打击了噶尔丹的嚣张气焰。尽管如此，清政府深知噶尔丹并不甘心失败，窥伺中原之心不死。清政府为了加强内部团结，彻底孤立噶尔丹叛乱势力，决定组织喀尔喀三部和内蒙古48旗王公进行会盟。康熙三十年四月，康熙帝亲自率领清军聚集多伦诺尔。五月二日，康熙帝于行营南门设置帐殿，召见蒙古贵族。在会盟前，康熙帝就札萨克图汗部贵族和土谢图汗部贵族之间的关系进行了协调。由于土谢图汗部曾经吞并过札萨克图汗部的属民，杀死过札萨克图汗部的汗沙刺，所以札萨克图汗部与土谢图汗部有隙。但是，康熙帝有鉴于土谢图汗部英勇抗击过沙俄的侵略，并在楚柏库兴大败沙俄侵略军，同时又坚决抗击噶尔丹的叛军。因此，康熙帝先让土谢图汗就杀害沙刺具疏请罪，由众喀尔喀议罪，最后由康熙帝以加罪土谢图汗与我

众无光，而予以免罪。康熙帝通过土谢图汗请罪，众喀尔喀议罪，皇帝最后予以免罪的办法，使土谢图汗部和札萨克图汗部贵族尽释旧怨。然后，以"赐宴"形式举行了会盟。并在宴会上庄严宣布，满足喀尔喀蒙古三部的要求，将喀尔喀蒙古按照内蒙古 48 旗制度编为 34 旗，旗下设参领、佐领，从而调整了喀尔喀蒙古三部之间、喀尔喀蒙古与内蒙古 48 旗之间的关系。同时，宣布蒙古贵族同样实行清朝的封爵制度。并建立多伦汇宗寺，满足蒙古喇嘛教民的要求。五月四日，在多伦草原又举行了盛大的阅兵仪式，显示了清军与蒙古军队的一统。五月六日，会盟结束，康熙帝返回北京。清政府通过这次会盟，加强了对喀尔喀蒙古的管理，进一步孤立了沙俄支持的噶尔丹叛军，有利于喀尔喀部民休养生息，对维护多民族国家的统一起到了积极的作用。　　　　（张正明）

平定噶尔丹之乱

康熙年间，清政府平定漠西厄鲁特（卫拉特）蒙古准噶尔部噶尔丹叛乱的历史事件。

清初，居住在我国西北方的蒙古族分为三大部，即漠南蒙古、漠北喀尔喀蒙古、漠西厄鲁特蒙古。厄鲁特蒙古又分为四大部：游牧于巴尔喀什湖以东、天山以北、伊犁河流域的是准噶尔部；游牧于乌鲁木齐附近的是和硕特部；游牧于塔尔巴哈台附近的是土尔扈特部；游牧于额尔齐斯河沿岸的是杜尔伯特部。噶尔丹（1644 或 1645—1697）是准噶尔部巴图尔珲台吉第六子，早年在西藏削发为僧。清顺治十年（1653），巴图尔珲台吉死，其子僧格嗣位。康熙九年（1670），准噶尔部发生争夺统治权的内讧，僧格被其同父异母兄车臣台吉和卓特巴巴图尔所杀。正在西藏当喇嘛的噶尔丹闻讯后，立即赶回准噶尔部，声称奉达赖之令为其兄报仇，并在僧格旧部鄂齐尔图汗（其岳父）和叔父楚琥尔乌巴什支持下，驱逐了车臣台吉，夺取了准噶尔部统治权。不久，野心勃勃的噶尔丹，又反目囚禁其叔父楚琥尔乌巴什，杀死岳父鄂齐尔图汗，自立为珲台吉。康熙十六年，噶尔丹向青海和硕特部发动进攻。次年，转而进攻南疆回部诸城，控制了天山南北厄鲁特诸部广大西部地区。噶尔丹为了巩固其统治，又杀害僧格次子索诺木阿拉布坦，并图谋杀害僧格长子策妄阿拉布坦。策妄阿拉布坦闻讯后连夜出逃。康熙二十七年，噶尔丹趁喀尔喀土谢图汗部和札萨克图汗部发生内讧，又率兵 3 万越过阿尔泰山袭击喀尔喀蒙古。噶尔丹所以能如此有恃无恐，是由于得到了沙皇俄国的怂恿和支持。从噶尔丹统治准噶尔部始，噶尔丹就和沙皇俄国往来频繁，沙皇俄国企图拉拢噶尔丹，而噶尔丹也企图同俄国订立军事同盟，得到俄国给予枪炮的支援，以实现称霸蒙古的野心。康熙二十六年，噶尔丹率军 3 万攻占喀尔喀蒙古札萨克图汗部。次年春，又率兵越过杭爱山向土谢图汗部进攻，并分兵掠取了车臣汗部。噶尔丹出兵喀尔喀蒙古之时，正是喀尔喀蒙古土谢图汗部在色楞格斯克地区抗击沙俄侵略者的战争紧急关头。由于噶尔丹的进攻，土谢图汗部军队猝不及防，处于腹背受敌的不利地位，使喀尔喀三部无力抵抗，10 万余众尽弃所有，被迫南迁进入漠南蒙古地区，要求清政府的保护和救济。清政府对噶尔丹的举动，一面保持高度警惕，一面派员进行调解，希望和平解决内部争端。但是，遭到了噶尔丹的拒绝。康熙二十九年五月，康熙帝获知噶尔丹将借兵俄国南犯，立即命令内大臣索额图向驻京俄国使臣吉里古里、伊法尼齐揭露噶尔丹勾结俄国的无耻行径，并对沙皇俄国提出了警告。是年六月，噶尔丹以为有沙俄的支持，借追击喀尔喀蒙古为名，大举南犯，并在漠南蒙古乌珠穆沁一带的乌尔合河地方击败了清廷理藩院尚书阿喇尼率领的骑兵，逼近乌兰布通（内蒙古昭乌达盟克什克腾旗南境），距北京仅 700 里，直接威胁到清朝首都北京的安危。为了制止噶尔丹的猖狂进攻，保卫边疆的安宁，清政府决定平定噶尔丹发动的叛乱，并由康熙帝亲自组织和指挥了这场战争。在平定噶尔丹的叛乱中，康熙帝曾经三次亲征。第一次亲征，是在康熙二十九年七月，康熙帝采取分兵合击的战术，命裕亲王福全为抚远大将军，率左翼清军出古北口；命恭亲王常宁为安北大将军，率右翼清军出喜峰口。康熙帝亲自出塞，准备亲临前线指挥作战，后因病驻扎在博洛和屯（河北隆化）指挥各路大军。当时，噶尔丹在乌兰布通摆好阵势，骑兵数万在山下，依林阻水，万余骆驼缚足卧地，背加箱垛，蒙以湿毡，环列如栅，士兵于栅隙处注矢发枪，并施钩矛，谓之"驼城"，大有不可破之势。八月初一日，清军向乌兰布通推进，隔河而阵，以火器为前列，遥攻中坚，自午后至傍晚，终于摧毁"驼城"。清军乘势发动进攻，千军万马，势不可挡，大败噶尔丹军。噶尔丹兵败，行缓兵计，派人向清军乞和，发誓不敢复侵喀尔喀。清军前线统帅福全，误信其言，暂止出击。噶尔丹获得喘息机会，趁夜遁去。这次战斗，尽毁噶尔丹军之精锐，给了噶尔丹以沉重打击。噶尔丹逃至科布多，集合残部休养生息，企图东山再起。康熙三十五年正月，康熙帝指出，噶尔丹不除，日后益多扰累。清政府

决定再次发兵平定噶尔丹，并由康熙帝再次亲征。这次出兵，清军仍采取分兵合击战术。兵分三路：中路由康熙帝亲自率领出独石口，寻噶尔丹军主力；东路由黑龙江将军萨布素率领会同科尔沁部军，沿克鲁伦河进剿；西路由抚远大将军费扬古和振远将军孙思克率领，自宁夏截噶尔丹军归路。中路军行至克鲁伦河，噶尔丹见清军来势凶猛，不敢迎战，尽弃庐帐器械，仓皇西逃。但其归路已被西路清军截断，西路清军统帅费扬古还在昭莫多地方设下了埋伏。昭莫多在肯特岭之南，土拉河之北，汗山之东，地势平旷，为古战场之地。费扬古采取以逸待劳、诱敌深入的战术，在昭莫多重重包围了噶尔丹军。噶尔丹军争夺山顶峰甚烈，清军据险俯击，弩铳迭发，战斗十分激烈。在清军左右两翼的包抄突袭下，噶尔丹军大溃，死亡数千，噶尔丹之妻阿奴勇敢善战，也被炮队击毙，噶尔丹仅以身免，率数骑逃去。昭莫多战役，基本上歼灭了噶尔丹的叛军力量，清军取得了平定噶尔丹之乱的决定性胜利。昭莫多战役后，噶尔丹率残部流窜于塔米河流域。康熙帝再次招抚噶尔丹，但噶尔丹仍然顽固不化，继续坚持分裂祖国的叛乱。康熙三十六年春二月，康熙帝第三次亲征噶尔丹，命费扬古两路进兵，康熙帝到宁夏，准备循贺兰山出边。这时，噶尔丹残部大多逃亡，只剩几百人，食尽粮绝，杀马而食。噶尔丹欲北投俄国，沙俄因噶尔丹已失去利用价值，拒不接受。噶尔丹在走投无路的情况下，于是年三月在漠北阿察阿穆塔台地方服毒自杀，余部携其尸骸投降。至此，在沙俄支持下历时8年的噶尔丹叛乱，为清政府彻底平息。　　　　　　　　（张正明）

平定策妄阿拉布坦之乱

康熙五十九年（1720），清政府平定准噶尔部策妄阿拉布坦叛乱的历史事件。

策妄阿拉布坦（1663—1727），是厄鲁特蒙古准噶尔部巴图尔珲台吉之孙，僧格的长子，噶尔丹之侄。噶尔丹夺取准部统治权后，策妄阿拉布坦因与噶尔丹争夺权力，逃离准噶尔，率僧格旧部5000余人到博罗塔拉居牧。噶尔丹发动叛乱，进攻喀尔喀蒙古，策妄阿拉布坦乘势返回噶尔丹的根据地伊犁，收其父旧属及噶尔丹余众，复成部落。同时，向清政府“请安纳贡”，协助并配合清军对噶尔丹的清剿。康熙二十九年（1690），噶尔丹第二次发动大规模武装叛乱时，策妄阿拉布坦趁机夺取了原为噶尔丹占领的科布多，并占据了额尔齐斯河到乌布萨泊的广大地区，基本上控制了准噶尔部。噶尔丹死后，策妄阿拉布坦献出噶尔丹的骨灰，表示服从清廷。康熙三十八年，策妄阿拉布坦率兵占据了哈萨克草原南部，趁土尔扈特部发生内讧，吞并了土尔扈特部首领阿玉奇儿子散札克所属1.5万余人口，截留土尔扈特部前往清廷的使者，抢夺贡物，断绝贡道。又出兵攻打南疆回城喀什噶尔，用武力控制南疆回部六城。在不长时间内，策妄阿拉布坦的军事力量已经控制了整个天山南北，并将其扩张矛头指向西藏。就在策妄阿拉布坦积极策划向西藏用兵时，沙皇俄国已准备派兵侵占准噶尔部的辖地。康熙五十四年，沙俄陆军中校布赫戈利茨带领4000侵略军侵入准噶尔部管辖的雅梅什湖一带，并在那里筑堡修筑工事。五十五年二月，策妄阿拉布坦命大策凌敦多布率兵万余人，向侵入雅梅什湖的沙俄侵略者发动进攻。沙俄从托波尔斯克派出援军，被准部军民所阻击和歼灭。在准部人民的支持下，经过两个月的相持，准噶尔军民终于击败沙俄军，沙俄侵略者被迫撤离雅梅什湖地区。康熙五十五年，策妄阿拉布坦派军队开始入侵西藏，挑起了一场新的内战。十一月，策妄阿拉布坦派台吉策凌敦多布统兵6000，翻越雪山，于次年七月由腾格里入藏，奔向拉萨。拉藏汗兵在达穆地方迎战失败，准噶尔军进至拉萨。十一月初一日，拉藏汗被杀，遂废掉拉藏汗所立六世达赖意希嘉措。至此，蒙古和硕特部顾实汗及其后裔在西藏的统治宣告结束。准噶尔军在西藏烧杀抢掠，并将劫掠的拉萨寺院财物运回伊犁。西藏的拉藏汗地方政权是得到清廷承认的，拉藏汗也是清廷委以管理西藏事务的，所以清廷对西藏事务十分关注。由于西藏地处边陲，路途遥远，信息传递很慢，所以清廷未能及时得到准噶尔部军队进入西藏的消息。清廷得知西藏事变后，立即派西安将军额伦特及侍卫色棱率兵赴援。康熙五十七年七月十六日额伦特自赞西里克起程，进至喀喇乌苏（西藏那曲），色棱亦于二十日统兵至。清军与准噶尔军在喀喇乌苏相持月余，后清军作战失利，额伦特战死。十月十二日，康熙皇帝以额伦特兵败，授皇十四子、固山贝子允禵为抚远大将军，统率大军，驻节西宁，指挥进藏各路清军。又升年羹尧四川总督，协助允禵办理军务，命傅尔丹及富宁安分兵出巴里坤及阿尔泰等地，以牵制准噶尔的援藏兵力。五十九年正月，授都统延信为平逆将军，率兵进藏。旋授噶尔弼为定西将军，带领滇川清兵进藏。噶尔弼命岳钟琪为前锋，自里塘、巴塘进兵察木多（昌都），轻装急进，直抵拉萨。延信率西路清军由青海前进，先后三次败策凌敦多布兵，护送格桑嘉措于九月回至拉萨“坐床”。

后命原拉藏汗官员康济鼐管理前藏事务，颇罗鼐管理后藏事务。策凌敦多布"计穷力竭，狼狈而遁"，率残军逃回伊犁。策妄阿拉布坦发动的这次入藏和反叛清王朝的战争就这样遭到了彻底的失败。

（张正明）

康熙朝储位之争

康熙朝诸皇子争夺储位的历史事件。

满族帝王原无立储之制，康熙帝玄烨当上皇帝后，立意学习汉族帝王做法，确立了立嫡立长的建储原则。康熙长子胤禔是庶出，康熙帝便按照立嫡立长之法，于康熙十四年（1675）正式立孝诚仁皇后所生之年仅2岁的皇二子胤礽为皇太子，并颁诏"布告中外，咸使闻知"。为了培养皇太子，康熙帝为其选择名儒教诲。太子稍长后，康熙帝南巡北狩，皆令太子随行，亲自传授治国之道。康熙三十五年，康熙帝亲征噶尔丹叛军时，已把朝中大事委于时年仅22岁的皇太子处理。次年，再次亲征，仍命太子居守。随着时间的转移，皇子们一个个长大成人，都在窥觑着太子之位。于是，施展权术、谋夺储位的活动随之而生。胤礽虽然已经是太子，但是在众皇子的阴谋活动面前，对其储位的位置也不放心，也开始了在朝中发展自己势力的活动。当时保和殿大学士、议政大臣索额图，因为曾帮助康熙帝清除鳌拜集团，深得康熙帝信任，而索额图又是太子生母的叔父。于是太子胤礽便和索额图结成党羽，以巩固其太子地位。此时，索额图正与朝中另一权臣明珠争权夺利。明珠官居武英殿大学士，历任刑部、吏部尚书，又是皇长子胤禔的舅父。明珠及其党羽反对皇太子胤礽，极力想把皇长子胤禔推上储位。因而，索额图与明珠两个集团展开了激烈的斗争，致使朝政混乱不堪。康熙帝是位有为的皇帝，不允许朝中有这种现象存在。于是，在康熙二十七年，先从明珠开刀，以明珠等"植党羽以树私，窃威服以获公"之罪，将明珠及其党羽革职，使明珠一党瓦解。但索额图继续在皇太子周围集结势力，康熙帝发现后对此极为反感。康熙四十年，索额图因老病休，其职领侍卫内大臣由其弟心裕出任。次年，心裕因虐毙宗人被夺官，索额图也被拘禁于宗人府。后来，被康熙帝以结党妄行、助胤礽潜谋大事的罪名处死幽所。索额图被康熙帝处死对于皇太子胤礽是一个沉重的打击，也是一次严重警告。但是胤礽的活动并未因此而停止，康熙帝与胤礽的芥蒂一直不能消除。康熙四十七年，康熙帝终于以胤礽不法祖德，不遵朕训，惟肆恶虐众，暴戾淫乱之罪，将胤礽拘执，宣布废除胤礽的皇太子。同时警告诸皇子及诸大臣，胤礽已服法，倘有借此邀结人心，树党相倾者，断不姑容。但是事情的发展并不如康熙帝所想，储位位置暂空缺后，诸皇子争夺皇储位置的斗争愈演愈烈。皇长子胤禔，本是惠妃纳喇氏所生，因非正后所出，对自己未能立为皇太子，早有怨愤，一直在暗中结交权臣，网罗党羽。他见胤礽被废，认为正好落井下石，致胤礽于死地，以便为自己登上皇太子位置铺平道路。他极力主张杀掉胤礽，向康熙帝奏请若诛胤礽，不必出自父手。康熙帝窥透其野心，当着诸皇子面，斥责胤禔不谙君臣大义，不念父子至情，天理国法，皆所不容，命革去胤禔郡王衔，禁锢终身。在皇储位置的争夺战中，皇八子胤禩也是一个强有力的竞争者。胤禩是良妃王氏所生，18岁时被封为贝勒。胤禩广罗党羽，邀集人心，在其周围形成了一股政治势力。胤禩幼时曾由惠妃抚养，与皇长子胤禔有交往。当皇长子胤禔看到自己当皇太子无望时，便向康熙帝举荐胤禩，以代表自己的利益。在胤礽被废后，康熙帝曾命胤禩署理内务府总管，以考验胤禩。但胤禩利用这一职权，到处收买人心，把康熙帝对下的恩典也归功于己，使康熙帝逐渐认识胤禩柔奸成性，妄蓄大志，企图不良。于是命拘囚胤禩，同时被拘禁的还有皇三子胤祉、皇四子胤禛、皇五子胤祺。结果，康熙帝建储不成，反而在很短时间内拘禁了六个皇子。尽管如此，年近六旬的康熙帝毕竟需要解决皇嗣问题，还得在诸皇子中遴选。康熙四十七年十一月，康熙帝开释了除皇长子外的五个皇子，并令众大臣议立皇储。没想到众大臣和包括皇九子胤禟、皇十子胤䄉、皇十四子胤禵在内的皇室人员，一致保举皇八子胤禩。康熙帝十分恼怒，严斥诸皇子和众大臣，指出胤禩生母出身贱籍，在立皇太子问题上又罹罪，不宜立为皇太子。康熙帝对胤禩如此深孚众望，十分怀疑，下令追查操纵建储推荐胤禩之人。后查出原来是内阁首辅大学士马齐、尚书王鸿绪、满大臣阿灵阿、鄂伦岱、揆叙等暗地有活动。康熙帝最忌恨权臣为皇子谋位，认为其意在结恩于太子，以备日后恣肆专行。于是下令拘禁马齐，责令王鸿绪致仕。康熙帝为了缓和皇储之争和不使胤禩得势，于康熙四十八年三月，称胤礽狂疾已愈，复立为皇太子。但康熙帝此举，不但未能稳定局面，反而在朝中引起混乱。原保举过胤禩和反对过胤礽者均人人自危。康熙帝为了稳定人心，平衡各方面势力，便将皇三子胤祉、皇四子胤禛、皇五子胤祺封为亲王，皇七子胤祐、皇十子胤䄉封为王，皇九子胤禟、皇十二子胤祹、皇十四子胤禵封为贝子，释

放皇八子胤禩并恢复贝勒，只剩下皇长子胤禔、皇十三子胤祥仍被拘禁。尽管如此，皇子们的争嗣斗争并未停止，愈演愈烈。而且皇太子胤礽废而复立，并未改恶从善，继续援结朋党，处处表现目中无父皇。康熙帝看透了胤礽，觉得祖宗弘业，断不可托付此人。于是，先将皇太子党羽兵部尚书耿额、都统鄂善、刑部尚书齐世武等拘拿，于康熙五十一年九月再度废掉皇太子胤礽，禁锢终身。此后，康熙帝虽然再未册立皇太子，但诸皇子争夺储位的斗争仍在激烈进行。其中比较活跃的有皇三子胤祉、皇四子胤禛、皇十四子胤禵。胤祉生母为荣妃马佳氏，在皇太子胤礽被废后，皇长子被禁，胤祉成为诸皇子中年龄最长者。康熙帝对他在带兵打仗、处理政务等方面，一直有意进行培养。胤祉学术渊博，精通历法，主持过律吕、算法诸书编纂工作，在诸皇子争储斗争中，以外表中立不倚来悦取父皇，同时投父所好，当康熙帝正在恼恨皇长子结党谋立储位中，揭发皇长子胤禔用蒙古喇嘛咒胤礽，给了胤禔致命一击。胤祉始终以温文尔雅的学者面貌希冀储位，而为康熙帝所喜爱。皇十四子胤禵是德妃乌雅氏所生，当胤禩争储受挫之时，胤禵趁机大肆活动，以谋取储位。康熙五十七年，新疆策妄阿拉布坦属下策零敦多布进攻西藏，西部不靖，康熙帝因自己年迈，便命胤禵为抚远大将军，由贝子擢受王爵，率兵出征西北。胤禵军权在握，虽未能解决准噶尔部问题，但却顺利解决了西藏问题，从而成为皇储位置的有力竞争者。皇四子雍亲王胤禛是胤禵的同母兄长，自幼由康熙帝亲自抚养。他为人深沉，言行谨慎，惯用两面手法进行活动，外弛而内张，欺骗康熙帝和朝内官员，暗中结党，经营了包括川陕总督年羹尧、步军统领隆科多等重要人物在内的小集团。他又善于审时度势，附和父意，使康熙帝对他产生好感。他和胤祉一样，经常协助父皇处理政务和代父主持祭祀大典。胤祉、胤禛、胤禵各自在不同方面施展了自己的才能，成为康熙帝立储的培养人。但康熙帝鉴于前几次立储教训，在立储问题上一直很谨慎。因而康熙朝储位之争，一直到康熙六十一年康熙帝去世，胤禛即位才告结束。　　　　　（张正明）

台湾朱一贵起义

清康熙六十年(1721)，台湾朱一贵领导的反清斗争。

朱一贵，小名祖，福建漳州府长泰县人，家贫穷，康熙五十二年迁居台湾罗汉门，先为衙门小吏，后以养鸭为生，为人侠义，广交友，颇孚众望。康熙六十年春，台湾凤山县令出缺，台湾知府王珍代掌县印，委其次子操县政，征收钱粮苛刻，以风闻逮捕结盟者数十人及违禁入山砍竹木者百余人，激起民愤。四月十九日，李勇、吴外、郑定瑞、王玉全、陈印等 52 人与朱一贵焚表结盟，聚众数百人，树“大元帅朱”旗帜，在罗汉门揭竿起义，夜出冈山，袭击塘汛。二十二日，义军夜出槺榔林，大败汛防把总张文学，获大量鸟枪、藤牌、军械。是日，南路起义军杜君英遣杨来、颜子京率其众百人至一贵所，称杜君英在下淡水槟榔林召集粤东种地佣工客民，与陈福寿、刘国基议共攻台湾府库。又有郭国正、翁义起义草潭，戴穆、江国论起义下埤头，林曹、林骞、林琏起义新园，王忠起义小琉球，皆愿与杜君英攻府城，约朱一贵共事。二十七日，起义军与清军在赤山发生遭遇战，朱一贵、杜君英率众两路夹攻，大败清军，杀死千总陈元，俘获把总周应遂，游击周应龙逃归府城。杜君英又偕陈福寿、刘国基、戴穆、翁飞虎、江国论、郭国正、杨来、颜子京、林曹、林骞、林琏、郑文苑、王忠等攻凤山县南路营，再败清军，杀死把总林富、守备马定国。赤山之战，全台震动，在台文武各遣家属宵遁，先后驾舟并出鹿耳门，士民相率逃窜。五月初一日，朱一贵、杜君英率数万义军围攻台湾府城，守城清军大败，总兵官欧阳凯、守备胡忠义、千总蒋子龙、把总林彦皆战死。官兵既败，台厦道梁文煊、知府王礼、台湾知县吴观域、县丞冯迪、典史王定国、诸罗知县、典史张青远皆相率登舟，出鹿耳门，逃到澎湖。起义军攻占台湾府城后，在五月初三日，朱一贵称中兴王，戴通天冠，黄袍玉带，建号永和，称万岁。令兵民蓄发，复明制，发布讨清檄文。朱一贵又登台行礼，大封诸将为国师、太师、公、侯、都督、尚书等。时起义军发展到 30 万人，几占领全台。但起义军内部互争雄长，发生了分裂。六月十三日，清廷命福建水师提督施世骠、南澳总兵官蓝廷珍率援兵自澎湖进攻台湾。十六日，清军于鹿耳门登陆，陷安平镇(台湾台南安平港)。朱一贵为夺回安平镇与清军展开激战，后败走。二十二日，清军陷台湾府城，又分兵南北路进攻起义军。闰六月初五日，朱一贵义军残部千余人退到诸罗县沟尾庄一带，受当地豪绅诱骗，除少数突围外，主要首领朱一贵、王玉全、翁飞虎、张阿山等皆被俘。七月二十五日，清军参将林政等率兵向台湾南路起义军进攻，游击林秀等率兵向台湾北路起义军进攻，朱一贵义军余部因力量悬殊，被清军镇压。后朱一贵被清军槛送北京杀害。八月，康熙帝以台湾文职官员不知爱民，只知图利苛索，引发台湾朱一贵之乱，命将台湾道台以下官

员俱着提拿。十二月，将台厦道梁文煊、知府王礼、知县吴观域等斩首。　　（张正明）

雍正帝即位

康熙六十一年（1722），雍正帝胤禛即位称帝的历史事件。

康熙六十一年十一月，康熙帝玄烨病死，其第四子胤禛继承大统。但是对胤禛如何登上皇帝宝座，却有遗诏嗣位和矫诏篡位之说。据胤禛自称，康熙六十一年十月冬至之前，他不在京城，而是奉父皇之命，代祀南郊。父皇病重，他曾请求入宫侍奉，父皇以祭祀为大典，不得离开，到是月十三日父皇病危后才奉诏入宫。而在此之前，已有康熙其他诸子胤祉（允祉）、胤祐（允祐）、胤禩（允禩）、胤禟（允禟）、胤䄉（允䄉）、胤裪（允裪）、胤祥（允祥）、原任理藩院尚书隆科多在父皇床前。父皇谕言，皇四子胤禛人口贵重，必能克承大统，着继承帝位。其夜戌时，父皇病故，隆科多述皇帝遗诏，诚亲王允祉等叩首劝即位，始理大事。按胤禛所说，他继承皇位完全合法。但另一说法是胤禛矫篡了遗诏，原来康熙帝是传位十四子胤祯（胤禵原名），而胤禛盗名改诏，将十字改为于字，把祯字改为禛字，使遗诏成为传位于四子胤禛。此外，还有康熙帝病重时召胤禵来京，被隆科多从中作弊，假传圣旨立胤禛为帝之说。雍正帝究竟是遗诏嗣位，还是矫诏篡位，千古之谜，尚难断定。然而，不论如何，胤禛终归是争夺皇位斗争的胜利者。

（张正明）

雍正帝打击诸王及其党羽

雍正帝胤禛即位后为巩固其统治进行的一场政治斗争。

康熙六十一年（1722），康熙帝去世，雍正帝即位。表面看诸王争储斗争已经有了结果，但并不意味着诸王已经甘心臣服，而雍正帝对诸王也极不放心，于是演出了一场雍正帝打击诸王及其党羽的政治斗争。雍正帝在这场斗争中采取了分化瓦解、区别对待和各个击破的策略。允禩（胤禩）是诸皇弟中实力最雄厚的一个，得到了许多皇亲国戚及权贵大臣的支持，其党羽布满朝廷内外，是雍正帝的最大政敌。雍正帝对允禩采取了先拉拢后打击的谨慎做法。雍正帝先任用允禩党羽大学士马齐为总理事务大臣，封允禩爵号和硕廉亲王，兼管理藩院和上驷院。雍正元年（1723）改兼管工部。又赐允禩之子弘旺贝勒衔，任命允禩的支持者佛格为刑部尚书、贝勒满都护为总理事务大臣协同行走，擢佟去图为山东按察使，又将康熙时获罪的允禩母舅噶达浑削其贱籍，赏赐世袭佐领世职。对于允禩党羽的升迁，连允禩也预感着今日的荣宠，正是以后开罪的理由，每日忧心忡忡。雍正帝对亲兄弟允禵集团则采取了立即打击的策略。先是以允禵气傲心高为由削其王爵，只保留其贝子爵。然后令允禵看守景陵，将他软禁。雍正帝对允禟则迫令流放西北，并由川陕总督年羹尧派兵监视。后又以允禟抗违军法、肆行边地之罪革去贝子爵。对允䄉，则命其护送哲布尊丹巴呼图克图之灵龛到喀尔喀，允䄉不愿离京，行至张家口不肯再走，雍正帝便削其郡王爵，调回京师，永远拘禁，并查抄其家产。对允祉，则除去党羽陈梦雷，发往远边。对废太子允礽，仍禁锢如初，封其子弘皙为郡王。对允禔，继续严行禁锢。雍正二年四月，雍正帝的帝位逐渐稳定后，便开始向政敌允禩开刀，称允禩怀挟私心，其大志至今未已，命诸大臣正其罪。七月，发表《御制朋党论》。八月，召见诸王宗室，谴责允禔、允禩、允禵、允禟结为朋党，欲成大事。雍正四年，年羹尧、隆科多案结束后，开始处理允禩集团。是年正月发出上谕，历数允禩对雍正帝承继大统心怀怨恨，摇惑众心、扰乱国政之罪，褫夺允禩黄带子，削除宗籍，逐出宗室，其同伙允禟、苏努等也予以同样处分，同时将允禩妻乌雅氏去福晋，休回母家，严行看守。二月，将允禩降为民王，交所属旗内稽查，不得依宗室诸王例保留所属佐领人员，随后又圈禁高墙。三月，命允禩改名阿其那（满语狗），其子改名菩萨保。五月，颁布允禩、允禟、允䄉等罪状，允禟改名塞思黑（满语猪）。后押允禟至保定，由直隶总督李绂负责圈住。八月，允禟死。雍正帝怕允禵在外地景陵不好控制，又将他移往京城景山寿皇殿囚禁。九月，允禩死于禁所。至此，雍正帝诸兄弟中对其皇位有威胁和不附和者，一个个都被打了下去，使其皇权得以巩固，保持了清朝的政治稳定局面。　　（张正明）

平定罗卜藏丹津叛乱

清雍正初年，清政府平定青海地区和硕特蒙古贵族罗卜藏丹津为首的反清武装叛乱的历史事件。

罗卜藏丹津是厄鲁特蒙古和硕特部顾实汗之孙，其父达什巴图尔是顾实汗的第十子，康熙三十七年（1698）被清政府封为和硕亲王。康熙五十三年罗卜藏丹津承袭其父的亲王爵位。和硕特蒙古原游牧于新疆乌鲁木齐地区，因与游牧于伊犁地区的准噶尔部矛盾，于明朝崇祯十年（1637）由顾实汗率领进

入青海。崇祯十五年顾实汗又率兵进攻卫藏，杀死藏王藏巴汗，占领西藏。于是，青藏地区尽为和硕特蒙古贵族所控制。顾实汗在世期间，一直与清朝政府保持着朝贡关系。清顺治十一年(1654)，顾实汗死。青海和硕特各部便失去了统一的约束力，顾实汗留在青海的诸子，相互割据。顾实汗留在西藏的长子鄂齐尔汗·达延，孙达赖罕及达赖罕的儿子拉藏汗皆与清朝中央政府保持着臣属关系。西藏达赖五世委任的第巴桑结嘉错，为了摆脱清政府与和硕特部的控制，在康熙二十一年达赖五世圆寂后，匿丧不报清朝中央政府，并私立仓央嘉错为达赖六世，以便背后操纵。康熙四十四年桑结嘉错谋毒害拉藏汗未遂，拉藏汗便在青海蒙古骑兵帮助下，杀桑结嘉错，并向清廷奏知假达赖喇嘛情由。清廷以拉藏汗杀桑结嘉错有功，封为"翌法恭顺汗"，令其管理藏务。康熙五十六年，桑结嘉错属下勾结准噶尔部策妄阿拉布坦之兵进入西藏，围攻拉萨，杀死拉藏汗。康熙五十九年，清廷派军进藏逐出准噶尔军，并命罗卜藏丹津等青海台吉护送达赖喇嘛(噶桑嘉错)进藏举行坐床大典。同时，为了减少和硕特蒙古和西藏地方势力的矛盾，决定建立西藏政府。封藏官康济鼐、阿尔布巴为固山贝子，隆布奈为辅国公，理前藏务；颇罗鼐授札萨克一等台吉，理后藏，各授噶卜伦。从此，结束了和硕特蒙古对西藏的统治。罗卜藏丹津素来怀有政治野心，原来想由他接替拉藏汗来统治西藏。结果事与愿违，罗卜藏丹津不仅未能接替拉藏汗实现统治西藏的野心，而且护送达赖入藏只得到了清廷"加俸银二百两、缎五匹"的微薄赏赐。加之清政府加封原为郡王的察汗丹津(顾实汗曾孙)为亲王，封原为贝勒的额尔德尼托克托鼐为郡王，并命罗卜藏丹津与察汗丹津共同"领青海右翼"。清政府上述加强对青藏地区管辖的措施，引起了素有割据野心的罗卜藏丹津不满，于是便乘康熙帝逝世和雍正帝初登位的空隙发动了叛乱。雍正元年(1723)七月，罗卜藏丹津胁迫青海各台吉于巴尔巴罗海会盟，罗卜藏丹津自称达赖珲台吉，强令青海诸台吉呼旧日名号，一律不许呼王、贝勒、贝子、公号，正式宣布反清割据。郡王额尔德尼托克托鼐和亲王察汗丹津因拒绝参加叛乱，先后遭到罗卜藏丹津的袭击。额尔德尼托克托鼐与妻子投至甘州报警，察汗丹津率妻子及所属至河州老鸦关外，向清政府求援。十月，雍正帝命川陕总督年羹尧为抚远大将军，率军前往平乱。年羹尧令奋威将军岳钟琪等分领军队，派兵往永昌、布隆吉尔，以防罗卜藏丹津内犯；南守巴塘、里塘，扼其入藏之路；又命富宁安等屯吐鲁番及噶斯泊(罗布泊东)，截其通准噶尔之路；分兵攻南川、归德等堡，溃其羽翼。旋败罗卜藏丹津于布隆吉尔。于是镇海、申中、南川、西川、北川等地尽为清军所收复。雍正二年初，清军又平定了塔尔寺、郭隆寺等处的喇嘛叛乱。二月初八，年羹尧命兵分三路：岳钟琪出南路，总兵武正安出北路，总兵黄喜林出中路，分进合击罗卜藏丹津。钟琪率军进至哈喇乌苏，获其大酋阿尔布坦布。又进至额母讷、布隆吉尔，罗卜藏丹津西窜。钟琪率兵追逐，一日夜驰300里。二十二日晨追至罗卜藏丹津军帐，罗卜藏丹津军大溃，罗卜藏丹津易妇人服，骑白驼遁。后逃入准噶尔，为策妄阿拉布坦所收容。之后，平叛战争进入扫尾阶段。到三月，青海境内叛乱全部肃清。清廷以年羹尧平定青海之功，旋授一等公，岳钟琪为三等公。经过这次平定罗卜藏丹津叛乱，清政府决定进一步强化对青海地方的统治。首先，对青海地区蒙古各部按照分别游牧居住的原则，编置佐领，以札萨克领之。其次，对西宁周边可耕之地，实行开垦屯种。再次，整顿喇嘛教寺院。此外，对青海地区的行政建制进行改革，改西宁卫为西宁府，下设两县一卫，任命副都统达鼐为首任办理青海蒙古番子事务大臣，管理青海一切政务。从此，使青海地区完全置于中央政府的直接统治之下。　(张正明)

年羹尧之狱

雍正三年(1725)，雍正帝胤禛治罪封疆大吏年羹尧的历史事件。

年羹尧(? —1726)，字亮工，号双峰，汉军镶黄旗人，康熙进士，历任内阁学士、四川巡抚、四川总督等要职。在康熙朝诸皇子争储斗争中，支持皇四子胤禛。胤禛即位初，年羹尧以川陕总督控制着西北，在为胤禛防范政敌并握有兵权的皇十四子允禵方面有着特殊作用。胤禛即位后年羹尧即成为新政权的核心人物，雍正帝胤禛对年羹尧也宠幸非常。当皇十四子允禵被雍正帝召回京师后，年羹尧便受命总管西北军事。不久，被任命为抚远大将军率师征讨青海厄鲁特蒙古罗卜藏丹津的叛乱。平定叛乱后，封为一等公，威震西北，兼领云南，成为没有封王的西北王。此后，年羹尧恃功尊大，结党营私贪赃枉法，甚至对皇帝"无人臣礼"，渐为雍正帝所厌弃。由于年羹尧权势甚重，又曾有功于胤禛，故雍正帝对年羹尧的处理采取了逐渐打击的办法。首先，采取分化瓦解策略，使年羹尧的亲信王景灏、李维钧等大臣与年疏远，与年关系较一般的官员如李成龙等及早警觉，不再追随

年。接着，开始对年动手，先将年调离陕西，交出抚远大将军印信，改任杭州将军。官吏们看出年已失势，于是上疏揭发年羹尧者不断。雍正三年六月，雍正帝对年氏子弟和亲信进行治罪，将年子大理寺少卿年富、副都统年兴、骁骑校年逾，削籍夺官，对年氏亲信南赣总兵黄起宪、四川按察使刘世奇等，或削籍，或籍没资产，或罚修河工。七月，革年羹尧的将军职，以闲散将军安置杭州。九月，逮捕年。十二月，议政大臣罗列年氏罪行92条。雍正帝声称其中应服极刑和立斩之罪有30余条。后令年羹尧自裁，其父年遐龄、兄年希尧革职，子年富斩立决，其余15岁以上子发遣广西、云南、贵州充军。雍正帝通过制裁年羹尧，进一步巩固了自己的帝位。（张正明）

《中俄布连斯奇条约》的签订

清雍正五年(1727)，中俄双方有关中段边界谈判和签订条约的历史事件。

《中俄尼布楚条约》签订后，使得沙俄政府对黑龙江流域的侵略有所收敛。而条约中有关中俄双方进行贸易互市的规定，又使得俄国通过向中国贸易来攫取高额利润。当时，俄国的对华贸易主要采取国家商队形式，禁止私商参与。商队主要向中国输出毛皮，向中国购买大量丝绸、布匹、药材。俄国商队大致二三年来华一次，贸易商队多达四五百人。同时，沙俄政府在《中俄尼布楚条约》签订后，加紧了从中段进行侵略的步伐。由于俄国对中国北部蒙古地区的骚扰日益严重，清政府多次向俄方提出交涉，但毫无结果。在被迫无奈的情况下，清政府于康熙五十八年(1719)起，暂时停止了对俄单方有利的贸易。康熙五十九年，俄国政府派特使伊兹玛依洛夫来北京，交涉恢复中俄之间的贸易。康熙皇帝多次召见伊兹玛依洛夫，一再表明中国方面的和平意愿，希望两国在中段地区划界，以保持边界安宁。伊兹玛依洛夫回国后，沙俄政府不但不答复中国政府提出的划界问题，反而在我国西北地区挑起民族纠纷，并诱迫厄鲁特蒙古准噶尔部首领噶尔丹投奔俄国。清政府被迫于康熙六十一年再次宣布终止中俄贸易，驱逐俄国在华商队。停止沙俄对华贸易，对沙俄来说在经济上有着巨大损失。雍正三年(1725)，沙俄政府为维护其经济利益，派出以萨瓦·符拉迪斯拉维奇为首的使团出使中国，谈判解决边界和有关贸易问题。次年，萨瓦·符拉迪斯拉维奇到京。清政府派吏部尚书察毕那、兵部侍郎图理琛、理藩院尚书特古忒为代表与俄方进行谈判。中俄双方在北京谈判中未能达成具体协议，商定在波尔河继续进行边界谈判。雍正五年五月，中俄双方在波尔河畔举行勘分边界谈判。沙俄方面仍以萨瓦·符拉迪斯拉维奇为首席代表，中国方面首席代表先是隆科多，后改由策凌。经过两个月的谈判，最后，清政府作出了让步，双方在雍正五年七月十五日签订了《中俄布连斯奇条约》。条约规定了中俄中段边界：自额尔古纳河沿布尔古特山等处至博木沙毕鼐岭(即沙宾达巴哈，位于唐努乌梁海地区西北端)为两国边界。并定恰克图为互市之场所。签约后，中俄双方派出界务官，勘分了中俄中段的整个边界，设置了界标。不久，又订立《阿巴哈依图界约》，确定了从恰克图向东至额尔古纳河的边界；订立《色楞额界约》，确立了从恰克图向西至沙宾达巴哈的边界。《中俄布连斯奇条约》的签订，对沙俄政府十分有利，使他们夺取了中国的大片领土。对于清廷来说，通过条约确定了中俄中段边界的划分，有利于清朝进一步加强对北部边疆的防御和管理。（张正明）

隆科多之死

雍正六年(1728)雍正帝治罪帮助他即位的大臣隆科多的历史事件。

隆科多(？—1728)，满洲镶黄旗人，佟佳氏，康熙皇帝之孝懿仁皇后弟。初授一等侍卫，后擢理藩院尚书、步军统领，握禁中兵权。康熙帝去世后，帮助外甥皇四子胤禛继位，与年羹尧同成为胤禛新政权的核心人物。胤禛即位后，备受宠遇，称舅舅，授公爵，总理事务大臣，任吏部尚书，兼步军统领，后又兼管理藩院事，赐太保加衔，双眼孔雀花翎，四团龙补服，鞍马紫辔，赞为“当代第一超群拔类之稀有大臣”。隆科多尽管作为心腹重臣，专断揽权，但他又认为“白帝城受命之日，即是死期已至之时”，觉得雍正帝不会永远信任他，所以在许多事情上留有后手。他知道雍正帝好抄家，就把财产分藏到亲友家。他认为按照自己与皇帝的关系不宜任禁军头目，便在雍正二年主动提出辞去步军统领。尽管如此，雍正帝也难以容得隆的存在，只是分别轻重，把处理隆氏放在了处理年羹尧之后。雍正四年四月，雍正帝令隆科多与俄国使臣会议两国疆界，隆科多坚决要求俄国归还侵占中国的大片蒙古地区，维护了清朝的领土权。但在谈判中，隆科多因被揭发私藏《玉牒》底本，被雍正帝逮捕回京。隆走后，其他代表未能坚持维护国家利益的原则，对俄国作了许多让步，签订了《中俄布连斯奇条约》，使中国失去了大片土地。所谓《玉牒》就是皇室宗谱，隆科多私藏为大不敬罪。雍正帝为了治罪隆

科多，便抓住此事不放。是年十月，由诸大臣议隆科多罪行 41 条。雍正帝便将隆科多永远圈禁，并从其家产中追补赃银数十万两，夺其长子岳兴阿一等阿达哈哈番世爵。六年六月，隆科多死于禁所。隆科多之狱，实质上是封建君王与大臣的权力分配的矛盾。雍正帝通过清除擅权大臣，而进一步达到了集权皇帝的目的。（张正明）

雍正朝改土归流

清代雍正年间在西南少数民族地区废除土司制度为中央委派流官进行统治的历史事件。

我国西南部的云南、贵州、广西、四川以及湖南等地区，历来是少数民族聚居区，自元明以来，一直采取土司制度统治这些地区。所谓土司制度是指土司与土官两种制度而言。土司是指宣慰司、宣抚司、安抚司等，这些官爵虽受封于中央政府的皇帝，实际上是割据一方的地方政权；土官是由少数民族头人担任的土知府、土知州、土知县等官职。这种土司制度，在其创建之初，有其可行的一面。但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阻碍着与中原地区政治、经济、文化的联系，不利于多民族国家的统一。因此，从明朝开始，已在一些条件成熟的地方，实行流官代替土司制度。入清以后，随着中原与边远地区政治、经济关系的发展和清朝统治力量的增强，落后、封闭的土司制度已不适应形势发展的要求，于是改土归流提到了议事日程上。雍正四年(1726)云贵总督鄂尔泰上疏请求实行改土归流。雍正皇帝批准，并于雍正六年颁铸给他云南、贵州、广西三省总督大印，命他进行大规模的改土归流。改土官为流官，废土司为府、州、县的工作，损害了土司的利益，遭到了一些土司的激烈反对，并引起了一些土司的武装叛乱。鄂尔泰针对各地不同情况和土司们对改流所持的不同态度，采取和平招抚和武力镇压手段。大致上，在广西、四川和湖广多采招抚手段，在云南、贵州二省则曾大规模用兵。到雍正九年，改土归流工作初步完成。改土归流措施伴随着民族压迫的因素，清军在平定土司叛乱中烧杀抢掠，给少数民族带来了灾难。但是从历史的长远观点看，改土归流是有进步作用的，它打击和限制了土司的割据势力和特权，加强了中央和地方的联系，巩固了国家的统一，发展了各族人民之间的经济、文化联系，有利于少数民族地区生产的发展和人民生活的改善。（张正明）

平定噶尔丹策零之乱

雍正年间，清政府平定准噶尔部首领噶尔丹策零发动的武装叛乱。

噶尔丹策零(？—1745)，厄鲁特蒙古准噶尔部首领策妄阿拉布坦之子。雍正五年(1727)，策妄阿拉布坦死，袭父职为本部首领。噶尔丹策零继续奉行其父策妄阿拉布坦的政策：一方面，对于不断向南扩张的沙俄殖民主义者，采取坚决抵制的态度；另一方面，又不断向东部喀尔喀蒙古地区扩张，并屡次派兵骚扰喀尔喀蒙古。特别是藏匿反叛清朝的青海和硕特蒙古叛军头目罗卜藏丹津，激化了与清廷的矛盾。雍正七年，清廷命领侍卫内大臣傅尔丹为靖边大将军、川陕总督岳钟琪为宁远大将军，准备分别从北、西两面合击噶尔丹策零的军队。噶尔丹策零闻讯惊恐，特遣使赴京，声称本欲将罗卜藏丹津解送清廷，但听说清兵出动，暂行中止，如果能赦其既往，仍愿听从清廷命令，解送逃犯。清政府决定放弃立即出兵的计划，而缓兵一年。就在这时，噶尔丹策零采取先发制人战术，突然出兵 2 万袭击清朝西路大军，清军损失很大，清政府与准噶尔贵族之间的关系进一步破裂。雍正九年，北路傅尔丹统率的清军进驻科布多。噶尔丹策零侦知后，命大策凌敦多布等率兵 3 万，越阿尔泰山，直犯北路。六月十七日，准噶尔军先遣哨骑佯为被擒，诡供有兵 1000，驼马万余，在博克托岭，尚未立营防守，且大策凌敦多布途中患病，诸将不和。傅尔丹勇而寡谋，轻信供言，驱兵往袭。二十日，大策凌敦多布等诱傅尔丹军至和通泊(今科布多西 200 里处)。二十一日，谷中胡笳远作，毡裘四合，伏兵 3 万，驰骋冲突，傅尔丹前锋 4000 人被围。准噶尔军以逸待劳，以众击寡。傅尔丹军前锋统领丁寿、参赞苏图、副都统马尔寿等虽经力战，终至败殁。二十三日，准噶尔兵直犯大营。傅尔丹命索伦、科尔沁蒙古兵迎击。蒙古兵先大遁，索伦兵遂大溃。傅尔丹率领满洲兵 2000 且战且退，于七月初一日还科布多。是役副将军巴赛、查纳弼以下皆战死，全军失利。岳钟琪得傅尔丹败报后，于七月十二日由巴尔库尔起行，进攻乌鲁木齐，在阿尔木克河地方略有斩获，追至纳邻河，探知准军遁，旋回兵。岳钟琪的这一军事行动，有力地牵制了噶尔丹策零的军队，才使傅尔丹军摆脱困境，免遭覆灭。清廷旋降傅尔丹为振武将军，以顺承郡王锡保代北路军统帅，移科布多营于察罕叟尔(乌里雅苏台附近)。又命绥远将军马尔赛统兵 1.4 万人移守扎克拜达里克城，与察罕叟尔大营

相犄角，以扼准噶尔军由山南东犯之冲。雍正十年七月，噶尔丹策零派小策凌敦多布率3万骑劲旅，由北路东驰，绕避科布多察罕叟尔大营，潜越杭爱山，掠喀尔喀蒙古地区黄教教主哲布尊丹巴呼图克图驻地，时哲布尊丹巴已徙帐多伦泊，噶尔丹策零军空无所获。八月初，小策凌敦多布侦知喀尔喀亲王额驸策凌率军赴乌里雅苏台东南之本博图山，遂潜袭塔米尔河额驸策零牧地，掠其子女牲畜。额驸策零闻报，即断发誓天，麾师驰追。额驸策零一面急报大将军锡保派援师截击，一面派哨骑侦察虚实，亲自率2万骑绕道出山背。初五日黎明，突袭准营。小策凌敦多布兵不及弓，马不及鞍，仓皇溃逃。日暮，额驸策凌率军追至鄂尔浑河边之光显寺（即额尔德尼昭），此地左阻山，右限大水，准军无路可走。额驸策凌督骑横冲，击杀万余，尸满山谷，河水尽赤。小策凌敦多布乘夜突围，自推河逃出西窜。在这次光显寺战役中，清政府以额驸策凌战功卓著，晋封他为超勇亲王，赐黄带，封其子车布登扎布为辅国公。光显寺一战，准噶尔部因损失惨重，元气大丧，转而倾向与清廷议和。从雍正十二年到乾隆四年（1739），双方派人几经交涉，终于划定喀尔喀蒙古与准噶尔部的牧区界限，即以阿尔泰山为界，准噶尔部在山后游牧，不得越阿尔泰界东；喀尔喀蒙古在阿尔泰以东游牧，不得越过界西。清政府与准噶尔部割据势力的矛盾，暂时得到了缓和。　　（张正明）

杜尔伯特蒙古内迁

乾隆年间，杜尔伯特蒙古反对准噶尔部贵族分裂割据，举部内迁的历史事件。

杜尔伯特蒙古为厄鲁特蒙古四部之一。16世纪末，厄鲁特蒙古和硕特、准噶尔、杜尔伯特、土尔扈特等四部结成松散的部落联盟，游牧于天山以北，阿尔泰山以南，巴尔喀什湖以东、以南广大地区。杜尔伯特蒙古姓绰罗斯，与准噶尔部有着亲密的血缘关系。17世纪初，准噶尔部势力逐渐增长，到巴图尔珲台吉统治准噶尔部时，厄鲁特联盟内部矛盾日益尖锐，原游牧于塔尔巴哈台的土尔扈特部被迫西迁到伏尔加河下游游牧。接着，和硕特部首领顾实汗因与巴图尔珲台吉发生冲突，也率其部离开原来的乌鲁木齐牧地，向东南迁到青海一带。杜尔伯特部因与准噶尔部同族，仍然同游牧于阿尔泰地区。准噶尔部噶尔丹等上层贵族发动叛乱时，杜尔伯特部倾向于国家统一，与清朝中央政府保持着经常的朝贡关系。早在顺治十四年（1660），杜尔伯特部已遣使向清政府进贡马匹。康熙三十三年（1694），附牧于噶尔丹的杜尔伯特台吉巴拜，因噶尔丹"强取其戚属"，归附了清朝。康熙三十六年，被噶尔丹裹胁参加叛乱的杜尔伯特台吉车凌，知噶尔丹不足恃，率其臣属250余户内徙，投奔了清朝。噶尔丹死后，准噶尔部贵族为争夺汗位，发生了内讧。噶尔丹侄策妄阿拉布坦离开阿尔泰地区，移至额尔齐斯河流域游牧，杜尔伯特部从之。乾隆十八年（1753），长期遭受准噶尔部贵族排挤欺凌与控制的杜尔伯特部，因深受准噶尔部统治集团混战之苦，决定为维护本部的生存，与准噶尔部割据势力彻底决裂并坚决斗争。是年冬，杜尔伯特部的三位台吉，即车凌、车凌乌巴什、车凌蒙克，率其部属3700余户，挣脱准噶尔部割据势力的羁绊，离开多年游牧的额尔齐斯河流域，向内地迁移。他们扶老携幼，驱赶着成群牲畜，在后有准噶尔部达瓦齐追兵的情况下，用了19天的时间，由乌兰岭、乌英齐到达博东齐部，派出使者向巴颜珠尔克所驻清军报告了来意。清政府对杜尔伯特部三车凌的内迁极为重视，立即派员赍赏物往谕，并对其牧民生活、生产作了妥善安排，让他们暂时游牧于扎克拜达里克，并接济牛羊数千只，以解决他们的生活困难。乾隆十九年，清政府把杜尔伯特部编旗分佐领，正式命名杜尔伯特部为赛因济雅图盟，以车凌为盟长，车凌乌巴什为副盟长。同年五月，乾隆帝在避暑山庄接见了三车凌，并封车凌为亲王，车凌乌巴什为郡王，车凌蒙克为贝勒。乾隆二十年，又赐车凌亲王双俸，晋封为杜尔伯特汗，赐特古斯库鲁克达赖号，车凌乌巴什晋封为和硕亲王，车凌蒙克晋封为多罗郡王。清政府统一乌梁海后，又迁杜尔伯特部游牧于乌兰固木，使乌梁海游牧于科布多。从此，杜尔伯特部便在乌兰固木定居下来。杜尔伯特部在三车凌领导下举部内迁，对准噶尔部上层贵族割据势力是一次沉重打击，同时对清政府完成统一西北边疆的事业，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　　（张正明）

平定阿睦尔撒纳之乱

乾隆二十二年（1757），清政府平定厄鲁特蒙古阿睦尔撒纳叛乱的历史事件。

阿睦尔撒纳（1722—1757），辉特部台吉，厄鲁特蒙古和硕特部拉藏汗之孙，噶尔丹丹忠之子，准噶尔部策妄阿拉布坦的外孙。其母博托洛克为策妄阿拉布坦女，与噶尔丹丹忠结婚，先生子班珠尔，后又怀阿睦尔撒纳，及噶尔丹丹忠死后，博托洛克带着身孕改嫁辉特部台吉韦征和硕齐，生阿睦尔撒纳。乾隆十

年(1745),噶尔丹策零死后,准噶尔部贵族互相残杀,争夺汗位。乾隆十一年,噶尔丹策零的次子、13岁的纳木札尔嗣汗位。十五年,纳木札尔被其姐夫萨奇伯勒克所杀,立噶尔丹策零长子喇嘛达尔札为汗。乾隆十七年,阿睦尔撒纳与准噶尔部大策凌敦多布之孙达瓦齐联合,杀喇嘛达尔札,立达瓦齐为汗。此后,阿睦尔撒纳与达瓦齐之间又展开争夺汗位的残杀。乾隆十九年春夏之间,阿睦尔撒纳集聚军队6000人在额尔齐斯河源向达瓦齐发动进攻,达瓦齐也调集了大量军队,双方经过一场大厮杀之后,阿睦尔撒纳大败,率所部2万人投归清政府,清廷封其为亲王。清政府对准噶尔部的动乱十分关心。准噶尔部崛起西北,割据称雄,屡次兴兵进犯喀尔喀、青海、西藏,已成为清朝实现国家统一和安定的主要障碍。清廷为了解决这一问题,于乾隆二十年命班第为定北将军、阿睦尔撒纳为定边左副将军出北路;命永常为定西将军出西路,各率2.5万人,进军伊犁。在清军两路进攻之下,准噶尔军纷纷归降,达瓦齐军土崩瓦解,清军兵不血刃进抵伊犁。达瓦齐见大势已去,被迫逃往南疆,后被维吾尔族首领霍集斯擒获,押送清营。从此准噶尔割据政权结束。达瓦齐被俘后,乾隆帝赦其罪,封为亲王,住在北京。达瓦齐割据势力被平定后,阿睦尔撒纳图谋割据的野心逐渐暴露。他一心想当厄鲁特蒙古四部的总汗,同时遣人四出,招兵买马,竭力扩展割据势力,积极准备叛乱。清廷对阿睦尔撒纳的野心已有察觉,决定消患于未萌。乾隆二十年九月命他到热河避暑山庄入觐。阿睦尔撒纳看出清廷的用意,在途中逃回塔尔巴哈台,公开反叛清朝。当时,在北疆地区的清军大部分已经撤走,仅有班第、鄂容安所率500清军驻守伊犁处理善后。阿睦尔撒纳的叛乱,使清军措手不及、班第、鄂容安兵败俱死。将军永常拥兵数千屯乌鲁木齐,惧战退至巴里坤,致使天山南北变乱四起。不久,喀尔喀蒙古和托辉特部郡王青滚杂卜与阿睦尔撒纳相勾结,也举起了反清叛旗。清政府采取各个击破的策略,命成衮扎布为定边左副将军征讨青滚杂卜。乾隆二十一年十一月二十八日,成衮扎布在杭哈奖噶斯地方俘获青滚杂卜,后解京处死。二十二年,清政府命成衮扎布为定边将军,舒赫德为参赞大臣,出北路;命兆惠为伊犁将军,富德为参赞大臣,出西路,进剿阿睦尔撒纳。时准噶尔地区"瘟疫盛行,死亡相望",清军长驱直入,锐不可挡。阿睦尔撒纳在清军的进剿下,仓皇失措,逃往哈萨克。不久,又带领八名亲信逃往沙皇俄国。清军在夺得阿睦尔撒纳的大车中,发现有俄国勾引其"加入俄国籍"的四封信件。理藩院行文俄国,索要阿睦尔撒纳;但俄方加以拒绝。是年八月初九日,阿睦尔撒纳患痘症死。经理藩院再三要求,俄国于翌年正月,将阿睦尔撒纳尸体送至恰克图,并经理藩院遣官验尸。至此,清政府平定阿睦尔撒纳叛乱。

(张正明)

平定大小和卓木之乱

乾隆年间,清政府平定天山南路维吾尔族上层首领波罗尼都、霍集占兄弟发动叛乱的历史事件。

波罗尼都(? —1759),即大和卓木,霍集占(? —1759),即小和卓木,二人为叶尔羌(新疆莎车)、喀什噶尔(新疆喀什)封建主玛罕木特之子。其祖父阿布都什特为回部(维吾尔)首领。康熙十年(1678),准噶尔部首领噶尔丹发动反清叛乱,出兵占领天山南路,将阿布都什特扣押到伊犁。康熙三十五年,清政府平定噶尔丹之乱后,阿布都什特得以解脱,由清军护送其返归南疆叶尔羌,管辖南疆"回部"事务。阿布都什特死后,其子玛罕木特继位,因欲摆脱准噶尔贵族的控制,玛罕木特与其子波罗尼都、霍集占均被准噶尔部押解到伊犁禁錮起来。玛罕木特死,波罗尼都与霍集占兄弟仍被准部禁錮。乾隆二十年(1755),清军打败准部达瓦齐分裂势力,占领伊犁,波罗尼都与霍集占兄弟同时获释。清廷将波罗尼都送回南疆叶尔羌继续管辖"回部"事务,而留霍集占于伊犁,管辖伊犁地区的维吾尔事务。阿睦尔撒纳在伊犁发动叛乱时,霍集占助纣为虐,参与叛乱。清廷迅速平定阿睦尔撒纳之乱后,霍集占逃亡南疆,投奔其兄波罗尼都。清廷本想利用和卓木兄弟在宗教上的影响,和平统一南疆。波罗尼都原来也想"集回地各城人民,听候大皇帝谕旨",但霍集占欲图称汗,煽惑波罗尼都,使波罗尼都也参加了反清叛乱。乾隆二十二年五月,和卓木兄弟杀害了清政府派往南疆的使臣阿敏,据叶尔羌和喀什噶尔,称巴图尔汗,集众为乱。二十三年,清廷命雅尔哈善为靖逆将军、额敏和卓为参赞大臣,率满汉官兵万余人,往征大小和卓木。清军自吐鲁番进发,攻围库车。库车是通往"回部"的门户,乃清军必攻的战略要地,但库车城坚,不能骤取,断其水草,匝而围之。霍集占率兵数千,亲援库车。清军中途截击,霍集占军伤亡大半,退保库车城。由于清军未能趁霍集占入踞库车时机,发动强大攻势,聚而歼之,却因雅尔哈善"顿兵坐守",致霍集占趁夜突围而走。库车城被围三月之久,城守将阿布都克呼木率四五十骑夜遁,清军只得一空城。雅尔哈

善因贻误军机被撤掉军职，后被杀。清廷又命刚刚平定天山北路叛乱的伊犁将军兆惠率军南下，先攻叶尔羌。当时据守叶尔羌的军队有1.3万人，而兆惠军只有3000余人，孤军深入，攻城不下，遂至叶尔羌城东的黑水河之有水草处，结营自固，相持三个月。到乾隆二十四年正月初六，定边右副将军富德领兵援应，在清军内外夹击下，霍集占军大败。七月，清军又兵分两路，一路由兆惠统领进取喀什噶尔，一路由富德统领进取叶尔羌，每路兵员各1.5万人。和卓木兄弟在清军的进剿下，弃城逃走。兆惠和富德遂抚定喀什噶尔、叶尔羌。八月，清军追杀和卓木兄弟至巴达克山，和卓木兄弟被巴达克山首领擒杀。至此，大小和卓木发动的反清叛乱被清政府平定。乾隆二十七年，清廷于惠远城（新疆霍城南）设伊犁将军，统辖南北两路军政事务。又于乌鲁木齐设都统，统率乌鲁木齐、古城、巴里坤及吐鲁番等地驻军；于塔尔巴哈台设参赞大臣，统率塔城地区的驻军；于喀什噶尔设参赞大臣，总理回疆各地军政事务。清政府通过上述机构的设置，加强了新疆地区与清朝中央政府的联系，增强了清朝对西北地区的统治与边防，在客观上起到了维护国家统一和领土完整的作用。（张正明）

土尔扈特蒙古西迁及东返

土尔扈特蒙古移牧于伏尔加河流域下游及重返祖国的历史事件。

土尔扈特是我国厄鲁特蒙古四部之一，原为明代瓦剌后裔，清代称厄鲁特或卫拉特。16世纪末，厄鲁特蒙古有准噶尔、和硕特、杜尔伯特、土尔扈特四部，并形成了松散联盟，游牧于天山以北，阿尔泰山以南，巴尔喀什湖以东、以南广大地区。后来，准噶尔部势力增长，准噶尔部首领巴图尔珲台吉恃其强，企图兼并土尔扈特部，两部关系恶化。土尔扈特部首领和鄂尔勒克不愿屈从准噶尔部，决定分离出去。另外，16世纪末和17世纪初，土尔扈特西部牧地已达额尔齐斯河中游两岸草原。这时，沙皇俄国势力已扩张到西伯利亚，企图吞并厄鲁特各部及其牧地。沙皇俄国曾以厄鲁特部不入俄国籍为名，禁止土尔扈特部在额尔齐斯河流域游牧。后来，沙俄塔拉地方当局又要求厄鲁特各部首领发誓忠于沙皇，签订相应条约。但遭到了厄鲁特蒙古各部的拒绝，土尔扈特部为了摆脱沙俄的侵扰，便向西南方向移动。约17世纪30年代，土尔扈特部在和鄂尔勒克的率领下，联合部分和硕特和杜尔伯特部牧民，越过哈萨克草原，来到伏尔加河流域下游游牧。沙俄为了实现其向伏尔加河和顿河流域扩张的野心，又企图利用土尔扈特部和准噶尔部的矛盾，诱骗巴图尔珲台吉向土尔扈特部发动进攻，但遭到巴图尔珲台吉的拒绝。面对沙俄武力侵略的威胁，土尔扈特部积极进行斗争，并进攻俄国里海边的阿斯特拉罕城，但和鄂尔勒克不幸在攻城战中牺牲。和鄂尔勒克长子库尔岱青继承父位，他像其父一样不屈从俄国。但为了免遭沙俄的侵略，需要祖国的支持。清顺治三年（1646），库尔岱青亲自返回西藏，"熬茶供佛，谒达赖喇嘛"。顺治十年，又派使者向清政府"奉表贡"，表示对中央政府的隶属关系。土尔扈特部人笃信喇嘛黄教，敬奉达赖喇嘛，沙俄便对土尔扈特部众进行大规模的宗教迫害，企图让土尔扈特部人改信东正教。同时加紧对土尔扈特部政治上的控制和经济上的掠夺，强迫土尔扈特部与俄国订立了一系列不平等条约，以期控制土尔扈特部。又强征土尔扈特部牧民充当士兵，参加其对外的侵略战争。但是，土尔扈特部人民并没有屈服于沙俄的残暴统治，为了摆脱沙俄的民族压迫，他们"不断袭击俄国人"。17世纪末，土尔扈特人在阿玉奇汗领导下，不断掀起武装反抗，沉重地打击了沙俄在伏尔加河流域的统治，致使沙俄政府无法实现对土尔扈特部的彻底征服。土尔扈特部在汗下设有自己的权力机构，即由八名王公组成"札尔固"，他们实际上是汗手下的辅助大臣和助手，而且汗还握有大批军队，汗是不受外力操纵的军政首脑。同时，土尔扈特部还有自己的法令。这些都说明土尔扈特部一直保持着自己的独立性。土尔扈特部还进一步加强与清朝中央政府的联系。康熙时，土尔扈特部曾派使者由哈萨克到新疆，经准噶尔牧地到嘉峪关。康熙三十五年（1696），在清政府平定准噶尔部噶尔丹的叛乱中，土尔扈特部阿玉奇汗曾"遣宰桑以所部兵千"协助作战。康熙五十一年，准噶尔部策妄阿拉布坦割据时，阿玉奇汗又派使者绕道西伯利亚，由库伦（乌兰巴托）"达京师表贡方物"。清政府也派出了内阁侍读图理琛等人组成的使团前往伏尔加河下游探望土尔扈特部，图理琛一行出张家口，北上穿越察哈尔蒙古、喀尔喀蒙古，由楚库柏兴（色楞格斯克）进入西伯利亚，于康熙五十三年抵达阿玉奇汗驻地马奴托海附近，受到土尔扈特部众的热情接待。乾隆二十一年（1756），土尔扈特汗敦罗布喇什（阿玉奇之孙）又遣使吹扎布，假道俄罗斯返回祖国，向清朝政府表示土尔扈特部服从清朝中央政府领导的意愿。乾隆二十六年，渥巴锡（敦罗布喇什之子）继承土尔扈特部汗位。次年，叶卡特琳娜二世上台统治俄国。叶卡特琳

娜二世为维持其对俄罗斯帝国的统治，在封建贵族的支持下，加强了对全国广大农民的剥削和压迫。与此同时，也加紧了对土尔扈特部的控制和掠夺。为了镇压土尔扈特人的反抗，沙俄政府沿伏尔加河、乌拉尔河和萨马拉河流域，“修筑工事，包围汗国”。又派基申斯科夫作为大使，常驻土尔扈特部，监视土尔扈特部人的行动，改组“札尔固”，钳制渥巴锡汗的权力。更有甚者，强征土尔扈特人参加沙俄对土耳其的战争，凡“十六岁以上者尽行出兵”，企图通过这一阴谋的实施，“暗行歼灭”土尔扈特人。在这忍无可忍的情况下，土尔扈特人决心拿起武器进行反抗，返回祖国。起义之初，渥巴锡在一个秘密地点，召集了仅有策伯克多尔济、巴木巴尔、舍楞、达什敦杜克和大喇嘛洛桑丹增等五人参加的绝密会议，形成了起义领导核心。渥巴锡等原计划等到伏尔加河结冰之后，发动武装起义，携同左岸1万余户一道返回祖国。但这一年河冻迟，渥巴锡等因形势紧张，遂决定提前起义。乾隆三十五年十一月，土尔扈特人民举行了反抗沙俄压迫的武装起义，并开始踏上重返祖国的征程。沙俄政府获知土尔扈特部东走的消息后，立即派出大批哥萨克士兵紧紧尾追，同时对留在伏尔加河左岸的1万余户土尔扈特人严密防范，以防止他们追随渥巴锡渡河东返，致使这部分土尔扈特人始终未能返回祖国。土尔扈特人在前有哥萨克拦截，后有俄军尾追的形势下，开始了返归祖国的艰苦旅程。渥巴锡把3.3万余户近17万人的东进队伍组织起来，以巴木巴尔和舍楞率领一部分武装部队为开路先锋，妇孺老弱乘坐牛车、马车走在中路，两翼各有武装骑兵加以保护，渥巴锡和策伯克多尔济率领2万战士殿后。他们以8天的时间，通过伏尔加河和乌拉尔河之间的草原，把尾追的俄军远远抛在后面。在先头部队摧毁乌拉尔河流域的库拉金纳等要塞后，整个队伍穿过结冻的乌拉尔河，进入哈萨克草原。这时，外翼的一支土尔扈特部队遭到哥萨克的突然袭击，致9000名战士壮烈牺牲。之后，土尔扈特东进队伍来到奥琴峡谷，山口已被哥萨克抢先占领。渥巴锡组织了五队骆驼兵从正面进攻，策伯克多尔济则率领枪队包抄后路。这支哥萨克兵几乎被土尔扈特人全歼，从此哥萨克兵的拦截被彻底击溃。土尔扈特人到达吐尔盖河时，又战胜了哈萨克部队。乾隆三十六年五月，土尔扈特人进入中国境内，终于回到祖国。清朝政府得知土尔扈特部返回消息，十分重视，乾隆帝立即命令巴图济尔噶勒驰驿前往伊犁，协助“办理投诚土尔扈特事务”。接着又令土尔扈特部首领到避暑山庄朝觐，并初步指定了土尔扈特各部游牧地区和安排了接济马匹牲畜等事宜。随同渥巴锡归来的舍楞，原属土尔扈特部，当和鄂尔勒克率部西迁伏尔加河时，舍楞一支“附牧于伊犁境，为准噶尔属”，舍楞曾参与了准噶尔部达瓦齐与阿睦尔撒纳的叛乱，是清政府通缉之人。这次舍楞的归来，朝中有人“恐其有诡计”。经过分析，乾隆帝认为舍楞不可能怂动渥巴锡万里设计，断定归顺十有八九，遂决定接纳舍楞来归，声明“断不究其前罪，务与渥巴锡一体加恩”，顺利解决了舍楞归顺的问题。随后，渥巴锡通过伊犁将军，向清政府献出了玉器、自鸣表、瓷器、火枪、明朝所敕玉印等物，表示投归清朝的诚意。是年九月，渥巴锡等土尔扈特部首领到达承德，乾隆帝举行盛大宴会款待渥巴锡等人，并封渥巴锡为卓哩克图汗，策伯克多尔济为布延图亲王，舍楞为弼里克图郡王，其余人等也分别给予封爵。土尔扈特部到达伊犁者，仅有原起程人数之半，约七、八万人。他们长途跋涉，颠沛流离，几乎失去了所有的牲畜，返回祖国时已处于冻馁交迫之中。清政府从新疆、甘肃、陕西、宁夏及内蒙古等地抽调了大量物资供应土尔扈特部，计有：马牛羊20余万头，米麦4万余石，茶2万余封，羊裘5万多件，棉布6万多匹，棉花近6万斤，以及大量毡庐等，这些物资及时帮助土尔扈特人民渡过了难关。乾隆帝还亲自撰写了《土尔扈特全部归顺记》、《优恤土尔扈特部众记》两块碑文，立在承德普陀宗乘庙内，以志其事。乾隆三十八年和四十年，清政府对土尔扈特各部牧场作了规定：渥巴锡所领之地，称旧土尔扈特部，划分为南、北、东、西四路，分设四盟，各立盟长。南路在喀喇沙尔城（新疆焉耆）北裕勒都斯草原，置四旗，渥巴锡为盟长；北路在和布克赛里，置三旗，策伯克多尔济为盟长；西路在精河县一带，置一旗，默们图为盟长；东路在库尔喀喇乌苏（乌苏县）一带，置二旗，巴木巴尔为盟长。舍楞之领地称新土尔扈特部，划牧于科布多、阿勒泰地区，置二旗，舍楞任盟长。和硕特恭格部，游牧博斯腾湖峡（和硕县一带），置四旗，设巴图色特奇勒图盟，恭格为盟长。土尔扈特人反抗沙俄压迫和重返祖国的斗争，为我国各族人民反抗民族压迫和维护国家民族团结树立了良好的榜样，谱写了可歌可泣的辉煌篇章。

（张正明）

山东王伦起义

清朝乾隆三十九年（1774），山东王伦领导的反清斗争。

王伦，山东寿张县党家庄人，精拳棒，善医术，性慷慨，济危扶困，在乡民中威信很高。时山东、直隶一带很久以来在民间流传着白莲教，王伦所领导的清水教为其中一支。乾隆三十九年(1774)，山东寿张县年岁歉收，地方官却额外加征不已。王伦决定率教众于是年十月发动起义，后因走漏消息，官府将派兵搜捕，王伦在衙役中的教徒赶来通报消息，遂决定提前举事。是年八月二十八日，王伦率众起义，义军白布缠头，各带器械，趁夜攻入寿张县城，杀死知县沈齐义，占衙署，据城池，开粮仓。王伦自称"真紫微星"，设置元帅、先行、国公等官职。九月二日，义军攻克阳谷，击毙清游击赵福。随后，又克堂邑。旬日之内聚集义军2000余。起义军纪律严明，并将没收当铺财物分给贫苦人民，深受人民拥护。九月初七日，起义军攻克临清旧城。临清位于山东西北运河东岸，是清朝控扼漕运要地。起义军开典库，夺粮船，使清朝漕运梗阻。清军与义军交锋，战败，兵众四散奔溃，后总兵惟一、格图肯因之被斩。起义军占领临清旧城后，又挖掘地道，准备攻夺临清新城。起义军的胜利，使清朝统治者极为恐慌。清廷命大学士舒赫德、额驸拉旺多尔济、左都御史阿思哈等，统领健锐、火器二营等兵前往弹压，又命直隶总督周元理、河南巡抚何煟等率兵四面截击。舒赫德率军抵临清，向起义军进行反扑。起义军出城迎战，给清军以有力打击。后终因寡不敌众，被迫退守临清旧城。城破，起义军与清军展开巷战，王伦据屋死守，兵败，举火自焚死。王伦起义虽然只有一个月即被清军镇压，但它是清朝大规模农民起义的先声，它发生在清朝统治力量较强的山东运河沿岸，影响很大，是对清王朝统治的一次严重挑战。 (张正明)

台湾林爽文起义

清乾隆五十一年(1787)，台湾林爽文领导的反清起义历史事件。

林爽文，原籍福建漳州平和县人，家贫难以度日，乾隆三十八年随父迁居台湾彰化县大里杙庄，以农为业。乾隆四十七年天地会首领漳州人严烟渡海至台湾彰化传播天地会教义。次年，林爽文加入天地会，不久被推为彰化天地会首领。天地会有事相帮，团结互助，在贫民中很受欢迎，入会人数越来越多，发展很迅速。是年秋，官府派兵镇压天地会，到处焚烧村庄，抢掠人民，激起民怨。乾隆五十一年十一月二十七日，林爽文遂以"安民心，保家业"为号召，率众起义。翌日，攻克大墩官军兵营。二十九日，陷彰化，杀死知府孙景燧、知县俞峻，释放狱囚，打开仓库，用官府的武器装备起义队伍，林爽文自称盟主大元帅。十二月初六日，起义军攻克诸罗(嘉义)县城。初七日，再下淡水城(新竹)。十三日，庄大田在台湾南路起兵响应，攻陷凤山(高雄)，知县汤大奎自杀。起义军实行有利于安定社会秩序的措施，多次发出安民告示，大得民心，许多贫民纷纷加入起义军，起义军很快发展到10余万人。接着，林爽文率军南下，庄大田率军北上，会攻台湾府城，未克。清廷命闽浙总督常青、水路提督黄仕简、陆路提督任承恩率兵赴台增援。正月二十二日，清总兵官柴大纪夺占诸罗城。二月二十一日，清廷总兵官郝庄猷夺占凤山城。林爽文等不得不放弃攻打台湾府城的计划，回师北上，打败清军，再克彰化，包围诸罗。三月初八日，南路起义军庄大田用诱敌计，消灭清军3000余人，再克凤山城。清总兵官郝庄猷败回台湾府城，旋被清廷军前斩首。庄大田约林爽文再次联合攻打台湾府城。庄大田号称拥有10万大军，直逼府城10里之外。林爽文派起义军二三千人前往支援。这时府城清军士气低落，又因水土不服病者千余，起义军攻打府城胜利在望。但负责攻打府城南门的庄锡舍与清军暗中勾结，率2000人降清军，致使起义军登时哄乱，不得不撤离台湾府城。四月初四日，清廷以畏缩不前之罪将水路提督黄仕简、陆路提督任承恩革职逮问，命常青为将军，恒瑞、蓝元枚为参赞。八月初二日，清廷又将常青调任湖广总督，授福康安为将军赴台。又命海兰察为参赞大臣，普尔普、舒亮为领队大臣，恒瑞、蓝元枚、柴大纪仍参赞军务，并先后增调清军10万人，陆续驰赴台湾。十一月，被林爽文军围困近10个月的诸罗城，城中乏食，危在旦夕。是月初，福康安率援军至，从海兰察计策，佯言直抵大里杙，而阴趋诸罗，起义军措手不及，失利。初八日和初十日，海兰察和福康安率清军进入诸罗城，与守城清军柴大纪会合，诸罗围解。随后，清军进攻大里杙，义军战败，弃守大里杙。林爽文率众退至集集埔，不久，集集埔又为清军攻陷。林爽文等被迫走入高山族居住的深山密林中。乾隆五十三年正月初四日，林爽文等在老衢崎被福康安所派扮作民人之广东屯练兵俘获。福康安遂率军进入台湾府城。林爽文在敌人刑讯面前，"大义凛然，匿不吐供"，最后壮烈牺牲。林爽文军失败后，清军集中兵力进攻南路起义军，庄大田等顽强抵抗，终因力量对比悬殊，屡遭挫败。庄大田等被迫退入台湾最南端的琅峤。清军两路围住琅峤，庄大田被俘遇害。此后，林爽文的部属陈周全、陈光爱、陈容、黄朝

等又集合天地会员，在台湾各地起义，后也被清军镇压下去。　（张正明）

平定四川大小金川之乱

乾隆年间，清政府平定四川大小金川地方藏族土司叛乱的历史事件。

大小金川是大渡河上游的两个支流，地处四川西北部，因沿河诸山有金矿而得名。金川地区为藏族聚居之处，这里崇山峻岭，交通梗阻，气候深寒多雨雪。顺治七年(1650)，清廷授小金川的头人卜尔吉细为土司。康熙五年(1666)，清廷又授土司嘉勒巴"演化禅师"印。雍正元年(1723)，清廷以嘉勒巴之孙莎罗奔随岳钟琪进藏平乱有功，授为安抚司。莎罗奔自号大金川，而以旧土司泽旺为小金川。莎罗奔被授予安抚司后，势力日强，为了吞并小金川，以其女阿扣嫁泽旺为妻。乾隆十一年(1746)，莎罗奔劫持泽旺至大金川，并夺其印。后在四川总督的严令下，才不得不将泽旺释归小金川。乾隆十二年，莎罗奔进攻布什扎及明正两土司，四川巡抚纪山派军弹压，结果兵败。清廷调云贵总督张广泗为四川总督进兵金川，莎罗奔据险抵抗，致使清军阻险不前，师久无功。是年四月十一日，清廷命大学士讷亲赴川经略军务，旋起用已被革职的岳钟琪以提督衔随行。讷亲位高气盛，张广泗轻讷亲不知兵，遇事掣肘，故经略、总督不和。岳钟琪也密奏张广泗所用之向导良尔吉系莎罗奔派来之奸细。金川用兵，两易寒暑，无尺寸功。乾隆皇帝采取断然措施，将讷亲赐死，张广泗处斩，另派协办大学士傅恒为经略，统领金川军务。同时，选调各地军队入川。又拨内帑银10万两备傅恒赏军功。乾隆十四年，傅恒和岳钟琪两路清军，连克碉寨，军声大振。莎罗奔被困勒乌围，粮食将尽，欲降又恐被诛，因曾为岳钟琪部下，遂遣使至岳帐下乞降。岳请于傅恒，简从轻骑，径入莎罗奔驻地勒乌围，示以诚信。莎罗奔等随岳出洞至清营降。至此，持续两年多的大小金川之乱以兵不血刃而平定。后封傅恒忠勇公，封岳钟琪三等公并加兵部尚书衔。此后，大小金川仍属土司管理，而土司之间常有争斗。乾隆中期，大金川土司莎罗奔已老，由其侄郎卡主持土司事务。郎卡不断侵扰邻近土司。乾隆三十一年，清廷命四川总督阿尔泰征调大小金川周围九个土司的兵力，围攻大金川。阿尔泰未能以小金川等制约郎卡跋扈，却以苟且息事为策，并将安抚司大印交给郎卡。郎卡以其女嫁与泽旺之子僧格桑，以控制小金川。这样大小金川联为一起，其他小土司都不敢反抗，听命于两金川。不久，郎卡与泽旺死去。郎卡之子索诺木与僧格桑串通一气。乾隆三十六年，索诺木诱杀革布什咱土官，僧格桑攻扰鄂克什及明正两土司，并公然与清廷所派援军作战。而四川总督阿尔泰率军进剿大小金川，连年失利，至此又按兵打箭炉，半载不前。于是清廷先褫其总督职，后赐死。随后命大学士温福自云南赴四川督师，又以尚书桂林代阿尔泰为四川总督，一统军务，共剿叛军。温福率军由汶川出西路，桂林由打箭炉出南路。小金川僧格桑以割地为条件求援于大金川的索诺木，于是索诺木"潜遣兵助逆"。乾隆三十七年，桂林遣部将薛琮统兵3000，携五日粮，欲截小金川甲尔木后路，不意被其潜从后路抄截，被围于墨垄沟，致全军无援陷没，泅水还归者仅200余人。清廷将桂林褫职逮问，以阿尔泰署四川总督，以阿桂代桂林为参赞大臣。阿桂率军攻克僧格桑据守的美诺，僧格桑逃亡大金川。为了早日攻下大金川，清廷又命温福为定边将军，阿桂为副将军。乾隆三十八年六月，温福因山险碉坚不得进，便取别道攻昔岭，驻营大金川东境之木果木，并令提督董天弼分兵守底木达，以防守后路。温福筑碉卡以千计，2万士兵驻于碉卡，分散了兵力。索诺木出兵切断粮道，突然袭击木果木大营和各碉卡，温福战死，师遂大溃，小金川又失守。清廷又命阿桂为定西将军，丰升额、明亮为副将军，富德为领队大臣，富勒浑为四川总督，调集兵力，大举进军。阿桂率清军迅速攻下了小金川，集中兵力攻大金川。勒乌围(四川马尔康南)是大金川旧官寨，垣固碉高，位踞要害，索诺木据天险死守。清军兵分三路，夺山梁，占卡寨，逐近勒乌围。索诺木鸩死僧格桑，向清军献尸求降，阿桂不允，继续进攻。乾隆四十年八月，清军攻陷勒乌围，索诺木逃往刮耳崖(噶乐崖)。乾隆四十一年正月，清军包围刮耳崖，索诺木走投无路，率兄弟及大小头目等2000余人降。至是金川平，阿桂以平金川功晋一等诚谋英勇公，余各封赏有差。清廷两次出兵大小金川前后五年，先后从全国各地选调数万军队，动用帑银7000万两，最终平定了叛乱。清廷平定大小金川之乱，对于巩固国家统一，促进民族间的经济文化交流具有其积极意义，但在平叛中，大肆屠杀当地人民，充分暴露了清朝统治者民族压迫政策的本质。　（张正明）

击退廓尔喀入侵和订立西藏章程

清乾隆年间，廓尔喀统治者举兵侵藏，清政府派军击退廓尔喀军后，处理善后事宜，订立了《钦定西藏章程》。

乾隆四十五年(1780),班禅六世到热河觐见乾隆帝,受到清廷隆重接待,乾隆皇帝曾赏赐大量珠宝财物。班禅六世不久病逝,所遗财物俱归其兄扎什伦布摄政仲巴呼图克图掌握,其弟沙玛尔巴因未能染指这笔财物,而怀恨在心,潜赴廓尔喀(今尼泊尔),唆使其出兵劫掠扎什伦布财产。乾隆五十三年,廓尔喀统治者以税金过重和食盐掺沙为借口,举兵入侵后藏,攻陷宗喀(今吉隆)等地。清廷命理藩院侍郎巴忠等率兵入藏,但巴忠敷衍了事,令西藏地方当局与廓尔喀议和,廓尔喀退回侵占之后藏聂拉木、济咙、宗喀三处,许以每年给西番银元300个,作为地租。巴忠用"地租"买回了被占领土,却谎报廓尔喀已退兵,蒙骗清廷。乾隆五十六年,廓尔喀又兴兵索取"地租",旋陷济咙,占宗喀,侵踞扎什伦布(今日喀则),肆行抢掠,洗劫扎什伦布寺,班禅七世退居拉萨。败报驰至,巴忠闻变畏罪投水死。十一月,清廷授福康安为将军,海兰察、奎林为参赞大臣,统兵由青海入藏,反击廓尔喀入侵。次年,福康安率军于擦木、邦杏连获胜仗,继又克复济咙。又兵分两路:福康安率军由济咙直夺界隘热索桥;成德等统军,由聂拉木直奔关隘铁索桥。六月,福康安至廓尔喀关津热索桥,两崖壁立,前阻横河,敌卡御守,难以夺取。福康安派兵潜从上游缚木渡河,分兵三股,奇师袭敌。敌大败,遂占卡焚栅,夺桥前进。成德率军攻碉卡,踞山梁,强夺铁索桥。福康安和成德分军夺渡热索桥和铁索桥后,翻越雪山,攻隘夺卡,逼近廓尔喀都城阳布(尼泊尔加德满都)。七月初八日,廓尔喀国王拉纳·巴哈都尔愿归还所掠财物,承允今后永不侵犯西藏。九月初四日,清军全部由廓尔喀境内撤出,退回济咙。旋议征廓尔喀功,授福康安一等轻车都尉、武英殿大学士兼吏部尚书。十月,廓尔喀国王派使者入觐。福康安击退廓尔喀入侵后,鉴于西藏地方制度废弛,弊病很多,即遵照乾隆帝旨意,会同西藏大喇嘛及有关官员,共同议定西藏善后条例。乾隆五十八年正月,《钦定西藏章程》正式颁布。其主要内容是:(1)重新规定了驻藏大臣和达赖、班禅的职权和地位。驻藏大臣督办藏内事务,应与达赖喇嘛、班禅额尔德尼平等。(2)驻藏大臣有拣选西藏地方官吏之权力。(3)达赖、班禅和各地黄教呼图克图的转世,必须在驻藏大臣的监视下,按照"金奔巴"制度,以金瓶抽签来决定。呼毕勒罕(即转世灵童)长大后,须在驻藏大臣主持下,举行"坐床"典礼。(4)建立西藏地方常备军。(5)西藏对外交涉,俱由驻藏大臣主持。(6)西藏地方财政收支,俱由驻藏大臣稽查总核,并设立机构,铸造统一货币。清政府通过实施《钦定西藏章程》,加强了中央政府对西藏地区的管辖,密切了中原与西藏人民之间的关系,稳定了西藏的社会秩序。　(张正明)

马戛尔尼使团来华

清乾隆五十七年(1792),英国派遣马戛尔尼率使团来华,进行外交和商务交涉。

乾隆五十七年,英国政府派遣马戛尔尼率领使团一行700余人,携带天文、地理仪器、乐器、钟表、图册、毯毡、车辆、武器、船只模型等,价值1.3万余英镑,来与清政府进行外交和商务谈判。事前,英国东印度公司派人到广州通知两广总督。清政府不了解英国使团的真实意图,以为是英国派来的第一次"贡使",广州官员甚至说是为补祝乾隆皇帝80岁寿辰而来。因此,使团的来华受到清政府的重视,沿途给予照顾和迎送。五十八年六月十八日,马戛尔尼使团到达大沽,清政府派员迎接。到京后,除留一部分人在圆明园和皇宫安装仪器外,主要成员赴热河承德避暑山庄谒见乾隆帝。这时,双方为觐见礼节发生了争吵。清政府要求使团谒见乾隆帝时行跪拜礼,而使团拒绝这个要求。使团到达热河后,这一争执尚未解决。乾隆皇帝对此很不高兴,声称要减其接待之礼。最后双方商妥了一个折中办法,即马戛尔尼以见英皇之礼觐见乾隆帝,以单膝下跪,但免去吻皇帝手的礼节。是年八月初十日,乾隆帝在避暑山庄接见英国使团,马戛尔尼呈递了国书,乾隆帝赐宴并向英王和使团正副使节赠送礼物,又派大臣陪同使团游览了山庄,使团还参加了乾隆帝83岁生日的庆典,然后返回北京。清政府认为,进贡和祝寿已毕,英国使团已完成任务。但马戛尔尼则认为他们来华的使命才开始,并向清政府提出了一系列要求,主要是:1、允准英国政府派人驻京;2、通市宁波、舟山、天津、广东等地,并减关税;3、在舟山附近划一未经设防小岛,归英商使用,且可居住;4、英国商货,自澳门运往广州者,予以优待免税或减税;5、英国船货按中国所定税率交税,不额外加征。英国使团所提要求,具有殖民主义侵略的性质,特别是要求中国割地,当然遭到了清政府的拒绝。尽管清政府对世界形势极不了解和妄自尊大,但拒绝英国政府割地要求无疑是正确的。马戛尔尼在北京交涉未获结果。九月初三日离北京,沿运河南下,抵杭州。又从杭州到广州。自北而南,穿行70余天。十二月初九日从广州乘船回国。马戛尔尼使团要求与清政府建立外交和商业联系的目的虽然未能达到,但他们通过实地观察、同中国官员

谈话等，搜集到大量有关中国政治、经济、文化、国防、军备等情况，从而得出清帝国已是一艘破烂不堪的头等战舰的结论，为英帝国以后入侵中国提供了情报。（张正明）

川湘黔苗民起义

清朝乾隆六十年（1795）至嘉庆十一年（1806）间，川、湘、黔苗民反抗清朝政府和汉族官吏压迫、剥削的斗争。

四川东北、贵州东、湖南西接壤之处，历来为苗、瑶族聚居地区。自雍正年间（1723—1735）实行"改土归流"以后，苗族旧贵族的剥削、压迫有所减轻，但是清朝政府和汉族官吏的压迫却越来越重。他们在广大苗区实行高压政策，苗民稍有"不法"，立即被搜捕；苗民稍有反抗，马上"剿灭"。为了控制苗民，清政府强制"苗汉杂居"，由汉族官吏监视苗民的一举一动。他们又在广大苗区编保甲、立寨长，实行连坐法。官吏和乡绅还通过高利贷盘剥苗民，利息是一年翻几番，逼迫苗民拿田地"折算"。原来是苗民的田地，逐渐多被满、汉官绅所侵吞。以至"苗众转致失业，贫难度日者日众"，造成了以清王朝为代表的满汉地主阶级与广大苗民的尖锐对立。乾隆五十九年（1794）末，贵州松桃厅（松桃苗族自治县）大塘汛大寨营苗民石柳邓、湖南永绥厅（花垣）黄瓜寨苗民石三保等，于凤凰厅鸭保寨百户吴陇登家歃血为盟，秘密集会，决定于次年正月十八日同时起义，并提出了"逐客民（满汉官绅）、复故土（夺回被占田地）"的口号。不料起义计划被汉族地主察觉，于是石柳邓率领松桃苗民提前于十三日发动起义，一举攻占大塘、长行铺等地，树立起反清起义大旗。接着，湖南永绥厅石三保、凤凰厅吴半生、乾州厅吴八月及保靖县各寨苗民也纷纷起事，分头攻打永绥、乾州。清永绥副将伊萨纳、镇算（凤凰县）总兵明安图被起义苗民击毙，起义军声势大振。不久，石柳邓率领的贵州苗民起义军与湖南石三保的起义队伍在黄瓜寨会合。起义军声势浩大，提出了"打到黄河去"的战斗口号。清朝政府大震，派云贵总督福康安、四川总督和琳、湖广督抚和湖南提督合兵镇压，并以福康安为主帅，和琳为随军参议，统领全军。苗民起义军充分依靠群众和有利地形，同各路来攻的清军进行了顽强的斗争，灵活地运用"官有万兵，我有万山；其来我去，其去我来"的流动战术，给清军以有力打击。随后，起义军进行整顿，在乾州平陇建立起各部起义军的统一领导机构，吴八月为苗王，石柳邓、石三保为将军，斗争方兴未艾。不料鸭保寨的吴陇登，在福康安的收买下叛变投敌。吴陇登以擒献起义军首领为降清进见之礼，与清军暗中勾结，先后将起义军首领石三保的幼子、主要领导人吴八月献与清军，使起义军受到重大损失。嘉庆元年（1796），川、楚、陕白莲教起义，石三保决定打通湖南，与湖北的白莲教起义军联合，但这一计划遭到清军破坏，未能实现，石三保也被叛徒出卖而惨遭清军杀害。清军的攻击力量全部投入了起义军的最后根据地平陇镇，石柳邓率众展开了英勇的保卫战，一直坚持了三个月，给清军以重大创伤。最后，石柳邓在战斗中受重伤，壮烈牺牲，平陇被清军攻陷。石柳邓牺牲后，大规模的苗民起义虽被镇压下去，但各地苗民的反抗斗争仍然此起彼伏，直到嘉庆十一年十二月才被清军镇压下去。吴八月等领导的苗民起义，前后经历了12年，沉重地打击了清朝在湘西、黔东和川东北广大地区的统治，有力地配合了川、楚、陕三省的白莲教起义。（张正明）

川楚陕白莲教大起义

清嘉庆元年（1796）至十年间，在四川、湖北、陕西三省交界地区爆发的白莲教反清起义。

白莲教是由摩尼教、弥勒教、道教、佛教等各种宗教混合演变而成，其历史可追溯到唐宋或更早一些。白莲教组织在清代分布很广，尤其直隶（河北）、山东、山西、湖北、四川、陕西、甘肃、安徽等省最为活跃。川、楚、陕三省边境，包括陕西南部至湖北西北部的"南山老林"，陕西、四川、湖北交界的"巴山老林"地区，这里群山起伏，千峦万壑，森林茂密，广袤辽阔。从明朝中后期，就不断有许多贫苦破产农民迁徙到这里，垦种荒山。到清代乾隆朝，川、楚、陕、豫、皖等省贫民也多来这里垦荒，当时流落到这里的贫民达数百万人，白莲教则在这些贫民中广为传布。由于白莲教是一个反抗封建统治阶级的秘密组织，直接威胁着清王朝的统治，所以清王朝对白莲教组织一直采取残酷镇压手段。乾隆五十九年（1794），襄阳地区白莲教首领齐林、王聪儿、宋之清、樊学明等商定于正月元宵灯节，趁万民观灯，官府疏于戒备之机举行起义，并派出人员到湖北各地，串联各地教众届时响应。不幸事泄，齐林、宋之清等人惨遭清廷杀害，王聪儿藏身于襄阳郊区青莲庵的尼姑庙中，幸免于难。不久，湖北各地教众秘密商议在嘉庆元年（1796）三月同时举行起义，但由于清政府搜捕白莲教徒非常严酷，湖北教众又决定提前行动。嘉庆元年正月初七，在湖北宜都、枝江交界的温泉窑一带爆发了张正

谟、聂杰人等领导的起义，揭开了这次大起义的序幕。接着，松江的刘盛鸣、长阳的林之华、覃加耀、黄廷柱，宜都的曾广宁等率领教徒相继起义响应。二月十五日，当阳教众在杨起元、熊道成、陈德本的领导下，杀掉县令，占领县城。紧接着曾士兴等攻破竹山、保康两县城，杨之敖起于来凤之小坳，谭贵起于旗鼓寨。三月初，襄阳、樊城一带人民在王聪儿、姚之富、王廷诏、刘启荣、樊人杰、张汉潮、张天伦、王光祖、高均德等领导下，在襄阳郊区黄龙垱揭竿而起。二十九日焚烧吕堰驿，攻樊城。五月，孝感人民在樊金贵、鲁维志等领导下起兵响应。襄阳起义军在湖北各路起义军中人数最多，战斗力最强，在白莲教师徒中辈分最高，是湖北各路起义军中的主力。清政府急忙调兵遣将，湖广总督华源、湖北巡抚惠龄、西安将军恒瑞等相继出动，分路攻堵白莲教军。起义军在陈家河设下埋伏，大败清兵后，北走鄂豫陕边境。起义军在战斗中逐渐摸索到流动作战的战术，使清军虽然集中很大兵力，却不能捕捉和扑灭起义军的主力。湖北白莲教起义很快蔓延到四川、陕西、河南等省。嘉庆元年十月，四川达州爆发了徐天德、王登廷领导的起义。东乡(宣汉)爆发了冷天禄、王三槐领导的起义。接着又爆发了太平孙赐俸、龙绍周等人领导的起义。十一月，冯得状、林开泰、翁禄玉也在陕西安康、米溪发动了起义。十二月罗其清、苟文明、冉文俦、鲜大川、冉天元等人分别在四川巴州、通江等地起义。不到一年，湖北、四川、陕西到处燃起起义烽火，清军顾此失彼，连吃败仗。各地起义军还纷纷建立了自己的政权，自立年号，任命官吏。湖北襄阳起义军以"万利"纪年，设大丞相、都督、知府、知县等文职及元帅、先锋、总兵等武职。清政府为了镇压这次起义，除纠集湖北、四川、陕西、河南的军队外，并从山西、直隶、两广、山东、黑龙江、吉林、盛京(辽宁)等省调来大批清军进行镇压。嘉庆元年四月开始，清廷首先集中兵力，由明亮、鄂辉、庆成等率领包围湖北襄阳起义军。襄阳起义军在王聪儿、姚之富领导下展开英勇斗争，并几次猛攻襄阳、樊城；后由于守军顽强抵抗，未能攻下，接着分路转战于河南、湖北交界区。起义军又派出一支部队出随州(随县)，经安陆，攻占孝感，使武昌震动，宣布戒严。后因遇到大水，起义军被迫停止进攻。由于起义军与清军力量对比悬殊，为了保存有生力量，起义军于嘉庆元年八月从襄阳地区突围到钟祥。是月下旬，王聪儿、姚之富率5万起义军在钟祥粉碎了清军"四面夹攻"，突围北上。九月，在双沟分成二路：一路向东南，由王聪儿、姚之富率领2万多义军，从枣阳赴唐县；一路向西北，由张汉潮率领2万多义军，由白河西上经吕堰驿赴邓州，不久又折东南与王聪儿会合。嘉庆二年正月，襄阳起义军到河南。起义军为了分散清军兵力，二月初在河南滹沱镇(湖河镇)分成三路。北路由王廷诏、高均德率领从桐柏出发，经叶县、裕州，挺进到陕西商南一带。西路由李全、樊人杰率领从桐柏进军信阳，三月又返回湖北应州(应山)、随州，不久又进入河南，往信阳、确山沿楚豫边界经淅川、卢氏、内乡，由武乡进入陕西，在商南与北路会合，经郧西、郧阳挺进镇安。中路由王聪儿、姚之富率领往南阳、嵩县、山阳、郧西、孝义厅等地到镇安，三路起义军胜利会师。清军为了追剿义军，也分成三路，分别由惠龄、景安、庆成率领，尾追起义军。襄阳起义军会师后，开始向四川进军。起义军从镇安出发，沿汉水北岸经洵阳、安康于嘉庆二年五月在紫阳渡过汉水。起义军胜利渡过汉水，为进军四川铺平了道路。清廷责怪清将惠龄无能，下令夺惠龄官阶、世职、花翎，降为领队。起义军渡汉水后，又分成三路，时分时合，于六月二十三日在东乡(宣汉)与四川起义军会师。东乡会师后，起义队伍更加壮大，经各路起义军共同协商，决定按地区进行分编，以黄、蓝、青、白等各色为号。湖北襄阳起义军以王聪儿、姚之富为首称襄阳黄号，包括王光祖、樊人杰、伍金柱、辛聪、辛文、庞洪胜、曾之秀、齐国谟、王廷诏等各部；高均德、张天伦为首领称襄阳白号，包括宋国富、杨开甲、高二、高三、马五、王凌高、辛斗、魏学盛、陈国珠、高见奇、杨开第等各部；张汉潮为首领称襄阳蓝号，包括李潮、李槐、冉学胜、胡明远等各部；四川起义军徐天德为首领称达州青号，包括徐天寿、赵麻花、汪瀛、熊翠、熊方青、陈侍学等各部；冷天禄、王三槐为首领称东乡白号，包括张子聪、符日明、刘朝选等各部；龙绍周为首领称太平黄号，包括唐大信、龚健、徐万富、王国贤，唐明万等各部；罗其清为首领称巴州白号，包括罗其书、鲜大川、苟文明等各部；冉文俦、冉天元为首领称通江蓝号，包括冉天泗、王士虎、陈朝观、李彬、杨步青、蒲天宝等各部；林亮功称云阳月蓝部，包括林定相、张长更、萧占国、包正洪等各部；龚文玉为首领称奉节线号，包括龚其位、卜三聘、陈得俸等各部。襄阳起义军与四川起义军会师后不久，宜绵、明亮、庆成等率领清军从三面向起义军包抄。襄阳起义军决定离开四川返回湖北。嘉庆二年七月，襄阳起义军从东乡出发经云阳、万县、夔州白帝城沿长江东下，进军湖北。前路由王聪儿、姚之富率领经巴东、兴山到保康、南漳一带；后路由王廷诏

率领经远安、当阳后转到南漳与前路会师，然后攻襄阳不下，加之清军在湖北加强了防范，起义军在湖北很难落脚，只好转移，向西北陕西进军。襄阳起义军原计划把清军往房、竹一带引向南巴老林、乘机渡汉水，占据全陕。因汉水两岸清军防守严密，只好沿汉水西上。嘉庆二年十月，襄阳起义军在陕西安康（兴安）与李全带领的部分起义军会师，计划在勉县、宁羌之间渡过汉水，因当地驻有大批清军，只好折而向南，同时派高均德率领一支队伍折返宁羌，乘虚疾渡，把拥有重兵的清将明亮钳制在汉中一带。嘉庆三年二月，王聪儿、姚之富率领2万多起义军由西乡、洋县渡过汉水，北上攻下眉县、周至。又由李全带领一支义军从周至出发，向陕西西安进军，并有部分起义军到达西安近郊焦家镇圪（鸽）子村。后遭到清军的进攻，被迫撤军。王聪儿、姚之富率领起义军折向陕西东南，经山阳再入湖北。后来，襄阳起义军被明亮、德楞泰等率领的清军包围在郧西县三岔河一带。激战半日，起义军损失惨重，7000多人壮烈牺牲，王聪儿、姚之富跳崖牺牲，被俘的1000多义军也惨遭清军杀害。此后，襄阳起义的余部由李全、张汉潮、高均德、樊人杰领导继续坚持斗争。四川方面的起义军于嘉庆二年十一月分为两路，一路由冉文俦、罗其清率领进军巴州、仪陇、营山；一路由徐天德、冷天禄、王三槐领导继续坚持战斗。在起义军的沉重打击下，主持在四川镇压起义军的宜绵只好请求清廷增援。清廷命额勒登保总管四川军务，额勒登保向清廷提出把起义军引出老林地区，企图在川北聚而歼之的计划。嘉庆三年七月，王三槐被额勒登保诱捕，俘解京师，后被处死。十月，起义军与清军在营山县发生战斗。罗其清首先占领了大鹏山，冉文俦、徐天德等转战大竹、梁山等地为外援，清军则由额勒登保、德楞泰、惠龄、恒瑞率军包围了罗其清起义军。两军对峙三个多月，最后起义军因寡不敌众失败，罗其清被俘就义。次年正月，冉文俦在通江战役中壮烈牺牲。嘉庆四年正月，清朝对起义军实行“坚壁清野”、“边抚边剿”政策，宣布额勒登保代替勒保任清军镇压起义军最高统帅。三月初十日，冷天禄率领的起义军行至顺庆府广安州城头堰，遭到额勒登保所率清军的抄截，冷天禄率军突围，被箭伤额、身中乱矛，力竭而死。嘉庆四年十一月，额勒登保集中清兵主力，将冉天元义军包围于苍溪。冉天元英勇善战，在义军中有很高威信。额勒登保令参将杨遇春、穆克登布从左右两翼合围攻击，同时分队迂回绕袭。战斗开始，穆克登布恃勇前进，绕至义军占据的山头前方，杨遇春则袭义军山后。起义军冉天元率部自山巅下冲，直压穆克登布后帐，并以全力攻击额勒登保的指挥营，打乱了清兵的部署，使其指挥失灵。起义军四面出击，打得清兵四处逃窜。起义军在这场战斗中，取得了巨大的胜利。义军冉天元得以率部从容向巴州、开县一带转移。刚刚上任的清军统帅额勒登保打了这一败仗后，不得不向清廷“具奏请罪”。与此同时，王廷诏、杨开甲率领的义军经陕西城固进入甘肃，接着徐天德率领一支起义军进入湖北。嘉庆五年正月十五日，冉天元趁额勒登保赴陕甘作战，川境空虚，联合各路起义军由定远县的石板沱夺渡嘉陵江，进入川西，攻打蓬溪县城，在高场院包围了清军，杀死总兵朱射斗。此后，冉天元率军北上梓潼、剑州，德楞泰率清兵自广元南下，占据龙安各要道。双方在白家坝发生遭遇战，经过激战，各有损伤。嘉庆五年三月，起义军与清军又在江油马蹄岗展开决战。起义军利用伏兵击败清兵，清兵统帅德楞泰率数十亲兵，下马据山巅，以为必死。冉天元率众登山，直取德楞泰，不意冉天元坐骑突然中箭，跌入山涧，不幸被俘遇害。起义军失去指挥，溃不成军，反而转胜为败。最后，突围的1万多起义军分为二支，一支过潼江与北上陕甘的起义军会合，一支留在川西坚持斗争。经过几次激烈斗争，起义军大伤元气。不久，达州青号首领汪瀛被俘杀，杨开甲、鲜大川先后为叛徒所杀害。起义军被迫退出川西撤入川东北，进入南山和巴山老林中，坚持长期斗争。嘉庆六年，清廷重金悬赏、企图捕杀起义军首领，并由经略额勒登保和参赞德楞泰各率一军，两路会剿，以肃清川陕交界地区的义军。是年二月，义军首领王廷诏战死。接着徐天德、冷天禄、高均德、李全、张汉潮、樊人杰等也都相继被俘或牺牲。到嘉庆六年年底，起义军只剩下苟朝九、苟文润、王国贤、王世贵、冯天保、余佐斌等小股义军，在南巴老林中坚持斗争。从嘉庆八年正月开始，额勒登保、德楞泰、穆克登布、杨遇春等先后率清兵搜索老林数次。起义军化整为零，经常出其不意地打击清军，并打死了清军悍将穆克登布（钮祜禄氏）。六月，额勒登保大规模“搜剿”老林。嘉庆九年八月，起义军内叛徒赵洪周杀死其领袖苟文润降清。九月，苟朝九在南郑被俘就义。直到嘉庆十年五月，起义军最后一个元帅王世贵壮烈牺牲。历经九年零四个月的川楚陕白莲教大起义，给满、汉地主阶级以沉重打击，成了清朝走向衰落的起点。

（张正明）

和珅贪污案

清朝乾嘉年间，大学士兼军机大臣和珅贪赃枉法，蠹肥国家的历史事件。

和珅(1750—1799)，字致斋，姓钮祜禄氏，正红旗满洲人。父常保，曾任福建副都统，后又被赠一等云骑尉。和珅少年时被选入咸安宫官学，学习和掌握了满、汉、蒙、藏文及经史。18岁，与东阁大学士英廉孙女冯氏结婚。20岁，承袭三等轻车都尉世职。乾隆四十年(1775)，被乾隆帝发现和赏识，此后青云直上，先是被擢为乾清门御前侍卫兼副都统。后累迁户部侍郎、军机大臣兼内务府大臣。四十五年，云贵总督李侍尧贪污案发，和珅受命前去查办。他不仅查清了李侍尧焚索贪赃的事实，而且调查出了云南吏治腐败，各府州县财政亏空严重等重大问题。回京后，乾隆帝又升他为御前大臣兼镶蓝旗都统，并赐名和珅儿子丰绅殷德，招为额驸。自此，和珅身价骤增。十月，又任《四库全书》馆正总裁，兼办理藩院尚书事。从此，他的权力越来越大。和珅便利用乾隆帝对他的信任和他手中的权力，以各种手段聚敛钱财。他独揽清朝政府和皇家财政的主管权，拚命地向地方官吏和富商大贾要钱。他经常利用职权，任用私人，把一些有实权、好捞钱的差使分给他的党羽和亲信，然后再让他们"报效"自己，有时一次纳贿就有几万或几十万银两。他还疯狂掠夺土地，利用大量土地，收取高额地租，放高利贷，收取高额利息。同时，他还从事工商业活动，开当铺、钱铺、印局、帐局、药铺、瓷器铺、古玩铺、粮食店、酒店、煤窑等。由于身分和地位的原因，他不一定出面经营，多是身居幕后进行操纵。和珅柄政久，弄权作威福，善伺乾隆意，积怨满朝野。对于和珅的劣行，嘉庆皇帝早有所知，想除掉他，只是由于太上皇乾隆皇帝支持和珅，才未敢轻举妄动。嘉庆四年(1799)正月初三日，太上皇乾隆皇帝病逝，嘉庆皇帝亲政。不久，嘉庆皇帝就褫夺了和珅的军机大臣、九门提督等重要官职。随后，又将和珅逮捕下狱，查抄家产。和珅是当时贪官污吏的总后台，其家产十分富有，所抄家产除房屋外，计有田地80万亩，银号42座、赤金580万两、沙金200余万两，金元宝1000个，元宝银940万两，其它如珍珠、白玉、珊瑚、玛瑙、钟表、宝石、绸缎、磁器、古鼎、人参、貂皮等，不计其数，查抄的家产共109号，其中已估价者26号，值银22000万两。当时国库年收入4000多万两，这部分已估价财产相当于五年的国库收入。嘉庆四年正月，和珅被赐自尽，民间有"和珅跌倒，嘉庆吃饱"之说。

（张正明）

蔡牵领导的海上渔民抗清斗争

清嘉庆年间，蔡牵领导的东南沿海渔民抗清斗争历史事件。

蔡牵(1762—1809)，福建省同安县西浦乡新厝顶村人，自幼父母双亡，从小"佣工自食"。乾隆五十九年(1794)，率失业渔民、船工在漳泉一带海面起事。他为人多谋善断，崇信重义，体贴下属，深得群众拥护。初期，蔡牵的活动主要在广东洋面，尚属一般的海盗劫掠活动。后来，随着势力的增长，发展到用主要精力打击清军。嘉庆七年(1802)五月初一日，蔡牵率船队夜袭厦门海口大担、二担岛上的清军，全歼二岛清军，拆毁炮台，夺取炮位13门，从此开始了打击清军的斗争。嘉庆九年，蔡牵率船驶至台湾鹿耳门海口，突入北汕木寨，杀死武克勤、王维光二员。旋率船航至浙江温州浮鹰岛海面，将总兵坐船炮焚，总兵胡振声死亡。嘉庆十年十一月，蔡牵乘大船，渡海攻台湾。二十三日，攻入凤山(台湾高雄)，复驶进鹿耳门。台湾嘉义县义军首领洪老四等响应，队伍壮大至2万余人，连战皆捷，攻占州仔尾，沉舟填塞鹿耳门，阻止清兵增援，部队进而包围台湾府城，蔡牵被众人推为镇海王。嘉庆十一年一月，浙江水师提督李长庚率水师3000渡海，至鹿耳门，因海口为沉船堵塞，不得入，旋进汕大港。金门总兵许松年、澎湖副将王得禄等率部由大港绕安平港进攻，李长庚等扼南北二汕阻击，蔡牵军与清军双方进行了殊死激战。二月，蔡部在北汕受困，幸而风潮骤涨，鹿耳门沉船被掀起漂出，蔡牵率余部经鹿耳门退出台湾。后与李长庚等追逐于闽、浙海面。嘉庆十二年，清政府加紧剿灭蔡牵海上渔民抗清力量，一面坚壁清野，于各海口巡防严密，以断绝海上义军给养，另一面统一事权，责成李长庚负责军事行动，并拨巨款赶造大船，增强战斗力。是年十二月，李长庚偕同福建水师提督张见升统兵追逼蔡牵军至黑水外洋，双方展开激战，时蔡牵部只有大船三艘，小船十余艘，而闽粤水师则数十倍于义军。李长庚稳操胜券，趾高气扬，贪功心切，自以火攻船挂住蔡牵坐船后艄，欲活捉蔡牵，不料蔡船尾发炮，中长庚咽喉、额角，当即毙命。清兵指挥船失去统帅，顿时混乱。提督张见升见总统船乱，引舟师遽退。蔡牵化险为夷，乘船弋洋。蔡牵军连续作战，伤亡重大，元气大损。嘉庆十四年八月，清闽浙水师与蔡牵军交战于定海的舟山海面。清兵据上风，蔡牵恐被包围，挥舟向东南方向移动，转战至黑水深洋，经一昼

夜至第二天午后，又转战近绿水内洋。清兵恐蔡牵退兵外洋，更加紧进攻，浙江提督邱良功亲率浙主舰撞蔡牵坐船，蓬索相纠，短兵相接，矛贯邱良功之左腿，浙舟败退下阵。但清兵船多炮多，福建提督王得禄率闽舟复上，蔡牵以银丸伤其额、腕。得禄复令掷火斗、火罐，毁牵船舵、尾楼。蔡牵寡不敌众，举炮自裂坐船，沉海死，余部败退。次年，余部败降。蔡牵领导的海上渔民抗清斗争，实际是官逼民反。他们纵横闽浙粤三省海面，转战达14年之久。尽管最后失败了，但给予了日趋腐败的清王朝以沉重打击。（张正明）

李文成等领导的天理教起义

清嘉庆十八年(1813)，李文成等领导的天理教徒反抗清朝统治斗争的历史事件。

天理教又名八卦教，是白莲教的支派之一。白莲教起义失败之后，天理教就秘密在北方直隶(河北)、山东、河南、山西等省传播开来。其主要领导人有李文成、林清、冯克善、牛亮臣。李文成，河南滑县谢家庄人，木工出身。嘉庆十六年(1811)，李文成在教内被拥戴为教首，掌管“震卦”，兼管“九宫”，统管八卦，众至数万。林清，本籍浙江，久居直隶大兴县黄村，林清传教活动在河北各地，掌管“坎卦”。其他有“乾卦”首领山东定陶人张廷举，“艮卦”首领河南虞城人郭泗湖，“巽卦”首领山东城武人程百岳，“离卦”首领山东城武人张景文，“坤卦”首领山西岳阳人邱玉，“兑卦”首领山西岳阳人侯国龙等，“俱分隶震卦”。嘉庆十六年春，河南、山东、河北三省教首李文成、林清、牛亮臣、冯克善等在滑县聚会，磋商起义和联合行动事宜，决定林清封为“天皇”，冯克善封为“地皇”，李文成封为“人皇”，由林清直取直隶，李文成攻河南，冯克善夺山东。这一年，林清三次到滑县，与李文成商讨起义大计。嘉庆十七年正月，各地教首大会于滑县的道口镇，决定嘉庆十八年九月十五日午时在北京、河南、山东同时发动起义，届时河南义兵至京，配合林清义兵。随后，河南天理教在李文成的领导下，集中全力进行起义准备工作，并在滑县大伾山中铸造器械。不幸机密泄漏，被官府侦知。九月初二日，李文成、牛亮臣等首领被官府逮捕下狱。审讯时，李文成“坚不吐实”，遭毒打，以致“两股顿烂”，足胫也被夹断。初七日，起义军部将宋元成等率滑县天理教众5000余人，头缠白布，身着白衣，攻陷滑县城，杀死滑县知县强克捷、巡检刘斌，救李文成、牛亮臣出狱。数日间，河南、山东天理教军据浚县，破长垣，占定陶，克曹县，众积至七八万人，声势大振。清廷急命直隶总督温承惠为钦差大臣，会同浙江巡抚高杞、山东巡抚同兴率清兵镇压起义军。李文成等提前起义后，由于清军的堵截拦阻，使义军未能迅速北上如期与林清领导的义军会合。而林清在北京对河南滑县的情况一无所知，仍按原计划部署起义。九月十五日，林清发动起义。林将起义军分为东西二队，分别攻打京师紫禁城，林坐镇黄村。清廷镇压了京城的天理教起义后，急忙抽调精锐兵力去镇压河南的天理教，并命陕甘总督那彦成代替温承惠为直隶总督，委以钦差大臣，节制山东、河南各路清兵，又命陕西提督杨遇春及杨芳、西安将军穆克登布(季氏)、副都统富僧德、徐州总兵徐洪等协同围剿。十月初八日，那彦成率兵抵河南卫辉一带。十一月初，起义军与清军发生激战，道口镇失陷，义军兵退滑县。接着那彦成迅速进兵滑县，包围县城。义军几次作战，均失利，山东、直隶各处的天理教军亦被清军各个击破，滑县陷于孤立，危在旦夕。李文成、牛亮臣等会议，将主力转移至太行山。李文成因受刑胫折不能骑，坐大车率众行至辉县西司寨。司寨东临山，西濒河，围有墙垣，便于防守。十一月二十日，杨芳等率军先设伏白土冈，佯败；天理教军往追，遇伏败。接着，清将杨芳又败义军于南首山后，率兵进攻司寨。天理教军据险掷石，枪炮齐放，坚持固守。最后，清军破寨墙一隅而入，李文成等被围困于一碉楼，杨芳等率众登楼，妄图活捉李文成。义军将领刘国明持刀跃出，击杀清兵数人后英勇牺牲。李文成等举火自焚，司寨陷落。道口镇、司寨失陷后，起义军只剩下滑县最后一个据点了。滑县城坚厚，外砖内土中沙，大炮攻之，遇沙而止。所以清军围之，数旬不克。嘉庆十八年十二月初十，那彦成下令各路清军同时对滑县五个城门发起攻击，清兵暗挖地道，埋下炸药，城垣崩裂二十余丈，清兵冲入南门，接着各门皆破。义军首领牛亮臣、元帅徐安国等被俘死。李文成、林清等领导的天理教起义，就这样被清朝统治者残酷地镇压下去了。　（张正明）

平定张格尔之乱

清道光年间，清政府平定新疆张格尔叛乱的历史事件。

张格尔是已故大和卓木波罗尼都之孙。乾隆年间，清政府平定天山南北路，大和卓木被杀，其子萨木萨克逃居浩罕(今乌兹别克东部)，生三子，张格尔为其次子。张格尔自称新疆伊斯兰教白山派(即白帽回)之和卓，在英国殖民主义者和浩罕统治者的支持下，于嘉庆二十五年(1820)九月，首次由浩罕入扰回

疆。张格尔率兵300人，将图舒克塔什卡伦官兵杀伤，并夺伊斯里克卡伦马匹，旋遁去。道光六年(1826)夏，张格尔由开齐山路入境，窜至距喀什噶尔(新疆喀什)百余里的阿尔图什庄，以礼拜其祖先"玛杂"(坟墓)为名，煽惑当地居民聚众闹事，清朝的喀什噶尔参赞大臣庆祥命帮办大臣舒尔哈善等率兵围之，张格尔突围而去。张格尔恐北路伊犁清军到来，便遣使向浩罕求援，约破西四城(指喀什噶尔、英吉沙尔、叶尔羌、和田)，"子女玉帛共之，且割喀什噶尔酬其劳"。浩罕统治者穆罕默德·阿里汗亲自率浩罕军队万人入侵南疆，攻打喀什噶尔。清军进行了坚决抵抗，浩罕军退回。张格尔又诱二三千浩罕军为其亲兵，张格尔之弟巴布顶率兵破英吉沙尔，清副都统苏伦保等死。张格尔连陷叶尔羌与和田，并包围喀什噶尔。守城清军尽力抵御两月有余。八月二十五日，张格尔派兵挖地道进城，城陷，庆祥自缢身死。张格尔进据喀什噶尔后，自称"赛亦德·张格尔苏丹"，宣布为当地的统治者。清廷急命伊犁将军长龄为扬威将军，陕甘总督杨遇春、山东巡抚武隆阿为参赞大臣，调集吉林、黑龙江、陕西、甘肃、四川五省清军3万余人，会师于阿克苏。这时，张格尔军已至浑巴什河，距阿克苏只有80里，企图抢占阿克苏和乌什。清军立即发动浑巴什河之役，击退了企图渡河的张格尔军。十一月，张格尔派兵踞守柯尔坪(新疆乌什西南柯平)南、北回庄，并阻截清军进攻之路。长龄派提督杨芳督率官兵前往攻击。杨芳兵分两路抄截，杀敌过半，余敌溃逃，复追杀十余里，全歼。柯尔坪战役的胜利，不仅保卫了东四城(乌什、阿克苏、库车、辟展)的安全，而且打通了清军西进的道路。道光七年三月，清军发动喀什噶尔之役，长龄等率军3万余人，由浑巴什河进击，分为前敌后应，齐往驰攻喀什噶尔城。二十三日，师次大河拐，清军扎营后，张格尔军乘夜潜袭，被击退。次日，清军星驰进发，击溃排列沙冈拒守之张格尔军。二十五日，清军至沙布都尔。张格尔于沙布都尔庄外，决水挖坎，临渠排列，扼险死守。清军以连环枪炮轰击，步兵拥上，横渡渠水，短兵相接，复派马队，分左右两支，涉浅渠抄击，张格尔军大败。清军追至洋达玛河，距喀什噶尔仅10余里。张格尔悉众抗拒，阻河而阵。清军以索伦兵千骑，绕道下游佯渡，然后以主力在上游抢渡，张格尔军大溃。是月初一日，清军进克喀什噶尔城。张格尔先一日率数十骑遁去。旋杨遇春率兵复英吉沙尔、叶尔羌，后杨芳统兵复和田。至此，喀什噶尔之役，历时两个多月，清军光复四城。张格尔自喀什噶尔败走后，众叛亲离，生计日蹙。十二月二十七日，张格尔由开齐山旧路，潜向阿尔图什庄，清军察觉，杨芳兵分三路，星夜追至喀尔铁盖山内，张格尔被前击后截，仅带十余骑登山，清总兵胡超等驱骑直前追捕。张格尔势穷力绌，将欲自刎。总兵胡超等带兵拥上，夺兵获擒张格尔，后解至北京处死。　(张正明)

鸦片贸易

近代西方殖民主义者为掠夺中国人民财富而经营的毒品贸易。

鸦片，英文opium的音译，亦称"阿片"。是从罂粟(又称阿芙蓉)果中的乳状液体提炼的，俗称大烟。原产于南欧及小亚细亚，后传入阿拉伯、印度及东南亚等地。鸦片作为药用，早在唐代即自阿拉伯输入中国，但为数极少。明代以来，中国关税则例将鸦片列入药材征税。17世纪，吸食鸦片之法从南洋传入中国。从药用转为嗜好毒品，始于18世纪上半期。鸦片含有大量麻醉性的毒素，吸食上瘾，会使人精神萎靡，骨瘦如柴，如同废人，直至死亡。鸦片能使所有各种不同体质的人都走上同样自我毁灭的道路，是一种慢性的杀人不见血的毒药。

西方对华走私鸦片，最早有葡萄牙、荷兰等。它们从卧亚·达曼等地贩运鸦片来中国，数量不大。乾隆二十二年(1757)英国占领印度鸦片产地孟加拉后数量剧增，10年后英国偷运到中国的鸦片就增到1000箱。三十八年，英属印度政府确立了鸦片侵华政策。英国的首任印度总督哈斯丁斯宣称："鸦片不是生活必需品，而是一种有害的奢侈品，除仅仅为对外贸易的目的外，它是不被容许的。明智的政府应该严格限制鸦片的国内消耗。"这是把毒品作为对外侵略、牟取厚利的自供状。为了保证这一侵略政策的充分实现，乾隆三十八年和嘉庆二年，英属印度政府又先后给予英国东印度公司在印度的鸦片专卖和制造特权。东印度公司利用这一特权强迫和用贷款引诱孟加拉地区农民种植罂粟，垄断了全部毒品的制造，使罂粟的蒸晒和鸦片的调制适合中国鸦片吸食者的口味。鸦片制成后，装入便于偷运的特制箱子，运往加尔各答，由政府的官吏在市场上公开标价拍卖，经投机商人转卖给走私商，然后偷运进中国。东印度公司在每箱鸦片上的费用不到250卢比，而在加尔各答市场上的拍卖价格却高达1210至1600卢比，超过原来成本的6倍。英国的印度殖民政府，按鸦片成本300%以上的税率抽税，鸦片税成了英国的印度殖民政府财政收入的大宗，道光十年(1830)约占全

年总收入的十分之一。英国鸦片贩子由印度将鸦片偷运进中国，既不需纳税，又能拿到中国烟贩的预购烟款，既稳妥又能牟取暴利。英国最大的鸦片贩子查顿（William Jardine，1784—1843）在其私人信件上说，在最好的年头，每箱鸦片的毛利可高达1000银元；夸耀"这是最安全和最有绅士气派的投机生意"。肮脏的鸦片贸易，对整个英国资产阶级都有密切的利害关系。英国强迫印度生产鸦片，换取中国白银，借以扩大英国棉纺织品的销路。印度用种植鸦片的收入购买英国纺织品，英国用印度的鸦片换取中国的茶、丝，运销中国和世界各地。在英国—印度—中国，即棉纺织品—鸦片—茶、丝，这种循环转贩的"三角贸易"关系中，鸦片起着特殊的作用。英国资产阶级从中获得了大利，严重受害者首先是中国，其次是印度。由于英印政府的大力推动和偷运鸦片所获大利的刺激，鸦片倾入中国的数量迅速增加。由乾隆三十二年的1000箱，到道光十四年达2万余箱，十八年猛增至4.02万箱！总计英国在鸦片战争前40年间，共偷运进中国的鸦片不下42.7万箱。从19世纪初年起，由于鸦片年年走私，使中国对外贸易由出超迅速变为入超，而且入超数字惊人上升。鸦片成为套购中国商品、倒转贸易差额的支付手段。并用它套走了大量白银。总计英国在鸦片战争前40年间，从中国掠夺了3至4亿银元。巨大利润驱使鸦片走私船在东南沿海"往来如织，不胜繁忙"。

美国也是贩运鸦片来华较早的国家。美国独立后，资金缺乏，工业落后，其资本原始积累的重要途径之一就是对华走私鸦片。19世纪上半期，在广州的美商几乎无不经营鸦片走私，普金斯洋行和旗昌洋行都是巨大的贩毒集团。由于英国垄断印度的鸦片，使美国不惜绕过大半个地球，从土耳其、波斯等地到处收购鸦片。美国鸦片商人特制快速武装"飞剪船"，猖狂地向中国沿海走私鸦片。在嘉庆十一年至道光十四年的29年间，根据大大缩小了的报关数字即有8901箱。美国对中国贩毒居第二位。此外，沙俄自19世纪30年代起，也由中亚向中国输入鸦片，俄国人自己独享内地陆路贸易，成了他们没有可能参加海上贸易的一种补偿。

清政府从雍正七年第一次颁布禁烟令起，多次下令禁烟，嘉庆元年下诏禁止鸦片入口。可是，屡禁不止，鸦片走私却越来越猖狂。这是因为，英、美鸦片贩子采取武装走私、收买贿赂清政府官员等手段，破坏禁烟；同时腐败的清政府官员恃法求贿。正如马克思指出的："浸透了天朝的整个官僚体系和破坏了宗法制度支柱的营私舞弊行为，同鸦片烟箱一起从停泊在黄埔的英国趸船上偷偷运进了天朝。"西方资产阶级的海盗掠夺和"商品重炮"都无法打开中国的门户，乃利用鸦片作为打开中国大门和谋财害命的阴险工具。污秽的鸦片走私成了西方资本主义发家史上永远冲刷不掉的罪痕。

19世纪30年代，以英国为首的鸦片贸易不仅给中国社会带来巨大的灾难，而且严重损害了中国人民的身心健康。道光十八年十一月十五日（1838年12月31日），道光帝命湖广总督林则徐为钦差大臣，前往广东查禁鸦片。二十年五月（6月），英国资本主义为了维护鸦片贸易，打开中国大门，发动了侵略中国的鸦片战争。战后，鸦片进口虽未合法化，但实际是清政府被迫默许免税大量输入。咸丰八年十月（1858年11月）清政府被迫同英、法、美签订《通商章程善后条约·海关税则》，承认贩卖鸦片为"合法"贸易，鸦片改名为"洋药"，每100斤收税银30两。　（邱远猷）

林则徐上奏禁烟

清道光十八年（1838）林则徐向道光帝上奏《筹议严禁鸦片章程》和《钱票无甚关碍宜重禁吃烟以杜弊源片》。

19世纪30年代，以英国为首的资本主义国家，向中国大量输入鸦片毒品，道光十八年已猛增至4万余箱。鸦片大量流入，给中国社会带来了严重祸害，严重损害了中国人民的身心健康。吸食鸦片成了近代中华民族的灾难。人民群众禁烟呼声普遍高涨。对待外来的鸦片侵略和人民群众的禁烟正义要求，清朝统治阶级内部逐渐形成了两种不同的态度：一派主张消极弛禁；一派主张积极严禁。在道光十六至十八年间，两派展开了激烈的辩论。太常寺卿许乃济（1777—1839）、大学士、直隶总督琦善（约1790—1854）等主张开禁。内阁学士朱嶟（1791—1862）、兵科给事中许球、鸿胪寺卿黄爵滋（1793—1853）以及湖广总督林则徐等是严禁派的代表，主张严禁鸦片。道光帝最初态度犹豫不决，因为一方面可以从粤海关得到大量"贡献"，另方面又感到鸦片泛滥、白银外流威胁着他的统治。于是下令各省督抚大员议复。

林则徐（1785—1850），字元抚，又字少穆、石麟，晚号竢村老人、竢村退叟，福建侯官（福州）人。生于一个清贫知识分子家庭。嘉庆十六年（1811）中进士。道光十一年任东河河道总督。十二年改官江苏巡抚。十七年升湖广总督。为官清廉自守，关心国计民生。

道光十八年闰四月初十(6月5日),黄爵滋在《请严塞漏卮以培国本折》中从国家财政着眼,详细陈述了鸦片大量涌入、白银外流,造成"银贵钱贱"的严重后果,提出了一个"重治吸食"的严禁方案,主张凡吸食鸦片的人必须在一年内戒绝,否则百姓处以死刑;官吏除本人处死外,其子孙不准参加科举考试。五月初七,林则徐在湖广总督任上的复奏——《筹议严禁鸦片章程》中,对黄爵滋赞佩备至,完全支持黄爵滋的主张,指出:"鸦片流毒于中国,纹银潜耗于外洋,凡在臣工,谁不切齿!"今天鸦片流毒至于已甚,断非常法之所能防,必须审时势而权所重,适应时代的变化,变更原有的禁烟法令,改用严刑峻法。认为鸦片不是"难于革瘾",而是"难于革心",而要"革玩法之心",就得"立怵心之法",既重治吸食,又给一年戒烟期限。这符合古圣人"辟以止辟"之义,断不能与苛法同日而语。主张用大辟严刑,治吸鸦片者罪。为此,他提出禁烟方策6条:一、责成州县,尽缴烟具,并许核作州县功过之数;二、劝令吸食者自新,将一年之期划分四限,逐步递加罪名,以杜因循观望;三、加重开馆、兴贩以及制造烟具各罪名,许限内缴具自首;四、以严于所近的原则,给予官吏失察处分;五、着令地保、牌头、甲长,收查烟土、烟膏、烟具;六、采用熬审之法,审断鸦片吸食者。同时,附上多年历试历验的戒烟断瘾丸方、饮方各两种,建议颁布各省,以资疗治。这四种验方,后来在民间广为传抄。同时,他又在武昌、汉口、长沙等地设立禁烟局,散发断瘾药丸。

八月十七日(10月5日),林则徐针对反禁烟派的谬论和道光帝举棋不定的心理,再次递上《钱票无甚关碍宜重禁吃烟以杜弊源片》。进一步阐明了必以"重治吸食为先"的道理。主张重治烟毒吸食者、开馆者、贩运者,规定期限,逾期不改,一律处死。而其中又"必以重治吸食为先"。因为果真禁绝了吸食,谁还会去开烟馆、贩鸦片呢?他考虑到当时各级衙门中的幕友、官亲、长随、书办、差役,嗜鸦片者十居八、九,且能包庇贩卖之人,想望卖烟者为之源源接济,安能破获以断来路。主张从政府机构中的官员和其他人中的吸食者严起。强调:刑罚轻重,盖因时制宜,目前鸦片流毒天下,则为害甚巨,"法当从严"。这样,人人涤虑洗心,怀刑畏罪,结果一定是先时虽有论死之法,届时并无处死之人,决不会诛不胜诛。最后,他尖锐地指出:鸦片流毒天下,"若犹泄泄视之,是使数十年后,中原几无可以御敌之兵,且无可以充饷之银。兴思及此,能无股栗!"这段话触动了道光帝,道光帝想到滔滔毒流引起"兵弱银枯"的可怕前景,终于倾向严禁,召林则徐进京,并于十八年十一月十五日任命他为钦差大臣,驰粤查禁鸦片。 (邱远猷)

虎门销烟

清道光十九年四月二十二日(1839年6月3日)至五月十五日林则徐收缴英、美鸦片贩子的鸦片237万余斤,在虎门海滩当众销毁。

十八年九月二十三日(11月9日)道光帝看到湖广总督林则徐奏折《钱票无甚关碍宜重禁吃烟以杜弊源片》后,想到滔滔毒流引起"兵弱银枯"的危险前景,终于倾向严禁,召林则徐进京,并于十一月十五日任命他为钦差大臣,颁给关防,授予兵部尚书衔和节制广东水师的权力,驰赴广东查禁鸦片,并颁布《钦定严禁鸦片烟条例》。又特下诏谕,令两广总督邓廷桢(1776—1846)、广东巡抚怡良(1791—1867)等广东地方大员,一定要与新任钦差大臣和衷共济,支持林则徐。十一月二十三日,林则徐离京南下赴任,十九年正月二十五日抵广州,行辕设在越华书院。他周密调查研究鸦片走私的有关情况,掌握了外国鸦片贩子与广东海关、水师、行商等勾结舞弊的种种黑幕,看到广东地区鸦片贩卖者、吸食者远远超过其它沿海和内地各省,究其原因在于外国鸦片贩子"卖烟而起",他们"若不带鸦片来,内地民人何由而吸"?鉴此他把禁烟方针从"必先重治吸食",调整为"先以断绝鸦片为首务",锋芒直指外国侵略者和鸦片贩子。他认为必须紧紧抓住"缴烟"和"具结",以此作为禁烟的中心。缴烟即收缴已经来华的鸦片;具结即要外国鸦片贩子出具外文、中文合写甘结申明:"嗣后来船,永不敢夹带鸦片;如有带来,一经查出,货尽没官,人即正法,情甘服罪。"林则徐说,只要坚持了这两点,就可以使鸦片"已来者尽数呈缴,未来者断绝不来"。

据此方针,林则徐首先与邓廷桢共同查办了历年包庇走私受贿的督标副将韩肇庆,罢其官职,抄没其"巨万"家产。派兵船急驶伶仃洋面严密监视满载鸦片的20多艘趸船,以防溜走。下令炮轰前往南澳和雷州半岛的鸦片走私船,严禁中国船只靠近趸船,如有违犯,立即逮捕,敢有拒捕者就地处分。二月初四,林则徐会同邓廷桢、怡良等突然传讯十三行行商。林则徐当场发给《谕洋商责令外商呈缴烟土稿》、《谕各国商人呈缴烟土稿》二件谕帖,斩钉截铁地表示:"若鸦片一日未绝,本大臣一日不回,誓与此事相始终,断无中止之理。"并警告他们:倘若"不知改悔,唯利是图,非但水陆官兵,军威壮盛,即号召民间丁

壮,已足制其命而有余”。责令总商怡和洋行行首伍敦元(1765—1843)等到商馆传谕外国鸦片贩子,必须在3天内缴烟、具结。当天,行商们赶回十三行公所传见外国商人,宣布林则徐的命令。充分显示了林则徐严禁鸦片和反抗侵略的决心。同时,立即密派兵丁在商馆周围,暗设防备,监视外国鸦片贩子。海关监督豫堃也发出告示,暂停外商“传牌下澳”。二月初七,即林则徐指定3天限期之最后一天,外商在外侨商会开会研究对策。当时英国最大的鸦片贩子威廉·查顿,害怕林则徐首拿究办,早于上年十二月十二日“请牌下澳”,于十六日由澳门坐船逃回英国。第二号大鸦片贩子颠地(Lancelot Dent)等极力反对缴烟。经过激烈辩论后,决定采取拖延敷衍态度,仅表示“尽早答复”。当晚,伍敦元又匆匆来到商馆传达林则徐口谕:如果不马上答应呈缴鸦片,明早10时亲到十三行公所,措办一切,先审讯洋商,正法一二!当晚10时外侨商会召集特别会议,研究翌日的答复,并邀请伍敦元等行商与会,探询林则徐真实意图。最后勉强决定捐凑1037箱鸦片上缴,妄图蒙混过关。二月初八,伍敦元面见林则徐,眼看难以幸免,妄图行贿过关,说:“愿以家资报效。”林则徐拍案怒斥:“本大臣不要钱,要你脑袋耳!”当机立断,下令传讯颠地,命令广州府南海、番禺二县捉拿颠地,未果。这时,在澳门的英国驻华商务监督查理·义律(Charles Elliot,1801—1875)被迫亲自出马于初七黄昏抵达广州,溜进商馆颠地住地,与外国鸦片贩子策划对抗缴烟并企图乘夜携带颠地逃遁。但在商馆周围防范的中国管店工人,截住岸边,大声吆喝,警报迅速传开,商馆周围所有通道立即戒严。林则徐抓住英国侵略分子破坏禁烟的罪行,为了打击义律的破坏禁烟活动,按照“违抗封舱”惯例,下令将所有停泊在黄埔港里的各国商船一概不准上下货物;不准外商出入往来,离开广州,并派兵严密监视;将所有商馆的后门全部封闭,前门建立栅栏,断绝商馆与趸船的交通;撤退洋馆中受外商雇用的全部中国人员;在商馆附近做买卖的中国商人,限期迁移别处,不许靠近私相交结;停止对商馆的一切供应,断绝食品用水。林则徐声势浩大、敏捷果断的行动,得到人民群众的热烈拥护和坚决支持,沉重地打击了蜷伏在商馆内的侵略者和鸦片贩子。义律迫不得已于二月十三日早晨6时具禀林则徐,表示愿意缴出所有鸦片。他以英国政府代表的身分,命令英商缴烟,声明保证烟价以后由英国政府负责赔偿。义律为了联合美国侵略者一致反华,也劝美国烟贩缴烟,声明烟价同样将来由英国政府赔偿。从二月二十二日起至四月初六止,英国鸦片趸船驶至穿鼻洋龙穴岛及虎门沙角,呈缴鸦片计19187箱(其中美商有1540箱)又2119袋。鸦片的袋、箱斤两一样,故实收总数为21306箱。二月二十九日,林则徐向道光帝奏报收缴趸船鸦片,请解京验明烧毁。道光帝在三月二十六日,最后谕令林则徐毋庸解京,就地销毁。

四月二十二日,久雨放晴。上午,广东巡抚怡良、粤海关监督豫堃、广东布政使熊希镗到达东莞县(东莞市)虎门镇口村(太平镇)会同钦差大臣林则徐,监视和观看第一天的销烟。午后2时,在林则徐的主持下,震惊中外的虎门销烟开始。镇口村码头旁海滩高地上挖掘两个长宽各15丈的方形大池,池底平铺石块,以免透漏。池岸四周每隔9英尺架上厚板,以保安全。池后通一水沟,销烟时,先由水沟车水入池,撒入食盐,溶成浓卤。然后,把3尺长、高宽各1.5尺的鸦片烟箱劈开,将过秤后的鸦片逐个切成4小瓣,投入卤中,浸泡半日成浆。再将烧透了的整块石灰抛入池中,顿时如汤沸腾,不烧自化,浓烟上涌,渣滓下沉。销烟工人或在池岸四周或站在伸入池中的跳板上,用锄、木耙往来翻搅,直到鸦片全部化尽。待海水退潮时,打开池前涵洞闸门,随浪送出大海,并用清水刷除池底,不留涓滴烟灰。一池化完,另一池开始,轮流替换销毁。到夕阳西下,当天共销毁170箱。从四月二十二日到五月十五日(其中五月初五端午节停销一天),共销毁鸦片19179箱又2119袋,除去箱、袋皮重,共销毁鸦片2376254斤。在销烟的日子里,虎门附近沿海居民欢欣鼓舞,纷纷前往观看这一空前壮举。林则徐还根据道光帝谕旨,在五月初三发出告示,准许外国人到现场“共见共闻”。初五下午,美国奥立芬洋行股东经氏(C. W. King)及“能解汉语且晓汉文”的夫人,《中国丛报》主编、美国基督教新公理会传教士裨治文(Elijah - Coleman Bridgman,1801—1861),以及商船“马礼逊”号船长弁逊(Capt Benson)等10余人带着猜疑心理,乘船从澳门赶到虎门参观。初七上午,由广东水师船只从沙角带到镇口村海滩。林则徐允其走进栏栅,来到池前观看销烟全过程。后裨治文在《中国丛报》6月号的《镇口销毁鸦片》参观记中写道:“我们反复考察过销烟的每一个过程,他们在整个工作进行时细心和忠实的程度,远出于我们的臆想,我不能想象再有任何事情会比执行这一工作更忠实的了。”为了向外国人表明中国禁烟运动的决心和政策,林则徐还在销烟池旁边棚厂内接见了他们,坦率

宣称:"中国政府对今后走私鸦片,必予以最严厉的惩处,而对于从事正当贸易的外商,则将给以恩惠,并且,走私决不容牵累合法贸易。"这样,林则徐赢得了原先抱有怀疑态度的外国人的崇敬,甚至连他的对手和敌人也不能不承认他是一位伟人。当时在英国首都伦敦有一座专门陈列世界名人的蜡像馆,其中就塑有林则徐的蜡像。虎门销烟39年后,即光绪三年(1877),清政府派驻英国的第一任副使刘锡鸿陪同公使郭嵩焘专程前往参观。后刘锡鸿所撰《英轺纪行》记述说:"文忠公前有一小案,摊书一卷,为禁鸦片烟条约。上华文,下洋文。"道光十九年五月二十五日,林则徐向道光帝上《虎门销化烟土一律完竣折》。六月十八日,道光帝阅后朱批道:"可称大快人心一事。"中国人民禁烟斗争取得重大胜利的消息传到伦敦,英国资产阶级感到"鸦片贸易的末日似乎是到了",觉得"天色昏暗悲惨"。禁烟运动是以反对英国侵略者利用鸦片毒害中国、侵略中国为主旨的一次伟大爱国运动。它揭开了近代中国人民反侵略斗争史的帷幕,也是国际禁烟史上的第一块丰碑。新中国成立后,矗立在天安门广场上的人民英雄纪念碑铭刻的第一幅巨型浮雕,就是"虎门销烟"的伟大形象;人民政府在广东省东莞市虎门林则徐销烟池旧地建立了"虎门林则徐纪念馆"。 (邱远猷)

林维喜事件

鸦片战争爆发前英军逞凶事件。

清道光十九年五月二十七日(1839年7月7日),5名英国水手在九龙尖沙嘴(村)酒醉行凶,殴伤中国居民多人,其中林维喜身负重伤,于次日死亡。六月初二,清钦差大臣林则徐接到报案后,即决定派新安县(宝安县)知县梁星源前往查办。林则徐根据调查结果,按杀人偿命的法律,派员到澳门多次谕令英国驻华商务监督查理·义律交出凶犯,由中国官府法办。义律抗不收阅,寻找借口,拒不交凶。为了更有力地驳倒义律的狡辩,林则徐依照袁德辉译国际法第172条"外国有犯者,即按各犯事国中律例治罪"精神,确信"杀人偿命,中外所同",一再要求交凶。义律存心践踏中国司法主权,于六月二十四日,非法宣布在中国领海上设一"具有刑事与海上管理权的法庭",拟于七月初四在一艘英国船上开庭审讯有关林维喜案件的凶手。林则徐根据中外律例,理直气壮地宣布义律要进行的"审讯"为非法。义律置若罔闻,在七月初四,自扮"法官",依照英国法令判决此案:其中3名水手各罚款20英镑,监禁6个月;其他两名水手各罚款15英镑,监禁3个月;还指定应在英国一个监牢里执行监禁。中国地方当局坚不承认此项判决,严令英方交出凶手。林则徐为了维护中国的独立主权,不使英国侵略者"坏法养痈",援引嘉庆十三年(1808)清政府处理英军强占澳门事件成例,下令停止供应停泊在香港岛的英国船只柴米食物,限期撤回澳门英商雇用的中国职员和工役,驱逐英船撤离澳门和黄埔,对英国侵略者作了坚决的斗争。 (邱远猷)

穿鼻海战

鸦片战争爆发前中、英之间在虎门南面穿鼻洋海面上的战斗。

清道光十九年五月林维喜事件发生后,英国驻华商务监督查理·义律既抗拒交出林案正凶,又阻止英船自愿具结。清钦差大臣林则徐于九月十七日下令,严索林案正凶,限令英国商船3日内,或具结入口,或开回本国,不得滞泊伶仃洋面。此前九月初九英国商船"担麻士葛"号,不听义律乱令,前来具结,保证"永不夹带鸦片",随即被引入黄埔,进口贸易。林则徐本着"奉法者来之,抗法者去之"的原则,保护其安全,并传见船主弯喇,面加奖励。这为正当贸易的英国商人开一先例。九月二十八日,又一英国商船"撒克逊"号(船主当啷)也遵令前来具结。义律恼羞成怒,即派"士密"号(又称"窝拉疑"号)和"华伦"号两兵船于中午赶至穿鼻洋,阻止正报关入口的"撒克逊"号。广东水师提督关天培正欲向前查究,"士密"号竟先开炮,前来攻击,衅端遂开。关天培遂令本船兵弁开炮还击,并挥令后船协力进攻。英国侵略者挑起的穿鼻洋海战爆发。关天培亲自挺立水师船桅杆前,拔腰刀督战,厉声喝称:"敢后退者斩。"适有英船炮弹飞过桅边,剥落桅木一片,从关天培手面擦过,皮破见红。关天培奋不顾身,仍复持刀屹立,又取银锭先置案上,有击中敌船一炮者,立刻赏银两锭。其本船所载3个铜炮最称得力,关天培督令弁兵对准"士密"号连轰数炮,将其船头(粤人呼为头鼻)打断,船头数十人纷纷滚跌入海。水师提标左营游击麦廷章,督率兵弁,连轰两炮,击破"士密"号后楼,英兵亦随炮落海,左右舱口,间有打穿。"华伦"号畏不向前,未致受伤。激战约一个时辰之久(中午12时至下午2时),"士密"号帆斜旗落,且御且逃,"华伦"号亦随同遁去。清军水师3只兵船受击进水,兵丁死15名,伤数十。这次战争,清军由于遭到突然袭击,英军武器又占优势,所以损失较大。尽管如此,仍奋

勇抗击。林则徐在十月十六日向道光帝的奏折中说，关天培奋勇督战，士兵英勇抗击。"收军之后，经附近渔艇捞获夷帽二十一顶，内两顶据通事认系夷官所戴，并获夷履等件，其随潮漂淌者尚不可以数计。"道光帝阅后朱批："可嘉之至。"　（邱远猷）

鸦片战争

清道光二十(1840)至二十二年英国对中国发动的侵略战争。因战争的导火线是英国强行向中国推销鸦片，故称鸦片战争。

鸦片战争前夕，中国封建社会已进入衰落末世。清王朝政治腐败，经济凋敝，科技落后，武备废弛，思想文化领域"万马齐喑"，阶级矛盾不断激化，国势阽危。其时，欧美资本主义国家迅速发展起来；特别是英国掌握了资本主义世界的霸权，成为奔走全球、寻找殖民地、侵略中国的急先锋。在这历史关键时刻，清政府仍奉行闭关主义，结果使中国孤立于世界历史前进的潮流之外，越来越落后。中国人，特别是清朝封建统治者对外部世界茫然无知。为了掠夺中国，使之纳入资本主义世界市场，英国企图用"商品重炮"轰开中国大门。可是，由于当时中国社会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占主导地位，英国工业品在中国很难扩大其销售市场。相反，中国的丝、茶出口却越来越多，中国对外贸易一直处于出超的有利地位。为了改变贸易逆差，英国政府遂以"特殊商品"鸦片作为撬开中国大门的武器。清乾隆三十八年(1773)英属印度政府确立了鸦片侵华政策。乾隆三十八年和嘉庆二年(1797)、英属印度政府又先后给予英国东印度公司在印度的鸦片专卖和制造权。于是，以印度为基地向中国走私鸦片的规模不断扩大，由乾隆三十二年的1000箱，到道光十八年猛增至4万余箱。由于英、美鸦片贩子的破坏和贿赂，清朝官员的腐败受贿，使得清廷累次发布的禁烟法令成了一纸空文，非法的鸦片走私屡禁不止，恶性发展起来。罪恶的鸦片走私给英国带来了暴利，给中国带来严重灾祸：清朝统治阶级更加腐化，更加残酷地压榨人民；中国对外贸易由顺差转为逆差，白银大量外流；造成金融恐慌，市场混乱，国内工商业日趋凋敝；严重侵害了中国人民的身体和精神，摧残了中国社会生产力；封建统治危机与民族危机不断加深。面对鸦片流毒泛滥成灾，反对鸦片侵略的斗争日益高涨，清朝统治阶级内部形成了弛禁派与严禁派。许乃济等反对严禁，公开奏请弛禁鸦片。黄爵滋、林则徐等鲜明地提出严禁鸦片的主张，形成一个鸦片非禁不可的全国性舆论。严禁派逐渐占了上风。道光十八年十一月十五日(12月31日)，道光帝任命林则徐为钦差大臣，驰赴广州，主持禁烟。十九年正月二十五日(3月10日)，林则徐抵广州，与两广总督邓廷桢、广东巡抚怡良、广东水师提督关天培密切合作，严禁鸦片。对内劝惩结合，广泛劝谕戒烟，发动绅民查拿烟贩，收缴烟土、烟枪，严禁吸食、贩卖。对外则缴烟与具结结合，谕令外商缴交全部鸦片出具甘结，保证此后不再偷运鸦片来华。以英国驻华商务监督查理·义律为首的不法外商拼命破坏。林则徐针锋相对，坚决反复斗争，终于迫使义律和英、美鸦片贩子共缴出鸦片19187箱又2119袋，重237万多斤。从四月二十二日至五月十五日，在虎门海滩当众销毁。这是近代中国人民维护民族尊严、反对外国侵略的第一次伟大胜利。为了防备英国的军事侵略，林则徐在虎门销烟前后，积极筹办海防，加强备战，相信"民心可用"，组织团练水勇，多次打退英军武装挑衅。

八月二十四日，英国内阁决定出兵侵华。二十年一月(2月)，英国政府任命乔治·懿律和查理·义律为正、副全权代表，并任命懿律为侵华英军总司令。五月，由舰船48艘、大炮540门、陆军4000人组成的英国"东方远征军"，先后到达广东海面，封锁珠江口，第一次鸦片战争爆发。战争分为三个阶段，主要在粤闽、浙江两个战区进行。第一阶段，从二十年五月下旬英军封锁珠江口开始，到十二月下旬义律单方面宣布所谓《穿鼻草约》，强占香港为止。侵华英军到达中国海面后，挑起战端，因林则徐严密设防，未能入广州；旋即以5艘舰船封锁珠江口，主力则于六月初北犯福建厦门，未能得逞。接着，又北犯浙江，攻陷定海。七月中旬，到达天津大沽口外，投书清廷，提出割地、赔款、通商等无理要求。道光帝由抵抗转向妥协，命弛禁派、投降派直隶总督琦善到达大沽口与英军会谈。为换取英军返棹南还，清廷谴责林则徐、邓廷桢在粤禁烟措置失当，并向英军表示要重治其罪。英军于八月折回南方。道光帝改派琦善为钦差大臣、署两广总督，赴粤继续与英军谈判；同时，将林则徐、邓廷桢等革职查办。琦善到广州后，一反林则徐所为，撤除珠江口附近防务，遣散水勇乡勇，同意义律提出的种种侵略要求，只对割让香港一事不敢贸然答应。义律了解到琦善求和心切和广东防务空虚，进一步施加压力，迫使琦善完全屈服，于十二月十五日(1841年1月7日)攻占虎门要塞的第一重门户沙角、大角炮台。琦善赶忙向义律乞和。义律提出《穿鼻草约》，并未经双方议定、更未签字，即于二

十八日单方擅自宣布。内容为：割让香港；赔偿烟价600万元；恢复广州通商；英军退出定海等。二十一年正月初四(1月26日)，英军宣布“正式占领”香港岛。第二个阶段，从二十一年正月初五清政府对英宣战开始，到四月上旬《广州和约》签订，三元里人民抗英胜利为止。正月初五，清廷获悉沙角、大角炮台被占，道光帝下诏对英宣战，派御前大臣、皇侄奕山为靖逆将军，隆文和杨芳为参赞大臣，前往广东主持战事。但道光帝并无真正抵抗的决心，竟提出所谓“攘外必先安内”的反动方针，对林则徐等抵抗派仍排斥不用。义律因琦善未在所谓《穿鼻草约》上签字，又获悉清廷调兵遣将，乃先发制人，于二月初六攻占虎门各炮台。初七，英军溯珠江而上，进逼广州。三月二十三日，奕山、隆文及新任两广总督祁𡑴到达广州。奕山提出“患不在外而在内”、“防民甚于防寇”。为了邀功请赏，他于四月初一在无充分准备的情况下，突然发动夜袭，而英军却乘机进攻，占领了城郊重要据点与四方炮台，包围广州城，居高临下，飞炮轰击城内。奕山急派广州知府余保纯缒城而下，向英军乞降。初七签订了《广州和约》，其中包括清军撤离广州城60英里以外，奕山等向英军交纳“赎城费”600万元。然而，广州人民却不甘屈服。初九，三元里人民奋起惩罚进犯该地的英军，初十至十一日，广州北郊103乡群众、城厢丝织工人、打石工人和各乡爱国绅士纷起响应，组成义军，发动了中国近代史上第一次自发武装抗英斗争，取得辉煌胜利，迫使英军撤离广州，退出虎门。第三阶段，从二十一年七月英军再度进攻厦门开始，到二十二年七月二十四日(8月29日)《南京条约》签订为止。英国政府对义律在《穿鼻草约》所规定的特权仍感不满足，二十一年闰三月初十，任命璞鼎查为侵华全权公使，取代义律，扩大侵华战争。七月初十，英军攻陷厦门。八月英军再犯定海，十七日定海再度失陷。接着英军攻占镇海、宁波。在此期间，宁波、镇海等地人民组织“黑水党”勇敢机智地不断袭击、重创敌人。清政府为了挽回在浙江所受挫败，于九月初四，又派皇侄奕经为扬威将军赴浙主持战事。奕经与奕山一样腐朽庸懦，既不了解敌情，又毫无战守准备，却迷信梦幻“吉兆”，于二十二年正月二十九日，从绍兴分兵三路反攻宁波、镇海、定海，幻想侥幸一举收复三城。英军乘机反扑，攻占慈溪，奕经逃回杭州，从此不敢再战。道光帝此时转向妥协，起用投降派代表耆英、伊里布向英军求和。英军置之不理，暂拒和谈，继续向经济重心地区长江流域进军，逼清政府答应其全部侵略要求。相继攻陷乍浦、吴淞炮台、宝山、上海县城及镇江等地，英军舰驶抵南京江面。耆英、伊里布和牛鉴赶到南京求和。七月二十四日，耆英、伊里布代表清政府，璞鼎查代表英国政府，在英舰“皋华丽”号签订了中英《江宁条约》，即《南京条约》，鸦片战争结束。

鸦片战争，就英国而言，是侵略的、非正义战争；就中国而言，是反侵略的、正义的战争。但是，由于清朝政治十分腐败、中国经济技术落后，中国失败了，英国打胜了，用大炮轰开了中国的大门。鸦片战争后外国资本主义侵略者强迫清政府签订了中国近代史上第一批不平等条约，从中国攫取了种种侵略特权。除《南京条约》外，英国又胁迫清政府于二十三年六月二十五日(7月22日)，在香港议定并公布了中英《五口通商章程》(八月十五日正式签订)，八月十五日在虎门正式签订了《中英五口通商附粘善后条款》(又称《虎门条约》)。通过这些条约，英国从中国取得了以下主要特权：一、割占香港；二、赔款2100万银元；三、强开广州、厦门、福州、宁波、上海五口为通商口岸；四、英领事在中国享有司法裁判权；五、中国海关进出口货物税率由中、英议定，并降低中国进出口货物的海关税率，绝大部分主要货物的税率为百分之五。六、英国军舰可在五口停泊；七、英国在中国享有片面的最惠国待遇；八、英国人可在五口租地盖房。美国是英国侵华的主要帮凶。在鸦片战争结束后，强迫清政府于二十四年五月十八日(7月3日)在澳门附近的望厦村签订了中美《望厦条约》，取得了以下特权：一、享有英国在《南京条约》中所取得的除割地、赔款以外的各项有关特权；二、美国兵船可以自由出入中国通商口岸；三、美国可在通商口岸建立教堂、医院；四、中国变更关税，需与美国领事官议允；五、扩大了领事裁判权。法国也不甘落后，强迫清政府于二十四年九月十三日(10月24日)在广州黄埔签订了中法《黄埔条约》，取得了以下特权：一、享有中英、中美条约中规定的各项有关特权；二、法国可在五口租地建立教堂，中国有保护教堂的义务。

鸦片战争，促使中国发生了前所未有的变化，成为中国历史上的重要转折点，是中国由封建社会一步一步变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开始。战前，中国在政治上是一个独立自主的国家。战后，中国的关税、司法、领海等主权开始受到破坏。它标志着中国从独立国被迫开始走上半殖民地的道路。战前，中国是一个自给自足的封建经济占统治地位的国家。战后，外国资本主义凭借许多不平等条约，向中国大量销售商品和掠夺原料、特产，封建经济受到越来越严

重的冲击，使中国日益成为世界资本主义的商品市场和原料供应地。战前，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是农民阶级与地主阶级的矛盾。战后，除原有的主要矛盾外，新添了外国资本主义和中华民族这一主要矛盾，而且随着外国资本帝国主义侵略的深入，它逐渐成为中国社会各种矛盾中的最主要矛盾。中国社会中的阶级关系和阶级斗争形式，出现了前所未有的新局面。落在中国人民肩上的革命任务是双重的，即不但有反封建主义的斗争，而且还有反外国资本帝国主义的斗争。鸦片战争成为中国人民反抗资本帝国主义及其走狗封建势力的旧民主主义革命的开端。鸦片战争使中国面临着“侵略的西方”与“先进的西方”的双重性挑战。近代中国第一批开明进步的爱国者的回应是，提出了“师夷之长技以制夷”、向西方学习的新课题，开始了向西方寻求救国救民真理的艰巨历程。鸦片战争是中国近代史的开端。

（邱远猷）

沙角、大角之战

清道光二十年十二月（1841年1月）鸦片战争中，中、英在虎门第一重门户沙角、大角的战斗。

道光二十年八月下旬，道光帝任命弛禁派、投降派主要成员之一琦善（约1790—1854，博尔济吉特氏，字静庵，满洲正黄旗人）为钦差大臣，赴广州与英国侵略军继续谈判。九月初八（10月3日）道光帝又革林则徐、邓廷桢职，任琦善署两广总督兼海关监督。十一月初六琦善到达广州，一反林则徐所为，尽撤江防，妥协求和。英国全权代表查理·义律再次提出割让香港、赔款等各项要求，并利用琦善“一意求和”而自毁长城的弱点和做法，于十二月十五日（1月7日）上午8时突然袭击虎门第一重门户——沙角、大角炮台，以迫使琦善接受其所提条件。英军派出水陆兵1461人，大小战船20余艘，由陆军少校伯拉特任总指挥。海面战船分左右两支队，右支队任主攻，攻打沙角炮台，左支队攻打大角炮台。同时，英军向沙角、大角两岸阵地发起进攻，以大兵船向岸上炮台作正面进攻为掩护；另以舢板小船和轮船运载登陆部队绕至后山强行登陆。进攻沙角的英军和收买的汉奸从穿鼻登陆，以汉奸夹在其中引路，用竹梯爬上后山，向驻沙角清军阵地进攻；并焚毁山下三江口守军和水师船10余艘。驻守沙角炮台的清军共600人，由陆军三江口协副将陈连升指挥。陈连升（1775—1841），土家族，湖北鹤峰人，寄居恩施。行伍出身。道光十八年任广东增城营参将；十九年因抗击英舰有功升任此职。此时，他年逾花甲，仍老当益壮，斗志昂扬，亲自坐镇炮台后卫，凭着自己丰富的战斗经验，使用扛炮及事先埋藏的地雷，炸伤爬山而上的数百英兵；使用掺杂炭屑的劣质炮弹与数倍于己的英兵作殊死战斗；并用弓箭堵击来犯之敌，英军在箭雨下被击退数次。战斗从早晨8时直至下午4时前后，守军一直顽强抵抗，但终因敌众我寡，火药已竭，无力退敌。当时驻守靖远炮台的广东水师提督关天培、威远炮台的总兵李廷钰各率兵数百防守，无法前往支援。关天培深感前线兵力单薄，派李廷钰回广州“哭请增兵”，全省文武亦请求派兵往援，琦善却以有碍“抚议”为由，按兵不动，坐视海防被突破。陈连升及其所属兵勇终因兵力单薄，战术呆板，炮台侧后暴露，经不起英军正面炮击和侧后登陆包围而陷入被动。陈连升胸部中弹牺牲。其子武举陈举鹏英勇不屈，见父死，更奋勇力战，誓不投降，被英军戮数刀而死。守备张清龄也英勇奋战，直至身死。沙角炮台陷落。英军进攻沙角炮台的同时，从海上炮击大角炮台，摧毁胸墙、炮洞、山后围墙多处，火药局被烧，并延及兵房。同时，英军纠集汉奸多人从大角后山南北两侧登陆包抄炮台。守军被迫将大炮推入海内，突围撤退。大角炮台陷落。沙角、大角炮台虽然失陷，但守军抵抗十分顽强。陈连升父子为保卫祖国而英勇牺牲的事迹为后人所传诵。时人张维屏（1780—1859，字子树、南山），作《三将军》颂之：“英夷犯粤寇氛恶，将军奉檄守沙角。奋前击贼贼稍却，公奋无如兵力弱。凶徒蜂拥向公扑，短兵相接乱刀落。乱刀斫公肢体分，公体虽分神则完。公子救父死阵前，父子两世忠孝全。”

（邱远猷）

义律擅布《穿鼻草约》

《穿鼻草约》，清道光二十一年（1841）鸦片战争中英国全权代表查理·义律提出并不经中方同意、单方面公布的不平等条约草约。

二十年十一月初六（11月29日），清新任钦差大臣、两广总督琦善抵广州，与义律谈判。十一日义律照会琦善提出割地、赔款、开埠等14条侵略要求的议和条件。十二月初十琦善同意赔款600万元，但对义律提出的仿照葡人在澳门办法，“给予外洋寄居一所，俾得英人竖旗自治”，不敢贸然答应。义律决定进一步施加压力，以迫使琦善完全就范。十二月十五日英军突然发动进攻，强占虎门要塞第一重门户沙角、大角炮台。十九日琦善复照义律，答应“代为奏恳”给予英人“外洋寄居一所”。二十二日义律把原来

要求"寄居地""竖旗自治"变为"让英国主治"。二十三日琦善复照义律，只同意"择一处地方寄居贸易之所"。二十四日义律向琦善提出"以香港一岛接收，为英国寄居贸易之所"。二十八日义律以"公告"形式，单方面宣布他和琦善议而未定、更未经双方签字的《初步协定》(即所谓《穿鼻草约》的第一方案)。主要内容为：割让香港；赔偿烟价 600 万元；恢复广州贸易；英军退出定海。二十一年正月初三(1841 年 1 月 25 日)英军在香港登陆，次日正式举行占领香港的典礼。初五，清廷下诏对英宣战。义律与琦善在狮子洋莲花山下的莲花城，把"初步协定"作为"章程草底"，举行第一次签约谈判。因义律坚持"要香港全岛"，琦善仍"只肯给一处"，谈判破裂。十九日琦善以自拟的《章程底稿》(所谓《穿鼻草约》的第二方案)与义律在穿鼻洋蛇头湾举行第二次签约谈判。因琦善仍只准英人在"香港地方一处寄居"，义律不同意，谈判又无结果。二十二日义律向琦善提出《善定事宜》条款(即《穿鼻草约》的第三方案)坚持要割香港全岛。这时，琦善因奏请香港给英人寄居被革职。他见事情不妙，于二十七日借口病重，请求义律暂缓办理。直到二月初六被锁拿解京，始终没有在草约上签字。　(邱远猷)

虎门之战

清道光二十一年二月(1841 年 2 月)鸦片战争中虎门抗英战役。

是年正月初五(1 月 27 日)，清廷接获虎门要塞第一重门户沙角、大角炮台被占奏报，道光帝下诏对英宣战，派御前大臣、皇侄奕山(1790—1878)为靖逆将军，赴广东主持战事。英军全权代表查理·义律因琦善未在单方面公布的《穿鼻草约》上签字，又获悉清廷调兵遣将，乃先发制人，乘奕山未抵广州之机，于一月下旬向虎门要塞第二重门户进逼。第二重门户是虎门要塞最险恶的中心门户，由沙角、大角向北航 7 里，有上横档岛、饭箩排、下横档岛 3 小岛横挡来路，上横档岛上建有横档炮台、永安炮台。三岛东边为珠江主航道，主航道东侧雄踞南山(亦称武山，俗名亚娘鞋山)，建有威远、靖远、镇远炮台。西岸山上建有巩固炮台、蕉门炮台。林则徐督铸、安装了 5000 至 8000 斤重的大炮几十门，火力可以严密封锁江面。同时，在南山与上横档岛，南山与上、下横档岛间的饭箩排之间江面最窄、水深流急处，安装了两条拦江木排铁链：第一条长达 309 丈，安装大木排 36 个；第二条长 372 丈，安装大木排 44 个。拦江铁链可开可合，犹如"南大门"上两把金锁。由上横档岛再北进 5 里，又对峙着大虎山炮台和小虎山，构成虎门要塞第三重门户。但是，这些号称"金锁铜关"的防御体系尽被新任钦差大臣琦善撤除，造成海防松弛，水勇裁撤，排链冲散，各炮台守军单弱，每台不过数百人。

当时负责指挥保卫虎门的是关天培。关天培(1781—1841)，字仲因，号滋圃，江苏山阳县(淮安)人。行伍出身。道光十四年任广东水师提督。当英军进逼虎门时，他驻靖远炮台，另以潮州镇总兵李廷钰守威远炮台，马辰、多隆武守镇远炮台。他眼看海防尽撤深感痛心，恨声不已，再次派人赴广州向琦善求援。琦善仅派兵 200 人进行敷衍。援兵无望，关天培深知身处绝境，决心以死报国，特派家丁将其广东水师提督官印送走，把自己的几件旧衣服和几枚坠齿装入一只木匣，寄回家中以示诀别。然后来到靖远炮台，坐镇指挥。

正月二十八日，英舰开始向虎门口集结。二月初五前，完成了进攻虎门的准备，计兵船 10 只、轮船 3 只和运输船多只。英军发现下横档岛没有设防，遂于初五下午派出炮兵分队由轮船运至该岛登陆，并连夜选择阵地，安设炮位。初六清晨，南风正盛，英军乘上风轰击横档、永安炮台。守台清军奋勇抗击，英军初未得势，到后来涨潮，复蜂拥逼近，围攻一时许，即陷。清军阵亡 300 人，一部分被俘，少数突围。英军攻占横档、永安炮台后，集中兵力进攻靖远、威远炮台。由于风潮不顺，直至上午 11 时半，两艘最大的军舰"伯兰汉"号和"麦尔威里"号才乘涨潮冒着炮火驶抵南山一里左右的水域，以右舷炮轰击威远、靖远炮台。关天培决心死守阵地，将自己的财物全部分赠将士，鼓励他们英勇杀敌。他亲燃大炮，自上午 10 时至下午 7 时，与敌激战近 10 小时之久。英军自炮台背后进攻，关天培身受数十创，血染衣甲，仍持刀拼杀，终因伤重力竭，弹尽援绝，最后含恨壮烈殉国。游击麦廷章(？—1841)及所部战士数十人亦英勇捐躯。虎门各炮台相继失陷。大虎山、小虎山清军不战而退。林则徐对关天培英勇牺牲倍感悲痛，特写挽联悼念："六载固金汤，问何人忽坏长城，孤注空教躬尽瘁；双忠同坎壈(指同时战死的麦廷章)，闻异类亦钦伟节，归魂相送面如生。"　(邱远猷)

广州之战

清道光二十一年(1841)鸦片战争中广州抗英战役。

英军攻陷虎门要塞第一重门户沙角、大角炮台后，在道光二十一年正月初四(1月26日)占领香港。初五清廷下诏对英宣战。初八清廷命御前大臣、皇侄奕山为"靖逆将军"，户部尚书隆文(?—1841)和湖南提督杨芳(1775—1845)为参赞大臣，赴广东主持战事，又陆续从四川、湖南、贵州等7省调集军队1.7万多人开赴广东。二月初六，英军攻陷虎门，溯江而上。初九新任英陆军司令卧乌古(Hugh Gough，1779—1869，另译郭富)少将及两兵船到达广州，准备新的进攻。广州城分新城和老城(或称外城、内城)，均系明代建筑。南濒珠江，北依白云山，沿江傍山筑有大小炮台15座，防卫相当严密。二月十三日杨芳到达广州。三月二十三日奕山、隆文及新任两广总督祁𡊮(1777—1844)到达广州。林则徐向奕山提出6条系统的御敌措施：一、堵塞水道要口；二、洋面船只查明备用；三、炮位验演拨用；四、火船水勇，整理挑用；五、外海战船分别筹办；六、夷情宜周密探报。但未被重视。奕山诬蔑广东人民是"汉奸"、"匪徒"、"贼党"，认为粤省情形，"患不在外而在内"，辱骂主战者皆"无赖之徒"，公然提出"防民甚于防寇"的反动卖国方针。闰三月初十，英国政府任命璞鼎查(Henry Pottinger，1789—1856)取代义律为侵华全权公使，扩大侵略战争。道光帝自宣战以后，幻想速胜，不断严催奕山赶快进剿，以显国威。奕山也想一战幸胜，邀功请赏。于是决定在闰三月二十日以后选择月黑潮顺之夜，对侵入广州附近的英军发起一次反攻，企图以夜袭取胜，进而收复各处炮台。当时英舰早已占据大黄滘、二沙尾要隘，经常游弋于白鹅潭一带。四月初一夜，奕山匆令陆路兵弁加意防堵，令都司胡倖伸、守备孙应照、千总杨泽等率领1700余名兵勇，分三路乘小船去焚烧停泊在白鹅潭上的英舰，并围攻洋馆，开始了广州抗英战役的序幕，初获小胜。但英军得到情报早已逃退，损失甚微。次日黎明，英舰顺风进攻，猛攻西炮台，守军溃退。英军接着进攻泥城，数十只民船、木筏及大批造船材料被毁。奕山的广东反攻作战，由于谋划不周、敌已有备等原因，遂以失败而告终。

清军三路反攻失利，英军决定乘势进攻广州城。四月初三，英陆军司令卧乌古、海军高级长官佛兰明统率舰队集中珠江，会晤义律，探明清军情况后，确定了分左右两翼攻城的计划。选定城西北为主攻方向，首先夺取西炮台，而后绕道城西直插城北越秀山(又称观音山)，夺取山上炮台，控制俯瞰全城的制高点。此任务由左纵队担任，以第26团，配备炮兵20人、工兵30人，共360人组成。同时，以一部分兵力进攻省城西南的商馆区，吸引清军注意力，保证主攻部队的行动。此任务由右纵队担任，以第49团、37团、18团及水兵、炮兵等共2393人组成。四月初四，清帝诞辰日，英军乘机分左右两翼开始进攻广州城，广州战役正式开始。攻城英军共2753人。驻防和入援广州的清军共4.9万人。清军比英军多近20倍。下午3时，英军右纵队开始在商馆附近登陆，占领了紧靠城南的商馆区，严重威胁广州城，但广州城高兵多，进攻不易奏效。在右纵队登陆1小时后，左纵队搭乘的30只船在铁壳轮船"尼米斯"号(即"复仇神"号)拖带下，溯江而上，于下午6时到达登陆地点泥城。当晚，步兵和炮兵大队一部先后登岸，遭到当地壮勇的阻击，死伤数十人。但湖南兵为了争功邀赏，竟在后面乱放排枪，击伤壮勇多名，引起混乱。英军后续部队趁势大批上岸。四月初五凌晨，英军全部上岸，经由缯步、西村、流花桥直扑北门外各炮台。广州城北越秀山一带有拱极、保极、耆定、永康(四方炮台)、东得胜和西得胜炮台6座，由西向东，弧形排列。由贵州、湖北兵4100名防守，安装有42门各种类型的大炮。上午8时，英军开始炮击最西端的拱极、保极炮台。9时半，步兵开始进攻。清军毫不畏惧，与敌激战。同时，驻守在城西北山丘上的约4000名清军和广州城内清军，使用炮火猛轰敌人，有力支援了城北高地防御战斗。英军死9人，伤68人，损失惨重。一海军少校中弹毙命，另一英军被打断一条腿。一颗炮弹落在卧乌古近旁爆炸，卧乌古泥首垢面，魂飞天外，侥幸不死。但一小时后，清军力不能支，放弃炮台和阵地纷纷退入城内。广东按察使王廷兰欲乘敌立足未稳，率兵出城夺回炮台，奕山不允，万余清军只得依托城墙不断炮击英军，十分被动。英军占领城北越秀山最高处的四方炮台和山岗后，贴近城墙不足100米，居高临下，俯瞰广州全城。英军在四方炮台上向城内俯射，昼夜不息；与此同时，其兵舰则沿珠江20里飞炮攻城。城内两个大火药库被击毁，火光冲天。满城大吏惶惶无主，居民群涌出城，一时陷入混乱。至此，清军阵亡500人，受伤1500人。卧乌古乘机袭取广州城，四月初六更集中炮火猛轰城北贡院奕山住所。奕山伏处一隅，一筹莫展，竖起白旗，命广州知府余保纯缒城而出，向敌人投降。广州战役以清军失败而告终。 (邱远猷)

《广州和约》签订

《广州和约》，鸦片战争中清将领奕山与英国代

表查理·义律于广州订立的停战条约。

清道光二十一年四月初四(1841年5月24日),英军分左右两翼开始进攻广州城。初五占领城北四方等炮台,飞炮攻城。初六更集中炮火猛轰城北贡院奕山住所。奕山等惊慌万状,上午10时,派人挂出休战白旗,并派广州知府余保纯缒城而出,向英军乞和。初七奕山接受了英军提出的全部条件,签订了《广州和约》。规定:限奕山等率外省军队6日内撤出广州城200余里;不得重新武装各要塞;一星期内向英军缴纳"赎城费"600万元;赔偿英国商馆损失30万元;"赎城费"付清后,英军撤出虎门。奕山一面撤兵,一面向道光皇帝谎报军情,把大败说成大胜,把自己求降说成英人"乞求通商",把赔款说成"商欠"。昏聩自大的道光帝,虽然也知道奕山打了败仗,却于五月二十九日下谕,以"该夷性等犬羊,不值与之计较","朕谅汝等不得已之苦衷,准令通商"为词,默认了《广州和约》,以期早日结束战争。但英国勒索巨款后,又提出割香港、订正约。因未达到要求,旋即撕毁和约,扩大侵华战争。　(邱远猷)

三元里人民抗英斗争

鸦片战争时期广州人民自发的武装抗英斗争。

鸦片战争爆发后,英军入侵,使劳动人民蒙受了深重灾难,也损害了地主士绅的利益。因此,广大人民群众和爱国士绅对英国侵略者同仇敌忾,郁积了强烈愤恨。清道光二十一年四月初五(1841年5月25日)英军攻占广州城北四方等炮台后,四出骚扰,无恶不作。尤其是经常到泥城、西村、三元里、萧冈一带村落,杀人放火,奸淫妇女,抢劫粮食、牲畜,甚至盗掘坟墓,盗取陪葬品。城乡各地绅民便利用旧有的社学为联系纽带,集众会盟,誓师抗击英军侵扰,保卫家园。初七,清将奕山与英军订立《广州和约》,广州城乡人民义愤填膺,奋起反对,议定联防抗英。初九早晨,一小股英军又窜入距城北约6里的三元里村东华里,适遇菜农韦绍光(约1810—约1901)的妻子李喜外出拜神,被英军拦截,恣意侮辱。韦绍光见状,忍无可忍,与敌力搏,乡人群起相助,当场打死英军八九人,其余狼狈逃窜。三元里人民料定英军必来报复,立即在东华里门外的三元古庙(供奉北帝的道教小庙,道教所指的天、地、水为"三元",故名)前齐集,誓愿齐心合力,共同御敌。他们取出庙中北帝神座前的三星神旗(黑底,白三连星,白牙边)共同举手对旗宣誓:"旗进人进,旗退人退,打死无怨。"据说旗上的白色三连星象征天时、地利、人和,因此,三元里村民把它作为同英军战斗的指挥旗。爱国士绅番禺县萧冈乡(广州市境内)举人何玉成以地跨南海、番禺两县的怀清社学领导人身分,向广州城东北、南海、番禺、增城诸路各村发出"飞柬",要他们集合丁壮,准备抗英。下午,附近103乡群众代表聚会于南海、番禺交界的牛栏冈,共商组织群众联合抗英的部署,一致决定:一、三星旗为总指挥旗,各乡自成一个战斗单位,各备乡旗一面,推选领队,指挥作战;二、吹螺、打鼓进兵,只许前进,不许后退;三、各乡准备大锣数面,一有警报,一乡鸣锣,各乡皆出;四、不正面进攻,诱敌深入至丘陵起伏、人民武装主力埋伏的牛栏冈围歼;五、16岁至60岁男丁一齐上阵杀敌,老弱疏散至西海、茶头、潭村一带,妇女在后方煮饭接济粮食。还派专人与邻乡村民和社学、书院等社团组织以及附近的打石工人、城西高基围的纺织工人(机房仔)取得联系,以求支援。这样,一支有组织、有纪律、有共同指挥标志的抗英义勇队伍迅速组织起来。其中主力是贫苦农民,另有丝织、打石和烧炭工人,渔民,秘密会党成员和爱国士绅。而爱国士绅是主要的组织者和领导者。四月初十清早,经过一夜繁忙准备的各乡义勇1万多人,打着各色斑斓旗帜,手持大刀、长矛、鸟枪、锄头、铁锹、木棍、石锤,浩浩荡荡向英军占据的四方炮台挺进佯攻。英军司令卧乌古率手持新式武器的1000多英军负隅顽抗。在战斗中,卧乌古曾下令炮兵发射火箭、火炮。义勇队伍按原定计划,诱敌深入,进到牛栏冈附近。忽然,螺号、战鼓齐响,伏众四起,漫山遍野,猛冲下来,围歼敌人。义勇颜浩长手持长矛冲杀在前,挺矛刺死英军少校毕霞。英军被迫转入防御。下午2时,大雨滂沱。英军陷在泥泞里难以动弹,枪炮淋湿不能使用。相反,由于义军用刀矛、地理熟、打赤脚等特点,却能不受雨天的限制,发挥出自己的长处,越战越勇,乘机分割包围,痛歼敌人,"杀之如切瓜"。英军舍命突围,无奈人积如山,围开复合,各弃其枪枝,"徒手延颈待戮,乞命之声震山谷"。直到晚9时,在四方炮台守敌的接应下,逃出丘陵地带,溜回四方炮台。在这场围歼战中,"三元里前声若雷,千众万众同时来","妇女齐心亦健儿,犁锄在手皆兵器","少壮争御侮,老弱争赍粮",组成了一幅人民战争的画卷。牛栏冈围歼战,计杀死英军5人,击伤英军官兵23人,义勇牺牲20余人。抗英义勇乘胜追敌,当夜包围了四方炮台。第二天,四月十一日,广州附近佛山、番禺、增城、花县、从化等各地义勇民众,不约而来者,竟至数万人,把英军团团围困在四方炮台,刀矛如林,杀声震天。义律、

卧乌古无计可施，便密派奸细混出重围，投书广州知府余保纯，威胁说：群众"示威运动"如不制止，便立即"恢复敌对行动"。奕山、两广总督祁埙派余保纯和南海、番禺两知县前往威胁、诱骗绅民，强迫解散抗英队伍，英军得以解围。十二日，英军上船撤离广州，退出虎门。英军在三元里遭到痛击后，贴出布告把败退说成"宽容"，三元里等村民亦大张檄文，表达"我们义民……不用官兵，不用国帑，自己出力，杀尽尔等"的豪迈气概。三元里抗英斗争，是近代中国人民自发的武装反抗外国侵略者的第一声，并取得了"自从航海屡交锋，数万官军无此绩"的辉煌战果。1950年广州市人民政府为三元里人民抗英斗争竖立纪念碑，碑文为"一八四一年广东人民在三元里反对英帝国主义侵略斗争中牺牲的烈士们永垂不朽。"

（邱远猷）

定海、镇海之战

清道光二十一年(1841)鸦片战争中浙江抗英战役。

广州休战后，清道光帝以为万事大吉，下令沿海各省撤兵。然而英国政府对义律在《穿鼻草约》中所攫取的特权仍感不满足，于道光二十一年闰三月初十(4月30日)任命璞鼎查接替义律为驻华全权公使，扩大侵略战争。六月二十四日，璞鼎查抵香港、澳门，拼凑侵略军。除留军舰6艘、轮船2只以及陆军1300人留守各港外，其余军队倾巢而出。七月初五，他会同海军司令巴加(Sir William Parker，1781—1866)和陆军司令卧乌古，率领军舰10艘、轮船4只、运输船4只，装载陆军2500余人，驶离香港，自广东海面再次北犯。七月初十攻陷厦门，总兵江继芸力战牺牲。八月间，英军再犯定海。定海三面环山，北有晓峰岭，俯瞰县城，崖岭陡绝，临海有间道，由安徽寿春镇总兵王锡朋(1786—1841)出守；东为竹山门，滨海，港狭水深，由浙江处州镇总兵郑国鸿(1777—1841)守卫；南为道头，空旷无蔽，海陆往来要道，修筑土城一道长1430余丈，由浙江定海镇总兵葛云飞(1789—1841)据守，当敌要冲；西为九安门，山重叠，去海远。八月十一日英舰29艘，结集舟山群岛黄牛礁一带，侦察定海海面。十二日午后开始发炮进攻。岛上守军4000人浴血奋战6昼夜，而军粮匮乏，士兵每人每日只有光饼之类6两(约合今4两)，后来每日只得3碗稀粥，日夜枵腹作战，给英军以重大杀伤。十七日，英军利用大雾天气，乘清军饥饿交困，分作三路：一由五奎山迎面攻打，一由东面东港浦，一由西北晓峰岭，向清军发动总攻。英军分番迭进，清军倚崖踞守。官兵日夜苦战，不得安息，食物又供不应时，饥疲交加，且连日下雨，衣甲尽湿，但仍艰苦战斗，往返泥泞，士气高昂，全力反击，实为"年余未有之恶战"。午后2时，英军从晓峰岭登陆，攻入县城，葛云飞、王锡朋、郑国鸿率军死守，最后壮烈牺牲。定海再陷敌手。在这次保卫战中，清军击焚英军大轮船1只，大兵船3只，舢板船多只，杀伤英军数百人。

定海陷落后，英军供应困难，急谋进窥镇海、宁波，为其冬季驻军夺取营地。镇海位于甬江入海口西岸，东濒甬江，北临大海。甬江口西岸的招宝山与东岸之金鸡山夹江对峙，形势十分险要。由钦差大臣、两江总督裕谦驻守。裕谦(1793—1841)，原名裕泰，字鲁山、衣谷，博罗忒氏，蒙古镶黄旗(锡林部盟商都镶黄旗)人。他反对妥协，坚持抵抗侵略，对镇海防御十分重视，在招宝山、金鸡山加筑了炮台和工事，增设了炮位，并于甬江口填塞巨石，暗钉木桩。各炮台共安装大小火炮86门，连同定海溃兵，共有防兵5000余人。其部署是：浙江提督余步云率兵1000余防守招宝山及其以西之东岳宫；总兵谢朝恩率兵1500人防守金鸡山；总兵李廷扬率兵数百防守东岳宫以西之拦口埠炮台(该炮台控扼江口，与金鸡、招宝两山的炮台互为犄角)；沿江两岸傍泊火攻船只，凡可登陆之处，均挖掘暗沟，密布蒺藜，分驻兵勇。裕谦率兵1000余人坐镇县城指挥。八月二十四日，英军在镇海外海黄牛礁集结，二十五日完成临战准备。其进攻计划和部署是：以舰炮摧毁金鸡山、招宝山的炮台和工事，并阻止镇海县城清军增援，掩护陆军登陆攻占上述两山(以金鸡山为主攻方向)；后面水陆并进，夺取镇海。登陆部队由陆军、水兵和海员2400余人组成，分为左、中、右三纵队。二十六日晨，左、中纵队在3艘军舰的掩护下开始进攻。中央纵队在金鸡山东北的突出部位登岸，即向金鸡山前进。左纵队乘舢板驶入小浃江登陆，绕攻金鸡山侧后。守军腹背受敌，仍顽强抵抗，多次同进攻之敌展开非常激烈的肉搏战，伤毙英军数百人。终因伤亡甚众，总兵谢朝恩受伤落海阵亡，金鸡山失守。与此同时，英军大型舰4艘，以200余门舰炮，对招宝山猛轰，烟火漫天。余步云贪生怕死，临阵不令士兵开炮还击，甚至单骑上城，谒见裕谦，以"保全数百万生灵"为词，请人向英军求和，以"暂事羁縻"。裕谦指责他："苟且旦夕，况有伤国体。"后来，余步云又登城哀求裕谦说："以伊一人身死，分所宜然，但家中妻子儿女三十余口，实属可怜！"裕谦对他说："儿女情长，英雄不免，但忠

义事大，此志不可夺。”余步云不听劝告，眼看英军欲登招宝山，便率先弃台逃跑，裕谦在城上鸣炮制止，余步云仍率部绕山逃往宁波。上午11时许，英军右纵队在招宝山登陆，随即占领，居高临下，俯击县城。守军登城抗击，英军以大炮俯轰，掩护步兵从东门蜂拥缘梯登城。裕谦见金鸡山、招宝山相继失守，镇海城危，大势已去，便怀着失地辱国的义愤，殚竭血诚，投水殉职。守军伤亡惨重，余部弃城逃走，镇海失陷。八月二十九日，英军进攻宁波，由镇海逃回宁波的余步云又与宁波知府、鄞县知县逃奔上虞，文武员弁溃散一空，宁波未战失守。九月初三，清廷派协办大学士、吏部尚书、皇侄奕经(1791—1853)为扬威将军，蒙古副都统特依顺(？—1849)、侍郎文蔚(？—1855)为参赞大臣，牛鉴(？—1858)为两江总督。并下令从江苏、安徽、江西、河南、湖北、四川、山西、甘肃、陕西等省调兵遣将，驰赴浙东。奕经离京后，一路游山玩水，蓄意拖延，直至二十一年十二月十一日才到达嘉兴，与文蔚等筹划反攻事宜。二十二年正月初一(2月10日)，奕经等移驻浙江省城杭州。当时，从各省调来援兵1.1万人，召募水勇、乡勇2000余人，云集浙东，人人思奋，敌忾同仇。但奕经却诬蔑浙江人民十之七、八是“汉奸”；且又愚昧怯懦，指挥调度乖方，幻想侥幸取胜。十六日，他与参赞文蔚同时梦见英军弃陆登舟，联帆出海，宁波三城已绝夷迹，以为这是“吉兆”，决定采取“明攻暗袭，同时并举”的方针，兵分三路，全面反攻，一举克服宁波、镇海、定海三城。继而，奕经又往杭州西湖关帝庙占得虎头签，因寅属虎，据以择定“四寅期”为出师“吉日”，于壬寅年(道光二十二年)、壬寅月(正月)、戊寅日(农历二十九日)、甲寅时(四更)，贸然分3路反攻宁波、镇海、定海。但是，奕经的计划早已为英军探知，并做好了应战准备，乘机进行反扑。在宁波，清军冲入城内，途中突遭英军伏击，伤亡很大，不支后退。在镇海，清军与英军刚一接仗，稍有伤亡，即行败退。至于定海，曾发动一次小规模夜袭，没有成功。奕经的幻想完全破灭。英军乘胜反扑慈溪，负责前路指挥的文蔚首先弃营宵遁，全军遂溃。奕经等仓皇逃回杭州，从此不敢再战。当时浙江传出一副对联：“红鬼、白鬼、黑鬼，俱由内鬼；将军、制军、抚军，总是逃军。”描绘出了这批官僚的丑恶嘴脸。　(邱远猷)

黑水党抗英斗争

鸦片战争中浙江沿海船民自发的抗英斗争。

清道光二十一年(1841)英军侵占定海、镇海、宁波后，四出骚扰，烧毁房屋，抢掠银钱，奸淫妇女，强夺牲畜，其惨状不可胜言，从而激起了浙东等地人民和爱国人士的强烈反抗。当地人民以徐保(绰号大白板)、张小火、钱大才为首，组织宁波黑水党，平时分伏在宁波城乡内外，并在江中备有8桨船多只，经常神出鬼没，专门狙击袭杀小股英军。二十二年四月二十九日(6月7日)，定海县36岙民众集誓订盟，“协心”杀敌，发出告示，号召人民用各种方法抗英：“一次无成，二次再举；水战不胜，陆战再图；明不得手，暗可施谋”；“使彼有防所不及防，有备所不能备”。宁波人民也发出《公启》，号召“各乡里父老……各自为主，或一人而聚数十人，愈多愈好，或用暗计，或用明攻，总要把红毛夷人除灭，不在浙省滋闹”。黑水党用“奇策秘术”斩取英军的头颅。仅宁波一地，被擒斩的侵略者就有42名。结果使英军防不胜防，引起大惧，不敢复留，遂弃宁波、定海，退镇海。　(邱远猷)

吴淞之战

清道光二十二年(1842)鸦片战争中吴淞抗英战役。

吴淞口位于江苏宝山县境黄浦江与吴淞江汇入长江的出口处，是保卫上海和长江门户的首要阵地。道光二十年鸦片战争爆发后，由江南提督陈化成(1776—1842，字业章，福建同安人，出生于金门)驻守。他在前任两江总督裕谦的支持下，积极备战，大力加强吴淞阵地防御。从吴淞镇到宝山县城六七里长的江岸上，共筑土塘26座，既可御敌，又能藏身，俨如一道长城，共安炮154门，统称西炮台。由陈化成亲率苏松镇总兵周世荣部1300人防守。在吴淞口的东岸筑有一略成圆形的炮台，安炮27门，称为东炮台。由署理川沙营参将崔吉瑞带兵1000多人防守。在东、西炮台之后，另有徐州镇总兵王志元带兵700人，防守宝山县城西北的沙背，以防英军迂回包抄。两江总督牛鉴带兵2000余人防守宝山县城，以为后援。陈化成亲临校场，指挥士兵操练演习，并经常对士兵进行爱国教育，他说：“人莫不有一死，为国而死，死亦何妨？我无畏死之心，则贼无不灭矣！”陈化成在吴淞深得将士敬佩拥戴，连侵略者也畏其威名，有所谓：“不怕江南百万兵，只怕江南陈化成。”二十二年四月，英国从印度派来的援军大小舰船100余艘，载有陆军万余人，陆续到达中国。三十日(6月8日)英舰27艘，陆续集结在长江口外的鸡骨礁附近，并闯入吴淞口内测量水道。五月初八清晨6时，英舰分批驶入沿江，向吴淞进犯。未等敌舰全部泊

定，陈化成亲自指挥西炮台最先开炮击敌，战斗空前激烈，达两个半小时，英军旗舰“皋华丽”号及其它各舰被击中多次，死伤20余人。英军感到：这是“自与中国军队作战以来，中国人的炮火以这次最厉害”。炮战自清晨至中午，陈化成一直出帐挥旗发炮，与敌军对击。但守小沙背的王志元按兵不动。守东炮台的崔吉瑞则作壁上观，不发炮。而牛鉴见炮战初胜，竟大摆仪仗，耀武扬威，前来观战。英军发现后，一阵炮轰，牛鉴十分惊恐，急檄陈化成退兵，陈化成不从，牛鉴溃逃太仓。英舰炮火并力轰击西炮台。周世荣贪生怕死，劝陈化成撤兵，陈化成拔剑怒斥：“向谓尔诚，荐拔若是，今尔负我，以至负国！”周世荣顾自逃命。陈化成带领亲兵数十人坚守孤立无援的西炮台阵地。他操炮发射，连发数十炮。炮震手伤，血流至胫，还坚持指挥抬枪队、鸟枪队，向登岸侵略军射击。登陆英军大队蜂拥而至，他身中7弹不能支，血流如注。最后和所部官兵80余人全部壮烈牺牲，西炮台失守。东炮台守军溃散。宝山未战而失。十一日上海县城被占。但这次战斗亦给英军以重创，共击毁敌舰多艘，歼敌数百人。陈化成的遗体收殓在嘉定关帝庙，殡葬时，数万人罢市哭奠。时人有诗凭吊陈化成老将云：“报国捐躯日，遥天黯将星，山河留壮气，风雨泣阴灵；泪洒三年血，名流万载馨，茫茫烟水阔，凭吊问沧溟。”　（邱远猷）

镇 江 之 战

清道光二十二年(1842)鸦片战争中镇江抗英战役。

二十二年五月(6月)，吴淞、宝山、上海相继失陷后，英军以攻占镇江、控制南北交通命脉为目的，溯长江西上。由于清廷决计求降，沿江防务瘫痪，英军顺利地于六月十三日(7月20日)全部到达镇江城下。镇江位于长江和运河的交汇处，是运河的咽喉，江宁(南京)的屏障。镇江城雄峙长江南岸，西北有金山，东北有北固山、焦山、象山。战前，由江宁副都统海龄(？—1842，郭洛罗氏，满洲镶白旗人)驻守。他采取闭城固守策略，保卫镇江。二十二年六月十二日，英军集中海陆军1.2万余人，其中包括海军陆战队9000人，具有高度的作战效能，而且大部分兵士有毛瑟枪装备，又配备炮队，开始登岸攻城。海龄只有旗兵2400人，其中当地旗兵1200人，青州绿营兵400人，武器仍是古老的刀、矛和抬枪。敌我力量对比悬殊。但海龄不畏强敌，领导守军英勇抵抗。他亲冒矢石，点兵上城，并令城中居民置水瓮砖石，准备与敌巷战。他指挥守城炮兵勇猛发炮，轰击登岸英军，给予沉重打击。当时，城外各地则由参赞大臣齐慎、湖北提督刘元孝带兵驻防。为了扭转围困局面，海龄曾一度派兵出城出击。但在出击失利后，便一味闭门自守，而且对发动组织居民、乡民协守也不得力。闭城后，他做了一定的肃奸工作，但因严厉阻止难民迁徙出城，并持民族偏见，肆意扩大索奸，造成乱捕乱杀，一度引起恐怖混乱。十四日，当齐慎、刘元孝败退后，英军全力攻城。海龄决心死守镇江，与城共存亡。他亲驻北门城楼，相机调度，并令协领武忠阿带领青州兵，驰赴接应。英军重点进攻镇江西门，主要由陆军负责，陆海军协同作战，冒着清军的炮火，蜂拥爬梯登城。海龄亲自带领旗兵堵击，战斗非常激烈。他身受重伤，仍坚持战斗，在危急关头号召官兵：“宁可自杀，决不投降！”守城旗兵誓死抵抗，与敌展开短兵相接的肉搏战，有的用刀矛冲刺来敌；有的徒手将敌人推摔下城墙；有的扭住敌人一起跳下城墙同归于尽；有的杀死自己的妻小，然后与敌拚命搏斗，直至牺牲。敌军军官记载说：中国人“寸土必争，因此每一个城角和炮眼都是短兵接战而攻陷的”。海龄虽率部与英军殊死血战，坚守两日，打死打伤敌军185(一说168)人，终因力量悬殊，镇江失守，守军全部壮烈牺牲，海龄自焚殉国，妻与孙同时死难。镇江保卫战是鸦片战争中的最后一次战斗。英军投入兵力比以往历次都多，但所遭损失比以往历次惨重。镇江军民英勇抗英震动了当时的欧洲。恩格斯曾经高度赞扬镇江抗英英雄们的“勇敢和锐气”，歌颂他们“殊死奋战，直到最后一人”，并且指出：“如果这些侵略者到处都遭到同样的抵抗，他们绝对到不了南京。”　（邱远猷）

《南京条约》签订

《南京条约》，即《江宁条约》。清道光二十二年(1842)英国强迫在鸦片战争中战败的清政府于南京签订的中国近代史上第一个不平等条约。

鸦片战争爆发以来，由于清朝政治极端腐败、中国经济技术落后，清军节节失败，英军步步进逼。在英国侵略者坚船利炮进攻下，道光帝由主战转为倾向主和。他为了讨好英军，在二十二年四月九日(5月18日)，英军攻陷江、浙海防重镇乍浦后，便密令主持浙江军务的扬威将军奕经和重新起用的署乍浦副都统伊里布(1772—1843)，“相机办理，不必强攻”。六月初五英军开抵镇江；初九，道光帝密谕署杭州将军、钦差大臣耆英(1790—1858)，只要英国息战退兵，便同

意割让香港，并增开通商口岸。十二日，英军封堵瓜州口门，英军全权公使璞鼎查照会伊里布，约在江宁（南京）面会。六月十四日英军攻陷镇江，道光帝决心专意“议抚”，二十日授权耆英、伊里布“便宜行事”，向英国侵略者投降，并令奕经所率援军暂缓由浙入苏，以免引起英军疑虑。然而，英军仍不理睬清政府的“羁縻”，决心打到江宁，逼签城下之盟，迫使清政府接受其所提出的全部要求。二十七日，英军除留部分军队驻镇江外，向江宁开进。七月初四，抵达江宁江面。伊里布、耆英紧跟在英舰后面，从浙江追到江苏，由沿海进入长江，于上旬先后抵江宁。同两江总督牛鉴商议与英军谈判事宜。江宁是当时两江总督的驻地，背负钟山，面临长江，龙蟠虎踞，形势险要，是同侵略者一决雌雄的好战场。英军又由于沿途遭到中国军民打击，精疲力尽，只剩3400兵员，加上瘟疫蔓延，作战人员与日俱减，后援难继。侵略军官柏纳德(Bernard)曾供认：“如果不以武力强迫中国方面同我方立即媾和，……战争就会拖延一个更长的时间，……我们就很难说再要用多少时间才能把战争结束。”只要清政府下抵抗决心，断不至于订立城下之盟。但是，清政府为了取信于英国侵略者，根本不敢在江宁积极设防，仅有4500名左右兵士防守，江宁将军德珠布又是一个荒淫无耻的昏官。七月初三，耆英、伊里布派出五品军功顶戴张喜（原为伊里布家丁）、外委陈志刚及谢继超、刘建勋等5人，把照会送去英舰“皋华丽”号上交给璞鼎查；同时，耆、伊被任命为钦差大臣，同英方代表、总管理事麻恭(Maleolm)、译员马儒翰(John Robert Morrisson，1814—1843，即小马礼逊)、罗伯聃(Robert Thom，1807—1846)、郭士立(Karl Friedrich August Gützlaff，1803—1851)等人谈判贸易和赔款等问题。璞鼎查照会伊里布，称如有做主签订之权，即派员先行详议，否则任凭领兵者自办。初四，英军大队到达江宁。初五，道光帝谕令耆英、伊里布完成和局，勿顾虑。英军照会牛鉴称，两国既未议和好，亦未准赎城，惟有前行攻破。随即在南京观音门上岸，进屯迈皋桥。伊里布立即照会璞鼎查，申明已与耆英“钦奉谕旨”，“便宜行事，从权处理”，所有各条，“均可酌商定议”。初七，耆英派盛京佐领塔芬布，伊里布派张喜、陈志刚，到江宁北门仪凤门外静海寺，与麻恭、马儒翰、郭士立、罗伯聃等人会谈，逐条议论。初八，静海预备会议继续进行。英方限明日答复，否则攻城。初九，耆英、伊里布接受璞鼎查所开条款，牛鉴亦备文说明和好诚意。并加派江苏按察使黄恩彤(1801—1883)、四等侍卫、前吉林副都统咸龄和汉奸颜崇礼（又名颜柳桥，扬州盐商）以及张喜，与麻恭、马儒翰、罗伯聃，正式会于仪凤门外静海寺，互示委任状。十一日，黄恩彤、咸龄与麻恭、马儒翰等会于英舰。十二日，中英和议条款决定。璞鼎查通知英水陆师统领，暂停军事行动。十三日，道光帝诏允英人所请，命耆英妥为定议。十五日，璞鼎查为了再次恐吓耆英、伊里布、牛鉴，使其服服帖帖谈判，顺利接受投降条件，特安排他们到英国军舰“参观”。被英军“摆队挎刀”吓得魂飞胆裂的耆英给道光帝奏报说：“该夷船坚炮猛，初尚得之传闻，今既亲上其船，目睹其炮，益知非兵力所能制伏！”十九日，耆英、璞鼎查等会于静海寺。二十一日，璞鼎查与耆英等会于南京城内上江考棚，将前连日集议各条，拟就和约，并缮出汉文，交耆英等阅看。耆英等对外交家们极重视的条约字句、语法，“并不细加审查，一览即了”。二十四日，耆英、伊里布代表清政府，璞鼎查代表英国政府在英舰“皋华丽”号上签订了中国近代史上第一个不平等条约《江宁条约》（亦称《白门条约》）。共13款，主要内容为：一、中国割让香港。从此香港沦于英国的殖民统治之下，成为它进一步侵略中国的基地。二、中国赔偿鸦片费600万银元、商欠300万银元，军费1200万银元，共2100万银元。这是英国侵略者对中国人民的无耻勒索。三、开放广州、厦门、福州、宁波、上海等五处为通商口岸，英国可以派领事官。从此，我国东南沿海门户洞开，外国资本主义势力步步侵入。四、中国抽收进出口货的税率必须由中、英共同协定。这些规定，开了协定关税的恶例，使中国丧失了海关自主权，为外国侵略者对中国进行经济掠夺提供了有利条件。五、废除公行制度，准许英商与华商自由贸易。这项规定不仅是对中国对外贸易主权的践踏，而且也便利了外国侵略者在中国培植为其服务的买办势力。

《南京条约》签订后，为了议定关税税率及其它有关问题，英国侵略者又强迫清政府在广东继续谈判。二十三年六月二十五日，《五口通商章程》在香港公布。八月十五日，耆英与璞鼎查在虎门正式签订，作为《虎门条约》的一部分。共15款。附有《海关税则》。主要内容：一、凡是中国人和英国人“交涉词讼”，“其英文如何科罪（即定罪），由英国议定章程、法律，发给管事官（即领事官）照办”，即承认英国享有领事裁判权。二、规定绝大部分货物的税率为值百抽五。低标准的关税税率的确定，使中国海关开始失去保护本国工商业发展的作用。八月十五日，耆英与璞鼎查在虎门还签订了中英《五口通商附粘善后条

款》，又称《善后事宜清册附粘和约》，通称《虎门条约》或《虎门附条》。《虎门条约》属于《南京条约》的子约，是《南京条约》的重要补充。中英《五口通商附粘善后条款》共16款，附有《小船定例》3款。主要内容：一、“设将来大皇帝有新恩施及各国，亦应准英人一体均沾”，从此英国取得了片面的最惠国待遇。二、准许英人在五口租地盖房，永久居住。这项规定成为日后“租界”的开始。

《南京条约》和《虎门条约》都没有提鸦片问题。这是因为耆英等清朝官吏认为用不着在条约上规定鸦片贸易为合法的缘故，他们向璞鼎查作了保证：不管外国商船带不带鸦片，中国不必禁问，也不采取任何行动。在英国侵略者和清政府这一默契下，实际上鸦片走私继续进行。

《南京条约》是资本主义侵略者强加给近代中国的第一个不平等条约，是套在中国人民头上的第一副枷锁，是中国开始从独立自主的封建社会逐步走向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标志。　（邱远猷）

广州人民反入城斗争

清道光二十三(1843)至二十九年广州城乡人民反对英国侵略者强行入城的斗争。

鸦片战争前，外国商人来华贸易一向居住在广州城外的洋馆。二十二年《南京条约》签订，其中虽有英国人可以在五口居住、贸易的条款，但没有准许英人入城的规定。可是，英国侵略者于二十三年六月(7月)肆意曲解《南京条约》，恃强要求入城。广州城乡人民在鸦片战争期间和战后深受烧杀淫掠之害，切肤痛心，所以万口一辞，坚决不许英人入城。他们纷纷组织起来，以反抗英国侵略者为主旨的社学人民武装遍布各地，在升平社学的领导下掀起声势浩大的反抗斗争。英国侵略者认为入城与否，直接关系到自己的“体面”和侵略利益，利用各种手段胁迫清政府官员屈服。美、法也支持入城要求。于是，入城与反入城的斗争，就成了鸦片战争后中英关系上的突出问题，成为鸦片战争后广州人民进行的规模最大、持续最久的反侵略斗争。二十四年，德庇时(John - Francis Davis，1795—1890)就任香港总督兼驻华公使以后，又向两广总督耆英提出进入广州城的要求。耆英于二十五年二至十月间，多次复信德庇时，卑躬屈膝地表示：“本大臣与贵公使，心心相印”，“同心同德”，对“入城一节，……并非本大臣别有意见”，“无如众志甚坚，牢不可破”，“若强行势迫，诚恐激起事端”，“此中为难之处，不独上帝可以鉴察，贵公使应亦谅及苦衷也”。乞求英国宽予时日，等他说服士绅，疏通民情，再行进城。二十五年十月二十二日(11月21日)，德庇时邀耆英到香港，当面恫吓：如再不许进城，英国“只可动兵”，别无选择。要耆英就进城一事，张贴告示，晓喻居民。耆英奏请道光帝：“复查前议条约，并无准夷人进城之说，而稽查历来案牍，亦无不准夷人进城明文，且福州、宁波、上海等处，业已均准进城，独于粤省坚持不允，尤难免有所借口。”道光帝批准。耆英遂于十二月十六日(1846年1月13日)，与广州巡抚黄恩彤联衔贴出告示，准许英人入城，禁止省城内外绅民人等阻挠，同时派广州知府刘浔到英国兵船同德庇时密约进城日期和准备工作。告示一贴出，立即被人民群众撕得粉碎，并且在城厢内外到处张贴痛斥耆英的揭帖，例如：“赃官误国，甘丧廉耻。从夷所欲，天实厌之。倘夷进城，鸣鼓攻之。”有的直揭耆英之名，提出“倘有不测变端，我中华百姓，先杀勾通卖国之奸官，然后与鬼子决战！”十八日，数千群众闻知刘浔从英船回城，纷纷携带刀械，冲入广州知府衙门，烧掉刘浔的朝珠公服，烧毁内署住房数间。刘浔越墙遁出奔告耆英。次日耆英贴出拒绝英人入城告示。二十一日，又照会英国公使，哀求英人不要入城。人民群众纷纷贴出《公檄》，无情揭露英国侵略者的滔天罪行，号召群众约期进攻城外洋馆，“内则斩诛丑类，外则焚毁其巢，同心合力，尽剿根株，以彰天讨而申公愤”。德庇时慑于群众威力，缩回香港。这次英人入城的企图没有得逞。

二十七年二月十八日(4月3日)，野心不死的德庇时又率军舰20余艘、侵略军1000余人，突袭虎门，闯进珠江，泊十三行附近，强要进城，并欲在城郊强租土地。社学壮勇迅速武装戒备，广州城乡人民纷纷贴出揭帖，号召“四民人等，务宜齐心杀绝，不准一步入城”。二十一日，耆英在人民强大的声势下不敢公然答允德庇时的侵略要求，暗地里却擅自承诺自二十二日起算，过两年民愤稍缓再让英国官兵进城。同时，奏请朝廷赴京述职，赶忙离开了广州。二十七日广州全城士绅集议制定《防夷章程》，组织街约团勇1万余人，严防英人强行进城。

二十八年春，徐广缙(1797—1858)继耆英任两广总督，英国殖民地新加坡总督文翰(Samuel George Bonham，1803—1863)也代替了德庇时的职务。二十九年正月二十五日(2月17日)，英国公使文翰率领兵船到达虎门口外，与两广总督徐广缙会议，要求履行耆英两年前的密约，届时进城，并以驾兵船到江苏、天津相威胁。社学群众闻讯，纷起反对，

一时雷动云合，旬日之间，广州城厢内外人民组织起来的团勇有10多万人，按地段编练队伍，每日操练战守，随时准备歼灭入侵之敌。绅民还捐资60万两白银作经费。与此同时，棉花、棉纱及匹头行宣布暂停对外贸易；升平公所发表宣言，订出防守城北条例，防止英人强行进城。社学还派人劝说徐广缙阻止英人入城。徐广缙在广州人民的压力下，也在社学团练的支持下，三月十四日照会文翰以广州绅民不同意，拒绝英人入城。他在赴英船拒绝文翰的要求时说："百姓之不肯听尔入，……当有所闻，亿万同心，我更何能自主！"文翰企图扣留徐广缙，珠江两岸10万群众严阵以待，杀声震天，准备与英国侵略者决一死战。文翰无可奈何，只好放回徐广缙，暂时放弃了入城的要求。十七日，文翰登报"不准英人入城"，并复照会给徐广缙，把入城问题作为未决悬案，目前不再辩论此事。广州人民坚持7年之久的反入城斗争获得了胜利。 （邱远猷）

《望厦条约》签订

《望厦条约》，即《中美五口贸易章程》，清道光二十四年(1844)美国强迫清政府签订的第一个不平等条约。

美国资本主义侵略者在可耻的鸦片贸易中是英国资产阶级最大的伙伴，通过明目张胆的毒品走私从中国掠走了大量的白银和原料。在鸦片战争期间，充当英国侵华的主要帮凶。二十二年春，美国海军少将加尼（Lawrence Commodore Kearny，1789—1868)率东印度分遣舰队到中国海面，一面为英军声援，替英商转销商品、代购原料，一面乘机讹诈。结果，迫使清政府"赔偿美商损失"25万美元。《南京条约》签订后，美国掠夺中国的野心急剧膨胀，速派大鸦片贩子家庭出身的顾盛(Caleb Cushing，1800—1879)，带领3艘兵舰于二十四年正月初七(2月24日)到达澳门。初十，顾盛向清朝护理两广总督、广东巡抚程矞采(？—1858)递交照会，声称"不日进京"，"约一月之间，兵船满载粮食，即驶往天津白河口而去"。程矞采奏报清政府说："其意在仿照英夷，并欲驾出其上，已可概见。"道光帝十分害怕，派两广总督耆英赶到澳门会晤顾盛。五月初六，耆英与顾盛于澳门附近的望厦村开始谈判。十八日，在顾盛的恫吓之下，耆英在望厦村与顾盛签订了中美《五口贸易章程》，即《望厦条约》。共34款，附有《海关税则》。规定美国享受英国在《南京条约》中除割地、赔款以外的协定关税、五口通商、领事裁判权、片面最惠国待遇等全部特权，而且比《南京条约》有所扩大，规定：美国人有权在五口通商口岸租地盖楼、开设医院和教堂；美国兵船可以到中国沿海各港口"巡查贸易"；对在华的美国商人，清政府必须"时加保护，令其身家安全"；12年后对五口贸易等条款可以"稍为变通"，为以后借口"修约"以索取更多侵略特权埋下伏笔。《望厦条约》是美国初期侵华活动的第一个罪恶记录，进一步破坏了中国的独立和主权。顾盛在给美国国务院的报告中直言不讳地供认："美国及其他国家，必须感谢英国，因为它订立了《南京条约》，打开了中国的门户。现在，英国及其他国家也要感谢美国，因为我们将这个门户开放得更宽阔了。"因此，就连美国的资产阶级学者丹涅特(Tyler Dennett，1883—1949)也不得不承认："美国在《望厦条约》中第一次显现了帝国主义的色彩。" （邱远猷）

《黄埔条约》签订

《黄埔条约》，即《中法五口贸易章程》，清道光二十四年(1844)法国强迫清政府签订的第一个不平等条约。

鸦片战争后，对华贸易远在英、美之后、对华关系较中英、中美关系疏淡的法国，开始注意中国情况，企图乘机渔利。二十一年派真盛意（Theobois de Jancigny，1795—？)来广州，调查远东情势，从事侵略活动。 鸦片战争中国失败，英国、美国强迫清政府先后签订《南京条约》、《望厦条约》，取得许多侵略特权，法国不甘落后，决定派拉萼尼(Theodore Marie Melchior Joseph de Lagrene，1800—1862）为专使，带领7艘兵舰前来中国，进行讹诈。拉萼尼于二十四年六月三十日(1844年8月13日)到达澳门。清政府忙派两广总督耆英前往交涉。八月二十日，耆英与拉萼尼在澳门开始正式谈判。这时，拉萼尼已详细研究了中英、中美条约，并掌握了清政府的情况，于是援引英、美先例，提出订立商约的要求。耆英不顾国家民族利益，加之对外国心怀恐惧，因此很快答应了拉萼尼的要求。九月十三日，清政府代表耆英与法国代表拉萼尼在广州附近黄埔的法国军舰"阿希默特"号上，签订了中法《五口通商章程》，即《黄埔条约》。共36款，附有《海关税则》。规定法国享有协定关税、五口通商、领事裁判权、片面最惠国待遇等特权。还规定法国人得在通商口岸建造教堂，中国不能"触犯毁坏"。十月初二，清政府又在法国胁迫下，同意取消雍正元年(1723)颁布的对天主教的禁令，准许他们在各通商口岸自由传教。从此，外国传教士紧

随鸦片、大炮和商品之后，源源来到中国进行侵略活动。 （邱远猷）

《上海租地章程》签订

《上海租地章程》，清道光二十五年（1845）英国强迫清朝地方当局签订的英国在上海租借土地的章程。

鸦片战争后，根据中英《南京条约》规定，二十三年九月二十六日（11月17日）上海正式开埠。此后英国第一任驻上海领事巴富尔（George Balfour，1809—1894）就积极在上海进行勒索土地的活动。他曲解中英《五口通商附粘善后条款》第7款中关于在通商各口岸“中华地方官必须与英国管事官各就地方民情，议定于何地方，用何房屋或基地，系准英人租赁”的规定，强求划定一块专供外国人占用的“居留地”。昏聩的中国地方官员则认为，一则洋人分居各地，则领事管理非常困难；二则有领事裁判权一事，已对于保护外国人有所掣肘，今者再令各处分住，保护难见功效。是以为各方利益起见，遂有划分地界之举。加之当时清政府以天朝大国、“华胄神明”自居，也不愿华人与洋人杂居。于是，上海道台宫慕久在与巴尔富谈判不久，于二十五年十一月初一（11月29日），以道台名义和告示形式公布了《上海租地章程》，又称《上海土地章程》、《上海地皮章程》、《上海地产章程》、《上海租界章程》。共23条。根据这个土地章程，中国方面决定将洋泾浜（延安路）以北、李家场（北京东路）以南地区租借给英国商人，以为建筑房舍及居留之用。由此划定了居留地的南界与北界。东边是黄浦江，是自然的界限。第二年，又议定以边路（河南路）作为西界。于是，黄浦江以西、边路以东、李家场以南、洋泾浜以北的这一块总面积约830亩的地段，便构成了英国居留地（即后来所称的“租界地”）。这是资本主义国家在中国强占租界的开始。

（邱远猷）

拜上帝会创立

拜上帝会，亦称拜上帝教，或太平基督教。清道光二十七年（1847），洪秀全、冯云山在广西桂平县紫荆山区创立的农民反清斗争组织。

19世纪中叶，清政府的黑暗统治和沉重的封建剥削，以及外国侵略势力所造成的灾难，激起了人民群众走上反抗的道路。广东花县青年农民知识分子洪秀全同当时大多数读书人一样，走的是一条“学而优则仕”的道路，他7岁入村塾读书，从道光八年16周岁时即开始到广州应考秀才，但几次都没有考取。考试的失败，堵塞了他走向“上层”的阶梯，社会的急剧变化，又增强了他对清朝黑暗统治的憎恨，他开始把个人的坎坷遭遇和探索救世之道结合起来。在道光二十三年最后一次应试落第后，他阅读了传教士梁发编写的基督教布道小册子《劝世良言》。这本书是道光十六年他第二次到广州应试时得到的，当时并未十分留意。这次仔细阅读后，其中的一些内容引起了他的注意：比如只有上帝才是惟一真神，其他为人所礼拜的偶像都是妖魔；天下人都是“上帝”的子女，都是平等的；上帝差遣其子耶稣下凡，替世人赎罪；人人要遵守十诫等等。这种新奇的说教，使正在探索救世之道的洪秀全茅塞顿开，以为找到了“上天堂之真路”，于是他按照书中的启示，祈祷上帝，自行施洗，表示“洗除罪恶，去旧从新”。由此开始从事传教活动，劝人敬拜上帝，不拜祖先、邪神，不行恶事。最先“皈依其新教”的是塾师冯云山和其族弟洪仁玕等。冯云山（约1815—1852），又名乙龙，广东花县人。“家道殷实”。自幼诵习经史，博览天文、历算、地理、兵法等书。曾多次参加科举考试，但屡试不中，在童古顶等地为塾师。富于反抗思想，成为洪秀全的得力助手。洪秀全等拜上帝后，把村塾中供奉的偶像和孔子牌位尽行撤去，这一行动违背了传统的封建伦常，有人攻击洪秀全等“大逆不道”，结果他们失去了塾师的职业。

道光二十四年春，洪秀全、冯云山离开花县，辗转到广西贵县赐谷村传教，受洗入教者100多人。七月，冯云山先离赐谷村去桂平山区活动。十月，洪秀全返回广东花县，边教书边传教。在乡居期间，他先后撰写了《原道救世歌》、《原道醒世训》等作品，把基督教教义和儒家思想结合起来。《原道救世歌》用诗歌体裁宣传天父上帝是独一真神，主宰万事万物，劝人敬拜上帝，不拜邪神。指出“天人一气理无二，何得君王私自专”，“普天之下皆兄弟”，“上帝视之皆赤子”，流露了政治平等思想。又针对当时社会上腐败颓风日甚一日，劝人要做“正人”，反对淫乱、忤父母、行杀害、为盗贼、为巫觋、赌博以及吸食洋烟、饮酒等，表达了洪秀全的救世思想。《原道醒世训》受中国古代大同思想影响，反映出经济平等思想，指出“天下多男子，尽是兄弟之辈，天下多女子，尽是姐妹之群”，不应存此疆彼界之私，起尔吞我并之念，要实现天下患难相救，夜不闭户，道不拾遗，男女别途，举选尚德的“大同”社会，最终达到“天下一家，共享太平”的理想世界。在洪秀全潜心著述的同时，冯云山在广

西桂平紫荆山区扎下了根。紫荆山区四面高山环绕，重峦叠嶂，地势险要。这里居住着很多以烧炭为业、受苦很深的农民。冯云山来到这里以后，替人担泥挑土，割禾打谷，又兼当塾师。他翻山越岭，深入村寨，宣传"拜上帝"的教义，在贫苦群众中展开宣传、组织活动。经过两年多的努力，约于道光二十七年上半年，在紫荆山区建立了"拜上帝会"组织，团聚会众2000多人。拜上帝会的主要成分是广大贫苦农民，其次是手工业者，此外，还有部分贫穷的农村知识分子和少数家庭富裕而社会地位较低的人。当年七月，洪秀全到紫荆山与冯云山会合。他看到冯云山开辟的这块基地，以及拜上帝会众龙腾虎跃的局面，信心大增，并从这些被压迫被剥削的劳动群众身上，看到了实现自己理想的希望。为了加强拜上帝会的组织，洪秀全和冯云山共同制定了"十款天条"，平时作为会众的生活准则，战时则为会众的军事纪律，同时还制定了各种条规和宗教仪式。随即进行反封建神权的斗争，捣毁象州甘王庙及其它庙宇偶像，扩大影响，触怒了当地地主豪绅。年末冯云山被捕，洪秀全返回广东设法营救未果。后冯云山出狱亦往广东，与洪商讨起义大计。道光二十七年至二十八年，洪秀全又撰写了《原道觉世训》，并由洪仁玕代笔写成《太平天日》。前者借用宗教语言，指明了战斗目标，把农民与封建者的对立概括为正与邪、神与妖的对立。以"皇上帝"为革命农民的化身，清朝皇帝则指为"阎罗妖"，清朝大小官吏一律斥为"妖徒鬼卒"，揭露"阎罗妖"是"老蛇妖鬼也。最作怪多变，迷惑缠捉凡间人灵魂"。号召人们站在"皇上帝"一边，团结一致共同"击灭""阎罗妖"和一切"妖徒鬼卒"，"天下凡间我们兄弟姐妹所当共击灭之惟恐不速者也"。强调，"皇上帝"才是"帝"，他人不得妄称。斥责清朝皇帝说："他是何人，敢腼然称帝者乎？"表示了对封建君主的蔑视。后者假托道光十七年洪秀全病中异梦，编造了上天受命诛妖的神话故事，宣称洪秀全是上帝的次子，耶稣之弟，是"真命天子"，受命下凡，"斩邪留正"。《原道觉世训》和《太平天日》两部作品标志着洪秀全反清革命思想正式形成。

拜上帝会在斗争中逐渐涌现出一批领袖人物，除洪秀全、冯云山外，还有杨秀清、萧朝贵、韦昌辉、石达开等人。杨秀清（？—1856），原名嗣龙。广西桂平人。5岁丧父，9岁丧母，零丁孤苦，困厄难堪，种山烧炭为业。他无文化，不识字，但富于谋略，当道光二十八年洪秀全和冯云山离开紫荆山之际，拜上帝会众曾一度发生动摇和分裂，他假托天父下凡，传言安定群心，后洪秀全承认其代上帝传言的特殊身分，地位仅次于洪秀全。萧朝贵（约1820—1852），广西桂平人，原籍武宣。壮族。贫苦农民出身，种山烧炭为业。当杨秀清假托天父下凡之际，他也伪托天兄耶稣附身，也一并得到洪秀全的承认。故后来在领导集团中，杨、萧均位在冯云山之上。韦昌辉（约1823—1856），原名韦志正，或作韦正。广西桂平人，原籍广州。一说壮族。地主兼典当商出身，又捐过监生，因受本村其他地主排挤和贪官勒索，愤而加入拜上帝会。石达开（1831—1863），广西贵县人。客家地主出身，家富读书，文武备足，因受土著地主欺凌，参加拜上帝会。道光二十九年夏，洪秀全、冯云山重返紫荆山区，与杨、萧、韦、石结成异姓兄弟，组成领导核心。经过长期的酝酿和准备，拜上帝会发动起义的时机日趋成熟。次年秋，全体会众奉洪秀全令赴广西桂平县金田村团营。道光三十年十二月初十（1851年1月11日），洪秀全率会众在金田举行起义，规模浩大的太平天国农民战争爆发。（殷常符）

无产阶级诞生

19世纪40至90年代中国早期无产阶级诞生。

第一次鸦片战争以后，由于外国资本主义的经济侵略，使中国的社会经济发生了重要的变化，并由此而引起了中国社会阶级结构的某些变化。在中国开始逐步走向半殖民地半封建化的过程中，最先出现的一个新的社会阶级，就是中国的无产阶级。中国无产阶级是伴随着3种近代企业的产生而产生的。19世纪40年代，外国资本主义基于输出商品和榨取原料的需要，开始在中国的通商口岸修建船坞和开办船舶修造厂，并逐渐开办起加工制造等近代工业，廉价雇佣中国破产的农民和手工业者从事生产劳动。这些破产的农民和手工业者成为直接受外国资本奴役的雇佣劳动者，由此而产生了中国第一批产业工人。60、70年代以后，在洋务派创办的军事和民用工业中，又产生了一批产业工人。70年代起，在民族资本主义工业中，又产生了一批工人。据统计，70年代中国近代工人大约有1万人左右；80年代增至4.5万人左右；至光绪二十年（1894）大约有9万多人。其中：外国经营的企业中有3.4万人，约占产业工人总数的35%左右；清政府经营的近代军事、民用工业中有三万五六千人，约占工人总数的37%左右。民族资本经营的企业中有2.75万人，约占工人总数的28%左右。除此而外，属于早期无产阶级的还有海员、船员、码头运输工人、城市建筑工人、手

工业雇佣劳动者、商店店员及在农村中的雇农和其他城乡无产者。而近代产业工人是早期无产阶级的核心。中国无产阶级除具有一般资本主义国家无产阶级所具有的基本优点(如与大机器生产相联系,除出卖劳动力外一无所有,富于组织性纪律性)外,还有它自己的特殊优点:中国无产阶级的前身,大多数是破产的农民,因而与广大农民有一种天然的联系,便利于他们结成亲密的联盟。早期产业工人总数虽然不多,但在地域上大多集中在上海、广州、汉口、天津等沿海沿江大城市;在行业上比较集中在机器缫丝业、船舶修造业和机器工业、军用工业、棉纺织业、煤矿开采业中;在企业上比较集中在大企业中,有利于他们的组织和团结,使之具有更大的先进性。身受本国资产阶级、外国资产阶级和本国封建势力三重压迫和剥削,其残酷程度在世界上也是少有的,因而其革命性很强。当时,中国无产阶级虽未登上政治舞台,但它是中国新的社会生产力的代表者,是最有前途的阶级。　(邱远猷)

凌十八起义

清道光三十年七月至咸丰二年六月(1850年8月—1852年7月)拜上帝会一方首领凌十八在广东信宜大寮一带发动的大规模农民起义,是太平天国起义的重要组成部分。

凌十八(1819—1852),本名才锦,同辈兄弟中大排行十八。广东信宜县燕古村(茂名市信宜县塘坳)人。祖籍福建汀州。道光二十九年,经胡以晃介绍在金田加入拜上帝会,洪秀全、冯云山与他"共为结拜",并委以重任。三十年正月下旬,奉命回信宜发展会众。县城东北140里的大寮一带,多广西种山客民,生活困苦,许多客民全家参加拜上帝活动,人数渐拜渐多。三月,凌十八在大寮"团营",制定会众纪律,日夜铸造武器,加紧练习武艺,筹饷聚粮,打击地主劣绅,砸庙宇毁神像,声名大振。博白、高州、罗定各县以及广西岑溪、北流、容县、陆川等地的贫苦村夫山民从之如市。大寮成为粤西两广交界地区拜上帝会的中心。地主士绅十分惊恐,遂派人密告官府,请求查禁。七月中,信宜县令官步霄统带团练、差役前去逮捕凌十八。时值凌十八去广西未归,会众打退团练。凌十八返回大寮后,遂加紧编制队伍,拟往广西,并举行了庄严的"拜旗",滴血盟誓:"生同生,死同死,有饭大家吃。"三十年十二月初十(1851年1月11日)金田起义爆发。咸丰元年正月十四日(2月14日),他率领起义队伍二三千人,扶老携幼,自信宜的东镇出发,经化州边界,前往广西金田,欲与洪秀全的太平军会师。途经高州、茂名、化州、博白、陆川等地,一路斩关夺卡,所向披靡,与太平军互为犄角,遥相呼应,给清朝封建统治者以沉重打击。咸丰帝多次惊叹:"朕心悬念","朕寝馈之不安矣!"二月二十九日,起义军抵广西郁林州(玉林)城下,围攻月余不下。四月初五,冒雨主动撤围,原路退归信宜。起义军几经辗转,于七月初一攻克罗定州的罗境圩。罗境圩距州城70里,圩内南北长5里,层峦叠嶂,幽径深林。铺户、居民向有千余家,水陆交通、市廛贸易均很发达,为附近各州县著名的富饶之区。这里地处粤、桂交错接壤边缘,前临池塘,背依群山,易进难出,易守难攻。走山间小路,可经泗纶入广西苍梧、岑溪等县,沿西山大道,可经罗定州城转西宁(郁南)入广西。

七月十九日,两广总督徐广缙亲至高州督战,旋赴信宜指挥清军1万多人分东西两路进攻罗境圩。起义军最多时才6000人,凌十八鼓励将士奋勇迎敌,众志成城,清军合围五个月,竟攻不下。二年四月,清廷命徐广缙赴桂林抗拒太平军,另派广东巡抚叶名琛攻打罗境圩。五月初一,叶名琛带领2660多名丁勇抵罗定州,对起义军发动围攻。起义军此时仅存2000人,粮食将绝,仍"党固心坚",死战月余不降。六月十三日凌晨三时,清军攻入圩内。起义军与敌人展开肉搏战,战死者达1100多人,被烧死者800多人,被俘者268人,凌十八跳井自尽,起义失败。凌十八起义历时两年多,转战两省三州六县,与太平军互为犄角,彼此配合,声威相依,牵制了广东、广西、云南、贵州四省数以万计的清军和一批地方团勇,糜饷银80余万两,为太平军的胜利进军做出了重大贡献,并促进了广东农民武装反清斗争的发展,沉重地打击了腐朽的清王朝。　(邱远猷)

太平天国起义

清道光三十年末至同治三年夏(1851年初—1864年夏)反对清朝封建统治和外国资本主义侵略的全国规模的农民战争。

鸦片战争后,中国开始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西方列强凭借《南京条约》等一系列不平等条约,从政治、经济各方面大肆侵华。清政府为了支付高达2800万元的战争赔款和赎城费,弥补由于鸦片大量输入而造成的财政亏空(道光二十七年至二十八年平均每年流出白银1000万元),加紧横征暴敛,增加税收一至三倍以上。兼之外国工业品大量倾销,使中

国城乡手工业受到摧残，农民和手工业者纷纷破产。地主阶级乘机兼并土地，加重剥削。民族矛盾的加剧促进了国内阶级矛盾的激化，广大农民饥寒交迫，纷纷揭竿而起，鸦片战争后十年间，各族人民自发的反清起义达100多次。广西是多民族聚居区，清朝统治者对广大少数民族的民族压迫和阶级剥削十分严酷；又加以天灾人祸，广大农民苦不堪言，反抗斗争此伏彼起，终于在道光三十年末爆发了洪秀全领导的大规模的太平天国农民起义。

洪秀全(1814—1864)，原名火秀，又名仁坤，自号秀全。广东花县人。农民家庭出身，幼读私塾，16岁时辍学助父、兄务农，后任本村塾师。曾几次赴广州应考秀才，均名落孙山。社会的急剧变化，个人发展道路的坎坷，增强了他对清朝黑暗统治的憎恨，开始探索救世之道。道光二十三年，受到基督教布道书《劝世良言》启示，自行施洗，劝人敬拜上帝。二十四至二十六年间，撰写《百正歌》、《原道救世歌》、《原道醒世训》等，揭露清朝世风败坏，道德堕落，是个相凌相夺相斗相杀的黑暗社会，以西方原始基督教朴素的平等观念糅合中国古代的大同理想，宣传"普天之下皆兄弟"，提出要把凌夺斗杀之世改造为"公平正直"之世，试图以宗教、道德说教来改造世道人心。二十七至二十八年，撰成《原道觉世训》和《太平天日》两部著作，把清朝皇帝比作"阎罗妖"，号召"天下凡间我们兄弟姊妹所当共击灭之惟恐不速者也"，实质是要推翻清朝封建统治，标志着洪秀全确立了反清思想。二十七年在广西桂平县紫荆山区和冯云山一起创建了一个以贫苦农民和手工业者为主体的"拜上帝会"，入会者达2000多人。随着广西阶级斗争形势的逐渐发展，拜上帝会在邻近州县迅速发展壮大。三十年五月洪秀全下令，各地会众于十月初一到桂平县金田村团营。2万多会众齐集金田村，他立即按军事编制组织起一支起义大军。十二月初十(1851年1月11日)，洪秀全在金田正式宣布起义，建号太平天国，起义军称太平军。咸丰元年二月二十一日(3月23日)，洪秀全在武宣东乡称天王。闰八月初一，攻克永安(广西蒙山)，在此进行了一系列军政建设：诏封杨秀清为东王，萧朝贵为西王，冯云山为南王，韦昌辉为北王，石达开为翼王，西王以下俱受东王节制；颁行天历，用太平天国的正朔否定了清朝的正朔；颁行《太平条规》等军事法规，整饬军纪；此外还进行了肃反除奸斗争。初步奠定了太平天国建国的规模，为推动革命向前发展准备了条件。次年二月，太平军自永安突围北上，三月攻桂林不克，四月撤围，攻克全州。南王冯云山中炮受重伤，在蓑衣渡牺牲。后入湖南，七月围攻长沙，西王萧朝贵中炮牺牲。太平军在湖南进军期间，先后组成了"土营"和"水营"，大大提高了战斗力。十一月，从岳州挺进湖北。十二月攻克武昌，顺流东下。三年正月，占领九江，攻占安庆。二月初十(3月19日)攻克江宁(南京)，阵斩两江总督陆建瀛。洪秀全以两江总督衙门为天王府，改江宁为天京，定为都城，正式建立起农民政权。

太平天国定都后，颁布了《天朝田亩制度》。该制以解决土地问题为中心，包括了政治、军事、经济和文化等方面，以宗教语言否认一切私有财产权，规定了废除一切私有制的总原则："天下人人不受私，物物归上主"，据此宣布"凡天下田，天下人同耕"，实行土地平均使用制；规定凡16岁以上的男女均可分田，15岁以下减半，好田次田搭配，绝对平均。农民的农副产品除自用外，均缴"国库"，力图实现"无处不均匀，无人不饱暖"的理想。这反映了农民阶级要求土地的迫切愿望，是对行之二千年的封建土地所有制的否定。然而它把小农业与农民家庭手工业紧密结合的自然经济理想化、固定化，具有阻碍生产力发展、违反社会发展规律的落后性；它所宣扬的平均主义分配方案，只是农民小生产者的农业社会主义空想，是不可能实现的。最后，为了保证革命战争对钱、粮及军需物资的需要，不得不实行"照旧交粮纳税"政策，实际上恢复了旧有的封建土地所有制。但是广大农民在太平天国革命精神的鼓舞下，打击地主、官僚，夺回土地，不交或少交地租，仍在一定程度上减轻了农民负担，促进了农业生产的发展。同时，太平天国还制定了一系列内外政策：内政上，从中央到地方建立了军政合一的政权机构；一度宣布废除私营商业，经营公营商业(后又恢复私营商业)；实行"圣库制度"；设立诸匠营与"百工衙"，实行官营手工业制度。社会习俗上，废除买卖婚姻，规定"凡天下婚姻不论财"；科举考试不受出身门第的限制，考试题目"不本《四书》、《五经》"。外交上，主张与各国平等往来，鼓励正当贸易，严禁贩卖鸦片。这一系列制度和政策，表现了太平天国农民反封建反侵略的革命精神。但是，农民阶级不是新生产力的代表者，不能创造新的生产方式，也不可能建立起符合历史发展规律的新社会。

为了巩固农民政权，太平天国分别派军进行了北伐和西征。北伐的总目标是攻占清廷老巢北京。咸丰三年四月初一，北伐军在天官副丞相林凤祥和地官正丞相李开芳率领下，自扬州出发，经安徽入河

南，经山西，东向折回河南，从武安进入直隶，在临洺关大败清钦差大臣直隶总督讷尔经额所部清军1万多人，前锋直抵杨柳青，进逼天津。次年，在直隶东光县连镇和山东高唐抗击清军。咸丰五年正月连镇失陷，林凤祥受伤被俘，槛送北京，英勇就义。四月李开芳自高唐突围，在茌平县冯官屯被俘，被执送北京凌迟处死。北伐军由于远离根据地，孤军深入，流动作战，又未能深入发动群众，经过两年艰苦鏖战，终归失败。但它沉重地打击了清朝统治，推动了北方人民的反清斗争，有力地支援了太平军在长江流域的革命斗争。同年四月十二日，太平天国派春官正丞相胡以晃和夏官副丞相赖汉英率军西征。西征的战略目的在于确保天京，夺取安庆、九江、武昌三大军事据点，控制长江中上游，以屏蔽天京。西征初期，连战皆捷，很快占领安徽大部分地区及江西、湖北部分地区，实现了攻占安庆、九江、武昌的战略目标。但咸丰四年春攻入湖南后，遇到曾国藩湘军的顽抗，武昌、汉阳相继失守，湘军反扑九江，西征军受挫。四年末，洪秀全命石达开督师增援，在湖口、九江两次战役中大败湘军水师，扭转了战局。五年二月，太平军第三次克复武昌。后石达开率军进入江西，至咸丰六年二月，攻克江西8府50多州县。西征历时三年多，攻占了上自武昌下至镇江长江沿岸的重要城市，控制了安庆、九江、武昌三大重镇及湖北东北、安徽、江西大部分地区，使天京有了可靠的屏障。与此同时，又于咸丰六年解镇江之围，摧毁了清江南、江北大营，解除了清军包围天京的军事压力。至此，太平天国在军事上达到了全盛时期。在太平天国影响下，全国各地反清斗争风起云涌，南方有天地会起义，北方有捻军起义，西南、西北有苗民、彝民、回民等少数民族起义，汇成席卷全国的农民起义高潮。

在军事胜利面前，太平天国内部的各种矛盾和弱点日益暴露。太平天国因袭了封建君主制，追求权利名位和奢侈生活，领导人大兴土木，建造王府，养尊处优，专务声色货利，奢侈腐化相当严重。洪秀全宣扬自己是“真命天子”、“万民之主”，而杨秀清自恃功高，一切专擅，领导集团之间争权夺利的斗争日益尖锐。咸丰六年夏太平军攻破清江南大营后，杨秀清进一步扩大个人权势，逼天王亲到东王府封他为万岁。洪秀全密诏北王韦昌辉、翼王石达开回京图杨。八月初三(9月1日)深夜，韦昌辉率精锐部队回京，次日凌晨，攻入东王府，杀死杨秀清及其全家。接着，关闭城门，自相残杀，两万多将士死于非命。十月，洪秀全下令诛韦，并命石达开回京辅政。但又对石达开心存疑忌，封其两位兄长洪仁发、洪仁达为安王、福王，牵制石达开。次年五月石达开负气率部离京出走，转战于安徽、江西、浙江、福建、湖南、广西、贵州、云南、四川等省，于同治二年春进攻四川，五月在四川大渡河紫打地全军覆没，石达开在成都被凌迟处死。天京事变，破坏了太平天国内部的团结，削弱了太平军的战斗力，丧失了乘胜歼灭敌人的有利时机。而清政府则借机反扑，武昌、镇江、九江、吉安等名城重镇相继失陷，清军重建江南、江北大营，天京再度被围困，太平天国战争出现了严重的危机，被迫从战略进攻转向战略防御。

为了扭转形势，洪秀全任命陈玉成、李秀成、李世贤、杨辅清等为各军主将，率军作战，力挽危局。咸丰八年六月下旬，各路将领在安徽枞阳举行会议，确定了联合作战、共解京围的方针。是年八月二十日(9月26日)发动了二破江北大营的浦口之战，毙敌1万余人。十月初十安徽三河之战，歼灭湘军精锐李续宾部3000多(另说6000)人。九年三月，洪秀全的族弟洪仁玕由香港抵达天京，被封为干王，总理朝政，提出了一个统筹全局的方案《资政新篇》。政治上主张加强中央统一领导，反对结盟联党。经济上主张效法西方资本主义国家，进行社会经济改革，提出发展交通事业，仿制火车、轮船、汽船，兴办邮政，发展民间工业、矿业，开办银行，发行纸币。文化上主张破除封建陋俗，兴医院，办学校等。外交上主张同资本主义国家自由通商，进行文化交流，坚持独立自主、反对外来侵略的原则立场。这些建议，具有鲜明的资本主义色彩，符合当时中国社会发展的客观要求，具有进步意义，得到洪秀全的批准。但没有提到农民的土地问题，及当时革命战争所面临的实际问题，且因处于战争环境，故未能实行。同年，洪秀全晋封陈玉成为英王，李秀成为忠王。咸丰十年春，太平军再破江南大营，天京解围战取得胜利；李秀成乘胜进军苏南，占领苏州，直逼上海，同美国侵略分子华尔指挥的洋枪队作战；陈玉成进军浙江，直逼杭州。当太平军东征苏南之际，曾国藩湘军加紧围攻安庆。为解安庆之围，决定由李秀成、陈玉成分别从长江南北两岸西征武汉，迫围安庆之敌西援湖北。由于外国侵略者的干涉，以及李秀成贻误战机，谋取武汉未成。咸丰十一年八月初一(9月5日)，安庆陷落。陈玉成移师庐州(合肥)，整军备战，待机重振淮南战局。浙江战场上，李秀成率太平军先后攻克了绍兴、宁波、杭州。是年底，陈玉成为恢复安庆，派扶王陈得才、遵王赖文光、启王梁成富等自庐州出发，远征西北。湘军乘

机扑向庐州，陈玉成因孤军无援，于同治元年四月撤至寿州(寿县)时被清军俘获。五月初八(6月4日)英勇就义。当陈得才得知陈玉成被俘的消息后，急率西北远征军东归，但未及挽救，仍返西北。同年，太平军第二次进攻上海，杀法国侵华舰队司令卜罗德于南桥(奉贤)，又在浙江战场上击毙华尔于慈溪(慈城)，次年春在绍兴击杀了"常捷军"首领法国侵略分子勒伯勒东、达尔第福等。同治二年十月下旬(1863年12月)苏州失陷。次年二月杭州陷落，三月常州沦陷。至此，太平军在苏、浙战场完全失败，天京形势危急。李秀成向洪秀全建议"让城别走"，别作良图，洪秀全执意固守，使太平天国事业丧失了最后一线希望。四月二十九日，洪秀全病逝，子洪天贵福即位。六月十六日，天京陷落，太平天国革命失败。李秀成从天京突围后被俘，写了数万言的"自述"，记述了太平天国起义的经过，总结了天国失败的经验教训；提出了"收齐章程"，向曾国藩示意招降太平军余部。旋被曾国藩处死。幼天王洪天贵福突围到安徽广德，与洪仁玕会合，转战皖、浙边界，后入江西，兵败。十月幼天王与洪仁玕在南昌就义。李世贤等率部自江西入福建，占漳州，兵败后转至广东嘉应州(梅县)，同治四年十二月下旬(1866年2月)，在黄沙嶂失败。赖文光部与捻军联合，在北方展开艰苦卓绝的斗争。同治四年在山东曹州(菏泽)高楼寨，阵斩清亲王僧格林沁，歼灭其马队万余人。次年九月捻军分为东、西两部，赖文光率东捻军转战河南、湖北、山东等地。同治六年十二月败于扬州，赖文光英勇就义。梁王张宗禹所部西捻军进入陕西，经山西、河南、直隶，回山东。同治七年六月底，在茌平覆没。太平军余部最后失败。

由于历史条件和阶级地位的限制，太平天国不能克服农民阶级自身的弱点，缺乏远大的政治眼光，不具备科学的世界观和理论武器，制定不出科学的革命纲领和政策，不能正确处理领导集团内部的矛盾，不认识外国资本主义联合中国封建阶级以压榨中国人民的实质，终于在中外反动势力的联合镇压下失败。太平天国起义的历史表明，没有无产阶级领导的单纯的农民战争，是不能领导民主革命取得胜利的。但太平天国起义历时14年，纵横18省，把中国历史上的单纯农民战争推上最高峰，冲击了封建经济基础及其上层建筑，沉重地打击了清朝的封建统治和外国资本主义侵略势力，表现了中国人民反对外国侵略的英雄气概和爱国主义精神，在近代史上具有深远影响。　(殷常符)

金田起义

清道光三十年十二月初十(1851年1月11日)，洪秀全领导拜上帝会会众在广西省桂平县金田村举行的反清武装起义，是为金田起义。

道光二十八年以后，广西连年饥荒，民不聊生，广大贫苦农民被迫举旗反抗，从二十七至三十年间，见于文献记载的农民起义队伍多达二三十支，表明起义时机已经成熟。三十年五月洪秀全发布总动员令，号召各地拜上帝会会众于是年十月初一(11月4日)到金田村集中"团营"。金田村坐落在紫荆山南麓的新圩平原上，前隔蔡村江，背靠紫荆山，左有紫水，右有横龙江，战略地位十分重要。金田村的农民富有革命传统，村后犀牛岭上的古营盘就是明朝瑶族人民起义时建立的。洪秀全特把拜上帝会的总机关从紫荆山的高坑冲迁到金田村，准备在这里竖旗举事。各地会众接到团营令后，立即行动，冲破地主武装的重重阻挠，陆续到达金田。先后参加的有紫荆山区群众，桂平、贵县、平南、武宣、象州以及陆川、博白一带会众。参加者主要是贫苦农民、贵县龙山银矿矿工，桂平饥民和贵县受排挤的客家人也踊跃参加，包括汉族、壮族、瑶族人民，共约2万人。金田团营前后，会众根据"同食同穿"的原则，将自家田产屋宇变卖，易为现金，并将个人所有财物缴纳于"圣库"，全体衣食俱由圣库供给，实行平均主义的生活制度。这就是"圣库"制度的开始。这种制度是适应战争需要而采取的一项重要措施，在起义初期，对于保持起义队伍的团结和纪律，发扬艰苦战斗的精神，起到了积极作用。拜上帝会众到金田团营后，洪秀全仿照《周礼》"五人为伍，五伍为两，四两为卒，五卒为旅，五旅为师，五师为军"的制度，把他们按军事编制组织起来，编制以军为单位。伍长领兵4人；五伍为一两，设两司马，辖25人；四两为一卒，设卒长，辖104人；五卒为一旅，设旅帅，辖525人；五旅为一师，设师帅，辖2630人；五师为一军，设军帅，辖13155人。军帅之上依次又设监军、总制、将军、指挥、检点、丞相等各级将领，直至全军最高军事统帅正、副军师。由此为武装起义做了必要的准备。此举引起清朝统治者的震惊，急忙调兵遣将镇压，先后撤换了镇压不力的广西提督闵正凤和广西巡抚郑祖琛。调湖南提督向荣(约1788或1792—1856)继任广西提督，起用前云贵总督林则徐为钦差大臣，要他星驰就道，悉心剿抚。但是，林则徐在赴任途中，病死于广东潮州。清政府又任命前两江总督李星沅(1797—1851)为钦差大

臣，以前任漕运总督周天爵(1772—1853)署理广西巡抚，赴广西进行镇压。道光三十年十一月，清浔州(桂平)协副将李殿元、秦川巡检张镛侦知洪秀全、冯云山在平南花洲山人村密藏后，立即封闭路口、断绝交通，企图围困革命领袖。杨秀清立即命令蒙得恩(1806—1861)带兵进援，于十四日在思旺圩大败敌军，迎洪秀全安全回到金田。与此同时，清军驻桂平将领周凤岐又派清江协副将伊克坦布率贵州兵进攻金田。二十九日，拜上帝会会众在蔡村江击溃来犯之敌，阵斩伊克坦布。经过几个月的团营准备，又取得了两次战斗的胜利，洪秀全即于道光三十年十二月初十(1851年1月11日，洪秀全38岁生日)，领导拜上帝会会众在金田村誓师起义，建号太平天国，起义军称太平军。洪秀全随即颁布军纪五条：一，“遵条命”；二，“别男行女行”；三，“秋毫莫犯”；四，“公心和傩(睦)、各遵头目约束”；五，“同心合力，不得临阵退缩”。这五条军纪，对加强太平军的团结和战斗力，起了重要的保证作用。起义两天后，太平军东出大湟江口，展开了轰轰烈烈的太平天国农民革命战争。

(殷常符)

东乡登极

清咸丰元年二月(1851年3月)洪秀全在广西武宣东乡称天王，史称“东乡登极”。

金田起义以后，又有天地会首领罗大纲(约1811或1804—约1855)和苏三娘各率数千人参加太平军，使太平军队伍扩大到3万多人，遂乘势向武宣进发。咸丰元年二月十一日(3月13日)，太平军前锋抵达离武宣县城仅30里的三里圩，洪秀全在东乡设立大本营。十四日，向荣所部清军在三里圩附近的东岭扎下大营。十七日，洪秀全趁敌兵刚到，立足未稳之机，主动出击，在台村、灵湖间歼灭大部清军。二十一日，洪秀全在武宣东乡正式称天王，这一天在太平天国历史上定为“登极节”。洪秀全认为称帝亵渎神圣，故不称帝而称王，他说：“天父上主皇上帝……才是上，才是帝。天父上主皇上帝而外，皆不得僭称上，僭称帝也。”大约同时，以杨秀清为左辅正军师，领中军主将；萧朝贵为右弼又正军师，领前军主将；冯云山为前导副军师，领后军主将；韦昌辉为后护又副军师，领右军主将；石达开为左军主将。这就是太平天国前期“五军主将”制度。这个制度的确立，使太平天国的领导体制大体上具备了一个轮廓。三月初二，广西巡抚周天爵伙同向荣率清军6000余人分兵四路，向三里圩进攻。太平军在洪秀全、冯云山亲自指挥下，“视死如归，赤身赴敌”，清军大败而逃，太平军取得辉煌胜利。三月十四日，杨秀清在东乡假借天父传言说，洪秀全“出一言是天命，尔等要遵，尔等要真心扶主顾主”。三月十八日，萧朝贵也在东乡假借天兄传言说，全军上下“要守天条，要遵命令，要和傩兄弟”，强调只有严明纪律，才能取得军事斗争的胜利。

当洪秀全东乡登极、积极筹划建国措施和军事部署之际，反革命方面也在积极调集军事力量。三月十八日，清政府派大学士赛尚阿(？—1875)为钦差大臣，赴广西任统帅，以乌兰泰(？—1852)、向荣两人为大将，从各省调集重兵，拟将太平军剿杀净尽。太平军利用当地崎岖地形，多次重创清军。但在清军步步围困之下，伤病员渐多，军中粮、盐、弹药奇缺。四月十五日，洪秀全率太平军乘夜冒雨自东乡拔营，经大琳、庙旺进入象州县境，迅速攻占象州古城、寺村、中坪、百丈、新寨等地。六月又回师桂平紫荆山地区，高筑营垒，严阵以待。八月，太平军进至平南县境，广西提督向荣部尾随追击，结果在平南官村被太平军打得大败。太平军乘胜前进，直趋永安州(另说洪秀全于道光三十年二月二十一日(1850年4月3日)在桂平平在山称天王)。

(殷常符)

永安建制

清咸丰元年(1851)，太平天国在广西永安进行的军政建设。

金田起义后，太平军于咸丰元年闰八月初一(9月25日)攻克了永安(广西蒙山)，这是太平军占领的第一座州城。在永安，太平军进行了一系列军政建设：一、健全领导体制。是年十月二十五日，洪秀全封左辅正军师杨秀清为东王；右弼又正军师萧朝贵为西王；前导副军师冯云山为南王；后护又副军师韦昌辉为北王；石达开为翼王。以上各王，俱受东王节制。同时又封秦日纲(约1821—1856)为天官丞相，胡以晃(1816—1856)为春官丞相，其余有功将士均各晋升官职。太平天国的中央政权组织由此初步形成，对加强统一领导、扩大革命队伍具有重要意义。二、颁行天历。道光二十八年(1848)冯云山在桂平狱中创制历法，称天历。咸丰二年颁布实行。天历有以下几个特点1.基本上采用阳历，以366日为一年；2.单月31日，双月30日；3.立春、清明、芒种、立秋、寒露、大雪俱16日，余俱15日；4.仍以干支纪年纪月纪日，但改丑为好，改卯为荣，改亥为开；5.以金田起义之年为纪元，定为太平天国辛开元年；6.天历纪日

的干支和礼拜日，分别比阴历纪日的干支和阳历的礼拜日提前一天；7.删除封建统治者塞进旧历书的“支干生克”、祸福吉凶之类的迷信色彩。天历的颁行标志着太平天国用自己的正朔否定了清朝的正朔，意味着太平天国与清朝统治决裂，因此有重要的政治意义。三、整饬军纪。洪秀全在永安多次发布诏令，申明军纪。并颁布了军事法规——《太平条规》，要求“各军各营众兵将，各宜为公莫为私”，凡杀敌攻城时所得一切，全部上缴“圣库”，不得私藏，违者议罪。教育全体官兵要恪遵“十款天条”，特别是第七条（“不好奸邪淫乱”），如有违犯，一经查出，立即严拿斩首示众，决不宽赦。这对加强军队内部的团结，推进革命战争起了重要作用。四、肃反除奸。太平军攻克永安后，清朝皇帝下令要“密委有胆有识者潜入城中，探悉贼情，或设法诱擒，或与城内被胁绅民密相要约，以为内外夹攻之计”。为此洪秀全告诫全体官兵提高警惕，“莫被诱惑”，要“立志顶天，真（贞）忠报国到底”。不久，太平天国就在永安破获了周锡能反叛案件。周锡能，广西博白人，早年参加金田起义，受封为军帅。咸丰元年夏，太平军转战象州一带时，处境艰难，他离开队伍，投入敌营，后又潜回永安城，窥探城防虚实，策动太平军将领叛变，阴谋配合清军夺取永安城。杨秀清得知情报后，以天父下凡方式，当场揭发了周锡能的罪行，并斩首示众，打击了敌人的阴谋，提高了全军将士的觉悟，纯洁了革命队伍，进一步增强了战斗力。永安建制初步奠定了太平天国建国的规模，为推动太平天国革命向前发展准备了条件。　（殷常符）

捻军起义

清代太平天国起义时期由民间反清结社“捻党”发动的北方农民起义。

“捻”为淮北方言，当地人民俗称一束、一股、一伙儿为“一捻”。小捻十数人、数十人；大捻一、二百人。产生于清康熙年间。成员主要为农民和手工业工人。活动地区遍及安徽、河南、湖北、山东、江苏等省。在大规模起义之前称为“捻党”，各部捻党首领通称为“捻头”或“趟主”。咸丰元年（1851），太平天国起义后，河南南阳、南召、唐县等地捻党聚众起义。次年，张乐行（1810—1863）、龚得树（？—1861）等在安徽雉河集率众万余人起义，一度攻克河南永城等地。咸丰三年，太平天国北伐途经安徽、河南，捻党纷起响应。捻军初起时，各自独立，缺乏统一的领导和组织，平时各归各家，一遇事起，才呼之即至。在斗争中，他们日益感到有联合的必要。咸丰四年，安徽蒙城、亳州张乐行所部捻军和河南永城苏天福带领的捻军就曾实行联合作战。第二年，皖北捻军龚得树部入河南夏邑，与当地王冠三（？—1856）率领的捻军联合作战。皖、豫边界这些捻军部队的联合行动，表明他们正向统一集中的方向发展。咸丰五年秋，各路捻军首领齐集雉河集（安徽涡阳），商讨联合问题，公推张乐行为盟主，建国号大汉，张乐行称大汉永王（一作大汉明命王）。下设军师、司马、先锋等职。并祭告天地，宣布信条，旗分黄、白、黑、红、蓝五色，各旗统将皆听盟主调遣。五色总旗各设总旗头，称大趟主。黄旗总领头由张乐行兼，白旗为龚得树（兼军师），黑旗为苏天福，红旗为侯士伟，蓝旗为韩奇峰。总旗之下设大旗，是捻军的基本单位，大旗设大旗头，称趟主。每个大旗头所辖人数少则四、五百人，多则数千以至数万人。为了区别每一总旗以下众多的大旗，各色总旗之下，又分五色镶边旗（同一颜色的旗，边色不同），“以正镶递推递广”。大旗之下有小旗，为最基层的组织，没有固定编制，自十余人至百余人不等。一般都是步队、马队混合，以后发展到以马队为主。张乐行发布《告示》和《行军条例》。告示痛斥清朝官吏“以刀锯而代扑责，用贿赂而判生死。酷以济贫，视民如仇，竭万姓之脂膏”的种种暴行，庄严宣布捻军“大起义师，救我残黎，除奸诛暴，以减公忿”的起义宗旨。《行军条例》规定了严明的军纪：凡有奸淫、掳掠、不遵号令约束、对敌时私自逃走等行为者斩；缴获的枪炮子药，私为己有者，酌律定罪等等。雉河集会盟使捻军有了比较明确的反清目标，改变了各自为战的局面，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咸丰七年二月，捻军渡雉河南征，在霍丘、六安交界处与太平天国陈玉成、李秀成部会师，并接受太平天国的领导。张乐行被封为征北主将，全军同太平军一样蓄发，改用太平天国旗帜。不过，捻军依然保持自己的领导系统和原有制度，配合太平军作战只限于安徽境内及邻近地区。咸丰八年四月（6月）占领安徽怀远，五月攻克临淮、凤阳。次年夏，龚得树率领捻军从淮远渡淮，南围定远，太平军吴如孝部赶来助战，六月十七日（7月16日）攻克定远。咸丰十年，太平天国封张乐行为沃王。十一年二月初四（3月14日），龚得树在罗田松子关战斗中，不幸中炮牺牲。八月初，安庆陷落，淮南局势恶化，张乐行驻守定远的捻军北上进驻颍上。同治二年二月初一（1863年3月19日），清军攻陷雉河集。张乐行率数百人杀出重围，二月初七被叛徒出卖，在西阳集被捕，后在义门集附近的周家营殉难。捻军战争

从此转入后期。

同治三年六月(7月),天京陷落,太平天国起义失败。在险恶的局势下,张宗禹(?—1868)、任化邦(?—1867)等捻军将领,表示愿与在河南的太平军余部赖文光(1827—1868)联合抗敌,"誓同生死,万苦不辞"。十一月间,在赖文光、张宗禹、任化邦等率领下,捻军和太平军余部于豫南地区进行整顿和改编,组成了一支集中统一的部队,沿用太平天国的年号、历法、封号和印信,推赖文光为首领,逐渐"易步为骑",使捻军成为一支10余万人的骑兵武装。同治四年,经过整编的捻军在山东曹州(菏泽)高楼寨,歼灭清军主力僧格林沁马队1万多人,阵斩了僧格林沁。捻军声威复振。五年八月(10月),捻军分为东西两部,张宗禹、张禹爵(?—1868)一军由河南许州(许昌)启程,向西北进军,是为西捻军;赖文光、任化邦一军留在中原地区坚持斗争,是为东捻军。东捻军转战于鄂、豫、皖、鲁之间,同治六年被李鸿章淮军围困于黄河南岸、运河东岸、胶莱河西岸和六塘河北岸等地区内,十月二十四日(11月19日),在江苏赣榆同刘铭传部淮军展开激战,任化邦被叛徒杀害,东捻军主力覆没。赖文光率余部重返山东,败于淮县、寿光,首王范汝增(1840—1867)牺牲。赖文光率数千将士冲出重围,折往江苏,突破六塘河防线,抵达扬州附近的仙女庙(江都)。十二月十一日(1868年1月5日),东捻军直趋运河渡口扬州东北的湾头和瓦窑铺,欲渡河返回皖北,不料敌人包抄上来,双方恶战,赖文光坐马中枪倒毙,身负重伤,为清军所俘。十六日,在扬州从容就义。西捻军入陕后,曾围攻西安,联合西北回民起义军同敌人展开斗争。同治六年十月二十七日(11月22日),攻克绥德。不久,接到东捻军告急书信,便强渡黄河,深入华北地区。七年六月二十七日(8月15日),西捻军败于山东茌平南镇。次日,张宗禹冲出重围,来到徒骇河边,"穿林凫水,不知所终"。西捻军在徒骇河边的覆没,标志着捻军起义的最后失败。捻军坚持斗争18年,转战于鄂、皖、豫、鲁、苏等10个省区,与南方各省天地会起义相呼应,有力地配合了太平天国农民战争,予清朝统治以沉重打击。　(殷常符)

太平军桂林之围与蓑衣渡之战

清咸丰二年(1852),太平军在广西桂林与蓑衣渡同清军展开的战斗。

当年二月,太平军自永安突围北上,兵锋直指桂林。二十九日(4月18日)进抵桂林城下。桂林是广西的首府,城墙高厚,但清军守兵薄弱。向荣得讯,急率清军千余人,日夜兼程,抢在太平军之前进入该城,督饬守城兵勇紧急设防。随后,都统乌兰泰、总兵秦定三(?—1857)、和春(?—1860)等也率军陆续赶来救援,城内外清军达到2万余人。太平军围住桂林,在象鼻山上架设大炮向城内轰击,并猛攻西、南、文昌三门。三月初一,在南门外重创清军,乌兰泰被击伤,二十日死于阳朔。但太平军攻城月余,始终未能攻克,杨秀清即令暂行解围,别作良图。四月初一,主动撤围北上,向湖南进军。初四,攻破兴安。随后,太平军兵锋抵全州,南王冯云山被守城清军炮火击中,身受重伤。在攻全州的战斗中,太平军首次成功地使用"穴地攻城法"(太平军设有土营,凡遇攻坚,由他们挖掘地道,放置地雷,轰塌城墙,此为"穴地攻城法"。),于十六日轰塌全州西门城墙2丈余,乘势攻入城内,杀知州曹燮培及清军千余人。全州为广西湖南两省交通孔道,在太平军围攻期间,广西清军约2万人陆续往援,湖南巡抚骆秉章(1793—1867)闻讯告急,咸丰帝命钦差大臣赛尚阿加强湖南衡州(衡阳)、长沙防备,以水路为重点,千方百计阻止太平军进入湖南。十八日,太平军撤出全州,分水、陆两路沿湘江北进。位于全州以北十里的蓑衣渡,是湘江上游的一个险要渡口,这一带重峦叠嶂,树木参天,河床狭窄,江水湍急。湖南永州(零陵)知州江忠源(1812—1854)为阻扼太平军北上,在渡口北面3里的水塘湾江中伐木为堰,钉塞河道,以拦截太平军船只,并以楚勇千余在西岸设伏。水路太平军在此遭到伏击,船队受阻,不少船只被击沉。幸东岸无伏兵,太平军得以弃舟登岸,但辎重尽失。陆路太平军亦于西岸遇伏,一面力战,一面夺舟东渡。太平军与清军在蓑衣渡附近激战两昼夜,彼此均有较大伤亡。在全州中炮受伤的南王冯云山因伤势恶化,于四月二十三日不幸在此牺牲。冯云山是拜上帝会的实际组织者和奠基人,是太平天国政治、军事制度的规划者和创立者,他的牺牲是太平天国的重大损失。太平军撤出全州后,原拟沿湘江北进,直取长沙,因在蓑衣渡受挫,只好在湘南稍事停留,补充人力物力,然后再绕道进攻长沙。　(殷常符)

太平军传檄天下与湘南扩军

清咸丰二年(1852),太平军在湘南进行的宣传与扩军活动。

是年四月蓑衣渡之战,太平军损失惨重,所余能作战的部队不满万人,因此放弃了原来沿湘江北进,

直取长沙的计划，改由陆路自广西进入湖南境内，同时大力加强宣传工作，发动群众参军。在此期间，太平军以东王杨秀清、西王萧朝贵的名义，相继发布了《奉天讨胡檄布四方谕》、《奉天诛妖救世安民谕》、《救一切天生天养中国人民谕》三篇檄文，痛斥清王朝对广大汉族及其他少数民族人民残酷的民族压迫和封建剥削的滔天罪行，指出其强迫汉人剃发易服，"造为妖魔条律，使我中国之人无能脱其网罗"；"凡有水旱，略不怜恤，坐视其饿莩流离，暴露如莽"；"纵贪官污吏，布满天下，使剥民脂膏"；"官以贿得，刑以钱免，富儿当权，豪杰绝望"，"凡有起义兴复中国者，动诬以谋反大逆，夷其九族"。既揭露了清朝统治者的民族歧视政策，又控诉了残酷的阶级压迫。檄文直指咸丰皇帝"乃我中国世仇，兼之率人类变妖类，拜邪神，逆真神，大叛逆皇上帝，天所不容，所必诛者也"；明确阐明太平天国革命的目的在于"诛妖"、"灭胡"（即推翻清朝政府），建立"同享太平"的理想社会。号召湘南三合会和各省各界群众响应太平军，"同心同力以灭清"；"各各起义，大振旌旗，报不共戴天之仇，共立勤王之勋"。檄文向群众宣传了太平天国的宗旨和斗争目标，揭露了清朝政府的残暴统治。文告远近散发，"武昌城内外所在亦多有之"。四月二十五日（6月12日），太平军攻克湖南道州，接着又攻占江华、永明、郴州。太平军在道州、郴州等地进行休整，大力扩军，先后吸收了五、六万人。湘南扩军，不仅扩大了太平军的人数，还提高了战斗力，道州、郴州一带的挖煤工人也参加了太平军，他们组成"土营"，专开地道攻城，在此后进攻城市和要塞的战斗中，发挥了巨大作用。由于广大群众踊跃参军，太平军空前壮大，为以后继续北进，在军事上做了重要准备。在道州休整期间，太平军内部就整个战略问题进行了讨论，有一部分人主张返回广西，而这样做就无法打击清朝统治的要害，夺取全国政权。所以杨秀清坚决主张：舍粤不顾，直前冲击，循江而东，略城堡，舍要害，专意金陵（即南京），据为根本。洪秀全接受了杨秀清的战略主张，决定挥师北上，准备攻取长沙。（殷常符）

太平军围攻长沙与占领益阳、岳州

清咸丰二年（1852）太平军围攻长沙与占领益阳、岳州的战斗。

太平军于当年七月初三（8月17日）攻克湖南郴州后，探悉长沙清兵防守薄弱，洪秀全、杨秀清遂决定派西王萧朝贵率精兵2000人，从郴州出发奔袭长沙。为避开清军主力，奔袭部队不走耒阳、衡州大道，而绕经永兴、安仁、攸阳、茶陵、醴陵，于二十八日进抵长沙南门外妙高峰一带。长沙守城清军仅数千人，不敢出战，紧闭城门。太平军强攻亦未奏效。次日，萧朝贵亲率部队继续攻城，清军凭城顽抗，萧朝贵不幸中炮牺牲，太平天国又失去了一位重要领袖。洪秀全、杨秀清得悉后，于八月十二日暂时放弃郴州，率大队进援长沙，九月初一赶到长沙城下，但清将和春、江忠源、向荣已各率部先期到达，清军总兵力达到五六万人，太平军失去了乘虚攻取的战机。遂将大队人马驻扎在南门外，于九月初二、初三，连续出动六七千人对长沙发起进攻，遭到清军顽强抵抗，伤亡甚众。初五，石达开率领二三千人渡过湘江，控制西岸龙回潭等地和湘江中的水陆洲（橘子洲），在江上搭造浮桥，使湘江东西两岸得以联络，初步改变了被动态势。然而向荣也率部过江，企图截断太平军东西两岸的联络。太平军机智地抄袭敌后，使清军大败溃逃，死伤千余人。向荣乘马凫水过江，幸免于死。九月三十日，湘江东岸的太平军采用穴地攻城法，轰塌长沙南门附近的城墙数丈，突击部队二三千人蜂拥而上，负责防守南门的清军副将邓绍良率部拚死抵御，太平军伤亡数百人，只得后撤。其后，太平军又多次使用穴地攻城法，均未得手。乃于十月十九日主动撤围北上，二十二日占领益阳，二十八日，乘船出湘阴临资口，越洞庭湖。十一月初三占领岳州（岳阳）。除缴获大批粮饷、军械（其中有清初吴三桂部所遗大批火炮）等胜利品外，还有更重要的意义：一、岳州濒临长江和洞庭湖，正当水陆要冲，又扼湖南、湖北两省咽喉，地势险要，为湖北省门户，占领此地，即可实现太平军循江而东直取武昌的战略计划。二、在这里又获得了5000多条民船，太平军将参军的船户组成"水营"，从此太平军有了水军，大大提高了战斗力。东王杨秀清挑选湖南祁阳人唐正才（约1816—1863）作典水匠，职同将军，统率水营。此时太平军总数已达到10余万人，队伍空前壮大，又有了强大的水军，为以后实现循江而东，占领武昌，攻克南京准备了雄厚的军事力量。（殷常符）

太平军攻克武昌

清咸丰二年十二月（1853年1月）太平军攻占武昌的战斗。

是年十一月初三太平军攻克岳州，初七水陆两路并发，直趋武汉。初九前锋部队进至距武昌60里的金口。清廷惊恐万状，立命钦差大臣、署湖广总督

徐广缙亲率大军绕道援救武昌。武昌是湖北的省会，西临长江，东依洪山，城高墙厚，形势险要。守城清军仅3000余人，湖北巡抚常大淳（？—1852）、提督双福将城外兵勇全部撤入城内。自湖南来援的总兵常禄、王锦绣所率千余名清军也全部入城，准备依城固守。十二日，陆路太平军六、七千人由蒲圻直逼武昌城外，占领了城东洪山、小龟山、紫荆山诸要地，包围了武昌城。水路太平军也于当天抵鹦鹉洲，经一昼夜激战，十三日占领汉阳。十九日占领汉口。为了渡过长江攻取武昌，典水匠唐正才率部于汉阳、武昌之间架起两座浮桥，一座是以密集的船只相连，一座是用巨缆横缚大木，铺上木板。十五日，太平军开始进攻武昌城，先后使用了大炮、土火箭等武器。清军则用炮火、滚木、礌石等抵御。太平军又改用穴地攻城法，十二月初四（1853年1月12日）凌晨，先以火药炸开文昌门附近城墙，然后派先头部队冲入缺口，大队亦相继攻入城内。常大淳、双福丧命，武昌为太平军占领。这是自金田起义以来太平军攻下的第一座省城。太平军进入武昌后，宣布“官兵不留，百姓勿伤”，坚决镇压与太平军为敌的清朝官兵，保护百姓，并释放监狱中的罪囚，劝人“拜上”和“进贡”。所谓“拜上”，即欢迎大家入拜上帝会，愿入会者报名登记，然后分别设馆组织起来，青壮年男子入正牌馆，老幼入牌尾馆，有疾者入能人馆，妇女入女馆，每馆日发油一杯，人各发谷三合。所谓“进贡”，即在城内设进贡所，对于不愿参加太平军的人，允准为民，只要求他们把金银、钱米、鸡鸭等物作为贡品交进贡所，支援太平军，此即所谓“拜上则为兵，进贡者依然为民”。太平军的政策受到武昌广大群众的拥护，所以当太平军离开武昌继续东进之时，“男子从者十之九，女子从者十一二”。这时太平军总人数号称50万，太平天国起义已经由地方性的农民运动成为全国性的农民运动了。在武昌期间，太平军内部就下一步进军方向产生了争论，有人主张北进中原；有人主张东取金陵（南京），“据为根本”，两种意见争执不下。最后杨秀清假托天父下凡，坚持其进军金陵的一贯主张。至此，太平军“循江而东，略城堡，舍要害，专意金陵”的战略进攻方向才最后确定下来。　（殷常符）

湘军之编练

湘军，清咸丰二年十二月至四年正月（1853年1月—1854年2月），曾国藩在湖南创建的封建地主武装。

咸丰二年，太平军从广西向湖南进军，革命声势越来越大。咸丰皇帝十分震恐，屡颁命令，要各地官绅筹办团练。是年十一月二十九日（1月8日），正当太平军从岳州分水陆两路沿长江逼近武昌之际，咸丰帝令湖南巡抚传旨，命湘乡在籍礼部侍郎曾国藩帮同办理本省团练。曾国藩（1811—1872），字伯涵，号涤生，湖南湘乡县白杨坪村人。早年中进士，是军机大臣穆彰阿的得意门生，追随唐鉴、倭仁（1804—1871）讲习程朱理学，经常以“诚”字标榜自己，以维护封建伦常和封建统治秩序的死硬分子自居。历任侍讲学士、礼部侍郎等职。咸丰二年秋因母殁回籍守丧。随着人民起义的烽火燃遍各地，地主阶级的统治岌岌可危，他力主用孔孟之道和刽子手的屠刀两手来对付人民。他受命帮同办理本省团练时，太平军已攻占武昌。他怀着地主阶级的“愤憾”，于十二月二十一日由家乡抵达省城长沙，与巡抚张亮基（1807或1809—1871）筹议团练事宜。曾国藩认为，太平军纪律严明，内部团结，誓同生死，故能无往不胜。欲战胜此强敌，必须有一支强悍的地主武装。过去的绿营兵已腐败不堪，一般的团练武装也难以得心应手，必须改弦更张，练成一支足以抵敌太平军的全新的地主武装，使其能做到“呼吸相顾，痛痒相关，赴火同行，蹈汤同往”，成为“誓不相弃之死党”。以此为出发点，制定了有别于清朝旧军的建军原则：一是以募兵制代替世兵制。曾国藩认为，绿营的腐败习气已深入膏肓，牢不可破，只有“尽募新勇，不杂一卒，不滥收一弁”，“特开生面，赤地新立”，才能扫除陈迹，练成劲旅。他规定，士兵主要招募健壮、朴实的山乡农民，不收散兵游勇和集镇码头上油头滑面之人，也不要曾在衙门当过差的书役、胥吏之类。因为山乡农民缺少文化知识，“朴实少心窍”，容易驾驭，又能吃苦耐劳。招募山乡农民，可使湘军避免八旗、绿营兵的油懒桀骜习气，便于指挥调动。二是将兵为国有变为兵为将有。湘军招兵的方法是先设官，后募兵。曾国藩自己直接挑选水陆各军统领，各统领再挑选所属营官，营官挑选所属哨官，哨官挑选所属什长，什长挑选士卒。士卒仅服从直接招募他的什长，什长服从哨官，哨官服从营官，而各营彼此独立，互不统属，全军只服从曾国藩一人，不受其他任何人节制。这样就造成了自上而下严密的层层隶属关系，造成曾国藩在湘军中的牢固的统帅地位和军队属私人所有的性质。在这一点上，可以说曾国藩的湘军具备了某些近代军阀的特征。曾国藩还认为，一军之中若募有两地的士兵，必然造成区域间的不和，因而不如只用一地之人。所以湘军只在湖南募兵，又以湘乡为最多。这样，

官兵之间均以同乡、同事、师生、朋友等私人关系相招引、相维系,且"勇丁感营官挑选之恩","平日既有恩谊相孚,临阵自能患难相顾"。总之,严密的封建隶属关系,加上浓厚的封建乡土观念,是湘军维系内部团结的唯一纽带。三是以"礼"治军。曾国藩是封建理学的信徒,他说:"带勇之法,用恩莫如用仁,用威莫如用礼。"认为建军的首要原则是要有"军礼",要以"礼"治军,从上到下,灌输"忠君爱民"、"乡土情谊"等封建礼教。他选择忠于孔孟之道,死心塌地维护封建纲常伦理的知识分子为将,规定军官首先要"有忠义血性",并能以"礼"来教育士兵,也就是以孔孟之道、封建伦理纲常武装全军,使其成为坚定地维护封建统治秩序的地主武装。

在曾国藩办团练以前,湖南有许多县都办了乡勇,湘乡知县朱孙诒依靠湘乡地主士绅罗泽南、王珍、刘蓉(1816—1873)、李续宾(1818—1858)等,在湘乡团练的基础上,组成湘勇。湘勇曾出省到江西南昌与太平军作战,使太平军进攻南昌受挫。此外,秀水知县江忠源所办的楚勇(号楚军)也以凶悍著称,曾最早出省到广西,在广州副都统乌兰泰属下镇压太平军。江忠源又是曾国藩的门生,曾协助曾国藩筹办"新军"。所以这两支地主武装均为曾国藩看中。曾国藩就是在各县乡勇的基础上,以朱孙诒湘勇为班底,又拉来江忠源的楚勇加以扩编,亲自制定营制饷章,从政治、军事各方面加以严格训练,成为一支强悍的地主阶级新军。因其起源于湘乡,故称湘军。除陆军外,曾国藩还编练了一支水师。咸丰三年八月十三日他由长沙移驻衡州(衡阳),请准清政府,在衡州设总厂,湘潭设分厂,制造炮船。到咸丰四年正月二十六日,经过五个多月,衡州总厂竣工,湘军水陆师基本建成。湘军建制以营为单位,陆师每营 500 人,设营官一人;营辖前、后、左、右哨,每哨设哨长一人;哨辖一至八队,每队设什长一人。水师每营官兵 447 人,有快蟹、长龙、舢板等船 21 艘。至建成时,计有陆师 13 营,6500 人,由塔齐布、周凤山、储玫躬、林源恳、曾国荃等任统领。水师 10 营 5000 人,由成名标、彭玉麟、杨载福(1822—1890,后改名岳斌)、褚汝航等任统领。另有夫役、工匠等,全军约有 1.7 万人。

咸丰四年正月二十八日,曾国藩率军从衡州出发,经湘潭到达长沙。临出发之际,发布了《讨粤匪檄》,疯狂咒骂太平天国农民革命,斥责太平天国"举中国数千年礼义人伦诗书典则,一旦扫地荡尽。此岂独我大清之变,乃开辟以来名教之奇变!"号召忠于封建礼教的地主阶级知识分子,要"赫然奋怒"而"卫道",为挽救清朝封建统治与太平军死战。湘军开始对太平军作战,初曾败于靖港,继占湘潭、岳州。八月二十三日,攻陷武昌、汉阳。咸丰四年冬至次年春,攻江西九江、湖口,水师败绩。咸丰六年十一月,再陷武昌、汉阳,水陆东下,攻向江西。次年十一月,攻陷镇江,天京形势开始紧张。咸丰八年四月,湘军攻陷九江。八月攻陷吉安府。十月,李续宾部 3000 余人在安徽三河之役被歼,李续宾毙命。十一年八月,攻陷安庆,致使天京告急。同治二年(1863)十月,占领苏州。次年二月,攻陷杭州。六月十六日,湘军攻陷天京,太平天国起义宣告失败。七月十三日,曾国藩下令裁撤南京城内外湘军共 2.5 万人,留 1 万人守南京,1.5 万人为皖南、北游击之师。后又继续在皖、鄂、豫、鲁、苏等地镇压捻军,并分兵镇压陕、甘回民军和贵州苗民军。湘军主要将领左宗棠、刘长佑(1818—1887)、曾国荃(1824—1890)、刘坤一等均先后任总督,成为清末反动势力中的一个重要武装政治集团。

(殷常符)

天地会起义

清代太平天国起义时期民间秘密结社天地会领导的反清武装起义。

天地会创立于康熙十三年(1674),因其拜天为父,拜地为母,会员同为兄弟姐妹,故称天地会。以"反清复明"为宗旨,对内称"洪门",隐含明"洪武"年号之意。下分许多支派,如小刀会、红钱会、哥老会等。参加天地会的成员主要是破产农民、手工业者和其他游民群众。天地会起自福建漳州地区,到 18 世纪末、19 世纪初已遍及福建、台湾、两广、湖南、江西、云贵等广大地区。太平天国起义后,各地天地会及其支派纷起响应,最著名的有以下几支:一、两广天地会起义。咸丰二年(1852),广西天地会首领朱洪英(?—1874,即朱世雄或朱洪胜、朱声洪)、胡有禄(?—1855,即吴有禄)率会众在南宁竖旗起义,很快发展到三四万人。次年,克湖南永明县城。咸丰四年攻占广西灌阳,建立"升平天国",朱洪英称镇南王,胡有禄称定南王。咸丰五年,朱、胡接到太平天国天官丞相罗大纲邀其前往会合的信件,遂率起义军自广西攻湖南,克东安。后遭湘军王鑫(?—1857)部围攻,被迫放弃东安,走新宁。胡有禄在新宁被俘牺牲。朱洪英率起义军回师广西,咸丰七年二月(3 月)克柳州。次年夏,败走贵州古州,转战湘、桂、黔三省边区。同治十三年(1874)在湖南宜章被捕就义。余部重返广西,继续坚持斗争。在广西天地会发动起义的同

时，广东天地会也揭竿而起。咸丰四年五月十五日(6月11日)，天地会首领何禄(？—1856，即何六)率众起义，二十一日攻克东莞县城，起义军增加到2万多人。很快，全省各地天地会纷纷竖旗响应，影响最大的是陈开、李文茂领导的起义。陈开(1822—1861)，广东佛山人，驾船为业。李文茂(？—1859)，广东鹤山人，原为粤剧艺人。咸丰四年六月十一日，陈开在佛山起义，建号大宁。广州郊区李文茂、陈显良等率领数万人响应，起义军蓄发易服，头裹红巾，世称"红巾军"。起义声势浩大，"旬日之间，连陷数十州县"，顺德、香山、东莞相继克复，省城广州势孤援绝，陈开、李文茂率义军乘势围攻广州。两广总督叶名琛纠集地主豪绅组织团练，并勾结英、美、法侵略者血腥镇压起义群众。十二月二十四日(1855年2月10日)，起义军以统领水陆兵马大元帅陈显良名义照会英、美、法三国驻广州公使，斥责侵略者派兵船"用米盖住火药进省。其火炮名为防贼，而实卖与奸官，殊非正理"，要求他们停止类似行动。英、美、法侵略者不顾起义军抗议，继续协助清政府守城。起义军围攻广州达半年之久(一说10个月)，在中外反动派联合抵抗下，终未攻克，咸丰五年正月(一说三月)，被迫撤围。陈显良部仍留广东坚持斗争，陈开、李文茂率主力先抵肇庆，与另一支天地会起义军梁培友部会合。然后率战船千余艘，溯西江扬帆直上，进入广西，一路攻梧州，破藤县，于四月二十一日(6月5日)抵浔州府城外。起义军采用"穴地攻城法"，未果。又派军扼守大湟江口，使浔州城内的清军粮尽援绝，八月十七日，起义军乘机发起总攻，杀知府刘体舒和桂平知县李庆福等，占领浔州城，建立"大成国"，改元"洪德"，改浔州城为"秀京"，陈开称镇南王。设官分职，开炉铸钱。继而起义军攻占武宣、平南等地，军威大振。次年秋，陈开、李文茂，梁培友在梧州会师，决定陈开改镇南王为"平浔王"，守秀京；李文茂称"平靖王"，兼陆路总管；梁培友称"平东王"，兼水路总管，并率军向柳州挺进。李文茂曾发布告示，"要救百姓水火，贪官财主杀清"，让"大齐共享太平，人人安居乐业"。正当起义军迅速成长壮大之际，湖南巡抚骆秉章应广西巡抚劳崇光(1802—1867)的请求，派蒋益澧(？—1874)率湘军进入广西，向起义军发起进攻。咸丰七年梁培友牺牲。八年李文茂死于怀远山中。十一年七月十六日，湘军攻陷浔州城，陈开向贵州退却，二十八日夜，于横州东北被团练俘获，后被押回浔城，英勇就义。起义军余部在黄鼎凤领导下，继续坚持斗争。至同治三年四月下旬(1864年5月)，在广西坚持了10年之久的天地会起义最后失败。二、湖南天地会起义。咸丰二年浏阳人周国虞聚众万人，竖旗起义，建号"征义堂"。咸丰三年道州人何贱苟率领衡州、永兴、桂阳、常宁等地天地会起义，以常宁之五洞、桂阳的白水洞为中心，转战周围十余州县。三、福建小刀会和红钱会起义。鸦片战争前，漳浦一带已有小刀会组织，道光二十九年(1849)或三十年，又在厦门重建。咸丰三年四月初七(1853年5月14日)，福建小刀会首领黄威(又名黄位)率领会众在海澄(龙海)起义，克海澄、漳州、厦门、同安、漳浦等地。起义军在厦门建立政权，黄威以"汉大明统兵大元帅"名义发布告示，声讨清朝统治者的罪行，号召人民奋起斗争。起义军"所到之地，军法甚严，出示安民。米谷定价，不许贵卖，百姓秋毫无犯"。不久，清军进攻，十月初十，起义军撤出厦门，退至闽、粤海面，坚持斗争达五年之久。黄威曾派人与太平天国联络，未果。起义军最后于咸丰八年在海上失败。咸丰三年春夏间，福建永春县武秀才林俊(即林万青)率红钱会起义。他们将康熙年间的铜钱上"康熙"二字刮掉，中涂红色，作为会徽，故称红钱会。起义军先后攻占德化、永安、大田、沙县、龙溪、仙游、安溪等州县，一度发展到数万人。后林俊率众在南安、惠安一带坚持斗争到咸丰七年，曾与太平天国取得联系，并被封为烈王。次年北上迎接太平天国，途中负伤牺牲。至此，红钱会起义失败。四、浙江天地会起义。咸丰四年底，瞿振汉、金佩铨领导浙南红巾军起义。起义军以乐清为根据地，在临海、黄岩、大罗山、温州等地活动。曾发出告示，痛斥地主阶级的残暴统治，提出除凶暴，济贫民，扫除鸦片流毒的正义主张。瞿振汉还自称接受太平天国东王札委，说明浙南天地会起义是在太平天国影响下爆发的。五、江西边钱会起义。早在太平天国起义之初，吉安、建昌一带就有边钱会活动。会众"以钱涂朱，描金为字"，故称边钱会。咸丰六年，边钱会率数千人，在吉安、建昌交界处竖旗起义，在太平军的配合下，攻克南丰、新城、贵溪、铅山等县城，击毙建昌知府何栻。天地会起义，是南方各省响应太平天国革命的主要力量。虽然因其组织松散，"随起随灭"，被清军各个击破，但因其波及地域广泛，人多势众，在广大的中国南部，星罗棋布，一呼百应，极大地牵制了清朝反动统治力量，有力地配合了太平天国的反清起义斗争，并与北方捻军反清斗争相呼应，形成以太平天国为中心，席卷全国的农民起义大风暴。

(殷常符)

太平天国定都江宁(南京)

清咸丰三年(1853)太平军攻占江宁(南京),定为都城的历史事件。

咸丰二年十二月初四太平军攻克武昌后,停留四个星期,于次年正月初二,主动撤离,派出水师战船万艘,顺流东下,陆军步骑,驰骋两岸,屏障水师,长驱东进。水陆两路,势如破竹,所向披靡,直捣江宁。清政府在失去武昌后,又加强部署:逮治钦差大臣、署湖广总督徐广缙,以署湖北提督向荣为钦差大臣,专办两湖军务;以两江总督陆建瀛(1792—1853)为钦差大臣,进防江、皖;以署河南巡抚琦善为钦差大臣,驻防楚、豫。咸丰三年正月初八,秦日纲、罗大纲所率先锋水师于鄂东广济县南的老鼠峡一带大败陆建瀛的江防军,毙其翼长、安徽寿春镇总兵恩长。陆建瀛在九江闻败,仓皇弃师先逃,逭回江宁。此后,太平军长驱直进,于十一日占领九江,十七日攻占安徽省城安庆,杀巡抚蒋文庆,缴获大批军需物资。十九日至二十八日,又连克安徽池州(贵池)、铜陵、芜湖、太平府(当涂)及和州等地,二十九日兵锋直逼江宁城下。清廷在得知九江、安庆失守后,急命向荣率兵赶赴江苏;琦善、陈金缓率兵赴安徽,协助防守。江宁城西北两面濒临长江,东依钟山,形势险要。守城清兵约5000余人。陆建瀛逃回江宁后,数日不理政事。江苏巡抚杨文定借口防守镇江,也离城而去。江宁将军祥厚(?—1853)、江南提督福珠洪阿等将上述情况上奏参劾,清廷谕令将陆建瀛拿问治罪,杨文定革职留任,但未等清廷谕旨到达,太平军已进抵城下,水陆连营数十里,陆路扎营雨花台,水师布防水西门外,完成了对江宁的包围。江宁城垣南北略长,太平军决定以陆师进攻南端的聚宝门(中华门),水师进攻北端的仪凤门,发挥水陆两军的优势,迫使清军分散兵力。陆建瀛、祥厚将城外防军尽撤入城,据城固守。太平军一面准备攻城,一面深入宣传革命宗旨,杨秀清发布了一道告示说:“自谕之后,尔等务宜安居故土,乐守常业。圣兵不犯秋毫,群黎无庸震慑。”于是,人民群众积极献出银、钱、米、菜、猪、鸡、鸭等,大力支援太平军。太平军选定北面的仪凤门为突破口,采用“穴地攻城法”,挖掘地道,埋设火药,准备攻城。与此同时,南面聚宝门外的太平军设炮位于报恩寺塔上,猛烈轰城,使清军摸不清太平军的意图。二月初十(3月19日)拂晓,太平军炸塌仪凤门附近的城墙约2丈,乘势冲入北城,在黄家塘阵斩陆建瀛。防守南城的清军闻讯,不战而溃。数千太平军在天官副丞相林凤祥(1825—1855)、殿右四检点赖汉英(约1816—?)率领下,乘夜缘梯登城,打开聚宝门、水西门、旱西门。次日黎明,太平军攻入内城,斩江宁将军祥厚、副都统霍隆武等,这座江南名城终为太平军所占领。二十日,天王洪秀全进入江宁,以清两江总督衙门为天王府,并改江宁为天京,定为都城,正式建立起与清王朝相对峙的太平天国农民政权。

太平天国定都江宁后,为了巩固农民政权,采取了一系列军政措施。首先是对天京的防卫工作进行了严密的部署。二月二十二日,殿左一指挥罗大纲、木一总制吴如孝(约1815—?)率军攻克江宁以东的江南重镇镇江。次日,地官正丞相李开芳(约1826—1855)、天官副丞相林凤祥率军攻克江北重镇扬州。镇江与扬州隔江相望,太平军占有此二重镇,既能从东、北两翼屏蔽天京,又切断了南北漕运,予清朝统治者以严重威胁。太平军占领江宁后,清政府派钦差大臣向荣于二月二十二日率清军1.7万余人在江宁城东紫金山孝陵卫建“江南大营”,又派另一钦差大臣琦善于三月初九率军约万人至扬州城外建“江北大营”,两大营虎视天京,是对太平天国都城的严重威胁。太平军警惕地注视着江南、江北大营的破坏活动,在全城遍设望楼,派兵日夜观察警戒。城上分兵驻守,日夜巡防。此外,为了向北方和长江中上游扩展革命势力,进一步拱卫天京,太平天国领导集团又分兵北伐和西征,对清朝统治区实行了大规模的主动出击。其次,太平天国为了巩固农民政权,还颁布了以土地问题为核心的纲领性文件《天朝田亩制度》,制定了各项制度和政策;并进行政权建设,使各级政权组织进一步完备起来。太平天国的最高领导为天王,政权机关分为中央、省、郡、县四级。在中央一级,由于天王洪秀全在永安发布的诏令中宣布西王以下俱受东王节制,东王杨秀清实际掌管太平天国的军政事务,所以定都天京后,东王府实际上成为中央政权的国务管理机关。太平天国的各级官员,所有军政大事都要先汇总于东王裁处,然后上达天王,由天王最后裁决。省、郡、县三级为地方政权,省级政权的行政长官,由中央任命丞相、检点、指挥等职官员担任。郡设总制,县设监军,称作守土官。郡县长官或由中央直接委派,或由当地统帅将领充任,然后呈报中央批准。郡县长官的职责是统率所部太平军,编练和指挥地方武装,平时守卫地方,战时率兵杀敌;并负责征缴赋税、民间狱讼、民政事务等工作。县以下仿行太平军的组织体系,把农户组织起来,建立地

方基层政权,设立军帅、师帅、旅帅、卒长、两司马、伍长等官,均由本乡人充任,故称乡官。乡官的主要职责是催征钱粮,供应军需;团集乡兵,协助作战;管理民事、诉讼,维持地方治安等。在城市管理方面,太平天国领导者又将军队中所实行的一套原则推广到社会生活领域。一、废除家庭,在天京实行男女设馆分居,虽夫妇不得聚首。二、基本上废除商业和手工业,将有技艺的男子编入诸匠营和百工衙,女子善女红的编入绣锦营,从事集体手工业生产。三、一度完全废除私有财产,居民财物一概收归"圣库",实行平均主义的供给制生活制度。太平天国的这些做法显然违反了现实生活的需要和社会经济发展的客观规律,阻碍社会分工和商品经济的发展,不利于资本主义经济萌芽的成长,造成了社会经济的萧条和人民生活的不便,在实际生活中也难于行得通。故到咸丰五年,又恢复了家庭,承认私营工商业,逐渐恢复了正常的社会生活。除此之外,太平天国还规定:"凡天下婚姻不论财",禁止买卖婚姻。科举考试不受出身门第的限制,考试题目不本《四书》、《五经》,提倡文以纪实、朴实明晓的文风。在外交上,主张与各国平等往来,鼓励正当贸易,禁止贩卖鸦片。这一系列的措施、制度和政策,表现出强烈的反封建的精神。但是,太平天国毕竟是一场单纯的农民战争,由于农民小生产者的阶级局限,缺乏远大的政治眼光,不具备科学的理论武器,没有能够始终把夺取清朝中央政权摆在头等重要的地位,故此定都以后,军事上趋于保守,政治上没有也不可能创建符合历史发展规律的新的社会制度,基本上仍因袭旧的封建王朝体制。所以其所建立的南京政权一方面是一个与清朝封建政府相对峙的农民政权,另一方面又带有明显的封建性。　(殷常符)

《天朝田亩制度》颁布

《天朝田亩制度》,清咸丰三年(1853)太平天国定都天京(南京)后颁布的纲领性文件。

咸丰三年太平天国奠都天京后,为了巩固农民政权,废除封建剥削,实现"天下一家,共享太平"的理想,于是年冬颁布此制度。咸丰十年又曾重刻刊行。它是一个以解决土地问题为核心,包括政治、军事、经济、文教和社会生活等各方面制度和政策的农民起义纲领,是太平天国其它各项制度、政策的依据。

《天朝田亩制度》以宗教语言提出了否认一切私有财产权、废除一切私有制的总原则。一切土地和财富都属于上帝所有,"天下人人不受私,物物归上主"。根据这个总原则,提出了废除封建土地所有制,把全部土地平均分配给天下人耕种的土地制度总方针。"凡天下田,天下人同耕。此处不足则迁彼处;彼处不足则迁此处。""凡天下田,丰荒相通。此处荒则移彼丰处,以赈此荒处;彼处荒则移此丰处,以赈彼荒处。"又据此制定了平分土地的具体方法:把全国土地按产量分为尚(上)尚、尚中、尚下;中尚、中中、中下;下尚、下中、下下九等,规定每亩一年两季可产1200斤者为尚尚田,以下每减100斤即减一等,每年亩产400斤者为下下田。再按人口多寡、土地等级,以户为单位平均分配。凡16岁以上者,无论男女,均分田;15岁以下者减半;每户分田,"好丑各半"。《天朝田亩制度》又规定了全国农民仿照太平军军队编制组织起来,建立县以下的地方基层政权——乡官制。具体形式是:每五家为一伍,设伍长一人;每五伍为一两,设两司马一人;每四两为一卒,设卒长一人;每五卒为一旅,设旅帅一人;每五旅为一师,设师帅一人;每五师为一军,设军帅一人。各级乡官组成县以下的地方基层政权,既管理地方军政、民政,又负责组织经济生活和文化生活。与乡官制并行,还实行乡兵制,即每家出一人为伍卒,有警则为兵,杀敌捕贼;无事则为农,耕田生产。全国农户均按此编制组织社会生活,非常整齐划一。其次,又规划了农民的政治、经济和文化生活制度,规定每25家(即一两)设国库一所、礼拜堂一所,成为一个政治、经济、文化生活的基本单位,由两司马统一管理,这25家又以一家一户为单位进行个体农业生产,除了耕种每家分到的土地以外,还必须进行副业生产:种桑、养蚕、缝织衣裳;每家养五母鸡、二母彘;每五家中的"陶冶木石等匠",由"伍长及伍卒为之,农隙治事"。这25家又是一个统一分配的基层单位,规定每个农户生产的农产品,除留下口粮外,余均归国库;副业产品如苎麻、布帛、鸡犬各物及银钱,亦均交国库。各家婚丧弥月等项开支,都由国库统一按定制发给,"给钱一千,谷一百斤","通天下皆一式"。鳏寡孤独病残者,由国库统一供养。由25家农户组成的基层单位——两,同时还是农村的司法、文化、教育、宗教等各方面社会生活的基层组织,两司马不仅是农、副业生产的领导者,而且也是教育、司法和宗教等一切社会生活的组织者和领导者。各户儿童每天须到礼拜堂听两司马讲书传教,两司马就是教师;每礼拜日,伍长率各户男、妇到礼拜堂听讲道理;各种宗教仪式,亦由两司马主持;各家发生诉讼情事,必先由

两司马裁决、处理；两司马还负责保举人才；遇有婚丧嫁娶之事，也由两司马主持祭告上帝。总之，《天朝田亩制度》规定的农民生活的基层组织，就是这样一个以25家为单位，把土地、民政、军事、财政、宗教、教育、司法、选举等等社会职能统一起来的基层组织。同时又是一个废除了一切私有制、绝对平均主义的经济单位。这样，由一个两司马统一管理的25家就成为农民理想的公有制社会细胞，无数这样的社会细胞就成为理想的"地上天国"。太平天国的农民英雄就是企图通过这种途径达到消灭一切贫富不均的现象，而实现"有田同耕，有饭同吃，有衣同穿，有钱同使，无处不均匀，无人不饱暖"的理想社会。

《天朝田亩制度》规定的土地分配制度，在中国农民战争史上，第一次系统、完整地表达了二千年来我国农民反对封建剥削、要求土地的迫切心愿，它包含有彻底否定封建土地所有制的巨大革命性；它所规定的"人人不受私，物物归上主"的公有原则，表达了农民对私有制度的深恶痛绝，是一种朴素的共产主义思想。恩格斯曾把这种朴素的共产主义思想视为对人类社会发展的一个"天才预期"。但是它所设计的平分土地的办法以及通"天下皆一式"的社会生活组织制度，是要求在小农经济基础上废除私有制和平均一切社会财富，只是农民小生产者绝对平均主义思想的表现，是一种农业社会主义空想，是不可能实现的。同时它还企图把小农经济巩固起来，加以固定化，把农民的家庭手工业与小农业长期顽强地结合在一起，阻碍社会分工和商品交换，永远保持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特色，不利于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产生和发展。因此，它所规划的社会经济方案，在实质上带有反动性。由于《天朝田亩制度》的空想性，所以在它公布之后，并未能付诸实施。太平天国在奠都天京后，曾颁布一个《百姓条例》，这个条例规定了土地公有，剩余生产物交公，不收百姓"钱漕"等项原则，与《天朝田亩制度》的基本精神相一致。所不同的是，《百姓条例》没有提到平分土地的问题。太平天国曾试图实行《百姓条例》，但效果不好，未能行得通，"此令已无人理，究不能行，遂下科派之令"。太平天国为了维持革命政权，继续革命战争，必须保证有充足的财政经济来源，而《天朝田亩制度》、《百姓条例》都行不通，财政无来源，于是，实际生活迫使太平天国不得不从空想的方案退到当时历史条件所许可的范围之内，故此只好"下科派之令"，改行"照旧交粮纳税"政策。咸丰三年到四年间，在太平军西征进入安徽、江西以后，鉴于天京极度缺粮的实际情况，杨秀清、韦昌辉、石达开联名上奏天王洪秀全，提出为了"广积米粮，以充军储而裕国课"，要求准许"照旧交粮纳税"，得到洪秀全批准。所谓"照旧交粮纳税"，就是仿照清朝旧制收征田赋。地主是田赋的主要承担者，而"赋由租出"，既要向地主收田赋，必须维持地主收租的权利，亦即承认租佃关系的合法性，承认旧有的封建土地所有制的合法性。这样，农民没有分到土地，土地公有的理想被事实上的维系旧制所否定。封建主义的生产关系和阶级关系只是受到一定程度的冲击，而未能得到根本改造。农民阶级由于受到小生产者经济地位的局限，缺乏远大的政治眼光，虽然能够在破坏旧的封建制度方面起到革命作用，却不能提出科学的社会改革方案来解放自己。

（刘振岚）

太平军北伐

清咸丰三年(1853)至五年，太平军以攻取北京为目标在北方进行的战斗。

太平天国定都江宁后，为了攻占清廷老巢北京，最终推翻清王朝，决定派兵北伐。咸丰三年四月初一(5月8日)，天官副丞相林凤祥和地官正丞相李开芳奉派率军北伐。临行前，洪秀全诏令北伐军："师行间道，疾趋燕都，无贪攻城夺地糜时日。"北伐军共有9个军的番号，约2万余人。自扬州出发，在浦口上岸，攻入安徽，一路势如破竹，连克滁州、临淮关、凤阳、亳州等地，向河南挺进。五月初七攻克河南归德(商丘)，缴获火药4万余斤及大量铁炮。之后，拟由刘家口北渡黄河，取道山东北上。由于山东巡抚李僡沿河布防，将大小船只一律收归北岸，太平军无法北渡，只得沿河西走，进逼开封，因攻城未克，乃撤往朱仙镇。在此，林凤祥、李开芳呈书北王韦昌辉，报告了归德战况和未能渡河的原因，以及北伐途中所遇到的谷米短缺、通信不便等情况。北伐军决心另寻渡河地点，遂于五月十七日撤离朱仙镇，经中牟、郑州、荥阳，二十日到达汜水、巩县地区。这里是洛河归黄入口处，停有不少民船，北伐军便利用这批船只抢渡，至二十八日，主力全部渡过黄河，惟担任阻击任务的数千人，由于被清军截断，未能渡过黄河，后经河南、湖北、安徽，东向与西征军胡以晃部会合。北伐军渡过黄河后，于六月初三进围怀庆(沁阳)，当时怀庆城内驻守清军仅300人，连同团勇壮丁，也不过万人，林凤祥等拟速取，稍事休整后继续北伐，但却遇到清军的强力对抗。六月初八，清廷任命直隶总督讷尔经额(？—1857)为钦差大臣，调集清军数万人驰援怀

庆。北伐军久攻不下，不得不于七月二十八日主动撤围西进，绕道济源，进入山西，连下垣曲、绛县、曲沃、平阳等地。清廷急命江北大营帮办军务大臣胜保迅速率兵赶到霍州（霍县）堵截；命讷尔经额调兵控制正定、井陉等要地；命陕西、河南两省派兵控制黄河各渡口，妄图把北伐军消灭于山西南部地区。但北伐军自山西洪洞转而向东，复入河南，攻破涉县、武安。八月二十七日突袭临洺关，击溃清兵万余人，连下直隶沙河、任县、隆平（隆尧）、赵州（赵县）、深州（深县）等地。北伐军攻入直隶，清廷震动，北京城内的官僚豪绅纷纷逃散。咸丰帝立将讷尔经额革职，以胜保为钦差大臣，又任命惠亲王绵愉为奉命大将军、科尔沁郡王僧格林沁为参赞大臣，会同胜保"进剿"。北伐军在深州稍事休整后，又连破献县、沧州，于九月二十七日占领天津西南的静海县城和独流镇，前锋进至杨柳青。北伐军在静海、独流镇一带，构筑工事，等待援军，忍受着严寒和饥饿，抗击三四万清军和当地团练武装的不断围攻，整整坚持了100天，充分表现出坚韧顽强的战斗精神。但终因被围日久，粮食、弹药告急，援军又无消息，不得已于咸丰四年正月初八（2月5日）突围南走，二月十一日抵达阜城，被3万多清军包围。在二十七日的战斗中，重要统帅之一吉文元（约1825—1854）受伤牺牲。北伐军在此坚守两个月之久。洪秀全、杨秀清得知北伐军在津南受挫后，决定派遣援军北上。北伐援军共15个军，7500人，由夏官又副丞相曾立昌（？—1854）、冬官副丞相许宗扬（约1816—？）、夏官副丞相陈仕保（？—1854）等率领，于当年正月初七从安庆出发，二月中旬渡过黄河，二十一日进入山东，连克金乡、巨野、郓城、阳谷、冠县等地。十五日又攻临清，在战斗中，援军屡战不利，不得不于三月二十六日放弃临清南撤。北伐援军领导层中对下一步行动发生了激烈争论，曾立昌主张北进阜城，许宗扬却要南行，最后南返主张占了上风。四月初一，援军南退冠县，清军堵截追击，援军被杀二三千人，新附之众纷纷溃散。曾立昌渡黄河时投河殉难。陈仕保渡河后在安徽凤台县境内阵亡。许宗扬只身逃回天京，被杨秀清关进东牢。

咸丰四年四月初九，北伐军由阜城突围东走，占领东光县的连镇。当天，僧格林沁即率马队追来，将连镇紧紧包围。为牵制清军，李开芳率600余人骑马突围南下，于五月初四占领山东高唐。到高唐后，李开芳才得到北伐援军已败的消息，意欲返回连镇，却又被随后赶来的胜保部清军包围。林凤祥和李开芳只有各自为战了。

林凤祥坚守连镇，同多于自己十倍之敌相持将近一年之久，直至粮食断绝。咸丰五年正月十九（3月7日），清军总攻连镇，林凤祥在督战时受重伤。不久城破，双方展开了白刃战，太平军将士大多阵亡。林凤祥受伤后藏入地道，由于叛徒出卖被俘，解送北京。二十七日被凌迟处死，临刑时"刀所及处，眼光犹直视之，终未尝出一声"，表现出视死如归的英雄气概。李开芳在高唐也同敌人进行了殊死战斗。他组织太平军将士和居民开掘壕沟，挖掘地道，据城固守。胜保拥兵万余，先用云梯、吕公车攻城，继而重炮猛轰，均未能破城。太平军又伺机出击，夜袭敌营30余次，毙伤不少清军。因高唐久攻不下，胜保被解京治罪，僧格林沁奉命移师高唐。僧格林沁于正月二十三日率清军8000余人抵达高唐，围城清军增至2万余人。此时，李开芳得知林凤祥部已失败，决定突围南返，遂于正月二十九日午夜率部突围，入据离高唐约50里的茌平县冯官屯。太平军入屯后，掘壕立栅，严密防守。二月初一，僧格林沁马队赶到，用大炮向冯官屯轰击。太平军英勇还击，清军始终未攻入屯内。最后，僧格林沁强迫大批民工挖一条长120余里的水渠，引运河水至冯官屯。三月初五，放水浸灌，屯内平地水深数尺，壕沟地道被淹，粮草火药尽湿。四月十六日清军加紧进攻，太平军粮弹尽绝，陷于绝境。李开芳在危急时刻，曾向清军呈降表，缴械后，被清军解送北京，于四月二十七日被凌迟处死。至此，长驱六省、历时两年多的太平军北伐，英勇悲壮地失败了。北伐军的失败，是太平天国自金田起义以来在军事上所遭到的最严重的失利和挫折。究其原因，主要在于犯了孤军深入的战略错误，又未能积极联络和发动群众。给太平天国所带来的影响甚大，其教训也极为深刻。太平军北伐虽然失败了，但是它严重打击了清朝统治，给北方人民的反抗斗争造成了极为有利的形势。北伐军发扬了大无畏的英雄气概，在太平天国史上写下了英勇悲壮、可歌可泣的一页。

（殷常符）

太平军西征

清咸丰三年（1853）至六年太平军为夺取长江中游各省以屏蔽天京而进行的战斗。

太平天国领导集团派兵北伐不久，又于咸丰三年四月十二日（5月19日），派出春官正丞相胡以晃和夏官副丞相赖汉英率战船千余艘溯江西上，开始西征。意图是夺取皖、赣，进图湘、鄂，占领武汉、九江、安庆等军事要地，控制长江中游，以屏蔽天京。西

征军于五月初四占领长江北岸重镇安庆。此后，胡以晃坐镇安庆，指挥西征，赖汉英与老将曾天养(约1795—1854)率万余人进军江西。五月十八日，西征军前锋进抵南昌城下，稍事准备，即行攻城，为敌军炮火所阻。当时，江西巡抚张芾(1814—1862)率兵勇6000余人驻守南昌，太平军围城前夕，新任帮办江南大营军务、湖北按察使江忠源自九江率楚勇1300人先期赶到南昌，张、江共同据城防守。太平军数次攻城，均未成功。后来，国宗石祥祯(约1815—1854)、韦志俊(约1826—?)等率增援部队万余人，战船近千艘，自天京抵达南昌城外，与赖汉英等部联合发起进攻，又未得手。由于久攻不下，杨秀清决定撤围，转攻皖北和湖北。八月二十二日，太平军撤离南昌。二十七日，石祥祯部攻占九江。此后西征军分为两路：一路由胡以晃、曾天养率领、以安庆为基地，经略皖北；一路由石祥祯、韦志俊率领西取湖北。胡以晃、曾天养率军于十月十四日占桐城，二十九日占舒城，兵锋直逼庐州(合肥市)。庐州为安徽省城，攻占该城，既可东屏天京，又可北出鲁、豫，西进湖北，南援安庆。十二月十六日(1854年1月14日)夜，太平军以地雷轰毁城墙五六丈，乘势由缺口突入，至次日晨，守城清军全部被歼，占领了庐州。新任安徽巡抚江忠源投水自杀。太平军乘胜扩大战果，相继收复周围20余州县。石祥祯部于咸丰三年九月初六一举占领鄂东田家镇对岸的要隘半壁山。十三日，太平军水陆并举，猛攻田家镇，守城近万清军死伤逃亡几尽。田家镇为太平军占领。紧接着，太平军乘胜攻克湖北蕲州、黄州(黄冈)，直趋武汉。十八日，第二次攻占汉口、汉阳。为了集中兵力于安徽战场，太平军在汉口、汉阳一带仅停留半个月，十月初六主动撤离，由石祥祯等率一部分兵力留守黄州、蕲州，主力转向皖北。咸丰四年正月上旬，正值太平天国天历新年，黄州城内举行庆祝活动，驻扎在黄州以北20余里堵城的湖广总督吴文镕(？—1854)乘机三次督兵进攻黄州，但均未得逞。十五日(2月12日)，黄州太平军主动出击，猛攻堵城清军，清兵纷纷溃逃，吴文镕与总兵德亮、知府蔡润深皆被杀。太平军取得堵城之捷后，乘势沿江发动进攻，于十九日第三次攻占汉口、汉阳，并进围武昌。同时，又分兵两路，向湖南、鄂北进军。南路军2万余人由石祥祯及春官又副丞相林绍璋(约1826—1864)指挥，直捣长沙；北路军万余人由曾天养指挥，进逼荆襄。南下之师于二月初一再克岳州，初六占湘阴，初九占靖港，十三日占宁乡。

这时，新的地主武装湘军已经组成，此后太平军南下遇到湘军的顽抗。正月二十八日，曾国藩率全部湘军分水陆两路自衡州起程，集结湘潭，开赴长沙，陆路湘军又开赴靖港，阻截南下的太平军。太平军一时难以抗衡，一度放弃岳州，自湖南撤回湖北。三月初，太平军重整旗鼓，再度进军湖南。初十，又克岳州。曾国藩逃回长沙。太平军乘胜南下，三月二十四、二十五日击败靖港湘军水师，占据靖港。二十七日林绍璋率军占领湘潭，拟北据靖港，南据湘潭，南北夹攻长沙。四月初二，龟缩在长沙城里的曾国藩，为了解除太平军对长沙的威胁，亲率水师五营，陆师800人，由长沙进袭靖港。太平军以炮火猛烈袭击湘军水师，又出动200余只小划船，直接发起攻击，湘军水师失去战船三分之一。这时，在距靖港20里的白沙洲坐镇的曾国藩，急率陆师增援，但陆师见水师失利，也不战而退。曾国藩羞愤交加，先后两次投水自杀，皆被随员救起，最后狼狈逃回长沙。在靖港战役的同时，太平军与湘军在湘潭也展开了激战。四月初一，曾国藩派水师驰援湘潭，在湘江内与太平军水营展开激战。由于太平军水营多为民船组成，难以抵抗，几天之内失去大小船数百只，伤亡逾千人。四月初五，湘潭失陷。湘潭之战，太平军损失惨重。林绍璋率余部北返靖港。此时，率军围攻武昌的韦志俊集结鄂北各地太平军，合力进攻武昌。六月初二，再克武昌。湘军经过两个多月的休整补充后，曾国藩又以2万之众，自长沙北上，再次进攻太平军。七月初一，太平军失利，主动放弃岳州，退守岳州以北30余里的城陵矶。七月十五日，曾国藩亲率总兵陈辉龙所部广东水师400余人自长沙进抵岳州。次日，双方恶战，太平军奋勇迎敌，阵斩陈辉龙。湘军水师总督褚汝航率船援救，也被太平军击毙。十八日，曾天养率兵3000人由城陵矶登岸，准备据险扎营，牵制湘军北上。不意湘军悍将、湘南提督塔齐布(1817—1855)率兵猝至，曾天养意欲亲取塔齐布，遂单枪匹马冲入敌阵，不幸马失前蹄，被敌军乱刀砍死。曾天养牺牲后，太平军被迫撤往武汉，湘军水陆并进，直扑武汉。当时国宗石凤魁(约1815—1854)、地官副丞相黄再兴(1816—1854)等率军2万镇守武昌。八月二十一日，清军开始总攻，曾国藩督水陆两军自金口沿长江三路齐下，道员李孟群(1830—1859)率水师为中路，直抵鹦鹉洲，包抄太平军水师后路；浙江宁绍台道罗泽南(1806—1856)率右路，进攻花园；魁玉率左路进攻汉阳蛤蟆矶。同日，塔齐布部湘军也进扼武昌洪山。在湘军三路攻击下，太平军不支，于二十三日撤离武昌，途中遭湘军截击，损失千余人，泊于汉水中的太

平军水师战船千余只，也被湘军焚毁。二十四日，杨秀清委托燕王秦日纲统理湖北军事，命其在湖北田家镇、半壁山一线加紧设防。半壁山孤峰峻峙，俯瞰大江，形势险要。十月初一至初三，双方在半壁山展开激烈的攻防战，太平军伤亡数千人，半壁山失陷，余部退至田家镇。十三日，湘军水师猛攻田家镇江防，陆师6000余人排列大江南岸，以助水师声威。太平军水师阵势大乱，纷纷败退，战船被焚毁多艘。次日，秦日纲、韦志俊等自焚田家镇营垒，率部东退黄梅。至此，太平军苦心经营的田家镇、半壁山江防被湘军彻底突破。接着，湘军扑向九江，西征形势十分危急。

为了集中力量打击西线湘军，太平天国领导集团及时建立了西征指挥部，东王杨秀清指派翼王石达开主持西征事务。咸丰四年秋冬之间，石达开带领胡以晃自安庆抵达湖口，主持战事。罗大纲率部渡江至湖口协同作战，骁勇善战的陈玉成自江北赶至九江协同检点林启容(约1821—1858)设防固守。湖口位于鄱阳湖入长江口之东岸，形势险要；九江北枕长江，是兵家必争之地，因此，九江和湖口成为双方决战的战场。这时曾国藩也由田家镇进抵九江城外，加紧调兵遣将；塔齐布驻九江南门外，新任湖北按察使胡林翼(1812—1861)率黔勇分扎要隘，罗泽南自下游白水港渡江，围攻东路，再加上副将王国才(？—1857)所部为预备队，围攻九江的清军总兵力达到1.5万人。十二月初一(1855年1月18日)，清军发起全面进攻，塔齐布攻西门，胡林翼攻南门，罗泽南攻东门，王国才攻九华门。太平军沉着应战，待塔齐布进抵西门时，众炮齐放，弹若飞蝗。湘军冒死进攻，终未得逞。进攻其他各门之敌，也均未得手。曾国藩攻取九江的计划失败，遂决定改攻湖口，先破鄱阳湖内太平军水营，而后再攻九江。湘军水师先后进抵湖口。罗大纲鉴于湘军占优势，难以力胜，决定采用疲敌战法。多次在夜间出动小船百余只，或二三只，或五六只组成一队，船上堆积柴草和炸药，待近敌营时才纵火下放，兼放火箭火球，使敌彻夜戒严，不敢安枕。十二月中旬太平军主动撤出湖口，引诱湘军水师主力进入鄱阳湖内。湘军中计，于十二月十二日派120余只轻便快船进入鄱阳湖，石达开立即派兵堵塞湖口水卡，把湘军水师分割为二，被卡在鄱阳湖内的是轻捷快船和舢舨；被截在长江江面上的多是笨重大船。当天夜晚，太平军以小船数千只，烧毁泊于长江内的湘军大船40余艘，截在鄱阳湖内的敌船也被太平军消灭。十二月二十五日夜，林启容自九江、罗大纲自小池口以轻舟百余只，向泊于外江的湘军水师发起总攻，火箭喷筒，百枝齐放，烧毁敌船百余只，并围攻曾国藩座船，曾乘小船狼狈逃走，再次欲投水自尽，被部下救起。经此一战，湘军辎重尽失，不复成军。西征战役从失利退守阶段进入胜利进军阶段。西征军乘胜反攻。十二月三十日，秦日纲、陈玉成等乘清军后路空虚，率部西进，于湖北广济击溃湖广总督杨霈所部清军万余人。咸丰五年正月初七(2月23日)太平军第四次占领汉阳。二十七日，秦日纲、韦志俊等督军猛攻武昌，城内清军争相缒绳出城逃走，太平军则缒绳而上，当日三克武昌，杀新任湖北巡抚陶恩培等多人。太平军占领武昌后，曾国藩派罗泽南率湘军5000人进行反扑，又派塔齐布与副将周凤山等率湘军围攻九江。石达开见湘军全力救援武汉，江西兵力空虚，决定采用围魏救赵之策，进军江西，威胁曾国藩的南昌大营，以调动湘军，减轻湖北太平军的压力。石达开亲率3万人于十月十五日进入江西，先进占新昌(宜丰)，分兵连克上高、瑞州，新喻(新余)、峡江、樟树镇(清江)等地，威逼南昌。坐镇南昌的曾国藩，急调围攻九江的副将周凤山部湘军5000人回援南昌，被敌人围困近两年的九江得以解围。十二月初四(1856年1月11日)，周凤山部攻占樟树镇。咸丰六年正月初四(2月9日)，道员彭玉麟(1816—1890)也率水师赶到樟树镇。樟树镇是两岸之关键，省城之咽喉，因此，曾国藩用全力扼守樟树镇，以保东岸，以卫省垣。有鉴于此，石达开集中兵力，于二月十八日四路围攻樟树镇，尽破周凤山部湘军等营垒，杀敌千余。周凤山率残部逃奔南昌。石达开转战江西，先后攻占数十座城镇，8府50余州县望风归附。湘军陆师大将塔齐布久围九江不下，忧虑吐血而死，另一陆军大将罗泽南围攻武昌，被太平军击中，伤重身死。湘军士气大为低落。曾国藩困守南昌，惊恐万状，惊呼：江西"岌岌将殆"。但是，正当南昌指日可下，曾国藩"魂梦屡惊"，"呼救无从"之际，包围天京的清军向天京发动猛烈攻势，洪秀全、杨秀清急命石达开东援，以解天京之围。石达开不得不丢开曾国藩，于三月率部二三万人回援天京。以后，江西太平军基本上停止了进攻，使困守南昌的曾国藩得以绝处逢生。六月，解天京之围后，石达开率队重返西征战场。此时湘军又在包围武昌，石达开直入湖北，以解武昌之围。七月，正当石达开在武昌与湘军展开血战之时，太平天国发生内讧，石达开不得不再次离开西征战场，赶回天京，至此西征战役结束。历时三年的西征战役，经过浴血奋战，攻克了长江中下

游许多重要城镇，其中包括安庆、九江、武汉三大军事重镇，占领了湖北东北部和安徽、江西大部分地区。不仅在军事上使天京有了可靠的屏障，而且在经济上保证了天京的粮食供应，为天国后期坚持斗争创造了条件。 （殷常符）

上海小刀会起义

清代太平天国革命时期上海民间秘密团体小刀会发动的反清武装起义。

小刀会来源有两种：一属天地会支派，一属白莲教支派。上海小刀会属于前者。道光二十九年（1849，一说道光三十年），建立于福建厦门，不久传至上海。太平天国起义的爆发，推动了上海人民的反清斗争走向高潮。咸丰二年（1852）青浦县天地会首领周立春（1814—1853），率领白鹤江一带农民发动抗粮武装斗争，进攻县城，冲进县衙门，活捉知县余龙光。咸丰三年七月十三日（8 月 17 日），徐耀（？—1855）领导嘉定千余人起义，冲进嘉定县城，驱逐知县冯瀚。八月初三，周立春、徐耀领导第二次嘉定起义，占领了嘉定县城，并以“义兴公司”名义发布告示：“本帅……师兵伐暴，志在扫除贪官污吏，并勿扰害良民。”初五，小刀会领袖刘丽川（1820—约 1855）、潘启亮（？—1865）联合福建帮小刀会首领李咸池、陈阿林等在上海起义，迅速占领了上海县城，击毙了上海知县袁祖德，活捉了苏松太道吴健彰。起义军最初不过千人左右，几天之内发展到万人以上。起义当天建立了革命政权，称大明国，刘丽川被推为“大明国统理政教招讨大元帅”；李咸池为平胡大都督；陈阿林为左元帅，总理军务；林阿福为右元帅，兼署上海县事。刘丽川发出安民告示：“城厢内外，勿用惊迁。士农工商，各安常业。方今童君昏聩，贪官污吏，布满市朝。鞑夷当灭，明复当兴。”“本帅已严饬部下兵丁，不得取民间一物，不得奸民间一女。违者重究，各宜凛遵勿违。”当天晚上，刘丽川公开宣布：起义军与太平天国有联系，奉行太平天国的法令。十三日下午，刘丽川正式向各国驻上海领事公布：起义军建立的政权是“太平王的部属，在太平王的指挥下一致行动”。刘丽川还给天王洪秀全写了一个奏报，说小刀会“率千义勇，立定上海”，“保护居民辅户，安业如常”。希望“主上早命差官莅任”，“以顺天心，以慰民望”。太平天国得到消息后，东王杨秀清写了一道檄文，欢迎刘丽川“率众来归”。驻守镇江的罗大纲还在仪征各码头制造皮篷小船 600 只，去上海接应小刀会。因当时天京受到江南、江北大营的围困，分兵东下接应的计划未能实现。尽管如此，小刀会却一直奉洪秀全为领袖。不久，刘丽川将大明国改称太平天国，自称“太平天国统理政教招讨大元帅”。小刀会起义后，迅速向四郊发展，占领了宝山、南汇、川沙、青浦等县城，一度克复了太仓。小刀会占领上海，江南大营主要饷源的江海关税收陷于停顿，漕粮海运也受到影响，故清政府急忙从江南大营抽调兵力，由署江苏巡抚许乃钊（？—1870）率领到上海镇压。八月底，上海四郊各县，相继被清军夺回，小刀会退回上海，由进攻转入防御。英、美、法等外国资本主义侵略者公然支持清政府，镇压小刀会起义。他们策划救出了被起义军俘虏的道台吴健彰，将其隐藏在美国领事馆。咸丰四年六月初五（6 月 29 日），代理江苏巡抚吉尔杭阿派吴健彰与美、英、法三国驻上海领事谈判，签订了“协定”九款，成立税务管理委员会，共同管理中国海关。从此，中国的海关沦入外国侵略者之手。随后中外反革命势力进一步勾结，采取“按段筑墙，杜绝接济”的办法，从上海县城北门外修筑一堵墙，隔断城内起义军和郊区及租界的联系，使小刀会失去粮食和其他军需品的供应来源。十月，法国侵略军头子辣厄尔（La Guerre）宣布“法军对叛军进入包围战争的状态”，并于二十五日伙同清军，突破北门城墙，进攻上海县城，英国驻沪领事阿礼国（Rutherford Alcock，1809—1897）也随军出动。此后侵略者与清军相勾结，长期围困上海，屡次向城内起义军发起攻击。起义军曾于十一月打退侵略者的进攻，毙伤法军 40 多人、清军 2000 多人，但终因众寡悬殊，弹尽粮绝，被迫于咸丰五年正月初一（2 月 17 日），弃城突围。次日，刘丽川率领一支起义军，到达上海近郊的虹桥。在同敌人激战中，刘丽川、陈阿林、徐耀、周秀英等相继壮烈牺牲。潘启亮率领一部分起义军参加了太平军。上海小刀会起义，一共坚持了 17 个月之久，狠狠打击了中外反动势力。 （殷常符）

英法修约讹诈

清咸丰四年（1854）和六年英、美为首的资本主义侵略者两次要挟清政府修改《南京条约》等条约的外交讹诈活动。

第一次鸦片战争后，英、法、美等资本主义国家强迫清政府签订了一系列不平等条约，取得了许多侵略特权。到了 19 世纪 50 年代初期，欧美资本主义各国工业迅速发展，企图通过“修约”的形式来扩大其侵略要求。咸丰三年至六年间，太平天国农民战争风暴席卷长江两岸，中国内战方酣。外国侵略者断

定：清政府对待“反叛”的农民阶级绝不会妥协，一定要严加镇压；对待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政策又表现出动摇不定和十分软弱。决定趁清政府危难之际，利用其软弱性和动摇性，运用外交手腕，要挟“修约”。所谓“修约”就是要求修改《南京条约》、《黄埔条约》和《望厦条约》，扩充这些不平等条约的侵略要求。中英《南京条约》是政治条约，不是商约，本无任何修约规定。中法《黄埔条约》和中美《望厦条约》也首先规定了“和约一经议定，两国各宜遵守，不得轻有更改”。这两个条约虽曾分别规定可对某些条款作出“变通”，但这种“变通”，只是因为各口岸情形不一，对于贸易等款，将“不无稍有变通之处”。显然这种“变通”仅限于具体执行中的若干枝节问题。可是，英国却引用所谓“最惠国”条款和曲解《黄埔条约》、《望厦条约》中有关12年后贸易及海面各款在具体执行中的若干枝节性问题上“稍有变通”的规定，要求全面修约。美、法为了一旦英国“修约”成功，亦可援例修改《望厦条约》和《黄埔条约》，一致支持英国。

四年，第一次“修约”活动，是以英国为首，美、法附和的方式出现的。这年，《南京条约》届满12年。英国驻华公使包令(John Bowring，1792—1872)，联合法国驻华公使布尔布隆(Alphonse de Bourboulon，1809—?)、美国驻华公使麦莲(Robert Milligan Mclane，1815—1898)，正式向清政府提出“修约”要求。英使要求：中国全境开放、通商；鸦片贸易合法化；废除外国进出口货物通过中国内地时征收的子口税；外国公使常驻北京。美使要求：在长江流域及其支流任何口岸城市及港湾进行贸易；美国人可以进入中国内地任何地区贸易、传教、居住，并取得租赁、建筑的自由。法使除提出类似上述要求外，还要求释放因非法潜入陕西从事间谍活动而被中国地方当局逮捕的法国传教士。显然，这些修约要求，远非对某些条款“稍有变通”，实际上是要逼迫清政府另签一个比《南京条约》等条约更为广泛的新的不平等条约。三月(4月)，英、法、美三国公使到达广州，以这些苛刻条件为内容，致函办理外交事务的钦差大臣、两广总督叶名琛(1807—1859)，申请“修约”。叶名琛拒不接见，避不答复。五月，包令、麦莲到江苏昆山面见两江总督怡良，要求“修约”。怡良以办理外交系两广总督职责，要麦莲回广州商办。七月，英、法、美三国公使串通一气，再次联合向叶名琛提出面商修约，叶名琛仍拒见。八月上旬又回到上海，会晤江苏巡抚吉尔杭阿(?—1856)，谓叶名琛不允所请，声言前赴天津，要求“修约”。十二日(10月3日)，吉尔杭阿再与英、法、美三使会晤，命回广州与叶名琛商议，三使坚持赴津申诉。十八日，包令、麦莲率领300多名侵略军乘兵舰北上大沽口要求到天津“修约”。布尔布隆因兵舰需要修理，无舰可乘亲行，仅派使馆秘书哥士耆(Michel Alexandre, Comte Kleczkowski，1818—1886)同往。清政府不愿在近畿重地谈判，深恐侵略者借机寻衅，仅派级别较低的长芦盐政文谦和前任长芦盐政崇纶(1792—1875)听取意见，并要英、美公使仍回广东交涉。英、美公使却以“修约”不成即要发动战争相威胁。文谦不敢轻允。崇纶却主张答应其部分要求，并乘机上奏劝说咸丰帝。咸丰帝同意对英、美“修约”主要要求仅作少许让步，即减免外商所欠上海海关税和广东茶税。但除此以外一概拒绝，仍要求英、美公使去广州同叶名琛、怡良接洽。外国侵略者没有达到其主要目的。尽管他们大肆叫嚷：“除非有一个武力示威的支持和强迫，是得不到条约的修改或通商以及贸易情况的改善。”但是，当时英、法正在进行克里米亚战争；美国在华兵力也不足以逼迫清政府屈服。加上白河将冰冻。九月二十日只好调棹南返，初次“修约”要求失败。

两年后，又进行了以美国为首的第二次“修约”活动。六年，中美《望厦条约》、中法《黄埔条约》届满12年。不甘心第一次“修约”讹诈未成的美国，看到英、法陷于克里米亚战争，于是出来充当侵华主角，带头进行第二次“修约”。为了做好充分准备，美国先于五年改派了一个传教士出身的、有名的“中国通”伯驾(Peter Parker，1804—1888)接任驻华公使，并让他与英、法外交大臣和驻华公使先后策划共同要求“修约”问题。六年三月二十八日(5月2日)，伯驾到达广州，照会叶名琛提出“修约”要求：公使驻京；中国全境开放；无限扩大贸易；外国人在华传教自由；改造中国司法机关。四月十三日和六月初二，英国公使包令和法国代办顾随(De Courcy，1827—1908)，也先后照会叶名琛，支持美国要求。二十二日，叶名琛向咸丰帝奏报三国公使联合请重修条约。咸丰帝诏命叶名琛说：“各夷公使议定条约，虽有12年后公平酌办之说，原恐日久情形不一，不过稍有变通，其大段断无更改。”这是完全有理的。他指示叶名琛：“据理开导，绝其觊觎之心。如其坚持十二年查办之语，该督等亦只可择其事近情理，无伤大体者，允其变通一、二条，奏明候旨，以示羁縻。”叶名琛把咸丰帝可在有限范围内妥协、但不同意将“稍有变更”解释成全面修改、另立新约的表示，告诉了伯驾。伯驾在广州没有达到目的，七月一日到达上海。当时，

英、法感到和平"修约"不达目的，准备诉诸武力，除外交上支持美国"修约"活动外，包令、顾随并未随同北上。伯驾在上海活动了4个多月，仍无结果。九月，英国已在广州借口"亚罗"号船事件，燃起了新的侵华战火。十月，时届寒冬，伯驾停止"修约"交涉，离开上海，十一日回到香港，参与英、法的武装侵华活动。

（邱远猷）

马神甫事件

法国为发动第二次鸦片战争而制造的借口。又称"西林教案"。

清咸丰三年(1853)法国天主教神甫马赖(Auguste Chapdelaine，1814—1856)非法潜入我国广西西林县，披着宗教外衣，进行侵略活动。他吸收地痞流氓入教，勾结当地官府和土豪，欺压人民，强奸妇女，无恶不作。并纵容包庇教徒马子农、林八等无故在乡间起衅，进行抢掳奸淫，肇事多起。他们作恶多端，而又逍遥法外长达3年之久，激起当地人民极大愤慨，上控省大吏。六年一月二十四日(2月29日)，新任西林知县张鸣凤根据村民控呈，调查据实后，将马赖及不法教徒共26人逮捕归案，依法判处马赖及不法教徒2人死刑，其余分别论罪处罚。法国皇帝拿破仑三世(即路易·波拿巴)及其政府，为了进一步取得天主教的支持，巩固军事独裁及扩大资产阶级的海外权益，遂抓住这个事件，借口挑起侵华战争。八月二十九日，法国通知英国政府，准备派一支法国远征军到中国。次年联合英国出兵侵华。

（邱远猷）

一破江南大营

清咸丰六年(1856)太平军摧毁清军江南大营的战斗。

三年二月初十(3月19日)，太平军攻占江宁(南京)，定为都城，称天京。二十二日，清钦差大臣向荣率军1.7万人尾追太平军到天京城东的沙子冈，二十九日，移扎孝陵卫，建立江南大营。三月初九，另一钦差大臣琦善率军万余人抵达扬州，建立江北大营。两大营的兵力以后陆续有所增加，直接威胁着天京的安全，是太平天国的心腹之患。咸丰五年天京地区的形势日趋紧张，清廷命江苏巡抚吉尔杭阿移师镇江，会同江南大营，共1万多兵力进攻镇江。太平天国从西线抽调兵力，由燕王秦日纲率领东援镇江。六年三月(4月)，太平军在镇江大败清军，顺势再克扬州，摧毁清军营盘120余座。四、五月间，又横扫江北清军营盘150余座，击毙吉尔杭阿，江北大营被攻破。此时威胁天京的只剩下江南大营一座堡垒了。东王杨秀清决心除掉这座堡垒。他从西线调翼王石达开率部东下增援。石达开声东击西分兵东出，于五月十一日攻占溧水。溧水系入苏、常要道，而屏蔽苏、常又是江南大营的主要任务之一，向荣立即由江南大营抽调1500人前往助战，随后又令得力干将张国梁(1823—1860)选带精兵和马队，到溧水驻扎。这样一来，江南大营的兵力极为空虚。太平军的战斗计划是选定孝陵卫东北面的仙鹤门为主攻方向，西北面的龙脖子(地保门)为助攻方向。当清军南调之际，各路太平军正向天京集中，东路秦日纲部于五月十二日到达燕子矶。十五日，秦日纲又率陈玉成、李秀成等部自燕子矶移营于尧化门、仙鹤门附近。与此同时，东王杨秀清从天京城内派出两支太平军，一支数千人越过龙脖子；另一支七八千人自神策门、太平门出城，然后两队联兵占据大小水关及冯家边一带，离仙鹤门数里筑垒，与秦日纲相呼应，扼江南大营之背。向荣派总兵王浚统带2000人前往仙鹤门防堵。十六日，石达开率军2万人自西线赶到，扎营尧化门、仙鹤门一带，筑垒数十处，前锋抵达紫金山东面的黄马群，切断了江南大营赴仙鹤门的必由之路。至此围攻江南大营的石达开、秦日纲两部太平军共约4万余人。眼见江南大营危在旦夕，向荣急令张国梁率兵8000人由溧水星夜赶回大营，并从丹阳、秣陵关调兵1300人回援。十七日拂晓，太平军四、五千人直扑仙鹤门敌营，又出动数千人分队包抄，王浚等部清兵溃退。与此同时，扎营龙脖子方面的太平军也出动二三千人，排立山下，向荣不得不从大营抽兵600人前往抵御。当天，张国梁率千余人赶回大营，在黄马群南边的青马群屯兵筑垒，妄图阻止太平军进攻。十八日，各路太平军发起总攻。仙鹤门方向的太平军多路齐出，将敌营团团围住；并分兵一路越过紫金山，从后路直插清营；天京城内派数千人出通济门，直扑七桥瓮；另一支太平军四五千人从灵谷寺下山，攻破满洲马队营盘；此外，洪武门(光华门)、朝阳门(中山门)等处亦有太平军分路出击，连下清军营寨20余座，继而数万太平军集中力量，攻击向荣大营，歼敌千余人。向荣、张国梁等退至淳化镇，张左脚被打伤，向荣败逃丹阳。至此，威胁天京达三年之久的清军江南大营被太平军彻底摧毁。六月初太平军复进军丹阳。七月，向荣自缢身死。

（殷常符）

杨 韦 事 变

清咸丰六年(1856),太平天国领导集团分裂内讧、互相残杀的严重事件。

太平天国起义初期,由于敌我斗争十分尖锐,军事行动非常紧张,领导者们情同骨肉,团结一致。自定都天京,建立政权后,特别是占领了长江中游的广大地区,先后攻破了清军的江北大营和江南大营,领导者们滋长起骄傲自满情绪;同时农民阶级自身的弱点和为以前紧张的敌我斗争掩盖的内部矛盾也日益暴露。天王洪秀全宣扬自己是“真命天子”、“万民之主”,诸王、侯都因袭世袭制,人民群众成了他们统治下的子民。太平天国还颁布了一套严整的封建礼仪制度,上下尊卑,等级森严,甚至连称呼、服饰、仪卫、舆马等都有明确的等级差别。天王在民间广选秀女,到后期,他共拥有87个嫔妃。其他诸王也都妻妾成群,如此等等。随之而来的是生活上的奢侈腐化。洪秀全在建都之初便大兴土木,动用上万军民,拆毁大批民房,把两江总督衙门扩建为天王府。天王府周围十余里,墙高数丈,内外两重,内曰金龙城,殿曰金龙殿,苑曰后林苑,雕琢精巧,金碧辉煌,五彩缤纷,绚丽无匹。洪秀全将军政事务多委诸东王杨秀清,自己则务于声色。杨秀清也大修东王府,尽毁附近民居,穷极工巧,骋心悦目,王府内藏有奇珍异宝、佳酿、洋乐,各色享乐之物应有尽有。每次出行,盛陈仪仗,鼓乐齐鸣,役使千数百人。太平天国的领导人和封建帝王已相差无几。与此俱来的是内部争权夺利斗争愈演愈烈。洪秀全与杨秀清之间的矛盾由来已久,根深蒂固。从宗教方面说,洪是拜上帝会的缔造者,享有仅次于天父皇上帝和天兄耶稣的最高地位;而杨则拥有“代天父传言”的特殊权力。表面上,杨的宗教地位低于洪,但他时常利用代天父传言的特殊权力凌驾于洪之上。从政治方面说,洪是太平天国的最高领袖。杨受封东王,九千岁,低于天王,但由于各王俱受其节制,在长期的军事、政治斗争中,实际上掌握了太平天国的军政大权。从人伦方面说,洪、杨都被说成是“上帝爱子”,互称兄弟,而当杨假托天父下凡时,这种兄弟之间的关系又变成了父子之间的尊卑关系,杨代表天父,洪对“天父”绝对不能违抗。总之,洪秀全实际上已被架空,处处受制于杨。对此洪当然深怀不满,洪、杨矛盾与日俱增。洪秀全狂热地鼓吹封建纲常伦理,宣扬“生杀由天子”,千方百计维护其至尊至贵的统治地位。杨秀清则“自恃功高,一切专擅”,“威风张扬,不知自忌”。太平天国的重大政策措施,都是先经东王核夺,然后再上奏天王报可,因杨有“代天父传言”之特权,洪只得照准。东王府事实上成了太平天国的军政决策机关。杨秀清利用权力,飞扬跋扈,逼迫洪秀全就范,以便取而代之。因此在以东王名义进行的殿试中,竟然以“四海之内有东王”为试题,开科取士。他的参护们公开扬言要护卫东王早做人王。洪、杨矛盾迅速激化。咸丰三年十一月二十四日(12月24日),杨秀清假借天父下凡,怒斥洪秀全杖责女官等事,居然下令责打洪秀全40杖。在韦昌辉等人再三恳求下,杨才罢休。二十六日(12月26日),洪秀全在金龙殿款待杨秀清,指桑骂槐地说:前天有人要杖打你二兄,“我暂且容他,他服便罢。”杨答道:作为天王,“一旦怒而误杀之”,“悔之晚矣”。这实质上是杨秀清妄图取代洪秀全、争夺最高领导权的试探性演习,双方已剑拔弩张。

咸丰六年秋,太平军攻破江南大营,天京被围的形势暂时解除。杨秀清以为大敌已除,乘机发难,逼洪秀全封他为万岁。七月二十二日(8月22日)他假托天父下凡,将洪秀全召到东王府,以天父的口吻对洪说:“尔与东王均为我子,东王有咁(音 gèn,广东方言意即“如此”、“这样”)大功劳,何只称九千岁?”洪回答:“东王打江山,亦当是万岁。”“天父”又说:“东世子岂只是千岁?”洪答道:“东王既万岁,世子亦便是万岁,且世代皆万岁。”杨佯作“天父”欢喜说:“我回天矣。”对此,洪秀全忍无可忍,但鉴于杨秀清掌握着天京军政实权,不便当面发作,只好一面佯允其请,推说等到八月二十五日庆祝东王寿辰时,举行正式封典;一面密令在江西督师的北王韦昌辉、湖北督师的翼王石达开迅速返回天京,“以诛灭谋篡位者”。

杨秀清与韦昌辉之间的矛盾亦深,杨为树立个人权威,曾多次打击韦昌辉等人。他先免去韦负责天京城守之职权,又借韦部下张子朋在湘潭激变水营一事,“杖昌辉数百”,使韦“屡受其辱”,故此杨、韦积怨甚深。随着杨、韦矛盾的发展,韦昌辉便拟联洪反杨,曾奏请洪秀全诛杨秀清。起初,洪对杨采取了克制态度,没有答应韦的要求。逼封万岁事件发生后,洪决心借韦之手除掉杨秀清,于是密令韦返京。韦昌辉接到密令后,立即率领心腹部队3000多人于八月初三深夜从江西赶回天京,首先占领城内各要塞,然后连夜包围东王府。杨秀清正在熟睡,猝不及防,被韦昌辉部下乱刀砍死,并杀死杨秀清的家属及东王府多人。燕王秦日纲也从丹阳回到天京,参与了韦昌辉的屠杀活动。事后,韦昌辉立即将东王首级呈送致

天王。后来洪秀全把这一天定为东王升天节。杨秀清虽然死了，但他的部队还在，仍然是对天王的威胁，于是要“尽捕东王余党”。初六，天王洪秀全下诏，说韦昌辉、秦日纲杀人太多，令受鞭刑，并命东王部下前来天王府门前观看韦、秦受刑。韦昌辉佯作伸首受刑，正在这时，伏兵四起，东王部下5000余人被诱卸下军械，全部被杀。接着，以东王余部为一方，以洪秀全和韦昌辉的部队为一方，闭城月余，互相残杀，太平军优秀将领和战士2万多人死于这场变乱。之后，韦昌辉总揽军政大权。是时石达开正在湖北武昌洪山指挥作战，八月中旬赶回天京，面对天京惨状，责备韦昌辉不该滥杀无辜。韦昌辉又欲对石达开下毒手，石连夜逃往安庆。韦恼羞成怒，不仅杀了石达开全家，还派秦日纲率1.5万人追击石达开。洪秀全也下诏悬重赏购石首级。石到安庆后，立将武昌洪山军队调回，约有4万兵力，自安庆渡江至泾县，东讨韦昌辉。他上奏天王，要求诛韦，并说如果不得到韦昌辉首级，“即班师回朝攻灭天京”。最初，洪秀全未答应石达开的要求。十月上旬，韦昌辉竟率军攻打天王府，妄图加害洪秀全。洪这才下令诛韦，结束了自八月初四以来两个月之久自相残杀的局面。韦昌辉伏诛后，石达开于十一月初一回到天京，洪秀全命他提理政务，但对石又存有疑忌，多方牵制，终于迫使石离京出走，带走了太平天国十几万精锐部队。杨韦事变，使太平天国失去了坚强的领导核心，动摇了广大群众对太平天国的信念，极大地削弱了太平军的战斗力，丧失了歼灭敌人的有利时机。清朝统治者则因此获得喘息机会，马上气焰嚣张起来，咸丰帝欣喜若狂，叫嚷要“乘其内乱，次第削平”。清军很快在东、西两线发动反扑，在西线，从太平军手中夺回整个江西及安徽大部分地区，仅安庆及其周围的几个据点还在太平军手中；在东线，清军重建江南、江北大营，攻陷镇江，重又围困天京，太平天国占领区大为缩小。此次事变成为太平天国农民战争从战略进攻进入战略防御的转折点。（殷常符）

滇、黔少数民族起义

清代太平天国时期云南、贵州以少数民族为主体的农民起义。

太平天国起义爆发后，滇、黔各族人民纷纷响应。云南地处西南边疆，境内多山，土地瘠薄，各族人民遭受清王朝残酷的剥削压迫，兼之清政府经常挑拨汉回关系，捕杀回民，霸占回民矿权，激起回民反抗。咸丰六年(1856)，回民马金保首先在姚州(姚安县)起义，马复初(1791—1872)继起于新兴(玉溪县)，马如龙(？—1891)起于临安(建水)，杜文秀起于蒙化(巍山县)。其中影响最大的是杜文秀起义。杜文秀(1828—1872)，字云焕，云南永昌府保山县人。廪生出身，村塾教师。为人正直廉洁，为村民所敬仰。当年八月十八日(9月16日)，杜文秀率起义军攻占大理，建立了政权，并被推举为总统兵马大元帅，宣布遥奉太平天国南京之号召，“改正朔，蓄全发，易衣冠”，又下令制定各种制度法令：首先确定“不分回汉，一体保护”的政策，在《管理军政条例》中规定了“无分汉回夷，一以公平处之”的原则，废除人口税和其他苛捐杂税，发放耕牛、农具、招民垦荒；对工商业严禁以官压市，低价购买。杜文秀还特别强调群众纪律，规定起义军不得无故下乡，滋扰良民，纵放牲畜，践踏田禾；严禁毁拆庙宇，扰害民房等等，受到各族人民的拥护和支持。同治元年(1862)，马如龙等降清，并对杜文秀劝降，杜严词拒绝。同治六年杜文秀发兵20万围攻昆明，他在《誓师文》中说：全军要“汉回一心，以雪国耻”。先后攻克53个州县。同治十一年，清军进攻大理，起义军挖壕筑垒，奋勇防守。十一月(12月)，清军一面用大炮轰城，一面挖掘地道，埋伏炸药，轰毁城墙。形势十分危急。杜文秀认为，与其死伤万人，不如舍己“以救生灵”。遂决意出城，“请罪伏诛”。十一月二十六日(12月26日)，杜文秀服毒后乘轿到清营，遂被杀。十二月初二大理陷落。其余部在腾越继续坚持斗争，至同治十三年最后败亡。在回民起义的同时，云南哀牢山区彝族人民在李文学等人领导下举行起义。李文学(1826—1874)，又名正学，云南赵州(弥渡)瓦卢村人。彝族。出身于农民家庭。咸丰六年四月(5月)，与王泰阶、李学东(？—1876)等率领彝、汉、傣等各族人民5000多人，在云南赵州瓦卢村西面的天生营誓师起义。起义群众推李文学为彝家兵马大元帅，元帅府设于密滴村。李文学在起义当天发布檄文，揭露满汉地主“狼狈为奸”，“苛虐我夷汉庶民”的罪行，主张“彝汉庶民，共襄义举”，“铲除满清赃官，杀绝汉家庄主”。咸丰八年，李文学联合了哀牢山区田以正为首的哈尼族起义军。起义军队伍迅速增至万余人，并以密滴为中心，控制了附近10余州县，面积约达3万多平方公里，人口50万左右。起义军为了巩固和扩大农民政权，在政治、经济等方面采取了一系列措施，宣布佃户原来耕种地主之田，“归佃户所有”；原先应缴纳的租税，“全行废除”；积极鼓励农民从事农、牧、纺、猎生产，开辟农田，兴修水利。起义军的这些政策，得到各族人民

的拥护，促进了革命形势的发展。同治十一年，李文学率军增援大理回民起义军，遭叛徒出卖被俘，同治十三年二月十一日（3月19日），在牛街乌龟山被害。不久，清军攻陷密滴村。李学东率领余部500余人逃入深山丛林，在艰苦的环境下顽强坚持战斗，光绪二年（1876）夏病故。坚持了20年之久的哀牢山区彝民大起义最后失败。贵州是个多民族的省份，有汉、苗、布依等10多个民族。在清王朝封建统治下的贵州各族人民，过着十分悲惨的生活。为了生存，只有起来反抗。咸丰四年春，布依族人杨元保（？—1854）领导本族农民在独山的丰宁上司起义，不久，杨元保被俘遇害，起义失败。是年秋，汉族斋教领袖杨隆喜（？—1855）和参加过杨元保起义的舒裁缝（？—1855），领导群众在桐梓县九坝起义，起义军攻占桐梓县城，建立江汉政权，杨隆喜被推为都督大元帅。他们发布文告，声讨清王朝罪行。起义军威震黔北，很快逼近贵阳。次年春，清政府派清军前往镇压，杨隆喜战败自刎，稍后舒裁缝也被俘遇害，起义失败。这两次起义虽然失败，但推动了贵州各族人民的反清斗争。咸丰五年三月十五日（4月30日），贵州的苗族农民张秀眉（？—1872）和包大度、李鸿基等人，在台拱（台江）举起义旗，黄平、清平等地苗民起而响应。张秀眉被推为大元帅。次年，连克施秉、清江、台拱、黄平、清平、都匀等厅州县城，曾在都匀附近大破清军，贵州提督孝顺兵败自杀。咸丰八年八月二十九日（10月5日），起义军攻占黔东重镇镇远，起义烽火遍及贵州东南部，队伍发展到几十万人。起义军在军事上取得了一连串胜利后，积极进行根据地建设。他们重视农业生产，大力开垦荒地，把逃亡地主的土地分给当地农民耕种；废除各种苛捐杂税，明令保护商人。这些措施，打击了封建统治，团结了苗、汉各族人民，推动了起义的发展。同治五年春，兆琛、李元度等统率湘军万余人开往贵州。次年，清政府任命湘军悍将席宝田（1829—1889）负责贵州军务，调集云南、广西、四川等地清军向贵州起义军大举进攻。同治八年起义军在黄飘、羊安两次获得大捷，消灭清军2万人。同治九年十月二十五日（11月17日），清军发起大规模进攻，台拱失守。次年，起义军退入雷公山，坚持斗争。同治十一年三月初六（4月13日），张秀眉战败被俘，于湖南长沙慷慨就义。不久，起义失败。滇、黔少数民族起义虽然都失败了，但和各地农民起义相呼应，沉重打击了清朝统治者，形成了以太平天国为中心的农民起义高潮；同时加深了汉族和其他兄弟民族的情谊，促进了民族团结，巩固了祖国的统一。　（殷常符）

"亚罗"号事件

清咸丰六年九月初十（1856年10月8日），英国为发动第二次鸦片战争而制造的借口。故第二次鸦片战争，西方国家也有称"亚罗战争"者。该日，清广东水师千总梁国定，在广州海珠炮台附近的码头搜查装有走私鸦片及其它货物的"亚罗"号船，逮捕了李明太等两名海盗和10名有海盗嫌疑的水手。这只"亚罗"号是中国人苏亚成于四年七月建造的商船。苏亚成为了走私方便非法弄到香港英国政府登记证，雇用了一个叫"亚罗"的外国人在船上工作，船便称"亚罗"号船。五年四、五月间，该船转卖给另一个中国商人方亚明。方亚明又领取了一张自当年八月十七日起有效期为一年的香港英国政府登记证，雇用一个英国人为名义上的船长。该船雇用的水手中隐藏着海盗，他们凭借港英登记证作掩护，从事鸦片走私和抢劫等犯罪活动。广东水师上船搜捕时，该船登记证早已过期，而且船上根本没有悬挂英国国旗。因此，广东水师在中国船上逮捕海盗，纯属中国内政，与英国毫不相干。可是，英国驻广州领事巴夏礼（Harry Smith Parkes，1828—1885）为了制造战争借口，挑起事端，硬说"亚罗"号是英国船，声称水师上船捕人有损领事体面；并无中生有地造谣说，广东水师曾扯下船上悬挂的英国国旗，这是对英国的侮辱。他向两广总督叶名琛提出所谓"抗议"，要求释放水手。六年九月十二日，叶名琛先释"亚罗"号水手9人，巴夏礼拒受。十四日，巴夏礼再向叶名琛"抗议"，除请释放水手外，并要求交还划艇，尊重英旗，对英赔礼道歉，保证将来不再有此类事件，限两日答复。十六日，叶名琛拒绝巴夏礼要求，否认侮辱英旗。英海军即捕中国商船一只（误为师船）。十八日，英国公使兼香港总督包令警告叶名琛，施加压力。二十二日，巴夏礼到香港会晤叶名琛。二十三日，巴夏礼限叶名琛于24小时内承认其条件，"如逾期不允所请，即进兵攻城"。叶名琛害怕事态扩大，屈服于侵略者的压力，允释水手10人。二十四日，将逮捕的12人全部送到英领事馆，但不允道歉。巴夏礼故意刁难，借口礼貌不周，拒绝接受。当时马克思对巴夏礼的这种卑鄙伎俩曾进行了充分揭露，他指出：当广东水师登船捕人时，他们"认为它是一只中国船，而这是正确的"。甚至连英国前任首相德比伯爵在七年六月初四（7月24日）在上议院提出的议案中也承认："该船是由中国人建造、中国人俘获、中国人出售、中国

人购买的，船员是中国人，船归中国人所有。”又据英国人在下议院作证，承认当时该船英籍登记证已过期，没有挂英国旗。尽管如同马克思所说的英国“挑起冲突的法律根据不能成立，拘泥于国家荣誉的形式问题也不能成立”，但是英国政府却无耻地以“亚罗”号事件为借口，对中国发动了一场极端不义的战争。二十五日，英国海军上将西马糜各里(Michael Seymour，1802--1887)率领英国军舰，突入珠江，进犯广州，正式挑起了第二次鸦片战争。（邱远猷）

亚罗战争

第二次鸦片战争中第一阶段战斗的称谓。某些西方史学家也称第二次鸦片战争为亚罗战争。

清咸丰六年(1856)英国借口“亚罗”号事件，于九月二十五日(10月23日)，由海军上将西马糜各里率军舰3艘、划艇10余只、海军陆战队约2000人，向广东虎门开进，企图以武力胁迫清两广总督叶名琛屈服，乘机攻进广州城。当时广东清军总数约7.4万人，其中八旗兵5600余人，绿营兵6.8万余人。广州城内外约有清军1.3万人。城郊和珠江内河沿岸共有32座炮台，防守兵 力2000余人。清军8倍于英军。但是，由于昏庸愚昧的叶名琛毫无战备观念，不作战守，惟日事扶鸾降乩，幻想得到神祐。因而“亚罗”号事件发生后，虎门要塞及广州清军没有及时进入临战状态。当英军强行闯入虎门时，广东水师提督吴元猷因事先未加防范，又未接到叶名琛的命令，不敢开炮拦击。致使英舰乘虚闯过虎门，突入珠江内河，当日上午进攻广州猎德炮台。守军奋起还击，双方展开炮战，第二次鸦片战争爆发。叶名琛当时正在校场看乡试马箭，闻警报后仍以为英军不过是虚声恫吓，满不在乎地说：“必无事，日暮自走耳。”并下令：“省河所有之红单船及巡船，可传谕收旗帜，敌船入内，不可放炮还击。”猎德等炮台的防兵被迫停止抵抗，致使英海军陆战队顺利登陆，占领猎德炮台。二十六日，攻占凤凰岗及沙南等炮台。二十七日又攻占海珠炮台及广州城西南的十三行。至此，珠江内河一带的主要炮台均被英军攻占。二十九日，西马糜各里照会叶名琛，要求允外国人自由出入省城，因叶名琛不复，于是除集中3艘军舰的炮火外，还利用海珠炮台缴获的50门大炮，轰击广州外城，并以总督衙门为主要目标，企图胁迫叶名琛屈服。九月三十日下午，英军继续炮轰，并派海军陆战队登岸，纵火烧毁靖海门外民房，延及城楼。十月初一中午，英军炮火轰开外城城墙2丈多宽的缺口，并击毁总督衙署。下午，英海军陆战队登岸，约二三百人从缺口攻入外城。清军参将凌芳率标兵英勇抵抗。两小时后，凌芳中弹牺牲，标兵退入内城。南海县大浦乡团勇主动增援，杀敌数十，终因武器陋劣，势不能敌，亦退守内城。英军也因兵力单薄，未敢深入，便将靖海门、五仙门及附近民房烧尽，于当日傍晚撤回军舰。这时，叶名琛才派武弁梁定海、谭蛟等率兵1000人，前往被毁的猎德炮台防守。十月初二，英军继续炮击广州城，西马糜各里照会叶名琛，要求道歉，并履行进城规定。初三，叶名琛拒绝西马糜各里要求。初四、初七，西马糜各里再求进城。初六、初八，叶名琛再拒。初八，英军再攻广州，继续炮击城内各衙门。初九，西马糜各里派出3艘军舰，沿珠江主航道东进，炮击位于竹横沙的东定炮台。该炮台有36门大炮，七八十守军，他们开炮拒敌。停泊台外江面的广东内河水师红单船23只，也主动参战。击中英舰1艘，毙敌百余。终因弹药不继，水师战船又先后被英舰击毁。东定炮台失陷。十三日，英舰3艘、划艇2只再次轰击猎德炮台。这时炮台有1000防兵，台后还有陆路乡勇应援。但因火炮火箭射程近，打不到敌舰。而英舰火炮却可击中炮台，防守兵士受伤甚众。随后，英海军陆战队在炮火掩护下登岸，绕道抄袭炮台后路。这时，梁定海、谭蛟却在台后村庄里赌博，闻警后仓皇逃遁。守台士兵无人指挥，又受到英军前后夹击，一哄而散。英军再次攻占猎德炮台。英军为了打通广州与香港的联系和解除后顾之忧，于十五日沿珠江东南水道南返，从侧后袭击并占领了横档炮台。十六日，又攻占威远、镇远和靖远炮台。英军虽然攻占了珠江内河及虎门的主要炮台，但由于沿江军民不断采用夜战近战袭击敌舰，港澳爱国同胞亦以多种方式和英国侵略者斗争，致使英军无法保障水陆交通安全，与香港的联系经常受到威胁。加上是时英军不满千人，而兵勇和团练赴援者数万人。在广东爱国军民的反抗和打击下，英军没有久占广州的实力，进退失据，不得不从十二月二十六日(1857年1月21日)起陆续撤出，困守海面待援。（邱远猷）

第二次鸦片战争

清咸丰六年(1856)至十年英法联合发动的侵华战争。因其性质与鸦片战争基本相同，是其继续和扩大，史称第二次鸦片战争，亦称英法联军之役。

19世纪50年代是世界自由资本主义迅速发展的时代。由于美国加利福尼亚和澳大利亚金矿的相继发现，殖民地市场的扩大等等，促成欧美资本主义

国家新的工业高涨。当时，英国的工业发展最迅速，占世界第一位，号称世界工厂。英国及其殖民地在世界贸易中所占比重，超过法、德、美三国的总和。法国经过1848年革命之后，资本主义经济亦有显著发展，仅次于英国。美国是个后起的资本主义国家，但19世纪前半叶，纺织业发展较快，机器制造工业发展也较迅速，铁路增长速度跃居世界第一。沙俄这时还是一个封建专制的农奴制国家，但资本主义经济也有所发展，社会生活提出了废除农奴制的要求。鸦片战争后，英国资产阶级自恃侵略特权可在华广销其工业品，谋取厚利，把大量的棉织品和其他工业品运到了中国。但出乎意料的是，很多商品在中国市场上滞销；而中国的丝、茶、土特产的出口却逐年增加。英国资产阶级抱怨说："这好像是一个奇怪的结局。"所以如此，原因是：一、鸦片战争后，闭关锁国的封建中国，虽被轰开几个缺口，但外国资本主义侵略势力仅限于五个通商口岸及其周围有限地区。五口附近地区、广大内地，尤其是北方的城乡，依然是自然经济居统治地位，对商品经济的侵袭仍有顽强的抵抗作用。二、《南京条约》签订后，鸦片贸易迅速增长，造成中国白银继续大量外流，通货紧缩，致使中国没有多少白银能用来购买大量的外国工业品。增加鸦片贸易与发展合法贸易有矛盾。三、鸦片战争后，广州人民反对英国侵略者入城的斗争持续了多年，妨碍着英国工业品在华的倾销。特别是太平天国农民战争风暴席卷长江两岸，更使中国这个市场受到影响。英国工业品市场的扩大仍然赶不上工业的迅速发展，这是一个尖锐的矛盾，其发展必不可免地要引起新的经济危机。咸丰七年(1857)美国爆发了资本主义经济危机，并蔓延英国及欧洲其它各国。在这种情势下，英、法等国侵略者急于发动新的侵华战争，其目的是：扩大鸦片战争中所掠得的侵略特权，将侵略势力迅速推进和深入到中国内地，开辟更多的市场，倾销更多的商品，并使鸦片进口完全合法化，以追求更大的利润；通过"一打一拉"、"以打为拉"，驯服并勾结清政府，共同镇压太平天国，确立半殖民地统治秩序，以保证侵略特权的巩固和扩大。咸丰四年至六年，英、法、美先后两次向清政府提出了"修约"要求，包括允准外国人深入中国沿海和内地各城市并可购买产地、鸦片贸易合法化、改订税则、外国公使驻京等一系列特权。为了诱使清政府接受，他们表示愿意帮助清政府镇压太平天国起义，作为交换条件。清政府虽早想"借师助剿"，但对外国侵略者尚存疑惧，又担心接受这些条件会更加丧失"天朝"的尊严，影响封建统治，因而加以拒绝。侵略者的"修约"讹诈没有得逞，就阴谋发动侵略战争。六年，英、法与俄国进行的为时两年的克里米亚战争结束。于是，以"亚罗"号事件和马神甫事件为借口，对中国发动了一场"极端不义的战争"。

第二次鸦片战争持续了4年，经历了3个阶段。从咸丰六年九月(10月)英军进犯广州，至七年十一月广州沦陷后傀儡政权的建立，是第一个阶段。这一阶段，英、法侵略中国的第一个目标是攻占广州。六年九月二十五日(10月23日)，英国海军上将西马糜各里以"亚罗"号事件为借口，率领英国军舰突入珠江，进犯广州，正式挑起了第二次鸦片战争。清两广总督叶名琛不事战守，英军于十月初一一度冲入广州城内。在爱国军民的反击下，一时兵力不足的英军，于当日晚撤出珠江待援。叶名琛却以"两获胜利，夷匪伤亡四百余名"奏报。咸丰帝谕令叶名琛与侵略者议和，"以息兵端"。明白表示了全力镇压农民起义、对外妥协的方针，助长了外国侵略者进一步武装侵华的野心。七年二月，英国又任命额尔金为全权代表率领一支陆海军前来中国；同时建议法、美、俄三国政府共同出兵。法国借口"马神甫事件"，派葛罗为全权代表率军参加对中国的战争。八月下旬，额尔金和葛罗集会于香港。美国和俄国两国政府申明支持英、法侵华，分别派全权代表列卫廉、普提雅廷赶往香港，与英、法合谋，企图趁火打劫。十一月十三日(12月28日)，英法联军进攻广州，次日广州失陷。广东巡抚柏贵、广州将军穆克德纳投降，叶名琛被俘。英、法侵略者指派英国人巴夏礼、哈罗威上校和法国人修莱海军大佐组成所谓"联军委员会"，实行"军事管制"。卖国贼柏贵在"联军委员会"的严密控制下，照旧担任原职，充当傀儡政权头目。

从七年十一月广州傀儡政权建立，至八年五月(6月)《天津条约》订立后英军南撤，是第二阶段。这一阶段，英、法侵略的主要目标是攻占天津。英法联军侵占广州，除威胁到清政府财政经济来源外，并没有使清政府感到其它危险。英法侵略军为了达到目的，决定北上。当英、法专使过上海时，咸丰帝的上谕却说："现在中原未靖……不得不思柔远之方，为羁縻之计。"清政府为了扑灭太平天国起义不惜对外国侵略者实行妥协的宗旨仍没有变。八年三月英法联军相继窜抵大沽口外。四月初八(5月20日)，英法联军攻陷大沽炮台，后即直逼天津城下，扬言进犯北京。清政府急派大学士桂良、吏部尚书花沙纳赶天津求和，于五月被迫分别与俄、美、英、法签订了《天津

条约》;十月又在上海订立中英、中法、中美《通商章程善后条约》。沙俄趁火打劫,先于四月间用武力迫使黑龙江将军奕山签订中俄《瑷珲条约》,割去我国黑龙江以北、外兴安岭以南60多万平方公里的领土。《天津条约》及其善后条约的主要内容有:一、外国公使常驻北京,以便直接控制清政府;二、增开牛庄(后改营口)、登州(后改烟台)、台湾(后选定台南)、淡水、潮州(后改汕头)、琼州、汉口、九江、南京、镇江等10个通商口岸;三、外国人可往内地游历、通商、自由传教;四、外国商船得驶入长江一带通商口岸;五、由外国人掌管中国的海关行政;六、修改税则,降低关税,对一般进出口货物仅按"值百抽五"征税;七、外国商人运洋货进内地和从内地运土货出口,按值抽百分之二点五的子口税外,免征一切内地税;八、对英国赔款银400万两,对法国赔款银200万两,赔款交清后,英、法退还广州;九、承认贩卖鸦片为合法贸易,鸦片改称"洋药",纳税进口。

从八年九月清政府与英、法在上海举行"修约"谈判,到十年九月(10月)《北京条约》订立,是第三阶段。这一阶段,英、法侵略者的主要目标是攻占北京。《天津条约》签订后,英法联军于八年六月陆续南撤,暂时解除了对清政府畿辅重地的军事威胁。但是清统治者误认太平天国起义是外国宗教带来的,对增开通商口岸和外国人得入内地游历、传教等条款疑惧甚大,害怕外国人与内地反清的中国人民"勾结"起来,造成更大的"内忧外患"。还深恐外国公使驻京会损害自己的尊严和声威,带来不测的"肘腋之变"。因此,清政府在九至十月间,多次指使在上海同额尔金、葛罗谈判通商章程的桂良、花沙纳等人,要乘谈判之机"修约",并答应以免除关税为交换条件。当时,欧洲资本主义各国接连爆发了经济危机,为解脱困境,决意再次用武力迫使清政府履行《天津条约》和掠夺更大的侵略特权。九年,英、法、美借口换约又率军舰到大沽口,五月二十五日(6月25日)英法兵舰进攻大沽炮台。守军奋起迎击获胜,击沉击伤联军兵舰多艘,伤毙敌军数百,重伤英舰司令贺布,赶走英、法侵略者。十年,英法再组联军,扩大战争。六月中旬,兵临大沽,由北塘登陆。七月初五(8月21日)攻陷大沽炮台。初八攻占天津。清政府重开谈判。因侵略者索需苛重,天津、通州谈判破裂。八月,英法联军在通州八里桥击败清军后,侵逼北京。咸丰帝仓皇逃往热河行宫(河北承德避暑山庄),留异母弟恭亲王奕䜣为钦差大臣,负责和议。九月二十九日英法联军占领北京。北京西北郊举世罕见的、珍藏有中国历代图书典籍、文物书画和金银珠宝的圆明园,被侵略军劫掠后惨遭焚毁。奕䜣在俄使伊格那提也夫居间"斡旋"下,于九月中旬和十月初,分别与额尔金、葛罗和伊格那提也夫签订了中英、中法、中俄《北京条约》。《天津条约》批准书同时交换。中英、中法《北京条约》的主要内容有:一、承认《天津条约》完全有效;二、增开天津为商埠;三、准许外国侵略者招募中国人出国做苦工;四、割让九龙司,"归英属香港界内";五、退还以前没收的天主教堂财产,"并任法国传教士在各省租买田地,建造自便";六、赔偿英、法军费各增至白银800万两,恤金英国银50万两,法国银20万两。中俄《北京条约》,割去我国乌苏里江以东以至大海,包括库页岛,约40万平方公里领土。九月中、下旬,英法联军退出北京。

外国资本主义的野蛮侵略与清朝封建统治者的妥协投降,使中国继第一次鸦片战争之后又一次大量丧失领土主权。清朝封建统治者,在敌人"打拉结合"的侵略政策下,进而和外国资本主义侵略者勾结起来,出现了中外反动派合力绞杀太平天国,确保半殖民地半封建统治秩序的新格局。 (邬远猷)

石达开辅政与出走

清代太平天国领导集团内讧期间,石达开奉召回京辅政,因遭洪秀全疑忌而离京出走的事件。

咸丰六年十月下旬(1856年11月),韦昌辉伏诛后,石达开返回天京,在天京将士的拥戴下,洪秀全加封他为"电师通军主将义王",命他"提理政务",收拾残局。当时,武昌失守,清军水师直逼九江城下;安徽舒城、六安、庐江、巢县、无为等地相继失陷,淮南裸露敌前;在江苏战场,清军则猛攻句容、溧水,意图进逼天京。石达开勇敢无畏,才智出众,冷静、周密地分析局势,确定以守为主、进攻为辅的方针:西线坚守九江以下的长江水道;西南坚守江西;东线固守句容、溧水;在皖鄂边界地区则进行局部反攻。按照石达开的部署,贞天侯林启容坚守九江。咸丰六年十二月清军派骁将杨载福、李续宾猛攻六昼夜,均被林启容部击退。咸丰六年末至七年上半年,曾国藩亲自督战,调杨载福、彭玉麟、李续宜(1824—1863)、曾国荃等多次进攻江西,除因袁州一部分守军叛降才被攻破外,其他重镇吉安、瑞州、抚州、临江等,仍为太平军所控制。在东线,清钦差大臣和春、提督张国梁、副将王浚、总兵李定太等集中了大量兵力,多次袭击句容、溧水,由于太平军早有准备,句容、溧水寸土未失。淮南是天京的生命线之一,敌方兵力又相对虚

弱，为扭转局势，石达开决定在这里开始局部反攻。他任命年轻将领陈玉成为主帅，陈由枞阳东下，十二月十六日（1857年1月11日），攻占无为州，次年正月初六（1月31日）攻占庐江，斩都司彭万镒。后又连克舒城、六安、正阳、霍丘、英山等地。四月下旬，兵锋到达湖北的黄梅、广济、蕲水、罗田等地。敌军被迫从九江分军西上应援，太平军重又夺回了皖鄂边界地区的主动权。

石达开辅政，虽然成效卓著，初步扭转了太平天国因武昌失守而造成的被动军事局面，但洪秀全却疑神疑鬼，担心又来一个飞扬跋扈的杨秀清第二，因此疑忌石达开，专信洪姓一族，加封其长兄洪仁发（1805—1864）为安王，次兄洪仁达（？—1864）为福王，牵制石达开。安、福二王无才无能，无功受禄，干预朝政，处处排挤、打击、挟制石达开，令石不堪忍受。兼之石达开逐渐意识到洪氏兄弟有谋害自己之意，不得不另谋出路。当时，摆在他面前有三条可供选择的出路：一、忍辱负重，委曲求全，继续辅佐天王；二、取天王而代之；三、率部出走。石达开既不肯委曲求全，也不愿与天王发生正面冲突，导致第二次内讧。在心存极大的不满、苦闷和不安的情况下，乃决定率部出走。石达开感叹道：自恨无才智，区区一片心，上可对皇天，下可质古人，重重生疑忌，出师再表真。咸丰七年五月上旬，石达开逃出天京。为避免他人怀疑，先到雨花台向太平天国将士讲道三天，五月十一日，由苏、皖交界的铜井渡江，前往安庆，途中遍贴布告：太平军将士或"依然守本分，照旧建功名"，"或随本主将，亦足标元勋"。不少将士同情石达开的处境，约有十余万人随他出走。石达开的出走，引起天京的极大震动；石达开旧部纷纷出城投往他的麾下。洪秀全甚为惊慌，紧闭城门，阻止天国将士再度出城投奔，同时削去洪仁发、洪仁达"安"、"福"王的封号，派人将"义王"金牌及合朝文武要求石达开返回天京的表章送达安庆。石达开一概拒绝，誓不回京。

八月十八日，石达开率部离开安庆，经建德进入江西，在景德镇会集各部，分路南进。十一月初七，进攻吉水，为湘军所败。十一月中旬，经永丰、峡江退回抚州，后由抚州东进，经玉山入浙江。咸丰八年三月初二（4月15日），占领江山。从三月初七起，石达开亲率军队攻衢州（衢县），另由石镇吉（？—1860）率兵连占常山、开化、遂昌、松阳、处州（丽水）等州县，控制了浙江西南大片地区。石达开攻衢州久不克，于六月初四撤围南行，越仙霞岭南入福建。七月上旬，与石镇吉部会师于福建浦城，并攻占邵武。八月十六日，撤离邵武，后分军两路：一路由石达开亲自统率，于九月十二日经汀州（长汀）占领江西瑞金；另一路由石镇吉等统率，直趋赣南受阻，被迫退回福建。此后，石镇吉等脱离石达开单独行动。十一月二十七日，石达开部由瑞金南进会昌，后经安远、信丰，于十一月三十日攻克江西南安府（大余），十二月初九又克崇义。咸丰九年正月（2月）下旬，石达开弃南安、崇义，进入湖南境内，接连攻克桂阳（汝城）、兴宁（资兴）、宜章、郴州（郴县）、桂阳、嘉禾。湖南是湘军的老巢，石达开率军入湘，全省震动，巡抚骆秉章从本省各地调兵遣将赴湘南防堵。湖北巡抚胡林翼也派兵往援。石达开分兵两路，先后于四月初八和二十二日抵达湘南重镇宝庆城外，四面围攻。从五月下旬开始，清军各路援军相继抵达宝庆外围，宝庆清军增达4万余人，双方激战于蓝清铺、清水塘等地。宝庆久攻不下，石达开乃于七月十六日晚撤围，七月下旬进入广西。九月二十日攻占庆远府（宜山），驻扎达七个月之久。咸丰十年二月，石达开在庆远度过了他30岁生日。此时，清军逼近，他遂于当年四月弃庆远南下。随着时间的推移，将士们对其分裂行为反感日增，日渐离散。该年秋，彭大顺（？—1861）、童容海、朱衣点（？—1863）等率部重归天朝，对石达开的打击更大。终于在同治元年（1862）兵败于大渡河。

石达开出走，虽然洪秀全难辞其咎，但其分裂行为却给太平天国造成了极其严重的后果。此举使太平天国在政治上和军事上失去了统一的领导核心，极大地削弱了太平天国的实力，清廷则获得了喘息的时机，组织力量反扑。故李秀成指出，石达开的出走"此误至大"。在革命形势高涨时期，石达开表现出来的军政才能，曾经放射出夺目的光辉，而在分裂出走以后的日子里，却逐步地黯然失色，最终落得全军覆没的下场。这是石达开本人的悲剧，也是太平天国的悲剧。　（殷常符）

太平军镇江、九江失守

清咸丰七年十一月至八年八月（1857年12月—1858年9月）太平天国领导集团内讧后太平军的几次失利战役。

咸丰六年杨韦事变后，军事形势急转直下，清军猖狂反扑。七年五月石达开自天京出走，溧水、句容相继失守，清军直逼镇江。镇江是天京东面的咽喉要地，北可进攻扬州，西可支援天京，敌军欲合围天京，必先攻镇江。咸丰七年六月初五（7月25日），湖南

提督张国梁同总兵虎嵩林等逼近太平军营垒扎营。七月初三，清钦差大臣和春赴镇江查看地势。十二日，和春令张国梁、余万清等自高资太平军营西直达江边陆续筑垒，连营30余座，断绝了天京对镇江的接济，太平军守军日困。几年来镇江一直由殿左五检点吴如孝负责镇守，为确保城池巩固，吴曾督军将城墙加高数尺。清军多次攻城，太平军均奋勇抗敌。此时镇江因长期被困，粮食告急，天王洪秀全急派洪仁发率军往援。十月下旬，镇江守军千余人攻敌高资东路营盘，援军四、五千人攻敌高资西路营盘，以图会合，但作战失利，援军败回。是年冬，洪秀全特调李秀成往援。时李秀成驻安徽六安、霍山一带，闻命即统全军南下。约在十一月初八至龙潭，与镇江守军取得联系，因李秀成军远来疲惫，无力攻破围攻镇江之敌，只得把吴如孝守军救出。十一月十二日（12月27日），吴如孝率镇江全军弃城西撤，镇江失守。十一月下旬，清江南大营死灰复燃，重围天京。自咸丰六年冬武昌失守后，清署湖北提督杨载福、记名按察使李续宾率军进逼九江。九江是安徽、江西两省的门户，又是鄂、豫、皖三省水陆咽喉，兵家必争之地。从咸丰四年春，一直由殿右十二检点林启容奉命镇守。围攻九江的清军共达2万余人，李续宾督军挖长壕30余里，深二丈，宽三丈五尺，以期截断九江守军接济。七年九月初九，敌军向湖口进攻，缘梯攻城，火箭飞入，墙垒破裂，湖口陷落。九江接济断绝。自咸丰八年二月十六日（3月30日）起，李续宾等昼夜环攻九江，城垣屡被轰塌。自湖口陷落后，敌军又增添围兵，挖长壕六道，宽深均二丈，三面合围。林启容令种麦自给，在外援断绝的情况下，坚守九江达半年之久。四月七日，清军用炸药轰塌九江城墙100余丈，蜂拥而入。林启容部与之巷战，1700多人壮烈牺牲，九江陷落，屏蔽天京的安庆由此裸露敌前。九江太平军的英勇行为，连曾国藩也不得不叹服："林启容之坚忍，实不可及。"日本人白浪庵滔天把林启容坚守九江，比作是唐朝张巡的坚守睢阳，称赞道："睢阳而后有斯人！"同时清军乘机又在江西发动进攻，袁州、奉州、瑞州、临江、抚州相继失守，江西腹地重镇吉安危急。吉安地险城坚，是太平军在江西军需的供应基地。曾国藩说：欲占江西，吉安是必争之地。在临江、抚州失守之前，曾国藩就命曾国荃率军进扎吉安城下，于西、南、北三面开挖长壕，并派战船于水上梭巡，使吉安守军接济断绝。吉安被围近10个月，城内粮食将罄，守军只得食粥，或以草根充饥。咸丰八年八月十五日，曾国荃、刘腾鹤等率兵从各城门同时发起进攻，吉安于是夜陷落。吉安失陷，标志着太平军江西根据地完全丧失。上述各地失利，表明太平天国已面临严重的军事危机。（殷常符）

广州沦陷

第二次鸦片战争中，清咸丰七年十一月（1857年12月）英法侵略联军攻占广州。

咸丰六年十二月下旬（1857年1月下旬），英军撤出虎门后，两广总督叶名琛却以"两获胜仗，夷匪伤亡四百余名"奏报，并吹嘘说："防剿英夷水陆获胜，现在夷情方蹙。"咸丰帝当时处于内外交困境地，需要集中兵力镇压几乎遍及全国的农民起义；国库空虚，军饷难筹；认为英军攻打广州无非是提出更多的利益要求，而不至于推翻其封建统治，于是批示："此次已开兵衅，不胜固属可忧，亦伤国体；胜则该夷必来报复，……当此中原未靖，岂可沿海再起风波"，谕令叶名琛与侵略者议和，"以息兵端"。七年五月二十三日（1857年6月14日），咸丰帝在叶名琛《密陈近日夷情》奏折的批示中进一步明确提出了"息兵为要"的方针。清政府这一全力镇压人民起义、对外妥协求和的方针贯穿于第二次鸦片战争的整个过程中，助长了外国侵略者进一步武装挑衅的野心。

七年二月，英国为了扩大侵华战争，巴麦尊内阁强行通过了一项增加军费和增援远东英军的提案。二月二十五日，英国政府任命前加拿大总督额尔金（James Bruce, Earl of Elgin and Kincardine, 1811—1863）为全权代表，率领一支陆海军前来中国；同时照会法、美、俄，提议联合出兵，迫使清政府签订新的不平等条约。法国当时在远东的力量微弱，主要侵略目标是越南，为了换取英国支持它在越南"自由行动"，并取得天主教在中国传教不受干涉的保证，从中获得侵略权益，以所谓"马神甫事件"为借口，任命葛罗（Jean Baptiste Louis Gros, 1793—1870）为全权代表，率军参加对中国的战争。美国在"修约"问题上与英、法步调一致，但因国内处于南北战争前夕，政局不稳，没有参加英法联军，派出列卫廉（William Bradford Reed, 1806—1876）为驻华公使，同英、法密切配合，趁火打劫。沙俄为了实现侵占中国北方大片领土的野心，派海军上将普提雅廷（1803—1883）为驻华公使，积极支持英、法发动新的侵华战争。

十月下旬，英法联军5600多人编军完备，集结于港、澳地区，做好大举进犯的准备。二十七日，额尔金、葛罗分别向叶名琛发出通牒，要求入城、"修约"、

“赔偿损失”和英军把守河南地区各炮台，并限 10 日内答复。对于英、法等国相互勾结以及迫在眉睫的战争形势，叶名琛仍然茫无所知，仍以为“该夷不过虚张声势”，相反却迷信神仙的“乩语”：“（十一月）十五日后便无事。”因此，不做任何应战准备。部将僚属请求调兵设防，广州商民请求团练自卫，均不允准。相反下令：“不准擅杀夷人。”结果造成水路陆路毫无准备，广州事实上成了不设防的城市。十一月初九，额尔金和葛罗发出最后通牒，限 48 小时内交出广州城。十三日晨 6 时起，32 艘联军舰艇（英 25 艘、法 7 艘）的 100 余门大口径火炮同时炮轰广州，并登陆攻城。都统来存、千总邓安邦等虽英勇抵御，但城大兵单，广州于十四日失守。十五日，广州将军穆克德纳与广东巡抚柏贵（？—1859）投降，在侵略军的威逼下强令撤出城内兵勇。二十二日（1858 年 1 月 6 日）叶名琛被俘，数日后被解往印度加尔各答，次年病死于囚所。英、法侵略者占领广州后，组成以巴夏礼为首的“联军委员会”，实行“军事管制”。卖国贼柏贵在“联军委员会”的严密控制下，照旧担任原职，充当傀儡政权头目，为敌效劳。　（邱远猷）

港澳罢工

第二次鸦片战争中香港、澳门工人、雇员的反侵略斗争。

清咸丰七年十一月（1857 年 12 月）英法联军攻陷广州后，实行军事占领，对当地人民进行更加野蛮的烧杀抢劫，从而激起人民群众的更大愤怒和坚决反抗。八年三、四月间，广东花县团练总局为了反对英法联军侵占广州城，号召在香港、澳门等地外国企业中和洋人家中教书、办理文案以及一切雇工服役人等，限一个月内概行罢工回籍。结果，港、澳工人、雇员在一个月之内，罢工回籍者几占十分之七八，达 2 万余人。并且实行“封港之法”，绝其贸易接济，凡吗吁（英语商人的广东译音）敢私买卖者，拿获治罪。香港顿时变成一座死城，洋人各项经济活动停顿，所有中外人等，两不交易，而生意寂然。甚至洋人生活都发生了很大困难，而要“身引炊爨，不堪其苦”。管制广州的“联军委员会”头目巴夏礼派人到新安县张贴告示迫令复工，团练义勇突起袭击，先后杀死侵略者、汉奸百余人。吓得侵略者不敢再来。香港同胞以极其秘密巧妙的方法劫杀英人，使之不得安宁。港澳罢工是外国在华企业中中国工人、雇员反对侵略者的第一次大罢工。　（邱远猷）

第一次大沽之战

清咸丰八年（1858）第二次鸦片战争中清军在大沽抗击英法联军的第一次战斗。

七年底英法联军侵占广州后，英国全权代表额尔金、法国全权代表葛罗等又在香港密谋策划，确定联军先开往上海，威逼清廷签订新约；若不达目的，便北犯白河口，对清廷直接施加压力。这一阴谋得到美国公使列卫廉、俄国公使普提雅廷的赞同、支持。十二月下旬（1858 年 2 月初），英、法、美、俄公使分别照会清政府，要求于八年二月十七日（3 月 31 日）以前，派出全权大臣赴上海谈判，否则举兵北上，扩大战争。随即，英、法、美、俄四国使臣先后离广州，前往上海。咸丰帝从两江总督何桂清（1816—1862）的奏报中获悉四国照会以后，对事态的严重性认识不足，认为“此次夷人来沪投递照会，并言欲赴天津，显系虚声恫吓，欲以肆其无厌之求”，谕令两江总督何桂清分别照会四国，要求英、法、美公使驶回广州，去与新任两广总督黄宗汉（？—1864）商办；俄使到黑龙江与黑龙江将军奕山交涉（因俄国与五口通商素无关系）。四国公使对清政府这种态度自然不满意。八年二月，英、法、美公使北上。三月初七日会齐白河口外。十一月，四国公使照会清政府，强硬要求派出全权大臣前来海口进行谈判。英、法公使竟限令 6 日内答复，否则采取军事行动。十五日，咸丰帝加派直隶总督谭廷襄（？—1870）为钦差大臣，前往大沽口办理交涉。英、法公使借口谭没有便宜行事的全权资格，悍然拒绝与之会谈。美、俄公使则打出“调停”的旗号，劝告清政府尽快会谈。与此同时，英法联军陆续驶抵大沽口，进行进攻大沽炮台的各种准备。

大沽是天津的门户，近口 30 余里有拦江沙一道，称“口外之险”，大船不便航行。海口北岸有 1 座炮台，由游击沙元春率部防守。南岸有左、主、右 3 座炮台，由天津镇总兵达年、游击德魁、都司讷勤和、游击陈毅等率部防守。海口距大沽村（东沽、西沽）五六里，距天津一百八九十里。谭廷襄率督标各营驻防大沽东、西二村之间的海神庙。守兵共约 8000 人，并有神机营大炮 200 余门。雇募海船、盐船 40 余只，于海神庙前，搭一座浮桥，联络两岸，协同作战。此外，清廷还调派刑部左侍郎国瑞、护军统领珠勒亨、副都统富勒敦泰等率京营马步各队及火器营、健锐营兵 2000 余人，携炮 30 门（内有数门万斤大炮），赶赴海口，由谭廷襄节制。谭廷襄分派他们担任南北两岸炮台的后路接应。而陆续驶抵大沽口外的英、法、美等

国舰船，截至四月初七共约30艘，兵力2600余人。比较起来，大沽清军数倍于敌。当日傍晚，联军16艘舰艇和20余只舢板，载海军陆战队约2000人驶入拦江沙内，待命而动。四月初八上午8时，英法联军向谭廷襄发出最后通牒，要求让四国公使前往天津，并限令清军两小时交出炮台。清政府不予理会。两小时后，英法联军炮艇闯进大沽口，向大沽口炮台发动猛烈攻击。由于战前咸丰帝有令在先："不得先行开炮"，因此，直到英法联军开炮轰击以后，南北各炮台才先后开始抵御。广大爱国官兵予以侵略者迎头痛击，击沉敌舢板4只，毙敌近100人。法炮艇"霰弹"号遭到重创，艇长被打死，11人被打伤。接着，口外的联军旗舰"斯莱尼"号及其主力舰只的大口径火炮猛烈轰击南北炮台，致使炮台顶盖、炮墙被轰毁，有的大炮被炸毁，守兵伤亡惨重。11时，联军的两支陆战队强行登陆，向炮台接近。守军坚守炮台，与敌人展开白刃战。而总督谭廷襄、布政使钱炘、直隶提督张殿元、署天津镇总兵达年等负责指挥战争的文武官员，"闻炮声，心胆先怯"，率先奔逃，致使士气受挫。当联军陆战队逼进炮台附近时，后路接应清军惊溃。炮台守兵孤军奋战，游击沙元春、都司陈毅、千总常荣恩、刘英魁等指挥战斗，英勇杀敌，最后奋战身死。各炮台遂相继失守，死伤士兵400名。

（邱远猷）

《中俄瑷珲条约》签订

《中俄瑷珲条约》，清咸丰八年(1858)沙俄乘英法联军进攻天津、威胁北京时武力强迫清黑龙江将军奕山于瑷珲签订的不平等条约。

外兴安岭以南的黑龙江流域和乌苏里江以东(包括库页岛在内)的广大地区，自古以来就是中国的领土，而且为康熙二十八年(1689)中、俄签订的《尼布楚条约》肯定了下来。到了19世纪中叶，沙皇尼古拉一世积极策划重新入侵中国黑龙江流域，于道光二十七年七月二十七日(1847年9月6日)，任命狂热的扩张主义分子穆拉维约夫(1809—1881)为东西伯利亚总督。并亲自授意他放手侵占中国黑龙江流域。从咸丰四年至七年，穆拉维约夫不顾清政府抗议，多次入侵黑龙江流域，建立"村屯"，派兵驻守。英、法发动第二次鸦片战争后，沙俄除积极支持英、法外，还乘机于七年派普提雅廷出使中国，谈判中俄东段、西段的边界问题。三月(4月)到伊尔库茨克，同东西伯利亚总督穆拉维约夫进行多次密谋。穆拉维约夫狂叫："如果中国不同意我们提出的分界线，依然坚持阿穆尔(黑龙江)是中国的，我们必须以武力强迫他们承认我国的权利。"到时俄国将"派出两支部队：一路攻取库伦，另一路攻取瑷珲"，在瑷珲登陆后"通向南满和北京"，这样俄国就能"立足满洲、蒙古，从而使满蒙脱离中国，成为受俄国庇护的两个公国"。普提雅廷于闰五月二十二日(7月13日)，在庙街乘"亚美利加"号轮船南下赴天津。六月十八日，到达天津南口，向清政府提出中、俄两国以黑龙江和乌苏里江为界的无理要求，清政府严词拒绝。八年四月初八(5月20日)英法联军攻占大沽。初十，穆拉维约夫利用清政府处于内乱外患交迫、正濒于灾难性的困境，率领200多人，在两艘炮艇的护送下直趋瑷珲城(瑷珲县瑷珲乡)。十一日，穆拉维约夫与黑龙江将军奕山谈判时，制造各种借口，企图吞并中国大片领土。奕山开始不允，据理驳斥。狡猾的穆拉维约夫把事前准备好的条约草案交给中国谈判代表之后，就称病不出，派其随员彼得罗夫斯基出面谈判。俄方坚持"以河为界字样，断不能删改"，否则将联合英法联军进攻中国。接着穆拉维约夫又出动军舰在黑龙江上示威，鸣枪施炮，炫耀武力，进行恫吓。奕山被迫于四月十六日(5月28日)与穆拉维约夫签订了不平等的中俄《瑷珲条约》。共3条。主要为：一、俄国割去黑龙江以北、外兴安岭以南60多万平方公里的中国领土，只在瑷珲对岸精奇里江以南至豁尔莫勒津屯的一小块地区(后称江东六十四屯)仍保留中国方面的永久居住和管辖权，俄国人"不得侵犯"；二、乌苏里江以东至大海的中国领土划为中俄"共管"；三、黑龙江、乌苏里江只准中、俄两国船只航行。四月二十一日，穆拉维约夫为"庆祝"《瑷珲条约》签订，在海兰泡集会，悍然宣布将地名改为布拉戈维申斯克(意为"报喜城")。沙皇亚历山大二世于八月初一特封他为阿穆尔斯基伯爵，破格提拔为步兵上将。该条约使中国领土完整与主权蒙受重大损失，清政府拒绝批准，至十年订立中俄《北京条约》时始予认可。

（邱远猷）

《天津条约》签订

天津条约，清咸丰八年(1858)第二次鸦片战争中英、法、俄、美强迫清政府在天津分别签订的不平等条约。

八年四月初八(5月20日)，英法联军攻陷大沽炮台，溯白河而上，进逼天津。直隶总督谭廷襄吓得魂飞魄散，主张彻底投降。十二日，他向咸丰帝奏称："统观事势，细察夷情"，"不能战，不易守，而不得不

抚。"十四日，英法联军驶抵天津城下，英、法公使通知清政府另派头品大臣二员速来津共议，否则先取天津，再攻北京，两日以内，听候回音。十六日，清政府急忙派大学士桂良(1785—1862)、吏部尚书花沙纳(1806—1859)为全权大臣，驰往天津向英、法求和。十八日，额尔金、葛罗乘炮艇抵天津，普提雅廷和列卫廉乘俄船"亚美利加"号同至。当即照会清政府，钦差大臣必须有"全权便宜行事"衔名，否则仍需进京。二十日，清政府命桂良、花沙纳便宜行事，从权办理。二十三日，前此两天赶到天津的桂良、花沙纳就和额尔金在城南海光寺初次会见。此后在谈判过程中，额尔金和葛罗分别委派随员威妥玛(Thomas Francis Wade，1818—1895)、李泰国(Horatio Nelson Lay，1832—1898)和马吉士(Jose Martins Marquez)办理实际交涉，以李泰国为主。他是上海海关的英籍职员，同中国官员曾有频繁接触，此次充当英法联军的中文翻译与谋士。在谈判过程中，他以战胜国发言人自居，恃强要挟，态度蛮横，对桂良、花沙纳耍尽了威吓流氓手段。在谈判中最使清朝最高统治者头痛的是外国公使驻京、增开通商口岸、外国人得入内地游历传教等条款。因为这些将会影响到清朝封建君主专制统治。所以，咸丰帝一再讨价还价，不肯让步。有时甚至想到在不得已的情况下，"势须与之用武"。桂良、花沙纳对咸丰帝的苦衷虽然十分了解，但他们畏敌如虎，向咸丰帝奏称："战之不可"，"战则必败"。由于此时清朝封建统治者最害怕的是太平天国起义，而不是外国侵略者。因此在对外战争中所调动的兵力，不是主力，而是边远的军队。既然如此，那么在英、法联军的胁迫下，最终不得不屈服投降。

俄、美公使在"调人"的名义下抢先胁迫清政府签订《天津条约》。八年五月初三，俄国公使普提雅廷在天津海光寺与清钦差大臣桂良、花沙纳签订了中俄《天津条约》。共12款。主要内容：一、俄国在上海、宁波、福州、厦门、广州、台湾(台南)、琼州等7处口岸通商，并停泊兵船，若别国在沿海增开口岸，准俄国一律照办；二、俄国得在中国各通商口岸设立领事官，在华俄人享有领事裁判权；三、俄国东正教教士得入内地自由传教；四、中俄两国派员查勘"从前未经定明边界"(实际上是要借此侵占中国领土)；五、日后中国若给予其他国家以通商特权，俄国得一律享受。五月初八，美国公使列卫廉也诱迫桂良、花沙纳在天津海光寺签订了中美《天津条约》，原称《中美和好条约》。共30款，主要内容：一、清政府倘准许其他国家公使驻北京，应准美国一律照办；二、增开潮州(后改汕头)、台湾(台南)为通商口岸；三、耶稣教教士得自由传教；四、扩大片面的最惠国待遇，即：清政府给其他国家的特权，"无论关涉船只海面、通商贸易、政事交往等情"，美国得"一体均沾"；五、确定领事裁判权。

五月十六日，清钦差大臣桂良、花沙纳与英国全权代表额尔金在天津签订了中英《天津条约》，又称《中英续约》，共56款。主要内容：一、英国公使得驻北京，并在各通商口岸设领事官；二、增开牛庄(后改营口)、登州(后改烟台)、台湾(台南)、潮州(后改汕头)、琼州、汉口、九江、南京、镇江等处为通商口岸；三、耶稣教、天主教得自由传教；四、英国人得往内地游历、通商；五、英国商船可以在长江各口往来；六、中英两国派员在上海举行会议，修改关税；七、中国给英国赔款银400万两；八、确定领事裁判权和片面的最惠国待遇。十七日，桂良、花沙纳又与法国全权代表葛罗在天津签订中法《天津条约》，原称《和约章程》。共42款。主要内容：一、法国公使得驻北京；二、增开琼州、潮州(后改汕头)、台湾(台南)、淡水、登州、南京为通商口岸，并在各口设领事官；三、天主教教士得入内地自由传教；法国人得在内地游历；四、凡中国与各国议定的税则、关口税、吨税、过关税、出入口货税，法国都可"均沾"；五、法国兵船可以在中国各通商口岸停泊；六、中国给法国赔款银200万两；七、确定领事裁判权和片面的最惠国待遇。

根据《天津条约》关于由清政府派员到上海会同修改税则的规定，九月，清政府派桂良、花沙纳到达上海，会同两江总督何桂清等，与英、法、美代表继续谈判。十月初三和十九日，分别与英、法、美签订了《通商章程善后条约：海关税则》各10款，作为《天津条约》的补充条款。主要内容是：一、承认贩卖鸦片为合法贸易，鸦片改名"洋药"，每100斤在通商口岸交纳30两的进口税；二、除例外(指丝、茶和鸦片)和免税(指外国人用品)两项外，一般进出口货物，海关一律按时价值百抽五征税；洋货运销到内地，或从内地运出土货，除一律按时价抽2.5%的子口税外，免征一切税项；三、邀请英人帮办海关税务。

英、法、美、俄逼签的《天津条约》内容虽不尽同，但它们由于享有"最惠国待遇"，因而所攫取的侵略权益却是大体相同的。《天津条约》是《南京条约》的扩大，基本上包括了外国侵略者"修约"要求的主要内容，是外国侵略者强加在中国人民身上的又一副更加沉重的枷锁，给中国人民带来了严重的损害和

后患。（邱远猷）

太平军枞阳会议

清咸丰八年(1858)太平天国在安徽枞阳镇(枞阳县)召开的军事会议。

镇江失守,清江南、江北大营第二次合围天京。再解京围,成为太平天国燃眉之急。李秀成为调集外围力量助解京围,遂于八年二月中旬请命出京,进入安徽,先后攻克和州(和县)、全椒、滁州(滁县)、来安等地,并加紧在全椒操练部队。四月二十四日,率兵5000人自全椒进扎江浦县大刘村,拟取道桥林进攻江浦、浦口。次日,清江北大营统帅德兴阿(?—1867)督军万余进攻大刘村。时适大雨滂沱,太平军疏于戒备,以致寡不敌众,战斗失利,损失千余人,营垒13座。李秀成被迫率军退至全椒。他感到单凭一军之力,难解天京之围,于是传檄各路将领,约期在安徽枞阳举行会议。六月下旬,陈玉成、李秀成、黄文金(1832—1864)、李世贤等依约而来。会上各将领商定:先由陈玉成、李世贤等率部攻克安徽庐州(合肥),然后由吴如孝率部在庐州东北一带活动,牵制胜保所部清军;陈玉成则率主力速进滁州东南的乌衣镇一带,会同李秀成部全力进攻江北大营。会后,按照预定计划,陈玉成于七月十五日攻克庐州,又连续进占店埠(肥东)、梁园、界牌,继而南下滁州、乌衣,占领东葛、西葛。李秀成亦于八月十九日率所部自全椒到乌衣与陈玉成会合。次日发动了二破江北大营的浦口之战,取得重大胜利。此役的胜利,是枞阳会议制定的正确的作战方针的结果。日后,各军联合作战,取得了一系列的军事胜利,开始扭转了由于领导集团分裂所造成的被动局面。枞阳会议开创了太平天国各军联合作战的先例,因而在太平天国战争史上具有重要意义。（殷常符）

太平军浦口、三河大捷

清咸丰八年(1858),太平天国后期扭转被动局面的两次重要战役。

杨韦事变后,为挽救危局,洪秀全重建领导核心,咸丰八年,提拔才干出众的青年将领陈玉成为前军主将,李秀成为后军主将,李世贤为左军主将,韦志俊为右军主将,蒙得恩为中军主将兼正掌率。不久又封陈玉成为右正掌率,晋爵成天豫。同年枞阳会议以后,陈玉成、李世贤、吴如孝三部联合行动,自舒城三河镇向庐州(合肥)逼近。当年七月十五日,太平军进占庐州。继而吴如孝按约率部自庐州北进,占店埠镇(肥东)及梁园,进逼定远,以牵制胜保部清军。八月十一日,陈、李两军在乌衣一带会师。当时江北大营统帅德兴阿拥有兵力1.5万余人,以浦口、江浦之间的陟冈、安定桥、小店(永宁镇)一带为重点,分驻于西至江浦石碛桥(桥林)、高旺,东至瓜洲、三汊河;北至来安、施官集的广大地区内,绵延200余里。长江内则有水师巡船往来游弋,以资接应。敌人的这种部署,正好给太平军以各个击破的机会。八月十九日,德兴阿派军进攻乌衣,太平军奋起迎战,歼敌三四千人。次日,太平军乘胜猛攻小店,击败由江南大营来援的冯子材部5000人。陈玉成部冲破清军陟冈军营,直下浦口。然后陈玉成、李秀成率部前后夹击,在从九洑洲凫水前来的太平军配合下,将浦口一带的清军营垒全部烧毁,毙敌1万余人。这就是二破江北大营的浦口之战。德兴阿先逃往六合,又逃往扬州。陈玉成部随即于八月二十三日占领江浦。太平军再破江北大营,鼓舞了全军士气。当陈玉成、李秀成部挥师东向,进攻江北大营之际,江宁将军都兴阿(?—1875)和李续宾等率兵万余人自湖北东犯安徽。八月十六日陷太湖,然后分兵两路:都兴阿率军进逼安庆;李续宾率所部湘军北进庐州。九月十八日陷舒城,进犯三河镇。三河镇在庐州府城南80里,距舒城50余里,位于巢湖西岸,为巢湖沿岸重要的粮食集散地,是兵家必争之地,由太平天国勇将吴定规镇守。九月十八日,陈玉成刚克六合后,立即统兵救援,并启奏天王,调派李秀成部同往。二十八日,李续宾率精兵5000人进抵三河镇外围。十月初二,分兵三路进攻三河镇外九处营垒。太平军经顽强抵抗后,退入镇内。当天,陈玉成率大队赶到,扎营于三河镇南金牛镇。初九,李秀成也率部赶到,驻于三河镇东面的白石山。陈玉成命令庐州守将吴如孝南下截断敌人舒城方面的援军。至此,进抵三河镇一带的太平军达10余万人,对李续宾部形成三面包围之势。初十黎明,李续宾率军反攻,陈玉成部且战且走,将敌人诱至设伏地域。时大雾迷漫,咫尺莫辨,李续宾乘势追过金牛镇,不知陈玉成主力尚在他后面。这时,陈玉成借助大雾,率军从后路杀出,湘军大乱,死去千余人。屯军于白石山的李秀成,听到金牛炮声,立即率军前来参战。驻守三河的吴定规也率军从城内冲出,包围了李续宾部。庐州守将吴如孝已切断舒城援敌。是役,歼灭湘军精锐3000人,李续宾自缢而死。接着,太平军乘胜攻克舒城、桐城。包围安庆的都兴阿部湘军闻风他走,"皖围立解"。三河之役的胜利粉碎了湘军东犯的图谋,使天京转危为安,太平军由

全面防御而进入局部的反攻。　（殷常符）

《资政新篇》颁布

《资政新篇》，清咸丰九年（1859）太平天国干王洪仁玕提出的带有资本主义色彩的改革方案。

洪仁玕（1822—1864），字益谦（一作谦益），洪秀全族弟。曾为乡村塾师，是拜上帝会最早的信徒之一。他一边教书，一边宣传“拜上帝”，受洗信徒50多人。道光三十年（1850），金田团营时，洪仁玕由于被友人强留，未能成行。金田起义爆发，洪秀全派人入粤，带领洪、冯两姓族人赴广西参加太平军。洪仁玕立即邀集50人向广西进发，当赶到广西浔州（桂平）时，太平军已西趋武宣，洪仁玕遂命随行的40余人折回广东，他则改易姓名与其余三人毅然冒险西行，终因前进道路被清军严密封锁，不得已中途折返，回到花县家乡。以后，他又几次欲入广西，均未成功。太平天国起义的消息传到广东，清军立即血洗花县，大肆迫害洪、冯族人，烧毁洪氏宗祠及洪、冯家宅，挖掘了洪秀全祖坟。洪仁玕无地藏身，遂于咸丰二年春逃到了香港。经人介绍结识了巴色会传教士、瑞典人韩山文（Theodore Hamberg，1819—1854，一译韩山明），向其口述了自己所知的太平天国起义的源起和经过，经韩山文整理，用英文写成了《洪秀全之异梦及广西乱事之始原》一书，后人将它译成中文，定名为《太平天国起义记》。咸丰三年，韩山文为洪仁玕作了洗礼，使其成为太平天国历史上第一个也是唯一正式接受西方宗教洗礼的基督教徒。当时香港已成为英国的殖民地，办起了报馆、学校、教堂，洪仁玕在这里不仅学习了天文历算，还获得了不少有关西方资本主义的政治、经济、文化知识，使他成为最熟悉西方的中国人之一。他身在香港，心系太平军，得知太平天国定都江宁（南京）后，决心到江宁去。四年春，乘轮船到达上海。当时上海已爆发小刀会起义，清军包围了上海，道路难通，洪仁玕向小刀会说明自己身分，要求协助。然而起义军不信，他只好折回香港。八年夏，洪仁玕再次离港，踏上了他第六次追随太平军的征途。他由广州经南雄，过梅岭，至江西饶州（波阳），转湖北黄梅，一路扮做郎中或商人，躲避清军盘查，在咸丰九年三月二十日（4月22日），到达了天京。洪秀全大喜，立即封他为天福，继封义爵加主将，又封“开朝精忠军师顶天扶朝纲干王”，掌总理朝政大权。当时，内讧结束已近三年，但仍人心不一，团结不固；初期所订制度，有的不能实行，有的弊端重重。他决心改革现状，遂向洪秀全提出了《资政新篇》。

《资政新篇》的主要内容是：政治上强调“设法用人”。“设法”也即制定法律、制度，反对结党联盟，加强中央统一领导；提出了一些带有民主色彩的措施：一、一人犯法一人当，不应涉及家属子女，家属只有在同案犯罪的情况下才可逮捕治罪；否则应善视抚慰。二、罪行不同，应分别对待；服刑期满应予释放，以利改过自新。三、死罪必须公布罪行及行刑日期，以教育群众。较之封建刑律中株连九族等刑法，是一大进步。所谓“用人”，即要做到人尽其用，赏罚严明，延揽人才，广采意见，鼓励人人奋力上进。同时反对私门请谒及依恃父兄朋友权势，钻营仕途，发现此类情事，立即审实革职，二罪俱罚。洪仁玕还主张仿效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创办报纸，设立意见箱，在各省设立新闻官，搜集新闻，供天王参酌，以使中央在听取众人意见的基础上，能够“明决断”。他提出护国，必须除奸保良。认为用人不当，足以坏法；设法不当，足以害人。只有二者兼顾，才能“权归于一”。经济上，主张效法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发展交通运输事业，制造火轮车、火船、汽船，以坚固轻捷为妙；发展制造、开采、冶炼业，业主享有专利，国家予以保护，凡金、银、铜、铁、锡等矿物，探出者受赏，并允其招民开采；发展金融、邮政事业，国家设立邮亭，传递朝廷文书，民间可办书信馆，以通各色家信，并准许私人创办银行。文化教育上主张开办学馆，学习西方科学知识，凡轮船、火车、钟表等等“正正堂堂之技”，必须学习；认为文化遗产并非一无可取，但反对骄奢之习。社会改革上，严禁鸦片，取缔迷信，禁止溺婴和蓄奴，兴办医院、跛盲聋哑院、鳏寡孤独院、育婴堂等社会福利事业。外交上，反对闭关态度，主张同资本主义国家自由通商，进行文化交流，但外国人不得触犯太平天国的国法，不得干涉天国内政。总之，《资政新篇》是近代中国第一个比较完整的资本主义建设方案，具有明显的进步意义。但它不是农民战争实践的产物，仅代表少数接受西方资本主义思想影响的知识分子对社会发展的规划，因此未提及农民迫切要求的土地问题；同时，正当第二次鸦片战争时期提出的这个建设方案，却丝毫未涉及抗击外国侵略的问题，这是《资政新篇》的两个主要缺点。对上述各项改革主张，洪秀全均表同意，仅对个别条款持保留态度。只是由于太平天国本身不具备实施资本主义建设方案的阶级基础和社会条件，加以战争环境的限制，故未能实行。

（殷常符）

第二次大沽之战

清咸丰九年(1859)第二次鸦片战争中清军在大沽抗击英法联军的第二次战斗。

《天津条约》签订后,英法联军于咸丰八年六月(1858年7月)陆续南撤,暂时解除了对清政府畿辅重地严重的军事威胁。清廷内部在是否全部接受侵略者要求方面存在很大分歧。桂良、花沙纳等以英法联军"枪炮迅利"、"天津以北,道途平坦,无险可扼";"国家内匪未净"等为由,主张迅速订约,以期息兵停战。吏部尚书周祖培等则反对接受侵略者的全部要求,特别是不同意外国公使驻京,认为公使一入京师,则一切政令必多牵制。咸丰帝一贯害怕外国公使驻京,只是由于侵略者兵临天津,京畿难保,为顾眼前利益,才被迫同意订约的。因此,英法联军南撤后,其态度又有改变。他深感大清皇帝的尊严和威信受到损害,特别是担心外国公使驻京会给天朝上国带来"肘腋之变"。于是想"尽力挽回",甚至"罢弃条约"。一方面,在八至十月间多次指使在上海同额尔金、葛罗谈判通商章程的桂良、花沙纳等人,要乘谈判之机"修约",并答应以"全免课税"作为"修改"条约、"挽回"损失的交换条件。但英法侵略者的答应条件却是:条约以外之事,均可商量;条约既定之说,万不能动。咸丰帝的幻想终成泡影。另一方面,从英法联军一撤离大沽口,即开始修复炮台,加强防卫,并授科尔沁亲王僧格林沁(?—1865,博尔济吉特氏,蒙古族,科尔沁左翼后旗人)会同大学士、礼部尚书瑞麟(?—1864)、新任直隶总督庆祺负责办理。经过重建的大沽口炮台,由4座增至6座,每台守兵约400人。共安大炮60门,其中1.2万斤大铜炮2门,万斤大铜炮9门,5000斤铜炮2门,西洋铁炮23门。整个大沽海口地区共有防兵4000人。又鉴于距天津30余里的双港,地高河窄,便于拦击敌人,僧格林沁等特在该地沿河两岸设9座兵营,驻兵6000人,修筑炮台13座,安装1.2万斤以下大小铜铁各炮81门。对于从大沽口至山海关一线海口,择要布置了相应兵力,其中北塘1600人,山海关3000人。另天津道府及沿海各县还招募有5万多团练乡勇。

《天津条约》签订后,时逢资本主义各国经济危机新发展的英、法政府,仍不满足于从中国攫取的种种特权,更不满意清政府"罢弃条约"的举动,蓄意利用换约的时机,重新挑起战争,向清政府勒索更多的侵略权益。九年一月二十七日(1859年3月1日),英国以普鲁斯(Frederick William Adolphus Bruce,1814—1867)接替包令为驻华公使。三月二十四日抵香港。五月初六抵上海。随后,与法国新任驻华公使布尔布隆、美国新任驻华公使华若翰(John Elliott Ward,1814—1902)密谋再次北犯大沽,继续向京城挺进。五月为《天津条约》批准书在京互换之期。二十日,三国公使到达大沽口外,与十七日即已到达的英法联军舰队会合。英法联军舰队由新任英国侵华海军贺布(一译何伯,Vice Admiral James Hope,1808—1881)率领,共计舰船21艘(其中英舰19艘,载士兵1200余人;法舰2艘,载士兵约100人)。另有美舰3艘,随同行动。英法公使拒不接受清政府允由北塘登陆的通知,坚持打通白河经天津去北京。二十五日上午,贺布率联军舰艇13艘,悍然闯进白河,强行拆毁海口的防御工事。守卫大沽炮台的爱国官兵莫不义愤填膺,纷纷要求出击。但僧格林沁还"念两年抚局,一经开炮,则局势全变,仍复隐忍静伺",妥协退让,以咸丰帝早有"勿遽开枪炮,以顾大局"的禁令,坚决不许士兵出击。下午2时半,敌舰蜂拥直前,疯狂向炮台轰击。这时,郁怒多时、势难禁遏的中国爱国官兵各营大小炮位,环轰迭击。守将直隶提督史荣椿、大沽协副将龙汝元,奋勇先登,亲燃巨炮,击中敌舰。激战至下午4时,参战的联军舰艇差不多全被击毁或击沉。但是,侵略联军也凶焰正炽,炮火横飞。史荣椿、龙汝元酣战多时,部众请他们回帐少息,史、龙辄大声叱之。这时,天色惨淡,波涛汹涌,风雷激荡。史荣椿、龙汝元先后中炮。龙受伤尤烈,当即阵亡。史略延片刻,自知不起,犹复指挥三军,大呼杀贼而死。全营悲愤之余,勇气倍增,杀伤敌军无数。下午5时,贺布仍不认输,下令陆战队登陆作战,遭到炮台炮火以及枪队的射击,难以前进,伤亡惨重。直至半夜,其余部才陆续爬上舰艇,撤出战斗。激战一昼夜,侵略军遭到惨败。英舰悬挂白旗要求停战,并在美舰的援助下,狼狈退走,再次南撤。此次参战的13艘英军舰艇中,有6艘丧失了战斗力,有4艘被击毁或击沉。参战英军约1200人,死伤578人。参战法军约60人,死伤14人。英军司令贺布受重伤,其副手伤重致死。法军司令也受了伤。还活捉英、美兵各1人,并缴获了舢板船3只,洋枪41枝以及其他许多军用物资。清军伤亡仅32人,大沽炮台只遭到轻度破坏。第二次大沽之战,以中国人民的胜利,敌人的惨败而告终。这是自第一次鸦片战争以来,中国军队抵抗外国侵略军所取得的最大的一次胜利。

(邱远猷)

二破江南大营

清咸丰十年(1860),太平军第二次攻破清江南大营之役。

咸丰七年镇江失守,天京再度被江南大营包围。李秀成一再上奏洪秀全,要求率军攻破江南大营,以解天京之围。为此曾与洪仁玕三次面商。洪仁玕提出"围魏救赵"的方案,即攻击清军力量薄弱的湖(州)、杭(州)等地,迫其回援湖、杭,俟其撤兵远去,即行返旆自救。李秀成完全赞同,共同确定了作战方案:一、李秀成、李世贤率部袭取湖、杭,攻敌必救。二、陈玉成虚援安省,掩护江南的作战行动。一旦敌人中计,各路立即回师天京,围攻江南大营。咸丰十年正月初六(1月28日),李秀成自浦口前往芜湖,率部于正月十九日至南陵,二月初三攻占广德,然后轻装疾进浙江。二月十三日进占长兴,遂分军为二:李世贤率部佯攻湖州,牵制清军;李秀成率主力六七千人冒充敌军,日夜兼程进袭杭州。十九日,李秀成进至杭州城外。二十七日,太平军轰塌清波门城垣,精兵1250人组成的先锋队立即冲入,攻占杭州,杀死浙江巡抚罗遵殿等多人。江南大营统帅和春得知太平军入浙,即于二月十八日派总兵张玉良(?—1861)率兵2000人由六合往援。咸丰帝深恐浙江有失,命和春调劲旅赴浙。和春又从江南大营调1.3万人援浙。三月初二,张玉良率援兵到达杭州城外。李秀成见敌人中计,便于次日连夜撤出杭州,疾驰北返。十八日占领广德,二十一日占领安徽建平(郎溪),并在这里召开军事会议,参加会议的有中军主将杨辅清(?—1874)、左军主将李世贤、右军主将刘官芳、定南主将黄文金、平西主将吴定彩(?—1861),以及古隆贤(约1826—?)、陈坤书等,共同商定了解天京之围的详细计划。当时"虚援安省"的陈玉成部,正在全椒一带待机进援天京。会后,太平军分五路合围江南大营:李秀成部直趋淳化镇、紫金山;陈玉成部直趋板桥、头关、善桥;杨辅清、黄文金部直趋雨花台;李世贤部直趋天京北门洪山、燕子矶;刘官芳、陈坤书部直趋高桥门。闰三月十二日(5月2日),五路10余万太平军冒雨发起总攻。十五日,陈玉成部突破清军在天京西南所筑长壕。当天,城内太平军抛掷的火罐落入清军副将雷安邦营内,引起火药爆炸,该部随即外逃。太平军乘势内外夹攻,半日之内,将江南大营西半部的50余座营垒全行攻破,毙敌三五千人。当天夜里攻破设在小水关的江南大营总部。和春率残部逃往镇江。至此,包围天京将近二年四个月的清军第二次江南大营,被太平军彻底摧毁。此一战使太平军军威大振,成为太平天国后期一系列军事胜利的起点,直接为进军江浙创造了有利条件。

(殷常符)

太平军东征苏、常

清咸丰十年(1860),李秀成率领太平军攻取苏州、常州,建立苏南根据地的军事行动。

太平军第二次攻破江南大营后,洪仁玕、陈玉成、李秀成、李世贤、杨辅清、刘官芳等在天京举行军事会议,商议下一步进兵之策。陈玉成主张救援安徽;李世贤主张南取闽浙;洪仁玕主张乘胜下取,一俟下路得手,立即沿长江上取,合取湖北,占有长江两岸。李秀成支持洪仁玕。洪秀全权衡局势,采纳了洪仁玕的意见。具体战略计划是:先由李秀成率军东征苏(州)、常(州),限期一个月完成任务。然后集中兵力,溯江西上,合取湖北武昌,捣毁湘军老巢。为了实现这一战略计划,在李秀成挥军东下之际,陈玉成率部渡江,往攻扬州,牵制江北清军,使其不能南渡救援苏、常;刘官芳等率军折回皖南,屏障天京西侧。闰三月二十五日,东征大军由天京出发,四月初二逼攻常州。当时,清江宁将军和春已从丹阳跑到常州,总兵张玉良驻扎常州城外,所部不满万人。初六,太平军攻克常州,和春逃至苏州西北的浒墅关,愧惧自杀。张玉良率残部逃至无锡。初十,太平军占领无锡,张玉良又逃向苏州。十三日,太平军进抵苏州城下,当地农民积极协助太平军作战,即日占领苏州,杀江苏巡抚徐有壬(1800—1860)、署按察使朱钧等多人,收降清军五六万人,缴获大批洋枪洋炮。太平军进城时,受到群众的热烈欢迎,有的还在门口贴出字条,上书"同心杀尽张、和两帅官兵"。东征军乘胜扩大战果,连克昆山、太仓、嘉定、青浦、松江、嘉兴等地。不到50天,占领了除上海以外的苏南大部分地区。李秀成遵照天王洪秀全的命令,建立了苏福省,以苏州为省会,设立省、郡、县三级政权机构。太平军在苏州开设买卖街,活跃市场、农民无力经商的,给予贷款,市场秩序良好,商业繁盛。太平军还推行乡官制度,建立城乡基层政权,乡官多数由劳动人民担任,维持秩序,处理民间词讼,协助太平军作战,苏南地区出现了相对稳定的局面。太平军还建立了选拔人才的考试制度,对参加省试的考生给予每人十余千文的经济补贴。参加县试的考生,也可从县地方政权领取津贴。反映了太平天国对知识分子的重视和关怀。苏南根据地的开辟,使太平天国后期有了富庶的根据

地，天京的钱粮供应得到了可靠的保障。

（殷常符）

北塘之战

清咸丰十年（1860）第二次鸦片战争中清军在北塘抗击英法联军的战斗。

九年第二次大沽之战英法联军惨败的消息传到伦敦和巴黎，引起英、法等国统治阶级内部一阵争吵和叫嚣。他们叫嚣要对中国"实行大规模的报复"，应攻打中国沿海各地，占领京城，将皇帝逐出皇宫。英、法政府为了报复大沽口的惨败和在中国掠夺更多特权，于十年正月再度任命额尔金、葛罗为全权专使，并以克灵顿（Hope Grant，1808—1875）为两国联军司令，准备扩大侵华战争。十年春，英法联军战舰和运输轮船200多艘（英国173艘，法国32艘），士兵2.5万人，陆续驶达上海集结，随即开始第三次北犯。闰三月初一（4月21日）英法联军占领定海。四月初七联军占领大连湾。十九日占领烟台，完成了对渤海湾的封锁。此后，联军即以大连湾和烟台两处作为进攻大沽口的基地。五月二十一、二十三日额尔金和葛罗分别乘军舰抵达大连湾和烟台。美使华若翰和俄使伊格那提也夫（Николай Павлович Игнатьев，1832—1908）也随同北上，先后赶到渤海湾。他们表面上仍伪装"中立"，担任"调人"，而暗中与英、法互通信息，竭力怂恿英、法打仗，从中取利。当时负责天津海防的僧格林沁，自上年大沽获胜后骄傲轻敌，为了让英、法等国公使从北塘登陆进京"修约"，除在北塘敷设地雷外，竟尽撤该地防务，专守大沽口，为侵略军登陆作战造成了可乘之机。六月十五日，英、法军舰30多艘，陆战队5000人由俄人带路，未遇任何抵抗，就顺利登陆，并占领北塘。接着，后续部队相继登陆。北塘失陷为海口防御造成极大缺口。但咸丰帝这时为了集中全力镇压太平天国，对外仍求苟安妥协，于六月十六日起，屡次谕令僧格林沁等："不可因海口设防严密，仍存先战后和之意，……总须以抚局为要。""不可贪功挑衅，致误抚局。"六月十七日，侵略军2000人侦察通往大沽的道路，与清军发生遭遇战。二十六日拂晓，英法联军1万多人从北塘出发分路猛攻新河和军粮城。9时，清骑兵2000人勇敢冲锋反击，但最终全军覆没，新河、军粮城失陷。二十八日凌晨4时，联军由新河向塘沽逼近。塘沽与大沽相距8里，仅一河之隔，是大沽北岸炮台侧后的重要屏障。清军由副都统克兴阿、侍郎文祥（1818—1876）等率部驻守，连同从新河撤来的马队，总兵力约3000人。凌晨6时，联军抵塘沽近郊。7时半发起总攻，炮轰塘沽。守军发起反击，奋力抵抗。双方激战两小时，守军伤亡很大，力不能支。9时半，塘沽失陷。七月初二白河两岸的大小梁子亦告不守。至此，英法联军一方面从北塘将军舰集结到大沽口外，另一方面从陆路攻打大沽口后面，水陆夹击，致使大沽炮台腹背受敌，于七月初五失陷。

（邱远猷）

太平军第一次进攻上海

清咸丰十年（1860）李秀成率太平军进攻上海的军事行动。

太平军攻占苏常之后，李秀成决定乘胜进攻上海，他认为：有勇兵数万，势如山岭之坚，攻取上海，犹如囊中取物。李秀成所以把进攻上海看得轻而易举，是因为没有估计到外国侵略者会出面干涉。在此时，太平天国领导人对外国侵略者的认识还很幼稚，如军师洪仁玕即认为外国人同太平天国都"拜天父宗耶稣教"，他本人又与某些外国人素有交情，对外国侵略者存有一定的幻想。实际上海自第一次鸦片战争五口通商之后，不但成为中外贸易的主要商埠，而且成为外国资本主义侵略者最重要的侵华基地。道光二十五年（1845），英国侵略者强迫清政府上海当局公布《上海租地章程》，划出一定地界为英国人的居留地，以后美、法等国亦相继效法。咸丰四年英、美、法侵略者利用上海小刀会起义占领上海之机，搞了一个所谓新土地章程，公然把居留地变成了租界区，这些租界区便成为外国侵略分子聚集之所和谋划侵略中国的大本营。因此，当太平军逼近上海时，他们便公开进行干涉。咸丰十年四月初六（5月26日），英国驻华公使普鲁斯在上海发出通告，叫嚷：英国海陆军将保卫上海，抵抗任何攻击。次日，外国侵略军在上海布防。接着，法国的葛罗和英国的额尔金相继到沪，研究对付太平军的部署。与此同时，清苏松太道吴煦（1809—1873）和上海巨商杨坊（？—1865）为首的一批买办官僚，雇用美国人华尔于四月十三日组成洋枪队，公开抗拒太平军。华尔（Frederick Townsend ward，1831—1862）在上海募得外籍水手、流氓200余人，于五月中旬进袭松江。洋枪队多系无赖之徒，抵达城外竟酗酒喧闹，太平军乘机伏兵四起，洋枪队大败，华尔率残部逃回上海。五月二十八日，洋枪队在7000名清军的配合下，依仗洋枪洋炮，攻陷了松江。六月十六日，华尔又率洋枪队300人进犯青浦，太平军奋力还击，击毙洋枪队100

人，华尔五处受伤，狼狈逃回上海。二十三日，洋枪队再犯青浦，太平军冲出城外进行包抄，杀死洋枪队六七百人，缴获洋枪2000余条，大炮10余门。李秀成督军追击，于二十六日克复松江。在正式进攻上海县城之前，李秀成写信给各国公使，要求外国侵略者派代表到苏州面商一切，以敦旧好，并声明太平军到上海"不扰外人"，请各悬黄旗，以作标志。李秀成竟相信几个从上海到苏州做买卖的外国人所说的要他到上海"酌议将定之事"的鬼话，只携带卫队近3000人，于七月初二向上海县城进发。当天，风雨大作，太平军仁天安蔡元隆（1839—?）、主将郜永宽（?—1863）两部进至上海城外之九里桥，大败清军。李秀成遂督军直逼上海县城西、南两门，正准备入城之际，突遭英、法军的猛烈射击，太平军竟一枪未发，只是摇手示意，请勿放枪，要求通话。侵略者不予理睬，继续射击，数百名太平军战士牺牲在侵略者的枪炮之下。初四，太平军又向上海进发，守城英军用大炮轰击，在李秀成的命令下太平军几乎未回击一枪。次日李秀成率军"撤出射程之外"，再撤至徐家汇。太平军贸然进攻上海，不仅未能成功，而且耽误了以后攻鄂救皖的时间。实际上，在外国侵略者尚未撕下"中立"外衣之时，太平军暂缓进攻上海，立即回师西进，集中力量打击湘军，乃为上策；或者，乘外国侵略军兵力还很单薄之际，集中东线兵力，以压倒优势强攻上海，亦不失为中策。但李秀成虑不及此，结果徒劳往返，牺牲部众，自己也面部受伤，退回苏州。

（殷常符）

通州谈判

清咸丰十年（1860）英法联军攻占大沽、天津后与清政府在直隶通州的谈判。

十年七月五日（8月21日），英法联军侵占大沽炮台，八日攻占天津后，咸丰帝极度惊恐，急派大学士桂良为钦差大臣，赶赴天津，会同直隶总督恒福（?—1862）（亦授予钦差大臣头衔）向英法侵略者求和。十五日，桂良到达天津。英、法公使提出必须全盘接受《天津条约》、增加赔款、增辟天津为通商口岸等先决条件，方可议和。桂良等被迫答应其全部要求。从七月十七日起，与英、法代表巴夏礼等举行会谈。侵略者提出的停战条件是十分苛刻的：赔偿军费，先付给英、法现款各三四百万两；撤走通州清军，以便两国公使各带千人进京换约，并由巴夏礼随带几十人先行入京，察看沿途和京中住房；增辟天津为通商口岸，立即开市贸易等。咸丰帝感到条件过于苛刻，认为公使进京"拥兵而来，显怀莫测"。因而谕令桂良等拒绝英、法所提要求。七月二十二日，朱谕军机处和惠端亲王绵愉（?—1864）、怡亲王载垣（?—1861）、郑亲王端华（?—1861）、肃顺等王大臣，表示要与英法"决战"，并提出决战时机，应"趁秋冬之令，用我所长制彼所短"。同时，命令军机大臣等迅速调兵前往通州，以资攻剿。英法侵略军由于没有达到要求，遂中断谈判，决计进犯北京。七月二十四、二十五日，联军先头部队3000多人相继自天津向通州进发，窃伺帝乡。迢迢300里，毫无阻碍。路过数百村镇，无论大小，尽遭掳掠，杨村、蔡村、安平、河西务最为富庶，荡然无存。马头一庄，千数百家，毁为平地。这时清政府更加惊慌失措，"决战"决心又开始动摇。为了保存"天朝"体面，讨好侵略者，一面斥责桂良、恒福办事不力，撤销其钦差大臣职务，一面赶派怡亲王载垣、兵部尚书穆荫（?—1871）为钦差大臣，赶往通州议和。载垣、穆荫连续照会英、法公使，先则要求联军退回天津，然后进行谈判；继则请求联军在河西务停进，在通州谈判。当时，额尔金考虑到英法联军要进军北京，军需物资不足，需大量补充。为了争取时间，更加做好战备，同意在通州举行谈判。二十八日，英法联军前卫抵河西务，着手筹建兵站。次日额尔金派巴夏礼、威妥玛到通州谈判。载垣、穆荫向英、法表示完全接受其各项条件。可是，英法侵略者并不急于与清政府达成协议，而要直接占领北京城，于八月三日，巴夏礼等除坚持原先提出条件外，又增加了互换和约时须面见皇帝呈递国书，皇帝玺书亦须交来使带回，以及将张家湾的清军全部撤退等苛刻要求。载垣等再三驳诘，不准。通州谈判破裂，引发出以后的张家湾、八里桥之战。（邱远猷）

张家湾、八里桥之战

清咸丰十年（1860）清军与英法联军在直隶张家湾、八里桥进行的第二次鸦片战争中的最后一战。

十年八月，清政府全权代表与英、法公使在直隶通州谈判破裂。八月初四（9月18日）晨，巴夏礼要求怡亲王载垣通知僧格林沁将张家湾之兵撤退，并坚持亲递国书，否则即是中国不愿和好，言毕而去。同时，联军先头部队自河西务越过马关，推进张家湾附近。咸丰帝再次下谕与侵略军决战，并诏宣示逆夷反复状（坚欲亲递国书，撤退张家湾之兵，并将天津知府石赞清劫去），声罪致讨，悬赏杀贼。载垣即通知僧格林沁截拿巴夏礼。僧格林沁根据载垣等通知，将巴夏礼等39人（英人26名、法人13名）扣押送京

(锁禁于刑部北监),严阵以待,准备迎击敌人的进犯。当时,清军在通州一带的部署是:僧格林沁的督师行营设在通州与张家湾之间的郭家坟,率马步兵1.7万人驻张家湾至八里桥一带,扼守赴通州及京师广渠门(建国门)的约20里大道;其中驻前沿阵地张家湾兵力仅步队千人,异常单薄。副都统格绷额督带马队3000人驻张家湾东、南面。署直隶总督胜保率绿营兵4000人守通州。原驻通州的礼部尚书瑞麟所统京营万人和副都统伊勒东阿督带的马步队4000人移守八里桥,作为后援。僧格林沁还派将率哈尔滨马队2000人,防守张家湾西南,以防敌军绕道趋京。总计,通州地区防军达3万人,较之英法联军在兵力上占较大优势。另外,副都统胜保(?—1863)率京营5000驻齐化门(朝阳门)以东的定福庄,声援僧、瑞两军,保卫京师。

八月初四中午,英法联军约3500人突然向张家湾发起攻击,中国士兵英勇抵抗,给敌以重大杀伤。联军炮队突发火箭数百枚,马队惊骇,冲乱步队,清军阵势顿时混乱,马步队兵自相践踏,纷纷溃退。僧格林沁所部退守八里桥。瑞麟所部也从通州慌忙撤走。联军占领张家湾,乘胜追击,一举攻占郭家坟和通州城。载垣、穆荫、桂良等自通州回京。初五威妥玛抵通州,要求清廷释放巴夏礼等人,否则进攻北京。初七凌晨4时,联军向八里桥推进。八里桥位于通州城西8里,西距北京城东仅20余里,是由通州入京的咽喉要点,有僧、瑞两军3万人(其中马队近万人)防守。上午7时,由孟斗班任总指挥的联军分东、西、南三路进攻八里桥。僧、瑞商定:首先全马队出击,而后,由定福庄移至八里桥的胜保所部,迎击南路敌军,瑞部迎击东路,僧队迎击西路;所有步队隐蔽待机杀敌,马队向联军的左翼到右翼的宽大正面实施反冲锋。战斗打响后,清军马队立即冲向前去。他们奋不顾身,连声大喊杀贼,进如山倒,战一时许,毙伤敌军千余人。但马队因遭敌炮轰击而伤亡者多,被迫退却。南路联军主攻八里桥,在重炮猛轰石桥的同时,前卫冲至石桥边与清军激战,厮杀争夺阵地。胜保部伤亡严重,胜保亦中弹受伤,遂率军退出定福庄;联军追至,再逃北京。僧格林沁率队与西路联军激战,对方伤亡惨重。上午9时,英军分兵企图抄袭僧军后路,僧格林沁甚为惊恐,便于酣战之际,自乘骡车,撤队而逃,以致军心动摇,纷纷退出齐化门以东的皇木厂。瑞队则于未阵之前,先已溃散,逃至皇木厂,与僧队会合,后齐退出齐化门。中午,八里桥失守,联军迅速占领八里桥附近的咸户庄(咸宁侯庄)、三间房、于家卫一带地方。八里桥之战,清军虽败,但英法联军也损失惨重。为了等待从天津调来必需的兵员和粮弹军费补充,联军在通州城一直停留到九月初二。

(邱远猷)

太平军第二次西征

清咸丰十年(1860)秋至十一年夏,太平军西征武汉,以解安庆之围、巩固天京的战略行动。

咸丰十年李秀成率军东征之际,清政府以曾国藩署理两江总督,赏加兵部尚书衔,令其径赴苏州,以保东南大局。但曾国藩却不为所动,他认为:要保江南,必须稳定上游,安庆关系淮南之全局,是将来克复金陵之张本,因此,不肯派兵去苏南,而令其弟曾国荃率湘军近万人相继进扎安庆北面的集贤关,于城外挖壕沟二道,包围安庆。对太平军来说,安庆是生死攸关的必争之地,因为它是天京在长江中上游地区唯一的重要屏障,安庆有失,湘军便可直窥天京,严重威胁天京。按照咸丰十年闰三月二十一日天京会议确定的战略方针,一旦下路得手,即应沿长江上取湖北。由于安庆受围,救援安庆便成为太平军的当务之急。因此太平天国领导集团决定再次采用"围魏救赵"之计,按原定方针进军湖北。英王陈玉成率军从长江北岸西进,忠王李秀成率军从长江南岸西进,预定次年春会师武汉,进攻湘军后方基地,以调动围攻安庆之敌回救武汉,使安庆之围自解。按计划第二次西征应在咸丰十年四月下旬开始,但由于李秀成立意攻取上海,未按时赶回天京,使第二次西征拖延了三个多月。陈玉成于当年八月十六日率军自天京北渡,二十五日即占领皖北定远炉桥,又围寿州(寿县),攻六安和舒城。十月十四日,联合捻军龚得树、孙葵心等部共约10余万人,进至桐城西南的挂车河一带,扎营40余座,试图直接救援安庆。十月二十三日,陈玉成部遭到多隆阿(1818—1864)部清军万余人的进攻,稍有损失。二十八日,多隆阿部与李续宜部湘军近万人,联合进攻陈玉成,陈玉成部伤亡数千人,北走庐江,进行休整。十一年正月二十二日(3月3日),陈玉成率数万大军西进,二十九日克霍山,二月初四占英山,又乘胜挺进湖北,初七克蕲水(浠水),初八攻占离汉口只有50英里的黄州(黄冈)。当时武昌清军守备空虚,慌乱一团,太平军之夺取武昌即在旦夕。然而英国参赞巴夏礼却于十二日赶到黄州会见陈玉成,借口维护英国的商业利益,要求陈玉成必须远离该埠。于是陈玉成中止向武汉进军,除留赖文光部驻守黄州外,主力分成数路,先后

占领湖北蕲州、黄安(红安)、德安府(安陆)、孝感、黄陂、随州(随县)、云梦、应城、麻城等地。三月中旬,陈玉成鉴于安庆形势告急,又不见李秀成部如期入鄂会师,遂决计率部东下,驰援安庆。

李秀成不大赞成会攻武汉而解天京之围的战略思想,他的主要注意力在经营江浙一带,故对西进武汉采取消极态度。他的南路军,直到咸丰十年九月中旬才从安徽太平府(当涂)出发,经安徽芜湖、繁昌、南陵、石埭(广阳),于十月十九日破羊栈岭,进占黟县,距曾国藩的祁门大营仅80里,可"朝发夕至,毫无遮阻",曾国藩此时兵力薄弱,自认为无计逃脱,慌忙写了遗嘱。而李秀成对敌情估计错误,他以为祁门必有大军把守,所以错过了击破曾国藩大营的良机,反而由黟县出休宁,进入徽州,经屯溪,又绕道江西婺源,复折回浙江,使曾国藩绝处逢生。十一年正月(2月)李秀成自浙江入江西,经玉山、广丰、广信,二十七日(3月8日)攻建昌不克,二月十七日自抚州府南趋崇仁、宜黄。二十六日,进占樟树镇(清江),由于赣江水涨和地方团练防堵,未能过江,便沿江南进,三月十一日攻占吉安。二十三日攻临江不克,继续北上,连克奉新、瑞州府(高安)、武宁、新昌(宜丰)。四月下旬,分三路攻入湖北:右路由武宁北攻湖北兴国州(阳新);中路由义宁州北攻通山;左路西攻通城。鄂东南一带群众约30万人踊跃加入太平军。李秀成部前锋于五月初八攻克黄州府对岸的武昌县(鄂城),武汉震动。如果李秀成联合镇守黄州的赖文光,南北夹攻武昌,其结果,或拿下武昌,切断围攻安庆之敌的退路;或迫使围攻安庆之敌回援武昌。不管是哪一种结果,都能收到援救安庆的效果。但是,由于李秀成态度消极,此时,又接到赖文光发自黄州府的禀报,得知陈玉成军早已回师东援安庆,所以便于六月初二率军撤出湖北,进入赣西北地区。就这样,太平军又一次失去了攻占武汉的良机,两路"合取湖北"的计划至此落空。第二次西征失败,致使安庆形势恶化。　　(殷常符)

焚掠圆明园

清咸丰十年(1860)第二次鸦片战争期间英法联军的暴行。

圆明园是清代皇家的园林。位于北京西郊海淀低地上的原始湖区,流源于玉泉山和瓮山(万寿山)山麓,支脉分布,山水合璧,天置美景。早在公元11世纪,辽、金统治者已在玉泉山、香山一带修建行宫作为避暑游息之所。元代,这里就以风景佳丽而成为京都近郊的游览胜地。明万历时,武清侯李伟首建"清华园"(故址在今北京大学西墙外),周及10里,号称"京国第一名园"。嗣后,太仆寺少卿、著名书法家米万钟又于清华园东墙外别建"勺园"(故址在今北京大学校园西南隅)。于是,京郊昔日荒僻湖区,开始成为帝都附近名胜一时的园林荟集之地。明末清初,清华园、勺园渐废。康熙四十八年(1709),康熙帝把清华园废园赐给皇四子胤禛(即雍正帝),动工修建,并赐名"圆明园",作为"避喧听政"处所。"圆明"二字,取"圆而入神"、"明而普照"和"谨慎清明"之意。后历经雍正、乾隆、嘉庆、道光、咸丰,竭尽朝廷之财力,耗资白银2亿两,役使无数能工巧匠和几十万民工,用了151年的时间,把它精心营造成一座规模宏伟、景色秀丽的离宫。

圆明园由圆明园、长春园、万春园三园组成,又称圆明三园。三园紧相毗连,呈倒"品"字形。外围总长达20华里。面积合计5200亩,水面占一半以上,山地约占四分之一强。水面大中小结合,具有水景园的特点。建筑物约15万平方米,相当于故宫建筑面积的总和。这些建筑物各异,既有宫殿、住所和一般的园林建筑,还有佛寺、道观、祖庙、骑射场、大戏楼、藏书楼、陈列馆、码头、船埠,乃至市肆街道、村居水乡、西洋楼等。它不仅汇集了江南若干名园胜景,还创造性移植了西方园林建筑,集当时古今中外造园艺术之大成。

圆明园各殿宇内,陈设考究,装修精美,还珍藏着各式各样的无价珍宝、极为罕见的历史典籍和丰富珍贵的古代文物。它不仅是一座名园,也是一座国家综合艺术博物馆,堪称人类文化的宝库之一。它展示了我国古代文化的精萃,也体现着我国劳动人民的智慧和创造性的结晶。一个英国随军牧师见到圆明园后无限感慨地说:"唯一无二,世上没有什么东西可和它比拟。"西方国家也称誉它是"万园之园"。

十年八月二十二日(10月6日)傍晚,法军攻占圆明园,当晚开始抢劫。次日一早英军赶到。两军头目当即召开分赃会议,决定"协派英法委员各三人合议分派园内之珍物,若者归英军,若者归法军"。但到了第二天,英法的军官和士兵们再也不能耐心、也不甘心于等待上级分配"奖品",而争先恐后地动起手来。英军随军军医兰尼说:"他们不再能抵抗物品的诱惑力,军官和士兵们,都成群打伙,冲上前去抢劫,纪律毫无。"英军步兵第90队队长卧耳斯莱供认:"军官和士兵们,似乎暂时疯狂了一般,身心都沉浸在一件事业里,即是抢劫掳掠。""当军队既已开始抢

劫，再想停止这种举动，就非易事了。在这种时期，训练所造成的通常的约束规范、人性都打破，脱离樊笼，胡作非为了。”法军司令部秘书赫理逊目睹这抢劫现场后，也不得不写下侵略者们的贪婪丑态：“有互撞而相争者，有将仆或已仆者，有仆而复起者，有矢誓者，有汹骂者，有大声嘶喊者……犹之蚁穴为足所蹴，群蚁各衔米粒虫草等物，向穴狂奔而入。”这帮侵略军在“堆积如矿山似的财宝”、“所有各种珍奇物品”面前，“谁也不知道该拿什么东西：为了金子而把银子丢了，为了镶有珠玉的时计和宝石又把金子丢了”。总之，“每人都似乎不愿放弃这个特权，纵情肆意，予取予携，手忙脚乱，纷纭万状”，充分暴露出资本主义侵略者无比贪婪、穷凶极恶的本性。这伙明火执仗的强盗，从军官到士兵，每个人都是腰囊累累，满载而归。据法国侵略军全权代表葛罗供认，在抢劫圆明园后，“一个士兵口袋里有了二万、三万、四万、甚至一百万法郎”。另据英军工兵少校指挥官戈登供认，“离开圆明园时，军中每个人都获得至少十五镑以上的掠夺品”；并对那些拿不走的珍品“都以粗暴的态度将它们完全摧毁”。侵略者把抢得的大量赃物珍宝，有的就在现场或天津街上进行拍卖，有的运回本国，有的则由侵略军作为礼品献给英国国王和法国皇帝。为了掩盖劫掠的罪行，也为了对当时尚未完全就范的“天朝皇帝”施加一种切肤的压力，“逼北京开城投降”，英国侵华军全权代表额尔金提出“只有焚毁圆明园一法最为可行”。这个决定立即得到英国政府的支持。于是，额尔金下达了焚毁圆明园的命令。英军第一师师长米凯尔中将率所部骑兵奉命执行任务。放火的临时指挥所就设在圆明园的正大光明殿。焚烧分两次：八月二十三日当天抢掠的同时，已经烧了一些宫室；而大规模有计划放火是九月五、六日。一代举世无双的名园胜苑数日之间竟化为一片废墟。焚掠圆明园的罪行，彻底暴露了以“西方文明”相标榜的英法等侵略者贪婪、野蛮和残暴的丑恶本质，不仅受到中国人民的强烈谴责，也遭到国际正直人民的痛斥。　（邱远猷）

《北京条约》签订

《北京条约》，清咸丰八年（1860）英法联军攻进北京后，英、法、俄强迫清政府分别签订的结束第二次鸦片战争的不平等条约。

十年八月初七（1860年9月21日）八里桥失守、英法联军进逼北京的消息，传到北京，清廷极为震惊。咸丰帝走投无路，遂于当天立即下令以载垣、穆荫办理和局不善，撤去钦差大臣职务，另派他的六弟恭亲王奕䜣为全权大臣继续求和。他自己则于初八清晨带着后妃、皇子和一批王公大臣，仓皇逃往承德避暑山庄（热河行宫）。咸丰帝逃走后，北京陷于极端混乱之中。官眷商民人等，十有七八纷纷出城逃避；薪米诸物皆骤贵数倍；清廷六部九卿无能入署办事者，人心涣散，呼应不灵，各处办公人员多半星散。

北京是金、元、明、清四朝的都城，经过历朝特别是明清两朝的不断修建，已成为一座坚城，当时城上安设大小火炮数千门，外城、内城均挖有较为宽深的护城河。城内外守军约15万人。同时内地诸省的勤王之师在陆续赶来。尽管事先缺乏防御准备，但只要文武大员具有誓死坚守的决心，认真策划战守之策，激扬士气，稳定人心，足以据城一战。侵略军指挥官孟斗班（Charles Guillaume Marie Cousin de Montauban，1796—1878））也承认：“对这样的城市进行围困，特别是全然没有攻城火炮的情况下，就很可能旷日持久。”可惜，留守京城的王公大臣们，均以为“城不可守”，完全丧失了抵抗的信心，根本不进行抗击准备。恭亲王奕䜣（1833—1898，爱新觉罗氏，道光帝第六子，咸丰帝同父异母弟，隶镶白旗）畏敌如虎，认为形势危殆，战守两难，如“倘有一线可为，不惜委曲迁就”，即除了屈膝求和，别无出路。他照会英、法公使要求停战谈判。英法联军经过张家湾、八里桥之战，伤亡惨重，部队疲惫，急需从天津调来兵员枪弹补充，因此同意恢复通州破裂的谈判，借以做好进攻北京的准备。谈判近半月，自然毫无结果。八月二十一日，经过休整后的英法联军万余人进犯北京。由于东郊数10里之内，无一兵一官防守，很快兵临城下。英法联军根据伊格那提也夫提供的情报：清守军集中东城，北城是最薄弱的地点，应首先攻取。于是，其先头部队向城北安定门、德胜门附近进逼。二十二日，联军近千人抄至德胜门土城外。僧格林沁、瑞麟两部已成惊弓之鸟，望影闻风逃窜。坐镇圆明园的奕䜣、桂良等急忙逃往常新店（长辛店）。英法联军接着由黄寺、黑市直趋西北，进犯圆明园。僧格林沁、瑞麟两部向京城西南逃窜，守园官兵2000人也逃散一空。联军闯入圆明园并开始进行抢、砸、烧。英法侵略军乘战胜之威，照会清廷，限令于八月二十九日中午交出安定门，否则攻城。城内清廷大员们不敢违抗，如期开门揖盗。联军不折一兵安然进入北京外城。英法联军进入北京外城后，随即在安定门城墙上安放火炮，对准内城、紫禁城。九月初四，英、法公使再次照会恭亲王奕䜣，要求于九月初十签字换约，

并借口俘虏问题，要求赔偿英国白银30万两，法国20万两，限期付款。奕䜣全部答应。初五，联军再次闯进圆明园，在洗劫一空后纵大火焚烧。奕䜣在英、法武力威胁和沙俄诱逼下，签订了《北京条约》。九月十一日（10月24日），清钦差大臣奕䜣与英国全权代表额尔金在北京礼部大堂，交换了中英《天津条约》，签订了中英《北京条约》。该约原称《中英续增条约》，共9款。除确认中英《天津条约》仍属有效外，又增加了扩大侵略的条款：一、开天津为商埠；二、割让九龙司地方一区给英国；三、准许英国招募华工出国；四、中英《天津条约》中规定的赔款增加为800万两。九月十二日（10月25日），清钦差大臣奕䜣与法国全权代表葛罗在北京礼部大堂，交换了《天津条约》，并签订了中法《北京条约》。该约原称《中法续增条约》，共10款。除确认中法《天津条约》仍属有效外，又增加了扩大侵略的条款：一、开天津为商埠；二、准许法国招募华工出国；三、将此前被充公的天主教产赔还，法方在中文约本上私自增加："并任法国传教士在各省租买田地，建造自便"；四、中法《天津条约》中规定的赔款增加为800万两。英、法逼签《北京条约》后，即表示扶助清政府镇压太平天国起义，并支持洋务派奕䜣当政。英法联军由于其侵略要求基本上得到暂时满足，因而在九月十九日、十月初二先后撤出北京。咸丰十年十月初二（1860年11月14日），清钦差大臣奕䜣与俄国驻华公使伊格那提也夫在北京签订了中俄《北京条约》，承认了一直拒绝批准的中俄《瑷珲条约》。中俄《北京条约》原称《照依前换和约拟定条约》，又名《中俄续增条约》，共15款。主要内容：一、将所谓中俄"共管"的乌苏里江以东约40万平方公里的中国领土，强行划归俄国；二、规定中俄西段疆界，自沙宾达巴哈起经斋桑淖尔、特穆尔图淖尔（伊塞克湖）至浩罕边界。"顺山岭、大河之流及现在中国常驻卡伦等处"为界。根据这一规定，于同治三年（1864）签订了中俄《勘分西北界约记》，将巴尔喀什湖以东、以南和斋桑淖尔南北44万多平方公里中国领土割给俄国；三、开放喀什噶尔（喀什市）为商埠；四、俄国在库伦（蒙古人民共和国首都乌兰巴托）、喀什噶尔设立领事官。美国公使因国内爆发南北战争，当英法联军在北塘登陆时，应召回国，未及趁火打劫。但事后借口"利益均沾"条款，照样掠取了许多新的殖民特权。

《北京条约》是《天津条约》的继续和扩大，它不仅承认《天津条约》完全有效，而且攫取了一些新的侵略权益：天津开埠后，西方资本主义侵略势力有了大肆掠夺华北经济的侵略据点；割占九龙司、乌苏里江以东大片领土，进一步破坏了中国领土主权完整；英、法侵略者可以公开掠卖中国人口出洋做奴隶、当马牛；军费赔款是对中国人民的又一次残酷掠夺；外国教会侵略势力更加深入和日益猖獗。这些使中国人民的灾难日益深重了。　　（邱远猷）

洋务运动

旧称"同光新政"，或"自强新政"。19世纪60年代初开始至90年代中期为止，清政府在洋务派官僚倡导下所进行的，以引进机器生产、兴办近代军民用企业以及建立新式陆海军为中心内容的"求强"、"求富"活动。

咸丰十年（1860），第二次鸦片战争后，清朝统治阶级内部开始分化为两个主要派别。其中一派，对内主张残酷镇压太平天国农民起义，顽固地维护封建反动统治。对外国侵略者，还不愿放下"天朝"的虚骄架子，更疑惧外国资本主义侵略者与国内反清的人们结合起来危害其封建统治。他们闭目塞听，因循守旧，盲目排斥一切新事物，深恶引进先进技术，认为采用机器生产等活动是"用夷变夏"。幻想回到闭关时代。这一派人称为顽固派。大学士倭仁、徐桐、李鸿藻等是其代表。另一派，面对着第二次鸦片战争和太平天国农民战争，认为外国侵略者不过是"肢体之患"，而农民起义则是"心腹之害"，因而主张勾结外国侵略者，镇压农民起义，维护封建统治；同时也不甘心"受制于人"，主张吸取一些资本主义国家的军事和生产技术，以抵御外侮，并与洋商争利。于是，他们出面倡导和主持了洋务运动。这一派人称之为洋务派。在中央以恭亲王奕䜣、大学士桂良、户部左侍郎文祥等为代表，在地方以曾国藩、左宗棠、李鸿章、沈葆桢、丁日昌以及稍后崛起的张之洞等为代表。

"洋务"是由"夷务"一词转化而来，"夷夏之变"演变成华（土）洋对称之词。咸丰十年底（1861年初），清政府设置总理各国事务衙门作为综理洋务的中央机关。初任命恭亲王奕䜣、大学士桂良、户部左侍郎文祥3人为总理衙门大臣，主持洋务。下属机构有同文馆、海关总署，还管辖南、北洋大臣，选派出使各国大臣等。后南洋大臣例由两江总督兼领，北洋大臣例由直隶总督兼领。而两江总督长期由湘系曾国藩、曾国荃、左宗棠、刘坤一等交替占据；直隶总督则长期由淮系李鸿章独占。于是上海与天津遂成为南北筹办洋务的重要基地。中法战争后，又出现了以湖广总督张之洞为代表的洋务势力，湖北又成为中部

举办洋务的重要基地。在洋务活动中，洋务派分别结成了不同势力的集团。主要有以奕䜣、文祥、崇厚为代表的满族洋务集团，以曾国藩为代表的湘系集团，以左宗棠为代表的左系湘军集团，以李鸿章为代表的淮系集团，中法战争后又形成以张之洞为代表的洋务集团。由于恭亲王奕䜣被罢黜，湘系的曾国藩、左宗棠已先后死去，于是，李鸿章系和张之洞系成为前后最大的两个洋务集团。其中，李鸿章曾一度担任江苏巡抚和两江总督，后任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达20余年，所办洋务企业最多，遍及北洋南洋，因而成为全国洋务活动的实际主持者。但是，到了中日甲午战争后，李鸿章淮系集团势力日愈削弱，而张之洞集团势力却异军突起，继而成为后起的洋务巨头。

洋务运动的重心，前后有所不同。前期(60、70年代)以"求强"为主，即训练新式军队和设厂自造船炮，企图建立一套新的防务体系；后期(70至90年代)除继续进行"求强"活动外，还提出了"求富"的口号，强调兴办近代民用企业，"富"、"强"并重。

洋务派优先考虑的目标是"强兵"，以镇压太平天国和各地人民起义。在19世纪60年代初，开始在天津、上海、广州、福州、武昌等地聘用外国军官，购买枪炮，训练军队。上海、广州等地还购置了一些船舰。进而，在各地创办近代军事工业，制造枪炮和船舰，并对外国有所抵制。咸丰十一年曾国藩首在安庆设立内军械所。同治元年(1862)李鸿章在浙江设立弹药厂。二年李鸿章在苏州设立洋炮局。同年左宗棠也曾在杭州试制枪炮和轮船。四年李鸿章成立江南制造总局，制造枪炮和轮船。同年李鸿章又将苏州的洋炮局移至南京，扩充为金陵机器制造局。五年左宗棠在福州创设福州船政局，专造轮船。六年崇厚在天津设立机器制造局，九年由李鸿章接办加以扩充。70年代后，西安、兰州、昆明、福州、广州、济南、成都、长沙、吉林、杭州、北京等地都先后设立了中小型的军火工厂。为了适应洋务日益扩展的需要，继举办同文馆之后，70年代起，派遣留学生赴外国学习海军和造船；派遣驻外公使办理军火、船舰事宜。光绪元年(1875)清政府筹办海军，决定"分段督办，以专责成"，委派南洋大臣沈葆桢、北洋大臣李鸿章分别督办南洋、北洋海防，筹建南洋、北洋海军。

洋务派在建立大批近代军事工业后，既感资金短缺，材料、燃料和运输需要又日增，于是提出了"寓强于富"的口号，在"求富"的憧憬下，从70年代到80年代，又相继创办了一批工矿业和运输业。主要有：同治十年李鸿章在上海创办轮船招商局；光绪二年沈葆桢在台湾开办基隆煤矿；三年李鸿章在直隶开办开平煤矿；四年李鸿章在上海筹建机器织布局；同年左宗棠在兰州开办织呢局等等。七年开平矿务局筑成唐山至胥各庄铁路。十一年清政府建立海军衙门，由醇亲王奕譞为总理，庆郡王奕劻、北洋大臣李鸿章为会办，而实权却操在李鸿章手中。李鸿章扩大北洋海军，十四年编练成军，北洋水师遂成为当时清政府三支海军中最大的一支海军。十一至十九年，李鸿章主持建成了从天津到山海关的铁路。中法战争后，洋务派还继续办了一些军事工业和工矿企业，并出现了张之洞代表的洋务派势力。张之洞，在光绪十年由山西巡抚升任两广总督后，即在广东着手筹建钢丝厂、织布厂和枪炮厂。十五年调任湖广总督，又把机器设备迁到武汉，以后就以武汉为中心大规模地办起洋务企业来。到中日甲午战争前，所办洋务企业主要有：光绪十六年建立的湖北炼铁厂(即后来的汉阳铁厂，是中国第一个近代钢铁企业)、湖北枪炮厂(即后来的汉阳兵工厂)、湖北织布官局。此外，在七八十年代即参与李鸿章一系列洋务活动的盛宣怀，这时也成为炙手可热的经办洋务的人物。

前后经历了30年的洋务运动，其作用具有两面性。洋务派所办近代企业多数具有明显的资本主义性质，在客观上对民族资本主义近代工业不无倡导作用，对中国社会经济的发展、对抵御外侮和与洋商争利具有一定的作用。但同时具有浓厚的封建性，初期主要是为了对内镇压人民起义。对资本主义国家有依赖性，对外国侵略者有适应的一面，对民族资本又有压抑的一面。洋务派所建新式陆军和海军，在中法战争中已经暴露了它的腐败，经过中日甲午战争更受到毁灭性的打击，最后遂以失败而告终。洋务派所创办的工厂企业，在封建官府控制下，经营腐败。同时，在列强的压迫、打击下，好景不长，创办不久就瘫痪停办，或被帝国主义侵吞；有的转为商办，也只是勉强维持。总之，洋务运动并没有实现"富国强兵"的目的。 (邱远猷)

太平军安庆保卫战

清咸丰十年(1860)至十一年，太平军调集各路援军保卫安庆的大战役。

安庆为安徽省城，屏障天京的西南门户。自咸丰三年五月(6月)太平军攻克安庆后，一直据为重要基地，经翼王石达开的开辟经营，安徽成为太平天国军事政治最巩固的地区。咸丰六年太平天国领导集团分裂后，军事形势逆转，清军在各个战场加强进

攻，八年四月(5月)清军攻陷九江，此后即将战略重点指向安庆。同年十月，陈玉成、李秀成联军取得三河大捷，迫使清军从安庆撤走。但是曾国藩进攻安庆的战略思想非常坚定，认为安庆关系淮南之全局，只有夺取安庆，才能凭借上游之势，最终攻破江宁。故此在咸丰十年春又决定分三路围攻安庆：道员曾国荃部进攻安庆西北集贤关；副都统多隆阿部攻桐城；道员李续宜部为援军，接应以上二路。五月初，清军攻占枞阳，合围安庆。守城太平军约2万人在谢天义张朝爵(约1821—?)、受天安叶芸来(?—1861)率领下，固守待援。太平军领导人亦深知安庆战略地位的重要，洪仁玕认为安庆一日无恙，则天京一日无险。陈玉成一直经略皖北，更视安庆为生命线。故太平军第二次西征武汉的目的就是解安庆之围。曾国藩湘军也乘太平军第二次西征之际，加紧围攻安庆。十一年三月中旬(4月下旬)，已至武昌外围的陈玉成闻安庆告急，遂弃鄂回皖，率军3万人由黄州等处经宿松、石牌，于三月十八日(4月27日)进至安庆集贤关，逼近围城的曾国荃部湘军。二十日，陈玉成与城内守将叶芸来分别率部扎营于城东北的菱湖南北两岸，连夜筑垒18座(北岸13座、南岸5座)，并以小艇沟通两岸，保持联系。与此同时，太平天国领导人在第二次西征失败后，也决定集中兵力救援安庆：由干王洪仁玕、章王林绍璋自天京率兵直接救援安庆；定南主将黄文金率部自芜湖西援。二十二日，洪仁玕、林绍璋等会合桐城；庐江一带的吴如孝部，共2万余人，进至安庆北面的新安渡、横山铺、练潭一带，连营30余里，谋与陈玉成部会合。曾国藩也决心投入更大的兵力，下令将鲍超(1828—1886或1888)部6000人，自景德镇调往江北，坐镇太湖的湖北巡抚胡林翼奉命调总兵成大吉部5000人赴援安庆。声称：太平军全力救安庆，我亦以全力争安庆。于是一场争夺安庆的殊死搏斗展开了。

三月二十三日，多隆阿部近万人分四路向练潭、横山铺猛扑，太平军营垒被攻破。驻新安渡的太平军万余人前往救援，多隆阿以三营步兵迎面接仗，以马队从后面攻击，太平军前后受敌，伤亡甚众，被迫退守桐城。二十七日，自芜湖来援的黄文金部，会同洪仁玕、林绍璋、吴如孝等率军3万人，分兵两路，主力直趋新安渡，但很快战败，撤至天林庄；另一部进攻挂车河，也被清军击退。陈玉成见洪仁玕等所率援军受阻，而湘军鲍超、成大吉两部又将来到，形势更加吃紧，便于四月初十留部将刘玱琳(?—1861)、李四福等率部坚守集贤关外各垒，自率精兵五、六千人赴桐城，与洪仁玕等会商下一步救援计划。十一日，陈玉成抵达桐城，与洪仁玕、林绍璋等会晤，商定分三路进攻挂车河敌军老营：陈玉成率4000人攻击左翼；洪仁玕率7000人自江家桥由中路进攻；林绍璋、孙葵意率太平军和捻军共万余人进攻右翼。多隆阿事先得到情报，分兵设伏。四月十五日黎明，太平军发起进攻，正酣战间，敌军伏兵四出，太平军阵脚大乱，不得不退回桐城。在此之前，鲍超、成大吉两部湘军援兵已于四月十一日抵达集贤关外，在赤冈岭附近修筑炮台数十座，不断轰击赤冈岭太平军营垒。五月初二，鲍超部湘军围攻刘玱琳部太平军，当日午夜，刘玱琳率所部从赤冈岭冒死突围，至马踏石，被俘牺牲，赤冈岭失守。刘玱琳部系太平军精锐，4000人全部被歼，使陈玉成部战斗力大受影响。赤冈岭、集贤关失守，使安庆失去了与城外太平军联系的唯一通道，城外18座营垒全部失陷，吴定彩率太平军余部退入安庆城内。至此，安庆完全成了一座孤城，战局更加被动。

安庆被围一年多，粮食告罄，形势极度恶化。七月初，为救援安庆，陈玉成从天京请来了除李秀成部外所有能征善战的将领，准备同敌人进行决战。他布置三路大军进援安庆：陈玉成、杨辅清自太湖直至马鞍山，由西路威胁挂车河多隆阿部营垒；林绍璋、吴如孝自桐城西趋挂车河；黄文金率军自吕亭驿一带，至姬公庙、麻子岭，策应东路。湘军方面，多隆阿亲率主力迎战林、吴两部太平军；另派总兵雷正绾率兵迎击黄文金部太平军。太平军苦战半个月，终于在七月十九日攻克集贤关，在关口、毛岭、十里铺一带扎营40余座，安庆城内的太平军也列阵城门，准备接应。此后太平军向湘军挖掘的后壕沟轮番冲锋，均失利。七月二十九夜，太平军又发起攻击，同时用小船运米入城，但被湘军水师截获，城内粮食断绝。八月初一(9月5日)凌晨，湘军乘城内绝粮之际，用炸药轰塌城墙，攻入城内。城内太平军将士已数日断粮，饥饿无力，但仍奋起搏斗，叶芸来、吴定彩和守城的太平军全部英勇牺牲，安庆失守。自此，天京失去屏障，太平天国进入退守失败阶段。

安庆失守以后，陈玉成统率所部兵马转移庐州(合肥)，整饬军备，以便待机重振淮南战局。同治元年四月中旬(1862年5月中旬)庐州被多隆阿部攻破，陈玉成率兵北走寿州(寿县)。当时寿州掌握在苗沛霖(?—1863)手中。苗原是安徽凤台的一个落第秀才，后在家乡办团练。曾因镇压捻军有功，被清政府封官晋爵，官至四川川北道。后因敌人内部矛盾，

投入太平军，被封为奏王。但陈玉成在庐州时苗沛霖已投降了清将胜保。胜保命他去诱执陈玉成。苗沛霖派人至庐州对陈玉成说，寿州兵众粮广，请陈前去。陈玉成遂于四月十四日（5月12日）率兵北走，十七日至寿州被苗沛霖诱执，始知中计。陈玉成（1837—1862），原名丕成，广西藤县人，原籍桂平。道光二十八年（1848）至二十九年之间参加拜上帝会。三十年底，作为童子兵参加金田起义。咸丰四年领兵500人猛攻武昌，表现极为英勇。以后在太平军西征、摧毁江南、江北大营、解天京之围以及第二次西征等重大战役中，均战功卓著，所向披靡，为清军所畏惧。他"威名震天地，是天朝第一好角色"。咸丰五年升冬官正丞相。七年秋，受封成天豫、又正掌率，和蒙得恩、李秀成同主军政。是后期支撑太平天国的两大军事将领（另一为李秀成）之一。被捕后，大义凛然，威武不屈，在刑堂上怒斥胜保。胜保置酒食劝降也遭陈玉成坚拒，怒曰："大丈夫死则死耳，何饶舌也！"五月初八，陈玉成在河南延津被敌人杀害，年仅26岁。陈玉成的牺牲，是太平天国的重大损失。此后安徽腹地相继失守，曾国藩遂率军东下围攻天京。 （殷常符）

贵阳教案

清咸丰十一年（1861）贵州青岩和十二年开州群众反对外国教会侵略的斗争，合称贵阳教案。

法国天主教势力在16世纪后半期就已进入贵州，但影响不大。道光二十七年（1847）贵阳教区正式成立。咸丰三年贵州全省三分之一的州县设立了教堂或传教会。九年，法国传教士胡缚理（Louis Faurie，1824—1871）继任天主教贵州主教后，强买民地，建造大小修院和印刷厂，遭到当时人民抵制，结怨甚深，时思报复。八年和十年，中法《天津条约》和《北京条约》签订后，胡缚理有了庇护，更加骄狂不可一世。十一年二月二十五日（1861年4月4日），他趾高气扬，手持法国驻华公使馆寄来、由清政府总理衙门签发的"传教士护照"，公然违反中国法令，以清朝巡抚、提督一级官员的排场，乘坐紫呢大桥，雇用鼓吹，盛设仪从，招摇过市，激起绅民公愤。清贵州巡抚何冠英、行伍出身的贵州提督田兴恕联名向全省官吏发出秘密公函，斥天主教为"异端邪说，最为害民"，指出教会"肆行无妄，心实叵测"。号召"随时驱逐"，"倘能借故处之以法，尤为妥善"。随后，候补道缪焕章编撰《救劫宝训》，在贵阳刊刻传播，鼓吹"屏黜异端"。消息不胫而走，赶走洋教士的呼声竟成为贵州各阶层人民的共同心愿。田兴恕部下首先在贵阳附近展开激烈的驱教活动。五月初五端午节，青岩镇各族人民按传统习俗到郊区野游，途经姚家关天主教大修院（培养神父的教会学校），与修士、教民发生争执。青岩团务道赵畏三已知上司有驱教之意，遂率众一举焚毁修院，逮捕几名教徒，并在田兴恕的指令下，于六月二十二日（7月29日）将张文澜等3名修士和1名厨师秘密处死。胡缚理幸免后，急向法驻京公使报告。法公使馆派代办哥士耆与署两广总督（同治二年四月署云贵总督）劳崇光（1802—1867）谈判议定在贵州指定地点张贴《天津条约》、《北京条约》条文20份，并赔偿教会损失，抚恤死者家属。但新任贵州巡抚韩超（？—1878）不愿执行。正当双方紧张谈判之时，开州教案又生。

开州（开阳）教案起因，是天主教徒对青岩教案久议不决的报复。同治元年正月十五日（1862年2月13日），贵阳北百余里外的开州夹沙龙地方欢度元宵节，援例每户应出捐搭龙灯，祭龙神。法国传教士文乃耳（Jean-Pierre Néel，1832—1862）唆使教徒抗缴，破坏政令，民教双方发生冲突，几至动武。开州知县戴鹿芝、团首周国璋，本恨教会侵权，即在田兴恕批示"缉案就地正法"指令下，在正月内将文乃耳和4名抗捐闹事的教民逮捕处死。前案未结，后案又起。法国公使联合英、美、俄等国公使，一起向清政府提出"强硬抗议"，并以武力相威胁，要求：赔偿损失；处死田、戴、赵；严惩一切保教不力或查处不严的有关官吏；派亲王大臣到法国谢罪。此案交涉经年未决。二年十一月（1863年12月）在法国新任公使柏尔德密（Berthemy Jules Francois Gustave，1826—1903）的战争恫吓下，清政府被迫将韩超交部议处，田兴恕革职发配新疆，缪焕章等革职永不叙用（何冠英、戴鹿芝、赵畏三已死，毋庸议），提督衙门拨充天主教堂赔款1.2万两白银结案。 （邱远猷）

辛酉政变

清咸丰十一年（辛酉年，1861）咸丰帝妃叶赫那拉氏联合恭亲王奕䜣窃取清王朝最高统治权的宫廷政变。又称"北京政变"或"祺祥政变"。

那拉氏（1835—1908）是满洲贵族叶赫那拉氏的后代。那拉之意为太阳。叶赫，是吉林长白山麓的一支河流。那拉氏祖居叶赫，姓那拉氏，故称叶赫那拉氏。道光十五年十月初十（1835年11月29日），出生在山西潞安府衙西厅一个满族官僚家庭里。父亲惠征，镶黄旗满洲人。初任山西潞安府知府，后升任直隶霸江道道台，不久又调任福建汀漳龙道台，最后

任安徽徽宁池广太道道台，死在安徽任上。那拉氏是惠征的长女，乳名兰儿。其妹后来成为醇亲王奕譞(1840—1891)的福晋，即后来光绪帝载湉的生母。其二弟桂祥，后来是光绪帝的岳父。那拉氏从小受封建教育，十多岁时能背四书五经，而且“能诗、善书画”，“通满文，二十四史皆浏览”。“故能通古今治乱大势”。她从小跟随父亲奔南走北，也学会了不少封建官场中尔虞我诈、世故虚伪、逢迎拍马等本领，又使她满脑子装着攀龙附凤、荣华富贵的思想。但她早年丧父，家业中落，一时找不到缔姻显贵、出人头地的机会。咸丰元年16岁时被选中秀女。二年五月初九(6月26日)进宫后被咸丰帝看中，很快封为兰贵人。四年晋封为懿嫔。六年生载淳，母以子贵，封为懿妃。七年更晋位为懿贵妃。不几年就爬到了仅次于皇后和皇贵妃的地位。那拉氏阴险机诈，有很大的政治野心。由于咸丰帝耽于声色，懒于理事。加上时值太平天国起义和英法联军入侵，军报频繁，奏章甚多。咸丰帝“无一日之安”，遂让那拉氏“时时披览各省章奏”，代笔批答，因而她得到了议论国事和影响咸丰帝决策的机会。十一年七月十七日(1861年8月22日)咸丰帝在热河行宫(河北承德避暑山庄)病死。死前，咸丰帝最宠信的协办大学士、户部尚书肃顺(1816—1861，字雨亭，又作豫亭，爱新觉罗氏，镶蓝旗满洲人)曾劝咸丰帝效法汉武帝之钩弋故事，先处死太子载淳的生母懿贵妃，以防她恃子而骄。可是，咸丰帝未纳此议，于七月十六日，口授遗诏，立年方6岁的儿子载淳为皇太子，继承皇位；同时任命怡亲王载垣、郑亲王端华、协办大学士、户部尚书肃顺(与其兄端华、载垣相互倚重，煊赫一时)等8人为“赞襄政务王大臣”，要他们“尽心辅弼，赞襄一切政务”。同时，又把装有诏书的锦盒赐予皇后钮祜禄氏；把“同道堂”印赐予懿贵妃那拉氏，让她与皇后同心协力，辅导幼主。八大臣根据遗诏拥立载淳嗣位，立即通告留在北京的中央机构和各地政权，并决定自明年起改元“祺祥”。26岁的那拉氏以皇帝生母的身分与咸丰帝的皇后钮祜禄氏分别被尊为“圣母皇太后”与“母后皇太后”，合称“两宫皇太后”。载淳的帝位得到清朝统治集团的普遍承认，内阁送来了咨文，户部发出了鼓铸“祺祥”铜钱的通知，钦天监也刊印了“祺祥”的历书。这样，肃顺等人就从咸丰帝那里获得了实际控制最高统治权的权力。于是，当时的清政府实际存在着两个政治中心：一是主要由肃顺等八大臣掌握着总揽大权的热河行宫；一是以恭亲王奕䜣为首的清政府大多数官僚所在的北京。英国侵略者认为承德行宫这批官僚不是其理想的驯服工具，而是中外反动势力建立相互勾结关系的严重障碍。英国驻华公使普鲁斯表示：“只消朝廷不在北京，怡亲王、端华和肃顺继续掌政，我们就不能说中国人民(实指清朝政府)已确实承受了条约(《北京条约》等)。……实际掌权的人是偏向于不友好的，他们也就形成和我们为难的倾向。”“我们应以温和协调的态度获致恭亲王及其同僚的信任，消除他们的惊恐，希望迟早总会发生变动，使最高权力落到他们手里去。”

野心勃勃的那拉氏对咸丰帝的遗诏和肃顺等八大臣主持政务极为不满。她为了实现自己掌权的野心，根本不顾什么“祖制”、“家法”，决计利用咸丰帝刚死、载淳年幼这个有利时机，向八大臣夺权。于是，那拉氏与肃顺等人之间经常发生激烈的冲突，殿堂之上不断出现“哓哓置辩”的场面。但是，这时八大臣在朝廷上拥有军政实权。当时的热河行宫处于他们控制之下。于是那拉氏对肃顺等人外示优礼，暗中却加紧施展阴谋诡计，策划宫廷政变。首先，竭力奉承、拉拢咸丰帝的皇后钮祜禄氏，劝诱鼓动她出来垂帘听政。在那拉氏的挑动怂恿下，钮祜禄氏终于同意，并与之一起密议了政变计划。其次，决计联合恭亲王奕䜣以壮大自己的力量。因为奕䜣是道光帝第六子、咸丰帝同父异母弟，在清室中宗支最近，地位较高，很有才能，也颇得朝廷上下的赞许；奕䜣同肃顺等人有矛盾，可资利用；奕䜣又是洋务派官僚首领，深得洋人赏识和信任，可通过他获得外国侵略者的支持。八月初一(9月5日)，奕䜣以“奔丧”为名，从北京赶到热河行宫。为了取得外国侵略者的支持，事前特派文祥拜见英国公使普鲁斯，说明意图，并得到了外国侵略者的默契。奕䜣到热河行宫后，立即进见那拉氏，“奏对良久”，密商了回京发动政变的计划。那拉氏担心外国侵略者不支持她，奕䜣向她保证：“外国无异议，如有难，惟奴才是问。”密谋已定，奕䜣于八月初七赶回北京，两边分头下手。那拉氏授意御史董元醇呈上“太后垂帘，亲王秉政”的奏折，大造由皇太后垂帘听政的舆论，但遭到肃顺等八大臣的抵制和反对。那拉氏通过奕䜣竭力拉拢领重兵驻扎京、津、握有兵权的兵部侍郎胜保，胜保借机把部队布置在密云一带。另外还拉拢了拥有重兵的实力人物科尔沁亲王僧格林沁。这样，便控制了北京周围的军队。同时，那拉氏又借口肃顺等人事务繁忙，设法解除了他们兼管的部分兵权。在那拉氏的精心策划下，九月二十三日，咸丰帝的灵柩从热河起运回京，由肃顺护送，行进迟缓。那拉氏却偕同钮祜禄氏和小皇帝，并

让其他7个王大臣扈从，快班轿夫先行。二十九日那拉氏抵达北京，比咸丰帝的灵柩早到4天。当天，她立即召集奕䜣和其他亲信大臣秘密部署。次日凌晨，在那拉氏和奕䜣主持下，发动突然袭击，在宫廷当场逮捕了载垣、端华。并派醇亲王奕譞前往捕回正在密云途中的肃顺，一同交宗人府治罪。紧接着，那拉氏改组了军机处，把一些亲信安插到政府的重要部门。十月初一，任命奕䜣为议政王，在军机处行走，实际成为这个中枢机构的主持者。桂良、文祥也都被任命为军机大臣上行走。通过一系列的任免措施，那拉氏和奕䜣攫取了清王朝的最高统治权。

十月初六，那拉氏以幼帝名义发布上谕，公开否认咸丰帝的遗诏，说咸丰帝"并无令其赞襄政务之谕"，下令将肃顺斩决，载垣、端华赐令自尽，其余5大臣或革职，或充军。初九，那拉氏为载淳举行登极大典，正式即皇帝位，废除八大臣所拟年号"祺祥"，宣布明年为"同治"元年(1862)。那拉氏为了寻求外国资本主义的支持，在宣布八大臣罪状的上谕中，特别把他们对外国侵略者"不能尽心和议，……以致失信于各国"，作为重大罪状，表示上台后决心执行卖国求荣的政策，博得了外国侵略者的欢心。初十，普鲁斯在给英国外交大臣罗素的报告中说："此次谕旨，……实是我们自和中国有关系以来最有利的文件。"奕䜣照会英国驻华公使普鲁斯，告知"已被任为首揆，仍负责外交事务"时，普鲁斯"给他的回文，……措词是有意给他撑腰的"。十一月初一，那拉氏和钮祜禄氏在养心殿垂帘听政。并各上徽号，那拉氏称慈禧太后，钮祜禄氏称慈安太后。自此，权操慈禧太后之手。

那拉氏联合恭亲王奕䜣发动的辛酉政变，是外国侵略势力和清朝封建买办势力相互勾结的开始，是清朝封建政权半殖民地化的严重步骤。

(邱远猷)

淮军之编练

淮军，清咸丰十一年冬至同治元年春(1861—1862)，李鸿章在淮南组建的封建地主武装。

咸丰十一年十一月(12月)，太平军攻占浙江通商口岸宁波，并再次攻占浙江省城杭州。十二月兵进吴淞，第二次进攻上海。由于上海关税收入是江南清军的主要饷源，两江总督兼统苏、皖、赣、浙四省军务的曾国藩对上海有守土之责。但他从未派过一兵一卒进入江苏，恐怕引起清廷不满而惴惴不安；清朝在苏南仅存的一个据点镇江，常常受到太平军进攻的威胁，清廷屡谕曾国藩派军到镇江；上海官绅也派代表到安庆曾国藩大营请求"济师"。于是曾国藩决定让李鸿章到合肥募勇，仿照湘军建制，编练成一支地主武装，然后派往江苏与太平军作战。李鸿章(1823—1901)安徽合肥人，出身封建官僚家庭，道光进士，改翰林院庶吉士，散馆授编修。咸丰三年随侍郎吕贤基(1803—1853)回籍办理团练，在皖北对抗太平军。咸丰八年投入曾国藩幕府，曾率湘军与太平军作战，颇得曾国藩赏识。曾国藩向清帝密保李鸿章才可大用。咸丰十一年冬，李鸿章奉命回庐州府(合肥)募勇。合肥早就有地主士绅办的团练，其中以张树声(1824—1884)、张树珊(？—1866)兄弟，周盛波(？—1888)、周盛传(？—约1884)兄弟，以及潘鼎新(？—1888)、刘铭传(1836—1895)等所办团练最著名。太平天国定都江宁(南京)后，安徽省，特别是庐州府所属各州县一直是太平天国的根据地，但合肥县始终被地主团练所盘踞，太平天国未能全部占领。李鸿章回合肥后，整编了二张、二周和潘、刘的旧团练，曾国藩又把曾国荃部下的湘军参将、淮人程学启(1830—1864)、湘军将领郭松林(1833—1880)及其统带的八个营调拨给他。同治元年二月(3月)，淮军基本建成。营制饷章完全仿照湘军的模式：李鸿章挑选统领，统领挑选营官，营官挑选哨长，哨长挑选什长，什长挑选勇丁。淮军以营为单位，每营500人，设营官一人；营辖前、后、左、右四哨，哨设哨长；哨辖一至八队，队设什长。全军共6500人。因为这支军队主要是从淮河流域招募的，所以称为淮勇。李鸿章首先率领这支军队至安庆，后筹款18万两雇用外国轮船，于三月初八带陆勇2000人，由皖启航，初十抵沪。四月初五，淮军6500人全部抵沪，扎营上海城南。李鸿章到上海不久，署理江苏巡抚。他勾结英法侵略军及华尔的"常胜军"，一再阻遏太平军攻取上海，并向太平天国苏南地区反扑。同治元年十一月，招降常熟、昭文太平军守将。同治二年三月占太仓，四月占昆山、新阳(今昆山)。十月陷苏州、无锡。同治三年二月夺取浙江嘉兴。四月破江苏常州。六月天京(南京)失陷后，又配合湘军攻下浙江湖州，继赴安徽、江西、福建等地镇压太平军余部，是清末镇压太平天国起义的一支重要反动武装力量。同治四年淮军扩大到六七万人，从是年起至同治七年夏，在安徽、湖北、河南、江苏、直隶(河北)等地对捻军作战，终将捻军镇压下去。以后又逐渐形成淮系军阀，是清末反动势力中的一个重要武装政治集团。

(殷常符)

太平军第二次进攻上海

清咸丰十一年十二月至同治元年五月(1862年1月—6月)李秀成率太平军第二次进攻上海的军事行动。

上海是资本主义列强的侵华基地，外国侵略者非常害怕太平军打到上海。英国驻华海军司令何伯竟于咸丰十一年二月向太平天国提出不得进入上海、吴淞30英里之内的无理要求。当时太平天国对外国侵略者缺乏认识，竟然答应了这一要求，惟提出以一年为限，过期后将不受此约束。同年太平军进军苏、常之际，外国侵略者曾一再进行干涉。十一月底，英国侵略者又派人到天京要挟，再次要求太平军不进入上海、吴淞周围百里地带，立即遭到太平天国的断然拒绝，表示为了光复祖国，"不能弃寸土于不顾"。十二月初八(1862年1月7日)，李秀成督令谭绍光(1835—1863)、郜永宽、李容发(1847—约1864)等，分兵五路向上海进军。至十二月二十一日，各路太平军已先后占领了青浦、奉贤、南汇、川沙。西路进围吴淞，东路占领高桥镇，基本上完成了对上海的包围。同治元年初，清政府确定了"借师助剿"的方针，从此中外反动势力正式勾结起来，共同镇压太平天国。当时，上海由江苏巡抚薛焕等统带4万清兵驻防，城内只有8000人。清廷渴望英法侵略者给予援助，遂谕令薛焕立即与英、法筹商，请求帮助"剿"办。同治元年正月十五日(2月13日)，驻沪英法侵略军头目会商防务，决定由英军防守英、美租界，兼守北门，法军防守法租界和上海县城，驻沪英、法侵略军各约900余人，为加强实力，又从天津抽调一部分英军开至上海。此外，华尔的洋枪队也参与防守。不久，英、法侵略者以太平军进军上海影响租界供应和贸易为借口，公然与清军一起向太平军进攻。二十六日，英国驻华海军司令何伯、法国驻华军司令卜罗德(Admiral Auguste Leopld Protet，1808—1862)率侵略军400余人，华尔率洋枪队约600人，搭乘轮船炮艇，自上海开抵吴淞口登岸，在清军配合下，进攻驻守高桥镇的太平军。太平军顽强抵抗，终因敌不过侵略军的洋枪洋炮，被迫撤退，扶朝天军主将吉庆元阵亡。三十日何伯、卜罗德各率军500人，携大炮7门，另有华尔洋枪队750人，由上海搭乘11艘轮船，溯黄浦江而上，开抵上海以南约50里的闵行镇。二月初一向萧塘镇进攻。太平军奋勇抵抗，使华尔七处受伤。但终因侵略军火力猛烈，难以守御，被迫放弃萧塘。二月中旬，太平军进攻泗泾，又失利撤退。高桥、萧塘之战后，清政府对外国侵略者万分感激，认为"友邦谊笃，始终不渝"，并把华尔的洋枪队改名为"常胜军"，扩充到4500多人。中外反动势力的进一步勾结，对太平军更加不利。高桥、萧塘战役失利后，李秀成调整了进攻上海的计划：由驻青浦的开朝王宗李明成(李秀成胞弟)等先攻七宝，再攻泗泾，得手后，相持固守；朝将陈炳文率部由青浦南面的天马直取松江，然后赴吴淞口屯兵驻扎，待机进兵；朝将刘肇均(？—1865)部由嘉定赴黄渡安扎营盘。总的方针是：四面包围，待机攻取上海。七宝与泗泾是由上海至松江的必经之地，太平军一旦占领，即可切断松江与上海之间的通道，使松江陷于孤立。敌人方面也深知七宝与泗泾的战略地位。三月初五，何伯率英军近1100名，卜罗德率法军500余名，另有常胜军1200人，在侵华英军司令士迪佛立(General Charles W. Staveley，1817—1896)统一指挥下，由上海到达七宝。在侵略军先进武器攻击下，王家寺及龙珠庵的太平军相继败退。太平军攻占七宝、泗泾的计划失败。外国侵略者又乘势攻取嘉定、青浦、南桥等地。二十九日，侵略军近4000人携大炮30门，在5000清军配合下，自上海进攻嘉定。四月初一，在城外部署攻城：由英法侵略军攻南门，常胜军攻西门，清军攻东门，虚留北门，以清军设防。初三，侵略军发起进攻，太平军牺牲数百人后，从北门撤出，嘉定失陷。出北门的太平军遭清军伏击，又牺牲了约2000人。十四日，侵略军与清军7000人进攻青浦，守城的4000名太平军奋勇抵抗，终因寡不敌众，被迫撤退，青浦遂陷。太平军约1000人战死，2000人被俘。又加以李鸿章率淮军6500人已于三月初十自安庆到达上海(三月二十七日李鸿章被任命为署理江苏巡抚，四月十五日接任)，太平军处境更加艰难。四月十九日英法侵略军、常胜军和淮军共约5000人，进攻奉贤南桥。南桥守军不满1000人，用抬炮、火绳枪和少数欧制武器顽强还击，击毙法军侵略头目卜罗德。敌人再次攻城时，太平军撤出南桥。接着敌军占领了柘林、奉贤。嘉定、青浦失守后，李秀成亲率太平军万余人，自苏州出发，进行反攻。与侵略军攻南桥的同一天，在太仓打破清营30余座，清知府李庆琛被击毙，所部5000余人全军覆没。四月二十八日，又攻克嘉定，并乘胜连占泗泾、七宝等要地。五月十三日，攻占青浦，俘获常胜军副领队法尔斯德(Edward Forrest)。二十一日，李秀成督率谭绍光、陈炳文等部五六万人进至法华寺、徐家汇、九里桥一带，首先围攻新桥的淮军程学启部营垒，逼近上海。二十二

日，李鸿章督率参将张遇春、郭松林等部三路驰援，在九里桥、虹桥等地与太平军展开激战，太平军不支，退回泗泾。这时，曾国荃率军逼攻天京，洪秀全一日三诏令李秀成回救天京，李秀成遂放弃泗泾，将嘉定、青浦、太仓等地交谭绍光防守，自率大队返回苏州，致使太平军第二次进攻上海功败垂成，且影响到太平军在东南的胜利成果不能巩固，造成太平军东西两面受敌的被动局面。但是第二次进攻上海仍有重大意义，它是太平军直接与外国侵略者交战的重大战役，给了侵略者以重大打击。湘军头目曾供称："夷人之畏长毛亦与我同，委而去之，真情毕露。"集中地表现了太平天国革命的反侵略性质，以及农民阶级敢于同侵略者作坚决斗争的英雄气概。

（殷常符）

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建立

清咸丰十年十二月（1861 年 1 月）清政府为办理洋务、适应外国侵略者需要，设立中央外事机构总理各国事务衙门。

第一次鸦片战争以前，清政府在中央没有办理外交事务的专门机构，只有礼部、理藩院、鸿胪寺等分管接待和管理藩属朝贡和外国使臣，具体对外交涉（主要是对西方交涉）事宜例由两广总督兼理。当时，清廷以"天朝大国"自居，把藩属看作是"下邦"，将外国看作是"外夷"。第一次鸦片战争期间，专办签订各种条约和有关交涉等事宜的，则是清政府临时派遣的"钦差大臣"。第一次鸦片战争后，清王朝对外国侵略者逐步采取了屈服的政策。在体面上，资本主义列强又不愿与礼部、理藩院等按旧的礼仪规矩交往。事实上，完全属于封建性国家机关的礼部、理藩院等也不胜任与外国资本主义国家交涉的任务，需要另行设置专门的机构。于是，清政府设立了"五口通商大臣"，办理对外通商、交涉事务，先后由两广总督和两江总督兼任。咸丰十年《北京条约》签订后，外国侵略者为了有效地控制清政府，要求在中央设立专门外交机构。最早，清政府曾拟将此新设专门机构称为"抚夷局"，外国侵略者拒不接受。洋务派首领恭亲王奕䜣、大学士桂良、户部左侍郎文祥等人，于咸丰十年十二月初三，奏上通商善后章程，请设立"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十二月初十，清廷正式批准在北京成立"总理各国事务衙门"，简称"总理衙门"或"总署"、"译署"。清政府派奕䜣、桂良、文祥三人管理。嗣后乃增至八、九人不等。

总理衙门的组织，大体仿照军机处的体制。总理大臣一级，首领一人，由亲王等皇族和军机大臣兼领。咸丰十一年至光绪十年（1861—1884）为恭亲王奕䜣；光绪十年至二十七年（1884—1901）为庆亲王奕劻（1836—1918）兼领。总理大臣无定额，由军机大臣兼领。下有总理大臣上行走及总理大臣上学习行走，由内阁和各部院大臣中选任。以上各大臣均由皇帝直接任命。章京一级官员分为总办章京、帮办章京、章京和额外章京等职别，主要负责办理具体事务，由各部、院保送。总理衙门各大臣、章京仍兼任原来职务。总理衙门内分英国股、法国股、俄国股、美国股、海防股等 5 股办事。

总理衙门的下属机构有同治元年（1862）设立的最早洋务学堂同文馆（亦称京师同文馆）、海关总督，还管辖南、北洋通商大臣，选派出使各国大臣等。此外，五口通商大臣划归其管辖。同治五年，因通商口岸已扩展至长江各口，增加多处，遂改五口通商大臣为南洋通商大臣，管理东南沿海及长江沿岸各口岸通商、交涉事务。由于在办理有关外交、海防、关税及官办军事工业各项事务中，与地方行政牵连甚多，因此，从同治十二年起，南洋大臣由两江总督兼任，此后成为定制。咸丰十年底，清政府在总理衙门下设三口通商大臣，管理天津、牛庄、登州（后改烟台）三口通商、交涉事务，由奕䜣的得力助手、侍郎衔候补京堂崇厚担任，驻天津。同治九年，通商事务扩大，改三口通商大臣为北洋通商大臣，兼管直隶、山东、奉天（辽宁）三省通商、交涉事务。北洋大臣办理有关外交、海防、关税及官办军事工业各项事务，例由直隶总督兼任。两江总督和直隶总督的位置，又几乎照例归湘系、淮系军阀所专有。到后来，北洋大臣实际上权重于南洋大臣。

总理衙门的主要任务是办理外交，同时还经管通商、海防、军务、关税等事务，后来甚至连筑路、开矿、制造枪械军火等事务也都经营。它实际上总揽了整个"洋务"事宜，俨然成为一个权力大、职务广的清政府的中枢机构。总理衙门和南、北洋大臣的设立，是为了适应外国资本主义侵略者同清朝统治者互相勾结的需要，一开始就受到外国侵略者的欢迎和赞许。当英使馆秘书威妥玛会见奕䜣时得知设立该机构以"专办外国事务"的消息后，欣悦不已，认为此乃"数十年求之不得"之事。总理衙门，是第二次鸦片战争后清政府和外国侵略者相互勾结的产物，是清政权半殖民地化的重要标志。

（邱远猷）

近代军事工业之产生

19世纪60至90年代清政府洋务派官僚以“自强”为目的创办一系列近代化兵工厂，是为我国军事工业近代化之始。

19世纪60年代开始之际，太平天国运动和捻军起义，波及半个中国；列强侵略深入，英法联军进入北京；内外交困，威胁着清王朝的生存，这使他们力求寻找自强之道。清统治阶级中的洋务派认为，中国的典章制度远远超过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唯独“火器”落后，自强之道，首先需从“练兵”、“制器”开始。因此，洋务运动前期(六七十年代)以训练新式军队和建立近代军事工业为主要内容和重点，而洋务派用力最多的则是建立近代军事工业，仿照西方设厂制造新式枪炮和兵船，装备军队，建立一套新的防务体系。这项活动是从60年代初期开始的。清咸丰十年(1861)两江总督曾国藩攻陷太平天国重要据点安庆后，设立安庆内军械所，试造子弹、火药、枪炮等武器弹药，用以镇压太平军。产品供湘军自用，不在市场上销售；经费由湘军军费中拨给；劳动力从水师中调配；基本上全是手工操作；全用华人，未雇洋匠。严格讲，它不是近代军事工业，但它招募了如李善兰(1813—1884)、徐寿(1818—1884)、华蘅芳(1833—1902)等著名科技人才，为西方科学的输入和近代工业的建立创造了条件。化学家徐寿在此主持制造我国自制的第一艘木质轮船。同治四年(1865)制成，命名“黄鹄”号。后未续造。三年清军攻陷南京后，由安庆迁至南京，后改建为金陵机器制造局。继曾国藩之后，淮军首领李鸿章于二年在上海建立了三所洋炮局(又称“炸弹局”或“炮局”)：一所由英人马格里(Sir Samuel Halliday Macartney，1833—1906)主持；其余两所分别由丁日昌(1823—1882)和韩殿甲主持。二年十一月(1863年12月)，李鸿章占领苏州后，马格里主持的炮局迁至苏州，称苏州洋炮局。四年，丁、韩二局并入旗记铁厂，建立江南机器制造总局。这些洋炮局开始也全用手工制作，成效不大。到二年十二月，李鸿章买下“阿思本舰队”带来的一批机器，在苏州局安装使用。安庆内军械所和上海洋炮局是为镇压太平天国运动的需要而仓促建立起来的，规模很小，处在用土法制洋器的摸索阶段。三年湘军攻陷太平天国都城天京(南京)后，洋务派官僚能够腾出手来，投入更多的人力和物力，建立近代军事工业。自四年起，洋务派在各地先后建立起一批近代化的军事企业，到光绪二十一年(1895)，大约有20个制造枪炮、弹药和船舰的工厂。其中规模最大的有以下几个：

江南机器制造总局。前称“江南制造局”、“上海机器局”。同治四年李鸿章在上海虹口购英美商的旗记铁工厂，把原有的上海两所洋炮局并入，并拨给苏州洋炮局的部分机器和曾国藩委派容闳(1828—1912)从美国购来的机器，建成该局。六年，由虹口迁至上海城南高昌庙，不断扩充，由清政府指拨上海海关税收的二成作为常年经费，平均每年约60余万两。拥有2000余工人，成为当时规模最大的军工厂。主要制造枪炮、水雷、弹药、火药、机器和修造轮船。并附设有翻译馆和机械学校，以译西方技术书籍和培养科技人才。该局系湘、淮军两系合办，但实权在淮系手中。主要工程师由英人担任。

金陵机器制造局。简称“金陵机器局”、“金陵制造局”。同治四年李鸿章由江苏巡抚升两江总督时，把原苏州洋炮局迁至南京扩建而成，仍由英人马格里主持。光绪五年又将乌龙山机器局并入。七年添建火药局。生产枪炮和弹药，系淮系的军火供应基地。

福州船政局。又称“马尾船政局”，简称“闽局”。同治五年闽浙总督左宗棠在福建福州马尾山下罗星塔创设。初期委任宁波海关税务司法国人日意格(Prosper Marie Giguel，1835—1886)、法国洋枪队头目德克碑为正副监督，总揽一切。所用机器及铁木等原材料也都从法国购进。创办经费为47万两，由闽海关关税的四成结款内拨付。拥有10多个生产单位，工人最多时达3000余人。主要制造军舰装备福建海军。是当时经营规模最大、设备齐全的新式轮船修造厂。从同治七年正式开工到光绪二十年甲午战争之前共造大小兵轮船34只。还附有主要培养制造和驾驶轮船人才的船政学堂(又称“求是堂艺局”)和专门培养技工的“艺圃”，造就了一大批绘图、设计、制造、驾驶、海军人才和各种技术工人。福州船政学堂是中国近代最早的一所海军学校。

天津机器制造局。简称“天津机器局”、“津局”。同治六年北洋三口通商大臣崇厚在天津创办。初名“军火机器总局”。由兼任丹麦驻天津领事的英商密妥士(Meadows，John Armstrong TayLor，1817—1875)任总管。同治九年，天津教案后，李鸿章接任直隶总督，接办该局，始称此名。并大力扩建，建立了东、西两局，规模仅次于江南制造总局。光绪二十一年改称“北洋机器制造局”。主要制造枪炮、弹药、水雷。所造军火，除供直隶一省淮练各军、轮炮各船外，还按时拨济吉林、奉天、察哈尔、热河及江南防水陆

淮军，已成为中国北方最大的军火供应基地。还附设有电报学堂、水雷学堂和水师学堂，以培养专门技术人才。

湖北枪炮厂。光绪十六年，湖广总督张之洞(1837—1909，字孝达，号香涛。直隶南皮人)把原在广州筹办的枪炮厂移至湖北汉口，添购机器，兴建厂房，在光绪二十年建成，次年开工。二十四年添设的炼钢厂和无烟火药厂，不久也并入枪炮厂。主要制造枪炮、子弹和火药。该厂规模宏大，机器先进，分设炮厂、枪厂、炮架、炮弹、枪弹5所，雇工约1200人，是洋务运动后期创办的最大、最有成效的军工企业。三十四年改称汉阳兵工厂。

这些近代军事工业，完全采取官办的方式。各局(厂)大体采用"衙门"式的经营管理，不是独立的企业单位，而是政府附属的一个分支机构。上有督抚、总理衙门的节制，主持和管理局(厂)务者为总办、会办，下设提调、委员、司事等，官府习气十足。经费全靠清政府从财政收入、主要是关税中支付。经营管理腐败落后，生产率很低，成本高昂，大部分经费用于支付薪水和工食。产品一般是由清政府调拨给各地驻军使用，不投放市场，不计产值。有些局(厂)中工人们还要遭受超经济的剥削和压迫，工人不完全是自由出卖劳动力的雇佣者，有的还对他们实行军事管制。因此，这些近代军事工业基本上还是属于封建性的官办工业。但是，这些官办工业大多采用机器生产，较多地采用了雇佣劳动，工人大多是从不同的地方招来的自由出卖劳动力的雇佣劳动者，他们的工资大体上是按照技术高低而决定。产品开始是一般由政府拨给军队，不计产值，也不投放市场，但80年代以后，这种现象逐渐有所改变，部分产品还是酌收一部分工本费，这就带有商品买卖的性质。此外，各局(厂)的生产还在一定程度上受到国际军火市场的影响。可见，生产还受到价值规律的一定制约。因此，这些近代军事工业又带有一定的资本主义性质。洋务派创办近代军事工业，开始具有镇压人民反抗的意图和作用，但后来抵御外侮的意图和作用明显。客观上对生产力的发展也具有某些积极作用。

(邱远猷)

借师助剿

清同治元年(1862)初清朝统治者确定的勾结外国资本主义侵略者，剿灭太平天国革命的反动方针。

"借师助剿"和"助清平叛"是中外反动派联合绞杀太平天国，确保半殖民地统治秩序的共同需要。早在咸丰二年(1852)太平军攻楚南时，清朝政府地方官吏就有人提出请洋人帮助守江的建议。当时，由于两江总督要到沿江阅兵而中止其事。三年二月太平军攻克南京、镇江前，江苏巡抚杨文定命令前同顺行行商、当时的买办官僚上海道台吴健彰向上海英、法、美领事乞援，要求外国兵船开入长江，帮助清军守卫南京城。最初外国侵略者感到清政府对他们还有很大猜疑；而太平天国革命来势迅猛，且借基督教发动和宣传革命、称外国人为"洋兄弟"，对其对待外国人的态度不甚摸底。于是答以"不助官亦不助贼"，暂时保持"中立"。而暗中英国侵略者开始帮助清政府运送军火和运输士兵，出售或租给清军以兵船和其它军事物资，进攻太平军；不许英商把大炮、火药、米粮等卖给太平军。美国让吴健彰雇用其轮船帮助清军进攻镇江。八月初五(9月7日)，上海小刀会起义，占领上海县城，吴健彰被俘，由美国公使派人带他逃出。中外反动势力勾结步步加紧。四年底，英、法、美侵略者联合清军镇压了小刀会起义。四年六月(7月)，广东红巾军起义，10余万人围攻广州。英、法、美侵略者以武器、粮米接济清军，红巾军统领兵马大元帅陈显良斥责了他们的干涉行为。四年和六年，英、法、美三国还在"中立"的幌子下，利用中国国内的政治危机，以干涉太平天国起义为诱饵，向清政府提出"修约"要求，以谋求侵略权益的扩大。浙江巡抚吉尔杭阿主张"请夷助剿"，但咸丰帝犹豫不决。十年，太平军进迫上海，苏省官绅众口同声"欲借英法两国夷兵剿贼"，并通过地方绅商的关系，聘用美国流氓华尔招集一批外国士兵，由英、美等国人为教练，武装以新式武器，进攻松江，并以此为基地，干涉太平军进攻上海。清廷默认此事。

第二次鸦片战争结束以后，特别是咸丰十一年"辛酉政变"以后，外国资本主义侵略者完成了他们对清政府"一打一拉"的计划；同时，通过访问天京、觐见天王，探得太平天国对外坚持独立自主的外交政策，严正拒绝请外国人帮助攻打清朝、平分中国的"建议"。于是完全撕下了"中立"的伪装，"愿为中国攻剿发逆"。在清政府方面，两江总督曾国藩、江苏巡抚薛焕(1815—1880)等人积极奏请清廷"借师助剿"，在中央的奕䜣、文祥等人，更是卑鄙无耻地直接向外国侵略者求救"借师"，一再向咸丰帝上奏说："发"(太平军)"捻"(捻军)是"心腹之害"，俄国和英国不过是"肘腋之忧"或"肢体之患"。力主"中外同心，以灭贼为志"。由于中外反动势力在第二次鸦片战争后迅速勾结起来，慈禧太后遂于同治元年正月

初十(2月8日),以同治帝名义发布了"上谕",宣布了"借师助剿"的决策。英、法等国侵略者对此表示欢迎,由其驻京公使正式向清政府声称:"情愿帮助官军剿贼。"二月十一日,清政府也正式表示赞同。就这样,从同治元年开始,中外反动派结成了反动的军事同盟,扑向太平天国。该年,清政府将美国人华尔统领的洋枪队扩编为"常胜军",后由英国军官戈登(Charles George Gordon,1833—1885)统领,配合李鸿章淮军向太平军反扑。浙江巡抚左宗棠与法国侵略者勾结,在宁波招募组成"常捷军",由法国军官勒伯勒东(Albert Édouard Le Brethon de Caligny,1833—1863)、买忒勒(Capt Tardif de Moidrey,1824—1863)、德克牌(Paul Alexandre Neveued' Aiguebelle,1831—1875)等统领,进攻绍兴、富阳、杭州、湖州等地太平军。在浙江组成"常安军"、"定胜军",由英国人葛格(Col Cooke,一译科克)统领,进攻浙江地区太平军。署直隶总督崇厚(1826—1893)在天津组成"天津洋枪队",由英国教官克酉(Captain Coney)任总教习,后由英国军官薄朗任总教官,与捻军对抗。上述洋枪队是外国侵略者武装干涉中国革命和清政府"借师助剿"的产物。清朝统治者在洋枪队的帮助和支持下,共同绞杀了前后坚持14年、势力扩展到18省的太平天国农民起义与捻军起义,维护了清王朝的封建统治,建立了半殖民地统治秩序,出现了所谓"中外和好""同治中兴"的局面。　(邱远猷)

天京解围战与"进北攻南"

清同治元年(1862)至二年,太平军为解除清军对天京(南京)的包围而进行的战斗。

自咸丰十一年八月(1861年9月)湘军攻占安庆和同治元年清政府确定"借师助剿"方针后,中外反动派的联合武装对太平天国发起全面反攻,太平军被迫左右两面受敌:西有反动派的主力湘军,东有浙江巡抚左宗棠统率的湘军、江苏巡抚李鸿章统率的淮军同外国侵略军的联合武装,完全丧失了战争的主动权。同治元年二月二十四日(3月24日),江苏布政使曾国荃率湘军主力自安庆顺江东下,先后攻陷巢县、和州、西梁山,继而与兵部侍郎彭玉麟所部湘军水师相配合,于四月二十日越过芜湖,攻陷金柱关、东梁山,二十八日进至江宁镇之板桥。九日后,陷秣陵关、大胜关、三汊河,直逼雨花台,距天京城不及千里。与此同时,彭玉麟水师由金柱关东下,五月初攻占头关、江心洲、蒲包洲,进泊天京之护城河口,使天京处于湘军的直接威胁之下。在此形势下,洪秀全一日三诏催令正在进攻上海的李秀成迅速回援,李秀成只得停止进攻上海,回到苏州,于五月二十六日,召集各将领商讨救京之策,参加会议的有听王陈炳文、慕王谭绍光、纳王郜永宽、孝王胡鼎文、航王唐正才、相王陈潘武等人。会议讨论结果认为湘军气势正盛,立即与之交锋,很难取胜。主张暂取守势,待湘军24个月后久住而惰,战斗意志薄弱、疲惫厌战之时,再回师与战则可一鼓解围。于是李秀成先将苏州的财物、米粮、军火解送天京,以利固守;同时派开朝王宗李明成率一部分兵力赶回天京,加强防务。但天王不同意这次军事会议的主张,恰值六月十五日,天京西南屏障宁国府被浙江提督鲍超部攻陷,使天京外围形势更趋严重,于是洪秀全再颁严诏催令李秀成立即回救天京,甚至谓"若不遵诏,国法难容",于是李秀成于七月十一日,邀集护王陈坤书、辅王杨辅清、堵王黄文金、襄王刘官芳、奉王古隆贤、来王陆顺得等在苏州召开第二次军事会议,决定联合13个王的部队,约三、四十万人,分兵三路:南路由杨辅清、黄文金等进攻皖南宁国,牵制敌人的增援部队;中路由护王陈坤书等攻芜湖金柱关,截断敌军粮道;北路由李秀成和侍王李世贤率主力军进攻天京城外的敌军。太平军作战极为英勇,湘军"洋枪洋炮,骤若飞蝗",并暗掘地道,百计环攻。太平军冒烽烟直上,排炮雷轰,呼声动地,踊跃争先,"前者拽尸,后者更进",致使湘军伤亡5000余人,曾国荃的面部亦被打伤。曾国藩说他自己"心已用烂,胆已惊破",承认此战系"军兴以来未有如此之苦战也"。但是从闰八月二十日直到十月初五,太平军大战45天,始终未能攻破曾国荃大营。李秀成只得停止进攻,撤到天京城内,13王回援天京的作战宣告失败。

正面进攻失利后,洪秀全又命令李秀成执行"进北攻南"的战略计划,即渡江北攻,进军安徽、湖北,夺取武汉,调动围攻天京的湘军主力回援江北,解天京之围。佯为进北,实为拱卫天京。十月初十,李秀成遵令,命章王林绍璋、对王洪春元(?—约1863)、纳王郜永宽以及忠二殿下李容发率第一批部队数万人自天京下关至九洑洲,准备北进。十月十七日起,太平军渡江北上,先后占领安徽含山、巢县、和州,连克铜城闸、运漕镇和东关等要地。当时,曾国藩已识破太平军北进意图,因此命曾国荃坚守雨花台大营,保持紧围天京的战略计划不变;同时调军入皖,堵截太平军。李秀成对此次进兵计划不十分赞同,一直拖到同治二年正月初十(2月27日),才会同陈坤书第二

批部队数万人渡江。二月初三占领浦口，十六日占领江浦，三月二十四日进逼六安。当时正值青黄不接，粮食奇缺，加之敌军堵截甚严，李秀成被迫于四月初二撤六安之围，折往寿州，随即折回，退守江浦、浦口。至此，“进北攻南”失败，非但没有达到解救天京的目的，而且李秀成率领的十几万大军经过战死、饿死、病死，仅剩下四、五万人，一蹶不振，加速了太平天国最后失败的到来。（殷常符）

洋务学堂之兴办

19世纪60至90年代前期，清政府洋务派官僚为适应外交事务和洋务运动发展需要，相继创办一批新式学堂。咸丰十年十二月（1861年1月）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在北京设立以后，恭亲王奕䜣为培养通晓外语的洋务人才，正式奏请培养翻译人员。同治元年（1862），奕䜣在英国人威妥玛的帮助下，延请英籍教士包尔腾（Burdon John Shaw，1826—1907）充任教习。同治元年七月（1862年8月）在北京正式设立同文馆，为北京总理各国事务衙门的附属机构。京师同文馆是洋务派创建的一所新式学堂，清末设立的第一个官办外语学校。先只有英文、德文、日文等班。招收条件初为招收十三、四岁以下八旗子弟；后又招收有功名的满、汉学员。学习期限最初定为3年，到光绪二年（1876）分为五年和八年两种。课程最初只设英、法、俄、汉文，同治六年（1867）后又设算学、化学、万国公法、医学生理、天文、物理、外国史地等。除汉文由中国人任教外，其他课程多为外国人担任。该馆被外国人操纵，总税务司英国人赫德实际操纵着经费、人事和教学计划，美国传教士丁韪良（William Alexander Parsons Martin，1827—1916）任总教习长达20余年（1869—1894），总管教务。该馆设有印刷所，译印数、理、化、历史、语文等书籍。同文馆自同治元年开设算学。建馆以后，课程大为扩充，制度渐趋健全，师生人数也逐渐增加，它实际上已由一所外语学校发展成为一所近代化的多科的外语和科技学校了。同文馆每3年举行一次大考，择优保奏官职。光绪二十七年十二月二日（1902年1月11日），并入京师大学堂，属隶外务部。奕䜣奏设同文馆之初，得到江苏巡抚洋务派要员李鸿章等人的极力支持。李鸿章也深感在外交事务中因没有自己的真正通晓外国语言文字的译员而常受人欺弄，主张在洋人总汇之地的上海、广州设馆培养翻译人才。于是，在同治二年仿照北京同文馆，在上海创设学习外国语言文字学馆，称“广方言馆”，亦称“上海同文馆”，选拔江浙地区14岁以下颖悟端静的儿童入馆学习外国语文和自然科学。初分英、法文两班，后又设日、俄文班。3年毕业，派充翻译，并择优保送调京考试授职。同治八年移入江南制造总局，成为局内附设的一所西式学堂。光绪三十一年改为兵工专门学堂及中学堂。此外，经李鸿章奏请，由署两广总督晏端等人经办，仿照上海例，于同治三年创立广方同文馆，又称“广州同文馆”，选派协领王镇雄为该馆提调，谈广枬等为馆长。招收14至20岁之间的满汉学生，也收20岁以上有科举功名的学员。先设算学班，后又设法、德文班。3年毕业，派充各衙门翻译。与此同时，洋务派还创办了一批专门培养科技、军事、医务、制造、矿务等方面人才的学校。例如，江南制造局附设机械学校，同治五年马尾船政局附设船政学堂，光绪五年创办的天津电报学堂，六年创设的天津北洋水师学堂，十一年创办的天津武备学堂，十三年创设的广东陆师学堂和水师学堂，十六年创立南京水师学堂，十八年湖北铁路局附设化学堂、矿学堂，十九年创办天津军医学堂、江南水师学堂，二十年创办湖北自强学堂，二十一年创办湖北武备学堂，等等。其中，闽浙总督左宗棠创办的福州船政学堂，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李鸿章奏请创办的天津北洋水师学堂，湖广总督张之洞奏请创办的自强学堂，最有影响。以上这些学堂的建立，为西学在中国的传播奠定了一定的基础，培养了不少近代军事、技术和外语等人才，为我国近代化教育提供了模式，从而促进了新式文化和教育事业的发展。但是，这些学堂是以培养外交、翻译和军事技术人才为中心的，是洋务派“自强”、“求富”活动的重要组成部分，因而被各个洋务集团据为私有物，使之带有浓厚的军事色彩和一定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因素。（邱远猷）

太平军西北远征

清咸丰十一年底至同治三年初（1862—1864），太平军为恢复安庆而进军西北的战略行动。

咸丰十一年八月，安庆失守后，安徽腹地桐城、池州府（贵池）、无为州等地相继失守，使天京与庐州（合肥）间的联系被切断。九月太平天国军粮集中地运漕镇被敌人占领，损失粮食2000多石。继而军事重镇东关以及楚、皖间重镇宿松、英山、蕲州也先后失守，致使安徽根据地为之动摇。为了恢复安庆，陈玉成决定进军西北，远征豫、陕，以便广招兵马，早复皖省。自己则坐镇庐州，经略皖北，等待进取之机。咸丰十一年底，扶王陈得才（？—1864）、遵王赖文光、

启王梁成富（？—1865）、祜王蓝成春（？—1864）率领西北远征军3万余人自庐州出发，渡淮河进逼颍州。同治元年正月十四日（2月12日）攻河南新蔡，三月十九日入陕西，攻商南县城不克。接着太平军日夜兼程，出武关，过孝义，四月十九日，进至咸宁县三兆，逼近西安。当时陕西清军调赴他省，营务空虚，正当西安唾手可得之际，从庐州传来不幸消息：陈玉成在寿州被苗沛霖诱执。陈得才为了营救陈玉成，被迫放弃攻取西安的计划，急率大军东归，回救陈玉成。但未及救援，陈玉成已殉国。天王洪秀全命李秀成节制西北远征军。陈得才奉命到苏州，李秀成当面命令陈得才再征西北，招足人马，限24个月回来解救京城。陈得才、梁成富、赖文光、蓝成春等率军于十月经河南入湖北，抢渡汉水，越武当山，向陕南进军。同治二年正月十四日，陈得才等放弃攻占的兴安府，直捣汉中，一路攻无不克，战无不胜，二月中旬逼近汉中府城，并分军围攻城固县城。陈得才等一面包围汉中，开掘长堑，灌水围困城中之敌；一面分军到农村中去发展势力，南郑、城固、沔县、褒城一带，均为太平军所控制，广大贫苦农民纷纷响应。八月二十日，太平军猛攻汉中府城，阵斩清总兵贺兰桂、萧庆泗、何玉林、副将李凯章等，尽得其辎重。是日，城克，斩护汉中镇总兵陈天柱、知县周蕃寿等。二十四日，占领城固县城。此后陈得才、赖文光、蓝成春等驻汉中、城固，并分军驻守新集、黄官岭、西乡、洋县、镇安等城镇，多次击败清军及地方团练，摧毁了清王朝地方政权，太平军在陕南盆地建立起临时根据地。此时，天京告急，陈得才等立即在同治三年正月初三，分三路东援天京：陈得才、赖文光、蓝成春等为北路，由宁陕（宁陕县之北）出镇安、山阳、商州；梁成富，蓝二顺等为中路，由石泉、汉阴出兴安、郧阳；马融和、邱远才（？—1868）等为南路，由西乡出紫阳、砖坪厅、平利、竹山，约定至河南南阳、湖北襄阳会齐。但西北远征军未至，而天京城陷。远征军中一部分成为太平天国失败后坚持革命斗争的主力军。　（殷常符）

石达开兵败大渡河

清同治二年（1863），分裂出走的太平天国翼王石达开在大渡河全军覆没的历史事件。

石达开自咸丰七年（1857）五月离京出走后，转战江西、浙江、福建、湘南、广西、贵州、云南、四川等地。在长期孤军流动和清军围追堵截下，力量逐渐削弱，特别是咸丰十年彭大顺、童容海、朱衣点等率10余万太平军离他而去、重返天京以后，势力更孤，日益众叛亲离。同治二年春，他决定再次进军四川，准备渡过大渡河，直取成都。三月二十五日（5月12日），率领三、四万人自云南昭通进入四川宁远府境，欲由此北上，渡过大渡河。因侦知越嶲大路已有敌军扼守，便以土人为向导，绕经冕宁，抄小路北上。三月二十七日到达紫打地渡口（安顺场）。紫打地在松林河和大渡河的交汇处，前有大渡河，西有松林河，东为老鸦漩河，背后是万仞高山，是个易进难退的绝地。当时四川总督骆秉章与布政使刘蓉早已沿大渡河加强了布防：署雅州府（雅安）知府蔡步钟就近募勇，配合总兵唐友耕（？—1882）等部扼守北岸庆安坝至万工堰小渡口；土司千户王应元率土兵扼守松林河；东面有土司岭承恩及越嶲营参将杨应刚率兵勇把守；南面的山径险路也被岑承恩砍倒千年古树堵塞，又有游击王松林的兵勇在筲箕湾等处堵截。石达开四面受敌，别无出路，只得冒险强渡大渡河。二十八日晨河水陡涨，暂不得渡，直到三十日水位稍稍下降后，才开始抢渡。四月初四，石达开以数千人乘木船竹筏100余条抢渡，由于水势凶猛，清军又在北岸猛烈轰击，有的船筏被击中，火药箱爆炸，有的触礁，或被急流冲走沉没，抢渡失败。石达开又决定抢渡松林河，该河宽约二三丈，原有铁索桥，但已被土司千户王应元拆除，只能依靠船筏抢渡。石达开选择铁索桥附近的磨房沟为抢渡地点，先选派勇士泅水乘夜色偷渡，被对岸王应元部以长枪猛刺截回。石达开遂下令赶造船筏，用链环首尾连接，防止船筏被河水冲走。四月十七日，以数船相连，船上覆盖木板，令贾维扬率健卒500人，向对岸划去，忽然中间链环折断，船上健卒呼喊救援，王应元闻之，以枪炮轰击，渡船沉没，贾维扬落水淹死。第二次抢渡又告失败。十九日，石达开致书王应元，要求罢兵让路，“敦义讲和”。王表示要“一战必尽”，决不让路。石达开处境更加困难，军中无粮，宰马为食，但他仍表示“纵死涐江（大渡河，古名涐江）定不降”。谋士曹卧虎建议石亲自率部东行，由海棠大道突围南行。石达开犹豫未决，而敌军已逼近，二十五日石被迫率余部7000余人东走，取道岩埇，因道路狭窄，行军困难；后有王应元部尾随追击；又遭北岸清军周岐源部长枪袭击；过山地又遭山上敌兵用乱石、树干滚击，因此当石达开军仅前行20里到达小河村庄时，队伍已损失十分之五、六。是夜被敌军围困，其时粮草全无，士兵饥饿难忍，斗志全消，石达开陷入绝境。清军乘机劝降，竖立“投降免死”大旗。石达开毅然下令让妻妾五人携二子投河自尽，又致书骆秉章，表示自己愿意自刎，以

换取清朝皇帝的宏施大度，格外赦免其部下，将其部下或整编为军，或遣放为民，不得欺凌，有才干者则应按官授职，量才擢用。都司王松林和参将杨应刚来到石达开营中，赌咒发誓，表示接受石达开的要求。四月二十七日，石达开率宰辅曾仕和、中丞黄再忠、恩赏丞相韦普成及其五岁幼子石定忠随王松林到洗马姑清营，立即被擒。五月初三，石达开被押送成都。次日，清军将石达开部将200余员、战士2000余人在大树堡集体围杀净尽。石达开"舍命以安三军"的幻想破灭，被押送至成都凌迟处死。石走向刑场时，神色湛然，坚强之气，溢于颜面。临刑之际，神色怡然，时年33岁。有人云："真奇男子也。"（殷常荷）

太平军苏、浙保卫战

清同治二年四月至三年四月（1863年6月—1864年5月）太平军保卫苏、浙根据地的战争。

咸丰十一年（1861）秋安庆失守后，太平天国军事形势急转直下。同治元年正月初一（1月30日），清廷命两江总督曾国藩为协办大学士，统辖苏、赣、皖、浙四省军务。曾国藩消灭太平天国的战略计划共分三步：第一步攻取武汉；第二步攻取安庆；第三步进取江宁（南京）。在前两步实现后，他又确定了以进攻江宁为主要目标的全盘军事计划：新任江苏布政使曾国荃率湘军2万（后增至5万）自安庆直趋江宁；浙江巡抚左宗棠率所部湘军及部分赣军、浙军共约2万余人全力进攻浙江；署理江苏巡抚李鸿章率淮军约6500人会同外国侵略者进攻江苏，另有其他各路进攻安徽等地。此时太平军既要以强大兵力守卫天京，又要保卫苏、浙根据地，陷于两面受敌的被动局面。至同治二年春，苏、浙形势开始恶化。

在江苏战场，自同治元年五月李秀成第二次进攻上海撤兵以后，外国侵略者加强军力，转守为攻。二年三月十四日（5月1日），戈登率领常胜军（原常胜军首领华尔于同治元年八月被太平军击毙，后曾几易统领）攻占太仓，四月十五日淮军及常胜军占领昆山。接着，李鸿章制定了三路进攻苏州的方案：参将程学启统中路从昆山直趋苏州；李鸿章及总兵刘铭传（1836—1895）统北路从常熟进攻江阴、无锡；总兵李朝斌率太湖水师十营为南路，从泖淀湖攻吴江、平望、太湖，切断太平军进援的道路。常胜军驻昆山为预备队。五月二十二日李秀成自天京到达苏州，部署谭绍光主持苏南军务后，又返回天京。同天，北路淮军开始进攻江阴，八月初一得手，接着便分数路进攻无锡。十二日，郭松林部由无锡东面的东亭，进扑新塘桥，前锋抵达无锡南门外。同时，中路淮军因南路李朝斌部尚未到达，改变直取苏州计划，会同常胜军在六月十四日攻陷吴江，截断了浙江太平军援救苏州的必由之路。七月初九，程学启部攻占了太平军在太湖东洞庭山的营垒，逼近苏州。八月十一日，李秀成抵苏州，本欲召集各路将领商讨"合力解京围"的对策。但常州守将陈坤书、无锡守将黄子隆（？—1864）均未应约前来，也未发兵会师。李秀成只得督军向围攻无锡的李鸿章、刘铭传等部淮军发起进攻，结果损兵折将，难解苏州、无锡外围之敌。十月十七日，戈登率队夜袭苏州娄门外石垒栅寨，慕王谭绍光身先士卒，跣足赤膊督战，奋勇无比，给敌军以重大杀伤。敌军又在苏州护城河上架起浮桥，越河进攻，城外东、南、西三面的防御工事全被攻毁，直逼城下。清参将程学启是安庆保卫战中降清的叛徒。十八日，他与苏州守将康王汪安钧（？—1863），在阳澄湖畔秘密议降，商定清军进城后保全愿意投降的康王汪安钧、纳王部永宽、比王伍贵文、宁王周文佳（？—1863）、天将汪有为、范起发、张大洲、汪怀武等八人的生命，条件是他们交出一个城门。李秀成对叛变阴谋本已有所察觉，但听之任之，未予处理。他见苏州危不可救，又于十月二十日离城而去，由谭绍光坚守危城。十月二十四日，谭绍光召集上述八人会议，意欲遏止叛变。汪安钧突然抽出短剑刺向谭绍光，其余几个人把谭拉下座位，由汪有为割下首级。随即开城门降敌，苏州遂陷。但是八个叛徒仍不能为清朝所谅，两天后，均被李鸿章处死。十一月初二，无锡失陷，黄子隆被俘遇害。清军乘胜进攻常州。十一月初五，李鸿章到达无锡，对进攻常州作了部署。十五日，淮军将领刘铭传、周盛波部兵临常州城下。同治三年正月二十四日，戈登率常胜军攻陷宜兴，截断了浙江太平军北援之路。二月初一，溧阳守将降敌，常州南路被敌切断。到三月十八日，常州城外的据点尽失，太平军全部退到城内。三月二十二日，大南门、小南门和北门城墙被淮军轰塌数处，太平军顽强抵抗，多次击退敌人冲锋。淮军在城壕外构筑长墙，晚间又在护城河上偷架浮桥。四月初五，淮军发起总攻，以大炮猛烈轰击缺口。初六，南城、北城各被轰塌10余丈，淮军冲入城内。守城太平军与敌人展开激烈巷战，护王陈坤书身先士卒，在护王府门前，太平军战士全部牺牲，他单独一人和大批敌人鏖战。被俘后昂然直立，拒不投降，光荣殉国。初八，丹阳亦失陷。至此，苏南各城全部被清军攻陷。

在浙江战场，中外反动势力从东西两方面夹击

浙江太平军。浙东方面，清军与英法侵略军于同治元年四月十二日攻陷宁波。八月二十八日，华尔统率常胜军千人攻占慈溪，太平军英勇回击，华尔伤重毙命。同治二年正月二十六日，中外反动联军占领绍兴。二月初二，占领萧山，前锋直逼杭州城下。浙西方面，新任浙江巡抚左宗棠于同治元年正月率部由皖入浙，先后占领开化、常山、遂安、江山、严州等地。同治二年春，湘军又连陷汤溪、龙游、兰溪、金华、武义、永康、东阳、义乌、诸暨、桐庐等地。二月初六开始进攻杭州西南的富阳。富阳是湘军进攻杭州的必经之地，太平军坚守了五个月，直至八月初八才失陷。富阳既失，湘军沿钱塘江直逼杭州，且分军围攻余杭，以切断杭州太平军后路。同治三年二月十八日，嘉兴失守，杭州陷于敌军三面攻击之下。二十一日，湘军在中法混合组成的常捷军的配合下，猛攻杭州，轰塌凤山门城垛约三丈，敌军乘势冲入，被太平军打退。二月二十三日，敌军猛攻武林、钱塘、凤山、望江、清泰等门。当天晚上，听王陈炳文率部逃往德清。二十四日，比王钱桂仁(？—1866)投降，杭州沦陷。同日，康王汪海洋(约1830—1866)弃余杭北走。三月初九，李世贤会同陈炳文、汪海洋、黄呈忠(1826—？)、陆顺德(？—1865)等，自德清抵浙西昌化，拟离浙入皖。至此，浙江全省基本上为湘军占领。苏南与浙江根据地的丧失，使天京失去了东南屏障，天京形势更趋危急。

(殷常符)

“李(泰国)—阿(思本)舰队”事件

清同治二年(1863)英国侵略者利用清政府最初筹建近代海军之机妄图控制中国海军的事件。

咸丰十年(1860)，清政府根据洋务派官僚的建议，近期为了镇压太平天国运动、长期也为了防范外来侵略与“巡缉私贩之用”，在编制陆军的同时，也开始了购买火轮船、创办近代海军的活动。外国侵略者认为这是抓取中国海军指挥权的好机会。同治元年署理中国海关总税务司的英国侵略分子赫德(Robert Hart，1835—1911)，趁机向清政府表示，愿意“帮助”中国筹建近代海军。他说：中国现有的两只火轮船“并非打仗之船”，而英国火轮船“价减而佳”，提出愿帮助清廷购买。湘系洋务集团曾国藩等人求之不得，说：“购买外国洋船炮”是“今日第一要务”。最后清政府与赫德商定：向英国购买兵船7艘(中号兵船3艘，小号兵船4艘)，另有趸船1艘和一部分军火；由总理衙门从各海口抽税银凑齐80万两；由正请假回英国休假养伤(被太平军击伤)的、清政府海关总务司英国侵略分子李泰国代清政府在英国购买舰船和枪炮。此间，为了把这支海军控制在自己手里，曾国藩、曾国荃兄弟经清政府同意拟派巡湖营提督衔记名总兵蔡国祥为统领(司令)，物色了水勇，准备轮船一到，“操纵自如，指麾由我”。但是，英国政府批准李泰国为清政府建立“欧洲海军舰队”的计划，却安排英国海军大佐阿思本(Sherrard Osborne，1822—1875)担任所谓“英中联合舰队”(又称“阿思本舰队”、“欧洲舰队”、“吸血舰队”)总司令；并发布法令授权李泰国、阿思本“征募官兵和整装战舰”。李泰国遵照英国政府旨意，妄图充当中国皇帝的“代表”和“唯一的海军大臣”，在英国购船，滥施权力。将买船经费从80万两增至107万两；还擅自在英国为中国海军招募600名军官和水手；为“英中联合舰队”制成军旗；并于同治元年十一月二十七日(1863年1月16日)，以清政府代表身分同阿思本订立合同13条。合同规定由阿思本为舰队总司令，统领中国所置兵船(共7艘)，助剿太平军，定期4年，一切由李泰国从中负责，阿思本全权指挥，不直接接受清朝政府的命令。这表明从一开始，外国侵略者就企图控制中国的海军。二年八月(9月)间，这支具有很大特权的“英中联合舰队”开到上海。清政府官员得知后不胜诧异。总理衙门大臣奕䜣准备修改章程迁就接受。湘系军阀曾国藩、曾国荃兄弟和淮系军阀李鸿章等人，因未抓到这支海军的控制权而表示反对。清政府坚持派总兵蔡国祥为统领，只委派阿思本为帮统，并限令这支舰队接受所在地区的督抚节制和调遣。李泰国、阿思本拒绝接受，形成僵局。另外，美、法、俄等国公使也不愿英人取得中国海军统率权。九月下旬，清政府害怕接受这支舰队，将激起湘、淮军兵变以及带来所建海军受制于英人的后患，决定解散舰队，全部兵船遣回英国。九月二十五日，清政府总理衙门与李泰国、阿思本订立撤退兵船字单，订明兵舰撤回卖价交还中国，另赏给阿思本银1万两，令其将舰队开回英国变卖。阿思本即离北京。十月初五，清政府为洗刷这桩组建舰队的耻辱，革退李泰国总税务司职务。兵船后在印度出售，因变卖时金额尚不够“遣散”的费用，清政府又懊丧地拿出37万两银子才算了结。清政府在这次购船活动中，前前后后共花了白银160多万两，到头来却银船两空。清政府最初建立近代海军的计划宣告破产。

(邱远猷)

天京沦陷

清同治三年六月(1864年7月)太平天国都城天京(南京)被湘军攻陷的历史事件。

太平军"进北攻南"以解京围的作战失利后,天京形势已岌岌可危,特别是在同治二年十月下旬(12月)苏州失陷后,天京沦陷已成定局,剩下的只是时间问题。同治二年四月二十七日(6月13日),曾国荃率湘军攻占了天京聚宝门外的各石垒。洪秀全急令忠王李秀成自苏州前线迅速返回天京。五月初五李秀成抵京。初十湘军攻陷江浦、浦口,十五日湘军攻陷九洑洲,长江北岸完全被湘军占领。随后鲍超部渡江,扎营神策门外沿江一带,曾国荃部攻占了天京东南的上方桥和城西南的江东桥,又连续攻占了城东南的上方门、高桥门、双桥门、七桥瓮以及秣陵关、中和桥,太平军在紫金山西南的要点全部失守。十月十五日湘军进扎城东孝陵卫。这时,天京只有太平门、神策门尚与外界相通,危在旦夕。十一月十一日李秀成向洪秀全提出"让城别走"的建议:鉴于湘军壕深垒固,围困甚严,天京内无粮草,外救不至,不如暂时放弃天京,实行战略退却,率部转移至内地,保存力量,等待时机,再图发展。在当时来说,这是唯一的出路。因为当时天京尚未完全中断与城外的联系,突围有望;在各地的太平军尚有数十万之众,在天王的号召下,集中起来,重整旗鼓,仍有可能打出一个新的局面。可是,洪秀全对天京恋恋不舍,没有勇气和毅力实行战略退却;且又迷信愚昧,刚愎自用,断然拒绝,严厉责斥李秀成,自称奉上帝及天兄圣旨,下凡做天下万国之真主,是"铁桶江山",你不扶助,自有人扶助,"何惧之有"?致使太平天国事业丧失了最后一线希望。同治三年正月二十一日(2月28日),天京城外制高点紫金山巅的天保城失陷。二十四日,曾国荃部进驻太平门、神策门外,对天京形成合围。城中粮食断绝,洪秀全带头吃草,全城靠野草度日。四月下旬,洪秀全在病重期间还下令:坚决"保固天京"。二十九日,洪秀全病逝。五月初三,天王长子洪天贵福(1849—1864)被全朝文武拥戴即位,称幼天王,时年16岁。三十日,太平门外要塞地保城失陷,湘军在此修筑炮台数十座,还在附近距城十几丈处日夜挖掘地道,准备轰城。六月十五日深夜,李秀成选派1000余人伪装湘军,冲出城去,企图破坏太平门附近的地道,结果被湘军识破,退回城内。十六日中午,湘军以地雷轰城,城墙被轰开20多丈的缺口,湘军蜂拥而入。当时城中太平军不过万人,能作战的不过三四千人,而敌人攻城部队有5万多人,太平军以少击多,高呼:"弗留半片烂布与妖享用",与冲进城的敌人展开激烈的肉搏战,为太平天国革命事业流尽了最后一滴血。及至傍晚,天京沦陷。湘军入城后,进行了疯狂的烧杀淫掠,公私财物被洗劫一空,全城一片火海,大火连烧十余日。大屠杀也持续了十余日,甚至连二三岁的幼儿也难幸免,40岁以下的妇女一个不剩,老者无不负伤,哀号之声达于四远。曾国藩自称共杀天京军民10余万人,此显系谎报战功,因天京守城军民仅3万人,但杀戮极为残酷确系事实,以致"尸骸塞路,臭不可闻"。在这场浩劫中,受辱最甚的是妇女,她们遭到湘军的肆意糟蹋和奸淫。经过这场浩劫,繁华的天京城变成一片废墟。天京沦陷,标志着太平天国农民战争的失败。太平天国虽然失败了,但它的历史功绩却永彪史册。

(殷常符)

李秀成之死

清同治三年(1864),太平天国将领李秀成被俘死难的历史事件。

李秀成(1823—1864),或作寿成,原名以文。广西藤县人。贫农出身。自幼种地耕山,帮工就食,艰难度日。道光二十八(1848)、二十九年间加入拜上帝会。咸丰元年八月(1851年9月),太平军进军永安,路经藤县时他参加太平军,历任军帅、丞相、副掌率等职。太平天国后期与陈玉成同主军政,对扭转因杨韦事变造成的不利局面做出了贡献。九年晋封忠王,次年参与指挥再破江南大营,解救天京之围;又乘胜进军苏、常,开辟江浙,成为太平天国后期的主要根据地。后与陈玉成奉命第二次西征,以解安庆之围,结果失败。李还两次进攻上海,指挥天京解围战,执行洪秀全"进北攻南"战略,均未成功。同治二年苏州失陷后,回守天京。在天京沦陷前夕,向洪秀全提出"让城别走"建议,遭拒绝。同治三年六月十六日(7月19日)天京陷落,他率军千余人,携幼天王洪天贵福奔向旱西门,企图突围出城,为湘军陈湜(?—1896)部所阻,只得转上清凉山。突围时,见幼天王无好马,便让幼天王骑上自己的战马,自己骑劣马。后在敌人追赶下,与幼天王失散。十九日,在方山被奸民陶大来等抓住,送至清军提督萧孚泗(?—1884)军营。次日,曾国荃亲自审讯,并喝令兵勇用刀锥直刺李秀成臂股,鲜血直流。曾国荃见硬的不行,即令曾国藩的幕僚赵烈文软化李秀成。赵烈文观察李秀成有乞活之意,对李说:"汝罪大,当听中旨,此亦非

统帅所得主也。"二十五日,曾国藩自安庆到江宁(南京),亲自讯问过李秀成两次之后,也说李有乞恩之意。审讯中曾国藩说:是否处死,"要听旨,连日正踟蹰此事,俟定见后再相复"。并令李秀成书写供词。于是,李秀成从六月二十七日起赶写了一篇六万余字的笔供(即《李秀成自述》)。《自述》记述了太平天国的历史和他本人的战绩,总结了太平天国失败的教训,是研究太平天国和李秀成个人历史的重要资料。《自述》提出"天朝十误",认为太平天国所以失败,是由于犯了十大错误,其中包含有不少正确的见地。此外,提出了"防鬼反为先"的主张,劝曾国藩把反对外国侵略者放在首要地位,表现了他反侵略的爱国思想。同时,由于他在与外国侵略者作战中,感受到落后的刀枪、土炮很难战胜外国侵略者,因此提出向敌人学习制造新式武器,购买洋炮,"寻好匠人,照其样式,一一制造"的方案,表现了他不固执鄙习的开放眼光。但是,由于李秀成对曾国藩抱有很大幻想,在"主死国亡"的情况下,对前途失去信心。因此《自述》中多处贬损自己,谀颂敌人。他吹捧曾国藩"恩深量广"、"仁爱惠四方","恩德巍峨"、"铭刻不忘,今世已误,来生愿图报";又贬斥太平天国说:"何生天王而乱天下,何我不才而佐他乎",甚至向敌人提出"收齐章程",吁请曾国藩"亭(停)刀勿杀",要用仁爱平定天下,表示愿意劝说太平军余部向清朝缴械投诚,企图以此换取曾国藩保全其数十万部下性命;自己也能得到"恩赦",保全活命;并争取曾国藩从事反侵略斗争。晚节不忠,是他一生中最大的污点。但是这位农民将领的天真幻想,很快被冷酷的现实碰得粉碎。七月初六,他写完《自述》后,等待他的不是活路,而是刑场,当日即被曾国藩处死。时年40岁。

(殷常符)

《中俄勘分西北界约记》签订

《中俄勘分西北界约记》,清同治三年(1864)沙俄强迫清政府于塔城签订的不平等条约。

在清朝,中国西部疆界在巴尔喀什湖。19世纪初,沙俄在中亚进行殖民扩张的同时就开始觊觎中国西部地区。清道光十一年(1831)沙俄西伯利亚和亚洲问题委员会讨论决定,把俄国的边界推进到中国的斋桑湖,直至卡伦线。二十六至二十七年,沙俄武装侵占了巴尔喀什湖东南的喀拉塔勒河、伊犁河等七河地区。咸丰四年(1854)又强占阿拉木图,把伊犁河下游一带据为己有。沙俄在武力强占中国西部大片领土并为进一步扩大侵略做好准备的情况下,就援引咸丰十年中俄《北京条约》第2条关于中俄西部边界走向的规定,逼迫清政府订约割地。十一年十二月沙皇亚力山大二世任命沙俄从西部入侵中国的鄂木斯克军团军官巴布科夫(Бабков　И. ф. 1827—1905)上校为对华谈判代表,并指示他:谈判只能一丝不苟地执行中俄《北京条约》,坚持以中国"常驻卡伦"为界,强迫清政府接受俄国的划界方案。巴布科夫派出军队强占伊犁、塔城地区中国常驻卡伦西侧的战略要地,阻止中国军队出常设卡伦查边;并派人非法进入斋桑湖、额尔齐斯河和伊塞克湖周围进行测量、绘制地图,设立哨所、垒石立界,作为划界谈判的所谓依据。同治元年七月初八(1862年8月3日)俄方代表巴布科夫与中方代表乌里雅苏台将军明谊、塔尔巴哈台参赞大臣明绪,在塔城举行勘分西北边界的谈判。巴布科夫坚持"不论中华边界,只以常驻卡伦为界"的无理要求。明谊严加驳斥:"常驻卡伦"根本不是中国的国境线,就是按照中俄《北京条约》第2条规定,中、俄两国也"应顺山岭大河之流"划界;斋桑湖和特克斯河上游等地仍属中国,俄国无权强求。俄方代表理屈词穷,但横加破坏,致使谈判中断。同治三年九月,清政府处于外有沙俄大军压境、内有新疆回民反清举事的形势下,再次与沙俄在塔城谈判。在沙俄武力威胁和政治讹诈下,三年九月七日(10月7日),清政府被迫签订了《中俄勘分西北界约记》。通过《中俄北京条约》和《中俄勘分西北界约记》,沙俄将中国西境的3个大湖——巴尔喀什湖、斋桑湖和伊塞克湖,连同周围广大地区,共达44万多平方公里的领土占为己有。　(邱远猷)

近代海军之组建

19世纪60至80年代,清政府为防范列强欺凌,先后组建3支近代化海军。

晚清近代海军建设大体经历了三个阶段:一、晚清第一支海军的建立。19世纪60年代初,西方国家的军舰制造和武器装备有了新的发展。加上两次鸦片战争失败的教训,清朝统治者才大梦初醒,开始议办海军。其目的主要是为了防范外来的侵略。清政府购买船炮以建立近代化海军的初次尝试失败后,洋务派的代表人物立即开始了自设船厂造船和筹建海军的活动。同治五年五月十三日(1866年6月25日),时任闽浙总督的左宗棠上疏反复向清廷陈述不造轮船就无法抵御列强侵略并与洋商争利权的道理,提出了"整顿水师"和"设局监造轮船"的建议和方案,成为筹建近代化海军的开端。六月初三,清廷

批准了左宗棠的计划，在福州马尾设了福州船政局（又名马尾船政局）。八月，左宗棠得知即将调任陕甘总督时，为了继续控制船政，特奏请派江西巡抚沈葆桢（1820—1879）继任闽浙总督兼福州船政大臣。沈继任后继续经营筹备。六年十二月二十四日（1868年1月18日）正式开工造船。八年五月初一（6月10日）所造第一艘1450吨的"万年青"号下水。闽局的设立与发展为晚清第一支海军的建立奠定了基础。到同治十三年福州船政局先后共建造舰船15只。九年八月二十五日（9月20日），清政府允船政大臣沈葆桢等奏，简派福建水师提督李成谋为轮船统领。这是晚清海军有舰队官制之始。十年二月二十一日（4月10日）清政府又批准了闽省上报的、仿照西方各国海军兵船条例，参照中国水师营制而制定的《轮船出洋训练章程》和《轮船营规》。这些标志着晚清第一支海军的建立。因主要驻泊于福建海域，故称福建海军。二、"海防议"与晚清海军的初步发展。同治十三年，日本发兵侵占台湾事件发生，朝野为之震动。九月二十七日（11月5日），总理衙门鉴于形势严峻，奏请切筹海防，并建议发展海军。清廷谕沿江沿海督抚、将军详细筹议，限一月内复奏。于是"海防之议"兴起。最后，清政府一方面接受左宗棠的海防塞防并重主张，任命他为钦差大臣督办新疆军务，"速筹进兵，节节扫荡"；一方面采纳海防重于塞防论者的合理建议部分，派北洋大臣、淮系军阀李鸿章督办北洋海防，南洋大臣沈葆桢督办南洋海防。经总理衙门核准，每年由粤海关、潮州、闽海、浙海、山海5关以及江苏、广东、福建、浙江、江西、湖北6省厘金项下，拨款400万两作经费，计划在10年内建成南洋、北洋和粤洋三大支海军。但因财力未充，重点先建设北洋海军，"俟力渐充，由一化三"。从光绪元年六月（1875年7月）起到三年五月止，为保证重点，海军军费统归北洋支配；从三年六月起，海军军费南北洋各得其半。以期10年建成北洋、南洋、粤洋三支。五年沈葆桢死，以后筹建海军大权统归李鸿章。他在天津设立水师营务处，办理海军事务，以道员马建忠（1844—1900）负责处理日常事务。并调淮军记名提督丁汝昌（1836—1895）主持北洋海军。这时，李鸿章已从英国购进8艘蚊船，还向德国以300万两白银高价订购定远、镇远两艘铁甲舰，分别拥有6000匹马力。七年李鸿章正式奏准由丁汝昌统领北洋海军，奏改三角形龙旗为长方形，以纵3尺、横4尺为定制，质地章色如故。北洋海军初步建立起来。七年九月初四（10月26日），左宗棠以大学士出任两江总督，决定向德国订购两艘快船，加快南洋海军建设。以后，南洋兵轮数量已有增加。十年一月二十日（2月16日）新任两江总督兼北洋大臣曾国荃奏称：所有南洋"各船大小不齐，兵额不一，以之海战则不足，以之扼守江海门户，与炮台相辅，借固江防"。同年五月初二，又奏以长江水师提督李成谋总领南洋兵轮。至此，南洋海军初步建成。从同治十三年至光绪十年，经10年筹建，三洋海军初具规模。北洋海军14艘船舰（大多从英、德购进），分驻旅顺、营口、大沽、烟台，防卫奉天（辽宁）、直隶、山东海域，归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节制。南洋海军18艘船舰（大多是福州船政局、江南制造总局所造），分驻江宁、吴淞、浙江等地，防卫江苏、浙江海域，归两江总督兼南洋大臣节制。福建海军11艘（均为福州船政局所造），防卫闽、粤海域，归闽浙总督节制。表面看来，三支海军蔚为壮观，拥有船只总数为43艘，总计42174吨。但从总体来看，质量差，吨位小，航速慢，又缺乏铁甲船；特别是三洋各成派系，畛域分明，互不统属，形不成统一整体，而被敌人各个击破。十年中法战争中，福建海军遭法军偷袭，致使全军覆没。三、"大治水师"决策与晚清海军发展的新时期。中法战争对清朝统治者的刺激很大，他们总结经验教训，看到了海军发展中所存在的问题是："造船不坚，制器不备，选将不精，筹费不广"，看到了自己与西方之间的差距，对发展海军的重要性有了进一步的认识，也表现出更大的决心。光绪十一年五月初九（6月21日）发布上谕，作出了"大治水师"的决策，并又着令沿海督抚确切筹议，以期改变落后的局面。这是继同治十四年"海防议"之后的第二次筹设海防。复奏多主张设立统一领导全国海军事务的中央机构。十一年九月初五（10月12日）清廷批准成立总理海军事务衙门，着派醇亲王奕譞总理海军大臣，所有沿海水师，悉归节制调遣。并派庆郡王奕劻和大学士、直隶总督李鸿章为会办大臣，正红旗汉都统善庆、兵部右侍郎曾纪泽（1839—1890）为帮办。九月十七日正式办公。海军衙门成立后，本着"先办北洋一支"的方针，全力支持李鸿章筹建北洋海军。因此，总理海军事务衙门实际上由李鸿章掌握。北洋海军得天独厚，其发展也就进入一个新时期。海军衙门初设，主要做了以下几件事：其一，由户部奏明，海防常年经费400万白银归海军衙门管理，从而保证了最初几年北洋海军经费的基本维持。其二，营建了北洋海军两大基地：威海卫为舰队永久驻泊之区，旅顺口为舰队修治舰只之所，各建有提督衙门。其三，巡阅北洋海防并提出海军发展规划，从

英、德新购快船和鱼雷艇多艘。北洋海军实力迅速发展，到十四年北洋海军拥有铁甲舰、快船、碰船、蚊船、运船、书信船、鱼雷艇等25艘(21艘购自英、德，4艘自制)，官兵近4000人，基本上配套。八月间，海军衙门制定了《北洋海军章程》，它是参照西方资本主义国家近代海军制度而制定的中国近代第一个海军章程。八月二十八日，清廷批准了《北洋海军章程》，北洋海军正式成军。北洋海军成军后，清政府根据李鸿章的推荐，委派淮系将领、天津镇总兵丁汝昌为水师提督。由曾留学英国通晓海军业务知识的刘步蟾(1852—1895)、林泰曾(1852—1894)分任右翼、左翼总兵兼定远、镇远舰管带。聘英国水师兵官海军大佐琅威理(Lang，William　M. Captain)为总教习。这些标志着晚清海军发展到了顶峰。至于南洋海军因没有铁甲舰，现有的快船、蚊船也是又旧又少，仅备巡防之用，始终未成军。　(邱远猷)

罗佛号事件

清同治六年(1867)美船"罗佛号"在台湾海面触礁，船员7人被杀的事件。

台湾自古以来就是中国的领土。到了近代，随着西方殖民主义者的东来，台湾就成为他们企图霸占的首要地方。从19世纪四五十年代开始，美国就把我国台湾作为其远东侵略的重点。同治六年二月初七(3月12日)美国轮船"罗佛号"在海上遇到了大风，漂流到台湾南部琅玡(恒春)，不料触礁沉没，仅7人乘小船爬到岸上。台湾高山族人认为他们是强盗，将他们杀死。这件事本可经过交涉合理解决，而美国却利用这一事件，小题大作。三月十四日(4月18日)美国驻厦门领事李仙得(即李让礼)(Charles William　Legendre，1829—1899)到台湾琅玡，要求查办美国轮船遇难事。三月十九日，美国公使蒲安臣(Anson　Burlingame，1820—1870)照会清政府总理衙门，要求查办。五月十二日，美国派海军少将倍尔(Henry　Haywood　Bell，1808—1898)，率两艘兵舰入侵，副舰长马凯基(Mckenzie)率陆战队180人在琅玡登陆。高山族人民团结一致，英勇抗敌，于十八日打退了美军的进犯，击毙马凯基。八月十一日，清政府派台湾总兵刘青简前往当地调查。李仙得也一同前往。高山族人民据理驳回了李仙得的无理要求，李仙得最后只领回了美国死者的遗物而归。

(邱远猷)

民族资本近代工业之产生

19世纪70年代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形成过程中，民族资本主义近代工业在中国产生。

中国民族资本主义近代工业是在两次鸦片战争后、本国沦为半殖民地社会的历史条件下产生的，与一般资本主义国家不同，有自己独特的道路。在一般资本主义国家里，资本主义近代工业的产生、发展，经过了单纯协作、手工工场和大机器工业三个阶段。中国有所不同。原来在中国封建社会内部孕育着的资本主义萌芽，尚未发展到直接向近代工业过渡的阶段。鸦片战争后，外国资本主义的入侵，截断了中国资本主义正常产生的道路。19世纪70年代，由于外国资本主义的刺激和封建经济结构的某些破坏，在洋务派创办官督商办企业的同时，中国社会出现了一批商办企业，中国民族资本主义近代工业产生了。但这些企业主要不是鸦片战争前资本主义萌芽的发展和扩大，而主要是一部分官僚、地主、商人和买办直接投资创办而来的。其次，还有一些是由原来的旧式手工工场或大作坊因开始采用机器生产，直接转化上升成为民族资本近代企业的。中国民族资本主义近代工业的产生，大体上经历了三种不同途径：第一种，开始就是纯粹商办的。如同治八年(1869)打铁作坊主方举赞，在上海开始使用车床，成立发昌机器厂。同治十一年(1872)华侨商人陈启沅(约1825—约1905)在广东南海县设立的、中国最早的一家机器缫丝厂——继昌隆缫丝厂。它们就是由民族资本经营的纯粹商办的近代工业。第二种，买办依附于洋行的企业的转化。如光绪八年(1882)在上海成立的英国公平洋行附设的公平丝厂。这家大型外国丝厂实际上是由湖州丝商与公平洋行合股开设的，三年后即出租给中国买办经营。第三种，从官办、官督商办、官商合办转化而来的。如光绪二十年湖广总督张之洞发起创办湖北缫丝局，因官款不足先是拟官商合办，后商股不愿再合办，最后只好另行招商接办，该丝厂事实上遂成为纯粹商办的企业。

中国民族资本主义近代工业，从19世纪70年代产生起到中日甲午战争前夕，一共创办了100多家，规模大小不等，寿命也有长有短。其中主要的有：同治八年打铁作坊主方举赞在上海成立的发昌机器厂；十一年华侨商人陈启沅在广东南海县设立的继昌隆缫丝厂；光绪四年朱其昂在天津创办的贻来牟机器磨坊；八年徐鸿复叔侄、徐润等在上海集股设立的同文书局；同年广州商人钟星溪等集股设立的宏

远堂机器造纸公司；十二年官绅杨宗濂、买办吴懋鼎、淮军将领周盛波等在天津合资设立的"自来火公司"(即火柴厂)；十三年买办商人严信厚(1839—1907)在宁波设立的通久源轧花厂；十五年华商卢干臣等在重庆开设的森昌泰自来火厂；十六年上海商人叶澄衷(1840—1899)、宋炜臣(1866—约1920)设立的燮昌火柴公司；十九年武举出身的李福明联合一些天津商人在北京东便门外设立的机器磨坊；二十年朱鸿度在上海创办的裕源纱厂；等等。重工业方面，开办了一些煤矿和金属矿，规模都不大，多以土法开采。

民族资本主义工业基本上集中在沿海、沿江通商口岸，以上海为最多。广州、天津次之。这与交通发达、原料供应和商品销售方便固然有关，但也由于这些地方向外国购买机器和技术上依靠利用外国技术较方便，原料加工后直接出口方便。有些企业为了获得外国势力的庇护，竟把厂房设在外国"租界"内。这些都表现了它的发展不平衡性和对外国的依赖性。这一百多企业，内容较为广泛，包括缫丝、轧花、棉纺织、面粉、火柴、造纸、公用事业、船舶修造、机器修造、采矿等行业。但又比较集中，以缫丝业厂家最多，仅广东一地，光绪七年已有机器缫丝厂11家。十八年达五六十家，雇用工人自几十人、二三百人至五六百人不等。广东厂丝出口量，光绪八至九年1254担，二十至二十一年18179担，增加了12倍半。这是民族资本主义近代工业初创时期收效最为显著者。总的说来，中国民族资本主义近代工业资本较少，设备简陋，技术落后，与外资工厂相比，实力悬殊。如上海法商宝昌丝厂资本为80万两，英商怡和丝厂为50万两，而最大的民族资本丝厂上海坤记丝厂资本额才有24万两，其它大部分企业资本都在10万两以下。但它标志着一种新的经济力量、新的生产方式——民族资本主义在中国诞生了。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国，它是当时国民经济中最先进的经济形式，对于提高社会生产力起着积极的推动作用。

由于中国民族资本主义是在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形成过程中产生的，它也是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经济形态形成的一个标志。在这种历史条件下，中国民族资本主义工业，一方面，与外国资本主义和本国封建势力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与之有着依存的关系；另一方面，又受着外国资本主义和本国封建势力的压迫和束缚，与之存在着尖锐的矛盾。中国民族资本主义工业一产生便处在对外国资本主义势力和本国封建势力既矛盾、又依赖的关系之中。因此，中国民族资产阶级是一个带有两重性的阶级：一方面，身受外国资本主义和本国封建主义的压迫和束缚，因而有反帝反封建的革命性、积极性；另一方面，由于他们力量比较薄弱，与外国资本主义和本国封建主义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因而缺乏彻底反帝反封建的勇气，具有软弱性、妥协性。

(邱远猷)

天津教案

清同治九年(1870)天津发生的大规模反对外国教会侵略的斗争。

咸丰十年(1860)《北京条约》签订后，法国天主教传教士在天津望海楼设立教堂，仗势横行，诱人入教，强占民地，激起民愤。同治九年五月初，天津望海楼天主教育婴堂虐死三四十名儿童，并草草埋葬，致使一些儿童尸体外露，有的被野狗扒出，惨不忍睹。消息传出，立即引起天津人民的极大愤慨，纷纷要求官府查办教堂。此事发生不久，天津县衙门于五月二十日(6月18日)捕获拐骗儿童的罪犯武兰珍，供词涉及法国天主教堂教民王三；不久又捕获拐犯安三，安三也是天主教徒。天津知府张光藻遂将本案报告北洋通商大臣崇厚。崇厚答应会审，派天津道周家勋面见法国领事丰大业(Henri Vietor Fontanier，1830—1870)。但丰大业借词逃避。次日，天津知县刘杰前往，将案件移送丰大业，丰大业矢口否认教堂的罪行。二十二日，崇厚又亲自出马会见丰大业和神父谢福音(Claude Marie Cherier，1820—1870)，决定由天津知县刘杰带领武兰珍与教堂对质。二十三日刘杰将武兰珍押往教堂，广大群众闻讯，也从四面八方涌向教堂。由于教堂隐匿了主犯，销毁了罪证，对质毫无结果。刘杰只得去通商衙门交差，群众不肯离去，到中午聚至万人。教士们指使一些堂内教民手执棍棒，驱使恶犬扑向众人，群众奋起自卫，砸毁教堂门窗。丰大业气急败坏，一面写信要崇厚派兵弹压，一面带着枪支、利刃伙同秘书西蒙(G. Eugene Simon，1829—1870)，直奔通商衙门，未及进室，向崇厚连开两枪，子弹擦肩而过。复捣坏什物，扬长而去。途中遇刘杰，丰又举枪射击，打死家人高升。积忿已久的群众至此忍无可忍，遂一拥而将丰大业和西蒙殴毙。接着又涌向教堂，当场打死恶贯满盈的谢福音，放火焚烧了教堂和法国领事馆，又从仁慈堂救出了不少孤儿，然后将仁慈堂烧掉，使十年积愤，发于一旦。愤怒的人们还在这一天焚烧了美国"布道堂"两所和英国"讲经堂"4所，共杀死法国人13名，俄、

比等国人 7 名。这场大规模的群众性反教会侵略斗争持续了 3 小时。事件发生后，英、美、法等 7 国军舰集中开到天津、烟台一带逞威。清政府派直隶总督曾国藩到天津查办。他对外国侵略者完全屈服，任意判处天津知府、知县革职充军；16 人处死，缓刑 4 人，25 人充军；赔款 50 余万两；清政府派崇厚赴法国道歉。曾国藩的卖国求荣，使人民看清了他的丑恶嘴脸。天津人民与之进行针锋相对的斗争，致使曾国藩处理此案时十分棘手。因而引起外国侵略者不满。清廷不得不以曾国藩有病为借口，将他调任两江总督，改由李鸿章任直隶总督，处理津案未完事宜。李与曾一样，以杀人结案。行刑之日九月二十五日(10 月 19 日)，死难者慷慨激昂，而天津人民对他们英勇献身深表悼念。人们称该天为“鬼节”。　(邱远猷)

洋务派近代民用工业之创办

19 世纪 70 至 90 年代清政府洋务派官僚以“求富”为目的创办一系列近代民用工业。

洋务派在建立大批近代军事工业后，既感到资金的短缺，又因材料、燃料和运输的需要日增，于是由“练兵”、“制器”进而提出要“寓强于富”的口号。在“求富”的憧憬下，从 70 年代起，他们在继续进行“求强”活动的同时，着手经营以“求富”为目的的民用企业。洋务派的眼光，从军事开始转向经济，转向生产、与洋商竞争；他们的活动，也由单纯的练兵强国，转向“富国强兵”、“寓强于富”，这无疑是认识上的一个进步。

从 19 世纪 70 年代至 90 年代，洋务派创办的近代民用企业，大约有 20 多个，其中包括采矿、冶炼、纺织等工矿业以及航运、铁路、电讯等交通运输事业。当时所办的民用企业，大致有“官办”、“官督商办”和“官商合办”几种。由于清政府经费拮据，完全“官办”的企业只有少数几个。而在七八十年代，盛行的是“官督商办”的形式，就是由官府倡办，招商认股，由政府委派官员经营管理。名为“商办”，实权却掌握在官员手里。并且规定官本必须分年取利归还，然后坐收官利，而“所有盈亏，全归商认，与官无涉”，因此弄得商民纷纷逃避。于是有“官商合办”的形式出现，但仅是一度采取的个别形式。这种企业由官、商双方共同出资，共负盈亏，经营管理大权则还是操在官方委派的人员手中。洋务派创办的、主要采取官督商办方式的民用工矿、运输业，最重要的有以下几个企业：

轮船招商局。简称“招商局”。是我国第一家近代轮船航运公司，也是兴办最早、规模最大的一个新式民用性企业。同治十一年(1872)，李鸿章令浙江海运委员、候补知府朱其昂(? —1878)招商筹办，次年在上海正式成立。开始时，资金有官股制钱 20 万串(合白银 13.5 万两)、商股 10 余万串，订购外轮 6 艘，试航宁波、汕头、香港等地。十二年续招商股 47.6 万两，光绪二年(1876)后又先后借拨官款 150 万两。三年以白银 220 万两高价购进美商旗昌轮船公司一批旧船和设备，扩大经营，拥有轮船增加到 30 多艘，2.3万多吨，除航行沿海沿江各埠外，还先后远航日本、新加坡、菲律宾、美国等地。除上海总局外，在烟台、汉口、天津、福州、广州、香港、横滨、神户、吕宋等地还设有分局。招商局的活动遇到列强在华轮船公司的激烈竞争和排挤，同时也受到本国封建官僚势力的腐蚀，处境艰难。十一年，由盛宣怀(1844—1916)接任督办，改为官督商办。从此，招商局的“商办”色彩大为削弱，“官督”的权力显著加强，其业务停滞不前。

开平矿务局。光绪二年，李鸿章为了解决天津机器局和轮船招商局所需的燃料问题，委札轮船招商局总办唐廷枢(1832—1892)，到开平一带察勘煤铁，结果发现储量甚丰。李鸿章于是在光绪三年派唐廷枢主持开采开平煤矿的工作，并派天津海关道黎兆棠和前天津道丁寿昌会同督办。四年在直隶(河北)唐山开平镇正式成立，官督商办，初办资本约商股 80 万元。七年全面投产。由于黎兆棠于五年调至福州船政局，丁寿昌于六年病死，李鸿章于该年派徐润(1838—1911)和吴炽昌为会办。直至 90 年代初期，该局一直由这些精通洋务的人员经营管理。煤总产量逐年上升。八年产煤 3.8 万吨，十五年增至 24.7 万吨。因运煤需要，六年起修筑唐山至胥各庄铁路，第二年建成，全长 11 公里，是中国自建的第一条铁路。十二年矿务局投资成立了开平铁路公司，并将该路延至芦台。十四年该路筑至大沽。十五年购运煤船一艘，二十年增购至 4 艘，往来于天津、牛庄、烟台等地。十八年唐廷枢病逝。一个惯于纳贿受赃而不懂近代企业经营管理的江苏候补道张翼，通过醇亲王奕譞和李鸿章的关系，继任总办。他经营腐败，大量举借外债。二十六年八国联军入侵时，英商勾结张翼，趁机骗占矿权，该矿遂长期为英人霸占。

漠河金矿。位于黑龙江南岸。同治初年发现有矿后，俄国人不断越境偷采。光绪十三年由李鸿章和黑龙江将军恭镗(? —1889)筹建，官督商办。创办资本 20 万两，十四年开工，次年产金。初期年产金砂约值

银12万两。到二十三年有矿工2000人,年产量值银30万两,是当时中国规模最大、成效最著的金属矿。

上海机器织布局。是中国最早的机器棉纺织厂。光绪四年南、北洋大臣李鸿章、沈葆桢奏准设立。八年经李鸿章奏准,享有专利权,规定10年内只准本国商人附股搭办,不准另行设局。资本来源有公款、商股、私人款项等。由于筹组人员营私舞弊,抽逃资金,筹办搁浅。十三年李鸿章复派员清查接办,十六年才建成开工。有纱锭3.5万枚,布机530台,雇用工人约4000名。十四年天津商界知名人物杨宗濂、杨宗瀚兄弟接办后即连年获利。十五年每昼夜出布600匹。十六年失火,工厂被毁。旋由李鸿章派盛宣怀规复,改建为华盛纺织总厂,仍为官督商办。另在上海、宁波、镇江等处设立10个分厂。至二十年,总厂已部分建成投产。

电报总局。光绪六年(1880),李鸿章奏请敷设天津至上海的电报线,立即得到清廷的批准。他一面在天津设立电报学堂以培养专门人才,一面在天津设立电报总局,派盛宣怀为总办,郑观应(1842—1922)为会办。并于紫竹林、大沽口、济宁、清江、镇江、苏州、上海等7处设立分局。津沪电报线于七年开办并竣工。共用湘平银17.87万两。八年改为官督商办企业,故有"电报招商局"之称。共招集股本8万两,当年缴发官本6万两。津沪电线接通后,英、法、美、德要求在上海设立万国电报公司,添设上海至香港各口海底电线。李鸿章与总理衙门来往函商,决定立即劝集商股先行接办由沪至粤沿海各口的陆线。十年,上海至广东的线路竣工,电报总局由天津迁至上海,仍由候补道盛宣怀督办。次年,自南京沿长江以达汉口的电线亦已接通。后来,电报逐渐扩充,几乎遍及全国各重要城市。但经营方式不一,有的是官督商办,也有的是官办。

汉阳铁厂。光绪十五年(1889)两广总督张之洞为抵制洋铁入口,主张"自炼内地钢铁"供应各省机器局所需之钢铁,遂于广州筹建铁厂。旋因他调任湖广总督,遂将铁厂移建湖北,并于十六年在汉阳大别山下开工建立,设"湖北铁路局"管理厂务。创办时由户部拨银200万两,官办。十九年基本完工,二十年投产。共有6个大厂,4个小厂,炼铁炉2座、炼钢炉3座。工人3000多人。为了解决原料和燃料问题,先后开采大冶铁矿和办起了王三石煤矿、马鞍山煤矿。成为中国第一个最大的钢铁企业。这个工厂亏损很大。中日甲午战争后,清政府财政濒于破产,无力筹措经费,不得不于二十二年改为官督商办,由盛宣怀招股接办。三十四年盛宣怀奏准将汉阳铁厂、大冶铁矿、萍乡煤矿合并扩充,改称"汉冶萍煤铁厂矿公司"。

洋务派所创办的、主要采用官督商办方式的民用工矿运输企业,经营管理大权都操在"官"的手里,都由政府派来的总办、会办等大小官员进行控制,而私人资本家除了保留资本所有权和按年领取股息、负担亏损责任外,既失去了股金的支配权,又不得过问局事。在经营上实行一定的垄断,并享有特权,排斥商人资本投资新式工业。在企业内部,官权侵害商利的现象随处可见。可见,它仍有封建性。但是,这些企业基本上已经是商品生产,产品的全部或大部分是为市场而生产。生产的目的主要是为了赚取利润,价值规律对生产起着作用。企业内部普遍采用了雇佣劳动,绝大部分工人都是自由出卖劳动力的雇佣劳动者,他们的工资基本上是按照技术高低来决定的。从这些方面来看,它基本上已经是资本主义性质的近代工业了。尽管它对民族资本主义的自由发展有所妨害,但在客观上又为民族资本主义产生准备了必要的条件,对社会经济的发展起着积极的作用。官督商办近代民用企业是作为外国资本主义侵略中国的对立物而出现的,它受到外国侵略者的排挤和打击。它又对外国资本主义企业存在着依赖性:机器的采购、安装直到运转,大都依靠外国技术人员,有的企业还依靠外国银行或洋行贷款作为资金周转。但总的来说,这些民用企业的创办是为了"稍分洋人之利"及"以敌洋产",在一定程度上起了抵制外国资本主义扩大在华政治经济势力的有益作用。

(邱远猷)

《中日北京专条》签订

《中日北京专条》,清同治十三年(1874)日本强迫清政府签订的不平等条约。

台湾自古以来就是中国领土。从19世纪70年代起,台湾成为日本侵略中国首当其冲的目标。琉球与中国一直有历史悠久的密切关系。直到19世纪60年代,琉球始终承认是中国的藩属,并和中国人民保持着友好关系。日本吞并琉球与侵略台湾有直接关联。十年十月十五日,一只装载66人的琉球渔船因在海上遇飓风,漂流到台湾东岸,船上渔民与台湾当地高山族人民发生冲突,琉球54名渔民被杀。这个事件本属清廷与琉球间事,日本却使之成为侵占台湾的借口。十一年八月十六日,日本封琉球国王尚泰为藩王,以示琉球国隶属日本、琉球国人即日本

国人之意，作为侵略台湾的根据。十三年二月十八日，日本政府设台湾事务局，又任命陆军中将西乡从道(1843—1902)为台湾事务都督。二十三日，西乡从道率兵从东京出发，开赴长崎。三月十二日，西乡从道正式派舰发兵3000人开赴台湾。二十二日，日舰在台湾南端琅琊(恒春)登陆，对当地高山族人民进行了疯狂的烧杀抢掠。台湾人民奋起英勇抵抗，加上天气炎热、时疫流行，日军死伤甚多。二十六日，清政府向日本提出抗议。二十九日，派船政大臣沈葆桢率兵船前往台湾“巡阅”。四月十四日，清廷又发布上谕，命沈葆桢为钦差大臣，办理台湾等处海防，兼理各国事务大臣。又命福建布政使潘霨(？—1892)帮办台湾事宜。随后又命南北洋合调洋枪队5000人增防台湾。四月中旬，日军分三路攻占了牡丹社，后又入侵卑南社，到处烧杀抢掠。五月初八，潘霨、台湾道夏献纶抵琅琊，次日会见了西乡从道，双方就领土归属问题展开了激烈的争论。西乡否认其占领的是中国领土，潘霨拿出《台湾府志》据理驳斥。西乡虽理屈词穷，但拒不撤兵。日本感到武力夺取台湾一时难以实现，转派代表与清廷会谈，进行外交讹诈。七月二十五日，日本特使大久保利通(1829—1878)偕美国驻厦门领事李仙得等抵北京，即找总理衙门大臣奕䜣、文祥等人谈判。大久保利通虚张声势，两次作出决裂姿态，限定期限逼迫清政府提出解决台湾问题的办法。英国大使威妥玛也向清政府施加压力，要求向日本赔款来解决中日争端。九月二十二日(10月31日)，由文祥代表清政府与大久保利通代表日本政府正式签订了《北京专条》(亦称中日《北京专约》)，共3条：一、日本国此次所办，原为保民义举起见，中国不指以为不是。二、前次所有遇害难民之家，中国定给抚恤银两，日本所有在该处修道、建房等件，中国愿留自用，先行议定筹补银两，别有议办之据。三、所有此事两国一切来往公文，彼此撤回注销，永远罢论。至于该处生番，中国自宜设法妥为约束，以期永保航客不能再受凶害。后又互换会议凭单，内容为：“日本国从前被害难民之家，中国先准给抚恤银10万两。又日本退兵后，在台地所有修道、建房等件，中国愿留自用，准给费银40万两，亦经议定。准于日本国明治七年十二月二十日，中国同治十三年十一月十二日(1874年12月20日)，日本国全行退兵，中国全数付给，均不得衍期。日本国兵未经全数退尽之时，中国银两亦不全数付给。”日本此次侵台，致使中国主权和人民生命财产遭受损失。《北京专条》却承认日本此举为“保民义举”，琉球被害国民为日本“难民”，这等于承认了琉球为日本的领土，为日后日本最终吞并琉球埋下伏笔。从光绪元年(1875)起，日本公然阻止琉球向中国“入贡”。五年三月初三(3月25日)日军侵入琉球，占领那霸。初五，日本琉球处分官松田道宣布琉球为冲绳县。十三日，日本大政大臣正式宣布改琉球为冲绳县。 (邱远猷)

“海防”与“塞防”之争

19世纪70年代清政府面临边疆危机引起的关于东南“海防”与西北“塞防”的激烈争议。

19世纪70年代以后，世界资本主义开始由自由竞争阶段向垄断阶段过渡，出现了列强夺取殖民地的大高潮。列强在远东地区进行角逐，它们相继把侵略魔爪伸向中国的邻邦和边疆，中国边疆普遍发生危机。清同治四年(1865)，中亚浩罕国军官阿古柏率军侵入我国南疆。六年建立“哲德沙尔”(七城之意)汗国，自立为“汗”，其势力进而扩及北疆部分地区(伊犁不在内)。俄、英两国怀有侵吞新疆的野心，它们分别与阿古柏订约，企图控制阿古柏，实现分割新疆的目的。同治十年，沙俄出兵侵占伊犁，使西北边疆危机加深。早在同治六年，美国曾派军舰侵袭我国台湾，企图以此作为其在远东的军事基地，但遭到当地高山族人民的抗击。美国此时感到海军实力不足，难跨太平洋作战，遂利用日本为其开辟侵华道路。十三年，美国支持日本武装入侵台湾、强迫清政府签订中日《北京专约》，规定日军撤出台湾，清政府给银50万两。光绪五年(1879)，日本又以武力吞并琉球，改为冲绳县，以其为侵华基地。美、日的侵略活动造成了东南海疆的危机。

日本发兵侵略台湾事件发生，清廷朝野为之震动。清统治者开始觉察到日本“为中国永久之大患”，于是提出“切筹海防”之议。但筹海防需要经费，而清政府财政十分困难。加之，同治十二年九、十月左宗棠的军队彻底镇压了陕甘回民起义，从内地到新疆通路已开，收复新疆、巩固西北边防已成为现实问题；而准备收复新疆亦需军费。于是，在十三年冬至十四年春夏，中国同时面临着东南“海防”和西北“塞防”的问题：究竟何轻何重呢？十三年九月二十七日(1874年11月5日)，清廷谕令沿江沿海督、抚、将军详细筹议，限一月内复奏。于是在清政府内部兴起“海防”与“塞防”的激烈争论。当时沿江沿海各省的封疆大吏几乎都卷入了这场防务争论。归纳起来有5种观点。一、海防论。前江苏巡抚丁日昌认为，海防重于塞防，还提出《海洋水师章程》六条，强调尤以大

兵轮为第一利器,"初则购买,继则设厂自制"。二、江防论。两广总督英翰(1828—1876)和安徽巡抚裕禄(约1844—1900)认为,海防固为全局第一要务,然"合上游之力以固长江,则财力易集;合长江之力以防海口,则事机易赴"。三、陆防论。两江总督李宗羲(?—1884)认为,若论筹防,仍以水陆兼练为主,尤宜急练陆兵之法。四、塞防论。江苏巡抚吴元炳、山东巡抚丁宝桢(1820—1886)认为,东南沿海形势已与道、咸年间不同,由于列强相互牵制,洋人似不敢轻易发动。目前东西洋诸国尚不足为大患,而尤为大患者是俄罗斯。五、塞防海防并重而塞防为急论。湖南巡抚王文韶(1830—1908)认为,海疆之患,不能无因而至。其所视成败以为动静,则西陲防务也。

在此次"切筹国防"问题的大讨论中,举足轻重的两位主角是李鸿章和左宗棠。十三年十一月初二,李鸿章在《筹议海防折》中认为,中国历史备边多在西北,而此时东南万余里海疆门户洞开,实为数千年来未有之变局,面对的又是数千年来未有之强敌。新疆不复,于肢体之元气无伤;海疆不防,则腹心之大患愈棘。因此说,海防为重,塞防为轻,主张朝廷停止西征,放弃新疆,移塞防之饷以筹海防。光绪元年三月初七(1875年4月12日),左宗棠在《复陈海防塞防并及关外剿抚粮运情形折》中认为东则海防,西则塞防,二者并重。并认为停兵节饷行不通,还批评放弃新疆的主张。他说若此时即拟停兵节饷,自撤藩篱,则我退寸而寇进尺,不独陇右堪虞,即北路科布多、乌里雅苏台等处恐亦未能晏然。所以,停兵节饷于海防未必有益,于塞防则大有所妨。

左、李争论的焦点是新疆问题。李鸿章固有许多清醒之论,但停西征之兵以节饷的主张失之偏颇。左的海防塞防并重而塞防为急主张确为高见卓识。军机大臣文祥与左宗棠颇有共识,积极支持左宗棠,在军机处议事时,力排众议之不决者,力主进剿。经过广泛深入而有益的大讨论,清廷全面地估量了形势,最后作出正确决策:一方面采纳李鸿章建议中的合理部分,明发上谕称:"海防关系紧要,亟宜未雨绸缪,以为自强之计。"随之,以沈葆桢、李鸿章分别督办南、北海防事宜。一方面接受左宗棠的正确意见,于光绪元年三月二十八日任命他为钦差大臣督办新疆军务,负担规复西北的全责。于是,收复新疆的计划实现了,而且海防问题也开始得到更多重视。

马嘉理案

亦称"云南事件"或"滇案",清光绪元年(1875)英国翻译马嘉理非法入侵中国云南被当地人杀死的事件。

咸丰二年(1852)英国占领缅甸后,就处心积虑地寻找一条从上缅甸八莫开始,经腾越(腾冲)、永昌(保山)、大理(四川宜宾)的新路线,由西南方面入侵中国。同治七年(1868),英国派出第一支探路队,从缅甸八莫到达云南腾越,窥伺我国滇西地区。十三年,英国为侵入云南一带做好各方面的准备,再次派陆军上校柏郎(Horace Albert Browne,1832—1914)率武装"探路队"约200多人从缅甸出发,向云南开来。在组成探路队的同时,驻北京英使馆向清政府总理衙门索得三、四名官员入云南"游历"的护照,于当年六月十六日(1874年7月29日),特派翻译官马嘉理(Augustus Raymond Margary,1846—1875)从北京经云南,前往缅甸接应。七月初九夜,马嘉理从上海出发,经过武汉,取道湖南、贵州,向云南进发。沿途收集情报,勘测地形,为开辟新路线做各种准备。十二月初十(1875年1月17日)到达八莫,与两天前已达的柏郎探路队会合。光绪元年正月初,马嘉理和柏郎从八莫启程,向云南进发。英国侵略者的行径,引起云南各族人民的反对和警惕,陇川、猛卯、腊撒各地的景颇族、傣族、阿昌族人民立即组织起来,准备迎战。当地的一些土司、山官、头人也支持和参加了群众的保家卫国的斗争。正月十七日(2月22日)清晨,马嘉理一行擅自闯入云南蛮允附近,遭到驻守在曼久山寨的景颇族人民的盘询和阻拦。马嘉理蛮横无理,竟开枪挑衅,击杀当地群众多名。被激怒的景颇族人民给予坚决反击,当场将马嘉理击毙,把他的首级悬挂在村口蛮允城墙上。以柏郎为首的英国武装"探路队"经此打击后,不敢继续前进,只好立即返回八莫。英国获悉马嘉理被杀事件发生后,不但没有自责,反而立即训令驻华公使威妥玛与清政府交涉,借此向清政府提出广泛的侵略要求,除向清政府交涉滇案外,还必须商定办法,借机解决与滇案本身无关的公使"觐见"及通商税务的问题。并在历时一年半的谈判中,威妥玛一再以断绝外交关系、增派军舰来华相恫吓。代表清政府主持谈判的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李鸿章,唯恐谈判破裂,一再退让,甚至颠倒黑白,把马嘉理之死说成"其曲在我"。清政府还严令云贵总督岑毓英(1829—1889)速将此案确查严究,并杀害景颇族同胞23人。但英国的侵略要求依然寸步不让。二年七月二十六日(9月13日)清政府代表李鸿章与英国公使威妥玛在山东烟台签订了《烟台条约》。签订后第四天即七月三十日,清政府

即予批准。条约分所谓“昭雪滇案”、“优待往来”和“通商事务”3大部分，共16款，并附加一《另议专条》。通过该约，英国扩大了对中国的侵略特权，并使英国得以侵入我国云南、西藏地区。同年底，清政府还派兵部侍郎郭嵩焘(1818—1891)前往英国，就“马嘉理事件”向英国政府“表示歉意”。　(邱远猷)

左宗棠收复新疆

清光绪二年六月(1876年7月)至三年十一月(1878年1月)左宗棠奉命西征、取得收复新疆的巨大胜利。

清政府内部经过“塞防”与“海防”之争以后，于光绪元年三月，决定派陕甘总督左宗棠(1812—1895，字季高，湖南湘阴人)抵御英、俄及其走狗阿古柏的侵略，收复新疆。二十八日(5月3日)，清廷任命左宗棠为钦差大臣，督办新疆军务，以金顺(？—1885)为乌鲁木齐都统，仍帮办新疆军务。左宗棠认为，阿古柏已占据了新疆大部地区，控制着南、北疆许多战略要地和交通要道，是当前主要威胁。沙俄虽然居心叵测，但对于占领伊犁地区，曾假惺惺地表示“并无久占之意”，“俟关内外肃清，乌鲁木齐、玛纳斯各地克复之后，即当交还”。因此决定作战目标分两期，即：第一期作战目标是歼灭阿古柏入侵势力；第二期作战目标是驱逐伊犁地区的沙俄侵略军。并根据敌我情况和新疆地区的地理条件，提出了一个“缓进急战”、“先北后南”的战略方针。为此筹集军饷，采运军粮，整顿军队，改善装备，经过较长时间的准备之后，才开始收复新疆的军事行动。

二年三月十三日(4月7日)，左宗棠从兰州移驻肃州(酒泉)，准备发起进攻。当时清军已出关的各军有80余营，加上原在新疆的伊犁将军荣全(？—1879)、哈密办事大臣文麟所部4营等，总兵力约六七万人。此外，在星星峡以东担任警备的部队尚有20营，作为战略预备队。左宗棠率亲兵数营，坐镇肃州指挥，其前路进止机宜，悉委总统湘军刘锦棠(1844—1894)相机酌度。清军按照“先北后南”的战略，第一个目标是收复南北疆的交通要冲乌鲁木齐。左宗棠命刘锦棠和金顺两部担负此项任务。阿古柏得知清军西进的消息后，急忙从阿克苏赶到托克逊，调兵遣将，布置防御，企图以天山为依托，以乌鲁木齐为支柱，控制南北疆的交通要冲，阻止清军南下。阿古柏的主力部署在吐鲁番和托克逊，其总兵力约4万人。六月初八(7月28日)清军刘锦棠、金顺部由济木萨进驻阜康，二十八日，攻占古牧地。二十九日，攻克乌鲁木齐。九月二十一日，攻克玛纳斯。至此，天山以北，除伊犁地区外，所有敌占据点全部克复。这时大雪封山，不便南进。乌鲁木齐的收复具有重要意义。由于北疆作战速战速决，使清军巩固了在新疆的战略地位，解除了敌军窜犯内地的后顾之忧，为以后进军南疆创造了条件。

清军在北疆的胜利，使阿古柏的支持者英、俄侵略者惊惶不安。英国驻华公使威妥玛一面阻挠英商向清政府贷款；一面玩弄“调停”阴谋。提议让阿古柏“投诚”，要求清政府准许阿古柏“保南城自王”，作为“属国”，“只隶版图，不必朝贡”。企图牺牲中国在南疆的主权而维持阿古柏的实际统治。阿古柏为了配合英国的调处阴谋，命令“各处不要和清军纠杀”，而暗中却加紧部署防御，以达坂、吐鲁番、托克逊3城构成鼎足之势，其中又以托克逊为重点。沙俄也派出罗巴特金“特别代表团”去南疆同阿古柏谈判边界问题，企图割占新疆西南部大片领土和军事要点。清政府断然拒绝了英国的建议，坚决要求“交回各城，献缚叛逆”。左宗棠根据敌人的企图和设防部署，于二年冬提出了一个“三路并进”的作战方案，即由刘锦棠为北路、张曜为东路、徐占彪为东北路，各部克复达坂、吐鲁番、托克逊3城，打开南疆门户，然后乘胜西进，收复所有失地。为此，清军又用了较长时间进行准备：调运粮食，补充兵员，调整部署，巩固后方。三年三月，清军开始向南疆进军。在新疆各族人民的大力支持下，三月初六(4月19日)克达坂。十三日克吐鲁番和托克逊。清军3路并进，不到半个月连克3城，为直捣敌巢、收复南疆8城创造了条件。阿古柏由于精心部署的防线被摧毁，主力部队被歼灭，只好由喀喇沙尔退至库尔勒。这时迭遭阿古柏匪帮暴虐压迫的南疆各族人民纷纷起来反抗，加上派使臣去塔什请求“俄国人帮助反抗前进中的中国人”又无结果，阿古柏陷于绝望境地，遂于四月中旬(5月下旬)服毒自杀。其子伯克胡里在喀什噶尔自称为“汗”，企图在沙俄的卵翼下，苟延残喘，垂死挣扎。这时英国又通过驻英公使郭嵩焘向清政府提出保存伯克胡里汗位、将喀什噶尔作为中国“保护国”的无理要求。因此时俄、土(耳其)战争(1877—1878)业已爆发，英国自顾不暇，无力给阿古柏以有效支援，只得再搞“调停”花招。对此，清政府不予理睬，左宗棠更是义正词严予以驳斥，决心乘胜追击，彻底消灭阿古柏匪帮残余势力。

八月，清军乘秋高气爽之际，开始了收复南疆8城的作战。刘锦棠率马步32营为前锋，张曜率马步

16营为后队，并兼筹粮运和办理善后。两部总兵力为5万余人。清军于1个月之内，驰骋2000余里，经过两次较大的战斗，收复了南疆东四城：喀喇沙尔、库车、阿克苏、乌什。接着，在十一月内，以破竹之势，横扫敌巢，收复了南疆西4城：叶尔羌、英吉沙尔、和阗、喀什噶尔，伯克胡里率残部逃往俄境。至十一月二十九日(1878年1月2日)和阗克复，新疆全境除伊犁地区外，全部收复。

驱逐阿古柏侵略军、收复新疆的战争，是维护祖国统一、保卫祖国领土完整的正义战争。这次战争所以能在短短的一年多时间里取得如此辉煌的胜利，一是战争的正义性和新疆各族人民的大力支援；二是清政府决策正确，选将得当；三是左宗棠战略方针和作战指挥正确。这场战争的胜利，为早日收回伊犁地区创造了有利条件。 (邱远猷)

《中俄伊犁条约》签订

《中俄伊犁条约》，清光绪七年(1881)沙俄强迫清政府在彼得堡签订的不平等条约。

同治十年(1871)沙俄乘中亚浩罕国军官阿古柏(Yakoob Beg，约1825—1877)侵占中国新疆乌鲁木齐并向东亚进犯之际，出兵侵占了伊犁地区。清政府与之多次交涉，沙俄拒不撤兵。光绪元年，清政府任命陕甘总督左宗棠为钦差大臣督办新疆军务。三年左宗棠进军新疆，当年十二月击平阿古柏，收复了除沙俄侵占的伊犁地区以外的全部新疆国土，粉碎了俄、英通过支持和利用阿古柏变南疆为其殖民地的阴谋。这时，清政府任命崇厚为出使俄国头等钦差大臣，赴沙俄京城谈判收复伊犁事宜。中俄谈判从五年正月上旬开始，历时近9个月。八月十七日(10月2日)崇厚在沙俄胁迫下，未经清政府允许，擅自与沙俄在黑海之滨的里瓦吉亚签订了《交收伊犁条约》(即《里瓦吉亚条约》)。按约中国仅收回伊犁河上游谷地，划失伊犁西部、南部及南疆、北疆边境土地甚多，此外还要偿付“兵费”500万卢布(约合中国白银280万两)。这显然是一个丧权辱国的条约，朝野纷纷反对。在全国舆论压力下，清廷不予批准。并于十二月十六日将崇厚革职治罪。六年正月初十改派驻英公使曾纪泽赴俄修订崇约；同时命令左宗棠统筹部署新疆南北两路边防事宜，以备谈判破裂后，武力收复伊犁。七年一月二十六日(2月24日)，曾纪泽与沙俄代理外交大臣吉尔斯和布策签订了《中俄伊犁条约》和《改定陆路通商章程》。《中俄伊犁条约》当时称《改订条约》，又因签约地点在彼得堡，亦称《彼得堡条约》。主要内容是：一、沙俄归还被其强占的中国伊犁地区，而仍割去伊犁西部霍尔里斯河以西、伊犁河南北两岸的原属中国的大片领土。斋桑湖迤东一带中俄边界“有不妥之处”，要两国派员“勘改”。所有尚未设界碑的中俄各段边界都要派员“勘定，安设界碑”，为沙俄进一步侵占中国领土制造了依据。二、赔款增至900万卢布(合509万两白银)，限两年内偿清。三、俄商在新疆各地贸易，改“均不纳费”为“暂不纳税”。四、俄商只能到嘉峪关，免去到西安、汉口通商，仅许于肃州(甘肃嘉峪关市)和吐鲁番两地增设领事。五、伊犁居民“愿迁居俄国入俄籍者，均听其便”。这就为沙俄武力逼迫中国各族居民迁入俄境的罪行获得了根据。这个条约和《里瓦吉亚条约》相比，除赔款增加了400万卢布外，在界务和商务方面，中国都争回了一些主权。但它仍是一个俄国通过武力威胁和外交讹诈逼使清政府签订的不平等条约，严重地损害了中国领土和主权的完整，给西北边务、经济发展和人民生活造成了极大的恶果。

《中俄伊犁条约》签订后，沙俄又根据该约中关于修改南、北疆边界的原则规定，于光绪八年到十年强迫清政府订立了伊犁界约、喀什噶尔界约、科塔界约、塔尔巴哈台西南界约和中俄续勘喀什噶尔界约等5个勘界议定书，分段重新勘定了中俄西段边界。沙俄通过中俄伊犁条约和上述这些勘界议定书，共割占了塔城东北和伊犁、喀什噶尔以西约7万多平方公里的中国领土。 (邱远猷)

中 法 战 争

清光绪九至十一年(1883—1885)法国发动侵略越南和中国的战争。

在19世纪最后30年中，法国资本主义有了进一步发展，开始向帝国主义过渡，大资产阶级推行对外扩张的殖民政策也倍加积极。其目标在远东地区，企图完全占领越南，进而侵入中国。中越两国是山水相连、唇齿相依的邻邦，彼此之间有着悠久的政治、经济、文化联系。越南统治者和清朝统治者之间存在着一种特殊的历史关系，其国王接受清朝皇帝的“册封”，并定期派人到北京“朝贡”；清王朝对越南则负有保护之责。70年代初，法国探明从越南北部北圻的红河，可通航至中国云南境内，正合其向中国西南扩张的需要，便加紧对越南北圻的侵夺，打开红河。同治十二年(1873)九月十七日，法国西贡总督杜白蕾派安邺抵越南河内，要求航行红河。十月初一，安邺率领远征军，侵袭并攻陷了河内，之后又攻陷了河

内附近地区。并扬言要进攻中国越南边境上的重要交通门户保胜(越南老街)。面对法国侵略者的严重威胁,越南政府邀清驻在越南保胜的中国人刘永福领导的黑旗军进军河内,协助越南政府抵抗法国侵略。黑旗军原是太平天国起义时期活动于中国广东、广西边境地区的一支农民起义军,因以七星黑旗为战旗,故称黑旗军。同治三年太平天国失败后,清军加紧进攻黑旗军。黑旗军为了生存和发展,于六年赴越南,九年驻保胜。十二年十一月法将安邺率军侵略河内,刘永福应越南政府之邀率部进军河内,决心为越南削平敌寇,为中国捍蔽边疆而战。十一月初二,打退了法国侵略军,击毙了法军头目安邺。次年,被越南政府任命为三宣副提督。但越南政府却在法国侵略者的压迫和讹诈下,与法国议和。十三年正月二十七日(3月15日),在西贡签订了《越法和平同盟条约》,即第二次《西贡条约》,越南从此实际上成了法国的保护国。光绪八年二月(1882年3月),法国政府任命交趾支那舰队司令李维业指挥侵略军第二次侵犯越南北部。三月初八再占河内。越南政府再次请求刘永福的黑旗军参战。黑旗军立即进军河内。九年四月十三日(5月19日),黑旗军与法军在河内西二里处的纸桥进行决战。双方鏖战4小时,法军大败而去,李维业被当场击毙。刘永福被越南政府晋升为三宣正提督。七月,法国政府又任命孤拔为印度支那舰队司令,入侵越南,攻占了越南的都城顺化(在越南中部),强迫越南政府于七月二十三日订立了《顺化条约》,把越南变成法国的"保护国"。

《顺化条约》签订后,法国侵略者就把侵略矛头直指中国。开始,企图通过外交诈讹,要求清政府承认法国对越南的殖民统治,撤出驻越南北部的清军,开放云南边界,以便从越南北部侵入中国西南地区。但遭到拒绝。中、法之间的战争迫在眉睫。面对法国侵略越南、并进而侵略中国的严重局势,中国人民莫不感到极大的愤慨,特别是居住在中越边界地区的各族人民,强烈呼吁清政府援越抗法,保家卫国。在这种情势下,清政府内部出现主战、主和两派的激烈争论。总理衙门大臣恭亲王奕䜣和直隶总督、北洋大臣李鸿章等竭力夸大敌人的力量,主张妥协退让,不能言战。兵部尚书彭玉麟、两江总督左宗棠、山西巡抚张之洞、驻法公使曾纪泽等则竭力主战。慈禧太后举棋不定,总的倾向是"避战求和"。由此助长了法国侵略者的气焰。

九年十一月十二日新任法国远征军总司令不久的孤拔,率兵6000人进攻协守越南山西的清军和黑旗军,中法战争正式爆发。中法战争经过了3个阶段。从九年十一月山西之战开始,到十年四月《中法会议简明条款》签订,是中法战争的第一个阶段。战争局限在越南北部和红河三角洲的北宁等地。战争爆发后,驻扎在越南山西的清军统帅、云南新任巡抚唐炯弃军而逃。黑旗军却在形势险要、具有重要军事意义的山西,代为坚守,激战5天,终因众寡悬殊,于九年十一月十七日被迫撤离。十年正月,法国增派侵略军到达河内,改由米乐接替孤拔任法国远征军总司令。三月,法军1200人进攻北宁。驻北宁的清军统帅、新任广西巡抚徐延旭躲避龙州,前线将领不战而逃,北宁迅速失陷。接着,法军占领太原、兴化,清军东线全面溃退,法军完全控制了红河三角洲地带。清政府对此十分惊恐,慌忙授权李鸿章与法国代表、法国侵华海军旗舰"富尔达"号舰长福禄诺举行和谈。四月十七日(5月11日)双方在天津签订了《中法会议简明条款》(又称《李福协定》)5款。清政府被迫承认法国对越南的"保护权",同意在中越边境开埠通商,并声明将北圻清军撤回边界,但未明确商定时限。法军却在一个月后,于闰五月初一(6月23日)推进至北黎的观音桥,企图强行接收清军阵地,清军被迫还击,法军败退。事后,法国反诬中国破坏《中法会议简明条款》,利用"北黎冲突"(又称"观音桥事件")为借口,蓄意扩大战争。清政府被迫再度应战。

从十年四月《中法会议简明条约》签订后法军攻基隆起,到七月马尾海战中国战败为止,是中法战争的第二阶段。战争主要在中国东南沿海进行。法国在军事上决定从海上进攻中国,其远东舰队分兵两路向中国再次发动侵略战争。远东舰队副司令、海军少将利士比于六月十五日率领4艘军舰轰击台湾基隆港,被督办台湾军务大臣刘铭传率守军击退。六月二十九日,法国驻华代理公使谢满禄以基隆事件为借口提出新的侵略要求,清政府未予接受。七月初一谢满禄下旗离开北京,中法关系正式破裂。闰五月下旬,时任远东舰队司令的海军中将孤拔利用中法交涉的时机,率舰队主力驶入福建马尾港,和中国舰队同泊一处。清钦差会办福建海疆事宜大臣张佩纶和船政大臣何如璋既不阻止,又不戒备,并禁止港内中国舰队移动,自缚手足。七月初三,停泊在马尾的法国舰队突然开炮轰击,福建水师仓促应战,军舰被击沉7艘,官兵伤亡700余人。次日,福州造船厂亦被轰毁。马尾海战的惨败激起了全国人民的极大愤慨。清政府被迫于七月初六下诏对法国宣战。

从十年七月清政府下诏宣战到十一年二月清政

府下诏停战，是中法战争的第三阶段。战争除在东南沿海继续进行外，主要战场在中越边境。十年八月十一日法国远东舰队司令孤拔命利士比率兵舰3艘自马祖进犯台湾沪尾(淡水)，自率大队进犯基隆。十三日，孤拔占领基隆，向台北进犯。清军和当地人民顽强抵抗，在沪尾大败法军，粉碎了法军夺占台湾的计划。十一年春，法国舰队北犯浙江镇海。浙江提督欧阳利见沿岸戒严。法军登陆未成，不久退出浙江海面。与此同时，驻守越南谅山一带的东线陆军统帅、广西巡抚潘鼎新部却于十年十二月下旬节节败退至边境，边防要塞镇南关(友谊关)于十一年正月初九(2月23日)被法军占领。两日后，法军炸毁镇南关，退驻关外30里的文渊城，伺机反扑。西线岑毓英部围困法军于越南宣光，久攻不下，亦以法军增援而败退后撤。仅刘永福部黑旗军仍孤守奋战。新任两广总督张之洞起用老将冯子材为广西关外军务帮办，重新部署战略。二月，冯子材率部在镇南关内关前隘筑长城，连接东、西岭成一防御阵地，奋力迎战三路来犯之法军。当地各族人民和越南义民亦配合作战。二月初八，冯子材部取得镇南关大捷，乘胜出关追击。十二、十三日，又取得谅山大捷，重创法军前敌统帅尼格里。西线刘永福部黑旗军也在越南义军配合下，于临洮大败法军，取得大胜。中越军民斗志昂扬，法国侵略军一败涂地，整个中越战场上呈现出一片胜利的局面。

镇南关--谅山大捷，是鸦片战争以来中国所取得的一次重大胜利，是法国发动侵越和侵华战争以来所遭受到的最大一次惨败。引起了法国政局动荡，法国政府茹费理内阁因此倒台。法国的军事和外交陷于一片混乱之中。正当抗法前线捷报频传，法国政府倒台，中越军民准备乘胜追击的关键时刻，李鸿章等人把它当作向侵略者寻求妥协的好机会和乞和的资本。主张“乘胜即收”，建议清廷“当借谅山一胜之威，与缔和约，则法人必不再要求”。英、美、德等国政府也都极力要促成以中国方面的妥协让步为前提的和议。在镇南关—谅山大捷前夕，清政府即派英人金登干为代表在巴黎与法国秘密议和。二月十九日，金登干以清政府名义，在巴黎和法国代表毕尔签订了《中法停战条件》。二十二日，清政府发布了停战撤军的命令，命前线各军三月初一停战，十一日撤军，向法国侵略者求和。中法战争以中国不败而败、法国不胜而胜结束。四月二十七日，清政府授权李鸿章与法国政府代表、驻华公使巴德诺在天津签订了屈辱的《中法会订越南条款》，即《越南条款》、《中法新约》，法国不仅把越南变成它的殖民地，而且打开了中国西南门户。由于清政府的腐败、怯懦，法国在战场失利的形势下仍然达到了发动这场侵略战争的目的。从此，法国势力伸进我国云南和广西，大大加深了大西南边疆的危机。　(邱远猷)

《中法会议简明条款》签订

《中法会议简明条款》，清光绪十年(1884)法国强迫清政府签订的不平等条约。

中法战争爆发后，驻扎越南山西的清军统帅、云南新任巡抚唐炯(1829—1909)，感到清廷战议不坚，败则为罪，胜不为功，即率军逃往兴化。黑旗军代为坚守，奋战后败退。十年正月，法国任命米乐(Charles Théodore Millot，1829—1889)继孤拔为法国侵略军的统帅，并增兵河内。二月，法军1.2万人向北宁进犯。北宁守军由新任广西巡抚徐延旭(？—1884)指挥，但他远躲在据北宁800里后的龙州避暑，前线将领不战而逃，北宁迅速失陷。接着，太原、兴化相继被法军占领。不到5个月，法军就占领了红河三角洲。山西、北宁失陷后，清军在北圻的地位大大动摇。慈禧太后得报后十分惊恐。为掩饰败绩和乘机加强自己的专制权势，把战败责任推到恭亲王奕䜣身上，罢黜其军机大臣等一切职务，更换了全部军机大臣，命礼亲王世铎(1853—1921)领导军机处，贝勒奕劻主持总理衙门，光绪帝生父醇亲王奕譞会同商办军机处要政。实际上是由奕譞集团代替奕䜣集团。同时，下令将唐炯、徐延旭撤职查办，任命潘鼎新(？—1888)为云南巡抚。但是，清政府并未从根本上放弃妥协方针，仍寻机与法国谈判。而法国这时正与英国争夺埃及，一时难以扩大侵华战争，于是利用其在越南北部取得军事胜利的形势，对清政府“诱和”，并通过新任粤海关税务司德籍德璀琳(Gustav Von Detring，1842—1913)向李鸿章转告了这番意图。在德璀琳的撮合下，十年四月十七日(5月11日)李鸿章代表清政府，法国侵华海军旗舰“富尔达”号舰长福禄诺(Fran，çois Ernest Fournier，1842—1934)代表法国政府在天津签订了《中法会议简明条款》，又称《李福协定》。共5款。主要内容是：一、清政府承认法国与越南订立的条约。二、法国不索赔款，中国同意在中越边境开埠通商。三、中国将驻北圻的部队调回边界。四、法国答应在越南修约时，决不出现有损中国政府体面的字样。五、3个月后，双方各派全权大臣，照以上各节，制定细则。根据中法天津《简明条款》，清政府被迫承认了法国对越

南的保护权，并同意中越边境开埠通商。法国还要挟性地迫使清政府声明将北圻清军撤回边界。由此，法国侵略越南以窥伺中国的欲望全部得到了满足。

（邱远猷）

《中俄续勘喀什噶尔界约》签订

《中俄续勘喀什噶尔界约》，清光绪十年（1884）沙俄强迫清政府于新玛尔噶拉签订的帕米尔地区的边界条约。

新疆西部的帕米尔，古时称葱岭，是天山、喀喇昆仑山和兴都库什山交汇而形成的高原地带，有“世界屋脊”之称，自古以来就是中国的领土。帕米尔地区既是中国西部边疆的天然屏障，也是沟通费尔巴干盆地和印度平原的捷径，具有重要战略地位。因此，它一直是俄、英争夺要地。同治十二年正月初三（1873 年 1 月 31 日），两国外交大臣背着中国非法达成分赃“协议”，规定从中国帕米尔地区的萨雷库里起，顺着帕米尔河和喷赤河，划一条分界线：南面的瓦罕帕尔属于英国的势力范围；北面的中国帕米尔地区划为俄国势力范围。从光绪二年（1876）起，沙俄不顾我国边境哨卡和当地人民的制止和阻拦，以游历、考察为名，甚至组织“远征军”，非法进入帕米尔地区。十年五月初五（6 月 3 日），沙俄强迫清政府于新玛尔噶拉签订了《中俄续勘喀什噶尔界约》。通过该约将它的边界向南推进到乌孜别里山口，割占了中国的喀什噶尔西北部大片领土以及什库珠克帕米尔。该约还规定，从乌孜别里山口起，“俄国界线转向西南，中国界线一直往南”。这是中、俄两国在帕米尔地区的唯一边界条约。据此走向线，中国仅保留帕米尔东的郎库里帕米尔、小帕米尔、塔克敦巴什帕米尔。而走向线以西的萨雷兹帕米尔的大部和阿尔楚尔帕米尔的西北角，则被划入俄国的版图。两条走向线（从乌孜别里山口“一直往南”与“转向西南”）之间的三角形地带，则成了“待议地区”，为以后沙俄进一步侵略这个地区埋下了祸根。十八年，沙俄公然违背《中俄续勘喀什噶尔界约》，出兵侵占了帕米尔。清政府提出抗议。沙俄不仅不撤兵，反而增兵强占了萨雷阔勒岭以西 2 万多平方公里的中国领土，进而指出必须“以山中水流处”（即萨雷阔勒岭）划分中俄在帕米尔的边界，以先占后议的惯用手法，阴谋迫使清政府承认既成事实。从十八年秋开始，沙俄强迫中国谈判帕米尔划界问题，谈了很久，毫无结果。二十年三月十三日和十八日（1894 年 4 月 18 日和 23 日），中、俄两国政府先后向对方发出照会，声明各国命令本国“主管机关不得超越目前它们所占据的位置”，直到两国间“对帕米尔划界问题得到最后解决为止”。清政府还声明：“在采取上述措施时，并不意味着放弃中国对于目前由中国军队所占领以外的帕米尔领土的权利。它认为应保持此项以 1884 年界约为根据的权利，直到达成一个满意的谅解为止。”自此次中俄两国换文以后，双方再也未就帕米尔问题进行谈判。沙俄始终非法霸占萨雷阔勒岭以西 2 万多平方公里的中国领土。于是，中、俄两国在帕米尔就存在一个未定国界的问题。二十一年二月十五日，沙俄背信弃义，私与英国趁中日甲午战争中国战败之机，擅自订约瓜分了萨雷阔勒岭以西的帕米尔。清政府当时提出抗议，再度申明：“日后必重申前说”，明确表示了中国政府不承认俄、英瓜分帕米尔协议的严正立场。

（邱远猷）

马尾海战

清光绪十年（1884）中、法海军在福建马尾的战斗。

马江，又称马尾，位于福建福州东南，是闽江下游海军天然良港。清政府除南、北洋水师以外的第三支海军福建水师和洋务派创建近 20 年的福州造船厂，均在此港。马尾港是一河港，四周群山环抱，港阔水深，可泊巨舰。从闽江口至马江，距离 30 余公里，沿岸形势险峻，炮台林立，仅马江附近就有炮台 7 座，并有部分克虏伯大炮，防御能力较强。十年四月（5 月）《中法会议简明条款》签订后，法国侵略者并未满足，决定在军事上从海上进攻中国。六月中旬进犯基隆没有得逞，后即调动全军准备进攻福州。早在闰五月下旬起，法国海军中将孤拔（Amedèe Anatole Prosper Courber，1827—1885）率领舰队以“游历”为名，驶进闽江马尾军港。钦差会办福建海疆事宜大臣张佩纶（1848—1903）、闽浙总督何璟（？—1888）、福建船政大臣何如璋（1838—1891）等，唯恐拒绝他们前进将会得罪法国，影响中法“和议”和列强“调解”，竟听任法舰违犯国际惯例，驶入马尾，甚至给以友好款待；同时，命令各舰：“不准先行开炮，违者虽胜也斩。”于是，法舰在马江者每日或四五艘，或五六艘，出入无阻。它们与福建水师军舰首尾相接，并日夜监视之，前后为时月余。福建水师处于被法舰围困的状态，战争一触即发。福建海军许多官兵请战，要求自卫；不少士大夫上书要求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李鸿章派北洋水师支援，以挽救大局。但李鸿章执意求和，不准抵抗，更拒绝增援。何如璋等也怕

影响和谈，命令各舰不准发给子弹，不准无命自行起锚。七月初二(8月22日)，法国政府电令孤拔消灭中国福建水师。孤拔决定于次日下午趁退潮船身转移方向时便开战。因为当时用船首系泊，船身随潮水涨落而改变方向。涨潮时，船头指向下游，落潮时船头指向上游，可使大部分福建水师位于法舰的前方，无法进行有力的回击。初三上午8时，法国驻福州副领事白藻太(Georges Gaston Servan de Bezaure，1852—?)向何如璋等投递最后通牒，限福建水师当天下午撤出马尾，否则开战。何如璋得知后，竟然对福建水师封锁消息，听任各舰抛锚江心，实际上是让各舰坐以待毙。当他们看到法舰升火待发，才慌张起来，以未做好战斗准备要求法方把开战日期改在七月初四；遭拒绝后，才匆忙下令进行临战准备。

当时，法国拥有9艘军舰，共计14514吨，摆在罗星塔的南面和东南，另有鱼雷艇2艘。还有两艘军舰在金牌、琯头一带江面，阻止清军塞江封口，保障后路安全。参战法舰共有重炮71门，还有不少射速为每分钟60发的哈齐开斯机关炮，官兵共有1790人。福建水师拥有11艘军舰，共计6500吨，炮47门(大口径炮很少)，官兵1176人。福建水师8艘战舰停泊在马江边的罗星塔之西，3艘停在罗星塔之东。从吨位、防护能力、重炮数量、兵员素质等方面比较，中法两国海军实力悬殊，法国舰队显然占有优势。当日13时56分，孤拔趁落潮的有利时机，指挥法舰突然袭击福建水师。福建水师舰只未及起锚，就被法舰第一排炮弹击沉两艘，重创多艘。战斗开始后，张佩纶竟吓得神慌意乱，晕倒在地，由随从扶起逃命。驻福州的福建巡抚张兆栋以及旗舰“扬武”号管带兼舰队指挥张成，也都先后逃之夭夭。在十分不利的情况下，福建水师下层官兵却英勇还击。旗舰“扬武”号(福建水师中唯一的一艘轻巡洋舰)，虽受重伤，船身倚斜，势将及溺，仍发尾炮准确地击中法国旗舰“富尔达”号，击毙其引水和5名水手。江面战斗仅进行了近半小时，很快就以清军的失败而告终。福建水师兵船11艘、运输船19艘，全被法舰击沉、击毁，官兵阵亡521人，受伤150人，下落不明者51人。法军仅死5人，受伤15人，有两艘鱼雷艇受重伤，其余为轻伤。七月初四上午，部分法军炮舰乘涨潮上驶，用大炮轰毁福州造船厂，使之变成一片瓦烁。七月初五，法海军陆战队一部在罗星塔登陆，夺去了3门克虏伯大炮。此后几天，法舰驶向下游，逐次轰击闽江两岸炮台，炸毁无数民房，然后鱼贯而出，退至马祖澳(定海湾)。马尾海战的惨败，主要是清朝政府妥协政策和前敌将领昏聩畏敌造成的，也是中国军事技术落后于法国的结果。 (邱远猷)

镇南关大捷

清光绪十一年(1885)中法战争后期清军在镇南关大败法军的重要战役。

光绪十一年正月初九(1885年2月23日)，法军攻占中越边境上的重镇——镇南关(广西友谊关)，战火烧到中国境内。广西龙州乃清军全军后路，商民惊徙，游勇肆掠，逃军难民蔽江而下，广西全省大震，形势十分严重。新任两广总督张之洞为挽回不利形势，除任命潘鼎新总统广西关外军事外，起用了退职老将冯子材(1818—1903，字南干，号萃亭，一作翠亭，行伍出身)帮办广西关外军务。冯子材虽年近七旬，但因久任广西提督，三次出关，威惠素著，颇得桂、越人心，被新任广西巡抚李秉衡等前敌将领推为前敌主帅。冯子材在中越人民高昂斗志的鼓舞下，团结各军将士，大力整顿溃军，迅速稳定后方，广泛联络边民，加紧修筑工事，积极准备反击侵略军，收复镇南关。法国侵略军慑于中国军民的强大声势，于十一年正月十一日，炸毁镇南关，退出关外30里地的文渊城，伺机反扑。

法军退出镇南关后，冯子材移驻关内8里处关前隘。他和各军将领到前线反复勘察，选定形势险要的关前隘(隘南口)附近的有利地形构筑防御阵地，作为同法军进行决战的地点。关前隘在镇南关内约8华里处，东西两面高山夹峙，中间为宽约2华里的隘口。东面的大青山高800余米，向南倾斜与小青山相连，再南为马鞍山，一直延伸到镇南关的东面。西面的凤尾山高600余米，同样向南倾斜，直至龙门关(一东西向峡口，有小路可通扣坡)，然后经一座大石山延伸到镇南关的西面。关前隘南面的谷地宽2华里多，谷地南端有几座小石山，往南直至镇南关都是起伏不平的山丘，统称横坡岭。冯子材命令部队在关前隘两旁的东西岭上赶修炮台多座，在隘口前抢筑了一条横跨东、西岭的土石长墙(长3华里多，高约9尺，宽约4尺)。墙外挖掘4尺宽的深堑，以利坚守。从而构成一座较完整的山地防御阵地体系。在兵力部署上，冯子材亲率所部18营萃军(因冯子材号萃亭，故时称其所率军队为“萃军”)扼守关前隘的长墙和两面高山险要，担任最主要的前沿阵地正面防御；王孝祺部8营勤军屯于萃军后面半华里处，作为正面防御的第二梯队；苏元春(约1845—1907)及陈嘉(?—1885)所部桂军18营屯于关前隘后5华里

的幕府村，作为总预备队；魏纲所部鄂军8营屯于平而关，控制由芃葑（七溪）至龙州的水道；蒋宗汉所部10营广武军、方友升（？—1906）所部4营抚标亲兵屯于凭祥，作为第三梯队，防止敌人暗袭；王德榜（1837—1893）所部10营定边军，屯于镇南关东南15里的油隘，为左路军，准备抄袭来犯敌人后路。潘鼎新率淮军5营屯于海村，以镇后路。加上驻龙州、新街等处部队，东线清军总兵力约达80余营。

冯子材周密布防后，便先发制人，于二月初六主动出击法军占据的文渊城，打乱法军侵略部署，提高了将士的战斗情绪。初七，尼格里为争取主动，率法军第二旅2000余人分三路发起攻击，进入镇南关，企图占领关前隘清军阵地。冯子材指挥苏元春、王孝祺等部迎击，战斗甚为激烈。当地壮、瑶、白、彝、汉等族人民也前来助战。越南人民闻讯，亦建立忠义军五个大团共2万余人在关外配合作战。经过一场激烈的白刃战，终于将法军逼离长墙，压下山谷。初八、法军分三路再次发起冲击。其主力猛扑关前，冯子材身先士卒，率部英勇杀敌。接着，发起声势浩大的反攻，以排山倒海之势向法军勇猛冲杀过去，进行围攻。经过两天的激战，中国军队取得大胜，法军全线崩溃，狼狈逃出镇南关，退到文渊。前线中国将士群情振奋，乘胜追击逃敌，于二月初十攻克文渊城。十二日攻克驱驴（亦作骑驴），重伤法军总司令尼格里（François Oscar de Négrier，1839—？）。十三日收复谅山。十五日收复屯梅、观音桥。十七日收复谷松。法军犹惊弓之鸟，一口气逃到郎甲、船头一带。镇南关、谅山一役，共杀伤法军近1千人，取得巨大胜利，威震中外，法国茹费理（Jules François Camille Ferry，1832—1893）内阁为此倒台。中国的胜利扭转了整个战局。冯子材决定于二月底三月初亲率东线全军进攻北宁、河内。但就在此刻，清廷下诏停战撤兵，彻底破坏了前线军民乘胜进军的作战计划。

（邱远猷）

临 洮 大 捷

清光绪十一年（1885）中法战争后期刘永福黑旗军与清军在临洮大败法军的重要战役。

刘永福（1837—1917），一名义，字渊亭。广东钦州（广西防城）人。雇工出身。咸丰七年（1857）参加天地会起义，所部因以七星黑旗作军旗，故称黑旗军。同治九年（1870）率部进据保胜，十二年应越南政府约请，领兵入越抗法。屡获战功。光绪十年八月下旬至十一年正月中旬，法国西路侵略军在越南宣光被刘永福黑旗军围困。十一年正月十七日（1885年3月3日），法军解宣光之围，随即以第一旅留守宣光，其余部队撤回端雄、河内等地。接着占据兴化的法军第二旅统领波里也企图向兴化以东红河两岸滇军发动进攻，以进一步改善法军在北圻西线的态势，保障主力在东线继续发动进攻。清军西线指挥官岑毓英获此情报后，即令滇军总兵覃修纲部约4000人严守红河两岸重要据点馆司、夏和、清波、锦溪等；令竹青、陶美等人率领的1000余人及越南义队，与滇军李应珍部，共同防守临洮府以东村落；刘永福则率黑旗军进驻临洮。二月初七，法军1000余人伙同一批越南教民，由兴化渡红河，进攻临洮东南的山围社、越池。防守该地的中越军民联合部队坚守阵地，沉着应战，等待法军接近前沿阵地时，齐鸣枪炮，引发地雷，打退了法军的进攻。接着，法军连续几次冲锋，守军均以坚固工事为依托，发挥近战火力，顽强抗击，守住了阵地。法军企图均未得逞，而且伤亡不少，已处于进退维谷的境地。傍晚，越南义军趁机在村落周围遍插刘永福黑旗，并用中国语齐呼杀贼，声震九霄。法军以为遭到黑旗军的突然包围，惊恐万状，于是弃械纷纷逃窜。由于中越两国军民紧密配合，英勇战斗，中国守军又充分利用地形，构筑了比较适应当时作战情况的野战工事——地营，中越军民在临洮附近大败法军，毙伤敌军数百人，缴获法军红白衣裤、军帽等1000余件，收复了广威府、黄冈屯、鹤江和老社等十几个州县，取得西线战场上的一次较大的胜利。可惜，正当他们准备进攻宣光之际，突然接到清廷的停战诏书，只好忍痛罢兵。　（邱远猷）

《中法会订越南条约》签订

《中法会订越南条约》，即《越南条款》或《中法新约》，又称《李巴条约》，清光绪十一年（1885）法国强迫清政府订立的关于结束中法战争的不平等条约。

十一年二月镇南关、临洮大捷，是鸦片战争以来中国所取得的一次重大胜利，是法国发动侵越和侵华战争以来所遭到的最大一次惨败。它极大地鼓舞了中国军队的士气，把反对法国侵略的斗争推向高潮；沉重地打击了法国的侵略气焰，使法国国内政局发生了极大的变化，茹费理内阁因此于二月十四日（3月30日）倒台。从当时的局势来看，中法战争将有可能以中国的胜利和法国的失败而告终。然而，本来就是被迫宣战的清政府，这时不但没有利用这种极为有利的形势，去争取战争的彻底胜利，反而把军事胜利当作求和的资本。北洋大臣李鸿章主张“乘胜

即收”，建议清政府立即与法国缔结和约。他在谅山大捷之后就迫不及待地致电总理衙门，叫嚷：“当借谅山一战之威，与缔和约，则法人必不再妄求。”英、美、德等列强为了本身的利益也都极力促成议和。慈禧太后立即采纳，表示仍然愿按照税务司英国人金登干(James Duncan Campbell，1833—1907)与法国外交部政务司司长毕乐(Billot)在巴黎已经谈妥的条件恢复和平。法国方面，军事失败及其由此而引起的政局混乱，迫使它同样急切地希望按已经谈妥的条件停止战争，所以不待新内阁成立，便由总统授权毕乐于十一年二月十九日(4月4日)与金登干匆促签订停战协定。二月二十二日，清政府向前线各军下达定期停战撤兵命令，规定：越南宣光以东，三月初一停战，三月十一日中国军队撤回，二十一日齐抵广西边界；宣光以西，三月十一日停战，二十一日撤军，四月二十二日齐抵云南边界；台湾于三月初一停战。前线清军爱国将士接到停战令后，莫不痛心疾首，不肯退兵。冯子材致电张之洞请他奏请清廷“诛议和之人”，表达了爱国将士对卖国贼的愤怒抗议。张之洞、左宗棠、彭玉麟等也都极力反对撤兵。但清廷一意孤行，竟电告张之洞：“冯(子材)、王(德榜)若不乘胜即收，不惟全局败坏，且恐孤军深入，战事益无把握。……着该督遵旨，亟电各营，……如期停战撤兵。倘有违误，致生他变，惟该督是问！”就这样，前线军民浴血奋战赢得的胜利，竟被腐败无能的清统治者白白断送了。三月二十九日，一意和戎的清政府，不顾中国人民的反对，授权北洋大臣李鸿章为谈判代表，与法国政府代表、驻华公使巴德诺(Jules Patenôtre，1845—1925)在天津开始谈判中法正式条约。四月二十七日(6月9日)，在天津签订了《中法会订越南条款》，共10款。主要内容是：一、清政府承认法国与越南订立的条约；二、在中越边界上指定两处为通商地点，一在保胜以上，一在谅山以北，允许法国商人在此居住并设领事；三、降低中国云南、广西同越南边界的进出口税率；四、日后中国修筑铁路时，应与法国商办；五、法军退出台湾、澎湖。显然，法国侵略者利用清政府的昏庸怯懦，在战败的情况下，仍然达到了它发动这次战争所要达到的目的，以致中国“不败而败”，法国“不胜而胜”。从此，法国对越南的殖民统治权取得了清政府的承认，越南全境成为法国进一步侵略中国的基地，法国侵略势力伸入我国云南和广西。中法战争结束后，中国边疆面临列强侵吞蚕食的危机进一步加深。随着中国西南几个友好邻邦相继沦为英、法殖民地，外国侵略者据此不断地向中国腹地推进。同时，清政府在战争中所表现出的软弱态度，也更加刺激了英、日加强对中国邻邦缅甸、朝鲜的争夺和觊觎中国边境的侵略野心。

(邱远猷)

《中葡和好通商条约》签订

《中葡和好通商条约》(亦称《中葡北京条约》)，清光绪十三年(1887)葡萄牙在英国支持下强迫清政府订立的不平等条约。

澳门自古以来就是我国的神圣领土。它位于广东珠江口之西，面积15.51平方公里，其中澳门半岛5.42平方公里，凼仔岛3.48平方公里，路环岛6.61平方公里。人口约40万，我国同胞占98%以上。澳门旧属广东省香山县(中山市)管辖。明嘉靖三十六年(1557)，葡萄牙殖民者贿赂广东地方官吏，借口曝晒水浸货物，强行登岸而留居在澳门，但每年向广东省香山县缴纳地租。清政府在澳门设关征税。鸦片战争后，葡萄牙殖民者眼看英国侵略者用武力夺得中国领土香港岛，亦仿效英国人扩大自己的侵略地盘。道光二十九年二月十一日(1849年3月5日)，擅自发布通知封闭粤海关监督驻澳门办事处，赶走清政府官员和海关人员，停付澳门租金，公然强占了澳门半岛。咸丰元年(1851)攻占凼仔岛。同治三年(1864)攻占路环岛。从此，整个澳门被葡萄牙殖民者所占领。光绪六至九年间，中俄、中法关系紧张时，葡萄牙多次企图乘机迫使清政府承认澳门归葡萄牙所有，但均未达到目的。葡殖民者为使侵占澳门合法化，勾结英殖民者于十三年三月初二(3月26日)利用清政府派拱北税务司金登干前往葡都里斯本交涉鸦片走私问题之机，签订了《中葡会议草约》，塞进“葡国永驻管理澳门”字样。同年十月十七日(12月1日)，清政府总理衙门大臣奕劻与葡萄牙全权代表罗沙(Thomaz de Souza Roza)，在北京签订了《中葡和好通商条约》，共54款，附《缉私条款》3款。主要内容：一、中国仍允葡萄牙永驻和管理澳门以及属澳之地；二、葡萄牙得派公使驻北京和在通商口岸设领事；三、葡萄牙取得领事裁判权；四、葡人可享受中国已给或将给其他国家的通商特权，在通商口岸有居住、租买土地、建造房屋、设立教堂等权利。条约虽然再次确认《草约》中有关澳门的提法，但同时规定：“惟现经商定，俟两国派员妥为会订界址，再行特立专约。”1928年4月，中国政府外交部通知葡萄牙政府中止《和好通商条约》，但葡萄牙不走，继续占领着澳门。

(邱远猷)

西藏隆吐山战役

清光绪十四年(1888)西藏军民进行的第一次抗英战斗。

英国早就企图从其殖民地印度向中国西藏扩张。19世纪60年代初,英国资本主义侵略势力在进一步伸入中国的两个邻邦哲孟雄(锡金)和不丹之后,不断派遣侵略分子,以传教、游历为名入藏侦察。光绪二年《中英烟台条约》签订后,使英人入藏合法化,因而人数越来越多。他们大都从事间谍或文化特务活动。英国驻华公使还多次到清政府总理衙门取闹,要求与西藏通商。并从光绪十年起,不断入侵西藏。西藏地方政府呈文驻藏大臣,历数英国侵略罪行,表示西藏僧俗人等“男丁死后,即剩女流,情愿复仇抵御,别无所思”,并于光绪十二年在热纳宗隆吐山要隘建卡设防,实行自卫。十四年二月初八(1888年3月20日),英国侵略军在拉累诺的率领下,向守卫隆吐山的西藏地方军民突然发动进攻,正式挑起了第一次侵藏战争。西藏爱国军民奋勇抗击,用火绳枪、抛石器等简陋武器打击侵略者,伤毙英军约100余人,几乎活捉印度的孟加拉代理省督,取得初战胜利。翌日,英军全力反攻,因敌我力量悬殊,西藏地方军队退守隆吐山东北的纳汤,隆吐山宣告失守。接着,英军又侵占涿纳,西藏地方军队退往捻纳各地。七月,林芝、波密、边坝等地1万多援军赶到,发起反攻,重新集结于前线,与在孟雄的英军相对峙。在隆吐山战役中,西藏人民用鲜血和生命实践了“誓死抵抗,决无二心”的誓言。　(邱远猷)

“伏阙忧危数上书”

清光绪十四年(1888)至二十四年,戊戌变法前十年间,康有为先后七次上书光绪帝,要求变法。后康氏在《怀翁常熟去国》诗中有“伏阙忧危数上书”句。

光绪十四年十一月初八(12月10日),康有为利用到北京应顺天乡试的机会,第一次向光绪皇帝上奏了一篇长达五六千字的《为国势危蹙,祖陵奇变,请下诏罪己及时图治折》(即《上清帝第一书》),历陈中国面临列强环伺,“外夷交迫”的危险局面:日本、俄国窥伺东北,英国图吞西藏,法国谋占越南,觊觎我国西南。欲抵御外敌,必须“内修政事”,“变成法,通下情,慎左右”——此即康有为向光绪皇帝提出的三项变法建议。所谓“变成法”:他认为如今的法制承袭的是六朝、唐、宋、元、明的弊政,已不适用于今日,因此不能固守成法,必须根据形势的变化,革除弊政,参酌古今中外的法制,制订新法。他以日本“变法兴治”为例,认为中国10年之内“富强可致”,20年即可“雪耻”。所谓“通下情”:康认为中国政治一大弊端是“上体太尊而下情不达”,“太尊则易蔽,易蔽则奸生”,所以他要求清朝统治者能纡尊降贵,削减那些阻格言路的重重堂陛,使“臣下人人得尽其言于前,人人得献其才于上”。所谓“慎左右”:就是要清朝统治者辨明“忠佞”,“近忠良”而革佞臣。这次上书,由于顽固派阻挠,未能上达光绪帝,而且康有为备受顽固派的攻击和嘲笑。光绪二十一年春夏之交,《马关条约》签订,正值康有为到北京参加会试,遂联合18省1300余名应试举人联名上书,要求“拒和、迁都、练兵、变法”,是为《上清帝第二书》,即“公车上书”(见“公车上书”条)。“公车上书”后不久,榜发,康有为得中进士,授工部主事,又于同年五月初六(5月29日)呈上1.3万字的《请及时变法、富国、养民、教士、治兵呈》,即《上清帝第三书》。这次上书补充和发挥了《公车上书》的内容,并提出变法的步骤。他提出自强雪耻四策,即富国、养民、教士、练兵。前三策是重述《公车上书》的内容,对练兵策提出了几项具体办法:一、汰冗兵而合营勇;二、起民兵而立团练;三、练旗兵而振满蒙;四、募新制以精器械;五、广学堂而练将才;六、厚海军以威海外。如何能实现上述四策?则在于“求人才而擢不次”,“慎左右而广其选”,“通下情而合其力”,以使人才得,左右贤,下情达。为了“通下情”,康又重申《公车上书》中已提出的设立议郎的要求。这次上书于五月十一日由都察院转呈,这是光绪皇帝第一次看到康有为的上书,大为振奋,“毅然有改革之志”。命阁臣抄录副本四份,一份上呈慈禧太后,一份放军机处抄发各省督抚将军议处,一份留乾清宫,一份存勤政殿备览。闰五月十三日,光绪帝颁布《举人才诏》。二十七日又谕命将康有为的奏折发交各省督抚“会议奏复”;并督促各地修铁路、开矿山、办邮政、训练军队,鼓励私人办厂;还提到“因时制宜”,“图自强而弭祸患”。闰五月初八,康有为又呈上近万字的《为变通善后,讲求体要,乞速行乾断,以图自强折》,即《上清帝第四书》。着重从政体着眼,提出了“扫除更张,再立堂构”的变法方案,内容可概括为三个方面:一、“讲明国是”,就是要求光绪帝面对群臣,痛下决心,摆脱封建伦理纲常的束缚,全面采用西法,“尽弃旧习,再立堂构”,进行政治制度的变革。如此则3年而规模成,10年“则治化大定”。二、“设议院以通下情”,认为设立议院是西方

资本主义国家所以富强的重要原因之一，谓设议院可使“民间疾苦”上闻，朝廷“德意下达”，“事皆本于众议”，则权奸可除，中饱可杜，然后百度并举，以致富强。但康有为请设的议院是以尊君权为前提，实质还只是皇帝的咨询机构，作用仅限于宣扬上德，沟通下情，解决筹饷问题等方面，与西方资产阶级议院尚不可同日而语。但明确地要求设立议院，在中国历史上这还是第一次。三、为使皇帝能做到“有情必通，有才必用”，提出如下5项具体措施：1.“下诏求言”：广开言路，允许天下百姓直接到午门递折言事，由御史监收，各省府州县也许收条陈，以通下情。2.“开门集议”，令天下都邑10万户推举一名议郎，凡有政事，交议郎会议讨论，以三分之二多数通过后，立即实行。3.“辟馆顾问”，大开便殿，广集图书。皇帝公务之余翻阅图书；并设顾问人员，以备咨询，使天下人才群集皇帝左右，经常探询中外兴衰之故。4.“设报达聪”，令各省设报馆，州县乡镇亦陆续开设。报纸须及时进呈，使“皇上可周知四海”。5.“开府辟士”，中央及地方督府均应开设幕府，招纳贤士，以劝诫官吏廉洁知耻。康有为指出，要做到上述几条，皇上必须“引咎罪己，以收天下之心”；“赏功罚罪，以伸天下之气”；“广顾问以尽人才”；“置议郎以通下情”。数诏一下，则中国富强可致，外国必收敛锋芒，从此不敢轻犯我中华。这次上书由于遭到御史徐郙、工部侍郎李文田和督办处大臣荣禄的阻挠，以致投递无门，未能送达光绪皇帝。年末，康有为返回广州，继续在万木草堂讲学。

光绪二十三年十月（11月），德国强占胶州湾，瓜分大祸迫在眉睫。康有为立即从南方赶到北京，于十一月十二日（12月5日）呈上6000字的《外衅危迫，分割洊至，急宜及时发愤，革旧图新，以少存国祚折》，即《上清帝第五书》。这次上书较前数次上书情词激烈。他开门见山，痛切批评清朝统治阶级没有吸取以往战争失败的教训，仍然苟且偷安，故步自封，守旧不变，致使国势日衰，酿成今日之祸。他警告说，现在中国的危险情形好比“地雷四伏，药线交通，一处火燃，四面皆应”，如果仍不思变法图强，恐怕此后“皇上与诸臣，求为长安布衣而不可得矣！”他并向光绪帝提出了变法的上、中、下三策，以供采择：上策是“采法俄、日，以定国是”；中策是“大集群才而谋变政”；下策是“听任疆臣各自变法”。认为能行上策，可以强；行中策，可以弱；行下策，可以不亡。在这次上书中，比第四书更为鲜明地提出了“自兹国事付国会议行”，“采择万国律例，定宪法公私之分”等内容，涉及了清朝中央政权体制的改革，体现了维新派追求资产阶级民权制度的政治理想。可惜的是，由于时间匆忙，上书系仓促拟就，故对这些带有根本性的改革建议，未能深入展开论述。这次上书由于工部尚书淞桂扣压，不肯代呈，故仍不得上闻。但为京中许多官员辗转传抄，天津、上海、长沙的报纸也陆续披露刊载，上海大同译书局于当年十二月（1898年1月）即出版了单行本。十一月十九日，给事中高燮曾并上书推荐康有为，要求光绪帝予以召见，恭亲王奕䜣以清朝惯例，非四品以上高官，皇上不能召见为借口，加以阻挠。光绪帝遂于二十四年正月初三（1898年1月24日）命王大臣于总理衙门西花厅接见康有为，询问变法事宜。次日，翁同龢将召见情形报告给光绪帝，并加以保荐，光绪帝命康条陈所见，同时进呈其所撰《日本变政考》等书。正月初八，康呈上《外衅交迫，分割洊至，宜及时发愤，大誓臣工开制度新政局折》，即《上清帝第六书》。此折是康有为提出的统筹全局、尽变旧法的纲领性文件。主要内容如下：一、再次强调“明定国是”的重要性，形象地将“定国是”比喻为船上的舵、罗盘的针，没有它，无以定航向，船不能行驶。认为“明定国是”是实行维新变法不可或缺的大前提。二、提出变法的施政纲领。康有为认为中国变法“莫如取鉴于日本”，走日本明治维新之路。他把日本明治维新的经验归纳为3条：1.“大誓群臣以革旧维新，而采天下舆论，取万国之良法”；2.“开制度局于宫中，征天下通才二十人为参与，将一切政事制度重新商定”；3.“设待诏所，许天下人上书”。康有为指出，“此诚变法之纲领，下手之条理，莫之能易也。”此三条，第一条标明其依靠君权实行变法，是变法的前提；第二条是要改革中央政府的权力机构，要使维新派参与政权，是变法能否成功的关键；第三条是要广开言路，是变法顺利推行的条件。三、提出以设立制度局为核心，建立从中央到地方一整套全新的政治机构的主张。按照康有为的设想，制度局是一个指导全国变法的中枢机构，参加制度局的人选应当是妙选“天下通才”（指维新人士）十数人为“修撰”，派王大臣负责主持，体制平等，便于商榷，每日值内，共同讨论，皇上亲临，折衷一是。制度局的职能是将旧制新政，斟酌其宜，某政宜改，某事宜增，草定章程，考核至当，然后施行。为推行新政，康有为还建议在中央设立12个专局：法律局、税计局、学校局、农商局、工务局、矿政局、铁路局、邮政局、造币局、游历局、社会局、武备局。凡经制度局所议定新政事宜，皆交12局施行。可见制度局是立法机构，12局是行

政机构。地方机构改革的主旨是变“官”为“差”，道设新政局，县设民政局，管理各级地方新政事务。四、此次上书放弃了前几次上书当中提出的民权要求，不再提设立议郎、议院、国会、宪法等项主张，而一概代之以设制度局，这是一种策略上的重大转变，由“变于下”改变为“变于上”，由兴民权以挽危局，变为以君权雷厉风行推行新政。施行策略转变的原因，一是顽固派与维新派力量对比悬殊，强行民权，阻力太大，即便施行，仍为顽固派所操纵，结果会适得其反，反而不如以君权雷厉风行，推行新政更为有利。也就是梁启超所说的“借君主之法，行民权之意”。二是由于中国民智未开，不具备行民权的条件。三是二十四年初，光绪帝已有接受变法的意向。既要依靠皇帝推行变法，就需制订一套皇帝及其左右都能接受的变法方案，故只得放弃民权要求，而提倡尊君权。这种策略的转变从政治上说虽是一种倒退，但却符合当时的实际情况。以后康有为的上清帝书和新政奏议基本上坚持了第六书提出的方针。光绪皇帝看了这个奏折非常满意，“置御案，日加披览”，“变法之志更决”。二月二十日，康有为又进呈《俄彼得变政记》一书，并一起呈递将近3000字的《译纂俄彼得变政记成书，可考由弱致强之故折》，即《上清帝第七书》。在这次上书中，康有为主要说明中国变法应效法俄国。他认为，考察全球，富乐莫如美国，而美国的民主制度与中国不同；强盛莫如英、德，而英、德的君主立宪制也与中国相异；惟俄国，其君权最尊，体制崇严，与中国同。故“中国变法莫如法俄；以君权变法，莫如采法彼得”。他又认为俄彼得最重要的经验便是“纡尊降贵，游历师行”，希望光绪皇帝能切实效法。要求皇帝纡尊降贵，实质上是希望光绪帝能破除陈规，接纳维新人士参政；“游历师行”，则是希望光绪帝善于学习外国经验，凡是外国的长处，无论是工业技艺还是政治法律，均应了解、学习、效法。只要照此办理，国家必能富强。此外，康有为还希望光绪帝能像彼得那样富于魄力，敢于毅然打击顽固派，排除阻力，雷厉风行推行新法。康有为所呈第六书、第七书，及《日本变政记》、《俄彼得变政记》两书，促成了“诏定国是”的实现。 （刘振岚）

《中英会议藏印条约》签订

《中英会议藏印条约》，清光绪十六年(1890)英国强迫清政府签订的不平等条约。

十四年西藏隆吐山等地失守后，西藏地方爱国军民丝毫没有动摇保卫祖国领土的决心。他们庄严宣告：“凡我藏众男女，誓不与英人共天地。”西藏地方政府也积极组织反攻。但是，昏愦的清朝中央政府在接到隆吐山失守的战报后，不仅没有领导与支持西藏爱国军民的反侵略战争，反而撤出隆吐山边卡，罢黜了力争热纳宗属于我国西藏和积极支持抗英斗争的驻藏大臣文硕，说他“识见乖谬，不顾大局”，改派升泰（？—1892）为驻藏帮办大臣进藏主持一切，与英国“罢兵定界”；并派海关总税务司英人赫德之弟赫政(James Henry Hart，1847—1902)为升泰的助手。从光绪十四年六月十二日(7月20日)起，英军曾两次进攻西藏地方军队阵地。西藏地方军队曾准备对英国进行反击和战败后准备再战，均因升泰下令阻拦而未能如愿。十五年九月，升泰亲去仁进岗前线同英军谈判。十月十六日(11月8日)升泰同英方代表柏尔(Sir Charles Bell，1870—1945)在哲孟雄(锡金)属地会面。至此，英国第一次侵藏战争遂告结束。十六年正月，升泰前往印度加尔各达与英印总督兰士顿(Henry Charles Keith Lansdowne，1845—1927)进行谈判。二月二十七日(3月17日)双方签订《中英会议藏印条约》，共8款。主要内容为：一、清政府承认哲孟雄归英国“保护”；二、划定了中国西藏地方和哲孟雄间的边界；三、有关通商、游牧等项，以后再议。英国由此侵占了哲孟雄，并向中国西藏侵略扩张。十七年冬，为解决《藏印条约》中的遗留问题，升泰与英方代表柏尔在仁进岗重开谈判。次年，升泰在仁进岗病死。清政府任命参将何长荣接替升泰继续谈判。十九年十月二十八日(1893年12月5日)，何长荣与英国特派政务司保尔(Alfred Wallis Paul，1847—1912)在大吉岭签订了《中英会议藏印条款》，又称《藏印议订附约》或《藏印续约》，为十六年《中英会议藏印条约》的附加条款，共12款。主要内容为：一、开放亚东为商埠，准许英国派员在此驻扎；二、亚东自开放之日起，5年内藏印贸易互不收税；三、限制中国西藏人民在哲孟雄的传教、游牧的权利。通过以上两个条约，英国既侵占了中国西藏的一部分领土，又攫取了在中国西藏通商等许多特权。从此英国打开了中国西藏的大门，为深入侵略中国西南准备了条件。 （邱远猷）

余栋臣起义

清光绪十六年(1890)和二十四年余栋臣在四川大足发动的两次反对外国教会侵略的起义。

大足县是川东外国宗教势力侵略较早的地区之一。十六年六月中旬，龙水镇法国天主教堂在十二、

十三年先后两次被群众打后，又重新建成。法国教士彭若瑟害怕教堂再次遭打，竟预先强迫大足县令钱葆塘出令禁止举办迎神赛会。钱葆塘出示禁止，并派把总刘联升带兵守卫。同时传教士还召集管辖的教民100多人守护教堂，结果引起殴斗。教徒烧毁民房，群众遂奋起第三次打教堂。教士逼迫县令逮捕惩办为首人员。前两次打教堂，大足县龙水镇余家坝人、哥老会首领余栋臣(1851—? 名腾良，绰号"余蛮子")都积极参加了，在当地群众中有较大号召力。在第三次打教堂时，他对官兵逮捕为首人员极为愤慨，即约唐翠坪、李玉亭、李尚儒及其二弟翠坪、四弟海坪等12人，在余家院子歃血为盟，众推余栋臣为首，准备起义。十六年六月二十三日(8月8日)，余栋臣等率领由西山煤窑、纸厂工人组成的数百人队伍攻入龙水镇，正式竖旗起义，并发布檄文，号召广大群众驱逐外国传教士。大足、铜梁等县数百里内的群众纷起响应。是年冬，四川总督刘秉璋指使查办委员、候补知县桂天培对起义队伍进行分化和镇压。十七年三月十七日(4月25日)，桂天培率两营勇丁进驻龙水镇，立即调集当地团练配合官兵扫荡余家院子。起义军潜伏西山，继续坚持战斗。七月二十一日(9月11日)起义军与官兵在十万场遭遇激战，损失惨重，余翠坪力战被擒牺牲，余栋臣只身突围，转入大足边境的西山隐蔽活动，为清廷通缉。第一次余栋臣起义失败。二十四年三月二十八日(4月18日)余栋臣在大足双路铺被捕获，即由间道就近解送荣昌监狱。蒋赞臣、唐翠坪、张桂山得悉后立即组织营救。四月初二，约集西山煤窑、纸厂工人和四乡农民200余人涌入荣昌县城，救出余栋臣。为了反对外来侵略和抵制官兵进剿，众推余栋臣为首，蒋赞臣、唐翠坪为副，在龙水镇招募兵卒，铸造武器，再度起义。五月十五日派人前往荣昌河包场郑家湾天主教堂，捕捉了法国传教士华芳济(François Fleury，1869—1919)，当众宣布洋人包揽词讼、强买田产、奸污妇女、残害儿童的种种罪行。次日发布檄文，痛斥帝国主义侵华的各种罪行，指出中国面临被列强瓜分的危机，郑重宣告："爰起义师，誓雪国耻。"在战斗中，起义军又陆续提出了"顺清灭洋"、"保民革教"和"除暴安民"、"打富济贫"等口号。清廷急于五月二十五日谕令四川总督恭寿剿办。起义军击溃清朝官兵。八、九月间，起义军分兵主动出击，北攻铜梁、安岳，南攻永川、江津，东攻重庆，西打内江，所过之处，打教堂，逐教士，惩办不法教民，没收不法教民财产，抗拒官兵。起义队伍多达1万人，编为100哨，每哨50—200人不等。哥老会是这支队伍的组织者和骨干力量。起义影响及于远近30余州县，焚烧教堂20余处。光绪二十四年十一月清廷改派江苏巡抚奎俊任四川总督，相机剿办。四川布政使王之春，在资州(资中)、内江一带以优势兵力击败唐翠坪所部起义军，唐翠坪牺牲。第2次击败安岳、铜梁等地起义军。十二月初四(1899年1月15日)，清军占领距起义军大本营龙水镇20里的双龙埠，次日用大炮轰击余栋臣营，起义军败退。初六，清军攻占龙水镇。余栋臣率3000余人退守西山，清军以重兵围攻。初八，余栋臣走投无路，投降清军。余栋臣第二次起义失败。事后，清政府向侵略者赔款118.61万两白银结案。

（邹远猷）

金丹道起义

清光绪十七年(1891)热河人民反对外国教会侵略的起义。

鸦片战争前，法国天主教教会就潜往热河传教。到甲午战争前夕，天主教把内蒙古分为东蒙古、中蒙古、西南蒙古。热河与朝阳(属辽宁)属于"东蒙古"范围。到光绪十六年，有洋教士30名，教会、教堂150余处，教徒逾万。洋教士和一些不法教民，与地方官吏、蒙古王公勾结，欺凌人民，残害儿童，早已激起民愤。十七年三月，天主教会在热河建昌(辽宁凌源)向各铺恃强"借粮"，在理教首领徐荣到教堂论理，被洋教士枪杀。教堂进而组织武装，蹂躏人民。被迫害的农民、矿工忍无可忍，相率参加金丹道和在理教，反抗压迫。十月初十(11月11日)金丹道首领李国珍、杨悦春率众起义，攻占贝子府，建立"开国府"，杨悦春被推为总大教师，李国珍称"扫北武圣人"。下设丞相及各种官职，发布了安民告示。起义队伍数千人分青、黄、白、红、黑色旗等5队，由开国府分兵四路，划占土地。十三日攻克朝阳府。在理教首领郭万昌(一作万淳)等率众数千首先响应。接着赤峰(属内蒙古)、建昌、平泉一带人民纷纷响应，起义军扩大至数万人。他们喊出了"仇杀天主教，仇杀蒙古王公，仇杀贪官"的响亮口号，摧毁了教堂的武装，击毙作恶多端的教士和教民800多人。在热河起义的影响下，奉天(沈阳)、锦州(属辽宁)和直隶开平(河北独石口)、滦州(滦县)、迁安、永平(卢龙)一带人民纷起驱逐洋教士。这次大起义攻占了热河东部的(和)泉、建(昌)、赤(峰)、朝(阳)4州县，完全摧毁了清王朝在这个地区的统治，直接威胁着热河省城及清王朝的发祥地之一奉天。于是，清政府急调直隶、奉天、热河

军队，在传教士配合下进行血腥"合剿"。到十月底清军与教会勾结在朝阳东部捕杀了在理教首领郭万昌，镇压了东、南两路起义军。十一月底清军打败了西、北两路起义军，重要首领李国珍在转移中被俘，后遭凌迟处死。各路起义军余部相继向开国府集中，准备最后决一死战。芦台练军记名提督聂士成督饬步马队"合力仰攻"，起义军遭到失败，开国府很快陷落，首领王正（增）、王幅和1000余战士奋战阵亡。接着，聂士成又率军攻占起义军另一根据地——距开国府40里的下长皋。2000余义军战死。起义军大本营开国府陷落后，"开国府总大教师"杨悦春父子于十一月二十八日被俘遇难。起义群众共牺牲2万余人。 （邱远猷）

万木草堂讲学

清光绪十七年(1891)至二十四年，康有为为培养变法人才，在广州开堂讲学，堂址几度迁移，通称万木草堂。

十四年，康有为第一次上书清帝，因风气闭塞，顽固派阻挠而不能上达。在愤激之余，他认识到，欲行变法，一必须创立变法理论；二必须培养变法人才。遂于十五年年底返回广东，次年春举家迁往广州云衢书屋。此时结识四川学者廖平。廖平(1852—1932)，原名登廷，字旭陔，旋改名平，字季平，晚号六译。四川井研人。其学以善变著称。光绪十四年至二十四年间提倡今文经学，批判古文经学，著《今古学考》、《知圣》、《辟刘》诸篇，使康有为大受启发。从此康弃古而从今，吸取今文经学"三统"说之变易思想，"三世说"之发展变化的历史观，为其论证变法的理论张本。亦在当年春，广州学海堂的高材生陈千秋慕康有为之名，登门求教，成为康第一个拜门弟子。当年秋，陈千秋以极为崇敬的心情向同窗好友梁启超介绍了康有为的思想和学说，认为"吾与子今得师矣"。梁启超成了康第二个弟子。此后，来学者渐多，至年底已增至20余人。十七年春，康有为租赁长兴里邱氏书屋，正式开设学堂，称长兴学舍。由于学生不断增加，学舍一再易址，十八年再迁于卫边街邝氏祠。十九年又迁于广府学舍仰高祠，学生已达百余人。这时装上匾额，正式题上"万木草堂"四个大字，取"万木森森散万花"之意，比喻培养人才数量多，质量优。比起旧式书院，万木草堂有如下几个特点：一、它的教学宗旨"专在激励气节，发扬精神，广求智慧"，以培养维新变法人才。它的教学内容，已抛弃了陈腐八股，并在一定程度上摆脱了旧时训诂词章等"无用之学"，而贯彻以孔学、佛学、宋明理学为体，以史学、西学为用的方针，重点讲解中国数千年来的学术源流、历史沿革得失，并与外国的历史、政治相比较，不是为学术而学术，而是透过学术，引导学生留意政治问题，探求西方强盛之故，中国衰弱之源，以及解救中国之法。对于中国古代经典，重点讲解今文经学，批判古文经学，令学生熟读《公羊传》和《春秋繁露》，吸取其变易进化思想作为论证变法的思想武器。此外，还令学生阅读江南制造局翻译的西方有关声、光、化、电的自然科学知识，以及容闳、严复、外国传教士李提摩太(Timothy Richard 1845—1919)、傅兰雅(John Fryer，1839—1928)等人的译本。教学方法生动活泼，不拘一格。在课堂上，康有为经常纵论天下大事，从先秦典章制度，到汉、唐、两宋政治；从西方文明到列强侵略，无所不讲。每讲一学，必上下古今，究其沿革得失，并引欧美比较证明，使学生眼光开阔，触类旁通。他还经常结合救亡图存的需要，讲解世界大势，有时讲到外侮频仍、国难当头之处，竟至慷慨激昂，涕泪纵横，"如大海潮音，如狮子吼，善能振荡学者之脑气"，激励学生的爱国情操，坚定学生的救国信念，"使之悚息感动，终不能忘"。二、在学术思想上注重实践，反对空谈。康有为在万木草堂宣讲的学术思想的核心是今文经学。他曾亲手编订《长兴学记》作为学规，其中标明其学术思想"务在逆乎常纬"，"常纬"，即指积习上千年的"俗学"，教育学生"逆乎常纬"，实是对当时高踞庙堂的"宋学"和在学术界占统治地位的"汉学"(指古文经学)的挑战和抨击。康有为为创建变法理论，发动学生和他一起动手，从事著述活动，如《新学伪经考》、《孔子改制考》以及《春秋董氏学》等著作，即是在陈千秋、曹泰、梁启超等弟子参与、协助下撰成的。《新学伪经考》宣称，古文经系王莽国师刘歆(？—23)为帮助王莽篡汉建立"新"朝而伪造的，湮没了孔子"改制"的"微言大义"，因而是"伪经"，与孔子无涉，乃王莽"新"朝之学，故当称"新学"。这既是此书以"新学伪经考"题写书名的含义，也是本书的内容主旨。这部著作打击了"恪守祖训"的顽固思想，动摇了古文经学在思想学术界的统治地位，开"疑古"、"辨古"之风气，为变法维新开辟了道路。《孔子改制考》发挥今文经学"托古改制"之义，把孔夫子打扮成"托古改制"的鼻祖，将资产阶级维新派的政治理想假托于孔子名下，借以争取人们的信服，避免顽固派的非议；同时引"公羊三世说"论证世界历史的进化规律，说明变法的合理性与必然性。这两部著作，前者从"破

旧"立论，后者从"立新"阐发，为维新变法奠定了理论基础。弟子们通过助师撰书的理论实践，在鉴选资料、编纂、校勘以及刊刻印行等方面都受到良好训练，萌发了著书立说的宏志大愿。三、万木草堂的教育方针是德育、智育、体育并重。按照康有为手订的《长兴学记》，在德育方面，要求学生进行"格物"（摆脱外界物质引诱，立下刻苦攻读的志向）、"厉节"（砥砺气节）、"慎独"（谨慎独处）、"养心"（置生死患难、毁誉谤讪于度外），"检摄威仪"（注重仪表、谈吐文雅）、"崇尚任恤"（提倡朋友之间相救相赒、相亲相葬）等方面的道德修养。在智育方面，规定学生应掌握"义理"（包括孔学、佛学、周秦诸子学、宋明哲学、西方哲学）、"经世"（包括政治学理、中外政治沿革得失、政治应用学、群学）、"考据"（包括中国经学、中外史地、数学、格致）、"词章"（包括中外语言文学）以及礼节、音乐（学习各种乐器）、书法、绘图、枪法等方面的知识。在体育方面，规定对学生进行音乐（唱歌）、舞蹈、体操等方面的训练，并开展游历活动。《长兴学记》还提出"四耻"，作为学生的戒条：一、"耻无志"；二、"耻徇俗"；三、"耻鄙吝"；四、"耻懦弱"。《长兴学记》仍包含有旧的封建教育思想内容，但可贵的是，它在中国教育史上，第一次明确提出了学生要在德、智、体三方面发展的教育思想。总之，万木草堂既是一个萌芽状态的资产阶级教育团体，又是一个资产阶级维新派政治团体。在这里，康有为聚徒结党，培养了大批维新人才；著书立说，建立了变法的理论体系。万木草堂的康门弟子，除陈千秋、曹泰早逝外，其他如梁启超、麦孟华（1875—1915）、梁朝杰、韩文举、徐勤（1873—1935）、王觉任、欧榘甲、叶觉迈等都成为维新运动的骨干。参加过维新运动的民主人士张元济（1867—1959）解放后曾赋诗赞誉万木草堂："南洋讲学新开派，万木森森一草堂。谁识书生能报国，晚清人物数康梁。"万木草堂于光绪二十四年八月二十二日被清政府查封，300 多箱图书被焚毁，康有为的著作全部毁版，禁止发行。　（刘振岚）

《中美华工条约》签订

《中美华工条约》，即《限禁来美华工保护寓美华人条约》，清光绪二十年（1894）美国强迫清政府签订的不平等条约。

鸦片战争后资本主义的入侵和掠夺，给东南沿海人民带来深重的灾难。大批破产农民和城镇失业游民，被迫走向海外谋生。外国侵略者乘机进行掠夺人口的"苦力贸易"，掠夺大批华工，前往太平洋诸岛、澳洲、美洲等地，从中牟取暴利。据美国移民局统计，咸丰三年（1853）入美华工仅 42 人，光绪八年竟达 4 万余人。他们对美国西部的开发和建设起了很大作用。19 世纪 80 年代以后，美国由于劳工过剩而开始掀起排华狂潮。八年，美国国会通过了《排华法案》：停止华工入美 10 年；驱逐部分华工出境。十八年，美国国会再次通过一项"排华法案"，宣布将八年通过的《排华法案》延长 10 年；剥夺华人"人身保护法"；在美华工一年内必须登记，否则驱逐出境。中国各阶层人民，尤其是广东人民掀起反美浪潮，抗议美国迫害华工。在人民群众强烈要求下，清政府驻美公使杨儒（？—1902）与美国政府商订华工条约。二十年二月十一日（3 月 17 日），杨儒与美国国务卿葛礼山在华盛顿签订了《中美华工条约》，共 6 款。主要内容是：一、承认美国排华法案中 10 年内限制华工入美的规定；二、寓美华工离美逾一年者，不得再入美境；三、寓美华工须按美国排华法案之规定进行登记；四、华工不得加入美国国籍，美国政府应保护在美华人的生命财产。这一不平等条约的签订，不仅没有起到保护华工正当权利的作用，反而用条约的形式承认了美国排华暴行的合法化。　（邱远猷）

中日甲午战争

清光绪二十（1894）至二十一年日本帝国主义侵略朝鲜和中国的战争，因爆发于旧历甲午年，故称甲午战争。

日本在明治维新后迅速走上向外扩张的军国主义道路。明治政府一建立，就在"武国"方针指导下制定了通过战争征服中国和世界的"大陆政策"：第一步征服中国台湾；第二步征服朝鲜；第三步征服中国满蒙；第四步征服全中国；第五步征服南洋、亚洲及世界。光绪十三年，日本政府制定了详尽的《征讨清国策》，拟以 5 年为准备期限，寻机侵犯中国。光绪十六年，日本出现经济危机和政治动荡，为转嫁危机和转移人民的不满情绪，日本政府更加速了战争准备。光绪二十年，日本从欧洲购买 429 万多日元的军火，建成七个陆军师团（六个野战师团和一个近卫师团），现役总兵力 12.3 万人；海军拥有各种战舰 31 艘，鱼雷艇 37 艘，总吨位达 5.98 万余吨。总之，日本已做好充分的战争准备，正等待时机，将侵略矛头指向朝鲜和中国。与日本相反，甲午战争前清政府危机四伏。从 19 世纪 70 年代开始，资本主义各国对中国边疆进行了多次侵略活动，签订了一系列不平等条约，攫取了很多特权。特别是中法战争后，中国西南

门户洞开,外国侵略势力进一步深入中国内地。它们在与清政府的交往中看到其腐败无能,侵略野心更加膨胀。与此同时,中国社会内部阶级矛盾日益加剧。资产阶级作为一支新兴的政治力量正在中国悄然兴起,起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在清廷内部,帝、后两党争夺统治实权的斗争日趋表面化。光绪皇帝不甘于傀儡地位,希望成为名副其实的国君。帝党群僚也幻想通过对日战争打击日本咄咄逼人的侵略气焰,提高声望,以利于从后党手中夺取实权,因此坚决主张做好战争准备,回击日军的武装进攻。反之,以慈禧为首的后党集团却穷奢极欲,为保住其既得权力和地位,千方百计避战求和。慈禧不顾中日战争一触即发的危急局势,挪用海军军费修建颐和园,忙于自己的60岁寿典,从光绪十一年至二十一年,先后挪用海军经费约1000万两,极大地削弱了清廷的海防力量。对日本步步进逼的侵略态势,慈禧力主退让妥协。后党重要人物李鸿章,时任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掌握全国军政外交大权,一贯奉行"以夷制夷"的方针,在战争迫在眉睫之际,不积极调动军队进行备战,而是幻想依靠列强调停。因此,甲午战前清政府并未做好抗战准备。就当时军事实力看,清廷亦不如日本。甲午战前清廷陆军总数为35万人,但部署分散、缺额较多、训练废弛,多不堪重用。淮军和湘军采用新式武器装备,是清廷陆军主力,却因其腐败,战斗力很差,也无力与日军抗衡。北洋水师战斗力较强,当时已拥有大小战舰22艘,鱼雷艇12艘,排水总量4.1万多吨,基本可与日本海军匹敌。惟北洋战舰多购置较早,有些已经陈旧,在航速、快炮火力等方面都落后于日军。

光绪二十年春,朝鲜爆发了东学党农民起义。朝鲜政府无力镇压,要求清廷派兵助剿。当时朝鲜为中国属国,清政府有保护属邦的义务和权利,却因顾虑日本觊觎朝鲜,不敢贸然出兵。日本政府把东学党起义看作发动侵朝、侵华战争的大好时机,极力怂恿清廷派兵赴朝,以便为自己发动战争寻找借口。为了麻痹清政府,日本特向中国保证"必无他意"。李鸿章没有识破日本的阴谋,对其虚假保证深信不疑,于同年五月初三(6月6日)派直隶提督叶志超和太原总兵聂士成率军2000多人赴朝,驻守朝鲜忠清道的牙山县。同日,清廷根据《中日天津会议专条》的有关规定,将出兵朝鲜一事告知日本政府。日本看到战争时机成熟,一方面宣布不承认朝鲜为中国属邦,进行猖狂挑衅;另一方面设立战时大本营,并派日军7000多人以"保护侨民"为由,大举入朝,使其在朝兵力远远超过清军。这时,朝鲜东学党起义已经平息,清政府遂建议中日双方同时撤兵,日本政府蛮横拒绝,于十九日向中国发出第一次绝交书,战争一触即发。李鸿章仍未积极调遣军队,部署攻防,而是频繁地与英、俄等国公使接触,乞求列强出面干预,迫使日本撤兵。英、俄两国在甲午战前是争夺侵华霸权的主要对手。沙俄对朝鲜和中国东北早就抱有侵略野心,极不愿日本插足,故借李鸿章乞求调停之机,两次照会日本,要求中日两国同时从朝鲜撤兵。英国在亚洲侵略权益最多,不愿改变远东的局势,它既希望日本侵入朝鲜,阻止沙俄势力南下;又惧怕因朝鲜问题给俄国造成扩张机会。于是当李鸿章请求英国出面斡旋时,英国政府就顺水推舟,表面上促成中日双方直接谈判,暗地里却与日本进行交易。日本政府则充分利用英、俄矛盾,一方面向英国保证不给俄国任何政治性的利益,不在上海及附近发动战争,以换取英国的支持;另一方面又依恃英国,婉转拒绝了俄国的撤兵提议。俄国虽然觊觎朝鲜,却不愿冒战争危险开罪英、日两国,因此被迫有条件地退出调停。至此,李鸿章"以夷制夷"的外交努力终归失败。六月十二日,日本政府向中国发出第二次绝交书。在帝党主战派及全国舆论的一致要求下,清政府被迫着手战争准备,十九日,调重兵进驻平壤,并决定增派2500人支援牙山守军。此时日本兵力也已部署完毕。在清廷调兵进驻平壤的前二日,即十七日,日本外相陆奥宗光训令日驻朝公使大鸟圭介,不惜一切手段,立即挑起中日间的战争冲突。十八日、二十日,大鸟圭介两次向朝鲜发出最后通牒,勒令朝鲜废除与中国的从属关系。二十一日,日军公然劫持朝鲜国王,另立傀儡,组成亲日政权,接着又于二十三日发动丰岛海战,拉开了中日战争的序幕。当日凌晨,济远、广乙两艘北洋战舰护送运兵船抵达牙山后返航,行至丰岛附近海面时与日本联合舰队三艘战舰相遇。7时45分,日舰首先发炮,挑起冲突,中国军舰在缺乏准备的不利情况下仓促应战,奋起还击。双方激战一个多小时,中方广乙被毁,济远受伤,败逃旅顺;恰于此时到达战场的清轮操江号被俘;清廷雇佣运送军队的英轮高升号亦被击沉,船上800多名清军官兵阵亡。在日本海军袭击中国舰队的同时,驻扎朝鲜的日本陆军也向牙山清军发起进攻,清军被迫放弃成欢、公州等地,在叶志超、聂士成的率领下向北撤退,于七月下旬抵达平壤,与清军主力会合。七月初一,中日两国同时宣战,甲午战争正式爆发。

牙山战役后,驻朝清军全部集结在平壤附近,总

兵力约1.6万余人，由叶志超负责指挥。此时李鸿章仍然坚持消极、避战的方针，置清军于被动挨打的地位。叶志超是这一方针的忠实执行者，他不指挥清军主动出击，而是固守平壤，消极防御。日军为霸占朝鲜全境，继续向朝大举增兵。八月初，大本营下令将入朝的第三师团与第五师团组成第一军，担任朝鲜境内战事，任命陆军大将山县有朋为司令长官。十六日，第一军1.6万多人兵分四路向平壤发起总攻，马玉昆、左宝贵、丰升阿、卫汝贵及叶志超等部清军分别把守平壤各门，与敌力战。左宝贵壮烈牺牲，清军最高指挥叶志超却贪生怕死，于当晚率众突围，遭到日军伏击，清兵死伤惨重，十七日平壤陷落。叶志超率军仓皇北退，狂奔500里，直过鸭绿江，逃回中国境内，朝鲜全部沦入敌手。紧接着，日本海军又向北洋水师发起攻击，挑起黄海海战。早在平壤战役前夕，清廷为支援驻朝守军，决定增派4000人赴朝。北洋水师提督丁汝昌率定远等12艘战舰、两艘炮艇和四艘鱼雷艇前往护航，八月十七日抵达鸭绿江口大东沟。次日准备返航时，突然遭到日本海军中将伊东祐亨率领的日本联合舰队的袭击。北洋水师官兵与12艘日本战舰苦战五个多小时，中方五艘战舰被击沉，管带邓世昌、林永升等壮烈牺牲，官兵伤亡800余人；日舰亦有五艘受重创，死伤约300人。经此一战，日本海军基本控制了黄海制海权，北洋水师被迫退守威海卫基地。

平壤战役和黄海海战的相继失利，使清廷后党主和派的乞和活动复萌。李鸿章、徐用仪等人在慈禧授意下又向英、俄等国乞求调停。俄国由于顾忌英国，表示不愿单独出面斡旋。英国表示只愿意从旁劝说，不便用力强压日本。九月，英国向清廷提出调停条件：朝鲜由各国保护，中国赔偿日本军费等项。英国政府又邀请俄、美、德、法等国联合出面，建议日本停战。对此，俄、法赞成，而美、德两国因无利可图，断然拒绝。英国见美、德反对，又看到日本在军事上节节胜利，无意停止侵略战争，因此也不愿强力干涉。这样，清政府乞求列强联合调停的幻想再次落空。是时，日军大本营正加紧调军，准备海陆并举，把战火烧向中国。八月，山县有朋率领的第一军在中朝边境集结，计划从陆路进攻辽东半岛北部；同时日本第一师团、第二师团及第十二混成旅团组成第二军，以大山岩为司令长官，准备从海路南攻辽东半岛。清军也在鸭绿江一线集结重兵约3万人，进行布防，同时在辽南加紧募新兵、筑炮台，增强守备。九月下旬，日本侵华第一军向鸭绿江防线发起总攻，很快占领军事重镇九连城和安东，清军全线溃退，鸭绿江防线土崩瓦解。同时，日本侵华第二军也在大连附近的花园口登陆，直犯金州，向辽南疾速推进，十月初十进占大连，二十五日侵占旅顺。清军在辽东战场的接连失利，特别是旅顺、大连的沦陷，使光绪帝和帝党集团十分震怒。他们一面严责李鸿章，予以革职留任处分，一面起用湘军，代替屡战屡败的淮军出关作战，加紧在营口、牛庄、鞍山一线集结兵力，部署防守。后党集团对帝党的主战言行已不能容忍，开始予以压制，并决定直接派人赴日议和，于十月二十二日委派德国人德璀琳为头品顶戴，赴日乞降。日本政府以德璀琳乃西人，非中国大员，不具备交战国使臣资格而拒绝开议。光绪二十一年正月初一(1895年1月26日)，清廷改派张荫桓、邵友濂为全权大臣赶赴日本广岛，日方又以中国代表“全权不足”为由，百般刁难。日本政府所以一再拒绝清廷的议和请求，是认为议和时机尚不成熟。当时中国陆海军虽已遭到沉重打击，但尚未败到甘心屈服、完全接受日本苛刻停战条件的程度，所以日本政府决定实施新的对华侵略方案——“山东半岛作战计划”，以迫使清廷彻底屈服。光绪二十年底，日本组成山东作战军，由大山岩指挥，于十二月二十五日在山东半岛登陆。日本联合舰队也积极配合日本陆军作战，将北洋水师全部封锁在威海港内。面对极为严峻的险恶局势，丁汝昌率北洋官兵浴血奋战，顽强坚守。二十一年正月初八，威海港南北两岸炮台全部失守，威海卫陷落。丁汝昌组织反攻、突围均未果，舰队损失惨重。此后，集于刘公岛的部分将领伙同外国洋员趁机煽动兵勇水手哗变，逼迫丁汝昌向日军投降。丁汝昌宁死不从，于十七日夜自杀殉国。二十日，营务处道员牛昶昞与洋员浩威等人托名丁汝昌向日军投降，刘公岛失陷。二十三日，日军进入威海港，北洋水师全军覆没。不久，日军又攻占了澎湖。二月上旬，占据辽东的日本陆军再度发起攻击，湘军同样无力阻挡敌人的强大攻势，几天内牛庄、营口、田庄台接连失守，辽东战役完全失败，京畿为之震动。至此，帝党集团也完全失去抵抗信心。慈禧更不顾一切，公开投降卖国。正月十九日，清廷在日本政府的暗示下，开复李鸿章革职留任处分，委任为头等全权大臣，赴日议和。二月二十三日，李鸿章抵达马关，旋即与日方首席代表、首相伊藤博文、外相陆奥宗光开始议和谈判。谈判中，日方代表气焰嚣张，所提议和条件极为苛刻，声称“中国对之，只有诺否二字”。经过双方磋商，李鸿章在请准清政府后，于三月二十三日与日本政府签订了空前丧权

辱国的《马关条约》，甲午战争终以清政府的彻底失败而告结束。《马关条约》包括中国承认朝鲜独立；中国割让台湾全岛及所属岛屿、澎湖列岛和辽东半岛给日本；赔偿日本军费2万万两；开放沙市、重庆、苏州、杭州为通商口岸；日船可沿内河驶入上述各口，日本政府得在通商口岸设立领事官；日本臣民在中国通商口岸城邑任便设立工厂、输入机器，只交进口税，日本在华制造的商品免征各项杂税，日货可设栈寄存等项内容。该约反映了帝国主义列强对中国进行资本输出的要求，大大加深了中国社会的半殖民地化和民族危机，标志着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形态的基本形成。从此，帝国主义对中国的侵略进入了以资本输出为主的新阶段。

《马关条约》签订后，台湾人民为保卫自己的家园，纷纷组成义军，与日寇展开英勇斗争，直至二十一年九月台湾全省沦陷。俄国得知《马关条约》内容后，认为日本占领中国辽东半岛，妨碍了自己的侵华计划，遂勾结德、法两国威逼日本放弃辽东半岛。同年九月，中日签订《辽南条约》，中国收回了辽东半岛主权，日本向清廷索取赎辽费3000万两。中日甲午战争后，欧洲帝国主义列强受到日本从中国攫取到巨大侵略权益的刺激，纷纷趁火打劫，在华强索租借地和划分势力范围，瓜分中国铁路权益，捞取政治经济特权。此后几年中，德国出兵胶州；沙俄强租旅、大；法国抢占广州湾；英国占据威海卫和展拓香港界址；日本也将福建划归自己的势力范围，掀起了瓜分中国的第一次狂潮。中华民族与帝国主义矛盾的迅速激化，导致了中国人民的进一步觉醒和中国社会的重大变革。　（董增刚）

丰岛海战

清光绪二十年六月（1894年7月）日本海军在朝鲜丰岛海面偷袭中国舰船，揭开了中日甲午战争的序幕。

是年春，朝鲜爆发东学党起义，朝鲜政府请求清廷派兵助剿。久蓄侵华阴谋的日本政府极力怂恿清政府出兵，以便制造借口，挑起战火。五月初三（6月6日），李鸿章调直隶提督叶志超（？—约1901）、太原总兵聂士成统淮军2400人入朝赶赴牙山。日本政府获悉后，即借口保护侨民，急忙大举发兵，兵力远远超过清方，抢占仁川、汉城等军事重镇。六月十七日，日本常备舰队与西海舰队合并，组成联合舰队，中将伊东祐亨（1843—1914）为司令长官，准备与北洋海军开战，争夺制海权。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李鸿章鉴于朝鲜局势日趋紧张、牙山清军势孤力单，决定再派2500人增援牙山守军。十九日，清廷为运送牙山援军而雇佣的爱仁、飞鲸、高升三艘英国商轮先后离港起航，炮船操江号载运饷银炮械与之同行。北洋水师提督丁汝昌拟派海军大队护航，为李鸿章所阻。二十日清晨，丁派济远舰管带方伯谦（1852—1894）统领济远、广乙、威远三舰护航。当天，日军获悉这一情报，大本营急忙下达作战密令，于次日派遣联合舰队15艘战舰、六艘鱼雷艇及一艘侦察舰从海军基地佐世保出发，在伊东祐亨率领下向朝鲜西海岸行驶，连夜兼程，准备截击北洋舰队的护航舰，二十三日晨抵达丰岛海面。丰岛是牙山湾外群岛中的一个岛屿，地处牙山湾之冲，岛北水深，可航巨轮，为进出牙山湾的必经之路。北洋海军济远等三舰已于二十一日先期抵达牙山。次日午前，爱仁和飞鲸两船也先后到达，并立即拖带驳船，将兵丁、军械等物资运送上岸。此时方伯谦已获悉日本“大队兵船明日即来”的消息，考虑威远是木船，经不住炮火轰击，令其先期离港。二十三日凌晨，济远、广乙帮助卸运完毕，也启碇返航。是时，日本联合舰队由于未能遇到北洋海军，伊东祐亨于是决定派第一游击队吉野、秋津洲和浪速三舰在少将坪井航三（1843—1898）率领下成单纵队继续搜索，其余舰只暂泊群山湾，等待时机。清晨，晴空万里，波平如镜，海上能见度甚好。6时30分左右，日本第一游击队遥见丰岛海面两艘汽船驶来，立即以15节的时速逼进。7时30分，济远在前，广乙在后，一起驶入丰岛海面，突然发现南方三艘日舰横海驶来。7时45分，双方相距3000米，日舰吉野首先以左舷炮向济远轰击，挑起战斗，秋津洲、浪速亦相继开炮，济远、广乙被迫应战，奋起还击，战斗甚为激烈。虽然日舰有备而来，在数量、吨位、航速、兵力、炮火等方面占压倒优势，仅大炮就比中方战舰多50余门，但中国水师官兵拚死力战，毫不畏惧。济远所发炮弹多次击中吉野和浪速，一枚15公分的榴弹打中吉野的机器间，惜未爆炸。双方激战一个多小时，济远中弹多处，大副都司沈寿昌（1865—1894）等50余人伤亡；广乙受创更重，死伤20多人，不能再战，北洋二舰被迫败退。济远向旅顺方向西逃，广乙则东奔朝鲜海岸。恰在此时，操江和高升两船驶入战场，坪井航三于是下令各日舰“自由行动”；吉野追击济远；浪速直扑高升；秋津洲则舍广乙而截击操江。吉野时速快，很快与济远相距2500米，以右舷炮猛轰济远。方伯谦急忙在济远舰上挂起白旗，又加挂日本旗。士兵王国成见状义愤填膺，奋起以尾炮还击，四

发三中，吉野受重伤，不敢继续尾追，但方伯谦却置高升、操江等船于不顾，开足马力逃回旅顺。广乙船舵被毁，勉强驶至十八岛后搁浅。管带林国祥率70余人将锅炉及战炮毁坏，弃船登陆，后辗转回国。操江号为一陈旧木船，武器装备薄弱，在接到济远发出的危险信号后，立即向西退走，但航速缓慢，很快被日舰秋津洲追及。管带王永发（1843—?）见势危急，焚毁了重要文件，后被俘获，船员80多人被押往日军佐世保监狱，备受虐待。日舰浪速追及英轮高升号，鸣放空炮，准备俘获带回，但船上清兵宁死不从。日舰置国际公法于不顾，用鱼雷和六门大炮齐向高升号轰击，清军官兵用步枪奋起还击。午后1时30分，高升被击沉。灭绝人性的日军竟出动小船，射击落水清兵，1100多中国官兵除少数遇救外，871人丧生。丰岛海战是日本侵略者在中、日双方没有宣战的情况下以强盗手段首先挑起的战斗，揭开了中日甲午战争的序幕。丰岛海战后，朝鲜西岸海域制海权被日军所控，牙山清军完全陷于孤立无援的境地；日本海军侵华决心亦急剧膨胀，发出了“聚歼清国舰队于黄海”的叫嚣，孕育着发动更大战争的野心。

（董增刚）

牙山战役

又称成欢之战，清光绪二十年六月（1894年7月）中日两国军队在朝鲜进行的第一次陆战。

是年五月初三（6月6日），直隶提督叶志超、太原镇总兵聂士成率淮军2400人进入朝鲜，驻扎忠清道牙山县。日本政府也向朝鲜大举增兵，抢占仁川、汉城等军事重镇，决心与中国开战。六月二十二日，清军援兵陆续赶赴牙山。二十三日，就在日本挑起丰岛海战的同一天，日军少将大岛义昌（1850—1926）指挥日本陆军混成旅团向驻守牙山的清军进犯。叶志超、聂士成因牙山无险可守，遂移师牙山东部的成欢和公州。成欢驿位于朝鲜忠清道平泽县东南，是汉城通往天安、全州的南北咽喉要地，丘陵环绕，安城川河水两岸沼泽密布，地势复杂，易守难攻。公州位于成欢之南，背山面江，亦是兵家攻守要地。聂士成部2000余人赴成欢后立即构筑工事，分左、右两翼展开。左翼部署在成欢西北约2公里的牛歇里高地，集中了主要炮火及兵力，以阻击日军由成欢趋牙山的道路。右翼在月峰山一带，兵力较为薄弱。叶志超率1000余人退守公州，作为后援。二十六日，日军抵达成欢前沿素沙场。大岛义昌了解清军军事部署后，于二十七日五更指挥日军乘黑夜重点进攻清军右翼。日军前卫部队涉过沼泽，越过安城川上的桥梁安城渡时，突然遭到于光炘、周宪章等四名武备学堂学生率领的数十名清军的伏击，死伤多人。由于黑夜迷失道路，又不知清军虚实，惊慌后退。很快，日军发现清军兵少无援，再次猛攻。数十名清军以寡敌众，与敌人激战一个多小时，于光炘等壮烈牺牲，余众被迫撤回。拂晓，日军攻占了牛歇里阵地前沿佳龙里，逼近清军主阵地。6时30分左右，双方步兵在阵地前展开激战，炮兵亦猛烈对射。大岛义昌亲自指挥日军炮火猛轰清军右翼两个堡垒，清军士兵奋起还击。阵地前炮弹飞驰，爆炸声震耳欲聋。聂士成身先士卒，在枪林弹雨中往来策应，鼓舞士兵，指挥战斗。由于清军右翼阵地火力薄弱，不久一号堡垒被攻占。聂士成急调左翼数百人支援，日军则倾全部火力拦截，援军受阻。6时50分许，右翼二号堡垒亦被攻陷。不久，左翼阵地又告失守。清军被压缩在成欢驿街道附近，四面受敌，聂士成不得已率众撤退，成欢遂被日军攻占。二十八日，聂在率部退奔公州的途中，路遇北撤的叶志超部。叶认为成欢失陷，公州亦不可守，遂决定牙山清军北奔平壤。为避免与日军相遇，叶、聂率军绕经汉城东部，于七月下旬与左宝贵、卫汝贵等驻守平壤的清军主力会合。牙山之战是中日陆军的首次交锋，清军投入3000多人，日军4000多人，双方伤亡相差不多，但清军辎重损失较多，且牙山失守，因此，牙山之战是清军的一次失败。但叶志超却战败夸胜，假报战功，竟受到清政府的奖赏。牙山战役后，中日双方于七月初一同时宣战，甲午战争全面展开。

（董增刚）

平壤战役

甲午战争时期中日两军在朝鲜进行的规模最大的陆战。

清光绪二十年（1894）六月，中日两国正式宣战前，为加强驻朝兵力，清廷派遣卫汝贵（约1836—1895）的盛字军、马玉昆（?—1908）的毅字军、左宝贵（1837—1894）的奉军和丰升阿（?—1909）的奉天练军盛字营及吉林练军等共32营、1.3万多人赶赴平壤驻守。中日宣战后，叶志超、聂士成又率领牙山战役败退下来的清军3000多人赶来会合，平壤清军总兵力增达1.6万余人，另有朝鲜军队千余人协助守卫。叶志超在牙山战役后战败夸胜，谎报战功，受到奖赏，七月二十五日（8月25日）奉命统率平壤诸军。消息传出，“一军皆惊”。他根据李鸿章“先定守局”的消极作战部署，派多数兵力在平壤城内赶修工

事，未能主动进攻尚未集结完毕的日军，丧失了挫败敌人的良好时机。日军按照早已制定的作战方针，向朝鲜大举增兵，企图将清军驱逐出朝。七月中旬，担当朝鲜境内攻势作战的日本第一军 1.6 万多人集结完毕，陆军大将山县有朋(1838—1922)任司令长官，从汉城和元山分兵四路进犯平壤，于八月十六日(9 月 15 日)前完成了对平壤的包围，同时切断清军的退路，于是日凌晨发起总攻。激烈的战斗在平壤城东南、城北和西南三个战场同时展开。日军混成第九旅团在少将大岛义昌指挥下，进攻平壤城南门(朱雀门)。马玉昆毅字军和盛军一营驻扎在朱雀门南、大同江西岸。日军首先进攻大同江东岸的清军桥头堡，遭到清军猛烈还击，大同江西岸的清军也隔江发炮，暴露在开阔地带的日军进攻部队伤亡颇重。但日本指挥官下令宁死勿退，驱赶士兵拚命冲击。堡内清军与江西岸清军密切配合，顽强抵抗。不久，清军增援部队赶到，士气大振。大岛义昌被迫于午后 1 时下令撤退。此战日军死伤 430 多人，平壤守军取得初步胜利。日本朔宁支队和元山支队 7000 多人为日军主力，主攻平壤城北牡丹台与玄武门(北门)一线。左宝贵奉军和江自康军二营在此坚守，丰升阿之盛字营为应援。这是平壤战役最为激烈的战场。清晨 5 时，日军集中炮火轰击牡丹台外侧的四座清军堡垒，掩护步兵冲锋。清军凭垒据守，顽强抵抗，终因火力不敌，至上午 8 时四座堡垒全部失守。日军随即推进牡丹台。牡丹台是平壤城的制高点，也是全城的命脉所在。清军在左宝贵指挥下，用大炮和速射枪奋勇还击，与敌力战。突然，日军炮火击中牡丹台垒墙，清军大炮被毁，无法压制敌炮火力，部队伤亡甚重。日军乘势冲锋，蚁附而上，牡丹台失守。在玄武门指挥作战的左宝贵见此情形，知势已瓦解，决心以身殉国。他穿上御赐黄马褂，在玄武门上指挥士兵射击敌人，拒绝部下劝他下城躲避的要求，亲自点燃大炮，轰击日军，身上负伤多处，仍奋勇撑持。清军部下感奋，皆激昂作战。左宝贵被流弹击中胸部，壮烈牺牲，成为甲午战争中为国捐躯的第一位清军高级将领。不久玄武门即被日军攻占。驻防平壤城西南、大同江北一线的清军是卫汝贵的盛字军。野津道贯率领日本第五师团本队亦于十六日晨 7 时发起进攻，清军马队反击，遭到敌人伏击，200 多名骑兵全部牺牲。此后，清军凭借坚固阵地顽强防守，日军几次进攻均未奏效，遂暂停攻城，与清军相持。中午过后，两军处于休战状态。平壤城西静海门至七星门一线由叶志超率芦榆各营(牙山军)防守，此日无战事。一天激战，中日双方伤亡基本相等，胜负未分。平壤城北玄武门虽然失守，但日军也未敢贸然入城。此时作为平壤守军最高指挥的叶志超却贪生怕死，惊骇万分，不与众将商议，擅自决定放弃平壤城。午后 4 时，他在七星门上悬出白旗，派人向日军要求停战。晚 8 时许，当叶志超指挥清军纷纷从平壤城七星门和静海门涌出、准备弃城逃跑时，遭到日军伏击，死伤近 2000 人，500 多人被俘，军火、辎重损失无数。叶志超率军狂奔不止，经顺安、肃州、安州、义州等地，一直跑过鸭绿江。十七日，日军占领平壤。平壤战役是甲午战争爆发后中日陆军第一次大兵团作战。此战日军伤亡约 700 人；清军伤亡 2000 多人，500 人被俘，超过日军伤亡人数 2 倍多。日军乘胜推进，完全控制了朝鲜半岛，此后更加猖狂，很快将战火烧向中国境内。

（董增刚）

黄海海战

又称大东沟之战，甲午战争中中日两国海军在黄海海面进行的一次重大战役。

清光绪二十年(1894)八月，日本重兵包围平壤，平壤清军告急，清政府决定将驻防大连一带的刘盛休所部铭军 10 营 4000 多人由海路运往大东沟，再转由陆路赴朝。八月十六日(9 月 15 日)午夜，铭军搭乘新裕、图南、镇东、利运、海定 5 艘运兵船由大连起航，北洋水师提督丁汝昌率北洋水师主力护航，其舰队编制为：定远、镇远两铁甲舰；致远、靖远、经远、来远、济远、超勇、扬威、平远 8 战舰；广甲、广丙 2 辅助舰；镇南、镇中 2 炮艇；另鱼雷艇 4 艘。定远为旗舰。十七日夜，北洋舰队护送运兵船抵达大东沟。定远等 10 战舰泊于港外，平远、广丙泊于港口，镇南、镇中及鱼雷艇护送运兵船入港。铭军连夜上岸，安全到达目的地。但此时平壤已经失守，铭军无法起到应援作用。在日本陆军大举进犯平壤之际，日本海军也积极寻求与中国海军决战。日本中将司令长官伊东祐亨得知北洋海军出航的消息后，立即率领日本联合舰队的松岛、严岛、桥立、扶桑、千代田、比睿、赤城、西京丸、吉野、浪速、高千穗和秋津洲 12 艘战舰驶向黄海北部，决心重创北洋海军，夺取黄海制海权。十八日上午 10 时 30 分左右，北洋舰队正准备起锚回航，突然发现西南海面耸起一簇簇黑烟，一队战舰疾驶而来。丁汝昌断定是日舰，下令准备战斗。午后，日舰呈进攻队形逼近北洋海军。泊于港外的北洋 10 战舰迅即起锚，编队迎敌。日舰利用航速快、机动性能好、快炮多、攻击力较强的优势，成单纵队汹汹

扑来，吉野、高千穗、秋津洲、浪速4艘航速最快的巡洋舰为第一梯队，伊东祐亨乘坐旗舰松岛号率本队8战舰紧随其后。丁汝昌下令北洋水师变换队形，以夹缝雁行小队阵迎敌，10战舰编为5个小队，每两舰为一队，一舰居前为队长，一舰在其右后策应，各舰应始终以舰首向敌，借以发挥主炮的威力。但丁汝昌未等舰队阵形最后完成，即率队迎击，因此，北洋海军实战中是以接近“人”字状的阵形与日军交战。定远、镇远两铁甲舰居中，两翼向后展开，靖远、致远、广甲、济远为左翼，来远、经远、超勇、扬威为右翼。这一阵形把航速不同的战舰混合编队，造成彼此牵制，丧失了各舰机动攻击的机会。12时50分，中日舰队相距约5000多米，定远首先发炮轰击日舰，北洋其余各舰亦相继开炮，但多未命中目标。日舰也向北洋海军猛烈射击，在舰桥上指挥作战的丁汝昌受伤，右翼总兵、定远管带刘步蟾遂代为指挥。日军慑于定远、镇远两铁甲舰主炮的火力，迅速从北洋舰队阵前驶过，攻击北洋水师较为薄弱的右翼，扬威、超勇相继中弹起火。14时30分超勇沉没，扬威驶出阵外救火，复又搁浅，失去了战斗能力。此时，北洋海军泊于港口的平远、广丙两舰和两艘鱼雷艇已赶到战场参战，但火力不强，未能缓解北洋舰队右翼的严重态势。当日舰攻击北洋舰队右翼时，航速较慢的比睿和赤城掉队，正好被北洋水师截击，受到重创。西京丸亦受重伤，慌忙出逃。日舰第一梯队在击沉超勇后，旋即回航，再度发起进攻；日舰本队则绕至北洋舰队背后，实行两面夹击，避开定、镇两舰的巨炮，用快炮猛轰北洋海军左、右翼小舰。北洋舰队腹背受敌，各舰难以保持原有阵形，陷于混乱，逐渐处于不利的境地。面对日舰猛烈的炮火，北洋广大官兵士气高昂，特别是邓世昌率领的致远号官兵更是英勇无畏。邓世昌(1849—1894)，字正卿，广东番禺人，福州船政学堂毕业，光绪十三年任致远号管带，次年晋升总兵。战斗中他鼓舞将士浴血奋战，当看到敌舰火力危及定远时，毅然率舰驶出阵形之外，用舰身护住定远，与日舰激战。不久，致远多处中弹，弹药将尽，邓世昌毅然下令开足马力，向迎面驶来的日舰吉野撞去，沿途鸣炮，不绝于耳，以求与吉野同归于尽，保全全军。吉野慌忙躲避，日舰第一梯队集中火力瞄准致远，连连轰击，数发炮弹同时命中致远水线，致使其舷旁鱼雷发射管内一枚鱼雷爆炸，右舷随即倾斜，15时20分许沉没，邓世昌等250名官兵除7人遇救外，全部壮烈牺牲。致远沉没后，北洋舰队左翼的济远和广甲处境孤危。开战后，济远累中敌炮，伤亡20余人。济远管带方伯谦“先挂本舰已受重伤之旗”，及见致远沉没，遂转舵西驶，遁回旅顺。广甲管带吴敬荣也随之而逃，因慌不择路，偏离航线，搁浅于大连湾的三山岛外，吴敬荣弃舰上岸。两天后，广甲也被日舰发现击毁。济远、广甲的出逃对战局影响甚大，此后日舰第一梯队转而攻击经远。经远被划出阵外，以一敌四，孤军作战。管带林永升(1853—1894)临危不惧，率将士拚死应战，终因孤立无援，中弹身亡。经远火势陡发，也被日舰击沉。不久，靖远、来远因中弹过多，不得不退出战斗，避至大鹿岛附近紧急抢修。平远、广丙及鱼雷艇因尾追单独逃跑的西京丸而被日舰阻隔，不能及时归队。此时北洋海军只有定远和镇远两主力舰与日舰本队松岛等5舰进行艰苦的鏖战。定远虽受重伤，多次起火，全体将士仍然顽强抵抗，激愤异常，毫不畏惧。双方激战良久，定远所发重炮命中敌旗舰松岛号，日军死伤约100人，使其失去指挥能力，伊东祐亨只得下令各日舰自由行动。不久，靖远、来远抢修完毕，重新投入战斗。靖远看到旗舰定远桅杆断裂，不能升旗发令，便代为集队，指挥各舰绕击日军。此时，泊于港内的镇南、镇中两炮艇也赶来助战；平远、广丙及各鱼雷艇亦迅即折回。伊东祐亨看到松岛已经瘫痪，吉野失去战斗能力，其它日舰亦有伤亡，继续战斗将对日军不利，于是在17时30分左右下令日舰向东南撤逃。北洋水师见日已暮，弹药告竭，于是编队返航，回到旅顺。黄海海战历时五小时，规模之大，时间之长，为近代世界海军史上所罕见。海战的结果：北洋海军致远、经远、扬威、超勇、广甲5舰被击沉，来远等舰受重创，将士伤亡800余人；日本联合舰队松岛、吉野、比睿、赤城、西京丸5舰受重创，死伤约300人。此次海战，日军虽未达到聚歼中国北洋海军的目的，但此后黄海制海权基本被日本海军所控制，对整个甲午战争的进程产生了重大影响。　(董增刚)

辽东战役

甲午战争时期中日陆军在奉天(辽宁)辽河以东进行的一系列战斗。

清光绪二十年(1894)八月，平壤战役和黄海海战后，日本政府决计把战火烧向中国，令大将山县有朋率侵华第一军集结在朝鲜义州附近，准备从鸭绿江一线进攻中国辽东半岛北部；日军第一师团、第二师团及第十二混成旅团组成侵华第二军，以陆军大将大山岩(1842—1916)为司令长官，准备从海路登上辽东半岛南部，进攻清军重地金州、大连和北洋海

军基地旅顺口。清朝陆军在平壤战役后全部退出朝鲜，集结于鸭绿江一线。李鸿章得知日军决计进攻中国本土的消息后，提出“严防渤海以固京畿之藩篱，力保沈阳以顾东省之根本”的战略计划，急忙加强辽东防御。八月二十二日(9月21日)，清廷命四川提督宋庆(1820—1902)帮办北洋军务，率毅军从旅顺进驻鸭绿江防线重镇九连城，指挥前线战事。黑龙江将军依克唐阿(？—1899)率镇边军、刘盛休率铭军也先后到达九连城附近，鸭绿江防线清军人数增至80多营，约3万人，其部署是：以安东至九连城一线为主阵地，分左、右两翼设防。右翼向西南延至大东沟、大孤山一线，由宋庆指挥；左翼由九连城向东北延伸至长甸河口一线，由依克唐阿指挥。同时，清军也在辽南地区加强守备。怀字军、和字军、桂字军及徐邦道(1837—1895)拱卫军等30多营分别把守金州、大连和旅顺，修筑炮台，增加炮位，构筑工事。清廷还在旅顺设置北洋前敌营务处，任命龚照玙节制诸军。

九月二十六日，山县有朋率日本第一军近3万人进犯鸭绿江防线，选择清军的左翼和中路为突破口。是日中午，部分日军从水口镇涉渡鸭绿江，冲击清军左翼，守军不支，纷纷败退，鸭绿江左翼防线被轻易突破。当晚，进攻九连城一线的日军主力在鸭绿江上架设浮桥两座。次日黎明，晓雾浮江，对岸清军又没有察觉。上午6时许，从浮桥上跨过鸭绿江的日军登上沙滩，进攻九连城前沿阵地虎山高地。清军五、六百人在马金叙指挥下顽强奋战，先后打退敌人3次冲锋。不久，日军迂回到虎山高地左右两侧，配合中路猛攻马金叙部和驻守虎山旁边的聂士成部；宋庆派来的清朝援军也被日军阻隔、分割。敌众我寡，虎山守军付出了重大代价后被迫撤退，阵地失守。二十八日拂晓，日军总攻九连城，但城中寂然无声，原来守城清军早已在夜间撤离，日军不费一枪一弹，占领了这一军事重镇。驻守右翼防线的清军见九连城已失，也纷纷向西溃退。清军苦心经营的鸭绿江防线数日间便土崩瓦解了。日军乘胜西进，抢夺了凤凰城、大东沟、大孤山、岫岩、苏甸、宽甸、木城、海城等辽东重镇。清廷震骇异常，唯恐日军乘胜攻占陪都奉天(沈阳)，破坏清朝列祖列宗的陵寝，急忙调集重兵，进行阻击，在辽阳东路，西起摩天岭、东到赛马集长约150多里的地方构筑新的防线，与日军苦战3个多月，交战十几次，暂时阻止住日军的攻势，缓解了辽沈地区的危急。在辽阳南路另一军事重镇海城，清军也调集9倍于敌的兵力，在40多天内5次进攻日军，但终未收复海城。此时，日本侵华第二军已在辽南登陆，战局对清军更加不利。

九月二十五日，日本侵华第二军在日本联合舰队护卫下从大同江口渔隐洞出发，向辽南进犯，次日清晨在清军未布防的花园口登陆，后续部队分乘40余艘运兵船相继而来。此时李鸿章及清军大部正忙于应付辽东半岛北部战局，无力分身在辽南一带加强守备。十月初六，日军进犯辽南军事重镇金州，初八发起攻击。金州守军3000余人在徐邦道指挥下顽强抵抗，多次挫败日军。次日，日军调集重兵，用炮火压制清军火力，炸开金州城门，双方展开激烈巷战，清军势单力孤，被迫撤退，金州遂沦入敌手。这时，日本第二军约2.5万人已全部在花园口登陆。初十，敌人进攻大连湾，少数清军在前沿阵地堡垒内遥放数枪后即纷纷撤退，大部分清军早已在昨夜退往旅顺口，致使日军兵不血刃，占领了“严城巨防”的大连湾。二十日，日军扑向旅顺口，次日清晨先遣队行至旅顺北10公里土城子时，遭到徐邦道、姜桂题(1843—1922)率领的500多清军的阻击，受到重创，死伤50多人，不及收尸即狼狈后撤。二十二日，日军分兵三路再次进犯旅顺，二十四日清晨进攻旅顺前沿防线。在椅子山炮台、松树山堡垒、二龙山堡垒和鸡冠山炮台等地，两军相继开战。时至中午，旅顺前沿防线全部失守，清军退入旅顺市区。下午五时许，旅顺东南的黄金山炮台亦被攻占，旅顺市区岌岌可危。当夜，清军乘风雨大作，放弃旅顺口，向金州方向仓皇撤逃。节制旅顺各军的北洋前敌营务处会办道员龚照玙贪生怕死，早在金州失陷后即逃离前线。二十五日清晨，日军占领旅顺，清政府经营16年、耗资数千万的船坞、炮台，一夜之间全部沦陷。日军进入旅顺市区后制造了惨绝人寰的大屠杀，全市仅36人因被驱赶掩埋尸体而得免于难，仅埋葬在旅顺“万忠墓”中无辜百姓的尸骨就有2万多具。

旅顺、大连的沦陷使清廷朝野大为震动。光绪帝气愤异常，将李鸿章革职留任，并积极策划起用湘军，代替屡战屡败的淮军出关作战。是年底，清廷任命湘军宿将、两江总督刘坤一为钦差大臣，督办东征军务。次年初，刘率湘军开赴辽东战场，亲抵山海关节制关内外诸军。帮办东征军务的湘军大将吴大澂率所部清军在营口、牛庄、鞍山一线重新构筑工事，以阻挡日军的进攻。日军为在辽东战场彻底取胜，也重新调动兵力，将第一军、第二军一部协调行动，向在辽河以东营口、牛庄、鞍山一线布防的清军发动新的攻势。二十一年正月二十七日(1895年2月21

日),接替山县有朋为日本侵华第一军司令长官的野津道贯与侵华第二军第一师团长山地元治在汤池举行会议,确定了具体的共同作战方针。二月初六,日本第一军占领鞍山,次日扑向牛庄。牛庄是辽河下游平原的一个街镇,外围无城廓。清将魏光焘所部武威军6营在此驻守。初八上午9时,战斗在牛庄外围打响,清军利用民宅土墙为掩体,与敌人激战,至中午被迫退入牛庄市内。是时,清将李光久(?—1900)率老湘军5营赶来,中、日两军遂在牛庄镇内展开激烈巷战,弹飞如雨,硝烟蔽空,双方逐屋争夺,犬牙交错。天黑后,清军不支,阵亡达千余人。魏光焘、李光久率少数清兵突围,牛庄失守。十一日拂晓,日本侵华第二军第一师团也按照既定作战方针,向营口发起总攻。营口位于辽河口左岸,为东北的重要通商口岸。清军原有2万多人驻守此地,但初九清晨,清军统帅宋庆对敌情判断错误,将主力调往田庄台,仅留3000余人驻守。由于敌众我寡,清军稍作抵抗即纷纷溃退。中午,营口沦陷。十三日,日军集中3个师团、近2万人的兵力向田庄台发起总攻。双方炮战十分激烈。不久,日军炮火占优,清军不支,遂向东北方向溃退,田庄台亦告失守,清军伤亡2000余人。此后,宋庆率军退走双台子,吴大澂部退往锦州。辽东半岛及其以北的大孤山、宽甸以及辽河以西以北的田庄台等重要城镇全部沦入敌手。

辽东战役是中日双方在中国境内进行的大规模陆战。战役历时7个月,战场波及辽东半岛大部地区。清军苦心经营的鸭绿江防线、辽南防线和营口至鞍山防线被日军先后突破,防守兵力占优势的清军纷纷败退,致使辽东大部重镇沦陷,且直接危及奉天和京畿地区的安全。辽东战役失败后,以慈禧为首的清廷被日军威力所慑服,加紧了乞和投降的步骤。

(董增刚)

兴中会成立

兴中会,清光绪二十年(1894)孙中山在檀香山创建的中国资产阶级第一个革命团体。

19世纪末期,中国的民族危机愈益严重。光绪九年至十一年的中法战争,予年轻的爱国者孙中山以极大刺激,促使他萌发了反清革命思想。此后,他在广州结识了与会党联系密切的郑士良(1863—1901);在香港与陈少白(1869—1934)、尤列(1865—1936)、杨鹤龄(1868—1934)密切交往,互抒救国抱负,颂扬洪秀全,被称为"四大寇"。光绪十九年冬,孙中山进一步与陆皓东(1868—1895)、郑士良等酝酿建立革命团体,提出以"驱除鞑虏,恢复华夏"为宗旨。但这时孙中山尚未完全摆脱改良主义思想影响。光绪二十年,他北上天津投书李鸿章,提出要在中国发展资本主义经济和文化教育的纲领,未获得任何结果。从此放弃了对清政府的幻想,坚定地走上了革命道路。于是他再度到檀香山,在当地华侨中开展革命组织活动。光绪二十年十月二十七日(11月24日),20余名侨胞,在火奴鲁鲁埠美商卑涉银行华人经理何宽住宅中集会,正式成立兴中会。会上孙中山宣读了他起草的章程9条,沉痛地揭示了民族危机的严重性,谴责了清朝的反动统治,规定了"振兴中华,维持国体"的宗旨。在入会的秘密誓词中更明确地提出了"驱除鞑虏,恢复中国,创立合众政府"的革命纲领。与会者推举永和泰杂货商行司理刘祥、何宽为檀香山兴中会正副主席。随后孙中山让会员填写盟书,各以左手置圣经上,高举右手,向天次第读之。会后兴中会继续向檀香山各埠发展,先后入会约计126人(一说130余人),其中华侨资产阶级占80人,其余为工人、会党和知识分子。为了举行反清起义,孙中山一方面组织华侨兵操队,使会员接受一些军事训练,一方面积极在会员中募捐筹饷。光绪二十年底,孙中山与部分会员归国。二十一年正月二十七日(2月21日),在香港,孙中山与杨衢云(1861—1901)领导的爱国组织辅仁文社联合成立兴中会总部,地址设于中环士丹顿路13号,为便于活动,对外以"乾亨行"名义作掩护。与檀香山兴中会相比,在总部起主导作用的已是具有爱国思想、并有初步资产阶级政治观念的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有实力的则是那些有着"反清复汉"思想的会党分子。修订的总部章程删去了檀香山兴中会章程中一些温和词句,对清政府的残暴腐败,正面进行了猛烈的抨击。兴中会成立后曾先后发动广州起义、惠州起义。光绪二十五年十二月在香港创办《中国日报》,作为革命宣传机关;相继在横滨、长崎、台湾、河内、旧金山以及南非洲等地建立分会。光绪三十一年七月二十日(8月20日)与华兴会等联合建立中国同盟会。

(王 才)

威海卫之战

又称山东半岛之战。甲午战争时期中日海军和陆军在山东威海卫进行的战役。

清光绪二十年(1894)底,日军在辽东战役中取得重大胜利后,为配合对东北地区的军事攻势,给清政府以更沉重的打击,日本政府拒绝了清廷的和谈

要求，决定实施扩大对华侵略的作战方案——山东半岛作战计划，将在中国辽东的侵华第二军第二师团和在国内的第六师团合编为山东作战军，由陆军大将大山岩指挥，准备从海路登上山东半岛，进攻北洋水师海军基地威海卫（威海市）。清政府鉴于山东半岛是京畿左辅，战略地位重要，很早就开始布防。威海卫军港依据天然屏障修筑工事，易守难攻。中日战争爆发后，威海又添新兵、筑炮台，加强海上防御。旅顺失陷前，北洋舰队全部驶入威海。至二十年底，山东半岛清兵总数已达60营，约3万多人，分别由北洋大臣李鸿章和山东巡抚李秉衡统辖。李鸿章被日军在朝鲜和辽东的强大攻势所震慑，对山东布防更加消极被动，命令北洋舰队以“保船”为主，不许出海与日军作战；加之山东半岛海岸线绵长、地面辽阔，清兵防守部署分散，李秉衡又不谙战事等因素，故清军在山东半岛的防务漏洞很多，难以阻挡日军的锐利攻势。二十年十二月二十四日（1895年1月19日），日本山东作战军在联合舰队护送下分乘50多艘运兵船从大连湾出发，次日在山东半岛荣成湾登陆，占领滩头阵地。守岸清军兵少力单，被迫后撤，日军乘势进占荣城。二十八日，日军3.4万余人登陆完毕，三十日，分两路进犯威海。日本海军也从海上正面进攻，企图全歼北洋舰队。是日下午，日本陆军行至白马河，遭到福字军和嵩武军总兵孙万林率领的1000多清军的英勇阻击，激战2小时，日军死伤10余人，狼狈后撤。二十一年正月初四（1月29日），两路日军对威海港南岸炮台形成包围，次日发起总攻。驻守摩天岭、杨枫岭等炮台的清军奋力抵抗，日军少将大寺安纯被击毙。但清军寡不敌众，付出重大牺牲，炮台陷落。不久，百尺崖、龙庙嘴、鹿角嘴等海岸炮台亦相继失守。为避免日军利用海岸炮台轰击威海港内的北洋舰队，北洋水师提督丁汝昌下令将皂埠嘴炮台炸毁，威海港南岸炮台于是全部失守。初七，日军开始进攻威海卫和北岸炮台。炮台守将戴宗骞（1842—1895）贪婪谲诈，致使士兵溃散，炮台无人把守。次日，丁汝昌只得下令将北岸炮台炸毁。这样，“威海之防尽堕”，威海卫城陷落，北洋海军被封锁在港内，形势万分危急。此时，丁汝昌和广大清军水陆官兵表现出可贵的爱国精神和无畏的高尚品质。丁汝昌断然拒绝日军的诱降，决心血战到底。初九，日本海军大举出动，猛烈进攻威海港前沿天然门户刘公岛和日岛。日本陆军也将原南岸炮台的7门大炮修复，从海岸射击北洋水师，形成“炮资敌，我杀我”的惨痛局面。北洋官兵及守岛陆军奋起发炮还击，击中筑紫、葛城等日舰。次日深夜，日军鱼雷艇进港偷袭，北洋旗舰定远被击伤搁浅。十二日，日军故伎重演，北洋海军来远、威远、宝筏三舰又被鱼雷击沉，实力大损。十三日，日军发动总攻，清军士兵奋勇迎战。双方炮火互射，硝烟蔽海，战斗甚为激烈。松岛、桥立、千代田、秋津洲、浪速、扶桑等日舰均被击中，士兵死伤众多。清军日岛炮台弹药库也被敌炮击中爆炸，守军被迫撤至刘公岛。正当战斗激烈进行时，北洋鱼雷艇管带王平贪生怕死，率10余艘鱼雷艇和2艘汽船乘机逃跑，被日舰追及，大部分鱼雷艇被击沉，北洋海军损失惨重。十四日夜，日舰又破坏了封锁威海港东口的铁链，打开了港口门户。清军极其盼望援军赶来，但希望渺茫，士气开始低落。这时，在北洋舰队服务的外国船员英人泰莱、克尔克（kirk）、德人瑞乃尔等散布失败情绪，威逼丁汝昌向日军投降，遭到丁严辞拒绝。为避免战舰落入敌手，丁汝昌下令炸沉各船。十六日，管带刘步蟾在定远被炸沉后自杀殉国，其余各舰将领害怕以徒手降敌“取怒倭人”，竟拒绝执行命令。十七日，北洋守军弹药将尽，势不能支。当夜，丁汝昌召集部下，提出冒险突围，多数将领表示反对，纷纷散去。丁汝昌见大势已去，决心以身殉国，与刘公岛北洋护军统领张文宣（？—1895）、镇远管带杨用霖（1854—1895）先后自杀。第二天，外国洋员浩威勾结威海卫水陆营务处候选道牛昶昞等人投降。二十日，牛昶昞代表清军在投降条约上签字，刘公岛沦陷。二十三日上午10时30分，日本联合舰队摆出征服者的架式，占领了威海港，举行捕获仪式。北洋海军镇远、济远、平远、广丙、镇东、镇西、镇南、镇北、镇中、镇边等10艘舰船全部作为日军战利品，被插上日本国旗。北洋练习舰康济号被解除武装，交还中国。下午4时，康济载运着丁汝昌、刘步蟾、杨用霖、张文宣等人的灵柩，在潇潇细雨中凄然离港，驶向烟台，汽笛哀鸣，威海卫战役至此结束，清政府苦心经营多年的北洋水师全军覆没。威海卫和山东半岛的失陷，使京畿地区门户洞开，清廷危急万分，以慈禧为首的统治集团更加快了向日本乞和投降的步伐。　（董增刚）

《马关条约》签订

《马关条约》，原名《马关新约》，又名《春帆楼条约》，清光绪二十一年（1895）日本强迫清政府订立的结束中日甲午战争的不平等条约。

自光绪二十年七月初（8月初），中日两国宣战以后，清政府的决策人慈禧太后、直隶总督兼北洋大

臣李鸿章等，一直消极避战，把希望寄托于帝国主义列强的"调停"上。但美、英、德、俄等国一直观望，各有打算，形不成一致的"调停"步骤。九月下旬，日军越过鸭绿江，侵入中国境内。二十七日（8月27日）侵占安东和九连城。十月初九又攻陷金州。此时，一直支持日本侵华的美国，认为"调停"时机已到，日本已取得了足以压迫清政府投降的巨大胜利，于是，就在日军攻陷金州的同一天，美驻日公使谭恩（Edwin Dun）根据本国政府训令，通知日本政府，对华战争应适可而止，否则，如果把中国打垮，其它列强可能会以维持秩序为名，瓜分中国，从而给日本带来不利；并表示愿做中、日间的"调人"。日本虽然在军事上取得胜利，但毕竟是个小国，财力有限，已感军需严重匮乏，所以表示接受。二十五日旅顺失陷。清政府再度向列强呼吁"调停"。美公使田贝（Charles Denby，1830—1904）向清政府表示愿以"传信人"的身分，居间"调停"。本来，在此以前，清政府即想派员赴日，探询日本的"议和"条件，又怕日本以胜而骄，若派大员，恐为所轻，故决定派一名洋员前往，以为试探。十月二十二日，李鸿章派出津海关税务司、德国人德璀琳赴日，结果碰壁，日本政府拒绝与之开议，德璀琳只好返回。十一月初一、初六，日本政府向谭恩提交两份备忘录，表示，中国若欲议和，须任命具备正当资格之全权委员前来，否则日本不能宣布媾和条件。是年底，清廷派总理衙门大臣、户部侍郎张荫桓和署湖南巡抚邵友濂（？—1901）东行。光绪二十一年正月初六（1月31日），张、邵抵达广岛。日方代表为内阁总理大臣伊藤博文（1841—1909）和外务大臣陆奥宗光（1844—1897）。初七，双方代表举行谈判。按照日方拟定的议程，首先检验双方全权证书。中方代表所出示的"国书"中，明确载有张荫桓、邵友濂为"全权大臣"字样，而日方硬说中国代表的"全权权限"不完备，声称不能同随时须请旨遵行的所谓"全权大臣"谈判，强调中国必须派遣位高望重、携有正式全权委任状之全权委员，日本方能与之谈判议和。所谓"位高望重"之全权委员，伊藤点名指出，惟恭亲王奕䜣或李鸿章堪胜此任。张、邵只得于正月十八日离日归国。清廷决定派李鸿章赴日议和。但李在去年八月十八日，因中日开战以来，统筹全局，日久无功，受到革职留任处分，被拔去三眼花翎，褫去黄马褂。光绪二十一年正月十九日，清廷宣布开复其"革留"处分，赏还翎顶，派为头等全权大臣，赴日议和。二十三日，清廷托美使田贝将这一决定转告日本政府。日本政府这才感到满意，于同日致电田贝，露出议和条件的轮廓，大体有三项：一要中国承认朝鲜独立；二要赔款；三要割地。并通过田贝向清廷暗示，来使必须具有执行此三种条件的全权，其中尤其强调割地权。清廷的答复是，头等全权大臣李鸿章具有执行此等条件之全权。这样，李鸿章在出国以前，割地求和的局面已定。正月二十八日，李鸿章奉诏来京，他深知此次议和最大的难题是割地问题。故此来京后，连日拜会各国驻京公使，再次请求列强出面干涉，共同"劝阻"日本放弃割地要求。但到处碰壁，英、美两国拒绝，美使田贝并要他彻底抛弃求列强干涉的念头，尽快与日本议和。俄国则向日本表示，如日本要求中国割让海岛台湾，俄国无异议，但反对日本割取大陆土地。李鸿章一无所获，只得不惜一切条件向日本求和。为了逃避割地的罪责，表面上他声称不赞成割地，但又强调不割地无法求和，委曲婉转地表示，只有明确给他割让土地的全权，才能赴日。此时慈禧称病躲入深宫，传话给李鸿章，让他"一切奉上旨"，显然也是想推卸割地卖国的罪名。光绪自然也不甘担此罪名，故一直犹豫不决。二月上旬，清军在辽东全面溃败，光绪为形势所迫，终于表示可以授予李鸿章"以商让土地之权"。

二月十八日，李鸿章率参赞李经方（1855—1934，李鸿章子）、张孝谦、于式枚、徐寿朋（？—1901）、伍廷芳，以及美国顾问科士达（John Watson Foster，1836—1917）、毕德格（Pethick，William N.？—1902）等多人自天津乘船赴日，二十三日到达谈判地点马关。二十四日，李鸿章同日方代表伊藤博文、陆奥宗光及其美国顾问端迪臣，在马关春帆楼开始第一次谈判。这次谈判有两项内容，一是交换双方代表的全权证书，二是中国代表向日方提出停战要求。二十五日第二次谈判，日本代表提出苛刻的停战条件：一、停战期间，日军占守大沽、天津、山海关，该数处之清军武器、军需交日军暂管；二、天津、山海关之间的铁路由日军管理；三、停战期内之日军军费、军需由中国支付。李鸿章认为条件太苛，没有答应。会后把日方停战条件电奏清廷。清廷急于实现停战，电示李鸿章可以允许停战期内支付军费一条，如日方仍不允，则暂且搁置，先向日方索要议和条款。二十八日，举行第三次谈判，李鸿章撤回停战要求，并未露清廷允许支付军费一条；同时向日方索要议和条款。日方答应次日可提示议和条款内容。但在这时，发生了一个意外事件：第三次谈判结束后，李鸿章回行馆途中，突遇一日本暴徒行刺，面部受枪伤。这一消息传出后，世界舆论为之哗然，发出一片谴责

日本和同情中国的声音。日本政府唯恐李鸿章借口负伤，中途回国，博取欧美各国同情，进而引出列强干涉，则对日本大为不利。因此一面严惩暴徒，一面打算在议和谈判的非实质性问题上作些许让步，以避免列强干涉。这个让步就是答应无条件停战。李鸿章很高兴，三月初五，在病榻上与伊藤博文签订了中日停战条款，规定从光绪二十一年三月初五起双方停战，至二十六日届满，如期内和议破裂，停战条款即告终止。

三月初七，日方将和议条款底稿送交中方代表，限四日答复。主要内容为：一、中国承认朝鲜独立。二、中国割让盛京省（辽宁）南部地方，包括辽东半岛（指从鸭绿江口抵安平河口向西划线，抵凤凰、海城、营口而止以南之奉天土地）及辽河以东、榆树以西以南、含辽阳、牛庄、田庄台等盛京省地方，并辽东湾东岸、黄海北岸属盛京省之诸岛屿；台湾全岛及所属岛屿；澎湖列岛。三、中国赔款库平银3万万两。四、中、日两国之间原有双边条约一律作废，另行商定新约，日本应享有欧洲列强在通商方面的一切特权，并将2.5%的子口税减为值百抽二，所有日本官吏、臣民及商业工艺、行船船只、陆路通商等方面享有最惠国待遇。五、增开北京、沙市、湘潭、重庆、梧州、苏州、杭州为通商口岸。六、日本臣民得在中国任便从事各项工艺制造，各项机器任便进口、免交进口税等等。还有许多关于通商、税则、存放货物、赔款利息等方面的无理要求，远远超过欧洲列强享有的侵华特权。李鸿章一面电告清廷，一面于三月十一日向日方提出说帖，表示对日本之议和条件，除朝鲜自主一条可允诺外，其它割地、赔款、通商特权等款，均要求过奢，万难应允。同时又以委婉的笔锋，对日方无理要求一一批驳，言之切切，颇能博取同情。陆奥宗光接读说帖后，认为这份说帖"笔意精到，仔细周详"，"不失为一篇好文章"。遂与伊藤博文商讨对策。伊藤主张彻底反驳，陆奥认为，一开论驳之端，则彼方亦必有再三反驳之余地，故此，不同中国讲道理，只要中国谈事实，或承认，或拒绝，以此迫其接受日本条款，此乃"胜于力而屈于理"的办法。伊藤接受陆奥意见，于三月十二日晚会李鸿章，令其对日方所开列之议和条件，"可否之处，即请明复"。十四日，李鸿章拟定一份商改约稿，对日方议和条件提出修改意见：一、朝鲜为特立自主国，中、日须共同"认明"。二、奉天南部辽阳等地以及台湾全岛，均为日军未到之地，中国不能割让；又按欧洲惯例，险要之地，虽为敌国占据，仍应归还，则旅顺口、大连湾应归还中国。三、3万万两赔款为数过巨，中国无力承担。其它通商、税则等项亦均有申辩，表示"万难允行"。伊藤见到此修改意见后，即于当日邀李经方（因李鸿章受伤，已补李经方为全权大臣）到他的行馆，进行恫吓，声称如中国不答应日方全部条件，我一声令下，将有六、七十艘运输船只搭载增派之大军，开往中国，北京的安危将有不忍言者；中国全权大臣离开此地后，能否再安然出入北京城门，恐亦不能保证。至此，李鸿章知难以拖延，遂于十五日正式向日方提出修正案，做了更大的妥协。要点为：一、许割辽南的安东县、宽甸县、凤凰厅、岫岩州及澎湖列岛；二、允赔款1万万两；三、在通商、税则方面，答应另订新约，承认日本之最惠国待遇。三月十六日，中、日双方举行第四次谈判。会谈中，日方提出一个改定条款"节略"（即对李鸿章三月十五日修正案之复文），赔款减为2万万两，割地亦稍有让步，原定榆树以西以南、海城以东以北之辽东土地（不含海城），不在割让之列，规定辽东半岛及奉天所属岛屿、台湾全岛及附属岛屿、澎湖列岛均割让给日本。伊藤蛮横地向李鸿章宣布：对日方条件，中方"但有允、不允两句话而已"，李反问："难道不准分辩？"伊答："只管辩论，但不能减少。"李鸿章提出，赔款请再减少5000万两，割地应减去辽东之营口和台湾全岛。一直与伊藤争辩达2小时之久，但毫无效果，伊藤乘胜贪横，悍然坚拒，并限中方3日答复。会谈结束后，李鸿章立即致电清廷，报告会谈情况及日方最后所提条件；说明日方态度凶蛮，再无商谈余地，请旨定夺。清廷回电，仍要李鸿章力保台湾，实不得已，可以答应将台湾矿利让与日本，而土地、人民仍归中国。三月十七日、十九日，伊藤两次函告李鸿章，声明改稿"节略"为"尽头条款"，无商量余地，中国对之，"惟有允、否两字耳"。十九日一天内，李鸿章三次电达清廷，反复说明日方态度无可转寰，恐非允以矿利所能了事，并告以日方已从广岛派兵船30余艘开赴大连湾，如再迟延，和议有破裂之危险。二十日，李鸿章接到清廷最后谕旨，允其按日方条件定约。二十一日，中、日双方举行第五次，亦是最后一次谈判。李鸿章明知所议条款决无再改可能，然而在谈判中，仍可怜巴巴地作无谓争辩，希图争得一分即少损一分，结果只饱受对方揶揄。二十三日（4月17日），中、日两国全权代表在马关春帆楼正式签订和约，史称《马关条约》，共11款，另附有《另约》和《议订专条》。主要内容为：一、中国承认朝鲜"完全无缺之独立自主"；二、中国割让台湾全岛及附属岛屿、辽东半岛及奉天省所属岛屿、澎湖列岛给日本；三、赔

偿日本军费库平银2万万两；四、开放沙市、重庆、苏州、杭州为通商口岸，日船可沿内河驶入上述各口，日本政府得在各口岸设立领事馆；五、日本臣民在中国通商口岸任便设立工厂，输入机器，只交所订进口税，日本在华制造的一切物品免征各项杂税，所有日货均可设栈寄存；六、为保证切实执行所订条款，允许日军暂驻山东威海卫。此外，在《另约》中规定了驻守威海卫之日军数目、活动范围以及与中国官署分别管理之权限等项。《议订专条》规定了本约各种文本之效力等项。条约签订时，李鸿章对伊藤说："如此凶狠条款，签押又必受骂，奈何？"伊藤答曰："任彼胡说，如此重任，彼亦担当不起，中国惟中堂一人能担此任。"

二十四日，中国代表一行离日回国，二十六日，李鸿章上折奏报签约经过。此后便躲到天津，称病不出，实则逃避国人唾骂。四月初八，清廷正式批准《马关条约》，初九，派伍廷芳为换约大臣。十四日晚，伍廷芳与日方换约大臣伊东美久治在烟台互换条约。次年，又根据本条约有关规定，订立了《中日通商行船条约》，日本从中攫取了在华领事裁判权和片面最惠国待遇。《马关条约》是继《南京条约》以后又一个苛刻的不平等条约，它适应了帝国主义列强对中国进行资本输出的要求，标志着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基本形成，对近代中国社会影响极为深远。

（刘振岚）

三国干涉还辽

清光绪二十一年(1895)《马关条约》签订后，俄国联合法、德两国强迫日本向中国归还辽东半岛的事件。

光绪二十年中日甲午战争爆发初期，英、俄两国担心日本崛起将损害它们在中国的既得利益，试图进行干涉，但两国之间互相猜忌，未能联合采取共同行动。是时，日本政府也向英国保证，不损害其在中国长江流域的通商利益，使英放弃干涉打算，改而严守中立。俄国虽然将中国东北视为自己的势力范围，极不愿日本插足，但此时又不肯与日本发生直接冲突，故暂时容忍，等待时机。二十一年《马关条约》签订后，俄国得知条约具体内容，大为震动，认为辽东半岛割与日本，严重损害了它在满蒙地区的侵略利益，妨碍了自己的侵华计划，于是迅即决定联合其它列强向日本提出忠告，奉劝其放弃辽东半岛，撤出满蒙驻军。日本如果拒绝，俄国将不惜采取军事行动。德国在中日战争初期抱观望的态度，当看到日本必胜的结局后，又希望从中国捞取好处——企图在远东占据一块海军基地，而干涉还辽正好为它提供了实现这一愿望的绝好机会，于是完全赞同俄国迫使日本向中国归还辽东半岛的立场。法国本不愿与宿敌德国立于同一战线，但它与俄国有同盟关系，更不愿因拒绝俄国提议使欧洲同盟受到影响，于是也与俄、德两国采取了共同行动。三月二十九日(4月23日)，即《马关条约》签订后的第六天，俄、法、德三国公使同至日本外务部递交备忘录，表示：日本占有辽东，将对远东和平造成威胁，共同劝告日本放弃辽东半岛。此时俄国海军舰队已做好战斗准备；德国海军远东舰队也接到命令，准备配合行动。日本接到三国劝告书后，首相伊藤博文即与外相陆奥宗光等重臣商议对策。伊藤认为，解决辽东半岛问题有3个方案可供选择：一是断然拒绝劝告，准备与三国交战；二是请求欧美列强出面干涉；三是完全接受三国劝告，退出辽东半岛。就实际情况看，中日战争以来，日本精锐部队已全部调往朝鲜和中国东北地区，本土兵力空虚，加之连续作战，将士疲劳，军需品缺乏，实际已无力与三国为敌。有鉴于此，日本政府决定首先取第二方案，争取英、美等列强出面干涉，使三国收回劝告，停止干涉还辽行动；如果不能实现，必要时可取第三方案，向三国全然让步。对中国，日本则坚持强硬立场，一步不让，促使《马关条约》尽快生效。依据上述方针，日本开始了一系列外交活动，一方面断然拒绝中国提出的延迟《马关条约》批准交换期限的建议，强迫清政府批准这一极其苛刻的不平等条约，并于四月十四日在烟台换约，使条约各项条款成为既定事实；另一方面又请求英、美、意等国出面干涉，协助和支持日本永久占有辽东半岛。然而，英国不愿为此得罪俄、法、德三国，以概不支持任何一方为词加以拒绝；美国也声称严守中立；意大利政府虽有意协助，但毕竟实力不强。故此日本这一计划最终落空。此后，日本政府又策划了一个新计谋。四月初六它向俄国递交了一份备忘录，声称除包括旅顺、大连在内的金州湾外，日本将放弃辽东半岛其它地区的占有权，但须以巨额赔款作补偿，并在中国完全履行媾和条约的义务前，保持占有该地区的权利。日本的如意算盘是：其索取的赎金款数之巨，使中国永远无力还清，结果辽东半岛就等于变相地为日本占有。俄国坚决拒绝这一提议，决计维持最初的劝告。至此，日本政府不得不完全让步。四月十六日，日本天皇颁布诏书，声称为保障东洋地区的永久和平，维护日本帝国的光荣和尊严，对中国政府表示"宽宏"，决定接

受三国忠告，放弃辽东半岛的占有权。但日本并不肯无条件地交还辽东半岛，而是迫令中国必须交出一笔巨款作为赎辽费，并就赎辽款项及附属条件等问题与三国展开秘密协商。闰五月二十七日，日本提出赎辽款数额为5000万两白银；中国偿清这笔赎款及第一次战费赔款后，日军撤出金州；偿清第二次战费赔款及交换修订《中日通商行船条约》后，退出辽东半岛。对这一条件，俄、法、德三国内部产生了分歧。德、法认为日方要求合理，俄国认为偿款要求过高。经过多次协商，三国最后达成一致意见，议定日方索取赎辽费不得超过3000万两，此外不应再有附加条件。日本为尽快解决辽东问题，决定接受三国要求。至此，中日双方才开始就辽东半岛的归还问题直接谈判。八月二十六日，清政府任命李鸿章为全权大臣，与日本公使林董(1850—1913)洽谈。然而一切问题均已由三国与日本议定，中日谈判徒具形式。李鸿章明知减少赎款无望，但谈判中仍唇枪舌剑，百般辩驳，终无收效。九月二十二日，双方签订《中日辽南条约》，包括约款6项、议定专条3项，主要内容为：一、日本政府将"奉天省南边地方，即从鸭绿江口抵安平河口，至凤凰城、海城、及营口而止以南各城市邑"(亦即通常所称"辽东半岛")，以及辽东湾东岸、黄海北岸奉天(辽宁)所属诸岛屿及该地所有堡垒、军器、工厂等公物永远交还中国；双方不再订立陆路通商章程。二、中国作为酬报，将于光绪二十一年九月三十日向日方交清赎款白银3000万两；日本政府自收到酬款日起3个月内撤出该地驻军。三、本约自两国政府批准后21日内在北京互换。该约签订后，清政府按规定赔偿日方白银3000万两，日军也陆续撤出。至此，中国收回了辽东半岛主权。三国干涉还辽实现后，清政府对欧洲各国更加依赖，特别由于俄国在干涉还辽中起了主要作用，致使清廷内部亲俄派势力日益抬头，逐渐在军事、外交决策中占居重要地位。俄、法、德三国也居功要挟，强迫清政府租地和划分势力范围，从而掀起了帝国主义列强瓜分中国的狂潮。

（董增刚）

公车上书

清光绪二十一年(1895)《马关条约》签订后，康有为联合各省在京应试举人1300余人为要求"拒和·迁都·变法"，联名上书请愿事件(汉代以公家车马送应举之人赴京，后因以"公车"为入京应试举人之代称)。

是年二月二十二日(3月18日)，康有为偕弟子梁启超赴北京参加会试，正当中国在甲午战争中失败，李鸿章赴日乞和之时。三月二十一日，即《马关条约》签订前二日，空前丧权辱国的条约内容已传到北京。当时云集京师的举人义愤填膺，奔走相告，强烈要求清廷拒绝批准条约，继续抗战。起初各省举人自为单位，分别向都察院提出要求。康有为、梁启超发动广东、湖南领先，别省继之。数日之内，书呈纷飞，"章满察院，衣冠塞途"，举人们甚至"围其长官之车"，情绪激昂。台湾省举人更是捶胸顿足，垂泪请命，强烈反对割让台湾。而清政府竟毫不理睬。于是，康有为又倡仪18省举人联名共上一书，向清廷提出强烈要求。众人即推举康起草。康有为壮怀激烈，热血沸腾，用一昼两夜时间，起草了一份长达1.8万余字的《上今上皇帝书》，就是有名的《公车上书》，亦为康有为《上清帝第二书》。

《公车上书》情词慷慨，气势磅礴，极言救时之方，详陈自强之道，引经据典，文贯中西，可以说是当时爱国知识分子救亡图存、振兴中华的一篇宣言书。上书首先强烈反对割让台湾，指出割台湾给日本是"弃台民"、"散天下"，会造成"民心先离"，中国将有土崩瓦解之患。又反对议和，认为言和是"解散民体，鼓舞夷心，更速其亡"，故要求"拒和·迁都·练兵·变法"，并提出了他的全部变法维新主张：一、下诏鼓天下之气。要求光绪帝速下三诏：一下"罪己之诏"，中日甲午之战，中国惨败于日本，皇上应特下明诏，深刻反省，承担责任，以便激励国人，同雪国耻，鼓舞将士，慷慨效死。二下"明罚之诏"，对那些主和辱国、大僚尸位、无补时艰的昏庸大臣；阵战不力、闻风溃逃、克扣军饷的贪鄙将帅；擅许割地、辱国通款的卖国使臣；守御无备、调度非人的大小疆吏，应区别情况，给以处罚，重者处死，轻者革职，以蔽其辜。而对那些有功绩的将帅疆吏，则予以奖赏。三下"求才之诏"，建议光绪帝应悬赏求贤，破格提拔那些有真才实学的知识分子参与决策国家大事，应令中央、地方各级官吏各举所知，不论已仕未仕，均可引见擢用。三诏一下，赏罚既明，天下士气必大受鼓舞，则可上下一心，以赴国家之急。二、迁都定天下之本。康有为认为，京师近海，容易为外国侵略者所胁制，而今旅顺、威海卫已为日军攻占，京师屏障全失，建议迅速迁都西安，使日本失其胁制之术，则不必割地，也能达成和议，即使和议不成，我大军云集都畿，扼守潼关、函谷关之险，亦可言战。三、练兵强天下之势。康有为认为，中国所以屡战屡败，将衰兵弱、武器落后是重要原因，所以主张训练重兵，尤其强调选将和购

械。选将应注意挑选年少力壮、出身卑贱者，肯为国家效力；而不用那些精力衰竭、暮气沉沉的老将。建议令各地绅士举办团练，并令州县各荐一位慷慨知兵之士，十中挑一，则必能选拔出优秀将才，为国家所用。购械则需选拔精于制造技术、又能廉洁奉公的人，向外国购买近代化枪炮，使“器械精利，有恃无恐”。康认为只要有精兵猛将，再配以精锐武器，即可强天下之势，对外能稳操胜券。四、变法成天下之治。康有为认为以上三者，还只是“权宜应敌之谋”；而惟有“变法”，才是“立国自强之策”。他发挥变易的哲学思想，指出清朝制度沿袭明制，已经数百年之久，而“物久则废，器久则坏，法久则弊”。他向光绪帝建议说：今之为治，当以开创之势治天下，不当以守成之势治天下，清朝应更新百度，再不能率由旧章了。如何变法？他提出了富国之法、养民之法、教民之法三项建议。富国之法有六：一“曰钞法”，即成立国家银行，由国家发行户部以精工制造之钞票。钞票通行后，可扩商务，可筹军饷，可致国富民强。二“曰铁路”，即允许私人资本修筑铁路。使民间自筹资金，“无使外国，收我利权”，政府既可向修路者征收一定的费用，增加财政收入；铁路四通八达后，又可裁掉漕运，废除驿站，为国家节省大量开支。三“曰机器、轮舟”。康有为指出，现各省严厉禁止民间设厂制造兵器，致使我国工艺制造不能日精，所生产的兵器极端落后，只得花钱进口洋枪洋炮。这种做法是自己束缚自己的手脚。他主张应允许民办机器工厂和轮船公司，政府应加以保护。四“曰开矿”，建议设立矿学，聘请矿学最发达的比利时专家来传授知识，指导勘探，“则吾金银煤铁之富，可甲地球”。五“曰铸银”。鉴于大量外币流入国内市场，造成金融混乱，致使我国“亏折滋多”的情况，建议令各省依照广东做法，开铸银局，统一银元成色、形状，以利流通；同时随着矿产的开发，逐步增铸金钱，抵禁洋圆，以塞漏卮，以收利权。六“曰邮政”，即撤除旧时驿站，开设邮政局。养民之法有四：一曰“务农”，建议在城镇遍设农学会，提倡科学方法种田；开设丝茶局和丝茶学会，以振兴中国传统的丝茶业。其他如东南种棉、蔗；西北讲畜牧；沙漠地区开河种树；海滨开网取鱼，全面改造和发展中国农业。二曰“劝工”，即奖励科学创造发明，建议各州县设立考工院，翻译外国制造之书，培养制造机器的人才，凡有发明创造者，均给以执照，授以奖章，许其专利。三曰“惠商”，即减免重税，保护商业。在此，康有为提出了“并争之世，必以商立国”的思想。他认为古之灭国以兵，人皆知之；而今之灭国以商，人皆忽之。现在洋货充斥国内市场，国货入内地有厘捐盘剥，出口又克以重税，怎能与洋货竞争？他建议中央设立通商院，各省设立商会，集结商人团体，如合公股、设立公司，由国家奖励，使“力量易厚”；奖励商学，翻译外国商学书籍，培养商业人才；设立“比较厂”，比较商品之优劣，目的是“广纺织以敌洋布，造用物以敌洋货”，与“洋货比较”，以夺其利。同时免除厘金之害，减少出口重税，定能货畅其流。四曰“恤穷”。康有为指出，中国人口众多，但民穷财尽，乞丐遍地，不予收恤，不足以“固结人心”。他提出三种恤穷之法：一是移民垦荒；二是在各州县设立警惰院，凡无业游民收入其中，教以工艺，使自食其力；三是将鳏寡孤独或各种残疾之人由各州县设院收养。教民之法有四：一曰普及教育，建议令各州县乡镇“皆设书藏，以广见闻”；乡村一律设立学塾，使儿童皆得入学。二曰改革科举，即改革文、武科取士方法。建议改武科为艺科，各省州县遍开艺学书院，凡天文、地矿、医律、光重、化电、机器、武备、驾驶分立学堂，测量、绘图、语言、文字都要学习。各级考试内容除经学外，主要考核历史、时事和策论，量才录用。殿试策问不问楷法，而选拔那些敢于“直言极谏”，有真才实学的人入翰林；另凡有创著一书，发明新义，切实有用者，皆可入翰林。这样，天下之士，才智大开，奔走鼓舞，中国人才将辈出。三曰开设报馆，出版报纸，“可通时务”，“开拓心思”，移风易俗。四曰设立道学，即提倡孔教，建议将乡村淫祠一律改为孔子庙，并在南洋有华侨聚居的地方也建立孔子庙，弘扬中国文化。此外，康有为还指出当时法制的多种弊端，建议裁撤冗官，紧缩机构，澄清吏治，改革官制等等。他又特别着重指出中国贫弱的最大根源在于“壅塞”，君与臣隔绝，官与民隔绝，上下不通，不能集思广益，故请求皇帝颁行特诏，令士民公举“博古今、通中外、明政体、方正直言之士”，每10万户推举一人，名曰“议郎”。议郎的职责是备皇帝咨询，且可“上驳诏书，下达民词”，凡内外兴革大政和筹款事宜，皆令议郎会议讨论，经三分之二多数通过后，交由政府各部执行。“议郎”每年更换一次。康有为这里所说的议郎会议，虽然与典型的西方资产阶级议会还有若干差距，但这却是康在上皇帝书中明确要求在中国实现资产阶级代议制理想的第一次表述。他认为实行这种制度，即可出现“君民同体，情谊交孚，中国一家，休戚与共”的政治局面。最后，康有为满怀信心地说：今若百度更新，力图自强，就可以使中国收复失地，摆脱含耻忍诟、割地赔款的屈辱地位。总之，从某种意义

上可以说，康有为的《公车上书》是在中日甲午战争后，中华民族危机空前严重的情况下，提出的资产阶级维新改革的政治纲领，企图在不推翻清朝旧政权的前提下，救亡图存，把中国引上资本主义道路。此后康有为历次上书大抵不出《公车上书》的范围。

《公车上书》脱稿后，于四月初七、初八、初九连续三天在北京宣武城南松筠庵之谏草堂，集18省1300名举人传观讨论，并预定抢在《马关条约》换约（四月十四日）前4天，即四月初十去都察院投递。清廷内力主和局之军机大臣、兵部尚书孙毓汶（？—1899）恐人心汹汹，阻挠和局，暗中派出亲信，连夜到松筠庵和各省举人居住的会馆，造谣惑众，动摇人心，又在街上张贴匿名揭帖，虚声恫吓，阻人联衔上书。清廷亦连忙于四月初八在《马关条约》文本上盖用"御宝"，造成既成事实；并以此为借口，挡回爱国举人们的正义要求。初九，不少举人听到清政府已批准和约的消息，于是"群议涣散"，"取回知单者"凡数百人。所以，初参加松筠庵集会者虽有1300名举人，最后《公车上书记》附录的题名录里仅存603名，而上书亦未能送达都察院。《公车上书》的直接目的——阻签《马关条约》——虽未达到，但在封建专制时代，数以千计的爱国知识分子勇敢地冲破清政府"士人干政"的禁令，会集一堂，敲起祖国危亡的警钟，发出救亡图存的呐喊，这本身是一件了不起的创举，惊天地、泣鬼神的爱国伟业。而且，上书的内容经辗转传抄，在神州大地上引起了惊天动地的回响，它标志着酝酿多年的资产阶级维新思潮已开始变为实际的政治运动，是资产阶级改良派正式登上历史舞台的第一幕，预示着以后更大规模的群众性变法维新运动的兴起。（刘振岚）

反割台斗争

中日甲午战争时期台湾人民反对清政府向日本割让台湾的斗争。

按照清光绪二十一年（1895）三月签订的《马关条约》第二款第二条规定：中国将台湾全岛及附属岛屿永远让与日本。五月初十，清政府委派李经方为割台专使，与日本新任台湾总督兼军务司令桦山资纪（1837—1922）互换割台文据，正式把台湾拱手让与日本，同时饬令驻台清朝文武官员陆续内渡，准备让日本接管台湾全境。台湾各族人民得知清廷这一卖国行径后，"若午夜暴闻轰雷"，惊骇异常，义愤填膺，为了保卫自己家园，决心团结起来，与日本侵略者血战到底。早在互换割台文据前，五月初二，台湾各界士绅苦心策划，宣布台湾独立，成立台湾民主国，推选原台湾巡抚唐景崧（1841—1903）为总统，国号"永清"。日本政府为尽快控制台湾局势，决定动用武力，镇压台湾人民的反抗，遂于五月初五派日本近卫师团作为侵台部队，在中将北白川能久亲王统率下扑向台湾。日本海军也在少将东乡平八郎（1847—1934）指挥下，协助日本陆军对台作战。当时，台湾守军约3.3万多人，由唐景崧、邱逢甲（1864—1912）、林朝栋、刘永福分别率领，驻守台北、台中、台南各战略要地。初六，日军在台北附近没有重兵把守的三貂角澳底登陆，很快占领基隆港，直逼台北府城。唐景崧军作战不利，纷纷溃退。十五日台北府城失陷，台湾民主国总统唐景崧慌忙逃往大陆，邱逢甲和驻守台中的林朝栋闻讯后，也相继离台返回大陆，台湾民主国仅仅存在十几天即告失败。二十五日，日军在台北设立总督府，开始对台湾人民实行殖民统治。在台湾民主国败亡、台北陷敌、台中空虚、台南势孤的不利局势下，台湾人民没有屈服，纷纷拿起武器，以吴汤兴（1860—1895）、徐骧（1858—1895）、姜绍祖（1874—1895）等人为首领，组成义军，拥立驻守台南的刘永福为统帅，与日本侵略者展开殊死斗争。五月下旬，日军占领台北及附近城乡后，即向南进犯，在大湖口、新竹、中枥、平安镇、三角涌等地，都遭到义军的有力阻击。双方进行20多次战斗，数百名日军被击毙。台湾人民在武器粮饷严重缺乏的情况下不屈不挠，付出了沉重代价，姜绍祖等义军首领壮烈牺牲。义军总指挥刘永福在筹集武器装备和粮饷等方面遇到了极大困难。他曾派人内渡大陆请求援助，但"遍走沿海各省无应者"。清政府害怕因台湾问题引起中日纠纷，竟拒绝台湾人民的要求，使义军处于孤立无援的境地。七月初，日军基本控制台北地区后，又大举进犯台中。义军在尖笔山、苗栗、大甲溪、八卦山、彰化等地与日本侵略军展开激战。七月初三，日军行进到竹林丛生、山谷险峻的大甲溪，当刚刚渡过河溪到达南岸时，埋伏在丛林中的义军吴彭年（？—1895）部突然发起猛烈攻击，打得日军措手不及，慌忙向北岸回渡。这时隐藏在河溪北岸丛林中的徐骧率领数十名义军也猛然杀出。日军腹背受敌，50余人被击毙，余者大败而逃。初九，日军占领台中，接着又向彰化城东八卦山发动进攻。徐骧、吴汤兴等在此奋勇抵抗。当战斗激烈进行时，日军利用汉奸做向导，从小路悄悄爬上山来。徐骧、吴汤兴立即扑上前去，与敌人进行白刃格斗，终因寡不敌众，徐骧率少数义军杀出重围，吴汤兴及大部分义军壮烈牺牲。不

久，彰化失守，台中地区全部沦陷，义军被迫退往台南。七月二十三日，日军大本营为加强侵台兵力，命第二师团开赴台湾，配合近卫师团猛烈进攻义军驻守的最后阵地——台南地区。八月二十日，日军兵临嘉义城下。义军守将王德标和徐骧率众在城外义军军营中埋设了许多地雷。傍晚，日军占据义军宿营地后，地雷突然爆炸，死伤 700 多人，近卫师团长北白川能久亲王亦因伤病，不久死去。第二天，日军疯狂反击，嘉义失守，徐骧率部退往距台南府城 20 多公里的曾文溪，不久亦壮烈牺牲。此时，日军近卫师团正从陆路逼进台南，第二师团的第四旅团和第三旅团也在海军掩护下从布袋嘴和枋寮登陆，三面合围台南，义军形势危急。九月初一，日军兵临台南府城，次日发动进攻。守军统领刘永福率部英勇抵抗，并亲自登上炮台发炮轰击，毙敌数十人，但因势孤力单，渐不能支，遂于当夜率亲兵退回大陆。初四，台南沦陷，台湾人民的反抗斗争被日本侵略者血腥镇压。台湾人民反割台斗争坚持 4 个月之久，他们在兵力少、武器落后、粮饷缺乏、孤立无援的条件下，与近 5 万日军展开生死搏斗，歼灭敌人 4600 余人，用自己的鲜血和生命谱写了中国人民反帝斗争史上慷慨悲壮的光辉篇章。　　　　　　　　　　（董增刚）

清政府大借“洋款”

中日甲午战争后清政府为偿还对日巨额赔款而向俄、法、英、德四国举借的外债，统称“洋款”。

按照光绪二十一年（1895）签订的《马关条约》，中国需向日本赔偿军费 2 亿两，分八次付清；俄、法、德三国干涉还辽后，又需支付赎辽费 3000 万两。当时清政府每年财政收入仅 8000 万两左右，为偿还这笔巨额赔款，不得不多次举借外债，其中有三次数额最大，即“俄法洋款”、“英德洋款”和“英德续借洋款”。

是年九月，中国对日第一次赔款 5000 万两和赎辽费 3000 万两的支付日期将到，数额大，时间紧迫，清廷别无他途，唯有举借外债以救燃眉之急。俄、法、英、德等国为进一步把持中国经济命脉，攫取更多侵华特权，都积极争夺对华贷款权。清政府于《马关条约》签订前就通过海关总税务司赫德向英国提出了借款要求。正在策划三国干涉还辽的俄国得知此事后十分恼火，它自认为在干涉还辽中起了主导作用，在对华贷款方面理应具有“优先权”。俄国外交大臣罗拔诺夫声称，清廷借款应“先商俄国，方见交谊”。是时，日本政府对三国干涉还辽尚未做出最后答复，清廷担心俄国态度有变，使还辽一事半途而废，于是改变初衷，与俄国交涉贷款事宜。但俄国当时并无足够的财力提供这笔巨款，遂拉上法国金融资本家，而把共同干涉还辽的德国排除在外。二十一年闰五月十四日（7 月 6 日），清廷驻俄公使许景澄（1845—1900）代表清政府在彼得堡与法国霍丁格尔银行、巴黎荷兰银行、里昂信托银行、国家贴现银行、振兴工商业合股公司、工商信托银行及俄国的彼得堡国际商业银行、彼得堡贴现贷款银行、俄国对外贸易银行以及伏尔加—卡马银行，共计俄、法 10 家银行签订了中俄《四厘借款合同》和中俄《四厘借款声明文件》。《四厘借款合同》规定：中国政府向上述 10 家银行借款总额为四亿法郎（合银约 1 亿两），年息 4 厘，九四又八分之一（即 94.125%）折扣，36 年还清，中国以海关税担保。这就是所谓“俄法洋款”。《四厘借款声明文件》规定：一、沙俄政府对签订借款合同的银行团负责，如到期中国不能偿还本息，可由俄国政府垫支，但中国应另许俄国以海关税以外的别项收入作担保。二、中国政府声明：无论何国何故，决不许其办理照看中国税入等项权利；如果中国应允他国此种权利，亦准俄国均沾。可见，清政府向俄、法集团所借的巨额贷款，不仅仅是高利贷性质的金融借贷，而且还附加了许多出卖中国主权的政治条件。俄、法集团通过四厘贷款，不仅在中国获得了巨大经济利益，而且还以此为手段，试图插足中国海关，与英国争夺中国海关的行政管理权。这就大大加强了清政府对俄、法集团的依赖。

清政府向俄、法两国举借外债，引起英国强烈不满，英国驻华公使欧格讷（O'conor，Sir　Nicholas Roderick，1843—1908）亲自到总理衙门抗议，大发雷霆。德国也对俄、法两国在对华贷款中抛弃自己的做法十分恼怒，转而站在英国一边，共同对清政府进行威胁。为了不开罪英、德两国，清廷在中俄《四厘借款合同》签订前作出允诺，下次借款时尽先考虑向英、德借贷。二十二年初，第二次赔款日期又将临近，英、德抢先采取联合行动，向总理衙门声称：英国汇丰银行与德国德华银行愿意向中国提供贷款 1600 万英镑（合银约一亿两），年息五厘，九五折扣、中佣五厘五毫。此时，美国也争着要做债主。早在上年十月，美国公使田贝就亲到总理衙门进行兜揽，并虚伪地声称美国不想通过贷款在中国谋求政治特权。但由于其贷款条件苛刻，清廷没有答应。沙俄在得知英、德贷款条件后，也急起直追，奋力争夺。俄国财政大臣维特向清政府表示，俄、法、德、荷四国愿以较

"优惠"的条件提供这笔巨款。英、德两国为了与俄、法竞争,一面让赫德从中撮合,另一面也将贷款条件降低。这时,法国金融界正卷入对非洲金矿的投资,俄国正全力修筑中东铁路,两国一时无法凑足大批款项,只好听任英、德所为。二十二年二月初十(3月23日),清政府与英国汇丰银行、德国德华银行签订《英德借款详细章程》,规定清政府借款总额为1600万英镑,年息五厘,九四折扣,以海关税收为担保,自二十二年三月起,36年还清,借款还期不得提前。此款付清以前,中国海关事务应照现今办法办理。这笔借款又称"五厘借款"或"英德洋款"。英国通过这笔借贷,获得了36年内对中国海关的控制权,从而抵制了俄、法集团与英国争夺中国海关的企图。"四厘借款"和"五厘借款"除去折扣、佣费等项,清政府实收白银1.7亿多两,两次支付对日赔款及赎辽费后,所剩无几。

根据《马关条约》有关规定,清政府如能在光绪二十四年闰三月十八日(5月8日)《马关条约》换约三周年之前偿还全部赔款,不仅可免付每年五厘的赔款利息(约合银1400余万两),而且日军也将从山东威海卫撤出。清廷为赶在这一天前对日付清余下的7000多万两赔款,又拟第三次举借外债。早在二十三年下半年,清政府即着手办理借款事宜。亲美派官僚盛宣怀首先与美国接洽,美国德伦公司愿意出借,但要求八五点六折扣,且指明以地丁银为抵押。英国呼利詹悟生公司得知后,以较为"便宜"的条件排挤了德伦公司。但沙俄从中作梗,李鸿章遂转而向俄国提出借款请求。俄国利用这一时机,提出三项极为苛刻的借款条件:一、允许俄国投资修筑和控制东北、华北的所有铁路;二、中国海关税务司职位出缺时,应任命俄国人出任;三、借款以地丁银和厘金为担保。俄国的目的是要将其势力范围伸入华北地区,并企图控制中国最主要的财政收入。对此,英国反应强烈。英国驻华公使窦纳乐(Claude Maxwell MacDonald,1852—1915)竟用威逼恫吓手段强迫清政府接受英国贷款。清廷左右为难,最后只得决定不向英、俄两国举借,自己另筹办法。英国毫不退让,悍然表示无论清廷借款与否,都必须满足它下列要求,并以诉诸武力相威胁:一、确立南宁、湘潭为通商口岸;二、中国内河对外开放;三、中国保证不把长江地区让与他国。对这些无理要求,清政府除第一项害怕触及法国在西南侵略利益而不敢答应外,其余两项均对英国做出了承诺和保证。不久,对日第三次付款期限逼近,清政府在国内发行"昭信股票"债券,希望以此筹得巨款,但只募到1000多万两,远远不够偿付对日赔款之用。在走投无路的情况下,只好再次向列强伸手乞求。由于赫德的兜揽,二十四年二月初九,清政府与英国汇丰银行和德国德华银行签订了《英德续借款合同》,规定:借款总额为1600万英镑,年息四厘五,八三折扣,偿还期限45年,以中国海关收入和苏州、淞沪、九江、浙东等处的厘金及宜昌、湖北、安徽的盐厘为担保;借款不得提前还清。借款偿清前,中国海关事务应照现今办法办理。这次借款又称"续借英德洋款"或"四厘五息金镑借款"。通过这次借贷,英国确保了长江流域为自己的势力范围,并取得了45年内对中国海关的控制权。

这三次大借款都是政治性借款,帝国主义通过借款及其苛刻的附加条件,进一步控制了中国经济命脉,扩张了在中国的政治势力。三次巨额借款后,清政府仅向各国支付的利息即高达3.9亿多两。中国社会经济更加衰败凋敝,广大人民群众的生活更加痛苦不堪,中国社会的灾难愈益严重。

(董增刚)

小站练兵

中日甲午战争后清政府在天津小站编练新式陆军,史称"小站练兵"。

清朝旧式军队在甲午战争中屡战屡败,依靠镇压农民起义起家的淮军和湘军虽然装备了洋枪洋炮,但因其腐败,在日本军队面前亦不堪一击,致使国土沦丧,清廷被迫割地赔款,向日乞和。《马关条约》签订后,清朝内外臣僚痛切感到旧有军队已失去维护封建统治的效用,纷纷上奏清廷,争献练兵之策。清政府遂决心整顿旧旅,改练新军,于光绪二十年(1894)冬,命淮系官僚、长芦盐运使胡燏棻(?—1906)主办练兵事务。胡招募壮丁,聘用德国教官,训练新式陆军10营,4750人,号"定武军",屯驻马厂。次年八月又选定天津以南70里的新农镇,即小站地方继续编练。小站练兵自此始。不久,张之洞也在南京采用新法练兵,创建"自强军",计13营,2600多人。定武军和自强军的创建,揭开了中国陆军近代化的先声。正当清朝臣僚争言练兵之际,刚从朝鲜归国的浙江温处道袁世凯投机钻营,招徕幕友译撰兵书12卷,赢得知兵虚名。同年十月,胡燏棻被调督办津芦铁路,李鸿藻(1820—1897)、翁同龢、荣禄、长麟等人联名保荐袁世凯,接替胡燏棻到小站编练新军。袁到任后,将"定武军"扩充至7300多人,改称为"新建陆军",全部采用西式武器装备,聘请巴森斯、伯罗

恩、祁开芬、曼德等10多个德国人任教官,仿照德国陆军营制操典进行训练。督练处为新建陆军领导机关,袁世凯自任督练,下设参谋、执法、督操三个营务处和中军、文案等官职,附设粮饷局、军械局、转运局、洋务局、军医局、教习处等部门,分别负责训练、运输、军械、辎重、军法和研究西方军事方面的工作。新建陆军士兵分为步兵、炮兵、骑兵和工程兵等兵种。全军附有参谋职能、电讯联系、随营军事学校和军乐队等,从而形成较为完备的近代化陆军体系。袁世凯视新建陆军为自己的军事资本,煞费苦心,竭力经营,使这支军队在组织、训练、技战术和战斗力等方面一改过去湘、淮各军的腐化落后状态,具备了清廷旧式军队所没有的独特优势。袁世凯十分重视士兵的来源和招募工作,严禁游勇溃卒掺入新军,以杜绝旧军队的恶习。在军事训练中,新军要求极为严格,配有一整套军法军纪作为维护纪律、保证士兵战斗力的手段。在供给方面,新建陆军开销直接由户部支付,士兵待遇较为优厚。袁世凯为收买军心,严禁官弁克扣士兵薪饷,同时向士兵灌输"忠君"、"尽孝"等封建伦理观念,使士兵把袁视为衣食父母,肯为其拚死卖命。为牢牢控制这支新式武装,袁世凯还在军队内部培养亲信,固结死党,将自己的门生故吏安插在军中各部门,并大批启用具有近代军事知识而地位较低的武备学堂毕业生担任重要职务,使他们成为自己的党羽和爪牙。后来成为北洋军阀头面人物的徐世昌、王士珍(1861—1930)、段祺瑞、冯国璋(1857—1919)等人都曾是袁世凯"新建陆军"的骨干。二十五年,清政府调新建陆军赴山东镇压义和团运动,袁遂借机将军队扩充至约2万人。二十七年,自强军也调归袁世凯节制。这样,从小站练兵开始,经过袁世凯苦心经营,新建陆军初具规模。这支新式军队成为袁世凯以后政治发迹的资本,亦成为中国最大的近代军阀体系——北洋军阀体系的基础。

(董增刚)

乙未广州之役

清光绪二十一年(1895)兴中会在广州发动的反清武装起义,是为资产阶级革命派发动的第一次反清起义。

兴中会总部成立后,立即筹划在广州发动起义。当时推定孙中山驻广州直接策动、指挥起义事宜,由郑士良、陆皓东、邓荫南(1846—1923)、陈少白等担任助手;杨衢云驻香港负责后方接应和财政事务,由黄咏商、谢缵泰(1872—1937)等担任助手。孙中山等到广州后,在城内双门底王家巷王氏书舍设立机关,公开打出农学会的旗号,以研究农学掩人耳目,实则借此秘密联络会党、防营。在广州陆续加入兴中会的很快达到数百人。为便于容纳往来同志及贮藏秘密文件和武器,复增设分机关于东门外咸虾栏张公馆及双门底圣教书楼后礼拜堂,此外又在省河南北设立小机关数十处。经过半年多的努力,各方面的准备逐渐成熟。起义的具体计划几经研究,最后确定为"分道攻城"之策,即以丘四、朱贵全等集合散处新安、深圳、盐田、沙头等地会党3000人集中香港、九龙,俟发难当天进入广州,作为首先发动冲击的敢死队;附城各处之会党、绿林、民团预先进入市内,届时会同防营、水师举事响应;炸弹队在各要区施放炸弹,以壮声势;北江、清远、花县、香山、顺德等地的会党、绿林、民团在广州起义后立即响应,以为臂助。起义日期定为农历九月初九(10月26日)重阳节,因是日为粤俗秋节扫墓期,便于起义队伍混在回省城扫墓的人中间入城。又确定以青天白日旗为旗帜,以"除暴安良"为口号,以红带缠臂为联络暗号,讨清檄文、安民布告及英文对外宣言等均事先拟定。为统一指挥,八月二十二日召开会议,选举会长;会长名曰"伯理玺天德"(President,总统),意在起事后即以"会长"一职为合众政府之大总统。起初大家一致推举孙中山为会长;但杨衢云力争此职,孙中山考虑到起义前不应引起党内纠纷,说服同志,重开会议,选杨衢云为会长。此后起义的准备工作更加速开展起来。但到原定起义那一天,情况突然发生了变化。九月初九黎明,军队、民团、会党首领齐集总机关等待大举进攻的命令,并领取枪械,但香港一路却始终未到。早八时总部接到杨衢云从香港拍来的电报,告知"货不能来"(此为隐语,"货",指起义武器),香港起义人员也因故需推迟二日方能出发。有鉴于此,孙中山认为当天起事已不可能,况且众多起义人员齐集省城,风声必然走漏,再冒险行动亦必失败。于是一面将军饷分给各路首领,让他们带队回原地待命;一面致电杨衢云:"货不要来,以待后命!"然而这时清广东政府已得知党人即将起事的信息。会员朱淇之兄以其弟名列党籍,恐为所累,竟用朱淇名义向缉捕委员李家焯自首;清政府驻港密探韦宝珊也将兴中会起义准备情况报告广东政府。两广总督谭钟麟接到密报,立即派人到各机关搜捕起义者,陆皓东、程怀、程次、程耀臣、梁荣5人先后被捕。杨衢云在港虽接到孙中山来电,但因已有军械7箱装泰安轮准备运广州,竟仍派朱贵全、丘四等于第二天率众200人

乘轮前往。结果，船一到广州，先登岸的朱贵全、丘四等45人全部被捕，后登岸的见状立将红带等符号毁弃，方才得免。陆皓东、朱贵全、丘四被清政府杀害，程奎光（？—1895）被捕后在清军营务处被打600军棍后牺牲。陆皓东在敌人非刑面前，威武不屈，大义凛然，豪迈地表示："今事虽不成，此心甚慰，但我可杀，而继我而起者不可尽杀。""吾言尽矣，请速行刑！"广州起义失败后，孙中山间道澳门，经香港与陈少白、郑士良东渡日本；邓荫南、黄咏商赴澳门；杨衢云先到印度，后又转至南非。兴中会总部无形瓦解。但这次起义是中国人民企图用革命的手段来实现民主共和国理想的第一次尝试，对以后资产阶级革命派的形成和革命运动的发展具有深远的影响。

（王　才）

强学会成立

强学会，又名强学书局或强学局、译书局，清光绪二十一年（1895）先后在北京、上海成立的最早的资产阶级维新派政治团体。

是年四月（5月），康有为发动《公车上书》失败后认识到，欲实行变法维新，必先"合群"以开风气，即结成团体，扩大维新思想的宣传。遂决计组织学会，争取官吏与士大夫对变法运动的支持。为阐明组织学会的必要性，又决定先办一份报纸，遍送在京官吏和士大夫，使之"渐知新法之益"，"告以开会之故"。所办报纸称《万国公报》，是年六月二十七日（8月17日）正式创刊，与英、美传教士在上海组织的广学会所办报纸同名，因广学会所办《万国公报》在政府官僚中行销有年，故袭用其名，以利发行。由梁启超、麦孟华任编辑。主要转载上海广学会《万国公报》文章，介绍西方政治经济概况，宣传"富国"、"养民"、"教民"之法，发挥康有为《公车上书》中的变法思想。共出45期。七月底八月初，康有为联络一批帝党官员，如户部郎中、军机处章京陈炽（？—1899）、刑部郎中沈曾植（1850—1922）、翰林院编修沈曾桐（1853—1921）、丁立钧、张孝谦等人，"各出义捐"，集资设会。十月初，强学会正式成立（以强学书局的开设为标志，另说七月初成立），会址设在北京宣武门外后孙公园。推陈炽、沈曾植为正董，沈曾桐、侍读学士文廷式（1856—1904）为副董，而实以张孝谦负实际责任。列名会籍或参预会务者还有梁启超、麦孟华、汪大燮（1860—1929）、王鹏运（1849—1904）、陈仰垣、袁世凯、徐世昌、杨锐、张权（张之洞之子）等，共22人，另有帝党官僚首领、光绪帝师翁同龢、孙家鼐、军机大臣李鸿藻、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王文韶、两江总督刘坤一、湖广总督张之洞、武将宋庆、聂士成以及英、美传教士李提摩太、李佳白（Gilbert Reid，1857—1927）、英使欧格讷等人支持、赞助强学会。强学会成分复杂，既有资产阶级维新派，又有帝党官僚；既有洋务派官僚或其代理人，又有清廷其他派系的文臣武将，但基本上可以说是以维新派与帝党官僚相结合的一个政治团体。梁启超曾谓，强学会之性质，"实兼学校和政党而一之"。软弱的中国资产阶级最早的政治团体便是以这种形式出现的。强学会每10日集会一次，每集会必有演说。康有为特为强学会作序，痛陈中国处于"俄北瞰，英西睒，法南瞵，日东眈"的危迫局面，若不急图挽救，有亡国之危；又阐述成立学会的宗旨在于广联人才，创开风气，以挽救时局。强学会成立后，"先以报事为主"，把《万国公报》改名为《中外纪闻》，作为强学会的机关报，于十一月初一正式出版，以梁启超、汪大燮为主笔。双日刊，每次一册，约发二三千份，托售《京报》人随宫门钞免费分送在京官员阅览。该报内容载有"阁抄"、"新闻"、"译报"、"论说"等项，"译报"介绍西方资本主义国家政治经济情况及自然科学知识，"论说"则着重于考察各国强弱之原，反映了资产阶级维新派学习西方的政治倾向，因而遭到后党忌恨。李鸿章怂恿其儿女亲家、御史杨崇伊于十二月初六（1896年1月20日）上疏弹劾强学会"植党营私"，《中外纪闻》"贩卖西学"，"请饬严禁"。于是，强学会被封禁，《中外纪闻》被迫停刊。后经李鸿藻、张孝谦等力争，改成官书局，但渐被官僚系统人把持，维新派遭到排斥；专门翻译各国书籍，不准议论时政，不准臧否人物，"渐讳时政"，已失去强学会原有性质。

在北京强学会成立的同时，康有为又到沪、宁活动，以上海为南北交通总汇，"士大夫走集之所"，是"合群"和讲究"自强"的重要地区，故打算在上海成立强学会，以扩大维新声势，推进变法运动。光绪二十一年八月二十九日出京，九月十五日到宁，游说署两江总督张之洞支持开设上海强学会。张正想借用维新派的宣传才能以扩张自己的声势，故颇以立会事"自任"，并允拨款相助，除捐助北京强学会5000两外，又拨款1500两创建上海强学会。但反对康有为《孔子改制考》。十月初，康有为偕张之洞幕僚梁鼎棻（1859—1902）等由宁抵沪，十月至十一月间（十一月二十八日以前），上海强学会成立（以上海强学书局开局为标志），会址设在上海跑马场西首王家沙一号，发布由张之洞署名的公启，序文由康有为代拟，

康另拟《上海强学会后序》、《上海强学会章程》，标明"本会专为中国自强而立"，"联人心，讲学术，以保卫中国"为宗旨，规定四项会务：一、译印图书，学习西学，去塞求通；二、出版报纸，了解外国情况；三、设立图书馆，搜集中外学术著作；四、开办博物院，置办仪器，讲求制造，"以为益智集思之助"，不但提倡学习西方自然科学，而且提倡学习西方社会政治学说。列名会籍者有康有为、内阁学士黄体芳(1832—1899)、翰林院编修梁鼎棻、黄绍箕(1854—1908)、御史屠仁守、翰林张謇(1853—1926)，还有维新人士汪康年、黄遵宪、章炳麟等共24人。十一月二十八日，上海强学会出版《强学报》，以为其机关报。康有为的学生徐勤、何树龄任主笔，共出3号，以孔子纪年，铅字排印，装订成册，派送赠阅，不收报费。内容有"上谕"、"论说"等项，以"论说"为主，其政治色彩较北京强学会之《万国公报》和《中外纪闻》更为鲜明。鼓吹设会办报，力言科举制度之积弊，倡导维新变法，强调变法当知"本原"，并鲜明地提出了开设议院以通下情的政治主张，这是资产阶级维新派首次在报刊上公开提出开议院的主张。《强学报》虽仅出3号，历时仅十几天，但对维新运动起过很大推动作用。张之洞虽资助《强学报》，但反对以孔子纪年，故当十二月初六北京强学会被封禁的消息传来后，立即嘱其幕僚致电上海各报馆："现时各人星散，此报不刊，此会不办。"上海强学会随之解散，《强学报》亦随之停刊(终刊于十二月初八左右)。　　(刘振岚)

《中俄密约》签订

《中俄密约》，又称《御敌互相援助条约》或《防御同盟条约》，清光绪二十二年(1896)沙皇俄国以共同防御日本在亚洲的霸权为名，诱迫清政府签订的不平等条约。

光绪二十一年俄、法、德三国干涉还辽后，沙皇俄国居功索酬，要求将西伯利亚铁路修至中国境内，经黑龙江、吉林两省直达海参崴。这一铁路即后来所称东省铁路或中东铁路。同年六月，沙俄置中国政府于不顾，擅自派人进入东北地区进行铁路勘察活动。不久，沙俄财政大臣维特(Сергей юлъевич Витте，1849—1915)和驻华公使喀西尼(А. П. Кассини，1835—?)先后向清政府提出借地修路的无理要求。清廷害怕沙俄势力侵入中国东北，以自修铁路为名予以拒绝。但甲午战争后清廷内部亲俄势力日益抬头，众多朝臣都倾向与俄国结成秘密联盟，借以对抗日本。清廷内部这种联俄拒日的主张，为沙俄实现其筑路侵略野心提供了可能。二十二年四月十四日(5月26日)，俄皇尼古拉二世(Николай，Ⅱ，Александрович，1868—1918)将举行加冕典礼，清政府决定派官员前往祝贺。沙俄认为这是向清廷索取中东铁路修筑权的极好机会，于是经过精心策划，以"人微言轻"为借口，拒绝清廷贺使王之春(1842—?)赴俄，指名要李鸿章前往。清廷无奈，只好委任李鸿章为"正使"，赴俄致贺加冕，并"访问"英、法、德、美等国。此时，李因签订丧权辱国的《马关条约》遭国人唾骂，躲在家中养病避风。他深知此次俄国之行"非寻常交际之仪"，托病恳辞，清廷不允。二月十四日，李鸿章在与慈禧太后及翁同龢密议与俄结盟的有关事宜后，即以钦差头等出使大臣身分，率随从人员启程赴俄，搭乘法国邮轮抵达苏伊士运河，在那里受到俄国特使的迎接，再改乘俄国航业公司的轮船，于三月十八日经黑海抵达彼得堡。二十一日，李鸿章与俄国外交大臣罗拔诺夫(А. Б. Робанов-Ростовский，1824—1896)和财政大臣维特就中东铁路问题开始密谈。次日，李觐见俄皇尼古拉二世，递交国书，密谈中俄皇亲自提出铁路问题。二十五日，尼古拉二世再次与李密谈，李对俄国借地修路作出承诺。此后，罗拔诺夫和维特又以出力"援助"中国、抵制日本为诱饵，对李鸿章威逼利诱。四月二十二日，李鸿章征得清廷同意，与维特和罗拔诺夫在莫斯科正式签署了《御敌互相援助条约》。当时双方商订条约内容保密，故又称《中俄密约》。该约共六款，主要内容包括：一、日本如侵占俄国远东或中国及朝鲜土地，中俄双方应将所有水陆各军届时所能调遣者尽行派出，互相援助，并互相接济军火、粮食。二、战时如有紧要之事，中国所有口岸均准俄国兵轮驶入，中国地方官应尽力供给所需。三、非由两国共同协商，一国不得单独与敌议和。四、中国允许俄国在黑龙江、吉林地方接造铁路，直达海参崴(即中东铁路)。该路建造和经营交给华俄道胜银行承办；俄国不得借端侵占中国土地和损害中国应有权利。五、无论战时或平时，俄国均有权通过该路运送军队和军需品；俄国用此铁路运送军粮时，除转运暂停外，不得借故停留。六、条约以铁路合同批准之日起生效，有效期为15年。由于密约规定中东铁路交给华俄道胜银行承办，所以七月二十五日中方又与该银行签订《银行合同》，规定中国政府以库平银500万两予以道胜银行作为中方股本，与俄国共同经营中东铁路，并对经营事宜详加申明。八月初二，中、俄双方根据密约有关条文，又在柏林签订了中俄《合办东省铁路公司合同章程》

(《中东铁路合同》),共12款,主要内容是详细规定了设立东省铁路公司及修建该路的具体事宜。至此,俄国终于实现了将西伯利亚铁路伸展至中国境内的宿愿。这样,沙皇俄国就可以运用"铁路征服政策",将侵略势力渗透到中国东北,把黑龙江、吉林等满蒙地区囊括为自己的势力范围,以便最终实现吞并中国东三省的野心。 (董增刚)

《时务报》发行

《时务报》,清光绪二十二年(1896)维新派在上海创办的报刊。

二十一年末,强学会因遭顽固派奏劾被封禁,维新人士黄遵宪想通过办报宣传及倡导维新,恰汪康年由湖北来沪,两人不谋而合,商定以上海强学会余款、征集绅商捐款(黄自己捐款1000元)作为办报经费,并函邀梁启超参加。黄遵宪(1848—1905),字公度,广东嘉应州人,举人出身。甲午战前历任驻日本使馆参赞,驻旧金山、新加坡总领事,曾著《日本国志》一书,主张学习西方,但主渐进,以君主立宪为归宿。光绪二十年由新加坡总领事任归国至沪。甲午战后,列名参加上海强学会。汪康年(1860—1911),字穰卿,浙江钱塘(杭州)人,张之洞幕僚。曾任两湖书院史学斋分教习。甲午战后,知非变法不足以救中国,参加上海强学会。梁启超(1873—1929),字卓如,一字任甫,号任公,又号饮冰室主人。广东新会人。少年聪慧,12周岁中秀才,14岁入学海堂学习,16岁中举。17岁起师从康有为,在万木草堂3年,助师编著《新学伪经考》、《孔子改制考》等书,全盘接受康有为变法思想理论。光绪二十一年随康有为到北京参加会试,助康发动公车上书。六月(8月)康创办《万国公报》,他任撰述,十月,强学会成立,他任书记员,旋改《万国公报》为《中外纪闻》,他又任主笔。八月底,康有为离京赴沪,他主持北京维新工作。十二月(1896年1月)强学会被封后,他在次年三月离京赴沪,与黄遵宪、汪康年筹划办报,由其草拟"公启",以黄遵宪、汪康年、梁启超、吴德潇、邹凌翰5人署名为创办人,而以前3人为核心。二十二年七月初一(8月9日),报纸正式创刊,名曰《时务报》。报馆设在上海福州路福建路口。旬刊。每册约20余页。内容分"论说"、"谕折"、"京外近事"、"域外报译"诸栏,其中"域外报译"几占全册二分之一,另附各地学规章程等。创办初期的办事人员为:总理汪康年、主笔梁启超、英文翻译张坤德、法文翻译郭家骥、日文翻译古城贞吉、理事(管印书及财务)黄春芳。

《时务报》以变法图存为宗旨,从光绪二十二年七月初一创刊至二十四年六月二十一日(8月8日)停刊,共出69册。每册3万字,而出自梁启超一人手笔或经他删改者近万字,其中每册"论说"4000字皆梁手撰。该报开宗明义首载梁氏《论报馆有益于国事》之论文。该文把报纸比作国家的耳目、喉舌,认为"无耳目,无喉舌,是曰废疾";而起"废疾",助"耳目喉舌",就要靠报馆,报馆是"去塞求通"的开端。梁启超论述维新变法的代表作《变法通议》,以及《论中国积弱由于防弊》、《古议院考》、《论君政民政相嬗之理》等重要政论文章均在《时务报》陆续发表;学术代表作《西学书目表》及《读西学书法》也由《时务报》馆单行出版。梁在这些文章中,以极大的爱国热情,敲起民族危亡的警钟,呼吁救亡图存;以资产阶级进化论和康有为"公羊三世说"历史进化观论述维新变法的必要性与合理性;尖锐揭露封建专制制度的黑暗与腐朽,认为专制制度是中国衰弱落后的根源;批判洋务派仅袭西学皮毛,而不知"变法之本原";大力鼓吹资产阶级民权思想,对中国近代第一次思想解放运动做出了突出贡献。他在《变法通议》一文中,将其变法主张归结为:"变法之本,在育人才;人才之兴,在开学校;学校之立,在变科举;而一切要其大成,在变官制。"他赞美西方议会制度,并以"公羊三世说"历史进化观论述中国将来必实现君主立宪制及民主共和制,但认为目前民智未开,开议院尚不具备条件,故将其变法主张归结为"变科举,兴学校",提出"强国以议院为本,议院以学校为本"的著名公式,反映了他是个以实现资产阶级民权制度为目标的教育救国论者。在学术上主张中学、西学并重。认为"舍西学而言中学者,其中学必为无用;舍中学而言西学者,其西学必为无本,皆不足以治天下。"梁文议论新颖,文字流利畅达,"笔端常带感情",极富感染力。《时务报》出版后,很快风行海内,几个月之间,行销万余份,为中国办报以来所未有。江淮河汉之间的新学士子"爱其文字之奇诡,争传诵之",上至通都大邑,下至僻壤穷陬,无不知有新会梁氏者。从此,梁启超名声大噪,与其师并称"康、梁"。《时务报》销行日广,受到各方面注视。洋务派官僚头目、湖广总督张之洞也认为该报"识见正大,议论切要",下令湖北全省官销《时务报》,并对梁表示钦仰,又捐赠该报500元,目的在于摆出一副"宏揽人才"的姿态,以利用维新派的宣传才能为自己张目。

随着《时务报》影响的日益扩大,维新派的议论时有激烈言词,触犯到洋务派,而总理汪康年是张之

洞的亲信，办报秉承张之洞意旨，故汪与主笔梁启超之间的矛盾日益深化。梁氏《变法通议》一文抨击张之洞编练的"自强军"和汉学家倭仁、纪昀，又宣扬康有为《孔子改制考》，已为张所不能容忍；第40册《知耻学会序》更全面揭露封建官僚、军阀、买办的罪恶，对洋务派卖国官僚的丑态作了淋漓尽致的刻画，极大地触怒了张之洞，立即电饬湖南巡抚陈宝箴禁止此册《时务报》入湘。汪康年更是多方排挤梁启超。光绪二十三年十月（11月），梁应湖南维新派的邀请，赴湘任时务学堂中文总教习。黄遵宪早于二十二年九月离沪，二十三年夏、秋之间赴湘，任湖南长宝盐法道，署湖南按察使。故此汪康年得以独掌报务，总揽一切，遂将《时务报》改弦易辙，经常刊登攻击、诽谤康有为的文字；又不许维新派称引"康学"；还利用梁启超赴湘之机，任用私人。梁忍无可忍，于二十四年三月愤而去职，自当年三月初一出版的第55册以后，就再无梁启超的文章。此后，"论说"即由汪康年自己撰写，完全贯彻张之洞的洋务派思想，从内容到形式，都与55期以前有很大不同。《时务报》的汪、梁之争，不是个人意气之争，也不是单纯的争权夺利，而是以张之洞为代表的洋务派对资产阶级维新派的一场政治斗争，结果以维新派的失败而告终。光绪二十四年五月二十九日御史宋伯鲁上《奏改〈时务报〉为官报折》，意在扩大《时务报》的维新宣传，且借此将报权从汪康年手中收回，改官报后仍由梁启超督办。六月初八孙家鼐又上《奏遵议上海〈时务报〉为官办折》，建议派康有为赴沪督办《时务官报》，因其不满康有为"孔子改制"学说，想借此将康排挤出京。光绪帝鉴于此时维新与守旧势力的斗争已很尖锐，为缓和矛盾，保全康有为，故准孙家鼐奏，于同日颁谕令康赴沪督办《时务官报》。此谕颁发后，张之洞与其幕僚经过密商，决定将《时务报》空名让与康有为，借口该报经费系由绅商捐款而来，毫无官款，故"不能入公家"，令汪康年设法以此款另办《昌言报》，指明为商报，"绝不与官报相混"。汪遂改名《昌言报》，于当年七月初一正式创刊，以梁鼎芬为总董，其封面、版式都和《时务报》后期一样，仍与从前《时务报》"蝉联一线"。康有为、梁启超非常气愤，反击汪康年"私改为《昌言报》，抗旨不交"，并电致两江、湖广各省，谋禁发《昌言报》。七月初六，光绪帝颁谕令黄遵宪赴沪"查明原委，秉公核议"。汪康年大肆活动，张之洞亦为其辩护，坚称《昌言报》为商报，与《时务官报》无涉，汪康年遂公然拒绝向康有为交代报务，《昌言报》仍照常出版。黄遵宪到沪没几天，戊戌政变发生，"查办"一事不了了之。政变后，梁鼎芬辞去总董职务，改以日人安藤虎雄为总监。十月初六，《昌言报》停刊，共出10册，《时务官报》迄未出版。　（刘振岚）

孙中山伦敦蒙难

清光绪二十二年（1896）孙中山被清驻英使馆囚禁事件。

乙未广州起义失败后，孙中山逃亡国外，相继到日本、檀香山和美国，在华侨中继续宣传革命，发展兴中会组织。这时清政府悬重赏通缉孙中山，派出大批暗探到香港、澳门、新加坡一带"购线跟踪"，设法搜捕，并电告各驻外使节相机缉拿。光绪二十二年八月十八日（10月4日）孙中山由纽约乘轮赴英，二十四日抵利物浦，二十五日抵伦敦，随即往访在香港西医书院时的老师康德黎（Cantlie，Sir James）；经其师介绍，从赫胥旅馆移住葛兰旅店。其时清驻美公使杨儒已将孙中山的行踪电告驻英公使龚照瑗。龚即派使馆二等参赞马格里雇请司赖特侦探社侦察孙中山的活动，同时又请英政府代为捕拿，但遭英政府拒绝。于是龚采纳馆员之议，施以诱擒之计。九月初五上午10时半，孙中山依约自旅店往康德黎住所，途经中国使馆附近，被早已窥伺在那里的使馆翻译邓廷铿等人挟持进使馆，幽禁于三楼一间小屋中。之后龚照瑗以7000英镑的高价向格来轮船公司租了一艘2000吨的轮船，企图将孙中山装入木箱中秘密运回国内杀害。被严密囚禁于使馆的孙中山想尽一切办法以取得同外界的联系，但均未成功。初十，使馆之英籍工人柯尔前来炉中添煤，中山遂请其协助。次日柯尔之妻（一说为女工英人贺维）将孙中山所书名片交与康德黎。十二日柯尔又向康德黎面告孙中山被囚详情。康德黎遂邀孙中山在香港西医书院求学时的另一老师孟生，四出奔走，设法营救。他们先后到伦敦警察署、英国外交部和清驻英使馆交涉，均不得要领，又请《泰晤士报》发消息，亦未能如愿。直到九月十五日《地球报》通过采访才以"可惊可怖之新闻"为题，报道了中国革命家被囚于清驻英公使馆的消息，随后其他各报也接连刊载。这一消息震动了伦敦的舆论界，引起了英国人民对清驻英公使馆的极大不满。在社会舆论的压力下，英国政府派遣代表向清驻英公使馆提出交涉，首相兼外相萨里斯倍并于十六日向清使馆递交备忘录，要求按国际公法和国际惯例，迅速释放被私捕囚禁的孙中山。十七日下午，清使馆终于被迫将被羁囚了12天的孙中山释放。此一事件在世界各地引起反响，孙中山开始在国

外享有声誉。脱险后，孙中山又在伦敦继续居住了近一年时间，认真地研读了西方国家的有关政治、经济、军事、外交以及农业、畜牧、矿业、机械工程等类书刊，深入地考察了英国的社会经济政治状况，从而为他的三民主义理论的形成提供了思想资料。光绪二十三年元月初三(7月2日)他由伦敦启程，于七月十九日再到日本，继续从事革命活动。

（王　才）

冠县教案

清光绪二十三年(1897)山东省冠县梨园屯乡民反对外国教会侵略的斗争，是为义和团反帝斗争首举义旗之战。

咸丰年间，山东东昌府冠县梨园屯士绅曾公捐义学坡地38亩，并在义学堂后面修建玉皇庙一座，后毁于兵燹。同治八年(1869)，村中天主教民分配义学公产，将分得的3亩多宅地转让给法国传教士梁宗明。同治十二年，梁宗明在宅地上拆毁庙宇修建天主教堂，引起梨园屯乡民的公愤。知县韩光鼎袒护教民，无理审断，允许教会在庙宅基上改建教堂，埋下民教冲突的引线。光绪十三年春，传教士费若瑟欲重建教堂，唆使教民拆庙扩充宅基，再次激起该屯乡民的愤怒。他们集结数百人，手执器械阻止教会建堂。为此，民、教双方呈讼到县，要求官府审断。知县何世箴明知教会无理，却不敢触动外国侵略势力，允许教会重新建堂。村民不服，公推王世昌等人上告东昌府，不料知府洪用舟竟公开表示不敢管束教民。王世昌据理力争，知府大怒，将王世昌等人监禁半年。消息传来，梨园屯村民义愤填膺，遂在阎书勤、高元祥率领下展开斗争。阎书勤，出身贫苦，平时善习“红拳”，长于刀法，刚直不阿，在群众中享有较高威望。高元祥，平时疾恶如仇，爱打抱不平，受到群众信任。王世昌被捕后，阎、高等共18位村民当即表示要用武力夺回庙宇，保护村民公产，被村民称誉为“十八魁”。此后，该屯乡民纷纷跟随阎书勤学习红拳，加入武装护庙的行列。教会也派人持枪把守，寻事生非，民、教冲突愈演愈烈。光绪十八年，知县何世箴害怕事态扩大，亲到梨园屯调解，再次将庙产判归天主教堂。次年春，教会继续修建教堂，诬蔑“十八魁”谋反，要求官府予以严惩，开枪射击前来辩论的乡民。阎书勤等人怒不可遏，奋起开枪还击，并把枪械集中在玉皇庙中，准备与教会拚命。二十一年，知府洪用舟亲率官兵前来弹压，再次将庙基交还教会，留下一队清兵长期驻守，防止村民反抗。为打击教会的嚣张气焰，阎书勤等人主动与直、鲁、豫三省交界的梅花拳首领赵三多联系，改习梅花拳。赵三多(约1842—1902)，又名洛珠，字祝三、祝盛，人称赵老祝，威县沙柳寨人，自幼习拳练武，为人仗义豪爽，痛恨洋教势力，是远近闻名的梅花拳师。二十三年二月，赵三多慨然应允阎书勤等人邀请，率各地拳民3000多人赶到梨园屯召集大会，连续三天练拳比武，向教会示威。三月二十六日(4月27日)，拳民聚众攻打梨园屯教堂，掀起了反抗外国教会侵略的武装斗争。不久，洪用舟奉委再次查办梨园屯教案，将玉皇庙基充公，另为教会觅地建堂，赔偿教会京钱2000吊，下令缉拿起义首领。同年十月，德国强占胶州湾，山东主教马天恩乘机推翻梨园屯教案协议。清廷饬令洪用舟复查，并将知县何世箴撤职。次年二、三月间，赵三多为避免因参与反洋教起事而牵连威县等地的梅花拳组织，遂改称义和拳。从此，赵三多率领的梅花拳、梨园屯地区的红拳、大刀会和其他拳会，大都改称义和拳，广招徒众，练拳习武。对此，外国侵略者深感震惊，威逼清廷逮捕“十八魁”，剿灭义和拳。洪用舟遂率兵勇赶赴梨园屯，击伤阎书勤，拆毁玉皇庙，复将庙基交还教堂。赵三多在清廷“剀切开导”下，同意解散拳民，于是各路义和拳相继撤离。六月，清廷与教会达成协议：清政府向教会赔偿白银1万两，严缉起义军首领“十八魁”等人。这时阎书勤率义和拳转战各地，继续进行斗争。至九月，阎又迫促赵三多在冠县蒋家庄(河北威县境内)马场再次祭旗起义，竖起“助清灭洋”大旗，啸聚千人，声威波及附近10余县。清廷急忙调集直隶、山东两省兵力合力镇压。在威县候未村，起义军遭到清军包围，赵三多等人突围逃散，义和拳队伍受到严重损失。　（董增刚）

时务学堂设立

时务学堂，清光绪二十三年(1897)湖南维新派创办的新式学堂。

中日甲午战后，民族危机空前严重，有识之士亟谋挽救，维新变法思潮迅速兴起。素以保守排外著称的湖南，其变化也很大，发展实业，鼓吹新学，很快成为全国革新气象最为蒸蒸日上的省份。光绪二十二年秋冬之交，湖南士绅蒋德钧、熊希龄等人创设宝善成机器制造公司，开局后，蒋德钧即议请开设学堂，以便推广工艺，培养人才。得到巡抚陈宝箴的支持。陈宝箴(1831—1900)，字右铭。江西义宁(修水)人。举人出身。历任浙江、湖北按察使，光绪二十年任直隶布政使。次年《马关条约》签订，痛感国家危难，主

张变革，曾向光绪帝疏陈利害得失。同年七月，因兵部尚书、总理衙门大臣荣禄推荐，得授湖南巡抚。上任以后，即以"变法开新"为己任。二十二年，当他得知蒋德钧等议设学堂，"惊喜叫绝"，于十二月（1897年1月）即批准立案，并亲自命名曰"时务学堂"。次年八月（1897年9月）发布《湖南时务学堂缘起》，宣称："吾湘变，则中国变；吾湘立，则中国存。"规定办学宗旨为："用可用之士气，开未开之民智"，"广立学校，培植人材，为自强本计"。旋乘当年乡试之时，用陈宝箴的名义发布《时务学堂招考示》，指出："国家之强弱，系乎人才；人才之消长，存乎学校。"稍后，刊布《湖南开办时务学堂大概章程》，规定入学学生按府分派，经过考试，择取12岁至16岁聪俊朴实子弟入学。至八月二十八日（9月24日）时务学堂招考之时，投考者竟达4000余人，可谓盛况空前。结果录取40名，十一月初六正式开学。校址暂租长沙小东街故阁老刘文恪旧邸。陈宝箴任命熊希龄为学堂提调（总理），主持学堂一切行政事务；聘请梁启超、李维格分任中、西文总教习；另聘韩文举、叶觉迈、欧榘甲为中文分教习，许应垣为数学教习。当年十月中旬，梁启超自沪抵湘，即拟订《时务学堂学约十章》：立志、养心、治身、读书、穷理、学文、乐群、摄生、经世、传教，其中又以立志、经世、传教为纲。立志，要求学生摒除科第衣食之念，一心以救国图存为己任；经世，要求学生必深通六经制作之精义，又证以周秦诸子及西人公理公法之书以为经，以求治天下之理；必博观历朝掌故沿革得失，又证以泰西、希腊、罗马诸古史为之纬，以求古人治天下之法；必细察今日天下郡国利病，知其积弱之由，及其可图强之道，又证以西国近史宪法章程之书及各国报刊，以为之用，以求治今日之天下。一言以蔽之，即要求学生须掌握中西治国之道，贯串的是一种"中西并重"的思想。传教则要求学生"传孔子太平大同之教于万国"，运用的是康有为"大同三世说"，体现的是资产阶级政治思想。梁启超并建议加收"外课生"，吸收20岁以上的青年，使其粗明新学，进而"以保国、保种、保教为己任"，陈宝箴采纳了这一建议，加收外课及附课生。时务学堂共招考三次，除上述光绪二十三年八月二十八日第一次招考外，二十四年三月初一（3月22日），录取内课生30名、外课生18名、附课生7名；四月录取第三期学生，内课生46名、外课生52名，备送北洋学生10名。学制五年。梁启超亲为学生制订课程表，规定所学课程，其指导原则是"中西并重"，具体课程又分两种：一为博通学，包括经学、诸子学、公理学、中外史志及格算诸学之粗浅者；二为专门学，包括公法学、掌故学、格算学。入学后，头六个月专读博通学；六个月以后，读专门学，但仍兼习博通学。学生所读之书，有涉猎之书，有专精之书，所占比例为4∶6。要求学生先阅读《春秋公羊传》和《孟子》，反复钻研其微言大义，领会其包含的民权思想，再摄取中外政治法律，比较参证，以明了维新变法之要旨。梁启超在时务学堂讲学时，大肆宣扬康有为改制学说，把康有为为万木草堂制订的《长兴学记》加以重印，以供时务学堂参考。又自撰《春秋界说》和《读孟子界说》，前者阐释孔子素王改制之义；后者附会孟子言行皆合孔子"大同之义"，孟子之言，即孔子之言。此二书为梁启超主讲时务学堂时的主要教材。又撰《读西学书法》及《西学书目表》，详述其读经、读子、读史之法，警诫读者：当知六经皆孔子改定制度以治百世之书；当知东汉古文经皆刘歆伪造；当知三代以后，君权日益尊，民权日益衰，为中国致弱之根源。尊今抑古，扬新弃旧，倡言民权之说，宣扬变法之义，使学生们耳目一新，思想为之大振。梁启超、韩文举和其他教习还通过讲课和批答学生札记等方式，批判封建专制，宣扬资产阶级民权思想，比如在学生札记中有这样的批语："二十四朝其足当孔子至号者无人焉，间有数霸者生于其间，其余皆民贼也"；"屠城屠邑，皆后世民贼之所为，读《扬州十日记》，尤令人发指眦裂"；"臣也者，与君同办民事者也，如开一铺子，君则其铺之总管，臣则其铺之掌柜等也"。梁启超、谭嗣同等人还将带有反清倾向的两部著作——黄宗羲《明夷待访录》、王秀楚《扬州十日记》秘密刊印，加上按语，广为散发。这些言论振聋发聩，影响深远，也极大地触怒了湖南顽固派。长沙岳麓书院院长王先谦（1842—1917）、士绅叶德辉（1864—1927）、苏舆（1873—1914）等人上书陈宝箴，攻击梁启超、韩文举、叶觉迈诸人"自命西学通人，实皆康门谬种"，而谭嗣同、唐才常则"为之乘风扬波，肆其簧鼓"，长此以往，必将使学生"不复知忠孝节义为何事"，要陈宝箴"严加整顿"，"屏退主张异学之人"。叶德辉又撰《輶轩今语评》、《长兴学记驳义》等文，对康、梁民权平等学说肆意攻击，并斥今文经学为"野说"，辱骂康有为为"乱民"，梁启超为"诐士"，反动气焰十分嚣张。在封建顽固派的环伺下，时务学堂主事人顶不住压力，除梁启超因病早于光绪二十四年二月离湘外，提调熊希龄辞职，分教习韩文举、叶觉迈、欧榘甲也均辞职离湘。陈宝箴亦退让，六月中旬奏请毁弃康有为《孔子改制考》书版，又委派守

旧人物俞廉三接任时务学堂总理。八月戊戌政变发生以后，湖南新政全部废止，陈宝箴被革职，时务学堂遂被彻底解散，后改为求是书院。但时务学堂在宣传新学和培养人才方面发挥过重大作用：首先，创开风气，促进了湖南全省新式学堂的创办和旧式书院制度的改变。时务学堂是最早宣传资产阶级思想理论的新式学校，堪称“国中学校之嚆矢”，其影响广泛而深远。就当时来说，时务学堂“缘起”、“招考示”、办学章程以及试题、批复、告示等均刊载于《湘报》，对湖南各地影响很大。半年间，岳州、衡州、郴州、武冈、常德、浏阳、黔阳、新化等处，皆纷纷改革书院章程，仿时务学堂办法，创办新式学堂，搞得很有生气。其次，时务学堂师生参与维新活动，学堂教习有的是《湘报》的撰稿人，有的兼任南学会讲习，又多方赞划湖南新政，对湖南维新运动的开展起了推动作用。第三，培养了一批具有维新思想的青年士子，在戊戌维新运动及以后的资产阶级民权民主运动中成了栋梁之材，如林圭(1875—1900)、李炳寰、田邦濬、蔡钟浩、傅慈祥等5人参加自立军运动，并为之殉难。秦力山参加自立军起义，失败后从事反清革命活动，后死难。时务学堂年龄最小的学生蔡锷成了护国运动中的名将。据梁启超在民国元年归国演说辞中说：时务学堂第一班的40名学生中“十余年来强半死于国事，今存五、六人而已”。时务学堂虽仅存在了几个月，但它却是培养近代中国最早一批有志青年的摇篮。　　　　(刘振岚)

巨野教案

又称“曹州教案”。清光绪二十三年(1897)德国天主教神父能方济和韩·理加略在山东曹州巨野县被杀事件。

光绪十六年(1890)，德国夺得法国在山东传教的护教权后，开始在山东积极进行传教活动。巨野县磨盘张家庄教堂德国天主教神父薛田资(Georg Maria Stenz，1869—1928)，在当地发展教会势力，唆使教徒欺压平民，激起公愤。二十三年十月初七(1897年11月1日)下午，分别在阳谷和曹州郓城一带传教的德国天主教神父能方济(Franz Nies，1859—1897)和韩·理加略(Hen Le Ricandus)，来到张家庄，参加天主教纪念“诸圣”的例会“诸圣瞻礼”。薛田资因能方济和韩·理加略是来客，就把自己的寝室让给两人住，自己住于门房里。当天晚上，天下小雨，约11时，巨野县大刀会组织会员和民众惠二哑巴、雷协身、萧盛业、姜三绿、张允等二、三十人手持刀、红缨枪进入教堂院子里。他们见堂内已经熄灯，就砸开西边窗户，杀死能、韩两人。躲在门房里的薛田资则侥幸逃命。早在光绪二十一、二十二、二十三年曾几次向清政府要求租借东南沿海港湾的德国政府，即以此为借口，于二十三年十月二十日出兵强占胶州湾，并强迫清政府签订《胶澳租界条约》，允许德国租借胶州湾、在山东享有修筑胶济铁路和开采铁路沿线矿产等特权。在强占胶澳之后，德国天主教会以军事力量做后盾，迫使清政府在谈判方面作出如下决定：一、山东巡抚李秉衡(1830—1900)革职，永不叙用；二、在济宁、曹州及巨野张家庄3处各建天主教堂1所，并于巨野、菏泽、郓城、单县、成武、曹县、鱼台7处各建教士住房1所，中国偿付上述建筑费白银2.4万两。三、降谕保护德国传教士，并保证今后不发生类似事件。四、惠二哑巴、雷协身斩首，萧盛业、姜三绿、张允监禁5年。巨野教案发生后，天主教会由于有本国军事势力做后盾和清政府地方官吏的悉心庇护，对中国人民的压迫、敲诈更加残酷，为所欲为，飞扬跋扈。张家庄常有教民指控某某为大刀会员，某某参加过杀教士事件，唆使清廷捕杀。有的教民还公开抢劫大刀会家属的财产，强迫他们为教会做苦工。正是在这种情况下，反教会侵略斗争的怒火又燃烧起来。巨野教案和翌年爆发的“大足教案”、“冠县教案”，堪称19世纪末揭开义和团运动序幕的三大教案。　　　　(邱远猷)

《天演论》出版

《天演论》，书名。原名《进化论与伦理学》(《Evolution and Ethics and Other Essays》)，是英国生物学家赫胥黎(Thomas Henry Huxley，1825—1895)的一本论文集，严复选译其中的前两篇，定名《天演论》。严复(1854—1921)，初名传初、体乾，又改名宗光，字又陵，入仕后始改名复，字几道，晚号瘉壄老人。福建侯官人。同治五年(1866)入福州船政学堂学习海军，十年以优等成绩毕业，在军舰上实习5年。十三年日、美侵扰台湾期间，随福建船政大臣沈葆桢至台测量海口，筹备海防。光绪三年(1877)到英国留学，入格林尼茨海军大学。留学期间对资本主义国家的经济、文化和社会政治制度表示倾慕，并留心观察，潜心研究，广泛涉猎西方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说，辨析西学与中学之异同。光绪五年卒业归国，就福州船政学堂教习。次年，调天津，任北洋水师学堂总教习，后升会办、总办。自此，在这里任职达20年之久。中日甲午战争后，在战败的刺激下，

连续发表《论世变之亟》、《原强》、《辟韩》及《救亡决论》等重要政论文章，呼吁维新变法；同时决心"致力于译述以警世"。首译《天演论》，光绪二十三年十一月（12 月）在所创《国闻报》上发表，次年三月（4 月）正式出版。严复撰写了《〈天演论〉自序》，又在译文中以按语的形式，附加了他自己的许多见解，总共全书 95 页，所加按语达 33 页。所以严复不单纯是翻译《天演论》，而是以"达旨"的方法对赫胥黎的原作加以取舍、改造和评论。《天演论》既吸收了赫胥黎阐述的达尔文（Charles Robert Darwin，1809—1882）生物进化观点，也吸收了英国哲学家斯宾塞（Herbert Spencer，1820—1903）的社会达尔文主义观点，同时灌注了他自己的哲学思想和政治观点。概括其内容，主要有：一、确认进化为自然界和人类社会的普遍规律。赫胥黎的《进化论与伦理学》一书根据达尔文的进化观点，说明生物不是自古不变的，而是沿着进化的道路不断发展变化的。严复据此阐发，认为人类社会和生物界一样，也是不断发展变化的，原作《导言》中说："天道变化，不主故常"，严复的按语说："自达尔文出，知人为天演中一境，且演且进，来者方将。""来者方将"，即后胜于今，即进化论。原作第一节论述自然界的变化说："不仅植物界，而且动物界；不仅生物，而且地球的整个结构；不仅我们的行星，而且整个太阳系，……都在努力完成它们的进化的预定过程。"严复的译文则把自然进化引入人类社会，认为"隐之则神思智识之所以圣狂，显之则政俗文章之所以沿革"，"皆可一言蔽之，曰'天演'是已。""天演"，即进化。可见严复是把进化当作自然界和人类社会的共同规律。达尔文进化论学说曾摧毁了唯心主义的上帝创世说和生物永恒不变论，给宗教界以严重打击，成为 19 世纪三大发现之一。严复介绍达尔文进化论，并将其引入人类社会，是为了宣传发展变化的观点，打击封建顽固派的"天不变，道亦不变"的形而上学观点，为资产阶级维新变法运动提供理论基础。唯赫胥黎主张的是一种"渐变"思想，其《导言》说："特自皇古迄今，为变盖渐"，严复更接受斯宾塞庸俗进化论思想影响，反对"骤变"，主张温和改良。二、大力宣传"物竞天择，适者生存"的生物进化规律适用于人类社会。赫胥黎原作阐发了达尔文《物种起源》一书中关于生物进化的理论。生物之所以进化，是由于存在着"物竞"和"天择"的自然现象。所谓"物竞"，即生存竞争，亦即生物对赖以生存的自然条件的竞争；"天择"，即自然界对生物的选择，意即自然淘汰。竞争的结果，是"适者生存"，"优胜劣汰"，这就呈现了生物界的不断进化，所谓"一争一择，而变化之事出矣"。按照赫胥黎原书的看法，认为人类社会不同于自然界，因为人类具有高于动物的先天"本性"，这种先天"本性"就是存在于人心之中的主宰人们行动的一种"天良"，人的这种天良驱使人们"保群"，使人们能够相亲相爱，互敬互助。所以人类不同于动物，社会也不同于自然界；人类社会的发展不能用生物界的生存竞争来说明，而只能用伦理学来说明；伦理学不能等同于生物进化论。这是赫氏原著中后半部的基本观点。所以原书名题为《进化论与伦理学》，"进化论"讲的是自然界，"伦理学"讲的是人类社会。严复反对赫胥黎后半部的观点，他受斯宾塞的影响，认为自然界的进化规律完全适用于人类社会。他通过按语的方式批评赫胥黎的上述观点，认为人类的天良、同情心、团结互助等特点并非人类的天性，而是"天演"的结果和产物。他解释说，按照物种起源的学说，人与禽兽本来是没有区别的，都是由低级生物逐步发展而至高级动物，最后发展到人类，形成社会。这正是"天择"的结果，而不是一开始就有与动物不同的同情心、"天良"等心理。可见自然界"物竞天择"的规律同样适用于人类社会。正因为严复反对赫胥黎后半部书的观点，所以书名只翻译了一半，认为《天演论》既可包括生物界，也可包括人类社会。根据这个观点，严复认为人类社会中种族与种族之间、国家与国家之间，也同生物界一样，是个生存大竞争的局面。在竞争中强者、智者获得生存；弱者、愚者要被淘汰，因此弱肉强食是普遍规律。欧洲国家之所以能够到处侵略，即因其不断自强，成了竞争中的强者、智者；美洲、澳洲土人所以日衰，即因其浑浑噩噩，不知自强。中国再不能妄自尊大，高谈什么"夷夏之辨"了。要老老实实承认，侵略中国的，正是竞争中的优者、强者、智者；而中国正是劣者、弱者、愚者，以致成了强国欺侮的对象。他告诉人们，"物各争存，宜者自立"，中国如果不变"弱种"为"强种"，就只有亡国灭种之一途！"存亡之间，间不容发"，何去何从，应该有所抉择！赫胥黎原作的后半部用伦理观念解释人类社会的发展，否认阶级斗争，是一种唯心史观（毛泽东曾说，赫胥黎此书前半部是唯物的，后半部是唯心的）；而斯宾塞则是用生物学的生存竞争学说解释人类社会的发展，同样也否认阶级斗争，在理论上也是错误的，是一种社会达尔文主义观点，曾遭到恩格斯的批判。但是社会达尔文主义理论在实践上有二重性：斯宾塞作为帝国主义思想家提出这种理论，其目的是为帝国主义的侵略扩

张政策提供理论依据。而严复是在中国面临瓜分危机的特殊历史条件下，站在挽救民族危亡的立场上提出这种理论的，与斯宾塞有着完全不同的出发点和完全不同的意义。严复的出发点是呼吁人们：中国不应自甘做劣等民族，而应赶快起来变法图强，否则就无法逃脱“优胜劣败”、“弱者先绝”的亡国厄运！这就是严复翻译《天演论》，宣传“物竞天择”、“适者生存”的进化思想的动机和核心！三、宣扬“任人为治”、“与天争胜”的思想。这一点，严复与斯宾塞不同。斯宾塞强调生物现象中的自然淘汰，主张“任天为治”，是为帝国主义殖民侵略政策服务的；严复则强调生物现象中的“人工淘汰”，认为“人工淘汰”可以抵制、克服“自然淘汰”，人类社会的发展可以依靠人的主观努力，“任人为治”、“以人持天”，生死存亡，其权在我，目的在于激励弱者与强者竞争，使人们相信事在人为，只要中华民族振作起来，奋发图强，中国不但可以摆脱亡国灭种的厄运，还可以逐渐走向独立富强，祖国的前途是大有希望的。

在19世纪末叶，正当中国民族危机严重、亡国灭种大祸迫在眉睫之际，严复把“物竞天择，适者生存”的进化论思想介绍到中国来，并以“任人为治”、“与天争胜”、“自强保种”的思想激励国人，对中国社会起了振聋发聩的作用。它敲起了祖国危亡的警钟，激发了人们的爱国热情，唤起人们民族民主意识的觉醒，有力地推动了维新运动。所以《天演论》出版后，立即轰动一时，风行全国，在思想界引起强烈反响。康有为等宣传维新变法，也讲“变”，讲“进化”，但缺乏科学的理论基础，系从中国传统儒学中的今文经学“三统”、“三世”说附会而来；而严复则根据伟大生物学家达尔文的生物进化的科学理论，使其维新变法宣传建立在坚实的自然科学基础之上，从而大大增强了变法理论的科学性和吸引力，使人们感到耳目一新，连康有为都承认严复“为中国西学第一者也”。所以严复译《天演论》不仅成为资产阶级维新派从事维新变法运动的理论基础和最锐利的思想武器，而且成为以后资产阶级革命派从爱国走向革命的理论基石，直到马克思主义传入之前，进化论一直是中国人民从事反帝、反封建民族民主革命运动的有力思想武器。 （刘振岚）

南学会成立

南学会，清光绪二十四年(1898)春，资产阶级维新派在湖南创建的政治团体。

二十三年十月(11月)，德国强占胶州湾，其他帝国主义纷起效尤，强占租借地，划分势力范围，中国面临被瓜分的危机，国家命运危在旦夕。湖南维新志士谭嗣同等做了最坏的打算，一旦中国被列强瓜分而亡国，则须“做亡后之图，思保湖南之独立”，使“南支那”“可以不亡”。他们的具体办法是成立一个学会，宣传救亡，发展地方自治，并联络广东，以湘、粤为中心，实行变法，而后再图救中国。他们的想法得到康有为和梁启超的支持。康认为若中国被列强瓜分，则湘省“可图自主”，即使中国被“割尽”，也可留下湖南一片净土，“以为黄种之苗”。梁也认为：为今日计，必有腹地一、二省可以自立，然后中国有一线之生路。赞成湘、粤联合，以为“湖南之士可用，广东之商可用”。故所立之学会，取名南学会，而不名湘学会。南学会为挽救瓜分危机而设，明显地带有救亡性质。学会由谭嗣同、熊希龄、唐才常等倡议创建，得到湖南巡抚陈宝箴和署湖南按察使黄遵宪的大力支持。光绪二十三年冬开始筹备，二十四年二月初一(2月21日)正式成立(以开会讲学为成立标志)。会址设在长沙孝廉堂，延聘今文经学家皮锡瑞(1850—1908)为学长，黄膺、戴德成为佐办，主会者则为陈宝箴。由上海来湘的《时务报》主笔梁启超也参与筹划，并为南学会作叙。叙文强调在民族危机空前严重的形势下，建立学会以挽救危亡的重要性，并引欧洲各国历史上设立各种“会”而洗刷国耻的许多实例加以证明，突出了南学会御侮救亡的性质。南学会先后发布的三个章程——《南学会大概章程十二条》、《南学会总会章程二十八条》、《南学会入会章程十二条》，确定了学会的宗旨是：“专以开浚知识，恢张能力，拓充公益为主义”；“本会以同心合力，振兴中国为务”。又根据章程的规定，由巡抚陈宝箴选派本地绅士10人为会长，再由这10人各举所知，汲引会友。会友分为三种：一曰“议事会友”，由学会创办者谭嗣同、熊希龄、唐才常等充任，凡会中事务章程均由其议定，是为学会的决策人。二曰“讲论会友”，即担任南学会讲学的人员，定期开讲，随时答疑问难。推皮锡瑞主讲学术，黄遵宪主讲政教，谭嗣同主讲天文，邹代钧主讲舆地。三曰“通讯会友”，这是外地士绅向南学会函讯新政、新学，南学会负责“随时酬答”联系的会友。南学会是官绅合办的学会，但力求扩大社会联系，要求“官绅士商，俱作会友”，“以通上下之气，去壅阂之习”。南学会还提倡改革，讲求内治，于地方重大兴革事项时加讨论，提出方案，供政府参考，并提倡会友对于地方风俗利病、兵马、钱粮、厘金、矿务、法律、刑狱等事，如确有见地，均可提出改革方案，经

过学会总会讨论，禀请抚院核夺，批准施行。所以南学会又是联结全省官绅士商，广开知识，提倡新学，讲求地方自治的政治学术团体。南学会的主要活动方式是讲学，自二月初一正式开讲后，有讲学记录可查的，共13次。讲学内容包括政教、学术、中外大势、保种保教、交涉、自然科学等各个方面，每次讲学者一人或数人，先后作讲演的有皮锡瑞、陈宝箴、黄遵宪、徐仁铸（1863—1900）、谭嗣同、熊希龄、戴德成、李维格、杨自超、邹代钧、欧阳中鹄、乔树枏、曾广钧等，其中学长皮锡瑞讲的次数最多，每逢讲期必讲。讲演人大力宣传在民族危机的严重关头，设立学会以开风气、以广民智的极端必要性，借以宣传维新变法；大肆宣扬“孔子改制”，试图借用孔教名义，“托古改制”，“翻然一变”，“易贫弱为富强”；提倡地方自治，呼吁湖南士绅“自治其身，自治其乡”，兴利除弊，规划新政，强调官民上下，同心同德，群策群力，共同治理湖南；强调采用新法，发展资本主义经济，以保利权，抵抗侵略；号召清除中外畛域之见，防止仇洋排外衅端。讲演颇具感染力，听者踊跃，每会集众千数百人。南学会除讲演外，还设答问。讲学后遇有疑义或提出建议的，进行答问；答问中带有普遍意义的，再作讲演。南学会还设立藏书处，搜集“古今中外有用之书”，供会中人阅读（书籍来源，多系捐助）。故南学会又是一个振兴新学、造就人才的教育团体。

南学会在长沙成立后，湖南各府县州纷纷响应，竞相成立各色学会。较著名的有长沙的“湖南不缠足总会”、“延年会”、“积益学会”、“学战会”、“公法学会”、“法律学会”、浏阳的“群萌学会”、衡州的“任学会”、郴州的“舆算学会”、龙南的“致用学会”、常德的“明达学会”等等。这些学会活动内容虽有不同，但均以南学会为总会，自为分会；且都抱定“联通群力，振兴新学”的共同宗旨。所以南学会不但促进了湖南新政的开展，而且促使湖南省“民智骤开，士气大昌”，对社会风气的转变及知识分子思想的解放起了推动作用。梁启超、谭嗣同等维新人士曾设想把南学会办成“议院规模”，结果未能如愿。这是因为南学会是官绅结合的团体，其创办人和支持者的多数人的政治态度尚不能接受资产阶级议会思想，巡抚陈宝箴赞助南学会，为其拨款，并亲临讲演，在湖南力行新政，功不可没；但他在湖南封建顽固派的环伺下，对康有为的“孔子改制”思想及民权平等学说亦持反对态度，其他如学政徐仁铸等亦复如是。在讲演人中，讲得最多的学长皮锡瑞虽主变法，却维护封建纲常。李维格更公开宣称“开议院，中国断不可学”，即连思想较激进的黄遵宪也主张采用“渐进法”，不主张立即实行议院制。故此，南学会并未能如梁启超所说“实兼地方议会之规模”，“隐寓众议院之规模”。但是毕竟由于南学会宣传新学，推行新政，仍遭到湖南顽固派的切齿痛恨。岳麓书院院长王先谦及劣绅叶德辉大肆攻击南学会，并以“首创邪说，背叛圣教，败灭伦常，惑世乱民”的罪名于四月十五日将邵阳分会会长樊锥（1872—1906）驱逐出境。不久，皮锡瑞由于受到顽固派攻击，亦被迫离湘赴赣。五月，南学会开讲仅三个月即告辍讲，南学会历史至此结束。（另说南学会是由于“天时渐热，人多气邪，难以宣讲”，故而停会，实则五月天气尚不算炎热，它的辍讲停会仍是由于受到封建势力破坏所致。）　　（*刘振岚*）

帝国主义掀起瓜分中国的高潮

中日甲午战争后帝国主义列强趁中国战败之机纷纷在华强索租借地、划分势力范围、践踏中国领土与主权的侵略活动。

甲午战争以前，在中国争霸的主要帝国主义国家是英国和俄国。英国侵华势力主要集中在长江流域，19世纪末又向云南、四川及华北地区渗透。俄国在19世纪60至80年代侵吞了中国东北、西北大片领土，19世纪末又企图霸占整个东北地区。甲午战争后，英、俄、德、法等欧洲列强深受日本对华一战而胜，夺取到大量侵略利益的刺激，侵华野心急剧膨胀，纷纷向清政府强索租借地和划分势力范围，掀起中国近代史上第一次瓜分中国的狂潮，致使帝国主义在华侵略势力的格局发生重大变化，即由原来的英、俄两国在华争霸，变为帝国主义列强共同宰割中国的局面。

德国很早就想在远东获得一个军港作为它侵略扩张的基地。甲午战争后，看到俄国以干涉还辽“有功”为名，千方百计谋求中国东北，便也以参与干涉还辽为词，在光绪二十二年底（1897年初），正式向总理衙门提出索借胶州湾的无理要求。清廷害怕各国群起援例，予以拒绝。次年八月（1897年9月），德皇威廉二世（Wilhelm Ⅱ，1859—1941）访俄，会见尼古拉二世，在占领胶州湾一事上得到沙皇的支持，于是待机而动，企图强行霸占。同年十月，山东发生巨野教案，两名德国传教士被杀。德国遂以此为借口，派兵强占胶州，向总理衙门提出罢免中国官吏；赔偿教会损失，添设教堂；设立德华公司；修筑山东铁路；开采附近矿产等无理要求。对此，清政府一再妥协退让，幻想俄国出面阻止。而德国为避免国际干

涉，早就以承认满洲、直隶及新疆为俄国的利益范围；支持日本将来对中国的侵略计划为条件，换取了俄、日两国对其侵华行动的谅解与支持。清政府孤立无援，只得于二十四年二月十四日（3月6日）委派李鸿章与德国驻华公使海靖（Heyking，Edmund，Baron　Von，1850—1915）签订《胶澳租借条约》，内容包括：一、中国允许德国租借胶州湾，租期99年。胶州湾海面100里内，德国军队可以自由通过。中国政府在此区域内发布命令须与德国协商。二、允许德国在山东境内修筑两条铁路。一条从胶州湾经潍县、青州、博山、淄川、邹平等地直达济南及山东边界。另一条由胶澳经沂州转向莱芜而至济南。铁路附近30里内允许德国开矿及办理工程各事。三、德国有承办山东各项工程的优先权。这样，德国终于获得了梦寐以求的海军基地，并将山东全省划为自己的势力范围。

俄国借口干涉还辽有功，在二十二年四月诱迫清政府签订《中俄密约》，获得在黑龙江、吉林两省修筑中东铁路的权利，将其侵略势力伸入中国东北北部后，并不满足，企图进一步独霸整个东北地区。二十三年十一月二十六日（12月19日），俄国趁德国强占胶州湾之机，派军舰强行占领旅顺港和大连湾，并以“借港度冬”为名，企图长期霸占。次年初，清政府派许景澄为钦差大臣出使俄国，要求沙俄从旅大退兵，遭到沙俄拒绝。继而俄国又提出租借旅顺港和大连湾的无理要求，对清廷软硬兼施，威逼利诱。清政府只得委曲求全，派总理衙门大臣李鸿章于二十四年三月初六与俄国驻华代办巴布罗福（Александр Иванович　Павлов）在北京签订了《旅大租地条约》。闰三月十七日双方又签订《续订旅大租地条约》。这两个条约的主要内容为：清政府将旅顺港、大连湾及附近海面租与俄国，租期25年，俄国享有租借地内的行政权；旅顺作为军港，由中、俄共用，俄国得在租借地内建造各种军事设施；大连开放为通商口岸；允许俄国从中东铁路某点至旅大修筑一条铁路支线（即南满铁路），该路所经地区的权益不得让与别国。通过这两个条约，沙俄将其侵略势力从东北北部扩至整个东北地区。东三省遂沦为沙俄的势力范围。

法国对中国西南地区垂涎已久，干涉还辽后也自恃“有功”，向清廷要求扩大侵略特权。当年五月二十八日（6月20日），奕劻、徐用仪代表清政府与法国驻华公使施阿兰（Gérard　A，1852—1922）在北京签订《续议商务专条附章》和《续议界务专条附章》。在商务专条中，清政府同意开放广西龙州、云南蒙自、思茅、河口等四处为通商口岸，各口岸间进行土产贸易予以减税；清廷如在云南、两广开矿，须先与法国商议；越南境内的铁路可由中法“酌商”接至中国境内等。在界务专条中，清廷同意将云南边境的猛乌、乌德、化邦、哈当贺、联盟、猛地等处划归越南，作了领土割让。这样，法国在中国西南边省获得了极大特权。云南、两广的门户也进一步向法国敞开。二十四年俄国强租旅大后，法国侵略野心再次受到鼓舞而膨胀。同年二月二十一日，法国署理公使吕班（Dubail，G，1845—1932?）照会清政府，提出在琼州设趸船所（后改为租借广州湾）；从越南修筑至云南的铁路等侵略要求。英国得知法国强索广州湾的消息后十分震惊，唯恐影响它在华南的侵略利益，急忙出面阻挠。法国因有俄国暗中支持，毫不退让。清政府在权衡利弊后，于三月二十日与法国互换照会，满足了它各项要求，并于次年十月十四日（11月16日）正式签订《广州湾租借条约》，主要内容：一、广州湾租与法国，租期99年，租期内该地由法国管辖。二、法国有权在租借地内驻军、修筑军事设施和修建广州湾赤坎至安铺的铁路。至此，法国在西南地区的侵略权益得到进一步巩固，同时由于广州湾的租借得手，在华南地区也据有了地盘，开始与英国相抗争。

俄、法、德三国侵华势力的膨胀直接威胁到英国的在华优势，引起英国政府的极大震惊。为了与俄、法集团相抗衡，英国相应地调整了对华策略。它南北出击，向清政府索取华北和华南的地盘，以遏制俄、法集团势力继续扩张。二十四年春俄租旅大后，英国即向清廷寻求“补偿”，蛮横地索租威海卫。威海卫位于山东半岛，属于德国的势力范围。根据《马关条约》的有关规定，日本军队此时还驻扎在威海卫内。因此，英国在与德、日两国秘密交涉中，保证无意损害德国在山东的权益，并支持日本在中国谋求势力范围，从而换取了德、日两国对它索取威海卫的谅解。同年闰三月，清政府全部偿清对日战争赔款，日军撤出威海卫。五月十三日，奕劻代表清政府被迫与英国驻华公使窦纳乐在北京缔结《订租威海卫专条》，主要内容是：将威海卫及附近海面（包括刘公岛、威海湾内岛屿及海湾沿岸10英里地方）租与英国，租期25年；租地内允许英国修筑炮台和驻军。英国据有了威海卫，与俄租旅顺港遥遥相对，实即与俄国共同据有了渤海湾的控制权，华北也因此成为英、俄两国共同控制的区域。在华南，英国提出租借九龙半岛和

展拓香港界址的要求，以阻止法国势力向长江流域渗透，维持华南地区与法国势力的“均衡”。清廷自然无力拒绝。二十四年四月二十一日，李鸿章、许应骙和窦纳乐分别代表中、英双方在北京签订《展拓香港界址专条》，规定：中国将九龙半岛，即从深圳湾至大鹏湾的全部及其附近海面、岛屿（不包括九龙城）租给英国，租期99年；期内该地归英国管辖。这样，英国通过《南京条约》、《北京条约》和《展拓香港界址专条》等不平等约款，连割带租，共占有我国香港地区的土地1066平方公里。

此时，日本也不甘落后，妄图把福建划为自己的势力范围。二十四年闰三月初二，日本政府照会清廷，要求不将福建省内地方让与或租与别国。在俄租旅大、德占胶州时，由于日本对两国侵略行径并未表示异议，因而大大缓解了因辽东半岛问题而造成的日、俄矛盾。英国在租借威海卫的过程中，也暗地表示支持日本的侵华计划。所以当日本提出上述要求后，各列强均以默许表示支持。清政府对甲午战败记忆犹新，此时当然无力拒绝日本的索求，初四即对日本政府做出如下保证：“查福建省内及沿海一带均属中国要地，无论何国，中国断不让与或租给。”这等于承认了福建为日本的势力范围。

中日甲午战争后，帝国主义列强视中国软弱可欺，在华强租港湾、抢占地盘。至二十四年夏，中国版图几无净土，大部分地区成了列强的势力范围和租借地。帝国主义在华势力也形成新的“均势”格局。中国领土和主权遭到进一步损害。中国更加堕入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的黑暗深渊。　　（董增刚）

保国会成立

保国会，清光绪二十四年（1898）康有为等发起在北京成立的资产阶级维新派政治团体。

二十三年末“胶州事变”发生后，民族危机愈形严重，举国上下，舆论沸腾。康有为再次从南方赶到北京，一面上书要求变法，一面结合各省旅京人士倡设学会，扩大爱国宣传。十二月十三日（1898年1月5日），康有为亲自发起组织旅京广东同乡在北京南海会馆成立粤学会；次年正月初十（1月31日），由林旭、张铁君等发起，结合福建旅京人士在北京福建会馆成立闽学会；十八日，宋伯鲁、李岳瑞等发起，结合山西、陕西旅京人士成立关学会；二月，杨锐等发起，结合四川旅京人士在北京四川会馆成立蜀学会。这些学会的发起，意在团结维新志士，在全国各地推行变法维新。这时，又值会试期近，各省举人云集北京，康有为以为，自《马关条约》签订，割让台湾已经3年，及今胶州、旅顺、大连、威海卫又相继割弃，急须“成一大会，以伸国愤”，使“爱国之忱，当为天下所共与”。恰好江南道监察御史李盛铎也有会合在京应试举人开会的主张，于是，由康、李为主要发起人，组织保国会。三月二十七日，保国会在北京南横街粤东会馆召开第一次会议，出席集会的有在京官吏及各省举人一二百人。康有为登台演说，痛陈中国所面临的民族灾难。他说，中国4万万人有如笼中之鸟、釜底之鱼、牢中之囚，为奴隶、为牛马、为犬羊，听人驱使，任人宰割，“此四千年中二十朝未有之奇变”。而近两个月来，中国失地失权之事又20起，长此以往，中国面临的也将是像波兰、印度那样的亡国结局。故今日“不责在上而责在下，责我士大夫义愤不振之人”，因今日人人有亡天下之责，人人有救天下之权，如果4万万人都积极奋进，热心救国，则必大有可为，中国何患不能救！康有为讲演时，声气激昂，座中人有为之泪下者。康又作《保国会序》一篇，呼吁“我四万万同气同种之胄”，只有“合群以救之”，“激耻以振之”，“厉愤气以张之”，“以保一大国”。第一次集会议定了《保国会章程》30条，首列开会目的：该会以国地日割，国权日削，国民日困，思维持振救之法，故开本会，“以冀保全”，即“名为保国会”；又宣布该会宗旨为“保国、保种、保教”，即“保国家之政权土地”，“保人民种类之自立”，“保圣教之不失”。章程还规定，在北京和上海设立总会，各省、府、县设立分会；会中由公选之总理及值理主持会务。又规定了总会和分会的组织、权限、工作人员职责、入会手续、会员权利和义务等项。闰三月初二，又在崧筠草堂举行第二次集会。梁启超因病未能出席，“以笔代舌”，作了书面演说。演说词历述国家危亡在即，局势紧迫，强调必须“合群策以讨论之”，“合群智以讲求之”，“合群力以分任之”，意即立会以保国，此正保国会开会之宗旨。后又在贵州会馆举行第三次集会，是为最后一次集会。保国会成立后，保滇会、保浙会、保川会先后在北京成立，均为御侮救亡的爱国团体。保国会等团体的爱国维新活动，引起封建顽固势力的仇视和惊慌。顽固派吏部主事洪嘉与怂恿浙江人孙灏出面攻击康有为，并代孙草拟《驳保国会章程》，对《章程》逐条驳诘，对康有为进行恶毒的人身攻击，竟诬称其想做“民主教皇”，言语粗鄙，近于谩骂，所谓“地方大光棍”、“厚聚党徒、妄冀非分”、“形同叛逆”、“辩言乱政”、“邪说诬民”、“鬼域伎俩”，甚至诬康有为“诳骗人财”，恶言秽语，不一而足。最后又颠倒黑白，认为

外来侵略并非主要危险，“内患交乘”才是主要危险，而康有为等辈正是最大的“内患”，可谓荒谬已极。闰三月十二日，御史潘庆澜又疏劾保国会，说康有为“聚众不道”。二十七日，后党御史黄桂鋆参劾保滇会、保浙会、保川会“包藏祸心，乘机煽惑”，认为如果各省均起自保，那岂不将“从此分裂”，要求严禁。后党亲信大臣荣禄甚至公开扬言，康有为立保国会是“僭越妄为，非杀不可”，警告入会者要小心脑袋。从此以后，对保国会的攻击、诽谤甚嚣尘上，气氛相当紧张。与康有为一起发起成立保国会的李盛铎见势不妙，竟反戈相向，参劾保国会，以求自免。此时光绪帝已看过康有为的两次上书(上清帝第三书和第六书)和他进呈的《日本变政考》、《日本会党考》，大体明了集会结社的意义，故对守旧派之参劾保国会事置之不问。守旧派军机大臣刚毅(1837—1900)要求查究保国会会员，光绪帝制止谓：“会能保国，岂不大善，何可查究耶?”故保国会虽遭劾奏，却终未封禁。保国会的规模超过强学会，是资产阶级维新派的一个全国性政治团体，其御侮救亡的爱国色彩比强学会更为鲜明，并且厘订章程、编订组织机构，规定了入会手续及会员权利、义务等项，略具政党规模。它在“合”爱国之“群”，促进光绪皇帝接受变法要求，终于诏定国是，开始变法新政等方面的作用是不容忽视的，以致在百日维新开始以后，顽固派仍以保国会之罪名攻击康有为，谓其“名为保国，势必乱国”。为变法而牺牲的六君子有4人——林旭、刘光第、杨深秀、杨锐均是保国会员。但它也表现了资产阶级改良派的弱点，他们所“合”之“群”仍是地主、官僚出身的知识分子，政治上的软弱性、动摇性十分明显，顽固派一加反击，立即自行瓦解，有反戈相向者；有先列名保国会，后对康、梁不满，“致书诟詈”者；平时与康、梁交往密切的也不敢再来，以致“门可罗雀”。所以保国会虽未遭封禁而形存实散，只开了三次会即自行瓦解了。 (刘振岚)

《劝学篇》刊行

《劝学篇》，书名，清张之洞撰，洋务派思想代表作。光绪二十四年三月(1898年4月)撰成，四月刊行。

洋务派官僚头目张之洞在维新运动初期，为利用维新派的宣传才能以扩张自己的声势，曾向北京、上海强学会捐款；上海《时务报》刊行后，又札饬湖北全省官销，颇似“维新大员”面貌。而当二十四年春维新运动高涨，以“保国、保种、保教”为宗旨的保国会在北京成立，维新派宣扬的民权思想大为勃兴之时，他惊呼“邪说暴行，横行天下”，“祸中国之祸，不在四海之外，而在九州之内”，遂摆出一副“权衡新旧”的姿态，撰写《劝学篇》，以“辟邪说”，对维新思想展开正面进攻。

《劝学篇》共24篇，4万余字。分“内篇”、“外篇”两部分。其中“内篇”九：同心、教忠、明纲、知类、宗经、正权、循序、守约、去毒；“外篇”十五：益智、游学、设学、学制、广译、阅报、变法、变科举、农工商学、兵学、矿学、铁路、会通、非弭兵、非政教。其序言说：“内篇务本，以正人心；外篇务通，以开风气。”“本”指封建伦理；“通”指工商业、学校、报馆等“西艺”，可为变通举办。指责“旧者不知通，新者不知本。不知通，则无应敌制变之术；不知本，则有非薄名教之心”。似乎既批评新者非薄名教，不知本；也批评旧者因噎废食，不知通，实质是批评新者，要以封建伦理、纲常名教来正人心，以洋务派“旧学为体，西学为用”的口号来对抗维新派的变法纲领，攻击维新理论，“绝康、梁并谢天下”，以维护摇摇欲坠的封建专制制度。《劝学篇》的中心思想是：封建纲常不能动摇，专制制度不能改变，中国的“圣教”是根本，是不能变的；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工艺、器械，则只能“补吾缺”——此即《设学》篇提出的“旧学为体，新学为用”口号的含义。《劝学篇》首篇《同心》，高唱“保国”说。其所谓“保国”，无一字谈及救亡、反帝，而专“辟”康、梁保国、保种、保教学说。谓：保国、保教、保种，“合为一心，是谓同心”，保种必先保教，保教必先保国。维新派所尊的“孔子之教”是加进了资产阶级政治内容的维新变法学说；而张之洞之所谓“教”，是“无悖于”封建经义，“无损于”封建社会圣人形象的“圣教”。其所谓“保国”，即保封建专制的大清帝国，以激发忠爱、尊重朝廷为根本大计，决不允许结朋聚党，犯上作乱。就这样，张之洞将维新派挽救民族危亡、反对帝国主义侵略的“保种”要求，置于保卫封建伦常和封建礼教(即“保圣教”)的前提之下；又将保“圣教”置于其捍卫封建专制王朝(“保国”)的前提之下。第二篇《教忠》大肆宣扬清王朝“德泽深厚”，列数了薄赋、宽民、救灾、惠工等15条“仁政”，目的是使“薄海臣民，咸怀忠良”，做大清朝的忠顺良民，此即“保国”。《明纲》篇公然鼓吹“三纲为中国神圣相传之至教”，“圣人所以为圣人，中国所以为中国，实在于此”。直接反对维新派宣传的民权思想：“知君臣之纲，则民权之说不可行也”。《正权》篇更集中攻击民权论，谓“民权之说，无一益而有百害”，“民权之说一倡，愚民必喜，乱民必

作，纪纲不行，大乱四起”，不但反对政治上的民权，即对经济上的民权——民间设厂的权利，《劝学篇》也含糊其词。本来，中日甲午战争以后，由于允许外资设厂，清政府对民族资本设厂不得不给予一定程度的让步，而张之洞却对民间设厂问题避而不谈。尽管他也主张“变法”，在《农工商学》、《矿学》、《铁路》等篇中提出了办工厂、开矿山、修铁路的主张，但《正权》篇却说若倡民权，“将以立公司、开工厂欤？有资者自可集股营运，有技者自可合伙造机，本非官法所禁，何必有权？”而且，“机器造货厂，无官权之弹压，则一家获利，百家仿行，假冒牌名，工匠哄斗，谁为禁之？”这分明是认为工商业的发展，只有在封建官权的保护之下才能实现，仍旧是将开矿、设厂限制在官办和官督商办的范围之内，可见《正权》篇是洋务派政治、经济立场的集中反映，是全书画龙点睛之篇，真正命意所在。外篇均谈其“变法”主张，即所谓“务通”之事。但他所谈变法，无非是像甲午战前文祥、曾国藩、左宗棠、沈葆桢、丁日昌等洋务派官僚所从事的“洋务”。他在《变法》篇将变法主张概括为：“不可变者伦纪也，非法制也；圣道也，非器械也；心术也，非工艺也。”至于“西学”，也只能选择其中“无损于圣教者”来“补中学之缺”，“起中学之疾”。总之，《劝学篇》根植于封建主义，反映了封建统治阶级中顽固派和洋务派的共同愿望；同时又具有调和中西、折衷新旧的色彩，比顽固派露骨的守旧言论带有更大的迷惑作用。故此，这部书不仅受到清朝统治者的赏识，而且得到封建势力各个派别的肯定，又为帝国主义者所欣赏。当年六月张之洞门生、翰林院侍讲黄绍箕将此书进呈给光绪帝，光绪帝披览后，认为“持论平正通达，于学术人心大有裨益”。并命各省“广为刊布，实力劝导，以重名教，而杜卮言”。封建顽固派代表人物苏舆广泛搜集守旧派文人攻击维新变法的论著编成《翼教丛编》，即曾将《劝学篇》中的《教忠》、《明纲》、《知类》、《正权》、《非弭兵》等篇收入。顽固派叶昌炽赞《劝学篇》为“拯乱之良药”。光绪二十六年美国人乌特勃来基(Samuel I Woodbridge)将《劝学篇》翻译出版，译名题称《中国唯一之希望》，并在序文中赞扬张之洞为“今日中国一个最伟大的人”。美国传教士丁韪良、林乐知(Young John Allen，1836—1907)等均著文赞扬过《劝学篇》。而维新派和革命派则对此书采取批判态度，梁启超谓其“不特无益于时，而且大累于世”，“不十年将化为灰烬，为尘埃，其灰其尘，偶因风扬起，闻者犹将掩鼻而过之”。何启、胡里垣且撰文揭露《劝学篇》之危害乃“保一官而亡一国”，“倾天下以顾一家”。革命派人士沈翔云更斥张之洞为“将欲中国永不自立乎？将欲中国永无文明之日”。

（刘振岚）

戊戌变法

又称“戊戌维新”。清光绪二十四年(戊戌年，1898)康有为为代表的资产阶级维新派发动的资产阶级政治改良运动。

中日甲午战争后，民族危机空前严重，民族资本主义获得初步发展，以康有为等为首的维新派，代表着民族资产阶级上层和开明士绅的政治要求走上历史舞台，主张对中国传统的政治、经济和思想文化进行资产阶级性质的改革，把中国引向资本主义发展道路，以挽救民族危机，使国家臻于富强。康有为(1858—1927)，原名祖诒，字广厦，号长素。广东南海人。地主官僚家庭出身。18岁时受业于江南名儒朱次琦，但不囿于师说，能独立思考，喜好陆(象山)、王(阳明)，而鄙弃程(颐)、朱(熹)。21岁游历香港，接触到西方资本主义文明，以为“西人治国有法度，不得以古旧之夷狄视之”，购买西书，大倡西学，走上了从西方探求救国真理的道路。光绪十年中法战争爆发，他目睹外侮凭陵，清廷腐败，大受刺激，激发了变法维新思想。十四年乘赴京参加顺天乡试之机，第一次上书清帝，提出“变成法，通下情，慎左右”三策，要求光绪帝纡尊降贵，引咎罪己，求言图治。当时顽固派把持朝政，予以阻格，难以上达，且以狂生见斥。康意识到变法尚非其时，遂南返。十七年春起，在广州开办万木草堂，培养变法维新人才。得弟子梁启超等人。二十一年春，康偕梁赴京会试，适值清政府在甲午战争中败于日本，签订空前丧权辱国的《马关条约》。消息传至北京，应试举人群情愤激，奔走相告。康有为、梁启超联络18省举人1300余人联名上书清帝，反对签订《马关条约》，提出“拒和·迁都·练兵·变法”的主张。上书虽遭清廷拒绝，但它的内容辗转传抄，在社会上激起广泛影响。这次上书标志着资产阶级维新派正式登上历史舞台，酝酿多年的资产阶级维新思潮开始变为实际的政治运动。此后，康有为以“变法图强”为号召，先后在北京、上海组织强学会，发行《万国公报》(后改为《中外纪闻》)和《强学报》，宣传变法维新、救亡图存，提倡西学，考察各国强弱之源，反映了维新派对西方资产阶级民主政治的倾慕，因而遭到封建顽固派的忌恨。二十一年末，北京、上海强学会先后被封禁，《中外纪闻》、《强学报》被迫停刊。但是维新变法已成为一种时代思潮，

它不会因封建统治者逞虐施狂而沉寂下去。二十二年，梁启超等在上海创办《时务报》，发表梁著《变法通议》等重要论文；二十三年严复在天津创办《国闻报》，连载严译《天演论》和《原强》等重要论文；二十四年谭嗣同、唐才常等又在湖南创办《湘报》。这些报刊以达尔文进化论为思想武器，敲起民族危亡的警钟，呼吁"救亡以图存"，论述变法维新的必要性与合理性；揭露封建专制制度为中国衰弱落后的根源，大力鼓吹资产阶级民权思想；批判封建主义旧思想、旧文化，大力提倡新学，影响遍及全国。与此同时，维新派又在各地组织学会，创办学堂。据不完全统计，光绪二十一年至二十四年间，维新派创办学会、学堂、报馆等共50余所，出版报刊30余种，为维新运动高潮的到来，做了舆论准备，培养了人才。其时，帝党在与后党争夺统治实权的斗争中处于弱势，急需寻找社会力量的支持。甲午战后，部分帝党逐渐倾向变法，企图借助维新派的改革才能和勇气，辅助光绪帝通过变法从后党手中夺取统治实权，达到救亡图强的目的。中国民族资产阶级这时尚未形成独立的政治力量，维新派也迫切寻求政治靠山以为奥援。于是，甲午战争后，帝党与维新派逐渐结合。强学会的成立是其结合的标志。

光绪二十三年冬，德国强占胶州湾，其它帝国主义纷起效尤，掀起了在中国强占租借地、划分势力范围的高潮，中国面临被瓜分的危机。康有为再次从南方赶到北京，于当年十一月十二日(12月5日)呈递《上清帝第五书》，提出变法的上、中、下三策以供采择。上策是"采法俄、日以定国是"；中策是"大集群才而谋变政"；下策是"听信疆臣各自变法"。并提出"自兹国事付国会议行"，"采择万国律例，定宪法公私之分"等内容，涉及了清朝中央政权体制的改革，体现了维新派追求资产阶级民权制度的政治理想。这次上书，因言辞激烈，被顽固派阻格，未能上达。光绪帝本欲召见康有为，亦为顽固派所阻。光绪二十四年正月初三(1月24日)，光绪帝命王大臣于总署西花厅接见康有为，询问变法事宜，继命康条陈所见。正月初八康有为上《大誓臣工开制度新政局折》(即《上清帝第六书》)，提出变法纲领：一、"大誓群臣以革旧维新，而采天下舆论，取万国之良法"；二、"开制度局于宫中，征天下通才二十人为参与，将一切政事制度重新商定"；三、"设待诏所，许天下人上书"。其核心是第二款。按照康有为的设想，制度局是一个指导全国变法的中枢机构，其职能是负责立法和议政；另立法律、税计、学校、农商、工务、矿政、铁路、邮政、造币、游历、社会、武备等十二专局，作为行政机构，具体执行制度局所议定之新政事宜。三月，康有为在北京发起成立御侮救亡团体保国会，刊布《保国会章程》30条，以"保国、保种、保教"为宗旨，又规定了总会和分会的组织系统、权限和职责、入会手续、会员权利和义务，已略具资产阶级政党规模。在保国会的推动下，各地纷纷建立御侮救亡性质的爱国团体，"维新变法"、"救亡图存"已汇聚成为强大的时代潮流。四月初十，反对变法、位尊权重的恭亲王奕䜣病逝，变法的有利时机到来，康有为积极联络帝党，促成光绪帝立即变法。二十三日光绪帝接受维新派建议，毅然发布"明定国是诏"，宣布变法维新，号召大小诸臣努力向上，发愤为雄，"以圣贤义理之学植其根本"，"博采西学之切于时务者实力讲求"，切实举办新政，"不得敷衍因循"。自此，至八月初六慈禧重新宣布训政为止，共103天，光绪帝引用维新人士，黜斥守旧派，颁布维新法令，推行变法新政，史称"百日维新"。变法新政的内容主要包括：一、经济方面：保护奖励农、工、商业，在北京设立农工商总局、铁路矿务总局，提倡实业，鼓励私人投资，令各省设立商务局(或农工商分局)；命各省地方官兼采中西各法，切实振兴农业；奖励科学著作发明，颁布《振兴工艺给奖章程》12款，规定对士民著新书、创新法、制新器者，赏给官职或给予专利；在京师及各通商口岸，广设邮政分局、裁撤驿站；编制国家预、决算，由户部按月公布；取消满人寄生特权，准其自谋生计。二、政治方面：令各衙门删改则例；中央裁撤詹事府、通政司、光禄寺等闲散衙门，外省裁撤湖北、广东、云南三省(此三省督抚同城)巡抚、东河总督等重叠机构；广开言路，允许官民上书言事，严禁官吏阻格。三、军事方面：裁汰旧军，令八旗及各省军队一律改练洋操；筹办兵工厂，筹造兵轮，添练海军；力行保甲，实行团练。四、文教方面：改革科举，废除八股取士制度，改试策论；设立学堂，提倡西学，首先开办京师大学堂，令各省、府、厅、州、县，将现有大小书院一律改为兼习中西学的学堂；设立译书局，翻译外国新书；允许开设报馆，举办学会；派人出国游历、游学等等。尽管维新派与帝党相结合所进行的改革相当温和，但它涉及到政治、经济、军事和思想文化各个领域，是一次影响深远的资产阶级性质的社会改革。在短短的百日之内，中国人民取得了一定程度的言论、出版、集会、结社的自由；民族资本主义工业第一次获得法律上的承认；封建主义旧思想旧文化受到沉重打击，资产阶级思想得以广泛传播。特别是在维新变法运动深入发展过

程中,维新派大力鼓吹资产阶级民权思想;康有为在第二至第五次上书中提出的立宪法、设议院的政治主张;以及百日维新中提出的开制度局、要求资产阶级参预政权等等,具有反对封建专制主义的资产阶级启蒙意义,是中国人民反对封建主义斗争历程上的一个里程碑。

百日维新反映了新兴资产阶级的利益,引起了封建顽固派的拼死抵抗。刚毅、徐桐等顽固大臣宣称"宁可亡国,不可变法",多次要求慈禧太后镇压维新派,制裁光绪帝。慈禧作为清朝实际上的最高统治者并不死死地站在顽固派一边,她的统治权力建立在顽固派与洋务派互相牵制与平衡的基础之上。面对外患日亟,社会上要求变法救亡的呼声高涨的情况,只要变法不出洋务派"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范围,她可以暂时容忍,以显示其俯顺舆情,"改弦更张"之意,达到缓和阶级矛盾和新旧冲突的目的。她的方针是决不能动摇其从中央到地方的军政实权,决不容许光绪排斥她的亲信,更不容许他在朝廷内结成自己的党羽。一旦光绪帝越此雷池一步,她将随时准备发动政变。为此,在百日维新开始后几天,她即黜退翁同龢,剪除光绪羽翼;任命后党骨干荣禄为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统率北洋三军;又命二品以上大臣接受新职时要到太后前谢恩,以控制光绪的人事任免权,防止他破格提拔维新派;此外,还派她的亲信党羽掌管北京城内的军事指挥权和警卫权,为后党随时发动政变做好了准备。这等于告诉大臣们,权力仍牢牢地掌握在她的手中,他们可以放手抵制新政。正因此,除湖南巡抚陈宝箴认真举办新政外,绝大多数督抚不以光绪帝的诏书为然,他们的赌注仍押在慈禧太后身上。因此百日维新中,尽管颁布了180余道新政上谕,实际成效甚微。顽固派还不断地直接向维新派发起攻击,光绪帝曾大胆地给予反击。五月初二,帝党御史宋伯鲁、杨深秀因礼部尚书许应骙阻挠疏请废八股之议,奏劾许"守旧迂谬,阻挠新政"。光绪帝遂命许应骙明白回奏。许百般掩饰,借机攻击康有为"摇惑人心,混淆国是",请将其"驱逐回籍"。遭到光绪帝申斥。五月二十日后党御史文悌严参康有为"遍结言官,把持国是"。光绪帝怒将文悌斥回原衙门行走。七月十九日,礼部尚书怀塔布、许应骙、侍郎堃岫、徐会沣、溥颋、曾广汉以阻挠主事王照上书言事,被光绪帝革职。次日,光绪帝又赏谭嗣同、杨锐、刘光第、林旭四人四品卿衔,在军机章京上行走,参预新政事宜。这几件大事极大地激怒了后党顽固派,新、旧两党矛盾迅速激化,后党大臣荣禄、刚毅、怀塔布等纷纷活动,加紧策动政变。

康有为等维新派早有以"尊君权"、"去太后"为目的的军事政变计划,看到后党顽固派加紧政变准备,亦多方努力促成军事政变计划之实施。他们拉拢袁世凯,企图借助其兵力诛杀荣禄、包围颐和园,劫持西太后,保护光绪帝,捍卫变法新政。光绪帝不知维新派计谋,但召见袁世凯,破格赏其侍郎头衔,以备缓急可恃;且孤注一掷,大量提拔维新人士,拟开懋勤殿以议制度;又定于八月初五召见日本前首相伊藤博文;维新派和帝党官员亦频频接触伊藤,上折请聘其为新政顾问官。这两件事更引起后党集团极大疑忌,他们最害怕帝党掌握武装,最担心维新派与外国势力结合,促使帝国主义扶植光绪帝从慈禧手中夺权。于是慈禧决定抢先在光绪接见伊藤之前发动政变。八月初三,后党御史杨崇伊向慈禧上密折,请太后"即日训政"。后党主将荣禄于同日调兵遣将,为发动政变预作军事部署。维新派亦加紧行动,谭嗣同于当日夜访袁世凯,策动袁执行"杀(荣)禄锢后"计划。袁佯作应允,但借词延缓执行。初四,慈禧突然从颐和园回宫,发动政变,幽禁光绪。初五,光绪在慈禧严密监视下,处理了两件原先预定的政务,一是召见袁世凯"请训",二是召见伊藤博文。初六,慈禧假光绪帝名义,发布吁请太后训政的诏书,宣布第三次临朝训政,下令逮捕康有为和康广仁。袁世凯于初五"请训"后回津,立即向荣禄告密,荣沉吟良久,得悉政变"已自内先发"的讯息后,始将袁告密内容密报慈禧。初九,慈禧下令逮捕谭嗣同、杨锐、刘光第、林旭、杨深秀。十三日此五人与康广仁一起被杀于北京菜市口,史称"戊戌六君子"。康有为、梁启超逃亡日本。支持变法维新的官员陈宝箴、江标、黄遵宪、李端棻、张荫桓等数十人或被捕系狱,或罢官,或遣戍边陲。除京师大学堂和通商、惠工、重农、育才等洋务项目外,废除全部新政,戊戌变法失败。

戊戌维新运动是19世纪末中华民族同帝国主义矛盾激化的产物,是一场旨在挽救祖国危亡的爱国运动;又是中国近代史上第一次思想启蒙运动。它是中国人民在旧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反帝反封建斗争的一个驿站,有着不可磨灭的历史功绩。但是由于二千年封建主义经济基础的牢固,封建主义政治力量的强大、封建主义思想影响的根深蒂固,非初登历史舞台的幼弱的资产阶级所能抵敌,戊戌变法的失败带有必然性。兼之当时中国民族资产阶级还没有成为独立的阶级力量,和封建势力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维新派又严重脱离人民群众,缺乏与封建主义彻

底决裂的勇气，对帝国主义怀抱不切实际的幻想，充其量，他们只能发动一场软弱的资产阶级政治改良运动，而不能使改革派掌握政权。就在维新上谕如雪片般飞舞之际，军政实权仍牢牢地掌握在封建顽固派手中。没有政权的改革必然遭致失败。戊戌变法的历史证明，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国，自上而下的维新改良，只是幼弱的民族资产阶级不切实际的幻想，它必然让位于资产阶级民主革命。　（刘振岚）

诏定国是

清光绪二十四年四月二十三日（1898年6月11日），光绪帝颁布"明定国是诏"，决定变法大计，百日维新自此始，史称"诏定国是"。

是年春，维新运动进入高潮，维新派与帝党紧密结合，促成光绪帝接受变法要求。光绪帝自《马关条约》签订后，思想发生重大变化。他看到甲午战败，北洋海军全军覆没，陆军"不足以拱卫"，中国面临外患日亟，"国将不国"的危险局面，感到"非变法不足以救中国"。特别是当他看到康有为《上清帝第三书》以后，思想上受到巨大震动，促使了他改革图强的决心，"不欲为亡国之主"。此其一。马关约成，割台湾，赔巨款，辟商埠，设外厂，入超日益加剧，财政日益拮据，清政府面临严重的经济危机，使他感到"非变法不能立国"。此其二。甲午、戊戌年间，各地农民暴动、会党反清斗争、少数民族起义、城乡人民反洋教斗争连绵不断，此伏彼起，台湾人民反割台斗争高涨，资产阶级革命派已在广州举行起义等等，正所谓"乱机遍伏"，大可"忧危"，这使他感到清朝统治面临深刻危机，"非变法不足以图存"，不足以"固结人心"。此其三。自光绪十五年，慈禧太后虽言归政，然而一切行政大权仍牢牢把住不放。光绪不甘心长期处于无权地位，在帝傅翁同龢的诱导下，决计借助维新派力量，摆脱慈禧控制，成为有实权的国君。此其四，也是最关键的一点。光绪二十四年初，光绪帝命总理衙门王大臣代其接见康有为，询问变法事宜；又见到康著《俄彼得变政记》、《日本变政考》及《上清帝第六书》，思想上进一步受到鼓舞。当年春，康有为在北京创立保国会，顽固派起而攻击，要求查办。光绪帝回护说："会能保国，岂不大善，何可查究耶？"四月初十，位尊权重、反对变法的恭亲王奕䜣病逝，变法的有利时机到来，康有为积极联络帝党，极力促成光绪帝颁布诏书，明定国是，宣布维新变法。首先，他代御史杨深秀草拟《请定国是而明赏罚以正趋向而振国祚折》，于四月十三日上奏清廷。杨深秀（1849—1898），字漪村（或漪邨）。山西闻喜人。进士出身。历任刑部主事、郎中。光绪二十三年冬授山东道监察御史。中日甲午之战，由于清廷腐朽，中国惨败，他深以为耻。任御史后，表示欲"以澄清天下为己任"。次年保国会成立时，他曾给以支持。此后与维新派密切往来。此次康有为代拟的奏折，符合他的思想。奏折要求光绪帝明降谕旨，定国是，明赏罚，宣布变法决心，痛斥守旧之弊，以定国家趋向，使臣民有所适从。稍后，康有为又为侍读学士徐致靖草拟《请明定国是疏》，于四月二十日上奏清廷。徐致靖（1826—1918），字子静。江苏宜兴人。进士出身，授翰林院编修，后任侍读学士。光绪二十三年德国强占胶州湾以后，民族危机愈形严重，他忧虑国家前途，赞成变法。他在《请明定国是疏》中指出，外患日亟，政局纷乱，其原因皆出于朝廷用人行政游移两可，莫衷一是，开新守旧、两无所据。故请皇上"特伸乾断，明示从违"，甚至以激将之法促使光绪帝于"开新"、"守旧"两者之间明确表态，谓：如皇上以为应当守旧，则即请明谕内外臣工，有主张维新者，"罪无赦"；若皇上以为应当变法，则也请"特颁明诏"，有坚持守旧、阻挠变法者，"亦罪无赦"。如此，则国是划一，令天下臣民有所适从。光绪帝在甲午战后已颁布过若干所谓"新政"上谕，诸如修铁路、开矿藏、铸钞币、创邮政、练陆军、练海军、建学堂等项。但因后党环伺，官僚因循，多次上谕仍是一纸空文，毫无实效，这使光绪帝深深感到无权受制，不能任行己意的痛处，确有"明定国是"的必要，故此决定接受杨深秀、徐致靖的建议。遂令翁同龢起草诏书，并亲到颐和园请示慈禧，得到允准。二十三日，召集全体军机大臣，发布"明定国是诏"，决意变法。诏书首先陈明，数年以来，多数官员讲求时务，主张变法自强，但因一时风气尚未大开，朝廷内外，思想主张也不尽一致，所以迄今尚未实行变法。但是现在时局已经大变，不容再"徒蹈宋、明积习"，必须根据情势变化，及时变法，号召中央到地方大小诸臣，自王公至普通百姓，均宜努力向上，发愤为雄，吸收新学，举办新政。并警告各级官吏，对新法要切实遵行，"不得敷衍因循"。诏书规定的变法宗旨是："以圣贤义理之学植其根本，又须博采西学之切于时务者实力讲求"，与洋务派"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口号相近，但也指责了"徒袭"西学"皮毛"和空谈习气，号召实力讲求中、西学，"化无用为有用"，以求"通经济世"。关于变法内容，诏书提到练兵和兴学，前者是为了"强国"，以达"坚甲利兵"；后者是为了"励才"，即培养新政人才。诏书提出应首先举办京师大学堂，以"为各

行省之倡”，并未提及政治改革。“明定国是诏”是维新派与帝党结合的产物，又得到慈禧允诺，所以它的内容较康有为的“全变”主张温和，其改革宗旨没有超出洋务派所能接受的水准。但这个以皇帝名义发布的定国是诏，仍具有重大意义，它是宣布维新开始的政治宣言，从此使维新变法取得了合法地位，为资产阶级维新派推行新法开辟了道路，对守旧派破坏变法的图谋产生一定的约束力，而使那些为振兴中华而奔走的进步人士看到了希望，诚如梁启超所说：“一切维新，基于此诏，新政之行，开于此日。”

（刘振岚）

百日维新

自清光绪二十四年四月二十三日（1898 年 6 月 11 日）光绪帝诏定国是、决定变法起，至同年八月初六慈禧太后重新“训政”止，共 103 天，史称“百日维新”。

四月二十三日，光绪帝毅然发布“明定国是诏”，决定变法，自是日起，开始了中国近代史上轰动一时的“百日维新”。二十八日，光绪帝在颐和园仁寿殿召见了时任工部主事的康有为，这是他们君臣初次会见。康利用这次面谈机会，重申其全面变法的主张。首先陈述中国民族危机严重到了生死关头，非尽变旧法不能自强。光绪同意，表示：今日诚非变法不可。康又指出，近年来并非不言变法，然少变而不全变，举其一而不改其二，结果必至无功。认为欲变法必先改订制度法律，否则只是变事，不是变法，要求光绪帝“先开制度局而变法律”。并说他研究过各国变法的情形，西方各国讲求三百年而治，日本经过明治维新，三十年而强，相信中国只要认真变法，三年可以自立。光绪帝认为他讲的条理很详备。康又问：“皇上既知非变法不可，为何久而不举，坐视国家危亡？”光绪睫睨帘外，叹道：“奈掣肘何！”康领会光绪帝是顾虑慈禧太后阻挠，故此建议“就皇上现在之权，行可变之事，虽不能尽变，而扼要以图，亦足以救中国”。指出，现在当朝大臣多老朽守旧，不懂世界大势，皇上若欲变法，不能依靠守旧大臣，只有擢用有才干的小臣，给以官职，准许他们上条陈，若有真才实学，予以破格重用，令其办理新政。至于守旧大臣，可保持他们原来的俸禄，使其无失位的恐惧，他们便不会阻挠新政了。这是康有为在新旧力量对比悬殊的情况下，为光绪皇帝设计的一种带有妥协性的变法策略。康还建议，以后凡变法之事，请皇上多下诏书，“示以意旨所在”，则大臣虽守旧，亦“无从议驳”。为了选拔和造就人才，康又建议废除八股取士制度，强调翻译西书和派人出国游学、游历；并对答了如何筹款以解决财政困难等问题。对康所言，光绪帝均表同意，最后又表示：“汝尚有言，可具折条陈。”康有为大为兴奋，在这不同寻常的百日之内，他和其他维新人士一起，忧国阽危，呕心沥血，屡上新政奏议，频呈自撰之变法书籍，对变法维新提出了许多有价值的建议。光绪皇帝亦“深观时变，力图自强”，“政厉雷霆”，“令如流水”，发布了 180 条新政诏令，使这昙花一现的百日，曾是一个“谕旨雷厉风行，人心为之一振”的时刻。主要内容有：

一、选拔维新人才。这是维新派呼吁最强烈、顽固派最敏感、也最忌讳、光绪帝想做而又最有顾虑的一个问题。百日维新伊始，光绪帝接连谕令朝廷大臣举贤任能，令各省督抚向朝廷保荐品学端正、通达时务的优秀人才参与变法新政。四月二十五日侍读学士徐致靖上折保荐康有为、黄遵宪、谭嗣同、张元济、梁启超。此后，湖南巡抚陈宝箴、詹事府少詹事王锡蕃又分别保荐杨锐、刘光第、严复、林旭等人，均为光绪帝所采用。光绪本拟重用康有为，因荣禄、刚毅等顽固大臣阻挠，只给了他一个在总理衙门章京上行走的六品衔小官。梁启超也被召见，委为六品衔办理大学堂译书局事务。按清朝成例，四品以上高官才能被皇帝召见，今康以主事、梁以布衣被召见，故梁启超说是“咸丰以来四十年未有之创举”，显示了光绪帝真心提拔维新人才的意向。但是按清朝惯例，举人一旦被召见，即得赐入翰林，最低不失为内阁中书。可见康、梁的待遇不是破格提拔，而是被破格压低了。这反映了维新派力量弱小、光绪皇帝无权的严酷现实。按照康有为的规划，大量任用维新人士最根本的办法是开设制度局，但在顽固派坚决抵制下，未能实现。故百日维新中，只能零零星星地提拔几个维新人士。在变法新政的实际执行机构总理衙门中，只有帝党大臣张荫桓和章京张元济倾向维新，新添的维新人士仅康有为一人。在负责转递士民上书的都察院中，只有原来的御史杨深秀与宋伯鲁倾向维新，此外没有提拔维新人才。在六部中，仅礼部经过一次严重冲突，将礼部六堂官全部撤换，以倾向维新的原仓场侍郎李端棻为尚书，原少詹士王锡蕃、内阁学士阔普通武、侍读学士徐致靖分别为左右侍郎，但后党骨干裕禄仍为尚书，且位在李端棻之前，左、右侍郎亦分别配以守旧人物寿耆和萨廉。而这已然是维新党在人事方面的最大胜利了。光绪帝任用维新人士最堪注意的是在军机处中选拔了所谓“军机四卿”——

七月二十日颁谕宣布，内阁侍读杨锐、刑部候补主事刘光第、内阁候补中书林旭、江苏候补知府谭嗣同“均著赏加四品卿衔，在军机章京上行走，参预行政事宜”。官位虽不高，职务很重要，具体负责草拟新政谕旨，阅看臣工奏章，帮助光绪帝处理新政事务，实则参预枢机，隐夺军机大臣之权，时人目为“宰相”，是百日维新中维新人士占据的最要害的岗位。可惜礼部堂官的撤换和军机四卿的任用，离戊戌政变仅半个月，实际未起多大作用。

二、文教改革。又包括两个方面：1.废除八股取士制度。百日维新开始以前，康有为等维新人士即已多次上折痛陈八股取士制度的严重危害，四月二十八日康有为被召见时，又当面向光绪帝历数八股之害，要求废止，得到光绪帝允准。次日，康即命御史宋伯鲁上奏其早已代拟好的《请改八股为策论折》，要求各级科举考试，一律废止八股文体，改试策论。光绪帝接受此建议。为避免顽固派的阻挠，不将此事下部议，在请准慈禧后，即于五月初五颁布上谕，宣布：自下科起，乡会试及生童岁科各试，“向用四书文(即八股文)者，一律改试策论”。五月十二日、六月初一、七月初三又连下三次谕旨，令各省生童岁科试即行改为策论，不必候至下届；又对考试的场次和考试内容作了具体规定，并宣布废朝考之制。至此，维新派废除八股取士的努力，取得了重大成果，以至“酌酒相庆，以为去千年愚民之弊，为维新第一大事也”。但是这次改革并没有从根本上取消科举制度，只是改革了考试的内容和文体。过去以八股文取士，考试内容均系“四书”、“五经”，改行“策论”取士后，“四书”、“五经”仍旧保留，仅增加了中国历史和西方自然科学及政治法律知识。在这一点上，维新派与洋务派官僚并无原则差异。这既是维新派考虑到数百万八股士人的出路而不能不作出的让步；也反映了他们自己未能完全摆脱旧经典的束缚。2.创办学堂，提倡西学。废除八股取士之诏颁行后，康有为等维新人士又屡上奏折，主张在全国创办近代化学堂，改旧式书院为新式学堂，兼习中学、西学，得到光绪帝的支持。四月二十三日发布的“明定国是诏”即明令首先举办京师大学堂，以“为各行省之倡”。五月十五日颁谕批准总理衙门拟奏的京师大学堂章程，委派孙家鼐办理大学堂事务，京师大学堂(北京大学前身)自是正式开办。二十二日又谕令各省府、厅、州、县之大小书院及民间的祠庙“一律改为兼习中学西学之学校”。省会改设高等学校，郡改设中学，州县改设小学。以后又陆续颁谕，令各省筹办矿务、海军、农务、编译、医学、茶务等专门学堂；设立译书机构，翻译外国新书，提倡出国游历、游学等。但各省督抚对光绪帝的谕令均熟视无睹，延宕不办，结果仅京师大学堂正式创办并成为戊戌变法仅存的硕果，其他各地均遭到各种阻挠而举动寥寥。

三、经济改革。康有为等维新派关于经济改革的主导思想，是对农、工、商业按照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模式，进行全面改造，使中国走上资本主义发展道路。在工业方面，强调奖励发明创造和允许民间筹资设厂。在商业方面，批判封建统治阶级“重本抑末”思想，阐明“商若能盛，国以富强”的道理，建议在中国设立商部，各省设立商务局。在农业方面，强调农业是根本，提倡以西法治农。光绪帝接受康有为主张，屡颁经济改革谕令，包括如下内容：1.保护及奖励农、工、商业，在北京设立农工商总局、铁路矿务总局，提倡实业，鼓励私人投资，修筑铁路，开采矿产；令各省设立商务局(或农工商分局)。2.命各省地方官兼采中西各法，切实振兴农业。3.奖励科学著作发明，颁布《振兴工艺给奖章程》12款，规定对士民著新书、创新法、制新器者，或赏给官职或给予专利。4.在京师及各通商口岸广设邮政分局，裁撤驿站。5.编制国家预、决算，由户部按月公布，6.取消满人寄生特权，准其自谋生计等等。各省督抚除湖南巡抚陈宝箴认真办理新政外，其余皆置若罔闻，借故推托，如对设立商务局一事，各省一直拖延未办。光绪帝异常愤怒，曾严旨切责两江总督刘坤一和两广总督谭钟麟(1822—1905)。但直至政变爆发，经济改革收效甚微。

四、政治改革。包括两个方面：1.官制改革。百日维新期间，康有为对于政治改革最主要的主张是设立制度局作为议政机构，将一切政事制度重新商定；并于中央成立12局，作为推行新政的执行机构。这一主张虽得到光绪帝支持，却遭到顽固派大臣拚死反对，未能实现。康有为对改革官制的另一重要主张是区别“官”与“差”，即以虚官高位位置老臣，而办实事的重要差使一定要委任通达之才，即所谓“以高秩优耆旧，以差使任贤能”；在对待官制改革和裁冗署问题上，主张持慎重态度。但光绪帝由于长期受后党顽固派压制，很想在变法时惩治后党大臣，所以没有完全听从康有为的劝告，而是采纳了前太仆寺少卿岑春煊(1861—1933)提出的裁冗官的建议，于七月十四日发布上谕，令裁撤詹事府、通政司、光禄寺、鸿胪寺、太常寺、太仆寺、大理寺等闲散衙门；外省裁撤湖北、广东、云南三省(此三省督、抚同城)巡抚、东河

总督及不办运务之粮道、仅管疏销之盐道，各省同道佐贰等官，并无地方之责者，均著裁汰。这些冗衙冗官本应裁汰，但由于事先未对大批被裁官员的出路作适当安置，所以矛盾空前激化，守旧派对维新派更加切齿痛恨，“必欲得康之肉而食之”，加速了政变的到来。此为改革派急躁冒进、疏于策略的表现之一。2.广开言路，鼓励上书言事。按原来清朝定例，不仅普通百姓，即使四品以下京官和三品以下地方官亦无资格上奏章。六月十五日、七月十七日、二十八日先后发布谕旨，宣布大小臣工及一般士民均有权上书言事，各部官员上书，由各堂官代奏；士民上书，由都察院代呈；地方士民上书由本省道府随时代奏。而且规定“不准稽压”，“倘有阻格，即以违旨惩处”，同时又发布谕旨，鼓励各地开设报馆，发行报纸，并改上海《时务报》为官报。此外，在军事上还谕令裁汰旧军，以西法练兵，筹建海军；力行保甲，实行团练等等。

总之，由于维新派的推动，光绪帝的倡导，在短短的百日之内，中国人民取得了一定程度的言论、出版、集会、结社的自由；民族资本主义工业第一次获得法律上的承认；资产阶级思想文化获得了广泛传播，封建旧学受到沉重打击。所以，百日维新在中国历史上是有进步意义的，康有为曾兴奋地赞颂百日维新“扫两千年之积弊”，“顺四万万之人心”，“百日变政，万汇昭苏，举国更始以改观，外人色动而悚听”。康的说法虽不无夸张成分，但说明百日维新确实反映了新兴资产阶级的利益。正因此，它引起封建顽固派的拚死抵抗，慈禧太后在后党顽固派支持下发动政变，八月初六重新宣布训政，幽禁光绪皇帝，恢复旧制，捕杀维新派，康有为、梁启超出逃，谭嗣同、杨锐、刘光第、林旭、杨深秀、康广仁被杀，史称“戊戌六君子”，百日维新失败。　　（刘振岚）

己酉三旨

清光绪二十四年四月二十七日己酉（1898年6月15日），慈禧太后为打击变法新政而采取的胁迫光绪帝连降三旨以剪除异己、位置党羽的严重步骤。

百日维新开始后，慈禧太后的态度是对于那些不触动封建统治阶级根本利益的经济文化改革措施，诸如办学堂、修铁路、设厂矿等项，可以容忍一时；而对清朝从中央到地方的军政实权，却牢牢抓住，只能加强，不能退让。为此，在诏定国是后的第四天，即四月二十七日，一天内她即命令光绪帝发布了三道上谕，从人事安排上打击帝党，进一步加强后党实权。第一道上谕是将协办大学士、户部尚书4），字声甫，号叔平。江苏常熟人。咸丰状元。光绪五年为光绪帝师。历任刑部、工部、户部尚书，又加太子少保衔，协办大学士。光绪八年、二十年至二十四年，两度任军机大臣，二十一年以后又兼总理衙门大臣。最为光绪帝宠信，“每事必问同龢，眷倚尤重”。中法战争及中日甲午战争时期均主战，反对李鸿章妥协投降。对前方清军溃败，“焦灼愤懑，如入汤火”，战后又坚持“宁多赔款，必不可割地”。《马关条约》签订后，“憾于割台，有变法之心”，并企图借助维新派力量，通过变法，实现光绪帝亲政。于是赞助维新派的变法活动。光绪十四年，康有为第一次上书清帝，要求变法，曾转托翁代递，他虽未予代递，但已深感康有“过人之见”而心怀好感。二十一年五月（5月底），康有为呈《上清帝第三书》，翁“见康书大惊服”，以一品大员身分屈尊走访六品主事康有为，因康外出，未遇；康得知后，受宠若惊，立即回访，二人得以长时间交谈。次日翁即将交谈情景密报光绪帝。十月康在北京成立强学会，他亦曾予以支持。二十四年正月初三，又参与总理衙门王大臣传询康有为变法事宜，次日将问话情形详细奏报光绪帝，再次密荐康有为才堪大用，并不断与康磋商变法的措施与步骤。四月初十，位尊权重、反对变法的恭亲王奕䜣病卒，翁以为变法的有利时机到来，遂积极促成光绪帝变法，并代拟“明定国是诏”。翁为帝党中坚，光绪帝的智囊，又是光绪帝与维新派之间的中介人，故为慈禧所忌。后党中有人暗中谮于慈禧，谓：“翁取悦于皇上，妄思改变成法，此肇乱之道。恐蛊惑皇上，宜早防范。”于是，遂有四月二十七日将翁“开缺回籍”之谕，所拟罪名是“渐露揽权狂悖情状，断难胜枢机之任”。当光绪帝发布的变法诏书墨迹未干之时，慈禧即将翁同龢革职，使光绪帝“股肱顿失”，此为釜底抽薪之法。光绪见此诏时，“战栗变色”，“竟日不食”，但亦“无可如何”。第二道上谕是命凡二品以上大臣授新职或接受赏赐，须具折到皇太后前谢恩。发这道上谕的目的在于控制光绪帝的人事任免权，防止他破格提拔维新人士。第三道上谕是任命慈禧的心腹宠臣荣禄署直隶总督。荣禄（1836—1903），字仲华，瓜尔佳氏，满洲正白旗人。光绪初年以内务府大臣兼步军统领。光绪四年擢工部尚书，曾因纳贿，被参免职。十七年，出为西安将军。二十一年授兵部尚书、总理衙门大臣。二十二年以协办大学士察阅芦台武毅军、小站新建陆军，次年上疏请参酌中外兵制，设武备特科，各省以西法练兵。但他反对康有为等维新派的变法主张。二十四年

正月初三，总理衙门王大臣接见康有为询问变法事宜时，他力言“祖宗之法不能变”，遭康有为驳斥。荣禄是后党中坚，与帝党矛盾甚深，而最得慈禧宠信。慈禧命荣禄为直督，目的是将京畿重地的军政实权牢牢控制在后党手中。直督有权统率驻扎在畿辅一带的北洋三军，即董福祥(1840—1908)甘军、聂士成武毅军、袁世凯新建陆军。此三军合共二、三万人，均配有西式装备，是清廷军队中的精华。五月初四，又授荣禄为文渊阁大学士，初五，实授直隶总督兼充北洋通商大臣。至此，荣禄“身兼将相，权倾举朝”。慈禧胁迫光绪帝所下的这三道上谕，使后党顽固派进一步掌握了清朝的军政实权，对变法新政是个沉重的打击。它好比树立了一面黑旗，召唤着从中央到地方掌握实权的各级官吏，敢于有恃无恐地抗拒光绪皇帝的新政诏书；同时它对维新派和帝党官员是个巨大的威胁，为以后后党顽固派发动政变打下了基础。

(刘振岚)

废除八股取士制度

清光绪二十四年(1898)“百日维新”期间文教改革的一项重要举措。

科举制度自隋朝创行后，一直成为后来各朝培养和选任官吏的“正途”。经过唐、宋、金、元诸朝的发展，至明、清达到了鼎盛时期。它在中国历史上曾经起过进步作用，但从创行伊始就存在着难以避免的消极因素和弊端，并随着封建社会走向衰落而进一步恶性发展起来。明清两代，八股取士大兴，成为禁锢思想、摧残人才的工具，再没有什么进步作用。戊戌变法期间，资产阶级维新派围绕着要不要废科举、办新学问题，与封建顽固派进行了激烈争论。维新派指出，要挽救民族危亡、实现君主立宪、发展民族资本，必须改革教育制度，废科举，兴学校，培养维新人才。顽固派极力维护八股取士制度，说“中学所以为教，人皆知之，无待别求门径也”，攻击维新派兴学校是邪说，名为培才，实则丧才，“且贻人心风俗无穷之忧”。维新派猛烈地抨击这些迂腐、顽固的陈词滥调。康有为的弟子徐勤揭露这种制度只求背书，不求义解，读的书越古越好，完全脱离社会现实，造成乡里子弟读书十年而不能作一书札；通人学士或有问一里之长果几许，多无能答者；甚至一代名臣而不知范仲淹为何人；曾入翰林而问司马迁为何科前辈。科举制度是封建统治者“牢笼天下”的愚民政策，“为中国锢蔽文明之一大根源”。他认为：“覆中国，亡中国，必自科举愚民不学始也。”严复揭露八股取士制度有三大害：锢智慧；坏心术；滋游手，“害在使天下无人才”。培养出来的一些腐儒和学究是谬妄糊涂，“上不足以辅国家，下不足以资事畜，破坏人才，国随贫弱”。二十一年四月初八(5月2日)，康有为在《公车上书》中，提出了请变科举的主张，认为只有改革科举，才能使天下之士才智大开，奔走鼓舞，以待皇上之用。四月二十三日(6月11日)，“百日维新”开始。二十八日，光绪帝召见康有为，康当面力陈八股取士的危害性：“今群臣济济，然无以任事变者，皆由八股致大位之故。故台、辽之割，不割于朝廷而割于八股，……胶州、旅、大、威海、广州湾之割，不割于朝廷而割于八股。”光绪帝同意：“西人皆为有用之学，而吾中国皆为无用之学，故致此。”康进一步说：“上既知八股之害，废之可乎？”光绪帝点头说：“可。”并任康担任总理衙门章京，许以专折奏事。康有为遂于次日上《请废八股试帖楷法取士改用策论折》，旋上《请停刀弓石武试改设兵校折》。前折以其从事八股制艺的亲身经历，痛陈八股文的无用与危害。他说：“其立法之谬异，流弊之奇骇，诚古今所未闻，而外人所尤怪诧者矣。”他向皇帝建议：第一，立废八股、试帖、楷法取士，改试策论，并罢试帖，勿尚楷法，引导人们专研有用之学；第二，等到学校尽开，徐废科举。后折以“整武备、养人才”为由，建议下诏停止弓刀步石武试及旗兵习弓矢；广设武备学校，先于京、津设立，逐渐推广于各省，课程仿照德、日制，必令毕业学生可任将校。康有为还联络帝党官僚，代他们拟奏稿，轮流递折，以“耸动上听”。如：四月二十九日代宋伯鲁拟上《请改八股为策论折》；五月初四代徐致靖拟上《请废八股以育人才折》；十二日又代宋伯鲁拟上《请将经济岁举归并正科，并各省岁科试迅即改试策论折》；十八日，又代徐致靖拟上《请酌定各项考试策论文体以一风气而育人才折》。

康有为接二连三、沉痛而又激烈的上书，深深打动了不甘做亡国之君、力求振作的光绪皇帝。光绪帝决心颁布科举新章，立命军机大臣拟旨，废除八股。可是遭到顽固派军机大臣徐桐的竭力反对。他说：“此乃祖制，不可轻废，请下部议。”光绪帝说：“部臣据旧制以议新政，惟有驳之而已。吾意已决，何议为？”刚毅只好说：“此事重大，愿上请懿旨。”五月初四光绪帝诣颐和园请慈禧太后懿旨。尽管光绪帝“上扼于西后，下扼于顽臣”，但由于他锐意维新，力排众议，以为“非得人才不足以图富强，而非改科目不足以得人才”，遂于次日发布上谕，明告天下：“著自下科为始，乡会试及生童岁科各试，向用四书文(即八

股文)者,一律改试策论。"十二日又发上谕,准御史宋伯鲁奏,著将经济岁举归并正科,各省生童岁科立即改试策论。十八日,光绪帝再次发布上谕,嗣后一切考试,均著毋庸用五言八韵诗。二十五日清政府颁发《经济特科章程》6条,并诏举经济特科,命各省长官各举所知,保荐人才,于三个月内送京,然后定期举行。六月初一,准张之洞、陈宝箴奏变通科举章程。乡试会试仍为三场,一试历史、政治,二试时务,三试四书五经,岁科亦以此例推之。并命嗣后一切考试,均以讲求实学实政为主,不得凭借楷法之优劣定高下。初三,发布上谕,变通科举,嗣后一经殿试,即可量才授职,停止朝考一场;再申取士以讲求实学实政为主,不凭楷法。初五,光绪帝命各省将军督抚学政对变通武场事,各抒所见,报部采择。十二日,光绪帝发布上谕,开经济特科,严禁滥保,不得瞻徇情面。七月初九,光绪帝命兵部妥议御史杨福臻所奏武科章程宜合学堂、营制、科举为一事一折。十一日,光绪帝命礼部迅速议奏徐致靖所请岁科两试照新章分场去取事一折。与此同时,光绪帝又下谕设立学堂,包括创设京师大学堂、专门学堂、将旧式书院淫祠改为学堂、各省设中小学堂等等。光绪帝一系列诏令的颁布,改变了几百年来的惯例,表现了他变法维新的勇气和毅力。八股取士制度的废除,有利于冲破封建文化专制主义,有利于知识分子的思想解放,得到了资产阶级维新派和多数知识分子的热烈拥护和支持。五月初五光绪帝废八股的上谕发布后,"京师哗然,传废八股,喜色动人"。"及命下之日,欢声雷动"。但也应当指出,百日维新期间康有为等维新派改革科举的主张,以及光绪帝的改革措施,都是很不彻底的。首先表现在维新派只要求废除八股取士制度,而不敢要求废除整个科举制度。其次,只要求废除八股文体,对于考试内容仅要求增加新的内容,而对于四书五经等传统的封建经典仍旧保留,不敢触动。这一方面是由于来自顽固派方面的阻力太大;另一方面也反映了康有为等维新派迷恋旧经典,不能彻底摆脱封建传统文化束缚的局限。纵使如此,仍遭到封建顽固派和八股士子的激烈反对。湖南举人曾廉曾上书慈禧太后,要求杀死康有为、梁启超等人以泄忿。戊戌政变后,立即恢复旧制。八月二十四日颁谕:"嗣后乡试、会试及岁考科考等,悉照旧制,仍以四书文、试帖、经文、策问等项,分别考试。"但此次废除八股取士仍对20世纪初年清政府废除科举制度起了催生作用。

(邱远猷)

帝国主义争夺在华筑路权

中日甲午战争后帝国主义列强强迫清政府签订不平等条约,瓜分中国铁路权益,巩固和扩大在华殖民统治的侵略活动。

甲午战争以前,清政府只修筑了两条铁路,一条是开平矿务局在英国帮助下修建的从唐山至胥各庄的铁路,这条铁路以后逐渐延展,西至天津,东至山海关外的绥中,全长300多公里;另一条在台湾,从基隆至新竹,全长77公里。甲午战争后,帝国主义列强在中国竞相争夺租借地和势力范围的同时,也开始抢夺铁路的借款权与承造权。它们都把自己势力范围内的铁路修筑权视为己有,不容别国插足。俄国通过《中俄密约》和强租旅、大,获得在东北修建中东铁路和南满铁路的特权;德国强占胶州后,即在山东境内大修铁路;法国租到广州湾,也取得修筑赤坎至安铺铁路的权利;英国在长江流域经营多年,正拟定一个庞大的长江流域铁路系统,以加强其在华政治经济霸权。至光绪二十四年(1898)夏,中国已被列强大致分割完毕,于是帝国主义各国对华铁路权益的争夺便跃出各自的租借地和势力范围,开始更大规模的、纵横交错的霸占与瓜分。其中英、德、美、俄等国对芦汉、津镇、京奉和粤汉铁路的争夺,成为这次瓜分铁路权益的中心和焦点。

芦汉铁路从北京近郊芦沟桥直达汉口,是贯通中国南北交通的主要干线之一,具有重大的经济和战略价值。甲午战争后,清政府决定修建此路,但由于财政空虚,只好举借外债。帝国主义各国得知后蜂拥而至,法、美、英、德等国竞相提出筑路要求。比利时银团在俄、法集团支持下以较为"便宜"的条件出面争揽,获得成功。光绪二十三年四月二十六日(1897年5月27日),中比双方签订《芦汉铁路借款合同》。不久,德国强占胶州湾,俄国强租旅、大,俄、法集团在华势力有所增强。俄国想利用芦汉铁路在华获取更多利益,因而怂恿比利时大耍无赖手段,撕毁合同,要求增加新的借款条件。为实现这一目的,俄、法两国也亲自出面进行干涉。清廷无奈,只得忍气退让,于二十四年五月初八(6月26日)令张之洞、盛宣怀与比利时银团在上海签订了《芦汉铁路比国借款续订详细合同》及《芦汉铁路行车合同》。这两个合同规定:清廷借款总额为11,250万法郎,年息五厘,九折实付,偿还期限30年,前10年不还本;借款以该路车辆、料件及通车后行车进款为担保;如果中国到期不能还本付息,该路将由比国公司"照顾",

即夺取铁路管理权。这样，俄、法集团通过比利时银团，就将芦汉路掌握在它们手中，将中国河南、直隶、湖北三省铁路沿线地区置于其直接控制下，并将俄、法集团势力伸入到长江流域，对英国在华特权构成了直接威胁。

对此，英国难以容忍。在清廷尚未批准芦汉铁路合同时，英国公使窦纳乐即对总理衙门恐吓威胁，要求清廷拒绝签约。芦汉路合同签订后，英国政府立即着手实现其长江流域铁路系统计划，于二十四年七月初五向清政府提出修筑下列五条铁路的要求：一、天津至镇江；二、从山西经河南至长江沿岸；三、九龙至广州；四、浦口至信阳；五、苏州至杭州或展至宁波。这些铁路修筑条件要与芦汉路完全相同。上述五条铁路除广九线外全部会合于长江，其中特别是津镇路，可以大大抵销俄、法集团控制的芦汉路对英国在长江流域侵略利益所构成的威胁。由于英国欲望太奢，清政府犹豫不决，而英国毫不退让，并以武力相威胁，强迫清廷限期答复。七月二十一日，清政府被迫向英国表示，除津镇路“另议”外，其余要求完全同意。但英国并不以此为满足，坚决要求津镇路的修造权。津镇路是贯通直隶、山东、安徽、江苏四省的南北铁路大动脉，其重要性决不在芦汉路之下，二十四年初容闳建议修筑时，各列强就群起争夺。清政府所以犹豫不决，是因为津镇路必须经过山东。山东是德国的势力范围，没有德国的合作，英国就不可能获得该路的承筑权。为此，英、德两国开始直接交涉，并就瓜分津镇路投资权益和划定两国在华铁路投资范围等事项达成协议。结果双方同意合资修建此路，英国负责山东以南的路段，其余由德国修建，全线建成后，由英、德两国共管。关于双方在华铁路利益范围，协议规定：英国利益范围包括津镇路山东以南部分、长江流域、江南各省及山西省等；德国铁路利益范围包括山东省、黄河流域，北到天津、正定，南抵南京、镇江一带。协议达成后，英、德两国共同迫使清廷接受其要求。二十五年四月初九(5月18日)，许景澄代表清政府与英、德两国银团在北京签订了《津镇铁路草合同》，规定借款总额为740万英镑，年息五厘，九折，自1910年起50年内还清。借款以津镇路收入作担保。借款偿清以前，该路由英、德两国代为经理。这样，英国终于如愿以偿，取得了津镇路的控制权，增强了它在华北地区的侵略实力。

津镇路的修建并不能从根本上缓解英、俄两国在华的利益冲突。英国在极力谋取津镇路的同时，还竭力夺取京奉路(北京至奉天〔沈阳〕)的控制权。当时，清政府修筑的天津至芦沟桥的铁路已经竣工，英国遂怂恿清廷修筑京奉路山海关至牛庄路段。二十四年四月十九日，中英签订《山海关—牛庄铁路借款草合同》，又称《关内外铁路借款草合同》。俄国得知后极力阻挠，未能奏效。八月二十五日，胡燏棻代表清政府与英国中英公司在北京正式签订《山海关—牛庄铁路借款合同》，又称《关内外铁路借款合同》，共20款，其中规定：借款总额为230万英镑(合白银约1600万两)，年息五厘，九折实付，45年还清，以京奉路收入及北京至山海关段的铁路财产、行车进款及新造关外铁路的进款作为担保；铁路总工程师由英国人担任；中国政府须向英国保证，山海关至牛庄段铁路永远不得让与他国。这样，英国通过控制京奉路，有力地阻止了沙俄势力的南下，并在俄国独占的东北地区打开一个渗透的“缺口”。为减少俄、法集团对津镇路和京奉路的敌意，英国主动与俄国磋商双方铁路修筑权的势力范围。二十五年三月，两国互换照会；英国承诺不在长城以北要求铁路投资，并且不阻挠俄国的铁路投资要求；俄国保证不在长江流域要求铁路投资，并且不反对英国的投资要求。这是英、俄两国背着中国政府暗自分赃，相互承认各自势力范围的强盗协议。

在英、俄等国大肆瓜分中国铁路权益时，美国也不甘落后。二十四年初，清政府拟修筑粤汉铁路，决定借用美款。三月二十四日，清廷驻美公使伍廷芳在华盛顿与美华合兴公司签订了《粤汉铁路借款合同》，规定：借款总额为400万英镑，年息五厘，九折实付，以铁路财产作担保，偿还期30年。借款未偿清前，铁路由美华公司代为经理等。但合同签订后不久，美国即卷入与西班牙的战争，粤汉铁路的修建因此陷于停顿。同年七月，英国取得广州到九龙的筑路权，认为粤汉路危害了广州与九龙的联系，损害了它在华南的利益，因而向清廷提出异议。美国也认为广九路使粤汉路受损，并为此与英国发生激烈争吵。为解决这一冲突，两国政府在协商后相互妥协，于二十四年底达成如下协议：美国美华公司取得的粤汉铁路允许英国投资，而英国中英公司取得的广九路也允许美国投资；今后两国任何一方在华获得铁路权益时，应允许另一方参与二分之一的投资；在对华问题上，英、美两国今后应采取一致行动，互相支持。这样，粤汉、广九铁路的投资修筑权终被英、美两国共同瓜分。二十六年六月十七日(7月13日)，中美双方又签订《粤汉铁路借款续约》，美国又从中国索取到更多的铁路权益。

光绪二十一年至二十四年，帝国主义列强在华进行了疯狂的铁路权益掠夺活动。英、俄、德、比、法、美等帝国主义列强在华共索取6420英里的铁路投资修筑权，其中英国最多，达2800英里，沙俄次之，1500英里。这一时期帝国主义争夺筑路权，是它们向中国进行资本输出的重要方式之一，也是帝国主义列强对中国人民肆意掠夺的重要组成部分。通过对华铁路投资，帝国主义列强控制了中国铁路的修筑权和经营权，不仅从中国攫取了高额利润，而且进一步掌握了中国的经济命脉，获得了许多政治特权，巩固和扩大了它们在华的侵略地盘。　（董增刚）

帝国主义对华输出金融资本

19世纪末帝国主义列强在中国设立银行，加紧金融资本输出，对中国进行经济掠夺和政治控制的侵略活动。

19世纪末，世界资本主义各国先后由自由竞争阶段发展到垄断阶段，形成英、俄、法、德、日、美等帝国主义列强。与此相应，各列强对殖民地半殖民地的经济掠夺方式也由商品输出逐渐转化为资本输出。甲午战争以前，英、俄、法、德等国虽然已开始对华输出资本，但为数很少，总共不过2至3亿美元，在对华经济侵略中不占主要地位。从甲午战争后到20世纪初，各国在华投资数额急剧增长，至清光绪二十八年(1902)，已达15亿多美元，比甲午战争前增加了5至8倍。资本输出已取代商品输出，成为帝国主义掠夺和侵略中国的主要方式。这一时期资本输出主要包括两种形式：一是产业资本输出，即各国在华直接投资从事修建工厂、开发矿山、经营铁路、航运及外贸、房地产等事业；另一种是金融资本输出，或称借贷资本输出，即通过向清政府大量贷款来获取高额利润及政治、经济特权。

帝国主义对华输出金融资本，是通过各国在华的金融机构——银行来实现的。鸦片战争后，中外贸易的增长引起金融业务的扩大，经营金融周转业务的外国银行也相继在中国出现。英国是在华设立银行最早的国家。道光二十五年(1845)，英国丽如银行即在香港和广州开建分行，成为在中国设立的第一家外国银行。同治三年(1864)，大英轮船公司、宝顺洋行、太平洋行等香港大商行联合当地英、美、德、印度等国商人，共同出资创建了汇丰银行，次年在香港和上海两地同时开业。汇丰银行总行设在香港，额定资本500万港元，汇丰银行伦敦委员会是其最高决策机构，经营大权一直操纵在英国资本家手中。该银行主要经营范围包括汇兑、吸收存款和发放贷款、发行纸币等，至光绪十六年，资本总额已增至1000多万港元，并在汉口、厦门、烟台、九江、广州、天津、澳门、北京、牛庄、基隆等10多个城市开设了分支机构。到19世纪末，汇丰银行已逐渐成为英国对华输出金融资本、进行经济侵略的大本营。法国的法兰西银行于咸丰十年(1860)在中国设立分行，但无力与英国金融势力竞争。光绪元年(1875)，在法国政府特许和支持下，法国社会实业银行、巴黎商业银行和巴黎荷兰银行等共同组成东方汇理银行，取代了法兰西银行在华的金融地位，在法国金融资本家对华经济侵略上发挥了重要作用。东方汇理银行最初资本800万法郎，总行设在巴黎，光绪十一年在西贡设远东总行，二十年在香港设分行，甲午战争后逐渐伸入中国内地，光绪二十五年后在上海、昆明、广州、天津、汉口、北京、湛江等地设立分支，至二十六年，该银行资本总额已增至2400万法郎，成为法国在中国的主要金融机构。同治十一年，德国的德意志银行也在上海设立据点。光绪十五年，德国13家大银行又联合投资，组成了德华银行。德华银行属于德国海外银行系统，是德国金融资本在华活动的中心机构，总行设在上海，资本总额500万两白银，汉口、青岛、天津、香港等地设有分行。俄国不甘落后，光绪二十一年联合法国向清政府争得《四厘借款合同》后，即决定成立俄国自己控制的银行，作为对中国进行经济掠夺的大本营。同年十月，俄国彼得堡国际商业银行联合法国的霍丁格尔银行、里昂信托银行、巴黎荷兰银行、巴黎国际贴现银行等共同组成了华俄道胜银行，资本总额为600万卢布。虽然法国各银行占据资本总额八分之五的股份，但该行仍被沙俄政府一手把持和操纵，总行也设在彼得堡。第二年，沙俄政府又以“合伙开行”为名，诱骗清政府入股白银500万两，并用清政府的股资从事对中国的经济侵略活动。至光绪二十七年，华俄道胜银行已分别在上海、北京、天津、大连、哈尔滨、旅顺、汉口、牛庄、烟台、吉林、奉天、齐齐哈尔、海拉尔、喀什等地设立分行16所，并在张家口、库伦和乌里雅苏台设有代理处。日本竟起效尤，光绪十九年，日本横滨正金银行在上海设立分行，甲午战争后又在香港、天津、牛庄、北京、大连、汉口等地设立分支。美国在华开设银行较晚，光绪二十七年花旗银行成立，次年在上海建立分行。二十八年，比利时的华比银行也宣告成立。

综观甲午战争以前，资本主义各国在华设立银行共8家，分支机构16所，势力不大，主要作用是为

对华进行商品输出服务。但甲午战争后，各帝国主义几乎都在中国设有银行，金融网络遍布全国广大地区，作用也已变为以输出借贷资本为主了。至光绪二十八年，各国在华投资的15亿多美元中，除去庚子赔款这一大部分外，通过外国银行实现的借贷资本仍达28,440万美元，其中向清政府投放的军事财政借款为24,680万美元，用于投资修建铁路的借款3,760万美元。甲午战争前，清政府也曾向外国银行举借外债，但总数不过白银4000万两左右，并且随借随还，并未对中国经济构成严重影响。甲午战争后，清政府为向日本支付巨额战争赔款而大借洋款，为外国银行提供了竞相对华输出借贷资本的极好机会。光绪二十一年闰五月，俄、法两国10家银行与清政府签订《四厘借款合同》，向清廷贷款4亿法郎。次年二月，英国汇丰银行与德国德华银行争得对清廷的贷款权，通过《英德借款详细章程》向清政府贷款1600万英镑；二十四年二月，又通过《英德续借款合同》再次向清廷借款1600万英镑。这三笔借款，使俄、法、英、德等国从中国获取了极大经济利益和政治特权。首先是获得了极高的垄断利润。俄、法、英、德4国银行对清廷的上述三次贷款共合白银约3亿两，清政府实收不过26,000多万两，利息却高达39,000多万两，加上折扣、佣金、"镑亏"（按照列强要求，中国偿还上述赔款时均须以外币交付，主要以英镑计算。19世纪中期后，世界上出现了一个金涨银落的持续过程。随着银价不断下跌，中国每次支付的银两数都有所增加，此即所谓"镑亏"。）等项，为数亦甚可观。这种惊人的高利贷剥削正是帝国主义通过银行借贷资本输出对中国进行的无耻勒索。其次是进一步控制了中国的财政命脉。例如：前两次贷款都要求以海关税收作担保；英、德续借洋款，即第三次贷款则以苏州、九江等地的厘金和盐厘为担保，从而部分地把持了中国的经济命脉，促使清政府对帝国主义的财政依赖进一步加强。最后是索取更多的政治特权。例如：沙皇俄国通过借款取得了参加中国海关行政管理的权利；英国在借款合同中明文规定："中国总理海关事务应照现今办法之法办理"，从而保证了它对中国海关税务司的行政管理权。

帝国主义银行除了对清政府直接进行政治财政贷款外，还通过借款插足中国的交通运输业，特别是铁路事业，把借贷资本的输出与产品投资结合起来，即帝国主义银行通过对清政府铁路贷款获取铁路的修筑权与经营权。早在光绪十三年，英国汇丰银行就向清政府投放铁路贷款，将唐胥铁路延至芦台。华俄道胜银行成立伊始，即获得了中东铁路修筑权。光绪二十四年三月和闰三月，沙俄又通过《旅大租地条约》和《续订旅大租地条约》，获得南满铁路的承筑权。同年四月，英国汇丰银行与怡和洋行组成华英公司，与清政府签订了《关内外铁路借款草合同》，通过贷款230万英镑而取得北京至牛庄铁路的控制权。五月，中比两国签订《芦汉铁路比国借款续订详细合同》及《芦汉铁路行车合同》。虽然芦汉路的承建由比利时银团出面，但实际上却由华俄道胜银行一手控制。光绪二十五年四月，英国汇丰银行、怡和洋行又联合德华银行，向清政府借款740万英镑，修建津镇铁路。此外，广九、沪宁铁路也都有汇丰银行的投资。帝国主义银行在通过借款谋取铁路权益的同时，还取得了其他政治经济特权。例如：铁路贷款条件苛刻，年利率最高可达七厘，一般九折实付，佣金也多达借款总额的5.5%。银行在向铁路投资的同时，也就包揽了铁路原料供应、设施施工和修建后的管理、用人等权益，并享有该国商品在铁路运输等方面的特权、铁路沿线矿产开采权、警察治安权等。至宣统三年（1911），中国共建有铁路9618.1公里，其中帝国主义直接投资修筑3759.7公里，通过贷款而间接投资修建5192.78公里，中国自己投资修筑的只有665.62公里。可见，中国铁路绝大部分被帝国主义所控制，而通过各国银行贷款投资修筑的铁路又居多数。

19世纪末欧洲各国对华输出金融资本，是帝国主义对中国进行侵略的重要方式。通过金融资本的输出，列强从中国获得极大的垄断利润和政治经济特权。中国社会半殖民地化的程度也因此大大加深。

（董增刚）

京师大学堂之创办

京师大学堂，中国近代最早的大学，北京大学前身。清光绪二十四年（1898）创办，为戊戌变法的"新政"内容之一。

光绪二十二年五月初二（6月12日），刑部左侍郎李端棻上《请推广学校折》，第一次向清廷提出设立京师大学堂的建议。七月，清廷命管理官书局大臣孙家鼐"察度情形，妥筹办理"。孙家鼐（1827—1909），字燮臣，安徽寿州（寿县）人。咸丰状元。与翁同龢同为光绪帝师，累迁内阁学士，擢工部侍郎，署工部、刑部、户部尚书。同月，孙家鼐上《议复开办京师大学堂折》，提出6项办法：一、京师大学堂应"以中学为主、西学为辅，中学为体、西学为用"为宗旨。

二、应于京师择宽旷地点作为堂址，必使讲堂斋舍“爽垲宜人”，仪器图书“庋藏合度”。三、拟分天学、地学、道学、政学、文学、武学、农学、工学、商学、医学10科。四、应延聘中西总教习各2人。中国教习应选取品行端正，学问渊深，又通达中外大势者担任；外国教习既须深通西学，又须“精识华文”。五、慎选生徒，切实考验考生的中西各学，择优选取；并须“性行纯正，身家清白”。六、毕业学生如科举不中，由学堂发给“金牌文凭”，派往总署充译员，或任教习；或分送南北洋海军、陆军、船政、制造各局为帮办等，以广出路。光绪二十四年四月二十三日(6月11日)的“明定国是诏”宣布“京师大学堂为各行省之倡，尤应首先举办”，并命军机大臣、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大臣“会同妥速议奏”。五月康有为上《请开学校折》，奏请加速筹办京师大学堂。初十，光绪帝谕军机大臣等，令著总理衙门“妥拟”筹办京师大学堂及译书局详细章程，迅速具奏。十五日总理衙门复奏筹办京师大学堂的草定章程，其要旨有：一、宽筹经费；二、宏建学舍；三、慎选管学大臣；四、简派总教习。并附由梁启超代为草拟的《筹议京师大学堂章程》。同日光绪帝颁谕，称京师大学堂章程“纲举目张，尚属周备，即著照所议办理”，强调：“京师大学堂为各行省之倡，必须规模闳远，始足以隆观听而育人材”。派孙家鼐管理大学堂事务，原设官书局及新设译书局均并入大学堂。一般即将五月十五日(7月3日)作为京师大学堂创办之日。

根据梁启超代理总理衙门草拟的办学章程，京师大学堂不仅是全国的最高学府，而且是全国教育的最高行政管理机关，各省学堂都归大学堂管辖，各省会暨外府州县所有已设立学堂，均须将学堂章程、教习姓名、学生额数，咨送大学堂覈考。因各省中学尚值草创，不能为大学堂提供足够的生源，故京师大学堂兼办中、小学堂，分列班次，循级而升。京师大学堂的建立，是中国高等教育近代化的标志，其最大特色是在继承中国古代文明的基础上引进西方资本主义文明和近代科学文化。其办学方针遵循“中学为体，西学为用”原则，强调“中西并重”，务使二者“会通”，缺一不可。对于西学，又强调西文仅为“学堂之一门”，而非“学堂之全体”；仅以西文为“西学之发凡”，而不为“西学之究竟”。课程设置仿照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办法，分普通学科和专门学科两类。普通学科为全体学生必修课，包括经学、理学、掌故、诸子、初等算学、格致、政治、地理、文学、体操10科。专门学科由学生任选其中一或两门，包括高等算学、格致、政治、地理、农矿、工程、商学、兵学、卫生学等科。另设英、法、俄、德、日5种外语，学生凡年在30岁以下者必须修一门外语；30岁以上者可免修。孙家鼐被任为管学大臣后，又于六月二十二日上《奏筹办京师大学堂大概情形折》8条，主要内容为：一、为举人、进士出身之京官设立仕学院，以习西学专门为主。二、大学堂应为毕业生代筹出路，其已授职者，由管学大臣出具考语，各就所长请旨优奖；其未仕者，亦由管学大臣严核其品学，请旨录用。三、精简学科门类，如经学、理学可合并为一门，兵学宜另设武备学堂。四、编译局主要应编译西学各书，旧有经书仍应以“列圣所钦定者为定本”，即使非钦定本，也不得增减一字，以示尊经之意。五、总教习可设2人，分管中学和西学。西学教习薪水应从优。六、应取消学生“膏火”(即生活津贴费)，而改为奖赏，以激励学生努力向学。这些建议得到光绪帝批准。经孙家鼐推荐，任命许景澄(1845—1900)为中学总教习，美国传教士丁韪良为西学总教习。大学堂校址设在地安门内马神庙和嘉公主旧第，原有房340多间，又新建130多间，即后来的北大二院，又在北河沿购置房舍一所，开办译学馆，即后来的北大三院。大学堂办学经费为30万两，常年用费为200,630两。户部指定从华俄道胜银行中国政府存款500万两的利息中支付；不敷之数，由户部补足。

戊戌政变后，清廷恢复旧制，京师大学堂是百日维新的仅存硕果。但实际上也一度陷于停顿，光绪二十四年十月开学时，学生不及百人。原定开10科，实际只办了诗、书、易、礼四堂及春秋二堂，每堂不过10余人，所学内容仍旧是孔孟经书和朱子理学，性质仍近似于旧式书院。而且，因恢复了八股取士制度，大学毕业生也只有参加科举考试得中后，才能进入仕途，故每于科举考期，学生纷纷请假赴考，学堂形同虚设。光绪二十六年夏，八国联军进攻北京，七月初九(8月3日)，慈禧下令停办大学堂。二十七年十二月初一(1902年1月10日)又下令恢复，重新任命张百熙为管学大臣。张百熙(1847—1907)，字埜秋(一作冶秋)。湖南长沙人。同治进士，授编修，督山东学政，又迁侍读学士。中日甲午战争时反对李鸿章议和。戊戌政变后，因荐举康有为获罪，受革职留任处分。光绪二十六年任礼部侍郎，擢左都御史。《辛丑条约》签订后，曾疏请清廷改官制、理财政、变科举、办学堂、设报馆，主张变法自强。受任管学大臣后，励精图治，颇想有一番作为，光绪二十八年主持制定了《钦定京师大学堂章程》，将大学堂分为预备科(简称

预科)、大学专门分科和大学院三级。预科又分政、艺两科,政科包括经史、政治、法律、通商、理财;艺科包括声、光、化、农、工、医、算学。预科学制三年,毕业后可升入大学专门分科,并给予举人出身资格。大学专门分科相当于后来的大学本科,分科相当于学院;科下又分门目,相当于后来的系。规定共设 7 科:政治、文学、格致、农业、工艺、商务、医术。每科下设几个门目,7 科共设 35 门。大学专门分科学制 3—4 年,毕业后可升入大学院(相当于后来的研究生院)深造,并给予进士出身。大学堂另设速成科,包括仕学、师范二馆,学制 3 至 4 年,毕业后可任初级官吏或学堂教习。当年九月十三日正式举行速成科招生考试,十月二十六日又第二次招考,两次共录取 182 名,十一月十八日(12 月 17 日)开学。1949 年以前即以公历 12 月 17 日为北京大学校庆日。光绪二十九年,清廷命洋务派官僚首领张之洞会同张百熙改定学制,对京师大学堂的章程也作了修改,修改后的章程——《奏定大学章程》,较之《钦定京师大学堂章程》有几点不同:一、大学专门分科将原来 7 科 35 门改为 8 科 46 门,主要是增设了经学科,下分周易、尚书、毛诗、春秋左传、春秋三传、周礼、易礼、礼记、论语、孟子、理学 11 门课程,突出了经学的地位。二、大学院改名通儒院,年限规定为 5 年。三、大学堂设总监督,总管全学堂各分科事务,统率全学校人员,相当于后来的大学校长,受总理学务大臣之节制。从光绪三十年开始,清政府专设京师大学堂总监督,与管学大臣职务分开。光绪三十三年第一批速成科学生毕业。宣统元年(1909)第一批预科学生毕业。宣统二年 8 个专门分科除医科外,均正式招生开办,惟各科分门比原计划为少。辛亥革命后京师大学堂改名北京大学。1913 年底大学专门分科学生 226 人毕业,是为北京大学第一批本科毕业生。京师大学堂创立于 19 世纪末民族危机严重之时,故其诞生伊始,即表现了强烈的爱国主义精神。光绪二十九年为反对沙俄长期侵占我东北,京师大学堂师生积极参加了全国各界的拒俄运动,四月初四(4 月 30 日),速成科、仕学馆、师范馆的师生 200 余人举行集会,声讨沙俄侵略。师生几十人愤怒发表演说,要求清政府拒绝沙俄无理要求,会后由 73 人署名草拟了《京师大学堂师范、仕学两馆学生上管学大臣请代奏拒俄书》,要求清政府拒约抗俄,推动了全国拒俄运动的发展,并为京师大学堂——北京大学树立了光荣的爱国主义传统。

(刘振岚)

《振兴工艺给奖章程》颁布

《振兴工艺给奖章程》,戊戌变法时期清政府关于奖励科学发明提倡工商业的法令。

百日维新期间,康有为屡上新政奏议,其中有关发展经济的奏折占其全部奏折的六分之一。康有为的一个重要经济观点,是把科学技术的发展看作是促进工业生产的关键环节,因此非常强调在工业方面奖励创造发明。为此,他在光绪二十四年五月初八(6 月 26 日)递上《请以爵赏奖励新艺新法新书新器新学,以励人才而开民智折》,建议光绪帝下令总理衙门议定劝励制新器、著新书专科,对有发明创造者,予以破格奖励,或准许专卖。五月十七日,光绪帝根据康有为的建议颁布上谕:各省士民著有新书及创行新法,制成新器,果堪实用者,允宜悬赏,或予实职,或表以殊荣;所制新器,颁给执照,酌定年限,准其专利售卖;有能独力创建学堂,开辟地利,兴造枪炮厂者,给予特赏。并命总理衙门拟定具体条例,"即行妥议具奏"。二十五日,总理衙门上奏《遵议优奖开物成务人才折》,并附《振兴工艺给奖章程》12 款。当日光绪帝颁发谕旨,谓总理衙门所拟章程"尚属妥协,著依议行"。《章程》主要内容为:一、对能采用新法,制造各种船械枪炮等新器而超过世界各国现有水平者;或以新法兴建大工程有利于国计民生者,可给予特赏,准其集资设立公司开办,给予专利权 50 年。二、对能制造人生日用之物而为西方各国所无者,可授以工部郎中之官职,并给以专利权 30 年。三、对能仿造西方各国器械而成就可用者,授以工部主事职衔,给以专利权 10 年。四、对有新著书,贯通中外政学,深明治体,或能发明经义者,给予特赏,授翰林院编检官职,或派充各省学堂总教习;对著有发明专门学问之新书者,可授庶吉士、主事、中书等官职,或令任外交、洋务及各省学堂分教习等职,其所著书享专售权 20 年。五、对能独捐巨款,或募捐集资兴办学堂、藏书楼、博物院、枪炮厂、辟地利者,按规模大小,给以不同世职或官职,或赐御书匾额,以示鼓励。六、对于现职官吏有符合以上奖励条件者,除有"特恩"字样者外,一般按照军功例,"就原官超擢"。这个章程第一次从法律上承认了中国民族资本主义工商业的合法性和科学技术发明创造的进步性。戊戌政变后,此章程仍得保全,对以后中国民族资本主义的发展起了一些促进作用。　(刘振岚)

礼部六堂官事件

清光绪二十四年(1898)百日维新后期,光绪帝毅然撤换六名阻挠上书言事的礼部尚书及侍郎事件。

是年六月十五日(8月2日)光绪帝发布谕旨,鼓励天下臣民上书言事,规定"部院司员"上书,由各堂官(清代对中央各部长官,包括管部大学士、尚书和侍郎的通称)代奏;士民上书,则由都察院呈递。强调各部"毋得拘牵忌讳,稍有阻格"。兹有礼部主事王照(1859—1933),字小航,直隶(河北)宁河人,进士出身。中日甲午战争后,倾向变法,且同情帝党。此人"性勇直",在上述谕旨发布后,感于光绪帝"求言之切",于当月拟折,"请皇上奉皇太后"游历日本及各国;并请设立商部、教部;又对守旧官僚进行尖锐抨击,"开人所不敢开之口"。此折拟就后,按照程序,即请礼部堂官代递。礼部尚书怀塔布(? —1900)、许应骙仍不守旧迂谬,不肯代递,尤对要求皇帝游历外国一事表示反对。王照坚请代递,谓:准与不准,出自圣裁,你们只负转呈之责,为何不允?怀塔布、许应骙仍不肯代呈。左侍郎堃岫、右侍郎溥颋也不肯代呈。王照怒,又具呈奏劾,指责礼部堂官阻挠新政;并亲到礼部大堂对堃岫、溥颋严正表示:皇上特许员司递折,不许阻格;若一定不肯代递,吾当亲到都察院递之。怀塔布不得已,答应代递,但许应骙又另作折,参劾王照"咆哮署堂,藉端挟制";又谓日本多刺客,李鸿章赴日签订《马关条约》之时,即曾被刺,王照竟请皇上游历日本,是"置皇上于险地,故不敢代递",王照显系"居心叵测,请加惩治"。七月十六日,光绪帝颁谕,明确表示,"广开言路",早经降旨申明,今怀塔布等对"前奉谕旨,毫无体会","著交部议处",并命嗣后一切条陈均须原封呈进,各部堂官"毋庸拆看"。次日再次颁谕,进一步宣示了保护士民上书言事的宗旨。后党大学士徐桐(1819—1900)为减轻对礼部堂官的处分,上折奏称:怀塔布的迟递,是旧习惯使然。查大清律例,应奏而不奏者,系私罪,应降三级调用。光绪帝由于长期受到后党压制,忿懑之情早郁于胸;诏定国是以来,后党顽固派大臣又处心积虑阻挠变法,不以新法为然,更觉忍无可忍。王照上书遇阻事发生后,即想借机打击顽固派气焰,以利新政推行。故不听徐桐之言,乃于七月十九日毅然颁谕,命将礼部尚书怀塔布、许应骙、左侍郎堃岫、署左侍郎徐会沣、右侍郎溥颋、署右侍郎曾广汉"均著即行革职",又表彰王照"不畏强御,勇猛可嘉",特赏给三品顶戴,以四品京堂候补,以示"激励"。次日即任命署汉军都统裕禄、仓场侍郎李端棻署礼部尚书;内阁学士寿耆、原詹事府少詹事王锡蕃署礼部左侍郎;翰林院侍读学士徐致靖、原通政司通政使萨廉署礼部右侍郎。二十二日,以上6人新任官职均予实授,同日又补授内阁学士阔普通武为礼部左侍郎。这就是震动一时的"礼部六堂官事件"。二十七日,光绪帝再次发布上谕,重申"广开言路"、"力除壅蔽"之宗旨;并命令各衙门将六月十五日、七月十六日、十七日鼓励上书言事的谕旨,以及十九日革礼部六堂官职的朱谕,同本日谕旨一起,统通录写一遍,张贴悬挂,使"触目警心",以杜绝阻格言路之事再生。礼部六堂官事件及光绪帝倡导"广开言路"一系列上谕的发布,一方面有力地打击了封建顽固派的气焰,促使各级官吏和士人争先恐后,踊跃上书。七月下旬,各衙门每日收到的奏折多至数十件,"厚或盈寸",甚至下层劳动群众,所谓"野民"、"渔人"等也有上书言事的,使维新派要求的言论自由在一定程度上得到实现。另一方面,这一事件也是改革派在人事安排上对后党顽固派的一次重大反攻,新任命的礼部7名堂官中,李端棻、徐致靖、王锡蕃、阔普通武均为维新官员;寿耆与萨廉虽属旧党,但既非后党嫡系,在维新变法时也没有进行露骨的抵制活动;只有裕禄一个人是慈禧宠信的顽固派官僚,正因此,此诏一下,"维新者无不称快,守旧者初而震恐,继而切齿",总的来看,维新派占据优势。应当说,不掌军政实权的光绪皇帝敢于打击后党骨干,无疑是一个果敢的举动,但他不加区别地将礼部六堂官一律革职,连未参与其事的徐会沣及到任仅两天的曾广汉也不能幸免,则显得策略欠佳。以致使新旧矛盾迅速激化,加速了政变的到来。 (刘振岚)

军机四卿之任用

清光绪二十四年(1898)百日维新后期,光绪帝为任用维新人士参预枢机的一项重大措施。

当年维新变法开始后,后党顽固派百般阻挠,肆意诋毁,光绪帝忍无可忍,利用手中有限的权力发起反击,在七月十九日(9月4日)毅然将阻挠上书言事的礼部六堂官革职。二十日,又采取了两项关系重大的措施:其一是任命几名倾向维新的官员为新的礼部堂官;其二是颁谕宣布:内阁侍读杨锐、刑部候补主事刘光第、内阁候补中书林旭、江苏候补知府谭嗣同"均著赏加四品卿衔,在军机章京上行走,参预新政事宜。"

杨锐(1857—1898),字叔峤,四川绵竹人。举人出身。张之洞弟子。光绪十五年起任内阁中书,政治上与张之洞关系密切,在北京做官时,经常书写密札给张之洞,向张密报朝廷政治动态和"宫闱禁事"。光绪二十一年《马关条约》签订后,感于时局危迫,支持变法,在北京参加强学会。二十四年春倡立蜀学会,后并入保国会。六月十八日,湖南巡抚陈宝箴向光绪帝疏荐杨锐,称其"才学淹通,志性端谨"。七月十六日杨锐受到光绪帝召见。刘光第(1859—1898),字裴村。四川富顺人。进士出身,授刑部主事。中日甲午战争时期,曾上书光绪帝,提出四条建议:一请皇上乾纲独断,以一事权;二请皇上下诏罪己,固结人心;三请严明赏罚,以操胜算;四请隆重武备,以振积弱。刑部堂官不为代奏。光绪二十一年以亲丧去官,教授乡里,提倡实学。二十四年春列名参加保国会。六月十八日,与杨锐一起被陈宝箴疏荐于光绪帝,荐折称其"器识宏远,廉正有为"。七月十九日受到光绪帝召见。林旭(1875—1898),字暾谷。福建侯官(福州)人。举人出身。《马关条约》签订时,曾上书请拒和议,继而入赀为内阁中书。曾慕名拜访康有为,对康的政治见解和学术思想非常崇拜,遂受业为弟子,并曾为康著《春秋董氏学》一书作跋,热心宣传康有为的思想和学说。光绪二十四年正月,在北京倡设闽学会。三月康有为组织保国会,林奔走其间不遗余力。七月十三日,詹事府少詹事王锡蕃向光绪帝疏荐林旭,称其"才识明敏","英年卓荦"。几天后,受光绪帝召见。谭嗣同(1865—1898),字复生,号壮飞。湖南浏阳人。近代著名政治家、思想家、资产阶级维新派主要代表人物之一。其父谭继洵,官湖北巡抚。少年时期,师从欧阳中鹄。鄙薄科举,喜好今文经学,赞赏龚自珍、魏源诸家,又乐读王夫之《船山遗书》。光绪十年,入新疆巡抚刘锦棠幕。此后10年间往来于西北、华北、东南各省,视察风土人情,结交社会名士,曾发出"风景不殊,山河顿异,城郭犹是,人民复非"的感叹。中日甲午战争后,愤中国积弱不振,大力提倡新学,呼吁维新变法,大胆提出"尽变西法"的主张,当年即在浏阳创设算学馆,开湖南维新风气之先。二十二年二月(3月)入京,三月结识梁启超,四月谒见翁同龢,不久奉父命以同知入赀为江苏候补知府,六月供职南京。此后一年内撰成其代表作——《仁学》,尖锐批判封建专制制度和纲常伦理,痛斥封建君主为独夫民贼,倡言君主"不善,人人得而戮之";又抨击"三纲五伦"为封建帝王"钳制其下"的工具和手段,"能制人之身者,兼能制人之心",其中尤以"君为臣纲"一伦最为"黑暗否塞";进而大胆提出冲决一切封建"网罗"的口号;并对法国资产阶级革命和清末太平天国农民起义寄予一定程度的同情;同时提出发展资本主义的政治、经济主张,赞美资本主义机器大生产。由于谭嗣同在《仁学》一书中对封建君权和纲常伦理批判的尖锐性和深刻性;也由于他对法国大革命和太平天国农民起义的赞颂和同情超出改良思想范畴,使他成为资产阶级维新派最激进的思想家。光绪二十三年,谭嗣同应陈宝箴之邀,回到湖南开展维新活动。当年在长沙协助陈宝箴等创设时务学堂。二十四年又参与筹设南学会,与唐才常创办《湘报》,宣传维新变法,推进湖南新政,致使湖南成为全国维新运动最为高涨的省区。四月二十五日,即明定国是诏颁布的第二天,侍读学士徐致靖上《保荐人才折》,称谭嗣同"天才卓荦,学识绝伦,忠于爱国,勇于任事,不避艰险,不畏谤疑,内可以为论思之官,外可以备折冲之选"。当日即奉谕:"送部引见。"谭嗣同大为振奋,以为"朝廷毅然变法,国事大有可为",遂起程北上,因病,途中稍事延误,七月初五到京。几天后受到光绪帝召见。

七月二十一日,光绪帝又分别授四人以朱谕:"凡有所见,及应行开办等事,即行据实条陈","万不准稍有顾忌欺饰",意在鼓励他们放手经理变法新政。故对四人任用官阶虽不高,职务却重要,具体负责草拟新政诏书,批阅臣工奏章,帮助光绪帝处理新政事务,实则参预枢机,为皇帝近臣,时称"军机四卿"。光绪帝毅然任用军机四卿,是改革派在人事安排上的一次重大举措。原来,光绪帝虽有意重用康有为,但"上畏西后,不得行其志",翁同龢又遭罢斥,致使新政乏人辅佐。任用军机四卿,则辅佐得人,使旧有军机大臣降低了权威,大大有利于新政的推行。同时军机四卿也可沟通康有为等维新派与光绪帝之间的联系。据康有为称,从此以后,光绪帝有事要传达,康有为有事需向光绪帝禀报,都是通过谭嗣同和林旭中间传递。军机四卿虽共同赞襄新政,但态度各异。谭嗣同积极奋发,思想激进,勇于任事,富于牺牲精神。林旭也能积极任事,对变法新政抱有极大热情,并曾与谭嗣同一起主张设立议院。唯因年少,而略嫌"轻躁"。杨锐宗本洋务派思想,与维新派思想差距颇大,曾谓康有为学说"多谬妄",又谓光绪帝"误听于康有为",故在处理新政事务中常"稍加裁抑"。军机四卿例分两班办公,杨与林旭同在一班,而与林旭较为激进的维新思想不相适应,对林处理条陈常不满意,有时强令其改换三四次,并曾当面"加责"。

他还在背后对人说过，恐怕以后日久天长，与林不好合作；兼之他担心朝局不久会有变动，所以曾打算“抽身而退”，但终究并未离去。资产阶级革命家章炳麟曾谓杨锐是因为贪图“富贵利禄”，而“恋之不能去也”。刘光第思想调和，畏惧新旧斗争，也曾想解职归里，但又以“圣恩高厚，急切不忍去”，故对政事抱着“无新旧畛域之分”的态度，极力想调和其间，使“维新守旧，咸得其宜”。但在紧要时刻，也能表现出牺牲精神。七月二十六日，湖南守旧派曾廉罗织罪名，上折请杀康有为、梁启超，光绪帝令谭嗣同逐条驳斥。谭驳云：“臣嗣同以百口保康、梁之忠，若曾廉之言属实，臣嗣同请先坐罪。”刘光第（与谭一班）表示也要署名，谓：“臣光第亦请先坐罪。”致令谭肃然起敬。军机四卿当班仅半月，政变发生，均被杀。（刘振岚）

戊戌密谋

清光绪二十四年（戊戌年，1898）康有为等维新派为捕杀西太后，夺取后党顽固派实权而密议的武装政变计划。

光绪帝诏定国是后，维新变法运动全面高涨，然而受到以慈禧为首的后党顽固派的严重阻挠。鉴于清朝统治实权掌握在慈禧太后手中，康有为逐渐萌生了除掉慈禧，由光绪帝亲掌大权，雷厉风行推行新法的设想。但在百日维新以前，仅与少数维新人士议及此事，尚无行动。此后，由于康有为与支持变法的户部侍郎张荫桓密切往来，闻悉不少有关慈禧苛待光绪帝的密闻掌故，使康对光绪帝无权的处境知之更深，除掉慈禧的决心更坚。四月二十八日，康有为受到光绪帝召见，从言谈中，康切实感受到顽固派对推行新法的阻力与威胁，随即和几位维新志士开始策划由维新派掌握兵权、调集军队，发动一场“尊君权”、“去太后”的军事政变秘密计划（时称“戊戌密谋”），并在新旧斗争日趋尖锐的过程中逐步具体化。

为了动员力量，阐明维新派掌握兵权的必要性，他们首先从舆论下手。原来，四月二十七日，慈禧曾以光绪帝名义颁谕当年秋她要携光绪一起到天津阅兵。其时，新旧两党斗争激烈紧张，康有为、梁启超利用人们对后党顽固派可能会发动政变的猜度心理，编造了一种说法：慈禧此举目的在于借阅兵之机，废黜光绪帝位，扑灭新政。很快，慈禧“九月阅兵于天津，以为废立之计”的消息不胫而走，传遍宫廷内外，大大加重了当时的紧张气氛。于是，维新派密谋军事政变就有了一个顺应时势、吻合人心的巧妙借口：防范“天津废立之计”。第二步是物色一位倾向维新而又干练的“将材”，来实施秘密计划。康有为选中了袁世凯。袁世凯（1859—1916），字慰亭，河南项城人。出身官僚地主家庭，是淮军将领袁甲三（1806—1863）的侄孙。青年时期两次投考举人不中，愤而不再走科举道路。光绪七年任淮军将领吴长庆（1834—1884）幕僚。次年，因朝鲜事大党发动兵变，中日两国各派军队入朝，他随吴长庆军到朝鲜。不久显出办事才干，受到李鸿章赏识。光绪十一年升任驻朝鲜总理交涉通商事宜的全权代表。甲午战争后，由于善于钻营，任荣禄署下新建陆军督办，在天津小站以西法练兵。一年后，练成一支拥有西式装备的新建陆军7千人，博取了知兵之名。光绪二十一年强学会成立时，他曾捐银500两入会，并呼康有为为“大哥”；百日维新开始后，翁同龢被慈禧罢黜回籍，路过天津时，他又派人持函慰问，进献厚礼，表示同情帝党。所以康有为认为他“知外国事，讲变法”，又“拥兵权，可救上者，只此一人”。为了慎重起见，康有为于六月派好友徐致靖的侄子徐仁禄专程去天津小站袁世凯军营探风，进一步考察袁的政治态度，但未能面见，仅由袁的智囊、新建陆军营务处负责人徐世昌代为传话。徐仁禄所得印象是，对于康有为，袁世凯颇说了几句恭维话，诸如“悲天悯人之心，经天纬地之才”云云；而对于时局发展趋势，仅虚与委蛇，“应以模棱语”。康有为碰了软钉子，只好另想办法。七月十九日（9月4日）左右，他又派徐致靖和谭嗣同先后拜会王照，请王照赴芦台游说荣禄手下另一将领——武毅军首领聂士成（此时聂正统5000军驻芦台），打算先征求其同意，然后召其入觐，令其支持新政，保护光绪帝；且许以代荣禄为直隶总督。王照为新党中坚分子，平时与康有为关系密切，但不同意康的秘密政变计划，因此拒绝所请，声言“王小航（王照字）不作范睢（战国时魏国人，后入秦为相，曾说秦王除太后党）！”康有为也感到请聂士成未必比请袁世凯更有把握，因此作罢，仍属意袁世凯。林旭认为袁老谋深算，狡诈多智，恐事成难制，不可靠，请召董福祥。董为甘军首领，亦属荣禄统辖。此人虽不似袁世凯之狡诈，却无倾向维新的表现，故康有为仍一厢情愿地把希望寄托在袁世凯身上。七月下旬，康有为上了一道密折，建议光绪帝仿照日本参谋部办法，选天下“虎罴之士，不二心之臣”置于左右，由皇上亲自统兵，以掌大权。二十六日，徐致靖应康有为之托，上奏了一个由康草拟的推荐袁世凯的奏折。荐袁的目的是为实施维新派的政变计划，但却不能对光绪帝明说，只建议皇上召见袁世凯，予以加官优奖，厚其兵力，以资御

侮。同时康又令谭嗣同上密折荐袁,请重用袁世凯,以备不测。光绪帝接受所请,当天即传谕,令袁来京陛见。二十九日,袁世凯到京。

也在二十九日,光绪帝到颐和园向慈禧请安,同时请示开懋勤殿以议制度之事,慈禧一反常态,陡然变色,训斥光绪。光绪帝有如五雷轰顶,意识到大势已危,焦灼不安。次日,召见杨锐,授以"密诏"一道,令其会同林旭、谭嗣同、刘光第等维新人士"妥速筹商"救援办法,诏中有"朕位且不能保,何况其他"一语。八月初一、初二,光绪帝连续两次召见袁世凯,特赏他候补侍郎头衔,嘱他好好练兵,并告他此后可不受荣禄节制,各办各事,确有笼络之意。但光绪帝并不知道维新派的密谋,因无人敢对他明言。光绪帝因下第一道"密诏"后,迄无回音,又在初二召见林旭,授以第二道"密诏",令康有为火速离京。原来杨锐接第一道"密诏"后,心慌意乱,胆小怕事,竟迟延两日未将"密诏"传出,此时才传给林旭。初三晨,林旭将两道"密诏"一起传给康有为。康立即召谭嗣同、梁启超等共同商议,几位相抱痛哭,筹划多时的秘密政变计划还远未部署完毕,形势已急转直下。在慌急中,只好孤注一掷,提前实施军事政变计划。决定当夜即由谭嗣同赴法华寺袁世凯居所,以光绪帝授予杨锐之第一道"密诏"为上方宝剑,说袁起兵勤王。忠勇的谭嗣同,一腔热血,将生死置之度外,一见面,即单刀直入,对袁世凯和盘托出维新派军事政变计划的全部内容,以期必成,否则即与袁以生死相拚。谭嗣同披露的军事政变计划如下:先由谭嗣同上一道密折,开列荣禄阴谋废立弑君等罪状,要求光绪帝在袁世凯八月初五"请训"(清制:奉召到京之官员回任前须再次觐见皇帝,请示训诫,称请训)时,给袁下一道密诏,令袁率兵赴津,传见荣禄,对其宣读皇上密诏,立即正法,即以袁世凯取代荣禄为直隶总督,并张贴告示,公布荣禄罪状,然后派兵占领电报局及铁路沿线,同时以火车载袁部军队入京,一半包围颐和园,一半守皇宫,保护皇帝,"复大权,清君侧,肃宫廷"。袁世凯曾诘问:包围颐和园"意欲何为?"谭嗣同答称:"不除此老朽,国不能保",意即杀掉慈禧。袁世凯老奸巨猾,借口手下军官皆旧人;枪弹火药又都由荣禄掌握;且天津小站距北京200余里,恐中间辗转,稍有差迟,即难免败露等情,不肯立即起兵勤王。但又害怕谭嗣同与他拚命,因此提出,俟九月天津阅兵时,皇上可跑到他的军营,传号令以除奸贼,则我袁某"诛荣禄如杀一狗耳!"谭嗣同只好接受了这个办法。关于杀慈禧一节,谭嗣同未对袁世凯详细说明,因为康有为另有布置。七月二十九日,即袁世凯被召进京的同一天晚上,康有为秘密会见了湖南会党领袖毕永年(1869—1901)。毕系谭嗣同、唐才常的好友,为人侠义豪爽。康有为与之见面后,即开诚布公对他说:"吾欲效唐朝张柬之(625—706,唐武周后期宰相,705年发动政变,迫使武则天退位,恢复中宗帝位)废武后之举!"并说明已奏请皇上,召袁世凯入京,目的就是使用他的武力完成此举。八月初一,康有为再召毕永年,给他布置了一项特殊任务,让他到袁世凯军中,监视袁的行动;当袁奉诏率兵包围颐和园时,他即率百名勇士"往执西后而废之"。初三,康有为接读光绪帝两道密诏后,形势已万分紧迫,康连忙派人对毕永年明确表示:康先生之意,对于慈禧,奏知皇上时,只言废之,其实是让你在乱军中"执而杀之"。可惜,次日慈禧太后已由其它因素激发,匆匆从颐和园赶回紫禁城,囚禁光绪帝,发动政变。初六,重新宣布训政,百日维新结束,维新派的"密谋"流产。维新派策划谋围颐和园、捕杀西太后的武装政变的密谋,显示出这场资产阶级改良运动并不完全和平。

(刘振岚)

戊戌政变

清光绪二十四年(戊戌年,1898)八月慈禧太后发动的推翻戊戌新政的宫廷政变。

百日维新开始时,掌握清朝军政实权的慈禧太后由于以下原因,对维新派和帝党的变法暂时采取了容忍态度:一、甲午战败,《马关条约》丧权辱国,激起全国人民愤慨,后党集团在战争中一味避战求和,妥协投降,对战败签约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慈禧畏惧"外患日急,人心激昂",不得不在政治上暂时退缩。二、社会上救亡图存、维新变法的呼声已形成强大舆论,慈禧不得不稍顺舆情,以示不无"改弦更张"以"救时"之意。三、作为清朝实际上的最高统治者,慈禧太后并不死死地站在顽固派一边,她的统治权力建立在顽固派与洋务派互相牵制与平衡的基础之上,她并不反对洋务派的路线和政策。只要变法不出洋务派"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范围,她是可以接受的。四、对于康有为为首的维新派她是要坚决镇压的,也不能容许光绪帝实行维新派的路线和政策。所以从一开始她即做着政变的准备,但须从容布置,待机而动。五、光绪十五年她已宣布"归政",戊戌年春光绪帝又大胆向她要权:"太后若仍不给我事权,我愿退让此位,不甘做亡国之君。"对于这位已经"亲政"、得到维新派支持、受到英、美列强关注的青年皇

帝的废立，她不能无所顾忌，在他没有明显出轨的行为之前，她既不能擅行废立，也不能完全不给他"事权"。故此对光绪的争权，她表示："由他去办，俟办不出模样再说。"她的对策是牢牢抓住从中央到地方的军政实权，绝不容许光绪排斥她的亲信，更不能容许他在朝廷内结成自己的党羽。为此，四月二十七日，即维新变法的第四天，她就胁迫光绪帝下了三道谕旨(参见"己酉三旨")。二十八日，任命后党崇礼署步兵统领。五月初六，派后党骨干怀塔布管理圆明园官兵，刚毅管理健锐营。这样，慈禧除掉了光绪最宠信的重臣翁同龢，控制了高级官吏的任免权，并由其心腹党羽荣禄控制了北洋三军及京畿重地，怀塔布和刚毅等掌握了北京城内的军事指挥权及警卫权。在完成上述部署后，直到七月中旬，慈禧再没有什么大的举动，她住在颐和园里，静观着光绪帝发布的一道道新政诏旨，冷视着帝党君臣和维新派为变法新政付出的焦虑和操劳。当时从中央到地方，掌握军政实权的官吏均系慈禧所任用，他们对新政的态度以慈禧的好恶为依归。认真办理新政者，仅湖南巡抚陈宝箴一人，其他督抚对新政诏书一概采取抵制的态度。尽管光绪皇帝曾"三令五申"，"数四严责"，但"终不能去一人或惩一人"，因为光绪对督抚皆"无用舍之权"，故督抚"皆藐视之"。

有一点慈禧和荣禄看得很准，即随着变法新政的推行，会触及到顽固派的阶级利益而调动起他们对新政的仇恨。废除八股取士制度，使醉心科举的封建士子失去"安身立命之业"；裁汰绿营，使平日坐吃空额的腐败军官断绝了"外快"；要八旗旗丁"自筹生计"，"各习四民之业"，又使清朝入关250年来过惯寄生生活的满人失去特权。这些改革措施虽不能根本动摇封建专制制度，却处处牵动封建官僚及其社会基础的既得利益，而引起他们的拚死反抗。七月中旬，光绪帝在官制改革和人事任免方面大胆地采取了三项措施：一是大裁冗员。七月十四日，颁谕裁撤詹事府、通政司、光禄寺、鸿胪寺等闲散衙门，并裁撤湖北、广东、云南三省巡抚(因这三省督、抚同城)、东河总督等重叠机构。二是七月十九日，将阻挠上书言事的礼部尚书怀塔布、许应骙等六名堂官全部革职。三是二十日任用谭嗣同、杨锐、刘光第、林旭四人为军机章京上行走，参预新政事宜。裁撤闲散衙门，使那些长年尸位素餐的官僚"失其所恃"，人事任免又使顽固派受到沉重打击，改革派力量得到加强，尤其是军机四卿的任用，"谕旨皆令拟撰，宠任在军机大臣上"，更使顽固派忍无可忍，新旧两党矛盾迅速激化。顽固派大臣纷纷活动，策划政变。怀塔布被免职后，他的老婆到颐和园向慈禧太后哭诉；准旗人"自筹生计"的上谕颁布后，管理皇室事务的内务大臣立山(?—1900)等率下属官员数十人"环跪于西后前"，哭诉新政对满人之不利；怀塔布与后党御史杨崇伊等先后到天津与荣禄密谋策划，伺机反扑；庆亲王奕劻、端王载漪(1856—1922)等亦一同哭请慈禧太后重新垂帘听政。慈禧感到有必要行动了。特别是七月末光绪帝的几个动作，更成为她发动政变的直接动因：一、请开懋勤殿以议制度。光绪帝在百日维新初期就准备采纳康有为开制度局的主张，因顽固派大臣阻挠而未能实现。后康有为又提出仿前朝故事，开懋勤殿招纳维新人士为顾问官，"延聘东西各国政治家共议制度"，与制度局的作用相同。七月二十八日，光绪帝采纳康有为建议，并已拟好包括康、梁在内的顾问官名单，次日，到颐和园请示开懋勤殿事。如能实现，即意味着维新派上台。慈禧勃然变色，发怒骂道："小子以天下为玩弄，老妇死无所矣。"二、召见袁世凯。这是康有为等围困颐和园，劫持西太后的秘密军事政变计划的重要环节。七月二十六日，康有为请徐致靖和谭嗣同分别上折推荐袁世凯，"请予破格之擢"，厚其兵力，"使之独当一面，永镇畿辅"。光绪帝不知维新派的"密谋"，但为捍卫新政，防范顽固派反扑，当天即传谕，令袁来京陛见。八月初一、初二，两次召见，赏其侍郎衔，责成专办练兵事宜，暗示其可不受荣禄节制，直接向皇帝负责。此举引起慈禧及后党集团的极大不安和疑忌，他们害怕光绪和维新派掌握了兵权会危及自己的权位。三、准备召见日本前首相伊藤博文。伊藤博文是日本前内阁总理大臣，明治维新时期曾积极策划和推行改革政策。戊戌变法时期以个人游历名义来华。七月二十九日到达北京。在慈禧、荣禄等人看来，康有为等书生并不足畏，他们最担心维新派与外国势力结合；最害怕光绪在帝国主义扶植下从慈禧手中夺回统治实权。后党集团深知，伊藤来华，决不是为了"游历"。按照当时报界的分析，伊藤"此行关系甚大"，其来华"颇有深意存焉"。确实，伊藤此来是为了解中国变法的情况，企图对中国维新运动施以影响，使之纳入符合日本侵略利益的轨道。而维新派对伊藤在日本明治维新时期的业绩颇为景仰，希望他能帮助中国谋划新政。故伊藤到京后，康有为即专程拜访，告以光绪无权，慈禧掣肘，顽固守旧大臣阻挠变法等情，请伊藤在觐见慈禧时"剀切陈说"，使"太后回心转意"。不少维新人士奏请皇帝，聘任伊藤为新政顾问官。与此同时，

康有为还建议邀请英国传教士李提摩太担任顾问，又令杨深秀和宋伯鲁疏荐伊藤博文和李提摩太。光绪帝接受建议，定于八月初五接见伊藤博文，初八接见李提摩太，准备聘为顾问官。面对这种局势，后党集团异常惶惧，慈禧决定抢在光绪帝接见伊藤之前发动政变。

经过后党周密策划，由杨崇伊首先发难。杨崇伊，字莘伯，江苏常熟人。光绪进士，授编修，任监察御史，李鸿章姻亲，并为荣禄所倚重，乃后党中坚。光绪二十一年曾上折攻击强学会，二十二年又秉承李鸿章意旨，疏劾文廷式。二十四年百日维新期间，往来于京、津之间，与荣禄密谋政变。八月初三，杨崇伊向慈禧上密折，请太后"即日训政"。密折主要说了三件事：一曰："今春会试，公车骈集，康有为偕其弟康广仁及梁启超来京讲学，将以煽动天下之士心……不知何缘，引入内廷。"二曰："两月以来，变更成法，斥逐老成，借口言路之开，以位置党羽。"三曰："风闻东洋故相伊藤博文，即日到京，将专政柄……伊藤果用，则祖宗所传之天下，不啻拱手让人。"前两条说出了顽固派蓄谋政变的基本原因；后一条说出了慈禧发动政变的直接动因。杨折仅400余字，却足以成为慈禧发动政变的根据。同日，后党主将荣禄调兵遣将，为慈禧发动政变预作军事部署。他在一天内连发三封电报，佯称英、俄在海参崴开战，英国军舰突然入泊塘沽口内，调董福祥军进驻天津陈家沟，以切断京、津交通；令奉召进京的袁世凯"即日回防"(袁因须等待初五"请训"，未能即日回防)。至此，政变之弓已张满，只待箭发。

在变法新政的危急时刻，康有为为首的维新派为挽救新政做过殊死努力。七月二十九日，慈禧为开懋勤殿事发怒后，光绪帝意识到大势已危，次日即召见杨锐，赐给"密诏"一道，令其会同林旭、刘光第、谭嗣同等维新人士"妥速筹商"救援办法，诏中有"朕位且不能保，何况其他"一语。八月初二慈禧面告光绪：康有为"紊乱朝纲，诽君谤上"，应"拿办"。当日，光绪帝即召见林旭，授以第二道"密诏"，令康有为火速离京，脱离险境。原来杨锐接第一道"密诏"后，"震恐不知所为计"，竟延误两日未将"密诏"传出，此时才传给林旭。初三晨，林旭将两道"密诏"一起交给康有为。康有为立即召梁启超、谭嗣同、康广仁等共同商议救援之法，决定采取两条对策，一是请求帝国主义出面干涉。康有为、容闳、梁启超分别找过英、美公使及李提摩太、伊藤博文等人，但均落空。英、美、日帝国主义为与支持慈禧的沙俄抗衡，企图扶植光绪帝向后党夺权，进行符合他们侵略利益的改革；康有为等也主张实行联络英、美、日以制俄的外交政策。随着维新运动的发展，英、美、日帝国主义发现帝党和维新派毫无实力，并认为维新派的变法"过分急于求成"，是"不合实际的"。其实是唯恐维新运动把中国"弄得不成样子"，妨碍他们在华的侵略利益，故称赞"太后是宫廷中唯一头脑清晰的人"，而她之干涉"是有裨于时局的"，所以不愿给维新派以实际的帮助。二是借用袁世凯的军事力量发动一场推翻慈禧太后的武装政变。当晚，谭嗣同往法华寺袁世凯居所，当面说袁起兵勤王，要袁先在天津杀荣禄，然后率兵进京，以一半包围颐和园，劫持西太后；一半守卫皇宫，保护光绪帝，"复大权，清君侧，肃宫廷"。袁佯作应允，唯借口枪械、子弹均由荣禄控制，一时不及准备，须俟九月光绪奉慈禧赴天津阅兵时才能执行(四月二十七日慈禧曾颁诏，预定九月至天津阅兵)，谭只得同意。他却不知政变之箭已在弦上。初四，慈禧突然从颐和园回宫，训斥光绪："我抚养汝二十余年，乃听小人之言谋我乎?"光绪良久才说："我无此意。"慈禧唾之曰："痴儿，今日无我，明日安有汝乎?!"遂命将光绪软禁于南海瀛台涵元殿，派亲信太监严加看管，截断了他同外界的一切联系。光绪帝作为百日维新的最高决策人，他的被囚禁，意味着百日维新事实上的终结。故此八月初四，乃慈禧发动政变之日(另说初三、初五、初六)。初五，在慈禧的严密监视下，光绪最后处理了两件原先预定的政务，一是召见袁世凯"请训"；二是召见伊藤博文。初六，慈禧以光绪有病为辞，宣布第三次临朝"训政"。同日，以"结党营私，莠言乱政"的罪名，下令逮捕康有为及其弟康广仁。康有为已于前一日遵照光绪帝前发密诏，离京南下，后乘英轮逃往日本。袁世凯在初五请训后立即回津，径奔直隶督署，向荣禄报告谭嗣同等"杀禄锢后"的"密谋"。荣禄大吃一惊，但并未立即向慈禧告密，因虑维新派"密谋"会涉及光绪帝，一旦揭开，光绪被废，则易引来外国干涉，势必危及后党政权。故此沉吟良久，直至初六晚杨崇伊自京来津报告政变已"自内先发"，才拟密折，次日由杨崇伊转托奕劻，报于慈禧。慈禧得报大怒，立即于初八审讯光绪关于谋围颐和园之事，光绪表示不知。初九，慈禧下令逮捕"叛逆要犯"谭嗣同和杨锐、刘光第、林旭、杨深秀。十三日，五人连同先遭逮捕的康广仁一起被斩于北京菜市口，史称"戊戌六君子"。八月初十，梁启超乘日本轮船逃往日本。其他还有维新人士及帝党官员多人，或开缺回里，或革职拿问，或遣戍边疆。戊戌变法失败。

慈禧太后训政后，曾令军机大臣议论新法旧法之利弊，以决是否废新复旧。新任军机大臣启秀（？—1901）极言"非废新法，则训政为无名"，刚毅谓：新法皆康有为臆造，"今用新法，是用有为，以叛徒执政，实从古所无"，慈禧遂决定恢复旧制。八月十一日开始，陆续下诏恢复詹事府等衙门，广东、湖北、云南三省巡抚亦重新设置；停止普通官吏和百姓上书言事；取消官办《时务报》，全国报纸一律停办，并捉拿各报主笔；恢复八股取士制度；停办经济特科，恢复武科弓箭刀石之试等等。但对向来实行的洋务，如"通商、惠工、重农、育才以及修武备、浚利源"等项，并不废除，而要"切实次第举行"。正因此，才有光绪二十七年之所谓"清末新政"。　　（刘振岚）

戊戌喋血

清光绪二十四年（戊戌年，1898）八月（9月）慈禧太后发动政变，推翻新政，斩谭嗣同等六君子于菜市口的历史事件。

是年八月初六，慈禧太后政变成功，重新临朝训政，其首要之举，即捕杀维新人士。当天即颁谕：康有为"结党营私，莠言乱政"，著革职，并与其弟康广仁一起"拿交刑部，按律治罪"。康有为前一日已奉光绪帝"密诏"离京南下，后在英国轮船帮助下，逃往日本。康广仁被捕。康广仁（1867—1898），名有溥，字广仁。少年时代即因鄙薄科举功名而放弃投考，曾任浙江保甲小吏，后因不满官场腐败而辞职，协助其兄从事变法活动。光绪二十三年在澳门办《知新报》；又在上海办大同译书局，参预发起不缠足会。二十四年百日维新期间，帮助康有为草拟新政奏稿。他特别重视变革科举制度，当五月初五废八股取士制度的诏令下达后，以为顽固派势力强大，光绪帝又无实权，全面变法恐难以有成，故劝其兄南归办学，培养变法人才，三年后再谋大行改革，也不为晚。但康有为未纳其言。他被捕后，谈笑自若，谓："若死而中国能强，死亦何妨"；"八股已废，人才将辈出，何患无继哉！"八月初六，梁启超闻政变消息，即避往日本公使馆，拜谒正在华"游历"的日本前首相伊藤博文，请其帮助光绪帝和康有为脱险。次日，谭嗣同也来到日本使馆，劝梁出逃，并将自己所作书稿及诗文稿交梁收藏，悲壮地对梁说："不有行者，无以图将来；不有死者，无以酬圣主。"意即让梁做行者，继续为变法事业奋斗；自己留下来，决心为变法而死。谭嗣同从事维新运动以来，一直有为变法而献身的思想准备。当戊戌年春湖南维新运动受到顽固派攻击，有人表现退缩时，他就很不以为然，谓："平日互相劝勉者，全在'杀身灭族'四字，岂临小小利害而变其初心乎？""今日中国能闹到新旧两党流血遍地，才有复兴之望。不然，则真亡种矣。"故此，政变发生后，当日本友人劝他与梁启超一同逃走时，他毅然表示："各国变法，无不从流血而成，今中国未闻有因变法而流血者，此国之所以不昌也，有之，请自嗣同始。"坚不肯逃，初九被捕。在狱中曾赋《题壁诗》一首云："望门投止思张俭，忍死须臾待杜根。我自横刀向天笑，去留肝胆两昆仑。"同日被捕者还有与谭嗣同同为"军机四卿"的林旭、杨锐、刘光第以及御史杨深秀等人。杨深秀在政变后，仍不避艰险，诘问光绪帝何故被废？并吁请"太后撤帘归政"。初九，正欲往南苑召董福祥军救光绪帝，刚出门，搜捕新党的清军已到，遂被捕。在狱中吟诗数首，其中有句"缧绁到头真不怨，未知谁复请长缨"，仍挂怀于挽救变法事业。杨锐是张之洞的忠实门徒，乃变法中的右翼。七月三十日接到光绪帝第一道密诏后，曾向光绪帝复奏三条建议：一、皇上之天下，得自太后，故对太后应当顺从，不宜固执己见；二、变法应分轻重缓急；三、大臣之升迁贬斥"不宜太骤"。并对"密诏"中所言"将旧法尽变，而尽黜此辈昏庸之人"，"登进通达英勇之人，令其议政"等语，震恐不知为计，耽搁两天才传给林旭。被捕后又呼冤："我当差方五日，而又未上一折，同遭祸，岂非冤孽乎？"张之洞曾致电盛宣怀转军机大臣王文韶，请其设法营救，谓杨"素非康党，平日议论，诋康之处，不一而足"，"此次被逮，实系无故受累"；又致电荣禄，"愿以百口保杨锐"。但毕竟由于杨锐为军机四卿之一，参预新政枢机，被后党视为皇帝近臣，所以非杀不可，一切保奏均无效力。八月十三日，康广仁、杨深秀、杨锐、林旭、谭嗣同、刘光第六人未经审讯，即被提出西门。刘光第曾在刑部任职，知提犯人自东门出则生，西门出则死，故大声问道："未讯而诛，何哉？"值事官命其跪下听旨，竟立而不跪，遂将六人绑赴菜市口，以"大逆不道"罪，宣布"著即处斩"。行刑时，"人头拥挤"，"观者如堵墙"。林旭最年轻，仅23岁，思想激进，曾反对依靠袁世凯保护新政，未被采纳。临刑时，态度激昂，要求监斩官刚毅允许他讲几句话，但横遭拒绝。谭嗣同不顾阻拦，勇敢地对行刑官喊道："为了救国，我愿洒了我的血，但是今天每一个人的牺牲，将有千百人站起来继续进行维新的工作，尽其忠诚去反抗篡夺。"最后又呼道："有心杀贼，无力回天，死得其所，快哉快哉！"说罢，从容就义。同时被杀的六位维新人士，史称"戊戌六君子"。

康有为、梁启超虽逃往日本，但慈禧多次下谕，令各省督抚"一并严拿惩办"。八月十六日下谕，命将康有为所有书籍版片，由地方官严查销毁，又命两广总督谭钟麟督饬地方官查抄康、梁原籍财产，捉拿康、梁家属到案，并根究康、梁下落，悬赏严拿。结果，康、梁家属避至澳门，后康有为家属又去香港。

其他因主张变法而获罪的维新人士和帝党官员还有多人：李端棻(1833—1907)，字苾园。贵州贵筑(今并入贵阳)人。进士出身，授翰林院编修，累官至侍郎，并多次任乡试主考官。在广东主持乡试期间，发现梁启超文才超群，以堂妹李蕙仙配与梁为妻，从此与维新派关系密切，以后又荐康有为、谭嗣同等赞助新政。百日维新时，因礼部尚书怀塔布、许应骙被罢职，他被擢为礼部尚书。政变后被革职，遣戍新疆。徐致靖，原翰林院侍读学士，曾保荐康有为、梁启超等维新人士，又屡上新政奏议。礼部六堂官被革职后，他被擢为礼部侍郎。政变前，曾疏荐袁世凯，又曾令其侄徐仁禄至小站试探袁世凯动向。政变后，被捕系狱。张荫桓(1837—1900)，字樵野。广东南海人。光绪八年起任职于总理衙门，后出使美洲，归国后仍在总理衙门任职，后擢户部右侍郎。百日维新期间被命管理京师矿务铁路总局，外交上主联英、日，为新党外交柱石。伊藤博文来京时，他曾设宴款待，又带领其觐见光绪帝。政变后，慈禧欲处以死刑，经英、日公使保护，谓"如杀张，将引发列强之干涉"，遂改为流戍新疆。宋伯鲁(1854—1932)，字芝栋，陕西醴泉人。进士出身。曾入翰林，后任御史。光绪二十三年德国强占胶州湾后，有感于民族危机，赞成变法。次年倡设关学会，后并入保国会。百日维新期间，屡上新政奏议，首请废八股，继议开懋勤殿，并曾为康有为代递变法奏章；又与杨深秀合劾礼部尚书许应骙"守旧迂谬，阻挠新政"。政变后革职，永不叙用，遂避居上海，受英国领事庇护。陈宝箴，湖南巡抚，为督抚中唯一认真推行新政者。百日维新期间，曾举荐杨锐、刘光第等参预新政，但反对康有为《孔子改制考》及民权平等学说。政变后被革职，永不叙用。黄遵宪，光绪二十二年参与创办《时务报》，二十三年任湖南长宝盐法道、署湖南按察使，襄助陈宝箴推行新政，参预时务学堂和南学会的创办工作，并为《湘报》撰稿。百日维新期间，被命以三品京堂出使日本大臣，因病未能就任。政变后，被劾"奸恶与谭嗣同等"，其上海住所曾被清兵围两日，经日本公使抗议，清廷始改为将其开缺归里。其他尚有礼部主事王照，政变前礼部六堂官等即因阻其上书言事，被革职。政变后，王照逃往日本，慈禧下令革职严拿，其兄王燮、弟王焯被逮，家产查抄。刑部主事张元济、工部员外郎李岳瑞、少詹事、新任礼部侍郎王锡蕃、前湖北巡抚曾鉌均革职，永不叙用。湖南学政徐仁铸、翰林院编修徐仁镜(二徐均徐致靖子)、吏部主事陈三立(1852—1937，陈宝箴之子)、湖北巡抚、谭嗣同父谭继洵(？—约1898)亦均革职。内阁学士张百熙革职留任。湖南举人皮锡瑞因曾宣传新学，亦令地方官严加管束。另有前已革职的翰林院学士文廷式也被通缉。直至十月二十一日仍颁谕，谓翁同龢"前令其开缺回籍，实不足以蔽辜"，令革职永不叙用，并交地方官严加管束。戊戌政变共处分30余人。此后，大批爱国知识分子，经受此次血的教训，认识到改良主义道路不能挽救中国，而另谋他途，走上了资产阶级民主革命道路。

(刘振岚)

保皇会成立

保皇会，亦称中国维新会。清光绪二十五年(1899)康有为在加拿大成立的资产阶级改良派政治团体。

光绪二十四年八月(9月)戊戌政变爆发，康有为在英国军舰保护下，由北京逃往上海，又转香港，后乘日轮去日本，九月十一日(10月25日)到达东京，与先期到达的梁启超会合。康有为对于戊戌变法的失败、六君子被杀，心情异常悲愤，唯一使他感到欣慰的，是光绪帝尚健在，变法新政或许还有中兴的希望。于是，在百日维新期间依靠君权变法的幻想，凝成了保皇复辟的决心，以为欲救中国，惟有迫使慈禧归政、光绪皇帝复辟之一途。为此，他与梁启超首先考虑重建自己的宣传阵地。当年十一月十一日，梁启超在日本横滨发刊《清议报》，以"尊皇"为宗旨，认为中国能立与否，全系乎改革不改革；能改革与否，又全系乎皇上有权无权，故当前"惟有一策，曰尊皇而已"。同时也深刻指出民族危机的严重，揭露帝国主义的侵略本性和侵略手法；尖锐抨击以慈禧为首的封建顽固派——所谓"逆后贼臣"之凶残守旧和昏庸腐朽；批判封建专制，阐述"国"与"民"的关系，谓"不有民，何有国；不有国，何有民。民与国，一而二、二而一者也"，提出资产阶级"国民"的概念，其民权思想比戊戌时期更进一步。康、梁当时又以"维新志士"流亡海外，在爱国华侨中颇具威望，故此《清议报》在舆论界有相当影响。其次，拒绝与革命派合作。当时孙中山、陈少白(1869—1934)等革命派人士也在日本，曾主动托日本友人居间斡旋，试图与康、梁

维新派商谈合作。康有为声称他奉有光绪帝的"衣带诏"，不便与革命党往来，竟拒而不见，并表示：今上圣明，必有复辟之一日。余受恩深重，无论如何不能忘记，惟有鞠躬尽瘁，力谋起兵勤王，脱其禁锢瀛台之厄，其他非余所知。拒绝了革命派的合作要求。但清朝统治者却仍把他们看做"孙文羽翼"，多次向日本政府交涉，不许康有为在日本居留。光绪二十五年二月二十三日(4月3日)，康有为离日本赴加拿大。三月初七，抵温哥华。曾先后在温哥华、乌嘁士晚士咑等地对华侨演讲，谓"惟我皇上圣明，乃能救中国"，希望华侨"齐心发愤"，"洒血以救圣主"。四月赴伦敦，拟通过英前海军大臣柏丽斯辉运动英国政府干涉中国内政，扶助光绪帝复辟，未果。不久，返回加拿大。六月十三日，与李福基等创设"保救大清光绪皇帝会"，或称"保救大清皇帝公司"，简称保皇会，亦称中国维新会。据康有为长女康同薇云，当时"那拉后与守旧派正谋危光绪"，为"抗那拉氏之谋而言"，故称"保皇会"。保皇会成立后的第一个举动便是在海外遥为光绪帝祝寿。当年六月二十八日是光绪帝30岁寿辰，是日康有为率领当地华侨多人到维多利亚中华会馆庆祝"圣寿"，在龙旗飘舞中"北望行礼"，"拳跪起伏"，祝愿皇上健康长寿，早日"复政以保中国"。康并吟诗谓："遥从文岛瞻琼岛，波绕瀛台梦几回。"

保皇会以"忠君爱国"相号召，以保救光绪皇帝为宗旨。光绪二十五年冬刊印《保救大清皇帝会例》，宣称"今同志专以救皇上，以变法救中国、救黄种为主"，凡有"忠君爱国救种之心"的，都是会中同志。次年又刊印《保皇会草略章程》，谓"本会专以保全中国为主"，"欲保中国，非保皇上复位不可，故本会名保皇"。他们把"忠君"和"救国"联系在一起，把国家兴亡和光绪帝复位联系在一起，揭露慈禧为首的封建顽固派专权卖国的种种罪状，对其"卖地鬻权"表示愤慨，故此会仍具爱国救亡性质。其次，保皇会还有第二宗旨——保护侨商。保皇会又称"保救大清皇帝公司"。"会例"第二条规定："此会为保救大清皇帝公司，即保种会、保国会，亦为保工商会之事，皆同一贯。"还规定会员捐款作宣传、通讯、办报之用，并以集资作工商、开矿的股份。在捐款奖励办法中，捐巨款者，除政治上给予官职外，还给予开矿、筑路、工商等事的优先权，体现了侨商发展资本主义的经济要求，所以保皇会又带有资本主义经营色彩。据康有为估计，当时海外华侨约有500多万人，广大爱国华侨身在海外而心系华夏，他们当中大多对戊戌变法的失败表示惋惜，对六君子被杀表示愤慨，对光绪帝被囚表示同情。所以保皇会以忠君救国相号召，再加上它具有保商性质，便对广大海外华侨具有很大吸引力。保皇会成立以后，总会设在香港和澳门，康有为任总会长，梁启超、徐勤任副会长。以澳门《知新报》、横滨《清议报》为其喉舌。康有为陆续派出门弟子分赴南北美洲、澳洲等有华侨居住的200多个城市宣传保皇会宗旨，发展组织，总共建立保皇总会11个，支会103个，会员发展至百余万人，成为近代史上颇具影响的群众性华侨爱国团体。但是保皇会宣传的"爱国"最终归结为"保皇"，把挽救中国危亡、图中国之富强的希望完全寄托在光绪帝一人身上，一味赞颂的是"圣主"之德政，一味渲染的是康有为个人思君之幽情，这就把变法救亡的政治理想蜕变为眷恋光绪皇帝个人的不幸遭遇，由维资本主义之新，转而为保光绪皇帝之位，维新派变成保皇党。在保皇会成立初期，其斗争锋芒主要指向清朝顽固派，并于光绪二十六年支持唐才常自立军起义，起过进步作用；但它对帝国主义怀抱幻想，仇视义和团农民反帝爱国运动，提出"分兵北上勤王，助外人攻团匪以救上"的错误口号，结果是与虎谋皮，造成了自立军的惨败。特别是20世纪初年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运动逐渐高涨以后，保皇会的斗争锋芒也逐渐由针对清朝顽固派转向资产阶级革命派，曾在光绪三十一年至三十三年与革命派展开大论战，坚决反对同盟会的"三民主义"革命纲领，成为阻碍民主革命运动的绊脚石。光绪三十二年清政府宣布"预备立宪"后，康有为通告各地保皇会于当年十一月十七日(1907年元旦)改名国民宪政会，次年二月二十一日(1907年4月3日)又定名为帝国宪政会，与国内立宪分子相呼应，敦促清政府加速立宪步伐，妄图以立宪抵制革命，成为资产阶级立宪派政治团体。　　　(刘振岚)

反对外国教会侵略的斗争

鸦片战争后到辛亥革命前反对外国教会侵略的斗争，是为中国人民反帝爱国运动的重要组成部分。

清道光二十年(1840)鸦片战争以前，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教会和传教士就妄图用"十字架征服中国"，开始了对中国的侵略活动。鸦片战争后，由于中英《南京条约》等一系列不平等条约的签订，便给教会和传教士的侵略活动提供了合法的依据。二十四年签订的中美《望厦条约》和中法《黄埔条约》中，明文规定允许在五口通商地区建造教堂、医院，遂使传教士的宗教活动和侵略活动有了牢靠的据点。《黄埔

条约》规定："倘有中国人将法兰西礼拜堂、坟地触犯毁坏，地方官照例严拘重惩。"不仅如此，法国侵略者还强迫清政府于二十五年一月（1845年2月）同意解除雍正以来禁止天主教活动的禁令。但是，法国侵略者仍不满足，进而要求清政府发还历年被封闭的天主教堂旧址。二十六年一月（1846年2月），清政府又被迫发布了"废教"和发还天主堂旧址的上谕。从此被查禁长达120年的天主教正式弛禁。这使欧美的天主教、基督教以及其它教会在通商口岸传教"合法化"。但外国传教士进入内地还是非法的，并已经引起中国人民的反对。例如，咸丰六年（1856）广西省西林县地方官员即对法国传教士马赖进行了惩处。十年，第二次鸦片战争中清政府与英、法等国签订的《天津条约》和《北京条约》规定，外国传教士可以自由深入内地传教，无论是洋教士或中国教徒，地方官都要"一体矜恤保护"；还扩大了"发还旧址"的范围，凡"前奉天主教者之天主堂、学堂、坟茔、田地、房廊等件"，应一律"赔还""奉教之人"。担任翻译的法国传教士孟振生（Joseph Martial Mouly，1807—1868）更擅自在中法《北京条约》的中文稿内私增一项条款：听任传教士"在各省租买田地，建造自便"。昏愦无能的清政府竟默认了。第二次鸦片战争以后，外国传教士遂以《天津条约》和《北京条约》为护符，以本国驻华公使为后盾，利用一切机会深入内地城乡，建设教堂会所，进行各种侵略活动。他们扬言："准备在每个山头上和每个山谷中设立光辉的十字架。"到19世纪末期，在中国的欧美天主教、基督教、俄国东正教共有外籍传教士达3300多人，建立了40个教区，60多个教会，招收教徒达80余万人。其中，山东、直隶等省天主教势力最为集中，也最为猖獗，竟至出现了"教堂遍天下，传教洋人相望于道"的景象。

到中国来的传教士中，个别人在传播西方文化、增进中外联系上，做了些有益于中国的好事；多数人是信仰虔诚、但深受殖民主义和宗教神学影响，企图用基督教、天主教来"挽救""异端横行"的中国，自觉不自觉地为西方殖民主义者的侵略扩张服务；更有一部分是披着宗教外衣的殖民主义分子，以征服者自居，并在"圣洁"面纱的遮掩下充当侵略、奴役中国人民的急先锋。他们在中国到处霸占民房地产，经营高利贷，包庇走私，强夺百姓生计，残酷剥削中国人民；勾结地主恶霸，招徕地痞流氓，称霸一方，为害乡里；包揽词讼，私设"班房"，拘禁中国百姓，破坏中国司法主权；搜集各种情报，充当间谍和谋士；挑拨民族关系，制造民族纠纷，破坏我国民族团结；宣传奴化思想，进行文化侵略；以教堂为营垒，暗藏武器弹药，以屠杀中国人民；为本国出谋划策，攘夺中国利权。他们起了侵略者的大炮所不能起的作用。资本帝国主义国家教会侵略，早就激起了首当其冲、深受其害的广大中国人民的无比愤怒和强烈反抗。同时，一些地主、富绅和地方官吏也因为自己的统治地位和经济利益受到教会侵略势力的损害，而愤懑不平。由此而引起的同外国教会的纠纷、抗争，当时被称为"教案"。中国各族、各阶层人民共同反对外国教会侵略的斗争，从19世纪60年代开始，此起彼伏，几乎遍及全国，至辛亥革命前一直持续了近70年。总数多达约1600起。因此，外国教会侵略和中国人民反教会侵略的斗争，构成了19世纪后半期和20世纪头10年中国社会矛盾的一个重要方面。

近代反对外国教会侵略的斗争大体可以分为五个时期。从道光二十六年开始到咸丰十年第二次鸦片战争结束，是晚清反教会侵略斗争的第一个时期，即始发和兴起的时期。早在道光二十六年春，法国遣使会教士噶毕约则（Joseph Gabet，1808—1853）和额洼里斯塔（Evariste-Regis Huc，1813—1860）二人身着蒙古喇嘛服，口讲汉语，非法潜入内地，经广东、福建、江西、湖北、山东、直隶，到达北京，之后又到热河，进入盛京、黑龙江、内蒙古、外蒙古、察哈尔、甘肃，最后于道光二十六年初进入西藏。他们一边传教，一边查找原来天主教堂旧址及旧有教徒，为日后"还堂"交涉做准备。结果，在西藏被清政府地方官查获。驻藏大臣琦善将此案上报清廷后，奉旨解赴成都，由四川总督宝兴（1776—1848）审讯。后又解交广东省审理。经讯明查实后，发交澳门荷兰领事收领，转交法国领事严加管束。这是中国近代史上第一次反教会侵略斗争。二十七年，法国主教罗类思（Louis Marie Besi，？—1871）在上海徐家汇购买土地，集工建造耶稣会总部，当地上百名群众闯来工地，扬言要阻止并拆毁建筑物。这是中国近代最早的因民教纠纷而引起的徐家汇教案。据不完全统计，道光二十六年至咸丰十年间，东南沿海及内地发生的教案或华洋争殴事件达几十起。其中比较著名的有：道光二十八年黄竹岐民教争殴、青浦教案、咸丰元年定海教案、六年西林教案等。这时期反教会侵略斗争的特点是：一、因外国传教士非法潜入内地案引起者最为突出；二、因民教纠纷案引起者数量不多，带有一定偶发性；三、地方官审理时多数能依照教民作奸犯科应得罪名，俱照定例办理。

从咸丰十年《北京条约》签订开始到光绪十一年(1885)中法战争结束，是反教会侵略斗争的第二个时期，即发展和扩大时期。《天津条约》和《北京条约》的签订，为资本主义列强的宗教侵略打开了全方位的绿灯。从此，教案遍及全国各省，反教会侵略斗争风起云涌。从咸丰十一年贵州首先驱逐外国传教士开始，反对外国侵略的怒火，迅速燃遍湖南、湖北、江西、四川、江苏、安徽、广东、河南、直隶、山东、奉天、黑龙江、内蒙古、云南、西藏、福建和台湾等省区。发生教案近200起，形成第一个高峰。其中典型的有：咸丰十一年至同治元年(1862)贵阳教案、南昌教案，同治元年衡州教案，同治二年第一次重庆教案，同治四年、七年两次酉阳教案，七年第一次扬州教案、台湾凤山教案，八年安庆教案、八年至九年建德教案，九年天津教案，光绪二年两次宁国府教案，邻水、江北、涪州教案。这时期反教会侵略斗争的特点是：一、斗争次数猛增，范围扩大；二、斗争的暴力事件明显增加；三、利用反教舆论动员群众参加反教会侵略斗争；四、斗争中心集中在抗法前线的东南沿海和西北边陲各省，并自发地把反教会侵略斗争与保卫边境斗争结合起来；五、清政府采取"杀民谢敌"的政策，地主阶级上层人物态度日渐消沉，中小地主成为斗争的领导者，下层群众参加的人数日增。

从中法战争后开始至光绪二十年甲午战前，是反教会侵略斗争的第三个时期，即深化时期。中法战争后，中国半殖民地化的程度急速加剧。外国传教士公开与中国媚外官吏勾结起来，包揽词讼，干涉内政，插手外交，加剧了我国日益严重的民族危机。各地群众反教会侵略斗争继续向前发展，并在光绪十六至十七年，以四川、江南、热河为中心，出现了三个洪峰，形成了第二个高峰。典型的有：光绪十二年第二次重庆教案，十二至十三、十六年大足两次教案，十三年第一次冠县梨园屯教案，十五年镇江教案，十七年芜湖教案、丹阳教案、无锡教案、宜昌教案、热河东部教案等。此时期反教会侵略斗争的特点是：一、集中在西南、长江流域、热河东部，规模比以往更大；二、秘密会社(哥老会及其他会党)开始在某些斗争中担起领导重任，斗争领导权已逐渐转移到社会下层群众手中；三、大规模武装起义和武装斗争已是主要斗争形式。

从甲午战后到义和团运动，是反教会侵略斗争的第四个时期，即高潮时期。这时期，帝国主义列强纷纷在中国划分势力范围，掀起了瓜分中国的狂潮。外国传教士积极参与本国政府瓜分中国的活动。在民族危机日益严重的情况下，更多的秘密会社参加到反教会侵略斗争的行列中来。山东、广西、四川、湖北等地的人民则自发地把反对教会侵略和反对列强瓜分逐渐结合起来，从而将反教会侵略斗争的发展推向最高峰。这时期著名的有：光绪二十二年曹县大刀会与曹州教案，二十三年巨野教案，二十四年余栋臣起义、第二次冠县梨园屯教案、广西天地会起义，二十四至二十五年沂州教案，二十五年郯城神山教案，以及二十六年北方义和团运动高潮期间衡州教案、诸暨教案、衢州教案、宁海教案等。此时期反教会侵略斗争的特点是：一、明确地提出了"扶清灭洋"的战斗口号，这是帝国主义和中华民族的矛盾成为中国社会最主要的矛盾的反映；二、秘密结社开始成为反教会侵略斗争的中坚；三、反教会侵略和反列强瓜分逐步结合起来，终于汇合成为轰轰烈烈的义和团反帝爱国运动。

从光绪二十七年《辛丑条约》签订到宣统三年(1911)辛亥革命前，是反教会侵略斗争的第五个时期，即余波时期。《辛丑条约》签订后，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完全形成，清政府完全投入帝国主义怀抱，成了"洋人的朝廷"，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兴起。教士和教民疯狂进行复仇活动，清政府"袒教抑民"。因此，中国人民除了投身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活动外，反教会侵略斗争仍在继续。这一时期著名的有：光绪二十九年桐庐教案和白布起义，三十年施南(恩施)教案，三十一年巴塘教案，三十二年霍山教案、第二次南昌教案等。此时期反教会侵略斗争的特点是：一、斗争中心从华北移向南方；二、江浙各地的反教群众仍以"顺清灭洋"、"助清灭洋"或"扶清灭洋"为口号，在一定程度上保留着北方义和团的影响；三、会党在斗争中起了领导作用。

鸦片战争后到辛亥革命前的反教会侵略斗争，实为西方资本帝国主义列强对中国实行宗教侵略的产物，始终贯串着帝国主义与中华民族的矛盾，具有侵略与反侵略的斗争性质，是近代中国人民反帝爱国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它不仅显示了中国人民的强大力量，而且进一步激发了爱国热情。但也不可避免地有其局限性一面，带有一定的封建色彩，对当时的社会进步产生某些阻碍作用。　(邹远猷)

"门户开放"政策之提出

19世纪末20世纪初美国政府为争夺中国市场，协调列强矛盾而提出的侵华政策。又称"海约翰政策"。

清光绪二十一年(1895)中日甲午战争后，俄、德、英、法、日等帝国主义列强掀起瓜分中国的狂潮，东北、华北、长江流域及西南地区分别沦为它们的势力范围；胶州、旅大、广州湾、威海卫等军港也先后成为其租借地。此时美国经济实力已跃居世界领先地位，工业总产值超过了英国。但列强在中国划分势力范围和索取租借地时，美国正与西班牙争夺菲律宾，无暇东顾；待到美西战争结束，各国在华势力范围均已划定，中国版图上再也没有可供美国占据的整块地盘了。对此，美国很不甘心，但其军事实力不如欧洲列强，光绪二十四年，美国海军只排在世界第六、七位，陆军数量更远远落后于俄、德等国，无力在军事上与欧洲各国为敌，不可能通过武力在中国谋取更多特权。有鉴于此，美国政府决定采取适合于自己的政治外交政策，与欧洲列强抗争。二十五年八月(9月)，美国国务卿海约翰(John Milton Hay，1838—1905)训令驻伦敦、彼得堡和柏林的大使，以美国政府名义把对中国“门户开放”的照会递交英、俄、德三国；十月，又把同样内容的照会递交法、意、日政府。照会声称：为避免帝国主义各国在华发生冲突，保证彼此之间的商务利益，美国政府特提出“门户开放”政策，其基本内容为：一、各国在中国任何所谓势力范围或租借地内之通商口岸或投资事业，别国不得加以干涉。二、中国现行之关税率对于一切所谓势力范围内之口岸装卸一切货物，无论何属国均为适用；其税款应由中国政府征收。三、势力范围内之任何口岸，对别国船舶不得课以较对本国船舶为高的码头税；势力范围内所敷设、管理或经营的铁路，在运输别国货物时，收费不得较运本国同样的货物为高。海约翰曾标榜“门户开放”政策是为了维护中国主权，但实际上其侵略野心极为险恶。首先，这一政策完全肯定了帝国主义列强瓜分中国、划分势力范围和夺取租借地的现有格局，肯定了欧洲各国侵略中国的合理性；其次，美国在“机会均等”、“利益均沾”的口号下，要求各国在各自势力范围内不实行独占，使帝国主义各国在华都能享有共同的经济利益。美国推行这一政策，实质即在与各国竞争中保持中国市场对美国商品的自由开放，使美国有可能凭借其强大经济实力战胜竞争对手，逐渐实现独霸中国的野心。就英、法、德、俄等国来说，当时也没有任何一个国家有实力鲸吞整个中国，因而也乐于接受美国倡议，保住自己在华的势力范围，并通过“门户开放”从别国势力范围内取得某种利益。英国由于经济实力有所下降，在中国与俄国竞争已感到有些力不从心，首先赞同；不久，其它五国亦相继表示接受。可见，“门户开放”政策是帝国主义列强为协调彼此矛盾，本着各国都能接受的原则共同宰割中国的强盗政策。从此，中国成为向全世界开放的共同市场。光绪二十六年，中国爆发义和团反帝爱国运动。帝国主义各国纷纷派兵组成八国联军，向中国大举进犯。战后为夺取更多侵华特权，列强间开始明争暗斗，矛盾再度加深。美国在八国联军中人数较少，竞争中处于不利地位，于是海约翰于当年六月再次照会各国政府，发出所谓第二次“门户开放”的通牒。照会称：各列强应“保持中国领土及行政之完整，保障所有条约及公法对列强保证之权利，并保护全世界在中国各地均等、公正通商之原则”。海约翰还标榜美国推行这一政策的目的是“在寻求一种解决，俾可在中国获得永久之安宁与和平”。但实质上第二次“门户开放”政策与第一次一样，是在维护中国领土主权及行政完整的幌子下缓和列强争夺中国的矛盾，保证它们对中国的共同占有。欧洲列强此时也感到，实行“门户开放”政策，较之势必引起中国人民激烈反抗的“瓜分”政策更为有利，于是再一次达成妥协，一致拥护美国这一政策，共同“保护”中国，共同管理中国，共同侵略中国，共同扶持清政府以继续统治中国。此后，“门户开放”政策即成为帝国主义列强侵华方针的共同基础和原则。　　(董增刚)

森罗殿之役

清光绪二十五年(1899)秋，山东茌平、平原等地义和团群众在森罗殿地方粉碎清军围剿的战斗。

是年八月(9月)，山东平原县杠子李庄教民李金榜借教会势力为非作歹，欺压百姓。义和拳民李长水率领愤怒的群众与李金榜斗争，冲击了教堂。李金榜气急败坏，到平原县衙诬告拳民谋反，县令蒋楷派捕头陈德和会同恩县马队前来弹压，逮捕6名拳民。李长水突围逃往茌平，向义和拳著名首领朱红灯求助。朱红灯(?—1899)，原名逢明，山东泗水人。光绪二十四年至长清县(齐河)大李庄，以治病为业，学习“神拳”，曾率拳众攻毁当地徐家楼教堂，成为当地义和拳重要首领。后因地主民团压迫，率众退至茌平、平原、高唐一带。当得知平原县杠子李庄要求支援时，他慨然应允，于九月初率领高唐、茌平、长清等地义和拳众赶赴杠子李庄，附近拳民1000多人及曹州一带大刀会也闻讯前来。各地拳民同仇敌忾，严惩李金榜，冲击当地教堂，声势日益壮大。县令蒋楷惊恐万分，于九月初七(10月11日)携同陈德和率领亲

兵马队及捕役扑向杠子李庄。朱红灯召集拳民竖起"天下义和拳兴清灭洋"的大旗，严阵以待，急擂战鼓，与清军混战。蒋楷率队败逃，请求山东巡抚毓贤（？—1901）派兵镇压。十一日，济南知府卢昌饴和管带亲军营补用知府袁世敦率骑兵两哨、捕勇数十人开赴平原县。根据毓贤对义和团"开导弹压，不准孟浪生事"的指令，卢昌饴释放了被捕的6名团民，收押讹诈多端、妄捕无辜的陈德和，引诱朱红灯"议抚"。此时朱红灯见清军势大，已率拳民1000多人退至平原县与恩县交界处的森罗殿（距平原县城18里）扎营，严词拒绝"议抚"，准备进军恩县，攻打教堂。十四日凌晨，袁世敦率领亲兵逼进森罗殿。森罗殿位于马颊河东岸大芝坊庄，庙基立于河堤上，四周树木茂密，地势居高临下。袁世敦将清军分为左、中、右三路，对义和团进行围攻。义和团则集中力量向中路清军猛烈冲杀。朱红灯身披大红斗篷，骑马挥刀，率领超过清军二、三倍的团民英勇战斗。清兵使用洋枪洋炮，义和团主要武器是大刀长矛，但人多势众，勇猛异常。双方激战数小时，清军死伤10多人，义和团亦有数十人牺牲。最后清军不支，溃至大芝坊庄滥捕群众10多人以泄恨。朱红灯率义和团民撤至在平，继续坚持斗争。森罗殿之役是山东义和团兴起后与清政府进行的一次正面冲突。这次战斗，使清朝统治者看到了义和团的强大威力，进一步坚定了招抚义和团的决心。森罗殿之役后，义和团运动在鲁西北地区迅速扩展，逐渐会合成一股强大的反帝爱国浪潮。　（董增刚）

《查禁义和拳匪告示》颁布

《查禁义和拳匪告示》，清光绪二十五年（1899）署理山东巡抚袁世凯发布的镇压义和团的反动文告。

光绪二十四年冠县梨园屯群众首揭义和团反帝运动义旗后，义和团在山东不断成长壮大。时任山东巡抚的张汝梅及其后任毓贤，对教会、教民专横跋扈、肆意欺压乡民的种种暴行亦十分不满，在弹压的同时，也同情人民群众的反洋教斗争，对义和团采取剿抚兼施、以抚为主的政策，这在客观上有利于义和团运动发展。至二十五年底，义和团运动在山东已呈波澜壮阔之势。对此，帝国主义列强惊恐不安，多次威逼清廷罢免毓贤，启用执掌新式陆军的袁世凯，因为袁十分仇视人民群众反帝斗争，唯洋人之命是从，对义和团力主镇压。是年十一月初四（12月6日），清政府顺从帝国主义旨意，改派袁世凯署理山东巡抚。袁率新建陆军7000多人赶赴山东，二十三日抵达济南，到任伊始，凶相毕露，两天后即发布了《查禁义和拳匪告示》。宣称：袁此次亲率重兵东来，目的就是要弹压、镇抚、扑灭"目无法纪，恃众抗官"的山东各地的义和团。《告示》威逼广大乡民要"互相劝诫，守分安常"，不要堕入义和团的"迷途"；已入教者要"痛改前非"，立时解散，未入教者万勿附从；如果拳民能够改过自新，"缚献首犯"，必将予以奖励，反之定当严缉惩治；乡民如敢包庇义和团首领，或隐匿不报，必当按律科罪，且将里保一并究惩。当时清政府害怕袁世凯"一意主剿，致滋事端"，多次谕令他"持平"办理教案，"化大为小，化小为无"，不可徒恃兵力，激成大祸。袁虽不敢公开违抗清廷旨意，但更不敢辜负帝国主义对他的厚望，所以在颁布上述《告示》后，又相继采取一系列反动措施，压制和打击山东人民的起义浪潮。首先，袁世凯指民为匪，残酷屠杀义和团民，责令各州县乡团保甲不分畛域，协力捉拿义和团首领，防止乡民继续起义。其次，借剿灭义和团之机大量扩军，采用合并或招募山东原有清军的办法，使自己的兵力从7000多人增加到约2万人，大大加强了军事实力。再次，在处理山东民、教冲突中偏袒教会，屈膝媚外。二十五年底，山东发生肥城教案，一名英国传教士被杀，英国政府借机讹诈。袁世凯依照洋人旨意，无端逮捕和屠杀当地群众，以此博取帝国主义的欢心。从署理山东巡抚、发布查禁义和团反动文告开始，至光绪二十六年前后，在袁世凯疯狂镇压下，活跃在冠县、高唐、茌平、博平、清平、邱县、陵县、禹城等地的义和团组织及沂州、兖州、曹州一带的大刀会遭到巨大挫折；王立言、王玉振、徐福、王立东、王文义、孙文等众多义和团首领先后牺牲；广大民众的鲜血洒遍齐鲁大地。山东义和团运动转入低谷。对袁世凯，山东人民切齿痛恨，"皆有欲杀之势"。有人在山东巡抚衙门照墙上画了一个头戴花翎的大乌龟，匍在洋人屁股后面；还有人编出"杀了袁鼋蛋，我们好吃饭"的歌谣，以表示对袁世凯的仇恨和鄙视。　（董增刚）

肥城教案

清光绪二十五年（1899）因英国传教士卜克斯在肥城被杀而引起的民、教冲突。

是年十一月二十八日（12月30日），基督教安立甘会英国传教士卜克斯（Sydney Malcolm Wellbye Brooks，1874—1899）由泰安府城返回平阴教堂，路经肥城县张家店地方，当地乡民孟洸文、

吴方城、吴经明3人认为"近来教民欺讹平民，疑系洋人主使"，遂上前阻拦，双方发生殴斗，结果卜克斯受伤，次日毙命。英国以此为借口，肆意讹诈。十二月初四，英国驻华公使窦纳乐联合法、德、美等国向清廷提出强烈抗议。清政府谕令署理山东巡抚袁世凯"严缉凶犯"，保护教民。袁世凯把这一事件看作他讨好帝国主义的大好机会，亲自审理，根据英国传教士所列"凶犯"名单，下令逮捕群众，统统"缉送来省归案质讯"。肥城知县在执行过程中发现牵连许多无辜百姓，请求将无罪群众就地释放。袁世凯不允，向清廷故意夸大案情，结果判处2人死刑，1人终身监禁，2人有期徒刑，并罢免了肥城知县，又向当地群众勒索白银9000两和5亩空地，为传教士修建一所教堂；另用500两白银在卜克斯被杀处立碑，"盖造碑亭"。但英国侵略者并不以此为满足，无理要求严惩山东地方官员及前任巡抚毓贤，逼迫清政府采取更加严厉的措施镇压义和团运动。袁世凯则通过处理肥城教案，再次博得帝国主义的欢心。此后他更加有恃无恐，疯狂屠杀群众，镇压山东各地的义和团运动。　　（董增刚）

己亥建储

清光绪二十五年(己亥年)十二月(1900年1月)慈禧太后为废黜光绪帝位，另立溥儁为皇储"大阿哥"事件。

光绪十五年(1889)，慈禧太后表面上"归政"光绪帝，实际上仍然操纵着清朝军政大权。光绪帝不甘于长期处于无权地位，故清廷内部一直存在帝、后两党争夺统治实权的斗争。戊戌变法时期，帝，后党争更与维新、守旧的斗争交织在一起，达于高潮。戊戌政变后，光绪已是一个傀儡，但慈禧却想废掉光绪帝位，由于遭到外国公使和部分疆臣的反对，未能如愿。康有为、梁启超出亡后，在海外大肆鼓吹"惟我皇上圣明，乃能救中国"。光绪二十五年六月十三日(1899年7月20日)，康有为等在加拿大成立"保救大清光绪皇帝会"(简称保皇会)，狂热宣扬光绪"圣德"，抨击慈禧侵夺帝权、抗拒变法等罪行，号召国人起而迫慈禧归政，拥光绪帝复辟。在康、梁等人鼓动下，南洋、欧美华侨纷纷响应，各地入保皇会者达百余万人。海外保皇势力又与国内维新派互通声气，里应外合，形成一股促太后"还政"的强大舆论，对慈禧太后的统治构成很大威胁。于是慈禧"益恨德宗(即光绪帝)，思废"。后党顽固派骨干荣禄、载漪、刚毅等人，曾助慈禧发动戊戌政变，奔走不遗余力，因此对光绪帝有很大戒心。光绪帝虽被幽禁，而帝位犹存。荣禄等以为"太后既老，皇上方壮"，一旦慈禧先死，光绪帝复政，则他们难免杀身大祸，因此耿耿于怀，必欲去光绪帝位而后快。光绪二十五年十一月二十九日荣禄向慈禧献密计：选择宗室近支子为大阿哥(即皇储)。慈禧采纳，于十二月二十四日(1900年1月24日)召集王公大臣至仪鸾殿，宣读了以光绪帝名义发布的诏书，内称光绪孱弱多病，久无后嗣，上负祖宗社稷，下误黎民百姓，决定立端王载漪之子溥儁为皇储"大阿哥"，定于次年正月初一(1900年1月31日)举行建储典礼。此消息公布后，在社会上引起一片反对声，各界人士纷纷斥责清廷此举"名为立嗣，实则废立"。上海绅商1200余人合词电奏，强烈反对；湖北官绅50多人赴京"拚命力争"；南洋及美洲华侨中也有人电达总理衙门谏阻此事。清廷命李鸿章探询外国公使意见，英国公使答称：此虽系中国内政，邻国无干涉权，但以后"遇有交涉事，我英认定光绪二字，他非所知"。英驻上海领事甚至公开宣称：如光绪帝被废，于一月内英可调印度兵30万来华。其他日、美、法等国公使也纷纷表示"干预"，并拒绝为大阿哥致贺。荣禄电询部分疆臣意见，两江总督刘坤一复称："君臣之分已定，中外之口宜防。"国内外的反对声浪，给慈禧后党顽固派造成巨大压力，所以，虽然立了大阿哥，却迟迟不敢进而废掉光绪帝。光绪二十六年义和团运动高涨，八国联军发动侵华战争。盼子成龙心切的载漪极恨列强阻止废立之事，遂捏造列强发兵是为"勒令太后归政"的谎言，激慈禧对洋人开战，以借混乱之机，遂行废立。事后，慈禧察觉，大怒。光绪二十七年《辛丑条约》签订，按照列强旨意，载漪被定为"祸首"，遭到革爵、革职、遣戍新疆的处分。十月二十日(11月30日)慈禧从西安回北京途中，在开封宣布，撤去溥儁"大阿哥"名号，立即出宫。历时22个月的"己亥建储"风波结束。此事件虽系清廷内部以夺取权力为目的的宫廷斗争，但它曾影响慈禧对义和团的态度，促成清廷向八国联军宣战，使中华民族蒙受了空前的屈辱，从而在近代史上成为一个具有一定政治意义的事件。

（刘振岚）

义和团运动

清光绪二十六年(1900)以农民为主体的中国人民自发的反帝爱国运动。

随着帝国主义掀起第一次瓜分中国的狂潮和百日维新的失败，以农民为主体的广大人民群众的反

帝反封建斗争迅速高涨。山东、东北、上海、广东等地相继爆发反侵略、反瓜分、反封建压迫的起义浪潮。同时，各地人民的反洋教斗争也日益发展，教案频仍，此伏彼起，大小斗争数百起，波及贵州、湖南、江西、四川等十几省，并与各地风起云涌的群众斗争相会合，形成一场声势浩大的义和团反帝爱国运动。

戊戌维新失败后，后党处心积虑地图谋废除光绪帝。二十五年底，清廷宣布立端王载漪之子溥儁为"大阿哥"，但遭到列强的反对和两江总督刘坤一等清廷重臣的劝阻。顽固派与西方列强之间矛盾迅速激化，对以后顽固派在八国联军侵华及义和团运动中的态度产生重要影响。

义和团首先兴起于山东。中日甲午战争后，沦为德国势力范围的山东省是帝国主义瓜分中国最激烈的场所。外国教会势力极为猖狂，全省各地教堂林立，传教士专横跋扈，民、教冲突异常严重。加之连年水旱，广大乡民流离失所，饥寒交迫，民族矛盾、阶级矛盾十分尖锐，人民群众反抗烈火愈燃愈烈，山东终于成为义和团反帝风暴的策源地。义和团源于大刀会、红拳、梅花拳、义和拳、神拳等民间武术团体，并与白莲教系统某些秘密结社相结合。各团体最初以"保卫身家，防御盗贼"为号召，聚众设坛，练拳习武。甲午战后，随着帝国主义侵略势力的深入，教会势力的横行，逐渐走上反帝斗争的道路，焚毁教堂，处死洋人，打击教会势力。斗争初期，各地拳会没有统一领导和组织，源多流杂，处于分散、自发状态。随着反洋教斗争不断发展，山东及直、鲁交界地区逐渐形成了几个中心和几支力量较强的队伍：一是曹县、单县、菏泽、定陶、郓城等地的大刀会。它是民间秘密结社与八卦教分支相结合的组织，系曹县烧饼刘庄刘士端创立，早在光绪二十二年即掀起反洋教斗争，成为义和团运动的先驱，后被山东地方政府镇压。二是以东昌府冠县梨园屯为中心，旁及临清、武城、邱县及直隶威县、曲周、南宫等地赵三多、阎书勤领导的梅花拳。二十四年九月（10月），赵三多、阎书勤率众在冠县蒋家庄（河北威县）马场起义，竖起"助清灭洋"大旗，将梅花拳改称义和拳，首揭义和团反帝斗争的序幕。三是以东昌府茌平为中心，旁及高唐、恩县、博平、平原、禹城等地的神拳，后改称义和神拳或义和拳，首领是朱红灯和心诚和尚。二十五年九月，朱红灯率众千余人在平原县森罗殿地方粉碎清军围剿后，不断壮大，逐渐成为山东地区重要的反帝力量。义和团在山东兴起期间，李秉衡、张汝梅、毓贤相继担任山东巡抚，他们在处理教案时，对洋教势力的专横颇有不满，多少同情乡民反洋教斗争，主张"持平办理"，反对一味镇压，采取剿抚兼施、先抚后剿、以弹压劝导为主的政策。二十四年五月，张汝梅上奏清廷，建议将各地拳民列诸乡团之内，听其自卫身家，守望相助，并在奏折中第一次将拳会改称"义和团"。目的在于控制和利用义和团，客观上也使义和团在山东取得了合法地位，有利于义和团运动的发展。这一政策以后也为毓贤所继承。大抵从二十五年下半年起，各地拳会纷纷改称义和团，竖起义和团旗帜。九月，清廷公文中正式将各种拳会组织统称为义和团。"义和"，乃"取朋友以义合之义"。义和团基本成员是贫苦农民、手工业者及水手、脚夫等劳动群众；基层组织称坛、坛口或坛场（厂），首领称大师兄、二师兄等。若干坛口组成一个团（又称总坛），首领称老师、团首。团与团之间互不统属，没有统一组织和领导系统，具有浓厚的宗教色彩。各坛均供奉牌位，举行烧香、焚表、念咒等仪式，宣传降神附体、刀枪不入等宗教迷信，充分体现了农民小生产者自发、分散的特点和封建蒙昧的落后性。义和团提出的"扶清灭洋"等口号，是当时帝国主义同中华民族的矛盾上升为中国社会最主要的矛盾的产物，是反对帝国主义侵略、反对封建主义压迫的朴素情感的反映。"灭洋"显示出义和团对帝国主义及洋教势力的切齿痛恨，是中国人民要求民族自立的精神体现；"扶清"则表明义和团对清政府抱有幻想，对帝国主义与清王朝互相勾结的反动本质认识不清，以致后来为清廷所利用，走入歧途。义和团在山东迅猛发展引起西方列强和教会势力的恐慌。德、美等国逼迫清廷罢免了毓贤，于二十五年底任命袁世凯署理山东巡抚。袁一上任即发布《查禁义和拳匪告示》，严厉镇压和防范各地人民反帝斗争，山东义和团运动转入低潮。

光绪二十四年前后，义和团运动逐渐波及直隶的大名府、冀州、深州、景州等地。二十六年初，义和团在山东受挫，在直隶却迅速发展壮大，逐渐形成以天津、北京、保定三角地带为中心的战斗基地。三月（4月），义和团在北京设立坛口，利用揭帖、乩语、预言碑等形式广泛揭露帝国主义侵略罪行，吸引群众参加反帝斗争。同年春，保定府和天津城内也开始出现义和团组织：在静海，有以张德成为首的"义和神团天下第一坛"和以曹福田为首的"署理静海一带义和神拳"；在新城，出现了王成德、宋福恒两支义和团队伍。这些都是直隶地区举足轻重的反帝力量，后多进入天津，在抗击八国联军中起到了重要作用。四月，北京西南直隶涞水县高洛村及附近义和团民进

攻村中教会武装，在石亭镇大败前来围剿的清军，一举进驻涿州城，向北京挺进。在直、鲁义和团影响下，反帝怒潮遍及全国，东北、河南、山西、内蒙古、陕甘及江南一带人民群众反帝斗争也蓬勃兴起。

义和团运动在全国普遍高涨更加引起帝国主义列强的恐慌。他们一面威逼清廷派兵镇压，一面开始酝酿对华直接武装干涉。是年三月，英、美、德、法四国联合照会清廷，限两个月内将义和团一律扫平，否则将派兵来华"代为剿平"。五月初，英、美、德、法、俄、意、日、奥八国以保护公使及在华洋人为名，派兵400多人进抵北京，大批侵略军也相继开往中国，积极进行战争准备。此时清廷在对待义和团和八国联军的态度上，渐形成主剿（主和）与主抚（主战）两派。主剿派以荣禄、奕劻、许应骙、徐用仪、袁昶等人为代表，主张镇压义和团以换取列强撤兵，极力反对与八国宣战。这一主张得到了李鸿章、张之洞、刘坤一等地方实力派的支持。主抚派以载漪、载澜、刚毅、徐桐、赵舒翘等人为代表，主张招抚义和团以抗拒八国联军，目的是利用义和团阻止英、美等国扶持光绪帝，进而实现废立阴谋，确保溥儁早日继位。掌握清廷实权的慈禧太后感情上倾向主抚派，却又惧怕与列强开战，因而在剿与抚、战与和的问题上一时举棋不定。她一面派聂士成率清军赶往芦保铁路及天津附近围剿义和团，以消弥列强发动侵华战争的借口；一面派刚毅等赶赴良乡、涿州等地探查义和团虚实，妄图加以利用。结果聂士成清军遭到义和团有力抵抗，事实上已无力阻挡反帝运动的迅猛发展；刚毅通过观察看到义和团的强大，力劝慈禧因势利导，进行招抚。慈禧几经犹豫后，终于承认了义和团的合法地位，默许其进入北京。于是五月上、中旬，大批直隶义和团涌入京、津两地，至下旬，天津已有坛口300多个，团民约4万人；北京有坛口1000多个，团民10万多人。

义和团涌入京、津后，开始焚烧和捣毁教堂，惩处传教士及不法教徒。外国侵略者惊恐万状，在北京使馆区和天津租界构筑工事，蓄意屠杀义和团民，同时增派大批联军进犯北京。五月十四日（6月10日），以英国中将西摩为统帅的侵华联军2000多人从天津租界分批向北京进犯，挑起八国联军之役。京、津各地义和团立即拆毁铁路，破坏电讯交通，配合清军在廊坊车站与侵略军激战，迫使其退回天津租界。二十日后，慈禧一连几天秘密召开御前会议，讨论与列强和战问题，主战、主和两派争吵激烈。载漪为促使慈禧宣战，伪造了一个列强要求她归政的照会。慈禧见后大怒，遂下决心不顾一切与列强反目。二十一日，八国联军攻占大沽炮台，打通了海上至天津租界的运输线。二十四日，德国公使克林德在北京被清军击毙。当日下午，清廷决定与各国开战，命清军与义和团包围、攻打各国使馆及西什库教堂。各国使臣、侵略军、传教士及教民凭借坚固工事，负隅顽抗。次日，清廷正式与列强宣战，嘉奖义和团为义民，令英年、载澜、刚毅办理义和团事务。北京义和团开始被封建顽固派利用，走上歧途，成为他们报复洋人的工具。至二十七日，奥地利、荷兰、比利时、意大利等国使馆先后被焚。清廷与列强宣战，客观上促进了义和团运动的发展，反帝烈火在全国迅速蔓延，江南地区会党组织和广大民众也开始投入反帝斗争。但两江总督刘坤一、湖广总督张之洞极端仇视义和团，不顾清廷宣战谕旨，指使上海道余联沅在三十日与上海各国领事团草签《东南保护约款》和《保护上海城厢内外章程》，与列强携手维持"地方秩序"，镇压义和团，并先后怂恿10多个省区加入"互保"行列，严重阻碍了江南义和团运动的发展。清廷宣战后不久，慈禧发觉归政照会查无实据，转而与列强暗中勾结，伺机乞和，一面赞同、认可刘、张等人的"互保"举动，一面密令对北京使馆区明攻暗保，与各国使臣互通声气，并将大批义和团调离出京，采取分化、瓦解、屠杀等手段，使北京义和团力量大为削弱。

侵华战争开始后，帝国主义各国为在华索取更多特权，竞相派大军来华，侵华联军人数激增，至六月初在大沽登陆的侵略军已达1.4万人。西摩联军受挫后，八国联军调集兵力，企图先夺取天津，再进犯北京。为保卫天津城，曹福田、张德成及天津周围各地义和团于五月下旬纷纷入津，配合清军在紫竹林租界和老龙头火车站等地接连向敌人发起猛攻，取得一定战果。六月十三日，联军开始反扑，兵临天津城下，清军将领聂士成壮烈牺牲。此时驻守天津的帮办北洋军务大臣宋庆不积极策划天津城的守卫，反而秉承慈禧旨意，在伙同马玉昆清军大肆屠杀义和团2000多人后，弃城溃逃，严重削弱了天津防守力量。十八日，天津沦陷，八国联军疯狂屠杀无辜市民，实行残酷殖民统治。同时，沙皇俄国一面派兵参加八国联军之役，一面单独出兵东北，武装进占东三省。六月二十至二十二日，俄军在海兰泡和江东六十四屯制造了惨绝人寰的大屠杀，残害中国居民7000余人，然后出兵11.6万人，分4路进攻营口、哈尔滨、海拉尔、宁古塔等地，至闰八月上旬，侵占了东北全境主要城市和交通线。七月初十，八国联军2万余

人从天津进犯北京。由于义和团遭到侵略军和清政府的疯狂屠杀，实力大损；津、京沿线10多万清军又缺乏有力的统一指挥，毫无斗志，望风即溃，致使联军轻易攻占北仓、杨村、通县等地，直逼北京。十三日，慈禧任命李鸿章为全权议和大臣，火速来京向列强乞和，企图以出卖主权阻止联军进京。十九日夜，联军向北京发起进攻。二十一日晨，慈禧携光绪、溥儁等仓皇出逃，是日深夜北京沦陷。八国联军在京城烧杀淫掠，无恶不作。无数百姓惨遭屠戮，百年古都横遭浩劫，义和团反帝运动受到极大打击。八月初三，慈禧在经太原逃往西安的途中授予奕劻全权，令其回京与李鸿章向列强乞和。帝国主义各国本着各自利益，对清廷乞和举动采取了不同态度。沙俄为迫使清廷承认它霸占东北三省的合法性，支持亲俄的慈禧太后继续执政，极力说服各国接受清廷议和要求。英、德等国则幻想扶持光绪帝，拒绝与清廷开议。此时八国联军总司令、德国元帅瓦德西率大军来华，置清廷议和要求于不顾，继续对直隶全境发动武装进攻，扩大侵华战争。十一月初，经过长期讨价还价，各国最终协调一致，对慈禧为首的清朝政权采取"保全主义"，同意议和，并拟定《议和大纲》12条。次年七月二十五日(9月7日)，英、美、德、俄等11个帝国主义国家强迫清政府签订屈辱的《辛丑条约》。八国联军之役终以清政府失败而告终，义和团运动也被中外反动势力联合绞杀。但中国人民并未就此屈服。二十八年初，各地义和团余部为反对《辛丑条约》，举起"扫清灭洋"大旗，继续坚持反帝反封建斗争，其中规模最大的是直、鲁交界地区景廷宾起义，坚持4个月之久。

义和团运动是19世纪末20世纪初中华民族与帝国主义的矛盾空前尖锐的形势下，以农民为主体的广大人民群众，采取旧式农民战争形式掀起的自发的反帝爱国运动。由于农民阶级自身的局限和严重弱点，无法完成反抗帝国主义侵略的艰巨历史使命。但义和团英勇抗击了八国联军，沉重打击了帝国主义列强瓜分中国的狂妄野心，把中国人民反帝反封建斗争推进到一个新阶段。　　（董增刚）

涞水之战

清光绪二十六年四月(1900年5月)直隶义和团在涞水伏击清军的战斗。

是年初，继山东之后，反帝爱国的义和团运动在直隶地区不断发展壮大，反洋教斗争此伏彼起，逐渐形成以北京、天津、保定三角地带为中心的活动基地。直隶涞水县位于北京城西南，芦保铁路西侧，长期以来就是洋教侵略势力的巢穴，传教士及恶霸教民欺压乡里，无恶不作，民、教矛盾十分尖锐。早在二十四年底，当地乡民即与教会势力发生冲突。是时，涞水县高洛村乡民举行除夕迎神赛会，天主教民借机寻衅，撕毁神像，闯入村民阎老福家行凶，事后反诬告群众毁坏教堂，乘机敲诈勒索。法国驻京大主教樊国梁(Pierre Marie Alphonse Favier，1837—1905)出面要挟，州县官吏又袒教抑民，强迫群众出款赔礼，从而激起当地村民的义愤。阎老福等人遂设立坛口，聚众练拳习武，建立义和团组织，"意在借习拳以压教，图雪其耻"。至二十六年四月，涞水县义和团已有较大发展。高洛村教会为防范群众反帝斗争，也添置枪炮，准备与义和团为敌，并要挟清政府派兵帮助镇压。高洛村乡民飞帖邀请涞水、定兴、新城、涿州、易县等地义和团前来助战。四月十四日(5月12日)，高洛村聚众达千余人。涞水知县祝芾闻讯急忙赶来，"劝导弹压"，被乡民打跑。当晚，义和团愤怒烧毁当地教堂及教徒住宅数十间。祝芾急忙请求直隶总督裕禄派兵镇压。十九日，道员张莲芬、副将杨福同(？—1900)奉命率清兵100多人驰往高洛村，对义和团民逮捕、屠杀。义和团为争取有利形势，主动撤离高洛村，向涞水城北30里的石亭镇转移。石亭镇乡民在首领伊老善领导下起而响应，联络附近乡县，聚众万余人，决定在石亭镇附近的两狼沟进行伏击。二十四日，杨福同率清兵马队30人、步兵40人到石亭镇挑衅。义和团且战且退，把清军诱引到两狼沟伏击圈内，事先埋伏好的义和团众突然从四面跃起，持械猛扑，将清军紧紧包围。杨福同见势大惊，急忙下令开枪扫射。但清兵马队在山沟内无法施其长，被冒死冲锋的团民打得人仰马翻，清兵70余人溃不成军，多带伤逃窜。杨福同也受伤坠马，体无完肤，被一团民持枪刺中咽喉，当场毙命。义和团取得重大胜利。涞水大捷后，义和团又将进军目标指向涿州城。涿州位于北京城西南140里，距涞水县约35里，是畿南咽喉要地，也是京城通往保定及南方的必经之地。二十六年初，涿州就有义和团活动，荣起、慈二庆等人在城内设坛，建立了义和团组织。四月，涿州附近义和团得知高洛村和石亭镇团众起事消息后大受鼓舞，纷纷响应。二十七日，涿州、房山等地义和团数千人在密熏和尚率领下"亮队操演"，积极准备向涿州城大规模进军。二十九日，各地义和团万余人齐集涿州城下，声称"涿州兵备空虚，洋兵将来，愿为代守"，一举占据该城，在城门竖起了"兴清灭洋"的旗

帜，把守城门，缉拿清军，控制了整个城池。此后，附近义和团民相继涌来，总数达二、三万人，成为畿南地区反帝运动的重要力量，并为义和团进入北京创造了有利条件。　　（董增刚）

京、津义和团运动高涨

清光绪二十六年(1900)春夏之交，直隶义和团聚集北京、天津，开展反帝斗争的历史事件。

光绪二十六年，继山东之后，直隶地区及北京、天津等地义和团运动迅速兴起、高涨，逐渐在京畿重地形成反帝爱国的战斗基地。早在二十三年，北京城南就发现过义和拳埋下的碑文。二十五年，京城内以青少年为主练习神拳的活动开始流行，逐渐扩展到广大市民、清军士兵甚至王公贵族。二十六年春，习拳练武在京城已相当普遍，景山后墙外空地是当时群众练武最集中最活跃的地方。三月(4月)，在东单牌楼西裱褙胡同建立了义和团第一个坛口。四月以后，随着外地义和团大批入京，北京城内居民参加义和团的人数与日俱增，“千百成群，择地操演”，“铺团”(义和团设立新的坛口称“铺团”)活动迅速展开，坛口越来越多。清军中不少爱国士兵也积极参加，董福祥甘军练拳者500多人；虎神营、神机营士兵练拳的更多。在京城，义和团还以张贴揭帖、传播乩语等方式揭露帝国主义及洋教势力“毁谤神圣，上欺中华君臣，下压中华黎民”的恶行，公开表明其宗旨是“助清灭洋，专与洋人教堂为难”，号召市民精练义和拳术，“同心协力，共灭洋鬼子”。是年春，义和团托言在北京西郊温泉山煤洞中掘出了明朝“刘伯温预言碑”。它强烈谴责帝国主义的侵略罪行，尖锐揭露清政府的卖国嘴脸，表明了坚决反帝的斗争决心。并借刘伯温之口，预言帝国主义最终将被中国人民彻底消灭。义和团运动在京畿兴起前，清朝统治者采取“剿抚兼施”的政策，以安抚劝导为主，并未严厉镇压。自直隶义和团进据涿州后，清廷和帝国主义驻京公使都感到了极大威胁，于是对义和团转而采取严厉措施，四月派聂士成武卫前军沿芦保铁路进行围剿，但清军屡战屡败，无法扑灭遍地的义和团烈火。面对不断高涨的群众反帝爱国运动，清政府不得不重新考虑如何对待义和团。五月初九、初十(6月5、6日)，慈禧分别委派赵舒翘(？—1901)、何乃莹及刚毅前往良乡、涿州一带“开导”、“劝散”义和团，借以探查其虚实。通过观察，刚毅等人看到了义和团的强大威力，认为京师门户“拳民麇集”，已蔓延到诛不胜诛、剿不胜剿的地步，建议清政府改剿为抚。在几经犹豫后，慈禧终于不顾清廷内部“主剿派”的强烈反对，决心对义和团因势利导，进行招抚，以为清廷所用。这样，义和团终于得到清政府的承认，取得了合法地位。从五月中旬开始，在慈禧太后招抚和默许下，直隶各地义和团不分昼夜，日以千计地涌入北京城。至五月下旬，北京各地共有义和团坛口1000多个，团民10万多人。义和团入京后，随处设坛练拳，竖起“扶清灭洋”、“替天行道”等大旗，焚烧、捣毁城内及京郊各处教堂、洋楼，外国人开办的医院、商行及教徒住宅等亦被冲击。如崇文门内路东奉真教堂、沟栏胡同两教堂、宣武门大街耶稣堂、天主堂、东堂子胡同施医院、米市西路天主堂所开铺户、四牌楼六条胡同赫德家、日本旧馆、西交民巷教民房屋、海关办公洋房、前门大栅栏老德记西药房等，均被捣毁并付之一炬。“灭尽洋人教民”的反帝激情弥漫全城。至五月下旬，北京城内只剩下了法国天主教在北京最大的教堂——西什库教堂。

外地入京的义和团中，以“乾”字团、“坎”字团的人数较多，也有一些属于“震”字团和“坤”字团。团民大多是农民、水运工人或小商贩。他们多怀着朴素的反帝热情，成为北京义和团运动的主力。北京城内义和团成分相当复杂，甚至有王公贵族、太监、宫女等。特别是清廷中以载漪、刚毅等人为代表的封建顽固派，怀着极端仇外心理，企图利用这场群众运动达到自己的政治目的，也对义和团表示支持。这种状况使得北京义和团人数虽多，但鱼龙混杂，纪律涣散，缺乏统一指挥。慈禧又采取强令义和团“挂号”和“编入行伍”等手段，进行分化瓦解。据记载，许多义和团在进京后都先到庄亲王(载勋)府中挂号，受到清廷的左右和利用。五月二十日，清廷责成刚毅、董福祥等一面开导、劝散义和团，一面将年轻力壮者招募成军，严加管束。二十五日清政府与八国联军宣战后，又派英年(？—1901)、载澜会同刚毅办理义和团事宜，统率京师和天津一带的义和团队伍。此后，北京义和团普遍竖起“奉旨义和团”旗号，接受招抚，与清兵“联合”，被封建顽固派引上盲目排外的歧路。

天津义和团运动始于光绪二十五年，二十六年春已有很大发展。城外许多地方都建立了义和团坛口，其中较著名的有：王荫荣在西郊张家窝建立的“坎”字团总坛；刘呈祥在西郊高家庄设立的“乾”字团总坛；韩以礼在西郊大南河村建立的“乾”字团总坛；杨老师在杨柳青附近于庄子建立的“坎”字团坛口；滕德生在于庄子建立的“离”字团总坛；以及王老师、潘老师在北仓到丁字沽一带设立的13个坛口等

等。同年四、五月间，天津城内也先后出现义和团及红灯照组织。他们广泛利用乩语、揭帖等宣传手段，揭露帝国主义及洋教势力的侵略罪行，提出鲜明的反帝主张。五月十二日，安次县义和团首领杨寿臣率领几百名团民进入天津城，在三义庙建立总坛。不久，附近县乡义和团纷纷入津。静海等地"乾"字团数千人在首领曹福田率领下，于天津吕祖堂设立总坛；王成德率领文安、霸县、雄县等地数百名"乾"字团众在天津大佛寺建立总坛；张德成率众7000人在天津小宜门设立总坛。在这些外地进入天津的义和团中，以曹福田和张德成率领的两支最为强大。曹福田（？—1900），直隶静海（今属天津市）人，游勇出身，光绪二十六年在静海、盐山、庆云一带设坛建团，被推为团首。他以太平天国首领杨秀清自居，曾表示："吾将洋人杀尽，即杀赃官、贪吏。"张德成（？—1900），直隶新城人，自幼在白沟镇操船为业，光绪二十六年在家乡组织义和团，先后建立了北坛、中坛、南坛三个大坛口，后又到杨柳青等地设立坛口10余处，统称"义和神团天下第一坛"，统辖团众达2万余人。曹福田、张德成等外地义和团进入天津后，逐渐成为反洋教斗争和抵抗帝国主义侵略的主要力量。在这些外地义和团的推动、影响下，天津居民也纷纷组成义和团、红灯照等群众团体，其中以庞围和林黑儿两支最为著名。庞围原籍山东，长期在天津以挑水为生，此时拜师学拳，设立坛口，投入到反帝斗争行列。林黑儿为船户李有的儿媳，幼习拳棒，曾以走江湖演杂技为生。后李有因触犯洋人被捕入狱，林黑儿遂毅然投身义和团，招集青年妇女结成红灯照，自称"黄莲圣母"，远近闻名。至五月下旬，天津城乡义和团计有坛口300多个，团民约4万人。与其他地区相比，天津义和团组织较为严密，战斗力强。义和团运动在天津兴起后，广大人民群众纷纷掀起反对外国教会势力侵略及反抗清朝官府弹压的斗争。五月十八、十九日，杨寿臣带领义和团接连焚烧了天津租界外的全部教堂8处；塘沽、汉沽的广大乡民也竞相焚毁农村教堂。二十日，义和团一举砸毁天津府、县衙门、监狱、天津海关道衙门和电报局，并强迫直隶总督裕禄打开武器库，将枪支弹药搬运一空。义和团还狠狠打击镇压过他们的清军将领和媚外官吏，严惩不法之徒，维护社会秩序。五月二十五日，清廷招抚义和团的谕旨发布后，天津义和团声势更加壮大，反帝斗争也更加坚决。

义和团运动从山东兴起并逐渐扩展到直隶，最后在京、津地区达到高潮。义和团在北京和天津的不断壮大，为抗击八国联军的侵略创造了有利条件。

（董增刚）

廊房之战

清光绪二十六年五月（1900年6月）京、津沿线义和团及清军在廊房阻击西摩联军进犯北京的战斗。

义和团在京、津地区的蓬勃发展引起列强的极大恐慌。英、法、德、美、俄、日、意、奥等国纷纷以保护使馆为名，向北京增兵，准备对义和团进行镇压。五月十四日（6月10日），天津租界内的各国驻军在北京公使团授意下组成侵华联军，英国中将西摩（Seymour，Admiral Sir Edward H，1840—1929）担任统帅，准备分批乘火车进犯北京。当天上午9时，西摩率领首批联军500人先行，第二批联军约600人紧接着上路。此后侵略军不断出动，总数达2300多人。各地义和团闻讯后纷纷拆毁铁路，西摩联军难以顺利通行，至十五日傍晚才到达京、津之间的廊房车站附近。当侵略军正在抢修铁路时，突然一队头扎红布、手执大刀长矛的义和团从铁路右侧猛冲过来，打得敌人措手不及，慌忙向廊房车站窜逃，义和团跟踪追击。这时一队美军恰好从后面赶来，在铁路两旁架起大炮，向义和团轰击，当场打死团民30多人。附近乡民闻讯立即前来参战，将敌人紧紧包围在廊房车站一带，一连两天发起多次冲锋。敌军凭借洋枪洋炮进行抵抗。十八日清晨，当西摩联军准备继续乘车北上时，义和团300多人又奋不顾身地冲来，击毙敌军5名。西摩联军开枪扫射，义和团也有百余人伤亡。是日下午，驻守在落垡的侵略军也遭到义和团包围，西摩闻讯后只得抽出兵力回兵搭救。至二十日，西摩联军已出动六天，仍被义和团群众围困在距北京尚有一半路程的廊房车站，给养断绝，弹药告缺，刚刚修好的铁路又被义和团破坏，前不能进犯北京，后与天津租界失去联系，在廊房一带完全陷于孤立状态。西摩只得改变计划，下令联军退回杨村，准备改由运河北上入京。二十二日，在廊房车站尚未后撤的联军余部又遭到2000多义和团民及董福祥甘军的联合袭击，6名敌军被打死，48人受伤。当晚，义和团和甘军又在杨村车站偷袭敌营，打死打伤近40人。在中国军民联合打击下，西摩感到"进京之路，水陆俱穷"，于是决定放弃进犯北京的计划，沿运河向天津后撤。在回撤路上，联军又屡遭义和团袭击，白天不敢行动，只好夜间窜逃。二十九日，天津租界内2000多侵略军前来搭救，次日西摩联军才狼狈逃回

租界。廊房一战，西摩侵略联军 62 人被击毙，228 人受伤；在半个月时间内未能从天津到达北京。中国军民联合抗击西摩联军的胜利，狠狠打击了侵略者的嚣张气焰，对保卫北京和天津起到了重要作用。

（董增刚）

紫竹林之战

清光绪二十六年（1900）夏义和团及清军攻打紫竹林租界，共同保卫天津的战斗。

紫竹林原为天津城东南、海河西岸一个小村庄。咸丰十年（1860）《北京条约》签订后，天津开放为通商口岸，法、英、美等国首先在紫竹林强划租界，至19 世纪 90 年代末，俄、德、日又在海河西岸划定租界，此后这一地区统称紫竹林租界。它是帝国主义列强在天津的巢穴，也是八国联军侵华的军事据点。二十六年五月十六日（6 月 12 日），盘据在紫竹林内的侵略军肆意挑衅，无故枪杀市民数人，激起天津居民极大愤怒，天津义和团遂张贴揭帖，声言将攻打租界。十九日晚，义和团 400 多人向侵略军发起进攻，开始了攻打紫竹林租界的英勇战斗。二十一日，大沽炮台被八国联军攻陷，数千敌军乘火车开往紫竹林，遭到义和团和清军的奋力拦击。当天下午，租界内一股侵略军准备夺取天津武备学堂，数十名学生与敌人展开激战，隐蔽在学堂房屋中向敌人猛烈射击，最后全部壮烈牺牲。二十七日，600 多侵略军进犯海河东岸、距租界近 10 公里的东机器局（俗称东局子），被清朝守军击退。六月初一，八国联军又纠集 2800 多人从三面包围机器局。清军和义和团临危不惧，利用地雷和排枪射杀敌人百余人，不久因局中火药库被敌击中起火，联军乘势闯入，清军被迫撤出，并将火药库引爆，没给敌人留下一枪一弹。自五月下旬开始，天津附近义和团纷纷赶来参加攻打紫竹林的战斗，其中曹福田、王成德、张德成、韩以礼、庞围、林黑儿等率领的义和团成为主力。六月初三，马玉昆率武卫左军七营抵达天津，不久直隶提督聂士成也率武卫前军 3 万人自芦台赶来，共同参加保卫天津的战斗。直隶总督裕禄遂邀请义和团首领张德成、曹福田与聂士成、马玉昆共同商讨战斗部署，制定保卫天津、攻打紫竹林租界的“三面进取之计”。根据作战计划，马玉昆和曹福田分率所部开始攻打租界北面老龙头火车站，扼制了紫竹林租界的西北要路。聂士成率武卫前军从租界南边发动进攻，并先后占据跑马场、八里台一带，一直打到租界边缘小营门附近，给租界敌军造成了极大威胁。张德成为首的“天下第一团”是攻打紫竹林租界的主力。他们从天津城东南马家口一带发起进攻。八国联军在租界各道口都建有工事，埋有地雷。初六，张德成率义和团与敌力战 5 小时未能取胜。为冲破敌人地雷封锁，张德成在以后战斗中大摆“火牛阵”，在几十头牛的尾巴上捆上油絮，点燃后向租界猛赶，惊恐的火牛狂奔乱跑，将敌人埋设的地雷扫除净尽，义和团民随后猛冲，摧毁租界建筑物多处。初十，张德成又在马家口附近设下埋伏，将企图偷袭的敌军打得措手不及，并乘胜追击，再次焚烧了租界内的洋楼。天津军民攻打紫竹林的战斗从五月中旬开始，一直持续到天津沦陷，前后历时 1 个月。紫竹林之战沉重打击了侵略军的嚣张气焰，对保卫津、京地区起到了重要作用。（董增刚）

攻打西什库教堂

清光绪二十六年（1900）夏，义和团及清军攻打北京西什库天主教堂的战斗。

西什库教堂又称北堂，是法国天主教在北京最大的教堂，也是天主教会在直隶北部的总堂。该堂大主教樊国梁在京、津地区义和团运动高涨后，为对抗中国人民反帝斗争，将八国联军先遣队中 40 名法、意侵略军调往教堂驻扎，并把教堂内教士和 3000 多名教徒组织起来，结成反动武装，作为保护教会势力的主要力量。因此西什库教堂当时就成为帝国主义在北京城内的重要侵略堡垒之一。是年五月中旬，直隶各地义和团大量涌入北京，愤怒烧毁城内各处教堂。五月十九日（6 月 15 日），聚集在西什库周围的义和团开始向该教堂发起进攻，焚烧了教堂门面旁舍。樊国梁指挥侵略军和教民凭借坚固建筑和大量洋枪洋炮负隅顽抗，打死团民 40 多人。二十五日清政府正式宣战后，义和团便与清军互相配合，共同猛攻西什库教堂。朝廷中封建顽固派为利用义和团，对阻止他们废黜光绪帝、另立载漪之子溥儁的阴谋的帝国主义进行报复，极力把义和团引向盲目排外的歧路。载漪、刚毅和载澜等人先后来到西什库督率清军和手持简陋武器的义和团对教堂发起冲锋。为攻破教堂坚固的防御工事，义和团在战斗中自制了许多土火器。比如一种土火箭，全长 5 尺多，点燃引线后，能“力大穿屋”。还有火药罐，即将火药置于沙吊子中，点燃后提绳一抛，“如流星然，落地即燃”。六月十五日，义和团又挖掘地道，用地雷炸毁教堂内仁慈堂东侧房屋，炸死一名教士，炸伤教徒多人。但就在西什库受到义和团及清军猛攻时，慈禧太后却转而向列强乞和投降，在七月初六下令停止进攻。但是义

和团并未放弃攻占教堂的决心。为瓦解敌人，争取被蒙蔽的教徒，七月初六和初十，义和团分别向教堂内投射劝降书，号召教民出教投诚，献出侵略者首级。清政府为进一步控制和瓦解义和团，又以"前敌打仗"为由，将团民纷纷调离出京，使攻打使馆和西什库教堂的义和团力量大为削弱。二十二日，八国联军攻陷北京，日、法两国侵略军立即赶到西什库救援。留守此处的清军及义和团与敌人展开英勇搏斗，激战3小时，800多人壮烈牺牲。上午10时许，侵略军与教堂神父及士兵会合，"互庆余生"。从五月十九日至七月二十二日，义和团及清军围攻西什库教堂长达62天，击毙侵略者15人，教民400余人，给侵略军及反动教会势力以沉重打击。　（董增刚）

老龙头争夺战

清光绪二十六年(1900)夏义和团及清军与八国联军争夺老龙头火车站的战斗。

老龙头火车站位于天津紫竹林租界以北，海河右岸。它不仅是津、京地区的交通枢纽，而且也是紫竹林租界的北面门户。当时俄军有1700多人盘据在此，控制这一军事要地。二十六年五月天津保卫战开始后，老龙头就一直成为敌我双方激烈争夺的战场。五月二十一日(6月17日)，占据车站的一队俄国士兵400多人出外挑衅，行至陈家沟时被义和团和守护铁路的清军击退。第二天，俄军再次出动，在娘娘庙附近炮轰义和团。义和团首领曹福田当即率团民一、二千人联合清军对敌人发动猛烈攻击，俄军不支，向车站溃退。义和团乘胜追击，将车站包围并展开猛攻。俄军被打得狼狈不堪，高挂白旗，以示不战。曹福田坚决不允，表示"非一律扫平不可"。在中国军民猛烈打击下，俄军老龙头阵地险些失守，500多名敌军死伤，被迫到租界求援。此后曹福田一直在车站附近指挥战斗。他率领的义和团红旗招展，旗正中大书一"曹"字，旗旁写有"扶清灭洋"的口号，甚是威武。当时直隶总督裕禄也不得不与曹福田商讨战事，给曹大令一支，让他执掌生杀大权，随意调用各队清兵。二十三日，曹福田又率义和团将车站附近的铁轨纵火焚烧，水师营清军也向老龙头开炮轰击，杀伤敌人数名。六月初一，张德成率领义和团4000多人赶来参战。曹福田斗志昂扬，向租界内敌军投一战书，声称此刻义和团神兵齐聚，定要扫平疆界，要求敌军定准战期，一决雌雄。这封战书词锋犀利，充满了对帝国主义的藐视。初三，曹福田、张德成再度向老龙头发起攻击，马玉昆7营清兵也赶来参战，与义和团合力围攻车站，并借此扼制紫竹林租界的西北要路。初六，曹福田、马玉昆率部由陈家沟、贾家坡、十字桥、娘娘庙等处分路进军，与2000多敌人展开激烈鏖战，曾于次日傍晚一度攻占老龙头车站，击毙侵略军百余人。此后初八、十四、十五等日，义和团及清军又连续发起进攻，打死打伤敌军多人。十七日，八国联军向天津发起总攻，5000多敌军从火车站出发，沿海河进攻天津城北三叉河口及黑炮台一带，切断了曹福田与城内的联系。在车站俄军两面夹击下，曹福田所率义和团被迫分散，撤出阵地。马玉昆也率部出逃。次日，天津沦陷。老龙头争夺战历时一个月，中国军民在战斗中狠狠打击了八国联军的嚣张气焰，为保卫津、京地区做出了重大贡献。　（董增刚）

克林德事件

清光绪二十六年五月(1900年6月)义和团运动高涨期间德国公使克林德被清军击毙事件。

克林德(Ketteler，K · A Barn Von，1853—1900)，德国外交官，1881年来华，曾任广州等地领事官，光绪二十五年为驻华公使。二十六年五月京、津义和团运动高涨后，美、英、德、法、俄、意、日、奥八国以保护使馆为名，派军队进抵北京，在使馆区积极备战，多次向义和团挑衅。五月十八日(6月14日)下午，克林德率士兵出外寻衅，看到义和团练拳习武，毫不迟疑地下令开枪，打死团民约20人。二十三日，清政府准备与列强开战，照会各国公使：为保护使臣及眷属安全，各公使须于24小时内由清军护送前往天津。当晚，各国公使复函清廷，请求展期赴津，要求清政府于次日上午9时答复，克林德等人且准备同来总理衙门"面议"，迫使清廷接受。总理衙门以义和团塞满街市为由进行阻止，并于二十四日上午照复各国公使。但当天上午8时，各国公使尚未接到清廷复文，克林德不愿被中国政府讥其惧怕义和团，遂带一名翻译乘轿气势汹汹地直奔总理衙门而来，准备向清廷提出抗议。途经东单牌楼时，清军神机营霆字枪队章京恩海正率队在此巡逻。恩海看到洋人乘轿而来，即站在北面高处，取枪对准轿子。克林德发现后，即在轿中首先开枪，未中。恩海开枪还击，克林德当场毙命，翻译受伤，是为克林德事件。事后，各国侵略军纷纷以此为借口，对中国进行威胁。清政府已决定对列强宣战，遂令清军和义和团围攻使馆区。克林德作为德国公使，多次屠杀和绑架中国居民，已违反了他的外交使命，其毙命完全是咎由自取。二十七年七月，清政府战败，被迫与英、美、德、法、俄等

11 国签订《辛丑条约》，其中规定：清政府派醇亲王载沣（1883—1951）为头等专使大臣，代表中国政府就克林德被杀一事亲赴德国谢罪致歉，并在克林德被害处建立碑坊，为侵略者"涤垢雪侮"。

（董增刚）

攻打公使馆

清光绪二十六年（1900）夏，清朝封建顽固派利用义和团配合清军围攻各国在京公使馆事件。

是年五月（6 月），义和团反帝爱国运动在北京迅猛发展，英、俄、法、德等帝国主义决心组成八国联军侵华。清政府连续几天召开御前会议，筹议和战问题。顽固派代表载漪为利用义和团，对阻止他们实现废黜光绪帝、另立其子溥儁阴谋的洋人进行报复，于五月二十日（6 月 16 日）伪造了一份列强"归政照会"，诡称英国将派兵胁迫慈禧太后归政于光绪帝。慈禧闻讯大怒，于二十四日决定对各国宣战；同时，为恐吓、围困外国公使，乘混乱之机实现废立阴谋，于当天下午 4 时组织清军并有部分义和团配合，围攻东交民巷外国使馆区。军机大臣、武卫军统帅荣禄为总指挥。荣禄将武卫中军列阵于使馆区东、南面，董福祥甘军列阵于西、北面，昼夜猛攻。400 多名侵略军、各国外交使臣和教民在使馆区内依恃坚固建筑和临时构筑的工事，凭借洋枪洋炮负隅顽抗。二十五日下午，董福祥率领甘军首先攻破奥地利使馆。当夜，清军又焚烧了荷兰使馆、中国通商银行和海关大部分房屋。次日，使馆区内枪声不绝，"烧交民巷，灭洋人"等口号声昼夜不断。二十七日，比利时、意大利等国使馆也被焚烧。各国侵略军和使臣纷纷退守英、俄、美、法、德等使馆内，推选英国公使窦纳乐为最高指挥官，调动使馆武装顽强对抗。海关总税务司赫德也火速派人前往天津租界求援。但就在清军、义和团围攻使馆、造成"洋人几不能守"的关键时刻，慈禧得知"归政照会"并无实据，又怕义和团势力太大而无法控制，遂从主战转为求和。荣禄也极力怂恿慈禧乞和，并嘱清军不可力攻使馆，以为求和留下余地，甚至唆使武卫中军对参与围攻使馆的义和团猛烈开火。二十九日，荣禄奉慈禧旨意在北御河桥端悬挂白旗，旁立"钦奉懿旨，力护使馆"的木牌。广大甘军及义和团对清廷投降行径极为愤怒，当场将一名议和官员击毙。当夜，又向使馆发动"惊人的排枪射击"，此后不断猛攻。慈禧和荣禄害怕公开向列强议和会激起全国人民反对，采取明攻暗保的策略，授意武卫中军施放空枪空炮，虚张声势，又处处节制甘军，不使力攻。六月十八日，荣禄派人与使馆秘密接触，不断送去面粉、蔬菜、冰和瓜果之类的生活必需品，希望各国公使出面斡旋，同意议和。此后一段时间，攻打使馆的战斗时断时续，基本处于休战状态。七月中旬北京沦陷前，清军又一度向使馆区发动大规模进攻，目的是拘捕各国使臣，作为人质，但很快北京被八国联军攻陷，清军目的未能达到。清军和义和团从五月二十四日至七月二十日围攻使馆区，历时 56 天，击毙联军 43 人，击伤联军及使馆人员 152 人，虽然在一定程度上打击了帝国主义的嚣张气焰，却违反了保护外交使节的国际交往准则和惯例。这是清朝封建顽固派有意将义和团反帝斗争引向盲目排外的歧路的结果。

（董增刚）

东南互保

清光绪二十六年（1900）英、美等帝国主义勾结东南督抚共同防范义和团运动、阴谋分裂中国的侵略活动。

是年五月（6 月），义和团运动进入高涨阶段，东南各省也不断发生反帝教案，长江中下游会党更跃跃欲试，活动频繁。对此，英帝国主义坐立不安，它一直把长江流域视为自己的势力范围，害怕义和团运动波及江南，影响其既得利益，处心积虑地防止和镇压，并想趁机一举实现独霸长江流域的野心。五月二十日（6 月 16 日），英国政府下令"仙女"、"红雀"、"无畏"3 艘军舰分别驶入南京、汉口和吴淞，并准备派军舰到每个条约口岸。同一天，英国政府又授权上海代理总领事霍必澜（Pelham. L. Warren，1845—1923，又译为华伦）向清廷两江总督刘坤一和湖广总督张之洞表示，愿意用武力帮助"维持地方秩序"。刘坤一（1830—1902），湖南新宁人，字岘庄，咸丰年间率楚勇对抗太平军，光绪五年调任两江总督。他与张之洞都是亲英派的重要人物，与朝廷中的主和派遥相呼应，互相支持，恶毒攻击义和团，坚决主张镇压，极力反对与列强开战，深恐义和团运动波及他们的管辖范围，推行实力弹压政策，极力保护洋商教士。当他获知英国的态度后，喜出望外，表示不惜一切与英国同心协力，"维持和平"，立即会同督办芦汉铁路大臣盛宣怀与沪、宁、汉的英国领事频频接触，商讨"互相保护"的具体事宜。江南各地买办官僚和士绅，如张謇、沈瑜庆、沈曾植、陈三立等，也本着各自利益麇集在刘、张、盛周围，东奔西跑，出谋划策。但是，在对待英国是否有必要出兵江南的问题上，刘坤一、张之洞态度不尽相同。刘坤一盼望英国军舰早日到来，

而张之洞害怕各国群起援例，不愿接受英国军事保护。五月二十二日，刘、张经过协商，一致向英国表示：他们有足够的力量维持长江流域的和平，暂不需要英国军舰出兵帮助。霍必澜看到独霸长江地区的阴谋落空，遂放出空气，谎称欧洲各国准备进攻吴淞，对刘坤一施加压力，提出中、英共守吴淞炮台的要求。英国独霸长江地区的阴谋引起美、俄、法等国强烈不满。美国传教士福开森(Ferguson J.C.，1866—1945)当即向盛宣怀表示：各国并无进占吴淞之意。俄国也立即派兵150人侵入汉口，其他列强都纷纷声明要派军舰进入长江。英国见此情形，生怕激化与列强的矛盾，决定暂缓派舰出兵，暂时放弃独霸长江流域的打算。鉴于列强共同觊觎长江流域的局面，刘坤一、张之洞提出与各国上海领事团、而不是单独与英国谈判在长江流域实行"互保"的建议。张之洞请求美国总统与各国磋商，保护东南大局，并致电英、美、日三国公使，表示长江内地由各督抚自任保护的原则，上海各国领事团也与刘、张等人遥相呼应，声称他们无意出兵长江内地。这样一来，英国预谋单独侵吞长江流域的"互保"阴谋，一变而为以英、美为主的各列强与东南督抚共同进行的"互保"了。

五月二十五日，清廷向欧洲各国宣战，"招抚"义和团。盛宣怀获悉后，害怕影响"互保"密谈，严饬各地电报局不准张扬，于二十八日飞电刘坤一、张之洞，建议抢在正式奉旨前，与各国领事订立"互保"条约。李鸿章则称宣战上谕是"矫旨"，概不奉行，支持两江、湖广的分裂活动。张謇、沈瑜庆、沈曾植等人也极力游说。刘坤一、张之洞遂下决心采纳盛宣怀的建议，急忙电令上海道余联沅(？—1901)与各国领事紧急会商。三十日，余联沅和苏、皖、赣、鄂、湘各省巡抚代表与领事团举行会议，盛宣怀以两江、湖广地区"公请"帮办的身分出席。经过谈判，于当天议定了《东南保护约款》9条和《保护上海城厢内外章程》10条。前者的主要内容是：长江及苏、杭等地的各国商民、教士产业由各地督抚切实保护；各口岸的外国兵舰照常停泊；上海制造局火药库的军火只限于"剿匪"和保护中外商民之用。后者的主要内容是：上海租界由各国巡防保护；上海道则添募巡捕，在城乡内外昼夜巡逻，严拿"土匪"、"流氓"等等。为贯彻"互保"方针和扩大"互保"地区，刘坤一、张之洞又极力鼓动和串联其他各省参加。很快，李鸿章对此表示全力支持，山东巡抚袁世凯亦表示赞成。六月十八日，闽浙总督许应骙按照东南互保精神，与俄、英、美、日等国签订《福建互保协定》。浙江、四川、陕西、河南等地督抚也表示赞同。这样，"互保"范围就由两江、湖广扩展到全国10多个省份。

东南互保本来是刘坤一、张之洞等地方官吏违背清廷宣战谕旨，以保护东南地区为名，公开对抗清政府的分裂行径。但慈禧太后反而称赞这是老成谋国之道，在批阅了"互保"奏折后说：这与朝廷"意见正复相同"。"互保"有功人员均获得加封晋爵的奖赏。可见，刘、张等人策划东南互保，与慈禧太后的宣战在实质上是完全一致的，即都要镇压义和团、消灭义和团，维护其封建统治，仅是在策略上略有差异而已，因此最终两者都走上了崇洋媚外、屈膝为奴的卖国道路。

《东南保护约款》和《保护上海城厢内外章程》只是草约性质。刘坤一、张之洞原以为很快就能完成签约手续，于六月初七照会各国领事签字，结果遭到各国拒绝。这是因为，此时八国联军在北方侵略进展顺利，列强也不愿用此条约限制他们在长江流域的活动。但刘、张二人仍把"互保"条款看作正式签订的文件推广执行，在江南一带张贴"互保"告示，禁止一切反帝活动，严拿义和团民，充当帝国主义的忠实鹰犬。

东南互保的形成，严重阻碍了东南地区人民群众的反帝爱国斗争，给华北地区的义和团运动带来了极为严重的困难。东南督抚的分裂行径，还为以后北洋军阀和国民党统治时期列强与军阀官僚彼此勾结进行割据，开辟了恶劣的先例。　（董增刚）

天津沦陷

清光绪二十六年六月(1900年7月)天津被八国联军攻占，惨遭荼毒的事件。

是年五月中旬，义和团及广大清军保卫天津的战斗开始后，帝国主义列强也加紧向中国大举增兵，准备进一步扩大对华侵略战争。至六月初，在大沽登陆的八国联军总数已达1.4万人。沙俄关东司令官阿列克谢耶夫(Алексеев Е.И.，1843—1949)也从旅顺赶来，指挥八国联军进攻天津的军事行动。六月十三日(7月9日)，一股日军从租界冲向天津南郊纪家庄，企图包抄那里的义和团及清军。义和团在韩以礼率领下顽强坚守，击毙日军中队长一名，但终因寡不敌众而失利。与此同时，八国联军6000人从租界扑向小营门、马场道，向聂士成武卫前军发起进攻，清军被迫撤至八里台一带。是时占领纪家庄的日军又从背后冲来，清军腹背受敌，局势危急，但广大官兵仍奋勇抵抗，与敌苦战两个多小时。直隶提督聂士

成在枪林弹雨中身先士卒，身上负伤多处，“腹破肠出，犹挥军向前”，最后头部、胸部相继中弹，英勇牺牲。聂士成(？—1900)，字功亭，安徽合肥人，淮军将领，曾参与镇压太平军和捻军。中法战争、中日甲午战争期间，他英勇抗敌，战功卓著。光绪二十六年春，曾奉命在落垡等地镇压、屠杀义和团，但在反侵略战争中，能够英勇抵御外侮，直至阵亡，不愧为一个爱国将领。聂士成牺牲后，清军败溃，阵亡350多人。同一天，侵略军还占领了天津城南海光寺西机器局，兵临天津城下，局势万分危急。在大敌压境的紧要关头，帮办北洋大臣宋庆却秉承慈禧太后旨意，伙同马玉昆清军在天津城内大杀义和团，为清政府乞和投降做准备。当天晚间，义和团与清军合力围攻租界，清兵责令义和团充当先锋，冒着猛烈炮火向敌人进攻，清军却在背后向义和团开枪射击，直至天明。义和团当场牺牲2000多人。十七日凌晨，阿列克谢耶夫指挥5000多俄军进犯天津城东北角三叉河口及黑炮台一带；同时英、日、美、法等国军队5000多人从海光寺向天津南门发起进攻。清军“闻之”，然“皆以击拳匪为忙”，即在城内大肆屠杀义和团，仅半天时间，城内义和团坛场全遭破坏。而后，宋庆、马玉昆率军临阵脱逃，仓皇退往北仓、杨村。天津城内留守兵力只有少数义和团、清朝练军、水师营和打雁猎户，总共不足1万人，防守力量大为削弱。面对敌人的猖狂进攻，留守天津的清兵和义和团进行了顽强抵抗。天津城南门是战斗最激烈的战场，坚守此处的有义和团民、何永盛练军及打雁猎户。他们利用城外壕沟、坟丘及房屋作掩护，灵活地阻击敌人。猎户凭借准确枪法也在船上和芦苇丛中向敌人射击。5000多侵略军被四处射来的子弹打得晕头转向，进退两难。战斗一直持续到第二天凌晨，敌军才在汉奸郑殿芳引导下炸开城墙，攻入城中。义和团、清军又与敌人展开激烈的巷战，张德成、杨寿臣等义和团首领身负重伤，练军守备宋春华英勇牺牲。下午，义和团及清军渐不能支，被迫撤出天津。南门保卫战，中国军民共击毙敌军750多人，是中国人民抗击八国联军战斗中歼敌最多的一仗。在南门保卫战同时，攻打天津城东北角的敌军也受到义和团及清军水师营的有力阻击，伤亡150多人。直至十八日下午南门失守后，城东北角的守军受到敌人前后夹击，才撤出战斗。天津遂被八国联军攻占。

八国联军攻占天津后，进行了野蛮的屠杀。当时天津城中大乱，逃难的人群纷纷涌向北门。侵略军在市中心鼓楼上架起大炮，对准人群疯狂射杀。“自城内鼓楼迄北门外水阁，积尸数里，高数尺”；天津西门也是“死尸山积”；海河内死尸漂溢，阻塞河流。事后清理天津城内满街的尸体，三日未净。在城乡，八国联军还以搜捕义和团为名，肆意屠杀乡民。凡稍有可疑者，立即就地枪毙，甚至河东一对正结拜天地的新婚夫妇，也因身着红衣，被侵略军疑为红灯照和义和团，“用枪一并轰毙”。八国联军还纵火焚烧房屋，抢劫珠宝财物。整个城市一片火海，多数商业区被付之一炬，化为废墟。天津城外也到处是碎砖破瓦，狼籍满地。成千上万的天津人民家破人亡，流离失所。在长芦盐务处，日军抢走白银200多万两；俄军也将造币厂存银一劫而空；美军抢来的白银可堆成一座高、宽各30英尺的银山。各国士兵更是带枪结伙，游街串巷，挨家挨户进行搜刮。金银、珠宝、古玩、钟表等财物被洗劫一空。

八国联军在灭绝人性的烧杀淫掠的同时，还对天津分区占领，实行残酷的殖民统治。六月二十六日，帝国主义各国在天津设立“暂行管理津郡城乡内外地方事务都统衙门”(简称都统衙门)，下设巡捕、卫生、财务、粮食及中国私人财产管理等部门，开始对天津、静海、宁河一带进行殖民统治。帝国主义各国为扩大在天津的侵略势力，还拼命争夺地盘，扩大租界。俄国将老龙头车站附近大片土地划为“租界”，面积多达5917亩，并声称这是俄国部队通过战争行动而取得的财产，是“征服者的权利”。同年十一月初九，沙俄逼迫清政府签订《天津俄租界条约》，将霸占的“租界”合法化。英、法、日等国纷纷仿效，将租界外沿领土统统收归界内。意大利、比利时和奥地利也各自独占一块地方，竖起界碑，作为自己的统治地盘。二十七年七月，《辛丑条约》签订，帝国主义各国本应从天津迅速撤兵，但它们一再推托，迟迟不把天津地区交还中国政府。直至二十八年七月十二日(1902年8月15日)，各国才以不许中国军队在天津四周20里内驻扎等为条件，撤销都统衙门，向直隶总督袁世凯举行移交天津地区的仪式，勉强从天津撤出驻军。

(董增刚)

沙俄侵占东三省

清光绪二十六年(1900)沙俄利用八国联军共同镇压义和团、清政府岌岌可危之机，武装进犯中国东北三省的侵略活动。

是年初，华北地区义和团运动开始高涨，东北也出现义和团组织，不断焚烧铁路和教堂，打击俄国在东北的侵略势力。东北义和团运动的兴起，标志着沙

俄企图利用“和平”手段、“从经济上征服满洲”政策的破产。为维护沙俄在东北的既得利益，继续贯彻开疆拓土的侵略方针，沙皇尼古拉二世在派兵与英、法、德、美等国组成八国联军，共同进犯北京的同时，还单独出兵东北，进行赤裸裸的武力征服。五月二十七日(6月23日)，俄国宣布阿穆尔军区和西伯利亚军区的部队进入战争状态，六月上旬，已动员部队11.6万多人，组成4个军团，做好了进攻中国东北和华北的准备。西伯利亚第一军团以旅顺口为基地，准备夺取大沽、天津和营口，直逼北京和盛京(沈阳)。西伯利亚第二军团以伯力为基地，作战方向是哈尔滨和盛京。由阿穆尔军区部队右翼组成的西伯利亚第三军团以斯列田斯克为基地，拟从呼伦贝尔城(海拉尔)和海兰泡两个方向直趋齐齐哈尔和盛京。阿穆尔军区部队左翼组成登陆军团，以海参崴为基地，作战方向是宁古塔、吉林和盛京。在上述四路军队中，旅顺口、海兰泡和伯力三路为主力。为便于军事指挥，沙俄政府将北直隶和南满战场(旅顺口至盛京)交给关东地区部队和太平洋海军司令官阿列克谢耶夫中将指挥，将北满战场(吉林、黑龙江两省)交给阿穆尔军区司令格罗杰科夫(Гродеков)指挥。陆军大臣库罗巴特金(Куропаткин，А. Н.，1848—1925)负责全面战事，直接向沙皇负责。六月十九日(7月15日)，俄国军舰进犯瑷珲，被中国士兵击退。二十日、二十二日，俄军接连在海兰泡和江东六十四屯制造骇人听闻的大屠杀，揭开武装进犯中国东北的序幕。二十二日当天，西伯利亚第二军团从伯力附近驶入松花江，占领富锦县的拉哈苏苏，二十九日攻占三姓(黑龙江伊兰)后，继续向哈尔滨进犯。七月初五，西伯利亚第三军团从老祖鲁海图出发，直逼呼伦贝尔城，在完工车站遭到清朝守军的顽强抵抗。次日，俄军登陆军团攻占珲春，全力向宁古塔推进。初七，西伯利亚第三军团另一路从海兰泡出发，占领瑷珲城上游35公里的黑河屯。初九，哈尔滨失陷，次日呼伦贝尔城失守，十一日瑷珲重镇又被俄军占领，惨遭俄军焚毁，化为瓦砾。同一天，西伯利亚第一军团也从旅顺口出发，攻占营口，十八日再陷海城。这时，八国联军已向北京进犯，沙俄为在京、津地区取得主动，从南满战场西伯利亚第一军团抽调大批兵力开赴华北，推迟进攻盛京，其他各军仍按原定方案直插东北腹地。八月初四，齐齐哈尔失守，黑龙江将军寿山(1860—1900)自杀身亡，黑龙江全省沦陷。次日，宁古塔失守。此后，吉林将军长顺(1839—1904)下令清军前线官兵不许与俄军开仗，极力迎合李鸿章的乞和活动，并于八月三十日向俄军投降，吉林全省沦入敌手。此时，北京已被八国联军攻占，俄军又将主力调回南满战场，于三十日攻占牛庄，闰八月初三侵占鞍山，初六占领辽阳。清朝陪都盛京完全失去屏蔽。盛京将军增祺(？—1919)乞和未成，连夜逃往新民厅。初八，盛京被俄军占领。十三日，各路俄军于铁岭会师，东北三省全部沦陷。

北京被八国联军攻陷后，慈禧太后携光绪帝仓皇出逃，不顾一切向列强乞和。沙俄政府一面积极参预与英、法、德、美等国共同制裁和宰割中国的议和谈判，一面谋求与清廷及东北地方政府单独会谈，订立秘密协定，以实现永久霸占东北三省的野心。闰八月十四日，被俄军软禁在新民厅的盛京将军增祺再次向俄国提出谈判请求，于十八日派革职道员周冕等人前往盛京，与阿列克谢耶夫谈判。九月十八日，周冕擅自越权，与俄方代表草签《奉天交地暂且章程》，章程规定：盛京将军名义上仍是该省最高长官，但已无军政实权，俄国在盛京(沈阳)设立总管一人，对该省实行有效统治；盛京原有中国军队全部解散，武器和军事设施全部收缴或拆毁；沙俄有权随时动用武力镇压当地人民的反抗。实质上已把该省置于俄国直接殖民统治下。二十二日，沙俄又拟订《俄国政府监理满洲之原则》，表面上承认东三省为中国领土，保留中国在该地区的行政管理权，但实际上却要把《奉天交地暂且章程》的殖民统治方式扩展至整个东北地区，将东北三省变为沙俄的殖民地。十月初九，沙俄政府威逼增祺，以“暂且的商议”为由在《奉天交地暂且章程》上用印画押。十一月十二日，清政府任命驻俄公使杨儒为全权大臣，与俄谈判接收东三省事宜。二十八日，清廷得知增祺擅订《奉天交地暂且章程》后，将他交部严加议处，宣布该章程无效。杨儒据理力争，东北人民也自发组成忠义军，给沙俄侵略者以沉重打击。日本对俄国企图独占满洲、触犯自身利益深为不满，联合英、美等国发难。迫于形势，沙俄在二十八年三月初一(1902年4月8日)，在北京签订《中俄交收东三省条约》，东北三省仍归中国版图，交中国治理，俄国军队限期从东北撤出，从而使沙俄建立“黄俄罗斯”的侵略计划变为泡影。但沙俄并不认真执行《中俄交收东三省条约》，为此曾激起中国人民的“拒俄运动”；同时沙俄也未放弃独占满洲的梦想，致使日俄矛盾因争夺中国东北地区而迅速加剧，最终引起以后的日俄战争。(董增刚)

海兰泡惨案

清光绪二十六年(1900)沙俄侵略军在海兰泡残杀中国居民的事件。

海兰泡原名孟家屯，是我国黑龙江省瑷珲县一个村庄，位于黑龙江和精奇里江汇合处。咸丰八年(1858)，沙俄通过不平等的中俄《瑷珲条约》将其强占，改名为布拉戈维申斯克(意为“报喜城”)，后来成为俄国阿穆尔省首府，这里的中国侨民约有1.5万多人。光绪二十六年，沙俄准备入侵中国东北三省，于五月二十七日(6月23日)在阿穆尔军区实行军事动员，此后海兰泡不断发生迫害华人的暴行，许多华人不堪虐待，纷纷逃回瑷珲。六月十九日，俄国军舰“米哈依尔”号和“色楞格”号从海兰泡沿江下驶，进攻瑷珲，被中国士兵击退。沙俄军事当局遂以此为借口，策划对海兰泡的中国居民进行血腥屠杀。第二天，俄军突然宣布封锁黑龙江面，禁止华人渡江回归瑷珲，在海兰泡全城进行疯狂搜捕，将抓到的华人统统押到精奇里江边一个锯木场中，华人住宅、财产和商店也被洗劫一空。二十一日，俄军以送华人过江为名，将人群驱往江岸，但江边没有一条船只。突然，俄军士兵手持刀斧，东劈西砍，将华人向江中驱赶，只见岸上断尸碎骨，哭号一片；江中溺亡无数，骸骨漂溢，蔽满江面。这样灭绝人性的大屠杀一共进行4次，持续5天，5000多无辜华人惨遭杀害，尽沉诸江，泅水渡江幸免者仅约百人。二十六日，沙俄当局宣布，海兰泡的中国人已被“肃清”。海兰泡惨案是沙俄侵略者对手无寸铁的华人进行的惨绝人寰的野蛮屠杀，是沙俄殖民者对中国人民欠下的一笔血债。俄军的残暴行径激起了中国人民的无比愤怒，同时也遭到全世界公正舆论的一致谴责。　(董增刚)

江东六十四屯惨案

清光绪二十六年(1900)沙俄侵略军在黑龙江流域残杀江东六十四屯中国居民的事件。

江东六十四屯位于黑龙江左岸，为精奇里江江口以南至孙吴县霍尔莫勒津屯对岸的一片土地，南北长约200里，东西宽约90余里，历史上曾建有64个中国居民村屯，故名。咸丰八年(1858)，中俄签订《瑷珲条约》，黑龙江以北60多万平方公里的领土被沙俄霸占。但条约明文规定了江东六十四屯中国居民在原地的永久居住权和中国政府对这些居民的永久管理权。虽然沙俄早已垂涎这片沃土，但一直未能如愿侵吞。至光绪二十六年，常住江东六十四屯的中国居民约有2万多人。是年五月，沙俄准备进犯中国东北三省，在阿穆尔军区实行军事动员。六月二十一日(7月17日)，沙俄当局在海兰泡搜捕屠杀中国居民的同时，还派出一支军队渡过精奇里江，扑向江东六十四屯。俄军所到之处举火焚烧，恣行屠戮。死里逃生的华人纷纷赶往黑龙江边，竞相抢渡，回归瑷珲。俄军骑兵随后赶来，向人群射击，鲜血染红了黑龙江水。驻守瑷珲的清军副都统凤翔(?—1900)见此情形，急派统领王良臣率清军300人深夜渡江，截击俄军援兵。次日清晨，清军诸将士奋不顾身，大呼直前，将俄军击退，为逃难华人赢得了宝贵的渡江时间。于此同时，瑷珲水师营调用30多艘商船和战舰，飞棹如梭，昼夜摆渡，将幸存的同胞骨肉救过江岸。同一天，另一支俄军渡过精奇里江，仅在博尔多屯一处就枪杀华民上千人。未及过江者不分老幼，统统被赶入江中，浮尸蔽江者数日。至二十五日，俄军已杀戮华民2000多人。七月初十，沙俄政府悍然宣布江东六十四屯已归俄国当局管辖。江东六十四屯惨案是沙俄侵略军对手无寸铁的华人进行的血腥屠杀，也是沙俄殖民者继海兰泡惨案后对中国人民欠下的又一笔血债。江东六十四屯惨案揭开了沙俄武装侵略中国东北三省的序幕。　(董增刚)

自立军起义

清光绪二十六年(1900)唐才常领导自立军在长江沿岸地区发动的反清武装起义。

唐才常(1867—1900)，字黻丞、佛尘，自号洴澼子，湖南浏阳人。出身于封建士大夫家庭，光绪二十四年戊戌维新期间，在湖南参加变法运动，广泛宣传资产阶级民权思想及君主立宪制度，是年八月应谭嗣同之邀赴京，准备参与新政，行至汉口即得到慈禧发动政变、光绪帝被囚、谭嗣同等六君子被杀的噩耗。他悲愤至极，决心推翻以慈禧为首的清朝封建顽固派政权，拥立光绪帝复辟，恢复变法新政。为此赶赴上海，后辗转至香港、新加坡和日本，在日本谒晤了康有为、梁启超等人，广泛联络流亡海外的志士，以图匡救祖国。二十五年初回国，在上海主编《亚东时报》，以开拓民智、激发忠君爱国之志为己任。夏天再赴日本，与康有为、孙中山取得联系。当时康有为正大力提倡保皇，鼓动起兵勤王。孙中山也密谋发动反清武装起义。保皇党和革命派都把唐才常看作在国内组织武装起义的倚重人物。康有为给他3万元活动经费，并表示愿以募集到的30万元继续支持。同年四月(5月)，康有为、梁启超、唐才常等人在日

本横滨成立自立会，康有为任会长，梁启超为副会长，并在《清议报》上发表《自立会序》，宣布维新保皇的政治宗旨。孙中山也主动与康、梁联络，倡议合作，在长江地区发动起义，派吴禄贞(1880—1911)、傅慈祥、毕永年、戢元丞等兴中会员直接参与其事。康有为一心保皇，拒绝与革命派合作，唐才常因受孙中山革命思想的影响，欣然表示愿与革命派联合起事，决心回国发难，并与梁启超、吴禄贞、林圭、秦力山等商讨起义的具体部署。唐才常回国后，支持丁惠康、汪康年等人在上海英租界新马路梅福里东文译社创办正气会。由于唐才常与保皇派和革命派都保持密切联系，受到双方的影响，思想上经常呈现自相矛盾的状态。他所领导的正气会既有反满倾向，却又主张保皇；既对义和团运动持否定态度，又认为机不可失，试图利用义和团造成的动荡局面发动武装起义。唐才常依靠的武装力量是长江中下游地区的会党组织和新军中下级军官及士兵。为便于联络各地会党和新军官兵，唐才常采取了秘密结社中传统的建山堂、发票布的办法。自立会会员称"会友"，每人发"富有票"一张，上书救国保民的政治宗旨，作为会员凭证。自立会建立富有山堂，设有正龙头、副龙头、内八堂、外八堂等名目，体系庞大。许多省份会党头目均名列其中，唐才常也被列为副龙头。自立会的口号是："万象阴霾打不开，红羊劫日运相催，顶天立地奇男子，要把乾坤扭转来。"在筹建勤王军队过程中，唐才常一方面接受康、梁等人的指导，另一方面又遥戴孙中山为"极峰"，在两派中左右逢源，"各方咸为之用"。经过上述努力，唐才常领导的武装力量发展十分迅猛，至二十六年六、七月间，人数已达10万多人，遍布鄂、皖、赣、湘各省的会党组织及新军中。六月初五(7月1日)，唐才常以保国保种为号召，邀集容闳、严复、章太炎、文廷式等社会名流与正气会员在上海张园召开会议，号称"国会"，后改为"中国议会"，容闳被推为议长，严复为副议长，唐才常任总干事，总会设在上海。国会宣布三项宗旨：一、保全中国自立之权，创造新自立国；二、不认满清政府有统治中国之权；三、请光绪皇帝复辟。唐才常召开国会，旨在借重社会名流的声望以资号召，并使武装勤王取得合法地位。但会上争吵激烈，在依靠哪一派政治力量保全中国的策略问题上分歧很大。有人主张借重张之洞、李鸿章等地方督抚；有人主张依恃日本和英、美等列强。汪康年等人旨在发扬清议，依靠张之洞等地方实力派保护中国东南，徐图振兴之策，没有与清廷决裂的勇气和决心；唐才常等人则十分痛恨后党顽固派，坚决主张勤王起事。几派意见始终无法统一，矛盾日益尖锐。在此情况下，唐才常等人毅然决定在正气会内恢复自立会名目，不顾汪康年等人的反对，于七月初六(8月2日)以"总会理事员"名义宣布篆刻关防，组成自立军，任命自立军统带，并挟国会以自重，作为起事以后立国建制的雏形和统率自立军的最高机构。国会名义上是自立军的领导机关，但实际上自立军领导权仍掌握在唐才常手中。就在唐才常等人在上海活动之际，林圭、傅慈祥等人也在武汉加紧武装起事的准备，于汉口英租界李慎德堂设立自立军机关总部，将各地自立军勤王武装分为中、前、后、左、右各军及总会亲军、先锋营，共7军，兵力约2万人。中军为自立军本部，设在武汉，由林圭、傅慈祥统领；前军在安徽大通，由秦力山、吴禄贞指挥；后军在安徽安庆，由田邦璿负责；左军在湖南常德，陈犹龙统之；右军在湖北新堤(洪湖县城关)，由沈荩统率；总会亲军和先锋营在武汉，由唐才常亲自指挥，唐并负责节制诸军。起义原定于七月十五日在汉口发动，湘、鄂、皖各地五路兵马同时响应，但因康、梁等人允诺的汇款迟迟未到，自立军粮饷无着，起义日期只得后延。然而安徽大通自立军前军未得通知，秦力山、吴禄贞等人于十五日准时起义，一举轰毁大通盐局，占领大通县城。两江总督刘坤一、安徽巡抚王之春急调湖北、安徽两省清军全力进剿，另派3艘兵轮驶入大通江面进行堵截。秦力山、吴禄贞兵少不敌，率众退往九华山。十五日当天，唐才常从上海溯江西上，抵汉口指挥起义，但因饷械延误，起义时间一拖再拖。这时大通起义失利的消息传来，湖北清军又蠢蠢欲动。唐才常、林圭等人默察形势，决定破釜沉舟，于二十八日在汉口起义，湘、鄂各地同时并举，计划汉口自立军先夺取汉阳兵工厂，解决武器装备后一举占领武汉三镇，然后挥师西安，救回光绪帝(此时由于八国联军攻陷北京，光绪随慈禧逃往西安)。但却因对湖广总督张之洞与英帝国主义抱有幻想而最终失败。

张之洞对自立军的活动早有了解。义和团兴起后，英国一面极力拉拢张之洞结成"东南互保"，一面策动康有为指使自立军拥立张之洞在长江流域宣布独立，建立"东南自立之国"。唐才常、林圭等奉康有为旨意，也曾劝说张之洞宣布独立，脱离清政府。在清廷、英国和自立军三者之间，张之洞反复权衡，态度暧昧。但到自立军起事前，慈禧与光绪已从北京安全逃往西安，清政府得以苟延残喘，于是张之洞决计回到清廷怀抱，剿灭自立军，并将这一决定通告英国

驻汉口领事傅磊斯(Fraser E. D. H.，1859—1922)。英国此前也暗中支持唐才常，有意把自立军作为可资利用的肢解中国的途径之一。但此刻八国联军正与清政府洽谈媾和条件，对慈禧采取“保全主义”；同时英国也惧怕自立军起义动摇它在长江流域的统治秩序，故转变态度，支持张之洞扑灭自立军。二十七日晚，张之洞下令清军包围唐才常、林圭在前花楼街宝顺里4号的住所和设在汉口英租界内李慎德堂的自立军总部，并于次日清晨逮捕了唐才常、林圭等30多人，查获自立军大批军械、印章、书札及“富有票”等。二十九日清晨，唐才常、林圭、傅慈祥等20余人在武昌紫阳湖畔被残酷杀害。退往九华山的秦力山、吴禄贞得知这一消息后，立即解散部队，分别潜伏。新堤自立军右军一部及湖北蒲圻、麻城、沙市、巴东和湖南常德、岳州等地的自立军及会党组织也曾举行起义或开展零星、分散的斗争，但在张之洞严厉镇压下相继失利。唐才常领导的自立军起义最终失败。

唐才常领导的自立军是资产阶级革命派、保皇党及各地会党等诸多社会力量组成的联盟武装，其成立伊始，政治纲领就自相矛盾，宗旨模糊，兼之对英帝国主义和洋务派官僚张之洞抱有不切实际的幻想，因而起义未给清政府造成沉重打击即迅速失败。但自立军起义是戊戌变法后在长江流域掀起的有10多万人参加的武装斗争，锋芒直指掌握清朝实权的后党顽固派，在当时具有进步意义。这次起义还吸引了革命派参加，导致了保皇派的分化和革命派的发展，为推动两湖地区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和辛亥武昌首义的爆发创造了条件。 (董增刚)

北京沦陷

清光绪二十六年七月(1900年8月)古都北京被八国联军攻陷，遭到空前浩劫的事件。

同年五月，英、法、俄、美、德、日、意、奥等帝国主义国家以保护使馆为名，对中国发动侵略战争，镇压义和团反帝爱国运动。清政府也发布上谕，向八国联军宣战。六月十八日(7月14日)，八国联军攻占天津后，积极准备进攻北京。七月初十，联军2万多人从天津出发，沿运河两岸向北京进犯。当时京、津地区义和团由于清政府的利用、瓦解和屠杀，力量已大为削弱，但北京地区仍有武卫军、甘军、各地勤王师以及宋庆、马玉昆的军队，总数在10万人左右，完全有可能与敌人抗衡。可是，慈禧太后被八国联军吓破了胆，一再电催李鸿章北上，与列强谈判，企图通过乞和投降换取联军停止进攻北京，未选派得力将领统率京畿附近10万清军进行周密布防，致使八国联军从天津出发后，很少遭到清军的强大抵抗。七月十一日深夜，联军抵达北仓。驻守北仓附近韩家墅的聂士成残部与当地义和团民在运河两岸挖掘战壕，放河水阻遏敌军。次日清晨，双方发生战斗，联军伤亡300余人。不久，英、日、美等国军队迂回到清军侧翼进行夹攻。清军不支，北仓失守。十二日，联军进攻杨村，驻守此地的宋庆、马玉昆部军心瓦解，刚一交锋便纷纷败退，逃往通州。直隶总督裕禄见事不妙，口呼智穷力竭，自杀身亡。同一天，坚决主张抗击八国联军、力阻议和投降的帮办武卫军事务大臣李秉衡请缨出战，次日抵达河西务，率张春发、万本华、夏辛酉(?—1908)等军于十五日与敌交战，但这些清军战斗力极差，一触即溃。李秉衡只得退往通州张家湾。十七日，八国联军大兵逼近，身边已无一兵一卒的李秉衡看到清军数万充塞道路，闻敌辄溃，实未一战，羞愤交加，自杀殉国。第二天，敌军攻占通州，直逼北京城下，京城内一片混乱。慈禧太后企图利用停火协议保住北京的打算已经落空，准备逃离出京。王公大臣、文武官员、甚至各部院当差人员都惊慌失措，纷纷外逃。清政府统治机构完全瘫痪。北京武卫军、神机营等大部分清军亦四散无踪，坚持守卫京城的只有部分甘军和义和团民。十九日深夜，俄军首先向北京东便门发起进攻，守卫在此的甘军和义和团顽强坚守，终因抵敌不住，次日2时东便门被攻占。紧接着，俄军猛攻建国门，甘军隐蔽在城墙上向敌人猛烈射击，俄军死伤甚多。战斗直至下午2时，俄军在付出重大伤亡后才攻入城内。这时其他帝国主义军队也已拔队攻城。日军进攻朝阳门和东直门，同样遭到清军的有力阻击，日军敢死队多次试图靠近城墙，全被清军击退，直至二十日黄昏才占领朝阳门。英军进攻广渠门，布防此地的武卫军和八旗军多已溃逃，英国士兵首先攻入京城。随后，法、美等国军队也相继入京。二十一日凌晨，慈禧在得知八国联军入城后惊恐万状，急忙携光绪、溥儁等人，在载漪、刚毅和近千名兵勇的护送下，出西直门逃离北京，先到太原，后转至西安。就在慈禧出逃的当天，京城内义和团及清军仍与敌人进行着激烈巷战，拼死守卫皇宫。二十二日夜间，清军的最后抵抗终告失利，联军完全控制了京城，北京沦入列强之手。

八国联军攻陷北京后，进行了疯狂的奸淫烧杀和掠夺。义和团各个坛口均遭洗劫，多少中国人遇害，至今虽无精确统计，但肯定十分惊人。仅庄王府

一处，就有1700多人被杀；法国士兵曾将一群平民逼进一条死胡同，开枪扫射达15分钟之久，将其全部杀害；联军士兵随意闯入民宅，乱砍乱杀，蹂躏妇女，乃至京城百家之中“所全不过十室”，北京“成了真正的坟场”。八国联军统帅瓦德西也供认：由此而死之人，究有若干，实永远不能调查。当时，官邸、府院、寺庙、民宅、城垣、宫苑，都遭到大规模焚烧和破坏，有些甚而瓦砾无存。翰林院被火焚；清中央许多部门档案文稿被集中在长安门内付之一炬，黑烟纸灰蔽空迷目；多册《永乐大典》及许多珍贵图书皆被烈火吞没。从地安门以西至西安门以北，“其房屋焚毁无数”；地安门以东到东安门以北，房屋仅存十之二、三；前门至东四牌楼以南，更是破墙残垣、满目荒凉。昔日饰满金漆房舍的北京城失去了“数百年来巍奂之美观”，到处“是一片罗列着萧条残物的荒野”。侵略者在北京简直是无物不抢，无物不夺。联军虽然规定各国军队不得擅入皇宫，但是各国军官却以“参观”为名，进行偷盗。从金银器皿到珠宝古玩，无不成为他们劫掠的对象。至二十六年冬，宫中财物已损失过半，贵重之物无一遗存。三海（北海、中海、南海）、颐和园也均遭浩劫，财产损失难以估计。京城内神坛、寺庙、官署及王公府第亦不能幸免。日军仅从户部就劫走白银290多万两；法军从礼王府抢走白银200多万两；北京天文台10件古代天文仪器被德、法两国瓜分。据不完全统计，官府各库银款损失约计6000万两左右。联军士兵还以搜查义和团为名，携带洋枪，三五成群地闯入民宅，挨家挨户进行搜刮和抢劫。各国外交官、传教士及侨民也趁火打劫，大肆剽掠。一名曾参与抢劫的外交官承认，当时北京简直成了一个强盗世界。

八国联军进入北京后，纷纷划定区域，抢占地盘，实行分区占领。北京外城被德、美、英三国占据，内城则由日、德、俄、美、英、法、意等国瓜分。十月十九日，除法国以外的其他侵略军成立“北京管理委员会”，实行军事殖民统治。“北京管理委员会”横施淫威，搜捕义和团，收缴居民军器，强派劳役和苛捐杂税。在其直接统治下，北京人民备受摧残和侮辱。北京的沦陷，标志着清政府抗拒八国联军侵华战争的最后失败；义和团反帝爱国运动至此基本被镇压下去。（董增刚）

忠义军抗俄

清光绪二十六年（1900）沙俄武装占领东三省后，中国军民自发组成忠义军抗击俄国殖民侵略的斗争。

是年闰八月沙俄侵占我东北三省，到处杀人放火，无恶不作，企图建立和强化殖民统治，实现最终吞并东三省的野心。东北人民、清军官兵和义和团不堪忍受其血腥镇压，自发组织武装反抗，形成众多的抗俄义军，其中较强大的有三支：一是王和达、董毅敏为首的义和团余部和农民军。王和达（？—1902），奉天（辽宁）海龙人，贫苦农民。董毅敏，原籍山东，时在奉天通化县一座寺观做住持，人称董老道。他们由于不堪忍受地主、官府欺压而起义，后投入抗俄斗争，率领义和团活动在海龙、通化交界一带的山区。二是刘永和为首的忠义军。刘永和（约1841—？），奉天海龙人，原籍山东，猎户。曾在吉林珲春一带投身绿林，枪法超群，人称刘弹子，后归附清军，随珲春副都统英联抵抗沙俄入侵。英联兵败后，刘永和退到吉林西南磨盘山一带，沿途清军兵弁和地方散勇纷纷归附，队伍很快发展到4000多人。他们武器精良，号称忠义军，为当时东北地区一支重要的抗俄力量。三是杨玉麟为首的镇东军。杨玉麟是盖平（辽宁盖县）人，曾做捕役，绰号“十四阎王”，在吉林将军长顺镇东营效力。俄军入侵东北后，他领导一支数千人的队伍，以吉林官兵名义活动在朝阳和海龙一带。当时，参加这几支抗俄武装的民众阶层十分广泛，起义队伍成分复杂，各军之间又独自作战，没有统一的领导核心，力量单薄，无法集中兵力进行大规模军事行动。

二十六年底，各路义军迫切感到联合抗俄、共同作战的必要，于是刘永和率部从吉林西南回师海龙，二十七年正月（2月）与王和达、董老道的农民军、杨玉麟的镇东军及李贵春、栾鸿钧率领的抗俄武装实现了联合。此后这几支抗俄军队统称为忠义军，以“御俄寇、复国土”为宗旨，集结将士约2万人，不受官饷，亦不归节制，独自竖起抗俄斗争的大旗。忠义军号称40营，仍沿用原刘永和军队的清军编制。刘永和自称总统，统率全军；与刘永和兄弟相称的刘秉和为帮统；王和达、董老道、李贵春、杨玉麟等为统领，各率数营官兵。下设营官、帮带、哨官等职。忠义军的组成标志着东北人民抗俄武装力量日趋强大。

同年二月，屈膝于俄军的原盛京将军增祺企图利用刘永和抗俄不反清的思想招抚忠义军，但俄军不允，企图迫使忠义军彻底缴械。俄军关东司令官阿列克谢耶夫一面在铁岭至大孤山一线加强警戒，防止忠义军与退守东库鲁（哲库伦旗）一带继续坚持抗俄斗争的原盛京副都统晋昌联合，进攻盛京（沈阳）；

一面调集奉天和吉林的俄军，在其头目柴尔必思克和高里巴尔斯指挥下，分兵三路进犯通化、海龙，围剿忠义军。柴尔必思克率俄军从奉天出发，二月二十二日（3月31日）到达兴京，次日刚进入通化境内，就遭到王和达、董老道率领的忠义军的袭击。同时，忠义军一支精锐骑兵在帮带姜海山指挥下，奔赴敌后，直捣新宾堡。新宾堡地邻省城，是兴京厅所在地，距老城及清朝陵寝重地很近。忠义军突袭新宾堡使俄军与清政府十分恐慌，俄军尼古拉部立即赶来救援。二十六日，姜海山率军以逸待劳，阻击俄军，打死打伤20多人。二十八日，刘永和、刘秉和、杨玉麟避实就虚，率忠义军主力从通化西北赶到新宾堡，与姜海山部会合，兵力达万余人。三十日，忠义军进攻老城，后与俄军在永陵展开激战。刘永和准备攻下兴京后进军盛京（沈阳），收复省城。这时，柴尔必思克率俄军主力在通化扑空，急忙调头回援。另外两路俄军也被王和达、董老道及当地群众武装牵制，死伤50多人。三月初三，柴尔必思克赶到兴京，忠义军又迅速撤出。至此，俄军的围剿计划变为泡影，被迫退回奉天和吉林。此后，刘永和、董老道率主力回到通化一带修整；王和达、李贵春率部进入山城镇，准备再次阻击俄军。同时，忠义军十营总巡郑兰亭（绰号老君炉）率一支精锐骑兵挺进凤凰城，扩大占领区，牵制旅、大俄军增援沈阳。至此，西至沈阳、铁岭一线，南至凤凰，北达海龙、通化，全有忠义军活动。

俄军围剿失败后，阿列克谢耶夫于五月初指令柴尔必思克、高里巴尔斯和“护路军”上校米申科率兵三路进犯通化、海龙、凤凰等地，再次对忠义军进行围歼。此次俄军采纳了吉林将军长顺和盛京将军增祺的建议，大力扶植地方民团，利用忠义军叛徒组成别动队，从抗俄武装内部进行分化、瓦解和暗杀，对忠义军剿抚兼施。在中外反动势力的强大攻势下，成分复杂的忠义军出现分裂。杨玉麟率部出走，重新打出镇东军旗号，到东库鲁投奔晋昌；刘秉和、姜海山在与俄军激战中被俘牺牲；李贵春被叛徒刺杀；刘永和、王和达、董老道等部被迫分散作战，忠义军实力受到极大损失。这时，帝国主义各国正胁迫清政府签订《辛丑条约》，要求惩办义和团祸首。不久，在东北积极支持义和团和抗俄斗争的晋昌被充军新疆。杨玉麟、刘永和等人对抗俄斗争前途产生动摇，于二十七年冬先后接受清廷招抚，结果被俄军劫持到伯力，做了俘虏。王和达、董老道一部经过艰难跋涉，转移至鸭绿江边帽儿山，与六合拳民众会师，继续坚持抗俄斗争。忠义军是东北人民自发组成的抗俄武装力量，坚持斗争3年多，进行大小战斗数百次，沉重打击了俄国殖民者的侵略势力，显示了中国人民保卫国土的坚强决心。直至光绪二十九年（1903），忠义军才被中外反动势力联合绞杀。　（董增刚）

庚子惠州之役

亦称惠州三洲田起义，清光绪二十六年（1900）兴中会在广东惠州发动的反清武装起义。

二十三年夏，孙中山离开英国，再次旅居日本。在将近三年中，他在极其困难的条件下，不辞辛劳地宣传革命，发展兴中会组织；广泛结交日本“贤豪”，努力争取日本朝野人士的支持；并多次与逃亡日本的康有为、梁启超商谈合作，希望他们从保皇转向革命。同时，他用了很大精力，筹备发动新的反清武装起义。为此，他于光绪二十五年派兴中会员毕永年偕日人平山周（1870—1940）等先后两次赴两湖等地联络哥老会，并在香港设立联系三合会的机关。该年冬季，兴中会与长江哥老会、广东三合会首领在香港集会，决定联合成立一个大团体，取名“兴汉会”，推孙中山为总会长。但此后兴中会并未给予会党以有力的领导，加以长江会党首领闻保皇会资金充足，很快投向保皇会方面。光绪二十六年，中国北方爆发了震撼世界的义和团反帝爱国运动。帝国主义为了防范义和团运动向南方发展，由英国出面，策划刘坤一、张之洞与各国驻上海领事签订了《东南保护约款》，并劝两广总督李鸿章与兴中会合作宣布两广“独立”；日本为了插手华南，对兴中会活动也伪表同情，“许以起事之后，可以相助”。面对这一复杂局势，孙中山决心乘义和团蓬勃发展的有利时机发动反清起义，又认为英国的举动“设使有成，亦大局之福，故亦不妨一试”。为此，他于五月十五日（6月11日）偕同日本友人宫崎寅藏（1871—1922）等自横滨乘船赴香港。孙中山对李鸿章怀有警惕之心，到港后只派宫崎代表他进省接洽，他本人则转到西贡等候消息。李鸿章一向对义和团主剿，对外国列强主和。六月中旬，清政府电召李鸿章北上，担任议和大臣；李决意北上，两广“独立”的计划遂告破产。二十一日孙中山从西贡再次到香港，在轮船上召开军事会议，决定由郑士良等赴惠州准备起义，郑荫南、史坚如（1879—1900）等赴广州准备组织策应，杨衢云、陈少白等在香港担任接济饷械事务。孙中山并已同菲律宾独立军代表谈妥借用其存贮日本的武器供惠州起义之用；日本台湾总督儿玉源太郎（1852—1906）也答应予以协助，因此会后孙中山即转道日本赴台湾准备

接应起义军。闰八月，郑士良在惠州的三洲田（广东惠阳）集合会党群众600余人，准备发动起义。风声泄露，清署两广总督德寿迅即派水师提督何长清率虎门防军进驻深圳，陆路提督邓万林率惠州防军进驻镇隆，准备夹击三洲田的革命军。郑士良感到起义已不能再延，亲赴香港，电请孙中山火速接济武器。孙复电令起义军冲破清军拦阻，到距台湾最近的港口厦门接收武器。当郑士良赴香港之际，何长清已移驻沙湾，拟进横冈以攻三洲田。十五日夜，起义军统领黄福亲率冲锋队80人袭击清军于沙湾，击毙清军40余人，夺得洋枪40余杆，子弹数箱，并拟乘胜取广州。此时郑士良带回孙中山的指示，全军遂改道东向，直趋厦门。二十二日起义军在镇隆再败清军，生擒归善县丞兼管带杜凤梧，夺得洋枪700余杆，子弹5万发。以后起义军又在永湖、崩岗墟连败清军。起义军所经之地，人民燃放爆竹迎送，踊跃投军参加。二十八日起义军抵达三多祝时，队伍已扩充到2万多人，准备直指厦门，迎接总部的给养援助。这时孙中山才发现从日人手中取得的菲律宾独立军的军械全部是无法使用的废铁，同时已改组的日本内阁也严禁武器出口，不许孙中山从台湾进入内地。孙中山只得派人将情况通知郑士良。二十九日日人山田良政（1868—1900）等持孙中山手书赶到三多祝前线。孙中山手书指出："政情忽变，外援难期；即至厦门，亦无所得。军中之事，请司令自决进止。"郑士良只好将起义队伍解散，率少数人退往香港；山田良政在归途中因迷路为清军所擒，被害。当起义军苦战惠州时，史坚如在广州屡谋响应，皆因准备不及，未能如愿；遂决定孤注一掷，暗杀两广总督，以补未及起义之不足。九月初六，他引燃预埋在抚署衙门附近地下的炸药，震坍抚署后围墙一角；德寿却只从床上震落地面，并未受伤。初九，史坚如在赴码头途中被清军逮捕，十八日在广州壮烈牺牲，年仅21岁。惠州起义虽然因为未深入发动群众，单纯依赖外援而失败，但它震慑了敌人，提高了革命派的声威，扩大了革命思想的影响，使更多的人同情革命，有力地推动了民主革命的发展。　　（王　才）

清末"新政"

清光绪二十六年底至光绪三十一年（1901—1905），清政府为缓和阶级矛盾、抵制民主革命而采取的客观上有利于资本主义发展的内政改革措施。

《辛丑条约》签订后，帝国主义采取以华治华的策略，全面控制清政府，加紧和扩大对华的政治、经济、文化侵略。在内外反动势力的压榨下，人民群众反帝反封建斗争继续深入，资产阶级领导的民主革命运动逐渐兴起。清王朝已无法照旧统治下去了。为了进一步取得帝国主义的扶植，缓和统治阶级内部的矛盾，拉拢资产阶级上层人物，欺骗人民群众，增强反动统治的力量，流亡西安的清廷在光绪二十六年十二月初十（1901年1月29日）急忙颁布"变法"上谕，诏令军机大臣、大学士、六部九卿、驻外使臣、各省督抚在不触动封建君主专制制度及封建伦理纲常的前提下，各就当时形势，参酌中西政略，各举所知，各抒所见，向朝廷提出改革建议。二十七年三月初三（4月21日）成立了以庆亲王奕劻为首的督办政务处，以李鸿章、荣禄、昆冈、王文韶、鹿传霖为督办大臣，刘坤一、张之洞（后增袁世凯）为参预政务大臣，总揽一切新政事宜。从此开始至光绪三十一年五大臣出洋考察宪政止，清政府依据内外臣僚特别是袁世凯提出的新政10条和刘坤一、张之洞会奏的"变法三折"，陆续颁布一系列上谕，推行"新政"。主要内容是：一、改革官制，整顿吏治。将总理各国事务衙门改为外务部，位列六部之前；裁汰各衙门胥吏差役、河东河道总督、湖北、云南、广东三省巡抚；裁詹事府、通政司、太常寺、太仆寺、光禄寺、鸿胪寺等衙门；停止捐纳实官；改定律例，删除凌迟、枭首、戮尸等刑罚。二、编练新军。鉴于原绿营、防勇已腐朽透顶，清廷便倾全力来加强武备，光绪二十七年七月十六日宣布停止武科科举考试；二十九日命各省仿北洋、两江例筹建武备学堂，次日下谕各省裁汰绿营、防勇，编练"常备军"。对此最看重并全力以赴者是袁世凯和张之洞。李鸿章死后，袁世凯署理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一上任即奏准在直隶编练"北洋常备军"，光绪二十八年夏练成一镇约1.25万余名新军。同年张之洞在湖北也编练新军7000余人。清廷以直隶、湖广两处为"典型"，命就近各省派人分别前往参观效法。为了在全国推行编练新军计划，光绪二十九年十月十六日（12月4日）设立了练兵处，命庆亲王奕劻总理全国练兵事务，袁世凯为会办大臣，铁良（1863—1938）襄同办理，实权掌握在袁世凯手中；又命各省设立督练公所，负责各省的新军编练。光绪三十年清政府划定新练军队为常备军、续备军和后备军三等，制定了招募应征条件、官制、训练、给养、奖罚、征调、退休、军器、运输等一些规章制度。三十一年为了统一和扩充全国的军事编制，清廷计划在全国共编新军36镇（师），按各省的战略地位及人力物力状况进行分配，限期完成。同时，还创办了巡警。光

绪二十八年四月(5月)清廷批准袁世凯的奏请，在保定创办警务学堂，训练巡警。同年七月，袁世凯根据八国联军退出天津时清政府与帝国主义议定的中国军队不得在天津周围20里以内驻扎的规定，将保定新军3000人改编为巡警，派驻天津，组成天津南北段巡警局。三十一年清廷成立巡警部，以徐世昌为尚书，毓朗、赵秉钧(1865—1914)为左右侍郎。同时制订了各种警务章程，普遍设立警务学堂，在全国大办警务。三、筹饷。当时清政府的财政已十分拮据，但庚子赔款、练兵育才、臃肿腐败的官僚机构，皆需大量开支。为了筹措经费，解决财政危机，清政府巧立名目，多方搜刮。第一是乱增税种。从光绪二十八年起，在通商口岸征收印花税，在湖广征收房捐、铺捐、膏捐，在吉林征收烧窑、车辆捐，在察哈尔征收牛马驼捐，在一些地方还有斗银、畜税、油酒缸课、盐商捐、绅富捐、糖捐、果捐、妇女首饰捐、僧尼巫道捐、赌捐、柴把捐、烟灯捐、学捐、庙捐、自治费、巡警捐、路捐、门牌捐、调查户口捐等等，名目繁多，不一而足。第二是乱提税率。有的由户部决定在全国公开加收，如盐斤加增四文，土药、茶、糖、烟、酒厘金加增三成；有的由各地任意增加税率，诸如粮捐加收、盐引加课等。有的在全国加抽之外又一加再加，全无固定标准。第三是派员查库，严提中饱，官吏报效。查库是清廷钦派大员到各地查明司库进出，将盈余款项强迫上缴。严提中饱是将各级官吏例行贪污的款项收归公有。报效是倡导官吏不定期地向朝廷奉献银物。实际等于承认并鼓励官吏贪污。四、兴学育才，即废科举、办学堂、派留学。光绪二十七年八月初二清廷命各省书院于省城者改设大学堂，于各府及直隶州者改设中学堂，各州县均改设小学堂，并多设蒙养学堂(即幼稚园)。规定教育内容以四书五经纲常大义为主，历代史鉴及中外政治艺学为辅。十月二十五日颁布学堂选举鼓励章程，规定学堂毕业考试后可得进士、举人、贡生等出身。二十八年二月初二(3月11日)又命各省速筹设立学堂及武备学堂。关于科举，二十七年七月十八日清廷下谕以后科考要加试中外政治、史事、策论；废八股文体，停止武科考试。三十一年八月初四(9月2日)下令停止一切科举考试。关于派留学生，二十七年七月二十九日下谕，令各省仿照湖北、四川等省之例，选派学生出国留学，凡毕业留学生均分别赏给进士、举人各项出身。自备旅费出洋留学的，按照官派学生标准给予奖励。据统计，截止光绪三十一年，全国共兴办学堂5万多所，留学生人数则从二十七年的几百人激增到上万人。五、振兴商务，奖励实业。光绪二十九年七月十八日清廷下令成立商部，将前路矿总局并入。接着各省设立路矿农务工艺各项公司；陆续设立商标局、劝工陈列所，并开始参加有关国际博览会。次年又公布《商律》、《公司律》、《商会简明章程》。三十一年陆续颁布了《商标注册试办章程》、《重订铁路简明章程》、《重订开矿暂行章程》、《奖励公司章程》、《改订奖励华商公司章程》、《试办银行章程》等。这些规章对外商也采取同样保护的态度。这时一些著名资产阶级上层人物的政治地位也有所提高，如翰林院修撰张謇被聘为商部头等顾问，加三品衔；华侨巨商张振勋(1840或1841—1916)被命为考察商务大臣兼督办闽广农工路矿。总之，清末新政是在20世纪初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兴起、清朝统治岌岌可危的形势下，封建统治阶级为缓和阶级矛盾而采取的客观上有利于资本主义发展的某些政治措施。其中，奖励工商、兴学育才等项内容对民族资本企业的初步发展、资产阶级新学在中国的传播，以及资产阶级知识分子队伍的形成起了一定的促进作用，但总体来说，并未能达到缓和阶级矛盾和加强封建统治的目的。　（王　才）

拒俄运动

清光绪二十七年(1901)至三十一年中国人民反对沙俄侵占我国东北的爱国运动。

光绪二十六年，沙俄在伙同其他帝国主义国家组成"八国联军"镇压义和团运动的同时，又乘机单独出兵11.6万多人侵占我国东北三省，妄图实现其"黄俄罗斯"的梦想。此后，沙皇政府多次逼迫清政府与其签订出卖东北的条约。二十七年正月二十二日(3月12日)沙俄又向清政府提出新约款，规定沙俄驻兵东北，有"保护"铁路、出兵帮助"剿抚"以及革办中国官吏等特权，并要求将蒙古、新疆、华北等地划为沙俄的势力范围。消息传出，立即激起了中国人民的极大愤怒。二十五日上海爱国人士集会张园，严正谴责沙俄的侵略野心，主张抗击沙俄的侵略，要求清政府"力拒俄约，以保危局"。接着江苏、浙江、广东、山东等地群众也举行了类似的抗议集会；香港、澳门同胞和新加坡、檀香山等地华侨，纷纷致电清政府，强烈要求拒绝签约。在群众斗争的压力下，二月初五清政府电令驻俄公使杨儒，命其通知沙俄政府"非展限改妥，无碍公约，不敢遽行画押"。沙俄逼签条约失败，再变花招，在光绪二十八年三月初一(4月8日)与清政府签订《东三省交收条约》，规定将侵占中国东北的俄军分三期在十八个月内全部撤走。二十九

年三月十一日(4月8日)是俄军第二阶段撤兵的最后期限;但沙俄不仅不撤,反而制造借口派兵前往安东,重新占领营口,向清政府提出七项无理要求,妄图从法律上确认其对东三省和外蒙古的占领。消息传出,激起中国人民的极大愤慨。四月初一,上海千余名群众在张园集会,致电外务部,声明“此约如允,内失主权,外召大衅,我全国人民万难承认”;同时分电各国外交部,申明中国人民的严正立场,指出“即使政府承允,我全国国民万不承认”。会后由冯镜如(? —1913)等发起组织“以保国土、国权为目的”的“国民总会”,1000多人签名入会。初三上午,留日学生会馆召开干事及评议员40余人会议,浙江学生汤槱(1877—1940)建议分电南北洋大臣,要求他们主战。钮永建(1870—1965)则主张自行组织义勇队抗俄,与会者均表示赞成。下午,全体留学生大会在锦辉馆举行,参加者500余人,会上发言者10余人,临时议长汤槱演说表示:“东三省一失,内地十八省外人纷树国旗,中国人还有立脚地吗?”“吾辈徒以国家大义所激,誓以身殉,为火炮之引线,唤起国民铁血之气节。”听了他的发言,“众皆愤发,涕泣不能仰”。会上决定:一、愿入义勇队赴前敌者,在两日内签名;二、未即赴前敌者,别设本部,部署军队各事;三、致电北洋大臣袁世凯请求将义勇队编其麾下;四、遣特派员至天津与袁订定彼此关系;五、遣人至本国内地各殷富地方、南洋各埠及欧美各国发动拒俄。会后各省同乡会继续开会,留学生纷纷报名参加义勇队,报名者年龄最小的才12岁;女留学生决定参加赤十字社,决心从军北征,任军中看护。初四,报名从军者达130人,愿入本部办事以为后应者50余人。初六,参加签名的留学生集会于锦辉馆,通过《学生军规则》:“第一、定名:学生军(义勇队改名)。第二、目的:拒俄。第三、性质:甲、代表国民公愤。乙、担荷主战责任。第四、体制:在政府统治之下。”又将全军121人分成甲乙丙3个区队,每区队辖4个分队,以留日士官生蓝天蔚(1878—1922)为队长,准备开赴前线,与沙俄决一死战。在上海与东京拒俄浪潮的推动下,拒俄运动迅速发展到全国。四月初四,京师大学堂学生集会,通电各省学堂,呼吁“发大志愿,结大团体”,“勿将东三省予俄”。湖北学生立即响应,“不期而集会于曾公祠者数百人”。安徽学生成立爱国会,江西大学堂组织义勇队,福州学生成立滨海公会,湖南学生要求领枪备战,广东人士联名抗俄,直隶400举人上书要求“皇上坚忍力持,转亡为存”。在全国普遍反对下,清政府拒绝了沙俄的七项要求。但是沙俄亡我之心不死,四月二十四日,沙皇尼古拉二世决定废除交还中国东北的条约,增加在中国东北的兵力,设置处于俄国保护下的特别区域。九月初九,沙俄马步兵、炮兵1000余人,强行闯入奉天,占领清行宫及将军衙门等各署第,升起沙俄旗帜。这时全国各地相继成立抗俄团体,如上海有对俄同志会、对俄同志女会,北京京师大学堂有抗俄铁血会,广东有助国拒俄同志议会,哈尔滨有商民自仇会,锦州有仇俄会等。对俄同志会发刊《俄事警闻》日报,揭露沙俄侵华罪恶和清政府的卖国政策,广泛报道各地拒俄消息,号召社会各界奋起拒俄。在各地拒俄团体领导下,全国人民的抗俄斗争一直持续到日俄战争结束。这场运动本来是由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发动的爱国运动,它最初只采用请愿、演说的做法,学生军也明白规定“在政府统治之下”,并没有革命色彩。但清政府却说义勇队“名为拒俄,实则革命”,勾结日本政府解散义勇队,并要“地方督抚于各学生回国者,遇有行踪诡秘,访闻有革命本心者,即可随时获到,就地正法”。正是在这种“报国无路”的情况下,前一年春建立的青年会的发起人秦毓鎏(1880—1937)、叶澜等即于二十九年四月十五日将义勇队改组为军国民教育会,标明宗旨是:“养成尚武精神,实行民族主义;其进行方法:一曰鼓吹,二曰起义,三曰暗杀。”随后这个组织就分派会员回国开展革命活动,建立组织,筹划反清起义。拒俄运动的重大意义在于促使相当一部分知识分子从爱国走向革命,有力地促进了民主革命运动的发展。 (王 才)

《辛丑条约》签订

《辛丑条约》,又称《辛丑议定书》、《辛丑各国和约》,清光绪二十七年(辛丑年,1901)英、德、美、法、俄、日、意、奥、西、荷、比11个帝国主义国家强迫清政府签订的关于结束八国联军侵华战争的不平等条约。

光绪二十六年五月(6月)下旬清廷对八国联军宣战后,清军一再溃败。六月上旬,慈禧太后改任两广总督李鸿章为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命其从速来京,全权与各国协商议和。七月十三日(8月7日),八国联军逼近北京,清廷正式任命李鸿章为全权议和大臣,与列强谈判。二十一日,北京沦陷。慈禧太后在逃跑途中命荣禄、徐桐、崇绮(? —1900)留京乞和。八月初三,再派庆亲王奕劻与李鸿章共同协商议和事宜。侵华列强对此反应不一。沙俄为诱迫清廷承认它侵占东三省合法化,首先表示承认李鸿章代表

资格，赞同与清廷议和，将在京俄国公使和军队撤往天津。英、德等国希望索取更多利益，强烈反对与素有亲俄倾向的慈禧政权开议，拒不承认李鸿章的代表资格。德国因其公使克林德被击毙而更加忌恨清廷，甚至与英国商定准备拘捕李鸿章，阻挠清廷与俄国的交涉。为此，李鸿章从广州抵沪后迟迟不敢北上。俄国极力为清廷斡旋，力劝英、德放弃了拘捕李鸿章的打算。八月二十三日，李鸿章在俄军保护下抵达塘沽，并很快赴京，在各国公使间奔走。德国提出以惩办慈禧太后、端王载漪等战争祸首作为议和的先决条件，从而使和谈无法进行。帝国主义各国围绕是否与清廷和谈、以及李鸿章代表资格等问题进行的争论，实际是各国在华挑选代理人的矛盾显现。俄国支持素有亲俄倾向的慈禧和李鸿章；英、美等国则支持光绪帝；德国明显倾向英国，以拖延时间，等待德国元帅、八国联军总司令瓦德西(Alfred Graf Von Waldersee，1832—1904)来华，以便扩大对华侵略战争。

闰八月中旬，瓦德西抵达北京后，执行德皇指令，多次拒绝李鸿章求见，指挥联军向直隶发动武装进攻。瓦德西的激烈做法不仅引起俄国强烈不满，英、美等国也害怕德国独受其益，遂一面派兵参与扩大侵华的军事行动，以待日后分赃时能多得一些侵略利益，一面又表示希望尽快结束战争。特别是八国联军逼进山西，触动英国在山西的侵略利益时，英国更强烈地呼吁停战。英、美等国态度的转变，迫使德国不得不就此止步，为清廷乞和打开了方便之门。慈禧为取得各国宽恕，于闰八月初三发布惩处肇祸诸臣的上谕。刘坤一、张之洞、李鸿章等也极力为慈禧开脱，将宣战责任归咎载漪。清廷及封疆重臣的这些表现，使列强感到慈禧已经驯服，继续支持这个驯服政府对他们大为有利。另外，欧洲各国也担心抛弃慈禧，将导致清政府垮台，丧失讹诈中国的机会和可能。这样，在挑选代理人的问题上，欧洲列强态度渐趋一致，最终决定"保全"慈禧，开始与清廷议和。

闰八月十一日，法国提出6项建议作为议和基础：一、惩办罪犯；二、禁止中国输入军火；三、赔偿各国损失；四、在北京设立外国卫队，保护使馆；五、拆毁大沽炮台；六、占领大沽至北京之间的二三处据点。二十二日，中国代表提出5条建议，作为和约草案：对攻打使馆表示认罪，保证以后不再发生类似事件；答应赔偿各国损失；修改或新订商约；要求各国交回总理衙门及其档案；和谈开始后即行停战等。各国公使认为，中国提议"狂妄"，根本不屑一顾，仅就法国建议进行磋商，决定增加下列内容：一、董福祥、毓贤应处斩。二、罢免发生排外纠纷的各地官员。三、扩大赔款范围。四、划定使馆区，不许中国人居住。五、将拆毁大沽炮台扩展至大沽以外地区。六、严禁华人组织和参加排外会社。七、改总理衙门为外务部。此外，公使团还通过了德、日各自提出的"优恤"义和团运动中被杀的克林德、杉山彬的处理意见。十一月初三，公使团以法国建议为基础，增补了上述各项内容后形成所谓《议和大纲》12条，送交清方代表，并转达西安行在。慈禧看到《大纲》没有将她列为祸首，大喜过望，初六即命"所有十二条《议和大纲》，应即照允"，"诏报奕劻、鸿章如约"。很快，奕劻和李鸿章代表清廷签字，并将加盖御玺的有关上谕作为附件，分送各国公使，《议和大纲》正式生效。这个大纲基本包括了后来正式和约的主要内容。十二月二十六日，清廷发布"罪己诏"，恶毒攻击义和团，为慈禧太后卸责，并对列强的"宽大"感激涕零，说是"今兹议约，不侵我主权，不割我土地，念列邦之见谅，疾愚暴之无知，事后追思，惭愤交集"，表示今后要"量中华之物力，结与国之欢心"。

《议和大纲》确定后，各国使团即开始研究大纲细目和付诸实行的问题。由于各国贪婪无厌，彼此又勾心斗角，互相争夺，因此针对大纲细目的拟定又争吵了八九个月，焦点集中于惩凶和赔款两个问题。惩凶即惩罚支持义和团及主张与列强宣战的清朝重臣。对此，英、俄两国意见分歧：俄国力主免除亲王载漪等死刑；英国要求扩大刑罚范围，对伪造列强归政照会、挑动慈禧与八国宣战的端王载漪也要处死。争吵结果，列强达成妥协，决定"懿亲不加刑"，王公大臣由清廷自己惩处。二十七年正月初三(2月21日)，清政府迫于列强压力，赐庄王载勋(？—1901)自尽；端王载漪、辅国公载澜为斩监候，发往边疆永远监禁；毓贤即行正法；董福祥革职降调；其他主战文武官员均受不同处分。三月二十一日和七月初六，清廷又两次惩办各省地方官员100多人。赔款是列强争吵的另一问题，也是整个和谈中困难最多、费时最久的问题。瓦德西来华前，德皇令他"要求中国赔偿，务达最高限度"。这种贪婪索求也是其他各国的共同欲望。为确定赔款总数，公使团责成英、德、比、荷4国组成"赔款委员会"，研究赔款标准和范围，最后确定赔偿应以各国直接损失为限的原则。另外，日、美、德、比4国又组成"财源调查委员会"，调查中国财政情况，并根据海关总税务司赫德提供的数字，最后确认中国能够负担的最高赔款总额为白银4.5

亿两(约6750万英镑)。赔款总额确定后,各国竞相提高索偿砝码,肆意讹诈。俄国在侵吞东三省的阴谋屡屡受挫后恼羞成怒,把赔款额提高到1.3亿两;德国索取远征费4亿马克(实际只用2.5亿马克);英国把赔偿费从拟议的480万英镑提至650万英镑;美国要求赔偿2500万美元(实际仅花费1360万美元)。但是,当时中国每年财政收入仅8800万两左右,支出却高达1.1亿两以上,存在巨额赤字,绝无现金支付赔款的能力。为此,各国就赔偿方式问题绞尽脑汁。俄、法两国为尽快拿到赔款,主张由列强共同作保,替清廷在国际金融市场筹集外债,作为偿金。美、英两国坚决反对,认为这样会造成列强共管中国财政的局面,与“尊重中国行政完整”的“门户开放”原则不符,对其凭借强大经济实力掠夺中国不利。英国提出在中国发行债券分年摊还的办法:即由中国发行债券(保票),发行前3年年息3厘,每两年增加0.5厘,以后一律4厘;债券还本减息基金,在债券发行后5年实行,每年归还本金1%;中国政府指定特种财政收入作为偿还债务之用。这一办法后经德国修改为:各国从中国得到等于各自应得的全部赔款数额的保票,年息4厘,每年至少还本0.5%。这一提议终被列强所接受。关于赔款抵押,各国一致同意用中国偿还债务后的海关税余额、常关税、盐厘为指定项目。俄、德两国为迅速得到赔款,又提出将海关税率提高到值百抽十,新增收入归入赔款。当时中国海关税名义是值百抽五,但实际平均只有3.17%。这一提议遭到在华贸易占很大比重的英、美两国的反对。讨价还价后,公使团最后决定,将关税增至切实值百抽五,但以清廷改善河道、修改内河航船章程为条件。这样,经过一年多的争吵,帝国主义各国侵略利益大体得到满足,议和的有关问题基本达成一致。整个和谈过程中,条约主要内容均由列强间议定,清廷代表形同虚设。

光绪二十七年七月二十五日,奕劻、李鸿章代表清政府在北京与英、美、德、法、俄、日、意、奥、西、荷、比11国公使在《最后议定书》(即《辛丑条约》)上签字,共12款,19个附件,主要内容:一、中国赔款白银4.5亿两,年息4厘,39年还清。二、在北京东交民巷设立使馆区,允许列强驻兵,界内不许华人居住。三、将大沽炮台和大沽至北京的沿线炮台一律拆毁;天津20里内不允清兵驻扎;北京至山海关铁路沿线的黄村、廊房、杨村、军粮城、塘沽、芦台、唐山、滦州、昌黎、山海关、秦皇岛、天津等12个沿线要地准许各国军队驻守;禁止军火和制造军火的原料输入中国2年,并可延长。四、惩办主战凶犯;永远禁止中国人民成立或加入任何反帝组织,违者皆斩;在发生排外纠纷的城镇停止各等文武考试5年;清廷官吏所属境内如发生伤害洋人或违约之事,官吏必须立时弹压,否则革职,永不叙用。五、总理衙门改为外务部,班列六部之前,办理对外事宜;变通各国使臣觐见礼节。六、清政府派大臣赴德、日两国谢罪,在克林德被害处树立碑坊,对杉山彬“用优荣之典”;在各国被“污渎”及挖掘的坟茔建立“涤垢雪侮之碑”。七、订立新的通商航船条约。《辛丑条约》是一个空前的奴役性条约。从经济上说,4.5亿两赔款相当于当时国人人均分摊1两,加上赔款利息、地方赔款等项,总数在10亿两以上。这种勒索旷古罕闻。赔款以海关税、常关税和盐税为抵押,使清廷丧失了除田赋外的所有财政来源,中国财政为列强进一步控制,中国经济几乎处于崩溃状态。从军事上说,建立使馆区、驻军、拆毁炮台等,严重损害了中国领土主权,使北京门户洞开,使清廷处于帝国主义直接监督和军事控制之下。从政治上说,惩办主战官员、禁止中国人民从事反帝活动、优恤克林德、杉山彬、改总理衙门为外务部等,使清政府承担了替帝国主义镇压中国人民反帝运动的条约义务,清王朝成为名副其实的“洋人的朝廷”。总之,《辛丑条约》是帝国主义用暴力强加在中国人民身上的殖民枷锁。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至此完全形成。 (董增刚)

“扫清灭洋”起义

清光绪二十八年(1902)景廷宾领导直、鲁、豫三省人民反帝反封建的武装起义。

按照《辛丑条约》,清政府向列强赔款白银4.5亿两。本利相加,共9.8余亿两,加上各省地方赔款约2000万两,总数共达10亿两以上,即清政府平均每年需支付2000万两,这笔巨额赔款分别由各省承担。直隶除每年分担条约规定的“大赔款”85.8万两外,还要承担地方赔款1100多万两(包括北京)。山东每年分担“大赔款”99.3万两,另承担地方赔款约57万两。清朝地方政府再以各种名目把这款项强行摊派到广大人民身上。贪官污吏、土豪劣绅乘机搜刮,致使民不聊生。各地人民拒不交纳洋款,拿起武器,投入反帝反封建的武装斗争。

直隶广宗县在《辛丑条约》签订后承担地方赔款2万吊,该县已交纳1.3万吊,不敷之数仅7000吊。二十七年九月(10月),广宗知县魏祖德上任后乘机勒索,下令全县每亩再摊京钱40文,全县可收2.3

万吊，超过所需2倍以上，激起群众极大愤怒。当地群众把赔款称作“洋差”，理直气壮地予以拒绝，并在景廷宾领导下掀起了声势浩大的反“洋差”斗争。景廷宾（1861—1902），广宗县城北东召村人，地主出身，24岁考中武举。在群众反帝爱国激情鼓舞下，在抗“洋差”斗争中积极奔走，得到群众热烈拥护，人称“英雄义士”，被公推为东召村一带联庄会的总头目，召集联庄会众操演示威，抗拒“洋差”。这时，义和团著名首领赵三多正率义和团余部驻守巨鹿县吉家屯，等待机会东山再起，主动派人与景廷宾联系，希望与联庄会共同行动。同年底，直隶总督袁世凯为缓和广宗县人民反抗情绪，将魏祖德撤职，改派赵锷继任。赵锷到任后，仍勒逼乡民交纳“洋差”，又收买联庄会中动摇分子，企图通过谈判软化景廷宾，劝诱他放弃武装，停止斗争。景廷宾坚决不从，袁世凯决定派兵镇压，于二十八年正月二十四日（3月3日）命大名镇总兵、正定镇总兵统率练军，武卫左军后营管带鲍贵卿统率新军，杀奔东召村。景廷宾率领联庄会众千余人奋起反击，击伤鲍贵卿，揭开武装起义的序幕。由于联庄会内出现奸细，有些团头发生动摇，压下景廷宾召集附近各村赶来增援的传帖，致使战斗失去支持而失利，景廷宾堂弟景廷贞牺牲，助手刘永清身负重伤，起义队伍被迫突围，转战到巨鹿县，与赵三多义和团余部会合。三月十六日，景廷宾、赵三多等人在巨鹿县厦头寺正式宣布起义，竖起“扫清灭洋”、“官逼民反”两面大旗，表明了反抗帝国主义和清政府的坚定决心。起义军约有3万人，主要是联庄会群众及义和团余部。景廷宾被推为龙团大元帅，刘永清为副元帅，参加过义和团的南和县水月寺老慈和尚（原名郝振邦）为军师，赵三多等人为主将。宣布起义后，景廷宾即率队进攻威县，焚烧张家庄教堂，在鱼堤村杀死法国天主教神父，打击官兵，后转战到群众基础较好的广宗县件只村。直、鲁、豫三省交界的平民、游勇及义和团民纷纷赶来参加，起义队伍声威大振。袁世凯十分恐慌，害怕起义烈火迅速蔓延，一面悬赏3万元缉拿景廷宾，一面急派段祺瑞、倪嗣冲（1868—1924）率领清军进行围剿。德、日、法等帝国主义军队6000多人也从北京开往广宗，伺机助剿。为解决军粮严重短缺问题，起义军被迫分为两支：刘永清、老慈和尚率一部向广宗县西北挺进，边作战边筹粮；景廷宾率众固守件只村。这样，起义军力量受到分散。四月初一，段祺瑞、倪嗣冲率清军杀向件只村。在击退敌人数次冲锋后，起义军战斗失利，景廷宾被迫撤退，回到东召村，不久刘永清也赶来会合。经过协商，决定向靠近河南、群众基础较好的成安县转移。景廷宾等人到达成安后，受到当地人民的热烈欢迎，许多群众踊跃参加。但是，景廷宾在成安准备再度起事的消息很快走漏，袁世凯立即派大兵赶来围剿。起义军尚未做好准备即仓促应战，最终失利。景廷宾由众人掩护脱险出逃，准备到河南边境临漳活动，不幸再陷重围，弹尽粮绝，于成安县郭家小屯被清军抓获，六月二十一日在威县英勇就义，时年42岁。不久，赵三多也被捕牺牲，起义失败。

（董增刚）

“支那亡国二百四十二周年”纪念会

清光绪二十八年（1902）章炳麟等革命志士和部分留日学生在日本举行的反清革命集会。

清末“新政”期间，出现了兴办学堂和出国留学、特别是到日本留学的高潮，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队伍迅速扩大。留学生们迅速接触到完全新鲜的资本主义事物。他们身处异国，在义和团反抗精神的鼓舞和严重的民族危机的刺激下，大多痛感祖国危亡，产生了强烈的救国愿望，有些人走上了反清革命的道路。但当时多数人尚在保皇派的影响下，仍寄希望于清政府的改革。为了使更多的爱国知识分子走上革命道路，革命志士便在新到日本的留学生中积极地开展宣传和组织工作，章炳麟、秦力山等人倡议举行的支那亡国二百四十二周年纪念会就是其中一次具有重大意义的活动。章炳麟（1869—1936），一名绛，字枚叔，号太炎，浙江余杭人。早年到杭州入诂经精舍，从俞樾（1827—1907）学习经史。甲午战争后，他深感民族危机严重，投入变法维新运动，任梁启超主编的维新派报纸《时务报》撰述。戊戌变法失败，他遭通缉，先后逃亡台湾、日本，后结识孙中山。二十六年，他在上海曾参加唐才常发起的旨在扶助光绪帝复辟、建立“新自立国”的“张园国会”，但反对其既“排满”又“勤王”的宗旨，当场剪辫与之决裂，坚定地走上了反清革命的道路。秦力山（1877—1906），原名鼎彝，湖南善化人。光绪二十四年考入善化县学，受到变法维新思潮影响。戊戌政变后自费留学日本，二十六年归国赴津游说义和团倒戈反清未果，旋至汉口与唐才常等筹组自立军起义，失败后逃往新加坡，从此，由改良转向革命。二十七年秦力山在日本创办留学界第一份革命刊物《国民报》，自任总编辑。二十八年春，章炳麟再次来到日本东京，与秦力山等来往甚密。三月中旬，他们集议，认为要唤起人们反清，需“先振起人们的历史观念”，恰值该年

为南明永历帝覆亡二百四十二周年，三月十九日(4月26日)是崇祯帝自缢纪念日，议定在这一天召开纪念会，名为"支那亡国二百四十二周年纪念会"，亦称支那亡国纪念会，并预定在东京上野公园内精养轩举行。依据会议的决定，章炳麟事前起草的《宣言书》，揭露和控诉了清朝的民族压迫政策和罪恶统治，号召人们学习200多年以前反清志士的民族精神，推翻清朝的反动统治。宣言书写成后最初署名发起的有十数人，有几人中途翻悔，最后剩下章炳麟等10人。中国留日学生报名赴会者达数百人，孙中山亦准备届时莅会。由于清驻日公使蔡钧和日本外务省勾结阻止开会，大会未能按计划在东京举行。当天下午，在横滨补行纪念仪式，孙中山主持，章炳麟宣读《宣言书》。同一天，香港的爱国志士也召开了纪念会，《中国日报》全文刊登了《宣言书》。这次活动扩大了革命思想的影响，促进了革命运动的发展。

(王　才)

拒 法 运 动

清光绪二十九年(1903)中国人民反对法国侵略我国广西的爱国运动。

光绪二十八年广西爆发会党游勇的反清起义，声势日益浩大，广西官府被打得狼狈不堪。二十九年三月二十七日(4月24日)日本报纸忽然刊载如下消息：广西巡抚王之春为平定游勇，请求驻屯越南谅山的法兵援助；同时向亨达利洋行筹借巨款，答以事平后用全省路矿等权益作酬。消息传出，国内外绅商学各界大为震动。二十八日各省留日同学会干事及留学生会馆干事集会，决定致电北京政务处，请将王之春撤职，拒绝法人无理要求；并致电上海中国教育会，请求响应，协力电争。次日留日学生大会于神田锦辉馆举行，参加者有500余人，通过致电力争等决议。会后又向政务处发出长函，陈说借兵借款"平乱"，将"祸至无日，言之寒心"。同日中国教育会在上海张园召开拒法大会，各界到会者达400余人，通过发电阻止借款借兵，以保主权。二十九日，虽受顽固者阻挠，两广在沪绅商仍再次集会，募得"爱国捐款"千余元。广州、杭州等地绅商学界也先后投入"拒法惩王"的斗争。在各界人民的强大压力下，清政府被迫罢免了王之春。虽然后来证实向法国殖民者借兵借款是误传，但这次运动充分表明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高度的爱国热情。　(王　才)

《苏 报》案

清光绪二十九年(1903)清政府镇压资产阶级革命派，禁锢民主革命思潮的政治事件。

经过二十七、二十八两年的酝酿，资产阶级革命党人的宣传组织活动日益活跃起来，日本的东京和国内的上海是党人活动的两个中心。在上海影响较大的是蔡元培主持的中国教育会。蔡元培(1868—1940)，字鹤卿，号孑民，浙江绍兴人，光绪十六年进士，甲午战争后，接触西方社会政治学说，同情维新派，戊戌政变后回乡任中西学堂监督，二十七年在上海任南洋公学教员，次年和上海一批从事教育工作的人士蒋智由(1866—1929)、黄宗仰(1865—1921)等发起成立中国教育会，被推为会长。教育会"以译本教科书多不适用，非重新编订完善不足以改良教育"为名，联络上海有志之士，实际成为东南各省之革命集团。恰在这一年，东京留学生与清驻日公使蔡钧发生冲突，一部分留学生被逐回国；同时上海南洋公学也发生学潮，200多名学生退学，抗议校方压制言论自由。为安置这些学生，中国教育会特别创办爱国学社，由蔡元培任总理，章炳麟等任教员。校内师生高谈革命，放言无忌，出版物有《学生世界》，持论尤为激烈。二十九年春，民主革命宣传家邹容的《革命军》和章炳麟的《驳康有为论革命书》相继发表。邹容(1885—1905)，原名绍陶，字蔚丹，又名威丹，四川巴县人。二十八年自费留学日本，投身民主革命运动。次年春回到上海，入爱国学社，参加拒俄运动。《革命军》一书以通俗晓畅、痛快淋漓的笔墨宣传民主革命，明确提出了结束中国君主专制制度、建立"中华共和国"的主张，在社会上引起巨大反响。《驳康有为论革命书》则全面地批判了康有为反对革命、主张保皇的谬论，使保皇派在爱国群众中的影响大大削弱。为了引起社会的重视，上海《苏报》对上述革命著作进行了大力鼓吹。《苏报》原是二十二年由中国人胡璋的日籍妻子生驹悦出面创办、并在日驻沪领事馆注册的一份平庸小报，二十六年由因教案牵累落职的原江西铅山知县陈范(1860—1913)接办，拥护康、梁的改良主张。二十八年学界风潮兴起后，陈范表示支持，在该报专辟"学校风潮"栏，报道南洋公学等校斗争情况。二十九年春节前后，陈范聘蔡元培、吴稚晖(1865—1953)等爱国学社教员每日为《苏报》撰写一篇社论，由报社每月提供100元作为爱国学社经费，从此排满革命的言论便洋溢报端。五月初六(6月1日)《苏报》正式聘请学社教员章士钊

(1881—1973)任主笔。此后《苏报》发表了一系列引起社会震动的文章,如《康有为》、《驳〈革命驳议〉》、《〈革命军〉序》、《客民篇》、《杀人主义》等社论、来稿40余篇,有力地揭露了清朝统治者的残暴,批判了康有为等的保皇邪说,号召人们"插义旗于大地,覆政府于中央"。从而使革命思想得到广泛传播。对此,清朝统治者切齿痛恨,斥为"猖狂悖谬"的"革命邪说",必欲铲除而后快。五月二十六日,清政府以《苏报》及爱国学社"形同叛逆",谕令沿海沿江各省督抚"严密查拿,随时惩处"。两江总督魏光涛当即派候补道俞明震赴沪协同上海道袁树勋(1847—1915)处理此案。俞明震等与上海租界工部局勾结,于闰五月初五由租界巡捕捕去《苏报》帐房程吉甫;初六,从爱国学社捕去章炳麟,从女学报馆捕去陈范之子陈钟彝及钱宝仁,龙积之当晚投案;次日,邹容亦自动投案。闰五月十三日,《苏报》及爱国学社被封。《苏报》案发生后,清政府曾设想将章炳麟、邹容等人"一日逮上海,二日发苏州,三日解南京,四日处极刑"。但租界当局从维护列强在华的治外法权和租界的独特地位出发,拒绝引渡,坚持该案必须"在租界内执行"。于是章、邹等人先后由巡捕房移送会审公廨受审。闰五月二十一日第一次开庭,由律师古柏代表清政府向会审公廨所组织之额外公堂起诉《苏报》"心怀叵测,谋为不轨",章、邹则坦然应对,无所回避。清政府同本国老百姓在租界内诉讼,激起人民极大义愤。租界当局迫于压力,对案件采取了敷衍应付的态度,因此审讯出现了屡讯屡停、未能判决的局面。后因陈仲彝、钱宝仁、程吉甫三人在本案中无关重要,关押四个月后被释放。直至三十年四月初七(5月21日),会审公廨才判决章炳麟监禁三年,邹容监禁两年,自到案之日起算,期满逐出租界。邹因不堪狱中的虐待和凌辱,于刑满前不久即光绪三十一年二月二十九日(4月3日)含冤而死,年仅21岁。章炳麟于三十二年五月初八(6月29日)刑满出狱,赴日本东京参加同盟会本部工作。清政府本想通过《苏报》案扼杀方兴未艾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运动,结果适得其反。它的发生不仅促进了民主革命思想更广泛的传播,而且有力地推动了民主革命运动的发展。

(王 才)

收回利权运动

清末中国人民反对帝国主义掠夺路矿权利的爱国运动。

19世纪末,世界资本主义进入帝国主义阶段,资本输出成为它对外侵略的主要特征。甲午战后,帝国主义在中国强占租借地和划分势力范围的同时,即将投资的重点集中到铁路的建筑和矿山的开采方面,并以此作为其巩固"势力范围"和伸展侵略势力的手段。这就不仅使中国人民蒙受了重大的经济损失,阻碍了中国民族资本主义的发展,而且严重地侵犯了中国的主权,直接关系到中华民族的存亡。因此,20世纪初,在民族资产阶级力量有所增强、资产阶级领导的爱国运动和革命运动同时兴起的历史条件下,中国人民掀起了一场轰轰烈烈的收回路矿利权的运动。收回粤汉铁路主权是收回路权运动的开端。19世纪末,美国华美合兴公司同清政府先后签订《粤汉铁路借款草合同》和《粤汉铁路借款续约》,攫取了粤汉铁路的修筑权。但合兴公司违背条约,自光绪二十八年(1902)起将大量股票私售给法、俄支持的比利时资本家;又按《续约》规定,粤汉路工程应在5年内修成,但直到二十九年秋,铁路仍未动工。这种侵犯与无视中国主权的行为,激起了湘、鄂、粤三省人民要求"废约自办"粤汉铁路的斗争。从三十年开始,广东商务局决议力争废约;湖南省绅民纷纷上书湖广总督张之洞,要求立即废除合同;湖北绅民亦群起力争;三省留日学生组成铁路联合会,积极声援国内的斗争。当年底,美商摩根财团向比方收回被买去的股票,但仍拒绝废约。三省人民坚持斗争,积极自筹款项,准备自办。美国迫于压力,于三十一年八月初八(9月6日)同清政府签订《收回粤汉铁路美国合兴公司售让合同》,中国以675万美元的代价将粤汉铁路赎回自办。接着浙江、江苏人民要求商办苏杭甬铁路的斗争进入高潮。苏杭甬铁路是光绪二十四年英国驻华公使窦纳乐向总理衙门要求准许英商承修中国五条铁路中的一条,它起自苏州,中经杭州,迄于宁波。合同签订后,测勘工作一直没有进行。光绪三十一年六月二十二日,浙江绅商在上海议决成立浙江全省铁路有限公司,公举前署两淮盐运使汤寿潜(1856—1917)和在籍京堂刘锦藻为正、副总理。接着江苏也组成了以官绅王清穆为总理、状元资本家张謇为协理的铁路公司。两公司不仅要求自办铁路,而且立即着手集股筑路。浙江先修杭州至嘉兴段,江苏则修上海至嘉兴段。但在英国胁迫下,清政府竟于三十三年同英国订立《中国国家沪杭甬铁路五厘利息借款合同》,议定借款150万英镑,用英国总工程师筑路。消息传来,江浙人民大哗。杭州、苏州、绍兴、宁波相继成立国民拒款会或拒约会,两省学校也分别聚众集议,一致要求力拒借款,保全权

利。浙路副工程师汤绪绝食抗议死难，浙路业务学校学生邬钢因路事呕血而亡。清政府无视民意，竟然下令将领导争回路权斗争的浙路公司经理汤寿潜革职。由此浙江全省顿时沸腾起来，茶寮酒肆以及街巷之间，所谈无非路事，甚至说现在情形实系政府强迫我人民暴动，我人民亦不能再守秩序等。迫于苏浙人民顽强不屈的斗争，邮传部尚书盛宣怀于宣统三年与英国银行公司协议，将沪杭甬借款移作开封至徐州铁路借款；江浙人民终于争得了商办沪杭甬铁路的胜利。同时，由于绅商各界的努力，四川人民于光绪三十三年争得了商办川汉铁路的胜利；直隶、山东、江苏三省人民争取自办津镇铁路和云南人民反对法国修筑滇越铁路的斗争也先后开展起来。

与收回路权斗争互相呼应，收回矿权的斗争在光绪三十一年以后也日益高涨起来，其中斗争最激烈、影响最大的是山西人民收回英国福公司掠夺的矿权的斗争。光绪二十四年四月初二(5 月 21 日)清廷同英国控制的福公司签订了《山西开矿制铁以及转运各色矿产章程》20 条，规定将盂县、平定州、潞安、泽州与平阳府所属煤铁以及他处煤、油各矿转请福公司办理，限期为 60 年。但因山西对外交通不便，采矿迟迟未动。光绪三十一年正月初六，山西巡抚张曾敭(1852—1920)等支持绅商组成山西同济矿务公司，制定开办章程 14 条，规定先行推广开采煤炭，次第举办五金煤油各矿，强调不招外洋股份，不用外省人员。然而福公司在英国驻华公使萨道义(Sotow，Sir Emest MaSon，1843—1929)的支持下派人到平定州、盂县勘察，蛮横地向清政府要求专办权，声言非经福公司同意，无论何人何公司都不准在该处开矿。这就更加激起了山西人民的愤怒。这年底翰林院庶吉士解荣辂、梁善济、知县崔廷献、举人刘懋赏等 343 人联名公禀山西巡抚，要求废除与福公司所订的办矿合同；山西大学堂和武备、师范、商矿、警务、农林等中等学堂学生 1034 人也联名具禀，主张筹款赎回矿权。次年二月初七(3 月 1 日)，中国留日学生总会以及山西、河南、陕西三省留日学生先后联名致电外务部，请求主持废约。山西省留日东京法政大学学生李培仁因愤于清政府的卖矿活动，在该年八月二十六日蹈海自杀。留日学生连续举行追悼会，派代表回国，在太原、平定州等地举行悼念活动，将争矿运动推向高潮。接着同济矿务公司改组，于当年冬创设保晋矿务公司，着手集股开采煤矿。经过反复交涉，光绪三十三年十二月十七日(1 月 22 日)，福公司被迫同意与山西省商务局订立《赎回英商福公司开矿合同》，山西绅民以 275 万两的代价赎回福公司凭一纸合同所攫得的山西矿权。在这期间，安徽人民为收回铜官山等处矿权、山东人民为收回德国霸占的五处矿权、四川人民为收回江北厅矿权、云南人民为收回澂江等七府矿权、河南人民为抵制福公司掠夺矿权以及辽宁人民为收回都鲁河及吉拉林沙金矿权，都进行了持续不懈的斗争，取得了不同程度的胜利。

收回路矿利权运动是一个以反对帝国主义侵略为内容、具有相当规模的群众性的爱国运动。参加运动的有工人、农民、民族资产阶级(包括上层和中下层)、部分爱国官绅等各个阶层，因而声势浩大，但起领导作用的是资产阶级上层，即立宪派，所以又使运动具有极大的软弱性和妥协性，它表现在对清政府的依赖上，还表现在对帝国主义掠夺我国路矿权利不是采取“夺回”而是“赎回”的方式上。据统计，仅 9 项主要矿权的“赎款”即达 904.8 万元。但是收回利权运动打击了帝国主义侵略势力，促进了中国民族资本主义的发展；激发了人们的爱国主义觉悟，使人们进一步看清了清政府反动卖国的真面目，加速了革命形势的成熟。　（王　才）

华兴会成立

华兴会，清光绪二十九年十二月(1904 年 2 月)黄兴等在湖南长沙建立的资产阶级革命团体。

《辛丑条约》订立后，由于民族危机的加深和阶级矛盾的尖锐化，民族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群的涌现，民主革命思想的广泛传播，资产阶级革命派队伍的扩大等等因素，有力地促进了各地革命组织的建立，以黄兴为首的湖南志士筹建的华兴会就是其中影响较大的一个组织。黄兴(1874—1916)，原名轸，字廑武、竞武，号杞园，从事革命后改名兴，字克强，湖南善化(长沙)龙喜乡凉塘人。少时受儒家传统教育，光绪二十四年(1898)入武昌两湖书院，受到变法维新思想影响。二十八年春由张之洞选派赴日本留学，入东京弘文学院速成师范班学习。在这里黄兴受到民主革命思想影响，坚定地走上了反清革命的道路，先后参与创办了《湖南游学译编》、《湖北学生界》以及“湖南编译社”等宣传民主革命的刊物和阵地。为了团结同志，他在学院内选择一些坚贞可靠的湘籍同学，秘密组织“土曜会”，每逢周日，会员即开秘密会议，黄兴经常“登台演说，痛诋满人之罪状，声泪俱下，咸为之动容”；课余他又请日本军官讲授军略，参加射击比赛，

做好开展武装斗争的准备。二十九年沙俄违约，拒不从东北撤兵。消息传来，黄兴“焦急万状，咯血斗余”，积极投入拒俄运动，后被军国民教育会委派为“运动员”，于五月初五（5月31日）离日归国开展革命活动。在上海停留期间他广泛接触各省旅沪人士，并入圣彼得教堂受洗；该堂牧师吴国光把他介绍给长沙圣公会牧师黄吉亭，以便他利用教堂掩护革命活动。《苏报》案发生后，他与《苏报》主笔章士钊一起离上海回湖南，路经湖北时，结识武昌文普通学堂湘籍进步学生宋教仁，相约一同归湘进行革命。至长沙后，黄兴任教于胡元倓（1872—1940）创立的明德学堂，主持师范班，并任中学的历史、体操和小学的地理、博物等课程。在此期间，他不仅在课内外向学生灌输革命学说，物色了进步学生胡瑛（1884—1933）等人，并与长沙的革命者建立了密切的联系。九月十六日（黄兴生日），黄兴与章士钊、宋教仁、刘揆一（1878—1905）、长沙高等学堂教务周震霖、民立第一中学监督柳聘农、教员彭渊恂、柳刚、实业学堂监督福建人翁巩、长沙学堂教员徐佛苏、明德学堂教员江苏人秦毓鎏及胡瑛等12人，齐集长沙（西区）保甲局巷彭渊恂家，以祝寿为名举行秘密会议，决定成立革命组织“华兴会”，推黄兴为会长，宋教仁、刘揆一为副会长。为避免清政府的注意，华兴会对外采用“华兴公司”的名义，打着集股“兴办矿业”的旗号，实际以“矿业”二字代“革命”，股票即是会员证。华兴会以“同心扑满，当面算清”为口号，隐寓“扑灭满清”的意思。十二月三十日（1904年2月15日）华兴会在长沙召开正式成立大会，参加者百余人；黄兴建议各方面应联合起来，共同发难；提出了“驱除鞑虏，复兴中华”的革命口号，确定了雄踞一省与各省纷起响应以推翻清政府的战略方针。鉴于华兴会是一个以归国留学生和在国内新式学堂毕业或肄业的知识分子为主体的革命组织，在学界有较好的基础，而当时湖南新军力量较弱，会党的力量却相当雄厚的客观形势，黄兴等人确定除了在省城积极进行起义的准备工作外，另设“同仇会”，大力发动会党。当时湖南会党中力量最为强大的是以马福益为龙头（即老大，亦即山堂之最高首领）的醴陵、湘潭、浏阳一带的哥老会，会众达2万多人。刘揆一同马福益具有深交，黄兴通过刘的关系与马福益达成共同发动反清起义的协议。他们商定：预埋炸弹于省城玉皇殿下，趁光绪三十年十月十一日（11月7日）西太后70寿辰，全省城文武官吏在玉皇殿行礼时，进行爆炸，宣布起义；省城以武备学堂学生为主，联络新军和巡防营以为策应，会党群众予以协助；在军、学界党人指挥下，以马福益能调动的会党群众为主力，于岳州、常德、浏阳、宝庆、衡州五路响应，然后进攻北京。起义以黄兴为主帅，刘揆一、马福益为正副总指挥。为了促成“各省纷起”，华兴会又派宋教仁、胡瑛联络湖北科学补习所，派人同浙江党人、四川会党、江西防营等取得联系，俟长沙枪声一响，各省立即配合起义。结果风声泄漏，九月十六日，长沙清军出动捕人，搜查华兴会机关。黄兴在圣公会黄吉亭牧师的掩护下化装出走，经汉口转赴上海，不久再次东渡日本。马福益先是逃往广西，后返湘准备再次发动起义，不幸被清军截捕，于三十一年三月十五日（4月20日）遇害。就在这一年，华兴会主要成员均集于日本，与孙中山领导的兴中会等团体联合建立了中国同盟会。（王　才）

光复会成立

光复会，清光绪三十年十月（1904年11月）陶成章等浙江志士在上海成立的资产阶级革命团体。

义和团运动失败前后，随着清政府卖国真面目的彻底暴露，国内新式学堂的建立以及出国留学人员的迅速增加，浙江革命派的队伍也有了较大的发展，开始着手筹建组织的活动。光绪二十六年，杭州求是书院的进步师生组织了一个研究时事的小团体，名为“浙会”，后来改为“浙学会”，其大部分成员或留学日本，或前往上海，相继投入东京留学生和上海中国教育会等组织的爱国革命运动。二十九年发生的“拒俄运动”与《苏报》案之后，在东京的原浙学会的会员10余人齐集《浙江潮》编辑王嘉祎的寓所，举行秘密会议，决定另行组织秘密革命团体，加强革命宣传工作，发动武装起义。其第二次会议又决定派陶成章等人归国开展发动会党和联络知识分子的工作。陶成章（1878—1912），字焕卿，浙江绍兴人。自幼读书，尤喜史学。青年时期萌发种族革命之念。为此，于光绪二十八年东渡日本，初拟进成城军校，但遭清留日学生监督阻挠未果，遂愤然投入留学界的反清革命运动。二十九年底和同省留日学生魏兰一起回国，先到上海，与蔡元培“熟商进取之法”；十二月二十八日（1904年2月13日）抵杭州。然后同魏兰每天步行七八十里，游历浙东各地，遍访山堂林立的各会党头目，在会党群众中广为散发《革命军》、《猛回头》、《浙江潮》等书刊，“由是浙东之革命书籍，遂以遍地，而革命之思想亦遂普及于中、下二社会”，为光复会的建立打下了较好的群众基础。与此同时，受军国民教育会委派归国的龚宝铨（1886—1912）在上海

正积极筹建新的组织。龚从日本回到上海即建立了"暗杀团",准备先杀二三个满族大臣,以为武装起义的先声。不久,因"暗杀团"人数太少,力量薄弱,龚宝铨急想扩大组织。恰好陶成章从浙江来到上海,经与龚宝铨密商,决定根据东京浙学会的原议,建立革命团体;推举蔡元培为首领,以资号召。密议后,龚宝铨先与蔡元培商讨,决定扩大暗杀团组织,并由蔡元培提出邀陶成章参加。在狱中的章炳麟也参与了革命团体的创立工作。经过认真筹备,光绪三十年十月十三日(11月19日),在上海新闸路余庆里启华译书局内召开成立会,定名为光复会,又名复古会,以蔡元培为会长。成立时拟定的章程没有流传下来,据其成员后来回忆,光复会的誓词是:"光复汉族,还我河山,以身许国,功成身退",其核心是"光复"二字。为了把会党引导到民主革命的旗帜之下,陶成章拟联络东南各地会党,组织革命协会,山名为一统龙华山。他为革命协会起草的《檄文》和《会规》,更为具体地反映了光复会的政治倾向,其中宣布革命的宗旨是要"赶去满洲鞑子皇家,收回了大明江山",但又说"今日就是同种人来立宪(指君主立宪),还要再起革命";在经济上则"要把田地改作大家公有财产,也不准富豪们霸占;使得我们四万万同胞,并四万万同胞的子孙,不生出贫富的阶级,大家安安稳稳享福有饭吃"。由此可以看出,因为参加光复会的有各阶层的成员,尤其有较多的会党头目,所以光复会的政治思想比较复杂,但它的革命总目标却是以反满民族主义为核心,争取建立一个平等、自由、富裕的资产阶级共和国。光复会最初选择会友极严格,会内制度亦极严。会员彼此都不相识,只有在共同参加多次会议和秘密工作之后,才互相知道是会友。新会员入会时,必须选一极秘密的地方举行仪式,并要刺血和对天发誓,表示革命的决心。光复会成立后,首先致力于扩大组织,为武装革命做准备。在国外,陶成章在日本建立了光复会东京分部。在国内仍以会党为发展的重点。先是陶成章、龚宝铨协助原中国教育会成员敖嘉熊在嘉兴成立温(州)、台(州)、处(州)会馆,作为光复会在浙江的联络点。不久敖因遭家难,经费发生困难,光复会中心转移到徐锡麟主持的绍兴大通学堂。徐锡麟(1873—1907),字伯荪,浙江山阴(绍兴)人。光绪二十七年任绍兴府中学堂算术讲师,次年升任副监督。二十九年春赴日本大阪参观博览会,受到留学生的影响,坚定了革命信念。三十年在上海由蔡元培邀请加入光复会,随即回乡发动会党。在寻访过程中,他深受鼓舞,说是"涉历四县,得俊民数十,知中国可为也"。但又感到"会党知识浅暗,莫若稍事教训,以兵法相勒",于是决心创办武备学堂,训练会党骨干。在徐锡麟、陶成章的共同努力下,大通师范学堂于三十一年七月二十五日(1905年8月25日)在绍兴正式开学,金(州)、处(州)、绍(兴)三府会党头目均入校受兵操训练,且校规确定:"凡本学堂卒业者,即受本学校办事人之节制;本学校学生,咸为光复会会友。"此后光复会本部事务,由上海迁至绍兴,浙江的民主革命运动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次年,中国同盟会在日本东京成立,光复会多数成员加入同盟会,部分会员则继续独立活动。光绪三十三年、三十四年,徐锡麟、秋瑾、熊成基以光复会名义在安徽、浙江先后发动两次起义。宣统二年(1910)章炳麟、陶成章与同盟会分裂,在东京成立光复会总部,李燮和(1874—1927)在南洋组织光复会南洋总部,代行东京总部职权,并在浙江、上海等地组织光复军。武昌起义后光复军在汕头、浙江、上海、镇江等处响应。民国元年3月陶成章在上海被陈其美(1878—1916)指使人刺杀,光复会解体。 (王 才)

反美华工禁约运动

又称"抵制美货运动"、"反美爱国运动",清光绪三十一年(1905)资产阶级发起组织的群众性反帝爱国运动。

美国早期开发西部的过程中,劳动力十分缺乏。鸦片战争后,美国大量招募华工入境,利用廉价劳动力在西部垦殖、采矿及修筑铁路。华工为美国西部的开发与繁荣做出了巨大的贡献。但是19世纪80年代初美国发生周期性经济危机,失业问题严重,引起广泛的工人运动。美国资产阶级在血腥镇压本国工人罢工斗争时,为转移工人斗争视线,胡说美国工人之所以失业,是华工抢走了他们的饭碗,煽动排华。一时间华工财物被抢劫,华人房屋被烧毁,侨民生命遭到威胁,甚至入境华人亦经常受到种种刁难、欺凌和侮辱。清政府迫于广大华工、侨商要求,曾就排华事件向美国政府提出交涉,但是美国政府不仅不收敛,反而在光绪二十年(1894)迫使清政府签订《限禁来美华工保护寓美华人条约》,表面声称保护寓美华侨,实际是使美国行之已久的限禁华工、歧视虐待华人的做法具体化、合法化。对此中国人民表示强烈抗议。光绪三十年"禁约"十年期满,国内舆论和各界民众均要求废约,旅美华侨10余万人联名上书要求清政府同美国交涉废约问题。清政府照会美国驻京公使,声明"禁约"期满即行废止,应另订新约。美国政

府拒绝中国修约要求，执意继续保持原约，遂激起中国人民的极大愤慨。资产阶级首先发起抵制运动。三十一年四月初七(5月10日)，上海总商会召开特别会议，讨论拒约办法，会长曾铸(1849—1908)慷慨陈词，严厉谴责美国的排华政策，建议以两个月为期，若美国仍不允修改条约，则抵制美货。全体商董一致赞成，立即以曾铸名义致电外务部，“吁恳峻拒画押，以伸国权而保商利”；同时又分电各省及香港21埠商会或商务局，请其协力进行。国内各城市工商界以及海外华侨相继召开大会，响应上海总商会的建议，并印发传单广泛宣传，国内和华侨所办报刊亦纷纷发表抵制美约、不用美货的言论。两个月后，美国政府仍然拒绝，上海各行业旋即行动，不买、不卖、不用美货；不到美国人所办学校读书，不给美国人当翻译、车夫、厨师等；缝纫工人不做美国面料服装，刻字工人不刻美货商标，漆业工人公议不给美国公司漆招牌，不用美国木材和颜料，表现了人民群众抵制美货的坚决态度。广州、天津、北京、武汉、苏州、杭州、长沙等许多城市的商、学界和工人、农民纷起响应，相继成立“拒约会”、“争约会”、“抵制美货公所”等团体；许多爱国人士自动捐款编印宣传抵制美货的传单，分发给广大群众；每天在各地都有大小集会，号召各界抵制美货；各地工人除参加一般活动外，运输工人还拒运美货，邮政工人不收美货标本，制造工人拒用美国原料，江苏嘉定等县农民群众将美货统统烧毁。这个运动在华侨社会中也引起强烈反应。旧金山华商及檀香山华侨致电并汇款支持广东的抵制美货斗争；菲律宾、新加坡、日本、暹罗、越南等地华侨，积极投入反美爱国运动；菲律宾华工冯夏威在美国驻沪总领事馆门前自杀，以示抗议，并激发同胞将运动坚持下去。运动的迅猛发展，震动了帝国主义列强和清朝政府。美国多次向清政府施加压力，要求予以镇压。七月二十一日清廷发布上谕，令各省对抵制美货者要“从严查究，以弭隐患”。接着各省督抚便相继查禁抵制运动。在内外压力下，领导运动的资产阶级动摇、退缩了。经半年多的斗争，运动渐趋沉寂。这次运动参加阶层之广泛，坚持时间之长，在近代历史上都是空前的，它充分表现了中国人民高昂的反帝爱国热情，给予帝国主义以沉重的打击，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中国民族资本主义的发展，而更重要的是提高了中国人民的觉悟，加速了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运动的发展。 （王 才）

中国同盟会成立

中国同盟会，简称同盟会，清光绪三十一年七月二十日(1905年8月20日)孙中山为首的资产阶级革命派在日本东京建立的全国性的资产阶级革命政党。

20世纪初年，随着民族矛盾、阶级矛盾的尖锐化，民族资本主义的发展，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群的涌现，爱国运动的广泛开展，革命派的队伍也日益扩大。孙中山敏锐地觉察到中国已处于革命高潮的前夕。为了联合各种革命力量，迎接革命高潮，孙中山在光绪二十九年提出新的战斗任务：“物色有志之士，广为结交”；“打击保皇毒焰于各地”，发展革命力量；“联合大群，团集大力”，建立统一的革命组织。为此，他离开日本到达檀香山，发表《敬告同乡书》和《驳保皇报》两篇文章，前者着重划清革命和保皇的界限，揭露梁启超“名为保皇，实则革命”的欺骗性，指出：“革命、保皇二事，决分两途，如黑白之不能混淆，如东西之不能易位”；号召革命群众一定要认清保皇派反对革命的真面目，肃清其流毒。后者针对檀香山发行的保皇报刊载的《敬告保皇会同志书》中所散布的种种反对革命的谬论，指出保皇派之所谓“爱国”，非爱“我中华”，而实爱“大清国”；“非爱国也，实害国也”。因天地会组织致公堂在华侨中有众多的成员，为同保皇派争夺群众，孙中山在檀香山加入了洪门，被封为“洪棍”，即元帅。接着他来到美国，在旧金山致公堂大佬黄三德的协助下，举行了致公堂全美会员总注册，并代为重订致公堂新章规程80条，规定“本堂以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创立民国，平均地权为宗旨”。但因美国华侨风气尚未开通，注册收效不大。于是孙中山应中国留欧学生邀请抵达欧洲。光绪三十一年春，他在布鲁塞尔、柏林、巴黎相继建立革命组织，发展留欧学生60余人。在此之前一年，黄兴、蔡元培、陶成章等革命党人继兴中会之后，在国内先后建立起华兴会、光复会、科学补习所等10余个革命小团体，遍及江、浙、湘、鄂、皖、闽、赣、川、陕等省。这些革命团体建立后，均投入了武装起义的准备，且都相继遭到挫折，其主要成员在三十一年春天前后陆续来到日本。此时在日本的中国留学生倾向革命的人也越来越多，孙中山已成为革命者众望所归的领袖，被称为“近今谈革命者之初祖，实行革命之北辰”。通过革命的实践，越来越多的人逐渐认识到：日益高涨的革命形势，迫切需要把相继出现而又散见各地、组织狭小、力量有限的革命小团体

联合起来，以便领导全国规模的民主革命运动。因此，孙中山于光绪三十一年六月十七日从欧洲返抵日本，同在日本的革命团体领导人商组统一的革命政党问题。他指出："中国现在不必忧各国之瓜分，但忧自己之内讧。此一省欲起事，彼一省亦欲起事，不相联络，各自号召，终必成秦末二十余国之争，元末朱（元璋）陈（友谅）张（士诚）明（小明王韩林儿）之乱，此时各国乘而干涉之，则中国必亡无疑矣。故现今之主义，总以互相联络为要。"孙中山的主张，得到了黄兴等多数人的支持。

六月二十八日，各省有志革命的留学生和旅日华侨共70余人，在东京赤坂区桧町三番黑龙会址召开建立统一组织的筹备会议。到会人员分属17省籍，唯甘肃省因没有赴日留学生而缺席。会上，孙中山首先发表演说，阐明革命的理由、形势、进行方法及联合组织统一团体的必要性，与会者一致赞成。在讨论团体的名称时，孙中山提议为"中国革命同盟会"，有人表示异议，主张叫"对满同志会"。孙中山指出革命宗旨不专在对满，其最终的目的尤在废除专制，创造共和。还有人提出此会为秘密组织，不必明用"革命"二字。经反复讨论，遂定名为"中国同盟会"，简称"同盟会"。在讨论政治纲领时，孙中山提议以"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创立民国，平均地权"十六字纲领为宗旨。有些人不同意把"平均地权"列为政纲，对此，孙中山作了详细说明，指出："现代文明国家最难解决者，即为社会问题，实较种族、政治二大问题同一重要"，"欲解决社会问题，则平均地权之方法，乃实行之第一步。本会系世界最新之革命党，应立志远大，必须将种族、政治、社会三大革命，毕其功于一役。"最后，政纲获得通过。会议随即举行宣誓加盟仪式，并推举黄兴、陈天华（1875—1905，《猛回头》、《警世钟》作者，曾与黄兴等组织华兴会）等8人起草同盟会章程，提交成立大会讨论。七月十三日，东京中国留学生和华侨1300多人集会，欢迎孙中山。孙中山当场发表激动人心的演说，指出：中国文明悠久，土地广大，人口众多，只是到了近代才落后了。如果能"发愤为雄"，推翻腐朽的清政府，努力学习西方先进国家，中国的建设将"有异常之速度"，"不仅足以突驾日本"，而且"十年、二十年之后，不难举西人之文明而尽有之，即或胜之焉"。他号召大家一定要"将振兴中国之责任，置之于自身之肩上"，为建设独立富强的民主共和国而奋斗。孙中山明确的民主革命观点以及中国革命后必能赶上和超过先进资本主义国家的思想，给与会者以巨大鼓舞，促使更多的人参加同盟会。七月二十日，中国同盟会在东京赤坂区灵南坂日人阪本金弥宅召开成立大会，到会者百余人。大会一致通过了《中国同盟会总章》（已佚失。今见到的是光绪三十二年四月二十三日改订的《总章》，共24条）；确定孙中山提出的十六字纲领为同盟会宗旨；除总理一职已经筹备会确定为孙中山外，又以投票方式选举了总部各部负责人，推选了各省主盟人。依照《总章》的规定，同盟会总部设于日本东京，按"三权分立"原则，下设执行部、评议部、司法部；黄兴被任为执行部庶务科总干事，居协理（副总理）地位，总理外出时，代总理主持总部工作。章程规定在总部统一领导下，各地分设支部；国内按地区设东、西、南、北、中五个支部，支部以下各省设立分会，支部部长由总理指任，分会长由会员选举产生；国外设南洋、欧洲、美洲、檀香山四个支部，支部以下各国设立分会。当时设想，不但机关有组织，全体党员亦仿照军队，建立营、队、列、排等各级组织，以保证组织的坚固。三十一年十月三十日，在日本东京出版了机关报《民报》。次年孙中山、黄兴、章太炎等又编定《革命方略》，规定了同盟会纲领的实施计划和其他各项具体方针政策，有些则作为文告供各地起义时发布。总部所委派之主盟人于同盟会成立后亦相继分赴国内外各地，吸收会员，建立支部，进行宣传和组织活动，为武装起义做准备。

同盟会是一个具有比较明确的政治纲领的资产阶级政党。孙中山在《〈民报〉发刊词》中首次将同盟会的十六字纲领概括为民族、民权、民生三大主义。随后，又通过《军政府宣言》和《民报》周年纪念演说，对三民主义的内容作了具体的阐述：民族主义，即"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当时革命派以最简洁的语言把这一内容概括为"反满"。孙中山指出"反满"的原因有两个：一是"异种残之"，即指窃据全国政权的满族贵族对以汉族为主体的全国各族人民所实行的残酷的民族压迫。这种压迫又是与封建阶级对包括民族资产阶级在内的全国人民的封建压迫结合在一起的。因此要使全国人民摆脱国内的民族压迫和阶级压迫，都必须以革命的手段推翻以满洲贵族为代表的反动腐朽的清政府。孙中山特别强调必须把掌权的少数满洲贵族和广大满族人民区别开来，不能搞民族复仇主义。他指出："民族主义，并非是遇着不同种族的人，便要排斥他，是不许那不同种族的人，来夺我民族的政权。"二是"外邦逼之"。即指帝国主义对中国的疯狂侵略和野蛮掠夺。兴中会成立伊始，孙中山每到一处，即沉痛揭示中华民族所面临的危险

处境，号召人们起来救亡图存。但是在分析民族危机发生的原因时，以孙中山为代表的革命派却片面地认为仅仅在于中国社会制度的腐败，尤其在于甘当帝国主义鹰犬的清政府。因此，他们得出结论："故欲免瓜分，非先倒满清政府，则无挽救之法也。"可见，同盟会的民族主义紧紧抓住了20世纪初期帝国主义和中华民族的矛盾、封建主义同人民大众的矛盾的集中反映——革命人民和清政府的矛盾，具有鲜明的反帝反封建的革命精神。但是同盟会的民族主义，没有正面提出反对帝国主义，还幻想"世界列强赞成中国之革命事业"。同盟会的《对外宣言》明确宣布："所有中国前此与各国缔结之条约，皆继续有效"，赔款外债"照旧承担"；"所有外人之既得权利，一体保护"。这充分表现了民族资产阶级的软弱性和妥协性，表明同盟会民族主义的不彻底性。民权主义，即"建立民国"，也就是推翻封建的君主专制制度，建立资产阶级的议会制共和国。孙中山认为中国延续几千年的君主专制政体，"不是平等自由的国民所堪受的"，只搞"民族革命"不行，必须与"政治革命"结合，在推翻清政府的同时，废除君主专制，"就算汉人为君主，也不能不革命"。他主张按照自由、平等、博爱的精神，给国民以充分的"民权"，让国民选举总统、议员，由议会制订五权（立法、行政、司法、考试、监察）宪法，人人共守。这样，孙中山就绘出了一幅完整的资产阶级共和国的蓝图，从理论上解决了当时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中心问题。然而，同盟会的民权主义只注意了政体的变革，忽略了国体的变革，即忽略了推翻君主专制制度的阶级基础——整个地主阶级，尤其表现出对汉族地主阶级抱有幻想，因而最终导致了革命的失败。民生主义，即"平均地权"，核心是解决土地问题。孙中山主张民国政府一经建立，先核定全国地价，承认初次核定的地价归地主所有，而以后随着社会经济飞跃发展所日益增涨的地价，则归国有。国家可按照原定地价收买地主的土地。很明显，平均地权就是通过涨价归公和照原价收买的办法，逐步剥夺地主对土地的所有权，实现土地的国有化；国家还可以利用全国地产收入来发展经济，做到"家给人足"。孙中山认为这样就避免了资本主义的祸害，实现了"社会革命"，即实现了"社会主义"。但这完全是空想的、主观的"社会主义"；要让租营国有土地的人拥有资本，相互竞争，实质上仍是发展资本主义；因此"平均地权"归根结柢是一个为资本主义发展开辟道路的土地纲领。另一方面，"平均地权"并非是将土地平均分配给广大农民耕种。在同改良派的论战中，革命派一致强调，同盟会土地国有的主张，绝非"夺富人之田为己有"，而且他们根本反对贫苦农民起来夺取地主的土地。所以，"平均地权"并不是一个能够解决农民土地问题的真正革命的土地纲领。总之，同盟会时期孙中山的三民主义是半殖民地半封建时代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产物，尽管它存在着根本性的弱点，无法把革命引向彻底的胜利，但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它充分体现了民族资产阶级在政治上和经济上的要求，反映了中国人民要求民族独立和民主权利的迫切愿望，因而成为资产阶级革命派的战斗旗帜，成了动员广大群众起来推翻清朝统治、建立资产阶级共和国的有力思想武器。

同盟会的成立，使全国的资产阶级革命派有了一个统一的领导，极大地增强了他们夺取全国革命胜利的信心，有力地推动了民主革命运动的发展，标志着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运动进入高潮。同盟会成立后，一面传播民主革命思想，组织革命派同改良派论战；一面联络会党、新军，发动一系列武装起义，直至辛亥革命推翻清朝，建立中华民国，在中国革命历史上建立了不朽的功勋。武昌起义后，同盟会总部由日本东京迁至上海，南京临时政府成立时，迁至南京，旋又迁回上海。1912年8月改组为国民党。

（王　才）

五大臣出洋

清光绪三十一年（1905）至三十二年清政府为仿行宪政，派出五位大臣出国考察政治的事件。

义和团运动后清政府为了挽救其垂危统治，缓和阶级矛盾，曾推行"变法新政"，结果却是在旧矛盾进一步激化的基础上又产生了一系列新的矛盾，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运动也日益高涨。恰在此时，日、俄为争夺我国东北和朝鲜爆发了战争，最后竟然是蕞尔小国日本打败了庞然大物的俄国，还引发了俄国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由此维新派得出结论，认为日所以胜，俄所以负，是因为日本经过明治维新，实行了君主立宪制，而俄国仍然是封建君主专制，日胜俄负，反映了立宪与专制的胜负。于是，要求君主立宪的呼声更加高涨，在民族资产阶级上层及其代表人物的奔走鼓动下，逐渐变成了一场全国性的立宪运动。这些代表人物也就被称为"立宪派"。光绪三十年以后，他们广为宣传改革政体的必要性，强调日俄之战实为"立宪专制二政体之战"，"故以今日而言外交，言内治，惟立宪二字，强于百万之师"。同时又多方结纳当朝权贵和封疆大吏，力图依靠这些实权派

人物实现真正的君主立宪制度。受立宪派的影响和日俄战争的刺激，考虑到本身的利益，一部分官僚也打出了"立宪"的旗号。三十年和三十一年，驻法公使孙宝琦(1867—1931)、两江总督周馥(？—1900)、湖广总督张之洞、两广总督岑春煊、直隶总督袁世凯，相继奏请清廷"变更政体，实行立宪"，敦请派亲信有声望之大臣游历各国，考察宪法。清廷迫于形势和压力，于三十一年六月初召集枢府大员连日会议，讨论立宪和派员出洋考察政治；六月十四日(7月16日)发布上谕，简派镇国公载泽(1868—1928)、户部侍郎戴鸿慈(？—1910)、兵部侍郎徐世昌、湖南巡抚端方(1861—1911)四大臣"随带人员，分赴东西各国考求一切政治，以期择善而从"。二十五日又加派商部右丞绍英随同前往，共计五大臣出洋考察。八月二十七日五大臣出发时，在北京正阳门车站遭革命党人吴樾阻击。吴樾(1878—1905)，字梦霞，后改孟侠，安徽桐城人。光绪二十八年考入保定高等师范学堂，萌发反清革命之志，主张以暗杀推动革命。为表明反对君主立宪的态度，于三十一年夏潜入北京。五大臣出发那天，他怀揣炸弹，乔装混入前门车站，登上五大臣专车，恰车身突然震动，炸弹自爆，当场殉难。五大臣中绍英、载泽受轻伤，出国考察只好暂缓启程。后清廷命改派山东布政使尚其亨、顺天府丞李盛铎代替徐世昌(已授巡警部尚书)、绍英(因遇炸受伤未愈)，合原已定之载泽等三人仍为五人前往。五大臣按原方案分两路：一路是载泽、尚其亨、李盛铎，主要访问日本、英国、比利时、法国，于十一月初五从北京出发；一路是戴鸿慈、端方，主要访问美国、德国、俄国、意大利、奥国，于十一月十五日从北京出发。在分别访问过程中，他们广泛接触各国政府官员，听取对方介绍"立宪要政"，同被访问国的专家"探讨立宪原理"，对各国的政治、经济、军事、教育、市政建设作了较为详细的调查。经过半年多的实地了解，由杨度、梁启超等代笔拟定考察报告，光绪三十二年夏除李盛铎因任驻比利时公使未回外，其他四大臣先后归国。接着他们便奏请朝廷"改行立宪政体"。在对比了中外不同体制后，他们指出：中国"言外交，则民气不可为后援；言内政，则官常不足治理；言练兵，则少敌忾同仇之志；言理财，则有剜肉补疮之虞"，要摆脱这一困境，唯一的出路就是立宪。载泽更在密折中针对反对派的意见明确提出了立宪对清政府的三大利益："一曰皇位永固"；"一曰外患渐轻"；"一曰内乱可弭"。"至于实行之期，原可宽立年限"。在听取了这些意见后，经反复权衡，西太后终于决定"预备立宪"。因此，五大臣出洋是清政府推行"预备立宪"的重要组成部分，是清政府为延缓其统治而采取的欺骗措施，也是在内外形势逼迫下所作的某种有限的让步。

（王　才）

《中日会议东三省事宜条约》签订

《中日会议东三省事宜条约》，又称《满洲善后协约》，清光绪三十一年十一月二十六日(1905年12月22日)日本帝国主义强迫清政府签订的不平等条约。

光绪二十六年沙俄乘八国联军侵华之机，单独出兵侵入中国东北全境。中俄双方虽于二十八年签订《交收东三省条约》，但俄国却拒不撤兵，执意要把中国东北变为"黄俄罗斯"，并把侵略魔掌进一步伸向朝鲜。这不仅严重地侵犯了中国的主权，而且也触犯了日本的侵略利益，加剧了俄、日间的矛盾。在英、美等国支持下，日本于光绪二十九年十二月二十三日(1904年2月8日)对俄绝交；突袭旅顺俄军。俄、日随即宣战，结果俄国失败。在美国调停下，日俄议和，三十一年八月初七双方订立《朴茨茅斯条约》，主要内容是：俄国承认日本对朝鲜的实际控制权，并将库页岛南部及其附近的全部岛屿割给日本；俄国将旅大租借地、长春到旅顺的铁路(中东铁路支线)以及与此有关的一切特权转让给日本。这是一个日、俄两个帝国主义强盗背着中国和朝鲜政府而签订的分赃条约。事后日本根据《朴茨茅斯条约》关于俄国转让给日本的旅大"租借地"及中东铁路支线权利"须商请中国政府允诺"的规定，强迫清政府承认既成事实。同年十一月二十六日日本外相小村寿太郎(1855—1911)、驻华公使内田康哉(1865—1936)与清外务部总理大臣奕劻、外务部尚书瞿鸿机(1850—1918)、直隶总督袁世凯在北京签订了《中日会议东三省事宜条约》，正约3款，附约12款。主要内容有：一、清政府承认《朴茨茅斯条约》中有关东三省的规定，即俄国将旅顺、大连租借地、长春到旅顺间的铁路及其支线以及与上述租借地、铁路相关的一切权利全部转让给日本；二、允许开放凤凰城(凤城)、辽阳、新民屯、铁岭、通江子(通江口)、法库门(法库)、长春、吉林、哈尔滨、宁古塔(宁安)、珲春、三姓、齐齐哈尔、海拉尔、瑷珲(爱辉)、满洲里等16处为商埠；三、允许日本在奉天(沈阳)、营口、安东划定租界和直接经营安奉铁路(苏家屯—安东)；四、允许日本在鸭绿江右岸采伐森林。《朴茨茅斯条约》和《中日会议东三省事宜条约》的相继签订，使中国东北半殖民地

化的程度大大加深。从此,俄国继续以中国东北北部作为自己的势力范围,中国东北南部则成了日本的势力范围,而且中国东北几乎全境对外开放,为帝国主义进一步侵略东北大开方便之门。光绪三十二年日本成立了"南满铁道株式会社",并改旅大"租借地"为关东州,设立关东都督府;这两个机构成为日本帝国主义日后对东北进行政治、军事、经济、文化侵略的中枢。 (王 才)

革命派与改良派大论战

清光绪三十一年(1905)至三十三年以孙中山为代表的资产阶级革命派同以康有为、梁启超为代表的资产阶级改良派在思想理论战线上展开的一场大辩论。

以孙中山为代表的革命派与以康有为为代表的改良派是中国民族资产阶级的两个政治派别,前者是民族资产阶级中下层的代表,后者是其上层的代表。早在甲午战争期间,这两个派别就同时出现了。不过当时改良派因为发动了戊戌变法运动,在社会上的影响远远超过革命派。戊戌变法失败后,康、梁等人逃亡国外,梁启超在日本重建改良派的宣传阵地,光绪二十四年十一月(1898年12月)创办《清议报》,前后历时三年,共出100册;二十八年又创办《新民丛报》,历时近六年,共刊行96号。康有为则于光绪二十五年六月十三日(1899年7月20日)在加拿大建立"保救大清光绪皇帝会"(亦称"保救大清皇帝公司"、"中国维新会",简称"保皇会"),在"爱国救亡"的旗帜下,反对通过革命办法推翻清王朝,建立资产阶级共和国,而是寄希望于光绪帝,祈望光绪复辟,继续推行变法维新,实行君主立宪制度。因此以孙中山为首的革命派多次同他们倡议"联合",都被拒绝。可是20世纪初,在内忧外患刺激下,知识分子通过清政府对爱国运动镇压的反面教育,日益倾向革命。改良派从切身利益考虑,在加紧要求清政府实行真正的君主立宪、抵制革命的同时,又将矛头指向革命派,正面阻止革命运动的发展。为此双方在二十九年、三十年已初步进行了交锋。同盟会成立后,革命派有了统一的组织和明确的纲领,为革命思想的传播提供了有利的条件。孙中山在《〈民报〉发刊词》中号召:要把三民主义思想"灌输于人心,而化为常识"。为了实现这一任务,继《民报》之后,在国内外各地遍设宣传机关,出版书报杂志。据统计,光绪三十一年至三十三年革命派主办的报纸、杂志达60余种,其它革命出版物"无虑百数十种"。这些刊物都在不同程度上阐述了同盟会的主张,《民报》则更为系统地阐述了三民主义思想;其文章理论透辟,脍炙人口,激动人心,深受广大读者欢迎,每期再版、三版以至五版,仍供不应求。对此康、梁十分恐惧,公然宣称"今者我党与政府死战,犹是第二义,与革党死战,乃是第一义。"梁启超以《新民丛报》为阵地,连续发表文章,诋毁同盟会政纲。改良派的活动,成了民主革命的巨大障碍,孙中山立即组织革命派进行有力的回击。这样,以《民报》和《新民丛报》为中心阵地,革命派和改良派在国内外的20多种报刊先后都投入了论战。

论战涉及的范围很广,主要有三个方面。一、要不要革命,要不要推翻清政府。改良派竭力为清政府的民族和阶级压迫政策辩护,宣扬清圣祖康熙皇帝的薄税政策不仅为"中国数千年所无,亦为地球万国古今所未有";声称在清朝统治下,"举国人民其在法律上本已平等,无别享特权者",因此民族革命是完全不必要的。革命派以大量事实揭露清朝统治者施行的种族压迫、奴役及歧视政策,强调救国必先反清排满,铲除异族政府。他们控诉清政府卖国媚外的罪行,强调欲救中国,免除民族灾难,只有坚决推倒清朝专制政府,指出"满洲去,则中国强"。针对改良派曲解革命派"排满"口号是"种族复仇"的谬论,革命派申明"排满"只是"仇一姓","不仇一族",种族革命并非尽杀满族数百万之众,而是"倾覆其政府,不使少数人扼我主权,为制于上之谓也",明确地把满族平民与满洲贵族区分开来,将打击矛头指向封建统治者。二、要不要兴民权,建立资产阶级共和国。改良派从本阶层的利益出发,反对共和革命论,鼓吹"渐进论",说封建专制必须经过君主立宪阶段才能实行民主共和;借口"民智未开",诬蔑中国人民"既乏自治之习惯,又不识团体之公益",根本没有享受民主权利、当"共和国民之资格",宣扬这种资格只有在开明专制时代和君主立宪时代才能养成。革命派进行了有力的驳斥,指出:事物的发展总是后来居上,当世界上已经有了先进的民主制度,在革除专制建立共和国又已成为大势所趋、人心所向的历史条件下,一个落后的国家在民族革命之后,必然要选取先进的民主制,无须再经过君主立宪的阶段。认为:说"中国之民族,贱民族也,只能受压制,不能与以自由","吾民族万古不能有能力,惟宜永世为牛马为奴为隶者"云云,是帝国主义和民贼的语言,是对中国人民的极大诬蔑。因为"疾专制,乐自由,为人类之天性",是人人具有的。而"以一人擅神圣不犯之号,以一姓

专国家统治之权，以势以情，殆皆不顺”。正是这种制度把中国引向世界劣败之林。且人民群众的智慧是在斗争中发展的，在革命时代群众民主主义觉悟的提高是十分迅速的。改良派强调中国“民智未开”，不能行共和，只能行专制，实际是继续贩卖“君权神授”的传统观念，究其目的不过是为了“巩固万世不替之皇基”罢了。三、要不要改变封建土地制度，实行“平均地权”。改良派为维护封建土地所有制，反对“平均地权”，说中国的封建经济制度与欧洲不同，既无贵族压制，土地又极为平均，而且“赋税极轻”，即使将来工业发展了，也不会造成欧美那样的“贫富相悬”的社会现象，因此进行“社会革命”是完全不必要的。同时又说地主占有大量土地，都是由“劳动”或“节约”而来；社会经济的发展，“实起于人类之利己心”，私有财产制度的存在，在历史上有其必然性，不能“蔑弃”，是“现社会一切文明之源泉”。实行“平均地权”、“土地国有”，就是“掠夺人民勤劳之结果”，打击人们从事生产的积极性，“推翻现社会之根柢”。他们声言对其他问题尚可让步，对改变土地制度问题，“则寸毫不能让”。革命派虽然对封建制度缺乏本质的认识，断言中国尚未出现欧美那样的“贫富悬隔”的现象，却鲜明有力地予以回击，指出：“社会革命”的原因，是社会经济组织的“不完全”，是“放任竞争绝对承认私有财产制”造成贫富悬隔所引起的。虽然从中国的具体状况来看，马上“绝灭竞争废去私有财产制”是不现实的，但“加之制限与为相对的承认”则是必要的。有的针对改良派的指责明确地回答：“知吾国经济现象之不足恃，而当消患未然者，则社会革命不必行之说破；知国家为大地主大资本家（指实行土地国有和节制资本），而外资无足忧者，则社会革命不可行之说破；知国有土地主义，其定价买收方法更无驳论者，则社会革命不能行之说亦破。”个别激进者甚至指出，中国的社会经济制度并非完美无缺，而是弊病百出，其主要表现是土地集中于少数人之手，由此才造成人民的极端贫困。认为，“土地者，一国之所共有也，一国之地当散之一国之民”，否则就必然造成“地权之失平”以及“人权之失平”，所以“必尽破贵贱之级，没豪富之田，以土地为国民所共有，斯能真合于至公”。同时进一步指出中国既然存在着这种不平等的制度，一旦采取大机器生产，就一定会产生西方资本主义国家那种“富者资本骤增，贫者日填沟壑”的现象。为预防这种弊病的产生，就必须在进行民族革命、政治革命的同时，实行社会革命，具体办法是消除私人对“天然生产力”即土地的占有，把土地收归国有。

革命派和改良派的论战，开始于光绪二十九年，三十一年至三十三年间全面展开，时间之长，规模之大，涉及问题之广，都是空前的。经过这场大论战，一、进一步划清了革命派和改良派的界限，使人们清楚地认识到实行民主革命的必要性，于是纷纷脱离改良派，参加到革命的行列。二、革命派批判了封建文化思想，使西方的资产阶级民主思想和孙中山的三民主义思想得到了更广泛的传播，促进了革命力量的壮大。改良派也不得不承认，经过论战，“革命党之势力”，“如决江河，沛然而莫之能御也”。但是由于阶级的和历史的局限性，革命派对中国民主革命一系列根本问题却未能作出完全正确的回答。在驳斥革命会招致帝国主义干涉和瓜分的问题上，革命派虽然表示即使干涉也不足惧的态度，但始终天真地认为帝国主义是遵守国际法的，不会干涉中国革命，更不致引起瓜分。在驳斥革命会引起下层群众暴动因而产生“内乱”的问题上，他们一方面说要对“自然的暴动而加以改良使之进化”“为秩序的革命”；另一方面为了避免社会的长期动乱，又提出了速战速决的意见，即所谓“革命之范围，必力求其小；革命之期日必力促其短”。在驳斥关于“土地国有”就是“夺富予贫”的问题上，除个别激进分子外，革命派不仅未能做出有力回答，反而明确声明根本没有这种打算，即“吾人之政策”，“非损富者以益贫”，是欲使富者“有益无损也”，且使“富者愈富，贫者亦富也”。革命派的这些严重弱点，反映了民族资产阶级的软弱性和妥协性，表明他们无力把民主革命引向彻底胜利。

（王　才）

《中英续订藏印条约》签订

《中英续订藏印条约》，清光绪三十二年四月初四（1906 年 4 月 27 日）英国迫使清政府签订的不平等条约。

为了把西藏从中国分裂出去并变为英国的殖民地，光绪二十九年，英国发动了第二次侵略西藏的战争。次年六月二十二日（8 月 3 日），英军悍然侵占拉萨。七月二十八日英军上校荣赫鹏（Younghusband, Sir Francis Edward 1863—1942）迫使西藏三大寺（哲蚌寺、色拉寺、噶尔丹寺）寺长罗生戛尔曾等人签订了非法的《拉萨条约》，共 6 款，主要内容有：一、非英国事先同意，不得将西藏土地让卖、租典与外国；不许将西藏进款、货物、金银钱币等给与外国抵押拨兑；外国不许享受西藏的铁路、道路、电线、矿产

或其他利权；外国不得派员入藏和干涉西藏一切事务。二、除亚东开埠外，增开江孜、噶大克为商埠，英国在商埠派驻官员。三、赔偿英国军费50万镑，在赔款偿清前，英军仍驻春丕。四、自印度边界至江孜、拉萨之炮台山寨，须"一律削平"。这个严重损害中国主权的条约，遭到全国各族人民的反对，清政府不予承认，并派代表与英国重新谈判。光绪三十二年四月初四，清外务部右侍郎唐绍仪与英国驻华公使萨道义在北京签订《中英续订藏印条约》共6款，主要内容有：一、《拉萨条约》作为本条约的附约。二、"英国国家允不占并藏境及不干涉西藏政治；中国国家亦应允不准他外国干涉藏境及一切内治"。三、《拉萨条约》中第九款所声明的各项权利，"除中国所能享受外，不许他国家及他国人民享受"。这个条约未能使中国收回在《拉萨条约》中所丢失的权益，但却迫使英国确认了中国对西藏的领土主权。 （王 才）

清政府"预备立宪"

20世纪初期清政府为抵制革命，拉拢资产阶级立宪派，加强皇族集权而采取的政治措施。

清廷从光绪二十七年(1901)起，推行"变法新政"后，各种矛盾进一步激化，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运动也日益高涨。恰在此时，在我国东北进行的日俄战争，以日胜俄败而结束。以此为契机，资产阶级改良派广为宣传改革政体的必要性，强调日胜俄败，反映了立宪与专制的胜败，中国要摆脱困境，只能变君主专制为君主立宪。在他们的鼓动下，一些当朝权贵和封疆大吏也先后奏请"变革政体，实行宪政"，敦请派亲信有声望之大臣游历各国，进行实地考察。迫于形势和各方面的压力，清廷于光绪三十一年(1905)派载泽等五大臣出洋考察。次年，五大臣归国，力陈只有实行宪政才能巩固统治，否则就会使希望立宪的人们失望，革命亦无法避免。经过反复筹商，慈禧太后终于下定决心，于三十二年七月十三日(9月1日)颁布上谕，宣布"预备仿行宪政"。次日清廷按"廓清积弊，明定责成，必从官制入手"的预定计划，下诏进行官制改革，著派镇国公载泽、大学士世续(1853—1921)、学部尚书荣庆、户部尚书铁良、户部尚书戴鸿慈、直隶总督袁世凯等共同编纂官制改革方案，同时令各总督派员至京随同参议协助，由庆亲王奕劻、军机大臣瞿鸿禨、孙家鼐总司核定。十八日，在朗润园设立了新官制编制馆。于是围绕官制改革，内外亲贵权臣间展开了激烈的争夺。九月二十日，清廷公布了中央新官制：内阁、军机处一切照旧；中央共设11个部，其中外务部、吏部、学部照旧；将巡警部改为民政部，刑部改为法部，理藩院改为理藩部，大理寺改为大理院，工、商二部合并改为农工商部；户部改为度支部，以财政处并入；兵部改为陆军部，以练兵处、太仆寺并入，海军部及军咨府未设立前，事归陆军部代理；礼部以太常寺、光禄寺、鸿胪寺并入；设邮传部专司轮船、铁路、电线、邮政。次日清廷重新任命了各部院大臣。按清朝旧例，中央各部均设满汉尚书各一人，以示名义上的对等，而这次京官改革在"择贤简用，不分满汉"的幌子下，反而进一步扩大了满族权贵的势力。除军机处仍控制在皇族手中外，中央11个部的尚书，汉官5人(外务、吏、法、民政、邮传)，满官5人(度支、礼、陆军、农工商、理藩)，蒙古1人(学部)，如加上外务部的管部大臣及会办大臣满族官员2人计，则13名大臣中满族亲贵占7名，汉族5名、蒙族1名；而满族亲贵又控制了陆军、度支、外务3个最重要的部，度支、陆军两部的尚书、侍郎由清一色的满人把持(初仅汉官陈雨苍任度支部右侍郎，但不久亦由满人宝熙代理)；且将袁世凯掌握的北洋六镇中的四镇军队改归陆军部直接统辖。光绪三十三年六月，清廷开始地方官制改革，令改各省按察使为提法使，增设巡警、劝业两道，裁撤分守分巡各道，酌留兵备道，分设审判厅，增易佐治员等。由东三省先行开办，直隶、江苏两省试行，其它各省则限15年一律办齐。为了加强中央权力，又特规定：陆军部直接委派督练公所军事参议官，以收回各督抚的军权；度支部派清理财政监督官，以收回各省督抚的财权；且把当时权势最大的汉族官僚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袁世凯和湖广总督张之洞调为军机大臣，用明升暗降的办法削其实权。这样满汉地主官僚的关系更加紧张了。为了应付部分督抚和立宪派的请求，清廷又改因出洋考察政治而设立的考察政治馆为宪政编查馆；再派达寿赴日，汪大燮赴英，于式枚赴德，考察宪政；宣布在中央筹设资政院，以立议会基础，命溥伦、孙家鼐为资政院总裁；要求编译东西洋各国宪法，以为借鉴；又命各省筹备咨议局，预备设立各府县议事会。三十四年颁行《各省咨议局章程》、《咨议局议员选举章程》，次年又颁布《资政院院章》。三十四年七月(8月)奕劻奏呈宪法大纲、议院选举各法以及逐年筹备事项；八月初一，清廷颁布《钦定宪法大纲》，宣布自本年起，以9年为期(至1916年)，将预备各事一律办齐，正式召开国会。《钦定宪法大纲》共23条，其中关于"君上大权"的内容有14条，规定皇帝有颁行法律、黜陟百司、设官制

禄、宣战议和、解散议院、统率陆海军、总揽司法权等至高无上的权力；关于人民义务的有9条，除了纳税、当兵等项义务外，还规定了一些在封建专制法律许可范围内的言论、出版、集会、结社等项权利和自由。这个宪法大纲纯抄自日本宪法，而关于君主大权的规定又超过了日本天皇，实际把皇帝至高无上的权力用宪法的形式固定下来。就在这一年的十月，光绪帝和慈禧太后相继死去，慈禧死前指定醇亲王载沣之三岁幼子溥仪即皇帝位，改元宣统，载沣以摄政王监国。载沣一上台即下诏重申"预备立宪"，同时以袁世凯"现患足疾，步履维艰"为由，令其回河南老家"养疴"，然后宣布自任代理大元帅，任命其弟载洵为海军大臣，载涛为军咨大臣，兄弟三人总揽军政大权。为掩饰皇族集权的真面目，宣统元年九月初一(10月14日)，全国21省除新疆暂缓外，同时召开咨议局第一届常会。按规定各省咨议局以"采取舆论"，"俾其指陈通省利弊，筹计地方治安"，"为资政院储才"为宗旨；设议长1人，副议长2人，以议员定额十分之二为常驻议员，均由议员中互选产生；议员用复选举法选出，任期三年；每年九月起开常年会一次，会期40天，临时会期20天。但各省咨议局只是各该省督抚控制下的咨询机关，而非真正的民意机关。清廷规定"各省督抚有监督咨议局选举及会议之权"；如咨议局"议事有逾越权限不受监督劝告者"，"督抚得令其停会"；若咨议局"所决事件有轻蔑朝廷情形者"，"督抚得奏请解散"。咨议局只有议决本省兴革事件、预算、决算、税法、公债、单行章程规则之增删修改、权利之存废等事件之权；而且议定后仍须要"呈请督抚批准"，才能执行，咨议局不但无权监督地方行政，反而要受各省督抚的监督。然而事与愿违，本年常会开始后，各地选出正副议长63人，不少立宪派的骨干取得了议长、副议长、常驻议员等要职，如江苏的张謇、奉天(沈阳)的吴景濂(1873—1944)、四川的蒲殿俊(1876—1934)、山西的梁善济、湖南的谭延闿(1880—1930)等均当选为议长；湖北的汤化龙(1874—1918)、福建的刘崇祐、四川的罗纶(1876—1930)等当选为副议长。这样，咨议局就成了立宪派推进立宪运动的重要阵地；武昌起义后不少省份的咨议局又成了策动各该省督抚反正、宣布独立的重要机构。宣统二年九月初一(10月3日)，资政院正式开会。按规定资政院以钦遵谕旨，取决公论，预立上下议院基础为宗旨；设总裁2人，以王公大臣"着有勋劳通达治本者"特旨简充；副总裁2人或4人，以三品以上大员"着有才望学识者"特旨简充；议员分为"钦选"和"互选"(即"民选")两种，各100名，凡宗室王公世爵、满汉世爵、外藩王公世爵、宗室觉罗、各部院衙门官、硕学通儒以及纳税多额者为钦选议员，各省咨议局议员互选后经督抚复核咨送者，为互选议员，均任期三年；每年一次常年会，会期三个月，临时会期一个月。资政院有议决国家预算、决算、税法、公债，制定或修订法典及议定奉特旨交议事件等权。但它议决的事项须"具奏请旨裁夺"方可生效，实际仍是清政府的御用工具。如本次常年会，议了三个月，除了一些兴学、垦荒之类的议案得到清廷同意外，凡触及清统治利益的问题都是徒费唇舌。但立宪派却利用资政院开院的机会，把原定要发动的第三次国会请愿提前举行，迭向资政院和载沣上书，请求速开国会。九月二十日资政院一致议决将请愿书转奏上去，并通过了一个奏请朝廷允准国会请愿代表要求的专折。二十三日17省督抚将军联衔入奏，要求"立即组织内阁"，"定期明年开设国会"。在内外压力下，清廷于十月初三发出谕旨，宣布将预备立宪期限由九年缩短为五年，定宣统五年开设议院，在国会召开前两年成立责任内阁。宣统三年四月初十(5月8日)，清廷发布内阁官制和任命总理、协理大臣以及各部大臣的上谕，总理大臣为庆亲王奕劻(宗室)，协理大臣为大学士那桐(1856—1925)和徐世昌(汉)，外务大臣为梁敦彦(1857—1924，汉)，民政大臣肃亲王善耆(宗室)，度支大臣加贝勒衔镇国公载泽(宗室)，学务大臣唐景崇(汉)，陆军大臣荫昌(满)，海军大臣加郡王衔贝勒载洵(宗室)，司法大臣绍昌(觉罗)，农工商大臣加贝勒衔贝子溥伦(宗室)，邮传大臣盛宣怀(汉)，理藩大臣寿耆(宗室)。内阁13个大臣中，满族9人，其中皇族又占7人。在当时它就被人们称为"皇族内阁"。"皇族内阁"的成立，使原先对清廷预备立宪寄予很大希望的立宪派大为失望。立宪骗局彻底破产。与清廷的愿望相反，"预备立宪"的结果，不仅未缓和任何矛盾，反而使满汉官僚之间的矛盾、立宪派与清王朝的矛盾极度尖锐化了；"皇族"不仅未能"永固"，相反地却陷入了众叛亲离、四面楚歌的窘境。立宪派人士纷纷到革命派方面寻找出路，清王朝彻底孤立了。

(王　才)

萍浏醴起义

又称丙午萍浏之役，清光绪三十二年(1906)同盟会影响下的江西萍乡、湖南浏阳、醴陵地区会党和矿工发动的反清武装起义，也是同盟会成立后第一

次大规模的武装起义。

光绪三十年华兴会在长沙起义失败，次年会党首领马福益又被捕死难，会党群众亦遭到反动势力的迫害。然会党的组织基础并没有被打乱，马福益旧部肖克昌(？—1906)、李金奇在安源矿工中具有很大的号召力；龚春台(？—1907)、姜守旦、冯乃古在浏阳，李香阁在醴陵等县农民群众中尤有威信；他们同愤激于清政府的残暴镇压，积极扩大力量，准备重新起义。三十二年春，同盟会总部派刘道一(1884—1906)、蔡绍南(1875—？)回湖南发动会党和新军起义。蔡绍南通过同乡魏宗铨(1881—1907)同龚春台等会党头目取得联系。随后，刘道一等即约集蒋翊武、龚春台等数十人在长沙水陆洲船上举行秘密会议，基本确定了在萍、浏、醴三地同时发动起义，然后分兵进取长沙、南昌的计划。会后，刘道一留长沙筹划全局，并赋予同盟会总部联系的责任。蔡绍南赴萍乡帮助龚春台联络哥老会各部，举行开山大典，公议将哥老会改称"六龙山号洪江会"，推龚春台为大哥，以忠孝仁义堂为最高机关，誓词是："誓遵中华民国宗旨，服从大哥命令，同心同德，灭满兴汉，如渝此盟，神人共殛。"洪江会成立后，发展迅速，会员很快增到10多万人。正因人员庞杂，引起清廷注意，洪江会头目遭到逮捕杀害的事件屡有发生。在此紧急情况下，光绪三十二年十月十八日(12月3日)，蔡绍南、龚春台在萍乡高家台召开各路首领会议，商议起义日期和办法。会上，会党首领一致主张乘官兵未到，立刻发难；蔡绍南等认为同盟会总部无信息，军械又不足，仍拟等待接济。大会经终宵争论，未能作出任何具体决定。十九日凌晨，洪江会首领之一廖叔保急不可待，首先在浏阳麻石聚众二、三千人举旗发难。蔡、龚只得宣布动员：以同盟会名义通知洪福会首领姜守旦和普迹市哥老会大头目冯乃古，并饬知各县各处会党同时发动。二十一日，起义军占上栗市，并立即整编部队，定名为"中华国民军南军革命先锋队"，龚春台为大都督，蔡绍南为左卫都统领兼文案司，魏宗铨为右卫都统领兼钱库督粮司，廖叔保为前营统带兼急先锋，沈益古为后营统带兼殿后指挥。起义军又发布檄文，历数清政府十大罪恶，宣布起义宗旨为"破千年之专制政体，不使君主一人独享特权于上。必建共和民国，与四万万同胞享平等之利益，获自由之幸福。而社会问题，尤当研究新法，使地权与民平均，不致富者愈富，成不平等之社会"。在这里，资产阶级革命派的纲领第一次以起义檄文的形式公诸于广大群众之中，并且得到拥护；贫苦农民、矿工和部分防营兵勇纷纷加入起义队伍，旬日间，起义军迅速增至数万人，浏阳与醴陵以及江西萍乡、宜春、万载边境广阔农村地区也燃起了反抗烽火，其声势震动了长江中游各省。蔡绍南等原拟分三路进兵：一路据浏阳、醴陵，进窥长沙；一路据萍乡安源矿区为根据地；一路由宜春、万载东出瑞州、南昌诸府，攻略沿江各省。但起事后，形势发展迅速，革命力量每到一处，清军望风披靡，人民热烈拥护，而领导者们却不知道如何巩固革命秩序，如何统一军事调度，致使前方各自为战，后方也步调混乱。二十三日当龚春台部整军准备出击时，洪福会首领姜守旦在浏阳大旗山、大光洞、九鸡洞一带也立刻集合了1万多人，起而响应，自号"新中华大帝国南部起义恢复军"，发布檄文称："勿狃于立宪、专制、共和之成说，但得我汉族为天子，即稍形专制，亦如我家中祖父，虽略示尊严，其荣幸犹为我所得与。"反映了单纯反满的意向。这次大起义的消息传到日本东京，同盟会员纷纷到总部机关请命回国，投身反清武装起义。孙中山和黄兴派多人到鄂、皖、苏、浙、赣、湘等省策应。面对蓬勃发展的起义，清政府十分惊恐，急令湖广总督张之洞、两江总督端方，湖南巡抚岑春蓂(1868—？)调集湘、鄂、赣、苏四省军队及地方驻军、"义勇"共5万人前往围剿；美、英、德、日各国亦派军舰闯入长江，对起义军进行恐吓。起义军凭着手中极其简陋的武器，顽强抵抗，多次打败清军。但由于起义军互不统属，领导不力，奋战月余后终被清军各个击破，惨遭失败。刘道一、蔡绍南、肖克昌、廖叔保等首领数十人牺牲；龚春台辗转逃往长沙。然而这次起义的影响是重大的，它打击了清朝的反动统治，扩大了同盟会的政治影响，增强了革命党人武装反清的信心。

（王　才）

潮州黄冈起义

又称丁未黄冈之役，清光绪三十三年(1907)同盟会在广东潮州黄冈发动的反清起义。

这次起义是孙中山委派许雪秋发动起来的。许雪秋(1875—1912)亦作雪湫，原名有若。广东海阳(潮安)人，新加坡华侨富商之子。初曾向清廷捐得候补道衔，后立志"逐满兴汉"。光绪三十年归国。次年以承筑潮汕铁路工程及召募团练为名，聚众千余，约期举义，未发事泄，再赴新加坡。三十二年得识孙中山，加入同盟会，被委任中华国民军东军都督，主持岭东军务，遂返粤为武装起义做准备。雪秋回潮州后，召集同志会商进行办法；并往香港会晤冯自由

(1881—1958)等，谓事机成熟，惟人才缺乏，请电同盟会总部速派同志归国相助。后孙中山派人配合雪秋，加紧了起义筹备工作。适萍浏醴起义失败后，清政府要求日本政府驱逐孙中山出境。三十三年正月二十日(3月4日)，孙中山被迫离开日本赴安南(越南)，到河内后立即在甘必达街61号设立了领导西南武装起义的总机关，准备就近组织领导广东、广西和云南三省的起义。他认为这些省份地处边陲，群众基础较好，易于发动；地域宽广，便于迂回作战；尤其有利于从国外输送武器和人员。为此，孙中山决定先在广东西部的钦州(今属广西壮族自治区)、廉州(今属广西壮族自治区)与东部的潮州、惠州四府同时起义；许雪秋仍负潮州方面起义之责。许通过会党首领余既成、陈涌波在会党中做发动组织工作。但由于走漏风声，引起清潮州总兵黄金福、黄冈都司隆熙的警觉。四月初十，黄金福派兵勇数十名进驻黄冈镇，并借故捕去会众2人。次日余既成等聚集党众200余人于黄冈城外起义。经一夜血战，攻克黄冈。十二日，起义者在旧都司衙门成立军政府，举陈涌波为司令，余既成、张跃为副司令，以"广东国民军大都督孙(指孙中山)"或"大明都督府孙"名义布告安民。起义军纪律严明，秋毫无犯，因此深受群众拥护，附近贫民纷纷参加义军，队伍很快发展到五、六千人。但这次起义事出仓促，具体主持者不了解通盘计划，事发后才派人去香港请许雪秋来督率义军。适时黄金福部清军已抵离黄冈二十里的汫州。起义军决定：兵分两路，一路由陈涌波率领，直趋潮州、汕头，目标是乘黄金福带兵外出之时，攻占其巢穴；一路由余既成率领，直接奔向汫州，攻击黄金福部。十四日两路军队同时出发。余部抵达汫州时，天已黎明，而清军早有准备，因此初战失利。进攻潮汕之义军，得知汫州失利，即改变计划，转援余部义军。两路会攻黄金福清军，敌势危急。恰于此时，清广东水师提督李准所派援军到来，双方夹攻义军，因而汫州未能攻下。十六日，在敌我力量悬殊的情况下，陈、余决定解散队伍，转往香港，起义遂宣告失败。　　　　(王　才)

惠州七女湖起义

又称丁未惠州七女湖之役，清光绪三十三年(1907)同盟会在广东惠州地区发动的反清起义。

按孙中山原来设想，粤东的潮州、惠州应同时举义，所以他在委派许雪秋规划黄冈起义时，又先后派遣惠州地区的会党首领黄耀庭、余诏卿、邓子瑜三人从新加坡返香港，负责惠州及阳江、阳春等处军事工作。黄、余二人抵港后，分别领去活动经费千余元，却毫无动作，唯有邓子瑜进行了认真的准备。邓子瑜，广东归善(今惠阳)人，与归善、博罗、惠阳等地三合会众有广泛联系。光绪二十六年由郑士良引见识孙中山，受命协助策动惠州起义，事败后走避新加坡，以经营旅店为生，联络惠属各地来往南洋的同志。三十二年加入同盟会，旋受孙中山命再次筹划惠州军事。他在香港一面委派会党首领陈纯、林旺、孙稳分别在归善、博罗、龙门等地聚集党众，一面在港购置械弹，准备亲自沿小道押解入惠州接济起义。光绪三十三年四月十六日(5月27日)，黄冈起义失败，但惠州方面未得到消息，仍举旗响应。二十二日，陈纯等在距惠州府城二十余里的圩镇七女湖集众百数十人，劫夺防营枪械，杀水陆兵勇多人，发布反清讨满檄文。二十五日起义军进攻泰尾，清军闻风而逃；义军连克杨村、三达等墟。二十七日义军乘胜进攻柏塘、公庄各处，各乡会党纷纷来会，队伍发展到300余人，声势大振。然后义军分击八子爷、公庄、横刀、梁化，所向无敌。归善、博罗二县城门均闭。惠州协统两次派兵往御，均被击回。继调横沥巡防营管带洪兆麟至柏塘，自二十九日至五月初二，亦多次被义军所败。初三，洪兆麟带队赴八子爷地方，为义军在山凹突击，洪中枪坠马，所部死伤极重。消息传出，广州震动。两广总督周馥(？—1920)电调李准由黄冈驰援惠州。李部由澳头登岸向起义军反扑。起义军坚持战斗10余日，多次击败清军。终因黄冈起义已失败，他处亦未响应，惠州义军孤立无援，被迫转移到梁化圩附近，将枪械埋于地下，队伍自行解散。(王　才)

皖浙起义

清光绪三十三年(1907)光复会在安徽、浙江发动的反清武装起义。

当同盟会在华南发动一系列反清武装起义之时，光复会在安徽、浙江也打响了反清的枪声。光绪三十一年，陶成章协助徐锡麟在绍兴设立大通师范学堂，作为光复会的革命机关，招收金(州)、处(州)、绍(兴)三府各县会党头目来校受训，规定凡入校学员均属光复会员，卒业后仍归学堂领导人统辖和节制。为打入清政府内部，掌握军权，徐锡麟又捐银赴日学习军事，因眼近视而未果。光绪三十二年他捐资为道员，分发安徽，得到巡抚恩铭(？—1907)重用，任安徽武备学堂会办、巡警处会办兼巡警学堂监督，与陈伯平(1885—1907)、马宗汉(1884—1907)等密谋革命，并与归国主持大通学堂的秋瑾保持联络，期

与浙江同时举义。秋瑾(1875--1907)字璿卿,号竞雄,又称鉴湖女侠,浙江山阴(绍兴)人。义和团运动失败后,她目睹民族危机深重,决心献身救国事业。光绪三十年,她冲破封建家庭的束缚,自费到日本留学,投入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运动。是年冬归国,加入光复会。三十一年春复去日本,加入同盟会,被推为评议部议员和同盟会浙江省主盟人。同年冬,为反对日本取缔中国留学生规则,愤然归国。三十二年在上海参与创办中国公学,发刊《中国女报》。次年到绍兴,主持大通学堂,联络金华、处州等地会党,组织光复军,与徐锡麟相约,于六月上旬在皖、浙两省同时起义,分兵进取南京,进而占领江苏、安徽、浙江各省要地,再图发展。但是五月间,绍兴会党过早地暴露了形迹,清政府已有觉察,到处查拿革命党人。徐锡麟见事机已败露,决定铤而走险。五月二十六日(7月6日),安徽巡警学堂甲班学员举行毕业典礼;当天上午8时巡抚恩铭以及省文武高级官吏前来祝贺。典礼开始后,陈伯平首先向文武官员坐席掷一炸弹,未爆炸。接着徐锡麟持双枪向恩铭射击;恩身中七弹,后经抢救不治死于抚署内;清吏遇变如鸟兽散。徐锡麟复拍案对众大呼:"抚台已被刺,我们去捉奸细,快从我革命!"学生们愕然不知所措,徐遂率陈伯平、马宗汉等30余人攻抚署,旋转至军械所取械,结果被清军包围,双方激战六小时,陈伯平战死,徐、马等20余人被捕。在受审时,徐自称"革命党首领"、"专为排满而来",慷慨陈词,视死如归,当晚英勇就义。皖省起义的失败牵连到绍兴大通学堂。秋瑾自知安庆败讯后,即焚毁名册,掩埋枪弹,疏散党人;她本人则坚持不走,决计以身殉国。六月初五,浙江巡抚张曾敭派清兵往大通学堂,捕去秋瑾等6人。次日秋瑾英勇就义于绍兴轩亭口。

受皖浙起义的影响,光绪三十四年十月下旬岳王会成员熊成基利用新军又在安庆发动了一次起义。熊成基(1887—1910)一名承基,字味根,江苏甘泉(今江都)人。光绪三十年入安徽练军武备学堂练军班当学兵,参加革命团体岳王会。次年入江南炮兵学堂学习。三十二年任江宁陆军第九镇炮兵排长。三十三年由南京调回安庆,先任马营队官,继任炮营队官,参加光复会,并负责主持岳王会,在军队中发展革命力量。三十四年十月二十一日(11月14日)、二十二日,光绪帝和慈禧太后相继死去。消息传到安庆,熊成基认为这是起义的极好机会。二十六日,他召集党人会议,决定当晚起义。晚9时,熊成基率马炮两营千余名新军进攻安庆。经一昼夜激战,因城内已有防备,起义军未能破城。二十七日,清水师提督陈从周率舰5艘,炮轰起义军;端方从太湖派兵7营向安庆进逼。起义军二面受敌,战至晚10时,被迫向集贤关、桐城方向突围出走。突围中,起义军又遭到清提督姜桂题部追击,义军退至庐州时,余部已不足百人,只好解散队伍。起义虽然失败了,但它是革命派转化清朝新军用以反对清政府的开始,标志着新军革命新阶段的到来。 (王 才)

共进会成立

共进会,清光绪三十三年(1907)部分同盟会员在日本东京建立的资产阶级革命团体。

从光绪三十三年起,孙中山、黄兴等同盟会的主要领导人均集全力在华南地区组织反清武装起义,设在日本东京的同盟会总部群龙无首,日趋涣散,内部分歧愈益严重。部分来自长江中上游各省并与会党联系较多的同盟会员,不满于孙、黄只注意在南部边境发动起义,更不满于东京同盟会总部的涣散和行动迟缓,强烈要求在长江流域各省发动会党,加紧起义活动。为此,在日本的隶属长江流域各省的部分同盟会员,经过酝酿和筹备,于三十三年七月(9月),在东京清风亭召开大会,另行组织团体,定名为共进会。参加成立会的有湖北、四川、湖南、江西、浙江、广西、云南、安徽等省留日学生100多人。四川教友会首领张百祥(? --1914)在下川东一带拥有相当多的会党群众,在会党中的资格最老,对各地码头最熟,被推为共进会的第一任会长,下设军务、内政、外交、党务、理财、交通、调查、纠察等9部,各设部长一人,并制定三等九级军制,十八星军旗。以后继任会长的有江西人邓文翚、湖北人刘公(1881—1920),湖南人焦达峰等分任各部负责人。共进会成立后发布了文言文和白话文两种宣言书,大体上以同盟会的宗旨为宗旨,尤着重于反满的宣传。但因共进会与会党联系密切,而会党中的上层分子有不少人是地主或与地主有密切联系,故反对同盟会的民生主义纲领,擅将"平均地权"改为"平均人权"。所谓"平均人权",按他们自己的解释,是说汉人与满人人权不平等,故应"平均人权",实际仍为"反满"之意。为了联络会党,共进会内部也用开堂、烧香、结盟、入伙的办法,并有"山"、"水"、"堂"、"香"等名目;"山"叫中华山,"水"叫兴汉水,"堂"叫光复堂,"香"叫报国香。但总体上,这个组织是较散漫的,各派会党仍按原来的系统和各自的堂口进行活动,并无集中统一的领导。总会会址先设在日本东京共进会员居正(1876—

1951)寓所,后在青山区赁得一屋,署名"华群舍",作为本部的办公地点。光绪三十四年秋,共进会的主要成员孙武、焦达峰等分别回国活动。孙武(1880—1939)原名葆红,字尧卿,湖北夏口人。光绪二十四年入湖北武备学堂,毕业后充清军军官,先后参加自立军起义、科学补习所和日知会,后去日本入大森军事学校学习。焦达峰(1886—1911)原名大鹏,湖南浏阳人。光绪三十二年参与萍浏醴起义,失败后逃往日本,入东斌学校学军事,旋入同盟会。宣统元年(1909),孙武、焦达峰等在汉口法租界设立共进会机关部(后迁至汉口俄租界宝善里),在武昌设分机关多处。随后焦达峰即到湖南在长沙建立秘密机关,并赴浏阳、醴陵、萍乡联络洪江会、洪福会群众。同时江西、广东、广西、四川等省都相继建立了共进会分会。在湖北,孙武等人积极吸收会员,将会党按军队形式组成五镇,准备起义。但会党不受约束,行动难于统一。从此,共进会的联络重点亦转向新军,在新军中建立组织。宣统三年同盟会中部总会派人到达武汉,促使共进会与文学社合作,共谋举义。八月初三共进会与文学社联合成立了革命领导机关,文学社社长蒋翊武为起义总指挥,孙武为参谋长。八月十九日,两个组织联合发动了武昌起义;湖南、江西等省的共进会积极响应。共进会对辛亥革命在长江流域各省迅速取得胜利起了重要作用。 (王 才)

钦廉防城起义

又称丁未防城起义,清光绪三十三年(1907)同盟会在广东钦州地区(今属广西壮族自治区)发动的反清武装起义。

这次起义是在当地群众抗捐斗争的基础上开展起来的。三十三年春,广东钦州三那墟(那黎、那彭、那思)人民因糖捐繁重,举绅耆数十人向清地方官府请求蠲减,官府反将代表囚禁。于是乡民推当地富绅刘思裕为首领,组织"万人会",举行抗捐起义。钦(州)廉(州)道王秉必派兵镇压无效,向省方请兵。粤督周馥乃派统领郭人漳率兵二营、标统赵声(1881—1911)率兵一营,会同当地清军镇压,刘思裕及众多乡民惨遭杀害。于是三那乡民派代表到河内,请孙中山援救。孙中山即派王和顺为"中华国民军南军都督",前往钦州主持起义事宜,复派黄兴前往钦州郭人漳营、胡毅生赴廉州赵声营策动清军响应。王和顺(1868—1934),字德馨,壮族,广西邕宁人,早年曾参加黑旗军抗法,退伍回乡后加入三合会。光绪二十九年与游勇头领陆亚发在广西发动反清起义,坚持战斗两年之久,失败后避居西贡。三十二年加入同盟会。这次王和顺受命后即来到三那地区,与起义群众会合,伺机进取。后得知防城清军有反正之意,乃请示孙中山在防城发动起义。三十三年七月二十四日(9月1日)王和顺率200余众首先在钦州王光山举义,发布《告粤省同胞文》及《招降满洲将士布告》,宣示起义军"誓当与我国民披坚执锐,共冒矢石,以驱丑胡,以立新国"。二十七日王率部攻防城,得清军刘辉廷、李耀堂两哨官内应,次日义军进入防城,杀知县宋鼎元等;军队在城内"秋毫无犯,鸡犬不惊,居民皆燃爆竹庆贺,异常鼓舞",相继加入义军,革命队伍很快扩至3000人。在这里王和顺再发出《告海外同胞文》,号召海外同胞响应和支援祖国的民主革命运动,为祖国的独立富强做出贡献。攻克防城的当天,王和顺命少数人留守防城,自率主力进攻钦州城。本来黄兴早已潜入钦州,策动清军倒戈内应。不料郭人漳却借故变卦,唆使义军转攻广西南宁,企图使这支仅有数百人的革命武装在驻有重兵的南宁城下自蹈危机。革命军进攻钦州受阻,八月初一开始进攻灵山城。因攻城器具缺乏,战至次日,城仍未攻下。清军乘势出城反扑,革命军只得且战且退。这时郭人漳又重新攻占防城,使革命军腹背受敌。八月七日,王和顺被迫解散革命军,自率20余人返越南境内,余部退往边境山洞和十万大山。 (王 才)

国会请愿运动

清末立宪派为促使清政府速开国会而举行的政治请愿运动。

20世纪初,随着清政府推行"新政",资产阶级爱国运动和革命运动的兴起,民族资产阶级上层的政治代表也积极行动起来,重新议论起开国会、立宪法的问题。他们认为要发展资本主义,就必须改良封建专制主义的政治组织,开国会、立宪法,实行君主立宪。只有这样,才能"安上全下",即缓和阶级矛盾,消弭革命,抵御外侮,争得资本主义发展的有利条件,并使本阶层获得参政的权益,保障自身的经济利益。这样,要求实行君主立宪,就成了这一时期改良派的政治纲领及其活动的中心内容,故改良派也被称立宪派。为此,他们开展了一场延续八九年之久的立宪运动。立宪派又分为海外和国内两个部分。海外以康有为、梁启超为代表。戊戌变法失败,他们受清政府通缉,成为"国事要犯",在国内无立足之地,逃往国外,在华侨中建立保皇会,宣传保皇、立宪,反对革命,在国内外有相当的影响。这部分人也被称为保

皇派。国内以较大的商办企业主、商办路、矿公司的主持人以及与他们在政治、经济上有联系的知名人士为代表，如大生纱厂和通海垦牧公司的主办人张謇、浙江铁路公司总理汤寿潜、湖北铁路协会首脑汤化龙、首倡湖南“铁路股东会”的谭延闿等，都是立宪派里声名显赫的人物。同身居国外的立宪派比较，他们有较强的政治、经济实力，是国内立宪运动的发起者和组织者。立宪运动的酝酿，起于光绪二十九年(1903)。这一年，广西会党举起了反清义旗，同时又先后发生了“拒俄”、“拒法”运动和《苏报》案事件，资产阶级领导的民主革命运动也得到迅速的发展。在此形势下，“立宪之说以起”。接着，日俄战争和三十一年的俄国革命，又给立宪派的要求提供了最新的例证。从此“立宪之声，洋洋遍全国矣”。在立宪派的鼓动下，一部分汉族官僚出于同满洲贵族争夺权力的目的，也先后向清廷奏请立宪；他们并不属于立宪派，但其活动却壮大了立宪运动的声势。从此，立宪运动也就从酝酿逐渐进入实行的阶段。光绪三十二年七月(9月)，清政府正式宣布“预备立宪”。对此，立宪派欢欣若狂，认为多年来倡导的宪政终于有了实现的征兆。为了准备参与政权，立宪派在各地相继建立起了自己的团体。在国外，康有为于三十三年二月(3月)改保皇会为国民宪政会；九月梁启超在日本东京成立政闻社。在国内，有江浙地区的预备立宪公会、湖北的宪政筹备会、湖南的宪政公会、广东的自治会等。这些团体的共同目标，就是要求清政府召开具有制定法律、监督政府职权的国会，建立有实权的责任内阁。可是，通过清政府的官制改革，他们很快发现，清廷并无立宪的诚意，只不过是“假立宪之名，以行专制之实”。为了迫使清政府真立宪，立宪派联合起来，采取“匍匐都门，积诚罄哀”的方式，举行了轮番的国会请愿，把立宪运动推向了高潮。首先提出国会请愿问题的是宪政讲习所的实际主持人杨度。光绪三十三年秋，宪政讲习所的主要成员领衔给清廷上了第一份要求速开国会的请愿书。三十四年，全国各省的立宪派陆续派代表入京请愿；一些留学生、海外华侨以至清廷的驻外使节、官僚也纷纷电请或奏请开国会。一时全国上下，形成了一股要求速开国会的高潮。对此清政府在采取查禁政闻社的严厉措施、压制立宪派的请愿的同时，继续玩弄骗术，许诺定期九年召集国会，公布了《钦定宪法大纲》和“九年筹备清单”。此后各省立宪派都投入筹开咨议局的活动，请愿运动遂暂告沉寂。宣统元年九月(1909年10月)，各省咨议局同时开幕，立宪派取得了合法活动的讲坛，决定以咨议局为阵地，再度发起国会请愿。同年底，江苏咨议局议长张謇召集16省咨议局代表在上海开会，决定组成赴京请愿代表团。元年十二月初六(1910年1月16日)“请愿国会代表团”33人向都察院呈递请愿书，要求一年内即开国会。清政府以“筹备既未完全，国民知识程度又未画一”为理由，予以拒绝。第一次请愿失败后，请愿代表团遵照“诚不已，则请亦不已”的方针，立即部署第二次请愿。他们在北京组织国会请愿同志会；在各省召开大会，募集捐款，征集签名，推选入京代表。据说各省参加签名请愿的竟达30万人之多。在此基础上，宣统二年五月初十，请愿代表以全国各种社会团体名义向都察院递了10份请愿书，结果又遭到拒绝，清廷并警告立宪派“毋得再行渎请”。第二次请愿失败，立宪派“决为第三次准备，誓死不懈”。七月各省咨议局联合会在北京召开，决议向即将开会的资政院提出要求速开国会的提案。九月资政院开会后，立宪派正式发动第三次请愿；资政院通过请求速开国会的提案；各省督抚也联电军机处，提出速开国会和建立责任内阁的要求。在各方面压力下，清政府被迫允许缩短“预备立宪”的期限，将九年改为五年，在国会召开前两年先成立新内阁，同时下令遣散各地请愿代表。这时，以张謇为代表的江、浙上层分子决定奉命停止请愿，其它各省仍然要求再缩短预备期限，但步调已不一致，无法组织起统一的行动。十一月奉天省(辽宁)第四次请愿代表启程赴京，天津学界群起响应。清政府感到形势紧迫，即下令将正在北京活动的东三省请愿代表押送回籍，接着又下达镇压学生请愿活动的命令，并将天津学界请愿活动的组织者温世霖遣戍新疆。至此各省立宪派代表纷纷失望而去，各地请愿活动被迫停止。在民主革命运动蓬勃发展的新时期，改良派反对革命，坚持君主立宪，是违背历史潮流的。但他们掀起的立宪运动在客观上也具有揭露清政府、启发人们的民主觉悟的作用；而立宪派在对清政府绝望后，也相继寻找新出路，成为革命派推翻清朝封建帝制的同盟军。　（王　才）

镇南关起义

又称丁未镇南关之役，清光绪三十三年(1907)同盟会在广西镇南关发动的反清武装起义。

这次起义，是孙中山在华南开展武装反清的重要组成部分。光绪三十三年五、六月间，孙中山先委任同盟会员关仁甫为“中华国民军西军都督”，负责镇南关军事。关仁甫与镇南关清军管带黄瑞兴、边防

统领总教练官易世龙及龙州厅幕友陈晓峰等人取得联系,并允俟起义时为内应。不久事泄,易、陈二人被害;关仁甫退回越南。是时王和顺从灵山败归,孙中山复命他继续经营镇南关军事。王于十月初五(11月10日)前往那模,与早同革命党有联系的凭祥土司李祐卿会合,议定于十三日晚率所联络之游勇夺取镇南关炮台。然桂省绿林、游勇原分两派,王属绿林出身,而祐卿所部游勇不听王调度,王只得退归河内。孙中山接着派同盟会员黄明堂(1870—1938)、关仁甫继续到镇南关策动起义。明堂、仁甫向系游勇首领,李祐卿事前又早与关上守兵联络成熟;故十月二十七日(12月2日)黎明,明堂等率那模村乡勇80人、快枪42杆,循山脊间道向关上右辅山炮台攻击,守兵百余人略事抵抗,即相率投降,镇南、镇中、镇北三座炮台陆续为义军所占领,附近游勇来投者不绝于道。次日孙中山偕黄兴等来到镇南关右辅山炮台亲临指挥。二十九日清参将陆荣廷(1856—1928)率军来犯,义军奋勇抗击,孙中山亦亲自开炮轰击敌军;陆荣廷损兵折将,未能夺回义军阵地。孙中山鉴于镇南关炮台难于进取,台上枪炮又陈旧不堪,遂命黄明堂坚守炮台,他本人则偕黄兴等回河内筹款集械,俟械弹一到即进攻龙州。孙等离开镇南关后,敌人的援军蜂拥而来,对革命军进行围攻。黄明堂率部与龙济光、陆荣廷部清军激战,肉搏相持7昼夜,最后因弹尽援绝,于十一月初五撤离镇南关。

(王　才)

钦廉上思起义

又称戊申马笃山之役,清光绪三十四年(1908)同盟会在广东钦州、廉州(今均属广西壮族自治区)和广西上思地区发动的反清武装起义。

镇南关起义失败后,法国殖民当局应清政府的请求将孙中山逐出安南(越南)。孙临行前命同盟会负责人之一胡汉民(1879—1936)驻守河内机关部,指示黄兴再入钦廉发动起义。黄受命后,向法商购得匣子枪数十支,又得香港革命党人冯自由等运到的一批枪械的接济,遂组织旅安南华侨200余人,组成"中华国民军南军",于光绪三十四年二月二十五日(3月27日)向钦州进发。二十七日下午义军抵小峰,遇清军一营依山堵击。黄兴佯败,引清军离山上阵地,然后分兵三路包抄,将清军一举击溃。次日再败清军一个营。二十九日义军在大桥击溃清军两个营。三月初二,义军占据马笃山,清军管带龙某率兵三营来攻。义军居高临下,顽强奋战;黄兴身当前敌,亲发枪将龙某击落马下,敌三营尽溃。义军自起义与清军计接仗四次,全部获胜,共缴获快枪400余杆,弹药无算,声势日盛,拟乘胜取道那楼、大录诸地,向桂边进攻。清军统领郭人漳等部3000余人尾追不舍。黄兴机智地命部队夜间用炸弹突袭敌营,使清军自相惊扰,不战而退。此后,黄兴率义军纵横于钦、廉、上思一带,坚持战斗40余日,数千清军疲于奔命,令钦廉道龚心湛(1871—?)"闻风而栗",频向粤督告急。在同盟会领导的各次起义中,这次起义是战绩最大、坚持时间最长的一次。孙中山赞扬黄兴说:"克强乃以二百余人出安南,横行于钦、廉、上思一带,转战数月,所向无前,敌人闻而生畏,克强之威名因此大著。"但是,由于革命军孤军深入,长期转战,没有根据地为依托;同时黄兴亦未接受防城起义时受骗的教训,仍把接济弹药的希望寄于郭人漳身上,而郭则再次违背原已答应"接济弹药相机反正之约",且疯狂地向义军进攻。结果终因补给十分缺乏,军心涣散,黄兴被迫下令队伍解散,一部分退回安南,大部分退入十万大山。

(王　才)

云南河口起义

又称戊申河口之役,清光绪三十四年(1908)同盟会在云南河口地区发动的反清武装起义。

镇南关起义失败后,法国殖民当局应清政府的请求将孙中山逐出安南(越南)。孙中山离开河内时,令黄明堂会同王和顺、关仁甫策划云南河口军事,策应黄兴在钦、廉、上思起义的行动。河口是滇南门户,当滇越铁路的交通孔道,上通蒙自、昆明,左通蛮耗、普洱,右通剥隘、广南以达桂边;其地处边陲,是铁路工人和游勇聚散之地。光绪三十四年三月,关仁甫先入云南,游说清防营及铁路巡警等响应起义。四月初一(4月30日)凌晨,黄明堂等率所部百余人从安南边界渡河袭攻河口,清军防营一部起义响应,经过两小时的战斗,占领河口。旋进取半山炮台,经激战,清军管带黄元祯率部返戈助战,至午后4时清河口副督办王镇邦被击毙,河口四炮台皆为义军所有,缴获快枪4000枝,子弹无算。黄明堂即以"中华国民军南军都督"名义,布告安民,严申军纪。义军秋毫无犯,居民悦服,远近归附者络绎不绝,数日内增加至千余人,声势大振。关仁甫于初三率众400人左趋蛮耗,拟上个旧,并合临安周文祥之兵,以攻蒙自;初四与清军管带柯树勋所部200余人相遇,清军不战而走,降者数十人,驻霸西清管带李开美也率众反正,义军遂占领新街。初五王和顺率起义军从河口出发沿铁

路进攻，先有清军李兰亭部一营归诚，继又招降黄茂兰部两哨，遂占领南溪。时开广镇总兵白金柱奉云贵总督锡良(1853—1917)命，带兵四营到八寨。王和顺闻报，乃分兵袭取古林菁，以牵制白军。白军来降者百余人。义军本可乘胜进克蒙自，因粮弹不济，只得暂驻原地停止进击。为数众多的清兵反正，是起义迅速胜利的原因之一，但随之而来的也给起义的发展带来了无法克服的困难，其中最重要的是不听号令。孙中山见河口前线缺乏得力主将指挥，又适黄兴从钦州返安南，遂电委黄兴为云南国民军总司令、节制前线各军。黄初六从海防乘晚车入河内，初八即乘早车上老街，赴前敌督师。他至河口后，见军事状况“疲玩不振”，力促黄明堂迅速增兵，沿滇越铁路进攻昆明。黄明堂以粮食缺乏，犹豫不决；黄兴不得已，亲率一军前往袭取蒙自，但是“将士多不听号令”，行军未及一里，“各兵群向天开枪一排，齐声呼疲倦不已。黄兴再三抚慰无效”。再行半里，兵士纷纷溃散。黄兴深感“本身非有基本军队不能指挥他军”，遂决计回河内，组织基本队伍，然后再赴前敌。不料十二日黄兴自河口返安南，刚到老街即被法国当局扣押，旋被驱逐出境，法当局且明令禁止起义人员及粮械从安南进入云南。此后，义军进入困境。清云贵总督锡良乘机调集军队向义军反扑，委道员方宏纶为全军总统，白金柱督办全省军务，他本人则亲赴临安居中策应。白金柱由蒙自分兵两路沿铁路线进攻，进至蛮耗的义军左队关仁甫部原清降兵，闻清军到来，立即哗变，关部损失惨重，只得退守河口。四月下旬，清黔军二营、川军二营、桂军三营络绎而至，向王和顺大营进攻；王与清军在泥巴黑附近相持20余日，义军渐处劣势。二十三日王和顺亲至河口与黄明堂相商，双方议定义军全数开赴普洱府，袭取思茅为根据地，然后徐图进取昆明，并确定两部开至巴沙会合，再相机进取。但黄明堂部先到巴沙，未等王和顺兵到即先自出发，在下田房与清军大队相遇，败后退回河口；王和顺闻讯也只好向河口退却。鉴于敌我力量悬殊，义军诸首领商议确定行动方针为“保全队伍，移师桂边，再作后图”，全数撤出河口。四月二十七日，清军占河口。黄明堂等率军600余人撤至安南境内，拟再转进桂边，结果被法殖民当局强行缴械，遣散到新加坡等地。历时一个月的河口起义最后失败。

（王　才）

广州新军起义

又称庚戌广州新军之役，清宣统二年正月初三(1910年2月12日)同盟会在广州依靠新军发动的反清武装起义。

同盟会在发动西南边境起义时，部分革命党人已投身新军队伍或各军事学堂，着手运动军队，但当时党人依靠的主力仍为会党。河口起义失败后，他们感到会党组织涣散，难于节制，转而以运动新军为重点。在广州最早拟利用防营发动起义的是朱执信。朱执信(1885—1920)，原名大符，广东番禺人。光绪三十年(1904)留学日本，次年加入同盟会，任评议部议员兼书记，多次为《民报》撰文，宣传孙中山的三民主义，反对改良主义，并发表《德意志社会革命家小传》，介绍马克思、恩格斯的革命活动和《共产党宣言》、《资本论》的某些内容。三十二年回广东，以教书为掩护，从事革命活动。之后，同盟会员葛谦等也深入广州防营中发展革命组织。三十四年十月(11月)，朱执信、赵声等集会，拟乘光绪帝和慈禧太后相继死去之机，依靠葛谦等所能掌握的力量发动起义，因计划泄漏而失败。这次事件前不久，倪映典来到广州。倪映典(1885—1910)，一名瑞，字炳章，安徽合肥人。光绪三十年入安徽武备练军学堂，毕业后复入炮兵学堂，三十二年任江南新军第九镇炮兵队官，参加同盟会，后在军中的革命活动被人告发，只得离军南行，因赵声的关系得任新军炮兵二营右队二排排长。以此为掩护，通过讲故事的方法，向下级军官和士兵宣传革命，发展组织。宣统元年五六月间，广州同盟会负责人赵声、朱执信、倪映典、张醁村、胡毅生、陈炯明、莫纪彭等开会决定：由倪映典联系新军各营，张醁村联系巡防各营，胡毅生联系农村会党，赵声总其成。八月以后，倪映典因受到清方注意，请假辞职，专门从事新军的发动工作。经过几个月的努力，同盟会在广州军队、特别是新军中的力量有了长足的进展。当时广东新军计有步兵第一、二两个标(团)、炮兵第一、二两个营、辎重兵一营、工程兵一营、学兵营一营，除第二标和学兵营驻北校场外，余均驻在广州东北郊的燕塘；另有巡防新军七营。到这年冬，广州新军已有不少人加入同盟会。为适应形势的发展，同盟会在香港建立了南方支部，作为指挥南方革命的总机关，以胡汉民为支部长，汪精卫(1883—1944)为书记，林直勉为会计，下设筹饷、军事、民事、宣传各组。不久，倪映典自广州至香港，报告运动新军情况。南方支部遂电邀黄兴、谭人凤、赵声来港，“共图大举”。宣统元年十二月十九日(1910年1月29日)黄兴抵达香港，主持起事大计。为保证起义的胜利，除倪映典加紧在新军中开展工作外，又命姚雨平

(1882—1974)、张醁村运动省会附近之巡防营，朱执信、胡毅生联络番禺、南海、顺德之民军。二十六日倪映典再到香港向南方支部报告工作，共同商定于农历元宵节前后发动起义。不料这时广州发生了意外事件：三十日中午，二标二营士兵胡英元原先在城隍庙前绣文斋定刻图章、名片，托同营士兵华宸忠代取，因为争论价格，发生口角，老城第一局警察上前干涉，以至动武互殴，后警察拘押了 8 名新军士兵。消息传到军营，兵士怒不可遏，百余人持械包围了警署，索回被押士兵。当晚，倪映典知事态严重，即赴港向南方支部报告，要求提前发难，经商议决定正月初六举义。但倪离广州后，新军处于群龙无首的自发状态，被押士兵回营后大讲警察如何蛮横无理，凌辱新军弟兄等情事。党人士兵闻言大愤，于宣统二年正月初一自动携械入城，逢警察即打，并捣毁几处警署。粤督袁树勋闻讯，立令教练处长吴晋、新军协统张培爵弹压。当日张率宪兵至二标，集合兵士训话，暗中派宪兵会同官长将二标各营的枪机拆卸、子弹收检，从后门运至城内；为防止事变，下令初二不放假，禁士兵外出。一标及炮营党人得知二标枪机、子弹被缴消息，十分愤怒。已知不放假的一标士兵于初二晨纷纷夺门而出，往协司令部、军械房、讲武堂等处取枪械及子弹，准备立即起义。初三从香港赶回的倪映典发现新军士兵已纷纷做好了战斗准备，群情愤激，难以抑制，于是当机立断，率炮兵第一营首先起义，接着步兵、辎重、工程各营士兵纷起响应，共集合 3000 人；公推倪映典为总司令。倪与义军对天宣誓："愿为革命战死"，随即分三路向广州城推进。主力抵达牛王庙时，消防营统领吴宗禹已率所部三营在此扼守，居高临下，发炮轰击，起义军伤亡颇重。这时，巡防营帮带童常标、管带李景濂等人到阵地前，传呼请见。倪与童是安徽同乡，而李又曾加入同盟会，倪以为他们是来约自己磋商反正问题的，遂释然不疑，独自一人入清营。当倪从清营回本阵地时，清军突然开枪，当即被击毙。倪牺牲后，义军失去了领袖，造成很大混乱，但余下的部队仍坚持战斗至深夜，后因"子弹罄竭，无法抵御"，终至溃散。次日清军四出搜剿，义兵被俘百余人。这次起义虽然失败了，但影响巨大。它证明清朝统治的工具新军，通过革命党人的工作，确可转化为革命的力量，从而大大增强了革命党人和广大群众对革命胜利的信心，加速了革命形势的发展。　（王　才）

长沙抢米风潮

清宣统二年(1910)湖南长沙人民的反帝反封建斗争。

义和团运动失败后，人民群众自发的抗捐抗税斗争、反清武装起义及反对外国教会侵略的斗争，此伏彼起，连绵不断。随着资产阶级领导的民主革命运动的蓬勃发展，以及在清王朝统治下整个社会经济趋于崩溃的情况下，宣统二年前后，群众自发的反抗斗争也普遍高涨起来，据不完全统计，光绪三十二年(1906)已多达 160 多次，宣统二年骤增到 290 多次。抗捐抗税和抢米骚动遍及全国各地，其中以长沙抢米斗争规模最大。湖南向有粮仓之称，但在地主阶级的残酷剥削下，即或丰年，农民亦不得温饱。宣统元年春夏间，湖北荆江和湖南澧、沅二水同时并涨，湖南滨湖产米各县普遍发生水灾，尤以华容、南州、安乡、澧州、常德灾情最为惨重；长沙、湘潭、宁乡等府县，因晴雨不时，半遭虫灾；宝庆一府和郴州、衡州，则有严重的旱灾。农民生活更不堪设想。如华容向来是产米丰盛和米业运贩总汇之地，可是自宣统元年秋冬以来，饥民充塞于道，以剥树皮、掘菜根、摸蚌拾蛤疗饥者，不下数万家。到二年春天，米价升值 80 余或 90 余及百余文不等，且皆有价无米，到处均闭市停贩。有的地区则饿殍相继。在这种惨况下，湖南地主劣绅大量囤积居奇，待价而沽；英、美和日本帝国主义者则乘机打劫，于元年夏秋间，通过长沙各洋行直接与巡抚岑春蓂并报经外务部批准，签订照约，包揽组织一批"坐庄"的奸商，深入产米地区直接搜购，而各洋行又组织一批外地奸商潜入湖南专门从事走私，大量盗运粮米运往广东出口，或转运各大城市抛售高价。在这种情况下，湖南人民除了反抗，别无出路，于是宣统二年三月首先在长沙爆发了前所未有的米荒风潮。当时长沙米价每升 80 文，四乡同时飞涨。长沙南门外挑水工黄贵荪一家四口因卖水一天所赚买不到一升米而于三月初二(4 月 11 日)投水自尽，市民闻此凶耗，无不义愤填膺。次日上午，因巡抚部院出示压价，谷米一度下降到 76 文一升，但不久又重新上涨。当天南门外一老妇先持 76 文前往碓坊买米，其中有 2 文小钱米店不收，待回家凑足 76 文再往，米价又上涨到 78 文。此事激起群众更大的愤怒。在木工刘永福率领下，愤将碓坊捣毁，冲向鳌山庙巡警分局，要求官府平粜救命。前来处置的善化县令郭中广在民众压力下，被迫答应传令各米店次日平粜，然而次日不但平粜渺无音讯，反而全城米店

都关门停业。官府且无理拘捕了刘永福。泥木工匠、城市贫民、饥民及四乡农民等数千人涌向鳌山庙巡警分局，要求官府履行平粜诺言，立即释放刘永福。巡警道赖承裕前来镇压，被愤怒的群众绑在庙树上，打得头破血流。接着数万民众拥至巡抚衙门前，一举捣毁巡抚部院的辕门、照壁、石狮，部分群众直向大堂冲去。巡抚岑春蓂十分惊恐，传令巡防营开枪，当场打死14人，打伤40余人。当晚，怒不可遏的群众将城厢内外各碓坊堆栈之米抢劫一空，又打毁警兵站岗之木棚，分派人至各街道鸣锣，勒令各铺户每家悬灯门首，以便往来，次日不准互市。初五，长沙全市罢市，齐集巡抚衙门外的群众不下万人。岑春蓂再次下令开枪，打死打伤20余人。群众遂放火烧毁巡抚衙门的二门、号房、赍奏厅、文武巡厅、大堂、二堂、一实堂等处。岑春蓂惊慌失措，急电北京军机处自劾，请旨以布政使庄赓良署理湖南巡抚，并立即将巡抚关防交给庄，慌忙逃命。庄与湖南劣绅企图用欺骗手法平息事态。但是群众很快识破了他们的卑劣伎俩，当晚即焚烧了英、美、意、日等帝国主义在长沙的一些洋行、货栈、银号及教堂等。三月初六代理巡抚庄赓良派长沙知府汪凤瀛、候补道胡得立率巡防队布满城厢内外，调新军四十一标一营前来镇压与搜捕，明令对反抗群众要"就地立杀无赦"，并准许地主绅士任意格杀。几天之内，参与暴动的群众被捕杀者约百余人。三月初九以后，这场空前规模的群众反抗斗争被血腥镇压下去了。但是这场斗争与同期遍布全国各地的群众斗争一起，汇合成一股强大的洪流，为辛亥革命一举冲垮清王朝，创造了雄厚的基础。

（王　才）

文学社成立

文学社，清宣统三年正月初一(1911年1月30日)湖北革命党人在武昌成立的资产阶级革命团体。

为了推动湖北地区革命运动的发展，光绪二十九年(1903)，湖北地区倾向革命的知识分子经常在武昌花园山聚会，酝酿建立革命组织。三十年六月初一(7月13日)革命组织科学补习所在武昌正式建立，在知识分子和新军中开展革命的宣传和组织工作。不久因华兴会长沙起义失败，科学补习所受到株连，无形瓦解。接着党人又利用美国基督教中华圣公会在武昌附设的一个阅报室日知会，进行革命活动；三十二年建立正式组织，亦称日知会，尔后日知会实际成了同盟会湖北分会。日知会遭到破坏后，革命党人以新军为基础，又相继建立了军队同盟会、群治学社、振武学社。宣统二年八月十五日(9月18日)，振武学社在武昌黄土坡召开成立大会，推杨王鹏(1887—1916)为社长，李六如为文书兼庶务，制定了更严密的制度：各标、营、队分别设立代表；干部会议非标代表不得参与；各营接受代表的命令行动，不得互相了解彼此的情况。振武学社成立后，工作进展顺利，很快发展至千人。其情况为第二十一混成协协统黎元洪侦知，但他不愿扩大事态，仅将杨王鹏、李六如等人开除出营了事。后代为主持社务的蒋翊武决定静观待变。蒋翊武(1885—1913)，字伯夔，湖南澧州(澧县)人。光绪二十九年入常德师范，次年因参与华兴会革命活动被开除。三十一年抵沪，肄业中国公学，与杨卓林等刊行《竞业旬报》，宣传革命。宣统元年，投湖北新军，先后加入群治学社和振武学社。当年底，在各标营党人催促下，蒋翊武约集詹大悲(1887—1927)、刘复基(1884—1911)等人在阅马场集贤酒馆集会，与会"同志多主张复振武之旧观。詹大悲以'振武社已为官厅侦知，而振武二字，尤易注目，不如另改名称，重新组织为愈'"，大家一致同意这一意见，为避清廷耳目，遂将团体更名为文学社，推詹大悲起草简章。宣统三年正月初一，蒋翊武等及各标代表，在黄鹤楼的风度楼举行会议，宣告文学社成立，推蒋翊武为社长，詹大悲为文书部长，刘复基为评议部长。社章公开标明"以联合同志研究文学"为宗旨，实际则为"推翻清朝专制，反对康、梁的保皇政策，拥护孙文的革命主张"。会后，文学社迅速扩大组织，仅一个多月，除马八标外，在湖北新军各单位都发展了社员。二月十五日文学社举行第一次代表会议，会议增选30标的王宪章(1886或1888—1914)任副社长；派党人章裕昆到马八标发展社员；将詹大悲主办的《大江报》免费送各营队一份，加强宣传；除继续深入新军外，还加强与商学两界的联系。文学社继承了群治、振武学社始终在新军中开展革命工作的传统及各项秘密工作规则，并注意加以改进。他们埋头苦干，深入新军士兵，进行细致的发动工作，意欲将新军中除满人与官长外，全体运动成熟，一举"拔赵易汉"，这便是所谓"抬营主义"。故文学社成立后，组织发展很快。黄花岗起义失败后，清吏加强了对新军的管制。为此，文学社决定由刘复基出营寄居阅马场文昌阁，进行联络。四月十二日在武昌小朝街85号设立文学社机关部；不久又设立阳夏支部，负责驻汉口、汉阳及河南信阳的四十二标社务。到这年夏季，新军中的文学社员已达3000之众，成为湖北新军中一支巨大的革命力量。当时，除文学

社在新军中发展组织外，共进会也在新军各标中发展会员，并且发展得很快；有些会员甚至同时参加了两个组织，因此互相之间必然产生一些摩擦和冲突。且文学社的领导成员绝大多数是下层知识分子出身的新军士兵，而共进会的领导成员大都是归国的留日学生，这也使双方不免产生了隔阂和戒心。然而当时革命形势的发展，迫切需要两个革命团体联合起来，共同对敌。在同盟会中部总会的帮助下，于八月初三文学社与共进会联合成立革命领导机关。八月十九日发动武昌起义，并取得胜利，从而推动了革命在全国的发展。此后，文学社在湖北反对黎元洪等旧势力篡权斗争中，起了巨大作用，其中不少成员遭到黎的屠杀。1912 年 4 月，与同盟会鄂省支部合并。

（王　才）

保路运动

清宣统三年（1911）湖南、湖北、广东、四川人民反对清政府向帝国主义出卖路权的爱国运动。

在收回利权运动中，粤汉、川汉铁路已收回商办，铁路所经省份绅商以至人民群众已经筹集相当数量的股金，有的路段且正在修筑。但帝国主义不甘心失去对中国铁路的控制权，千方百计要夺回已归商办的铁路，其主要方式就是迫使清政府借债筑路。而清王朝为解决严重的财政危机，也只有以路作抵举借外债。光绪三十四年，英、德分别要挟张之洞签订粤汉、川汉铁路的借款合同。次年英国汇丰银行、德国德华银行、法国东方汇理银行组成三国银行团，与张之洞签订湖广铁路借款草合同。美国不甘落后，一方面与英、德交涉，一方面对清政府施加压力，要求参与借款；英、德在相互对抗中，都想争取美国的支持，于是经过多次谈判，三国银行团变成四国银行团，并于宣统二年四月十五日（5 月 23 日）与清政府订立协定，规定清政府向四国银行团借款 600 万英镑，修筑粤汉、川汉铁路。三年三月清邮传部尚书盛宣怀与四国公使议定了借款合同细节，俟各该国政府批准后正式签字。但要批准这个出卖路权的合同，清廷必先将商办铁路收归官办。于是清政府在四月十一日（5 月 9 日）即皇族内阁成立次日，正式下达铁道干路国有的“上谕”，规定“干路均归国有，定为政策”，“所有宣统三年以前各省分设公司集股商办之干路，延误已久，应即由国家收回，赶紧兴筑”。二十四日，盛宣怀与四国银行团正式签订《湖北湖南两省境内粤汉铁路、湖北省境内川汉铁路借款合同》，首先劫夺了粤汉、川汉两大干线。清政府所谓“官办”即是官卖，“国有”实为帝国主义所有的真面目暴露无遗。首先起来反抗的是湖南人民。“铁路国有”的消息传到长沙，湖南商办铁路公司即致电军机处、外务部、度支部、邮传部，表示湘路“力能完全自办，毋庸另借外债”。长沙各界连日集会，一致反对“铁路国有”政策，要求湘抚杨文鼎代奏，望清政府收回成命，否则将“全力抵抗”。湖北咨议局紧接湖南之后，召开了有数千人参加的大会，与会者纷纷演说路权丢失之利害关系，“大呼救国”。革命党人詹大悲主编的《大江报》发表以《大乱者，救中国之妙药也》为题的“时评”，揭露清政府的卖国罪行，鼓吹革命。湖北境内数万名川汉铁路工人也群起响应。在广东，粤汉铁路公司于五月初十召开有千余人参加的股东大会，议决“万众一心力争商办”，在公司内设立争路机关部，致电邮传部要求“撤销国有令，以昭大信”。市民们拒用官发纸币，挤兑现银，以此抗议广东地方当局的阻挠破坏。海外华商会馆致函粤路公司，声明“粤路国有，誓死不从”，“政府虽欲卖国，我粤人断不能卖国”。争路斗争最为激烈、规模最大的是四川。起初立宪派绅商还试图通过护理四川总督王人文奏请清廷收回成命，但清廷不仅置若罔闻，反而于五月初五由邮传部尚书盛宣怀和督办粤汉、川汉铁路大臣端方联衔致电王人文，声称川汉铁路公司已用之款和现存未用之款，一律换发国家铁路股票，概不退回现款，若川省表示异议，则“必复借外债，必以川省财产作抵”。这不仅是剥夺商办铁路的权利，甚至连商办公司的股金也要加以吞并，因而深深地激怒了四川广大人民。五月二十一日，川汉铁路股东代表 1000 余人集会成都，决定组织四川保路同志会，推举立宪派蒲殿俊、罗纶为正副会长，确立以“破约保路”为根本宗旨，派员分赴各州县宣传鼓动，发起成立保路同志分会。四川保路运动蓬勃发展起来。当时全川 142 个州县的工人、农民、学生和市民纷纷投身于运动。不到半月，保路同志会会员已逾 10 万人，及至“夏秋间，保路同志会遍布全川”。立宪派力图将斗争局限在集会请愿的“文明争路”范围内，规定了诸如“防止暴动”、“不可自由行动”、“不应怨枉朝廷”、“不必集矢外人”等种种清规戒律。但是在同盟会影响下，人民群众很快冲破了这些禁令，不断将运动推向深入。闰六月，对保路运动持同情态度的王人文被清廷革职，素有刽子手之称的赵尔丰（1845—1911）接任四川总督。他一上任即强行收回川汉路宜（昌）万（县）段路权。消息传开，群众异常激愤。七月初一，保路同志会在成都举行大会，通过全城罢市罢课的决定。传

单一出，成都万众一心，百业停顿；接着，四川南自邛雅，西迄绵州，北近顺庆，东抵荣隆，千里内外，府县乡镇，一律闭户。风潮波及全川，捣毁经征局、自治局、巡警分署、外国教堂等事件接连发生。初九，四川人民宣布不纳正粮、不纳捐税、不负担外债。在铁路公司股东大会上，有人发出《川人自保商榷书》，提出川人"共同自保"、"共挽时局之危"的号召。在清廷一再严责下，赵尔丰以《川人自保商榷书》中有"隐含独立"的思想，于七月十五日诱捕蒲殿俊、罗纶等人。两天后又查封了保路同志会、铁路公司、铁路学堂和鼓吹保路的报刊。赵尔丰的蛮横手段，激起了成都人民的强烈反对。就在蒲、罗等人被捕的同一天，数万群众有的头顶光绪牌位，有的手握香炷，潮水般涌向总督衙署，要求放人。赵尔丰竟然命令卫队开枪扫射，当场击杀30余人，伤者不计其数，制造了著名的"成都惨案"。为了向全川人民揭露清朝的残暴行径，号召人民起义，同盟会员龙鸣剑（1878—1911）等裁制数百木片，上书："赵尔丰先捕蒲、罗，后剿四川，各地同志，速起自保自救。"然后在木板上涂以桐油，制成"水电报"置入锦江。水电报"乘秋潮顺流，不一日几传遍川西南"。各地群众闻警，纷纷揭竿而起。本来保路运动兴起后，革命党人即积极投入运动，并乘机加速革命在四川的发展。六月初十同盟会员邀哥老会各路首领在资州罗泉井召开秘密会议，决定组织武装起义，改同志会为同志军。"水电报"传警之后，各地同志军相继响应，只有几天逼近成都周围的起义军已达一二十万之众。赵尔丰惊慌失措，连电清廷求救；清廷急调鄂、湘、陕、黔、滇、粤六省军队援川，命端方率鄂军迅速兼程西上，加派前两广总督岑春煊会同赵尔丰"剿抚兼施"。但是已成燎原之势的革命烈火，再也无法扑灭了。同志军围攻成都10余日，因装备不足，缺乏统一的组织，最后决定撤围，分兵攻略各州县。八月初五，哥老会著名首领侯宝斋率南路同志军自成都回师，与反正倒戈的新军周鸿勋部在新津会合，在这里坚持战斗半个多月，抗击和牵制了四川清军主力，推动了全川革命形势的发展。哥老会首领、同盟会员秦载赓统率的东路军从成都转向华阳中和场一带，有众20余万，与新津遥相呼应。除这两支主力同志军外，整个四川几乎处处有同志军起义，汇成了推翻清廷在四川反动统治的巨流，其中同盟会员吴玉章在荣县宣布独立，成为全川独立的先导。吴玉章（1878—1966），原名永珊，字树人，四川荣县人。光绪二十九年赴日留学，先后参加拒俄义勇队、同盟会和共进会，创办《四川》杂志，鼓吹反清。宣统三年奉命回川开展革命工作。当荣县同志军向成都进军时，吴玉章在荣县发动群众，训练民团，筹集粮饷，为夺取荣县政权打下了基础。当同盟会员、四川东路民军副统领王天杰（1888或1890—1913）从成都转战返回荣县后，吴玉章不失时机地提出了推翻旧政权的建议。八月初四，王天杰召集各界开会，吴玉章发表演说，宣告荣县独立，是为革命派在全国建立的第一个县级政权。此后，四川各州县纷纷效法，从而促进了全省的光复。保路运动揭露了清政府媚外卖国的罪行，有力地推动了革命运动的发展，最终导致了武装推翻清王朝的革命运动。而鄂军入川，则削弱了湖北的兵力，有利于革命党人在武昌举义，促使了辛亥革命高潮的到来。（王　才）

黄花岗之役

亦称辛亥广州之役，清宣统三年三月二十九日（1911年4月27日）同盟会在广州发动的反清武装起义。

广州新军起义失败后，同盟会的许多干部产生了悲观情绪。当时在美国活动的孙中山洞察到国内各种社会矛盾正在激化，革命时机日趋成熟，积极推动同盟会再举行一次大规模的起义。宣统二年十月十二日（11月13日），孙中山在马来亚的槟榔屿，召集黄兴、赵声、胡汉民等同盟会的重要骨干以及国内外的代表秘密会议，讨论继续发动起义的有关问题。统一思想后，决定：筹集巨款，以新军为骨干，联络防营、警察与会党，聚集同盟会的主要精干力量，在广州发动起义，然后北伐推翻清王朝。十二月十八日，黄兴抵达香港，主持起义的筹备工作；月底成立了作为起义领导机关的统筹部，黄兴、赵声分任正副部长，下设八课：一、调度课，负责运动新旧军队，由姚雨平任课长；二、交通课，负责联络江、浙、皖、鄂、湘、桂、闽、滇各路，赵声兼课长；三、储备课，负责购运军械，胡毅生（1883—1957）为课长；四、编制课，负责草定规则，陈炯明为课长；五、秘书课，负责文件，胡汉民为课长；六、出纳课，负责出纳财政，李海云为课长；七、调查课，负责侦察敌情，罗炳扬为课长；八、总务课，负责其他杂务，洪承点为课长。各课均加紧了起义的准备工作。一是筹饷购械。槟城会议后，以孙中山为首的革命党人即分赴海外各地，向广大爱国华侨演说革命形势，募集起义经费，在侨胞的慷慨资助下，共收"义捐"157,213（银）元，超过了孙中山原计划募款13万元的设想，保证了起义所需的经费。同时党人又分别到日本及南洋各国购置枪枝弹药，

潜运到广州城内各秘密机关。二是组织起义力量。除分派革命党人去长江流域各省联络党人响应外，重点派专人发动广州新军、防营、巡警以及联络番禺、南海、三水、顺德、惠州等地会党参加。考虑到以往历次起义中临时联络的军队、会党常不听指挥的教训，这次精选一批青年党人及志士组成一支“选锋”队，充当敢死队，任务是首先在城内发难，打乱清政府在广州的指挥机构，夺取军械库，打开城门，引入驻在城外的新军，一举占领广州。这支选锋队初定为500人，后增定为800人。国内外志士得到要组织“选锋”的消息，抱定以身殉事业的决心，争相踊跃赴义。党人方声洞、林觉民(1887—1911)等不少人写下了遗书，向亲人诀别。三是派人潜入广州，先后设立大小机关38处，作为党人活动及储存枪械的据点。各项起义准备工作大体就绪后，黄兴于宣统三年三月初十(4月8日)主持召开了统筹部的发难会议，决定10路进攻计划；因赵声曾任新军标统，有丰富的军事学识和指挥经验，故确定赵声为总司令，黄兴为副；定于十五日发难。不料就在统筹部开会这天，广州城内发生了同盟会员温生才(1870—1911)枪杀清署理广州将军孚琦(1869—1911)的事件；且吴镜由香港运炸弹至广州又为清兵查出被捕，清广东当局因此加强了戒备；加之美洲华侨的捐款及由日本购运的部分枪弹也未送到。鉴于上述情况，统筹部将发难日期推至二十八日。因赵声在广州任过标统，相识者较多，不便过早露面，黄兴于二十五日亲至广州主持起义事宜，在两广总督署的小东营五号建立起义指挥部。考虑到购置的枪械尚未运到，黄兴将起义日期改为二十九日。此时清广东当局对起义计划已有所闻，粤督张鸣岐(1875—1945)、水师提督李准加强了防范和戒备，有些储存手枪、炸药等的重要据点相继遭到清方军警的袭击和破坏。这样，党人对是否按期举义出现了分歧：陈炯明等主张缓期再举；林文等主张立即起义。在众说纷纭面前，黄兴一度举棋不定。二十八日晨，黄兴决定改期再举，“令各部即速解散，以免搜捕之祸”，于是电香港总部“省城疫发，儿女勿回家”，暗示速即停止将在香港集合待命的大批党人继续派来广州。可是又考虑到这次起义经过党人精心准备，动员了党内的众多骨干力量，筹集了较为雄厚的财力、物力；而当时改期实际等于取消，会造成消极的思想影响，因此经一天思考，黄兴和部分党人下决心拚个人的一死来酬答国人，决定如期发动。当晚黄兴电告总部要赵声速令选锋队员前来参加次日的起义。接着黄兴召集会议讨论发难事项，发难时间定在次日下午5时30分。鉴于人员已减少，将原定10路进攻的计划改为4路：黄兴率队攻打两广总督署；姚雨平率队攻小北门，占飞来庙，迎新军与防营入城；陈炯明率队攻巡警教练所；胡毅生以20余人守大南门。但香港方面于二十八日晚上10时接黄兴第二电，因300多名选锋队员于次日无法到达广州，急电黄兴再展期一日；黄接电后决定不再延期。而第二天起义时，姚雨平、陈炯明、胡毅生三路又均未发动，最后只剩下黄兴一路。三月二十九日下午5时30分，黄兴率选锋队员120余人，臂缠白布，手持枪械炸弹，吹响海螺，直扑总督衙门。经过激战，起义军击毙了卫队管带，打退了负隅顽抗的督署卫队，一举冲进署内。总督张鸣岐早由后壁逃至水师行台，与水师提督李准一起部署兵力，围攻起义军。黄兴下令焚烧总督衙门，随后转攻督练公所，途中遇李准的亲兵大队，双方展开激战，旋突围而出。这时黄兴将所部分为三路：徐维杨率花县党人攻打小北门，接应新军；川、闽及南洋党人攻打督练公所；黄兴一路出大南门，接防营同志入城。攻小北门的一路在源盛米店、司后街等处与清军交战失利，转攻飞来庙又未成功，大部分壮烈牺牲。攻督练公所一路与防营激战，喻培伦(1886—1911)胸前挂一筐炸弹，所向披靡，弹尽被捕，其余选锋队员也或死或伤。黄兴一路行至双门底，与同志温带雄部相遇，因温部未带白巾，致误会交火，温带雄及方声洞(1886—1911)等牺牲。在战斗中，黄兴右手中食二指被打伤，仍英勇奋战，率众且战且退，直到队伍被打散，剩下他一人时，才躲入一小店，化装后出城到女同志徐宗汉(1877—1944)所在机关，后返抵香港。起义军经过一夜激战，终因敌众我寡而失败。战斗中英勇牺牲或被捕后慷慨就义的有80余人。事后，广州革命志士潘达微(1880—1929)多方设法，收敛牺牲的烈士遗骸72具，合葬于广州城郊红花岗，并改其名为黄花岗。因此，后来称这次起义为黄花岗之役。这次起义虽然失败了，但它沉重地打击了清王朝的腐朽统治；广大党人在起义中表现的牺牲精神，极大地鼓舞了各地的革命志士，促进了辛亥革命高潮的到来。

（王　才）

中国同盟会中部总会成立

中国同盟会中部总会，简称中部同盟会，清宣统三年(1911)长江中下游地区同盟会成员为推动长江流域的民主革命运动而建立的革命组织。

光绪三十三年(1907)以后，孙中山、黄兴集中全

力在华南地区组织武装起义，东京同盟会总部日趋涣散，内部分歧未能得到及时正确处理，以至造成分裂，部分会员另组共进会及光复会总会。其时，长江中下游各省革命形势却日臻成熟，部分会员感到应加强长江中下游地区革命的组织领导。宣统二年春，广州新军起义失败后不久，宋教仁、居正和谭人凤（1860—1920）等于日本聚会研讨革命前途，宋教仁提出要成立一个专主长江流域的革命机关。谭人凤等赞同。五月，谭人凤召集在日本的中国11省区的同盟会分会长会议，讨论建立组织问题。会上，宋教仁提出革命进行方略有上、中、下三策：在边地进行为下策，在长江流域进行为中策，在首都和北方进行为上策。认为革命地点宜居中，不宜偏僻；革命时期应缩短，不可延长；战争地域应狭小，不可扩大。与会者对三策作了仔细的利弊权衡后得出结论："上策运动稍难，下策已行之而败（指华南边境地区起义相继失败），且足引起干涉酿分裂之祸，故决采用中策。"于是决议组织中部同盟会作为策动机关。至此，组织同盟会中部总会基本确定下来，因经费无着，暂告搁浅。宣统三年黄花岗起义失败再次证明不能仅局限在南方地区发动起义，原酝酿在中部发动起义的同盟会员"益坚信长江革命之重要"，遂决定加紧建立组织的准备。闰六月初六（7月31日），同盟会中部总会在上海四川路湖北小学召开正式成立大会。会议通过了章程和宣言，选出谭人凤、宋教仁、陈其美、潘祖彝、杨谱笙五人为总务会干事，分掌党务、文事、庶务、财务、会计各部事务。初八，总务会干事又公推谭人凤为总务会议长。其《章程》表现出对同盟会的改组倾向，称"本会由中国同盟会会员之表同意者组织而成"，"凡中国同盟会会员依本法律入会者，皆为本会会员"。以"推覆清政府，建设民主的立宪政体为主义"。《宣言》宣布同盟会中部总会"奉东京本会为主体，认南部分会为友邦"，但在名义上又自冠"总会"，宣称总理一职暂不设立，虚位以待贤豪。《章程》规定总机关设于上海，各省设分部，并制定有《分会章程》，对各分会机构的组织、经济开支与本部的关系等，都作了规定。对机关内部的组织原则规定实行"合议"制，防止专制；加强团结，破除"省界"；"培元气，养实力"，"不轻易发难"等。会员共40余人（一说20余人）。中部总会成立后，主要做了两项工作：一、其成员分别回本省发动革命，在江苏、安徽、湖北、湖南、四川、陕西设立分会，推动各该地区革命形势的发展。二、加强了与武汉地区革命力量的联络与指导，促成了武汉革命势力的联合，从而保证了武昌首义的胜利。武昌起义后，中部总会又为光复上海、浙江、南京等地做出了积极贡献。上海光复后，同盟会本部自东京迁来上海，该会遂告结束。同盟会中部总会的成立，组织上具有从同盟会分裂出来独树一帜的趋向，但它适应了革命形势的要求，将革命的重心转移到长江流域一带，实际上担负起指导长江中下游革命斗争的重任，对辛亥革命的胜利做出了重大贡献。

（王　才）

民　国

辛亥革命

以孙中山为代表的资产阶级革命派发动和领导的民主革命，清宣统三年八月十九日(辛亥年，1911年10月10日)武昌起义为其爆发阶段的起点，故名。

鸦片战争以后，中国逐渐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到19世纪末期，在清朝封建专制政权的腐朽统治下，民族危机空前严重，社会经济凋敝，人民生活愈益痛苦。在民族资本主义经济产生的基础上，继太平天国之后，民族资产阶级为挽救中国的危亡，登上了历史舞台。中国民主革命的先行者孙中山是民族资产阶级中下层的代表。孙中山(1866—1925)，名文，字德明，号日新，改号逸仙，光绪二十三年(1897)在日本化名中山樵从事革命，后遂以中山名世。广东香山(中山市)翠亨村人。因家庭穷困，6岁参加农业劳动，10岁入塾读书，受太平天国起义影响，以洪秀全第二自许。光绪四年至十八年，先后在檀香山、广州、香港读书，深入接触了西方资本主义文化，痛感帝国主义的欺凌和中国社会的落后和腐败，萌发了爱国救亡思想。光绪九年至十一年的中法战争，对他刺激很大，思想发生重大变化，认为："吾国人民之艰苦，皆不良之政治为之。若欲救国救人，非锄去此恶劣政府不可。"光绪十八年，孙中山从香港西医书院毕业后，以在澳门和广州行医为业，在此期间，广泛结交爱国志士，酝酿建立革命团体。但这时他尚未摆脱改良思想的影响，对清朝封疆大吏仍抱有幻想。二十年，孙中山前往天津投书李鸿章，提出要在中国发展资本主义的经济和文化教育的纲领："人能尽其才，地能尽其利，物能尽其用，货能畅其流。"未获任何结果。孙中山乃到檀香山正式成立中国资产阶级的第一个革命小团体——兴中会。《兴中会章程》规定了"振兴中华，维持国体"的宗旨；在入会的秘密誓词中明确提出了"驱除鞑虏，恢复中国，创立合众政府"的革命纲领。这是孙中山第一次向中国人民提出推翻清朝帝制政府，建立资产阶级共和国的主张。翌年孙中山在香港成立兴中会总机关，在广州发动第一次反清武装起义，正式开始了资产阶级领导的民主革命。当时革命派在国内的影响极微，在极端困难的情况下，孙中山在海外华侨中间开展宣传和组织活动，认真研读了西方资产阶级的政治经济学说和自然科学书刊，实地考察了资本主义英国的社会状况，为比较完整的民主革命纲领的形成积累了思想资料。光绪二十六年，义和团运动爆发，孙中山乘机发动了惠州起义；由于日本政府的阻挠，原定从台湾接济起义军的计划无法实现，使坚持血战半月之久的起义军因弹尽援绝，被迫解散。义和团运动失败后，帝国主义完全控制了清政府，清王朝彻底成了"洋人的朝廷"，这时帝国主义与中华民族的矛盾、封建主义和人民大众的矛盾集中的体现就是中国人民和清政府的矛盾。清政府为了挽救垂危的统治，推行了以练兵、筹饷为中心的"新政"，进一步激化了统治阶级内部及清王朝和人民大众之间的矛盾，促进了民族资本主义的发展和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群的涌现。在群众反抗斗争的基础上，资产阶级及其知识分子发动和领导的"拒法运动"、"拒俄运动"、"反美爱国运动"相继展开。在清政府的镇压下，知识分子深感"爱国无路"，纷纷倾向革命。此时革命

志士广泛开展了宣传活动，据统计，光绪二十七年至三十一年，他们创办了数十种报刊，编撰、翻译了百余种革命书籍。章炳麟的《驳康有为论革命书》、邹容的《革命军》、陈天华的《猛回头》、《警世钟》，对知识分子及广大群众的革命化起了重大作用。这些书报、著作从不同方面宣传了反帝爱国、反清革命以及资产阶级的民主主义思想，初步批驳了改良派反对革命、宣扬保皇的谬论。为了阻扼革命思想的传播，光绪二十九年闰五月初，清政府勾结上海租界工部局，逮捕章太炎、邹容，查封了宣传革命的《苏报》，制造了震惊中外的"《苏报》案"。但是，与清政府的愿望相反，这一事件不仅没有达到压制革命宣传的目的，反而扩大了革命的影响，各地革命团体相继建立起来。光绪三十年，除孙中山领导的兴中会外，湖南的华兴会、湖北的科学补习所、江浙的光复会、安徽的岳王会等革命组织纷纷成立，积极投入了反清革命斗争。革命形势的发展，迫切需要一个全国性的统一的革命政党来领导。光绪三十一年，孙中山从欧洲重返日本。七月二十日各革命组织负责人及在日本的中国革命志士，于东京正式建立中国同盟会，公推孙中山为总理，确定以"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创立民国，平均地权"为纲领。孙中山在《民报》发刊词中，把同盟会的纲领阐发为"民族"、"民权"、"民生"三大主义，称为"三民主义"。这个纲领没有明确提出反对帝国主义和地主阶级的口号，表现了民族资产阶级的软弱性和妥协性。但它坚决主张通过暴力革命的手段，推翻腐朽卖国的清王朝，建立资产阶级共和国，充分反映了民族资产阶级在政治上和经济上的要求，反映了当时中国人民要求民族独立和民主权利的迫切愿望，因而它也就成了资产阶级革命派的战斗旗帜，成了动员广大群众起来推翻清王朝、建立共和国的有力思想武器。同盟会的成立标志着民主革命运动进入高潮。同盟会成立后，以孙中山为首的革命派在政治思想战线和武装起义两个方面展开了强大的革命攻势。在政治思想上，从光绪三十一年至三十三年，他们主要以《民报》为阵地，同梁启超主办的改良派的喉舌《新民丛报》展开了针锋相对的大论战，革命派有力地批驳了改良派反对革命、反对共和、反对改变封建土地制度的谬论，夺取了思想阵地的领导权，为辛亥革命推翻清朝做了舆论准备。与此同时，革命派依靠会党和新军发动了一系列武装起义，如光绪三十二年的萍（乡）浏（阳）醴（陵）起义；三十三年和三十四年在广东、广西、云南的潮州黄冈起义、惠州七女湖起义、防城起义、镇南关起义、钦（州）廉（州）上思起义、云南河口起义，光复会员在浙江、安徽发动的起义；宣统二年（1910）和三年在广州的新军起义和黄花岗之役。这些起义由于没有深入发动群众，都相继失败了，但它震动了国内外，有力地冲击了清朝的反动统治，扩大了革命影响；尤其是革命党人在历次起义中表现出来的赴汤蹈火、临危不惧、视死如归的献身精神，进一步激发了全国人民的斗志，鼓舞了更多的志士仁人奋起参加推翻清朝的革命斗争。在此期间，资产阶级领导的收回利权运动日益高涨；全国各地群众抗捐、抗税、抢米风潮此伏彼起，连绵不断。清王朝已经不能照旧统治下去了。为了抵制革命、拉拢民族资产阶级上层、加强中央集权，达到"皇位永固"的目的，清廷于光绪三十二年发布"预备立宪"上谕，七月（9月）首先下诏进行官制改革，九月公布中央官制，在新任命的外务部总理大臣、会办大臣及各部尚书中，满族占7名，汉族5名，蒙族1名。不久，清廷又将袁世凯掌握的北洋四镇军队改归陆军部直接统辖。次年，清廷又以明升暗降的办法，把当时权势最大的汉族官僚袁世凯和张之洞调为军机大臣。三十四年八月清廷颁布《钦定宪法大纲》，实际把皇帝至高无上的权力用宪法的形式固定下来。十月光绪帝和西太后相继死去，3岁的溥仪继承帝位，改元宣统；其父载沣以摄政王监国。载沣继续玩弄"预备立宪"的骗局；同时罢袁世凯职，令其回籍"养疴"，并宣布自任代理大元帅，命其弟载洵为海军大臣、载涛为军咨大臣，兄弟三人总揽军政大权。宣统三年四月（5月），清廷颁布新内阁官制，在内阁总理、协理、各部尚书13人中，满族占9人，汉族4人，而9名满人中皇族竟占7人，成为名副其实的"皇族内阁"。这场"假立宪之名，以行专制之实"的骗局，至此就完全暴露了。"预备立宪"的结果，"皇位"不仅未能"永固"，却陷入了众叛亲离、四面楚歌的窘境。清政府只有进一步依靠帝国主义。为此，在"皇族内阁"成立的次日，宣布了"铁路国有"政策，将已归商办的粤汉、川汉铁路再次出卖给帝国主义。消息传出，广东、湖南、湖北、四川四省人民异常愤慨，迅速掀起有广大群众参加的保路运动。其中四川的保路风潮发展成为武装反清，有力地冲击了清廷在四川的统治，直接推动了武昌起义的爆发。

武汉地处长江中游，向称"九省通衢"，是帝国主义侵略较早和压迫最深的地区之一，又是"洋务新政"的一个重要基地，也是民族资本主义经济发展较快的城市。在革命工作中，湖北革命党人较之别的省区做了更为长期的、艰苦踏实的准备。从光绪二十九

年起，大批革命的小知识分子纷纷投笔从戎，以普通士兵的身分，在新军中宣传革命、发展组织。宣统三年，湖北1.6万名新军，参加文学社和共进会这两个革命组织的近5000人。保路风潮兴起后，文学社和共进会的领导人认为武装起义的时机已经成熟，经多次磋商，双方联合成立了领导起义的临时总指挥部。八月十九日晚，武昌新军第八镇工程第八营的革命党人首先行动，接着二十九标、三十标、测绘学堂、南湖炮队、塘角辎重队等也陆续起义；各起义部队在统一指挥下，经一夜激战，占领了武昌。二十日、二十一日，起义军又先后占领了汉阳和汉口。武昌光复后，革命党人即邀请立宪派和地方绅商代表，齐集原省咨议局，商讨建立湖北军政府事宜。当时革命党人错误地认为自己资望太浅，不足以号召群众，于是与立宪派、旧官僚共同推举原新军二十一混成协协统黎元洪为军政府都督。这一举措客观上扩大了革命影响，但也为旧势力窃取政权提供了有利条件。武昌起义的枪声震动了全国，人民群众到处掀起自发的反封建压迫的斗争。在群众广泛斗争的基础上，各地同盟会员及与同盟会有联系的革命团体，在各省立即发动了反清起义。从八月下旬到十月上旬的50天内，先后就有湖南、陕西、山西、云南、江西、上海、贵州、浙江、江苏、广西、安徽、福建、山东、广东和四川15个省区宣布起义或独立，脱离清朝的统治。客观形势的发展要求建立统一的革命政权，巩固和发展已经取得的胜利成果，并最后推翻清王朝。

在筹组中央政权的过程中，各派势力展开了激烈的争夺。十一月初六，在全国人民中享有崇高威望的孙中山从海外回到上海；初十，17省代表在南京举行选举，孙中山当选为临时大总统。1912年1月1日，中华民国临时政府在南京宣告成立，资产阶级民主共和国诞生了。与此同时，武昌起义的枪声引起了中外反动势力的极端仇视。帝国主义在"中立"的幌子下破坏革命，首先是武力威胁，到宣统三年九月下旬，帝国主义侵入中国的军舰达51艘，侵略军达1.9万人，以此对革命派进行恫吓；其次是财政扼杀，帝国主义在革命政府财政极端困难的状况下，不仅拒绝革命政府的求贷，而且将革命政府占领的通商口岸的关税全部扣留，北方通商口岸的关税却继续交给清政府；第三是支持北洋军阀头子袁世凯窃取政权。清政府接到武昌为革命党占领的电报后，立即命令湖广总督瑞澂、第八镇统制张彪戴罪立功，夺回武昌，同时命陆军大臣荫昌率北洋军南下镇压革命。可是荫昌对袁世凯控制的北洋军指挥不灵，前线接连败北。在内外压力下，一筹莫展的摄政王载沣只得重新起用袁世凯；宣统三年九月十一日，任命袁世凯为内阁总理大臣，全权组织责任内阁。袁世凯在利用革命派所造成的反清声势掌握了清王朝的全部实权后，便在帝国主义和国内封建买办势力的支持下，利用名存实亡的清王朝，采用武力威胁和政治欺骗的两面手法，迫使革命派交出政权。在国内外反动势力的胁迫面前，软弱的资产阶级革命派不得不妥协退让。1912年1月，孙中山在清帝退位、袁世凯赞成共和的条件下，同意把政权让给袁世凯。2月12日清帝溥仪宣布退位，13日孙中山辞去临时大总统，15日南京临时参议院即选举袁世凯为临时大总统。3月10日袁世凯在北京宣誓就职。4月1日孙中山正式解除临时大总统职务，5日临时参议院迁往北京。至此，资产阶级共和国和南京临时政府一同夭折。在帝国主义扶植下，袁世凯建立起了大地主大资产阶级的反革命专政。

辛亥革命是中华民族与帝国主义、人民大众与封建主义这两个基本矛盾不断发展和激化的产物，是鸦片战争以来中国人民反帝反封建斗争的继续和发展，也是以孙中山为代表的资产阶级革命派长期奋斗的结果。辛亥革命是一场正规的、比较明确的、完全意义上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这场革命在政治上推翻了统治中国268年的清王朝，结束了在中国延续了2000多年的君主专制制度，建立了共和国，有力地打击了帝国主义和封建势力，使人们或多或少地争得了某些民主权利；在思想上极大地提高了中国人民的民主主义觉悟，使民主共和观念深入人心；在经济上促进了民族资本主义的发展，从而把中国社会向前大大推进了一步。但是，由于民族资产阶级的软弱性和妥协性，辛亥革命并没有改变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性质，中国人民依然在帝国主义和封建买办阶级的统治下，因此它最终是失败了。辛亥革命的历史证明：中国的反帝反封建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不能经过资产阶级领导，而必须经过无产阶级领导才能够完成；资产阶级共和国的方案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国是行不通的。　（王　才）

武昌起义

清宣统三年八月十九日(1911年10月10日)资产阶级革命党人在湖北武昌(今属武汉市)发动的首次成功的反清武装起义，是为辛亥革命的首义之战。

清宣统三年春夏间，全国革命时机已趋成熟。遍

及全国的各族人民的反抗斗争，资产阶级革命派此伏彼起的反清起义，动摇了清朝的统治基础。“皇族内阁”的建立和铁路国有政策的宣布，使清王朝在全国人民面前彻底孤立了。当年春，广州黄花岗起义的发动，极大地鼓舞了全国的革命党人，而这次起义的失败则更加坚定了两湖革命志士在长江中游地区发难的信念。接着，在广东、湖南、湖北、四川相继爆发的保路风潮，尤其是四川保路运动的高涨，直接推动了武昌起义的爆发。武汉地处长江中游，向称“九省通衢”，是一个政治、经济、文化和军事的重镇。这里，是帝国主义侵略较早和压迫最深的地区之一。20世纪初，帝国主义在武汉设立的各种企业多达180余家；它们在武汉的贸易额仅次于上海，居全国第二。湖北又是“洋务新政”的重要基地。19世纪末20世纪初，张之洞督鄂，先后创办汉阳兵工厂、汉冶萍钢铁公司、纱麻布丝四局以及造纸、制革等10余厂。为了培养“洋务人才”，他大力兴办近代的文化教育，光绪三十四年(1908)，湖北的新式学堂已激增到1972所，在校学生72634人；湖北派遣的留学生远赴欧、美、日本，仅日本一地最多时即达1000多人。同时，他还编练了一镇(师)一混成协(旅)的新军，吸收了大量小知识分子入伍。在帝国主义侵略和洋务新政的刺激下，从光绪二十八年至宣统二年，武汉设立纺织、水电、面粉、火柴、机器等民办企业24家，成为仅次于上海的中国近代第二大工商业中心，是民族资本主义经济发展较快的城市。湖北革命党人较之别的省区做了更为长期的、艰苦踏实的准备。他们认为，“要革命非运动军队不可，运动军队非亲身参加行伍不可”。从光绪二十九年开始，大批革命的小知识分子纷纷投笔从戎，以普通士兵的身分，在新军中宣传革命，发展组织。他们自办印刷所、图书室、学校、书报社等，翻印传播《革命军》、《猛回头》等革命书籍，使倾向革命的新军士兵几乎人手一册，有力地促进了新军士兵的革命化。他们顽强不屈、坚持不懈地开展工作，在科学补习所和日知会遭到破坏后，以新军为对象，相继建立了军队同盟会、群治学社、振武学社，最后形成文学社和共进会两大革命团体。宣统三年夏，湖北新军第八镇11,204人和第二十一混成协4,896人中，参加文学社的已达3000人，参加共进会的亦达1500人。党人又在新军队(连)一级建立基层组织，完备了指挥系统。同时，在学生、会党和其他社会力量方面，也争取了大量的革命者和同情者。

随着革命形势的发展，新军中的文学社和共进会的领导人为了统一步调，于宣统三年四月十三日举行会议，讨论组织联合问题。经多次磋商，八月初三，双方召开联合大会，成立起义临时总指挥部，举蒋翊武为总指挥，孙武为参谋长，刘公为总理部总理；下设军务、参议、内务、外交、理财、调查、交通六个部；确定以刘公、孙武等20人为政治筹备员，设政治筹备处于汉口长清里98号(后迁至俄租界宝善里14号)，以蒋翊武、刘复基等为军务筹备员，设军事指挥部于武昌小朝街85号；决定于中秋节(后延至八月二十日)起义。会后，指挥部在对新军各标、营、队的革命党人进行具体部署的同时，分别派人到上海迎接同盟会领导人前来“主持大计”，并联络邻省响应。起义准备基本就绪。然而，八月十八日孙武在汉口俄租界宝善里秘密机关配制炸弹，失慎爆炸，受伤入院。沙俄巡捕闻声赶来，将所有革命文告、名册、符号、旗帜全部搜去，并转交清朝官府。湖广总督瑞澂(1864—1912)下令紧闭城门，按名册搜捕革命党人。革命者感到，“与其坐而被捕，不如及时起义”，以图“死中求生”。蒋翊武决定当晚12时起义，以南湖炮队发炮为号。但是，由于改变计划的命令没有按时下达到各部队，起义未能实现。这天夜里，起义指挥部又遭到破坏，蒋翊武逃脱，党人彭楚藩(1884—1911)、刘尧澂(即刘复基)、杨洪胜(1886—1911)等人被捕；十九日清晨，三人英勇就义。清政府的血腥镇压，没有吓倒革命党人，新军革命士兵在“群龙无首”的紧急形势下，秘密串联，决定立即起事。当晚8时半，工八营第二排排长陶启胜带护兵巡棚查哨，见金兆龙、程正瀛等持枪而待，即斥问金想干什么？金语带双关地回答：“准备不测。”陶狂叫：“你想造反吗？”金则明确答道：“反就反！你能怎样？”陶上前扼住金的手腕，呼令护兵逮捕。程正瀛当即用枪柄猛击陶头部，陶负痛急逃；程继开一枪，将其击伤。革命的第一枪打响了。该营党人总代表熊秉坤(1885—1969)即刻鸣笛集合，率队猛攻楚望台军械库。此时，守卫楚望台军械库的革命士兵也正在展开行动。熊秉坤率队到达，两部胜利会合，军械库被工八营占领。接着，蔡济民(1886—1919)率二十九标起义士兵、吴醒汉率三十标起义士兵、方兴等率测绘学堂学兵也相继来到楚望台。城内响起枪声后，驻南湖炮八标的党人徐万年等即起而响应，旋即拖炮10多尊向中和门进发。驻武胜门外塘角的二十一混成协辎重队差不多与工程八营同时举起了义旗，党人李鹏升集合了炮、辎、工等营队约百余人绕城转到中和门，与炮八标会合后，一齐进至楚望台。这时武昌城内的

敌我态势是：敌军在城的西南角，革命军在城的东南角，彼此对垒。革命军占据了有利地形，控制着制高点，有充足的弹械。但领导和发动起义的大多是一般士兵，一部分是正目、副目（正、副班长），职位最高的也只是个排长。他们有饱满的革命激情和勇气，却缺乏组织、指挥攻坚夺垒的军事知识和经历。在这种情况下，工八营左队队官吴兆麟（1882—1942），因曾参加过日知会，具有较多的军事知识而被起义群众拥戴为临时总指挥，负责主持攻打督署。吴兆麟当众宣布了共同遵守的约章，发布命令：熊秉坤、马荣、邝杰各率兵分三路进攻督署；程国贞指挥炮队，在中和门城楼及蛇山等处布设阵地，炮击督署及第八镇司令部；其余起义部队分别执行巡查、策应、防守等任务或后备待命。接近午夜，进攻督署的战斗激烈地展开。革命军的第一次进攻均遭挫折，稍事退却。发起第二次进攻时，中和门与蛇山等地的炮队因天黑，不能准确测定目标，建议在督署附近放火照明。居民得知后，主动引火助焚。霎时间，火光烛天，目标极其明显。督署和第八镇司令部相继遭到革命军炮火的轰击。各路革命军乘势进击，突破敌人防线，攻克镇司令部，逼近督署。湖广总督瑞澂深恐被四面围困，急命差弁在署后围墙上穿凿一洞，仓皇溜走，出文昌门到江边，逃上了楚豫兵舰。约午夜两点多钟，革命军发动第三次攻击，与顽敌展开争夺督署的决战。敌第八镇统制张彪（1860—1927）亲自督队，从望山门城上窜下反扑，迫使革命军第三路退守保安门。这时，由熊秉坤等数十人组成的敢死队已攻抵辕门，冲锋在前的纪鸿钧、王世龙等携带煤油等引火物，冒死跃登门房和大堂附近纵火焚烧。他们虽相继饮弹牺牲，但蛰伏大堂的顽敌已无法存身；张彪奔出文昌门，逃往汉阳（今属武汉市）。八月二十日清晨，武昌城全部由革命军占领，一面红地十八星旗，飘扬在黄鹤楼上，宣告了武昌首义的胜利。接着，与武昌隔江而望的汉阳、汉口的革命党人也急起响应。原来属于第二十一混成协的步队四十二标第一营驻汉阳，二营驻汉口，三营驻京汉铁路黄河以南沿线。文学社在该标的机构称阳夏支部，由标代表胡玉珍（1890—1915）兼支部长，邱文斌为副标代表，王缵承任书记。八月十九日，胡玉珍到汉口，遇到小朝街机关破坏后逃来的文学社副社长王宪章，当即商定了响应武昌发难的安排。八月二十日下午，任文学社联络的袁金声过江到武昌，回汉阳后即将武昌光复和见到由黎元洪署名的军政府布告等事情向党人作了汇报。胡玉珍遂决定当晚十时发难。入夜以后，胡玉珍鸣枪为号，前、左两队如约集合，入子弹库夺取弹药。管带汪炳山逃窜。队官宋锡全企图制止士兵行动，党人黄家麟即将白布系其左臂，对宋说："你不要糊涂。"宋闻言即抽出指挥刀表示反正，遂被推为指挥官。这时，革命军已占领龟山，在山上设立炮兵阵地，将前一天窜到龟山脚下的辎重营残部击溃，残敌逃往刘家庙。八月二十一日清晨，汉阳宣告光复。同时，党人赵承武率队在汉口居仁门首先发难；汉阳的革命军在起义胜利后，如约派曾汉臣等率兵到汉口与赵承武会合，迅即占领全城。

八月二十日上午，取得胜利的革命党人，陆续赶到湖北省咨议局，筹商组织军政府。本来文学社、共进会领导人在武昌起义前即曾多次议及推举黎元洪任起义胜利后的军政府都督问题。由于自身政治上的软弱和幼稚，认识不到政权问题的重要性，对选择首义都督缺乏明确的政治标准，存在英雄史观和地域观念。他们认为黎乃"鄂中名将"，由他出任都督，一、可以慑服清廷，号召天下，增加革命军的声威；二、可以号召部属附和革命；三、革命党人容易与他合作，革命必易成功。当时"众议虽无任何决定，然亦无人反对"。武昌光复后，革命派的主要领导人都不在武昌，起义的具体组织者又均感资望太浅，不足以担当重任，于是这些与会的党人首先决定请省咨议局正副议长和驻会议员前来开会商讨。会上，先有人提议推举咨议局议长汤化龙出任都督，被汤婉言谢绝。接着，有的党人提议推举黎元洪为都督，获绝大多数赞同，遂决定派党人蔡济民、咨议局议员刘赓藻为代表前往寻迎。黎元洪（1864—1928），字宋卿，湖北黄陂人。20岁入天津北洋水师学堂，卒业后到北洋海军供职。甲午战后，转投张之洞自强军，得张之洞赏识，在湖北参与训练新军事宜，先后三次被派往日本考察军事。光绪三十二年夏，黎任二十一混成协统领。在新军中，他以"军务娴熟"，为人"厚重"著称。湖北保路运动兴起后，黎以军界代表资格签名参加铁路协会，在进步分子里赢得了好感。宣统三年八月十九日夜，工程八营起义后，他坐镇第四十一标第三营，阻止士兵响应；该营共进会员邓玉溪夺门欲出，党人周荣棠前来约三营会攻督署，均先后遭黎杀害。后见形势不妙，黎遂离营逃至参谋刘文吉家，随即转至黄土坡三营管带谢国超家。约在革命军攻克督署后不久，担任巡查的党人马荣、程正瀛从为黎搬运行李的伙伕口中得知了黎的下落，吴兆麟即命马、程二人带领一排革命军到黄土坡谢家，将黎元洪请出，拥至楚望台。蔡济民、刘赓藻得知黎的下落，遂赴楚望

台，迎黎到咨议局。蔡济民同吴兆麟交换意见后，正式提出推黎为都督，汤化龙负责民事，大家鼓掌赞成；但黎元洪仍推辞。争执中，党人李翊东（1887—1960）手持已拟就的安民布告，对黎说："请于都督衔下，署一黎字。"黎颤声说："毋害我！毋害我！"李翊东则提笔在布告上代书一"黎"字，然后将布告贴遍全城。黎任都督的消息一传出，军中士兵"鼓掌欢呼"，市民群众"奔走相告"，起到了稳定军心、号召群众的作用。但是，黎元洪任都督后，开始两天不言不语，活像一个"泥（黎）菩萨"。于是，起义党人即以军政府参谋部作为行使军政府军政大权的主要权力机关，作出如下决议，1. 湖北革命领导机关定名为中华民国军政府湖北都督府，设于咨议局；2. 称中国为中华民国；3. 改纪元，以该年为黄帝纪元四千六百零九年；4. 以都督黎元洪的名义，布告地方及通电全国；5. 定革命军旗为十八星旗。黎元洪充任都督，一方面起了分化清廷反动营垒、扩大革命影响的作用；另一方面他成了立宪派、旧官僚的领袖人物，为排挤革命派、窃取政权，埋下了祸根。但湖北军政府成立之初，革命派在军政府内仍占有相当的势力，在南京临时政府北迁以前，它发布了一系列革命性的政策和措施，表明它基本上是一个资产阶级革命政权，也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共和制地方政权。经过革命派的长期奋斗，革命终于在武汉首先取得了胜利，从而揭开了最后推翻清政府、建立共和国的新篇章。

（王　才）

武汉保卫战

清宣统三年（1911）武昌起义胜利后，革命党人为保卫武汉三镇与清军进行的一次重大战役，分为汉口保卫战和汉阳保卫战两个阶段。汉口古称夏口，因而又被称作"阳夏战争"。

武昌起义胜利后，革命势力与反革命势力都充分认识到，武汉革命政权的存亡，对双方都至关重要。宣统三年八月二十一日（10月12日），清廷谕令瑞澂、张彪革职留任，戴罪立功；急调在永平参加秋操的第四镇统制官王遇甲率二、四两镇各一部星夜赴援；命陆军大臣荫昌赶赴湖北节制诸军；又命海军统制萨镇冰（1858—1952）率海军及程允和主管的长江水师溯江西上赴援。八月二十三日，清廷调整军队的配置：陆军第四镇暨第二镇第三协、第六镇第十一协，编为第一军，赴湖北由荫昌亲自指挥；第五镇暨第三镇第五协、第二十镇第三十九协，编为第二军，军统冯国璋，作为预备队，"听候调用"；禁卫军、陆军第三镇，编为第三军，军统载涛，驻守京畿。清军陆续到达汉口附近。湖北的革命党人也加紧扩军备战，誓死保卫武汉。时武汉革命军政府的兵力不过几千人，故湖北军政府一成立即决定扩军四协。武汉的劳动人民、学生以及邻近的工人、农民都踊跃投军，不到五天，四个协、约2万人的新兵就告足额。当时，清廷虽然作了全面反扑的规划，但集结于直隶的北洋军不可能迅速进入湖北，更为重要的是，北洋六镇本是袁世凯一手训练出来的一支军阀武装，荫昌根本指挥不动。清政府不得已，重新起用袁世凯，于八月二十三日任命袁为湖广总督。袁认为清廷给的权力过少，次日以"旧患足疾，迄今尚未大愈"为辞，拒不奉命。袁世凯不出，北洋军就不肯卖力作战，这就给革命党人提供了休整和发展力量的有利时机。

武汉三镇保卫战，首先从保卫汉口开始。八月二十七日凌晨3时，革命军在第二协统领何锡蕃指挥下，进攻盘踞在汉口郊区刘家庙火车站的清军。其时，清方仅有张彪残部、河南混成协、岳州巡防营共2000人应战。已抵刘家庙的北洋军不肯支援，战事一起，即向滠口退去。由于清方海军发炮轰击，民军不支退却；清军一部尾追至市区内的大智门附近。下午3时，民军再次发起攻势，又因清军舰炮击而退却。清军乘火车追击，铁路工人预先毁路10余丈，致使火车倾覆，民军和四周民众齐声喊杀，一举消灭清军数百。二十八日清晨，民军步、炮、工、骑兵共3000余人，乘胜再攻刘家庙车站，清军仓皇逃往滠口，遗弃帐篷140余顶，粮食600余石及大量枪支弹药。民军本应乘胜前进，据三道桥，夺取滠口，据有利地形，阻止清军沿铁路线南下进攻汉口。但旧军官出身的何锡蕃对民军的力量估计不足，既不敢大胆进攻，也没有在三道桥修筑坚固的防御工事，认为刘家庙与租界相近，敌人必不敢贸然进攻，因此把防线设在刘家庙附近。这样，每至夜间，清军就越过三道桥，向民军进攻。对此，革命党人十分不满，强烈要求并自动组织敢死队，向敌人发起攻击。但这时敌人喘息已定，并占据三道桥有利地形，以机枪多挺，堵塞路隘，民军进攻遭到失败。指挥官何锡蕃自感指挥不力，引咎辞职。军政府于九月初三任命原清军第二十九标统带张景良为汉口前线总指挥。可是张景良到汉口后，既不召开军事会议，又不下令作战，采取拖延态度。这时，清军大部陆续南下，前锋抵达滠口。九月初五，清海陆军开始大举反扑，敌舰潜过武昌青山革命军的炮兵阵地，未遇狙击即到达造纸厂附近江面，向民军阵地猛烈炮击，民军牺牲500多人。在炮舰掩护

之下，清步兵也向刘家庙发起进攻。经过三天的激烈战斗，民军伤亡2000余人，被迫退入市区。在民军苦战过程中，担任前敌总指挥的张景良逃离前线，与张彪暗中勾结，被汉口军政分府领导人詹大悲处以死刑。正当民军处于极端不利的关键时刻，九月初八午后，革命党重要领导人黄兴自上海到达武昌，毅然承担起前线总指挥的重任。黄兴亲临前线指挥，给正在苦战中的民军以很大鼓舞，士气为之大振。但这时清军也已因袁世凯的复出而加强了力量。九月初六，清政府召回荫昌，授袁世凯为钦差大臣，冯国璋为第一军总统，段祺瑞为第二军总统。九月初八，冯国璋到达汉口，接统第一军；初九，袁世凯自彰德南下，进驻湖北孝感，亲自督阵。至此清军兵力已达1万多人，且配备了许多机枪和大炮，而在汉口的民军仅有5000人左右。为扭转不利局面，黄兴于初八日指挥各军攻击敌方大智门阵地，一度击溃敌军，因敌人大量援军赶到，民军反攻未获成功。第二天，在市区内民军与清军展开了激烈的巷战。为破坏革命军的顽强阻击，冯国璋竟丧心病狂地下令纵火。大火从歆生路花楼街一直烧到满春茶园，又从满春茶园烧至硚口，一连三昼夜不熄，十余里街道皆被夷为焦土。民军的将士们在烈火中坚持了三天三夜可歌可泣的战斗。九月十一日夜，汉口失陷，黄兴渡江返回武昌。

汉口失陷以后，开始进入汉阳保卫战阶段。由于双方均需要重新部署兵力，前半个月战事暂时呈沉寂状态。黄兴于九月十四日在汉阳伯牙台(后移昭忠祠)组成战时总司令部，以李书城(1882—1965)为参谋长，正式接防备战。到九月二十一日，黄兴所辖防守汉阳的民军各部计有：鄂军第一协蒋肇鉴两标，第四协张廷辅两标，第三协熊秉坤两标，第二协第四标，工程、辎重各一营，炮队一团；援鄂湘军第一协王隆中、第二协甘兴典各部，总兵力约2万余人。清军占领汉口后，即以左翼扼长江沿岸，右翼由京汉铁路进至玉带门停车场之北，后方预备队屯于孝感，总兵力约3万余人。在势均力敌、各有优劣的情况下，是进攻还是防守?民军内部出现严重分歧，黄兴主张进攻。九月二十六日夜，黄兴决定分兵三路反攻汉口。第一路由鄂军第三协协统成炳荣率所部从武昌青山渡江，在汉口湛家矶登陆，进攻刘家庙，击清军后路以为牵制；第二路以步兵第六标标统杨选青率领所部，由汉阳东北岸渡江，在汉口龙王庙登陆，以为助攻；第三路是主攻部队，以湘军第一协为右翼，湘军第二协为中央，以鄂军第五协为左翼，在襄河(汉水在襄阳以下之别称)琴塘口军桥渡河，向汉口玉带门一带进攻。战事开始后，第三路右翼湘军王隆中部进展迅速，将敌人打退至韩家墩；左翼进展迟缓，进攻失利；居中湘军指挥甘兴典更是临阵慌乱，首先率部退却。王隆中部孤军奋战，最后也不得不退至汉阳。其他两路则因指挥员的贻误，根本未能按时发动。反攻汉口失利，民军形势日益被动。十月初一，清军一路从孝感绕道至蔡甸，强渡汉水，民军堵截未成，退守三眼桥；另一路清军从舵落琴断口架设浮桥渡过汉水，向民军右翼阵地美娘山、仙女山进攻，形成对汉阳的两翼包围形势。此后数日，双方在汉阳外围的重要据点展开了激烈的争夺。美娘山失守后，民军管带祁国钧率几十人，勇敢冲锋，一举夺回美娘山；磨盘山被清军占领，革命党人组织108人的敢死队，乘夜冲上磨盘山山顶，奋勇肉搏，全歼敌军。直到十月初四，清军才最后夺得美娘山和仙女山。这时，黄兴急将主力集结在十里铺一线，先后组织两次反攻，均告失利。初六，清军夺得磨盘山、扁担山两处阵地之后，以猛烈炮火轰击十里堡。黄兴速调各军阻击，但指挥不灵，湘军将领甘兴典擅自率部撤回湖南，王隆中部苦战疲惫，也退至武昌。黄兴只得决定撤离汉阳。十月初七，敌占龟山；下午，汉阳陷落。当日晚，黄兴从武昌乘船离鄂，武昌的湖北军政府已面临危机。但从全国形势来看，此时海军已经归向革命，江浙联军占领了南京，各省纷纷独立，清廷已处于土崩瓦解的困境。鉴于此，袁世凯施展一打一拉、以拉为主的策略，命占领汉阳的冯国璋暂不渡江攻武昌，只从龟山用重炮轰击武昌，对黎元洪施加压力，暗地里则通过帝国主义使团加紧进行停战议和的活动。这样，武昌起义后掀起的革命战争，在湖北基本上停顿下来。

持续40余天的武汉保卫战，虽然由于敌我力量过于悬殊、指挥不统一，部分旧军官不能用命、士兵新募、军事部署失误等原因，遭受了重大挫折，但是，这场保卫战是辛亥革命期间规模最大的一次战役。它有效地保卫了首义之区和第一个革命政权；广大革命军将士在战争中所表现出的英勇无畏、自我牺牲和顽强奋战的精神，为全国人民树立了一个英勇抗敌的典范，鼓舞了革命人民的斗志；武汉保卫战将清兵主力吸引到湖北长达一个半月，这对各省革命党人发动起义是极大的支援，有力地促进了革命在全国范围内的发展。　　(王　才)

"十九信条"之颁布

"十九信条"，全称《宪法内重大信条十九条》，清宣统三年九月(1911年11月)，清政府为挽救即将

垮台的命运而采取的欺骗措施之一。

武昌起义后，革命烈火迅速燃遍全国。尤其使清政府感到震惊的是，继湖南、陕西、江西宣布独立后，九月初八(10 月 29 日)山西宣布独立，革命烽火已燃到北方。同一天，驻滦州的陆军 20 镇统制张绍曾(1879—1928)、协统蓝天蔚等在袁世凯的指使下，通电清廷，提出在本年内召开国会、组织责任内阁、制定宪法、特赦国事犯、削除皇族特权等 12 项要求，表示如果清廷不允，就要率军进攻北京。载沣见到电报后，大惊失色，其他皇族亲贵也均感"大势去矣"。在这种形势下，清廷被迫让步，并继续玩弄欺骗伎俩。九月初九，载沣以宣统帝名义下诏"罪己"，承认三年来"促行新治，而官绅或借为网利之图；更改旧制，而权豪或只为自便之计；民财之取已多，而未办一利民之事；司法之诏屡下，而实无一守法之人"。表示从即日起，"誓与我国军民维新更始，实行宪政"。接着便宣布解散皇族内阁、解除党禁，命资政院起草宪法。第二天清廷又任命袁世凯为内阁总理大臣，全权筹组新内阁。九月十三日，清政府颁布了由资政院草拟的《宪法内重大信条十九条》。在确认中国要继续保持清王朝的君主制，大清帝国皇统万世不易，皇帝神圣不可侵犯的前提下，仿照英国资产阶级宪法，规定"皇帝之权以宪法所规定者为限"，"宪法由资政院起草，议决后皇帝颁布之"，"宪法改正提案权属于国会"。国会具有宣战、媾和及决定财政预决算的权力。宣布实行责任内阁制，总理大臣由国会公举、皇帝任命，皇族不得担任总理大臣、其他国务大臣以及各省行政长官。与光绪三十四年(1908)清政府颁布的《钦定宪法大纲》相比较，"十九信条"对君主至高无上的权力有所削减，加强了议会的权力。然而，形势已经急速地向前发展了，革命党人以武器的批判，不仅宣告了君主专制的垮台，而且君主立宪制也为全国多数人所唾弃。因此，清王朝企图以此达到消弭革命、阻挡民主共和潮流的目的，自然是无法实现的。但这个"十九信条"却为袁世凯出任全权内阁总理大臣提供了合法根据。资政院根据"十九信条"于九月十九日正式选举袁世凯为内阁总理大臣。二十三日袁世凯由汉口来到北京，三天后组成了新内阁。从此以后，以袁世凯为代表的北洋军阀集团实际上掌握了清王朝的实权，成了革命的最凶恶的敌人。

（王　才）

各省响应武昌起义

清宣统三年(1911)武昌起义以后，全国各省相继响应，纷纷脱离清政府并建立地方共和政权的历史事件。

武昌起义的枪声震动了全国，各阶层人民热烈响应，到处掀起自发的反封建压迫的斗争。江苏常熟、江阴、无锡三县交界地区爆发了农民武装暴动，烧毁恶霸地主的房屋，竖立"革命大都督"旗帜。手工业工人和会党在扬州起义，以"革命军政府扬州都督"名义发布文告，通令人民"三年不纳粮"，"诸捐杂税全免"，并打开大清银行大门，招呼贫民任意取钱。湖南衡阳、醴陵等 10 余州县农民围攻县署，杀逐官吏豪绅。陕西自咸阳至凤翔、陇州，数百里地区内，到处都发生杀官劫狱的暴动。广东顺德等县农民组成各路民军，拆毁豪绅住宅，包围局所衙门，勒缴饷械。河南永城、柘城一带会党 2 万余人，举行暴动，查抄劣绅家产，分给贫民。洛阳地区有数万人参加"复汉军"。山西高平、长治等县爆发了声势很大的"干草会"运动，农民串联起来，手执干草和农具，抄没劣绅财产，捣毁巡警局，迫使县衙出告示免除捐税。其它各省也都爆发了大大小小的群众起事。

在群众斗争广泛开展的基础上，各省的革命党人甚至立宪派、旧官僚，通过武装的或非武装的方式，相继脱离清廷，建立军政府。首先响应武昌起义的是湖南和陕西。湖南是革命风潮屡起的省份之一。自光绪三十年(1904)华兴会长沙起义失败，经萍浏醴之役，湘省革命党人活动始终未断。共进会成立后，浏阳人焦达峰受命由日本回湘，在浏阳、醴陵一带发动会党，又由党人陈作新(1870—1911)等联络新军和巡防营，革命准备逐渐成熟。武昌起义前，焦达峰曾与湖北革命党人相约，若湖北首义，湖南立即响应；若湖南首义，则湖北响应。从此湘省党人将全省分西、中、南三路加紧筹备工作，并在长沙设立各种名义的联络机关多处。武昌起义消息传来，新军党人均立即起而响应。宣统三年九月初一(10 月 22 日)清晨，焦达峰、陈作新集合长沙城外的新军士兵，分两路进攻长沙城。清军不战而溃，巡抚余诚格逃走，清军中路巡防营统领黄忠浩被革命军击毙，革命军当天即占领长沙。第二天，湖南军政府成立，焦达峰、陈作新被举为正副都督，原湖南咨议局议长谭延闿任参议院议长。混入革命队伍中的立宪分子，不甘心让革命党人任正副都督，他们首先利用参议院攫取军政府的实权，规定"参议院规划民军全局、行政一切用人事宜"；"都督之命令，必经本院决定，加盖戳印，请都督盖印，由本院发交各部执行"。又仿照湖北军政府的办法，实行军民分治，在都督之下分设军

政、民政两部，其部长及所属司、处负责人员，多为立宪派所掌握，正副都督形同虚设。对此，陈作新等不仅毫无防范，反而天真地以为“今日复见汉官威仪，如家人聚首，何戒备之有”，在立宪派面前完全解除了武装。立宪派进一步收买旧军官梅馨和一部分士兵，在九月初十发动反革命暴乱，先后杀死陈作新和焦达峰，拥谭延闿为都督，篡夺了湖南的革命政权。与湖南起义的同一天，陕西爆发了革命。陕西的同盟会员井勿幕（1888—1918）等人在省内活动多年，很多新军士兵加入了同盟会，势力遍布全省的哥老会也与革命党人联成一气。武昌起义的消息传来，协参谋兼第三标一营管带、同盟会员张凤翙（1881—1958），新军排长、党人钱鼎率领革命的新军士兵和陆军中学堂学生，于九月初一起义响应，并一举攻占省城西安。当晚，革命军领导人集中在军械局，选举张凤翙和钱鼎为全陕复汉军大统领和副统领（后改称军政府正、副都督），成立陕西军政府。陕西独立，使清政府背后受敌，因此，立即受到清军东西两路的进攻。革命军为保卫新政权，与清军展开了激烈的战斗，直到南北议和开始才告结束。江西省的响应是从九江开始的。武昌起义后，革命党人积极运动驻九江的第五十三标起义。标统马毓宝与革命本来毫不相干，但在形势感召和革命党人的劝诱下，勉强同意起义。九月初二晚上，九江城内各营新军以发炮为号，进攻九江道衙门和知府衙门，各官员狼狈逃走。次日，成立九江军政分府，推马毓宝为都督。这时南昌的革命党人也加紧运动城内的新军第二十七混成协，促使一些下级军官在九月初十晚上发难。次日，南昌的绅商学界在咨议局开会，决定宣布独立，推原清军协统吴介璋（1874—1926）为都督。后来由于一部分新军军官暗中活动倒吴，因此吴上台仅两日就辞职他去，革命党人彭程万（1877—?）被推为都督。彭本身无实力，不久便自动取消都督名义，由马毓宝担任了江西都督。山西的留日学生在同盟会成立后，有100多人加盟，组成山西同盟会支部。在他们的宣传鼓动下，驻太原的新军第四十三混成协官兵，有很多是同盟会员。武昌起义和陕西独立后，革命党人准备响应。清山西巡抚陆钟琦既害怕陕西革命军来攻，又担心太原新军起义，于是以防止陕西革命军入晋为借口，调第八十五标去扼守河东。新军中的党人乘机要求陆配备子弹，否则难以应命。陆被迫答应新军条件。得到子弹后，八十五标士兵在第三营管带姚以价（1881—1947）领导下，决定第二天黎明起义。九月初八晨，起义军分兵三支从城外进攻太原城。同时，城内陆军小学堂学生及以同盟会员阎锡山为标统的第八十六标的部分官兵也起而响应。起义军很快攻占巡抚衙门，巡抚陆钟琦、协统谭振德被当场击毙，太原宣告光复。当天，起义领导人和各界代表在咨议局集会，推阎锡山为都督，陆军小学堂监督、同盟会员温寿泉（1880—1955）为副都督。姚以价以起义首功被推为全省总司令，并立即率兵进驻娘子关，以防清军进攻。武昌起义的消息传到云南，革命党人极为振奋。九月初六，哥老会首领、同盟会员张文光（1882—1914）首先发动新军第七十六标及当地防营在腾越起义，占领腾越城。三天以后省城昆明亦燃起了革命烽火。自光绪三十四年三月底河口起义失败后，革命党人李根源、罗佩金（1878—1922）等相继回滇，着重在新军中活动，到宣统三年新军大部分已倾向革命。起义前，党人邀集一些军官在营管带唐继尧住宅开会，举梁启超的学生、第三十七标协统蔡锷为总指挥。九月初九晚上，驻城外北校场的第七十三标第三营首先发难，进入城内后，再攻军械局，不克。清军据五华山顽抗，战斗非常激烈。次日革命军开炮助战，革命军遂先后攻入军械局和督署。当天蔡锷被选为云南都督，各级军官分任要职，而多数同盟会员却以“不居功就大任”自慰。上海的起义，是同盟会和光复会两大团体的革命党人共同领导的。宣统三年同盟会中部总会成立后，同盟会员陈其美等在上海租界设立了革命军事总机关，积极联络商会、商团上层领导人，准备起义。在此期间，光复会领导人李燮和来到上海，利用沪军营、制造局、炮台营官兵多为湘籍同乡的关系进行联络，并与陈其美相约，双方携手合作。九月十三日下午，起义军先后占领了闸北巡警局和巡警总局，各处的巡警、商团、防营随即响应，只有制造局总办张士珩负隅顽抗。陈其美率一部分商团围攻制造局，只身入内劝说张士珩及士兵投降，结果反被张扣押。李燮和等闻讯即组织起义军连夜发动进攻，第二天黎明，驻局炮兵反正，制造局被起义军占领，上海光复。十五日下午，在没有光复会员参加的情况下，召开推举都督大会，陈其美的亲信利用帮会势力，推举陈为上海都督，而李燮和的总司令职务却被解除，因而进一步加深了两团体的芥蒂。上海的独立在江苏省会苏州引起极大的震动。本来在阳夏战争期间，当地的立宪派就曾多次酝酿江苏独立之事。上海脱离清政府，使江苏失去了最大的商埠、海口和军火供应地，苏州各界更加紧了独立活动的步伐。九月十五日苏州商务总会总理尤先甲等谒见苏抚程德全（1862—1930），“请其保全地方治安，免

致生灵涂炭”。当天夜晚，上海民军50多人抵苏，在城郊与苏州新军士兵会合。次日，苏州绅商又同程德全密议，这时新军马、步、辎重队也“一律袖缠白布，直达巡院”，要求巡抚程德全反正。程万般无奈，表示同意，改称都督，在督署的旗杆上升起一面“中华民国军政府江苏都督府兴汉安民”的旗子，令人用竹竿将大堂上的檐瓦挑去几片，以示除旧布新。立宪派头面人物张謇任民政总长。贵州与浙江是同日宣告独立的。领导贵州革命起义的组织是贵州自治学社。这个组织是爱国知识分子张百麟(1887—1919)于光绪三十三年十一月所创立，打着“赞助地方自治”的旗号，进行合法的活动，初期基本上是一个主张立宪的团体。宣统二年秋同盟会员平刚回到贵州，与张百麟商量整顿革命力量，预备起事。从此自治学社便作为一个革命组织积极在新军、省陆军小学堂和会党中发展革命力量。到宣统三年，它在省内建立的分会多达50多个，会员人数达10万多人，控制了省咨议局和各府州县的“自治”机构，为日后的武装起义打下了胜利的基础。九月十三日，新军和陆军学堂的学生在贵阳城外发动起义。巡抚沈瑜庆命抚署卫队前往弹压，但卫队管带及其部下均已臂缠白布，表示赞同革命。沈见无可挽救，不得不承认贵州独立。次日晨，革命党人黄泽霖(1882—1912)等迎接新军入城，当日成立了贵州军政府，推陆军小学堂教练官杨荩诚(1883—1922)为都督，新军队官赵德全为副都督，张百麟为枢密院院长，实际上成立了以自治学社为主、包括各派政治力量的“联合内阁”。浙江是光复会的主要活动场所，同盟会在这里也进行过不少活动，所以会党群众和新军士兵加入这两个组织的很多。武昌起义后，浙江革命党人决定响应。九月十四日晚，驻杭新军第八十一标、八十二标和从各地集中来的会党，加上从上海前来的敢死队，开始攻打杭州城，很快攻入抚署，占领军械局，清巡抚增韫被俘。次日革命军进攻满城，清将军德济投降。革命军占领杭州后，即在咨议局召开选举都督会议，同盟会员褚辅成(1871—1948)提议立宪派首领、前咨议局议长汤寿潜为都督，获多数人同意。上海、江苏和浙江独立后，革命党人即组织江浙联军向两江总督所在地、长江重镇南京发动进攻。此前新军第九镇统制徐绍桢(1861—1936)因不满两江总督张人骏的猜忌，加之士兵中革命情绪日益高涨，曾于九月十八日率部起义进攻南京，战不利，败退镇江。江浙联军组成后即云集镇江，与徐绍桢等会合，计1万多人，举徐绍桢为联军总司令。十月初三，联军分四路进攻南京，江防营提督张勋等率清军拚死抵抗，苦战数天，双方伤亡数以百计。十月十一日，联军夺得紫金山，炮轰城内清军，总督张人骏、江宁将军铁良连夜潜逃，张勋也带领残兵出走徐州。十二日城内清军投降，革命军占领南京。十三日由宋教仁提议，江苏都督府由苏州移往南京，仍以程德全为都督。广西革命党人在新军和绿林中活动多年，武昌起义后，即酝酿在各地分头起义。清巡抚沈秉堃(?—1913)、布政使王芝祥(1858—1930)以及咨议局议员们，感到广西独立已是大势所趋，无可挽回，便决定抢在革命党人发难之前在桂林宣布广西独立。九月十六日夜间，王芝祥让人缮写有“大汉广西全省国民恭请沈都督宣布独立，广西前途万岁”等字样的黄旗数百面，在天明前分别竖立在城内外各街巷和衙门。十七日，在咨议局开会，公推沈秉堃为都督，王芝祥和广西提督陆荣廷(1856—1928)为副都督，改巡抚衙门为军政府，咨议局为议院，各行政机关及税制暂仍其旧，原有军队一律改为国民军。安徽自光绪三十三年徐锡麟起义和三十四年熊成基起义失败后，革命活动并未中断。革命党人孙毓筠(1869—1926)等在新军和农村中活动，逐渐扩大了革命的影响。武昌起义后，省城安庆的革命党人曾在九月初九发动新军起义，遭到失败，新军也被巡抚朱家宝(1860—1923)解散。但鉴于省内外革命形势的迅速发展，立宪派决定打出安庆独立的旗号，请朱家宝宣布并任都督。朱初时不肯答应，后来因接到袁世凯嘱他顺应时势、静候变化的密电，才在九月十八日宣布安徽独立，就任都督。但革命党人于二十一日选出王天培为都督，遭到立宪派的坚决反对。双方争持不下，直到十月二十二日，才最后确定同盟会员孙毓筠为都督。同安徽的情况相近，广东自黄花岗起义失败后，大部分革命党人离开了广州。鉴于一时难于在省城再发动大规模的武装起义，党人决定先在广州以外地区举义。处于四面楚歌中的清广州当局产生了分化。水师提督李准被迫秘密和党人谈判，“立意反正”；两广总督张鸣岐犹疑观望；清军统制龙济光(1868—1925)感到对事态发展无可奈何。于是立宪派和部分革命党人决定实行“和平独立”。九月十八日，传闻城外的各地革命军即将开到，上层人物急派代表与张鸣岐代表会谈，决定宣布广东独立，举张鸣岐为都督，龙济光为副都督。但在次日，张鸣岐潜逃香港，龙济光不肯就任，广州绅商只好推举清军协统蒋尊簋(1882—1913)为临时都督。二十日，顺德、佛山和广州近郊的革命军四、五千人进入省城，胡汉民同时从香港到达，遂被选为都

督，后来又选陈炯明为副都督。光绪三十二年在福州党人成立了同盟会福建支部，宣统三年又成立军警特别同盟会，各地哥老会和福州的军警加盟的很多。武昌起义后，党人决定响应。九月十九日黎明，以新军为主、民军为辅组成的革命军，在党人彭寿松、许崇智(1886—1965)的率领下，在福州起义，激战半天后，清军投降，闽浙总督松寿自杀。二十一日各军推举附从革命的新军统制孙道仁(1867—?)为都督，许崇智为福建海陆军总司令。四川独立的过程较为复杂。武昌起义以后，四川各地的保路运动在党人的主持下，普遍转为夺取各级地方政权的斗争。在邻近各县起义成功的基础上，重庆的革命党人张培爵(1876—1915)、杨庶堪(1881—1942)于十月初二，与从外地开来的夏之时领导的起义军里应外合，迫使重庆知府钮传善投降，当即成立中华民国蜀军政府，推张培爵、夏之时为正副都督。接着军政府派人到资州击毙端方。这时在成都的四川总督赵尔丰与立宪派蒲殿俊、罗纶联合，共同对付革命。十月初七，双方宣布四川"独立"，蒲殿俊、朱庆澜(1874—1941)分任"大汉军政府"正副都督。这种自欺欺人的独立，引起了革命党人的斥责和抗议。十月十八日，赵尔丰策划兵变，蒲、朱被吓走，城内秩序大乱。于是一些军官和立宪派分子又另举前陆军小学堂总办、军政府军政部长尹昌衡(1884—1953)为都督，罗纶为副都督。不久，尹昌衡将赵尔丰逮捕处死。成都的四川军政府和重庆的蜀军政府直到次年 2 月才合并为一。在各省相继独立的高潮中，海军船舰也大部起义，为革命增加了重要力量。此外山东于九月二十三日上演了一出假独立的丑剧，到十月初四又自动取消了独立。十一月十二日，驻直隶滦州(滦县)新军第二十镇七十九标官兵，在第一、二营管带王金铭(1880—1912)、施从云(1880—1912)率领下，宣布起义，成立"北方革命军政府"。这次起义虽很快遭到北洋军的镇压而失败，但它说明革命之火已烧到清统治心脏地区。其它未独立各省，也在革命浪潮的冲击下动荡不安，或爆发局部性的革命，或出现群众的自发斗争，有力地打击了清朝的反动统治。

从八月十九日武昌起义开始，到十月初七成都宣布独立，仅仅一个半月多一点的时间，全国 24 个省就有 14 省和上海市脱离清政府，宣告独立。席卷全国的群众自发斗争和各省的相继独立，汇合成了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高潮，使清王朝陷于土崩瓦解。但在这大好形势后面已经隐伏着导致革命失败的因素，因为从总体来看，革命党人事实上并没有在独立各省中取得统治地位，而让立宪派、旧官僚取得了支配权。 (王 才)

南 北 议 和

清宣统三年(1911)武昌起义后，以袁世凯为代表的中外反动势力通过和平谈判胁迫孙中山为首的资产阶级革命派让出政权的政治事件。

革命在武汉三镇的胜利，给中外反动势力以沉重打击，引起了他们极端的恐惧和仇视。面对迅猛发展的革命运动，清王朝惊慌失措，内部分崩离析，已无力维持其苟延残喘的统治。帝国主义急欲通过武力扑灭革命之火，但是，一、当时已处于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前夕，主要帝国主义国家忙于准备在欧洲厮杀，无法抽出较多的兵力来镇压中国革命；二、帝国主义之间特别是英、俄、日三国在对华权益上存在着错综复杂的矛盾，难于采取一致行动；三、最重要的是中国革命的迅速发展，使他们深感使用武力不仅不能达到其罪恶目的，反而会使自己同革命势力形成对立，从而使自己的在华权益受到损害。因此，武昌起义后不久，帝国主义便在虚伪的"中立"旗号掩护下，全力支持袁世凯窃取革命成果。走投无路的清王朝，在内外压力下，被迫于宣统三年八月二十三日(10 月 14 日)重新起用已罢黜的袁世凯。富于政治经验的袁世凯深知，在全国范围内掀起的革命风暴，只靠北洋军是绝对平息不下去的。于是他在压迫清王朝让出全部军政大权的同时，对革命势力采取了一打一拉的反革命策略，即在武力威胁的基础上，迫使革命派通过"和议"让出政权。为此，袁在未正式出任前，即令其与湖北军政府都督黎元洪有乡谊的幕僚刘承恩接连致书黎，希望黎与袁设法和平了结。九月初九，袁世凯亲自南下督师，令冯国璋率军夺取汉口，并通过英国驻汉口代理总领事戈飞(H・Goffe)的撮合，再派刘承恩前往武昌与湖北军政府直接会谈。这次接触，虽然由于革命党人的抵制，袁世凯企图"招抚"革命势力的目的未能达到，但从军政府方面却得到了如袁能"返旆北征"，"将来大功告成，选举总统，当推首选"的信息。九月二十三日，袁世凯从武汉前线回到北京，与各国公使频繁会谈。经密商，英国公使朱尔典(Jordan，Sir John，1852—1925)于十月初六电戈飞，要他向湖北军政府转达袁世凯"停战议和"的意见。当天，袁下令汉口清军猛攻汉阳。次日汉阳陷落。这时，湖北军政府外交次长王正廷(1882—?)首次吁请驻汉的英、美领事"调停"，并经由戈飞正式提出了"停战条款"。袁世凯利用有利时

机，一方面命汉阳的清军在龟山上架起大炮隔江轰击武昌，一方面与朱尔典、戈飞等策划停战议和。十月十一日第一次武汉地区停战协议宣告成立，确定从十三日8时起至十六日8时止，停战3天。十二日江浙联军攻克南京，革命军士气高昂起来，北洋军士气顿挫。因此，武汉地区停战3日尚未届满，袁世凯即和朱尔典磋商，于十四日拟订出了“续停战条款四条”，经戈飞转致湖北军政府。这时袁世凯又从北京直接致电湖北军政府，提出双方直接谈判商讨大局，建议第二次停战期满后再继续停战15天。当时各省都督府代表会议正在汉口召开；在接到戈飞转来的停战条款和袁世凯的电报后，代表会议同意了停战和议和的意见，提出议和纲要四条：一、推翻清政府；二、主张共和政体；三、礼遇旧皇室；四、以人道主义待满人。决定以汉口为议和地点。十八日袁命唐绍仪为全权代表，偕同随从人员迅即南下议和。唐绍仪(1860—1938)，字少川，广东香山(中山)人。少年赴美留学，回国后赴朝办理税务，受到袁世凯器重，后历任天津海关道、外务部侍郎、沪宁、京汉铁路督办、邮传部侍郎、尚书、奉天(辽宁)巡抚等职。南方独立各省确定以伍廷芳为南方议和全权代表。伍廷芳(1842—1922)，字文爵，号秩庸，广东新会人。早年赴英留学，后在香港当律师、法官兼立法局议员；在李鸿章幕府协助办理洋务和外交；20世纪初历任清法律大臣、会办商务大臣、外交部与刑部右侍郎等职。十月二十一日唐绍仪一行抵达汉口，二十三日前往武昌与黎元洪晤谈。当时江浙地区的立宪派和革命派均坚持谈判应在上海进行，此意得到帝国主义和袁世凯的认可。二十七日唐绍仪一行抵达上海。二十八日“南北和谈”在上海英租界市政厅正式开始。与会的除南北双方代表外，还有英、美、俄、日、德、法等国驻沪总领事及上海外商代表。这次会议主要讨论了停战问题，确定在晋、陕、鄂、皖、鲁、苏和奉天七省一律停止军事行动。十一月初一双方举行第二次会议，主要讨论“国体”问题。为了使“和谈”能按照帝国主义的意图进行，在这次会议上六国驻沪总领事向南北双方代表致送同文照会，公然要挟说：“目前在中国的战争如若继续下去，这不仅使中国本身，亦将使外国人的利益与安全遭受重大的危险。”因此他们告诫双方：“有必要尽速达成协议，使目前的冲突归于停止。”实际是压迫革命派向袁世凯妥协。对于所谓“国体”问题(实际是“政体”问题)，伍廷芳提出：一、废除满洲政府；二、建立共和政府。对于第一条，北方代表唐绍仪无异议；关于第二条，唐提出实行君主立宪。双方发生争论。但唐绍仪意识到，他代表袁世凯来与南方议和，主要目的是迫使革命派向袁世凯让出政权，至于采取何种政体，不是问题的实质，故此并不十分坚持，提出中国未来是实行君主立宪政体抑或民主共和政体，“宜筹一善法，使和平解决”。双方未达成协议。此后，以解决“国体”问题为中心的公开谈判即暂时休会，而以是否选举袁世凯为民国总统为议题的秘密谈判却加紧进行。原来袁世凯在派唐绍仪为正式谈判代表时，又通过段祺瑞密派亲信廖宇春(1870—?)等以“个人身分”尾随唐绍仪前往上海。伍、唐开第一次会议的次日，廖宇春即与黄兴委派的民军代表顾忠琛举行秘密会议；十一月初一伍、唐举行第二次会议，当天廖、顾便达成五条秘密协议，主要内容为：确定实行共和政体；优待清皇室；先推覆清政府者为大总统。接着，廖宇春等离上海先后向段祺瑞、袁世凯报告情况。袁世凯经征得帝国主义的同意，决定承认共和，但须召集国民会议讨论决定。基调确定后，伍、唐之间的公开会谈步骤加快，十一月初十、十一日、十二日，议和谈判连续举行第三、四、五次会议，双方确定：通过“国民会议”决定国体问题；每省出代表三人，每人一票；独立各省由临时政府发电召集，未独立各省由清政府发电召集，蒙古、西藏由两政府分电召集；各处代表到达四分之三以上，即可开议。伍廷芳提议开会地点在上海，时间定在1912年1月8日(宣统三年十一月二十日)；唐绍仪允以电达袁内阁，请其从速电复。然而由于十一月初十南方独立各省公举孙中山为临时大总统，袁世凯立即全部否定了业已达成的协议。十二日、1912年元旦(十三日)，唐绍仪等两次电袁辞职，并通知伍廷芳停止和谈。1月2日袁世凯一面电准唐绍仪辞职，一面电告伍廷芳，以后南北和议事项由他直接电商。这时议和谈判表面上似已中断，但南北暗中的谈判活动并没有停止。上海南洋路充当袁世凯政治掮客的赵凤昌的住宅“惜阴堂”，成了南北议和代表和立宪派昼夜密议的场所。谈判双方争执的中心是如何结束南北两个政权的对立，建立以袁世凯为总统的统一中央政权问题。为了迫使革命派让步，袁世凯授意北洋将领连续发表通电，声称“若国民会议竟议决采用共和政体，吾人惟当奋力战斗，至死不承认此政体”。冯国璋等人也群起鼓噪“开战”；武汉前线清军则向武昌开炮轰击。与袁世凯相呼应。南京临时政府成立后，帝国主义在政治上拒不承认，在经济上封锁扼杀，在军事上武力恫吓，在舆论上恶毒攻击；对袁世凯则予以全力支持。在南方，立宪派

和旧官僚乘机大搞拆台活动，同盟会内部妥协势力占了优势；他们共同压迫孙中山将临时大总统让与袁世凯。在内外重重压力下，孙中山不得不让伍廷芳电告袁世凯，表示只要清帝退位，袁世凯宣布绝对赞成共和，即举袁为临时大总统。接着，1912 年 2 月初，双方代表商定清室退位后优待条件；12 日清帝溥仪下诏退位，袁世凯先一日致电南京，宣告“共和为最良国体”。13 日孙中山向临时参议院辞职，推荐袁世凯继任临时大总统。15 日临时参议院选举袁世凯为临时大总统。南北议和以革命派向袁世凯让出政权而告结束。 （王 才）

中华民国建立

1912 年 1 月 1 日以孙中山为首的资产阶级革命派领导人民推翻清王朝、结束封建帝制、建立资产阶级共和国的历史事件。

武昌起义后，50 天内全国 14 省和上海先后响应，宣布脱离清朝统治而独立。为统一步调，把革命推向最后胜利，建立全国统一的革命政权不仅十分必要，而且有了现实的基础。但是，在建立政权的过程中，各派势力之间同样存在着激烈的斗争。江、浙地区的立宪派、旧官僚和革命党人组成的上海集团和以黎元洪为代表的首义地区的武昌集团，为了控制未来的临时中央政府，几乎同时发出了筹组中央政权的倡议。宣统三年九月二十一日（1911 年 11 月 11 日）江苏都督程德全、浙江都督汤寿潜联电沪督陈其美，倡议于上海设立临时议会机关，以处理内外关系。次日程、汤即用苏、浙两省名义电请全国各省派代表来沪，商组临时政府。二十五日，依据“两省以上代表到会即行开议”的建议，上海、江苏、福建代表举行第一次会议，正式建立“各省都督府代表联合会”。早在上海方面发出通电前二日（十九日），武昌方面已由黎元洪署衔通电各省，请速派代表来鄂商组临时政府。结果，湘、苏、闽、浙、沪等省区都督府和未独立省区直、鲁、豫咨议局派代表至沪与会；赣、粤、桂等省都督府派代表径赴湖北。于是上海各省都督府代表会致电黎元洪、黄兴，要求会议在沪举行；考虑到武昌首义地区的历史地位，三十日又议决：“承认武昌为民国中央军政府，以鄂军都督执行中央政务”。武昌方面立予反驳，说“既以湖北为中央军政府，则代表会亦自应在政府所在地。府、院地隔数千里，办事实多迟滞，非常时期，恐失机宜”。接着便派居正等到沪，力争各省代表会在湖北举行。上海方面审时度势，感到不宜再坚持原议，在十月初五议决：“各省代表赴鄂，宜各有一人留沪；赴鄂者议组织临时政府事，留沪者联络声气，以为鄂会后援。”十月上旬，鄂、湘、闽、鲁、苏、皖、桂、直、豫、浙、川等 11 省代表 23 人陆续到达武汉。此时恰值清军攻陷汉阳，武昌危急，因此代表会只得在汉口英租界顺昌洋行内举行。十月初十开第一次会，举谭人凤为议长，会议开至二十日，主要议决以下事项：一、通过《临时政府组织大纲》二十一条；二、同意与北方停战，并接受南北方举行“议和谈判”，以推翻清政府、建立共和政体为议和条件。会议期间，江浙联军攻克南京，代表会当即议决：临时政府设于南京；各省代表转到南京开会，俟 10 省以上代表出席，即开会选举大总统。这时，由于汉阳的失守、南京的光复以及黄兴等自武昌返上海，相对地增强了上海方面的地位，因此，他们又抢先召开会议。南京光复后第三天（十月十四日），陈其美、程德全、汤寿潜三都督即邀集各省留沪代表举行会议，决定暂以南京为临时政府所在地，选举黄兴为大元帅、黎元洪为副元帅，由大元帅负责筹组临时政府。对此，黄兴一再推辞，黎元洪不甘居黄兴之下，通电要求取消黄兴的大元帅职位，汉口代表会认为其选举不合法定人数，没有权利选举元帅，这样，上海的选举归于无效。十月二十二日，到达南京的 15 省代表即行开会，举汤尔和（1877—1940）为议长。二十四日代表会决定二十六日选举临时大总统。可是二十五日浙江代表陈毅向代表会报告说：袁世凯代表到汉时，已表示“袁内阁亦主张共和”。当天北方议和代表唐绍仪通过胡瑛和王正廷从武汉也急电南京各省代表，说袁“极愿平和了结”，“宁会选举，务乞稍缓”。会外袁世凯的插手，会内立宪派和投机政客乘机响应附和，促使代表会作出决定：缓举临时大总统，重又承认上海所举大元帅、副元帅，并在《临时政府组织大纲》中追加一条：大总统未选定以前，其职权由大元帅暂任之。然而因为武昌集团本来就反对关于黄兴为正、黎元洪为副的决议，这时苏浙军人又以汉阳败绩为借口反对黄兴为大元帅，代表会只好在二十七日改举黎元洪为大元帅，暂驻武昌；黄兴副之，而代行大元帅职权，组织临时政府。但黄兴在得到孙中山即将归国的确讯后，认为组织政府应待孙中山归来决定，因而并未到职。孙中山是革命派的公认领袖，在全国人民中有崇高的威望。他在美国得到武昌起义成功的消息后，为促成民国的建立，即开始遍访美、英、法等国朝野人士，力争他们对新政权予以政治上和经济上的支持。十一月初六孙中山抵达上海，受到各界群众的热烈欢迎。初十，各界代表

在南京举行临时大总统选举，与会17省代表，每省一票，孙中山以16票当选。1912年1月1日（宣统三年十一月十三日）孙中山在南京宣誓就任临时大总统，正式宣告中华民国成立。2日通令各省改用阳历，定1912年为民国元年。3日各省代表会议增选在武昌的湖北省军政府都督黎元洪为临时副总统，并通过了孙中山提出的国务员（各部总长）名单：黄兴为陆军总长，王宠惠（1881—1958）为外交总长，蔡元培为教育总长（以上三人为同盟会员），张謇为实业总长，汤寿潜为交通总长（以上二人为江浙立宪派首领），程德全（旧官僚）为内务总长，黄钟英（1868—1912，起义舰长）为海军总长，伍廷芳为司法总长，陈锦涛（1870—1939）为财政总长（以上二人均在清政府任过职，又分别为受过西方影响的“法界前辈”和“理财专家”）。按照总统制组织原则以及根据同盟会所确定的“部长取名，次长取实”的办法，孙中山直接任命的九部次长、三局局长和总统府秘书长等均为同盟会的骨干。28日，由各省都督府各指派代表三人在南京成立临时参议院，作为立法机关；43名临时参议员中，同盟会员占33人，自治学社1人，与革命派有过联系的绅士1人，立宪派8人；同盟会员林森（1867—1943）、王正廷为正副议长。至此，资产阶级共和国的政权体制、组织机构基本确立。

中华民国南京临时政府成立以后，不仅颁布了一部具有资产阶级共和国宪法性质的文件——《中华民国临时约法》，还先后颁布了一系列具体的法律、法令，推行了许多打击封建主义、有利于资本主义发展的进步性措施。在保护人民权利方面，根据“天赋人权，胥属平等”的原则，宣布人民享有选举、参政、居住、言论、集会、信教等一切公民权利；取消法律中对各项所谓“贱民”的歧视和特别限制；禁止买卖人口；废除奴婢卖身契约和一切主奴名分；禁止“刑讯鞫狱”，焚毁不法刑具；通令保护华侨，禁止贩卖华工；革除清朝官场中“大人”、“老爷”称谓，宣布职员为“人民公仆”，官厅人员咸以官职相称，民间普通称呼则曰“先生”或“君”；废止跪拜礼，规定普通相见为一鞠躬，最敬礼为三鞠躬。在革除社会陋习方面，严禁种吸鸦片；禁止赌博、蓄辫、缠足等；提倡俭朴和廉洁奉公，上至大总统，下至一般职员，除食宿由政府供给外，每人一月只发军用券30元。在社会经济方面，宣布政府经营实业的方针，颁布保护工商业的法令和规章；废除一些清代的苛税；鼓励发展有利于国计民生的工矿企业，提倡垦殖事业；奖励华侨在国内投资。在文化教育方面，禁用清政府学部颁行的教科书，废止小学读经科；重新编写“合乎共和国民宗旨”的教科书，并对教育进行一系列改革。这些政策和措施，体现了资产阶级的原则和利益，具有反封建的革命性和进步性。因此以孙中山为首的中华民国南京临时政府的成立，就宣判了清王朝和封建帝制的死刑，促进了民主精神的高涨，给饱受苦难的中国人民带来了新的希望。但是，以资产阶级革命派为主体的南京临时政府，并没有触动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基础。对内，它没有解决农民的土地问题，也没有使广大劳动人民得到实际的民主权利，对旧的政权机构未给予有力的冲击。对外，它对帝国主义始终充满着畏惧和幻想，明确宣布继续承认清政府与帝国主义签订的一系列不平等条约，继续偿还清政府所借的一切赔款和外债。这些都表现了中国民族资产阶级的软弱性和妥协性。正是因为这种软弱性和妥协性，尤其对汉族地主官僚存在幻想，使革命派未能组织独立各省军队进行北伐，直捣北京，推翻清王朝，而是把希望寄托在大地主大资产阶级的代表袁世凯反正，以便取得革命的廉价胜利上。因此，在帝国主义和封建势力的联合进攻下，资产阶级革命派只能步步退却，最后通过南北议和，在清帝退位和袁世凯赞成共和的条件下，将政权让与大地主大资产阶级的代表袁世凯。1912年2月13日，孙中山向临时参议院辞职；4月1日正式解除临时大总统职务；5日临时参议院议决迁都北京，南京临时政府至此夭折。此后，北洋军阀集团和蒋介石集团先后把中华民国变成了地主、买办阶级联合专政的工具。

（王　才）

清帝溥仪退位

1912年2月12日清帝溥仪颁布退位诏书，宣告结束清朝封建专制统治的历史事件。

在资产阶级领导的民主革命运动和人民群众反抗斗争的有力打击下，经过武昌起义和各省的相继响应，清王朝已经土崩瓦解，其实权已为被它重新起用的袁世凯所掌握。在“南北议和”中，袁世凯和南方革命势力都要结束清政府，争论的中心只是由哪一方掌握未来的中央政权的问题。在内外压力下，孙中山向袁世凯让步，1912年1月15日明确表示：“如清帝实行退位，宣布共和，则临时政府决不食言，立即正式宣布解职，以功以能首推袁氏。”袁世凯在得到南方的确切保证后，便集中全力进行“逼宫”。1月16日袁与内阁诸大臣联衔密奏，要隆裕太后召集皇族会议，“速定方针”；同时他代表内阁全体成员向隆

裕辞职。这天，当他从皇宫出来行经东华门大街时，革命党人突然向他投掷炸弹，却未炸中，党人被捕牺牲。袁受此虚惊后即乘机称病不再入朝，在幕后指挥爪牙加紧逼迫清帝退位。在内外胁迫下，隆裕于1月17日召开第一次御前会议，庆亲王奕劻和贝子溥伦受袁贿买，主张在取得优待条件下，“自行逊位”。恭亲王溥伟、肃亲王善耆及辅国公载泽等表示反对。双方驳诘甚久，无结果而散。次日再议，仍无结果。19日，袁世凯派财务大臣胡惟德、民政大臣赵秉钧、邮传大臣梁士诒(1869—1933)等为内阁代表，邀集载沣、奕劻及其他满蒙王公亲贵到内阁会议。会上除溥伟重弹“痛剿”的老调外，其余群臣中无一人敢公开站在溥伟一边。胡惟德等乃联衔奏称：“人心已去，君主制度恐难保全，恳赞同共和，以维大局。”隆裕遂于当天再次召集御前会议，袁内阁仍派胡、赵、梁为代表出席与议。会上胡等正式提出拟由袁世凯在天津另设临时政府的意见，受到与会王公亲贵的一致反对。1月20日南京方面正式向袁世凯提交了清帝退位的优待条件，促清帝下台。这时，皇族亲贵中一些顽固分子组织所谓“宗社党”，誓与革命为敌，并用以对抗袁世凯的“逼宫”；有些蒙古封建王公且回归本旗，图谋武装反抗。在22日召开的御前会议上，奕劻避不出席，与会的皇族亲贵及蒙古王公一致要求隆裕坚持君主立宪，拒绝民主共和。隆裕左右为难，决定采取拖延的办法，提出采取何种政体由“国会”解决。袁世凯见清廷仍不同意退位，即向隆裕复奏：“如改为国会议决国体，则优待皇室条件，似亦应由国会议定，能否照前优隆，臣未敢预决。”接着他又指使前不久还通电“誓死反对共和”的段祺瑞等50名北洋将领于1月20日致电内阁、军咨府、陆军部，强硬要求清廷“明降谕旨，宣示中外，立定共和政体”，并且警告清室“杀身之祸且在目前”。就在这时，川籍革命党人彭家珍(1888—1912)乘宗社党骨干良弼(1877—1912)回家时，在其门前投掷炸弹，彭当场牺牲，良弼受重伤后两天毙命。于是那些爱财而又惜命的王公亲贵们“人人变色，无敢有异词者”，且纷纷逃离北京，潜居青岛、大连、天津等地的租界中；隆裕也彻底屈服。1月30日隆裕再次召开御前会议，决定让袁内阁准备宣布共和的诏旨。2月3日，清廷授权袁世凯与南京临时政府商酌退位条件。经双方反复讨论，南京方面于2月9日向袁世凯送交了以下三个文件：一、《关于大清皇帝辞位后之优待条件》(共八款)的最后修正案，主要内容为：大清皇帝辞位之后，(一)尊号仍存不废。中华民国以待各外国君主之礼相待；(二)岁用400万两，由中华民国拨给；(三)暂居宫禁，日后移居颐和园，侍卫人等照常留用；(四)其宗庙陵寝永远奉祀，由中华民国酌设卫兵妥慎保护；(五)德宗(即光绪帝)崇陵未完工程继续进行，其奉安典礼仍如旧制，所有实用经费均由中华民国支出；(六)以前宫内所用各项执事人员可照常留用，惟以后不得再招阉人；(七)其原有之私产由中华民国特别保护；(八)原有之禁卫军归中华民国陆军部编制，额数俸饷仍如其旧。二、《关于清皇族待遇之条件》：(一)清王公世爵概仍其旧；(二)清皇族对于中华民国国家之公权及私权与国民同等；(三)清皇族私产一体保护；(四)清皇族免当兵之义务。三、《关于满蒙回藏各族待遇之条件》：(一)与汉人平等；(二)保护其原有之私产；(三)王公世爵概仍其旧；(四)王公中有生计过艰者设法代筹生计；(五)先筹八旗生计，于未筹定之前八旗兵弁俸饷仍旧支放；(六)从前营业居住等限制一律蠲除，各州县听其自由入籍；(七)满蒙回藏原有之宗教听其自由信仰。2月11日清廷接受优待条件，决定退位。12日，在养心殿举行了爱新觉罗王朝最后的一次朝见仪式。隆裕太后偕6岁的皇帝溥仪接受了内阁首次改用的三鞠躬礼，然后将退位诏书交胡惟德，使布告全国。从此统治中国268年的清王朝连同在中国延续2000多年的君主专制制度一起宣告结束了。(王　才)

《中华民国临时约法》颁布

《中华民国临时约法》，1912年3月中华民国南京临时政府颁布的具有资产阶级共和国宪法性质的国家临时大法。依据资产阶级“自由、平等、博爱”的精神和三权分立的组织原则，拟定国家的根本大法，是巩固资产阶级共和国的根本大计。对此，资产阶级革命党人是十分重视的。早在同盟会建立时，孙中山就在其政纲中明确规定了未来国家的资产阶级共和国的体制和政权组织方案。武昌起义后，宋教仁从上海抵武昌，首先为湖北军政府拟定了一部根本法——《中华民国鄂州约法》；后来各省都督府代表会议通过的中华民国临时政府组织大纲，即以此约法为依据，南京临时政府颁布的临时约法，也是在这部约法的基础上拟定的。以孙中山为首的中华民国南京临时政府的成立，标志着资产阶级共和国的诞生。为了用法律的形式把资产阶级共和国的国体和政体确立起来，巩固国基，维护和发展资产阶级的利益，从1912年2月7日起，在孙中山的主持下，南京临时参议院召开了制订约法的会议。经过两次起草，32

天的讨论，通过二读、三读手续，于3月8日获得通过。3月11日，即袁世凯在北京就任临时大总统的第二天，孙中山正式公布了《中华民国临时约法》。《临时约法》分总纲、人民、参议院、临时大总统、副总统、国务员、法院、附则七章，计56条。它确立了资产阶级民主共和国的国家制度："中华民国，由中华人民组织之"；"中华民国之主权，属于国民全体"；"中华民国领土，为二十二行省，内外蒙古，西藏，青海"。这就用根本法的形式否定了"朕即国家"的封建君主专制制度，向全世界明确宣布中国是一个领土完整、主权独立、统一的多民族国家。关于人民，《约法》规定："中华民国人民一律平等，无种族、阶级、宗教之区别"；人民享有人身、居住、财产、言论、出版、集会、结社、通信、信仰等自由；有请愿、诉讼、考试、选举及被选举等权利；也有纳税、服兵役等项义务。体现了资产阶级民主精神，对于促进人民觉醒、废除封建等级制度，有着积极作用。《约法》确定以资产阶级"三权分立"的原则建立政府组织机构："中华民国以参议院、临时大总统、国务员、法院行使其统治权。"参议院为最高立法机关，行使中华民国之立法权，由各地方选派之参议员组成。它有权议决一切法律案、预算决算、税法、币制及度量衡之准则；公债的募集及国库有负担之契约；选举产生临时大总统、副总统；弹劾临时大总统和国务员；对临时大总统行使的某些权力具有同意权和最后决定权。临时大总统和内阁为行使行政权的最高行政机关。临时大总统代表临时政府总揽政务，拥有公布法律、统率全国海陆军队、制定官制官规、任命文武职员、宣战媾和、缔结条约、宣布戒严、大赦、特赦、减刑、复权等权力。内阁由国务总理及各部总长组成，为临时大总统以下的中央行政机关。国务总理及各部总长称国务员，辅佐临时大总统负其责任。法院为行使审判权的司法机关，由临时大总统和司法总长分别任命的法官组成；法官独立审判，不受官厅的干涉，且一般实行公开审判。法官为终身制。从实际情况考虑，《约法》在国家机构的体制上，特意将原来《临时政府组织大纲》规定的总统制改为责任内阁制，确定内阁总理由议会的多数党产生；总理对总统要办的事项，如不同意，可以驳回；总统颁布命令须由总理副署才能发生效力。它的目的就是用缩小总统权力、增大总理职权的办法，来限制袁世凯实行专制独裁，从而保卫民主共和制度。《约法》附则规定：该约法施行后，限10个月内，由临时大总统召集国会，制定中华民国宪法，"宪法未施行以前，本约法之效力，与宪法等"。为防止对《约法》随意改动，它规定增修《约法》必须"由参议院三分之二以上，或临时大总统之提议，经参议员五分之四以上出席，出席员四分之三可决，得增修之"。《约法》的各项规定充分表明它是依据美、法等资本主义国家的宪法原则而订立的。这部具有资产阶级共和国宪法性质的文件，是辛亥革命的硕果，也是1840年鸦片战争以来中国人民长期革命斗争的积极成果。它集中体现了资产阶级的意志，反映了资产阶级的利益和愿望，在中国民主宪政史上具有划时代的意义。但是，由于资产阶级并未取得政权，所以这部资产阶级的《约法》很快就被袁世凯废除了。

（王　才）

白朗起义

北洋军阀统治初期，白朗领导的一次规模最大、带有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色彩的农民起义。

白朗（1873—1914），字明心，河南宝丰人。因身材高瘦，腿长行快，因名谐音，号称"白狼"。青年时代曾投巡防营当兵，枪法颇精。虽目不识丁，而胆略颇壮，后因犯律潜逃回乡。武昌起义爆发后，各省纷纷宣布独立，白朗亦率众在家乡宝丰县起义，在宝丰、鲁山一带坚持反清武装斗争。辛亥后，袁世凯篡夺革命果实，为了加强对河南的统治，1912年3月派其表弟张镇芳（1864—1933）任河南都督。张对河南人民进行残酷剥削，致使经济凋敝，民不聊生，豫南一带十室九空，死亡流离，道殣相望。贫苦农民纷纷揭竿而起，千百成群，几成燎原之势。张镇芳剿抚兼施，诱骗各支农民武装首领就范。1912年10月，有10多位农民武装首领在鲁山"受抚"，结果全部被杀。白朗坚决拒绝受抚；再加上他"性豪爽，善驭人，疏财仗义"，深受义军钦佩和爱戴，很多被打散的农民队伍纷纷投奔白朗，使这支原来只有几十人的农民武装，顿时增加到六七百人。白朗整顿队伍，申明纪律，提出"打富济贫"的口号，号召广大贫苦农民参加。1912年冬，为了避开敌人的重兵围攻，白朗率部离开宝丰、鲁山一带，在东至京汉铁路的西坪、遂平、确山，南至湖北的随县，西至邓县、淅川一带来往流动作战。所到之处，打击地主豪绅，将其财物分给农民，受到广大农民的热烈拥护。至1913年春，起义军已扩大到二三千人。5、6月间，白朗亲率起义军1000余人南下，5月底攻下河南重镇唐县，6月又攻克富庶的禹县，7月初攻克鄂、豫、陕三省交界的重镇荆紫关，声威大振。

1913年夏，反袁的二次革命爆发前后，资产阶

级革命党人曾主动与白朗联络共同讨袁。是年5、6月间，河南国民党人熊嗣鬻曾至白朗军中联络，从此，白朗乃以“二次革命”之说号召群众。稍后，江苏讨袁军总司令黄兴曾写信给白朗，要求他进攻湖北，配合讨袁军作战，但因所派信使被张镇芳捕杀，信未能送到。同时，黄兴还委派河南国民党人杨体锐为河南讨袁军豫西民军司令，令其联络白朗。杨亲到白朗军中游说，白朗颇受其影响，表示愿听约束。不久，杨被张镇芳捕杀，国民党与白朗的联系中断。还有记载说，孙中山也曾致函白朗，并向其军中派遣革命党人充当参谋。总之，白朗起义军确曾受到革命党人的影响，公开打出“政治革命”的旗帜，“假伟人（指孙中山）名义号召党羽”，勇猛地打击封建军阀的反动军队，牵制了袁世凯用来镇压二次革命的力量。9月，白朗又进军湖北，围随县，攻占重镇枣阳。此时二次革命的各路讨袁军相继失败，白朗不得不放弃和革命党人联合作战的打算，于10月率众回师北上，11月仍攻占白朗故乡宝丰城。在进军过程中，鄂、豫破产农民、开封的进步青年以及在二次革命中被打散的国民党军队，纷纷投入白朗军，至1913年底，白朗义军已发展至万余人，成为当时坚持反袁武装斗争的震惊中外的一支生力军。

然而由于二次革命失败，袁世凯得以调集更多的兵力镇压白朗军，遂严令张镇芳限期全部剿灭白朗军。张镇芳会同新任河南护军使赵倜（1871—？）等策划了“围剿”计划，扬言要在一个月内，把白朗起义军全部消灭在宝丰、鲁山一带。在这种形势下，部分投入白朗军的资产阶级革命党人建议白朗迅速离开河南，直往安徽，下至南京，举黄兴为大元帅，谋据长江中心，上窥武汉，下图皖、赣，联合皖、苏革命党人，重新开展反袁斗争。白朗接受此建议，于1913年底率万余众，越过京汉铁路，连克豫东南的光山、潢川、商城等地。1914年1月，又攻克安徽六安、霍山，起义军发展到2万余众，转战鄂、豫、皖三省，声势大振。袁世凯大为惊慌，撤换镇压不力的张镇芳，派陆军总长段祺瑞兼河南都督，从豫、鄂、皖、苏等省调集北洋主力军队数万人，企图将白朗军队聚歼于霍山、六安、霍丘之间。英、美、俄、法等帝国主义纷纷派出武官到信阳“观战”，为北洋军打气助战，出谋策划。俄国还派出飞机对起义军进行侦察。1914年2月，白朗军突围入鄂，3月7日，一举攻克湖北商业重镇老河口，歼敌2000，缴获大批枪枝弹药，并把英国的煤油公司、缝刺机器公司、烟草公司以及天主教堂、医院等，尽付一炬，对中外反动派打击甚大。但由于白朗受到资产阶级革命党人的影响，并没有把外国教会当作打击的目标。在老河口，白朗召开各路首领参加的军事会议，议定避实就虚，西走陕、甘，夺取四川为根据地，以长期坚持反袁斗争。同时改编了队伍，称“公民讨贼军”，又称“中原扶汉军”，白朗自称“中原扶汉军大都督”，以李鸿宾为参谋长，正式组织起统率机构，将队伍分编为前、中、后三军，以王生岐（参加过辛亥革命和二次革命）、韩世昌、白瞎子分领之。3月10日，白朗率众离开老河口，14日攻克豫、陕交界的荆紫关，4月初逼近西安，5月进入甘肃，连克岷州（岷县）、洮州（临潭），所到之处，遍贴告示，痛斥袁世凯反动统治，阐明起义宗旨，揭露袁世凯八大罪状：托名共和，厉行专制；纵容宗社党，不加防制；摈除贤士，宠信爪牙；植党营私，排除异己；摧残人民，较清朝尤甚。宣称要纠合豪杰，为民请命，甚至还提出“平等自由”的口号和“逐走袁世凯”、“设立完美政府”（指共和制政府）的奋斗目标，这比起义初期的“打富济贫”口号，具有鲜明的民主主义色彩。洮州等地为回、藏等少数民族聚居之区，由于反动政府的离间、煽动，白朗起义军未能处理好民族关系，曾与少数民族发生冲突，使起义军陷入困境。在洮州，再次举行军事会议，白朗等少数领导人坚持原来入川计划，主张取道松潘，以至成都，而多数将领和士兵思乡情绪严重，主张立即东归，仍返豫、鄂一带。白朗见众志难违，遂于1914年5月下旬率部1万余人，长驱入陕，途中不时与追赶之敌发生战斗，7月上旬进入荆紫关时，部众已不足万人。为了避免敌人集中兵力围剿，改为各将领分别统率部分起义军在不同地区分散活动，白朗自率1000余人回宝丰。由于兵力分散，战斗力大减，便于敌人各个击破。8月上旬，白朗在临汝、宝丰交界的虎狼爬岭被围，突围时身负重伤，不久牺牲，起义军溃散失败。白朗起义是在辛亥革命高潮中爆发的一次带有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色彩的农民起义，历时三年，驰骋豫、鄂、皖、陕、甘五省，先后攻克50多座县城，迫使袁世凯政府调集20万大军进行镇压，四易统帅，使袁世凯反动政权遭到巨大打击。同时起义军所到之处打劫富家，筹备饷械，外商投资的企业也在劫难逃，说明白朗起义军既反封，又兼具反帝性质，在近代中国人民反帝反封建的斗争史上，占有重要地位。但终因其未能克服农民阶级自发分散、宗派主义、流寇主义等弱点；又由于资产阶级革命党的软弱无力，未能给起义军以有力的支持，以致不可避免地遭到失败的命运。

（刘振岚）

袁世凯窃国

1912年大地主大资产阶级的政治代表袁世凯在帝国主义的支持下，迫使资产阶级革命派让出政权，窃据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的历史事件。

武昌起义爆发后，帝国主义和国内大地主大资产阶级一致认为，只有重新起用北洋军阀首领袁世凯，才能挽救他们在中国的垂危统治。一时间形成了一股"非袁莫属"、"非袁则亡"的反动舆论。在帝国主义的压力下，面对革命党人的起义一筹莫展的清王朝，被迫于宣统三年八月二十三日(1911年10月14日)任命在河南彰德"养疴"的袁世凯为湖广总督，前往湖北剿杀革命。擅长玩弄反革命两面派手法的袁世凯则要利用革命的声势迫使清王朝让出全部实权；又以一打一拉的手段，诱使革命派妥协，最后取消南北两个政权对峙的局面，由他建立统一的全国政权。他利用清廷被迫再次敦请其"出山"之机提出：明年即开国会、组织责任内阁、宽容参与此次事变诸人、解除党禁、授予指挥水陆各军及关于军队编制的全权及十分充足的军费等六条要求，实际就是要清政府交出军政实权并用以讨好、迷惑革命派。在革命迅速发展的形势下，载沣被迫再次让步，于九月初六任命袁世凯为钦差大臣，授予指挥水陆各军的全权；初九宣布解散皇族内阁，解除党禁，命资政院立即起草宪法；十一日命袁世凯为内阁总理大臣，全权组织责任内阁。这时南方各省相继起义；北方陕西、山西宣告独立，第六镇统制吴禄贞暗与山西都督阎锡山会晤，组织"燕晋联军"以攻北京，并下令扣留经石家庄南运之军火，上书清廷主张停战。鉴于这种形势，取得实权的袁世凯即于九月初九从彰德南下，进驻湖北孝感，命冯国璋攻陷汉口；九月十四日他又派人在石家庄刺杀了吴禄贞。接着，他在回北京组织内阁的同时，通过英国驻汉口总领事向黎元洪正式提出"和议"问题。十月初八，按照袁世凯的命令，清军攻陷汉阳，但并未渡江，只是在龟山上架起大炮向武昌进行轰击；同时，袁又通过英国驻汉口领事再次向革命党人提出停战和谈的建议。在袁世凯的武力威胁下，在汉口召开的各省都督府代表会议同意和谈，并决议只要袁世凯反正，就公举他为临时大总统。十月二十八日，南方独立各省代表伍廷芳与袁世凯的代表唐绍仪在上海正式开始议和谈判。双方争论的焦点表面上是实行民主共和还是君主立宪的问题，实际上则是选举袁世凯为民国临时总统的问题。同会议上的谈判相配合，帝国主义以及立宪派、旧官僚，甚至相当一部分革命派，一致起来压迫以孙中山为首的革命者向袁世凯让权。在内外压力下，临时大总统孙中山于1912年1月15日明确表示："如清帝退位，宣布共和"，即让位于袁氏。袁世凯在得到南方的确切保证后，便掉转头来逼迫清帝退位。一些皇族亲贵组织宗社党，企图作垂死挣扎，但已无能为力。2月11日，袁世凯以清帝溥仪退位电告南京临时政府，并宣布赞成民主共和的政见，表示"永不使君主政体再行于中国"。在清帝退位诏书中，袁又擅自添入"即由袁世凯以全权组织临时共和政府，与民军协商统一办法"等语，暗示他的政权系由清室递嬗而来。对此，孙中山虽予驳斥，但仍在2月13日向临时参议院提出辞职咨文，推荐袁世凯接任临时大总统。15日，临时参议院选举袁世凯为临时大总统，选举黎元洪再任副总统。为了维护资产阶级共和制度，孙中山在辞职咨文中特提出三个附带条件：一、临时政府地点设于南京，各省代表议定，不能更改；二、俟参议院举定新总统，亲到南京受任之时，大总统及国务员乃行解职；三、《临时约法》为参议院所制定，新总统必须遵守，颁布之一切法律章程，非经参议院改订，仍继续有效。这三项条件中的第一、二两项是企图把袁世凯调离他经营多年、实力雄厚的北京；第三项则是企图用资产阶级的宪法来约束袁世凯。为促袁南下，18日孙中山电告袁世凯：决定派教育总长蔡元培为迎袁专使，偕同魏宸组(1885—?)、宋教仁、汪精卫等欢迎员前往北京迎袁来宁就职。27日迎袁专使抵京。袁世凯是绝不会离开他经营多年、有着雄厚基础的北方前往革命派力量较强的南方的。为欺骗世人，他特命开正阳门迎接专使。与蔡等见面后，立即应允赴宁就职，并计划先至武昌，再沿江东下至南京。暗地里却指使爪牙盗用民间团体的名义或通电、或致函、或登门直接向迎袁专使无理取闹，举出种种"理由"，"佥以袁君不能离京为言"。2月29日，驻北京的曹锟所属第三镇北洋军奉命哗变，其士兵在东城和前门一带纵火焚烧；当夜北京市民数千家惨遭焚劫；变兵们甚至持械闯入迎袁专使的住所进行威吓。3月1日变兵又继起大掠西城。接着通州、高碑店、长辛店、黄村、三家店、保定、天津等地也相继发生兵变，洗劫居民店铺。这时袁世凯又函请英国驻华公使朱尔典"设法维持北京之秩序"。3月3日各国军队700多人列队出现北京街头；随后各国又分别从哈尔滨、山海关、旅顺、天津、青岛、香港等地增调军队入京，总数达3000人。段祺瑞等乘机再次发表通电："临时政府必应设于北京，大总统受任必

暂难离京一步，统一政府必须旦夕组成。”黎元洪也危言耸听地通电各省：“舍南京不至乱，舍北京必至亡。”在此形势下，3月1日、2日，迎袁专使蔡元培等分别致电孙中山和南京临时参议院，表示“速建统一政府，为今日最重要问题，余尽可迁就，以定大局”，主张“改变临时政府地点”。在一片“迁就”声中，孙中山只好再次让步。3月6日，南京临时参议院决议统一政府组织办法六条：一、由参议院电告袁世凯允其在北京受职；二、袁接电后即电参议院宣誓；三、参议院随后即复电承认受职，并通告全国；四、袁受职后即将拟派国务总理及国务各员电达参议院征请同意；五、国务总理及国务各员确定后，即在南京接收临时政府；六、孙中山于交卸后始行解职。7日孙中山将上述办法电达袁世凯。8日袁世凯将其就职誓词电致南京参议院，宣称：“世凯深愿竭其能力，发扬共和之精神，涤荡专制之瑕秽，谨守宪法。”第二天，参议院复电袁世凯，同意袁之誓词，“认大总统为受职”。10日袁世凯在北京正式就任临时大总统。13日经临时参议院同意，袁任命唐绍仪为国务总理。25日唐抵南京组织内阁。30日，袁任命各部总长：外交：陆征祥（1871—1949），内务：赵秉钧，财政：熊希龄，陆军：段祺瑞，海军：刘冠雄（1858—?），司法：王宠惠，教育：蔡元培，农林：宋教仁，工商：陈其美，交通：唐绍仪（兼）。外交、军事、内务、财政大权均掌握在袁世凯的亲信手里，革命党人虽也占有几个席位，但均属摆设性的。4月1日孙中山正式解职，其他一些同盟会的重要领导人也“相率下野”。黄兴以南京留守的名义，暂在南京主持留守府。5日，临时参议院议决临时政府迁往北京。这样，由于资产阶级革命派的妥协退让，在帝国主义的支持下，袁世凯终于窃取了辛亥革命的成果，在中国重新建立了大地主大资产阶级的专政。（王　才）

张振武案

1912年8月黎元洪勾结袁世凯制造的暗杀湖北首义党人张振武事件。

1912年春，清朝旧军官出身的湖北都督黎元洪逐渐独揽了湖北军政府的军政大权，并配合袁世凯，排挤、镇压和屠杀湖北首义党人。其中影响最大、激起全国政治风潮的便是谋杀张振武事件。张振武（1883—1912），原名尧鑫，字春山。湖北竹山人。肄业于湖北省师范学校，任小学教员，后加入共进会，为负责人之一。武昌起义时，在群龙无首的情况下，他与蔡济民共同挑起了指挥全局的重任。起义胜利后，出任军务部副部长，对于革命初期的政权建设、稳定革命秩序以及武汉保卫战都做出了贡献。他思想激进，武昌起义时激烈反对以黎元洪为湖北军政府都督，曾说：“我不相信他能够革命！”并主张将黎斩首示众。民国成立后，对黎元洪把持下的湖北政局不满，曾表示：“鄂政不良，我等当再度革命”，“革命非数次不成，流血非万万人不止”，从而遭黎忌恨。同时，作为军务副部长，张在湖北军队中颇有影响，“得鄂军士心”，他手下还直接掌握有两支军队，一支是3000人的将校团，以其心腹方维为团长。另一支是原兵站总监所辖的6个大队，共千余人。黎元洪一直把这两支军队，特别是将校团视作眼中钉，屡欲遣散，张皆“抗不遵令”，从而被黎视为心腹之患。兼之张刚毅自信，为人坦直，锋芒毕露，桀骜不驯，尤其藐视黎元洪，有时因与黎意见不合，竟至拔枪威胁，使黎深为不满。宣统三年（1911）冬，张到上海购置枪械，准备北伐，因在用款问题上有漏洞，受到舆论谴责。回鄂后，都督府召开特别会议，清查他的帐目。张对黎大发雷霆，拍桌怒骂：“我们把你拉出来当了大都督，现在已经安富尊荣了，你也清起我们的帐来了！”张如此居功自傲，飞扬跋扈，为黎元洪所不能容忍，必欲除之而后快。但黎又害怕承担擅杀首义功臣的罪名，于是想出了一个借刀杀人之计——假手袁世凯，在北京除掉张振武；同时在北京杀张振武还有一个好处，即可避免湖北因此发生动乱。黎元洪杀张振武的图谋，得到袁世凯的全力支持，袁通过参谋次长陈宧（1869—?）主谋，操纵黎元洪，并与黎的幕僚们共同策划了杀害张振武的具体策略：先由袁世凯电邀首义党人进京，再由黎电袁推荐。从1912年春开始，袁屡电武昌，共召首义党人及将领百十人入京，首当其冲便有张振武。张于当年5月进京，袁给了他一个“蒙古屯垦使”的头衔作为敷衍，张不满意，负气返回湖北。8月初，袁再次电召张到京，黎特拨给路费4000元，促张迅即北上。张携方维等于8月10日前后到达北京，接受“蒙古屯垦使”一职，并雄心勃勃地投递《上袁大总统书》，建议筹边之策；同时为联络南北感情，积极调和党见，于14日在德昌饭店宴请共和党和同盟会两党要人。正当张振武兴高采烈之际，袁、黎谋士们的毒杀阴谋也在加紧进行。陈宧与黎元洪的亲信秘书饶汉祥（1876—1927）共同为黎元洪起草了一道致袁世凯的密电，密电指责张振武“怙权结党，桀骜自恣”，并诬告张“蛊惑军士，勾结土匪，破坏共和，昌谋不轨。狼子野心，愈接愈厉”，要求“将张振武立予正法”。又谓将校团团长方维与

张“同恶相济”，应“一律处决，以昭炯戒”。此电由黎元洪签署后，于8月11日发出，即有名的“真电”。15日，袁世凯签发捕杀张振武的军令。当晚8时，张振武与鄂省在京将校一起宴请北方将校，10时席散，张乘马车返归金台旅馆。当行至前门棋盘街“振武敷文”牌楼下时，忽然伏兵四出，将张绑缚至西单牌楼京畿军政执法处，未经审讯，即于16日凌晨1时将张处死，方维也在当夜被处死。黎元洪请袁世凯在京暗杀张振武、方维，意欲借刀杀人，结果却弄巧成拙，17日报上全文登出黎之“真电”及袁世凯军令大意，使全国舆论哗然，“群情愤激”，“函电纷驰”，各界一致谴责黎元洪为杀害首义功臣的“罪魁”。向有“忠厚长者”之称的黎元洪，在人们心目中的形象从“黎菩萨”变成了“黎屠户”。黎始知被袁所卖，甚为尴尬。袁世凯则获一箭双雕之利——既打击了革命党；又挑拨了黎元洪与革命党人的关系，使其成为孤家寡人，过街老鼠，只能死心塌地投靠袁世凯。黎、袁勾结杀害张振武、方维一案，激起全国规模的政治风潮达两个月之久。参议院中，以张伯烈（1872—?）为首的20名共和党议员提出了《质问政府枪杀武昌起义首领张振武案》，并曾动议弹劾黎元洪。后为袁世凯利用政治手腕，拉拢收买共和党议员，使其放弃追究，才将弹劾案搁置。同盟会领导人对此案曾经予以谴责，同时宣布撤销黎元洪同盟会协理名义，将其从同盟会除名。但因当时重在调和南北，张振武曾参加过反对同盟会的民社，后成为共和党党员，同盟会对于他的被杀无切肤之痛，故未予十分重视。1912年9月中旬，袁世凯经与孙中山、黄兴多次洽谈，达成内政大纲八条，在征询黎元洪同意后，以袁、孙、黄、黎四伟人名义发表。南北达成表面的谐和一致，张振武一案不了了之。此案成为袁世凯更大的毒杀阴谋的问路石——资产阶级革命党人在张振武一案过程中表现的软弱、涣散，使袁世凯敢于在七个月之后悍然刺杀国民党领导人宋教仁。　　（刘振岚）

国民党成立

国民党，1912年8月以同盟会为基础，联合统一共和党、国民共进会、共和实进会、国民公党等几个小党派组织而成的民族资产阶级政党。

1912年4月临时政府北迁后，以袁世凯为首的北洋军阀的统治虽已建立，却未完全巩固；资产阶级民主派虽已失败，但南方革命力量还在，一场南北双方、革命与反革命、民主共和与专制独裁的斗争仍在继续。当时，虽然同盟会内部妥协势力日益占据上风，但仍有民主斗士宋教仁挺身而出，同袁世凯展开正面斗争。他以“议会政治”和“政党内阁”为武器，主张改组同盟会，扩大党的势力，造成议会多数，进而组织责任内阁，以钳制袁世凯，把中国纳入资产阶级民主政治轨道。宋教仁（1882—1913），字遯初，又作钝初，号渔父。湖南桃源人。光绪三十年（1904）与黄兴等在长沙创立华兴会，为副会长。因谋长沙起义事泄，逃亡日本，入早稻田大学，习法政。曾参与筹组同盟会，十分倾慕欧美近代政治，特别是英国式的议会政治和政党内阁。留日期间，他阅读并向国内翻译介绍了大批西方资产阶级政治制度和社会制度的书籍，以在中国实现西方议会政治为其终身奋斗目标。武昌起义胜利后，他兴致勃勃地从上海来到武昌，协助湖北军政府从事法制建设，草拟了成为以后《中华民国临时约法》蓝本的《鄂州临时约法》。宣统三年十月十一日（1911年12月1日），在汉口举行的各省都督府代表会议讨论中央临时政府组成时，议决虚临时总统之位，“以待袁世凯反正来归”。宋教仁对袁世凯怀有警惕，故于当年十一月初七同盟会领导人会商临时中央政府组织方案时，第一次明确提出要在中国实行责任内阁制的政治主张，即通过两党在宪政范围内的“和平竞争”，由议会中的第一大党组织责任内阁，责任内阁直接向议会负责。他认为，只要有一个代表资产阶级利益的政党掌握了内阁，便可以架空总统，使他有名无实，即使像袁世凯这样的人做总统，亦可迫其就范，则资产阶级民主政治的理想便可实现。1912年4月临时政府北迁，唐绍仪为首的混合内阁成立，宋教仁出任农林总长。不久，袁世凯违反《临时约法》，不经内阁副署即发布命令，宋教仁等四名同盟会阁员辞职，唐绍仪内阁垮台。此事使宋进一步感到要防止袁世凯利用混合内阁把持权力，实行独裁，必须联合其它政见接近的政团，组成一强大的、具有“巩固庞大之结合力与有系统、有条理、真确不破之政见”的“强健而良善”的政党，遂积极主张并实际主持了同盟会的改组。7月16日，同盟会本部讨论改组问题，多数人反对。21日再次开会，改组主张占据了上风，仅反对变更其名称。于是宋教仁等积极展开组党活动。经过一段时间的奔走联络、磋商、妥协，终于实现了同盟会与有一定反袁倾向的统一共和党、国民公党、国民共进会、共和实进会五党联合。8月11日，五党代表集会，通过宣言，13日以五党本部名义公诸于世。25日在北京举行大会，正式宣告国民党成立。宋教仁一再强调，同盟会改组为国民党，一是“求组织一健全有力之国

会”；一是“求组织一健全有力之政府”。国民党与同盟会所持态度与手段虽有不同，但牺牲精神、进取精神，必须始终如一，不能更易。他指出，从前，对于敌人，是拿出铁血的精神同他们奋斗；现在，对于敌党，是拿出政治的见解，同他们奋斗。国民党成立前夕，孙中山与黄兴联电同盟会各支部，说明同盟会改组及改变名称之必要，要求各支部对改组“务求同意”。孙中山亲自出席成立大会，发表演说，对国民党的党纲作了说明。在成立大会上选举孙中山为理事长，黄兴、宋教仁、王宠惠、王人文、王芝祥、吴景濂、张凤翙、贡桑诺尔布（1865—1931，内蒙古喀拉沁人）8人为理事，胡汉民等29人为参议。另设总务部、交际部、政事部、文学部、会计部、政务研究会六个职能部门，共有干事312人。从领导组成人员看，老同盟会员占据优势。不久，孙中山委任宋教仁代理理事长，党务实权一直为宋所掌握。国民党在北京设本部，在各省和海外各埠设立支部，国内各交通口岸设立交通部。国民党成立后，很快发展成为一个人数众多、机构遍于海内外、在临时参议院占有三分之二席位的第一大党。

国民党从筹备到成立，先后发布过《通告海外书》、《组党宣言》、《成立宣言》和《国民党规约》等文件，确定了党的宗旨、政纲、组织系统、党员权利义务等项。透过这些文件和国民党的实践活动，可以看出该党的性质属于民族资产阶级政党。它在成立时，表现了相当的进步性：一、积极维护资产阶级共和制度，强调民权，反对专制，宣称“本党以巩固共和，实行平民政治为宗旨”，其最终目的是在中国“完成共和立宪政治”，并明确提出反对“阀族”、“官僚”的独裁政治，强调“共和之制，国民为国主体”，为此特定名为“国民党”。二、主张实行责任内阁制，以防制袁世凯独裁。是实行限袁的责任内阁制，还是实行拥袁的总统集权制，这是当时进步与反动势力斗争的焦点。这场斗争，在一定程度上关系到国家政权究竟落到哪一个阶级手里的重大问题。改组后的国民党，主张扩大革命势力，组织责任内阁，敢于直接从政治上与袁世凯反革命势力相抗衡，这要比单纯提倡振兴教育、兴办实业的“社会革命”更为积极、更具现实意义；而它的实质和意义，又不仅是钳制袁世凯一人，而是要把中国引向民主宪政的轨道，体现了民族资产阶级的政治要求。除责任内阁制外，还提出“单一国制”（与联邦制相对而言，即由若干行政区域构成单一主权国家的制度）、国务总理由众议院推选、发展地方自治等政治主张，有利于增强资产阶级的政治地位。三、主张采用民生政策，发展资本主义经济。此项政策是国民党政纲的主要内容之一。同盟会在与统一共和党商谈合并时，后者提出“废去民生主义”为合并条件之一，同盟会为求得合并成功，接受这一要求，但仍坚持在政纲中保留“民生”这一特殊名词。国民党虽然放弃了“民生主义”的提法，但从它对“采用民生政策”的解释来看，“民生政策”不过是“民生主义”的代名词。《国民党宣言》说，采用“民生政策”，就是要以施行国家社会主义，“保育国民生计”；以国家权力，“使一国经济之发达均衡而迅速”。宋教仁解释说，“民生政策”就是国家社会政策，旨在不使富者愈富，贫者愈贫，以防止劳动阶级与资本家阶级发生冲突。在《国民党大政见书》里又将“民生政策”规划为兴办实业、奖励新式工业、奖励输出商品、振兴交通与农林事业等项内容，反映了民族资产阶级发展资本主义经济的强烈愿望。可见国民党并没有真正“废去”民生主义。四、在组织上团结了一支不同程度的反袁政治势力。和同盟会相比，虽然国民党的组织成分更为复杂，但是在当时整个资产阶级趋于向袁世凯妥协的历史条件下，国民党毕竟维系了一批革命分子和进步人士，形成了一支不可低估的反对袁世凯独裁的政治对立面。而且，国民党中的骨干力量，仍然大多是同盟会的革命志士，成为以后发动二次革命和筹组中华革命党的骨干力量。但是另一方面，由于民族资产阶级政治上的软弱性，看不到袁世凯作为大地主、大资产阶级政治代表的反动实质，幻想以政党内阁和平地限制其独裁野心，仅仅把组织第一大党作为唯一出发点，从而在政治和组织路线上都犯了一系列错误，束缚了本阶级的手脚，给革命事业造成严重损失。政治路线上的错误，集中体现在其政纲的倒退。国民党公布的五大政纲是：一、保持政治统一；二、发展地方自治；三、励行种族同化；四、采用民生政策；五、维持国际和平。这五大政纲不但比革命时期同盟会的三民主义纲领大为倒退，即使比起公开后的同盟会九条政纲亦有所倒退，抛弃了同盟会独具特色的“男女平权”的条文；把同盟会的多少带有反帝斗争意味的“力谋国际平等”改为不敢丝毫触犯帝国主义的“维持国际和平”，甚至与共和党政纲相比，至少从字面上，亦看不出本质区别。仅有一项“发展地方自治”与共和党相异，曾被对方攻击为“足以减杀中央统一的权力”而大张挞伐；但同时它又主张“促成政治统一”，这便使“发展地方自治”的积极意义大为降低，而与共和党的“采用国家主义”的政纲未见得绝对不能调和。如果抛开国民

党的反袁斗争实践，单从政纲上看，确实失去了同盟会时期的革命精神，而正在向着改良主义政团的方向蜕化。从组织路线上说，宋教仁等为了扩张党势，争取多数，不分新旧畛域，不问派系，大倡无原则的“化合主义”，结果造成泥沙俱下、鱼龙混杂，使相当一部分旧派人物和官僚政客进入党内，连袁世凯的亲信党羽赵秉钧及其内阁的大部分成员也被拉入党内，这势必搅乱党的阵线，加剧思想分歧、步调不一、主张各异的涣散之风，使党进一步脱离人民群众，而向官僚集团方向演化。（刘振岚）

宋　案

1913年3月袁世凯阴谋刺杀宋教仁案件。

1912年春袁世凯窃夺临时大总统宝座之后，立即着手实行反动的集权统一，逐步确立北洋军阀的军事独裁统治。但是毕竟他受到《临时约法》的制约，不能一下子撕下“忠于共和”的假面，所以又试图以政党对付革命派的政党政治，因而拉拢立宪派组织拥袁政党，旨在造成议会多数，压迫资产阶级革命派就范。这种局面使得一些资产阶级政治家对在中国实现西方议会民主政治的前景充满幻想，其中最典型的是宋教仁。宋教仁十分倾慕欧美资产阶级的代议政治，特别是英国式的议会政治和政党内阁，并以此作为终身奋斗的目标。临时政府北迁后，他通过一段时间的奔走联络，于1912年8月以同盟会为基础，结合其他几个政团组成国民党，欲借国民党实现其政党内阁的宿愿。1912年底、1913年初，在国会大选中，国民党获得重大胜利，在参、众两院共计870个议席中独得392席，占整个议席的45%强，而拥袁的共和、民主、统一三党所得总和仅223席，不到总议席的26%。1913年1月10日，袁世凯发布国会召集令，定于4月在北京召开国会。国民党内上上下下，无不喜形于色。宋教仁更是踌躇满志，大大增强了由国民党组阁、实现责任内阁制的信心，并有以国民党党魁身分(时任国民党代理理事长)出任内阁总理的抱负。于是不辞劳瘁，风尘仆仆，周游长江中下游各省，到处发表演说，批评时政，大肆宣扬政党内阁制，指斥袁世凯政府“无一善状可述”，是一个无能的、不符民意的、退步的政府。他的演说既是对袁世凯破坏资产阶级民主共和制罪行的揭露，也是对广大人民群众的一次民主思想的灌输和普及。作为第一代民主共和斗士，宋教仁的言论风采深得人心，“所至欢迎，大有倾倒一时之概”。在他的家乡湖南，他以百分之百的票数当选为参议员，满怀信心地说：“国民党在全国的选举都已胜利，已占国会的绝大多数，大局已定，政党责任内阁一定可以成功。”他并不讳言自己的政治抱负，在《答匿名氏驳词》一文中，他回击当时社会上一些攻击者的无耻谰言说：“国家既为共和政治，则国民人人皆应负责任。有人焉自信有能力，愿为国家负最大之责任，此国家所应欢迎者……吾人之志则不讳言，实深愿将来能当此责任者也。且希望人人有此希望者也，惟枉道以得之则不可耳。”表明了他欲出面组阁的决心，由此激起袁世凯的极大忌恨。袁早已认定宋是国民党的“灵魂”，是他倒行逆施的“最大障碍物”，因此曾对人说：“以暴力抢夺政权，我倒不怕，以合法手段来夺取政权，却厉害得多了。”为了阻止宋教仁南下从事竞选活动，袁亲自向宋馈赠50万元，但宋不为所动，退回支票，如期南下；袁还曾表示，可以借重宋为内阁总理，条件是放弃责任内阁制，亦被宋所坚拒。袁恨恨地说：“噫！宋教仁欲组织政党内阁耶？抑何相逼之甚也？”特别是，宋教仁并不以组成责任内阁为满足，还想凭借国民党在议会中的优势，与他党提携，通过民主选举，排斥专横跋扈的袁世凯，选举“最为愚呆脆弱的黎元洪”为总统，以便于控制总统，组成强大的“同志内阁”，保证革命党人牢牢地掌握住政权。为此，在他从事竞选活动、路过武昌时，曾“舌敝唇焦”地向黎元洪反复陈说，希望黎为首的共和党予以配合(但未得到黎的积极响应)。这个计划更使袁世凯必欲除宋而后快，“乃暗萌杀意”。于是他与心腹党羽、国务总理赵秉钧策划了一个暗杀阴谋。1913年3月20日晚，宋教仁取道沪宁、津浦路北上入京，时至上海车站送行的有黄兴、廖仲恺、于右任(1879—1964)等人。22时40分，宋走到检票处，突遭枪击，身中三弹，当即送进靶子路沪宁铁路医院。22日晨，因毒弹剧发，不治身亡。宋教仁为实现资产阶级民主制度奋斗了一生，最后献出自己的生命，享年仅31岁。他由于过分相信合法的议会斗争的威力，对袁世凯缺乏应有的警惕，当一些老革命党人劝他加强戒备时，他淡然说：“蛇影杯弓之事也，请毋虑。”又说：“此为防不胜防之事，只有处之泰然。”果遭毒手后，临终前，仍致电袁世凯谓：“望总统开诚心，布公道，竭力保障民权，俾国会确立不拔之宪法，则仁虽死犹生。”不能不说这封电报表明了宋教仁对民主事业的真诚，但同时也说明他至死也没有看透袁世凯的反动本质。

宋案发生后，袁世凯一面散布流言，说宋教仁之死系国民党内部争权的结果；一面又演出了一场贼喊捉贼的丑剧，在21日致电慰问：“岂意众目昭彰之

地，竟有凶人敢行暗杀，人心险恶，法纪何在?”怒骂“何物狂徒，施此毒手!”22日，又故作姿态地发布大总统令，称颂宋教仁“缔造共和，厥功甚伟”，“方期大展宏猷，何意遽闻惨变?”并电饬江苏都督程德全、民政长应德闳：“穷究主名，务得确情，按法严办!”23日，一个名叫王阿发的古董商向上海捕房提供了重要线索，当天即将要犯应桂馨逮捕归案，次日又抓获凶手武士英，搜出应桂馨与内务部秘书洪述祖往来的密电文本及函电多起、五响手枪一支。这些密电、函件主要包括：国务院总理赵秉钧致应桂馨密函一件、应桂馨致赵秉钧密电一通、洪述祖致应桂馨密函六件、应桂馨致洪述祖密电一通。其中：洪述祖在1913年2月1日致应桂馨的密函中，指示应要“做一篇激烈文章”，意指采取激烈行动，即刺杀宋教仁。2月2日，应桂馨密电赵秉钧，报告已由日本购买孙中山、黄兴、宋教仁“劣史”，印刷10万册，拟在横滨发行。2月4日，洪述祖密电应桂馨，告知应2日致赵秉钧之密电已“面呈总统”，总统“阅后颇有喜色”，并夸赞应“颇有本事”。又嘱刺宋事，“既有把握，即望进行”。2月12日，洪述祖致应桂馨密函，告以应之来函“已面呈总统、总理阅过”，为避人耳目，嘱以后不必通电国务院，赵秉钧已将刺宋事全归洪一人经手，有事可径与洪一人联系即可。3月13日，洪述祖致应桂馨电：“毁宋酬勋位。相度机宜，妥筹办理。”3月14日应桂馨致洪述祖电：“梁山匪魁(指宋教仁)四出扰乱(指宋在各大城市演说鼓吹政党内阁制)，危险实甚。已发紧急命令，设法剿捕之。”3月21日应桂馨致洪述祖电：“匪魁已灭，我军无一伤亡”等等。这些物证确证了杀人主使者正是袁世凯及赵秉钧，同谋犯是内务部秘书洪述祖，布置行凶的是上海大流氓应桂馨(又名应夔丞)，杀人凶犯是兵痞武士英(又名吴福铭)。

宋案发生后，孙中山主张立即组织讨袁军，武力讨袁，但在党内居少数地位。以黄兴为首的部分国民党领导人主张“法律解决”，建议组织专门处理宋案的特别法庭，推黄郛(1880—1936)为主裁，王宠惠、伍廷芳为承审官，以避免来自北京方面的行政干涉。这个建议通过江苏都督程德全向袁世凯政府提出，袁假惺惺地表示同意，暗中却指使司法总长许世英(1872—1964)以“不合编制”为借口，加以反对。组织特别法庭审理宋案的建议不能实行，而改由在地方法院内设特别旁听席，以接待与本案有关人士，并确定由上海地方法庭负责审理。4月16日、17日，上海会审公堂先后将凶犯武士英和应桂馨移交上海地方检察厅看管。袁世凯杀人灭口，24日，武士英突然死于狱中。26日，程德全与应德闳发表通电，将有关宋案的证据全部发表。上海方面开审多次，原告律师提出必须票传赵秉钧、洪述祖到案，否则不能洞悉确情。然而洪述祖已于宋案发生后不久逃到青岛隐蔽起来，赵秉钧则提出辞职，袁世凯只准其“请假”。5月8日，上海地方检察厅票传赵秉钧到案，袁、赵一时慌忙无计，便想出一个奇妙的抵制方法：在北京制造所谓“暗杀风”谣传，借此滥施逮捕，煞有介事地说搜出一个什么“血光团”的名册来，接着逮捕国民党议员谢持(1876—1939)，诬为“血光团”团员。又贿买周予儆自首为“女子暗杀团”团长，“供”出她是奉黄兴之命到北京进行政治暗杀的。北京地方检察厅即票传黄兴到案对质，用以抵制上海票传赵秉钧，使沪上法院对宋案的审理进行不下去，“法律解决”之路被堵塞。

宋案本来就不是单纯的法律问题，而是反映着要求资产阶级民主制度的民族资产阶级与以袁世凯为代表的大地主、大买办阶级的阶级斗争的重大政治问题；是袁世凯破坏民主共和、实行武力统一的必然结果，也是资产阶级革命党人放弃武装斗争、转向向袁世凯妥协的必然结果，是袁世凯铲除异己、实行独裁专制、准备复辟封建帝制的一个重要步骤。袁世凯既悍然杀害宋教仁，便一不做，二不休，决心彻底铲除资产阶级革命势力，就在宋案真相公布的同一天，4月26日，悍然非法与帝国主义签订2500万镑的“善后大借款”合同，以为发动反革命内战筹备资金。又于5月1日任命北洋宿将段祺瑞为“战时内阁”总理，为发动内战做好了一切准备。原来以黄兴为首的主张“法律解决”的部分国民党人也逐渐觉悟过来，准备武力讨袁。“宋案”和“善后借款”案成为二次革命爆发的导火线。与“宋案”有关人犯应桂馨、赵秉钧、洪述祖等均未得善终。应于1913年7月乘沪上战乱时越狱逃出。二次革命失败后，认为国民党失势，该是他的出头之日了，于1913年11月公然发出“请平反冤狱”的通电。1914年1月入京，招摇过市，19日出京时在京津铁路客车上被袁世凯派出的刺客杀死。应死时赵秉钧在天津任直隶都督，兔死狐悲，赵公然通电严缉杀应之凶犯，并在长途电话中对袁说：“应桂馨如此下场，以后谁还敢替总统办事!”2月17日，赵七窍流血而死。洪述祖则于洪宪帝制失败后，被宋振吕(宋教仁之子)和刘白(宋教仁秘书)拿获，以杀人罪于1919年4月5日被处绞刑。从法律角度说，“宋案”至此终结。 (刘振岚)

善后大借款案

1913年袁世凯为筹措镇压国民党的反革命内战所需经费，而向英、法、德、俄、日五国银行团非法签订《善后借款合同》事件。

袁世凯窃夺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职位后，财政极其困难。为了"统一政令"、"统一军令"，铲除异己，镇压人民，维系北洋军阀独裁政权，迫切需要向帝国主义贷款。帝国主义也急需在中国物色贷款对象，以便通过贷款控制中国财政和操纵中国经济命脉。1912年唐绍仪内阁时期，英、美、法、德四国银行团操纵对中国借款，不久俄、日两国又加入，变成六国银行团。六国银行团对袁世凯政府提出十分苛刻的贷款条件，唐绍仪和财长熊希龄未予承认。熊下台后，周学熙(1866—1947)继任财长，周也不敢冒天下之大不韪，故与六国银行团虽经多次谈判，却未能最后达成协议。1913年3月，美国由于与其他帝国主义发生矛盾声明退出六国银行团，故又变成五国银行团。美国打算靠其强大财力另外组成一个新银行团，以与五国银行团竞争，并鼓励该国银行向中国便宜投资，这使其它五国颇为恐慌。这本来是袁世凯政府冲破五国银行团封锁的一个良好机会，但恰在此时，"宋案"发生，袁世凯迫切需要筹集发动镇压国民党反革命内战的经费，先于4月10日以扩充海军名义，向奥国秘密借款320万镑。又于4月26日，即江苏都督程德全、民政长应德闳公布宋案证据的同一天，指派国务总理赵秉钧、外交总长陆征祥、财政总长周学熙等，以"善后"为名，与英、法、德、日、俄五国银行团签订了《中国政府善后借款合同》21款。合同规定借款数目为2500万镑，年息5厘，九折售出债券，八四折实收，期限47年。借款的担保有三项：一、中国盐务收入之全数；二、关税中除应付款项(主指庚子赔款)外的余数；三、直隶、山东、河南、江苏四省所指定之中央税款。对借款的用途也指定为仅能用于以下六项：一、偿还已到期的各种债款，包括1912、1913年到期的庚子赔款、六国银行垫款、四国银行垫款、华比银行借款、五国银行团零星借款，共约570万镑。二、赔偿各国因中国革命所受的损失200万镑。三、赎回各省政府所欠五国旧债287万镑。四、各省军队解散费300万镑。五、1913年4—9月中央政府行政费及工事费550万镑。六、全国盐务整顿费200余万镑。这次借款除了控制中国财政经济外，还附加政治性条件：一、将来以盐税担保而借款，或与此款相同用途之借款，银行团有优先权。二、在审计处设洋稽核员，凡关于借款款项之领款凭单须有洋稽核员会同签押，方能核准。三、在盐务署内设稽核总所，由中国总办一员、洋员会办一员共同主管。各盐区设稽核分所，有华经理和洋协理各一人，共同担负征收存储盐务收入之责任。盐区之盐纳税后，须经华、洋经、协理会同签字后方能放行，盐务进款存于指定银行，非有稽核总所总会办会同签字之凭据，不能提用。借款总数虽有2500万镑，但按八四折实收，只能收到2100万镑，其中又扣除赔款、借款和垫款及盐务整顿费共1270余万镑，实际到手的只有820万镑，不过是借款债面的40%。而47年利息即达42893597镑，本利共合67893597镑。帝国主义不仅通过这次借款获得巨大的经济利益，而且开了以政治借款操纵中国政局的先例。这次借款条件苛刻，使列强继海关之后，又控制了中国主要税收之一的盐税，中国政府提用盐税抵还外债后的余额都必须经过银行团的核准。帝国主义通过对盐税的管理、对善后借款用途的稽核、对审计工作的干预，而监督和控制中国的财政；又通过监督和控制中国财政而操纵中国政局，使北洋政府成为其得心应手的工具。

这次借款不但丧失利权，而且违法。自民国成立以来，政府所有对外借款均须经参议院审议通过方能生效。而这次借款却未经国会正式通过而径行签字，仅在签字后，"咨国会请备案"，故此引起国民党议员大哗。参议院正、副议长、国民党人张继(1882—1947)、王正廷在签约之前一日得到消息，即以议长资格赴总统府求见袁世凯，意欲阻止大借款签字，袁托故不见。26日，黄兴发表通电，指出未经国会承认而擅行借款是违法行径，并警告袁世凯，"非得人民代表之画诺"而径行签字，"则人心瓦解，大局动摇，乃意计中事"。与此同时，孙中山、胡汉民分别到上海、香港汇丰银行，要求电阻银行团签字。孙中山并通电各国银行团，表示反对违法的善后借款。但这一切努力均未能阻止住善后大借款之成立。袁世凯政府采取欺骗手段，于26日深夜至27日凌晨秘密进入北京汇丰银行完成签字仪式。借款成立后，张继、王正廷又以议长名义通电全国，愤怒谴责袁政府违法借款的行径。在国会中也展开激烈斗争，国民党占优势的参议院情绪沸腾，由汤漪领衔就借款问题提出质问。29日，袁政府仅以一纸咨文答复参议院，说是此项借款大纲曾于去年12月为参议院所通过，故以借款合同全文咨请查照备案，不须交付国会讨论。实则是1912年9月17日和12月27日财长周学熙曾向临时参议院报告大借款的条件及接洽的大致情

形，当时参议院未表示不同意见，但彼时周所作报告仅出以“说帖”形式，并非政府的正式咨文，参议院也未形成任何形式的正式决议，大借款签字更非参议院所知。故参议院接到袁政府答复咨文后愤慨异常，当即作出决议，表示对于善后借款合同，“认为未经临时参议院议决，违法签字，当然无效”。5月5日，众议院讨论大借款案，当日代理总理段祺瑞出席议会，答复议员质问。段在议员据理诘责之下，也不得不承认“政府对于此次借款案手续实欠妥协”，但又声称，政府“宁愿担错误之责任，不愿陷国家于破产之地位”，要求议员“曲为原谅”。国民党议员谷钟秀(1874—?)发表演说，愤怒谴责袁政府违法行径，并动议：“政府违法签约借款，咨谓查照备案，本院决不承认。”这一动议获得众议院通过。但事后共和党议员又企图翻案，以致在5月7日的众议院会议上发生国民党和共和党的激烈争执，议场大乱，几酿成武斗。8日，袁世凯政府又向参、众两院发出咨文，以列强逼债相威胁，要求两院承认大借款。正在商谈合并的共和、民主、统一三党联合起来与国民党作对，致使善后借款案在国会被搁浅。在社会上，革命党人和舆论界也纷纷口诛笔伐，谴责袁政府违法借款。黄兴和南方国民党掌握的安徽、江西、湖南、广东四省都督以及各省议会也纷纷连电抗争，指斥袁政府“私借巨款”，“弁髦议会”，“凡有血气，孰不发指眦裂!”孙中山在借款成立以后，再次与汇丰银行交涉，要求停止向袁政府交款，同时向欧洲各国政府、议会发出呼吁，要求其取消对袁政府的借款合同。6月，国民党党部发表反对借款的宣言，驳斥了袁世凯所谓大借款已于去年12月获参议院通过的谰言，表示“但使共和制度一日尚存，则一日不能承认此违法签约之借款”。一时借款案成为激荡南北风潮的重大事件之一。袁世凯因有重兵在握，又有列强撑腰打气，已决心发动内战消灭国民党，故对这次事件态度极为强硬，一方面亲自出马发表通电进行弹压，指斥国民党反对借款是“包藏祸心，思借端煽惑，倾陷我四万万人民共有之民国”，并对国民党四都督下令严加申斥；另一方面又指使其军阀爪牙联合大骂国会反对借款是“不顾大体，无理取闹”，攻击国民党是唯恐世界不乱的“奸人”。进步党于5月底成立后，立即充当袁世凯的马前卒，指责国民党反对借款纯系一种“别有用心”的“手段”。5月30日，除国民党四督之外的17省都督和热河都统(当时共22行省)由黎元洪领衔致电国会，要求其放弃对袁世凯的斗争，批准善后大借款。就这样，一场反对袁世凯政府违法借款的政治风潮被平息了。然而此次风潮与宋案风潮一样，是资产阶级民主势力同袁世凯为首的封建军阀独裁势力政治斗争的反映，同时也是激起反袁的二次革命的导火线。当着违法的善后借款终于得以实现，国民党看到一切“法律解决”的希望终成泡影之时，武装讨袁的方针也便不可逆转了。　(刘振岚)

第一届国会召开

第一届国会，又称旧国会，即指1913年4月8日根据北京临时参议院通过的《国会组织法大纲》和《国会选举法大纲》而召开的参、众两院议会。

1912年3月11日由孙中山公布的《中华民国临时约法》规定：约法施行后限10个月内，由临时大总统召集国会；国会组织法及议员选举法由临时参议院制定。4月5日，临时参议院北迁。5月1日，北京临时参议院改选吴景廉、汤化龙为正副议长。6日，临时参议院第二次常会把南京临时参议院提出的“国会组织及选举法大纲”列为第一议案，经全院委员会审议与大会多次讨论，于7月9日通过了《国会组织法大纲》和《国会选举法大纲》。在此基础上，起草制定了《中华民国国会组织法》与《参议院议员选举法》、《众议院议员选举法》，8月10日由临时大总统袁世凯正式公布。国会组织法及议员选举法规定，国会由参议院和众议院组成，参议员由22省议会各推举10名，蒙古、西藏、青海等地由选举会共推举54名，全国共计274名。众议院则按80万人口选举1名的标准选出，不满800万人口的省份，也可选出议员10名。全国共计596名。12月上旬开始国会选举。1913年1月10日，袁世凯发布正式国会召集令及各省定期召集议会令。3月，国会选举基本结束。选举结果：在参、众两院870个议席中，国民党独得392席(众议院269席，参议院123席)，占整个议席的45%强；共和、民主、统一三党共得223席(众议院154席，参议院69席)，不到总议席的26%。其余255席为“超然派”、跨党者所得。国民党赢得了选举的胜利，在议会中取得优势。这一选举结果使国民党大为兴奋，袁世凯大为懊丧。为此，袁氏制造了刺杀国民党领导人宋教仁的血腥案件。4月8日上午9时，中华民国第一届国会正式开幕，出席的参议员计179人，众议员503人。国务总理赵秉钧及各部总长均列席，其他国内外观礼代表千余人。11时，筹备国会事务局委员顾鳌宣布典礼开始，鸣礼炮108响，接着由筹备国会事务局委员长施愚(1875—?)报告国会召集经过，并公推议员中年事最高的云南参议员

杨琼为临时主席，杨又委托筹备参议院事务处筹备事务员林长民(1876—1925)代为宣读开会词，继而袁世凯的代表梁士诒致贺词。词曰："我中华民国第一次国会正式成立，此实四千年历史上莫大之光荣，四万万人亿万年之幸福。世凯亦国民一分子，当与诸君同深庆幸"，并高呼"中华民国万岁！民国国会万岁！"袁世凯对国会的虚伪态度，增加了国民党议员以法律解决"宋案"的幻想，以致贻误了武装讨袁决策的时机。4月25日，参议院选举国民党议员张继、王正廷为正副议长；4月30日、5月1日，众议院先后选举汤化龙(民主党)、陈国祥(共和党)为众议院正、副议长。仿照西方资产阶级代议制开设国会，这在中国历史上是第一次，它是作为中国2000年来奉行的封建君主专制制度的对立物而出现的，是资产阶级共和制度的象征，体现了近代向西方寻找救国真理的仁人志士梦寐以求的政治理想，在近代史上具有不可抹杀的进步意义。但是由于中国资产阶级经济基础、政治力量的薄弱，尚不能成为典型的西方式的议会民主制度的阶级基础。在第一届国会议员当中，大多出身于原来清政府的旧官吏(包括参加新政权的旧官吏)或地方士绅，他们与封建经济、政治、文化有较密切的联系；即使在"资产阶级"议员中，也大多数为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而民族资本家的比例微乎其微，国会议员与民族资产阶级实业界较少直接联系，特别是很少经济往来。按照国会议员选举法的规定，大批商业资产阶级的选举权受到限制，所以国会得不到工商界的有力支持。正因此，在同袁世凯封建军阀势力的斗争中，国会常处于孤立无援的地位，而常常表现出对封建势力的妥协性，便于封建军阀对议员进行拉拢收买、分化操纵，以致使国会成为封建势力的附庸。这个事实正是资产阶级议会民主制度在中国破产的一个重要表现。1914年1月10日，第一届国会被袁世凯解散。护国战争胜利后，又于1916年8月1日复会。1917年6月13日又第二次被张勋胁迫黎元洪所解散。张勋复辟失败后，掌握北京政府实权的段祺瑞拒绝恢复旧国会和《临时约法》，孙中山先生发动了护法运动，于当年8月25日在广州召开非常国会，是为第一届国会之延续。9月1日非常国会选举孙中山为大元帅，组成护法军政府，1918年5月护法运动失败。皖系军阀段祺瑞、徐树铮(1880—1925)指使王揖唐、曾毓隽(1865—1963)等组织安福俱乐部，操纵新国会的选举。8月12日，新国会召开，是为安福国会。第一届国会正式结束。　　　　(刘振岚)

进步党成立

进步党，1913年5月在北京成立的以旧立宪派为主体的民族资产阶级保守政党。

1912年春，临时政府北迁后，袁世凯并未立即撕下拥护民主共和的伪装。他在扩充北洋军武装实力的同时，又极力从政治上拉拢立宪派政客和革命派中的蜕化分子，组成拥袁政党，妄图在议会中"以党治党"，操纵政党政治，压迫革命派；资产阶级各派系对在中国实现议会民主政治亦充满幻想，纷纷组织政党；其他官僚政客也大投"政党政治"之机，以猎取功名利禄；各派系为在议院中获得尽可能多的席位极尽纵横捭阖之能事，拚命地改组、化分、化合，致使民初政坛呈现党派林立、鱼龙混杂的局面。从武昌起义到袁世凯政权建立(1911年10月至1912年4月)共涌现出大大小小的政党政团300多个。进步党脱胎于立宪派与旧官僚结合而成的政治集团，它的前身是统一、共和、民主三党。统一党系由章太炎为首的"中华民国联合会"和以张謇为首的立宪派团体"预备立宪公会"联合组织而成；共和党是以黎元洪为首的民社和统一党为基础，联合国民协进会、国民共进会等几个立宪派团体结合而成；民主党是以汤化龙为首的立宪派团体"共和建设讨论会"为核心，联合孙洪伊(1870—?)为首的共和统一党、国民协会、共和俱进会、共和促进会、国民新政社等立宪派团体结合而成。1912年底至1913年初，各党派为了在即将召开的国会中多获得席位，展开了激烈的竞选活动。1913年2月，选举结果揭晓，国民党取得重大胜利，在两院全部870个席位中，共获得392席，而统一、共和、民主三党仅得223席。国民党人无不喜形于色，特别是代理理事长宋教仁积极活动，到处发表演说，批评时政，准备一展其在中国实现议会政治、政党内阁的抱负。袁世凯大为恐慌，竟冒天下之大不韪，刺杀宋教仁，非法进行善后大借款，准备发动内战，同时，又极力促成统一、共和、民主三党合并成一大党，以图在国会中压倒国民党。促成三党合并的主要人物是梁启超。梁自戊戌变法失败后，一向以袁世凯为政敌．但在武昌起义后，为了共同反对革命派，扑灭革命烈火，他放弃了"反袁"、"倒袁"，提出"和袁、慰革、逼满服汉"八字方针，即实行"联袁"政策。宣统三年九月(1911年11月)，清朝皇族内阁垮台，袁世凯出任清内阁总理大臣，给了梁启超一个法部副大臣的职位，梁虽未就，却从袁的这一任命中看出"联袁"政策的效果，于是又进一步提出"拥袁"政

策，试图以袁氏为政治靠山，为立宪派寻找生存和发展的机会，以便在共和制前提下，实现其多年来追求立宪政治的理想。为此，1912 年 2 月 23 日，梁从日本给袁世凯写了一封披肝沥胆的长信，为袁设计了一个以共和为名，行“开明专制”之实的统治方案，强调掌握舆论和建设政党的重要性：“善为政者，必暗中为舆论之主，而表面自居舆论之仆，夫是以能有成”，建议袁联合旧立宪派和革命党分化出来的分子，组成一个“健全之大党”，与同盟会为核心的革命派作斗争，使“彼自归于劣败”。袁欣然接受。10 月，梁回国，袁资助其 20 万元作建党活动经费。梁认为 20 万不够，非 50 万不可。袁世凯便从善后大借款中拨出 160 万元作为统一、共和、民主三党联合组党的活动经费。1913 年 4 月 2 日，袁世凯派出马队、宪兵、探访队保护梁启超从天津来到北京，磋商“合党事”。16 日三党举行联谊会，由梁启超在演说中强调，为战胜国民党，取得议会之多数，为“使中国保有二大党对峙之政象渐入于轨道”，必须谋三党之合并。5 月 29 日，举行三党全体在京党员大会，宣布三党合并，改组为进步党，举黎元洪为理事长，梁启超、汤化龙、张謇、伍廷芳、那彦图、孙武、王揖唐(1877—1948)、蒲殿俊、王印川(1879—?)9 人为理事，冯国璋、蔡锷、汪大燮、熊希龄等 23 人为名誉理事，林长民为秘书长。分政务、党务两部，由林长民、丁世峄(1888—1930)分任部长。会议决定在北京设立本部，各省会及蒙、青、藏地区设立支部，各县设分部。从组织成分上看，进步党以“旧立宪党”和“旧革命党”中的变节分子为中坚，而以“旧立宪党”为主体，同时也不拒绝“善趋风气随声附和者入党”，思想领导和党务大权主要掌握在梁启超和汤化龙手中。

进步党宣布的组党宗旨有二：一“欲将全国政治导入轨道”；二“欲造成一种可为模范之政党”。具体政纲有三：一、“采取国家主义，建设强善政府”；二、“尊重人民公意，拥护法赋自由”；三、“顺应世界大势，增进平和实利”。实质是通过联合袁世凯，与地主阶级结成联盟，建立强固的、共和其名专制其实的中央政权，然后在此基础上实行政治改造，逐步确立完善的民主共和制。体现了进步党既欲投靠袁世凯，以对抗革命派；又欲改造袁世凯，引其走上资产阶级宪政轨道的双重政治目的。它表明进步党是一个代表民族资产阶级上层利益的保守政党。进步党以“国权主义”(20 世纪初欧美资产阶级“国家主义”理论的变种)和“政党政治”为理论基础，主张采用责任内阁制；又以英国式的“完全之政党内阁”为最理想的政府，为政党政治之极轨。但又认为中国当时不具备实行完全政党内阁的条件，只能实行议会各政党的联合，建立包括袁世凯官僚势力在内的混合内阁。这种混合内阁实质上是资产阶级与地主阶级联盟的一种政权形式，它集中体现了民族资产阶级上层的软弱性、妥协性。在进步党看来，当时的中国，有两种政治势力阻碍社会进步：一种是“官僚社会之腐败的势力”(指袁世凯为首的封建势力)；一种是“秀民社会之乱暴的势力”(指以孙中山为首的革命派，也称“暴烈派”)。进步党欲改造社会，必须与这两种势力作战，而同时战胜此两敌，实为该党力所不能及，只得“急其所急”、“先战其一”。按照“国权主义”的理论，认为“暴烈派”“祸国最烈”，妨碍国家统一，故以“暴烈派”为第一敌，必须先倾全力与之对抗；“腐败势力”则为第二敌，须于战胜“暴烈派”之后再与之对抗；同时可借助它的权势发展己党势力。数年之后，“暴烈派”排除了，己党势力壮大了，成为影响全国政治的大政党，到那时，即可对袁世凯施加影响，迫使他走上资产阶级宪政轨道，逐步实现理想的政党政治——完全政党内阁。这就是进步党人企图先联袁，后改造，所谓“将顺其美，匡救其恶”的如意打算，实质上表明他们试图在与地主阶级联盟的形式下，完成建立中央集权的共和政体——以共和为名，行“开明专制”之实——的任务。正因此，进步党对袁世凯在不抛弃共和政体形式的前提下所进行的镇压资产阶级革命党及破坏资产阶级民主制度的一切倒行逆施，都给予了支持和合作，成了袁世凯镇压革命派的帮凶。就在进步党成立不久，6 月 18 日，梁启超主持该党讨论时局问题，会后发表了《进步党之大方针》，主要内容为：一、拟推选袁世凯为正式大总统；二、主张改组内阁，宣称该党“有掌握政权之雄心”，并以为“非本党掌握政权，不足以产生强善政府”；三、认为“宋案”应以“法律解决”，反对法庭传讯赵秉钧到案；四、支持善后大借款，惟主张对“借款须严督用途”。二次革命爆发后，梁启超连续发表《共和党之地位与其态度》(梁曾一度参加共和党)和《革命相续之原理及其恶果》等文，攻击国民党为“乱暴势力”，谓“暴民政治之祸，更甚于洪水猛兽”。认为革命后接着革命，只能造成“生灵涂炭”，“国事日非”，告诫袁世凯政府必须防范“乱暴势力”。7 月 23 日进步党发表通电，支持袁世凯镇压二次革命。汤化龙还致电黄兴，斥责其参与发动二次革命为“覆雨翻云”、“倒行逆施”，规劝黄兴“敛兵效顺”，否则“声名俱败，家国随之”。袁世凯投桃报李，在 7 月底任命进步党名誉理事熊希

龄组织内阁，几经讨价还价，熊自兼财政总长、梁启超任司法总长、汪大燮任教育总长，组成所谓“第一流人才内阁”。这些“第一流人才”首先要办的一件大事是把袁世凯捧上正式大总统宝座。袁在镇压了二次革命之后，急不可待地要在当年10月10日武昌起义两周年纪念日当上正式大总统。他等不及履行先制定宪法、再根据宪法制定总统选举法据以选举总统的正常法律程序，于8月5日唆使北洋派19省军事长官发表联名通电，提出先选总统、后定宪法的主张。进步党最初主张先定宪法、后举总统，这时改变初衷，附和“先选后宪”的主张，并操纵国会通过此议，使袁如愿以偿。此后，袁便不再需要国会，当年11月，悍然下令解散国民党，收缴国民党议员438人的议员证书，使国会不足法定人数；1914年1月下令停止参、众两院议员职务，至此第一届国会被解散。2月，又下令停办各省地方自治会，解散各省议会。这一切破坏资产阶级民主制度的违法命令，都是熊希龄内阁副署的。当有的议员对此事提出质问时，熊竟辩解说：这是大总统为“挽救国家之危亡，减轻国民之痛苦”的紧急措施，是为了“巩固真正之共和，宣达真正之民意”，甘当袁世凯破坏资产阶级民主制度的副署工具，这将永远是进步党历史上可耻的记录。

然而，有一点不容埋没，即进步党确曾试图在拥袁的前提下，改良政治，力图将袁引上宪政轨道。这表现在熊希龄内阁上台后，曾发表由梁启超起草的《政府大政方针宣言书》，规划了进步党人改造政治、发展资本主义经济的蓝图。在政治上，主张贯彻资产阶级法制精神，建设法治国家，实行责任内阁制；司法独立；军民分治，废省改道；实行地方自治。经济上，提出了整顿财政；发展实业；制定工商法规等等一整套发展资本主义、繁荣经济的计划，体现了浓重的资产阶级色彩，表明进步党人试图通过与地主阶级联合政权的阶梯，登上资产阶级的理想王国。但是这些计划因与袁世凯军事独裁统治的利益相抵触而根本不能实现，而且即连熊希龄内阁本身也因完成了副署袁氏一系列违法命令的历史任务，而再没有存在的意义了。1914年初，袁唆使其亲信党徒，在报纸上大肆攻击熊希龄。2月12日，熊希龄宣布辞职，熊内阁垮台，进步党被袁世凯遗弃，从此在政治上陷于彷徨。直到1915年袁氏悍然抛弃民国招牌，暴露出复辟帝制的真面目时，进步党人才又在绝望中奋起，梁启超发表著名的《异哉所谓国体问题者》一文，旗帜鲜明地反对袁世凯复辟帝制，吹响了讨袁护国的号角。当年12月，蔡锷在云南宣布独立，护国战争爆发，进步党又联络国民党及其他各方面反袁爱国人士，在孙中山为首的中华革命党的支持下，结成护国讨袁的联合战线，最后粉碎了袁世凯复辟帝制的狂想，迫使洪宪帝制丑剧收场，此即成为进步党最重要的历史功绩。然而护国战争只争回了一块民国的招牌，以后进步党人重又与袁世凯的继承者段祺瑞携手，继续维持以共和其名、军事独裁其实的封建军阀统治。进步党的历史也到此结束。1916年8月国会重新召开，再没有打出进步党的旗号。以后便一分为三，组成以汤化龙为首的宪法研究会，以梁启超为首的宪法研究同志会，以及倾向国民党的孙洪伊为首组成的韬园系。不久，汤、梁两派又合并为宪法研究会，即研究系。研究系后来虽有重建进步党的意图，但终未实现。（刘振岚）

二次革命

1913年以孙中山为首的资产阶级革命派为挽救资产阶级民主制度而进行的第一次“讨袁（世凯）之役”，又因其发生的时间和地点而称为“癸丑之役”或“赣宁之役”。

1913年3月袁世凯制造的暗杀宋教仁案件，使原来对袁世凯怀抱幻想的资产阶级革命党人受到了血的教训，很多人开始从“议会政治”、“政党内阁”的幻梦中惊醒过来。诚如宋教仁被刺前所说：“脱不幸而余被刺死，或足以促进吾党之奋斗，而缩短项城（即袁世凯）之命运。”最先觉悟的是孙中山，他在日本得知宋被刺后，悲愤异常，立即返国，26日到达上海，当晚即与黄兴等召开紧急会议，商讨对策。孙中山认为：“宋案证据确凿，人心激昂，民气奋发，正可及时利用”，力主武力讨袁，并提出“联日”、“速战”的主张，打算在广东、福建、江西、湖南、安徽五省同时起兵，先发制人，推翻袁世凯的反动统治。以黄兴、陈其美为代表的部分国民党领导人则认为，革命党方面“武力不足恃，苟或发难必致大局糜烂”，所以坚持听候法律解决。国会中大部分国民党议员更主张联合进步党人，依据法律，进行倒袁活动。双方争论激烈，孙中山反复说明：袁世凯是总统，总统指使暗杀，则断非法律所能解决，所能解决者，只有武力。但只有江西都督李烈钧等少数人拥护。正当国民党内部争论不休之际，袁世凯积极筹备军力，决定与国民党兵戎相见。为了筹集战费，未经国会正式讨论，即于4月26日，也就是宋案公布的当天夜里，袁世凯政府与英、法、德、日、俄五国银行团签订了条件极为苛

刻、数额为2500万英镑的所谓“善后大借款”。5月1日，任命段祺瑞为代理内阁总理，确立“战时内阁”体制。6日，下达“除暴安良”令，矛头直指国民党。6日和15日先后召集紧急军事会议，确定了对国民党控制的湘、赣、皖、苏四省用兵计划，决定以段芝贵(1869—1925)为第一军军长，率第2、第6两师及毅军驻豫、鄂边界，进攻江西，并防制湖南；以冯国璋为第2军军长，率第3师及张勋、雷震春、倪嗣冲各部；分别由津浦路与河南两路向苏、皖推进。同时，袁世凯还从善后大借款中拨出160万元作活动经费，促成拥袁的共和、民主、统一三党联合，以集中力量对付国民党。5月29日，三党正式合并，拼凑成以黎元洪为理事长、梁启超、汤化龙、张謇等为理事的进步党，在国会中与反袁的国民党相对抗。在完成上述一系列反革命部署后，袁世凯正式与国民党摊牌，于5月21日，发出“传语国民党人”的最后通牒：“现在看透孙、黄，除捣乱外无本领。左又是捣乱，右又是捣乱。我受四万万人付托之重，不能以四万万人之财产生命听人捣乱。自信政治军事经验、外交信用，不下于人。若彼等能力能代我，我亦未尝不愿，然今日诚未敢多让。彼等若敢另行组织政府，我即敢举兵征伐之！”在袁世凯的猖狂进攻面前，国民党内部仍不能形成统一意见。对于非法的“善后借款合同”，举国哗然，纷纷反对，而部分国民党领导人仍然幻想依靠国会、依恃法律解决。孙中山则认为，在袁世凯的淫威之下，国会只能作“口舌之争”，法律更无抵抗之力，要想彻底解决问题，“惟有诉诸武力而已”。但这个正确意见竟不能为多数国民党人所接受。万般无奈，孙中山只好以个人名义，命广东胡汉民首先发难，在广东宣布独立，胡以“时机未至”拒绝；又命陈其美在上海宣布独立，陈则以“上海地小，难与之抗”为理由，不能赴命。孙中山非常气愤，想亲自到广州主持武力讨袁，又被党内同志阻止。在国民党主持的南方各省实力派当中，除江西都督李烈钧支持武力讨袁政策外，其他各省意见纷歧，莫衷一是。由于国民党内在讨袁问题上步调不一，举棋不定，一误再误，以致错过了发动讨袁战争的良好时机，造成军事上的被动局面。

在国民党与袁世凯对峙之际，一批旧立宪党人，如张謇、赵凤昌；接近国民党的旧官僚，如岑春煊、李经羲、伍廷芳、王芝祥；已投靠了袁世凯的老同盟会员，如汪精卫、孙毓筠、胡瑛；以及一批颇具影响的知名人士，如谭人凤、蔡元培、章士钊等，曾试图进行“调解”。5月4日，谭人凤、岑春煊、王芝祥等10人致电袁世凯，提出引渡洪述祖、赵秉钧出庭对质；大借款提交国会通过；政府不得干涉宪法的制订等项作为“南北妥协”的条件，袁世凯回电一口拒绝。5月下旬，谭人凤、王芝祥、伍廷芳和岑春煊的代表蓝建枢等到京，分别面见袁世凯。袁态度凶横，绝口否认有违法情事，并声称：今日非调和南北问题，而是地方不服从中央，中央宜如何统一问题；宋案自有法院解决，善后借款问题自有国会解决，任何个人不能干预。6月初，汪精卫、蔡元培从国外回国，立即参与“调解”活动，提出如下几项妥协方案：一、国民党仍选举袁世凯为正式总统；二、袁世凯暂不撤换皖、赣、粤、湘四省国民党都督；三、坚持宋案法律解决，而追究罪名仅至洪述祖、应桂馨为止，不再向上追究。这个妥协方案，实际上意味着向袁世凯屈服。但即使如此，仍不能为袁世凯所接受，袁决心以武力消灭国民党。6月9日，袁借口李烈钧反对善后借款是不服从政府，悍然下令撤销其江西都督职务；14日和30日，又下令撤销广东都督胡汉民、安徽都督柏文蔚(1876—1947)职务。李、胡、柏三督是当时国民党握有实力的重要人物，袁世凯撤免三督是向国民党进攻的开始。

7月初，孙中山在上海再次召开军事会议，黄兴等为大势所迫，放弃法律解决的主张，一致决定兴师讨袁。李烈钧在孙中山支持下决心返江西兴兵讨袁，其他地方的革命党人也表示将举兵响应。李烈钧(1882—1946)，原名烈训，字协和。江西武宁人。清光绪三十一年(1905)留学日本，在士官学校学习陆军，不久加入同盟会。宣统二年(1910)归国后，先后在江西、云南新军中任职，积极宣传革命。宣统三年武昌起义后回九江，联络新军宣布独立，并任军政府参谋长。旋到安庆，被推为安徽都督。不久率军支援武昌，被任为北伐第二军总司令。1912年改任江西都督。自袁世凯免国民党三督职务的命令下达后，北洋军李纯(1874—1920)部已于7月5日开赴九江，在沙河镇与原李烈钧部下林虎(1887—1960)部发生冲突，林部被迫退往湖口。当李烈钧8日自上海潜抵湖口时，李纯部已兵临九江城下。12日，袁世凯任命李纯为九江镇守使。同日，李烈钧在湖口宣布独立，并以江西讨袁军总司令的名义发布讨袁檄文，正式兴兵讨袁。檄文揭露袁世凯“暗杀元勋，弁髦约法，擅借巨款”等罪行，宣布以“保卫共和，驱除民贼”为目的，指出赣省之战，是“反对专制”的正义战争，号召国民“亟起自卫，与天下共击之！”当天拂晓，李烈钧讨袁军向沙河北洋军发起猛攻，二次革命正式爆发。首先

起而响应的是南京。7月14日夜，黄兴潜往南京组织江苏讨袁军，15日率南京高级将领迫使江苏都督程德全宣布独立，黄兴被程任命为江苏讨袁军总司令，随即以江苏讨袁军总司令名义发出通电，宣告："法律解决，既经无效，仍不得不诉之于武力，作最后之解决。"又发布"督师文"，表示决心率"吊民伐罪"之师，"努力驱驰，不除袁贼，誓不生还"。此后，徐州、镇江、无锡、常州、苏州、松江、清江等地相率竖旗独立。7月17日，安徽宣布独立，柏文蔚被举为安徽讨袁军总司令。18日，上海宣布独立，陈其美为上海讨袁军总司令。同日副都督陈炯明宣布广东独立。19日，福建宣布独立，以许崇智为讨袁军总司令。25日湖南都督谭延闿被迫宣布湖南独立。8月14日，川军第3师师长熊克武(1881—1970)任四川讨袁军总司令，在重庆宣布独立。革命党人张百祥在川西组织讨袁军，自任全蜀民军总司令。21日，袁世凯发布了一个千余言的公报，宣布"讨伐令"，诬蔑李烈钧等"破坏民国统一"，扰害地方治安，并声称：政府为"整肃纪纲，维持国本"起见，"不得不以兵力戡定"。孙中山先生是二次革命的领袖和策动者，他在袁世凯发布"讨伐令"的次日，即致电袁世凯，痛斥其刺杀宋教仁、非法签订"善后借款合同"等罪行，指出袁氏"舍辞职外，决无他策"，申明如袁不听劝告，必将以前此反对清朝君主专制之决心，讨伐袁世凯，"义无返顾"！同日发表《告全体国民宣言》，并向北京参、众两院、国务院、各省都督、民政长官等发出通电，号召共同敦劝袁世凯辞职，若袁氏"执拗不听"，则应同仇敌忾，奋起讨袁。电文表明孙中山高举民主共和的旗帜，誓与袁世凯一决雌雄的坚强决心。

二次革命开始后，南方七省区相继独立，表面上一时颇有声势，但双方力量对比，袁世凯军事力量明显地占有优势。江西和南京是袁世凯进攻的两个主要目标，也是二次革命的主要战场。7月12日晨江西讨袁军林虎部以一团兵力猛烈攻击沙河北军的左翼，首先打响了战斗。讨袁军初战取胜，毙伤北洋军120余名，占领沙河。但很快北洋军增援部队赶到，大举猛攻，相持10余日。23日晚开始，北洋军兵分三路，大举进攻湖口，讨袁军曾顽强抵抗，终于抵敌不住，不得已放弃湖口，25日湖口失陷，李烈钧败走。8月18日南昌陷落，江西讨袁军失败。江苏方面，黄兴到南京后，遇到军队不听调遣、军饷无着等种种困难；程德全一宣布独立，马上逃到上海，不与黄兴合作，所以讨袁军很快失败，被迫放弃徐州、蚌埠，退守浦口。7月25日，程德全公然声明南京独立的一切电文都是黄兴借用他的名义发出的，并诬称黄兴曾向他下跪，乞求其宣布独立等情，要求黄兴取消讨袁名义，"投戈释甲，痛自引咎，以谢天下"，又于28日向南京军界发出取消独立的密电，并令捉拿黄兴。黄兴原拟死战，受此打击，怨愤万分，竟企图自杀，经部下规劝，于当日夜乘日轮离宁赴沪，转赴日本。次日，代理江苏民政长蔡寅等宣布取消独立；8月8日国民党员何海鸣(1887—1944)在南京发动兵变，自任江苏讨袁军总司令，再次宣布独立，但仅六小时即被已经投敌的第八师师长陈之骥(冯国璋女婿)拘禁，很快又被下层士兵所释放。11日，何海鸣第三次宣布南京独立，奋力抵御袁军，直坚持到9月2日，南京终于被张勋、冯国璋所率北洋军攻占。南京城陷后，北洋军纵兵抢掠三日，使南京人民的生命财产蒙受巨大损失。在南京保卫战期间，讨袁军各个战场纷纷失利。安徽由于第1师师长胡万泰为袁世凯所收买，于8月7日取消独立；上海陈其美于8月13日放弃吴淞；同日，福建、广东、湖南也自行宣布取消独立；9月14日，熊克武在重庆失败，讨袁军失去最后一个据点，二次革命至此完全失败。二次革命，是一场资产阶级革命民主派保卫民主共和制度的战斗，虽然很快遭到失败，但它仍然是对袁世凯独裁统治的一次冲击。二次革命的历史证明了单纯通过议会斗争的途径以取得政权的道路是行不通的，中国革命必须走武装斗争的道路，这是中国革命的客观规律。二次革命的优点在于它继承了辛亥革命武装斗争的光荣传统，即使未能取得胜利，却使革命的火种得以保存，为今后革命的复苏和发展准备了条件。二次革命失败的根本原因仍然是中国资产阶级及其政党的软弱性和妥协性。民国成立以来，他们一再忍辱退让，期望用调和妥协的方法来换取袁世凯的善意，维持一个所谓共和的局面，结果只是更加涣散了自己的阶级队伍和战斗意志，以致在推翻清朝后，整个资产阶级即迅速"转向为背"，抛弃革命，渴望稳定、和平，要求兴办实业，发展资本主义经济，从而使革命民主派失去本阶级的支持，不堪封建势力一击。兼之革命党人和讨袁军方面未能形成一个坚强的政治领导核心和统一的军事指挥中心，思想分歧，内部涣散，意志不能统一；战略上各自为战，步调不一，容易被敌人各个击破，忽视与人民群众斗争的配合，形成单纯军事冒险等等具体原因，二次革命的失败不可避免。 (刘振岚)

“第一流内阁”之登台与瓦解

“第一流内阁”，1913年9月组成的以熊希龄为首的进步党与北洋派联合内阁，因国务总理熊希龄、阁员梁启超、汪大燮、张謇等都是当时社会名流，故此届内阁被称为“第一流经验与第一流人才内阁”，简称“第一流内阁”或“名流内阁”。

宋案发生后，参与策划的国务总理赵秉钧为逃避舆论谴责，被迫“请假”，国务总理职务由段祺瑞代理，各部总长也七零八落，内阁成员残缺不全。1913年7月底以后，北洋军对南方用兵节节胜利，调整政府机构提到日程上来。袁世凯希望能由他的北洋派老搭档徐世昌担任国务总理，但因遭到国民党议员和部分进步党议员的激烈反对，徐不肯贸然出山，只得作罢。求其次，袁想借重进步党，因为该党在宋案及大借款问题上采取偏袒袁世凯的态度，继而又支持袁镇压二次革命，袁于是选择进步党人熊希龄出组内阁，认为“以党杀党，可减少反响”；且拉拢进步党，对于以后利用国会选举正式大总统和最后战胜国民党都是非常有利的。国民党在二次革命失败后，已然失势，正想和进步党提携，所以对进步党组阁抱欢迎态度。7月31日，袁世凯正式任命熊希龄为国务总理。熊希龄(1870—1937)，字秉三，湖南凤凰人，故人称熊凤凰。进士出身。戊戌维新运动时，曾助湖南巡抚陈宝箴举办新政，并担任长沙时务学堂总理，聘请梁启超为中文总教习。戊戌政变后被革职，禁锢于家。光绪三十一年(1905)充任清廷出洋考察宪政五大臣参赞，回国后历任奉天农工商局总办、盐运使、东三省清理财政监理官等职，有“理财能手”之誉。民国成立后，加入章太炎组织的中华民国联合会，后改名统一党，为理事之一。先后任袁世凯政府财政总长、热河都统。5月进步党成立时，被推为名誉理事。支持袁世凯，反对国民党，是他的基本政治态度。但是被袁任命组阁，颇使他感到意外，曾以其个人“性质与暴徒(指以孙中山为首的革命派)、官僚皆不合”为理由，向袁提出辞呈。袁不允，复电召其“来京一行，计议大局”。7月20日，熊入京，复与进步党领导人筹商进退。进步党领袖梁启超认为组阁是扩张党势、实现进步党宪政理想的大好时机，极力怂恿熊就任，并表示自己愿任财政总长，共同筹划建国大计。但袁世凯仅把熊希龄内阁视为过渡性政府，并不想把实权交给进步党人，所以熊一到北京，袁就把一张拟好的总长名单交给他，要害部门都由北洋派占据，仅空下农商、司法、教育三个闲职请熊希龄物色人选。财政总长袁安排了周自齐(1871—1932)，而不肯任用梁启超，令熊改任梁为教育或司法总长。梁启超愤而不就，曾亲见袁世凯面辞。后以折衷办法解决：熊希龄自兼财政总长，改任周自齐为交通总长；熊又亲自与梁洽谈多次，坚请其入阁，梁只得答应任司法总长，但提出以“如将来对于党中所提出之政策和主张失败即行辞职”为条件，说明进步党即使组织与北洋派的联合内阁也是经过斗争的。最后确定的内阁成员为：外交：孙宝琦，财政：熊希龄，交通：周自齐，内务：朱启钤(1871—?)，陆军：段祺瑞，海军：刘冠雄，农商：张謇，司法：梁启超，教育：汪大燮。9月11日，国务员名单经国会通过，并由袁世凯任命。阁员9人中，进步党4人，北洋派5人。为北洋派与进步党的联合内阁，其实质是地主资产阶级联合政权。

熊希龄内阁的上台，是进步党的黄金时代。进步党人当时雄心勃勃，欲以共和为前提，通过联合袁世凯，与地主阶级结成联盟，建立强固的中央政权；并在此基础上，实行政治改造，把国家引向资产阶级宪政轨道。梁启超为内阁起草了《政府大政方针宣言》。熊希龄一上台即率全体国务员出席国会，郑重宣布大政方针，对外交、军政、财政、实业、交通、司法、教育各项大政都作了规划。在政治上，贯彻资产阶级法制精神，建设法治国，即实行责任内阁制；司法独立；重视教育；军民分治，废省改道；整顿吏制，严格考试制度；实行县、城镇乡两级地方自治。经济上，提出了一整套发展资本主义、繁荣经济的计划：一为整顿财政，从治标、治本两方面着手。其治标之策，强调政府须严格控制预算，量入为出；治本之策，提出改正税制，整理金融，统一货币，改良国库。二为发展实业，强调奖励私人工商业，制定工商法规等等，体现了浓重的资产阶级色彩，称得上是一个建设资产阶级共和国的纲领。表明梁启超、熊希龄、张謇等进步党人在建设资产阶级国家方面，确想有一番作为。但是他们的方针，他们的理想均与袁世凯北洋集团的真实意图相抵触。袁的政策是要扩张官僚资本主义经济势力和建立封建军阀独裁政治，熊内阁的许多政策严重触犯了袁氏集团的政治经济利益，必然为袁世凯为首的军阀官僚所不容。如政治上熊内阁提出的责任内阁制，最为袁所忌恨；军民分治、废省改道方针必将大大降低握有军权的各省疆吏的权力，为各级北洋军阀所绝对不能接受；司法独立也与袁氏专制独裁水火不容；地方自治更妨碍袁氏“统一军令”、“统一政令”。经济上熊内阁整顿财政的计划，对袁世

凯建立独裁统治的财政体系的企图是一种威胁，并直接损害了封建军阀和旧官僚的切身利益。特别是整顿财政须节制开支，实行减政主义，军队要缩减编制，而这一点直接与北洋派扩充武力、加强实力的政策相抵触。结果是熊希龄内阁想做的事做不成，他们能做的事，就只有助纣为虐了。这届内阁所做的第一件大事便是把袁世凯捧上正式大总统的宝座。袁在镇压了二次革命之后，急不可待地要在1913年10月10日武昌起义2周年纪念日当上正式大总统。他等不及履行先制定宪法、再根据宪法制定总统选举法据以选举总统的正常法律程序，而于8月5日唆使北洋派19省军事长官发表联名通电，提出先举总统后定宪法的主张。梁启超等进步党人最初也曾主张先定宪法、后举总统，这时却改变初衷，附和先举总统后定宪法的主张，并操纵国会通过此议，使袁如愿以偿。此后，袁便不再需要国会，当年11月下令解散国民党，收缴国民党议员证书，使国会不足法定人数，1914年1月下令停止参、众两院议员职务，至此第一届国会被解散。2月，又下令停办各省地方自治会，解散各省议会。熊内阁的全部“政绩”便是恭顺地副署了袁世凯这一切破坏资产阶级民主制度的违法命令，帮助袁氏消除了国民党在国内的残余力量，将作为民主共和制度象征的第一届国会送终。在这一点上，熊希龄内阁比进步党走得更远。在国会闭会期间，进步党还曾发表过“维持国会”的“通告”，要求袁世凯政府必须于本年内召集国会；宪法必由民选机关制定。11月17日和12日3日，包括进步党人在内的众议院议员194人和参议院议员61人分别联名向袁政府提出质问，众议院议员气愤地指出：“民国不能一日无国会，国会议员不能由政府取消。”并质问说：“不知政府毅然出此，根据何种法律？”直至12月23日熊内阁才予复书，竟谓：“对于不足法定人数之议员非法所提出之质问书，应不负法律上答复之义务。”熊希龄本人更为袁世凯辩解说：这是大总统为“挽救国家之危亡，减轻国民之痛苦”的紧急措施，是为了“巩固真正之共和，宣达真正之民意”。正因此，熊希龄内阁遭到社会舆论的抨击，被称为“帮闲内阁”，从此它便以袁世凯封建独裁势力帮凶的面目永远被钉在历史的耻辱柱上。

尽管如此，进步党和熊希龄内阁仍然逃脱不了被袁世凯遗弃的命运。当初袁不过是把这届内阁作为通向他建立封建专制独裁统治的一种过渡。国会被解散以后，责任内阁本身就成了他实行封建独裁的障碍，必欲一脚踢开而后快。从1914年1月下旬，北洋集团就开始叫嚣废除国务院，实行总统制，并由安徽都督倪嗣冲首先发难，通电倡议修改约法，改行总统制；其他各省都督、民政长群起呼应，使熊希龄席不安枕；加以财政困难，遂于2月3日在国务会议上提出辞职，9日正式向袁世凯上辞呈，袁准免其财政总长兼职。12日熊再上辞呈，求免国务总理职务，袁照准。接着，梁启超、汪大燮也连上辞呈，“第一流人才内阁”至此瓦解。袁世凯为敷衍进步党人，又任命熊希龄为煤油督办，梁启超为币制局总裁兼参政院参政，汪大燮为参政院副院长，张謇为水利局总裁，原担任众议院议长的进步党领导人汤化龙被任为教育总长。这些进步党人士虽对袁世凯满腹牢骚，怨愤不已，但仍对他抱有幻想，以为只要袁不放弃民国招牌，实行“开明专制”，以后总还会有他们的出路，因此都分别赴任。显然，此时尚未到进步党与袁世凯分道扬镳的时候。　（刘振岚）

正式总统选举

1913年10月袁世凯采取组织御用党、拉拢收买国会议员等手法，“当选”为中华民国第一任正式大总统的历史事件。

当年4月国会召开后，即着手制订宪法和选举正式大总统。按照民元《临时约法》的规定，组织政府的程序应是先产生临时总统和临时政府，再由临时总统根据临时参议院所制定的国会选举法和组织法，在十个月内召集国会，然后由国会制订出宪法，再根据宪法制订总统选举法，据以选举总统，产生政府。可是袁世凯因急于登上正式大总统宝座，颇嫌《临时约法》规定的产生总统的程序太繁琐，便指使爪牙极力鼓吹先选总统，后定宪法。所持理由，是说没有正式大总统，列强不承认，则中华民国在国际上立不住脚，随时有被列强瓜分或招致清室复辟的危险。国民党议员则主张按照法定程序，先制定宪法，后举总统，因为总统的权力和地位应根据宪法产生；先举总统，后定宪法，乃本末倒置，必为舆论所不容。进步党起初也主张先定宪法，后选总统。由于两党趋于一致，国会于6月底议决先定宪法，并由参、众两院推举出宪法起草委员，于7月12日正式成立宪法起草委员会，着手赶制宪法。正当此时，二次革命爆发，以参议院议长张继为首的一批国民党激进派议员相率南下，参与举兵讨袁，大部分国民党议员则仍留北京，幻想“以法律倒袁”。袁世凯为了利用国会选举他为正式总统，所以还必须保留国会这块垫脚石，而要保留国会，就必须暂时容忍国民党议员的存在，

否则国会不足法定人数，也不能完成总统选举。故此，他一面对南方国民党用兵，一面又在北京发表保护国会和议员的命令，对国民党议员表示“宽容”。因此，正当国民党人在南方浴血奋战之时，北京的国民党议员却照常出席国会。但此时的国民党议员在袁世凯的打击、分化、瓦解、利诱之下，已分裂出一批小政团，如政友会、相友会、超然社、集益社等等，有的甚至投入进步党怀抱以求自保，所以此时国民党已完全丧失了在国会中第一大党的优势。进步党由于支持袁世凯镇压二次革命，受到袁的垂青，而逐渐扩充了党势，成了国会中最有影响的大党。为了进一步拉拢进步党，袁世凯于7月31日任命进步党领导人之一的熊希龄组阁，成立了所谓“第一流人才内阁”。通过这一系列纵横捭阖的手段，袁世凯初步控制了国会。为了早日攫取正式大总统职位，8月间袁指使一批议员分别向国会提出先选总统的议案，并策动由副总统、湖北都督黎元洪领衔，联合19省军政长官联名致电参、众两院，要求两院“将一切议案概从缓议”，而“先从选举总统入手”。8月30日，黎元洪又致电进步党领袖梁启超、汤化龙，说只有先选总统，“方足以定人心、固国本”。在内外的压力下，进步党人首先变了腔调，同意先选总统，后定宪法。此时国民党议员连“法律倒袁”的勇气也已丧失，只能在袁世凯划定的圈圈内，充当表决机器，所以国会于9月5日顺利通过了先选总统后定宪法案。由于国民党向进步党妥协；也由于袁世凯对国会进行压迫和干涉，引起许多议员，包括进步党议员的不满，所以进步、国民两党议员的矛盾反而日趋缓和，较易于协调一致。袁世凯恐两党接近，于己不利，故又指使亲信梁士诒以金钱和地位收买一批政客，拼凑了一个近百人的御用政党——公民党，9月7日公民党正式成立，即以梁士诒为党魁。公民党是袁世凯在国会中的打手，它成立的目的只有一个——确保袁世凯当选大总统，除此外无任何政党精神可言。所以该党成立后立即发表通电，表示拥护袁世凯为正式大总统，黎元洪为副总统。在公民党的鼓噪下，国会加快了选举总统的步伐。为了满足袁世凯在10月10日辛亥革命两周年纪念日登上正式大总统宝座的心愿，不到一星期，宪法起草委员会即将总统选举法起草完毕，10月4日获国会通过，6日即召开总统选举会。袁世凯有进步党的支持，公民党的保驾，仍不放心，选举当天，又派出大批军警“保卫”国会。此外还收买数千名便衣军警、地痞流氓，组成所谓“公民团”，将国会会场团团围住，逼令议员选举袁世凯为大总统。根据《总统选举法》规定：大总统应由国会议员组成的选举会选举产生，选举会的法定人数由议员总数的三分之二构成，候选人必须获得总票数的四分之三的绝对多数才能当选。如投票两次均无人当选，则将第二次投票获票领先的两人提出作为候选人，第三次投票进行决选。本来选举袁世凯为大总统已为大势所趋，但很多议员对袁操纵选举的行径感到气愤，所以以拒绝投袁的票为消极抵制，故此经两次投票后，袁得票虽居领先地位，却未能当选。两次投票后，时已过午，议员们想回家吃饭，却被“公民团”围住大门，高呼：“不选出我们中意的大总统，就休想出院！”选举会只好接续第三轮投票，将袁世凯与黎元洪二人进行决选。可怜的议员们忍饥挨饿，知道袁氏不当选，“公民团”誓不罢休，于是纷纷放弃消极抵制的想法，投票了事。结果，袁世凯终于以507票当选（到会议员共759人），“公民团”始高呼“大总统万岁”的口号，做鸟兽散。次日，又选举黎元洪为副总统。10月10日，袁世凯在清宫太和殿举行了大总统宣誓就职典礼，首先按《总统选举法》的规定宣读誓词：“余誓以至诚，谨守宪法，执行中华民国大总统之职务。”紧接着宣读宣言书，他引用西方资产阶级思想家的言论，强调“立宪国重法律，共和国重道德，顾道德为体，而法律为用”，但他所强调的道德，仍是“忠信笃敬”等封建道德；又对共和政体下了定义，谓“共和政体者，采大众意思，制定完全法律，而大众严守之”。强调“共和国以人民为主体”，“余愿极力设法使人民真享共和幸福，以达于乐利主义之目的。”最后又信誓旦旦地宣称：“余一日在职，必一日负责！顾中华民国者，四万万人之中华民国也。”袁世凯之“逼选”总统以及他虚伪的就职宣言，堪称近代史上的一大秽闻。他爬上正式总统宝座之日，即是他开始复辟帝制之时。

（刘振岚）

西姆拉会议

民国初年，英帝国主义为分裂中国版图，拉拢西藏少数叛国分子策划“西藏独立”的一次非法会议。

西藏自古以来即是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自清康熙五十九年（1720）清军入藏平定准噶尔叛乱以后，开始派员驻扎西藏，加强对西藏地方的管理。雍正五年（1727）又正式设立驻藏大臣。乾隆五十八年（1793），清廷颁布了《钦定西藏章程》，规定有关藏内一切事务，“均应禀命驻藏大臣办理”，表明中国对西藏拥有完全的主权。但自19世纪中叶以后，英国一直企图侵占我国西藏，曾于清光绪十四年

(1888)、二十七—二十八年两次发动侵略战争，逼迫清政府签订了《中英藏印条约》(光绪十六年)及其续约(光绪十九年)、《中英续订藏印条约》(光绪三十二年)及《通商章程》(光绪三十四年)，攫取了开放亚东、江孜、噶大克，自由通商，派驻官员，租赁房屋，领事裁判权等一系列侵略特权。尽管如此，在《中英续订藏印条约》中，英国也不得不"允不占并藏境及不干涉西藏一切政治"。因此，英国的侵略野心仍未得到满足，还在寻找有利时机，策划将西藏从中国分裂出去的阴谋。英军两次侵略西藏，加之沙俄也妄图插手西藏，使清廷感到西藏地位的危险，于是从光绪三十二年以后，对西藏进行一系列改革，以加强西藏与内地的联系。首先惩办贪赃枉法、卖国求荣的官吏，改革和整顿西藏地方的政务和办事机构；又推行开辟商埠、添练新兵、设置巡警、兴办学堂等一系列新政；并在藏民聚居的四川西部实行"改土归流"，废除土司政权，改设流官。清廷的改革措施，触犯了西藏上层分子的既得利益，引起他们的激烈反对。他们拼命煽动各地土司头人反对改革，并派藏军进军三岩等地。宣统元年(1909)又往昌都增派军队，扬言进攻盐井和巴塘。与此同时，英国已通过经济渗透和政治分化的手法逐步培植了一批亲英势力，他们千方百计收买藏族官员，挑拨汉藏关系，加剧了西藏对中央政府的离心力。在这种情势下，清政府决定派兵入藏，一面命驻藏大臣联豫就地募兵 2000 名，一面派知府钟颖率川军 2000 名入藏，以加强控制。宣统二年正月初三(1910 年 2 月 12 日)，川军进入拉萨。十三世达赖喇嘛偕亲英派首领夏札等人于当日仓皇出逃，先到亚东，后又转往印度大吉岭，请求英国"保护"。英国如获至宝，英印总督托明、英国驻锡金政务官柏尔等人多次会见达赖，策动其加紧搞"西藏独立"。达赖出逃后，清政府曾一度宣布废除其喇嘛名号，命驻藏大臣另找灵童代替。但在英国压力下，又改变策略，派人到印度劝说达赖回国。达赖执迷不悟，始终不肯回国。武昌起义爆发后，英国利用清朝垮台之机，积极策划"西藏独立"的阴谋。托明立即到大吉岭同达赖密谈。达赖派出亲信、英国间谍达桑占东潜回西藏，组织叛乱集团，拼凑了一支 1 万多人的藏军，在英国支持下武装"驱汉"。英国侵略者公然以"保护商务"为名，于 1912 年 5 月派军数千名侵入西藏，直抵拉萨附近。6 月达赖在英军保护下返回西藏。7 月西藏叛军在英军支援下进攻拉萨，民国政府任命的西藏办事长官钟颖被迫"讲和"。至 9 月驻藏军队陆续返回内地，达赖在英国卵翼下重新掌握了西藏地方政权。在西藏叛军大搞武装"驱汉"的同时，还对川边地区发动进攻。民国政府于当年 7 月派四川都督尹昌衡率川军前往川边平叛，又命云南都督蔡锷派出一支军队，出云南与尹军配合，局势趋于稳定。从此后，中英两国在西藏问题上展开激烈的外交战。8 月 17 日，英国向中国政府提出照会，以不承认中华民国相威胁，否定中国对西藏的主权和在西藏的行政管理权及驻兵权。这个照会是对一个主权国家内政明目张胆的干涉。但此时袁世凯政府迫切需要得到列强承认和借款，不敢轻易与英国决裂，因此采取了拖延态度，暂未答复。此后，袁政府力图通过谈判途径，与西藏地方当局解决争端。首先下令川滇军"不可冒昧轻进"，仅至怒江一线而止。又于 10 月 28 日宣布恢复达赖名号。12 月，袁世凯又致电达赖，表示已令有关方面停战，希望达赖亦下令"属下停战"，对以往争端"另派专员商办"。达赖一度也有和解表示，1912 年底，通过新疆督军袁大化向北京政府提出了恢复汉藏关系的条件，并写信给蒙藏事务局总裁贡桑诺尔布，表示愿意"妥商"西藏事务。西藏地方与北京政府的关系趋向缓和，引起了英国的恐慌。英国唯恐其独占西藏的阴谋落空，再加上当时沙俄正在外蒙古地区拼命扩张，也进一步刺激了英国的侵略胃口，于是它一面切断中、藏间经印度的交通(这是当时进藏的主要通路)，以阻止北京政府派往西藏的官员与达赖发生联系；另一面千方百计压迫北京政府对 1912 年 8 月 17 日英国政府的照会作出答复。12 月 23 日，中国政府严正声明：中国对西藏拥有全权，不但有权管理西藏行政，而且为维持治安，必须在藏境驻有军队；对于西藏问题，中英无改订新约之必要，但答应不改西藏为行省、不无限制地在西藏驻扎军队两项。照会基本上坚持了民族立场，使英国分裂西藏的图谋不能得逞。于是英国侵略者又施展计谋，妄图迫使中国同意举行中、英、藏三方代表会议，以通过签订不平等条约达到其分裂和霸占西藏的目的。北京政府经过一年多的抵制、拖延、犹豫，最终还是屈服于英国的压力。

1913 年 10 月 6 日，在英国策划下，中、英、藏三方代表会议在印度西姆拉开幕，13 日开始首次工作会议。英印政府外交大臣麦克马洪为英方代表，另以原英驻华使馆官员罗斯为中国事务顾问，柏尔为西藏事务顾问；亲英集团头目、首席噶伦伦青夏札为西藏代表；中国代表是西藏宣抚使陈贻范、副宣抚使王海平。在会议开始前三个月，柏尔就窜到江孜与夏札秘密会晤，根据英国政府训令，事先拟好了在西姆拉

会议准备提出的草约，商讨对付中国代表的办法。所以会议一开始，西藏代表就提出六条草案，主要内容包括：一、西藏独立；二、西藏疆域要包括青海、理塘、巴塘等处并及打箭炉；三、光绪十九年暨三十四年之印藏通商章程，由英、藏修改，中国不得过问；四、中国不得派员驻藏。这些要求不仅要使西藏完全脱离中国，而且还要割走中国的青海和四川西部的大片领土，理所当然地遭到中国代表的坚决反对。11月1日，中国代表提出驳复条款七条，主要内容是：一、西藏为中国领土之一部分；二、中国可派驻藏长官及卫队2600人驻扎西藏；三、西藏于外交及军事事宜均应听命中国中央政府指示而后行；四、通商条款之修改应由中英双方商议；五、中藏边界以当拉岭、江达等处划分。中藏双方争执十分激烈。麦克马洪竟无耻地充当中国内部问题的“调人”，实则与西藏代表狼狈为奸，干着有损于中国主权的勾当。直到1914年3月11日，麦克马洪才正式交出英方调停约稿一件，主要内容包括：一、中国对西藏拥有宗主权；二、把西藏划分为外藏（包括西藏地区及青海、川边部分地区）和内藏（包括西康和青海之一部分），外藏有自治权，所有外藏内政由拉萨政府掌理，中国不改西藏为行省，西藏不设代表于中国议院或类似之团体；三、除中国驻藏代表及卫队百名可驻扎西藏外，中国于西藏不派军队，不驻文武官员，并不办殖民之事；四、英藏议订新通商章程，废除光绪三十四年的中英通商章程；五、英国商务委员可于必要时随时带卫队前往拉萨等等。这个所谓“调停约稿”，是妄图用外藏“自治”之名，行西藏独立之实，中国所谓“宗主权”，只是个空洞的名义；而西藏的所谓“独立”，无非是受英帝国主义控制的一块殖民地而已。英国提出这一约稿后，中方代表对其中的几项内容提出异议，特别是不能接受划界一事。经多次谈判，中方一再退让，曲意迁就，却仍不能使英方满足。4月27日，英方提出修正案，除在界务问题上作少许让步外，其它无实质性修改。英、藏代表先行签字后，即压迫中方代表签字画押。陈贻范在英国压力下，被迫草签条约，但随即声明：“画行与签押，当截然分为两事”，表示正式签字必须得到中国政府批准。次日北京政府即回电表示：“执事受迫画行，政府不能承认，应即声明取消。”陈贻范依据中国政府的指示，一直拒绝在正式条约上签字。6月6日、25日，英驻华公使两次向中国政府发出强硬照会，声明不管中国政府的态度如何，英国代表将与西藏代表一起在条约上签字，如中国拒绝签字，它将失去所有三方协约所载的中方拥有的特权与利益，包括对西藏的宗主权。7月2日，英方又通知陈贻范，决定于7月3日正式签订条约，并重复了一遍以前的威胁，陈不为所动。7月3日，英国果然与西藏代表私行签订了正式条约，即所谓《西姆拉条约》。该条约正文共11款，除个别条文外，基本上与3月11日英国提出的“调停约稿”相同。另有交换文书七款及声明一件，前者承认西藏为中国领土之一部分，达赖喇嘛的封号由中国政府加封，但又规定外藏官员由西藏政府任免，外藏不派代表出席中国国会及其类似机关，从而实际上使西藏居于“独立”地位。“声明”一件是确认：如果中国拒绝在条约上签字，则“将被排除享受由于该条约所生的一切权利”。陈贻范于当天发表严正声明：“凡英国和西藏地方本日或他日所签订的条约或类似的文件，中国政府一概不能承认。”7月6日驻英公使又照会英国政府，作了同样声明。以后历届中国政府都坚持了这一立场。这样，由英国片面提出而又未经中国政府签字的所谓《西姆拉条约》完全是非法的，不具有任何法律效力，对中国没有任何约束力。它只是作为英国侵略中国、阴谋分裂中国领土的铁证而留于史册。在西姆拉会议期间，英国还背着中国进行了一系列阴谋活动。7月3日，英、藏签订了新的通商章程11款，规定英国拥有在西藏全境租赁土地、建盖房屋、自由贸易、架设电线、会同审判等特权。这一通商章程未经中国政府认可，其根据又是非法的《西姆拉条约》，自然同样没有法律效力。此外，在西姆拉会议之外，英方代表麦克马洪又背着中国政府，诱迫西藏政府代表夏札以秘密换文的方式，划了一条中印东部边界线，将西藏东南门隅、洛隅、察隅地区的9万平方公里土地划归英属印度，这就是所谓的麦克马洪线。此线之划定，即使在非法的西姆拉会议上亦未予讨论，中国政府毫不知情，更谈不上承认，当然是一条非法、无效的边界线。西姆拉会议从1913年10月6日开幕，至1914年7月3日以中国拒绝签字而收场，英国政府终于无计可施，只是作为一个历史的陈迹，证明着英帝国主义对中国的侵略图谋之卑劣。

（刘振岚）

国民党被取缔与国会之解散

1913—1914年，袁世凯为破坏资产阶级民主制度、确立专制独裁统治，而取缔国民党、解散第一届国会的历史事件。

1913年10月6日袁世凯当选为正式大总统之后，感到国会对他已属无用，便借口“增修约法”，向

国会发动进攻。国会在4月成立以后，即着手制订宪法，7月初由参、众两院议员推选出宪法起草委员60人，其中国民党员33人，占据优势。12日，宪法起草委员会正式成立，选举汤漪为委员长，开始制宪工作。10月中旬，宪法起草委员会起草的宪法草案(即《天坛宪法草案》)脱稿。与民元《临时约法》比较，这个草案扩大了总统权限，对袁世凯作了很多让步，但仍含有责任内阁的精神，没有满足袁世凯大幅度扩大总统权限的欲望。10月16日，袁氏当选正式总统的第10天，即向国会提出了"增修约法案"，要把以责任内阁制为实质的民元《临时约法》改为总统制约法，大大加重总统的权力，要求国会"从速议决见复"。18日，袁世凯又向国会提出咨文，根据《临时约法》第30条临时大总统有"公布法律"之权的规定，指责国会10月4日以宪法会议名义公布的《大总统选举法》侵犯了他的法令公布权，提出所有法令，包括将来议定之宪法，"均须经大总统公布，始能有效"。这实际上是要把国会宪法起草委员会所起草的宪法最后决定权掌握到他自己手中。袁世凯既反对《临时约法》，却又以《临时约法》攻击国会；他本人即根据国会宪法会议公布的《大总统选举法》而当选正式总统，却又用来作为攻击国会的口实，其两面派手法何其露骨！这时国会正在讨论《天坛宪法草案》，认为正式宪法即将制定，无须再增修约法，故对袁氏之"增修约法案"置之不议。袁氏提出"增修约法案"，无非是要国会将其意图作为制宪的根据。而宪法起草委员会竟不肯老实就范，于是袁氏进一步施加压力。10月24日，当宪法起草委员会开会时，他派出施愚、顾鳌等八人为政府委员，突然出席会议，自称"奉总统令，来会陈述意见"。按宪法起草规则，除两院议员外，其他机关人员一律不得出席会议，旁听亦不许可，因此拒绝八人列席会议。袁世凯恼羞成怒，指责"国会专制"，决心以暴力手段对付国民党和国会。25日即通电各省都督、民政长，攻击国会的宪法起草工作，大骂国民党，指责国民党议员操纵把持宪法起草委员会，制定的宪法"妨害国家者甚多"，并且"干犯行政，欲图国会专制"，煽动各省军政长官反对《天坛宪法草案》，攻击国民党人。此电发出后，北洋派各省都督、民政长心领神会，纷纷复电响应，由直督冯国璋领先，浙督朱瑞(1883—1916)、豫督张镇芳、湘督汤芗铭(1880—?)、苏督张勋、鄂督黎元洪等等均通电附和。几天之内，各省附和的通电即有数十通。大家瞋目攘臂，异口同声，斥骂国会宪法起草委员会"竟敢订此暴民专制之宪法"，"欲蹈专制君主之喜怒用事"，但大多对宪法内容略而不谈，只叫嚣撤销宪法草案，解散宪法起草委员会，撤销国民党议员，解散国民党，甚至有的要求袁世凯毅然独断，解散国会，"搜捕乱党，以断根株"，而由袁世凯本人"察纳众言"，另定"中华民国万世不易之宪法"。袁世凯的通电和各省军政长官之复电，算是画龙点睛，说到了主题。经过这番舆论攻势之后，袁世凯便借口查获李烈钧与国民党议员有来往，于11月4日悍然下令(经国务总理熊希龄副署)解散国民党，取消国民党籍议员资格，当天派出军警数百人包围国民党北京支部，连夜追缴国民党籍议员证书、徽章。凡自湖口起兵之日起，挂名于国民党籍的议员都在收缴之列，被收缴议员证书的国民党议员共350余人，但两院议员犹足法定人数，可以开会，所以又补行追缴80余人，连跨党的国民党议员，或在湖口起兵以前已经脱离国民党的，也都被追缴，共计438人。这样一来，国会已不足法定人数，从此不能开会议事。11月10日，宪法起草委员会宣布自行解散，《天坛宪法草案》流产。12日，袁世凯又令各省一律取消国民党籍议员资格，从此全国各级议会均因不足法定人数而陷于停顿状态。15日，参、众两院自行通告停会。国会议员中除公民党外，对此十分愤慨，11月17日和12月3日，众议院议员194人和参议院议员61人分别联名向袁政府提出质问，限三日内答复，但直至12月23日，国务院才予复书，竟说什么，"对于不足法定人数之议员非法所提出之质问书，应不负法律上答复之义务"。进步党领袖梁启超和张謇也分别晋见袁世凯，询问善后办法。袁世凯一面对进步党人敷衍搪塞，一面以政府不能无咨询机关为理由，于11月26日下令组织政治会议。政治会议原是为召集各省军政长官讨论熊希龄内阁所提出的废除省制计划的一种行政会议，召集起来之后，却把它变成了取代国会的咨询机关。政治会议由中央和各省官吏所派代表组成，其中每省派2人，蒙藏两地区各派8人，总统派8人，国务总理派2人，每部各派1人，共计80人。绝大部分是前清官僚。袁指定曾任清朝云贵总督的李经羲为议长，张国淦(1876—1959)为副议长。12月15日政治会议开幕，议员们首先到总统府觐见，聆听了袁世凯的"训辞"，然后在北海团城举行开幕典礼。李经羲致词，要求政治会议"以扶植强有力政府为归"，要全体委员"无负大总统召集本会之盛意"。政治会议完全是袁世凯的御用咨询机关，袁氏即利用它最后完成了解散国会的"大计"。就在政治会议召开前几天，袁世凯强行将黎元洪从湖北调来

北京，利用黎以副总统身分来赞助政治会议。22日，黎以“前兼领湖北都督”的名义，承“旨”领衔邀集各省都督、民政长联名通电，倡议遣散议员，取消国会，即以政治会议代之。袁世凯即以此议作为咨询案，交政治会议讨论。1914年1月10日，政治会议议复，主张应请大总统俯纳各都督、民政长之议。同日，袁即下令停止两院现有议员职务，每人发旅费400元，饬令回籍。民国第一届国会自成立以来仅存在了九个月，即被封建军阀非法解散(此为第一次解散)，充分说明中国民主制度的基础十分薄弱。在国会解散后，袁世凯又向地方自治机关和省议会进攻，2月3日，下令各省自治机关“立予停办”；28日，又令将各省议会“一律解散”。作为民主共和制度重要标志的国会及地方议会被取消，是袁世凯反动势力破坏资产阶级民主制度、实行封建专制独裁、意欲帝制自为的一个严重步骤。民国的共和制度已到了最危险的时期。　　　　(刘振岚)

制宪风潮与毁法造法

北洋军阀头目袁世凯为实现个人独裁，毁弃民元《临时约法》而另造《中华民国约法》的历史事件。

1912年南京临时参议院制定的中华民国《临时约法》规定：在正式宪法产生以前，《临时约法》与宪法具有同等效力；自《临时约法》公布日起，应由临时大总统根据临时参议院制定的国会组织法和议员选举法，在十个月内召开正式国会，制定宪法。1913年4月国会开幕后，即着手于正式宪法的制订。但如何制订宪法，是国民党人与袁世凯势力之间激烈斗争的一个重要问题。国民党人意欲制订一部真正贯彻民主共和精神的资产阶级宪法，以在中国实现资产阶级民主制度，所以对制宪工作十分认真，以为“一字之出入，或关系于国本之安危，一语之增减或关系于国民之消长”，决不可以忽视。袁世凯则企图制订一部大大加重总统权力的宪法，以为实现个人专制独裁铺平道路。制订宪法，本是立法机关的神圣职责，根据《临时约法》和国会组织法的规定，宪法由参、众两院各选同数委员起草拟定，但袁世凯却千方百计以行政手段粗暴干预国会的制宪工作。早在1913年2月，正式国会召开以前，他即下令成立了一个由北洋官僚政客组成的宪法研究会，为制订适合他个人独裁政治的宪法张目。7月，国会宪法起草委员会正式成立，立即着手制宪工作。8月19日，袁世凯派官员将宪法研究会制定的“宪法大纲草案”24条提交国会宪法起草委员会，主旨是扩大总统权力，规定大总统有任命国务员及驻外公使之权，无须经国会同意；大总统得参议院同意，有解散众议院之权。此项草案被国会宪法起草委员会拒绝，认为政府无权干预宪法起草工作，并将袁氏派来的官员驱逐出会场。袁与宪法起草委员会的矛盾激化。10月中旬，宪法起草委员会起草的宪法草案(因以天坛祈年殿为会所，故称《天坛宪法草案》)脱稿，共10章113条。与民元《临时约法》比较，这个宪法草案扩大了总统权限，对袁世凯作了很多让步，但仍含有责任内阁精神，没有完全满足袁世凯大大扩大总统权限的欲望，特别是未能采纳上述“宪法大纲草案”中所要求的两条。10月16日，即袁氏当选正式总统的第十天，又向国会提出了“增修约法案”。他认为《临时约法》“行政权薄弱”，对总统权力限制过苛，说什么：“临时约法第四章关于大总统职权各规定适用于临时大总统已觉得有种种困难，若再适用于正式大总统，则其困难将益甚。”“本大总统一人一身之受束缚于约法，直不啻胥吾四万万同胞之生命财产之重同受束缚于约法。”因此要把以责任内阁制为实质的《临时约法》改为总统制约法，并大大加重总统的权力。如规定总统有权制定官制官规、任命文武官吏、宣战媾和、缔结条约等，无须经国会同意；在国会闭幕期间，大总统有权制定与法律有同等效力之教令及临时财政处分权等。这时国会正在讨论《天坛宪法草案》，认为正式宪法即将制定，无须再增修约法，故对袁氏之“增修约法案”置之不议。袁氏进一步施加压力。10月24日，派出施愚、顾鳌等八人为政府委员，列席宪法起草委员会会议，并要求在会上陈述增修约法的理由。按宪法起草规则，除两院议员外，其他机关人员不但不能出席会议，即连旁听亦不许可，因此拒绝八人列席会议。袁氏恼羞成怒，次日即发表通电，煽动各省军政长官反对《天坛宪法草案》，并借此攻击国民党。北洋派各省都督、民政长心领神会，纷纷复电响应，斥责国会，咒骂国民党，要求撤销宪法草案，解散宪法起草委员会，撤销国民党议员，取缔国民党，解散国会。袁世凯遂于11月4日悍然下令解散国民党，取消国民党籍议员资格，造成国会不足法定人数而陷于停顿状态。11月10日，国会宪法起草委员会宣布自行解散，《天坛宪法草案》流产。袁世凯为了迅速增修约法，制订出一部适合于自己专制独裁的新约法，需要建立一个御用制宪机关，遂于11月26日以政府不能无咨询机关为借口，下令组织政治会议。政治会议原是为召集各省军政长官讨论熊希龄内阁所提出的废除省制计划的一种行政会

议，召集起来之后，却把它变成了取代国会的政治工具。政治会议由中央和各省官吏所派代表组成，其中每省派 2 人，蒙藏地区各派 8 人，总统派 8 人，国务总理派 2 人，每部各派 1 人，共计 80 人。绝大部分是前清官僚。袁世凯指定曾任清朝云贵总督的李经羲为议长，张国淦为副议长。12 月 15 日，政治会议正式开幕。22 日，袁向该会提出"约法增修咨询案"，但政治会议自认为该会委员均由政府派遣，作为政府的咨询机关，无权增修根本大法，遂建议袁氏另设"约法会议"作为造法机关，其职权"以议增修约法案及其附属于约法之重要法案"。据此，袁世凯于 1914 年 1 月 26 日公布《约法会议组织条例》，下令组织约法会议。按组织条例规定，约法会议的议员共 60 人，其中京师 4 名，每省 2 名，蒙藏、青海共 8 名，全国商会联合会 4 名。议员选举在袁政府的严密控制下进行，只有具备下列资格之一者，才有选举权：一、曾任或现任官吏通达治术者；二、曾由举人出身而声望素著者；三、曾在高等专门以上学校三年毕业而精研科学者；四、有万元以上之财产而热心公益者。因此各地有选举权的人寥寥无几。其实选举只是形式，被选人均由政府提名，议员都是由袁世凯指定或经他同意的。3 月 18 日，约法会议在北京北海团城开幕。孙毓筠、施愚当选为正、副议长。孙是个变了节的国民党人，袁用他旨在标榜约法会议有革命党人参加，增修约法决非北洋派私意。约法会议成立后，首先确定以"力谋国权之统一"，"但求统治组织无所变更"作为增修《约法》之主旨，"以总揽统治权，属之国家元首，以重大总统之权"。20 日，袁世凯即向约法会议提出他的"修改约法大纲"七条：一、总统得宣战媾和，与外国缔结条约，无庸经参议院之同意；二、总统得制定官制官规，任用国务员及驻外使节，无庸得参议院之同意；三、实行总统制；四、宪法由国会以外之国民会议制定，宪法起草权属于总统及参议院，宪法制定后由总统公布之；五、关于公民权力之褫夺与恢复，总统得自由行之；六、总统有紧急命令之权；七、总统有紧急处分财产之权。约法会议即根据这个大纲，经过 40 多天的起草和讨论，终于制定了一部"字字皆袁氏手定"的《中华民国约法》，亦称《新约法》，俗称《袁记约法》，于 5 月 1 日由袁世凯公布，同时废除《临时约法》。新约法共 10 章 68 条，其内容特点是采取极端集权主义，完全否定了民国以来的民主主义精神，是一部适合独裁者需要的约法。第一，关于国家统治权问题，《临时约法》规定由参议院、临时大总统、国务员、法院共同行使，新约法改为"大总统为国之元首，总揽统治权"；"大总统对国民之全体负责"，不对任何民意机关负责，而大总统作为国家元首又有代表国民全体的权力，这就是说，他仅对自己负责。他可以盗用"国民之全体"的名义，为所欲为，谁要反对他，谁就是人民公敌。第二，关于行政权，取消了《临时约法》规定的责任内阁制原则。内阁制的特点是大总统不负实际责任，而由内阁行使职权，内阁则须对国会负责。新约法规定："行政以大总统为首长，置国务卿一人赞襄之。"这就把代替内阁总理的国务卿降低为附属于总统府的一个工作人员，而使总统的权力不受任何制约，凌驾于一切政府机关之上，成为一种不同于欧美资产阶级国家的特殊的"总统制"。而且从美国官制中搬来"国务卿"这个名词，别有一番移花接木的深意："卿"又是中国封建官制中的特有名词，"卿"之上必有皇帝，袁想利用这种"烘云托月"的手法，逐渐完成从总统到皇帝的演变。第三，关于立法，新约法规定采取一院制，定名为立法院。立法院为民国议会，由各省人民选举的议员组成。此外，还设立参政院，作为大总统的咨询机构，在立法院成立以前，即以参政院代行立法院职权。立法院由大总统召集，由大总统宣告开会、停会、闭会。立法院无弹劾总统权，而总统只要经参政院同意，有解散立法院之权，参政院参政员均由大总统指定，所以这项限制等于具文。参政院对立法院制定的法律有否决权，还有宪法起草权。袁世凯虽也公布了立法院组织法和议员选举法，但实际上立法院始终没有成立，而一直由参政院代行其职权。通过"增修约法"，袁世凯把他两年来恣意破坏资产阶级民主制度所取得的各种专制特权，用法律形式肯定下来，而且为他进一步实行独裁，提供了"法律依据"，使得袁世凯无论在事实上或形式上都成为中国的独裁元首。

除制定约法外，约法会议还承袁世凯之命，炮制了袁记《大总统选举法》。1913 年 10 月 4 日公布的《总统选举法》规定大总统由国会选举，总统任期五年，如再被选得连任一次。对此，袁世凯深为不满，但那时为迅速登上正式总统宝座，暂时隐忍未发。新约法公布后，梁士诒趋承袁氏意旨，在参政院提出修改总统选举法。参政院即咨请袁世凯提交约法会议。1914 年 12 月 28 日，修正《大总统选举法》经约法会议通过，次日由袁世凯公布。其内容要点为：一、总统任期改为 10 年，连选亦无限制。二、凡届总统改选之年，如参政院认为"政治上有必要时"，得为现任总统连任之议决，即无须改选。三、总统继任人，应由现任总统推荐于选举会，其名额以 3 人为限，被推荐者之

姓名由现任总统预先书于嘉禾金简，藏之金匮石室，非奉大总统命令，不得开启，临选时始行取出，由大总统交付选举会。根据这个选举法，袁世凯实际上成为终身总统，而且有权传子，世袭罔替。新约法的颁布，标志着辛亥革命的完全失败和袁世凯大地主大资产阶级独裁统治的完成。袁世凯距封建皇帝只差一个称号和一顶皇冠了。（刘振岚）

讨袁宣言发布

1914年5月至1916年5月，孙中山为揭露袁世凯复辟帝制罪行，号召武装讨袁，三次发表《讨袁檄文》和《讨袁宣言》。第一次讨袁檄文于1914年5月发表于革命党人在上海创办的《生活日报》，题为《孙文檄文》(亦称《讨袁宣言》)，此即第一次讨袁宣言。此次讨袁檄文发表于袁世凯镇压二次革命之后，正当袁氏疯狂破坏资产阶级民主共和制、解散国会、废弃《临时约法》、大倡尊孔复古逆流、大搞封建专制独裁、猖獗不可一世之时。当时虽有少数革命党人对袁世凯称帝野心有所察觉，但多数人尚在袁氏制造的扑朔迷离的政治氛围中认不清庐山真面，而孙中山的檄文却一针见血地抨击袁世凯"背弃前盟，暴行帝制"的种种罪行，指出袁之"暴戾更甚于清"：其解散地方自治会，使人民不得安；解散国会，使国家"无正论"；滥用公款、谋杀人才，又陷国家于危险之地；假借革命党罪名而滥杀无辜，则使无数"良懦"受冤狱之苦。认为"有此四者，国无不亡！"而这一切均为博袁世凯"一人皇帝之雄"。孙中山愤怒表示"誓死戮此民贼，以拯吾民"，并号召一切"爱国之豪俊共图之"。两个月后，1914年7月8日，孙中山在日本成立中华革命党，首举讨袁义旗，准备发动"第三次革命"。为达此目的，决定建立中华革命党自己的军队——中华革命军，孙中山以中华革命党总理任中华革命军大元帅。为解决中华革命党的建军指导思想及一系列军事问题，孙中山于1914年秋主持制订了一部完备的军事著作——《革命方略》，确定以"推翻专制政治，建设完全民国，启发人民生业，巩固国家主权"为中华革命军的最终目标。《革命方略》共分六编，其中第六编《文告》中首篇为《中华革命军大元帅檄》，此即孙中山第二次讨袁檄文。这篇檄文声讨袁氏罪恶，言词较第一次檄文更为尖锐，开首即称"世界自有共和国以来，殆未有此万恶政府危亡祸乱至于此极者"！又揭露袁氏自窃夺总统权位以来，毁弃约法，解散国会，停罢地方自治，裁并司法，生杀予夺，一出于私，假中央集权之名，行奸雄窃国之实；继而又大倡尊孔复古逆流，妄行帝制，致使殉国烈士饮恨九泉，首义元勋流亡海外，窃国者竟以自由幸福非吾中华国民所应享，此真天下之奇耻大辱。他大声疾呼："袁贼妄称天威神武之日，即吾民降做奴隶牛马之时！"号召天下志士群起讨袁，表示"虽肝胆涂疆场，膏血润原野"，也在所不辞。1916年5月9日，孙中山又在上海《民国日报》再次发表讨袁宣言，题为《孙文宣言》，世间流传之所谓《第二次讨袁宣言》即指此。此时反袁的护国战争已进入高潮，滇、黔、桂、粤、浙等省已宣布独立，袁世凯在护国军的打击和全国人民的反对下，被迫于3月22日宣布撤销承认帝位案，但是仍想依靠北洋军，继续保持总统权位；而南方护国军坚持要袁退总统位，提出拥副总统黎元洪继任大总统、恢复《临时约法》和旧国会的政治主张。同时，南方护国军也已表现出愿与除去袁世凯的北洋军阀重新携手的迹象。在这种情势下，孙中山发表第二次《讨袁宣言》，对滇、黔独立讨袁给予赞扬；对独立各省要求恢复约法和国会的主张给以肯定和支持；同时明确指出："袁氏推翻民国，以一姓之尊而奴视五族，此所以认为公敌，义不返兵"，号召全国人民起来把反袁斗争进行到底，"除恶务尽"，并尖锐指出，这场斗争"不徒以去袁为毕事"，而要永远铲除帝制，"袁氏未去，当与国民共任讨贼之事；袁氏既去，当与国民共荷监督之责，决不肯使谋危民国者复生于国内。"孙中山先后发表的三次讨袁檄文和宣言对于揭露袁世凯复辟帝制的阴谋，呼唤全国人民奋起讨袁起了巨大的警醒和动员作用。在其号召下，中华革命党组织了中华革命军东南军、东北军、西南军、西北军，先后在广东、湖北、湖南、江苏、浙江、山东、奉天(辽宁)等地进行过40余次反袁武装起义，虽然都未能取得胜利，但是由于它发动的时间最早、斗争最为坚决，对全国各阶层的反袁斗争起到了召唤、激励和推动的作用，特别是中华革命党在广东和浙江的反袁斗争曾直接配合了护国军驱走此二省的袁氏政权，而实现了二省的独立。（刘振岚）

中华革命党成立

中华革命党，1914年孙中山在日本重建的资产阶级革命政党。

1913年二次革命的失败，在国民党人中造成严重创伤。当时的情形是，党人星散，军队溃灭，地盘沦丧，革命党人在国内已无立足之地，悲观失望情绪严重滋长。亡命日本的革命党人，意见纷歧，心灰意冷，"几于一蹶不振"。但孙中山先生不为失败所吓倒，在

挫折面前，百折不回。他总结了二次革命失败的经验教训，认为它的失败，“非战之罪”，“亦非袁氏(指袁世凯)兵力之强”，而是同党人心之涣散，党员有如一盘散沙，不肯服从领袖的命令，号令不能统一所致。为此，他决心解散毫无战斗力的国民党，重组新的有战斗精神的革命党，以便恢复同盟会时期的革命精神，再度举起民主革命的旗帜，发动反袁的第三次革命。鉴于前车之失，孙中山提出了三条建党方针：一、改变不服从领袖的心理，绝对服从党魁命令；二、改变以前散漫状态，强调组织系统严密、队伍团结；三、正本清源，排除一切不革命、不纯粹的分子。经过半年多的努力，孙中山于1914年7月8日在东京精养轩召开大会，正式宣布新党成立，定名为中华革命党。大会通过了《中华革命党总章》。孙中山当场宣誓加盟，并就任总理职务。总部陆续颁布了79次委任令，委任了832名各级干部，其中总部人选为：总务部正副部长为陈其美、谢持；党务部正副部长为居正、冯自由；财政部正副部长为张人杰、廖仲恺；政治部正副部长为胡汉民、杨庶堪；军务部正副部长为许崇智、周应时。在总部直接指导下，国内18个省成立了支部；海外建立了39个支部和45个分支部。海内外组织系统建立后，新党员不断增加，逐渐发展到一万多人。

孙中山手书的《中华革命党总章》提出了该党纲领，它明确规定“本党以实行民权、民生两主义为宗旨”，以“扫除专制政治，建设完全民国为目的”，继承了同盟会时期的民权、民生主义的革命内容；同时把推翻袁世凯专制独裁统治、建立一个新的资产阶级民主共和国，作为党纲的重要内容，比起国民党只求在袁世凯统治下分享部分权力的纲领来，有明显的进步。《总章》特别强调在革命时期内，即在正式宪法颁布以前，不再以《约法》为依据，而是“一切军国庶政，悉归本党党员完全负责”。这是接受了辛亥革命后袁世凯篡权，约法却无能为力，反被袁氏废弃的惨痛教训，防止官僚政客投机革命，侵夺政权而做的特殊规定；并以此加强党在巩固政权时的地位和领导作用。这一规定，反映了孙中山比辛亥革命时期更重视政权问题。这个纲领的缺陷在于它仍然没有提出反对帝国主义问题。对于同盟会的三民主义，只提出坚持民权和民生两主义，而忽视了民族主义的反帝内容。在组织方面，中华革命党力图实现集中领导，加强党的统一。孙中山接受以往党内分裂造成革命失败的教训，煞费苦心地采用了中国封建社会秘密结社的组织形式，规定全体党员“首以服从命令为唯一之要件”，而且必须服从孙中山一人；入党者须有人介绍，要填写《誓约》，加盖指模，宣誓“附从孙先生再举革命”；党员叛党，除处罚本人外，介绍人也要负过失之责。同时还规定将党员分为“首义党员”、“协助党员”和“普通党员”三种，各享受不同的政治权利：凡于革命军起义之前入党者为“首义党员”，列为将来的“元勋公民”，有参政执政的优先权；凡于革命军起义之后、革命政府成立之前入党者称为“协助党员”，列为将来的“有功公民”，有选举权和被选举权；凡于革命政府成立之后入党者为“普通党员”，列为将来的“先进公民”，仅有选举权。所有这些规定，目的在于“正本清源”，“摒斥官僚”，“淘汰伪革命党”；克服以往同盟会、国民党时期的人心涣散、党内分裂、鱼龙混杂之弊病；也为避免革命后革命党人被排斥在政权之外，以致革命成果付诸东流的危险结局。在这种带有封建性的秘密结社形式的背后，仍然渗透着孙中山为国为民、拯救革命的一片真诚。但作为一个革命政党，以这种封建家长式的落后形式作为组织纽带，并把党员分成等次，论资排辈，讲究特权等等做法，势必加深党内、党外的隔膜，甚至形成特权阶层，造成新的不平等，从而进一步脱离群众，使党成为一个人数寥寥、带有神秘色彩的狭隘团体，而组织不起广泛的革命队伍。正因此，有部分同盟会的老会员和国民党员，如黄兴、谭人凤、李烈钧、柏文蔚等，拒绝加入该党。《总章》还规定：“以积极武力，扫除一切障碍，而奠定民国基础。”说明中华革命党继续坚持武装斗争的革命道路。孙中山亲自主持制订了一部十分详尽的《革命方略》，作为建军的指导思想和基本原则，规定以“推翻专制政府”、“建设完全民国”、“启发人民生业”、“巩固国家主权”为革命军的奋斗目标。并对誓约、官制、编制、军律、军法等方面都作了详尽的规定。这是自同盟会成立以来最完备的一部军事著作。孙中山如此注重军事工作，是因为他把武装讨袁作为中华革命党的首要任务。

中华革命党成立后，立即投入反对袁世凯独裁统治、重建民国的斗争。一方面，创办报刊杂志，揭露袁世凯破坏民国、图谋复辟帝制的罪行。如在美洲发行《民口杂志》、新加坡发行《国民日报》，在日本创办《民国杂志》。这些报刊旗帜鲜明、战斗性很强。孙中山自己也在1915年至1916年间相继发布了《讨袁檄文》、《讨袁宣言》和《第二次讨袁宣言》，号召要永远铲除帝制，维护约法，恢复国会，重建资产阶级民主共和国。另一方面，中华革命党以更大的精力，发动了一系列武装反袁斗争。孙中山先后派遣陈其美、

居正、胡汉民、于右任等多人回国，分别在各地发动反袁起义，比较著名的有：1914 年 6、7 月间，李国柱、雷瀛、雷英等人领导的湖南郴县、桂阳反袁起义；同年 11 月 1 日，洪兆麟又在广东惠州聚众 2000 余人(号称万人)，举兵反袁；11 日，朱执信在广东顺德举兵讨袁，曾率众数千人攻打佛山。1915 年 11 月 10 日，王晓峰(？—1915)、王明山刺杀上海镇守使郑汝成(？—1915)；12 月 5 日，陈其美策动肇和兵舰起义。1916 年，江苏江阴、吴江、安徽大通等地先后爆发了中华革命党人领导的武装反袁起义；居正还在山东青岛建立了一支拥有数千人的中华革命军东北军，1916 年春曾攻克山东十余州县，威震华北，沉重地打击了袁世凯的反动统治。此外，湖北武昌、湖南湘乡、宝庆、福建连江、奉天兴京(辽宁新宾)等地，也都爆发了中华革命党领导的武装起义。但是，由于这些起义缺乏统一的组织领导，忽略了广泛发动群众，只是依靠个别党员进行单纯军事冒险，所以结果都失败了。

中华革命党的成立，有其总结历史经验、振作革命精神、坚持革命道路、维护共和制度等积极的一面；但是，也有脱离人民群众、组织形式落后、不善于团结各方面政治力量等消极的一面。其根源在于孙中山在总结二次革命失败的教训时，只看到党内涣散这样一些表面现象，并没有看到造成党内涣散的根源主要是由于对于本阶级的使命缺乏真正的认识。因此在组建新党时，仅把注意力集中到服从领袖、整肃纪律这样一些非根本性的问题上，而没有把该党的思想统一到夺取政权、重建政权、实现资产阶级专政这一根本问题上来；也未能正确回答依靠什么力量去实现反对专制、重建民国的目标这样一些带有根本性的问题。因此党员只能凭着对孙中山个人的信仰与服从，搞单纯的军事冒险，表现了个人的英勇精神，却不能完成阶级的使命。1916 年袁世凯死后，该党党部由日本东京迁到上海。1919 年 10 月，仍改组为中国国民党。 (刘振岚)

欧事研究会成立

欧事研究会，1914 年以黄兴为首的部分国民党人因与孙中山存在策略分歧而组成的反袁政治团体。

1913 年二次革命失败后，孙中山、黄兴、胡汉民、李烈钧、柏文蔚、廖仲恺、李根源、谭人凤、陈其美、朱执信等人逃亡日本，暂借日本为安身立足之地，总结经验教训，整顿内部，确定下一步方针。但在总结以往失败教训及筹划下一步进行方针这个问题上，国民党内产生了严重分歧。孙中山认为二次革命失败的主要原因是“不服从、无统一”两大端，其中尤以“不肯服从一个领袖的命令”最为关键，致使党内人人自由行动，革命主义无从贯彻，以致坐失良机，造成失败。孙中山还指责黄兴在“宋案”发生后，一味主张法律解决，贻误了武装讨袁的战机；战争发生后，黄兴又以“文(孙中山自指)不善戎伍”，阻拦他“亲统六师”赴南京指挥战斗；而黄兴自告奋勇赴南京指挥，又不坚守，在关键时刻，竟“贸然一走”，致使“三军无主，卒以失败”。黄兴不同意孙中山对二次革命失败原因的分析，认为主要是由于敌强我弱，革命党缺乏足够的准备；加之仓促应战，遂致湖口失败，死战而不得上海，南京也难于坚守。至于战争失败的责任，黄兴身为三军主帅，理应负有较大责任，故在致孙中山的长函中表示接受孙中山的批评。但对孙中山的一些过分的指责，也作了一些解释。他说当时胜负未知，他阻拦孙中山“亲统六师”赴南京，“实重爱先生，愿留先生以任大事”。党内对战争失败原因产生不同看法，本是正常现象，但如果过多追究个人责任，只会加深党内分歧，于团结不利。况且，孙中山对黄兴的指责也是有欠公允、不够客观的，结果是加深了党内裂痕。此外，孙、黄对当时政治形势的估计以及对以后斗争的战略策略，也出现严重分歧。孙中山对形势的估计是乐观的，认为表面上袁氏气焰嚣张，革命党势力似乎已丧失殆尽，但由于袁氏种种倒行逆施，必将激起各阶层人士不满，革命势力定能不断发展。如果从现在即着手准备，一两年内还可以“造成一番新的形势”。所以他号召革命党人持“积极主义”，一致猛进，共图三次革命。为达此目的，他认为应当从整顿党务入手，解散国民党，重组新党。黄兴则认为革命党新败，袁党势力正当盛时，不可低估；况且二次革命时，革命党拥兵数万，有数省地盘，尚且失败，而今日流亡海外，“无尺土一兵，安敢妄言激进”？认为当前图三次革命的时机尚未成熟，应从长计议。他还反对孙中山另组新党的主张，坚持应继续保全国民党。陈其美、廖仲恺、朱执信、居正等人支持孙中山的激进主张；李烈钧、柏文蔚、李根源、钮永建等赞同黄兴的“缓进”主张。从此，革命党内部出现了“激进派”和“缓进派”的分野。1914 年 7 月，“激进派”在孙中山领导下另组中华革命党，黄兴等人因反对该党誓词中“附从孙先生”；入党手续中要求党员加按指模；以及党章中关于非党员在革命时期内没有公民资格和元勋公民等项规定，拒绝加入该党。从

此两派在组织上正式分裂。部分国民党员趁机主张拥黄兴"另行组党"。黄虽不肯屈从孙中山意见，但一直视孙中山为革命党唯一领袖，不肯另树一帜。为避免党内纠纷、给敌人造成挑拨离间的机会，并向孙中山"明表心迹"，黄兴决定离开日本，前往美国。临行前，曾宴请孙中山叙别。

黄兴离日后，正值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缓进派国民党人经常聚在一起讨论欧战与中国革命前途的关系问题。1914年8月，李根源、彭允彝、殷汝骊、冷遹(1882—1959)、林虎、程潜六人发起，以讨论欧事为名成立组织，即定名为"欧事研究会"(以下简称"欧会")，因这个名称既可避免发生与中华革命党对立的误会；又不致为袁政府所忌。参加者，有一百数十人，主要包括两部分人：一部分是追随黄兴的原同盟会军事骨干、二次革命时武装讨袁的领导人和军事将领，即所谓"黄派军人"，如原江西都督李烈钧、广东都督陈炯明、安徽都督柏文蔚、江苏讨袁军将领钮永建、江西讨袁将领林虎、湖南将领程潜等人，这部分人是"欧会"的核心力量。另一部分是原国民党稳健派，即二次革命时主张"法律解决"的国会议员，如殷汝骊、彭允彝，以及谷钟秀(1874—?)、吴景濂、杨永泰(1880—1936)等。"欧会"的组织者和实际负责人是李根源。李根源(1879—1965)，字印泉，号雪生。云南腾冲(腾越)人，日本陆军士官学校毕业，后加入同盟会，曾任云南参议院院长兼军政部总长，1913年任众议院议员。他以军人和国会议员的双重身分，和以上两部分国民党人均有密切联系，故此成为联络两派的核心人物。"欧会"没有制订正式章程，只留下一份该会发起人于1914年8月13日起草的"协议条件"，主要内容为：一、集中人才，"不分党界"；二、对于孙中山先生取"尊敬主义"；三、对于国内取"渐进主义"，争取各方同情。"欧会"也没有严密的组织系统，没有设置最高领导职务。只是成立后，由六名发起人联名致函在美国的黄兴，请其加入。黄兴于9月3日复函欣然赞同。因黄兴的思想对该会具有指导作用，它的成员又多是黄兴的追随者，故黄兴便成为该会的精神领袖。

"欧会"成立后，坚持反袁立场。初期，主要是在美国、日本以及上海等地从事反袁宣传，留在上海的"欧会"成员谷钟秀、杨永泰等人，本着"对于当代有望人物，取广义的联络主义"的方针，筹备创办法政专门学校，一面培养人才，一面拟在各学科延聘有望人才，发起成立学会，作为联络各方人士的纽带。同时又设立明明编译社和泰东书局，创办《正谊》杂志，以编译法政、哲学、文学各种书籍，从事宣传活动。在美国，黄兴、钮永建等人先后到檀香山、旧金山、纽约等地，发表演说，著文立说，揭露袁世凯破坏共和、实行专制独裁的罪行，争取美国人民对中国革命的同情。在日本东京，由章士钊创办《甲寅》杂志，揭露袁世凯假共和之名、行专制之实的反动本质。1915年1月，日本提出灭亡中国的"二十一条"，消息传出，举国哗然，在尖锐的民族矛盾与反对袁世凯专制独裁的斗争交织在一起的复杂情势下，"欧会"从缓进的讨袁方针转而倾全力反日救国，提出暂时"停止革命"活动，联合袁世凯政府"一致对外"的口号，希图以停止革命活动换取袁世凯拒绝日本的"二十一条"要求。但是，无情的事实粉碎了"欧会""联袁反日"的幻想。袁世凯为依靠日本称帝，于1915年5月9日对日本"二十一条"除"第五号"表示"容日后协商"外，全部接受。至此，"欧会"豁然大悟，放弃"暂停革命，一致对外"的主张，黄兴、李烈钧、陈炯明、柏文蔚、钮永建、林虎、程潜、李根源等17人即于5月9日当天发表联名通电，愤怒斥责袁世凯政府对日本"一味屈让"，竟冒天下之大不韪，承认日本旨在灭亡中国的侵略要求。所以造成这种严重后果，完全是由于袁政府媚日卖国政策所致，表明"欧会"再次向袁世凯公开宣战。袁世凯不顾舆论反对，于同年8月指使杨度等人在北京成立筹安会，公开推进帝制运动。"欧会"会员纷纷回国，于11月聚集上海，确定了不分党派、联合各派力量一致反对袁世凯卖国称帝的方针。从此，"欧会"作为讨袁联合战线的一支生力军发挥了重大作用。一方面，它先后在上海创办《新中华杂志》和《中华新报》等报刊，继续从事反袁宣传；另一方面，又发挥其作为国民党缓进派与各方保持密切联系的政治优势，积极联络各派政治力量共同讨袁。它首先与中华革命党实现联合，继而又对进步党从拥袁到反袁的转变给予热烈赞扬与支持；还派人南下与广西将军陆荣廷联络，促其下定讨袁决心。与此同时，"欧会"把策动武力讨袁当作中心任务。经过反复筹划，他们认为西南五省袁氏力量相对薄弱，其中尤以云南发动反袁条件最为成熟，于是决定以云南作为策动反袁起事的基地。1915年10月，李烈钧即开始试探云南将军唐继尧的态度，继而又派出方声涛(1885—1934)等人赴滇，联络、策动军界人士反袁。12月17日，李烈钧等人到达昆明，为发动反袁起事做了大量组织工作。黄兴虽身在美国，亦时刻关心国内局势的发展，利用其影响，致函各方，联络西南军、政界人士，并积极设法帮助蔡锷入滇，促其

在云南发动反袁起事。事实上,云南能首举讨袁护国义旗是和黄兴及欧会的努力分不开的。

综观欧会的成立及其活动可看出,该会虽与孙中山组织的中华革命党存在分歧,但它在革命危难之际,仍然坚持了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立场,在这个根本点上和中华革命党是一致的,两者的分歧属于反袁策略各异。欧事研究会所持"缓进"方针,确实存在过高估计敌人力量、对再举革命缺乏信心等消极因素,但是他们反对中华革命党组织上的宗派主义、神秘主义,军事上的盲动冒险倾向;主张不分党界,联合一切可能联合的爱国反袁力量共同讨袁,无疑是当时正确的斗争策略。他们运用这个策略,联络各方,开展了各种形式的反袁斗争,为推动护国运动的爆发做出了积极的贡献。惟"二十一条"交涉开始后的几个月内,"欧会"由于未能清醒地认识袁氏独裁政权就是丧权辱国的根源,忽略了对外反侵略与对内反对卖国政府的一致性,曾提出"联袁对外"、"停止革命"的错误主张,虽含有坚决反对日本侵略的积极因素,但客观上使袁世凯得以利用欧会停止革命的时机,分化瓦解革命队伍,有利于他进一步集中权力。（刘振岚）

中日"二十一条"交涉

1915年中日两国就日本帝国主义提出的妄图灭亡中国的二十一项秘密条款所进行的外交斗争。

日本帝国主义独霸中国的野心由来已久,早在清光绪三十四年(1908),日本政府在其《对外方针政策决定》中就确定了日本应在满洲享有"特殊地位"。1913年日本外务省在其《对华外交政策纲领》文稿中又具体地筹划了在中国满蒙、华中、华南、福建、台湾等地区如何进一步推进或巩固其侵略势力的方针。1914年日本右翼浪人团体黑龙会,提出了《对支那问题意见书》,这便是以后"二十一条"的雏型。当年8月,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欧洲帝国主义列强忙于互相厮杀,暂时放松了对中国的侵略,为日本实现其独霸中国的野心提供了千载难逢的良机。8月23日,日本以英、日同盟为借口,参加英、法、俄协约国一方,对德宣战,但它并不派兵到欧洲战场,而是在中国山东半岛登陆,进攻德国侵占的青岛和胶济铁路沿线,乘机夺取德国在山东的侵略权益。袁政府仿照日俄战争时期清政府的做法,宣布局外中立,划出战区,听任日、德在中国领土上厮杀、蹂躏。10月底日军对青岛发起总攻击,11月7日,德军投降。1915年1月7日,袁政府宣布取消战区,要求日军撤出。日本大隈政府蛮横地拒绝,乘机将早已筹划好的《对支那政策文件》(即"二十一条"草案)付诸实施。1月18日下午3时,日本驻华公使日置益(1861—1926)在怀仁堂晋见袁世凯,当面递交日文本"二十一条"一份。两日后,日置益又将另一份附有汉文译文的"二十一条"文本递交袁政府外交部,作为中日两国正式交涉的根据。"二十一条"的内容分为五号:第一号,关于山东问题四款:德国所占有的山东一切权利转让给日本;山东境内沿海土地及岛屿不得租让给他国;日本建造龙口或烟台接连胶济铁路之铁路;中国开辟山东省各主要城市为商埠。第二号关于日本在南满及东蒙"享有优越地位"七款:旅大租借期及南满、安奉铁路租期均延至99年;日人得在该地区租借或购买土地;日人可在该地区居住往来,经营工商业;该地区之矿产开采权许以日人;吉长路的经营管理权延至99年;该地区或因筑路或以税课作抵押向外国借款须经日本政府同意;中国政府在该地区聘用政治、财政、军事顾问、教官等须与日本商议。第三号关于汉冶萍公司共二款:中日合办汉冶萍公司;附近矿山,包括汉阳铁厂、大冶铁矿和萍乡煤矿,不准公司以外之人开采。第四号一款,即要求中国沿海港湾及岛屿不得让与或租借与他国。第五号共七款:中国中央政府须聘用日人充当政治、财政、军事顾问;日本在中国境内所设医院、寺院、学校拥有土地所有权;警察由中日合办;半数以上之军械向日本购买,或中日合办军械厂,聘用日本技师,采买日本材料;武昌、九江、南昌、杭州间,南昌、潮州间各铁路之建造权许与日本;福建省内筑路、开矿及整理海口(船厂在内)如需外国资本须先向日本协议;日本在中国享有宣教权。"二十一条"严重损害了中国主权,充分暴露了日本帝国主义妄图变中国为其独占殖民地的狰狞面目。日置益在向袁世凯递交"二十一条"时,一面威胁说,如中国拒绝日本要求,则日本有可能支持中国的革命党;一面又引诱说:如袁总统能接受日本要求,则"日本政府从此对袁总统亦能遇事相助"。怎样相助呢?日置益曾向外交次长曹汝霖(1877—1966)明确表示:"敝国向以万世一系为宗旨,中国如欲改国体为复辟,则敝国必赞成。"暗示可以支持袁世凯称帝为交换条件——这是日本政府胁迫中国政府承认"二十一条"的主要交涉手段。同时,为了避免引起中国人民反对和其他列强干涉,日本要求中国政府对"二十一条"内容"绝对保密,尽速答复"。

对于日本如此穷凶极恶的无理要求,袁世凯也

感到难于承受。本来,作为一个主权国家,完全有理由严正驳回,拒绝讨论,但因袁正在做着帝制自为的美梦,亟需获得帝国主义的支持,所以不敢得罪日本,竟派出全权代表与日本公使举行秘密谈判,开始了中、日政府间的"二十一条"交涉。为了避免过多丧失主权,减轻卖国罪责,袁世凯还采取了一些相应步骤:一是派自己的日本顾问有贺长雄回国拜访对日本政府有相当影响的几位元老;又命外交次长曹汝霖密令驻日公使陆宗舆(1876—1958)会见日外相加藤高明,双管齐下,探询日本政府提出"二十一条"的"真意"以及日方可以"让步"的最低限度,并要求日本"留亲善余地"。二是密电江苏将军冯国璋联合19省将军发表通电,声称拒绝日本要求,不惜一战,以增强自己谈判的力量。三是有意向中外报界透露日本要求的部分内容,用以动员舆论,作为要求日本降低条件的口实。但是袁世凯的鬼把戏被日本政府一眼看穿,对冯国璋的联名通电,认为是"袁氏权诈老套",根本不予理睬;对袁氏有意透露"二十一条"内容,多次提出抗议,多方进行威吓,但确实激起中国人民的极大愤慨,上海、北京、天津等地掀起了各种形式的抗议活动,很快形成波及全国范围的抵制日货热潮。袁世凯政府迫于日本的要挟,多次传令各地禁止抵制日货,而反日斗争却压抑不住,声势日益浩大。"二十一条"交涉就是在人民的一片反对声中开始的。中日秘密交涉自1915年2月2日开始,每周举行二三次,至4月26日,共开谈判会议25次。日方代表为日置益、参赞小幡酉吉、高尾亨。中方代表是外交总长陆征祥、次长曹汝霖和秘书施履本。交涉一开始,日置益就坚持要中方代表对"二十一条"整体内容表示态度,以诱使中方代表将日方要求囫囵吞下。陆征祥则主张逐条讨论。双方为此曾发生激烈争论,终于还是中方让步,同意先对"二十一条"整体发表意见,再进行逐条讨论。此时袁世凯鉴于全国人民反日情绪高涨,唯恐完全向日本屈服,会遭到人民激烈反对;加以他通过有贺长雄及陆宗舆了解到日本政府提出"二十一条"的"真意"在于获得在满蒙的扩张机会,至于侵犯中国主权最为严重的第五号条款,仅为"希望商订之件","系劝告性质",于是令中方代表提出对日方一、二、三号要求的修正案,基本上满足日本对满蒙的权益要求;对第四号主张由中国政府自行宣布,不将沿岸港湾岛屿让与外国,而不必订入条约;对第五号予以拒绝,表示"碍难商议"。但日置益态度凶蛮,对中方第二号之修正案大为不满,尤对延长安奉铁路期限及日人因在南满东蒙杂居而要求的领事裁判权等问题,展开激烈辩论;同时一再逼迫中方讨论第五号,并威胁说:如中国政府"不允照办","恐生不测危险之结果"。4月17日,又以中断谈判作为要挟。与此同时,日本政府还以换防为名,往大连、青岛及塘沽等地增派军队,示以武力威胁。袁世凯无奈,继请有贺长雄拜会日政府要人,"奔走说情"。同时,欧美列强已从袁世凯的英国政治顾问莫理循(Morrison, George Ernest, 1862—1920)处得知"二十一条"全部内容(日本提出"二十一条"时,仅以一至四号通知英、美、俄、法四国,隐瞒了最严重的第五号),对日本企图独占中国,损害他们在华权益的野心纷纷给予激烈抨击。英国约于4月下旬照会日政府,声称长江流域铁路,"中英已有成约,请勿侵扰"。再加以中国人民反日浪潮日趋激烈,日本只好同意降低要求,于4月26日提出修正案,共24条内容,仅将若干条文改用换文方式,表面上似乎减轻了严重性,实质依然如故。对此24条,日方宣称"此系日本政府最后之让步",同时声明,如中国政府将24款完全承认,日本政府拟将胶州湾以适当时机,附加条件,交还中国。袁政府既不愿完全接受,也不敢完全拒绝,决定对第一至第四号原争议各款再作让步,惟第五号仍完全拒绝。据此作成修正案,于5月1日提交日置益,表示中国"万难再让"。日置益继续威胁,说中国政府若不完全承认24款,日本政府将"执行严重手段"。6日,袁政府开会,决定再作让步,并于同日遣外交次长曹汝霖面晤日置益,作最后请求。但已无济于事。7日下午3时大隈政府向袁政府外交部发出"最后通牒",并附"觉书解释"七款,宣称除第五号各项允许"日后另行协商"外,限48小时内完全"应诺",否则日本政府"将执认为必要之手段"。与此同时,日本政府颁布关东戒严令,命令山东、奉天(辽宁)日军备战,日舰游弋于渤海,进行武力威胁。

对日交涉过程中,袁世凯一直寄希望于英、美两国从中调解。但英、美所关注的仅是它们在华的利益是否受到侵害。日本的最后通牒中撤销了第五号要求后,英国就改变了态度,告诫中国"不宜作武力之争","为目前计,只有忍辱负重,接受要求"。美国驻华公使芮恩施(Paul　S. Reinsch, 1869—1923)曾试图斡旋,但由于得不到英、法、俄三国支持而作罢,仅于5月5日发表声明,"劝告日本"。最后通牒提出后,又于5月13日发表声明:"凡关于损害美国之条约及旅华美国人民权利",美国政府"决不承认"。俄国公使克鲁朋斯基(Крупенский)竟然要中国无条件

接受日本的最后通牒。袁政府在国际上孤立无援。袁世凯本人又一心想登上皇帝宝座，当然不敢得罪日本。于是，8日下午，袁在总统府召集的政府要人会议上，宣布接受日本最后通牒。9日，陆征祥、曹汝霖奉命前往日本使馆递交复文，表示对日本4月26日之修正案，除第五号各款“容日后协商”外，“即行应诺”。25日，中方代表陆征祥与日方代表日置益，依据日本最后通牒及中方答复，签订了“中日条约”两件(《关于山东之条约》、《关于南满洲及东部内蒙古之条约》)和关于福建、汉冶萍及旅大南满安奉铁路租期延长等问题的“换文”13件，除第五号外，原“二十一条”内容大都包括在内。袁世凯深知签订如此恶毒条约，定会遭到全国人民激烈反对，所以“二十一条”签订后，特向各级文武官吏发出“密谕”一道，以装腔作势的爱国辞藻掩饰其罪恶的卖国行径。“密谕”除了表白他拒绝承认侵犯中国主权最为严重的第五号条款的“功劳”外，也承认这次交涉“损失权利颇多！疾首痛心，惭愤交集”，还表示要“痛定思痛”，“力图振作”。而在公开通电中，为保持自己的体面和威风，竟厚颜无耻地宣称：“日本既有让步，无损主权，故决定由外交部答复，此案已结，中外敦睦。”同时还动员各省官吏发来贺电，颂扬“元首外交成功”，甚至有的地方竟开庆祝会，或举行提灯游行，庆祝“外交胜利”。这些愚弄人民的手段并掩盖不住他的卖国罪行，袁政府接受最后通牒的消息一经传出，立即激起全国人民如火如荼的反日运动。各大城市爱国团体奔走呼号，集会游行，誓不承认卖国的“二十一条”，并要求惩办卖国贼陆征祥和曹汝霖。上海各界召开万余人参加的国民大会，表示拒日到底。上海等地工人举行罢工，各地青年学生组织团体，呼吁抗日救亡，掀起规模巨大的抵制日货运动。全国教育联合会决定将接受日本最后通牒的5月9日定为“国耻纪念日”。袁世凯惧怕群众的爱国运动触怒日本，竟采取高压手段，申令禁止抵制日货，逮捕爱国群众，将反日热潮镇压下去。

“二十一条”是日本帝国主义以吞并中国为目的而强加于中国政府的单方面条约，它的签订仅以最后通牒的方式，未经正当手续，完全违背国际关系的基本准则；加以中国人民反日爱国斗争的高涨，迫使袁世凯政府事后也曾声明中国政府是被迫同意的，此后历届北洋政府始终未承认“二十一条”有效。所以“二十一条”从国际法来看，不能视作正式成立，在事实上亦未能执行。 (刘振岚)

《中俄蒙协约》签订

《中俄蒙协约》，1915年在沙俄胁迫下，由中、俄、蒙三方参与签订的确定外蒙古“自治”的不平等条约。

蒙古地区位于中国北部，中间以戈壁沙漠相隔，以北为外蒙古，以南为内蒙古。内外蒙古自古以来是中国领土。沙俄对我国蒙古地区的侵略野心由来已久，特别是对外蒙古，早在清乾隆二十八年(1773)，沙俄御用学者米勒尔在给叶卡特琳娜二世(Алексеевна Екатерина П，1729—1796)的条陈里就曾提出：“应将北蒙纳入俄国”，戈壁沙漠应当成为中俄两国的“天然边界”。19世纪中叶以后，沙俄更多次叫嚣要“支持蒙古独立”，“占领蒙古北部”。宣统三年(1911)武昌起义爆发后，沙俄认为时机已至，加紧侵略活动。当年十月(11月—12月)，在沙俄驻库伦领事馆的策动下，以杭达多尔济为代表的少数蒙古王公赶走清朝驻库伦办事大臣三多，宣布“独立”，成立所谓“大蒙古国”，“活佛”哲布尊丹巴自称日光皇帝。自外蒙宣布“独立”后，沙俄即要求由中俄直接接触解决外蒙问题，目的在于缔结一项条约，迫使中国政府承认外蒙独立的现状。宣统三年十一月十二日(12月31日)，沙俄照会清外务部，提出中国在外蒙不驻兵、不殖民、外蒙自治、俄国在库伦有筑路权等五项要求，被清政府拒绝。1912年初，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孙中山和民国政府曾多次电告或派人赴外蒙，劝令外蒙王公、活佛取消“独立”，不要投靠外国。这帮叛国分子不但置之不理，而且还在沙俄侵略军的支持下，先后侵占乌里雅苏台和科布多，造成中国边疆的严重危机。1912年6月，沙俄政府又向中国政府提出俄国“调停”外蒙问题的三条要求：中国不在外蒙驻兵；不向外蒙移民；外蒙取消“独立”，但内政由蒙人自治。被中国政府拒绝。外交部并于8月授权驻外使节声明：“民国对于满蒙各地，有自由行动之主权，外人不得干预。”北洋政府一直不肯承认外蒙“独立”，而且拒绝直接与沙俄交涉外蒙问题，于是沙俄政府进一步对中国施加压力。10月，派出前驻华公使科罗斯托维茨到外蒙与库伦当局进行秘密谈判，俄方以威胁利诱的强盗手段，迫使库伦当局于11月3日与之签订了《俄蒙协约》四款，规定俄国扶植蒙古自治，帮助蒙古练兵；不准中国军队进入蒙境；不准华人移殖蒙地；不经俄国政府允许，蒙古不得与中国或其他外国订立条约。《俄蒙协约》还附有《商务专约》17款，规定了俄人在蒙古享有居住、经

商、租地、开垦、经营矿产、设立领事、邮政等特权。库伦地方当局根本无权与外国签订这样的条约，沙俄竟不顾这一事实，完全无视中国对外蒙的主权，俨然把外蒙视为俄国的殖民地。故此《俄蒙条约》签订后，激起了中国各阶层人民的极大愤慨，迅速掀起征蒙抗俄的热潮。革命党人一致指责袁世凯政府应付无方，坚决主张不予承认；其他各政党、各团体和爱国群众纷纷集会，发表通电，痛斥沙俄的侵略行径；各报纸也连篇揭露沙俄的侵略罪行，呼吁立即出兵征蒙。在北京、天津、上海等地，爆发了纷起向俄国道胜银行提取存款的群众性爱国行动，以致造成道胜银行纸币不能流通市面的局面。北洋政府也声明对《俄蒙协约》，"中国政府概不承认"。但当时袁世凯正忙于稳定国内局势，千方百计弹压革命党人对他独裁统治的不满，不肯分出精力从事外交斗争，更不肯调军征蒙，削弱他对革命党人的防范。故此，只有接受与俄人谈判解决外蒙问题这一屈辱的途径。11月底，北京政府外交总长陆征祥开始与沙俄驻华公使库朋斯基会谈外蒙问题。经20余次谈判，中俄双方于1913年5月20日商订《中俄协约》草约六条，规定俄国承认外蒙为中国领土，俄国不向外蒙派兵和殖民；中国不更动外蒙历来之地方自治制度，许其有组织军备警察之权，拒绝非蒙古籍人殖民之权；中国同意《俄蒙协约》所给予俄国的商务利益。这个草约签订后，遭到国会中国民党议员的坚决反对，参议院否定了这个草约。中俄交涉暂时陷于停顿。二次革命结束后，袁世凯镇压了国民党，"统一"了全国，从当年9月起，新任外交总长孙宝琦又接续陆征祥与克鲁朋斯基谈判，双方共会谈10次，至11月5日，正式签字互换了《中俄声明文件》。文件承认了《俄蒙协约》的内容，同意了外蒙古有自治之权。虽然俄国在表面上承认外蒙是"中国领土的一部分"，但同时又规定中国政府不得在外蒙设治、驻军，亦不得移民，还须声明承认俄国调处，实际上承认了沙俄对外蒙的控制地位。又根据《中俄声明文件》的规定，中俄蒙三方于1914年9月8日起在恰克图会议，解决各项未决问题。中国代表为专使毕桂芳、驻墨西哥公使陈箓；俄国代表为驻外蒙总领事密勒；外蒙代表先为达赖喇嘛达锡札布，后为"司法副长"希尔宁达木定。在俄方强权压迫下，三方代表于1915年6月7日签订了《中俄蒙协约》，共22款，主要内容为：一、外蒙古承认《中俄声明文件》，承认中国宗主权；二、中、俄承认外蒙古自治，为中国领土之一部分；三、外蒙无权与各外国订立政治与土地关系之国际条约；四、外蒙哲布尊丹巴呼图克图汗名号由中华民国大总统册封；五、外蒙使用民国年历，兼用蒙古干支纪年；六、中、俄承认外蒙办理一切内政及各国订立关于工商事宜条约之专权；七、中俄不干涉外蒙现有内政之制度；八、中国商民运货入外蒙不纳关税，但须交纳已设及将来添设之各项内地货捐；九、凡关于中蒙、中俄人民诉讼事宜，均由中俄、中蒙双方会同审理；十、《俄蒙通商章程》继续有效，等等。通过《中俄蒙协约》，俄国前此在外蒙获得的一切侵略特权均得到确认和具体化，而中国除了一个空洞的"宗主权"（实即册封权和民国纪年）外，几乎丧失了对自己领土外蒙古的一切权利。这就是袁世凯政府用于这次外交谈判的指导方针——"彼有实事，我徒虚名"原则的体现。这个原则可说是中国近代封建主义妄自尊大思想与妥协退让精神相结合的半殖民地外交的典型。《中俄蒙协约》签订的当天，袁世凯宣布册封哲布尊丹巴呼图克图汗，所有外蒙王公喇嘛的爵、职名号一仍其旧。库伦活佛于6月9日致电北京政府，宣布取消"独立"及独立后使用的国号年号。中国对外蒙恢复了名义上的治权，沙俄策划的分裂中国、搞外蒙独立的阴谋至此暂告结束。1917年俄国十月社会主义革命爆发后，沙俄政府被推翻，外蒙古傀儡失去靠山。1918年北洋政府军队开进库伦。1919年11月外蒙王公、喇嘛上书北京政府，表示"情愿取消自治"，宣布所订条约"概无效力"。　（刘振岚）

筹安会成立

筹安会，1915年8月杨度等人成立的为袁世凯复辟帝制制造舆论的御用团体。

袁世凯称帝的野心由来已久，在镇压了"二次革命"后，便一步一步地为复辟帝制铺平道路：政治上，彻底摧毁了资产阶级民主制度；思想文化上，掀起尊孔复古逆流；外交上，与日本经过"二十一条"交涉，签订了"中日和约"和换文，换取了日本帝国主义对复辟帝制的支持。于是，袁以为障碍已除，天下莫予毒，为了尽速实现建立袁家王朝的美梦，从1915年开始，大大加快了帝制运动的进行。"二十一条"交涉刚刚结束，袁氏党羽编造的"共和不适于中国国情"之类的流言便不胫而走，哄传一时，很快传播到海内外。8月3日，袁政府机关报《亚细亚日报》发表了袁氏美籍宪法顾问古德诺（Frank Johnson Goodnow，1859—1939）《共和与君主论》一文，诬称中国为"民智低下之国"，大多数人民"无研究政治之能力"，"率行共和制，断无善果"，结论是：在中国，君主制"较共和制为

宜”，直接为袁世凯复辟帝制制造舆论。与此同时，袁氏党羽又物色杨度，积极组织推动帝制的机关。杨度(1874—1931)，字哲子，湖南湘潭人。早年留学日本，一度与革命派关系密切，后又大倡君宪论，与梁启超引为同调。曾为清政府出洋考察宪政五大臣起草报告，并任宪政编查馆提调。辛亥革命后，依附袁世凯，与袁世凯长子袁克定关系密切。1914年任参政院参政。他一直以君主立宪制为其政治理想，主张在推翻清廷后，另造君统，因此把拥袁称帝视为己任。1915年帝制运动公开进行以前，参预袁氏帝制机密的内史监内史夏寿田向杨转达了袁世凯想让他出面组织推进帝制的团体的意图，杨欣然受命，立即联络孙毓筠、李燮和、胡瑛、刘师培(1884—1920)及严复六人联名发起成立鼓吹君主立宪的团体筹安会。孙、李、胡、刘四人都曾参加过同盟会，是名噪一时的革命党。刘师培参加同盟会后很快变节，并为两江总督端方所收买，充当密探。1913年又充当山西都督阎锡山的高等参议，次年由阎举荐给袁世凯，入京担任总统府咨议、参政院参政等职。他是以国学渊博的资格被借重的，但因其志行骤丧，为知识界所不齿。其他三人原是国民党的知名人士，二次革命后公开变节，倒在袁世凯一边。袁氏党羽选定这些人发起筹安会，目的在于标榜复辟帝制并非北洋一派的私意，而是全国各界的共同主张，连过去的革命党人都参与提倡。至于严复，是一位学贯中西的名流学者，清末主张君主立宪，辛亥革命后不反对袁世凯做总统，先后被聘担任总统府高等顾问、约法会议议员、参政院参政等职。杨度用了许多手段把他拉进来，列为筹安会的发起人之一，目的是借重他的声望和影响，来为筹安会装点门面。筹安会的中坚人物是杨度和孙毓筠，其他几个均为配角，尤其是严复，仅挂名而已，并不肯为袁称帝动笔鼓吹。8月14日，杨、孙、李、胡、刘、严六人联名发表由杨度起草的筹安会宣言，宣言标明“以筹一国之治安”为宗旨，责难辛亥革命激于感情义愤而仓猝成立共和国体，此种国体殊与中国国情相悖；又引用古德诺论点，证明“世界国体，君主实较民主为优”，认为“古博士以共和国民而论共和政治之得失，自为深切明著”。23日，又刊登启事，宣告筹安会正式成立，推杨度为理事长，孙毓筠为副理事长，李、胡、刘、严为理事，时讽此六人为“洪宪六君子”。筹安会事务所设在石驸马大街。同日，以筹安会名义通电各省，重申14日之发起宣言，声称该会之宗旨系“研究君主、民主国体二者以何适于中国，专以学理是非、事实利害为讨论之范围。至范围以外各事，本会概不涉及”，显然是以学术团体相标榜。除宣言外，杨度、孙毓筠、刘师培等人连续抛出鼓吹帝制的文章，如《君宪救国论》、《君政复古论》、《国情论》、《唐虞揖让与民国制度之不同》等，掀起所谓“讨论国体”的轩然大波。其中以杨度的《君宪救国论》(署名“虎公”)最有代表性。该文杜撰了两个论据，力图证明只有君主制才能救中国：其一是说中国人民程度太低、中国“非专制不能治”；在共和制下决不能实现立宪，唯君主制方能立宪，故与其共和而专制，不如立宪而君主。结论是“今欲救亡，先去共和”，“欲求立宪，先求君主”。其二是重复古德诺的论调，认为共和制竞选总统必造成国家大乱，因此，唯有易大总统为君主，使一国元首立于绝对不可竞争的地位，或许可以止乱。这种奇谈怪论最为帝制派所欢迎。帝制派一个持之最力的论点就是妄图把行之几千年的世袭君主制说成是永恒的中国国情，而任何改变帝制的民主要求，都被攻击为不合中国国情。筹安会的出现，引起人们的不安和愤慨，在北京、上海等大城市和海外华侨中，许多人著文或写信声讨筹安会，对其谬论进行抨击。其中以9月3日发表在北京英文《京报》中文版上的梁启超《异哉所谓国体问题者》一文批判帝制派种种谬论最为鲜明有力，在当时争相传诵，成为以后发动护国战争的号角。

筹安会的成立，标志着袁世凯帝制活动的公开进行。前此，社会上关于袁世凯的称帝野心虽颇多传言，但他一概坚决否认。而筹安会成立后，再也掩盖不住了，当有人问到政府对筹安会的态度时，袁表示：筹安会“所研究君主制与民主制之优劣，不涉政治，苟不扰乱国家治安，则政府未便干涉。”实则不但不干涉，而且尽心保护。筹安会事务所和杨度等六人私宅均有警察荷枪守卫，而对那些反对筹安会的群众团体则百般刁难，不予立案。筹安会成立伊始，立即剥去“学理讨论”的外衣，派专员四处活动，策动各省组织分会，并通电各省，要各地文武官吏和商会团体速派代表进京，“讨论”国体。由于筹安会背后有袁世凯支持，再加上北洋系帝制派头目段芝贵等密电策动，于是各省文武官吏函电交驰，纷纷阿附筹安会调论，并派代表进京，加入“讨论”。没过几天，筹安会就通电全国：经投票议决，各省机关及团体，“一致主张君主立宪”。袁氏党羽为使其主子早日登上皇帝宝座，如紧锣密鼓般神速推进帝制活动的步伐。9月，另一批帝制派头目梁士诒、张镇芳、周自齐、朱启钤以及被袁氏收买的一批无耻政客，积极策动各省在京文武官员组成“公民请愿团”，向参政院请愿改变

国体。紧接着，社会上各种形形色色的请愿团纷纷出笼，请愿书千篇一律，诸如"非速改君主之制，不足以救苍生，保中国"之类，均系筹安会代拟。很快，梁士诒、张镇芳、杨度、孙毓筠等人，秉承袁世凯意旨，收买各请愿团于9月19日组成全国请愿联合会，掀起更加猖獗的改变国体"请愿"活动。此时，以鼓吹为主旨的筹安会已完成了颠覆共和、为复辟帝制制造舆论的历史使命，其显赫地位也就被实际执行帝制的帝制派所代替。于是，筹安会以研究君主制度实现后的宪法做幌子，改名"宪政协进会"，从此不受重视了。（刘振岚）

老西开事件

1915—1916年天津人民为反对法国侵占老西开地方而展开的反帝斗争。

法国从1900年将其在天津的租界扩展至墙子河以后，一直越界在墙子河以西的地区(俗称老西开，即今天津海光寺地区)收买土地，建立教堂，创办学校，企图以保护教堂为口实，侵占老西开地区。光绪二十八年(1902)，法国驻津领事照会清政府津海关道唐绍仪，要求把老西开地区并入法租界，唐绍仪未加理睬。1913年，法国竟以未得唐答复，"即为中国之默认"为借口，公然在老西开地区动土修建教堂，设立巡捕。在天津人民的一致反对下，北洋政府天津警察厅派了部分警察驻扎在张庄大桥，以示"抵制"。1914年7月，法国驻津领事又致函直隶交涉署，声称老西开地区已划入法国租界，要求撤出该地区的中国警察。北洋政府当即予以驳复。次年9月，法国工部局竟公开在该地区散发传单，责令当地居民纳捐，遭到天津人民坚决抵制。9月15日，天津商会会长卞月庭发起成立"维持国权国土会"，与法国当局展开针锋相对的斗争，致使法帝国主义一厢情愿的如意算盘难以实现。1916年1月，法驻京公使照会北洋政府外交部，再次要求将老西开并入法租界。6月，法工部局竟擅自竖立标界木牌，派出武装军警巡逻，引起天津人民的公愤，"维持国权国土会"要求北洋政府立即制止法国的越轨行为，当地居民并群起拔除了标界木牌。法国侵略者恼羞成怒，于10月18日向北洋政府提出警告，限中国方面于48小时之内，撤出该地区的中国警察。20日，48小时期满后，派法国巡捕及安南兵多人，强行解除了驻扎在张庄大桥华警的武装，并加以拘禁，断绝了该地区交通，派法警占据，悍然强占老西开地区，激起天津各界人民极大愤慨。23日，在"维持国权国土会"的组织下，天津商界议决三事：一、抵制法国银行纸币；二、抵制法货；三、要求北洋政府致电法国政府，更换法驻华公使。25日，天津各界市民8000余人举行集会，宣告成立"天津公民大会"，作出六项决议：一、通电全国人民与法国断绝贸易；二、拒用法国银行纸币；三、解散法国在天津招募华工的机构"惠民公司"，不准法国招募华工；四、中国货不售予法国；五、中国人有为法国侦探者，一经查出，予以相当处分；六、电告驻法公使，要求法政府撤换法驻华公使。此后，如火如荼的反法爱国斗争便在天津全面展开。10月26日，老西开法汉学校学生宣布罢课。11月，天津南开学校召开全校大会，正在该校读书的周恩来作了题为《中国现时之危机》的长篇讲演，揭露法国侵略罪行，抨击北洋政府腐败无能，号召同学起来维护民族尊严，投入到反对法国"攘土之事"的斗争中去。天津工人阶级也积极投入了斗争，11月12日，法租界仪品公司和实业铁厂工人首先罢工，其它法商企业，包括洋行、电灯房、饭店、球房的工人，连侦探、巡捕、职员、兵营工役，以及服役于法人的厨师、马夫、仆佣等等都参加了罢工行列。11月18日成立了罢工团，在罢工团登记注册的有1400余人。在学生罢课、工人罢工的鼓舞下，法界华警也一律罢岗，法界华民纷纷外迁，"爱国团"、"保卫社"、"演说团"等各界爱国团体纷纷成立，展开了广泛的反帝宣传活动。天津人民的正义斗争，得到全国人民的大力支持，各地省议会、商会、爱国团体及个人纷纷通电声援，有的还捐款资助。这场反法斗争持续了半年之久，迫使法国侵略者不得不放弃完全侵占老西开的图谋，而于11月经过英国公使朱尔典的调停，改由中法共管老西开地区。（刘振岚）

肇和之役

1915年中华革命党策动的肇和兵舰反袁(世凯)起义。

1914年7月中华革命党成立伊始，即强调把武装讨袁放在一切工作的首位。1915年8月筹安会成立后，袁世凯帝制活动公开进行，全国人心大为激愤。11月10日，袁世凯的心腹大将、上海镇守使郑汝成被中华革命党人暗杀，大大鼓舞了革命党人的士气。他们乘时加紧运动，认为上海为全国重镇，又是革命党基础最为雄厚的地区，如上海能首先发难，各省必可随后响应。于是孙中山立即委任陈其美为淞沪司令长官，主持策划上海举义。原陈其美已在上海法租界霞飞路渔阳里设立革命机关，以吴忠信、蒋

介石、杨庶堪、周淡游、邵元冲(1890—1936)、丁景良、余建光等,分任军事、财政、总务、文牍、联络等职务,共同辅助陈其美。陈其美随即派出党人,加紧运动停泊在长江江面上的"肇和"、"应瑞"、"通济"三艘军舰的官兵发动起义,首先得到肇和舰舰长黄鸣球的支持,该舰大多数官兵也同意响应起事,"应瑞"、"通济"两舰赞成起义的官兵也逐渐增多。此外,还联络了部分陆上军警,约定响应起义。指挥总部计划在12月中旬发动,但因走漏了风声,袁世凯预先采取了防范措施:对可疑之陆军,一部分调往北方,一部分就地遣散;对海军,则采取"隔离战术",命"肇和"舰于12月6日开赴广东,俾使革命党人鞭长莫及,无能发动起事。突然的变化,打乱了革命党人原来的部署,指挥总部当机立断,提前于12月5日发动。战略目标是:"袭击海军,后即攻击制造局,再取吴淞要塞,然后图浙攻宁,以为东南之根据。"总部并进行了具体分工:陈其美任淞沪司令,吴忠信任参谋长,黄鸣球任海军司令,杨虎任海军陆战队司令,孙祥夫任副司令。确定以肇和为海军总司令部。5日下午3时,杨虎率海军陆战队30多人,暗藏手枪、炸弹,冒充游客,乘汽艇由黄浦出发,直奔"肇和",在该舰倾向起义官兵的配合下,顺利登上"肇和"。傍晚6时许,杨虎命"肇和"舰向制造局发炮,拉开了起义的战幕。另一路由孙祥夫率领海军陆战队30余人,由杨树浦乘小船出发,试图夺取"应瑞"、"通济"两舰,但被巡捕所阻,被迫折回,使"肇和"舰处境孤立。"肇和"发炮后,潜伏于陆地外国租界的数百名革命党人闻风而动,分兵几路,向电话局、警察局、警察第一区工程总局、闸北四区警察二分署等目标发起攻击,曾一度占领电话局,攻入警察署,但终因寡不敌众,党人死伤惨重,数路均不支而退;夺取制造局的计划也未能实现;"应瑞"、"通济"两舰又未能实现起义。陈其美见此情势,急回总部,商议重新组织进攻的方案。不料,法捕房侦探及巡捕十余人破门而入,逮捕了两名在楼下放风的革命党人。陈其美、吴忠信、杨庶堪听得楼下骚动,迅即登上屋顶,潜入邻舍,得以逃脱。总部机关遭到破坏,使起义的"肇和"舰失去指挥,孤军奋战,本以为能得到"应瑞"、"通济"两舰响应,却不知此两舰已被袁世凯收买,一些原已答应响应起义的官兵,得到厚贿,转而赞成攻击"肇和",舰上革命党人虽竭力阻拦,已无济于事。6日拂晓,"应瑞"、"通济"两舰突然向"肇和"猛烈发炮,"肇和"在毫无思想准备的情况下,仓促还击,但命中率很低。而"肇和"自身屡屡中炮,死伤惨重。经过将近一个小时的激战,"肇和"前身起火,锅炉炸裂。杨虎见败局已定,不得不下令弃舰撤退。杨虎等凫水脱险,舰上起义官兵数十人被袁军捕获,英勇就义。"肇和"起义失败。但此役举国震惊,意义重大:它向全世界戳穿了袁世凯恢复帝制出自民意纯属谎言,对袁世凯及其帝制追随者是一个不小的打击,使他们因帝制活动日益遭到人们唾弃而惶惶不安;同时也暴露了袁氏政权貌似强大,实则军心浮动、内部不稳的虚弱本质,从而激发了国内人民的反袁斗争,鼓舞了革命党人武装讨袁的信心。 (刘振岚)

洪宪帝制

1915年12月袁世凯宣布帝制自为,以"洪宪"为国号,史称"洪宪帝制"。

袁世凯窃国后,疯狂破坏资产阶级民主制度,镇压革命势力,解散国会,毁弃《临时约法》,一步步集中权力,为复辟帝制做准备。特别是1914年颁布的袁记《中华民国约法》和修订的《大总统选举法》,规定了有皇帝权力的总统制,更可视为洪宪帝制的前奏曲。为了早日黄袍加身,从1915年起,袁世凯加紧了复辟帝制步伐。当年8月3日,他的美籍法律顾问古德诺发表《共和与君主论》一文,宣称共和不适合中国国情。23日,杨度等六人组成筹安会,大肆鼓吹只有改行帝制才能固国本而救危亡。此后帝制活动便公开进行。筹安会四出活动,积极策动湖南、吉林、奉天(辽宁)、湖北、安徽等省组织分会,同时通电全国,要各地文武官吏和商会团体速派代表进京,"讨论"国体,打算在代表赞成君主立宪后,即向参政院发起改变国体的请愿。参与策动帝制的更具决定意义的是大批北洋军阀封疆大吏和政府要员。就在筹安会成立的第二天,8月24日,上将军段芝贵及袁乃宽等在石驸马大街袁宅召开秘密军警大会,讨论所谓"筹安"事宜。参加会议的有北京军政执法处处长雷震春、北京步兵统领江朝宗(1863—1943)、北京警察总监吴炳湘(1874—1930)等44人,都是北洋系军警要人。在段芝贵带动下,全体当场一致赞成君主国体。会后,中央军事机关及将校级以上军警官员、海军舰长等数百名上密呈给袁世凯,请愿实行君主制。段芝贵又密电各省将军、巡按使,策动他们拥护。奉天将军张作霖(1875—1928)第一个直接密呈袁世凯,要求"速定国体,以安大局",表示如各省有敢反对者,"作霖愿率所部以平乱"。至9月2日已有广东、湖北、陕西、山西、河南、四川、湖南、浙江、江西、云南、安徽、山东、吉林、黑龙江、甘肃、察哈尔、绥远、

福建、贵州等省将军、都统、护军使、巡按使19人回电表示赞成。段芝贵即据此领衔缮写密呈，面呈袁世凯，谓"合词恳请元首改君主国体"，此即盛传一时的"十九将军联名劝进电"。参与策动帝制的政府要员有交通系首领梁士诒、参政院参政张镇芳、内务总长兼交通总长朱启钤、农商总长周自齐。其中梁士诒最活跃，他依仗交通系雄厚的财力，筹集巨款，收买各方，组织改变国体的请愿活动。

在上述情况下，帝制活动颇有声势。各省文武官吏函电交驰，大都阿附君宪救国之说，纷纷派代表进京，加入筹安会组织的国体讨论。速度之快，连"讨论"都来不及，于是取消"讨论"，改采投票决定；后来票决也来不及，又改为直接组织请愿。很快，在京各省文武官员的代表分别组成"公民请愿团"向参政院请愿改变国体。紧接着，北京出现了"商会请愿团"、"教育请愿团"、"社政进行会"、"妇女请愿团"、"乞丐请愿团"等等，形形色色，五花八门。他们使用筹安会代办的内容千篇一律的请愿书，一致恭请参政院"早定君主立宪"、"复尊君亲上之本"，掀起了改变国体的请愿风潮。9月1日，参政院开始审查各方呈进的请愿书，6日，开始讨论国体问题，准备一鼓作气，将变共和为君宪国体作成参政院的决议，让袁世凯速登皇帝宝座。但是由于当时北洋派内部及政府要员中对改行帝制意见不一，特别是列强对此态度不明朗，所以这一天袁氏突然派其代表政事堂左丞杨士琦(1862—1918)到参政院发布宣言：作为中华民国的总统，他有维持共和国体之责，认为改变国体"不合时宜"。但又说国民请愿"如征求多数国民之公意，自必有妥善之办法"。实质是暗示其党羽暂缓步伐和进一步制造"民意"要求实行帝制的假象。

当时北洋派内部，各省军阀从保住地盘、巩固既得利益出发，大多阿附袁世凯，积极劝进。也有一些头面人物从维护北洋统治的长远利益着眼，从反对建立袁家王朝、避免对袁氏父子称臣出发，颇不以帝制为然。如身为国务卿的徐世昌虽不公然反对，但拒绝劝进；段祺瑞则称病退居西山，袖手旁观，以致被袁免去陆军总长职务。江苏都督冯国璋曾于当年6月进京探询袁有无称帝打算，袁矢口否认。两个月后，筹安会成立，帝制活动公开进行，使冯感到寒心，以为袁已不把他当作"自家人"。因此，非但不理睬筹安会，还联络驻徐州的定武上将军、长江巡阅使张勋采取一致态度。张勋一直图谋清室复辟，对袁世凯帝制自为反感。所以冯、张在接到段芝贵的密电后，均不肯列名劝进，反而致电政事堂，提出改国体事应由徐世昌"定稿领衔"，联合京外文武官吏联名提请参政院公议，"以召公正"，并将此电咨发各省，征求同意。直隶都督朱家宝和一向不满袁世凯武力统一政策的广西将军陆荣廷、云南将军唐继尧均表示附和。贵州巡按龙建章(1872—?)更正面反对帝制，致电徐世昌，要求取消筹安会。在政府要员中，副总统黎元洪、财政总长周学熙主张总统世袭，反对君宪。教育总长汤化龙、平政院长周树模、水利局长张謇等则以辞职抵制。在这些反对者中，袁世凯极重视北洋元老徐世昌，特派袁乃宽去劝说。此老不仅仍拒绝，而且辞职出京而去，袁氏只好由他。袁世凯最顾忌的是冯国璋等封疆大吏，乃采取了多种手法，争取他们转变态度。对龙建章施以压力；对朱家宝极力疏通，很快迫使二人转变了态度。又特派内史监阮忠枢南下劝说冯、张，反复强调北洋派团结的重要性，要求他们即使不赞成，亦"不必正当反对"。至9月下旬，冯、张终于转变了态度。北洋派表面上取得了一致。

袁视帝国主义列强的态度为帝制成败的第一要素，千方百计争取列强的支持。德国早在两年前就表示中国应建立强有力的君主制。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后，又与奥国一致表示支持中国改行帝制。美国采取不干涉态度。这样，袁政府的外交主要是乞求日本与英国的承认。他满以为承认"二十一条"后，日本就会支持帝制。但日本欲以此为诱饵，索取更多的报酬，所以首相大限重信(1838—1922)、外相石井菊次郎(1866—1945)等态度暧昧，不肯具体许诺。袁世凯指示外交次长曹汝霖和驻日公使陆宗舆同日本人秘密接触，又派日本顾问有贺长雄(1860—1921)前往东京，游说日本政府要人。9月下旬，有贺长雄和陆宗舆均从东京带回信息，谓大限重信表示，只要袁"诚意联日"，日本对中国改行帝制，将"努力为援助"。英国正忙于欧战，一时无暇东顾，英公使朱尔典担心改行帝制会引起中国政局动荡，影响英国在华权益，曾表示"甚不赞成"。但当其得知日本支持帝制时，为与日本竞争，迅即改变态度。10月初，当面对袁表示："若中国无内乱，则随时可以实行，此系中国内政，他人不能干涉。"至此，改行帝制之内外阻力业已排除，帝制步伐随之加快。梁士诒、张镇芳等秉承袁世凯9月6日宣言中"尊重民意"的暗示，收买各请愿团，成立了全国请愿联合会，推沈云霈为会长，张锦芳、那彦图为副会长，于9月16日向参政院呈上第二次请愿书，要求召开国民会议，解决国体。次日，参政院议决并咨请政府，于年内召开国民会议或另筹其他征求民意办法。但召集国民会议手续纷繁，

颇费时日，因此全国请愿联合会又第三次呈上请愿书，推翻召开国民会议成案，改为举行国民代表大会。10月2日参政院公布了“国民代表大会组织法”，6日，正式议决组成国民代表大会，决定国体。8日，袁世凯公布国民代表大会选举法，并命各地地方官主持“选举”，选出代表后，即在当地举行国体投票，推戴皇帝。袁政府又密电命令各地方官暗中物色绝对顺从袁氏旨意之人，并多方设法使其当选。各地方官即以金钱贿买或军警弹压等卑劣手段操纵选举和投票，进展十分神速，自10月25日开始选举代表，并进行国体投票，到11月20日，各省“选举”及“投票”告竣。各省国民代表共1993人，全部赞成君主立宪。各省推戴书一字不差地写着45个字：“恭戴今大总统袁世凯为中华帝国皇帝，并以国家最上完全主权奉之于皇帝，承天建极，传之万世。”这是10月23日朱启钤等10人向各省发出的密电中拟定的，同时命令各省“万勿丝毫更改”。12月11日，参政院议决以“国民代表大会总代表”的名义恭上推戴书，要求袁世凯“俯照舆情”速登“大宝”。当天中午袁便发还，电令表示既然全体国民代表表决改用君主立宪，他“自无讨论之余地”。然而又故作谦词，说自己居政以来“上无裨于国计，下无济于生民”，“今若骤跻大位，于心何安？”况且自己曾向参议院宣誓，愿竭力发扬共和，“今若帝制自为，则是背弃誓词”。所以要他们“另行推戴”。实质是要党徒为他歌功颂德，洗刷背弃共和之罪名。党徒们心领神会，仅15分钟即拟就了2600字的第二次推戴书，歌颂袁有“经武”（编练新建陆军）、“匡国”（屠杀义和团）、“开化”（办新政），“靖难”（绞杀辛亥革命）、“定乱”（镇压二次革命）、“交邻”（承认日本“二十一条”要求）六大功勋，至于曾宣誓效忠共和，不过是当时作为共和元首“就职仪文之一”。声称国体取决于国民的意向，元首当视民意为从违，誓词亦应随国体而变迁。无论共和、君宪，“皆国民之所自为，固于皇帝渺不相涉者也”。把改变国体的罪责推在“国民”头上。总之，袁世凯“功崇德茂”，“迈越百王”，所以当皇帝是“责无旁贷”。袁世凯以为经过请愿、选举、推戴这三大步骤，再加上第二次推戴书把他的罪恶一笔勾销，自可掩尽天下人耳目。12日即申令承认帝制，13日在居仁堂接受百官朝贺。31日下令改民国五年(1916)为洪宪元年。12月1日成立登极大典筹备处，登极大典的预算高达590余万元。又下令改总统府为新华宫，发行刻有龙图案和袁世凯头像的纪念金币；册封皇后和嫔妃，立皇储及选拔宫女等皇家事务，也加紧举办，只待择吉日正式加冕登极了。

袁氏独裁卖国以及悍然称帝的罪行，早已激起全国各阶层人民的强烈反对。孙中山先生从1914年5月至1916年5月，先后三次发表讨袁檄文和讨袁宣言，又领导中华革命党先后发动40余次反袁起义；以黄兴为旗帜的欧事研究会也积极联络各方人士，策动反袁。原来一些对袁抱有幻想的人也看清了袁氏复辟帝制的野心。1915年8月，筹安会刚一成立，梁启超即发表《异哉所谓国体问题者》一文，旗帜鲜明地反对袁世凯复辟帝制。袁世凯陷入全国一片声讨之中。当年12月25日，蔡锷、唐继尧等在云南宣布独立，护国战争的熊熊烈火在南方燃起。在全国反对复辟帝制的高潮中，北洋政府和北洋军阀内部也日趋分崩离析，副总统黎元洪公开反对帝制，辞去一切职务，拒绝武义亲王之封。袁的两员心腹大将段祺瑞、冯国璋和北洋元老徐世昌均对袁离心离德，对帝制运动作消极抵制；1916年5月，袁世凯最亲信的心腹党羽四川将军陈宧和湖南将军汤芗铭也宣布独立。日、英等帝国主义也改变了态度，“劝告”袁停止帝制活动。1916年1月，日本拒绝接待袁政府派出的以祝贺日本天皇加冕为名乞求日本支持的特使周自齐。袁世凯内外交困、走投无路，被迫于3月22日取消帝制，23日废止洪宪年号，恢复民国。洪宪帝制仅历83天即宣告失败，6月6日，袁世凯忧惧病死。在袁死前，袁氏及其党徒导演洪宪帝制丑剧的全部50余件致各省密电被揭露出来，梁启超特作《袁政府伪造民意密电书后》一文，痛诋袁氏伪造民意大搞帝制自为的活动：“自国体问题发生以来，所谓讨论者，皆袁氏自讨自论；所谓赞成者，皆袁氏自赞自成；所谓请愿者，皆袁氏自请自愿；所谓表决者，皆袁氏自表自决；所谓推戴者，皆袁氏自推自戴。举凡国内外明眼人，其谁不知者。”“此次皇帝之出产，不外右手挟利刃，左手持金钱，啸聚国中最下贱无耻之少数人，如演傀儡戏者然。由一人在幕内牵线，而其左右十数嬖人蠕蠕而动；此十数嬖人者复牵第二线，而各省长官乃至参政院蠕蠕而动；彼长官等复牵第三线，而千七百余不识廉耻之辈冒称国民代表者蠕蠕而动。”这确是对袁世凯帝制自为丑剧最生动的写照。

（刘振岚）

护国战争

1915—1916年梁启超为首的进步党领导的反对袁世凯帝制的革命战争。

1915年12月12日，袁世凯悍然发布接受帝位

申令，准备称帝，激起全国各阶层人民的强烈反对。以孙中山先生为首的中华革命党虽然首举义旗，先后发动40余次反袁起义；以黄兴为旗帜的国民党人——欧事研究会也积极联络各方人士，策动反袁，但是由于当时历史条件的限制和他们自身的弱点，中华革命党和欧事研究会都没有成为反袁战线的领导力量，领导反袁的重任落到了以梁启超为首的进步党的身上。进步党原来追随袁世凯，在袁氏公开推进帝制后，其拥袁立场发生了根本转变。促使这种转变的核心人物是梁启超和其学生蔡锷。蔡锷(1882—1916)，原名艮寅，字松坡。湖南邵阳人。早年留学日本，学习军事。回国后，历任军职，参与训练新军，在军界极负时誉。曾在昆明发动新军响应武昌起义，后任云南都督。二次革命时奉袁氏之命率兵镇压四川反袁起义。后奉调入京，历任政治会议委员、约法会议议员资格审定会会员、参政院参政、将军府将军等职。过去梁、蔡的拥袁是为了依靠袁的实力，改良政治，最终实现其立宪政治的理想，所以当袁氏公然帝制自为，导致"普天同愤"、"党人思逞"时，他们便毅然与袁分道扬镳，积极反袁了。1915年8月筹安会宣言发表后，蔡锷即自北京赶到天津，与梁启超共同商议了讨袁大计。8月21日，梁启超用一夜时间，撰写了万余言的《异哉所谓国体问题者》一文。袁世凯以20万元高价收买，求他不要发表，又以包着子弹的匿名信相威胁，他不屈服，毅然于9月间将此文在京、津各大报纸发表。该文辛辣地讽刺了袁世凯复辟帝制的野心，批驳了筹安会杨度及袁世凯的美国顾问古德诺等鼓吹帝制的种种谬论，虽然批驳得并不彻底，但态度极为鲜明，且又出自以稳健著称的梁启超之手，所以在各阶层引起了强烈的反响，各地争相传诵，成为发动护国战争的号角。蔡锷则利用他在西南军界的声望和影响，密切联系酝酿反袁的云南军官，积极筹划武装讨袁。

辛亥革命时期受过民主主义思想熏陶的云南新军军官在袁氏帝制阴谋公开以后，义愤填膺，摩拳擦掌，自发结群，酝酿反袁。不少云南籍或与云南有各种联系的革命党人也纷纷奔赴云南，秘密策划讨袁。云南都督唐继尧(1882—1927)原是蔡锷的部下，早年参加同盟会，经蔡锷提拔、保荐，曾任北伐军总司令、贵州都督。蔡调京后，又接任云南都督，故对蔡怀有感激之情。只因曾追随袁世凯，杀害过孙中山派往云南的革命党人，一时对公开揭旗反袁顾虑重重。但在云南反袁势力的不断策动与激励下，大抵至1915年11月上旬，终于明确了反袁立场。至此云南军界武装讨袁已呈一触即发之势。正当此时，蔡锷巧妙地避过袁世凯的监视，历尽艰险，于12月19日辗转到达昆明，使云南人民和中下级军官受到极大鼓舞。与此同时，梁启超于18日自天津到达上海，得知袁世凯近日将派周自齐为特使赴日洽谈，换取日本承认帝制。梁为防止袁氏勾结日本成功，于20日致电蔡锷："外交紧急，袁将卖国，请即发动。"23日晚11时，以云南将军唐继尧、巡按使任可澄(1878—1946)的名义致电袁世凯，要求取消帝制，惩办帝制祸首，立将帝制派急先锋杨度、朱启钤等13人"明正典刑"。限36小时，即25日上午10时前答复。届时未见袁氏答复，唐继尧、蔡锷、任可澄，以及贵州护军使刘显世(1871—1927)、进步党骨干、参政院参政戴戡(1879—1917)五人通电，宣布云南独立，实行武力讨袁。护国战争正式爆发。

云南独立后，废去将军、巡按使名义，建立护国军政府，恢复民国元年都督府制，召集省议会，仍举唐继尧为都督。同时组成"中华民国护国军"，分别以蔡锷、李烈钧、唐继尧为第一、二、三军总司令官，决定第一军北出四川；第二军东进广西；第三军居中策应，唐继尧留守。四川为战略进攻的重点。31日，唐、蔡、任、刘、戴等再次联名发表梁启超手撰的通电，宣布护国军的最终目的是与全国人民戮力拥护共和国体，使帝制永不发生；建设名实相副之立宪政体，以适应世界大势。1916年元旦，护国军政府又发表讨袁檄文，列举袁世凯自辛亥以来19条大罪状，号召全国军民"合众兴师"，"共整戎马"。同日，护国军在昆明校场举行誓师大会，当即宣布兴兵讨袁。袁世凯于1915年12月29日通电全国，宣布唐、任、蔡"构中外恶感"、"违背国民公意"、"诬蔑元首"三大罪状，命将三人撤职查办。1916年1月5日，命令虎威将军曹锟(1862—1938)为总司令，率两路北洋军镇压护国军：第七师师长张敬尧(1880—1933)统领3万余人为主力，经四川进攻云南；第六师师长马继增(？—1916)率2万余人进军湘西、贵州而进攻云南。后又任命广惠镇守使龙觐光为云南查办使，率军假道广西进军云南。护国军方面，首由蔡锷率第一军兵分三路攻打四川和贵州。左翼由刘云峰率领，于1月21日攻占川南重镇叙州(宜宾)，取得了护国战争的第一个重大胜利。右翼由戴戡率领，进入贵州，争取贵州护军使刘显世于1月27日宣布贵州独立，继而进入川黔门户綦江，分兵进入湘西。蔡锷亲率中路，在贵州独立后，军锋直指泸州，川军第二师师长刘存厚(1885—1960)在纳溪率部起义响应，配合中路前

锋董鸿勋支队，于2月上旬包围了战略地位十分险要的泸州，全川大震。袁世凯调兵遣将，以解泸州之围。2月下旬，北洋军援川部队陆续到达，轮番进攻护国军。护国军连续战斗，消耗很大，伤亡渐多，蔡锷多次电催唐继尧接济，唐继尧为实现其称霸西南的野心而置若罔闻。为避免不必要的牺牲，蔡锷下令退却。3月上旬，叙府、纳溪、綦江相继失守，未能达到夺取泸州的目标。与此同时，进攻广西的李烈钧第二军也与云南查办使龙觐光部北洋军激战于百色，不能顺利东进。

正当护国战争处于危急关头之际，广西将军陆荣廷于3月15日宣布独立，护国战争出现了新的转机。辛亥革命后陆也曾追随袁世凯，残酷杀害革命党人，1915年3月晋升为耀武上将军。随着陆地位的加强，袁渐起戒心，任命心腹龙济光做广东都督，借以牵制；又将其子陆裕勋调入北京做人质，双方矛盾逐渐加深。1月下旬，梁启超写了一封3000字的长信策动陆荣廷宣布独立。3月初，梁又毅然由沪启程赴桂，并派其代表汤觉顿先行到达南宁。15日，陆即与梁启超联名发表致北京最后通牒电和致各省通电，宣布广西独立，并俘获云南查办使龙觐光父子，粉碎了袁世凯从广西进攻云南的阴谋，使滇、黔、桂三省连成一片，极大地鼓舞了在川南、湘西前线浴血奋战的护国军士气。四川护国军乘机反攻，收复了失去的阵地。北洋军全线崩退，伤亡惨重。广西独立，与云贵一致讨袁，对袁世凯是沉重一击。此时北洋派内部已趋于分崩离析，北洋派的两大柱石——段祺瑞、冯国璋在"民国"招牌之下本都有争夺继承总统的资格，却因袁氏称帝而丧失这种机运，故对袁称帝均抱消极抵制态度。段祺瑞辞去陆军总长职务，躲到北京西山养病。江苏将军冯国璋在南京消极怠工，作壁上观。广西独立后，他又联络江西、广东、浙江三省将军和长江巡阅使张勋联名致电袁世凯，请速取消帝制（即当时盛传一时的"五将军密电"），把袁世凯惊得目瞪口呆。与此同时，帝国主义也改变了态度。1915年10月28日，日本联合英、俄劝告袁世凯"善顾大局"，缓办帝制，"以防祸未然"，不久，法国也加入劝告。12月15日，日、英、俄、法、意五国公使以更为严厉的措辞警告袁氏取消帝制。云南起义后，日本料定袁氏必败，故将对帝制活动的外交干涉转变为"倒袁"政策。1916年1月15日，断然拒绝接待袁政府派出的以祝贺日本天皇加冕为名乞求日本支持的特使周自齐，同时以贷款等方式支持中国内部各派反袁势力。袁世凯在内外交困、走投无路的情势下，遂于3月22日宣布取消帝制，23日废除洪宪年号。仍以徐世昌为国务卿，段祺瑞为总参谋长。袁世凯83天的皇帝梦就这样破灭了。可是他仍想依靠北洋军队，保持总统权位。3月25日和4月1日，曾两次以副总统黎元洪、以及徐世昌、段祺瑞三人名义电达南方护国军，要求停战议和。护国军方面则坚持袁世凯必须退大总统位，否则无调停之余地。与此同时，蔡锷在川南猛攻北洋军，广西陆荣廷也厉兵秣马，准备攻击广东、湖南。但此时，护国军在激战后，无论人员、器械、弹药都十分缺乏，急待补充修整。于是同意自3月31日开始先行停战，而要袁退位的立场丝毫没有改变。此后，反袁斗争即主要以政治斗争方式向前发展。4月6日，袁世凯在广东的忠实代理人龙济光在陆荣廷桂军和中华革命党讨袁军的压力下，被迫宣布广东独立。浙江新军通过武装起义的方式，驱逐浙江将军朱瑞，共推巡按使屈映光（1883—1973）为首领，于4月12日宣布浙江独立。不久，因屈暗通袁世凯，又将其驱走，5月6日改推嘉湖镇守使吕公望（1879—1954）为都督。至此宣布独立的省份已达到五个。为了统一南方各省的反袁力量，在梁启超的奔走之下，于5月8日在广东肇庆成立中华民国军务院，由唐继尧任抚军长，岑春煊为抚军副长，梁启超任政务委员长，蔡锷、李烈钧和独立各省都督共十人为抚军。因唐不能离滇赴粤就职，由岑春煊代摄抚军长职务。军务院是由进步党人、国民党人和西南实力派组成的临时联合机构，带有临时政府性质。它发表了一系列宣言和通告，严正宣告它将指挥全国军政，否定了袁世凯政府的合法地位，声明"恭承"副总统黎元洪为中华民国大总统，并提出惩办帝制祸首、拥护民元"约法"和国会的主张，在政治上起到了同袁世凯政权相对抗的作用，使南方护国军有了统一的指挥机构，有力地推动了全国各省讨袁运动的迅速高涨。

随着反袁斗争的高涨，北洋派内部矛盾更趋激化，段祺瑞承袭辛亥年袁世凯对付清廷的手法，不取得实权不肯为袁挽救危局出力。袁不得已，乃于4月21日任命段祺瑞代替徐世昌为国务卿，组织政府。5月8日又申令撤销政事堂，恢复国务院，以段为总理，组织责任内阁。在南京的冯国璋则积极联络各方，企图造成第三势力，夺取国家最高权力。5月18日，他联合张勋等发起召集由未独立各省将军的代表参加的南京会议，企图通过此会，确立其盟主地位，以促成提前召集国会，选举他为大总统。因各省军阀各有打算，形不成统一的主张，不欢而散。但对

袁世凯刺激甚大。5月9日，陕北镇守使陈树藩在蒲城自任护国军总司令，宣布陕西独立，26日进入西安，驱走陕西将军陆建章（？—1918），自称都督。22日，四川将军陈宧宣布独立，声明与袁世凯断绝个人关系；29日，汤芗铭宣布湖南独立。陈和汤是袁世凯异常信用的心腹党羽，他们宣布独立，带给袁世凯的打击格外沉重。袁本自2月下旬下令缓办帝制不久已生病，经陕、川、湘三省独立的刺激，病势沉重，时人有"催命二陈汤"（陈宧、陈树藩、汤芗铭）之说。6月6日上午10时，这个曾经不可一世的窃国大盗终于在护国战争的打击和全国人民的一致反对下，忧惧而死。6月7日，黎元洪宣誓继任中华民国大总统。但北京政府的实权仍掌握在袁世凯的继承人段祺瑞手中。护国军及各派反袁势力经过斗争，迫使北京政府于29日宣布恢复民元《临时约法》和旧国会，定于本年8月1日召开国会。梁启超为首的进步党人为防止孙中山为首的革命党势力抬头，急于同段祺瑞北洋军阀势力合作，不等国会召开，正式产生国务院，即于7月14日宣布提前撤销军务院，独立各省也陆续取消独立；北京政府则以惩办帝制祸首八人敷衍南方各省。护国战争结束。

护国战争是中国近代史上一次具有重要地位的革命战争。它顺应了历史发展的要求，粉碎了袁世凯复辟封建帝制的图谋，阻止了历史车轮倒转，维护了资产阶级民主共和制度，捍卫了辛亥革命取得的成果，恢复了孙中山先生主持制定的《临时约法》和旧国会，因此赢得人民的拥护与支持，在中国近代史上有着不可磨灭的历史功绩。但是领导这次革命战争的核心力量是资产阶级保守派政党，他们重蹈辛亥革命失败的覆辙，把胜利果实重新拱手交给了取代袁世凯地位的北洋军阀头目段祺瑞，同时承认帝制发生以前北洋政府与帝国主义列强签订的一系列不平等条约，国家政权和社会性质均未发生革命性的变化，护国战争所争得的仍只是一块"民国"空招牌。如同当年的辛亥革命一样，中国民族民主革命的历史任务仍旧没有解决。（刘振岚）

西原借款

1917—1918年间，由日人西原龟三负责经办、皖系军阀段祺瑞与日本寺内正毅内阁签订的八次贷款之总称。

袁世凯为了复辟帝制虽曾接受日本灭亡中国的"二十一条"，但袁世凯其人，素为日本所不喜。一则由于中日甲午战争时期袁在朝鲜曾主张强硬对日；二则由于日本认为袁在当国后一直积极投靠英美，抵制日本。在袁因推行帝制而声名狼籍时，日本转而"倒袁"，一方面对中国穷凶极恶地任意宰割；另一方面支持中国内部各派反袁势力。1916年6月袁世凯死后，"倒袁"目的达到，日本政府开始致力于在华建立一个稳定的亲日派政府，并看中了段祺瑞是唯一能稳定中国的实力人物。皖系军阀头目段祺瑞在袁死后以国务总理的身分掌握了北京政府实权。他为了扩充皖系实力，建立军事独裁，并实现其武力统一全国的野心，也积极投靠日本。日、皖一拍而合。不过，此时期日本帝国主义的侵华策略有了变化。1917年10月大隈重信内阁倒台，寺内正毅（1852—1919）继任总理大臣。由于大隈内阁所执行的逼签"二十一条"等露骨的侵华政策遭到中国人民的强烈反对；在国际上，其妄图独占中国的野心也引起其它帝国主义不满，使日本政府受到国际舆论的谴责，因而日本统治集团对它的侵华政策作了修正。寺内内阁预见到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后的世界，必将进入经济竞争剧烈的时代，而日本国土狭小，资源短缺，如欲使经济飞速发展，只能"求诸地大物博的中国"，从中国掠夺廉价原料及其他一切物资，发展加工制造，才能使日本足以同欧美列强竞争。因此日本对华必须放弃那种赤裸裸的武力讹诈和军事威胁的强硬政策，而改以经济渗透为主要侵略手段；在方法上，应先诱之以利，然后再谋取更大的侵略权益。为此，寺内在未组阁以前曾于1916年6月派他的智囊西原龟三来华"考察"，以为寺内上台组阁制定对华政策搜集情报。西原龟三（1875—1954），早年曾受日本政治活动家神鞭知常（1848—1905）扩张主义思想影响，自称是"王道主义"的信徒，反对大隈内阁以武力威胁为主的"霸道主义"。在寺内正毅任朝鲜总督时，西原即跟随左右，受到寺内宠信。1916年夏西原结束中国之行回到日本后，向寺内内阁提出一份题为《在目前时局下对华经济措施纲要》的文件。此文件的要点，一是鼓吹日本应组织对华实业投资团，以确保日本在华的经济基础；二是强调日本应向中国贷款，以解决中国目前的财政急需。西原起草的这份《纲要》，即成为寺内内阁制定对华政策的主要根据之一。同时，日本借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欧洲列强忙于厮杀之机，大力发展出口贸易，自1915—1918年间，出口贸易顺差达28亿日元，日本银行的现金储备1918年已达15.8亿日元，具备了向中国输出资本的经济基础。于是，寺内内阁采取所谓"菊分根"政策，即像菊花分根移植一样，将资本输出给中国，借贷给亲日的

段祺瑞政府,"既可获得利权,兼可转移华人对日之恶感",妄图利用第一次世界大战给日本造成的有利时机,以投资为手段,掠夺中国的森林和矿产资源,控制中国的金融财政及交通等要害部门,加强它在中国的优势地位,以便在战后有能力同欧美各国在华展开竞争。

为了大量向中国输出资本,1917年1月20日,日本政府批准由兴业、朝鲜、台湾三家银行为主体,组织一个特殊银行团,专门经营对华的经济性借款;政治借款仍由正金银行经营。这个特殊银行团,是以非正式的方式,对华进行秘密借款,以避免其它列强干预。同年8月,段祺瑞政府也成立了中日合办的中华汇业银行,专门经营"中日间之汇兑事业",实即经手向日本大量借款的专门机关。其华股东代表为陆宗舆,段祺瑞即以陆宗舆为该银行总裁。日股东即兴业、朝鲜、台湾三家银行。1916年12月,寺内内阁再次派西原龟三秘密来华,与段祺瑞政府直接洽谈。西原到京后,积极活动,广泛接触中国政界要人,一方面促成日、皖勾结,一方面开始经办对华贷款事宜。段祺瑞政府出面办理借款的是交通总长兼财政总长曹汝霖、中华汇业银行总裁陆宗舆和驻日公使章宗祥。经西原之手经办的借款先后共八项,计:一、1917年1月20日签订之第一次交通银行借款500万日元,年息7厘5分,3年为期,以陇海路债券(额面130万元)、中国政府国库券(额面400万元)和中国政府欠交通银行债权证书(额面242.5687万元)为担保。二、1917年9月28日签订之第二次交通银行借款2000万日元,年息7厘5分,3年为期,以中国政府国库债券(面额2500万元)为担保。三、1918年4月30日签订之"有线电信借款"2000万日元,年息8厘,5年为期,以中国全国有线电报之一切财产及收入为担保。四、1918年6月18日签订之吉会铁路(吉林至会宁)借款1000万日元,年息7厘5分,40年为期,以现在及将来本铁路所属之一切财产及其收入为担保。五、1918年8月2日签订之吉、黑两省林矿借款3000万日元,年息7厘5分,10年为期,以吉、黑两省之金矿及国有森林以及此两项所生之政府收入为担保。六、1918年9月28日签订之满蒙四铁路(热河至洮南、洮南至长春、吉林至开原、热洮铁路至某海港)借款2000万日元,年息8厘,40年为期,以现在及将来满蒙四铁路所属之一切财产并其收入为担保。七、1918年9月28日签订之高徐(高密至徐州)、济顺(济南至顺德)二铁路借款2000万日元,年息8厘,40年为期,以现在及将来二铁路所属之一切财产及其收入为担保。八、1918年9月28日签订之"参战借款"2000万日元,年息7厘,1年为期,未正式规定担保品,但在附件中的驻日公使章宗祥致朝鲜银行总裁函中提到,对于此次参战借款,中国政府"以将来整理新税之收入作为偿还财源"。这八项借款总数为1.45亿日元,其中除第一次交通银行500万日元借款是兴业、朝鲜、台湾三银行自己的资金、第二次交通银行借款及参战借款是用大藏省储蓄部资金外,其余五项借款均由日本议会批准,政府保证支付本利,由三家银行发行1亿日元债券支付,亦即以日本财政资金为后盾,仅由三家银行出面达成借款。西原借款,与以前中国同欧美列强借款有一个显著的不同点,就是在各项借款条约中,都规定"十足交款,并无回扣",利息也不算高。这一点曾为寺内内阁及西原个人所夸口,似乎是"日中亲善"的表现;也成为借款中方经手人曹汝霖、章宗祥等辩解卖国罪责的口实,其实这正是寺内内阁侵华政策狡猾的表现。日本正是通过这种狡猾手段,诱使段祺瑞政府对日本所提出的种种侵略要求,有求必应,大量拍卖中国主权,从而使日本帝国主义从中攫取了大量利权。首先,通过贷款,段祺瑞政府将东北的吉会铁路、满蒙4路、吉林、黑龙江两省的金矿及森林等利权以及全国有线电信的财产和收入,全部抵押给了日本,不仅使日本获得大量的经济权益,而且进一步控制了中国的交通和电信事业。其次,西原经办八次贷款的过程,也是日本帝国主义和皖系军阀相勾结的过程,西原先后六次来华,与段祺瑞、徐树铮、曹汝霖、靳云鹏(1877—1951)等皖系军政要人频繁接触,成为日皖之间的重要牵线人物。西原借款就是日皖勾结的产物。这批贷款从名目上看,除参战借款外,均似经济性借款,但实际上大多用于当时北京政府的军政开支。据北京政府财政部帐簿记载的有线电信、吉会铁路、吉黑林矿、满蒙四路和高徐、济顺二路五项经济借款共1亿日元的开支细帐来看,其中直接用于军费开支和购买军械之款,即占借款总数的35.3%;支付内债本利占34%,而所谓内债是指北京政府临时挪用或借用交通银行等用作军政开支的款项,实际上这笔钱也多用作军费。上述两项合计即占借款总数的69.3%。更何况直接以参战名义的借款,自然是全部用于内战军费开支。段祺瑞政府的财政总长曹汝霖在日后写的回忆录中曾提到,当时北京政府军政费用每月需2000万元,而财政收入每月不足1200万元,所欠之数均以借款弥补。除西原经手的贷款以外,日本政府还以各种名义给予

段祺瑞政府以多次贷款，如善后借款三次垫款3000万日元，以盐税剩余和地租为担保；两次军械借款3200余万日元以及京畿水灾借款500万日元，其它还有吉长铁路、四郑铁路、无线电等项零星借款，若与西原借款合在一起，总数可达38645万日元。正是由于有日本帝国主义源源不断地输送金钱和武器，才使得段祺瑞皖系军阀能够连年发动对南方的战争，镇压护法运动，猖獗地推行他的武力统一政策。同时，日本通过“参战”、军火等借款名目，垄断了中国的“兵工厂及各省煤铁大矿”；并派出大批顾问、军官钻进段祺瑞政府，或帮助皖系军阀训练军队，从而掌握了“参战军”的指挥权。第三、《西原借款》中附有山东密约，即山东问题换文，规定：“日本国军队除济南留一部队外，全部均集于青岛”；胶济铁路“归中日两国合办经营”，北京政府对此竟表示“欣然同意”，以致成为日后日本在巴黎和会上拒不交还山东的借口。事实上，日本帝国主义从段祺瑞手中攫取的侵略权益远比从袁世凯手中得到的更多。西原为此非常得意，他在后来回忆时说：“到燕以来，以七十天的时间，为日中经济合作结成纽带，为东亚永久和平打下基础。前年访华时值袁世凯去世不久，回忆当时中日关系的情况，实有隔世之感。”寺内正毅在1918年秋下台时也曾夸耀自己的侵华功绩说：“大限向中国要求二十一条，惹中国人全体之怨恨，而日本却无实在之利益。本人在任期间，借与中国之款，三倍于从前之数，实际扶植日本在中国之权利，何止十倍于二十一条！”

（刘振岚）

张勋复辟

又称丁巳复辟。1917年7月张勋借“调停”府院之争，率辫军北上拥清逊帝溥仪复辟事件。

张勋（1854—1923），字绍轩，江西奉新人。光绪十年（1884）在长沙投军当兵，辗转升迁，至宣统三年（1911）任江南提督。武昌起义时期，在南京残酷镇压响应起义的新军，又顽抗围攻南京的江浙革命联军，失败后退守徐州，被清政府任为江苏巡抚兼署两江总督、南洋大臣。袁世凯窃国后，所部改称武卫前军，驻兖州，仍以清朝忠臣自命，时刻梦想复辟清室，所部禁止剪发，被称为“辫军”，称他为“辫帅”。1913年积极参加镇压“二次革命”，被袁世凯提升为江苏都督，后转长江巡阅使，授定武上将军，武卫前军改称定武军，移驻徐州。1913年和1916年曾两次策动叛乱复辟，均未得逞。袁世凯洪宪帝制失败后，他从反面总结“教训”，认为袁氏错在不复辟清室而帝制自为，未免“辜负皇恩”，有失忠义，故此致败。因此他妄图复辟清室的活动不仅不加收敛，反而益形猖獗。从1916年6月至1917年1月，他连续召开了三次有北洋督军及清朝遗老遗少参加的徐州会议，一面大肆攻击国民党，干涉国会制宪；一面为复辟清室聚集力量。1917年春，当国务总理段祺瑞与继任总统黎元洪之间的政争因对德宣战问题进入高潮之际，段和黎争相拉拢张勋，以为奥援。段企图借张之手，解散国会，推倒黎元洪；黎企图利用张与段在参战问题上的分歧（因复辟派依恃德国支持，故张勋反对对德宣战），借张之力，“昌言”反对参战，实现“倒阁去段”的宿愿；张勋则欲利用府院之争造成的混乱之机，达到他复辟清室的梦想。

1917年5月下旬，黎段府院之争已到了不可开交的地步，原在北京参加军事会议的各省督军纷纷离京回任。其中拥段的急先锋、安徽省长倪嗣冲、山东督军张怀芝（1860—1934）等20余人于21日晚乘火车奔赴徐州，鼓动张勋带头解散国会，驱逐黎元洪。于是，由张勋出面召开第四次徐州会议，段祺瑞的心腹党羽徐树铮也参加了会议。23日，黎元洪罢免国务总理段祺瑞职务。消息传来，倪嗣冲立即在会上借题发挥，顿足大骂，声称要首先发难，非推倒黎元洪不可。张怀芝随声附和，提议与会各省由京奉、津浦、京汉三路进攻北京。张勋则乘势表示，“保护北洋系，当另求善法”，他所谓的“善法”，即推倒现政府后，各省共同拥戴清帝复辟。徐树铮当场表示，段祺瑞虽然不能公开支持复辟，但只要解散国会，推倒黎元洪，其他一切在所不计。倪嗣冲、张怀芝等也都表示支持。于是，这次徐州会议议定了实行复辟的步骤：各省督军先各回本任，宣布独立，与中央脱离关系；而张勋则暂不参加，以便在黎元洪无计可施之时，出任“调人”，胁迫黎接受督军要求，解散国会；然后再迫黎下台，复辟清室。会后，由张勋倡首，与会者在一块黄绫子上签名为信，表示驱黎复辟的决心。24日，各督军自徐州各回本任，张勋则展开他即将出任“调人”的活动。张在黎元洪和段祺瑞之间，一直采取两面派手法：一方面发表公开通电支持督军团解散国会的要求；另一方面又密电黎元洪，表示支持罢免段祺瑞和“尊重国会之意”。5月24日，他又致电黎元洪，一方面气势汹汹地斥责罢免段祺瑞为非法，并以北洋各省将“自由行动”相威胁；另一方面又说免段法令为总统府秘书厅逾权“擅发”，要黎拿出“持平办法”，以免“激生他变”。这种两面手法，显然是为充当“调人”埋下伏笔。

黎元洪在免段后，立即发生内阁危机。他先后恳请徐世昌、王士珍出组内阁，徐、王均坚不应召。黎百般无奈，于28日任命既与张勋关系密切、又与北洋军阀有渊源的前清官僚李经羲（李鸿章之侄）出组内阁，一以安定北洋派；二可拉拢张勋，以为李出组内阁必使当时纷乱的政治局面趋于稳定。但是，就在同一天，奉天（辽宁）督军张作霖、安徽省长倪嗣冲发表通电，提出四项要求：修正宪法、解散国会、复段祺瑞职、释放政治犯。声称如不照办，“惟有断绝关系以谢天下”！29日，倪嗣冲在蚌埠发表独立通电，宣布同中央脱离关系，叫嚷誓师北伐，并擅自扣留津浦路局火车50辆，以运兵北上。紧接着，奉天、山东、河南、浙江、山西、福建、陕西也纷纷宣布独立。张作霖更声称要出兵“直捣京师，惩彼奸人”。“奸人”，指黎元洪。面对混乱的北京政局，直系军阀头目、身为副总统的冯国璋空喊“调停”，却无得力举动，实则采旁观态度。6月1日，直系军阀曹锟宣布独立，冯国璋也向段派倾斜，致电黎元洪称，“惟有从解散国会入手”。黎元洪一筹莫展，只得连电李经羲入京组阁，但李也被北洋督军的气势所吓倒，躲在天津租界不敢出来。最后在黎元洪的一再敦请之下，声言必须张勋北来，与张偕同到京方肯就职。正在黎元洪走投无路之际，5月30日张勋致电黎元洪，提出担任调停的五项条件：一、解散国会；二、段公复职；三、督军参议宪法；四、摈斥群小（指为黎元洪信任的总统府军事幕僚处处长哈汉章及金永炎等人）；五、大赦帝制党人（指洪宪帝制要犯）。谓黎若能接受这五项条件，则“勋可北上调停”。此电意在取悦于拥段派北洋督军。同日，张又密电黎元洪，对宪法和国会问题，表示了中立立场，且称对出席第四次徐州会议的督军“曾经力为排解”；在语气之间，对黎充满关心爱护，颇符合一位“调人”的身分。黎以为能有张勋这样一位有兵有势的强人出面调停，是他摆脱政治困境的唯一办法。于是6月1日，特以大总统明令召张勋进京调停时局。

当北京政局混沌、杌陧不安之际，下野的段祺瑞正在天津积蓄力量，待机卷土重来。在拥段的各省军阀、研究系、交通系、帝制派分子的共同策划下，于6月2日在天津成立“各省军务总参谋处”，以洪宪帝制要犯雷震春为总参谋。段还打算在天津成立临时政府，准备赶黎下台后，举徐世昌为大总统。但终因内部分歧，且遭到美国的反对、张勋的谴责，段祺瑞很快放弃了这个计划。

6月7日，张勋率辫子军步、马、炮兵十营、约4300人从徐州启程北上，8日晨抵达天津，9日辫子军即进入北京，驻扎在天坛、先农坛一带，而张勋本人则在天津停留，目的一是等待黎元洪解散国会；二是探询段派人物及列强对复辟帝制的态度。当时日本明确表示反对清室复辟。段祺瑞为利用张勋解散国会，驱黎下台，对其复辟企图未加可否；徐世昌则秉承日本意旨，力劝张勋万勿轻举妄动，张勋复辟的决心为之动摇。他打算先胁迫黎元洪解散国会，再扶植李经羲内阁以控制大局；复辟之事，观望一个时期再说。8日晚，张勋即对来天津迎接他的总统府秘书长夏寿康（1871—1923）提出“解散国会”、“摈斥群小”等调停条件，限三日内实现，否则不负调停责任，任各省军队自由行动。黎元洪不敢怠慢，当天即下令撤销军事幕僚处；次日又拟好解散国会的命令，但因代理国务总理伍廷芳拒绝副署，特改任步军统领江朝宗为代总理，副署此项命令，并于13日凌晨（倒填为12日）发布。14日，张勋以胜利者的姿态，偕新任国务总理李经羲及帝制分子刘廷琛、胡嗣瑗、张镇芳、雷震春等到京。黎元洪特开中华门，以黄土铺路，迎接张勋。张勋进京后，一面通电各省，令其取消独立；一面求助于冯国璋帮助疏通各省军阀支持李经羲组织内阁。19日至22日，独立各省相继取消独立；天津“各省军务总参谋处”也于22日宣布撤销；24日李经羲宣布就职。复辟派的死硬分子刘廷琛、胡嗣瑗、万绳栻、张镇芳、雷震春等不满张勋中止复辟之举，骂他欺君卖友；并煽动栖息津、沪的清朝遗老密函张勋，逼其立即树起复辟旗帜。6月27日晚，早已由维新派堕落为保皇派的康有为带领着预先拟好的伪诏十余道，并携同沈曾植（1850—1922）、王乃征等人秘密潜入北京，为张勋复辟推波助澜。于是张勋决心不顾一切，发动复辟。28日晚，张勋与康有为、沈曾植、王乃征、张镇芳、雷震春等在张勋私宅举行会议，决定了复辟计划。30日傍晚，张勋偕刘廷琛等潜入清宫，与溥仪的师傅陈宝琛（1852—?）举行御前会议，将复辟计划告知清室。会后，张勋到江西会馆听戏，同时飞调驻扎在天坛的辫子军和驻在南苑的第十二师（陈光远统率）入城，被步军统领江朝宗所阻。夜12时，张勋返回住所，召集京津警备司令王士珍、江朝宗及京师警察总监吴炳湘、陈光远、李进才（第十三师师长）及康有为、梁鼎芬、刘廷琛等开会，当即宣布欲行复辟，继而厉声逼迫王士珍、江朝宗立开城门，放辫军入城。王、江面面相觑，不敢反抗，于是北京城门洞开，放辫军尽入。7月1日凌晨3时，张勋身着朝服，头戴红顶花翎，率领刘廷琛、康有为等50余人乘车进宫，早已做好准备的溥仪即在养

心殿召见张勋等人，表示接受"奉还大政"、立即"复位"的要求，宣布复辟。当天，一连下了由康有为事先拟好的《复辟诏》等19道伪谕，主要内容为：

一、下诏即位。宣布即日"临朝听政，收回大权"，改民国六年为宣统九年。二、锡封张勋为忠勇亲王，黎元洪为一等公；并诡称黎元洪"奏请归还国政"。三、恢复宣统初年官制，唯增设议政大臣，授张勋、王士珍、陈宝琛、梁敦彦、刘廷琛、袁大化、张镇芳为内阁议政大臣；又任命梁敦彦、张镇芳、雷震春、朱家宝、王士珍分别为外务、度支、陆军、民政、参谋各部尚书。四、授总督和各省巡抚。总督仅设三人：张勋、冯国璋和陆荣廷分别为直隶、两江、两广总督。原各省督军改称巡抚。在复辟上谕中，还宣布，对内完全恢复封建统治秩序，"以纲常名教为精神之宪法，以礼义廉耻收溃决之人心"。对外，自宣统九年五月十三日（1917年7月1日）以前，凡与东西各国正式签订的条约及已付债款合同，一律继续有效。就在7月1日这一天，张勋派梁鼎芬逼迫黎元洪在"奏请归还大政"的奏折上签字。黎严辞拒绝，并于次日电请副总统冯国璋代理总统职务，重任段祺瑞为国务总理，率兵讨逆。继而在张勋逼迫下，驱车避入东交民巷日本使馆区，日本公使依据国际惯例，予以保护。自7月1日起，警察强迫北京居民悬挂龙旗。蜷缩于各地的封建遗老遗少，听到溥仪重新坐龙廷的消息后，像冬眠刚过的毒虫，从各个黑暗的角落里爬出，弹冠相庆，称心快意，有的急忙从箱底里翻出密藏着的红顶花翎，有的到估衣铺里抢购古旧朝服蟒袍；有的到戏装店里定做以马尾制成的假发辫，个个穿戴整齐，沐猴而冠，招摇过市。

张勋的倒行逆施，遭到全国人民强烈反对。孙中山在上海发表《讨逆宣言》，号召各省革命党人出师讨逆，并召集党人制定了"扫穴犁庭"的军事计划，决定派军舰三艘，星夜开往秦皇岛，迎黎元洪南下在沪组织政府以反对复辟。在资产阶级革命派的推动下，全国各地掀起声讨张勋复辟的强大舆论。北京十几家报纸一律停刊，表示抗议。上海各报连载《普天同愤录》，发表各方面谴责复辟的通电。天津、武汉等处报纸也都连连载文，口诛笔伐，痛斥张勋叛国复辟罪行。支持复辟的报纸只有康有为办的《国是报》，却因排字工人拒绝排印而停刊。上海、两广、两湖等地区各阶层人士以及海外华人纷纷组织集会，成立团体，发表通电，愤怒声讨复辟罪行。各地反复辟斗争的广泛性和群众性，表明经过辛亥革命的洗礼，要求民主共和，反对封建专制，已成为古老中国不可抗拒的新潮流。

张勋复辟丑剧登场后，段祺瑞决心利用这一时机重新登台。7月3日段祺瑞向全国发表反复辟通电，并组成"讨逆军"，4日讨逆军在马厂誓师出发，辫军不堪一击，顷刻瓦解。张勋扶植的溥仪复辟仅12天即告流产。7月11日夜张勋在外国人保护下逃往荷兰使馆。1923年病死于天津。　（刘振岚）

段祺瑞"讨逆"

1917年7月段祺瑞讨伐张勋复辟事件，史称"讨逆"。

当年5月段祺瑞被黎元洪免职后，一直躲在天津筹集力量，准备卷土重来，重掌政柄。他一面怂恿、支持皖、奉等八省北洋督军宣布独立，对黎元洪施加压力；一面于6月2日，在天津成立"各省军务总参谋处"，将各省北洋军阀、研究系、交通系政客等拥段力量聚集门下，而以洪宪帝制要犯雷震春为总参谋。段还打算成立临时政府，拟赶黎下台后，举徐世昌为大总统，建立以段为核心、以共和为招牌的个人独裁政权。为造成最有利的时机，他表面上常常扬言，只要张勋复辟，他"必尽力扑灭"；暗地里皖系骨干、段的智囊徐树铮却竭力唆使万绳栻（张勋的参谋长）在张左右鼓动复辟。徐树铮并出席了张勋在1917年5月下旬召开的策划复辟的第四次徐州会议，当场表示：段祺瑞虽然不能公开支持复辟，但只要达到解散国会和驱黎的目的，其他一切在所不计，默许了张勋的复辟计划；又在私下里对其同党说："张勋是复辟脑袋，先让他去做，我们机会就来了"，流露了利用张勋复辟的真意。1917年7月1日张勋扶清室复辟。次日黎元洪重任段祺瑞为国务总理，段立即召集左右商讨对策。因另立临时政府、举徐世昌为大总统的计划遭到美国等列强的反对，故此决定接受黎元洪的任命，就任国务总理，以达名正言顺便于号召之目的。当日晚，段率靳云鹏、张志潭、梁启超、汤化龙从天津赶赴马厂，策动驻马厂的第八师（师长李长泰）、驻廊房的第十六混成旅（旅长冯玉祥）及驻保定的第三师（师长曹锟）等组成"讨逆军"，于7月3日在天津马厂第八师司令部举行誓师，组成"讨逆军总司令部"，公举段祺瑞为讨逆军总司令，以梁启超、徐树铮、李长泰为讨逆军总部参赞。其他研究系政客汤化龙、交通系政客叶恭绰（1880—1965）和段祺瑞的亲信徐树铮等均参加了总司令部，分任职务。当日，段祺瑞在马厂发表由梁启超起草的反对复辟的通电，指斥张勋在当今"民智日开，民权日昌"之世，"欲以

一姓威严驯伏亿兆",推翻共和国体的罪行,表明了反对复辟帝制的立场。但它不从共和制度优、专制制度劣方面立论,而仅认为国体"定之匪易","既定"而不可复改;"民国肇建",不是中国人民长期奋斗的硕果,而是由于前清"推诚逊让";所以反对复辟,不是为保卫共和,而是由于"既已服劳于民国"——仍援不事二主、不做"二臣"之封建观念。在这里,可以清楚地看到"先朝旧臣"的本色。同日,段祺瑞又以"讨逆军总司令"名义发布讨逆檄文。冯国璋也于3日在南京发表讨逆通电,指斥张勋借"调停"时局之机,"擅行复辟"的罪行,表示"誓扫妖氛","刻日兴师问罪,殄此元凶"。4日,冯、段又联合发表讨逆通电,列举张勋八大罪状,表示要"整率劲旅"、"犁扫贼巢",使"国命重光"。而在所列八大罪状中,有三条是指责张勋"危害清室"之罪,并极力为清室开脱干系,表明军阀反复辟的不彻底性。

段祺瑞讨伐张勋复辟,得到了日本的大力支持。日本政府在大隈重信内阁时期曾纵容宗社党复辟清室,而自1916年10月寺内正毅上台后,改变方针,全力扶植段祺瑞,明确反对张勋复辟。寺内的心腹西原龟三于6、7月间一直潜伏于天津,为段出谋划策。继而又派出青木宣纯(1859—1924)中将帮助段策划军事。从7月1日至6日,段祺瑞以各种名义向日本三菱洋行、大仓洋行和正金银行约取得300万元以上的贷款,充作讨逆军的军费。本来根据《辛丑条约》的规定,中国军队不能在天津周围20里以内采取军事行动,亦系经由日本公使向各国建议特许中国讨逆军在天津附近有行车及运输的自由,而得到各国同意的。

7月5日,段祺瑞自马厂回到天津,宣布就总理职(暂以直隶督署为总理办公处),并开始指挥讨逆军事。根据7月3日马厂会议决定:讨逆军分东西两路进行,西路由曹锟任司令,率第三、第二十师沿京汉路北上;东路由段芝贵任司令,督第八师和第十六混成旅集合于廊房,沿京津路西进。5日凌晨,东路军第八师一部在廊房、万庄之间与辫军首次接战,辫军退往丰台,讨逆军追至黄村以北。同日,西路军第三师也乘火车北上,占领涿州、良乡,直抵芦沟桥。6日,东路军冯玉祥部参加战斗,与第八师合兵追击辫军至丰台以东。7日,东路军与辫军激战于丰台,西路军从后夹攻,陈光远第十二师也加入讨逆阵营,与西路军配合。辫军腹背受敌,四散逃命,原依附张勋的近畿第二旅倒戈,加入讨逆军。讨逆军乘胜占领丰台。同一天,由南苑航空学校组成的讨逆军航空队轰炸了城内辫军营地和清宫,往清宫投下的三枚炸弹,一枚落于乾清宫水池,未爆炸;一枚落于养心殿前,炸坏殿前金缸;一枚落于某殿台阶上,当场炸死侍卫、太监、轿夫各一人,使辫军和清宫人人自危。同日,西路军又占领了协寨、跑马场等地。至此北京城东南各要隘均为讨逆军控制。

自段祺瑞重新就任国务总理、宣布讨伐张勋后,原支持张勋的北洋军阀纷纷摇身一变,追随段祺瑞"讨逆"。故此,张勋发动复辟后听到的是来自全国各地的讨伐声,而得不到各省的响应。7月4日他曾致电参加徐州会议的各省军阀,要求他们实践前言,赞助复辟。当他得知段祺瑞组织讨逆司令部后,大为愤懑,向报界发表谈话,揭露徐世昌、段祺瑞乃破坏约法和国会、推翻黎元洪的主谋和祸首,根本"不配说维护共和",又威胁说:"芝泉(即段祺瑞)如果逼我急了,我即将徐又铮(即徐树铮)累次到徐州求我对于黄陂(即黎元洪)、对于国会种种计划,种种文件,一一宣布。"7月6日又致电北洋各省督军,揭露徐世昌、冯国璋等均曾参与复辟之谋,谓其"信使往还,均有可证"。但是,张勋的哀求与威胁均不能奏效,许多支持过复辟的军阀也都倒戈相向。张勋见大势已去,只得一面向伪清廷提出辞职,一面请求北京公使团出面"调停"。8日,伪清廷召开皇族会议,准张勋辞去议政大臣暨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职务,责成徐世昌组阁,徐来京前,由王士珍代理阁务。经徐世昌斡旋,讨逆军方面派出外交代表汪大燮、刘崇杰(1880—?)入城,与外国使团接洽,希冀外国使团促使张勋投降。段提出停战条件四款:一、取消帝制;二、解除辫军武装;三、保全张勋生命;四、继续优待清室。而张勋态度死硬,只承认第四条。9日,讨逆军已兵临城下,复辟派纷纷出逃,协助张勋复辟的第二十八师师长冯德麟在天津车站被捕,帝制派急先锋张镇芳、雷震春也于10日在丰台车站被查获,只有康有为化装逃跑。9日、10日,王士珍、江朝宗、吴炳湘等两次劝告张勋投降,张勋大骂参加徐州会议之人背信弃义,一口拒绝投降,而要求"调停";拒绝解除武装,要求率辫军仍回徐州;并不以优待清室为满足,仍坚持实行君主立宪。张勋以为,现在的"讨逆者"正是他复辟当初的同盟者,他们虽然"讨逆",未必没有"投鼠忌器"的顾虑,不一定能把他张勋怎么样,所以敢于死硬到底。

段祺瑞见劝降既不可能,决计攻城。11日晚荷兰公使代表外交团向讨逆军提出,攻城战争只能以12日上午4时至晚12时为限,大炮只允许放实弹

一发。12日凌晨，讨逆军分三路向北京城内的辫军发起总攻击。东路军第八师和十六混成旅自城南经永定门直取天坛，西路军第三师自城西占领彰仪门；中路军十一师、十二师占领朝阳门。辫军分两处设防：城外步兵六个营守天坛；城内四个营驻守辫军大本营——张勋私宅南河沿一带。天坛辫军稍加抵抗，迅即投降。南河沿辫军则负隅顽抗。上午10时，讨逆军仅发的一颗炮弹恰中张勋住宅，张在两个荷兰人的保护下逃进荷兰使馆，辫军缴械投降。至此，讨逆战争结束。讨逆战争从7月5日至12日，历时八天，实际上只经历了7月6—7日和12日两次战事，辫军被打死者仅70余人，讨逆军战死20余人，可见战斗并不激烈。7月6日，冯国璋已在南京宣布就任代理大总统，同日下令将接替段祺瑞国务总理职务的李经羲免职，正式任命段祺瑞为国务总理。14日，段祺瑞以"再造共和"的功臣姿态回到北京。当日下午即到日本公使馆迎接黎元洪，黎于同日连发两道通电坚拒复任。次日，段祺瑞派人赴南京请冯国璋北上就代理大总统职，并于同日正式组成以段派官僚和研究系政客为主体的混合内阁。8月1日冯国璋到达北京。北京政府在冯、段合作的新体制下暂时趋于稳定。　（刘振岚）

护　法　运　动

又称护法战争。1917—1918年孙中山为首的资产阶级革命党人为维护临时约法、恢复国会，联合西南军阀共同进行的反对北洋军阀独裁统治的斗争。

孙中山先生亲自主持制定的《中华民国临时约法》及据此召集的第一届国会（俗称旧国会），一向被公认为资产阶级共和国的象征。孙中山在被迫让出政权后，一直为维护约法和国会而进行着坚持不懈的斗争。当1917年5月，国务总理段祺瑞利用督军团压迫国会接受对德宣战案之际，孙中山即与章太炎、岑春煊、唐绍仪联名致电段祺瑞及参众两院，要求他们遵守约法、尊重国会。段被继任总统黎元洪罢职后，唆使北洋督军叛变独立，以武力胁迫黎元洪解散国会，孙中山又连续通电（或单独、或联名）西南各省，呼吁拥护约法和国会，起兵讨伐北洋群逆。7月1日，张勋拥清室复辟，3日，孙中山便在上海召集在沪陆海军及国民党要人讨论拥护共和、出师讨逆大计。决定在南方另行召集国会，组织临时政府。4日，孙中山致电参众两院议员，号召议员南下护法。当时控制广东的两广巡阅使陆荣廷为首的桂系军阀为借助护法声浪，确保两广地盘，反对段祺瑞的武力统一政策，并向湖南扩张势力，表示欢迎孙中山来粤护法。7月6日，孙中山偕章太炎、朱执信、廖仲恺、陈炯明等率海琛、应瑞舰离沪南下，17日到达虎门，19日到达广州。在广东各界欢迎会上，孙中山发表演说，指出当今变乱，"实真共和与假共和之争"，认为"假共和之祸尤甚于真复辟"，只有打倒假共和，才能"得真共和之建设"。最早响应孙中山护法号召的是海军总长程璧光，他于7月4日发表讨贼檄文，痛斥张勋复辟。孙中山南下护法后，程即于21日与第一舰队司令林葆怿联名通电，提出拥护约法、恢复国会、惩办祸首三项主张，率第一舰队共十艘军舰，于8月5日到达黄埔，同行者有唐绍仪、汪精卫等。当时控制滇、黔两省的滇系军阀头目唐继尧也为对抗段祺瑞，确保地盘，并向四川扩充势力，于8月11日通电加入护法行列。由于段祺瑞打败张勋重新掌握政权后，拒绝恢复约法和国会，采纳梁启超建议，准备另行召集"临时参议院"，重新制定国会组织法和选举法，选举新国会，以达到他取消国民党议员占优势的旧国会和废除临时约法的目的，从而引起旧国会议员的不满，他们响应孙中山择地另开国会的号召，纷纷南下赴粤。至8月中旬，到达广州的国会议员已达150余人。

8月18日，孙中山在黄埔公园宴请国会议员，商讨召开国会问题。考虑到来粤议员不足法定人数，决定效法法国大革命前夕第三等级代表举行国民议会的先例，召开"国会非常会议"（俗称"非常国会"）。25日非常国会开幕，31日通过《中华民国军政府组织大纲》13条，规定中华民国为戡定叛乱、恢复《临时约法》，特组织中华民国军政府。军政府设大元帅一人，元帅三人，由国会非常会议分别选举之。《临时约法》的效力完全恢复以前，中华民国之行政权由大元帅行使，大元帅对外代表中华民国，元帅协助大元帅筹商政务。军政府设外交、内务、财政、陆军、海军、交通六部。为了适应护法戡乱的战争需要，军政府没有采纳《临时约法》规定的内阁制，而采取中华革命党《革命方略》中提出的党、政、军权合一的大元帅制方案，实行军事、内政、外交合一的元首制，体现了孙中山为首的中华革命党人希望通过护法运动建立本党单独执政的资产阶级革命政权的意图。9月1日非常国会选举孙中山为海陆军大元帅，陆荣廷和唐继尧为元帅。10日，孙中山宣誓就职。同日，非常国会通过了军政府各部总长名单，外交：伍廷芳，财政：唐绍仪，陆军：张开儒，海军：程璧光，内政：孙洪伊，交通：胡汉民，军政府参谋总长：李烈钧，大元帅府秘

书长：章太炎。军政府的人事安排，体现了中华革命党人主动与西南实力派以及国民党稳健派合组护法军政府的愿望。但是陆荣廷与唐继尧等追求的是建立护国战争时期军务院那样的合议制政府，按各方实力排定座次，实现他们称霸西南的野心。而军政府却采取了元首制，树立了孙中山在护法政权中的领导地位，他们反而成了配角。所以陆荣廷与唐继尧对军政府的组织原则及选举结果都非常不满，均不肯就元帅职。伍廷芳、唐绍仪、程璧光、李烈钧等国民党稳健派人士为求得与西南实力派的合作，也赞成合议制，故这四人也不肯就职。于是孙中山任命了一批中华革命党的骨干和原同盟会或国民党的激进分子代理各项工作。这样，军政府实际上成为中华革命党力图领导护法运动的资产阶级政府，从而决定了它必遭西南军阀的反对而难以长期存在下去。

军政府的成立，标志着护法运动高潮的到来，也标志着南北对峙局面的形成。段祺瑞继承袁世凯武力统一中国的衣钵，决心以北洋武力镇压西南护法，挑起第二次南北战争。其军事战略有两个重点：一是对湖南用兵以制两广，一是对四川用兵以制滇、黔。8月6日，段派出心腹大将傅良佐（？—1926）代替谭延闿为湖南督军；派其内弟吴光新（1881—？）为长江上游总司令兼四川查办使。9月9日傅良佐率北洋军到湘后，即下令免除原同盟会会员、零陵镇守使刘建藩和驻衡阳湘军旅长林修梅的职务。18日，刘、林二人联名通电，宣告“自主”，与海军和西南护法各省一致行动。西南护法各省将湘督易人看作是北洋派进军西南的信号，桂系决定派出桂、粤联军80营援助湖南。10月3日孙中山正式下令讨伐段祺瑞等民国叛逆。湘省护法军组成以程潜为首的湘南总司令部，粤、桂、湘三省护法军的总目标是会攻长沙。此时，段祺瑞也向北洋军下达了讨伐令，傅良佐任命第八师师长王汝贤为湘南司令、第二十师师长范国璋为副司令，分三路讨伐湘南。10月6日，北洋军和湘南护法军在湘潭西倪铺接战，护法战争正式爆发。南北两军在湘南激战了一个多月。11月14日，直系军阀王汝贤和范国璋不愿为皖系卖命，径直通电议和，撤离衡山前线。20日护法军轻取长沙。段祺瑞对湘用兵以制两广的计划宣告失败，桂系控制了湖南。与此同时，唐继尧为首的滇系为对抗吴光新率领的入川北洋军，也组成滇、黔联军，与孙中山派往四川的中华革命党组织的四川国民军（后改四川靖国军）相配合，与北洋军交战，于12月3日攻占重庆，赶走了段祺瑞新任命的四川督军周道刚（1875—？）和四川查办使吴光新。在其它各省，由中华革命党和国民党人领导组建的护法武装也相继而起，纷纷宣布与西南各省一致行动。规模较大的有湖北襄郧镇守使、鄂军第九师师长黎天才等组织的“湖北靖国军”，在襄阳宣布“自主”；前陕西警备军统领郭坚组织“陕西护法军”，在凤翔宣布“独立”。此外，在山东、河南、浙江、江苏、安徽、福建、甘肃，乃至东北等省区，都先后组织了“护法军”、“靖国军”，宣布“独立”或“自主”，护法战争的烽烟席卷了全国大部分省区。这种形势使孙中山非常振奋，他多次召集军事会议，制定了护法北伐的进兵战略：令桂、滇两军肃清湘、川北军，出师合击武汉，其他各路护法军、靖国军也与桂、滇军会师武汉，然后占领南京，大举北伐，会攻北京。

北洋军在湖南的失败是直、皖两系矛盾分裂的结果，同时又进一步激化了直皖矛盾。直系首领、代总统冯国璋一直同皖系首领段祺瑞争夺北洋派正统地位及北京政府中央大权。护法战争打响后，冯企图借助西南军阀势力对抗皖系，因而暗中主和；且对皖系利用直系军队打头阵的部署深为不满，正因此，王汝贤、范国璋二将在前线擅自停战撤兵，打乱了皖系夺取湖南的战略部署。对此，段祺瑞极为恼火，愤而向冯国璋提出辞职。冯索性暗示号称“长江三督”的湖北督军王占元（1861—1934）、江西督军陈光远、江苏督军李纯于18日发表联名通电，主张南北双方罢兵休战，和平解决南北问题。11月22日，冯免去国务总理段祺瑞，任王士珍为国务总理，段祺瑞内阁再次倒台，直皖两系公开分裂。25日冯国璋颁布南北停战令。此举在护法阵营内部引起不同的反响。孙中山始终坚持护法，反对南北调和，在11月18日发表对时局的声明：“舍恢复约法及旧国会外，断无磋商余地。”以程潜为首的湘军将领则要求乘胜攻取岳阳，巩固护法军在湖南的胜利。然而以扩张实力和地盘为目的的桂、滇两系，在分别控制了湘、川两省后，便不顾孙中山护法运动的宗旨，很快和直系军阀妥协。陆荣廷在11月24日，即冯国璋颁布停战令的前一日，就表示赞成“长江三督”的主和通电，带头发起南北停战。28日又授意广西督军谭浩明（1871—1925）以湘粤桂联军总司令名义通令响应冯国璋的停战令，命护法军前敌各军停战。滇系军阀则采取两面派手法，一面慷慨陈词，表示坚决护法，敷衍孙中山；一面又与陆荣廷沆瀣一气，彼此呼应，下令驻川滇军停战。

直系的主和政策引起皖系与北洋主战派的强烈不满。在段祺瑞及其心腹徐树铮的策动下，吉、黑、

奉、直、鲁、晋、陕、豫、甘、新、皖、浙、闽13省督军代表分别于1917年12月2日和1918年1月5日，连续召开两次天津会议，强烈要求冯国璋明令讨伐西南。冯被迫让步，于1917年12月15日任命直隶督军曹锟、山东督军张怀芝分别为第一、二路军总司令南下伐湘。18日任命段祺瑞为参战督办，皖系干将段芝贵为陆军总长，让皖系重掌中央军事指挥大权。1918年1月10日，又以参谋部、陆军部名义下达局部讨伐令，令北洋军进攻湖北荆州和襄阳。1月14日，吴光新率北洋军攻占荆、襄。桂系与湘军看到直系屈从主战派，也向岳阳发动进攻。1月27日护法联军攻克岳阳，俘敌1300余人。如联军乘北洋军兵力集中荆、襄之机直捣武汉，将会使护法战争出现重大转机。但桂系以保守湘境为满足，按兵不动，并提出"北不攻岳，南不攻鄂"为议和条件，从而丧失攻取武汉、会师北伐的大好时机。南军夺取岳阳后，北洋主战派气势更凶，胁迫冯国璋于1月30日下达对整个西南的讨伐令，命曹锟、张怀芝和张敬尧统率所部分路进兵。2月中旬，各路北洋军约10万人分别向湘鄂、湘赣边界进军。3月18日，北洋军"后起之秀"、署理第三师师长吴佩孚(1874—1939，字子玉，山东蓬莱人)率部攻占岳阳。3月23日，冯国璋被迫重任段祺瑞为国务总理，段立即组织北洋军大举南攻，护法军在湖南战场接连失利。26日，吴佩孚占领长沙。北洋政府旋即任命张敬尧为湖南督军兼署省长，命吴佩孚等部分左、中、右三路向湘南进军。4月24日，吴佩孚率中路军占领衡阳，湖南大部分地区沦于北洋军之手。进攻湖南的第一路总司令曹锟及其部下、署第三师师长吴佩孚本为直系军人，挥师南下后连克岳阳、长沙、衡阳，战功最大，而段祺瑞政府竟把湘督兼省长一职授予皖派嫡系张敬尧，使曹、吴大为不满，直、皖矛盾再度尖锐。吴佩孚秉承曹锟意旨，占领衡阳后即停步不前。5月底，曹锟擅自回师天津。6月15日直系与桂系代表签订停战协定，息战言和。8月，吴佩孚通电主和，公开攻击段祺瑞的武力统一政策"实亡国之政策"。直系将领纷纷响应。8月下旬段祺瑞被迫命令前线各军暂取守势。

桂、滇两系军阀不仅在护法战争中勾结直系罢兵议和，破坏孙中山护法宗旨，而且还拉拢国会中的政学会分子和国民党稳健派破坏护法军政府，排斥孙中山，企图攘夺护法运动的领导权。1918年1月，由桂系军阀发起，成立护法各省联合会议，试图成为与军政府抗衡的另一政权机关。2月，又由国民党稳健派人士出面，正式提出改组军政府的主张，并拟定《中华民国军政府组织大纲修正案》七条，其中心用意在于改大元帅单独首领制为若干总裁合议制，以排挤孙中山。4月10日，滇系军阀唐继尧率先通电西南各省支持这一主张，提出护法各省现宜遥戴黎元洪或冯国璋为大总统，推岑春煊为国务总理，至于孙中山，"则宜游历各国，办理外交"。5月4日，在政学系及益友社操纵下，不顾孙中山和中华革命党议员的坚决反对，非常国会竟强行通过了《修正军政府组织法案》。当日孙中山即向非常国会提出辞呈，并发表大元帅辞职通电。他在电文中回顾护法以来的艰难历程，愤然指出："顾吾国之大患，莫大于武人之争雄，南与北如一丘之貉。虽号称护法之省，亦莫肯俯首于法律及民意之下。……"20日非常国会选举唐绍仪、唐继尧、孙中山、伍廷芳、林葆怿、陆荣廷、岑春煊七人为政务总裁，以岑春煊为主席总裁。改组后的军政府完全由桂、滇军阀及其附庸政学会所控制，护法成为空名。孙中山看透了西南实力派名为护法、实为争夺地盘的面目，认识到依靠军阀不可能达到护法救国的目的，遂于次日离开广州，前往上海。护法运动宣告失败。　（刘振岚）

中日军事协定签订

中日军事协定，指1918年5月日本帝国主义为反对社会主义苏俄、霸占中国东北及俄国远东领土，诱使段祺瑞政府签订的《中日陆军共同防敌军事协定》和《中日海军共同防敌军事协定》。

自光绪三十三年(1907)第一次日、俄协定签订，直至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前，日本对东亚大陆的侵略野心，主要是与沙俄分割我国东北，俄占北满，日占南满。欧战爆发后，日本侵略势力伸展至我国山东及南洋群岛。1917年俄国的十月革命引起各帝国主义的仇视；1918年2月苏俄与德国单独媾和，帝国主义列强遂有联合进攻苏俄西伯利亚的打算。日本帝国主义认为这是实现其"大陆政策"的重要步骤——占领中国东北的大好时机。早在1917年11月，日本侵略分子川上俊彦在对俄国进行了四个月的考察之后，即向日本外相本野一郎建议，如果苏俄政府与德国单独媾和，日本至少要占领满洲北部及直至贝加尔湖沿岸的俄国远东领土。次年1月，日本参谋本部和陆军省联合成立了军事共同委员会，由参谋次长田中义一主持，拟定出兵西伯利亚的各种方案，着手出兵的准备工作。为全面实现这一侵略计划，日本必须首先取得派兵进驻中国东北三省的合法依据。日本政府的如意算盘是：以诱骗的手段，同北京政府缔

结一个军事协定，建立牢固的“日中同盟”，根据“日中同盟”，在军事上，可以“协同作战”为借口，使日军取得自由向中国领土派兵的权利，从而窃据北满，继而霸占整个东三省和外蒙古，远征西伯利亚，实现其囊括东亚大陆的野心；又以“相互支援”为名，参与编练中国军队，控制和掌握中国的军火工业原料，并力求“握得中国之中央军权”。在政治上，积极干涉中国内政，扶植亲日势力。在经济上，以“同盟协作”的名义，掠夺中国资源，占领市场，以同英美侵华势力竞争。总之，是企图利用中日结盟的关系，将中国在政治上、军事上、经济上完全置于日本的控制之下，最终实现它把中国变为日本独占殖民地的野心。这是日本帝国主义在华多年孜孜以求的侵略目标。苏俄与德国单独媾和后，日本即以所谓防止德奥势力经由西伯利亚东侵为借口，展开了诱使段祺瑞政府缔结中日军事协定的活动。1918年2月5日，田中义一对中国驻日公使章宗祥提出：鉴于德、奥势力东渐，中日两国必须在军事上“共同行动”，“切实筹防”。章宗祥立即报告北京政府。此时因南方护法战争的打击和直、皖两系军阀矛盾的深入发展，段祺瑞内阁已经倒台，但段仍任参战督办，皖系骨干段芝贵任陆军总长，所以北京政府的军事大权仍掌握在皖系军阀手中。当国务总理王士珍就中日关系事征询段的意见时，段当即表示应积极与日本“达成完满之协定”。与此同时，北京政府的日本军事顾问青木宣纯和军事研究员坂西利八郎连续对代总统冯国璋及王士珍进行游说，诱使他们承认缔结中日军事同盟的重要性。冯国璋在日本和段祺瑞皖系军阀的双重压力下，终于接受了中日两国在军事上采取共同行动的建议。2月22日，北京政府电示驻日公使章宗祥，表示了这个意向，但提出中日军事合作仅限于中国国境之外，中国境内防务仍由中国军队自己承担。这代表了冯国璋为首的直系军阀的态度。日本当然不满，外相本野对章宗祥表示：中日既决定共同行动，便没有必要分彼此界限，并诱骗说：“日本此时对于中国实无野心，设中国仍不免怀疑，则共同声明等于形式”，“深望中国当局放开胸襟……切实共同提携”。2月26日，田中义一又向章宗祥提出了两项解决办法：一、先由两国外交当局结共同行动之协约，其余军事布置由两国军事当局再商。二、先由军事当局商定军事布置，“外交当局但与认可，俟时机再定”。这两项办法的要旨在于避开北京政府而直接同中国军事当局商订缔结中日军事同盟问题。因当时北京政府军事大权掌握在皖系手中，避开北京政府，即可绕开直系的反对，直接与皖系打交道。此时期直皖矛盾急剧发展，由于北洋军在南方与护法军交战失利，皖系及北洋主战派军阀强烈要求冯国璋下讨伐令，皖系甚至勾结奉系军队入关，拟发动政变，赶冯国璋下台。冯被迫向皖系妥协，将中日军事协定的交涉事务交由段祺瑞主持。3月2日，北京政府电示章宗祥，表示接受田中义一两项办法中的第二项办法，“由两国军事当局各委专员共同规划”。3月23日，段祺瑞重新出任国务总理。25日，按照日本所定的调子，中日两国互致中日共同防敌换文。换文大意是：中日两国政府，“因敌国（指德、奥）实力之日见蔓延于俄国境内”，威胁远东和平，两国政府应就两国陆海军共同防敌之战略范围进行协商。本野立即复函表示同意。双方换文后，“共同防敌”的具体条款，即交由两国军事委员进行协商。中国方面派出皖系军阀、果威将军靳云鹏、海军中将沈寿堃；日本方面由日驻华公使馆武官斋藤季次郎、日本海军少将吉田增次郎分别担任陆军和海军的协商委员长，并各派协商委员若干人。5月16日，靳云鹏与斋藤季次郎在北京签订《中日陆军共同防敌协定》12条；19日沈寿堃与吉田增次郎在北京签订《中日海军共同防敌军事协定》九条；9月16日陆军部次长徐树铮与斋藤季次郎又议定《关于中日陆军共同防敌军事协定实施上必要之详细协定》七条。这些协定的主要内容为：中、日两国采取“共同防敌”行动；日本军队在战争期间可以进驻中国境内；在军事行动区域的中国当局对日军“须尽力协助，使不生军事上之窒碍”，中日双方应相互提供武器和军需品；在军事行动区域之内，设置谍报机关，相互交换军事地图及情报；若必要往中国境外派遣军队时，“两国应协同派遣”；中国军队参与日本在西伯利亚的军事行动，“应入日本军司令指挥之下”；中国军队及军需品经南满铁路运输者，交由日方负责，而日军须经中东铁路运输者，“中日应设协同机关”负责等等。这些协定表面上都载有中日双方“彼此推诚亲善，同心协力”、“互相尊重其平等”，相互提供方便等词句，但实际上，因所谓“共同军事行动”，不过是适应日本向中国东北及苏俄西伯利亚扩张的单方面军事行动，中国并无主动出击之所谓军事行动，所以一切所谓“共同”、“相互”字样，其实只是中国单方面为日本提供战争所需要的一切人力、物力、财力；而且日军可以借口共同防敌，任意进入中国领土、领海，占用中国各项军事设施，而中国当局则必须与日军合作，提供一切方便条件。这就为日本帝国主义出兵侵占我国东三省北

部并攫取中东铁路权益提供了依据。根据中日军事协定，日本立即派兵侵占我国东北。1918年8月16日，日本单方面宣布出兵北满，很快侵入哈尔滨、满洲里、齐齐哈尔等地。又据吉林将军孟恩远(1856—?)11月11日报告，日本在中东铁路沿线的某些地区驻扎了军队，并在哈尔滨设立兵站总监，东北铁路的交通运输和电信等由日本野战交通部主管。此外，蒙古、新疆也有日本军人侵入。如当年10月18日新疆督军杨增新(1867—1928)向北京政府报告：日军已派出九名"调查员"来到新疆，分赴塔城、伊犁、喀什等地进行调查，并准备在肃州(酒泉)、迪化(乌鲁木齐)驻兵。总之，中日军事协定的签订，为日本侵略中国大开方便之门，日本军国主义的铁蹄可以任意践踏中国的领土主权。按照其实际后果来看，它比"二十一条"尤为凶恶，所以它的签订激起全国人民的激烈反对。早在中日军事协定秘密交涉过程中，《京津泰晤士报》和北京《晨钟报》等报纸，已陆续透露了中日共同防敌换文的内容及秘密谈判中日军事协定的消息。4月下旬，上海37个商民团体联合致电北京政府，反对中日军事密约。广东护法军政府伍廷芳、陆荣廷等人联合致电冯国璋，质问是否有中日密约之事，声明若有，"应请严行拒绝"。5月上旬，消息传到日本，各省留日学生纷纷召开大会，坚决反对中日密约，并有1200余人回国，在北京、上海、天津等地从事宣传鼓动，呼吁全国人民反对中日密约。5月19日，北京《大中华日报》刊载了中日军事协定的全文，次日北京大学全体学生集会，声讨北京政府亲日卖国的罪行。紧接着，北京大学、北京高等师范学校、工业专门学校、法政专门学校等校学生2000余人，齐集总统府请愿，要求废除军事密约，天津、上海、福州等地学生也分别向各地当局请愿，要求废除军事协定。但是，段祺瑞为了得到日本的贷款和武器，不顾全国舆论的反对，反而加速了与日本秘密谈判的进程，迅速签订了中日军事协定，而且为了迅速生效，双方议定，仅以换文形式代替批准手续。5月29日在北京互相完成交换手续后，协定立即生效。按照中日共同防敌军事协定规定，该协定"俟中、日两国对于德、奥敌国战争状态终了时，即失其效力"，可是1918年11月11日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时，日本帝国主义和北京政府(此时段祺瑞任参战督办)都有意延长协定的有效期限，故1919年2月5日由徐树铮和日本陆军代表又签订了延长军事协定的协约，将"对于德、奥战争状态终了之时"解释为战后各国缔结和平条约、并经中日两国批准、中日两国及协约各国的军队均由中国境外撤退之时，以致使中日共同防敌军事协定一直延长到1921年1月27日才宣告废止。(刘振岚)

安福国会召开

安福国会，又称新国会。由依附于北洋皖系军阀的政客集团安福系操纵的段祺瑞御用国会。

1917年7月张勋复辟失败后，皖系军阀头目段祺瑞复国务总理任重掌北京政府实权。段为了推行武力统一政策，拒绝恢复《临时约法》和旧国会，采纳研究系头目梁启超的建议，于11月10日组织临时参议院，作为代行立法机关，以修改《国会组织法》和参、众两院议员选举法，然后根据这些新法召集新国会。这样，既可达到废除《临时约法》、取消旧国会的目的；又可利用新国会作为"民主"、"共和"的装饰品，欺骗舆论，使皖系军阀的一切非法行为披上合法外衣。临时参议院成立后，积极着手修改《国会组织法》和参、众两院议员选举法，1918年2月17日修正的《国会组织法》和两院议员选举法由北京政府正式公布，并立即着手筹办新的国会选举。

护法战争期间，直、皖矛盾日趋尖锐，冯国璋和段祺瑞形同水火。皖系为战胜南方，推倒冯国璋，依靠日本大量贷款和军火援助，组织了一支"参战军"，军事实力大为加强；同时又从政治上下手，力图通过新的国会选举，将冯国璋赶下台，选举段祺瑞或能为皖系所用的人当总统，以全面把持中央政府军政大权。为此，皖系军阀和依附皖系的官僚、政客在临时参议院召开前后，奔走联络，聚集力量，意在组成一个足以操纵新的国会选举的政治派别，于是，安福俱乐部应运而生。早在1917年8月，依附于皖系的政客王揖唐、曾毓隽等人就经常在北京宣武门内的安福胡同梁式堂的住宅(简称梁宅)聚会，开始时纯然为俱乐部性质，下棋打牌，请宴召妓，无所不致，间或也交换政见。临时参议院成立，特别是《修正国会组织法》公布后，皖系官僚、政客愈聚愈多，谈论热点转向政治问题，尤以国会选举问题为谈论的中心。1918年3月6日，北京政府发布命令，定于5月20日和6月10日举行众议院议员的初选和复选；6月20日举行参议院议员选举。3月7日晚，王揖唐、曾毓隽以及王印川、郑万瞻、刘恩格等人在梁宅开会，决定成立组织，不以政党相标榜，而谓之俱乐部，即以所在胡同定名。8日，安福俱乐部正式成立，对外标榜"安国福民"之宗旨。不久又在太平湖清醇亲王府旧邸设立分部，故有时也称太平湖俱乐部。安福俱乐部

也称安福系，有完整的组织系统，下设干事部、评议会、政务研究会。干事部由王揖唐任主任，曾毓隽、王郅隆任常任干事。评议会会长为田应璜，副会长为吴文瀚、王印川。政务研究会会长为李盛铎，副会长为秦望澜、克希克图。这是一个为皖系军阀谋取派系和个人私利的军阀、官僚、政客的集合体，其前台首领为王揖唐，幕后总首领则为段祺瑞的亲信徐树铮。徐曾向他的一个心腹透露过他组织安福俱乐部的目的：控制总统和总理，掌握国中大权，使天下督军惟我马首是瞻，从我者留，叛我者黜。

安福俱乐部成立后，在段祺瑞、徐树铮指挥下，又取得旧交通系首领梁士诒300万元巨款的援助，派员分赴各省，以政治胁迫、金钱贿买、伪造选票等非法方式，包办了各地的选举。徐树铮亲自拟定参、众两院议员候选人名单，发出密电，号令各省按照名单进行选举。有的地区以每张400元、800元、1200元，甚至高达5000元的高价收买选票；有的地区以浮报选民数量来伪造选票，保证已派人物当选；有的地区让小学生停课一天，充当"选民"，排队循环投票，每个小学生竟投票数次；有的地区甚至将不肯按指定名单投票的选民逮捕入狱。7月底选举结果揭晓，除两广、云、贵、川护法五省不承认新国会、未参加选举外，参加选举的共14省，选出参议员147名，众议员325名，两院合得472名，其中安福系384名，占总数的80%强，成为国会的唯一支配者。研究系因与冯国璋联系密切，支持冯当选大总统，故与皖系日趋不睦，仅得20余议席，遭到惨败。8月12日，新国会在象坊桥众议院开会。开会期间，安福系议员每人发给津贴费300元。安福首领王揖唐、依附奉系军阀的奉籍议员刘恩格分别当选为众议院正、副议长，旧交通系首领梁士诒、朱启钤分别当选为参议院正、副议长。这一届国会，一般被称为新国会，而将1912年召开的第一届国会称为旧国会。又由于新国会是由安福系一手操办的，并占据绝对多数的议席，因此又被称为安福国会。安福国会是皖系军阀权力与金钱操纵下的御用机关，是段祺瑞假共和之名实行独裁的装饰品，不但与本来意义上的议会民主完全背道而驰，而且是对民主共和原则的践踏。

安福国会召开后，首先需要解决的问题是选举大总统。皖系组织安福俱乐部操办国会选举最主要的政治目的就是把冯国璋赶下台。按照1913年10月《大总统选举法》的规定，大总统的任期为五年。袁世凯1913年10月10日就任大总统，死后，黎元洪继任，1917年7月黎去职，由冯国璋代理。因此，冯之任职到1918年10月9日即满法定期限，10月10日应为本届大总统任职之日。所以安福系大造舆论，必须尽速改选总统。冯国璋自知为皖系所不容，所以一再表示不愿再当选总统。皖系本想推段祺瑞为大总统，但此时段由于受到各方面的压力，不便直接登台：首先是皖段的卖国独裁政策激起各方反对，段祺瑞已被全国人民看作祸国殃民的罪魁祸首。其次是直、皖两系矛盾日益尖锐，在前方的直系将领屡屡发出罢兵议和的通电，反对皖系的武力统一政策。如果安福系公然去冯选段，势必加深直、皖分裂，导致整个北洋系解体。同时，段祺瑞对西南护法各省用兵失利，武力统一政策破产，也使段处于不利地位。于是段知难而退，表示不但自己不任总统，而且为了避免北洋派分裂，可以陪冯国璋一起下台，放弃内阁总理的职位。在这种情势下，段祺瑞和皖系军阀、安福系政客共同议定，选举北洋派元老徐世昌为大总统。徐世昌(1855—1939)，字卜五，号菊人。前清进士，曾任翰林院编修。光绪二十一年(1895)随袁世凯在天津小站编练新建陆军，成为袁的主要策士。后历任清朝军机大臣、巡警部尚书、东三省总督、邮传部尚书、皇族内阁协理大臣，并授体仁阁大学士。1914年袁世凯废弃国务院、改设政事堂，他为第一任国务卿。袁氏称帝时，封他为"嵩山四友"之一，可不对袁称臣。此人资历甚深，有丰富的官场政治经验，为人圆滑，处世八面玲珑，长于权术，善观风色。在直、皖对立和南北斗争中，他两面讨好，以"调和者"自居；对皖系不即不离，对直系暗表亲近，为直皖两系均能接受之人，且与旧交通系及研究系有较深的政治渊源。段祺瑞更以徐世昌为文人，不掌兵权，易于操纵，故决定推出徐做大总统。冯国璋为缓冲直皖矛盾，也表示赞成。9月4日，参、众两院议员举行总统选举会，共出席议员436人，徐世昌以425票当选为中华民国第二任大总统。10月10日，徐在怀仁堂宣誓就职。同日，徐发布命令，免去段祺瑞国务总理职务，而以钱能训(1869—1924)代理。冯、段同时下野。冯返回河间老家休养，政治上完全失势。而段仍任参战督办，手中掌握着一支装备精良的参战军(后改为国防军、边防军)；同时又控制着安福国会；内阁中也由皖系党羽占据重要职位，所以皖系仍能控制北京政局。

安福国会的召开和徐世昌当选大总统，遭到西南护法各省及直系军阀吴佩孚的反对。西南护法各省依据《临时约法》，认为这次两院议员的选举是非法的；兼之其选举过程全被皖系权势和金钱所操纵，西南五省根本未参加选举，所以不承认安福国会。他

们并不反对徐世昌个人，但也不承认他的总统地位，仍承认冯国璋是代理总统。吴佩孚由于反对皖系的武力统一政策，也与西南持一致立场，并致电徐世昌，力劝其不可就任大总统，又通电各省，主张另选总统。所以直皖矛盾并未因冯国璋、段祺瑞同时下台而消弭，反而愈演愈烈，以致1920年7月，终于爆发了直皖战争，结果直胜皖败。7月19日，段祺瑞通电下野，北京政府为直、奉两系（以直系为主）所控制。28日，北京政府免去段祺瑞本兼各职，29日，明令惩办徐树铮、曾毓隽等安福系十大祸首。8月3日，下令解散安福俱乐部，7日，通缉王揖唐及安福系其他重要分子。至此，安福系随着皖系军事上的失败而做鸟兽散。安福国会也在8月30日宣布闭会，只是由于徐世昌及署理国务总理靳云鹏与直系头目曹锟、吴佩孚搞了一笔政治交易，才未加诸"解散"名义。

（刘振岚）

府院之争

1916—1917年间继任总统黎元洪与国务总理段祺瑞争权夺利的斗争。

段祺瑞（1865—1936），原名启瑞，字芝泉。安徽合肥人。故后来人们把以他为首的一派北洋军阀集团称为"皖系"。清末随袁世凯在天津小站编练新建陆军，受袁赏识，和冯国璋、王士珍并称"北洋三杰"。北洋政府成立后，长期担任陆军总长，为袁世凯独裁统治效力。袁氏准备称帝之际，开始削弱他的兵权，段对此深表不满，公开抵制袁氏帝制活动。1916年6月袁死后，为避免北洋军阀分裂，拥黎元洪继任总统，段任国务总理。他以北洋正统派首领自居，凭借皖系军阀的力量，拉拢以梁启超等人为代表的研究系，依靠日本帝国主义支持，掌握北京政府的实权，把黎元洪视作傀儡；黎则以美国为靠山，拉拢国民党议员组成的商榷系，引国会为后援，与段祺瑞明争暗斗，酿成了"府院之争"。"府"即总统府，指黎元洪一派；"院"即国务院，指段祺瑞一派。这场斗争既反映了日本与美国两个帝国主义争夺中国的矛盾；也反映了研究系与国民党人的矛盾、国民党与皖系军阀的矛盾以及黎元洪和段祺瑞个人之间争权夺利的矛盾。斗争的焦点主要表现在制定宪法、府院权限和对德绝交与宣战三个问题上。

制宪问题上的斗争，主要是在国会中进步党研究系和国民党商榷系之间展开。1916年7月南方军务院撤销后，国民党和进步党双方都积极组织力量，力图由自己控制即将恢复的国会。8月底、9月初，国民党划分成以中华革命党议员为骨干的"丙辰俱乐部"、国民党稳健派为主体的"客庐系"和激进派进步党人组成的"韬园系"。9月，这三派议员组成"宪法商榷会"（简称商榷系），是为国会中的第一大党。不久客庐系又分化成政学会和益友社，丙辰俱乐部与韬园系合组为"民友社"。进步党早于8月即分别结成"宪法研究会"和"宪法研究同志会"，9月合并成"宪法研究会"（简称"研究系"），在国会中是仅次于"商榷会"的第二大党。在当时国内政治斗争中，国民党人（商榷系）和南方地方势力支持黎元洪；进步党（研究系）和亲段的北洋督军支持段祺瑞，所以商榷系与研究系在制宪问题上的矛盾斗争直接反映着黎、段之间的矛盾，在府院之争中占有重要地位。从9月下旬国会开始审议宪法草案，双方争议最大、辩论最激烈的是省制（地方制度）列入宪法问题。研究系为加强段的势力，主张加强中央集权，由中央任命各省省长，反对把省制列入宪法；商榷系则主张将省制定入宪法，省长民选，给地方一定的自治地位，目的在于反对北洋军阀集权，维持南方实力派的半独立地位，以使国民党得到生存和发展，反映资产阶级和南方各省实力派的利益。在国会体制问题上双方也存在严重分歧。国民党主张扩大国会权限，以抵制段祺瑞的独裁；研究系则主张缩小国会权力，改两院制为一院制，以迎合段祺瑞专制的需要。双方激烈辩论，互不相让。12月8日，众议院投票表决省制入宪问题时，竟至发生两派议员互相辱骂，以墨盒、椅子为武器大打出手的武斗闹剧。

府院权限之争是府院之争的又一重要内容，黎、段个人关系的恶化，首先表现在这个问题上。袁世凯死后，段祺瑞起用亲信徐树铮做国务院秘书长。当时府院权限不明确，徐树铮又刚愎自用，飞扬跋扈，只知有总理，不知有总统，把黎元洪当作盖印工具，常把拟好的国务院命令，不加任何说明，照直呈请黎加盖总统印发布。黎稍加询问，徐即不耐烦，有时甚至言语顶撞，令黎元洪十分不快，也引起府方人员极大不满。8月下旬，府方秘书长丁世峄起草了一份《府院办事手续意见书》，提出总统可出席国务会议；总统对任免官吏不同意，得拒绝盖印等七项内容。段祺瑞坚决反对，称病不出，后经人劝解，方销假视事。最后府院双方对府院权限议定了几项折衷办法：总统不出席国务会议，但会议议事日程须先期呈阅；会议记录随时呈阅；总统对国务会议所议事件认为不合者，得交回复议一次。此后，黎、段矛盾一度有所缓和。但段独揽政权的局面并无改变，所以府院矛盾仍

在继续发展。8、9月间，站在黎元洪一方的内务总长孙洪伊(1870—?)因职务权限被侵，与徐树铮发生激烈冲突。10月18日，院方在段祺瑞单衔副署的情况下拟就免去孙洪伊职务的命令，黎元洪拒绝盖印，段遂以辞职相威胁，黎只好让步，提出令孙自己辞职；而孙坚拒辞职。国会中民友社议员也支持孙与段抗衡，并就免孙问题向内阁提出质问案；又向国会提出查办徐树铮"七大罪状"案。黎元洪只好请正在河南卫辉原籍休养的徐世昌进京调解。徐提出兼顾府、院双方威信的三点办法：一、保持段内阁；二、孙洪伊免职；三、府秘书长丁世峄与院秘书长徐树铮同时去职。段勉强接受，20日孙被解职。两天以后，徐树铮辞职。丁世峄本也提出辞职，但黎元洪以为，孙已被免职，院方以徐树铮辞职作交换条件，尚属合理，若再令丁世峄辞职，则未免不公，故此不准丁辞职。段祺瑞不能容忍，立即挑唆北洋系督军通电攻击丁世峄，令丁不安其位。2月25日，黎被迫批准丁辞职。至此，此次府院政潮以段祺瑞的胜利而告终。

黎元洪与段祺瑞之间的政争在1917年对德外交问题上达到白热化的程度。1917年春，第一次世界大战正在欧洲激烈进行，其间，日本借西方列强大战之际，加紧侵略中国；在西方列强中，只有尚未参战的美国有余力与日本在侵华中展开竞争。2月初美国宣布对德绝交后，企图拉中国步美国后尘。美驻华公使芮恩施连日拜谒黎元洪、段祺瑞，要求中国与美国采取一致行动。黎对美国素具好感，希望在外交上得到美国支持，以与以日本为靠山的段祺瑞抗衡，所以欣然接受芮恩施的要求。2月9日，北京政府就德国潜艇封锁公海一事向德国提出抗议。日本原来反对中国参战，但当获悉美国插手中国对德外交、企图左右中国政局的动向之后，立即转而积极支持中国参战，同美国争夺对中国参战的控制权。段祺瑞也企图借宣战之机，勾结日本，借款练军，扩充皖系实力，所以甘心听从日本摆布，特向日本保证今后对德问题均"与日本取同一之态度"。美国见掌握北京政府实权的段内阁完全按日本意旨行事，显与美国当初拉中国参战的意图相违背，于是又转而反对中国参战，并通知中国政府，在对德问题上不必与美国取一致态度。美国态度的转变又影响了黎元洪集团，黎一变而为对德绝交和宣战的反对者，段祺瑞则成为这一政策的积极推进者。黎、段在对德问题上的冲突，正是美、日两国不同政策的反映。3月3日，段祺瑞主持的国务会议通过对德绝交案，并拟就致驻日公使章宗祥(1879—1962)的电稿，令章通告日本政府，中国即与德国绝交。4日，段率阁员至总统府，要黎在对德绝交咨文上盖印。黎认为事关重大，以还需慎重为辞，拒绝盖印。段愤怒离去，当晚即宣布辞职，离京赴津。黎本想乘段离京之机改组内阁，以徐世昌或王士珍出面组阁，但徐、王均坚拒不就。此时恰值副总统冯国璋来京磋商外交问题，黎即请冯出面调停。冯答应调停，但需黎接受不反对内阁确定的外交方针；对国务院拟发之命令不拒盖印；对内阁致各省及驻各国使节之训电不提异议(黎元洪曾反对发出3月3日国务会议拟就的致驻日公使章宗祥的电稿)等三项条件。黎无异言。7日冯亲赴天津迎段返京。8日，段即将经黎盖印之对德绝交咨文提交国会。10日、11日两天，参、众两院分别通过对政府外交政策信任案。14日，北京政府正式宣布对德绝交。

对德绝交实现后，参战问题又成为府、院和国会两派斗争的焦点。当时段祺瑞推行参战政策遭到强大的社会舆论的反对。对德绝交前，孙中山曾电参、众两院，坚决反对参战。其他社会名流，如康有为、唐绍仪、谭人凤、马君武等均通电反对，唯梁启超帮助段祺瑞狂热鼓吹对德宣战。各地工商界因害怕战争影响商业利益，纷纷致电北京政府，反对与德绝交和宣战。甚至各省军阀，包括皖系北洋军阀，也都因害怕调动他们的军队去欧洲而反对参战。在社会舆论的影响下，国会的态度也有变化。民友社本来就反对对德绝交，只因不占多数，所以国会通过了对德绝交案。商榷会大多数议员认为对德外交只能到绝交一步为止，不能再宣战。在这些反对参战的舆论中，段祺瑞最重视的是各省军阀的态度。为了统一北洋军阀的认识，段假借"军事会议"名义，召各省督军进京议论外交，以图将各省军阀由推行宣战政策的阻力，转变为助力；然后再以军阀势力恫吓国会，压迫总统，通过参战案。4月中下旬，各省督军或督军代表陆续到京。段祺瑞向他们说明，所谓"对德宣战"，实际是"宣而不战"，不必各省出兵，而且能从外国借款练兵，加强实力。很快，北洋督军们转变了态度。25日，军事会议开幕，段的外交方针在北洋督军中获得压倒多数的支持。此次会议，后来即被称为"督军团"会议。5月1日，国务会议在督军团干预下通过了对德宣战案。段随即率阁员奔赴总统府，面请黎元洪核准。同日，日本公使林权助(1860—1939)也登门"拜访"黎元洪，声称如国会否决参战案，政局将发生纷扰。3日，安徽省长倪嗣冲率督军团至总统府，要挟黎元洪核准参战案。在段祺瑞、督军团和日本公使的压力下，黎元洪于5月6日在参战案咨文上盖印，提

交国会讨论。在国会，反对参战的力量占据优势。10日，国会全院委员会审查对德宣战案。皖系军阀效法当年袁世凯选举正式大总统之故伎，出钱收买地痞流氓，组织所谓“公民团”数千人包围国会会场，沿街散发传单，要挟国会即日通过参战案，否则不许议员离开会场一步。有些国民党议员拒绝接受传单，竟遭到殴打。议员们极为愤慨，当即议决全院委员会改为全体议员大会，请国务总理段祺瑞、内务总长范源濂（1876—1927）、警察总监吴炳湘到会保护议员安全。后因“公民团”向会场抛掷砖头，误伤日本记者，吴炳湘才派马队将“公民团”驱散。“公民团”事件发生后，引起全国舆论大哗，孙中山、唐绍仪等及各界人士纷纷通电谴责，要求严惩肇事者，国民党阁员伍廷芳、谷钟秀、张耀曾（1845—1938）、程璧光（1861—1918）辞职。这届内阁包括国务总理段祺瑞在内，共9人，早有因其他原因去职者，也有长期请病假者，内阁中仅剩下段祺瑞一人。在国会，商榷系议员一致采取抵制段内阁的立场。19日，众议院议决：“对德宣战案暂行缓议，俟内阁全体改组后再行讨论。”实际上已构成对内阁的不信任。段祺瑞不甘心失败，决心胁迫黎元洪解散国会。督军团也连开会议商讨对策，并几次入总统府要求黎元洪解散国会。黎元洪看到段祺瑞在内阁中已成光杆司令，又受到社会舆论一致谴责，遂在美国“允为后盾”的情况下决定改组内阁。23日，黎元洪发布了三道命令：一、免去段祺瑞国务总理和陆军总长职务，特任外交总长伍廷芳暂代国务总理；二、委派陆军部次长张士钰暂代陆军总长；三、委派王士珍为京、津一带临时警备总司令，江朝宗、陈光远（1872—?）为副司令；同时通电各省说明“迫不得已”罢免段祺瑞的理由。段接到免职令后即乘火车赴津，临行前发表致各省电，声称免职令未经他本人副署，将来“地方及国家因此发生何影响，概不能负责”。嗣后，段即赴津策动督军团解散国会，驱逐黎元洪，以致引发张勋复辟丑剧。　（刘振岚）

五四爱国运动

1919年5月4日爆发的中国人民反对帝国主义和反对封建主义的爱国运动。

1911年发生的资产阶级领导的辛亥革命，推翻了帝国主义势力所支持的清王朝，结束了延续两千多年的封建帝制，建立了中华民国。但在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联合的压力下，政权很快落到代表大地主和买办资产阶级的北洋军阀手中。中国仍然处于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反对帝国主义和反对封建主义仍然是中国人民的根本任务。在中国，农民和资产阶级都不能领导民族民主革命取得胜利，领导中国革命的重任落到了新兴的无产阶级身上。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中国民族资本主义有了比较迅速的发展，无产阶级队伍逐步壮大。到1919年，近代产业工人已有200万人左右，工人罢工次数逐年增加，斗争规模随之发展。中国无产阶级身受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资产阶级的三重压迫，具有最坚决的革命性，必然要成为中国革命的领导阶级。1915年开始的以“民主”与“科学”为旗帜的新文化运动，为传播适合中国社会需要的新思潮开辟了道路。1917年俄国十月社会主义革命的胜利，使中国人民看到了国家的前途和希望。以陈独秀、李大钊为代表的先进知识分子热情歌颂十月革命，积极宣传马克思主义，进一步促进了人民的觉醒。1919年1月18日，第一次世界大战中获得胜利的协约国在法国巴黎召开和平会议，讨论处理战后的世界问题。中国作为参加对德宣战的战胜国之一，派出由北京政府外交总长陆征祥、中国驻美公使顾维钧、中国驻英公使施肇基、中国驻比利时公使魏宸组、南方军政府代表王正廷组成的代表团出席会议。中国代表向和会提出7项希望条件：废弃势力范围；撤退外国军队、巡警；裁退外国邮局及有线、无线电报机关；撤销领事裁判权；归还租借地；归还租界；关税自由权。后在中国留欧学生的强烈要求下，又向和会提出取消日本强加的“二十一条”不平等条约的要求。英、美、法等帝国主义以“不在和平会议权限以内”为借口，拒绝讨论中国的这些要求。1月27日，在讨论德属殖民地问题时，中国代表要求将战前德国在胶州湾的租借地、胶济铁路及其在山东的其他权利，直接归还中国。4月12日，巴黎和会讨论山东问题，日本以中国曾于1917年9月有“欣然同意”日本在山东享有特权的换文为理由，坚持继承德国在山东的权利。4月29日，和会在英、美、法等帝国主义国家的操纵下，决定将德国在山东的一切权益转交给日本。北京政府屈服于帝国主义的压力，准备接受这个决定，在和约上签字。中国在巴黎和会上的外交失败，成了五四运动爆发的导火线。5月2日，消息传到北京，在中国人民中，首先是在知识界中激起强烈的愤慨。各校学生代表于当天下午在马神庙（景山东街）北京大学西斋饭厅紧急开会，决定5月3日（星期六）晚7时，在北河沿北大法科礼堂召开学生大会。5月3日，北大学生和北京高等师范学校、法政专门学校、中国大学、高等工业学校、汇文大学等10多所学校的代表举行集会。大会开

始，先由北大新闻研究会讲师、新闻记者邵飘萍报告巴黎和会讨论山东问题的经过和目前形势，继由北大学生张国焘、许德珩等及其他学校学生代表发表演说。北大法科学生谢绍敏当场咬破中指，裂断衣襟，血书“还我青岛”4字，揭之于众，会场情绪达到了沸点。大会议决4项：一、联合各界一致力争；二、通电巴黎专使，坚持不在和约上签字；三、通电全国各省市于5月7日国耻纪念日举行群众游行示威运动；四、定于5月4日（星期日）齐集天安门举行学界大示威。5月4日午后1时许，北京大学、北京高师、汇文大学等13所大专学校学生3000多人，按照预定计划到天安门前集会。学生们手持小旗，上面写有“取消二十一条”、“还我青岛”、“头可断，青岛不可失”、“收回山东权利”、“保我主权”、“拒绝在巴黎和会上签字”、“抵制日货”等口号，要求惩办亲日派卖国贼曹汝霖（北京政府交通总长，签订“二十一条”时为外交次长）、陆宗舆（币制局总裁，签订“二十一条”时为中国驻日公使）、章宗祥（中国驻日公使，山东问题换文的签字者）。他们在宣言中写道：“中国的土地可以征服而不可以断送！中国的人民可以杀戮而不可以低头！国亡了！同胞们起来呀！”会后，学生们举行游行示威。队伍从天安门广场出发，向东交民巷使馆区进发，至东交民巷西口时，被巡捕拦阻，后北转经富贵街（南公安街）、东长安街、东单、石大人胡同（外交部街）、大羊宜宾胡同，至赵家楼胡同曹汝霖住宅。愤怒的学生见曹宅大门紧闭，门前由三四十名警察守卫，无法入内。北京高师学生匡互生从临街窗口跳入曹宅，打开大门，群众一拥而入。学生们痛打了正在这里的章宗祥，因未寻见曹汝霖，便放火烧曹宅。下午5时许，北京政府步军统领李长泰、京师警察厅总监吴炳湘率大批军警赶到赵家楼。这时绝大多数学生已离去，军警将未来得及走脱的学生32人捕去。当晚，各校学生开会讨论营救被捕同学和继续坚持斗争问题。从5月5日起，北京各大专学校学生举行总罢课，并呼吁社会各界与学生一致联合，齐心协力地去“外争国权，内除国贼”。5月6日，北京中等以上学校学生联合会宣告成立。北京学生的爱国行动得到各地学生的声援和社会舆论的支持。5月7日，北京政府迫于全国压力，释放了被捕学生，但对学生的政治要求却置之不理，并逼走同情学生爱国行动的北京大学校长蔡元培。5月14日，北京政府大总统徐世昌发表挽留曹汝霖、陆宗舆等卖国贼的命令，并连续下令镇压学生运动，要求军警“遇到纠众滋事不服弹压者，仍遵照前令，依法逮惩”；各级行政机关切实约束学生，对那些“不率训诫，纠众滋事者，查明斥退”。这些反动措施进一步激怒了爱国学生。5月19日，北京学生再次举行总罢课，参加者除大专院校学生外，还有许多中学生，共达2.5万多人。罢课后，学生组织“十人团”（每个讲演团10人左右），开展讲演活动，在城区及昌平、南口、长辛店等地进行宣传。出版《五七》日刊等刊物，扩大爱国宣传。同时，开展抵制日货、提倡国货运动。还组织护鲁义勇军，进行军事训练。学生爱国运动的发展，使帝国主义十分恐慌。日、英、美、法等国驻华公使联合向北京政府施加压力。日本公使小幡于5月21日晚向北京政府外交部发出紧急照会，诬蔑中国人民“争回青岛，抵制日货”的呼声是“谗诬友邦”，并威吓说：对此如“不加以何等之取缔”，“怕有惹起两国国际重大之事态”。北京政府秉承帝国主义者的旨意，对学生进行大规模的镇压。从5月25日开始，荷枪实弹的步兵、马队，在北京各街道来往穿梭，夺走学生讲演团的旗帜，撕毁传单，驱散听众。在反动当局的严厉镇压下，学生斗争一度转入低潮。6月1日，徐世昌下令表彰被民众斥为卖国贼的曹汝霖、陆宗舆、章宗祥，同时下令取缔学生的一切爱国活动，要求学生立即复课。京畿警备司令段芝贵和步军统领王怀庆按照命令竟然逮捕贩售国货的学生。从6月3日起，北京20余所学校数百名学生重新走上街头讲演，讲演者“垂泪而道”，听众则“掩面而泣”。北京政府出动军警镇压。当晚，学生遭逮捕者达178人。由于捕人过多，警察厅容纳不下，便把北大法科校舍临时改为拘留所。6月4日，学生比前一天加倍出动上街讲演，又有700多人被捕。学生并未屈服。第二天，上街讲演的学生达5000多人，受到军警马队的冲击。北京政府对学生的大逮捕，激起全国人民更大的愤怒。从北京开始的爱国运动，很快扩展到全国。5月9日，上海学生停课一天。上海各界开始抵制日货。5月11日，上海学生联合会成立。天津学生于5月7日举行游行示威，支援北京学生斗争。5月14日，天津学生联合会成立，并设立国货维持股，制定抵制日货的办法。5月23日起举行1万多人的总罢课。周恩来领导了天津的爱国运动。6月，他从日本回到天津，立即参加学联工作，并主办《天津学生联合会报》。该报对鼓舞天津学生和各界群众坚持爱国运动起了重要作用。济南学生和各界群众3万多人冲破武装军警的阻挠，于5月7日召开了国耻纪念大会，要求收回青岛。同日，毛泽东等领导长沙学生举行集会和示威游行。5月28日，他领导成立了湖南学生联合会。6

月3日，长沙各校学生总罢课，掀起抵制日货运动。武汉、广州、南京、杭州等地的学生和各界群众也举行罢课和示威游行。这就形成了一个全国范围的爱国运动。

6月3日以后，爱国运动进入新的阶段。运动的中心由北京移至上海，工人阶级开始以独立的姿态登上政治舞台，成为运动的主力。6月5日，日本内外棉第三、第四、第五厂工人首先罢工。接着，日华纱厂、上海纱厂、商务印书馆、中华书局工人以及码头工人和沪宁、杭甬铁路的部分工人相继罢工。各商号陆续罢市。从5月26日开始，2万多名学生坚持罢课。上海实现了"三罢"。6月5日，上海各界代表举行联席会议，成立上海商学工报各界联合会。从6月6日起，工人罢工不断扩大。上海华商电车公司、法商电车公司、求新机器厂、锐利机器厂、英商祥生铁厂工人罢工。6月7日，沪宁、杭甬铁路总机厂、英商别发印书房、兴发荣机器造船厂、信通织布厂等工人罢工。6月8日，日商内外棉各厂、同济学校工厂、华界自来水厂等处工人罢工。6月9日，英商耶松公司老船坞、瑞镕机器造船厂、江南船坞、各轮船公司、日商纱厂码头、叉袋角日本纱厂、上海电器公司、英美烟草公司及附属印刷厂、浦东美孚和亚细亚两火油栈的工人，以及全市司机、清洁工人举行罢工。6月10日，沪宁、沪杭铁路工人及各马车行工人相继罢工。上海市内市外、海上陆上交通断绝。罢工达到最高潮，一周内，上海有50多个工厂企业、六七万工人参加罢工。工人突破了行会、帮口的组织和观念，为着统一的斗争目标而进行同盟罢工，显示了鲜明的政治目的。工人们表示，罢工是"为国家之土地，再为学生被拘速救释放"，"对于卖国贼表示我们的愤怒"，目的是要唤醒国民，"格政府之心，救灭亡之祸"。上海工人还多次高举"罢工救国"旗帜，开展各种爱国活动，发文告，散传单，举行集会游行。上海"三罢"斗争实现后，很快波及全国。京奉、京汉铁路以及九江等地工人，举行了罢工和示威游行。南京、济南、长沙、汉口、杭州、芜湖、无锡、天津等地工人，进行了各种形式的斗争。南京、宁波、厦门、镇江、芜湖、无锡、苏州、杭州、天津、济南、唐山、安庆、九江等许多城市的商人相继罢市。据统计，全国有22个省的150多个城市，举行了罢工、罢课、罢市斗争。五四运动突破了知识分子的狭小范围，发展成为有工人阶级、城市小资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参加的全国范围的群众性的爱国运动。爱国运动的迅速发展，沉重打击了帝国主义和封建军阀的统治，充分显示了人民群众的威力。帝国主义者和北京政府极为恐惧。6月8日，淞沪护军使卢永祥会同沪海道尹沈宝昌急电北京政府，惊呼上海"三罢"斗争势如"星星之火，可以燎原，失此不图，将成大乱"。6月10日，天津总商会急电北京政府，指出："津埠之劳动者数十万众，现已发生不稳之象，倘迁延不决，演成事实，其危厄之局，痛苦有过于罢市者，市面欲收拾而不能矣。"在群众运动的压力下，北京政府于6月10日下令免去曹汝霖、陆宗舆、章宗祥的职务。同日，国务总理钱能训辞职。这是五四爱国运动的一个胜利。6月17日，北京政府按照帝国主义旨意，电令出席巴黎和会的专使在和约上签字。消息传出后，全国学生联合会立即号召各地学生投入拒签和约的斗争，并致电北京政府，表示"未经正式民意机关通过，全国人民誓不承认"。6月19日，山东各界请愿团80多人到京，要求北京政府拒绝在和约上签字。为支持山东请愿团的斗争，天津各界联合会于6月27日派10名代表赶赴北京。同日，山东、天津、北京等地代表联合向总统徐世昌请愿。上海各界人民积极配合，开展拒签和约运动。6月21日，上海学界和商界召开会议，反对在和约上签字。6月23日，上海商学工报各界发表宣言，呼吁全国人民"共谋抗拒签字，急毁中日条约二十一条及其他一切密约"。同日，上海一些群众团体直接致电出席巴黎和会的中国专使，警告说："如或违背民意，不保留青岛及山东主权而签德约者，当与曹、章、陆同论。"6月27日，全国学生联合会和上海各界群众召开万人大会，上海各界代表、各地学生和留日学生代表发表演说，一致反对在和约上签字。旅居法国的华工、留学生和华侨数百人在和约签字前一天包围了中国代表陆征祥的住地，要求拒签和约。6月28日，中国代表终于没有出席巴黎和约的签字仪式。这是五四爱国运动取得的又一个胜利。

五四运动的杰出的历史意义，在于它带着为辛亥革命还不曾有的姿态，这就是彻底地不妥协地反帝国主义和彻底地不妥协地反封建主义。它促进了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及其与中国工人运动相结合，在思想上和干部上准备了中国共产党的成立。五四运动是中国革命史上具有划时代意义的事件。它标志着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伟大开端。

（陈隆涛）

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

五四运动后，在中国出现的研究和宣传马克思

主义的思想运动。

五四爱国运动推动了新文化运动的深入发展。由于巴黎和会打破了人们对于帝国主义列强的幻想，更由于俄国十月社会主义革命的影响渐次扩大，中国思想界相当一部分人怀疑以至否定资产阶级共和国的道路，转而向往社会主义。研究和宣传社会主义学说开始成为新思潮的主流。当时，被人们当作新思潮来介绍的社会主义学说是很庞杂的，除马克思主义的科学社会主义外，还有无政府主义、新村主义、合作主义、泛劳动主义、基尔特社会主义、社会民主主义等。中国的先进分子经过反复的比较、探求，才选择了马克思主义的科学社会主义。一些具有初步共产主义思想的知识分子通过撰写文章、编辑刊物、翻译著述、组织社团等多种形式，研究和宣传马克思主义。在中国早期的马克思主义思想运动中，李大钊起着主要的作用。李大钊(1889—1927)，字守常，河北乐亭人。曾任《新青年》杂志编辑，并与陈独秀创办《每周评论》，是五四新文化运动的主要倡导者之一。1918年7月1日，他在《言治》季刊第3册上发表《法俄革命之比较观》一文，分析了1917年俄国十月社会主义革命和1789年法国资产阶级革命的本质区别，指出俄国革命是"立于社会主义上之革命"，是"二十世纪全世界人类普遍心理变动之显兆"。11月，他在《新青年》上发表《庶民的胜利》和《布尔什维主义的胜利》两文，热烈地赞扬十月革命是"二十世纪中世界革命的先声"，预言十月革命所掀动的革命潮流是不可阻挡的。"试看将来的环球，必是赤旗的世界！"1919年5月，李大钊在他主编的《新青年》"马克思主义研究专号"上发表《我的马克思主义观》一文，系统地介绍马克思主义的三个组成部分——唯物史观、政治经济学和科学社会主义的基本原理，指出"阶级竞争说恰如一条金线，把这三大原理从根本上联络起来"。之后，李大钊在《新青年》、《每周评论》、《新潮》等刊物上发表了一系列文章，介绍马克思主义，并初步地运用马克思主义观点来解释中国革命和中国思想史上的若干问题。他还帮助当时很有影响的北京《晨报》副刊增设"马克思研究"专栏，译载马克思的原著和介绍马克思主义的著作。同时，在北京大学、北京女子高等师范分别开设《唯物史观》、《社会主义与社会运动》、《社会主义的将来》等课程，利用讲坛宣传社会主义思想。陈独秀也是马克思主义的积极宣传者。陈独秀(1879—1942)，字仲甫，安徽怀宁人。1915年起主编《青年》杂志(后改名《新青年》)，1918年和李大钊创办《每周评论》，提倡新文化，是五四新文化运动的主要领导人之一。1919年12月，他在《〈新青年〉宣言》中指出，帝国主义和资本主义已经造了无穷的罪恶，"现在是应该抛弃的了"。之后，又发表《劳动者的觉悟》、《谈政治》等文章，批驳伯恩施坦主义和无政府主义的观点，阐述马克思主义关于剩余价值理论、阶级斗争和无产阶级专政学说。毛泽东也是在五四爱国运动的推动下，由激进民主主义者逐渐向马克思主义者转变的。毛泽东(1893—1976)，字润之，湖南湘潭人。1918年与蔡和森等在长沙组织新民学会。1919年创办《湘江评论》。他在《湘江评论》第2至第4期上发表《民众的大联合》一文，指出改造中国的根本方法就是民众的大联合，号召工人、农民、小资产阶级各阶层人民起而仿效俄国，组成一个大联合。他认为"中华民族原有伟大的能力。压迫愈深，反动愈大，蓄之既久，其发必速。……我们黄金的世界，光华灿烂的世界，就在前面！"周恩来(1898—1976)，字翔宇，祖籍浙江绍兴，出生于江苏淮安。1917年在天津南开学校毕业后，赴日本求学。1919年6月回到天津。7月，主编《天津学生联合会报》。他在为创刊号起草的社论《革心！革新》中提出改造社会、改造思想的号召。蔡和森(1895—1931)于1919年赴法国勤工俭学，在努力学习和积极宣传马克思主义方面，也表现得很出色。在1920年初到法国的几个月内，就"猛看猛译"了多种马克思主义的书籍和有关社会主义的小册子，并着手编写阐述社会主义理论的著作。正在日本留学的李达(1890—1966)翻译了《唯物史观解说》、《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说》等著作，寄回国内出版，并在上海《民国日报》副刊《觉悟》上发表《什么是社会主义？》、《社会主义的目的》等文，宣传科学社会主义。留日归来的杨匏安于1919年11月在广东《中华新报》上发表《马克思主义——一称科学社会主义》一文，对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经济学说和科学社会主义作了相当系统的介绍，还先后发表《社会主义》、《国家社会主义》、《社会改良主义》等文，介绍各派社会主义学说的要点及其创始人的生平。在早期的马克思主义思想运动中，恽代英、瞿秋白、陈望道、邓中夏、赵世炎、张太雷、向警予等，都做出了重要贡献。

在这期间，传播新思想的进步报刊大量出版，许多早期宣传新文化的报刊这时也以介绍马克思主义和俄国十月革命为主要内容。在五四运动后的一年间，全国在不同程度上具有社会主义倾向的报刊达400多种。《新青年》杂志已成为宣传马克思主义的

主要阵地。《每周评论》摘译了《共产党宣言》的一些段落，并在编者按语中强调："阶级战争"和"劳工联合"的思想。《国民》杂志译载过《共产党宣言》第一章全文。《民国日报》副刊《觉悟》、《星期评论》、《建设》、天津《觉悟》等报刊，用很多篇幅介绍马克思主义和十月革命。《湘江评论》歌颂十月革命，认为这个胜利必将"普及于世界"，"我们应该起而仿效"。这个刊物文章精辟，语言通俗，颇受读者欢迎。《新社会》宣传"马克思主义派的直接行动"和"根本的改造"的观点等。

与此同时，马克思主义团体在全国各地纷纷出现。1920年3月，李大钊和邓中夏等在北京大学秘密成立了马克思学说研究会，组织青年学生阅读马克思、恩格斯著作，提出推翻军阀、官僚政府的主张，掀起了改造社会的热潮，对提高青年的马克思主义水平和传播马克思主义起了重要作用。在上海，1920年5月，陈独秀发起组织马克思主义研究会，成员有李汉俊、李达、陈望道、俞秀松、沈雁冰等。在天津，1919年9月，周恩来、邓颖超、郭隆真等组织了觉悟社，出版《觉悟》杂志，讨论研究新思潮，抨击孔孟之道，积极领导爱国运动，反对帝国主义和封建军阀。周恩来等赴法留学后，该社活动无形停顿。后有半数以上社员入党入团，成为革命骨干。在湖南，1920年8月，毛泽东以新民学会会员为骨干，联合教育、新闻等各界人士发起创办文化书社，传播新思想新文化，销售大量马克思主义书报。在武昌，1920年初，恽代英、林育南、李求实等建立利群书社，推销进步书刊，宣传马克思主义。在山东，1920年初，王尽美、邓恩铭等成立了马克思主义学说研究会，对山东青年影响很大。在五四运动后不到一年的时间里，全国研究马克思主义的社团多达400个。

马克思主义著作的大量翻译出版，为传播和研究马克思主义创造了条件。1920年8月，全文翻译出版了《共产党宣言》(陈望道译)。在这前后，翻译出版的马克思主义原著有：《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雇佣劳动与资本》、《〈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资本论自叙》(即初版叙言)、《科学的社会主义与唯物史观》(《反杜林论》第三编中的一部分)等。还有列宁的《民族自决》(即《在俄共(布)第八次代表大会上关于党纲的报告》)、《过渡时代的经济和政治》(即《无产阶级专政时代的经济和政治》)、《建设中的苏维埃》(即《苏维埃政权当前的任务》的节译)、《鲍尔雪佛克之排斥与要求》(即《俄国的政党和无产阶级的任务》的节译)、《国家与革命》等。还翻译出版了一些介绍马克思主义的著作，如考茨基的《马氏资本论释义》、《阶级斗争》，马尔西的《马克思资本论入门》、《马克思经济学说》，刻卡朴的《社会主义史》，河上肇的《马克思唯物史观》等。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广泛传播，并逐渐成为社会公认的新思潮，为中国共产党的建立奠定了思想基础。　(陈隆涛)

留法勤工俭学运动

五四运动后兴起的知识青年赴法国一边做工、一边求学，寻求革命新思想的运动。

留法勤工俭学始于1912年，李石曾、吴稚晖等在北京组织留法俭学会，曾得到南京临时政府教育总长蔡元培的支持。1915年6月，蔡元培、李石曾、吴玉章等发起成立勤工俭学会，提倡"勤于做工，俭以求学"。1916年6月22日，正在法国的蔡元培、吴玉章等在巴黎建立留法华法教育会，蔡元培任中国会长，法国人欧乐任法国会长，李石曾和法国人辈纳任书记。它的任务主要是从事华工教育，创办华工学校，组织留法勤工俭学和中法两国学术交流。蔡元培、吴玉章等于同年底回到国内，又在北京成立了华法教育会。接着，上海、四川、广东、湖南等地成立了分会，负责宣传和组织本地区的留法勤工俭学活动。为了使知识青年在赴法前受到法语和劳动工艺方面的训练，1917年至1918年间，北京、河北保定等地创办了留法勤工俭学预备学校。1918年4月新民学会成立后不久，毛泽东、蔡和森、肖子升等在湖南发起和组织留法勤工俭学活动。8月，毛泽东带领几十名湖南青年来到北京。他们分别在北京、保定、蠡县布里村(今属高阳)的留法预备班学习。五四运动后，一批有志于改造中国的青年纷纷去法国学习，勤工俭学出现了空前的热潮。1919年10月至12月，赴法学生达300多人，其中有蔡和森、蔡畅、李富春、向警予、李维汉等。到1920年底，全国各地赴法勤工俭学的学生共有17批，1600余人，其中以四川、湖南、广东、河北、福建的青年学生最多。在这期间，到达法国学习的有周恩来、赵世炎、王若飞、李立三、陈延年、陈乔年、徐特立、陈毅、聂荣臻、邓小平、刘伯坚、李慰农、傅钟、肖三等。他们到工厂做工，亲身体验工人阶级的生活，思想感情逐渐发生根本性的变化。他们广泛地接触西方社会，看到了资本主义文明的缺陷，逐步靠拢无产阶级，倾向马克思主义。他们利用欧洲的有利条件，读到较多的马克思主义和介绍社会主义思潮的书籍。许多人在十月革命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影响下，经过反复的比较和长期的思索，

最后作出自己的抉择，信仰共产主义，成为马克思主义者。他们组织革命团体，团结教育了一批进步的留法学生和旅欧华工。1920年2月，张昆弟、李维汉、李富春等在法国蒙达尼组织工学励进会。8月，改称工学世界社，社员有30多人。大多数社员赞成信仰马克思主义和实行俄国式的社会革命。它成为留法勤工俭学学生进行斗争的主要力量之一。1921年初，赵世炎、李立三等在巴黎成立了劳动学会。3月28日，以它为核心，建立了勤工俭学学会，其宗旨是“本工学主义及互助精神，实行勤工俭学以谋社会之改造”，会员达200多人。在这期间，在法国的新民学会会员蔡和森等形成以蒙达尼为中心的有组织的活动。他们和国内毛泽东等保持着通信联系。1920年7月，新民学会在法会员在蒙达尼召开会议，决定以“改造中国与世界”为该会宗旨。蔡和森主张激烈革命，提出要仿效俄国十月革命的方法，组织共产党，实行无产阶级专政。新民学会、工学世界社和勤工俭学学会的成员，积极讨论筹建少年共产党问题。它的许多成员后来加入了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和共产党。 （陈绍畴）

“问题与主义”的论争

1919年7、8月间马克思主义者与实用主义者胡适之间进行的一场思想论争。

随着马克思主义的广泛传播，新文化运动的营垒开始发生明显的分化。胡适等一些站在资产阶级右翼立场的知识分子，充当了在思想上反对马克思主义的角色。胡适（1891—1962），字适之，安徽绩溪人。早年留学美国。1917年回国，任北京大学教授，信奉实用主义哲学。实用主义是19世纪末产生于美国的一种主观唯心主义的哲学思想。它否认世界的客观存在和真理的客观标准，认为客观世界就像一个“很服从的女孩子”和“一块大理石”，可以由人任意“涂抹装扮”和雕塑。真理是“人造的”，“造出来供人用的”，是一种“假设”，一种“工具”。实用主义在社会政治问题上，反对社会革命，主张点滴的进化和改良。1919年5月初，美国实用主义哲学家、教育家杜威（John Dewey，1859—1952）来华讲学，进一步传播实用主义的社会哲学、政治哲学和教育哲学，影响很大。7月，胡适在《每周评论》第31号上发表《多研究些问题，少谈些“主义”》一文，挑起了“问题与主义”的论争。他攻击马克思主义“是没有什么用处的”，“一切主义都是某时某地的有心人对于那时那地的社会需要的救济方法”，否认马克思主义对中国的适用性。他要求人们多多研究这个问题如何解决，那个问题如何解决，不要高谈主义。认为不去研究具体问题，却去高谈社会主义，还要得意洋洋夸口“根本解决”，这是“自欺欺人的梦话”，是“中国思想界破产的铁证”。胡适的用意是反对中国人接受马克思主义，反对中国走革命的道路。胡适的文章发表后，最初表示不同意见的是《国民公报》编辑蓝公武。他在《问题与主义》一文中指出，“主义是多数人共同行动的标准”，并逐条驳斥胡适的文章给宣传主义列举的3条“教训”。由于他侧重从思维逻辑方面进行论证，并没有击中胡适否认“根本解决”这个要害问题。8月，李大钊在《每周评论》第35号上发表《再论问题与主义》一文，批驳胡适的资产阶级改良主义观点。他指出，社会主义是时代的旗帜。宣传主义和研究问题是交相为用、并行不悖的，解决“问题”离不开“主义”。“因为一个社会问题的解决，必须靠着社会上多数人共同的运动。”要想使一个社会问题成为社会上多数人共同的问题，应该使这社会上可以共同解决这个那个社会问题的多数人，先有一个共同趋向的理想、主义。因此，研究问题必须有主义作指导。他认为，一个社会主义者，为使他的主义在世界上发生一些影响，必须要研究怎么可以把他的理想尽量应用于环绕着他的实境。而我们只要把这个那个的主义，拿来作工具，用以为实际的运动，他会因时、因所、因事的性质情形生一种适应环境的变化。李大钊强调，一点一滴的改良是不行的，中国社会问题“必须有一个根本解决，才有把一个一个的具体问题都解决了的希望”。这个“根本解决”，就是通过阶级斗争，改变经济制度。针对胡适的论调，毛泽东于12月1日在《湖南教育月刊》上发表《学生之工作》一文，指出要想使社会进步，“不可徒言‘改良其旧’，必以‘创造其新’为志”。认为社会的基础是经济制度，社会“制度改革，岂区区‘改良其旧’云云所能奏效乎？”“问题与主义”的论争，是马克思主义在中国传播过程中出现的第一次思想论战，实质上是中国需要不需要马克思主义，需要不需要社会革命的论争。这一论争在当时整个思想界产生了深刻的影响，站在不同阶级立场的各种知识分子围绕着对待“主义”问题开始了分化。这一分化过程，在许多社团和刊物中都可以明显地看出来。这场论争，对于扩大马克思主义的影响，推动人们进一步探索中国革命的正确道路起了积极的作用。 （陈隆涛）

直皖战争

1920年7月14日至18日，直系军阀曹锟、吴佩孚和皖系军阀段祺瑞在京畿地区发生的军阀战争。

直系、皖系和奉系是北洋军阀集团内的3支主要势力。在帝国主义的操纵下，各派军阀为了巩固和扩大自己的地盘，进行频繁的争夺以至战争。1917年7月，总统徐世昌任命皖系军阀首领段祺瑞为督办防边事务（边防督办），参战军改称边防军。段祺瑞以日本帝国主义为靠山，控制着北京政府的实权，并统治山东、河南、安徽、福建、浙江等省，企图夺取直系军阀的地盘，“武力统一”中国。直系军阀冯国璋以英、美帝国主义为后台，控制着直隶（河北）、湖北、江苏、江西等省，并与皖系争夺对北京政府的控制权。1919年12月冯国璋死后，曹锟（1862—1938，字仲珊，天津人）、吴佩孚成为直系军阀的首领。1920年4月9日，曹锟联合奉系军阀，结成直隶、湖北、江苏、江西、奉天（辽宁）、吉林、黑龙江、河南8省反皖同盟。5月，正在湖南南部与西南军阀作战的吴佩孚，通电指斥安福系“祸国殃民，卖国媚外，把持政柄，破坏统一”。5月下旬，吴佩孚不听北京政府的阻拦，从衡阳前线领兵北撤。5月底到武汉，得到直系湖北督军兼两湖巡阅使王占元的资助，继续北返。6月5日，抵河南郑州。6月上旬，奉军借口北京防卫空虚，将驻在独流的4个营开往廊坊。这时，段祺瑞、徐树铮也积极备战。7月4日，在直、奉两系的压力下，总统徐世昌免去徐树铮的西北筹边使和西北边防军总司令职，其所辖军队由陆军部接收办理。次日，段祺瑞以边防督办名义命令边防军紧急动员。7月9日，段祺瑞派重兵围困总统府，胁迫徐世昌褫夺曹锟、吴佩孚等人官职，并在团河成立定国军总司令部，自任总司令，令其部队开赴廊坊、长辛店、卢沟桥、高碑店一线。此时，吴佩孚将所部组成讨贼军，设大本营于保定。7月12日，吴佩孚等通电讨段。7月14日，直皖战争爆发。双方各投入兵力10万人，在直隶境内交战。直、皖两军的战区分东西两路。西路是双方的主力战场，在京汉铁路沿线涿州、高碑店（河北新城）一带；东路在京奉铁路沿线杨村（天津武清）一带。这时，奉军派兵入关，在东战场协同直军作战。开始，皖军在日军支持下曾获小胜，直军退出高碑店、杨村。7月17日，直军突袭皖系设在西路的前敌指挥部成功，俘虏皖军前敌司令曲同丰。直军占领涿州后，向长辛店、北京方向追击。7月18日，东战场皖军全线崩溃。7月19日，段宣布辞职。直奉联军进入北京，联合控制了北京政府，大权实际落入直系手中。直系势力扩大到直隶、河南、陕西、甘肃、安徽等省。奉系夺得直隶、热河、察哈尔的一部分。皖系只保有浙江、福建、上海等地。直系军阀的胜利，反映了英、美帝国主义在中国势力的加强。　（陈隆涛）

共产党早期组织建立

1920年8月到1921年春，上海、北京、武汉、长沙、济南、广州等地先后成立共产主义小组。

五四运动后，以李大钊、陈独秀等为代表的具有初步共产主义思想的知识分子，深入工人群众中，宣传马克思主义和进行组织工作，开始把马克思主义和中国工人运动结合起来。在中国建立共产党组织的条件基本成熟。1920年1月，李大钊和陈独秀在北京开始探讨成立共产党问题。不久，陈独秀迁居上海。他和李大钊分别在南方和北方进行建立共产党的准备工作。1920年4月，经共产国际批准，俄共（布）远东局派维经斯基等人来华，了解中国革命的情况，并同中国的革命组织建立联系。维经斯基Григорий Наумович Войтинский，1893—1953），在华化名吴廷康，俄国人。维经斯基一行到北京后，会见了李大钊。5月，经李介绍，维经斯基到上海，与陈独秀联系。在这期间，维经斯基同李大钊、陈独秀等讨论建党问题，并介绍了共产国际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情况与经验，对中国共产党的建党工作给予了帮助。

中国共产党的早期组织是在上海首先建立的。1920年5月，陈独秀发起组织马克思主义研究会，探讨社会主义学说和中国社会改造问题。7月，上海社会主义者举行会议，商讨建党问题。8月，上海共产主义小组正式成立。参加者有陈独秀、李汉俊、李达、陈望道、俞秀松等，陈独秀任书记。11月，上海共产主义小组拟定《中国共产党宣言》，阐明中国共产主义者关于创立共产主义新社会的理想，提出消灭私有制，实行生产资料公有，废除旧的国家机器，消灭阶级的主张。《宣言》指出，无产阶级要创立新社会，就要团结起来，开展阶级斗争，“用强力打倒资本家的国家”，铲除资本制度；就要“组织一个革命的无产阶级政党——共产党”，领导无产阶级夺取政权，建立无产阶级专政，并“用革命的办法造出许多共产主义的建设法”。《宣言》第一次比较系统地表达了中国共产主义者的理想和主张。上海共产主义小组对各地共产党早期组织起着联系和指导作用。

1920年10月，李大钊、张申府、张国焘成立了北京共产党支部。当时，无政府主义者标榜信仰共产主义，赞成社会革命，于是吸收了黄凌霜、陈德荣、袁明熊、张伯根、华林、王竟林等无政府主义者参加组织。后又发展了刘仁静、罗章龙等人。11月，无政府主义者因反对实行无产阶级专政而全部退出组织。不久，一批优秀的社会主义青年团员邓中夏、高君宇、何孟雄、缪伯英等转为党员。1921年1月，北京共产党支部举行全体会议，决定组织名称定为中国共产党北京支部，推李大钊为书记，张国焘负责组织，罗章龙负责宣传。此后，又发展了一批党员。到1921年7月，党员有李大钊、张国焘、邓中夏、罗章龙、刘仁静、高君宇、何孟雄、缪伯英、范鸿劼、李骏、张太雷、陈为人等。北京共产党支部曾派人到天津、唐山、太原、济南等地，帮助社会主义者开展工作，对北方共产党、青年团的建立起过促进作用。

武汉的共产党组织是由董必武、陈潭秋、张国恩等发起建立的。董必武(1886—1975)，原名贤琮，又名用威，号壁伍，湖北黄安(红安)人。1919年春，董必武、张国恩由鄂西到达上海，结识了刚从日本留学回国的李汉俊。他向董介绍了俄国十月革命和布尔什维克党的情况。五四运动后，董必武回到武汉，与陈潭秋等筹办了武汉中学。陈潭秋(1896—1943)，字云先，湖北黄冈人。武汉中学成为宣传马克思主义、培养革命人才的阵地。同年8月，董必武等接李汉俊来信，信中告知上海共产主义小组的情况，要董等在武汉成立共产主义组织。同年夏，陈独秀派刘伯垂到武汉帮助建立党组织。秋天，由刘伯垂召集，在武昌抚院街董必武寓所开会，成立武汉共产党支部，推选包惠僧为支部书记。包离武汉后，陈潭秋负责支部工作。

长沙的建党活动是毛泽东领导进行的。1919年12月，毛泽东再次来到北京，与李大钊、邓中夏等进一步接触，并钻研马克思主义著作。1920年5月初，他由北京到上海，与陈独秀讨论《湖南改造联盟》的计划。7月回到长沙，与何叔衡、易礼容等创办文化书社。何叔衡(1877—1935)，湖南宁乡人。他是新民学会会员中最年长者。9月9日，文化书社正式营业，成为宣传新思想、传播马克思主义的重要阵地。9月16日，毛泽东与姜济寰、易培基、方维夏、何叔衡等筹备的俄罗斯研究会成立，毛泽东为书记干事。从1920年8月至1921年1月间，毛泽东与在法国勤工俭学的肖旭东、蔡和森、李维汉以及在国内的罗章龙、邓中夏等有着频繁的通信联系，多次谈到建党问题。蔡和森给毛泽东的信中提出，中国现在就要准备组织共产党，作为“革命运动的发动者、宣传者、先锋队、作战部”。毛泽东复信表示同意，并强调建党必须以马克思主义作为理论指导，指出“唯物史观是吾党哲学的根据”。1921年1月1日至3日，在长沙的新民学会会员聚集于文化书社举行新年大会，讨论建党问题。不久，建立了湖南共产党组织。到1921年7月前后，成员有毛泽东、何叔衡、彭璜、陈子博、夏曦、肖铮、彭平之等。

1919年冬，王尽美、邓恩铭等在济南发起组织励新学会。这是传播新思潮、团结进步青年的群众性团体。王尽美(1898—1925)，原名瑞俊，字灼斋，山东莒县人。1919年积极参加五四爱国运动。邓恩铭(1900—1931)，字仲尧，贵州荔波人。在五四爱国运动中，他作为山东学生自治会负责人，被派赴北京、天津活动。王尽美、邓恩铭多次去北京和马克思主义者发生了联系。1920年4月，维经斯基由北京去上海途经济南时，与王尽美、邓恩铭商谈了宣传马克思主义和建立共产党组织等问题。9月，王、邓等人在济南成立马克思学说研究会。年底，李大钊派人到济南，帮助建立共产党组织，其成员有王尽美、邓恩铭、王翔千、王复元、贾乃甫、王用章等。

广东共产党组织于1920年9月酝酿成立，成员大多是无政府主义者。1920年冬，陈独秀到广州任广东省教育委员会委员长，和梁冰弦、黄鹏声、区声白、谭祖荫等研究建立共产党组织问题。无政府主义者不愿意接受坚持无产阶级专政的主张，便退出了共产党。1921年初，陈独秀找谭平山、谭植棠、陈公博等商谈，重新组建了广州共产党组织。谭平山任书记，陈公博负责组织，谭植棠负责宣传。

1920年夏，去日本的共产主义小组成员施存统、周佛海组建旅日共产党小组，后来发展到10多人。1921年春，在国内参加共产主义小组的张申府、赵世炎在法国巴黎组成旅法共产主义小组，成员还有陈公培、刘清扬、周恩来等。

中国共产党早期组织的名称不一。有的叫“共产党”，有的叫“共产党支部”或“共产党小组”，都是组成统一的中国共产党的地方组织，后来被习惯地一律称为共产主义小组。各地共产主义小组成立以后，有计划有组织地宣传马克思主义，批判各种反马克思主义思潮，到工人中去开展宣传和组织工作，进一步促进马克思主义和中国工人运动的结合，同时，积极指导各地建立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组织，为中国

共产党的建立做了思想上和组织上的准备。

（陈隆涛）

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成立

1920年8月开始在上海、北京、长沙、武汉、广州等地成立的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组织。

各地共产主义小组成立后，把建立社会主义青年团作为团结教育革命青年、培养共产党的后备力量的一项重要工作。1920年8月，上海共产主义小组派最年轻的成员俞秀松负责组织社会主义青年团。首先在外国语学社的学生中发展青年团员。外国语学社是上海共产主义小组创办的一所培养干部的学校，吸收上海、湖南、浙江、安徽等地的青年入学，学习外语和马克思主义基本知识，同时参加一些革命活动。发展的第一批团员有刘少奇、罗亦农、任弼时等。不久，他们被选送到苏维埃俄国东方劳动者共产主义大学学习。上海社会主义青年团成立后，俞秀松任书记。随后，即向全国各地的共产主义者发出社会主义青年团章程，要求各地建团。11月初，在李大钊的指导下，由邓中夏、罗章龙、刘仁静、张国焘等发起组织北京社会主义青年团，团员约有40人，高君宇任书记。北京团组织联络进步学生学习马克思主义，宣传社会主义，建立工读互助团，举办劳动补习学校，并组织一部分青年赴苏俄参观学习。不久，又派张太雷到天津建立社会主义青年团。毛泽东与北京的李大钊、上海的陈独秀保持着联系。1920年10月，他接到上海寄来的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章程后，即在长沙着手建团工作。毛泽东发展团员十分注意“找真同志”、“中坚分子”。12月，长沙社会主义青年团正式成立，毛泽东任书记，有团员30多人。他们多是新民学会会员以及愿为社会主义而奋斗的青年学生和工人。1920年秋，武汉共产党支部在武汉地区吸收了10多名大中学校的先进知识青年加入社会主义青年团。11月初，董必武和张国恩、李书渠等研究，正式成立了武昌社会主义青年团，确定团的主要任务是实现社会主义。后在各大、中学校建立起团支部，组织青年学习马克思主义，并到工人中进行宣传。广东社会主义青年团始建于1920年8月，团员中有不少的无政府主义者。由于团员宗旨不能一致，不久便停止活动。10月，广东再次组织社会主义青年团。1922年5月5日至10日，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在广州召开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到会代表25人，代表全国17个地方团组织的5000多名团员。大会通过《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纲领》和《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章程》，选举了中央执行委员会，施存统任书记。1922年6月，在法国的赵世炎、周恩来、李维汉等联络旅居法国、德国、比利时的中国青年30多人，在巴黎成立了旅欧中国少年共产党，赵世炎为书记，周恩来负责宣传，李维汉负责组织。10月，它决议加入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的成立，为共产党造就了一批后备力量。

（陈绍畴）

关于社会主义的论战

1920年11月至1922年初，马克思主义者与资产阶级改良主义者张东荪、梁启超等关于社会主义是否适合于中国的争论。

五四运动后，张东荪（1886—1973，浙江杭州人）和梁启超在研究系创办的《解放与改造》（后更名《改造》）杂志上宣传基尔特社会主义。基尔特社会主义也称行会社会主义，是20世纪初英国工人运动中出现的一种打着社会主义旗号的资产阶级改良主义思潮。它主张在保存现有国家的条件下，按照中世纪行会的某些精神和办法，建立“产业自治”，从而消灭剥削，实现劳动者的解放，反对无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1920年10月，英国资产阶级哲学家罗素（Birtrand　Russell，1872—1970）来华讲学。他宣扬中国当务之急是开发实业，兴办教育，认为对中国最适宜者是基尔特社会主义。张东荪、梁启超借助罗素讲学的声势，连续发表文章，挑起关于社会主义的论战。11月6日，张东荪在《时事新报》上发表《由内地旅行而得之又一教训》的时评。12月15日，又在《改造》上发表《现在与将来》一文。1921年2月15日，梁启超在《改造》上发表《复张东荪书论社会主义运动》一文。他们口头上声称“资本主义必倒而社会主义必兴”，实际上强调的是，中国经济落后，缺少真正的劳动者，中国绝对不能建设劳动阶级的国家，也没有条件建立代表劳动阶级的政党，“真的劳农革命决不会发生”。他们认为，救中国只有一条路，就是依靠“绅商阶级”来振兴实业，发展资本主义。马克思主义者在《新青年》、《共产党》、《国民日报》上纷纷发表文章，批驳张东荪、梁启超等人的反对社会主义的言论。其中较为重要的有陈独秀的《社会主义批评》，李大钊的《中国的社会主义与世界的资本主义》，李达的《讨论社会主义并质梁任公》、《社会革命底商榷》，蔡和森的《马克思学说与中国无产阶级》等。他们指出，中国经济虽然落后，但无产阶级的存在是一个客观事实。中国无产阶级所受的压迫，比欧美、日本的

无产阶级所受的更甚。这种状态，除了中国劳动者联合起来，组织革命团体，改变生产制度，是无法挽救的。他们认为，从当前的国际条件和国内社会状况来看，中国若要发展资本主义，实行“保护资本家的制度”，这不仅“理所不可”，而且“势所不能”。指出资本主义道路是行不通的，中国的出路在于社会主义，“今日在中国想发展实业，非由纯粹生产者组织政府，以铲除国内的掠夺阶级，抵抗此世界的资本主义，依社会主义的组织经营实业不可”。这是一次关于中国是走社会主义道路还是走资本主义道路、是实行社会革命还是实行社会改良的争论。这场争论持续到 1922 年初结束。 （陈隆涛）

马克思主义者对无政府主义的批判

1920 年下半年至 1921 年，马克思主义者与无政府主义者之间展开的一场思想论战。

无政府主义是一种小资产阶级社会思潮，20 世纪初传入中国。中国早期无政府主义者在冲击封建政治和礼教方面起过积极作用。随着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广泛传播，无政府主义者便把反对的矛头主要指向马克思主义。1919 年 5 月，无政府主义者黄凌霜在《新青年》上发表《马克思学说的批评》一文，向马克思主义公开挑战。文章根据俄国无政府主义者克鲁泡特金（Пётр Алексеевич Кропоткин，1842—1921）的“互助论”，认为“互助”是人类社会进化的动力，“国家”是人类互相“仇视”、“嫉妒”以及“相侵相夺相杀相害”的根据，反对一切国家和强权，反对暴力革命，反对任何组织纪律，鼓吹个人的绝对自由，攻击马克思主义关于无产阶级专政的学说。他们要求立即废除一切国家，废止一切权威，立即实行“各取所需”的分配原则，实行“绝对自由”的“无政府共产主义”。在当时流行的各种社会主义思潮中，无政府主义一度曾占着优势。1919 年至 1920 年间，无政府主义团体有近 50 个，宣传无政府主义的刊物和小册子达 70 多种。1920 年 9 月，陈独秀在《新青年》上发表《谈政治》。随后，李达在《共产党》上发表《社会主义的商榷》和《无政府主义的解剖》，李大钊在《少年中国》上发表《自由与秩序》，蔡和森在《新青年》上发表《马克思学说与中国无产阶级》等文。1921 年 1 月，毛泽东在新民学会新年大会上讨论“改造中国与世界”问题时指出，资产阶级改良主义是补苴罅漏的政策，不成办法；社会民主主义的议会道路是保护有产阶级的；无政府主义的主张是永世做不到的；“激烈方法的共产主义，即所谓劳农主义，用阶级专政的方法，是可以预计效果的，故最宜采用。”《民国日报》副刊《觉悟》也发表了一些有关讨论无政府主义的通信，对无政府主义进行批判。他们阐明了无产阶级专政与资产阶级专政国家的本质区别，指出无产阶级夺取政权和建立无产阶级专政的重要性；驳斥了无政府主义者在生产和分配问题上的谬论，指出只有“社会的生产力达到无限制的程度”，各取所需的分配原则才是可实行的；驳斥了无政府主义者所谓“绝对自由”的谬论，指出在人类社会中自由是相对的，不是绝对的，个人“绝对自由”是不存在的，即使在社会主义制度下，也要有组织纪律和集中统一。论战持续了一年多。这是五四运动后马克思主义同反马克思主义思潮间规模最大的一场论战，是一次关于社会主义学说的深入讨论。通过论战，宣传了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学说，强调了革命团体的组织纪律性，为中国共产党的建立奠定了思想基础。

（陈隆涛）

中国共产党成立

1921 年 7 月 23 日至 8 月初在上海举行的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宣告中国共产党正式成立。

1921 年 1 月，李大钊公开呼吁创建无产阶级政党。他指出：“中国现在既无一个真能表现民众势力的团体，派（指共产主义派）的朋友若能成立一个强固的精密的组织，并注意促进其分子之团体的训练，那么中国彻底的大改革，或者有所附托！”3 月，各地共产主义组织的代表举行了一次会议，并以会议的名义发表了“关于我们的目标和原则的共同声明”。这次会议还制定了临时纲领。6 月，共产国际驻中国代表马林（Maring，原名亨克・斯内夫利特，1883—1942，荷兰人）和共产国际远东书记处代表尼科尔斯基（Нцкoьcкцй，1898—1943，俄国人）到达上海，与李达、李汉俊等建立联系，了解筹建共产党的情况，建议迅速召开党的全国代表大会。李达等征得陈独秀、李大钊同意后，确定在上海召开中国共产党全国代表大会，并分别通知北京、长沙、武汉、广州、济南等地党组织各派两名代表出席。7 月 23 日，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上海法租界望志路树德里 3 号（兴业路 76 号）秘密举行。出席大会的有来自 7 个地方的 12 名代表，他们是：上海小组的李汉俊、李达，北京小组的张国焘、刘仁静，长沙小组的毛泽东、何叔衡，武汉小组的董必武、陈潭秋，济南小组的王尽美、邓恩铭，广州小组的陈公博，旅日小组的周佛

海。参加大会的还有包惠僧。包惠僧原是武汉共产主义小组的成员，1921 年初因事到上海。5 月中旬，李达派包去广州找陈独秀商谈工作，后留广州，陈独秀即指派他到沪参加大会。他们代表着全国 53 名党员。共产国际代表马林与尼科尔斯基列席了大会。会上先由马林和尼科尔斯基讲话，阐述第三国际的使命和中国共产党的任务，建议要特别重视开展工人运动，建立工会组织。7 月 24 日，各地代表报告本地党团组织成立的经过及其主要活动，以及开展工作的方法和经验。7 月 25 日至 26 日休会，由张国焘、董必武、李达组成的小组起草党的纲领和今后实际工作计划。7 月 27 日至 29 日集中讨论党纲。7 月 30 日，会场受到暗探注意和外国巡捕搜查。第二天，会议改在浙江嘉兴南湖一艘游船上举行。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的中心任务是讨论正式成立中国共产党问题。大会通过《中国共产党第一个纲领》，确定党的名称为"中国共产党"。规定党的纲领是：一、革命军队必须与无产阶级一起推翻资本家阶级的政权，必须支援工人阶级，直到社会的阶级区分消除为止；二、承认无产阶级专政，直到阶级斗争结束，即直到消灭社会的阶级区分；三、消灭资本家私有制，没收机器、土地、厂房和半成品等生产资料，归社会公有；四、联合第三国际。党纲明确提出，承认苏维埃管理制度，把工农劳动者和士兵组织起来，并承认党的根本政治目的是实行社会革命；彻底断绝同黄色知识分子阶层及其他类似党派的一切联系。党纲规定，凡承认本党纲领和政策，并愿成为忠实党员的人，经党员一人介绍，不分性别、国籍，均可接收为党员，成为我们的同志。但在加入我们队伍之前，必须与企图反对本党纲领的党派和集团断绝一切联系。党纲还规定了接收新党员的手续及党的各级组织系统。大会通过《关于当前实际工作的决议》，明确了党在当前的基本任务是，集中力量领导工人运动，首先是组织产业工会和教育工人。规定凡有一个以上产业部门的地方，均应组织工会；在没有大工业而只有一两个工厂的地方，可成立比较适于当地条件的工厂工会。党应在工会里灌输阶级斗争的精神。在一切产业部门应成立工人学校，并使之逐渐变成工人政党的中心机构。工人学校的基本方针是提高工人的觉悟，使他们认识到成立工会的必要。同时，成立工会组织的研究机构。这种机构应由各个产业部门的领导人、有觉悟的工人和党员组成，负责研究产业工会组织的工作方法等问题。成立这种机构的主要目的，是教育工人，使他们在实践中去实现共产党的思想。应特别注意组织工人工会，援助其他部门的工人运动，研究工人工会以及其他无产阶级组织的情况。最后，大会选举陈独秀、张国焘、李达组成中央局。陈独秀为中央局书记，张国焘为组织主任，李达为宣传主任。从此，在中国出现了完全新式的、以共产主义为奋斗目标的、以马克思列宁主义为行动指南的统一的无产阶级政党。中国共产党的成立，是中国历史上开天辟地的大事。"自从有了中国共产党，中国革命的面目就焕然一新了"。　（陈隆涛）

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成立

1921 年 8 月中旬，中国共产党在上海成立的公开领导工人运动的机关。

中国共产党成立后，就集中全力组织工人阶级，领导工人运动。1921 年 8 月中旬，在上海成立了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它在成立宣言中，申明其任务是向劳动者宣传组合之必要，联合或改组已经成立的各劳动团体，使劳动者有阶级的自觉，并要建立中国工人们与外国工人们的密切关系。张国焘（1897—1979，江西萍乡人）为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主任，在北京、武汉、长沙、广州、济南设立分部。北方分部主任是罗章龙，武汉分部主任是包惠僧，湖南分部主任是毛泽东，广东分部主任是谭平山，山东分部主任是王尽美。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成立后，首先是开展宣传教育工作，启发工人的阶级觉悟。1921 年 8 月 20 日创办机关刊物《劳动周刊》，其"宗旨为劳动者说话，并鼓吹劳动组合主义"。每期发行最多时为 5000 份。在上海纺织工人最集中的沪西小沙渡，开办了第一个工人补习学校。通过刊物和工人学校，揭露资本家及其走狗不劳而获，榨取工人剩余劳动的罪行，向工人阶级宣传团结和组织的重要性，教育工人掌握和运用阶级斗争的武器来维护自己的利益。同时，发动工人群众，组织产业工会，开展罢工斗争。它帮助上海工人建立了上海烟草工会、印刷工会、纺织工会浦东分会、邮务友谊会、海员工会、机器工人俱乐部等工会组织。1922 年 5 月 1 日至 5 日，劳动组合书记部发起在广州召开第一次全国劳动大会。到会代表 173 人，代表 12 个城市、110 多个工会、34 万有组织的工人。大会接受了中国共产党提出的"打倒帝国主义"、"打倒封建军阀"的政治口号。大会决定在中华全国总工会成立前，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为全国工人组织的总通讯机关，实际上公认书记部为全国工人运动的最高领导机构。7 月，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迁北京，邓中夏（1894—1933，名康，字仲澥，湖南

宜章人）任总主任。8月，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发布《劳动法大纲》，提出劳动立法的4项原则：一、保障政治上自由；二、改良经济生活；三、参加劳动管理；四、劳动补习教育。还提出承认劳动者有集会结社、同盟罢工、缔结团体契约、国际联合的权利，实行8小时工作制，保护女工、童工，保障劳动者的最低工资等具体要求。并动员全国工人广泛开展劳动立法运动，这对推动工人运动的继续高涨起了重要作用。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在工人中进行的宣传工作和组织工作，为中国工人运动的第一次高潮做了准备。

（周兴旺）

香港海员罢工

1922年1月12日至3月8日，香港海员工人为反抗英国资本家的压迫剥削，要求增加工资而举行大罢工。

香港海员长期遭受英国帝国主义的殖民统治和资本家与封建包工头的残酷剥削，工资微薄，不及白人海员的五分之一，生活非常痛苦。他们往来于世界各国港口，接受国际工人运动的影响较多，阶级觉悟较高。各地工人罢工斗争也给香港海员以极大鼓舞。海员积极分子苏兆征（1885—1929，广东珠海人）、林伟民（1887—1927，广东中山人）等接受了中国共产党的影响，开始在工人中做共产主义的宣传，组织现代工会。1921年3月6日，苏兆征、林伟民等在香港成立中华海员工业联合总会，着手进行罢工的酝酿和准备工作，组织了海员增加工资维持团、征求队、劝进队、宣传队、防护破坏罢工队和交通队等，并募集罢工经费。9月，海员工会向轮船资本家提出3项要求：一、增加工资，工资在10元以下者加5成，10元至20元者加4成，20元至30元者加3成，30元至40元者加2成，40元以上者加1成。二、工会有权介绍海员就业。三、雇工合同签订时，工会有派代表权。对此，轮船资本家拒不答复。11月，海员工会再次提出要求，资本家不予理睬。1922年1月12日，海员工会第三次向轮船资本家提出要求，并限24小时内给予圆满答复，否则就举行罢工。资本家仍置之不理。同日下午，苏兆征所在的德忌利士轮船公司的"海康"轮海员首先宣布罢工。接着，所有从香港开往广东广州、江门和广西梧州等地的内河轮船，以及从外埠开到香港的英、美、法、日、荷等国轮船上的中国海员，都相继举行罢工。参加罢工的轮船有90余艘，海员约1500人。当晚，香港英国当局派华民政务司夏理德到海员工会，用欺骗恐吓的口吻"劝告"海员复工。苏兆征、林伟民等表示，要复工，除非完全承认海员工会的条件。罢工继续发展，一星期内，参加罢工的轮船增至123艘，人数达6500人。罢工浪潮迅速波及新加坡、暹罗（泰国）等国和上海、广东汕头等港口，有的轮船一经靠岸，中国海员随即加入罢工行列，先后参加罢工的海员达两万余人。罢工海员纷纷离开香港回广州。到1月底，回到广州的罢工海员约有1万人以上。设在广州的罢工总办事处负责指挥罢工和接待罢工海员的工作。罢工海员返抵广州时，广州各阶层群众前往车站列队迎接，并和罢工工人一起上街游行。国民党领导的广东政府对香港海员罢工也表示支持。罢工海员回到广州后，对香港采取封锁政策。他们分头劝导广州及其附近各县商人停运粮食及食物赴香港。罢工海员还分头驻守各港口，杜绝走私者破坏封锁。香港与外地的航运几乎全部断绝，日常所需的食品匮乏，物价飞涨，给香港的经济生活造成严重影响。香港英国当局企图以威胁和利诱的手段来迫使罢工海员屈服。先是在1月16日宣布戒严，非有凭照不能自由出入香港。1月17日又发出通告，坚持轮船资本家提出的加薪条件，迫使罢工海员接受。接着，还派人去上海、菲律宾、印度等地招募新工人，妄图彻底破坏罢工。港英当局采取这些手段都未达目的。香港罢工海员积极争取其他行业工人举行罢工援助。1月27日，香港运输工人举行同情罢工。罢工规模进一步扩大，全港罢工人数增至3万人以上。港英当局决定进行野蛮镇压。2月1日，悍然宣布海员工会为"非法团体"，下令封闭海员工会，抢走海员工会的牌子。同时，封闭了海陆理货工会、同德工会、集贤工会等运输工会组织。港英当局还调来10多艘军舰驻防，水兵全副武装登岸巡查。香港海员和运输工人罢工，给英国当局和轮船资本家以沉重打击。香港一些绅商纷纷要求港英当局与罢工海员进行谈判，并表示愿意充当调停人。于是，港英当局变换手法来对付罢工。先是指使"华工总会"到广州协同基督教青年会和中国航业公司出面"调停"，后又利用华人绅商集团开办的东华医院请求广东海员罢工总办事处派代表到香港商谈。2月7日，海员罢工总办事处召开海员大会，认为要在港英当局首先答应恢复海员工会的前提下才能进行谈判。大会通过了9项解决罢工的条件：一、海员工资每月30元以上者加30%，30元以下者加40%。二、对复工工人不得无故辞退或降职。三、增加工资的办法适用于现在香港停泊的轮船和从各埠向香港开驶的轮船。四、船主雇用海员，须由海员

工会介绍，以免中间人克扣工钱。五、签立雇用海员合同时，须有海员工会派证人到场，否则无效。六、无论海员或海员工会的职员，不得因无相当理由递解出境。七、加工资日期由1922年1月1日起。八、中国海员复工之后，雇主须加以平等待遇，不可苛虐。九、恢复中华海员工业联合总会原状及现被封各工会，释放被禁的办事人。大会还提出复工的暂时办法：海员月薪在15元以下者加薪40%，25元以下者加30%，25元以上者加20%。如船主承认此办法，海员即刻复工。2月15日，海员罢工总办事处派苏兆征等4名代表到香港，与港英当局及中外绅商代表谈判。海员代表首先提出以恢复工会为先决条件。港英当局和绅商代表却提出改变工会招牌、举出代表公道评判解决加资问题。谈判无结果。海员工会便加紧联络香港各工会举行全港性同情总罢工。2月27日，港英当局宣布紧急戒严令，把驻在中国各口岸的英国军舰调集香港，禁止火车通行，出动大批军警巡查街道，规定居民离开香港一定要有铺保。当天，香港各业工人陆续举行同盟总罢工。至3月初，罢工人数超过10万，其中海员约2万多人。整个香港的海上航运全部瘫痪，市内交通中断，生产停顿，商店关门，食物和其他生活用品来源断绝，垃圾无人清扫，粪便无人清理。香港变成了“臭港”、“死港”。3月4日，罢工工人成群结队步行回广州，行至离香港6公里的沙田时，遭英国军警开枪射击，当场死4人，伤数百人。这就是英帝国主义一手制造的“沙田惨案”。消息传到广州，罢工海员更形激愤，决心与英帝国主义斗争到底。海员罢工总办事处一面督促广东政府向香港当局提出严重抗议；一面发出通电，揭露事件真相，吁请支持。中国共产党广东支部发表《敬告罢工海员》的传单，表示全力支援。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号召全国工人给予声援。上海、湖北、开封等地和京奉、京汉、陇海、京绥铁路工人及别业工人等组织香港海员罢工后援会，从多方面援助罢工海员。京汉铁路工人在火车头上竖起写着“援助香港海员”6个红字的大旗，在北京至汉口间往返飘扬。上海香港海员后援会一面劝告上海工人切勿受雇赴港，一面募集捐款支援香港海员。并致电勉励罢工海员“坚持到底，勿擅让步”。香港海员罢工还得到海外华侨和各国工人的同情和支持。香港工人坚决斗争的联合行动，迫使港英当局不得不以海员工会提出的9项条件为基础进行谈判。海员工会代表林伟民等与港英当局及中外船主的代表经过多次会谈，于3月5日达成协议：同意增加工资15%至30%，恢复原有的海员工会，释放被捕的工人，抚恤“沙田惨案”死难者家属各1000元。3月6日，港英当局下令取消2月1日封闭海员工会的命令，把工会招牌送还给海员工会。海员罢工总办事处宣布从3月8日起正式复工。罢工坚持56天，终于取得胜利。香港海员罢工是中国工人阶级第一次直接同帝国主义势力进行的有组织的较量，“70年来赫赫奕奕的大英帝国主义终于在中国海员的威力之下屈服了”。这极大地鼓舞了中国工人阶级的战斗勇气，推动了全国工人运动的发展。此后，长江船员、上海邮务工人、日华纱厂工人、汉阳钢铁厂工人，以及京汉、粤汉、京奉、京绥、正太等铁路工人，相继举行罢工。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工人运动逐渐形成高潮。香港海员罢工是中国工人运动第一个高潮的起点。　（陈绍畴）

《九国公约》签订

1922年2月6日，美、英、法、日、意、比、荷、葡与中国北洋军阀政府在华盛顿会议上签订的条约。

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日本帝国主义乘西方列强忙于欧战、无暇东顾的机会，扩大在中国的侵略，夺取了德国在胶州湾和山东的各项权益。巴黎和会承认了日本在中国的特殊权利，巩固了它在中国的地位。美国为了与日本争夺远东霸权，于1921年11月12日，发起由美国、英国、法国、日本、意大利、中国、比利时、荷兰、葡萄牙等9国参加的华盛顿会议，讨论限制军备问题和太平洋及远东问题。经过激烈争夺，讨价还价，美、英、日、法签订《关于太平洋区域岛屿属地和领地的条约》(即《四国条约》)，规定互相尊重在太平洋上岛屿属地的权益，废除1902年缔结的英日同盟。美、英、日、法、意签订《限制海军军备条约》(即《五国海军协定》)，规定美、英、日、法、意主力舰的吨位比例为5∶5∶3∶1.75∶1.75。通过这两个条约，拆散了英日同盟，迫使日本承认其海军居于二等地位。中国问题是会议的中心议题。中国代表在会上提出处理中外关系的10项原则，要求各国尊重中国领土的完整及政治与行政的独立，收回山东主权。美、英为打破日本独霸中国的局面，支持中国的要求。美国提出在华“各国商务、实业机会均等”和“中国门户开放”的原则，企图凭借其经济优势，以遏制日本独占中国的势头。在美、英的压力下，日本于1922年2月4日与中国签订《解决山东悬案条约》，规定日本将胶州德国租借地交还中国，中国将其全部开为商埠，准许外国人在该区域内自由居住，并经营工商业及其他职业；日本军队撤出山东；胶济铁路

由中国以5340多万金马克赎回，在路价未偿清前，中国应选任一日人为车务长，一日人为会计长。2月6日，与会各国签订《九国关于中国事件应适用各原则及政策之条约》，通称《九国公约》。条约虽然宣称“尊重中国之主权与独立及领土与行政之完整”，却规定要“维持各国在中国全境之商务、实业机会均等之原则”，任何一国“不得因中国状况乘机营谋特别权利”等。同时，还签订《九国间关于中国关税税则之条约》，规定中国进口货税率一律为值百抽5；废除厘金，代以值百抽2.5的附加税，奢侈品的附加税额可稍加提高，但不得超过值百抽2.5。规定会后3个月内由有关国家召开关税会议，讨论中国关税问题。会议通过的《中国领事裁判权决议案》规定，由有关国家组成调查团，对中国进行司法调查，然后决定领事裁判权的撤废问题。《九国公约》确认几个帝国主义国家共同控制中国的局面，遏制了第一次世界大战后日本独占中国的趋势。由于美国的经济实力超过其他国家，这个公约实际上为美国用“机会均等”的名义压倒对手、进而独占中国准备了条件。

（陈绍畴）

第一次直奉战争

1922年4月29日至6月17日，直系军阀吴佩孚和奉系军阀张作霖在北京地区进行的军阀战争。

直皖战争后，北京政府的实权主要落入直系军阀手中。美、英在华势力大为加强。日本在失去皖系军阀这个工具后，转而扶植奉系军阀张作霖。张作霖(1875—1928)，字雨亭，奉天(辽宁)海城人。1916年任奉天督军兼巡按使(后改称省长)。1918年任东三省巡阅使。直皖战争后在北京设奉军司令部，驻兵京津要冲。1921年兼充蒙疆经略使，节制热河、察哈尔、绥远3特区都统。直奉军阀为把各自的势力伸展到长江流域展开激烈斗争。1920年9月，北京政府发表皖系张文生为安徽督军，直系江苏督军李纯升任苏皖赣3省巡阅使。10月，李纯死后，直系齐燮元继任江苏督军和苏皖赣3省巡阅使。1921年8月，吴佩孚取代王占元为两湖巡阅使，直系肖耀南为湖北督军。直系势力在长江中下游地区迅速扩张，张作霖大为不满，便联合反直各派组织讨直大同盟。12月18日，靳云鹏内阁因财政困难提出辞职。12月24日，徐世昌应张作霖的要求，任命交通系梁士诒为内阁总理。梁上台后，即下令特赦被通缉的皖系军阀政客；对华盛顿会议中提出的山东问题，主张中日直接交涉。1922年1月初，吴佩孚通电指斥梁士诒媚日卖国，逼梁下台。1月25日，梁士诒托病出京，由外交部部长颜惠庆代国务总理。此后，张作霖电诘徐世昌等，直奉双方互相攻讦不已。从3月开始，直奉军阀加紧调兵遣将，配置军事力量。3月31日，张作霖令奉军第二十七师入关。4月10日，吴佩孚将京汉铁路车辆扣备军用，运输驻岳阳第二十四师北上应战。4月28日晚，张作霖在军粮城下总攻击令，第一次直奉战争爆发。次日，直奉两军在京汉路长辛店和津浦路马厂一带开战。双方各动员兵力12万左右。奉军号称镇威军，张作霖自任总司令，孙烈臣为副司令，分东、中、西3路出兵。直军以吴佩孚为总司令，以保定为大本营，由冯玉祥、王承斌、张国镕分头抵御。5月3日晚，吴佩孚改守为攻。5月5日，西路奉军张景惠部第十六师停战倒戈，直军攻占长辛店、卢沟桥。中路奉军闻讯，军心大乱，相继败退天津。东路奉军仓皇溃退。张作霖被迫下令退却，后经天津、滦州(滦县)，率残部出关。5月10日，北京政府明令免除张作霖东三省巡阅使、奉天督军兼省长各职。张作霖不甘失败，于5月12日宣布独立。接着，又利用奉天、吉林、黑龙江3省议会拥其为东三省自治保安总司令，宣布“闭关自治”。6月17日，直奉双方接受美、英的建议，和议罢兵。直军全权代表王承斌、杨清臣与奉军全权代表孙烈臣、张学良在秦皇岛海面的英国军舰上签订和约8条及附约两条。双方自6月19日起撤退军队，奉军退回关外。第一次直奉战争结束。此后，直系军阀控制了北京政权，日本在华势力又一次受到打击。　　（陈绍畴）

陈炯明叛变

1922年6月16日，陈炯明在广州发动反对孙中山的武装叛乱。

陈炯明(1878—1933)，字竞存，广东海丰人。1917年护法军政府成立后，任援闽粤军总司令。1920年8月，粤军从闽南回师广州，将桂系军阀势力逐出广东。10月，孙中山任命陈炯明为广东省省长兼粤军总司令。11月，孙中山从上海回到广州，重新树起“护法”的旗帜，恢复军政府。1921年4月4日，在广州召开的国会非常会议通过《中华民国政府组织大纲》，选举孙中山为非常大总统。5月5日，孙中山宣誓就职。次日，任命陈炯明为军政府内政部部长兼陆军部部长。7月，粤军挥师进军广西，铲除桂系军阀势力。孙中山为“贯彻护法主张”，于11月15日在桂林设立大本营，进行北伐的准备工作。1922年2月3日，孙中山以大元帅名义颁布动员令，假道

湖南开始北伐。这时，留守广东的陈炯明随着自己实力的增长，想在广东割据称雄，反对孙中山的北伐主张。他暗中与英、美帝国主义和北洋军阀勾结，联络湖南督军赵恒惕阻止北伐军入湘，并暗杀了倾向孙中山的粤军参谋长邓铿。3月26日，孙中山在桂林召开紧急会议，准备变更北伐计划。4月8日，孙中山回师广州，免去陈炯明的内政部部长、广东省省长和粤军总司令职(仍留任陆军部部长)。4月21日，陈炯明部叶举、翁式亮、杨坤如等通电自南宁还广东，进攻广州，要求恢复陈炯明各职，并电请孙中山、徐世昌同时下野。5月4日，孙中山发布北伐令。5月6日，将大本营移至广东韶关，改道经江西北伐。6月13日，北伐军进占江西赣州，接着攻克吉安，直逼南昌。这时，陈炯明令其部属从广西进攻广州，准备发动叛乱。孙中山闻讯，即回广州坐镇。6月14日，陈炯明囚禁了廖仲恺。6月16日清晨，陈炯明部叶举、洪兆麟、李云复、杨坤如在广州发动武装叛乱，占据石井兵工厂，派兵4000余人围攻总统府，炮击观音山孙中山住所粤秀楼。当时，广州城内陈炯明的部队有2.5万人，而孙中山掌握的警卫团总共才500人，双方力量悬殊。孙中山在秘书林直勉等帮助下，逃离总统府，登上停泊在白鹅潭的“楚豫”号军舰避难，随即召集各舰长商议应变戡乱措施。6月17日，孙中山令海军永丰、楚豫、永翔、豫章、同安、广玉、宝璧各舰集中黄埔港，准备进攻广州。随后，孙中山登上“永丰”号军舰(后改名为“中山”舰)转移。6月18日，孙中山致电在上海的粤军参谋长蒋介石，说明“粤局危急，军事无人负责”，召他“速来”。6月29日，蒋介石登“永丰”舰侍随孙中山左右。这时，北伐军回师广东与叛军激战。因陈炯明得到英帝国主义和直系军阀的支持，北伐军不得不于7月下旬分途向湖南、江西边境撤退。8月9日，孙中山被迫离开广州赴上海。护法运动至此完全失败。10月，孙中山以入闽北伐军为东路讨贼军，讨伐陈炯明，任命许崇智为总司令，蒋介石为参谋长。后又联合滇军杨希闵、桂军刘震寰组成西路讨贼军，从广西进发讨伐叛军。1923年1月，孙中山通电讨伐陈炯明。1月14日，讨贼军攻克广州，陈炯明败退惠州。2月21日，孙中山返回广州，重建陆海军大元帅府，再任陆军大元帅，控制了珠江三角洲和广东中部地区。陈炯明的叛变，使孙中山遭受了一次最痛心的失败。孙中山开始逐步确定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政策，积极推进国民党的改组工作。　　(陈绍畴)

广东农民运动的兴起

1922年6月开始，彭湃领导广东海丰、陆丰及广东其他地区农民组织农会，开展反对封建地主的斗争。

彭湃(1896—1929)，广东海丰人。1921年，在广州参加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旋回海丰组织社会主义研究社。1922年6月，他深入海丰农村，开始从事农民运动。7月29日，在海丰赤山约创建了“六人农会”，团结农民，开展反抗地主加租易佃、打击土豪劣绅敲诈勒索的斗争。农会的影响不断扩大，会员很快发展到500余人，分布在赤山约范围内的28个乡村。10月25日，“六人农会”扩建为赤山约农会，黄凤麟任会长。农会发表的《农会利益》传单宣布农会的任务是：防止田主升租；防止勒索；防止内部竞争；凶年呈请减租；调和争端；救济疾病；救济死亡；救济孤老；救济罹灾；防止盗贼；禁止烟赌；奖励求学；改良农业；增进农民知识；共同生产；便利金融；抵抗战乱。到年底，海丰全县已有12个约，共98个乡建立了农会。1923年1月1日，召开全县农民代表大会，成立了海丰总农会，彭湃当选为会长，会员约10万人，占全县人口的四分之一。这是我国第一个县农会。大会通过了《海丰总农会临时简章》，明确农会的任务是：一、图农民生活之改造；二、图农业之发展；三、图农民之自治；四、图农民教育之普及。确定总农会“以联合各约农会，本合群之天职，互助之精神，唤醒农民之自觉，而实行本会所定之纲领为宗旨”。总农会积极开展工作，为农民群众谋福利，创办农民学校，扩大农民医药房，组织农民植树造林，排解农民内部纠纷，同时，领导农民进行经济斗争和政治斗争。过去，集市的管理权为地主、豪绅、庙祝所掌握，市场收入为他们吞食。农会决定将番薯市、糖市、菜脯市、地豆(花生)市、柴市、猪仔市、草市等权利收归农会掌握，将所得市利全部充作农会经费，用于农民福利事业，从经济上政治上限制了封建势力对农民的剥削。3月中旬，彭湃率农会会员6000余人前往海丰县法庭请愿示威，抗议地主豪绅组织的“粮业维持会”串通法庭，无理扣押拒绝加租的6名农民。慑于农民群众的压力，法庭立即释放了被押的农民。随着斗争的胜利，农会组织向周围各县发展。在彭湃的帮助下，陆丰、归善(惠阳)相继成立了农会，彭湃兼任陆丰总农会会长。紫金、五华、普宁、惠来、潮安、揭阳、潮阳等县农民也都组织起来，会员增至20余万。5月，海丰总农会改组为惠州农民联合会。7月，惠州

农民联合会又改组为广东省农会，彭湃任执行委员长。这是广东东部以海丰为核心的各县农会的联合组织。8月，海丰两次遭强台风袭击，农村受灾严重，全县农作物损失约90%。实行减租，成为农民最为关切的问题。彭湃不失时机地领导农民开展减租运动，主持召开海丰全县各约农民代表大会，讨论通过了"至多三成交租"的决议，要求减租7成，以3成交纳。农会发表了《为减租而告农民书》，号召农民群众坚持减租斗争。8月16日(农历七月初四)，反动县长王作新出动军警袭击农会，逮捕农会干部25人，并宣布解散农会，通缉彭湃。减租运动遭受挫折。此后，海丰及广东东部地区的农民运动，在陈炯明的镇压下，暂时转入低潮。　(陈绍畴)

中国共产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召开

1922年7月16日至23日，中国共产党在上海召开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

1922年1月21日至2月2日，共产国际在莫斯科举行远东各国共产党及民族革命团体第一次代表大会。中国共产党派代表出席了这次大会。大会根据列宁关于民族和殖民地问题的理论，指明中国"当前的第一件事便是把中国从外国的羁轭下解放出来，把督军推倒"，创立一个民主主义共和国。这些思想对中国共产党制定当前阶段的革命纲领给予了直接的帮助。6月15日，中共中央发表《对于时局的主张》，着重分析了近代中国社会的政治经济状况，指出帝国主义的侵略和军阀政治是中国内忧外患的根源，也是人民受痛苦的根源。无产阶级在目前最迫切的任务是，必须用革命手段打倒帝国主义和封建军阀，建立民主政治。7月16日至23日，中国共产党在上海举行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出席大会的代表12人，代表全国195名党员。大会发表了《宣言》，揭示了中国社会的半殖民地半封建性质，指出"加给中国人民(无论是资产阶级、工人或农人)最大的痛苦的是资本帝国主义和军阀官僚的封建势力，因此反对那两种势力的民主主义的革命运动是极有意义的"。《宣言》提出，中国共产党现阶段的革命纲领，即最低纲领是：消除内乱，打倒军阀，建设国内和平；推翻国际帝国主义的压迫，达到中华民族完全独立；统一中国为真正的民主共和国。党的最高纲领是要组织无产阶级，用阶级斗争的手段，建立劳农专政的政治，铲除私有财产制度，渐次达到一个共产主义的社会。大会通过的《关于民主的联合战线的议决案》指出，为了实现反帝反军阀的革命目标，应该号召全国工人、农民团结在共产党的旗帜下进行斗争，同时，联合全国一切的革命党派，组织民主的联合战线。大会通过的《关于共产党的组织章程决议案》和《中国共产党章程》，阐明了中国共产党的性质，指出中国共产党不是知识者所组织的马克思学会，也不是少数共产主义者离开群众的空想的革命团体，而是中国无产阶级的先锋队组织。强调党的一切活动都必须深入到广大的群众里面去，党的内部必须有严密的、高度集中的、有纪律的组织与训练。要求党员不应只是在言论上表示是共产主义者，重在行动上表现出来是共产主义者。同时，对党员条件、党的各级组织和党的纪律作了具体规定。大会还通过《关于世界大势与中国共产党的议决案》、《关于国际帝国主义与中国和中国共产党的决议案》、《中国共产党加入第三国际决议案》、《关于议会行动的决议案》、《关于工会运动与共产党的议决案》、《关于少年运动问题的决议案》和《关于妇女运动的决议》等。大会选举陈独秀、邓中夏、张国焘、蔡和森、高君宇为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中央执行委员会推选陈独秀为委员长。大会决定出版中共中央机关刊物《向导》周报，蔡和森任主编。中国共产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全中国人民面前破天荒地第一次提出了明确的反帝反封建的民主革命纲领，为中国革命指明了方向。

(陈绍畴)

安源路矿工人罢工

1922年9月14日，安源路矿1.7万多名工人在毛泽东、李立三、刘少奇等组织领导下举行的大罢工。

安源路矿是安源煤矿和株(洲)萍(乡)铁路的总称。安源煤矿地处江西萍乡县境内，同湖南省接壤，创办于1898年，是当时中国的大型煤矿之一，每天产煤2000多吨，主要供湖北大冶铁矿和汉阳铁厂做燃料。为将煤运往上述两地，专门修筑了从萍乡到株洲的铁路线，与粤汉路相接。1907年，汉阳、大冶和萍乡三处企业合组为汉冶萍煤铁厂矿有限公司。后因连年亏损，靠向日本、德国借债度日，公司的实权操在日本人和德国人的手里，企业管理则采取封建把头制。安源路矿共有工人1.7万余人。他们受着帝国主义、官僚买办和封建把头的三重压迫，过着极其贫困悲惨的生活。在中国共产党成立以前，安源路矿工人进行了多次的自发斗争。湖南共产党组织建立后，把开展安源工人运动作为工作的重点之一。1921年秋冬，中共湘区执行委员会书记、中国劳动组合书

记部湖南分部主任毛泽东两次到安源考察，宣传革命道理，启发工人团结起来进行斗争。11月，中共湘区执行委员会派李立三(1899—1967，湖南醴陵人)等到安源开展工作，创办工人子弟学校和工人夜校，并于1922年2月建立了中共安源支部。5月1日，成立了安源路矿工人俱乐部，李立三为主任。俱乐部的宗旨是为保护工人的利益，减除工人的压迫与痛苦。9月7日，路矿当局勾结军阀诬蔑俱乐部是“乱党机关”，禀请赣西镇守使肖安国以武力封禁。加之矿局拖欠工人工资，物价飞涨，工人生活痛苦不堪。群众的反抗情绪到了无法抑制的地步。这时，毛泽东再次亲临安源，认为罢工时机已经成熟，目前急需发展部员，做好罢工准备。9月11日，中共湘区执行委员会又派刘少奇到安源，加强对罢工的领导。刘少奇(1898—1969)，名绍选，字渭璜，后曾化名胡服等，湖南宁乡人。李立三、刘少奇等研究和部署了罢工计划。同日，安源路矿工人俱乐部致函矿长，提出最低限度的3项要求：一、路矿两局须呈请行政官厅出示保护俱乐部；二、路矿两局按月津贴俱乐部常月费200元；三、于7日内将从前积欠工人存饷一律发清。上述要求限于12日午前12时以前完全答复，否则举行罢工。路矿当局见工人态度强硬，答应了前两项要求，对第3项要求则借口财政困难，予以拒绝。工人甚为不满。9月12日晚，工人俱乐部举行紧急会议，分析了当前形势，认为这一时期工人群众觉悟大有提高，绝大多数工人都跃跃欲试；俱乐部在工人中具有很高威信，已经成为斗争的领导核心；省内外罢工运动高涨，给安源工人很大鼓舞。同时，估计路局方面尚缺乏准备，而且内部意见不一。会议作出了举行大罢工的决定，并成立了罢工总指挥部，李立三任总指挥，刘少奇为工人总代表。俱乐部向路矿当局提出增加工资、减轻剥削等条件。这时，接到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声援信，鼓励安源工人“努力作最后的对待，不要为官威所降服”。又收到毛泽东的来信。信中指出，罢工胜利的条件，首先要靠工人群众有坚固的团结和坚强的斗志，同时必须取得社会舆论的同情和支持。因此，必须运用“哀兵必胜”的道理，提出“哀而动人”的罢工口号，号召工人们进行义无反顾的斗争。9月13日晚，路矿当局对工人俱乐部提出的要求，迟迟不予答复。萍乡县保护俱乐部的告示也未送达。午夜12时，工人俱乐部断然发出罢工命令。由萍乡开赴株洲的首次列车先行停开，工人们拆除火车头及水柜各种重要机件，并通知机务处各工友次日早不放进班号。9月14日凌晨3时，矿局电线切断，运煤电车停驶，窿内工人如潮水一般涌出窿外，高举斧头、岩尖，大呼“罢工！罢工！”“工人要活命！”“从前是牛马，现在要做人！”等口号。14日上午，除关系全矿安全和生活的锅炉房、电机处照常工作外，洗煤台、制造处、修理厂、炼焦处等都停止工作。罢工实现后，工人们坚决而有秩序。工人监察队持旗在街市及工厂附近巡行，四处贴出“候俱乐部通告方准开工”、“各归住房，不得扰乱”等布告。同时发表了《萍乡安源路矿工人罢工宣言》，提出了17项要求条件。主要内容是：俱乐部改为工会，路矿两局承认工会有代表工人向路矿两局交涉之权；以后路矿两局开除工人，须得工会之同意；路矿两局从前积欠工人存饷，一律发给；罢工期间工钱照发；职员工头不得殴打工人；工人每日工资在4角以下者，须增加1角等。路矿当局恐慌万状，施展阴谋诡计，破坏罢工。先是由总监工王鸿卿出面，以亲朋好友关系，出高价诱惑、收买一些工人入窿工作。后又悬洋600元，密遣暗探刺杀李立三。接着，又电请赣西镇守使将安源划为特别戒严区，设立戒严司令部，以旅长李鸿程为戒严司令，妄图实行武力镇压。路矿当局破坏罢工的种种阴谋遭到破产后，又经地方商会出面调停，与工人俱乐部谈判。9月15日，路矿当局提出先开工再慢慢磋商条件。工人俱乐部当即声明“不承认条件无说话之余地”。9月16日下午，刘少奇等到戒严司令部商谈解决办法。李鸿程威逼说：“如果坚持作乱，就把代表先行正法！”刘少奇毫不为动，坚定地答道：“如不能达到万余工人的要求，虽把我斫成肉泥，仍是不能解决。”这时，数千工人已把戒严司令部包围，声言请戒严司令与矿长到俱乐部商量。由于工人的英勇斗争，路矿当局被迫接受工人所提出的大部分要求。9月18日上午，路矿当局和工人俱乐部的全权代表签订了13项协议：一、路矿两局承认俱乐部有代表工人之权。二、以后路矿两局开除工人须有正当理由宣布，并不得借此次罢工开除工人。三、以后例假日，路矿两局须照发工资；假日照常工作者须发夹薪；病假须发工资一半，以4个月为限，但须路矿两局医生证明书。四、每年12月须加发工资半月，候呈准主管机关后实行。五、工人因公殒命，年薪在150元以上者，须给工资1年，在150元以下者，给150元，一次发给。六、工人因公受伤不能工作者，路矿两局须予以相当之职业，否则照工人工资多少按月发给半饷，但工资在20元以上者，每月以10元为限。七、路矿两局存饷分5个月发清，自10月起每月发十分之二；但路局8月份饷，须于9月20日发

给。八、罢工期间工资，须由路矿两局照发。九、路矿两局每月须津贴俱乐部常月费洋200元，从9月起实行。十、以后路矿两局职员工头不得殴打工人。十一、窿工工头发给窿工工价，小工每日1.5角递加至1.8角，大工2.4角递加至2.8角，分别工程难易递加。十二、添补窿工工头，须由窿内管班大工照资格深浅提升，不得由监工私行录用。十三、路矿工人每日工资在4角以下者须加大洋6分，4角以上至1元者照原薪加5%。坚持了5天的安源路矿罢工取得了胜利。萍乡安源路矿工人发表《上工宣言》，宣告"罢工胜利了！气也出来了！从前是'工人牛马'，现在是'工人万岁'！我们的第一步目的已经达到了"。宣言说，我们这次罢工的"秩序、齐心、勇敢"，要算是我们神圣精神的表现。这次罢工，是安源工人出头的第一日。我们从今日起，结紧团体，万众一心，为我们自己的权利去奋斗。当天下午，安源路矿工人俱乐部举行庆祝罢工胜利大会。李立三、刘少奇先后在会上发表讲话。万余工人欢呼"劳工万岁！""罢工胜利万岁！"会后，举行游行示威，鞭炮齐鸣，旗帜飞舞，显示了工人团结的力量。工人俱乐部成员迅速发展到一万五六千人。安源路矿工人罢工，是中国工人运动高潮中南方工人举行的主要罢工之一。这次罢工的胜利，不仅对当时湖南工人运动有很大的鼓舞，而且对后来全国工人运动的发展也产生了影响。

（陈绍畴）

《孙文越飞宣言》发表

1923年1月26日，孙中山和苏联政府代表越飞在上海联名发表的宣言。

俄国十月革命后，孙中山和列宁与苏俄政府开始函电来往，并多次和共产国际与苏俄代表晤谈，表达了与苏俄建立友好关系的愿望。孙中山从对苏俄的进一步了解和过去一再遭到帝国主义国家的冷遇与破坏的痛苦教训中，深切感到只有列宁领导的苏俄才是真正帮助中国革命的。1922年8月12日，苏俄政府为与北京政府商谈外交、商务关系，特派副外长越飞（А·А·Иоффе，1883—1927）以全权大使身分来华。越飞在北京一面进行紧张的外交活动，一面派代表携函到上海与孙中山接洽，向处于困境中的孙中山伸出友谊之手。8月25日，孙中山会见了越飞的代表，回答了所问的"远东大局问题及解决方法"，并请其先派与越飞同行的军事工作者到上海来，以便详细了解军事问题。这一会晤更加强了孙中山前进的信心。从8月至12月间，孙中山与越飞曾往来信件7次，商讨有关中国革命的各种迫切问题。12月，孙中山派张继去北京会见越飞，商谈安排他与越飞直接会晤的事宜。1923年1月17日，越飞由北京到达上海，和孙中山举行多次会谈，商讨改组国民党与建立军队，以及苏联与共产国际援助中国革命和反对帝国主义等问题。1月26日，孙中山和越飞联名发表了《孙文越飞宣言》。其主要内容是：一、双方认为，中国最要最急之问题，乃在民国的统一之成功，与完全国家的独立之获得。关于此项大事业，中国当得俄国国民最挚热之同情，且可以俄国援助为依赖。二、越飞应孙中山的要求，重申俄国政府准备且愿意根据俄国抛弃帝政时代中俄条约（连同中东铁路等合同在内）之基础，另行开始中俄交涉。三、中东铁路问题，应于适当的中俄会议解决。孙中山以为现在中东铁路的管理，事实上只能维持现况。双方同意，现行铁路管理法，只能由中俄政府不加成见，以双方实际的利益与权利权时改组。四、越飞正式向孙中山宣称，俄国现政府决无亦从无意思与目的，在外蒙古实施帝国主义之政策，或使其与中国分立。孙中山因此以为俄国军队不必立时由外蒙古撤退。这个宣言的发表，体现了列宁领导的苏联对中国革命的关心和支持，标志着孙中山联俄政策的正式确立。随后，越飞因与北京政府的谈判陷入僵局而去日本。孙中山又派廖仲恺到日本，与越飞就学习俄国革命经验、改组国民党和建立革命军队等问题进一步商谈。此后，苏联开始了对国民党的实际帮助。

（陈绍畴）

京汉铁路工人罢工

1923年2月7日，京汉铁路工人为争取组织总工会的自由，反对军阀压迫而举行政治大罢工，又称二七大罢工。

京汉铁路是连接华北和华中的重要的交通命脉。它的收入是直系军阀吴佩孚军饷的主要来源之一。1921年冬，在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的领导下，京汉铁路上的长辛店成立了铁路工人俱乐部（工会）。1922年4月9日，在长辛店举行全路第一次代表会议，决定整顿和统一全路工会组织。8月10日，在郑州召开全路第二次代表会议，成立了京汉铁路总工会筹备委员会。会后，正值长辛店工人罢工取得胜利，工人对成立全路总工会的要求更为迫切。到1922年底，全路已有16个站成立了工会，会员达3万余人。1923年1月5日，京汉铁路总工会筹备委员会在郑州召开全路第三次代表会议，拟订《京汉铁

路总工会章程草案》，确定其宗旨是：一、改良生活，增高地位，谋全体工人的利益，得到共同幸福；二、联络感情，实行互助，化除地域界限，排解工人相互的争端；三、增进知识，唤起工人的阶级自觉；四、联络全国各铁路工人，组织全国铁路总工会，并与全国各业工人和世界工人建立密切的关系。会议决定于2月1日在郑州举行京汉铁路总工会成立大会。总工会筹委会将开会的宗旨及地点登载各报，并向京汉铁路局局长赵继贤呈文报告。赵继贤玩弄两面手法，表面上同意工人成立总工会，暗地里却密电吴佩孚，诬称工人"未经地方官厅许可集会，竟敢明目张胆，聚众招摇"，请吴佩孚"迅饬预为防范，确切监视"。1月28日，郑州警察局局长黄殿辰到总工会筹委会，声称奉吴佩孚命令，禁止在郑州召开总工会成立大会。2月1日上午，京汉铁路总工会成立大会在郑州如期举行。出席大会的，除京汉铁路各工会的代表65人外，还有京奉、津浦、道清、正太、京绥、陇海、粤汉等铁路的代表60多人，汉冶萍总工会和武汉30多个工会的代表130人，北京、武汉的学生和新闻界人士30多人。吴佩孚下令郑州全城戒严。工人代表冲破军警的封锁线拥入会场，开会宣布京汉铁路总工会成立，全场高呼"劳动阶级胜利万岁"等口号。这时，军警包围了会场，黄殿辰迫令大会立即自行解散。大会被迫中断。接着，军警强行占驻总工会，并包围代表们的住所，限制工人代表的行动自由。当晚，总工会召开秘密会议，决定于2月4日午刻实行全路总同盟罢工，以反抗军阀的武力压迫。罢工决议宣告：总工会移汉口江岸办公，全路一切进止，于罢工期内，全视总工会命令而定，"我们是为争自由作战，争人权作战，只有前进，决无后退"。会议决定成立总罢工委员会，统一指挥罢工行动。具体分工是：总罢工委员会以杨德甫为委员长，凌楚藩、史文彬为副委员长，项英为总干事；郑州罢工负责人为高彬、姜海士等；江岸罢工负责人为林祥谦、曾玉良等；长辛店罢工负责人为吴汝铭、史文彬等；传达罢工命令负责人为彭占元。会后，各路代表从速离开郑州。2月2日晨，京汉铁路总工会发表《特别紧急启事和大罢工宣言》，郑重宣布：从2月4日正午起，京汉路全体一律罢工，不达到下列条件，决不上工：一、要求由交通部撤革京汉铁路局局长赵继贤和南段段长冯沄；要求吴佩孚、靳云鹏（驻郑州第十四师师长兼警备司令）及豫省当局撤革查办黄殿辰。二、要求路局赔偿开成立大会之损失6000元。三、所有当日在郑州被军警掏留之一切牌额礼物，由郑州地方长官用军队奏乐送还总工会郑州会所。所有占领分会之军队立即撤退，郑州分会匾额重复挂起，一切会中损失由郑州分会开单索偿，并由郑州地方官到郑会道歉。四、要求每星期休息，并照发工资。五、要求阴历年放假一星期，亦照发工资。2月4日，京汉铁路2万多工人遵照总工会的命令举行总同盟罢工。正午12时，全路所有客车、货车、军车、车站、桥梁、工厂、道棚全部停止工作，长达1200余公里的铁路顿时瘫痪。这次罢工的主要领导人是张国焘、罗章龙等。在帝国主义势力的支持下，吴佩孚调动军警在京汉铁路沿线血腥镇压罢工工人。2月5日，靳云鹏在郑州逮捕了郑州分会负责人高彬等，施以重刑，强迫其下令复工。在长辛店，赵继贤贴出告示，以开除全体工人相威胁，限12小时内全路取消罢工。吴佩孚从保定、琉璃河方面调集军队包围长辛店，禁止工人走动。在江岸，湖北督军肖耀南派其参谋长张厚生指挥军警强迫工人开车，并胁迫工会交出京汉铁路总工会和江岸分会的负责人。工会以强硬态度严词拒绝。"非有总工会的命令，决不上工"，成为罢工工人坚守不渝的誓言，表现出中国工人阶级特有的团结性和严密的组织性、纪律性。2月6日，帝国主义驻北京公使团召开紧急会议，议决向北京政府提出严重警告，要求立即采取武力镇压罢工。英国驻汉口总领事也召集肖耀南的代表和外国资本家开会，策划破坏罢工运动。2月7日黎明，长辛店3000余名工人在纠察队副队长葛树贵等带领下，到警察局门前，要求释放被捕工人，遭军警开枪射击，葛树贵等6人壮烈牺牲。同日下午，张厚生派一警官到江岸分会，约定总工会的代表于下午5时半在会所等候谈判。到了约定的时间，肖耀南即令张厚生率两营全副武装的军队，分3路包围了总工会，并开枪射击。当场被打死的有纠察团副团长曾玉良等36人。敌人将京汉铁路总工会江岸分会委员长、共产党员林祥谦（1892—1923，福建闽侯人）捆绑在车站的电线杆上，强迫他下令复工。林祥谦威武不屈，严词拒绝。张厚生气急败坏，命令刽子手朝林祥谦砍了一刀，然后问道："上不上工？"林忍痛大呼："上工要总工会下命令。我的头可断，工不可上的！"张厚生复命又砍一刀，将林祥谦的头割下，挂在车站"示众"。当晚，肖耀南逮捕了武汉工团联合会法律顾问、共产党员施洋（1889—1923，湖北竹山人）。敌人以"煽动工潮"罪，于2月15日将施洋杀害。施洋就义时身中3弹，仍引吭高呼"劳工万岁！"林祥谦、施洋的壮烈牺牲，深深地教育了广大人民，激发了社会舆论对军阀的抨击。京汉

铁路沿线郑州、新乡、正定、保定、高碑店等站工人也遭到军警武力镇压。全路工人被杀害52人，受伤300余人，被捕40余人，被开除流亡在外者有1000余人，工人家属也遭洗劫，造成了二七惨案。随后，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发表《为"二七"惨案告全国工人书》，历数吴佩孚一伙屠杀工人的血腥罪行，号召全国"工人阶级组成一个极大极强的团体，再联合农民商界学界，同心努力，打倒大家的公共敌人军阀，建设真正的民主共和政治来代替军阀政治"。中共中央发表《为吴佩孚惨杀京汉路工告工人阶级与国民》书，号召全国人民和工人阶级团结起来，打倒惨杀工人的军阀吴佩孚、曹锟。全国各地工人和各阶层人民纷纷发表通电，捐款救济，举行游行示威和同情罢工，迅速掀起一个声讨军阀、援助罢工工人的运动。国外侨胞、国际无产阶级和世界革命人民也积极声援。京汉铁路工人罢工坚持到2月9日，为保存革命力量，京汉铁路总工会和武汉工团联合会下令忍痛复工。从1922年1月开始，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工人运动逐渐形成高潮，到1923年2月，前后持续了13个月之久。在此期间，爆发罢工斗争100余次，参加罢工的工人达30万人以上。工人运动的迅猛发展，锻炼了无产阶级队伍，巩固了共产党的阶级基础。京汉铁路工人罢工失败后，各地工会组织除湖南、广东外，大部分被反动军警捣毁或封闭，许多工人领袖被逮捕或杀害。全国工人运动暂时转入低潮。罢工斗争的失败表明，中国工人阶级孤军奋战是不能战胜强大敌人的，必须团结广大农民、城市小资产阶级和资产阶级民主派，建立广泛的反帝反封建的革命统一战线，必须组织人民武装力量，进行武装斗争，才能取得中国革命的胜利。　　（陈绍畴）

中国共产党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召开

1923年6月12日至20日，中国共产党在广州召开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正式确定了与国民党合作的政策。

1922年8月29日至30日，中共中央在杭州西湖举行特别会议，讨论与国民党合作的具体形式问题。会议决定，在孙中山改组国民党，使之成为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的民主革命统一战线组织的条件下，共产党员以个人名义加入国民党。由于党内大多数同志对这种做法存有疑虑，会后，只有陈独秀、李大钊等少数中央领导人加入国民党。1923年1月12日，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根据马林的提议，作出《关于中国共产党与国民党的关系问题的决议》，指出国民党是中国唯一重大的民族革命集团。它既依靠自由资产阶级民主派和小资产阶级，又依靠知识分子和工人。由于国内独立的工人运动尚不强大，由于中国的中心任务是反对帝国主义者及其在中国的封建代理人的国民革命，而且由于这个国民革命问题的解决直接关系到工人阶级的利益，而工人阶级又尚未完全形成为独立的社会力量，所以，中国共产党和国民党合作是必要的，共产党员留在国民党内是适宜的。但是，这不能以取消中国共产党独特的政治面貌为代价。共产党必须保持自己原有的组织和严格集中的领导机构。决议还指出，只要国民党在客观上实行正确的政策，中国共产党就应当在民族革命战线的一切运动中支持它。但是，中国共产党绝对不应当与它合并，也绝对不应当在这些运动中卷起自己原来的旗帜。共产国际的指示，对于促进国共两党合作，建立革命统一战线，起了积极的推动作用。6月12日至20日，中国共产党在广州召开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出席大会的代表30余人，代表党员420人。共产国际代表马林参加了大会。大会的中心议题是讨论全体共产党员加入国民党的问题。大会首先听取了陈独秀代表第二届中央委员会作的工作报告。报告总结了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以来党的工作，着重说明了西湖会议决定全体党员加入国民党，与国民党建立联合战线问题。在大会讨论中，张国焘等反对全体共产党员、特别是产业工人加入国民党，认为那样就会取消共产党的独立性，把工人运动送给国民党。陈独秀等认为共产党和无产阶级现在都很幼弱，还没有形成一个独立的社会力量。因此，全体共产党员、产业工人都应参加国民党，全力进行国民革命；凡是国民革命的工作，都应归于国民党，由国民党组织进行，即所谓"一切工作归国民党"，只有这样，才能增强国民革命的力量。多数代表批评了张国焘等不愿积极与国民党合作的错误意见，也不同意陈独秀等低估共产党和无产阶级的作用，高估国民党和资产阶级的作用的右倾观点。经过讨论，大会接受了共产国际关于同国民党合作的主张，通过了《关于国民运动及国民党问题的议决案》，指出在帝国主义和封建军阀统治下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国，应该以国民革命运动为中心任务，以解除内外压迫。依中国社会的现状，宜有一个势力集中的党为国民革命运动的大本营。中国现有的党，只有国民党比较是一个国民革命的党。议决案认为，以产业落后的原故，中国劳动阶级还在极幼稚时代，多数劳动群众的意识，还停顿在宗法社会，非政治的倾向非

常之重，只有少数产业工人已感觉国民运动之必要，真能了解共产主义及共产党组织的更是少数。工人运动尚未能强大起来成功一个独立的社会势力，以应中国目前革命之需要。因此，中国共产党须与中国国民党合作，共产党员应加入国民党，努力扩大国民党的组织于全中国，使全中国革命分子集中于国民党，以应目前中国国民革命的需要。议决案强调，共产党员加入国民党时，仍旧保存共产党的组织。党必须在政治上、思想上、组织上保持自己的独立性。并指出，拥护工人、农民的自身利益是我们不能一刻遗忘的，对于工人农民的宣传与组织，是我们特殊的责任；引导工人农民参加国民革命，更是我们的中心工作。大会认为，共产党员加入国民党的目的是：一、改组国民党为左翼的政党；二、在中国共产党不能公开活动的地方，扩大国民党；三、把优秀的国民党员吸收到我们党里来。大会还通过了《中国共产党党纲草案》、《关于第三国际第四次大会决议案》、《劳动运动议决案》、《农民问题决议案》、《关于党员入政界的决议案》、《青年运动决议案》、《妇女运动决议案》、《中国共产党中央执行委员会组织法》、《中国共产党第一次修正章程》、《中国共产党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宣言》等文件。大会改选了中央领导机构，选举陈独秀、李大钊、毛泽东、蔡和森、罗章龙、谭平山、王荷波、朱少连、项英为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李汉俊、徐梅坤、邓中夏、邓培、张连光为中央候补执行委员；由陈独秀、毛泽东、蔡和森、谭平山、罗章龙组成中央局（后因谭平山调任驻粤代表，9月初补入王荷波），陈独秀为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长，毛泽东为秘书，罗章龙为会计，负责中央的日常工作。中国共产党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制订了建立革命统一战线，实行国共合作的政策，对第一次国共合作的建立和推动中国革命的发展，具有重大的意义。这次大会的不足之处是没有提出工人阶级应当努力争取对民主革命的领导权的问题。大会认为，中国工人阶级尚未成为一个“独立的社会势力”，“中国国民党应该是国民革命之中心势力，更应该立在国民革命之领袖地位”。大会对国民党内的复杂情况和日后可能发生的变化估计不足，多少种下了后来陈独秀右倾投降主义错误的根子。中共三大闭幕后，收到共产国际5月《给中国共产党第三次代表大会的指示》，其主要内容是：一、中国共产党在进行民族革命的斗争中必须建立工农联盟，实行有利于农民的政策，领导农民进行土地革命，才能取得反帝反封建革命的胜利。二、领导权必须属于工人阶级的政党。加强共产党使其成为无产阶级的群众性政党，把工人阶级的各种力量结合于工会，是共产党员的最重要的任务。对国民党的基本要求应当是无条件地支持工人运动。三、支持孙中山反军阀的内战，同时要求国民党发动以国家的独立、统一和民主为政纲的国民政治运动，以号召广大群众进行反帝反军阀的斗争。在国民党内部要防止孙中山与军阀之间的联盟。为贯彻共产国际这个指示，中共中央于11月24日至25日在上海召开三届一中全会。会议主要讨论如何开展国民运动问题，通过了《国民运动进行计划决议案》。指出国民运动当以扩大国民党的组织及矫正其政治观念为首要工作。要求共产党员在国民党中须努力做到站在国民党中心地位。并指出：我们的同志在国民党中为一秘密组织，一切政治的言论行动，须受本党的指挥。这在实际上体现了在国共合作中争取领导地位的指导思想。12月25日，中共中央发出《第十三号通告》，要求各地方党组织认真执行中共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的决议，再次强调：凡有国民党组织的地方，同志们要立时全体加入；没有国民党组织的地方，望即将同志非同志可以加入国民党的人数及何人可以负责，报告中央局，以便中央局向国民党接洽，请其派人前往成立分部。中共三届一中全会加快了国共合作的步伐。（陈绍畴）

曹锟贿选

直系军阀首领曹锟贿买国会议员选举其为大总统的事件。

1922年直奉战争后，直系军阀曹锟控制了北京政权。他急于取代黎元洪登上总统宝座。1923年6月8日，曹锟雇用流氓组成“公民团”，在天安门前举行“国民大会”，要求黎元洪“即日退位，以让贤路”。6月9日，又唆使冯玉祥、王怀庆率所部中级军官300余人到黎宅索饷，声言冯军要入京，维持秩序。6月13日，黎元洪被迫出走天津，在天津车站被直隶（河北）省长王承斌扣留，勒令黎交出印信。次日，黎交出印信，并发出辞职通电后，始获放行。由于众参两院常会和宪法会议不足法定人数不能成会，曹锟密派专人组织“暗察处”，探员日夜分班尾随、跟踪、监视议员，强迫议员出席会议。同时，大规模地进行贿选活动。在9月10日的总统预选会上，曹锟以每张选票5000元至1万元的高价，贿买议员500多人，以40万元收买了国会议长宋景濂。此次贿选共耗费1300多万元。四川、湖北、浙江、福建、广东、河南、山西等省议员皆未出席会议，但签到者竟达436人。10

月5日，举行北京总统选举会。曹锟派出大批军警宪兵严密监视。出席会议的议员587人，曹锟以480票"当选"为中华民国大总统。这届国会被称为"猪仔"国会，曹锟被称为贿选总统。10月10日，曹锟就职，向众议院提名孙宝琦组阁。接着，制订和颁布了一部《中华民国宪法》，被人们称为"不另取价"的"曹锟宪法"或"贿选宪法"。曹锟的贿选和"制宪"，遭到全国人民的强烈反对。10月8日，孙中山以大元帅名义发布了《讨伐曹锟令》和《通缉惩办受贿附逆的国会议员令》。10月10日，孙中山发表《致外交团请否认曹锟为总统电》，指出曹锟贿选是"文明之国家所认为奇耻大辱"，曹锟之当选总统，是"一种篡窃叛逆行为"，希望各友邦与中国人民一致反对曹锟的贿选。许多省对该省议员接受贿选投票予以声讨，斥责他们为"猪仔"议员，否认其代表身分，有的还宣布开除其省籍。上海20余个团体组织了"双十节国民讨曹游行大会"，数千群众到护军使署请愿，要求"出师讨逆"。传单上印有"下半旗，讨曹锟，诛猪仔，惩政客，打倒万恶军阀"字样。杭州、芜湖的学生组织集会游行，并结队捣毁了当地参与贿选的议员住宅。各地群众以反对曹锟贿选为起点，展开了反对直系军阀的运动。　（周兴旺）

国家主义派的出现

1923年12月2日，曾琦、李璜等在巴黎组织奉行国家主义的中国青年党。

曾琦（1892—1951），四川隆昌人；李璜（1895—1991），四川成都人，都是五四时期少年中国学会的成员。五四运动后赴法国留学。1923年12月2日在巴黎建立中国青年党。1924年9月，曾琦、李璜等回到上海后，与左舜生等会合，青年党的活动中心移到国内。因他们标榜国家主义，人们称之为国家主义派。10月10日，他们在上海创办《醒狮》周报，作为青年党的主要宣传工具，故又称"醒狮派"。为了活动上的方便，青年党于1925年10月成立了中国国家主义青年团，并用这个名义对外公开发展组织。1925年秋冬至1926年上半年，国家主义派的活动曾嚣张一时，先后在湖南、湖北、广东、广西、上海、江西、福建、山东、安徽、四川、云南、贵州、北京、天津、山西等省市建立了30多个小组织，出版了数十种报刊，进行国家主义的宣传和反共活动。1926年7月，中国青年党在上海召开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推选曾琦、李璜、左舜生、陈启天、余家菊、张子柱等7人为中央委员，曾琦为委员长。中国青年党的名称长期保密，直到1929年8月召开第四次全国代表大会时，发表《公开党名宣言》，才正式公开其名称。中国青年党对外依附于帝国主义，对内则投靠有帝国主义支持的当权的反动派。国家主义派抹煞国家的阶级实质，宣扬超阶级的国家观和"国家至上"、"民族至上"的反动资产阶级民族主义思想，鼓吹"全民革命"、"全民政治"、"全民福利"，反对马克思主义的阶级斗争学说，反对无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把攻击的矛头集中地对着中国共产党和社会主义苏联。中国共产党人毛泽东、周恩来、恽代英、瞿秋白、肖楚女等在《中国青年》、《政治周报》等刊物上发表文章，批判国家主义派的反动思想，指出国家主义派是"一个借了反对共产党而干反革命事业的大集合"，是"最反动势力的结晶"。他们高喊"外抗强权，内除国贼"，却不反对帝国主义及其走狗封建军阀，而专门反对中国共产党和苏联，反对最受压迫的工农的解放，"完全成了帝国主义的走狗，中国国民运动的仇敌"，"是极端的反革命派"。经过揭露批判，国家主义派的反动面目日益暴露，影响也逐渐缩小。　（陈绍畴）

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召开

1924年1月20日至30日，孙中山在广州主持召开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

1922年8月，孙中山从广州到达上海后，接受了共产党人的建议，决定改组国民党。9月4日，孙中山召集研究改组国民党的会议。9月6日，他指定包括陈独秀在内的9人为国民党党务改进案起草委员会委员，负责拟订党务改进案和国民党章程草案。11月15日和12月16日，他先后两次召集会议，审议和修改中国国民党改进案。1923年元旦，孙中山发表《中国国民党宣言》和《中国国民党党纲》。2月，孙中山重返广州，建立陆海军大元帅府。10月6日，应孙中山的邀请，苏联代表鲍罗廷（Михаил МарковичВорокин，1884—1951）到达广州，被聘为国民党组织教练员。随后，鲍罗廷与瞿秋白、谭平山等共产党人研究了改组国民党的计划。11月，孙中山发表《中国国民党改组宣言》，提出先由总理委任9人，组织临时中央执行委员会，着手国民党改组工作，筹备召集海内外全党代表会议。年底，中国共产党人李大钊等应邀到广州，帮助孙中山筹备召开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1924年1月20日，大会在广州举行。出席开幕式的代表165人，其中有加入国民党的中国共产党人李大钊、谭平山、林伯渠、张国焘、瞿秋白、毛泽东等23人。大会的主要议

题是改组国民党。孙中山指定胡汉民、汪精卫、林森、谢持、李大钊5人为主席团成员。孙中山致开幕词时指出，这次国民党改组有两件事：一、改组国民党，把国民党改组成一个有力量的政党；二、用政党的力量去改造国家。他要求大家注意历史的教训，以后要团结一致，把自己的聪明才力贡献到党内来。他说，这样全党才能有能力，才能担负革命的大事业，才能够改造国家。同日下午，孙中山作题为《中国之现状及国民党改组问题》的演讲，大会秘书长刘芷芬宣读《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宣言》草案。孙中山指定胡汉民、戴季陶、于树德、李大钊、恩克巴图、叶楚伧、黄季陆、王恒、茅祖权等9人组成宣言审查委员会，收集代表们的意见，审查、修改大会宣言。1月21日，谭平山代表国民党临时中央执行委员会作工作报告。1月23日，大会通过了《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宣言》，孙中山作了《对于中国国民党宣言旨趣的说明》。《宣言》的内容有三部分：一、中国之现状。总结了过去革命斗争的经验教训，指出只有实行国民革命和三民主义才是"中国唯一生路"。二、国民党之主义。这是《宣言》的灵魂和核心。《宣言》重新解释了三民主义，赋予其以新的革命内容。指出国民党的民族主义有两方面的意义，一则中国民族自求解放，免除帝国主义的侵略，使中国民族得自由独立于世界；二则中国境内各民族一律平等，实行民族自决，反对民族压迫。从而突破了旧民族主义中没有提出反对帝国主义的任务这一缺陷。《宣言》指出，近世各国所谓民权制度，往往为资产阶级所专有，成为压迫平民的工具。因此，国民党的民权主义，主张于间接民权之外，复行直接民权，国民"不但有选举权，且兼有创制、复决、罢官"等项权利，民权为国民所享有，为一般平民所共有，非少数人所得而私。凡真正反对帝国主义之个人及团体，均得享有自由及权利；凡卖国罔民以效忠于帝国主义及军阀者，无论其为团体或个人，皆不得享有此等自由及权利。这就使得试图以资产阶级共和国的模式代替封建专制国家的旧民权主义，改变成了建立反帝反封建的各革命阶级联合专政的纲领。《宣言》指出，国民党的民生主义，最重要的原则有两点，一是平均地权；二是节制资本。所谓平均地权，即由国家规定土地法、土地使用法、土地征收法及地价税法。私人所有土地，由地主估价，呈报政府，国家就价征税，并于必要时依报价收买，以防止土地权为少数人所操纵。中国以农立国，而全国各阶级所受痛苦以农民最甚。因此农民之缺乏田地沦为佃户者，国家当给以土地，资其耕作，并为之整顿水利、移殖荒徼，以均田力。8月，孙中山进一步将这一内容概括为"耕者有其田"，使三民主义具有了消灭封建土地制度的新内容。所谓节制资本，即凡本国人及外国人之企业，或具独占的性质，或规模过大为私人之力所不能办者，如银行、铁路、航路之属，由国家经营管理，使私有资本制度不能操纵国民之生计，而以国家资本掌握国计民生的发展方向。《宣言》还强调了工农大众在国民革命中的重要作用，指出只有依靠全国农夫、工人的参加，国民革命运动方可以取胜。要努力吸收工人、农民参加国民党，促进国民革命的进行；要全力扶助工农运动，增进国民革命的实力。三、国民党之政纲。《宣言》阐明国民党的对内对外政策，主要是：取消一切不平等条约；废除军阀政府所借外债；实行地方自治；实行普遍选举制；确定人民有集会、结社等自由权利；改良农村组织，增进农人生活；制定劳工法，改良劳动者的生活状况等。《宣言》重新解释的三民主义，具有鲜明的反帝反封建的内容，使旧三民主义发展为新三民主义。它的各项主张，同中国共产党在民主革命时期的政治纲领基本相同，因而成为国共合作的政治基础和革命统一战线的共同纲领。1月28日，大会通过了《中国国民党总章》，规定全国代表大会常会为最高权力机关，其常设机构为中央执行委员会、中央监察委员会。国民党地方组织为省、县、区党部和区分部4级，其权力机关为各同级党员大会及大会闭会期间的执行委员会。还规定各级党部均由选举产生，确定了各级执行委员会的职责、任期，制定了党的纪律，要求党员严格遵守党章，服从党义，党内问题可以自由讨论，但一经决议后即须一致执行。凡不执行党的决议者、破坏本党章程者、违反党义及党德者，视情节予以处分。基于孙中山在党内所处的地位，专门设立了总理一章，确定以孙中山为国民党总理。总理为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总理对于中央执行委员会之议决，有最后决定权。1月30日上午，大会选举胡汉民、汪精卫、张静江、廖仲恺、李烈钧、居正、戴季陶、林森、柏文蔚、丁惟汾、石瑛、邹鲁、谭延闿、覃振、谭平山、石青阳、熊克武、李大钊、恩克巴图、王法勤、于右任、杨希闵、叶楚伧、于树德等24人为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邵元冲、邓家彦、沈定一、林伯渠、茅祖权、李宗黄、白云梯、张知本、彭素民、毛泽东、傅汝霖、于方舟、张苇村、瞿秋白、张秋白、韩麟符、张国焘等17人为中央候补执行委员。选举中央监察委员5名：邓泽如、吴稚晖、李石曾、张继、谢持；候补中央监察委员5名：蔡元培、许崇智、刘震

寰、樊钟秀、杨庶堪。同日下午,孙中山致闭幕词,指出:这次大会,"是重新来研究国家的现状,重新来解释三民主义,重新来改组国民党的全体。从此以后,大家分散到各地方,便要希望一致奋斗"。1月31日,孙中山主持召开国民党一届一中全会,推定廖仲恺、戴季陶、谭平山为中央执行委员会常务委员,处理日常事务。中央党部设在广州,其组织机构及人选为:秘书处;组织部,部长谭平山,秘书杨匏安;宣传部,部长戴季陶(暂由彭素民代理),秘书刘芦隐;工人部,部长廖仲恺,秘书冯菊坡;农民部,部长林伯渠,秘书彭湃;青年部,部长邹鲁,秘书孙甄陶;妇女部,部长曾醒,秘书唐允恭;军事部,部长许崇智;调查部,部长未定。不久又增设海外部,部长林森。会议还决定在北京、上海、汉口等地组织执行部。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制定了反帝反封建的新三民主义的革命纲领,实行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三大政策,承认了共产党员和社会主义青年团员以个人资格加入国民党,选出了有共产党员参加的中央领导机构,从而使国民党开始成为工人、农民、城市小资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的民族民主革命联盟组织。这次大会标志着第一次国共合作的正式形成,以国共合作为基础的民族民主革命统一战线的建立。（周兴旺）

黄埔军校建立

1924年5月,孙中山在中国共产党和苏联的帮助下,于广州黄埔创办陆军军官学校。

孙中山在长时期内依靠旧军队从事革命活动,屡遭失败,给他留下痛苦的教训。因此,他在改组国民党的同时,决定建立一支"和革命党的奋斗相同的"革命军队。1923年9月,孙中山派以蒋介石为首的代表团访问苏联,学习苏联的建军经验。11月15日,中国国民党临时中央执行委员会第6次会议通过了建立革命义勇军的决议。11月27日,中国国民党临时中央执行委员会第11次会议,议决了建立军官学校的有关事项。1924年1月24日,孙中山以大元帅名义委任蒋介石为陆军军官学校筹备委员会委员长。蒋介石(1887—1975),名中正,浙江奉化人。孙中山还任命邓演达、王柏龄、沈应时、林振雄、俞飞鹏、张家瑞、宋荣昌7人为筹备委员。1月28日,确定以原广东陆军学校和广东海军学校的旧址长洲要塞——黄埔为军官学校的校址,故称黄埔军校。孙中山兼任军校总理。5月3日,任命蒋介石为校长,在总理领导下,负责处理校务工作。5月9日,委任廖仲恺为军校的中国国民党代表。随后,任命李济深为教练部主任,邓演达为副主任兼总队长;王柏龄、叶剑英为教授部正、副主任;戴季陶、周恩来为政治部正、副主任,11月,中共广东区委委员长周恩来接任政治部主任;林振雄为管理部主任;周骏彦、俞飞鹏为军需部正、副主任;宋荣昌、李其芳为军医部正、副主任;何应钦为总教官。11月29日,又增设教育长,由胡谦担任。还聘请布留赫尔(В·К·Сполюхер 在中国化名加伦,Галин,1889—1938)等苏联红军将领为军事顾问。军校筹备工作基本就绪。当时,全国各地前来报考的学生总数达1200余人,其中粤籍学生最多,大大超过了原来的预计。考试成绩达到录取标准的学生大大超过招生名额,故决定扩大招生。5月初,第一期学员录取正式生350名,备取生120名。5月5日,新生开始入学。6月16日,举行开学典礼。孙中山发表演说,着重讲了办学宗旨和办学方针。他说,只有革命党的奋斗,没有革命军的奋斗,革命便不能完全成功。开办这所军校,"就是要从今天起,把革命的事业重新来创造,要用这个学校内的学生做根本,成立革命军"。他号召全体学员努力养成和发扬革命党人以一当百、视死如归的革命精神,为推翻帝国主义和封建统治,完成革命事业而奋斗。军校实行政治与军事并重、理论与实践结合的教育方针,对学生除授以下级干部必需的军事学识外,复授以政治教育,使明了社会经济、政治、历史及主义、党纲、政策等,即不仅知道枪是怎样放法,而且要知道枪向什么人放。为适应革命形势的需要,军校缩短学制,规定学员只受1个月的入伍教育、半年的正式教育。军事教育课程分学科与术科两种。学科由教授部教官讲授《步兵操典》、《射击教范》、《野外勤务》等军事基本知识。继而教以《战术学》、《兵器学》、《筑城学》、《地形学》等4大教程,以及《交通学》、《算制学》、《战术作业》、《实地测图》等军事理论课程。术科由教练部教官负责,对学生施以《制式教练》、《战斗教练》、《野外演习》、《夜间演习》、《实弹射击》等军事技术。从第2期开始,实行分科教学,分设步科、炮科、工科、辎重科及宪兵科等5个科种。后又增设政治科、骑兵科、交通科、无线电科。学员接受严格的教学教育管理,同时还注重斗争实践的锻炼。各期学员分别参加了平定商团叛乱、东征、平定杨(希闵)、刘(震寰)的战役。黄埔军校是一所国共合作的学校。中国共产党曾派周恩来、恽代英、肖楚女、熊雄、聂荣臻等先后到这个学校担任政治工作和其它工作。学员中有很多共产党员和社会主义青年团团员。黄埔军校举办5期共毕业7399人,为革命军队培养了大批

"为主义而奋斗,为主义而牺牲"的军事、政治干部。它对于建立国民革命军、统一广东革命根据地和北伐战争的胜利发展,起了重大作用。　(周兴旺)

农民运动讲习所的设立

1924年7月3日,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为培养农民运动骨干在广州创办农民运动讲习所。

第一次国共合作实现后,在中国共产党的推动下,以孙中山为首的国民党和广东革命政府,对日益开展的农民运动持积极态度,设立了国民党中央农民部。共产党员林伯渠被任命为部长,共产党员彭湃任秘书。彭湃根据自己从事农民运动的经验,深感农民运动的迅速发展迫切需要解决农民运动干部缺乏的问题。1924年6月30日,他向国民党中央提出创办农民运动讲习所的建议。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第39次会议讨论通过了《农民运动第一实施方案》,决定组织农民运动讲习所,每期讲习时间为一个月。并委派彭湃筹办广州农民运动讲习所,由彭湃任主任。第一届广州农民运动讲习所于7月3日正式开学,所址设于广州惠州会馆。学员是来自广东的38名志愿从事农民运动者,其中有共产党员和社会主义青年团员20名。农民运动讲习所的宗旨是"养成农民运动之指导人才","养成冲锋陷阵之战斗员"。彭湃、廖仲恺、谭平山、刘尔嵩等和苏联顾问鲍罗廷都曾给学员讲过课。农讲所注重对学员实际能力的培养,经常组织学员进行军事训练,到社会作调查研究。农民运动讲习所要求学员学习20多门课程,如《帝国主义侵华简史》、《中国民族革命史》、《各国革命史》、《社会学浅说》、《政治经济浅释》、《各国政党状况》、《法律常识》、《中国秘密社会简史》、《每周政治报告》、《农民运动之理论》、《中国农业情形及改良方法》、《农村教育》、《合作运动与农村之关系》、《中国工人运动及工人状况》等,还规定了严格的纪律。第一届农讲所学员于8月21日毕业,共33人。在毕业典礼上,孙中山亲临大会祝贺。这批学员有25人被委任为国民党中央农民部特派员,分赴广东各县开展农运工作,有力地推动了全省农民运动的开展。为了适应正在兴起的农民运动的需要,国民党中央农民部决定继续举办农民运动讲习所,并扩大在全国范围内招生。第二届至五届农民运动讲习所的主任分别由罗绮园、阮啸仙、谭植棠、彭湃担任。1926年5月举办的第六届农民运动讲习所改主任制为所长制,毛泽东任所长。这一期学员来自全国20个省区,共310余人。他们学习了《中国农民问题》、《农村教育》、《地理》等课程。同年9月毕业。6届农民运动讲习所共培养了约800名毕业生,其中很多人成为农民运动和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的领导骨干,对中国革命做出了重大贡献。　(周兴旺)

废除不平等条约运动

1924年7月开展的反对帝国主义、要求废除不平等条约的群众性宣传运动。

1923年9月4日,苏联政府驻华全权代表加拉罕(Лев Махайлович Карахан)在北京发表《第三次对华宣言》,再次表示苏联政府愿意本着尊重中国主权和完全抛弃帝俄侵略所得的特权,同中国政府进行谈判。1924年5月31日,北京政府外交总长顾维钧和加拉罕分别代表各自政府正式签订了《中俄解决悬案大纲协定》。协定规定:苏联政府废除帝俄政府同中国签订的一切不平等条约;放弃帝俄政府在中国境内所得的一切租界等特权;放弃庚子赔款;取消治外法权和领事裁判权;取消中东铁路方面除商务以外的一切特权。这是鸦片战争以来中国外交史上的第一个平等条约,受到了中国人民的热烈欢迎。6月6日,北京各界在中央公园召开数万人参加的庆祝大会。大会发出致苏联的贺电。6月7日,北京学生联合会在北京大学三院开庆祝会,到会3000多人。上海、长沙等地市民也召开庆祝会或发出通电表示祝贺。北京国会议员也有135人联名发表拥护中苏协定的宣言。6月中旬,北京公使团借口维护《辛丑条约》,拒不将其代管的俄国使馆交还苏联,以图阻止中俄协定的实施。这件事深深刺激了中国人民的民族感情。于是由一批爱国的知识分子和国会议员发起,开展了一个废除一切不平等条约的运动。7月,《向导》发表文章明确地说:废约运动即是民族独立运动,国际间不平等条约不废除,中国是不会独立的。7月9日,北京学生联合会、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等10余个团体,和国会议员胡鄂公(共产党员)、雷殷等150余人,联合组成北京反帝国主义运动大同盟。短短几天,北京就有50多个团体参加。7月13日,这些团体的代表和各界人士230多人,在中央公园举行反帝国主义运动大同盟成立大会,宣布其宗旨是:一、扑灭帝国主义的侵略政策,废除压迫中国弱小民族所订的一切不平等条约;二、联络一切愿意参加反帝国主义工作的同志;三、只从事反帝国主义事业,其他任何事务概不与闻;四、反对帝国主义的走狗和汉奸。大会选举胡鄂公、雷殷、王文璞等15人为执行委员,负责大同盟的日常工作。7月18日,北

京8所专科以上学校教职员举行联席会议，响应反帝大同盟的号召，发表宣言要求废除一切不平等条约。上海、天津、武汉、济南、广州、杭州、湖南、四川等地相继成立反帝大同盟，开展废除不平等条约运动。9月3日至9日，由反帝运动大同盟发起全国性反帝运动周。由于9月7日为《辛丑条约》签订23周年，大同盟以这一天为国耻纪念日，以激发民众的民族自尊心，进行反帝废约宣传，全国各地召开了群众大会，反帝运动形成了高潮。（周兴旺）

江浙战争

1924年9月3日至10月13日，江苏直系军阀齐燮元和浙江皖系军阀卢永祥在江浙地区进行的军阀战争，又称齐卢之战。

第一次直奉战争后，直系军阀控制了北京中央政权，美、英等国在华势力增长，日本在华势力削弱。但日本仍加紧扶助在东北整军备战的奉系军阀，同时，积极联络孙中山、段祺瑞、张作霖结成反直三角同盟。另外，扶持时任浙江督军的皖系军阀卢永祥（1867—1933，山东济阳人），以对抗在美国势力控制下的时任江苏督军兼苏皖赣三省巡阅使的直系军阀齐燮元（1879—1946，天津人）。江苏原是齐燮元的地盘，但江苏境内的上海却为卢永祥所控制，齐燮元十分不满。在直皖战争和第一次直奉战争期间，齐、卢就曾为争夺上海而不断发生冲突。1922年9月，皖系军阀徐树铮联合孙中山部属许崇智、陆军第二十四混成旅旅长王永泉驱走背皖附直的福建督军李厚基。1923年3月，孙传芳任福建督理，福建重为直系势力所控制。1924年5月，北京政府为进图广东，任直系周荫人为福建督理，孙传芳为闽粤边防督办。因广东不易深入，孙便谋向浙江扩张势力。而被孙传芳、周荫人从福建逐出的闽军臧致平、杨化昭部由江西退入浙江，被卢永祥收编为浙江边防军，卢永祥的实力大增，引起控制苏、皖、赣、闽4省的直系势力的不安。于是齐燮元联合江西、福建、安徽3省军阀强迫卢永祥解散臧、杨两部，并电请曹锟下令讨伐卢永祥。8月间，双方积极备战。9月3日，齐军向卢军进攻，江浙战争爆发。卢永祥则联合其部属淞沪镇守使何丰林，以所部第十师及陈乐山第四师及臧致平、杨化昭等部共9.1万人，组成浙沪联军抗击。齐燮元方面拥兵8.1万人，以朱熙率第十九师驻防沪宁前线，宫邦铎率一混成旅进驻镇江、丹阳一带，马玉仁部由淮阴调驻南通，威胁吴淞，白宝山部驻守海州待命；齐燮元亲率第六师及吴佩孚派来的张允明混成旅和王桂林的武装警察，坐镇南京至溧阳一带；另外还有闽、浙、皖各路援军，实力大大超过卢永祥。战争开始时，浙军进展比较顺利，但它三面受敌，孤立无援。双方在嘉定、黄渡、太仓、浏河一带相峙。时孙传芳以谢鸿勋为入浙前敌总司令、孟昭月为预备队总司令，率所部由福建向浙江进兵。防守江山一带的浙军潘国纲部投降孙传芳，引孙部长驱直入攻打杭州，浙江省警务处长夏超等起为内应，卢永祥被迫将浙沪联军总司令部移驻龙华，将兵力集中于松江、上海一带继续作战。在孙传芳、齐燮元两部钳形攻势下，湖州、吴淞、上海告急，嘉兴、松江相继失守，而皖、奉两系援军又无法及时赶到，卢部处于不利地位。卢永祥被迫于10月13日通电下野，偕同何丰林等逃亡日本。江浙战争遂告结束。北京政府下令免除卢永祥浙江督办职务，任命孙传芳为浙江督办兼闽浙巡阅使，夏超为浙江省省长。卢部约5个师人马为孙传芳收编。

（周兴旺）

第二次直奉战争

1924年9月17日至11月5日，直系军阀曹锟和奉系军阀张作霖在朝阳、山海关地区进行的军阀战争。

1924年9月3日江浙战争爆发后，在第一次直奉战争中失败的奉系军阀张作霖，于4日发出援助结盟的浙江督办卢永祥的通电，向直系宣战。奉军编为6个军，共约17万人。9月15日，向山海关和热河方向进兵，突袭朝阳。曹锟电召吴佩孚进京商议对策。9月17日，曹锟下令讨伐张作霖，并任命吴佩孚为讨逆军总司令。直奉两军在朝阳和山海关一带交战，第二次直奉战争爆发。9月18日，吴佩孚发布作战命令，任命彭寿莘、王怀庆、冯玉祥分别为第一、第二、第三军总司令，分别出山海关、喜峰口、古北口迎击，并以曹瑛、胡景翼所部为应援部队，兵力共25万人。直军在山海关一线守备力量较强。9月下旬至10月上旬，山海关附近战斗激烈，吴佩孚赶往滦州（滦县）亲自督战，奉军张学良、郭松龄部奋力作战。战争初期，奉军在热河方面进展顺利，9月22日占领开鲁、朝阳。随后攻克凌源、平泉。10月6日，攻克九门口，进抵石门寨。次日，奉军骑兵攻占赤峰。直军渐有不支之势。这时，被派往热河方面作战的直系将领冯玉祥因与奉系达成共同推翻曹、吴的协议，乘吴去山海关督战转而南下退至冷口关。10月23日，冯玉祥倒戈回师，发动北京政变，囚禁曹锟。直奉战争形势急转直下。吴佩孚匆忙率部七八千人于10月26日

从山海关回救北京。留驻山海关的直系主力部队军心发生动摇。奉军趁势全线出击,断绝了直军的后方通路,将其包围在山海关和秦皇岛之间。10月31日,山海关地区战斗结束,直军官兵除重要将领从秦皇岛乘船逃回天津外,其余全部被俘。吴佩孚率兵抵天津后,将军队集中于北仓、杨村、军粮城一线,并致电江苏、浙江、湖北、河南等省求援,准备先平定冯玉祥部队,再讨伐张作霖。皖系山东督军郑士琦于11月1日宣布独立,随即出兵沧州、马厂,并派部队南下炸毁了津浦路韩庄附近的铁路。同日,山西阎锡山也宣布中立,并出兵石家庄,切断了京汉路的交通。这样,吴佩孚期待的京汉、津浦两路援军被阻挡,无法前进。11月2日,冯玉祥所部攻占杨村和北仓,吴佩孚被迫将总部撤至军粮城。此时奉军西进部队攻入冷口,占领滦州,到达唐山和芦台附近,直军主力覆灭。吴佩孚的援兵和退路均被堵截。在奉军和国民军的夹击下,他不得不于11月5日率其残部约3000人登上装甲运输舰南逃长江流域,徐图再起。第二次直奉战争至此结束。直系在战争中惨败,是其反动统治倒行逆施及其内部矛盾不断加深的结果。

(周兴旺)

平定商团叛乱

1924年10月14日,广东革命军镇压大买办陈廉伯控制的反革命武装组织——商团的事件。

1924年,英帝国主义用大量金钱和军火支持广州大买办陈廉伯所控制的反革命武装组织——商团,企图颠覆广东革命政府。5月,广州市政府财政局决定征收铺底捐,广州商人拒绝缴纳并酝酿罢市。经调停,市政府决定取消这项捐税,总罢市风潮得以平息。5月28日,商团各分团代表秘密聚会,决定组织商团联防总部。7、8月间,商团联防总部总长陈廉伯向英商南利洋行购买了总价值约100万元的长短枪近1万支、各种子弹300多万发,偷运广州,企图组织武装叛乱。8月10日,军火被广东革命政府查获扣留。陈廉伯潜逃香港,指使商团党羽1000余人包围孙中山的大本营,强求政府无条件发还枪械,并以"中华民国政治定国军"的名义,通电全省各县商团,要他们行动起来,驱逐县长,宣告独立。8月27日,商团以武力强迫商人罢市。商团军沿街散发反革命传单,撕毁政府张贴的布告,气焰嚣张。次日,英舰集中于白鹅潭,将炮口对准中国"永丰"号、"广贞"号军舰及大元帅府。8月29日,英国驻广州总领事翟比南蛮横地宣称:若广州商团遭政府攻击,英国海军即以全力对付。驻广州的滇军第二军军长范石生、第二师师长廖行超等和商团沆瀣一气,向广州政府施加压力。9月初,孙中山赴韶关统率北伐,以与奉、皖配合进行反直战争。代理大元帅胡汉民与商团密谋妥协,步步退让。10月9日,商团发出第二次罢市通牒,胡汉民向商团发还了枪支。10月10日,广州市民为纪念辛亥革命13周年举行游行,竟遭到商团军射击,被打死20余人,伤100余人。参加游行的16个团体成立了工农兵学革命大同盟,发表宣言,坚决要求解散商团,严惩凶手。商团军四处张贴反动标语,在市内构筑炮台,封锁市区,举行武装叛乱。这时盘踞在东江的陈炯明配合商团,准备进攻广州。孙中山在广大工农群众的支持下和中国共产党及国民党左派的帮助下,采取断然措施,令北伐部队回师广州肃清叛乱,成立了指挥机关——革命委员会,亲自担任会长,指派廖仲恺、谭平山为全权委员。命令胡汉民解散商团,勒令商团军缴械;警卫军及湘、粤军各一部,连夜赶回广州戡乱。10月14日晚,商团军布满在政府机关周围,并开枪射击。10月15日凌晨,革命委员会下达总攻击令。警卫军、黄埔学生军、工团军、农民自卫军以及粤、湘、桂、赣军纷纷投入战斗,分5路包围商团大本营——西关。是日上午,西关商团全线瓦解,各地商团也都被迫缴械。平定商团叛乱粉碎了英帝国主义及其走狗颠覆中国革命的阴谋,为以后国民革命军统一广东创造了条件。

(周兴旺)

北京政变

1924年10月23日,直系将领冯玉祥倒戈回师北京,囚禁贿选总统曹锟、发动政变的事件。

冯玉祥(1882—1948),字焕章,安徽巢县人。曾任北洋陆军第十一师师长、陕西督军。第一次直奉战争后任河南督军。1922年11月,北京政府依照直系吴佩孚的愿望,调冯为陆军检阅使,移驻北京。冯在部队编制、军饷方面受到吴的排挤。冯吴矛盾激化。在中国革命高潮推动下开始倾向革命的冯玉祥暗中同对吴不满的直系将领王承斌、胡景翼、孙岳结成同盟。第二次直奉战争爆发后,吴佩孚令冯玉祥率部赴热河迎击奉军。10月13日,冯部在热河前线与奉军达成联合反直协议,即奉方同意事成后请孙中山北上主持国家大计,奉军不入关;冯方许诺热河方面军事行动从缓,以便奉系抽出兵力加强山海关方面的主攻力量。10月19日,冯玉祥率部由古北口兼程回北京。10月23日晨2时许,冯军占领北京各要地,

包围总统府，囚禁了曹锟。当日，冯玉祥、胡景翼、孙岳和热河都统米振标及所属师旅长联名通电，同奉军停战。10 月 24 日，曹锟被迫下令前敌停战和解除吴佩孚的职务。北京政变后，冯玉祥于 10 月 25 日在北苑召开军事政治会议，议定将冯、胡、孙所部组成中华民国国民军，辖 3 个军，公推冯玉祥为总司令兼第一军军长，胡景翼、孙岳为副总司令，分别兼任第二军、第三军军长，决定在北京组织国民军联合办事处和总军法处。10 月 28 日，冯玉祥、胡景翼、孙岳联名通电，提出速开和平统一会议的主张。10 月 31 日，曹锟批准颜惠庆内阁辞职，任命黄郛代理国务总理。11 月 2 日，曹锟被迫自辞大总统职务，由黄郛摄行大总统职务。11 月 4 日，冯玉祥授意摄政内阁会议通过《修正清室优待条件》，规定清室宣统皇帝即日起永远废除皇帝尊号，与中华民国国民在法律上享有同等权利；清室移出宫禁。次日，宣统皇帝溥仪在北京警备司令鹿钟麟监督下迁出故宫。冯玉祥控制了北京，直系在北方的势力被击溃。国民军先后占领了河南、陕西等省，奉军则乘机南下占领了山东、安徽、江苏等省。时张作霖违背奉军不入关的允诺，冯奉两派矛盾突出起来。冯玉祥考虑到长江流域的直系势力还可能北上，为争取皖系山东督理郑士琦阻截直系援军，于 11 月间在天津同张作霖会晤，同意由段祺瑞出来组织临时执政府。11 月 21 日，段祺瑞就任临时执政，宣布召集善后会议，解决时局纠纷，附带筹备建设方案。在这个政府中，存在着国民军、奉系、皖系的尖锐复杂的斗争，段、张都是日本帝国主义在中国的工具，较为接近，冯玉祥一派孤立，渐被排斥。1925 年 1 月，段祺瑞撤销了国民军的名义，冯玉祥被派往张家口任西北边防督办。

（周兴旺）

国民会议运动

1924 年 11 月，孙中山接受中国共产党提出的召开国民会议的口号，在全国范围内形成以此为内容的人民运动。

1923 年 7 月，中国共产党在《中共中央第二次对于时局的主张》中提出召开国民会议的政治主张。1924 年 11 月 10 日，孙中山发表《北上宣言》，主张对内推倒军阀，对外推倒帝国主义，废除不平等条约，并召集国民会议来解决这些问题。11 月 19 日，中共中央发表《第四次对于时局的主张》，重申召开国民会议的主张，希望国民党努力号召全国人民团体，促成召开国民会议；在国民会议产生的正式政府未成立前，以国民会议预备会为号令全国的唯一政府，以代替北洋军阀的反动统治。同时还提出废除一切不平等条约等 13 项最低限度的要求。中国共产党人在解释这一主张时，明确地谈到这是为彻底的国民革命而准备自己的力量。中国共产党的这一号召，得到全国人民的响应和孙中山的积极支持。11 月中旬，孙中山在应段祺瑞、冯玉祥、张作霖的邀请北上途中，先后两次就派遣宣传员问题对 13 个省区的军民长官发出通电，要求对宣传员惠予接洽。国民党中央根据孙中山的指示，派出宣传员与各省区人民团体联系，发动各阶层人民投入国民会议运动。孙中山抵达上海时，中共中央要求各地党组织联络各人民团体，组织国民会议促成会，尽量吸收广大劳动群众和中小商人参加，使之成为有广泛代表性的群众团体。声势浩大的国民会议运动蓬勃兴起。12 月 26 日，上海机器工人俱乐部、劳工青年会、全国学生总会、上海平民教育研究社等 27 个工团代表发起组织国民会议促成会，并成立了筹备会。12 月 29 日，该会发出通电，发起组织全国国民会议促成会。湖南、湖北、江西、福建、安徽、山东、热河和汉口、徐州、广州、天津、保定、济南、青岛、石家庄、太原、张家口、厦门、宁波、北京、九江、吉安、三原、南京、长沙等地先后成立了国民会议促成会。上海、杭州、天津、北京等地还成立了女界国民会议促成会。随后，各地国民会议促成会和各人民团体积极开展各种宣传活动。为了解决直系军阀政权被推翻后中央权力的分赃问题，临时执政段祺瑞于 1925 年 2 月召集有各地军阀、政客、前清遗老、趋炎附势的学者参加的善后会议，对抗孙中山号召的国民会议。中国共产党积极领导各地群众举行游行示威和集会，声讨段祺瑞的倒行逆施。各地国民会议促成会发表通电、宣言，指责善后会议“纯为分赃式的会议，只代表军阀、官僚和帝国主义之利益”。3 月 1 日，国民会议促成会全国代表大会在北京召开，到会代表 229 人，列席代表 100 余人，代表了 20 多个省、120 多个地方的国民会议促成会。大会的宗旨是：“组织民众，宣传民众，武装民众，向掠夺和压迫阶级手中夺回人民的自由和自己建设独立之国家。”大会揭露了段祺瑞企图通过善后会议来巩固其独裁统治的阴谋，提出各阶层人民反对军阀独裁统治、实现民主政治的共同要求。国民会议运动对于组织、引导人民群众参加政治斗争起了积极作用。

（周兴旺）

孙中山北上

1924年11月，孙中山由广州到北京，谋求和平统一，召集国民会议的事件。

1924年10月北京政变后，冯玉祥等电请孙中山赴北京共商国是，控制北京政府的段祺瑞、张作霖也发了表示欢迎的电文。10月30日，孙中山从广东韶关前线返回广州，当即召集军政会议讨论应付北方时局的方针和办法。11月4日，孙中山发布大元帅令，命令大本营总参议胡汉民留守广州，代行大元帅职权；建国军北伐总司令谭延闿驻守韶关，全权办理大本营有关北伐事宜。同时为北上事通告市民，指出北京政变后“余孽未靖，固当悉予扫除，而根本之图，尤在速谋统一，以从事建设”。为此，“决定即日北上，共筹统一建设之方略”。11月10日，孙中山发表《北上宣言》，主张对内推倒军阀，使曹、吴覆灭之后永无继起之人；对外要推倒军阀赖以生存的帝国主义，废除不平等条约。孙中山接受中国共产党提出的召集国民会议的口号，号召召集有各人民团体及反对曹、吴的各军及各政党的代表参加的国民会议，共同解决中国的统一和建设问题；在召集国民会议之前，先召集一个预备会议。孙中山还宣布决不与北方军阀妥协，号召全国人民支持他的斗争。这个宣言受到全国人民的欢迎。11月13日，孙中山同宋庆龄等离开广州北上，经香港赴上海。11月17日，孙中山受到万余群众的热烈欢迎。孙中山广泛会见各界人士宣传其北上的主张，他说只有打破军阀及其后台帝国主义，中国才可以和平统一，才可以长治久安。11月21日，孙中山乘“上海丸”号日轮离沪取道日本赴天津。在日本停留的8天时间内，孙中山一再表明他反对帝国主义的立场。他指出，对于西方帝国主义者不能存在幻想。我们要完全收回自己的权利，只有诉诸武力。12月4日，孙中山抵达天津，受到2万多群众的热烈欢迎。中共北京地委书记赵世炎也前往迎接，并在群众欢迎会上讲了话。当晚，孙中山肝病发作，留在天津治疗，但仍在病榻上处理公文、接见客人，为实现其政治主张而努力。12月5日，他在卧室同来访的张作霖、卢永祥等晤谈。12月18日，接见段祺瑞的代表叶恭绰、许世英时，怒斥了段政府关于尊重一切不平等条约的主张。12月31日，孙中山扶病入京，受到北京各界群众10万人的盛大欢迎。他在火车站发表书面谈话，指出中国人民的自由平等，已被清朝政府从不平等条约里卖与各国了，以致我们仍然处于次殖民地的地位，所以我们一定要救国；这次来京不是为争地位，不是为争权利，是为特来与诸君救国的。1925年1月17日，孙中山在复段祺瑞电中，要求善后会议容纳人民团体代表，指出会议虽可涉及军政财政，但最后决定权应归国民会议，目的是“令人民回复主人之地位”。1月26日，孙中山的病情恶化，入协和医院手术治疗，确诊为肝癌。经多方医治无效，于3月12日在北京东城铁狮子胡同5号寓所病逝。

（周兴旺）

中国共产党第四次全国代表大会召开

1925年1月11日至22日中国共产党在上海召开第四次全国代表大会。出席会议代表20人，代表党员994人。共产国际代表维经斯基参加了大会。大会由陈独秀主持，并代表第三届中央执行委员会作工作报告；维经斯基作关于世界共产主义运动状况的报告；彭述之代表中共出席共产国际第五次代表大会代表团传达了“五大”的决议。大会的中心议题是讨论加强党对日益高涨的革命运动的领导。大会分析了国际国内形势，总结了一年来国共合作的经验教训，通过了《中国共产党第四次全国代表大会宣言》、《对于出席共产国际第五次代表大会报告之议决案》、《对于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代表报告世界共产主义运动状况之议决案》、《对于民族革命运动之议决案》、《对于职工运动之议决案》、《对于农民运动之议决案》、《对于青年运动之议决案》、《对于妇女运动之议决案》、《对于宣传工作之议决案》、《对于组织问题之议决案》等11个文件。大会号召全国人民积极参加国民会议运动。指出目前国内正处在旧统治军阀倒台、新统治军阀尚未能巩固自己势力的时期，各帝国主义国家企图利用这种形势操纵军阀间的战争，以膨胀他们各自在华的势力。革命势力应抓紧时机，在全国范围内广泛开展国民会议运动，把革命引向高潮。大会突出地从理论上阐明无产阶级在民族革命运动中的地位问题。指出中国资产阶级的民族运动，虽然有了多年的历史，但总逃不脱妥协、失败的命运。中国无产阶级在客观上的力量虽还幼稚，但其革命要求及决战心理，已使他们“在最近中国民族运动中，已站在最前进的地位”。因此，“中国的民族革命运动，必须最革命的无产阶级有力的参加，并且取得领导的地位，才能够得到胜利”。大会还指出农民“天然是工人阶级之同盟者”，工农联盟是实现无产阶级对民主革命的领导权和夺取民主革命胜利的保证。由于中国经济落后，中国农民占全国人

口80%，所以农民问题在中国尤其在民族革命时代的中国，是特别的重要。中国共产党与工人阶级要领导中国革命成功，必须尽可能地、系统地组织农民逐渐从事经济和政治的斗争。没有这种努力，希望中国革命成功是不可能的。大会明确指出，在反对国际帝国主义的同时，既要反对封建的军阀政治，“反对封建的经济关系”，还要“反对帝国主义工具之买办阶级”。大会指出，无产阶级在民族革命运动中既要反对“左”的倾向，也要反对右的倾向。目前更危险、更普遍的是右倾错误。强调共产党要在国民党内和党外坚持彻底的民主革命纲领，保持自己的独立性，在思想上、组织上和民众宣传上扩大左派、争取中派、反对右派，既帮助国民党在实际运动和组织上发展，又加紧同国民党内的妥协倾向作斗争。大会决定在全国范围内建立和健全党的组织，加强党对工人、农民、青年、妇女运动的领导。大会选出新的中央执行委员会，陈独秀、李大钊、瞿秋白、蔡和森、张国焘、彭述之、谭平山、李维汉、项英为中央执行委员，邓培、王荷波、张太雷、罗章龙等为中央候补执行委员。中央执行委员会选举陈独秀、张国焘、彭述之、蔡和森、瞿秋白组成中央局，陈独秀为总书记。中共四大突出的历史功绩是明确提出无产阶级在民族民主革命中的领导权问题和工农联盟问题，并对中国民主革命的内容作了更加完整的规定。不足之处是对如何实现无产阶级的领导权，特别是如何处理在同资产阶级争夺领导权中的种种复杂问题，对政权和武装问题的极端重要性，仍缺乏足够的认识。（周兴旺）

五卅运动

1925年5月30日爆发的全国规模的反对帝国主义的爱国运动。

1925年1月，中国共产党第四次全国代表大会后，全国工人运动逐渐复兴，并开始走向新的高涨。2月，上海发生日商内外棉第八厂日本监工殴打中国女工事件。蔡和森、邓中夏、李立三及中共上海地委领导22个日商纱厂4万多工人举行罢工。4月，青岛日商纱厂1万多工人为要求资方承认工会举行大罢工，遭到日本帝国主义和北洋军阀的镇压。上海日资纱厂的日本资本家利用棉价升高、纱市清淡时机，撕毁了2月罢工所签订的协议，减低、克扣工人工资，拖延工资发放时间，随意打骂工人。5月15日，上海内外棉第七厂日本资本家突然宣布关闭工厂。当晚，五六百名工人冲进工厂，要求复工和发给工资。内外棉厂副总大班（相当于厂长）元木、七厂大班川树，率领打手枪杀了中国工人顾正红，打伤工人数十人。次日，沪西内外棉第五、第七、第八、第十二厂约7000名工人罢工反抗。中国共产党通过上海国民会议男女两界促成会、印刷工人联合会、学生联合总会、店员联合会、沪北工商学会、天潼福德两路商联会等35个团体，组织了“日人残杀同胞雪耻会”，发宣言，散传单，谴责日本资本家残杀中国工人的暴行。上海学生联合会组织文治大学、上海大学等校学生开展募捐救济、追悼死难工人的活动。帝国主义者严禁工人在租界活动，并决定对那些援助工人的学生采取行动。5月23日，文治大学两名学生上街募捐时被捕；次日，上海大学学生结队前往潭子湾参加有1万多人参加的顾正红追悼会，路过租界时4人被捕。租界当局还准备于5月30日在会审公廨（租界内特有的审判机关）以“扰乱治安”的罪名对被捕学生进行公开审讯。这时，上海纳税人大会准备于6月2日通过上海公共租界工部局提出的增订印刷附律、增加码头捐、交易所注册、“取缔童工”等4项提案。“印刷附律”案规定各类印刷品须向工部局登记方准出版，否则处以罚款。“增加码头捐”案规定向华人所抽的码头捐由3%增加到5%。“交易所注册”案规定，凡中国人在租界内开设交易所，要到工部局缴款注册，否则不许营业。所谓“取缔童工法”案，只是禁止雇用10岁以下的童工，4年以后禁用12岁以下的童工，并规定童工每天工作12小时，照例要做夜工。这根本不是取缔雇用童工，而是使雇用10岁以上的童工合法化。中国的工商业者由于雇用了较多的童工，从其本身利益出发而反对这一提案。这4个提案，损害了中国主权和中国工商业者的利益，进一步激起了工人、学生和民族资产阶级的愤怒。5月27日，负责全国学联和上海学联工作的共产党人恽代英，召集上海大学、文治大学、大夏大学等校学生代表开会。会议决定：一、通过传单和露天演讲，向公众说明罢工真相。二、募捐援助罢工工人。三、设法营救被捕学生。同日，大夏大学、南洋大学等60余团体的代表800余人开会，讨论营救被捕学生的办法。会议决定提出组织上海各团体救援被捕学生联合会；出版特刊，组织演讲队；反对工部局增加码头捐、增订印刷附律、交易所注册等3提案。5月28日，中共中央召开紧急会议，决定以反对帝国主义屠杀中国工人为中心口号，发动学生和工人于5月30日在上海租界内举行反帝示威。会议作出决议：一、分头向各校负责人谈话。二、向学校宣传，并派工人同去。三、印行传单——包括揭露外人侵略一切事实。四、

上街演讲示威。中共中央还决定，为加强工会的组织力量，由共产党人李立三、刘华等主持，成立上海总工会。随后，中华全国总工会副委员长刘少奇抵达上海，也参加了上海总工会的领导。上海总工会的成立，标志着上海工人运动从分散的状态开始转向集中的有组织的活动。5月30日，在上海学联的指挥下，上海学生2000多人分头在公共租界各马路散发传单、宣传讲演，揭露日本资本家枪杀顾正红、逮捕工人和学生的罪行。是时，南京路自英华街以西至西藏路一带，"人如蚁聚，驱之不散"。100余名学生遭巡捕（租界内的警察）的逮捕，被拘押在南京路老闸巡捕房内，引起了学生和市民的极大愤慨。有近万人聚集在巡捕房门口，要求释放被捕学生。英国巡捕以警棍驱赶、殴打群众，群众坚不退却。下午3时许，巡捕向群众开枪，打死10余人，伤几十人。这就是震惊中外的五卅惨案。当晚，中共中央召开紧急会议，决定组织行动委员会，建立各阶级的统一战线，发动工人罢工、学生罢课、商人罢市，一致反对帝国主义屠杀中国人民，组织全上海的反帝大运动。6月1日，上海总工会公开成立，李立三任委员长，刘华任副委员长并发表宣言及告全体工友书，声讨帝国主义屠杀中国人民的暴行，宣布全市举行总同盟罢工。从6月2日开始，20余万工人相继罢工，5万多学生举行罢课，绝大多数商人罢市，半数左右的华籍巡捕也实行了罢岗。6月4日，上海总工会联合上海各路商界总联合会、全国学生联合会、上海学生联合会建立了统一战线性质的上海工商学联合会，作为反帝运动的公开指挥机关。6月11日，工商学联合会主持召开了有20万人参加的市民大会，通过了向帝国主义交涉的17项条件。主要内容是：惩办凶手；赔偿损失；中国人民在租界有言论、出版、集会的自由；撤退驻华之英、日军队；取消领事裁判权等。中国人民反帝斗争迅速由上海扩展到各地，形成了全国规模的反帝爱国运动。中共北方区委领导北京民众举行示威游行和国民大会。天津、唐山等地工人罢工、学生罢课。邓恩铭等领导成立了青岛市沪青惨案后援会，召开市民大会抗议帝国主义暴行。在武汉，陈潭秋、董必武领导学生罢课、工人罢工，声援上海工人斗争。据不完全统计，全国约有五六百个县市的1700多万群众直接参加了这场反帝斗争。其中以苏兆征、邓中夏领导的省港罢工规模最大、时间最长。海外侨胞也进行了示威游行和募捐活动，支援国内民众斗争。中国人民的反帝斗争得到了世界各国人民的广泛同情和支持。上海三罢斗争给帝国主义严重打击，英、日两国银行的纸币在市场上被拒绝使用，报纸停止刊登英、日商品的广告，仅太古、怡和（英商）、日清（日商）3家轮船公司，就因船员罢工而每天损失营业额4.1万多元。帝国主义和军阀对上海人民反帝斗争继续采取镇压政策。从5月30日至6月10日，英、日帝国主义杀害中国民众60余人，重伤70余人。奉系军阀、淞沪戒严司令邢士廉下令宣布上海戒严，禁止民众集会、结社和游行示威。9月18日，封闭了上海总工会，通缉上海总工会委员长李立三。同时，他们采取分化瓦解的策略，对资产阶级即以"司法调查"、"关税会议"进行诱惑，又以停止借款、通汇、运输和电力供应相威胁。6月19日，上海总商会宣布于6月26日单独提前开市。总商会另组"五卅事件委员会"，将17项交涉条件修改为13条，删掉取消领事裁判权、撤退英日驻军、承认工人有组织工会及罢工的自由等项内容。不久，学校开始放暑假，学生纷纷离校。鉴于这种情况，中国共产党决定改变工人斗争的策略，由总罢工改为经济斗争和局部解决。8月10日，上海总工会发表宣言，提出9项复工条件：一、无条件交回上海会审公廨；二、租界内出版、言论、集会、结社之自由；三、租界华人须与外人有同等参政权利；四、承认工人有自由组织工会之权，并承认工会有代表工人之权；五、工人全体上工，不得因此次罢工开除工人；六、发给罢工期内工资50%；七、增加工资15%，工资一律发给大洋；八、优待工人，尤须改善女工、童工工作条件；九、赔偿死伤学生、工人。在英、日资本家先后答应"承认中国政府颁布工会条例所组织之工会"、对罢工工人在生活上予以相当之帮助、酌加工资、不得无故开除工人等条件后，各业罢工工人从8月底到9月上旬陆续复工。五卅运动显示了工人阶级的领导力量和革命统一战线的作用，提高了中国人民的觉悟，标志全国革命高潮的到来。

（周兴旺）

省港大罢工

1925年6月19日开始，广州和香港工人为声援上海人民反帝斗争而举行政治大罢工。

1925年五卅惨案发生后，6月2日，广州工人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举行游行示威表示对上海民众的支持，并决定待革命军平定滇系、桂系军阀杨希闵、刘震寰后，立即举行大罢工。6月上旬，中国共产党派中华全国总工会秘书长兼宣传部部长邓中夏等人赴香港，与苏兆征一起组织发动香港工人罢工；派李启汉、刘尔崧等发动广州沙面洋务工人罢工。6月13

日中华全国总工会为组织省港罢工委员会发表启事，并于广州设立省港罢工委员会临时办事处。6月15日，中共广东区委发表《告广东人民书》，号召广东各界一致行动，与上海工人阶级共同进行反对帝国主义的斗争。香港工人团体组成了以苏兆征为主席，邓中夏为副主席、总顾问的全港工团联合会。6月中旬，邓中夏召集香港各工会举行全港工团联席会议，决定举行大罢工，发表罢工宣言。会后各工会联名致函港英当局申明罢工理由，表示拥护上海工商学联合会提出的17项交涉条件；并针对英帝国主义在香港奉行的歧视华人的政策，提出了政治自由、法律平等、普遍选举、劳动立法、减少房租、居住自由等6项要求。6月19日，海员、电车、印刷业工人首先举行罢工，码头、洋务、煤炭、建筑及服务业工人相继响应。罢工宣言中提出，要“与帝国主义决一死战”。英帝国主义走狗把持下的机器工会的工人，也冲破阻挠，宣布罢工。港英当局事先知悉工人酝酿罢工，即派出密探四处捉拿工人领袖，并告示说：上海事件与本港无关，工人应安心乐业，不得妄动，妄动者严惩不贷。罢工发生后，港英当局又发布戒严令、禁止粮食出口令、禁止金银圆块纸币出口令，并令海军陆战队全体登陆，军舰生火往来于海面巡逻。15天内，参加罢工的工会组织就有几十个，罢工人数达到25万人。香港罢工工人纷纷离开香港返广州，每天达两三千人之多。香港工人罢工得到广东革命政府的支持。广东革命政府封闭全市赌馆、烟馆、敌产等，作为罢工工人宿舍，每日拨罢工委员会1万元经费，妥善解决了罢工工人的食宿问题。6月21日，广州沙面租界3000余名洋务工人罢工退出租界，并组织成立了沙面中国工人援助上海惨案罢工委员会。广州市英、日、美洋行的职工也实行罢工。6月23日，广州工人、郊区农民、学生、商界、黄埔军校学生军等约10万人为声援上海人民和香港工人在东校场集会。会后举行声势浩大的示威游行。中共广东区委领导人周恩来、陈延年等参加了群众游行。当队伍行经沙基时，沙面租界内的英、法军警突然向游行群众开枪射击，当场被打死52人，重伤170余人，轻伤无数，制造了沙基惨案。当天，广东省长公署就沙基惨案照会英、法、葡3国领事提出严重抗议。6月26日，省港罢工工人召开第一次代表大会，讨论省港罢工委员会章程等问题。6月27日，广东各界举行代表大会，通过“经济封锁办法”、“援助省港罢工工人办法”等决议案。7月6日，省港罢工委员会正式成立。委员会由香港罢工工人代表7人、沙面罢工工人代表4人、中华全国总工会代表1人组成，苏兆征为委员长。它是领导罢工斗争的最高执行机关。它的组织十分健全、严密，下设干事局、财政委员会、筑路委员会、审计局、会审处、保管拍卖处、法制局、工人医院、宣传学校，组织了有2000人的工人纠察队。罢工工人代表大会是领导罢工斗争的最高权力机关。代表大会共有代表800余名，由每50名工人中选出1名代表组成。罢工中的重大问题如选举罢工委员会成员、罢工策略、审查财物等均由代表大会讨论决定。代表大会隔日召开一次。罢工委员会及罢工工人代表大会行使了部分政权职能。中国共产党是罢工委员会的核心力量，邓中夏任党团书记，又是罢工委员会对外事务主要发言人，宣言和重要决议多由他起草。罢工初始，工人们封锁香港和沙面租界，禁止粮食外流，扣押走私物资，厉行抵制英货，使港英当局在政治上和经济上受到严重打击。香港是世界上最重要的港口之一，“每年出入口货价值1356万镑，约合中国银15亿元，罢工后各地封锁香港，使其商务停顿，平均每日损失400万元，每月1亿2千万元”。市场上则肉食蔬菜供应短缺、商店货源枯竭，几乎每天都有商店倒闭，仅11、12两个月就有3000余家商店破产；银行业存款断绝、提款突增，当局只好将长存不用的款项1700多万元均从银行提出以解眼前之忧。1925年6月22日至10月19日期间汇丰银行股票下跌11.5%。香港内外交通断绝。物价不断上涨。街上垃圾、粪便成堆无人清理，烈日曝晒臭气熏天，蚊蝇成群，香港变成了“饿港”、“死港”。封锁香港也给广州带来了困难。8月1日，罢工委员会第七次工人代表大会制定了“特许证”制度，即凡不是英国货、英国船及经过香港者，可准来广州做生意。上海、暹罗（泰国）等处商船闻风而来，美国大来公司、日本三井洋行及各国商船纷纷领取特许证直接来广州进行贸易，广州江面每日有40多艘船入口，使广州市场格外活跃，为坚持罢工斗争提供了条件，大大增加了广东国民政府的税收而稳定了广州的局面。省港大罢工得到各界群众的同情与支持，广州郊区工人及汕头、宝安、惠阳一带的农民自卫军自动协助工人纠察队检查仇货，农会会员无偿提供工人粮食；广州商界为解决罢工工人的食宿进行捐款，广州商联会、总商会、市商会及大新等3大公司，组织起对外经济绝交委员会。香港青年学生成立了学生联合会，领导学生罢课，派学生代表回广州讲演，以声援罢工斗争。海外华侨纷纷成立声援省港罢工的团体。自罢工开始至1926年6月，罢工委员会共筹款

490万元，其中华侨捐款113万元。数十万罢工工人成为当时广东革命根据地的有力支柱。7月，国民革命军在广州誓师北伐。罢工委员会组织了5000多人的运输队、救护队、铁路修路队、宣传队随军出发，支援北伐战争。随着革命形势的变化，罢工委员会决定结束罢工，并同意国民政府致函港英当局，协商解决罢工问题。7月15日至25日，中英两国代表在广州进行5次谈判。由于英方缺乏诚意未能达成协议。随着北伐战争的胜利发展，出现了全国人民反帝反封建斗争的新局面。9月，中共广东区委提出改变罢工斗争策略以及自动停止封锁香港、结束罢工等重大问题。9月30日，罢工工人代表大会决定暂时避免对英武装冲突，收敛罢工，全力进行北伐，结束对香港的封锁，并提出以增加关税25%附加税作结束罢工费用为条件。国民政府确认这个决定，并于10月6日由外交部致函各国驻广州领事。各帝国主义国家迫于省港罢工的威力，只得表示承诺。11月，国民政府与罢工委员会共同组织关税征收机关，开始征收二五附加税，分批发给罢工工人。省港大罢工坚持了1年零4个月之久，是截至当时为止的世界工人运动史上时间最长的一次罢工。它沉重打击了英帝国主义，再一次显示了中国工人阶级的伟大力量，在中国工人运动史上写下光辉的一页。　（周兴旺）

戴季陶主义的出现

1925年6、7月间戴季陶歪曲孙中山学说的革命内容，散布反对国共合作、反对工农革命运动的谬论。戴季陶（1891—1949），名传贤，字选堂，号天仇。原籍浙江吴兴，生于四川广汉。早年参加中国同盟会。辛亥革命后，曾追随孙中山从事反对袁世凯和北洋军阀统治的活动。1924年1月，在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上被选为中央执行委员、常务委员，先任国民党中央宣传部部长，后任黄埔军校政治部主任。孙中山逝世后，戴季陶回到上海，积极参加西山会议派的反革命活动。1925年6、7月间连续发表《孙文主义之哲学的基础》、《国民革命与中国国民党》等小册子，系统地提出了一套反共的理论，时人称之为戴季陶主义。戴季陶歪曲孙中山学说的革命内容，提出一种唯心论的道统说，把三民主义曲解为完全渊源于中国封建时代的“正统思想”。说孙中山学说的哲学基础是“仁慈忠孝的伟大人格”，“是继续尧舜以至孔孟而中绝的仁义道德的思想”。声称“仁爱是人类的生性”，任何人只要“发现”自己的“仁爱心”，就“能够为受痛苦的农夫工人努力”。认为三民主义的思想基础是“民生哲学”，仁爱又是“民生哲学之基础”。他宣扬阶级调和，反对马克思主义的阶级斗争学说。认为中国“没有明显的强大的阶级区分”，“革命与反革命势力的对立，是觉悟者与不觉悟者的对立，不是阶级的对立”。因此，“拥护工农群众的利益，不需要取阶级斗争的形式……可以仁爱之心感动资本家，使之尊重工农群众的利益”。他把国民革命说成“是主张各阶级的人要抛弃他们的阶级性，恢复他们的国民性”。他反对国共合作，攻击共产党是“争得一个唯物史观，打破了一个国民革命”。戴季陶提出必须以他所解释的三民主义作为统一战线“共信”的基础，否则，“共信不立，互信不生；互信不生，团结不固；团结不固，不能生存”。他鼓吹国民党的生存必须具备“独占性、排他性、统一性、支配性”，召唤“真实的三民主义信徒，很勇猛精进的团结起来”，要求已加入国民党的共产党员“脱离一切党派，做单纯的国民党党员”。戴季陶主义反映了资产阶级右翼的利益和要求，为他们打击和排斥中国共产党、夺取革命领导权做舆论准备。它的出现是国民党内以蒋介石为首的国民党新右派势力抬头的信号。戴季陶主义一出笼，即遭到了中国共产党人陈独秀、李大钊、瞿秋白、毛泽东、恽代英、肖楚女等的严厉驳斥。他们指出，戴季陶的理论是对孙中山学说的严重歪曲，这“完全是要想把国民党变成纯粹资产阶级的政党”的论调。中国共产党对戴季陶主义的批判，大大缩小了这种反动思潮的恶劣影响。　（周兴旺）

广州国民政府成立

1925年7月1日在广州成立的合议制的国民政府。

1924年1月召开的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通过了《组织国民政府之必要提案》。1925年2月，伴随孙中山在北京的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提出改组广州大本营问题。在北京的中央政治委员会委员曾讨论政府的体制问题，提出采取合议制。随后，汪精卫将这些意见电告广州。2月19日，在广州的中央政治委员会委员依据来电开会议决：一、广州政府应改为合议制。二、委员以军事委员略为扩充为执政委员，其它分子暂勿加入。孙中山逝世后，汪精卫等返广州。6月15日，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议决：一、中国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为全国代表大会闭会期间的最高权力机关。二、改组大元帅府为国民政府。三、建国军及党军改称为国民革命军。四、整顿军政、财政。6月24日，代大元帅胡汉民发出通电，

接受中国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关于政府改组决议案，并发布政府改组的通令，其要点为：一、设置国民政府，管理全国政务。二、设置军事委员会，统辖军事。三、设置监察院，监督政府各机关官员的行动及考核款项的开支。四、设惩罚院，专治贪赃不法及不服从命令的官员。五、设省政府，管理全省政府。六、设市政委员会。7月1日公布的《国民政府组织法》，明确提出党治的原则，规定国民政府受中国国民党指导及监督，掌理全国政务；政府的政制采取委员制，国民政府以若干人组织之，并于委员中推定一人为主席；国民政府设置常务委员5人，处理日常政务，常务委员于委员中推定之。同日，国民政府在广州正式成立，并发表《国民政府成立宣言》，申明其对外对内政策。对外方面，首先督责北京政府迅速宣布废除不平等条约，与各国重订双方平等互尊主权的条约；对内则继续发起国民会议运动，从帝国主义及军阀手中收复已失主权，以还之国民，从而实现致中国于独立平等自由的国民革命的最大目的。国民政府采取委员制，以汪精卫、廖仲恺、胡汉民、徐谦、谭延闿、孙科、于右任、许崇智、程潜、伍朝枢、朱培德、张继、戴季陶、林森、张静江、古应芬等16人为委员。以汪精卫、胡汉民、谭延闿、许崇智、林森为常务委员，汪精卫为主席。汪精卫(1883—1944)，名兆铭，字季新，祖籍浙江山阴(绍兴)，生于广东番禺(广州市)。早年参加中国同盟会。1921年任广东军政府最高顾问。国民政府聘请鲍罗廷为高等顾问。广州国民政府设立外交、军事、财政等部，分别由胡汉民、许崇智、廖仲恺(后由邓泽如、宋子文继任)等任部长；设大理院，院长徐谦(未到任前由林森代)。广州国民政府成立初期，只辖广东一省。1926年广西也置其管辖下。随着北伐战争的胜利进军，湖南、江西、湖北等省先后归属广州国民政府统辖。 (周兴旺)

廖仲恺被刺

1925年8月20日，国民党左派领袖廖仲恺在广州被暗杀。

廖仲恺(1877—1925)，原名恩煦，又名夷白，广东惠阳人。辛亥革命后任广东都督府总参议。积极协助孙中山确立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三大政策，是国民党左派领袖之一。历任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常务委员、工人部部长、农民部部长、国民政府财政部部长、军事委员会常委、广东省省长、黄埔军校党代表等职。孙中山逝世后，以廖仲恺为代表的国民党左派继承孙中山的遗志，坚持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三大政策。廖仲恺参加领导讨伐陈炯明的东征和平定杨希闵、刘震寰的叛乱；公开揭露国民党右派背叛孙中山三大政策的反动面目，积极支持工农运动的开展。他的这些行动引起帝国主义、军阀和国民党右派的仇视。1925年5月，国民党右派即在广州大造舆论，说革命政府已被“赤化”、“共产”了。7月初，右派分子邹鲁、孙科、邓泽如、伍朝枢、吴铁城、胡毅生等多次攻击廖仲恺“被人利用，祸害国民党”。8月20日晨8时，廖同夫人何香凝自广州东山寓所驱车赴国民党中央党部参加中央执行委员会第106次会议。廖在中央党部大门前下车，刚踏上石台阶，突然遭暴徒开枪射击，身中4弹仰面倒地。随行卫士还击，击中一人，其余暴徒逃走。何香凝等将廖送往医院抢救，因伤势过重，不治身亡，终年48岁。廖仲恺遇害后，引起全国人民尤其是工农群众的悲痛。广东各地民众以各种形式表达了对他的哀悼与怀念。中国共产党在唁电中指出，廖先生几十年来为国民革命做出了重大贡献，他的牺牲是全国被压迫民众的损失。周恩来在廖仲恺被刺的当天赶往医院探望。8月31日，周恩来出席黄埔军校举行的追悼廖仲恺大会。会后撰写《勿忘党仇》、《沙基惨案与党代表之死》等文，称赞廖仲恺是“国民党中历史上仅存的有数领袖之一”，是“孙中山革命志愿之承继者，孙文主义之最真实的信徒”。9月1日，广州20万群众参加了送殡仪式，廖仲恺的遗体暂时安放在广州驷马岗朱执信的墓侧。1935年移葬南京紫金山。国民政府组织了廖案特别法庭，查明廖仲恺被刺案系胡汉民的堂弟胡毅生及朱卓文、梁鸿楷、魏帮平等人雇佣凶手制造的凶杀事件。案情查明后，国民政府派军队搜查了胡汉民兄弟的住宅，逮捕了与此案有关的胡汉民的哥哥胡清瑞等人，撤销了第一军军长梁鸿楷的职务；扣押了粤军统领梁士锋和杨锦龙。胡毅生、朱卓文畏罪潜逃。胡汉民因同此案有牵连，离开广州。蒋介石利用这一案件开展肃清内奸运动，借口粤军勾结陈炯明谋叛，将斗争矛头指向许崇智的粤军。许崇智在蒋的逼迫下，向国民党中央政治委员会提出辞去军政部长、粤军总司令等本兼各职，于9月20日离粤赴沪。蒋介石趁机夺取了粤军军权，大大提高了自己在国民党中的地位。 (周兴旺)

中国致公党成立

中国致公党是由洪门致公堂改组而来，以国外华侨特别是海外洪门人士为基础组成的政党。

洪门致公堂是华侨洪门中最大的一个组织，其

成员是侨居在美洲和东南亚的华侨。洪门致公堂以“忠诚爱国，义气团结，侠义除奸”为三大信条。1923年10月10日由美洲旧金山致公总堂发起，在旧金山举行了五洲洪门第三次恳亲大会。会议决定把堂改党，并成立了筹办中国致公党委员总会。经过筹备之后，1925年10月在旧金山召开洪门团体代表会议，讨论了成立中国致公党问题。决议以洪门致公堂为基础，组织华侨政党，名为中国致公党。会议决定从“本年十月十日以后，各地致公堂，一律改称致公党”，推陈炯明、唐继尧为正副总理。这就是中国致公党的第一次代表大会。刚刚成立的致公党，由于对国内外的政治形势和社会发展的趋势还没有一个正确的认识，而国外的组织又散处各国，联系不易，因此致公党的有些组织被国内的军阀和政客所利用。被国民革命军打垮后蛰居香港的陈炯明，趁机当上了致公党的总理后，利用致公党，兜售反动的政治主张。1931年，中国致公党在香港召开第二次代表大会，来自美洲和其他地区的代表数十人出席了会议。大会所解决的中心议题是堂党不分问题，因意见分歧、各执己见，会议只好承认堂党并存的现实。会议决议反对蒋介石的独裁统治。并决定存堂保党，党堂分家，以党领导堂。这一决议和第一次代表大会改堂为党的决议相比，是一个前进。但会后，决议未能贯彻执行，党堂并存、堂就是党的状况，仍然沿袭下来。大会还决定在香港成立中国致公党总部。抗日战争开始后，致公党号召成员抗日，发动华侨积极支援祖国抗战。太平洋战争爆发后，致公党总部的活动陷于停顿。抗战胜利后，陈其尤、黄鼎臣、陈演生、钟杰臣、伍觉天等于1946年初在香港恢复致公党总部的工作。1947年5月，致公党在香港举行第三次代表大会，发表宣言，揭露和谴责国民党当局发动内战、实行独裁的政策，主张为中国政治真正民主化而奋斗到底。会议推选陈其尤为中央副主席，主持中央党部日常工作。1948年5月，致公党响应中国共产党关于召开新的政治协商会议、成立民主联合政府的“五一”号召。1949年1月，致公党领导人陈其尤和其他民主党派领导人、无党派民主人士联名发表《我们对时局的意见》，宣布愿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将革命进行到底，随后积极参加筹备新政治协商会议工作。同年9月，致公党代表出席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参与制订《共同纲领》，选举中央人民政府。（陈绍畴）

浙奉战争

1925年10月16日至11月8日，直系军阀孙传芳与奉系军阀张作霖争夺东南5省的军阀战争。

1925年4月，奉系据有山东后，以“拱卫中枢”为名，加派奉军入关，进驻京奉、津浦沿线地区，势力向南扩张到长江流域的安徽、江苏等省。五卅惨案发生后，张作霖借口维持秩序，令张学良率奉军2000人于6月13日进驻上海。6月21日，邢士廉率大部奉军入沪驻扎。次日，郑谦以江苏省省长名义宣告淞沪戒严，任邢士廉为淞沪戒严总司令。淞沪地区再度成为奉军的势力范围，加剧了奉系与浙闽巡阅使兼浙江督办、直系军阀孙传芳（1885—1935，山东历城人）的矛盾。8月29日，奉系迫使临时执政段祺瑞任命姜登选为安徽督办，杨宇霆为江苏督办，使奉系与孙传芳的矛盾进一步激化。孙传芳利用全国反奉运动的声势，联合各方势力，发动讨奉战争。孙传芳以长江流域的直系势力为后盾，联合冯玉祥的国民军，与受奉系逼迫的苏皖地方军阀陈调元、白宝山、马玉仁、张仁奎、王普等暗中联络，结成反奉战线。北京政变后，国民军控制着热河、察哈尔、绥远、河南、北京及河北部分地方。孙、冯相约两路出兵夹攻奉军，孙军先在南方发动，把奉军主力吸引到江浙一带。待孙军攻到徐州后，国民军即在北方出击奉军。10月7日，孙传芳在杭州召集浙江、福建、江苏、安徽、江西等省代表举行秘密会议，决定5省结成联盟，树立“拥段反奉”旗帜，推举孙传芳为五省联军总司令，立即发动讨奉战争。会后，孙传芳下令动员，部署兵力，加紧进攻准备：以浙军第一师师长陈仪为第一路司令，北军第四师师长谢鸿勋为第二路司令，担任由沪杭线进攻上海的任务；北军第二师师长卢香亭为第四路司令，浙军第二师师长周凤岐为第五路司令，担任由长兴进攻苏州的任务；孙传芳兼任第三路司令，居中策应，另派孟昭月为杭州戒严司令，留守后方。10月15日，孙传芳以五省联军总司令的名义通电讨奉。10月16日，浙奉战争爆发。孙传芳出敌不意，先发制人，很快夺得淞江、上海。10月17日，段祺瑞令孙军立即撤回原防。鄂、皖、赣3省直系军阀和地方军阀肖耀南、白宝山、马玉仁、陈调元、方本仁、倪朝荣、马祥斌等纷纷通电响应，并电请孙传芳与吴佩孚共同主持讨奉大计。奉军陷于孤立，杨宇霆、姜登选即放弃江苏、安徽。张作霖令张宗昌为直鲁皖苏防御总司令，集重兵于徐州，准备大战。10月20日，孙传芳部进占南京，随即渡江追击，于10月23日占领

安徽蚌埠。接着，兵分 3 路进攻徐州。奉军与鲁军 8 万人在徐州以南地区同孙军激战。10 月 24 日，直系军阀吴佩孚以十四省讨贼联军总司令名义通电反奉，拟由河南与孙军会攻徐州。孙传芳与国民军第二军军长、河南督办岳维峻晤谈，力劝岳联合攻直鲁，驱奉系出关。11 月初，孙传芳抵蚌埠督师。11 月 8 日，孙军进占徐州。奉军在东南地区的势力迅速瓦解，败退山东境内。11 月底，孙传芳在南京正式宣布成立五省联军，自任总司令。此后，孙传芳控制了东南 5 省，成为直系军阀中最有实力而又独立的势力。

（陈绍畴）

关税会议召开

1925 年 10 月 26 日开始在北京举行的有英、美、日、法等 13 国代表参加，讨论中国关税自主问题的会议。

1922 年 2 月，中国代表在华盛顿会议上提出了关税自主问题，根据《九国间关于中国关税税则之条约》规定，会后 3 个月内由有关国家召开关税特别会议，讨论中国关税问题。11 月，北京政府成立了关税特别会议筹备处。1924 年 4 月，北京政府发出召开关税特别会议的照会。由于各国借口《九国公约》签字国尚未全部批准公约，会议未能如期举行。1925 年 8 月 5 日，《九国公约》签字国在华盛顿交换公约批准书。段祺瑞执政府为增加值百抽 2.5 的附加税，以增加其财政收入，于 8 月 18 日邀请有关各国到北京举行关税会议。10 月 26 日，会议开幕。参加会议的有英国、美国、日本、法国、意大利、比利时、荷兰、葡萄牙、瑞典、挪威、西班牙、丹麦和中国等 13 个国家。北京政府的代表是沈瑞麟、颜惠庆、王正廷、黄郛、施肇基、蔡廷干等。会议开始，中国代表提出 5 项建议：一、撤废现行条约中关于限制中国关税的一切束缚；二、中国允诺裁废厘金与国定税则条例同时实行，至迟不过 1929 年 1 月 1 日；三、在未实行国定税则条例以前，中国海关税则照现行的值百抽 5，普通品加征值百抽 5 的临时附加税，甲种奢侈品（即烟酒）加征值百抽 30 的临时附加税，乙种奢侈品加征值百抽 20 的临时附加税；四、前项临时附加税应自条约签字之日起 3 个月后，即行开始征收；五、关于前 4 项问题，应于条约签字之日起立即发生效力。北京政府的提案不是收回关税自主权，而是向帝国主义要求增加附加税。11 月 19 日，会议通过以裁撤厘金为条件的《中国关税自主案》，各缔约国（中国除外）承认中国享受关税自主的权利，允许解除各该国与中国间现行各项条约中所包含的关税束缚，并允许中国国定关税定率条例于 1929 年 1 月 1 日发生效力。中国政府声明：裁撤厘金与中国国定关税定率条例须同时施行，并于 1929 年 1 月 1 日须将裁厘切实办竣。这个方案完全是帝国主义和军阀政府迫于中国人民革命高潮的压力而共同玩弄的花招。因为在军阀割据局面下，裁撤厘金无法实行，以此为前提条件的关税自主只不过是一句空话。1926 年 4 月，段祺瑞执政府垮台，出席会议的中国代表随之逃亡，会议实际开不下去。7 月 3 日，各国代表在荷兰公使馆集议发表宣言，决定暂时停止会议。关税会议毫无结果地不了了之。

（周兴旺）

郭松龄倒戈

1925 年 11 月 22 日，奉军将领郭松龄联合国民军倒奉事件。

五卅运动后，中国革命形势不断发展。全国反奉运动的高涨，促使奉军内部发生分裂。浙奉战争后，奉系军阀内部分为新旧两派。新派中，又有士官派和大学派之别。在第二次直奉战争中，以郭松龄（1881—1925，辽宁沈阳人）为首领的大学派，与以杨宇霆、姜登选为中坚的士官派及旧派军官张作相等人的矛盾加深。当时，郭松龄任东北京榆驻军司令部副军长、东北陆军第六师师长，驻守直隶（河北）滦州（滦县）一带。他对奉军大举入关抢夺地盘十分不满。当知悉张作霖以承认“二十一条”换取日方军火、进攻国民军的消息后，决心倒戈反奉。1925 年 11 月 20 日，他同冯玉祥签订密约，主要内容是：排除军警专横，永远消灭战祸；实行民主政治，改善劳工生活及待遇；实行强迫普及教育；开发边境，保存国土。并划分了势力范围，即直隶、热河归直隶督办李景林（当时表示参加郭、冯联盟）；郭松龄部在东北、内外蒙古的东部；冯玉祥主要在西北。11 月 22 日，张作霖突然电召郭松龄回奉。当天，郭与李景林密议，发出通电，要求张作霖下野，推张学良继承大任；历数杨宇霆罪状，要求将其即日免职；声言国内应即日停止敌对军事行动。11 月 23 日晨，郭在滦州召开秘密军事会议，宣布独立，将所部改称东北国民军，并决定班师回奉。11 月 25 日，冯玉祥、李景林宣布中立，并分别通电要求张作霖下野。11 月 27 日，郭率所部 4 个军 7 万余人进占山海关。接着占领绥中、兴城。12 月 3 日，郭军前锋与防守连山的奉军接触，12 月 5 日黎明，发起全线总攻击，摧垮奉军防线，取得了连山战役的胜利。12 月 6 日，占领锦州。次日，渡过大凌河，

进至沟帮子，直逼沈阳。这时，张作霖急派杨宇霆赴大连，与日本帝国主义进一步勾结；由日本以愿助饷械并保证李景林安全为诱饵，诱李景林反郭助奉。日本派关东军司令白川到沈阳，向张作霖提出日本在东北享有种种特权的要求：日本臣民在东三省和东部内蒙古均享有商租权，移让间岛地区行政权，延长吉敦铁路并与图们江以东的朝鲜铁路接轨、联运，洮昌道所属各县均准许日本开设领事馆。日本的侵略要求得到满足后，即撕下了"严守中立"的伪装，全力支持张作霖。当郭松龄率部打到距沈阳30公里的巨流河附近时，日军不仅为奉军提供大笔军费，补充了大量武器弹药，而且直接出兵干涉。这时候的郭军，经过长途跋涉，官兵过于疲劳，天寒衣单，冻伤和患病的很多，且要分兵回驻山海关防御李景林，因而直接参加总攻击的兵力不足5万人。奉军根据日方提供的情报，从两翼反击郭军薄弱部分，并迂回到郭军后方，截断其后路。郭部终因腹背受敌彻底失败。12月24日晨，郭松龄偕部分人退向营口，途中为奉军骑兵捕获。次日被就地枪杀。北方的反奉斗争形势急剧逆转。　（周兴旺）

西山会议召开

1925年11月23日，国民党右派分子邹鲁、谢持等在北京西山非法召开所谓"国民党一届四中全会"，史称西山会议。

五卅运动后，随着革命形势的不断高涨，国民党内部发生了新的分化。国民党内的老右派不但更加仇视共产党和国民党左派，而且对实行两面政策的新右派也感不满。国民党新老右派之间一直存在着争权夺利的矛盾。一部分老右派分子便纠集起来公开进行分裂国民党的活动。1925年10月，国民党老右派分子林森、邹鲁率广州国民外交代表团从广州北上，途经上海，与谢持、戴季陶、叶楚伧、邵元冲等密谋，进行"反共清党"。于11月23日，在北京西山非法召开了所谓"国民党一届四中全会"。出席会议的，在24名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中，只有邹鲁、林森、居正、覃振、石青阳、石瑛、邵元冲、叶楚伧等8人；在5个中央监察委员中，只有谢持、张继2人；另有中央候补执行委员沈定一、茅祖权、傅汝霖3人，远远不足法定人数。会议到1926年1月4日结束，其间共开会22次，林森多次任会议主席。他们以"国民党中央第四次执监委员联席会议"名义，非法决定：一、取消共产党员加入国民党者的党籍。二、开除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和中央候补执行委员中的共产党员谭平山、李大钊、于树德、林伯渠、毛泽东、韩麟符、于方舟、瞿秋白、张国焘9人的国民党党籍。三、解除鲍罗廷的顾问职务。四、开除中央执行委员汪精卫的国民党党籍及其中央执行委员职务，并不得在国民党执政地方之政府机关服务。五、取消国民党中央政治委员会。六、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暂移上海，停止广州中央执行委员会的职权。七、修正国民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选举法。八、推举林森、覃振、石青阳、邹鲁、叶楚伧为国民党中央常务委员。九、派定北京、上海、广州3地中央执行委员——北京有李烈钧、柏文蔚、邹鲁、林森、傅汝霖、张秋白；上海有沈定一、叶楚伧、戴季陶、茅祖权、居正、石瑛、石青阳、张知本；广州有谭延闿、邵元冲、熊克武。十、决定国民党此后对于苏俄的态度。十一、因反对共产党而被开除出国民党者分别恢复党籍。会议期间，他们在上海《民国日报》接连发表《国民党为什么要取消共产党的党籍》、《解除国民党和共产党抱合形势之后》等文章，攻击共产党以国民党为躯干，只做发展共产党势力的事情。会后，他们在北京等地设立伪国民党地方党部，随后又在上海另立"国民党中央党部"，从事反共反人民活动。这批人被称为西山会议派。1925年12月国民党在广州召开了一届四中全会，斥责了西山会议派的分裂活动，并决定在党的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上严肃处理西山会议派的问题。1926年1月召开的国民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通过《弹劾西山会议决议案》，对参加西山会议的老右派分子分别给予警告以至开除党籍的处分。1927年蒋介石发动四一二政变后，西山会议派同蒋介石合流。

（周兴旺）

奉直联合进攻国民军

1926年1月至4月，奉系军阀和直系军阀组成所谓"反赤联合战线"，集中对付北方冯玉祥国民军的战争。

北京政变后，冯玉祥的国民军控制着热河、察哈尔、绥远、河南、北京及直隶（河北）部分地方。在郭松龄倒戈反奉时，冯部进占天津等地，势力进一步扩展。这时，直奉这两个连年敌对的军阀势力，在英、日帝国主义的策划下，组成所谓"反赤联合战线"，集中对付倾向革命的国民军。1925年12月，直系军阀吴佩孚致电奉系军阀张作霖表示"愿意援助"。1926年1月5日，张作霖致电吴佩孚解释误会，取得"谅解"。此后，吴、张之间互派使者，来往密切。奉系派张景惠去汉口，与直系政客张志潭多次晤谈。直系派吴

天民、杜孝穆等至奉，商议直奉联合进攻国民军的计划，决定直军、奉军分别从湖北、山东出兵。1926年1月1日，国民军总司令冯玉祥通电下野，把部队和地盘交给下属，离张家口去平地泉，准备赴苏联考察，由张之江继冯为西北边防督办。郭松龄败后，其残部魏益三改编为国民军第四军，驻山海关。魏通电继续助冯。1月11日，张作霖以讨伐魏益三为名，出兵向关内进攻，目标是滦州(滦县)和热河。1月19日，奉军占领九门口、山海关。2月2日，张学良由榆关进抵秦皇岛，国民军将魏益三部调至保定。与此同时，直鲁联军于1月19日向退守大汶口以南的国民军第二军第九师师长李纪才、第三师师长田玉洁两部发动进攻。李、田退守山东济宁。自1月24日起，直鲁联军先后攻占嘉祥、巨野、曹州、郓城。这时，直鲁联军第二十四师师长方振武脱离张宗昌部，宣布与国民军合作，改称国民军第五军，自任军长。方振武率部开往直隶大名。国民军第二军军长岳维峻将所部调回河南。岳兼任河南督办。至此，国民军全部退出山东。在湖北方面，吴佩孚于1月20日发出讨冯通电，兵分3路进攻河南。南路由鄂军寇英杰率部自鄂北攻入豫南，2月下旬，攻占确山、驻马店。接着占领郾城、漯河、许昌等地。东路直军靳云鹗部紧随由鲁西退回河南的国民军第二军李纪才部进入豫东，于2月28日攻下开封，3月2日占领郑州，3月5日下洛阳。吴佩孚又重回到河南基地，任寇英杰为河南督办，靳云鹗为河南省省长。西路直军刘镇华、张治公两部分别从陕西安康、湖北襄樊向豫西急进。这时，晋系军阀阎锡山亦陈兵黄河北岸。3月中旬，直军靳云鹗部前锋北进至石家庄。3月12日，日本军舰掩护奉军舰队进攻天津大沽口，炮击国民军。国民军还击。日本纠合英、美、法等8国公使，以维护《辛丑条约》为借口，向北京政府发出最后通牒。各帝国主义国家的20余艘军舰齐集大沽口，对中国施行武力恫吓。3月22日，直鲁联军突破马厂，进占天津。国民军处于四面受敌的形势。4月9日，驻北京的国民军鹿钟麟部驱逐段祺瑞，推倒执政府。但这时直奉联军已进逼北京。4月15日，国民军撤离北京，随后，沿西北方向经察哈尔向绥远、甘肃退却。直奉联军进入北京。6月，张作霖、吴佩孚组成北京政府。北方出现更反动的局面，工农革命运动受到严重摧残。奉直军阀打算在北方消灭国民军后移师南下，消灭广东的革命力量。　(陈绍畴)

广东革命根据地的统一

1925年，国共合作的革命军举行东征和南征，讨伐广东境内军阀势力，历时近一年，造成广东统一的局面。

广州革命政府成立后，一直没有能够控制广东全省，内部也不巩固。被逐出广州的陈炯明退踞广东东江地区。陈炯明部邓本殷盘踞南路(广东西南部)。打着拥护国民革命旗号、实际上是地方军阀势力的滇军杨希闵部和桂军刘震寰部把持着广州市区。他们和英帝国主义与其他军阀势力秘密勾结，对广州革命政府造成严重威胁。1925年1月，陈炯明乘孙中山北上病重之机，自封为“救粤军”总司令，举兵进犯广州。广州革命政府决定由粤、桂、滇、湘各军组成东征联军，并于1月15日发表《东征宣言》，分3路讨伐陈炯明。滇军杨希闵部约3万人，为左路，进攻河源、老隆、兴宁、梅县；桂军刘震寰部约6000人，为中路，围攻惠州；许崇智部粤军约1万人，为右路，进攻淡水、平山、海丰、陆丰、潮州、汕头。黄埔军校校军两个教导团3000人编入右路军。黄埔军校政治部主任周恩来随军东征，负责军中政治工作。2月1日，东征军从广州出发。孙中山十分关心东征，于2月5日从北京来电督促各将领“努力破敌，以安内而立威信于外”。东征开始后，杨希闵、刘震寰徘徊观望，按兵不动。右路军在工农群众的积极支援下，进展迅速，于2月11日，由东莞进抵深圳，控制了广(州)九(龙)铁路。2月15日，在淡水战役中，右路军击败陈炯明嫡系熊略、洪兆麟两部，俘敌2000人，缴枪1000余支。27日，占领海丰。右路军乘胜挺进，于3月初攻占普宁、揭阳、潮安。3月7日，进入汕头。是时，“救粤军”总指挥林虎从紫金、五华包抄而来，企图与洪兆麟、叶举残部前后夹击东征军。黄埔军校校军教导团和粤军一部从普宁、揭阳回师迎击林虎部，在普宁以西的棉湖击溃敌6个师。林虎败退五华、兴宁。3月17日，东征军兵分两路奔袭五华、兴宁，占领梅县、蕉岭、大埔，收复潮、梅地区。右路军所向披靡，迫使困守惠州的陈炯明军杨坤如部接受改编。4月20日，杨希闵部开入惠州。东征军取得第一次东征的胜利。5月，杨希闵、刘震寰与段祺瑞、陈炯明、唐继尧等军阀勾结，开始军事调动，企图推翻广州革命政府。6月初，他们在广州发动叛乱，攻占广东省长公署和财政部等政府机关。6月5日，广州大元帅府下令免建国滇军总司令杨希闵、建国桂军总司令刘震寰职。东征军迅速回师广州，于6月12日平息

了杨、刘叛乱。7月1日，国民政府在广州成立。随即组建了国民革命军。9月，陈炯明乘东征军回师广州的机会，重新占领东江地区，策划进攻广州，并约同南路邓本殷一致行动，分头并进。9月下旬，国民政府决定举行第二次东征，任命蒋介石为东征军总指挥，周恩来为总政治部主任。10月1日，东征军3个纵队分道出击，连战皆捷。10月14日，攻克惠州。10月下旬，进占海丰、陆丰、紫金、老隆，控制了通往潮、梅的要冲地区。11月4日，周恩来率部首先进入汕头。11月底，东征军在粤、闽边区全歼陈炯明残部。第二次东征胜利结束。在第二次东征期间，国民政府还组成南路联军总指挥部，以国民革命军第三军军长朱培德为总指挥，朱克靖为总政治部主任，讨伐邓本殷。10月31日，南征部队兵分4路，分别从广东台山、开平、、新兴、罗定和广西陆川出发。12月，进占钦州、雷州。接着，渡海收复海南岛。邓本殷逃亡，残部被缴械收编。在东征、南征中，中国共产党党员和共产主义青年团团员都英勇地站在战斗的前列，中国共产党还发动广大工农群众支援革命军。东征、南征的胜利，造成了当时广东统一的局面，为举行北伐战争准备了比较巩固的后方基地。　（陈绍畴）

三一八惨案

1926年3月18日，段祺瑞执政府残酷屠杀北京爱国群众的事件。

1926年1月，日本帝国主义积极援助奉军攻打国民军。3月12日，日本军舰掩护奉军军舰进攻天津大沽口，炮击国民军。国民军还击。3月14日，北京举行声势浩大的国民反日大会，愤怒声讨日军炮击大沽口的暴行。3月16日，日本纠集英、美、法、意等8国公使，以维护《辛丑条约》为借口，向段祺瑞执政府发出最后通牒，提出即刻停止大沽口附近的军事行动，国民军撤除海上水雷等5项要求，限48小时答复。否则，各国海军当局“决采所认为必要之手段”。与此同时，各帝国主义国家调集20余艘军舰群集大沽口，对中国进行武力恫吓。段政府立即表示愿意协商解决。为反对帝国主义的蛮横挑衅，3月17日，北京各界两百多团体的代表分成两路去外交部、国务院请愿。到达国务院的代表们被执政府士兵打伤、刺伤多人。当天晚上，段祺瑞和国务院总理贾德耀召开秘密会议，策划镇压爱国民众的办法。18日，在中共北方区委和国民党北京执行部的领导下，北京学生、工人、市民两万余人在天安门前举行反帝示威集会，抗议8国公使的最后通牒。李大钊、徐谦等13人组成大会主席团。李大钊在会上号召群众不分界限地联合起来，反抗帝国主义和一切不平等条约。群众将17日赴国务院请愿时被打成重伤的杨伯伦的血衣高悬于台前，血衣上写着“段祺瑞铁蹄下的血”8个大字。大会决议通电全国民众一致反对8国通牒；通电全世界被压迫民众，一致反对8国政府进攻中国；督促北京政府严正驳复8国通牒；驱逐署名最后通牒之8国公使出境；宣布《辛丑条约》无效；驳复8国通牒最后之要求；严惩17日执政府卫队枪伤各团体代表之祸首；电勉国民军为反对帝国主义而战。会后举行示威游行，共产党人李大钊、赵世炎、陈乔年、陈毅等走在游行队伍最前列。下午1时左右，2000多人的请愿团到达铁狮子胡同的执政府门前。群众推定王东平、安体诚、丁惟汾、陈公翎等人为代表，携大会决议案要求入见总理贾德耀和执政段祺瑞，军警不允。群众激愤高呼“打倒帝国主义”、“打倒段祺瑞”等口号。事先布置的军警即向群众队伍开枪，继之以马刀、刺刀、铁棍追击砍杀，死47人，伤200余人。三一八惨案发生后，段祺瑞执政府反诬群众的爱国举动是共产党聚众谋乱、危害国家，下令通缉领导示威的李大钊和国民党左派徐谦等人。段祺瑞政府的血腥镇压，遭到全国人民的强烈反对。鲁迅在当天无限悲愤地指出：“这不是一件事的结束，是一件事的开头。墨写的谎说，决掩不住血写的事实。血债必须用同物偿还。拖欠得愈久，就要付更大的利息！”他把3月18日看作是“民国以来最黑暗的一天”。　（周兴旺）

中山舰事件

1926年3月20日，蒋介石逮捕海军局代局长、共产党员李之龙，打击共产党人和国民党左派的反共阴谋事件。又称三·二〇事件。

1926年3月18日，黄埔军校驻省（省城）广州办事处主任欧阳钟声称“奉蒋（介石）校长的命令”，通知海军局代理局长李之龙，速派有战斗力的军舰两艘到黄埔听候调遣。李之龙即派“宝璧”号舰和“中山”号舰开赴黄埔。3月19日晨，当中山舰开抵黄埔时，邓演达等均未闻知有调舰之事，李之龙即打电话请示蒋介石：可否调中山舰回广州。经蒋允许，中山舰于当日下午6时返航广州。这时，黄埔军校教授部主任王柏龄等人乘机造谣说：中山舰“无故生火弋游”，“显系共产党阴谋暴动”，“阴谋策动海军局武装政变”，“要赶走蒋介石”等。蒋介石对此表示“惊异”，于3月20日凌晨在广州实行紧急戒严，断绝内外交

通，调动大批军警包围火车站和中央银行，使广州大沙头、东山、北校场、东校场和惠爱路一带，笼罩在紧张、恐怖气氛之中。蒋介石令陈策、欧阳格派兵占领中山舰及海军舰队，解除中山舰武装；又命王柏龄、陈肇英逮捕李之龙，并将有关派舰一事写给李之龙的函件销毁。刘峙指挥军队包围坐落在东园的省港罢工委员会，强行收缴工人纠察队的枪支；派兵包围苏联领事馆，监视苏联顾问。广州市公安局局长吴铁城率领武装警察，包围汪精卫的住宅，监视共产党在广州的领导机关和负责人。蒋鼎文部占领海军局机关，解除该局武装。接着，又派两营士兵开赴黄埔军校，监视军校教育长邓演达、军官团团长张治中等。蒋介石还密令何应钦逮捕驻守潮汕的第一军中的共产党员，并在第一军中取消党代表制。中共中央和苏联顾问团对这个突然事变既缺乏精神准备，也没有应付的经验。中山舰事件发生后，毛泽东、周恩来、陈延年等共产党人主张对蒋介石予以严厉制裁，发动广东工农群众，联合国民革命军，组织反蒋联合战线，逼蒋下台。这个主张是可行的。可是陈独秀及在广东的苏联顾问却害怕造成分裂，没有接受他们的意见，采取了妥协退让的方针。3 月 22 日，国民党中央政治会议通过蒋介石提出的在黄埔军校和国民革命军第一军中排除共产党的提案。部分苏联顾问被辞退回国。国民政府主席和军事委员会主席汪精卫称病被迫离开广州出国。蒋介石通过这一事件，打击了中国共产党和国民党左派，加强了他在政治上、军事上的地位。中山舰事件成为国共关系发展中的一个重要转折。 （周兴旺）

整理党务案

1926 年 5 月国民党二届二中全会通过蒋介石提出的排斥共产党的《整理党务决议案》。

中山舰事件后，蒋介石即策划从国民党的领导机构中排挤共产党、全面控制国民党的党权。1926 年 4 月 1 日，蒋介石与谭延闿、朱培德、宋子文等提出“整军肃党、准期北伐”的建议。4 月 6 日，蒋介石向国民党中央常务委员会提出召开国民党第二次中央执行委员会全体会议案。国民党中央接受了蒋介石的提议。鲍罗廷与蒋介石会商国共合作问题时，未经与中共中央商量即同蒋介石达成“整理党务”的 8 项协定。这时，张静江、吴稚晖、孙科等聚于广州，为蒋介石出谋划策，制订整理党务案的具体计划。邵元冲等西山会议派分子也纷纷云集广州四处活动。5 月 15 日至 22 日，国民党二届二中全会在广州召开。会议选举谭延闿、蒋介石和谭平山等为大会主席团成员。蒋介石借口要改善中国国民党与共产党的关系，扬言为避免共产党在国民党内的力量发展引起“党内纠纷”，应有一个“消除误会的具体办法”，提出所谓《整理党务决议案》。其主要内容是：加入国民党的共产党员在国民党中央、省、特别市党部中担任执行委员，其数额不得超过各该党部委员数额的三分之一；共产党员不得担任国民党中央各部部长；国民党员不得加入共产党；共产党须将加入国民党的共产党员名单交国民党中央主席保存；共产党对参加国民党的共产党员的指示，须事先提交国共两党联席会议通过方能下达等。国民党左派何香凝、柳亚子等都投票反对。中共中央领导人陈独秀等和苏联顾问鲍罗廷采取妥协退让的态度。他们派张国焘等到广州指导出席国民党二届二中全会的中共党团。张国焘强使共产党员接受这个提案，使《整理党务决议案》得以顺利通过。随后，原任国民党中央部长的共产党员全部离职，换上了国民党右翼分子。张静江代理国民党中央常务委员会主席，叶楚伧任国民党中央党部秘书长，顾孟余代理中央宣传部部长，邵元冲任中央青年部部长，蒋介石任中央组织部部长兼军人部部长，随后，又任国民党中央常务委员会主席和国民革命军总司令。蒋介石一手控制了国民党的党、政、军大权。从此，右派势力在国民党中央占据了优势。 （周兴旺）

北伐战争

1926 年 7 月开始，中国共产党和中国国民党合作进行的以推翻帝国主义支持的北洋军阀为直接目标的革命战争。

1924 年国共合作的形成，1925 年广东革命根据地的统一及全国革命运动的高涨，为北伐战争的进行创造了条件。1926 年 2 月，中共中央在北京召开特别会议，提出以革命战争推翻帝国主义和军阀统治的政治主张。4、5 月间在广州召开的第一次全国农民代表大会、广东省第二次农民代表大会及第三次全国劳动大会，提出督促和援助国民政府北伐是当前的主要任务。在中国共产党的推动与全国人民的强烈要求下，5 月 21 日国民党二届二中全会发布对时局宣言，接受海内外请愿北伐。6 月 4 日，国民党第二届中央执行委员会临时全体会议通过国民革命军迅行出师北伐案。次日，国民政府任命蒋介石为国民革命军总司令，李济深为总参谋长，白崇禧为总参谋次长，邓演达为总政治部主任，郭沫若为副主

任，苏联加伦将军为军事总顾问。7月1日，蒋介石以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主席名义颁发北伐部队动员令。7月4日，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临时全体会议通过发表《国民革命军出师北伐宣言》。宣言指出中国人民一切困苦的总原因，在帝国主义的侵略及其工具卖国军阀的暴虐。这次北伐的目的是剿除军阀势力，建设统一政府，实现人民之需要。7月9日，国民革命军在广州东校场举行誓师典礼，提出："打倒帝国主义"、"打倒军阀"、"扫除封建势力"等口号。北伐战争正式开始。7月14日，国民政府发表北伐出师宣言。当时国民革命军共有8个军，何应钦、谭延闿、朱培德、李济深、李福林、程潜、李宗仁、唐生智分任第一至第八军军长，共约10万余人。国民革命军面临的敌人是北洋军阀的3支主要势力：直系军阀吴佩孚，据守在湖南、湖北、河南3省和直隶（河北）保定一带，控制着京汉铁路，约有兵力20万人；直系分化出来的孙传芳，占据江苏、浙江、安徽、江西、福建5省，约有兵力20万人；奉系军阀张作霖控制着东北3省、热河、察哈尔、京津地区和山东，有兵力30多万人，实力最雄厚。国民革命军在以加伦为首的苏联军事顾问的建议下，制定了集中兵力、各个歼敌的战略方针。首先向湖南、湖北进军，迅速消灭力量最薄弱的吴佩孚，争取张作霖、孙传芳在一段时间内保持中立；待两湖战场取得胜利后，再引兵东向，消灭孙传芳；最后北向消灭实力雄厚的张作霖，统一全中国。1926年5月，国民革命军第四军第十师、第十二师、叶挺独立团和第七军第七旅、第八旅作为先遣部队出兵湖南，援助正被吴佩孚派出的援军击败而由长沙退守衡阳的第八军唐生智所部。当时，在国民革命军中，第四军内共产党员最多，而叶挺独立团又是战斗力最强的。叶挺（1896—1946），广东惠阳人。1925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同年冬任国民革命军第四军独立团团长。该团是中国共产党直接领导的武装力量，连以上干部都是共产党员，士兵中也有许多共产党员和青年团员。6月初，独立团攻克汝城、承兴、安仁、攸县等地。与此同时，第七军一部到达衡阳一带。北伐军初战告捷，稳定了湘南战局，打开了向北进军的通道。7月初，国民革命军分3路进攻长沙。7月11日，占长沙。次日，克浏阳、宁乡、湘阴、益阳。8月18日，国民革命军发动汨罗江战役，连战皆捷。8月19日，克平江。8月22日，占岳阳。随即进入湖北。北伐战争一开始，就是在广大工农群众的支持下进行的。7月25日，中华全国总工会发表宣言，号召全国工人和广大人民群众参加并援助北伐战争。在中共广东区委领导下，省港罢工委员会发动各行业工人组织3000人的运输队以及宣传队、卫生队随军出征。北伐军进攻长沙时，中共湖南区执行委员会发动工农群众为北伐军带路、送情报、侦察、运输、扫雷、担架救护，还组织农民自卫军直接参加作战。第四军渡汨水时，没有船只，农民交通队以门板、木桶等做船筏，渡革命军于白湖口，使敌军不及退却而被缴械。运输队员为革命军担运粮米、子弹。交通队为北伐军修桥铺路，清除障碍，拆毁敌人军用电线，破坏桥梁，断敌交通。工农群众的支持对北伐战争的胜利发展起了重大的作用。8月下旬，国民革命军同吴佩孚嫡系部队在鄂南作战，8月27日攻克汀泗桥。8月30日，再克贺胜桥，击溃了吴佩孚主力，直指武汉。8月31日，吴佩孚在汉口总司令部召开紧急军事会议，决定电请孙传芳出兵湘、鄂，陈炯明扰乱广东；任命靳云鹏为"讨贼"联军总司令，鄂军统领刘佐龙为湖北省省长，陈嘉谟为武汉防御司令，刘玉春为武昌守备军总司令，高汝桐为汉阳、汉口守备军总司令；放弃保定，调田维勤、王为蔚、魏益三等部南下；由北方南下的4个旅驻防鄂北广水、花园一线，集中火力于龟山、蛇山，并布置舰艇于江汉水面。吴佩孚部队部署尚未完全就绪，国民革命军即于9月2日进逼武汉。同日，北伐军前敌总指挥唐生智、右路军总指挥李宗仁、第四军代军长陈可钰在余家湾车站召开军事会议。会议认为国民革命军大都集中于武汉附近，虽弹药、粮食供应不够及时，但军队士气高涨；而吴佩孚所部的防御工事尚未修建完毕，孙传芳增援部队也未出动，因此对武汉的军事行动应该速战速决。会议决定第四军第十、第十二师，第七军第二路主攻武昌；第八军第一、第二、第四师和鄂军第一师进攻汉阳、汉口；第一军第一师为总预备队，向崇阳推进；第七军第一路攻鄂城、樊口，切断敌方的长江交通，掩护攻城部队右侧背的安全。9月3日，攻打武昌城的战斗打响，猛攻两次未破，只得实行对武昌的围困。9月6日、7日，国民革命军先后攻占汉阳和汉口。吴佩孚逃往河南信阳。此时孙传芳派出四、五千人到武昌解围，途中被国民革命军击退。10月10日，国民革命军第四军主力和第八军一部攻克武昌城。是役，国民革命军全歼吴佩孚主力，俘敌陈嘉谟、刘玉春以下军官740余人、士兵9495人。在攻城战斗中，叶挺独立团英勇善战，战功卓著。独立团所在的国民革命军第四军被誉为"铁军"。同年9月初，国民革命军把军事重心由两湖战场移向江西战场。北伐开始时，孙传芳以"保境安民"为幌子，

实际企望吴佩孚与国民革命军两败俱伤，坐收渔人之利。8月底，孙传芳将东南5省军队20余万人编为5个方面军，除第四方面军留在福建外，其余11个师又12个旅悉数调入江西。以其主力郑俊彦、卢香亭两个方面军驻于从九江到南昌的南浔路两侧，主攻方向为湘鄂边界地区；以陈调元部从安徽沿长江西进武汉，解武昌之围；以邓如琢部在樟树（清江）以西以南布防，策应正面战场；以周荫人部从福建进攻广东潮安（潮州）、汕头，威胁国民革命军后方。9月7日，孙传芳发出通电，限令国民革命军于24小时内撤出江西和两湖，退回广东。根据这一形势，国民革命军制订了3路攻赣的计划，以第四、第八军留守湖北和围攻武昌；以第七军沿长江东进，攻取九江，反击陈调元部；以第三、第六军及第一、第二军各一部向敌主力湘鄂边界正面进攻，进而夺取南昌；以第二军一部及新编第十四军攻取赣南重镇赣州，威逼南昌，从南北两翼配合赣西北正面战场的作战；以广东留守部队对付来自福建方面可能的进攻。9月上旬，国民革命军乘孙部尚未集结完毕之时，即派第二、第三、第六军及第一、第五军各一部和独立第一师向赣西、赣北、赣南发起攻击，占领20余县和赣州。9月19日，进占南昌。9月21日，孙传芳调集主力猛力反扑，夺回南昌，第六军和第一军第一师遭受重大损失。9月22日，第六军乘敌立足不稳再度攻入南昌。由于第一军教导师王柏龄部配合不力，第六军孤军作战，伤亡惨重，次日南昌得而复失。9月底、10月初，第七军从鄂南转入赣北作战，歼灭孙部主力谢鸿勋师，打垮了援赣联军前敌总指挥卢香亭部，截断南浔路。10月16日，浙江省省长夏超面对重兵压境的情势投向国民政府，宣布自治，对孙部军心影响颇大。夏超很快被孙传芳扑灭。10月下旬，国民革命军独立第二师和第四军主力奉调进入江西，分左、中、右3路合攻南昌。11月2日，国民革命军在江西战场发起总攻击。11月4日占马回岭。翌日，第四、第七军和独立第二师组成的左翼军攻克九江。11月7日攻占湖口，控制了南浔路北段和长江水道，南昌之敌处于四面包围之中。接着，国民革命军集中第二、第三、第四、第六、第七各军围歼孙部主力于南浔路南段，俘敌官兵约4万人，国民革命军伤亡1.5万人。孙传芳逃往南京。11月8日，国民革命军进占南昌。至此，孙传芳的主力大部被消灭。江西的溃败，引起孙传芳后方闽、浙两省的动摇。北伐开始时，留驻粤闽边境的北伐军第一军两个师主力，于10月上旬乘势向福建发起攻击，10月10日克永定。孙传芳由于江西吃紧和浙江夏超倒戈而无力援闽，福建第四方面军内部分崩离析，第三十五旅旅长兼福州省防司令李生春等倒戈，第四方面军司令周荫人率所部败退浙江，闽敌防务空虚。12月18日，第一军何应钦部未经大的战斗轻取福州。1927年1月初，国民革命军总司令部在南昌召开军事会议，制订进军长江下游的作战计划，先期攻取杭州、上海，再行会师南京。国民革命军分编为东、中、西3路军向长江下游浙江、安徽、江苏推进。东路军以第一军为主，何应钦为总指挥，白崇禧为前敌总指挥，由赣东及闽北入浙江，直逼杭州、上海。中路军以第三、第六、第七军为主，由蒋介石兼总指挥，其下分为程潜的江右军和李宗仁的江左军，由长江两岸向苏、皖前进，与东路军会攻南京，并进入皖北阻止直鲁军南下。西路军以第四、第八军为主，唐生智为总指挥，除留一部巩固武汉外，主力进入豫南，策应江左军作战，并与在陕西的国民军取得联系，相机进入豫中。在浙江战场，东路军于汤溪、兰溪、淳安、严州、桐庐等地挫败孙传芳主力孟昭月部，孟昭月残敌退至上海和太湖沿岸地区，2月18日占领杭州。安徽敌军内部则相继倒戈，陈调元、王普先后起义，编为国民革命军第三十七军和第二十七军。中路军兵不血刃地占领了安庆、芜湖。继而两路分兵，江左军沿长江北岸向蚌埠前进，江右军从芜湖分路围攻南京。在江苏战场，东路军占领浙江后，一路沿沪杭路进攻上海，一路沿太湖进攻苏州、常州。3月中旬，攻占苏州、常州，抵达上海郊区。3月21日，上海工人举行第三次武装起义，于22日解放上海。与此同时，中路军的江右军于3月24日攻克南京，俘敌4000余人。在北伐战争中，冯玉祥于1926年9月从苏联回国。经与国民政府联系，冯玉祥于9月17日在绥远五原宣誓就任国民军联军总司令。随后国民军联军经甘肃向陕西进军，1926年底占领陕西全省。后与国民革命军会攻河南。这对北伐战争是一个有力的支持与配合。国民革命军出师北伐不到10个月的时间，就消灭了北洋军阀吴佩孚、孙传芳的主力部队，从广州打到武汉、上海和南京，占领了湖南、湖北、江西、浙江、安徽、江苏等省的全部或一部，取得了决定性的胜利。这次战争所以取得胜利，第一、由于实现了国共两党合作，并对军队进行了改造，在军队中灌输了反帝反封建的思想，所以能在共产党员、青年团员的带动下，士气旺盛、前仆后继、英勇杀敌；第二、由于中国共产党人在战斗中发挥了骨干作用，并组织广大工农群众积极支援和参加战争；第三、国民军的配合。国民革命

军向两湖战场用兵时，国民军在南口一带，拖住了直奉军阀几十万兵力。国民二军、国民三军的西安保卫战和晋北战争，牵制了刘镇华10余万镇嵩军和阎锡山五六万晋军，使直系主力无暇南顾，在战略上有效地支援了国民革命军；第四、直、奉两大军阀为了争夺北京中央政权，不能成为统一的势力。国民革命军利用了这一矛盾，各个击破。第五、得到了苏联和共产国际的援助，利用了当时所能获得的科学知识和军事技术。从而使革命势力迅速由珠江流域发展到长江流域，北洋军阀的统治陷入了崩溃的危机之中。

（周兴旺）

汀泗桥战役和贺胜桥战役

北伐战争中，1926年8月国民革命军与直系军阀吴佩孚在汀泗桥与贺胜桥进行的具有决定意义的战役。

1926年8月22日，北伐军占领岳阳后，随即进入湖北。吴佩孚看到北伐军有直捣武汉之势，急调在北方进攻国民军的直军主力南下，布防汀泗桥一线。汀泗桥是粤汉铁路上的军事要隘，为武汉南面第一门户。一面高山峻岭，三面环水，地势险要，易守难攻。8月23日，国民革命军总部在羊楼司召开会议，决定分3路打破吴佩孚死守待援的计划，迅速攻取汀泗桥，以扫除直取武汉的障碍。8月25日，吴佩孚率部分主力南下抵汉口。次日即在汉口查家墩司令部召开紧急会议，决定扼守汀泗桥、咸宁、白墩一线，确保武汉安全；力促孙传芳派兵相助，袭击国民革命军的侧背。8月26日，国民革命军第四军以6个团的兵力自崇阳直至汀泗桥，与第七军一起向敌发起总攻。吴佩孚以军官团、大刀队及王献臣部共七八千人前来增援，凭险固守。双方争夺激烈，死伤惨重。汀泗桥4次易手，桥下尸骨累累，仍未决定胜负。最后，叶挺独立团在当地农民引导下，从东面大山的小路迂回到汀泗桥东北面敌军背后实行突然袭击。敌军受到前后夹击，慌忙退却逃跑。8月27日上午8时，国民革命军占领汀泗桥，进占咸宁，毙敌千余，俘其官兵近2500人，打开了通向武汉的南大门。这时，吴佩孚设司令部于贺胜桥，集中10万兵力、数十辆装甲车、几十门大炮、两百余挺重机关枪于贺胜桥以南杨林塘、桃林铺、王本立等要隘布防据守。8月29日，国民革命军前敌总指挥部决定乘敌增援部队没有完全到达前，迅速攻下贺胜桥。第四、第七军遇敌警戒部队强大火力阻击。叶挺独立团和第二师等部队，向京汉铁路沿线左右两侧敌之重要据点吴家湾、北路学校等地猛袭，占领了这些地段。8月30日晨5时，即向吴部第一道防线的主要阵地进攻。吴部以优势兵力、密集炮火向国民革命军第四、第七军结合部猛烈反扑。激战至7时许，吴部第一道防线被突破，退守第二道防线。吴佩孚命刘玉春、陈嘉谟各备大刀队赴前线押阵，并亲率宪兵队、军官团、卫队团乘专列火车在贺胜桥往来督战。9时许，国民革命军向吴军第二道防线展开进攻。经过激战，第四军攻占贺胜桥，击溃吴佩孚的主力，直指武汉。吴仓皇逃回武昌。8月31日，第四军第十师的追击部队进占洪山，开始围攻武昌城。9月上旬，第八军占领汉口、汉阳。10月10日，国民革命军克复武昌。汀泗桥、贺胜桥一役，是国民革命军同吴佩孚部具有决定意义的一战。

（周兴旺）

万县惨案

1926年9月5日，英国帝国主义军舰炮轰四川万县县城，屠杀中国军民的事件。

随着北伐战争的胜利发展和工农革命运动的高涨，帝国主义加紧干涉中国革命。英国在长江流域享有的特殊权益最多。北伐军进入湖北后不久，英国船舰依仗帝国主义所攫取的在华内河航行权，在四川长江江面多次浪沉中国船只。1926年8月29日，英国太古公司“万流”号商轮在四川云阳江面故意疾驶，浪沉杨森部载运军饷的木船3艘，杨部官兵和船民50余人淹死，饷银8.5万元和枪支50余支沉入江底。杨森当时刚就任吴佩孚委任的四川省省长职，对此事感到奇耻大辱，即找中共派到杨部工作的朱德、陈毅计议。朱德、陈毅力说杨森：反对帝国主义的暴行，是杨部官兵和四川人民的强烈愿望，因而必须采取强硬态度，才能加强杨森的军中威望和政治影响。陈毅提出：一、立即向报界披露事件真相；二、发动工农兵学商各界奋起御侮；三、扣留肇事船只。朱德强调在与英方交涉的同时，必须充分准备英国动用武力。杨森采纳了朱德、陈毅的意见，一面电请重庆交涉员季叔平向英国领事提出抗议，要求惩凶、赔偿损失；一面命令部队加强戒备，随时听命行动。8月30日，英国太古公司“万通”、“万县”两轮由重庆驶抵万县，杨森派兵予以扣留。次日，万县各人民团体和学校联合发出快邮代电，揭露英帝国主义的暴行，要求全国声援。9月2日，中共万县组织以《万县日报》社名义发表通电，提出5项主张：一、组织全国抗英大同盟；二、不购英货，不为英人服役，不供给英人食料，完全对英经济绝交；三、收回英人在华内河

航行权;四、取消中英间一切不平等条约;五、责令赔偿此次生命财产的损失。英国蓄意扩大事态,拒绝惩办肇事凶手和赔偿损失,并以武力威胁,不断向万县增派军舰。同时,向北京政府施加压力迫使吴佩孚电令杨森"和平了结此案"。9月4日,英国领事向杨森发出通牒,限24小时内将"万通"、"万县"两轮放行。9月5日,英舰"嘉禾"号、"威警"号和"柯克捷夫"号进迫万县江岸,强行靠帮跳舷劫夺被扣的轮船,开枪打死守船的杨部士兵。杨森部队按事先的命令给予回击。英舰竟开炮轰击万县人口稠密的繁华市区近3个小时,发射炮弹和燃烧弹300余发,中国军民死伤以千计,民房商店被毁千余家,造成了"万县惨案"。9月6日,朱德、陈毅推动召开了万县各界万人抗英大会,并组织了万县惨案后援会,通电全国,要求严厉制裁英帝国主义,为国雪耻,为死难同胞复仇。中共四川省委书记杨闇公等共产党人联合国民党左派人士在重庆成立了"万县九五惨案后援会",发出快邮代电,宣传群众,发动和组织群众,掀起了抗英高潮。9月18日,重庆举行有十几万人参加的抗英示威游行。四川成都、泸州、自贡、綦江、叙府(宜宾)、顺庆(南充)等地,以及上海、北京、广州、长沙、武汉等城市,先后成立万县惨案后援会、国民雪耻会,声援万县人民的爱国斗争。9月23日,杨森秉承吴佩孚的旨意,下令释放了"万通"、"万县"两轮,并压制人民的反英示威运动。万县惨案后掀起的群众性的抗英爱国斗争,被封建军阀的妥协政策所断送。

(陈绍畴)

湖南农民运动的高涨

1926年秋起,在北伐军占领的地区掀起以湖南为中心的农民革命运动。

1926年10月,随着北伐战争的胜利进展,湖南、湖北、江西等省的农民运动以空前的规模迅速高涨起来。11月,毛泽东担任中共中央农民运动委员会书记,决定以湖南、湖北、江西、河南的农民运动为重点。湖南是农民运动发展较早的地区之一。11月底,湖南全省75个县中,有37县建立了农民协会,农会会员由北伐战争前的40万人发展到136万多人;到1927年1月,农会会员激增到200万人,能直接领导的群众达1000万人。农民协会领导农民的第一个行动,就是从政治上打击土豪劣绅、不法地主。根据他们的罪行大小,分别采取清算、罚款、捐款、小质问、戴高帽子游乡、关进监狱等手段实行惩处。对罪大恶极、民愤极大的恶霸地主,则召开群众大会宣判死刑。农会起来以后,推翻地主武装,建立农民武装,组织梭标队。广大农民推倒农村旧式的都、团政权机关,几千年封建地主的特权被打得落花流水,农民协会便成了乡村唯一的权力机关,真正做到了"一切权力归农会"。农民协会领导农民从经济上打击地主,建立了平粜局或平粜委员会,规定本乡谷米外运,必须有区、乡农会的命令,并在车站、码头等交通要道设专人检查,不准地主把谷米运往外地,禁止高抬谷价和囤积居奇。在一些地方开展减租、减押、减息和废除苛捐杂税的斗争。农民协会还领导农民对各种宗法的思想和制度进行猛烈冲击,打破族权、神权、夫权,着手建设新农村,组织力量修道路,筑塘坝,建立消费、贩卖、信用合作社,大办农民学校,普及政治宣传。农会势盛地方,牌赌禁绝,盗匪潜踪。12月1日,在长沙举行的湖南全省农民协会第一次代表大会,通过了铲除贪官污吏、土豪劣绅,推翻封建统治,建立民主政权和农民武装等40个决议案,并发表了宣言,进一步促进了湖南农民运动的发展。这期间,湖北、江西也开始出现农村大革命的形势。1926年11月,湖北全省的农民协会会员由7月间的3万余人增加到20万人。江西的农民协会会员到10月间发展到5万余人。河南等省的农民运动也逐渐兴起。到1927年初,全国农民协会会员已达900余万人。这时,国民党和国民革命军军官中的地主分子、资产阶级分子对农民运动极端仇视,他们同大批逃亡到城市的土豪劣绅一起,咒骂农民运动是"痞子运动"、"惰农运动",叫嚣"糟得很"。共产党内以陈独秀为首的右倾机会主义者,被国民党的反动潮流所吓倒,不敢支持已经起来和正在起来的农民革命运动。为了答复党内党外对于农民运动的责难,支持正在蓬勃发展的农民运动,毛泽东于1927年1月4日至2月5日到湖南湘潭、湘乡、衡山、醴陵、长沙5县实地考察,并写了《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3月开始在中共湖南省委机关刊物《战士》周报上发表。他充分肯定了农村的大变动,热情赞扬农民运动"好得很",用事实驳斥了怀疑和指责农民运动的错误论调,总结了湖南农民运动的丰富经验,提出了解决中国民主革命的中心问题——农民问题的理论和政策。

(陈绍畴)

上海工人三次武装起义

1926年10月至1927年3月,上海工人阶级为配合北伐的胜利进军,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先后举行三次武装起义。

1926年9月初，为配合北伐军向东南进军，中共上海区委根据中共中央关于开展国民会议运动和领导民众武装暴动的指示精神，决定在上海开展市民自治运动，发动武装起义。10月16日，浙江省省长夏超在杭州宣布起义，进攻上海。这时，孙传芳驻上海的兵力仅有1个团和警察2000人，城防空虚。国民党上海政治分会主席、国民政府驻沪代表钮永建和夏超秘密联系，准备里应外合，占领上海。10月19日，中共上海区委确定由罗亦农、赵世炎、汪寿华、李震瀛等组成武装起义总指挥部，李震瀛任总指挥，领导上海工人武装，准备与资产阶级相配合举行武装起义，建立上海市民自治政府。10月23日，夏超被孙传芳部击败，钮永建误以为夏部获胜，仓促通知上海总工会下令于当夜举行起义。由于起义信号未及时发出，大部分队伍没有行动，只有闸北的几个小队与警察发生冲突，遭到大批反动军队的镇压。码头工会副委员长陶静轩、工人武装起义总指挥部成员奚佐尧等10余人牺牲。上海工人第一次武装起义失败。

1927年2月17日，国民革命军占领杭州。次日，其先头部队到达嘉兴，逼近上海。孙传芳部已全线动摇，无力防守江南。孙传芳为保存实力，将沪宁线交直鲁联军驻防，孙部调往江北整编。中共上海区委决定乘敌军换防之际，在总同盟罢工的基础上，组织以工人为主体的武装暴动，计划以国民革命军进入松江作为总同盟罢工转入武装起义的时机。2月18日晚，上海总工会发布《为举行总同盟罢工的通告(第二号)》，明确指出举行全沪工人总同盟罢工的目的在于“援助北伐军，打倒孙传芳，而取得上海”。2月19日，上海总工会发布总同盟罢工令，同时发表总罢工宣言，提出17条要求，主要是：反对帝国主义，消灭军阀势力，肃清一切反动派，建立真正保护人民利益的政府和保障工人工作和生活的基本权利。参加罢工的工人达15万人以上。罢工工人遭到上海孙军李宝章部和帝国主义租界当局的残酷镇压。工人群众们奋起袭击敌军警察步哨，起义的军舰轰击敌兵工厂。2月22日，国民革命军占领石湖荡，前锋到达泾枝桥，离松江只有6公里。时孙传芳准备逃跑。中共上海区委决定乘孙传芳要倒台、鲁军尚未集中上海之际，于当晚将总同盟罢工转入武装暴动，夺取上海政权，建立市民革命政府。中午12时，由共产党、国民党及上海各阶层代表组成的上海市民临时革命委员会成立，委员有汪寿华、罗亦农、钮永建、杨杏佛、虞洽卿、王晓籁、章郁庵、王承伟、刘荣简、周寿公、张曙时等11人，其中共产党员6名，国民党左派2名。并宣告这个委员会即是暴动胜利后的上海市政府。晚6时，各城区大队工人群众向军警和步哨发起袭击，终因参加暴动的工人较少、武器太差，敌我力量悬殊，以及距离上海不远的北伐军根据蒋介石的命令，拒绝工人请予援助的要求，上海工人第二次武装起义失败。

中共中央军委和上海区委在总结两次起义的经验教训的基础上，又领导上海工人举行第三次武装起义。1927年2月23日，中共中央和上海区委召开联席会议，决定扩大武装组织，准备暴动，并建立由陈独秀、周恩来、罗亦农(1901—1928，湖南湘潭人，时任中共江浙区委书记)、赵世炎(1901—1927，四川酉阳人，时任中共江浙区委第二书记兼上海总工会党团书记)、汪寿华(1901—1927，浙江诸暨人，时任上海总工会委员长)、尹宽、彭述之、肖子璋等8人组成的特别委员会，作为上海工人武装起义的最高领导机关。同时还由周恩来、顾顺章、颜昌颐、赵世炎、钟汝梅等5人组成特别军事委员会(后增加罗亦农)。特别委员会多次召开会议，为第三次武装起义做周密的准备。组织了5000多人的武装工人纠察队，进行秘密的武装操练和射击等训练；中共各级组织在工人和城市贫民中进行广泛的政治工作，加强同上海其它武装组织如自卫团的军事联系工作。3月5日，特别委员会制订统一指挥、分区作战的起义计划，将全市划分为闸北、沪西、沪东、南市、虹口、浦东、吴淞7个作战区，各作战区多由中共区委书记直接指挥。直鲁联军第八军军长兼奉军渤海舰队司令毕庶澄率陆战队1000余人及陆军2000余人，已于2月底接替李宝章部负责上海防务。毕进入上海后，自知无法与国民革命军抗衡，曾派出代表与钮永建等谈判，表示愿意投降，但却提出将上海、无锡归其所辖、投蒋不投国民政府、降后要予以军长以上职务等条件，遭钮拒绝。直鲁联军立足未稳，军心动摇，在上海的军事力量已不堪一击。为确保起义的顺利进行，特别委员会于起义前组织铁路工人罢工，断绝了直鲁联军司令张宗昌对毕庶澄的一切可能援助。3月12日，上海市民公会召开了上海第一次临时市民代表会议，出席会议的有各市民团体的代表。会议选出执行委员31人。这次会议是组织未来上海市政府的第一步工作。3月16日，国民革命军开始向淞沪攻击前进。3月18日，攻克吴江、苏州，松江指日可下。3月19日，罗亦农在中共上海区委召开的各部委、各产业总工会联席会上发布第三次武装起义的

预备动员令，并代表中共上海区委发布《行动大纲》，规定“此次上海革命民众的广大动作，中心思想是民众与武力合作，中心目的是建立上海革命民众的政权——民选市政府”。3月20日傍晚，国民革命军先头部队薛岳师进至上海近郊龙华，常州、丹阳已为何应钦所部东路军占领，毕庶澄部处于国民革命军的包围之中。3月21日晨，中共上海区委发出举行武装起义的命令。午12时，上海总工会颁布总同盟罢工令，全市80万工人举行总同盟罢工。上海市民代表会议执行委员会举行紧急会议，决定全市实行罢工、罢课、罢市，随即转入武装起义。周恩来担任起义总指挥，赵世炎为副总指挥。上海各工厂、作坊、商店、码头、车站的工人群众，纷纷涌向街头，到预定地点集合。工人武装按计划向淞沪警察厅、虹口警察署、吴淞第二警察署、烂泥渡第三警察署、闸北第四警察署、闸北第五警察署、曹家渡第六警察署及各敌军兵营、驻地发起攻击。租界内的工人群众在罢工后1小时全部集中到市区。工人纠察队在前、广大群众在后，与敌军警展开了激烈的巷战。徒手的群众勇敢地夺取敌人的武器武装自己，市民们纷纷拿出木板、麻袋、砖石等帮助工人建起街垒，各食品店、饭店赶制熟食送给作战的人员，佩戴红十字袖章的济难队员救护、输送伤员。经过半天激烈拼夺，警察们有的逃散、有的投降，电话局、制造局等要地均被起义者占领。最后激战集中于闸北。这里有敌军警据点20余处，毕庶澄的直鲁联军都集中于北站一带，还有配备迫击炮的雇佣军——白俄铁道装甲车队。经一天一夜的战斗，到3月23日晚6时，工人武装攻克最后一个据点——北火车站。上海工人阶级在周恩来等指挥下，最终击溃直鲁联军3000余人、警察部队2000余人，收缴枪枝5000余支，占领了上海，取得了第三次武装起义的胜利。当工人进攻闸北时，上海总工会委员长汪寿华派代表到龙华，要求国民革命军东路军前敌总指挥白崇禧从速进兵上海，支援起义工人。但白崇禧根据蒋介石的密令，按兵不动。起义胜利后，白崇禧即率部开进上海市区，迅速抢占兵工厂。3月22日，上海工商学各界举行上海市民代表会议，选举产生了上海特别市临时政府。政府委员会由罗亦农、汪寿华、侯绍裘、李泊之、林钧、顾顺章、白崇禧、杨杏佛、钮永建、谢福生、郑毓秀、陈光甫、虞洽卿等19人组成。上海工人武装起义的胜利，是对帝国主义和北洋军阀的沉重打击，充分表现了中国工人阶级的力量。这是第一次大革命时期中国工人运动的一次壮举。　（周兴旺）

国民政府迁都武汉

1927年1月1日，国民政府明令以武汉为首都，国民政府和国民党中央党部迁武汉办公。

1926年11月8日，国民革命军再克南昌，平定江西，形势发生重大变化。国民政府偏处广州已不适应革命形势发展的要求。国民党中央政治委员会决定将国民政府和中央党部迁武汉。11月16日，国民政府派宋庆龄、陈友仁、宋子文、孙科、徐谦和苏联顾问鲍罗廷为迁都调查委员，先到武汉考察，筹备迁都事宜。11月26日，国民党中央政治委员会临时会议正式决定国民政府和中央党部从广州迁往武汉。12月7日，国民党中央和国民政府分别通电，宣布为适应环境，迁往武汉。当时，粤汉铁路尚未全线通车，国民党中央党部和国民政府的成员从广州到武汉要途经南昌、九江，费时较多。12月10日，宋庆龄等一行抵达武汉。12月13日，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暨国民政府委员临时联席会议在武昌成立，暂时代行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和国民政府的最高职权。其成员有徐谦、宋庆龄、陈友仁、宋子文、孙科、邓演达、吴玉章、詹大悲、董必武、唐生智、于树德、王法勤、柏文蔚、蒋作宾等，以徐谦为主席，叶楚伧为秘书长，鲍罗廷为总顾问，下设外交、财政、司法、交通4个部。1927年1月1日，国民政府明令以武汉为首都，并决定以武昌、汉口、汉阳为京兆区。蒋介石原来是赞成国民政府迁武汉的。1926年11月19日，他致电广州方面说：“中央如不速迁武昌，非特政治、党务不能发展，即所得革命根据地亦必难巩固。”12月7日，他在庐山与宋庆龄等会见时认为，国民政府迁鄂，“有益无损”。年底，当第二批、第三批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和国民政府委员抵南昌后，蒋介石却一反前言，反对迁都武汉，公然截留取道南昌去武汉的委员。1927年1月3日，蒋介石勾结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代主席张静江，召开所谓国民党“中央政治会议临时会议”，决定中央党部和国民政府暂移国民革命军总司令部所在地南昌，以便置于他的控制之下。1月5日，他通电武汉方面，改都南昌，挑起了“迁都之争”。这就形成南昌和武汉两个中心的公开对峙。1月6日，徐谦等复电蒋介石，明确表示国民政府已迁武汉，“不宜变更决议”，要求中央党部和国民政府的成员“照已定策略来鄂”。1月7日，武汉临时联席会议重申坚持原决议，反对蒋介石迁都南昌的主张。2月8日以后，滞留南昌的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和国民政府委员陆续抵武汉。2月21日，在武汉召开国

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中央监察委员和国民政府委员扩大联席会议，决定国民党中央党部及国民政府即日在武汉正式开始办公。3月10日至17日，国民党在汉口召开二届三中全会，决定选举国民政府委员28人，以当时还在国外的汪精卫为国民政府主席。武汉国民政府初期，在国民党左派和中国共产党人的共同领导下，继续执行孙中山的三大政策，支持工农革命运动，坚持反对帝国主义、反对封建军阀的斗争，使武汉地区呈现出一派生气勃勃的局面。

（周兴旺）

收回汉口、九江英租界

1927年1月武汉、九江民众收回英国租界的事件。

自1927年元旦开始，武汉民众连续三日举行盛大集会，庆祝北伐胜利和国民政府迁都武汉。1月3日下午3时，中央军事政治学校宣传队在汉口江汉关前面的广场讲演，听众极多，秩序井然。英国水兵登岸逞凶，驱逐民众，用刺刀向听众乱刺，当场杀死码头工人李大生，打伤30余人。武汉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和国民政府委员会临时联席会议获悉后，即令外交部向英国领事提出口头抗议，要求在24小时内撤退一切陆上武装；同时，派徐谦、蒋作宾到现场向民众说明政府必当采取适当办法保护民众，并在24小时内决定对英办法，劝说群众离开现场以免发生危险。正在主持湖北全省总工会第一次代表大会的李立三、刘少奇得知惨案消息后，立即带领与会代表举行声讨大会，控诉英帝国主义者的暴行。此时，武汉三镇群众向租界附近集中。英国领事看到他们处在中国人民强大的反英风暴之中，即于1月4日凌晨2时慌忙把水兵撤到江心军舰上去，并请国民政府派兵进驻租界，维持英租界内的秩序。是日上午，湖北全省总工会第一次代表大会发表《为反对英水兵惨杀同胞通电》。午间，武汉农工商学各界召开联席会议。会议根据湖北全省总工会第一次代表大会通电中提出的6项条件，通过了解决一三惨案的8项要求：一、请政府立向英领事提出严重抗议；二、令英领事赔偿死伤同胞损失；三、令英领事将行凶水兵交中国政府惩办；四、撤走驻汉英舰及英租界的沙袋、电网；五、撤销英方内河航行权；六、英领事向中国政府道歉；七、英租界巡捕缴械；八、由中国政府管理英租界。会议推定周星棠、邹裴痕等14位代表向政府请愿，请政府据以向英领事提出交涉。这8项要求，被武汉国民政府全部接受，并作为对英交涉的条件。1月5日，武汉市民30万人举行反英示威大会。会后，游行群众愤怒地冲入汉口英租界。国民政府决定由外交部、财政部、交通部、武汉卫戍区司令部和国民党中央党部的代表共5人，组成汉口英租界临时管理委员会，即日起接管英租界，由中国军队维持英租界的治安。1月6日，江西九江英租界内也发生英水兵殴打码头工人致死事件。次日，愤怒的群众冲破了英国士兵的武装戒备线，涌进英租界，英领事及水兵被迫退到舰上。是日，国民革命军应英领事的要求派部队入英租界维持秩序。1月8日，国民革命军总政治部主任邓演达组织召集九江关监督、各军长官、地方各团体的联席会议，议决组织九江市民对英行动委员会，处理租界一切事务。1月10日，正式成立了九江英租界管理委员会，商同军警办理租界内各项事务及治安。武汉国民政府接管汉口、九江英租界后，进一步通过外交途径以从法律上解决两地英租界的归属问题。经1月15日至2月19日的反复外交谈判，英方代表阿马利于2月19日在“英界收回，绝对由华管理”为基本内容的协议上签字。协议规定自3月15日起，汉口、九江英租界的管理权正式收归中国所有。这是近百年来中国人民反帝外交斗争史上的第一次重大胜利。

（周兴旺）

南京惨案

1927年3月24日，英、美等国军舰炮击南京，屠杀中国军民的事件。

1927年初，国民革命军乘胜沿长江东下直逼南京、上海。英、美、法、日等帝国主义加紧干涉中国革命，增派军队和调集军舰来华。1月，英国增派驻威海卫第二舰队的兵舰及鱼雷快艇27艘到上海，还组织3个旅的“上海防军”，以陆军少将邓肯为总司令，开赴上海。美国训令其在菲律宾马尼拉的亚细亚舰队司令威廉率舰队赶到上海。1月19日，英国驻华大使蓝浦生往访日本驻华公使芳泽，提议在“协同防卫”方针下，集中舰队于上海，英、美、法各准备陆战队1500名，日本准备2000名。1月26日，美国国务卿凯洛格发表对华政策声明，一面宣称美国准备以最宽大的精神，“与中国任何政府或可代表中国发言之代表”谈判新约，一面声称为“保障美侨之生命财产”，美国海军目下实有开入中国之必要。接着，英、美分别提出以上海为“自由市”及划淞沪为“中立区”的建议。日本则将佐世保海军基地的第二十四舰队编入第一外遣舰队，开驶中国，企图与英、美协同阻止北伐军进入上海。至3月，帝国主义列强停泊在中

国水域的军舰已达 170 艘，而集中在上海的有近 60 艘。驻上海的外国军队及万国商团和巡捕共有 3 万多人。停泊在南京长江江面的英、美、日的军舰指挥官于 3 月 7 日密商制订“联合警备计划”，准备在南京成为战场的情况下，由 3 国合作派陆战队登陆“保护侨民”。3 月 22 日，由美国驻南京领事戴伟士指挥，在美孚石油公司总经理住宅所在的小山上设置了信号站，不断把北伐军攻城的情报通知英、美军舰，以便随时进行武装干涉。3 月 24 日，国民革命军第六军、第二军由安徽东进，占领南京。溃逃的直鲁联军和一些地痞流氓乘机打家劫舍，袭击抢掠外国领事馆和外侨住宅，打死打伤外国人 6 人。是日下午 3 时许，英、美帝国主义便以“保护侨民”为借口，令其停泊在下关江面的军舰“翡翠”号、“诺亚”号、“普莱斯顿”号开炮轰击南京，发炮百余响，中国军民死 39 人，重伤 26 人，轻伤无数，房屋财产损失严重，造成震惊中外的“南京惨案”。这是帝国主义武装干涉中国革命的严重挑衅事件，也是他们胁迫国民党右翼集团叛变革命的信号。4 月 11 日，英、美、法、日、意等国向武汉国民政府外交部部长陈友仁和国民革命军总司令蒋介石提交通牒，要求惩凶、道歉、赔偿，扬言将“执取认为适当之手段”。4 月 14 日，武汉国民政府答复 5 国，驳斥了他们的无理要求。蒋介石则加紧同帝国主义势力勾结，公开背叛革命。

（陈绍畴）

四一二反革命政变

1927 年 4 月 12 日，蒋介石在上海发动血腥屠杀共产党人和革命群众的反革命政变。

1926 年 11 月，蒋介石把国民革命军总司令部设在江西南昌后，便加紧和帝国主义、旧军阀官僚勾结，公开反共，镇压革命。1927 年 2 月 21 日，他在南昌总部第 14 次纪念周的演讲中声称：“我是中国革命的领袖，并不仅是国民党一党的领袖，共产党是革命势力之一部分，所以共产党员有不对的地方，有强横的行动，我有干涉和制裁的责任及其权力。”3 月 6 日，蒋介石指使驻赣州新编第一师国民党党代表倪弼枪杀了江西省总工会副委员长、赣州总工会委员长陈赞贤。3 月 17 日，蒋介石嗾使暴徒在九江捣毁并派兵强占左派领导的国民党市党部和市总工会。3 月 23 日，蒋介石又指派杨虎等收买一批地痞流氓，在安徽安庆捣毁左派领导的国民党安徽省党部和安庆市党部，以及安徽省总工会和农民协会筹备处。自帝国主义在汉口、九江、南京不断用武力干涉中国革命的同时，越来越重视采用分化革命统一战线，对蒋介石的反共态度极为关注。3 月 26 日，蒋介石到达上海，即公开表示保证与租界当局密切合作，以建立上海的法律与秩序，进一步投入帝国主义和买办资产阶级的怀抱。他通过报界宣布：“决不用武力改变租界的现状，租界问题将通过外交途径解决。”并派员到英、美、日、法、意领事馆就南京事件表示“遗憾”，声明将“火速解决南京事件”，“解除上海工人武装”，防止出现“用武力及暴动”收回租界的事件。帝国主义者清楚地看出，蒋介石是“唯一有武力进攻激烈分子，维持这里（上海）局面的人物”，特许他带着卫兵自由出入租界，并答应以驻扎在上海的侵华军队帮助其镇压革命。他们鼓动蒋介石“迅速而果断地行动起来”，“使长江以南的区域免于沦入共产党之手”。在日本政府的督促下，蒋介石定下“整顿国民政府内部”的决心，即首先解除上海工人的武装，然后以在沪的国民党中央执、监委员“取代武汉派，夺取中央党部，排除共产党”。同时，蒋介石向上海大资产阶级的代表人物表示，在劳资问题上，“决不使上海方面有武汉态度”。大资产阶级答应在财政上给他以全力支持，并立即为蒋提供 300 万元资助。上海青红帮头目黄金荣、杜月笙、张啸林等组织了秘密的中华共进会和公开的上海工界联合会，充当蒋介石反共的打手。蒋介石为他们提供经费、武器，并派王柏龄、杨虎、陈群等军官将他们编成队伍。在帝国主义和大资产阶级的支持下，蒋介石加紧准备发动反革命政变。首先将没有完全受他控制的军队陆续调开或解决，而调集其嫡系部队及新近投靠过来的军阀部队接防沪宁地区。从 3 月底开始，蒋介石连日召集秘密会议，策划“清党”反共。3 月 28 日，吴稚晖在国民党中央监察委员会常委会上诬蔑加入国民党的共产党员“谋叛国民党”，提出对共产党“应行纠察”。随后，吴稚晖致函国民党中央监委，声称共产党“逆谋昭著，举凡中央执行委员会内叛逆有据之共产党委员及附逆委员，应予查办”。4 月 2 日，蒋介石邀集国民党中央监察委员李宗仁、古应芬、黄绍竑、吴稚晖、李石曾、陈果夫等开会，向国民党中央提出《检举共产分子文》，要求对共产党作“非常紧急处置”。汪精卫于 4 月 1 日从国外回到上海。4 月 3 日，蒋介石发表支持汪复职的通电，并与汪秘密会谈。蒋介石主张立刻用暴力手段“清党”，汪精卫因担心这样做会使权力全部由蒋独揽，主张召开国民党二届四中全会来解决共产党问题。4 月 5 日，蒋介石发布总司令部布告，要工人武装纠察队与工会一律在总司令部的管

辖之下，“否则以违法叛变论，绝不容许存在”。4月8日，蒋介石指使吴稚晖、白崇禧、陈果夫等组织上海临时政治委员会，规定该会将以会议方式决定上海市一切军事、政治、财政之权，以取代上海工人第三次武装起义后成立的上海特别市临时政府。4月9日，蒋介石发布《战时戒严条例》，严禁集会、罢工、游行，并成立了淞沪戒严司令部，以白崇禧、周凤岐为正、副司令。与此同时，蒋介石又利用政治欺骗手段麻痹群众。他刚到上海，对上海总工会交际部主任赵子敬说：“纠察队本应武装，断无缴械之理，如有人意欲缴械，余可担保不缴一枪一械。”4月6日，他派军乐队将一面写着“共同奋斗”4个大字的锦旗赠送给上海总工会纠察队，以表示对上海工人的“敬意”。蒋介石在一切部署就绪后，于4月9日离上海去南京，由白崇禧等监督执行其反革命政变的阴谋计划。在上海工人第三次武装起义前后，中共中央和中共上海区委对于蒋介石的某些阴谋活动是有警惕的，也采取过坚定的态度。但是，在蒋介石到上海后，共产党的政策很快发生变化。共产党领导人陈独秀表现了严重的右倾麻痹。3月28日，中共上海区委主席团会议宣读了陈独秀关于“要缓和反蒋”的信。之后，上海的反蒋斗争开始放松。4月5日，《汪精卫、陈独秀联合宣言》发表后，一部分共产党员十分愤慨，但许多人却误以为局势已经和缓下来。原来在武汉整装待发的国民革命军第四军、第十一军不再东下，第六军、第二军的绝大部分服从蒋介石的命令，离开南京开往江北，使蒋介石得以控制南京。4月11日，蒋介石发出“已克复的各省一致实行清党”的密令，上海的形势骤变。

4月12日凌晨，停泊在上海高昌庙的军舰上空升起了信号，早已做好准备的青红帮流氓打手，臂缠白布黑“工”字袖标，冒充工人，从租界内分头冲出，向闸北、南市、沪西、吴淞、浦东等14处工人纠察队袭击。工人纠察队奋起抵抗。双方正在激战，国民革命军第二十六军（蒋介石收编的孙传芳旧部）开来，以调解“工人内讧”为名，收缴工人纠察队武装，1700多支枪被缴，300多名纠察队员被打死打伤。事件发生后，上海工人和各界群众举行总罢工和示威游行，抗议反动派的血腥暴行。4月13日上午，上海烟厂、电车厂、丝厂和市政、邮务、海员及各业工人举行罢工，参加罢工的工人达20万人。上海总工会在闸北青云路广场召开有10万人参加的群众大会。大会通过决议，要求：一、收回工人的武装；二、严办破坏工会的长官；三、抚恤死难烈士的家属；四、向租界帝国主义者提极严重的抗议；五、通电中央政府及全国全世界起而援助；六、军事当局负责保护上海总工会。会后，群众冒雨游行，赴宝山路第二十六军第二师司令部请愿，要求释放被捕工人，交还纠察队枪械。游行队伍长达1公里，行至宝山路三德里附近时，埋伏在里弄内的第二师士兵突然奔出，向群众开枪扫射，当场打死100多人，伤者不知其数。宝山路上一时血流成河。当天下午，反动军队占领上海总工会和工人纠察队总指挥处。接着，查封或解散革命组织和进步团体，进行疯狂的搜捕和屠杀。在事变后3天中，上海共产党员和革命群众被杀者300多人，被捕者500多人，失踪者5000多人，优秀共产党员汪寿华、陈延年、赵世炎等光荣牺牲。4月15日，广州的国民党反动派也发动反革命政变。当日捕去共产党员和革命群众2000多人，封闭工会和团体200多个，优秀的共产党员肖楚女、熊雄、李启汉等被害。江苏、浙江、安徽、福建、广西等省也以“清党”名义，对共产党员和革命群众进行大屠杀。奉系军阀也在北京捕杀共产党员。4月28日，李大钊和其他19名革命者从容就义。四一二反革命政变标志着中国阶级关系和革命形势的重大变化。以蒋介石为首的国民党反动派从民族资产阶级右翼完全转变为大地主大资产阶级的代表。从此，蒋介石和他的追随者完全从革命统一战线中分裂出去。革命在部分地区遭到重大失败。4月18日，蒋介石在南京建立代表大地主大资产阶级利益的国民政府，与保持国共合作的武汉国民政府相对抗。在北京，还存在奉系军阀张作霖政权。全国出现3个政权互相对峙的局面。4月20日，中共中央发表《为蒋介石屠杀革命民众宣言》，指出“蒋介石业已变为国民革命公开的敌人，业已变为帝国主义的工具，业已变为屠杀工农和革命群众的白色恐怖的罪魁”，号召全国人民动员起来，团结一致，形成一个巩固的革命民主主义战线来对付与战胜帝国主义、军阀、封建资产阶级联合势力的进攻。武汉政府控制下的武汉、长沙等地召开数十万群众参加的反帝讨蒋大会，愤怒声讨蒋介石叛变革命的罪行。4月17日，武汉国民党中央发表命令，宣布开除蒋介石的国民党党籍，免去其本兼各职，“着全体将士及革命民众团体”，将蒋介石“拿解中央，按反革命罪条例惩治”。并将国民革命军第一集团军所统率的第一、第二、第三、第四方面军及总预备队划归中央军事委员会直辖指挥。这些决定得到武汉各界的一致拥护。

（陈绍畴）

陈独秀右倾投降主义的形成

1927年上半年，以陈独秀为代表的右倾投降主义错误在中国共产党内占据了统治地位。

中国共产党成立后，陈独秀一直是中共的主要领导人。1923年，他先后发表《资产阶级的革命和革命的资产阶级》和《中国国民革命与社会各阶级》等文章，系统地阐述了他对中国革命和社会各阶级的看法。他认定中国革命要分两阶段进行，当前最急需的是争取民族独立和人民民主的国民革命，而不是社会主义革命。但是，陈独秀对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中无产阶级地位的认识表现了很大的动摇。认为“工人阶级在国民革命中固然是重要分子，然亦只是重要分子而不是独立的革命势力”，“工人阶级不但在数量上是很幼稚，而且在质量上也很幼稚”。而“资产阶级的力量究竟比农民集中，比工人雄厚”，而且随着产业的发展会不断增强。他认为，民主革命的胜利，只能是资产阶级的胜利，应先由资产阶级握得政权，发展资本主义，然后再进行无产阶级革命。这后来被称为陈独秀的“二次革命论”，是右倾投降主义的理论根源。五卅运动后，随着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争夺革命领导权斗争的发展，国民党内部发生了新的分化，以蒋介石为首领的新右派势力抬头。在中山舰事件和整理党务案后，蒋介石已经公开实行反共的步骤，而陈独秀却一味妥协退让，不敢进行坚决的斗争，害怕会导致国共关系的破裂。1926年7月12日至18日，中共在上海召开第四届中央执行委员会第三次扩大会议，着重讨论对待资产阶级和蒋介石的方针问题。会议通过了《中国共产党与国民党关系问题议决案》。会议虽然指出资产阶级的妥协性，但对资产阶级在民族民主革命中的作用仍估计偏高，强调“国民革命若没有资产阶级的有力的参加，必陷于异常困难或至于危险”，不能“敌视他们过早，逼他们为帝国主义利用”。会议虽然提出要防止右的和“左”的两种错误倾向，但仍片面强调对资产阶级联合，害怕斗争会吓跑资产阶级，“使革命运动流产”。会议把蒋介石列为新右派，但仍幻想争取他向左转，而看不到他已逐渐发展成为与共产党争夺领导权的更危险的主要对手。随着北伐战争的胜利发展，形成群众团体联合掌握政权的形势。共产党员董必武参加了湖北省政府的领导工作，林伯渠、李富春参加了江西省政治委员会。王环心、涂振农、师古隆等共产党员担任九江等县县长职务。但以陈独秀为总书记的中共中央却严厉批评和制止各地共产党员参加政府的正确做法，坚持不参加政府的在野党的方针。9月27日，他们给中共湖北区委写信，提出“此后我们的人力务全用在民众方面，万勿参加政府工作”。10月7日，他们在复中共湘区区委的信中，强调在国民革命阶段，共产党“必须立脚在野党的地位”，“应该彻头彻尾表示独立的在野党态度”。之后，中共中央又提出要“严厉取缔党中机会主义做官热的倾向”，限令已担任县长的共产党员立即辞职，否则开除党籍。在与政权问题紧密联系的军队问题上，陈独秀和中共中央的多数领导人忽视掌握军队，也没有尽力在北伐战争中直接掌握武装力量。北伐战争开始后，中共中央决定少派共产党员去黄埔军校学习，凡从事工运、农运的同志“绝对不可令之抛弃工作前去”军校。当时，中共所从事的军事工作，主要是在国民革命军中的政治工作、敌军中的兵运工作和群众武装工作。中共中央还要求在国民军联军中担任党代表的共产党员、共青团员“只是注意政治宣传的事，而不可干涉军事行政上事”。结果，北伐军的实权，大部仍在旧式的军官手中，特别是在蒋介石的手中。当时，一些国民党人看到蒋介石个人独裁倾向的发展，曾主张迎汪(精卫)倒蒋。蒋介石感到自己的处境一时比较孤立，请求中共中央给予支持，以维持他的总司令地位。陈独秀竟向蒋介石派来的代表作出保证：一是汪蒋合作，不是迎汪倒蒋；二是仍维持蒋介石的军事首领地位；三是不主张推翻整理党务决议案。这显然是表示对蒋介石的完全支持。由于陈独秀的妥协退让，使蒋介石有可能逐渐摆脱困境，有计划地加强右翼势力。1926年12月13日至18日，中共中央在汉口召开特别会议，中心议题是讨论民族革命中联合战线问题，主要是关于国民党问题。陈独秀在会上作政治报告。会议通过了《政治报告议决案》、《关于国民党左派问题议决案》等文件。会议指出，自国民革命军攻克九江、南昌之后，“我们与国民党的关系又发生许多新的变化”，中国的民族革命联合战线已发生各种“危险倾向”，其中“最主要的严重的倾向是一方面民众运动勃起之日渐向‘左’，一方面军事政权对于民众运动之勃起而恐怖而日渐向右。这种‘左’右倾向继续发展下去而距离日远，会至破裂联合战线，而危及整个的国民革命运动”。会议虽然也承认国民党的右倾，承认蒋介石言论虽左，实际行动很右，但是对此却拿不出任何有效的办法，反而着重批评共产党内“左”的幼稚病，如看不起国民党、包办国民党、包办民众运动、否认左派存在、误解党的独立等。为此，提出要“防止党外的右倾，同时反对党内的

'左'倾"。陈独秀提出挽救危机的7项策略措施，一方面提出"督促国民党和国民政府实行'武力和民众结合'的口号"，"继续对外对内在城市在乡村中反封建势力的争斗，在城市在乡村扩大民主主义的宣传运动。扶助国民党左派领袖获得在政府及党的领导地位，以推动国民党的军事政权向左，至少也要不继续更向右"。另方面强调要"改善我们和国民党的关系，纠正同志们关于我们党独立之误解，纠正同志们否认左派存在之错误，一切群众运动尽可能的与左派合作，使左派获得他们的群众(农民及城市小资产阶级)，在工农群众实际争斗中勿存幻想(如手工业工人过高要求，工人纠察队执行一部政权，实行耕地农有等)，以防止我们过于向左"。认为"如此才能够停止左右倾之距离日远的危险，才能够弄好我们和国民党的关系，才能够巩固国民革命的联合战线，这是目前最重要的策略"。实际上，就是把挽救革命危机的希望完全寄托在汪精卫和其他国民党军事首领身上，压制正在蓬勃高涨的工农运动的发展。这种政策实质上是牺牲工农群众的根本利益，去迁就国民党右派的要求，为蒋介石、汪精卫夺取国民党领导权提供了方便。会议的决定得到共产国际代表维经斯基和苏联顾问鲍罗廷的赞同。这次会议标志着以陈独秀为代表的右倾思想发展为右倾投降主义。1927年初，中共中央对蒋介石的某些阴谋活动有所察觉，努力加强工人纠察队，力图巩固革命成果。但当时共产国际仍对蒋介石抱有期望，不赞成同蒋破裂。3月下旬，陈独秀致信中共上海区委，提出"要缓和反蒋"。4月5日，陈独秀和汪精卫会谈后发表联合宣言，只字不提蒋介石的反革命言行，却把"国民党领袖将驱逐共产党，将压迫工会与工人纠察队"说成是"不审自何而起"的"谣言"，希望国共两党的同志"立即抛弃相互间的怀疑，不听信任何谣言，相互尊敬，事事协商"，"开诚合作，如兄弟般亲密"。这个宣言的发表，使一部分共产党员误以为局势已经和缓下来，而放松了警惕。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后，陈独秀继续把维护与国民党"左派"的关系当作一切问题的中心，不惜做任何让步。陈独秀等坚持北伐讨奉，不敢采取深入土地革命、广泛武装工农的果断措施来挽救革命，而是企图把革命限制在汪精卫等允许的范围内，以此来稳定武汉国民党。当汪精卫集团日趋反动，夏斗寅、许克祥等相继叛变的时候，陈独秀对汪精卫处处迁就退让，跟着他们片面指责工农运动过火，不敢对反动派的进攻进行坚决的斗争。6月14日，中共中央发出通告说："放任农民无组织的自由行动来解决土地问题，已经引起了无数的过火行为，这种情形，必须纠正。"6月28日，中共中央决定自行解散工人纠察队。7月3日，中共中央开会，通过《国共两党关系决议案》。这个决议案仍然承认国民党"当然处于国民革命之领导地位"，并表示为了减少冲突，共产党的部长可以暂时离开政府；工农群众组织必须受国民党的领导；"根据国民党的命令，工农纠察队必须置于国民政府的监督之下"等。这是陈独秀右倾投降主义的恶性发展。以陈独秀为首的中共中央企图以投降式的让步来拉住汪精卫，只能助长了反革命的气焰。7月15日，汪精卫等控制的武汉国民党中央正式同共产党决裂。第一次国共合作全面破裂，1924年至1927年的中国大革命宣告失败。这次大革命所以遭到失败，客观上是由于帝国主义和封建势力的联合力量大大超过了革命力量，国民党背信弃义地对共产党及其领导的工农群众发动突然袭击；主观上则是以陈独秀为代表的中共中央犯了右倾投降主义错误，"自愿地放弃对于农民群众、城市小资产阶级和中等资产阶级的领导权，尤其是放弃对于武装力量的领导权"。　(陈绍畴)

中国共产党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召开

1927年4月27日至5月10日，中国共产党在武汉举行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

在中国革命的紧急关头，中国共产党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于1927年4月27日至5月10日在武汉举行。出席大会的代表80多人，代表党员5.79万多人，以罗易(M. N. Roy，1887—1954，印度人)为团长的共产国际代表团参加了大会。大会通过了接受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第七次扩大全会于1926年12月16日通过的关于中国问题的决议案的决议，并根据这一决议的精神，讨论陈独秀向大会所作的报告。陈独秀在报告中提出了目前只能"扩大革命"而不能"加深革命"等观点。大会批评了陈独秀的右倾投降主义错误。大会通过的《政治形势与党的任务议决案》指出，五卅运动以来，中国共产党只注意于反对帝国主义和反对军阀的斗争，而忽略了与资产阶级争取革命领导权的斗争，以致没有能够有效地防止蒋介石的叛变。但议决案对于当时的形势并没有作出符合实际的具体分析。认为中国资产阶级已经背叛，中国革命已经发展到"建立工农小资产阶级的民主独裁政权"阶段，要从政治上经济上向资产阶级勇猛的进攻，应该以土地革命及民主政权的政纲去号召农民和小资产阶级，使革命"向非资本主义前途发

展”。议决案把蒋介石的叛变当作整个资产阶级的叛变，把民族资产阶级当作革命的对象，认为“中国的国民革命已经冲破了资产阶级式的民权主义之限制”，这就混淆了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的界限。同时，又把已经由汪精卫、唐生智控制的武汉国民政府当作工农小资产阶级的联盟，对汪精卫、唐生智等人仍抱有很大的幻想，对他们公开叛变革命的严重危险缺乏清醒的认识和足够的精神准备。大会还通过了《土地问题议决案》，肯定了“将耕地无条件的转给耕田的农民”的土地革命原则，认为在“革命的国民政府之下”的几个省里，可以深入进行土地革命，但又把实现土地革命的希望寄托在武汉国民政府的身上。这次大会虽然强调争取无产阶级领导权、建立革命民主政权和实行土地革命的重要性，但对无产阶级如何争取革命领导权，如何领导农民实行土地革命，如何对待武汉国民政府，特别是如何建立共产党领导的革命武装等问题，都没有提出有效的具体措施。大会选举中央委员会中央委员 29 名，中央候补委员 11 名。五届一中全会选举陈独秀、张国焘、李维汉、蔡和森、李立三、瞿秋白、谭平山为中央政治局委员，苏兆征、张太雷、陈延年、周恩来为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陈独秀、张国焘、蔡和森为中央政治局常务委员会委员，陈独秀为总书记。大会产生的中央领导机构不可能实行切实有力的领导，也没有能担负起在紧急关头挽救革命的任务。（陈绍畴）

夏斗寅叛变

1927 年 5 月 17 日，武汉国民革命军独立第十四师师长夏斗寅在湖北宜昌叛变、进攻武汉的反革命事件。

蒋介石背叛革命后，出现了宁汉对立的局面。武汉国民政府面临着东面蒋介石和北面张作霖的威胁。1927 年 4 月 19 日，武汉国民政府誓师继续北伐，沿京汉路向河南的奉军进攻。蒋介石乘武汉空虚的时机，联合川、黔、粤、桂等省军阀进攻两湖地区，并策动反动军官叛乱。帝国主义和封建军阀对武汉地区实行经济封锁。民族资本家惧怕工农运动，抽走资金，商店、工厂纷纷歇业、停工。武汉政府税收减少，财政危机加深，纸币贬值，物价飞涨，严重影响人民生活。以汪精卫为首的武汉国民党中央和国民政府迅速走向反动，连续发布限制工农运动的条例和训令。武汉地区的形势急剧恶化。蒋介石策动驻防湖北宜昌的国民革命军第十四师师长夏斗寅，会同杨森的川军及李燊的黔军向武汉方面进迫。5 月初，蒋介石派密使去宜昌，同夏斗寅及杨森的代表范绍增密商，决定分别沿长江两岸进攻武汉。5 月 13 日，夏斗寅通电反共，诬蔑共产党和工农运动，谩骂徐谦、董必武、邓演达、詹大悲等共产党人和国民党左派，攻击武汉国民政府。接着，进兵沙市、嘉鱼、咸宁、汀泗桥。5 月 17 日，直逼武昌附近的纸坊镇、土地塘一带。杨森、李燊同时行动，准备协同夺取武汉。夏斗寅随即将其军事叛乱计划报告蒋介石，南京方面致电夏斗寅，鼓动他“锐进救援，勿稍瞻顾”。这时，武汉国民政府的主力部队正在豫南与奉军激战，无法回援。武汉危急。夏斗寅的突然袭击，顿时引起武汉局势的严重混乱。武汉国民党中央和国民政府对夏斗寅图谋叛乱虽有所闻，但并未做应变准备。国民党的一些首领惊恐万状，纷纷准备逃跑。国民党左派詹大悲要求国民党中央对夏斗寅“褫职拿办”，而汪精卫却认为这样做可能过于严厉，说什么夏斗寅的目的不是反对国民政府，而是反对所谓“盘据要津”、“喧宾夺主”的共产党，或者可视为哗变，不必当成反革命事件来处理。中国共产党和国民党左派迅速动员群众，组织反击。5 月 18 日，中共中央发表《关于夏斗寅叛变告民众书》，揭露夏斗寅的反动阴谋，号召工农群众削平夏斗寅的反叛，郑重表示：“无产阶级将武装起来枕戈以待，保障革命。”武昌卫戍司令叶挺根据中共中央和武汉国民政府的命令，率国民革命军第十一军第二十四师、第二十五师一部及中央独立师进行反击，迅速击败叛军。5 月 20 日，乘胜追击至咸宁，使武汉转危为安。随后，夏斗寅口头表示仍愿归顺武汉国民政府，汪精卫即命令叶挺停止追击，回师武汉，致使夏斗寅残部得以流窜到鄂东、皖西一带。当地的土豪劣绅乘机反攻倒算，摧残革命团体，捕杀共产党人和工农群众，在不到一个月里，被害者达四五千人。革命陷入严重危机。（陈绍畴）

马日事变

1927 年 5 月 21 日，国民革命军第三十五军独立第三十三团团长许克祥在湖南长沙发动的反革命政变。

1927 年 4 月底，国民革命军第四集团军第三十五军军长何键，利用唐生智督师河南前线的机会，在汉口召集高级军事将领会议，策划在两湖地区发动反共军事政变。何键以增防湖南省城为名，于 5 月 14、15 日将驻湖南湘乡、湘潭的独立第三十三团许克祥部调到长沙。许克祥抵长沙后，即指使该团反动军官与驻长沙的其他部队进行反革命串连。5 月 17

日，许克祥与反动军官第三十五军参谋余湘三、第三十五军教导团团长王东原、教导团大队长陶柳、晏国涛、魏镇等举行会议，策划于5月21日在长沙发动军事叛乱，彻底摧毁共产党及其他革命机关，并推定许克祥担任这次叛乱的指挥官，以独立第三十三团为叛乱主力。许克祥等散布谣言说："武汉的国民政府倒台了"，"汪精卫坐飞艇逃走"，"夏斗寅的军队进据武昌城"，"工农军要缴革命军的枪"，"工农要暴动袭击司令部"等等，使得长沙城内人心惶惶。5月19日晚，第三十五军留守处部队公开挑衅，夺走电气工会工人纠察队的枪支。许克祥唆使伤兵打伤工人纠察队员多人。5月21日晚，许克祥指挥驻省叛军1000多人，分途袭击长沙各革命机关。第三十五军留守处部队向湖南省总工会、公安局、特别法庭等机关进攻，独立第三十三团和教导团捣毁湖南省农民协会、国民党湖南省党校、省工人运动训练班和农民运动讲习所等。他们解除了工人纠察队和农民自卫军的武装，捕杀共产党员和革命群众100多人。因21日的电报代日韵目为"马"字，故被称为马日事变。这个事变，是以汪精卫为首的武汉国民党右派和以蒋介石为首的南京国民党右派公开合流的信号。5月22日，叛军到处张贴"拥护打倒共产党的唐(生智)总司令"、"拥护蒋总司令"、"铲除暴徒分子"等反动标语。5月24日，许克祥与国民党右派召开所谓各界联席会议，成立了"中国国民党湖南省救党委员会"。会议宣布"拥护南京中央党部、国民政府"、"拥护蒋汪合作"，废止前国民党湖南省党部和省政府颁布的一切革命法令。事变发生后，汪精卫等力主调解所谓"军工冲突"。5月25日，武汉国民党中央政治委员会决定组织赴湘特别委员会调查处理。他们一面声称要查办许克祥，一面又下令查办工农运动的"过火"行为。次日，特别委员会成员抵岳阳，因受到许克祥的恐吓，未到长沙即折返武汉。以陈独秀为首的中共中央原来主张以武力解决许克祥部，但听到汪精卫等的意见后，又认为目前从政治上考虑不宜用武力讨伐，"百事应由(武汉)政府解决，不得自由行动"。中共湖南临时省委一度决定调长沙附近10多县农军向长沙进军。但在中共中央和平解决的方针下，中途改变计划，下令农军撤退。之后，许克祥继续镇压工农运动，捕杀共产党人和革命群众，在短短的20多天里，长沙附近各县被杀害者达1万多人。共产党组织遭到严重打击。革命形势急转直下。

(陈绍畴)

郑州会议和徐州会议

1927年6月，汪精卫、蒋介石与冯玉祥先后在郑州和徐州举行的联合反共会议。

1927年6月1日，冯玉祥所部与唐生智指挥的北伐军在河南郑州会师。面对帝国主义和地主资产阶级的强大压力，又受到工农革命运动的冲击，冯玉祥的政治态度明显转向。他虽然表示拥护武汉国民政府，但对武汉的反蒋运动保持沉默，并暗中派代表常驻南京，同蒋介石联系。这时，汪精卫把最后的希望押在冯玉祥身上，打算联冯反蒋、反共。6月10日至11日，汪精卫和冯玉祥在郑州举行会议。参加会议的，武汉方面还有谭延闿、顾孟余、孙科、徐谦、唐生智、张发奎等；国民军方面还有鹿钟麟、于右任等。双方就党务、政治、军事问题进行了讨论。汪精卫既谴责蒋介石的独断专行，又攻击共产党"破坏国民革命"，表示对工农运动的不满。冯玉祥对汪精卫等攻击共产党和工农运动的言论表示赞赏，而对蒋介石没有片言谴责，反而力劝武汉方面停止宁汉间的对立，与蒋介石联合起来共同北伐。会议决定：设立政治委员会开封分会，以冯玉祥为主席，负责指导河南、陕西、甘肃3省党务；成立河南、陕西、甘肃3省省政府委员会，分别以冯玉祥、于右任、刘郁芬为省主席；唐生智率领的北伐军全部撤回武汉，承认冯玉祥所部第二集团军扩编为7个方面军。汪精卫把豫、陕、甘3省的党、政、军大权交冯掌握，联冯反共的目的基本达到。郑州会议，实际上是武汉"分共"与宁汉合流的酝酿。会后，冯玉祥在蒋介石的极力拉拢下，于6月20日至21日在徐州与蒋介石、张静江、胡汉民、吴稚晖、李宗仁等南京国民党首领举行会议。会议着重讨论了对付共产党的办法、继续北伐和武汉政府等问题。对反共问题，蒋介石与冯玉祥意见一致。会议决定驱逐苏联顾问鲍罗廷回国，由冯玉祥先发电警告武汉。冯玉祥同意蒋介石提出的在冯军队及其所辖地区内"清党"的要求。会议主张，宁汉双方应在共同反共的基础上继续北伐。蒋介石原打算联冯制汉。冯玉祥不同意对武汉用兵，认为武汉方面已开始"分共"，宁汉双方就不再有何分歧。关于武汉政府问题，会议议决"先在冯玉祥警告武汉电内，促伪政府注意"。6月21日，冯玉祥致电汪精卫、谭延闿、唐生智、徐谦等，攻击共产党"阳冒国民革命之名，阴怖全国恐怖之毒"，要共产党"退出国民革命之联合战线，停止农工运动之阶级斗争"。指出宁、汉"双方处境之苦，业已完全了解"，"既异地而同心，应通力

而合作”。敦促汪精卫等“速决大计，早日实行”“清党”“分共”。冯玉祥完全倒向蒋介石，使蒋介石的地位大为加强，并加速了汪精卫实行反共的步伐。

（陈绍畴）

七一五反革命政变

1927年7月15日，汪精卫在武汉发动的反革命政变。

蒋介石在上海发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后，以汪精卫为首的武汉国民政府逐步走上公开反共的道路。1927年6月5日，共产国际代表罗易把共产国际的5月紧急指示送给汪精卫看，幻想争取汪精卫的同意。汪看后暂时没有表态。他向罗易说明：“这件事很重要，要交给政治委员会主席团看了后再作答复。”随后，他把这份文件给在武汉的主席团成员看，仅对谭平山保密。6月10日至11日，汪精卫同冯玉祥举行郑州会议，策划反共。会后，汪精卫便以共产国际的指示“根本危害”国民党的“生命”为借口，加快了分共的步伐。他回到武汉，即与国民党中央党部非共产党的成员商量和共产党分离的方法。认为现在讨论的“不是是否应当驱逐共产党，而是什么时候驱逐——现在还是过些时候”。6月中旬，唐生智的主力部队从河南撤回武汉，公开站在反叛的军官一边，镇压工农运动。接着，唐生智以“解决湘事”为名回到湖南，开始搜捕共产党人和革命群众。6月27日，武汉国民政府应冯玉祥的要求，决定解散工人纠察队，逼迫共产党人谭平山、苏兆征辞去所任国民政府部长的职务。6月29日，唐生智所部第三十五军军长何键发出反共训令，攻击工农运动幼稚，工作过火，发生错误，“纯系共产党中暴徒之策略”，要求武汉国民政府“明令与共产党分离”。同日，何键和负责武汉卫戍任务的第八军军长李品仙协同动作，占领中华全国总工会、湖北全省总工会，捣毁、解散各业工会。南京方面对何键的反共训令表示欢迎，认为它“比其他任何反共产的理由材料，都要来得新颖切实”。何键继续煽动说：“民众的敌人，是万恶的共产党。三民主义的敌人，也是万恶的共产党。共党不灭，国民革命便不能成功。”鉴于汪精卫集团已在公开地准备发动政变，中共中央于7月13日发表《对政局宣言》，谴责武汉国民党中央和国民政府的反动罪行，宣布撤回参加国民政府的共产党员，并庄严声明，中国共产党将继续支持反帝反封建的革命斗争，愿意同国民党的革命分子继续合作。7月14日晚，武汉国民党中央政治委员会主席团召开秘密会议，接受了汪精卫提出的“分共”主张，决定将《统一本党政策案》和《统一本党政策决议案》提交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常务委员会扩大会议通过实行。7月15日，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举行第二届常务委员会第20次扩大会议。出席会议的有汪精卫、孙科、谭延闿、顾孟余、陈公博等17人。汪精卫在会上宣读了共产国际5月指示，并就其内容发表了长篇讲话。他认为，共产国际提出开展土地革命，由下级没收地主的土地，违背了国民党关于由国民政府下令没收土地的主张，与“三民主义相冲突”。并攻击说湖南是按照共产国际的训令去做的，“怪不得湖南闹成这个样子”。他指责共产国际提出要在国民党的中央委员中“多增加工农领袖”，“简直是破坏本党的组织”。他攻击共产国际关于武装工农、改造旧军队的指示，“是根本动摇我们的军队”。他歪曲组织以有声望的国民党人为首的革命军事法庭的目的，说什么组织特别法庭，不要共产党同志参加，由老党员组织，就是“让国民党做刽子手”。汪精卫声称，“综合这五条而论，随便实行哪一条国民党就完了！”这是共产党“破坏国民党的阴谋”。汪精卫提请会议讨论决定两个问题：一是派负责任的重要同志到莫斯科去，重申国民党的联俄政策“乃是三民主义联合共产主义，三民主义的中国联合共产主义的俄国”，“若是丢开了三民主义那就不是联俄而是降俄了”。二是对共产党应采取一个“处置办法”，因为“一党之内不能主义与主义冲突，政策与政策冲突，更不能有两个最高机关”。孙科、顾孟余、谭延闿等发言，认为“共产党同志加入国民党是要使三民主义共产主义化”，“将国民党作为共产党的工具”，现在国民党的主义、政策、组织“差不多都受了容共的影响”，因此，不能不对共产党“加以相当的制裁”。会议根据汪精卫的提议通过了3项决定：一、在一个月内，召开第四次中央执行委员会全体会议，讨论政治委员会主席团所提出的意见并解决之；二、第四次中央执行委员会全体会议开会之前，中央党部应裁制一切违反本党主义政策的言论行动；三、派遣重要同志前赴苏俄，讨论切实联合办法，其人选由政治委员会决定。汪精卫等控制的武汉国民党中央决定与共产党决裂，彻底背叛了孙中山制定的国共合作政策和反帝反封建的革命纲领。7月16日，汪精卫向国民党中央政治委员会主席团报告《容共政策之最近经过》，声称中共中央7月13日发表的《对政局宣言》是对国民党的“厚诬丑诋”，中共中央决定撤回参加国民政府的共产党员“是共产党破坏容共政策之最大表示”。他说，既然共产党退

出国民政府，“便无异脱离本党”。它在国民革命军及各级政府机关中亦无须存在。这是汪精卫发出的“取缔共产党”的动员令。同日，武汉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向各级党部发出《保护共产党员个人身体自由的训令》和《保护农工之训令》，虚伪地声称：7月15日限制共产分子的提案是执行党的纪律，并非妨害共产党员个人身体自由，若压迫共产党而妨害其身体自由，定要依法严办。国民党中央并不因限制共产主义而停止农工政策之活动，对于农工团体须极力保护，对于农工利益须加意维持；若违背党义，少加摧残，唯有执行革命纪律。与此同时，汪精卫集团在武汉的党、政、军部门进行大规模“清党”。7月19日，武汉国民政府训令通饬各军长官务须于最短期间，对所属军队中的军事负责人员和政治工作人员进行核查，对已经知名的共产党员应切实劝导，使之“与共产党脱离关系”，否则即行停止职务；对未知名的共产党员则应随时留心查禁，禁止一切秘密会议，并考核其言论行动，如有违反本党主义及政策者，立予惩办。7月24日，中共中央发表《对于武汉反动时局之通告》和《致中国国民党革命同志书》，强烈抗议武汉国民党中央作出的“分共”决定，号召革命的国民党员应与叛变革命的汪精卫集团决裂，实行孙中山的三民主义的革命政纲和三大政策，明确表示中国共产党党员决心和革命的国民党员共同工作，同生共死，继续孙中山的国民革命事业。之后，汪精卫集团连续发布公开取缔共产党的反动法令。7月26日，武汉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公布7月14日中央政治委员会主席团提出的《统一本党政策案》，宣布：一、凡列名国民党员，在各级党部、各级政府和国民革命军中任职者，应自即日起脱离共产党，否则一律停止职务。二、共产党员不得以国民党名义做共产党的工作。三、国民党党员未经中央许可，不得加入他党，违反者以叛党论。7月27日，武汉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发表《告中国共产党书》，诬蔑加入国民党的共产党员“不愿接受本党决议，而至破坏全部革命工作”，指责湖南的共产党组织对于土地问题自布一种经济没收办法，是不愿与国民党合作，自绝于国民党的表现，并宣称：共产党应即自懔放弃其近日“对本党敌视的态度”，否则就要执行相当的纪律。同日，国民党中央训令各省党部、各省政府、各军部，应对共产党人的活动“严加防范”。8月1日，武汉国民政府发布命令，要国民政府领域之内的共产党员“务须洗心革面”，否则，一经拿获，即行明正典刑，“决不宽恕”。汪精卫集团在武汉地区搜捕、屠杀共产党人、革命人士和工农群众。随着汪精卫集团的叛变革命，国共两党的合作彻底破裂，1924年至1927年的大革命宣告失败。　（陈绍畴）

南昌起义

1927年8月1日，周恩来、贺龙、叶挺、朱德、刘伯承等领导中国共产党掌握和影响的军队，在江西南昌举行武装起义。

1927年大革命的失败，使中国共产党人开始认识到独立掌握军队和领导武装斗争的极端重要性。1927年7月中旬，中共中央临时政治局常委决定了土地革命和组织民众武装暴动的新政策，并计划集合自己的武力，联合国民革命军第二方面军总指挥张发奎“回粤徐图发展”。随后，派李立三、邓中夏、谭平山、恽代英等赴江西九江指导工作；指定聂荣臻、颜昌颐、贺昌组成前敌军事委员会，聂荣臻（1899—1992，四川江津人，时任中共湖北省委军委书记）为书记，先去九江准备起义。7月20日左右，李立三、邓中夏、谭平山、恽代英、叶挺、聂荣臻等在九江举行谈话会，认为张发奎已深受汪精卫的影响，并有“在第二方面军之高级军官中的共产分子如叶挺等须退出军队或脱离共产党”的表示。若“依靠张（发奎）为领袖之回粤运动，很少成功之可能”。建议抛弃依赖张发奎的政策，进行独立的军事行动，将军队迅速集中于南昌，联合贺龙（1896—1969，湖南桑植人）的国民革命军第二十军，举行武装起义。这一意见得到了正在庐山休息的瞿秋白的同意，并由瞿秋白带交中共中央决定。7月23日，贺龙抵九江，对起义极表赞同。7月24日或25日，中共中央临时政治局常委周恩来、张国焘等和共产国际代表罗米那兹（Б. Ломинадзе，1897—1935，苏联人）、苏联军事总顾问加伦举行会议，决定以国民党革命委员会的名义在南昌举行武装起义，起义后部队立即南下，占领广东，以期恢复革命根据地，取得出海口，求得共产国际的援助，再举行第二次北伐。7月26日，周恩来密赴九江，向李立三、邓中夏、谭平山、恽代英等传达中共中央关于举行南昌起义的决定。随后，准备参加起义的部队和大批共产党干部向南昌集中。7月27日，周恩来到达南昌。根据中共中央的决定，在江西大旅社正式成立了由周恩来、李立三、恽代英、彭湃组成的中共前敌委员会，周恩来为书记，负责领导南昌起义。前委当即讨论决定于7月30日晚举行武装起义。当时驻在南昌的敌军，有朱培德的国民革命军第五方面军总指挥部及警卫团，第三军第二十三团、第

二十四团，第六军第五十七团，第九军第七十九团、第八十团，南昌卫戍司令部和江西省政府警卫部队等，共约1万人。驻在九江、南昌地区中国共产党所掌握和影响的起义部队，有叶挺指挥的第十一军第二十四师，贺龙（南昌起义后参加共产党）指挥的第二十军，周士第指挥的第四军第二十五师，朱德领导的第五方面军第三军军官教育团和南昌公安局的保安队等部，共2万余人。7月28日，起义军总指挥部成立，贺龙任总指挥，叶挺任前敌总指挥。同日，周恩来到第二十军指挥部会见贺龙，告以中共中央关于南昌起义的决定和具体行动计划。贺龙表示："我完全听共产党的话，要我怎样干就怎样干。"7月29日，张国焘以中共中央代表身分到九江，给中共前委连发两封密电谓："暴动宜慎重，无论如何候我到再决定。"7月30日晨，张国焘到达南昌，传达共产国际关于南昌起义的复电：如有成功把握，可举行暴动；否则不可动，将在军队中的同志退出，派到各地农民中去。中共前委即召开扩大会议。会上，张国焘以共产国际的电报为由，主张"应极力拉拢张发奎，得到张发奎之同意，否则不可动"。周恩来、李立三、谭平山等反对。周恩来等表示："暴动断不能迁延，更不可停止"，"应当是我党站在领导的地位，再不能依赖张（发奎）。"7月31日，周恩来主持召开中共前委紧急会议，经过数小时激烈辩论，张国焘不得不表示服从多数。会议最后决定8月1日晨4时举行起义。后因第二十军第一团一副营长向敌告密，中共前委决定起义提前2小时举行。8月1日凌晨2时，起义枪声打响，经过4个多小时激战，全歼城内守敌3000余人，缴枪5000余支，占领了南昌城。当日上午，在原江西省政府所在地西华厅召开有中国共产党人和国民党左派人士参加的国民党中央委员及各省、区、特别市和海外各党部代表联席会议，由叶挺报告起义经过。会议议决成立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推举邓演达、张发奎、谭平山、陈友仁、吴玉章、彭泽民、林伯渠、贺龙、郭沫若、黄琪翔、恽代英、江浩、朱晖日、周恩来、张国焘、叶挺、张曙时、李立三、徐特立、彭湃、苏兆征、宋庆龄、何香凝、于右任、经亨颐等25人为委员，由宋庆龄、贺龙、张发奎、邓演达、谭平山、郭沫若、恽代英等7人组成主席团。会议通过了《联席会议宣言》，宣告国民党革命委员会将于最短期间，当确立革命的新根据地；坚持孙中山的革命的三民主义与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政策；继续不妥协地反对帝国主义；继续为解决土地问题，解放农民，打倒乡村封建地主的反动势力而奋斗。8月2日，聂荣臻、周士第率领在九江与南昌之间的马回岭起义的第四军第二十五师两个团3000余人，赶到南昌。同日，革命委员会发布命令，任命吴玉章为秘书长，刘伯承（1892—1986，四川开县人）为参谋长，林伯渠为财政委员会主席，恽代英为宣传委员会代主席，郭沫若为总政治部主任，张国焘为农工委员会主席，张曙时为党务委员会主席，李立三为政治保卫处处长；起义部队仍沿用国民革命军第二方面军的番号，任命贺龙为第二方面军代总指挥，叶挺为代前敌总指挥。下辖3个军：第九军，军长韦杵（未到任），副军长朱德（不久即任军长），党代表朱克靖；第十一军，军长叶挺（兼），副军长蔡廷锴，党代表聂荣臻；第二十军，军长贺龙（兼），党代表廖乾吾。总计兵力2万余人。是日下午，南昌工农商学兵各界群众数万人集会，庆祝起义胜利和举行革命委员会宣誓就职典礼。8月3日，起义部队根据中共中央的预定计划，开始分批撤离南昌，取道赣东临川（抚州）、宜黄、广昌，南下广东。8月18日，到达广昌。然后分宁都、石城两路向瑞金进军。8月26日，贺龙率二十军在瑞金以北壬田击溃王文翰两个团。次日占领瑞金。8月30日，叶挺、朱德指挥起义部队在会昌向守敌钱大钧部发起攻击，俘敌900余人，缴枪1000余支。随后经福建长汀（汀州）、上杭，沿汀江、韩江南下，直趋广东潮安（潮州）、汕头地区。9月19日，进占大埔三河坝。中共前委决定分兵两路：朱德率第十一军第二十五师和第九军一部留守三河坝，警戒梅县方面的敌军；周恩来、叶挺、贺龙、刘伯承率主力部队第二十军和第十一军第二十四师向潮汕进军。9月23日与24日，进占潮安、汕头后，再次分兵：周逸群率第三师留守潮汕；贺龙、叶挺率主力部队经揭阳向丰顺进军。由于缺乏经验，起义部队没有与当地农民武装相结合，而是孤军南下。起义军进入广东后，总兵力约有1.07万人。贺龙、叶挺率第十一军第二十四师和第二十军第一、第二师，共约6000人向西进攻惠州，在距丰顺县汤坑15公里的白石、汾水一带，遭到3倍于己的国民党军陈济棠等部的阻击。起义部队苦战3昼夜，歼敌3000余人，但本身也伤亡2000余人，无力再战，于9月30日退至揭阳。9月底，国民党军黄绍竑部分两路围攻潮安。起义部队腹背受敌，于10月1日撤出潮安、汕头。10月3日，中共前委在普宁流沙镇召开会议，决定向海丰、陆丰转移。保存下来的起义部队一部分约1200人，在董朗、颜昌颐的率领下到达海丰、陆丰地区，与当地农民武装会合，继续坚持革命斗争；由朱德、陈毅等率领从三河坝退

下来的另一部分近 800 人，经赣南、粤北转战到湘南地区。1928 年 4 月到达井冈山，与毛泽东领导的工农革命军会师。起义部队南下失败后，周恩来等一部分领导人，于 1927 年 10 月中旬到了香港。他们总结教训，决定命令起义军余部“各就所在地与农民结合，努力实行农村斗争”。南昌起义打响了中国人民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第一枪。从此开始了中国共产党独立地领导革命武装斗争的新时期。1933 年 6 月 30 日，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决定以 8 月 1 日为中国工农红军纪念日。7 月 11 日，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批准此决定。从此，8 月 1 日，成为中国人民解放军的建军节。　(陈永禄)

八七会议召开

1927 年 8 月 7 日，中共中央在湖北汉口召开的紧急会议。

大革命失败后，国内革命形势和阶级关系发生了新的变化。中国共产党迫切需要彻底清算并纠正过去中共中央指导机关的严重错误，制定新的路线和政策。1927 年 8 月 7 日，中共中央在湖北汉口秘密召开紧急会议，这便是八七会议。参加会议的有中共中央委员李维汉、瞿秋白、张太雷、邓中夏、任弼时、苏兆征、顾顺章、罗亦农、陈乔年、蔡和森；中央候补委员李震瀛、陆沉、毛泽东；中央监察委员杨匏安、王荷波；共青团代表李子芬、杨善南、陆定一；湖南代表彭公达；湖北代表郑超麟；中央军委代表王一飞；中央秘书处负责人邓小平；还有共产国际代表罗米那兹和牛曼(Heinz Nunmann，1902—1937)。会议由瞿秋白、李维汉主持。会上，罗米那兹作关于《党的过去错误及新的路线》的报告和结论，瞿秋白代表中共中央临时政治局常委作《将来工作方针》的报告。会议总结了 1924 年至 1927 年大革命失败的经验教训，着重清算了以陈独秀为代表的右倾投降主义错误，指出它在同国民党的关系上，完全放弃了共产党的独立的政治立场，实行妥协退让政策，使共产党的指导者成了国民党上层分子的政治上的俘虏；在革命武装问题上，“没有想着武装工农的必要，没有想着造成真正的工农军队”，甚至主动下令解散工人纠察队；在对待工农革命运动上，没有积极支持和领导农民革命运动，而“受着国民党领袖恐吓犹豫的影响，不能提出革命的行动政纲来解决土地问题”。会议确定了土地革命和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统治的总方针，并把发动农民举行秋收起义作为当时党的最主要任务。毛泽东在会上发言时强调：“以后要非常注意军事，须知政权是由枪杆子中取得的。”会议通过了《中国共产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告全党党员书》和《最近农民斗争的议决案》、《最近职工运动议决案》、《党的组织问题议决案》。会议选出中共中央临时政治局，苏兆征、向忠发、瞿秋白、罗亦农、顾顺章、王荷波、李维汉、彭湃、任弼时等 9 人为临时政治局委员；邓中夏、周恩来、毛泽东、彭公达、张太雷、张国焘、李立三等 7 人为临时政治局候补委员。8 月 9 日，瞿秋白主持召开中共中央临时政治局第一次会议，推选瞿秋白、苏兆征、李维汉为中央临时政治局常务委员会委员。八七会议给正处在思想混乱和组织涣散中的中国共产党指明了新的出路，为挽救党和革命做出了巨大的贡献。中国革命从此开始由大革命失败到土地革命战争兴起的历史性转变。但是，这次会议由于受共产国际及其代表的“左”倾思想和党内“左”倾情绪的影响，在反对右倾错误时没有防止“左”的错误，不认识应当根据各地不同的情况，组织恰当的反攻或必要的策略上的退却，反而容许和助长了冒险主义和命令主义的倾向，并在组织上开始了宗派主义的过火的党内斗争，因而为后来的“左”倾错误开辟了道路。　(陈永禄)

湘赣边界秋收起义

1927 年 9 月，毛泽东与中共湖南省委领导在湖南、江西边界地区举行的武装起义。

1927 年 8 月 3 日，中共中央制定《关于湘鄂粤赣四省农民秋收暴动大纲》，决定在大革命时期工农运动基础较好的这 4 个省发动秋收起义。八七会议确定把发动农民举行秋收起义作为当时党的最主要的任务。会后，中共中央派毛泽东、彭公达回长沙改组中共湖南省委，领导秋收起义。8 月 16 日，中共湖南省委改组，彭公达任省委书记。8 月 18 日、30 日，中共湖南省委先后召开会议，根据八七会议的精神讨论土地纲领和军事问题，制定了秋收起义计划。会上，毛泽东指出：要发动暴动，单靠农民的力量是不行的，必须有一个军事的帮助。有一两团兵力，这个暴动就可起来，否则终归于失败。并强调我们党从前的错误，就是忽略了军事，现在应以 60%的精力注意军事运动。实行在枪杆子上夺取政权，建设政权。鉴于国民党已经变成压迫、屠杀民众的工具，会议认为起义不应再打国民党的旗子，而应高高打出共产党的旗子来号召，并应竭力宣传和建设工农政权。会议决定集中力量，在以长沙为中心的湘东、赣西地区，包括湘潭、醴陵、浏阳、平江、萍乡、安源等处发动

起义。同时，成立了中共湖南省委前敌委员会作为秋收起义的领导机关，毛泽东任前委书记。9月初，毛泽东在安源召开军事会议，部署起义。将参加起义的部队和工农武装统一编为工农革命军第一军第一师，卢德铭为总指挥，余洒度为师长，下辖3个团：第一团，由原国民革命军第四集团军第二方面军总指挥部警卫团和湖南平江、湖北崇阳、通城的农民武装组成，团长钟文璋；第二团，以安源工人纠察队、矿警队为骨干，吸收江西萍乡、莲花、湖南醴陵等县的农民武装组成，团长王兴亚；第三团，以湖南浏阳农民自卫军为主，吸收原国民革命军第四集团军第二方面军总指挥部警卫团一部组成，团长苏先骏。还收编了一部分原黔军武装为第四团，团长邱国轩。全师共约5000人。起义计划兵分3路，分别从江西修水、安源、铜鼓出发，进攻平江、萍乡、醴陵、浏阳，然后会攻长沙。9月9日，湘赣边界武装起义爆发。第一团从修水出发，进入湖南，取道长寿街，进攻平江。在进抵长寿街附近的金坪时，第四团突然叛变，第一团腹背受敌，两个营被打散。9月10日，第二团在安源起义，相继攻克醴陵、浏阳。后在浏阳遭敌人袭击，部队损失惨重。9月11日，第三团从铜鼓向浏阳挺进，在攻克浏阳东门市后，遭敌军围攻，撤到浏阳上坪。起义部队受挫后，毛泽东于9月14日在上坪召开紧急会议，决定放弃进攻长沙的军事行动，命令各路起义军迅速到浏阳文家市集中。9月19日，中共前委在文家市召开会议，讨论部队的进军方向问题。毛泽东在会上分析了敌强我弱的形势，指出敌人的主要力量在中心城市，目前我们攻打中心城市已不可能取得胜利，必须改变攻打长沙的计划。会议决定起义军撤出湘东，向南转移到湘赣边界敌人统治力量比较薄弱的农村中去。9月29日，部队到达江西永新三湾，中共前委决定将保留下来不足千人的部队进行改编，将一个师缩编为一个团，称工农革命军第一军第一师第一团；在部队中建立中国共产党的各级组织和党代表制度，党支部建在连上，班、排设党小组，营、团设党委；在连以上设党代表，建立各级士兵委员会，实行民主管理制度，在政治上官兵平等。三湾改编，确立了共产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为建立一支新型的人民军队奠定了组织基础。10月3日，工农革命军到达江西宁冈古城。10月4日和5日，毛泽东召开中共前委扩大会议，初步总结了湘赣边界秋收起义的经验教训，决定了在井冈山地区建立根据地和对这个地区的农民武装袁文才、王佐部采取团结改造的方针。10月7日，毛泽东率领工农革命军到达宁冈茅坪，10月27日抵茨坪。11月初，又返回茅坪，开始了创建井冈山革命根据地的斗争。

（陈永禄）

宁汉合流

1927年9月，国民党内在南京的蒋介石集团同在武汉的汪精卫集团在反共的基础上实行反革命合流。

蒋介石、汪精卫相继背叛革命后，中国国民党已变成为一个由代表地主、买办资产阶级利益的反动集团所控制的政党。1927年7月以后，国民党内形成了宁、汉、沪3个集团：在南京，有蒋介石控制的“国民政府”和“中央党部”；在武汉，有汪精卫控制的“国民政府”和“中央党部”；在上海，西山会议派也以“中央党部”的名义进行活动。此外，还有粤、桂、晋等地方势力。宁、汉双方集中了国民党中最重要的一批领袖人物，又各自掌握着一个政府，拥有一支军队，割据着一大块地盘，因而成为最有分量的势力。他们为争夺最高权力明争暗斗，但很快地在反共的基础上开始合流。他们为了实现“合作清党”、“统一党务”，进行了一系列酝酿和接触。冯玉祥从中牵线，与各方反复电商，于7月20日提出解决宁、汉合作的具体办法。汪精卫等表示愿意“和平统一”，同意“迁都南京”。蒋介石、李宗仁、胡汉民等欢迎武汉重要分子到南京“柄政”，赞成各方“共同北伐”。8月上旬，宁、汉双方基本上达成了妥协。这时，汪精卫等虽然同意与宁方合作，但仍坚持反蒋态度，且声浪很大。同时，蒋介石排斥异己，引起桂系的不满，李宗仁、白崇禧等对蒋不再采取积极支持的态度。加之蒋介石亲自指挥的津浦线上战事的失败，使其陷入困境。蒋介石感到自己的地位还不巩固，便采取以退为进的策略，于8月13日发表下野宣言，宣布辞去国民革命军总司令职务，然后回浙江奉化。不久，东渡日本。蒋介石的下野，加快了宁、汉合作的步伐。9月11日至13日，宁、汉、沪3方代表在上海举行谈话会。出席会议的有汪精卫、谭延闿、孙科、李宗仁、张静江、蔡元培、李石曾、邹鲁、张继、谢持、许崇智等21人。宁方的蒋介石、吴稚晖、胡汉民和汉方的陈公博、顾孟余拒不出席。经激烈争吵，会议通过关于党务方面的决议案，主要内容是：一、组织中央特别委员会，统一党务；二、特别委员会由宁、汉、沪3方共同推定若干人组成；三、宁、汉、沪3方中央党部将其职权委托于特别委员会；四、特别委员会除施行中央执行委员会全部职权外，应负责统一各地方的国民党党部，并

筹备国民党三大的召开；五、规定特别委员会委员的名额32人，候补委员为9人，具体人员由3方共同提出，由中央执行委员会临时会议发表；六、中央各部部长人选，由特别委员会决定。会议作出关于政府方面的决议案，主要内容是：宁、汉两方政府合并、改组，政府委员、各部部长、军事委员会委员等，皆由特别委员会会议决定。会议推举汪精卫、谭延闿、蔡元培、谢持共同起草统一宣言。9月13日，武汉国民政府停止办公，汪精卫通电下野。9月15日，在南京召开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中央监察委员临时联席会议，决定成立国民党中央特别委员会，推定汪精卫、蒋介石、胡汉民等32人为中央特别委员会委员，并决定劝蒋、汪、胡迅速来南京就职。9月16日，国民党中央特别委员会在南京正式成立，并举行第一次会议。9月17日和19日继续开会，作出以下决定：一、推定汪精卫、蔡元培、谢持为中央特别委员会常务委员；叶楚伧为秘书长；各部不设部长，实行委员制，由各委员互选主任1人以统理党务。二、改组国民政府及军事委员会。推定丁惟汾等47人为国民政府委员会委员，以汪精卫、胡汉民、李烈钧、蔡元培、谭延闿5人为常务委员；推定于右任等67人为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委员，以蒋介石、汪精卫、胡汉民、谭延闿、唐生智、杨树庄、李宗仁、白崇禧、李济深、何应钦、冯玉祥、阎锡山、程潜、朱培德等14人为主席团。三、取消中央政治委员会及各地政治分会，其职权分别由国民党中央党部和省党部、国民政府和省政府执行。四、设立监察院。同时，发表了《中国国民党特别委员会宣言》，宣告国民党"统一"完成。9月20日，新产生的国民政府委员和军事委员会委员在南京举行就职典礼。国民政府发表成立宣言，宣称："本政府今后誓当竭智尽能，肃清共党，以拯同胞永脱布尔什维克恐怖之祸，而保持国民革命势力之统一。"实际上，宁、汉、沪3方合作很快又为新的分裂所代替，出现了国民党新军阀混战的局面。（陈永禄）

瞿秋白"左"倾盲动主义

1927年11月至1928年4月，以瞿秋白为代表的"左"倾盲动主义的急性病在中国共产党内取得支配地位。

瞿秋白(1899—1935)，江苏常州人。1927年八七会议后任中共中央临时政治局常委，主持中央工作。1927年11月9日至10日，瞿秋白在上海主持中共中央临时政治局扩大会议。在共产国际代表罗米那兹的"左"倾思想指导下，会议通过《中国现状与党的任务决议案》、《最近组织问题的重要任务议决案》、《政治纪律决议案》等。会议号召一切革命力量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坚决反对帝国主义，推翻国民党的反动统治；坚决领导农民暴动，实行农村割据；没收地主阶级的土地归农民耕种；组织工农革命军，开展游击战争等。这些都是正确的。但会议混淆民主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的界限，认为中国革命的性质是"无间断的革命"，"中国革命进展的过程中决不能有民权革命自告一段落的局势；这一革命必然是急转直下从解决民权革命的责任进于社会主义的革命"。会议否认革命处于低潮，认为国民党新军阀的统治已经处于崩溃的边缘，"现时全中国的状况是直接革命的形势"。会议确定实行全国武装暴动的总策略，要求农村暴动与城市暴动相结合，而以城市暴动为"中心及指导者"。会议还规定没收中外大资本家的工厂企业、绝无顾惜地杀尽豪绅反革命派等过左政策。通过这次会议，"左"倾盲动主义的急性病在中国共产党内取得支配地位。会后，一些地区发生强迫工人罢工、农民暴动和盲目烧杀等情况。农村的武装起义多数没有成功，或根本没有发动起来。武汉、长沙、上海等大城市中少数工人举行的罢工，也很快被敌人镇压下去。大革命失败后保存下来的有限的革命力量进一步遭受重大损失。1928年2月25日，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第9次扩大会议通过《关于中国问题的议决案》，基本上正确地分析了中国革命的性质和革命的形势，批评了盲动主义和罗米那兹的"无间断革命"的错误观点。4月30日，中共中央临时政治局发出《中央通告第44号》，承认中国共产党内存在着盲动主义的"左"倾错误，表示接受共产国际的决议，并指出争取群众，建立城市、乡村的群众组织，巩固与健全共产党的组织，是当前最重要的工作。至此，以瞿秋白为代表的"左"倾盲动主义错误在全国范围的实际工作中基本结束。（陈绍畴）

广州起义

1927年12月11日，中国共产党在广州发动反击国民党反革命势力的武装起义。

1927年11月，国民党粤系军阀张发奎和桂系军阀李济深、黄绍竑为争夺对广东的控制权，爆发了粤桂战争。张发奎的粤军主力开赴广东肇庆、广西梧州一带作战，广州市内兵力空虚。广州及其周围地区的工农运动在大革命高潮时期又有较好的基础。11月17日，中共中央通过《广东工作计划决议案》，认为目前广东的局面正是工农进攻的一个好机会，要

求中共广东省委迅速组织全省工农起义，建立苏维埃政权。11月26日，中共广东省委决定于12月11日在广州发动武装起义，成立了指挥起义的革命军事委员会，由广东省委书记张太雷(1898—1927，江苏常州人)任委员长。12月11日凌晨，在张太雷、叶挺、叶剑英等领导下，国民革命军第四军教导团和警卫团一部、广州工人赤卫队7个联队，分别向驻在广州市内各处的敌人发起攻击，市郊芳村、西村等地一部分农民武装入城参加起义。经过10多小时激战，起义部队占领了广州市区的绝大部分，成立了广州市苏维埃政府，苏兆征为主席(因病未到任，由张太雷代理)，叶挺任起义军总司令，提出"打倒帝国主义"、"打倒军阀"、"镇压地主豪绅"等政治纲领，颁布了工人实行8小时工作制、一切土地归农民等法令。这时，张发奎部主力约3个师共5万人回师广州，在美、英、法、日等帝国主义的军舰和陆战队支援下，从南、西、北三面进攻起义部队。由于敌我力量悬殊，起义军不可能坚守广州。起义的当晚，叶挺主张趁张发奎部主力尚未开到广州前，将起义部队撤出广州。这个正确意见遭到共产国际代表诺伊曼(H·Neumann，1902—1937，德国人)的严厉批评。他认为起义只能以城市为中心，必须"进攻进攻再进攻"，退却就是"动摇"。起义部队经过3天3夜的英勇奋战，终因寡不敌众，遭受严重损失。张太雷和许多指战员在战斗中牺牲，革命群众七八千人惨遭杀害。12月13日，起义部队余部约1000人被迫撤出广州。部分武装在广东花县由叶镛、袁裕(袁国平)整编为工农革命军第四师，开赴东江地区，与海丰、陆丰的农民武装会合。另一小部分转移到广西左、右江地区，后来参加了百色起义。还有少数人员撤往粤北韶关附近，加入朱德、陈毅率领的南昌起义保留下来的部队，后来上了井冈山。广州起义是中国共产党对国民党反动派屠杀政策的又一次英勇的反击。它表现了中国共产党和革命人民的英勇斗争精神。实践再次证明：在国民党新军阀控制全国政权和掌握强大武装的情况下，企图通过中心城市武装暴动来夺取革命胜利是不可能的。革命只有在反革命统治力量薄弱的农村，才有可能积蓄力量，最后夺取革命的胜利。

(陈绍畴)

第二次"北伐"

1928年4月至6月，国民党政府军队北上讨伐奉系军阀张作霖的战争。

1928年1月8日，国民政府明令蒋介石复任国民革命军总司令。蒋介石重新上台后，拉拢汪精卫，排斥桂系势力。2月2日至7日，国民党在南京召开二届四中全会，改组了国民党中央和国民政府机构，谭延闿(1880—1930，湖南茶陵人)担任国民政府主席，蒋介石兼任军事委员会主席。会议认为"加倍努力以促进北伐之完成，实为今日不可稍缓之工作"，并通过《集中革命势力限期完成北伐案》。会后，蒋(介石)、冯(玉祥)、阎(锡山)、桂(李宗仁、白崇禧、黄绍竑、李济深)4大派系，由于对奉系军阀作战的需要达成暂时的妥协。它们的军队先后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一、第二、第三、第四集团军，蒋介石、冯玉祥、阎锡山、李宗仁分别担任这4个集团军的总司令，共约100万兵力。北伐的作战部署是：以何应钦为北伐军总参谋长，留守南京；第一集团军沿津浦线北进；第二集团军沿京汉线北进；第三集团军由京绥、正太线东攻。各路会师北京。4月5日，蒋介石在徐州誓师北伐。4月9日，下达总攻击令，第一、第二、第三集团军，分别沿津浦、京汉、正太铁路向奉军发起进攻。当时，奉系军阀的安国军亦号称百万，共有7个方面军团，分别以孙传芳、张宗昌、张学良、杨宇霆、张作相、吴俊升、褚玉璞为军团总司令。其作战部署是：对京汉路、津浦路取攻势防御，对正太路、鲁西、大名一带取攻势，参加作战的兵力达60万人。4月27日，第一集团军攻克山东泰安，大破张宗昌、孙传芳联军主力，直鲁军向黄河北岸溃退。5月1日，北伐军第一集团军占领济南。日本为阻止北伐军北进，于5月3日出兵济南干涉，制造了"济南惨案"。国民政府对日采取妥协的方针。北伐部队撤出济南，绕道北进。5月下旬，李宗仁率第四集团军沿京汉线北上。5月28日，各集团军开始全线进攻，相继攻占邯郸、石家庄、保定、德州、大同、张家口等地，直逼北京、天津地区。5月30日，张作霖见大势已去，命令部队撤离京津地区，向滦河方向退却。他本人决定出关。国民政府委派南桂馨、孔繁蔚为代表到北京与奉系代表张学良、杨宇霆谈判和平接收京津事项。议定国民政府给奉军撤退以方便条件，奉军未完成撤退以前，国民党政府军队不予追击。6月2日，张作霖发表出关通电。次日凌晨，张作霖乘专列离北京返奉天(沈阳)。6月4日晨，当专列行至皇姑屯时被日本关东军预谋炸死。同日，国民政府任命阎锡山为京津卫戍总司令。阎即呈请委任张荫梧为北京警备司令、傅作义为天津警备司令。6月8日，第三集团军商震部开进北京城。6月12日，傅作义接收天津。6月15日，国民政府发表《对外宣言》，宣称"统一告成"，要

求与各国遵正当手续另订新约。6月20日，国民党中央政治会议议决：直隶省改为河北省，旧京兆区各县并入该省；北京易名北平；北平、天津为特别市。6月27日，张学良返回奉天。7月1日，张通电停止战争，并开始与南京国民政府代表商洽合作事宜。7月6日，蒋介石及参加北伐的主要将领在北平香山碧云寺孙中山灵前，举行北伐完成的祭告典礼。

（陈永禄）

济南惨案

1928年5月3日，日本帝国主义在山东济南屠杀中国军民的事件，又称五三惨案。

1928年4月上旬，蒋介石在英、美帝国主义的支持下，进行第二次“北伐”，攻打奉系军阀张作霖。4月中旬，北伐军占领山东临城、济宁、兖州等地。为阻止北伐军北进，4月19日，日本内阁会议以“保护日侨”为借口，决定第二次出兵山东，由国内派遣福田彦助率第六师团5000余人至青岛，同时令日本天津驻屯军步兵三中队沿津浦路南下济南。4月25日，日军第六师团在青岛登陆，随即开赴济南。4月28日，日军先遣队1500余人由天津进驻济南城外商埠区，自定防界，不准中国军民进入，其势力范围占繁华商业区一半以上，并在防界内设立沙垒、电网。4月30日，北伐军第一集团军方振武部和第二集团军孙良诚部抵济南近郊，奉军所据泰安、津口、界首、肥城一线阵地被北伐军击溃，张宗昌、孙传芳离开济南，退守德州。5月1日，北伐军进占济南。是日下午，日军蓄意挑衅，杀害中国民众。5月2日，济南卫戍司令方振武会晤日军驻济南第一旅团司令斋藤，声明北伐军“必力负维持秩序、保护外侨之责”，要求撤销日兵的警备。同日，福田彦助率日军第六师团主力抵济南，对其官兵说：“凡我士兵，于奉令开火之后，必当尽力歼吾敌人，以保我大日本帝国之权威。”5月3日上午9时，北伐军第四十军一名士兵生病，被送往商埠区外交部山东交涉公署对面的医院治疗，日军阻止通行，双方发生争执。日军开枪打死中国士兵和伕役各1人。随后，日军向北伐军第四十军第三师第七团发起攻击，并炸毁中国军用电台，守台战士全部被炸死。这时，于5月2日抵济南的国民党政府外交部长黄郛即往日军司令部交涉，日军竟禁止其自由行动，不给饮食。新任战地政务委员会委员兼外交处主任蔡公时即与日本领事通电话，询问冲突原因。下午4时，日军包围交涉公署。当晚9时许，日军公然破坏外交惯例，借口两名日军被枪杀在交涉公署墙内，诬指是交涉公署人员所为，冲入交涉公署，将蔡公时及职员19人捆绑毒打。蔡提出抗议，怒斥日军暴行，日军先割去他的耳鼻，后又将其舌头、眼睛挖去。蔡公时等17人被日军惨杀。接着，日军又烧毁外交部办公处。事件发生后，蒋介石下令北伐军不准还击。并令驻商埠区的军队一律退出。同时，要求日军停止射击。但日军置之不理，竟开炮轰击济南城，制造了“济南惨案”。5月4日，蒋介石派高级参谋熊式辉和日军代表黑田周一谈判。日方提出极其苛刻的条件。同日，蒋介石令北伐军李延年团和苏宗辙旅一部留守济南卫戍，其余各部撤出济南，绕道北伐。国民党政府要求日本撤兵，日本则多方要挟。5月6日，城外日军开始攻击济南城。5月7日下午，日军第六师团长福田彦助向蒋介石提交最后通牒，提出5项无理要求：一、严惩北伐军有关高级军官；二、抗日的军队须在日军阵前解除武装；三、严禁一切反日宣传；四、12小时内撤退辛庄、张庄驻扎的军队；五、济南及胶济铁路沿线两侧10公里内，禁止驻扎中国军队。以上要求，限12小时内答复。5月8日，蒋介石派高级参谋熊式辉和战地政务委员会委员罗家伦由泰安去济南向日方说明：“全部承认”日军的要求，“同时亦请日本军处罚其责任者”。但福田彦助蛮横地声称期限已过，即下令用重炮轰击济南城。5月11日，日军占领济南，奸淫烧杀，无所不为。据济南惨案外交后援会调查团告世界各国民众书宣布：自惨案发生之日起，至5月11日止，中国军民共死亡3940人，受伤者1537人，建筑物、兵工厂、火药库、民房等一切财产之损失2962余万元。之后，中日两国代表就解决济南事件进行谈判。1929年3月28日，日本驻华公使芳泽谦吉和中国政府外交部长王正廷互换照会，其要点是：一、中日两国所受之损害问题，由双方各任命同数委员设立中、日共同调查委员会，实地调查决定；二、中国政府负全责保护在中国的日本人的生命及财产安全，日军于换文后两个月内全部撤去。这个协议，把日军屠杀中国数千军民的罪行一笔勾销。这是南京国民政府对帝国主义屈辱妥协的具体表现。（陈永禄）

井冈山革命根据地的建立

1928年5月，毛泽东、朱德等领导在湘赣边界井冈山地区创建的第一块农村革命根据地。

井冈山位于湖南、江西两省交界的罗霄山脉中段。这个地区群众基础较好，各县在大革命时期曾建立过共产党组织和农民协会。袁文才、王佐等领导的

农民武装在这里继续坚持斗争，并愿与工农革命军联合。井冈山地区大部分是山区，山高林密，地势险要，易守难攻，有回旋的余地；周围各县有自给自足的农业经济，便于部队筹款筹粮。湘赣边界地区距离国民党统治的南昌、长沙等中心城市较远，加之湘赣两省军阀之间又存在矛盾，连年混战，反动统治力量比较薄弱。1927年10月初，毛泽东率领工农革命军到达宁冈茅坪，开始创建农村革命根据地的斗争。11月上旬，毛泽东主持召开湘赣边界宁冈、永新、莲花等县共产党组织负责人会议，要求各县尽快恢复和建立共产党的组织，发动群众，开展武装斗争。工农革命军利用湘赣军阀混战的有利时机，首先在边界各县发动群众，打倒土豪劣绅，逐步开始分田斗争，建立工农民主政权。11月，工农革命军攻占茶陵县城，成立了边界第一个红色政权——茶陵县工农兵政府。随后，派游雪程、徐彦刚、陈伯钧、何长工等到袁文才、王佐部队帮助工作。12月，毛泽东要求工农革命军改变过去军队只顾打仗的旧传统，担负起打仗消灭敌人、打土豪筹款子、做群众工作3项任务。1928年春，毛泽东又总结部队从事群众工作的经验，规定了三大纪律、六项注意。三大纪律是：一、行动听指挥；二、不拿工人农民一点东西；三、打土豪要归公。六项注意是：一、上门板；二、捆铺草；三、说话和气；四、买卖公平；五、借东西要还；六、损坏东西要赔(1929年以后，又增加洗澡避女人和不搜俘虏腰包两项注意，发展成八项注意)。与此同时，工农革命军粉碎了江西国民党军队的"进剿"，先后攻克遂川、宁冈县城，成立了县工农兵苏维埃政府。到2月，先后建立了中共茶陵、遂川、宁冈、永新4个县委和中共酃县特别区委、中共莲花特别支部。至此，初步奠定了井冈山革命根据地的基础。同年1月，朱德(1886—1976，四川仪陇人)、陈毅(1901—1972，四川东至人)率南昌起义保留下来的武装从粤北转移到湘南，发动宜章起义，成立了工农革命军第一师，朱德任师长，陈毅任党代表。4月下旬，朱德、陈毅率所部到达宁冈砻市，和毛泽东所率部队会师，合编为中国工农革命军第四军(5月改称红军第四军)，朱德任军长，毛泽东任党代表兼军委书记，王尔琢任参谋长，陈毅任政治部主任。下辖3个师(不久取消师的建制，改编为4个团)：第十师，师长朱德(兼)，党代表宛希先；第十一师，师长张子清(毛泽东代)，党代表何廷颖；第十二师，师长陈毅(兼)。会师后，井冈山革命根据地的武装力量从原来的2000人增加到1万余人。5月20日，在宁冈茅坪召开中共湘赣边界第一次代表大会。会议总结了井冈山革命根据地的经验，指出革命根据地和红军能够长期存在并发展，回答了一些人提出的"红旗到底打得多久"的疑问，再次肯定了创造罗霄山脉中段政权的方针，反对逃跑主义，强调坚决地和敌人作斗争。会议选举产生了中共湘赣边界特别委员会(简称特委)，毛泽东任书记。之后，由陈毅担任红四军军委书记。5月下旬，湘赣边界工农兵苏维埃政府成立，袁文才任主席。从5月开始，湘赣边界各县掀起了全面分田的高潮。10月，中共湘赣边界第二次代表大会后，谭震林任中共湘赣边界特委书记。11月，根据中共中央的指示，重新组织中共红四军前委(3月曾被取消)，毛泽东任书记，统辖中共湘赣特委和红四军军委，并管理地方党组织工作。11月14日召开的中共红四军第六次代表大会后，朱德任红四军军委书记。在毛泽东、朱德领导下，红四军运用"敌进我退，敌驻我扰，敌疲我打，敌退我追"的游击战争的基本原则，粉碎了国民党军队的多次"会剿"，使根据地日益扩大。6月23日，取得龙源口战斗胜利后，井冈山革命根据地扩大到宁冈、永新、莲花3个全县，吉安、安福各一小部，遂川北部，酃县东南部，创造了井冈山根据地的全盛时期。12月11日，彭德怀、滕代远率领红五军主力到达井冈山，与红四军会师，进一步增强了井冈山地区工农武装的力量。1929年1月，红四军主力向赣南、闽西进军后，留下红五军和红四军第三十二团坚持井冈山的斗争。 (林健柏)

皇姑屯事件

1928年6月4日，日本关东军在沈阳附近皇姑屯预谋炸死奉系军阀首领张作霖的事件。

奉系军阀张作霖依靠日本帝国主义的扶植取得了东北的统治权。后与直系军阀合流，掌握了北京政权。1927年日本向张作霖提出在东北修筑铁路、开矿、设厂、自由租借土地和经营工商业的商租权、营业权等严重侵害中国主权的要求。张作霖对此既不敢公开对抗，又不想完全听命，采取拖延的办法，引起了日本的极大不满。1928年5月下旬，北伐军逼近北京。日本乘机强行威逼张作霖答应扩大日本在东北的权益，声称"帝国政府为了维持满洲治安，必将采取适当而有效的措施"。日本驻华公使芳泽谦吉奉田中义一首相命，劝告张作霖收兵回东北，如不听劝告，因失败而退回东北时，日军将在山海关拦击。张作霖被迫同意离开北京，退守东北。同时，日本加紧策划对付张作霖的各种方案：一、向山海关、锦州

增兵，解除张作霖败兵的武装，逼其下野，以杨宇霆代之；二、杀掉张作霖；三、继续与张作霖合作，但要使他成为日本的傀儡。最后，日本关东军司令官村冈长太郎等决定杀掉张作霖，并派关东军高级参谋河本大作去执行这一任务。河本先派参谋竹下义晴去北京，侦察张作霖的行踪，然后选择在南满铁路和京(北京)奉(沈阳)铁路的交叉点皇姑屯作为爆炸点。河本指派工兵在铁路桥下预先安放了120公斤炸药，接上电流引爆装置。河本考虑到爆炸失败的可能，又制定了第二步计划，即"使列车脱轨颠覆"，"不失时机地乘混乱之机，让'拔刀队'闯进去杀他"。6月3日，张作霖乘专列离开北京返奉天(沈阳)。次日晨5时许，当专列行进到皇姑屯车站以东南满路与京奉路交叉点的桥洞时，张作霖乘坐的花车前后三节车厢被炸翻，随行的黑龙江督办吴俊升当即殒命。张作霖身负重伤，倒在血泊之中，被送回奉天大元帅府急救，于当日上午10时左右身亡。事件发生后，东北局势一片混乱。东北军元老张作相等人为稳定东北政局，防止日本人乘机举事，对张作霖之死不发丧，严锁消息。对外声称：张作霖"身受微伤，精神尚好"，正在治疗中。等张学良回奉主持大计。6月17日，张学良由直隶(河北)滦州秘密回到奉天。6月20日，张学良通电就任奉天军务督办。6月21日，奉天省长公署正式公布张作霖死亡的消息。皇姑屯事件，是日本帝国主义决意抛弃张作霖、另行成立"满蒙帝国"计划的一部分。　　(陈永禄)

改订新约运动

1928年6月起，国民党政府发起与帝国主义列强以关税自主和废除领事裁判权为主要内容的"重订新约"运动。

国民党政府在"北伐"张作霖取得胜利后，为了树立对外"自主"的形象，于1928年6月15日发表对外宣言，内称："中国80余年间，备受不平等条约之约束。这种束缚，既与国际相互尊重主权之原则相违背，亦为独立国家所不许。……今当中国统一告成之际，应进一步而遵正当之手续，实行重订新约，以副完成平等及相互尊重主权之宗旨。"7月7日，外交部发表《关于重订新约之宣言》，宣布废除一切不平等条约，重订新约。提出废旧约订新约的原则是：一、中国与各国间条约之已届期满者，当然废除，另订新约；二、其尚未期满者，应即以正当的手续解除旧约，重订新约；三、其旧约业已期满而新约尚未订定者，另订适当临时办法，处理一切。当时，中国与意大利、丹麦、葡萄牙、比利时、西班牙、日本等国的不平等条约以及中法越南商约等已期满，尚未期满者为中国与美国、英国、法国、荷兰、瑞典、挪威等国的不平等条约。这次改订新约的外交活动，是在承认帝国主义对华不平等条约的基础上，主要是对关税自主和废除领事裁判权两项内容进行修订。7月25日，国民党政府财政部部长宋子文与美国驻华公使马慕瑞在北平签订《整理中美两国关税关系之条约》。条约规定：缔约各国不论以何借口，在本国领土内不得向彼国人民所运输进出口的货物，勒收关税或内地税或何项捐税，超过本国人民或其他国人民所定纳者，或有所区别。从8月起，中国陆续和德国、挪威、比利时、意大利、丹麦、葡萄牙、荷兰、英国、瑞典、法国、西班牙、日本等国签订新的关税条约或通商条约。但修订后的新约都规定"在彼此领土内享受之待遇，应与其他国享受之待遇毫无区别"，若一国在关税待遇上有所突破，则其他各国要享受最惠国待遇。必须所有与中国订有不平等条约的国家都签订了新约，承认了中国的关税自主，新约才能真正生效。还规定中国对进口货物所课税率，最高不得超过1926年关税会议所议定的税率。这样的关税自主，实际上仍然不能起到保护中国经济的作用。此外，中国海关的总税务司和各重要海关的税务司，仍由外国人担任；在一些新约中还保留了帝国主义国家的一些特权。事实上，中国的关税权仍不能真正独立自主。新的关税条约的签订，在一定程度上克服了过去关税制度上的一些弊病。首先是改变了均一税制的不合理规定，把过去进口货物不分种类，一律征收5%的关税，改为将进口货物分为不同等级，按不同的税率收缴关税。其次是废除陆关关税比海关关税少纳三分之一的规定，使陆、海关税税率划一。关税自主后，中国海关税收有了明显的增加。1927年海关税收为1.13亿元(中国银元)，1928年为1.34亿元，1929年为2.45亿元，1930年为2.92亿元，1931年为3.88亿元。关于废除领事裁判权的要求，从一开始就遭到各帝国主义国家的反对。当时，在6个约期已满的国家中，除日本反对废除旧约外，意大利、丹麦、葡萄牙、比利时、西班牙等国在与中国重订的新约中，都承认取消在中国的领事裁判权。但又规定应于现享有领事裁判权的国家半数以上放弃该特权时，方得废除。1929年4月，国民党政府照会约期未满的美、英、法等国，吁请废除领事裁判权，然无结果。1931年5月4日，国民党政府公布《管辖在华外国人实施条例》，其中某些条文较过去有所进步，但

仍保留了外国人的一些特权。且条例一再延期实施，最后不了了之。改订新约运动客观上反映了中国人民的愿望和利益，但并没有从根本上取消帝国主义在中国的一切特权。　(陈绍畴)

中国共产党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召开

1928年6月18日至7月11日中国共产党在苏联莫斯科举行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

中共六大的召开，经过了将近一年的酝酿和准备。1928年6月9日，斯大林(Иосиф Виссарионович Сталич，1879—1953)与中共中央负责人瞿秋白、向忠发(1880—1931，湖北汉川人)、周恩来、李立三等谈话，就中国革命的性质和革命形势问题发表了意见，指出中国革命是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不是"不断革命"，也不是社会主义革命。现在中国的形势不是高潮，是低潮。革命高潮是将来的事，而不是眼前的事。6月14日、15日，共产国际政治书记处书记布哈林(Н. И. Бухарин，1888—1938，前苏联人)召集政治谈话会。参加谈话会的有瞿秋白、苏兆征、周恩来、蔡和森、李立三、项英、向忠发等21人。会议就中国革命的性质、任务和革命形势、党的工作路线、城市工作、农村工作、工人运动和农民运动等问题交换了意见，并对准备提交大会的政治报告进行了讨论。这实际上是大会的一次小范围的预备会议。6月17日下午，周恩来主持召开各省代表团书记联席会议，初步通过了大会主席团和秘书长名单。当晚，瞿秋白主持举行大会预备会议，通过了大会主席团、秘书处及代表资格审查委员会的组成人员名单。6月18日，中国共产党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正式开幕。大会的主题是总结大革命失败以来的经验教训，特别是八七会议以来党的工作，制定党在新的历史时期的路线和政策。出席大会的中共中央主要领导人和各地代表142人，其中有选举权的正式代表84人，代表全国党员4万多人。瞿秋白致开幕词。共产国际和其他国家共产党的代表、少共中央和中华全国总工会的代表致祝词。6月19日，布哈林代表共产国际作《中国革命与中国共产党的任务》报告。6月20日，瞿秋白代表中共第五届中央委员会作题为《中国革命与共产党》的政治报告。接着分组讨论这两个报告，主要集中在中国革命的性质和任务、革命的高潮和低潮、要不要进行合法斗争等问题上。6月30日，周恩来作组织问题报告。7月1日，李立三作农民土地问题报告。7月3日，周恩来作军事问题报告，刘伯承作军事问题副报告。7月4日，向忠发作职工运动报告。7月9日、10日，大会通过《政治议决案》、《土地问题议决案》、《农民运动决议案》、《职工运动决议案》、《关于党纲的决议》、《关于组织问题草案之决议》、《军事工作决议案(草案)》和《中国共产党党章》等文件。大会分析了第一次大革命失败后中国的政治经济状况，明确指出：中国仍然是一个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中国革命现在阶段的性质是资产阶级性的民权主义革命"。如果认为中国革命目前阶段已转变到社会主义性质的革命，这是错误的。同样，认为中国现时革命为"无间断革命"也是不对的。因此，驱逐帝国主义者，完成中国的真正统一；彻底的平民式的推翻地主阶级私有土地的制度，实行土地革命；力争建立工农兵代表会议(苏维埃)的政权，是当前中国革命的中心任务。大会提出中国民主革命的10项政纲：一、推翻帝国主义的统治。二、没收外国资本的企业和银行。三、统一中国，承认民族自决权。四、推翻军阀国民党的政府。五、建立工农兵代表会议(苏维埃)政府。六、实行8小时工作制，增加工资，失业救济与社会保险等。七、没收一切地主阶级的土地，耕地归农。八、改善兵士生活，给兵士土地和工作。九、取消一切政府军阀地方的税捐，实行统一的累进税。十、联合世界无产阶级和苏联。大会认为，当前中国革命的形势是处在两个革命高潮之间，即低潮时期，革命的发展具有不平衡性。这个时期，一般说来是没有广泛的群众的革命高潮，"反革命的势力还超过工农"。由于引起现代中国革命的基本矛盾一个也没有解决，新的广大的革命高潮是不可避免的。党的总路线是争取群众，准备起义，而不是立即举行全国性的起义。大会强调，必须加强党的组织建设和思想建设，加强自己的战斗力及党的无产阶级化。积极恢复和发展各级组织，实行真正的民主集中制，发扬党内民主，肃清各种错误倾向。目前最主要的危险倾向就是盲动主义和命令主义。必须继续反对机会主义，尤其要反对"左"倾盲动主义。大会指出，党在职工运动中的主要任务，是争取工人阶级的大多数。必须坚决反对强迫工人罢工和盲目实行武装暴动，用最大努力恢复革命工会，用一切力量团结统一无产阶级群众，尽可能地领导群众的日常的经济政治斗争，发展工农群众组织。大会提出，必须努力扩大农村革命根据地，发展红军，实行土地革命，无代价地立即没收豪绅地主阶级的土地财产，将没收的土地归农民代表会议(苏维埃)处理，分配给无地及少地的农民使用。7月10日，大会根据主席团和各省代表团的提名，选举产生了中共中央委员23人，候补中央委

员13人。7月11日，大会闭幕，向忠发致闭幕词。7月19日，中共六届一中全会选举中央政治局，苏兆征、项英、周恩来、向忠发、瞿秋白、蔡和森、张国焘为中央政治局委员，关向应、李立三、罗登贤、彭湃、杨殷、卢福坦、徐锡根为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选举苏兆征、向忠发、项英、周恩来、蔡和森为中央政治局常务委员会委员，李立三、徐锡根、杨殷为常务委员会候补委员。由于当时片面强调领导干部的工人成分的意义，7月20日，中共中央政治局第一次会议推举向忠发为中央政治局主席兼中央政治局常务委员会主席。会议决定了中央组织机构的设置和常委的分工，周恩来为中央政治局常务委员会秘书长兼中央组织部部长，蔡和森为中央宣传部部长，杨殷为中央军事部部长，苏兆征为中央工人运动委员会书记，李立三为中央农民运动委员会书记，张金保为中央妇女委员会书记。中国共产党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对中国革命性质和革命形势的分析，以及规定党的任务和政策，基本上是正确的，它对中国革命的发展起了积极的推动作用。这次大会也存在一些严重的错误，主要是：仍把城市工作放在中心地位，没有认识到中国革命的长期性和复杂性，没有认识到农村在中国革命中具有特殊重要的地位。认为全面实行武装起义的革命高潮很快可以到来，那时就可以使革命首先在一省或几省之内取得胜利，以至推翻整个国民党新军阀的统治。同时，继续把反对民族资产阶级和反对帝国主义、反对封建势力并列，断定整个民族资产阶级是阻碍革命胜利的最危险的敌人之一，中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必须反对民族资产阶级方能胜利。大会在组织上片面强调"指导机关工人化"。因此，大会虽然着重地批判了"左"倾盲动主义，但并没有能够从根本上纠正"左"的错误。11月11日，中共中央发表《告全体同志书》，指出中国共产党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决定的总的政治路线，是我们目前制定一切策略的准绳，要求全党同志坚决执行大会的决议。同时，进一步强调要与机会主义、盲动主义、命令主义及其他非无产阶级思想继续斗争，强固党的无产阶级基础。从1928年底至1929年初，中国共产党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的精神逐步传达和贯彻到各地的党组织，实现了党的工作路线的转变。

（陈绍畴）

国民党政府颁布《训政纲领》

1928年10月3日，国民党政府颁布《训政纲领》，宣布实行"以党治国"的训政。

1928年7月，蒋介石发表《中国建设之途径》的讲演，借口中国人民缺少政治训练，公开宣称要"以党治国"。8月，国民党二届五中全会通过《政治问题决议案》，宣布依照国民政府建国大纲，应设立司法、立法、行政、考试、监察5院，实施"训政"。10月3日，国民党中央常务委员会会议通过《训政纲领》，规定在训政期间，由中国国民党全国代表大会代表国民大会领导国民，行使政权；国民党全国代表大会闭会期间，"以政权付托中国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执行之"；由国民党训练国民逐渐推行选举、罢免、创制、复决4种政权；国民政府总揽行政、立法、司法、考试、监察5种治权；由国民党中央政治会议指导监督国民政府重大国务之施行，负责修正及解释国民政府组织法。《训政纲领》是训政时期"中国国民党党政关系的最高依据"。10月8日，国民党政府公布《中华民国国民政府组织法》，规定国民政府"总揽中华民国之治权"，由行政、立法、司法、考试、监察5院组成。同日，国民党中央常务委员会任命蒋介石为国民政府主席兼海陆空军总司令；任命谭延闿为行政院院长，胡汉民为立法院院长，王宠惠为司法院院长，戴季陶为考试院院长，蔡元培为监察院院长。10月26日，国民政府国务会议通过《国民政府训政时期施政宣言》。1929年3月15日至27日，国民党在南京举行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通过决议追认《训政纲领》，正式宣布军政时期结束，训政时期开始。大会通过的《训政时期党、政府、人民行使政权、治权之分际及方略案》规定："中华民国人民必须服从拥护中国国民党"，始得享受国民的权利。"国民党独负全责，领导国民，扶植中华民国之政权、治权"。1931年5月5日至17日，国民党在南京召开国民会议。蒋介石在开幕词中，公然鼓吹在训政的"过渡时期"实行法西斯主义。会议通过了以《训政纲领》为基础的《训政时期约法》，共8章89条。约法规定训政时期由中国国民党全国代表大会代表国民大会行使中央统治权；中国国民党全国代表大会闭会时，其职权由中国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执行之。约法中虽然列举了一些人民可以享受的民主自由，但却又加上"非依法律不得停止或限制之"条文，实际上剥夺了人民的民主自由权利。国民会议发表宣言，强调"约法为训政时期根本大法"。《训政时期约法》以国家根本法的形式确认了国民党一党专政的统治。（陈绍畴）

四行二局成立

1928年至1935年间成立的中央银行、中国银

行、交通银行、中国农民银行和邮政储金汇业局、中央信托局，总称四行二局。

中央银行于1928年11月1日在上海成立，由南京国民政府设置经营，享有发行兑换券、铸造及发行国币、经理国库、募集或经理国内外公债等特权。资本额为2000万元。国民党政府财政部部长宋子文(1894—1971)兼任总裁。1935年，总行迁南京。通过发行金融公债，资本额增至1亿元。中国银行的前身为1905年在北京建立的户部银行。1928年10月25日，中国银行被国民党政府特许为国际汇兑银行，资本额为2500万元，其中官股占五分之一。它受政府之委托，办理发行海外公债、经理政府存在国外的各种公款并收付、发展及扶助海外贸易、代理一部分国库等事宜。1935年，该行利用金融危机发行金融公债，资本额增为4000万元，其中官股占二分之一。总行设于上海，在海内外设分行。交通银行于1907年11月由清政府邮传部奏设，以经理轮船、铁路、电报、邮政4项事业为主要宗旨。1928年11月26日，该行被国民党政府特许为发展全国实业的银行，资本额为1000万元，其中官股占五分之一。设总行于上海。它受政府之委托，代理公共实业机关发行债票、代理交通事业的公款出入、办理其他奖励及发展实业、经理一部分国库等，并得发行兑换券。1935年，国民党政府拨发该行金融公债1000万元，资本额增到2000万元，其中官股占60%。1935年4月，国民党政府将鄂豫皖赣四省农民银行改称为中国农民银行，并加入官股250万元，使其资本额达到1000万元。设总行于南京。它主要是办理农贷和农业投资等业务。邮政储金汇业局于1930年3月15日在上海成立，后迁南京。经营邮政储金、邮政汇兑及人寿保险等业务，并受政府或中央银行的委托，得代理国库及办理其他委托的事项。中央信托局成立于1935年10月1日，由中央银行拨资1000万元，办理储蓄、信托、保险等业务。总局设在上海。此外，国民党政府还利用政治特权、人事改组及加入股金、实力补助等经济手段，控制了一批具有相当实力的二等银行，其中有：被称为“小四行”的新华信托银行、中国通商银行、四明银行、中国实业银行；被称为“北四行”的金城、盐业、中南、大陆四个银行；被称为“南三行”的上海商业储蓄银行、浙江实业银行、浙江兴业银行。这样就在全国建立起一个以四行二局为中心的金融垄断体系。据1936年统计，中央、中国、交通、农民4大银行的实收资本占全国银行的42%，其资金总额占全国银行的59%，其各项存款总额占全国银行的59%，其所发行的兑换券占全国银行的78%，其纯益占全国银行的44%。四行二局通过货币、信用和外汇政策等垄断了全国的金融事业和国民经济各部门的活动，掌握了全国工商业的命脉，迅速集中了大量财富，逐步形成了以蒋介石、宋子文、孔祥熙、陈果夫、陈立夫四大家族为代表的国家垄断资本主义。它构成了国民党反动政权的重要经济基础。 （陈绍畴）

东北易帜

1928年12月29日，张学良通电宣布东北“服从国民政府，改易旗帜”的事件。

张学良，1901年生，字汉卿，奉天（辽宁）海城人。奉系军阀首领张作霖之子。1928年6月4日，张作霖在皇姑屯被日本关东军炸死后，张学良于6月20日就任奉天军务督办，主持东北军政。鉴于皇姑屯事件的教训，他决心御外侮，报家仇，认为“东北一隅不能抵抗日本一国”，必须靠全国力量，全力对外。7月1日，张学良通电宣布与南京方面停止军事行动，决不妨碍统一。7月4日，张学良任东北三省保安总司令，表明了国家统一的意向。北伐军进占北京之后，蒋介石恐出兵关外引起日本的干涉，决定对东北采取和平统一的方针。其时，日本政府警告张学良不得与南京国民政府妥协，企图继续分离东三省。7月19日，日本首相田中义一令驻奉天（沈阳）总领事林久治郎转交张学良一封信，表示：一、南京政府含有“共产色彩”，且其地位尚未稳定，东北没有同它联系的必要；二、如果南京政府以武力压迫东北，日本不惜“牺牲”，尽力相助；三、如果东北财政发生困难，日本银行愿给予“充分接济”。张学良表示：“东三省政治一以民意为决定。如果东北人民主张改制，我是难以抗拒的。”7月25日，蒋介石在北平会晤张学良的代表王树翰、邢士廉，指出易帜是东北三省的自主权，不应受日本的干预。8月3日，蒋介石又派方本仁为驻奉天代表，同张学良商谈易帜事宜。张学良表示服从三民主义，希望统一，惟以对日外交问题，易帜不得不慎重。8月4日，日本派遣曾任过驻华公使的林权助为特使赴奉参加张作霖丧礼，借吊唁的机会与张学良会晤，再次转达田中首相的意向，企图打消张学良易帜的念头。张学良一面应付日本的压迫，一面派代表与南京国民政府商谈，达成分治合作的默契。为慎重起见，张学良将东北易帜的时间，推迟了3个月，但在行动上仍同南京国民政府保持一致。蒋介石答应将热河省划归东北，每月拨东北军饷

1000万元，并于10月任命张学良为国民政府委员。12月29日，张学良发来通电："依承先大元帅遗志，力谋统一，贯彻和平，已于即日宣布遵守三民主义，服从国民政府，改易旗帜。"是日上午，张学良在奉天省府举行易帜典礼。东北各地废止使用北京政府的红、黄、蓝、白、黑五色旗，改挂南京国民政府的青天白日满地红旗。12月31日，国民政府特任张学良为东北边防军司令长官，张作相、万福麟为副司令官；翟文选、张作相、常荫槐、汤玉麟分别为奉天(辽宁)、吉林、黑龙江、热河省的省政府主席。至此，国民党政府在名义上实现了全国的统一。东北易帜，一方面使张学良由北洋系旧军阀一变而为国民党新军阀，从而把其命运与南京国民党政府紧密联系在一起。另一方面，张学良毅然归顺中央，对维护国家领土主权的完整，打击日本帝国主义分离东北的侵略阴谋，起了一定的积极作用。　(陈永禄)

国民党改组派的出现

1928年冬，汪精卫集团的陈公博、顾孟余等在上海组织"中国国民党改组同志会"。

宁汉合流和中央特别委员会的成立，实质上取消了武汉的国民党中央，剥夺了汪精卫的"合法"领袖地位，并使桂系利用宁、汉之间的矛盾，控制了实权。1927年12月，汪精卫因与控制中央特别委员会的桂系和西山会议派有矛盾，出走法国。汪精卫集团主要人物陈公博、顾孟余等避居上海租界。1928年初，蒋介石重新上台，任国民革命军总司令兼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主席、国民党中央政治会议主席。与蒋介石争权夺利的汪精卫、陈公博等不满蒋介石独揽权力，寻找机会以图东山再起。5、6月间，陈公博、顾孟余创办《革命评论》和《前进》杂志，主张"恢复1924年国民党改组的精神"，"复活革命的国民党"。同年冬，陈公博、顾孟余、王法勤、王乐平等在上海集会，宣告成立"中国国民党改组同志会"，简称改组派，推定陈公博为总负责人。中央设总部，各省、市和海外设支部，县、区设分部，基层设小组，改组派的成分极其复杂。它的上层，大多是国民党官僚政客。汪精卫、陈公博等标榜"继承孙中山的三民主义"，打着"重新改组中国国民党"的旗号，与蒋介石争夺国民党中央的权力。它的下层，主要是一些彷徨苦闷中的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他们既不满意蒋介石的独裁统治，又害怕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人民民主革命，幻想在革命和反革命两条道路之外，另找一条有利于中国资本主义发展的道路。1929年2月，改组派发表《中国国民党改组同志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宣言》。3月11日，汪精卫、陈公博等又发表《关于最近党务之宣言》，提出：一、继承孙中山的革命精神和国民党第一次、第二次代表大会的纲领，"努力改组运动，务期重新建设能担负实现三民主义的中国国民党"，实现"以党治国，以党建国"。二、反对"帝国主义的新工具"新军阀，"努力铲除一切新旧军阀"，反对南京政府对帝国主义俯首降服。三、"代表农工小市民的利益"，"确定工农小资产阶级的联合战线"，"扶助民众行使政权"。"建设国家资本"，"组织农村的合作事业"，"促进工人的红利制"；"实现经济平等"。四、"努力扫除""恶化势力"中国共产党。"对其团体尽量反对，并严厉制止其活动"；"对其主义与政策尽量指摘与批评"；"对其分子，在可能范围内，予以自新，使其脱离共产党之组织"。5月，改组派策划反蒋活动，反对蒋介石指派和圈定国民党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代表，组织"护党革命大同盟"，号召"打倒盗窃党权政权的蒋介石"，"打倒勾结帝国主义的蒋介石"，"打倒新军阀领袖的蒋介石"。10月初，汪精卫从法国回到香港，策动张发奎、唐生智、石友三等组织"护党救国军"，进行军事反蒋。1930年初，改组派军事反蒋失败。2月，改组派总部实际负责人王乐平被蒋介石特务暗杀。此后，改组派在各地的活动陷于停顿，其上层人物仍利用改组派这块招牌同蒋介石进行争权夺利的活动。1931年1月，汪精卫发表解散中国国民党改组同志会宣言。九一八事变后，汪精卫与蒋介石合流，改组派不复存在。

(陈绍畴)

蒋桂战争

1929年3月爆发的蒋介石与桂系军阀李宗仁、白崇禧之间的军阀混战。

北洋军阀垮台后，国民党新军阀之间的矛盾激化起来。蒋介石利用自己掌握的中央大权，借口"军政军令必须绝对统一"，于1929年1月在南京召开国民革命军编遣会议。会议通过了《国军编遣进行程序大纲》。蒋介石企图利用编遣军队的办法，来达到削弱或消灭异己、扩充自己实力的目的，引起各派新军阀的不满。桂系军阀李宗仁(1891—1969，广西桂林人)、白崇禧(1893—1966，广西桂林人)是蒋介石发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的主要支持者。南京国民政府成立后，蒋桂之间的矛盾逐渐暴露出来。1927年8月，李宗仁、白崇禧在何应钦的配合下，迫使蒋介石下野。1928年春，李宗仁任国民党中央政治委员会

武汉分会主席、第四集团军总司令，白崇禧任第四集团军副总司令兼前敌总指挥。李、白与程潜合作，打败并收编了唐生智的军队。其后，桂系又软禁程潜，独占湖南、湖北两省。桂系黄绍竑部占有广西。白崇禧率部参加第二次“北伐”，桂系势力伸展到河北和北平、天津一带。桂系在很短的时间内就膨胀发展为纵贯南北的强大的军事集团。蒋介石为制止桂系势力扩张，暗送军火给亲蒋的湖南省政府主席鲁涤平，唆使其反桂。桂系先发制人，于1929年2月19日由武汉政治分会以鲁涤平“把持财政，剿共不力”，“潜运军火，阴谋破坏”为由，将其免职，改组湖南省政府，以何键为湖南省政府主席。并派第五十二师师长叶琪、第十五师师长夏威率部由湖北进攻长沙。鲁涤平慌忙逃往南京。这时，蒋介石即以武汉政治分会违反编遣会议通过的《国军编遣进行程序大纲》为口实，下令“彻查桂军侵湘事”。同时，调集军队由南北两路合击武汉，令缪培南、方鼎英师由江西进取鄂南，夏斗寅、刘峙师从河南、安徽进击鄂东北。蒋介石还派曾被桂系打败的唐生智潜赴河北，策动被白崇禧收编的旧部倒戈。3月20日，李品仙通电拥唐倒白。白崇禧逃亡香港。在国民党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期间，蒋介石于3月21日软禁了与桂系站在一边的广州政治分会主席李济深。又在广东策动陈济棠等倒李，使广西陷于孤立。3月26日，蒋介石以国民政府名义下达“讨伐令”，免去李宗仁、李济深、白崇禧本兼各职，并令前方各军对桂系部队“痛加讨伐”。蒋桂战争爆发。蒋介石在江西九江设行营，亲自督师进攻武汉。3月28日，蒋命朱培德为讨逆军第一路总指挥，率第三、第五军从九江、南昌西攻武(昌)长(沙)路，截断桂军退路；刘峙为第二路总指挥，率第一、第二军由皖鄂边沿长江西取武汉；韩复榘为第三路总指挥，率第六、第七军由河南南袭武汉；陈调元为预备队总指挥。3月30日，蒋军攻入湖北境内。4月3日，在蒋介石策动下，桂军李明瑞、杨腾辉部在前线湖北黄陂一带倒戈，武汉桂军向荆州、沙市、宜昌退却。次日，蒋军进占武汉。桂军胡宗铎、陶钧等通电下野，所部被收编。这时，李宗仁、白崇禧已逃回广西。蒋介石派军队从湖南、广东、云南3路向广西进攻。5月5日，李宗仁组织南路护党救国军，自任总司令，由白崇禧、黄绍竑率部分两路进攻广东。5月21日，双方在广东境内激战，桂军败退广西。6月，粤军陈济棠部先后进占广西桂林、梧州、南宁。滇军龙云部经贵州攻占柳州。白崇禧、黄绍竑败走龙州，后与李宗仁相偕逃往香港。6月7日，蒋介石任命原桂系俞作柏为广西省政府主席。7月，俞作柏在南宁就职。蒋桂战争遂告结束。此后开始了国民党各派新军阀混战，相继爆发蒋冯(玉祥)战争、第二次蒋桂战争、蒋唐(生智)战争。这些战争均以蒋介石的胜利告终。　　　　(陈绍畴)

中东路事件

1929年7月10日，国民党政府单方撕毁1924年中苏协定，以武力手段夺占中东铁路的事件。

中东铁路全称为中国东省铁路。它是1896年清政府与沙皇俄国签订《中俄御敌互相援助条约》(即“中俄密约”)后，由俄国投资在中国东北地区修建、经营的一条铁路。这条铁路干线西起满洲里，中经哈尔滨，东至绥芬河，西端与俄国境内的西伯利亚铁路相连接。1924年5月31日，中国和苏联签订《中俄解决悬案大纲协定》和《暂行管理中东铁路协定》，规定中东铁路由两国共同经营管理。1927年南京国民党政府建立后，执行亲帝、反苏的外交政策，制造了一系列反苏事件。12月13日，国民党政府以苏联领事馆人员参与广州起义为借口，派军队围攻苏联驻广州领事馆，杀害副领事以下人员10余人。次日，国民党政府下“绝俄令”，撤销苏联驻各地领事馆，勒令各地的苏联商业机构停止营业。它指责苏联驻在各地的领事馆和商业机构是“宣传赤化藏匿共党”的场所。苏联外交人民委员齐契林发出照会，强烈抗议国民党政府的反苏活动。1929年5月27日，东北边防军司令长官张学良借口苏联人员在苏联驻哈尔滨领事馆内召开秘密会议，派军警前往搜查，逮捕苏联驻哈尔滨总领事及职员39人。7月10日，东北地方当局在国民党政府的授意和支持下，单方撕毁1924年的中苏协定，武力接收中东铁路及其附属机构，指使中东铁路督办(中方理事长)吕荣寰以非法手段解除苏方铁路局局长、副局长及各处处长的职务，由中方铁路局副局长代理局长职务。同时，将被撤职的苏方人员59人遣送回国；封闭中东铁路上的所有工会，挑起了中东路事件。7月13日，苏联政府给国民党政府发出通牒，提出3项解决办法：一、立即召集会议，以处理与中东路有关的问题；二、中国当局应立即取消关于中东路的一切断然的命令；三、一切被扣苏方人员应立即释放，中国当局应停止一切处分苏俄人员与苏俄机关的行动。通牒限国民党政府在3日内对上述要求作出反应。7月16日，国民党政府复照苏联政府，声称中国在中东路采取的措施是“维持中国社会之安宁”而“不得不采取”的“适当之处

置”。对苏联政府提出的3项要求避而不答。7月18日，苏联政府宣布与中国断绝外交关系，召回苏联在华全体外交人员、商务代表及在中东路工作的全体职员，停止中苏间的铁路交通，并令中国驻苏联的外交人员立即离境。同时声明苏联保留1924年中苏协定的一切权利。8月中旬，苏联军队在中苏边境地区采取了一些军事行动。8月17日，蒋介石发表与苏联交战宣言。武装冲突开始后，苏军很快攻占东线的富锦、密山、东宁、汪清和西线的满洲里、扎兰诺尔、海拉尔等地。东北军抵挡不住苏军的进攻。中东路事件发生后，美、日等帝国主义企图进行干涉，实现中东铁路的国际共管。但苏联政府声明，决不容第三国干涉。11月30日，张学良派蔡运升为代表前往苏联伯力(哈巴罗夫斯克)与苏联交涉。12月22日，蔡运升与苏联代表西曼诺夫斯基签订《伯力会议议定书》，其主要内容是：按照1924年的中苏协定恢复冲突以前的状态，包括恢复苏联人员一切职务，恢复苏联在东三省的领事馆及中国在苏联远东的领事馆；至于中东路争议问题及中苏国交全部恢复问题，另由中苏会议解决。之后，中东铁路恢复了1929年7月10日以前的状态。　　(陈绍畴)

左右江革命根据地的开辟

1929年12月和1930年2月，邓小平、张云逸、李明瑞、俞作豫、韦拔群等领导在广西西部左江和右江流域一带创建的革命根据地。

1929年3月间，蒋介石和桂系军阀内讧，双方调兵遣将，准备战争。当双方正处在剑拔弩张的时候，桂军前线代总指挥李明瑞(1896—1931，广西北流人)在前线突然倒戈，使桂系李宗仁措手不及。蒋桂战争遂以桂系土崩瓦解而告终。5月，李明瑞率部从武汉回广西。俞作柏担任广西省政府主席，李明瑞担任广西编遣分区特派员(后改为第四编遣分区主任)。他们与新桂系首领李宗仁、白崇禧及蒋介石都有矛盾，在大革命时期又深受中共和工农运动的影响，倾向进步。在执政期间，表示愿意与共产党合作。中共先后派邓小平、张云逸、李谦、叶季壮、袁任远、冯达飞、李干辉、袁振武(也烈)等一批干部来广西，与原先派去广西工作的雷经天、俞作豫(1900—1930，广西北流县人，中共党员)、韦拔群等一起，由中共中央代表邓小平(1904—　，四川广安人)负责领导。在中共的推动下，俞、李制定和执行了比较进步的政策，释放和任用在四一二事变后被捕的共产党员和进步人士，支持工农运动，实行“二五”减租，安排中共推荐的干部到其军队和各级政权机构中工作等。中共在这里的基层组织得到较快的恢复和发展。当时，中共与俞、李合作，主要是争取军队的领导权，积极开展兵运工作，准备武装起义。那时还不是共产党员的李明瑞对此是支持的。经过中共的活动，又建立了中共领导的革命军队——张云逸率领的教导总队、广西警备第四大队和俞作豫率领的广西警备第五大队。李明瑞和俞作柏还接受中共建议，将300多支枪、2万多发子弹武装韦拔群领导的东兰、凤山两县的农军，并拨出一部分武器弹药武装南宁郊区和左江地区的农军。左、右江地区农民武装声威大振。10月22日，邓小平、张云逸等率领中共掌握的武装部队到达右江流域的百色山城，发动群众、武装工农，发展中共地方组织，加紧武装起义的准备工作。12月11日，邓小平、张云逸、雷经天、韦拔群等领导在中共影响下的广西警备第四大队、教导总队和右江农军，举行百色起义，建立了工农红军第七军，辖3个纵队，共2800余人。张云逸任军长，邓小平任政治委员。同日，在恩隆(田东)平马镇召开右江第一届工农兵代表会议，成立了右江苏维埃政府，雷经天任主席。不久，右江苏维埃政府颁布《土地法暂行条例》，在较有群众基础的东兰、凤山开展土地革命的试点工作。1930年2月1日，邓小平、李明瑞、俞作豫等又领导在中共影响下的广西警备第五大队在左江流域的龙州举行起义，成立了工农红军第八军，俞作豫任军长，邓小平任政治委员。并建立了左江革命委员会，王逸任主席。接着，红七军、红八军总指挥部成立，李明瑞任总指挥，邓小平任总政治委员。左江革命根据地包括龙州、宁明、左县、崇善等县。龙州起义后，红八军第一、第二纵队分赴各地，协助各县成立工农民主政权，开展打士豪、剿匪、除恶霸的斗争。并在城内召开了群众大会，控诉法帝国主义的侵略罪行，发动群众没收了它在龙州非法掠夺的财产，以及用以对付起义群众的一台发报机、一箱手榴弹、几支短枪，收缴了豪绅地主窝藏的金银财宝，仅光洋一项，就达15万元。驱逐了作恶多端的法国领事夫妇和“传教士”，枪毙了与帝国主义有勾结的大土豪兼资本家谢秋、“清党”委员欧文俊、闵玉达等。随后，右江流域的百色、恩隆、东兰、凤山、奉议(田阳)、思林、果德(平果)、隆安、向都(天等)、镇结等县相继成立了各级工农民主政权，并同左江革命根据地一起，称为左右江革命根据地。3月20日，国民党军队勾结地方反动武装共约4000余人，分两路沿邕龙公路和左江北岸进犯龙州。由于敌我力量悬

殊，红八军撤出龙州，左江革命根据地丧失。红八军余部经过艰苦斗争，转移到右江革命根据地编入红七军。11 月，红七军主力离开右江革命根据地，于 1931 年 7 月到达中央革命根据地江西雩都（于都），编入红一方面军红三军团。红七军离开右江革命根据地后，韦拔群、陈洪涛等率领一部分武装，组建红二十一师，坚持右江地区的革命斗争。1932 年冬，革命根据地完全丧失。（林健柏）

古田会议召开

1929 年 12 月下旬，在福建上杭县古田举行的中国共产党红军第四军第九次代表大会，又称古田会议。

坚持农村革命根据地的斗争，必须建设一个坚强的无产阶级政党和一支新型的人民军队。红军和红军中的共产党是以农民为主体组织起来的，又长期在农村游击战争的环境中进行活动，必然受到来自农村和城市小资产阶级及其他非无产阶级的思想影响。红军第四军的共产党内存在着各种非无产阶级思想，极大地妨碍党的正确路线的贯彻执行。1929 年 6 月 22 日，在福建龙岩召开的中共红四军第七次代表大会上，中共红四军前敌委员会书记毛泽东打算通过总结建军以来的经验，解决红四军党内存在的不正确的思想倾向问题。但会上对党的领导、思想政治工作、农村根据地和红军的任务等问题发生了争论。毛泽东的正确意见未能为多数同志所认识和接受。大会改选了前委，由陈毅任前委书记。会后，毛泽东离开红四军的主要领导岗位，到闽西协助指导地方工作。8 月 29 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听取陈毅汇报红四军的工作情况，并决定由周恩来、李立三、陈毅组成委员会，由周恩来主持，负责起草对红四军工作的指示文件。9 月 28 日，中共中央发出《给红军第四军前委的指示信》。这指示信是陈毅按照周恩来多次谈话和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的精神代中央起草并经周恩来审定的。它总结了红四军及各地红军的斗争经验，明确规定了红军的基本任务，对红四军党内发生过的争论问题作了明确的结论。要求红四军前委和全体指战员维护朱德、毛泽东的领导；毛泽东“应仍为前委书记”。10 月 20 日，陈毅将这封指示信送达红四军前委。11 月 26 日，毛泽东回到红四军主持工作。12 月下旬，在福建上杭东北的古田召开中国共产党红四军第九次代表大会，集中解决红军的建军原则问题。大会由陈毅主持，毛泽东作政治报告，朱德作军事报告，陈毅传达中央 9 月来信。大会通过了毛泽东主持起草的《中国共产党红军第四军第九次代表大会决议案》。决议案根据中央来信的精神，总结了红军创建以来的斗争经验，明确指出中国的红军是一个执行革命的政治任务的武装集团。它必须是服从于无产阶级思想领导的、服务于人民革命斗争和根据地建设的工具。批评了那种认为军事和政治是对立的单纯军事观点，指出红军决不是单纯地打仗的，它除了打仗消灭敌人的军事力量之外，还要负担宣传群众、组织群众、武装群众、帮助群众建立革命政权以至于建立共产党的组织等项重大任务。强调军队必须绝对服从共产党的领导，全心全意地为着党的纲领、路线和政策而奋斗。决议案指出党内各种非无产阶级思想的表现、来源及其纠正的方法，强调要加强党的思想建设，使党员的思想和党内的生活都政治化、科学化。主要是教育党员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方法去作政治形势的分析和阶级势力的估量，以代替主观主义的分析和估量。使党员注意社会经济的调查和研究，由此来决定斗争的策略和工作的方法。开展党内的正确批评。同时要加强党的组织建设，坚持民主集中制，严格组织纪律。大会选举产生了新的中共红四军前委，毛泽东当选为书记。古田会议决议，是中国共产党和红军建设的纲领性文献，对党和军队的建设发挥了重大作用。

（陈绍畴）

中国左翼作家联盟成立

1930 年 3 月 2 日，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文学团体中国左翼作家联盟在上海正式成立。

1927 年大革命失败后，一批共产党员及中共所影响的文化工作者陆续聚集到上海，在思想文化战线上坚持革命斗争。经过 1928 年至 1929 年间的革命文学论争，传播了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提高了革命作家的思想理论水平，各方的观点逐渐接近。他们认识到必须联合起来才能有力地进行文艺思想斗争。革命文艺运动的发展及其由于论争而暴露出来的弱点，引起中共中央的重视，加强了对文艺工作的领导，帮助革命作家成立联合的文艺团体。1929 年秋，在中共中央宣传部之下成立中央文化工作委员会（简称“文委”），由潘汉年负责，统一领导这方面的工作。1930 年 3 月 2 日，经过中国共产党的建议和筹划，中国左翼作家联盟在上海中华艺术大学举行成立大会。到会的党内外作家有冯乃超、华汉（阳翰笙）、龚冰庐、孟超、莞尔、邱韵铎、沈端先（夏衍）、潘汉年、周全平、洪灵菲、戴平万、钱杏邨（阿英）、鲁迅、

冯雪峰、黄素、郑伯奇、田汉、蒋光慈、郁达夫、陶晶孙、李初梨、彭康、徐殷夫、朱镜我、柔石、林伯修(杜国庠)、王一榴、沈叶沉、冯宪章、许幸之等40多人。最初的盟员共50多人。鲁迅(即周树人,1881—1936,浙江绍兴人)在会上发表题为《对于左翼作家联盟的意见》的演说,强调了革命作家一定要接触实际的社会斗争,并对左联工作提出4点意见:对于旧社会和旧势力的斗争,必须坚持,持久不断,而且注重实力;战线应该扩大;应当造出大群的新的战士;联合战线是以有共同目的为必要条件的,即目的都在工农大众。大会通过了左联的理论纲领和行动纲领,选举沈端先、冯乃超、钱杏邨、鲁迅、田汉、郑伯奇、洪灵菲为常务委员,周全平、蒋光慈为候补委员。左联内有中国共产党党团,先后任党团书记的有潘汉年、冯乃超、冯雪峰、阳翰笙、丁玲、周扬等。左联接受中共中央宣传部文委的领导。左联成立后,盟员不断增加,达数百人,活动地区逐步扩大,由上海发展到北平、天津、南京、武汉、广州、保定和日本东京等地。左联先后创办的机关刊物有《萌芽月刊》、《拓荒者》、《巴尔底山》、《世界文化》、《前哨》(后改名为《文学导报》)、《北斗》、《十字街头》、《文学》、《文艺群众》、《文学月报》、《文学新地》等。左联领导的左翼文艺运动,在创作方面取得巨大成就。革命作家在左联刊物和其他进步刊物上发表了大量为群众所欢迎的作品。左联以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指导自己的实践,在宣传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方面,鲁迅、瞿秋白、冯雪峰等做了不少翻译介绍工作。同时,对"新月派"、"民族主义文学"、"第三种人"和"论语派"等资产阶级文艺观点进行了批评,并对国民党政府的反动文艺政策进行了批判和斗争。左联加入国际革命作家联盟,成为它的一个支部,与国际无产阶级文艺运动建立了联系。左联在工作中受到中国共产党内"左"倾错误的影响,有过教条主义和宗派主义的倾向。1936年春,为了更广泛地组织文艺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左联宣布自行解散。左联在国民党政府残酷压迫下顽强战斗了6个年头,粉碎了国民党当局的文化"围剿",培养了一支革命的文艺大军,为建设人民大众的革命文艺做出了卓越贡献。　(陈绍畴)

中国社会性质问题和中国社会史问题的论战

20世纪20年代末至30年代初,中国思想理论界围绕着中国社会性质问题和中国社会史问题展开的一场论争。

中国社会性质问题的论战是在1927年大革命失败后开始的。当时,中国革命转入低潮。各种政治势力都在重新思考、探索中国的出路问题。中国要不要继续革命?要继续革命,进行什么性质的革命?这些问题都归结到对中国社会性质问题的认识。1927年前后,斯大林曾对中国社会和中国革命问题有过许多正确或基本正确的论断,指出中国是"受国际帝国主义牵制的半殖民地",军阀、官僚的封建残余"是中国国内的压迫的主要形式"。"中国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是反封建残余的斗争和反帝国主义的斗争的结合"。托洛茨基、拉狄克等则断言资本主义关系在中国已"无条件的占优势和占直接的统治地位",中国"已发展到资本主义国家了"。因此,认为中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已经过去,再次爆发的革命必然是"社会主义性质"的革命。共产国际和苏联共产党内关于中国问题的争论,直接影响到中国。托陈取消派公开宣传托洛茨基的错误观点,反对中共六大的路线。1929年8月5日,陈独秀在给中共中央的信中说,经过1925年至1927年革命,"资产阶级得了胜利,在政治上对各阶级取得了优越地位",而"封建残余在这一大转变时期中,受了最后打击",已经"变成残余势力之残余"。中国社会已是资本主义占优势并将持续和平发展的社会。中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已经完结,无产阶级只有等到将来再去进行社会主义革命。以国民党御用文人陶希圣等为代表的"新生命派",出于反革命目的,也极力鼓吹与托派类似的观点。陶希圣在《中国社会到底是什么社会?》一文中,认为中国社会"是一个宗法封建社会的构造,其庞大的身分阶级不是封建领主,而是以政治力量执行土地所有权并保障其身分的信仰的士大夫阶级"。顾孟余认为中国社会是"封建思想所支配的初期资本主义"。梅思平则断定中国社会"完全是一商业资本主义社会"。他们歪曲中国社会的性质,进而否定中国进行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必要。1930年春,李立三在《布尔什维克》上发表《中国革命的根本问题》一文,批驳了托派的观点,论述了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特点,阐明中国共产党的主张。4月,由中共中央宣传部文化工作委员会通过创造社主办的《新思潮》杂志出刊"中国经济研究专号",发表潘东周的《中国经济的性质》、王学文的《中国资本主义在中国经济中的地位其发展及其前途》等文章,批判托派和"新生命派"的观点。他们以《新思潮》为主要阵地,被称之为"新思潮派",成为中国社会性质问题论战中马克思主义阵营的代表。论战的另一方则是以托派

严灵峰、任曙为代表的反马克思主义流派。7月，托派创办《动力》杂志。严灵峰在这个刊物上先后发表《中国是资本主义的经济，还是封建制度的经济？》、《再论中国经济问题》等文。之后，他又出版《中国经济问题研究》、《追击与反攻》等书。1931年1月，任曙出版《中国经济研究绪论》。严、任之间虽有意见分歧，但都一致认为中国已是“资本主义社会”，反对中国共产党关于中国社会和中国革命的主张。因为他们以《动力》为主要阵地，被称之为“动力派”。与此同时，《读书杂志》等刊物也纷纷发表争论文章。中国社会性质问题论战全面展开。这次论战的中心问题是：近代中国社会究竟是封建社会、资本主义社会，还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争论的主要问题是：一、关于帝国主义和近代中国社会经济的关系；二、关于中国资本主义的发展程度；三、关于封建势力在中国农村经济中的地位。托派认为，封建经济是自然经济，商品经济就是资本主义经济。自帝国主义入侵以来，中国的自然经济已经崩溃，商品经济已经“深入并支配了全国穷乡僻壤”，资本主义关系已占领导的地位。他们否认帝国主义有阻碍中国资本主义发展的作用，认为帝国主义在中国势力的发展，要“绝对”的破坏封建势力和关系，促使中国走向资本主义进化的过程。他们抹煞帝国主义与中国封建势力相勾结的事实，认为帝国主义“也推动了和加紧了农业经济踏进资本主义的领域”。中国土地的问题，主要的已不是封建关系，“而是资本主义的关系”。为了回击托派的猖狂反扑，共产党人和进步的社会科学工作者在《布尔什维克》、《读书杂志》、《中国经济》等刊物上连续发表文章，其中影响较大的有刘梦云（张闻天）的《中国经济之性质问题的研究》、刘苏华的《唯物辩证法与严灵峰》等。他们批驳了托派把商品经济和资本主义等同起来的谬误，指出商品经济本身并不能决定一个社会的经济性质，“在有阶级的社会中间，离开剥削关系与阶级关系，就没有法子了解这一社会的经济性质”。“商品经济的社会，决不就是资本主义的社会”。他们阐述了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民族资本主义三者的关系，指出帝国主义入侵中国，一方面破坏了中国的自然经济，在一定程度上刺激了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在中国造成了些资本主义的关系。但更重要的一方面，帝国主义与中国封建关系勾结着，用一切力量阻碍中国民族资本主义的发展。帝国主义的目的，“并不是为了要发展中国的资本主义，使中国变成一个资本主义国家，而是为了要使中国变成它的殖民地，变成它的附庸”。他们分析了农村经济的现状，指出封建半封建关系仍占据着农业经济的优势。“现在中国农村租佃制度下的剥削关系，是封建式的剥削关系”。要打破这种封建剥削关系，必须解决农民土地问题。根据上述分析，他们得出结论：中国社会的现阶段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中国经济实在是帝国主义侵略下的一个半殖民地的封建的经济”。因此，“只有在根本上推翻帝国主义及肃清中国封建势力以后，只有这样才能使中国经济发展”。

对中国社会性质问题的争论，必然联系到对中国社会历史发展过程的探求。因此，在中国社会性质问题论战开展不久，又发生中国社会史问题的论战。1931年5月，王礼锡主编的《读书杂志》开辟“中国社会史论战”专栏。从同年8月至1933年4月，相继出版了4辑《中国社会史论战》专辑，汇集了各种观点的有代表性的论著。这样，中国社会史论战和中国社会性质问题论战交叉进行，达到高潮。这场论战涉及中国几千年的历史，集中反映在3个问题上：一、“亚细亚生产方式”问题；二、中国历史上是否经过奴隶制社会；三、中国封建社会的性质及其特征问题。这些问题，关系到人类社会历史发展是否存在着共同的客观规律，马克思主义关于社会形态学说是否适用于中国的问题。“新生命派”的陶希圣、梅思平等和托派李季、杜畏之等，既否认中国历史上有过奴隶制社会，又认为中国的封建社会为时短暂，而且早已瓦解，并且在封建社会和资本主义社会之间插入一个“先资本主义社会”或“商业资本主义社会”，说鸦片战争后的中国社会为“资本主义社会”。马克思主义者旗帜鲜明地批判了各种伪马克思主义观点，揭露了他们歪曲中国社会历史的实质，就是假借马克思所说的“亚细亚的”词句来鼓吹历史发展的多元论，取消马克思主义的阶级斗争理论；以否认中国历史上奴隶社会的存在来反对马克思主义的社会形态学说；以所谓“先资本主义”、“商业资本主义”论来否定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原理。其目的是反对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反帝反封建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在论战中，以郭沫若、吕振羽为代表的马克思主义史学工作者，运用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的理论和方法，科学分析中国社会的历史和现状，批驳了违反中国实际的种种错误观点，取得了突破性的进展。最早肯定中国历史上有奴隶制社会存在的是郭沫若。他在1930年3月出版的《中国古代社会研究》一书中，根据甲骨卜辞、青铜铭文和各种古代文献，把中国古代社会划分为：西周以前是原始共产社会，西周是奴隶社

会，东周以后，特别是秦以后进入封建社会。1934 年至 1936 年间，吕振羽出版了《史前期中国社会研究》、《殷周时代的中国社会》等著作。他利用文献资料和考古材料，对中国原始社会的内部结构及其特征进行了探索，理出了中国历史的发展阶段，认为夏以前是原始共产社会，殷代是奴隶社会，周代为初期封建社会，由秦到鸦片战争前为变种的(亦即专制主义的)封建社会，鸦片战争以后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肯定中国社会有过奴隶制存在的还有翦伯赞、邓云特(邓拓)等。尽管他们对历史上某些朝代的社会性质的看法有所不同，分析和论述中国社会史问题还有不够完善的地方，但他们都一致论证了马克思主义关于人类社会发展普遍规律的科学性和真确性，说明“中国社会发展的法则，也和世界其他民族一样，并没有什么本质的特殊”。在中国社会性质问题和中国社会史问题论战中，马克思主义者对中国社会的历史和现状进行了科学分析，进一步论证了中国社会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的性质，肯定中国进行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是历史发展的客观要求，从理论上为中国共产党的民主革命路线提供了科学依据。

(陈绍畴)

蒋阎冯战争

1930 年 5 月爆发的蒋介石和阎锡山、冯玉祥在中原地区的大规模军阀战争，亦称中原大战。

1929 年先后爆发的两次蒋桂战争、蒋冯战争、蒋唐战争，均以蒋军的胜利告终。国民党各派军阀之间的矛盾日益尖锐起来。1930 年春，阎锡山(1883—1960，山西五台人)、冯玉祥、李宗仁 3 派军阀势力和国民党改组派、西山会议派两个政客集团形成反蒋大联合。3 月 14 日，原第二、第三、第四集团军将领鹿钟麟、商震、黄绍竑等 57 人联名发表反蒋通电，声称将统率各军，陈师中原，以救党国。次日，他们拥控制晋、冀、察、绥 4 省的阎锡山为中华民国陆海空军总司令，冯玉祥、李宗仁、张学良为副总司令。4 月 1 日，阎、冯、李宣布就职，设总司令部于河北石家庄。编桂军为第一方面军，以李宗仁兼总司令，由广西入湖南，攻长沙，相机向北发展；西北军为第二方面军，以鹿钟麟为总司令，由陕西攻河南，担任平汉线作战任务；晋军为第三方面军，以阎锡山兼总司令，徐永昌为前敌总司令，主要担任津浦线作战任务；第四方面军以石友三为总司令，由鲁西南济宁会攻济南。4 月 4 日，南京国民政府下令免去阎锡山本兼各职，通缉拿办。4 月 7 日，国民党中央执委会常务会议决定永远开除阎锡山的党籍。5 月 1 日，蒋介石通电讨伐阎锡山、冯玉祥，并将其军队编为 4 个军团：以韩复榘为第一军团总指挥，在山东据守黄河西岸，阻止晋军沿津浦路南下；刘峙为第二军团总指挥，率蒋介石的嫡系部队沿陇海路西进；何成濬为第三军团总指挥，集结于平汉路许昌以南地区，牵制西北军主力；陈调元为总预备军团总指挥。5 月 10 日，蒋介石与阎锡山、冯玉祥的军队在河南马牧集(虞城)和鲁西、皖北交战，中原大战爆发。双方投入兵力上百万，战争波及河南、山东、安徽等省，而沿陇海路两侧的争夺战尤为激烈。战争前期，阎、冯获胜，蒋军失利。沿陇海路西进的刘峙部一举攻占河南归德(商丘)、宁陵，但受到西北军孙良诚、吉鸿昌部的反击。双方激战 10 余日，蒋军被迫退至山东曹县、定陶一带。沿平汉路进逼河南许昌的何成濬部，被冯军孙连仲、高树勋、张自忠等部击退到漯河以南。在津浦路上作战的晋军傅作义部于 5 月下旬进入山东，韩复榘部未作有力抵抗，即退到黄河南岸。6 月 28 日，晋军占领济南。同时，桂军及张发奎部于 5 月底进入湖南，6 月上旬，占领长沙、岳阳。7 月以后，战局发生变化。由于广东军阀陈济棠拥蒋出击截断桂军后路，桂军退回广西。蒋介石稳住了平汉路阵脚，即调陈诚等主力部队增援津浦路，并令蒋光鼐、蔡廷锴部由广东开赴徐州。8 月 4 日，冯玉祥为牵制蒋军对津浦路的进攻，在陇海路发动攻势，企图取下徐州，打通陇海、津浦两路，与晋军会师。因时逢暴雨成灾，及晋军不积极配合，结果未达目的。8 月 15 日，蒋军占领济南，晋军退到黄河以北。蒋军由被动转为主动。与军事上混战的同时，汪精卫等在北平召开“国民党中央党部扩大会议”。参加会议的以改组派为主，还有西山会议派和阎锡山、冯玉祥的代表。9 月 9 日，在北平成立以阎锡山为主席的“国民政府”，与蒋介石南京政府相抗衡。9 月 11 日，蒋军由陇海、平汉两路联合进攻，以洛阳、郑州、开封为目标分 3 路推进。冯军败退豫北。9 月 18 日，在蒋介石的争取下，东北的张学良通电拥蒋，随即派兵入关，占领天津、北平。10 月初，蒋军占领开封、郑州、洛阳。整个战局急转直下。阎锡山、汪精卫等退到太原。冯军大部投蒋，一部被东北军改编。阎军退回山西，阎锡山躲往大连。10 月 15 日，冯玉祥宣告下野。历时 5 个多月的中原大战，是中国近现代历史上规模最大的一次军阀混战。它给人民造成极大灾难，死壮丁 30 万人，伤者不计其数，财产损失更无法计算。经过 1929 年至 1930 年的军阀混战，国民党各派军阀间的力量对比发生很大变

化。蒋介石打败了所有同他相抗衡的对手，在整个国民党军阀势力中取得了明显的优势。（陈绍畴）

李立三"左"倾冒险主义

1930年6月至9月，以李立三为代表的"左"倾冒险主义在中共中央领导机关取得统治地位。

1930年上半年，红军和革命根据地有很大发展，中国共产党在国民党统治区域的工作也有相当恢复。国民党各派新军阀正在进行大混战，出现了有利于革命力量发展的形势。中国共产党内"左"倾思想又逐渐发展起来。1930年6月11日，在李立三的主持下，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通过《新的革命高潮与一省或几省的首先胜利》的决议，以李立三为代表的"左"倾冒险主义在中共中央领导机关占了统治地位。决议运用和发展了共产国际过分夸大资本主义总危机的"第三时期"理论和其他一些"左"的理论，片面夸大中国统治阶级的危机，过高估计革命力量的发展，认为新的革命高潮已经逼近到我们的面前，而革命高潮就是全国范围内的"直接革命的形势"，"有极大的可能转变成为全国革命的胜利"。只要在产业区域与政治中心爆发一个伟大的工人斗争，便马上可以形成革命高潮。决议提出在全国革命高潮之下，准备一省或几省的首先胜利，建立全国革命政权，是"目前党的策略总路线"。会后，中共中央制定组织全国中心城市武装起义和集中全国红军进攻中心城市的冒险计划，命令南京、上海、武汉、广州、天津、北平、哈尔滨等十几个中心城市的共产党组织，立即举行总罢工和武装暴动，并命令各地红军攻打南昌、九江、长沙、武汉等城市，然后各路红军向武汉进逼，会师武汉，饮马长江。8月1日，中共中央决定将共产党、青年团、工会的各级领导机关合并为准备武装起义的各级行动委员会，使一切正常工作陷于停顿。8月6日，成立了中央总行动委员会，作为领导武装暴动和总同盟罢工的最高指挥机关。"左"倾冒险主义错误使刚刚发展起来的红军和革命根据地受到不同程度的损失，白区的共产党组织和革命群众组织也遭到破坏。9月24日至28日，中共中央在上海召开六届三中全会。会前，在瞿秋白、周恩来等主持下，根据共产国际的指示，已在实际工作中纠正了部分"左"倾错误。全会通过《关于政治状况和党的总任务议决案》，批评了李立三的"左"倾错误，停止了组织全国中心城市武装起义和集中全国红军进攻中心城市的冒险行动，并恢复了共产党、青年团、工会的组织和经常工作。至此，结束了以李立三为代表的"左"倾冒险主义在中共中央领导机关的统治。

（陈绍畴）

鄂豫皖革命根据地的开辟

1930年6月，在湖北、河南、安徽3省边界大别山地区革命斗争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革命根据地。

1927年11月13日，中共黄麻特委和潘忠汝、吴光浩、戴克敏等领导鄂东黄安（红安）、麻城地区的农民起义。次日，起义军占领黄安县城，成立了黄安县农民政府，曹学楷任主席，并组织了中国工农革命军鄂东军，潘忠汝任总指挥，戴克敏任党代表。12月5日，起义部队在国民党军队围攻下失败，转移到黄陂木兰山区和河南光山柴山堡一带开展游击战争。1928年1月，鄂东军改编为工农革命军第七军，吴光浩任军长，戴克敏任党代表。5月，红七军在柴山堡地区建立游击根据地。7月，红七军改称中国工农红军第十一军第三十一师，吴光浩任军长兼师长，戴克敏任党代表，下辖4个大队，共120余人（后发展到700余人）。11月，根据中共湖北省委的决定组建鄂东特委，王秀松为特委书记。同年冬，鄂东特委提出"学江西井冈山的办法"，向中央建议把湖北黄安、麻城、光山、河南商城、安徽六安等划为鄂豫皖特区，以创建整个大别山区域的根据地。1929年4月，中共鄂东北特委成立，徐朋人任特委书记。至5月，游击根据地从柴山堡向南扩展到黄安的八里、桃花和麻城近郊，向东扩展到麻城黄土岗附近，向西发展到孝感汪洋店，鄂豫边革命根据地初步形成。12月，鄂豫边军事委员会成立，徐向前（1901—1990，山西五台人）任主席，统一领导鄂豫边地区红军。1929年5月，中共商（城）罗（田）麻（城）特别区委和徐子清、肖方、周维炯、徐其虚等领导了河南商城南部地区的农民、士兵武装起义。5月6日，起义武装解除了当地一些反动民团的武装。5月9日，起义武装编为中国工农红军第十一军第三十二师，周维炯任师长，徐其虚任党代表，下辖3个团，共300余人，开辟了豫东南革命根据地。11月，中共六安中心县委和舒传贤、周狷之、余道江等在安徽六安、霍山领导农民、士兵武装起义。起义武装控制了当地一些地区，分别组建了游击队，建立了革命委员会。1930年1月，这些游击队组成为中国工农红军第十一军第三十三师，徐百川任师长，姜镜堂任政治部主任，共200余人，建立了皖西革命根据地。4月，以郭述申为书记的中共鄂豫皖边特别区委员会成立，红十一军编为工农红军第一军，许继慎任军长，曹大骏任政治委员兼中共

红一军前委书记，徐向前任副军长，下辖3个师，共2100余人。其后，由阳新地区北渡长江转战到鄂东蕲春、黄梅、广济地区的红八军第四、第五纵队与当地游击队合编为红十五军，蔡申熙任军长，陈奇任政治委员。6月，召开鄂豫皖苏区第一次工农兵代表大会，宣布成立鄂豫皖特区苏维埃政府，甘元景任主席，以大别山为中心的鄂豫皖革命根据地正式形成。11月，鄂豫皖边临时革命军事委员会成立，曾中生任主席。同时，中共鄂豫边特委改组，曾中生兼任书记。1931年1月，红一军与红十五军在黄麻地区会师，合编为红四军，邝继勋任军长，余笃三任政治委员，徐向前任参谋长，全军共1.2万余人。这时，蕲春、黄梅地区也划归鄂豫皖根据地。5月，中共鄂豫皖中央分局成立，张国焘任书记兼军委书记。11月7日，在黄安七里坪组成了红四方面军，徐向前任总指挥，陈昌浩任政治委员。为打破国民党军队对鄂豫皖革命根据地的第三次“围剿”，至1932年6月，先后发起黄安、商（城）潢（川）、苏家埠、潢（川）光（山）4次战役，歼敌约6万人。1932年1月，中共鄂豫皖省委成立，沈泽民任书记。由于张国焘推行“左”倾冒险主义政策，红四方面军未能粉碎国民党的第四次“围剿”，主力于10月撤出鄂豫皖革命根据地向西转移，在川陕地区开辟新的根据地。留下的红军重组红二十五军，在吴焕先、徐海东、王平章等领导下继续坚持斗争。　（林健柏）

湘鄂西革命根据地的开辟

1930年7月，周逸群、贺龙、段德昌等领导在以洪湖地区为中心的湘鄂西地区创建的革命根据地。

1927年9月，段德昌、段玉林等领导当地农民举行武装起义。1928年2月，由周逸群、贺龙等组成的中共湘西北特委先后到达湘鄂边洪湖地区和湘西桑植地区，把原来中共鄂中、鄂西特委领导的石首、监利和鄂中等游击队组织起来，利用贺龙以前的旧部属关系，收集失散武装，组成工农革命军，贺龙任总指挥，共约1000余人。4月又发动桑植武装起义，进占县城，建立了县革命政权和中共桑植县委。不久，国民党军攻占桑植，周逸群转移到洪湖地区，贺龙仍留在桑植、鹤峰一带，坚持湘鄂边游击战争。5月，周逸群到石首，将几支游击队统一合编。6月，组成了以周逸群为书记的中共鄂中特委，开辟了洪湖革命根据地。到1929年上半年，根据地扩大到江陵、石首、监利、沔阳等县的大部地区。7月，洪湖地区的游击队扩编为红军鄂西游击总队，周逸群任总队长，段德昌任参谋长。12月改编为红军中央独立师，段德昌任师长，队伍有近5000人。在湘鄂边区，1928年7月，工农革命军改编为中国工农革命军第四军（以后改称红二军），贺龙任军长，恽代英任党代表（未到职）；并成立了中共湘西前敌委员会（11月改为中共湘鄂西前委），贺龙兼任书记，统一领导当地共产党组织和红军。8月，敌人10万余人进攻湘鄂边区。贺龙率部东进，牵制敌人对湘东红军的进攻。在敌强我弱的形势下，红四军主动撤离桑植，转移到鹤峰地区。1929年1月，部队攻占鹤峰县城，发展到千余人。5月，攻占桑植县城，分别建立了县委和县、区工农民主政权，并发动群众打土豪、分田地，迅速打开了局面。到1929年上半年，逐步形成以桑植、鹤峰为中心的湘鄂边革命根据地。1930年2月，红军中央独立师扩编为红军第六军，孙德清任军长（不久因病离职，由邝继勋继任），周逸群兼任政治委员。同时建立了中共红六军前委，王一鸣任书记，统一领导鄂西、洪湖地区红军。红六军先后攻占沔阳、潜江、石首、华容等城镇，并相继建立各县苏维埃政权。7月，洪湖和湘鄂边两块革命根据地发展为湘鄂西革命根据地，红四军与红六军在湖北公安会师，合编为中国工农红军第二军团（这时红四军改称红二军），部队扩大到1万余人，贺龙任总指挥，周逸群任政治委员，孙德清任参谋长，并组成中共红二军团前敌委员会，周逸群兼任书记。7月下旬，红二军团主力向东北发展，洪湖根据地的江陵、监利、潜江、沔阳等县连成一片。9月12日，邓中夏到洪湖任中共鄂西特委书记及红二军团政治委员。不久，为了统一领导鄂西和湘鄂边地区的工作，成立了中共湘鄂西特委，邓中夏任书记，同时，成立了湘鄂西联县政府。因邓中夏随军行动，由周逸群代理中共湘鄂西特委书记兼湘鄂西联县政府主席。1931年3月，中共湘鄂西中央分局成立，夏曦任书记。红二军团在枝柘坪休整，根据中共中央指示改编为红三军，贺龙任军长，邓中夏任政治委员（10月夏曦接任），全军共5200余人。5月，成立了湘鄂西革命军事委员会，由贺龙、夏曦、万涛组成主席团。红三军转战鄂西北，创建了鄂西北根据地。1932年1月，关向应到湘鄂西，任红三军政治委员。到1932年夏，湘鄂西革命根据地发展到20多个县的地区，红军和地方武装共约3万余人。

（林健柏）

中国国民党临时行动委员会建立

1930年8月，邓演达等国民党左派分子在上海

组织的中国国民党临时行动委员会”。

邓演达(1895—1931)，字择生，广东惠阳人。曾任国民革命军总政治部主任、湖北省政府主席。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后，被蒋介石下令通缉，流亡苏联。1927年11月1日，与宋庆龄、陈友仁等在莫斯科以中国国民党临时行动委员会名义发表《对中国及世界革命民众宣言》。指出国民党的上层领导已完全背叛孙中山的三民主义，成为“旧势力之化身，军阀之工具，民众之仇敌”。号召工人、农民、手工业者、小商人和青年学生向一切反动仇敌进攻，争取三民主义的革命纲领完全实现，建立以工农为中心的平民政权。1928年春，谭平山、章伯钧等联合一部分左派和一部分脱离中国共产党的人士，以中华革命党的名称起草了《党纲》和《政纲》，首先在上海以“科学的三民主义”为号召，秘密进行政治活动和组织活动。他们既反对国民党反动派的背叛革命，又不赞成中国共产党组织工农武装起义、建立农村根据地的做法，但有振兴中华的愿望和继续革命的意志，要求民族的解放，要找革命的出路。因当时外界未获悉其组织名称和政治纲领，故通称其为“第三党”。它成立后与在国外的邓演达保持着联系。1930年5月，邓演达秘密回到上海，着手主持讨论党的政治纲领和筹建党的中央机构等问题，决定沿用中国国民党临时行动委员会的名称。8月9日，邓演达主持召开第一次全国干部会议。出席会议的有黄琪翔、章伯钧、季方、郑太朴、丘哲等30多人。会议通过了《中国国民党临时行动委员会政治主张》，指出中国革命的对象是帝国主义、封建军阀地主和反动的资本阶级，主张由直接的或间接的参加生产行程的平民群众自己起来推翻他们的统治，建立以农工为重心的平民政权，实行耕者有其田，由国家资本主义过渡到社会主义。会议选举邓演达、黄琪翔、彭泽民、章伯钧、季方、郑太朴、罗任一、朱蕴山、李世璋、丘哲、郭冠杰、王枕心、谢树英、丘学训、肖秉章、江董琴、杨逸棠、李毓九、陈豹隐、万灿、丘逵华、杨树松、潘震亚、詹显哲、邹兰甫等25人为干事，组成中央干部会，邓演达为总干事。8月10日，中央干部会发出第1号《通告》，宣告中国国民党临时行动委员会正式成立，要求全党在“最短时间得到新的革命根据地，把革命的同志重新结合起来”，以完成孙中山三民主义的使命。之后，中国国民党临时行动委员会在20个省市和香港建立了地方组织，成员有近2000人。中央机关创办了《革命行动》半月刊和《行动日报》。1931年8月17日，邓演达被捕。11月29日被蒋介石秘密杀害于南京。中国国民党临时行动委员会受到沉重打击，但大多数成员继续坚持反蒋斗争。1935年“第三党”改名为中华民族解放行动委员会，响应中国共产党关于各党各派合作抗日、共赴国难的号召，积极参加抗日活动。

（陈绍畴）

土地革命路线的形成

1930年底、1931年初，各革命根据地在实践中逐步形成的土地革命路线、政策和方法。

土地革命是中国共产党领导农民消灭封建和半封建性的土地占有制度的革命。旧中国的广大农村，占农村人口不到10%的地主和富农，占有约70—80%的土地，借此残酷地剥削农民。而占农村人口90%以上的贫苦农民，只占有20—30%的土地，终年劳动，不得温饱。这种封建的土地所有制和封建的剥削关系，阻碍着社会生产力的发展，是中国长期以来穷困和落后的根源。因此，解决农民的土地问题，是中国民主革命的基本内容之一。1927年8月7日，中共中央紧急会议作出关于实行土地革命的决定，指出“土地革命问题是中国资产阶级民权革命中的中心问题”，是“中国革命新阶段的主要的社会经济的内容”。现时主要的是用“平民式”的革命手段，发动千百万农民自下而上地解决土地问题。规定要没收大地主和中地主的土地，没收一切所谓公产的祠族庙宇等土地，分给佃农及无地的农民。对于小田主则减租。强调贫农是农民运动的主要力量。9月，中共中央提出：“对于小地主的土地必须全部没收，实现‘耕者有其田’的原则。”11月，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又扩大了土地没收的范围，规定“一切地主的土地无代价的没收，一切私有土地完全归组织成苏维埃国家的劳动平民所公有”。中国共产党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进一步制定了实行土地革命的纲领，纠正了关于在土地革命中“没收一切土地”的错误主张，指出应“无代价的立即没收豪绅地主阶级的财产土地，没收的土地归农民代表会议(苏维埃)处理，分配给无地及少地农民使用”；要保护工商业，反对均分小资产阶级财产的倾向。同时，明确提出：农村豪绅地主阶级是革命的主要敌人。无产阶级在乡村中的基本力量是贫农，中农是巩固的同盟者。强调联合中农是保证土地革命胜利的主要条件。对于富农，则要根据它对革命的不同态度予以区别对待。凡富农已成为反动力量的地方，在反军阀、反地主豪绅的同时，应进行反富农的斗争；在富农继续同军阀地主豪绅斗争时，要争取它；党在目前阶段中的任务，乃在

使这种富农中立，以减少敌人的力量。随着红军和农村革命根据地的建立与发展，土地革命日益广泛和深入地开展起来，在斗争实践中经过摸索和总结，逐步形成了土地革命的路线、政策和方法。从1927年冬开始，井冈山根据地在发动群众打倒土豪劣绅的基础上，逐步开展分田斗争。1928年5月中共湘赣边界第一次代表大会后，宁冈全县，永新、莲花的大部分地区，遂川、酃县的部分地区都分了田。12月，湘赣边界政府颁布了井冈山《土地法》，共9条。这个土地法否定了封建土地所有制，规定没收一切土地归苏维埃政府所有。土地分配的原则和方法是以人口为标准，男女老幼平均分配，主要以乡为分配单位。由于当时尚不知道中共六大的有关精神和缺乏经验，这个土地法还存在一些缺陷，一是规定没收一切土地，而不是只没收地主的土地，容易侵犯中农的利益；二是规定土地所有权属于政府，而不是属于农民，农民只有使用权，禁止土地买卖。1929年4月，在总结赣南土地革命经验的基础上，毛泽东主持制定了兴国县《土地法》，共8条。这个土地法将井冈山《土地法》中规定的“没收一切土地”改为“没收一切公共土地及地主阶级的土地”。这是一个原则性的修改。7月，在毛泽东的指导下，中共闽西第一次代表大会通过了《关于政治决议案》和《关于土地问题决议案》，提出自耕农的田地不没收；富农多余的土地要没收，但在革命初期不没收其土地，也不废除其债务；对农村小地主要没收其土地，废除其债务，但不要派款及其它过分打击；对大小商店应取一般的保护政策（即不没收）。规定土地的分配方法，应以乡为单位。在分田时（在原耕基础上）以“抽多补少”为原则，按人口进行平均分配。与此同时，赣东北、湘鄂西、鄂豫皖、湘鄂赣、左右江等革命根据地也相继开展土地革命，颁布了关于土地革命的法令。如1930年10月，中共湘鄂西特委制定了《关于土地问题决议案大纲》和湘鄂西第二次工农兵贫民代表大会通过了《土地革命法令》。这些文件明确了划分农村阶级的标准，规定凡有土地自己不耕种，也不雇人耕种，而只出佃，坐收租谷者为地主。凡自耕农土地有余，而兼雇人耕种或以余田出租者，及佃农虽自己无土地，却有资本租得大批土地，所收获超过需要，并雇人耕种者为富农。不论自耕农、佃农，土地仅足自给者为中农。虽兼雇用少数工人耕种，但其土地数量与其人口需要刚刚相符者，仍不失为中农，不能因其少有余裕便认为富农。规定没收地主阶级的土地和财产；没收富农所余出佃的一部分土地；不动中农的土地；不禁止雇佣耕种；土地不禁止买卖。鄂豫皖根据地于1929年6月和12月先后制定了《临时土地政纲》和《土地政纲实施细则》，规定没收和分配土地时，不得侵犯自耕农的利益，要联合中农，应切实运用各种策略防止无原则地妨碍中农利益；对富农只分配其剩余的土地；要保护商业，对中小商人的经济不能妨害；分配土地应采取人口与劳动力兼顾的原则。湘鄂赣根据地分配耕地的办法，多数地方实行分耕制，将没收的土地按人口或劳动力为标准分配给农民，由其自行耕种经营，收获归己。关于土地所有权问题，开始曾规定“土地国有”的原则。1930年9月，周恩来在中共六届三中全会上传达了共产国际关于土地革命的指示精神，指出“土地国有问题，现在是要宣传，但不是现在已经就能实行土地国有”，“禁止土地买卖，目前是不需要的口号，这只是增加了农民的恐慌心理”。1931年2月8日，中共苏区中央局发出《土地问题与反富农策略》的第9号通告，明确指出：农民是小私有者，他们热烈地起来参加土地革命的目的，不仅要取得土地的使用权，主要的还要取得土地的所有权。目前土地国有只是宣传口号，尚未到实行的阶段。必须使广大农民在土地革命中取得他们唯一热望的土地所有权，才能加强他们对于土地革命和争取全国苏维埃胜利的热烈情绪，才能使土地革命更加深入。2月27日，毛泽东以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政治部主任的名义，写信给江西省苏维埃政府，肯定了农民对土地的所有权。信中指出：过去分好了的田（实行抽多补少、抽肥补瘦了的）即算分定，得田的人，即由他管所分得的田，这田由他私有，别人不得侵犯。以后一家的田，一家定业，生的不补，死的不退，租借买卖，由他自主。田中出产，除交土地税于政府外，均归农民所有。还指出，这些规定，是民权革命时代应该有的过程，共产主义不是一天做得起来的。只有实行资产阶级民主革命阶段所必需的政策，才是真正的走向共产主义的良好办法。3月，江西省苏维埃政府发布文告，正式宣布：“土地一经分定，土地使用权、所有权通通归农民。”到1930年底、1931年初，各个革命根据地在不断总结经验的基础上，逐步解决了关于没收土地的对象、土地分配的原则和方法、土地分配后的所有权，以及土地革命中的阶级路线等基本问题，形成了一套比较切实可行的土地革命的路线、政策和方法。这就是依靠贫农雇农，联合中农，限制富农，保护中小工商业者，消灭地主阶级，变封建的土地所有制为农民的土地所有制，发动农民自己动手解决土地问题，以乡

为单位,按人口平均分配土地,在原耕地基础上,抽多补少,抽肥补瘦,满足无地少地的农民的土地要求。在这条土地革命路线的指导下,各个革命根据地完成了土地制度的深刻变革。土地革命推动了根据地农业生产的发展,也为红军战争奠定了坚实的群众基础。 (陈绍畴)

红军三次反"围剿"战争

1930年12月至1931年9月,红军第一方面军在毛泽东、朱德的指挥下,先后粉碎国民党军队对中央革命根据地的三次军事"围剿"。

1930年10月中原大战结束后,蒋介石陆续调集11个师,共10万余人的兵力,以江西省政府主席、第九路军总指挥鲁涤平为陆海空军总司令南昌行营主任,准备进攻以江西南部地区为中心的中央革命根据地。这时,红一方面军约有4万余人,部署在江西清江(临江)至分宜的袁水两岸地区进行群众工作和筹款。10月30日,红一方面军总前敌委员会和江西省行委在新喻县(新余市)罗坊召开联席会议,根据敌强我弱和湘敌强、赣敌弱的实际情况,决定红军实行"诱敌深入"的方针,向根据地中部退却,寻找战机,等敌军疲惫后,在运动战中歼灭敌人。11月1日,红一方面军主力向赣江东岸新淦(新干)、永丰、崇仁、宜黄地区转移。11月5日,国民党军队向袁水流域推进,扑空后又向赣江东岸逼进,寻求红军主力决战。11月中旬,红军主力逐次转移到中央革命根据地中部的东固、龙冈地区。12月1日,又秘密转移到宁都黄陂、小布地区隐蔽待机。12月16日,国民党军队从江西吉安至福建建宁一线,由北向南,采取"长驱直入,分进合击"的战术,向中央革命根据地中心区进攻。敌左路第十八师、第二十八师进至吉安富田、东固、南垅;中路第五十师进抵宁都源头;右路第二十四师进至宁都洛口,第八师先头进至广昌西南的头陂。红一方面军总政治委员毛泽东、红一方面军总司令朱德根据敌军战线长、兵力分散的弱点,决定实行中间突破,集中兵力先打敌主力第五十师或第十八师,以便打开敌军阵线一个缺口,把东西之敌分离为远距离的两群,然后各个击破。12月28日,鲁涤平命令其已深入中央革命根据地的5个师向宁都以北的黄陂、小布、麻田地区的红军发起总攻。次日,国民党军队第十八师师长张辉瓒以第五十四旅留守东固,率师部及第五十二旅、第五十三旅向永丰龙冈推进。这地区群众条件和地形对红军都有利,敌人又是孤军冒进,红军主力秘密西进埋伏在龙冈附近山中。12月30日晨,敌第十八师主力由龙冈向五门岭进犯。上午9时许,该敌在龙冈以东、小布以西登山时,突然遭到预先设伏的红三军第七师的猛烈袭击。下午3时许,张辉瓒亲自指挥4个团多路猛攻,被红军击退。此时,红十二军沿龙冈南侧占领表湖及附近各山头,红四军和红三军团一部沿龙冈北侧迅速插到张家车,截断龙冈之敌和东固、因富之敌的联系,并从背后向龙冈之敌发起猛攻;红三军团主力则进到上固及其附近地区占领阵地,截断敌军从西北方向增援和龙冈敌军向西北方向突围的道路;红三军十五师迂回到敌后,切断敌军从西南方向增援和龙冈敌军向西南方向突围的道路。下午4时,红军发起总攻,至黄昏前,战斗结束,歼敌近万人,活捉张辉瓒。这时,深入根据地的其他敌军纷纷收缩。红军乘胜追击,挥戈东向,于1931年1月3日在宁都东韶地区再歼敌第五十师1个多旅,俘敌3000余人。其他敌军仓皇溃退。红军在5天内连打两个胜仗,共歼敌1.5万人,缴获各种武器1.2万余件,胜利地打破了国民党军队的第一次"围剿"。

1931年2月,蒋介石任命国民党政府军政部部长何应钦为陆海空军总司令南昌行营主任,调集18个师零3个旅,共约20万兵力,对中央革命根据地发动第二次"围剿"。4月1日,国民党军采取"稳扎稳打,步步为营"的战术,分4路向中央革命根据地大举进攻。至4月下旬,敌第五路军所部分别进占吉安富田、水南、吉水白沙、严坊等地;第六路军所部进占广昌、南丰地区;第十九路军所部进抵兴国江背洞、龙冈头、城冈等地;第二十六路军所部占领乐安招携、界上、横石等地。当时,红军有3万余人,从中央革命根据地北缘永丰、乐安、宜黄、南丰以南移至广昌、宁都、石城地区。红一方面军在毛泽东、朱德的指挥下,继续采取诱敌深入、集中兵力先打弱敌、在运动战中各个歼灭敌人的方针。4月23日,红军主力转移到东固附近秘密集结,寻机破敌。5月13日,敌第五路军分为左、中、右3个纵队,脱离富田的巩固阵地向东固进犯。其右纵队第二十八师和第四十七师第五旅经龙坑、中洞、头陂、东固岭和九寸岭、观音崖向东固攻击前进。5月16日,红军抓住战机,按预定计划,把敌人包围在中洞、九寸岭地区,经1昼夜激战,全歼敌第二十八师和第四十七师一部。红军首战告捷,乘胜追击,向东横扫,于5月19日在吉水白沙截住逃敌,歼敌第四十七师一个旅残部和第四十三师一部。红军继续向东扩张战果,5月22日进至永丰中村,又歼灭前来西援的敌第二十七师近一

个旅。当晚，红军进至宁都南团，敌第二十五师撤回宜黄。接着，红军日夜兼程向东急进，全力打击敌第六路军。敌慌忙收缩兵力，由广昌向南丰逃窜。5月27日，红军攻克广昌，歼敌第五师一部，该师师长胡祖玉受重伤后毙命。是时，奉命增援广昌的敌第五十六师自福建建宁、安远以南的中沙仓皇回撤建宁。红四军第十师与红三军配合北上，追击向南丰逃窜的敌第二十四师、第八师和第五师残部；红四军主力在广昌休整；红一方面军总部即率红三军团和红十二军主力向建宁急进。5月31日，红军乘敌第五十六师立足未稳，一举攻占建宁，歼敌3个多团，俘敌3000余人。红军在半个月中，从江西东固、富田一直打到福建建宁，横扫350公里，连打5个胜仗，共歼敌3万余人，缴枪2万余支，从而粉碎了国民党军队的第二次“围剿”。

1931年7月，蒋介石亲自担任“围剿”军总司令，何应钦为前线总司令，调集23个师又3个旅，共30万兵力，采取长驱直入、分进合击的战略，分左、中、右3路，由北向南进攻中央革命根据地。这时，红军只有3万人左右，主力还在福建建宁，而且是苦战之后，尚未得到休整补充。7月10日前后，红军从建宁分路出发，经福建宁化、长汀、江西瑞金，绕道千里，回师赣南兴国西北高兴圩地区集结。7月底，敌人发现红军主力已转移到兴国，即令其主力由东向西、由北向南急进，企图聚歼红军于赣江东岸。红一方面军在毛泽东、朱德的指挥下，实行诱敌深入、避敌主力、打其虚弱的作战方针，决定主力由高兴圩秘密北移，突破吉安富田一点，然后由西而东，横扫敌军的后方联络线，置敌主力于无用之地。待敌发觉，其主力回头向北时，再乘敌疲惫，寻机打其可打者。7月31日，红军开始向富田开进，至石陂以北，发现敌已先于红军到达富田。毛泽东、朱德遂改取中间突破，率红军折返高兴圩，向东面兴国的莲塘、良村，宁都的黄陂方向突进。8月5日晚，红军主力利用夜暗，从崇贤、兴国两地敌军之间的20公里空隙地带秘密向东突进到莲塘地区。8月7日拂晓，红军在莲塘全歼敌第四十七师1个旅又1个多营。接着，红军尾追残敌，直逼良村，歼敌第五十四师师部及两个旅。莲塘、良村两仗，共俘敌3500余人，缴获枪支3000余支(挺)。之后，红军以第三军佯攻龙冈，主力则东向急进黄陂。8月11日，红军主力一举突破黄陂，歼敌第八师约4个团，俘敌4000余人。红军主力即转到永丰、兴国、宁都3县交界的君埠及其以东尖岭崓地区休整。这时敌发现红军主力在东面，即令其向西向南的主力转旗东向，分两路取密集大包围态势进逼红军集结的地区。红军则取声东击西战术，命红十二军(欠第三十五师)伪装主力，向乐安方向佯动，将敌向东北方向引诱，而红军主力2万余人则从正在东进的敌第一军团和第二路进击军之间10公里的间隙中偷越过去，西进到兴国东北的白石、枫边一带隐蔽休整待机。为进一步调动和疲惫敌军，红军主力于9月初继续西移至兴国的均村、茶园地区隐蔽待机。及至敌人发现红军再向西进时，红军已休息了半个多月。敌军在中央革命根据地来回奔波，数次扑空，饥疲不堪，无能为力，只得退却。9月7日，当敌军正沿黄土坳、老营盘之线北撤，红军迅速出击，在老营盘歼敌第九师1个旅，俘敌2000余人。接着，红军在兴国高兴圩与敌打成对峙，为争取主动，即撤出战斗，主力转至茶园、均村、永丰圩地区。9月15日，当敌经崇贤、东固向吉安撤退时，红军在兴国方石岭战斗中歼敌第五十二师及第九师一部，俘敌5000余人。在这次反“围剿”战争中，红军共歼敌3万余人，缴枪1.4万余支。蒋介石亲自指挥的第三次“围剿”又被粉碎。此后，赣南、闽西两个根据地连成一片，中央革命根据地扩大到包括21座县城、面积5万平方公里、人口达250万人在内的广大地区。

（陈绍畴）

中共六届四中全会召开

1931年1月7日，中国共产党在上海召开六届四中全会，王明等取得了在中共中央的领导地位。

王明(1904—1974)，原名陈绍禹，安徽金寨人。1925年参加中国共产党。后去苏联中山大学学习。在校时，受到该校校长米夫(П. А. Миф，1901—1938，苏联人)的器重，并形成一个以他为首的教条主义小宗派。1929年3月回到上海，先后在中共沪西区委、沪东区委、《红旗》报、中央宣传部工作。曾在《红旗》、《布尔什维克》上发表许多文章，宣传“左”倾思想。他对李立三的“左”倾错误有所批评，并表示拥护中共六届三中全会决议。1930年10月，共产国际执委会在给中共中央《关于立三路线问题的信》中，指出立三路线就是反国际的政治路线，批评中共六届三中全会犯了“调和主义”错误。10月底，王明等通过不正常的途径预先获知这一信件的内容，乘机打起“拥护国际路线”、“反对立三路线”、“反对调和主义”的旗号，进行反对中共六届三中全会及其后的中央的活动。王明还散发他的纲领性小册子《两条路线》(1932年3月补充再版改名为《为中共更加布尔什

维克化而斗争》),要求以"积极拥护和执行国际路线的斗争干部"来改造和充实各级领导机关。11月16日,中共中央接到共产国际10月来信,即召开中央政治局会议讨论,于11月25日通过《关于最近国际来信的决议》,表示"完全同意"共产国际的来信,说明中共六届三中全会"一般的已经接受了国际的路线",并承认没有把立三路线彻底揭发出来,"包含着对于'左倾'错误的调和态度"。同时决定向全党公开共产国际的来信。这时,一个以中华全国总工会党团书记罗章龙为代表的宗派也打着"拥护国际路线"、"肃清调和主义"的旗号,乘机进行分裂党的活动,要求立即召开紧急会议,根本改造中央政治局。此外,一些受过李立三和六届三中全会批评的地方党组织和干部也纷纷要求改组中共中央。于是,中共中央政治局于12月9日作出决议,准备召开紧急会议通过新的政治决议案,以代替六届三中全会的决议案。12月中旬,时任共产国际执委会东方部副部长的米夫以共产国际代表的身分来到上海。他否定中共中央作出的召集紧急会议的决定,要求召开中共六届四中全会,中心是反右倾,以便通过这次会议支持王明为首的小宗派,改变中共中央的领导,贯彻共产国际的路线。1931年1月7日,中共六届四中全会在上海举行。出席会议的有中央委员、中央候补委员22人,列席的有中共江南省委、北方局、全总党团、青年团中央等单位代表15人。米夫参加了会议。会上,向忠发作《中央政治局报告》。会议发生激烈的争论。米夫使用不正常的组织手段控制会议的进行。王明在会上作了长篇发言,宣扬他的《两条路线》小册子的观点。米夫作会议结论。会议认为"立三主义是用'左'倾词句掩盖着实际上的右倾机会主义",指责六届三中全会后的中共中央继续并扩大了立三路线,决定改造充实各级领导机关。瞿秋白、周恩来等在会上受到严厉指责。最后按照米夫以共产国际远东局名义和中央政治局事先议定的名单,改选了中央领导机构。李维汉、贺昌退出中央委员会,增补王明、韩连惠、王尽仁、沈先定、黄苏、夏曦、徐畏三、沈泽民、曾炳春等9人为中央委员;瞿秋白、李立三、李维汉退出中央政治局,向忠发、周恩来、项英、张国焘、徐锡根、卢福坦、任弼时、陈郁、王明等9人为中央政治局委员,关向应、罗登贤、毛泽东、温裕成、顾顺章、刘少奇、王克全等7人为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1月10日,中央政治局会议推举向忠发、周恩来、张国焘为中央政治局常务委员会委员,陈郁、卢福坦、徐锡根为中央政治局常务委员会候补委员。王明等通过中共六届四中全会取得在中共中央的领导地位。中共六届四中全会在党的历史上没有任何积极的建设性的作用。从此,以王明为代表的"左"倾冒险主义在中共中央领导机关内开始了长达4年之久的统治。

(陈绍畴)

王明"左"倾冒险主义的出现

王明等人通过1931年1月召开的中共六届四中全会取得了在中共中央的领导地位,开始了长达4年之久的"左"倾冒险主义在共产党内的统治。

在中共六届四中全会上,王明等人在共产国际及其代表米夫的支持下,提出了一系列比李立三"左"倾冒险主义还要"左"的错误观点,取得了在中共中央的领导地位。从此,以王明为代表的"左"倾冒险主义统治全党达4年之久。《两条路线》(后改名为《为中共更加布尔什维克化而斗争》)的小册子,实际上是王明"左"倾冒险主义的政治纲领。整个说来,它比李立三的"左"倾错误更坚决,气焰更甚,形态也更完备,并且更有理论。中共六届四中全会后,王明的"左"倾冒险主义开始在各地贯彻。中共中央派遣许多中央代表或"新的领导干部"到全国各地去,对革命根据地和白区地方党组织进行所谓"改造"。5月9日,中共中央通过《关于目前政治形势及党的紧急任务决议案》,强调改造苏区各级领导机关,号召白区共产党组织发动群众,必须在五卅当天于上海、南京等大城市举行示威或飞行集会,不这样做,就是"极可耻的取消主义与逃避主义"。这是王明"左"倾冒险主义在实际工作中的进一步贯彻和发展。6月下旬,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务委员会主席向忠发在上海被捕叛变。9月,王明决定前往莫斯科,担任中共中央驻共产国际代表团的负责人。在共产国际指示下,成立中共临时中央政治局,由秦邦宪(1907—1946,又名博古,江苏无锡人)、张闻天(1900—1976,又名洛甫,上海川沙人)、卢福坦(后被捕叛变)担任中央常委,秦邦宪负总的责任。中共临时中央虽然揭露了九一八事变以后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和国民党政府的不抵抗主义,号召全党和下层小资产阶级群众结成抗日反蒋统一战线,发动和领导群众开展反对日本帝国主义和国民党反动统治的武装斗争,但是却继续推行以王明为代表的"左"倾冒险主义。他们在政治上混淆民主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的界限,把反资产阶级和反帝反封建并列;强调日本进攻苏联的可能性,把"武装保卫苏联"作为头等重要任务;否认九一八事变后国内阶级关系的明显变化,忽视中间阶级

的抗日民主要求，认为当时形势的特点是革命与反革命的决战，中间势力"是帮助国民党来维持它的统治，来使群众不去反对与推翻国民党统治"的，因而"这些派别是最危险的敌人，应该以主要的力量来打击这些妥协的反革命派"。1931年9月20日，中共临时中央在《由于工农红军冲破第三次"围剿"及革命危机逐渐成熟而产生的党的紧急任务》中，片面强调国民党政权与苏维埃政权的对立，认为"国民党统治的崩溃，正在加速进行着"，红军和苏维埃政权能够立刻取得决定性的胜利。1932年1月9日，中共临时中央作出《关于争取革命在一省与数省首先胜利的决议》，继续推行"城市中心论"，指令根据地的红军采取"积极的进攻"策略，攻打中心城市。规定在国民党统治区共产党的"第一等的任务，是用最大的力量去开展城市工人的罢工斗争"。在领导城市工人运动时，继续采取冒险主义的方针，如组织赤色工会，无条件地举行冲厂、总罢工，拒绝采用合法形式来组织工人斗争。他们不顾客观条件是否可能，要求山西、河南、河北等地的共产党组织，通过发动兵变和工农运动，立刻"创造出北方的苏维埃区域"。在军事上，他们先是推行冒险主义，后来又变为保守主义和逃跑主义。在组织上，他们实行宗派主义，对不同意他们的错误主张的同志，进行"残酷斗争，无情打击"，甚至以同罪犯和敌人作斗争的方式来进行党内斗争。1933年1月，中共临时中央政治局因在上海无法立足，被迫迁入中央革命根据地瑞金。1934年1月，中共临时中央在瑞金召开六届五中全会，不但全面肯定了中共六届四中全会以来的"左"倾错误，而且还错误地断定中国已存在"直接革命形势"，第五次反"围剿""即是争取中国革命完全胜利的斗争"，并要求在国民党统治区的共产党组织"用最大的力量去准备、组织领导工人阶级的罢工斗争"，从而使"左"倾错误发展到顶点。王明"左"倾冒险主义给中国共产党和革命事业造成重大损失。1935年1月在贵州遵义召开的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确立了以毛泽东为代表的新的中央的正确领导，从而结束了王明"左"倾冒险主义在中共中央的统治。

（陈绍畴）

中国托派组织的出现

1931年5月，陈独秀等在托洛茨基的直接撮合下，同其他托派分子相结合，在上海建立了统一的中国托派组织"中国共产党左派反对派"。

中国托派最先酝酿于1925年至1927年间在苏联学习的中国留学生中间。他们参加了当时苏联共产党内托洛茨基（Троцкий，1879—1940，苏联人）与斯大林两派之间围绕着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和共产国际指导中国大革命的路线等问题的大辩论。属于托洛茨基一派的被称为"托洛茨基反对派"，简称托派。从1927年底开始，中国留苏学生中的托派分子陆续回到国内，从事托派活动。1928年12月，托派分子区芳、梁干乔、宋逢春、陆一渊等在上海召开所谓第一次代表大会，成立了中国第一个托派小组织，自称"中国布尔什维克列宁主义反对派"，选举了中央机构"全国总干事会"，史唐任干事长。1929年4月，创办《我们的话》，传播托洛茨基论述中国革命问题的观点。1927年大革命失败后，陈独秀等人由于对革命前途悲观失望，逐渐变成取消主义者。他们接受托洛茨基的观点，认为1927年大革命失败后，中国资产阶级对于帝国主义和封建势力已经取得了胜利，它对人民的统治已趋稳定，中国社会已是资本主义占优势并将得到和平发展的社会。断言中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已经完结，中国无产阶级只有待到将来再去举行社会主义革命。认为在当时只能进行以"国民会议"为中心口号的合法运动，而取消革命运动。因此，他们被称为"托陈取消派"。1929年8月5日，陈独秀给中共中央常委写信，要求中央接受托派的主张，改变中共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的路线。陈独秀等拒绝中共中央的多次警告，坚持错误立场，在党内进行宗派活动，于同年11月15日被开除出党。12月10日，陈独秀公开发表《告全党同志书》。12月15日，陈独秀又纠集81人发表《我们的政治意见书》，公开打出"左派反对派"的旗帜，攻击党的政治路线。1930年3月，他们创办《无产者》作为机关报。在此期间，归国留苏学生中的托派分子还成立了两个托派小组织：王文元、王凡西等组织的"十月社"和赵济、刘胤等组织的"战斗社"。1931年5月1日至3日，在托洛茨基和托派临时国际的催促下，上述4个托派小组织在上海联合举行大会，建立统一的中国托派组织，名称沿用"中国共产党左派反对派"，选举了"中央委员会"，陈独秀、郑超麟、陈亦谋、王文元、宋逢春为常委，陈独秀被推为总书记。不久，它的领导成员先后被国民党政府逮捕，这个组织随即瓦解，但一些托派分子和托派小组织还在继续活动。1935年1月，中国托派组织改名为"中国共产主义同盟"。陈独秀成为中国托派组织的首领后，虽然对国民党反动政府仍有所批评，但主要地是进行反对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斗争的活动。由于托派的主张完全

脱离中国实际，加之内部派系的矛盾很深，所成立的统一组织很快陷于分裂和瘫痪，没有在社会上产生重大的影响。 （陈绍畴）

湘赣革命根据地的开辟

1931年8月在湘赣边、赣西南地区革命斗争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革命根据地。

1928年12月，彭德怀（1898—1974，湖南湘潭人）、滕代远率红五军到达井冈山与红四军会师。年底，湘赣两省国民党军队以6个旅约3万人的兵力，分5路进攻井冈山革命根据地。1929年1月上旬，以毛泽东为书记的中共前委在宁冈柏露召开前委、湘赣边界特委、红四军和红五军军委以及各县委负责人联席会议，决定红四军主力出击赣南，红五军和红四军第三十二团留守井冈山。1月14日，红四军主力离开井冈山，开始向赣南进军。留守井冈山的红军虽经艰苦斗争，井冈山仍曾一度被敌占领。彭德怀、滕代远率红五军主力向赣南转移。5月，红五军主力重返井冈山，湘赣革命根据地得到恢复发展。1930年，以江西永新为中心的湘赣边10余县先后建立了苏维埃政权。8月1日，中共湘东特委成立，张启龙任书记。月底，在萍乡成立了湘东工农兵苏维埃政府。10月，成立了湘东独立师。从1930年12月至1931年4月，湘东、赣西南两根据地在配合中央苏区连续粉碎敌人两次“围剿”后，连成一片。1931年7月，中共苏区中央局根据中央决定，以湘东和赣西南根据地为基础，加上附近若干地区，合并为湘赣省，统一领导该地区的斗争。8月1日，在永新成立了中共湘赣临时省委，王首道任书记，管辖永新、吉安、安福、泰和、宁冈、遂川等20余县。10月8日至15日，在江西莲花召开中共湘赣省第一次代表大会，正式成立中共湘赣省委，王首道为书记。10月17日至25日，召开湘赣省苏维埃第一次代表大会，选举产生了湘赣省苏维埃政府，袁德生任主席，张启龙、彭德怀任副主席。湘赣革命根据地扩大到赣江以西、袁水流域以南、大庾以北、粤汉铁路以东地区。1932年1月，湘赣军区成立，张启龙任总指挥，甘泗淇任政治委员。2月，湘赣独立第一、第三师合编为红八军，李天柱任代军长，王震任代政治委员。1933年6月，任弼时（1904—1950，湖南湘阴人）接任中共湘赣省委书记。根据中央军委命令，湘赣革命根据地的红十七师和湘鄂赣根据地的红十八师合编为红六军团，肖克任代军团长，蔡会文任代政治委员。1934年8月，红六军团突围转移，进至湘南桂东地区，正式宣布成立红六军团军政委员会，任弼时任主席，肖克任军团长，王震任政治委员。留下的地方武装在谭余保等领导下，继续坚持湘赣地区的游击战争。

（林健柏）

九一八事变

1931年9月18日，日本驻在中国东北境内的关东军进攻沈阳，进而侵占东北三省的事件。

日本帝国主义侵略中国，蓄谋已久。1927年6月27日至7月7日，日本首相田中义一在东京召开东方会议，制订《对华政策纲领》，确立了使“满蒙”脱离中国本土，置于日本势力之下的方针。7月25日，田中义一将这次会议讨论的内容奏呈日本天皇，提出“惟欲征服中国，必先征服满蒙；如欲征服世界，必先征服中国”，鼓吹以武力侵占中国东北，进而占领全中国，实现日本的“大陆政策”。1929年开始的资本主义世界经济危机波及日本，加速了日本侵略中国的步伐。1931年3月31日，日本关东军参谋板垣征四郎在日本陆军步兵学校发表《从军事上所见到的满蒙》的讲话，宣称中国东北是日本“国防的第一线”，“对帝国的国防和国民的经济生活有很深的特殊关系”。认为“必须对控制满蒙资源、改变日本国内产业等进行充分的研究和准备”，但“从目前中国方面的态度来考察，如果单用外交的和平手段，毕竟不能达到解决满蒙问题的目的”。6月19日，日本陆军省和参谋本部联合拟订《解决满洲问题方策大纲》，确定了武装侵略中国东北的原则和步骤。7月，日本陆军省密召关东军参谋长三宅光治到东京，把这份大纲作为指令，传达给关东军司令官本庄繁。8月，本庄繁加紧调整兵力部署，并去关东军驻地巡视，观看军事演习。在这期间，日本为寻找发动侵略战争的借口，蓄意制造了“万宝山事件”。4月1日，与日本、朝鲜浪人合资经营的长农稻田公司经理、汉奸郝永德，在吉林长春县万宝山地区（德惠万宝镇）租用土地500垧（每垧相当于7亩），为期10年，言明契约经长春县政府批准后生效。契约尚未批准，郝永德便将地转手租给流浪到东北的朝鲜农民耕种。朝鲜农民为引导伊通河水入田，在马家哨口处筑坝截流，并强行在中国农民的土地上挖渠，严重损害当地农民的切身利益。5月20日，受害农民呈请当地政府制止。6月7日，长春县政府派人前往劝告朝鲜农民停工，朝鲜农民称是日本人指使的。日本驻长春领事田代重德借机扩大事端，唆使朝鲜农民继续施工，并派武装日警来“保护”。7月1日，数百名受害的中国农

民自发填平引水渠一段。次日，中国农民正待继续平渠，日警公然开枪，打死中国农民数人，伤数十人，被捕受刑者 10 余人。日本和朝鲜的报纸故意捏造事实，进行欺骗宣传，煽动仇华情绪，在朝鲜平壤、汉城、仁川等地掀起排华暴行，从 7 月 3 日至 9 日，杀害华侨 109 人，伤 160 余人。7 月 7 日，日本政府召开内阁会议，讨论万宝山事件和朝鲜排华问题，主张对中国采取强硬态度。7 月 15 日，日本驻沈阳总领事林久治郎往访坐镇沈阳的吉林省政府主席张作相，交涉万宝山事件，提出：一、保障万宝山韩人生命财产；二、赔偿万宝山事件损失；三、要求韩人在吉林的自由居住权；四、华方承认万宝山水田自来年种稻，日方官宪即退出现场。由于日方坚持无理要求，谈判陷于僵局。在这期间，又发生了"中村事件"。5 月，日本参谋本部派遣中村震太郎大尉等携带军用地图、测量仪器及枪支等物，冒充农业技师，非法潜入中国东北兴安岭地区进行军事侦察活动。5 月 25 日，中村等人经洮南返回途中，被驻防当地的中国东北兴安区屯垦军第三团抓获处死。由于采取"灭迹保密"，及至 7 月 23 日日本关东军才获得中村被杀的消息。8 月 11 日，日本外务大臣币原电令驻沈阳总领事"努力使中国方面坦率承认事实，进行交涉"。8 月 17 日，日本政府以陆军省名义歪曲事实，隐瞒真相，公布了中村等被杀情况，宣称"日本在满蒙特殊权益受到了中国的侵害，现处危险之中"，煽动武力解决问题。8 月 20 日，日本陆军大臣南次郎在内阁会议上提出，对"中村事件"，应由中国方面作出保证，将来不再发生类似事件，如果这一保证遭到破坏，即使使用武力也要让他们承认日本方面提出的要求。前日本关东军司令官白川义则、菱刈隆更明确主张，应利用"中村事件"的机会诉诸武力，一举解决各项悬案，确保日本的各项权益。9 月 18 日，日本又制造"柳条湖事件"，发动侵略中国东北的战争。当晚 10 时许，日本关东军岛本大队川岛中队河本末守中尉率部下数人，在沈阳北大营南约 800 米的柳条湖附近，将南满铁路一段路轨炸毁。日军在此布置了一个假现场，摆了 3 具身穿中国士兵服的尸体，反诬是中国军队破坏铁路。日军独立守备队第二大队即向中国东北军驻地北大营发动进攻。次日晨 4 时许，日军独立守备队第五大队由铁岭到达北大营加入战斗。5 时半，东北军第七旅退到沈阳东山嘴子，日军占领北大营。战斗中东北军伤亡 300 余人，日军伤亡 24 人。这就是震惊中外的九一八事变。国民党政府对日本的侵略采取不抵抗政策。事变发生前，蒋介石于 8 月 16 日致电张学良："无论日本军队此后如何在东北寻衅，我方应予不抵抗，力避冲突。"9 月 12 日，他在河北石家庄召见张学良时说："最近获得可靠情报，日军在东北马上要动手，我们的力量不足，不能打。我考虑到只有请国际联盟主持正义，和平解决。我这次和你会面，最主要的是要你严令东北全军，凡遇到日军进攻，一律不准抵抗。"事变发生后，国民党政府电告东北军："日军此举不过寻常寻衅性质，为免除事件扩大起见，绝对抱不抵抗主义。"当时，日本关东军只有 1 万多人，而中国东北军驻在东北的有 16.5 万人。东北军部队多次接受不准抵抗的训令，在日军突然袭击面前，除小部分违反蒋介石的命令奋起抵抗外，其余均不战而退。9 月 19 日上午 8 时，日军几乎未受到抵抗便将沈阳全城占领。东北军撤向锦州。全国最大的沈阳兵工厂和制炮厂连同 9.5 万余支步枪，2500 挺机关枪，650 余门大炮，2300 余门迫击炮，260 余架飞机，以及大批弹药、器械、物资等，全部落入日军之手。据统计，仅 9 月 18 日一夜之间，沈阳损失即达 18 亿元之多。此后，东北各地的中国军队继续执行蒋介石的不抵抗主义，使日军得以迅速占领辽宁、吉林、黑龙江 3 省。九一八事变是日本帝国主义长期以来推行对华侵略扩张政策的必然结果，也是它企图把中国变为其独占的殖民地而采取的严重步骤。此后，中日民族矛盾逐步上升到主要地位，使中国国内的阶级关系发生重大变动。在中国共产党的号召下，中国人民掀起了抗日救亡运动。

（陈绍畴）

湘鄂赣革命根据地的开辟

1931 年 9 月，彭德怀、滕代远、黄公略等在湖南、湖北、江西 3 省边界地区创建的革命根据地。

1928 年 7 月 22 日，平江起义后，成立了平江县工农兵苏维埃政府。起义部队组成工农红军第五军，彭德怀任军长，滕代远任党代表，共 2000 余人。8 月 20 日，彭德怀、滕代远率红五军主力撤出平江，向湖南浏阳、江西万载边界地区发展。黄公略率红五军第二纵队留在平江、浏阳一带，开展游击战争。9 月 17 日，中共湘鄂赣特委成立，滕代远任书记。12 月 11 日，彭德怀、滕代远等率领红五军主力向井冈山转移。之后，王首道任中共湘鄂赣边特委书记，领导湖南平江、浏阳、岳阳、湘阴和江西修水、铜鼓、万载、宜丰、宜春、武宁、湖北通城、通山等县工作。根据中共湖南省委的指示，湘鄂赣边区的地方武装组建为中国工农红军湘鄂赣边支队，黄公略任支队司令。1929

年7月和1930年3月，彭德怀、滕代远先后两次率红五军返回湘鄂赣边开展斗争。1930年6月，彭德怀、滕代远根据中央的命令，在湖北大冶将红五军（军长邓萍，政治委员张纯清）和红八军（军长何长工，政治委员邓乾元）组成红三军团，彭德怀任总指挥兼中共前委书记，滕代远任政治委员。7月，由湘鄂赣边独立师和一部分游击队组成的红十六军（军长孔荷宠，政治委员李楚屏），编入红三军团。8月23日，红三军团主力与红一军团合编为红一方面军。9月，红一方面军主力转移后，红十六军同地方武装继续坚持湘鄂赣边区的斗争。革命根据地扩展到湖南平江、浏阳、岳阳、湘阴，湖北通城、宗阳、大冶、阳新、黄柏，江西万载、修水、铜鼓、宜春、奉新、高安等20余县，人口达300万。1931年7月，中共湘鄂赣省委正式成立，李宗白任书记。9月，建立了湘鄂赣省苏维埃政府，赖汝樵任主席。1932年4月，湘鄂赣军区成立，孔荷宠任总指挥，林瑞笙任政治委员。由于王明“左”倾冒险主义的错误领导，在反对敌人第五次“围剿”的斗争中部队损失严重。1934年秋后，少数部队在陈寿昌、徐彦刚、傅秋涛等领导下，继续坚持游击战争。　（林健柏）

中央革命根据地的建立

1931年11月，在赣西南、闽西革命根据地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中央革命根据地，亦称中央苏区。

1927年10月到1928年3月，中共赣西特委、赣南特委和赖经邦、李文林、古柏等在赣西南地区领导发动吉安东固、万安、泰和、永丰、赣县（赣州）、大埠、信丰、雩都（于都）、寻邬（寻乌）、南康谭口和兴国崇贤等地农民武装起义，建立了江西工农革命军，开辟了东固、桥头等革命根据地，为赣西南革命根据地的形成奠定了基础。1928年9月，工农革命军第七、第九纵队组成红军独立第二团，李文林任团长兼党代表。1929年2月，工农革命军第十五、第十六纵队和兴国游击队组成红军独立第四团，段起风任团长，金万邦任党代表。5月，由红五军留在永新的一部及游击队合编为红军独立第五团，陈雷任团长。同年冬，吉安、延福地区第三纵队改编为红军独立第三团。这时赣西南地区的革命武装力量不断发展。1928年2月至7月，郭滴人、邓子恢、朱积垒、张鼎丞等在闽西地区发动平和、龙岩、后田、永定和上杭蛟洋等地武装起义，建立了工农革命军第七军第十九师，成立了永定溪南区苏维埃政府，为创建闽西革命根据地奠定了基础。1929年1月14日，毛泽东、朱德、陈毅等率领红四军主力由井冈山根据地开始向赣南进军。2月11日，红四军进抵瑞金与宁都交界的大柏地山区，歼灭尾追之敌刘士毅旅大部，俘敌800余人。随后北上东固，与红军独立二团、红军独立四团会师，在赣南站住了脚。3月中旬，红四军利用闽西敌军兵力空虚之机，第一次挥师入闽，在闽西地方党和邓子恢、张鼎丞等率领的革命武装配合下，首战长汀附近的长岭寨，击溃闽西地方军阀、福建省防军第二混成旅郭凤鸣部，击毙旅长郭凤鸣，进占长汀县城，建立了长汀县革命委员会。3月20日，红四军在长汀召开前委扩大会议，决定利用军阀混战之机，在赣西南、闽西放手发动群众，开展游击战争，建立红色政权。3月底，红四军由闽西回师赣南，进占瑞金、雩都（于都）、宁都、兴国等县，进一步打开了局面。4月初，红四军在瑞金同从井冈山转移到赣南的红五军主力会合。5月至10月间，红四军乘福建军阀部队主力去广东参加粤桂军阀战争的机会，先后两次进入闽西，在闽西工农武装的配合下，歼灭地方军阀陈国辉旅和卢新铭旅。1930年春，包括兴国、雩都（于都）、宁都、瑞金、安远、寻邬等县的赣西南根据地初步形成。同年1月，红军独立二、三、四、五团和永新、莲花、宁冈等县赤卫队合编为红六军，黄公略任军长，刘士奇任政治委员，共2000余人。2月6日至9日，毛泽东在吉安陂头主持召开红四军前委、红四、红五、红六军军委和赣西、湘赣边、赣南特委联席会议（即二七会议），决定将赣西、赣南、湘赣边3特委合并为中共赣西南特委，统一领导赣西南的斗争。3月22日至29日，在吉安富田召开中共赣西南第一次代表大会，选举产生了中共赣西南特委，刘士奇任书记。随后，成立了赣西南苏维埃政府，曾山任主席。与此同时，包括龙岩、永定、上杭、武平、长汀、连城等县的闽西革命根据地初步形成。3月18日至24日，在龙岩召开闽西第一次工农兵代表大会，宣布成立闽西工农苏维埃政府，邓子恢任主席。6月，赣西南、闽西地区的红四军（军长林彪，政治委员彭清泉）、红六军（军长黄公略，政治委员陈毅，7月改称红三军）、红十二军（军长伍中豪、政治委员谭震林）合编为红军第一军团，朱德任总指挥，毛泽东任政治委员。同年秋，红二十军（军长刘铁超、政治委员曾炳春）、红二十二军（军长陈毅，政治委员邱达三）也编入红一军团。8月23日，红一军团与彭德怀、滕代远领导的红三军团在湖南浏阳永和会合，编为红一方面军，朱德任总司令，毛泽东任总政治委员兼总前委书记，彭德怀任副总司令，全军共3万余人。1931年

1月15日，中共苏区中央局在江西小布成立，周恩来任书记(同年12月周恩来到任前，项英为代理书记)。9月，红一方面军粉碎敌人的第三次“围剿”后，赣西南、闽西革命根据地连成一片。11月7日至20日，中华苏维埃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江西瑞金召开，宣告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成立。大会通过了《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宪法大纲》等重要文件，并选举出中央政府执行委员会委员63名。11月25日组成以朱德为主席，王稼祥、彭德怀为副主席的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11月27日，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执行委员会第一次会议选举毛泽东为主席，项英、张国焘为副主席。至此，以瑞金为中心的中央革命根据地正式形成。中央革命根据地最大时辖有瑞金、会昌、寻邬、安远、信丰、雩都(于都)、兴国、宁都、广昌、石城、黎川、建宁、泰宁、宁化、清流、归化、龙岩、长汀、连城、上杭、永定等21个县，人口约250万。它对各地区的红军游击战争的发展和革命根据地的建设起了鼓舞和示范的作用。

(林健柏)

国民党政府推行“攘外必先安内”政策

1931年，国民党政府宣布把“攘外必先安内”政策作为处理对内对外关系的基本国策。

1930年，全国工农红军和革命根据地有很大的发展。九一八事变后，声势浩大的群众抗日运动高潮，冲击着国民党的反动统治。蒋介石把国内革命人民看作是“心腹之患”，决心用主要的力量来对付。1931年7月23日，蒋介石发表《告全国同胞书》，提出“攘外应先安内”的方针，声称“不先消灭共匪，恢复民族之气，则不能御侮”。11月30日，蒋介石在顾维钧就外交部部长职宣誓会上致训词时说：“攘外必先安内，统一方能御侮，未有国不能统一而能取胜于外者。故今日之对外，无论用军事方式解决，或用外交方式解决，皆非先求国内统一不能为功。”蒋介石认定“外患不足虑，内匪实为心腹之患”。因此，必须“先清内匪，再言抗日”。要解决外交问题，就先要解决内政问题。强调“安内是攘外的前提”。当前第一个责任“乃是剿匪来安内”；第二个责任“才是抗日来攘外”。1932年一二八事变后，蒋介石正式宣布“攘外必先安内”为国民党政府处理对内对外关系的基本国策。他所谓的“安内”，主要是消灭中国共产党，“围剿”工农红军，镇压抗日爱国力量，在其内部排除异己。他所谓的“攘外”，就是继续对日本帝国主义采取不抵抗主义，谋求妥协。国民党政府推行这个反动的基本国策，一面调集重兵向各革命根据地的红军发动大规模的军事“围剿”；一面对各革命根据地实行经济封锁，使根据地军民不能有一粒米、一撮盐、一勺水的补给，使之无法生存下去。与此同时，蒋介石采取各种措施强化反动国家机器，加强其军事和政治实力。1932年6月，蒋介石通令将国民党的军队统一编为48个军96个师，并通过聘请外国军事顾问、购买外国军火等来加强中央军。还在各地建立民团、保安团(队)等地方武装力量。接着，国民党政府军事委员会又颁行《剿匪区内各省民团整纪条例》、《各省保安制度改进大纲》、《保安团管区暂行条例》，统一地方武装的编制和指挥。到1934年6月，南方8省的民团扩大到1700万人。1933年7月，蒋介石在江西庐山创办“中国国民党赣粤闽湘鄂北路剿匪军军官训练团”，简称庐山军官训练团，蒋自任团长，对其嫡系部队的军官进行军事的和政治的训练，以便普遍推行构筑碉堡以及其他进攻红军的办法。着重以“恢复国家的灵魂”和“恢复军人的灵魂”为要旨，施行精神训练，要求军官做到“绝对信仰统帅和绝对服从命令”，“不成功便成仁”。蒋介石声称开办军官训练团“唯一的目的，就是要消灭赤匪，所以一切的设置，皆要以赤匪为对象”。1934年后，庐山军官训练团不仅训练蒋介石嫡系部队的军官，而且也调集各地方实力派的军官，借训练之名加以收买和控制。训练内容也由单纯的“剿匪”训练，扩充为整个的整军训练。此外，国民党政府还建立庞大的特务组织，推行保甲制度，强化法西斯统治，破坏中国共产党组织，绑架和暗杀共产党人及爱国民主人士，在全国造成严重的白色恐怖局面。

(陈绍畴)

宁都起义

1931年12月14日，国民党军队第二十六路军在赵博生、董振堂等领导下，在江西宁都起义。

1930年10月中原大战后，西北军冯玉祥所部第二方面军总指挥孙连仲率余部投靠蒋介石，被编为国民革命军第二十六路军。1931年春，该军奉调江西进攻红军，屡遭溃败。九一八事变后，该军广大官兵响应中国共产党的抗日号召，要求“回北方，打日本”。该军中共特别支部在中共中央的领导下，积极开展工作，发展了该军参谋长赵博生(1897—1933，河北黄骅人)为共产党员，争取该部第七十三旅旅长董振堂(1895—1937，河北新河人)、第七十四旅旅长季振同及团长黄中岳转向革命，准备起义。12月14日，赵博生、季振同命令：第七十四旅第二团接

替第一团担任守宁都城任务，第七十三旅学兵连、第七十四旅一团特务排、总指挥部特务营分别控制第二十五师师部电台、总指挥部电台和蒋介石的特务电台；宁都各要害部门及通往苏区的交通要道，由第七十三旅旅部参谋刘振亚派人看守；第七十四旅第一团一营包围第二十五师师部，第三营包围总指挥部。当天下午6时，赵博生以参谋长名义在第二十六路军总指挥部楼上"宴请"团以上军官，第七十四旅第一团部分人在楼下招待随同前来的护兵。席间，按照预定计划，收缴了军官们的枪支。赵博生发表讲话说：现在士兵痛苦到万分，为士兵计，我们应取革命行动，大家去当红军。在场的多数军官表示赞同，少数反动军官当场被捕。在赵博生、董振堂等领导下，第二十六路军1.7万多人起义。12月15日晨，起义部队集合在宁都城东南梅江河畔宝塔山下，开赴苏区。当晚，起义部队向全国广播起义宣言，宣告第二十六路军脱离国民党军队，加入中国工农红军，为工农的解放奋斗到底。12月16日，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和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授予起义部队中国工农红军第一方面军第五军团的番号。季振同任第五军团总指挥（后董振堂接任），董振堂任副总指挥（后赵博生接任），肖劲光任政治委员，赵博生任参谋长（后周子昆接任），刘伯坚任政治部主任。下辖3个军：第十三军军长董振堂（兼），政治委员邝朱权（后何长工接任）；第十四军军长赵博生（兼），政治委员黄火青；第十五军军长黄中岳，政治委员左权。宁都起义使红军增加了一支新的力量。　（陈绍畴）

国际联盟调查团来华

1932年3月，李顿率国际联盟调查团到中国调查日本侵略东北的活动。

国际联盟于1920年1月成立，先后参加的有60多个国家。它标榜以"促进国际合作，维护国际和平与安全"为目的，实际上日益成为帝国主义国家推行侵略政策的工具。九一八事变发生后，中国驻国联代表施肇基于9月21日致函国联，请求立即采取办法，制止日本的侵略。国联对日本侵略中国东北采取了纵容态度。9月22日，国联理事会讨论中国的声明，决议授权理事会主席勒乐对中日两国政府发出通牒，劝告双方避免事态扩大，停止一切冲突，立即协商撤兵。日本表面接受国联的决议，实际上仍继续扩大侵略战争。经过近3个月毫无结果的争论之后，国联于12月10日决议派调查团赴中国东北调查。在取得日本同意后，1932年1月21日调查团正式组成，以英国李顿（G. R. Lytton，1876—1947）为团长，成员有意大利马柯迪、法国亨利·克劳德、美国佛兰克洛斯·麦考益、德国恩利克·希尼。中国派前外交部部长顾维钧、日本派驻土耳其大使吉田参加调查团活动。2月3日，调查团由法国巴黎启程，先到东京，访问日本外相和陆相，于3月14日抵达上海。4月21日，调查团到东北后，首先同日本关东军司令官本庄繁商谈，后又与溥仪会晤。6月，调查团与国民党政府行政院院长汪精卫等会谈。7月，去东京与日本政府交换意见，然后再度来华，在北平起草报告书。9月5日，调查团离华。10月2日，《国际联盟调查团对于中日问题报告书》在日内瓦、东京、南京同时发表。报告书承认了若干基本事实，如承认东三省是中国的一部分，指出日本在九一八事变中的军事行动不能认为是合法的自卫手段，伪"满洲国"是日本人的工具等。但报告书用大量篇幅污辱中国人民，诬蔑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根据地是"赤匪蹂躏之区"，共产主义是中国的"祸源"。报告书认为，恢复九一八事变前的原状不能解决，维持"满洲国"也不能解决，适当解决的原则是：一、中国抑制难堪民族主义及抵货运动，日本不求单独解决；二、先须中国具有强有力的中央政府。报告书提出对中国东北实行"国际共管"的解决办法。这既反映了英、美与日本之间的矛盾，又暴露了欧美帝国主义在"国际合作"名义下共同控制中国东北的企图。10月5日，汪精卫对报告书发表感想，认为"依赖国联，并不错误"；"《报告书》之观察，明白、公允"。10月26日，国民党政府外交部电达驻国联首席代表颜惠庆，对报告书表示原则接受。1933年2月24日，国联大会以42票赞成，日本1票反对，通过了19国委员会起草的《国际联盟特别大会关于中日争议报告书的决议案》，基本上接受了李顿调查团报告书的意见。3月27日，日本政府宣布退出国联，表明其不顾国际反对，继续推行武装侵略中国的政策。　（陈绍畴）

一二八淞沪抗战

1932年1月28日，蒋光鼐、蔡廷锴指挥国民党军第十九路军在淞沪地区抗击日本侵略军的战役。

日本侵占东北后，又很快在上海发动武装侵略。1932年初，日本制造一系列事端，挑起军事冲突。1月18日，日本驻华公使馆驻上海武官田中隆吉勾结日本女特务川岛芳子（华名金璧辉）制造了所谓"日本和尚事件"。是日下午，住在江湾路妙发寺的日莲宗（日本佛教的一个支派）僧侣天崎启升等5人，行

至杨树浦区马玉山路三友实业社总厂时，在墙外向厂内正在操练的工人义勇军故意掷石寻衅，双方发生冲突。事后，日方声称有一受伤僧人死于医院，指使日本“上海青年同志会”会员纵火焚烧三友实业社。1月20日，又煽动日侨千余人集会，会后游行示威，无端滋扰，打毁商店多家。1月22日，日海军第一外遣舰队司令官兼驻沪特别陆战队司令官盐泽幸一少将为“日本和尚事件”，要求上海市政府解散抗日团体，取缔抗日运动，声称如不圆满答复，将采取严厉手段。随后，日本增派巡洋舰“大井”号、航空母舰“能登吕”号和第十五驱逐舰队驶抵上海，并调集日海军陆战队在浦东登陆布防。1月26日，日本驻沪总领事村井仓松向上海市政府提出4项要求：一、市长对总领事道歉；二、逮捕肇事者；三、赔偿医疗费用及抚慰金；四、取缔排日运动，解散上海抗日救国会及各种抗日团体。限48小时答复，否则，将采取相当手段，“以保护日本帝国之权利利益”。次日，村井仓松又向上海市长吴铁城提出最后通牒，声称“24小时不见满意答复，即采取自由行动”。1月28日下午4时许，吴铁城答复日本驻沪总领事，全部接受所提要求。晚11时10分，盐泽幸一发表声明：“帝国海军因担心有多数日侨居住的闸北一带的治安，特决定配备兵力负责维持。”要求中国当局撤退闸北驻军，撤除防御工事。10分钟后，日海军陆战队即分3路向闸北中国守军阵地发起进攻。一路由北四川路向淞沪线天通庵车站进袭；一路由虬江路向宝山路攻击；另一路由北四川路向宝兴路进攻。驻上海的国民党军第十九路军在全国人民抗日运动的影响下，在总指挥蒋光鼐（1887—1967，广东东莞人）、军长蔡廷锴（1892—1968，广东罗定人）的指挥下，奋起抵抗。战斗打响后，闸北守军第十九路军第七十八师第一五六旅首当其冲。在日军逼近前沿阵地时，旅长翁照垣一声令下，予日军以迎头痛击。两军在街道相连、楼房栉比的市区内激战。当日军铁甲车冲入宝兴路时，中国士兵冒死攀登房屋高处，投掷手榴弹，炸毁敌铁甲车数辆。至次日拂晓，守军打退日军多次进击。日军在飞机的掩护下，向北火车站中国守军阵地冲击。中国军队苦战1小时后退出北站。下午5时，第十九路军第一五六旅主力反击，将北站夺回，日军退至北四川路以东、靶子路以南地区。从2月2日起，日军连续3次进攻闸北，守军顽强战斗，坚守阵地。日军毫无进展，被迫于2月5日退回原进攻出发地。日军进攻闸北失败后，将原在上海和新增援的海军编成第三舰队，调野村吉三郎海军中将为司令官，代替盐泽幸一，并以植松炼磨少将为海军陆战队指挥官。同时，加派陆军第九师团和混成第二十四旅团增援上海作战。2月7日晨，日海军陆战队分两路向吴淞进攻。一路以铁甲车为先导，由杨树浦沿军工路进至张华浜；另一路以军舰和铁壳驳船由浦江至高桥沙渡，在张华浜粮米栈码头登陆。两路敌人会合后，即向蕴藻浜车站进攻。敌军舰10余艘也先后集中吴淞附近。第十九路军第七十八师第一五六旅第四团英勇抵抗，至中午，将敌击退。2月12日上午，日军混成第二十四旅团为在蕴藻浜北岸夺取进攻吴淞的支撑点，令步兵第十四联队第二大队经纪家桥附近占领沈家宅，并令工兵中队在永安纱织厂附近架桥，以备步兵通过。中国守军发现敌偷渡企图后，即将架桥之敌击退。当晚，日军利用夜暗在纪家桥附近架桥成功。次日拂晓，敌强渡蕴藻浜，在曹家桥附近突破守军防线。第十九路军急调第六十师第一二二旅增援，将渡河之敌包围，双方展开肉搏战。被围之敌在步兵第二十四联队第一大队接应下拚力突围数次，均未得逞，大部被中国军队歼灭。2月14日，植田谦吉率日军第九师团抵上海，继任侵沪日军司令官。2月18日，植田谦吉向第十九路军发出最后通牒，提出6项无理要求，要中国军队立即停止战斗行为，于2月20日午前7时以前，将现据之第一线撤退完了。同时撤除炮台及其他军事设施。第十九路军当即召开高级军官会议。指挥部命令前线部队炮击日军阵地，作为对敌最后通牒的答复。这时，国民党中央军第五军军长张治中率第八十七师、第八十八师、中央军校教导总队和一个山炮营到上海，与第十九路军共同作战，归蒋光鼐统一指挥。蒋光鼐以张治中为左翼军指挥官，接替由江湾北端经庙行镇沿蕴藻浜至吴淞西端之线第十九路军防务；以蔡廷锴为右翼指挥官，指挥第十九路军担负由南市、龙华、北新泾、真茹亘闸北、江湾之线的防务。日军不等中国方面答复，即于2月19日下午4时下达进攻命令，除以一部兵力监视吴淞炮台外，主力攻击庙行、江湾一线，企图将中国守军消灭在苏州河以北地区。第十九路军将领通电誓以铁血答复日牒，抵抗到底。2月20日晨，集结在赵家浜附近的日军混成第二十四旅团在飞机、重炮支援下，向庙行镇方向攻击前进。中国守军第八十八师奋起迎击。至午后4时，日军仍停留在中心巷、金家宅、孟家宅等地区不得前进。日军第九师团右翼队和中央队在坦克、炮兵掩护下，进击江湾镇。第十九路军各师沉着应战。激战3昼夜，日军伤亡惨重。植田谦吉电请东京再增兵，并

调整部署。2月22日拂晓，日军突入庙行镇东端中国军队阵地及麦家宅一带。守军第八十八师将其全部预备队投入战斗，仍未击退敌军，且伤亡很大，呈全线不支状态。蔡廷锴当即指挥第十九路军由江湾至蕴藻浜全线反击。第六十一师一部由江湾西北小场庙、竹园墩向敌侧击，进占赵家宅、孟家宅。第八十七师第二六一旅南渡蕴藻浜，先后攻占北孙宅、陆家桥、南孙宅，与第六十一师部队相连接。第八十七师第二五九旅加入庙行正面战线后即与第八十八师实施反冲击。进攻庙行之敌陷入中国军队包围之中。这时，日军第九师团急令步兵第七联队及吴淞支队一部增援。是日黄昏，双方展开白刃格斗，战斗之惨烈为开战以来仅见。日军突围时，一小部被中国军队消灭在金穆宅、麦家宅一带。与此同时，日军对江湾中国军队阵地也发起攻击。守军在八字桥展开英勇的阻击战，打退了敌人的进攻。

淞沪抗战得到上海和全国人民的有力支持。一二八事变发生的第二天，中华全国总工会发表宣言，号召工人和一切民众武装起来，实行决死抵抗，并举行总同盟罢工，反对日本帝国主义占领上海。1932年1月30日，上海日厂工人举行罢工，组织上海各界民众反日救国会，支援中国军队抗战。上海工人、学生、妇女、退伍军人等纷纷组成义勇军、敢死队、救护队、运输队，或直接参战，或开展战地服务工作，救护伤员，运送弹药，递送情报。据不完全统计，在第十九路军中参加战勤工作的义勇军达2万余人。上海各界民众积极参加支援前线的各种工作。兵工厂工人日夜赶制军火，供应前线。中国守军急需大批手榴弹时，上海总工会即募集了数万只空烟罐，赶制成土炸弹运往前线使用。2月初，日军飞机、舰炮轰击吴淞要塞，上海工人送去数百块大钢板，供守军构筑掩蔽部。同时，上海和各地民众广泛开展捐献运动。在淞沪抗战期间，海内外同胞捐给第十九路军的款项达700余万元。在战斗中涌现了许多可歌可泣的英雄事迹。胡阿毛烈士即是其中一例。2月26日下午，司机胡阿毛到虹口百老汇路探亲访友，行至中虹桥附近时，被日军搜出驾驶执照，被拘禁于汇山码头日军司令部。次日晨，日军逼令他驾驶满载弹药的卡车去公大纱厂。在4名日兵监押下，他开足马力急驶到公大纱厂附近时，车头一转，连人带车坠入黄浦江中，为国捐躯。由于上海和全国人民的支援，中国军队在劣势装备的条件下，与优势的日军坚持了一个多月的作战，迫使敌人3易主帅，数度增兵，损伤1万余人却无法实现其速战速决的迷梦。2月29日，日本增调第十一、第十四两师团到上海，派白川义则大将接任侵沪日军司令官。至此，在沪日军达10万人。3月1日，日军对淞沪地区发起全线攻击，第十一师团在七丫口强行登陆，进占茜泾、浏河镇，第九师团进抵大场。由于蒋介石国民党政府屈服于日本的压力，破坏淞沪抗战，中国守军兵力不敷分配，在腹背受敌的严重情况下，不得不放弃庙行、江湾、闸北阵地，撤退到昆山至福山一线。3月3日，淞沪地区全被日军侵占。　（陈绍畴）

日军侵占东北三省

九一八事变后，日军继续扩大侵略，至1932年2月初占领中国东北辽宁、吉林、黑龙江三省。

日本关东军占领沈阳后，按预定计划继续向辽宁、吉林、黑龙江进攻。日军第三旅团进攻长春附近的中国东北军。当时驻长春的东北军第二十二旅除留一个营于二道沟外，其余全部避往双阳县境内。9月19日晨，日军向宽城子进击。东北军第六六三团第二营坚守兵营顽强抵抗，营长重伤后牺牲，部队一部分撤出防地，一部分被日军缴械。上午11时，日军占领宽城子、二道沟。与此同时，驻守南岭的东北军第五十团和炮兵团与日军展开激战。守军坚持至下午2时许撤退。日军在公主岭解除了国民党治安部队的武装。午后，日军进占长春。同日，日军占领了辽宁营口、辽阳、鞍山、本溪、抚顺和吉林四平、安东（丹东）等20座城市，控制了南满铁路沿线。9月21日，日军借口保护日侨，令第二师团主力进犯吉林省省城吉林市。国民党吉林省政府代理主席、吉林边防署司令熙洽叛国投敌，日军占领吉林。驻朝鲜的日军混成第三十九旅团也越过鸭绿江侵入中国东北，分向辽宁、吉林出击。至9月25日，日军占领了辽宁、吉林两省的30座城市，完全或部分地控制了12条铁路线。从10月中旬起，日伪军发动对黑龙江的进攻。10月15日，叛国投敌的原洮南镇守使张海鹏率伪军3个团在日军独立飞行队第八中队支援下进入泰来。次日拂晓，向嫩江桥进攻。中国守军将伪军击溃，张海鹏败退洮南。为阻止敌军再犯，守军将嫩江桥破坏3孔。日军以中国军队破坏嫩江桥损害了日本铁路权益为借口，向黑龙江省当局提出由“满铁”修理江桥的要求，遭拒绝。接着，日本关东军代表要求黑龙江省当局于11月3日前将江桥修复，否则，日方以实力掩护自行修理。11月3日，日军向中国守军阵地发起攻击。国民党黑龙江省政府代理主席马占山率部奋勇自卫，战斗至11月6日，因伤亡过重，放

弃江桥阵地。11月19日，日军占领黑龙江省首府龙江(齐齐哈尔)。马占山率省政府退至克山。接着，日军越过中东路开始向大兴安岭及巴尔虎各旗推进，侵占黑龙江大部分地区。之后，日军即将作战方向指向锦州，袭取辽西地区。当时，东北军骑兵第三旅、步兵第十二旅、第二十旅沿大凌河布防。12月28日，日军进攻锦州。由于国民党政府与日本于12月初达成协议，划定锦州为中立区，命令驻辽西的东北军撤入山海关内，仅留公安骑兵3个总队分驻锦州和大凌河南岸地区。1932年1月2日，日军强渡大凌河，中国守军稍事抵抗后即撤入锦州城内。次日，日军未发一弹进占锦州。东北军政当局逃向关内，日军迅速占领辽西地区。至此，辽宁全省为日军侵占。接着，日军将进攻方向转移北满，夺取哈尔滨。当时，哈尔滨是东三省特别行政区官署所在地，为北满的政治、经济中心。1月27日，熙洽伪军冯占海部侵入哈尔滨，遭到中东路护路军司令丁超部抗击。次日，日军进犯哈尔滨，在双城堡受到预先埋伏的东北军第二十二旅的袭击。2月2日，中国守军在日军飞机、大炮、坦克的猛烈攻击下，伤亡惨重。2月5日，守军不支，全线撤退，哈尔滨被日军占领。至此，东北三省全部沦陷。　　　　　　　　　　　　　　　　(陈绍畴)

伪"满洲国"成立

1932年3月1日，日本帝国主义在中国东北制造的傀儡政权。

1931年9月22日，日本关东军参谋部炮制了《满蒙问题解决方案》，策划建立一个由日本支持、领土包括中国东北及蒙古的"新国家"。11月，日本把清朝末代皇帝爱新觉罗·溥仪(1906—1967)从天津挟持到东北。接着，在东北各省拼凑地方伪政权。1932年1月6日，日本陆军省、海军省和外务省制订《中国问题处理方针纲要》，规定东北要从中国主权下分离出来成为一个"国家"，它的政治、经济、国防、交通、通讯等受日本的控制，并决定将各省伪政权"联省合并"，相机建立"新的统一政权"。2月，关东军在沈阳召开"建国会议"，成立了"东北行政委员会"，以汉奸张景惠为委员长，宣称与国民党政府脱离关系，"东北省区完全独立"。同时，日伪在各地开展"促进建国运动"，加速推进制造伪国工作。2月29日，"全满建国促进运动大会"通过决议，选出代表，"敦请"溥仪出任伪国"元首"。3月1日，日本以伪"满洲国"政府名义，发表"建国宣言"，宣布"满洲国"成立。3月9日，溥仪粉墨登场，就任"执政"，年号大同，以长春为"首都"，改称"新京"。张景惠为参议府议长兼北满特别行政区长官，赵欣伯为立法院院长，于冲汉为监察院院长，林启为最高法院院长。3月10日，溥仪按照日本关东军的旨意，任命郑孝胥为伪国务总理，日本人驹井德三任伪国务院总务厅总务长官，总揽伪政府的一切大权，各部次长均由日本人充任。3月12日，伪政府外交部总长谢介石向英、美、法、意、日等17国发出宣言，要求各国承认伪"满洲国"。英、美等国未予置理。8月8日，日本天皇任命武藤信义大将为日本关东军司令官兼驻伪"满洲国"特命全权大使、关东长官，事实上他成为伪"满洲国"的太上皇。9月15日，武藤信义和郑孝胥在长春签订《日满议定书》，确认日本在伪"满洲国"所享有的一切权益，日本军队应驻扎于伪"满洲国"内。9月16日，日本政府发表声明，正式承认伪"满洲国"。同日，国民党政府发表《为日本承认"满洲国"致日本抗议书》，并照会"九国公约"签字国，请各当事国对日本的侵略行动采取正当及有效的应付方法。1934年3月1日，伪"满洲国"改称"满洲帝国"，溥仪改称"皇帝"，年号康德。日本帝国主义及其卵翼下的伪"满洲国"，对中国东北实行军事占领和殖民统治。1945年8月，随着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的胜利，伪"满洲国"被摧毁。　　　　　　　　　　　　　　　　(陈绍畴)

《淞沪停战协定》签订

1932年5月5日，国民党政府与日本签订关于上海停战的丧权辱国的协定。

在1932年淞沪抗战中，国民党政府在军事上阻挠和破坏第十九路军对日作战的同时，在政治上采取依靠国际联盟和英、美、法等国调停的妥协政策。2月13日，国民党政府行政院院长汪精卫发表谈话，称一面抵抗，一面交涉。蒋介石指示第十九路军"保持十余日的胜利，及早收束，避免再战为主"。并派军政部次长陈仪等为代表，去上海与日、美、英领事磋商和谈。2月28日，英国驻沪东方舰队司令凯累出面斡旋，中国代表顾维钧、第十九路军参谋长黄强与日本代表、第三舰队司令官野村吉三郎、松冈洋右在英舰"坎特"号上非正式会晤。谈无结果。3月4日，国联大会决议，要求中、日实行停战。3月14日，经英国驻华公使兰普森斡旋，中日双方停止军事行动，国民党政府外交部次长郭泰祺和日本驻华公使重光葵作非正式会见，英、美、法、意4国公使列席，讨论停战协定草案意见。从3月24日开始，中、日正式举行停战谈判。中国首席代表郭泰祺、军事代表戴戟

(淞沪警备司令)、黄强等 7 人;日方首席代表重光葵、军事代表植田谦吉(第九师团师团长)、田代皖一郎(上海派遣军参谋长)、岛田繁太郎(海军参谋长)等 9 人。英国驻华公使兰普森、美国驻华公使詹森、法国驻华公使韦礼德、意大利驻华代办齐亚诺列席。经过多次谈判,于 5 月 5 日正式签署《上海停战及日方撤军协定》,简称《淞沪停战协定》。其主要内容是:一、中日双方自 1932 年 5 月 5 日起确定停战。双方军队尽其力之所及,在上海周围停止一切及各种敌对行为。二、中国军队在本协定所涉及区域内的常态恢复,未经决定办法以前,留驻其现在地位。三、日本军队撤退至公共租界及虹口方面的越界筑路,一如 1932 年 1 月 28 日事变之前。四、为证明双方之撤退起见,设立共同委员会,列入与会友邦代表为委员。该委员会并协助布置撤退的日本军队与接管的中国警察间移交事宜,以便日本军队撤退时,中国警察立即接管。五、本协定自签字之日起发生效力。除协定正文外,还有中国政府取缔抗日、第十九路军换防及浦东、苏州河南中国不得驻兵等 3 项"谅解"。依照这一协定及其附件,中国军队只能留驻在昆山、苏州一带,不能进驻上海及其周围地区,而日军却可以继续留驻上海。这个丧权辱国的协定的签订,遭到上海和全国人民的强烈反对。5 月 6 日,上海各民众团体联合会等群众组织通电抗议,指责国民党政府丧权辱国。5 月 9 日,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发表《反对国民党出卖淞沪协定通电》,号召全国人民以民族革命战争驱逐日本帝国主义出中国。

(陈绍畴)

国民党政府推行保甲制度

1932 年 8 月,国民党政府开始实行的法西斯统治的基层政治制度。

保甲制度曾是中国历代封建统治者统治人民的工具。辛亥革命后,这个制度一度松弛。蒋介石为强化其专制独裁统治,又重新推行这一制度。1929 年 9 月 13 日,蒋介石致电各省政府主席,限期 3 个月至多半年办理保甲,清查户口,声称欲绝"匪"之根株不在用兵,宜由举办保甲、清查户口入手。1931 年 1 月 27 日,蒋介石电令湖南、湖北、江西 3 省厉行保甲制。3 月 29 日,国民党政府行政院严令湖南、湖北、安徽、河南、江西、浙江、福建等 7 省于 8 月 1 日前完成民团及保甲组织。6 月,国民党"剿匪"总司令部党政委员会地方自卫处草拟保甲制度法规,在江西修水等 43 县试行。1932 年 8 月 1 日,国民党豫鄂皖 3 省"剿匪"总司令部颁布《"剿匪"区内各县编查保甲户口条例》,开始在革命根据地周围地区建立保甲组织。后经国民党中央政治会议议决,由行政院通令,从 1934 年 11 月 7 日起全国一律推行保甲制度。保甲的编组,以户为单位,户设户长;10 户为甲,设甲长;10 甲为保,设保长。保甲长的人选,形式上为保甲内公推,实际上是在地方政府庇护下,多为豪绅、地主或与当权者有联系的人充任。保长是在区长的指挥监督下负责维持保内安宁秩序,其职责是:一、辅助区长执行职务;二、监督甲长执行职务;三、教诫保内住户毋为非法;四、辅助军警搜捕"匪犯";五、对曾参加"反动"或曾受"赤匪"胁从现已邀准悔过自新者进行察看管束;六、处罚违犯保甲规约者;七、分配督率保内应办防御工事设备或建筑事项等。甲长是在保长的指挥监督下负责维持甲内安宁秩序,其职责是:一、辅助保长执行职务;二、清查甲内户口,编制门牌、取具联保连坐切结;三、检查甲内奸宄及稽查出境入境人员;四、辅助军警及保甲搜捕"匪犯";五、教诫甲内住民毋为非法等。保甲组织依据"管、教、养、卫"的原则进行活动。保甲编定后,要求制订保甲规约,编制门牌,编查户口,实行联保连坐,各户户长应联合甲内他户户长至少 5 人共具联保连坐切结,声明结内各户互相劝勉监视,绝无"通匪"或"纵匪"情事,如有违犯者,他户应即密报惩办,倘瞻徇隐匿,各户愿负连坐之责。保甲长不仅向居民进行党化教育,灌输反动思想,而且向居民摊派保甲费及苛捐杂税,勒令承担修筑碉楼工事等义务。同时,强行抽选壮丁,编练民团,搜捕革命者,镇压无辜百姓。保甲制度的推行,强化了国民党政府对城乡的控制和统治。

(陈绍畴)

中国民权保障同盟成立

1932 年 12 月 18 日,宋庆龄、蔡元培、杨杏佛等在上海发起组织的进步政治团体。

宋庆龄(1893—1981),广东文昌人。蔡元培(1868—1940),字鹤卿,号孑民,浙江绍兴人。杨杏佛(1893—1933),名铨,江西清江人。1932 年 12 月 18 日,宋庆龄、蔡元培、杨杏佛、黎照寰、林语堂等在上海发起成立的中国民权保障同盟筹备委员会发表宣言,提出其任务是:一、为国内政治犯的释放与非法的拘禁、酷刑及杀戮的废除而奋斗,并首先致力于大多数无名与不为社会注意的狱囚;二、予国内政治犯以法律及其他的援助,并调查监狱状况,刊布关于国内压迫民权的事实,以唤起社会的公意;三、为争取

结社集会自由、言论自由、出版自由诸民权而奋斗。中国民权保障同盟总会设在上海，最高执行机关是临时全国执行委员会，主席为宋庆龄，副主席为蔡元培，总干事为杨杏佛。国内各重要城市设分会。1933年1月17日，上海分会成立，推举宋庆龄、蔡元培、杨杏佛、林语堂、伊罗生、邹韬奋、陈彬龢、胡愈之、鲁迅等9人为执行委员。接着成立了北平分会，并筹备在汉口、广州等城市成立分会。4月26日，临时全国执行委员会通过了《中国民权保障同盟章程》，规定“同盟以唤起民众努力于民权之保障为宗旨”。中国民权保障同盟成立后，积极开展反蒋抗日和各种保障民权的活动。它与上海20多个进步的群众团体组织了国民御侮自救会，号召团结抗日，反对妥协投降，要求国民党政府立刻派军队开赴东北、华北抗日；立刻武装民众；保障民权，要求政治自由，立刻释放一切政治犯等。同盟成立了由宋庆龄等7人组成的营救政治犯委员会，进行营救被捕的爱国革命人士的活动。为营救被捕的共产党员罗登贤、廖承志、陈赓等，宋庆龄通过外国报纸发表声明，号召广大人民为保护被捕的革命者起来斗争。同盟要求释放在北平被非法拘捕的许德珩等进步师生，抗议国民党政府杀害左翼作家应修人，并通过各种途径营救进步作家潘梓年、丁玲。宋庆龄等往南京监狱探望泛太平洋产业同盟秘书牛兰夫妇，要求国民党政府立即释放他们。同盟还举行记者招待会和发布消息，揭露和抨击国民党政府蹂躏民权、捕杀革命人士的法西斯恐怖统治。1933年5月24日，宋庆龄在国民御侮自救会筹备大会上发表演说，号召团结全国抗日力量，反对国民党的妥协投降政策。要求国民党政府派遣军队并组织义勇军抵抗日本侵略，立即恢复人民的民主自由权利，停止向中国苏维埃区域进攻。国民党政府对中国民权保障同盟进行破坏和迫害，并对其领导成员进行人身攻击或投书恐吓。1933年6月18日，蒋介石指派特务暗杀了杨杏佛。中国民权保障同盟原拟在各重要城市普遍成立分会后，召开全国代表大会选举产生全国委员会。因杨杏佛被暗杀，同盟被迫停止活动，此计划未能实现。中国民权保障同盟的活动，配合了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民主运动，起了积极的作用。　（陈绍畴）

闽浙赣革命根据地的开辟

1932年底，方志敏、邵式平、黄道等领导在福建、浙江、江西3省边界地区建立的革命根据地。

1928年1月，方志敏（1899—1935）、邵式平、黄道等在赣东北弋阳、横峰一带发动和领导农民举行武装起义。随后成立了中心县委和游击队。5月，召开了弋阳县第一次工农代表大会，建立了弋阳工农民主政府。接着，又成立横峰苏维埃政府。由于遭到优势的国民党军阀部队的进攻，起义武装转移到弋阳、横峰北部丁山（磨盘山）地区，发动农民群众，建立红军，开展游击战争。到1929年下半年，红军粉碎了敌人多次的“进剿”，赣东北弋阳、横峰、德兴的大部分地区和上饶西北的部分地区成为较巩固的根据地，并同新开辟的贵溪、余江、万年等县的红色区域连成一片。10月1日至3日，在弋阳漆工镇湖塘村召开赣东北信江工农兵第一次代表大会，产生了以方志敏为主席的信江苏维埃政府，并颁布临时土地法及其他各项法令，开展“废债分田”的土地革命。广大农民没收豪绅地主和封建祠堂的土地，焚烧剥削农民的契约。1929年底，中共赣东北特委成立，唐在刚任书记。在这之前，1928年10月，中国共产党在闽北崇安领导农民举行武装起义。1929年4月，成立了闽北红军独立团。同年底，在游击战争的基础上，形成了崇安、浦城、铅山等数块小范围的武装割据。1930年初，利用军阀混战的时机，红色区域逐步连成一片。5月1日，建立了崇安县苏维埃政府。7月，根据中共中央的指示，江西红军独立一团扩编为工农红军第十军，周建屏任军长，胡庭铨代理政治委员兼中共前委书记，全军共约6000人。8月1日，赣东北革命委员会成立，方志敏为主席。9月，红十军在乐平进行整编，扩编为3个旅。周建屏任军长，邵式平任政治委员。赣东北根据地逐步扩大到闽浙赣3省。1932年12月，中共赣东北省委改为闽浙赣省委，并成立闽浙赣军区总指挥部，唐在刚任总指挥，曾洪易任政治委员。至此，闽浙赣革命根据地包括福建崇安、浙江开化、江西横峰、弋阳等20多个县，拥有100万人口，红军发展到1万余人。（林健柏）

长城抗战

1933年3月开始，中国军队在喜峰口、古北口、冷口一带长城线上抗击日本侵略军的战役。

1933年1月1日，日军在山海关制造事端，炮击临榆县城。中国守军还击，揭开了长城抗战的序幕。1月3日，山海关沦陷。日军开始把军事侵略的矛头指向华北，并加紧部署进攻热河。2月10日，日本关东军司令官武藤信义召集各兵团主任参谋会议，布置热河作战要旨。2月21日，日本关东军第六、第七、第八、第十二4个师团主力，纠合伪军张海

鹏部共10多万人，分3路进犯热河。北路由通辽攻开鲁；中路由义县攻朝阳；南路由绥中攻凌源。守凌源的万福麟部于兆麟师一度抵抗后，因腹背受敌，退守长城线上军事要塞喜峰口。3月4日，国民党热河省政府主席汤玉麟弃地逃走，日军骑兵128人乘虚进占热河省会承德。3月上旬，日军攻占热河北部赤峰、围场、全宁（乌丹）等地，热河全省沦陷。全国舆论一致谴责张学良，要求惩办汤玉麟。蒋介石决定让张学良辞职，由军政部部长何应钦兼代北平军分会委员长。日军占领热河后，即南下向长城各口推进。何应钦执行国民党政府一面抵抗、一面交涉的政策，沿长城线布防，企图阻止日军进攻。以第二十九军宋哲元（1885—1940，山东东陵人）所部担任冷口（不含）经董家口、喜峰口、罗文峪至马兰峪之间的防务；以第十七军徐庭瑶所部在古北口至南天门一线驻防；以第三十二军商震所部担任由董家口（不含）经冷口到刘家口、义院口方面的防务；调由长城线后撤的东北军担任北宁线天津以东及冷口以东的防务；并调晋军傅作义所部担任独石口方面的防务。中国军队调整之际，日军已发动对长城各口的进攻。在全国抗日热潮的推动下，中国守军奋起抵抗。

喜峰口—罗文峪战斗。3月9日下午，日军服部、铃木两旅团的联合先遣队进抵河北遵化东北50多公里的喜峰口，即向东北军万福麟部进攻。傍晚，侵占北侧长城线及喜峰口以东的董家口等阵地。中国守军第二十九军军长宋哲元指挥该军英勇抗击。第三十七师冯治安部旅长赵登禹，奉命派王长海团为先锋，急行军增援喜峰口。王长海组成500人的大刀队，乘夜分两路潜入敌阵，趁日军酣睡，用大刀砍杀，暂时稳定了战局。3月10日，日军服部旅团长令步兵第二十六、第二十七联队一部增援喜峰口，由董家口、铁门关等处发起进攻。赵登禹即率部前往堵截敌人，宋哲元令第三十七师王治邦、佟泽光两旅分左右两翼支援，与敌展开激烈战斗。日军以一部确保喜峰口关口，将主力集中在长城北侧地区待机。3月11日夜，第二十九军采取迂回夜袭战术，分左右两路向敌出击。赵登禹带伤率两个团从左翼出潘家口，绕至敌右侧背，攻击其喜峰口西侧高地。官兵们身携手榴弹，手提大刀，在夜暗中踏雪前进，于次日拂晓前进至日军三家子、小喜峰口、狼洞子、白台子等阵地。敌人在睡梦中未及还击，纷纷被砍杀。佟泽光率两个团从右翼经铁门关出董家口，绕至敌左侧背，攻击喜峰口东侧高地之敌。王治邦旅在第一线固守，俟左右两路出击得手后，即行出击。3月12日，驻喜峰口外老婆山的日军赶来增援。双方激战，伤亡均重。3月13日，日军再攻喜峰口，迄未得逞，渐次后撤到遵化以北25公里的半壁山。3月14日，宋哲元部收复老婆山。此役，第二十九军虏获敌坦克11辆，装甲车6辆，步枪6000多支，俘敌万余。日本报纸不得不承认喜峰口战斗丧尽了“皇军名誉”，遭受了“60年来未有之侮辱”。中国军队重创日军，使全国人心为之一振。天津《大公报》称喜峰口抗战“竟能使骄妄气盛之日军受偌大打击，此诚足为中国军人吐气”。日军在喜峰口受挫后，于3月16日沿半壁山向遵化以北9公里的罗文峪进攻。被第二十九军刘汝明部击退。3月17日，日军三四千人又向罗文峪、沙石口一带进攻，并以飞机20多架助战。刘汝明部奋起抵抗，反复争夺阵地10多次。当晚，刘部从两翼夹击日军，营长王合春率部抄到敌后，重创日军。王合春阵亡，全营生还者仅70多人。敌向莺手营方向退去。3月18日晨，日军再次猛攻罗文峪。守军依托城墙、碉楼顽强抵抗。刘汝明师长亲率手枪队督战。激战至天黑，将敌击退。此时，李金田旅长率一个团由沙宝峪绕攻敌之侧背，另一个团由左翼绕攻敌之后方，正面守军也全线出击。次日拂晓，敌除以一部配置在龙王庙警戒外，主力调回承德。罗文峪战斗后，第二十九军在整个防御线上与敌形成对峙状态。

古北口—南天门战斗。古北口是由承德到北平（北京）最近的关口古道，为北平、天津的门户。日军占领承德后，追击向古北口溃退的东北军第一〇七师王以哲部。王部在古北口外与日军激战。3月10日，中央军第十七军第二十五师关麟征部抵古北口接防，即以杜聿明旅占领古北口南城东西两侧高地，张耀明旅集结在黄道甸附近。另以原在古北口防守的东北军第一一二师一个团在第一线阵地防守。3月11日拂晓，日军第八师团川原旅团向守军阵地发起总攻。第一一二师不战而退。日军迅速占领古北口关口，并向第二十五师右翼龙儿峪阵地包围攻击。第二十五师师长关麟征指挥张耀明旅主力支援被围部队，出古北口东关不远与敌遭遇，双方短兵相接。关麟征负伤后仍继续指挥战斗，将敌击退。3月12日，日军增兵进攻古北口，以主力对守军阵地右翼延伸包围。战况异常激烈。守军连续击退敌3次攻击。午后，日军迂回到古北口东关附近。守军第二十五师各部通讯联络中断，形成各自为战。部队遭受重大伤亡，全线退至蓟县西北的南天门及其左右阵地守备。第一四五团一部远离主力，未及撤退，继续抵抗，毙伤日军百余名。3月13日，第二十五师撤至密云整

补，防务由第二师黄杰部接替。至4月中旬，日军未敢轻易冒进。中国守军充分利用作战间隙，加强阵地构筑。4月21日，日军第十六旅团主力攻南天门3个望楼高地，一部攻南天门两侧高地，经苦战，侵占八道楼子。守军虽两次反击无效，但仍坚守南天门等处。至4月25日，第二师连续作战5昼夜，伤亡甚大，疲劳已极。敌继续以炮火轰击，终日未止。当晚，由第八十三师刘戡部接替南天门防务。第八十三师与敌激战至4月28日，直至高地全化为焦土，才放弃中央据点高地南撤。日军占领南天门。此役，日军死80人，伤236人。

冷口战斗。3月16日，日军混成第三十三旅团进攻长城东部要隘界岭口。中国守军第四军团独立第十六旅缪澂流部稍事抵抗即后撤。3月21日，日军占领义院口。3月22日，日军第六师团进攻迁安西北的冷口。守军第三十二军第一三九师黄光华部奋勇抵抗。日军不支，退保肖家营子。3月24日，冷口日军分路进攻山神庙、马家沟一带。4月1日，占领义院口以南的石门寨。4月9日晚，日军第六师团主力攻击守军第一三九师第七一五团阵地，均被击退。嗣后，日军以飞机、大炮配合，猛攻守军山顶工事，同时以骑兵向守军阵地侧翼迂回。第七一五团被迫撤出前进阵地。接着，日军突破守军第一三九师第七一七团左翼阵地，占领冷口左侧高地。此时，右侧刘家口方面补充团与敌战斗激烈，请求增援。第一三九师全线向兰若院方向退却。4月11日起，日军3万人连日猛攻冷口。商震部伤亡甚重，放弃冷口，沿建昌营、迁安向滦河右岸撤退。日军侵占冷口及其附近刘家口、白羊峪。迁安失陷后，宋哲元部在喜峰口腹背受敌，奉令撤至通县以东沿运河布防。

长城抗战给骄横的日本侵略军以沉重打击。由于国民党政府坚持"攘外必先安内"的政策，长城守军得不到有力的支援，奋战两个多月，被迫撤离长城各口。日军进占长城各口后，南进密云、怀柔等地，守军第三十五军傅作义部英勇抵抗。5月12日，日军渡滦河西进，突破中国军队第五十七军何柱国、第六十七军王以哲等部阵地，先后占领河北丰润、遵化、玉田、平谷、蓟县、三河等县，直逼北平、天津。长城抗战以签订卖国的《塘沽协定》告终。　（陈绍畴）

川陕革命根据地的开辟

1933年2月，徐向前、陈昌浩等领导在四川、陕西边界地区创建的革命根据地。

1932年6月，蒋介石对鄂豫皖革命根据地发动了第四次"围剿"。10月，红四方面军主力在总指挥徐向前的指挥下，自鄂豫皖根据地越过平汉路向西转移。12月中旬，趁四川刘湘和刘文辉两大军阀混战、川北敌军守备空虚之机，越过巴山，进入川北。12月25日，攻占四川通江。12月29日，成立了以邝继勋为主席的川陕省临时革命委员会。1933年1月23日和2月1日，红四方面军先后解放巴中、南江，为建立川陕革命根据地奠定了基础。2月7日，在通江召开中共川陕省第一次代表大会，选举产生了以袁克服为书记的中共川陕省委员会。2月17日，又在通江举行川陕省第一次工农兵代表大会，成立了川陕省苏维埃政府，选举熊国炳为主席。至此，川陕边革命根据地初步形成。随后，川陕省苏维埃政府颁布《关于土地改革的布告》，开展土地革命，没收地主阶级的土地，分配给贫苦的农民。同时，建立各级共产党组织和苏维埃政权。2月中旬，川陕边"剿匪"督办田颂尧指挥所属第二十九军30多个团约4万兵力，向川陕根据地发动3路围攻。为了诱敌深入，红四方面军采取"收紧阵地，积极防御"的作战方针，在运动战中节节抗击敌人，消灭其有生力量，待机实行反击。3、4月间，红四方面军逐步撤离南江、巴中、通江，退守通江北部的空山坝。5月17日，红四方面军总部决定发动反攻，先打冒进到空山坝南面的敌左纵队。5月20日，红军将敌分割包围，激战3昼夜，至24日，全歼敌7个团，击溃敌6个团，毙伤俘敌5000余人。接着，红军乘胜击败敌中央纵队和右纵队，连克通江、南江、巴中，进逼仪陇、苍溪、广元。至6月15日，粉碎了敌人的围攻，歼敌1万余人，缴枪8000余支，机关枪200余挺，炮50余门。田颂尧余部退守嘉陵江两岸。川陕革命根据地面积扩大1倍以上。7月，红四方面军由4个师扩编为4个军11个师，发展到4万余人，徐向前任总指挥，陈昌浩任政治委员。8月到10月，红四方面军又利用刘湘和刘文辉之间争夺四川霸权的"川中之战"，在仪陇、南部间，营山、渠县间，宣汉、达县间发动3次进攻战役，歼灭四川军阀部队近两万人，开辟了一些新区。川陕革命根据地扩大到东起城口近郊，西到嘉陵江东岸，北至陕南宁强、西乡、镇巴，南抵营山、渠县，总面积达4.2万平方公里，人口约400万。10月底，王维舟领导的川东游击军与红四方面军胜利会师，扩编为红三十三军。至此，红四方面军共辖5个军：第四军，军长王宏坤，政治委员周纯全；第九军，军长何畏，政治委员詹才芳；第三十军，军长余天云，政治委员李先念；第三十一军，军长王树声，政治委员张广

才；第三十三军，军长王维舟，政治委员杨克明。全军发展到 8 万余人。到 12 月，川陕革命根据地建立了 23 个县和 1 个市的苏维埃政权。1935 年 3 月，红四方面军退出川陕革命根据地，开始长征。留下的红军独立师在刘子才等才领导下坚持游击战争。

（林健柏）

红军第四次反“围剿”战争

1933 年 2 月至 3 月，红一方面军粉碎国民党军队对中央革命根据地的第四次军事“围剿”。

1932 年底，蒋介石调集 30 多个师，四五十万人的兵力，分 3 路对中央革命根据地发动第四次军事“围剿”。以蒋介石嫡系 12 个师组成中路军，担任主攻任务，陈诚为总指挥；由驻福建的第十九路军等部 6 个师又 1 个旅，编为左路军，蔡廷锴为总指挥；由驻赣南、粤北的广东部队 6 个师又 1 个旅编为右路军，余汉谋为总指挥。这两路担任就地“剿办”，并策应中路军的行动。1933 年 1 月底，敌中路军共 16 万人，组成 3 个纵队，采取分进合击的作战方针，向江西南丰、广昌一线推进，企图在黎川地区与红军决战。这时，红一方面军辖第一、第三、第五军团和第十一、第十二、第二十一、第二十二军，总兵力约 7 万余人。2 月 4 日，中共苏区中央局根据中共临时中央的指示，电令红一方面军总司令朱德、总政治委员周恩来等率部先发制人，集中全力迅速攻取敌重兵把守的南丰和南城。周恩来、朱德等从实际出发，认为目前条件不利于攻城，红军应求得在运动战中各个歼灭敌人。这个正确意见遭中共苏区中央局拒绝。2 月 9 日，红一方面军由黎川及其附近集结地区向南丰开进。2 月 12 日，红军包围南丰，黄昏后对守敌发起全线进攻，激战至次日晨，未能突破敌主阵地，自己伤亡却过 300 人。此时，周恩来、朱德等当机立断，改强袭南丰为佯攻南丰。2 月 13 日夜，红军主力从南丰撤围，秘密集结在南丰和里塔圩一线以西地域，待机打击援敌。2 月 22 日，红军以第十一军伪装主力，在里塔圩和新丰街之间东渡抚河，向黎川前进，以迷惑敌人；主力部队则秘密转移到宁都东韶、洛口地区集结待机。2 月 26 日，敌中路军第一纵队右翼第五十二、第五十九师由乐安分两路东进黄陂，同由宜黄南下的第十一师会合。红军主力即星夜冒雨从东韶一带北进至固岗、登仙桥以东，河口、黄陂以西地区隐蔽接敌。2 月 27 日，敌第五十二、第五十九师进入红军伏击圈内。红军集中优势兵力，出敌不意发起猛攻，经两天激战，歼敌近两个师，俘敌师长李明、陈时骥，取得黄陂战斗的胜利。敌中路军第二、第三纵队急忙兼程西援，企图夹击红军。3 月 2 日，红军撤回东韶、洛口、小布地区。陈诚即调整部署，改取中间突破的方针，将中路军缩编为前后两个纵队，交叉掩护，由宜黄向广昌方向搜索前进，寻找红军主力决战。3 月 16 日，红一方面军令第十一军向广昌西北地区开进，吸引敌人前纵队加快南进，以拉大敌人前后两个纵队之间的距离，主力则秘密北移，准备侧击敌之后纵队。3 月 20 日，敌后纵队第十一师进至草台冈、徐庄一线，与前纵队相距近百里。3 月 21 日拂晓，红军突然向敌第十一师发起攻击，激战 1 天，将其大部歼灭。次日，又在东陂歼敌第九师一部。敌前纵队经南丰向抚州方向退却。红军两战两捷，歼敌主力近 3 个师，俘敌 1 万余人，缴枪 1 万余支，取得了第四次反“围剿”战争的胜利，创造了红军战争史上前所未有的以大兵团伏击歼敌的范例。（陈绍畴）

察哈尔民众抗日同盟军成立

1933 年 5 月 26 日，冯玉祥在张家口通电成立察哈尔民众抗日同盟军。

九一八事变后，冯玉祥多次发出通电，主张团结全国民众的力量，一致抗日，反对蒋介石的不抵抗政策。1932 年 10 月，冯玉祥由山东泰山到张家口，开始抗战的准备活动。1933 年 3 月热河沦陷后，在中国共产党的推动和帮助下，冯玉祥以第二十九军教导团和方振武的抗日救国军为主，与从东北退到察哈尔的义勇军等筹组察哈尔民众抗日同盟军。5 月 24 日，日伪军进占沽源，察哈尔省形势危急。各界代表在张家口召开察哈尔省民众御侮救亡大会，决议组织民众抗日同盟军，公推冯玉祥为总司令。5 月 26 日，冯玉祥通电就职。6 月 15 日，在张家口举行民众抗日同盟军第一次代表大会，通过抗日同盟军纲领及军事问题、军队中政治工作与协助民众运动、军事委员会组织大纲、财政政策等决议案。纲领宣布民众抗日同盟军“为革命军民之联合战线，以外抗暴日，内除国贼为宗旨”。否认一切卖国协定，并反对任何方式的妥协；誓以武力收复失地；主张对日断绝国交；必须肃清汉奸卖国贼；实现抗日救国的民众政权等。会后，民众抗日同盟军任命吉鸿昌为北路前敌总指挥，邓文为左副指挥，李忠义为右副指挥，方振武为北路前敌总司令，率部北进抗日。抗日同盟军得到中国共产党人的大力帮助，也得到群众的广泛支持，队伍很快发展到 10 万余人。6 月 22 日，抗日同盟军克康宝。7 月 1 日，收复宝昌、沽源。7 月 12 日攻占察

北重镇多伦，并乘势追击，把日伪军完全赶出察哈尔省。中共地下组织、平绥路工人、御侮救亡会及察哈尔民众派出代表，赴前线慰问，勉励抗日将士"确保既得胜利，收复未复国土"。蒋介石用软硬兼施的手段破坏民众抗日同盟军，先后派庞炳勋、冯钦哉、关麟征等16个整师共15万人进行军事"围剿"，进驻沙城、怀来，直逼张家口。7月中旬，日伪军2万余人向察哈尔推进，日本关东军限令冯玉祥3日内退出多伦。7月28日，蒋介石、汪精卫致电冯玉祥施加政治压力，提出：一、勿擅立各种军政名义，使察省脱离"中央"；二、勿妨害"中央"边防计划；三、勿滥收散军"土匪"；四、勿引用"共匪头目煽动赤祸"。8月初，日军重占多伦。同时，蒋介石对冯玉祥部下进行政治拉拢和分化瓦解。冯玉祥在内外交困、腹背受敌的情况下，被迫于8月5日通电宣布："自即日起完全收缩军权。政权归之政府。复土交诸国人。并请政府即令原任察省主席宋哲元克日回察，接收一切，办理善后。"随后冯玉祥撤销民众抗日同盟军总部，于8月14日离张家口赴泰山"休养"。吉鸿昌、方振武坚持抗日，将所部改称抗日讨贼军，转战于热河、长城一带，至10月中旬，在国民党军队和日军的联合进攻下失败。吉鸿昌潜赴天津，于11月9日被捕，24日英勇就义。方振武辗转到香港。至此，察哈尔民众抗日同盟军完全瓦解。（陈绍畴）

《塘沽协定》签订

1933年5月31日，国民党政府与日本在塘沽签订的丧权辱国的协定。

1933年初，国民党政府对日军向关内的侵略采取交涉与抵抗并行的方针。为准备对日直接交涉，蒋介石先后派外交部部长罗文干、外交部次长刘崇杰等到北平（北京）活动。5月初，日本军部确定对华北国民党军队采取"以迫和为主，内变策应为从"的方针。国民党政府急于同日本妥协，于5月4日决定设立行政院驻北平政务整理委员会，指定亲日派黄郛为委员长，负责对日交涉停战问题。5月6日，日军参谋本部将《华北方面紧急处理方案》通报关东军，并下达平津特务机关，要求于6月中旬实现。《方案》要点为：日军继续进行强压方针，沿长城线对华军进行反复、彻底打击。作为停战条件，中国方面应主动撤退至宣化、顺义、三河、玉田、滦县、乐亭以南、以西地区，切实取缔排日活动，条件成熟时签订停战协定。接着，日军渡滦河西犯，占领冀东20余县，直逼北平、天津。5月17日，黄郛由南京经天津抵北平，对记者发表谈话说：决秉承中央意旨，一面交涉，一面抵抗，应付华北危局。5月22日，行政院院长汪精卫电示黄郛与日方谋停战，除签字承认伪"满洲国"、割让东北之条约外，其他条件皆可答应。当晚，黄郛与日军代表秘密谈判，达成停战原则性协议。5月25日，何应钦、黄郛派北平军分会高级参谋徐祖诒为军使，到顺义日本关东军第八师团司令部去"阵前求和"。5月30日，北平军分会总参议熊斌作为中国首席代表到塘沽，与日方首席代表、日本关东军参谋副长冈村宁次会谈。次日，双方签订《塘沽协定》，主要内容是：一、中国军队一律迅速撤退至延庆、昌平、高丽营、顺义、通州（通县）、香河、宝坻、林亭口、宁河、芦台所连之线以西、以南地区。尔后不得越过该线。又不作一切挑战扰乱之行为。二、日本军为证实第一项的实行情形，随时用飞机及其他方法进行监察。中国方面对此应加保护，并给予各种便利。三、日本军如证实中国军业已遵守第一项规定时，不再越过上述中国军的撤退线进行追击，并自动回到大致长城一线。四、长城线以南，及第一项所示之线以北、以东地区内的治安维持，由中国方面警察机关担任之。上述警察机关，不可利用刺激日军感情的武力团体。此外，日方向中方口头表示希望：一、丰宁西面的骑兵第二师，望即撤去；二、平津附近的第四十师，望即他调；三、白河附近堑壕及其他军事设备，望即撤去；四、中日纷争祸根之排日，望即彻底取缔。《塘沽协定》事实上承认日本占领东北三省和热河的"合法"性，并承认冀东为"非武装区"，中国不能在这地区驻扎军队，而日本可在这里自由行动。这就为以后日军进一步扩大侵略提供了方便。（陈绍畴）

中央苏区开展查田运动

1933年6月，中央革命根据地在分配土地后开展的查田、查阶级运动。

1933年6月1日，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发出《关于查田运动的训令》，要求在中央革命根据地内开展普遍的深入的查田运动，把一切冒称"中农"、"贫农"的地主、富农完全清查出来。没收地主阶级的一切土地财产，没收富农的土地及多余的耕牛、农具、房屋，分配给过去分田不够的及尚未分到田的工人、贫农、中农，富农则分与较坏的劳动份地。据此，首先在瑞金、会昌、博生、雩都（于都）、胜利、石城、宁化、长汀等8个县开展查田运动。6月2日，中共苏区中央局作出《关于查田运动的决议》，指出在查田运动中，应依靠雇农、贫农，与中农群众结

成巩固的联盟，并使雇农群众在查田运动中起先锋队的领导作用，来消灭地主阶级残余势力，削弱富农经济上的势力与打击他们窃取土地革命果实的企图。6月17日至7月1日，在瑞金先后召开8县区以上苏维埃负责人员会议和8县贫农团代表大会。毛泽东在会上作报告，指出查田运动是查阶级，不是按亩查田。查阶级是查地主富农阶级，查剥削者，查他们隐蔽在农民中间而实在不是农民的少数人，决不是查中农、贫农、工人的阶级。他说，查田运动的策略，是以工人为领导者，依靠贫农，联合中农，去削弱富农，消灭地主。强调联合中农是土地革命中最中心的策略，中农的向背，关系土地革命的成败，侵犯中农的利益是绝对不许可的。还指出，富农与地主有分别，富农自己劳动，地主自己不劳动。所以，对地主取消灭的政策，对富农则取削弱的政策。消灭富农的倾向是错误的，同时不应该把富农成分当做地主待遇。会后，查田运动迅速形成一个广大的群众运动，并取得了一定的成绩。查出了一批隐瞒成分的地主、富农，纠正了一批错划的阶级成分，纯洁了阶级队伍。但在工作中发生了侵犯中农利益、消灭富农、按家遍查等“左”的错误。9月1日，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执行委员会发布《开展查田运动布告》，要求各级政府及查田委员会抓紧查田工作的领导，纠正和防止“左”的偏向。指出查田不是分田，查阶级不是查中农、贫农、雇农阶级，因此不应该按家按亩插起牌子遍查。再次强调中农的利益绝对不能侵犯，不能随便把中农当富农。有些富裕中农分子，过去虽然有些小小剥削，同样不能当富农看待。指出既不应该把富农当中农看待，也不能把富农当地主看待，完全没收富农家产的办法是错误的。10月10日，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作出《关于土地斗争中一些问题的决定》，并通过了毛泽东起草的《怎样分析农村阶级》，作为划分农村阶级成分的标准。当各地开始按照这两个文件的精神去检查工作，纠正错误偏向时，又受到“左”倾错误路线的干扰。1934年3月15日，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政府发出《关于继续开展查田运动问题的训令》，批评许多地方纠正过左的错误，阻碍了查田运动的继续发展，是给地主富农以反攻的机会，并提出“右倾机会主义是目前的主要危险”，致使查田运动出现了反复，给土地革命造成严重的后果。　（陈绍畴）

红军第五次反“围剿”战争

1933年9月至1934年10月，红一方面军反击国民党军队对中央革命根据地发动的第五次军事“围剿”的战争。

1933年5月，蒋介石成立了全权处理赣粤闽湘鄂5省军政要务的军事委员会委员长南昌行营，并亲自筹划、准备和指挥围攻各革命根据地。9月，在德、意、美等国军事顾问参与策划下，蒋介石调集约50万兵力，采取持久战和堡垒主义的新战略，分几路进攻中央革命根据地：北路军共33个师又3个旅，担任主攻；另有南路军、西路军和第十九路军，分头担任阻止红一方面军向外发展的任务。9月下旬，北路军由南城、硝石开始进攻黎川。这时，中央革命根据地有红军主力8万余人。地方红军和赤卫队等群众武装也较前有发展。如果红军能够正确地估计形势，利用有利条件，针对敌人采取的新战略，灵活运用历次反“围剿”战争的成功经验，打破这次“围剿”仍然是可能的。毛泽东这时已离开红军的领导岗位。中共临时中央直接领导这次反“围剿”战争。10月初，共产国际派来的军事顾问李德(1900—1974，原名奥托·布劳恩 Otto　Braun，又名华夫，德国人)由上海抵瑞金。中共临时中央主要负责人秦邦宪对李德十分信赖和支持。李德和秦邦宪直接控制了红军的指挥权。在反“围剿”战争开始时，他们实行军事冒险主义的方针，主张“御敌于国门之外”，要求红军在根据地以外战胜敌人，并争取苏维埃在全国的胜利。9月28日，国民党军队占领黎川。他们震惊于黎川一城之失，急忙命令红军主力北上应敌，到外线去攻打敌人的坚固据点。10月2日，中革军委命令红军东方军由福建将乐、顺昌兼程北上，进攻南城硝石、黎川资溪桥之敌，企图恢复黎川，御敌于根据地之外。10月6日至7日，东方军在黎川洵口遭遇战中偶然获胜，歼敌3个团。10月9日开始，连攻硝石数日未克，于10月13日撤出战斗。10月22日，中革军委又令红一、红三、红五军团集中兵力在资溪桥同敌人进行攻坚战斗。至10月26日，连战失利，陷于被动地位。11月11日，红三、红七军团在金溪浒湾、八角亭地区多次向敌进击，激战两日，伤亡1100余人，匆忙撤回苏区内。1934年1月下旬，蒋介石镇压福建人民革命政府后，重新集中全力继续进攻红军。这时，“左”倾错误领导者又实行防御中的保守主义，命令红军处处设防，分兵防御。从1月下旬至3月底，红军在黎川邱家隘、平寮反击战，南丰鸡公山阵地防御战，凤翔峰阵地防御战，三溪圩、三坑反击战中，均遭失利。4月上旬，敌北路军和东路军进到黎川以南康都、西城桥至泰宁一线。4月10日，敌集

中11个师兵分两路进攻广昌。中共临时中央负责人不顾敌强我弱以及红军连续作战、减员很大的情况，急忙调集红军主力9个师坚守广昌，实行阵地战、堡垒战和“短促突击”，同敌人“决战”。结果打了18天，红军伤亡5000余人。4月27日，广昌失守。7月上旬，敌集中31个师从6个方向向中央革命根据地中心区全面进攻。“左”倾错误领导者又命令红军分兵把口，组成多道防线全线抵御，继续在内线同优势敌人拼消耗。8月5日，红军主力在广昌县驿前以北高虎脑、万年亭地区同敌军顽强拼搏，重创敌第八十九师，但自己也受到严重损失，陷入更加被动地位。10月初，国民党军队已推进到中央革命根据地的腹地，兴国、宁都、石城相继失守。在王明“左”倾冒险主义的军事战略指导下，红军苦战1年，未能打破国民党军队的第五次军事“围剿”。10月10日，中共中央机关和红军主力退出中央革命根据地，被迫实行战略大转移。（陈绍畴）

福建事变

1933年11月，国民党军第十九路军将领蒋光鼐、蔡廷锴等联合国民党内李济深等一部分反蒋势力，在福建成立中华共和国人民革命政府的事件。

1932年淞沪抗战后，国民党军第十九路军被蒋介石调到福建同红军作战，屡遭失败。在中国共产党抗日政策的影响下，第十九路军蒋光鼐、蔡廷锴等将领以及与第十九路军有历史关系的陈铭枢等认识到同红军作战是没有出路的。1933年10月26日，他们派徐名鸿为国民党福建省政府及第十九路军的全权代表到瑞金，与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及工农红军的全权代表潘汉年签订《反日反蒋的初步协定》。协定规定双方为挽救中华民族的垂亡，准备进行反日反蒋的军事同盟；双方立即停止军事行动，暂时划定军事疆界线，各在该线不得驻扎主力部队；双方采取互相合作原则，恢复商品贸易。11月20日，蒋光鼐、蔡廷锴等联合国民党内李济深等一部分反蒋势力，在福州举行中国人民临时代表大会。出席大会的有全国25个省、市和华侨的代表80多人。大会发表《人民权利宣言》，宣告大会的宗旨为“救护国家，保障人权”。指出中国为中华全国生产的人民的民主共和国，蒋介石国民党政府为买办、军阀、豪绅地主的反革命政府。为迅速推翻此反革命政府，大会宣布：一、否认南京反动政府；二、号召全国反帝反南京政府的革命势力，立即组织人民革命政府，打倒以南京为中心的国民党系统；三、于最短期间召集第一次全国生产人民代表大会，制定宪法解决国是。宣言提出“排除帝国主义在中国势力，打倒军阀，铲除封建残余制度，发展人民经济，实现彻底的民主政权”的主张。这些主张反映了中间阶层的政治、经济要求。11月22日，中华共和国人民革命政府（通称福建人民政府）宣告成立。以李济深、陈铭枢、蒋光鼐、蔡廷锴、陈友仁、徐谦、戴戟、李章达、黄琪翔、何公敢、余心清（代表冯玉祥）为人民革命政府中央委员会委员，李济深（1885—1959）任政府主席兼军事委员会主席，陈铭枢任文化委员会主席，余心清任经济委员会代主席，陈友仁任外交部部长，蒋光鼐任财政部部长，李章达任政治保安局局长，彭泽湘任人民政府秘书长，徐谦任最高法院院长，蔡廷锴任人民革命军总司令兼第十九路军总指挥。11月27日，福建人民政府与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签订《闽西边界及交通条约》，对双方之间通商、交通等问题作了具体规定。1933年底，蒋介石迅速地从“围剿”中央革命根据地的前线抽调9个师，共15万兵力入闽，自任“讨逆军”总司令。同时派人潜入福建，以金钱、官职收买第十九路军的军官。在蒋介石的军事压力下，第十九路军内部发生分化。中共临时中央犯了“左”倾关门主义错误，在军事上没有给第十九路军以应有的支援。1934年1月16日，蒋军进占福州，福建人民政府遂告失败。（陈绍畴）

新生活运动

1934年2月19日，蒋介石在南昌发起以“礼义廉耻”为中心准则，以国民生活军事化、生产化、艺术化等为口号，宣扬封建道德和法西斯主义的运动。

九一八事变后，国民党政府以“攘外必先安内”为基本国策。蒋介石鼓吹封建伦理道德，宣称：“我们要达到复兴民族的目的，一定要从礼、义、廉、耻这个根本急务做起。”1934年2月19日，蒋介石在南昌行营各界扩大纪念周会上发表《新生活运动之要义》的演讲，提出为加强“国民的心理建设”，要“使一般人民都能除旧布新，过一种合乎礼义廉耻的新生活”。即日，在南昌成立新生活运动促进会，蒋介石任会长，邓文仪为主任干事，萧纯锦为副主任干事，李焕之为书记。3月17日，国民党中央民众指导委员会发出通电，号召全国民众厉行新生活运动。3月22日，国民党中央常委会议决议，由国民党中央组织、宣传、民众运动3会和国民党政府内政、教育两部会拟新生活运动推行办法。3、4月间，南京、上海、江苏等20多个省市迅速发起新生活运动。5月，由杨永

泰执笔、蒋介石审阅的《新生活运动纲要》颁布实行。接着，又制订《新生活须知》。这是指导新生活运动的纲领性文件。它强调要以中国固有道德礼义廉耻为基本准则，从衣食住行日常生活入手，谋求国民生活的改造，以适应现代化社会的需要，奠定中华民族复兴的基础。6月间，蒋介石连续发表《新生活运动之中心准则》、《力行新生活运动》、《新生活运动的意义和目的》、《再释新生活运动》和《礼义廉耻的精义》等演讲，宣称新生活运动是"全体国民之生活革命"，是"目前救国建国复兴民族的一个最基本亦最有效的革命运动"。他认为，中国社会的颓风败俗，统统都是由于固有道德没有恢复，礼义廉耻不张之故。因此，要使一般国民的生活都要合乎封建伦理道德的规范，达到"军事化、生产化、艺术化"。蒋介石强调，现在"赤匪充斥，内乱未已"，要"完成安内攘外之目的，亦非准备全国国民之军事化，不足以图存。而军事化之前提，即在养成国民生活之整齐、清洁、简单、朴素、迅速、确实之习性，以求其共同一致之守秩序，重组织，尽责任，尚纪律，而随时能为国家与民族同仇敌忾，捐躯牺牲，尽忠报国"。蒋介石发起新生活运动的目的，就是要以封建伦理道德来整治人心，禁锢人们的言行，让人民群众服服帖帖地接受国民党的封建买办法西斯独裁统治。7月1日，新生活运动促进会改组为新生活运动促进总会，蒋介石任会长，熊式辉为主任干事，邓文仪为副主任干事，阎宝航为书记。聘请杨永泰、何应钦、熊式辉、陈果夫、张群、张学良等33人为总会指导员，负责就近指导各省市新生活运动促进会；还聘请邓文仪、阎宝航、李焕之、李厚微等22人为总会干事，负责日常工作和具体事务。1936年1月1日，总会迁南京办公，主任干事改由钱大钧担任。到1936年，全国有20个省、4个直辖市、1355个县成立了新生活运动促进会。新生活运动全面展开，但没有取得预期的效果，"只做到表面一时的更新，而未达到永远彻底的改革"。

（陈绍畴）

红军长征

1934年10月，中国工农红军从福建长汀、宁化和江西瑞金、雩都（于都）等地出发，开始战略性大转移，于1935年10月胜利到达陕北。

1934年10月初，红军第五次反"围剿"失利后，秦邦宪、李德等又变得惊慌失措，未经中共中央政治局讨论，即决定中央红军（第一方面军）主力撤离中央革命根据地，转移湘西与红二、红六军团会合。10月10日晚，中共中央和红军总部从瑞金出发，率领红军主力第一、第三、第五、第八、第九军团和中央机关直属部队共8.6万余人，向湘西进军，开始长征。这时，国民党南路军陈济棠部为配合北路军、东路军对中央革命根据地的进攻，在江西安远、信丰间修筑了许多碉堡群，构成第一道封锁线，阻止红军进入广东。10月21日晚，红军主力开始突围。10月25日，红军全部渡过桃江（信丰河），突破了敌人第一道封锁线，向湖南汝城、广东仁化城口方向前进。国民党西路军总司令何键为阻止红军西进，令其主力向湘赣边境集结。11月1日，红军先头部队进入湖南。11月8日，红军由汝城到城口间全部通过了敌人第二道封锁线。11月15日，又在良口、宜章之间，突破国民党军队设置的第三道封锁线。接着，红军分两路西进，先后占领道县、江华，渡过沱水（潇水）。这时，蒋介石才判明红军转移的战略企图，急令何键的"追剿军"与粤桂军相互配合，凭借湘江天险，设置第四道封锁线，从四面对红军进行围追堵截。11月27日，红军先头部队顺利渡过湘江，控制了界首到脚山铺的渡河点。湘桂两省敌军分路向红军猛攻，妄图夺回渡河点，围歼红军于湘江两岸。红军在全县以南湘江东岸同敌人激战5天，于12月1日渡过湘江，突破了敌人第四道封锁线。长征开始后，中共中央领导人又犯了退却中的逃跑主义错误。红军携带大批辎重，实行大搬家式的转移，行动十分迟缓，严重削弱部队的机动作战能力。渡过湘江后，红军和其他人员损失过半，减至3万余人。12月5日，红军越过西延山脉主峰越城岭（老山界），继续沿西延、龙胜山区西进，于12月11日进占湖南通道城。这时，桂军在红军左侧后跟进，敌"追剿军"主力已进至城步、绥宁、靖县、洪江、黔阳、芷江地区赶筑工事，张网以待。12月12日，中共中央一些负责人在通道召开紧急会议，讨论红军行动方向问题。毛泽东等力主放弃北出湘西与红二、红六军团会合的计划，改向敌人兵力薄弱的贵州前进。但秦邦宪、李德等仍坚持原定计划，只在行军路线上略作变动。中革军委命令部队迅速脱离桂敌，西入贵州，寻求机动，以便转兵北上，并令在湖南常德一带活动的红二、红六军团向沅江上游地区行动，以策应中央红军北上。12月15日，中央红军突破黔军防线，占领贵州黎平、老锦屏地区。12月18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在黎平召开会议，讨论红军的战略方针问题。会议肯定了毛泽东的正确主张，作出《关于在川黔边建立新的根据地的决议》，放弃红军向湘西前进的计划，改向敌人力量薄弱的黔北发展。

会后，红军分为左右两路西进，于 12 月底进至乌江南岸。红一、红三军团分别在江界河、袁家渡、清水口 3 个渡河点架桥，准备抢渡乌江。1935 年 1 月 1 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在贵州瓮安猴场（草塘）召开会议，通过了《关于渡江后新的行动方针的决定》，重申了黎平会议的战略方针，提出首先在以遵义为中心的黔北地区、然后向川南创建川黔边新根据地的战略任务。会后，红军渡过乌江，把尾追和堵击红军的国民党"追剿军"甩在乌江以东和以南地区。1 月 7 日，红军先头部队占领黔北重镇遵义城。1 月 8 日，又攻占娄山关。1 月 9 日，中共中央、中革军委进驻遵义。1 月 15 日至 17 日，中共中央在遵义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审查黎平会议的决定，总结第五次反"围剿"和红军长征以来在军事指挥上的经验教训。会议鉴于黔北的实际情况，决定放弃在川黔边建立新的根据地的原定计划，北渡长江，在四川西部建立根据地。会议肯定了毛泽东等在领导红军长期作战中形成的基本作战原则，并增选毛泽东为中央政治局常委，取消秦邦宪、李德的最高军事指挥权。会后，根据会议精神，常委进行分工，由张闻天代替秦邦宪在党内负总责。接着又成立由毛泽东、周恩来、王稼祥组成的三人小组，负责指挥红军的军事行动。遵义会议确立了以毛泽东为代表的正确路线在中共中央和红军中的领导地位，在极端危急的关头挽救了党和红军，是中国共产党历史上一个生死攸关的转折点。

1935 年 1 月中旬，敌薛岳兵团 8 个师进到乌江南岸，黔军 3 个师向遵义、湄潭进击，川军 10 多个旅向川南集中，一部已到松坎以北，对红军形成新的包围。毛泽东等根据敌情的变化，采取高度灵活的运动战方针。红军忽东忽西，迂回曲折地穿插于敌人重兵之间，处处主动。1 月 19 日，红军从松坎、桐梓、遵义地区移师北上，向川南开进。至 1 月 26 日，进至土城、猿猴（元厚）场、旺隆场、复兴场。此时，川军两个旅先于红军到达赤水城，阻止红军北进。1 月 29 日晨，红军主力分 3 路从猿猴场、土城地区西渡赤水河（即一渡赤水），向古蔺、叙永地区前进。由于敌军加强了长江沿岸的防御，并以优势兵力向红军进逼，红军从川南泸州或宜宾上游北渡长江已无可能。2 月 7 日，中革军委决定暂缓执行渡江计划，改取在川滇黔边机动作战的方针，令各军团迅速脱离川敌，向川滇边镇雄（后改到扎西）地区集中。2 月 9 日，红军于扎西（威信）地区集结完毕。这时，滇军孙渡纵队和川军潘文华部从南北两面向扎西逼近，周浑元纵队主力正从黔西、大定向古蔺、叙永追击。2 月 11 日，红军利用敌人主力和注意力都集中川南一线的时机，出其不意地由扎西掉头东进。2 月 18 日至 21 日，红军分为左右两路在古蔺县太平渡、二郎滩东渡赤水河（二渡赤水），向敌人兵力比较空虚的黔北桐梓地区急进。2 月 28 日晨，红军再占遵义城，歼敌两个师又 8 个团，取得长征以来的第一个大胜利。为了进一步调动敌人，打乱敌军的部署，红军于 3 月 16 日再度西进，在贵州茅台附近西渡赤水河（三渡赤水），进到四川南部古蔺以东之大村、铁厂、两河口地区。蒋介石以为红军又要渡江北上，急忙调整部署，将各路敌军调向川南。3 月 21 日晚至 22 日，红军主力秘密地出敌不备折而向东，在二郎滩、太平渡等地东渡赤水河（四渡赤水），并从敌人重兵集团之间分路向南急进，先敌到达遵义、怀仁之间地区。接着渡过乌江，逼近贵阳。正在贵阳督战的蒋介石焦急万分，一面命令各部队火速增援贵阳，一面下令守城部队死守。4 月初，红军乘云南敌军增援贵阳之际，主力突然大踏步转向西南，于 4 月 9 日从贵阳、龙里间越过湘黔公路，进入云南。4 月下旬，红军连克白水、沾益、曲靖、马龙、寻甸、嵩明等 10 数县，前锋逼近昆明。这时，昆明防守力量空虚。国民党第二路军总司令龙云急调在曲靖以东的孙渡纵队取捷径直开昆明，同时调集各县民团防守昆明，致在滇北和金沙江南岸的防御比较空虚。4 月 29 日，中共中央和中革军委决定利用有利时机，争取迅速渡过金沙江，转入川西。红军分 3 路由寻甸、嵩明地区转向西北前进。红一军团为左纵队，经禄功、武定、元谋，直取龙街；红三军团为右纵队，经思力坝、马鹿塘，夺取洪门渡；军委纵队和红五军团为中央纵队，经山仓街、海龙塘、石板河，抢夺皎平渡。5 月 3 日，中央纵队先遣队干部团一部，在刘伯承率领下，从几百里外直扑到金沙江边皎平渡口，缴获停留在江上的两条渡船，当晚偷渡成功，抢占了北岸制高点，控制了渡口。接着北进通安地区。至 5 月 9 日，红军全部渡过金沙江，完全摆脱了数十万国民党军队的围追堵截，取得了战略转移中具有决定意义的胜利。

1935 年 5 月 12 日，中共中央在四川会理附近的铁厂举行政治局扩大会议，讨论红军渡江后的行动计划。会议决定红军在会理及其附近休整 5 天，争取在长期鏖战后的必要休息与补充，以便继续夺取西昌而北上，实现在川西与红四方面军会合的目的。5 月 15 日，红军继续北进，先后占领德昌、泸沽、越嶲（越西）、冕宁，进入大凉山彝族聚居区。红军总参谋长兼中央红军先遣队司令刘伯承根据中共的民族

政策与彝族沽基部落首领小叶丹歃血为盟，帮助他们成立了“中国红军彝民沽基支队”。红军模范地执行少数民族政策，得到彝族人民的拥护和爱戴，顺利通过彝族区。5月24日晚，红一军团先遣部队进至大渡河右岸石棉的安顺场，歼敌两个连，控制了安顺场渡口。安顺场一带水急山陡，是太平天国石达开北渡未成而最后覆灭的地方。次日，红一团第二连的17名勇士，在连长熊尚林的率领下，冒着敌人密集的火力，强渡大渡河，迅速击溃川军第五旅第七团1个营，巩固了滩头阵地。这里水深流急，不能架桥，全军仅有4只小船，要迅速渡过河去十分困难。为此，中革军委决定红一师和干部团由安顺场渡河北上，红军主力沿大渡河右岸向北急进，以两天时间赶完170公里的行程，直取大渡河上游的泸定桥。5月27日，红军主力从安顺场出发，沿途击破川康边防军的拦阻，兼程疾进，于5月29日晨夺取了泸定桥的西桥头。下午4时，红一军团第四团第一营第二连的22名共产党员和积极分子组成突击队，在连长廖大珠率领下，冒着敌人密集的火力，攀缘桥上悬空的铁索链，穿过桥东头敌人燃起的大火，向对岸冲去。第三连在连长王有才的率领下，每人扛着一块木板，跟随在突击队后边，一面铺桥，一面进击。后续部队紧跟前进，击溃守敌1个团，胜利进入泸定城。6月2日，红军全部渡过大渡河。红军过河后分左中右纵队向天全、芦山北进。6月8日，突破敌人芦山、宝兴防线，歼敌一部，进至宝兴大跷碛。红军指战员以坚韧不拔的革命精神，克服重重困难，战胜风雪严寒，翻越过位于懋功以南、海拔4000多米、终年积雪、空气稀薄的大雪山——夹金山。这时，红四方面军先头部队已攻占懋功（小金），一部前出懋功东南的达维镇。6月12日，中央红军先头部队在北进达维的途中，与红四方面军先头部队胜利会师。6月18日，中共中央和中革军委抵达懋功。21日晚，中央红军和红四方面军的部队举行庆祝会师大会。红军两大主力会师，粉碎了国民党反动派各个消灭红军的企图，增强了红军的力量。会合后，红军总兵力达10余万人。中共中央根据会师后的形势，确定了北上建立川陕甘根据地的方针。但张国焘与中共中央的方针背道而驰，主张向川康边退却。6月26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在懋功以北的两河口举行会议，经过充分讨论，于28日作出《关于一、四方面军会合后战略方针的决定》，否定了张国焘的错误主张，明确指出两大主力红军会合后的战略方针是“集中主力向北进攻，在运动战中大量消灭敌人，首先取得甘肃南部，以创造川陕甘苏区根据地”，以便领导和推进全国抗日运动。据此，中革军委制定了松潘战役计划，确定在岷江东岸大石桥地区和懋功地区各留一个支队，牵制东、西两面之敌，掩护后方工作，主力集中于箭步塘、壤口、芦花地区，分左中右3路向松潘及其西北地区开进，消灭松潘地区的胡宗南部，控制松潘以北及东北各道路，以利红军向北开进，胜利进入甘南。两河口会议后，中央红军主力翻越过几座大雪山，向松潘西部行进。7月16日，红军一部占领毛儿盖。7月18日，中共中央为了全军的团结，任命张国焘为红军总政治委员。此后，张国焘才开始调动红四方面军主力北上。这时，敌情发生了变化。胡宗南部主力已集结于松潘地区，薛岳部由雅安进抵文县、平武，与胡宗南部靠拢，川军已进占懋功、绥靖（金川）、北川、茂县、威州及岷江东岸地区。红军丧失了夺取松潘地区的有利时机。中共中央、中革军委决定放弃松潘战役计划，改经草地北上。8月4日至6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在毛儿盖附近的沙窝召开会议，通过了《中央关于一、四方面军会合后的政治形势与任务的决议》，重申两河口会议确定的战略方针。会后，中共中央、中革军委决定红一、红四方面军混合编为左、右两路军北上。右路军由红一方面军的第一、第三军（当时，红一方面军的第一、第三、第五、第九军团已改称第一、第三、第五、第三十二军）和红四方面军的第四、第三十军组成，由前敌总指挥徐向前、政治委员陈昌浩、参谋长叶剑英率领，中共中央机关和前敌指挥部随右路军行动。左路军由红四方面军的第九、第三十一、第三十三军和红一方面军的第五、第三十二军组成，红军总司令朱德、总政治委员张国焘、总参谋长刘伯承随左路军行动。8月中旬，左、右路军分别从卓克基、毛儿盖等地出发，经过艰苦行军，跨过荒无人烟的茫茫草地，于8月下旬先后抵达阿坝、巴西地区。8月29日，右路军发起包座战斗，歼敌胡宗南部第四十九师5000余人，为向甘南进军创造了有利条件。9月9日，张国焘拒绝执行北上方针，背着中共中央电令右路军政委陈昌浩率右路军南下，企图分裂和危害中共中央。9月12日，中共中央在甘肃迭部俄界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通过《关于张国焘同志的错误的决定》。会议一致同意中共中央采取的步骤和继续北上的方针，并决定将红一方面军主力和中央直属部队改编为中国工农红军陕甘支队，彭德怀任司令员，毛泽东任政治委员。陕甘支队迅速北上，于9月17日一举突破川甘边界的天险腊子口，进入甘南，翻过岷山。9月18日，占领哈达铺。9月27日，

进抵通渭榜罗镇。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在这里开会，正式决定率陕甘支队前往陕北，以陕北作为领导中国革命的大本营。随后，陕甘支队分3路北上，越过六盘山，于10月19日到达陕甘苏区的保安吴起镇（吴旗县城）。至此，中央红军历时1年，途经11个省，行程2.5万里的长征胜利结束。　（陈绍畴）

南方红军的游击战争

1934年至1935年间，中国工农红军主力长征后，留在南方的红军和游击队在8省15个地区坚持游击战争。

1934年10月，中国工农红军主力退出中央革命根据地实行战略转移，中共中央决定在中央苏区设立中共中央分局（后改为东南分局），项英（1898—1941，湖北武昌人）任书记；成立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政府办事处，陈毅任主任。10月22日，中央军区成立，项英任司令员兼政治委员，负责领导留在南方的一部分红军和游击队，在江西、福建、浙江、安徽、河南、湖南、湖北、广东等8省15个地区坚持游击战争。

赣粤边游击区：1935年3月底，项英、陈毅和赣南军区部队余部先后抵达赣粤边区，与中共赣粤边特委书记李乐天、副书记杨尚奎及赣粤边军分区部队会合，共1000余人，在这个地区坚持游击战争。4月，项英、陈毅在江西大庾长岭召开干部会议，贯彻中共中央关于立即改变组织方式与斗争方式，分兵开展游击战争的指示，确定了依靠群众，积蓄力量，创造条件，迎接新的高潮的方针，并决定部队以南岭山脉为依托，分别进至大庾、信丰、南雄3县边界油山地区，大庾、南雄边界北山地区，信（丰）（南）康赣（县）地区，信丰、南雄、虔南（全南）、龙南、定南等县边界南山地区，以及上（犹）崇（义）地区，坚持游击战争。至1936年春，赣粤边军民先后挫败国民党粤军的两次“清剿”，红军游击队初步站稳了脚跟。两广事变后，粤军他调。项英、陈毅即将游击队相对集中进击，攻克大庾、信丰、南雄等地的许多圩镇，赣粤边各小游击区连成一片，游击队扩大到500余人。

闽赣边游击区：1935年1月，中共瑞金特委成立，赖昌祚任书记，领导瑞金、西江、瑞西的游击队就地坚持斗争。3月，敌人以两个多师兵力连续“清剿”闽赣边区。游击队苦战两个月，损失严重，余部改称瑞金游击队，转移到大柏地一带山区坚持斗争。与此同时，原属福建军区的（长）汀瑞（金）游击队和刘国兴率领的一支游击队，在长汀、瑞金、会昌一带游击活动。1937年上半年，3支游击队合编为（长）汀瑞（金）会（昌）游击队，发展到300余人。

闽西游击区：1934年11月，敌人调集8个师，10余万兵力进攻闽西苏区。留在闽西的红军独立第八、第九团和明光独立营等部先后向龙岩、永定地区集中。1935年春，陈潭秋、邓子恢、谭震林等率红二十四师一个营到达永定，与闽西部队会合，两部共1500余人。4月，张鼎丞主持召开各部队负责人会议，确定了坚持游击战争，保存力量，锻炼部队，等待时机以开展新局面的方针任务，并选举产生了闽西南军政委员会，张鼎丞任主席，邓子恢、谭震林为副主席。会后，闽西部队分散到4个作战分区开展游击战争，先后打破敌人两次“清剿”。1936年1月，闽西游击武装改称抗日讨蒋军，编为4个支队，各县游击队改称抗日义勇军，游击区扩大到闽粤边南靖、平和、大埔、蕉岭、武平、连城等10余县，建立了几块游击根据地。至8月，游击武装发展到近2000人，增编为6个支队。

闽粤边游击区：1934年冬，中共闽粤边特委领导红军独立第三团在福建南靖、漳浦、平和等县和广东饶平、潮安、澄海等县坚持斗争。1935年5月，闽粤边苏区被敌占领，红军游击队分散到漳浦、云霄边界梁山和云霄、平和、诏安3县边界活动。年底，重建了（南）靖（平）和（漳）浦游击根据地。在此期间，原属中共东江特委领导的潮（安）澄（海）饶（平）游击队转战到闽南，同红三团1个排合编为独立营，改归中共闽粤边特委领导，活动于云霄、平和、诏安边界地区。1936年初，闽粤边红军游击队改称中国工农红军闽南抗日军。9月，闽南抗日军采取军事打击和政治争取相结合的方法，打破粤军1个师的“清剿”。至年底，闽粤边各游击区连成一片，红军游击队发展到1300余人。

皖浙赣边游击区：1934年11月，红十军团向皖浙边挺进时，中共闽浙赣省委书记关英和闽浙赣军区司令员唐在刚领导红三十师及各游击队，留在赣东北坚持斗争。1935年1月，闽浙赣苏区被敌全部占领，关英、唐在刚率余部由葛源转移到德兴、弋阳交界的磨盘山地区。5月，在优势敌军的“清剿”下，部队损失严重，余部转向皖浙赣边的鄣公山，同在当地活动的皖南独立团会合。与此同时，皖赣独立师一部和地方游击队共400余人，在赣东北彭泽、湖口、都昌、鄱阳（波阳）和皖南祁门一带开展游击战争。皖赣独立师另一部在同红十军团失散部队一部会合后，共约300余人，转到皖南贵池、秋浦（东至）、东流

地区。此外，在皖南泾县、旌德、宁国、宣城和开化、婺源、休宁地区各有一支游击队就地开展游击活动。1936年春，这些游击队在强敌进攻下受挫，先后转移到鄣公山地区。4月，中共闽浙赣省委扩大会议决定，将闽浙赣省委改为皖浙赣省委；将皖浙赣边30余县游击区划分为赣东北、皖赣、上浙皖、下浙皖和浙皖5个特区，分别成立特委，各领导1个独立营坚持游击战争；以皖南独立团为基础，加上其他部队，组成皖浙赣独立团，共800余人，扩大以鄣公山为中心的游击根据地。至此，结束了一年多来的分散坚持斗争的局面。到1936年底，皖浙赣边游击武装发展到近3000人。

浙南游击区：1935年2月，红十军团突围出来的部队共500余人，组成挺进师。3月下旬，在师长粟裕、政治委员刘英的率领下，由闽浙赣苏区进到闽浙边区游击活动。经过5个多月的艰苦斗争，在浙西南江山、浦城、龙泉、遂昌、松阳（今属遂昌）5县边区建立了游击根据地，部队发展到近千人。10月底，浙西南游击根据地被敌占领。1936年6月，挺进师乘敌正规军他调，广泛出击。至年底，恢复了浙西南游击根据地，并开辟了浙南、浙东游击根据地，部队发展到1600余人。

闽北游击区：1934年11月，红五十八团、闽北独立团、西南独立团、广（丰）浦（城）独立团和各县游击队在闽北坚持斗争。1935年1月，闽北苏区被敌占领。以黄道为书记的中共闽北分区委率领部队转移到武夷山区，合编为闽北独立师，共约2000人。随后，在崇安、浦城和资溪、光泽、邵武等地区开展游击战争。1936年春，进入闽东北的独立师一部开辟了以迪口为中心的游击根据地。2月，独立师主力进至闽浙边洞宫山地区，同在当地坚持斗争的闽东独立师会合，打通了两个游击区的联系。4月，中共闽赣省委成立，统一领导两地区的游击战争。随后，闽北独立师和闽东独立师仍分别在本地区游击活动。到1936年底，闽北游击区扩大到10余县，部队发展到3000余人。

闽东游击区：1934年10月，中共闽东特委以中国工农红军抗日先遣队留下的伤病员和闽东独立第二、第十三团为基础，组成闽东独立师，冯品泰任师长，叶飞任政治委员，共1000余人。1935年春，闽东苏区被敌占领，独立师遭受很大损失。5月，叶飞、阮英平等重建中共闽东特委。独立师3个纵队分别在宁德、罗源、古田、福安、福鼎、霞浦和平阳地区开展游击战争。至1936年冬，建立了福（安）寿（宁）、霞（浦）（福）鼎、古（田）屏（南）宁（德）、（福）鼎平（阳）等4块游击根据地。

闽中游击区：1935年5月，中共闽中特委（后改称闽中工委）成立，王于洁（吴梅）任书记，独立地领导闽中游击队在福清、莆田、仙游、永泰、闽侯（福州）、长乐地区开展游击战争，开辟了以常太为中心的莆（田）仙（游）永（泰）边和以罗汉里为中心的福（清）莆（田）永（泰）边两个游击根据地。1936年5月，中共闽中特委将闽中工农红军游击队第一支队和第二支队合编为闽中抗日义勇军第二支队，吴德标任司令员，刘突军任政治委员，由山区转向平原沿海敌后地区开展斗争。

鄂豫皖边游击区：红二十五军长征后，留在鄂豫皖边区的红军第二一八团和鄂东北独立团等部，于1935年2月合编为红二十八军，高敬亭任政治委员（未设军长），共1300余人，在安徽太湖、宿松、潜山、霍山和河南英山一带开展游击战争，着手建立游击根据地。与此同时，中共皖西特委率红军第二四六团在霍山、舒城、潜山、英山地区开辟了游击根据地；中共鄂东北道委领导的部队也积极活动，组建了1个独立团；在中共豫东南特委领导下，豫东南地区的游击战争也逐步开展起来。1936年2月，红二十八军以营为单位，分散在鄂豫皖山区与平原广泛发展游击战争，打破了国民党军队的“清剿”。经过近一年的作战，鄂豫皖边游击区扩展到45个县的地域。

鄂豫边游击区：红二十五军长征后，中共鄂豫边工委（后为鄂豫边省委）经过一年多的艰苦工作，于1936年1月组建了一支游击队，周骏鸣任队长，张星江任指导员，在桐柏山区开展游击活动，在信阳、确山两县边界建立了活动基点。5月，敌进攻鄂豫边游击区，游击队化整为零，分散活动。9月，以王国华为书记的新省委成立后，游击队深入群众，建立秘密的党和群众组织。至1937年初，游击队重新得到了发展，鄂豫边游击区发展到纵横约100余公里的范围。

湘鄂赣边游击区：1934年8月，湘鄂赣苏区的红十六师在配合中央红军第五次反“围剿”作战中受到严重损失，余部在中共湘鄂赣省委书记陈寿昌、湘鄂赣省军区司令员徐彦刚领导下，转移到以黄金洞为中心的平江、浏阳、铜鼓边界地区坚持斗争。不久，中共湘鄂赣省委副书记傅秋涛等率领在崇阳、通山一带活动的地方部队也转移到黄金洞地区，全部编入红十六师，徐彦刚任师长，方步舟任政治委员。1935年春，红十六师向鄂南地区进击。至5月，部队

发展到5000余人。7月，敌调集60多个团的兵力突然进犯湘鄂赣边区。部队在突围中遭受重大损失，徐彦刚不幸牺牲。11月，傅秋涛等率余部1000余人先后返回平江地区坚持斗争。1936年3月，红十六师挺进到南浔铁路以西地区开展游击战争。至年底，红军保存有黄金洞、九宫山、冷水坪等几小块游击根据地。

湘赣边游击区：1934年8月，红六军团西征时，留在湘赣边苏区坚持斗争的5个独立团和各县游击队，共有5000余人。在掩护红六军突围中，部队损失严重。不久，苏区全部被敌占领，各独立团和游击队被敌隔断，分散各县隐蔽活动。1935年7月，原湘赣工农民主政府主席谭余保联络40多个游击队干部，在江西莲花棋盘山举行会议，组建了中共湘赣临时省委和游击司令部，谭余保任书记兼政治委员，统一领导湘赣边区的斗争。会后，将部队编为两个支队，分别在酃县、茶陵、攸县、醴陵地区和永新、莲花、萍乡、宜春、安福地区进行游击活动。至1935年底，开辟了莲花、安福两县边界游击根据地。1936年，湘赣边地区的敌正规军调走，红军游击队适当集中出击，先后攻克安福、油田、官田等城镇，部队也有了发展。

湘南游击区：1934年8月，红六军团西征途经湘南时，留下独立第四团，在中共湘南特委领导下坚持斗争。11月，国民党粤军3个师及湖南保安团对红军游击队进行"清剿"，部队遭受严重损失。1935年3月，独立第四团团长李宗保叛变投敌，该团第一营营长李林组建湘南红军独立大队，在宜章骑田岭山区坚持游击活动。与此同时，由刘后总、谢竹峰等领导的湘南赤色游击队第三大队，在耒阳、安仁、永兴、常宁等地坚持斗争。

琼崖游击区：1932年冬，广东琼崖地区的红军独立师在敌人进攻下失败，苏区被敌占领。1933年夏，中共琼崖特委书记冯白驹率余部由母瑞山区转移到琼山云龙地区，分散各县恢复工作。1936年春，成立了琼崖工农红军游击大队，朱运泽（朱克平）为司令员，王白伦为政治委员，坚持游击战争。同时，在琼山、澄迈、临高、儋县、乐万、琼东、文昌等地恢复了一些共产党组织，部队也有所发展。

南方各苏区的红军和游击队在极艰苦的条件下，坚持3年之久的游击战争，挫败了优势敌人的多次"清剿"，钳制了大量国民党军队，在战略上配合了红军主力的长征，扩大了中国共产党在南方8省的政治影响，推动了抗日救国运动的发展，保存了一支经过严峻考验的武装队伍，保持了中国革命在南方的战略支点，为中国革命战争做出了重大贡献。

（陈绍畴）

陕甘革命根据地的开辟

1934年11月，刘志丹、谢子长等在陕西北部和陕西、甘肃边界地区建立的革命根据地，亦称陕北革命根据地。

1927年10月，唐澍、白乐亭、谢子长等在陕北清涧领导武装起义。1928年春，中共陕西省委决定发动渭南、华县农民和部分西北军部队举行武装起义。4月底，刘志丹、唐澍等率领西北军新编第三旅举行起义，由潼关开往华县，成立西北工农革命军，唐澍任总司令，刘志丹任军事委员会主席。5月初，在中共陕东特委和中共渭南、华县两县委的组织领导下，以及西北工农革命军的支援下，渭南、华县万余农民举行起义。6月，起义军因遭到优势敌军的进攻而失败，保留下来的部分革命力量转入隐蔽斗争。1930年下半年，刘志丹等在甘肃合水县南梁地区成立了游击队。10月，阎红彦领导的晋西游击队转战到陕北，改为红军陕北支队，于10月间与南梁游击队会合。1931年1月，两支游击队改编为西北工农反帝同盟军，谢子长任总指挥，刘志丹任副总指挥。1932年2月，西北工农反帝同盟军扩编为陕甘游击队，谢子长任总指挥，李杰夫任政治委员。12月，陕甘游击队改编为红二十六军第二团。这时，建立了以薛家寨为中心的照金革命根据地。1933年8月，陕甘边红军临时总指挥部成立，王泰吉任总指挥，高岗任政治委员。11月，临时总指挥部撤销，所属部队改编为红二十六军第二十四师，王泰吉任师长，高岗任政治委员，开辟了以南梁为中心的陕甘边根据地。1934年1月，建立了以习仲勋为主席的陕甘边革命委员会。从1933年5月至1934年4月，陕北游击战争迅速发展，成立了陕北游击队，下辖6个支队，在延川、神府（神木、府谷）、佳县、吴堡、清涧、绥德等地区，建立了一些小块根据地。6月，陕北红军粉碎了敌人的第一次"围剿"。7月成立了陕北游击纵队总指挥部，谢子长任总指挥，郭洪涛任政治委员。11月，陕甘边苏维埃政府成立，习仲勋为主席。同时，成立了陕甘边革命军事委员会，刘志丹任主席。这时，红军已发展到1500余人。在陕北，1932年2月，刘善忠、高郎亭在中共延川县委领导下组建了延川游击队。10月，改编为中国工农红军陕北游击队第九支队。1933年4月，又改为第一支队。7月，以马明方为首的陕北特委陆续创建了第二、三支队。1934年1

月，中央驻北方代表派谢子长回到陕北，任驻西北军事特派员，协助陕北特委加强对陕北游击队的领导。之后，组建了红二十七军第八十四师，杨琪任师长，张达志任政治委员。1935年1月，陕北省苏维埃政府成立，刘志丹任主席(后为马明方)。2月，成立了以惠子俊为书记的中共西北工作委员会和以谢子长为主席的西北革命军事委员会，统一了对陕甘边和陕北革命根据地的领导。7月，粉碎了陕、甘、宁、晋4省国民党军的"围剿"后，解放了延川、延长、安塞、保安、安定、靖边等县，陕甘根据地和陕北根据地连成一片，有近20余个县的地区，人口90余万。1935年10月，中共中央率红一方面军主力到达陕北后，它成为革命的中心根据地。　(林健柏)

遵义会议召开

1935年1月15日至17日，中共中央在贵州遵义召开的具有伟大历史意义的政治局扩大会议。

在红军长征途中，中共中央于1935年1月15日至17日在贵州遵义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出席会议的有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毛泽东、朱德、陈云、周恩来、张闻天、秦邦宪，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王稼祥、邓发、刘少奇、何克全。还有中央秘书长邓小平，红军总部和各军团负责人刘伯承、李富春、林彪、聂荣臻、彭德怀、杨尚昆、李卓然。共产国际派来的军事顾问李德及担任翻译工作的伍修权也列席了会议。这次会议集中全力解决当时具有决定意义的军事上和组织上的问题，着重总结红军第五次反"围剿"和长征以来军事指挥上的经验教训。秦邦宪在会上作关于反对敌人第五次"围剿"的总结报告，为导致第五次反"围剿"失败的错误军事领导进行辩护。接着，周恩来作副报告，批评了秦邦宪、李德在军事指挥上的错误，并作了自我批评。毛泽东在会上作了重要发言，对错误军事路线进行了切中要害的分析和批评，正确阐述了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指明了今后正确的方向。张闻天、王稼祥、朱德、刘少奇等多数同志发言，支持毛泽东的正确意见。会议委托张闻天起草《中共中央关于反对敌人五次"围剿"的总结决议》，后由中央常委审查通过。决议明确指出，红军第五次反"围剿"的失败以及退出苏区后遭到的严重损失，其主要原因是秦邦宪和李德在军事指挥上犯了一系列严重错误。在敌大我小、敌强我弱的条件下，我们的战略路线应该是决战防御(攻势防御)，集中优势兵力，选择敌人的弱点，在运动战中，有把握地去消灭敌人的一部或大部，以各个击破敌人，彻底粉碎敌人的"围剿"。然而在反对第五次"围剿"战争中，却以单纯防御路线(或专守防御)代替了决战防御，以阵地战堡垒战代替了运动战，并以所谓"短促突击"的战术原则来支持这种单纯防御的战略路线。在战略转变和实行突围的问题上，同样是犯了原则上的错误。决议肯定了毛泽东等关于红军作战的基本原则。会议决定改组中央领导机构。增选毛泽东为中央政治局常委，撤销秦邦宪、李德的最高军事指挥权，仍由中央军委主要负责人朱德、周恩来指挥军事，而周恩来为党内委托的对于指挥军事下最后决心的负责者。会后，在行军途中，根据会议精神，中共中央常委进行分工，由张闻天代替博古在党内负总的责任。3月4日，中革军委决定设置前敌司令部，以朱德为司令员，毛泽东为政治委员。3月11日，在贵州鸭溪、苟坝一带，成立由毛泽东、周恩来、王稼祥组成的三人小组，负责指挥红军的军事行动。遵义会议集中解决了当时最为紧迫的军事问题和中央领导机构问题，结束了以王明为代表的"左"倾冒险主义在中共中央的统治，确立了以毛泽东为代表的正确路线在中共中央和红军中的领导地位。这次会议，是中国共产党独立自主地运用马克思列宁主义基本原理解决自己的路线、方针和政策的会议。它在极端危险的时刻，挽救了党和红军，是中国共产党历史上一个生死攸关的转折点，标志着中国共产党从幼年达到成熟。

(陈绍畴)

反对张国焘分裂主义的斗争

1935年至1936年在红军长征途中，中国共产党反对张国焘分裂党和红军的活动的斗争。

1934年11月，红四方面军在四川巴中清江渡召开会议，确定向西进攻、在川陕边界扩大根据地的方针。遵义会议后，1935年1月22日，中共中央电告张国焘令红四方面军向西进攻，以策应中央红军渡江北上。3月底，红四方面军主力经过激烈战斗，渡过敌军严密封锁的嘉陵江，控制了平武、北川等广大地区。但张国焘却于4月擅自放弃川陕根据地，渡过涪江。5月初，红四方面军5个军，共8万余人，先后撤出彰明、中坝、青川、平武等地，向岷江地区西进，开始长征。6月12日，红四方面军一部到达四川懋功(小金)东南达维镇，与红一方面军先头部队胜利会师。中共中央根据红军两大主力会师后的形势，提出北上建立川陕甘根据地的战略方针。这时，红四方面军有8万余人，而红一方面军只有3万人左右。张国焘自恃掌握的兵力多，个人野心大大膨胀，不赞

成中央的方针，提出红军西进青海、新疆或暂时向南进攻的主张。6 月 26 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在两河口召开会议，否定了张国焘的错误主张，指出今后的战略方针是向北发展，在岷山以北建立川陕甘革命根据地，并要求把部队指挥权集中于中革军委。张国焘口头上表示同意北上的方针，但返回红四方面军后，在杂谷脑召开的干部会议上，散布对中央的不满情绪，对中央派来的慰问团实行封锁，借口“统一指挥的组织问题”没有解决，要求改组中革军委和红军总司令部，故意拖延红四方面军的北上行动。中共中央拒绝了张国焘的无理要求，但为了有利于党和红军的团结，于 7 月 18 日任命张国焘为红军总政治委员。此后，张国焘才开始调动红四方面军主力北上。8 月 3 日，红军总部制定进军甘肃南部的《夏(河)洮(河)战役计划》，将红军分为左、右两路军北上。张国焘不执行沙窝会议的北上战略方针，极力排斥坚决拥护北上方针的朱德、刘伯承。8 月 20 日，中共中央在毛儿盖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批评了张国焘企图使红军主力西渡黄河，深入青海、宁夏、新疆偏僻地区的错误主张，指出这是“一个危险的退却方针”。会后，中共中央、中革军委决定红一、红四方面军混合编为左、右两路军北上。8 月 21 日，徐向前、陈昌浩、叶剑英率右路军从毛儿盖出发，越过茫茫草地，于 8 月下旬到达四川班佑、巴西、阿西地区，等待左路军前来会合。9 月 9 日，随左路军行动的张国焘坚持“乘势南下”的主张，背着中共中央电令右路军政委陈昌浩率右路军南下，企图分裂和危害中共中央。右路军参谋长叶剑英看到电报，立刻报告毛泽东。毛泽东、周恩来、张闻天、秦邦宪紧急磋商，决定率红一、红三军和军委纵队先行北上，并发表《中央为执行北上方针告同志书》，指出“南下是绝路”。当时红四方面军有的干部不明真相，主张武力阻拦。红四方面军总指挥徐向前坚决制止这种行动，维护了红军的团结。9 月 12 日，中共中央在甘肃迭部俄界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会议一致同意中央已经采取的步骤和今后继续北上的战略方针，作出《关于张国焘同志的错误的决定》，严厉谴责了张国焘分裂党和红军的错误，再次指出“南下没有出路”。张国焘顽固地坚持其错误主张，于 9 月 13 日在阿坝召开活动分子会议，作出所谓《阿坝会议决议》，攻击中央领导，诬蔑中央北上战略方针是“右倾机会主义的逃跑路线”。9 月 15 日和 17 日，张国焘发布《大举南进政治保障计划》和南下命令。9 月下旬，红四方面军各部队和第五、第三十五军先后从阿坝和包座南下进到马塘、松岗、党坝一带。10 月 5 日，张国焘在四川理番县卓木碉(马尔康县足木脚)公然另立中共“中央”，自任“主席”。随左路军行动的朱德、刘伯承等坚持全党团结，在艰难的处境下与张国焘的分裂行为进行坚决斗争。1936 年 1 月 22 日，中共中央又作出《关于张国焘同志成立第二“中央”的决定》，责令他立即撤销另立的“中央”，停止一切反党活动。张国焘的反党分裂行为，在红四方面军中是不得人心的。南下川康边的部队在作战中虽然歼灭了许多敌人，但本身也伤亡很大，减员一半。2 月中旬，红四方面军在强敌围攻下，被迫撤离天全、芦山、宝兴地区，向西康东北部转移。到 4 月，只剩下 4 万余人。6 月 6 日，张国焘在炉霍宣布取消另立的“中央”。继而表示同意北上，准备向夏河、洮河西北行动。7 月 2 日，红四方面军在四川甘孜地区与任弼时、贺龙等领导的红二、红六军团(后编为红二方面军)会合。经过朱德、任弼时、贺龙等力争，并得到红四方面军许多指战员支持，红二、红四方面军共同北上。10 月 9 日，红四方面军指挥部到达会宁，与红一方面军会师。22 日，红二方面军指挥部在静宁以北将台堡同红一方面军会合。至此，红二、红四方面军胜利地完成长征。　(陈绍畴)

华北事变

1935 年日本帝国主义侵略华北和国民党政府出卖华北主权的一系列事件。

1935 年 1 月 4 日，日本关东军在大连举行会议，讨论对华侵略方针，要求中国充分履行《塘沽协定》，调整华北中日关系，实行中日提携。1 月 23 日，日本关东军借口国民党军队第二十九军步骑兵开驻热河丰宁大滩一带，以飞机、大炮轰击察东独石口以东长城附近的东栅子。2 月 2 日，中日代表就和平解决察东事件在大滩举行会谈，达成口头约定：日本即返回原防；第二十九军不“侵入”石头城子、南石柱子、东栅子之线及其以东的地域。之后，日本制造一系列事端，向国民党政府提出华北统治权的要求。5 月 2 日，天津日租界发生《国权报》社社长胡恩溥、《振报》社社长白榆桓被暗杀的“河北事件”。5 月 17 日，热河义勇军孙永勤部受日伪军压迫，撤入冀东遵化附近。5 月 29 日，日本驻华公使馆武官高桥坦、日本华北驻屯军参谋长酒井隆就这两个事件，向国民党政府军事委员会北平分会代委员长何应钦提出抗议，声称天津两报社长被杀是“中国排外行动”，“对日本的挑衅”，“与中国官厅不无关系”；孙永勤事件是“破坏《塘沽协定》行为”。认为“发动此等行动的根

据地是北平(北京)、天津。因此,日军不仅有必要再次越过长城线,而且实际上于平、津两地,也有必要包括在停战地区内"。接着,驻津日军连日在国民党河北省政府门前举行武装示威,并在天津举行巷战演习,从各方面施加政治压力,迫使国民党政府接受日方所提的要求。6月5日,日本关东军4名军人未携护照由多伦潜入察哈尔境偷绘地图,行至张北县北门,被中国驻军第二十九军第一三二师扣留。国民党第二十九军军长兼察哈尔省政府主席宋哲元为避免引起事端,下令将其释放。6月11日,日本驻张家口领事桥本、特务机关长松井源之助就张北事件向第二十九军副军长秦德纯提出要求:惩办直接负责人;第二十九军军长亲自道歉;保证不再发生同类事件,并限5日内答复,否则日军自由行动。同日,日本关东军指示沈阳特务机关长土肥原贤二和中国驻屯军及驻北平武官辅助官协商,要求宋哲元部撤至黄河以南。国民党政府为在谈判中争取主动,于6月18日免去宋哲元察哈尔省政府主席职,遗缺由该省民政厅厅长秦德纯兼代。6月23日开始,土肥原、高桥、松井到北平与秦德纯举行会谈,于6月27日签订《秦土协定》,主要内容是:一、将驻于昌平和延庆一线的延长线之东,并经独石口之北、龙门西北和张家口之北,至张北之南一线以北的宋哲元部队,调至其西南地区。二、解散排日机构。三、对日表示遗憾,并处罚负责人。四、从6月23日起,在两星期内完成以上各点。五、制止山东移民通过察哈尔省。7月6日,何应钦与日本华北驻屯军司令官梅津美治郎达成《何梅协定》。通过这些协定,日本攫取了中国河北、察哈尔两省的大部分主权。接着,日本加紧策动"华北五省自治运动",企图使河北、察哈尔、山西、绥远、山东脱离中国。9月24日,新任日本华北驻屯军司令官多田骏向日本记者散发他写的《日本对华之基础观念》小册子,宣称日本应当"在两国之间建立一个共存共荣的乐园,以推行日本帝国的对华政策",而"华北正是上述对华政策最易最速实施的地区"。并说:为彻底扫清华北反"满"抗日分子,实现华北经济独立,防止赤化,必须脱离南京政府,确立华北政治新机构,实行"华北五省联合自治"。之后,日本关东军和华北驻屯军分别在大连、天津召集会议,传达日本内阁通过的《关于对华政策方案》,在华北大肆煽动"自治"运动。10月18日,在日本驻天津特务机关长大迫通真策动下,汉奸武宜亭等在河北香河安抚寨召开"国民自救会",阴谋暴动。10月20日,又纠众千余人以反对苛捐杂税为名,围困香河县城,要求县长交权,由其另组"自治政府"。10月22日,日宪兵掩护汉奸武宜亭、安厚斋等闯入香河县城骚扰,安厚斋自封为县长,实行"自治"。香河事件后,河北安次、三河、永清、庆云等县先后发生日人策动的"自治"运动。11月11日,土肥原贤二携带《华北高度自治方案》抵北平,策动新任国民党平津卫戍司令宋哲元等于11月20日前联合华北5省,脱离南京国民党政府,宣布"自治"。这个方案的要点是:一、新政权名称为华北共同防共委员会;二、领域为华北5省2市;三、首领宋哲元,总顾问土肥原贤二;四、军事由最高委员会主持;五、财政截用中央在各省市的关税、盐税和统税;六、经济:开发华北矿业和棉业,使与日"满"结成一单位;七、金融:脱离法币制度,另定5省通用货币,与日元发生联系;八、信仰:同时扑灭三民主义和共产主义,奉行东洋主义;九、政治:保留南京的宗主权;十、外交政策:亲日反共。同日,日本关东军司令官南次郎为强制推行华北自治做军事后盾,发布作战命令,令步兵、炮兵于11月13日集中山海关、古北口附近,做入侵华北的准备,又令旅顺口、青岛的舰只驶大沽。鉴于华北局势紧张,国民党政府派军事委员会参谋本部参谋次长熊斌抵北平,向宋哲元等传达中央应付日本计划,劝宋等切勿自作主张。同时,调动部队在南京附近进行特别大演习,并令其一部北上佯动。11月18日,日本政府电其驻华大使有吉明向蒋介石提出"准许华北某种自治"要求,并扬言对中央军北上"决不默视"。11月20日,蒋介石会见有吉明,要日方抑制华北自治运动,表示愿以实行"广田三原则"作为交换条件。11月24日,在日本策动下,河北省滦榆区行政督察专员殷汝耕在通县发表宣言,宣布冀东停战区"脱离中央政权","自治独立",成立"冀东防共自治委员会"(12月25日改称"自治政府"),殷汝耕任委员长(后改称政务长官),辖冀东22县。这是日本帝国主义在关内扶植的第一个伪政权。迫于日本压力,国民党政府于11月26日明令发表:一、撤销军事委员会北平分会;二、特派何应钦为行政院驻北平办事长官;三、特派宋哲元为冀察绥靖主任;四、令河北省政府将滦榆区专员殷汝耕免职拿办;五、撤销滦榆、蓟密两区行政督察专员公署;六、宋哲元、商震等负责维持地方治安。同日,国民党中央电示冀、平、津军政当局:一、对冀东脱离中央行动绝不承认;二、注意不因此事引起战区纠纷;三、在可能范围内对殷汝耕行动加以注意。这时,日本继续向国民党政府和宋哲元施加政治、军事压力,推进华北"自治"。11月27日,

日本驻南京总领事须磨弥吉郎访国民党政府行政院副院长孔祥熙，对中国政府关于华北的措施表示不满，并称：中国政府拿办殷汝耕，将使日本政府不得不采取措施，事态将陷于恶化。日军随即入关，强占丰台车站和天津东局子机场，并续开长城各口。蒋介石既不允许华北5省脱离南京政府而宣布“自治”，又慑于日本的武力威胁，于11月30日与行政院等5院院长商决《华北自治办法》，并派何应钦等据此与宋哲元共商处理华北问题。12月3日，何应钦、熊式辉、陈仪抵北平，与宋哲元、肖振瀛、秦德纯会商应付华北时局对策。为适应日本关于华北政权特殊化的要求，于12月5日抛出设立“冀察政务委员会”的方案，经征得日本方面土肥原贤二、多田骏、酒井隆等同意，并电请南京国民党政府照准。12月11日，国民党政府特派宋哲元、万福麟、王揖唐、刘哲、李廷玉、贾德耀、胡毓坤、高凌蔚、王克敏、肖振瀛、秦德纯、张自忠、程克、周作民、门致中、石敬亭、冷家骥等17人为冀察政务委员会委员，指定宋哲元为委员长，负责处理河北、察哈尔两省及北平、天津两市一切政务。冀察政务委员会原定12月16日成立，因慑于北平学生示威游行，改于12月18日正式成立。它名义上隶属于南京国民党政府，但实际上却具有相当大的独立性，日本帝国主义和汉奸亲日势力对它有很大的影响和控制力。　　（陈绍畴）

《新生周刊》事件

1935年6月，上海《新生周刊》编辑兼发行人杜重远因该刊登载爱国文章被国民党政府判刑治罪的事件。

杜重远（1897—1943），吉林怀德人。1934年2月10日在上海创办进步刊物《新生周刊》，任编辑兼发行人。该刊坚持“一贯反帝立场”，发表文章揭露日本帝国主义的侵华暴行和国民党的不抵抗政策。1935年5月4日出版的该刊第2卷第15期刊载易水（艾寒松）写的《闲话皇帝》一文。文中说：现在世界上还存在着不少的皇帝，“他们差不多都是有名无实”，是“古董”，是“傀儡”。日本的统治者要保留天皇，“就是企图用天皇来缓和一切内部各阶层的冲突和掩饰了一部分人的罪恶”。在此之前，蒋介石、汪精卫多次发表谈话，大谈“敦友睦邻之道”，以谋“中日亲善”之实现。6月10日，国民党政府发布《睦邻敦交命令》，内称：“凡我国民，对于友邦，务敦睦谊，不得有排斥及挑拨恶感之言论行为，尤不得以此目的，组织任何团体，以妨国交。兹特重申禁令，仰各切实遵守，如有违背，定予严惩。”日本借口《新生周刊》发表文章“侮辱天皇，妨害邦交”，挑起事端。6月24日，日本驻上海总领事石射猪太郎向上海市政府和南京国民党政府提出严重抗议，要求国民党政府向日谢罪；封闭《新生周刊》社，没收该期周刊；惩办该刊编辑杜重远及《闲话皇帝》一文作者；惩办中央图书杂志审查委员会有关人员等。国民党政府一一允诺。当日，上海市公安局以“触犯刑章”、“妨碍邦交”罪名，迫令《新生周刊》停刊。6月25日，上海市市长吴铁城向日方道歉。7月1日，国民党上海江苏高等法院第二分院传讯杜重远。杜当庭申明《新生周刊》依法登记，每期稿件都经中央图书杂志审查委员会审查批准，编者不能负责。法官无词以对，令杜交保500元出院。次日，日本驻华大使有吉明邀国民党政府外交部次长唐有壬到其私宅晤谈，传递日本外务省训令，声称事件直接责任者吴铁城对此事处置予以谅解，对国民党部的处置作严重抗议。国民党政府屈服于日本的压力，于7月5日下令撤上海市公安局局长蔡劲军职。7月7日，国民党中央宣传委员会电令各省市党部转饬当地出版界及各报社、通讯社：“《新生周刊》刊载对日本皇室不敬文字，引起反感”，嗣后对此类记载或评论，务须严行防止。并要求各地切实遵守《睦邻敦交命令》，取缔反日运动。次日，国民党中央宣传委员会主任委员叶楚伧对中央社记者郑重负责声明：国民党对中日关系所取之态度，与蒋、汪两先生之政策完全一致，对于中日间任何问题，均愿以诚恳和平之态度，谋圆满之解决。同时宣布：对中央图书杂志审查委员会负责审查人员项德言等7人撤职；此后各书店不准再代售《新生周刊》。7月9日，江苏高等法院第二分院再次开庭审理《新生周刊》案，以“诽谤友邦元首罪”，判处杜重远有期徒刑1年两个月，没收《新生周刊》第2卷第15期，并不得上诉。当庭将杜收押。宣判下达时，法庭内外群情激奋，高呼抗日口号，散发传单。上海各界还组织了“《新生》事件救援会”，支援、慰问狱中的杜重远。　　（陈绍畴）

《何梅协定》签订

1935年7月6日，国民党政府军事委员会北平分会代理委员长何应钦与日本华北驻屯军司令官梅津美治郎达成的丧权辱国的协定。

1935年5月，日本帝国主义开始在华北制造事端，向国民党政府提出对华北统治权的要求。6月上旬，国民党政府为满足日本的要求，将北平军分会政

治训练处处长曾扩情、宪兵第三团团长蒋孝先撤职；将天津市市长张廷谔免职，由王克敏接任，王未到任前，由天津警备司令商震兼代市长；调河北省政府主席于学忠任川陕甘边区"剿匪"总司令，遗缺由省政府民政厅厅长张厚琬代理；将第五十一军于学忠部调离河北；严令平、津军政宪警机关取缔有害中日邦交的秘密结社和团体。6月9日，国民党政府军事委员会北平分会委员长何应钦(1889—1987，贵州兴义人)会晤日本华北驻屯军参谋长酒井隆、日本驻华公使馆武官高桥坦称："日本希望各点已完全办到"，中日必须亲善提携，才能维持东亚和平，这是中央既定方针。日方表示不满足，又提出更苛刻的要求：一、撤销河北省内(包括铁路)一切国民党党部；二、撤走国民党军队第五十一军，并将该军离开河北日期告知日方；三、中央军第二师、第二十五师必须调离河北省；四、禁止全国排日行为。并声称"绝无让步可言"，必须在6月12日午前答复。同日，日本华北驻屯军司令官梅津美治郎致备忘录于何应钦，主要内容为：中国政府取消在河北省的党政机关；撤退驻河北的中央军及东北军；撤换日方指定的军政人员；禁止一切抗日活动；日方监视实施等，并限期3天答复。6月10日，何应钦根据国民党中央政治会议主席、国民党政府行政院院长汪精卫关于对日方要求处理意见，约见高桥坦，面告中国政府全面承诺日军要求的决定，并说明河北省党部即日起结束、中央军已决定他调、五十一军已开始移动等。6月11日，高桥坦将日方拟定的中国答复日本的备忘录文稿送何应钦，要求照缮盖印。其主要内容是中国方面对于日本军曾经承认实行的事项如下：一、罢免于学忠、张廷谔；二、罢免蒋孝先、丁昌、曾扩情、何一飞；三、撤去宪兵团第三团；四、解散北平军分会政治训练处及北平《军事杂志》社；五、取缔日本方面所谓蓝衣社、复兴社等有害中日两国国交的秘密机关，并不容许其存在；六、撤退河北省内一切国民党党部，撤废励志社北平支部；七、第五十一军撤退河北省外；八、第二十五师撤退河北省外，解散第二十五师学生训练班；九、禁止中国内一般排外排日。7月6日，何应钦经请示国民党政府行政院同意后，复函梅津美治郎，内称："6月9日酒井参谋长所提各事项均承诺之，并自主的期其遂行。"这一信函，习惯上被称作《何梅协定》。这个协定虽未签字，但事实上构成了法律上的承诺，成为日本帝国主义侵略华北的依据。

（陈绍畴）

八一宣言发表

1935年8月1日，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和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政府发表《为抗日救国告全体同胞书》。

1935年7月25日至8月20日，共产国际在苏联莫斯科召开第七次代表大会，明确提出建立广泛的反法西斯统一战线和反帝人民统一战线的策略任务。大会认为，中国苏区是为反对帝国主义者奴役和瓜分中国而斗争的团结核心，是集合一切反帝力量进行中国人民民族斗争的团结核心。赞同中国共产党同中国一切决心真正救国救民的有组织的力量结成反对日本帝国主义及其走狗的广泛的反帝统一战线。8月1日，中国共产党驻共产国际代表团以中国苏维埃中央政府和中共中央的名义发表《为抗日救国告全体同胞书》，简称八一宣言。宣言分析了九一八事变以来的国内政治形势，指出日本帝国主义的加紧进攻，国民党政府步步投降，继东北之后，华北各省已实际沦亡，国家民族已处在千钧一发的生死关头。抗日则生，不抗日则死，抗日救国已成为每个同胞的神圣天职。宣言向全国同胞呼吁："无论各党派间在过去和现在有任何政见和利害的不同，无论各界同胞间有任何意见上或利益上的差异，无论各军队间过去和现在有任何敌对行动，大家都应当有'兄弟阋于墙外御其侮'的真诚觉悟，首先大家都应当停止内战，以便集中一切国力(人力、物力、财力、武力等)去为抗日救国的神圣事业而奋斗。"宣言号召一切愿意参加抗日救国事业的各党派、各团体、各名流学者、政治家，以及一切地方军政机关进行谈判，共同成立全中国统一的国防政府；一切愿意抗日的部队联合组织抗日联军。宣言还提出十大方针作为国防政府的施政纲领：一、抗日救国，收复失地；二、救灾治水，安定民生；三、没收日寇在华一切财产，充作对日战费；四、没收汉奸卖国贼财产、粮食、土地，交给贫苦同胞和抗日战士享用；五、废除苛捐杂税，整理财政金融，发展工农商业；六、加薪加饷，改良工农军学各界生活；七、实行民主自由，释放一切政治犯；八、实行免费教育，安置失业青年；九、实行中国境内各民族一律平等政策，保护侨胞在国内外生命、财产、居住和营业的自由；十、联合一切反对帝国主义的民众做友军，联合一切同情中国民族解放运动的民族和国家做同盟。9月中旬，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指示在美国的中共组织将八一宣言印发，并通过各种途径传到国内。八一宣言的发表，得

到全国各阶层人民的响应，对推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工作和抗日救亡运动，起了积极的作用。

（陈绍畴）

国民党政府实施法币政策

1935年11月，国民党政府宣布废除银本位制，实行法币政策的经济改革措施。

国民党政府成立后，中国币制紊乱，多种不同的银两、银元、铜币及形形色色的纸币并行流通，严重阻碍商品交换和贸易发展。1928年6、7月间，国民党政府召开全国经济会议和财政会议，决议从速实行废两改元，以期统一币制。1932年7月，财政部邀聘上海中外金融界人士组织废两用元研究委员会，经研究决定自1933年3月10日起，先在上海施行，凡公私款项及一切交易，均按一定比率用银币收付，不得再用银两。接着，财政部拟具《银本位币铸造条例》，呈经国民党政府批准于1933年3月公布施行，并令中央造币厂同时开铸。该条例规定，本位币为元，总重26.6971公分，银88，铜12，每元含纯银23.493448公分。4月，财政部发布《废两改元的训令》，规定自4月6日起，一律实行废两，所有公私款项的收付，订立契约票据及一切交易，须一律改用银币，不得再用银两。7月1日，中央造币厂新铸的中山银元上市。至此，中国银本位制正式确定。银两的废止，简化了币制，促进了商品流通和经济发展。但中国白银少，使用银本位，极易受国际市场白银价格的影响。8月，美国宣布白银国有政策，放弃金本位，货币准备金改为“金三银一”。1934年5月，美国实施购银法案，高价收购白银，国际市场银价大涨，导致中国白银大量外流。自7月至10月中旬，中国白银出口额竟达2亿元之多，造成金融紧缩，银根奇紧，物价跌落，入超严重，商业萧条。10月25日，国民党政府明令征收白银出口税及平衡税，规定本位币出口征税10%，减去铸费，净征7.75%；大条宝银及其他银类除原征出口税2.25%外，加征7.75%，合为10%。这一措施仍未能遏止白银外流。为摆脱经济困境，国民党政府决定实行币制改革。当时，英、美等帝国主义国家争夺对中国货币的控制权。英国派李滋·罗斯（Leith　Ross，1887—？）来华，担任国民党政府财政顾问，帮助制订币制改革方案。11月3日，国民党政府颁布《紧急法令》，宣布废止银本位制，实行法币政策。其要点是：一、自1935年11月4日起，以中央、中国、交通3银行（1936年增加中国农民银行）所发行的钞票定为法币，所有完粮纳税及一切公私款项的收付，概以法币为限，不得行使现金，违者全数没收。二、中央、中国、交通3银行以外曾经财政部核准发行的银行钞票，现在流通者准其照常行使，其发行数额截至11月3日止流通的数额为限，不得增发，由财政部酌定限期，逐渐以中央钞票换回，并将流通数额的法定准备金，连同已印未发的新钞，及已发收回的旧钞，悉数交由发行准备管理委员会保管。其核准印制中的新钞，并俟印就时一并照交保管。三、法币准备金及其发行收换事宜，设发行准备管理委员会办理。四、凡银钱行号商店及其他公私机关或个人，持有银本位币或其他银币生银等类者，应自11月4日起，交由准备管理委员会或指定的银行兑换法币。除银本位币按照面额兑换法币外，其余银类各依其实含纯银数量兑换。五、旧有以银币单位订立的契约，应各照原定数额于到期日概以法币结算收付。六、为使法币对外汇价按照目前价格稳定起见，应由中央、中国、交通3银行无限制买卖外汇。法币本身无法定的含金量，也不能兑换银币，但它以外汇为本位，信用由外汇的价格决定，是一种金汇兑本位制。按当时的国际汇价，以法币1元合英镑1先令2便士半为比率。法币与英镑发生固定的等价联系，被纳入英镑集团。美国对此不肯罢休，便采取停止在伦敦购银、降低银价的办法，向国民党政府施加压力。由于中国靠出卖白银换取美元做法币的外汇准备金，这就直接影响法币准备金的来源和汇价的稳定。1936年5月，国民党政府与美国政府签订《中美白银协定》，规定由美国继续收购中国白银，银价略高于国际市场，价款以美元交付，使中国获得美元与黄金来调整对外汇兑；中国不得向其他国家出售白银，以防银价涨跌；法币与美元发生固定的等价联系，以法币1元合美元0.295元。这样，法币成为英镑和美元的共同附庸。同月，国民党政府为谋金融的稳定及增加法令的保障，又规定具体施行事项3点：一、政府为充分维持法币信用起见，其现金准备部分，仍以金银及外汇充之，其中白银准备至少应占发行总额的25%；二、政府为便利商民起见，即铸半元1元银币，以完成硬币的种类；三、政府为增进法币地位的巩固起见，其现金部分业已筹得巨款。法币政策公布之初，财政部即指派委员在上海成立发行准备管理委员会，委员人选多属商界及金融界领袖，并核准在天津、汉口、广州、西安、济南、长沙等处设立分会。关于接收各发行银行事项，其经财政部核准发行的总行在上海的中南等8行，以及总行在津、汉等4行，由该会指定中央、中

国、交通3行分别负责接收。至于各省银行，除陕西省银行、河南农工银行、浙江地方银行、湖北省银行等发行部分，业经中央、中国、交通3行接收外，其余各省银行或类似省银行的发行部分，概由中国农民银行接收。发行准备管理委员会自1935年12月起，依照财政部制定检查规定，每月至核定的发行银行检查法币准备金一次，并将检查结果公告全国。据1936年6月28日报告称：中央银行发行2.992亿余元，中国银行发行3.517亿余元，交通银行发行2.049亿余元，共计8.559亿余元。法币政策的实施，使以蒋介石、宋子文、孔祥熙、陈果夫、陈立夫四大家族为代表的官僚资本完成了对全国金融的垄断。他们公开合法地搜刮了民间大量存银，到1936年底，国民党政府收回的白银，除中央、中国、交通3行原有存银不计外，当不下3亿元。但由于统一了全国货币，有利于商品经济的发展和促进国内统一市场的形成。由于实行白银国有，稳定法币汇价，安定金融行市，有利于国内外贸易的发展和金融业的改造。由于采取货币减值的办法增加货币流通量，使物价回升，刺激了农业和工商业的发展。法币政策的实施，客观上对中国经济的复苏起了一定的积极作用。

（陈绍畴）

国民党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召开

1935年11月12日至23日，中国国民党在南京召开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

华北事变的发生，超出了国民党政府所能容忍的限度。国难严重，国民党内外要求“立息内争”的呼声日高。1935年11月，国民党在南京召开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出席大会的中央执行委员有103人，代表401人。11月12日，大会开幕，林森致开会词，于右任作主席团工作报告，孙科、张继分别代表中央执行委员会、监察委员会作党务报告。蒋介石先后作政治、外交报告，何应钦作军事报告。11月19日，蒋介石发表对外关系的讲演，声称外交方针为对本国求自存，对国际求共存。和平未到完全绝望之时，决不放弃和平；牺牲未到最后关头，亦决不轻言牺牲。这表明国民党中央对中日妥协仍抱有幻想，没有放弃这方面的努力。但蒋介石又说：和平有和平之限度，牺牲有牺牲之决心；若到了和平绝望的时期与牺牲的最后关头，则当听命党国，下最后之决心。提出将抱定最后牺牲之决心，而为和平最大之努力，期达奠定国家复兴民族之目的，作为国民党救国建国唯一之大方针。这反映了国民党政府与日本帝国主义之间矛盾的加深，及其可能修改对日政策的一些新动向。大会接受了蒋介石提出的外交方针，并授权政府，在不违背方针之下，政府应有进退伸缩之全权，以应此非常时期外交之需要。在内政方面，大会宣称“匪共暴行，荼毒生民，重为民族心腹之患者”，坚持“铲绝残余之赤匪”的反共方针。大会还授权第五届中央执行委员会决定宣布宪法草案及召集国民大会日期。大会通过了对于政治、军事、党务各报告等决议案。11月23日，大会闭幕，选举出中央执行委员120人，中央候补执行委员60人，中央监察委员50人，中央候补监察委员30人，并发表了宣言，提出关于建设国家挽救国难的10项措施，其中有“开宪治，修内政，以立民国确实巩固之基础”；“恢复民族自信，确立正当之对外关系，以保持国家独立平等之尊严”等。12月2日至7日召开的国民党五届一中全会，决定1936年5月5日公布宪法草案，11月12日召开国民大会。会议通过《关于今后党务工作纲领案》、《中央执行委员会组织大纲》，将中央政治会议改为中央政治委员会，为中央政治的最高指导机关，对中央执行委员会负责；中央常务委员会及中央政治委员会添设主席、副主席。全会选举胡汉民（1879—1936，广东广州人）、汪精卫、蒋介石、冯玉祥、丁惟汾、叶楚伧、孔祥熙、邹鲁、陈立夫等9人为中央常务委员会委员，胡汉民为主席，蒋介石为副主席。选举张人杰等25人为中央政治委员会委员，汪精卫为主席，蒋介石为副主席。全会通过国民政府主席及各院院长人选案：国民政府主席林森；行政院院长蒋介石，孔祥熙副之；立法院院长孙科，叶楚伧副之；司法院院长居正，覃振副之；考试院院长戴传贤，钮永建副之；监察院院长于右任，许崇智副之。会后，行政院作了改组。这反映了国民党内部蒋介石和汪精卫之间的矛盾进一步发展，以蒋介石为代表的亲英美势力得到了加强。（陈绍畴）

直罗镇战役

1935年11月20日至24日，红军在陕西鄜县（富县）直罗镇粉碎国民党军对陕甘根据地的第三次“围剿”的战役。

1935年7月，国民党军开始对陕甘革命根据地发动第三次“围剿”。陕甘红军第二十六军先在东线击溃敌人两个旅，将该线敌军主力赶到黄河以东。9月18日，原在鄂豫皖革命根据地的红军第二十五军，经陕南、陇东到达陕北延川永坪镇，与陕甘红二十六军、红二十七军会合，组成红军第十五军团，徐

海东任军团长，程子华任政治委员，刘志丹任副军团长兼参谋长，全军团共7000余人。9月26日，蒋介石在西安成立"西北剿匪总司令部"，自兼总司令，张学良任副总司令，代行总司令职权，统一指挥陕、甘、宁、青、晋5省军队。此时，东北军第六十七军1个师又两个团已进至肤施（延安），另两个师又1个团仍驻在洛川、鄜县（富县）、甘泉地区，兵力比较分散。10月1日，红十五军团在甘泉劳山设伏，歼灭东北军第一一〇师大部，俘2000余人，击毙师长何立中。接着红军主力南下，于10月25日进攻鄜县（富县）榆林桥守敌第一〇七师。次日，全歼该敌，俘团长高福元以下1800余人。10月底，红军陕甘支队由吴起镇经保安东进，于11月初到达甘泉地区，同红十五军团会师。陕甘支队恢复红一方面军番号，红十五军团列入红一方面军建制。这时，国民党"西北剿总"重新调整部署，以东北军第五十七军军长董英斌带5个师分两路进攻红军，东路1个师沿洛川、鄜县（富县）大道北上，西路4个师由甘肃庆阳、合水沿葫芦河向鄜县（富县）方面前进。红一方面军决定首先集中兵力歼灭沿葫芦河东进之敌一至两个师，再视情况转移兵力，各个歼灭敌人，以打破敌之"围剿"，并向洛川、中部（黄陵）、宜君、宜川、韩城以及关中、陇东一带发展。11月19日，东北军第五十七军1个师留守太白镇，主力沿葫芦河向直罗镇、鄜县（富县）前进，其先头第一〇九师进至直罗镇西北的黑水寺等地，军部及第一〇六、第一一一师进至张家湾东西地区。11月20日下午4时，敌第一〇九师在红军警戒部队节节抗击下被诱入直罗镇。当晚，红军将其包围。次日，将敌大部歼灭。红军以少数兵力围困敌第一〇九师残部，并阻击由鄜县（富县）西援之敌第一一七师，集中主力向西迎击由黑水寺增援之敌第五十七军主力又两个师。11月23日，敌沿葫芦河西撤，红军在追击中歼敌第一〇六师1个团于张家湾地区，余敌仓皇后撤。第一〇九师见待援无望，于当日向东突围被全歼。11月24日，红军攻占直罗镇。此役，红军共歼敌1个师又1个团，毙敌师长牛元峰，俘敌5300余人。直罗镇战役的胜利，打破了国民党军对陕甘革命根据地的第三次"围剿"，巩固了陕甘苏区，为中共中央把全国革命大本营放在西北，举行了奠基礼。

（陈绍畴）

中日关于"广田三原则"的外交谈判

1935年冬开始，国民党政府与日本政府就调整中日关系的"广田三原则"举行多次谈判。

1935年10月7日，日本外务大臣广田弘毅根据内阁通过的《关于对华政策方案》，向中国驻日本大使蒋作宾提出调整中日关系的3原则：一、中国取缔一切排日运动；二、承认伪"满洲国"，建立日"满"华经济合作；三、中日共同防共。声称"中国如能完全同意以上3点，日本就可逐步商议实行中国所提希望条件"。11月20日和22日，蒋介石两次会见日本驻华大使有吉明，提出以日本取消华北自治运动，中止自治宣言为条件，全面承认"广田三原则"，并称最近将派人赴日，推诚交换意见。11月至12月间，中日双方就"广田三原则"进行多次谈判。1936年1月21日，广田弘毅在日本议会演说，再次对"三原则"作解释，并声称中国政府"对以上三原则表示了赞成的意思"。次日，国民党政府外交部发表声明，说"国民政府既非全部承认三原则，亦非全然不承认"。3月16日至19日，国民党政府外交部部长张群与日本新任驻华大使有田八郎就调整中日外交关系问题举行了4次会谈。张群提出，调整中日邦交最正当的办法，应自东北问题谈起，第一步至少限度，也须先行设法消除妨碍冀察内蒙古行政完整的状态。日本方面不同意。中日交涉停顿。这时，国民党政府虽然还继续与日本搞妥协，但已不得不轻微地修改原来执行的对日政策。7月中旬，蒋介石在国民党五届二中全会上对国民党五大确定的外交方针作了解释，明确表示决不签订承认伪"满洲国"的协定，并说："假如有人强迫我们签订承认伪国等损害领土主权的时候，就是我们不能容忍的时候，就是我们最后牺牲的时候。"9月15日至23日，张群与日本驻华大使川樾茂举行3次会谈。日方要求华北设立特殊区域，共同防共；取缔排日；修改对日货的关税；解决日本航空运输；中国尽量聘用日本顾问等。中方则提出调整邦交的希望条款：一、取消上海、塘沽两停战协定；二、取消冀东伪组织；三、取缔华北走私；四、取缔日机自由飞行。会谈无结果。9月30日，日本方面认为中日局势无进步，盼蒋介石与川樾茂直接谈判。10月8日，蒋介石会见川樾茂，表示："中日间一切问题，应根据绝对平等及互尊领土主权与行政完整的原则，由外交途径，在和平友善的空气中从容协商。"10月19日至11月10日，张群与川樾茂又进行了4次会谈。日方要求两国订立共同防共协定，扩大防共地域等。中方坚持9月提出的4项希望条款。双方距离很大，会谈仍无结果。12月3日，川樾茂访晤张群，将一份据称内载中日交涉以来双方谈话要点的备忘录面诵后，递交张群。张以其内容与经过事实不

符，拒绝接收。至此，中日交涉停顿。12月11日，国民党政府外交部发言人发表谈话，答复日本外务省关于中日交涉的声明书各点，并称：“中国政府对于任何外国以任何借口，在中国领土内采取任何非法行动，断不容许，而必设法排除之。”　（陈绍畴）

一二九运动

1935年12月9日，北平（北京）学生数千人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举行的抗日救国示威游行。

华北事变后，民族危机空前严重。中国共产党发出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号召，推动了全国抗日救亡运动的高涨。处在国防最前线的北平学生，痛切感到“华北之大，已经安放不得一张平静的书桌了”。1935年春夏之交，中共河北省委特派员李常青抵北平，建立由彭涛等组成的中共北平临时工作委员会，指定周小舟负责中华民族武装自卫委员会北平分会的工作。在中共北平临时工作委员会的领导下，1935年11月18日，北平市大中学校学生联合会成立。随后，学联决定以请愿的方式，发动一次抗日救国行动。12月6日，北平15所大中学校发表宣言，反对华北“防共自治”，要求国民党政府讨伐殷汝耕，宣布对日本的外交政策，动员全国对敌抵抗，切实开放人民言论、结社、集会自由。这时，传来冀察政务委员会将于12月9日成立的消息。北平学联党团决定在这一天举行抗日救国请愿。12月7日，北平学联召开各校代表会议，议定请愿游行的集合时间、行动路线和口号等。会后，各校学生自治会紧张地进行动员和准备工作。12月9日，寒风凛冽，滴水成冰。在黄敬、姚依林、郭明秋等共产党员的组织和指挥下，参加抗日救国请愿游行的爱国学生涌上街头。走在队伍前列的是东北大学、中国大学、北平师范大学和市立女一中等校的学生。警察当局事先得知学生要请愿游行，清晨即下达戒严令，在一些街道要冲设了岗哨。清华大学、燕京大学等城外学生被军警阻拦，在西直门同军警发生冲突。上午10时许，城内一两千名学生冲破军警的阻拦，汇集到新华门前。他们高呼“停止内战，一致对外！”“打倒日本帝国主义！”“反对华北五省自治！”“收复东北失地！”“打倒汉奸卖国贼！”“武装保卫华北！”等口号，表达了全国人民抗日救国的呼声。各校临时推举董毓华、宋黎、于刚等12人为代表，向国民党政府军事委员会北平分会代委员长何应钦递交请愿书，提出6项要求：一、反对华北成立防共自治委员会及其类似组织；二、反对一切中日间的秘密交涉，立即公布应付目前危机的外交政策；三、保障人民言论、集会、出版自由；四、停止内战，立刻准备对外的自卫战争；五、不得任意逮捕人民；六、立即释放被捕学生。何应钦避而不见。请愿不成，群情激愤。各校代表当即决定改为示威游行。队伍由新华门出发，经西单、西四，然后奔向沙滩、东单，再到天安门举行学生大会。一路上，不时有冲出军警包围的法商学院、北平大学医学院、中法大学、北京大学等大中学校的学生加入游行行列，队伍逐渐扩大到五六千人。行进中，学生们向沿街的群众宣讲抗日救国的道理，散发传单，得到群众的鼓掌和支持。当游行队伍前锋到达王府井大街，后尾尚未走出南池子时，大批警察手执大刀、木棍、水龙，对付手无寸铁的爱国学生。爱国学生不畏强暴，队伍仍在继续前进。这时，警察打开水龙，冰冷的水柱喷射在学生们身上，接着又挥舞皮鞭、枪柄、木棍殴打。学生们与军警展开英勇的搏斗，有百余人受伤。游行队伍被打散。12月10日，北平各大中学校发表联合宣言，宣布自即日起举行总罢课。提出罢课的具体目标是：一、誓死反对分割我国领土主权的傀儡组织；二、反对投降外交；三、要求动员全国抗日；四、争取救国自由。呼吁全国各界立即响应，一致行动。要求当局立即释放被捕学生，撤回封锁各校的军警。同日，北平学联发布《宣传大纲》，指出在目前形势下，首先要打倒日本帝国主义，反对危害民族生存的残暴内战，反对一切出卖民族利益的政策和行动。强调要实现中华民族的自由解放，必须联合全国民众，结成统一战线。在罢课中，各校学生建立和健全了自己的组织。北京大学成立了学生救国会，发表宣言，反对成立冀察政务委员会。清华大学、燕京大学等校学生会组织专题讨论会、文艺社、宣传队等，开展抗日救亡活动。从12月11日开始，天津、保定、太原、上海、杭州、武汉、广州、成都、重庆等大中城市先后爆发学生的爱国集会和示威游行，许多大中学校及工会等组织，纷纷给北平学生发来函电，支持北平学生的爱国行动。北平学联在中共北平临时工委的具体领导下，及时地研究制订了组织更大规模示威游行的计划。12月14日，北平报纸登载了国民党当局定于12月16日成立冀察政务委员会的消息。北平学联即决定在这一天再次举行示威游行，把学生抗日救国运动推向新的高潮。12月16日清晨，北平各校学生分为4个大队，分别由东北大学、中国大学、北京大学和清华大学率领，举行声势浩大的示威游行。参加的学生总计1万余人。他们高举校旗，打着“反对华北特殊化！”“反对成立冀察政务委员会！”等横幅，向天桥进发。上午

11时左右，汇集到天桥广场上的学生和市民举行大会。游行指挥部负责人黄敬站在一辆电车上慷慨激昂地发表演说，并带领群众高呼口号。大会通过了反对冀察政务委员会，反对华北任何傀儡组织，要求停止内战、一致对外，收复东北失地，争取抗日和爱国自由等8个决议案。会后，游行队伍奔向冀察政务委员会预定成立的地点——东交民巷口的外交大楼举行总示威。队伍走到前门，遭到大批警察和保安队的拦截。经学生代表反复交涉，军警才让游行队伍分批分别由前门和宣武门进入内城。在宣武门，爱国学生遭到上千名军警的血腥镇压，有二三十人被捕，近400人受伤。北平学生的抗日救国示威游行，沉重地打击了国民党政府的卖国活动，迫使冀察政务委员会不得不延期成立。一二九运动得到全国人民的支持和响应。天津、上海、南京、武汉、广州、杭州、西安、开封、济南、太原、长沙、桂林、重庆等城市的爱国学生举行请愿集会、示威游行，或发表宣言、通电，声援北平学生的爱国行动。陕甘苏区学生联合会也发出响应的通电，苏区各界民众集会声援全国各地学生的抗日救国运动。12月18日，中华全国总工会发表《为援助北平学生救国运动告工友书》，号召全国各业、各厂的男女工友起来召集群众会议，发表宣言和通电，抗议汉奸卖国贼出卖华北与屠杀、逮捕爱国学生。12月21日，上海市总工会通电声援北平学生，呼吁全国同胞一致兴起，集合民族整个的力量，反对任何伪组织之存在，以维护主权而保国土。广州铁路工人、上海邮务、铁路工人举行集会，发通电，要求对日宣战。鲁迅、宋庆龄等爱国知名人士赞扬爱国学生的英勇奋斗精神，捐款支持学生抗日救国运动。海外华侨也以各种方式支援爱国学生。一二九运动广泛地宣传了中国共产党停止内战、一致对外的抗日主张，掀起了全国抗日救国运动的新高潮。

（陈绍畴）

瓦窑堡会议

1935年12月17日至25日，中共中央在陕北瓦窑堡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

日本帝国主义侵占东北和热河后，步步进逼华北，中日民族矛盾已上升为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国内阶级关系正在发生新的变动。为制定新形势下的革命策略，从1935年12月17日起，中共中央在陕北安定（子长）瓦窑堡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出席会议的有毛泽东、张闻天、周恩来、秦邦宪、刘少奇、邓发、张浩等。会议主要讨论全国的政治形势与党的策略路线及军事战略问题。12月23日，会议通过《关于军事战略问题的决议》，确定战略方针应是坚决的民族革命战争，首先把国内战争同民族战争结合起来，一切战争都在民族战争的口号下进行。在军事部署方面，应该是准备直接对日作战的力量，猛烈扩大红军。红一方面军的行动部署，应放在打通抗日路线与巩固扩大现有苏区的基础上，把主要发展方向放在东边的山西和北边的绥远等省。还提出抗日游击战争对于战胜日本帝国主义及汉奸卖国贼有很大的战略上的作用。12月25日，会议通过《关于目前政治形势与党的任务决议》，确定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策略方针。决议全面分析了当时国内外的形势和阶级关系的新变化，提出党的策略路线，是在于发动、团结与组织全中国全民族一切革命力量去反对当前主要的敌人——日本帝国主义与卖国贼头子蒋介石。强调不论什么人，什么派别，什么武装队伍，什么阶级，只要是反对日本帝国主义与卖国贼蒋介石的，都应该联合起来开展神圣的民族革命战争。只有最广泛的反日民族统一战线（下层的与上层的），才能战胜日本帝国主义与其走狗蒋介石。决议提出以国防政府和抗日联军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组织形式，把苏维埃工农共和国改变为苏维埃人民共和国，并以八一宣言中提出的抗日十大纲领作为行动纲领。决议明确指出，在目前形势下，"左"倾关门主义是党内的主要危险。党必须同"左"倾关门主义作坚决的斗争，同时，丝毫也不要放松反对右倾机会主义的斗争。会后，毛泽东于12月27日在中共活动分子会议上作《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策略》的报告，系统地阐明了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策略方针。报告充分地说明了在新的形势下，不仅工人、农民、城市小资产阶级和广大知识分子是坚决抗日的基本力量，而且和民族资产阶级也有重新建立统一战线的可能性。即使是地主买办营垒，也可能发生分化。党的基本策略是"组织千千万万的民众，调动浩浩荡荡的革命军"，建立起广泛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因此，必须反对"左"倾关门主义，同时要坚持无产阶级在统一战线中的领导权。瓦窑堡会议是从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到抗日战争的伟大转折时期中召开的一次极其重要的会议。这次会议不失时机地制定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政策，使共产党在新的历史时期将要到来时掌握了政治上的主动权。会后，全国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很快形成，为抗日战争做了直接的准备。

（陈绍畴）

中华民族解放先锋队成立

1936年2月1日，一二九运动中的先进青年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所组织的革命青年团体——中华民族解放先锋队在北平（北京）成立。

一二九运动后，北平、天津的学生组织了南下扩大宣传团，董毓华任总指挥，姜文彬（江明）、宋黎任副总指挥，彭涛任党团书记。1936年1月，南下扩大宣传团分为4个团，分别从北平、天津出发，沿平汉铁路南下，到农村去扩大抗日宣传，踏上与工农结合的道路。参加南下扩大宣传团的，多为一二九运动中的骨干和积极分子，共500人左右。这时，国民党政府指令学校当局劝阻学生返校，并派出大批军警、特务对宣传团前堵后截，强迫学生回北平。1936年2月1日，在北平师范大学文学院召开南下扩大宣传团团员代表会议，成立了中华民族解放先锋队，简称“民先队”。会上选举敖白枫（高锦明）为总队长，刘导生为秘书，肖敏颂为组织部部长，王仁忱为宣传部部长，黄敬任党团书记。会议讨论通过了《斗争纲领》、《工作纲要》、《组织系统》和《规约》等，发表了成立宣言。宣言指出：救亡工作是繁难的，我们只有在反汉奸反日本帝国主义的前提下作长期的抗争，才能争取到中华民族的解放。《工作纲要》要求民先队员：一、站在最前线，参加一切救亡斗争；二、与各种救亡团体取得密切联系，并采取一致行动；三、把握现实，分析目前国际形势，并研究民族革命的理论与实践；四、学习军事技术与理论，促进民众武装自卫运动。民先队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以抗日民主为奋斗目标的革命青年团体。最早加入的队员约有300人左右。按学校成立分队，下设26个分队，北平全市设4个区队部。7月28日，民先队总队部作出《关于改造组织的决议》。8月底，选举李昌为民先队总队长。9月2日，民先队总队部发表《告队员同志书》，说明改造组织的意义，指出今后工作的目标，强调要发挥民主的、革命的、苦干的精神，努力自我教育，争取爱国自由，促成全民抗战，还特别强调了建立联合战线问题。民先队通过组织军事训练，举办夏令营，开展文艺活动等多种形式，团结了广大青年群众。民先队迅速发展到全国和海外一些地区。到1936年底，北平、天津、西安、济南、南京、上海、武汉、长沙、广州、成都、太原等30多个城市及日本东京、法国巴黎、里昂等地都有民先队组织，队员共有3000余人。1937年2月4日至9日，民先队在北平举行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出席代表24人，代表18个地方队部约6000名队员。大会明确提出努力促进全民族抗日联合战线，促成国内和平统一与民主政治的实现，扩大工作领域，把救亡运动广泛地开展到各阶层中去等任务。大会选举李昌、李哲人、刘导生等7人为民先队总队部负责人，李昌为总队长。民先队工作的开展，从组织上巩固了全国学生运动的成果。

（陈绍畴）

红 军 东 征

1936年2月20日，中国人民红军抗日先锋军东渡黄河，进入山西抗日的军事行动。

1936年2月17日，中华苏维埃人民共和国中央政府发表《东征宣言》。为扩大抗日武装和革命根据地，准备东出与日军直接作战，红军第一方面军以中国人民红军抗日先锋军的名义，在毛泽东、彭德怀率领和指挥下，于2月20日从陕北清涧以东的沟口、河口等地渡过黄河，发起东征战役。阎锡山急调已入陕北的晋绥军4个步兵旅回援，并将其所属7个师编为4个纵队，分路进行拦击。红军以第一军团一部在中阳关上村附近钳制敌第四纵队，以第十五军团一小部在石口镇钳制敌第一纵队先头旅，集中两个军团的主力向敌第二、第三纵队发起攻击。3月10日，红军突入孝义兑九峪地区，打退晋绥军的初次反击。从3月上旬起，蒋介石调集10个师的兵力增援阎锡山。3月中旬，红军分兵3路发展胜利，以少数兵力为中路军，在石楼、中阳、孝义、隰县之间地区钳制和吸引晋军主力；以红一军团、红十五军团主力为右路军和左路军，分南北两线向敌进攻，前锋分别进抵侯马和太原近郊，占领了晋西南和晋西北的广大地区。这时，阎锡山一面再次请求蒋介石派军队增援，一面将已调入的中央军编为第五、第六、第七纵队，参加对红军的进攻。3月24日，蒋介石派陈诚任入晋中央军的总指挥，协助阎锡山指挥作战。4月初，红军主力从南北两线向中路军靠拢，集中兵力准备歼击敌人，打破敌围歼红军于黄河以东地区的企图。红军为保存国防实力，履行中国共产党提出的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主张，于5月初分两路分别从永和、兴县回师黄河西岸，胜利返回陕北。5月5日，中华苏维埃人民共和国中央政府主席毛泽东、中国人民红军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朱德发表《停战议和一致抗日通电》，公开放弃反蒋的口号，呼吁蒋介石及其部下的一切爱国军人“停战议和，一致抗日”。要求国民党政府以“兄弟阋于墙外御其侮”的精神，在全国范围，首先在陕甘晋停止内战，双方互派代表磋商

抗日救亡的具体办法，实现全国一致抗日。红军东征是一次战略性的进攻战役。红军共歼敌约7个团，俘敌4000余人，缴获各种枪支4000余支(挺)，炮20门，取得了在江河地区作战的经验，使陕北革命根据地得以恢复和发展。在此期间，红军扩充新兵约8000人，筹款30余万元，并在山西20多个县开展了群众工作，宣传了中国共产党的抗日主张，扩大了党和红军的政治影响。　(陈绍畴)

东北抗日联军成立

1936年2月20日，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东北各地的抗日武装统编为东北抗日联军。

九一八事变后，中国共产党号召人民武装抗日。东北各阶层人民和国民党在东北的一部分爱国军队相继组成义勇军、救国军、自卫军等各种名义的抗日义勇军。抗日义勇军由于敌我力量对比悬殊和国民党政府的破坏与限制，以及自身存在的弱点，到1932年底基本瓦解。从1932年初开始，在中国共产党直接领导下，南满、东满、吉东和北满先后组织了十几支抗日游击队，坚持抗日游击战争。从1933年秋起，各地方游击队发展为东北人民革命军、抗日同盟军、反日联合军等抗日武装。1935年6月3日，中国共产党驻共产国际代表团根据共产国际关于建立反法西斯统一战线的策略原则，以王明、康生的名义，写了《给东北负责同志的秘密信》，提出扩大游击运动和联合一切反日武装力量共同抗日问题。1936年2月10日，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以中共中央名义提出《为建立全东北抗日联军总司令部决议草案》。2月20日，东北人民革命军负责人杨靖宇(1905—1940)、王德泰、赵尚志、李延禄、周保中、谢文东和汤原游击队、海伦游击队发表《东北抗日联军统一军队建制宣言》，宣布东北各抗日武装改组建制为东北抗日联军。至抗日战争爆发前夕，东北抗日联军编成10个军。第一军，1936年7月编成，军长兼政治委员杨靖宇，政治部主任宋铁岩，参谋长安光勋，下辖3个师，2个教导团，共3000余人，活动于南满地区。第二军，1936年3月编成。军长王德泰，政治委员魏拯民，政治部主任李学忠，参谋长刘汉兴，下辖3个师，1个教导团，共2000余人，活动于东满地区。第三军，1936年8月编成，军长赵尚志，政治部主任张寿篯(李兆麟)，下辖10个师，共6000人，活动于北满哈尔滨以东地区。第四军，1936年3月编成，军长李延禄，政治部主任黄玉清，下辖3个师，共2000余人，活动于吉东(黑龙江牡丹江地区)密山、勃利一带。第五军，1936年2月编成，军长周保中，副军长柴世荣，政治部主任胡仁，参谋长张建东，下辖2个师，共700余人，活动于吉东绥芬河、宁安地区。第六军，1936年9月编成，军长夏云杰，政治部主任兰志渊，参谋长冯治纲，下辖4个师，共1500人，活动于北满松花江下游汤原、萝北、依兰、桦川、富锦、宝清等地。第七军，1936年11月编成，军长陈荣久，参谋长崔石泉，下辖3个师，共700余人，活动于吉林虎林、饶河地区。第八军，1936年9月编成，军长谢文东，副军长滕松柏，政治部主任刘曙华，参谋长于光世，下辖6个师，近1000人，活动于黑龙江依兰、方正、延寿、勃利、桦川、富锦等县。第九军，1937年1月编成，军长李华堂，参谋长李向阳，下辖3个师，共800余人，活动于北满勃利、依兰、方正地区。第十军，1936年冬编成，军长汪雅臣，副军长张忠喜，政治部主任王维宇，下辖10个团，共700余人，活动于吉林五常、舒兰一带。东北抗日联军得到苏联、朝鲜人民的支持和帮助，金日成等朝鲜共产主义者还在抗日联军中担任领导工作。东北抗日联军在东北南起长白山，北抵小兴安岭，东起乌苏里江，西至辽河东岸的广大地区，开展抗日游击战争，同日伪军进行了几千次战斗，粉碎了敌人多次的“讨伐”。他们的英勇斗争，有力地打击了日本帝国主义在东北的殖民统治，支援了全国的抗日爱国运动。

(陈绍畴)

全国各界救国联合会成立

1936年5月31日，沈钧儒、章乃器、陶行知、邹韬奋等人发起组织的全国各界救国联合会在上海宣告成立。

一二九运动后全国抗日救亡运动进一步高涨。1935年12月12日，上海文化界马相伯、沈钧儒、李公朴、章乃器、陶行知、邹韬奋等280多人联名发表《救国运动宣言》，旋即成立上海文化界救国会。12月21日，沈兹九、史良、王孝英、胡子婴、杜君慧、陈波儿等发起组织上海妇女界救国会。接着，成立了上海各大学教授救国会、大中学校学生救国会。1936年1月28日，上海各界救国联合会宣告成立。之后，北平(北京)、南京、武汉、天津等地也成立了各界救国会。救国会最初的发起者和参加者，主要是一部分具有正义感的爱国知识分子，还有一些各阶层、各党派的民主人士。5月31日至6月1日，在上海举行全国各界救国联合会成立大会。出席大会的有全国20多个省市60多个抗日救国团体的代表70多人。

大会听取了上海、南京、天津、厦门、香港、广东、广西等地救国会和平津中华民族解放先锋队的代表的报告,通过了《全国各界救国联合会成立大会宣言》、《抗日救国初步政治纲领》和《全国各界救国联合会章程》,申明全国各界救国联合会是一个全国统一的联合救国阵线,以团结全国救国力量,统一救国方针,保障领土完整,图谋民族解放为宗旨。现阶段的主要任务是促成全国各实力派合作抗敌。宣言呼吁全国各党各派立即停止军事冲突,立即派遣正式代表进行谈判,以便制定共同抗敌纲领,建立一个统一的抗敌政权。大会选举宋庆龄、何香凝、马相伯、邹韬奋等40多人为执行委员,沈钧儒、章乃器、李公朴、史良、沙千里、王造时、孙晓村、曹孟君、何伟等14人为常务委员。全国各界救国联合会的成立,进一步从政治上、组织上巩固和扩大了全国抗日救国运动的阵地。7月15日,沈钧儒、章乃器、陶行知、邹韬奋联名发表题为《团结御侮的基本条件与最低要求》的告全国同胞书,全面阐述了救国会的立场,表示赞同中国共产党提出的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主张,要求国民党改变"先安内后攘外"的方针,联合红军,共同抗日。救国会的号召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华北、西北、华南等地区以至在旅居欧美、东南亚的华侨中,相继成立了各界救国联合会。据估计,到1936年底,全国救国会会员人数达数十万人。中国共产党对全国各界救国联合会给予高度的评价。9月18日,毛泽东致函章乃器、陶行知、邹韬奋、沈钧儒,指出救国会的抗日救国的言论和英勇的行动,已经引起全国广大民众的同情,使全体红军和苏区人民发生无限的敬意。同时表示中国共产党愿同救国会在各方面作更广大的努力与更亲密的合作,并派潘汉年与救国会领导人经常交换意见。1945年冬,救国联合会改名为中国人民救国会。1949年12月18日,救国会鉴于它所担负的历史任务已经完成,在北京宣告结束。

(陈绍畴)

两广事变

1936年6月初,广东地方实力派陈济棠和广西地方实力派李宗仁、白崇禧发动的抗日反蒋事件。

1936年5月12日,胡汉民在广州逝世,两广地方实力派失去重心。蒋介石企图乘机解决两广问题,提出取消两广地方实力派组织的国民党西南执行部和西南政务委员会等条件,要陈济棠把广东的军政大权交还南京国民党政府。陈济棠先发制人,联合广西李宗仁、白崇禧等人,打起"抗日救国"旗号进行反蒋。6月1日,国民党西南执行部和西南政务委员会举行联席会议,敦请国民党中央和国民党政府立即对日抗战。6月2日,将抗日主张通电全国。6月4日,陈济棠、李宗仁、白崇禧等数十名将领联名发表通电表示支持。6月6日,组成抗日救国军。随即出兵湖南,于6月10日,进逼衡州(衡阳),与蒋介石军队发生战争。两广于6月22日宣布成立西南军事委员会,以陈济棠为委员长兼抗日救国军总司令,李宗仁为副委员长兼抗日救国军副总司令。全国各界对两广事变极为关切,普遍要求抗日,反对内战,希望双方和平解决。蒋介石一面派出军队准备进攻两广,一面派人用分化利诱等手段收买两广地方势力。7月初,广东空军司令黄兴锐率飞机投往蒋介石。抗日救国军第一集团军参谋长兼第一军军长余汉谋通电拥蒋。广东东区绥靖主任李汉魂离开汕头,并电请蒋介石授权他收拾粤局善后。7月13日,正在南京举行的国民党五届二中全会决议撤销国民党西南执行部和西南政务委员会,对粤桂两省负责人区别处理。免除陈济棠本兼各职,任命余汉谋为广东省绥靖主任,林云陔为广东省政府主席;李宗仁、白崇禧为广西省绥靖正、副主任,黄旭初为广西省政府主席。7月14日,余汉谋在江西大庾通电就职,率部向广东韶关推进,并通电陈济棠于24小时内离粤。陈济棠部主力在英德、军田与余汉谋部对峙。7月17日,陈部第二军军长陈达为蒋介石收买,陈济棠见大势已去,于次日离广州去香港。蒋介石转而谋求解决广西问题。7月25日,蒋介石改任李宗仁为军事委员会常务委员,白崇禧为浙江省政府主席。李、白表示难以从命。蒋即调集大军进逼广西。7月底,桂军与蒋介石军队在广东肇庆发生战争。全国一致反对内战。8月11日,蒋介石飞广东,与李、白的代表刘为章谈判。9月2日,居正、程潜、朱培德等携蒋介石亲笔信赴南宁,调解宁桂冲突。9月6日,南京国民党政府明令任命李宗仁为广西省绥靖主任,白崇禧为军事委员会常务委员,不离开广西,黄旭初为广西省政府主席。9月16日,李、白、黄在南宁宣誓就职。次日,李宗仁去广州与蒋介石会晤。两广事变遂告和平解决。

(陈绍畴)

山西牺牲救国同盟会成立

1936年9月,在中国共产党的推动和帮助下,山西牺牲救国同盟会在太原宣告成立。

1936年5月,山西军阀阎锡山所属各群众团体的核心组织自强救国会成立。这个团体中的左派进

步青年宋劭文、戎子和、刘玉衡、张隽轩等，响应中国共产党的统一战线的号召，倡议组织一个抗日救亡团体，得到阎锡山的赞同，定名为山西牺牲救国同盟会，简称牺盟会。它以铲除汉奸，武装抗敌，牺牲救国为宗旨。9月18日，牺盟会在太原举行宣传大会，发表了《牺牲救国同盟会成立宣言》和《告同胞书》。宣言号召不分党派，不分阶级，不分职业，不分穷富，不分性别，凡是愿意争取民族的生存与个人的出路的人们，都团结到牺牲救国同盟会来。不愿做亡国奴的人们都联合起来，抗战到底，争取中华民族的独立自由与领土完整。接着，牺盟会制订简章和工作纲领，并选出临时执行委员会，阎锡山任会长，梁化之任总干事，宋劭文、牛佩琮、戎子和、刘玉衡、张隽轩等为委员。牺盟会成立不久，由于国民党当局的反对，牺盟会的实际工作陷于停顿状态。1936年秋，日本在侵占察北6县之后，继续向绥东进攻，直接危及阎锡山在晋绥的统治。阎为了保全自己的实力和地盘，提出"守土抗战"、"牺牲救国"等口号，开始表现出某种程度的抗日积极性。9月间，阎锡山派人到北平邀请刚出狱的共产党员薄一波回山西"共策保晋大业"。中共中央北方局为促进山西抗日救亡运动的发展，推动阎锡山转向抗日，决定由薄一波、杨献珍、董天知、韩钧、周仲英等组成中共山西公开工作委员会，薄一波任书记，专门做阎锡山及其军政上层的统一战线工作。10月25日，薄一波等抵达太原。阎锡山接受了薄一波的3点要求：宣传共产党的抗日救亡主张不能受到限制；对抗日救亡有利的事情都做，不利的事情都不做；在用人方面应给予方便，必须保证安全。随后，薄一波接办了牺盟会，同阎锡山建立了特殊形式的统一战线关系。薄一波等本着站稳脚跟、抓住实权的原则，利用牺盟会这一合法的组织，及阎锡山提出或他能够接受的口号和方式，积极开展抗日救亡工作。首先改组了牺盟会的领导机构，会长仍是阎锡山，常委中除梁化之外，薄一波、牛荫冠、宋劭文、傅雨田、雷任民、冯基平等均为共产党员。牺盟会名义上是阎锡山的官办组织，实际上是由中国共产党人直接领导的群众抗日团体。1936年冬开始，牺盟会先后举办临时村政协助员训练班、军政训练班、民训干部教练团、国民兵军官教导团等，培训了一大批领导抗日救亡工作的骨干，派到山西各地，宣传、组织和武装群众，逐渐形成了山西新派的领导力量。牺盟会在推动山西进步和发展统一战线、坚持山西以至华北抗战上，起了重要的作用。阎锡山在牺盟会建立初期表示支持。后来阎锡山追随蒋介石转向消极抗战，积极反共，于1939年12月宣布解散牺盟会。原牺盟会中坚持抗日的成员，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继续进行抗日斗争。　（陈绍畴）

红军三大主力胜利会师

1936年10月，中国工农红军第一、第二、第四方面军在甘肃会宁、静宁地区会师，长征胜利结束。

1935年11月19日，红二、红六军团主力退出湘鄂川黔革命根据地，从湖南桑植地区出发，向湘黔边转移，开始长征。1936年1月，进入黔东地区。红二、红六军团原定在贵州石阡、镇远、黄平地区创建根据地。渡过乌江以后，又打算在黔西、大定（大方）、毕节地区建立根据地，均因追敌逼近，敌情严重而未能实现。3月底，红二、红六军团到达滇黔边地区。接着，向云南中部疾进，于4月下旬渡过金沙江，北进西康甘孜。7月2日，红二、红六军团齐集甘孜，与先期到达的红四方面军胜利会师。7月5日，中共中央指定红二、红六军团加上红三十二军合编为中国工农红军第二方面军，贺龙任总指挥，任弼时任政治委员，肖克任副总指挥，关向应任副政治委员，辖第二、第六军团和第三十二军。红二、红四方面军会师后，在中共中央的积极争取下，并经过朱德、刘伯承、任弼时、贺龙、关向应等坚决斗争，张国焘被迫同意两个方面军北上同中央会合。7月上旬，红四方面军组成左、中、右3个纵队分别从甘孜、炉霍、绥靖出发北上。红二方面军分为两个梯队由甘孜东谷出发，在红四方面军左纵队之后开进。7月27日，中共中央批准成立中共西北局，以张国焘为书记，任弼时为副书记，统一领导红二、红四方面军的北上行动。两个方面军经过艰苦行军，通过数百里荒无人烟的茫茫草地，于8月上旬到达班佑、包座地区，取得了北上同中共中央会合的具有重大意义的第一个胜利。8月5日，中共西北局根据中共中央的指示，发布《岷（州）洮（州）西（固）战役计划》，决定乘敌主力尚未集中岷洮以前，先机夺取岷州（岷县）、洮州（临潭）、西固地区，以利继续北进。从8月5日开始，红二、红四方面军先后由包座地区向甘南进发。8月9日、10日，红四方面军抢占天险腊子口，进抵哈达铺。9月中旬，红二、红四方面军控制了甘南漳县、洮州、渭源、通渭、成县、徽县、两当、康县和岷州、陇西、临洮、武山、礼县等广大地区，形成了与红一方面军会师的有利态势。这时，中共中央一面指示红二、红四方面军迅速北上，一面指示红一方面军向南进攻予以接应。红一方面军主力由宁夏豫旺堡附近出动，于9月14日

占领甘肃静宁(宁夏隆德)以北的将台堡。10月2日进占会宁城,控制了西(安)兰(州)公路一段。10月8日,红四方面军先头部队在会宁的青江驿、隆德的界石铺与红一方面军接应部队会师。次日,红军总部及红四方面军总指挥部到达会宁。10日,在会宁城举行庆祝红一、红四方面军会师大会。10月22日,红二方面军总指挥部到达将台堡,与红一方面军会师。至此,红军三大主力胜利地结束了具有伟大历史意义的长征。长征的胜利,推动了抗日民族民主运动的发展,开始了中国革命的新局面。　(陈绍畴)

绥远抗战

1936年11月,国民党军队傅作义部在绥远东北部抗击日伪军的战役。

1936年初,日本帝国主义唆使蒙古王公德穆楚克栋鲁普(德王)成立伪"蒙古军司令部",自任总司令,李守信任副总司令。5月12日,在嘉卜寺组织伪"蒙古军政府",以云端旺楚克(云王)为主席,德王为总裁。同时,日本将伪军王英部编为"西北蒙汉防共自卫军"(后改称"大汉义军")。11月初,日本策动和指挥伪蒙军分3路进攻绥远。以李守信的伪蒙军第一军部署在兴和一带为左翼;伪蒙军第二军部署于绥北土木尔台以北,并以伪蒙军第七师驻百灵庙为右翼;另以王英部为主力,进攻陶林的红格尔图。计划先攻取红格尔图,然后左、右两翼同时出动,一举攻占归绥,再分兵进占绥东平地泉(集宁)与绥西包头、河套。11月15日,王英率部5000余人,在日军飞机、大炮掩护下向红格尔图发起猛攻。国民党绥远省政府主席傅作义(1895—1974,山西临猗人)即亲临平地泉前线指挥作战。11月17日夜,晋绥军骑兵旅旅长彭毓斌、第三十五军第二一八旅旅长董其武率部跃进到红格尔图西南丹岱沟一带。次日晨,出敌不意发起攻击,歼敌千余人。王英部败退商都。伪蒙军随即抽调兵力加强商都、化德的防务,并在绥北百灵庙构筑坚固的防御工事,准备以此为基地,相机向武川、归绥进攻。蒋介石此时正集中大量军队准备"围剿"红军,仅派汤恩伯率第十三军一部援绥。11月22日,傅作义令晋绥军骑兵师旅长孙长胜、第三十五军第二一一旅旅长孙兰峰为前敌正副指挥,率部集结在百灵庙东南二分子、乌兰忽洞一带,选定东南山口为主攻方向,奇袭百灵庙。11月23日夜,部队冒零下42℃严寒,向百灵庙发起攻击,很快占领了外围山头,将敌压缩在山内平地。日军顾问在前沿督阵,指挥伪蒙军第二军第七师扼守女儿山进行阻击。11月24日晨,孙兰峰令山炮营进至百灵庙东南高地,集中火力猛攻女儿山,并配以装甲车队,向东南山口冲击。与此同时,骑兵团攻占北山,控制了飞机场,断敌后路。敌由东北方向败退大庙。中国军队收复百灵庙。12月2日,又攻克大庙,小滨大佐等20余名日本顾问被击毙,伪蒙军两个旅反正。百灵庙大捷,是中国军队自1933年长城抗战以来取得的又一次胜利。全国掀起援助绥远抗战运动。国民党政府和各界人士组织慰问团、战地服务团赴前线慰问抗日将士。各阶层群众捐赠款物,北平学生募集万件皮衣,上海学童捐助零用钱。据不完全统计,全国捐款达120余万元。12月1日,中共中央和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政府发出《关于绥远抗战通电》;毛泽东、朱德等致书蒋介石,再次呼吁"化敌为友,共同抗日"。绥远抗战和援绥运动是抗战形势高涨的一种表现。　(陈绍畴)

山城堡战役

1936年11月17日至22日,红一方面军和红四方面军一部在红二方面军配合下,在甘肃环县山城堡打退国民党军队进攻的战役。

1936年10月,红军三大主力会师后,蒋介石继续坚持反共内战政策,集中5个军的兵力,从甘肃会宁至固原一线由南向北分4路进攻红军,同时令马步芳、马鸿逵等部沿兰州至宁夏银川段黄河防堵红军渡河北进或西进,企图消灭红军于黄河以东的甘肃、宁夏边界地区。11月8日,中共中央军委根据情况的变化,制定作战新计划,确定11月份红军三个方面军主力在甘肃关桥堡至金积、灵武之间作战,以求歼敌一部,争取休息与准备,以示红军欲渡黄河,吸引敌胡宗南部北进。11月12日,红军主力开始逐次向北、向东转移。至11月15日,红四方面军留在黄河以东的第四军、第三十一军分别移至宁夏、甘肃边界红城水、萌城、甜水堡、石堂岭附近地区,红一方面军第一军团、第十五军团、第八十一师移至豫旺堡以东地区,红二方面军全部移至甘肃环县以西地区休整。此时,国民党军第三十七军正准备西渡黄河,参加"追剿"红四方面军河西部队;同红军有统战关系的东北军第六十七军经劝阻,前进缓慢;敌第三军进占同心城后,也停止前进;唯有胡宗南第一军行动积极,向甘肃豫旺堡进攻。11月17日,敌第一军分3路向陕西定边、宁夏盐池前进:左路第一师第一旅由宁夏惠安堡东进,中路第一师第二旅向萌城、甜水堡前进,右路第七十八师由西田家原向环县山城堡进

击。当日，红四方面军第四军、第三十一军在萌城以西地区设伏，击溃敌中路第一师第二旅。接着经古城堡、张天堡向山城堡地区转移。这时，敌第一军独自向山城堡进攻。红军前敌总指挥部见敌孤军深入，决定将红军主力隐蔽集结于山城堡南北地区待机，首先歼敌右路第七十八师，而后向北横扫敌中路。11月21日，红军左翼部队红一军团和右翼部队红十五军团、红四方面军第三十一军突然向山城堡之敌发起攻击，红二方面军和红四方面军第四军位于中央配合。是日黄昏，敌人开始向山城堡以北的曹家阳台一带山地撤退。红军乘机攻入山城堡，接着乘胜追击，将溃敌大部压迫于山城堡西北的山谷中。经1昼夜激战，红军歼敌第一军主力第七十八师1个多旅。同时，红二十八军击溃了向盐池、定边方向进攻的敌左路第一师第一旅，余敌仓皇西撤。红军取得了三大主力会师后的第一次大捷，使敌人基本停止了对陕甘宁苏区的进攻。山城堡战役的胜利，对国内和平的实现起了重要的促进作用。　（陈绍畴）

“七君子”事件

1936年11月23日，国民党政府非法逮捕全国各界救国联合会沈钧儒、章乃器、邹韬奋、李公朴、王造时、沙千里、史良等7位领袖的事件。

全国抗日救国运动的高涨，使国民党政府大为惊恐。各界救国联合会成立后，国民党政府蓄意制造“爱国有罪”的舆论，扬言要取消救国会等抗日团体。1936年11月23日凌晨，国民党政府以“扰乱治安，颠覆政府”的罪名，在上海逮捕了全国各界救国联合会领导人沈钧儒(1875—1963，浙江嘉兴人)、章乃器(1897—1977，浙江青田人)、邹韬奋(1895—1944，江西余江人)、李公朴(1902—1946，江苏武进人)、王造时(1902—1971，江西安福人)、沙千里(1901—1982，上海人)、史良(1900—1985，江苏常州人)等。随后，将他们移解苏州江苏高等法院看守所。这就是震动全国的“七君子”事件。事件发生后，全国各界人士开展了声势浩大的营救运动。11月24日和27日，全国各界救国联合会为沈钧儒等无辜被捕先后发表《紧急宣言》和《告当局及全国国人书》，要求立即释放被捕诸领袖；公开保护救国运动；打倒汉奸；立即抗战。并表示救国会的人士既以身许国，决不是逮捕等足以阻遏其志愿的。全国所有救国会的会员，不但不会因为领袖的被捕而放弃抗敌救亡的主张，而且将更坚决秉承领袖们过去的言论、主张，永远继续地奋斗下去。11月26日，宋庆龄发表声明，抗议国民党政府非法逮捕爱国志士，指出：“救国会的7位领袖已经被捕，可是我们中国还有四万万人民，他们的爱国义愤是压迫不了的。”中国共产党的《红色中华》报和巴黎《救国时报》也发表社论，反对国民党“爱国有罪的暴政”，声援“七君子”。12月12日，张学良、杨虎城发动西安事变，通电提出8项主张，其中之一即为要求立即释放被捕的爱国领袖。1937年4月3日，江苏高等法院检察处罗织“以危害民国为目的而组织团体”、“宣传与三民主义不相容之主义”等10大“罪状”，对沈钧儒等提起公诉，并于6月11日和25日两次开庭审理。沈钧儒等在狱中坚持救国无罪的正义立场，进行了坚决的斗争。他们表示：个人自由事小，争取救国无罪的事大，宁可不出狱，决不丧失立场和有损人格。在第二次开庭审理的当天，宋庆龄、何香凝、胡愈之等16人联名发表宣言，发起救国运动，准备“一齐去法院，要求一并羁押，与沈先生等并案办理”。他们申明：救国入狱运动以争取救国无罪为其唯一目的。如爱国无罪，则与沈钧儒等同享自由；如爱国有罪，愿与沈钧儒等同受处罚。宋庆龄等还制定《救国入狱规约》。7月5日，宋庆龄等携带简单行李，由上海前往苏州江苏高等法院自请入狱。这一正义行动，得到许多爱国人士和各界人士的响应与支持。仅上海一地，签名自请入狱者达万余人。救国入狱运动给国民党政府以强大的政治压力。7月31日，国民党政府不得不将沈钧儒等7位爱国领袖交保释放出狱。　（陈绍畴）

西安事变

1936年12月12日，国民党爱国将领张学良、杨虎城在西安扣留蒋介石，迫使他停止内战、联共抗日的事件。

张学良是国民党政府东北边防军司令长官。九一八事变时，执行蒋介石的不抵抗命令，受到全国人民的指责。热河失守后，被迫去职出国考察。1935年任“西北剿匪总司令部”副总司令，代行总司令职权。东北军广大官兵流落关内，背井离乡，身受家乡沦陷的痛苦，迫切要求打回老家去，不愿同主张抗日的红军作战。这种情绪对张学良和东北军高级将领产生了影响。东北籍进步人士杜重远等也对张学良做了不少工作。杨虎城(1893—1949)，又名虎臣，陕西蒲城人。当时任国民党西安绥靖公署主任、第十七路军总指挥，是陕西地方实力派的领袖。他曾结识进步人士杜斌丞、共产党人魏野畴等人，受到进步思想的熏陶。1927年国共分裂后，他坚持孙中山的三大政策。

九一八事变后他多次请缨抗日，都被蒋介石拒绝。对蒋介石坚持“攘外必先安内”的错误政策，排除异己，极为不满。东北军和第十七路军被蒋介石调到陕甘一带进攻红军，屡受重创，又遭蒋介石的冷遇。张学良、杨虎城逐渐认识到“剿共”没有出路，只有停止内战，联合共产党共同抗日，才能救亡图存。中国共产党对张学良、杨虎城的部队采取争取与团结的政策。瓦窑堡会议后，中共中央成立了东北军工作委员会，周恩来为书记，叶剑英为副书记，专门做东北军的统一战线工作。1936年1月25日，毛泽东、周恩来等20位红军将领发表致东北军全体将士书，指出抗日反蒋是东北军唯一的出路，表示苏维埃政府和工农红军愿意与任何抗日的武装队伍联合起来，组织国防政府与抗日联军，愿意首先同东北军实行停止内战，共同抗日。中国共产党的代表分别与张学良、杨虎城就联合抗日问题多次商谈。2月，中共代表与杨虎城达成初步协议：一、在共同抗日的原则下，红军愿与第十七路军达成抗日友好互不侵犯协定，双方各守原防，互不侵犯，必要时可以事先通知，放空枪，打假仗，以应付环境；二、双方可以互派代表，在杨处建立电台，密切联系；三、第十七路军在适当地点建立交通站，帮助红军运输必要物资和掩护中共人员的往来；四、双方同时做抗日准备工作，先由对部队进行抗日教育开始。2、3月间，中共中央派联络局局长李克农两次会见张学良，商谈合作抗日。3月16日，中共中央在山西石楼召开会议，听取了李克农的汇报，决定派周恩来、李克农为全权代表，到东北军驻地陕西肤施（延安）和张学良会谈。4月9日，周恩来和张学良在肤施一座教堂中秘密会谈。张学良表示完全同意中国共产党提出的“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主张，赞成中共组织国防政府、组织抗日联军等意见，赞成红军集中河北抗日。张学良认为蒋介石现在歧路上，虽不会彻底抗战，但有可能争取与其合作。蒋介石错在坚持“攘外必先安内”政策，要做艰苦工作扭转他。张学良主张，共产党在外面逼，他在里面劝，促使蒋介石改变错误政策，走上抗日的道路。周恩来表示愿把这些意见带回去，提请中共中央郑重考虑后再作答复。双方还商定了红军与东北军互不侵犯、通商、互派常驻代表等事项。这次会谈是促使张学良走上联共抗日道路的重要一步。1936年上半年，张学良、杨虎城的部队与红军实际上已停止敌对行动。8月25日，中共中央发表《致中国国民党书》，再次呼吁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组成国共两党合作为基础的全民族的抗日统一战线。9月1日，中共中央发出指示，放弃反蒋口号，实行“逼蒋抗日”方针。10月5日，毛泽东、周恩来函请张学良转达蒋介石，互派正式代表谈判停战抗日的具体条件。但蒋介石仍继续坚持反共内战政策，于10月22日到西安分别召见张学良、杨虎城，宣布进一步“剿共”的计划，令张、杨向红军进攻。同时调集其嫡系部队约30个师部署在以河南郑州为中心的平汉、陇海铁路沿线，准备开入陕甘地区。12月4日，蒋介石由洛阳再次到西安“督剿”，以临潼华清池为“行辕”，胁迫张学良、杨虎城执行进剿红军的命令，否则即将东北军和第十七路军分别调往福建、安徽，由中央军进驻陕甘。张学良、杨虎城连续向蒋介石反复进谏，力劝蒋介石停止内战、一致抗日，都遭到蒋介石的严词训斥。12月7日，张学良再次到华清池向蒋介石进谏，痛陈利害，要求停止内战，联共抗日，遭蒋严词拒绝。12月9日，西安1万多名学生纪念一二九运动一周年举行示威游行，高呼：“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等口号，遭军警镇压。学生们去临潼向蒋介石请愿。蒋闻讯，即打电话命令张学良加以制止，并声言学生不服从，就“格杀勿论”。张学良急忙赶上学生队伍进行劝阻。请愿学生悲愤陈词，使张学良甚为感动，表示一星期之内以事实答复学生的要求。当晚，张学良向蒋介石反映学生的要求，并再次陈述自己的主张，受到重斥。张学良别无他法，于是与杨虎城秘密商定发动兵谏。12月12日凌晨，东北军派兵包围了华清池。蒋介石在睡梦中听到枪声，仓皇爬上骊山，藏在半山腰一块大石头后面的乱草丛中，被东北军战士捉下山来，护送到西安城内新城大楼。第十七路军在城内同时行动，迅速解除蒋系军警武装，拘押了正在西安待命的陈诚、蒋鼎文、朱绍良、卫立煌、陈继承、陈调元等10余名高级军政要员。张学良、杨虎城随即通电全国，说明发动兵谏的意图在于抗日救国，对蒋介石本人“保其安全，促其反省”，提出8项政治主张：一、改组南京政府，容纳各党各派，共同负责救国。二、停止一切内战。三、立即释放上海被捕之爱国领袖。四、释放全国一切政治犯。五、开放民众爱国运动。六、保障人民集会结社之政治自由。七、确实遵行总理遗嘱。八、立即召开救国会议。这就是震惊中外的西安事变。事变发生后，张学良、杨虎城采取了一系列军政措施：作出防御中央军进攻的部署，令驻陕甘宁边区各部队火速向西安集中，原有防务交红军接替；宣布撤销“西北剿匪总司令部”，所有“剿共”工作全部停止，成立以张学良、杨虎城为正副主任委员的抗日联军临时西北军事委员会，主持西北军政事

务；设立幕僚机构设计委员会和参谋团，分别负责研究政治、军事方面的重要问题；改组陕西省政府，任命原西安绥靖公署总参议王一山暂代陕西省政府主席；组织抗日援军第一团，以孙蔚如、王以哲为正副军团长；解散国民党陕西省党部，成立西北民众运动指导委员会，以王炳南为主任委员；释放政治犯；封存中央、中国、交通、农民 4 所银行在西安储备的银元 1500 余万元。

西安事变的突然爆发，引起国内外各种政治势力的强烈反响。各界群众同声称快，拥护张学良、杨虎城的爱国行动，纷纷要求严惩蒋介石。不少人担心内战再来，忧心忡忡。一些知名的爱国人士如宋庆龄、李济深、马相伯等，主张和平解决西安事变，释放蒋介石，避免发生内战，一致抗日。在国民党内部，以国民党政府军政部部长何应钦为代表的亲日派力主“讨伐”，借机置蒋介石于死地，以便取而代之。开始时这一派占优势。国民党中央常务委员会临时会议及中央政治委员会决议：褫夺张学良本兼各职，交军事委员会严办，所部军队归军事委员会直接指挥；行政院由副院长孔祥熙负责；军事委员会会议由副委员长冯玉祥及常务委员负责；指挥调动军队由何应钦负责。接着，南京政府明令讨伐张学良、杨虎城，任命何应钦为“讨逆军总司令”，刘峙、顾祝同为东、西两路集团军总司令，准备进攻西安，并派飞机轰炸西安附近的渭南、富平、三原县城和赤水车站。以宋子文、宋美龄（1897 年生，海南文昌人，蒋介石夫人）、孔祥熙为代表的亲英美派，反对立即“讨伐”，主张营救蒋介石。这一派很快占据上风，遂采用“正面处置严正，营救则多方运用”的原则，积极活动。孔祥熙、宋美龄委托与蒋介石、张学良都有私交的澳大利亚人威廉·亨利·端纳（Willin Henry Dona，1875—1946）去西安探明情况，沟通关系，居中调解。各地方实力派由于各自的处境，对西安事变表现出不同的态度。广西的李宗仁、白崇禧和四川的刘湘，支持张、杨的抗日救国主张，认为事变应政治解决，以保全御侮救国的实力。绥远的傅作义准备居中调停放蒋，并与张、杨商讨抗日援绥办法。山西的阎锡山先是责问张、杨，后派代表到西安，打算调停南京与西安方面的争执，并要求将蒋介石移太原。冀察的宋哲元频频表示拥护南京当局，对张、杨的抗日救国主张没有表示明确态度，及至和平解决的前景已渐明朗，他与山东的韩复榘通电主张保证蒋的安全，事变应谋求政治解决。国民党内部的分歧，反映了英、美帝国主义和日本帝国主义之间的矛盾。日本要求南京政府绝对不能与张学良、杨虎城妥协，否则日本政府将不能坐视，企图利用讨伐张、杨，挑起中国大规模的内战，以实现其灭亡中国的野心。英、美担心亲日派掌权，损害其在华利益，主张蒋介石与张、杨妥协，并表示愿意进行调解。中国共产党在事变前没有与闻此事。事变发生的当天，张学良立即致电中共中央，希望听取中共方面的意见。中共中央正确地分析了当时错综复杂的政治形势，经过反复研究和慎重考虑，从中华民族的根本利益出发，确定了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方针。12 月 17 日，应张学良电邀，中共中央代表周恩来抵西安同张学良会谈。张学良表示，只要蒋介石答应停止内战，一致抗日，应该放蒋，并拥护他做全国抗日的领袖。周恩来表明中国共产党的态度是保证蒋的安全，但声明如南京进兵挑起内战，则蒋的安全无望。双方商定东北军和第十七路军集中于西安、潼关一线，红军南下肤施（延安）、庆阳一带接防；红军加入抗日联军临时西北军事委员会。双方还商定了同宋子文谈判的 5 项条件：一、立停内战，中央军全部开出潼关；二、下令全国援绥抗敌；三、宋子文负责成立南京过渡政府，肃清一切亲日派；四、成立抗日联军；五、释放政治犯，实现民主，武装群众，开救国会议，先在西安开筹备会。12 月 18 日，周恩来与杨虎城商谈，说明逼蒋抗日的可能性及中共关于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主张。同日，中共中央致电国民党中央，呼吁国民党召集全国各党各派各界各军的抗日救国代表大会，将讨伐张学良、杨虎城与进攻红军的中央军全部增援晋绥前线，承认红军、东北军及第十七路军的抗日要求，停止一切内战，一致抗战，开放人民抗日救国运动，实现孙中山的三大政策。并表示，如国民党能实现上述要求，蒋介石的安全自由当不成问题。12 月 19 日，中共中央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分析了西安事变后的国内外局势，指出事变发展有两种前途：或者爆发新的内战，削弱全国抗日力量，推迟全国抗战的发动，这是日本帝国主义及中国亲日派所欢迎的；或者结束内战，使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主张得到早日实现，使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更迅速地建立起来，这是全国人民和抗日救国的各党各派各军各界所拥护的。会议确定了争取实现后一个前途的基本方针。会后，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政府和中共中央公开发表《对西安事变通电》，建议南京和西安双方军队以潼关为界，南京军队勿向潼关进攻，西安抗日联军暂止于陕西境内，由南京当局召集有各党各派代表参加的和平会议，讨论国策，团结全国，反对一切内战，一致抗日。同时，中共

中央向党内发出《关于西安事变及我们任务的指示》,指出我们的方针是:一、反对新的内战,主张南京与西安间在团结抗日的基础上和平解决。二、用一切方法联合南京左派,争取中派,反对亲日派,推动南京方面走向进一步抗日的立场。三、给张学良、杨虎城以积极的实际的援助(军事上的与政治上的),使之彻底实现其抗日主张。四、切实准备"讨伐军"进攻时给以严重打击,促其反省,并促成全国性抗日统一战线的建立与全国性抗日战争的爆发。12月20日,中共中央接共产国际来电,主张用和平方法解决西安事变。这和中共所确定的方针是一致的。南京方面在了解张学良、杨虎城和中共无意加害蒋介石,并希望和平解决这次事变的态度后,派宋子文、宋美龄、蒋鼎文等于12月22日飞抵西安进行谈判。12月23日,周恩来代表中国共产党和红军,张学良、杨虎城代表东北军和第十七路军,与蒋介石的代表宋子文、宋美龄举行谈判。周恩来提出6项条件:一、双方停战,中央军撤兵至潼关外。二、改组南京政府,排逐亲日派,加入抗日分子。三、释放政治犯,保障民主权利。四、停止剿共,联合红军抗日,允许共产党公开活动。五、召开各党各派各界各军救国会议。六、与同情抗日的国家合作。张学良、杨虎城同意以此为基础谈判。宋子文表示个人同意,答应转达给蒋介石。接着,双方就停止内战、撤兵、组织过渡政府、释放爱国领袖、放蒋等问题进行讨论。12月24日,宋子文、宋美龄对谈及的问题作了承诺:一、由孔祥熙、宋子文组行政院,肃清亲日派。二、中央军撤兵并调离西北,宋子文、宋美龄负绝对责任。三、蒋介石允许归后释放爱国领袖。四、目前苏维埃、红军仍旧,两宋担保蒋确停止剿共,并可经张学良手接济红军。抗战发动后,红军再改番号,统一指挥,联合行动。五、开放政权,召集各党各派救国会议。六、分批释放政治犯。七、抗战发动后,共产党公开。八、联俄,与英、美、法联络。九、蒋回京后通电自责,辞行政院长职。十、宋表示要中共做他抗日反亲日派的后盾,并派专人驻沪与他秘密接洽。当晚,周恩来会见蒋介石,向他说明中共的抗日救国主张及西安方面的意图。蒋介石作了3点表示:一、停止"剿共",联红抗日,统一中国,受他指挥;二、由宋子文、宋美龄、张学良全权代表他与周恩来解决一切;三、他回南京后,周可直接去谈判。蒋介石被迫接受了停止内战、联红抗日的条件。12月25日,张学良没有通知周恩来,就亲自陪同蒋介石乘飞机离开西安回南京。第二天,蒋介石一到南京,立刻扣留了张学良。此后,张学良长期在软禁中生活。消息传出后,西安出现动荡不安的局势,内战危险重新出现。周恩来在最困难的情况下,坚定而细致地进行工作,终于基本保持了西安事变和平解决的成果。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成为时局转换的枢纽。至此,内战基本结束,促成了以国共两党第二次合作为基础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形成。

(陈绍畴)

国共两党举行合作抗日谈判

1937年2月至6月,中国共产党和国民党的代表就合作抗日问题,先后在西安、杭州、庐山进行多次谈判。

日本帝国主义的步步进逼,打破了国民党依靠外交途径解决中日问题的幻想。华北事变后,国民党政府不得不考虑调整其对日政策。1935年底,国民党政府开始试探,要求苏联的援助,并设法打通与中国共产党的关系。之后,国共双方通过多种渠道,进行秘密接触。1936年8月25日,中共中央发表《中国共产党致中国国民党书》,指出当前全民族的绝大危险是国民党所实行的错误政策招来的,这种错误政策必须彻底改变,并表示愿意同国民党结成一个坚固的革命的统一战线。9月1日,中共中央在内部发出《关于逼蒋抗日问题的指示》,明确提出"逼蒋抗日"的方针。并说:"我们正在通知他们,共产党中央立刻准备派代表出去,或接受国民党和蒋介石的代表到苏区来,以便进行谈判。"国共两党的高层接触开始在酝酿和商议中。为了促进国共两党合作的实现,1937年2月10日,中共中央致电国民党五届三中全会,提出5项要求:一、停止一切内战,集中国力,一致对外;二、保障言论、集会、结社之自由,释放一切政治犯;三、召集各党各派各界各军的代表会议,集中全国人才,共同救国;四、迅速完成对日抗战的一切准备工作;五、改善人民的生活。同时提出4项保证:一、在全国范围内停止推翻国民政府之武装暴动方针;二、工农政府改名为中华民国特区政府,红军改名为国民革命军,直接受南京中央政府与军事委员会之指导;三、在特区政府区域内,实施普选的彻底民主制度;四、停止没收地主土地之政策,坚持执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之共同纲领。这是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公开提出实现国共合作的条件。2月15日至22日,国民党在南京举行五届三中全会,主要讨论对中国共产党的政策及对日本的态度问题。会议虽然没有根本放弃反共立场,但提出的谈判条件与中共所提出国共合作条件比较接近。此后,国共两

党主要领导人开始正式谈判。

2月9日至3月15日，中国共产党代表周恩来、叶剑英与国民党代表顾祝同、贺衷寒、张冲在西安谈判。周恩来重申了中共对一些基本问题的意见，要求国民党承认红军，承认苏区，承认各党派的合法地位，组织各党派的联盟，还提出恢复张学良的自由、复职授权等问题。经过反复磋商，双方意见大体趋于一致。3月8日，双方决定将一月来的谈判作一总结，由周恩来写成条文，送蒋介石作最后决定。主要内容是：一、中国共产党承认服从三民主义的国家和国民党的领导地位，彻底取消暴动政策和没收地主土地的政策，停止赤化运动；国民政府分批释放监禁中的中共党员，容许共产党在适当时期内公开。二、取消苏维埃政府及其制度，将目前红军驻在地区改为陕甘宁行政区，执行国民政府统一法令与民选制度，其行政人员经民选推荐，由国民政府任命；行政经费由行政院及省政府规定。三、红军取消，改编为国民革命军，服从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及蒋介石的统一指挥，其编制人员、给养及补充与国军同等待遇，其各级人员由自己推选，呈报军委会任命，政训工作由军委会派人联络；将红军中最精壮者改编为3个国防师，计6旅12团及其他直属之工、炮、通信、辎重等部队，在3个国防师上设某路军总指挥部；将红军的地方部队改编为地方民团或保安队；红军学校办完本期后结束；停止对河西走廊红军西路军的进攻。3月10日，国民党方面却另提出一个修改案，对原已达成的协议作了重大改动。其中提出：红军改编为3个师后，每个师的人数只能有1万人，共3万人，要服从南京政府军事委员会和蒋介石的"一切命令"，政训人员由南京政府派人参加，各级副职由南京政府派人充任；将"陕甘宁行政区"改为"地方行政区"，直属所在省，并取消"民选制度"一语，改"民选推荐"为"地方推荐"；也不提停止进攻河西走廊的红军西路军。双方争执基本上仍是民主政治与红军独立领导问题。因国民党的阻挠，谈判无结果。最后只达成红军改编为3个师、在西安设中共办事处的协议。从3月起，国民党开始接济红军的军饷。

3月下旬，周恩来由潘汉年陪同抵杭州，和蒋介石谈判。周恩来重申了中共中央的谈判条件，并提出几点具体要求：一、陕甘宁边区须成为整个行政区，不能分割；二、红军改编后的人数须达4万余人；三、3个师以上必须设总部；四、国民党不能派遣副佐及政训人员；五、红军学校必须办完本期；六、红军防地须增加。蒋介石开始时先表示，承认中共有民族意识、革命精神，是新生力量，几个月来的和平运动影响很好；承认由于国共分家，致使十年来革命失败，造成军阀割据和帝国主义者占领中国的局面，要求各自检查过去的错误。然后着重提出，要中国共产党不必说同国民党合作，只是同他个人合作，拥护他为领袖。还说具体问题容易解决，如：在几个月后中共可以参加国民大会、国防会议；陕甘宁行政区可以是整个的，但须由中共推荐一个南京方面的人来任正职，副职以下均归中共；军队人数不同中共争，总的司令部可以设，他决不来破坏红军部队。要中共提出一个永久合作的办法。周恩来表示制订共同纲领是保证合作到底的最好办法。双方商定谈判继续进行。4月初，周恩来回延安向中共中央报告杭州谈判情况。中共中央多次召开政治局会议，讨论国共合作和民族统一战线纲领问题。商定以抗日十大纲领及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宣言为共同基础，起草一个民族统一战线纲领，征求蒋介石的同意。提议在这个纲领的基础上，建立包括国共两党和赞成这个纲领的各党派及政治团体的民族联盟，共同推举蒋介石为领袖。对其他具体问题，则坚持在不妨碍苏区实行民主制度和共产党在红军中的独立领导的原则下进行谈判。

6月8日至15日，周恩来在江西庐山与蒋介石、宋美龄、宋子文、张冲等谈判。周恩来先提交了中共中央提出的《关于御侮救亡、复兴中国的民族统一纲领(草案)》。其主要内容是：争取民族独立，反对日本帝国主义；实现民权，保障人民自由；实现民生幸福，建立国防经济。细则共52条。蒋介石完全撇开中共的《民族统一纲领(草案)》，另外提出一个方案，其具体办法是：一、成立国民革命同盟会，由蒋介石指定国民党的干部若干人和共产党推出同等数量的干部组成，蒋为主席，有最后决定权。二、两党一切对外行动及宣传，统由同盟会讨论决定，然后执行。关于纲领问题，亦由同盟会加以讨论。三、同盟会在进行顺利后，将来视情况许可扩大为国共两党分子合组的党。四、同盟会可与共产国际发生代替共党的关系，并由此坚定联俄政策，形成民族国家间的联合。这个方案显然是要在国民革命同盟的名义下，从组织上把共产党溶化在国民党内。在国共合作中急需解决的具体问题上，蒋介石推倒在杭州时作过的承诺。他提出：先由中共发表宣言，国民党政府即公布红军编制为3个师，4.5万人，3个师以上设政治训练处指挥之；朱德、毛泽东须离开红军；陕甘宁边区政府可由中共推择国民政府方面的人任正职，中共

推荐副职；分批释放在狱中的中共党员。对允许共产党适时公开问题不再提起，反而规定中共派代表参加国民大会时不能以中共名义出席。周恩来当即表示不同意有关同盟会的组织原则、红军指挥机关与边区政府人事安排等问题的意见，并严词驳斥要朱德、毛泽东离开红军“出洋”的安排。双方争执很久，问题仍未得解决。6月18日，周恩来回到延安。中共中央研究了蒋介石的意见。为了顾全大局，准备作出重大让步。在提出的新方案中，原则上同意组织国民革命同盟会，但要求先确定共同纲领，以奠定同盟会及两党合作的政治基础。同盟会的组织原则，在共同承认纲领的基础上，可同意国共两方各推出同数干部组织最高会议，另以蒋介石为主席，承认其依据纲领有最后决定权。中共准备在7月中旬发表宣言，其内容以中共中央致国民党五届三中全会电及上次交蒋的方案为根据。在宣言发表后，如蒋同意设立总的军事指挥部，红军即待其名义发表后改编。否则即于8月1日自行宣布改编，采用国民革命军暂编军、师名义，编3个正规师，共4.5万人。陕甘宁边区民主选举在7月内自动实行，并向蒋推荐张继、宋子文、于右任3人中择1人任边区行政长官，林伯渠任副长官。这个新方案，尽可能地照顾了蒋介石所提的要求，而拒绝或限制其中一些极端无理的要求，为以后的谈判打开了通路。

抗日战争爆发后，中共和国民党的代表在庐山、南京继续谈判，实现了国共两党第二次合作。

（陈绍畴）

中国共产党全国代表会议召开

1937年5月2日至14日，中共中央在延安召开有苏区、白区和红军代表参加的全国代表会议。当时称苏区中共代表会议。

西安事变后，中国共产党为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做了不懈的努力，国内和平初步实现。为确定中国共产党在新形势下的新任务，1937年5月2日至14日，中共中央在延安召开苏区中共代表会议。参加会议的有苏区、白区和红军的代表200多人。会议开始，张闻天致开幕词。他指出：中国共产党目前的迫切任务，就是巩固国内和平，争取民主权利，实现对日抗战。为了完成这些任务，必须大大加强白区党的组织与领导；使陕甘宁特区成为抗日的模范区；红军必须成为模范的抗日军，成为抗日战争的领导核心；巩固中国共产党，加强党内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教育。他强调，只有实现上述任务，共产党才能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中取得领导权。取得共产党在民族革命运动中的领导权，是目前一切工作的中心。5月3日，毛泽东在会上作《中国共产党在抗日时期的任务》的报告。报告对华北事变以来共产党的工作进行了总结，分析了党所处的新的历史环境，指出国民党的政策已经有了初步的转变，开始接受了中共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因此，以争取和平为主要内容的阶段已经过去，当前的主要任务是争取民主。毛泽东认为，为了实现民主，必须立即开始实行两方面的改革，一方面是将政治制度上国民党一党派一阶级的反动独裁政体，改变为各党派各阶级合作的民主政体；另方面是人民的言论、集会、结社的自由。这两方面的改革，是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纲领上的重要部分，也是建立真正的坚实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必要条件。针对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已由可能性初步变为现实性的情况，毛泽东阐述了在统一战线中坚持无产阶级领导权的重要性，提出了无产阶级实现领导权的4个必须具备的条件：一、根据历史发展行程提出基本的政治口号和动员口号，作为全国人民一致行动的具体目标；二、共产党应该提起自己的无限的积极性和忠诚，成为实现这些具体目标的模范；三、在不失掉确定的政治目标的原则上，建立与同盟者的适当的关系，发展和巩固这个同盟；四、共产党队伍的发展，思想的统一性，纪律的严格性。5月8日，毛泽东作《为争取千百万群众进入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而斗争》的结论，回答了讨论中提出的一些问题。毛泽东着重提出，共产党的组织要向全国发展，要自觉地造就成万数的干部，提高全党特别是干部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水平，使他们有政治远见，有工作能力，富于牺牲精神，能独立解决问题，在困难中不动摇，忠心耿耿地为民族、为阶级、为党而工作。5月10日，秦邦宪作《苏区党的组织问题》报告。报告指出，共产党在苏区的基本任务，就是转变与创立特区为抗日的及民主政治的模范区。为了完成这个任务，苏区的共产党组织必须：一、彻底地实施民主共和制度，并保证共产党的领导作用。二、提高工农红军到新的阶段，以战胜现代武装的日本帝国主义军队为目标，把红军的军事政治的训练教育提高到新的阶段；三、大大地提高苏区人民的文化水平；四、恢复与发展苏区的生产，改善人民的生活。报告指出，为了适应新形势新任务的需要，共产党必须提高政治工作和组织工作的水平，改善工作方法和组织形式。党的建设本身要强调实行党内生活的民主化。加强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教育，发展自我批评，提高革

命的警觉性，实行正确的干部政策和正确的领导方式。5月14日，会议闭幕，林伯渠致闭幕词。这次会议批准了遵义会议以来中共的政治路线，为迎接全国抗日战争的到来，在政治上和组织上做了重要准备。

接着，从5月17日开始，中共中央在延安召开了白区工作会议。出席会议的有中共中央北方局及其所属的北平、天津、河北、山西、河南、山东等地中共组织的负责人。会议总结了共产党在白区工作中的经验教训，确定了党在白区的基本方针和斗争策略。刘少奇在会上作《关于白区的党和群众工作》的报告，回顾了十年内战时期党在白区工作的历史，着重批评了党内长期存在的"左"倾关门主义和冒险主义，阐述了白区的党和群众工作实行彻底转变的必要性。指出这种转变具有两重性质：一是因为环境的变动，政策的改变，需要改变我们斗争的组织的与工作的方式；二是因为在党与群众工作中还存在着错误的恶劣的传统，需要肃清与改变。这两重性质的转变缺一不可，但比较起来，前一种转变是比较容易的，而后一个转变，是一个极艰难的任务，然而这是决定一切的东西。报告还论述了正确建立党和群众的关系、公开工作和秘密工作的联系，提出了共产党组织自身转变的具体要求。6月6日，张闻天在会上作《白区党目前的中心任务》的报告，指出共产党在革命新阶段的中心任务是：建立全民族的统一战线，战胜日本帝国主义，实现民主共和国。6月9日至10日，刘少奇作会议结论发言。这次会议着力引导全党冲破"左"的历史传统的束缚，一般地正确地决定了党在白区工作的策略任务，以及为实现这些任务必须进行的党的组织工作和群众工作，对于推动白区工作实行彻底转变起了积极的作用。　（陈绍畴）

卢沟桥事变

1937年7月7日，日军在北平（北京）卢沟桥附近向中国驻军第二十九军发动进攻的事件，也称七七事变。

1935年华北事变后，日本大力进行以征服中国和称霸亚洲为主要目标的扩军备战，加速了发动全面侵华战争的步伐。1936年，日本大幅度地扩充中国驻屯军，兵力由1771人增至5774人，分别配置于天津、塘沽、唐山、滦县、山海关、秦皇岛等地。6月3日，日本在新的《帝国军队的用兵纲领》中提出"采取先发制人的攻势，谋求速战速决"的战略方针，其初期的目标是，占领华北要地和上海附近。8月，日军参谋部制订《1937年度的对华作战计划》，决定在对华北作战时，除过去的两个集团军（5个师）外，根据情况再增加3个师，必要时还可能在华北5省进行作战。日本还频繁地派出将校幕僚前往中国华北、华中和东北地区进行战略性的现地侦察。9月18日，日军在丰台地区进行军事演习，与中国驻军发生冲突。日军以此为借口，包围了中国军队的兵营，逼迫中国驻军撤出丰台。次日，日军侵占丰台。从10月起，日军以北平为目标，不断在丰台、卢沟桥一带及北宁铁路沿线进行挑衅性实战演习。卢沟桥在北平西南10余公里，横跨永定河，是北平西南的门户。当时北宁路沿线，东起山海关、西至丰台，均为日军所控制。1937年7月7日下午，驻丰台日军河边正三旅团第一联队第三大队第八中队，由中队长清水节郎率领到达卢沟桥以北龙王庙附近。当晚，日军在龙王庙、大瓦窑一带实施演习。10时许，宛平中国守军第二十九军第三十七师第一一〇旅突然听到城东北方向响起枪声，便严密注意日军的动态。夜12时许，日本驻北平特务机关长松井太久郎给冀察政务委员会外交委员会打电话，诡称：有日军陆军一中队，夜间在卢沟桥演习，仿佛听见由驻宛平城内之军队发枪数响，致演习部队一时呈混乱现象，失落士兵1名，要求进入宛平城搜索。二十九军军部拒绝了日军的无理要求，并答复说：卢沟桥是中国领土，日本军队事前未得我方同意在该地演习，已违背国际公法，妨害我国主权，走失士兵我方不能负责，日方更不得进城检查，致起误会。7月8日晨2时许，日军由丰台增派的部队在第三大队队长一木清直率领下与清水节郎所部会合，按计划占领了宛平东北的沙岗。冀察当局为防止事态扩大，同意双方派员前往卢沟桥调查。中方委派宛平县长王冷斋、冀察政务委员会外交委员会专员林耕宇、冀察绥靖公署交通处副处长周永业与冀察绥靖公署日本顾问樱井德太郎、日军辅佐官寺平忠辅和秘书斋藤进行谈判。晨5时许，双方尚在交涉中，日军即下令向卢沟桥一带的中国军队发动攻击，并炮轰宛平县城。在全国人民抗日热潮的推动下，中国守军第二十九军第一一〇旅奋起抵抗，揭开了全国抗战的序幕。他们表示"愿与卢沟桥共存亡"，"日军要求我军撤出卢沟桥，则有死而已，卢沟桥可为吾人之坟墓"。吉星文团连续击退日军3次进攻。日军第三大队直扑龙王庙和附近的铁路桥。守卫桥头阵地的二十九军只有两个排。他们表示"宁为战死鬼，不做亡国奴"，同日军展开拼杀，终因寡不敌众，60多名战士壮烈牺牲。日军也在河堤上丢下了上百具尸体。7月8日夜12时许，吉星文团突击

队的青年战士用绳梯爬出宛平城，出其不意地将日军1个中队全歼在铁路桥上，夺回了铁路桥和龙王庙，军心为之大振。

卢沟桥事变后的第二天，中共中央发表《中国共产党为日军进攻卢沟桥通电》，指出，平津危急！华北危急！中华民族危急！只有全民族实行抗战，才是我们的出路！号召全中国同胞、政府与军队团结起来，筑成民族统一战线的坚固长城，抵抗日寇的侵掠！同日，毛泽东、朱德、彭德怀等致电蒋介石，表示红军将士愿意为国效命，与敌周旋，以达保土卫国之目的。要求本"御侮抗战之旨，实行全国总动员，保卫平津，保卫华北，规复失地"。同时，红军将领致电宋哲元，表示"誓做贵军后盾"。北平中共地下组织发动各界同胞援助二十九军抗战。中华民族解放先锋队、华北各界救国联合会、北平各界救国联合会的代表赴前线慰劳抗日官兵；青年学生参加情报、募捐、救护等工作，并组织战地服务团；长辛店的工人运送枕木、铁板和铁轨到宛平，修筑阵地；郊区农民为前线输送粮食、饲料、燃料和民工。人民群众的支援，激发了二十九军广大官兵的抗日热情。冀察当局却根据国民党政府"应战不求战"的方针，放弃了歼敌的有利时机。于7月9日晨，接受了日方缓兵之计的和谈要求，并达成3项口头协议：一、双方立即停止射击；二、日军撤退到丰台，二十九军撤向卢沟桥以西；三、城内防务由保安队接防。7月10日，日本又在"就地解决"的幌子下，提出二十九军向日军道歉，卢沟桥、宛平县和龙王庙地区不得驻扎中国军队等无理要求。11日，日本政府发表派兵华北的声明，诬指中国守军"在卢沟桥附近进行非法射击"，决定增兵华北，任命香月清司为中国驻屯军司令官，并从驻朝鲜日军抽调第十二师团来华。随后，大批日本关东军开抵天津，并以重兵进犯北平郊区。当时，二十九军军长宋哲元正在老家山东乐陵"度假"，一度幻想和平解决事变。7月11日，他到天津，仍忙于同日方和平交涉，认为卢沟桥事变只是"局部之冲突，能随时解决"，因而延误了战机。7月17日，蒋介石在庐山发表谈话，声称："如果战端一开，就是地无分南北，年无分老幼，无论何人，皆有守土抗战之责任，皆应抱定牺牲一切之决心。"这一谈话，确定了准备抗战的方针。但这时蒋还没有完全放弃对日媾和幻想，仍想将卢沟桥事变限制在"地方事件"的范围内，企图通过外交途径，谋求和平解决。7月19日，宋哲元抵北平后，下令拆除城内的防御工事，打开关闭数日的城门，谢绝全国各界赠送给二十九军的抗战劳军捐款。同时，继续与华北日军进行谈判。国民党政府外交部向日本使馆提议，中日双方停止军事行动，将部队撤回原地，然后由外交途径解决，遭日本外务省拒绝。7月20日，日军第一批增援部队进入华北。当日下午，日军炮击宛平城和长辛店。守城官兵在团长吉星文指挥下，打退了敌人多次进攻。21日，大批日军抵达丰台。22日，日军40辆汽车往返于天津与丰台运送军火。25日，日军在天津集结的兵力达6万余人。26日，日军占领廊坊。同日，日军向宋哲元提出最后通牒，限令其部队退出北平。27日，日军向北平近郊中国守军发起总攻。在全国人民抗日浪潮的推动下，二十九军绝大多数官兵纷纷要求抗日，宋哲元感到求和无路，遂于7月27日发表通电：第二十九军为自卫护国，不惜牺牲，服从南京命令，更请各界给以指教。并令二十九军各部奋起抵抗。同日，第三十七师收复丰台车站，第三十八师一部收复廊坊，第一三二师在南苑与敌血战。第二十九军副军长佟麟阁（1892—1937，字捷三，河北高阳人）、第一三二师师长赵登禹（1890—1937，字舜臣，山东菏泽人）亲临前线指挥作战，壮烈殉国，官兵伤亡约5000余人。7月29日，日军南北两路向北平西郊推进，北平沦陷。30日，天津失守。日军进攻卢沟桥，标志着日本蓄谋已久的全面侵华战争的爆发。中国的抗日民族解放战争从此开始。（王佩琏）

山西新军建立

1937年8月1日，中国共产党领导和组织的山西青年抗敌决死队在太原宣告成立。

抗日战争爆发后，日军在占领北平（北京）、天津后很快地就侵入了山西。阎锡山的晋军和前来增援的中央军大部闻风而逃，大批城镇沦入敌手。阎锡山看到晋军存在许多弱点，战斗力不强，急欲扩充实力，应付危局。为争取阎锡山抗战，以薄一波为书记的中共山西公开工作委员会，通过山西牺牲救国同盟会培训了一批军政干部，为组建革命武装做了准备。薄一波以牺盟会负责人的名义，建议阎锡山组建新军。阎锡山同意先试建一个团。1937年8月1日，山西青年抗敌决死队第一总队（相当于团）在太原成立。10月，晋北前线吃紧，山西战局恶化。阎锡山又相继组建了决死队第二、第三、第四总队，人数达5000余人。阎锡山派旧军官担任各级军事指挥职务，各总队的政治工作人员大部分是共产党员。第一总队总队长鲁应麟，政治委员薄一波，政治主任牛佩琮；第二总队总队长陈庆华，政治委员张文昂，政治

主任韩钧；第三总队总队长陈光斗，政治委员戎子和，政治主任董天知；第四总队总队长梁浩，政治委员雷任民，政治主任刘玉衡。决死队名义上属于阎锡山的军队建制，实际上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一支人民抗日武装。它成为山西新军的主力。太原失守后，阎锡山把决死队4个总队扩编为4个纵队（相当于旅），还组建了工人武装自卫旅（简称工卫旅）、政治保卫队第二〇九、第二一二、第二一三旅和暂编第一师。部队发展到50个团（其中46个正规团），约5万余人。11月，根据中共中央北方局和八路军总司令朱德的指示，并取得阎锡山的同意，决死队先后开赴晋东南、晋西南、晋西北地区，协同八路军发动群众，开展游击战争，创建根据地。第一纵队主要活动于晋东南北部沁县、沁源、安泽和平遥、介休、灵石、霍县、赵城、洪洞、临汾等县的同蒲路东侧及屯留等地区，以及正太铁路以南昔阳、平定、阳泉等地区。第二纵队主要活动于晋西南孝义、隰县、大宁、永和、石楼、蒲县、吉县等地及同蒲路南段灵石、霍县、洪洞、赵城、临汾以东一部分地区。第三纵队主要活动于晋东南南部长治、长子、高平、陵川、壶关、阳城、沁水、安泽等地区。第四纵队主要活动于清源、徐沟、交城、文水、汾阳、平遥、离石、方山、中阳、石楼、临县、兴县、岚县、静乐等地区。工人武装自卫旅主要活动于太原、清源、徐沟、交城、文水、汾阳、离石、中阳及神池、五寨地区。政治保卫队主要活动于晋西南汾西、孝义、新绛、乡宁、万荣、临猗、平陆、芮城一带。暂编第一师主要活动于晋西北神池、五寨、宁武、平鲁、岢岚、兴县、静乐等地区。决死队同八路军互相支持、互相配合，在发展和坚持山西及华北的抗日游击战争中起了重要作用。决死队建立初期，曾得到阎锡山的支持。后来阎锡山转向消极抗战，积极反共，于1939年12月发动了"晋西事变"，妄图消灭决死队。根据中共中央的指示，决死队在八路军的支持下展开自卫反击，胜利地粉碎了阎锡山的进攻。1940年，决死队第二、第四纵队、工卫旅、暂一师和政治保卫队第二〇九旅编入八路军一二〇师序列；第一、第三纵队和政治保卫队第二一二、第二一三旅编入八路军第一二九师序列，成为中国共产党直接领导的人民军队。

（陈绍畴）

八一三事变

1937年8月13日，日军进攻上海的事件。

日军占领平津后，为了直接向国民党政府施加压力，求得"速战速决"，迅速解决中国问题，向上海发动大规模进攻。日本在上海早已驻有一支装备精良的海军陆战队，并在虹口建立了海军陆战队司令部。卢沟桥事变后，日本驻华中第三舰队司令官长川谷清在《对华作战用兵意见书》中声称："欲置中国于死命，以控制上海和南京最为重要。"日本政府决定向上海增派援军并加强其驻淞沪的第三舰队。驻上海日军一再向中国军队寻衅。1937年8月9日下午，日军海军陆战队大山勇夫中尉和水兵斋藤要藏持枪驾车冲入虹桥中国军用机场，窥探中国军队的情况。中国哨兵喝令其停车，日军不服制止，开枪打死中国士兵1名。中国保安队被迫还击，将两名日军官兵击毙。次日，日本命令在佐世保军港待命的军舰和特别陆战队立即开赴上海，并令驻沪海军陆战队和日侨义勇团备战，还派遣海军第三舰队主力集中吴淞一带。8月11日，驻沪日军要求中国政府撤退上海保安队，拆除防御工事，遭拒绝。国民党政府军事委员会即急令驻京沪沿线的京沪警备司令官张治中（1890—1969，安徽巢县人）率第五军第八十七师、第八十八师向吴县、常熟、无锡一带集结，开赴上海。同时令驻蚌埠的第五十六师、驻汉口的第九十八师和驻嘉兴的独立第二十旅即向吴县地区集结。8月12日，八十七师和八十八师分别进至杨树浦和闸北地区。8月13日，日军向中国守军发动进攻，中国军队奋起抵抗，淞沪战争爆发。

（王佩琏）

淞沪会战

1937年8月13日至11月12日，中国军队在上海及其周围地区抵抗日本侵略军的战役。

1937年8月13日，日军以"虹桥事件"为借口，对上海发动进攻。日军驻上海陆军及海军陆战队6000余人沿北四川路、江湾路、军工路一线展开，进攻中国守军阵地。敌军舰以猛烈排炮向中国军队做纵深轰击，中国守军奋起抵抗，淞沪战役爆发。日军进攻上海，直接威胁到国民党统治集团的心脏地区和英、美在华利益。在全国人民要求抗战的压力下，8月14日，国民党政府发表《自卫抗战声明书》，宣布对日作战。声明书称："中国之领土主权，已横受日本之侵略"，中国决不放弃领土之任何部分。"中国为日本无止境之侵略所逼迫，兹已不得不实行自卫，抵抗暴力"。8月15日，日军成立上海派遣军司令部，以松井石根大将为司令官，指挥由日本国内增援的第三、第十一师团和炮兵、坦克、航空兵一部，企图与海军协同占领上海及其北面地区的重要地带。趁日军增援部队尚未到达之前，中国军队第九集团军向据

守上海市区的日军发起围攻。8月16日，中国空军轰炸日军公大纱厂和虹口地区的据点；陆军第八十七师、第八十八师从左右两翼缩小对日军的包围圈。浦东日军被迫放弃三菱、太仓、日清公司的仓库和码头。第八十八师随后发动了向虹口日军海军陆战队司令部的进攻。日军凭借坚固的防御工事和舰炮的支援，进行顽抗。中国军队火力较弱，损失惨重。双方呈胶着状态。8月17日，中国空军前来助战，未能奏效。19日，由西安调沪的宋希濂的第三十六师与第八十七师、第八十八师一起投入战斗，经一夜激战，一度攻入汇山码头。21日夜，第三十六师第二一五团第二营冲至华德路十字街口，与敌展开白刃格斗。敌以战车阻塞路口，纵火焚烧房屋，营长李曾阵亡，全营300余官兵葬身火海，以身殉国。由于日军死守据点待援，中国军队两路进攻均受挫。8月20日，国民党政府军事委员会为统筹战局，将全国临战地区划分为5个战区，上海、苏南、浙江划为第三战区，由冯玉祥、顾祝同任正副司令长官，下辖第九、第十五、第十九集团军，共30余万人，重点防守吴淞、宝山、月浦、罗店、浏河沿江防线。23日，日本上海派遣军司令官松井石根指挥第三、第十一师团和第六、第十三师团一部分别在张华浜、狮子林、川沙一带强行登陆，向宝山、罗店、浏河一线进攻。国民党军第九、第十五、第十九集团军在顾祝同指挥下顽强抗击。日军以一个旅团的兵力，在飞机、舰炮掩护下，猛扑罗店、月浦中国守军阵地。双方形成对这一线阵地的反复争夺，屡进屡退成拉锯战。中国守军英勇战斗，予日军以重大杀伤。9月1日，日军千余人向守卫狮子林的第十八军第九十八师第五八八团第二营阵地进攻。该营坚守阵地，与敌展开肉搏战，反复冲杀达4小时，伤亡惨重。该团第三营前往增援，未及赶到，遭敌机轰炸，受到严重损失。狮子林被日军占领。9月3日，守卫宝山的第十八军第五八三团第三营受日军围攻，官兵伤亡惨重。该营营长姚子青表示："誓本与敌偕亡之旨，固守城垣，一息尚存，奋斗到底！"他率领官兵奋力抗击，打退敌人多次进攻。日军以强大炮火轰击宝山城并施放硫磺弹，燃起熊熊大火，工事、房屋全成灰烬。敌冲入城内，全营官兵与敌巷战肉搏，激战两昼夜，弹尽粮绝，500名官兵全部壮烈殉国。至9月17日，中国军队退守北站、江湾、庙行、罗店、浏河口一线，继续与日军对峙。日军鉴于上海作战不能迅速进展，再次增派第九、第十三、第一〇一师团到上海，加入上海派遣军战斗序列，并将华北后备步兵10个大队及炮兵、工兵一部增援上海。中国军队也陆续增援，调整部署。9月21日，蒋介石亲自兼任第三战区司令长官；以张发奎指挥第八、第十集团军为右翼作战军；朱绍良指挥第九、第二十、第十八集团军为中央作战军；陈诚指挥第十五、第十九集团军为左翼作战军。同时组织了江防军，防守长江下游各要塞。中国军队在淞沪一带的兵力达40余万人。9月下旬，日军增援部队先后在吴淞、上海间登陆。为确保其侧背安全，从22日起，在战车、火炮的掩护下，向浏(河)罗(店)公路猛扑。这时，中国守军已丧失战役初期的主动权，被迫转入防守。9月30日拂晓，日军突破万桥、严桥、陆桥等处中国守军阵地。刘行方面的中国守备部队陷于苦战，伤亡惨重。为避免日军继续突破，10月1日，陈诚左翼作战军向蕴藻浜南岸、陈行、广福、施相公庙、浏河一线转移。10月5日起，日军猛攻蕴藻浜，中国守军予敌以重大杀伤。10月11日后，日军为断闸北、江湾、庙行中央作战军归路，企图南渡蕴藻浜，控制大场、南翔。双方在蕴藻浜沿岸以大场为中心展开激烈争夺，中国军队伤亡甚重。10月15日，国民党第三战区再次调整部署，将蕴藻浜南岸地区划归中央作战军，廖磊的第二十一集团军归中央作战军指挥。10月19日，第二十一集团军向敌发起攻击。日军主力发动了步、炮兵联合进攻，双方展开大规模遭遇战。中国军队由于装备相形见绌，加之连日作战，伤亡过大，于23日开始撤退。26日，大场被敌攻占，中央作战军主力撤至苏州河南岸到虹桥、南翔一线地区。左翼作战军向姚家渡至唐家桥之线转移。从闸北撤退下来的第八十八师第五二四团一营官兵800人，在副团长谢晋元率领下，孤守着苏州河北岸四行仓库，掩护主力部队撤退。27日，日军向四行仓库攻击。谢晋元指挥所部激战4昼夜，毙敌200余人，直至奉命撤退，杀出重围，退入公共租界。至11月4日，日军仍未突破苏州河。此时，国民党第三战区根据战局变化，撤销中央作战军，将部队划为左、右两作战军，分别由陈诚、张发奎指挥。11月5日，敌第十军主力从杭州湾北侧金山卫和全公亭等处登陆，分路直扑松江，对淞沪守军实行侧后迂回，中国守军处于腹背受敌状态。8日晚，第三战区下令前线部队向福山、常熟、苏州、吴江全线撤退。11月12日，上海市区沦陷。淞沪战役历时3个月，敌我双方投入兵力之多和攻守作战的激烈程度，在抗战史上是罕见的。据日本陆军省11月初宣布，自8月13日至10月底，日军死伤达4万多人。国民党军队到10月中旬，每师所存人数多者三四千人，少者只有二三千人。中国军队在上海人民

的支援下进行了顽强抵抗。终因敌强我弱和国民党最高当局军事指挥上失误，以中国军队的失败而告结束。但它激发了全国军民的斗志，动员全国抗战，打破了敌人速战速决的计划，具有一定的意义。

（王佩琏）

《中苏互不侵犯条约》签订

1937年8月21日，中国和苏联政府在南京签订的互不侵犯条约。

抗日战争爆发后，苏联政府明确表示支持中国进行抗日战争。国民党政府进一步同苏联接近，并从苏联取得军火武器的援助。1937年8月21日，国民党政府外交部长王宠惠和苏联驻华大使鲍格莫洛夫分别代表本国政府在南京签订《中苏互不侵犯条约》。其主要内容是：双方斥责以战争作为解决国际纠纷的手段；在处理两国关系时，不以战争作为国家政策的工具；当缔约一方受到第三国侵略时，另一方不得给予该第三国以任何直接的或间接的援助；条约有效期为5年，如未经声明废止，期满后还可自动延长3年。接着，苏联国防部长伏罗希洛夫表示：苏联对中国的抗日战争"决不坐视"。苏联在财政上、物资上给中国政府以援助。1938年3月1日，中苏两国在莫斯科签订第一次借款协定，借款额为5000万美元。根据协定，苏联将297架飞机、82辆战车、425门曲射炮、1825挺机关枪、400辆汽车、36万发炮弹、1000万发来福枪弹及其他军用物资运往中国。同年7月1日，又签订第二次借款协定，限额为5000万美元。随后，苏联将180架飞机、300门大炮、1500挺轻机枪、300辆货运卡车、飞机发动机零部件、步枪子弹等总值为3000万美元的军用物资运抵中国。第三次借款协定于1939年6月13日在莫斯科由孙科和米高扬签订，借款额为1.5亿美元。同时又支援中国250门大炮、4400挺机枪、5万枝来福枪、500辆货运卡车、1亿发步枪子弹及其他军用物资。苏联从1937年底至1939年2月，先后派遣来华的军事顾问团成员和军事专家达3365人。苏联航空志愿队也来华参战。在太平洋战争爆发前，苏联是唯一的对中国抗战进行实际军事援助的国家。

（王佩琏）

洛川会议

1937年8月22日至25日，中共中央在陕北洛川冯家村召开的政治局扩大会议。

参加会议的有政治局委员和红军的主要领导干部20余人。会议分析了全国抗战开始后的新形势，讨论确定了中国共产党在抗日战争中的战略任务和基本政策。毛泽东在会上作了军事问题和国共两党关系问题的报告。他指出，红军的基本任务是：创造根据地，牵制消灭敌人，配合友军作战（主要是战略配合），保存和扩大红军，争取共产党对民族革命战争的领导权。红军的作战方针是：独立自主的山地游击战争，包括在有利条件下集中兵力消灭敌人兵团，以及向平原发展游击战争。作战原则是：分散发动群众，集中消灭敌人，打得赢就打，打不赢就走。关于国共两党关系，毛泽东指出，要坚持统一战线，巩固扩大统一战线，同时要保持共产党在政治上、组织上的独立性。会议通过了毛泽东起草的《抗日救国十大纲领》，其要点是：一、打倒日本帝国主义；二、全国军事的总动员；三、全国人民的总动员；四、改革政治机构；五、抗日的外交政策；六、战时的财政经济政策；七、改良人民生活；八、抗日的教育政策；九、肃清汉奸卖国贼亲日派，巩固后方；十、抗日的民族团结。这是实行全面抗战路线的纲领。会议还通过了《关于目前形势与党的任务的决定》。决定指出：中国的抗战是一场艰苦的持久战。争取抗战胜利的关键，在使已经发动的抗战，发展为全面的全民族的抗战。号召全党"应该克服一切困难，为实现本党所提出的争取抗战胜利的十大纲领而坚决奋斗"。会议确定了党的工作重心应放在战区和敌后。在敌人后方放手发动独立自主的山地游击战争，配合正面战场，开辟敌后战场，建立敌后抗日根据地；在国民党统治区，广泛发动抗日的群众运动，团结广大人民，与国民党的片面抗战路线进行斗争；在有利于动员全国人民参加抗日战争的前提下，争取全国人民所应有的政治、经济权利，以减租减息作为抗日战争时期解决农民土地问题的基本政策。会议决定中共中央军委由毛泽东、朱德、周恩来、彭德怀、任弼时、叶剑英、张浩、贺龙、刘伯承、徐向前、林彪等11人组成，毛泽东为书记（实际称主席），朱德、周恩来为副书记（实际称副主席）。洛川会议是在抗日战争刚刚爆发的历史转折关头召开的一次重要会议。它确定了中国共产党要按照独立自主的原则实行全面抗战路线，从而指导中共领导的军队实行由正规战到游击战的军事战略转变。

（王佩琏）

八路军挺进华北敌后

1937年8月下旬开始，八路军深入华北敌后与人民群众相结合，开展抗日游击战争，建立抗日根据

地。

根据国共两党达成的协议，1937年8月22日，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宣布红军主力部队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25日，中共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发布中国工农红军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的命令，任命朱德、彭德怀为正副总指挥，叶剑英、左权为正副参谋长，任弼时、邓小平为正副政治部主任。八路军下辖三个师：第一一五师，师长林彪，副师长聂荣臻，政训处主任罗荣桓；第一二〇师，师长贺龙，副师长肖克，政训处主任关向应；第一二九师，师长刘伯承，副师长徐向前，政训处主任张浩。全军编制4.5万人。9月12日，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发布电令，将第八路军番号改为第十八集团军，总指挥改称总司令。8月下旬开始，八路军第一一五师和第一二〇师主力先后经陕西韩城芝川镇渡过黄河，开赴山西前线抗日，随后第一二九师也沿此路线进入山西。八路军原准备进入恒山地区配合友军保卫山西，拱卫华北。华北日军在占领南口、张家口后，分3路向华北地区进攻：一路沿平绥线西进山西，一路沿平汉线南下，一路沿津浦线进攻山东。日军作战主力在平汉线，同时以一部兵力右翼迂回，企图首先夺取太原，占领山西，威胁平汉线方面的国民党军队和河南、山东的侧背，最后完成对全华北的占领。根据形势的发展，中共中央决定改变八路军的原战略部署，否则将全部处于敌之大迂回中，陷入被动地位。9月17日，毛泽东电示八路军总部：为使八路军在战略上展开于敌之侧翼，钳制敌人进攻太原和继续南下，援助友军，进行独立自主的山地游击战，决定将3个师由集中配置改为分散配置，第一一五师即时进入恒山山脉南段活动，准备依情况逐渐南移，展开于太行、太岳两山脉中；第一二〇师转至以管涔山脉为依托的晋西北地区活动；第一二九师于适当时机进至吕梁山脉为依托的晋西南地区活动。9月21日，朱德等率八路军总部到达太原。同日，毛泽东致电彭德怀，指出："今日红军在决战问题上不起任何决定作用，而有一种自己的拿手好戏，在这种拿手戏中一定能起决定作用，这就是真正独立自主的山地游击战（不是运动战）。"9月25日，毛泽东致电中共中央北方局，强调："整个华北工作，应以游击战争为唯一方向。"按照中共中央的战略部署，八路军总部令第一二〇师从左翼驰援雁门关；一一五师从右翼配合友军作战，在平型关前线首战告捷。10月上旬，国民党军败退至忻口一线。11月8日，太原失陷后，八路军在积极配合友军战役作战的同时，相机逐渐向敌后实行战略展开。第一一五师一部在聂荣臻率领下，以晋东北恒山地区为中心，开辟晋察冀抗日根据地；第一一五师主力转入晋西南，开始创建晋西南抗日根据地；第一二〇师进入管涔山脉创建晋西北抗日根据地；第一二九师进入以太行山区为依托的晋东南地区，开创晋冀豫抗日根据地。同时山西新军先后进驻晋东南、晋西南和晋西北地区，协同八路军发动群众，开展游击战争，创建抗日根据地。　（王佩琏）

陕甘宁边区政府成立

1937年9月6日，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在陕甘宁边区建立的抗日民主政权。

1935年10月，中央红军到达陕甘根据地。11月中旬，中共中央决定成立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政府西北办事处，将陕甘和陕北根据地连同新发展的地区划分为陕北、陕甘两省和关中、神府、三边3个特区，统一于西北办事处领导之下。西北办事处设主席团，秦邦宪任主席。1936年5月17日，中共中央决定设立陕甘宁省，归西北办事处领导。1937年1月13日，中共中央领导机关由保安（志丹）移驻延安。2月24日，中共中央决定由林伯渠（1885—1960，名祖涵，湖南临澧人）主持西北办事处工作，并着手筹建陕甘宁边区政府。3月，陕甘宁苏区改为陕甘宁特区。5月，正式颁布《陕甘宁边区选举条例》和《陕甘宁边区议会及行政组织纲要》，从7月15日开始，进行民主选举运动。抗日战争爆发后，中国共产党根据同国民党谈判达成的口头协议，并经国民党政府行政院第333次会议通过，陕甘宁边区政府于1937年9月6日宣告成立。林伯渠、张国焘、秦邦宪、董必武、徐特立、谢觉哉、郭洪涛、马明方、高岗等9人为边区政府主席团委员，林伯渠为主席，张国焘为副主席。陕甘宁边区辖陕西延安、鄜县（富县）、甘泉、延川、延长、安定（子长）、安塞、保安（志丹）、靖边、栒邑（旬邑）、淳化、米脂、绥德、清涧、葭县（佳县）、吴堡，宁夏盐池、定边，甘肃镇原、环县、庆阳、宁县、正宁等23个县及神府特区，面积13万平方公里，人口约200万。为了保卫和巩固边区，1937年8月，中共中央军委从八路军各师抽出兵力，在延安组成八路军后方总部留守处共9000余人。12月，留守处改编为留守兵团，肖劲光任司令员，曹里怀任参谋长，莫文骅任政治部主任。同时设立绥德、米脂、葭县、吴堡、清涧警备司令部和延川、延长河防司令部。原陕甘宁边区地方红军和游击队编成保安队，约5000余人，高岗任保安司令部司令员，周兴任副司

令员，谭希林为参谋长。此外，还组织群众性的、不脱离生产的自卫军，由保安司令部领导，人数约 20 余万。至 1937 年 12 月，陕甘宁边区完成了民主选举，建立了乡、区、县政府，选举产生了边区议员 500 多名。由于战争环境以及其他原因，未能及时召开边区议会会议。12 月 13 日，中共中央决定由林伯渠、张国焘、习仲勋、徐特立、刘景范、马明方、高岗组成新的陕甘宁边区政府主席团，林伯渠为主席，张国焘为副主席。1938 年 3 月 3 日，中共陕甘宁边区委员会和边区政府联合发出《告民众书》，号召全边区人民武装起来，开展广泛的民众游击战争；努力帮助政府、军队做好各项后勤工作；一切群众团体都要组织自己的力量，保证抗战工作之顺利进行。同年春，八路军留守兵团和保安部队在八路军一二〇师和一一五师配合下，打退了日军多次进犯。与此同时，边区军民进行了肃清土匪，打击汉奸、特务和反动地主豪绅的斗争，保卫了边区各项建设。陕甘宁边区首府延安，是中共中央所在地，是人民抗战的政治指导中心，是八路军、新四军和其他人民抗日武装的战略总后方，是全国实行抗日民主政治的模范区。

（王佩琏）

《中共中央为公布国共合作宣言》的发表

1937 年 9 月 22 日，国民党中央通讯社发表的中国共产党为促成第二次国共合作及全国人民大团结的基本政治纲领和政策的宣言。

抗日战争爆发后，中国共产党为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作出极大的努力。卢沟桥事变后，中共代表周恩来、秦邦宪、林伯渠抵庐山，继续同国民党就国共两党合作问题进行谈判。中共代表抵庐山后，随即将周恩来起草的《中共中央为公布国共合作宣言》草案提交蒋介石，建议以此为国共合作的政治基础，尽速发动全面抗战。由于蒋介石在红军改编问题上，坚持控制人事指挥权和由南京派任 3 个师的参谋长等，双方未达成协议。八一三事变后，日军大举进攻上海，威胁南京，全国的抗日情绪更加高涨，蒋介石急切希望红军出师作战以牵制日军，从而被迫同意了中共关于红军改编问题的主张。9 月中下旬，国共两党代表继续在南京谈判发表宣言和边区政府等问题。中共代表坚持宣言中所提的基本政治主张，对某些用词的修改作了某些让步。9 月 22 日，国民党通过中央通讯社发表了《中共中央为公布国共合作宣言》，提出中国共产党奋斗的总目标是：一、争取中华民族之独立自由与解放。首先须切实地迅速地准备与发动民族革命抗战，以收复失地和恢复领土主权之完整。二、实现民权政治，召开国民大会，以制定宪法与规定救国方针。三、实现中国人民之幸福与愉快的生活。首先须切实救济灾荒，安定民生，发展国防经济，解除人民痛苦与改善人民生活。并郑重宣布，愿在这个总纲领的目标下，与全国同胞携手一致努力。同时，重申中共的 4 项保证。23 日，蒋介石发表《对中国共产党宣言的谈话》。指出宣言之内容"均与本党三中全会之宣言及决议相符合"，表示"在存亡危急之秋，更不应计较过去之一切，而当使全国国民彻底更始，力谋团结，以共保国家之生命与生存"。蒋介石的谈话虽然"还表现着自大主义精神，缺乏自我批评"，但"蒋谈话指出了团结救国的深切意义，确定了共产党在全国的合法地位"。中国共产党的宣言和蒋介石的谈话"宣布了统一战线的成功，建立了两党团结救国的必要基础"。至此，国共两党的合作再次实现。

（林健柏）

平型关战役

1937 年 9 月 25 日，八路军第一一五师在山西繁峙平型关对日军进行的一次伏击战。

1937 年 8 月下旬，八路军东渡黄河向晋北前线开进。9 月，沿平绥线西犯的日军进入山西北部，占领天镇、广灵、大同，晋绥军向雁门关方向撤退。9 月 16 日，日军攻占浑源和涞源一线。此时，国民党第二战区司令长官阎锡山在平型关至雁门关和神池的内长城线组织防御。八路军总部指示第一一五师从东面配合友军作战，对从灵丘增援平型关之敌实施攻击。9 月 19 日，第一一五师进至平型关东南的上寨、下关地区集结。9 月 22 日，日军第五师团一部从灵丘向平型关方向进犯，次日，在平型关正面及团城口与国民党军发生激战。八路军利用平型关附近有利地形，采取侧面伏击的战术，予来犯之敌以歼灭性打击。24 日午夜，第一一五师主力冒雨由冉庄向平型关东北的白崖台前进，在小寨村至老爷庙公路附近山地设伏。25 日拂晓，敌第五师团第二十一旅团一部和大批辎重车辆沿灵丘至平型关公路西进，进入第一一五师的伏击地区。由于道路狭窄，雨后泥泞，其车辆、人马拥挤堵塞，在老爷庙东北的山谷里行动缓慢。第一一五师居高临下，突然发起攻击。该师第六八五团迎头截击，歼敌一部，封闭敌南窜道路；第六八七团将敌后尾部队分割包围于蔡家峪和西沟村地区，并抢占韩家湾北侧高地，切断了敌之退路；第六八六团勇猛冲向公路，与敌短兵相接，展开白刃格

斗。敌利用其车辆辎重作掩护，凭借优势火力进行顽抗。其中一部企图夺占公路两侧高地，掩护突围。第六八六团第二营迅速抢占老爷庙及其以北高地，与公路东侧部队形成对敌夹攻之势，将敌压缩于狭谷之中。敌企图突围，均被击退。先期进占东跑池之敌一部企图回援被困之部队，被第六八五团所阻。敌师团长板垣征四郎急令其在蔚县、涞源所部向平型关增援。担任钳制、阻击任务的第一一五师独立团，截断涞源、灵丘之间的交通线，在腰站地区打退日军增援部队的多次冲击，毙伤其300余人。被围于小寨村至老爷庙之敌，在6架飞机掩护下，再次猛攻老爷庙及附近高地，未得逞。第六八六团遂集中全力，在两翼友邻协同下，将被围之敌歼灭。至9月25日下午，战斗胜利结束。八路军第一一五师歼灭日军精锐第五师团第二十一旅团一部1000余人，缴获步枪1000余枝，机枪20余挺，击毁汽车100余辆、马车200余辆，取得了华北战场上中国军队主动寻歼敌人的第一个大胜仗。它振奋了全国民心，提高了中国共产党和八路军的声望。　　　　　（王佩琏）

忻口战役

1937年10月中旬至11月初，国民党军队在八路军的配合下与日军在山西北部忻口地区进行的一次战役。

平型关战役后，日军第五师团及关东军混成第一、第十一旅团与特种部队共5万余人，在板垣征四郎率领下，向太原进犯。为保卫太原，国民党第二战区集中8万军队，由副司令长官卫立煌（1896—1960，字辉珊，安徽合肥人）任前敌总指挥，在忻口地区组织防御，其部署为：朱德率第十八集团军为右翼，在滹沱河南岸依托五台山，制止日军前进，并相机以主力挺进雁门关，威胁敌之左翼，形成包围日军之态势；卫立煌率第十四集团军居中央，在代县至原平公路正面实施防御，抗击日军之进攻；杨爱源率第六集团军为右翼，在同蒲路西侧设防，并准备以一部兵力挺进敌后，威胁敌右翼，与第十八集团军东西呼应；傅作义指挥第七集团军为预备队集结在忻县、定襄一带，以便机动。10月3日，日军占领代县，沿原平公路向南进犯，7日，占领崞县。接着，攻占原平，迅速向忻口推进。忻口位于崞县与忻县之间，是晋北通往太原的门户。国民党军队自长城防线撤退以后，这里成为保卫太原的最后一道防线。卫立煌指挥第十四集团军配置在忻口以北龙王堂、南怀化、大白水、南峪之线。10月13日，日军在飞机、大炮、战车掩护下，强渡云中河向忻口西北主阵地南怀化高地发起猛烈攻击。中国军队以空军、炮兵协同作战，步兵肉搏冲锋，沿云中河两岸反复争夺，阵地失而复得，歼敌约两万余。为配合正面阻击，第十八集团军主力向灵丘、广灵、代县、崞县敌后进军，不断袭击日军交通线与后方目标。10月19日，第一二九师以一营兵力夜袭代县西南阳明堡机场，毁伤敌机24架，歼日军百余人，使其丧失空中支援能力。由于第十八集团军挺进敌后，迫敌以相当兵力回守后方，使其正面攻击能力减弱。卫立煌乘机组织反击。10月16日，第九军军长郝梦龄、第五十四师师长刘家骐、独立第五旅旅长郑廷珍在战斗中以身殉国。11月初，晋东娘子关一线阵地告急，日军进逼太原。第二战区司令长官傅作义回太原组织城防；令杨爱源率部赴晋南组织防御。卫立煌下令忻口方面部队停止反击，请求增援。11月2日夜，旋即奉命撤离忻口阵地，向太原撤退。忻口战役至此结束。这个战役是华北战场上规模最大、战斗最激烈的一次战役，也是国共合作抗日配合得较好的一个战役。　　　　　（王佩琏）

蒙汉人民抗日游击队成立

1937年10月，活动在归绥（呼和浩特）和大青山一带的蒙汉人民抗日游击队宣告成立。

1937年10月，日伪军占领百灵庙后，攻占归绥（呼和浩特）和包头，内蒙古西部的重要城镇和广大地区相继沦陷。共产党员杨植霖、刘洪雄和高凤英（蒙古族）等在归绥地区组织了蒙汉人民抗日游击队，活动在大青山南麓毕克齐、察素齐、武川一带。1938年春，日军向大西北的屏障和陕甘宁边区的北方门户伊克昭盟进攻。中共陕甘宁边区委员会确定内蒙古工作的中心任务是：发动蒙古族各阶层人民与全国各族人民团结一致，结成广泛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共同抗日。4月，中共蒙古工作委员会在靖边成立，一个月后改为中共绥蒙工作委员会，白如冰任工委书记。不久，八路军警备骑兵第一团从陕甘宁边区进伊盟，编为八路军绥蒙游击司令部，孔令甫任司令员，白如冰任政治委员。5月，中共绥蒙工委到达桃力民地区，建立了中共桃力民工委及中共乌审、杭锦、鄂托克、准格尔、郡王等旗工委，组织了战地动员委员会或“抗敌委员会”，开展抗日宣传活动及争取蒙古上层和友军的统战工作。还在鄂尔多斯草原上建立了蒙汉人民抗日游击队。同年秋，蒙汉人民抗日游击队由数十人发展为有200多人的骑兵游击队。8月，李井泉率八路军第一二〇师第三五八旅第

七一五团和骑兵营一部由山西雁北抵绥南，组成大青山游击支队。山西战地总动员委员会所属独立第四支队受其指挥并同行。9月，大青山游击支队在绥中与杨植霖等领导的抗日游击队会合，编成绥蒙游击大队，张友举任大队长，杨植霖任政治委员，开展抗日斗争。9月3日，绥蒙游击大队袭击陶林，歼敌一部。10日攻克乌兰花，全歼守敌。13日打到武川。9月下旬，在后窑子击退日军五六百人的拦阻，进至归(绥)武(川)公路以西。接着又袭击平绥路的陶思浩、苏安盖等车站，占领毕克齐，直逼包头、归绥，打开了绥中、绥西抗日斗争局面。11月，中共绥蒙工作委员会与中共大青山工委合并组建中共绥远省委，白如冰任省委书记，统一领导大青山地区的抗日游击战争。为了扩大蒙民抗日武装力量，1939年下半年，组建了蒙民游击队，高凤英任队长，活动于归绥、武川和陶林一带。各地还建立了地方游击队和武工队。到12月，开辟了以大青山为依托的绥西、绥南、绥中3块游击根据地，逐步同晋西北根据地连成一片。（林健柏）

陶德曼调停

1937年11月初起，德国驻华大使奥斯卡·陶德曼调解"中日冲突"的一系列活动。

日本发动全面侵华战争后，国民党政府试图"以外交之方式，谋和平之解决"，并向德国表示求和之意。1937年9月7日，蒋介石派蒋百里赴意大利和德国，促请墨索里尼和希特勒出面调停中日战争。10月21日，日本外相广田弘毅向德国驻日大使赫伯特·冯·狄克逊表示，日本准备和中国直接交涉，盼德、意劝告南京政府接受日本的议和条件。11月3日，广田将中日议和条件告知狄克逊：一、内蒙古成立"自治"政府；二、在华北沿"满洲国"边境至平津铁路线以南建立一个非军事区，在华北委派一个亲日的首长；三、在上海建立一个比现在更大的非军事区，由国际警察管制；四、停止反日政策；五、共同防共；六、减低对日本货物的关税；七、尊重外侨的权利。11月5日，陶德曼将这些条件面递蒋介石。蒋表示：一、中国接受这些条件作为和平谈判的基础；二、华北的主权和完整独立不得侵犯；三、在和平谈判中自始即由德国任中介人；四、在和平谈判中，不得涉及中国与第三国之间的协约。蒋还表示，倘日本无意恢复卢沟桥事变前的状态，则中国什么样的要求也不能承诺。12月6日，汪精卫在汉口主持召开国防最高会议第54次常务委员会会议，由外交部次长徐谟报告陶德曼调停经过。会议决定接受陶德曼调停，实现中日和平。停战议和正在进行中，战局发生了有利于日本的变化。12月13日日军占领南京。22日，日本对中国政府提出更加苛刻的条件：一、中国必须放弃亲共、反日、反"满洲国"的办法，并与日本和"满洲国"合作，执行反共政策；二、在有必要的地区建立非军事区和特殊政权；三、日本、中国和"满洲国"之间缔结关于在经济上密切合作的协定；四、中国偿付日本所要求的赔款。广田要求蒋介石须在规定的时期内派遣代表至日本所指定的地点进行谈判。12月26日，陶德曼将日方的要求通知中国政府，中方未作明确答复。1938年1月12日午夜，陶德曼试图作最后努力，促使中国政府向日本屈服。蒋介石既不敢冒天下之大不韪答应这些条件，又唯恐关闭和谈大门，便采取拖的办法。1月16日，日本政府发表声明，宣布终止谈判，今后不以国民政府为谈判对手。17日，德国外交部令陶德曼通知南京政府，德国的转达信件的中介人的任务已告终了。1月20日，中日双方各自召回驻对方的大使。（王佩琏）

国民政府迁都重庆

1937年12月1日，国民政府从首都南京迁到陪都重庆的事件。

抗日战争爆发后不久，国民政府在日本咄咄逼人的攻势下，为"适应战况，统筹全局，长期抗战"的需要，于11月20日明令迁都重庆。并于同日明令全国，昭告中外。当时国民政府主席林森只是名义上的国家元首，一切听从于蒋介石决策行事。这期间国民党中央召开军事会议，作出守城的战略部署。不久，国民政府就做迁都的准备。国民政府本身的机构只有文官、参军、主计3处直属于主席领导，全府员工不下一千余人。当局虽在1937年10月底已有西迁部署，但发布命令、正式行动都是临时决定的，故离南京之日，一般员工都是行色匆匆，没有思想准备。在临走的一两天内，秩序紊乱。11月20日，全府人员乘一艘"龙兴"客轮，舱位本来就分等级，除主席林森居于专舱之外，其余员工以职位高低依次乘不同的舱位，并允许携带家属，随身行李携带有限制，不得携带家具。全船有1个临时船长，由参军处总务局局长、海军中将田士捷担任，负责航行的指挥和保卫。根据国民政府的组织，它有直属的侍卫队约二三百人随船护航，军乐队百余人随行。文官处印铸局还带走了一部分技工和机件。部分医生还携带了医疗器材和药物。这只大船满载着国民政府的人员、物

品，与南京告别。这次西迁，除了带走的人和物之外，所有3个处的汽车由随车的司机驾驶，循公路经汉口直达宜昌后，舍陆登舟，再西行入川。“龙兴”轮航行了4天才到汉口，在汉口停泊了一天，因船大且江面渐窄，川江又不能夜航，只好换船，分乘民生实业公司的“民贵”、“民政”两轮。林森与文官、参军、主计3处长官和高级官员乘“民贵”轮，其余人员乘“民政”轮，“民贵”轮先行，“民政”轮在后。主席林森率部于11月26日先抵重庆，后至者到达时已近岁暮。初到重庆，四川省政府主席刘湘让出了城外龙桥私宅作为林森官邸。12月1日，国民政府择定大溪沟新址正式办公。但此时迁到重庆的只是极小部分，国民政府大本营仍暂时设在武汉。国民政府进驻后，一切因陋就简，大门是临时修筑的。门内有空场，文官、参军、主计3处办公房屋的分配，是依坡逐级而上，最下为参军处，其上正中为大礼堂(平房)，东为主席休息室，西为主计处。山上最高处偏西为文官处，亦设有主席办公室。后山有防空洞。1938年夏，随着战事的扩大，华中重镇武汉岌岌可危，7月17日，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命令驻武汉各党政军机关，限5天内移驻重庆。到8月4日止，国民政府驻武汉各党政军机关，除部分军事机关暂迁湖南外，其余全部迁到重庆。国民政府在重庆度过了8年。8年之中，风云变幻，国事多艰，始则敌机轮番轰炸，继则林森逝世，国民政府主席更替，蒋介石当上了元首。直到1946年，国民政府方迁回南京。（林健柏）

南京大屠杀

1937年12月13日，日军占领南京后对中国军民进行大屠杀的暴行。

日军占领上海后，直逼南京。国民党军队在南京外围与日军多次进行激战，但未能阻挡日军的多路攻击。1937年12月13日，南京在一片混乱中被日军占领。日军在华中方面军司令官松井石根指挥下，在南京地区烧杀淫掠无所不为。12月15日，日军将中国军警人员2000余名，解赴汉中门外，用机枪扫射，焚尸灭迹。同日夜，又有市民和士兵9000余人，被日军押往海军鱼雷营，除9人逃出外，其余全部被杀害。16日傍晚，中国士兵和难民5000余人，被日军押往中山码头江边，先用机枪射死，抛尸江中，只有数人幸免。17日，日军将从各处搜捕来的军民和南京电厂工人3000余人，在煤岸港至上元门江边用机枪射毙，一部分用木柴烧死。18日，日军将从南京逃出被拘囚于幕府山下的难民和被俘军人5.7万余人，以铅丝捆绑，驱至下关草鞋峡，先用机枪扫射，复用刺刀乱戳，最后浇以煤油，纵火焚烧，残余骸骨投入长江。令人发指者，是日军少尉向井和野田在紫金山下进行“杀人比赛”。他们分别杀了106和105名中国人后，“比赛又在进行”。在日军进入南京后的一个月中，全城发生2万起强奸、轮奸事件，无论少女或老妇，都难以幸免。许多妇女在被强奸之后又遭枪杀、毁尸，惨不忍睹。与此同时，日军遇屋即烧，从中华门到内桥，从太平路到新街口以及夫子庙一带繁华区域，大火连天，几天不息。全市约有三分之一的建筑物和财产化为灰烬。无数住宅、商店、机关、仓库被抢劫一空。“劫后的南京，满目荒凉”。后来发表的《远东国际法庭判决书》中写道：“日本兵完全像一群被放纵的野蛮人似的来污辱这个城市”，他们“单独的或者二、三人为一小集团在全市游荡，实行杀人、强奸、抢劫、放火”，终至在大街小巷都横陈被害者的尸体。“江边流水尽为之赤，城内外所有河渠、沟壑无不填满尸体”。据1946年2月中国南京军事法庭查证：日军集体大屠杀28案，19万人，零散屠杀858案，15万人。日军在南京进行了长达6个星期的大屠杀，中国军民被枪杀和活埋者达30多万人。

（王佩琏）

伪“中华民国临时政府”成立

1937年12月14日，日本侵略者扶植汉奸王克敏、王揖唐等在北平成立的伪政权。

抗日战争爆发后，日本侵略者为进一步并吞和控制华北，即着手在华北沦陷区策划建立伪政权。1937年7月底，在北平(北京)成立了以北洋军阀余孽、汉奸江朝宗为主席的“北平地方治安维持会”。8月初，又在天津成立了以直系军阀、政客、汉奸高凌蔚为首的“天津地方治安维持会”。10月，日本政府派喜多诚一为北平特务机关长，扶植汉奸筹建统一的华北伪政权，以王克敏、董康、汤尔和、朱深、王揖唐、齐燮元等为伪“政府筹备处”成员。12月14日，华北伪组织和伪“冀东防共自治政府”合并，在北平成立伪“中华民国临时政府”，管辖山西、河北、河南、山东4省及北平、天津两市。这个伪政权标榜“三权分立”，责任内阁设行政、议政、司法3个委员会，分掌行政、立法、司法权。以王克敏为行政委员会委员长，汤尔和为议政委员长，董康为司法委员长，以王克敏、王揖唐、江朝宗、齐燮元、朱深等为临时政府委员。伪政府下设6部：行政部总长王克敏，治安部总长齐燮元，教育部总长汤尔和，赈济部总长王揖唐，

实业部总长王荫泰，司法部总长朱深。伪政府采用北洋军阀政府时期的红黄蓝白黑五色旗为"国旗"。同时发表《政府成立宣言》，声称要"绝对排除共产主义，发扬东亚道义"。"临时政府"成立后，日本政府与之签订《政治技术指导协定》，用所谓"日本进步的行政、法制、军事的技术由侧面来指导华北的政治"。1938年4月，日本政府派行政、法制和军事高级顾问3名常驻"临时政府"，并派辅佐官15人分驻各部。"临时政府"的一些重大施政措施及人事调动，完全受日本控制。5月，王克敏去东京，与日本商定以"分治合作"的办法，成立一中介机构，作为统一的伪政权成立前的过渡。9月22日，"中华民国政府联合委员会"在北平成立。"临时政府"派王克敏、王揖唐、朱深为委员，"维新政府"派梁鸿志、温宗尧、陈群为委员，以王克敏为主席。1940年3月30日，汪精卫的伪"中华民国国民政府"在南京成立后，北平伪"临时政府"改称"华北政务委员会"，名义上隶属南京汪伪政权，实际上仍保持相对的独立性。（林健柏）

新四军挺进华中敌后

1938年初，新四军挺进长江南北敌后，开展的抗日游击战争。

根据国共两党谈判达成的协议，1937年10月12日，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宣布将活动于湘、赣、闽、粤、浙、鄂、豫、皖8省边界地区的红军和游击队（不含广东琼崖红军游击队）改编为国民革命军陆军新编第四军。中共中央任命叶挺为军长，项英为副军长，张云逸、周子昆为正副参谋长，袁国平、邓子恢为正副政治部主任。同时，中共中央决定，成立中共中央东南分局和中央军委新四军分会，项英任东南分局书记兼军分会书记，陈毅任军分会副书记。12月下旬，新四军军部在汉口成立。全军编为4个支队，共1.03万人。第一支队司令员陈毅，副司令员傅秋涛；第二支队司令员张鼎丞，副司令员粟裕；第三支队司令员张云逸，副司令员谭震林；第四支队司令员高敬亭。1938年1月，新四军军部由汉口迁至南昌，随即指挥各部进入长江南北敌后开展抗日游击战争和建立根据地。3、4月间，新四军第一、第二、第三支队先后到达皖南岩寺集中，第四支队分别从湖北黄安七里坪、河南确山竹沟东进到皖西霍山地区集中。军部也从南昌移至岩寺。根据中共中央的部署，新四军第一、第二、第三支队部分干部和侦察分队组成先遣支队，在粟裕率领下，于4月28日由皖南岩寺出发，向苏南敌后进发，执行战略侦察任务，5月中旬，进抵镇江地区。6月17日，在镇江西南的韦岗截击日军汽车队，消灭一股敌人，取得初战的胜利。6月中旬，陈毅率第一支队经南陵、高淳，并通过宁杭公路，进抵苏南溧阳、竹箦桥，旋即展开于溧（水）武（进）公路以北、宁杭公路以东的镇江、句容、金坛、丹阳地区。7月，第二支队在张鼎丞率领下，进入苏南敌后，活动于江宁、当涂、溧水、高淳地区。新四军进入苏南敌后的部队，本着"积小胜为大胜"的作战原则，积极开展游击战争。至8月初，取得了新塘、新丰、句容、东昌等百余次战斗的胜利。12月初，初步建立了以茅山为中心的抗日游击根据地，打开了江南敌后地区的抗战局面。第三支队在策应第一、第二支队挺进苏南后，于1938年7月初，进入皖南抗日前线，活动于东起芜湖、宣城，西至青阳、大通（镇），南起章家渡，北至长江的横宽百余公里，纵深约60公里的狭长地带。9月底，国民党第三战区令第三支队担负坚守青弋江阵地的任务。10月30日，湾沚日军500余人向第三支队红锡镇阵地发起进攻。经第三支队4天激战，歼日伪军300余人，迫敌退回湾沚。12月，第三支队奉命转战至铜陵、繁昌沿江地区担任防御任务。在江北的第四支队，在高敬亭领导下，于1938年4月底，东进到皖东舒城、桐城、庐江、无为地区。5月12日，在巢县东南蒋家河口伏击出扰的日军，歼敌一部，首战告捷。6月中旬，日军打通安庆到合肥的公路。第四支队在安合公路两侧、无为以东运漕地区、桐城以南之棋盘岭、安城公路之铁铺岭连续进行数十次伏击战，歼日伪军3200余人。7月，新四军军部从岩寺迁至泾县云岭。11月，张云逸率军部特务营抵无为地区，与国民党桂系军队建立了统战关系，并将庐江、无为地方党领导的游击队统一编为新四军江北游击纵队，初步打开了这一地区的抗战局面。（王佩琏）

苏联航空志愿队支援中国抗战

1938年初苏联政府派遣空军志愿人员来华直接参加对日作战。

《中苏互不侵犯条约》签订后，苏联政府派崔可夫将军率领苏联军事顾问团到中国。1938年初又派航空志愿队2000余人来华，直接参加对日作战。2月18日，在第一次武汉空战中，苏联空军击落日机12架。之后，又远征台北，参加粤北空战和顺德空战。在4月13日的广州空战中，击落日机8架。4月29日，同54架空袭武汉的敌机进行空战，击落敌机21架。5月11日，在南海之战中，击落日机2架，击

沉日舰1艘，击伤2艘。5月31日的第三次武汉空战中，击落日机14架。6月16日，在第二次粤北空战中，击落日机6架。苏联航空志愿队还参加过保卫重庆、成都、兰州的空战。据国民政府1940年统计，抗战以来，日本飞机被击落和炸毁的有986架。这是和苏联航空志愿队的艰苦战斗分不开的。库里申科苏联航空志愿队在作战中有近100余人献出宝贵的生命。库里申科(Кулишеко，乌克兰人，轰炸机大队长)。1939年夏，率一批飞行员、轰炸员、射手、地面人员、工程师、技术员及“达莎”远程轰炸机抵成都城南太平寺机场，支援中国抗战。库里申科大队一面执行作战任务，一面培训中国飞行人员。一次，在一个躲警报的晚上，人们劝他在结束夜间飞行教练以后，好好休息。他回答说：说实话，我像体验着我的祖国的灾难一样，体验着中国劳动人民正在遭受的灾难，我每看到遭日本飞机炸毁的建筑物和逃难的人群就难过。我们要敌人付出多倍的代价，要敌人在我们的打击下仓皇逃命。1939年8月14日下午两点，库里申科大队在武汉上空同日本战斗机搏斗。他驾驶的领航机不幸被敌机击伤，降落在扬子江，为中国人民的抗日战争英勇牺牲。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在武汉万国公墓建立了苏联空军烈士墓。1956年1月16日这座公墓迁至武汉市解放公园内东北隅，墓前壁正中嵌有考兹洛夫等15位烈士的姓名碑，并矗立着一座高8.1米的纪念碑，正面刻着“苏联空军志愿队烈士墓”，背面刻文是：“在中国人民抗日战争中牺牲的苏联空军志愿队烈士永垂不朽！”

(林健柏)

晋察冀抗日根据地的开辟

1938年1月，八路军第一一五师在山西、河北、察哈尔边区建立的敌后抗日根据地。

卢沟桥事变后，整个晋东北和冀西地区的旧政权官员大部南逃。八路军进入这个地区后，协同中共晋察冀省委发动群众，建立政权，组织自卫队和游击队，11月创立了晋东北抗日根据地。太原失陷后，晋察冀军区以山区为依托，向察南、冀西及平汉路西冀中区扩展。同年10月，吕正操率部回师北上，与地方党、河北游击军会合，开辟了冀中区。到1937年底，这些地区已连成一块。为加强领导，根据北方局指示，由聂荣臻、宋劭文主持，12月5日成立了晋察冀边区政府筹备委员会。1938年1月10日至15日，在河北阜平召开了晋察冀边区军政民代表大会。参加大会的各界代表共149人，他们来自晋东北、察南、冀西、冀中等地区。其中有边区国共两党的代表、各抗日部队的代表、蒙回藏少数民族代表、各县政府代表和工农商学妇各团体代表等。另外，五台山寺院还派了喇嘛和尚代表参加会议，充分显示了这次代表大会具有广泛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性质。大会由宋劭文主持，军区司令员聂荣臻、中共晋察冀省委书记黄敬、国民党代表刘奠基先后在大会上致词。聂荣臻在讲话中指出：只要我们能够建立起健全的政府来，能把政权统一，那么，这个区域就一定能统一，在这个地区内实现各党派大联合的民主政权，使在华北创造游击战争根据地得到最有利的条件。大会共进行了6天。代表们对边区的武装动员、民主政治、合理负担、减租减息、发展生产等各方面问题展开了热烈讨论。大会最后选举产生了边区政府的领导机构。1月15日，参加大会的全体代表用无记名投票方式一致选举聂荣臻、宋劭文、刘奠基、吕正操、胡仁奎、张苏、李杰庸、孙志远、娄凝先等9人为晋察冀边区行政委员会委员，宋劭文为主任委员，胡仁奎为副主任委员。中共领导的敌后第一个抗日民主政权宣告成立。边区行政委员会成立后，制订了政治、经济、文化教育等方面的政策，逐步建立和健全了基层政权组织。同时将所辖地区划分为晋东北、冀西、冀中3个行政区，设立3个政治主任公署。晋察冀边区政府成立后，行政区域不断巩固和扩大。1938年3月八路军邓华支队奉命挺进平西，开辟了平西抗日根据地。平西包括河北省西北部的宛平、昌平、房山、良乡、涿州，察哈尔省南部的宣化、涿鹿、怀来等县的一部分。八路军挺进平西后，组织抗日游击队，摧毁敌伪政权，不到3个月的时间，就建立了宣怀、昌宛、来涿、房良4个联合县的县政权。在行政系统上，平西地区归冀西行署管辖。到1938年底，晋察冀抗日根据地包括北岳、冀中、平西、平北、冀东5个地区，共70多个县，人口约1200万人，部队发展到约10万人，形成了集中统一的政权和抗日民主的新秩序，为坚持华北敌后抗战奠定了基础。 (林健柏)

白求恩率医疗队抵华

1938年1月白求恩大夫率加拿大、美国医疗队来华支援中国抗战。

亨利·诺尔曼·白求恩(Henry Norman Bethune，1890—1939)，加拿大共产党党员，著名的医生。1936年德国、意大利法西斯侵犯西班牙时，曾亲赴前线为反法西斯的西班牙人民服务。1938年1月8日，他率领一个由加拿大人和美国人组成的医

疗队来中国，1月下旬抵武汉。3月底到延安，受到毛泽东的会见。他表示要将自己的全部忠诚和力量献给中国人民，献给中国共产党。6月17日，白求恩到达晋察冀边区，被聘任为晋察冀军区卫生顾问。他在军区后方医院，先是为520多名伤员做了检查，后又为147名伤员做了手术。同年冬，白求恩到八路军第三五九旅参加战地救护，有时连续工作40多个小时。他还担负起培养训练八路军医务人员的重任，给医务人员讲课、做示范，把医术毫无保留地传授给中国医生。1939年6月下旬，他编写了《游击战争中师野战医院的组织和技术》一书，共9章14万字，并附插图119幅。在这之前写了《战地救护须知》、《战地治疗技术》、《初步疗法》、《战地外科组织治疗方法草案》、《消毒十三步》等20多种教材。10月中旬，日军对晋察冀北岳区发动大规模的冬季"扫荡"，白求恩率医疗队赴河北省涞源县摩天岭前线，在为一名患颈部丹毒并发蜂窝组织炎的伤员施行急救手术时，中指受感染，在体温高达40℃的情况下仍坚持工作。白求恩的牺牲精神、工作热忱、责任心，均称模范。11月10日，他抵河北省唐县黄石口村后，病情急剧恶化。11月12日凌晨5时许逝世。临终前他给聂荣臻司令员写信说："请告毛主席，感谢他和中国共产党给我的教育。我相信中国人民一定会获得胜利。"白求恩逝世后，晋察冀边区党政军领导机关和驻地群众为他举行了隆重的殓殡典礼。11月23日，八路军朱德总司令通令全军举行哀悼。12月1日，延安各界举行追悼大会。毛泽东送了花圈，亲笔写了挽词：学习白求恩同志的国际精神，学习他的牺牲精神、责任心与工作热忱。12月21日，毛泽东写了《纪念白求恩》一文，称赞白求恩毫不利己、专门利人，把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当作他自己的事业的国际主义精神和共产主义精神，号召每一个中国共产党员都要学习他。1952年春，白求恩的灵柩迁进石家庄烈士陵园。　（林健柏）

日本近卫三次对华声明

1938年日本首相近卫文麿先后三次发表的对华政策声明。

1937年12月，日军占领南京后，日本近卫文麿内阁向国民党政府提出极为苛刻的谈判条件，同时着手在华北策动成立伪"中华民国临时政府"。1938年1月11日，日本御前会议确定在中国建立傀儡政权的方针。随后，停止了与蒋介石的一切谈判。1月16日，日本内阁首相近卫文麿发表第一次对华声明，宣布以武力灭亡中国的方针，宣称由于国民政府仍在"策动抗战"，今后将不以国民政府为谈判对手，"而期望真能与帝国合作的中国新政权的建立与发展，并将与此新政权调整两国邦交"。1938年10月，日军攻占广州、武汉后，日本转而对中国国民党政府采取以"政治诱降为主，军事打击为辅"的策略。11月3日，日本首相近卫文麿发表第二次声明，提出侵略和奴役中国的阴谋计划，其中确定"日满支提携"，即日本、伪"满洲国"和国民党政府合作，共同防共，以便日本在政治、经济、文化等各方面建立连环互助的关系。日本帝国主义的诱降活动，加速了国民政府中汪精卫集团叛国投降的步伐。12月22日，日本首相近卫发表第三次声明，提出："日满华三国应以建设东亚新秩序为共同目标而联合起来，共谋实现相互善邻友好、共同防共和经济合作。为此，中国方面首先必须清除以往的偏狭观念，放弃抗日的愚蠢举动和对满洲国的成见，进而同满洲国建立完全正常的外交关系。"在日华经济关系上，谋求"提携和合作"，并要求日本"臣民在中国内地有居住、营业的自由，促进日华两国国民的经济利益"。这个声明，向国民政府公开抛出了招降的条件，并为国民党内投降派的降日活动预留了借口。　（林健柏）

晋西北抗日根据地的开辟

1938年初，八路军第一二〇师在山西西北部创建的敌后抗日根据地。

晋西北地区，东起同蒲路北段，与晋察冀北岳区相接；西至黄河，与陕甘宁边区隔河相连；南至汾（阳）离（石）公路，与晋军驻区毗邻；北至清水河，与大青山区连接。境内辖区38县，为八路军控制的县城有兴县、临县、保德、河曲、偏关、岢岚6城。1937年9月28日，第一二〇师师部率第三五八旅进入神池、八角堡地区。主力向同蒲线、雁门关出击，半月间在雁门关截击敌运输汽车千余辆，一度夺取雁门关，截断敌后方交通线，配合了忻口战役。之后，师政治部和教导团干部700多人，组成工作团，以岢岚县为中心，在静乐、兴县、五寨等14县开展工作。中共晋西北临时省委随同工作团，在各地恢复与发展了党的组织，成立了岢岚、静乐、临县、兴岚、保德等地委或县委。太原失陷后，国民党元老、进步人士、"第二战区民族革命战争战地总动员委员会"（简称"总动员委员会"）主任续范亭，被阎锡山任命为山西省第二行政区（晋西北区）保安司令。续率领"总动委会"机关及保安司令部所属部队转入晋西北。这时，由前线

溃退下来的晋军赵承绶骑一军、傅作义第三十五军、郭宗汾第三十三军、何柱国骑二军、杨爱源第十九军、王靖国第十一军，齐集晋西北，分驻各地。当时，中共公开活动受到很大限制，在多数地区是以"牺盟会"、"总动委会"名义开展工作。经过两三个月活动，晋西北各地普遍建立了各级半政权性质的"动委会"，在宁武、神池、五寨、保德等9县普遍组建武装自卫队。1937年10月，以共产党员雷任民为政治委员的国民兵军官教导第九团由忻县转移晋西北，争取与建立了临县、兴县、岚县3县政权，领导了该地区"牺盟会"，协助第一二〇师开辟了这个地区。至年底，晋西北抗日根据地中心区已具雏型。与此同时，1937年9月29日，第一二〇师第七一六团第二营组成雁北支队，由该团团长宋时轮率领，开赴雁北（雁门关以北13县总称，在同蒲路西有右玉、左云、平鲁3县），11月1日袭占井坪，4日收复平鲁县城。1938年初，省"总动委会"在太原、离石组织的察绥游击军第一、第二支队，由"总动委会"军事部部长程子华率领，进入平鲁、右玉、凉城一带活动。中共山西省委和北方局派赵仲池、郑林等，在平鲁、右玉一带组织了雁北战时工作委员会。1937年底，中共晋西北临时省委在偏关成立了晋绥边特委，赵仲池任书记，领导大同、怀仁、山阴、左云、右玉、平鲁、偏关、河曲等县。至此，雁北游击根据地形成。1938年2月20日起，日军从南北两线多路围攻晋西北中心区，占领偏关、保德、宁武、岢岚、河曲、神池、五寨7座县城，国民党军队溃逃。第一二〇师师部指挥第三五八旅、第三五九旅，在同蒲路北段原平、阳曲地区毁桥破路，连续攻占平社、豆罗、关城、田家庄等车站和据点，阻敌南进。2月28日，师主力急返岚县，3月6日起，集中主力4个团，加独立一支队等部队，打击深入岢岚、五寨之敌。经过围困岢岚、五寨，夜袭三井镇，组织义井镇虎北村战斗、神池凤凰山伏击战，共歼敌1500余人，至4月1日，收复7座县城。晋西北根据地稳定。5月，第一二〇师派出由李井泉等率领的大青山支队，从五寨进入雁北地区。8月向绥远挺进，9月初，越过平绥铁路，同杨植霖领导的蒙汉人民抗日游击队会合。9月下旬，大青山支队留一部武装在绥中活动，主力进到武川、百灵庙以西地区进行游击战争。到12月，开辟了以大青山为依托的绥西、绥南、绥中三块游击根据地，逐步同晋西北根据地连成一片。

（林健柏）

东北抗日联军的抗日斗争

抗日战争时期东北抗日联军在杨靖宇、周保中、李兆麟等率领下，在东北地区坚持抗日游击战争。

卢沟桥事变后，东北抗日联军为适应全国抗日斗争的需要，进行了改编，先后将11个军改编为3路军。即：第一路军，由抗联第一、第二军组成，总指挥兼政委杨靖宇，副总指挥王德泰，共约6000人；第二路军，由抗联第四、第五、第七、第八、第十军组成，总指挥兼政委周保中，副总指挥赵尚志，共约1000人；第三路军，由抗联第三、第六、第九、第十一军组成，总指挥李兆麟，政委冯仲云，共约500人。抗联改编以后，在中共东北地方组织的领导下，进行了艰苦卓绝的斗争。

第一路军转战于长白山西南和西北地区。1938年3月中旬，杨靖宇率领500余人，奇袭通北老岭通辑线铁道工事场的敌伪军，毙伤日伪军10余人，生俘83人，毁房屋12栋、汽车两辆。7月，伏击摩天岭敌人，两次击溃阻击抗日联军西征的伪满军精锐部队两个团，毙俘伪军团长以下1000余人。1939年初，第一路军又在吉（林）敦（化）铁路的哈尔巴岭消灭日军400余人，破坏了镜泊湖水电站的设施并切断了牡丹江和敦化公路的交通。5月，攻克敦化县南部重镇大蒲柴河，歼灭日军助川联队，助川中佐被击毙，伪警察署和自卫团被消灭，缴机枪1挺和大批步枪、弹药、粮食等。9月，又在寒葱岭伏击日军，毁汽车12辆，打死日军少将司令松岛以下200余人，缴获重机枪2挺，轻机枪4挺，迫击炮1门，步枪150支，子弹70余箱。第一路军机智勇敢的游击战，沉重地打击了日伪的统治。从1939年10月开始，日伪军30万人，把第一路军包围在原始森林里，企图活捉杨靖宇，根绝南满的游击队。杨靖宇率领部队与敌人周旋3个月，最后只剩下300余人。1940年2月23日，杨靖宇在吉林省濛江县（今靖宇县）保安村壮烈牺牲。

第二路军在吉林省东部松花江南岸地区宝清、富锦、东宁、密山、敦化等地坚持游击战争。1938年2月，日军和伪兴安军骑兵400余人袭击宝清尖山子抗联第五军阵地，担任警戒任务的李海峰等16个战士，一连打退了敌人5次冲锋，歼敌70余人，把敌人阻击在小孤山下，最后李海峰等12个战士壮烈牺牲。10月上旬，抗联第五军妇女团指导员冷云等8个女战士，在牡丹江支流乌斯浑河下游遭到敌人的包围和追击。她们进行了顽强的战斗，在打完了全部

子弹后，毅然投入了乌斯浑河，壮烈地献出了宝贵的生命。1939年，第二路军发动对图(们)佳(木斯)铁路以东、松花江南岸敌人薄弱之据点和屯垦军的进攻，歼灭了不少敌伪军，又取得了胜利。

第三路军以小兴安岭为依托，在黑龙江嫩江平原积极开展游击战争。1939年3月，第三路军龙北部队袭击德都县田家船口，俘日伪警察20余人，并且拔除了三合屯的日伪据点，在朝阳山一带建立了游击根据地。7月，又打死德都县日本人县长，攻取北兴镇，缴获了无数的武器、弹药和粮食，还组织了50余人的讷河人民抗日先锋队，直接配合抗联部队打击敌人。9月，又一举攻克讷河县城，活捉伪军团长1人，缴获机枪2挺，步枪3000余支，子弹10万发。1940年8月，冯仲云率领部队攻打克山县城，守敌1个日军大营、1个伪军大营和伪军团部进行抵抗。游击队在中共地方组织的配合下，从城墙西北角突破缺口，迅速攻入城内，解除了警察署和伪军团部的全部武装，缴获长短枪1000余支，迫击炮4门，子弹10万发。接着，许亨植率领的抗联15支队，渡过秋水泛滥的呼兰河到达肇东、肇州、肇源地区，组织群众，发动游击战争，于12月上旬攻入肇源城，解除了全部伪军的武装，发放了库粮，开放了监狱，深得群众的欢迎，有力推动了三肇地区抗日群众运动的高涨。抗联战士转战各地，足迹踏遍了呼兰、东兴、木兰、巴彦、庆城、铁力、讷河、克山、肇东、肇州、肇源等30几个县，无数的战士为中华民族的解放事业献出了宝贵的生命。

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日军进一步加强了对东北的统治，抗日游击战争的形势更加恶化。为了保存实力，坚持斗争，中共东北地方组织决定把抗联缩编成一个旅，旅长周保中，副旅长李兆麟，下辖4个教导营和一个通讯营，全旅约1700余人，转入中苏边境地区进行整训和学习。抗联的方针为：一、培养训练中国东北的民族革命的军事干部。一旦满洲形势发生变化，抗联特别旅应起重大作用，成为苏联红军与中国八路军的连锁，使东北人民早日从日本帝国主义压迫下解放出来。为此，要求指导员、政治工作人员领会战略、战术思想和游击运动的原则、经验，精通和掌握现代化各种兵器的性能和技术。二、为适应现代战争和反攻的需要，培养无线电通讯技术干部和政治干部。同时，又派出10多个支队，深入到延吉、和龙、汪清、宁安、敦化、五常、宝清、饶河、铁力、庆安、绥化、北安、萝北等敌人统治薄弱的山区进行活动，机动、灵活、巧妙地袭击敌人孤立的据点，进行军事侦察；联络群众，通过各种形式，灵活地进行有关抗日救国的宣传；在可能的条件下发展地下武装。每个小队15人至20人，队长和政治委员以曾任过连长、营长中之最坚定有斗争经验的同志担任。各个小队展开机动、灵活、巧妙的活动，袭击敌人的一些孤立的据点。1943年初，东北抗联一支小部队在东宁二十八道河子伏击战中，就歼灭日军100余人。1945年8月9日，苏联红军出兵东北。抗联配合八路军、苏联红军解放东北。抗联主力部队分成3路由野营出发：一路由冯仲云率领向沈阳进发，一路由李兆麟率领挺进哈尔滨，一路由周保中率领进驻长春。东北抗联坚持东北游击战争达14年之久，歼灭了大量的日伪军的有生力量，沉重地打击了敌人。据不完全统计，1937年至1945年共毙敌18.37万人。东北抗联的游击战争，在中华民族抗战史上留下了光辉的篇章。

(林健柏)

台儿庄战役

1938年3月23日至4月7日，中国军队和日军在山东峄县台儿庄(今属枣庄市)一带进行的战役。

从1937年12月起，华北、华中的日军分南北两线沿津浦铁路和台(儿庄)潍(县)公路进犯徐州外围地区。1938年3月初，日军为打通津浦线，连结华北、华中战场，派遣第五师团和第十师团分两路进犯台儿庄。台儿庄位于津浦路台(儿庄)枣(庄)支线及台潍公路交叉点，扼运河咽喉，是徐州的门户。3月5日，板垣征四郎率第五师团2万余人由青岛沿胶济路西进，经潍县转南抵达临沂以北汤头镇，谋取临沂，进而与矶谷廉介的第十师团会师台儿庄。14日，中国守军庞炳勋第三军团和前来驰援的张自忠第五十九军与敌激战5日，全歼敌3个联队，击毙其第十一联队长长野裕一郎大佐、弁田中佐和1名大队长，残敌向沂河东岸溃退。3月16日，敌第十师团一部3万人沿津浦路南下，进攻滕县。中国守军孙震第二十二集团军第四十一军第一二二师、一二四师与敌展开血战，伤亡惨重，第一二二师师长王铭章等壮烈殉国，官兵2000余人牺牲。3月18日，滕县沦陷。20日，日军继续南下受阻，主力东移，攻占枣庄、峄县，沿台枣支线向台儿庄突进。国民党第五战区司令长官李宗仁令孙连仲第二集团军三个师沿运河布防，扼守台儿庄正面阵地，命汤恩伯第二十军团的两个军让开津浦路正面，诱敌深入，待日军主力直扑台儿庄时，即行南下，抵敌之背，协同孙连仲部围歼敌人。次日，蒋介石到徐州督战。3月23日，第二集团军第

三十一师在泥沟车站与日军发生遭遇战，台儿庄战役开始。傍晚，日军追击中国军队第十一师一八五团到南洛。被伏兵所阻。24 日，敌军进至刘家湖后继续南犯，突击台儿庄城东北，被守军一八六团全歼 200 余人。25 日，日军进攻南洛。一八五团主动出击，三营营长高鸿立率全营士兵与敌拼杀，暂夺敌炮。敌 1000 余人配以 20 余辆坦克向高营猛扑。团长王郁彬率一、二两营赶来增援，血战两昼夜，王郁彬、高鸿立负伤。27 日，日军攻破台儿庄北门。中国守军第三十一师与敌在庄内展开拉锯战，双方伤亡甚重。日军不断增加兵力，从峄县调来增援部队 4000 余人。28 日，日军攻入台儿庄西北角，谋取西门，切断中国守军第三十一师师部与庄内的联系。该师师长池峰城指挥所部以强大炮火压制敌人，并组织数十名敢死队员，与敌肉搏格斗。汤恩伯军团关麟征第五十二军和王仲廉第八十五军在外线向枣庄、峄县日军侧背攻击。29 日，日军濑谷支队再以兵力支援，并占领了台儿庄东半部。31 日，中国守军将进入台儿庄地区的濑谷支队完全包围。是时，坂本旅团由临沂转向台儿庄驰援，到达向城、爱曲地区，侧击第二十军团。该军团即命第五十二军和刚到的第七十五军围攻坂本支队。激战数日，予日军以重创，使其救援濑谷支队的计划落空。4 月 3 日，李宗仁下达总攻击令。第五十二军、第八十五军、第七十五军在台儿庄附近向敌展开猛烈攻势。日军拼力争夺，占领市街大部。中国军队展开街垒战，逐次反击，肃清敌人，夺回被日军占领的市街。6 日，张金昭的第三十师收复南洛，断敌后路，黄松樵第二十七师向台儿庄以东出击，敌仓皇向西北退却。第三十一师向庄内敌人反击，濑谷支队力战不支，向峄县溃逃。4 月 7 日，坂本支队仍在庄内顽抗，在孙连仲、汤恩伯所部夹击下，当晚向北溃败。台儿庄战役取得了胜利。在台儿庄战役中，中国军队击败日军第五、第十两个精锐师团，歼敌 1 万余人。这是抗战以来国民党正面战场取得的重大胜利，粉碎了日本“三个月灭亡中国”的计划。由于敌强我弱，也由于国民党政府实行片面抗战路线和单纯防御的方针，这个胜利未能改变正面战场的被动局面。

（王佩琏）

伪“中华民国维新政府”成立

1938 年 3 月，日本侵略者扶植汉奸梁鸿志等在南京成立的伪政权。

日军占领上海后，于 1937 年 12 月扶植汉奸组织了“上海大道市政府”。1938 年 1 月又在南京成立“自治维持会”。1 月 18 日，日本陆军省拟定《华中政务指导方案》，规定在华中“建立高度的亲日政权”，“奠定以日本为盟主的中国一个地区的基础”。3 月 28 日，在日本华中方面军司令官松井石根和机关特务长臼田宽三的策划下，上述伪组织进行合并，并在南京原国民政府大会堂，举行伪“中华民国维新政府”成立典礼。梁鸿志等宣誓就职，宣读《维新政府成立宣言》。《宣言》攻击和诬蔑中国人民的抗日战争是“自杀”，宣称其“唯一使命，即使领土主权恢复战前状态，与邻邦折冲樽俎，以期敦睦，使国民脱离兵燹之苦，同种息阋墙之争”。同时声称，其统治区域为江苏、浙江、安徽 3 省及上海、南京两特别市地区，将来还要包括中国政府统治下的华中、华南一带。根据该政府组织法规定，“维新政府”由行政、立法、司法 3 院组成，但因预定为司法院院长的章士钊拒绝出任，日本又网罗不到适当人员充任，只得将司法院属下的司法行政部、行政法院等机构置于行政院的兼管之下。“维新政府”由梁鸿志（1882—1946，福建人）任行政院院长，温宗尧任立法院院长，陈群任行政院内政部部长。由梁、温、陈 3 人组成“议政委员会”，作为最高议政机关。行政院设秘书厅，铨叙、考试、统计、典礼、印铸、侨务 6 局及外交、内政、财政、绥靖、教育、实业、交通 7 部。日本华中派遣军特务部长原田熊吉为“维新政府”最高顾问。这个伪政府以北洋军阀时期的红黄蓝白黑五色旗为“国旗”。

“维新政府”成立后，与日本签订了铁路、电信、盐务、银行协定，听凭日本对沦陷区经济任意搜刮；设立伪苏浙皖税务总局；与日本合办“华兴银行”，发行伪币；建立绥靖军。伪绥靖军主要来自几个方面：一是国民党的降日部队，如任援道率领的徐朴诚部，国民党将领方振武部下王占林部；二是收编的当地土匪武装，如太湖著名土匪程万军部及皖北土匪沈席儒部；三是收编国民党溃兵、游杂部队及一部分“忠义救国军”；四是被俘的国民党官兵；五是招募的失业军人及青年。伪绥靖军司令部设在南京，以任援道为司令，黄其兴为参谋长。至 1940 年初，绥靖军人数达万余人。这支军队除为日军看门守院外，还配合日军进攻抗日武装，镇压抗日群众。

日本昭和研究会中国问题研究所于 1938 年 6 月提出《关于处理中国事变的根本办法》。《办法》指出：南京“维新政府”“在因为长期战争而与内地完全割开时，上海地方在经济上、政治上都不可能独立，归根结底，应该和华北政府合并”。7 月中旬，日本内阁采纳了这个建议，决定“引导”“中华民国临时政

府"和"维新政府"去建立一个联合委员会。9月9日，日本特务头子土肥原召集"临时政府"的王克敏、齐燮元、汤尔和，"维新政府"的梁鸿志、陈群、任援道，蒙疆联合委员会主席德穆楚克栋鲁普，以及日本华北、华中、蒙疆3方面军特务部长等，在大连举行会议，讨论成立联合委员会事宜。经过连续两天的讨价还价，由于关东军坚决要求保持其对蒙疆联合委员会的直接控制，不准参加联合委员会，会议毫无结果。于是，日本政府根据土肥原的意见，决定先使"临时政府"及"维新政府"两政权联合。9月20日，南北两个伪政府的王克敏、梁鸿志等以及各自的后台，在北平继续举行会议，并达成协议。22日宣告成立"中华民国政府联合委员会"。委员会设委员6人，由"临时政府"的王克敏、朱深、王揖唐，"维新政府"的梁鸿志、陈群、温宗尧组成，王克敏为主席委员，朱深、温宗尧为常任委员。

1940年1月23日至26日，日本在青岛召集汪精卫、王克敏、梁鸿志和有伪"蒙古联合政府"代表以及各方顾问人员参加的会议。通过了伪中央政府的政纲、名称、首都、国旗、组织机构和人选。3月20日至22日在南京召开了"中央政治会议"，完成了"中央政府"成立的全部预定步骤。"维新政府"的梁鸿志被委任为"中央政治委员会"的当然委员及"国民政府"监察院院长，温宗尧任"中央政治委员会"当然委员及"国民政府"司法院院长，陈群任"中央政治委员会"指定委员及"行政院"内政部部长。会议决定"国民政府"于3月30日"还都"南京。在该政府宣告成立的当天，"维新政府"即发表声明，宣告"解消"。

（林健柏）

国民党制订《抗战建国纲领》

1938年3月29日至4月1日，中国国民党临时全国代表大会制定抗战时期的纲领和政策。

1938年3月29日至4月1日，国民党在武昌召开临时全国代表大会，讨论党务问题和施政方针问题。大会通过了《抗战建国纲领决议案》，制定了战时的外交、军事、政治、经济、民众运动、教育等方面的政策。总则强调以三民主义为抗战行动及建国最高准绳，以蒋介石为全国抗战力量之领导。外交方面，规定了"独立自主"、"和平与正义"的原则，提出"联合一切反对日本帝国主义侵略之势力，制止日本侵略"，"否认及取消日本在中国领土内以武力造成之一切伪政治组织及其对内对外之行为"。军事方面，提出加强军队的政治训练，训练全国壮丁，充实民众武力，指导及援助各地武装人民，配合正式军队作战。在敌后发动普遍游击战，以破坏及牵制敌人兵力，抚慰伤亡官兵，优待抗战人员家属等。政治方面，规定改善政治机构，增强行政效率，整饬纲纪，严惩贪官污吏，并组织国民参政机关。强调以县为单位改善、健全、训练民众组织，加速完成地方自治，为实行宪政做准备。经济方面，规定"经济建设应以军事为中心"，发展农业、工矿业，实行战时税制，改革财务行政，整理发展交通事业，实行计划经济，奖励海外人民投资，调整和管理内外商业贸易，注意改善人民生活。民众运动方面，提出组织农工商学各职业团体，发动民众在"不违反三民主义最高原则及法令范围内，对于言论出版结社，当以合法之充分保障"，实行救济难民，加强民众的国家意识，惩办汉奸等。教育方面，规定实行战时教育，训练青年、妇女及各种专门技术人员，为抗战服务。《抗战建国纲领》是国民党片面抗战路线的集中体现。在当时日军大举进攻的形势下，《抗战建国纲领》对推动国民党的抗战起了一定的积极作用。1938年4月18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对国民党临时全国代表大会宣言与纲领立场的指示》，表示对该纲领"立在主动地位，取积极赞助与拥护的态度"，指出其基本精神同中共的主张是一致的。"要发挥其中一切进步的东西，并根据之以回答及反驳一切于我们之攻击。"　（林健柏）

晋冀豫抗日根据地的开辟

1938年4月八路军第一二九师在刘伯承、邓小平等率领下，在山西、河北、河南边区创建的敌后抗日根据地。

晋冀豫抗日根据地，东至平汉路，与冀鲁豫区衔接；西抵同蒲路，西北面与晋绥区相连；北至正太路，与晋察冀区相邻；南迄黄河，包括晋东南、冀西、黄河北之豫北部分地区。全区总计59个县城。行政区划几经变更，到抗战胜利时，包括太行、太岳两大战略区。太原失陷后，国民党中央军向南溃退，仅留西北军冯钦哉、川军李家钰、滇军曾万钟等部，与八路军花插共处。为发展游击战争，创造太行根据地，1937年11月13日，八路军第一二九师师部在山西和顺县石拐镇召开干部会议，传达中共中央、八路军总部关于创建太行根据地的指示，具体部署了分兵发动群众、开展游击战争的任务。会后，师部与中共晋冀豫省委移驻辽县，负责指挥和领导开辟根据地的工作。之后，第一二九师一方面以主力兵团展开于敌占交通线两侧，第三八六旅第七七一团进到平汉路西

磁县、邯郸地区，第七七二团活动于同蒲路榆次、太谷段以东，正太路以南，平定、昔阳以西地区，打击和牵制南犯之敌，掩护内线开辟根据地工作；另一方面，以教导团为主，抽调大批干部，配备相当数量的连队，组成游击支队或工作团，分散到太行山区各地，组织群众，开辟根据地。从1937年底起，晋东南各地开展了反汉奸、反贪污斗争，实行"有钱出钱、有力出力"的合理负担政策。各种抗日团体，如农救会、工救会、青救会、妇救会、文救会、儿童团等逐步组织起来。1938年2月，中共晋冀豫省委在辽县西河头村召开中共的活动分子会议，传达中共中央12月会议精神，总结抗战以来全区的工作，部署创建抗日根据地与发展边区工作的任务。3月，在辽县召开了辽县、和顺、昔阳、平定、元氏等10县区委以上负责人会议，讨论根据地建立后，如何开展群众工作，发展武装，做好统一战线工作和加强政权建设等问题。到1937年底，包括晋中、太南、冀西3个地区的太行抗日根据地创立。

太行根据地的开辟，八路军主力部队的袭扰，交通线的破坏，给正在向南进犯的日军以极大打击与钳制。日军乃以"分进合击"战术，对太行根据地进行了3次大"扫荡"。1937年12月22日，昔阳、平定、阳泉、寿阳、榆次、太谷等地日军共5000余人，由驻地出发，6路合围驻昔阳西花泉村之第七七二团。八路军与敌对峙终日，在花泉、松塔、南北军城等地进行了有力抵抗。第七六九团、汪乃贵支队由外线配合，在沾尚镇击敌，共毙伤敌260余名，24日敌退。1938年2月，日军万人进攻晋西、晋南。为配合国民党军队正面作战，切断敌后方运输线，2月22日，第一二九师第七七一团、第七七二团、第七六九团，分别在井陉、旧关之间的长生口伏击敌快速部队120余人，击毁汽车5辆。根据毛泽东指示和八路军总部命令，为打击侵入晋东南和占领长治的敌人，并策应第一一五师在晋西和第一二〇师在晋西北的作战，以牵制日军向黄河防线的进攻，第一二九师指挥第一一五师第三四四旅和第五支队向南转移，3月上旬在邯(郸)长(治)大道以北的襄垣、武乡地区集结完毕，寻机歼敌。

黎城是邯长大道上敌人重要兵站所在地。第一二九师决心袭击黎城，以吸引潞城、涉县两城之敌来援，于途中伏击歼灭之。3月16日拂晓前，第七六九团一部袭入黎城，与日军进行巷战后，撤至城外与敌继续战斗。拂晓，涉县之敌赶来增援，与八路军稍一接触即缩回涉县。9时，潞城日军第十六师团林清部队、第一〇八师团笹尾部队1500余人出来增援，进至黎城、潞城之间的神头岭，遭到八路军预伏部队第三八六旅的攻击。这次战斗，共毙伤日军1500余人，俘日军8人，缴获长短枪550余支，骡马600余匹以及大批军用物资，给入侵晋东南的日军以严重打击。日军遭第一二九师在神头岭打击后，仍沿邯长公路、长(治)临(汾)公路向前运送弹药、物资。第一二九师决心在黎城以东的东阳关和河北涉县县城之间响堂铺设伏，歼灭日军汽车运输队。3月31日，日军第十四师团辎重部队的180辆汽车及掩护部队170余人，由黎城经东阳关向涉县开进。9时，日军车队全部进入第一二九师设伏地区。经两小时激战，日军除少数人逃窜外，余均被歼。同时，阻击部队先后击退黎城和涉县出援之敌，歼其一部。此次战斗，共歼灭日军森木少佐以下400余人，烧毁日军汽车180辆，缴获各种枪130余支，迫击炮4门。4月初，日军为解除对它的后方的威胁，调集3万余人的兵力，由平汉、同蒲、正太铁路及邯长、临(汾)屯(留)公路上的各要点，分9路对晋东南地区大举围攻，企图将第一二九师和第三四四旅压缩在辽县、榆社、武乡地区一举消灭。第一二九师第三八六旅、第一一五师第三四四旅第六八九团和山西新军第一、第三纵队等部，进行反围攻作战。八路军采取广泛的游击战，阻滞、疲困敌人，集中主力击破其一路的作战方针，同进犯的日军周旋。4月16日，八路军主力将日军一个联队包围于长乐村，并同来援之敌展开激战，共歼敌2000余人。长乐村战斗的胜利，迫使其他各路敌军回撤，八路军又乘胜追击。到4月下旬，打破了日军的9路围攻，先后共歼敌4000余人，收复沁县、榆社、武乡、辽县、沁源、屯留、长治、黎城等县城18座。以太行山为依托的晋冀豫抗日根据地进一步巩固和扩大。1938年4月下旬，成立晋冀豫军区，对外称第一二九师后方司令部。　　(林健柏)

黄河花园口决堤

1938年6月9日，国民党军队炸开花园口黄河大堤的事件。

1938年5月19日，日军占领徐州，随后沿陇海路西进，谋取郑州，以打通津浦、陇海、平汉3条铁路线，造成进攻武汉的有利态势。5月24日，日军第十六师团占安徽砀山。29日，由山东鱼台南下的敌混成第三旅团陷河南归德(柘城)。6月1日，蒋介石在武汉召开最高军事会议，决定豫东作战略撤退，并掘开黄河大堤，以阻止日军前进。6月4日，商震派第

二十集团军第五十三军一团，在中牟县赵口掘黄河大堤，限当日夜12时放水。五十三军一团使用大量黄色炸药和地雷，并加派第三十九军一团协助，可是扒开两道决口，均流量甚小，未获成功。6月6日，由山东濮县南犯的敌第十四师团先后夺取兰封、开封。6月初，敌第十六师团进入杞县、尉氏、睢县，第十师团占领太康，郑州岌岌可危。蒋介石即令第一战区在花园口掘堤。花园口在郑州东北的郑县境内，黄河南岸，河堤宽约8米，高10余米。6月7日晚，第一战区令蒋在珍的新八师将花园口一带群众赶至5公里以外，密布岗哨，选出800名强壮士兵，分5个小队，日夜轮流掘堤，夜间以汽车灯光照明。6月9日上午9时，大堤被炸开放水。接着第十九集团军总司令薛岳调一个排及平射炮两门，连发60余发炮弹，将决口扩大至370米，黄河主道开始南移改道。黄河决堤的洪水虽然破坏了日军攻取郑州及沿平汉线南下武汉的计划，但却淹没了河南、皖北、苏北40余县的大片土地。河南民宅冲毁140余万家，陆沉800余万亩，安徽、江苏耕地陆沉1100余万亩，倾家荡产者480余万人，形成了连年灾荒的黄泛区，给人民群众造成极大的灾难。（王佩琏）

武汉会战

1938年6月12日至10月25日，中国军队与日军在武汉外围湖北、河南、江西、安徽4省境内的长江南北两岸展开的大会战。

1937年11月，国民政府迁都重庆，军事委员会迁至武汉。武汉成为当时中国的军事、政治、经济、文化中心和全国抗战的基地。日军占领南京后，即开始研究制订进攻武汉的计划。1938年6月15日，日本天皇召开御前会议，决定攻取武汉，控制中原腹地，以威逼中国政府迅速投降。日军调集第二军的第三、第十、第十三、第十六4个师团和第十一军的第六、第九、第二十七、第一〇一、第一〇六5个师团以及海空军各一部，约35万人，在华中派遣军司令畑俊六指挥下，绕过豫皖苏黄泛区，在合肥、芜湖、南京一带集结，企图沿大别山北麓和长江两岸西上，从南北两面合围武汉。6月中旬，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发布武汉会战指导方针，确定长江北岸由第五战区司令长官李宗仁指挥，长江南岸由第九战区司令长官陈诚（1896—1965，字辞修，浙江青田人）指挥，先后参战的有14个集团军，1个江防军，1个卫戍司令部共57个军，约100万人。中国军队利用鄱阳湖、大别山脉、幕阜山脉和长江两岸的山川湖泊等天然屏障，组织4个作战兵团，构筑工事，进行防御。6月12日，日军波田支队由芜湖西犯，攻占安庆，中国守军第二十七集团军向潜山、太湖方面转移。6月18日，日军攻占潜山，并向太湖进攻。中日双方在潜山、太湖之线以西山区形成对峙，拉开了武汉会战的序幕。在江南，日军以第九、第二十七师团和波田支队为右路，攻赣北瑞昌，穿幕阜山，谋切断粤汉路，迂回武昌之南。中国军队以第九战区薛岳第一兵团在南昌至德安附近鄱阳湖西岸设防，阻敌南犯；张发奎第二兵团在德安、星子至九江一线防御。至7月上旬，日军先后攻陷马当、彭泽和湖口。7月22日，日军越过鄱阳湖，在九江以东的姑塘登陆，26日，进占九江，取得从江南进攻武汉的桥头堡。8月8日，波田支队在瑞昌东北之港口登陆，遭中国守军第二兵团孙桐萱第十二军阻击。敌以主力第九、第二十七师团，分3路合击瑞昌。24日瑞昌失守。日军分别向赣北马头镇和箬溪方向进攻。汤恩伯第三十一集团军和关麟征第三十二军团与敌激战20余日。9月14日，马头镇陷落。24日，敌占富池口。中国军队调第二兵团甘丽初第六军、万福麟第五十三军、周磐第七十五军、张刚第九十八军驰援，在阳新、大冶一线予敌重创。10月中旬，敌攻陷阳新、大冶等地，中国军队逐次抵抗，退却到武宁、通城、岳州一线。与此同时，左路日军沿南浔铁路向南昌方向进犯。7月下旬，第一〇六师团在殷家庄附近登陆。李汉魂第六十四军在庐山两侧及南浔路奋勇抗击，与敌相持月余，全歼日军第一四五联队。8月20日，敌第一〇一师团在星子强行登陆，增援第一〇六师团。第一兵团叶肇第六十六军、王敬久第二十五军、陈安宝第二十九军将敌阻于修水河一线。10月上旬，第一兵团抽调欧震第四军、俞济时第七十四军、叶肇第六十六军协同作战，于10月10日在万家岭一带歼敌4个联队，时称万家岭大捷。10月25日，敌以猛烈炮火攻击德安，28日德安失守。

在江北，中国第五战区孙连仲第三兵团、李品仙第四兵团担任长江以北、大别山东麓一线防御。武汉卫戍部队担任固守武汉核心阵地的任务。1938年6月26日，日军第六师团占领太湖后，遭中国军队数次反攻，前进不得。7月25日，敌第三师团在海军掩护下于小池口登陆，协同第六师团猛攻黄梅、宿松。中国军队苦战数日，于8月上旬撤出。9月1日，日军分3路向广济以东刘汝明第六十八军、覃联芳第八十四军、王瓒绪第二十九集团军阵地攻击，激战数日，中国守军损失重大，阵地终被突破。9月7日，敌

陷广济，续占武穴。中国守军转移至广济以西之界岭南第二线阵地及田家镇要塞后，又遭敌攻击。张义纯第四十八军、萧之楚第二十六军、何知重第八十六军向敌侧背猛攻，成夹击歼敌之势，激战至9月下旬，敌死伤惨重。9月28日，敌以飞机70余架、大小炮百余门对田家镇狂轰滥炸，守军阵地被摧毁。当晚，田家镇陷落。10月初，敌利用长江水道侵入田家镇以西，在蕲春、兰溪、巴河、黄冈、阳逻等处登陆，策应广济西进之敌，10月25日，进至黄陂，直逼汉口侧背。江北的另一路日军，以第二军司令官稔彦王指挥第十、第十三、第十六师团约5万人，于8月28日，分3路自合肥向大别山北麓皖西的六安、霍山进犯。中国守军于学忠第五十一军、冯治安第七十七军与敌激战。敌第十三师团连陷六安、霍山，继续西犯，渡淠河进攻富金山阵地。宋希濂第七十一军与敌激战一周，放弃该地。此后，敌一路由第十三师团和第十师团濑谷支队于9月18日攻潢川。张自忠第五十九军、孙连仲第二集团军、宋希濂第七十一军予敌痛击。9月下旬，胡宗南第十七军团在信阳以东毙敌5000余人。敌第三师团赶来增援，胡军于10月12日放弃信阳，退守桐柏附近山地。日军转兵沿平汉线南下，相继占领武胜关、平靖关，直逼汉口之北。敌另一路于9月16日攻占商城、麻城，与溯江西上的日军相呼应。至此，武汉外围的要塞、阵地均被日军突破，处于日军北、东、南三面包围之中。10月24日，蒋介石下令部队从武汉撤退。至27日，汉口、武昌、汉阳相继沦陷。第五战区主力撤退至湖北、河南的平汉线以西地区。第九战区主力撤至江西、湖南两省的永修、幕阜山、岳阳以南一线。武汉会战，是抗日战争中最大的一次战役。中日双方军队在纵横千里的战线上激战4个月，大小战斗数百次，日军伤亡达20万人，中国军队也付出了伤亡40万人的巨大代价。日军虽占领中原重镇武汉，但其速战速决、以使中国屈服的计划并未实现。 （王佩琏）

保卫中国同盟成立

1938年6月14日由宋庆龄等发起在香港成立的爱国组织。

上海、南京沦陷后，宋庆龄于1937年12月23日离开上海，移居香港。为争取世界人民支援中国抗日战争，宋庆龄发起组织保卫中国同盟，总部设在香港。1938年6月14日保卫中国同盟宣告成立。简称“保盟”。它的领导机构是以宋庆龄为首的中央委员会，办公处设在香港西摩道21号。下设4个工作委员会：财政委员会，宣传出版委员会，运送委员会，促进委员会。“保盟”在《成立宣言》中指出，“保盟”的目标是：一、在现阶段抗日战争中，鼓励全世界所有爱好和平民主的人士进一步努力以医药、救济物资供应中国。二、集中精力，密切配合，以加强此种努力所获得的效果。“保盟”成立后，宋庆龄写信给美国旧金山的“中国人民之友社”，呼吁该社努力唤起美国人民对中国的同情，争取国际友人和海外华侨支援中国的抗日战争。美国的中国救济委员会马上募集500万美元援助中国。1938年9月，华侨第二届代表大会召开，宋庆龄写了《华侨总动员》一文热烈祝贺，并号召广大侨胞踊跃支持祖国抗战。1939年3月，“保盟”吁请广大华侨支持八路军、新四军和难民、孤儿等。同年初，“保盟”收到了加拿大“中国爱国者同盟”捐助的5个卡车底盘，立即拨款安装了车身并支付运费，装满来自纽约、伦敦、温哥华、香港等地援助的药品、食品，经过广东、广西、贵州、四川、陕西辗转运抵延安，交给了八路军。“保盟”为了筹募医疗救济基金，在香港5个妇女组织的帮助下，收集了几千件中国艺术珍品在纽约、伦敦、巴黎开设义卖市场。“保盟”得到世界各国广大人民群众的支援，如1939年1月至1940年2月以金钱（不包括物资）捐助“保盟”的，就有遍及美国、英国、加拿大、新西兰、印度等国的社会团体一百多个，以及无数的个人。当时人民军队和敌后抗日根据地，不但缺乏施行外科手术所必需的器械和麻醉剂，甚至连最普通、最必需的酒精、碘酊、凡士林、消炎药等都成为稀有之物。因此，“保盟”对人民军队除给予必要的财政支援外，把对它的医药援助作为头等重要任务。在“保盟”的援助下，马海德、白求恩、柯棣华等许多外国医生，先后在抗日根据地建立了11所国际和平医院、42个前方流动医疗队、8所医科学校。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日军进占香港。宋庆龄转移到重庆，继续领导“保盟”开展工作，举行募捐活动，并联络史沫特莱、斯诺、艾黎等国际友人，争取中印缅战区美军司令史迪威的支持和帮助，由他派美国军用飞机运送急救物资到延安和其他根据地，从美军军用仓库里拨送医药用品给八路军、新四军，并派去美国军医。“美国援华会”、“英国联合援华会”等外国友好团体，也都通过“保盟”给抗日根据地以帮助。“保盟”还根据中国各地区都享有救济权利的原则，也给国民党统治区的医疗救济机构和难民、灾胞、伤兵、孤儿以大力援助，对救济千百万贫病交加的灾胞难民，安定后方秩序，加强团结起了重要作用。“保盟”是中国与国际之间联系

的一座桥梁，为抗日战争和国际反法西斯战争做出了贡献。抗日战争胜利后，它改名为中国福利基金会。（林健柏）

山东抗日根据地的开辟

1938年6月，中国共产党领导山东省军民创建的敌后抗日根据地。

1937年10月，日军侵入山东。为开展山东抗日战争，中共山东省委员会根据中共中央关于迅速动员组织人民，建立统一战线，积极开展游击战争，建立根据地，独立自主地坚持山东抗战的指示，自11月至翌年夏，先后在冀鲁边、鲁西北、胶东、清河、泰(山)西、湖(微山湖)西、鲁中、鲁南、滨海等地发动武装起义，开展游击战争，摧毁伪政权，建立抗日民主政权，为山东抗日根据地的创建奠定了基础。1938年5月，中共山东省委扩大为苏鲁豫皖边区省委(12月改为山东分局)，郭洪涛任书记。6月，根据中共中央指示，山东各支起义武装部队恢复和使用八路军游击支队番号。12月，起义武装统一编成八路军山东纵队，张经武任指挥，黎玉任政治委员。同年9月，八路军第一一五师政治部副主任兼第三四三旅政治委员肖华率旅机关一部到达冀鲁边，同当地抗日武装会合，统一整编为八路军东进抗日挺进纵队，创建了冀鲁边抗日根据地。第三四三旅第六八五团于年底到达湖西地区后，与山东纵队挺进纵队合编为第一一五师苏鲁豫支队，创建了以丰县、沛县为中心的湖西抗日根据地。为增强山东抗日游击战争的骨干力量，根据中共中央指示和八路军总部命令，第一一五师代理师长陈光、政治委员罗荣桓于1939年春率师部及第三四三旅主力进入山东，先后与山东纵队第6支队、苏鲁支队等部会合，开辟和扩大了鲁西、泰西、鲁南抗日根据地。8月1日，八路军第一纵队在山东成立，徐向前任司令员，朱瑞任政治委员，统一指挥山东及江苏北部地区的八路军部队。10月，朱瑞接任中共中央山东分局书记，并兼任山东军政委员会书记，统一领导山东党、政、军、民工作。1940年6月，苏鲁豫皖边区和苏皖边区划归中原局领导。年底，山东分局领导的抗日根据地，包括鲁西(含湖西)、鲁中、鲁南、滨海、胶东、清河、冀鲁边等，拥有人口1200万，土地3.6万平方公里，成立了省参议会和行使政府职权的省战时工作推行委员会，并建立了1个行政主任公署，14个专员公署，95个县抗日民主政府。第一一五师、山东纵队及地方武装发展到12万多人。1941年4月1日，山东分局将全省划分为胶东、清河、冀鲁边、鲁中、鲁南和鲁西6个区。7月，鲁西区与冀鲁豫区合并，由中共北方局和八路军总部直接领导。1941年和1942年，日伪军对山东抗日根据地进行残酷的“扫荡”和“蚕食”，疯狂推行“治安强化运动”。两年中，千人以上的“扫荡”达70多次，万人以上的“扫荡”达9次，其中1941年冬对鲁中沂蒙山区根据地的大“扫荡”兵力达5万多人。这一时期国民党顽固派掀起第二次反共高潮，增派军队入鲁，配合日伪军夹击八路军，山东根据地遭到严重破坏和分割。至1942年年底，根据地人口减少到730万人，面积缩小到2.5万平方公里。根据地军民在极端困难的局势下，执行“敌进我进”的方针，坚持开展对敌斗争，粉碎了日伪军大规模的“扫荡”和“蚕食”。为适应斗争形势的需要，根据地党政机关和部队进行了精兵简政。1942年8月1日，山东纵队改称山东军区，黎玉任政治委员，王建安任副司令员。1943年，根据地实行了党的一元化领导，并成立了新的山东军区，罗荣桓任司令员兼政治委员，黎玉任副政治委员，肖华任政治部主任，辖鲁中、鲁南、滨海、胶东、清河、冀鲁边6个军区，所属部队编成13个主力团。8月，罗荣桓接任中共中央山东分局书记。9月8日，山东省战时工作推行委员会改为山东省行政委员会。根据地划分为鲁中、鲁南、滨海、胶东、清河、冀鲁边6个地区，并先后建立了行政公署。这一年，山东军区部队针对日伪军继续以“总力战”不断“蚕食”根据地的情况，采取各种形式和灵活策略，广泛开展群众性游击战争和政治攻势；在根据地内实行减租减息，开展大生产运动，从而扭转了根据地极端困难的形势。1944年1月，清河区与冀鲁边区合并为渤海区，清河军区与冀鲁边军区合并为渤海军区。1944年和1945年春、夏季，山东军区部队连续发起攻势作战。1945年8月，山东军区部队分5路向日伪军展开大反攻，经一个多月的连续作战，歼灭日伪军6万多人，扩大了山东抗日根据地。8月10日，山东省行政委员会改为山东省人民政府，黎玉任主席。山东抗日根据地军民在八年抗战中，共作战2.6万多次，歼日伪军50多万人。抗战结束时，根据地发展到2400万人口和12.5万平方公里的土地，各级民主政府先后成立和逐步健全，并拥有一支27万多人的强大武装力量。（林健柏）

国民参政会召开

1938年7月6日至15日，国民党政府在汉口举行的第一届国民参政会第一次会议。

1937年8月，国民党为表示政治民主，设立国防参议会，以各党派和社会名流代表为议员。1938年3月1日，中共中央向国民党临时全国代表大会提议："为增强政府和人民间的互信和互助，为增加抗战救国的效能，健全民意机关的建立，已经成为刻不容缓的当务之急。"3月29日至4月1日，国民党临时全国代表大会制定《抗战建国纲领》，规定组织国民参政机关。会议通过了《组织国民参政会案》，决定结束国防参议会，成立国民参政会，为战时最高民意机关。4月6日至8日，国民党五届四中全会通过了《国民参政会组织条例》，4月12日，由国民政府予以公布。国民参政会虽然有各党派的成员参加，但它既不是各党派统一战线的组织形式，也不是真正的民意机关，而是一个咨询性质的机构。条例规定，参政员由国民党遴选。参政会的职权为：对政府的内外施政方针进行议决，经国防最高会议通过后施行；对政府提出建议案；听取政府报告，向政府提出询问案等。6月16日，国民党中央常委会选任汪精卫为国民参政会议长，张伯苓为副议长，并公布了200名参政员名单。其中包括以"文化团体代表"名义参加的共产党参政员毛泽东、林伯渠、吴玉章、董必武、陈绍禹、秦邦宪、邓颖超7人。7月6日至15日，第一届国民参政会第一次会议在汉口召开，到会参政员136名。会议听取了何应钦的军事报告、王宠惠的外交报告、何键的内政报告、孔祥熙的财政报告、翁文灏的经济报告、张嘉璈的交通报告、陈立夫的教育报告、陈诚的民众运动报告。通过了胡景伊、邹韬奋、沈钧儒、陈绍禹等提出的《拥护政府长期抗战国策案》、《拥护国民政府实施抗战建国纲领案》、《具体规定检查书报标准并统一执行案》、《改善各级行政机构案》、《设立省县参议会案》、《实行民主政治案》、《在抗战时期改善民主案》等提案。会议发表了宣言，宣布："要动员一切物力、人力，为自卫、为人道，与此穷凶极恶之侵略者长期抗战，以达到最后胜利之日为止。"号召各党派"舍小异而趋大同，翊赞统一，共同救国"，要求在政治上"力求庶政之革新，树立民主政治之基础"，在经济上"增进生产，加速建设，务期巩固金融，开发资源，以求军需之自给并为民生之保障"。会议选举张君劢、左舜生、曾琦、董必武、秦邦宪、沈钧儒、陈绍禹等25人为驻会委员。由于国民党及其附庸在国民参政会中占了绝大多数，该会对国民党政府的政策措施没有任何的约束力。中国共产党当时接受国民党政府的聘请，派代表参加国民参政会，因为它毕竟是一个各党派可以发表意见和宣传政见的讲台。1941年皖南事变后，中国共产党参政员曾经几次拒绝出席参政会，表示对国民党政府反动措施的反抗。 （王佩琏）

冀东人民抗日武装起义

1938年7月初，中共冀热边特委在八路军第四纵队配合下，发动和领导冀东人民举行的抗日武装起义。

冀东是连接华北和东北的咽喉地带。日本侵略者在占领中国东北三省后，把魔爪伸进了冀东，把它作为进一步侵华的兵站基地和军事跳板。1937年9月底、10月初，中共中央北方局书记刘少奇给中共河北省委负责人写信，要求不失时机地抓紧准备冀东抗日武装起义。信中说，八路军已渡过黄河，正向太行山及北岳区进发，河北党组织的中心任务是配合八路军，广泛开展敌后抗日游击战争。强调党的工作重点要放在农村，动员干部和党员去农村，并尽量去平津周围的农村，宣传党的抗日主张，准备发动冀东游击战争，配合八路军建立以燕山山脉为中心的抗日根据地。接着委派李运昌回冀东，任中共冀热边特委书记，着手组织发动冀东抗日游击战争。1938年2月初，毛泽东电示八路军前方总部和晋察冀军区做好组织部队挺进冀东的准备。5月1日，刘少奇要求晋察冀军区立即派出部队，坚持在冀东创立根据地。5月底，八路军第一二〇师宋时轮支队和第一一五师邓华支队在平西宛平县杜家庄会合，整编为八路军第四纵队，宋时轮任司令员，邓华任政治委员，随即由平西挺进冀东。这时，华北人民武装抗日自卫委员会在天津开会，决定组建冀东抗日联军司令部，统一指挥抗日队伍。会后，又派自卫会负责人李楚离和王仲华分别去洪麟阁、高志远的部队指导工作。自卫会实际上成了中共发动冀东暴动的公开领导机关。6月21日，八路军第四纵队主力到达冀东蓟县靠山集、将军关地区。6月下旬，华北人民武装抗日自卫委员会冀东分会在丰润县田家湾子召开会议，通过中共河北省委提出的起义行动纲领，号召"全冀东人民武装起来，迎接八路军东进抗日"，"拥护中国共产党抗日救国十大纲领"等，并确定了发动武装起义的日期。7月6日，冀东滦县、丰润、玉田、迁安、乐亭、昌黎、遵化、蓟县等20多县和唐山矿区爆发武装起义，参加起义的工人、农民和各阶层群众达20万人。从7月到10月，起义烽火燃遍西起通县，东至山海关，北起兴隆，南至渤海湾的广大地区。起义武装发展到10万余人，并一度攻克9座县城和

很多重要集镇，控制了冀东的广大农村，成为当时震动全国的大事件。这次起义很快被日本侵略军镇压下去。这次起义为后来创建冀热辽抗日根据地奠定了基础。（林健柏）

三民主义青年团成立

1938年7月9日，三民主义青年团在武昌成立。

1937年9月，蒋介石约集陈立夫、刘健群、康泽等人商议筹建三民主义青年团，并提出筹备委员会的名单。1938年3月29日至4月1日在武汉召开的中国国民党临时全国代表大会决定建立三民主义青年团。会后，蒋介石以国民党总裁的名义，下令解散国民党内C·C派、复兴社改组派等一切小组织。接着，由陈布雷、陈诚、康泽3人起草的《三民主义青年团组织要旨》，在国民党五届四中全会上通过。1938年7月9日，三青团在武昌成立。三青团在团长的直接领导下，设中央干事会。首届中央干事会由陈立夫、朱家骅、张厉生、张道藩、贺衷寒、胡宗南、桂永清、康泽、谷正纲、谷正鼎、陈诚、周至柔、王东原、甘乃光、段锡朋、谭平山、卢作孚等24名干事组成。中央干事会设常务干事9人。下设组织处、训练处、宣传处、社会服务处、总务处、经济处，书记长办公处。复兴社全部并入三青团，成为其核心力量。三青团成立后，为扩大组织，网罗人马，即在中央训练团中附设"三民主义青年团中央干部训练班"，分别从党部系统（C·C系）、各级政治部的政工人员（复兴社系统）、军委会战时工作干部训练团（陈诚系统）选派200余人受训，以桂永清为班主任。1938年国民党从武汉撤退后，三青团中央团部迁重庆。三青团加强了对青年学生的法西斯统治。首先是在青年学生中进行反共反革命宣传活动。三青团在各大中学校中建立了基层组织，培植职业特务。三青团骨干分子在学校制造风潮，采取各种野蛮手段迫害、打击进步学生，勾结校方、军警、特务予以开除、逮捕。为了加强对三青团的控制，三青团支部要参加省政府召集的"党政军团联席会议"，在会上汇报所获得的情报材料，参与研究对付共产党和进步人士活动的对策。各县县政府大都有汇报秘书职务的设置，其主要任务也是专做"反共"、"防共"的情报工作。这一类工作，一般也由三青团骨干分子担任，以加强对三青团基层组织的控制。此外，在一些重要单位和地区，县政府、县党部和三青团共同设立秘密情报站，这些情报站的负责人，往往由三青团基层骨干分子充当。三青团成了蒋介石破坏抗战、推行法西斯主义的工具。（林健柏）

马本斋回民支队建立

1938年7月马本斋在冀中平原建立回民抗日武装八路军冀中军区回民支队。

马本斋（1901—1944），河北献县人。1937年冬，马本斋率领几十名回族青年在家乡与日军进行战斗。1938年初，成立了河北游击军回民教导队。7月，该教导队与吕正操领导的冀中人民自卫军回民干部教导队合编为八路军冀中军区回民教导总队，马本斋任总队长。1939年初，马本斋加入中国共产党。同年夏，回民教导总队改编为八路军冀中军区回民支队，马本斋任司令员。回民支队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回民抗日武装。支队设有政治处，开展政治工作，组织军政训练，学习"抗日救国十大纲领"、"三大纪律八项注意"和"如何粉碎敌人的军事围攻"等。各个战斗单位建立了共产党支部。回民支队初建时虽然武器装备相当差，但士气却非常高涨。他们在马本斋的率领下，灵活机动地深入敌后，时而化装插入敌人心脏，拔掉敌人的据点；时而袭击敌人一股，破坏敌军交通，对日伪的统治形成严重威胁。从1938年8月至11月，回民支队战斗30余次，破坏敌控铁路70余处，颠覆敌人列车20余次，毙伤日军500余人。这些胜利鼓舞了冀中人民的抗日斗争，回族青年纷纷参加这支队伍，部队很快发展到1500余人。1938年末至1939年初，日军在冀中发起大规模的"扫荡"，回民支队配合八路军主力，展开了反"扫荡"斗争。1939年冬，回民支队用土炮在无极至藁城的公路上，击溃了抢粮的日军，歼敌300余人，击毁敌汽车8辆，缴获大批新式武器，粉碎了敌人的抢粮计划。1940年夏，在康庄伏击战中，速战速决，毙俘日伪军80余人，支队无一伤亡。冀中军区授予"能征善战的回民支队"的锦旗，毛泽东题写了"百战百胜的回民支队"的赞语。1941年8月，日军山本联队对冀中根据地进行大"扫荡"时，包围了东辛庄，放火烧了清真寺和马本斋的住宅，毒打阿訇和群众。敌人捕去马本斋的母亲，迫使她诱劝其儿子投降。马老太太大义凛然，严词拒绝，并最后绝食而死，以激励儿子抗日到底。1944年2月，马本斋动身去延安前夕，因患对口疮转肺炎，医治无效，在山东莘县逝世，终年44岁。中共中央在延安开了追悼会。毛泽东的挽词是："马本斋同志不死。"朱德的挽词是："壮志难移，回汉各族模范；大节不死，母子两代英雄。"1944年4月

18 日回民支队来到延安，成为保卫边区的一支队伍，并执行着生产建设和军事训练的光荣任务。回民支队打遍冀中平原，并转战于冀鲁边区和冀鲁豫边区。6 年多来经历大小战斗 870 余次，消灭日伪军 3.67 万名，攻克敌人碉堡、据点，破坏敌人铁路、桥梁数百处，缴获大批军用物资，创造了辉煌的战绩。

（林健柏）

"中统"和"军统"建立

1938 年成立的国民党特务组织中国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调查统计局和国民党政府军事委员会调查统计局，简称"中统"和"军统"。

早在 1929 年 11 月，蒋介石授意陈果夫、陈立夫组成中央俱乐部，英文名称为 Central　Club，缩写为 C·C，又因陈氏兄弟姓氏的第一个英文字母也是 C·C，故称之为 C·C 系。之后，陈果夫、陈立夫在其控制的国民党中央组织部设立了党务调查科。1935 年党务调查科扩大为党务调查处，由原"党务调查科"主任徐恩曾任处长。1938 年 8 月，C·C 系特务组织又改组为"中国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调查统计局"，简称为"中统"，以朱家骅兼任局长，徐恩曾、叶秀峰先后任副局长、局长。中统以国民党各级党部为活动基地，在各省市党部及警察局内设立调查统计室或调查统计股，县、区党部设立调查干事，在党政机关广泛建立"党员调查网"，它由暗藏在党政机关中的中统特务组成。在局本部及所属各省室都设有党员调查网，建立委员会。由局本部直接掌握、建立的调查网达 3000 人以上，这些调查网分布于中央党政机关及各地方的党政机构中。由各省、市调查统计室建立、掌握、运用的调查网，大约在 10 万人左右，分布于各省、市、县以至乡镇。中统局对所属省室发出的年度工作计划大纲中，均把发展调查网作为重要项目之一，并规定在一年度中至少要发展 500 人。中统以党政机关、文化团体和大中学校为重点，采取"渗透与招抚"的策略，积极从事破坏共产党和革命团体的活动，对共产党员、进步人士、革命群众，以及国民党内不满蒋介石独裁统治的人进行调查、监视、炮制黑名单，配合军警机关逮捕、关押、审讯、杀害等。

"军统"的前身是"中华民族复兴社"的特务处，戴笠为处长，成立于 1932 年 4 月 1 日。抗日战争爆发后，戴笠系统的特务组织隶属于"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调查统计局"，简称"军统"，由贺耀祖兼任局长，戴笠任副局长，掌握实际权力。军统局成立后，复兴社原来的科改为处，组织越来越庞大。到 1942 年军统局共设 8 处 10 室。第 1、2 处由原情报处一分为二扩编而成，第 1 处专管军事情报，第 2 处管党政情报；第 3 处由原行动科扩编而成，仍主管警卫行动；第 4 处主管电讯；第 5 处由原来司法科扩编而成，仍主管特务训练；第 6 处由人事室扩编而成，主管日伪占领区的布建工作；第 7 处主管司法、监狱工作；第 8 处主管总务工作。此外，军统局本部还设立特种技术研究室，专门研究特务技术；时事研究室，专门研究防范中国共产党；经济研究室，专门研究经济问题；机要室，主管电稿的译电工作；秘书室，襄助主任秘书工作；人事室，主管人事的升迁、考核、奖惩；督察室，主管特务人员的监督、考察工作；会计室，主管财务出纳工作。军统系统特务人多，触角深入面很广，全国上下形成了网。它的组织系统分内勤外勤，处室为内勤，外勤又分秘密、公开两部分。秘密部分又分"区"、"站"、"特别组"三级，还有直属情报员和特别组。"区"由大城市或几个省联合而成立。全国共有 7 个区，即：渝特区、华北区、西北区、晋陕区、川康区、上海实验区、香港区。"站"以省为单位。"特别组"设在重要城市里。这些组织都有情报、行动、交通 3 个系统，配有秘密电台和专门交通线，一般都有掩护职业。外勤的公开组织是指被军统特务所控制的各种公开机构，主要是全国的警察、陆海空军的谍报网和警卫部门。例如：重庆卫戍总司令部稽查处，成立于 1939 年，由原武汉警务司令部稽查处迁渝后扩充而成。全部人员由军统人事室统一管理。稽查处下分为 4 个科：第 1 科负责总务；第 2 科为业务科，专管情报、行动、侦察、航检等；第 3 科为电讯监察科，由军统电讯处直接领导主管全卫戍区的无线电通讯器材的运销，侦听重庆的公私电台，监收中共办事处、《新华日报》等单位的电报等；第 4 科为司法科，属于军统局直接领导。稽查处另设党政侦察组，专管监视中共和民主人士的活动；外事侦察组专管监视当时苏联大使馆和塔斯社、苏联商务代表团在重庆的活动。稽查处还辖有特务队、稽查所和稽查哨。这些稽查特务遍布重庆各交通要道码头车站，他们可以任意检查旅客、搜查住宅、扣留车船、查封仓库，胡作非为。又如军委会特检处，是一个暗地对人民进行监视的特务机关。该处下属机构有：航空检查所，主要是在机场进行监视的特务活动，不仅进行反共反人民的活动，而且以缉私为名，进行走私活动。邮检所，是特检所所辖机构中人员最多的一个所。最多时有 200 人。其主要任务是偷拆各种信件、书刊。其检

查对象以寄往中共和民主人士的信件为重点。如发现有对国民党和蒋介石不满言辞，写信人轻则受监视，重则被逮捕受迫害。还有特务总队，主要任务是担任监狱、看守所的监禁工作，军统杀害革命志士也由该队执行。尤其是行动组，专门担任逮捕和用刑工作。行动组长办公室，满墙都挂着各种刑具，如皮鞭、藤条、手铐、脚镣等，军统的审讯首先在这里进行。

中统、军统这两大特务组织，密布全国各地。所有的机关、学校、工厂、企业、矿山、军队以至水陆码头、交通要道、公共场所、街头巷尾、茶馆酒楼到处都有特务的踪迹。这伙特务横行霸道，为非作歹，任意逮捕、囚禁和暗杀爱国进步人士。它的建立，标志着以蒋介石为代表的大地主、大资产阶级政权的更加法西斯化。　（林健柏）

官僚资本的膨胀

抗日战争时期，蒋介石、宋子文、孔祥熙、陈立夫和陈果夫四大家族，倚恃其特权地位，使其官僚资本空前膨胀，垄断了整个国民经济。

抗日战争时期，国民政府为了加强战时的金融垄断体制，于1937年8月在上海成立中央、中国、交通、中国农民4大银行联合办事处。1939年8月，以国防最高委员会的名义改组了四行联合办事处，11月改称四行联合办事总处，蒋介石为总处理事会主席，规定四联总处负责办理政府战时金融政策的有关特种业务。1939年后，又将中央信托局和邮政储金汇业局划归四联总处管理。四大家族从上至下加强了对国家金融的垄断。抗战中期，四大家族逐渐形成遍布西北、西南广大地区的金融网。到1942年4月前，他们在西南、西北各省增设分支60多处。同年7月，国民政府宣布施行“货币统一发行办法”，规定纸币集中发行与储备业务由中央银行负责。同时，中国、交通、农民3行资金也增加到6000万元，中央信托局资金增加到5000万元，从而使四大家族官僚资本在全国金融业的垄断地位越发加强，四大家族财富也迅速增长。抗战后，四行存款数额4年中即增长6倍，是全国各银行中增长最快的。在全部存款中，四行的存款这时更占到80%到90%，和战前1936年的59%相比，高出甚多。商业方面，四行以雄厚的资本进行商业投机，大发横财。抗战期间，四大家族垄断商业的公开组织分“官”、“商”两种形式。所谓官式，即以政府名义建立的各商业机构；所谓商式，即四大家族以私人名义公开设立的商业公司。国民政府借着战时的需要，制订了种种管制政策，为四大家族对商业的独占和投机活动提供保证和方便。其中，主要的有专卖制度。四大家族利用专卖权和大量专卖品，抬高物价，搜刮百姓钱财。同时在商业垄断组织贸易委员会控制下实行统购统销政策。他们把对外销的主要特产丝、茶、桐油、猪鬃、锑、钨等实行统购统销。四大家族的商业组织，利用这个政策，转手高价出售，获得大量收入。以秋蚕论，每担官价比市价：1938年差300元，1939年差1580元，1940年差2050元，1941年差5000元，1942年差8500元。工矿业方面，四大家族借口调整工矿事业，实行对工矿企业的统制和垄断。抗战开始，国民党政府设立了工矿调整委员会（后改隶经济部，称工矿调整处）。规定调整工矿的主要方式是：一、协助所有国营厂矿资本不足运用、或新设国营厂矿资本尚待筹措者；二、对于原有或新设立民营厂矿采用接管或加入政府股份的办法，由政府统筹办理或共同经营。这个工矿调整委员会即担负有发展官僚资本工业和并吞民营工业的任务。1938年10月，国民政府公布《非常时期农矿工商管理条例》，更加明白规定：凡国民政府经济部所指定的企业或物品，由地方政府分别管理；对战时所必需的矿业、军事工业或电力工业等，由国民政府分别收归官办，或由政府投资合办；对生产生活日用品的企业或物品，经济部得随时直接经营，对所用原料是军用必需品的或生产非必需品而缺乏原料的工厂，经济部得令其停业。四大家族就这样借口“非常时期”，凭借他们政权的一纸命令，从多方面进行加强垄断工矿企业的活动。官僚资本垄断工矿的主要机构资源委员会，这一时期获得了畸形的发展。1938年3月，资源委员会从军事委员会改隶经济部，根据国民政府同年8月1日公布的组织条例，该会的职掌有：一、创办及管理经营基本工业；二、开发及管理经营重要矿业；三、创办及管理经营动力事业；四、办理政府指定的其他事业。在抗日战争时期，该会除继续垄断钨、锑、锡等矿产原料出口业务外，较大规模地展开了工矿电力工业的建设和经营。1937年底，该会所辖工矿企事业只有26个，1938年，即筹办和接管了37个，所辖工矿企事业总数猛增至63个，1943年又增至105个，1945年底更增至128个，为1937年的4.92倍。拥有职工人数，在1937年时，全部员工只有1.2万人，至1943年时，已增加到职员1.2万人，工人17万人，增加了十几倍，后来还续有增加。据统计，1942年国民政府官营工业约占国民党统治区工业资本的69.58%，动力设备的42.29%，工人人数的31.95%。它的产值占到国民党统治区

工业总产值的三分之一以上。四大家族还以私人名义或通过他们控制的银行渗透到私营工业中去。如孔祥熙在中国兴业公司、中国制药厂、三才生煤矿公司、福华烟草公司、裕华纱厂等企业中都有投资;宋家控制下的西北雍兴实业公司,名为商营公司,实际上是官办工业,资本2000万元,全由中国银行信托投资,流动资金也由该行贷放。该公司于1940年成立,头两年即兴办了18个工厂,大部分在陕甘两省,遍布在兰州、西安、天水、咸阳、陇南等城市,包括纺织、面粉、机器、制药、皮革、印刷、火柴等部门,其中纺织业是重心。该公司各纱厂拥有纱锭10.6万枚,占当时国民党统治区纱锭总数24万枚的44.16%。这些规模巨大的商办工业,加强了四大家族在工业中的垄断地位。农业方面,四大家族也加紧了控制和垄断。除了实施统购统销农产品,田赋征实、征购、征借等垄断政策之外,四大家族对农民的高利剥削也逐年增加。据国民党统治区15个省的调查,农民借款来源中,受四大家族直接间接操纵的银行、合作社、合作金库所占的比重,1938年为27%,1943年增至59%。四大家族还直接参与土地兼并,经营农业。如1940年12月陈家设立"华西建设公司",在川、滇、黔、康、陕、甘等省霸占大量土地,开办农场,把土地租给农民耕种,获取高额地租。另外,四大家族还独占交通运输业。他们控制着全国的铁路网、公路网和轮船公司、航空公司,而民族资本几乎没有插足的余地。 (林健柏)

中共六届六中全会召开

1938年9月29日至11月6日,中国共产党在延安召开扩大的第六届中央委员会第六次全体会议。

为总结全国抗战以来的经验教训,确定中国共产党在抗战新阶段的方针任务,统一全党的认识和步调,1938年9月29日,中国共产党在延安桥儿沟召开了扩大的六届六中全会。参加会议的有中央委员和中央候补委员17人,中央各部门和各地区的领导干部30余人。这是自中共六大以来出席人数最多的一次中央全会。王稼祥在会上传达了共产国际关于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在中央领导机关中要以毛泽东为首解决统一领导问题等意见。10月12日至14日,毛泽东代表政治局作《论新阶段》的政治报告,这是会议的中心议题。报告分析了抗战的形势,指出,目前的抗战正处在由防御转入敌我相持的过渡阶段;明确了党和全国人民在抗战中的任务;强调党应该认真地担负起领导抗战的重大历史责任。周恩来、朱德、项英、张闻天、陈云、刘少奇分别就有关方面工作作了报告。会议围绕着争取中共对抗日战争的领导权问题、统一战线中的独立自主问题、中共的工作重点问题、党的军事战略问题、党的思想建设和组织建设问题,进行了讨论。11月5日和6日,毛泽东作了会议总结,着重讲了统一战线中的独立自主问题及战争和战略问题。会议通过了《中共中央扩大的六中全会政治决议案》,批准了以毛泽东为首的中央政治局的路线。会议确定要不断巩固和扩大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以国共两党的长期合作来支持长期的抗日斗争。同时要坚持统一战线中的独立自主原则。会议批判了党内在统一战线问题上的关门主义和投降主义的偏向,着重批判了"一切经过统一战线"、"一切服从统一战线"的迁就主义的错误观点。全会重申,应把党的主要工作方面放在战区和敌后,独立自主地放手组织人民抗日武装斗争,确定大力"巩固华北,发展华中"的战略方针。会议制定了正确的组织路线,强调了党内团结和党的纪律的重要性,确定了党的干部路线和政策,重申了党的纪律:"个人服从组织,少数服从多数,下级服从上级,全党服从中央。"会议通过了《关于中央委员会工作规则与纪律的决定》、《关于各级党部工作规则与纪律的决定》、《关于各级党委暂行组织机构的决定》等文件,作为党的法规,以健全党的民主集中制,巩固党的团结与统一。会议号召党的干部自上而下一致地努力学习马克思、列宁的理论,学会灵活地把马克思列宁主义及国际经验应用到中国每一个实际斗争中来,改变党内存在着的教条主义的错误倾向。会议决定对党的组织机构作相应的变动,撤销中共中央长江局,设立中原局和南方局,刘少奇、周恩来分别任书记;东南分局改为东南局,项英仍为书记,充实北方局,杨尚昆任书记。这次会议正确地分析了抗日战争的形势,规定了党在抗战新阶段的任务,为实现党对抗日战争的领导进行了全面的战略规划,基本上克服了以王明为代表的右倾投降主义错误,统一了全党的步调,推动了各项工作的迅速发展。

(王佩琏)

华中抗日根据地的开辟

1938年至1940年新四军在华中建立的敌后抗日根据地。

1938年9月至11月召开的中共扩大的六届六中全会确定了"巩固华北、发展华中"的战略方针。还

决定撤销长江局，成立中原局，由刘少奇任书记，统一领导长江以北河南、湖北、安徽、江苏地区党的工作；成立南方局，由周恩来任书记，董必武任副书记，负责领导长江以南地区党的工作。1939年2月，周恩来代表中共中央到新四军军部，确定新四军的战略方针是向南巩固，向东作战，向北发展。12月初，刘少奇率中原局机关抵达皖东定远藕塘新四军江北指挥部，先后主持召开三次中原局会议，讨论发展华中的战略方向、根据地建设的方针任务和统一战线的策略等问题，决定执行向南防御，向东发展，开辟苏北的战略任务。同时建议中共中央派八路军一部南下，新四军主力北上，大力发展华中。1939年华中新四军完成了向敌后展开的任务。5月初，新四军军长叶挺到庐江东汤池，组织新四军江北指挥部，张云逸兼指挥，徐海东、罗炳辉为副指挥。同时成立江北指挥部前委，张云逸为书记。随后，江北指挥部前委对第四支队及江北部队进行整编，由徐海东兼任第四支队司令员；以原第四支队第八团为基础组成了第五支队，罗炳辉为司令员。第四支队在皖东津浦路西开辟了以定远藕塘为中心的皖东根据地。第五支队在津浦路东开辟了以来安半塔集为中心的根据地。江北游击纵队一部在皖中巢县、无为地区坚持斗争，保持与皖南的交通联系；一部进至和县、含山地区开展游击活动，开辟了皖中抗日根据地。

1938年3月，由高敬亭、林维先领导的鄂豫皖游击队东进后，中共河南省委和豫南特委以确山竹沟镇为开展河南抗日游击战争的战略支点。武汉失守后，豫南特委以竹沟留守处分队与信阳、泌阳等地游击队合编为信阳挺进队，12月进入四望山开展游击战争。同年冬，中共中央派李先念率一部分干部由延安赴豫鄂边，领导当地游击队，挺进敌后开展游击战争。1939年6月，陈少敏率信阳挺进队与李先念部会合，将部队统一编为豫鄂独立游击支队，李先念任司令员，陈少敏任政治委员，不久由陶铸代理政治委员。11月，根据中原局书记刘少奇的指示，将豫南、鄂东、鄂中地区的部队统一编为新四军挺进支队。1940年1月，挺进支队改称豫鄂挺进纵队，李先念任司令员，下辖5个团队、3个总队，进入大、小悟山地区。1940年底，鄂豫边区扩大到十几个县的范围，部队发展到1.5万余人的游击兵团，建立了鄂豫边抗日根据地。

1939年11月，新四军第一、第二支队领导机关合并，成立江南指挥部，陈毅为指挥，粟裕为副指挥。之后，由叶飞、管文蔚领导的挺进纵队和由陶勇领导的苏皖支队渡江北上，向江苏仪征、扬州、天长、六合、泰州地区发展，并控制了扬州、大桥一带长江渡口，开辟了苏皖抗日根据地。不久，苏皖支队与皖东根据地的第五支队打通了联系。1940年6月，江南指挥部渡江后，改为苏北指挥部，由陈毅、粟裕任正、副指挥，下辖第一、第二、第三纵队。7月，苏北指挥部挥戈东进，占领泰兴的黄桥、蒋垛、古溪等地。随后转兵南进，连克靖江东北之孤山、西来镇，挺进到以黄桥为中心的泰兴、靖江、南通、如皋地区，开辟了以黄桥为中心的苏中抗日根据地。9月底，国民党江苏省政府主席兼苏鲁战区副总司令韩德勤纠集3万余人，分路南下，10月4日进犯黄桥。新四军苏北指挥部在陈毅等领导下，坚持自卫立场，在政治上彻底揭露韩德勤反共投降阴谋，积极开展统一战线工作；在军事上采取诱敌深入、断其归路、在运动中各个歼灭的作战方针。此役新四军歼灭韩德勤主力1.1万余人，为发展苏北奠定了基础。

在苏南新四军主力北上后，坚持苏南斗争的新四军一部，于1940年7月，在茅山地区重新组织了江南指挥部，坚持茅山抗日阵地。为加强苏南地区的抗日斗争和统一党政军领导，新四军第三支队副司令员谭震林于1940年5月进入该区。6月，成立江南人民抗日救国军东路指挥部，谭震林任司令员，坚持苏南抗日游击战争。

1939年春，由彭雪枫率领的新四军豫东游击支队，由河南鹿邑地区东进，进入商丘、亳县、永城地区。5月又进军淮河以北。年底，游击支队发展到9个团，1.2万余人，改称新四军第六支队。1940年2月，第六支队进入商丘、亳县、睢宁、夏邑、砀山游击区，建立豫皖苏抗日根据地。6月，第六支队(欠第四总队)与八路军南下部队第三四四旅(欠第六八七团)合编为八路军第四纵队，辖3个旅9个团，共1.7万余人，由彭雪枫任司令员，留在豫皖苏地区，执行向西防御任务。

1939年5月，八路军苏鲁豫支队主力越过陇海路，进入安徽萧县，河南永城、夏邑地区；八路军陇海南进支队和苏鲁豫支队进入皖东北泗县地区，与新四军第六支队一部会合，开辟了皖东北抗日根据地。不久，张爱萍率中共豫皖省委进入皖东北，设立八路军、新四军联络机构，加强皖东北的斗争力量。1940年5月，韩德勤向苏皖边的金锁镇、界头集等地进犯。陇海南进支队和苏鲁豫支队第一大队、新四军第六支队第四总队、第一团等部进行自卫反击，经过13天战斗，将韩德勤顽军逐回泗阳、宿迁县境。皖东

北抗日根据地的开辟，为新四军东进苏北开创了新的前进阵地。

1940年5月，黄克诚奉命率八路军第二纵队主力（第三四四旅、新编第二旅）共5个团1.2万余人，由冀鲁豫南下，6月到达豫东北永城南新头集与新四军第六支队会合。这支部队的南下，为发展华中抗战增加了突击力量。6月底，以八路军新二旅及第六八七团、苏鲁豫支队、陇海南进支队与新四军第六支队第四总队合编为八路军第五纵队，辖3个支队9个团，近2万人，由黄克诚任司令员兼政治委员，执行东进苏北任务。8月东渡运河，进入沭阳、淮阴、宿迁、东海地区，建立了淮海抗日根据地。1940年10月10日，八路军第五纵队和新四军苏北指挥部所部在东台以北白驹镇胜利会师。11月，新四军八路军华中总指挥部在苏北盐城成立。叶挺、陈毅分任正副总指挥，叶挺抵苏北前，由陈毅代理总指挥，刘少奇任政治委员，统一指挥陇海路以南、长江以北之新四军与八路军。

至1940年年底，新四军解放了江、淮、河、汉之间的广大国土和人民，建立了皖中、皖东、皖东北、苏南、苏中、苏北、豫皖苏、皖南等根据地，军队由组建时的1万余人发展到10万余人。 （林健柏）

南侨总会成立

1938年10月10日爱国华侨领袖陈嘉庚组织的南洋华侨筹赈祖国难民总会在新加坡成立。

陈嘉庚（1874—1961），福建同安（厦门）人。1937年8月13日，日军进攻上海，消息传到东南亚，陈嘉庚率先在新加坡发起组织华侨筹赈祖国伤兵难民大会委员会（简称星华筹赈会），号召侨胞捐款救国。随后，南洋各地华侨相继组织筹赈会、慈善会，筹款纾难。1938年，印度尼西亚华侨领袖庄西言和菲律宾华侨领袖李清泉联合致函陈嘉庚，倡议建立一个南洋华侨抗日救亡斗争的最高组织，并将此设想函达重庆国民党政府。同年7月，行政院电请陈嘉庚负责组织总机关。陈嘉庚即登报邀请香港、马来亚、缅甸、北婆罗洲、荷属爪哇、苏门答腊、南婆罗洲、西里伯、菲律宾、越南，以及泰国等45个商埠的华侨筹赈会、慈善会、商会，派出代表到新加坡参加南洋华侨筹赈祖国代表大会。10月10日，168名华侨代表出席大会。会议决定成立南洋华侨筹赈祖国难民总会，简称“南侨总会”。陈嘉庚为总会主席，庄西言、李清泉为副主席。在新加坡设总会办事处。大会发表宣言指出：中国之抗战实为御侮而战，保障世界和平而战。号召全体侨胞各尽所能，各竭所有，自策自鞭，自励自勉，踊跃慷慨，贡献于国家。《南侨总会通告第一号》又提出“焦土抗战、全面抗战和长期抗战”3个口号，作为全体侨胞努力的目标。南侨总会在各地的分支机构达85处。此后华侨筹赈工作在全南洋形成广泛的群众运动。陈嘉庚带头认常月捐2000元，南洋各地华侨积极响应。据统计，仅1938—1939年南侨总会捐款达1.4亿元。在南侨总会领导下，东南亚地区掀起了大规模的抵制日货运动。各界华侨组成“抗敌救国会”，走上街头，宣传抵制日货的意义，到处张贴“制裁奸商办法”的告示。日商工厂的华工“情愿受失业之苦”，纷纷举行罢工，迫使厂家停业减产。罢工后华工生活困难，统由南侨总会募捐解决。抗战开始后，陈嘉庚受国民党政府的“西南运输公司”的委托，由南侨总会在报上登广告，并发公函给各地筹赈会，号召华侨机工回国服务。一时间，热诚报名回国者达3200余人。1940年3月，陈嘉庚、庄西言率领南洋华侨回国慰劳视察团回国参观，到了延安。陈嘉庚看到延安的军政人员在共产党的领导下，“与民众辛苦合作，同仇敌忾”的种种事实，又了解到八路军在敌后奋战，开始认识到共产党人是真正的“公忠爱国”者，八路军敌后抗日根据地是真正“生聚教训，发愤图强”的场所。他在重庆期间，“见蒋介石狡诈独裁”，国民党统治集团“贪污专横，残民以逞”，消极抗日积极反共的事实，“断定国民党蒋政府必败，延安共产党必胜”。回到南洋后，他向海外华侨如实报告了在国内的见闻，使广大侨胞了解到国民党的黑暗，共产党的光明，把华侨爱国救亡运动向前推进一大步。

（林健柏）

长沙大火

1938年11月13日，国民党政府以“焦土抗战”为名，下令焚毁长沙市区的事件。

1938年11月11日，日军沿粤汉路南下，湘北的门户岳阳沦陷。日军还出动飞机轰炸通城、平江等地，长沙告急。聚集在长沙的国民党各军政机关纷纷撤退。12日上午，蒋介石急电湖南省政府主席张治中“对长沙要用焦土政策”，“长沙如失陷，务将全城焚毁”。张治中即召集长沙警备司令酆悌、省保安处长徐权，商拟实施方案，决定由警备旅第二团团长徐昆任焚城指挥，长沙市社训副总队长王伟能、警备司令部参谋处长许权任副指挥；待国民党军自汨罗撤退后开始行动。12日深夜，日军进抵距长沙100多公里之九岭以北地区。13日晨，地方军警负责人误

以为日军逼进长沙，下令焚烧长沙。命国民党湖南人民自卫团第二团分为24个队，散布全市各区，各带火油、汽油，首先从省府及警察局点火，各区一起响应。这场大火使长沙市内机关、团体、学校、医院、银行、工厂等建筑物付之一炬。民房除东站路及城外一部外全被烧毁，尤以长沙最繁盛之八角亭、红牌楼、中山路、南正街、北正街一带焚烧最烈。顿时，全市陷入一片火海，市民从睡梦中惊醒，一片混乱。大火燃烧了3天3夜，长沙化为一片焦土，共烧毁房屋5.6万余栋，居民死伤2万多人，几十万市民无家可归。正在长沙的周恩来撤到衡山后，于11月15日就长沙大火事件向国民党最高当局提出了3点善后办法：一、拨款救灾；二、调集民工清理街道，安置灾民；三、惩办放火首犯。由于民怨沸腾以及中共方面据理力争，蒋介石采取了一些紧急处置措施，在长沙进行“军法会审”，处决了长沙警备司令酆悌、警备旅第二团团长徐昆、省公安局长文重孚，了结此案。

（王佩琏）

国民党五届五中全会召开

1939年1月21日至30日，国民党在重庆召开第五届中央委员会第五次全体会议。

抗日战争进入相持阶段后，由于日本的诱降和英、美对日本的侵略采取绥靖主义政策，以蒋介石为代表的国民党英美派集团的反共和对日妥协的倾向明显增长。1939年1月21日至30日，国民党在重庆召开五届五中全会。到会的有中央执行委员和中央监察委员155人。会议的中心议题是讨论抗战和对付共产党问题。会上，蒋介石发表了《敌国必败及我国必胜》的演说，声称要“坚持抗战到底”。蒋介石说：抗战到底的底在哪里？是否是日本亡了，或者中国亡了才算到底，必须有一界说。现在要打到日本亡了，那不可能，或者说武汉失了就算到底，那太离奇了。在卢沟桥事变前现状未恢复、平津未收复以前不能与日本开外交谈判。我们不回复七七事变以前原状就是灭亡，回复了就是胜利。根据蒋的意见，军委会制定了《第二期作战指导方针》，提出“有限度”的作战计划。全会确定了“溶共”、“防共”、“限共”、“反共”的方针。蒋介石在会上扬言：对中共是要斗争的，不好怕它。我们对中共不好像十五、十六年那样，而应采取不打它，但也不迁就它，现在对它要严正一管束一教训一保育，现在要溶共——不是容共。它如能取消共产主义我们就容纳它。会议决定设立“防共委员会”，强调要发展组织，扩展势力，以与人民力量相对抗。五届五中全会通过了《整理党务》的决议案。蒋介石指示，加紧努力，切实实行。会后，国民党中央连续秘密颁布了《限制异党活动办法》、《异党问题处理办法》、《处理异党问题实施方案》等反动文件。这些文件规定“八路军与新四军之军政军令必须统一于中央”，“服从上级司令部之指挥调遣”，“绝对不准自由招募，尤其不准就地征粮或收缴民枪，乘机扩大私有武力”，“非得军事委员会之命令不得脱离驻区”。在行政上“绝对否认共产党所谓‘陕甘宁边区’之组织”，“共产党在华北各省游击区内组织之地方政权应即令移交冀察战区党政委员会分会”；“‘晋察冀边区政府’及其所组织之各县地方政权，应严令解散，所发行之货币，责令其负责收回，否则以军饷作抵”。1939年冬，国民党顽固派发动了第一次反共高潮。

（林健柏）

日军推行“治安肃正计划”

1939年1月起，日军为强化对华北的占领，实行军事征服与政治镇压相结合的“治安肃正计划”。

抗日战争进入相持阶段后，日本把进攻重点转向华北敌后根据地。日本大本营陆军部在1938年秋决定了华北作战指导的基本原则，是在所谓“建设东亚新秩序的理想下”，使华北乃至蒙疆“在国际方面、经济方面、特别是在开发利用资源方面，形成高度结合的地带”。同时在蒙疆“造成军事上、政治上的特殊地位”以防共。日本陆军部还命令华北方面军确保所占领地区的安定。据此，日本华北方面军制定了1939年度和1940年度的3期“治安肃正计划”。其主要内容是以军事进攻摧毁抗日根据地，建立伪组织，培植亲日武装团体，实行所谓“自卫”与“自治”控制民众，施以怀柔政策欺骗民心等。1939年3月30日，日本华北方面军在“治安肃正纲要”中规定，对抗日根据地实行所谓“肃正作战”，“重点专以敌人的游击战术为对象给予完全封锁。因此，以奇袭、快速奔袭作为作战指导的基础。”纲要确定要最大限度地有计划地强化伪军、伪政权。首先成立灭共自卫队（老百姓名之棒棒队），然后组织“保安队”、“警备队”，最后使之成为正规的伪治安军。同时要求伪政权先是马马虎虎维持局面，出面应付八路军，然后成立正式伪政权，自上而下的村、区、县、道的一套系统。还提出划小村治，筑寨并村，强化保甲制度，清查户口，建立门牌，颁发身分证明书等一套强化法西斯统治的办法。为达到“肃正作战”的目的，9月，日本华北方面军司令官多田骏又提出实行所谓“囚笼政策”，即

以铁路为柱，公路为链，碉堡为锁，辅之以封锁沟、墙，向抗日根据地构成网状压缩包围的"囚笼"，以扼杀抗日军民。从1939年至1940年，日军在华北修复铁路1870公里，公路1.56万公里，新筑碉堡、据点2749个；1940年修筑的碉堡、据点较1939年增加了4倍。在公路上每隔二三里便设一据点；在湖泊地区则挖掘新的河沟，把抗日根据地分割成若干小块。日军在军事指导上，由短促的"扫荡"，进到长期的"扫荡"，由分散的"扫荡"，进到集中优势兵力的"扫荡"，由线式的"扫荡"，进到纵深的"扫荡"，由分区围攻进到分区"清剿"，由长驱直入进到步步为营，由分进合击进到铁壁合围，由无组织的烧杀抢掠，进到有组织的"三光政策"。日军依靠其灵活的通信联络与周密的情报组织，实行夜间奔袭，跃进式地建立据点。

（林健柏）

"曲线救国"

1939年初开始，国民党内一些顽固分子为实行降日反共而制造的一种叛国谬论。"曲线救国"，最早是国民党河北省民军总指挥张荫梧提出的。1939年初，张荫梧在给国民党中央的电报中，把柴恩波率部投降日军后任"冀中剿匪总司令"的叛变投敌行为诡称为"曲线救国"。1939年4月国民党第一战区司令部颁发的秘密文件中也声称：除奸至为迫切要务，应分别轻重，首先从事剿共，如影响抗战，则可略走曲线。随后，这种论调在国民党顽固派中十分流行。他们指使或支持一部分国民党军队和文武官员投降日本侵略者。其中有国民党苏鲁皖边区游击总队副总指挥李长江率部5个支队投敌，计2万余人。江苏保安第8旅旅长杨仲华率部投敌。1942年4月国民党军事委员会委员、山东省政府主席、第三十九集团军副总司令孙良诚在鲁南率第六十九军暂三旅、特务旅投敌，随孙投敌的还有新编六师师长王清翰、暂编第三十师师长赵云祥、第一八一师师长陈光然、新编第十三旅旅长黄贞泰、特务旅旅长郭峻峰等。之后，国民党大批军官起而效尤，先后投敌的有新编第四师师长吴化文、第一二九师师长王劲哉、第六战区挺进军总司令兼第二纵队司令金亦吾、新编第五军军长孙殿英、苏北游击队第2支队司令张良才等。1943年5月，国民党中央监察委员、河北省政府主席、冀察战区副司令官兼第二十四集团军总司令庞炳勋与孙殿英联名通电投敌叛国。7月，国民党第二十七军预备第八师师长陈孝强在山西公开叛国投敌。在此前后，国民党文武官员中降将如毛，降官如潮。至1943年8月，国民党的叛国投敌人员中，有中央委员20人，旅长、参谋长以上的高级将领58人，投敌的军队达50万人，占80万伪军的62%。这些军队变为伪军，和日军一起进攻抗日根据地。

（林健柏）

齐会战斗

1939年4月，八路军第一二〇师主力和冀中部队密切配合，在河北河间县齐会村对日伪军的一次歼灭战。

1939年4月，第一二〇师主力正在卧佛堂、大朱村一带休整。4月20日晚，发现沧县日伪军分乘汽车50余辆向河间前进，河间日军渡佳行联队800余人及伪保安队一部，附飞机、大炮，带大车80余辆，由河间到达三十里铺附近，有进攻齐会模样。第一二〇师贺龙师长决定阻击东面、北面之敌，不使其向齐会增援，集中全力歼灭渡佳行联队。23日早晨，日伪军向齐会发动进攻。冀中军区驻守齐会的"铁军"第七一六团第三营进行反击。贺龙师长调集第一二〇师主力和冀中军区第三纵队一部，投入战斗。日伪军把齐会紧紧包围，双方战斗激烈，日伪军的炮弹向村内倾泻，第七一六团第三营的战士顽强地坚守着村落，一次又一次地打退了日伪军的进攻。后来日伪军冲进村沿，四面放火。四五百户的齐会村被烧去了大半，但因街道宽阔，又是瓦房，大火还不能烧着全村，八路军就在大火烧不到的地方坚持着。日伪军见急攻不下，即施放毒气。八路军用湿毛巾和口罩进行防毒，并将各家的庭院打通，把长板和梯子架在屋顶之间，就在屋顶上抵抗。23日上午11时，八路军增援部队到达齐会附近，将日伪军包围于砖瓦窑附近的炮兵阵地上，并与村里守军取得火力联系。双方相持到过午。下午4时，任丘日军300余人，向齐会增援，被冀中军区第三纵队独二旅击退。吕公堡、大城之日军相继增援，也为地方武装所阻。齐会日伪军陷于孤立。黄昏时，八路军内外夹击，将日伪军冲垮。为防止日伪军逃脱，八路军在南面、西面埋伏了强大的部队，撒下了天罗地网。困于齐会之日伪军腹背受击，死伤惨重，又无援兵，乃于24日晨4时向南溃逃，行至马村附近，又遇八路军阻击。日伪军见势不妙，急转身向东逃走。第七一五团跟踪猛追，东面独一旅也到南留路截击。25日晨，日伪军南逃未逞，又被围在南留路与张曹间的坟地里，在坟地被困了一天，吃喝不上，东撞西窜，有时掘井取水，有时焚烧尸体，狼狈不堪。为全歼残敌，八路军又调整部署，预计

在黄昏时将日伪军一举消灭。不意，黄昏前北风大作，尘土蔽天，不能通视目标，敌乘机向南逃窜。八路军追击10多公里，残敌80余人逃回河间县城。是役歼敌700余人，俘7人，缴山炮1门、轻重机枪20余挺、步枪200余支。八路军取得了平原歼灭战的首次胜利。（林健柏）

长沙会战

1939年9月至1942年1月，中国第九战区部队在长沙抗击日军的3次会战。

第一次长沙会战。日军为配合德、意法西斯在欧洲战场的攻势，并确保武汉地区的安定，于1939年9月14日，在冈村宁次的指挥下，调集了第六、第三十三、第一〇一、第一〇六师团主力和第三、第十三师团大部，共约12万多人，从赣北、鄂南、湘北3个方面向长沙发动进攻。中国第九战区先后出动17个军共35个师近40万兵力参战，以一部兵力于赣北、鄂南阻止进犯的日军，主力在湘北方面采取“逐步抵抗，诱敌深入”的战术，利用有利地形，节节抵抗并各个击破敌人。9月18日，日军由岳阳及其东南康王桥、大云山一线向中国守军第十五集团军阵地攻击。经5日激战，守军放弃新墙河一线阵地，移至汨罗江南岸。26日，日军向汨罗江南岸猛攻，守军在与日军反复争夺后，撤至福临铺、栗桥、牌楼一带设伏区。28日，进至福临铺地区的日军遭守军第一九五师的伏击，沿粤汉路南进的日军在栗桥、三姊桥遭守军第七十七师的阻击。日军因兵力不足，交通运输不便，给养供应不足，为避免陷入不利态势，29日，向新墙河以北后撤。10月2日，第十五集团军实施反击，先后收复福临铺、三姊桥等地。10月4日，克汨罗江南岸的汨罗、新市等地。7日，日军全部退至岳阳、临湘、通城等原来阵地。在会战中，中国空军出动飞机29架，两次轰炸汉口日军机场，击落日机3架，炸毁日机70多架。日军伤亡2万多人。这次会战是中国军队自“卢沟桥事变”以来首次用武力迫使日军回复到战前原态势的一次战役。

第二次长沙会战。1941年6月22日，苏德战争爆发，日本乘势放弃对苏作战计划，决定对英、美开战。为了加快南进速度，日军于7月下旬，进兵占领越南南部，作为南进的根据地。与此同时，为压迫蒋介石政府屈服，扫除其南进的障碍，发动了旨在消灭中国军队主力的第二次长沙战役。1941年9月初，日军再次进犯湘北。敌以第三、第四、第六、第四十等4个师团及第三十三、第十三师团一部共12万多人，在30多艘兵舰、数百只汽艇、民船、180架飞机的协同下，以阿南惟几为司令官，由岳阳以南再次向长沙发动进攻。中国第九战区第十九、第二十七、第三十集团军，以及第九十九、第三十七、第二十六军，共14个军，30多万人迎战。9月7日，日军由忠坊、两塘两路向临湖以南的大云山进犯，揭开了这次会战的序幕。17日拂晓，日军分由港口、西六房、潼溪街、新墙，开始进攻，强渡新墙河。中国军队逐次抵抗，并把主力转向敌人侧翼。日军因沿途未遭重大抵抗，所以行动迅速，19日抵汨罗江岸，26日渡过捞刀河，第二日进入长沙。日军在长沙掠夺5天4夜。由于第九战区部队向长沙四面会集，敌后交通被破坏，弹药补给困难，日军于9月30日开始突围北撤，10月8日全部撤往新墙河以北地区。在第二次长沙会战中，日军伤亡1万多人，中国军队则伤亡及被打散约10万人。

第三次长沙会战。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日军加强了对中国华南及东南亚地区的进攻。为了牵制中国军队南下出兵增援在香港、九龙英军及赴缅对日作战，日军决定对长沙发动第三次进攻。1941年12月初，阿南惟几纠集日军第三、第六、第三十四、第四十等4个师团与独立第九、第十四旅团，加上炮兵、特种兵及海军共5个半师团，总兵力与前次约略相等，企图于1942年元旦占领长沙。中国参战部队有第二十六军、第七十三军、第四军、第七十四军等，共14个军，约30多万人。12月24日，湘北、鄂南日军约7万多人，于罗家塅至八仙渡分8路攻过新墙河。中国守军逐次抵抗。日军强渡汨罗江后于1942年1月1日猛扑长沙。中国军队在敌人深入的情况下，实行大包围，于1月4日发动总攻击。日军不克，且战且退。敌派独立第九旅团南下接应，亦遭袭击。9日，日军突围北逃。中国军队乘胜追击，至15日，恢复了战前态势。第三次长沙会战历时20多天，取得了毙伤日军四、五万人，俘日军100多人，缴获步枪1千多枝、机枪100多挺、炮11门及其他军用品的重大胜利。三次长沙会战表现了中国军队广大官兵的爱国牺牲精神。日军统帅部也承认中国军队“不怕死，士气高”，“抵抗十分顽强”，“即使主力已经退却，留下来的掩护部队仍然坚守阵地，直到最后一个人”。

（林健柏）

陈庄战斗

1939年9月八路军第一二〇师在河北省灵寿西北陈庄进行的一次歼灭战。

1939年8月，冀中八路军第一二〇师主力大部在贺龙等率领下向晋察冀边区腹部转移，于9月间到达河北省行唐、山西省灵丘集结。9月25日，日军由灵寿向晋察冀边区腹地发起进攻，占领慈峪镇。27日上午，日军直奔陈庄，袭击晋察冀边区后方领导机关。第一二〇师在陈庄东南设伏，并以七一九团坚守白头山阵地，以另一部警戒灵寿、行唐增援之敌。28日拂晓，敌人烧毁了村里的房屋后，沿磁河南岸向东撤退。8时，敌先头部队进入预伏区，第一二〇师发起阻击，将日军全部包围在高家庄、破门口、冯沟里3个村庄。下午7时，第一二〇师发起总攻，将敌分割围歼，日军死伤众多。同日，灵寿、慈峪之敌1000余人沿磁河来援，被八路军阻击于白头山下，激战竟日，敌仍不得前进。29日晨，被围于破门口、冯沟里的敌人已伤亡过半，遂向南突围，又被包围于鲁柏山高地。第一二〇师以炮轰和步兵冲锋轮番向敌攻击。敌困守山头，陷入绝境。当夜，第一二〇师发起全线总攻击，突破敌军阵地，将敌大部歼灭。南逃残敌又被全歼。陈庄战斗，经6天5夜激战，歼敌水原旅团长以下1280人，俘敌16人，缴获山炮3门、轻重机枪23挺、步枪500余支、战马50余匹。这次战斗的胜利，为巩固北岳区，粉碎即将到来的日军大"扫荡"奠定了胜利的基础。（林健柏）

减租减息政策的实施

1939年11月1日，中共中央指示各根据地贯彻执行减租减息政策。

1937年8月，中共中央在陕北洛川召开的政治局扩大会议决定以减租减息作为抗日战争时期处理土地问题的基本政策。地租，一般实行二五减租，即不论公地、私地、佃种地或钱租制、物租制，均按原租额减去25%。利息，一般减到不超过社会借贷关系所许可的程度为限，即年利最高不得超过15%或10%。1939年11月1日，中共中央作出《关于深入群众工作的决定》，要求各根据地切实贯彻减租减息政策。1939年冬至1940年春，华北各根据地普遍开展了减租减息运动。1939年12月17日，晋察冀边区农会提出了减租减息的实施办法和主要内容。对各种情况作了具体的规定。1940年6月，据北岳第一、二、三、五专区的统计，减租已达1.29万多石，减息32万多元，清理旧债农民收回土地6.49万亩。在晋冀鲁豫边区，1941年6月，11个县已减租1.77万多石。在晋绥边区，1941年22个县已减租1.77万多石。1942年1月28日，中共中央发布《关于抗日根据地土地政策的决定》，以及《关于地租及佃权问题》、《关于债务问题》、《关于若干特殊土地处理问题》等3个附件。2月6日，又发布《关于如何执行土地政策决定的指示》。这些文件明确规定：承认农民是抗日与生产的基本力量，共产党的政策是扶助农民，减轻地主的封建剥削，实行减租减息，保障农民的人权、地权、政权、财权，借以改善农民的生活，提高农民抗日与生产的积极性。承认中国地主的大多数是有抗日要求的，一部分开明士绅是赞成民主改革的，共产党的政策仅是扶助农民减轻封建剥削，不是消灭封建剥削，更不是打击赞成民主改革的开明士绅。实行减租减息之后，又须实行交租交息，以联合地主阶级一致抗日。只是对不愿改悔的汉奸分子，才采取消灭其封建剥削的政策。承认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是中国现时比较进步的生产方式，富农的生产方式是带有资本主义性质的，富农是农村中的资产阶级，是抗日与生产的一个不可缺少的力量。因此不是削弱资本主义与资产阶级，不是削弱富农阶级与富农生产，而是在适当地改善工人生活条件之下，同时奖励资本主义生产与联合资产阶级，奖励富农生产与联合富农。因富农有一部分封建剥削，对富农的租息必须照减，同时须实行交租交息，并规定保留农民的永佃权，无永佃权的，奖励双方订立较长期的租佃契约。保障农民的土地使用权，债权人不得因减息而解除借贷关系、借贷契约等。《决定》的颁布执行，坚定了广大农民进行减租减息斗争的信心，打击抗拒减租减息政策的不法地主，也团结了地主阶级中的开明分子。1943年10月1日，中共中央在《关于减租生产和拥政爱民及宣传十大政策》指示中指出，减租是农民的群众斗争，依靠群众自己解放自己。政府的指示和法令是领导和帮助这场斗争，而不是给群众以恩赐。凡不发动群众积极性的恩赐减租，是不正确的，其结果是不巩固的。还责成各根据地各级党政机关，从秋后到年底以前来一次彻底的、普遍的查减运动，要求未认真实行减租的，必须今年一律减租，减而不彻底的，必须于今年彻底减租。1944年和1945年间，各根据地的减租减息运动进入高潮，形成了"几乎无村不斗争，无人不参加"的局面。这一运动的开展，减轻了地主对农民的剥削，农民群众在斗争中提高了阶级觉悟，得到了经济利益，改善了物质生活。确立了农民基本群众在农村中的政治优势，改造了一批为地主所把持的基层政权，从根本上巩固了抗日根据地。（林健柏）

黄土岭包围战

1939年11月晋察冀军区和八路军第一二〇师互相配合在河北涞源、易县交界的黄土岭对日军的一次战斗。

1939年11月4日，驻河北涞源日军会合插箭岭日军共1500多人，由独立混成第二旅团长阿部规秀中将率领，向银坊镇方向进犯。晋察冀军区决定待敌进至对我有利地区时，集中兵力予以歼灭。随即令第二十五团一部与敌保持接触，监视日军动向；令第一、第二、第三团、游击第三支队及第二十五团一部进行战斗准备。是时，八路军第一二〇师特务团从神南镇北上，准备参加战斗。当晚，日军进至张家坟、雁宿崖、三岔口一线。5日，抵达银坊。6日，日军沿山路向司各庄、黄土岭方向进犯，同时出动飞机侦察轰炸。当晚，日军抵达黄土岭、上庄子一线。晋察冀军区利用这一带有利地形，即令第一团和第二十五团迅速占领寨坨附近阵地，截断日军去路；第三团迅速占领黄土岭至上庄子以南地区；第一二〇师特务团接替第三团进至大安，随时准备加入战斗；第二团尾随敌后，待敌占领司各庄后，绕到黄土岭北面占领有利地形；第三支队控制通往涞源的要道。7日晨，日军主力由黄土岭出发，沿山沟向东蠕动。下午3时，全部人马陆续进入狭谷小路。这时第一团、第二十五团迎头杀出，第三团和第二团从西南北三面合击过来，把日军团团围住，压缩在上庄子附近一条长约1公里、宽仅百十米的沟里，100余挺机关枪从各个山头一齐朝沟中射击，炮兵部队也连续发射炮弹。日军依仗兵力雄厚和优良火器，向寨坨阵地猛冲，遭八路军反击后，乃掉头西向，妄图从黄土岭突围逃回涞源。第三团紧紧扼守西、南两面阵地，第一二〇师特务团也赶到，从第三团的左侧加入战斗。日军伤亡惨重。激战中，第一团发现远处一独家屋附近猬集一群敌人，即令第一军分区炮兵连以迫击炮火力对其进行袭击，日军独立混成第二旅团长阿部规秀中弹毙命。8日，日军在猛烈炮火和飞机掩护下向上庄子西北突围。这时，从唐县、定县出动的援敌1200余人已逼近黄土岭以南的花塔，从涞源增援之敌已到三岔口附近，同八路军第三支队接触。各路敌人企图对晋察冀军区和第一二〇师参战部队形成内外夹攻之势。晋察冀军区决定各部队迅速转移隐蔽。当援敌赶到后，再次扑空。黄土岭战斗，歼灭日军900余人，并缴获大量军用物资。阿部规秀被击毙，使日本侵略集团大为惊恐，北平和东京的报纸都登载了这一消息，哀叹“名将之花，殒落在太行山上”。晋察冀军区为表彰击毙日军中将的炮兵部队，颁发嘉奖令称：在黄土岭战斗中，第一军分区炮兵连充分发挥了炮兵的作用，给予敌人以极大的杀伤和威胁，以准确的射击命中敌酋，使敌人失去指挥与掌握，致全线动摇而陷于极端混乱状态中，并密切配合步兵获得黄土岭的胜利。

（林健柏）

晋西事变

1939年12月，山西地方实力派阎锡山在山西西部进攻山西新军和八路军的事件，又称“十二月事变”。

1939年12月，阎锡山在国民党顽固派发动的第一次反共高潮中，集中晋绥军6个军的兵力向驻在山西西部的新军进攻。12月3日，阎军在永和附近袭击山西青年抗敌决死队第二纵队第一九六旅旅部，同时破击永和、石楼、孝义等县抗日民主政权及“牺盟会”等抗日团体，杀害洪洞、蒲县县长及位于隰县的八路军晋西独立支队后方医院的伤病员数十人。决死二纵队政治部主任韩钧于12月7日致电阎锡山，有“将在外君命有所不受”等语，拒绝了他在12月1日给该队的5日破击同蒲路霍县至灵石段的命令。阎即以此为借口，宣布决死二纵队“叛变”，按其预定计划，由第六集团军总司令陈长捷指挥对晋西的新军和八路军发动大规模进攻，制造了“晋西事变”。晋西南新军成立了“拥阎抗日讨逆总指挥部”，指挥决死二纵队各部，在八路军晋西独立支队的配合支援下，进行自卫反击作战。12月27日，决死二纵队和晋西独立支队突破阎军和日军的封锁，越过离石军渡公路，抵达晋西北临县的招贤镇地区集结休整。晋西南地区遂全部陷入阎军的控制之下。在“晋西事变”发生时，第七集团军在总司令赵承绶指挥下，也伺机对晋西北的新军和八路军发动进攻。12月16日，赵承绶在兴县召开军事会议，具体部署进攻计划。参加会议的爱国进步将领、新军暂编第一师师长续范亭在得悉阎、赵计划后借故退席，不顾个人安危，毅然奔赴中共晋西北区委所在地岚县史家庄，向共产党揭露了阎、赵的阴谋。12月23日，中共中央发布指示，指出：“阎已令赵承绶调兵进攻四纵队，武装冲突势不可免，对此冲突，应当采取下述方针：（甲）立即准备作战，继续巩固新军；（乙）武装冲突不应由新军先发动，而应在赵承绶进攻时，新军占有利阵地，取防御姿态反攻而消灭之。”又指出：“胜利的进行这一斗争，保持山西抗战根据地在我手中，

保持华北与西北的联系，这是目前中心问题。"据此，中共晋西北区委于12月31日成立了以续范亭为总指挥的"晋西北拥阎抗日讨逆军总指挥部"，统一指挥八路军新三五八旅和新军决死四纵队、暂编第一师、工人武装自卫队等部阻击阎军。中共中央军委派八路军副总参谋长滕代远到晋西北前线指挥作战。1940年初，新军和八路军开始反击，将塞上、白文镇、马坊及方山县城之阎军肃清。1月11日至13日，在临县地区击溃阎军，赵承绶率残部越过汾离公路，退向晋西南地区。2月初，贺龙、关向应率八路军第一二〇师主力由晋察冀回到晋西北。接着，八路军和新军又将岢岚、河曲、保德等地的顽军肃清。至此，反共顽固势力即被全部赶出晋西北，结束了抗战以来两种势力、两种政权并存的局面，使晋西北变成了巩固的抗日民主根据地。与此同时，阎锡山所属第八集团军孙楚部联合蒋介石嫡系部队先后对活动在晋东南地区的决死队第一纵队、第三纵队和八路军发动进攻，摧毁沁水、阳城等7个县的抗日民主政权，屠杀共产党员和进步分子500余人，捕1000余人，并策动决死队第三纵队内的反动军官胁迫3个团及直属队叛乱。八路军前总决定利用蒋、阎之间的矛盾，集中打击当时反共最力的阎军孙楚部，对蒋军各部取守势。1940年1月，八路军第三八六旅及总部特务团进入太岳区。第三四四旅、晋豫边支队等部于1月中旬在高平以西歼灭阎军一部，恢复了太南部分地区。1月底2月初，第三八五旅、第三八六旅等部又在榆次东南及榆社以北地区歼灭阎军大部。至此，蒋、阎夺取太南、太岳抗日根据地的企图即被粉碎。阎锡山发动"晋西事变"，以损人开始，以害己告终。新军除决死队第三纵队约4个团和第二纵队有小部分分离出去外，其余33个团全部脱离了阎锡山。阎锡山的军事进攻被打退后，中国共产党从抗日大局出发，主动提出停止磨擦。2月25日，中共中央派肖劲光、王若飞到宜川秋林镇同阎锡山谈判。阎在军事、政治上均受到沉重打击后，不得不同意中共关于停止武装冲突和政治攻击、划分防区、实行团结抗战的主张。4月初，双方达成协议，确定以汾阳经离石至军渡的公路为界，晋西南为阎军的活动区，晋西北为新军和八路军的活动区。　（滕文藻）

昆仑关战役

1939年12月，国民党军队在广西昆仑关歼灭日军5000余人的战役，也称桂南战役。

1939年秋，日军为封锁中国后方，威胁法国，禁止中国取道越南运送物资，同时积极准备发动桂南战役，以侵占中国通往西南大后方的沿海交通线。11月15日，日军集结10余万人，由东京湾开拔，向广东北海（今广西壮族自治区）大举进犯。日军第五师团及台湾旅团主力在海、空军掩护下，在钦州湾登陆。11月16日登陆日军占领防城，17日占领钦州。11月24日，日军第五师团第十二旅团在空军掩护下，攻占南宁。随后，日军北犯桂南要隘昆仑关。昆仑关在南宁东北50公里处，山峦起伏，地势险要。从南宁至柳州的公路从此通过，是由桂南进入桂中腹地必经之道，是南宁的重要门户。从11月29日起，日本空军出动五六十架飞机分批轮番轰炸中国守军阵地。12月4日，日军占领昆仑关，即以一个旅团的精锐部队扼守，并在该关以北的仙女山、老毛岭、四四一、六五三、六〇〇、罗塘南等高地，以及立别岭、枯桃岭等地，修筑据点式的堡垒工事，企图固守。双方处于对峙状态。12月16日，国民党军第五军军长杜聿明奉命率部担任对邕（宁）宾（阳）路的正面攻击，意在先行击破昆仑关及八塘附近之敌。其作战部署是：以郑洞国荣誉第一师正面战斗；戴安澜第二〇〇师为总预备队；邱清泉新编第二十二师迂回敌后进出南宁以北，向六塘守敌攻击，以截断南宁、昆仑关交通联络，孤立昆仑关之敌。12月18日，第五军在战车、炮火掩护下，对昆仑关日军发起攻击。郑洞国师与日军展开白刃战，首先占领仙女山。当晚，各部乘胜夜袭，相继占领老毛岭、万福村、四四一等高地，最后攻占昆仑关。19日午后，日军在飞机掩护下，进行反扑，夺取昆仑关。双方展开反复争夺。27日，是昆仑关争夺战最激烈的一天，中国空军第三大队出动6架飞机支援陆军战斗。双方伤亡甚重。杜聿明经过缜密的观测，了解昆仑关周围地形和敌阵地兵力火力，决定采取"要塞式攻击法"，逐步缩小包围圈。其部署是：令第二〇〇师副师长彭壁生率部从公路左侧越过昆仑关，形成包围之势；邱清泉师把战车埋伏在公路两旁的丛林地带；郑洞国师则加强右翼攻势，进入昆仑关内敌军纵深阵地，将敌指挥部及炮兵阵地摧毁，并乘胜攻击，大败敌军。经过18天的激战，至31日日军被迫向九塘方面退却。昆仑关战役胜利结束。据日本战后公布的材料说，此役日军第十二旅团班长及军官死亡达85%以上，士兵死亡4000余人。旅团长中村正雄在昆仑关南5公里的九塘被郑洞国师第三团击毙。中村正雄临死前在日记本上写道：帝国皇军第五师团第十二旅团，之所以在日俄战争中获得了"钢军"的称号，那是因为我的顽强战

胜了俄国人的顽强。但是，在昆仑关，我应该承认，我遇到了一支比俄国更强的军队。昆仑关战役是国民党正面战场自武汉失守以来取得的一次重大胜利。

（林健柏）

国民党发动第一次反共高潮

1939年冬至1940年春，国民党军队向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武装发动进攻，掀起了第一次反共高潮。

1939年5月，国民党军在陕甘宁边区周围部署兵力，进攻解放区。6月20日，蒋介石密令西安程潜、蒋鼎文等着暂编骑二师调驻陕北，归阎锡山指挥，巩固河防。该师调陕北后，在边区周围构筑工事，建立封锁线，企图隔绝边区与外界的联系。12月，国民党当局密令包围边区的胡宗南部队，纠集地方反共势力进攻陇东地区和边区南部关中地区，袭击八路军驻防的宁县、镇原、旬邑、淳化、正宁等5个县城。他们还进犯边区东部绥德警备区，煽动反动分子叛乱，迫害共产党的军政干部和人民群众。中国共产党从抗战大局出发，派谢觉哉为代表同国民党当局谈判，力求避免冲突。八路军总部和留守兵团先后致电蒋介石和通电全国，呼吁停止进攻边区，要求撤退包围边区的国民党军队。谈判未获结果。八路军被迫进行自卫还击。王震率第三五九旅由晋西北返回陕北，协同留守兵团打退了国民党军的进攻，并乘胜收复绥德，赶跑国民党绥德专员兼县长何绍南，使陕甘宁边区获得统一和安定。

1939年12月，阎锡山在山西发动了“晋西事变”，进攻山西青年抗敌决死队第二纵队和晋西独立支队，并以一部兵力配合蒋介石的军队，向晋东南的山西青年抗敌决死队第一、第三纵队进攻。新军在八路军和人民群众支援下，粉碎了阎锡山军队的围攻，胜利地转移到晋东南和晋西北根据地。

1939年12月初，国民党第九十七军朱怀冰部进入冀西，逼近八路军阵地，破坏抗日政权。八路军副总司令彭德怀、第一二九师师长刘伯承先后到冀西，同国民党冀察战区总司令鹿钟麟和朱怀冰等人会谈，劝告他们以大局为重，一致对敌。朱怀冰置若罔闻，指使侯如庸部和乔明礼部向平汉路以西的游击纵队进攻。1940年1月，国民党第六十九军石友三部1.7万余人，在冀南、冀鲁豫地区向平汉路附近的八路军进攻。第一二九师在两地展开反击，歼灭和击溃其大部，取得反顽战役的胜利。1940年2月，朱、石等部再次向太行、冀南的八路军进攻。八路军在取得驱逐石友三部的卫（河）东战役胜利后，于3月间由刘伯承、邓小平指挥第一二九师和晋察冀军区兵力各一部，进行磁（县）武（安）涉（县）林（县）战役，歼灭朱怀冰部万余人，收复一部分地区。取得上述胜利后，八路军主动停战，并与第一战区司令长官卫立煌谈判，商定以临屯公路和长治、平顺、磁县为界，以南为国民党军防区，以北为八路军防区。至此，国民党发动的第一次反共高潮被粉碎。（林健柏）

“三三制”政策的实行

中国共产党从1940年开始实行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政权政策。

国民党第一次反共高潮被打破后，中国共产党内出现了忽视争取中间势力的倾向，不利于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巩固和发展。针对这种情况，1940年3月6日，中共中央发出《抗日根据地的政权问题》的党内指示，指出：在抗日时期，我们所建立的政权的性质，是民族统一战线的；这种政权，是一切赞成抗日又赞成民主的人们的政权，是几个革命阶级联合起来对于汉奸和反动派的民主专政。指示规定在抗日民主政权中的人员分配，共产党员大体占三分之一，非党的左派进步分子大体占三分之一，中间分子和其他分子大体占三分之一。强调必须保证共产党员在政权中的领导地位。还规定凡年满18岁的赞成抗日和民主的中国人，不分阶级、民族、性别、信仰、党派、文化程度，都有选举权和被选举权。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权的产生，应经过人民选举。其组织形式，应是民主集中制。1940年秋冬“三三制”政策首先在晋察冀边区的普选中开始贯彻执行。1941年2月，陕甘宁边区各级政府进行改选，在民意机关参议会，区、县、乡三级政府机关和司法机关的人员构成上，都忠实地执行了“三三制”政策，并逐步做到了党外人士有职有权，实现了党内外民主合作。1941年，经过民主选举建立的晋冀鲁豫边区临时参议会和边区政府，共产党员占三分之一稍强，专署和县政府也都基本上实现了“三三制”；区、村政权则是在1942年深入贯彻执行减租减息政策的基础上，经过改选，打下了“三三制”的基础。山东、晋绥、华中各抗日根据地也相继贯彻执行了这一政策，吸收各抗日阶层的代表人物参加各级政权的工作。“三三制”政策的贯彻执行，加强了抗日根据地的政权建设，保证了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地位，扩大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增强了各阶层人民的团结，加强了对汉奸和反动派的革命专政，对巩固和发展抗日根据地，坚持抗战，起

了积极作用。 （滕文藻）

成都抢米事件

1940年3月14日，国民党特务在成都制造诬陷共产党，破坏团结抗战的事件。

1940年3月14日晚8时许，国民党特务头子康泽指使二三百人化装成贫民，闯进有地方实力派潘文华大量资本的重庆银行，抢劫了银行的一个粮库，米流遍地。附近居民提着各种家什蜂拥前来拾米。国民党特务机关诬陷共产党策划饥民抢米，妄图暴动，从而胁迫地方军阀实行白色恐怖政策，大肆逮捕共产党人和进步人士。国民党顽固分子趁机查封《新华日报》成都营业分销处，逮捕分销处负责人、中共川康特委书记罗世文。接着，又逮捕了共产党员、中苏文化协会副会长车耀先、《时事新刊》编辑朱亚凡及洪希宗等文化界人士10余人。第二天，特务又逮捕了郭秉彝（中共地下党员，是刘湘的高级参谋）和汪导予（后来是潘文华的顾问）。接着，青年记者协会成都分会、东北救亡总会成都分会等进步社团被迫解散或停止活动。各校学生的校外活动被严令取缔，集会结社也被通令限制。之后，这股反共逆流波及到省内一些城市。阆中、南充、广元、万县、自贡、康定、乐山、重庆等地均有共产党员陆续被捕。罗世文等人被捕后，中共川康特委机关迅速转移，特委成员暂时下乡隐蔽，并派杨天华去重庆向中共中央南方局报告。1940年3月31日，中共中央书记处在关于成都事件对南方局工作的指示中指出：一、3月14日成都事件，明显系反共分子准备投降分裂的有计划的阴谋之一部分，应该引起整个南方党组织的严重警惕。二、除成都市委发表宣言外，必须动员广大社会舆论及四川地方有关方面，广泛揭露反共投降分子之阴谋。三、必须立即将成都、重庆及其他地方之已暴露或可能已被反共分子注意之党的干部和党员调动和隐蔽，以避免破获。四、立即严令成都、重庆等地各级党组织，将一切秘密文件焚毁，成都方面与罗世文直接联系之特委同志及其他同志，必须暂时隐蔽至安全区域，并尽量减少活动。按中共中央的指示，叶剑英以中共代表身分向国民党联络代表张冲提出交涉，要求查明事件真相，严惩肇事者，释放罗世文、车耀先等被捕人员。《新华日报》社长潘梓年致函国民党中央宣传部部长王世杰，抗议非法查封成都分馆，要求释放被捕人员，并奉命前往成都同有关当局交涉，向各界揭露抢米事件真相。南方局以中共成都市委的名义发表《为成都抢米事件真相告成都市同胞及全四川同胞书》，中共中央机关报《新中华报》全文转载，揭露了抢米事件的全部经过，指出：“此系奸人、匪徒有计划制造的阴谋暴行，其目的在破坏团结抗战，为压迫共产党和抗日救亡进步分子，为准备投降分裂制造口实。”经过反复斗争，国民党当局被迫同意《新华日报》成都营业分销处恢复营业，却拒绝释放被逮捕的同志。不久，朱亚凡、洪希宗被无辜枪杀。罗世文、车耀先先被秘密关押在重庆中美特种技术合作所，至1946年8月惨遭杀害。

（林健柏）

汪伪政权成立

1940年3月30日，日本帝国主义在南京扶植建立的以汪精卫为头子的傀儡政权。

汪精卫是国民党中亲日派的首领。抗日战争爆发后，任国民党国防最高会议副主席，主张对日妥协，宣扬“战必败，和未必大乱”的失败主义论调。1938年3月任国民党副总裁、中央政治委员会主席、国民参政会议长。12月19日，他由重庆、经昆明逃往越南河内。随同前往的有他的妻子、国民党中央监察委员陈璧君，国民党中委、代理中央宣传部长周佛海和陶希圣、曾仲鸣等。随后，国民党中委、四川省党部主任委员陈公博也由成都逃往河内。12月29日，汪精卫发表“艳电”，响应日本近卫声明，接受其“善邻友好”、“共同防共”、“经济合作”的所谓和平条件，公开叛变投敌。1939年5月，在日本特务的严密保护下，汪精卫等由河内经海防抵上海，后转往东京，乞求日本支持组织伪中央傀儡政权。日本内阁为此决定《建立新中央政府的方针》，提出在维持日军占领的情况下，由汪精卫按“分治合作”的原则，联合各伪政权组织“中央政府”。汪精卫回到上海后，于8月28日秘密召开伪国民党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成立以汪精卫为主席的伪国民党中央党部，并相继改组地方党部。会议承认近卫声明的3原则，声称今后“当易抗战建国为和平建国”，“以反共为和平建国之必要工作”。9月，欧洲战争爆发。日本为了巩固其在中国占领区的统治，决定设立中国派遣军总司令部，以统一调配兵力；同时，加速建立伪中央政权的活动。9月中旬，汪精卫在南京和王克敏、梁鸿志就召开伪中央政治会议、建立伪中央政府问题进行会谈。从11月1日起，汪精卫派周佛海等与日本影佐祯昭、须贺彦次郎、犬养健以及梅机关的其他成员在上海进行为时两个月的谈判。12月28日，日本外务大臣、陆军大臣、海军大臣签署《对外政策的方针纲

要》，规定对中国的政策是以建立中国新中央政府的工作为中心。12月30日，汪精卫与梅机关秘密签订《日支新关系调整要纲》及《秘密谅解事项》。主要内容有：汪伪政权承认"满洲国"；确定日本在蒙疆（指长城线以北地区，包括长城线在内）、华北、长江下游和华南沿海特定岛屿的不同的政治、军事、经济特权；自中央到地方的伪政府，都由日本顾问或职员监督；伪军和伪警察，由日籍教官训练，武器也由日本供给；伪政府财政经济政策，工业、农业和交通事业，都由日本控制；一切资源，任由日本开发利用；汪日共同防共等等。1940年1月初，梅机关为调整将要建立的伪中央政府与原"维新政府"、"临时政府"等傀儡政权的关系，拟定了《中央政治会议组织纲要》、《华北政务委员会组织条例》、《关于建立中央政府大纲》和《国民政府大纲》的决定草案。1月6日，日本内阁对华决策机构兴亚院（成立于1938年12月16日）通过《中央政府成立纲要案》，决定大力支持汪精卫的"和平运动"，以期早日建立伪中央政权。在梅机关的安排下，从1月23日到26日，汪精卫及其代表在青岛先后与伪"蒙古联合自治政府"代表李守信、伪"中华民国临时政府"王克敏和伪"中华民国维新政府"梁鸿志就这几个伪政权与即将成立的伪中央政府的关系、伪中央政治会议的人员分配等问题进行会谈，并达成协议。3月20日，伪中央政治会议在南京举行，确定伪中央政府名为"国民政府"，"首都"设于南京，"国旗"为青天白日旗，但另附加标志，在旗子左上角有一黄色三角形符号（1943年2月5日，伪国民政府训令去掉）；通过《国民政府政纲》、《中央政治委员会组织条例》，废止"临时政府"及"维新政府"名称，设置华北政务委员会，成立中央政治委员会等伪组织机构；决定伪国民政府代主席、伪行政院院长汪精卫，伪立法院院长陈公博，伪司法院院长温宗尧，伪监察院院长梁鸿志，伪考试院院长王揖唐，伪军事委员会委员长汪精卫，伪华北政务委员会委员长王克敏等人事安排。3月30日，伪国民政府成立。汪精卫及各院、部、会的主要人员陈公博、周佛海等宣誓就任伪职。伪"临时政府"及"维新政府"宣布解散。"维新政府"由伪国民政府直接接收，"临时政府"由华北政务委员会接续。这样华北伪政权名义上隶属于伪国民政府，但实际上仍直接受控于华北日军及其特务机关，伪国民政府无权任命该委员会的成员，无权否定它的任何决议，而且它有自己独立的财政，它的中国联合准备银行继续进行金融活动，包括发行钞票；它有自己的军队——治安军；它的旗帜也仍然是红黄蓝白黑的五色旗。伪国民政府成立后，日本特务机构梅机关由上海迁到南京，改称国民政府最高军事顾问部，影佐祯昭为第一任最高军事顾问，掌握汪伪政权一切措施的实施。4月26日，伪国民政府在南京举行"还都"典礼。汪精卫讲话称：要克日把邦交调整起来，与日本共同建设东亚，并表示要担负起"和平反共建国"的责任。11月28日，伪中央政治会议推举汪精卫为伪国民政府主席，去掉"代理"二字。11月30日，汪精卫即和日本驻"华"特命全权大使阿部信行、伪"满洲国"总理臧式毅在南京分别签署了《中日基本关系条约》和《日满华共同宣言》。条约包括正文、附属议定书、附属议定书谅解事项以及附属秘密协约、附属秘密协定共5件，进一步肯定了1939年12月30日签订的日汪密约的内容并有所发展。通过这个条约和宣言，日本政府公开承认南京汪伪政权，汪伪政权公开承认伪"满洲国"。重庆国民政府外交部长王宠惠为此发表声明，指出："伪组织为非法机关，其所订条约也属非法，……倘有任何国家承认伪组织者，我政府与人民，当认为最不友谊行为，不得不与该国断绝正常关系。"汪精卫的伪国民政府成立后，日本通过它破坏中国的抗战，残酷镇压和搜刮沦陷区的人民，日军和伪军互相配合进攻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敌后抗日根据地。1944年11月10日，伪国民政府主席汪精卫病死于日本名古屋。11月20日，陈公博继任伪行政院院长、伪军事委员会委员长、代理伪国民政府主席。1945年8月，随着日本帝国主义的无条件投降，南京的汪伪政权即被铲除。（滕文藻）

在华日本人反战同盟成立

1940年3月，在华日本反战人士和部分被俘日本士兵组织的反战进步团体。

1940年3月，日本进步作家鹿地亘在重庆发起成立"在华日本人反战同盟会"（简称"反战同盟"）。之后，在延安及晋察冀、晋东南、晋西北、冀中、山东、苏北、鄂豫皖等边区建立了反战同盟支部。为了统一反战团体的活动，1942年8月15日，在延安召开了华北日俘士兵代表大会和华北日人反战团体大会。大会通过了《在华日本人反战同盟华北联合会章程》，制定了《在华日本人反战同盟华北联合会纲领》，提出反对战争，促进日本士兵政治觉悟，打倒军部政府，加强东方各国人民团结，援助华北中国军之抗日战争等。反战同盟成为一个统一的组织，并由华北扩大到华中各根据地。反战同盟最基本的活动是

开展反战宣传，把日本侵华战争的本质告诉日本军队，指出日本人民是受军阀、财阀的欺骗被迫参战的。日中两国人民必须携起手来，尽快制止战争，鼓动日本士兵到八路军中来，保证其安全。仅1943年1年，反战同盟在华北、华中散发的反战传单就达103万份。反战同盟晋察冀、太行、延安等支部把《前进月刊》、《战友五日报》、《反战》(后易名《同盟新闻》)、《士兵之友》、《士兵的呼声》等10几种报刊寄送到日军中去，对于动摇日军军心、教育日俘起了相当的作用。从1941年起反战同盟太行支部在每年新年及盂兰节(日本民族祭祀祖先的节日，在7月中)都给日军士兵送慰问袋。袋里装着酒、水果、毛巾、手帕及反战思乡歌本、纸牌等。慰问袋给日军士兵一种亲切感，容易引起他们的思乡厌战之情。反战同盟延安支部还从1941年11月开始了专以日军士兵为对象的无线电广播，每周两次，解说时事战况，介绍八路军中的日军士兵生活和边区情形等。据反战同盟统计，如果把全体日俘定为100，其中自动投降八路军和从日军中逃亡者，1940年只有7%，1942年增至18%，1943年竟达48%。日军深以此为虑，惊呼要在军中进行"思想防御战"，防止"思想左化"。1944年1月15日至2月16日，反战同盟华北联合会于延安召开执委扩大会议，决定将华北日本人反战同盟改组为"日本人民解放联盟"。4月9日，解放联盟正式成立，其任务是"争取立即结束战争，打倒军部，建设民主日本，建立人民政府"。形势的发展，大大地加速了日本人反战组织的发展。据1944年4月统计，同盟在延安及华北已有晋西北、晋察冀、冀中、冀南、冀鲁豫、太行、太岳、滨海、鲁中、鲁南、清河、胶东等13个支部，成员达223人。在华中有苏中、苏北、淮北、淮南4个支部，并建立了华中地方协议会，5月在华北又成立了冀东支部。"日本人民解放联盟"到1945年8月日本无条件投降时，在华北和华中有21个支部，而且已经发展到华南。许多联盟成员在抗日最前线同八路军和新四军的指战员们一起战斗，瓦解日本军队取得了相当大的成就。

(林健柏)

枣宜战役

1940年5月初，国民党军队在湖北枣阳、宜昌地区抵抗日军进攻的战役。

1940年5月初，日军调集赣北的第四十师团和湘北的第六师团一部，与原湖北境内的第三、第十三、第三十九等师团会合，在第十一军司令官园部和一郎的指挥下，分3路向湖北枣阳、襄阳、宜昌等地进犯。日军左路由河南信阳、明港攻桐柏山、唐河；中路由随县沿襄化公路南下襄阳；右路由钟祥进取枣阳。日军企图以中路吸引国民党第五战区主力部队，左、右两翼构成包围态势，将中国军队围歼于枣阳附近。其时，国民党第五战区有6个集团军，共21个军、56个师。郭忏之江防军在荆门、沙市、宜昌一带布防；张自忠第三十三集团军在襄河以西布防；孙震第二十二集团军之第四十五军在洛阳店、随县以西布防，黄琪翔第十一集团军之第八十四军在随县以北、高城以南地区布防。豫南方面，孙连仲第二集团军之第三十军在桐柏以东，第六十八军在平昌关以北和明港一带布防；王瓒绪第二十九集团军控制大洪山地区，第六十七军在东桥镇、三阳店以北布防，第四十一军控制襄阳附近，为战区的预备队，汤恩伯第三十一集团军置于确山、叶县一带，为机动兵团，相机打击进犯之敌。

1940年5月1日，日军第十三师团配战车20余辆、飞机40余架，由钟祥北进，向中国第三十三集团军阵地攻击。守军利用地形与敌激战。至8日，日军先后攻占长寿店、田家集、丰乐、张家集、新野。此时，第二十九集团军向敌之侧背猛击，第四十一军也堵击日军北进。在信阳方面，日军第三师团、第四十师之一部击退刘汝明第六十八军及池峰城第三十军各一部，攻陷明港、狮子桥及小林店，至7日，又攻陷桐柏、唐河县城，并向枣阳进发。第三十一、第二集团军和李仙洲的第九十二军分路向日军侧击、尾追，8日收复唐河，9日收复新野。在随县方面，敌第三十九、第六师团之一旅待两翼包围完成，于5月4日开始向第十一集团军阵地攻击，先后陷高城、安居。第十一集团军主力转移至枣阳附近。这时，唐县正面之敌大举进攻，并以战车由两翼包围。此时枣襄公路被切断，中国军队从枣阳突出包围圈，留一七三师师长钟毅持久抗敌，掩护主力向唐白河西岸转进。至8日，日军攻占随阳店、吴家店，并冲入枣阳，与第一七三师激战。该师寡不敌众，且战且退，节节抵抗。师长钟毅以下大部分在新野县境壮烈殉国，而主力部队却安全撤出日军大包围圈转入外线。5月10日，各路日军会师唐白河畔。此时外翼部队反将日军左右两翼压迫于中央地区，将敌大部反包围于襄东平原地区。第五战区也转入攻势，令第二、第三十一集团军与第九十二师由北向南，第三十三、第二十九集团军由南向北，第三十九、第七十五军由西向东进攻，并以第九十四军进出汉宜路，深入京山、皂市、应城、

云梦攻击敌后方联络线，同时鄂东游击部队第七军占领平汉路上的鸡公山、李家寨与柳林车站各据点。至5月16日，第三十一集团军克服枣阳。此役毙伤敌2.5万人以上，缴获炮60余门，马2000余匹，战车70余辆，汽车400余辆，及其他战利品不计其数。其时，第三十三集团军总司令张自忠，为歼灭退却之敌，亲率总司令部特务营与七十四师主力，赶至南瓜店堵截，适敌大股转回，反攻枣阳并反击张自忠截击部队，张军因兵力薄弱，直到所部伤亡殆尽，张亦重伤阵亡。17日，日军再占枣阳。第五战区部队撤向唐白河西岸，于新野、唐河地区集结。日军重占枣阳后，于襄河东岸集中，拟进攻宜昌。此时由东北抽调第四师团接替襄河以东的防务，以第三、第三十九师团由襄阳、宜城分别渡河，6月上旬陷襄阳，继占南漳。日军第六、十三师团则在汉宜路由汨口、沙岸分渡襄河，与南下之敌会合，向中国军队进攻，连陷荆门、江陵，进迫宜昌。国民党军节节西退，溃不成军，14日放弃宜昌，改取外线态势，于宜昌、当阳、随县、枣阳以北地区布防，监视敌人。这次会战，日军虽占有宜昌，然而始终没有捕捉到中国军队的主力，也未能解除襄樊和大洪山地区对武汉的威胁。是役历时近两月，大小战斗500余次。中国军队在会战中达到了牵制和消耗敌人的目的。　（林健柏）

百团大战

1940年8月20日至12月5日，八路军在华北敌后发动对日军的大规模的进攻作战。

1940年夏，日本利用德国在欧洲推进，英、美无暇东顾的机会，加紧对国民党施行军事压力和政治诱降，于5月间发动枣(阳)宜(昌)战役，连续轰炸重庆，声称要进攻西安、重庆、昆明，迫使英、法封锁滇越路和滇缅路；还通过各种渠道和国民党蒋介石集团的代表进行接触，商谈“和平”条件。同时，加强对华北敌后抗日根据地的“肃正”讨伐，推行“囚笼政策”，使敌后抗日根据地受到严重威胁。这时国民党政府更加动摇。3月和6月，蒋介石的代表先后去香港、澳门与日本代表会谈；由于日本要求条件苛刻，未达成协议。为了打破日伪军对敌后抗日根据地的封锁和“扫荡”，争取华北乃至全国战局的好转，克服国民党的投降危险，八路军前方指挥部(简称“前指”)在华北敌后(除山东外)发动了大规模的破击作战。7月22日，八路军前指发出战役预备命令，同时上报中共中央军委。命令规定：“战役目的以彻底破坏正太线若干要隘，消灭部分敌人，收复若干重要名胜关隘要点，较长期截断该线交通，并乘胜扩张战果，扫除该线南北地区若干据点，开展该路沿线两侧工作，以至完全截断该线交通为目的。”8月8日，前指下达战役行动命令：晋察冀军区主力10个团破击正太线平定至石家庄段，重点在娘子关至平定段；第一二九师以主力8个团附总部炮兵团一个营，破击正太线平定至榆次段，重点为阳泉至张净镇段；第一二〇师以4至6个团破击同蒲路平遥以北及汾(阳)离(石)公路，以重兵置于阳曲南北阻敌向正太线增援。还要求各部派出兵力对本区范围内敌占铁路和重要公路封锁线进行袭击以配合作战。这次战役从1940年8月20日开始，到12月5日结束。随着战斗的展开，陆续参战部队增加到105个团，约20万人，故称为“百团大战”。它是战局发展的结果，并不是战前就有这样规模的整体计划。百团大战分为3个阶段。

第一阶段，自8月20日起至9月10日止。主要是交通总破袭战，破坏敌人的交通线，重点摧毁正太铁路。8月20日夜，在八路军前方指挥部的统一指挥下，各参战部队按计划对华北各线敌伪军据点同时发起进攻。晋察冀军区主力部队攻入要隘娘子关和井陉新矿等据点。第一二九师主力攻克了芦家庄、上湖、张净镇等车站和据点。第一二〇师由于行动上的困难，经前指批准，没有破袭同蒲路南段，而以主力破击忻(县)静(乐)和汾(阳)离(石)两条公路及同蒲路北段之朔县及宁武段，攻占了康家会及阳方口等据点和车站。同时，各军区和军分区部队和民兵还对平汉路、德石路、津浦路、平绥路、北宁路、白晋路及本区内的重要公路交通线展开了破击战，歼灭一大批日伪军。经过大规模的破袭，正太路的许多地段受到严重破坏而陷于瘫痪，井陉煤矿停产达半年之久；平汉、同蒲等铁路也一度中断。日军遭到严重打击后，急忙由石家庄、太谷、榆次、和顺、辽县、榆社等地增援正太路，同时以部分兵力向晋察冀根据地等进犯。8月31日，前指提出彻底摧毁正太路和同蒲路忻县至朔县段，以便使晋东南、晋察冀、晋西北等根据地连成一片的要求，由于不切合实际，未能实现。9月初，八路军撤离正太路，并以伏击、袭击等方式打击增援日军。晋察冀军区部队在盂县以北歼灭由上社南进之敌。第一二九师在榆社西北之双峰歼灭敌人一部。9月10日，部分作战部队转入休整，准备执行第二阶段作战任务。

第二阶段，自9月22日起至10月上旬止，继续破击交通线，重点是摧毁深入根据地内的日伪据点。

前指规定：晋察冀军区主力破坏涞源、灵丘公路并夺取这两座县城；第一二九师以收复榆社、辽县为目的，开展榆辽地区战斗；第一二〇师以截断同蒲路北段交通为目的，集主力彻底摧毁宁武轩岗段；其他各部队配合主力作战，攻击其余各大小交通线。9月22日，晋察冀军区发起涞源、灵丘战斗。首先攻占涞源县城外围的三甲村、东团堡等据点。由于张家口等日军增援部队大批到达，晋察冀军区遂放弃攻城计划。10月2日，晋察冀军区又组织兵力，向灵丘、浑源、广灵地区出击，先后攻占南坡头、抢风岭等据点。由于大同日军增援部队赶到，晋察冀军区主力部队于10月10日结束战斗。第一二九师主力于9月23日发动榆社辽县一线的进攻，攻克榆社县城和据点多处，由于和顺、武乡之援敌到达，遂停止对辽县的进攻，并从榆社撤退。第一二〇师主力在同蒲路北段忻县、宁武、朔县间展开破击战，曾一度控制朔县、原平间数段铁路，因日军大量增援，并估计到敌可能对根据地进行"扫荡"，遂结束破击战。与此同时，冀中、冀南、太行、太岳军区也对沧石、德石、平汉、白晋等交通线进行了破袭，冀中军区还在任丘、河间、大城、肃宁地区对日伪军发动攻势，攻克据点20余处。这个阶段作战，八路军虽然取得许多战果，但由于以主力攻打深入根据地内、设防比较坚固的敌人据点，结果造成敌人力量内调，打了一些得不偿失的攻坚战，伤亡较大。

第三阶段，自10月6日起至12月5日止。日军调集大批兵力对根据地进行大规模的报复性"扫荡"，八路军和游击队展开了英勇的反"扫荡"作战。10月6日，日伪军首先对前指和第一二九师师部所在地的太行根据地进行"扫荡"。武安敌军800余人进犯阳邑，辽县、武乡、潞城等地敌军3000余人进犯榆社、辽县、武乡之间浊漳河两岸地区。第一二九师部队先后在弓家沟伏击重创日军，敌被迫于17日分头撤退。从10月20日开始日伪军近万人对根据地进行第二次"扫荡"，重点攻击中共北方局、八路军指挥部、边区党政机关所在地的麻田、左会及清漳河东西地区。第一二九师主力包围进犯左会之敌的一个大队，经过激战，虽歼灭大部敌人，自己也付出了很大代价，敌援军赶到，遂撤出战斗。从11月1日起，敌7000余人又对榆社、辽县地区进行第三次"扫荡"。第一二九师以一部作掩护，主力适时转移，敌扑空后分路退回。11月17日敌7000余人"扫荡"太岳区，企图合击沁源。第一二九师主力跳出合围，转移至沁河两岸；12月上旬敌伪军分路退回。晋东南根据地历时40天的反"扫荡"作战即告结束。在晋察冀，日伪军从11月9日开始对北岳区"扫荡"，集结兵力达1.2万余人，先由北向南，再由东向西，分路平行推进，21日侵占阜平、王快等地。晋察冀军区主力部队和游击队在各地寻找战机，不断打击敌人，迫使日伪军于25日前后撤退。1941年1月1日，晋察冀军区部队收复阜平，4日收复王快，反"扫荡"作战结束。在晋西北，1940年10月下旬至11月上旬，根据地军民粉碎了日伪军4000余人的"扫荡"。

百团大战历时3个半月，进行大小战斗1824次，毙伤日伪军2.57万余人，俘虏日伪军1600余人，伪军反正1800余人，缴获各种炮53门，各种枪5800余支及大量弹药和物资，破坏铁路470余公里、公路1500余公里和车站、桥梁213座，隧洞260多处，摧毁敌人碉堡和据点293个。八路军伤亡1.7万余人，尤其在第二阶段的几次攻坚战损失较大。这次战役给敌伪以很大打击，振奋了全国人民争取抗战胜利的信心，锻炼了人民军队，提高了中国共产党和八路军在人民中的威望，对坚持抗战、遏制妥协投降的暗流、争取时局好转起了积极作用。百团大战后，日本帝国主义惊呼"对华北应有再认识"，并由华中增调兵力来华北，对华北敌后抗日根据地实行"更大规模的报复作战"。 （滕文藻）

黄桥战役

1940年10月初，新四军在江苏省泰兴县黄桥地区粉碎国民党军韩德勤部进攻的自卫反击战。

为了开辟苏北敌后抗日根据地，1940年7月，陈毅等率新四军江南指挥部主力部队渡江北上，与先期到达江北的挺进纵队、苏皖支队在扬州以东的大桥镇、郭村会合。随后，江南指挥部改称江北指挥部，陈毅、粟裕分任正副指挥，将部队统一整编为3个纵队，共9个团，7000人。7月下旬，新四军挥戈东进，开辟以泰兴县黄桥为中心的抗日根据地。与此同时，黄克诚奉中共中央之命，率八路军第二纵队主力由冀鲁豫南下，于6月底到达豫皖苏交界的永城，与新四军第六支队会合，并合编为八路军第四、第五纵队，由彭雪枫、黄克诚分任司令员。第四纵队留豫皖苏地区执行向西防御任务；黄克诚率第五纵队执行东进任务，于8、9月间占领了沭阳、泗阳、宿迁、淮阴、涟水、东海地区。此时，苏北形势错综复杂。日军为兵力所限，只在沿江占领几个重要县城，无力顾及广大农村。这时国民党江苏省政府主席、苏鲁战区副总司令韩德勤，盘踞在苏北、皖北及鲁南的小块地

区,自诩拥兵10万,但不与敌作战,却暗中与日伪勾结,企图在新四军苏北指挥部立足未稳之机将其消灭。陈毅等一再呼吁团结抗日,并作了有原则的让步后,韩仍一意孤行。10月1日,韩德勤集中其大部兵力由海安、曲塘、泰州等地分3路向黄桥地区的新四军进犯。陈毅、粟裕等正确执行中共统一战线方针,坚持自卫原则,首先争取苏北开明士绅韩国钧等的同情和苏鲁皖边游击军李明扬及税警总团陈泰运的中立,集中力量打击韩的主力。10月4日,韩的第八十九军、独立第六旅等部1.5万余人进攻黄桥。陈毅采取诱其深入,断其后路,在运动中各个歼灭的方针,在广大群众的积极支援下,奋起反击。经3天激战,先全歼韩的独立第六旅,旅长翁达负伤自杀。继将其第三十三师歼灭。最后又把第八十九军军部及第三四九旅消灭,其军长李守维在溃逃时落水身亡。黄桥战役共歼灭韩部顽军1.1万余人。新四军江北指挥部乘胜攻占海安、东台等地,韩德勤率残部1000余人向兴化逃窜。与此同时,黄克诚率八路军第五纵队主力由涟水以北南渡盐河,突破顽军保安第二、第八旅阵地,进占阜宁、东沟、益林,歼灭顽军保安第十旅后,直下盐城。10月10日,新四军陈毅、粟裕所部与南下的八路军第五纵队主力在东台县白驹镇会师。至此,八路军、新四军协同发展,开辟苏北敌后抗日根据地的战略任务基本实现。(滕文藻)

皖南事变

1941年1月,国民党军在安徽省泾县茂林地区制造的袭击新四军的反共事件。

国民党顽固派在第一次反共高潮被打退后,把反共武装磨擦的重点由华北逐渐转向华中。1940年3月22日,国民党政府军事委员会军令部制定《剿办淮河流域及陇海路东段以南附近地区非法活动之异党指导方案》,要求"将该地区内非法活动之异党,压迫于大江以南或相机剿灭之。务须截断新四军与十八集团军南北联系"。这个方案经何应钦、蒋介石审阅批准。3月25日,蒋介石密电第三战区司令长官顾祝同,要他严令新四军"将江北部队全数移至江南服行作战任务,不得故意延宕。否则,以违抗命令破坏抗战论处"。接着,又向第五战区副司令长官李品仙及韩德勤、李仙洲等下达了同样的密令。随后,顾祝同、李品仙等作出"围剿"江南新四军和进攻江北新四军的部署。蒋介石迫令新四军江北部队南移,遭到新四军的拒绝,陈毅等已率部渡江北移;他进攻江北新四军又连遭失败;黄克诚率八路军第二纵队主力由冀鲁豫南下,与新四军第六支队会合于豫皖苏地区,使蒋介石切断八路军与新四军联系而各个击破的图谋也化为泡影。因此,他不得不改变计划。1940年6月,中共中央派周恩来、叶剑英为代表在重庆同国民党代表何应钦、白崇禧就中共合法地位,陕甘宁边区的承认,八路军、新四军扩编及作战地区划分等问题举行谈判。7月16日,国民党提出所谓"中央提示案",要求取消陕甘宁边区,代以"陕北行政区公署",归陕西省政府指导;缩编八路军、新四军,并限制其防地;将活动在江南和整个华中的八路军、新四军集中到黄河以北冀察两省的狭小地区。共产党拒绝了这个无理的"提示案"。8月,蒋介石密令顾祝同进一步部署防范和制裁新四军皖南部队。8月25日,顾祝同在安徽徽州(歙县)召集苏南、皖南各军政要员面授机宜。他把上官云相的第三十二集团军从江西临川(抚州)调到皖南徽州,以后又将该集团军总部移至靠近新四军军部的宁国县万福村,并令新四军改归第三十二集团军指挥。9月11日,顾祝同致电蒋介石,请示对新四军"可否立予紧急处置"。正在这时,国际形势发生了重大变化。9月27日,德、意、日签订了军事同盟协定。日本想利用欧洲战争时机,通过对国民党的诱降早日解决中国问题,以便腾出手来扩大侵略。美、英与苏联则想利用中国抗战拖住日本,使其不能南进或北进,因而在尽力拉拢国民党。英国决定10月18日开放滇缅公路。美国给国民党政府贷款。苏联也大量增加援助,并派崔可夫任蒋介石的军事总顾问。在这种形势下,蒋介石认为大规模反共时机已到。10月19日,蒋介石以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参谋总长何应钦、副参谋总长白崇禧的名义致电八路军总司令朱德、副总司令彭德怀和新四军军长叶挺(即"皓电"),将国民党的"中央提示案"以最后决定的形式通知共产党,强迫命令黄河以南的八路军、新四军在一个月内全部撤到黄河以北,并要求把50万军队缩编为10万人。11月9日,朱德、彭德怀、叶挺、项英电复何应钦、白崇禧(即"佳电"),据实驳斥了国民党顽固派的攻击,揭露其反共投降的阴谋;同时,为了顾全大局,坚持团结抗战,同意将江南新四军部队移至长江以北,"江北部队则暂时拟请免调"。10月8日,何应钦、白崇禧再电朱、彭、叶、项(即"齐电"),宣称"调防"是"军令",必须执行,要求八路军、新四军迅即"遵令",将黄河以南部队全部调赴黄河以北。9日,蒋介石发布命令,限长江以南的新四军在12月31日前开到长江以北地区,黄河以南的八路军、新四军于翌年1月31日以

前开到黄河以北地区。顾祝同在接到"皓电"的第二天,就着手"围歼"皖南新四军的各项准备:规定堵击新四军由第三十二集团军总司令统一指挥;从10月至12月抓紧调兵遣将,先后将原安徽宣城以北敬亭山守备的第一〇八师,在浙江诸暨附近的第七十九师、建德附近的第六十二师,调到皖南新四军驻地附近地区,加上原有的第五十二师、第一四四师、第一四六师、新七师,使皖南新四军周围的国民党军队增加到7个师以上;命参谋处制定"围歼"新四军的计划。11月14日,国民党政府军事委员会军令部按照蒋介石的指示拟定了《剿灭黄河以南匪军作战计划》。该计划规定,第一步以第三战区顾祝同所部,肃清江南新四军。这时,苏北韩德勤部反共磨擦屡遭失败,告急求援电报不断发至重庆。12月3日,何应钦上书蒋介石:"若苏北异军竟敢攻击兴化,则第三战区应将江南新四军立予解决。"蒋介石批准了何应钦的报告,并于12月10日密电顾祝同:"该战区对江南匪军,应按照前定计划,妥为部署并准备,如发现江北匪伪竟敢进攻兴化,或至限期(本年12月31日)该军仍不遵命北渡,应立即将其解决。"顾祝同根据蒋介石的命令,进一步作出"围歼"皖南新四军的具体部署,将装备较好的第四十师从江苏溧阳、安徽郎溪以北的抗日前线撤下来,调到泾县东部地区。12月29日,第三十二集团军制定《进剿匪军计划》,要求以主力"摧破皖南方面匪巢,务求彻底肃清之。""进剿部队应于12月31日以前,秘密推进至南陵、泾县、茂林村、铜山徐、小河口、水东翟、包村、乔木湾、钱家桥、丫山镇之线,扼要构筑工事,确取连系,对匪区严密警戒,随时防止匪军乘隙逃窜……务于长江南岸歼灭之。"

1941年1月4日,奉命北移的新四军军部及所属皖南部队9000余人,从泾县云岭驻地出发绕道北上。6日,在泾县茂林地区,突遭国民党早已布置好的7个师8万余人的包围袭击。新四军英勇奋战7昼夜,终因兵力悬殊,弹尽粮绝,除约2000余人突围外,大部牺牲或被俘。新四军军长叶挺在前往和国民党谈判时被无理扣押,政治部主任袁国平牺牲,副军长项英、参谋长周子昆突围后被叛徒杀害。17日,国民党政府军事委员会发出通令,颠倒事实真相,反诬新四军"叛变",宣布取消其番号,声称将叶挺交付"军法审判"。这就是震惊中外的皖南事变。这一事件是国民党顽固派发动第二次反共高潮的最高峰。事变发生后,中共中央进行针锋相对的斗争,采取了军事上坚决自卫,政治上猛烈反击的方针。1月20日,中共中央军委发布重建新四军的命令,任命陈毅为代理军长,刘少奇为政治委员。全军编为7个师1个独立旅,继续坚持长江南北的抗日战争。同日,毛泽东以中共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发言人身分对新华社记者发表谈话,揭露国民党顽固派的反共阴谋,严正抗议其反革命暴行,提出取消17日反动命令、惩办祸首、释放叶挺、废止国民党一党专政、实行民主政治等12条解决办法。以周恩来为首的中共中央南方局在重庆也展开了反击。周恩来为皖南事变向国民党谈判代表张冲提出质问和抗议。当《新华日报》揭露事实真相的报道被国民党当局扣压后,周恩来写了"为江南死国难者志哀"和"千古奇冤,江南一叶;同室操戈,相煎何急?!"的题词,由该报刊出,冲破了国民党的封锁。周恩来和南方局干部还通过召开座谈会等方式向各方人士宣布皖南事变的真相,揭露了国民党顽固派的反共面目。中国共产党的自卫正义立场,得到了广大人民和民主党派的同情支持。宋庆龄、何香凝等打电报谴责蒋介石,指出:今后必须绝对停止以武力攻击共产党,必须停止弹压共产党的行动。在国际上,国民党的倒行逆施,不仅为苏联所反对,而且英美等国也因为要中国继续抗战以牵制日本,而表示不满。由于政治上陷于空前孤立,国民党顽固派的反共活动不得不暂时收敛。3月1日,第二届国民参政会第一次会议在重庆召开。2日,根据中共中央指示,董必武、邓颖超向国民党当局提出承认中共和陕甘宁边区及民主党派的合法地位,释放皖南所有被捕干部战士等第二个"十二条",作为出席国民参政会的条件。由于中国共产党的坚决态度,蒋介石于6日被迫在国民参政会上表示,保证"以后再亦决无剿共的军事"。8日,国民参政会选举董必武为驻会参政员。至此,国民党顽固派第二次反共高潮被打退。皖南事变后的事态发展,表现了国民党地位的降低和共产党地位的提高,这次事变成了国共力量对比发生某种变化的关键。 (滕文藻)

大生产运动

1941年起中国共产党领导抗日根据地军民开展的大规模的生产运动。

抗日战争进入相持阶段后,由于日军的"扫荡"、国民党顽固派的军事包围和经济封锁,抗日根据地在财政经济上面临着严重的困难。1939年2月2日,中共中央在延安召开生产动员大会,毛泽东在会上发出了"自己动手"的号召。1941年,中共中央再次强调走生产自救的道路。各抗日根据地的党政军

学人员和人民群众响应号召，掀起了大规模的生产运动。陕甘宁边区号召部队和机关开展生产运动，并号召农民群众组织起来，发展生产，要求在原有基础上扩大耕地面积，提高粮食产量。1941年初，中共中央命令八路军一二〇师第三五九旅开赴南泥湾实行军垦屯田，一方面打仗，一方面生产。朱德到南泥湾进行实地勘察。从3月起，王震率第三五九旅陆续开进荒无人烟但土质肥沃、适于开垦的南泥湾。他们在缺乏资金和工具的困难条件下，发扬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精神，一面动手开挖窑洞解决住宿问题，一面勘察开荒的地区，学习耕作技术，制作生产工具。该旅在“一把镢头一支枪，生产自给保卫党中央”的口号下，从旅长到勤杂人员及随军家属都人人动手，开荒种地。经过不长时间，他们在南泥湾开辟了26万亩荒地，种了粮食、蔬菜、大麻、烟草，解决了部队的蔬菜、灯油、打草鞋的麻、战士们吸的旱烟，又补足了粮食、菜油、马料、马草之一部分。他们还经营了畜牧业，部队经常养猪2000头，解决了吃肉与用油的问题。组织了一部分人去打柴、伐木、烧炭，解决了燃料及建筑材料的问题。他们还经营了工业，建立了大光纺织厂与大光肥皂厂，产品除自用外，一部分“大光”牌的产品还可出售。他们建立了有力的运输业，有1个拥有600头驮骡的运输队。毛泽东、朱德、周恩来、任弼时等领导人，带头参加生产劳动，开荒种菜。陕甘宁边区的党、政、军机关、民众团体和学校数万人都相继投入大生产运动。随后，各敌后抗日根据地也先后开展大生产运动。大生产运动收到了很大成效。农业和工商业的产值迅速增长，人民负担大大减轻，军民生活明显改善。到1945年，边区农民大部做到“耕三余一”，即耕种3年庄稼，除消耗外，可剩余1年吃的粮食。八路军第三五九旅到1944年，除吃用全部自给外，达到“耕一余一”，成为全军大生产运动的旗帜。陕甘宁边区农民所交的公粮，1941年占总收获量的13.58%，1942年降为11.14%，1943年降至不足9%。从1943年起，敌后各根据地的机关一般能自给两三个月甚至半年的粮食和蔬菜，敌后根据地人民的负担也只占总收入的14%左右。大生产运动发扬了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革命精神和优良传统，使抗日根据地渡过了严重的经济困难，坚持了敌后的抗战，积累了一些领导财政经济工作的经验，为抗日战争的胜利准备了物质基础。　（林健柏）

中国民主政团同盟成立

1941年3月19日，在重庆成立的民主党派组织。

1939年10月，出席国民参政会的各小党派的参政员梁漱溟、张君劢、黄炎培、左舜生、李璜、沈钧儒、邹韬奋、章伯钧和无党派人士张澜等，在重庆发起成立统一建国同志会，以座谈会的形式，集合各方热心国事的上层人士，探讨国事政策，以求意见的一致，促成行动的团结。1941年3月19日，该会改组为中国民主政团同盟，并秘密召开成立大会。大会通过《中国民主政团同盟政纲》，其主要内容是：一、贯彻抗日主张，恢复领土主权的完整，反对中途妥协；二、实践民主精神，结束党治，在宪政实施以前，设置各党派国事协议机构；三、加强国内团结，所有党派间最近不协调之点，亟应根本调整，使进于正常关系；四、督促并协助中国国民党切实执行抗战建国纲领；五、确立国权统一，反对地方分裂；六、军队属于国家，军人忠于国家，反对军队中的党团组织，并反对以武力从事党争；七、厉行法治，保障人民生命财产及身体的自由，反对一切非法的特殊处置；八、尊重思想学术的自由，保护合法的言论出版集会结社。九、避免任何党派利用政权在学校中及其他文化机关推行党务，避免为一党垄断及利用政权吸收党员。不得以国家收入或地方收入支付党费。十、纠正各种行政上妨碍生产的措施，以苏民困，并力谋民生的改善。这个纲领表明，民主政团同盟主张继续抗战，反对对日妥协投降；主张民主宪政，反对国民党一党专政。但它所提出的“国权统一”、“军队属于国家”，在客观上不利于发展抗日民主政权和抗日武装。大会推选黄炎培、张澜、梁漱溟、章伯钧、罗隆基、张君劢、左舜生、李璜、江恒源、冷遹、丘哲、林可玑、杨庚陶等13人为民主政团同盟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黄炎培、梁漱溟、章伯钧、张君劢、左舜生为中央常务委员会委员，黄炎培（1878—1965）为常务委员会主席，左舜生为总书记，章伯钧为组织部部长，罗隆基为宣传部部长。5月20日，梁漱溟经桂林到达香港，在中国共产党驻港办事处的协助下，开始筹备出版报纸。9月18日，政团同盟机关报《光明报》正式出版，梁漱溟任社长，萨空了任经理，俞仲华任总编辑。中国民主政团同盟成立后，蒋介石令张群四出活动，企图将其扼杀在摇篮里。接着，国民党中央常委会召开特别会议，讨论对付办法。国民党在香港的报刊攻击民主政团同盟图谋“颠覆政府”、“推翻现在的政权”。还策动香港英国当局搜查《光明报》社及其工作人员的住宅。10月28日，中共中央机关报《解放日报》发表以《中国民主运动的生力军》为题的社论，称赞民主政

团同盟的成立，是对抗战期间中国民主运动的一个新的推动。希望参加民主政团同盟的各党派，在民主大纛下，更进一步地努力，愿其所负担的使命迅速实现。1944年民主政团同盟改名为中国民主同盟，其成员主要是文教界知识分子。（林健柏）

日伪推行“治安强化”运动

1941年3月至1942年12月，日伪军在华北地区连续进行五次“治安强化”运动，实行军事、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相结合的“总力战”。

1941年3月起，日伪军在华北地区连续进行了5次“治安强化”运动，一次比一次凶狠狡猾，野蛮毒辣，除对抗日根据地进行大规模的军事“扫荡”外，每一次都有不同的重点和新的内容，而以反共与建立东亚新秩序为中心，前后衔接，循序展开。1941年3月30日至4月3日，伪华北政务委员会推行第一次《治安强化运动之实施及宣传计划》，在敌占领区内实行搜查，整顿和加强伪政权和伪组织，扩充伪军，建立与扩大乡村自卫团，清查户口，实行保甲制，以破坏中共地下组织，搜捕中共工作人员。7月7日至9月8日，日伪进行第二次“治安强化”运动，提出“实行剿共、巩固治安”为方针，继续加强与扩充伪军、伪组织，扩充与加强乡村自卫团，搜剿中共地下组织，并增修公路，挖封锁沟，进行分割封锁；同时，以县警队等汉奸武装对根据地进行小规模的军事进攻。11月1日至12月25日的第三次“治安强化”运动，除了政治、军事方面的反动措施以外，日伪开始强调对抗日根据地实行经济封锁。伪华北政务委员会制定的《第三次治安强化实施要领》规定：“扩充以往治安强化运动之效果，更进而为有机的攻击的活动，以期治安永固，尤应侧重经济，以谋经济彻底封锁，促进重要物资之生产流通，强化我之战斗力经济力，摧毁敌匪之抗战意志。”敌伪一方面在其占领区内实行配给制，推行计口售粮、计口售物，强征房地捐等苛捐杂税，加紧对钢、铁、粮、棉等战略物资和其他物资的掠夺，控制市场，禁止边币（根据地抗日政府发行的货币）流通；另一方面利用铁路、公路和封锁沟实行封锁，断绝抗日根据地的物资来源，妄图从经济上窒息根据地，摧毁抗日军民的抗战力量。1942年3月至6月的第四次“治安强化”运动，在前3次的基础上，强调在抗日根据地边缘地区，建立伪军、伪组织，修筑碉堡、公路，挖筑封锁沟墙，加强对抗日根据地边缘地区的控制，以巩固与扩大其占领区。在7月至12月的第五次“治安强化”运动中，敌人除政治、军事、经济等侵略活动外，又强调文化侵略。伪华北政务委员会制定的《第五次治安强化运动实施纲要》说：这次“治安强化”运动，“系继续前四次运动的精神，而谋扩大其成果，同时于武力推行运动之中，加以文化充分辅助，以期工作之目标及实施之内容得与民众之生活相吻合，而促成其自主之活动，实现上下通力合作中日军政全民总力体制之国民运动”。日伪军在华北推行“治安强化”运动，对沦陷区人民进行了摧残、劫掠和屠杀，却没有达到“掌握民心”和“确保华北占领”的目的。（林健柏）

陈纳德率美国志愿航空队来华

1941年陈纳德率领美国志愿航空队来华，帮助中国抗战。

陈纳德（Claire　L. Chennault　1890—1958），美国退役空军军官，1937年5月来到中国帮助训练飞行人员。1940年10月，陈纳德受蒋介石派遣，随宋子文去华盛顿寻求援助。经多方奔走，美国政府同意派遣“空中堡垒”（P—40型战斗机）前往中国。罗斯福总统还签署了一项行政命令，允许美国的预备役军官和从陆、海军退役的人员参加美国志愿队去中国。陈纳德随即组成招募小组，奔赴美国各空军基地招聘志愿人员。1941年7月10日，美国110名飞行员、150名机械师和后勤人员到达缅甸仰光。8月1日，中国空军美国志愿航空队宣告成立。中国空军也派出一些地勤人员加入美国志愿航空队。陈纳德给其起名为“飞虎队”。该队有战斗机100余架，陈纳德为指挥官和教官。飞行员先集中在仰光以北200余公里的东爪进行严格训练，然后参加战斗。它的3个驱逐中队在昆明和缅甸仰光两地轮流换防。12月19日，飞虎队的34架P—40型战斗机飞往昆明。次日上午，10架日本轰炸机袭击昆明，24架美机起飞截击，日本飞机丢了炸弹慌忙逃跑，美国战斗机追击，击落敌机9架。12月30日，美国政府决定将美国志愿航空队并入美国陆军航空队，作为正规军。1942年4月9日，陈纳德恢复了现役军职，由退伍上尉晋升为临时上校。4月16日，又被罗斯福总统晋升为准将。从1941年12月到1942年6月，美国志愿航空队先后在缅甸、中国、泰国和越南作战50余次，共击落敌机299架，而自己在空战中只损失12架。1942年7月4日，美国志愿航空队正式解散，并入美国陆军第十航空队，编为第二十三战斗机大队，也称美国驻华空军特遣队，陈纳德继续担任指挥官。从1942年7月到1943年3月，美国驻华空军特

遣队在战斗中共击落敌机149架，轰炸了被日军占领的汉口、香港、河内等地，取得了衡阳空战和广州空战的胜利。1943年3月3日，陈纳德晋升少将。3月10日，美国驻华空军特遣队扩编为美国第十四航空队。6月，根据陈纳德的建议，中国战区在印度卡拉奇成立了战斗机飞行员训练中心，中国空军派出飞行员赴印度受训。他们回国后于10月1日与部分美国空军人员合组编为中美空军混合团，归陈纳德统一指挥。1944年底以后，美国第十四航空队袭击了广州、汉口、南京、香港等地的敌机场及其供应线。12月，第十四航空队击落敌机241架。1945年1月，击落334架。1945年4月，美国政府决定陈纳德调离中国，7月8日陈纳德以身体健康的原因请求免去他的职务并从军中退役。8月8日回美国。

（林健柏）

精兵简政政策实施

1941年12月，中共中央为克服抗日根据地财政经济严重困难和休养生息民力而采取的一项极其重要的政策。

1941年11月6日至21日，陕甘宁边区召开了第二届参议会。米脂县参议会议长、陕甘宁边区参议员、开明人士李鼎铭(1881--1947)，针对当时边区行政机构同战争环境不相适应的情况，代表11位参议员向会议提交了关于精兵简政的提案。提案中说："在今日人民困苦、资源薄弱之状况下，欲求不因经济枯竭而限制军政发展，亦不因军政发展而伤害经济命脉，唯有政府彻底计划经济，实行精兵简政主义，量入为出，制定预算，以求得相依相助，平衡发展之效果。""对于军事实行精兵主义，加强战斗力，以兵皆能战，战必能胜为原则，避免老弱残疾，滥竽充数等现象。"毛泽东对此非常重视，在提案上加了一段批语：这个办法很好，恰恰是改进我们的机关主义、官僚主义、形式主义的对症药。精兵简政的提案于11月18日在参议会上通过。27日，陕甘宁边区政府决定成立整编委员会，落实这个提案。12月6日，《解放日报》发表题为《精兵简政》的社论，指出在各敌后抗日根据地实行精兵简政，是非常切合时宜的主张。17日，中共中央在《关于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敌后抗日根据地工作的指示》中指出，为进行长期斗争，准备将来反攻，必须普遍地实行"精兵简政"，这是目前迫切的重要的任务，并对党、政、军、民机关提出了精简人员的具体要求。12月28日，中共中央书记处和中央军委发出《关于太平洋战争爆发后党的战略方针的指示》，再次强调要把精兵简政作为1942年的中心任务之一。精兵，就是要求缩编主力部队及其指挥机关，充实连队，加强地方武装和发展民兵，加强整训，提高战斗力。简政，就是要求各抗日根据地切实整顿党、政、军各级组织，紧缩机构和人员编制，加强基层，提高效能，节约人力物力，反对官僚主义。同时，还具体规定，各抗日根据地脱离生产的人员，只能占总人口的3%，其中军队系统人员占2%，党政民系统人员占1%。各抗日根据地贯彻中共中央的指示，取得了很大成绩。陕甘宁边区各级政府工作人员，1941年冬精简了24%，1943年又精简了30%，并建立了各种工作制度，实行合署办公。1943年，边区政府公布了《简政实施纲要》。晋冀鲁豫边区是贯彻执行精兵简政的模范。它规定一切脱离生产的武装部队不能超过居民人数的2%，政府工作人员不能超过1%，民兵虽不脱产也不能超过5%。经过精兵简政，减轻了人民的负担，解决了机构庞大和社会经济缺乏足够承受力之间的矛盾。同时，将精简出的一批干部加强基层，进一步密切了党和群众的联系，并为培训干部、积蓄力量提供了条件。

（林健柏）

反"扫荡"、反"清乡"、反"蚕食"斗争

1941年至1942年，中国共产党领导抗日军民粉碎日伪军对敌后抗日根据地的"扫荡"、"蚕食"、"清乡"的斗争。

1941年后，日军将华北划分为"治安区"(即敌占区)、"准治安区"(即游击区)和"非治安区"(即解放区)。日军对"治安区"，以"清乡"为主，建立和强化各级伪军和伪政权机构，实行保甲制度和连坐法，禁绝抗日活动，同时进行欺骗宣传，毒化和麻醉中国人民的民族精神。对"准治安区"，以"蚕食"为主，恐怖政策与怀柔政策并用，通过在解放区周围加修据点，广筑封锁沟、封锁墙，制造"无人区"，蚕食邻近解放区。对"非治安区"，则以"扫荡"为主，采取"分进合击"、"铁壁合围"、"捕捉奇袭"、"辗转抉剔"等战术进行大规模的连续性"扫荡"，并实行野蛮的"杀光、抢光、烧光"的"三光"政策，甚至进行灭绝人性的细菌战，妄图彻底摧毁解放区军民的生存条件，消灭一切抗日力量。日军对华中和华南抗日根据地也采取类似对华北的侵略手段和殖民政策。

1941年至1942年，日军发动千人以上的大"扫荡"达174次，比前两年增加了三分之二，使用的总兵力达83万多人，比前两年增加了一倍。1941年4

月1日，日军第二十七师团主力、独立混成第十五旅团和关东军、伪军各一部共3万余人，对冀东抗日根据地进行“扫荡”。日军以重兵沿北宁路、长城和潮白河构成对根据地的包围圈，严加封锁、而后由东向西，由北向南，逐步压缩包围圈，进而又将根据地分割为东、西两部分，进行连续合击和分区“清剿”，逐村搜捕、屠杀根据地军政人员，大肆烧杀掳掠。4月18日，日伪军4000余人包围了冀东军分区后方医院所在地鲁家峪，伤病员及工作人员190余人惨死在敌人施放的毒气中。由于敌人在“扫荡”中实行残酷的“三光”政策，根据地人力、物力受到很大损失，约有2万群众遭敌杀害，2万多青年被掳走，许多村庄被洗劫一空，部分根据地与游击区沦为敌占区。与此同时，敌华北方面军加紧对冀中抗日根据地进行空前规模的“扫荡”，以3个师团、2个独立混成旅团、另2个联队共5万余人的兵力，采取“铁壁合围”、“拉网扫荡”战术，围歼冀中军民，企图摧毁冀中抗日根据地。5月1日，敌开始第一阶段的“扫荡”。首先自边缘区以第一一〇、第二十六师团各一部“扫荡”潴龙河以北地区，以独立混成第七旅团一部“扫荡”滹沱河以北地区，以独立混成第九旅团及骑兵第十三联队“扫荡”德石铁路沿线以南地区。而后，稳进稳扎，逐步增建据点，由边缘区向根据地中心区深县、武强、饶阳、安平等县压缩，企图聚歼冀中地区领导机关和主力部队。9日和10日，敌“扫荡”兵力增至2万余人。冀中各军分区部队未能突破敌之压缩、包围，机关、部队大部被迫退向根据地中心区，陷于拥挤、被动局面。5月11日，敌转入第二阶段的“扫荡”，7000余人合围晋(县)深(泽)安(平)地区，另一部8000余人合围深县以南地区。12日，敌又以1万余人合围深县、武强、饶阳、安平地区和深县、束鹿边地区。敌每次合围，都以五六架飞机进行空中侦察和轰炸扫射，地面部队则采取多梯队、多层次、大纵深的部署，犹如“拉网”，逐步搜索推进，企图使冀中军区部队难以机动和转移。6月初，敌转入第三阶段的“扫荡”，完全控制了冀中根据地中心区，转入全面“清剿”，到处搜捕在原地坚持分散斗争的共产党的政治、军事工作人员，破坏抗日政权和各种群众组织，建立伪政权、伪组织，并大力建据点、筑公路、挖封锁沟。两个月来，敌在冀中据点增到1635处，公路增到6000多公里，封锁沟增到3000多公里，抗日根据地被分割成2670多小块，形成“格子网状”，大部沦为敌占区，部分变为游击区。冀中军区部队减员46.8%，中共地方组织、政府机关和群众团体受到很大破坏，群众伤亡和被掳走的共达5万多人。造成了“无村不戴孝，处处闻哭声”的悲惨景象。从此，冀中敌后游击战争进入了更加残酷和困难的阶段。

日伪按照“三分军事，七分政治”的原则，通过“军事清乡”、“政治清乡”、“经济清乡”、“思想清乡”等，摧毁根据地的抗日力量。他们首先是以优势兵力、用闪电战术，进行梳篦式的军事“清剿”。接着是大量增设据点，用铁丝网、竹篱笆建立封锁线，切成小块封锁圈，进行分区搜剿。在军事“清乡”以后，立即进行“政治清乡”，清査户口，编制保甲，实行“联保连坐”制度。这种“清乡”，其重点是江、浙、皖地区，而苏南地区则是最早进行“清乡”的试验区。在日伪军的军事进攻和“三光”政策残酷摧残下，解放区军民进入了极端困难时期。

敌后军民展开了艰苦的反“扫荡”、反“清乡”斗争，创造了人民战争的战略战术。主要有华北的地道战、地雷战、麻雀战等。一、地道战。华北平原地区军民首先发明了地道战，民兵与群众挖成了高4尺、宽3尺的地道，村与村通，乡与乡通，甚至县与县通，几百里的幅员，不出地面就可以自由转移，建成庞大的地下交通网。地道有许多隐蔽的出入口，以保持秘密；有大小不同的掩体，可供居留；有许多曲折部可凭之进行抵抗；有许多岔路，以迷惑敌人；有许多通气口和简单的防毒设备，以防敌人放毒。在出入口的左右上下，又埋设地雷，进可以攻，退可以守。军民依托地道，人自为战，村自为战，有效地打击敌人，保存自己。二、地雷战。无论山区和平原，都普遍运用地雷战。群众自己动手，就地取材，利用废铁、玻璃瓶和石头、瓦罐，制成各式各样的铁雷、磁雷、石雷、瓦雷，把它埋设在大道、村口、沟边、路旁等敌人必经之地以及房屋内外，使得敌人到处挨炸，寸步难行。游击队和民兵还学会了“大枪与地雷相结合”的战术。有时敌人进到地雷附近，尚未踩响地雷，民兵就突然从山头屋顶或隐蔽处射出一阵排枪，打得敌人到处乱窜，从而踩响了地雷，炸得敌人血肉横飞。三、麻雀战。主要在山区实行。山区地势复杂、道路崎岖，人民自卫武装(民兵)熟悉当地情况。当日、伪军进入根据地后，他们时聚时散，到处打击敌人，而日、伪军则因人地生疏，只能在大道上盘旋挨打。四、水上游击战。主要在华中水网地带进行。苏北淮海区民兵将房砖拆下埋在地里，敌人弄不到砖，只得用土兴建碉堡。群众又集中万余人，将河改道，放水冲毁这些土堡。还展开了“筑坝运动”。苏北、苏中、苏南沿海地区，河流交错，面狭水深，敌人得以航行其装甲汽船。群众就

于冬季水浅时，横河筑坝，待水涨时，水面高过坝顶一二尺，木船可以行驶，汽船不能走，使敌人的优势武器无法使用。而敌后军民的小木船则可以在广阔水域里出没自如，寻找机会打击日伪军。

1941年初，日本侵略军开始实行"蚕食"政策，其方法是依托其所占领的交通线和据点，在抗日根据地边缘工作薄弱的地区，秘密潜入特务，暗中建立汉奸组织，等待时机成熟时，发动军事进攻，逐渐向内推进，建立据点和伪政权，从而使抗日根据地变为敌占区。或以军事"扫荡"为先导，深入抗日根据地建立据点，然后依托这些据点逐步向外扩张。日本侵略军企图以长期的逐步的、稳扎稳打的办法，达到缩小抗日根据地、扩大其占领区的目的。中国共产党领导敌后军民在游击区开展反"蚕食"斗争。1941年6月9日，中共中央军委在关于冀南工作的指示中指出：对日军的"蚕食"政策，若不予以击破，则我在平原将难以立足。击破"蚕食"的中心环节，在于有正确的政策，主要应从政治上着手，而不能只是军事进攻，或以军事进攻为主。抗日根据地广大军民，实行广泛的群众斗争和军事斗争相结合的原则，组织联防线，即正规军、地方游击队、民兵三位一体的密切配合，乘敌立足未稳时，给以坚决打击，扼制住敌人"蚕食"的态势。在敌据点实行对敌包围，直到把敌人撵走；或集结主力部队，拔掉据点；或围点打援，迫敌处于孤立无援地位。武装工作队是敌后军民为扭转反"扫荡"的被动局面，争取对敌斗争的主动而创造出来的。武装工作队员既能打仗，又能独立进行各项宣传和动员群众的工作。他们深入到敌占区，以军事斗争同政治斗争相结合，公开斗争同隐蔽斗争相结合，广泛地向群众开展宣传，揭露敌人，搜集情报，锄奸反特，破坏日伪统治秩序，争取并瓦解伪军和伪组织，发展秘密武装，建立两面政权，形成"隐蔽根据地"，把日伪统治的心脏地区变成打击敌人的前沿阵地。在敌人的碉堡附近，常能听到武工队员开展政治攻势的声音。武工队员还访问伪军家属，要他们转告自己的亲属早日弃恶从善。日伪军抢粮时，武工队员及时出现，帮助群众进行抵抗，夺回粮食。这样，日军在所谓的"治安区"也得不到安宁。交通破袭战也是有效的战术。冀中平原一带的群众，为了粉碎敌人快速部队（装甲车和摩托化部队）对敌后抗日根据地的"扫荡"，便把所有的大道都给予破坏，把它挖成宽七八尺、深1丈左右的道沟，使敌人的快速部队无法活动，而根据地军民却能利用道沟的掩护，四处打击敌人。同时，发动群众扒铁路、割电线、炸桥梁、毁公路，破坏敌人的交通运输和通讯联络，使敌人对敌后抗日根据地的"扫荡"屡遭失败。1941年至1942年，八路军、新四军和游击队、民兵共作战4.2万余次，毙伤俘日伪军33.1万余人。敌后军民的反"扫荡"、反"清乡"、反"蚕食"斗争，牵制、消灭了大量日伪军，成为坚持中国长期抗战最重要的因素，也是对盟国反法西斯战争的很大支持。　（林健柏）

延安整风运动

1942年起，中国共产党在全党范围内开展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思想教育运动。

抗日战争以来，中国共产党制定了一条正确的总路线，党的工作是有成绩的。以教条主义为特征的"左"倾冒险主义在中共中央的统治早在遵义会议后已经宣告结束，但这种错误的思想根源并未得到清算，在党内还存在着主观主义、宗派主义、党八股等不正之风。党的队伍迅速扩大，从1937年的3万余人发展到1940年的80万人。广大新党员有很高的革命积极性，并愿意接受马克思主义教育；但是，他们也带来了各种非无产阶级的思想作风。党的领导机关和党员队伍中存在的这种不正的作风，与党的任务形成极其严重的矛盾，给党的工作造成绝大的困难。不解决这种矛盾，党就不能顺利前进。为了使党员和党的干部特别是高级领导干部克服不正作风，学会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来观察问题、辨别是非，中共中央决定在党内进行一次普遍的马克思主义教育运动，这就是整风运动。1941年，开展整风运动的主客观条件已经具备。这时，已经形成了以毛泽东为首的中共中央的正确领导；已经有了一批比较了解党的历史上多次"左"、右倾错误的经验教训的骨干；敌后斗争虽然处在困难阶段，但是总的斗争形势变化较小，特别是中共中央所在地陕甘宁边区的形势比较稳定。因此，有可能进行一次全党范围的整风运动。整风运动大体分为3个阶段：第一阶段是组织高级干部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和研究党的历史问题，为全党整风运动做准备。1941年初，中共中央集中在延安的党的高级干部120多人，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著作，研究党的历史文献。5月19日，毛泽东在延安高级干部会议上作《改造我们的学习》的报告，深刻阐述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原理和中国革命具体实践相结合的原则，批判了主观主义的作风，号召全党注重调查研究，树立理论和实际相统一的马克思主义作风，为全党的整风学习指明了方向。7月和8月，中共中央作出《关于增强党性

的决定》和《关于调查研究的决定》，号召全体党员和干部，开展调查研究，坚持实事求是的原则，增强党性锻炼，遵守党的纪律，加强党的团结，在思想上、政治上和组织上克服各种不良倾向和作风。9月10日至10月22日，中共中央政治局举行扩大会议。毛泽东在会议上作了反对主观主义和宗派主义问题的报告，指明了主观主义的表现、危害、根源和克服办法。会议经过讨论，确认在土地革命战争时期，陈绍禹(王明)等人领导的中共中央所犯的错误是"左"倾冒险主义的路线错误。一些受陈绍禹影响而犯过错误的革命同志作了自我批评。会议决定在全党发动思想革命，反对主观主义和宗派主义。9月26日，中共中央决定成立中央学习研究组，毛泽东任组长，王稼祥任副组长，组织在延安的高级干部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研究中共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前后的历史文件，总结党的历史经验。同时决定成立各地的高级学习组，并颁发了高级学习组的组织条例。高级干部的学习，为全党的整风运动做了重要准备。从1942年开始，整风运动转入第二阶段，即全党整风阶段。2月上旬，毛泽东作了《整顿党的作风》和《反对党八股》的报告。这两个报告全面地阐明了整风运动的任务和方针，指出整风的主要内容是：反对主观主义以整顿学风，反对宗派主义以整顿党风，反对党八股以整顿文风。4月3日，中共中央宣传部发出《关于在延安讨论中央决定及毛泽东整顿三风报告的决定》；6月8日，中央宣传部又发出《关于在全党进行整顿三风学习运动的指示》，具体规定了整风学习的文件以及整风的方法和步骤。为了领导全党的整风运动，6月，中共中央成立了以毛泽东为主任的总学习委员会。在总学委的领导下，延安地区的中央直属机关、军委直属系统、陕甘宁边区系统及文委系统、中央党校等单位有近万名党员干部参加整风学习。华北、华中各抗日根据地的党组织和在国民党统治区的中共中央南方局，也先后开展了整风学习。在整风运动中，改变了过去"左"倾错误领导采取的"残酷斗争"、"无情打击"的错误做法，实行"惩前毖后"和"治病救人"的方针。整风的方法是认真地阅读整风文件，在领会文件的精神实质、掌握思想武器的基础上，联系个人的思想、工作、历史及所在部门的工作进行检查，发扬党内民主，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具体分析错误产生的原因，找出改正的方法，以求改进作风，改进工作。在整风运动中，中共中央大力提倡开展调查研究，要求广大党员和干部通过调查研究，深入了解中国社会状况、革命的特点和规律，学会将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和中国革命实际相结合。为了领导这一工作，中共中央于1941年8月设立了以毛泽东为主任、任弼时为副主任的调查研究局。1942年1月至1943年3月，张闻天率领一些同志深入陕北和晋西北农村基层进行调查研究，整理出许多调查研究报告。中共中央的一些工作部门和分局，也组织调查团和考察团，开展调查研究。在整风运动期间，中共中央各部委和陕甘宁边区的一些机关、学校在1942年底开始了审查干部的工作。这在当时党员队伍迅速扩大、国民党加紧特务活动的情况下，是完全必要的。但是，在审查干部工作中对敌情作了过分的估计，把一些干部在思想上和工作中的缺点错误或历史上未弄清楚的问题，轻易地当成政治问题以至反革命问题，并采用了逼供信的错误做法，这就出现了严重偏差。特别是1943年7月15日总学习委员会副主任、中共中央社会部部长康生在延安干部会上作了《抢救失足者》的报告以后，错误进一步发展，造成大批冤、假、错案。中共中央发现审干中的"左"倾错误以后，力图加以纠正。6月制定的《审讯工作的基本条例》规定，禁止指供审讯和肉刑及变相肉刑；不轻信口供，应注意证据；未有确凿证据，不得主观肯定其为反革命。7月1日，毛泽东指出防奸工作有两条路线，应该执行正确路线，反对错误路线。在发现错误仍在扩大时，7月30日，毛泽东再次强调了正确路线，并指示停止"抢救失足者运动"。8月15日，中共中央通过了《关于审查干部的决定》，坚持审查干部必须遵循"首长负责"等9条方针。10月9日，毛泽东又指示坚持"一个不杀，大部不抓"的原则。经过努力，审干工作中的错误得到制止。后来，又对错案进行甄别平反，并对受到冤屈的人员赔礼道歉。毛泽东主动承担责任，并作了自我批评。1943年10月10日，中共中央决定高级干部重新学习和研究党的历史与路线是非问题，整风运动转入第三阶段，即总结提高阶段。在这一阶段中，分别召开了许多总结党的历史经验的座谈会。通过这些座谈会，使干部从切身的实践经验中，更好地认识党史上的路线是非问题。为了帮助干部正确总结党的历史经验，周恩来于1944年3月作了《关于党的"六大"的研究》的报告。同年4月12日，毛泽东在延安高级干部会议上作《学习和时局》的讲演，对高级干部讨论党的历史中提出的一系列问题，发表了重要意见。他指出："对于任何问题应取分析的态度，不要否定一切"，对于1931年至1934年中共中央的领导路线问题，也应作两方面的分析："一方面，应指出

那个时期中央领导机关所采取的政治策略、军事策略和干部政策在其主要方面都是错误的；另一方面，应指出当时犯错误的同志在反对蒋介石、主张土地革命和红军斗争这些基本问题上面，和我们之间是没有争论的。即在策略方面也要进行分析。例如在土地问题上，当时的错误是实行地主不分田、富农分坏田的过左政策，但在没收地主土地分给无地或少地的农民这一点上，则是和我们一致的。"在深入讨论的基础上，1945年4月20日，中共扩大的六届七中全会通过了《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对党的若干历史问题作出了结论，使全党尤其是党的高级干部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基础上达到了一致。至此，整风运动胜利结束。延安整风运动，是一次普遍的马克思列宁主义思想教育运动，也是破除党内把马克思主义教条化、把共产国际决议和苏联经验神圣化的错误倾向的伟大的思想解放运动。它重新教育和训练了党内经过长期斗争保留下来的一批老干部，又教育训练了抗战初期入党的大批新党员。整风运动对于正确解决无产阶级政党内无产阶级思想和非无产阶级思想的矛盾，是一次成功的实践，是一个伟大的创举。经过这个运动，全党进一步地掌握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原理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的统一这样一个基本方向。　　（滕文藻）

中国远征军入缅作战

1942年中国远征军入缅甸与驻缅英军共同抵抗日军侵略。

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日军向英、美在西南太平洋地区的势力范围进攻，相继攻占菲律宾、新加坡、泰国和香港等地。1942年1月，日军进犯英属殖民地缅甸。2月，为阻日军侵略，保卫中国外援运输线滇缅公路的畅通，应英国的请求，中国组成远征军支援反法西斯同盟国的对日作战。中国远征军司令罗卓英，副司令杜聿明，辖第五、第六、第六十六军，共约10万人。当时在缅作战的有英缅军第一军团、英驻缅空军和美国志愿航空队。中美军队由中国战区盟军统帅部参谋长史迪威（Joseph Warren Stilwell，1883—1946）指挥。1942年3月初，日军在缅甸仰光登陆，并分3路北进。英军告急。中国远征军开赴缅甸。3月8日，中国远征军第五军先头部队抵同古，接替英军防务。3月20日，日军进攻同古，中国军队顽强抵抗，毙敌5000人，伤不胜数。4月1日，西路日军突破英军阵地普罗美，英军7000人退守仁安羌，被敌包围。4月18日，防守曼德勒的中国远征军六十六军新三十八师孙立人部击溃日军第三十三师团主力，毙敌1200余人，英军全部解围。4月29日，日军从东面突进，突破中国远征军防线，占领腊戍。5月中旬，远征军开始退出缅甸，大部经过野人山及高黎贡山撤回滇西。回撤路途异常艰险，气候恶劣，士兵伤病死亡的很多。第二〇〇师师长戴安澜（安徽无为人，1904—1942）在后撤途中遭日军伏击殉国。至8月初远征军仅存4万余人，装备大部丢失。滇缅公路也被日军切断。另一部远征军退往印度，加上后来从国内运去的部队，编为中国驻印军，由史迪威任总指挥，罗卓英为副总指挥。退回滇西的远征军及新增加的部队，于1943年春重新成立滇西远征军，陈诚为司令长官。1943年下半年中美联军组织打通中印公路的缅北战役。同年冬天，史迪威指挥中国驻印度军队3个师和一部分美军，翻过野人山，进入缅北胡康河谷。12月下旬在于邦与日军第十八师团激战，歼敌一大队。1944年3月5日，中美联军一举攻克孟关，毙敌1400余人；月底攻克拉班、高鲁阳、沙杜渣等地，占领了缅北天险坚布山，进入孟拱河谷等地。8月初攻占密支那。10月中旬占领八莫，击毙敌守城司令。1945年1月，先后攻占南坎、芝友。3月克腊戍等地，滇缅公路完全打通。为策应驻印军在缅北的作战，滇西远征军于1944年5月中旬西渡怒江向日军进攻。9月攻克松山、腾冲，11月进占龙陵、芒市。1945年1月中旬攻占畹町。27日中国远征军和中国驻印军在缅北芒支会师，打通了中印公路，使大批战略物资得以输入内地，支援了国内抗战。缅北滇西反攻作战，中国军队也蒙受了重大牺牲，官兵阵亡2.66万多人，伤3.55万多人，失踪4056人。中国远征军入缅作战，为缅甸抗日斗争的胜利做出了重大贡献。　　（林健柏）

盛世才制造的反共事件

1942年至1943年间，新疆军阀盛世才逮捕和杀害在新疆工作的共产党员和进步人士的反革命事件。

盛世才（1892—1970，辽宁开原人）是统治新疆多年的地方军阀，新疆边防督办。抗日战争爆发后，在全国抗日救亡运动及新疆各族人民抗日热潮的推动下，一度赞成中共团结一致共同抗日的主张。1937年10月，经盛世才同意，中共在迪化（乌鲁木齐）南梁设立"八路军驻新疆办事处"（对外称第三招待所），中共中央派政治局候补委员邓发主持办事处工作。1939年11月，陈潭秋出任中共驻新疆代表和八

路军办事处主任。中共中央还先后派黄民孚(黄火青)担任“大众反帝联合会”秘书长、毛泽民(化名周彬)为新疆省政府财政厅长,林基路任新疆学院教务长,不少地区和县的行政长官都由共产党人担任。经过中国共产党同当地爱国人士的共同努力,新疆出现了抗日、进步的新气象,并影响到了抗战后方的重庆,很多有志之士,如著名的文化教育界人士杜重远、沈雁冰、张仲实等奔向新疆。1939年后,盛世才政治态度向右转,开始防范、压制、排挤共产党人和进步人士。他镇压了以杜重远为首的青年学生追求真理的运动,制造了以沙里福汗为首的哈萨克牧民抵抗缴枪的事件,杀害了杜重远和沙里福汗,以削弱共产党在新疆的力量。1940年他解除了毛泽民的财政厅长职务。1941年,国内形势突变。蒋介石派兵接替甘北马鸿逵军的防地,从外部威胁新疆,同时策动哈萨克族暴动来扰乱新疆内部。1942年5月,盛世才派他的五弟盛世骥充当他的代表秘密到重庆,谒见蒋介石。同年7月,蒋介石派第八战区司令长官朱绍良到新疆,给盛世才加上了从国民党中央委员到西北边区以及新疆省党政军一大串高级官衔。9月初,蒋介石偕同宋美龄秘密飞抵嘉峪关,由国民党负责蒙藏委员会的吴忠信陪同宋美龄到达乌鲁木齐,代表蒋介石和盛世才最后商定反共的安排。盛世才为了投靠蒋介石,抛弃革命伪装,大肆逮捕和杀害共产党员和进步人士。1942年9月17日,他策划了一个所谓共产党“阴谋暴动案”,将中共在新疆的全部人员160余人逮捕。1943年9月27日,又把中共在新疆的主要负责人陈潭秋和盛世才聘请在其政府担任重要领导职务的毛泽民以及林基路等秘密杀害。在此之前,被监禁在新疆的中共过路人员和家属儿童等140余人,一直到盛世才离开新疆后才释放出来。对盛世才的本质,中共中央早已有所觉察,陈潭秋在给中共中央的几次报告中,都提出了挽救新疆危局的意见,并建议将中共一部分干部尽快撤走,中央复电同意陈潭秋的意见。但就在准备撤离的前夕,情况突变,通往延安以至通往苏联的一切交通都被盛世才切断。1944年,国民党政府派吴忠信任新疆省政府主席,朱绍良为新疆边防督办。同年秋,盛世才调任国民党中央政府农林部长。 (林健柏)

中美、中英签订取消在华治外法权协议

1943年1月,中国国民党政府与英、美两国分别签订关于取消在华治外法权及有关特权的条约。

1941年太平洋战争爆发后,美国与中国结盟,在亚洲及太平洋地区抗击日本,援助中国抗战。1942年10月9日,美、英两国分别通知中国政府,声明愿意放弃在华治外法权及其他有关权益,并提出平等互惠和国民政府在重庆举行谈判草订新约。国民党政府驻美大使魏道明与美国国务卿赫尔在华盛顿签订《中美关于取消美国在华治外法权及处理有关问题条约》,共8条,主要内容为:在华美国人应依照国际公法之原则及国际惯例,受中国政府管辖;终止美国在《辛丑条约》及附件中得到的一切权利;终止美国在上海和厦门公共租界中的权利,中国政府承认及保护该界内之一切合法权利;美国在华不动产之权利不得取消作废;双方公民有在彼国旅行、居住及经商的权利;尽快签订一现代广泛之友好通商航海设领条约等。换文还规定:凡平时对美国已开放之沿海口岸,在本约及所附换文生效后,仍继续开放;双方商船可自由驶至彼国;美国放弃商船、军舰在中国领水的特权等。同日,中国全权代表、国民党政府外交部部长宋子文与英国全权代表、驻华大使薛穆及印度特派代表黎吉生在重庆签订《中英关于取消英国在华治外法权及其有关特权条约》和《换文》,主要内容与中美新约基本相同。不同之点是:条约适用之领土范围包括英国本国和全部海外领土、殖民地;交还租界一条较美国增加交还天津、广州英租界一项。英国表示:放弃要求任英籍公民为中国海关总税务司的特权,关于条约内容完全适用于中国与印度间关系的谅解。这些条约于5月20日双方交换批准书后生效。从1943年10月至1945年5月间,中国又先后与在华享有特权的比利时、挪威、加拿大、瑞典、荷兰等国签订取消治外法权和在华特权的条约。中美、中英等不平等条约的废除,是近百年来中国人民斗争的结果。尽管新约并没有完全废除英、美在中国的特权,中国也没有彻底摆脱殖民地的地位,英国还拒不交还《南京条约》中所割据的香港、九龙,美国仍保留有在中国某些地区驻扎军队及经商、迁移等权益。5月21日,美国又和国民政府签订了《关于处理在华美军人员刑事案件换文》,规定在战争期间,美国海陆军人员如在中国触犯刑事罪款,不受中国法庭的刑事管辖。但是中美、中英不平等条约的废除,“新约”的订立,“表明了中国与盟国间有了更进一步的合作”,是中美、中英关系新的一页。1943年2月4日,《解放日报》发表题为《中国共产党与废除不平等条约》的社论,指出:延安各界正开盛大的群众大会,庆祝不平等条约的废除。全国人民对于我伟大民族之获得国际地位的平等,正在兴奋热烈地进行庆祝。

废除不平等条约和平等新约的订立，固然是中华民族独立解放斗争中的一个重大成功，可是，这还不是民族解放的彻底实现，必须打走日本帝国主义，收复一切失地，不如此，中国的独立解放便无法实现，中美、中英间不平等条约的废除还是一纸空文。社论指出，我们已经有了中美、中英间废除不平等条约的成功，我们还需战胜日本帝国主义的民族战争的胜利。

（林健柏）

对《中国之命运》的批判

1943 年中国共产党对蒋介石在《中国之命运》一书中所宣扬的法西斯主义理论进行揭露和批判。

1943 年 3 月 10 日，国民党以蒋介石名义发表了《中国之命运》一书，并强令各机关、团体、军队、学校一律诵读。《中国之命运》伪造歪曲中国历史，歌颂封建主义，提倡大汉族主义，鼓吹法西斯主义，公开提出既反对共产主义、又反对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诬蔑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八路军、新四军为“新式军阀”、“割据地方，企图破坏抗战，妨碍统一”，暗示在两年内要消灭共产党和一切革命力量。这本书的出版，是国民党发动第三次反共高潮的思想准备和舆论准备。中共中央对蒋介石在《中国之命运》一书中宣扬的法西斯主义理论展开了强有力的批判。刘少奇受中共中央和毛泽东的委托，主持召开了延安的理论干部会议，参加会议的有陈伯达、艾思奇、范文澜、王学文、何思敬、齐燕铭、陈唯实和吕振羽等。刘少奇指出：蒋介石的这本小册子公开抛出来，就是集中代表了蒋介石国民党同我们争夺革命的领导权，就是要从思想上政治上向我们党进攻。蒋介石叫嚣不消灭共产主义死不瞑目。我们共产党人要用笔杆子同蒋介石打一仗，捍卫革命的领导权，批判蒋介石鼓吹的法西斯主义。中共中央机关报《解放日报》是批判《中国之命运》一书的主要阵地。5 月 5 日，该报发表题为《中国思想界现在的中心任务》的社论，指出中心任务是从思想上彻底打垮和消灭法西斯主义。接着，发表了毛泽东的《质问国民党》、《评国民党十一中全会和三届二次国民参政会》，范文澜的《谁革命？革谁的命？》，吕振羽的《国共两党和中国之命运》，艾思奇的《中国之命运——极端唯心的愚民哲学》等重要文章，以及《根绝国内法西斯宣传》、《没有共产党，就没有中国》等社论。8 月 16 日，周恩来在延安作了题为《论中国的法西斯主义——新专制主义》的报告。这些论著揭露了蒋介石集团利用封建主义的思想糟粕来推行独裁统治，指出蒋介石宣扬的是“戴着三民主义帽子”的法西斯主义，说明中国共产主义者可以同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者团结合作，呼吁一切爱国的国民党人，坚持孙中山的三民主义，反对封建的法西斯主义，为建立民主的新中国而奋斗。他们指出，中国共产党为民族、为人民谋利益，为人民所共见，是消灭不了的。尽管蒋介石国民党要将中国引向法西斯道路，但中国人民一定会懂得和愿意接受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和教育，脱离中国法西斯的影响和圈套，而走上光明的道路。中国共产党把一些重要文章及其译文本在国民党统治区的中外人士中秘密散发，产生了很大影响。通过这场批判斗争，揭露和批判了法西斯主义的反动本质，有力地反击了蒋介石在政治思想战线上的进攻。同时，使全党和全国人民受到一次深刻的教育，进一步认识了蒋介石的反动面目，认识到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中国的命运完全寄托在中国共产党”的身上。　（林健柏）

国民党发动第三次反共高潮

1943 年 6 月，国民党顽固派发动的进攻陕甘宁边区，企图消灭抗日武装力量的反共活动。

1943 年 6 月，国民党顽固派利用共产国际解散之机，指使特务假借“民众团体”的名义发出通电，叫嚣“马列主义已经破产”，“解散共产党”，“取消陕北特区”；并令军统特务头子戴笠拟定了《解决中共问题之方案》，提出要“在军事上施极大压力”，“以使中共将军权、政权交还中央”，达到“正式解散中国共产党”，“取消边区政府”，使“十八集团军完全国军化”之目的。同时调集大量河防部队准备闪击陕甘宁边区。胡宗南先后从守卫黄河河防和封锁陕甘宁边区的第二线部队中抽调 10 个师加强包围陕甘宁边区的第一线兵力，并计划分 3 步夺占陕甘宁边区。第一步，以第三十七、第三十八集团军分别组成关中、陇东两个兵团，并完成进攻准备；第二步，以关中兵团的 13 个师兵力，分别由洛川、同耀（同官、耀县）和邠县（彬县）3 个方向对陕甘宁边区进攻，首先夺取位于正宁、旬邑、铜川之间的关中分区“囊形地带”，迫中共接受其无理要求。如遭拒绝，则实行第三步计划：以南线之关中兵团沿咸（阳）榆（林）公路实施重点进攻，在西线之陇东兵团、东线之阎锡山部及北线之邓宝珊部的策应和空军的支援下，夺取关中及陇东全部地区，并攻取延安。6 月 9 日，何应钦、白崇禧、胡宗南等在耀县召开作战会议，并于 15 日检阅了驻耀县之部队。18 日，胡宗南又在洛川召开作战会议，并决定在洛川、黄陵、宜君、同官、耀县、淳化等

地设置兵站派出所，在洛川、宜川、韩城设立野战医院及抢修同官境内之咸榆公路。6月底至7月初，国民党军不断派小部队进行侦察袭扰，并炮击中共关中军分区警戒阵地。7月2日，胡宗南令各部于10日前完成一切准备待命行动。至此，国民党顽固派掀起的第三次反共高潮达到了顶点。7月4日，中共中央军委向八路军、新四军通报国民党顽固派准备进攻陕甘宁边区的情况。同日，毛泽东指示八路军驻渝办事处，向大后方人民和美、英、苏等国驻华使团揭露国民党进攻边区挑动内战的阴谋。7日，关中军分区防军受到胡宗南部队炮击。8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开展揭露和声讨蒋介石发动内战进攻边区的宣传攻势"的指示，要求各地党政军民反对内战，反对分裂，支援陕甘宁边区的斗争。9日，八路军总司令朱德致电蒋介石、胡宗南，抗议国民党军队对陕甘宁边区的进犯。延安3万民众举行大会，发出《关于呼吁团结反对内战》的通电，号召全边区人民紧急动员起来，制止内战，保卫边区。刘少奇在会上发言，号召边区军民接受皖南事变的教训，"要准备好，给进攻者以迎头痛击"。三边（定边、安边、靖边）民众举行万人大会，动员一切力量反对内战。绥德也举行万人大会，号召人民努力生产，整顿自卫军，加强防卫。各解放区军民也纷纷集会，发表通电，声援陕甘宁边区，坚决要求制止国民党的祸国行动。同时，中共的报刊连续发表文章，揭露蒋介石的阴谋，警告他赶快停止军事冒险。7月12日，毛泽东为《解放日报》写了《质问国民党》的社论，历数国民党消极抗日、积极反共的罪行，揭露其进攻边区的阴谋。与此同时，八路军总部决定由晋察冀军区之冀中军区抽调部分部队开赴晋西北地区，由晋冀鲁豫边区之太行军区、太岳军区、冀南军区和冀鲁豫军区抽调部分部队开赴陕甘宁边区，以增强晋绥军区和陕甘宁边区的防卫力量。在国内外舆论的压力和陕甘宁边区军民已有充分的迎战准备的情况下，蒋介石被迫停止对陕甘宁边区的进攻。至此，国民党第三次反共高潮被制止。

（林健柏）

中美特种技术合作所建立

1943年7月1日，美国政府和国民党政府联合成立的特务机关。简称中美合作所。

太平洋战争爆发后，美国希望中国为其搜集对日作战情报，中国需要美国帮助训练特务，以新技术装备特工。1943年4月15日，中美双方签订了建立中美特种技术合作所的合同。合同规定美方同意向"军统"提供武装和电讯、气象、交通、医疗等器材装备，帮助中国国民党训练特务。美国可以在中国沿海及后方重要城市及国民党军队驻地设立水文站、气象和无线电台，军统局尽可能供给美方有关日本陆海空军在中国沿海及大陆活动的一切情报。7月1日，该所在重庆市郊磁器口正式成立。中美合作所直接隶属中美两国最高军事统帅部，国民党军统局局长戴笠任主任，美国海军中校梅乐斯任副主任。下设内勤、外勤两大部分。内勤分军事作战组、情报组、心理作战组、气象组、行动组、交通运输组、经理组、医务组、总务组及总办公室等单位；外勤设有东南办事处和上海、闽侯、定海、漳州4个情报站，1个前进指挥所。双方商定，中美合作所由双方派员组成，各部门原则上由军统派正职，美方派副职，对外一切行文由正副主任共同签署。中美合作所建立初期的主要任务是：一、搜集与交换情报，分呈两国最高统帅部参考；二、严密布置东南沿海的敌后情报网，以策应美军登陆；三、布置中国全国气象网，制定气象预报，提供美国海、空军参考；四、侦译敌方电讯，研究敌人动态；五、加强情报通讯，争取情报的时效；六、扩大特警训练，以达成防奸防谍、维护治安的任务；七、展开心理作战；八、加强秘密破坏工作，摧毁敌人的军事设施及军用物资。此外，还搜集反共情报。中美合作所还有一项重要的任务是美国帮助国民党训练各类特务，在全国20多个地方举办特务训练班。1944年秋后，此项工作进程大为加快。随之设立的重庆特种警察人员训练班，第一期受训学员800余人。第二期达1200余人。美方为军统训练特务，包括刑事警察和保安警察二类，主要是学习如何对付政治犯和实施有效的镇压手段。到抗战后期，中美合作所的基本方针是集中培训特务，逮捕、残杀共产党人和反蒋爱国人士。在反共反人民的内战中，中美合作所起了极为反动的作用。该所于1946年3月撤销。

（林健柏）

东江纵队组成

1943年12月初在广东东江地区组成的广东人民抗日游击队东江纵队，简称东江纵队。

1938年10月12日，日军在广东惠阳大亚湾登陆，东江下游各县及广州相继沦陷。国民党第十二集团军6个师大部撤到粤北。在此前后，中共广东省委及八路军驻香港办事处负责人廖承志根据中共中央关于要在日军占领区开辟抗日游击区的指示，派一批共产党员到东莞、宝安、惠阳、增城等地组织抗日

武装。当年12月2日，中共惠(阳)宝(安)工作委员会在惠阳周田村成立了惠宝人民抗日游击总队，曾生任总队长。12月下旬，中共东莞中心县委员会及宝安、增城中共组织领导的东莞模范壮丁队等在东莞苦草洞进行整编，成立了东宝惠边人民抗日游击大队，王作尧任大队长。两支武装共200余人。1939年初，经与东江国民党当局谈判达成协议，这两支武装分别改番号为国民革命军第四战区第三纵队新编大队和第四纵队直辖第二大队。9月，日军再次在大亚湾登陆，两支游击队主动袭击日军，先后收复大鹏半岛的沙鱼涌及宝安县城南头，并在横岗伏击战中毙伤日军30余名，迅速扩大了影响。广大群众、港澳同胞和海外华侨踊跃支援和参加抗日游击队。至年底，两支游击队共发展到700余人。1940年2月初，国民党广东军事当局命令新编大队和第二大队到惠州"集训"，企图将这两个大队包围缴械。曾生、王作尧识破顽固派的诡计，决定不去惠州"集训"，而准备去海丰、陆丰。3月8日，国民党军队3000余人进攻坪山和乌石岩，两支游击队遭到围攻，在突围途中被追击堵截，损失严重，最后剩100余人。1940年6月初，廖承志从香港转来中共中央的电报。电报说，必须大胆坚持敌后抗日游击战争，同时不怕磨擦，才能生存发展。曾生、王作尧两部仍应回东惠宝地区。根据这个指示，两个大队重返东惠宝地区。中共广东省委派省委常务委员、东江特别委员会书记林平(尹林平)到宝安上下坪召开游击队的干部会议，根据中共中央关于坚持在敌后开展独立自主的游击战、建立抗日根据地的基本方针，决定放弃"新编大队"、"第二大队"国民党军番号，改为广东人民抗日游击队。原新编大队改为第三大队，曾生任大队长，林平兼政治委员，下辖3个中队；原第二大队改为第五大队，王作尧任大队长，林平兼政治委员，下辖4个中队。整个游击队由林平负责，梁鸿钧任军事指挥。整编后，两个大队分别进入东莞大岭山区和宝安阳台山区开辟抗日根据地。11月，第三大队首先在黄潭击退进犯的日军，毙伤日军数十名。而后，两个大队不断袭击日伪军，打退国民党顽固派军队的进攻。1941年6月，第三大队在民兵的配合下，把进犯大岭山区的600余名日伪军围困了两昼夜，毙伤日军大队长以下50余名。第五大队在阳台山粉碎了日伪军的"扫荡"，毙伤敌70余名。两个大队在与日伪军和国民党顽固派军队的斗争中，发动群众，组织民兵，建立民主政权。到1941年秋，部队发展到1500余人，武装民兵1000余人，建立了广州—九龙铁路以西的大岭山和宝安—太平公路以东的阳台山两个抗日游击根据地。1941年12月，日军发动太平洋战争，同时占领香港。抗日游击队即派出武工队进入香港、九龙地区，开展城市游击战，建立新的游击基地。游击队还先后建立了海上中和护航大队，开展海上游击战，袭击日军海上运输线，保护渔民和商船往来。香港沦陷时，有一大批中国文化界知名人士和爱国民主人士和国际友人，滞留香港，处境危险。抗日游击队根据中共中央指示，克服重重困难，先后从香港营救出茅盾、邹韬奋、戈宝权、夏衍、何香凝、柳亚子、胡绳等以及美、英等国官员共800余人。1942年1月下旬，中共中央南方工作委员会副书记张文彬到达阳台山根据地的白石龙村，主持召开一系列会议，总结了部队3年来对敌斗争的经验，成立了以林平为书记的中共广东军政委员会，统一领导东江和珠江地区的抗日斗争。并将广东人民抗日游击队编为游击总队，梁鸿钧任总队长，林平任政治委员，曾生任副总队长，王作尧任副总队长兼参谋长，部队编成一个主力大队和东莞、惠阳、宝安、港九4个地方大队。此时，游击总队建立了电台，从而能及时直接得到中共中央和中共中央南方局的指示。4月以后，东江地区国民党顽固派军队与日伪军勾结，不断对抗日根据地进行围攻和经济封锁，根据地军民处境十分困难。游击总队贯彻中共中央南方局书记周恩来关于面对国民党顽固派对游击队势在必打、志在消灭的方针，要依靠群众针锋相对地进行斗争的指示，开展整风学习，统一了干部思想，部队与人民群众紧密团结，自力更生战胜困难，坚持抗战。经过一年的艰苦奋斗，终于渡过难关，取得了反击国民党顽固派军队进攻的胜利。1943年1月至10月，游击总队向日伪军主动出击，拔除了广九铁路及宝太公路、莞城—太平公路沿线的一批据点；争取了伪军1个营反正，2个连投诚。海上独立中队以少胜多，在大亚湾全歼伪海军1个大队。1943年11月，日军发起打通广九铁路的进攻作战。中旬，日伪军出动七八千人，号称"万人扫荡"，在空军配合下，对大岭山抗日根据地实行"铁壁合围"；下旬又对阳台山抗日根据地实行"多路围攻"。游击总队在杀伤一部日伪军后，巧妙地跳出包围圈，转向外线袭击敌人，经过一个多月的战斗，粉碎了日伪军的大规模"扫荡"，收复大片失地，使广九铁路两侧的解放区连成一片，卡住日军南线交通运输的咽喉，破坏了日军的战略部署。此时，游击总队发展到3000余人。为了适应对敌斗争形势和部队发展的需要，遵照中共中央的指示，1943年12月2

日，广东人民抗日游击总队扩编为广东人民抗日游击队东江纵队（简称东江纵队），曾生任司令员，林平任政治委员，王作尧任副司令员兼参谋长，杨康华任政治部主任。下辖：第二大队（1943年6月成立），阮海天任大队长，李筱峰任政治委员，杨步尧任政训室主任；第三大队，邬强任大队长，卢伟良任政治委员，黄业任政训室主任；第五大队，彭沃任大队长，卢伟如任政治委员，陈一民任政训室主任；港九大队，蔡国梁任大队长，陈达明任政治委员，黄冠芳任副大队长，黄高阳任政训室主任；惠阳大队，高健任大队长，谭天度任政治委员，叶锋任政训室主任；宝安大队，曾鸿文任大队长，何鼎华任政治委员，陈坤任政训室主任；护航大队（1943年夏成立），刘培任大队长，曾源任政治委员，叶基（后袁庚）任副大队长。共4000余人。东江纵队成立后，开展杀敌竞赛，在广九铁路沿线和惠阳、东莞、宝安地区，频频出击敌人。1944年上半年，进行较大战斗148次，攻克据点10个，破坏公路188公里、铁路35公里、桥梁11座，毙日军440人、伪军560余人，俘日伪军764人，伪军反正144人。这时，东江抗日根据地东接惠阳，西至三水，北达广州，南迄大海边，总人口约100余万。东江纵队由数千人扩大为万人以上的兵团，威逼广州市郊。“东江纵队像一把钢刀插在华南敌后，威震港粤”，成为坚持华南敌后抗战的主力之一。　（林健柏）

琼崖纵队组成

1944年春，冯白驹在海南岛地区（海南省）领导建立广东省琼崖人民抗日游击队独立纵队，简称琼崖纵队。

抗日战争爆发后，中共琼崖特委根据中国共产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与国民党海南岛当局经过谈判，达成团结抗日的协议，于1938年12月5日，将琼崖红军游击队改编为广东省民众抗日自卫团第十四区独立队（简称琼崖独立队），冯白驹任队长，刘振汉任副队长，张兴任政训室主任，共300人，编为3个中队。独立队编成后，积极进行政治教育和军事训练，准备抗击日本侵略军。1939年2月10日，日军台湾混成旅团约3000人，在海空军支援下，在海南岛海口西北天尾港登陆，迅速占领海口、琼山等地。14日，日军第五舰队一部开进三亚港，占领三亚（崖县城）、榆林。海南岛上国民党地方部队约4000人不战而退，撤到五指山。尔后，日军南北对进。到8月13日，全岛16个县，除白沙、保亭、乐东等3个县外，全部沦陷。日军在海口登陆时，冯白驹判断，敌可能以一部兵力向东进攻，即令第一中队在南渡江东岸潭口渡口（海口东15公里），利用地形，构筑工事，严阵以待。日军飞机轮番轰炸和扫射潭口渡口，第一中队英勇抗击敌人，一直坚持到黄昏，才奉命撤出阵地。潭口战斗后，独立队分散在琼山、文昌县各乡，协助中共组织发动群众，建立抗日根据地，同时做统一战线工作。随着这些工作的开展，要求参军抗日的人数增多，部队很快发展到1400余人枪。1939年3月，中共琼崖特委将独立队扩为独立总队，冯白驹任总队长，符振中（后刘振汉、马白山）任副总队长。下辖3个大队，共11个中队，每中队设中队长、指导员，平均100人枪。总队成立后，以第一、第二大队在琼山、文昌地区，第三大队在澄迈、临高、儋县、昌江地区，开展游击战争。为了充实和加强琼崖抗日斗争的领导力量，中共中央派一批红军干部（庄田、李振亚、覃威等）于1940年秋到海南岛工作。9月，独立总队领导人作了调整，冯白驹任总队长兼政治委员，庄田任副总队长，李振亚任参谋长，王业熹任政治部主任。同时，建立政治部和参谋、经理、卫生3个处，并成立两个支队和特务大队、直属第四大队。到1940年冬，独立总队共3500人。中共琼崖特委在代理书记冯白驹（书记李明11月去延安）主持下，于1939年12月举行会议。鉴于琼山、文昌根据地距敌占海口太近，又处平原地区，难以坚持；第三大队的活动遍及那大镇周围地区，有建立巩固根据地的有利条件，会议决定特委机关和总队部西移临高、儋县、白沙交界的纱帽岭地区。1940年1月25日，中共特委机关和独立总队由琼山地区西移，2月中旬到达琼山、澄迈、临高交界处的美合地区，建立根据地。1940年冬，琼崖特委和独立总队先后建立琼（山）文（昌）平原游击根据地、美合山区根据地、六连岭游击根据地和澄迈、临高、儋县、昌江、感恩等地区的小型游击根据地。1940年12月15日，国民党顽固派军队保安第七团和地方反动武装3000余人，分5路向独立总队驻地美合进攻。独立总队奋起自卫反击，掩护机关向外转移。16日，保七团进占美合。这就是抗日战争期间海南岛的“美合事变”。1941年2月，独立总队转移至琼山、文昌地区。6月，击退国民党顽固派军队的多次进攻，巩固了琼（山）文（昌）根据地。11月，成立了以冯白驹为主席的琼崖东北区抗日民主政府。从1942年起，琼崖抗日斗争进入困难阶段。5月，日军5个警备队和数千伪军，对琼（山）文（昌）地区进行“扫荡”，根据地日渐缩小。12月，日军两个警备队和数百伪军，在飞机、

坦克的配合下，再次对琼（山）文（昌）地区实行烧光、杀光、抢光的“三光”政策，制造“无人区”。独立总队以部分兵力坚持内线作战，主力转移到外线作战创建新区。1943年春，独立总队部转移至澄迈县绿现山。1944年春，根据中共中央的指示，琼崖游击队独立总队改称为广东省琼崖人民抗日游击队独立纵队（简称琼崖纵队），冯白驹任司令员兼政治委员，庄田任副司令员，李振亚任参谋长，王白伦任政治部主任，陈石任政治部副主任。下辖第一支队、第二支队、第三支队、第四支队和挺进支队。琼崖纵队成立后，以建立白沙根据地为中心任务，发展全琼的抗日斗争。据此，第一支队以少数兵力在琼山、文昌地区活动，主力在琼山、澄迈、临高地区活动；第二支队主力在昌江、感恩（后并入东方县）地区活动；第三支队主力在万宁、陵水、保亭、崖县地区活动；第四支队在儋县、白沙地区活动。1945年1月，琼崖党政军领导机关迁入白沙县阜龙乡文头山地区。在抗日战争中，琼崖纵队对日伪军作战2229次，歼灭日伪军5848人，缴获机关枪51挺，机关炮5门，掷弹筒10具，手提机关枪16支，长短枪2199支；解放全岛二分之一地区和100万以上人口（占全岛人口近二分之一）；部队发展到7780人，另有县区政府基干队2000人，不脱产的反攻预备队9000余人，为全国抗日战争的胜利做出了贡献。　（林健柏）

大后方的民主宪政运动

1944年春，国民党统治区的民主党派和民主人士在重庆、成都、昆明、桂林等地组织各种群众团体，要求民主自由，实行宪政的运动。

1939年9月9日，第一届国民参政会第4次会议在重庆召开，中共和各民主党派的参政员，要求国民党结束党治，实施宪政。中共参政员毛泽东、秦邦宪等7人在《我们对于过去参政会工作和目前时局的意见》中，提出要实现战时民主，严惩对民众和青年的非法压迫行为，切实保障人民有言论、出版、集会、结社及武装抗战之权利；加强抗战党派之精诚团结。章伯钧等36人向大会提出《请结束党治，立施宪政，以安定人心，发扬民主，而利抗战案》，救国会参政员王造时等37人提出《为加紧精诚团结以增强抗战力量而保证最后胜利案》，也提出了开放民主、实行宪政等要求。9月16日，经过激烈争论，大会审议通过《请政府明令定期召开国民大会，制定宪法，实施宪政案》。会后，国民参政会议长蒋介石根据大会的决议，指定各党派和无党派参政员董必武、黄炎培、张澜、左舜生、罗隆基、史良、褚辅成、钱端升、罗文干等19人组成宪政期成会。其任务是协助政府修改宪草，促成宪政。同年11月，国民党召开五届六中全会，表示接受国民参政会的决议，决定于1940年11月12日召开国民大会，制定宪法。1939年10月、11月间，张澜、沈钧儒等发起，在重庆先后召开了4次宪政问题座谈会，共产党参政员董必武、秦邦宪出席并参加了领导工作。第4次座谈会决定成立宪政促进会，选举黄炎培、沈钧儒、李璜、董必武等85人为筹备委员。同时，重庆30多个妇女团体发起妇女宪政座谈会，青年代表25人发起青年宪政座谈会。成都、桂林等地也先后组织了宪政座谈会和宪政促进会。1940年2月20日，毛泽东在延安各界宪政促进会成立大会上发表演说，揭露了国民党蒋介石所谓实行宪政的欺骗宣传。指出国民党顽固派历来就是反对宪政的人，现在却口谈宪政，“他们是嘴里一套，手里又是一套”，“他们一面谈宪政，一面却不给人民以丝毫的自由”，“他们是在挂宪政的羊头，卖一党专政的狗肉”。“中国人民所要的宪政是新民主主义的宪政，国民党顽固派口谈的宪政，是旧式的，已经变成反动的东西，我们万万不能要”。“他们口里说要这种宪政，并不是真正要这种宪政，而是借此欺骗人民”。民主宪政运动兴起后，国民党当局便采取各种手段加以打击和破坏。对讨论宪政的各团体采取钳制与高压的办法，禁止和限制争取宪政的活动，限制报刊刊登关于宪政的文章，派特务在宪政座谈会和宪政促进会上捣乱，中央社捏造取消宪政促进会的消息等等。1940年9月18日，国民党中常委以“各地交通受战事影响，颇多不便”为借口，宣布国民大会不能按期召开，会期另定。这暴露了国民党坚持一党专政的反动本质。从1944年起，一些争取民主宪政的团体又活跃起来。1月1日，民主人士创办的《宪政月刊》在重庆出版，发行人是黄炎培，主编为张志让。1月3日，各民主党派人士沈钧儒等26人发起宪政问题座谈会。董必武在会上发言指出，民主是讨论宪政的先决条件，民生更是今天动员人民参加抗战、加强团结的先决条件。没有民主，没有言论、出版、集会、结社的自由，就不能实现人民总动员，也不能认真地由人民研究宪草，宪草也就不可能实现。1月5日，宪政月刊社召集宪政座谈会，与会人员纷纷要求实行民主。3月1日，中共中央给各中央局、中央分局并各区党委发出《关于宪政问题的指示》，中央决定共产党参加此种宪政运动，以期吸引一切可能的民主分子于自己周围，达到战胜日本与建立民

主国家之目的。除中共代表已参加重庆方面国民党召集的宪政协进会会议外，延安亦已举行宪政座谈会。各根据地亦可于适当时机举行有多数党外人士参加的座谈会，借以团结这些党外人士于真正民主主义的目标之下。3月12日，周恩来根据中共中央的指示精神，在延安各界纪念孙中山逝世19周年大会上发表《关于宪政与团结问题》的演说。指出，我们主张要实行宪政必须保障人民的民主自由，开放党禁，实行地方自治。这是最重要的先决条件。当前各地人民的宪政运动，一致要求实施宪政，要先给人民以民主自由，只有有了民主自由，抗战力量才能源源不绝地从人民中间涌现出来，反攻准备才有坚实的基础。他提出：应在抗战期间召开国民大会，实施宪政。5月，中国民主政团同盟发表“对目前时局的看法与主张”，批评了国民党排斥异己、拖延训政、拒绝民主的态度。工商界代表在宪政月刊社组织的座谈会上，呼吁实行政治民主，生产自由，取消统制政策。国民党内的民主派李济深、柳亚子等倡议，在广西成立了“抗战动员宣传工作委员会”和“桂林文化界抗战工作协会”，主张立刻动员民众，坚决抵抗，痛斥抗战中的失败主义者。于是，重庆、成都、昆明各界人士纷纷响应。在成都，张澜等发起组织的“民主宪政促进会”，提出对国事的10项主张，要求切实施行约法，尊重人民的自由权利，刷新政治，革除目前征兵、征实、征税中的各项弊端，给予各级民意机构以必要的权力，实施全民动员，组织人民，武装人民，以保国家复兴之基地等等。6月以后，桂林、成都、乐山、城固等地大学生纷纷举行讲演会、座谈会，要求以实际行动，争取民主与自由。昆明云南大学、中法大学、西南联合大学等校学生3000余人，在“七七”纪念日联合举行的“时事座谈会”上，要求改革政治。9月15日，中共参政员林伯渠在第三届国民参政会第3次会议上提出：希望国民党立即结束一党统治的局面，由国民政府召集各党各派、各抗日部队、各地方政府、各人民团体的代表，开国事会议，组织各抗日党派联合政府。10月10日，周恩来在延安各界举行的双十节庆祝大会上发表题为《如何解决》的演说，提出成立联合政府的具体步骤：1.各方代表由各方自己推选，人数应按各方所代表的实际力量比例规定。2.国事会议应于最近期间召开。3.国事会议根据革命三民主义的原则，必须通过切合时要、挽救危机的施政纲领以彻底改变国民党所执行的错误政策。4.在共同施政纲领的基础上，成立各党派的联合政府，以代替目前的一党专政的政府。5.联合政府有权改组统帅部，成立联合统帅部。6.联合政府成立后，立即准备于最短期间内召开真正人民普选的国民大会，以保证宪政的实施。这样，就把民主宪政运动集中到建立民主政府的目标上来了。中共的主张，得到各党派的热烈响应。中国民主同盟在《对抗战最后阶段的政治主张》中，要求召集各党派会议建立联合政府。其他党派和民主人士在发表的宣言、文章和谈话中，也拥护建立统一的民主联合政府。国民党统治区的民主运动出现新的高潮。（林健柏）

敌后战场转入局部反攻

1944年春开始，八路军、新四军和华南纵队等人民军队在华北、华中、华南敌后对日伪军发起局部反攻。

1943年至1944年，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形势发生根本性变化，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敌后解放区战场开始摆脱严重困难的局面，根据地逐步恢复和发展，人民革命力量进入上升时期。从1944年开始，华北、华中、华南等解放区战场对日伪军普遍发起局部反攻。

在华北敌后战场上，晋察冀抗日根据地北岳区军民围攻涞源地区的日伪军，袭入灵丘、定襄两县城以及忻口车站，攻克敌据点、碉堡400余处，恢复和解放村镇1600余个，解放人口80余万。北岳区部队还向雁北、察南地区伸展，开辟了蔚县川、广灵川、壶流河南北、应县、浑源以及平绥路两侧等地区的工作，打开了雁北、察南地区的局面。冀中区军民攻克定县怀德、饶阳官厅和高阳旧城，解放了肃宁县全境，袭击天津，攻克敌据点、碉堡800余处，解放村镇3800余个，解放人口120余万。冀东区军民先后攻克太平庄、新庄子、三岔口等21处敌据点，收复蓟县、平谷、三河之间大片地区，开辟了通县公路以南地区，逼近北平、天津近郊。1944年晋察冀根据地军民共作战4400余次，毙伤日伪军2.29万余人，俘虏日伪军及争取伪军投诚、反正2.22万余人，解放人口758万，扩大了北岳区，巩固了平北与平西区，坚持了冀东区，恢复了冀中区。晋察冀部队分别组成了冀晋军区、冀中军区、冀察军区和冀热辽军区。在晋冀鲁豫抗日根据地，太行区军民收复蟠龙镇、榆杜县城、林县县城，并向邢台、沙河、新乡、辉县等地区进攻，出击临(城)内(丘)线，摧毁敌人三道封锁线，开辟了新(乡)、辉(县)地区。太岳区军民出击济源、垣曲地区的日伪军，收复国土2600余平方公里，解放人口11万，并控制了济源和垣曲之间部分黄河渡

口。冀鲁豫区军民在昆山、张秋地区发动攻势，攻克日军据点50余处。1944年晋冀鲁豫根据地军民共毙伤日伪军3.8万余人，俘日伪军3.49万余人，争取日伪军反正、投诚3200人，收复县城11座，解放人口500余万，收复国土6万余平方公里，改变了根据地被分割的局面。在晋绥抗日根据地，晋西北区军民在1944年春季攻势中开辟了新的游击根据地，收复了蒲格寨等据点多处。在秋季攻势中，他们以忻(县)静(乐)公路、离(石)岚(县)公路为重点，进攻静乐、忻县等地区的敌军，毙伤日伪军900余人，俘日伪军1000余人，收复土地770余平方公里。这年，晋西北根据地军民共解放村庄3100多个，解放人口40余万。大青山解放区军民也积极开展游击战，绥西、绥南区恢复到1942年前的局面。在山东抗日根据地，山东军民先后对鲁中、鲁南、渤海、滨海、胶东发动攻势，打通了沂山、鲁山、泰山、蒙山各山区间的联系，控制了诸(城)日(照)公路大部分及海(州)青(岛)公路和诸(城)胶(县)公路各一段，巩固和发展了胶东和滨海的联系。使滨海和鲁中连成一片，并解放了利津、沂水、乐陵、临邑、南皮、莒县等县城。这年，山东根据地军民共进行较大战役15次，歼日伪军近6万，争取伪军反正1.1万人，攻克县城9座，逼退敌据点200余处，解放人口930余万，形成了渤海、胶东、鲁中、鲁南、滨海5个巩固的根据地。

华中抗日根据地的新四军也主动地有计划地对日伪军发动攻势作战。1944年1、2月间，苏中地区新四军第一师为打破日伪“扩展清乡”和“屯垦”讨伐，趁敌军调整部署之际，以高(邮)兴(化)宝(应)东(台)和泰(州)泰(兴)如(皋)地区为重点，发起连续进攻，夺取大官庄等日伪据点17处。3月初，新四军在淮安、宝应以东发起以夺取车桥为目标的攻势作战。苏中军区集中5个团兵力组成3个纵队，采取攻点打援战法，以1个纵队夺取车桥，两个纵队于外围准备歼灭增援之敌。5日，主攻部队避开敌之外围据点，突入车桥镇内，经一夜激战，全歼伪军1个大队，并将日军压缩包围于核心工事内。淮阴、淮安、泗阳、涟水等地日军遂乘装甲车和汽车驰援车桥，进至车桥以西芦家滩时，遭新四军阻援部队沉重打击，被迫退入预设的地雷区。新四军乘雷群爆炸出击，歼敌240余人。接着又给逐次增援的日军以歼灭性打击。6日，车桥残敌乘隙逃窜。新四军乘胜扩大战果，至13日相继收复泾口、曹甸等据点12处，解放了淮安、宝应以东地区，使苏中与苏北、淮北、淮南各根据地联系起来。之后，苏中第四军分区部队主动出击，连克敌据点28处，歼灭日伪军近1000人。6月下旬，新四军又在如皋之海河滩歼灭日伪军500余人，并乘胜攻克南坎镇。与此同时，南通、海门、如皋各地军民发动为时20多天的破击战，破坏公路700余公里，炸毁桥梁50余座。9月，苏中第四军分区部队再次组织历时45天的攻势作战，基本上恢复了在“清乡”中被敌侵占的地区。苏北军区部队自1944年1月起，展开了反击日伪军“第二期治安肃正”的攻势作战，连克沭阳、涟水之间的塘沟、王集、徐溜等10余处据点，收复了1942年冬敌大“扫荡”时所侵占的大部地区。4月，又在涟水西北发起高沟、杨口战役。4月19日，苏北军区第十旅主力和第七旅一部采取各个击破的战法，首先包围高沟。25日，在炮火掩护下打破夜间攻击惯例，出敌不意地突然于昼间发起攻击，一举攻克高沟，全歼守敌。28日，攻克杨口，歼灭新安镇(灌南)、大伊山(灌云)等地出援之敌140余人。是役，新四军共歼灭日伪军2000余人，攻克据点14处，收复了六塘河两岸地区，使淮海、盐阜两区连成一片。苏北军区部队还攻克灌河口重镇陈家港和陇海路南侧之高流镇，歼伪军800余人。6月下旬，又对滨海地区之敌发动攻势，先后攻克交通要冲大兴镇和敌之盐棉集中地合德镇等重要据点，并在灌河和射阳河之间开辟了部分新区，彻底粉碎了敌人的“屯垦”计划。9月上旬，新四军又在运河线上攻克宿迁以南敌重要据点林公渡，粉碎了日伪军隔断苏北与淮北战略联系的企图。淮北军区部队自1944年3月中旬开始，在东起运河、西至津浦路宽数百里之战线上，对守备薄弱之敌军据点展开进攻。经50天连续作战，攻克据点51处，歼灭日伪军2000余人，解放了泗县、灵璧、睢宁之间的广大地区。6月，又以主力一部，发动了以夺取泗县北之张楼据点为主要目标的攻势，全歼长期盘踞该地的伪军500余人，并歼灭增援之日伪军一部，解放了泗北地区。苏南地区部队在攻势作战中，于8月下旬一度攻入长兴城，并攻克其外围据点13处，歼灭伪军4个营。还攻克了金坛以西的薛埠镇及南京郊区的六郎桥，并一度袭入溧水、溧阳两县城。淮南军民袭入盱眙、定远县城。鄂豫皖边区部队为巩固和发展鄂南，于1944年1月间，开辟了嘉(鱼)蒲(圻)临(湘)地区。2月至5月间两次粉碎国民党顽军攻占大悟山根据地的企图，巩固了鄂豫皖边区之中心区。而后，各部队对日伪军据点展开并破坏敌之交通线。五六月间，共作战30余次，先后攻克潜江之龙湾、石首之横堤市、黄冈之孔家埠等据点，歼敌千余人。8月，第三军分

区部队围攻监利之汪家桥敌军，敌仓皇逃窜。9月，该分区部队又向沔阳沙湖地区伪定国军残部进攻，歼其一部。与此同时，鄂南军分区部队逼近武昌，夜袭敌之青山据点。12月，第三军分区部队在潜(江)沔(阳)边歼灭伪军一部，并以荆(门)潜(江)地方武装袭击长垴垸敌之据点。第二军分区部队也攻克李家店、同兴店等据点。皖中军民也攻克10余处敌据点。在1944年，华中新四军共作战6500多次，歼日伪军5万余人，解放国土7400多平方公里，解放人口160余万。华中抗日根据地先后发展为淮北、淮南、苏北、苏中、苏南、皖江、浙东和鄂豫皖8个根据地。

在华南敌后战场上，东江纵队这时已发展为有11万余人的游击兵团，东江根据地包括东起惠阳、西至珠江口、北达增城、南接大海的广大地区，直接威胁着广州和香港。珠江纵队则驰骋于珠江三角洲各县。琼崖纵队在极端困难的条件下，坚持游击战，到1944年，也主动向敌人出击，在海南岛东北的8个县中，普遍建立了抗日民主政权；除了重要的县城被敌占领外，广大乡村已被人民武装控制。这时，华南解放区已拥有人口300万，并有2万正规部队和数万民兵，成为坚持华南敌后抗战的主力。

八路军、新四军和华南纵队在局部反攻中，取得了很大的胜利，毙伤敌伪军26万余人，俘获敌伪军6万余人，争取伪军反正3万人，收复县城16座，攻克据点5000余处，收复国土8万余平方公里，解放人口1200万人。敌后解放区战场在全国范围内形成了对日军占领的大多数城市和主要交通线的战略包围，已经成为中国整个战场实行战略反攻的主力，从而为举行全国规模的大反攻创造了有利条件。

(林健柏)

豫湘桂战役

1944年4月17日至12月10日，日军为打通平汉、粤汉和湘桂铁路，发起豫湘桂战役，又称打通大陆交通线战役。

1943年冬，日本在太平洋战场上逐次失利，海上交通线有被盟军切断的危险。日军为沟通与其南方军的陆上联系，并企图摧毁中国西南的空军基地，于1944年1月24日向日军中国派遣军下达打通大陆交通线的命令。其作战方针是从1944年春起，先由华北，次由武汉及华南地区分别开始进攻，占领黄河以南平汉铁路及湘桂、粤汉铁路沿线要地。3月日军修复黄河大铁桥。4月17日拂晓，日军以第十二军所属第三十七、第六十二、第一〇一师团和战车第三师团为基干，加上4个独立旅团和1个骑兵旅团，总人数约10余万人，在冈村宁次指挥下，在河南开封以西中牟县一带渡过黄河，开始向豫中进攻。河南属国民党第一战区，有驻军40余万人，其中多数属汤恩伯军事集团。经过两年的休战，汤部斗志松懈，临战时，又由于对敌人的战略意图不明，误认日军只是骚扰性的活动，所以既无周密的作战计划，又无必要的应急措施，除了非嫡系部队刘茂恩、孙蔚如、马法五等部进行了较积极的抵抗外，装备优良的汤部却望风而逃。4月22日，郑州陷落。5月1日，许昌丧入敌手。平汉铁路河南段被敌全部占领。5月25日，河南省会洛阳失守。此役，国民党丢失了38座城市，损失近30万人。5月底，日军调动10万兵力向湘北进攻，发起湘桂战役。湖南战场上国民党有30余万军队，在日军大举进攻下节节溃败。27日，日军主力由岳阳渡新墙河南犯，相继占领了湘阳、平江、沅江、浏阳、益阳、宁乡、湘潭、株洲等地，形成了对长沙的包围。6月18日，日军占领长沙。8月初，衡阳失陷，蒋介石嫡系第十军军长方先觉投敌。粤汉路以东的广大国土被日军占领。8月29日，日军以9个师团又2个旅团共约11万人的兵力，沿湘桂铁路进犯广西。同时，日军又分别从广州和雷州半岛出动，配合对桂北的进攻。11月10日，广西省会桂林陷落。11日，柳州失陷。12月10日，占领越南的日军经龙州向北进犯，与从柳州南下的日军会攻南宁。国民党守军不战而逃，日军于24日占领南宁。至此，从中国东北直至越南河内的大陆交通线，终于被日本侵略者打通。国民党军溃退入贵州。日军以3000余人的兵力沿黔桂公路追击，如入无人之境。12月2日，日军追到贵州独山，逼近四川，震动重庆。豫湘桂战役持续近8个月，国民党军损失兵力五六十万人，丢弃了河南、湖南、广西、广东、福建、贵州等省的大部或一部，使20余万平方公里的国土沦丧敌手，6000余万同胞处于日军铁蹄蹂躏之下。在这次大溃败中，中国人民生命财产所受的损失是无法统计的。河南损失88家工厂；湘桂粤3省的工厂占大后方工厂的三分之一，全部落入敌手；湖南著名的钨、锑等重要战略物资，全被日军攫夺；豫湘桂是重要农业地区，也被日军掌握。日军所到之处残暴地烧杀抢掠，仅萍乡一地，被杀害者1.9万余人，被虏者2万余人，妇女被侮辱者6000余人，房屋被毁700余间，农具被毁值4700余万元，米谷被劫5万余担，棉花被劫9500余担。战争中几十万难民颠沛流离，每天数百人死于疾

病冻饿。

豫湘桂战役的大溃退是抗战以来国民党正面战场的第二次大溃退，是国民党政府长期执行避战、观战政策，因而使部队大部丧失抵抗信心和战斗力的结果。国民党军事上的溃败，正是其政治上腐败的表现。　（林健柏）

赫尔利来华

1944年9月6日，美国总统罗斯福私人代表赫尔利来华推行扶蒋反共的对华政策。

1944年，解放区战场取得了局部反攻的胜利。国民党战场则在豫湘桂战役中遭到惨败。国共两党力量的消长和战后中国的前途，使美国感到焦虑和不安。9月6日，赫尔利以美国总统罗斯福(Franklin Delano Roosevelt，1882—1945)私人代表身分来华。美国政府给赫尔利(Patrick Jay Hurley，1883—1963)的使命是：一、防止国民政府的崩溃；二、支持蒋介石做中华民国的主席与军队的委员长；三、使蒋委员长与美国司令官间的关系和谐；四、增进中国境内战争物资的生产并防止经济崩溃；五、为击败日本计，统一中国境内一切军事力量。10月21日，赫尔利任美国驻中国大使。11月7日，赫尔利到延安，与中共毛泽东会谈。10日，双方签订《中国国民政府、中国国民党与中国共产党协议》(即《五条协定草案》)，内容是：1.中国政府、中国国民党及中国共产党应通力合作，为击败日本而统一所有国内武力，并共同致力于中国的改建工作。2.改组国民政府，成立联合政府和联合军事委员会，由所有抗日军队派遣代表构成。3.联合政府应遵照孙中山先生所倡原则，创设一民治民有民享之政府。联合政府所采取政策，其目标应为：提倡进步与民主，主持公道及维护信仰自由、出版自由、言论自由、集会结社自由，并给予人民以向政府请愿之权利，以及居住不受侵犯之权利。联合政府亦应采取政策，俾前规定之免除恐怖之自由及免除贫乏之自由，得以有效实施。4.一切抗日武装力量应遵守并实施联合政府及联合军事委员会之命令，并由政府及联合军事委员会予以承认。所有获自友邦之军事配备，应公平分配与各该武力。5.中国联合政府承认中国国民党、中国共产党及一切抗日政党为合法政党。赫尔利回重庆后，于11月18、19日同蒋介石会谈，并将《五条协定草案》交蒋介石，遭国民党拒绝。11月19日，蒋介石向共产党提出3点反建议，其主要内容是：1.共产党必须“竭诚”拥护国民党政府，并把其军队交给它指挥，然后才允许一些共产党的高级军官参加国民党的军事委员会。2.中共领导的军队，改编为“国军”之后，始可享受与国民党军队的同等待遇，方承认中国共产党的合法地位。3.国民党愿依其《抗战建国纲领》的规定，给各项民主自由以保障。但同时，又强调要“受抗战期间军事委员会需要之限制”。赫尔利随之变卦，背弃了他在延安的诺言。11月21日，赫尔利将国民党的“反建议”交周恩来。之后，周恩来与赫尔利继续谈判。12月28日，周恩来致函赫尔利，说明中共不愿在联合政府问题上“继续抽象的探讨”。并向国民党提出4点要求：1.释放政治犯；2.撤销对边区的包围和对华中、华南抗日武装的进攻；3.取消限制人民自由的各种禁令；4.停止特务活动。赫尔利声称这些要求不是一般“原则问题”，而是“特殊细目”，要求再就“原则问题”上进行谈判。1945年1月24日，周恩来到重庆。国共两党代表和赫尔利参加举行了多次会谈。1月25日，赫尔利与国民党策划了一个新方案，在3点“反建议”之外又提出补充措施，即在国民政府行政院之下，附设一个类似战时内阁的机构，作为行政院的“决策机构”，由7至9人组成，共产党及其他党派，均被“邀请参加”；由国共两党和美国军官各1名负责拟定改编中共领导的军队计划；由蒋介石委派1名美国军官充任中共领导的武装的直接司令长官。中共代表周恩来予以拒绝，指出国民党的建议，是“依然保持其对政府的控制”，反对成立联合政府。中共的立场是准备把军队交给废止一党专政后成立的民主联合政府，决不能把军队的指挥权交给国民党；也反对只改编中国共产党的军队，全国的一切军队都应改编。中共坚持只有在实现民主政治、建立民主联合政府的基础上，才能谈“军事统一”。谈判无结果。2月26日，周恩来返回延安。国共谈判基本结束。1945年4月2日，赫尔利在华盛顿国务院记者招待会上的谈话中，公开宣称不同中国共产党合作。毛泽东在为新华社写的《评赫尔利政策的危险》的评论中指出：“这个以赫尔利为代表的美国对华政策的危险性，就在于它助长了国民党政府的反动，增大了中国内战的危机。”赫尔利因支持蒋介石的反共政策而受到中国人民的坚决反对，于1945年11月27日离职。　（林健柏）

史迪威事件

1944年10月19日，美国总统召回驻中国战区参谋长史迪威的事件。

1942年1月，应中国战区最高统帅蒋介石的请

求，美国派史迪威为美军驻中国协调抗日的最高军事代表、中国战区参谋长。3月上旬，史迪威抵重庆。他来华的任务是：监督美国援华物资的分配与使用；指挥在华美军及蒋介石拨交的中国军队；控制在中国境内的滇缅公路。而蒋介石要求美国派任中国战区参谋长，主要目的是为了便于从美国得到更多的军事援助，装备嫡系部队，壮大自己的实力。史迪威抵华后，在他的政治顾问戴维斯·谢伟思等协助下，比较客观地了解到中国共产党在抗战中的作用，赞同国共合作抗日。主张凡是中国抗日的力量，都应得到国际的援助。他在重庆设立中、印、缅区美军指挥部，指挥中国军队入缅甸作战，收复了缅北，打通了中印公路。6月，史迪威向蒋介石提出整顿中国军队的计划。在印度加尔各答西北设立1个训练中心，由美国空运武器并派军官来训练和装备中国在印、缅的部队。同时撤换国民党某些高中级军官，改由美国军官直接指挥。蒋介石对此均未同意，史迪威很不满。1943年9月，史迪威建议蒋介石调西北方面的国民党军队和共产党的兵力，出山西、河南，袭击平汉线，进逼郑州、武汉，以扭转中国战局，并要求蒋介石拨出一部分武器给共产党领导的军队使用。遭蒋介石拒绝。史迪威对蒋介石这种无视抗战大局的偏私态度极为不满。他们之间的矛盾日益加剧。1944年9月，美国政府派赫尔利以美国总统私人代表身分来华调解蒋史之间的矛盾。9月25日，蒋介石以备忘录形式请赫尔利电转美国总统罗斯福，说明不能委以史迪威统率中国军队的重大责任，要求将史迪威调离中国。赫尔利急电罗斯福说：如是总统在目前的争执中支持史迪威，他将失去蒋介石，可能也失去中国。他建议请另派与蒋介石能够同心协力之年轻将领来华。罗斯福虽然对蒋介石有所不满和批评，但是他还是认为蒋介石是唯一能保持中国统一的人，加上美国政府内部的压力，终于在10月19日电召史迪威回国。并经蒋介石同意另派魏德迈任中国战区美军司令兼任蒋介石的参谋长。10月21日，史迪威离华返美。中美关系在抗战时期出现的短暂友好，就这样被断送了，代之而来的，是赫尔利扶蒋反共的政策。　　（林健柏）

八路军南下支队挺进华南

1944年11月，八路军独立第一游击支队由延安经豫、鄂、湘向华南敌后挺进的作战行动。

1944年下半年，日军向粤汉铁路和湘桂铁路沿线的国民党军进攻。国民党军败退，湘、粤、桂等省大片国土沦入敌手。为增强华南的抗日力量，10月，中共中央决定以八路军第一二〇师第三五九旅主力4000余人组成国民革命军第十八集团军独立第一游击支队，简称南下支队，王震任司令员，王首道任政治委员。它的任务是挺进华南，打通与广东人民抗日游击队东江纵队的联系，开辟湘赣粤桂边的五岭抗日根据地，造成南方一翼，以便将来配合全国的战略反攻。11月1日，南下支队举行誓师大会。11月10日从延安出发，经山西，渡黄河，过陇海路、平汉路，于1945年1月底到达河南、湖北交界的大悟山，与新四军第五师会师，将随同南下的干部大队移交给中共鄂豫皖区委，胜利完成了开进和护送干部的任务。2月19日至23日，南下支队从黄冈以东分批渡过长江，26日在大冶南的大田畈击退尾追之日军独立混成第八十四旅团，歼敌100余人。3月26日，南下支队进占湖南平江县城，改称湖南人民抗日救国军。旋即转战鄂南、湘北，打退了日伪军和国民党顽军的多次进攻。7月，鄂南伪军及大股土匪均被歼灭或击溃。长江以南，赣北彭泽以西，湘北岳阳以北地区，除公路、铁路及少数孤立日伪据点外，大部获得解放，开辟了以鄂南为中心的湘鄂赣游击根据地，东西150公里，南北100多公里，拥有200多万人口和13个县政权。7月初，湖南人民抗日救国军继续南进，8月5日，渡过湘江，向湘粤赣边进军。8月24日进入江西崇义地区。8月28日到达广东南雄西北的百顺地区。因遭国民党顽军重兵围攻，难于立足，遂于10月5日回到鄂豫皖边根据地，再次与新四军第五师会合。10月中旬，奉命恢复第三五九旅番号，编入第五师野战兵团序列。南下支队历时近一年，转战陕西、山西、河南、湖北、湖南、江西、广东7省，行程7900多公里，作战74次，打击了日伪军，粉碎了国民党顽军的围攻和拦阻，到达了目的地。由于形势发生根本变化，未能实现创建五岭抗日根据地的战略企图，但保存了基本力量，推动了粤汉铁路沿线人民的抗日斗争，扩大了共产党和八路军的影响，对巩固和发展中原解放区起了积极作用。　　（林健柏）

新四军第一师主力向东南敌后发展

1944年12月，粟裕率新四军第一师主力由苏中渡江南下，执行向东南敌后发展的战略任务。

1944年12月27日，新四军第一师3个团在粟裕师长率领下，由苏中渡过长江南下，于1945年1月上旬到达苏浙皖边长兴地区与原第六师王必成第十六旅会师。13日，苏浙军区成立，粟裕任司令员，

谭震林任政治委员(未到职),下辖4个纵队,并确定了进军部署。第一纵队进至安吉、递铺以东、余杭以北,开辟莫干山及杭(州)嘉(兴)湖(州)地区;第二纵队巩固四明、会稽山区,并逐步向西发展,策应主力南进。2月12日,第一纵队向莫干山地区挺进,沿途粉碎了安吉、梅溪等地伪军的出扰,开辟了莫干山地区。这时,国民党第三战区以5个团的兵力,由浙江天目山、孝丰(安吉城西)地区向第三纵队发动进攻,企图断其后路,并消灭之。第三纵队和第一纵队主力于2月14日在浙江天目山进行自卫反击作战,至18日结束,歼顽军1700余人,乘胜解放了孝丰县城,控制了天目山北部地区,取得了天目山第一次反顽作战的胜利。而后,遵照中共中央关于以巩固现地为宜的指示,加紧建设根据地,并准备粉碎顽军新的进攻。3月1日,国民党第三战区又令苏浙皖挺进军以12个团的兵力向孝丰地区进攻,企图夺取孝丰县城。6日,苏浙军区以第一、第三纵队发起反击,至27日,再次粉碎了顽军的进攻,控制了东、西天目山和临安县城,取得了天目山第2次反顽作战的胜利。苏浙军区部队控制了纵横100余公里苏浙皖边包括10余个县的广大地区,解放了100多万人口。3月中旬,中共中央决定第一师副师长叶飞率教导旅3个团及地方干部数百人南下,于4月到达苏浙皖边,编为第四纵队。国民党军第三战区又增调兵力准备发动新的进攻。苏浙军区一面加紧新区建设,整训部队,准备反击顽军再次进犯,一面以第四纵队一部与第二纵队打通联系,以另一部与地方武装相配合,开辟杭、嘉、湖敌后地区。在此期间,第二纵队主力依托四明山向西发展,并在上虞城(丰惠)附近击溃伪军1个师,占领上虞城。6月,苏浙军区部队取得第3次天目山反顽作战的胜利,巩固了苏浙皖边抗日根据地,扩大了实施战略反攻的前进阵地。大反攻开始后,苏浙军区部队攻克高淳、溧阳、金坛、溧水、长兴、句容、安吉等县城。苏中部队先后占兴化、宝应、泰兴、如皋、海安、盐城、高邮等县城。10月,苏浙军区部队北撤苏中,主力部队发展到3.1万余人,组织地方武装6000余人,胜利完成了坚持苏中、发展苏浙皖边区抗日斗争的任务。　(林健柏)

胡世合事件

1945年春,国民党特务枪杀重庆电力公司工人胡世合的事件。

1945年1月24日,重庆电力公司安装在大梁子的变压器因负荷过重被烧坏。原属该变压器用电的邹容路用户中韩文化协会饮食部私自将其电源线移接到都邮街的变压器上,致使这台变压器也负荷过重,随时有被烧坏的危险。电力公司于2月19日派人前往取缔。这里名为中韩文化协会饮食部,实际是一个国民党要员与特务活动的场所。当电力公司工人来执行任务时,遭到该饮食部对外经理、特务江德茂的无理阻挠,并指挥爪牙围攻、毒打工人。电力公司广大职工对这种野蛮暴行无比愤慨。2月20日,电力公司又派胡世合等工人前去劝阻剪火。该饮食部吴汉治竟唆使暴徒围打胡世合等人。当这些受伤工人被暴徒、特务扭送去保安总队路过民国路口时,中韩文化协会饮食部外交经理、国民党军统特务田凯竟开枪射击,弹中胡世合小腹,血流如注。保安队警和特务们把胡世合强拖到保安总队。胡世合由于伤势过重,流血过多,饮恨惨死。胡世合被惨杀后,电力公司职工和重庆市民怒火填胸,自发起来行动。中共中央南方局因势利导成立了以王若飞为首的总指挥机构,开展声援受害者、反对国民党特务统治的斗争。电力公司产业工会召开了全体职工紧急会议,成立了"胡世合事件申冤后援会"。同时以工会名义,举行记者招待会报告惨案经过,向国民党当局提出"杀人偿命、枪毙凶手"等要求。电力公司全体职工还向社会人士发出吁请主持正义、代为申冤的启示。南方局还通过地下组织的青年组和"据点",发动工人群众,书写和印刷为胡申冤的传单与抗议书,向市民群众散发,并在工人中组织"援胡委员会"发起募捐。许多民主党派、工厂、企业、学校发表声明和宣言,声讨特务罪行,揭露国民党独裁统治的黑暗。10天内,参加吊唁胡世合的群众达20多万人次,形成了一次声势浩大的群众性的民主运动。2月26日,国民党当局被迫将杀人凶手田凯绑赴刑场枪决,并抚恤胡世合家属。斗争取得了胜利。　(林健柏)

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召开

1945年4月23日至6月11日,中国共产党在延安召开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

中共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的召开,经过了长期的酝酿和筹备。1937年12月,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曾决定1938年内召开"七大",并成立了一个由25人组成的准备委员会,主席是毛泽东,书记是王明。由于战争紧张和准备工作不足,大会未如期举行。1938年9至11月间召开的中共扩大的六届六中全会作出了《关于召集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的决议》,决定加紧完成准备工作,在较短时间内召开"七大",

代表名额定为350人。1939年6月和7月,中共中央书记处先后两次发出关于选举"七大"代表问题的通知,决定再增加100名正式代表和150名候补代表,要求1939年9月1日前代表选举完毕。1940年,各地中共组织选出的"七大"代表陆续来到延安。曾准备在1942年召开中共"七大",由于敌后斗争极为紧张残酷,前方领导干部不便离开工作岗位,同时又开始了全党整风学习,大会又未开成。1943年8月1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发出《关于"七大"代表赴延出席大会的通知》,指出"七大"准备在年底举行,并决定在一些敌后根据地再增加代表120人(连前共计代表720人)。由于当年国民党顽固派发动了第三次反共高潮,同时全党又进行审查干部的工作以及党的高级干部深入学习党的历史和党的路线问题,大会又未能召开。1944年5月19日中共中央为召集中共扩大的六届七中全会发出通知说:"为着进行'七大'准备工作,决定召开七中全会。"在5月21日召开的中共扩大的六届七中全会第一次会议上,具体讨论了"七大"的议程。1945年3月31日,全会通过了为"七大"准备的政治报告草案和新党章草案。4月20日,全会又通过了为"七大"准备的军事报告草稿以及通过了《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4月21日,中共中央召开了"七大"预备会议。会议正式通过了七中全会向"七大"提出的大会主席团名单。毛泽东在会上作了《"七大"工作方针》的报告。回顾了中国人民和共产党经历的曲折而光荣的革命斗争历史,指出"七大"的方针是:"团结一致,争取胜利。"1945年4月23日至6月11日,中共在延安召开了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出席大会的正式代表547名,候补代表208名,代表着121万党员。毛泽东在开幕词中指出,中国面临着两个前途和两种命运的斗争,党的任务是要用全力去争取光明的命运,反对另外一种黑暗的前途和黑暗的命运。在大会上,毛泽东作《论联合政府》的政治报告;朱德作《论解放区战场》的军事报告;刘少奇作《关于修改党章的报告》;周恩来作《论统一战线》的重要发言。大会通过了《关于政治报告的决议案》、《关于军事报告的决议案》和《中国共产党党章》。还通过了《关于死难烈士追悼大会的决议》。大会认为,在抗日战争胜利以后,中国将面临两个前途和两种命运的斗争。为此,大会制订了党的政治路线,即"放手发动群众,壮大人民力量,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打败日本侵略者,解放全国人民,建立一个新民主主义的中国"。毛泽东代表中共中央委员会所作的《论联合政府》的政治报告,科学地分析了国际、国内形势,系统地总结了24年来中共领导新民主主义革命的经验,提出了夺取抗战最后胜利的政治路线,并且详细论述了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的一般纲领和现阶段的具体纲领。报告指出,中国一切问题的关键所在,就是两条不同指导路线的存在,即国民党消极抗战的反人民路线和共产党积极抗战的人民战争路线。正是由于国民党采取了对日消极作战、积极反共反人民的政策,"招致了战争的挫折,大部国土的沦陷,财政经济的危机,人民的被压迫,人民生活的痛苦,民族团结的被破坏"。国民党反动政策的总根源,就在于它坚持1927年发动内战以来的一党专政法西斯统治,代表一小撮中国大地主、大银行、大买办阶层的利益,企图在抗战中削弱和孤立中国共产党,使它变成了动员与统一中国人民一切抗日力量的障碍。共产党由于实行动员广大人民群众、坚决抗日的人民战争路线,不但有力地打击了敌人,牵制了敌人的进攻,而且发展和壮大了自己。中国解放区、八路军、新四军已经成了全国抗战的重心和主力军。报告着重论述了中共在整个资产阶级民主革命阶段的一般纲领,指出在中国的现阶段要建立的国家制度,不应该是大地主大资产阶级专政的国家制度,也不应该是资产阶级专政的国家制度,暂时也还不是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制度,而是"一个以全国绝大多数人民为基础而在工人阶级领导下的统一战线的民主联合的国家制度",即新民主主义的国家制度。根据民主革命阶段的一般纲领,毛泽东指出,当前最重要的是立即废止国民党一党专政,建立民主联合政府。国民党的一党专政,是中国民族团结的破坏者、是国民党战场抗日失败的负责者,是动员和统一中国人民抗日力量的根本障碍,是内战的祸胎。废止国民党的一党专政,是彻底消灭日本侵略者、在全国范围内实行民主改革的基本前提条件。报告提出了结束国民党一党专政的两个步骤:第一步,召开各党派和无党派的代表会议,成立临时的联合政府;第二步,召开民主选举的人民代表会议,成立正式的联合政府。报告指出,中国只能走这条路。这是一个历史法则,是一个必然的、不可避免的趋势,任何力量,都是扭转不过来的。报告指出了打败日本侵略者、建设新中国的根本途径,是放手发动群众,壮大人民力量。要在工人阶级的领导下,放手发动农民群众,重点放在人民军队和解放区的壮大和发展上。只有这样,才能把抗战的胜利变成人民的胜利。报告论述了打败日本侵略者、建设新中国的关键,是加强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指出:没有中

国共产党的努力，没有中国共产党人做中国人民的中流砥柱，中国的独立和解放是不可能的。为此提出要树立新的工作作风，即理论和实践相结合的作风，和人民群众紧密地联系在一起的作风以及自我批评的作风。强调理论和实践密切地相结合，是共产党区别于其他任何政党的显著标志之一。《论联合政府》的报告，对于指导全国人民争取抗日战争的最后胜利和中国人民的解放斗争起了重大的作用。朱德在《论解放区战场》报告中，论述了人民军队和根据地的创建、发展过程，及其在抗战中的伟大作用和战绩，总结了根据地军民抗战的经验。还论述了抗日战争中国共两党两条不同的军事路线，系统地阐明了人民军队的建军原则和人民战争的战略战术，它是敌后抗日根据地获得胜利的关键。报告提出了八路军、新四军的战略任务，是逐步地实现从游击战争向正规战争的战略转变，以迎接抗日大反攻。刘少奇作的《关于修改党章的报告》，根据马列主义的建党原则，总结了中共的历史经验，全面地阐述了新党章的特点：第一，规定了“中国共产党，以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与中国革命实践之统一的思想——毛泽东思想，作为自己一切工作的指针”。新党章又规定，努力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是每个共产党员的义务。这是新党章最显著的一个特点。第二，强调了“群众路线，是我们党的根本的政治路线，也是我们党的根本的组织路线”。新党章充分体现了共产党的群众路线的优良传统与作风，这是新党章的又一特点。第三，对共产党的民主集中制作了具体的规定，增加了党员义务和权利的新条文。大会通过了新党章，选举产生中央委员 44 人、候补中央委员 33 人。在选举中坚持三个原则：1. 对过去犯过错误的同志，不一掌推开，只要他承认错误，决心改正错误，还可以入选；2. 对于中国革命在长期分散的农村环境中形成的“山头”，既要承认和照顾，又要缩小和消灭，要把各个地方、各个方面的先进代表人物都选进中央委员会；3. 不要求每一个中央委员都通晓各方面知识，但要求中央委员会通晓各方面知识，因而要把有不同知识和才能的同志集中选出来。6 月 19 日，七届一中全会选出 13 名中央政治局成员，选举毛泽东、朱德、刘少奇、周恩来、任弼时为中央书记处书记，毛泽东为中央委员会主席。“七大”是中国共产党在民主革命时期召开的最后的、也是最重要的一次代表大会。这次大会是一个团结的大会，胜利的大会。

（林健柏）

国民党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召开

1945 年 5 月 5 日至 21 日，国民党在重庆召开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

抗日战争即将取得最后胜利的前夕，国民党统治区的民主运动高涨，全国人民迫切要求废除国民党一党专政成立联合政府。为了夺取抗战胜利果实，维护一党独裁统治，国民党于 1945 年 5 月 5 日召开了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到会代表 600 人，中央执行委员、候补执行委员、监察委员、候补监察委员 149 人，共 749 人。这时国民党党员人数 692 万人。国民党总裁蒋介石主持开幕式并致词，提出大会有 3 项任务：1. 加强战斗力量，争取抗战胜利；2. 确定实施宪政，完成革命建国大业；3. 增进人民生活，贯彻革命终极目标。大会听取了吴铁城的党务报告、吴鼎昌的政治报告、程潜的军事报告、白崇禧的续军事报告、翁文灏的经济报告、潘公展的特种问题报告、何应钦的中国陆军总司令部组织情形及湘西战役经过报告以及几个省的党务报告。这次代表大会的中心议题之一，就是决定继续坚持独裁，拒绝成立联合政府。它装出“还政于民”的姿态，决定于 1945 年 11 月召开国民大会，并由这个大会通过一部所谓“宪法”。但出席大会的代表，却是抗战前由国民党中央指定或包办“选举”出来的。大会将通过的宪法，也是以国民党政府于 1936 年公布的、维护大地主大资产阶级利益的“五五宪草”为依据。国民大会的职权，也要由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来决定。大会围绕着抗日和民主的问题，展开了争论。国民党民主派屈武等人提出了《加强民主设施促成国家统一案》，反对以武力消灭中共，主张在国民大会前，先承认各党派之合法地位与活动。国民党民主同志联合会发表了《向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的建议书》，要求国民党放弃多年党治，与全国抗战各党派共商解决国事；主张政治的革新，确遵民主的法治精神，保障全国人民的民主自由，取消现存之特务机关及其性质类似的组织；明令各党派合法的存在，以促进国家民主与统一。这些建议却遭到了国民党反动集团的压制。这次大会通过的《政策纲领》以及关于农业、土地、工业等方面的政策纲领，除了作出一些诸如保障人民自由和实行耕者有其田等虚伪的诺言外，还规定将都市土地、一切山林、川泽、矿产、水利，一律收归公有；企业及为私人之力所不能办者，均归国营或公营。就是说，这一切将由大地主大资产阶级的国家所占有，以扩大四大家族在各方面的垄断地位。加强反共，准备内战，

是国民党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另一个重要问题。蒋介石在会上强调说，今天的中心工作，在于消灭共产党。大会决定成立一个“特种审查委员会”，专门讨论反共方案。大会通过了《对中共问题之决议案》，内称：“在不妨碍抗战危害国家之范围内，一切问题，可以商谈解决。”这就是说，国民党随时可以以“妨碍抗战危害国家”为借口发动内战。另外，还对其内部发出《本党同志对中共问题之工作方针》，明确提出反对联合政府，反对解放区人民代表会议。还要其全体人员“努力奋斗，肃军肃政，加强力量”，准备发动内战。国民党“六大”，是坚持独裁、准备内战的大会，是代表着黑暗的中国之命运的大会。 （林健柏）

《中苏友好同盟条约》签订

1945年8月14日，中国国民党政府与苏联政府在莫斯科签署《中苏友好同盟条约》。

1944年，世界反法西斯战争取得了决定性胜利。1945年2月，苏联部长会议主席斯大林、美国总统罗斯福、英国首相邱吉尔（Sir Wirston Churchill，1874—1965）在苏联克里米亚半岛的雅尔塔会晤，安排战后世界格局，签署关于同日本作战的秘密协定。秘密协定涉及中国的主权和利益，但它是由3大国首脑背着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作出的，损害了中国主权。6月15日，美国驻华大使赫尔利受美国新任总统杜鲁门（President Harry Truman，1884—1972）之命，向蒋介石递交《关于中国国民政府和苏联协定纲要的说明》，并附雅尔塔协定秘约的全文。6月27日，宋子文等由重庆飞往莫斯科。中苏双方从6月30日到7月12日举行6次谈判。国民党政府方面参加的有行政院长兼外交部长宋子文及其随员蒋经国、外交部次长胡世泽、中国驻苏联大使傅秉常等。苏联方面有部长会议主席斯大林、外交人民委员部部长莫洛托夫、副部长罗佐夫斯基、苏联驻华大使彼得洛夫。7月14日，斯大林和莫洛托夫前往德国参加波茨坦会议。宋子文、蒋经国和苏联驻华大使也于同日回重庆。中苏会谈中断。由于远东局势急剧变化，中苏会谈加速进行。从8月8日（苏联对日宣战）到13日，举行3次谈判。双方参加谈判的人员，除中方增加新任外长王世杰外，其他无变动。这3次谈判，主要形成互换照会的文本。8月14日举行谈判，双方外长签署了《中苏友好同盟条约》以及《中苏友好同盟条约之换文》、《关于外蒙古问题之换文》、《中苏关于大连之协定》、《关于大连协定的议定书》、《中苏关于旅顺口之协定》、《1945年8月14日在莫斯科签订的关于旅顺口协定的附件》、《关于中苏此次共同对日作战苏联军队进入中国东三省后苏联军总司令与中国行政当局关系的协定》、《中苏关于中国长春铁路之协定》。《中苏友好同盟条约》的主要内容是：在对日作战中，两国互相支援；战后共同防止日本再侵略；双方友好合作，并相互给予可能的援助。莫洛托夫声明：苏联政府同意予中国以道义上与军需上及其他物资之援助完全供给国民党政府；苏联政府重申尊重中国在东三省之充分主权，并对其领土行政之完整重申承认；关于新疆最近事变，苏联政府重申无干涉中国内政之意。王世杰声明：因外蒙古人民一再表示其独立愿望，中国政府声明于日本战败后，如外蒙古之公民投票证实此项愿望，中国政府当承认外蒙古之独立，即以其现在之边界为边界。关于大连的协定及议定书宣布大连为自由港；大连之行政权属于中国；港口主任由苏籍人员中遴选；中国以所有港口工事及设备之一半无偿租与苏方。中国政府同意中苏两国共同使用旅顺口为海军基地。关于中国长春铁路之协定规定该路由中苏两国共同所有、共同经营；由中国人任理事长，苏联人任铁路局局长。上述关于大连、旅顺口及长春铁路之协定，期限均为30年。关于苏联军队进入中国东三省后苏军总司令与中国行政当局关系的协定，保证中国行政机构与苏军总司令积极合作。此外，苏联政府在备忘录中答应在打败日本后的3个月内从中国东北撤走一切苏联军队。1945年8月24日，中苏两国政府在重庆交换条约及附件批准书；8月27日，两国同时公布。1950年2月14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与苏联政府签订《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1945年8月14日中苏所缔结的条约与协定即失效。

（滕文藻）

日本无条件投降

1945年8月14日，日本政府宣告接受波茨坦公告，15日，日本天皇裕仁以广播“终战诏书”形式宣布无条件投降。

1945年5月2日，苏联军队攻占柏林。5月8日，德国宣布无条件投降，欧洲反法西斯战争胜利结束。在中国战场上，八路军、新四军从5月开始发动了大规模的夏季攻势，基本上把日军逼退到铁路沿线和一些主要公路线，为转入全面反攻创造了有利条件。7月17日至8月，苏、美、英三国在德国波茨坦举行会议。7月26日，中、美、英三国发表促令日本无条件投降的公告。8月6日和9日，美国先后在

日本广岛和长崎各投下一枚原子弹。8月8日，苏联政府宣布加入波茨坦公告并宣布对日作战。翌日零点10分，苏联远东军170余万人，配以火炮2600多门，坦克5500余辆，飞机3800余架，在华西列夫斯基元帅指挥下，分3路从600公里的战线上进入中国东北。日本关东军75万人全线溃退。苏联远东军在中国抗日联军和其他人民武装的配合下，迅速解放了长春、齐齐哈尔、哈尔滨、沈阳等大城市和东北大片土地。同时，切刘米索夫中将率第十六集团军攻入南库页岛；格涅奇少将率部攻占千岛群岛；奇斯佳科夫上将率第二十五集团军直扑朝鲜。8月9日，毛泽东发表《对日寇的最后一战》的声明，号召八路军、新四军及其他人民军队，应在一切可能条件下，对于一切不愿投降的侵略者及其走狗实行广泛的进攻。10日和11日，延安总部连续发布受降及对日军展开全面反攻的7道命令，命令各解放区抗日武装部队向敌伪发送通牒，限其在一定时间内缴械投降。从8月9日至9月2日，八路军、新四军共歼灭日伪军5.79万余人，攻克和收复县城139座、据点740多个，破坏和切断了平汉、津浦、正太、同蒲、平绥(东段)、北宁等铁路线，使各大解放区基本上连成一片。8月9日上午10时，日本天皇裕仁召开最高战争指导会议。8月10日，日本通过瑞士、瑞典等中立国政府向中、美、英、苏4国政府发出乞降照会。8月14日，日本天皇裕仁表示接受波茨坦公告。8月15日，日本以广播天皇"终战诏书"的形式正式宣布无条件投降。9月2日，在日本东京湾美军主力舰"密苏里"号上举行投降签字仪式，日本外相重光葵、参谋总长梅津美治郎分别代表日本天皇和政府及日本大本营在投降书上签字。由盟军最高统帅麦克阿瑟、中国代表徐永昌、美国代表尼米兹、苏联代表德勒维亚克、英国代表福莱赛以及澳大利亚、加拿大、法国、荷兰、新西兰等9国代表签字接受降书。中国战区日军投降签字仪式于9月9日9时在南京原中央军校大礼堂内举行。中国陆军司令何应钦代表中国战区最高统帅，率受降官第三战区司令长官顾祝同、陆军参谋长肖毅肃、海军总司令陈绍宽、空军第一路司令张廷孟等接受日军投降。中国战区日军投降代表是日本中国派遣军总司令官冈村宁次、总参谋长小林浅三郎、副总参谋长今井武夫、参谋小笠原清、舰队司令官福田良三、台湾军参谋长谏三春树、第三十八军参谋长三泽昌雄共7人。冈村宁次在投降书上签了字。至此，中国抗日战争和第二次世界大战胜利结束。

(林健柏)

芷江洽降

1945年8月21日—23日，中国战区陆军总司令部在湖南芷江约见侵华日军洽谈代表的事件。即是"芷江洽降"。

1945年8月15日，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后，蒋介石在8月17、18两日连续两次电令侵华日军总司令冈村宁次大将派代表到芷江洽降。19日，冈村宁次派其副参谋长今井武夫少将及参谋、翻译数人，乘坐中型双引擎运输机前往芷江。由于日军代表系副参谋长，中国陆军总司令何应钦安排陆军总参谋长肖毅肃中将出面，代为接见。重庆方面，派陆军副总参谋长冷欣中将和蔡文智少将、处长钮先铭少将先抵芷江，做受降准备。21日，自汉口起飞的日本九五式运输机，两翼系着红色布条，于11时20分被引导到芷江军用机场着陆。着陆次序是：前后为中国飞机，日本飞机排第2位，美国飞机紧随其后。日机一着陆，机外悬挂的太阳旗即被美国飞行员扯去，作为战胜日军的纪念品。今井武夫在机门前，请示前来接待的陈应庄能否下飞机。在陈应庄的允许下，今井武夫等8人走下飞机，由中美宪兵搜查全身，检查行李。然后，分乘两辆插有白旗的吉普车，驶向离机场约2公里的招待所。中外记者沿途拍照，今井武夫手握军刀，面带戚容，缄默无语，随员情绪皆颇紧张。今井武夫向肖毅肃等敬礼，报告了自己的身分后说：天皇业已接受波茨坦公告，日本政府代表将在马尼拉向盟军最高统帅麦克阿瑟将军办理投降手续。在此之前，本人无代表签订降书之资格，仅系负责联络任务，前来接受蒋委员长和何总司令指示。肖毅肃按受降准备的程序，介绍了在座中美要员的身分之后，便要今井武夫交出日军在中国(包括台湾)、越南和北缅等地的兵力布置、指挥系统表册。今井武夫只呈交了驻华日军战斗序列图册，申明说："冈村宁次司令官仅负责指挥中国战区的日军，台湾、越南、北缅的日军不属他指挥。"中国方面决定按战区划分15个受降区和受降地点，即越南河内、广州、汕头、长沙、南昌、杭州、上海、汉口、徐州、北平、济南、洛阳、郾城、太原、归绥。受降主官是卢汉、张发奎、余汉谋、王耀武、薛岳、顾祝同、汤恩伯、孙蔚如、李品仙、孙连仲、李延年、胡宗南、刘峙、阎锡山、傅作义。

(林健柏)

蒋介石与日伪合流

1945年8月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后，蒋介石在

美帝国主义支持下，与日伪合流抢夺胜利果实。

1945年8月10日，蒋介石获悉日军乞降消息后，于当晚对何应钦发出训令："命令敌军驻华最高指挥官维持现状。"11日，蒋介石连下3道命令：要解放区抗日军队"就原地驻防待命"，不得向敌伪"擅自行动"；令国民党军队"加紧作战努力，一切依照既定军事计划与命令积极推进，勿稍松懈"；要日伪军非经蒋介石许可"不得接受任何部队改编"，"切实负责维护地方治安"。8月13日，八路军朱德总司令、彭德怀副总司令致电蒋介石，坚决拒绝其错误命令。8月15日，日本政府宣布无条件投降。蒋介石发表了《以德报怨》的对日政策广播，要求中国人民对日军不要"企图报复"，不要"以暴行答复敌人从前的暴行"，要"不念旧恶"、"与人为善"等等。8月18日，侵华日军总司令官冈村宁次在《和平后对华处理纲要》中声称："延安方面如有抗日侮日行为，则应断然予以讨伐。""应向中国移交的武器、弹药、军需品等，根据统帅命令指定时间、地点，完全彻底地交中国方面，为充实中央政权的武力做出贡献。"31日，冈村宁次向冷欣表示："日军愿为地方治安、修路和剿匪方面效力。"美国政府为"援助国民党尽可能广大地在中国确立其权力"，竭力主张国民党同侵华日军合流。9月2日，远东盟军总司令麦克阿瑟向日本军队发布第一号命令：在中国境内(除满洲外)、福摩萨(即台湾)及北纬16度以北的法属印度支那境内的日本高级指挥官以及所有陆、海、空军和辅助部队，应向蒋介石投降。日军在蒋介石和冈村宁次以及美国政府反共方针的配合下，仅在华北和江苏北部因抗拒中共武装力量的正当受降而被击毙、击伤者就有7000人之多。与此同时，渝、宁也公开"合流"。还在日本投降前夕，蒋介石通过戴笠向汪伪政府的头目下达"戴罪立功"的手令。日本投降的当天，重庆国民党政府发出命令，委任汉奸周佛海为"军事委员会上海行动总队总指挥"，周立即组织了宁、杭行动指挥部，为蒋介石夺取了沪、宁、杭地区。汉奸陈公博也遵照蒋介石的密电指令，积极纠集伪军配合日、蒋进行反共活动。他多次电告蒋介石，伪南京政府及军事委员会已解散，并成立了临时政务委员会、治安委员会，负责维持社会治安；已将各伪军委以国军番号，以防止共产党军队收缴。伪军头目任援道被委为南京先遣军总司令；伪华北绥靖军总司令门致中被委为北平绥靖司令；伪第二、第三、第四、第五、第六、第七集团军总司令张岚峰、孙良诚、吴化文、庞炳勋、郝鹏举、孙殿英分别被委为第三路、第二路、第五路、第一路、第六路、第四路军总司令，为蒋介石反对共产党、抢夺地盘效犬马之劳。伪军经过数次遣散整并，编为4个纵队(相当师)、两个独立总队，共10万余人，东北自新军先后收编12万余人。这样在已"接收"的城市中，日伪军并未放下武器，依然以统治者的姿态，戒严放哨，检查行人，发号施令。甚至继续在平汉、正太、津浦、胶济、陇海、同蒲、平绥等铁路沿线及大城市周围，不断四出骚扰，进犯解放区。

(林健柏)

国民党政府接收沦陷区城市

1945年8月日本投降后，国民党政府派遣大批官员到收复区接收敌伪物资，掠夺人民财产的事件。

1945年8月，国民党政府制定了《行政院各部会署局派遣收复区接收人员办法》，其要旨是：一、行政院各部会署局为办理接收收复区直属各机关及事业机关，可派遣特派员或接收委员；二、对于接收机关较多、事业较巨者，可分区派遣特派员，该区内各机关、事业单位的接收委员，应受特派员指导；三、特派员办公地点，应以各区受降军事长官驻地为原则；四、特派员及接收委员，一律由各部会署局呈行政院核转陆军总司令部派遣，并受陆军总司令部指导监督。9月5日，在陆军总部下成立党政接收计划委员会，由陆军总司令何应钦任主任委员。下设党团、经济(含粮食、农林、水利等)、内政(含教育、社会、司法、卫生、地方行政等)、财政、金融、外交6组。该委员会委员及各组负责人由各有关机关的代表担任。之后，各省市相应设立了党政接收委员会，由各战区军事长官主持。10月，经行政院院长宋子文签请蒋介石批准，成立行政院收复区全国性事业接收委员会，由行政院副院长翁文灏主持。各地区、各省市相应设立敌伪物资产业处理局。除军事系统的接收由陆军总司令部主持外，一切属行政院范围内的接收、处理工作，全部划归行政院负责。由行政院制定的《收复区敌伪产业处理办法》规定：把全国分为苏浙皖、湘鄂赣、粤桂闽、冀察热、鲁豫晋、东北和台湾7个接收区。国民党派出大批接收大员到沦陷区城市去接收。军队与政府、中央与地方以及各系统各部门都同时插手接收，致使接收机构林立。一些机关和接收大员，趁接收混乱之机，贪污、隐匿、变卖敌伪物资。一些接收大员还任意将收复区的民有企业、房屋指为敌产，然后加以没收，占为私有。人们称国民党的"接收"为"劫搜"，称接收大员是"三洋开泰"(捧西洋、爱东洋、要现洋)、"五子登科"(大抢车子、房子、

金子、衣服料子和婊子)。中央银行接收了伪中央储备银行库存黄金55余万两、白银763余万两、银元37万余枚、美金550万元;伪中国联合银行库存黄金17万两、美金1020余万元、英镑2.6万多镑。官僚资本在金融界的垄断地位更趋加强。据1946年7月经济部统计,国民政府在战后共接收敌伪工厂2411家,大部分被官僚资本鲸吞,致使官僚资本总额在工业资本总额中的比重急速提高,至1946年达到78—80%。国民党政府的经济接收,使社会生产遭到了很大的破坏。大批的工厂停工、商店停业,上百万的工人、店员流浪街头,加上法币涌入收复区,引起物价飞涨,使人民群众处于水深火热之中。北平、南京、上海等地群众失望地说:"盼中央,望中央,中央来了更遭殃。""天上来,地下来,老百姓活不下来。"连当时拥护蒋介石的报纸也说:"无数千万的人民都曾为胜利狂欢过,而今却如水益深,如火益热,大家不得聊生!"　(林健柏)

台湾光复

1945年10月25日,被日本占领的台湾复归祖国的事件。

台湾自古以来是中国的领土。1895年中日甲午战争后,在《马关条约》中清政府被迫将台湾割让给日本。1941年12月9日,中国政府在《中国对日宣战布告》中宣布:所有一切条约、协定、合同有涉及中日间之关系者,一律废止。据此,中日《马关条约》即日起失效,日本对台湾、澎湖列岛的领有权完全失去了法律上的依据。1943年12月1日公布的《开罗宣言》规定:剥夺日本自第一次世界大战开始后在太平洋上占领的一切岛屿;满洲、台湾、澎湖群岛等归还中国。1945年7月26日发表的《波茨坦公告》第8项说:《开罗宣言》的条件必将实施,台湾、澎湖必须交还中国。复由中、美、英3国以联合公告的方式正式通知了日本。8月15日,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消息传到台湾后,台湾各地人民纷纷组织团体,商议如何参加祖国的建设和实现自己的理想。9月间,"台湾人民协商会筹备会"开始活动,号召全省人民团结起来,为争取人民民主政治的实现而斗争。各地中等学校以上的学生,在各学校组织了学生会,并于9月底在台北市举行代表会议,成立"台湾学生联合会"。10月5日,国民党在台北设"台湾行政长官公署前进指挥所";同日,台湾人民在台中市举行大会宣布"台湾人民协会"正式成立。台湾工人群众于10月20日宣布成立"台湾总工会筹备会",展开了工人群众组织的工作。台湾各地农民代表也聚集在台中市举行大会,宣布成立"台湾农民协会"。10月25日上午10时,在台北市公会堂(后改为中山堂)举行受降典礼。中国政府任命陈仪为台湾省行政长官兼台湾省警备司令,代表中国政府受降。日本代表、台湾总督兼第十方面军司令官安藤利吉领受陈仪的第1号命令,办理投降手续。陈仪发表广播说:从今天起,台湾及澎湖列岛正式重入中国版图。所有一切土地、人民、政事皆已置于中国政府主权之下。从此,被日本侵夺50年之久的台湾和澎湖列岛重归中国。接着,台湾省行政长官公署正式成立,行使职权,全省重新划分台北、新竹、台中、彰化、嘉义、台南、高雄、屏东等9个省辖市;宜兰、花连港2县辖市。从10月25日起连续3天,台北全市30万人举行火炬大游行,庆祝台湾光复。　(林健柏)

重庆谈判

1945年8月28日至10月10日,中国共产党和中国国民党在重庆举行的和平谈判。

抗日战争胜利后,国内出现了内战危机。1945年8月14日,蒋介石电邀毛泽东赴重庆,共同商讨国际国内各种重要问题。16日毛泽东复电表示将考虑同他会见的问题。20日蒋再次电邀毛泽东赴重庆谈判。22日毛泽东电告:"兹为团结大计,特先派周恩来同志前来。"23日,蒋介石第3次电邀毛泽东赴重庆。24日毛泽东复电表示准备随即赴渝。8月25日,中共中央召开政治局会议,商定毛泽东、周恩来、王若飞到重庆谈判。同日,中共中央发表《对目前时局的宣言》,提出和平、民主、团结三大口号和在和平、民主、团结的基础上,实现全国统一,建立独立自由富强的新中国的方针。针对国民党阴谋发动内战破坏团结、压制民主的活动,中共向国民党政府提出6项紧急措施:一、承认解放区的民选政府和抗日军队,撤退包围与进攻解放区的军队,以便立即实现国内和平,避免内战;二、划定八路军、新四军及华南抗日纵队接受日军投降的地区,并给予他们以参加处置日本的一切工作的权利,以昭公允;三、严惩汉奸,解散伪军;四、公平合理地整编军队,办理复员,救济难胞,减轻赋税,以苏民困;五、承认各党派的合法地位,取消一切妨碍人民集会、结社、言论、出版自由的法令,取消特务机关,释放爱国政治犯;六、立即召开各党派和无党派代表人物的会议,商讨抗战结束后的各项重大问题,制定民主的施政纲领,结束训政,成立举国一致的民主联合政府,并筹备自由无拘束

的普选的国民大会。8月26日，中共中央向党内发出《关于同国民党进行和平谈判的通知》，指出：国民党在内外压力下，可能在谈判后，有条件地承认我党地位，我党亦有条件地承认国民党的地位，造成两党合作（加上民主同盟等）、和平发展的新阶段。在谈判中我们准备作必要的以不伤害人民根本利益为原则的让步。在采取上述步骤后，如果国民党还要发动内战，它就在全国全世界面前输了理，我党就有理由采取自卫战争，击破其进攻。通知还告诫全党绝对不要因为谈判而放松对蒋介石的警惕和斗争。8月28日，毛泽东和周恩来、王若飞等，在美国驻华大使赫尔利、国民党代表张治中陪同下，由延安飞抵重庆。毛泽东一行抵达重庆九龙坡机场，在机场发表了简短的谈话，指出：目前最迫切者，为保证国内和平，实施民主政治，巩固国内团结。国内政治上、军事上所存在的各项迫切问题，应在和平、民主、团结的基础上加以合理解决，以期实现全国之统一，建设独立、自由与富强的新中国。希望中国一切抗日政党及爱国志士团结起来，为实现上述任务而共同奋斗。毛泽东到达重庆后，先后同蒋介石进行多次商谈。9月3日，周恩来、王若飞同张群、张治中、邵力子就军事、政治等问题交换意见，提出11条建议：一、以和平、民主、团结为统一的基础。二、承认蒋介石在全国的领导地位。三、承认国共两党、各党各派合法平等地位。四、承认解放区政权及抗日部队。五、严惩汉奸、解散伪军。六、重划受降地区，中共应参加受降工作。七、停止一切武装冲突。八、实现政治民主化、军队国家化。九、政治民主化办法：由国民政府召集各党派及无党派代表人物的政治会议；确定省、县自治，实行普选。解放区解决办法：由中共推荐山西、山东、河北、热河、察哈尔5省的主席和绥远、河南、安徽、江苏、湖北、广东6省的副主席以及北平、天津、青岛、上海4市的副市长；中共参加东北行政组织。十、军队国家化之必要办法：中共部队改编为16个军48个师，集中于苏北、皖北及陇海路以北中共驻地；设北平行营及北平政治委员会，由中共推荐人员分任并参加军事委员会及其所属各部工作。十一、党派平等合法之必要办法：释放政治犯，取消特务机关。4日，国民党政府代表根据4日蒋介石亲拟的《对中共谈判要点》，否定中共的建议。9月4日，周恩来、王若飞和张治中、张群、邵力子开始谈判。蒋介石对这次谈判的方针是，准备在政治上作出一些关于开放民主自由的空头许诺，但一定要在“政令军令统一”的名义下取消解放区和人民军队的存在。因此，国民党方面对于中共代表提出的确定和平建国方针、承认党派合法平等、结束党治、召开政治协商会议等项方案，表示接受。但对于解放区政权和人民军队的地位，却坚决不予承认。这两个问题就成为谈判中争论的焦点。为了使谈判能够获得进展，中共方面作了一些让步。9月19日，周恩来向国民党方面提出：关于军队数目，中共“愿让至七分之一”，即“如中央军队缩编为120个师，中共应为20个师”。关于军队驻地，中共第一步准备将海南岛、山东、浙江、苏南、皖南、湖北、湖南、河南境内黄河以南8个地区的军队撤出。第二步再将苏北、皖北、豫北地区的军队撤出，集中于黄河以北7个地区。解放区随军队驻地。由中共推荐山东、河北、察哈尔、热河4省与陕甘宁边区的主席，山西、绥远两省副主席及天津、北平、青岛3市副市长；北平行营由中共主持，并设政治委员会，由中共负责。国民党代表对于中共这一重大让步方案仍不同意，坚持要中共开名单，由政府量才任用，不同意指定省份。在9月21日的谈判中，周恩来指出：国民党的观念是自大的，不平等地对待中共，必将引起中共的愤怒。今日商谈，应取平等态度。如果成立联合政府，中共一切军队皆可交出。建议用民选方法解决解放区问题。由于对方要中共先交出军队和解放区，谈判陷入僵局。此后，中共代表向文化、妇女、产业、新闻各界和各党派、国民党内的民主派介绍国共谈判情况，说明中共的主张，指出导致谈判陷入僵局的责任在国民党方面。从9月27日开始，双方继续谈判。经过43天的谈判，10月10日，国民党代表张治中、王世杰、邵力子和共产党代表周恩来、王若飞在《政府与中共代表会谈纪要》（即《双十协定》）上签字。《会谈纪要》接受了中共提出的和平建国的基本方针，规定双方“必须共同努力，以和平、民主、团结、统一为基础”、“长期合作，坚决避免内战，建设独立、自由和富强的新中国”，确定召开各党派代表及无党派人士参加的政治协商会议，共商和平建国大计。这是会谈取得的一项重要成果。还有迅速结束国民党的“训政”，实现政治民主化，承认人民享有一切民主国家人民应享有的民主自由权利；党派平等合法；取消特务机关；释放政治犯；“积极推行自治，实行自下而上的普选”等等。但解放区政权和国民大会问题未达成协议。双方军队的整编方案也没有解决。10月12日，国共双方公布《会谈纪要》。10月11日，毛泽东返回延安。周恩来、王若飞留在重庆继续同国民党方面商谈。不久，蒋介石便撕毁协议，向解放区发动军事进攻。　　（林健柏）

上党战役

1945年9月10日至10月12日，晋冀鲁豫解放区军民对侵入山西东南部长治地区的国民党军阎锡山部的自卫反击战役。

山西东南部以长治为中心的地区，古属上党郡。这一带的山区在抗日战争时期是八路军第一二九师的根据地，属于晋冀鲁豫解放区。1945年8月中旬，国民党军阎锡山部集中13个师的兵力，在日伪军的配合下，先后自临汾、浮山、翼城和太原、榆次出发，侵入晋东南解放区的襄垣、屯留、长治、潞城等地。自8月26日起，中共中央军委先后指示晋冀鲁豫军区：集中太行、太岳军区主力首先歼灭侵入长治的阎锡山部，收复上党地区。并强调指出，长治等城堡坚垒密，须有充分准备，切不可草率，进攻时宜选择一两城，各个击破。晋冀鲁豫军区抓住史泽波部孤军深入、守备分散的弱点，集中太行、冀南、太岳3个纵队及地方部队一部共3.1万余人，并动员5万民兵配合作战。9月10日，刘伯承、邓小平指挥晋冀鲁豫野战军首先攻击屯留。敌曾两度出援，经与野战军打援部队接触即迅速缩回。12日晋冀鲁豫野战军攻克屯留，17日占潞城，切断了长治与太原、平遥的联系。19日，夺回长子、壶关等县城，孤立了长治守敌。20日，开始围攻长治。被困守在长治城的史泽波，急电阎锡山派兵来解围。9月22日，阎锡山增派第八十三军、第二十三军的6个师及伪军两个师共2万余人，由第七集团军副总司令彭毓斌率领，从太原、榆次沿白晋公路向长治扑来，于10月2日进抵襄垣、屯留交界的磨盘垴、老爷山一带。晋冀鲁豫野战军采用佯攻长治、围城打援的战法，重新调配部队，先打彭毓斌，后占长治城。经过激战，到10月7日黄昏，敌人增援部队除2000余人逃至沁县外，全部被歼，彭毓斌被击毙。长治守敌待援无望，于10月8日向西突围。10月12日，晋冀鲁豫野战军太岳纵队自虒亭取捷径直出沁水以北的马壁，协同追击部队歼灭突围之敌于桃川堡附近地域，解放了长治。上党战役共歼敌11个师及1个挺进纵队3.5万余人，生俘军长史泽波和师长多名，缴获山炮24门，机枪2000余挺，长短枪1.6万余支，给进犯解放区的国民党军以沉重打击，巩固了晋冀鲁豫解放区的后方，加强了中国共产党在重庆谈判中的地位。　（林健柏）

“向北发展，向南防御”方针的提出

1945年9月19日中共中央为争夺东北提出的战略方针。

东北地区在全国占据举足轻重的战略地位。它北靠苏联，东邻朝鲜，西临蒙古，南接冀热辽根据地。这里工业发达，交通方便，资源丰富，粮食充足，可以建设成为巩固的后方。1945年8月8日，苏联对日宣战。次日，苏军进入中国东北。8月15日，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8月下旬，冀热辽军区李运昌所部遵照中共中央的指示，以部分兵力分3路挺进热河和东北，先后解放了山海关、锦州，控制了辽西地区。9月6日进驻沈阳，随即分兵赴辽南、辽东等地，迫使日伪军投降，清剿土匪，初步打开了局面。9月15日，中共中央给各中央局发出指示：目前我党的任务，就是迅速地坚决地争取东北，在东北发展我强大的力量。同时决定建立以彭真、陈云、程子华、林枫、伍修权为委员，彭真为书记的中共中央东北局，立即奔赴东北。9月17日，刘少奇等致电正在重庆的毛泽东和周恩来，提出了“向北推进、向南防御”的战略方针。刘少奇认为：东北为我势所必争，热、察两省必须完全控制。但是，晋察冀军区的现有力量，只能巩固现有地区，不能再有大的力量加强与保障热河和冀东，更无力进入东北。为了控制热河和冀东，对付国民党的威胁，并争夺东北，必须在冀东屯集重兵。这样，才有可能在苏军撤退时，抢先进入东北。为了实现这个计划，全国战略必须确定向北推进、向南防御的方针，否则我之主力分散，地区太大，处处陷于被动。建议新四军江南主力部队立即转移到江北，并调华东新四军10万人到冀东，或调新四军主力到山东，再从山东和冀鲁豫解放区抽调10万人至15万人到冀东、热河一带，而华东根据地则以剩余力量加以扩大去坚持。建议得到毛泽东的赞同。9月19日，中共中央向各中央局发出指示，确定全国的战略方针是“向北发展，向南防御”。指出：“目前我全党全军的主要任务，是继续打击敌伪，完全控制热、察两省，发展东北我之力量并争取控制东北，以便依靠东北和热、察两省，加强全国各解放区及国民党地区人民的斗争，争取和平民主及国共谈判的有利地位。”据此中共中央相应调整兵力部署，继续调兵北上。首先将新四军撤出江南各个解放区，转移到江北，江北新四军主力部队，撤到山东，山东解放区部队开进东北。山东八路军主力部队9万余人分两路进入东北，一路沿津浦路北上，从山海关进入东北，一路从胶东渡海，从貔子窝、庄河等地登岸进入东北。新四军第三师3.2万余人从苏北出发，沿津浦路北上到河北玉田，经承德、朝阳一带进入东北。从陕甘宁出发南

下的第三五九旅，北上与鄂豫皖的新四军第五师靠拢，其他南下部队折回北上。此外，还调集各解放区2万名干部进入东北。各部队到达东北后，遵照中共中央指示，以人民自治军、省联防军名义，组织和发展军队。根据中共中央1945年10月9日的指示，东北临时军事机构东北军区司令部成立，程子华为司令员，彭真为政治委员，伍修权为参谋长。10月31日，为统一指挥东北人民军队，中共中央决定成立东北人民自治军总部（东北军区司令部撤销），林彪任总司令员，彭真、罗荣桓分任第一、第二政治委员。为了掩护人民军队向北发展，阻碍和迟滞国民党进入东北，1945年10月18日，发起平绥、津浦、平汉战役。经过半个多月的激烈战斗，聂荣臻、贺龙所部粉碎了傅作义集团对张家口的进犯；刘伯承、邓小平所部在邯郸地区歼敌3万余人，阻击了孙连仲集团的北犯；陈毅所部切断了津浦线，控制了徐州至济南之间的铁路线150公里，迟滞了国民党军。这3个战役的胜利，打破了国民党从陆上运兵到平、津、张建立基地，抢占东北和热察的计划。掩护了13万军队抢在国民党军前面进入了东北，开辟了广大的东北解放区。

11月中旬以后，东北形势有了变化。大批国民党军开进东北，由开始两个军14万人增加到5个军30万人；东北人民自治军也有很大发展，但未经整训，新去的主力又非常疲劳，情况不熟，不能阻止国民党军进入东北；国民党政府指责苏联供给中共武器反对国民党政府接收主权，向苏方施加压力。在蒋介石的要求下，苏军答应延期1个月从东北撤退，并将各大城市及中长铁路交给国民党接收。据此，1945年11月20日，中共中央及时提出了“让开大路，占领两厢”的方针，把工作重心放在距离国民党占领中心较远的城市和广大乡村，发动群众，建立巩固的根据地。要求东北局“应迅速在东满、北满、西满建立巩固的基础，并加强热河、冀东的工作，应在洮南、赤峰建立后方，作长久打算。只要我们能争取广大农村及许多中小城市，紧靠着人民，我们就能取得胜利。”12月28日，中共中央通过了毛泽东起草的《建立巩固的东北根据地》的指示，全面阐述了建立巩固的东北根据地的任务及其重大意义，要求在距离国民党占领中心较远的城市和广大乡村，建立巩固的根据地。建立根据地的中心工作是放手发动群众，进行清算汉奸、减租减息、增加工资和发展生产。并且组织各种群众团体，建立党的核心，建立群众的武装和人民政权，把群众斗争从经济斗争迅速提高到政治斗争，参加根据地的建设。中央强调，必须给东北人民以看得到的物质利益，群众才会拥护我们，这是群众区分共产党和国民党优劣的重要依据。中央要求东北地区的干部，必须扫除那些不经艰苦奋斗，而依靠意外便利的侥幸取得的错误思想，作长期打算，并准备作出重大牺牲。12月底，东北局及直属部队撤离沈阳，并在抚顺召开了会议。彭真、林彪、林枫、罗荣桓、吕正操、肖劲光、伍修权等参加了会议。会议经过讨论，一致同意中央关于建立巩固的东北根据地的指示，批评了一些人主张攻打大城市的思想。会议决定东北局等领导机关，向哈尔滨、佳木斯一带转移，以适应新形势、新任务的需要。东北局领导军民阻击进犯的国民党军的同时，组织了大批干部，深入北满、东满、西满等广大农村建立民主政权，进行剿匪、清算减租、生产运动等工作，建立和发展巩固的根据地，实现了中共中央的战略目标。　　（林健柏）

三民主义同志联合会成立

三民主义同志联合会是1945年10月28日由国民党内爱国民主人士谭平山等在重庆发起建立的民主党派。

谭平山（1886—1965），广东高明（高鹤）人，大革命时期历任国民党中央执委会常委、中央组织部长、农民部长和武汉国民政府委员等职。1927年参加南昌起义，为革命委员会主席团成员。后组织中国国民党临时行动委员会（即第三党）。抗日战争时期，反对蒋介石的卖国独裁政策。后经中共中央南方局领导人周恩来、董必武等人的启发和鼓励，决定团结国民党内民主派分子与国民党内顽固派势力进行斗争。谭平山与陈铭枢、杨杰、王昆仑、郭春涛等共同组织经常性的时事座谈会，定名为民主同志座谈会，参加的有国民党内政界人士及文化教育界的民主人士100多人。1943年8月，谭平山、陈铭枢、杨杰、朱蕴山、王昆仑、郭春涛、许宝驹、于振瀛、何公敢、甘祠森等开始酝酿成立政党问题，组成筹备小组，负责进行各项筹备工作。1944年，确定名为“三民主义同志联合会”（简称民联），一面秘密吸收会员，一面委托邓初民、马寅初、郭春涛、许宝驹、何公敢等起草《政治主张》和《组织章程》等文件。1945年5月5日，三民主义同志联合会向国民党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提出建议书，主张党的革新、政治的革新和军事的改革，以适应抗战的形势，争取抗战最后的胜利。民联举起革命旗帜，与国民党当权者作了斗争，扩大了影响，取得国民党内一些正直人士的同情与支持。10月28

日，三民主义同志联合会在重庆上清寺特园召开第一次全体会议。到会的有谭平山、柳亚子、陈铭枢、邓初民等20多人。会议由谭平山主持，郭春涛为秘书长。会议讨论通过了《三民主义同志联合会政治主张》、《三民主义同志联合会第一次全体大会决议案》、《三民主义同志联合会临时组织总章》等文件。其主张是：政治上，接受三民主义及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宣言与决议案。中国国民党应即自动结束党治，建立举国一致的民主联合政府，保障人民民主自由权利，国内一切民主党派一律处于合法平等地位。在国民大会召开之前，先召开各党派代表及无党派人士的政治会议，解决目前全国迫切要求的民主、团结、和平、统一诸问题。军事上，主张实行军队国家化，在民主政府之下，任何党派及个人均不得拥有军队。外交上，主张实践中苏友好盟约，并忠实履行大西洋宪章，反对任何国家在中国驻军。经济上，实行民主主义的计划经济，节制私人资本，发展国家资本，平均地权，以逐渐达到资本国家化、享受大众化的目的。文化上，主张保障人民受教育权利，鼓励学术思想自由。在民族政策方面，实行国内民族一律平等政策，依据民族自决权的原则，组成自由联合的中华民国。会议还通过《党的改革方案决议案》，要求对国民党进行改革，废除党内法西斯统治，实行党内民主制。民联中央设临时干事会和临时监察会。主要负责人有谭平山、陈铭枢、杨杰、柳亚子、朱蕴山、王昆仑、郭春涛等。此后在重庆、港九等地建立了地方组织，联络国民党内的爱国民主人士，反对国民党的独裁统治。　（林健柏）

邯郸战役

1945年10月28日至11月2日，晋冀鲁豫军区主力在河北省邯郸以南，对国民党军进行的自卫反击战役。又称平汉战役。

1945年10月，蒋介石按其“控制华北，抢占东北”的既定方针，命令其部队向北推进，抢占平津，夺取华北。10月中旬，国民党军第十一战区副司令长官马法五所部第三十军、第四十军和新编第八军及河北民军共4万人，从河南新乡地区北进，企图占领晋冀鲁豫解放区中心城市河北邯郸，打通平汉铁路；并以第三十二军及伪军孙殿英部跟进。此外，还有后续部队4个军向新乡等地集结。对此，中共中央军委电示晋冀鲁豫军区司令员刘伯承、政治委员邓小平，坚决歼灭沿平汉铁路北进的国民党军先头部队。指出即将到来的新的平汉战役，是为着反对国民党主要力量的进攻，为了争取和平局面的实现。这个战役的胜负，关系全局极为重大，务必精密组织，审慎忍耐，以逸待劳，诱敌深入至安阳以北于我有利地区，然后集中兵力各个歼灭之。晋冀鲁豫军区决定集中第一、第二、第三纵队和冀南、冀鲁豫、太行军区主力共6万余人，在10万民兵、自卫队的配合下，将沿平汉路北进的国民党军先头部队3个军诱至漳河以北、邯郸以南的滏阳河河套多沙地带，逐次歼灭之。以第一纵队及冀鲁豫军区部队为（平汉路）路东军，以第二、第三纵队及太行、冀南军区部队为路西军，实施东西钳击；另以太行军区一部组成独立支队（相当旅），在黄河以北至安阳间破坏铁路，加强袭扰，迟滞国民党军前进，掩护晋冀鲁豫军区主力向作战地区集中，待敌通过漳河后，控制渡口，切断其与安阳之敌的联系。并在预定战场上大举破路填沟，拆碉平寨，使进入预设战场的国民党军无险可守。10月20日，国民党军孙连仲部先头部队进占漳河北岸岳镇、丰乐镇一线，遭到晋冀鲁豫军区主力一部的阻击。10月22日，国民党军主力北渡漳河，沿平汉路东侧分两路各自交替掩护前进。刘伯承、邓小平为阻止国民党军进入邯郸，令第一纵队主力赶至邯郸以南进行阻击。10月24日，孙连仲部3个军全部渡过漳河，并沿平汉路东侧推进到马头镇、磁县间地域。这时，晋冀鲁豫军区部队将敌全部包围，同时展开政治攻势，促其放下武器。28日，晋冀鲁豫军区后续部队全部到齐，于黄昏对被围之敌发起总攻。同时派军区参谋长李达赴新八军军部敦促高树勋率部起义。战至30日，攻克数十处村镇。敌第四十军第一〇六师大部被歼，第三十军也遭到有力打击。高树勋在军事打击和政治争取下，率新八军和河北民军1万余人在马头镇起义。为了在运动中更多地歼灭敌人，晋冀鲁豫军区部队采取“围三阙一”战法，故意撤开南面之围，诱敌脱离阵地向南突围。10月31日，国民党军主力突围南撤到漳河以北旗杆漳、辛庄、马营一带。晋冀鲁豫军区第二纵队和冀南军区部队跟踪追击，在敌退路两侧隐蔽集结的第一纵队和第三纵队则从东西两面迅速出击，于是日下午将敌合围于旗杆漳一带。11月1日夜，晋冀鲁豫军区部队一部突入第十一战区长官部，国民党军队失去指挥，顿时大乱。11月2日，敌除少数逃脱外，全部被歼。分由石家庄、安阳出援的国民党军第十六军和第三十二军也闻风撤逃。邯郸战役共歼敌4万余人，俘敌第十一战区副司令长官兼第四十军军长马法五，缴获大批武器物资。这次战役的胜利，在国民党内部引起很大震

动，阻止和迟滞了国民党沿平汉路北进，掩护了其他解放区部队向东北进军和战略展开。　（林健柏）

国民党军队进入东北

从1945年11月初开始，国民党军队在美国支持下抢占东北的事件。

抗战胜利后，国民党政府把抢占东北作为其挑起内战的重要目标之一。早在1945年4月中旬国民党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前夕，政学系的一些头目张群、熊式辉等人在重庆进行密谋时，东北问题就占有一个特殊的地位。后来他们用中央设计局"东北复员设计委员会"的名义，提出了抗战后阴谋夺取东北的计划：一、根据日伪统治东北的具体情况，为便于控制东北，划分东北为9个省区。二、以三民主义作为对东北的施政方针。三、抽调国民党一部分精锐部队长驻东北，作为军事上的基本力量，改编和整训伪军，作为辅助力量，以达到巩固地占领东北的目的。四、将日伪企业变为四大家族官僚垄断资本，以垄断东北的经济命脉。1945年8月31日，日本投降不久，蒋介石就在重庆成立了东北行辕政治委员会，任命熊式辉为行营主任，并以国民政府名义明令划东北3省（辽宁、吉林、黑龙江）为9省：辽宁、安东、辽北、吉林、松江、合江、嫩江、黑龙江和兴安。9月5日发表了任命东北9省2市主席、市长的命令：省长是徐箴、高惜水、刘翰章、郑道儒、关吉玉、胡翰涛、彭济群、韩俊杰和吴焕章。大连和哈尔滨的市长沈怡和杨绰庵。10月12日，熊式辉飞抵长春，并将收编的伪满部队1000余人空运到长春和哈尔滨。10月18日，蒋介石任命杜聿明为东北保安司令长官。10月28日，杜聿明抵长春。国民党政府要求苏军协助，允许国民党军队在大连、营口登陆，遭苏方拒绝。于是，蒋介石依靠已调集在华北的军队，企图打通陆地交通，向东北进犯。蒋介石指令杜聿明"定要打出关东"，"可以两个军先从山海关打出去"，以"击灭"进入东北地区的人民军队，独占东北。按照蒋介石确定的方针和部署，11月1日，由秦皇岛登陆的国民党军队，向山海关发起突然袭击。11月16日，攻占山海关，沿北宁路向东北推进。11月19日，占领绥中。接着进占兴城、锦西、葫芦岛。11月26日，夺占锦州。这时，运抵东北的国民党军队有第十三军、第五十二军、新编第一军、新编第六军、第七十一军，全是美械装备，战斗力较强。1946年1月，国民党军队依仗其优势分南、中、北3路对东北民主联军发动进攻。南路新六军主力由沟帮子指向辽阳、营口，2月10日侵占盘山、台安，2月14日占辽中。中路第五十二军由北镇沿铁路线向沈阳推进，1月11日，侵占新民，1月14日占彰武。北路第十三军第八十九师由彰武和阜新出动，2月10日占领公主屯、鹜欢池，次日占秀水河子。2月14日，东北民主联军集中两个主力师7个团的优势兵力，歼灭孤军深入秀水河子的敌军一个团，共毙伤俘敌1600余人。3月12日，苏军全部撤离沈阳。次日，国民党军进驻沈阳，21日占抚顺、辽阳。至3、4月间，国民党军进入东北的部队已有6个军，连同地方保安部队，总兵力达31万人。3月27日"军事三人小组"达成《关于派遣执行小组前往东北调处停止冲突的协定》。但国民党却一面和谈，一面以沈阳为基地向周围扩张。4月上旬，国民党军开始南攻本溪，北犯四平。东北民主联军为保障四平翼侧安全，逐步向四平东西两侧延长防线，在东起火石岭、西至八面城的百里战线上部署了机动部队6个师（旅），英勇抗击敌5个师兵力的进攻。4月28日敌以5个师兵力进攻本溪。东北民主联军经6天抗击，于5月3日撤出本溪。5月14日，敌在飞机、坦克和大量火炮掩护下，对四平轮番攻击。激战至18日。东北民主联军在四平保卫战中，歼灭国民党军1万余人，自己也伤亡8000余人。5月19日，东北民主联军撤离四平、长春等地。5月23日，国民党军侵占长春，28日侵占吉林，逐步控制了松花江以南广大地区。　（林健柏）

新疆伊犁、塔城、阿尔泰革命政府成立

1945年11月，新疆维吾尔和哈萨克等族人民武装起义，推翻国民党新疆省政府，在伊宁成立了伊犁、塔城、阿尔泰3区革命政府。

在抗日战争时期，新疆各族人民为反对军阀盛世才及国民党统治进行了英勇斗争。1944年3月，国民党新疆省政府强令伊犁、塔城、阿山等地区牧民为国民党军队捐献1万匹军马，如交不足马匹必须按每匹马折缴现金新疆币700元。这成为3个地区革命爆发的直接导火线。伊犁的革命团体"解放社"发动群众掀起反对献马的武装起义。8月，尼勒克县哈萨克、维吾尔等族牧民首先响应，起义群众达1000余人，袭击了国民党驻军。10月13日，国民党第八战区司令长官朱绍良调机动第七师第十九团去伊宁。14日又派伪七师参谋长曹汝霖、省政府内务厅长邓尚海和省公安管理处副处长刘斌德去伊宁督阵，镇压起义群众。11月7日，伊宁人民又发动武装起义。国民党军队败退艾来木巴克等处负隅顽抗。11

月11日，起义队伍攻占绥定、察布查尔、霍尔果斯等县，接着占领博尔塔拉、温泉、昭苏等地。12日攻入伊宁，成立了临时革命政府。这个政府的主席艾力汗吐烈是一位大阿訇、大土耳其主义者。副主席艾肯木拜克和加，原是省政府委员，清代贵族世袭台吉的后裔。在他们的错误引导下，这个政权自称为"东土耳其斯坦人民共和国"，宣布脱离中国，并在反对国民党统治的同时，一度执行仇杀所有汉人的政策。不久，以阿合买提江、阿巴索夫和赛福鼎为首的革命者取代了他们的领导，并很快纠正了仇杀汉人的错误政策。1945年1月，据守伊宁城郊机场的国民党残部全部被歼，伊犁地区各县完全解放。2月8日，临时革命政府委员会第十九次会议通过了组建军队的决议。3月8日，起义部队1万余人组成民族军，在伊宁市举行授旗仪式。从5月开始，民族军向国民党新疆省政府展开进攻。6月攻下额敏县，7月直捣塔城。9月10日民族军在北疆各地人民的配合下，攻打承化县(阿尔泰县)，国民党残部2000余人仓皇向外蒙古溃逃。至此，伊犁、塔城、阿尔泰3区全部解放。同年11月，各地起义群众的代表在伊宁市召开会议，将临时革命政府改组为伊犁、塔城、阿尔泰3区革命政府。3区革命斗争进入了新的阶段。3区革命的胜利鼓舞了天山南部地区人民的反对国民党反动派的斗争。在此形势下，塔什库尔干爆发的人民武装起义波及到喀什、莎车等地。哈密游击队也活跃在天山一带，给国民党军军需供应以沉重打击。1946年秋，民族军进抵距迪化(乌鲁木齐)170公里处的玛纳河西岸，这里成了3区革命政府与国民党反动当局的分界线。 (林健柏)

一二一惨案

1945年12月1日，国民党当局镇压昆明学生反内战运动的事件。

1945年10月3日，国民党云南省政府改组，云南地方实力派龙云被赶下台，由C·C分子李宗黄代理省主席，不久又以关麟征为云南警备司令。11月19日，重庆各界500余人举行反内战大会，郭沫若、沈钧儒、黄炎培等发起成立陪都各界反内战联合会。大会发表宣言，号召全国人民动员起来，用罢工、罢课、罢市、拒绝纳税等一切方法来制止内战，呼吁早日成立联合政府，反对美国干涉中国内政。反内战的呼声迅速传遍各大城市。中共云南省工委通过民主青年联盟(简称民青)在青年学生和教授中积极开展工作，争取与联合爱国民主人士开展民主运动。11月22日，昆明西南联合大学、云南大学、中法大学等校学生自治会决定于25日晚在云南大学礼堂举行反内战时事晚会。国民党云南当局即发表"禁止学校团体集会游行"的命令，强令云南大学校方不得出借会场。11月25日，晚会改在西南联大举行。到会者有大中学生6000余人，还有少数教师、公务员、小职员、文化人等。晚会由联大学生自治会代表王瑞源主持。联大政治系教授钱端升作题为《中国政治之认识》的讲演，大声疾呼"内战必然毁灭中国"，"我们需要联合政府"。经济学教授伍启元的讲题是《从财政经济观点论内战必须避免》，指出："如内战继续扩大，中国势将失去建立现代工业化国家的机会，财政经济必将趋于总崩溃"。社会学家费孝通在《美国与中国内战之关系》的讲演中严正指出，"美国目前政策实有助长中国内战之嫌"，他呼吁"中美人民应该联合起来，反对中国内战"。潘大逵教授讲了《如何制止内战》的问题，强调从速召开政治会议，成立联合政府，美、苏军队各从中国撤退，是制止内战的主要条件。会议提出：反内战，要和平；反独裁，要民主；全国人民团结起来，建设新中国。晚会开始后，国民党第五军邱清泉部包围联大校舍，鸣枪恫吓，割断电线，熄灭灯光，以破坏会议的进行。群众则在子弹横飞的情况下，用预先准备好的煤油灯照明，继续开会。会上宣读了联大、云大、中法等校学生团体致大会书，要求大会通过反内战宣言并通电呼吁美国青年反对美国政府助长中国内战。晚会最后在《我们反对这个》的歌声中结束。散会时已是深夜。反动军警在学校附近戒严，禁阻师生通行返家。师生不得不绕道云大后门进城。第二天，国民党中央社竟发布"西郊匪警，黑夜枪声"的消息，对师生极尽造谣诬蔑之能事。联大及昆明30几所大、中学校3万余学生举行罢课，组织了昆明各校罢课联合委员会，通过了罢课宣言和反内战宣言，并出版《罢委会通讯》。联大是当时学生运动的中心，中共地下组织的力量较强。罢委会设在联大，其成员90%以上是共产党员和民主青年联盟盟员。罢委会发表的宣言提出，立即制止内战，要求和平；反对外国助长中国内战，立即撤退驻华美军；立即结束一党专政，召开政治协商会议，成立联合政府；切实保障人身自由。同时要求国民党云南省政府取消禁止集会游行之非法禁令，切实保障言论集会自由；军方说明25日射击联大之责任问题并保证以后不得有同类事件发生；中央社更正诬蔑大会之新闻，并向与会师生道歉。联大、云大等校教授也站在学生一边，向云南省政府和警备司令部提

出抗议，并专函教育部派人到昆明彻查此事。民盟昆明支部发言人发表声明，表示“完全同情”和“声援”学生运动。市民群众也帮助游行队伍分发传单，捐助金钱，阻止特务捣乱，向学生表示慰劳和同情，有些正义感的军人也送信给学生，表达他们厌恶内战的心情。11月27日、28日，李宗黄、关麟征先后召开全市大中学校校长及反动警宪头目的紧急会议，在会上关麟征叫嚣：你们有开会的自由，我有开枪的自由。蒋介石密令对学生运动要“以宣传对宣传，以组织对组织，以行动对行动”，并拨款200万元，纠合党棍特务成立所谓“反罢课委员会”，破坏学生罢课。《中央日报》、《和平日报》等国民党报纸发表《五四之风不可复见》、《目前已不是一二九时代了》的社论和文章，诬蔑“共产党制造内乱”，罢课是共产党的“圈套”。同时，组织流氓打手，向学生寻衅。11月29日，昆明街头发生学生被围攻殴打事件20多起，捕人事件15起。但同学们继续到街头进行宣传。多数教授支持学生的正义行动。反动派在政治上越加孤立。

11月29日、30日，李宗黄、关麟征先后召开秘密会议，决定对学生采取暴力行动。12月1日上午8时，李宗黄在国民党云南省党部召集干部训话，要大家宣誓“为党国牺牲”。随后，派出国民党省党部、三青团支部、警备司令部、第五军、军官总队、鸿翔（伞兵）部队的军警、特务袭击昆明各校。上午10时，大批军警、特务闯进云南大学，捣毁教具，打烂校警岗棚，追打学生。军政部第二军官总队100多名武装人员围攻西南联大，学生们奋力抵抗。正在南区实验室工作的袁复礼教授看到暴徒围攻北区校门，便出来劝阻，遭到殴打侮辱。南菁中学教师于再（共产党员）路过，仗义劝导，又遭殴打。当暴徒正拉开手榴弹的导火索，准备向西南联大新校舍（即校本部文理法3院所在地）投掷，于再猛扑过去奋勇阻止，头部受重伤身亡。上午11时左右，数十名特务、暴徒闯进西南联大师范学院和昆华工校，开枪投弹，学生多人受伤。西南联大女生潘琰（共产党员）、李鲁连和昆华工校学生张华昌牺牲。当日师生死4人，伤数十人。这就是震惊中外的一二一惨案。国民党反动派的屠杀政策，没有吓倒为正义而斗争的学生。中共云南省工委领导昆明各校学生有组织地走上街头，向广大人民揭露国民党反动派的暴行。西南联大教授会议决定罢教，并组织法律委员会向国民党政府最高法院和军事委员会控告屠杀学生的指使者李宗黄和关麟征。罢委会为殉难烈士成立了治丧委员会，举行烈士入殓仪式并设灵堂公祭。各界群众以至某些地方上层人物如龙云夫人顾映秋、次子龙绳祖纷纷以捐款、签名、慰问、吊唁等方式声援爱国学生的正义行动。12月2日至20日，参加公祭的机关、团体1000多个、人数达15万以上。挽联、挽诗1000多副，群众捐款3000万元。昆明学生的斗争得到全国人民的有力支援。12月9日，周恩来在延安各界青年群众大会上代表中共中央高度评价了这场学生运动，赞扬青年是争取和平民主的先锋队，并指出我们正处在新的一二九时期，昆明惨案就是新的一二九。中国民主同盟、三民主义同志联合会等民主党派、陪都各界反内战联合会等社会团体及各界知名人士，先后发出函电，表示声援。成都、上海、南京、西安、贵阳、武汉、广州、长沙、杭州、南昌等地都开展了各种声援活动。在全国正义舆论和人民斗争面前，国民党反动派在政治上极为孤立，被迫实行“公开让步，暗地分化”的方针，撤销了关麟征、李宗黄的职务，指派傅斯年、朱经农、霍揆彰等赴昆明“调停学潮”，一方面答应赔偿公私损失，同意抚恤、公葬死者，一方面命令西南联大、云南大学两校于12月17日复课。根据上述形势，中共云南省工委决定“停灵复课”。12月18日西南联大学生自治会决定修改复课条件：保障人身自由；取消非法禁令；抚恤、公祭及公葬死者；赔偿一切损失等。12月24日国民党政府全部接受上述条件。25日，昆明大中学校学生召开代表大会通过了复课宣言，宣布于27日忍痛复课，并声明：为了完成死者的遗志，全昆明3万同学愿意继续为民主自由而奋斗到底。国民党反动派一手制造的一二一惨案，以血的事实教育了广大群众，推动许多处于中间状态的学生、教师和社会人士走上坚决斗争的道路。

（林健柏）

中国民主建国会成立

中国民主建国会是1945年12月16日由黄炎培等在重庆成立的民主党派。

抗日战争时期，官僚资本操纵整个国民经济命脉，民族工商业遭到打击和排挤，几乎陷入绝境。1944年5月，国统区的中国全国工业协会、西南实业协会、迁川工厂联合会、国货厂商联合会和中国生产促进会5个产业团体的负责人为保持联络，组织了“星期五聚餐会”。因其每星期五聚餐一次，故名。在聚餐会上讨论经济、国内外政治形势等问题。1945年元旦，他们联名发表《对大局献言》，要求“政府对各党派公开”、“对战争直接有关的制造业免征直接税”。8月，黄炎培、胡厥文、章乃器等发起组织工商

界政治团体。11月28日，中国民主建国会筹备会正式成立，推选黄炎培、胡厥文、章乃器等15人为筹备干事。12月16日，在重庆白象街实业大厦举行成立大会。中国民主建国会，简称民建，主要由民族工商业者组成。出席大会的有黄炎培、胡厥文、章乃器、胡西园、施复亮、吴羹梅、林汉达等93人。大会通过了《民主建国会政纲》、《民主建国会成立宣言》等文件。政治方面，提出以民有、民治、民享为建国的最高理想。采取孙中山先生三民主义的重要进步部分，订入宪法，以确定全民共同信守的范围。反对军人武断政治与官僚政客包办政治，反对内战，主张和平统一，各党派相忍相让，通过政治的民主化，以达成军队的国家化。主张由直接普选产生各级政权；地方须实行真正的自治；切实保障人民的身体、信仰、言论、出版、集会、结社、通信等等的自由，所有侵害人民自由的特殊机关，立即解散，等等。经济方面，提出经济建设须有全国性计划，实行经济民主，人民有充分经营企业之自由。以民主方式制定国家经济发展计划。抵制官僚垄断资本主义，保护和发展民族工商业。同时，应发展教育，提高科学技术，促进机械化代替手工业生产的过程。还提出在农村必须实行保障佃权、限制佃租的政策，由国家征租或发行债券征购非自耕土地，分租给农民，并通过现代农业机具的运用，以促进于土地集中使用，逐渐形成农业资本主义。这些主张，代表了民族资产阶级发展资本主义的愿望，反映了当时濒于破产的广大中小工商业者的呼声，在一定程度上也反映了劳动人民的要求。大会选举胡厥文、章乃器、黄炎培、胡西园、施复亮、吴羹梅、李烛尘、王纪华、杨卫玉、孙起孟、胡子婴等37人为理事，李祖绅、阎宝航、冷遹、彭一湖等19人为监事。中国民主建国会成立后，联络各地爱国工商业者及其相联系的知识分子，开展革命活动。先在重庆出版了机关刊物《平民》，后在上海出版了《民讯》(内部)，宣传他们的政治主张。1948年，民建响应中国共产党提出的召开"新政协"的号召，1949年参加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会议。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民建拥护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是参加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民主党派之一。　(林健柏)

中国人民救国会成立

中国人民救国会是1945年12月下旬由沈钧儒等在重庆成立的民主党派。

抗战胜利后，全国各界救国联合会争取实现抗日民族解放的政治任务已经完成，决定改名为中国人民救国会。1945年12月冬，在重庆韦家园坝召开了成立大会。中国人民救国会，简称救国会。宗旨为团结国人建设独立自由幸福的民主的新中国。救国会的《政治纲领》提出：中国人民现阶段的革命任务是反对外来的殖民帝国的民族压迫，反对国内封建主义与法西斯主义残余势力的压迫。中国革命的性质还是资产阶级性的民主主义革命，而不是社会主义革命。但它不是停留在民主主义革命的阶段，而是经由民主主义革命走向社会主义。民主主义革命的目标，是建立一个以全国绝大多数人民为基础的联合战线的民主联盟的民主国家制度，即是建立一个独立自由平等的人民共和国。还提出当前的任务是彻底消弭内战，加强团结，在和平、统一、团结、民主的基础上，实行一切民主改革，经过政治协商会议，立刻结束国民党一党专政，成立正式的联合政府；保障一切人民有言论、思想、出版、集会、结社、信仰、营业、迁徙、通信的自由。已经实行地方自治的若干地区的民主政权及其抗日有功的人民武装，应立即给予合法地位，并保障其存在和发展。惩办汉奸，解散伪军，整编全国军队。限制土地兼并，实行减租减息，改善职工生活等等。政治纲领还提出了民主主义革命阶段在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的根本原则；召开国民大会，制定宪法，成立联合政府；发展民族资本，实行耕者有其田，防止工商业独占，不使私有资本操纵国计民生；建立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创造性的、民主主义的新文化与新教育。大会还通过了组织规程，选举沈钧儒、沙千里、刘清杨、沈志远、邓初民、千家驹、狄超白、张锡昌、罗淑章、胡子婴、杜君慧、宋云彬等19人为中央执行委员，沈钧儒、陶行知、史良、李公朴、萨空了、曹孟君和阿锟7人为中央常务委员，沈钧儒任主席，史良任秘书长，陶行知任组织部长，邓初民任宣传部长。1946年1月9日，由沈钧儒发起创办《民主生活》周刊。2月，救国会总部迁上海，在重庆、香港等地则成立执行委员会，联络各界人士开展革命活动。在此期间，救国会领导人沈钧儒等仍参加中国民主同盟活动，并与马叙伦等一同组织了南京请愿等反内战、争民主的斗争活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鉴于救国会的历史任务已经完成，1949年12月18日在北京开会宣告结束。

(林健柏)

马歇尔使华

1945年12月22日美国政府派遣马歇尔为总统特使来华调停中国内战的事件。

1945年11月27日，美国总统杜鲁门批准赫尔利辞呈，任命马歇尔为驻华特使，按照美国的对华政策，代表美国政府出面解决中国问题。12月15日，杜鲁门向马歇尔发出训令，要他“尽快地以和平民主的方式达到中国的统一”。同日，杜鲁门在《关于美国对华政策的声明》中说：“中华民国国民政府为中国唯一的合法政府，为达到统一中国目标之恰当机构”，认为“自治性的军队，例如共产党军队那样的存在，乃与中国政治不相符合，且实际上使中国政治团结不能实现”。马歇尔于12月15日离美国，21日到南京，22日到重庆，开始其“调处”活动。

在蒋介石被迫准备召开《双十协定》中所规定的政治协商会议以后，1945年12月16日，中共中央派出以周恩来为首的有董必武(已在渝)、王若飞(已在渝)、叶剑英(后来参加军调部工作，由秦邦宪代替)、吴玉章、陆定一、邓颖超等参加的中共代表团，由延安飞往重庆，准备出席政治协商会议。中共代表团认为，停止军事进攻是召开政治协商会议的前提条件，遂向国民党政府提出立即无条件停战的建议。国民党政府为求缓兵之计，同意双方进行谈判。参加谈判的有：国民党政府代表张群、王世杰、邵力子，中共代表周恩来、董必武、王若飞、叶剑英，还有马歇尔。1946年1月5日，双方达成《关于停止国内军事冲突办法的协议》。根据停战协定，1月7日正式组成由马歇尔、周恩来、张群(后为张治中、陈诚、徐永昌)组成“三人会议”(又叫三人委员会)，马歇尔任主席，会商解决军事冲突及有关事项。当时，张群同意全国停战，但认为东北和华北的赤峰、多伦例外，因为政府要从苏联手中接收主权。周恩来提出接收主权涉及到苏联，讨论时应有苏联代表参加。现在赤峰、多伦已由中共接收。马歇尔提议暂时不讨论这个问题。1月9日，周恩来同马歇尔会谈。反对国民党以接收主权为名，从中共手中“接收”多伦、赤峰的要求。当日，经马歇尔找蒋介石商谈，国民党政府撤回这一无理要求。自此晋察冀解放区北部的安全与东北解放区交通的通畅获得保证。2月1日，周恩来和马歇尔会谈。马歇尔介绍了西方民主制度形成的历史及内容，建议国共双方军队混编。中共军队主要驻在华北，一部可驻在东北、华南。周恩来希望“三人会议”能尽快到各地视察，他们既可调查停战和恢复交通的情况，又可就整编问题同各地将领交换意见。2月5日，周恩来致电中共中央，汇报同马歇尔、张治中会谈情况。说马歇尔主张按西方民主制度改变中国军队制度及军人思想。张治中不同意共产党军队整编为20个师，主张按七分之一比例整编中共军队。我们的意见是可以原则同意马歇尔的建议，因它是限制统帅权的。关于整军程序，我们的主张第一步平行整编，各编各的，坚持解放区军队整编为20个师。6日，中共中央回电周恩来：马歇尔所提办法，对于破坏国民党及许多军队的原系统是彻底的，但事实上今天行不通。可在原则上赞成他的意见。2月9日，周恩来出席“三人会议”，和张治中、马歇尔在恢复交通问题达成的协议上签字。据此，2月11日北平军事调处执行部发布恢复交通令，规定“不论政府或中共任何一方，均不得借故恢复交通而获取军事上之利益，除非经执行部特准，重行开放之各运输线，均不得运军队及武器军火”。

由于蒋介石顽固坚持国民党一党专政和个人独裁的制度，有时马歇尔同蒋介石也发生争论；在参加“三人会议”中，在某些问题上他尽力表现出站在国共之间的“调停人”立场。然而，马歇尔是忠实执行美国政府援蒋政策的。他积极支持国民党政府在“接收主权”的名义下独占东北的行动。当中原解放区的中心宣化店被国民党军队围困时，马歇尔则一声不响，但当李先念率领中原解放军突围到襄樊并即将入川之际，马歇尔又赶快派执行小组前往调处阻止。1946年7月，马歇尔推荐司徒雷登为美国驻华大使，参与调处。当蒋介石完成发动全面内战的部署的时候，南京和平谈判便倏然中止。7月14日蒋介石便从南京到庐山登高赏月去了。马歇尔也时而上海，时而庐山，游山玩水。8月10日，马歇尔和司徒雷登发表联合声明，宣布美国已不能调处中国内战，说：“国共双方领袖虽亟望制止冲突，但有若干问题需要立即解决者，尚未成立协议。双方显然无法就此项问题获得解决，否则即可颁布通令，完全停止中国之冲突。”公然为国民党的内战政策辩护。

9月15日，周恩来致书马歇尔，历数国民党军队向解放区进攻的事实及美国政府在马歇尔“调处”期间对国民党的援助，并要求他召开会议，协商停战办法。但马歇尔适应国民党的需要，拒绝召开“三人会议”。9月下旬，国民党军队进攻张家口。30日，中共代表致书马歇尔和蒋介石，严正声明：如果政府不立即停止对张家口及其周围的一切军事行动，中共不能不认为政府业已公然宣告全面破裂，并已最后放弃政治解决方针。蒋介石一意孤行，于10月11日占领张家口。当天即下令于11月12日召开一党包办的伪国大。伪国大闭幕后，马歇尔于1947年1月8日离华返美。在他离开中国前夕，发表了一篇欺骗

性的声明，把破裂和谈的责任都推到中共身上，声称最近数月中，中共所追随之路线，显示彼等不愿促成公允之妥协，此为最确定者。即欲使中共代表与政府代表会谈问题，亦属不可能。中共现已提出最后要求，而促使谈判中断。彼等要求解散国民大会并恢复1月13日之军事位置，此为政府所不能接受者。中共严厉驳斥了马歇尔的谎言。周恩来指出，中共提出的两项先决条件"正是最公允的"。"若说蒋介石可以不接受取消蒋宪与恢复1月13日军事位置之最公允的妥协，难道中共就应承认破坏政协的蒋记国大宪法与破坏停战协定的进攻位置，才算'公允的妥协'么？"周恩来对马歇尔使华期间的表现，概括为："他在第一时期对停战、政协、恢复交通、复员整军的意见和办法是公正的。第二时期对东北问题就偏了，只要我们让，不要国民党让，而且让了还不停战。"

（林健柏）

中国民主促进会成立

中国民主促进会是1945年12月30日由马叙伦等在上海成立的民主党派。

抗日战争胜利后，马叙伦、周建人、许广平、林汉达等在《周报》、《民主》、《文汇报》等报刊上发表文章，抨击蒋介石的独裁统治与内战政策。1945年12月30日，中国民主促进会在上海中国科学社召开第一次会员大会。到会的有马叙伦、王绍鏊、周建人、林汉达、徐伯昕、赵朴初、陈已生、梅达君、严景耀、雷洁琼、谢仁冰、柯灵、李平心、冯少山、万景光、曹梁厦、张纪元、陈慧、宓逸群等26人。马叙伦(1884—1970)任大会主席，并向会议作了民进的发起原因和筹备经过的报告。中国民主促进会，简称"民进"，其成员大部分是文化教育界知识分子，还有一部分工商界人士。大会通过了《中国民主促进会简章》，规定本会以发扬民主精神推进中国民主政治的实现为宗旨。大会原则通过了《对于时局的宣言》。1946年1月2日，民进举行第二次会员大会，会议选举马叙伦、严景耀、陈已生等11人为理事，傅雷、许广平、张凤举3人为候补理事，并通过《中国民主促进会对于时局的宣言》，阐明民进对时局的基本立场和政治主张。《宣言》指出：现阶段的中国，民主实在是统一的基础，同时又是统一的内容，统一的目的。统一而不以民主为前提，决无法实现。真正的统一是全国民心一致向往的结果，决非勉强可求。《宣言》强调指出，人民是国家的主人，政府要切实保障人民的民主权利，起码要给人民有言论、出版、集会、结社自由。世界上最有力最巩固的政权，一定建筑在真正民意之上，一定以人民的利害为利害，人民的视听为视听，人民的要求为要求。《宣言》主张自主自动地改革政权，实现民主；国民党立即无条件地还政于民；立即无条件停止内战，全国军队，各驻现地，听候调整；要求友邦从速撤退驻华各军，完成日本投降事宜由中国政府自行担任；重新制定宪法草案，交付正式最高权力机构决定公布；宣布国民大会代表之选举无效，制定普选方法，限期完成正式最高权力机构之选举；战时机构即核实裁并；制定适应时代的建国大纲，交付政府制定政策方案。还表示加紧我们的步伐，集中我们的力量，争取民主，实现民主。1月4日，民进理事会推马叙伦、陈已生、王绍鏊为常务理事，周建人为起草委员，严景耀为财务委员，徐伯昕为出版委员，宓逸群为秘书。此后，民进成员为实现自己的政治主张，进行了英勇的斗争。

（林健柏）

东北根据地建立

1945年底，中国共产党在东北地区建立的根据地。

1945年11月20日，中共中央指示东北局：东北人民自治军从中长铁路沿线及各大城市退出，"让开大路，占领两厢"，将主要力量放在广大农村及中小城市建立可靠的根据地。12月28日，中共中央向东北局发出《建立巩固的东北根据地》的指示，指出，"我党现时在东北的任务是建立根据地，是在东满、北满、西满建立巩固的军事政治的根据地。"

当时，北满指哈尔滨、牡丹江、北安、佳木斯、齐齐哈尔等地区。北满根据地创建最早。东北解放战争初期就在嫩江、龙江、合江、松江、牡丹江等地进行开辟根据地的工作。1945年11月下旬，中共北满分局成立后，立即改造旧政权，组织兵力进行剿匪。抗战胜利后，东北各地土匪有较大的发展。这些土匪主要的社会基础是敌伪残余警察、宪兵、伪官吏。国民党反动派在东北实行武装土匪政策，收编敌伪残余、土匪流氓，利用投机分子、野心家等组织所谓地下军、先遣军、光复军、保安军、义勇军等。据统计，国民党反动派在东北组织的匪伪系统就有16个之多，有37种名目，先后加委伪军、土匪"总司令"和"总指挥"32个，"军长"33名，"师长"158个。至1945年12月，东北全境土匪总数共达10万人左右，主要活动于通化、沈阳、安东三角地区，较大成股活动的有3000至5000人。当国民党军队进攻东北时，他们配合正面之敌，在东北民主自治军后方进行暴动和叛

乱，争城夺地，杀害干部，“北满有三分之二以上的县城掌握在顽匪手中”，造成了遍地匪患的局面，严重威胁人民生命财产的安全和民主政权的巩固。因此，清剿土匪，肃清敌伪残余，在当时就成了发动群众、建设根据地、巩固民主政权的中心环节。这一时期内，剿匪斗争取得了很大的胜利，逐步稳定了局面。1946年春，东北民主联军从四平撤到北满地区后，与地方部队配合，建立农民自卫武装，开展清算运动和分地等。在斗争中创造了“经济—武装—经济”等一整套发动群众的经验，建立了巩固的后方基地。

西满包括中长路沈阳至哈尔滨段以西的洮安、开鲁、阜新、郑家屯(今双辽)、扶余等地区。1945年12月，中共西满分局成立后，东北人民自治军创建了辽西根据地。后来，国民党军队进犯，主力部队北撤过江，辽西的干部和部队便与原在吉江地区活动的干部和部队一起，于1946年2月在辽吉地区开展创建根据地的工作。辽北根据地，是以1945年11月初派去的干部和部队为基础，在梨树、白城子和洮南等地创建起来的。内蒙古东部地区在西满分局领导下，1945年冬便成立了东蒙古自治政府。1946年4月，中央决定统一内蒙古自治运动，成立了内蒙古自治运动联合会东蒙总分会。随后建立起东蒙根据地。

东满包括中长路沈阳至长春段以东的吉林、西安(今东辽)、安图、延吉、敦化等地区。1946年5月，东北民主联军主力部队撤出长春、吉林，相继到达东满，迅速剿匪，发动群众，开展创建根据地的工作。南满包括中长路沈阳至大连段以东的安东(今丹东市)、庄河、通化、临江、清原和沈阳西南的辽中等地区。早在1946年2月东北人民自治军就开始在这地区创建根据地工作。后来，由于国民党军的进攻，特别是1946年10月以后，蒋介石推行“南攻北守，先南后北”方针，南满大部地区成了敌占区和游击区，根据地缩小到只包括长白、临江、濛江(今靖宇)、抚松4县的狭小地带。直到四保临江、三下江南战役后，南满根据地才又得到了恢复、发展和扩大。 (林健柏)

国共两党签订停战协定

1946年1月10日国共两党代表签订《关于停止国内军事冲突的协议》。

自1945年10月20日起，中共代表周恩来、王若飞、叶剑英等同国民党代表张群、王世杰、邵力子开始谈判。12月27日，中共代表将《关于无条件全面停止内战的提议》交国民党代表转蒋介石。其中提出：一、双方下令所属部队，在全国范围内均暂各驻原地，停止一切冲突；二、凡与避免内战有关之一切问题如受降、解除敌军武装、解散伪军、停止利用敌伪、驻兵地区、恢复交通、运兵及解放区、收复区等问题，均应于军事冲突停止后，经和平协商方法解决；三、为保证第一项办法之彻底实现及第二项办法之顺利进行，应在政治协商会议指导下，组织全国各界内战考察团，分赴全国发生内战区域进行实地考察，随时将事实真相提出报告并公布。12月31日，国民党政府代表复文，其内容是：一、停止国内各地一切军事冲突，并恢复铁路交通；二、因国内军事冲突及交通阻塞等事，与我国对盟邦所负之受降及遣送敌俘等义务有关，所有与停止军事冲突恢复铁路交通及其他与受降有关事项，由政府派代表1人，中共派代表1人，会同马歇尔将军从速商定办法，提请政府实施；三、由国民参政会驻会委员会推定公正人士5人，组织军事考察团，分赴全国发生冲突区域考察军事状况、交通情形，以及其他与国内和平恢复有关事项，随时将事实真相，提出报告并公布。1946年1月5日，中共代表周恩来、董必武、王若飞、叶剑英与国民党代表张群、王世杰、邵力子谈判，拟定《关于停止国内军事冲突的协议》。协议规定：一、停止国内各地一切军事冲突并恢复一切交通，关于停止冲突及恢复交通之命令，依第二条之规定商定。二、因国内军事冲突及交通阻塞等事，与我国对盟邦所负有之受降及遣送敌俘等义务有关，故应由政府与中共各派代表1人，会同马歇尔将军从速商定办法，提请政府实施。三、由国民参政会驻会委员会推定公正人士5人，组织军事考察团，分赴全国发生冲突区域考察军事状况、交通情形，以及其他与国内和平恢复有关事项，随时将事实真相提出报告并公布。政治协商会议成立时，亦请其推定公正人士参加。同日起，马歇尔以美国总统特使身分正式介入国共停战谈判。1月7日，由周恩来、张群、马歇尔组成的“三人会议”，讨论《关于停止国内军事冲突、恢复交通的命令和声明》的具体内容。1月10日国共代表举行停战文件签字仪式。周恩来代表中国共产党、张群代表国民政府、马歇尔代表美国政府在《关于停止国内军事冲突的命令》和《关于停止国内军事冲突命令的了解事项》上签字；周恩来代表中国共产党、张群代表国民政府在《关于建立军事调处执行部的协议》和《中共代表与国民政府代表关于停止国内冲突的命令和声明》上签字。“停战协定”规定：“一切战斗行动立刻停止”；“除另有规定者外，所有中国境内军事调动，一律停止”；“为实行停战协定，应即在北平设一军事调

处执行部，该执行部由委员 3 人组成之，1 人代表中国国民政府，1 人代表中国共产党，1 人代表美国。所有必要训令及命令，应由 3 委员一致同意，以中华民国国民政府主席名义经军事调处执行部发布之"。同日，国共双方各自向所属部队发布停战令，并规定从 1 月 13 日午夜起，停止国内各地一切军事冲突。根据协议，军事调处执行部于 1 月 11 日在北平成立，由国民党军事委员会军令部第二厅厅长郑介民、第十八集团军参谋长叶剑英和美国驻华代办罗伯逊组成。执行部下设由 3 方同等人员组成的若干执行小组，分赴各冲突地区进行调处工作。1 月 14 日军调部在北平开始办公。蒋介石在下达停战令的同时，密令国民党军队抢占战略要点，接着又不断调动军队向解放区进攻。1946 年 6 月下旬，国民党公开撕毁停战协定，发动全面内战。　（林健柏）

政治协商会议召开

1946 年 1 月 10 日至 31 日有国民党、共产党、其他党派和无党派人士的代表参加的政治协商会议在重庆举行。

1946 年 1 月 10 日，政治协商会议在重庆召开。出席会议的代表共 38 人，其中国民党 8 人，共产党 7 人，中国民主同盟 9 人，青年党 5 人，无党派人士 9 人。他们代表 3 种政治力量；国民党及其追随者青年党代表大地主大资产阶级利益，坚持和维护一党专政；共产党代表无产阶级和人民大众利益，主张建立民主联合政府；民主同盟和无党派人士中的多数人代表民族资产阶级和上层小资产阶级利益，试图推行资产阶级的民主制度。会议围绕着改组国民政府、施政纲领、军队、宪法草案、国民大会等问题展开争论，其焦点仍然是政权问题和军队问题。

关于改组政府问题。国民党代表提出《扩大政府组织方案》，由王世杰作说明。主张国民政府委员扩大三分之一，由 36 名增至 48 名，国民党在委员中要占特定的多数。国府委员由主席选任，国民党中央通过。国府委员的权力只限于讨论议决立法原则、施政方针、军政大计、财政计划及预算、主席交议事项和委员三分之一以上连署提出的建议事项，而没有用人权。国府主席有否决权和紧急处置权。按照这个方案，国府委员形同虚设，丝毫没有触动国民党一党专政的实质。国民党的方案遭到各方面的反对。董必武代表共产党作了《关于改组政府问题的报告》，主张改组国民党政府为民主联合政府，结束其一党专政，施行民主宪政，真正实现国家民主化。以民盟为主体的中间力量强烈反对国民党的提案。经过斗争，会议达成的协议是：国民政府委员会为最高国务机关；委员 40 人，半数为国民党员，但涉及施政纲领之变更须有三分之二的委员通过；国府主席的否决权，必须得到五分之三以上的委员同意；国府委员会有对各部、会长官的任免权。

关于军队问题。国民党代表在会上提出《全国军队国家化确保军令之统一案》，要求中共先交出军队，再由政府给一点民主。青年党代表陈启天等则主张军党分离、文人治军，希望国共两党交出军队，以实现其在中国建立资产阶级专政的幻想。周恩来代表中共作了《关于军队国家化问题的报告》，提出 12 条建议。他说：政治民主化与军队国家化要同时实行，不能认为先有军队国家化，然后才能政治民主化。"军队是从人民来的，只有军队能真正保护人民利益，才能保护国家，才能保护民族。"会议通过了《关于军事问题的协议》，确定建军原则是"军队属于国家，军人责任在于卫国爱民"。整军原则是"军党分立"，"军民分治"。同时还规定了"以政治军"的办法和实行整编办法。

关于国民大会问题。国民党坚持 1936 年由它包办选举出的 1200 名代表仍然有效，只补选一些不足名额。民盟和中共认为其不代表民意，表示强烈反对。各方代表几经协商，规定国大代表总数为 2050 名，"依选举法规定之区域及职业代表 1200 名照旧"，"台湾、东北等新增各该区域及其职业代表共 150 名"，"增加党派及社会贤达代表 700 名"。同时规定国民大会制定的宪法必须有出席大会四分之三以上的代表同意方能有效。这就基本打破了国民党企图一党包办国民大会的做法。

关于宪法草案问题。国民党企图将 1936 年 5 月 5 日公布的《宪法草案》（通称五五宪草）加以形式上的修改，作为宪政时期的根本大法。五五宪草的主要内容是设立一个大权独揽的总统，把国民党一党专政和个人独裁合法化。这一主张受到中共及民盟等代表的反对，国民党被迫同意组成有各党派代表参加的宪草审议委员会，对五五宪草进行审议修改。并确认人民的自由民主权利；同意采用国会制、内阁制的政体及地方自治原则。

关于施政纲领问题。会议基本上接受了中共提出的《和平建国纲领》，作为宪政实施前的施政纲领。它规定全国团结一致，建设统一、自由、民主的新中国；实行政治民主化，军队国家化，党派平等合法；用政治方法解决政治纠纷，以保持国家之和平发展；确

保人民享有身体、思想、宗教、信仰、言论、出版、集会、结社、居住、迁徙、通讯之自由。1月31日，政治协商会议闭幕。会议通过关于政府组织问题、关于国民大会、和平建国纲领、关于军事问题、关于宪法草案等5项议案，合称“政协决议”。这些协议在不同程度上有利于人民而不利于国民党的反动统治。蒋介石一方面表示承认这些协议，企图利用这些协议进行和平欺骗，另一方面，则积极备战，准备发动全国规模的内战。不久，这些协议都被蒋介石一一撕毁。

（林健柏）

沧白堂事件

1946年1月27日，国民党特务袭扰在重庆沧白堂举行的政治协商会议陪都各界协进会的会场的事件。

1946年1月10日政治协商会议在重庆开幕。1月11日重庆各界人士和人民团体组成政治协商会议陪都各界协进会（简称“协进会”），决定在政治协商会议开会期间，每日举行各界民众大会，邀请政协代表报告会议进展情况，听取人民群众的批评和建议；近期内举行陪都各界民众庆祝和平大会。从1月12日到27日，先后举行了8次各界民众大会。前3次在江家巷中国工业合作协进会的合作会堂举行，从第4次开始改在沧白堂举行。沧白堂全称叫“杨沧白纪念堂”，坐落在重庆沧白路中段，是抗战中期蒋介石为了缓和中央和地方的矛盾，控制川政，堵塞四川地方势力要求“川人治川”之口，以纪念国民党元老杨沧白而修建的，厅堂较大，院落宽敞。各界民众大会改在沧白堂举行以后，参加群众就更为踊跃。到会群众由最初的几百人增加到3000人。国民党C·C系特务头子陈立夫密令国民党重庆市党部注视协进会的活动。同时拨给法币400万元，以每人每晚2000元的代价，雇用一批特务打手，对各界民众大会进行捣乱破坏。第4次大会于1月16日晚举行的，由阎宝航任主席，民主同盟代表张东荪和无党派民主人士郭沫若作报告。当报告人讲到以后军队要成为国防军，不能再有党军时，台下就跳出十几个特务打手，狂叫“政府军队是国军，不是党军”。听众同声高喊：“是国民党的党军，不是国军！”严加批驳。郭沫若（1892—1978）指责在场的特务说：“今天上午政协是讨论军事问题，会场倒是一堂和气，并不像今晚沧白堂这般杀气腾腾。”但当他继续报告时，特务又狂呼乱叫。郭沫若指责面前的几个特务：“连政府都要来协商，你们何必要这样？！”说得特务哑口无言。但报告终被打断，大会未能终场。18日晚，李公朴主持第6次民众大会，由国民党代表邵力子、共产党代表王若飞作报告。王若飞揭露了蒋介石提出的“军队国家化”的实质，指出国民党污蔑共产党“拥兵自主”，搞“封建割据”的目的就是要取消八路军、新四军，消灭人民革命力量。这时，中统特务敲起小锣，拿起木棍、石块向讲台打去，会场秩序顿时混乱。许多进步群众和爱国民主人士立即奔向讲台，把王若飞护送到门外，让汽车安全驶去，不少群众因此被石头打伤。1月27日，协进会举行第8次民众大会。由阎宝航、李公朴、章乃器主持，国民党代表张群、吴铁城借故不到会。首先由共产党代表王若飞讲话。他说：政协会议开幕那天，政府就下了停战命令，经过这几天的分组讨论，关于政府改组、和平建国纲领、军事、国民大会和宪法草案5项问题，许多基本要点已经趋于基本一致，这是一大成功。而昨天政协代表黄炎培等人住宅却受到非法搜查，说明蒋介石的“四项诺言”（人民之自由；政党之合法地位；普选；释放政治犯）还没有彻底执行。接着，中共代表团顾问、山东大学校长李澄之报告山东解放区民主建设的情形，然后由郭沫若作报告。他着重指出，和平建国纲领虽已拟定，执行还待大家努力。大会通过了两项提案：一项是以大会名义致函黄炎培及其他同样遭受无理搜查的政协代表，表示慰问。另一项是向前来保护会场的宪兵、警察致以慰劳之意。在大会进行中，国民党派遣特务捣乱谩骂。郭沫若回答听众问题时，被几十个特务打手包围、辱骂，会后他们又尾追，用石头打郭沫若。李公朴从沧白堂到迁川大厦，也挨了特务甩掷的石头。

（林健柏）

较场口事件

1946年2月10日，国民党特务在重庆较场口打伤政协代表郭沫若等60多人的流血事件。

1946年2月10日上午，陪都各界协进会等20多个团体发起在较场口举行重庆各界群众庆祝政治协商会议成功大会。周恩来、沈钧儒、郭沫若、梁漱溟、曾琦、邵力子、马寅初、张君劢、王葆真、章乃器、施复亮、李公朴、李德全、史良等政协代表和社会名流出席了大会。大会定于9点半开始，但8点刚过，国民党特务打手700多人抢先进入会场，分布在主席台四周，他们夺占播音器，占据主席台，引起台下公众的反对。当大会总指挥李公朴及主席团成员章乃器、施复亮与他们交涉，并提出不应妨碍原定的大会程序时，突然有人高呼：“他们扰乱秩序！”于是台

上台下喊打声相应而起。十几个国民党特务暴徒包围李公朴，边打边往台下拖，把李公朴打得头破血流。郭沫若以自己的身体掩护李公朴，也遭毒打，眼镜被打落。马寅初身负重伤，马褂被剥去，文稿也被抢走。施复亮被打得遍体鳞伤。沈钧儒受暴徒追逐，因有10多个青年护送，方免被殴。当时在场的《新民报》记者邓蜀生、姚江屏，《大公报》记者高学逵，《商务日报》记者梁柯平，因劝说不要动武，也遭毒打。台下民众高呼不要打人，暴徒便把台上的长条木凳举起向人群中乱掷。到会群众负伤和失踪者有60多人。中国共产党代表周恩来到达会场时，目睹惨状，连声痛斥：这是什么国家！育才学校的学生闻讯赶来，才把几十名伤员护送到医院救治。周恩来当即赶到重庆市民医院慰问伤员。当晚，政协代表举行会议对此表示严重抗议，公推周恩来、陈启天、李烛尘、张君劢去见蒋介石。11日，蒋抵上海，避而不见。周恩来等11名政协代表联名致函蒋介石，抗议较场口事件并往访重庆市长吴铁城，希望政府和国民党推出代表检查与协商处理办法。　（林健柏）

解放区的练兵、减租和生产运动

1946年解放区掀起的以备战为中心的练兵、减租和发展生产运动。

中国共产党在同国民党进行和平谈判的同时，加紧了粉碎国民党军事进攻的准备，把巩固解放区和加强人民军队作为粉碎敌人进攻的基点。1945年11月7日，中共中央在《减租和生产是保卫解放区的两件大事》的指示中指出：只有减租和生产两件大事办好了，才能克服困难，援助战争，取得胜利。12月15日，中共中央在《1946年解放区工作的方针》中，又把练兵、减租和发展生产列为最主要的3件大事，号召解放区军民，一切工作都要做持久打算，使自己立于不败之地。1946年5月1日，中共中央指示各地必须认真地抓紧练兵这一工作。解放区野战军、地方军和民兵利用作战间隙，开展了官教兵、兵教官、兵教兵的群众练兵运动，练习射击、刺杀、投弹等技术，特别着重练习夜战。同时进一步加强政治工作，克服军队中存在着的教条主义和形式主义作风，加强官兵团结，军民团结。开展团结友军，瓦解敌军的工作。各解放区组成了野战军，尽一切可能建立和扩充各地的炮兵和工兵。至1946年6月，共建立起14个炮兵团，17个炮兵营，38个炮兵连；一些野战纵队和旅建立了工兵连。还整顿了军队的后方勤务工作。在减租减息运动中，中共地方组织和民主政府不是把经济利益恩赐给农民，而是发动农民群众自己组织起来开展斗争。与此同时，老解放区进行了检查贯彻减租法令的情况。此外，新老解放区还注意使雇农的工资能得到适当的增加。这个运动，削弱了封建势力的基础，使农民真正获得了利益，为开展生产运动创造了必要的前提。在减租减息的基础上，各解放区开展了生产运动，引导农民开展农村的变工队、互助组和小型合作社等组织，并及时地发放农业信用贷款和工业贷款。在为自卫反击作战动员民力时，尽力做到不违农时，减少误工，爱惜人力、物力；部队、机关、学校在不妨碍作战、工作和学习的条件下也适当地参加生产，以改善自己的生活，减轻人民的负担。生产运动的开展，使解放区的农业和工业生产得到了迅速的恢复和发展，为粉碎国民党反动派的军事进攻准备了一定的物质基础。1946年5月，中共中央还发布关于整理财政制度问题的指示，指出，必须一切依靠自力更生，作持久的打算。为应付长期战争，解放区应有计划地发展生产和整理财政，坚决实行发展经济、保障供给、统一领导、分散经营、军民兼顾、公私兼顾等方针。在财政供应上，既要满足自卫战争的物质需要，又要使人民生活有所改善。同时，必须提倡节约，力戒浪费。　（林健柏）

中国国民党民主促进会成立

中国国民党民主促进会是1946年4月14日由国民党内民主派及其他爱国人士李济深、蔡廷锴、李章达等在广州成立的民主党派。

1944年李济深、何香凝、蔡廷锴等在广西酝酿筹建民主促进会，简称“民促”，但因抗战后期形势紧张，人员分散，未能召开正式的成立大会。1946年3月12日，蔡廷锴、李章达、梅龚彬、吴仲禧、张文、李静之、谭启秀、云应霖、张励、李镇静、余勉群、李民欣、司马文森等10多人，在广州召开筹备会并通过了章程。4月14日，又秘密召开了中国国民党民主促进会成立大会，通过了《成立宣言》，选举李章达、蔡廷锴等10多人为中央理事会理事，李济深(1883—1959)为理事会主席，谭明昭为秘书长，建立了中央办事机构。5月15日，《成立宣言》在香港《华商报》上公开发表。宣言指出：抗战胜利后，全国人民人心所向，一致要求在三民主义最高指导原则下实行真正民主政治。民主不但为中国今日所需，也为世界潮流所趋。中国如欲成为革命的新国家，非实行民主不可；中国如欲富强自主，外足以抗强敌，内足以安民生，也非实行民主不可。申明组织民主促进会的

动机与宗旨，在于团结海内外志同道合的同志，齐一步伐，集中力量，以促进中国的民主运动，共同完成建国大业，使和平、统一、民主、富强的新中国，得以雄临于世界。《宣言》提出7个方面的主张：政治方面，要求国民党自动结束党治，建立举国一致的民主联合政府，保证人民各项民主自由权利，使国内一切民主党派一律立于平等合法的地位。经济方面，必须实行民生主义的计划经济，节制私人资本，发展国家资本，平均地权，外资活动不能超出法律范围之外。外交方面，主张外交公开，秘密条约与协定概属无效；与所有爱好和平国家以平等地位切实合作，实践中苏友好盟约；反对任何国家在我国领土内驻兵及侵害我国家主权的特权；扶助弱小民族，对殖民地人民的独立运动予以友好之同情。军事方面，主张军队必须国家化，在民主政府之下，任何党派及个人均不得拥有军队。工农及社会问题，提出要改善一般农民生活，铲除封建剥削，实行减租减息，对工人要提高待遇，对失业工人，应予救济和安置。对国内民族问题，应一律平等，有民族自决权。对海外华侨，政府必须彻底保护海外华侨的安全和利益，由国家银行低利贷款华侨经营事业。中国国民党民主促进会成立后，于1946年5月18日在香港成立港九总支部，肖隽英、黄精一等为领导人。同时，还在广州成立了分会，谭启秀任主任理事。“民促”先后在广州出版《现代》月刊，在香港出版《自由》月刊，进行反内战、反独裁宣传。（林健柏）

九三学社成立

九三学社是1946年5月4日由从事爱国民主运动的科学技术界人士许德珩等在重庆发起组成的民主党派。

1944年底，一批从事爱国民主运动的科学技术界人士，为坚持团结抗战和争取民主，在重庆组织“民主科学座谈会”。经常以聚餐的形式，讨论民主与抗战、民主与科学等问题，主张团结民主，抗战到底，发扬五四反帝反封建的革命精神，为实现人民民主与发展人民科学而奋斗。座谈会大体每日举行一次，约有20多人出席。在重庆谈判期间，许德珩（1890—1990，江西人）向毛泽东介绍了座谈会的情况。毛泽东鼓励他把民主科学座谈会搞成一个“永久性的政治组织”。为纪念抗日战争和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胜利，1945年9月3日，许德珩、潘菽、涂长望、褚辅成、税西恒等集会决定把座谈会改名为九三学社，简称“九三”，并成立了筹备委员会。1946年5月4日下午3时，九三学社在重庆召开成立大会，到会的有褚辅成、卢于道、黄国璋、许德珩、税西恒、吴藻溪、张雪岩、詹熊来、潘菽、黎锦熙、彭伤三、王卓然、孟宪章、刘及辰等50多人，推选许德珩、褚辅成、税西恒为主席团。大会讨论通过《九三学社社章》、《九三学社成立宣言》、《九三学社基本主张》及《九三学社对时局主张》等文件。《成立宣言》指出，中国一定要实现和平团结与民主宪政。中国今日，舍和平团结，实无救济之策，而和平团结能实现与否，端赖民主宪政的实施，故政治的民主与宪政的实施，实为救国要着。九三学社基本主张是：一、促进民主政治的实现，争取人民的基本自由；二、从政治的民主化，谋军队的国家化；三、肃清贪污，反对官僚政治；四、从速完成国家工业化、农业现代化，改善农民生活及农村佃租关系；五、建立以民生为主的经济制度；六、学术思想的绝对自由，奖励科学研究，拒绝党化教育及思想统治；七、积极普及国民教育，扫除文盲，提高人民文化水准，反对迷信与复古运动；八、加强同盟国家的团结与合作，促进世界和平。《九三学社对时局主张》要求国共两党军队立即在东北、中原及中国任何一隅无条件停止内战。一切问题概以和平民主方式解决。无条件实行停战协定、政协协议、整军方案，美国政府勿予中国任何一党派以任何援助（包括借款及运输军队）。大会选举许德珩、褚辅成、税西恒、潘菽、涂长望、黄国璋、张西曼、孟宪章、张雪岩、严希纯、吴藻溪等16人为理事，卢于道、梁希、侯外庐、黎锦熙等8人为监事。1946年8月，九三学社中央迁到北平，在重庆、上海、南京成立分社，密切联系一批进步的教授及其他高级知识分子，与各民主党派、民主团体及民主人士一道，在共产党的影响下，同国民党反动派的内战、独裁政策进行了斗争，用各种方式反对国民党的反动统治，在民主革命中起了积极的作用。（林健柏）

《五四指示》颁布

1946年5月4日，中共中央发布《关于土地问题的指示》。

抗日战争胜利后，以反奸、清算、减租减息为内容的群众运动广泛深入地开展，农民群众迫切要求获得土地。中共中央决定将减租减息政策改为没收地主土地分配给农民的政策。

1946年5月4日，中共中央发布《关于土地问题的指示》，明确指出：解决解放区的土地问题是中国共产党目前最基本的历史任务，是目前一切工作

最基本的环节。必须以最大的决心和努力，放手发动与领导群众完成这一历史任务。这个指示提出：一、在广大群众要求下，共产党应坚决拥护群众在反奸、清算、减租减息、退租、退息等斗争中，从地主手中获得土地，实现“耕者有其田”。二、坚决用一切方法吸收中农参加运动，并使其获得利益，决不可侵犯中农土地。整个运动必须取得全体中农的真正同情或满意，包括富裕中农在内。三、一般不变动富农的土地。应使富农和地主有所区别，对富农应着重减租而保存其自耕部分。四、对于抗日军人及抗日干部的家属之属于豪绅地主成分者，对于在抗日期间无论在解放区或在国民党区，与我们合作而不反共的开明士绅及其他人等，在运动中应谨慎处理，适当照顾。五、对于中小地主的生活应给以相当照顾，对待中小地主的态度应与对待大地主、豪绅、恶霸有所区别。六、集中注意于向汉奸、豪绅、恶霸作坚决的斗争，使他们完全孤立，并拿出土地来。但仍应给他们留下维持生活所必需的土地，即给他们饭吃。七、除罪大恶极的汉奸分子的矿山、工厂、商店应当没收外，凡富农及地主开设的商店、作坊、工厂、矿山，不要侵犯，应予以保全。八、除罪大恶极的汉奸分子及人民公敌为当地广大人民群众要求处死者，应当赞成群众要求，经过法庭审判，正式判处死刑外，一般应施行宽大政策，不要杀人或打死人，也不要多捉人。九、对一切可能团结的知识分子，必须极力争取，给以学习与工作机会。对开明绅士及其他党外人士，或城市中的自由资产阶级分子，只要他们赞成我们的民主纲领，均应当继续和他们合作。对于逃亡的地主及其他人等，应让其回家，并给以生活出路。十、群众尚未发动起来解决土地问题的地区，应迅速发动。必须完全执行群众路线，真正发动群众，由群众自己动手来解决土地问题，绝对禁止使用违反群众路线的命令主义、包办代替及恩赐等办法。十一、解决土地问题，应采取群众已创造的多种多样的方式。各解放区根据《五四指示》，迅速开展了土地改革运动。到1947年2月，已有三分之二地区解决了土地问题，极大地巩固了解放区和加强了对革命战争的支援。　（林健柏）

东北停战谈判

1946年6月6日起，国共两党代表在南京举行关于结束东北地区武装冲突问题的谈判。

1946年1月10日停战令正式公布后，国民党政府执意在停战协定中附加一项规定，即停战令对国民政府军队为恢复中国主权而开入东北9省，或在东北9省境内的调动并不影响，并在美国的帮助下向东北大量运兵。2、3月间，国民党军队侵占盘山、台安、辽中、辽阳、抚顺等地，形成了关内小打、关外大打的局面。中共代表曾向国民党政府再三要求东北停战。马歇尔也提议派遣执行小组至东北执行停战，但国民党方面却声称“东北在军事调处范围以外”、“执行部无权过问东北”。后经中共和全国人民的斗争，国民党政府才被迫同意举行谈判。3月27日，“军事三人小组”国民党政府代表张治中、共产党代表周恩来和美国特使马歇尔的代表吉伦达成《关于派遣执行小组前往东北调处停止冲突的协定》，主要内容是：一、执行小组之任务，仅限于军事调处工作；二、小组应在政府军队及中共军队地区工作，并避免进入仍为苏军驻留的地区；三、小组应前往冲突地点或政府军与中共军密接地点，使其停止冲突，并作必要及公平的调处。各方另同意：关于东北军事问题由“三人会议”继续商谈。关于东北政治问题，另行商谈，迅求解决。3月31日，国民党军队公开破坏协议，大举进攻营口、鞍山、本溪等地。4月16日，以7个师的兵力猛攻四平。5月23日侵占长春。28日侵占吉林，控制了松花江以南地区。这时，国民党在东北内战前线的兵力已达15个军，51万余人。后由于国民党军队的战线太长，兵力分散，继续组织大规模进攻有困难，不得不在6月6日同中共达成东北暂时休战15天的协议（后休战延长至月底）。蒋介石发表《关于东北暂时停战的声明》，声称下令东北各军自6月7日正午起，停止追击、前进及攻击，其期限为15日。同日，周恩来发表《关于东北停战的声明》：“不论对于中国本部的冲突，或是对于东北的冲突，中国共产党都是主张无条件而且真正停止内战的。”提出国共双方就以下事项进行谈判：一、完全停止东北冲突之详细办法；二、完全恢复中国交通之含有时间限制及协定；三、不再迟延地执行2月25日关于中国军队复员的整编及统编的协定之基础。蒋介石先是无理提出以东北民主联军退出长春为停战条件，当东北民主联军撤出长春后，他又提出在停战谈判中美方享有“最后决定权”。这种令中共无法接受的主张，使谈判陷于停顿。6月中旬，蒋介石提出，中共军队须退出察哈尔、热河、烟台、威海卫、苏北和东北大部。6月20日，周恩来会见马歇尔，说明目前情况十分紧迫，内战有一发不可收拾的危险，建议东北全境停战，关内停止冲突。6月21日，中共代表团致函国民党代表，提出由军事三人会议立即宣布东北长期停战，并重申全国停战令等4项建议。这些建议

均遭到蒋介石的拒绝。事实证明，在东北休战命令生效后，国民党军队在东北的进攻，并没有停止。

（林健柏）

下关惨案

1946年6月23日国民党特务在南京下关车站殴打上海人民和平请愿团的流血事件。

1946年6月，国民党反动派发动全面内战迫在眉睫。6月上旬，马叙伦、陶行知、王绍鏊、许广平等知名人士，联名致函蒋介石和马歇尔，要求制止内战和反对美国政府支持国民党政府打内战。蒋介石置之不理。6月中旬，上海各界50多个人民团体推举马叙伦、蒉延芳、盛丕华、包达三、阎宝航、胡厥文、雷洁琼、吴耀宗、张䌹伯、陈震中、陈立复等11人组成和平请愿代表团，以马叙伦为团长，去南京呼吁和平。中统局得到所属上海特派员季源溥的报告，上海各界人士将要举行一次声势浩大的示威游行，并拟推出一个"上海各界要求和平民主运动请愿代表团"前来南京向国民党政府请愿等情况，中统局局长叶秀峰当即向国民党中央秘书长吴铁城汇报，吴指示要设法阻止代表团来京，以免制造麻烦，为共产党所利用。叶复电季源溥，要季严密监视，并设法进行分化破坏活动；同时又把津浦铁路调查统计室主任陈叔平召来，当面吩咐加紧活动，做好对付上海代表团来京的准备，并说，万一代表团来到南京，也决不能任其入城，要设法迫令其返回上海。接着又向中统江苏省调查统计室（该室设在当时江苏省会镇江）主任季璞进行布置：如果该代表团来南京路过镇江时，要设法阻拦，迫其折回上海。6月23日，以马叙伦为团长的上海人民和平请愿团启程去南京。中统特务一面在上海站采取扣车头、不发车等卑劣手段不让代表团上车；一面由国民党上海市市长吴国桢（1903—1984，湖北人）出面劝阻，结果都没有成功。当代表团所乘列车经镇江时，季璞事先准备在车站的一批所谓"苏北难民"，等车一停站，就蜂拥上去，企图把代表团成员拉下车来，不让上南京。他们叫嚷我们是从苏北来的，在家乡遭到共产党迫害，弄得流离失所，无家可归，你们要求和平，停止内战，就是不让我们回去。这些论调遭到了代表团的有力驳斥。车上的旅客也纷纷起来支持代表团。他们捣乱了一阵，阴谋未能得逞。下午7时左右车到南京，麇集在南京下关车站的一群国民党特务和一批所谓"苏北难民"，在陈叔平的亲自指挥下，等代表团成员一下车，就一拥而上，把代表团成员拥至候车室和西餐厅，重重包围起来，大叫大骂，不让代表团出站，要他们回上海去。但代表团不畏强暴，坚决要进城。特务、暴徒见无计可施，便大打出手，用铁棒铁器袭击代表团。团长马叙伦、代表雷洁琼、阎宝航、陈震中和前来欢迎请愿团的中国民主同盟代表叶笃义以及进行采访的《大公报》记者高集、《新民报》记者浦熙修等被打伤，有的伤势很重。顿时车站秩序大乱，前后历5个多小时。当时在场维持秩序的宪兵警察，初则袖手旁观，若无其事；继则隐匿无踪，不知去向。中共驻南京代表团团长周恩来及成员董必武、滕代远、邓颖超、齐燕铭以及郭沫若等，于深夜两点钟赶到医院，慰问受伤代表。随后，冯玉祥、沈钧儒、邵力子、罗隆基等和南京各界人民也络绎不绝地到医院慰问。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毛泽东、朱德，各民主党派领导人和上海各界人民纷纷发来慰问电。24日，周恩来在国民党、共产党、美国三方代表会议上就下关事件提出报告，并发表备忘录，向国民党政府提出严重抗议，要求彻查事件真相，惩办凶手，保障民权。马叙伦等几位代表被打伤后，请愿团的活动并未停止。25日，请愿团举行记者招待会，揭露国民党反动派指使特务制造下关惨案的罪行。29日，蒋介石在接见部分上海和平请愿代表时说：和平很有希望的，就是共产党打过来，我也不打过去，请回去告诉上海人民好了。但是，在蒋介石说此话的3天前，他已经下达了进攻人民解放军中原军区的密令，暴露了他们假和平、真内战的面目。

（林健柏）

全面内战爆发

1946年6月26日，国民党反动派以围攻鄂豫边境的中原解放区为起点，发动对解放区的全面进攻。

1946年6月中旬，蒋介石要求人民解放军退出陇海路以南、胶济路全线、承德和承德以南的一切地区，东北除黑龙江、兴安两省，嫩江中部、北部及延吉地区外之所有各省，以及1946年6月7日以后解放军在山东、山西两省从伪军手里解放出来的一切地区。并声明如果中共不退出上述地区，国民党政府就不能考虑停战问题。6月20日，中共代表周恩来在南京发表声明，表示不能接受国民党方面提出的要求。21日中共代表团向国民党政府提出东北长期停战、恢复交通、整军复员、重开政治协商会议等4项建议。遭到国民党的拒绝。6月26日，国民党反动派片面撕毁《停战协定》，悍然派郑州绥靖公署主任刘峙指挥8个整编师又2个旅，约22万人，围攻中原

解放区，发动了全面内战。中原解放区位于鄂豫皖边境之大别山区，抗日战争结束时曾地跨平汉铁路东西，接近武汉，方圆达15万平方公里。由于国民党抢占战略要地，到1946年6月中原解放区已缩小到只有罗山、光山、商城、经扶(新县)、礼山之间以宣化店为中心、方圆不足50公里的狭小地区。人民解放军共6万余人。这时国民党的总兵力约有430万人，其中正规军约200万人；国民党政府统治着约占全国76%的面积，有3亿多人口的地区，控制着几乎所有的大城市和绝大部分铁路交通线。而人民解放军只有约127万人，其中野战军约61万人，解放区的面积约占全国24%，人口约1.36亿，至于武器装备、物资供应、运输条件等，更远不如国民党。就整个军事力量和经济力量对比上，国民党方面占着明显的优势。蒋介石狂言：在48小时内消灭中原解放军，3至6个月内消灭全部解放区和人民解放军。6月26日拂晓，国民党军队向黄安(红安)以西、经扶以东、孝感以北的解放区大举进攻，侵占邓店、虎湾等地。鉴于国民党军队重点围攻、解放区回旋余地甚小、难以长期坚持的情况，为了保存实力、牵制敌军，1946年5月初，中央军委就指示中原军区，在情况紧急时准备以一部分兵力坚持原地区斗争，一部分兵力向东突围，主力向西突围，转移到豫西、鄂西、陕南、川东地区活动。并指出：这个地区幅员广阔，便于机动就粮。在这一地区长期坚持，牵制敌人，对配合其它地区作战将起重大战略作用；如万分困难，也可出敌不意地突然向华北或陕甘宁解放区转移。中共中央于6月23日又指示中原局：立即突围，愈快愈好，不要有任何顾虑。生存第一，胜利第一。中原军区遵照中央军委的指示，令第一纵队第一旅伪装主力，向津浦路以东转移；鄂东军区部队在原地坚持斗争，以迷惑、牵制敌人；主力部队分左右两路于26日晚开始分两路向西突围。右路部队为第二纵队之第十三旅、第十五旅1个团、第三五九旅、干部旅及中原军区机关，共约1.5万人，由军区司令员李先念、政治委员郑位三率领，由宣化店向西北方向突围。经过1个月的艰苦转战，终于冲破敌人的重重追堵合围，胜利地进至陕南的商南县境，与当地游击队会合，在秦岭以东、伏牛山以西、陇海路以南、汉水以北地区创建游击根据地，8月3日组成鄂豫陕军区。其中第三五九旅则根据中央军委的指示继续北进，于8月底进入陕甘宁解放区。河南军区部队2000余人在掩护主力突围后，随右路突围部队前进，于8月初进至豫陕边的卢氏、灵宝、雒南(洛南)等地开展游击战。左路部队为第一纵队及第二纵队之第十五旅共1万余人，由军区副司令员兼第一纵队司令员王树声率领，于7月1日越过平汉路，进入长江以北、大巴山以东、汉水以南，以武当山为中心的地区创建游击根据地。于8月27日组成鄂西北军区。向东突围的第十纵队第一旅7000余人，由皮定钧率领于7月下旬向东北突围，转战20多天到达苏北的淮安，加入华中野战军序列。两个月来，解放军突破敌军重重包围和堵截，完成了战略转移任务，保存了主力，创建了两块游击根据地，并留置小部分兵力坚持鄂东和鄂中地区的游击斗争。共牵制国民党军30个旅的兵力，使其不能在预定时间转向华中、华北、西北解放区进攻。战争初期，蒋介石调动了80%的正规军，193个旅(师)，约160万部队，向解放区实行全面进攻。除围攻中原解放区外，还以58个旅约46万多人，进攻华东解放区；以28个旅约25万人，进攻晋冀鲁豫解放区；以38个师约26万人，进攻晋察冀、晋绥解放区；以16个师约16万人，准备再次进攻东北解放区；以19个旅约15.5万人，准备进攻陕甘宁解放区；以9个旅7.5万人，进攻广东各游击区和海南岛解放区。解放区的军民为粉碎国民党蒋介石的进攻展开了英勇奋战。从1946年7月至1947年2月，经过8个月的作战，人民解放军共歼敌71万人。而敌人在战争初期占领了解放区105座城市，以后骤然减少，并完全陷于被动局面。这时敌人在第一线攻击的兵力便以1946年10月的117个旅的最高点，下降到85个旅。于是蒋介石便不得不放弃全面进攻的方针。　(林健柏)

李公朴、闻一多惨案

1946年7月，中国民主同盟负责人李公朴、闻一多在昆明被国民党特务暗杀的事件。史称“李闻血案”或“李闻惨案”。

1946年6月，国民党反动派在美帝国主义支持下，对解放区发动全面进攻，同时对其统治区人民加紧迫害。国民党政府密令昆明警备司令部：“中共蓄意叛乱，民盟甘心从乱，际此紧急时期，对于该等奸党分子于必要时得便宜处置。”并拟定捕杀李公朴(1902—1946，江苏常州人)、闻一多(1899—1946，湖北浠水人)等人的名单。李公朴、闻一多都是中国民主同盟中央执行委员和民盟云南省支部负责人。抗战胜利后，他们积极参加反对独裁的民主运动，反对蒋介石的卖国内战政策。当时，国民党南京特务机关密令昆明特务机关，对“中共与民盟分子同样可以密

报、密捕、密决”，并拟定暗杀李、闻的行动计划。7月初，许多朋友都为李公朴、闻一多担心，劝他们早点离开昆明。李公朴说：“我准备好了，蒋介石要杀我，在他统治的地区，到别处也一样可以杀的。”他说：“既然要从事民主运动，就要抱着跨出了门，就不准备再跨回来的决心！”7月11日晚上，李公朴和夫人张曼筠外出，为筹办音乐会找人洽借会场。归途中已被特务跟上。10时半，他们乘坐公共汽车，到青云街与大兴街口处下车，被国民党特务以美式无声手枪杀害。李公朴遇难后，闻一多立即赶到医院，站在李公朴遗体前痛哭，随后来到民主周刊社，召开紧急会议，决定通电全国，向云南警备司令部送交抗议书，并组成“李公朴先生治丧委员会”，主持追悼及善后事宜。15日上午，闻一多主持昆明各界人士举行的李公朴追悼会。下午又出席记者招待会。在会上，他呼吁新闻界分清是非，主张正义，尽可能地反映一些人民的希望，报道一些人民的声音。5点半左右，当他走到离西南联大教员宿舍十来步远的地方，遭特务开枪扫射，当即身死。李、闻惨遭杀害，举国震惊，万民共愤。周恩来代表中共中央向国民党反动派提出严重抗议，并与民盟等民主党派一起提出彻查血案、惩办凶手等严正要求。7月16日和18日，昆明人民为李公朴、闻一多举行火葬仪式，成千上万群众，前来祭慰忠魂、向烈士告别。各校学生罢课，要求惩办凶手。7月18日，周恩来在上海举行的中外记者招待会上指出，国民党特务暗杀李公朴、闻一多事件“这不是偶然的，而是和平民主运动中一种反动的逆流，想以这种最卑鄙的手段来吓退民主人士”。但是，事实并没有按照反动派的意愿发展。茅盾在《对死者的安慰和纪念》一文中说：李公朴、闻一多先生以身殉民主，这告诉了反民主分子：暴力不能摧毁人民之要求。不流血而实现民主，在中国是一种幻想。全国人民从李闻血案中受到教育，愈加看清反动派的狰狞面目，从而抛弃幻想，更广泛投入争取和平民主、反对内战独裁的斗争。　　（林健柏）

苏中战役

1946年7月13日至8月31日，中国人民解放军华中野战军在江苏中部地区，为粉碎国民党军进攻所进行的自卫反击战役，亦称苏中七战七捷。

1946年6月下旬，蒋介石发动了全面内战。7月上旬，国民党军第一绥靖区司令官汤恩伯（7月中旬由李默庵接替）指挥5个整编师15个旅约12万人向苏中解放区大举进犯，企图先占如皋、海安，巩固其沿江一线阵地，而后继续沿（南）通（赣）榆公路和运河线向北进攻，以策应向淮北进攻的国民党军，夹击苏皖解放区首府淮阴。7月13日，中共中央军委电示苏中、苏北各部队先在内线打起来，最好先打几个胜仗，看出敌人弱点，然后我鲁南、豫北主力加入战斗，最为有利。据此，华中野战军司令员粟裕、政治委员谭震林集中主力3万人，采取大踏步进退、集中优势兵力各个歼灭敌人的战法，取得了七战七捷。7月13日至15日，华中野战军首战宣（家堡）泰（兴）。13日晚，第一、第六师和第七纵队按预定部署发起战斗，激战至15日拂晓，歼灭敌整编第八十三师第十九旅大部。15日，用15个团的兵力先机制敌，向国民党军守备较薄弱的宣家堡、泰兴发起攻击，以错乱其进攻部署，初战获胜。7月18日至21日，再战如（皋）南，歼灭进犯如皋之敌整编第四十九师师部和该师的1个半旅。如南战斗后，华中野战军主力转至海安东北地区休整补充。7月30日李默庵集中6个旅的兵力，分别由如皋、姜堰（泰县）合击海安，企图与华中野战军主力决战。华中野战军为保障主力休整，令第七纵队两个团实行运动防御。经连续阻击5天，歼国民党军3000余人后，于8月3日主动撤出海安，进行短期休整。8月10日至11日，袭击海安东侧李堡之敌，歼敌新七旅和第一〇五旅一部共9000余人。8月13日和15日，中共中央军委指示华中野战军：苏中地区各部分散的敌军，有利于我各个击破，望利用苏中各种有利条件“再布置几次作战，即各交通总队凡能歼灭者一概歼灭之”。8月21日至22日，华中野战军主力插入敌之侧后，于丁埝、林梓、东陈等据点，歼敌5个交通警察大队共5000余人。8月23日至26日，华中野战军第十纵队和地方部队击退了敌第二十五师对邵伯镇的进攻，毙伤敌2000余人。23日，华中野战军主力由丁、林地区西进，实行“攻黄（桥）救邵（伯）”计划，25日于如（皋）黄（桥）路与从黄桥出动的敌第九十九旅遭遇，即将该敌包围于黄桥东北的分界地区，随即又将从如皋来援的敌第一八七旅等部包围于加力，26日和27日，华中野战军集中5倍于敌的兵力各个歼灭被围之敌，并乘胜追击，31日攻占黄桥。苏中战役七战七捷，共歼敌5万余人，占敌军进攻苏中解放区全部兵力的五分之二，华中野战军伤亡1.6万人。

（林健柏）

安平事件

1946年7月29日，驻天津的美国海军陆战队

和国民党军队在河北香河安平镇附近袭击人民解放军防地的事件。

抗日战争胜利后，美帝国主义干涉中国内政，派军队侵驻北平(北京)、上海、南京、天津、唐山、青岛等重要城市，并不断向各解放区进行挑衅。1946年7月29日，驻天津的美国海军陆战队60多人以运送北平军事调处执行部美方人员的给养为名，配合国民党军队"巡逻"到天津西北约70公里的河北香河县安平镇附近，侵入冀东人民解放军防地，并向当地守军攻击。守军被迫自卫还击，双方都有伤亡。尔后美军出动空军配合陆军占领了安平镇，造成"安平镇事件"。当军事调处执行部小组到此地"调处"时，美国和国民党方面的代表极力抵赖其违反协议，侵入解放区的罪行。《解放日报》就安平镇事件发表社论，揭露美军的侵略行为和国民党反动派的阴谋活动，指出国民党北平某高级军事长官对于外国军队在中国领土上屠杀中国人民，竟引为无上光荣，表示无上感激。对中国人民向外国军队侵略行动所实行的正当自卫，却说是"无论此事系由中共自行计划，或其他人授意，同系野蛮之行动"。中国共产党严正要求美国海军陆战队道歉赔偿，处分直接负责的军官，并公开保证不再向任何解放区侵扰，美国驻华一切海陆空军立即撤出中国。　（林健柏）

《中美友好通商航海条约》签订

1946年11月4日，国民党政府和美国政府在南京签订的出卖中国主权的《中美友好通商航海条约》，简称《中美商约》。

1946年11月4日，国民党政府外交部部长王世杰、条约司司长王化成与美国政府全权代表施麦斯、驻华大使司徒雷登在南京签订《中美友好通商航海条约》。条约共30条，其主要内容是：一、美国国民在中国领土全境内享有居住、旅行及经商的自由，包括从事商务、制造、加工、科学、教育、宗教及慈善事业的自由，采勘和开发矿产资源、租赁和保有土地以及从事各种职业的权利。在这一切的政治、经济、军事、思想文化活动中，有取得保有或租借及占用适当的房屋，并租赁适当之土地，选用代理人或员工的自由权利；二、美国商品在中国所交纳进出口关税和内地税方面，享有与中国商品和第三国商品同等待遇，中国对美国任何种植物、出产物或制造品的输入，以及由中国运往美国的任何物品"不得加以任何禁止或限制"；三、包括军舰在内的所有美国船舶可以在中国开放的任何口岸、地方或领水内自由航行，必要时可以开入任何不开放的口岸、地方或领水。这一条约表面上双方享有对等权利，但在当时中国根本没有远洋运输设备的情况下，这只能是美国单方面享有的权利。这个不平等条约缔结后，受到中国人民坚决反对。上海人民团体联合会发表声明说：中美商约是绝对不利于中国的片面独惠的丧权辱国的新的不平等条约。延安《解放日报》发表社论《评蒋美商约》，指出它是"蒋政府把中国作为美国附属国的重大标志之一，是中华民族又一次新的大国耻。"延安各界人士建议以11月4日为新的国耻纪念日。1947年1月，陕甘宁边区政府正式接受了这一建议。中美商约签字前后，国民党政府还同美国政府签订了一系列卖国协定。对此，中共中央于1947年2月1日郑重声明："对于1946年1月10日以后，由国民党政府单独成立的一切对外借款，一切丧权辱国条件及一切其他上述的协定谅解，与今后未经政治协商会议通过或未经征得本党和其他参加政治协商会议各党派同意的一切同类外交谈判，本党在现在和将来均不承认，并决不担负任何义务。"　（林健柏）

国民党的"制宪国大"

1946年11月15日至12月25日，国民党在南京召开了一手包办的"国民大会"，制定所谓《中华民国宪法》。

1946年10月11日，国民党军队进占解放区政治、军事中心之一的张家口，蒋介石于当天颁发所谓"国民大会召集令"。之后，为孤立中国共产党、诱骗中国民主同盟参加，拉拢第三方面势力，宣布"国大"召开推延3天。但中共及民盟坚持拒绝派代表参加大会。本来召开国民大会，团结全国力量，制定民主宪法，结束一党专政，这是中共一向坚持的主张。中共认为，应根据政治协商会议的决议，第一，必须改组政府(包括国府委员会和行政院)，由改组后的政府负责召开国民大会；第二，依照政协决议的原则及其规定的程序，由政协宪草审议委员会修正宪法草案，作为提交国大的唯一宪法草案，各党派并保证该草案的通过；第三，国民大会的召开日期和国民大会代表增加名额的分配，不是由国民党一党政府片面决定，而是由政协综合小组协商决定，各党派将其国大代表名单交给改组后的政府，并由改组后的联合政府下令召集。但是，国民党政府却坚持片面召开"国大"，毫无改组政府的诚意，并且在国民党六届二中全会上不顾一切，修改政协所协议的宪草原则，维护国民党一党独裁。国民党召集的国大，完全违背了

政协决议的原则和程序。1946年11月15日,国民大会在南京开幕。出席代表1500余人。绝大多数代表为国民党员。此外,还有青年党曾琦、民社党张君劢、社会贤达王云五、傅斯年、胡霖等。这次国民大会的中心任务是制定和通过《中华民国宪法》。蒋介石在开幕词中宣称此次会议是"中国进入民主宪政时期的开端",将"制定一部完善可行的宪法,奠立民主法制的始基","以立民国百年不拔的根基"。12月25日,大会通过《中华民国宪法草案》,决定于1947年元旦公布。同日,国民大会闭幕。对于国民党召开的"国大",中共表示坚决反对。在"国大"开幕的第二天,周恩来在南京梅园新村举行记者招待会,发表书面声明,指出"这一'国大',是违背政协决议与全国民意,而由一党政府单独召开的","它是一党召开的分裂的'国大',而不是各党派参加的团结的国大。"它最后破坏了政协以来的一切决议、停战协定与整军方案,隔断了和平商谈的道路。11月25日,民盟发表声明,拒绝参加"国大",并宣布将参加"国大"的民社党清除出民盟。

《中华民国宪法》共14章,175条。第一章"总纲"共6条,规定三民主义为中华民国立国之本。第二章"人民之权利义务"共18条,虽然抄袭了外国资产阶级宪法中的一些"平等"、"自由"条款,但在第23条中却规定:"以上各条列举之自由权利,除为防止妨碍他人自由,避免紧急危难,维持社会秩序,或增进公共利益所必要者外,不得以法律限制。"实际上一笔勾销了人民的民主自由权利。第三章"国民大会"共10条,赋予总统召集国民大会的特权,规定"国民大会于每届总统任满前90日集会,由总统召集之"。第四章"总统"共18条,规定总统对外有"缔结条约及宣战、媾和之权",对内则有"戒严"、"发布紧急命令"等权力。其余各章为"行政"9条;"立法"15条;"司法"6条;"考试"7条;"监察"17条;"中央与地方之权限"5条;"地方制度"17条;"选举罢免创制复决"8条;"基本国策"33条;"宪法之施行及修改"6条。以上各条款表面上维持着立法院对行政院的"同意权"和"不信任权",似乎是责任内阁制。实际上国民党控制了行政院,而立法委员绝大多数又是国民党员,立法院对行政院不起制衡作用,行政院也只能是总统个人意志的执行机关。这部宪法表面上规定了省、县地方自治,但又在第108条中规定由中央制定"省自治通则",作为省、县"自治法"制定的依据;第110条还规定在发生争执时,由中央"立法院解决之",地方只能俯首听命。因此,它不是以地方自治为基础而是以中央集权为出发点。12月31日,民主建国会、民主促进会、九三学社等11个人民团体发表联合声明,坚决反对和否认国民党的一党宪法。正如周恩来所指出的:国民党一党"国大"通过的所谓宪法,"把独裁'合法化',把内战'合法化',把分裂'合法化',把出卖国家和人民利益'合法化'"。

(林健柏)

四保临江战役

1946年12月18日至1947年4月3日,东北民主联军辽东军区部队在临江、通化地区4次击退国民党军队进攻的战役。

1946年12月17日国民党东北保安司令部为贯彻"先南后北"的战略方针,集中新编第一军、新编第六军和第五十二、第六十、第七十一军各一部共6个师的兵力,沿辽宁省辉南、柳河、通化、桓仁、宽甸一线,向临江地区发起进攻,企图先打通通化、辑安(集安)线,尔后将南满东北民主联军消灭或困绝于长白山中。鉴于敌人在兵力上占优势,辽东军区采取内外线密切配合作战的方针,以第三纵队在临(江)通(化)地区进行运动防御,待机反击,第四纵队深入敌后,在本溪、抚顺、桓仁地区转战10多天,分散敌人的进攻力量。经过1个多月的作战,攻克敌据点20多处,歼敌5000多人,迫使敌人从进攻方向抽调两个师回援,粉碎了敌军对临江地区的第一次进攻。1947年1月30日,国民党军又调集第五十二、第六十军及新编第六军各一部共4个师的兵力,分3路再次进攻临江地区。2月6日,辽东军区以第四纵队主力深入敌后,于宽甸、辑安间歼敌一部,并袭入桓仁城,牵制与迷惑了敌人。第三纵队主力及第四纵队一部进至通化以北的高丽城子地区,歼敌中路第五十二军第一九五师大部,歼敌2000多人。继又转移兵力于三源浦歼敌援军两个营,粉碎了敌军对临江地区的第二次进攻,并由北满抽调1个师回援南满。2月13日,南满之敌又集结第六十、第七十一、第五十二军及新编第六军各一部,共5个师的兵力,分3路向临江地区发动进攻。18日辽东军区主力乘敌在运动中发起反击,在通沟歼左路之敌第六十军暂编第二十一师1个团,并乘胜收复金川、辉南、柳河、辑安等城。第四纵队一部于16日向抚顺、本溪挺进,21日于碱厂歼敌1000多人,吸引敌第十四师等3个师于自己周围,策应了正面主力的作战。前后10天,在柳河县通沟、大北岔地区,以及本溪县碱厂、下马塘等地,共歼敌7000多人,粉碎了敌军对临江地区的

第三次进攻。3 月 27 日，敌集中新编第六军、第五十二、第十三、第六十、第九十三军各一部共约 20 个团的兵力，分 3 路第 4 次进攻临江地区。辽东军区以部分兵力牵制其两翼，集中主力歼击其较弱之中路。4 月 3 日，中路之敌第十三军第八十九师被我军小部引诱至三源浦西南红石拉子(红石镇)地区，我预先设伏在该地的第三纵队主力和第四纵队一部突然发起攻击，全歼该师。其余两路敌军迅即撤退。此役歼灭敌第八十九师等部 1.9 万多人，收复桓仁、辑安(集安)等 5 座县城。四保临江战役的胜利，为尔后转入反攻创造了条件。　(林健柏)

抗议美军暴行运动

1946 年 12 月，全国各地学生为抗议驻华美军士兵强奸中国女学生掀起的反美爱国斗争。

1946 年 12 月 24 日晚 8 时许，北京大学先修班女学生沈崇在去东单平安电影院(儿童电影院)看电影途中，被美军士兵皮尔逊(Pear. Son)、普利查特(Prichart)强奸。这就是“沈崇事件”。第二天，北平一家民营的亚光通讯社，首先发表了沈崇被侮辱的新闻。12 月 26 日，中共北平地下组织通过《新民报》、《世界日报》、《经世日报》、《北平日报》等报社，冲破国民党政府的禁令，转载了亚光社发布的消息。北大学生听到这个消息后十分愤怒。27 日北京大学民主墙上贴满了抗议美军暴行的大字报和标语。当天下午，中共地下组织通过进步力量较强的史学系出面，由史学会发起召开了全校各系级代表及各社团代表大会，议决 30 日罢课一天，举行示威游行，并成立了“北京大学学生抗议美军暴行筹备会”。国民党政府通过“中央社”发布歪曲事实的消息，诬蔑受害女生“似非良家妇女”，“在北平某中学肄业，是二十几岁的妇女”等，为美军罪行开脱，并秘密逮捕报道这一消息的记者。12 月 30 日清晨，清华大学、燕京大学学生 5000 余人按照预定计划上街游行，辅仁大学的学生在中途也加入了队伍。这时北大学生已集中在操场上，中法、朝阳、师范学院、铁道管理学院等校学生陆续赶到这里。午后 1 时半，城外城内各校学生在沙滩会合成了一支万人的队伍，举行反美反蒋的示威游行。“抗议美军暴行！”“美军退出中国！”“维护主权独立！”的口号声响成一片。许多青年店员、公务员自动加入了队伍。队伍到达东单广场，展开了演说、朗诵等活动，控诉美军的暴行，揭露国民党政府的卖国外交政策。学生群众的这一行动得到社会各界的支持和响应。12 月 31 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在各大城市组织群众响应北平学生运动的指示》，要求国民党统治区的地下党组织站在抗暴斗争的前列，在运动中尽量“造成最广泛的阵容”，“采取理直气壮的攻势”，“使此运动向孤立美蒋及反对美国殖民地化中国之途展开”。各地中共组织坚持以“美军退出中国”为中心口号，把斗争逐步引向深入。抗议美军暴行运动席卷全国。从 12 月底到 1947 年 1 月初，上海、南京、昆明、杭州、武汉、无锡、广州、青岛、福州、桂林、台北等十几座大中城市相继举行抗议美军暴行、要求美军退出中国的爱国示威运动，参加的学生达 50 万人。各大城市的工人、教员和其他群众，大力支持学生的抗暴运动。1947 年 3 月，在上海成立了全国学生抗暴联合会，进一步推动了国统区爱国民主运动的展开。在中国人民的压力下，美军当局被迫对两名罪犯进行了“审讯”和处理。判处主犯皮尔逊 15 年徒刑(送回美国后又宣布释放)、帮凶普利查特 10 个月徒刑。这一声势浩大的抗暴运动，实际上是 1945 年在国统区爆发的一二一运动的继续和发展。　(林健柏)

东北民主联军三下江南作战

1947 年 1 月 5 日至 3 月 16 日，东北民主联军北满部队三渡松花江南岸作战。

1947 年 1 月 5 日，东北民主联军北满部队为策应辽东军区部队四保临江、坚持南满根据地斗争，集中主力第一、第二、第六纵队和 3 个独立师共 12 个师、3 个炮兵团，冒着零下 40℃的严寒，越过冰封的松花江，向长春、吉林以北的国民党军进攻。第一纵队首先以一部包围吉林以北其塔木要点，该纵队主力和第六纵队分别在九台县张麻子沟、焦家岭歼灭自九台、德惠来援之敌，乘胜歼敌新编第一军两个团和保安团队一部，共 4000 多人。第二纵队攻克伏龙泉等地，迫使敌军从南满抽调两个师、由西满抽调一个师北上增援。由于寒冷侵袭，北满部队于 1 月 19 日撤回江北，休整待机。2 月 21 日，北满部队以 3 个纵队、3 个独立师共 12 个师再次渡松花江南下作战。第六纵队和第一纵队以远距离奔袭手段，攻歼九台以北城子街要点守敌新编第一军 1 个团。独一师于德惠南之拉拉屯歼保安团大部，第一、第二纵队于布海以南中长路两侧，歼援敌 1000 多人。敌再次从南满、西满及长春地区抽调兵力 12 个团北援。3 月 2 日，北满部队又主动撤回江北。这时，敌新编第一军、第七十一军等部在空军一个大队的配合下，大举北犯，扬言与我决战于松花江两岸。3 月 8 日，北满部

队主力乘敌分散之机第三次越松花江南下进行反击。敌人迅速后撤，北满部队勇猛追击，于农安县东北的郭家屯、靠山屯地区歼敌第七十一军第八十八师全部及第八十七师一部，继而包围农安县城。敌又从南满及热河抽调两个师北援。3 月 16 日，北满部队在松花江开冻前回师江北休整。三下江南战役和四保临江战役共歼敌 3.5 万多人，坚持了南满，巩固了北满，并打乱了蒋介石的计划，结束了敌人在东北的攻势，为尔后转入反攻创造了条件。（林健柏）

中国农工民主党成立

中国农工民主党是 1947 年 2 月 3 日由章伯钧等在上海成立的民主党派，简称农工党。

农工民主党的前身是邓演达等在上海组织的中国国民党临时行动委员会(第三党)。1935 年改名为中华民族解放行动委员会。1941 年参加发起中国民主政团同盟。1945 年 11 月 12 日，第三党发表《抗战结束后对时局宣言》，反对内战，指责美国对国民党政府的军事援助，要求国民党以天下为公的原则给人民以民主权利，用和平方式解决军事、政治纠纷。1946 年 3 月 1 日，第三党在香港创办《人民报》。其宗旨是：站在中国农工平民的立场，为彻底完成中华民族的解放事业，为实现民主政治及争取社会主义前途而奋斗。5 月，第三党中央机关迁上海，同时，恢复出版《中华论坛》半月刊，反对美军驻留中国，助长中国内战；号召全国人民起来反对内战，反对独裁，争取民主权利。在组织活动方面，从 1945 年秋冬，就派遣干部到收复区进行审查党员、恢复整理基层组织、建立新的领导机构等工作。1946 年夏秋，上海、南京、浙江、江西、广东等省市的组织已建立起来。1947 年 1 月上旬，章伯钧等参加中国民主同盟一届二中全会后，决定将中华民族解放行动委员会改名为中国农工民主党，简称农工党，并筹备召开党的第四次全国干部会议，主要研究党的名称、政治纲领、路线和今后的工作方针等问题。1947 年 1 月 16 日至 18 日，在上海召开第四次全国干部会议，出席的有章伯钧、丘哲、左儒、罗任一、李伯球等 37 人，由章伯钧、丘哲、左儒 3 人组成主席团。会议讨论通过了章伯钧的《党务报告》。报告提出中国农工民主党代表农工平民利益，农民问题是中国革命的核心问题和主力军，农工民主，不是主张农工民主专政，而是主张联合其他民主力量，实现进步的以社会主义为归宿的民主革命。会议通过了章伯钧的《党务报告》，作出了改变党的名称的决议，并通过了《中国农工民主党党章》。《党章》规定：本党代表农工平民利益，定名为中国农工民主党。本党任务，为彻底完成民族解放，实现民主政治，达成社会主义。大会发表《宣言》，指出：对于现阶段中国经济的改造，首先须改善农民生活，实现耕者有其田；增进工人福利，由工人参加国家生产管理，并与工商业者合作，以发展生产。当前要停止征兵征粮，求农村安稳，停止通货膨胀及官僚买办的垄断，求工商业的复兴与失业的救济。会议选举了 25 人组成中央执行委员会，10 人组成中央监察委员会。中央执行委员会推选章伯钧、丘哲、罗任一、李伯球、张云川、王深林、郭则沉、王一帆、李士豪 9 人为常务委员，章伯钧为主席，推选彭泽民为监察委员会主席。（林健柏）

台湾二二八起义

1947 年 2 月 28 日，台湾人民举行反对国民党当局暴政的武装起义。

1947 年 2 月 27 日晚，国民党专卖局武装缉私员在台北市万里红酒店附近，抢走了妇女林江迈的 6000 元现款和几十条香烟，并打伤了她。群众愤愤不平，包围了缉私员。缉私员开枪击毙围观的群众陈文溪。当晚，台北市民从四面八方聚集拢来，整夜地游行，包围警察局、宪兵队，喊出“打倒贪官污吏！打倒官僚资本！反对国民党专政！撤销专卖局、贸易局！严惩凶犯！”但毫无结果。这一震动台湾的“缉私血案”成了台湾人民二二八武装起义的导火线。2 月 28 日上午，人民罢市抗议，集队游行，高呼卖香烟都要送命，我们台湾人还能活吗？并把本町专卖局台北分局的存货抛出路上焚毁。这时，台湾当局发布戒严令，宣布自 2 月 28 日起，台北市区临时戒严，禁止聚众集会，如有不法之徒企图暴乱扰乱治安的予以严惩。声称枪伤人民的凶手“由省署妥善处理”。上午 11 时左右，人民代表 5 人向警备总部参谋长柯远芬提出惩凶、赔偿、取消专卖局等 5 项要求。柯一面欺骗拖延，一面布置镇压。下午 1 时，群众又向长官公署请愿，军警开枪打死群众 30 多名，伤者无数。人民更加激怒，教师罢教、学生罢课、工人罢工、商人罢市，各机关员工走避一空。愤怒的群众走上街头，游行示威，并很快发展为武装起义，夺取了广播电台，呼吁全台同胞起来反抗暴政。3 月 2 日，台湾大学、延平学院、法商学院、师范学院、建国中学等校学生 5000 多人在中山堂举行大会，决议组织学生军。台湾民主联盟发表《告台湾同胞书》，号召同胞们起来，高举民主的旗帜，团结牺牲，继续前进，奋斗到底。2

日下午，台湾省行政长官兼警备司令陈仪发表广播讲话：一、凡参加此次事件的人，一律不加追究；二、被宪警拘捕的人，准予释放；三、伤亡的人，伤的给予治疗，死的优予抚恤；四、特设处理委员会，以商定善后办法。3日，台北人民组成二二八事件处理委员会。当日下午发出第一号公告，说：本事件已在彻底交涉中，要求同胞保持镇静，提出"重用本省人才"、"专卖局废止"、"贸易局改为商政机构，废除营私行为"、"根据建国大纲即行县市长民选"等9项要求。从台北市开始的反抗斗争，很快就蔓延到台湾各地。汉族、高山族人民并肩战斗，使台湾全省大部分地方的反动政权陷于瘫痪。谢雪红(1901—1970，台湾彰化人)领导组织了一支3000人的起义武装。3月2日台中市民游行示威，市长黄克立化装潜逃，市警察局全体缴械。市民冲入三青团团部，把蒋介石画像打得粉碎。全市被起义群众控制。3日，人民武装驱逐反扑和增援的宪兵队和两连国民党军，并俘虏军官30多人、士兵和文职人员300多人。嘉义的战斗也很激烈。国民党军队败退市区，逃至机场死守待援，被人民武装包围。台湾地方当局向南京国民党政府求援。3月8日，蒋介石调动在徐州一带打内战的第二十师和第二十一师到基隆、高雄登陆，随即对起义群众进行血腥镇压，被杀害的群众达3万人以上。二二八起义爆发后，中共中央由陕北电台向台湾广播，指出："台湾人民的武装自卫乃是被迫的，是必要的，是正义的，是正确的。"3月20日延安《解放日报》发表社论，表示完全同情台湾人民的反蒋武装自卫行动，号召台湾人民反对妥协，反对出卖，坚持武装斗争。指出：你们的斗争就是我们的斗争，你们的胜利就是我们的胜利。　(林健柏)

中共中央转战陕北

1947年3月19日，中共中央主动撤出延安，开始转战陕北。

从1947年3月开始，国民党军队在全面进攻受挫的情况下，便集中其总兵力的43%重点进攻山东和陕北两个解放区。3月13日，蒋介石令胡宗南率34个旅25万兵力，由南、西、北三面进攻中共中央和人民解放军总部所在地延安。为加强攻势，自上海、徐州先后调集飞机100架左右，轰炸延安党政机关、军事设施、工厂、仓库以及前沿阵地。当时，在陕北战场上，西北野战兵团只有第一纵队(辖第三五八旅、独立第一旅)及新编第四旅、教导旅等4个野战旅约1.7万余人及3个地方旅，约为敌人兵力的十分之一，装备上也处于绝对劣势。为迟滞敌人的进攻，掩护中共中央机关、人民解放军总部和人民群众的转移，中央军委决心以教导旅和警备第三旅第七团共3个团5000余人的兵力在鄜县(富县)、临真镇以北地区，采取运动防御战阻击进攻之敌。另以第一纵队及新编第四旅位于鄜县西南地区待机。西北野战兵团继续执行集中优势兵力、消灭敌人有生力量的积极防御的作战原则，在延安以南抗击胡宗南部，经激战6昼夜，至3月19日上午掩护中共中央和中央军委机关及群众安全转移后主动撤离延安，敌人以5000人伤亡的代价，占了延安一座空城。毛泽东指出：存人失地，人地皆存；存地失人，人地皆失。胡宗南占领延安，就背上一个沉重包袱。毛泽东预言，少则一年，多则两年，延安必定回到人民手中。3月29日，中共中央在陕北清涧县枣林沟村举行会议，决定中共中央主席、中共中央军委主席毛泽东，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共中央军委副主席周恩来，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任弼时等率中共中央机关与人民解放军总部继续留在陕北，指挥全国各战场作战；以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刘少奇、朱德以及一部分中央委员组成中央工作委员会，到华北进行中央委托的工作；叶剑英、杨尚昆主持的中央后方委员会，转移到晋西北统筹后方工作。

胡宗南部侵占延安后，急于寻找陕北解放军主力决战。从3月25日起，西北野战兵团在彭德怀的指挥下，与10倍于己之敌进行周旋，使其陷于疲劳和缺粮的困境中。西北野战兵团相继取得青化砭、羊马河、蟠龙镇3战3捷，歼敌2万余人，而后转战西北方向。蟠龙战斗后，胡宗南部主力缩集永坪、蟠龙、青化砭地区整补。青海、宁夏之敌马步芳、马鸿逵部却乘西北野战兵团主力与胡宗南部作战之机，不断自西、北两面蚕食陕甘宁解放区，至5月中旬，先后攻占庆阳、合水、环县、盐池、定边等城。为打击青、宁"二马"，西北野战兵团乃于5月29日以主力西进，至7月7日，进行了陇东(甘肃东部六盘山以东地区)和三边(即定边、安边、靖边)战役，收复了环县、定边、安边、靖边等地，共歼马步芳、马鸿逵所部2400余人。8月上旬，西北野战军对榆林发动进攻，至8月11日，全歼敌5200余人。接着转移到米脂东北沙家店地区。随即以后方机关一部伪装主力东渡黄河，主力隐蔽集结于陕西米脂西北地区待机。胡宗南误认为西北野战军是"仓皇逃窜"，正东渡黄河，即以整编第二十九军等5个旅由绥德北进，令整编第三十六师主力由榆林南下镇川堡再折而向东，企图

夹击西北野战军于葭(佳)县地区。西北野战军以一部兵力阻击整编第二十九军等部,集中6个旅兵力,于8月18日开始向孤军冒进至沙家店地区的整编第三十六师出击,该师缩据沙家店附近之泥沟则、张家坪之间地区。20日西北野战军再次发起攻击,经1日激战,全歼整编第三十六师师部及1个旅,并在常家高山以南歼该师另1个旅,共歼敌主力6000余人,俘敌少将旅长刘子奇、少将参谋长罗秋佩。西北野战军伤亡1814人。至此,西北野战军粉碎了敌对陕北的重点进攻。　(林健柏)

青化砭战役

1947年3月25日,彭德怀指挥中国人民解放军西北野战兵团在陕北青化砭进行的歼灭战。

国民党军第一战区司令长官胡宗南部占领延安后,骄狂地叫嚷"中共已成流寇","不堪一击",急于寻找西北野战兵团主力决战。为调动敌人,创造战机,彭德怀命令西北野战兵团第一纵队独立第一旅伪装主力,与敌保持接触,诱敌主力5个旅沿安塞方向北上,主力第一纵队第三五八旅、第二纵队第三五九旅、独立第四旅、教导旅和新编第四旅等部集结在延安东北青化砭地区,利用有利地形布成袋形阵地,待机伏击孤军冒进之敌。3月21日,胡宗南果然中计,以整编第一军之整编第一师和整编第九十师共5个旅的兵力,由延安向安塞方向扑去;另以整编第二十七师之第三十一旅(欠第九十一团)由临真镇向青化砭前进,担任翼侧掩护。3月24日敌整编第一军5个旅进至安塞,企图围歼西北野战兵团主力于安塞以北地区。3月25日拂晓,当敌整编第三十一旅由拐峁进入西北野战兵团伏击圈内,设伏部队立即按预定计划,拦头截尾,从两翼向敌冲击。顿时,敌军失去指挥,混乱不堪,一部则抢占地形负隅顽抗。双方激战1个多小时,西北野战兵团以伤亡265人的代价,换取了全歼该敌2993人的胜利,活捉敌少将旅长李纪云、少将副旅长周贵昌、少将参谋长熊宗继。这是西北野战兵团主力撤出延安后的第一个胜仗,打击了敌人的气焰,鼓舞了陕甘宁解放区军民的斗志,这一战役也是西北野战兵团避实就虚,集中优势兵力歼敌的一个范例。　(林健柏)

羊马河战役

1947年4月,西北野战兵团在彭德怀等率领下,在陕北羊马河对国民党军胡宗南部进行的伏击战。

青化砭战役后,胡宗南吸取分散行动易被各个歼灭的教训,改变了战术:部队开进时,集结几个旅为一路,数路并列,缩小间隔,便于互相策应。针对国民党军的新战术,西北野战兵团采取了相应的对策:主力选择有利于机动的地点隐蔽待机;组织小部队在敌进攻兵团的前后左右不断进行袭扰,长时间地疲惫、消耗敌人,耐心等待敌人弱点的暴露和兵力的分散。胡宗南在青化砭战役后发现西北野战兵团主力在延安东北地区,即于3月25日令整编第一、第二十九军主力共11个旅,由安塞、延安及金盆湾、临真镇地区分3路,经青化砭、甘谷驿及延长,向延川、清涧地区前进,寻找西北野战兵团主力。3月29日至4月3日,先后占领延川、清涧、瓦窑堡,但连连扑空,不仅没有找到西北野战兵团主力,反而使部队疲惫不堪,给养也发生了困难。遂以整编第七十六师守备延川、清涧,以第一三五旅留守瓦窑堡,主力于5日南撤蟠龙、青化砭休整补充。西北野战兵团主力利用有利地形和群众条件,在蟠龙镇西北地区隐蔽休整。6日,乘敌南撤时,在永坪地区歼敌600余人之后,即进至瓦窑堡、蟠龙大道两侧地区继续休整待机。胡宗南判断西北野战兵团主力在蟠龙、青化砭西北地区集结,即令整编第一、第二十九军主力共8个旅于12日向青化砭西北方向前进,并以驻清涧的整编第七十六师1个团开瓦窑堡,接第一三五旅防务;令第一三五旅沿瓦窑堡至青化砭公路南下策应。中央军委获悉敌人的这一动向,当即指示西北野战兵团以伏击手段求歼第一三五旅于运动中。根据这一作战意图,西北野战兵团以一部伪装主力,将敌整编第一军等部吸引至蟠龙西北地区;集中主力在瓦窑堡以南地区设伏。此时,国民党军已被拖得十分疲劳。4月14日,第一三五旅沿瓦窑堡、蟠龙大道两侧高地南下,进至羊马河以北高地,上午10时许,突遭西北野战兵团伏击,"发生空前激战,肉搏十余次",西北野战兵团歼敌4700余人,活捉了以第一三五旅旅长麦宗禹为首的许多军官,在西北战场首创了全歼敌1个整旅的范例。　(林健柏)

内蒙古自治区人民政府成立

1947年5月1日,以乌兰夫为主席的内蒙古自治区人民政府在呼和浩特宣告成立。

1945年11月25日,云泽(乌兰夫)等在张家口召开内蒙古(锡林郭勒、伊克昭等盟)各盟旗人民代表大会,决定成立内蒙古自治运动联合会,作为内蒙古自治运动统一的领导机关。1946年4月3日在承

德召开内蒙古自治运动代表联席会议。经过协商，决定民族解放的方针应是平等自治而不是"独立自治"；接受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和帮助，目前以联合会为公开领导机关；撤销1946年1月16日成立的东蒙古自治政府，建立内蒙古自治运动联合会东蒙总分会；改造内蒙古武装，分别直属人民解放军各军区领导与指挥。会议选举乌兰夫为内蒙古自治运动联合会执行委员会主席。从此，内蒙古人民革命力量实现了统一领导。经过一年筹备，1947年4月24日至5月6日，在呼和浩特召开内蒙古人民代表会议，出席会议的有各旗盟、各民族、各阶层的代表298人。会议通过了《内蒙古自治政府施政纲领》和《内蒙古自治政府暂时组织大纲》，规定自治政府是内蒙古地区的蒙族联合其他民族实行区域自治的民主政府，自治区域是祖国不可分离的组成部分。其任务是：团结自治区内的蒙、汉、回各民族，坚决反对美帝国主义侵略，推翻国民党封建买办大汉族主义的统治，为实现内蒙古地区各族人民的彻底解放而奋斗。会议选出临时参议会。经临时参议会选出内蒙古自治政府委员21名，乌兰夫为政府主席。1947年5月1日，内蒙古自治区人民政府正式成立，并发表宣言。宣言指出自治政府是实行高度区域性自治的地方民主联合政府，并非独立自治政府；联合一切赞助自治政府的民主党派和中国境内各民族，坚决粉碎美蒋反动派的进攻和压迫，争取内蒙古民族和中国各民族共同解放；确保人民身体、思想、宗教信仰、言论、出版、集会、结社、居住、迁移、通讯的自由；对国民党统治区蒙古同胞的悲惨境遇，及反抗国民党暴政的斗争寄以同情并尽一切可能给予支援。5月19日，毛泽东主席和朱德总司令致电祝贺内蒙古自治区人民政府成立，指出它标志着蒙汉人民之间的关系进入一个新的阶段，由历史上所造成的民族压迫、隔阂和歧视的关系，变为民族平等、团结、互助、共同繁荣的新关系。内蒙古自治区人民政府是我国第一个建立的民族自治区。为加强对内蒙古自治区的领导，7月9日，中共内蒙古工作委员会宣告成立。从此，内蒙古人民在中国共产党和自治区政府领导下，积极参加了人民解放战争。内蒙古人民骑兵1947年5月至1950年4月共对敌作战650余次，歼敌2.1万余人，为内蒙古、华北乃至全国的解放贡献了力量。

（林健柏）

蟠龙战役

1947年5月，西北野战兵团在彭德怀等率领下，在陕北蟠龙对国民党军胡宗南部的歼灭战。

西北野战兵团在陕北连续取得青化砭、羊马河两次歼灭战胜利之后，4月15日，中央军委、毛泽东在总结西北野战兵团前段作战经验的基础上，发出了《关于西北战场的作战方针》的指示，指出："目前敌之方针是不顾疲劳粮缺，将我军主力赶到黄河以东，然后封锁绥德、米脂，分兵'清剿'。""我之方针是继续过去办法，同敌在现地区再周旋一时期（一个月左右），目的在使敌达到十分疲劳和十分缺粮之程度，然后寻机歼击之。……这种办法叫'蘑菇'战术，将敌磨得精疲力竭，然后消灭之。"同日，中共中央军委在通报羊马河之战的胜利时还指出："这一胜利证明，仅用边区现有兵力（六个野战旅及地方部队），不借任何外援，即可逐步解决胡军"，"证明忍耐等候，不骄不躁，可以寻得歼敌机会"。遵照军委指示，羊马河战役后，西北野战兵团在瓦窑堡、安定、永坪、清涧之间继续与敌周旋。敌人为防止遭伏击，只走山路，不走大道，连续行军，露宿荒野，部队被拖得苦不堪言，病号和开小差的日益增多，但仍然找不到西北野战兵团主力的去向，反而使自己陷入兵疲粮缺的困境。正如国民党军的战史中所说的："战斗遂行中，我军因情报搜集无法深入匪区，……影响于指挥及部队间之行动不小。"而共军"始终凭借其严密之情报封锁，灵活之小后方补给，以避实击虚，钻隙流窜……，不行主力决战。尤以陕北原已人烟寥落，匪复利用其他方组织，将仅有之人与物等可资利用之力量，全部撤离。使我军行动之区，渺无人迹；行军作战，均发生极大之困难"。此时，晋冀鲁豫野战军第四纵队等部在晋南地区转入反攻，横扫汾河两岸，夺取了秦晋咽喉禹门口，严重地威胁了胡宗南部侧背的安全。此时，胡宗南忽接蒋介石指令，言称获得共军东渡黄河之情报，令其率主力北进，妄图将西北野战兵团主力歼灭于佳县、吴堡地区之黄河两岸。胡宗南遂以9个旅的兵力由蟠龙、青化砭地区北上，向绥德方向急进，以第一六七旅旅部率1个团，配合陕北保安第三总队及第四总队两个大队守蟠龙补给点。西北野战兵团遵照毛泽东制定的"蘑菇战术"，决定乘势诱敌北上绥德，然后乘敌后方空虚之际，歼灭蟠龙之敌。遂以一小部兵力诱敌，并在黄河边制造东渡黄河之假象。5月2日，当敌主力9个旅急速北上并进占绥德后，西北野战兵团即于同日晚，集中了第一纵队的第三五八旅、独一旅，第二纵队的新四旅、独四旅等4倍于敌的兵力对蟠龙发起了进攻，以第三五九旅、教导旅担任阻援任务。蟠龙是国民党军陕北的

后勤补给点，地势险要，并组成有一定纵深的、比较完整的防御体系，其东山为整个蟠龙防御的支撑点。西北野战兵团对蟠龙之敌的进攻，是首先攻其东山，继而再攻其北山，以瓦解其防御体系，全歼守敌。战役开始后，即集中力量对敌以东山为支撑的各外围据点进行了猛烈攻击。当首次攻击失利后，就改用对壕作业，破坏敌各类障碍物，逼近敌外壕。5月4日，攻占蟠龙外围之东山、北山等主要阵地。当晚，西北野战兵团各部向蟠龙镇发起总攻，至24时，镇内守敌全部被歼，战役胜利结束。此役，歼敌1个旅部、1个整团和近两个保安总队，共6750余人，活捉了敌旅长李昆岗、副旅长涂建、参谋长柳届春，缴获了军衣4万套、面粉1.2万袋、骡马1000余匹和大量武器弹药。西北野战兵团主力随即转至安塞休整。

（林健柏）

孟良崮战役

1947年5月13日至16日，华东野战军在鲁中孟良崮为粉碎敌人对山东解放区的重点进攻而举行的战役。

1947年3月下旬，蒋介石集中24个整编师60个旅约45万人的兵力对山东解放区重点进攻，并以主力17个整编师43个旅组成3个机动兵团，担任主要进攻任务，由陆军总司令顾祝同坐镇徐州，统一指挥。4月上旬，敌采取集中兵力，密集靠拢，稳扎稳打，齐头并进的战法，首先占领鲁南解放区，打通了津浦路徐州至济南段。5月上旬，华东野战军遵照中央军委的指示，将主力后撤至莱芜、新泰、蒙阴以东地区，诱敌深入，以待战机。国民党军判断华东野战军往东北方向撤退，即令3个兵团17个师向博山、沂水一线推进，企图在鲁中山区与华东野战军主力决战。5月11日，敌第一兵团各部开始北犯，其中整编第七十四师是国民党军自诩为“五大主力”之一的美械装备的精锐部队。华东野战军根据敌我态势，决定以5个纵队16个师，采取中间突破的方法围歼敌整编第七十四师于鲁中孟良崮地区，以4个纵队11个师分别阻击和钳制其它各路敌军。14日完成了对敌第七十四师的分割包围。蒋介石认为该师战斗力强，地形又有利，其左右友邻比较靠近，不仅无被歼之危险，且系与华东野战军决战的良好机会。于是一面令该师坚守阵地，吸引华东野战军主力，一面督令临沂、泗水、莱芜、新泰、蒙阴、河阳等地的10个整编师分路向孟良崮驰援，企图里外夹击，聚歼华东野战军。15日，敌我双方对孟良崮附近各制高点进行反复争夺，战况空前激烈。华东野战军的攻势，正如敌军在战报中所描述的：“在炽盛火力掩护下，逐波冲锋，势如潮涌。”敌第七十四师在抵抗无效后，于当日下午倾全力先后向南、向西、向东突围，均未得逞。华东野战军乘机攻占了雕窝、大碾等重要阵地，将敌压缩在孟良崮、芦山等几个山头上。16日，华东野战军在猛烈炮火掩护下，对残敌实施连续冲击。各路援敌在敌统帅部再三严令督促下向孟良崮推进。有的虽已进至距离孟良崮仅5公里，但在华东野战军阻援部队抗击下，未能挽救第七十四师覆灭的命运。15日下午5时，华东野战军将新编第七十四师及整编第八十三师1个团共3.2万余人全部歼灭，击毙第七十四师中将师长张灵甫。华东野战军也伤亡1.2万余人。孟良崮战役的胜利，打乱了国民党军重点进攻的战略计划，打击了蒋介石最精锐的部队。这一打击又出现于解放区举行全面反攻的前夕，因而具有特殊重大的影响。蒋介石哀叹该师被歼是他“最可痛心、最可惋惜的”一件事。第一兵团司令官汤恩伯因此被撤职，敌整编第二十五师师长黄百韬也因“救援不力”而受到处分。蒋介石对山东解放区的重点进攻基本被粉碎。

（林健柏）

上海工人反对冻结生活指数的斗争

1947年5月，上海工人、店员反对国民党政府冻结生活指数举行示威罢工的斗争。

抗战胜利后，经过各业工人的多次斗争，国民党政府实行以生活指数计算工资的办法，使工人工资收入不致和物价相差太远，保障了工人的实际收入。实行这个办法以来，国民党当局不断地压低生活指数，克扣工人工资。对此，工会组织工人和国民党反动派进行了斗争。全面内战爆发后，国民党的军费开支愈来愈大，国民党统治区的经济危机日益严重。由于物价飞涨，人民生活困苦不堪。1947年2月10日，国民党政府颁布《经济紧急措施方案》，宣布“冻结生活指数”，即不管物价如何飞涨，工人工资只能维持在1月份的水平，不能相应增加。接着，又以“经济警察”管制市场，掠夺中小工商业者，禁止工人怠工、罢工和要求增加工资的斗争。这些反动法令，激起了工人和广大人民群众的反对。1947年2月21日，杭州丝织业8000多工人，为反对《经济紧急措施方案》而发动总罢工，强烈要求按2月份物价上涨指数增加工资，迫使资方给工人增加了一部分工资。5月，国民党控制的上海市总工会召集纪念“五一”节大会，趁机进行反共宣传。参加大会的两万多名工人

喊出了"反对冻结生活费指数"、"实行民主政治"等口号，把大会变成了要求国民党无条件解冻生活指数的斗争，会后举行了游行。5月中旬，上海法商电车工会、三区百货业工会、电力公司工会等，又多次举行要求解冻生活指数的大游行，参加者六七千人。其他各业工人也用各种方式，如开大会、座谈会、通过会刊和广播宣传等，一致要求解冻生活指数。随后，江苏南通两万工人为要求无条件解冻生活指数举行大罢工，这次罢工持续了7天。正当工人争生存的斗争蓬勃发展时，全国12个省的40多个大小城镇都发生了抢米风潮。此外，大学教职工要求增加工资，大学生要求增加伙食费，中小学教员要求政府发"活命贷款"等斗争也到处发生。在工人阶级和全国各地人民反饥饿斗争的强大压力下，国民党政府被迫从6月份起解除对生活指数的冻结，斗争取得了胜利。　　　　　　　　　　　　　　　　（林健柏）

国民党统治区抢米风潮

1947年5、6月间，国民党统治区40多个城市贫民掀起的抢米事件。

1947年国民党统治区的经济状况急剧恶化，经济危机日益加深，恶性通货膨胀造成物价飞涨。以抗战前夕的物价为标准，到1947年7月，物价上涨6万倍。1947年1月至6月，上海的米价由每担6万元上涨到50万元，上涨8.3倍。广大劳动人民及一般市民、学生濒临饥饿的境地，不得不为生存而进行斗争。从1946年6、7月间起，浙江、广西、江西等省一些市、县先后发生抢米风潮，并席卷南京、上海、北平、无锡、芜湖、成都等40多个大中城市。参加的城市贫民达17万人。4月，杭州的米价每石涨到10.7万元，比1945年9月上涨63倍。到5月初，每石米又猛涨到16万元，粮价越涨，粮源越紧，以至经常出现闭粜停售的情况，引起广大群众对国民党政府和投机粮商的公愤。5月2日上午11时起，杭州4万贫民捣毁米店300余家，抢走大米2000余袋。国民党杭州当局出动军警进行镇压，群众奋起反抗，捣毁警察分局两处，并殴打警察局长和粮政官员。5月3日至7日，浙江嘉兴、瑞安、绍兴、富阳、永康等地，也先后发生抢米和捣毁米店风潮。5月4日和5日，江苏无锡数以千计的群众几乎抢了全市所有的米店，抢去大米1000余袋，米店雇员20人受伤。5月5日，成都饥民抢了300余家米店。饥民还展开"吃大户"运动，冲入饭馆和富户家中白吃。上海发生了1000人打米店事件。仅5月7日，上海至少有5家米店被饥民所抢，河南路万太米店并被捣毁。9日又发生12起以上的饥民抢米事件，1000袋以上的大米被抢走。南京发生了百余饥民捣毁4家米店事件，并有2000余铁路、码头职工捣毁了浦口镇所有米店，抢走大米300余袋。自5月以来，安徽合肥每日均有饥民抢米。5月17日，国民党从合肥武装押运4000余石米出境，5万余居民闻讯赴码头抢米，船上押运兵开枪打死饥民3人，重伤6人，逮捕5人。芜湖饥民万余人组成抢米队，到处抢米。到6、7月份，抢米风潮蔓延到皖南绩溪、歙县、旌德、宁国、泾县、芜湖、广德等8县，抢米群众达万余人，将国民党政府的军粮万余石一抢而光。国民党政府不仅不设法解决民食问题，相反的却用枪杀、殴打、逮捕等暴力来对付抢米群众，制造了一系列流血惨剧。如1947年5月南京浦口发生抢米风潮时，国民党警宪逮捕了9名群众，并宣布戒严。成都国民党当局竟通令对抢米饥民"准由军警格杀勿论"，据报载当时被枪杀者在10人以上，并在一天之内逮捕饥民达百人。国民党政府的镇压，激起了饥饿群众更大的愤恨。许多地方的抢米风潮，由骚动发展为对反动政府的直接斗争。成都一部分饥民，曾经包围了国民党成都市政府，另一部分饥民则要冲入四川省政府。无锡饥民包围并捣毁了无锡市政府，并将市政府牌子抬上街游行。湖南源江饥民活捉反动县长，把县政府也打得稀烂。1947年5月新华社时评《蒋介石的经济危机深刻化》一文指出：1947年5月由杭州饥民捣毁米店开始的抢米风潮，是蒋介石政府经济危机深刻化的表现，表明蒋介石集团已到了无法挽救的地步。

（林健柏）

反饥饿、反内战、反迫害运动

1947年5、6月间，在国民党统治区爆发的以反饥饿、反内战、反迫害为口号的学生爱国民主运动。

国民党发动全面内战以来，军事上不断失败，经济上、政治上的危机日益加深，教育危机也日趋严重，给人民生活带来极大的困苦，迫使他们不得不为生存而斗争。1947年2月28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在蒋管区的工作方针和斗争策略的指示，指出党在目前应"力求从为生存而斗争的基础上，建立反卖国、反内战、反独裁与反特务恐怖的广大阵线"。中共中央上海局及其他地方党组织根据这一指示精神，把政治斗争与经济斗争巧妙地结合起来，从群众的切身利益出发，指明饥饿的根源是内战，要有计划有准备地发动反饥饿、反内战斗争。2月，浙江大学学

生提出了"抢救教育危机"的问题。4、5月间，上海、南京等城市的学生喊出"抢救教育危机"的口号，并发出"向炮口要饭吃"的反饥饿的呼声。1月4日，南京中央大学教授会发表宣言，提出教育经费应占政府预算的15%，教员薪金应按物价指数调整等5项要求。13日，全校学生罢课表示支持，并要求将伙食费的标准从原来的每月2万多元增至10万元。15日，南京中央大学、国立剧专、国立音乐学院和东方语专等校学生3000人联合举行游行，他们唱着"我们要饿死了"的歌曲，举着"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的大字横幅，到国民党政府行政院和教育部请愿。他们在行政院的金字匾额上贴上"民瘦炮肥"4个大字，并与副院长王云五展开舌战，未得到满意的答复。学生们决定5月20日，即国民党包办的第四届国民参政会第三次大会开幕那一天，举行大规模的示威游行。他们打电报给北平、武汉等地学校，请求支援，并派代表到上海、杭州，要求他们共同采取行动，与南方学生的斗争相呼应。5月初，北京大学民主墙上贴满了"向制造饥饿的人宣战"、"是我们行动的时候了！起来！不愿饥饿的人们！大家起来反内战！反饥饿！"等宣言、标语和漫画。15日，北大召开的系级和社团代表会决定成立反饥饿反内战罢课委员会，从17日起罢课3天，并决议通电全国：呼吁各界响应反饥饿反内战运动，得到其他院校的热烈响应。18日，清华、北大等校学生上街头进行反饥饿、反内战宣传。他们唱着"这年头，怎么得了，一百元的钞票没人要"等歌曲，高呼"内战不止，人民饿死"等口号，引起市民的共鸣，有的随之高呼"老百姓要吃饭"等口号。学生们在西单遭到预先埋伏的青年军的拳打脚踢，北大学生受伤者8人，其中重伤2人。西单血案震动了华北各院校。当晚，北平、天津、唐山等院校代表召开紧急会议，成立华北学生反饥饿反内战联合会，号召华北学生在5月20日举行示威游行。5月18日，南京国民政府颁布的《维持社会秩序临时办法》规定：一、不得"越级请愿"；二、有意见只可派代表陈述，代表不得超过10人，违者依法解散；三、如有学生罢课、工人罢工、商人罢市，应予解散，否则送"司法机关处理"等等。蒋介石还亲自出面，训斥学生的活动已越出"法律所许可之范围"，要"严整法纪"。这个法令一经发布，立刻遭到广大学生和各界人民的强烈反对。中央大学学生严正指出：上述法案不但剥夺人民基本自由，违反民主精神，而且与蒋介石自己的"四项诺言"亦背道而驰。他们严正抗议政府此种非法行为。5月19日，上海8所国立大学和4所私立大学学生7000人欢送上海学生代表去南京，并举行了大规模的游行示威。学生们冲到街头，喊出了社会各阶层的共同要求：向炮口要饭吃！这时，学生运动逐步由分散的斗争会合成全国性的"反饥饿、反内战"运动。中共中央上海局决定把这一斗争进一步推展开来，并计划在南京组织一次有上海、杭州、苏州等大专院校学生代表参加的联合游行示威。1947年5月19日晚，上海、杭州、苏州等地学生代表会集南京。他们连夜在中央大学举行联席会议，一致决定次日联合向国民政府请愿。5月20日，京、沪、苏、杭地区16所专科以上学校的5000余名学生冲破警察宪兵的阻拦举行挽救教育危机联合大游行，"反饥饿、反内战、反迫害"运动达到了高潮。大批武装军警占据街心，阻止学生队伍前进。当游行队伍突破军警防线时，遭到军警的水龙喷射和棍棒皮鞭的殴打，重伤19人，轻伤90多人，被捕20余人。学生们没有被暴力吓倒，他们手挽手，冲过封锁线，到达国府路，又受到国民党当局的骑宪队、防护团、青年军、武装宪兵和机关枪队5道封锁线的阻拦。学生们冒雨同国民党军警对峙达6个小时。沿途市民纷纷送来热茶和雨具，慰问学生。直到傍晚，国民参政会秘书长邵力子出面接受了学生的抗议和请愿书。南京卫戍司令部撤走军警，让游行队伍通过。学生们按原定路线返回中央大学。同日上午，北平各大学和中学7000余名学生陆续来到北大红楼操场集合。下午1时20分，他们高举着"华北学生北平区反饥饿反内战大游行"的横幅自北大出发上街游行。北大的许多助教也参加了游行的行列。宣传队员在马路的两侧向市民讲演，控诉反动派制造西单血案和挑起内战。北大、清华等13所专科以上学校学生在游行时发表宣言，提出"反对饥饿，反对内战"、"提高公教人员待遇"、"提高教育经费至国家总预算百分之十五"、"反对征兵、征实、征购"、"提高工人工资，减轻农民负担"、"清算官僚资本"、"恢复政协路线"等口号。到黄昏时分，大队返抵红楼广场。"反饥联"常委会向广大学生报告了当天请愿团代表向北平行辕请愿未获结果的情况。"反饥联"又宣布接受北大提议，定6月2日为"反内战日"，命名北大广场为"民主广场"。5月22日，向达等31名教授发表宣言，表示同情和支持学生的斗争。国民党当局对学生运动的镇压，激起广大学生更加强烈的反抗，学生斗争进一步发展为反饥饿、反内战、反迫害运动。上海、杭州、重庆、广州、武汉、福州、济南、昆明、桂林、开封、沈阳等60多个城市爱国学生一致奋起，通过罢

课、示威游行等方式参加了这一斗争。面对学生斗争的怒潮，国民党当局决定采取恐怖手段。北平、天津、上海等地的学生连遭殴打和逮捕。中共地下组织研究了当时的形势，认为斗争已获重大胜利，目前在反动派加紧镇压的情况下，为了巩固成果，总结经验，积蓄力量，应即改变斗争方式。据此，京、沪、苏、浙、豫5区学联和华北反饥饿反内战联合会分别决定停止举行群众性游行。6月2日这一天，华北区学生在北大民主广场举行了内战牺牲军民追悼会。其他一些地方的学生也在这一天举行了罢课，并开展了相应的活动。6月3日，中共中央在给上海局的指示中指出，停止街头游行、改为校内活动的做法有利于巩固校内的统一战线，便于集中要求于可能实现的条件，然后改变斗争形式，继续进行要和平、要饭吃、要自由的运动；指出“学生组织应设法联合，以达到成立全国学联的目的”。6月15日，华北学联、京沪苏浙豫5区学联、武汉学联的代表在上海秘密召开会议，重建了在1938年被国民党反动派解散的全国学生联合会。广大学生的团结在斗争中得到了进一步的加强。反饥饿、反内战、反迫害运动，沉重地打击了蒋介石的内战、独裁、卖国的反动统治，有力地促进了国统区爱国民主运动的迅速高涨。人民解放军的军事作战和国统区人民斗争的发展，这两条战线的胜利，使蒋介石政府处在全国人民的包围之中。

（林健柏）

人民解放军挺进中原

1947年6月30日起，中国人民解放军晋冀鲁豫野战军在刘伯承、邓小平指挥下，强渡黄河，向大别山进军。

经过一年的人民解放战争，敌我力量的对比发生了重大变化。到1947年7月，国民党军队的总兵力已由战争开始时的430万人下降为370万人，其中正规军由200万人降为150万人。当时的战场形势是：在北线，敌人完全处于被动地位，人民解放军则继续发动攻势；在南线，敌人还在对解放区的陕北、山东两区实行重点进攻，其主力已陷入了这两个战场。而连接陕北和山东这两个战场的晋冀鲁豫战场，敌人防御力量大为削弱，战略上更加被动。在敌人战略纵深的中原地区和江南大后方，则兵力薄弱，守备空虚。根据战争形势的变化，1947年6月，中共中央确定人民解放军第二年的基本任务是：举行全国性的反攻，即以主力打到外线去，将战争引向国民党区域，在外线大量歼敌，彻底破坏国民党将战争继续引向解放区、进一步破坏和消耗解放区的人力物力、使我不能持久的反革命战略方针。中共中央选择了中原的大别山区作为首先举行战略进攻的方向。大别山雄峙于南京与武汉之间的鄂、豫、皖三省交界处，是敌人战略上最敏感而又最薄弱的地区。这里曾经是老革命根据地，有经过长期革命斗争锻炼的广大群众，又有游击队坚持斗争，解放军容易立足生根。一旦占据大别山，就可以东慑南京，西逼武汉，南扼长江，钳制中原，迫使蒋介石调动进攻山东、陕北的部队回援。中共中央还决定进攻大别山，不能像北伐战争时期那样逐城逐地推进，必须采取跃进的进攻样式，即下决心不要后方，长驱直入，一举插进敌人的战略纵深地区，先占领广大乡村，建立革命根据地，然后再夺取城市。为了实现这个战略计划，按中共中央的部署，逐步形成3路配合、两翼牵制的作战格局：以刘伯承、邓小平指挥的晋冀鲁豫野战军（简称刘邓大军）主力为中路，实施中央突破，直奔大别山；以陈毅、粟裕指挥的华东野战军主力为东路，挺进苏鲁豫皖地区；以陈赓、谢富治指挥的晋冀鲁豫野战军（简称陈谢兵团）一部为西路，挺进豫西。3路大军相互策应，机动歼敌。同时以西北野战军出击榆林，吸引进攻陕北之敌北调，以华东野战军山东兵团在胶东展开攻势，将进攻山东之敌牵向海边。千里跃进大别山，这是一种独特的进攻样式。

1947年6月30日夜，刘邓大军12万人一举突破黄河天险，揭开了战略进攻的序幕。在鲁西南地区，经过28天的连续作战，歼敌5.6万人，打开了南下的通道。接着，部队长驱南征，开始了千里跃进的壮举，从国民党数十万军队的前堵后追中，穿越宽达15公里的黄泛区，渡过沙河，抢渡汝河和淮河，经过20余天的艰苦行军和激烈战斗，于8月底进入大别山区。刘邓大军的进军，迫使国民党军队调动主力回援。围困大别山地区的敌军很快增加到30余个旅，约20万人。刘邓大军以主力一部坚持在大别山北麓就地展开，另一部分主力向皖西、鄂东地区展开。部队坚决依靠人民群众，艰苦作战，粉碎了国民党军队的重点轮番进攻，到11月，共歼敌3万余人，建立了33个县的民主政权，初步打开了大别山地区的局面。8月底，陈赓、谢富治率领的晋冀鲁豫野战军一部8万人渡过黄河，挺进豫西。到11月底，歼敌5万余人，建立了39个县的民主政权，完成在豫陕边地区的战略展开。9月由陈毅、粟裕率领的华东野战军主力，也越过陇海铁路南下，进入豫皖苏平原，执行外线作战任务。到11月下旬，完成在豫皖苏边

地区的战略展开。至此，3路大军都打到外线，布成“品”字形阵势，纵横驰骋于黄河以南、长江以北、西起汉水、东迄大海的广大地区。它们互为犄角，以鼎足之势，紧逼国民党的长江防线，直接威胁南京、武汉，把战线由黄河南北推进到长江北岸，使中原地区由国民党军队进攻解放区的重要后方，变成人民解放军夺取全国胜利的前进基地。3路大军的进攻调动和吸引蒋军南线全部兵力160多个旅中约90个旅左右于自己的周围，迫使蒋军处于被动地位，起了决定性的战略作用。　（林健柏）

《中国土地法大纲》颁布

1947年10月10日，中共中央颁布《中国土地法大纲》。

1947年7月17日至9月13日，中共中央工作委员会在河北建屏（平山）西柏坡召开全国土地会议。会议总结了1946年《五四指示》下达以后土地改革的经验，确定了彻底平分土地的政策。刘少奇在会上作了报告和结论。9月13日会议通过了《中国土地法大纲》。10月10日，由中共中央公布实行。土地法大纲规定：废除封建性及半封建性剥削的土地制度，实行耕者有其田的土地制度；废除一切乡村中在土地改革前劳动人民所欠地主、富农、高利贷者的高利贷债务；乡村中一切地主的土地及祠堂、庙宇、寺院、学校、机关及团体的土地，由乡村农会接收，分配给无地或少地的农民；乡村农会接收地主的牲畜、农具、房屋、粮食及其他财产，并征收富农的上述财产的多余部分，分给缺乏这些财产的农民及其他贫民，并分给地主同样的一份。它规定分配土地，以乡或等于乡的行政村为单位。一切土地，按乡村全部人口，不分男女老幼，统一平均分配，在土地数量上抽多补少，质量上抽肥补瘦，使全乡村人民均获得同等的土地，并归各人所有。如果中农不同意则应向中农让步，并容许中农保有比较一般贫农所得土地的平均水平为高的土地量。它规定保护工商业者的财产及其合法的营业，不受侵犯。土地法大纲不但肯定了1946年《五四指示》所提出的“没收地主土地分配给农民”的原则，而且改正了《五四指示》中对某些地主照顾过多的不彻底性。它还规定土地分配中的若干特殊问题的处理办法，如家居乡村的国民党军队官兵、国民党政府官员、国民党党员及敌方其他人员，其家庭分给与农民同样的土地及财产。汉奸、卖国贼及内战罪犯，其本人不得分给土地及财产。其家庭在乡村未参与犯罪行为，并愿自己耕种者，分给与农民同样的土地及财产。《中国土地法大纲》的颁布，为在全国消灭封建剥削制度，提供了一个战斗纲领，推动了各解放区的土地改革运动。之后，各解放区的中共中央局或党委，都召开了土地问题会议，制定了适合本地实际情况的土地法大纲实施细则或补充条例，并抽调大批干部组成土改工作团（队），深入农村帮助农民开展土改斗争。到1949年6月，在拥有2.7亿人口、面积约有230万平方公里的解放区（内蒙古自治区和华南不在内）中，约有1.51亿人口的地区业已完成土地改革，其中农业人口约1.25亿，约有1亿农民分得约3.75亿亩土地，中农也有50%的人获得了经济利益。经过土地改革，废除了地主阶级封建剥削的土地所有制，实行农民的土地所有制，广大农民在政治上经济上翻了身，群众踊跃参军参战，支援前线。　（林健柏）

《中国人民解放军宣言》发表

1947年10月10日，中国人民解放军总部发表的政治宣言，也称《双十宣言》。

在中国人民解放战争由战略防御转入战略进攻的历史转折关头，1947年10月10日，中国人民解放军总部发布了毛泽东起草的《中国人民解放军宣言》。《宣言》分析了当时的国内政治形势，提出了“打倒蒋介石，解放全中国”的口号。为实现全国人民的迫切要求，打倒内战祸首蒋介石，组织民主联合政府，以达到解放人民和民族的总目标。《宣言》宣布了中国人民解放军的、也就是中国共产党的8项基本政策：一、联合工农兵学商各被压迫阶级、各人民团体、各民主党派、各少数民族、各地华侨和其他爱国分子，组成民族统一战线，打倒蒋介石独裁政府，成立民主联合政府。二、逮捕、审判和惩办以蒋介石为首的内战罪犯。三、废除蒋介石统治的独裁制度，实行人民民主制度，保障人民言论、出版、集会、结社等项自由。四、废除蒋介石统治的腐败制度，肃清贪官污吏，建立廉洁政治。五、没收蒋介石、宋子文、孔祥熙及陈立夫兄弟等四大家族和其他首要战犯的财产，没收官僚资本，发展民族工商业，改善职工生活，救济灾民贫民。六、废除封建剥削制度，实行耕者有其田的制度。七、承认中国境内各少数民族有平等自治的权利。八、否认蒋介石独裁政府的一切卖国外交，废除一切卖国条约，否认内战期间蒋介石所借的一切外债。要求美国政府撤退其威胁中国独立的驻华军队，反对任何外国帮助蒋介石打内战和使日本侵略势力复兴。同外国订立平等互惠通商友好条约。

联合世界上一切以平等待我之民族共同奋斗。《宣言》给全国人民指明了彻底解放全中国的总目标。

（林健柏）

石家庄战役

1947年11月6日至12日，中国人民解放军晋察冀野战军攻克华北重镇石家庄的战役。

1947年10月，中国人民解放军晋察冀野战军在河北定县清风店地区全歼国民党军第二军第七师和第十六军1个团，共1.7万多人。当时，石家庄国民党守军只有第三十二师及保安团队一部，兵力薄弱。保定"绥靖公署"遂将其独立团、第三军炮兵营空运石家庄，增强守备兵力。其兵力部署是：第三十二师守内市沟及核心阵地；保安团队守外市沟及外围阵地，总兵力2.4万多人。第三十二师师长刘英为警备司令。清风店战役后，晋察冀军区司令员兼政治委员聂荣臻、副政治委员刘澜涛向中共中央军委提出集中野战军3个纵队及6个独立旅，乘胜攻打石家庄的建议。10月23日，中央军委复电同意，并指示晋察冀野战军认真组织实施。石家庄是平汉、正太、石德3条铁路的枢纽，敌军修筑了坚固的防御工事，设有3道防线。10月31日，朱德总司令出席晋察冀野战军前委召开的旅以上干部会议，与野战军司令员杨得志、第一政治委员罗瑞卿、第二政治委员杨成武等共同拟定了攻打石家庄的作战部署：以阵地战的进攻战术为主，稳打稳进，以坑道作业接近堡垒，用炸药爆破，辅以炮击，各个摧毁敌工事；继以步兵突击，夺取敌阵地。朱德提出"勇敢加技术"的号召，要求指挥员认真发扬军事民主，通过打石家庄学会攻坚战。11月6日，晋察冀野战军发起石家庄战役。第三、第四纵队分别从石家庄市的西南和东北方向担任主攻，冀晋、冀中军区部队各组成一个集团，分别由石家庄的东南和西北担任助攻；第二纵队与独立第七旅及第三、第九军分区部队在定县地区构筑防御阵地，阻击可能自保定来援之敌。同时，攻城部队进行了各种准备工作，并将清风店战役中俘虏的国民党军官兵释放回石家庄，以扩大胜利影响，瓦解守军士气。晋察冀解放区地方政府还调集民兵、民工近10万人，担架1万多副，大车4000多辆支援作战。当日，冀晋军区部队占领石家庄外围大部分据点。7日，占领机场，断绝了敌人的空援。第四纵队攻克被敌人吹嘘为"铁打的"云盘山制高点。继之，各部队在炮火掩护下，于8日下午向外市沟发起攻击，迅速打破了敌人的防御体系。10日下午向内市沟总攻，野战军勇猛穿插，分割围歼，充分发挥了军事打击与政治瓦解相结合的威力。残敌收缩于核心阵地负隅顽抗。11日，野战军攻入市区，同敌展开巷战，多次打败了敌人的反扑，至12日上午11时，攻克该城。是役，晋察冀野战军伤亡6075人，计歼敌第三十二师和暂编第三十二师1个团及3个保安团，共2.4万人，拔除了敌人在华北的一个战略要点，使晋察冀和晋冀鲁豫两大解放区连成一片。这是中国人民解放军在解放战争时期对国民党军坚固设防城市进行的一次攻坚战，被朱德总司令誉为"夺取大城市之创例"。

（林健柏）

台湾民主自治同盟成立

台湾民主自治同盟是1947年12月1日由谢雪红等在香港成立的民主党派。

1947年台湾二二八起义后，起义领导人谢雪红等由台湾到香港，继续进行革命活动。8月，谢雪红、杨克煌、苏新等联合香港各界台湾籍进步人士，筹建台湾人民的革命组织。9月，成立了新台湾出版社，发行新台湾丛书。10月又成立台湾民主自治同盟筹备委员会。经过酝酿和准备，1947年11月12日在香港召开了台湾民主自治同盟筹委会第一次会员代表会议，通过了《台湾民主自治同盟纲领章程》、《台湾民主自治同盟规程》、《台湾民主自治同盟筹备会时局口号》等文件，推选谢雪红、杨克煌、苏新为台盟负责人。12月1日，台盟宣告正式成立。台盟以团结台湾人民为争取台湾省的自治及建立民主联合政府而斗争为宗旨。当前的任务是：打倒独裁政权，实行人民民主制度；反对帝国主义侵略，反对美军在台湾建立军事基地，要求美军退出中国；反对日本侵略势力的复活；打倒土豪劣绅，实行耕者有其田，没收官僚资本，保护工商业，取消苛捐杂税，恢复生产，救济失业者和贫民。台盟成立后，先后出版了《新台湾》、《台湾二月革命》、《台湾人民的出路》等刊物，大力宣传台盟的政治主张，反对蒋介石的独裁统治。1948年2月28日，在香港召开了纪念"二二八"一周年座谈会，并出版了《纪念二二八周年特刊》。5月7日，台盟响应中共"五一"号召发表告台湾同胞书。指出，目前中国新形势，一方面反动政府加紧卖国，压迫人民，以图挽救灭亡的命运；另一方面，人民解放军的全国胜利，已经定局，筹建民主联合政府时机已经成熟。中共中央提出召开政治协商会议，讨论成立民主联合政府，这样的政府才是真正合法的中国政府，真正代表人民利益的政府。8月台盟公开宣布总部成

立，负责人有谢雪红等。同时在香港建立支部，盟员有30余人。1949年3月，台盟总部由香港迁到北平（北京），后又迁上海，并先后建立了华北（北京）、华东（上海）两个总支部和天津市支部等地方组织。台盟的成立，对于团结台湾同胞共同反对美帝国主义和国民党的独裁统治、支援人民解放战争有着重要的意义。（林健柏）

中共中央十二月会议

1947年12月25日至28日，中共中央在陕北米脂县杨家沟召开的一次重要会议。

1947年12月25日至28日在陕北米脂县杨家沟召开的会议，由毛泽东、周恩来、任弼时主持。参加会议的有当时能够到会的中央委员和中央候补委员、陕甘宁边区和晋绥边区的负责人等共19人。毛泽东在会上作《目前形势和我们的任务》的报告。这个报告是整个打倒蒋介石反动统治集团，建立新民主主义中国时期内，在政治、军事、经济各方面带纲领性的文件。报告指出：中国人民的革命战争，现在已经达到了一个转折点。这是蒋介石的20年反革命统治由发展到消灭的转折点。这是一百多年以来帝国主义在中国的统治由发展到消灭的转折点。报告阐明了彻底打败蒋介石，夺取全国胜利的政治、军事、经济等方面的纲领和政策。重申了现阶段共产党的最基本的政治纲领：联合工农兵学商各被压迫阶级、各人民团体、各民主党派、各少数民族、各地华侨和其他爱国分子，组成民族统一战线，打倒蒋介石独裁政府，成立民主联合政府。总结了统一战线的历史经验，强调中国新民主主义的革命要胜利，没有一个包括全民族绝大多数人口的最广泛的统一战线，是不可能的。但没有中国共产党的坚强的领导，任何革命统一战线也是不能胜利的。报告根据长期革命战争的经验，特别是解放战争一年多来的经验，提出人民解放军作战时必须遵循的十大军事原则。即：一、先打分散和孤立之敌，后打集中和强大之敌。二、先取小城市、中等城市和广大乡村，后取大城市。三、以歼灭敌人有生力量为主要目标，不以保守或夺取城市和地方为主要目标。四、每战集中绝对优势兵力，四面包围敌人，力求全歼，不使漏网。五、不打无准备之仗，不打无把握之仗，每战都应力求有准备，力求在敌我条件对比下有胜利的把握。六、发扬勇敢战斗、不怕牺牲、不怕疲劳和连续作战的作风。七、力求在运动中歼灭敌人。同时，注重阵地攻击战术，夺取敌人的据点和城市。八、在攻城问题上，一切敌人守备薄弱的据点和城市，坚决夺取之。一切敌人有中等程度的守备，而环境又许可加以夺取的据点和城市，相机夺取之。一切敌人守备强固的据点和城市，则等候条件成熟时然后夺取之。九、以俘获敌人的全部武器和大部人员，补充自己。十、善于利用两个战役之间的间隙，休息和整训部队。十大军事原则的核心是集中优势兵力，各个歼灭敌人。报告提出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三大经济纲领，即：没收封建阶级的土地归农民所有，没收蒋介石、宋子文、孔祥熙、陈立夫为代表的垄断资本归新民主主义的国家所有，保护民族工商业。报告还阐述了新中国的经济构成和党对经济工作的指导方针，指出发展新民主主义经济的总目标是“发展生产、繁荣经济、公私兼顾、劳资两利”。一切离开这个总目标的方针、政策和方法都是错误的。报告明确规定土地改革的方针是：依靠贫农，巩固地联合中农，消灭地主阶级和旧式富农的封建和半封建的剥削制度。强调在土改中必须注意两条基本原则：第一、必须满足贫农和雇农的要求，这是土地改革最基本的任务；第二、必须坚决地团结中农，不要损害中农的利益。会议讨论和通过了毛泽东的这个报告和他所写的《关于目前国际形势的几点估计》。会议还详细讨论了当时党内的倾向问题以及土地改革和群众运动中的几个具体政策问题。十二月会议，是在中国革命战争的历史转折关头召开的一次具有重大意义的会议，它为夺取全国革命胜利，在政治上、思想上和政策上做了充分的准备。

（林健柏）

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成立

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是1948年1月1日由国民党内民主派李济深、何香凝等在香港成立的民主党派。

抗日战争胜利前后，国民党内一部分爱国民主人士为了反对蒋介石的卖国独裁政策，先后成立三民主义同志联合会、中国国民党民主促进会等民主组织。1947年，国民党内各民主组织的领导人和一些爱国民主分子先后到达香港。11月举行中国国民党民主派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1948年1月1日，在香港正式成立了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简称民革。到会的有李济深、何香凝、谭平山、柳亚子、蔡廷锴、陈铭枢、李章达、朱蕴山、梅龚彬、邓初民等110多人，会议由李济深主持。何香凝在开幕式上作了重要讲话，指出国民党民主派的奋斗目标是：要真正的三民主义，实行三大政策。她号召大家要真心实意地

为继承孙中山先生未竟之志而努力。大会讨论通过了《行动纲领》、《组织总章》、《告本党同志书》，并发表了《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成立宣言》，宣言明确指出："推翻蒋介石卖国独裁政权，实现中国独立、民主与和平"。蒋介石及其领导下的集团是"国内一切反动力量，大买办、大地主、官僚、军阀、土劣、流氓的集合体"。蒋氏在党为三民主义的叛徒，在国为四万万五千万人民的公敌。国民党民主派当前的紧急任务是：推翻反对民主、破坏和平、媚外卖国的蒋介石的独裁统治。民革的行动纲领指出：立即开展反对蒋介石的武力统一政策，发动人民制止内战；反对蒋介石的独裁政治体制，否认其伪造的"国大"、伪制的"宪法"和伪定的"政府改组"。反对一切妨碍人民基本自由的法令与特务制度，力争人民应享的身体、居住、迁徙、通讯、信仰、言论、出版、集会、结社、请愿、游行及免于贫乏、失业和恐怖的自由；反对助长内战、窒息民生的财政经济政策，号召人民起来，一致反对征兵、征役、征实、征购、滥发纸币；取消苛捐杂税及一切经济统制办法；反对美国政府干涉中国内政，助长中国内战的政策，要求美军及顾问团撤出中国、停止军事和财政援蒋，不承认蒋介石独裁政府的一切卖国借款及签订的中美商约；并展开国民外交，联合世界上以平等待我的民族，共同消除助长中国内战分裂因素，确保远东与世界和平；扶助农工组织，保障农工生活；实行孙中山耕者有其田的内容；并保障劳动者免于失业、饥饿；联合各民主党派及各界人士代表成立联合政府，作为过渡时期的最高政治权力机关；召开国民大会，制定和颁布宪法；推行地方自治，废除保甲制度；没收豪门资本，促进民族资本繁荣。大会选举了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中央执行委员会执行委员、候补执委 71 人，监察委员 18 人。推选宋庆龄为名誉主席，李济深为主席；何香凝、冯玉祥、李章达、谭平山、蔡廷锴、陈其瑗、陈绍宽、朱蕴山等 16 人为中央执行委员会常务委员。李章达任秘书长，冯玉祥任政治委员会主席，朱学范任组织部长，陈劭先任宣传部长，蔡廷锴任财务委员会主任。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的成立，标志着国民党内民主派与反动派的公开决裂，是中国政治格局变化的一个重要方面。正如中共中央发言人评国民党革命委员会宣言所说的："国民党革命委员会发表的宣言与行动纲领，这些文件，表示反对美国帝国主义与蒋介石反动统治集团的民族民主运动的统一战线是何等广阔，表示反对美帝国主义、打倒蒋介石集团、没收官僚资本、实行土地改革、建立民主的联合政府的纲领，乃是一切爱国者所公认的唯一道路。""我们欢迎国民党革命委员会的成立，我们愿意在新民主主义的革命事业中，和所有一切反帝反封建的民主团体一道，为着共同的目的而携手前进。"（林健柏）

民盟一届三中全会召开

1948 年 1 月 5 日至 19 日，沈钧儒、章伯钧在香港主持召开民盟一届三中全会。

1947 年 10 月 27 日，国民党政府内政部宣称民盟"勾结共产党，参加叛乱"，为"非法团体"，强制民盟总部宣布解散。11 月，民盟中央常委沈钧儒、章伯钧和副秘书长周新民等秘密到达香港，与原来在香港的中央委员邓初民、沈志远、李伯球等会合，积极恢复民盟组织，筹备召开一届三中全会。1948 年 1 月 5 日至 19 日，中国民主同盟第一届中央委员会第三次会议在香港召开。会议由沈钧儒、章伯钧主持，参加会议的还有史良（沙千里代）、朱蕴山、周新民、柳亚子、邓初民、何公敢、刘王立明、李伯球等 29 人。另外，南方总支部、西南总支部、上海、重庆、云南、福建、港九、马来亚等支部的代表 12 人列席了会议。沈钧儒致开幕词，章伯钧代表中央执委会常委作政治报告。会议通过了《三中全会紧急声明》、《三中全会政治报告》和《三中全会宣言》等文件，宣布"恢复领导机构"，"为彻底摧毁南京反动独裁政府，为彻底实现民主、和平、独立、统一的新中国而奋斗到底！"民盟一届三中全会宣言所宣布的 4 项主张是：一、过去本盟主张以和平争民主，以合法争公开，但在今天南京国民党反动独裁集团既已关闭和平之门，且又不能容许任何不同意一党专政的反对党存在，则要实现中国的和平民主，已不可能由谈判妥协求之，我们必须粉碎一个独裁、反动、贪污、腐化的政权，才能建立一个和平、民主、廉洁、有效能的新政权。是以我们今后必须发动领导全国人民，积极从事此项斗争。二、对于独裁的国民党反动集团，我们要反对的不仅是独裁者个人，而是那代表地主、豪绅、买办、封建的整个集团。为了彻底消灭整个反动集团的统治，中国人民就得消灭这一反动统治所寄托的经济基础，那就是彻底消灭封建剥削的土地关系，实行耕者有其田，彻底实行土地改革。三、坚决反对美国目前的对华政策，反对美国把中国当成远东反苏反共的基地，反对美国反动派一切直接间接危害中国主权的行为。本盟并且愿意唤起美国政府的注意，中国人民决不承认美国政府与南京政府所签订的一切损害中国人民利益的条约；并认为美国政府给予南京政府的

所有援助，将是与中国人民为敌。四、为了反对独裁卖国，实现真正的民主和平，本盟愿意坚决欢迎一切民主党派的合作，而且与一切民主党派结成坚强的民主统一战线。中国共产党为民主之先进，其奋斗的历史，值得每个爱国的中国人赞佩，本盟要与他们携手合作；同时对于最近国民党革命委员会的成立，因为它是国民党的新生，本盟愿与共同奋斗。民盟宣言最后说：我们对内加强团结人民与各民主党派，对外与全世界的民主力量及亚洲的被压迫民族联合起来，为实现全世界的和平民主而奋斗。会议对民盟中央组织机构作了调整和充实，由沈钧儒、章伯钧以民盟常务委员名义领导全盟工作。民盟一届三中全会以民盟历史的政治转折点而载入史册。从此，民盟与中国共产党全面合作，接受了中共的新民主主义革命纲领并为之而奋斗到底。　（林健柏）

国民党召开"行宪国大"

1948年3月29日至5月1日，国民党政府在南京召开的选举"总统"、"副总统"的"国民大会"。

"制宪"国大以后，国民政府颁布了《国民大会代表选举罢免法》，规定国民大会代表"每县市其同等区域各选出代表一人，有被选举权而愿为候选人时，经五百名以上选举人之签署，或由政党提名，得登记为候选人，公开竞选，非经登记者，不得当选"。但国民党中央为了点缀民主，规定国大代表由国民党中央和中国民主社会党、中国青年党两党分别提名，然后经"民选"产生，还规定国民党党员非经中央提名不得当选。但当时国民党中央已控制不了全国的局势，各地国民党员中未经国民党中央提名而由"选民"签署选出的代表就有600多名。这就使原来预定分配给民社、青年两党的名额几乎全部被挤掉。因此，会前，国民党中央命令未经"圈定"而当选的国民党党员把名额让给"圈定"的党员和中国民主社会党、中国青年党。国民党中央的规定引起了这些未经圈定而当选的代表的不满，他们纷纷以"国法"对抗"党纪"，拒不退让。他们在南京组织起"民选代表联谊会"，向国民党中央请愿，由国民党中央圈定而落选的人也跟着吵闹，丑态百出。天津"民选"代表赵遂初为另一个代表取代，便在国民大会开幕那天，雇人抬了一口白边黑木棺材，闯进会场，在门口吵闹不休。民选代表联谊会办事处还组织了一个绝食请愿团，28日由杨翘新领头，带着苏铭芳、李化成、周游等10人到会场绝食请愿，以示抗议。蒋介石亲自出来训话也无济于事，只得派军警和卡车拉走棺材，拖走绝食者，始得开会。这些所谓"民选"代表之所以如此坚决顶撞"党纪"，并不是要坚持民主，而是因为选票来之不易。如广西贵县沈某，为"竞选"国大代表，花去黄金200多两。

1948年3月29日，国民党在南京召开国民大会。中心议题是选举总统与副总统。4月4日，国民党第六届中央执委会在南京召开了临时全体会议，决定蒋介石为总统候选人。4月5日，国民党中常会通过了张群提出的《赋予总统以紧急处置权》的建议。经过这番安排，蒋介石表示"尊重"和"接受"全会决定，参加总统竞选。4月18日，国民大会通过了《动员戡乱时期临时条款》，规定"总统在动员戡乱时期，为避免国家或人民遭遇紧急危难或应付财政经济上重大变故，得经行政院会议之决议为紧急处分，不受宪法第三十九条或四十三条所规定程序之限制"。并且还规定"动员戡乱时期之终止，由总统宣告，或由立法院咨请总统宣告之"。这样，总统就可以借口"动员戡乱时期"未终，而随心所欲地行使"紧急处分"之权，独揽国家大权，不受立法院的限制。4月19日，国大会议举行总统"选举"，蒋介石以2430票当选为中华民国总统。

副总统的选举，集中反映了李宗仁、蒋介石之间的矛盾。蒋介石支持孙科为副总统候选人，反对和抵制李宗仁。4月23日，国大选举副总统。候选人有李宗仁、孙科、程潜、于右任、莫德惠、徐溥霖6人。由于竞争激烈，经4月23日、24日两次投票，均无人达到当选票数，但孙科、李宗仁得票较多。蒋介石看到对孙科不利，乃要程潜退出竞选，并将选票改投孙科，许诺补偿他的全部竞选费用。程潜严词拒绝。28日，国民大会进行第3次选举，李宗仁得1156票，孙科1040票，程潜515票，仍无人达法定票数当选，最后由李、孙2人竞争。29日上午进行第4次投票，李宗仁以微弱多数当选为副总统。蒋介石在演出了这场"还政于民"的把戏以后，于1948年5月20日就任"总统"。5月23日新华社发表社论《旧中国在灭亡，新中国在前进》，指出蒋介石统治中国21年所追逐的最后一出戏，是演得这样难堪，以至人们不知他们是在做喜事，还是在出丧。　（林健柏）

人民解放军收复延安

1948年4月21日，人民解放军西北野战军收复延安。

1948年春，西北野战军遵照中共中央军委的指示，向南进攻，转入外线作战。2月22日，主力由延

安东面的甘谷驿、延长一线向宜川攻击前进，24日将宜川城包围。胡宗南即令其主力整编第二十九军军长刘戡率部由洛川、黄陵沿洛(川)宜(川)公路经瓦子街兼程驰援。西北野战军以第三、第六纵队各1个旅围攻宜川，集中9个旅的兵力迅速占领瓦子街至铁龙湾两侧高地，待敌深入而包围歼灭之。28日，援敌进至任家湾、丁家湾地区，与西北野战军阻援部队教导旅、独立第五旅各一部接触。刘戡判断阻援部队只有1个纵队，决心放手继续攻击前进。29日，西北野战军以运动防御诱敌先头部队进至宜川西南10余公里的铁龙湾地区后，即转入坚守防御，逼敌在路窄沟深四面环山的不利地形下展开作战。同日晨2时，第一纵队于瓦子街以西尾敌前进，6时攻占瓦子街。刘戡发觉处境不利，决定分路突围西窜。西北野战军第一、第四纵队和第三、第六纵队主力击退了企图突围之敌，将刘戡所部压缩于乔儿沟、丁家湾、任家湾狭小地区内；第二纵队经圪台镇地区赶到砖庙梁加入战斗。敌经连日战斗，伤亡惨重，被迫作困兽之斗。3月1日上午，第一、第二、第四纵队和第三、第六纵队主力，向敌发起总攻，激战终日，敌全部被歼。3月3日，攻克宜川，歼敌第二十四旅。宜川战役成功地实现了攻城打援的计划。西北野战军歼敌整编第二十九军军部、整编第二十七、第九十师，共5个旅3万余人，击毙敌中将整编军军长刘戡及中将整编师师长严明，缴获甚多。从此，西北解放军转入外线反攻，从根本上改变了西北战场的形势。3月5日，西北野战军挥师南下，发起黄龙山麓战役。9日，解放鄜县(富县)、黄陵、宜君、白水，逼近蒲城，围攻洛川，进一步孤立了延安守敌。胡宗南即令裴昌会兵团附整编第三十八师增援洛川。洛川地险城坚，西北野战军久攻未克，援敌裴昌会兵团又滞留于郃阳、澄城及其以南地区，不敢北进，黄龙山区粮食困难，因而不宜久留，而敌西府(西安以西泾渭两河之间地区)、陇东兵力空虚。西北野战军根据上述情况，于4月6日改变夺取洛川的计划，决心以第三纵队附黄龙分区武装一部继续围困洛川，而主力则向西府挺进，求得分散和寻机歼灭裴昌会兵团，相机夺取胡宗南的补给基地宝鸡。4月16日，西北野战军主力分3路西进。胡宗南一面急调裴昌会兵团配合马步芳部的第八十二师，分两路驰援宝鸡；一面令整编第十七师放弃延安、洛川南撤。4月21日西北野战军收复被敌人侵占了一年又1个月零3天的延安。

(林健柏)

反美扶日运动

1948年5、6月间，国民党统治区以学生为先导，形成各阶层人民反对美国扶植日本军国主义势力的爱国运动。

战后，美国采取扶植日本军国主义的反动政策，并拖延签订对日和约，激起了中国人民的民族义愤。1948年5月4日，上海120所大中学校学生代表在交通大学集会，发起组织“反对美国扶植日本复兴、挽救民族危机联合会”，通电全国，呼吁反对美国扶日。5月22日，上海1.5万学生又在交通大学集会，发起反对美国扶日的10万人签名运动。随后，上海交通大学、圣约翰大学、上海法专、复旦大学等校举行展览，揭露美国扶植日本及日本侵略罪行。上海文艺界巴金、周建人、姚雪垠、叶圣陶等13人联名发表《正告美国大使》，表示“美国扶日政策不变，则中国人民反美扶日运动不停”。上海杂志界、妇女界、航业界和中国留日同学会、香港九龙各爱国团体也纷纷发表声明、抗议、宣言，强烈谴责美国政府扶植日本军国主义的复活。中国文化界、工商界390人联名发表声明指出：中国人民决不终止其“反对美国扶植日本帝国主义复兴”的运动。民主同盟、国民党革命委员会、民主促进会、农工民主党等发表宣言、声明，反对美国扶日政策，主张以武力推翻国民党统治，与中国共产党携手合作。6月4日，许多素来倾向保守的舆论机关和政治人物，甚至包括某些属于国民党的机关和人物在内，也对美国明目张胆的扶日政策表示异议。在各阶层人民的严正抗议中，美国和国民党反动派凶相毕露。同日，美国驻华大使司徒雷登在南京招待记者，直接发表干涉中国人民革命的声明。以“防共”理论为美国扶日的反动政策辩护，并对中国人民威吓说：倘抗议运动“仍继续进行，可能招致不幸之结果”。5日，国民党政府即发表了遏制反美扶日的声明，出动大批军警，破坏和阻止反美扶日集会与示威游行，逮捕和殴打爱国学生。《中央日报》叫嚣要对爱国运动“操刀一割”，“斩草除根”。声称这“显系‘共匪军事间谍职业学生’所策动主持”，恫吓爱国的学生运动，为逮捕迫害爱国学生制造借口。同日，上海大中学生5000人会集在外滩游行示威，在美国驻华海军司令部及美国上海总领事馆门前高唱《义勇军进行曲》，高呼“反对美国扶植日本！”“美军回美国去！”“中华民族独立万岁！”等口号，并散发传单。国民党上海当局急调马队、军警将学生冲散。但分散的学生又在西藏路集合。在这次示威中，有2名学生

被特务打成重伤，30多人受轻伤，50人被捕。爱国运动迅速扩展到全国各地。6月6日，北平(北京)学生开始罢课。9日，北京大学、清华大学、燕京大学等高校学生进行大规模游行示威。当队伍行至东华门时，遭预伏的国民党军警袭击，重伤3人，轻伤10多人。北平各大学教师437人联名致书司徒雷登，历数美国扶日之5大事实，谴责美国干涉中国内政。美帝国主义曾声称"受惠"于美国救济的中国人民无权反对美国的政策。为此，许多人拒绝接受美国"救济物资"，清华大学、北京大学等高校教授朱自清、金岳霖、张奚若、吴晗等百余人发表声明，为表示中国人民的尊严与气节，拒绝美国具有收买灵魂性质的一切施舍物资，并拒购美援平价面粉，退还配给证。南京、青岛、福建、成都、重庆、武汉、长沙、广州、昆明等大城市的学生也纷纷进行罢课和游行。反美扶日运动揭露了美帝国主义扶日侵华的阴谋，揭露了国民党反动派的卖国勾当，有力地教育了人民群众，团结了社会各阶层人士，对人民解放战争的胜利进行起了配合的作用。　(林健柏)

保卫新疆和平民主同盟成立

保卫新疆和平民主同盟是1948年8月1日由阿合买提江等在新疆伊宁成立的各族人民统一战线组织。

1945年10月10日蒋介石发表广播演说，提出和平解决新疆问题的方案。10月中旬，以张治中为首的国民党政府代表与阿合买提江为首的新疆三区革命政府代表在迪化(乌鲁木齐)举行谈判。1946年1月2日，双方签订了《中央政府代表与新疆暴动区域人民代表之间，以和平方式解决武装冲突之条款》共11条。主要内容是：给予新疆人民选举自己信任的当地人士为行政官吏的权利；保障人民享有信仰宗教、使用本民族文字、发展文化艺术和出版、集会、言论自由；准予组织民族军队，总人数为1.1万多人，驻扎伊犁、塔城、阿山地区；政府按人民实际的生产力和负担状况，规定纳税率。由于国民党政府借故拖延，到6月6日有关民族军问题附件签字后，"十一项和平条款"才正式生效。7月1日，新疆省联合政府正式成立，张治中任省政府主席，阿合买提江任副主席。之后，国民党政府违背各民族意愿，在新疆加紧扩充兵力，从1946年的4万人增加到1947年的10万人；同时挑拨民族关系，进行反对三年区革命的活动，任命叛国外逃的大土耳其主义分子和资产阶级民族主义分子麦斯武德等为新疆监察使，出版发行《自由报》、《阿泰报》，散播大土耳其主义和泛伊斯兰主义反动思想，攻击3区革命。1947年5月，张治中辞去国民党新疆省政府主席，由麦斯武德接任。之后，在青年、学生和教师中，开始了反对麦斯武德当省政府主席的签名运动。5月底麦斯武德宣誓就职，伊宁及南疆各地群众先后举行集会游行，以示抗议。吐鲁番、鄯善、托克逊3县发动武装暴动，遭到国民党警备总司令部镇压，被杀群众3000多人。数十名幸存者撤退到伊犁。国民党政府单方面撕毁和平条款，联合政府名存实亡。8月，省政府中三区革命政府方面的委员和工作人员陆续撤回伊宁。从此新疆省政府与三区革命政府形成以玛纳斯河为界的武装对峙局面。1948年8月1日，以阿合买提江为主席的"保卫新疆和平民主同盟"在伊宁成立，后来改名为"新疆民主同盟"(简称新盟)。新盟是新疆各族人民统一战线的组织，主要任务是：加强和巩固各民族的团结，反对帝国主义和国民党反动派的统治，实现各族人民的自由平等。为宣传上述主张和进一步组织群众，新盟在伊宁出版《同盟》杂志和《前进报》，在塔城出版《民主报》，在阿山出版《正确之路报》等。到1948年，盟员发展到8万人。1949年1月，新盟领导新疆各族人民反对麦斯武德的斗争日益高涨。国民党政府不得不撤销麦斯武德的省政府主席职务，宣布改组新疆省政府。保卫新疆和平民主同盟的成立，有力地支援了全国人民的解放战争，为新疆的和平解放创造了条件。　(林健柏)

国民党政府实施币制改革和限价政策

1948年8月19日，国民党政府颁布"财政经济紧急处分令"，发行金圆券，限期收兑民间黄金、白银、银币及外国币券等金融措施。

1948年8月19日，国民党政府颁布《财政经济紧急处分令》，其主要内容是：一、自即日起，以金圆为本位币，十足准备发行金圆券，限期收兑已发行的法币和东北流通券。二、限期收兑人民所有黄金、白银、银币及外国币券，逾期任何人不得持有。三、限期登记管理本国人民存放国外的外汇资产，违者予以制裁。四、整理财政并加强管制经济，以稳定物价，平衡国家总预算及国际收支。随令还附有4个办法：一、《金圆券发行办法》，规定以金圆券为本位币，发行额为20亿元。以前使用的法币及东北流通券均停止流通，法币300万元换金圆券1元，东北流通券30万元换金圆券1元。二、《人民所有金银外币处理办法》，规定人民持有的金银外币应于1948年9月

30日前兑换金圆券，黄金每市两兑换金圆券200元，白银每两兑换3元，美元每元兑换4元。三、《中华民国人民存放国外外汇资产登记管理办法》，规定中国人(华侨除外)在国外的外汇资产，应于1948年12月31日前向中央银行申报登记，并移存中央银行保管。四、《整理财政及加强管制经济办法》，限制各地物价，冻结在1948年8月19日的水准上，所有按生活指数发给薪资办法一律废止，禁止工厂罢工、怠工。这就是国民党政府实行的“币制改革”和“限价政策”。这些法令公布后，国民党政府即在上海、天津、广州设立3大经济管制区，分别派遣俞鸿钧、张厉生、宋子文为各区经济管制督导员，蒋经国、王抚洲、霍宝树为协助督导员，严厉监督执行。8月26日，经济管制委员会举行首次会议，决定采取3项办法：一、限制利息，规定利息逐渐减低办法；二、颁布《非常时期取缔日用重要物品囤积居奇办法》与《违反限价处置办法》；三、禁止食油出口。同时，决定在上海设置物资调节委员会、检查委员会及物价审理委员会。经济管制是为发行金圆券服务的。它的主要内容，一是强迫人民将手中的金银外汇兑换成金圆券；二是实行限价政策，制止物价上涨，以维持金圆券的信用。而这两项内容的实现都离不开暴力。国民党当局宣称：“刑乱世用重典”要借“一二颗人头祭刀”。

币制改革初期，在国民党政府的高压政策之下，民族资本家忍痛交出黄金外汇，众多的升斗小民迫于生计也不得不将金银外汇兑成金圆券。据美国白皮书估计，1947年时，中国私人持有的外汇、黄金约值5亿美元。到1948年10月底，南京政府通过币制政策搜刮到的金银外汇价值2亿美元。在发行金圆券的同时，市场价格被稳定在8月19日的水准上。国民党政府强令民族资本企业和中、小工商业者按“限价”抛售货物，禁止囤积。为此，当局出动大批人马各处搜查，凡存期超过3个月的货物一律没收。仅8月28日一天的搜查，就有3000件棉纱、5000匹棉布被封存。上海的纸业、杂粮、油饼业、糖业等公会理事长被作为人质扣压，以强迫这些行业“平价”出售商品。永利公司“限价”出售纯碱6万袋，损失100万美元。上海纱厂“限价”出售棉纱5万件、棉布10万匹，损失达1250万美元。百货业存货照限价售出四分之三，上海4大公司除永安公司外，存货一空。绸布商店在金圆券发行前存有绸布呢绒150万匹，限价期间出售殆尽。但这一政策效力仅几个星期，平价局面便被打破。商人们纷纷停业、歇业，囤积商品，隐匿物资。特别是豪门，囤积甚重。仅孔令侃一人就囤积“新型汽车百辆、英美呢绒500余箱，西药200箱”。由于货物奇缺，贸易停顿，造成了物价上涨，黑市交易猖獗。10月2日，上海首先出现抢购商品的狂潮，市民见物即买，商店既不敢抬价，又不敢停业，只得用各种办法尽量减少损失，有的规定一次只能买一粒钮扣，有的则经常以无货相告。10月下旬，抢购风潮遍及全国。11月9日，京、沪发生抢米风潮，至10日，南京全市“被抢米2505石，米店被抢者计22家”。自此，金圆券信誉大跌，民怨沸腾。金价也上涨，至11月11日，各地金银外币的黑市价格均超过官价5倍以上。1948年11月10日，国民党政府正式宣布取消限价。12月又公布了《修正金圆券发行办法》、《修正人民所有金银、外币处理办法》等法令，宣布金圆券贬值10倍，并撤销了金圆券发行20亿元的限额；准许人民持有金银、外币，并把金银、外币的兑换率一律提高5倍。不久，金银、外币狂涨，金圆券猛跌，因而又发生挤兑黄金的热潮。上海中央银行门前求兑者日达数万人，中央银行又规定每天限兑2000两左右，致使打架斗殴不断发生。昆明还发生了捣毁、抢劫中央银行事件。国民党政府乘机宣布停止兑换黄金，导致了刚刚存在半年的翁文灏内阁倒台。孙科组阁后继续滥发金圆券。票面额从100元、500元、1000元到1万元、10万元，最后竟出现50万元、100万元的大票。随着物价暴涨，全国批发物价指数与1948年8月19日限价时相比上涨倍数：11月为25倍；12月为35倍；1949年1月为128倍，2月为897倍；3月为4053倍。金圆券的贬值和信用丧失，国民党许多地方政府公开拒绝继续使用金圆券。四川、云南等地都已明令限制金圆券入境和限制汇兑。湖南省省长程潜于1949年2月1日给财政部的电文中说：近来币值猛跌，物价暴涨，湘省人民对于金圆券更不信任，几等废纸，市面紊乱，势将停闭，而军警公教人员生活艰苦万分，现在士兵副食费金圆券折合银币不足数分，无法维持生活，坐视崩溃，徒呼奈何！甘肃省省长郭寄峤于同年5月13日给行政院的密电中说：齐日(8日)由沪送兰军费3300亿元，折合银币仅三四万元，各部队尚未发完，即上涨达每枚银元折金圆券2700万元，官兵所得均不足购银币1角或数分，不特发薪不能解除官兵痛苦，反而陷全部人马于不堪悲惨境地。现各部队已原封退还。金圆券的发行和破产以及限价政策实施的失败，促使国民党统治区经济迅速走向崩溃，加速了国民党反动统治的灭亡。

(林健柏)

济南战役

1948年9月16日至24日，人民解放军华东野战军解放山东省会济南的战役。

济南是津浦铁路和胶济铁路的交会点，也是连结华东、华北地区的战略要地。蒋介石令第二绥靖区司令官王耀武率重兵10万余人，以内外线和商埠构成环形基本阵地，以城郊100多个支撑点组成外围阵地，并筑有永备型和半永备型工事，包括飞机场在内的西守备区为设防重点，由第九十六军、保安第八旅、绥区特务旅及青年教导总队等部防守，东守备区由第七十三师及保安第六旅等部防守。同时，以配置在徐州地区的主力3个兵团，约17万人随时准备北援。中共中央军委为最后摧毁敌在山东的巢穴，决定集中华东野战军全力发起济南战役。并强调指出：此役关系甚大，必须先估计多种可能，准备对付最坏的情况，采取攻城打援，分工协作，夺取济南，并歼援敌一部。遵照中央军委指示，华东野战军代司令员兼代政治委员粟裕等决定：以第三纵队、第九纵队、第十纵队、第十三纵队、两广纵队、鲁中南纵队、渤海纵队、特种兵纵队大部和冀鲁豫军区两个军分区部队等部，组成攻城集团，统由山东兵团司令员许世友、兼政治委员谭震林指挥（攻城集团分为东、西两集团：东集团以第九纵队、渤海纵队等组成，由第九纵队司令员聂凤智、政治委员刘浩天指挥；西集团以第三纵队、第十纵队、两广纵队和鲁中南纵队组成，由第十纵队司令员宋时轮、政治委员刘培善指挥；另以第十三纵队为预备队）；以第一纵队、第二纵队、第四纵队、第六纵队、第七纵队、第八纵队、第十二纵队、特种兵纵队一部和中原军区第十一纵队及冀鲁豫军区两个独立师等部组成打援集团，统由野战军司令部直接指挥。中共华东野战军前委提出："打到济南府，活捉王耀武"和"大量歼灭来援之敌，争取战役全胜"等口号。9月16日晚，攻城部队从东西两面进攻济南。17、18日连续攻占敌外围的重要据点，并以炮火控制机场，迫使敌中断空运。至19日控制了外围地区，争取了国民党整编第九十六军军长吴化文率整编第九十六军军部、整编第八十四师师部及其独立旅、第一五五、一六一旅等部共2万余人起义，从而打开了华东野战军进攻济南商埠地区的大门，动摇了敌人坚守济南的信心。是时，王耀武张皇失措，即决定缩短阵地，集中兵力，以内城为主，固守城垣，以千佛山、四里山、齐鲁大学、商埠、外城为据点，外线留置小部队守备，拖延时间，以待援军。按照固守待援的方针，王耀武令各部队占领商埠土围子，掩护主力调入市区，配置于外城及内城。将西守备区撤回的第二师第二一一旅和保安部队配置于商埠及省立医院、打包厂、火车站。以第七十四师第二团7个连及保安部一部，固守绥靖区所驻过的邮政大楼。为扫清射界，王耀武下令将外城及内城城墙附近的很多民房拆毁和烧掉。华东野战军攻城兵团不给敌人以喘息时间，于20日黄昏迅速楔入商埠东部，至22日中午占领商埠。23日攻占外城，当夜突破内城，经1天激战，于24日全歼守敌10万余人（含起义的2万人），俘敌第二绥靖区司令官王耀武等高级将领23名，缴获各种炮800余门，坦克、装甲车20辆，汽车238辆。济南战役是人民解放军大规模围歼敌军主力和解放敌人重点设防的大城市的开始，也是蒋介石以大城市为主的"重点防御"体系总崩溃的开始。此役揭开了战略决战的序幕。中共中央军委授予华东野战军第九纵队第二十五师第七十三团为"济南第一团"、第十三纵队第三十七师第一〇九团为"济南第二团"的光荣称号。 （林健柏）

辽沈战役

1948年9月12日至11月2日，人民解放军东北野战军在辽宁省西部和沈阳、长春地区进行的一次具有决定意义的战役。

1948年秋，人民解放战争进入夺取全国胜利的决定性阶段。这时，人民解放军已由战争开始时的120万人发展到280万人，其中野战军149万人。在装备上已有很大改善，新增的装备是从敌方缴获来的。人民解放军建立起强大的炮兵工兵，提高了攻坚能力，取得了打阵地战的经验。各解放区相继连成一片，面积达235.5万平方公里，占全国总面积的24.5%；有1.68亿人口，占全国总人口的35.3%。解放区内已基本上完成土地制度改革，广大农民的革命和生产的积极性空前高涨，解放军的后方进一步巩固。与此相反，国民党军队已由战争开始时的430万人下降为365万人，由于大批部队担任守备，可用于第一线的兵力仅174万人；而且士气低落，战斗力不强；国民党反动派虽然还统治着全国四分之三的地区和三分之二的人口，但由于遭到广大人民的强烈反对，处境十分孤立。这表明人民解放军与国民党军队进行战略决战的时机已经成熟。中共中央军委抓住决战的有利时机，正确选定第一个歼击目标，首先在东北战场展开决战。1948年7月，东北战场上的国民党军队，有4个兵团14个军，计44个师（旅）

48万余人；加上地方保安团队，共55万人。分别被东北野战军分割包围在长春、沈阳、锦州3个互不相连的地区；其东北"剿总"卫立煌(1897—1960，安徽人)率第八、第九兵团8个军30万人困守长春；"剿总"副总司令兼锦州指挥所主任范汉杰率6个师，连同特种兵、后勤及地方部队约10万人，防守锦州、锦西地区。东北野战军至辽沈战役前，已有12个步兵纵队、1个炮兵纵队和17个独立师，连同地方武装共103万人。同时还控制了东北98%的土地，形势对东北野战军极为有利。在东北广大人民支援下，东北野战军发起辽沈战役。

针对双方军事态势，中共中央军委认为，从战略上考虑，"以封闭蒋军在东北加以各个歼灭为有利"。蒋介石对孤悬关外的55万国民党军队是守是撤，一时还举棋不定。如果让卫立煌指挥的这部分军队撤向关内，国民党就可以保住这个比较完整的战略集团，而且可以使它同在华北的傅作义集团结合起来，对解放战争日后的发展带来困难。毛泽东指出，要预见到敌人撤出东北的可能性。为了就地全歼东北敌军，东北野战军必须首先集中力量控制北宁线，攻克锦州，以关死东北的大门。东北野战军根据中央军委的指示，以1个纵队和6个独立师、1个骑兵师、1个炮兵团继续围困长春；以5个纵队又1个师以及炮兵纵队主力、1个坦克营围攻锦州；以两个纵队配置于锦州西南的塔山、虹螺山一线，11个师配置于彰武、新立屯以东地区，分别阻击由锦西、葫芦岛方向和沈阳方向救援锦州之敌；以1个纵队位于高桥地区为战役预备队。9月12日，东北野战军在林彪、罗荣桓指挥下开始锦州地区的作战。正当东北野战军攻克义县，扫清锦州外围敌人时，蒋介石急忙飞到沈阳亲自指挥，并调北宁线华北"剿总"的5个师来援，连同原来在锦西的4个师，共9个师，于10月10日起开始向塔山阵地猛攻，但未能突破东北野战军阵地。廖耀湘第九兵团11个师又3个骑兵旅由沈阳驰援锦州，被东北野战军阻击在彰武、新立屯地区。10月14日，东北野战军第二、第三纵队及第六纵队之第十七师从锦州北和西北，第七、第九纵队从锦州南，第八纵队从锦州东，在炮兵纵队支援下，开始向锦州发起总攻。经过31小时激战，全歼该敌，俘虏东北"剿总"副总司令范汉杰、第六兵团司令卢浚泉以下约9万人，完全封闭了东北国民党军从陆上退回关内的大门。蒋介石在锦州即将失守时，于15日再次飞到沈阳，督促廖耀湘兵团继续进攻，并派飞机到长春给郑洞国空投手令"空援机油两缺，立即向沈阳突围"，并以"如再迟延有失机宜，陷全盘战局于不利，该副总司令、军长等，即以违抗命令论罪，应受到严厉之军纪裁判"相威胁。这时，驻守长春西半部的新七军，是蒋介石的嫡系部队，有所谓"远征军"、"王牌军"之称；驻守东半部的第六十军，是滇系部队，到东北后，虽屡屡受挫，士气不高，但还有相当的实力；其余是东北的地主武装和土杂顽匪改编的部队，也非常反动。这些敌人依仗着城内坚固的防御工事和精良的美式装备，只要还有一线希望，就决不会放下屠刀，而是要进行困兽之斗，做垂死挣扎的。东北野战军对长春守敌实行了"久困长围"的方针。为了防止敌人突围和出击，在长春城外，东北野战军的封锁线层层密密，水泄不通；工事、交通壕纵横交错，形成了一个地下交通网。国民党军曾几十次大大小小的突围，均被打退，后来只好龟缩在城内，不敢轻举妄动。经济封锁，是东北野战军的另一项重要任务。在通往长春的各交通路口，设立检查站、检查哨，禁止粮食、蔬菜、燃料等一切生活资料和牛马入城，重点实行粮食封锁。这就把10万敌军的命运掌握在东北野战军手中。困守孤城，历来为兵家所忌。郑洞国率10万敌军要在城内生存下去，吃饭活命是起码的条件。围城之初，国民党军经常在长春城外的村庄里抢粮抢柴。后来，东北野战军围城部队日益向前压缩，逼得敌军不敢出城，只好依靠空投。实际上当时参加空投的飞机很少，开始每天有十一二架，到后来每周才有三四架，阴天下雨连一架也没有。这些飞机在东北野战军炮兵和高射机枪的射击下，有时来不及空投，就掉转机头仓皇四逃，有的被迫高空或漫无目标地乱投，很多物资都落到东北野战军阵地或封锁区内。投入城内的粮食等物资，国民党军成立专门机构，进行统一分配。规定大部分分配给新七军，引起了其他敌军的严重不满，以至乱抢空投物资，甚至为此发生械斗。这更加深了敌军内部嫡系与非嫡系军队之间的矛盾。东北野战军又展开了强大的政治攻势。如广泛的阵地喊话，散发宣传品，以及用打宣传弹、在护城河内放宣传木船等办法，将宣传品送到敌军阵地上。还组织向城外的群众及长春城内逃出的难民做工作，利用国民党军家属和俘虏、投诚官兵对敌喊话。在东北野战军强大的政治攻势面前，前来投诚者日众，从1948年6月25日至9月底，共接收投诚官兵1.35万余人。在大规模的群众性的瓦解敌军工作的同时，在国民党军内部，尤其是对第六十军上层军官的工作，也在紧张地进行着。刘浩受中共中央委托来到东北，与滇军中的中共地下组织接上关系，

做了大量的工作。将被俘军官中经过教育表现好的，如梅河口战役被俘的原国民党军一八四师团长张秉昌、李峥先等，以派遣方式放回城去做工作。东北局还委派1946年5月海城起义的原第六十军第一八四师师长潘朔端为东北野战军第一兵团副参谋长，他利用各种关系给城内上层军官写了不少信。刘浩还化装秘密进城做上层的工作。第六十军中以孙公达为首的中共地下组织，在此期间也积极工作，扩大影响，发展了一批党员，为第六十军起义创造了条件。10月17日，困守长春的第六十军军长曾泽生(1902—1973，云南永善人)率部2.6万人起义，郑洞国和新七军军长李鸿也于19日率部3.9万余人放下武器，长春宣告解放。

在东北野战军攻克锦州后，蒋介石于10月18日第3次飞赴沈阳指挥，策划夺回锦州，打开关内外联系。他严令廖耀湘兵团继续前进，命令杜聿明在葫芦岛设指挥所，指挥锦西、葫芦岛之国民党军由南向北攻击，南北对进，企图重占锦州，再向关内退却。东北野战军主力部队在攻克锦州后，立即向东北方向回师，将廖耀湘兵团包围于黑山、大虎山、新民地区，经两日一夜的激战，全部歼灭该敌，俘虏国民党军第九兵团司令廖耀湘、军长李涛、向凤武、郑庭笈以下10万余人。取得了辽沈战役的决定性胜利。廖耀湘兵团被歼后，卫立煌从沈阳乘飞机逃走，以第八兵团司令官周福成统一指挥第五十三军两个师、整编第二〇七师两个旅、新一军一个师及4个守备总队(相当于师)、3个骑兵旅之残部和一部分地方保安部队，约14万人，妄图继续顽抗，或伺机经营口从海上逃跑。中共中央军委于10月27日电示东北野战军："当面敌人解决后，望以有力兵团(不少于三个纵队)星夜兼程东进，渡辽河，歼灭营口、牛庄、海城一带之敌，阻塞敌人向海上的逃路。"东北野战军即令铁岭附近地区之第十二纵队除以一部围歼铁岭地区的敌第五十三军的第一一六师外，主力会同开原地区的5个独立师、内蒙古军区骑兵第二师和辽西战场上的第一、第二纵队，以及本溪地区之独立第十四师等部向沈阳急进；第七、第八、第九纵队和独立第二师、内蒙古军区骑兵第一师向鞍山、辽阳、海城、营口急进；并令辽南军区部队立即在辽河上设法架桥，准备主力东渡。10月31日，第一、第二纵队经新民、巨流河进抵沈阳西郊，会同已进至沈阳以南苏家屯的第十二纵队和进抵沈阳北郊、东郊的6个独立师包围了沈阳。11月1日，东北野战军发起总攻，守军迅速瓦解。2日，沈阳宣告解放，歼敌13.4万人，俘虏周福成。同日，营口之第五十二军1万余人由海路撤至葫芦岛。9日，国民党从锦西、葫芦岛撤出4个军13个师，约数万人，其余为东北野战军消灭。

辽沈战役自9月12日至11月2日，历时52天，国民党军共损失4个兵团11个军，共36个师47万人。东北全部解放。辽沈战役的胜利，使中国的军事形势进入了一个新的转折点，敌我双方力量对比发生了根本的变化。国民党总兵力由决战前的365万人下降到290万人。人民解放军则由280万人上升到300余万人，不仅在质量上早已占显著优势，而且在数量上也占了优势。 (林健柏)

淮海战役

1948年11月6日至1949年1月10日，人民解放军华东野战军和中原野战军在以徐州为中心，东起海州，西止商丘，北起临城(薛城)，南达淮河的广大地区同国民党军队进行的一个有决定意义的战役。

1948年10月11日，毛泽东为中共中央军事委员会起草的给华东野战军《关于淮海战役的作战方针》的电报，确定了淮海战役的任务，主要是消灭国民党军刘峙集团主力的一部(不是全部)，开辟苏北战场，使山东、苏北打成一片。10月22日，中原野战军主力攻占中原重镇郑州，中共中央军委当即决定中原野战军应东进直出津浦路徐州、蚌埠间，钳制国民党军孙元良、邱清泉、李弥兵团，配合华东野战军作战，形成两大野战军联合作战的有利态势。11月2日辽沈战役结束后，国民党在徐州召开作战会议，决定将刘峙、杜聿明集团蜷缩于徐州地区，能战则战，不能战则向南撤过淮河，据守长江。当时集结在以徐州为中心的津浦、陇海两条铁路相交的"十字架上"的国民党军队有：徐州"剿总"总司令刘峙、副总司令兼前进指挥部主任杜聿明指挥下的第二、第七、第十三、第十六兵团和第三、四、九绥靖区(战役中第四绥靖区改编为第八兵团，第九绥靖区改编为第六兵团)，以及第十二兵团，共30个军75个师，总兵力80万人。11月9日中共中央军委给中原、华东两野战军的电报指出："现在不是让敌人退至淮河以南或长江以南的问题，而是第一步(即现在举行之淮海战役)歼敌主力于淮河以北，第二步(即将来举行的江淮战役)歼敌余部于长江以北的问题。"电报还指出，中原、华东两野战军应迅速攻占宿县，截断宿蚌路，包围黄百韬兵团，并攻击李弥兵团，"应极力争取在徐州附近歼灭敌人主力，勿使南窜"。这是一个重大

的决策。至此，淮海战役已由原来以歼灭徐州敌右翼一部为目标的通常所说的“小淮海”战役，发展为以歼灭徐州刘峙集团主力全部为目标的通常所说的“大淮海”战役。中共中央军委指出，此战胜利，不但长江以北局面大定，即全国局面亦可基本上解决。11月16日，中共中央军委决定由刘伯承、邓小平、陈毅、粟裕、谭震林组成总前委，邓小平为总前委书记，统一领导中原野战军和华东野战军，执行领导淮海前线军事和作战的职权。中国人民解放军参战部队有：华东野战军16个纵队，中原野战军7个纵队，加上豫皖苏军区、豫西军区、陕南军区、冀鲁豫军区和江淮军区的地方武装，共60余万人。整个战役共分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从11月6日至22日，重心是集中兵力歼灭黄百韬兵团，完成中间突破。这时，国民党军队黄百韬兵团位于东接连云港、西近徐州的陇海线上。解放军决定以一半以上兵力用于阻断和打击前来援救黄百韬兵团的敌军，以期使分散之敌不得靠拢，被围之敌无法漏网。11月6日，中国人民解放军中原野战军歼灭国民党第一八一师米文和部在商丘以东马牧集附近，华东野战军歼灭国民党山东保安团队王洪九部在郯城。黄百韬兵团企图夺路西逃。11月8日，国民党第三绥靖区副司令官何基沣、张克侠（均为中共地下党员）率1个军部和3个师、1个团共2.3万人，在徐州东北贾汪、台儿庄地区起义，从而开放了台儿庄一带运河上的通道，使徐州的东北大门敞开。华东野战军主力立刻穿越他们的防区，迅速切断正向徐州靠拢的黄百韬兵团的退路，各路增援的敌军都受到坚决阻击。黄百韬兵团只得折回碾庄圩，被压缩在纵横不到10公里的包围圈内。碾庄圩位于运河以西，陇海路两侧，共有10几个村庄。为防洪水泛滥，每个村庄都筑有高出地面二三公尺的土围子，土围子四周多洼地、水塘，地形开阔。该地区原为敌第十三兵团的防地，已经构筑了比较完整的防御阵地，黄百韬兵团利用原有工事和有利的地形迅速筑成了以地堡群为骨干，并有纵横交错的堑壕。交通壕的环形防御阵地，每个村庄都形成可独立防守的支撑点，村与村之间又可以兵力、火力相互支援。黄百韬将其兵团部署于碾庄圩，所属之第六十四、第四十四、第一〇〇、第二十五军分别配置于东、南、西、北两侧。自11月11日起，华东野战军担任围歼黄百韬兵团的各纵队从四面八方向敌展开猛攻。敌在空军掩护下逐村顽抗。至16日晚，主攻碾庄圩地区各纵队以近迫作业接近敌人，集中兵力火力逐点攻击的战法，对被围之敌发起攻击。至20日，歼灭敌第四十四、第一〇〇军全部及第六十四、第二十五军各一部，攻占敌兵团所在地碾庄圩，黄百韬逃至大院上，继续指挥残部作垂死挣扎。至22日，人民解放军连续突击，在徐州以东新安镇碾庄地区，围歼了黄百韬兵团，黄百韬毙命，解放了碾庄以东陇海路两侧和徐州以西以北广大地区，切断了津浦路徐州、蚌埠段间国民党军的联系。

第二阶段从11月23日至12月15日，主要作战目标是歼灭由豫南赶来增援而孤军突出的黄维兵团。黄维兵团计有4个军12个师约12万人，是蒋介石的嫡系部队，战斗力较强，其中的第十八军是国民党军队的精锐主力之一。11月23日，该敌在空军和坦克的掩护下，分3路向南坪集地区猛烈攻击。坚守该地区的中原野战军第四纵队与敌激战竟日，当晚奉命放弃阵地，诱敌深入。次日中午，敌前进到忠义集、东坪集、杨庄、七里桥、朱口地区，进入中原野战军预设的袋形阵地内。黄维发觉处境不利，即令各部于下午向浍河南岸东撤，企图与李延年、刘汝明兵团会合。25日晨，该兵团行至双堆集，被中原野战军7个纵队、华东野战军两个纵队包围。27日，第一一〇师师长廖运周率师部和两个整团共5500人，在安徽宿县西南罗集起义。同时，北线邱清泉、孙元良兵团在孤山集、褚兰地区受阻；南线李延年、刘汝明兵团亦因灵璧失守而撤回浍河南岸。面对这种情况，蒋介石又改变决策，28日命黄维兵团固守双堆集；命杜聿明率3个兵团放弃徐州，绕道永城南下，侧击中原野战军以解黄维之围；命刘峙率徐州“剿总”转移到蚌埠，督促第六、第八兵团北援黄维兵团。11月30日，杜聿明集团率邱清泉、李弥、孙元良3个兵团撤出徐州向永城南逃，途中又接蒋介石指令，命其停止前进，转向濉溪口方向实施攻击，以解黄维兵团之围。12月4日拂晓，华东野战军将杜聿明所部3个兵团全部合围在永城东北的青龙集、陈官庄地区。6日，孙元良兵团向西南方向突围被全歼，孙元良只身潜逃。邱、李两兵团就地固守。蒋介石见救援无望，乃令黄维率部突围，并空投毒瓦斯弹襄助。因黄维兵团粮弹俱缺，伤亡又重，部队不断向解放军投诚，已无战斗力。15日，黄维率部从东、西、北三面突围。突围的命令下达后，各部争先恐后地逃命，特别是战车营，在将近黄昏时，因其停车场受到解放军的炮击，以致战车纷纷移动，引起部队误会，各自乱跑，而解放军立即层层截击。至此，人民解放军在宿县西南双堆集地区围歼了黄维兵团，生俘兵团司令官黄维、副

司令官吴绍周,军长覃道善、杨伯涛,副军长王岳,师长王元直、尹钟岳、夏建勋、潘琦等。该兵团一个师起义。黄维兵团被歼后,李、刘两兵团急忙退回淮河布防。

第三阶段从12月16日至1949年1月10日,主要作战目标是歼灭杜聿明集团。人民解放军淮海前线部队首先进行了20天的战场休整。为配合平津战役,麻痹并稳住傅作义集团,淮海前线部队奉命对被包围的杜聿明集团暂不作最后歼灭,而展开敦促杜聿明等率部投降的政治攻势。12月27日,中原人民解放军司令部和华东人民解放军司令部发表《敦促杜聿明等投降书》,指出放下武器、停止抵抗才是唯一生路。但是,杜聿明等高级将领拒绝投降,一再要求蒋介石调西安、武汉一切可以集中的力量,与人民解放军决战。华东野战军决定采取先歼包围圈东部第十三兵团、再歼西部第二兵团的方针,对杜聿明集团发起总攻。1949年1月6日16时,华东野战军3个突击集团对青龙集、陈官庄地区被围的国民党军发起总攻。在两个小时内,歼敌万余人。7日,第十三兵团残部仓皇逃入第二兵团防区。华东野战军乘势连续猛攻,攻克村落23处。9日,国民党军在20余架飞机掩护下施放毒气,向西突围,为华东野战军击退。至10日下午4时,人民解放军全歼邱清泉、李弥两个兵团,生俘杜聿明,击毙第二兵团司令官邱清泉,只有李弥逃脱。至此,规模巨大的淮海战役胜利结束。在战役过程中,中共中央华东局、中原局和冀鲁豫分局全力以赴地组织了庞大的支前工作。据不完全统计,支前的一、二线民工达150余万人,运送粮食达4.3亿斤,有力地保障了战役的胜利。淮海战役历时65天,人民解放军以伤亡13.4万余人的代价,歼灭国民党军一个"剿总"前进指挥部、5个兵团部、22个军部、56个师,共55.5万人。此外,还击退了由南京方面来援的刘汝明、李延年两个兵团,基本上解放了长江中、下游以北的华东、中原地区,使蒋介石的精锐主力丧失殆尽,国民党反动统治的中心南京以及上海、武汉等地,处于人民解放军直接威胁之下。　　（林健柏）

平津战役

1948年11月29日至1949年1月31日,人民解放军东北野战军、华北军区两个兵团在西起张家口,东至北平、天津、唐山地区同国民党军队进行的一次具有决定意义的战役。

1948年11月2日,辽沈战役后,华北之敌面临着被东北、华北解放军联合打击的形势。蒋介石、傅作义估计东北野战军在辽沈战役后需要休整3个月到半年才能入关作战,华北国民党军队尚能自保。因此,他们决定暂守平津,保持海口,扩充实力,以观时变。傅作义将其50多万兵力集中分布在东起北宁线的山海关、西迄平绥线的张家口长约500多公里的狭长地带。其具体部署共分3个防区:一是张家口防区,以张家口为中心,包括张北、万全、宣化、怀安一线,以孙兰峰第十一兵团部、1个军部、7个师防守;二是北平防区,以一个"剿总"司令部、两个兵团部、6个军部、20个师驻守;三是津、沽防区,主要是以天津警备司令部和第十七兵团,共5个军部、17个师。为把华北国民党军稳住在平津地区,就地歼灭,不使其逃跑,早在辽沈战役结束之前,中共中央、中央军委和毛泽东即电示东北野战军以第四纵队、第十一纵队等部组成先遣兵团于战役结束后速向北平附近开进;并指示华北第二十兵团撤围归绥,集结于集宁地区,命令第十八兵团缓攻太原;对杜聿明残部"两星期内不作最后歼灭之部署"。同时,决定利用傅作义派人与解放军谈判以拖延时间之机,将计就计,用谈判拖住敌人。随后,又指示东北野战军主力早日入关,至少以8个纵队取捷径以最快速度隐蔽入关,突然包围唐山、塘沽、天津3处敌人,不使其逃跑,在包围态势下进行休整。1948年11月27日,毛泽东命令东北野战军先遣兵团及华北第二、第三兵团组成平张战役之兵力,切断平(北平)张(张家口)线,包围柴沟堡、怀来、张家口、宣化等点之敌,相机歼敌一部或大部,以抓住傅系,拖住蒋系;并借此掩护东北野战军主力顺利切断平津、津塘诸敌之联系,以打开主要地区之战局。11月23日至26日,东北野战军主力南下。广大指战员不顾疲劳,连续行军,分别从喜峰口、冷口、山海关入关,12月20日前,80万大军全部进抵平津前线,东北15万民工随军入关。

中共中央决定由林彪、罗荣桓、聂荣臻组成总前委,领导平津前线人民解放军的一切行动。11月29日,平津战役开始。人民解放军向张家口外围的国民党守军发起进攻。12月8日,第十九兵团将傅部主力第三十五军包围于新保安地区,东北野战军一部将敌第十六军主力围歼于康庄、镇边城一带。11日,由怀来向南突围的暂三军也被歼于横岭、白羊城。至此,人民解放军将傅部主力7个师两个骑兵旅分别包围于张家口、新保安两地,调动了津、唐的敌军进到北平地区,拖住了傅作义集团,控制了平绥路,断绝了敌人西窜之路。12月11日,毛泽东为中共中央

军委起草了《关于平津战役的作战方针》，明确指出：现在唯一的或主要的是怕敌人从海上逃跑。为稳住敌人，西线解放军对张、新二处暂取“围而不打”的方针。命令东北野战军主力尽快入关，并对平津诸敌实施“隔而不围”的办法，割断诸敌联系，完成战略包围；命令山东军区部队控制济南附近一段黄河，并在胶济线预做准备，以防敌人向青岛逃跑。从12月12日起，入关的东北野战军主力先后抵达平津前线，以神速行动完成了对平、津、塘敌人的战略包围和战役分割。到12月21日，人民解放军完全斩断了傅作义的一字长蛇阵，敌人已无南逃西窜之路。东北野战军和华北军区主力遵照中央军委指示，对北平守敌采取军事打击和政治争取相结合的方针，从11月开始，傅作义经中共北平地下组织和爱国民主人士的争取工作，几次派人与中共接触，表示愿意和平解决平津问题。实际上却仍然动摇于和、战之间。平津前线司令部遵照中央军委指示，一面同傅作义部代表继续谈判，争取和平解决，一面加强军事攻势，以增强和平解决的可能性。由于傅作义缺乏诚意，谈判未获结果。从12月22日起人民解放军按照中央指示“先打两头，后取中间”的原则，首先攻取西线的新保安、张家口，歼灭傅部一部分主力。新保安是平张线上的一个集镇，由傅作义嫡系第三十五军军部和所属两个师共1.6万人固守。华北第二兵团于12月21日发起战斗，在扫除了外围据点后，22日7时发起总攻，战斗激烈，于当日17时全歼该敌，军长郭景云自杀身亡，新保安解放。张家口之敌闻讯后，于23日拂晓向张北方向突围，华北第三兵团和东北野战军第四纵队全力追击，24日16时，于张家口外围全歼第十一兵团部及其所属1个军、7个师，共5.4万余人。张家口重获解放。东线原计划先歼塘沽之敌，由于塘沽背面靠海，附近地势开阔，河渠纵横，又多盐田，冬不结冰，步兵难以跋涉，炮兵、坦克部队又不便施展。平津前线司令部还侦悉北平、天津守敌有乘机突围的征候后，故改为不打塘沽，先攻天津。以第十二纵队主力位于军粮城监视塘沽之敌，集中兵力转攻天津，命令华北第二、第三兵团东进，加强对北平的包围。天津守敌有蒋介石嫡系部队第八十六军、第六十二军、第九十四军10个师及地方团队共13万余人，归天津警备司令陈长捷指挥。敌人为顽守天津，从1947年起开始征调大批人力和物力，用250亿元的巨款，构筑长达40多公里的环城碉堡工事，并挖一道宽10米、深3米的护城河。内墙顶到河底高达7米，墙内每隔30米有一座碉堡。环城围绕一道铁丝网和电网，沿着护城河有大型碉堡380多个，连同市内纵深的碉堡先后共构筑1千多个。护城河放进运河河水和海河潮水，水深保持两、三米左右。陈长捷自夸为“大天津堡垒化”，凭此固守顽抗。人民解放军针对天津敌人的守备情况和地形，决定集中5个纵队22个师共34万人，并配属大口径火炮538门、坦克30辆、装甲车16辆，由参谋长刘亚楼组成前线指挥所统一指挥。根据天津东西窄、南北长的地形和守敌北部兵力强，南部工事强，中部兵力、工事均不强的特点，确定采取东西对进、拦腰斩断、先南后北、先分割后围歼的作战方针，以第一纵队司令员李天佑、政治委员梁必业指挥第一、第二纵队和特种兵部队三分之二的炮兵及20辆坦克向城西，以第七纵队司令员邓华、政治委员吴富善指挥第七、第八纵队和特种兵部队三分之一的炮兵和10辆坦克向城东，以金汤桥（解放桥）为会合点，完成拦腰斩断任务，而后穿插分割，各个歼灭守敌。以第九纵队及第十二纵队第三十四师，由南向北实施助攻；以小部兵力在北面实施佯攻；以第六纵队第十七师为预备队。在人民解放军部署攻城的前夕，陈长捷曾于1949年1月10日、11日两次派人来谈判，以拖延战局。1月12日，解放军平津前线司令部向天津守敌发出最后通牒，提出如果放下武器，人民解放军将保证其生命财产的安全，否则破城之日，将加倍惩罚，并限令24小时内答复。而天津守敌却提出只放下重武器，全部人马和轻武器撤往江南的无理要求，断然拒绝和平解决。人民解放军于14日对天津发起总攻，经29个小时激战，全歼守敌，俘虏陈长捷。15日下午，华北第二大城市天津宣告解放。16日，塘沽守敌5万余人乘舰南逃，东北野战军第十二纵队追歼其掩护部队3000余人，于17日解放塘沽。这时，北平守敌陷入绝境。中共中央和中央军委认为，和平解放北平的条件已比较成熟，决定继续同傅作义进行谈判，争取和平接管北平。同时命令人民解放军做好充分准备，以施加军事压力，如果谈判不成，再进行攻城。准备攻城的人民解放军与中共北平地下组织相配合，精确掌握敌情变化，加紧进行政治攻势，争取和平解决。1月上旬，傅作义的代表周北峰由张东荪引导出城与平津前线司令部谈判。天津解放后，平津前线司令部致函傅作义，向其指明两条出路，任其选择：一、自动放下武器并保证不破坏文化古迹、不杀戮革命人民，不破坏公私财产、武器弹药及公文案卷。如贵将军及贵属能够做到这些，则本军保证贵部官兵生命财产之安全。对于贵将军的战犯罪责，亦有理由向

人民说明情况，取得人民谅解，予以减轻或赦免。二、如果贵将军及贵属不愿意自动放下武器，而愿意离城改编，则本军为保全北平不受破坏起见，也可以允许这样做。本军可以允许贵军离开北平，开入指定地点，按照人民解放军的制度改编为人民解放军。上述两项办法，任凭贵将军及贵属自由选择。本军并愿再一次给予贵将军及贵属以考虑及准备之充分时间。此项时间，规定由1949年1月17日1时起至1月21日24时止。这件函扎于1月16日面交傅作义部代表邓宝珊和周北峰。1月19日，北平民间11个代表(包括何思源、吕复等)又出城与解放军联络。1月21日，傅作义将军与平津前线司令部达成《关于和平解放北平问题的协议》。1月22日上午10时，傅作义将军所部8个军、25个师开始出城听候改编。1月31日，北平原国民党守军全部开出城外。同日下午东北野战军第四纵队入城接防，古都北平宣告和平解放，平津战役结束。北平200万居民得以免遭战火之苦，北平丰富的文物古迹得以完好保存。平津战役历时64天，人民解放军共伤亡3.9万余人，歼灭和改编国民党军1个"剿匪"总司令部、1个警备司令部、3个兵团部、13个军部、50个师，共52万余人，使华北地区除归绥、太原、新乡等少数几个孤立据点外，全部获得解放。华北、东北两解放区人民为平津战役的胜利，做出了巨大贡献。据不完全统计，两解放区直接支援前线的民工共30余万人。担任修桥补路、运输粮食草料等其他工作的群众达150万人。为保证大清河水路运输，组织了4万余人，冒零下十几摄氏度的严寒，一日数次破冰，使100多公里水路运输畅行无阻。另参加支前的大车34万辆，运送到前线的粮食达3亿斤，保证了百万大军源源的供应，充分显示了人民战争的强大威力。中共中央在贺电中指出：平津战役的胜利，连同东北、华东、中原、西北人民解放战争的伟大胜利，以及南方人民游击战争的伟大胜利在一起，已经奠定了人民解放战争在全国胜利的巩固基础。　　(林健柏)

蒋介石"引退"

1949年1月21日，蒋介石宣告"引退"，由副总统李宗仁代理总统职务。

1948年底，蒋介石在军事、政治和经济等方面都遭到失败。1948年10月23日美国驻华大使司徒雷登向美国国务卿马歇尔提出建议：劝告蒋委员长退休，让位给李宗仁或者国民党内的其他较有前途的政治领袖。李宗仁、白崇禧为首的桂系也企图逼蒋下台。12月下旬，华中"剿匪"总司令白崇禧两度电蒋，要求停止国共间的军事行动。李宗仁也提出5项和谈主张：一、蒋介石下野；二、释放政治犯；三、言论集会自由；四、国共两军各自撤退15公里；五、划上海为自由市，政府撤退驻军，任命各党派人士组织上海市联合政府，政府与中共代表在上海举行和谈。同时，长沙绥靖分署主任兼湖南省主席程潜，河南省主席兼第五绥靖区司令官张轸以及湘、鄂、豫、桂4省参议会议长也先后发表通电，要求蒋介石下野，接受和谈主张。1949年1月1日蒋介石发表元旦文告，提出愿意与中共进行和平谈判的建议，声称只要和议无害于国家的独立完整，而有助于人民的休养生息，只要神圣的宪法不由我而违反，民主宪政不因此而破坏，中华民国的国体能够确保，中华民国的法统不致中断，军队有确实的保障，人民能够维持其自由生活方式与目前最低生活水平，则我个人更无复他求，只望和平果能实现，则个人的进退出处，绝不萦怀，而一惟国民公意是从。其核心仍然是要继续维持国民党的统治权。1月8日，蒋介石派张群到汉口、长沙争取白崇禧、程潜的支持，并向英、美、法、苏4国政府要求干涉中国的内战，但都失败。1949年1月14日中共中央主席毛泽东发表《关于时局的声明》，揭露了蒋介石的假和平阴谋，提出进行和平谈判的8项条件：一、惩办战争罪犯；二、废除伪宪法；三、废除伪法统；四、依据民主原则改编一切反动军队；五、没收官僚资本；六、改革土地制度；七、废除卖国条约；八、召开没有反动分子参加的政治协商会议，成立民主联合政府，接收南京国民党反动政府及其所属各级政府的一切权力。1月15日人民解放军解放天津，国民党反动统治面临全面崩溃。19日国民党政府提出所谓"先无条件停战"的建议。21日中共中央发言人发表谈话予以痛斥。同日，蒋介石发表文告，以"因故不能视事"为名，宣布"引退"，由副总统李宗仁代理其职权，自己退居幕后指挥。

上海人民和平代表团赴北平谈判

1949年2月14日以颜惠庆、章士钊、江庸等为代表的上海人民代表团到北平与中国共产党商谈和平谈判问题。

1949年1月22日，李宗仁代理国民党政府总统后，于27日致电毛泽东，表示愿意以中共的8项条件为和谈基础，并先后派黄绍竑、黄启汉、刘仲华、李书城等以个人身分直接或间接与中共接洽。2月6日，由邱致中、吴裕后等组成的南京人民和平代表团

到达北平。2月中旬上海组织了颜惠庆、章士钊、江庸为代表的"上海人民和平代表团",邵力子以私人资格参加了代表团。2月13日代表团离开上海去北平。随同前往的有李宗仁派往北平担任联络工作的黄启汉、刘仲华、秘书龚安庆、傅树苍、潘伯鹰、张丰胄、金山。中航公司也派电信课长顾乐村与技师雷仲仁等同行。14日下午4时半代表团抵北平。叶剑英的代表王拓、北平市副市长徐冰在机场欢迎。2月15日,叶剑英与颜惠庆、章士钊、江庸、邵力子作初次晤谈。关于南北通邮通航问题,双方很快作了初步的决定。2月22日代表团往西柏坡。24日分别同毛泽东、周恩来会谈。毛泽东、周恩来肯定了4位老人为和平努力的行动,并要求转告李宗仁立即派代表谈判实现和平。当天下午代表团返北平,带回毛泽东给李宗仁的一封信。代表团继续和叶剑英商谈关于正式和谈时间、地点及南北交通等问题。2月27日代表团返回南京,在机场发表谈话:同人等此次以私人资格访问北平,历时两周,迭与中共领导人叶剑英、聂荣臻、董必武、罗荣桓、薄一波共同或个别洽谈。中间并应邀赴石家庄一行,承中共主席毛泽东及周恩来将军延见,就和平谈判问题广泛交换意见。同人等深觉和谈前途困难尚多,而希望甚大。在北平和石家庄时,对于便利南北人民的通航、通邮诸问题,均经原则上商得同意。并承中共诸领袖恳挚款待,尤应附致谢之意。2月27日下午,李宗仁往访颜惠庆、江庸、章士钊、邵力子。他们即将毛泽东的信转交李宗仁并转达了中共的原则立场:希望李宗仁割断与美帝国主义的联系,划清和蒋介石顽固派的界限。代表团逗留南京3日,然后回到上海。上海人民和平代表团为正式和谈做了一些试探性工作,起了积极的作用。

（林健柏）

"重庆"号巡洋舰起义

1949年2月25日,国民党海军"重庆"号巡洋舰的官兵在上海吴淞口举行起义。

"重庆"号巡洋舰是英国政府于1948年5月19日赠给国民党政府的,是国民党政府海军中最大的巡洋舰。1948年10月30日国民党海军总司令桂永清奉蒋介石之命调舰艇赴东北,掩护在营口的刘玉章第五十二军撤退,他亲自坐镇在"重庆"号战舰上指挥。1949年2月25日,"重庆"号巡洋舰官兵570余人,在爱国青年王颐桢等人组成的"士兵解放委员会"的领导和舰长邓兆祥支持下,在上海吴淞口宣布起义,脱离国民党政府,加入中国人民海军,并于次日驶向解放区烟台港口。蒋介石闻讯,破口大骂桂永清是"败家子"、"蠢才"。一些"立法委员"和"国大代表"也对桂永清提出了"弹劾案",指斥他"治军无能,贻误军机"、"不学无术,营私舞弊",要求将他交付"军法审判"。3月19日,美帝国主义和国民党政府出动重轰炸机多架,将"重庆"号炸沉于东北辽东湾的葫芦岛附近。3月25日中共中央主席毛泽东和朱德总司令致电邓兆祥并全体官兵,对他们起义表示嘉勉。起义官兵经过一段时间学习后,便分配到人民解放军海军部队、院校任职,成为海军建设的一支重要力量。至年底,国民党海军舰艇起义共有14起,起义舰艇70多艘。国民党海军舰艇起义给国民党统治集团以沉重打击。

（林健柏）

中共七届二中全会召开

1949年3月5日至13日,中国共产党在河北省平山县西柏坡村召开第七届中央委员会第二次全体会议。

经过伟大的战略决战,人民革命在全国的胜利已成定局。形势发展表明,革命已处在一个新的历史转变关头。民主革命的任务即将全部完成,准备向社会主义革命转变的新的斗争任务已经摆在中共的面前。1949年3月5日至13日,中共召开了七届二中全会。出席会议的有中央委员34人,候补中央委员19人,列席会议的有中共中央及有关方面负责人12人。会议集中讨论彻底摧毁国民党统治,夺取全国胜利,在新形势下党的工作重心实行战略转移,即从乡村转到城市的问题。毛泽东代表中共中央政治局作报告,朱德、刘少奇、周恩来、任弼时等27人在会上就中共的工作任务、城市政策、国共谈判、筹备新政治协商会议以及军事等问题发了言。会议根据毛泽东的报告,通过了决议。报告提出了促进革命迅速取得全国胜利和组织这个胜利的各项方针,指出:三大战役以后,国民党军队的主力已被消灭,只剩下100多万人的作战部队了。今后解决这部分残余敌军有3种方式:天津方式,用战斗去解决敌人;北平方式,用和平的方法,按照人民解放军的制度,将敌军改编为人民解放军;绥远方式,使一部分国民党军队保存一段时间,再进行改编。在3种方式中,用战斗解决敌人,仍然是我们首先必须注意和必须准备的,人民解放军全体指挥员战斗员,绝对不可以稍微松懈自己的战斗意志。在进行军事斗争的同时,积极开展政治斗争,要把原则的坚定性同策略的灵活性紧密结合起来。为了适应斗争的需要,要把人民解放军变成

培养干部的学校，准备把210万野战军全部地化为工作队。报告提出了党的工作重心由乡村转到城市的问题。指出经过辽沈、平津和淮海三大战役，敌我力量发生了根本性变化，采取农村包围城市的工作方式的时期已经完结。从现在起，党的工作重心必须由乡村移到城市，实行由城市领导乡村的工作方式。报告指出，必须用极大的努力去学会领导城市人民进行胜利的斗争，学会管理城市和建设城市。必须依靠工人阶级，团结其他劳动群众，争取知识分子和尽可能多的小资产阶级分子以及自由资产阶级代表人物站在一条战线上，向帝国主义、国民党反动派和官僚资产阶级作坚决的斗争。管理和建设城市的中心任务是恢复和发展工业生产。必须确定第一是国营工业的生产，第二是私营工业的生产，第三是手工业生产。城市中的其他工作，如共产党和工会、人民团体、政权机关、治安保卫、文化教育等，都应当为恢复和发展工业生产这一中心工作服务。只有将城市的生产恢复和发展起来了，将消费的城市变成生产的城市了，首先使工人的生活，并且使一般人民的生活有所改善，人民的政权才能巩固起来。报告分析了全国胜利后中国社会的基本矛盾，提出了中共在政治、经济、外交等方面的基本政策。中国革命在全国胜利，并且解决了土地问题之后，中国还存在着两种基本矛盾：第一种是国内的，即工人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矛盾，第二种是国外的，即中国和帝国主义国家的矛盾。必须创造条件，使中国有可能稳步地由农业国变为工业国，由新民主主义社会发展到社会主义社会。据此，规定了党在政治、经济、外交方面应当采取的基本政策。在政治上巩固和加强工人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的国家政权。在经济上，就全国范围来说，抗日战争以前，分散的个体的农业和手工业经济在国民经济中约占90%左右，而现代工业只占10%左右。这是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经济十分落后的表现，是中国革命胜利以后一个相当长时期内一切问题的基本出发点。制定政策必须从这一点出发，否则我们就要犯严重的错误。在现代工业中，最大的和最主要的资本，都集中在帝国主义及其走狗官僚资产阶级的手里。没收这些资本归国家所有，使它变为社会主义性质的国营经济，使人民政权掌握住国家的经济命脉。私人资本主义工业，占了现代性工业中的第二位，它是一个不可忽视的力量。既要利用它的积极性，以利于发展经济，又要在活动范围、税收政策、市场价格、劳动条件等方面采取限制的政策。对于个体经济的农业和手工业，要逐步引导向现代化集体化的方向发展，使之成为半社会主义性质的合作社经济。在社会主义性质的国营经济的领导下，通过合作经济改造个体经济，通过国家资本主义经济改造私人资本主义，这是我国由新民主主义社会转变为社会主义社会的主要途径。在外交上，应当采取有步骤地彻底地摧毁帝国主义在中国的控制权的方针。取消一切帝国主义在中国的特权，按照平等的原则同一切国家建立外交关系。只要帝国主义国家一天不改变敌视新中国的态度，我们就一天不给他们在中国以合法的地位。我们既同社会主义国家做生意，也要同资本主义国家做生意。报告估计了中国人民民主革命胜利以后的国内外阶级斗争的新形势，及时提醒全党要警惕资产阶级“糖衣炮弹”的袭击。全会号召全党同志必须继续保持谦虚、谨慎、不骄、不躁的作风，必须继续保持艰苦奋斗的作风。要认识到夺取全国胜利，只是万里长征走完了第一步，今后的路程更长，工作更伟大更艰苦。全会批准了毛泽东的报告；批准了由中共发起，召开没有反动分子参加的新的政治协商会议及成立联合政府的建议；批准了1949年1月14日毛泽东发表的《关于时局的声明》。全会还通过了《关于军旗的决议》，规定“中国人民解放军的军旗应为红地，加五角星，加‘八一’二字”。七届二中全会是在中国人民革命全国胜利的前夜，为中共夺取全国胜利和建设新中国，做了政治上和思想上的准备，是一次具有重大历史意义的会议。会议结束后，中共中央于3月25日从西柏坡村迁至北平。　（林健柏）

国共北平和谈

1949年4月1日起，中国共产党代表与国民党政府代表在北平举行和平谈判。

1949年1月21日蒋介石宣布“引退”，李宗仁代理总统。次日，李宗仁声明：“中共所提8项条件，政府应立即开始商谈。”并电邀李济深、章伯钧、张东荪等共同策进和平运动，指示国民党行政院，派邵力子、张治中、黄绍竑、彭昭贤为和谈代表，等候与中共代表在双方同意的地点进行和谈。1月23日，中共声明与南京政府谈判，并非承认南京政府，乃因其尚控制若干军队；谈判地点，俟北平解放后在北平举行；反对彭昭贤为南京政府代表；战犯必须惩治，李宗仁也不能免。27日，李宗仁致电毛泽东请迅速指定谈判地点，表示承认中共所提8项条件作为和平谈判的基础。3月1日，李宗仁召集何应钦、童冠贤、吴铁城、张治中等商讨谈判事宜，提出谈判的3条原

则：一、和谈必须建筑在平等的基础上，绝对不能以胜利者自居，强迫我方接受不体面的条件；二、不能同意建立以共产党为统治的联合政府，应建议停火，在两党控制区之间划一条临时分界线；三、不能全部接受所谓8条，只同意在两政府共存的条件下讨论8条。李宗仁和何应钦就谈判内容问题拟订“和谈腹案”，中心内容是在承认中共8项条件的基础上讨价还价，力求在战争责任、整编军队、就地停战、与中共以同等名额参加政治协商会议与联合政府、人民解放军不得过江等问题上不让步。对国共停战协定最低限度的要求核心是停止一切战斗，各守原防，如发现人民解放军集结渡江材料及运兵船队时，国民党军队得采取自卫行动等等。3月26日，中共中央通知国民党政府：中共中央同国民党的和谈定于4月1日在北平举行；中共方面代表为周恩来、林伯渠、林彪、叶剑英、李维汉，周恩来为首席代表；谈判以毛泽东1月14日声明及8项条件为基础。4月1日又加派聂荣臻为代表。随后，国民党政府派出邵力子、张治中、黄绍竑、章士钊、李蒸、刘斐等为代表，张治中为首席代表。由于李宗仁等坚持先签订停战协定，再商谈和平条件，使原定4月1日的谈判被迫推迟。4月5日，朱蕴山、李民欣由北平飞南京，代表李济深劝告李宗仁、白崇禧完全接受中共所提8项条件。4月7日，李宗仁又电毛泽东，在战犯问题上做文章。电报说：所谓战犯者，纵有汤镬之刑，宗仁一身欣然受之而不辞。次日，毛泽东复电：贵方既然同意8项条件为谈判基础，则根据此8项原则以求具体实现，自不难获正确解决。战犯问题也是如此。毛泽东在北平还对张治中等人表示：战犯的条款中不举其名，但仍要有追究责任的字样；签约时李宗仁、何应钦等人应来北平参加；改编军队可以缓议；人民解放军必须过江；联合政府成立须经四五个月之久，期间南京政府仍可维持现状，行使职权，免使社会秩序紊乱，再次表明中共和谈的诚意。4月13日，中共代表向张治中送交《国内和平协定草案》，当晚双方举行谈判。国民党代表对该案提出40多条修改意见。其中“就地停战”、“划江而治”两点当即遭到中共代表的拒绝。其他条款中共作了让步。如对和平协定草案作了重大修正。对一些刺激性的字眼，像“反动分子”、“贪污分子”等形容词统统去掉，“背叛”改成“违背”，以减少心理上的刺激，能为李宗仁及南京政府所接受；对惩办战争罪犯一条，未将战犯名单列上去，“元凶”、“首恶”等字眼也都勾去，而且说：“一切战犯，不问何人，如能认清是非，翻然悔悟，出于真心实意，确有事实表现，因而有利于中国人民解放事业之推动，有利于用和平方法解决国内问题者，准予取消战争罪名，给予宽大待遇。”这条规定同样适用于头号战犯蒋介石和二号战犯李宗仁；对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的权力问题，中共也作了重大让步。规定政治方面：在联合政府成立前，南京国民政府与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协商处理”，暂时行使职权，去掉向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负责并接受其领导”等词句。在军事方面：成立整编委员会，也不再冠以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统率和指挥”等字样。周恩来指出：这是我们的一个重大让步，是为使得南京代表团向今日南京政府负责人李德邻先生、何敬之先生说服时有很多便利，俾和平能早日实现。在改编军队问题上，中共提出的改编条件比南京代表团提出的还要宽大。比如，他们曾主张裁兵复员，中共则主张一律按照原人数、原编制、原番号集中整训，并且与解放军同等待遇（每人每日4斤半小米）。对渡江问题，中共表示在谈判进行期间，命令人民解放军暂不渡江，愿意接受这个约束（至4月20日前）。15日，中共代表团提出8条24款的《国内和平协定（最后修正案）》，以张治中为首的国民党政府代表团表示可以接受。中共代表团要求国民党政府于4月20日以前答复，国民党政府代表团派黄绍竑和顾问屈武，于16日带《国内和平协定（最后修正案）》飞南京请示。4月20日，李宗仁、何应钦在给南京和谈代表的复电中断言：乃综观中共所提之协定全文，其基本精神所在，不啻为征服者对被征服者之处置。以解除兄弟阋墙之争端者，竟甚于敌国受降之形式；且复限期答复，形同最后通牒。因此，他要求延长签字期限，就若干基本问题继续进行商谈。国民党政府自己揭穿了“呼吁和平”的假面具，想用拖的手法，来挽回其失败，这当然是中共所不能接受的。4月20日中午，张治中通知李宗仁：中共中央拒绝延长签字期限的要求。当夜，中共中央发出进军江南的命令。

（林健柏）

渡江战役

1949年4月20日子夜起，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二、第三野战军和第四野战军一部强渡长江，发起渡江作战。又称京沪杭战役。

1949年4月20日国民党政府拒绝接受《国内和平协定（最后修正案）》，妄图凭借长江天险，阻止人民解放军南下。其部署是：以京沪杭警备总司令汤恩伯所部75个师45万人，布防于九江东北的湖口

至上海间，置重点于京沪地区；以华中"剿总"总司令白崇禧所部40个师25万人，布防于湖北宜昌至湖口间，并配以舰艇130多艘，飞机300多架，构成所谓陆海空联合防线。此外，美英帝国主义的海军舰艇一部驻泊于上海及长江口，企图对人民解放军渡江行动进行干涉。4月21日，毛泽东主席、朱德总司令发布向全国进军的命令，中国人民解放军按预定计划发起渡江战役。参战部队有：第二野战军、第三野战军及第四野战军共112万人。在以刘伯承、陈毅、邓小平、粟裕、谭震林组成的总前委统一指挥下，4月20日子夜，以第三野战军第七、第九兵团组成的中集团，在强大炮火掩护下，从荻港附近突破国民党军第八十八军防线，并占领荻港，首先登上长江南岸。激战至23日，第一梯队4个军全部渡过长江，并攻克安徽铜陵、南陵、芜湖等地，主力继续向宣城方向疾进。以第三野战军第八、第十兵团组成的东集团和以第二野战军第三、第四、第五兵团组成的西集团，于4月21日晚分别在马当至贵池间50多公里长的江面上，由华阳(望江)、枞阳等处分路同时胜利渡江。东集团渡江后，在江阴两侧滩头阵地，遇敌激烈抵抗。22日激战终日，打退敌人多次反扑。并争取江阴要塞守军起义，控制了江阴炮台，封锁了长江。23日，人民解放军占领镇江、丹阳、常州等地，切断了宁沪铁路。西集团在马当至贵池地区突破敌人江防后，迅速解放贵池、彭泽，占领青阳、高坦、至德一线和马当要塞。至此，敌人苦心经营了3个半月的长江防线完全崩溃。4月23日，人民解放军占领南京，宣告国民党在全国反动统治的覆灭。25日，人民解放军宣布约法八章：一、保护全体人民的生命财产；二、保护民族工商农牧业；三、没收官僚资本；四、保护一切公私学校、医院、文化教育机关、体育场所和其它一切公用事业；五、除怙恶不悛的战争罪犯和罪大恶极的反革命分子外，凡属国民党的人员，凡不持枪抵抗、不阴谋破坏者，一律不加俘虏、逮捕、侮辱，但应各安职守，服从人民解放军和人民政府的命令，听候接收处理；六、为着确保城乡治安、安定社会秩序的目的，一切散兵游勇，均应向当地人民解放军或人民政府投诚报到；七、农村中的封建的土地所有权制度是不合理的，应当废除，但应有准备有步骤进行；八、保护外国侨民生命财产的安全。与此同时，第四野战军先遣兵团进至武汉正面策应东线第二、第三野战军渡江作战，4月23日解放浠水、黄梅、荆门、汉川等地，并相继向长江北岸挺进。至此战役第一阶段结束。4月24日，各路大军展开追击作战，战役进入第二阶段。人民解放军中、东两集团军日夜兼程，于27日在吴兴地区会师后，在郎溪、广德地区围歼芜湖、南京、镇江逃敌5个军，俘敌8万多人，接着叶飞第十兵团一部解放苏州。5月3日，第七兵团占领浙江省会杭州。西集团的第三、第四、第五兵团，直出浙赣路，并乘势前出闽、浙、赣，5月7日控制了浙赣路义乌至东乡段400多公里，割断敌汤恩伯、白崇禧两集团的联系，粉碎残敌依托闽浙赣边山区建立第二防线的企图。上述作战中，共歼敌7个师及3个军各一部。此后，第二野战军以一部向浙东、闽北、赣中地区继续发起进攻，主力即转入就地休整，准备协同第三野战军对付美国帝国主义可能的军事干涉。至此战役第二阶段结束。5月12日开始，战役进入第三阶段。5月14日第四野战军先遣兵团在武汉以东的团风、田家镇突破敌江防阵地，南渡长江。16日、17日相继解放武汉三镇，敌十九兵团司令张轸率部1.8万多人在贺胜桥、金口起义，余敌南逃。第二野战军第四兵团于5月22日解放南昌，第五兵团一部占领九江。第三野战军第九、第十兵团，从5月12日起对上海发起进攻，27日解放上海。至6月2日渡江战役结束。渡江战役，人民解放军共歼敌43万余人，解放了南京、武汉、上海、杭州、南昌等城市和苏南、皖南、浙江、闽北、鄂东南、赣东北等广大地区，宣告了国民党政府22年反动统治的灭亡，为人民解放军继续向东南、华南和西南地区进军奠定了胜利基础。　　(林健柏)

太原解放

1949年4月24日，华北野战军和西北野战军一部及晋中地方武装攻占山西省会太原。

平津战役结束后，第一兵团改称人民解放军第十八兵团，第七纵队改称第一野战军第七军。1949年3月，以杨得志为司令员、罗瑞卿为政治委员的第十九兵团，以杨成武为司令员、李井泉为政治委员的二十兵团，第四野战军和华北军区各一个炮兵师，奉中共中央军委命令，开赴太原前线，会同第十八兵团等部总攻太原。此时，太原前线人民解放军已达32万余人，为阎锡山守军的3倍。为统一指挥，根据中央军委3月17日决定，组成以徐向前、罗瑞卿、周士第、杨得志、杨成武、陈漫远、胡耀邦、李天焕8人为中共太原前线委员会。徐、罗、周、陈、胡为总前委常委，徐向前任书记，罗瑞卿、周士第分任第一、第二副书记，成立以徐向前为司令员兼政治委员的人民解放军太原前线司令部。这时，阎锡山又将太原城周划

为东北、东南、西、南、北5个防区：东北区以温怀光的十九军军部指挥第六十八师、暂编第四十师和第三十军的一个团、暂编第四十六师的一个团，守备西岭、丈子头、牛驼村、剪子湾和卧虎山地区；东南区以刘效曾的四十三军军部指挥第七十师、暂编第四十九师，守备双塔寺、五龙口及郝家沟地区；西区以赵恭的六十一军军部指挥第六十九、第七十二师、忠贞师、工兵师，守备汾河以西的万柏林、大小王庄地区；南区以高倬之的三十四军军部指挥第七十三、第六十六师，守备太原以南、汾河以东的亲贤村、椿树村和杨家堡地区；北区以韩步洲的第三十三军军部指挥第七十一师、暂编第四十六、暂编第三十九师，守备太原以北、汾河以东的阳曲镇、向阳店和新城地区。另以戴炳南的第三十军军部指挥铁血师、神勇师守备城垣；以中央系的第二十七、第八十三师为战役预备队；以亲训炮兵团、榴弹炮团和以日军为骨干的今村炮兵队及6个独立炮兵营，组成10个炮兵群，分别配置在城东南、大东门、双塔寺、卧虎山、剪子湾、丈子头等阵地，由侵华日军今村中将、岩田少将指挥。1949年4月5日，总前委召开师以上主要领导干部参加的扩大会议，在人民解放军副总司令彭德怀参加指导下，制定了先打外围、后取城垣的作战方案，确定了总攻太原的作战部署。4月20日，全线同时开始总攻太原外围。在城东北，第二十兵团一个军突破丈子头，迅速西进，占领了新城以南之北机场；另一个军主力（两个师）及西北第七军一个师由兰村沿汾河两岸向南攻击，直插北机场以西之汾河铁桥，配合由丈子头西进之军，切断了北机场以北之敌的退路，另由西北野战军第七军一个师配合第二十兵团，同时攻占了牛驼（城东北），进而向北黄家坟之敌进攻，并钳制该敌。在城西，第十九兵团和晋中军区部队，一路于汾河以西突破南屯、义井，攻占大王村、小王村，即迅速进至万柏林地区，与由北向南插的一个师会合，切断了汾河以西敌之退路，并将该敌包围；另一路从汾河以东突破杨家堡防线，攻占东西寇庄、东岗和大南关等地，并以一部切断了双塔寺与太原城的联系。同时，第十八兵团一部在城东南肃清了双塔寺以南以东之敌，进而占领城南面粉公司、民众市场等地。在城东，第十八兵团主力和西北野战军第七军主力，连续攻占城东之剪子湾、仓库区、红营房、郝家沟，进而又攻占黑土港、大东关等地。至4月21日18时，太原周围除双塔寺和黄家坟两个据点尚在敌手外，其余被全部解放。解放军各部均逼至太原城下，并进行攻城之具体准备工作。4月22日9时，第十九、第二十兵团及第七军各一部，分别攻克双塔寺和黄家坟两个孤立据点。至此，全部肃清了城外敌人，共歼灭国民党军12个师。

太原敌军残部慌忙调整部署，以其第二十七师防守北面和东西大东门以北地段，以“神勇”师防守东面大东门以南地段，以第八十三师防守南面，以第七十二、第六十六、第四十六师和“坚贞”师的残部防守西面，企图据守城垣作最后挣扎。为减轻对太原市人民生命财产的破坏，太原前线司令部于4月22日向太原城内守敌发出了立即放下武器的最后通牒。敌置之不理，拒绝投降。4月24日5时30分，攻城部队运用1300门大炮进行炮火准备后，对城垣发起总攻。6时15分，第二十兵团首先由小北门东侧突破城垣，第十九、第十八兵团也相继攻入城内与敌展开巷战。为向纵深发动进攻，入城部队以小型爆破等手段，迅速开辟前进道路，向守军指挥中心勇猛穿插。9时许，攻入太原“绥靖公署”，全歼太原国民党军，俘太原“绥靖公署”副主任兼第十五兵团司令孙楚、太原守备总司令兼第十兵团司令官王靖国和日本顾问岩田等军政要员多人。太原遂告解放。此役共歼灭国民党军1个“绥靖公署”、2个兵团部、6个军部、20个师，共计13.5万人。大同国民党军第二七五师等部1.1万人，于4月29日接受和平改编。至此，结束了阎锡山对山西人民长达38年的统治，使山西全境获得解放。太原战役持续时间长，物资消耗大，弹药补给达400万公斤，粮秣供给两亿公斤，另外还有众多的战斗器材。这些庞大的物资运输，是依靠人力和畜力进行的。据统计，直接服务于太原前线的民工就有17万余人。特别是晋中人民担负了重要任务，该区劳动力的61%担任战勤，为夺取太原战役的胜利做出了贡献。　（林健柏）

上海和东南沿海解放

1949年5月至1950年5月，人民解放军通过淞沪战役、福州战役、漳厦战役及舟山战役，先后解放了上海、福建及舟山群岛。

淞沪战役：1949年4月，蒋介石命令国民党京沪杭警备司令汤恩伯部死守上海半年到1年，即使将整个上海市和数百万人民的生命财产在战火中毁灭，也在所不惜。汤恩伯指挥所部20万兵力企图阻止人民解放军解放上海。5月第二、第三野战军总前委根据中共中央军委的多次指示决定：以第三野战军第九、第十兵团采取钳形攻势，分别从浦东、浦西进逼吴淞口，先断敌退路，再行攻歼被围之敌；第二

野战军主力集结于浙赣铁路金华、东乡段休整，随时准备协同第三野战军反击帝国主义的可能的武装干涉。同时规定，战役发起时间，视中共中央华东局接管上海准备工作进展情况而定。参战部队应以加强城市政策和外事政策的学习作为战役准备的主要内容之一。5月12日，第三野战军主力发动了淞沪战役，第九兵团首先攻占松江、南汇、川沙等地，18日进抵高桥。第十兵团攻占南翔、嘉定后，直达浏行、月浦，与第九兵团形成夹击吴淞之势。敌为确保退路，利用既设阵地和纵横交错的河沟，以海陆空协同作战，企图负隅顽抗。人民解放军在不到两个星期的战斗中，全部攻克上海外围的城镇据点，迫使敌军退缩上海市区至吴淞口的狭长地带。24日，人民解放军完成了对上海的包围，接着解放了苏州河以南的市区。27日，上海全部解放。歼敌15万余人，汤恩伯率残部由海上逃走。6月1日，崇明岛解放。中共上海地下组织在配合人民解放军作战中起了巨大作用。

福州战役：1949年7月2日，第三野战军第十兵团由苏州、常熟、嘉兴地区出发挺进福建。接换已进入闽中地区的第二野战军部队，并担负扫清东南边境残敌的任务。8月6日该部发动福州战役。首先围歼福州守敌。11日，发起福州外围战斗。16日，攻占马尾、连江、长乐、福清等地，歼敌一部，截断了敌人的退路。福州守敌分路钻隙向厦门、平潭逃窜。第十兵团奋起追击，17日，解放福建省会福州市。经连日追堵，将逃敌大部歼灭于福清西北地区。是役，第三野战军第十兵团计歼敌福州"绥靖"公署、第六兵团部、第二十五军军部、第九十六军军部等共3.54万余人。自己伤亡1789人。福州战役的胜利，为解放福建全省创造了有利条件。

漳厦战役：敌在福州地区溃败后，国民党东南军政长官公署副长官汤恩伯依据蒋介石的计划，重新调整部署，统一指挥第八兵团和第二十二兵团在闽南组织防御，企图阻挠第三野战军进攻。解放军第十兵团在福州战役后，主力进行了休整，一部兵力在闽中游击队的配合下，先后解放了惠安、泉州、莆田、安海等地区，共歼敌9000余人。主力于1949年9月初开始由福州地区南下，19日发起漳厦战役。至25日，先后攻占同安、长泰、南靖、天宝、漳州及马巷、石码、集美、沃头等地。歼敌1.2万余人，控制了攻夺厦门的有利阵地。10月15日晚，第三野战军发动了对厦门岛之敌的渡海攻击，是夜21时登陆，17日拂晓攻占厦门市，当日11时解放全岛，歼敌2.7万余人。第十兵团在漳厦战役中，歼敌第八兵团部、厦门要塞司令部、第五十五军军部、第六十八军军部、第二十九师、第五十一师等部，共5.1万余人。第三野战军第十兵团进入福建以来，经过两个半月的连续作战，歼敌10万余人，解放了福建大陆及沿海大部分岛屿，为解放全部沿海岛屿，巩固东南国防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舟山战役：舟山群岛位于浙江杭州湾以东，拥有大小岛屿300余个。守敌为舟山防卫司令石觉所部第七十五军、第八十七军、暂编第一军等部共10个师约6万人。在解放军第十兵团进军福建的同时，第七兵团王建安司令员、谭启龙政委决定，以第二十二军并指挥第二十一军一部，担任攻占舟山群岛的任务。1949年8月18日，第三野战军开始向舟山本岛的外围岛屿发起进攻，10月先后攻占金塘、桃花等岛，歼敌1.2万余人。1950年5月16日，人民解放军向舟山本岛进军。至19日，舟山群岛全部解放。从此，敌对长江口的封锁被打破。 （林健柏）

人民解放军进军西北

从1949年7月开始，第一野战军向大西北进军的作战。

1949年5月11日，第一野战军发起陕中战役，多路西进，先后解放咸阳、周至、武功、扶风等县，20日占领陕西省会西安，尔后又克凤翔、岐山、眉县，并在麟游歼灭胡宗南部第五十七军1个师。与此同时，西北军区地方武装一部攻克潼关、华阴、渭南、临潼等地。胡宗南主力撤向宝鸡和秦岭山区。至5月25日，宝鸡以东、渭河南北广大地区全部解放。这次战役，第一野战军歼敌3.56万多人。第一野战军贯彻中共中央军委和毛泽东关于解放大西北的战略部署和先牵"马"（马步芳、马鸿逵）再打"胡"（宗南）的方针，从7月11日起向大西北进军。以第一兵团、第二兵团、第十九兵团发起扶眉战役。7月12日，彭德怀指挥第一野战军3个兵团完成了对扶风、眉县地区之敌的包围。敌数次突围，均被击退。第一野战军激战至14日，先后在扶风、眉县、宝鸡地区，歼敌胡宗南部主力4.4万人，胡宗南集团残部向陕南逃窜。取得了西北战场第一个回合的完全胜利。之后，胡宗南余部退踞秦岭地区，企图依托秦岭阻止第一野战军南取汉中；马步芳、马鸿逵部分别撤退兰州、临洮、同心、靖远一线，企图依托有利地形和既设阵地，消耗第一野战军的力量，阻止人民解放军向甘肃、宁夏、青海进军。彭德怀遵照中央军委和毛泽东关于暂不占领汉中，集中兵力歼灭"二马"的决策，乘胡宗南集

团和马步芳、马鸿逵两部远离之机，命令第十八兵团（欠一个军）于秦岭以北，监视胡宗南集团，以第一兵团、第二兵团、第十九兵团附第十八兵团一个军，乘胜展开陇东追击。7月下旬至8月上旬，第一野战军连续追击，前进500多公里，歼敌1.19万余人，相继解放平凉、天水、庆阳、通渭、武山、定西、临洮、榆中、临夏等20余座城镇和陇东广大地区，马步芳、马鸿逵两集团分别向陇中、宁夏撤退，形成了各个歼灭"二马"的有利态势。8月21日，彭德怀指挥所部主力向兰州发起进攻。由于该城三面环山，北依黄河，南山为天然屏障，守敌工事复杂坚固，又因第一野战军长途行军月余，思想轻敌，准备不足，故激战竟日受阻。彭德怀当机立断，命令各部停止攻击，总结经验教训。25日晨对兰州南山再次发起总攻，鏖战至黄昏，打垮了马步芳部数十次反扑，先后攻占狗娃山、沈家岭、营盘岭、马家山等主要高地。至26日，敌除一部在逃向西宁途中溃散外，其余全部被歼。甘肃省会兰州宣告解放。兰州解放后，第一兵团继续西进，相继攻占民和、甘都，化隆等地。9月2日，马步芳窜逃广州，残部纷纷投降。9月5日第一野战军解放青海省会西宁，基本歼灭马步芳集团。兰州战役后，9月2日，第十九兵团之第六十三军、第六十四军，从兰州、定西分路向银川挺进。15日，第十九兵团主力先后解放靖远、同心、中坚等地，歼敌两个团。18日，防守中坚的敌第八十一军举行起义。19日至21日，第十九兵团主力分别攻占青铜峡、金积、灵武，歼敌第十一军一部，敌一个师投降。第一野战军乘胜西渡黄河，直捣银川。敌总指挥马敦静乘飞机逃往重庆。23日，第一二八军卢志良军长率部投诚。第一野战军第十九兵团进驻宁夏首府银川，宁夏遂告解放。是役，歼敌4.19万人，结束了马鸿逵家族对宁夏长达数十年的封建统治。9月4日，第一野战军第二兵团及第二军分两路，沿河西走廊猛追向张掖、玉门逃窜的西北军政长官公署残部及第九十一军、第一二〇军等部。9月28日，第一野战军胜利到达安西，河西走廊追歼战结束。第一野战军在西北的攻势迅速获得胜利。9月新疆和平解放。至此，大西北5省全部解放。　（林健柏）

程潜、陈明仁湖南起义

1949年8月5日，国民党湖南省政府主席程潜和国民党第一兵团司令兼长沙绥靖公署副主任陈明仁在长沙率部起义。

1949年4月20日，南京国民党政府拒绝在《国内和平协定（最后修正案）》上签字。人民解放军发动了渡江战役。23日解放了南京，宣告国民党22年反动统治的灭亡。5月16、17两日，武汉3镇相继解放。白崇禧所部20余万人窜逃湖南，并将华中军政长官公署迁衡阳，指挥所设在长沙，企图控制湖南。人民解放军解放武汉后，兵分3路挥戈南下，追击逃敌，直逼湖南。这时，中共湖南省工作委员会（简称工委）为争取程潜、陈明仁起义，做了大量工作。1949年6月，省工委动员程潜、陈明仁（1903—1974，湖南醴陵人）写个"起义备忘录"。他们在文中表示，一俟时机成熟，谋致湖南局部和平。"起义备忘录"经中共中央华中局转送中共中央和毛泽东。7月4日，毛泽东复电程潜、陈明仁："先生决心采取反蒋反桂及和平解决湖南问题之方针极为慰佩。""请先生派员至汉与林将军会面商定军事小组联合机构及军事处置诸项。"7月21日，陈明仁接到白崇禧的命令，要死守长沙；如守不住可撤往湘西另作他图。这时，程潜因白崇禧所逼离长沙前往邵阳，委陈明仁代理省政府主席。白崇禧为拉拢陈明仁，建议广州国民党政府正式任命他为湖南省政府主席。接着，长沙绥靖公署撤销，成立湖南省绥靖总司令部，陈明仁被任命为总司令兼省保安司令。为安定民心，陈明仁对记者发表谈话说："我决不在长沙城作战，我保证在长沙城听不到炮声，甚至听不到枪声。"7月26日，陈明仁通知程潜速回长沙会晤。7月30日，陈明仁得到白崇禧电告："程潜率带武装人员潜返长沙，图谋不轨，着即缴除护卫武装，实行兵谏，迫其去广州就任考试院长。"他敷衍过去。这时，第四野战军接连解放了平江、浏阳、岳阳、临澧、津市、常德、醴陵等地，长沙处于3面包围之中。第四野战军派出以金明为首席代表，唐天际、袁志远、解沛然、李明灏为代表的和谈代表团到达平江县城。湖南当局委托李君九、程星龄前往平江，邀请李明灏来长沙商谈有关具体事宜。8月1日，程潜以个人名义发出和平通电。8月4日，程潜、陈明仁领衔发表湖南"和平起义通电"，宣布正式脱离"广州政府"，接受中共中央、毛泽东主席提出的国内和平协定"八条"。决定即日成立湖南人民临时军政委员会，推定陈明仁为湖南省政府临时主席。5日，毛泽东主席、朱德总司令复电同意。下午，解放军先头部队第一三八师举行入城仪式，10余万市民夹道欢迎，庆祝长沙和平解放。自10月1日起，将起义部队番号正式改为"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二十一兵团"。　（林健柏）

评美国白皮书

1949年8、9月间，毛泽东为新华社写了5篇对美国国务院的《美国与中国关系》白皮书的评论。

1949年8月5日美国国务院发表题为《美国与中国的关系》的白皮书，并把国务卿艾奇逊7月30日写给杜鲁门的信作为该书的序言一并发表。白皮书的正文分为8章，叙述从1844年美国强迫中国签订《望厦条约》以来，直至1949年中国人民革命在全国范围内取得基本胜利时为止的中美关系。白皮书特别详细地叙述了抗日战争末期至1949年间，美国实施扶蒋反共政策，千方百计地反对中国人民，结果遭到失败的经过。白皮书是一部美国对华政策失败的记录和辩护书。8月12日，新华社发表题为《无可奈何的供状》的评论。8月14日至9月16日，毛泽东为新华社写了《丢掉幻想，准备斗争》、《别了，司徒雷登》、《为什么要讨论白皮书?》、《友谊，还是侵略?》、《唯心历史观的破产》等5篇评论。这些评论揭露了美国政府对华政策的侵略本质及其对中国人民根深蒂固的仇恨。同时批评存在于一部分人中间的对于帝国主义的不切实际的幻想，号召他们“丢掉幻想，准备斗争”。毛泽东写道：“我们说‘帝国主义是很凶恶的’，就是说它的本性是不能改变的，帝国主义分子决不肯放下屠刀，他们也决不能成佛，直至他们的灭亡。”“希望劝说帝国主义者和中国反动派发出善心，回头是岸，是不可能的。唯一的办法是组织力量和他们斗争，例如我们的人民解放战争，土地革命，揭露帝国主义，‘刺激’他们，把他们打倒，制裁他们的犯法行为，‘只许他们规规矩矩，不许他们乱说乱动’。然后，才有希望在平等和互利的条件下和外国帝国主义国家打交道。”这些评论还说明了中国近代革命发生及其胜利的原因。指出艾奇逊歪曲中国近代史，从历史唯心主义出发把中国革命发生的原因归之为“人口过多”人多饭少和西方的影响。我们认为，中国革命是由于民族侵略和阶级压迫所导致的。是由于马克思列宁主义传入中国，成立了无产阶级政党，领导中国革命取胜的。这些评论引起了全国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各报社、各学校以及各界人士的注意和讨论。8月23日，中国民主同盟发表《对美帝白皮书的斥责》一文，指出一百年来美帝不断侵略中国，特别是从1944年以来更是变本加厉。在这5年中赫尔利、马歇尔、魏德迈先后来华，司徒雷登做大使，他们共同的使命，就是要紧紧地控制中国，使其变为美帝殖民地。艾奇逊所谓鼓动“民主个人主义”者来推翻“外来制度”(指无产阶级专政)，就是另找奴才、以华乱华的阴谋。这些评论和讨论对于提高中国人民对帝国主义和中国革命的认识起了积极的作用。 (林健柏)

衡宝战役

1949年9月13日至10月16日人民解放军第四野战军在湖南衡阳和宝庆(邵阳)为中心的湘南地区，歼灭白崇禧集团的战役。

1949年8月长沙和平解放后，国民党华中军政长官公署长官白崇禧所部撤退到以衡阳、宝庆为中心的湘南地区，总兵力5个兵团11个军共20余万人。当时，蒋介石集团在中南地区还有驻守粤北乐昌的余汉谋(国民党广州“绥靖”公署主任)集团15万人，驻守鄂西的宋希濂(国民党川湘鄂“绥靖”公署主任)集团约10万人。白崇禧企图依托湘江、永乐江、资水，背靠云南、广西、贵州，构成一条东起粤北的乐昌与余汉谋集团相衔接，西至湘西的芷江与川湘鄂绥靖公署宋希濂集团相呼应的半弦形“湘粤联合防线”，阻止解放军南进。7月16日，中共中央军委指出：白崇禧部本钱小，极机灵，非万不得已决不会和我作战。因此，对白部作战，应采取远距离包围迂回方法，以掌握主动，即完全不理白部的临时部署而远远地超过他，占领他的后方，迫其最后不得不和我作战。第四野战军司令员林彪、第二政治委员邓子恢指挥第十二兵团、第十三兵团、第十五兵团和第二野战军第四兵团等部约40万人，分成东、西、中3路，于9月中、下旬开始向华南进军，以求歼白崇禧、余汉谋两个集团，解放广东、广西。10月2日，以第十三兵团主力组成的西路军和以第四兵团与第十五兵团组成的东路军，分别占领芷江、粤北，从两翼突破了敌“湘粤联合防线”，切断了白崇禧集团退黔道路。同日，以第十二兵团组成的中路军向衡阳、宝庆(邵阳)地区发起攻击，并在永丰(双峰县)东西两侧突破白崇禧部第一阵地。同时，以一部兵力向敌后穿插，防敌南逃。此时，白崇禧尚未判明第四野战军行动，决定以主力集结衡宝间待援。鉴于敌人企图与第四野战军决战于衡宝地区，林彪、邓子恢即令衡宝公路以北各部就地集结，令西路军主力由黔阳、芷江东进宝庆、祁阳地区，准备与敌会战。10月5日下午，中路军一部插入衡宝公路以南之灵官殿地区；东路军逼近曲江(韶关市)。白崇禧发现第四野战军两翼迂回部队，遂令所部全线向广西方向撤退。第四野战军跟踪追击，战至11日，将白崇禧部精锐主力第七军和

第四十八军大部围歼于祁阳以北地区。与此同时，西路军主力10日攻占武冈，13日在右下江地区歼逃敌第六十二师。16日，留在湘西的第四十七军乘胜歼灭宋希濂部第一二二军大部，解放大庸、桑植。战役至此结束。是役，第四野战军计歼敌第七军军部、第一〇〇军军部、第一二二军军部、第六十二师、第一七一师、第一七二师等总计4.7万余人，解放了湘南、湘西大部地区，为进军广西消灭白崇禧残部创造了有利条件。（林健柏）

董其武绥远起义

1949年9月19日，国民党绥远省政府主席董其武等率部4万余人起义。

绥远（内蒙古自治区的西部）是傅作义经营多年的基地，属国民党华北"剿总"管辖。但当时国民党只控制着归绥（呼和浩特）以西地区；绥东是解放区。绥远国民党军队的主要将领多系傅作义的旧属。国民党绥远省政府主席、华北"剿总"驻归绥部队指挥所主任董其武（1899—1989，山西河津人）与傅作义共职二三十年，交谊甚厚。董其武对蒋介石的独裁统治，排除异己，消极抗日，积极反共，有过不满，对中国共产党的统一战线政策也极为关注。在中国人民解放军发动平津战役后，绥西一带的国民党军队已成华北地区的孤军，处于想逃无路、欲战无力的情况。北平和平解放，在该敌内部引起震动。1949年1月22日，董其武飞抵北平，谒见傅作义，明确表示要追随傅作义走和平道路。傅作义告诉他："绥远问题等我见到毛泽东之后再定。"2月23日，毛泽东在河北省平山县西柏坡接见傅作义、邓宝珊时，提出了"绥远方式"，即两军划一分界线，维持现状，让董其武做好内部工作，待条件成熟时起义。3月23日，毛泽东在中国共产党七届二中全会报告中，进一步阐述了"绥远方式"，就是有意保留一部分国民党军队，作暂时的让步，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以后，再去按照人民解放军的制度，将这部分军队改编为人民解放军。遵照毛泽东提出的方针原则，中共与傅作义代表在北平举行了谈判。中共代表有：晋绥军区政委李井泉、中共绥蒙区委城工部部长潘纪文等。傅方代表有：原华北"剿总"政训处处长王克俊、原绥远省政府厅长周北峰、原《奋斗日报》社社长阎又文。经双方多次商谈，于1949年4月下旬，拟定了《绥远和平协议》草案，其主要内容是：停止敌对行动，划定人民解放军和绥远董其武部队的临时分界线，恢复平绥铁路与通邮通电；恢复商业贸易往来、文化交流及双方货币兑换办法等。并指派联络处驻归绥，协同执行协议上的各项条款和过渡的有关事项。董其武接到"协议"草案后，召集军队和地方首脑征求对草案的意见，经过董其武做工作，除对草案中个别地方修改外，同意"协议"条款。6月8日，双方正式签订《绥远和平协议》。为使"协议"顺利推行，实现绥远起义，董其武采取了许多具体措施。如设立督训处，以整顿部队纪律，协助警备司令部镇压匪徒的抢劫，以及惩办贩毒犯和吸毒犯，维持地方治安。对在绥远的中统、军统等特务组织，一律取消其合法活动的权利，号召他们坦白登记，并集中了100多名特务骨干分子，在革新学院集训，促使其改过自新，以减少特务的破坏，分化瓦解特务组织。这些措施，为绥远走向和平道路做了准备。

正当绥远方面准备起义时，国民党政府一方面贿赂同蒋介石集团有密切来往的第十一兵团和第一一一军的某些将领，允诺单独供应枪支、弹药和军饷，令他们掌握和控制绥远局势，拖住董其武的部队，阻止绥远起义，并希望将部队拉到"后套"（包头以西的绥西地区）。另一方面加紧拉拢和威胁董其武。蒋介石曾多次致电董其武要他放弃归绥，撤到包头以西，靠拢宁夏，坚持同共产党对抗。国民党政府逃到广州后，6月间，又密电董其武赴广州参加会议。这些拉拢活动均遭董其武拒绝。7月中旬，国民党政府又派军令部长徐永昌和空军总司令王叔铭飞抵绥西陕坝（杭锦后旗），发表董其武为西北军政副长官，孙兰峰、刘万春为第九兵团正副司令官。并令董其武将部队交第九兵团指挥，向西撤退。董其武以部队欠饷几个月，又以士兵多是当地人为由拖住部队，抵制了徐、王的阴谋。1949年8月24日，受毛泽东、周恩来的委托，傅作义、邓宝珊赴绥远促成起义早日实现，薄一波负责从华北人民银行拨款10万银元，供傅作义慰劳将士之用。9月10日，傅作义在包头召集绥远军、师、旅级军官和政府官员、地方士绅，共商绥远起义问题。消息传出后，国民党特务头子毛人凤密电潜伏特务刺杀傅作义。徐永昌携带蒋介石、李宗仁、阎锡山的亲笔信，于9月15日飞来包头，用威胁恫吓和封官晋爵的许诺，游说傅作义、董其武，被他们拒绝。经过多方努力，排除种种困难，9月19日，董其武率领绥远军政各族各界代表39人，及1个兵团部、16个师（旅）签署通电起义，宣布正式脱离蒋介石、李宗仁、阎锡山等反动派残余集团，坚决走到人民方面来。并致电毛泽东、朱德、聂荣臻和薄一波。9月20日，毛泽东、朱德复电董其武说：看了

你们 9 月 19 日的声明，你们的立场是正确的。自从傅作义将军领导北平和平解放后，人民表示欢迎，反动派表示反对。反动派还企图破坏绥远军民和平解放的努力，但是终归失败。你们已经率部起义，脱离反动派，站在人民方面了。希望你们团结一致，力求进步，改革旧制度，实行新政策，为建设人民的新绥远而奋斗。

董其武起义后，毛泽东指示，绥远不再用军管形式，要成立军政委员会，由傅作义任主席，并指示绥远人民政府和绥远军区，与董其武的绥远政府和保安司令部，实行合并、合作。后来，中央人民政府任命傅作义为绥远省军政委员会主席、绥远省军区司令员；任命董其武为绥远省军政委员会副主席、绥远省政府主席、绥远省军区副司令员。　（林健柏）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召开

1949 年 9 月 21 日至 30 日在北平召开的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

1948 年 5 月 1 日，中共在纪念国际劳动节的口号中，发出召开新的政治协商会议、讨论成立民主联合政府的号召。这一号召迅速得到各民主党派、无党派民主人士、各人民团体及爱国华侨的热烈响应。5 月 5 日，各民主党派领导人与无党派民主人士郭沫若等，向国内外各报馆各团体及全国同胞发出通电，并致电中共中央毛泽东，认为中共发出迅速召开政治协商会议、成立民主联合政府的号召，符合人民要求和同人等的主张，对国家民族前途至为重要，表示积极响应。从 8 月开始，各民主党派和无党派民主人士的代表人物，应中共中央的邀请，来到东北解放区首府哈尔滨。11 月 25 日，他们与中共代表就成立政治协商会议筹备会及政协的性质、任务等问题进行协商，获得了共同的协议。1949 年 2 月 25 日，李济深、沈钧儒等 35 人由东北到达北平。经过中共与各民主党派、各界人士的充分协商，新政治协商会议筹备会由中国共产党和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无党派民主人士、国内少数民族和海外华侨等 23 个单位，134 人组成。6 月 15 日至 19 日，在北平中南海勤政殿举行新政协筹备会第一次全体会议。会议通过了《新政治协商会议筹备会组织条例》和《关于参加新政治协商会议的单位及其代表名额的规定》，选出了筹备会常务委员会委员 21 人，负责办理经常工作。毛泽东为常委会主任，周恩来、李济深、沈钧儒、郭沫若、陈叔通为副主任，李维汉为秘书长。9 月 21 日，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在中南海怀仁堂隆重开幕。出席会议的有中国共产党、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各地区、中国人民解放军、各少数民族、国外华侨及其他爱国分子的代表共 662 人。毛泽东在会上致开幕词。他说，在三年多的时间内，全国人民团结起来，以人民解放战争和人民大革命打倒了内外压迫者，宣布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我们的民族将从此列入爱好和平自由的世界各民族的大家庭，以勇敢而勤劳的姿态工作着，创造自己的文明和幸福，同时也促进世界的和平和自由。我们的民族将再也不是一个被人侮辱的民族了，我们已经站起来了。”9 月 27 日，会议一致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国都定于北平，自即日起改名为北京；中华人民共和国采用公元纪年，当年为 1949 年；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国歌未正式制定前，以田汉作词、聂耳作曲的《义勇军进行曲》为代国歌；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国旗为五星红旗，象征中国革命的人民大团结。9 月 29 日会议通过了《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组织法》、《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组织法》。《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规定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国家性质是人民民主专政，“是以工人阶级、农民阶级、小资产阶级、民族资产阶级及其他爱国民主分子的人民民主统一战线的政权，而以工农联盟为基础，以工人阶级为领导”。工人阶级（通过共产党）在国家一切生活中都要起领导作用。这就从根本上保证了我国必将从新民主主义向社会主义过渡，使我国成为一个伟大的社会主义国家。同时为新中国的政治机关、军事制度、经济政策、文教政策、民族政策和外交政策制定了总原则。《共同纲领》是在中国宪法尚未正式颁布前，起着临时宪法的作用。《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组织法》规定了同我国人民民主专政的国家性质相适应的政权形式，实行民主集中制原则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即人民行使国家政权的机关为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和各级人民政府。各级人民代表大会由人民用普选方法产生。9 月 30 日，大会选举毛泽东为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主席，周恩来、李济深、沈钧儒、郭沫若、陈叔通为副主席。选举刘少奇、林伯渠、董必武、陈云、彭真等 180 人为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委员会委员。选举毛泽东为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主席，朱德、刘少奇、宋庆龄、李济深、张澜、高岗为副主席。选举陈毅等 56 人为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委员。大会一致通过了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宣言。宣言指出，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已胜利地完成了自

己的任务。这次会议代表了全国人民的意志，表现了全国人民的空前的大团结。它是中国人民和人民解放军在中共领导下，经过长期的英勇斗争，战胜了美帝国主义援助的国民党反动政府所获得的。下午6时，全体代表来到天安门广场举行人民英雄纪念碑奠基典礼。礼成，大会在毛泽东的主持下举行闭幕式。朱德致闭幕词，指出：在整个会议期间，我们全体代表始终团结一致，和衷共济。这是我们国家兴旺发达的气象。我们既然能够团结一致，开创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我们就一定能够团结一致把我们的国家建设好，把我们的国家引导到繁荣昌盛的境地。

（林健柏）

新疆和平解放

1949年9月25日和26日，国民党新疆省警备总司令陶峙岳、新疆省政府主席包尔汉率新疆军政人员通电起义。

1949年4月，国民党政府拒绝在《国内和平协定》签字后，周恩来派和中共有联系的迪化市（乌鲁木齐）市长屈武到新疆做上层人士的工作。8月18日，毛泽东以新政治协商会议筹备会主任名义写信给阿合买提江，指出：随着西北人民解放战争的胜利发展，新疆全部解放已为期不远。衷心地欢迎你们派出自己的代表前来参加全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的全体会议。接着，中共中央又派邓力群到伊犁同三区革命政府领导人进行接触，并秘密到迪化会见包尔汉、刘孟纯、屈武、刘泽荣、陶峙岳等新疆军政领导人。邓力群向他们阐明中共中央和平解放新疆问题的主张。8月，新疆军政长官公署秘书长兼省政府秘书长刘孟纯、新疆省警备总司令部参谋长陶晋初、迪化市市长屈武、驻新疆外交特派员刘泽荣、总部政工处长梁客博等向有关方面进行联系，准备发动起义。这时，马步芳接任国民党西北军政长官职务，指使其嫡系骑兵第一师师长马呈祥和胡宗南系的第七十八师师长叶成等，阴谋逮捕刘孟纯、陶晋初、屈武，胁走陶峙岳。这时，西北野战军进军河西走廊，兵临玉门关，进叩新疆大门。驻新疆的8万国民党军队，外有解放军重兵压境，内有三区民族军的威胁，进退维谷，已成瓮中之鳖。9月25日，陶峙岳率部发出起义通电，宣布"自即日起与广州政府断绝关系，竭诚接受毛主席的八项和平声明与国内和平协定。全军驻守原防，维持地方秩序，听候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及人民解放军总部之命令"。26日，以包尔汉为首的新疆省政府，也通电宣布接受即将成立的中央人民政府的领导。10月20日，中国人民解放军进驻迪化，新疆宣告和平解放。至此，西北地区全部解放。23日，毛泽东电复包尔汉、陶峙岳，指出：你们的立场是正确的，是符合全国人民的愿望的。希望你们团结军政人员，维护民族团结和地方秩序，并和准备出关的人民解放军合作，废除旧制度，为建立新新疆而奋斗！

新疆和平解放后，起义的国民党驻军被改编为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二十二兵团。三区民族军被编为人民解放军新五军。新疆解放后，建立了以包尔汉为主席，高锦纯、赛福鼎为副主席的省人民政府。

（林健柏）

广州和海南岛的解放

1949年10月开始，人民解放军第二野战军第四兵团和第四野战军第十五兵团等部，追击广东境内的国民党军的战役。

1949年4月下旬，国民党政府由南京迁到广州。8月，解放军进占江西，准备进军广东。国民党华南军政长官余汉谋以7个军梯次配置在曲江（韶关市）至广州铁路沿线，2个军驻守潮安、汕头地区，1个军驻湛江，企图阻止解放军入粤。9月底，第四野战军第四、第十五兵团和两广纵队共22万多人，由第四兵团司令员兼政治委员陈赓指挥，集结湘赣边境地区，分3路向广东进军。10月初，解放军先后占领曲江、翁源、和平、河源等地。粤北守军败退广州。解放军乘胜急追，在佛冈、花县、英德、清远、增城等县城歼灭守军一部。此时国民党政府仓皇迁往重庆，余汉谋部主力向粤西溃退。14日夜，第十五兵团解放广州，两广纵队和粤赣湘边纵队进至珠江三角洲地区。15日，第四兵团在粤中纵队配合下分3路向粤西追击。至24日将国民党军第二十一兵团部及4个军的残部共4万多人包围于阳江地区。于26日将其全歼。至11月4日，先后占领了罗定、信宜、廉江等地，切断了广西白崇禧部向海南岛的退路。此时，驻潮安、汕头之国民党军已由海上逃跑，闽粤赣边纵队随即解放潮汕地区。接着，中国人民解放军第四野战军一部，对海南岛国民党守军进行了渡海登陆作战。人民解放军第四十、第四十三军军部共10万多人，组成渡海作战兵团，和岛上琼崖纵队约1.5万人，统由第十五兵团司令员邓华、政治委员赖传珠指挥。1949年12月底，兵团部队进至雷州半岛及其两侧沿海地区。1950年3月5日至11日，登陆兵团组织2个加强营，利用夜暗及有利的风向、潮汐，分别在岛上国民党守备薄弱的琼西北白马井、琼东北赤

水港偷渡登陆。4月16日傍晚，登陆兵团主力第一梯队第四十军6个团，第四十三军2个团，乘350只木帆船分左右两路从正面强渡海峡，歼灭国民党军3.3万多人，其余大部从海上逃跑。人民解放军开创了陆军乘木帆船大规模渡海作战、摧毁敌立体防御的先例，为解放沿海岛屿作战提供了经验。

（林健柏）

中华人民共和国开国大典

1949年10月1日，北京30万群众在天安门广场集会，隆重举行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的典礼。

1949年10月1日下午2时，毛泽东主持召开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第一次会议，一致决议接受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为政府施政方针；推举林伯渠为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秘书长；任命周恩来为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总理兼外交部长，董必武、陈云、郭沫若、黄炎培为副总理。毛泽东为中央人民政府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朱德（兼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司令）、刘少奇、周恩来、彭德怀、程潜为副主席；沈钧儒为中央人民政府最高人民法院院长，罗荣桓为中央人民政府最高人民检察署检察长。下午3时，首都北京30万军民在天安门广场集会，隆重举行开国大典。毛泽东按动电钮升起了新中国第一面五星红旗，并宣读了中央人民政府公告，向全世界庄严宣告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公告说，本政府为代表中华人民共和国全国人民的唯一合法政府。凡愿遵守平等、互利及互相尊重领土主权等项原则的任何外国政府，本政府均愿与之建立外交关系。接着，举行了长达3小时的阅兵式。朱德宣读了中国人民解放军总部命令。命令人民解放军迅速肃清国民党反动军队的残余，解放一切尚未解放的领土，完成统一祖国大业。同时肃清土匪和其他一切反革命匪徒，镇压他们的一切反抗和捣乱行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在中国历史上开辟了一个新的时代。它标志着中国已从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进入了新民主主义社会，开始了向社会主义社会过渡的时期。

（林健柏）

解放大西南

1949年11月起，人民解放军第二野战军在第一、第四野战军配合下，解放大西南的战役。

人民解放军解放湘、粤等省和进军西北后，国民党军川陕甘边区绥靖公署主任胡宗南和川湘鄂绥靖公署主任宋希濂率部分别退踞秦岭以南及川鄂边地区，企图凭借西南一隅进行顽抗。中共中央军委和毛泽东根据西南地理情况和敌人力避与人民解放军决战的特点，于1949年5月23日至10月19日，先后就进军西南的作战方针和部署等作了一系列指示，指出："胡宗南全军正向四川撤退，并有向昆明撤退消息。蒋介石、何应钦及桂系正在做建都重庆割据西南的梦，而欲消灭胡军及川康诸敌，非从南面进军断其退路不可"；应"取大迂回动作，插至敌后，先完成包围，然后再回打之方针"。7月16日，中共中央和中央军委进一步规定："陈赓之三个军则于完成广西作战后出昆明，以占领并经营云南为目标"；"由刘、邓、贺等同志组成西南局，经营川、滇、黔、康四省"。10月13日，中共中央、中央军委又指示：西南局的分工是：邓小平、刘伯承、贺龙分别任第一、第二、第三书记，贺龙任西南军区司令员，邓小平任政治委员，刘伯承任西南军政委员会主任，经营滇、黔、川、康及西藏。

11月初，第二野战军第五、第三兵团和第四野战军第四十二、第四十七、第五十军等部，在南起贵州天柱、北至湖北巴东约500公里的地段上向敌实施多路攻击。贵州境内之敌第十九兵团和位于湘鄂西地区的宋希濂部猝不及防，慌忙西撤。担任战略迂回任务的第五兵团和第十军，立即西出施秉、石阡，于15日解放贵州省会贵阳。21日解放遵义，从而拦腰切断敌人的西南防线，对川境敌军向滇、黔的退路构成了巨大威胁。与此同时，第四野战军第四十二军等部在第三兵团主力协同下，也由鄂西和湘西沿川鄂、川湘公路进军四川，宋希濂部连丢湖北省建始、恩施、宣恩，退守四川彭水，企图依托贵州乌江顽抗。此时，在重庆坐镇的蒋介石始察觉人民解放军由鄂、湘西进川、黔迂回重庆、成都的意图，急令胡宗南集团由秦岭、大巴山南撤入川，并以其第一军东运重庆增援；令第十五兵团及宋希濂部第二十兵团在南川及其以东布防，迟滞人民解放军前进，掩护胡宗南部退却。在胡部开始南撤、川东之敌即将西逃的新情况下，第二野战军前委认为："当前的战役重心仍在隔断宋希濂四个军、罗广文之三个军向云南的退却，并力求在长江南岸歼灭之。"11月21日命令第五兵团除以第十七军留置贵州担任接管等任务外，兵团主力和第十军迅速经黔西北迂回泸州、宜宾一带，强调必须确实计算行程与时间（包括战斗），求得先敌占领土城、叙永等地，争取主动；令第三兵团主力立即强渡乌江，进至南川地区，力争围歼宋希濂部和罗广文兵团于长江南岸。25日和27日，中央军委先后决

定：第五十军、第四十七军和第四十二军一部暂归第二野战军指挥，参加入川作战；第一野战军第十八兵团改归第二野战军指挥。11 月 28 日，第三兵团主力和第四十七军将宋希濂部和罗广文部 3 万余人歼灭于南川以北山区，并乘胜在重庆外围歼灭向重庆增援的胡宗南部第一军一部。29 日晚，蒋介石及"国民政府"由重庆逃往成都。1949 年 11 月 30 日，第二野战军解放重庆。

在加强军事打击的同时，第二野战军司令员刘伯承、政治委员邓小平于 11 月 21 日向西南地区国民党军政人员发出忠告，号召他们接受"约法八章"，停止抵抗，听候改编，保护公共财产，维持地方秩序。12 月 9 日，国民党云南省政府主席兼云南绥署主任卢汉（1896—1974，云南人）、西康省政府主席刘文辉（1895—1976，四川人）、西南军政长官公署副长官邓锡侯（1889—1964，四川人）、潘文华（1886—1950，四川人）率部分别于昆明、雅安、彭县等地通电起义，云南、西康宣告和平解放。同时，敌刚组成的第二十二兵团司令郭汝瑰率领所属第七十二军于宜宾宣布起义。

1949 年 12 月上旬，胡宗南集团和四川境内国民党军残部，在第二野战军的追击和迂回包围下，纷纷猬集成都地区，并在西昌设立总指挥部。10 日，蒋介石及"国民政府"逃往台湾。20 日，第二野战军主力前出至简阳、乐山、邛崃等地，从东、南、西 3 面逼近成都。同时，第十八兵团在秦岭地区完成了抑留胡宗南部任务后，乘胡部南撤时，分路追击，并迅速前出江油、绵阳、巴中一线。数十万国民党军队便被包围在成都附近地区。此时，敌内部极度恐慌，军心动摇。21 日，敌川陕绥靖公署副主任董宗珩率第十六兵团在四川金堂起义。24 日，敌第十五兵团司令官罗广文、第二十兵团司令官陈克非率残部也在彭县起义。25 日，敌第七兵团司令官裴昌会（1896—　山东人）率部在四川德阳起义。拒绝投降的第五兵团司令官李文纠集残部突围，于 26 日大部被歼，李文被俘。27 日，敌第十八兵团李振部在成都以东地区起义。30 日，贺龙率第十八兵团一部进驻成都。胡宗南逃往西昌。12 月下旬，逃至黔西的敌第十九兵团残部，在副司令王伯勋率领下，在贵州普安盘县地区起义，贵州全省宣告解放。1950 年 3 月 12日，第二野战军一部发起昌都战役。至 4 月 7 日，解放昌都，打开了进军西藏的大门。至此，云、贵、川、康 4 省全部解放。共歼敌 90 万余人。1951 年 5 月 23 日，和平解放西藏。人民解放军解放大西南，粉碎了蒋介石妄图在西南凭险顽抗、割据一隅的迷梦。　（林健柏）

附　录

历史人物索引

说明　1. 本索引按笔画顺序排列

2. 凡属同名同姓者则在括号内注明朝代以示区别

四 画

〔一〕

五 画

〔一〕

〔丨〕

六 画

〔一〕

七　画

〔一〕

八　画

〔一〕

〔丨〕

九　画

〔一〕

〔丨〕

〔丿〕

〔丶〕

十 画

〔一〕

〔乛〕

十一画

〔一〕

十二画

〔一〕

十四画

〔一〕

十五画

〔一〕

〔丨〕

〔丿〕

〔丶〕

〔丿〕

十八画

〔一〕

〔丨〕

〔丿〕

十九～二十四画